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下)

水陆洲 编辑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下) 目录

| | |
|---------------------|-----|
|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 4 |
| 第一节 杨余傅事件 | 4 |
|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 108 |
| 第三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167 |
| 第四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 484 |
| 第五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597 |
| 第六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687 |
| 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715 |
| 第八节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843 |
|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 908 |

| | | |
|-----|----------------------|------|
| 第一节 |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 908 |
| 第二节 |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1433 |
| 第三节 |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1799 |
| 第四节 |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 1869 |
| 第五节 |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 2177 |
| 第六节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 2217 |
| 第八章 |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 2341 |
| 第一节 | 全国山河一片红----- | 2341 |
| 第二节 |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 2496 |
| 第三节 |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2621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一节 杨余傅事件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1968.03.22；中发〔68〕52号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1968. 3. 22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1968. 03. 22；中发 [68] 53 号

根据毛主席、林彪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为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林彪讲话的指示

毛主席今天同我讲了，他说：讲讲马克思主义。他说讲了山头主义以外，讲了两面派以外，讲讲马克思主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凌晨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东兴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的十四级以上党员干部，并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五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到会同志，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欢呼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最后全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国际歌》。

林副主席：

同志们！（鼓掌）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

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热烈鼓掌。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鼓掌。姚文元：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鼓掌）（呼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发展总是通过矛盾的斗争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不是很稀奇事情。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能消除矛盾，永远也躲避不开矛盾的，而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另一方面，当然尽量的、尽量的能够不变为严重的矛盾，使他不成为严重的情况。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更多地能够好好地工作。这一个愿望过去、现在都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是一贯的对干部关心。我们大家都是有着这种心情，希望不要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的事。这是我们的心情，是我们的愿望。可是客观的规律，它总是矛盾的，它总要出事情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只有面对着客观，面对着现实，不隐藏矛盾，揭露矛盾来解决矛盾。脓疮只好让它探头，纸里面火总是包不住。因此我们只有面对现实，来解决它。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派性，这些是属于同类的东西，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它是同类，名词不同，意思也略有出入，范围也略有差别，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同共产党的党性是不相容的，同党的团结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产主义、反党的，破坏团结的。这种思想增长一分，共产

主义就减少一分，党的团结就减少一分，我们的力量就瓦解一分。而我们要想加强共产主义，加强党性，加强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的团结，就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派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群众呼口号。姚文元：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野心家！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共产主义同这一切落后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这一切落后的思想是尖锐的、直接的对立。这种落后的思想多一分，进步的思想就少一分。这种落后的思想多一分，我们的事业就受损害大一些。整个的共产主义可以概括为破私立公，共产主义的理论很多、很多，但是基本上概括为立公破私。而这些落后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根本相反的，这种思想就一定引起各种各样的落后的行为，叛党的行为，叛变的行为，损害革命的行为。有的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有的这种可能性隐藏着还没变为现实。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个同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的战争的胜利，就是最后的这个时期是几个野战军嘛，四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四野嘛！晋察冀也是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它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他还有三个分区。再拿老底子讲，晋察冀军区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就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放下了只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这个地方。至于后来四个野战军呢，有的有晋察冀的，有的没有晋察冀的，有的有一分区的，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其他的就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的一套啊，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拉掉，就把谢富治拉掉，把许世友拉掉，韩先楚拉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的。所以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作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作法。

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等，在历史上历来是给我们党的事业起破坏作用的。凡是这种东西泛滥的时候，抬头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受损失。凡是毛主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优势的时候，我们的战斗力就加强，我们的力量就大。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党的利益，所以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思潮，反对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垮了；

王明一个教条宗派垮了；刘少奇一个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水泼不进的北京市这一摊子也垮了；贺龙在去年八月以后展开全军的大夺权、打倒一切，就是用他们一伙子或者被他们拉过去的人，结果他也垮了；邓小平把持书记处，想搞独立王国，主席一再批评、点名，他不改正，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头一条不利于公，其次对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因为共产主义大公、党性，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无产阶级特有的，而为任何阶级所没有的，独特的一种政治品质。别的阶级恰恰与这个原则相反。而我们哪！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共产主义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因此，我们不能采取落后的思想，所以我们主席历来反对这东西。这种山头主义，实际上是放大的个人主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表面上他顾他那一伙，实际上他是个人主义，利用那一伙。山头主义就会把我们党的政权、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变为一个宗派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警惕避免这种错误。（江青：打倒个人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阴谋家！）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这种山头主义，反对杨成武的这种山头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两点：一点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杨成武，而变成反杨成武底下的一切人，认识他的人，同他工作过的人和拥护他的人。这种一起工作、认识、拥护，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由个人选择的，并且他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毛主席的招牌，人家也不容易认识他这种个人野心是很容易蒙蔽人的。所以我们继续相信那些参加革命，过去在他底下作过工作的所有的同志，除非是把这个问题已经讲清楚了，还不同他划清界限，还跟他走，只有这种人，我们不能信任。经过打了招呼之后，能够摆脱与他的关系，站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站在毛主席的司令部来，这种人我们是一百个放心来信任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打击这些与他同过事和拥护他的人，而观察他今后是不是还思想不能接受中央的这个决定，还拥护他，这种人我们就不能信任。（江青：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

以及还有其它些地方，工程兵的权。我一下子记不起。但是呢，那一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一个篡军、篡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揭露了很多严重事实。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批判了、撤销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是说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江青：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谢富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姚文元：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再一个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就是这种人。（姚文元：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打倒阴谋家！）刚才这一段的语录，开会前大家已经念过的，是关于两面派的。我现补充念念毛主席关于山头主义的语录：“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他，大家知道的，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当面好象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原来是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所以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作了的事情都不承认，譬如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个事情本来是杨成武命令，擅自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作坏了的事情。（叶群：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执行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

赖帐，他说他没有讲。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哪？就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余立金来夺权，把同余立金的关系搞的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就出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种好意，反而乘着机会来打击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控告的几个人，控告他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了，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侮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本来中央规定不能够在党内搞侦听的，这是一种对阶级敌人的办法。可是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并且甚至于侦察中央文革同志的行动，总理的行动。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去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以后，他要求撤回他的讲话。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所以，他是很标准的人物，政治品质很坏，阳一套，阴一套的人（众呼口号）。表面上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叶群：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迫害！）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问题，因为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别看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江青：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打倒谁！总理：谁反对中央文革打倒谁！谢富治：谁反对江青同志打倒谁！姚文元：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

过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很幸福，

引了一句俗语“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人就反对这句话。可是杨成武对于这种反对这句话的人采取包庇的态度，他说这个不算什么。这是看出他对于主席的作用，主席对于全世界和全中国、我们全党、对于整个的阶级、对于人民的作用是估计不够的。（姚文元：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鼓掌）（叶群：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的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江青：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十一全会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总理、江青等笑），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走走看，行不行哪，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再走走看。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和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的提法，就被他进行隔离反省，拿三个人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的厉害，不归他出名的事情，

他也去争一分。譬如说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来写上。还有那个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既然扣了哪，他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他的事实是可以说很多。山头主义的表现，两面派的表现，以及其他还有许多坏的表现。这是这两天在几个会议中间我零零碎碎听到一些，不全，也不准确，事实上还有很多事实没有揭出来。讲这一部分事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他的政治品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毛主席今天同我讲了，他说讲讲马克思主义。他说讲了山头主义以外，讲了两面派以外，讲讲马克思主义。这是指什么问题呢？是指关于这篇文章里面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绝对权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提的，《人民日报》就宣传开了，大家宣传开了。这种宣传作为对主席信任的态度，一个战士的想法是犹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的语言，那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毛主席在 12 月 7 日批示这样说的：“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绝对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又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绝对真理是存在于相对真理中一样。”这是毛主席去年 12 月间的一个批示。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这样子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也就是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相对和绝对这是一个真理问题上的一对经常用的范畴，一对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是不承认有孤立的绝对，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总是同相对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认识过程就是绝对和相对的矛盾过程，这种矛盾的解决就使我们的认识前进一步，就是向绝对真理前进一步。绝对的东西它

不能孤立的存在,如同任何抽象的概括它离开具体不能单独存在一样。如同一般不能离开个别一样。如同无限不能离开有限一样。如同共性不能离开个性一样。它是不能自成一体的,独立存在的。我们认为有绝对,但是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我们每一个时候的认识都是相对的,这是主要的一面。又如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情况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候的认识,无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是对社会领域里面的认识,无论在思想上对某一原则的认识,都是处在这种相对的状态中,只有通过无数的相对才能一步一步的来接近绝对,可是我们永远只能接近,我们永远也不能完成。只有如果事物是停止了,不变了,不发展了,那么我们反映客观的观念才能成为绝对。可是事物永远在发展着,辩证法也可以说是发展法,是运动法,是变化法。因此我们不能有一种绝对,如果是绝对就把事物看死了,把我们的观念看死了,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范畴,我们的一切原则,都随着事物的变化来变化的,它不是不变的,当然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认识,具有可靠性,我们是也不能否认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就变成相对主义。如果我们把事物看成绝对,把真理看成绝对,这就把事物的运动停止了,把我们的概念运动停止了,僵化了,我们思想再不会前进了,事物再不会向前发展了。如果我们存在这个观念,我们思想就会僵化,我们会把事物看成死的,把概念、把原则、把范畴、把定律都看成死的。不仅是政治上如此,社会如此,就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譬如说水在零度上是液体,百度以上变气体,零度下是固体,这也是要有条件的。你把它拿到最高的山上去,它不到一百度就开了的,因为上面的气压小,空气稀薄,是有条件的。水也不一定在零度就开始结冰,也许零度不能结冰。正如自然科学上一切其它的定律、规律,无论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都是处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自然科学只是现在发展的阶段,而不是永久如此的,事物的发展不仅如此,旧事物还没有什么基本变化,可是我们认识的水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原来没认识的事物,以后会认识了。而原来认识的,中间包含着很多错误的,也经过向前认识也克服了。所以自然科学现在这一切教科书上所列的规律都不是绝对的,将来还有很大的修改,很大的补充,其中包含了很多错误。现在大学、中学所教的东西,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东西,现在还包含着很多没有认识的东西;已经认识的东西,还包含着很多的错误,将来会纠正的,将来会发展的。而这种

自然科学的定律,无论是那个科学部门的,仅仅是由于它是在地球上这种条件的。这种各种数据、各种定律,假如是拿到另一个环境里面,譬如放到月球上去,很多东西要推翻的。譬如放到太阳里面去,高温到达一万度以上,这些很多冰点,沸点,通通都要发生变化。所以这一些真理,一方面是真理,但不是绝对的真理,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不能把它看成是死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所以我们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不停止的,不保守的,是进步的,发展的。只有我们依靠着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一个基本原则的指导,来否认这些定律的绝对性,否认这些定律的僵化,使得我们科学的发展才觉得大有可为,还有很多没有认识到的。而业已作过的结论,有些要被推翻的。我们每一个认识也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任何时候都是二重性的,而不是一重性的,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单纯的相对的。它总是具备着二重性,而同时具备着二重性。所以列宁说,相对和绝对也是相对的。相对不是简单相对,而是相对中间包含着绝对。只有这种思想的指导我们才看出万物在变化。我们一切政策,一切自然科学都应该相信它还会变化,还会发展的。这一对范畴是在认识论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范畴,是真理论里面一个经常性的范畴。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我们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使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客观,成为不发展的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就如列宁的阶段的时候不是大大的丰富发展了吗?并且把马克思原来提出的某些在当时条件可用的准则而在后来条件变了,不能用了吗?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没有错的,而且当时他提出的问题也是适合当时的情况的。譬如毛泽东思想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毛主席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地丰富了吗?不是毛主席把马、列所没有讲到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把马、列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出来了吗?毛主席不是现在还继续在发展着自己的思想吗?这都是证明着我们的思想不能对它用绝对的概念来限定的。绝对,事实上是一种错误地反映客观,客观上是永远也不会孤立的绝对。木头、桌子、茶杯、扩音机,这只有具体的桌子,具体的茶杯,具体的扩音机。而这种抽象的桌子,抽象的茶杯,抽象的扩音机,是只能存在于具体之中,它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房子的概念是很多房子的抽象,而没有离开了具体的房子,这种抽象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毛主席总是让我们解剖麻雀嘛!解剖麻雀就是从具体中间来找抽象,从个别中间找一般。也就是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割裂开,而不是把它孤立起来。而杨成武

这种说法是有哲学的根据、这是合乎哲学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单是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就是在政治上绝对权威只有在奴隶社会里面有这种情况。奴隶主可以自由支配他的奴隶，可以杀，可以当牲口来用，而奴隶是成为哑巴工具。把工具分为能说话的工具和不能说话的工具，人就变成说话的工具。而奴隶在法律上不是人。法律上不承认奴隶是人，而是作为牲口。这种情况只有在那种社会才有的。譬如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更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政治上是不合事实，也是不同意的。我们只可以原谅作为一种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主席的尊重、一种文学语言来讲它，一个战士的语言来讲他，如果真正提到作为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范畴，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的要害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运动否定了。譬如各种原则的发展、概念的变化的发展都否定了，那我们思想就会僵化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反马列主义的看法、想法，而必然导致到我们行动上的错误作法。因此主席提到要把这个问题讲一讲。（谢富治：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讲话，材料很零碎，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不准确、不全，也没有很好的整理，也是信口开河，是把中央的决定告诉大家，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我要讲的三个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山头主义，两面派，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

现在我来喊几句口号，来结束我的讲话。

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肖华！

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

反对为反动的二月逆流翻案！

打倒山头主义！

打倒宗派主义！

打倒两面派！

打倒野心家！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总理讲话。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要以无限的忠诚，坚定的立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伟大领袖的命令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热烈鼓掌。口号：我们要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林副主席！）

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要永远忠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热烈鼓掌。）

同志们，刚才林副主席宣布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

误的事件，这不是偶然的。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具体的事实不再多作解释，这里头有一点，就是说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所以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听到后（最近才知道）极其愤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都会愤慨的。

（热烈鼓掌。口号：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刚才说杨成武等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在进行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我们想一想快近两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年，自从毛主席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们在党内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等等陆续的揭发出来，也把各地方党政机关、中央政府机关里头一些走资派揭发出来了。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按照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中央文革是作了极其伟大的工作，（热烈鼓掌）她带领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前年的事情。但是，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接着就出现了去年的反动的“二月逆流”，就是说，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口号：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要想继续执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要复辟资本主义，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不是保护毛主席所说的我们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而是想要保护有一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发动的“二月逆流”，是要站在资

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制、打击、继续打击红卫兵小将。甚至于提到历史，要为王明路线复辟，直接把矛头指到我们最伟大的、四十年代的我们的整风运动。就是说，二十多年以后，他们要搞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维护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热烈鼓掌。口号：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那么在去年春天正是夺走资派权的时候，出现了反动的“二月逆流”。到了去年七、八、九月，我们伟大领袖说，这是大好形势。而出现了形左实右思潮，如“5.16”。还有其它的活动，特别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事情，又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了以后，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把暗藏在内部的一小撮坏分子端出来了，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口号：打倒王、关、戚！打倒两面派！打倒阴谋家！打倒个人野心家！）而象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王、关、戚那是在刘、邓司令部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提出的人。中央文革非常英明，一发现他们有错误就自己端出来，这种英勇果断的行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深刻的学习的。（热烈鼓掌。口号：向中央文革学习！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那么，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这一次事情还在继续揭发，我们甚至于要研究，要在座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整个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是会查清楚的。因为只是一小撮人，不成为气候嘛！并且有了这些反面的教材，能更好的锻炼我们，考验我们，教育我们。所以说这些死不悔改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一些黑手，坏人，他们不外都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社会主义。这些性质都有它的共同性。但是，我们可以说得很清楚，这些不成气候的，一经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洞察以后。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分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

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说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口号：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两个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还是解放前国、共战争的继续，那个时候是武装斗争，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这个斗争，是这个战争的继续。这个战争的指挥，最高的指挥部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中央文革就成为这个司令部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然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林副主席为副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各地夺走资派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是党中央，我们夺了刘、邓、陶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也是一样的。大家应该认识，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是一个夺走资派权的新的革命委员会。（热烈鼓掌）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

（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口号：谁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谁就是反革命！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

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江青同志：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走向夺取全面的胜利。现在国内形势大好，国际形势大好。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国内已经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热烈鼓掌）而且还要有四、五个或者更多的省市将要成立，在“五·一”劳动节前，我们估计29个省市基本上都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热烈鼓掌。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坚信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全国亿万人民都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力量，动员起来，各地方都纷纷的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战略部署。我们相信，在今年1968年，我们革命的发展以及建设的情况，一定毫无疑问要超过去年。这是伟大领袖说的嘛，现在形势好，以后还更好。我们相信，今年会比去年更好。（热烈鼓掌）而敌人呢？不管国内暗藏的敌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或者暗藏的特务、叛徒、内奸，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浪潮冲击出来，很多党内藏了几十年的叛徒、特务，被我们红卫兵小将揭发出来了，这是我们四十几年的党没有得到这次这样巨大的成绩。这一点使我们格外高兴，也是我们值得指出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丰功伟绩。（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际形势不需要多说，你们只要看一看越南战争，美帝被打得狼狈不堪，走投无路，要增兵增不了多少，他的前线司令威斯特摩兰要增加 20 万兵，增不出去，结果免了职。国内税收增加，人民负担要增加，征兵发生困难。首先表现出来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财政危机，就是通货膨胀，赤字解决不了，影响了西方世界的财政危机，面临着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多地方说，可能成为四十年以前 1929 年那样的危机，这种征侯现在一天天看得清楚。所以我们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不行了嘛！革命的人民，革命的力量一天天好起来，尤其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起着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能把今后的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全面胜利进行到底，那不仅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国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走向共产主义，有决定的作用，对于我们支援世界革命运动也起着极大的作用。（热烈鼓掌）。但是大家一定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的指示，时刻要提高警惕，不能因为我们胜利就冲昏头脑，我们戒骄戒躁。以国外的敌人来说，它发动世界性的战争困难很大，但是不能说一无可能，你总要防万一嘛。国内刚下台的走资派不甘心他的失败的，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也不甘心他的失败的，叛徒、特务也要乘机捣乱的。所以，这种对国内外敌人的警惕性，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时候，更要提高。我们要认识，在运动中是时常有反复的，刚才已经讲了，将近两年，我们反复了四次嘛！有这样的反复嘛！那么今后还会有，不过成不了大器，只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副帅林副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广大的亿万人民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依靠这样广大的革命力量，依靠我们战无不胜、举世无双的人民解放军，依靠我们在改造中不断前进的革命的干部，这样团结在一起，我们相信，这些国内外敌人的捣乱，或者是暗藏的敌人的破坏，特务的阴谋，叛徒的活动，都会一个一个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失败！（热烈鼓掌）万一美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经过我们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我们相信，我们更有能力在我们伟大统帅的指挥下，我们副帅的指挥下，把美帝国主义消灭在中国。（热烈鼓掌。口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向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

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也就是更加要如同江青同志去年九月五日的那次演说，要更加巩固我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更加巩固和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次揭发这件事是更加加强了，不是削弱了，把杨成武这件事揭发出来了，把空军的余立金揭发出来，把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极其严重错误揭发出来了，这不是更加加强了吗？更加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新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要按照我们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和最新指示，要遵照我们林副主席的教导，刚才大家喊的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好战士”。我们只要这样做，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得更好，党的队伍，部队的队伍，群众的队伍，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红色的政权，整顿得更好，这样迎接我们将要召开的党的“九大”。（热烈鼓掌）也就能够更好地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面的胜利。（热烈鼓掌）我们应该更好地按照林副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著作，来彻底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把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派性，把它批倒批臭。把我们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肖华，谭震林等等的这一小撮和他们在各省的一些代理人，及反动的思想，反动的行为，批臭批倒，把一些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活动揭露出来。我们要照刚才林副主席所指示的，要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因为在我们整风的时候就讲了嘛！20 多年以前，当时因为战争的隔断，我们是有一些山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是最后要消灭山头。现在离开“七大”已经这样远了，还讲山头主义！还讲小团体主义！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山头，将来还要建立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山头，一个山头嘛！（热烈鼓掌）刚才林副主席讲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前进的嘛，人类社会也是要这样前进的。

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
打倒一切野心家！
打倒一切阴谋家！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打倒苏修！
打倒美帝！
打倒各国反动派！
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万岁！
人民解放军万岁！
红色政权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

同志们好！（热烈鼓掌）我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同意林副统帅、周总理的讲话。（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执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

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历史上树立了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三

支”“两军”是有伟大的成绩的！（热烈鼓掌。口号：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向同志们致敬！（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向同志们学习！（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同志们！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工作做得也不多，学习比起同志们来也许差一些，但是，我努力紧跟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学主席的伟大思想。我要是说错了，同志们炮轰我，大字报、小字报我都不怕！在工作方面，我尽我自己的力量来做，和同志们共勉励！（热烈鼓掌）

刚才总理已经讲了一下形势，我不重复。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国际国内的形势我只补充一点。

事物是怕对比的。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修正主义国家，反动派领导的国家，是一片混乱，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囤积居奇，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例如印度，据我个人看，已经若干年了，处于是有革命形势的，但是它缺乏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特别缺乏一个英明的伟大的领袖。因此，它的革命就很难进行下去，使印度的人民遭受了很大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日子不好过了！苏修日子不好过了！这就是刚才总理讲的，财政混乱，货币贬值，物价高涨。而我们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了，我们去年农业大丰收，工业虽然有部分个别的地区发生武斗有所影响，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很多的发明，而且只要是把武斗的后台提出来以后，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生产就很快的上升，而且是超额完成任务。（热烈鼓掌）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我们的人民的基本的生活物资是稳定的！（热烈鼓掌）这在世界上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国家！

（热烈鼓掌）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是一片大好，敌人是一天一天要灭亡！（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我现在只想谈一谈我对这些两面派、阴谋家、个人野心家的认识过程。我并不是一下子就识破他们，也并不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是要有过程的，是要通过现象的，而是要从几个侧面的现象，才能看出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才能够看出某一个人、某些事物的本质。例如刘少奇，他一贯封锁毛主席，其实他是一个四次叛变的大叛徒，大特务，大

内奸。(口号：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打倒一切阴谋家！)我们是有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送了大量的材料，然后又设立专案组，有确凿的证据，有大量的旁证，这是铁证！叛徒、内奸、特务。他那个鬼老婆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的大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打倒王光美！)这是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的群众树立了丰功伟绩。(热烈鼓掌。口号：向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象王、关、戚，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他们原来就是中央文革当时起草小组的时候，是刘、邓他们安插进来的，他们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秀才，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许多事不请示伯达同志，也不请示我，更不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口号：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打倒两面派！)他们封锁，并且把我们架空、架空，使我们和同志们隔离，和小将们隔离，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去年九月五号讲的，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妄图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把他端出来了。同志们，这是不是一大胜利呀？(全场齐答：是！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迷惑了一些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甚至于有的解放军也被他们迷惑了。当时，我们为了受蒙蔽的、受迷惑的群众，我们很谨慎地采取了分割政策，我们大家讨论，并且向我们的毛主席请示了。但是王、关，我们分割不开，戚本禹的作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但是不然。到了下半年，戚本禹更猖狂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该隐蔽自己的观点的。因此，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摆到台面上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热烈鼓掌。口号：打倒王、关、戚！坚决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打倒资产阶级两面派！)

例如去年十一月九号和十一月十二号两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就是不点名的批评戚本禹的。又例如，有的人勾结起来，象杨成武之流，口头上说，中央文革怎么样、怎么样。而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骗中央文革，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口号：拥护江青同志的“九·五”讲

话！坚决捍卫江青同志“九·五”讲话的精神！)

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做《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才是一个“一言堂”呢。为了这个问题，我反对过他两次，这也是主席的教导，但是我并没有背后讲过他，这有人为证，我是跟他正面的原则问题上进行斗争。这说明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的，也是反对林副主席的指示的。他对于中央文革是十分不尊重的，发展到今年（几号我忘记了）不得我们的允许，冲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区，不得组长、副组长的同意，当时组长请示我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就冲进去了。身为司令，卫戍司令，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杨成武三次指示他进去的，（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坚决执行中央文革一切指示！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两部车子，当时我就赶过去，我说：“你，卫戍司令，不得我们的批准，是不是来捉人呀？！”我现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这样的事情能够允许吗？！（全场齐声回答：不能！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了他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去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进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来想打倒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跟我一样，可能有缺点、错误，也许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这是一个很正派的同志，这允许吗？！（全场齐答：不允许！）

“二月逆流”是个什么东西呢？刚才，我们的林副统帅、我们的总理已经讲了，它事实上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的路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想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想破坏革命委员会，这是办不到的！（口号：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 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口号：打倒大叛徒谭震林！）同志们，是跟刘、邓、陶、彭、罗、陆、杨以及“二月逆流”这些家伙走？还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走？（全场坚定地高声回答：我们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走！）我相信毛

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有光荣伟大传统的人民解放军决不会跟他们走的。（口号：毛主席万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坚信广大的指战员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击退“二月逆流”的反扑！（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击退‘二月逆流’的反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

同志们，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要有这样连续的胜利面前冲昏头脑，我们互相勉励。（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有这样的职责的，是要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敬爱的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革命的、英雄的人民万岁！

红卫兵小将万岁！

人民解放军万岁！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宣布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代总

长的职务，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的职务，逮捕余立金。同时，任命黄永胜同志为总参谋长（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坚决拥护林副统帅的英明指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温玉成同志为北京卫戍司令。

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是英明的命令，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很重大的胜利。（热烈鼓掌）

这两年以来，我们是处在大革命中，是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热烈鼓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经过这两年多的大的斗争，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几次大胜利可以讲一下的，从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起，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起，到现在恰好两年。在这开始以后，我们就取得了第一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揭发了彭、罗、陆、杨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打倒刘、邓、陶。（热烈鼓掌）

第三次胜利，我们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热烈鼓掌）

第四次，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热烈鼓掌）

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被我们打倒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动人物，有的是变色的小爬虫。同志们，看到这些小爬虫没有？我是看过的呀，我们家乡有这种小爬虫。象王、关、戚就是一种变色小爬虫，他们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变了一种颜色，钻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这么一个形式，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破坏人民解放军，想破坏革命的三结合，就是后来的革命委员会，象江青同志讲过的。他们这些企图，象刚才几位同志说过的，都失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赢得的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有英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热烈鼓掌）使得我们能够及时的，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揭露出来。

在总结这几次大胜利的教训，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教训呢？就是说，还是要防备一些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防备两面派，因为这些人，包括刘、邓、陶，

也是用两面派的手法爬上这样的地位。杨成武之流也是这样，耍了很多把戏，是一个中等的变色龙，不大不小，但不是那么大，比王、关、戚稍微大一些，他实际上是王、关、戚的后台。（江青同志：他搞窃听、监听，偷盗文件，用特务手法邮检文件。据我们这两天知道，杨成武都有份。）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在政治上用这样或那样耍两面手法，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耍阴谋的人总是阴一套、阳一套，欺上瞒下，对上封锁，对下欺骗。杨成武就是对上面欺骗，装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同时对林副主席，更不用说对毛主席，对中央、中央文革采取封锁的政策，在背后耍阴谋，搞背后活动。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充满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接触过的人可能会感到这种人有他的特点，正象林副主席讲过的，他是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唯我主义。他搞了一篇文章，《大树特树》，这篇文章事实上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这是真的，他在军事单位里，他就说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只改了一个字。（口号：打倒杨成武！永远忠于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斗争中，革命的阶级或反革命的阶级要夺取政权，都要先作夺权的舆论准备。杨成武这篇文章，名义上是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这个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时候，放在我那里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商量过，谈过的。我们不打算发表他这篇东西。但是他不断催，不断打电话。可是他是代总长呀。使我们相当愁眉苦脸，他看我们没有动，他找戚本禹去了，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把关的，不发表它。结果还是没有把好关，让他发表了。最近这篇文章不让它突出，放在第二版。这时，他又串通戚本禹，说他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戚本禹又来向我们施加压力，（江青同志：那也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来。）戚本禹又向姚文元同志和我施加压力，说什么“为什么不登这些消息呀！他是代表全世界人民声音的，为什么不登？”我们说，杨成武他怎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呢？他不是比毛主席更高了吗？这一点我们到抵制住了。没有再给他机会（姚文元同志：同志们，那天各报第一版登的都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杨成武居然公开的施加压力，就是要把他的文章登在第一版，这不是要驾凌于毛主席之上吗？）（口号：打倒杨成武！打倒杨成武！）（江青同志：我昨天还

听说戚本禹为这个事，跑到他家里去，代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他全家送给他勋章。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很可笑。（江青同志：是个小丑。）是非常卑鄙齷齪的资产阶级政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变色的小爬虫吧！

关于绝对和相对这个问题，哲学上的问题，刚才林彪同志讲得很多了。毛主席批评过很多次，讲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经常提出这个问题（江青同志：主席经常说，绝对真理只能通过各个阶段的相对真理，才能表现出来。对立的统一，同时是不可分割的。主席经常说，杨成武是以他自己为核心，唯我独尊。他要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而主席说，威信不是人为地大树特树能够树立起来的，威信是在革命实践中，由于能够正确领导，革命获得胜利，因而在革命群众中才能建立起威信来。我的话可能跟主席原来的语句不一样，我只能领会是这么个意思，错了，我自己负责）。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学习一下主席的《实践论》，主席的《实践论》关于绝对和相对的问题，是作了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的概括。（江青同志插话：毛主席的实践论说：“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主席对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极清楚地概括出来了，我们《实践论》读了好多遍，但是在“用”字上，我们就没有很好地领会，实际上没有学好。出了杨成武这篇文章的问题，作为经验教训：第一，对毛主席著作要学好，要会用。第二，我们在工作问题上，有两条也是应当总结的，第一条我们那时，由于求全，没有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是第一；（江青同志：没有报告主席）第二条

没有向主席请示报告。所以擅自作主，是经常犯错误的。象我们这样的人要少犯错误，第一要经常向主席请示报告；第二要尊重集体讨论。（江青同志：还要向群众学习）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训。我们有很多工作也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多请示报告，就象林彪同志经常告诫我们，要不怕麻烦，要请示报告，如果我们这一点做了，并不难的。（口号：向林彪同志学习！向林彪同志致敬！）还有既然有疑问，既然不那么舒服，为什么不向集体提出来讨论呢？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这两条经验教训不只是在宣传工作中，在其他工作中也应该牢记这个教训。（口号：向陈伯达同志的自我批评学习！向陈伯达同志致敬！陈伯达同志连连说：不对，不对。）

杨成武这个人实际上是彭真、罗瑞卿的余党，他所要用的人，他所采取的手段都是跟彭真、罗瑞卿学的，他也可能是有意地、故意地使我们陷于一种困难的处境，他也知道毛主席并不赞成他这篇文章，可是又要逼我们发表这篇文章，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意陷害人，强加于人。（江青同志：主席说，发表了也是好事，坏事变成了好事，暴露了。）两年来，一系列斗争，一系列胜利，我们处在大革命里面。两年来打了好多回合，大的回合、小的回合（江青同志：就是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较量了。）而这些斗争都是那一小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两面派、阴谋家首先挑起来的，可是他们象蚍蜉撼大树一样，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那一小撮大大小小的两面派，反对的人物，都一个一个地失败了！可耻地失败了。（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不是揪出了杨成武以后，我们可以睡大觉呢？不能睡大觉，还是会有一些变色龙、小爬虫跳出来的，会出来跟我们较量的，应当有这个精神准备，准备他们跳出来。但是，他们照样的都是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热烈鼓掌）

今天我们的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热烈鼓掌）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康老讲话。

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文化大革命争取全面胜利的时候，这一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对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置是既严肃又宽大的。对任命黄永胜同志做参谋总长，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的司令，这对于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我们的党中央，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巩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非常的英明的。（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所作的一个有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指示。（热烈鼓掌）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热烈鼓掌）

刚才，伯达同志讲，我们这个会议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因此我就想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同中国的亿万群众、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革命人民相结合，发生了巨大的威力，使中国的以及世界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原形毕露。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主席的光芒四射、阳光普照的伟大思想红旗照耀下，大家记得，在 1953 年、1954 年照出了高岗、饶漱石的反革命面目；在 1959 年揭露了彭、黄、张、周的牛鬼蛇神反革命面目；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时期，在广大的群众同毛主席的思想相结合，在以毛主席为首、以我们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中央文革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努力下，在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同志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到 1966 年 6 月 1 日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中间，就揭露出来了彭、罗、陆、杨的反革命面目；在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阶段，1966 年 6 月 1 日以后到 1967 年“一月风暴”以前，由于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路线彻底揭露出来；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从“一月革命”以后，又将叛徒陶铸的反革命的面目，将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及其一伙，揭露了他们的反动逆流；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争取全面胜利阶段中间，毛主席的阳光

又将一小撮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中间、是刘邓安置的变色的小爬虫王、关、戚的面目揭露出来；现在又将阴谋家、两面派杨成武，叛徒余立金，以及傅崇碧他们的两面派面目，反动的面目揭露出来了。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极大的胜利，而这一次又取得极大的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些胜利的取得，在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指导下面，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胜利的时候，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热烈鼓掌。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过去不认识，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无数的材料、无数的证据，证明了杨成武是一个玩弄阴谋的、两面三刀的两面派。正如象林付主席讲的，他反对罗瑞卿是假的，而他本质是罗瑞卿分子；他反对彭、罗、陆、杨是假的，他本质是彭真的亲信，彭真的黑帮的分子；他反对贺龙，实际上他按照了贺龙、继续贺龙的路线去夺取人民解放军权的；他表面上反对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他疯狂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举出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那篇文章，我应当说明一个事实，在主席批评说绝对权威是不妥当的，就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在这个时候，戚本禹这个反革命分子公开出来反抗，他狂妄地说，他“思想不通”，他“要保留意见”他假装说是拥护毛主席。当时我说这是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指示。当然，这种话是一种群众热爱毛主席的朴素的语言，主席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最科学的真理论，我刚讲完这个问题，杨成武跳起来，杨成武说，他认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在哲学上也讲得通。我非常的惊异，他什么时候学过哲学？他读过《矛盾论》没有？读过《实践论》没有？读通了没有？在主席的批示以后，他竟敢出来反对主席，好象他们的哲学比主席还要高明似的。问题容易理解，此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毫无所知，相反的，他是同王、关、戚一道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江青同志：他和王、关、戚一贯是暧昧的，没有什么反对的，我们反对，他都是躲躲闪闪的。）（伯达同志：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在这个问题上，他同他的黑上司罗瑞卿是一样，同彭真同刘少奇（江

青同志：还有邓小平）一样是假装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上面林付主席报告中提到的，他最近勾结余立金反对吴法宪同志，要夺取人民解放军的空军的大权。这个野心家，他是想夺取我们的广播电台的权，夺取军报的权。姚文元同志刚才讲了，他要夺取中央党报的权。他们所有这一些活动，仅仅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将来同志们揭露，我相信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存在的，但是总的方面讲，他们就是要为刘、邓翻案的，为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翻案的。他们要为“二月逆流”复辟的。现在我不想多讲，我只想扼要的介绍一下“二月逆流”的问题。

林付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做“二月逆流”呢？“二月逆流”是 1967 年二月中旬，一直到三月中旬，政治局的生活会议中间，所发生这样一种反革命的反动逆流。当时是在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反对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的阶段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以叛徒谭震林为首的还有几个人跳出来了，他们坚决的支持刘、邓路线，公开地、狂妄地、肆无忌惮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付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江青同志：抓“军内一小撮”杨成武是负了重大责任的，在我的批评之下，他曾经假惺惺的写了一个自我批评。他自己身为人民解放军，要破坏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他们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推及到二十几年以前的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他们恶毒的攻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且涉及到毛主席的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矛头对着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亲密战友林付主席。（口号：谁反对林付主席就打倒谁！）他们否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的原则，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污蔑成为“形而上学”。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实际上他就是反对了毛主席对于党、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几十年来的党的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保护”干部子弟，实际上他们是完全否定了阶级斗争，完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完全否定毛主席所讲的我们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依靠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和相信我们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这种阶级路线。他们想

迷惑一部份、欺骗一部分人来组织他们的反党集团。否定阶级路线，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主席的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不仅只是要为刘、邓翻案，而且要为汉奸王明路线翻案的，所以，这样就引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愤怒，引起中央文革同志的坚决反击。在反击中，谭震林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中间拂袖而去，并且声明，说是要砍脑袋、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口号：“打倒谭震林！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这种反动逆流是严重的，这种反动逆流中间，曾经提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了几十年来毛主席的领导，就是要恢复王明路线，就是要否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国全国的解放运动。（口号：打倒叛徒汉奸王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说过：延安整风是无产非无产，马列非马列的斗争问题。没有延安的整风，就没有我们全党在毛主席的马列主义思想上统一起来。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这些人，“二月逆流”替刘、邓翻案，替王明翻案，那么，实际上就是要推翻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要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但是，他们的意图遭受了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以及全国广大人民彻底的反击，将他们的企图完全粉碎了。但是，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等人，他们不甘心退出舞台，他们还想垂死挣扎，所以，他们的爪牙杨成武跳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们跳出来了，用阴谋的手法，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为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招魂。但是他们是不会得逞的，白日作梦，痴心妄想，他们只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在中央文革的揭露下，在广大群众的揭发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他们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走他们的那些黑头头的道路，走世界上的修正主义和中国赫鲁晓夫所走的道路。我们赞同伯达同志的这个意见，这次揭露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是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的巨大胜利！（热烈鼓掌）是毛主席缔造的、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巨

大胜利！（热烈鼓掌）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巨大胜利！（热烈鼓掌）是中国的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红卫兵小将的巨大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因此，我们全体同志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个英明决定，坚决执行林付主席的这个毛主席思想的重大指示。（热烈鼓掌）要坚决的听从学习。以我们林付主席作为榜样，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热烈鼓掌）要把杨成武他这种阴谋家、两面派、山头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以为戒，提高我们的警惕，加强对主席思想的学习。我们把刘少奇、邓小平等等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叛徒、特务、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国民党的代理人揭露出来了，但是，能不能说今后就没有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呢？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只要有阶级斗争，这些反革命分子是还会有的。因为毛主席思想是光芒四射全世界的，今天一切的反革命他要进行阴谋活动，只能用两面手法、阴谋手法，搞阴谋手段，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就要时刻警惕，擦亮我们的眼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识破这些隐藏在党内的这种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我们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人民会将他们揭露出来，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最后胜利！（热烈鼓掌）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

粉碎“二月逆流！”的翻案风！

打倒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付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
永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我们的林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姚文元同志讲话。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各项命令，（热烈鼓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热烈鼓掌）完全拥护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刚才的重要讲话。（热烈鼓掌）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刚才很多领导同志讲话中所传达的毛主席的声音，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在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时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坚决地揭露了和粉碎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一小撮人的资产阶级两面派、野心家的阴谋活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热烈鼓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胜利！（热烈鼓掌）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粉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又一个新胜利！（热烈鼓掌）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最新指示。刚才，林副主席、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已经传达了这一些指示，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对于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热烈鼓掌）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对两面派、反对阴谋家、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从思想上、政治上把我们武装起来。我们要认真学习刚才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使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指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化为我们的实际行动。

我补充一点，杨成武这一次跳出来，他以前当然就做过很多的坏事，是他指

挥傅崇碧冲中央文革所在地受到坚决抵制之后，江青同志对于傅崇碧这一种错误的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作了原则的批评和斗争，这使得杨成武非常紧张，就在第二天，他就突然称病，在背后耍阴谋，妄想夺空军的权，夺中央文革的权，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对谢富治同志，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他的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的嘴脸已经彻底暴露了，他反对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一阴谋已经遭到彻底粉碎、彻底破产。

让我们高呼：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永远忠于林副主席！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

打倒两面派！

打倒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

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

打倒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时，林副主席向大家报告最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接见你们了！”顿时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的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江青同志领唱《国际歌》。最后，林副主席宣布：会议结束，散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江青 康生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工人体育场风展红旗如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十多人满怀革命的豪情，怀着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阶级感情，在这里举行盛大集会。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叶群等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伯达同志主持。首先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决定。然后，江青同志，康生同志，伯达同志，周总理都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最后，大会在响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和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下面是首长讲话记录〕

陈伯达：请总理讲话。

周总理：

同志们，现在宣读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付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宣读第二道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 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 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点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陈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问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众：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今天开这个大会，是因为有的同志们要求我们解答一些问题，我们也有些事情要当面亲自告诉同志们。（口号：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首先我想讲一下形势问题。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是一片大好，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苏联修正主义者，反动派统治的国家，日子不好过了！很不好过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他们在两个月前就开始了财政危机。名子上叫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国家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囤积居奇，工厂倒闭。我只说这一点，使同志们了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日子不好过了。是不是对于我们有利呀？（众：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他们一天天接近覆灭的下场，而我们呢？远的不去说了，就说自从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人民的基本生活物资价格是稳定的。去年农业大丰收，工业有很多发明。当然在个别地区由于武斗引起生产下降，但是只要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生产就很快地上升了，并且超额完成任务。这不是大好形势吗？（口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好过起来了。事物是怕对比的。同志们，这样对比一下，是不是形势大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是大好的。目前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等着中央批准的还有四个省，其他正在酝酿着要到北京来。预计在“五一”节以前基本上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喜事，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口号：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同志们，这是大局。要看到这是一个大局，大局是非常好的。要反对那些资产阶级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把我们的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要坚

决反对他们！

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也是大好的。这要作具体的分析，各有优缺点，不可说哪儿比北京好，北京比那儿好。不能这样笼统说，要作具体分析。有的人就是不作具体分析，就说北京比不上上海。这个话不对！目前北京大好形势主要表现在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已经能够左右革命斗争形势。（叶群：巩固北京市革委会！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同志们，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是革命群众的小学生，工作做得不多，学习也不比同志们好，（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但是我努力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我自己所能来工作，来和同志们所共勉的。没有天生一贯正确的人，我也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也犯过错误，也有许多缺点，我作错了，说错了，同志们炮轰我，写大字报都可以。（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现在有的学生说是要油炸我，绞死我。等到我空了的时候，我就亲自去叫他去油炸，要让他绞死我。（江青同志笑！）（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那些一贯自封正确的人是不对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个人对于许多事物、许多人都有一个认识过程。对于两面派、阴谋家、个人野心家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因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我们面前是伪装革命。（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阴谋家！）而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尤其不能随意地怀疑一个人，这样谨慎地观察。毛主席教导我们，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需要有过程，而且需要通过各种现象来观察它的本质，而不是只看一种现象，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这样一些大叛徒，老反革命、大野心家混到我们党内，他们都是两面派。对于他们要是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挖不出来的，革命小将树立了丰功伟绩，革命小将送来了大量的材料，但是我们为了慎重，还是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小组。拿到了他们确切的证据，并且有许多旁证。刘少奇是四次被捕、四次叛变的大叛徒，是内奸是大特务。王光美是一个美国大特务，而且是战略情报特务。如果这样一批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家伙一旦得逞，他们就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志们，把他们揪出来是不是伟大的胜利呀？（众：是！）

现在要和同志们讲一讲二月逆流的问题。去年二月以黑干将叛徒谭震林为代表跳出来替他们翻案，因为这个斗争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广大群众是不知

道的，因此别有用心的人就蒙蔽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颠倒黑白，说什么谁反对余秋里，什么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真是颠倒黑白。（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打倒谭震林！）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但是主席伟大、宽宏，要一批二保。复辟就搞起来了，而且说他是一贯正确，这对不对？（不对！）对余秋里要一批二保，这是我们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还是要作，但是革命小将就不要上他的当了。

二月逆流它的主要矛头是朝着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朝着人民解放军，是朝着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他们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一笔抹杀。也就是说抹杀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的功劳。（呼口号）在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击溃了他们！彻底粉碎了他们！（口号）

在去年四、五月间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叫极“左”，形“左”实右，它的头面人物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倒王、关、戚！）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排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钉子（打倒刘邓黑爪牙王关戚！毛主席万岁！）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我们，封锁我们，架空工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因为他们是黑爪牙，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是有人又企图利用这样的事情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否定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的功勋，来否定中央文革。（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角色，势必蒙蔽欺骗一部分群众。这样我们对他们采取非常谨慎的政策，采取分割政策，王关分割不开，戚本禹作法不同，因此分割开来一个时期。但是分割出来不等于说他没有问题。果然到去年下半年他更猖狂起来了，（打倒戚本禹！）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内部在原则问题上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去年十一月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不指名的批评戚本禹。他勾结着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付！）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成说中央文革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打倒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而且这些坏蛋都是中央文革端出来的。（伯达：主要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我认为不应该归功于哪一个人，应该归功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革命

群众，归功于伟大的解放军报！有一篇文章叫做《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我反对两次，也是主席的教导，但是不听，一定要登，其实就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他当面给我们装作一派革命的样子，背后耍阴谋，搞小山头，搞极小极小一个山头，而不是搞中国的大山头，世界革命的大山头。

（打倒山头主义！）他招降纳叛。在三月八日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个什么问题？（众：反革命！）当场我们坚决抵制了他，严肃地批评了他，那一天以后，杨成武忽然间说：病了。其实他在背后天天开会，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叶群：打倒余立金！）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夺了一系列的权都被我们识破了。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付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问题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们！（总理：一批二保）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史上总是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目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在反动的那方面占优势，要击溃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防止“左”倾机会主义。但是现在要先反！先粉碎！（打倒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打倒野心家！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以上我说的这些坏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是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具体表现主要的是妄图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以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瓦解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在历史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树立了丰功伟绩，毛

主席亲手缔造的，林付主义直接指挥的。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人民解放军才不会跟他们走呢！（永远忠于毛主席！）企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也是他们的主要表现之一，（叶群：巩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我相信广大人民，广大指战员，红卫兵小将绝不会跟他们走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区别敌我两类矛盾，对敌人要狠、要稳、要准；对自己犯了错误的同志，特别是自己的头头要帮助他们整风，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越接近全面的胜利的时候，敌人会作垂死挣扎的。因此我们要百倍地提高警惕，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人民解放军，保卫革命委员会。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革命的英雄的人民万岁！

红卫兵小将万岁！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

全北京市的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大中学的学生们，革命的教职员工同志们，各机关的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革命小将同志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向你们致敬！我完全拥护宣读的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根据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的英明指示作出这个决定的，这次撤销杨成武的职务，撤销傅崇碧的职务，打倒余立金，任命黄永胜同志为参谋总长，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这一决定是对于我们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重要英明的

决定，我完全同意。希望同志们坚决拥护，彻底执行，我完全拥护刚才江青同志所作的重要指示。把许多的问题告诉了同志们，这是对同志们的极大关怀，极大的信任，极大的鼓励，极大鞭策，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口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夺取全面的胜利，在一片大好形势下面，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尖锐的斗争中，揭露出杨成武等隐藏在党内的极大的一个隐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的胜利，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口号）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对于反革命两面派他们的面目我们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我们以前还没有看到他们的本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材料，有无数的事实，无数的证据证明了杨成武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两面派、三面两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阴谋家，正象我们的付统帅林副主席所讲的他反对罗瑞卿是假的，他本身就是罗瑞卿分子，他反对彭、罗、陆、杨是假的，他本质就是彭真的亲信分子，彭真的黑帮分子，他反对贺龙是假的，实质上是依靠贺龙，继续贺龙的路线，去夺取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夺取空军的大权，他表面上也反对王、关、戚，但是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伙同戚本禹，一起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他指使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他疯狂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近，杨成武这个两面派勾结叛徒余立金反对吴法宪同志，要夺取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大权，他勾结傅崇碧妄图夺取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大权，他企图夺取广播电台、解放军报及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的大权，他所有这一些的活动当然现在还仅仅限有我们所知道的，将来还有同志们的揭发，我相信还有更严重更大的问题存在的。但是不管他用什么方法，玩什么阴谋，他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为刘、邓的反动路线翻案，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贺龙、彭、罗、陆、杨翻案，他也是为叛徒谭震林的二月逆流翻案复辟。刚才江青同志讲了二月逆流的问题，我稍微补充一下。二月逆流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的一个极小范围内所发生的一股反革命的逆流。当时是在党中央十一中全会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时，在夺权与反夺权的阶级斗争中，极为尖锐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叛徒谭震林的手和他的一小撮人出来了，他们坚决支持刘、邓路线，疯狂的、肆无忌惮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攻，向坚决忠实执行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付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他们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并且也反对了二十几年前的毛主席领导的伟大延安整风运动，恶毒地向着毛主席、林付主席进攻。他否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则，他们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诬蔑为形而上学，他们诬蔑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实际上他就是反对毛主席对党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否定几十年来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口号）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保护干部子弟，实际上就是保护那些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他们否定了阶级、阶级斗争，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完全歪曲了主席所说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相信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被他们加以歪曲，他们想迷惑一部分人，欺骗一部分人，尤其是欺骗青年，为他们反党集团服务，这些反革命分子否定阶级路线，否定主席的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中心问题就是要为刘、邓翻案，而且要为苏联的走狗王明路线翻案。所以这样子引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最大的愤怒，引起中央文革的同志坚决的反击。在这中间，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中他要……（原稿不清）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原稿不清）也要斗争到底，请同志们看他这个反革命气焰多恶劣！（口号）

在二月逆流的反动活动中，其中提到了什么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毛主席几十年来的正确领导，就是想为王明路线复辟，就是否定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否定中国全国的解放运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讲过，他说什么叫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我们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基础上，在毛主席的思想基础上把党统一起来，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替二月逆流翻案，替刘、邓翻案，替王明翻案，实际上是要推翻中国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企图遭受了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及全国广大革命人民的彻底反击，将他们的企图完全、彻底地粉碎了。（口号）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到了全面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等以及他们的黑爪牙，他们不甘心

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幻想垂死挣扎，因此嘛！杨成武等就跳出来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跳出来是用阴谋的手法，使用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反革命招魂，他们反革命企图是不会得逞的，革命的人民不允许的。我们有光荣传统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是不允许他们这样搞的，他们痴心妄想，他们只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副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在中央文革的揭露下，在广大群众的批判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碰得头破血流，走他们那些他们黑祖宗的道路，同世界上的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一道灭亡，这次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极大胜利。（口号）这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巨大胜利，是中央文革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巨大胜利，是中国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红卫兵小将的巨大胜利，（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下，在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活动的斗争中，在反对杨成武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特别是从极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人民解放军，动摇和破坏新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为首的、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忠于中央文革。（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有些刘、邓的黑爪牙，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分子，想蒙蔽群众，欺骗一些革命青年，利用中央文革，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向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向着中央文革。王力是个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信，（口号）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这么说：他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的时候就舒服了，就已经象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叛徒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善于

诱导的作风”，诱导他到反革命的作风。戚本禹说他“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缺点，更加意识到应该努力去改正自己的缺点”，就是要全部投降。这些事情我们过去是不晓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揭露出来了！特别是江青同志先将王、关，后将戚本禹的问题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巨大功绩。（口号）

因此当前我们在这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间，我们要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切阴谋活动。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卫戍我们的首都，在三支两军中作了巨大的贡献，得到巨大的成绩，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这使人民解放军更加巩固，因此我们同志们应该警惕，防止坏分子利用揪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坏人的事情，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对准卫戍区这个部队，在这方面我们要坚决回击他，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指示，坚决地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在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斗争中，我们要坚决地保卫北京市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亲自批准成立的，是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关怀指导下，同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等斗争胜利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是新生的事物，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它在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也混进了少数的坏人，象傅崇碧、周景芳等等的渣滓，对这些坏人我们当然要揭露，当然要斗争，当然要批判。但是，不能动摇我们这个红色政权，对革命委员会工作的缺点错误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爱护的角度出发，进行善意的批评和帮助，对它的错误要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改正，所有的革命群众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搞好革命大批判，改正我们的缺点，办好学习班，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最后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加强对毛主席思想的学习，要认清我们坚决把刘少奇、邓小平等等的叛徒、特务，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阴谋家面目揭露出来了，把他们这些叛徒、特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国民党的代理人的面目揭露出来了，但是能不能说今后就没有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呢？阶级斗争的规律告

诉我们：只要有阶级斗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还是有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光芒四射全世界的，今天一切反革命分子要进行阴谋活动，他只能用两面派的手法和阴谋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们要十分警惕，擦亮我们的眼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识破在党内的这种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相信我们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革命的干部是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紧紧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最后高呼：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讲话：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统帅的英明决策和对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所作的决定和所下的命令。

我们正处在一个完全新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这个伟大斗争就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进行过的伟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将会逐步地被人们察觉出来，这个大革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经过了几个大的战役，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这里不说还有一些小的回合。

现在大概可以说我们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一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口号）二月逆

流是彻底的破产了，（口号）彻底失败了！有一些极少数人企图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妄想！这是第三个回合。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它挖出来了，把它们挂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小爪牙，关、王、戚的后台。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总之，那些跳出来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一个在毛泽东思想面前失败了，可耻地失败了。这些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历史的渣滓，阴谋颠倒历史都是一些妄想，他们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他们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他们瞎了眼睛，很不自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道路上，一个个倒台了，倒下去了，他们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用的手法是阴一套，阳一套，欺上瞒下，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唯我主义，妄想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妄想动摇人民解放军，妄想破坏正在建立起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象杨成武这些跳梁小丑，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也制造出一些舆论，做过一些夺权的准备，可是，这些都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戳穿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是些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变色小爬虫，丢尽了丑，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今天这个会议也证明了嘛！已被毛主席为首的，以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揭穿了，他们就倒下去了，他们在群众当中成了一堆臭狗屎。根据我们这两年的斗争经验，给我们指出了下面的教训：

第一．就是我们要好好学习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著作，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读毛主席的书……）

第二．我们要警惕，要有高度的警惕，警惕两面派，警惕变色龙，警惕那些

小爬虫。（打倒变色龙！……）

第三．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宗派主义，打倒山头主义。（口号）

概括地说几句，我们在前进中，我们在胜利中，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无敌的！（口号）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胜！重复一遍我们必胜！

让我们的敌人，那些两面派，那些牛鬼蛇神，那些变色龙那些小爬虫都去见鬼去吧！

让那些资产阶级阴谋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那些阴谋诡计都去见鬼去吧！

那些家伙在我们伟大导师的照妖镜的照耀下，一个个都是逃不脱的，他们在革命群众的威力下，个个都将跌得粉身碎骨！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讲话：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北京市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职工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们解放军的指战员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完全拥护刚才宣布的命令，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定，我们要坚决拥护坚决执行！我完全拥护和同意江青同志、康生同志、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他们都传达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声音，我们坚决支持！坚决照办！这次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是极其英明果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我们林副主席题词上所说的“大航海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要永远忠于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让我们在这里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揭发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几个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他们这次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本身正如刚才江青同志和其他同志所说的，所犯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是犯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特别是他所发表的那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是树立他个人的权威，而不是树立我们伟大领袖的权威，刚才江青同志已经说得很清楚，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最不利于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一致对敌，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而利于敌人的，国内外的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的。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就说过，当然我们战争也有各个根据地，不在一起，所以当时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要消灭山头。

现在我们全国解放十八年多了，山头早已不存在了，杨成武几个人还要搞小小的山头主义，那是痴心妄想，正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我们现在搞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山头，要走向全世界共产主义大山头。我相信我们人民解放军，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抚育起来的，是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有着革命光荣的传统，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是久经考验的，是建立功勋的，决不会跟着少数人搞山头主义走，搞宗派主义走，并且相信只要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任何一个小山头都会垮下来的（江青：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你们看，刚才说过的，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吗？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我相信跟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旦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里来。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好好地改正错误。至于广大的指战员，

是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不管当年我们的部队是从哪个根据地来的，现在你们还不都是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分什么彼此呢！啊！不要这一个翘尾巴，那一个灰溜溜，这是不对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好队伍！你们不是正在说李文忠的话吗？他说啦，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们不是常常唱这个歌吗？我相信你们是会永远跟毛主席走的，跟林付主席走的，尤其是北京的卫戍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过很大的功劳，保卫了一千三百万红卫兵，保卫首都安全，保卫了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我们希望你们今后还要立新功！至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只要他们是挂伪装的，过去我们没察觉出来，一旦被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察觉出来以后，揭穿了以后，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比方过去的刘、邓、陶，彭、罗、陆、杨不都是如此吗！所以谭震林也好，现在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好，只要他们两面派揭露出来了，他们是一无所有了！正如刚才陈伯达所说的，是堆臭狗屎！

但是，他们在搞阴谋的时候，他们起了一点儿作用，就是想搞垮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指导成立起来的，另外经过去年的一月风暴，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说，要经过革命代表会议，一个个地成立起来以后，再成立总的，所以成立了四个代表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成立了以后，我们四月二十日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在那个会上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那就是把去年中央军委一月的八条、四月的十条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这一点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是红色政权，初期总是有些粗糙，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出了个别的坏人，这没有什么！好象小孩子刚生出来，总要害点疹子，害点病啊，但是，新生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她要生存下去，成长起来，要健康下去！所以谁要痴心妄想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搞垮，那是肯定要失败的，我们现在全中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正如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五·一”前基本上可以成立起来了，完全成立起来了。所以这一种阴谋一旦戳穿以后，使我们眼睛更亮了，阴谋就更容易被戳穿了，两面派更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很多的教训，希望我们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这一课。

还有第三件事，杨成武这几个人他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马列主义的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毛主席早已批评了，说这是错误的。绝对权威，刚才有的同志稍微提了一下子，江青同志提了一下子，实际上在几个月前就有福建一个战士来了一封信，给杨成武，说你的这个文章，首先题目上就是错误的，毛主席的权威是经过无数的实践、革命奋斗，经过广大人民的智慧，被毛主席集中起来，系统化了，成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人民中，革命人民中，生根了，扎根了。还有什么大树特树的必要呢！这种人为的大树特树，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你看一个福建前线的战士，他敢于批评当时的代理参谋长，这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有革命修养的，是学习了毛主席宝书的，熟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这一点应该引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们的骄傲，不仅是当前的问题，刚才陈伯达同志叙述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将近两年的发展，当然，从党的成立的一天起就存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就是站在革命路线方面，跟党内一切“左”倾的、右倾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我们不去提它了，就讲这两年，在前年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在去年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系列进行的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当中，在去年夏秋间极“左”思潮形成的“五·一六”呀！“揪军内一小撮”呀！这些活动当中，在今年的极右错误，极“左”的思潮又转向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的活动，杨成武这个事情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些事件中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进程中说来它不过是一个曲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但是，这个逆流都在我们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的揭露下，在我们中央文革的严厉的批判下，批倒了，批臭了，批垮了！我们懂得在一切革命运动中道路总是曲折的，总会出一点小小的逆流，这正是因为在胜利的前进中，鼓舞了我们，我们要遇到一点困难曲折，来考验我们，教育我们，所以这种小小逆流我们作为反面教材来锻炼我们，考验我们，因此正如刚才陈伯达同志所说的，就在这样一个战斗当中我们在夺取全面胜利当中，已经揪出这一小撮的人来了吗！所以我们应该高兴，应该庆祝这个胜利，我们要打倒被我们揪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我们要打倒彭德怀、贺龙，要打倒彭、罗、陆、杨，要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要打倒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要打倒小爬虫王、

关、戚，因为王、关、戚确实是刘、邓主持工作时候，他们决定参加当时的文革小组。而真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他们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出来，这就是他们表示出最无私的，最原则性的丰功伟绩。（总理带头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江青同志：向革命群众学习！向解放军指战员学习！）所以我们正如同我们大家所说的，我们首先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向我们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致敬！向毛主席为首的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红卫兵致敬！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广大的革命群众致敬！

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

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付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现在全世界全国的形势大好。江青同志刚才讲得很清楚，不需要多说了。的确敌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你看嘛！我们支持的越南，抗美援朝战争嘛，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接近或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面临着夺取全面胜利的日子了。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很对：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就是越接近胜利总有些坏人在捣鬼，国内外敌人在捣鬼，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它的代理人在捣鬼，党内外的叛徒、特务在捣鬼，还有我们周围敌人派遣间谍分子进来捣乱，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战略部署，擦亮眼睛，我们会洞察这些牛鬼蛇神，这些挑拨离间的，混水摸鱼的坏事坏人，因为敌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支离破碎。我们是走向全面胜利，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更加要提高警惕，譬如说，敌人现在面临着在越南战争失败，很难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但是，我们总得有个准备呀！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难以发动了，所以因此我们就要树这样的雄心壮志，如果万一美帝国主义甚至苏修把世界性的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得有准备嘛！我们相信我们有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当中，把它们消灭在中国的领土上，消灭光！（黄永胜：打倒反动派！）

还要继续动员和教导群众，防止国内外敌人的挑衅。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收复台湾，我们就应该很好地按照今年元旦社论，得到毛主席、林付主席批准的五条任务，好好地来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我们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提高我们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战斗的水平。第二，我们就在这个学习班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把全国 29 个省市争取在“五一”前统统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各个战线上，各个部门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在应该夺权的地方实现革命三结合。使我们每一个单位都能够把斗批改搞好，实现勤俭节约闹革命，把我们广大力量走向生产，走向农村，走向群众。在这个里头，我们应该强调的就是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这是整个历史时期都是如此，尤其现在把革命大批判搞得更好，就是刚才说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及其在各个方面的代理人，各个部门的代理人，把彭德怀、贺龙，把反动的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这一伙人，把刚才说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阴谋家，同样批臭批倒批垮，只有在这样的路线的斗争中，我们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好，因为你不管哪一派，符合于毛泽东思想的就对，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就不对，这样子按这个标准才能够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第三，我们要强调拥军爱民，今天就是个很好的军民联合的大会嘛！军爱民，民爱军，军民一致嘛！让我们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付帅林付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把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得更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让我们全体在场的同志们，你们把刚才几位同志的声音传达到你们所代表的机关中、工厂中、学校中、农村中、军队中去，大家要紧紧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把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和各机关的革命大联合都搞得更好，树立全国的榜样。第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接见今天在场的很大数目是我们的工人同志，我们的责任很大，不仅要把革命抓好，在革命的原则基础上要联合好，搞好生产，不能缺席，不能旷工，不能搞。我们要反对那些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缺勤呀！旷工呀！要真正的把我们的生产搞得更好，因为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放广大的人民，发挥我们更大的革命积极性，所以我们相信今年——1968 年北京的生产不管是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也要在全国树立一个榜样。

我们的机关、我们的学校都应该搞好斗批改，以后我们更多的人去接近群众、接近工农，投入生产支援工农业，精简机构，真正实现斗批改的成绩。第五，就是各个单位根据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小组的组织来进行整党，也要整团，整理红卫兵的组织，整理革命的队伍，象江青同志在去年十一月份的讲话所说的，要把所有单位的革命队伍好好整理一下，把坏人清理出去，把积极分子提拔起来担负重要的职务，这样子把我们的队伍搞得更整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经过锻炼考验的人跟广大的军队代表结合在一起，引起军、干、群的结合，革命的老、中、少的结合，这样子就能够有力量来准备，迎接我们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九次代表大会！让我们高呼：

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打倒刘、邓、陶！打倒彭德怀、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一切阴谋家、两面派！（江青）打倒个人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阴谋家！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红卫兵战友们万岁！

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现在宣布散会，散会！

江青：同志们唱个歌儿，总理指挥。

姚文元：《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江青同志起调）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 XX、XX 军时的指示

总理：林副主席的二十四日讲话录音放了没有？是否感到突然？xxx 师是否感到灰溜溜的？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不是杨

成武的部队。

林彪：我军是党的部队，经过了土地革命，打败了日本，国民党。我们的部队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只要把杨成武的问题讲清，相信部队是不会受蒙蔽的。杨成武是一步一步变的，跟他走的老干部，有的变好了，有的变坏了。不要认为有地位了就闹个人主义，不要认为地位变了，本事就大了。本事还是那么大，要经得起提拔，要经得起表扬，有的人经不起提拔，经不起表扬。不要稍微提拔一下，就发展个人野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地位越高，思想越好才行。地位高，野心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因为党的相信，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不愿干部犯错误、垮台，有的不向好处发展，学习资产阶级政客的办法，给党造成很大损失，把自己搞垮了。要加强部队思想工作，把部队思想工作搞好，搞好人的团结。把杨成武的问题传达下去，跟着毛主席走。

江青：杨成武主要是两面派、阴谋家。

林彪：过去没有揭发，蒙蔽了一些人。他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二、研究资料

《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第三十五章 杨成武整理《重要指示》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于是准备回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实现“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后，各种媒体发表了一份《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份历史性文件，是杨成武一手整理的。若干年后杨成武将军回忆说：最初形成这个文件，应该说是在回来的专列上。对于主席沿途所作的指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等一系列问题，总在我脑子里思考着。我把记录本子拿出来，从头至尾看了两遍，边看边摘录，把摘下来的东西一整理，居然有29

个问题。虽然有一些重要问题，在视察期间就及时向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军委常委有关同志传达报告过了，但总不是那么系统。

我将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秘书及同行的有关同志交换了意见，也希望他们帮着参谋参谋，出些点子。

专列在 9 月 23 日上午抵达北京车站。

回到北京，我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由于主席在各地讲的内容有重复，且使用的语言并不一致，我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上传达。

9 月 27 日，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我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我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第三十六章 与林彪的关系

中国的许多战将都与林彪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第四野战军的干部自不必说，就是后来在总部工作过的干部都或多或少与他有过联系。因为他曾经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嘛！

杨成武是这众多干部中的一个。

杨成武长期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依杨成武的个性是不会与林彪发生冲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冲突。因此有人说他反对林彪。

有一阵子，杨成武与林彪的关系是人们议论颇多的一个问题。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有人说是因为他反对林彪才遭此厄运。对此，杨成武却不这么看，他说，当时就是想紧跟还跟不上呢，哪里敢反对他！

在政治漩涡中，林彪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杨成武被卷进去之后，和林彪的关系慢慢发生了变化。

要考察政治漩涡中的杨成武将军，就不能不认真考察他和林彪的关系。有一次，杨成武和几位老同志说起此事时，有过这样一段话，倒是很能说明问题——“随着地位的变化，林彪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在他们谋权的过程中，我有点碍眼，不太听话；不拿掉我就不能实现他的目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作为一个革命者，没有做损害或背叛革命的事。”

回忆起早年与林彪的接触，杨成武感到，林彪讲战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林彪在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4军任军长，杨成武在红4军第11师第32团任政治委员。当时，部队正在整训和筹粮，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

在攻打赣州之前的一天，杨成武接到通知到军部参加训练演习。杨成武和团长向玉成骑马赶了几十里路来到军部所在地。那是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杨成武进院子一看，各师、团主管干部都已经到了。他们赶紧找地方坐定。

这时林彪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拿了个小本子。他看看大家说：“同志们要想打好仗，我们必须学习些军事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为了进攻赣州做准备，今天我们搞一次小演习，学习几个最常用的战术。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

说着，林彪一摆手，立刻从旁边跑来几个战士。他对那几个战士说：“你们暂时叫甲、乙、丙、丁吧！”

林彪先叫战士甲站在院子的中央，说：“你伪装敌人，比如说，你就是赣州

的敌人吧！”

又叫过战士乙，命令道：“你从左边包抄过去，准备从左翼进攻敌人。”

战士乙端着枪从左面向甲跑去，当到达甲附近时，立即卧倒，呈战斗姿态。林彪说：“这叫做左翼迂回。”接着，又命令战士丙做了右翼迂回的动作，战士丁做好从正面进攻的准备姿势。

这时，林彪挥动两臂做了一个从两侧向中间合抱的动作，说：“乙和丙的动作，就是迂回包围。”说着，收回两臂，右手并拢五指，猛然向正前方一插，说：“丁的动作，就是中间突破！”又说：“什么叫迂回包围呢？就是指绕向敌人侧后，配合正面部队，对敌人形成包围的作战行动。什么叫中间突破呢？中间突破也叫做中央突破，即对敌防御阵地或作战部署的正面中央部位实施的突破行动。”

林彪环视一下正看得入神的指挥员，问道：“明白了吗？”

院子里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有的人回答：“明白了！明白了！”

也有的人说：“我们过去也是这么干的呀！”

林彪说：“好！我们再说说什么叫四面包围和围点打援。”

第三十七章 林彪讲战术课

全场又肃静下来。林彪指着甲说：“你还是敌人、是赣州。”又对乙说：“你是红军围城部队。”战士乙立即持枪跑至甲的周围，做环绕运动。

接着，林彪用手向北边一指，说：“那边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现在我命令丙和丁，迅速进至赣州以北设伏，准备打援！”两名战士快速向北跑去，在屋门口两侧卧倒，成战斗准备姿势。

然后，林彪用左手在胸前划着圆圈右手向屋门口那边一指，说：“这说的是四面包围，围点打援！”并解释说：“什么叫四面包围呢？就是从敌人的正面、两侧和后方实施包围。什么叫围点打援呢？就是钓鱼，即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镇或要点，诱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其目的不在打被围之敌，而在于打增援之敌。”

这次林彪还没有发问，大家已经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

林彪说：“演习胜利结束。下一个科目开饭！吃完饭你们就回去吧。”

整个所谓“演习”仅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但却给杨成武和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次什么“演习”，而是林彪讲的一堂战术课，或者说算是带演示动作的示范课。林彪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仅用几个战士就把复杂的作战行动演示出来了，使大家耳闻目睹，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这就是杨成武听到的第一堂战术课，从此便引起杨成武学习研究战术的浓厚兴趣。

不久以后，杨成武率部开始攻打赣州南面的新城，消灭由广东来增援的敌陈济棠、余汉谋部一个旅。此战后，林彪任第 1 军团长，与聂荣臻政委一起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率部东征福建，同时东征的还有第 5 军团。在 1 军团的统一指挥下，他们在龙岩歼灭陈国辉一个旅，乘胜直取漳州。接着回师江西，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们踏上万里征途，爬雪山、过草地，进行的许多重要战役、战斗，其中包括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战役，林彪都是主要指挥员之一。他经常告诉杨成武要认真分析敌情、地形，并作过一些具体指示。在飞夺泸定桥的行军途中，林彪和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送来一份命令，这份命令是要求他们一昼夜强行 1 2 0 公里，同时还鼓励他们说：“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当时，杨成武和王开湘团长说：林聂首长这样相信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完成任务。

在战争环境中，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对部下的最大鼓舞。

在他们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林彪、聂荣臻又给杨成武等发来《敌情通报》，讲道：敌薛岳部已抵天全、芦山，胡宗南部见我进入草地后也火急赶到松潘，甘肃敌新编第 14 师鲁大昌部亦往北边压来，胡宗南部一部分从西安开始往西北移动，马宏斌、马宏魁部从西北往南移动……这样使他们还没有走出草地，就已经知道了草地外面的一些敌情，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不打盲目仗。

在攻打腊子口之前，林彪和聂荣臻以及陈光师长来到前沿阵地，不仅询问了情况，还亲自查看地形。林彪对他们说：“你们的决心是对的。由于正面的地形和兵力部署，对你们都不利，因此，打胜这一仗的关键不是靠正面突破，而是靠侧背突袭的成功。所以，你们正面部队一定要打得狠，打得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给迂回部队创造奇袭成功的有利条件。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一定会使天险变通途的！”后来杨成武部坚决完成了任务，取得了胜利。

第三十八章 平型关大战前的见面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

主要讲，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

八、要有很好的战斗作风。

主要讲，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要敢于打硬仗、打恶仗。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主要讲，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党的坚强领导、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

关于这次谈话，杨成武当时认真做了记录。谈话时，罗瑞卿也在场。记录稿曾先后送给罗瑞卿、刘亚楼、陈光等领导同志看过。这次虽然是林彪受毛泽东的委托和杨成武进行的谈话，但林彪也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后和杨成武谈的。

回忆起这次谈话，杨成武将军说：“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林彪着重指出，当好师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指挥作战、处理问题，并嘱咐我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带在身边，经常读，反复读，遇到问题就从那里找答案、找办法。后来，在华北战场转战的十几年中，我一直把这份油印的秘密文件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之后，军事博物馆征集历史文物时，我才把这本讲稿捐赠出来。”

杨成武将军还说，林彪变坏了，那是后来的事。当年他和我谈话时，要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也是真诚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抗日战争开始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再次见到林彪，那天，林彪指指桌上的材料，说：“你们先看看敌情通报。”

通报是总部拍发来的，主要是讲华北的敌情。

杨成武看过后，林彪说：大营镇以东几十里的平型关，是日军南下忻口的咽喉

喉要道，那里群山绵亘，沟谷纵横，便于伏击敌人。所以，决定利用这一带的有利条件打一仗，独立团必须马上赶到平型关东南方向的上寨、下关集结，随时准备出击。

杨成武连夜赶到上寨后，又接到林彪的电话，命令他们派人去灵丘以南的太白山去侦察敌情。

9 月 23 日，侦察组发来电报：日军第 5 师团先头部队第 21 旅团已进占灵丘城，即将向平型关进犯。

杨成武派人把电报送给林彪后，又奉命立即赶往师部，参加全师连干部会议上，林彪介绍了敌情，分析了首次与日军作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接着，林彪又分别给各旅、团部署了作战任务。

杨成武独立团的任务，就是大胆深入敌后，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切断敌人从涞源至灵丘和广灵至灵丘的两条运输线，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正面进攻的日军。

林彪还特地叮嘱杨成武：“你们如不能把敌人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一兵一卒。”

杨成武对林、聂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9 月 25 日，在师主力于平型关发起战斗的同时，杨成武团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第 5 师团步兵第 9 旅团 400 余人，迟滞了日军的增援行动，保证了师主力首战平型关的重大胜利。

第三十九章 毛泽东说：“谁封我四个官啊？”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林彪即率第 115 师在晋西南作战。此后不久，林彪给杨成武发过一封电报，详细询问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以及地形、交通、战场设置等各方面的情况。杨成武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给他发去一封很长的回电。

1938 年 9 月，林彪被阎锡山部误伤返回延安后，到苏联养伤去了。他和杨成武之间便再也没有交往。直到 10 年以后，1948 年在平津战役前线，他们才再次见面。

.....

后来杨成武到总参工作，和林彪的接触多了起来。一个是元帅，一个是上将，杨成武一直把他当成一位老领导、老首长。这期间，也曾经有过一些工作上的矛盾，但那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冲突。但有一点杨成武的感觉是明显的——聂荣臻也是元帅，也是老首长，自己心里有什么话可以和聂说，却不可能和林彪说。

症结还是文化大革命，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将军和元帅的关系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且发展成为政治斗争。

还是要从 1967 年的 7、8、9 三个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说起。还是要从杨成武当“联络员”说起。

从离京开始，毛泽东找了许许多多的人来汇报情况，找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了解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似乎要对这场运动的规模、进程做出相应的决定。

由于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王力扣了起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毛泽东的横渡长江的计划只好作罢，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这期间，毛泽东的一些精辟的见解，使杨成武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当时这“四个伟大”被吹鼓手们吹得天花乱坠。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争相转载、刊印，还被制成“语录牌”到处悬挂。就连毛泽东石膏像的底座上，也刻上了“林体”的“四个伟大”。

“谁封我四个官啊？”毛泽东的谈吐总是富有幽默感。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他的这种幽默是比较熟悉的。几天前，他同同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开了个很有意思的玩笑。

记者和他的妻子同在新华社工作，“文革”打派仗，两人参加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是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大家都被毛泽东逗笑了。

现在，他说“封四个官”，却没有人笑。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屋子里静得可怕。这恐怕是在座者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叫人们吃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没有人发表任何见解。杨成武感到毛泽东与这位亲密战友之间的事情也并不是亲密无间的。但他绝对不敢说什么。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第四十章 毛泽东对几位老战友的评价

“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师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主席，我讲不合适，还是由老师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师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受命回到燥热的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的口气很是热情。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成武马上想到“谁封我四个官啊……”也想起了“什么永远健康……”

这些话能对叶群讲吗？

将军只能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

杨成武不知道，他却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如果说，杨成武那次回北京让林彪感到封锁他的话，后来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他汇报时，他似乎进一步感到了“威胁”。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关、戚”事件。

对这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自然的，人们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立场。有人说，这是毛泽东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步骤，也有人说，这个事情是政治平衡的结果。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力，则认为是江青有意整他，并且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是早就想除之而后快。

要搞清楚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想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分析林彪和杨成武的关系。

第四十一章 “王、关、戚”事件

据杨成武回忆，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他回到北京，听周恩来总理讲了北京发生的一些情况——8月16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8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托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付之一炬，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里面和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夫人……

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乱。要使形势得到控制，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来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他决定，把北京的有关情况告诉已在上海

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定夺。

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束“王关戚”的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插曲，有材料说，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至于王力的“八七讲话”，他自己说，他只是对外交学院的人谈了话，而且谈话的观点也是中央文革定下了的。

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讲话，有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态度，这都是事实。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三个人先后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那里也许引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央文革的内部，在林彪一伙那里，则如同发生了十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第四十二章 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也正是那一次回北京，周总理让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在杨成武的记忆中这是最难堪的一次汇报了。到了北戴河，向林办通报说来向他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先等着，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听汇报再叫你。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才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林彪的居室内，拉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亮着灯。林彪光着头，坐在沙发里面，像一具僵尸。不知他为何惧怕阳光。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你想像不出，同一个他，在天安门广场讲话时会那样富有激情。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声音依旧是冷冰冰的。

杨成武从林彪卧室出来，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

这足以证明林彪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处理的态度了。

林彪、“四人帮”一向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今天，他们和“王关戚”亲如兄弟，明天见情况不妙，他们又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他们又把“杨余傅”说成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3月27日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当着数万人的面，他们可以脸不变色

心不跳地讲假话，欺骗广大群众。

陈伯达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很大的胜利。”

康生说：“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向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向着‘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1962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同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1964年1月27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

谁都知道，“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人，他们一下子又变成了“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的人”；谁都知道“王关戚”是靠着“文化大革命”整刘、邓、彭、罗、陆、杨起家的，这会儿又成了刘、邓他们的亲信。真该给康生送一个“最佳谎言奖”！

江青的话更有意思。她说：“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谣说‘中央文革’出了坏人了，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

林彪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把杨成武说成是“王关戚”的同党。他说：“他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

第四十三章 “大树特树”出笼之前

说到杨成武和林彪的关系，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为了搞清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笔者先后访问了有关当事人，终于搞清了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于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

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吴旭君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9 月 23 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

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他也是福建人，两人说话用闽南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回答说：“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很为难，他就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

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第四十四章 “大树特树”的文章见报了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 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 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 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第四十五章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了36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毛泽东要在他的老家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

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

于是，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枕头底下。压了一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在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批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如果把杨成武说成一个任人摆布的将军，那显然也不是事实。

其实，杨成武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的军人。在和林彪的交往中，有些时候他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没有按照林彪的要求去做。这也就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一步一步加深了。

1967年2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之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天杨成武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气呼呼地对他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了。”

看到林彪的口气很强硬，杨成武只是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拖着湖北腔甩手走了。

第四十六章 厄运在向他步步逼近

-----想到这些，杨成武在心里说，怎么说呢？因为解放前他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杨成武证明叶群1936年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杨成武沉思了一阵，对林彪说：“我和她，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1936年我们都在‘红大’这个你知道。她在天津、北京。我写不好。别人写了证明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两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这完全是摊牌。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意图？杨成武一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答应林彪吧，那完全是昧着良心，为人做假证，决不能干。不答应吧，林彪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罪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成武冷静了一下，决定来个缓兵之计。说：“林总，别人说叶群同志什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先看看材料再说。”

这时，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这场面太尴尬了，足有40平方米的大客厅里，空气凝固了，一切都像是死的。

总不能这样呆下去，杨成武问：“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林彪一摆手，这摆手是逐客令。杨成武便站起来告辞了。

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杨成武的最后“考验”。从他担任代总长的职务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他、“考验”他。这种观察和“考验”进行得很神秘，杨成武毫无察觉。据说代总长的“代”字，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也就是要看杨成武能不能成为“他的人”。在对待老干部、老师问题上，他觉察出杨成武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杨成武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林彪已经感觉到需要对杨成武采取措施了，于是，厄运在朝他步步

逼近。

面对这一切，杨成武努力抗争着。

3 月中旬，杨成武先后接到两封匿名信，都是空军机关的人写的，揭发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胡作非为的种种丑行。其中，有他们仗着吴法宪，整人于死地；也有他们玩弄几名小姑娘，致使她们怀孕的恶劣行径。

杨成武看后，批了两行字：

林副主席：

转去空军一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

杨成武

杨成武之所以把这封匿名信批给林彪，是因为他知道林彪、叶群同吴法宪的关系非同一般。记得“二月逆流”过后，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林彪的死党周宇驰和刘沛丰以及林家的那只老虎——林立果。林立果到空军不久，还不是党员就进了党委办公室。

既然是党委的调查研究小组，写了文章必然会给空军的政委余立金一阅。余立金觉得标题很刺眼，别人还没有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杨成武看。

杨成武说：“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那毛主席是什么榜样，这样提不大妥当。”并对余立金说：“你回去转告吴法宪这样提不好，能不能换个题目。文章的内容我没看。”

余立金同意杨成武的意见，找到吴法宪，谈了杨成武和他的看法。

吴法宪说：“就这样提。”

余立金再次提醒：“这样提不妥当，还是改一改为好。”

吴法宪像是有尚方宝剑，说：“你不要管，出了事我负责。”

第四十七章 关于“以林副主席为副……”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 5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上，署名是三个很大的楷体字：吴法宪。

事后杨成武和余立金才知道，这篇文章吴法宪早已送叶群、林彪看过，他们同意这样提，所以吴法宪才能否定杨成武和余立金的意见。

后来听说吴法宪还到叶群那里告了一状，说杨成武反对宣传林副主席。叶群一言未发，只是哼了一声。

过了没多久，空军开党委扩大会议，吴法宪在代表党委发言中，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这句话，作为政委的余立金又提出异议，说中央没有这么提，我们空军这样提好不好。

余立金又把吴法宪的讲话稿送给杨成武。杨成武看了讲稿，对余立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没用过。这样提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

吴法宪很快把杨成武的原话报告了叶群。第二天，吴法宪又告诉余立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杨成武的批示很快送到了林彪办公室，叶群看了信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吴司令，有人写信告你们党委办公室的人，你知道吗？”

吴法宪说不知道。叶群生气地说：“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太迟钝了，一点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现在派人把信送去，你们看着办吧。”

那封信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空军，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

周宇驰他们一见，非常恼火，于是把平时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的笔迹都找了来，像公安局查“反革命”信件一样，一个一个地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

关于这件事，他们又联系到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当时杨毅在空军报当编辑，和余立金的秘书认识。为了进行报复，他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由周宇驰找吴法宪，说：“吴司令，我们向你报告一个紧急情况。余立金的秘书和杨成武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秘书的老婆告到党委来了！”

“是吗？”吴法宪很吃惊。

“他们写的情诗让秘书的老婆发现了，告到了党委办公室！”

吴法宪再草包，也知道这件事是不可以开玩笑的。男的是政委的秘书，女的是

代总长的女儿，便问：“有证据吗？”

“有，秘书的老婆可以作证。”

“有证据就好。”

吴法宪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叫到他的办公室，但她却一问三不知。

他急忙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带走。

周宇驰、王飞等人又找上门来，要吴法宪立即下令“隔离审查”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没有这个胆量，这涉及到代总参谋长和空军政委。他对周宇驰说：“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抓他的秘书，不通过他不好！你们强迫我签字不是要夺我的权吗？”

周宇驰把吴法宪的话告诉了林立果，林立果又告诉了叶群。叶群气势汹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说我们夺你的权，夺你什么权？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从你们空军撤回来！你不识好歹，我们把儿女放在空军是为了保你，是为了保你的权！你反说我们夺你的权。”

叶群又说：“告诉你吧，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不要蒙在鼓里！”

吴法宪挨了叶群的骂，立即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起来。

这时，在病中的杨成武也得到了消息，气愤至极。他的女儿杨毅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他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派夫人赵志珍去找空军的人，吴法宪不在，找到了余立金。赵志珍又和余立金一起直接到毛家湾林彪住处。

第四十八章 江青贼喊抓贼

赵志珍与余立金等了很久，叶群才身穿便衣出来。

“哎哟哟，什么事情搞得你们两个跑来啊，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叶群装模作样，耐着性子听完他们所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以后再向林副主席报告，你们先回去吧。”

他们走后叶群立即打电话告诉吴法宪，并要吴法宪和他老婆一块找杨成武谈话，要“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斗争愈来愈表面化了。

几乎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傅崇碧所谓冲钓鱼台的“事件”。

钓鱼台，是个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这里曾经是“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

门口岗哨林立，墙边还有来回走动的流动哨兵，只要你在墙边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就会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警卫来干涉。人们只能在它的东门口，望一眼里面的假山、喷泉。

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这件事本来和林彪没有多大的关系，也和杨成武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在那种畸形的政治斗争中，却有了很畸形的关系——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傅崇碧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收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收藏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利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他们一行人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互相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抓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第四十九章 转了一个大弯子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是一个卫戍区司令员，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

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那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告诉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是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区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站定，江青推门进来。

江青见屋中站了 5 个军人，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周树青赶忙解释说：“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扯扯周树青说：“我们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未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江青大发脾气。姚文元变成了帮腔的：“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

这时，扑通一声，有人摔倒了。

他是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冯秘书。这几天，他几乎是连轴转，太疲劳，也太紧张，再加上肚子里空空的，一时虚脱晕倒了。

冯秘书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笔记本、文件也甩了出来。

第五十章 江青要报复戚本禹

冯秘书突然晕倒，江青被吓了一跳。她一边躲闪着，一边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傅崇碧了解冯秘书，忙说：“不要紧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同行的几个人，扶的扶，抬的抬，把冯秘书弄到一边。傅崇碧又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

“手稿在哪里？”江青的口气缓和些。

“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什么？”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气，又发作了。

“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把保密员叫来！”

保密员是一位空军的干部，衣着很整洁，模样也很文静，进门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首长找我有事？”他很恭敬地看着江青。

傅崇碧问他：“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

“在，就在楼上保密室里。”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着屋里的人，好似在说：问这干什么？

他又补充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 4 个箱子。”

江青两眼冒火，伸手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

保密员愣了，这是何故？怎么会使“文化革命的旗手”发这么大的火？周围的人再次愣了，这是怎么回事？

傅崇碧倒不觉得奇怪。一是江青是迁怒于人，把火气撒在别人的身上。她叫人查鲁迅的手稿，查了个遍，手稿就在她的身边，而且戚本禹还跟别人讲，她江青知道，她岂能不火？

江青见没人去抓保密员，又气又恨，跺着脚喊：“抓起来！”

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员的胳膊。

保密员急得满脸通红，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把我放开！我冤枉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把钥匙交出来！”江青恶狠狠地下命令。

保密员被人扭着，消失在门外。

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人们怕她再发火，急匆匆上楼抬下来 4 个箱子。打开来看，鲁迅手稿一扎扎、一束束地放在里面。

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阵，扔下，再拿一本翻看。

别人站在箱子旁边，等着她发话。大家都不敢动一动。她要再次发怒，说不定哪个又被抓起来。

看着看着，江青突然说：“不看了！封起来！”

瞧她骤变的脸色，人们不知她又看到了什么令她不快的文字。

“你们看着，封好。”

江青让别人封鲁迅的手稿，她站在窗前，挺胸抬头，不知在想什么。

箱子封好后，她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对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就在这里吃饭。”

“不用了，我们回去了。”

“叫你在这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是不是？”江青很执拗。

吃就吃吧，这样也可缓和一下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

江青对饭菜是很挑剔的。她说：“你们几位，这两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点吧，干革命嘛！”

傅崇碧心里明白，留他们吃饭，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江青说：“吃完饭，你们还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个坏蛋盗走了。你们去审问他，手稿藏在什么地方。”

手稿，又是手稿！在座的诸位都明白，江青可能要报复戚本禹一下，戚本禹说，鲁迅的手稿江青知道，江青却让人们去找，江青不成了贼喊抓贼了吗？

吃完饭，江青擦擦嘴说：“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盗，比鲁迅的更重要。你们一定要完成这重要的工作。”

……

第五十一章 又起风波

到了秦城监狱。他们再次把戚本禹提了出来。

“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眨巴着眼睛，说：“我，我，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

“你敢抵赖！你写文章没用过毛主席的手稿？”

“没，没有，绝对没有。”

又是一个对不上。江青到底搞什么鬼名堂？她真的要报复戚本禹吗？

“真的没有？”

戚本禹虽有些惊慌，但还是不肯承认这无中生有的事情。他说：“我借过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没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想，不妨打个电话问一下，不要再受骗了。

电话挂通了，听筒里传来汪东兴的声音：“他没借过手稿，是清样。”

……

他们赶回北京，立即给江青写了报告。

——这是钓鱼台事件的前半部分，后面，还有戏唱。

傅崇碧去了秦城，江青又发起疯来。她先找了周恩来，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本来知道此事，应该出来证明一下，他不仅不出来证明，反而火上浇

油：“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

越说越气愤，越说越升级。

“不行！这得叫傅崇碧做检查！”

“找杨成武，要他批傅崇碧。”

吴法宪赶快立正，忙不迭地说：“我马上就打。”

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悄声说：“吴法宪来

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了。”

“什么？”

秘书又重复了一句。杨成武这才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电话。

“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的指示。”

“干什么？我正开会。”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总理在不在？”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只能放下这边的会议，到钓鱼台去。

果然，“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都在，等杨成武进了屋，江青先发制人：“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叶群说：“他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成武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得了！”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杨成武好不生气，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卫戍区，就批傅崇碧？不让别人说话。他没好气地说：“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

江青哪能吃这一套，她听惯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哪能容得顶撞她。

她瞪起眼睛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跟着指责杨成武：“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第五十二章 诡秘的 3 月 22 日之夜

……

就这样，几条矛盾线索纠缠在了一起，使得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但杨成武还是没有料到事情会发生那么急剧的变化，会搞出一个“杨余傅事件”来。

“3·24 事件”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将军从此身陷囹圄。有人说，是林彪一手策划了这一事件；也有人说，是江青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人认为此事的背景复杂，至今还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地方……

1968 年 3 月 22 日深夜。喧闹的北京已经安静下来。

位于北京后海附近的杨成武将军住地也非常静谧。12 点半左右，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杨成武的秘书张忠庆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门卫的报告：“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这么晚了，他们来干什么？张忠庆忙出去迎接。见来者是林彪的两个秘书，他

和张秘书也认识。其中一个说：“101（林彪的代号）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的病情如何了。”

张秘书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几天前，由于过度劳累和紧张，杨成武患了美尼尔氏综合征。

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非见杨成武不可的，但这天他们执意要见首长，张秘书只好领他们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

杨成武坐起来，和他们打了招呼。

一个秘书说：“101 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另一个秘书说：“吃过药了吧？”

杨成武说：“谢谢 101，不要紧的。”

两个秘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这两位秘书，张忠庆告诉杨成武，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曾来过，当时他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就走了。

杨成武让张秘书回办公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不要让他来了。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接了电话，说：“吴司令正在开会，交待过，不能找。”

张秘书刚刚放下电话，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来的电话，声音很是急促：“张秘书，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张秘书一惊，虽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不少奇怪的事情，但军队内这么大的事情还是闻所未闻。他立即拨通了杨成武卧室的电话。

第五十三章 杨成武被抓走

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听后也感到很吃惊，在他们还没有搞清楚究竟发生什么情况时，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秘密包围了他们的住处，原来的警卫部队接到紧急命令，立即撤到景山。

凌晨 2 时许，“哐哐哐”的敲门声，“出来！不许动！”的叫喊声，“跟我走，快！”的呵斥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冲到楼内。

赵志珍刚推开门想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回答。全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被推搡着到了楼下的客厅，就连年近 8 旬的老太太和只有 10 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赵志珍要去叫杨成武，但把守客厅门口的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恶狠狠地说：“不行！”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了楼，闯进杨成武的卧室。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杨成武有点睁不开眼睛，他穿着睡衣，站了起来。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

大的墨镜。他身后是手持短枪的士兵。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道走出房门。几个士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着进厕所。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已经发生了大的变故。杨成武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几个人簇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进了客厅。这时，杨成武一眼就看见老母亲也被他们从房间里抬到乒乓球台上，心中更加气愤。两天前，杨成武的父亲在这里病逝，刚刚火化。母亲还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而且正在生病，她还能经得起这个沉重的打击吗？杨成武感到，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便大声说：“我要跟我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一个小头目当即拒绝，态度十分粗暴。

杨成武用肩膀使劲把那个人抗到一边，走到母亲身旁，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他又转身对孩子们说：“你们要管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奶奶。”

“快走，快走！”那个小头目又喊道。

在杨成武转身准备走的时候，母亲如从梦中惊醒一般，猛地扑过来，边哭泣边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

老母亲是想尽她的最大的力量和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儿子。但是，她不知道，此时已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能为力了。

杨成武被带出房门，儿女们大声哭喊着：“爸爸保重身体！”

杨成武一阵心酸，又猛然转过身，昂起头，大声说：“相信我！毛主席了解我！我不反对毛主席！”

杨成武走出楼门，见到一辆黑色吉姆车停在门前，车门开着。

见杨成武出来了，邱会作先钻进去，李作鹏伸手，示意杨成武上车，随后也跟着钻进车里。他俩一左一右为杨成武“保驾”。车队没有走大街，穿越小胡同，高速驶抵人民大会堂。

第五十四章 新疆厅的批判会

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地上铺着真正的和田地毯，墙壁上的装饰充满了维吾尔族的色彩。过去走进这个厅时总有一种浓郁的边疆气息。今天，杨成武却感到这里的气氛令人窒息。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十余人都坐在里面，中间有个位子，好像是留给谁的。

林彪一脸严肃，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平时好拿腔拿调的，这次一反常态，讲话干脆，也很有力量。

江青跳了起来，叫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江青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也跳了起来：“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的样子挺斯文，讲起话来却恶狠狠的：“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夫子”把眼镜往上抬一抬，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发言的声音很大也很响。由于激动，她的嗓子哑了。她用沙哑的声音声

嘶力竭地叫喊：“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说着说着，她带头呼起口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了枝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听不下去。诬蔑、造谣、栽赃……他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挥着手，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跳起来：“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杨成武没有再说什么，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说什么也于事无补。

三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把杨成武押解到西郊机场。一架伊尔十八型飞机已经发动，看样子是在等着他。一下车，他就被人架上了飞机。机上坐着一个班抱冲锋枪的战士。

这些战士倒很客气。他们问杨成武：“你喝水吗？这里有水。”

杨成武摇摇头。

其中一个长得很粗壮的干部说：“不要着急，能休息就休息一下。”

第五十五章 开始了软禁生活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了。杨成武一看，这不是武汉的山坡机场吗！几个月以前，他随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在这里起飞和降落过。

很快，他被押送到东湖宾馆。1967年7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巡视时，住过武汉的东湖宾馆。1968年3月25日，他又被押送到这里，所不同的是，上次住地是设备豪华的首长区，这次却是关在不住人的地下室。

从此，他开始了近7年的软禁生活。

说起“3·24事件”，杨成武将军回忆说，当时我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他们搞的？我脑际深处，曾经闪过，这或许是林彪授意吴法宪干的，是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干的。我没能想到的是，经过林彪多次进谗言之后，已经使毛泽东将信将疑，并同意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提法。林彪、江青一伙已经拿到尚方宝剑。难怪林彪在3·24人民大会堂的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说：“这件事，是在主席那里开了四次会才定下来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的问题。”

即使是在被押上飞机的时候，杨成武将军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开始了被“监护”的生活——杨成武被押送到武汉后，很快转移到湖北孝感，没有多久又被转移到河南。

他的妻子赵志珍和孩子们早已关押在这里。一家人得以团聚在囹圄中。

从被砖块堵起的窗户缝中，杨成武看到了著名的龙门石窟。两面青山，一泓碧水，依山而建的洞窟依稀可辨。他虽然没有来过这里游览，但对汉代著名的八大关之一，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蒋介石修的寺内行宫，杨成武都早有耳闻。他判断出被监禁在洛阳香山寺内。家人虽然来到了这里，但他们一家人都没有自由。门口有持枪的战士站岗，负责看押的人不断来找茬儿。没有了自由的生活就好比人间地狱。这与周围如画的风光相比，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

在这里，负责看押的人为杨成武一家制定了一套“让你死不了，也活不成”的规定：一、不准出房门，更不准下楼梯；不论春夏秋冬各处房门不得关闭。二、饭食定量，不够不添；每星期每人必吃两次忆苦饭。……

在关押他们的房间里，除了破木床就只有马桶了，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夏天热得像蒸笼，衣服被汗浸湿了，也没有换的衣服。全家人只有一把扇子——这还是在武汉山坡机场时，一位好心的战士给杨成武的。现在只能给老母亲使用了。

到了冬天，寒风刺骨，不给生火，冻得直发抖。母亲和姑姑年迈体弱，重病在身，过冬天简直就是过鬼门关。

吃的食物经常是发了霉的窝窝头，或者把烂菜叶、红薯叶、南瓜叶加糠用开水一拌，就端上楼来。按当时被关押人员的有关规定，杨成武和赵志珍的伙食费应为 1 元，其他人为 6 角，但实际上连 3 角也没让他们吃到。就连开水也从不保障，每天全家 12 口人只给 3 暖瓶水，除了老母亲、姑姑、杨成武夫妇外，孩子们无论冬夏都只能喝生水……

在这样的情境下，杨成武和夫人没有屈服，他们经常把眼前的情景和战争年代联系起来——有一次，赵志珍和杨成武谈起在晋察冀根据地时，抗日军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她们母女的情景。赵志珍说：“那一次，我们的住地突然被敌人包围，日本人逼迫群众交出我们，群众死也不说，鬼子竟残杀了五六个人！”

说着说着，赵志珍不禁潜然泪下：“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他们为了我们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和鲜血！”

第五十六章 给毛主席写信

杨成武说：“当年我们没有死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手里，现在一定要坚持下去，和他们斗争……”他还对孩子们说：“奸臣当权，忠良遭难，自古有之。要相信党和人民群众。只要我们问心无愧，掉了头也不要紧！”

杨成武要来了纸笔，噙着热泪一次又一次地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讲。”

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他不可能表示对林彪的意见，只能在信最后特意加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信交上去了，他们就开始盼望消息。他们多么希望毛主席能收到信，能从信中看出他的心思，能派人来让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啊。一封又一封的信，都石沉大海。事后杨成武才知道，他写的 20 多封信全部被扣押了，并被下令焚毁。多亏一个有远见的同志把这些信秘密地收藏起来。

在那几年的时光里，杨成武的家人都必须面对被关押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不同的抗争。

小儿子杨东成只有 13 岁，难以忍受这种寂寞的生活。一次，他偷偷溜到走廊上，爬到窗台上向外眺望。突然，“吧嗒”一声，他上衣口袋里的钢笔掉下去了，他看四周没有人，便悄悄地爬下去，把钢笔捡了回来，又小心地把堵塞物恢复了原状。

负责看押的人发现后，把四个男孩（杨成武的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叫到一个房间，进行审问：“好大胆子，谁下楼了？”

东成立刻站了起来，说：“是我。”

小头目下令把东成带走，并说：“好好教训这小子！”一顿训斥后，又逼着他写检查，还硬要他承认有“后台”。

一年春节前，下着大雪。东成站在楼上的栏杆旁，看楼下战士们杀猪，无意中在栏杆的积雪上写了一个“猪”字。专案组的人知道后，误认为是杨成武的侄子东海在骂他，非要狠狠整东海不可。东成便主动说是自己写的。于是，那个人就对东成一边骂，一边推推搡搡，强迫东成和他妈妈各写了几次检讨，还是过不了关。

有一次，二儿子杨东明坐在毛主席像前学习《毛选》，专案组的人来后，顿时大发淫威：“你为什么脊背对着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

东明轻蔑一笑：“你没有到过人民大会堂，每次开会时，主席台上的人都是脊背对着毛主席像，难道你敢说他们都反动吗？”

一句话气得那人暴跳如雷：“你想造反……”并命令几个孩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专案组的人还定时对看守班的战士训话：“杨成武是铁板钉钉的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了……”

如果说，年轻人尚能忍受，那么对于杨成武年迈多病的老母亲来说，已经经不起这样的煎熬了。入冬不久，他的母亲病情加重，所谓的医生既不看病，又不肯给药。天长日久，老人家骨瘦如柴，昼夜不停的咳嗽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

后来，一个看守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叫来一个女医生，她看也没有看，就说：“是气管炎犯了，不用看，过几天就好了。”又一次，杨成武的母亲胃疼得厉害，直在地上打滚，经苦苦哀求，医生才给了几片胃舒平，并说：“吃完就没有了。”

到了 1970 年冬，两年多的监禁生活使老太太的身体日渐衰竭，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奄奄一息的她躺在床上呼唤着：“孩子，我真想吃……吃个鸡蛋……”

在今天看来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要求，然而那时却使杨成武为难地低下头。那一刻，将军的心都碎了……

第五十七章 遭受非人折磨

听说奶奶想吃鸡蛋，孩子们掏出被关押前兜里剩的零钱，凑在一起，央求看守人员满足奶奶的一次愿望。可是，专案组头头却声色俱厉地说：“这里没有鸡蛋卖，有病就看病，吃什么鸡蛋！”值勤的战士不忍心看着老人受此虐待，背着有关负责人，悄悄地端来一碗软面条，说：“吃吧，出了事儿我兜着。”

就在这天夜里，杨成武的母亲被抬上了汽车，拉出香山寺。女医生随车前往，但不允许任何家人陪同，一家人寝食不安地惦念着她老人家的病情。

七八天后，女医生带回一个木盒，冷冰冰地对杨成武说：“这是她的骨灰。”

这消息对杨成武来说好似五雷轰顶。他戎马一生，不能侍奉老人，临到分手也不能见一面，杨成武悲愤不已，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事后得知，老母亲是被秘密送进第 132 陆军医院 5 号病房的。据说病房门口站着岗，既没有做病情检查，也没有进行治疗。陪同的人还对院方规定，不许任何人探望或接近病人，以致医院里传说来了个“神秘的老太婆”。至于老太婆叫什么，是什么人，患什么病，何时去世的，医院里没有任何记录或报告，至今仍是个谜。1986 年夏，杨成武再次去洛阳，来到母亲去世的医院时，强忍着泪水，对周围的人说：“那时候，若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有点人性的话，我母亲是不会那样快就离开人世的。”

杨成武的妻弟赵晶溪的命运就更惨了……

赵晶溪原是北京军区第 262 医院的医生，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林彪、“四人帮”的爪牙硬逼迫他揭发杨成武的问题，当然遭到严词拒绝。造反派便将他装进麻袋毒打，打得死去活来。看守还不准他上厕所，逼得他只好绝食。尤其令人惊骇的是，他们竟以强迫进食为名，将他的粪便再从嘴里灌进去，手段

极其残忍，令人发指。一直到迫害致死。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从 1968 年的 3 月 22 日开始，此后的几年里，杨成武的许多变故都和这个数字有关。

1971 年 1 月 22 日，又是一个漆黑、阴冷的冬夜，一群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将军的住处，把正在熟睡的孩子们从床上拽下来，又一个个点着名，强行把他们拖走。

孩子们的哭喊声，把杨成武和赵志珍从梦中惊醒，知道不好，急忙披衣而起，但房门早已被人把守住，不准出去。志珍只好挨个呼唤着每个孩子的名字，眼睁睁地看着几个拼命挣扎的孩子。杨成武也不停地高喊道：“你们要听党的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千万不能自杀！你们要百炼成钢啊！”

孩子们也不停地哭喊着：“爸爸，妈妈，你们要保重身体！”

在越来越远的凄惨的呼叫声中，突然听到当时正在发着高烧的二女儿杨俊生一声尖叫：“唉呀，我的胳膊！”便没了声音。事后才知道，挣扎中，她的胳膊被摔成重伤。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别竟是和大女儿杨毅的生离死别……

杨毅 1964 年毕业于人民大学中文系，是空军报社的编辑，也是林彪死党特别关注的人物，被认为是杨成武安插在空军的“钉子”。“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她先后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虽然身陷囹圄，却始终没有向淫威屈服。她从四川押来香山寺时，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在滑县，她被押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住的是“干打垒”的土屋，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来都不叫吃饱饭。杨毅的身体被折磨得很虚弱。

第五十八章 大女儿被打死

“9·13”事件后，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从捡来的报纸上敏锐感觉到，林彪出事了。她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出于对党的忠诚和信赖，她不怕威胁和迫害，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 40 多条罪行。很快，“中央专案组”派来一个人，说是要向她做调查。她也很认真地和那个人谈了话。

谁知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神秘地“自杀”了。有关当事人一口咬定杨毅是“自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那非人的折磨中，她熬过了漫长的 4 年，而当她看到光明，意识到有了希望的时候，却去寻短见呢？

专案组将此事报告到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的建议。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感到其中必然有缘故。他立即指示：要化妆，用棺木安葬。

打倒“四人帮”后，空军机关为杨毅平反昭雪，追认烈士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前，人们取出她的遗骸准备火化时，发现她身上除了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 6 根。经过法医鉴定，结论是：“外伤致死。”解开了所谓的“自杀”之迷。

杨毅是杨成武的女儿，更是人民的女儿。她是当年抗日军民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下来的革命后代，在她刚刚走完人生的第 32 个年头，竟惨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手里。杨毅罹难后，河南滑县人民自发地为她造墓立碑。她的生命是人民给予的，也永远安息在人民的怀抱之中。

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她性格刚强，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与林彪、“四人帮”之流做了坚决的斗争。她的命运比姐姐好些，因为管她的“专案组”组长缪锡跃不听专案组主要领导人的那一套，他认为俊生没有罪。因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在生活上给予关照，不时地向她透露些情况。杨毅的突然死亡，引起这位正直共产党员的警觉，他从许多迹象看出，杨毅之死，仅仅是个开头，一场新的迫害阴谋正在酝酿。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的分析告诉杨俊生，并把杨俊生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主席。主席接到信后，批给中央政治局，批示说：看来，杨成武是个冤案。与此同时，缪锡跃自己还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一些情况。

周总理在很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断然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一支到开封，一支到滑县，撇开专案组，以很快的速度，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出来。杨成武和赵志珍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转移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从此情况才有了好转。

杨成武知道大女儿的死，是 3 年多以后。

屋外的杨树叶子青了、绿了、黄了、落了。又青，又绿，又黄，又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杨成武夫妇坐在窗前，望着再次发青的树枝树叶，心急如焚。

快 7 年了！

7 年，多宝贵的 7 年，将军可以打两个解放战争，现在却被囚禁了 7 年。与世隔绝了 7 年。从东湖宾馆的地下室，被转移到山坡机场的单间房里，后又到了河南洛阳龙门和开封。在洛阳龙门的日子，他们全家又被分成几个“学习班”，由林彪的死党对他们进行逼供审讯，70 多岁的老母亲有病不能医，加上饥寒交加，很快就去世了……

在开封，曾关押刘少奇的房子，成了他们夫妇的居室，再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了侯马。

这 7 年里，他曾经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写过信，都没有丝毫的回音。这 7 年里，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人找杨成武谈过话……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从 1968 年 3 月 23 日起，他的家属都因为自己而被囚禁起来，上至 70 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他们有什么罪？凭什么也把他们关起来？

“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自己曾经想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啊！

第五十九章 “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就在杨成武一家人承受着巨大精神折磨、过着最难熬的日子的时候，忽然出现了黎明的曙光，一个战士悄悄告诉杨成武：林彪出事了！

杨成武相信自己的事情会有转机，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转机。

今天，树上的喜鹊叫个不停，赵志珍说：“莫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院门开了，进来两个陌生的军人，他们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其中一个很客气地对杨成武说：“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看来人说话的态度，不像那些专案组的人。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们。别又是什么新的圈套吧！他问：“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喜鹊还在院子里喳喳地叫个不停，杨成武对赵志珍说：“好事，咱们要解放啦！”

他们整理了一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跟着来人上了路。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北京白广路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他们早就认识。汪东兴说，他是奉命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觉得热血直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问题和最后出逃的情况。

杨成武说：“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那一阵子，杨成武的身体恢复很快，与其说是治病的良药起作用，不如说是愉快的心情起作用。

7月31日下午，中央军委的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以及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

邓小平、叶剑英等讲了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对他们的工作也谈了些意见，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工作。

这实际上是对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平反。

不久，周恩来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党政军的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发表了讲话。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谈话，一向是说古论今，不拘一格，谈开去，有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收拢来，又有当今发生的政治事件。他自然也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谈到贺龙，毛泽东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我保你，我是保他们的。

谈到此处，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

周恩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杨、余、傅都要翻案。

大家都没说什么，等着下文。

毛泽东接着说：“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

错误。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第六十章 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

又是一个“22日”——1974年5月22日。

杨成武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见他。快7年了，那天离开大会堂，再也没有见到过周总理！杨成武感到有许多话要说。

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杨成武看到很是消瘦的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忙迎上去，只叫了一声总理，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是啊，假如林彪、康生一伙提出的开设特别军事法庭的提议被通过，杨成武等将领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总理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放出来的经过后，语气沉痛地说：“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同志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直到这时，杨成武才知道几个孩子被带走之后，分别关押在河南滑县，进行劳动改造。

这期间，姐弟几人相互不通音信。大女儿杨毅被迫害得最厉害，轮番地批斗，变相地体罚，非人的待遇……

周总理安慰杨成武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杨成武先后失去了3个孩子——珍生、燕生、冀生。这3个孩子都是放在老乡家寄养的，尽管乡亲们用家中最好的食物喂养他们，可是恶劣的环境和病魔还是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自由的杨成武又有3位亲人——老母亲、大

女儿和妻弟被折磨致死。

周总理很动感情地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后来，在重病和百忙之中，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所以只要说起总理，杨成武总是心存感激。

1974 年的 9 月 30 日夜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 25 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怎能不感慨万千。6 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了。

这是三个人被“解放”后的第一次相见，该说点什么呢？该从哪里说起呢？

看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在台上谈笑风生，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笑了，也只能笑笑而已。

这笑，是辛酸的笑，是苦涩的笑，也是一种压抑的笑。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出来了，还是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

他们没敢再多说一会儿，如果逗留时间再稍长些，很可能会出现：“‘杨余傅’又聚会了”的谣言。

人言可畏啊！

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有了一份工作心情会稍好些，他们的心灵上还压着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他们还有着深深的忧虑。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才逐渐拂去他们心头的乌云。

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第六十一章 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这份发到县团级、传达到群众的红头文件指出：1968年3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

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

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

党中央的决定中说：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

决定中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党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决定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解放”了的杨成武，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在那座临近北海的总部大楼里，他曾经工作过十几个春秋，“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身为副总参谋长的他，要求自己“上下请示，左右求援，既不失职，也不越权”。现在又回来了，大楼依旧，物是人非，这16字的方针还管用吗？

那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总理给毛主席的一个报告。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10月20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10月下旬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

中青年干部。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同志改正。周后注 11 月 9 日）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工作和学习。待成熟了，小平可以不兼总参谋长，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都是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

看了这封信，杨成武深深感到总理的信任，也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面对十分复杂的局面，他将怎样开展工作呢？

许多年后，将军向笔者说起自己当时的心情：那段时间，真是很难啊。主要是上面有两种不同的势力在斗争。一方是叶帅等老同志，另一方是四人帮的势力，而总参历来是斗争的漩涡……

第六十二章 忆往昔峥嵘岁月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顿。杨成武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打心眼里拥护。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 年初，周总理逝世。在悼念的队伍里，杨成武流下了悲恸的泪水。

总理逝世以后，政治斗争更加复杂。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在指挥演习时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派杨成武和梁必业、张震一起去处理后事。

——这实际上是叶帅一个策略。把他们派到福建去就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的政治漩涡。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他们可能还要过一阵子才能回到北京。……

紧接下来的就是那场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杨成武起到了自己特殊的作用。叶帅主持军委工作时，杨成武是主持工作的副总长。他们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后来，叶帅被迫“靠边站”了，杨成武照样向他请示。

那天聂荣臻元帅把杨成武找了去，对他说，那几个人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你要告诉叶帅，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

禁了，那就麻烦了。聂帅还说，他们有特殊身份，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可能要出大事。

当晚，杨成武上了玉泉山，找到了叶剑英，对他说：“叶帅，聂帅有要事转告您。”

叶帅摆了摆手，说：“出去散步。”

杨成武明白了，叶帅是担心隔墙有耳。听了杨成武的转告，叶帅说，我们的想法一样。

那几天里，杨成武往返于几个老师之间，给他们当起了“联络员”。

10月5日叶剑英又把杨成武找了去，要他告诉聂荣臻，已经商量妥当，准备马上采取行动。同时叶帅又叮嘱杨成武：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在欢庆胜利的人群里，人们看到将军的身影。他和全军将士一道，欢呼这历史性的胜利。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1977年12月，杨成武将军又经历了一次职务的变动——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约杨成武在三座门谈话。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中央决定你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等形势缓和后再回总参工作。

叶帅、聂帅都对这次工作安排谈了各自的意见，并叮嘱他一定做好战区的工作。

杨成武没有想到中央军委派自己到福州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听完几位军委领导同志的谈话，他表态说：对于组织上安排，自己历来是没有二话的。

他很快打点行装离开了北京。

福建是杨成武的故乡，能到故乡担任大军区的司令员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在福州军区工作的时间里，将军依然是十分紧张忙碌的。

他轻车简从，抓部队战备训练；他深入基层，努力培养中青年干部；他废寝忘食，抓军民共建、老区脱贫……

工作之余，他拿起了笔，写当年的战争经历，写自己切身的感受，写牺牲了的同志和战友……

正是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思考

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特别是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后，他有机会到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闽西的大山，泸定桥的铁索，狼牙山的峭壁腊子口的险峻无不引起他的情思。

在老区的红土地上，他仿佛又回到了峥嵘岁月，又钻进了战火硝烟，又焕发了青春……

在老区的红土地上，他留下一串战将的脚印。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

第一篇第七章二、朴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

（该书第 234-243 页）

《吴法宪回忆录》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一、“杨、余、傅事件”（第 712-730 页）

2008 年 6 月 24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祸首除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联翩出现的革命委员会，象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现在，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在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壮丽一幕。

一年前，当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天才，高瞻远瞩地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总结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一年多来，它在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中，已经显示出朝气蓬勃的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深深地扎根于群众。毛主席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群众的代表，特别是工农劳动群众的代表，是有实践经验的革命战士。他们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利益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就使得各级革命委员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这对于保证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血肉相联，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革命的“三结合”，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军民团结发展

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多来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受到很大的锻炼。由于解放军代表直接参加了各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更能够经受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就更能够粉碎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

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他们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帮助，深刻地触及了他们的灵魂，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在革命委员会中，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好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地组织和带领群众前进。同时，在革命委员会中，有老干部同年青的新干部一道工作，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做到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这就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组织上有了保证。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同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它有着自己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象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做那样，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这样，就能够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要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革命司令部，就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断地巩固起来的。

革命委员会千好万好，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战员，是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识别和选拔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他们正在把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对自己的最高要求。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员，要继续把学习毛主席指示、执行毛主席指示、宣传毛主席指示、捍卫毛主席指示，当做自己最神圣的职责。革命委员会要保证毛主席的各项指示能够最迅速最准确地传下去，使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它还在发展。一切革命的同志，应该爱护它，支持它。对于它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提出批评，帮助它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一切参加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模范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十分注意扫除脱离群众的灰尘。

星罗棋布在祖国各地的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将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树立起无产阶级权威，发挥出巨大的革命作用。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国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这是湖南人民的大喜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我们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湖南三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湖南部队，致以崇高的战斗的敬礼！

湖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在阶级斗争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又亲临湖南视察，作了重要

的指示。在庆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湖南，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湖南的代理人，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他们的末日。这一小撮混进我们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同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相勾结，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工人阶级、广大革命人民和驻湖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心明眼亮，精神抖擞，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敌人以坚决的打击，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各种阴谋，取得了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反革命力量必然越要同革命力量作拚死的斗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按照毛主席关于“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教导，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能够率领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革命司令部。

我们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别那些伪装

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对自己人,对犯了错误的革命同志,不论是革命群众或者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全省军民,要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深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英雄儿女,一定能够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趁大好形势,乘浩荡东风,把湖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至此,全国已有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我们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宁夏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宁夏全体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宁夏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给宁夏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引导他们冲破重重困难,彻底粉碎

了杨、马之流在宁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宁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时传达和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密切联系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的巨大努力，大大推动了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迎来了塞上江南的无限春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场革命的胜利发展，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而取得的。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宁夏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正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宁夏地处西北要地。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广大革命人民要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敌人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军民关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特务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三十二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举世无双的工农红军，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篇。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坚信，宁夏各族革命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研究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最精辟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是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的持久的进攻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不能说没有问题了，阶级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非常复杂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越是在大好的形势下，越是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尖锐、复杂。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右倾翻案风。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变色龙杨、余、傅的阴沟里刮起来的，是通过他们在河南的代理人刮起来的，是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来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我省刮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批示，也就是说，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历史阶段所作的英明的结论。去年二月到七月，河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了。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执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也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这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明目张胆地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批示，要翻两个历史阶段的案！

二、对抗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到处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中央对河南问题的第一个批示公布以后，毛主席的声音一传到广大群众之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保守组织很快分化瓦解了。本来那个地区没有那么多派别，一些没有革命历史的保守组织早已垮台了。但是，在这股翻案风中，又改头换面重新拉起山头。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解放军，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革命造反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三、在干部问题上故意制造混乱，抹杀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拉起队伍后，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和坏干部。毛主席说，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可是，有些干部到现在还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执行了反动路线不但不检讨，还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死保他，把他封为“革命领导干部”，硬要把他拉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却扭住不放，抓住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非要把他们搞臭搞垮不可。

四、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刮翻案风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其实，他们所反的恰恰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总是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干扰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经常保持警惕就是了。去年八、九月间，我省一些地区一度出现过极“左”思潮，但是，我们进行了坚决抵制，很快就把它克服了。从去年十月开始，右的思潮就逐步抬头了，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反击了一下，杀了一下这股风，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这股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了，最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如果不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英明果断的决定，把刮翻案风的黑后台、变色龙揪出来，地下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多。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么？！对于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的这种进攻，我们必须坚决杀退，坚决打击。各级革命委员会应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领导这个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当然，在反右的时候，要防止“左”的东西抬头，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来破坏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极“左”思潮的派别，在新的形势下，和原来的一些保守组织结合起来了，和右倾翻案的妖风结合起来了，叫做“左”右合流，这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打着反极“左”思潮的旗号，其实，极“左”思潮正是他们鼓吹的，他们支持的，是为他们的翻案活动服务的。形“左”实右，他们是一致的。这里，我举个例子，驻马店有个从二七分裂出去

的组织，叫什么“红旗”，打着二七的招牌，搞分裂主义，不管他是右倾分裂主义，还是“左”倾分裂主义，反正现在和当地的保守组织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共同支持的是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们共同要打倒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矛头都是对着解放军，对着革命委员会，对着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纪登奎同志：已查明背后有反革命分子操纵。）又比如省广播电台，有一个打着二七招牌的所谓“狂派”，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也和去年二月逆流中搞反革命夺权的人物合流了，一起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支左部队。报社也是这样。“左”右合流，都是搞翻案。（纪登奎同志：极“左”就是极右。）河造总在上蔡的一个基层组织，叫“上造总”，印发反动传单，被革命造反派发现以后，还把传单寄到省革命委员会来告状，说是“内部传阅”，“二七压了我们”。我说，压得对，就是要压。这种反动传单，在外面散发是反革命，在“内部传阅”也是反革命。省革命委员会通知他们来郑州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竟然在车站把县革筹小组长打了一顿。象这样的坏组织，河造总还不应该把它清理出去。

五、在这股翻案妖风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打倒谢富治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北京消息”满天飞。在这股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洛阳街头贴满了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大字报。郑州有些人好象“聪明”一点，有些单位写好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没有贴，还要看一看风声。河南医学院红卫公社就写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只是没有贴出去。洛阳“十一”自称，打倒谢副总理是杨成武支持的，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现在，他们失败了。一反击右倾翻案风，洛阳“十一”的一些坏头头，带着机关枪逃跑了。操纵这个组织的后台前台都是当权派。（纪登奎同志：是洛阳地委的一个副秘书长，叫陈渊。他参加了好几次秘密会议，第一次在电厂召开了策划炮打谢副总理的黑会。第二次开会成立了地下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确定了，他是第三位。第三次会议没有开成，就带着机关枪跑了。洛阳造反派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把他抓住。）他跑不了的。反革命传单很多，各地都有发现。南阳就有什么“宛城诗人”、“小灵通”，反动得很。甚至诬蔑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周总理，攻击中央文革，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南阳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注意，值得当地的人民解放军注意。要抓这个东西。谁反对周总理，谁反对江青

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王新同志：河造总开了很多次会议，炮打谢副总理。）省直机关有个坏家伙叫高绍堂，策划炮打谢副总理，河造总的同志自己把他揪出来了，这很好！（纪登奎同志：河造总在北京有个联络站，专门搞小道消息，搞反革命活动，搞炮打谢副总理的传单。其中有个人是十三所姓于的。十三所的造反派为什么不把这个姓于的揪出来。）他们搞谢副总理，相当普遍。这股风是从阴沟里刮出来的。他们散布的所谓“北京消息”，都是从阴沟里出来的消息。（王辉同志：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恶毒得很。）中央文革揪出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本来是大好事，但是，他们却借此大作文章，抛出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说谁谁谁是王、关、戚的黑后台，流毒很广。现在清楚了，王、关、戚的黑后台是杨成武嘛！并不是你们要打的人。抛出很多反动的传单，散布很多反革命的谣言，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这是制造反革命舆论。商丘一个剧团到夏邑演戏，这曲戏非常反动，名字就叫“王、关、戚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时向中央汇报，是我和王新、纪登奎、王洪智同志四个人去的，这件事我们最清楚。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批准的，这和王、关、戚有什么关系！（王辉同志：这个问题查清楚了，是一个叛徒搞的。）我早就说过，这个剧团有坏人，肯定是这些人搞的。奇怪的是夏邑没有人抵制这种反革命的东西。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现在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不好混了，他们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到处挑拨离间，削尖脑袋往群众组织内部钻，煽阴风，点邪火。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统统揪出来。驻马店那个叫什么“红旗”的组织里边，就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他们的黑高参。（王辉同志：已经抓了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同志们，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联系我省的实际情况，展开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阶级敌人刮起的这股反革命的翻案妖风杀下去，彻底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江青同志。

这里，我要特别向同志们讲的一件事，就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杜河堤同志：他是总后台。）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了手。在这个问题上，戴苏理犯了严重错误，大家应

当揭发批判。我们已经开过两次小会，现在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耐心地帮助他、挽救他。（耿其昌同志：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一定有总后台，不然为什么这样统一？这样一致？）

戴苏理在历史上所犯的 error，我不想讲了，只说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error。戴苏理散布过这样一种论调，好象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他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潘复生同志和我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查，我不讲了，我的 error 我作检讨。戴苏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 error，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去年二月逆流中，他是破门而出的，跳得很高，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革命造反派。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讲，是和群众组织不一样的，群众组织造过反，犯了 error，是犯 error 的造反派。一个领导干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还不是路线 error。当然，在二月逆流以前，他支持过某些造反派，特别是郑工造总。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要说明清楚，那是我们统一研究的，是我派他去的。毛主席说，犯了 error 改了就好，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戴苏理究竟改了没有呢？是不是站过来了呢？（众答：没有。）（杜河堤同志：他是长期的、顽固的坚持反动立场、反动路线。）在北京的时候，我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他谈过三次话，是耐心地争取他，希望他从反动路线的泥坑里爬出来的。但是，他说：“站队站对了，不能再站了。”（李忠顺同志：他到现在还说，立场错了，队没有站错。）这是什么逻辑！当时，他说这个话，使我非常愕然。（王辉同志：他插手了八个地区，好多事情他都知道，全省来郑州大游行是从他那里来的。）在北京汇报期间，驻马店保守组织找他谈了几个钟头，他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群众，出了许多坏主意，包括保坏干部在内。这个材料造反派的同志得到以后，我转给康老了。康老有三点指示，让我告给戴苏理。第一点是，戴苏理不老实；第二点是，问你要把群众带到那里去？第三点是，问你为什么老说何运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戴苏理尽管犯有这样严重的 error，我们回到河南以后，还是耐心地帮助他的。我一回来，就请纪登奎同志给他谈话，我也找他谈过话。在河造总有些人为了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筹静坐的时候，我要他出来做点河造总的工作，希望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可是他误解了我们对耐心帮助的心情，相反地认为我们犯了 error，得罪了某个群众组织，非要请他

出马，不然我们解决不了。正因为他有这种错误想法，所以他的工作做得是不好的，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而是以此作“本钱”，向我们讨价还价。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尽管这样，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二七公社的同志，对他是很不谅解的，非要开十万人大会批判斗争他不可。但是，我们还是从耐心地帮助他出发，说服二七公社的同志没有这样作，给他改正错误的时间。今天，二七公社的负责同志都在场嘛，我们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向中央汇报的时候，一方面说明了上述情况，一方面还讲我们对戴苏理仍然寄予希望，说服广大革命群众，让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挽救他，要他立新功。但是，从现在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戴苏理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希望。他利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合法身份，利用在某些群众中的影响，继续蒙蔽一些群众，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干部，大刮反革命翻案妖风。他想借这个东西把我们的阶级阵营搞混，以达到翻案的目的。我们说，这是做不到的。戴苏理对他参加三结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有一派势力，非让他出来收拾局面不行。这样想就大大的错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什么问题他都会看翻的。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最近，我看到戴苏理的女儿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儿子的。这封信里说：“你搞垮革委会困难很大”，“你们独立是一件很蠢的事”，“我一直在学习‘左派幼稚病’”，“你们原可以在革委会内部造反，布尔什维克连最反动的议会都参加过，你们为什么不能留在革委会内部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他儿子颠覆革命委员会。她这个观点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你的儿子，竟然在登载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经验的报纸上逐段的“批判”，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李文忠同志，你的儿子思想为什么这么反动？你的老婆又是一个叛徒。如果你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你的家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仇视，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此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你女儿的信中还劝你回家种地。种地并不坏，问题是你的消极情绪。我看你有时候消极，有时候并不消极。前些时候你的宿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你不是积极得很，为什么现在又消极了呢，要回家种地了呢？你的女儿还说“就怕刘建勋不让你走，离开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个话如果是出于孩子们的年幼

无知，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是你的指导思想，认为河南离开你就不行了，非让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那是非常错误的。在座的同志没有谁都可以，不要把自己估计得那么高。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犯了错误，除非改正，别无出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这样作，对你进行揭发批判，还是为了帮助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再站错队，再站过来就是了。当然，我们是外因，戴苏理自己认真进行思想斗争才是内因。我们一定做到仁至义尽，在座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都要以诚恳热情的态度，耐心地帮助戴苏理同志。希望戴苏理同志改弦更张，不要自绝于人民。

（王新同志：批判戴苏理的斗争，在河南来说，就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是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戴苏理确实利用他参加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到处欺骗群众，拉势力，仍然要把一部分群众引导到错误路线上去。上次我们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都讲了，希望在我们河南不要出现大反复，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不要搞两面派。那时候我们是有所指的。建勋同志在讲话中也讲，不要反中央的两个批示。都是有所指的。但是，那次会议以后，戴苏理完全是背道而驰，利用他的合法地位搞翻案活动。开始我们不很清楚，根据这一段揭发的大量事实看，他继续蒙蔽干部，蒙蔽群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刮翻案妖风。在思想上，大造舆论；在组织上，大拉势力。很多地方革委会成立以后，他又拉出势力来。他确实是在搞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不彻底揭发批判他的错误，不利于挽救他，不利于教育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激烈尖锐的斗争中，有些人又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俘虏。通过对戴苏理的揭发批判，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受到锻炼，使受蒙蔽的同志进一步受到教育。所以决定开这样一个会议。这是关系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纪登奎同志：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要领导广大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夕召开的，意义确实重大。这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次会议。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革命群众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大家要团结一致，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带领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地、持久地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后，让我们来呼几句口号，结束我的讲话。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谭震林！

打倒杨、余、傅！

打倒王、关、戚！

打倒王任重！

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右倾分裂主义！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

反对右倾保守主义！

坚决杀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中，又传来一个新的喜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我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安徽三千五百万革命人民，以及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胜利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经过反复的较量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隐藏在安徽的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叛徒、特务，就是这样一些早已覆灭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甘心于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或者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者散布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者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充分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关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作出了英明指示，指明了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航向，引导英雄的江淮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畏的英雄气概，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在安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年多以来，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样，经受了很大的革命锻炼。我们希望，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在胜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里我们要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定不移地学习、宣传、执行、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为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胜利前进，立下了巨大的功绩。

我们希望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诞生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彻底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肃清他们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使自己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率领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把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大节摆在首位。这就是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要进一步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带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抓好煤炭、钢铁、粮食生产，搞好水陆交通运输，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我们深信，经历了阶级斗争暴风雨考验的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军民，一定

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紧跟伟大舵手毛主席破浪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我们打垮了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的进攻以后，当前又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逆流。有些坏家伙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江苏的代理人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叛徒、特务翻案，为黑手翻案，搞保杜、保高活动，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故意制造混乱，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经常放阴风，点鬼火，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关系，挑拨军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甚至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他们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甚至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不放，进行恶毒攻击，妄图否定伟大的群众运动，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这些现象，说明阶级敌人还在作垂死的挣扎。但这并不要怕，它们不过是几只嗡嗡叫的苍蝇。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种反革命行为不愤恨、不追查、不回击，对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不批斗，对混进自己组织的坏人不坚决清除，对黑手不痛恨、不揭发，有的甚至继续打内战、闹分裂。收交枪支的协议，已达成四个多月了，据说有的单位还没有全部上交，这在客观上起了掩护敌人的作用，对当前斗争十分有害。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今天胜利结束了。

上午，王新、纪登奎同志都讲了，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我再简单讲几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大大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展开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这是一次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誓师大会。

从会议期间大家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大搞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

这次会议把戴苏理的问题一揭开，前一段我们不能顺利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快实现全省一片红的症结所在也找到了。三月初，我们常委的同志从煤矿回来以后，各个地区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都搞不动了，几乎停顿下来了。这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但是警惕性不高，没有想到戴苏理会搞这一手。我们对戴苏理也是逐渐认识的。

关于戴苏理的问题，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把大概的情况讲了。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在革命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疯狂地进行翻案活动。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是，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批示。其次是，拉山头，搞分裂，一手扶植保守组织，一手支持形“左”实右的分裂派，也就是戴苏理称赞的那个所谓“猴派”。第三是，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抹杀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蒙蔽群众，死保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进行翻案活动。第一步，想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第二步，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戴苏理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陶翻案，为文、赵之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戴苏理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的时候，自鸣得意的是两张“王牌”，一是借口所谓“反对极‘左’思潮”，一是借口所谓“反派性”。他的这个阴谋，我们必须戳穿。

戴苏理口口声声说，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反右不反“左”。他到处唆使受他蒙蔽的一部分人和他的同党，借口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省革命委员会，诬蔑纪登奎同志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其实，他所反对的极“左”思潮，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午纪登奎同志讲了，去年八、九月份，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河南视察时的重要指示，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曾经坚决抵制了一度出现的极“左”思潮。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右倾的苗头就出来了，到十二月份就闹的很凶了，很严重了。当时，为了抵制这股右的思潮，王新、纪登奎、王辉、杜河堤等同志分别在军队的、地方的几个会议上讲了话，我也在有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主要服务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了话，重点都是同右倾思潮作斗争的。我的讲话最后也顺便批评了某些地区还存在的极“左”思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对于阶级敌人来自极“左”的方面和右的方面，或者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我们都是坚决抵制、坚决斗争的。但是，戴苏理却在背后嘀嘀咕咕，到处散布我们只反右不反“左”，这完全是诬蔑和攻击。实际上，他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派性是有阶级性的。戴苏理攻击我们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戴苏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来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来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的。

为了更好地增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防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本着毛主席要“斗私，

批修”的教导，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展开了“斗私，批修”的斗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敢于“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这是对的，无可非议的。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反。我们什么时候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但是，阶级敌人是无空不入的，我们这种革命的口号，也被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戴苏理接过去了，把它用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而后快，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而后快。好象只有他们刮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自由，没有我们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权力。就是只许他们放毒，不许我们消毒。如果我们去消毒，就说我们是“派性”。这是一切阶级敌人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惯用的手法。他们扬言要“四大”，要“民主”，要“自由”。其实，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

以上，就是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两把板斧。戳穿了，无非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的斗争，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起来了，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经过这次全会扩大会议，必然会使这场斗争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主动地、不停顿地进攻，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敌人是非常狡猾、非常阴险的，我们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识破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把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我们要继续广泛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里，我想特别着重说一下革命大批判的问题。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大批判运动。我们就是要彻底批判旧世界，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只有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才能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从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可以看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并没有斗倒斗臭，他们一有气候和温度，就跳出来进行反扑。最近，文敏生、赵文甫之流交出了一个所谓“检讨”。一看便知，是假检讨，真反扑。这说明，前一阶段他们是躺下装死。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戴苏理同志在这次全会上的检讨，同志们都听了，是极不深刻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现在我们还是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彻底交代，承认错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矛盾掩盖起来。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我们必须把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活动，为刘、邓、陶翻案的罪恶活动，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翻案的罪恶活动，彻底揭开，加以批判，批判得越深刻越好。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对戴苏理有所帮助，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有这样一些干部，过去他们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只要他们深刻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可以挽救，可以不打倒的。但是，这些人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在戴苏理的指使下，不但不承认错误，还继续蒙蔽一部分人死保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当了那个地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后台。这就可能要打倒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是走资派？还不该打倒？！这次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也害了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把戴苏理的错误揭发出来，把他批倒批臭，就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对戴苏理所犯的错误，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打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对这次又站错队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我们仍然坚持“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外，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他们、信任他们的。我在一次省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过争取边缘人物的问题。希望那些到了边缘的边缘人物迅速猛醒，不要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滑下去。我所指的就是受戴苏理影响的一些干部，包括戴苏理在内。现在，我对这些干部，再一次提出忠告。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可是有一些干部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现在能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愿意帮助他们。如果死不悔改，象戴苏理那样搞实力政策，拉山头，搞分裂，以为“人多力量大”，就可以保自己，就可以当核心，继续蒙蔽群众，搅乱阶级阵线，那就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于在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受了蒙蔽的群众，我们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当然，其中极个别的坏头头是要揪的。但是，为了更好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搅乱阶级阵营，那个组织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去揪。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

总之，在这场斗争，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杀退右倾翻案妖风。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逐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里，我再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不要因为有的群众贴过炮轰刘建勋、纪登奎的大字报而整他们。这个，问题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工作中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的，我们欢迎革命群众提出批评意见，炮轰也可以。不要因为炮轰我们而去整群众，更不能把贴这种大字报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至于有些人贴大字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要坚决地和他们作斗争。我们要誓死保

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关于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要注意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纪登奎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讲这么多。

最后让我们高呼：

坚决打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级。在各个阶级内部，又存在不同的阶层。各个阶级和阶层，在政治斗争中，都会有左、中、右各派的区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作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列宁说：“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它归根到底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的。”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并以党派斗争的形式最充分地展开。政党和政治派别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资产阶级有不同的党派，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两派。工人运动内部也有不同的党派。在第一国际内部，有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派别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二国际有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同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派别的斗争，考茨基曾经

在一定时候是中派，大战中变成了右派。在第三国际的斗争中，列宁、斯大林是真正的左派，布哈林是右派，托洛茨基是形“左”实右派，后来变成赤裸裸的反革命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是工人运动中的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别动队，它的基础就是工人贵族，它的思想，实际上是反映在工人阶级内部、企图腐蚀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指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这是真理。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只有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部队，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完整地、真正地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才能有最强烈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党性。我们一般所说的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党性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派别，就其世界观来说，基本上就是两大家，就是这两大阶级的党派性。

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说，不仅要看他们的口号和言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实际上站在那个阶级一边，执行的是那个阶级的路线，他们的行动对那个阶级有利。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无产阶级先锋队历来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正如毛主席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切无

产阶级革命派，都必须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个教导，使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胜利地前进。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就容易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加强无产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团结，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对于资产阶级的派性，必须坚决给以揭露。谁如果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而又坚持不改，那是很危险的，那就有可能站错队，甚至被坏人利用。对于小资产阶级要加强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

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是为了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列宁曾经说过：“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做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形“左”实右的极“左”派，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今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在欢庆自己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快两年了。这场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中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步地被人们觉察出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的形势。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遍及全国城乡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推动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把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猛烈的进攻。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带动了生产，工农业战线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是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总结丰富的阶级斗争实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那些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利令智昏，竟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把这样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从阴暗的角落里冲刷了出来，使他们的丑恶面目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敌人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用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作垂死的斗争。

正因为这样，处在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决不能因为胜利，就骄傲和麻痹，懈怠起来，放松对敌斗争。必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流毒，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要善于识别反革命分子的卑鄙手段，要善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粉碎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和分裂我们的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粉碎他们一切复辟、变天的痴心妄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特有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作为无产阶级的左翼，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新形势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切实地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原则性，同阶级敌人那些从右的方面来的或者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进行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我们永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同广大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自己的敌人，必须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必须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加强工农联盟，团结绝大多数人。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广大群众和混入其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团结对敌，始终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而绝不能把矛头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和革命群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劳动群众的子弟兵，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运动，大力加强军民团结。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正呈现出新的高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伟大的新风暴，亚非拉地区人民革命武装斗争蓬勃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各国反动派法西斯暴行的正义斗争的新发展，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团体革命斗争的新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苏修叛徒集团等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加速分崩离析，就是当前国际形势大好的突出标志。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给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们一定不辜负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的期望，坚定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一定要更有力地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更好地完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乘胜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继续胜利前进。在无产阶级的战斗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隆重地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兴奋地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两千一百万陕西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陕西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敬礼！

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把“延安还是西安”比作“革命还是反革命”，以此来教育我们划清敌我界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胜利斗争的革命中心；西安，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一个反革命重要基地。延安和西安的斗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关系着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

解放以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死党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怀着狼子野心，苦心经营，妄图在西北和陕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搜罗了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拼凑了一套又一套黑班子。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实质上，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大造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之流的反。斗争是剧烈的、艰苦的，但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广大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经过反复的较量，终于摧毁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陕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遵照毛主席“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教导，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广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

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宣传活动，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军民团结，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要防止斗志松懈、停滞不前的情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顾革命的大局。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妄想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分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活动。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决不准许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我们希望，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继续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拥军爱民。要发扬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时刻注意克服脱离群众的各种倾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所有参加省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同志，都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

我们相信，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在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把陕西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

两年前的一个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诞生了。

这个《通知》，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划时代的文献，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军的战斗号令。

两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这两年发生的革命变化是多么巨大啊！毛主席在《通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抵抗，武装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发挥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威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年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毛主席在《通知》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充分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造性的发展，它对于我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

在这两年中规模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象大海的怒涛，把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垮了，把那些反共、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冲刷出来了，粉碎了他们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现在，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的确凿事实，已经查明，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

富、反、坏、右利益的反革命黑帮。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党内头号的走资派，就是多次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脚下的可耻叛徒。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以及陶铸、彭德怀、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等，都是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家伙，钻到了我们党里，窃据了不少重要的岗位。他们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中国就会重演苏联和一些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统治的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悲剧，就会回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

我们同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正如毛主席最新指示所深刻指出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我们党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又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继续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象那些极端狡猾，极端阴险毒辣，藏了那么久，钻得那么深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正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动起几万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才把他们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亿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在这场大革命中对这些阶级敌人进行惊心动魄斗争的伟大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战斗的光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以从来没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在《通知》的鼓舞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情，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高涨。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斗争中涌现出来。

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进一步取得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

在政治思想领域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无产阶级压倒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压倒无产阶级。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对毒草，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是要坚决斗争，坚决批判。无产阶级就是要压倒资产阶级，对他们决不能讲什么“平等”。正如毛主席在《通知》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两年来，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进行革命大批判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各种不同的思想，都还会登台表演。那些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还会采取不同的伪装，采取两面派手法，进行欺骗。我们必须继续执行“破

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指示，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对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继续进行批判。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性，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想，批判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流派，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从思想上扫清道路。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各条战线上高高飘扬。

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正如毛主席指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主席最新指示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这种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由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的丰硕果实。它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这种权力机构，代表着工农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更好地帮助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权力机构。这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力量（革命群众代表）、坚强柱石（人民解放军代表）、领导骨干（革命干部代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军民的

团结，军政的团结，干群的团结，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民群众最充分地发动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都在关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大问题，积极参加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这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的专政，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专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取得全面胜利，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越来越发挥出巨大的革命威力。

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是灿烂辉煌的，不可磨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

那些面临末日而又不甘心自己死亡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疯狂地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他们怎样进行罪恶的阴谋破坏活动，不管他们怎样掀起右倾翻案的妖风，到头来，只能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面前撞得粉身碎骨。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年来巨大胜利的影响，广阔地波及到全世界，鼓舞了各国革命人民的战斗意志。无论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国家，在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统治的国家，我们都看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推动革命的群众运动方面所起的一定作用。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全世界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们的热情支持。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极大的恐惧、仇恨和惊慌。这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夭折”，寄托在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垮台”。他们象巫婆那样，恶毒地诅咒“文化革命前景暗淡”。但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前进的步伐，踏碎了这些老爷们的痴心妄想。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正在冲决一切障碍，汹涌澎湃，奔腾向前。

我们正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的斗争任务仍然是艰巨的。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乘胜前进。我们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要经常深入地注意调查研究，善于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要坚决维护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纯洁和巩固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向阶级敌人继续发动进攻。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必须坚持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方针。

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红色字体是毛泽东审稿时加上的）

我们要掀起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的热潮，继续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力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的功勋。我们要继续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军民团结。

我们要爱护和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使它不断地巩固和完善，使它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战斗指挥部。革命委员会应当领导千百万群众去夺取新的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全面地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坚持不懈地战斗吧！新的胜利在前面召唤我们，让我们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照遍了巴山蜀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胜利前进的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省七千万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四川的全体指战员，致以战斗的敬礼！

四川，是我国的战略后方。解放以来，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封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声音，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地在各条战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企图把四川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四川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一小撮又和社会上残留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猖狂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扑，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军民团结，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次又一次刮起右倾翻案妖风，进行垂死的挣扎。

在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中，贯串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当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还处在相当艰苦的时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四川很有希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四川革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

勇往直前，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击退了一次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终于取得了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四川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死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决不能使我们麻痹起来。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搞翻案：妄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翻案，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右倾翻案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足为怪。我们要坚决粉碎右倾翻案风，开展持久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把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努力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兴风作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少数的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最近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这一指示，透彻地揭露了世界上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共同的反革命本质，透彻地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本质，向我们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自己工作中，永远要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乘胜前进，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流和支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切不可中了坏人的挑拨。要爱护和支持革命委员会，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支持和拥护人民解放军，保护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不断增强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的坚强团结，增强军民之间的坚强团结，增强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坚强团结，警惕右倾分裂主义。要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

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四川革命人民，一定能够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更好地完成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基本建设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让我们迎接这个光辉时刻的到来吧！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从来也没有这样好。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大深入、大发展。据前些日子统计，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就有××××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现在人数还要更多些。“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挖出了一批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特务和一些现行反革命集团。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革命的大联会、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并且正在日益提高、巩固、充实和发展。从大家讨论的情况来看，对形势大好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认识还不大一致。

一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

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否定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掌握不好，也要犯错误。经验证明，凡是保守势力抬头的地方，后边总是有人在挑动。同志们提“老保翻天”也好，叫“逆流”也好，不是群众的问题，而都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那里操纵和蒙蔽群众，搞翻案、复辟活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对群众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发动群众，把后台、黑手统统揪出来，如果对这个情况不作具体分析，脑子热起来，就容易把矛头指向群众，形成群众斗群众。因此，笼统地提“老保翻天”的口号是不科学的。在当前形势下，不加分析地提“革”与“保”，也不科学。要看他保的是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他保了坏人，根子也还是在坏人身上。千万不要把矛头指向群众，更不要不加分析地划分“革”与“保”，硬把已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组织，再分成两派。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两者，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必须区分清楚，不要一概都看成是极“左”思潮。现在，的确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扩而大之，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这个问题，尽管各个地区都有一点，但也是一个支流，把它夸大了，看成是主流，也要犯错误。

总之，形势大好是主流，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是支流。但我们不能忽视这股支流，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掩盖了主要敌人，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就拿“老保翻天”来说吧：××地区有一个单位，走资派根本没有被打倒，仍然在那里操纵着一部分被他蒙蔽的群众，压制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压的很厉害。作为这个单位来说，

所谓“老保翻天”就不是支流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能进行到底，而且很快就要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但在全局来讲，这又仅是一个很小的局部，是一个支流。对于保守势力抬头和极“左”思潮，看不到或过于夸大，都是错误的。

关于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

新形势，主要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处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全面胜利的决战时刻。我们要夺取全面胜利，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必然进行垂死挣扎，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斗臭，并且从组织上把他们清理出去。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随着这个变化，带来许多新问题。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如何发挥这个新生事物的作用，运用政权的力量，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新问题。运动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反，到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向走资派进攻，终于把他们打垮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政权，就要运用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垮，把修正主义黑线的根子挖出来，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那套黑班底彻底砸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问题，我们掌权以后必须认真考虑和解决。

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有老中少，并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党政军民结合在统一的领导机构里，这和过去的政权是不同的。如何发挥三结合的作用？怎样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也是个新问题。我们的红色政权应当和过去走资派操纵的那个政权有根本的区别，彻底批判他们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一个新东西建立以后，总还有旧东西的影响，我们必须肃清这些影响。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大力突出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从各方面和他们对立起来，绝不走老路，恢复老样子。这些新问题，都应当提到议程上研究解决。

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还有个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组织的问题。没有掌权以前，群众组织之间有点问题，总还是群众之间的问题。掌权以后，就有个新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了。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都要正确对待群众，保护人民群众。我们要经常从已经掌权的地位出发，想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从全局出发处理问题。要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当好群众的服务员。如果自己掌了权就把群众甩在一边，甚至压群众，或者还和刚造反时对待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那样。看到群众不顺自己的心意也去造群众的反，那就非犯错误不行。同时。群众组织也有个如何对待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群众组织对革命委员会，应当爱护，应当支持，绝不能用对待走资派掌握的旧政权的态度对待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发挥作用，革命委员会也要关心群众组织，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要警惕阶级敌人挑拨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警惕他们故意拉着我们犯错误。

形势是大好的。形势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常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发现和支持新事物，朝气蓬勃地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

（二）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群众发动得很广，群众情绪很高，从城市到农村，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了一批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有些是隐藏了几十年的，也挖出来了。主流是很好的。

当然，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要指手划脚地指责群众，要爱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要积极领导群众，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工作中有某些

缺点和错误，也要善于引导群众经过群众自己的觉悟才能纠正。这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根本态度问题。

什么叫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清理那些人？依靠那些人去清理，用什么方法去清理？达到什么目的？这都是重大问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

首先，要把总的概念弄清楚：清理阶级队伍，清理谁？重点是那些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夺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权。现在，正在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深搞臭。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清除出去。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组织上讲，中国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招降纳叛，组成了一个黑班底，就是钻进我们党内隐藏下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要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很艰巨、很严肃的政治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贯串运动始终的大方向。清理阶级队伍，不能和前段运动脱节，要紧紧地围绕这个大方向去进行。就是说，重点还是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很多事实证明：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很多他本身往往就是叛徒、特务；有的即使本身不是国民党员、地主分子，但已成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第一是党内的，第二是过去的领导层（不是指现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的是挖暗藏的，就是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整人家的，而他们自己则被中国赫鲁晓夫保护下来。有些家伙隐藏得很深。有的隐藏了几十年。如果不大搞群众运动，是挖不出来的。这是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领导权才能巩固。因为过去他们是掌握领导权的，现在虽然被夺了权，但是如果不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领导权还会被他们篡夺了去，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总是少数，但是相当危险。清理阶段队伍的重点，就要要解决

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出去。这样，大方向就掌握准了。

清理阶级队伍，把重点指向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和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解放干部、整党建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有些干部执行了资反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但基本上还是好同志，这个敌我界限划开后，经过革命群众的批评帮助，就可以解放出来；如果是属于混进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就从组织上清理出去。

清理阶级队伍，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大揭露，大批判，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有这样，才能把暗藏的敌人揭露出来，也才能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地给合起来，而不至于形成单纯地为了揪几个人，脱离了革命的大批判这个大方向去孤立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为了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要下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一律不要派工作组、工作队，已经派了的，要马上收回来，以免包办代替，压抑群众积极性。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那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的问题。

要注意调查研究，见政治挂帅，不要材料挂帅，但一定要有材料。“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如果光信口供，会造成麻烦，以后很被动。“要严防反革命分子暗害好人。”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严禁打人、游街和变相体罚。武斗并不能解决问题。敌人是害怕的是揭露事实。要教育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制服敌人。

要给出路，对于挖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应注意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给出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挖出来的敌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真诚悔改，就宽大处理（当然不是宽大无边），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重点是清理党内的、上边的、暗藏的，那么，社会上的、公开的要不要搞？也要搞，但这和我们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是一回事。我们和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不属于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范围。对于社会上的，着重是搞现行反革命集团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要狠狠地打击，毫不留情。对于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般的是否还是用过去通常用的办法（例如过去农村沿用的每隔一定时间给他们训一次话，等等），其中突出地表现不老实、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也要批判，但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隐藏的、混进党内的敌人，特别是领导层的。这是主要危险。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公开的，也有危险，但不很大，好解决。事实上，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所以敢于搞破坏活动，往往是在我们内部有他们的后台和代理人。所以，重点还是要解决党内的、领导层的问题。如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连社会上的也一起普遍的搞，是否面就宽了。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我们一说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有的就不管他过去是否交待了，一看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就揪斗；一查档案出身成份有点问题，不问现实表现如何就揪斗，这是唯成份论，和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结合不起来。如果再搞上这么一段，不加以总结，可能出现更大的偏差。

革命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总是极少数。那个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要由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别的组织不要去揪，以免形成群众斗群众。

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问题上，如果讲的清理的对象、要求和做法对头的话，那么，敢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这样去做，以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区分是否右倾保守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敢，就是右倾保守。没个界线要划清。

什么是右倾分裂主义呢？就是类似杨成武那样的人物，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闹分裂，搞独立王国，搞宗派，搞山头，个人野心家。我们反对右倾分裂主义，要反出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反出一个革命的大联合来。这个革命的大联合，要包括运动初期站错了队的广大革命群众、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和一些小的组织；就是不包括暗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要把他们彻底地孤立起来。两个阵线，两大派，就要这样来划分。要警惕阶级敌人打着反对右倾分裂主义的旗号大闹右倾分裂主义，恶意指挑革命委员会、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制造新的分裂。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代表人物，要揭发批判，这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重大问题。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反右倾分裂主义，就什么都是右倾分裂主义，要划清界限。

右倾投降主义，就是对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划不清界限，有些人可能思想上被他们腐蚀了。这就很危险，值得我们每个同志特别警惕。

这些右字，总起来都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搞四个反右，要反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成果来，反右必须防“左”，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教训。四个反右如果搞不好，会反出一个极“左”思潮来。极“左”思潮对革命破坏也很大，历史上的李立三路线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要围绕和服务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大方向。目前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希望尽快联合起来；在组织上已经联合起来的，要进一步实现思想上的大联合。只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大联合要不要有核心？核心一定要有，没有核心怎么能行。问题在于：核心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不是争来的，不是自封的，自封的就会垮台。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派，形势很好，如果再人为地去分成两大派，重搞什么大联合，那就不是把革命向前推进，而是倒退了。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对于我们今后如何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夺了权以后，如果按运动初期的那个想法，搞不好也很容易压制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矛头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如果对准了群众那就坏了，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专无产阶级政了。我们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但是在我们掌权以后，如果搞不好，走下去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时刻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

（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

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围绕着拥护毛主席和反对毛主席的问题进行的。这次两个司令部的决战，则更突出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革命委员会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就必须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或者说我们实际做的还是很差的。讲起来，都拥护毛主席，实际做起来，却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例如，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的同志也会讲，可就是联合不起来。这是什么问题？这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们要紧跟毛主席，就必须改造世界观。如果不改造世界观，现在你可能是革命的，运动前进一步，你就有可能走到反面去。这种历史教训是很多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教训也不少。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我们有些同志注意不够，滋长一种骄傲情绪。只注意看成绩，缺点就看不见了；只愿意听好的，坏的就听不进去了。还有的总觉得自己有功劳，上进心不强了。甚至有的计较工作的安排，生活的享受，产生了一种颓废情绪。这些都是骄傲的表现。所以，现在不光是个防止骄傲的问题，而是克服骄傲的问题了。这一点值得同志们警惕，如果不警惕，就很容易中糖衣炮弹。

因此，现在我们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普遍地进行加强党性的教育。形势发展了，我们掌权了，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必须大大提高，再停

留在运动初期那个水平上不行了。提高到那里去？提高到无产阶级党性上来，提高到毛泽东思想上来。现在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作准备。有些同志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是党员，那么现在的思想水平符合不符合党性的要求，我们党发展党员是不能降低条件的呀！这就必须提高，必须加强党性教育。

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最基本的是思想建设。同时，也要加强组织建设，这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来说，就是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最后，建议同志们加加油，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争取快一点建立起来。

（四）生产问题

现在正值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旱情也比较严重，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都大力抓一下。我们××是夺权早的地区，形势很好，中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生产无论如何应该搞得更好一些，今年应该比去年好一些。我们有这个条件。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化肥不足等，但是，只要同志们认真去抓，发动群众，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目前，要集中力量抓好夏收、夏种这两件事。（完）

补充：

在形势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什么是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分析很好。从根本上分析，新形势从这方面看，当前运动正处在决战时刻，处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起了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过去被压制的地位，变成了掌权的地位，这是很大的变化，根本的变化。过去领导权在走资派手里，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制，起来造他们的反，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力量壮大了，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走资派过去掌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但主要矛盾没有变，还是与走资派的矛盾。造反派由被统

治地位变为统治地位，由没有权到有权。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垮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起了这个变化。随着这个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革委会还是个新生事物，是世界上没有的。军委会如何工作法，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个新问题，中央叫我们研究新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如地区的革委会是当地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怎样发挥政权的作用。用政权来领导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需要研究的。

过去走资派掌权，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我们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一段造反是分散行动，这里打头，那里打脚，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垮以后统一了，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怎样进行革命，怎样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用政权来推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新问题。如果跟不上还用运动初期造反的办法，这里打一下，那里冲一下，这样不行了。现在我们掌权了，如何维护这个政权，运用政权向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把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挖掉，我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三结合。怎么统一，军队、群众、干部，组织到一个组织里，过去是没有的。一元化的领导，这也是新问题，这次提出的一元化和过去不一样，还有老、中、少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关系，也是新问题。再一个，这个政权和过去的性质不同。我们和走资派要对立起来，如果过去怎么做，现在我们也怎么做，就会走老路。对过去的，合理的接受，不合理就打垮搞新的，这样才能革命，不然就很快会走老路，只有研究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我们掌权，不能再用以前的办法处理问题，我们当了“官”，对群众的态度和过去不一样，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夺权之前，我们是群众组织，内部有冲突，有些意见，这个关系不大，革委会成立就有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如果仍然用过去造反的态度对待，就不行了，就会犯错误。我们不应该用派性的观点去对待群众。打垮了资反路线，如何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把群众团结起来，进一步把资反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摧垮，这些问题还未搞好，研究的还不多，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一点。

作为主要矛盾是没有变化的，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新的形势，新的矛盾，新

的政策，新老干部的关系，怎么解决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很好的研究。群众组织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夺权以后，政权和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革委会怎么领导群众组织，群众组织怎么监督革委会，这个要解决，搞不好，群众组织放在政权之上，当成立前的旧政权对待来造反，就会站在革委会上面发号施令。不解决这个问题，三结合的班子没法工作，如果搞不好，革委会把群众一闪，又要犯另一方面错误，如何由政权发动群众革命，这个问题要研究。

虽然主要矛盾未变，但是形势变了，过去受压抑，现在变成统治，走资派变成了被统治。在现在的形势下，敌人会用新的形式斗争，会变得更加狡猾、更加隐蔽、更加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者在工作中故意制造错误，来破坏革委会的威信，破坏文化大革命，但是敌人由大变小，最后要垮台。

根本形势就是这么几个问题。我们要防止骄傲，如果不警惕，就会很快和走资派一样中糖衣炮弹，就会变质，这很重要。如何联系群众，也是很重要的，有的自己地位起了变化，还未发觉。……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革命化，加强对敌斗争，要比掌权前更加革命性更强一些，把权掌好，新形势，新问题就是这些问题。

全面胜利，我领会是把资反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在组织上清除出去，进一步团结群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忽视这个特点，还用运动初期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就要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给运动带来损失。

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从运动发动以来，已取得了很大胜利。群众发动的很广，情绪很高，挖出了不少敌人，隐藏几十年的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都挖了出来。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广大的农村、工厂、学校，通过解决这个问题，使运动深入了一步。

运动这么大，有没有缺点，会有的，有的把黑暗面扩大了，如果扩大了就会压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不能指手划脚地去指责群众。当然，如果不注意就会走上邪路，我们领导的责任是如何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清理阶级队伍，首先要把清理阶级队伍的概念弄清。清理阶级队伍的含义，就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们在政治上夺他们的权，

在思想上对修正主义进一步批判搞臭，在组织上清除出去，巩固党的领导。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党的队伍，清理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社会上的也要清理，这是两个意义。这个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两个阶级斗争的继续。要使我们党成为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必须把隐藏在党内的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清理出去，对这些人，不放手发动群众是挖不出来的。

走资派有化的和不化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往往本身就是叛徒、特务，斗争的重点就是这些人。

清理阶级队伍的矛盾所向，第一是党内，其次是领导集团(旧的一小撮)。因为历次运动，这些人都是整人家的，他们叫中国赫鲁晓夫保下来了，这是领导权问题，要解决。

这样大批判、三结合、解放干部就结合起来了，这样就彻底了，清理了坏人，加强无产阶级阵营，好干部解放了，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通过大批判清理出去，这个专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阶级敌人总是少数。虽然人数少，但危险很大。他们篡夺了领导权，控制了要害部门，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上公开的就好解决了(举例子)。

方法：一是放手发动群众，大搞人民战争，大揭发、大批判、大鸣大放。二是一定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重材料(当然不是材料挂帅，要政治挂帅)，不重口供，这样大的运动，光听口供将来要出问题的。三是要依靠大批判，不要用现在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打人，这样不解决问题。运动初期游街能发动群众，敌人也害怕，现在不行了，还是要揭材料，摆一摆，那个办法更好，那个办法更能团结群众，不要把群众引向邪路，要和群众商量，群众觉悟了，自己教育自己。

社会上的，属于另一性质的。社会上着重是现行反革命。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攻击中央、中央文革，这属于阶级斗争，不属于清理阶级队伍。对社会上的一般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加强批判，加强改造。重点不在这方面。如果这样，山东就有×××万，这些是公开的，很明显，也很容易搞，要搞隐藏的，主要是领导权问题。领导集团的问题是难解决的，要搞大批判，大批判是继续夺权的问题。这样就结合起来了。

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敢活动，就是后面有人支持。一个大队如果大队支书、大队长坚强，四类分子就活动不起来，能活动起来的，不是支书有问题，就是大队长有问题。

现在阶段阶级斗争的内容突出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土改、减租减息、建国初期的运动内容有些不同，现在代理人已钻进党内，危害性最大。

各地区回去要重新部署一下，再这样搞下去就压抑了群众，有些地区专门到造反派里去抓坏人，这对造反派是个压力，把造反派搞得灰溜溜的。有的一看历史上有问题，也不管交代不交代，有的只看成分，发展到唯成分论，这样搞下去会出偏差。革命群众组织不纯是会有有的，党内有坏人混入也是运动高潮中混进来的，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靠本组织的群众觉悟了自己清理，不然，这个抓那个，那个抓这个，内战又会起来。同时这也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举××的例子）搞不好成了乱抓。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也同走资派、领导集团里的坏人有联系。王、王、庄搞出来之后，在各地也揪出了一些坏人，但要讲清楚，和王、王、庄有联系的要分清楚，当然，他们有骨干，有一个黑班底，也有的是不知道，他们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面，人家从信任革委会出发，来联系些问题，上了些当，要分清楚，不要把面搞宽了。

类似王、王、庄的坏人也揪出了不少，但也不一定从革委会中揪“王、王、庄”，这样矛头就会指向革委会。省里不同，省革委会是经过长期斗争内部自己揪出来的，不要外部去揪。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自己解决。

当前，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刘、邓黑线彻底揭出来，敢不敢夺取全面胜利，如果不敢，这就是右倾保守。不是对群众组织没下决心搞垮就是右倾，要下决心把一小撮搞出来。

右倾分裂，类似王、王、庄、杨成武，和毛主席闹分裂，搞独立王国、搞宗派、搞山头，他们是个人野心家，他们就是右倾分裂主义。我们反右倾分裂的目的，是要反出一个革命的大联合包括运动初期站错队的犯过错误的组织，包括小组织，就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不包括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把这些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现在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搞分裂，挑拨离间，发现了这样的人就要揪出来。

右倾投降，就是和走资派、叛徒、特务划不清界限，受了他们的腐蚀，我们的政权很快就会改变颜色。

这些，总起来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反右倾要出个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搞不好，搞成极“左”思潮，这也很容易，对革命破坏也很快。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统治不过四个月，对革命损害很大。

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来源：河南二七公社主办《二七公社报》 1968年7月4日 第三版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征途中，生气蓬勃地迎接自己四十七周年的光辉节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的风暴中，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剧烈斗争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显示出改造世界的空前巨大的革命威力。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中国赫鲁晓夫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广大的革命群众所掌握。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国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但是，阶级斗争还是尖锐而复杂的。一小撮失败了的阶级敌人已经穷途末路，仍然要作垂死的挣扎。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能不经历十分剧烈的反复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对复辟的斗争，会经历一个很长时期。革命委员会逐步巩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离间和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联系。他们或者大刮右倾翻案黑风，妄图扰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施放糖衣炮弹，妄图欺骗或腐蚀我们的同志，使革命委员会某些成员脱离群众。针对这种特点，革命委员会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主动地带领革命群众，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同时，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不论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不论是清理阶级队伍，其阶级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极少数阶级敌人。要紧紧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斗、批、改，继续有力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对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并歪曲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对于敌人那种种的卑鄙手段，必须善于识破，勇于揭露。各派革命群众要注意团结对敌，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又要善于识别敌我矛盾。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又说：“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

部分人民。”毛主席这些极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于我们当前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如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有多么重大的指导意义啊！

毛主席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权力量的源泉。坚决依靠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权区别于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权的根本标志。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的丰富经验说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诞生的，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本身就具有联系群众的优越条件。我们一定要充分运用和发挥这种优越性，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侵袭，坚决改革旧的脱离群众的陈规旧习，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使革命委员会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普通劳动者，要深入群众之中，不要搞特殊化。遇事多和群众商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广大革命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要实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永远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职务变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不管来自那个方面，都应当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代表，都应当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办事。决不能只代表某个小山头，而不代表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团结少数人，而置绝大多数群众于不顾。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我们必须经常地用毛泽东思想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不断巩固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委员会。

革命群众要爱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要主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那里的群众能够经常地踊跃地以爱护的态度对改进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就说明那里的民主空气好，那里的工作有生气，那里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关系密切。毛主席指出：“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至于一小撮敌人借“批评”为

名而兴风作浪，恶毒攻击，企图动摇革命委员会的阴谋，则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现在读着毛主席这句名言，感觉是多么深刻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教育了我们，进行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彻底的革命，必须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必须依靠人民解放军，必须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以及地、富、反、坏、右在我们党内的一小撮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的一套国民党的作风，都是制造党和群众的分离，制造无产阶级政权和群众的分离，以达到他们隐藏自己反动面目、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党、政权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从而保证我们国家永远不变颜色。

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集中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要求。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时地准确地全面地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任务和方针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在努力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革命委员会才能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为了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深入地推行这个任务，必须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增加新的内容，不断提高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为促进各项工作胜利的巨大力量。

在夺取伟大胜利的历史关头，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在提出革命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同时，总是号召全党提起警觉，十分注意作风问题，把保持和发扬党的传统作风，看作是团结全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巩固胜利，发展胜利的重要保证。

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付出巨大的努力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动亿万革命群众进行整党的一次伟大运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指引下，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展开了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经过这场群众运动风暴的洗炼和考验，我们的党，和群众的联系极大地加强了，正在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们广大的共产党员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经得起阶级斗争的各种严峻的考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三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文献资料

一、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省无联”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恢复湖南铁路交通的电话指示

[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炳同志来电]

黎原同志即转胡勇、叶东初二同志并湖南省筹备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负责同志：

九月七日九时黎原同志来电收到，中央对京广线湖南段，铁路运输中断四天极为关切。

现责成湖南省筹备小组、“工联”、“湘江风雷”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十日发布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和“九·五”命令，无条件的立即恢复湖南段的铁路交通。

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

一、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一切武斗。

二、已经夺取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一派的武斗。

三、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跟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

周恩来九月七日下午五时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

九月十八日，毛主席来到了长沙，并于当日下午十时至十二时左右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

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张春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汪东兴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余立金同志（空军政委）。

接见中，毛主席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对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开足了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

毛主席说：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主席还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

毛主席说：打打也好，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主席回忆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返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他为中心，

主席说：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抢枪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了造反派了嘛。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主席说：“这也是一条经验。”

谈到极“左”思潮时，

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

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指万达）吗？

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

主席说：等一段嘛。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主席说：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大军嘛。

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主席说：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

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道：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那里？

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

主席说：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很好嘛，他有高血压。

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到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

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少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

（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精简。）

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主席说：过去好象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

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主席又说：以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

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湖南红旗军问题时，

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主席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搞起来。

（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主席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是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根据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传达整理）

（原转载于湖南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等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知识资料汇编》，1968年1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视察中的指示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之后，杨成武、张春桥等同志又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谈了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

杨成武、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最近在视察中，反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大联合问题。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主席反复讲：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搞好，大联合过国庆。

二、正确对待干部。

毛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头了，不要侮辱。

主席还说：人家犯了错误就够苦了，你们还要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斗争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陈讲话时，很多人插话，

主席说：会上要允许本人讲话，允许本人申辩。

陈再道被斗得很厉害，

主席知道后说：不要这样搞。

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很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百分之六十，山东站出来百分之二十，河北站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

主席说：将来还是要大翻案的。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

三、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目前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表现三个方面：1、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炮轰总理）；2、分裂人民解放军；3、有些地方分裂革命委员会。

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

（根据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传达整理）

（原转载于湖南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等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知识资料汇编》，1968年1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 15 到 30 个工分，有的一天给 100 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了……”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

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这是毛主席南巡以来第二次讲到极左的问题。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了。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

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 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 48 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了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毛泽东问这些的用意是指章是“工联”的后台，不过没有挑明就是了。

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 613 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 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 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这当然不是指铁路。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 250 亿斤至 260 亿斤；今年棉花可产 180 万担，去年是 150 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来源《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九日晨四时至七时，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

总理：戚本禹同志有病，不能参加。大家要求再见一见，今天听听大家的意见。

总理听取了常德、湘潭、益阳、株洲、黔阳、衡阳代表汇报。

总理。断铁路、断邮电、抢枪支，正好是暴露它。暴露了，才好解决。这是最高指示。长沙一中八个人，要反映情况提出只能给戚本禹同志说，这显然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挑拨，我们不去责怪他们。我要戚本禹同志见见他们，戚本禹同志不见。谢若冰打电话，都说老实话，年青人有点骄，免不了。湖南是很重要的地区，不是主席指示，我能随便说？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反映。革筹小组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榷、胡勇、唐忠富。朱顺祥，有的同志不同意，还可以商量。

（吉首、黔阳、长沙“红艺会”、“孙大圣”、岳阳代表汇报。）

总理：革筹小组的组成，除已定的三人外，军队无意见。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报告。万不参加小组，至少让他参加工作。给他亮相和考验的机会。能站出来，就结合。万与张、王不同。推荐新干部，要报告，现在不能回答。“湘江风雷”三人已定（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榷）。“工联”，胡勇、唐忠富，对朱顺祥有意见，可另外推选。革筹小组随时可扩大，代表提议地区两派参加，将来做到每派各五名，双方各留二名空额，当前，地区主要是回去把各地搞好。回去报名单来，即可宣布成立。

革筹小组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文攻武卫指挥部。长沙、株洲交通要畅通。要有秩序。制止乱抢枪。

吴自立这些家伙已经垮了，不要去责备那一方。，小将上了当，我们老头子还上当嘛？刘少奇、彭真唱双簧，骗了人嘛！不要去责备小将。他们七月十八日听蔡爱卿讲话，觉察出了嘛，这是好事、应该欢迎。

长沙、株洲是中心地区，要稳定，无论如何不要打“内战”。

地区代表在长沙多留几天看看，不要成立监督小组。岳阳可搞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在省文攻武卫指挥部之下，配合行动。衡阳、株洲也可以搞。中心地区稳下来，下一步是解放湘潭的问题。湘潭现在被坏人挑动，打击造反派。他们枪多，不可怕，进行政治攻势。延吉五座大楼都收回来了，最后两个，进行政治攻势，走出来二千多人，有一千多支枪。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不会怎么样，容易瓦解。他们要打，军队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学射击。

湖南还打算派个调查组去。

回去就成立革筹小组，特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办公。

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向零陵。主要是两派长期合作，戴利提消灭两派，提得太早。要经过一个友好合作，统一行动，共同对付路线斗争，将来才能矛盾统一，才能使其它十个军分区的造反派占优势。回去后，最关键的几件事：成立革筹小组，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搞好两派合作，逐步解决地区问题。其它是次要问题。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夜十时五十五分至十日四时四十三分。

地点：武汉军区礼堂二楼会议室。

陪同总理接见的有吴法宪同志。

被接见的湖南代表有：郑波、胡勇、谢若冰、康海新、邹定国、戴莉、雷志忠、尚春仁、吴逸银、李正魁等同志。

总理步入会场问大家好，大家问总理好，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后入座。郑波等同志交给总理一份目前湖南情况的材料，总理接过材料看到材料上写的湘南几个县乱杀人的情况时，

问：杀了这么多人，准不准确？

答：准确，有这么多。

总理：保守派这么猖狂，你们造反派还不联合起来，我真替你们着急。别的地方，有的是保守派垮了，两派才会打起内战来。你们怎么搞的？湖南还乱的不够呀！今天我在大会上讲的话你们听了没有（指在武汉欢迎谢胡同志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众答：没有）明天报上会登的，是对武汉讲的，对你们也有用处。

有人说：我们八号就来了，等了你一晚上。

总理：我到武汉是来陪外宾的，顺便接见你们，怎么能说没有先接见你们呢！总不能喧宾夺主嘛！湖南是另一种形势，当然总的还是好的。

毛主席到长沙作的最新指示，没有经过核对，你们就宣布了。

有人答：看到武汉宣布了，我们才宣布的。

总理：你们逼着我们也写了一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到全国。

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的情况。

有人说：从北京回去后，内战还是打，主席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发表后，下边有三百多个单位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有二十个观点一致派的组织发表了个九·三〇声明。声明发表后，报喜的单位少了。矛盾原来也有些，声明发表后，矛盾更深了。由于九·三〇声明，使大联合有所动摇，有点冷了。有的组织解散总部并在长沙晚报上登了，后来又没有解散，影响也不好，还有些组织又搞了个大联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北京谈判回去之后头头老开会，没下去，要求总理批评，有些人不够当造反派头头。

总理：我的工作还是要做，就是希望你们有点自我批评。

有人提：从北京回去后，我们对中央指示贯彻是不力的，对有些问题老是抱着怀疑态度。

总理：什么怀疑，你们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不服气，就想以我为核心，这是派性。湘南杀这么多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还这么猖狂，常德还没有完全解决吧？湘潭还解决得比较好。高司都回来了，你们还放心？你们还打内战，我真不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蔡爱卿，中央决定你们回去就要逮捕的，你们回去二十天还是一个月才逮捕的，还让他活动。三四一事件（八月十日）蔡在工院是确实的，为什么要保他，清清楚楚是坏人。为什么不把蔡抓起来？象这样的黑手，在别的地方早就自己把他抓起来了，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一刀两断呢？

我们把安徽的问题给你们看了吧？（众答：看了）多光明磊落！多么痛快！江青同志一点，他们就打电话回去，双方都有黑手，都把坏人抓起来了，两派并肩游行。北京处理了“五·一六”的问题。凡是乱，里面总是有黑手的。武汉也是这样的，就是长沙，为什么？我们痛痛快快的谈一下，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处理的，中央还有戚本禹同志，每次都是和我在一块嘛！我相信象你们这样，是不会走上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五·一六”极“左”思潮影响到长沙很深，你们这样是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你们要上当的。有坏人在挑拨你们，为什么愿意受人家挑拨蒙蔽你们呢？长沙保守派还这样活跃，你们还不联合，我只能说你们不自觉，只能这样说。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录音你们听了吧？（众答：听了）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条就是说的这些问题。就是有人要挑拨毛主席的司令部，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个个都说倒了，企图孤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你们爱护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司令部，说话后就不兑现了？你们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没有兑现的。你们是毛主席故乡的造反派，就这个样子，外宾都不能去。我若不是工作不能脱身，如果我有时间，我要把谢胡同志带到韶山冲去参观，我不相信群众不欢迎我们。坏头头你们自己抓。你们看了淮南煤矿报道吗？（不作声）哎呀！你们报纸都不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就是搞派性。你们要知道，乱而后治，越乱的凶，解决问题越彻底，主席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今天在群众大会上讲了淮南煤矿有几万工人，武装部和军区发枪给一派，把另一个造反派赶出去了两万多人，赶得到处都是。这个煤矿是长江流域最大的，供应很多地方用煤，每天产四万多吨。武斗后生产停顿，日产不到一千吨，不仅打枪，还打炮，这样严重的情况！本来都是造反派，就是被坏人蒙蔽了。江青九·五讲话

后，把两个坏人揪出来了，欢迎造反派回来，互相作了自我批评，日产量又很快上升到二万五千吨。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主席叫刚果（布）的总理去参观，还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我都没有想到。你们打内战，相形之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南越的代表团十一号到你们那儿，你们要组成联合接待组，把他们带到韶山冲去。你们打内战，他们打外战，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代表团团长身负七次伤，现在还有一颗子弹留在体内，我叫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说不去，要等到越南抗美战争胜利之后再走。

我们请谢胡同志来武汉，看看乱后的情况，我跟主席一讲，主席说叫他们去，先分两路出发，再到武汉会合。因为谢胡同志要到武汉来，我得陪同，我向主席请了两天假，来陪外宾。同时再利用时间请你们来谈谈，你们还质问我为什么不先接见你们，你看看，你们本位主义够多严重，你们这么骄气！要说骄，武汉应该比你们更骄，因为那里的百万雄师都没有了嘛！有人要我狠狠批评你们，今天试试看批不批得动！有的人能接受，恐怕有的人就可能不以为然。主席要我们告诉小将，现在正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要提醒你们。并且说要把我们过去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告诉你们。江青同志的眼睛非常锐利，上次在北京参加那个会，你们当时对邮电局那个人（答：刘秀英），就不太好嘛！江青同志特别感到湖南造反派同志的情绪不对头。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了，应该恨的人不恨，应该爱的人不爱，这是敌我问题。吴自立是彭的爪牙，蔡爱卿与吴自立又打得火热。蔡爱卿骗了青年近卫军，将他们经过上海绕弯子送到北京，在北京萧华还接见了。蔡爱卿与吴自立攻守同盟，要夺军权。长沙造反派心理状态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提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这是极“左”思潮。军内当然也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代表了一切。专揪军内一小撮，在北京就跟你们说了这是错误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有几十年的光荣传统，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最好，是觉悟高、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子弟兵。我们不能设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能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龙书金拿掉，你们来当司令员行吗？培养接班人现在还不能马上接班嘛！要锻炼十几年嘛！江青同志讲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讲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委员会的态度。解放军在支左中，有人犯了错误，我们把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调到北京学习。主席还叫陈再道到学习班去学习。主席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

得远。陈再道这样的人还调到学习班去学习，这对你们是不可思议的，陈再道虽然搞了“七·二〇”事件，但当时中央让他到北京去，他还是去了嘛！作了一个初步检讨。陈再道到北京后，武汉军区党委写了一个检讨（总理念主席对武汉军区检讨批语）。主席在批语中说：“包括你们和革命群众所一致要求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称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要是别人说的，你们一定要骂了。有三个条件（即毛主席批语里讲的），按这样做了也就可以站出来。

“要警惕坏人捣乱。”这句话对你们也起作用。蔡爱卿就是一个坏人。现在长沙的秩序你们造反派感到怎么样？……。还没有湘潭秩序好。过去我没有管湖南，以后主席批叫我管的。这次到武汉来我完全可以不接见你们湖南代表，明天还有事，但是我觉得既然要管，就有责任，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谈谈。蔡爱卿你们为什么就是恨不起来，没有敌我界限，你们都是革命左派，怎么能这样呢？红旗军总的组织中央还要考虑，红旗军的上层不能恢复，还要调查，下层可以恢复。总理介绍一份材料。

（一）蔡爱卿是湖南岳阳县人，一九二九年四月当过国民党兵（伪军），一九三〇年七月在彭德怀三军当通讯员，所以跟吴自立认识。吴自立编了一个剧本《怒潮》，吹捧彭德怀。西安事变后一九三六年，蔡爱卿在一一五师当指导员，后受撤职处分，又转到薄一波（新军）做事。在国民党当过兵痞，那个习气可是不容易改的。绝对不能把当过国民党的兵，受影响深的人，当我们的人看待（总理说了他有一个亲戚当过国民党兵的情况，通过此事说明，当过国民党兵的人不管怎样，那种习气是不容易改的）。蔡爱卿的历史短短几句，就可以说明这个人。

吴法宪：蔡爱卿一九五六年到北京一点事也没做。

总理：蔡爱卿在宣布的六十一个叛党集团做过事。他做副职总是不满意。

（二）他跟国民党的少将大特务、骗人的医生周潜川勾结在一起，这是个大骗子，把我们好些部长都给骗了。周潜川在我们党内是一个大案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说我们的干部总是有极少数是变了的，干活不多专保命，一天这个药那个药，蔡爱卿就是周潜川活动的一个。蔡爱卿介绍他给领导干部看病，领他参观尖端工厂。周潜川说天下好人不多，只有蔡爱卿还不错。蔡还准备把女儿嫁给周潜川的儿子。

蔡爱卿泄露党的机密，说太原有一个工厂如何如何。诬蔑毛主席，他把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成是毛派，称自己是彭派，这样一个人多恶毒……。

一九六四年，周潜川的儿子周朝富到蔡爱卿家里来住，有人不让住，蔡的老婆就恶毒的说，现在的社会，都搞得我六亲不认了。

（三）他勾结吴自立，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自立翻案……。一九六三年，中央主持批判了吴自立，蔡到湖南与他勾结，蔡爱卿说吴自立是个好老头子，他就是直，说坏了话。吴自立写了一个平江革命史，就是为彭德怀翻案。

（四）蔡爱卿说，喊万岁！我们活一百岁就差不多了，中国人那有活那么多岁的；说毛主席著作不都是毛主席写的，别人写了他签个字就成他的了；还说中央首长也有矛盾，但有意见不敢提。蔡爱卿说美帝不是纸老虎，有很大力量，（总理生气地说）毛主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要我们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嘛！他（指蔡）还说，毛主席放个屁都是香的……。真是恶毒已极。他（指蔡）还说，一九六二年苏联二十二大，批判斯大林犯错误杀了那么多人，毛主席也是那样，别人有意见不敢提。我们说，毛主席说的话是千斤重，万斤重。林副主席说过，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解放军被抢了枪，不动手，不动气，不打人，不开枪，听毛主席的话，那有那么好的解放军。公布罗瑞卿的罪行时，蔡爱卿说，我过去对罗是很崇拜的。可见他是个什么人，不叫人家崇拜毛主席，他崇拜罗瑞卿……。

许世友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因为这个口号（揪军内一小撮）提错了，到处抓一小撮，广州抓黄永胜、南京抓许世友……湖南抓龙书金，我们说一旦有事，我们还要这些人带兵上战场的，龙书金同志还是要当司令员的。龙书金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仗是很勇敢的。蔡爱卿这种人才是真正要打倒的。军区内现在搞得很乱，原来我们只叫司、政、后机关搞四大，但是有些基层单位也搞了，战士也有些走了，湖南军区现在完全瘫痪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干校就很好。校内搞四大，校外搞支左，听中央的话，讲政策。工程兵学院就不对头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极“左”，你们就支持他，不让他们外出串连，他就是出去。工程兵学院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话怎么行！要他们不要那样介入，他们就是没执行。

（五）蔡爱卿家从不挂毛主席像，并说：“我家又不是俱乐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革命旗号干反革命活动，蔡爱卿老婆参加红旗军宣传部，蔡爱卿又是红旗军的顾问，蔡爱卿打着老革命的招牌发表了两个声明，你们都看到了？

众答：看到了。

总理放下材料后接着说：毛主席最近有段话，是在学习时候说的。主席说：“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要教育。”对小将更要教育，要提醒你们，有错误还是要批评你们。主席说官做大了，工资高了，房子好了，有汽车出入了，架子也就大了。彭德怀就是这样。尽管是官做大了，工资高了，房子好了，有汽车出入了。前面四条即使有一点也不要紧，但要经常跟群众接触，谦虚埋头苦干。接近群众不摆架子，关键在于对群众的态度遇事和群众商量，不摆架子，接近群众。就是车间主任，官不大，但架子大了，骂人，这也是不允许的。蔡爱卿就想当官。挑动武斗，大造舆论，要蔡爱卿，不要黎源。自己要在工联住，工联不同意，就说工联“修了”、“右了”，这是挑动！

总理问：听说你们在十四日开大会。约请全国各省来人参加？

有人说：口头和钢工总说了一下。

总理：这样不好。西安交通大学第一个写大字报的李世英同志，反动路线迫害得他要自杀，后主席批给我给他平反，去年、今年我都见过他。西电、西军工大跟他对立，当时他本人比较稳，双方到北京，我劝他们联合起来。到北京后，我支持了他，他就骄傲了，回去不但不联合，反而要自己夺权，单独树立了旗子，搞了一个司令部，设在人民宾馆，搞了两千人，找两个工人做司令，他当政委，他忙这两千人都忙不过来了，那还能联系群众，造反派一样可以做官呢！你们要警惕，脱离群众是最危险的。中央文革认为，不管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都不要脱离群众才有力量。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小将们一样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蔡爱卿我们是做过调查的，你们还要调查，这是敌我问题。你们之间，你们和军区之间是内部问题。不把敌我问题、我友问题划清界限，是很不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席讲过，只要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在革命的原则下就要联合起来。

众问：现在保守派说，主席讲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是指的造反派与保守派，这样说法对不对，高司能不能存在？

总理：如果保字号头头承认了错误，采取了自我批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批判中考验。改正错误，交枪比你们更快，群众还是好的嘛！你们不要报复，他们不会一辈子保皇，组织当然可以转化为革命组织，就要看他大方向转过来了没有。组织是可以转化的，保守组织转过来了可以联合，革命组织也可以转化而犯错误。

高司这个组织能不能存在，不能这么说，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取消，要看你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你们采取正确的方针，你扩大了，他就小了。采取压的办法是压不垮的。决不要自封为核心，凡是以我为核心的结果都不能成为核心，都失败。有人提出要以左派为核心，这话听起来很对，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左派，别人是“保守派”、“中间派”，都右了、修了。青年的战友们要向毛主席学习，全世界人民这样拥护毛主席，可是毛主席向来没有提以他为核心，总是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和发展的。毛主席说：“自封为核心是最蠢的事，李立三、王明、博古就是以我为核心，都失败了。”还有一种思想，就是好象大方向对了、矛头对准了走资派和反动路线，其他什么不在乎了，就不会犯错误了，这是不对的。小将们应该注意，尽管你大方向对了是不保险的，如果你政策错了，还是要犯错误的，要失败的，要影响大方向的。用我犯错误的经历来说，四十年前，“八·一”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现在我们仍以“八·一”作为解放军生日，但是南昌起义的部队失败了。方向虽然对，政策没有对，集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城市观点，一个是外援观点。大方向对了，不能保证一切政策都对。你们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闹革命，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错误我们可以告诉你们，但是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听。现在的极“左”思潮方向是不对的，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我们中央常委与文革就是在一起办公的，有事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人要用显微镜找中央的空子。还有的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都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极“左”思潮，长沙是有他一定市场的，你们应该引起警惕，你们自己起来批判他，自己起来纠正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中央工作的同志有责任提醒你们，你们懂得了，改了就行了。年青人在大风大浪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是允许的，一个人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正反经验都有才全面。毛主席经常总结正面的反面的经验，把运动推向前。乱子出

来我们不怕，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不要怕自己队伍里有坏人，各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特性。主席讲：“出乱子有三种因素：①走资派的影响；②坏人、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捣乱；③自己本身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找出自己受那方面影响，总结经验，就可把运动推向前进。在自己组织发现有坏人也不要灰溜溜的。中央都出了坏人，刘少奇还曾培养作接班人，这点不能说中央都没有责任。陶铸是在十一中全会提上来的嘛！担任了三种职务，结果还是暴露了。主席说决不能庇护坏人。中央还出了坏人，难道你们比党中央还高明，更何况你们这些群众组织呢？

每个革命组织不可能没有坏人钻空子，走资派煽动你们，在旁边利用你们。有四句话：要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做到老，不通过实践不知道你做对了没有，不做事就没有实践。学到老，要学一辈子毛泽东思想。要改到老，有错误就要改。要跟到老，要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你们自己要把自己组织中的坏人揭发出来，我们在北京就是这么办的。由群众自己抓坏头头（总理举了北京“五·一六”农业口秦化龙的问题和吴传启的问题）吴是从国民党混到共产党里来的，还参加过竞选，跟武汉一些人有关，他的手伸得很长，财贸、外交、农村、统战部，刘影、刘大轮、民族的洪涛，通通给揭发出来的。陈伯达同志早就发现吴传启不是个好人。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悲观的。他们利用宣传的错误到处散布“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反动的嘛！武装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打谁？当然这次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也不准老保翻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五·一六”极“左”思潮是完全错误的，批判极“左”思潮能说高司就对了吗？张平化就对了吗？不是，还是错的。“二·四”批示是文革起草的，但没叫捉那么多人嘛！不能说你们批判极“左”，你们就“右”了，而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批“左”的。（总理秘书宣读中央整理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

总理：今天我的讲话讲了四个问题：

- (1) 不怕乱，要从乱中发现坏人；
- (2) 大联合，克服派性；
- (3) 抓革命，促生产；

(4)教育干部（包括红卫兵要学习）。

要办各级学习班，湖南也要准备办学习班左、中、右都要有，才有辩论，学习以自学为主，学一个月左右，再回来。有些人犯错误多数是认识问题，但是极个别人是立场问题。军区那么乱，要抽些人去学习，包括五好战士、造反派，军分区也可以抽人去。参加学习不仅可以有军队干部还要有造反派的头头。当然不是所有的都去，那抽不出来。蔡爱卿的问题你们可以各揭各自的问题，工联上过当揭工联的，湘江风雷上过当揭湘江风雷的，不要攻击对方。革命的组织要多看自己的缺点，要多看别人的长处，我们是满腔热情来跟你们说话，不能看到你们有错误不说。你们有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〇声明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潮，不能以我为核心，不能以为自己革命，不能自封为坚定的左派，别人都说成“修”了、“右”了。我的话，二·一二日社论都说了，武汉的问题也和你们说了嘛！还是小团体主义，是派性，那是联合不起来的。四十七军是毛主席所信任的，你们把矛头对准四十七军，你们要犯大错误的。我所指你们，是指有极“左”情绪的人，只要我们把意见告诉广大群众，广大群众是不会听你们的。我说的这些话是及其负责的，回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话是不算数的？你们是青年人更要说话算数的，不能当两面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听毛主席话的，切忌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刘少奇是两面派、陶铸更是两面派。分裂是不利于长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主席要我们六、七、八月份解决几个省的问题（当时说了几个省名），他们的问题都要解决的较好。你们湖南现在看还没完全解决。我们不希望有反复，如果你们硬要这么搞，就会出现反复，十一号开这么一个会，这就是单方面的嘛！你们这样搞要走向反面，你们开这样的会闹分裂，越南代表团还怎么去呢？你们不应再打内战了。

我接见了钢工总、钢二司，我跟他们谈了要把界限逐步打开，新华工还站得稳。打死了人要开追悼会，我同他讲这不好，有些不是走资派打死的，是内部打死的，大开追悼会就会造成彼此对立情绪，他们听话不开。主席的家，两个弟弟，妻子、外房妹妹、儿子都牺牲了，但一九五九年主席回到韶山又是怎样对待他的亲人呢？写了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抗美援朝是多大代价，

这次牺牲这么几个人还是值得的嘛！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是主席提的字，后面是我写上的，纪念碑把在一百零九年的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都列在一起，那才是永垂不朽的。

有人提：大联合委员会我们不知道。

总理：这么大事你们负责人都不知道？！那太不民主了，哪一个人就能通过啦？（总理拿中央对武汉问题批示）这个批示是主席亲自写的，还交给我们大家讨论，最高指示嘛！你看多么民主呀！

这时有人提什么官办、民办、走上层路线问题。

总理：跟革筹小组接触怎么能叫走上层路线？那今天我请你们来谈问题就更是上层路线了？！怎么能够把革筹小组和你们叫官、民呢！怎么能这样对待毛主席司令部呢！都是战友嘛！

有人提到敌人在挑拨离间，蔡爱卿不只一个，现在还有蔡爱卿式的人物在活动。

总理：湖南的阶级敌人还不少，旧军官、地、富、反、坏、右还在，我说蔡爱卿是拿他作个代表，不是说只这一只黑手。

有人说：都是在这说联合，回去就不联合，交了枪就抢车，抢了车我们都不能生产。各负责人回去都应好好传达，不然回去还是各搞一套。也有人提：在联合上长沙有长沙的特点，应该按长沙的特点搞。

总理：长沙道路、北京道路，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道路。符合毛泽东思想能促进大联合才是对的。

有人提出撤消总部的问题。

总理：组织第一步还保存，这还是对的，一步一步，那一派想把那一派搞掉，这是不行的，也要教育下边的战士。

要“斗私，批修。”你们这样怎么行？刘邓就是不向主席汇报，主席很不满意，说刘、邓搞独立王国，主席还是让他觉悟。没有民主，这很危险，刘少奇是这样搞的，但是主席一直等待他很久，直到十一中全会主席才说：“我对他完全失掉了信心。”你们这样不联合行吗？一派把另外一派抛开，年青人就学这样搞派性，还行呀！林副主席说了要有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年青就

不培养这三性，特别你们要管事，不要出更多乱子嘛？这是无政府主义！在年青的时候就用派性代替党性这是很危险的。

你们结合干部还是要和四十七军、革筹小组商量，因为他们是中央相信的。特别是转业的人，军队可以知道，不经调查你们可要上当的。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讲的话你们要尊重嘛！不管你们组织是几十万、几百万，坦率地说你们不能当湖南最高领导，不然那些干部怎么办？起来一个就把老干部甩掉，这样能行吗？！你们现在就这样接班那还行呀！如果那样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负责任，不行！还没有到时候，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还要学习、锻炼。今天和你们谈就是你们快到边缘了。今天说明，湖南的领导无论如何是四十七军，你们只能参加领导，不然我们就是不负责任。我很坦率地把这个问题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到边缘了，如果我们随便那样封官许愿，我们是要犯错误的。

这时有的同志自我批评。

总理：这就对嘛！多作自我批评，毛主席对黎源同志很称赞，对一些问题很耐心，黎源同志处理问题很有思想的。当兵打仗的容易急，龙书金打仗很勇敢，但就是处理问题急，不调查清楚就处理。他们很谨慎，主席很欣赏这个。湖南问题可能还没有暴露够，但对你们造反派不能不打招呼，你们非但没自己发现、找出坏人，而且还在那里闹矛盾。大家都检查自己，大联合的基础就有了，就是主席“斗私，批修”的方针。

有人提：北京谈判回长沙后，对四十七军、革筹小组支持不够，对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要求高，对自己原谅。现在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连汽车都被抢了。

总理：上次在北京就给你们说了，汽车都退回去，怎么还这样？要清查清楚。

有人提：收枪四十七军没有坚决措施，现在还有人抢枪。

总理：再有抢枪的按九·五命令办，抓一两个坏头头，你们同意不同意？

众答：同意。

有人提到三四一部队问题。

总理：三四一部队（工程兵学院）问题是军队内部的问题，由军队内部解决。对三四一下个命令，回去搞斗批改、整顿。你们支持不支持？（众答：支持）再有抢枪有坏人指使，抓坏人，你们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武装左派是主席思想，但不要急，先做试点训练不发枪。那个单位大联合好了，训练好了，才发

枪。武装是积极的，收枪是消极的。武装造反派这个是方向，不能从眼前考虑，从前途设想，这是个备战，一旦有事全民皆兵。原来民兵体制全部打乱了，要把左派武装起来，但步骤放慢一步两条腿走路，主席同意了。你们回去后，要落实几个问题。

(1) 三四一部队问题，军内解决大家同意了。

(众答：同意)

(2) 不准抢枪，带头的抓一两个。

(众答：同意)

(3) 地方上的枪通通收起来，交四十七军，推动大联合。

(众：同意)

(4) 正确对待保守组织。

(5) 一四号纪念会，我们不能阻止，但不能外地来造声势，我们不赞成，按主席的话来说叫帮倒忙，一定会犯错误的。今后各地造反派都起来了，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有了错误就改，我们还是要支持你们的嘛！

十一号欢迎外宾你们在四十七军、革筹小组领导下联合筹备这个工作，好不好？（众：好！）内战无论如何不能提倡了，坏人挑动，你们自己要能把他搞出来。

黑龙江有反复，炮轰派方向是不对的，革委会做了一些错事要改正，但还要支持革委会。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回去搞好大联合。

郑波：要说的话，总理都说过了，就是要回去执行，能不能执行。对造反派是一个考验。

吴法宪：毛主席、党中央、总理、中央文革的话要坚决执行，总理今天讲的都是主席的思想，你们很好领会总理讲话精神。

总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我们都是在一起工作，在这想挑一个缝子都是不可能的。你们现在年纪轻，不能不出点毛病，出点毛病要认识改正。人生不遇到点艰险怎么能得到锻炼呢？

总理让大家看墙上挂着毛主席诗词，并给解释说：“暮色苍茫看劲松，”革命造反派要看到光明的前途坚定不移。“乱云飞渡仍从容。”前进道路还有许多

困难，革命造反派应毫不畏惧。“天生一个仙人洞，”写景陪衬。“无限风光在险峰。”要大胆谨慎最后总会胜利的。

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热烈欢送总理。

（记录稿，未经总理审阅，不准外传、不准翻印）

陆军第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整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十月，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世界东方兴起的二十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我觉得许多人讲改造，却都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最终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这几个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今天参加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天讲造反，天天讲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的完整的阶级分析，对于引起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肯定不能称为“文化革命”，暂用此名称）的原因，性质，目的（即这场革命的“底”等等）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

为什么毛主席说：“连我提议的印小册子的意见全被否决……有时只我自己同意自己的意见。”为什么林副主席指出：“我们国家机器有很多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了就让它垮。”为什么江青同志说毛主席在中央确实是少数，为什么陈伯达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为什么戚本禹说中央很高的负责人都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而哭过？为什么中央里几个忠于毛主席的人对中国现状都估计得如此激进？对于中国十几年的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估计？

为什么各级党委都被摧垮？为什么揪出来那么多走资派？

为什么要搞一月夺权风暴？为什么党团员、干部在文化革命中不少趋于保守？为什么文化革命前的先进人物现在几乎都是钢杆保皇？如尉凤英、时传祥、

张百发、夏菊花、刘考安、瞿太安。为什么一些敢于想问题，有头脑，敢于造反的人以前被视为调兵捣乱，如郭嘉宏，有的长期被拒之于党团员大门之外，如刘英俊等。为什么文化革命中揭发出来的事实简直与文化革命前一般人的认识相颠倒？为什么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

激进的造反派经过一年多残酷斗争的实践头脑里堆砌着许多问题，找不着答案，很多人虽不自觉，但对理论研究的一种强烈要求产生了，滋长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大叫人感到不满，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停滞了，甚至后退了。在列宁逝世以后，思想界很不活跃，新东西很少，人们的思想感到几乎要僵化，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第一个打破了沉闷的空气，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谁胜谁负并未解决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此后，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活跃，57年58年毛主席多次讲到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强调了反官僚主义。60年毛主席以他那无比的马列主义天才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类似既得利益集团，62年毛主席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强调了干群矛盾，指出中国搞得不好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非常反动的法西斯专政”，1964年毛主席指出：“现在的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并以他那深刻、准确、尖锐的见解第一次提出了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毛主席后来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毛主席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伟大思想，象一小幽灵一样，徘徊于中国大地，从她一产生起就毫不畏惧地向一切反动思想界，向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发动了不可抗拒的猛烈的进攻，毛主席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伟大导师，他站在最前列，他的思想使中国的思想界又重新趋向于活跃。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套理论，思想是崭新的，由于作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她一掌握了群众，就必将致强敌于死命，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思潮，整个反动的思想界以及旧习惯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对毛泽东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围剿。尤其是在国内，毛泽东主义直接触犯了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中国的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主义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围剿。联动叫嚣拥护60年以前的毛主

席思想，（六〇年以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逐渐形成，）就是这种对毛泽东主义刻骨仇恨的最好表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权力，把毛主席最激进、最革命、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思想严密的封锁起来，只传出一些一般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习惯势力，对新思想的不理解，在十几年中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光辉的名称搞成为一个神像式的东西，千方百计地阉割和歪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灵魂。

尤其在今天，在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的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口号在不少场合几乎变成了攻击毛泽东主义的挡箭牌，长保军正是喊着这句口号残酷地围剿毛泽东主义，长高司也是喊着这个口号可耻地背叛了毛泽东主义，如今工联一小撮修正主义头头也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后边迅速地走向革命的对面。

作为马列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的毛泽东主义，她关于中国的特权阶层的论述，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论述，都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过，因此理解的人很少的。不少人一听毛主席讲：可能会变成法西斯党就想不通，地富反坏右还能来掌权吗？他不知道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本，但是在政权内部掌权人中却出了修正主义集团，他们会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党啊！毛主席说：“我们一套在中国不灵了”（毛主席的一套贯彻不下去了！）有人一听就跳起来，“十七年的成绩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有人立刻大叫，这是否定共产党，……

对于毛泽东主义，对于中国大地上暴发的这场伟大革命，人们是多么不理解呵！不仅是保守派，造反派也不见得很理解，不少造反派虽然参加了这场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人很不理解（正如很多工农刚参加民主革命时对于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质，对象，动力等并不了解一样），不少人口里喊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实际上对主席的思想根本接受不了，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他们也发生过动摇，目前革命出现的曲折使“极左派”中产生的思想混乱状况，不就很说明问题吗？可以断定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信仰毛泽东主义（真正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思想）的人，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是很少的。

不少人都这么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报纸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去研究。结果很少人象毛主席刚参加革命那样，敢于想，敢于提出新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毛主席认为建党初期，我党是很活跃的，而解放“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由于上述的旧习惯的顽抗，目前很少有人象建党初期那样形成对于政治变革的主张的讨论风气，很少有人提出新思潮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特见解；中国的思想界目前还不够活跃。不可否认很多报纸上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提出的理论已不够用。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给人启发很大。但它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刘少奇的词句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没有讲出刘少奇猖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没有具体分析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有哪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产生了发展了。有哪些刘少奇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了产生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是较高级的。它提过一个重要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讲到为什么时，它只说了地富没有资本，但如果问到党内产生走资派的条件，原因，社会基础，却没有很成熟的看法。很多地方都可以遇到这种社论不够用，甚至束缚思想发展情况，需要用触及本质问题的理论——毛泽东主义直接武装群众。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思想界有一种压抑感觉，从另一个问题上也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为什么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存在呢？在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中国，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列宁在讲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条件时指出：“布尔什维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思潮和政治派别。”文化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而毛泽东主义这种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还未在群众中形成，所以在中国无产阶级

专政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目前还不能存在。

而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义，革命群众才能产生出自己的先锋队——革命政党，也只有在这时，革命人民才能完全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前段文化革命就是连造反派里最激进分子也很少接受了毛泽东主义，没有认识到政治大革命暴发的原因是中国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向”，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没有认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最终目的。群众基本上是自发的，是中央文革下个指示才能前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扶着我们，把手前进的，我们还不自觉，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全国廿十多个省市前一段只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革命政党。“而没有革命的政党，革命是不能搞彻底，不能深入。”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意味着群众运动由自发进入自觉的伟大转折，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群众发动的很充分，一家人在一起也讨论国家大事，毛主席为什么那时不讲这句话呢？因为那时革命群众中的先锋分子政治思想上还不成熟，而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革命人民不但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而且还逐渐锻炼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分子逐渐成熟，由自发到自觉，陈伯达同志说：“现在是思想阵地，理论上，为阵地，落后于运动的形势，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落后得太远了，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总是由实际问题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开出灿烂的花，理论的花。”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动了，且开大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接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当前最切最要的问题，即是毛泽东主义小组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的惊心动魄的路程教育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尤其是一月风暴那扭转乾坤的伟大场面，八月风暴空前残酷的斗争和出于常人意料的变动，更是使新思潮越来越喷薄欲出。毛主席解放以后把被万把大锁锁住的一系列最精辟的讲话的印行（全部是非法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思想的传播更是最好的条件。中国各地出现了那么些激进分子，不但出现了那么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好文章（这些文章根本未收齐），这些激进分子虽是极少数，但思想越来越完整。特别是由于毛主席的引导（主席今年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的理论给了激进分子强大武器）激进分子逐渐趋向于形成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派别了，这些都说明了目前成立毛泽东主义小组具备了一定条件。

一切决心献身于这场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革命战士，一切有研究政治的决心真正信仰毛泽东主义趋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一切忠于毛泽东主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关心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注重于社会调查的实干家！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建立毛泽东主义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

推翻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我们为施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以推动我国向共产主义迈进，实现我们的最高纲领。（关于实现目前纲领和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必须要写文章，深入阐述这场革命起码要五年到十年）

改造中国和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毛泽东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的信仰！

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猛地投入实际斗争并起先锋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学习，对于政治的彻底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真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到八点三十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了省革筹小组、四十七军负责人黎原同志，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最重要的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其他负责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同志，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同志也在座。

（接见后，二十五日上午给毛主席秘书打电话，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下午一点二十分，毛主席秘书回电：主席说，就是林彪同志的指示，没有什么要谈的了，黎原同志可以回去了。）

当黎原同志汇报到湖南形势时。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总理、戚本禹：后边有黑手，蔡爱卿、吴自立就是黑手。除他们两个外，还有。）

（总理、杨成武谈了蔡爱卿的主要罪行。）

（黄永胜：吴自立已被三军造反派揪到广州。）

（总理：最好把吴自立揪到湖南去斗争。）

林副主席说，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象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刘兴元：长沙有国民党军官×××××人。）

（总理：你们应当注意，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还在机关、学校、工厂，所以很乱。）

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

有三条黑线：

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

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

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江青：削尖脑袋的是两面派，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暴露的，群众是要把他们揪出来的。所谓两面派，实际上还是一面派，到一定时候，他就暴露了。）

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一点事就大惊小怪。

（总理、伯达、戚本禹：过去想长生不老的人，×××，蔡爱卿就是怕死，总想长生不老，和伪少将、大特务周潜川结儿女亲家，有的打鸡血针、王八血针，保命哲学。）

林副主席说，过去有那么些人吃这个药，吃那个药，成天怕死，总想长生不老。一怕死就要演变过去，有的已经修了，有的开始在修。过去很多医院、疗养院还住不下，现在好多都空了没有人住了。

（总理：长沙有两个学校，政干校支左是不错的。）

林副主席说，政干校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高的，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是不错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讲过：政干校是不错的。三四一没有搞好，过去的底子没有打好。三四一和社会上搞到一起，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要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他们打架，不要他们支左了。

黎原同志汇报到军区问题，说瘫痪了。

（总理：军区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可以抓工作嘛，司、政、后要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了。）

（江青：军队上要搞忆苦思甜。）

汇报到红旗军问题。

（总理：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查，是调查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汇报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汇报到“高司”问题。

（总理：“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作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戚本禹：要讲政策，不要进行报复。湖南打人很严重。群众不能很快团结过来，干部不能很快争取过来。坏人也不能很快地孤立起来。通过学习班，很好进行教育。）

汇报到道县残杀造反派问题。

（谢富治：道县杀人很严重。）

林副主席说，这也是坏人搞的，有坏人在背后操纵。要立即制止。

汇报到十月二十一日打死红造会两个人时，

林副主席说，从这件事接受教训，军队加强爱民教育，对群众加强拥军教育。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宣传组根据传达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黎原在传达林彪和周恩来对湖南指示的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黎原在传达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大会上的讲话

（纪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今天，我向大家传达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们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

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于十月二十日到达北京。

十月二十二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

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叶群以及黄永胜、刘兴元等同志，接见从下午五时开始，到八时半结束，共三个半小时。

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林副主席精神很好，身体很健康！

三个半小时的接见，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们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使我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党中央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我向林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当汇报湖南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有国民党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总理和戚本禹同志插话：后面有黑手，如蔡爱卿、吴自立等。总理和杨成武同志还讲了蔡爱卿的一些情况。黄永胜同志插话：吴自立现在已揪到广州斗。周总理说：最好揪到湖南斗，更有现实意义。）

林副主席说：湖南的问题很多，和平解放不和平。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问题都多，如新疆、西藏。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烂摊子大，国民党的底子厚，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彭、贺的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林副主席说：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操纵，有反革命的三结合，这条黑线很长。第一条线是国民党这条线。和平解放的，原来有不少国民党的部队，这条线是起

作用的。第二条线是彭德怀、贺龙这条线，也很起作用，在湖南很有影响。第三条线是刘少奇、陶铸这条线，影响也是很大的。由于这三条线，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暴露是件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如蔡爱卿，就是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

（江青同志插话：削尖脑袋的是两面派，到一定时候，还是要暴露，群众要把他揪出来。所谓两面派，实际上还是一面派。）

林副主席说：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搞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了点事情就大惊小怪。

在谈到蔡爱卿问题时，总理、伯达、康生等同志都有些插话，说蔡爱卿和特务周潜川拉儿女亲家。有些怕死的人，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这是活命哲学。

林副主席说：这些人一天就怕死，想长生不老。一怕死，就要演变过去，有的开始“修”了，有的已经“修”了。过去很多疗养院、医院都住不下，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医院就没有这些人去住了。

当汇报到三四一部队的问题时，

总理说：长沙政干校支左不错。

林副主席说：政干校在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举得高，文化大革命中也不错，毛主席也讲过。三四一部队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上搞在一起，搞得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不要他们支左了。到社会上打架，怎么支左！

关于湖南军区问题。

总理说，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同志应该把工作抓起来。司、政、后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

关于“红旗军”问题。

总理说：基层可以平反，总部不能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我过去讲调查，是讲调查湖南红旗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关于下乡上山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说：坚决按中央指示执行。下乡上山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毛主席定的。动员他们回农村，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把生活安排好。

关于“高司”问题。

总理说：高司这个组织不要再成立了，基层组织，战斗队，认识了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尊重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可以参加联合。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总理还笑了笑说，你们对造反派还不好说服吧！

当汇报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时，

戚本禹同志插话：这在湖南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不能正确对待，打人很严重，进行报复。群众不能很快团结过来，干部不能争取过来。这是坏人在后面搞的，有的坏人还参加打人。要通过办训练班对造反派很好进行教育。

当汇报到道县杀人问题时，

林副主席说：这也是坏人搞的，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要立即制止。

当汇报到最近在长沙打死红造会两个同学时，

林副主席说：军、民都要从这件事中接受教训。军队要加强爱民教育，造反派、革命群众，要加强拥军教育。不要扩大事态。

同志们！

林副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对我们湖南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非常深刻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作了非常重要、非常明确的指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热情宣传，坚决贯彻执行。

第一、必须深刻领会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挖掉三条黑线。

林副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有国民党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林副主席的指示，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打中了要害，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林副主席指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湖南的具体化，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湖南的具体化。

湖南极“左”派的活动为什么这样突出呢？就是因为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背后有坏人策划。如蔡爱卿、吴自立之流，打着“老革命”的招牌，欺骗群众，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混水摸鱼，利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思想，极力煽动极“左”思潮。这股反动的极“左”思潮，分裂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刮经济主义风，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闹翻案风，让牛鬼蛇神打着“造反”的旗帜，进行阶级报复。极“左”思潮的实质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前一段，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在批判极“左”思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促进了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但是，我们队伍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判极“左”思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1. 有的说，现在不应该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认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认识，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迫使阶级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我们必须警惕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向我们的进攻。目前，在我们湖南，一小撮阶级敌人主要是从“左”的方面向我们发动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进革命队伍，篡夺领导权，达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以，批判极“左”思潮是当务之急，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把煽动极“左”思潮的黑手揪出来，把这股反动思潮彻底批倒、批臭，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听任这股反动思潮自由泛滥，就会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2. 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打击革命小将”，是“想压垮造反派组织”。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指向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绝不是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一时受了极“左”思潮影响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教育自己的问题。有些革命群众由于头脑里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革命小将，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

对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缺乏警惕，受了敌人的欺骗，因此，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清除混入革命组织内的坏人，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是打击革命小将，而是爱护革命小将，关心革命小将，帮助革命小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不是压垮造反派组织，而是爱护造反派组织，使革命群众组织更纯洁，更坚强，更有战斗力。

3. 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转移斗争的方向的，正是那一小撮极力煽动极“左”思潮的阶级敌人。他们竭力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界限，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混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限，把斗争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个新生事物。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不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是为了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敌我，明辨是非，澄清各种模糊认识，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当前，要反复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进一步提高对批判极“左”思潮的认识，以新的战斗姿态，勇敢地投入到批判极“左”思潮，深挖三条黑线的斗争中去，坚决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彻底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铲除三条黑线，揪出黑手和坏头头，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猖狂进攻，揪出黑手和坏头头，铲除三条黑线，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也是我们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我们同黑手、坏头头和同极“左”派、“三条黑线”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目前的集中表现。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妄图篡夺我们的胜利果实，把革命拉向反革命，企图复辟

资本主义。他们从反动的阶级本能出发，把十八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打着“反迫害”的旗帜，要翻十八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案，大刮“翻案风”，全盘否定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公开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司令部的绝对权威。他们妄图搞垮解放军。他们大刮经济主义妖风，投机倒把妖风，单干的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他们大搞迷信活动，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在群众组织中贩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革命队伍。他们极力破坏革命的大联合，鼓吹无政府主义；因为一搞大联合，加强了群众的团结，他们就无计可施，无处可藏了。他们就是妄图篡夺我们文化大革命以来同“走资派”艰苦奋战取得的胜利果实，要把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了十八年的社会主义江山，拉回资本主义老路上去。所以说，我们同“黑手”、“坏头头”及三条黑线的斗争，是复辟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是捍卫社会主义江山的斗争。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一切革命造反派，都要在这场新的斗争面前经受考验，鉴别你是真革命派还是假革命派甚至反革命派。我们希望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勇敢地投入这场揪黑手，抓坏头头，铲黑线的斗争，为人民立新功！

为什么极“左”思潮这样突出？颇有市场？原因是其后有坏人操纵。狡猾的阶级敌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猖狂加以反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硬说是反动路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的，他也说成是反动路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他硬说这是刘氏反动路线。一句话，就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加以攻击，打着反对刘邓路线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造了很多反动舆论，在群众认识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必须澄清。（一）“革”和“保”的问题。他们抽掉“革”和“保”的阶级内容，鼓吹“一切造反都有‘理’”，“一切保都是错误的”，为他们大造无产阶级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什么“造户口反有理”，什么“造工资反有理”，什么“‘造’上税的反有理”，“造公粮的反有理”等等，都是这一类货色。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造走

资派的反有理。造无产阶级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不仅无理，而且有罪。（二）

“反迫害”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革命闯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成了“黑鬼”、“右派”、“反革命”，给这些同志平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那些坏家伙抽掉阶级内容，提出“一切受迫害的团结起来造反”。现在，在一部分人中造成了一种舆论，一提“受过处分的，似乎不仅都应当‘平反’”，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在文化革命初期，群众起来揭发出来的三反分子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平反，而且这些人似乎是天然的“左派”，因为他受了“迫害”。还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公安六条规定的二十一种人，现在也打着“反迫害”的旗子，有的已经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有的还担任要职，出谋划策。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混进来的坏人一定要清除出去，

（三）借口反血统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论。我们认为，血统论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化革命中刘邓反动路线，走资派曾经用它来制造混乱，企图保自己过关。因此反动的血统论是必须反对的。但是，我们反对血统论，为的是坚持毛主席的阶级论。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就是既看经济地位，又看政治态度。决不能借口反血统论，把阶级论反掉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公安六条中规定的二十一种人，都不能参加群众组织，决不能给他们“四大”权利，决不能借口反血统论，抹杀了阶级界限。对待家庭出身和本人历史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对本人有影响的一面，也要看到可以革命，可以背叛家庭出身肃清旧影响的一面。决不能只看后者不看前者。现在有些阶级敌人打着反血统论的招牌“造反”，是犯罪行为，广大群众应当专他们的政。有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利用反血统论的招牌来掩盖他的反动立场和反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口反血统论，大造舆论把成份不好的都说成是革命派，把出身成份好的，都说成是右派、保守派，这是极端错误的。

由于阶级敌人的煽动，社会上流传一些非常错误甚至反动的舆论，我们必须加以驳斥，抓好活思想，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依靠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目前，在革命群众中，对于抓黑手，揪坏头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需要加以解决：

①小资产阶级派性。一些人只要派性，不要党性，毫无原则，不讲阶级分析。只要是支持他这一派的，不管是走资派还是伪军官、阶级异己分子、犯罪分子、地富反坏右，都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吸收到自己组织里来，甚至十分重用。相反，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不支持他的“派性”，不支持他的“以我为核心”，就说别人是“走资派”，要打倒。小资产阶级派性不克服，坏人、黑手就可能混水摸鱼，蒙混过关，革命干部就站不出来。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党性高于一切，决不当让小山头主义迷了心窍，干出帮助敌人，害了革命的事来。

②怕自己组织揭出坏头头，揪出黑手，不光彩。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党揪出刘、邓、陶等一小撮走资派，清洗一些混进来的坏人，这正说明我们的党光荣、伟大和正确。在这大革命时期，一个群众组织混进几个坏人，是不奇怪的，是很难避免的。揪出黑手和坏头头，清除坏人，正说明我们这个组织是革命的，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相反，如果不敢把坏人揪出来，那才是不光彩的，说明这个组织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战斗力不强，如果听任这些坏人在自己组织里活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从批判极“左”思潮以来，有些同志已经行动起来，写了自己组织的一些“为什么”，这是可喜的现象。革命派就是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些人提出要“紧跟总部”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毛泽东思想为检验一切的最高标准，总部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就执行，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要问个为什么，就要提出来。这不是对自己的组织不利，而正是关心自己组织的表现，这不是破坏本组织的团结，而正是为了巩固加强自己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最近以来有不少组织都作了自我批评，这是可喜的现象，特别是孙大圣的邹定国同志，工联的周国强同志，湘江风雷的罗新发同志，自我批评比较好，我们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

③私心杂念作怪，怕报复，怕“斗不过”，自己吃亏。我们认为，当前，同三条黑线的斗争，同黑手、坏头头作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掉私字，树立革命造反派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怕字的根子是私字。我们不当只怕自己吃亏，我们更要关心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应当敢字当头，依靠群众，团结起

来向一小撮坏人专政。应当看到，同这一小撮坏人作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压迫他，他就压迫你，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团结起来，勇敢地同一小撮坏人作斗争

④ 还有些同志认为：“抓坏人，揪黑手，是专政机关的事，是上头的事；我们只管斗走资派”。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挖三条黑线，同打倒走资派是一致的，只有挖掉三条黑线，才能挖掉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真正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把坏人揪出来。”因此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自己的事，要大家起来办才能办好。因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最清楚，本单位的群众、本组织的群众最清楚，同时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对这些坏人实行专政。所以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揪黑手，揪坏头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解放军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

⑤ 有些人耽心在造反派里揪出了黑手和坏头头，会造成“保皇派翻天”。当然，我们应当预防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扩大化，这个情况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讲保皇派，不应当是那些受蒙蔽的一般群众，而是走资派（如陶铸就是最大的保皇派）和顽固坚持反动路线而屡教不改的人，这些黑手本身就是真正的保皇派。把他们揪出来，老保就翻不了天了。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抓坏人了。我们就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我们不应当怕风险，应当迎着大风大浪前进。

第三、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林副主席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还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我们批判极“左”思潮，揪出黑手，铲除黑线，靠什么？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明察秋毫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批判极“左”思潮，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以“斗私，批

修”为纲，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当前，我们要大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结合学习“老三篇”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触及灵魂，狠斗私字，切实做到亮私心不怕丑，斗私心不怕痛，勇于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彻底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把黑手揪出来。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有斗掉了私字，才能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把黑手揪出来。只有斗掉了私字，才能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要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和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要大办学习班，大开讲用会，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总之，我们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斗私批修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思想革命化搞得好好的，真正把湖南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坚决执行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彻底批判极“左”思潮！

对湖南的三条黑线展开大揭发，大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宣传组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1967年秋，杨曦光与来长沙的山东师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以“批判小组”、“十月革命”红卫兵的名义，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无视中央绝对禁止任何全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共同在长沙主持过一次有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据此形成“调查报告”。原文如下：

我对知识青年运动还刚刚有一点接触，看了一些材料(能收集到的都看了)开了一些座谈会以及个别交谈，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调查中，知青运动的许多道理使每一个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知识青年暴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使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一些反对知识青年运动或冷眼旁观的人，不得不重新来评价和注意知识青年运动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所有的人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考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欢呼，为他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一切假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他们面前撕去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对这场文化革命的极端不理解 and 革命的不彻底性。一切反革命眼见知识青年运动触动了他们的根本，他们暴跳如雷了，他们妄图镇压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暴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们强烈的普遍的感觉到，因此还不能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他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预示着农民革命的伟大风暴，知识青年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老爷们，你们的掘墓人的新的觉醒宣布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公开镇压，经济收买和改良主义都不可能阻止你们的死亡！

新的觉醒

湖南的知识青年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发展过程。

文化革命初期知识青年受到的压迫是很大的，他们几乎只有所谓“自我革命”“互相揭发”的权力，他们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是他们写出全县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们很早就起来反工作组，湖南知识青年几乎全是造反派，所占总人数的比例比学生和工人都多。

一月革命风暴时，知青运动曾一度兴起，甚至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因为他们批判刘邓安置路线的斗争锋芒触痛了一些窃据中央的老爷，又因知识青年多是造反派，因此二月镇反时他们被反经济主义文件第三条和 2·17 通知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而惨遭镇压。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虽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觉悟还未提高，不少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因此知青运动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今年八月风暴以前，知识青年和各地造反派并肩战斗，还未显露出知青运动尖锐的斗争锋芒，因此各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知青作战勇敢、斗争坚决，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九月初知青中的少数勇敢分子开展了造户口反的斗争，同时“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等等知青运动的道理在知青中迅速传播，随着这种以奇特速度和空前广泛的传播，知青运动很快进入了高级阶段，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他们“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顺服的奴隶一旦打碎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就如火山爆发出强大的反抗精神。

湖南知识青年运动目前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中南知青运动的中心。湖南关于知青运动的理论是较高和系统的，湖南知青报纸空前的多，他们的强大生命力超过了任何小报，因此湖南知青在社会上的舆论是强大的，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通过标语、报纸等多种形式在人民中迅速传播，甚至流传到外省，唤起其他地区知青的觉悟，由于有统一思想作指南，湖南的知识青年的观点又是空前的统一，造反精神也最强，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团结在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的旗帜下，向旧世界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

知识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使命

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低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分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别。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最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十七年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吗？

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

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极左派”和知识青年运动

只因为知青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因此他们就成了“极左派”的同志和战友。“极左派”的斗争锋芒是直指特权阶层，官僚机构及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因此两股革命的潮流汇合了，这就是敌人把知青运动纳入“极左思潮”的原因吧！

然而“极左派”却与知青有很大的差别，每一场革命的暴发都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而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这些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

基本原理至今几乎被一切“马列主义者”所遗忘了)说实在的,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压迫剥削。不少是旧教育制度的宠儿,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敏感性,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知青运动面前暴露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而知识青年呢?他们优点和工农相似,他们是自己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深受特权阶层、官僚机器、旧教育制度的压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对旧世界实行叛逆,坚决造反!“不是在沉默中暴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比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还要坚韧不拔和革命彻底。稍举两例就可看出这种差别。

学生中的逍遥派之多,难道是因为没有复课吗?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出现了许多颓废、整天无所事事,逍遥,对文化革命不感兴趣以及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投降,叛卖的行为被当成革命的妥协而得不到惩罚。而只要你迈开你的双腿,到知识青年中走一走,只要你是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你就会感到从来未有的痛快和令人鼓舞。知青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是所有知识分子比不上的,八·一九时那种沸腾的场面随时都可以在知青中看到。

另外,人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在知青中的传播是惊人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改革等问题往往单纯从时髦出发甚至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他们谈社会改革,文化革命引起的原因、特权阶层,他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能接受,往往把毛泽东主义最激进的内容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知识青年呢?他们是自己深受压迫剥削,为了求解放他们就要找理论,以明白根本原因。他们有一种真诚强烈的学习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即使是一个对理论毫不感兴趣的知识青年,和他谈起社会中的阶级分化,社会改革,他们也是津津乐道。因为毛泽东主义把他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西提到了理性认识,正如他们所说,象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从种种社会矛盾中惊醒。一个知识青年讲出了他们要求理论的朴实性:“你们谈的是从革命的原则出发,玩弄词句术语(指那些知识分子)的造反者,我们是从吃饭问题说起革命,讲哲学。”知青经济最困难,但他们办的报纸最多,每出一种新的能解释说明知青现状的新观点,不要一天可以马上传到每一个知青。因此你去走访知青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关于知青运动的论点几乎完全一样。在知青中理论变为蓬蓬勃勃的运动,这种飞

跃更是屡见不鲜。如桂林知青九月份还在农场安于现状，几张长沙知青的报纸到了那里，讲出了他们切身体会到又没有理解到的东西，他们立刻造反了，掀起了批判安置路线的运动。桂林知青告诉我，长沙知青的报纸在那里传来传去，大家抢着看，磨成了碎片还传着看。这些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动人情景，是那些住高楼吃白米过着舒适闲散生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也不可理解的。伟大的知青运动一定会放出灿烂的理论之花，思想之花。

知识分子中的极“左”派向何处去？是走颓废的道路，还是走象牙塔尖上的“革命”的道路（这是最终也会动摇以至叛卖革命），这是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到社会最底层去，到工农中去，到知识青年中去，而目前知青运动最突出地暴露了工农进行社会革命的要求。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知青运动相结合是当务之急。丢掉你的臭架子，抛弃一切剥削阶级成见，跑到知青中去，握着他们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仇恨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和他们一起研究社会矛盾，真正在调查中掌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革命的力量，才能使改革社会，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否则知识分子高谈的“革命”。“造反”将是在一种多么空虚的沙滩上啊！

目前有些知识分子逍遥得太空虚了，想搞点复课闹改良，复课闹复辟。他们应当明白，作为旧教育制度的宠儿的他们，是不可能懂得吃人的旧教育制度的全部罪恶的，是不可能懂得被旧教育制度吃掉的那些人的心情的，知青提出了一个论点，旧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特权阶层分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辩证法，同时造就了一批奴仆和剥削对象。他们有的被赶入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也是旧制度的掘墓人。这难道不是对旧教育制度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吗？我们的教育革命必须与工农和知青运动结合起来，才不至于走上改良主义甚至复辟的道路。复课不是把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学生扯在一起，搞一个和和气气的大杂烩，而是要把那些愿意革命的人召唤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糟得很和好的很

知识青年回城市造反，搅动了那班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造反派右翼，无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舆论的压迫，他们闭眼一想知道知青造户口

反的“流氓”相，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知青运动的锋芒所向，乃是这次文化革命所必须摧毁的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乃是十几年刘少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拼命扩大的三大差别，乃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乃是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知青运动把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露骨地暴露出来了。许多长期在文化革命实践中积的问题，可以通过分析知青运动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找到答案，人民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将大大飞跃一步。这标志着革命人民掌握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飞跃，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一切真正献身于文化革命决心搞到底的人，对这样一个群众运动怎能不放声歌颂，虚心学习，和他们相结合，并肩战斗呢？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文化革命的对象——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打击革命人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资产阶级老爷企图保存资产阶级的旧秩序，阻碍革命暴发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一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到知青中去走了一遍的，你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快。千千万万的农奴摆脱了任人宰割，惟命是从的精神状况，他们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吸血鬼，旧制度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革命知识青年的举动好得很！好的很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文化革命需要一个较彻底的社会革命，需要推垮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一切改朝换代，改良主义，结构改良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拥护革命的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所谓经济主义问题

革命都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恩格斯说经济斗争到处发展为政治斗争。群众在推翻旧制度的初期提出经济要求决不是经济主义，而为了维护旧制度，用金钱来收买知青，妄图使他们停止斗争，这就是经济主义。目前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刘氏上山下乡运动，大讲什么“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大搞经济收买，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主义。而广大知识青年呢？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口号，他们所进行的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任何人都苦！但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热情比任何人都大，这是经济主义吗？

知识青年中也确实有败类，有些人对砸烂加剧阶级分化，复辟资本主义的安置路线不感兴趣，急于自己爬入上层社会，脱离知青阶层，他们这些人是想当新生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将成为知青的贵族。他们决不代表知青阶层的利益，决不代表知青运动的方向。相反知青的利益决定他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搞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将断送他们。

那些动用大批工厂资金的工贼，那些整天逍遥的知识分子，你们花费成十万数的国家资金却在那里贩卖机会主义，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你们在知青推动历史的革命运动面前指手划脚地咒骂经济主义不感到可耻吗？

彻底打倒反动的血统论——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

血统论为什么被文化革命的仇敌利用成为反动的理论，是当今许多用漂亮的批判血统论的言词继续贩卖血统论的说客文人所不愿回答和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中暴露出的阻止历史前进的反动性比其他非劳动人民子女要厉害得多呢？什么是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是不是被某些人所认为的分析阶级出身就是真正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不，阶级分析必须看人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十几年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对这场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资产阶级其子女。而知青身受特权阶层扩大三大差别的迫害，他们处在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他们最了解社会，他们是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错，他们有不少人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这就造成了他们革命时身上背了很多包袱。但这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不该被人遗忘吧！以前学校里所谓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培养新生资产阶级，使干部子女青云直上，这就是它的本质和总宗旨。所以以前学校并没有真正向工农开门，而是向高干子女开门，有的地方的团支部甚至干部子女夺工农子女的权，反动血统论是压在知青头上的一座山，必须推翻。知识青年决不是什么“狗崽子”，而是革命先锋。

所谓宣扬社会黑暗面

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腐败而担忧才发动了文化革命，看到我国社会的矛盾才能革命，才具有起码的当造反派的资格。保守派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社会矛盾，或不愿看到这些矛盾尖锐化必将导致革命暴发。而知青最懂这

些社会矛盾，最明白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恰恰是他们的优点。恩格斯讲到巴黎公社的意义时说：“1864 在全欧洲，即在群众中间，运动的理论性质还很模糊，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为工人党存在……连美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规章所陈述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大成就应该是破坏各派的幼稚……，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个成就。”前一段当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还不很明确时，我们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也有一种幼稚的合作，而知青运动的大成就就是很不明显也是第一个打破了这种幼稚的合作，把各种假革命，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知青运动使文化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毛主席说：“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的认识而定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历史以从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造反到底，我们黄金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拼命向前啊！

（注）补充一点——知青的利益与贫下中农是一致的，农村中走资派的压迫剥削的花样（如在工分上玩的花招）都是对富裕农民有利而不利于贫下中农和知青的。知青对国内存在的变相剥削异常愤慨，他们的这种情绪也反映了贫下中农在农村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要求。

知青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了社会的对立面。”这句话反映了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年）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们的纲领》

（这份纲领由张家政执笔）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以苏修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面对着现实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的严重挑战。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接受了这场挑战，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列宁在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毛主席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革命者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

旧的国家机器。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极少数是自觉的，多数是不自觉的。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中多数觉悟了，是会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觉悟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这是世界观的彻底改造，必然地会有反复。极少数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要推翻的特权阶层。

对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摘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的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而作为国家机关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监狱、法院、警察，则除了军队在六〇年后由林副统帅主持，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外，长期被罗瑞卿盘踞的公检法已经完全烂掉了。

特权阶级的出现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已经变质，虽然经济基础总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障碍作用，于是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的触动更少。因此，这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

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只是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群众的发动，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用他们仍然把持着的权力，愚弄群众，干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传播；由于反动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很大一部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还很不理解，对特权阶层的反抗往往还停留在改变自己受压抑的地位上。

尽管在去年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但是批判局限于对个别人的罪恶的揭发，而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

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尽管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但是一般的只认为这是武斗，而没有看到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因此，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使广大群众对文化革命有了感性的认识。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

四、林副统帅对湖南所作的十·二四指示，江青同志对文艺界作的十一·十二指示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文艺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十二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

林副统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

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

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

五、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人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

六、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出了它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机会主义思潮瓦解革命队伍的斗志，使反击成为分散的甚至不可能。

必须摆脱受机会主义思潮腐蚀的头头的束缚，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不肃清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会肃清革命。

七、在转折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还处于自发阶段的运动提高到高级的阶段，要实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就是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的开端。广大革命群众在生动的革命实践中学习，理解、运用、掌握毛泽东思想，终将揭穿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统治，愚弄群众而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歪曲，终将抛开习惯势力的束缚，把革命进行到底。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给我们展示了这光辉的前景。

原作日期应在 1967 年 12 月至 1968 年 1 月，

原转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这是一个将永远载入湖南文化革命斗争史册的光辉日子，就在这一天，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毛主席来到长沙，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号召我们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的号召下，在这光辉的历史背景下，《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于十月十一日正式宣告成立了。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生事物，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的集合体，她出世就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围剿。

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在这场反动势力的空前围剿中显示出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场围剿中发展壮大了。

今天，是我们向全省三千八百万人民公布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纲领的时候了。

1. 大好形势与逆流

毛主席在巡视华北、中南、华东等地途中最科学、最深刻、最精辟地概括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形势大好，这是我们坚定不移，从不动摇的信念。

但是，我们所说的形势大好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而决不是资产阶级老爷和他们的走狗所鼓吹的取消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

我们不仅从正面，从革命群众的充分发动来分析形势大好，而且我们还从反面，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垂死挣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湖南）来理解形势的大好。

当前，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一股自上而下的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使我们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必然覆灭更充满了信心。逆流的出现，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回光返照，“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一边高唱凯歌，一边迎接反扑。在二月逆流中我们是这样，在今天，还是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大好而放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拼死反扑的警惕性。

“谁要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在大好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2. 新的进军号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肯定了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的初步胜利。应该看到这个初步的胜利还是只是打乱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脚，湖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没有被摧毁，《决定》的发表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结束。而只是预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夺权斗争的开始。

林副统帅十月二十四日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指示是这场新的夺权斗争的进军号。

林副统帅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的烂摊子大，三条黑线又粗又长，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湖南还没有乱透。

林副统帅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必须大乱，乱敌人，乱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敲响了。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和林副统帅 10 月 24 日的指示，划分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不同的时期，贯穿其中的是一条不断革命的红线。

3.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是推动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林副统帅 10.24 指示中指出的反革命三结合，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湖南旧省委没有被广大群众冲垮之前，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旧省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旧省委被冲垮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利用省革筹的招牌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复辟资本主义。尽管省革筹这种三结合的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但是，内容才是事物的本质。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林副统帅给我们提出的战斗任务，新的夺权斗争就是夺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炮制的长沙、株洲、邵阳等地的市革筹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新的重要的据点，这些市革筹必须连同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彻底摧毁。

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维护上台黑线人过关，他们把一些台下人物作牺牲品抛出来，欺骗群众，以转移斗争目标，把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斗争引向揪革命组织“坏头头”的错误方向上去，对于他们的诡计必须坚决戳穿，必须立

即引导革命群众投入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风暴中，彻底埋葬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4. 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策动的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反极“左”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反极“左”运动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在革命阵营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极“左”思潮，所谓批判极“左”思潮就是批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是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灵魂。

所谓反极“左”运动，这是省革筹中黑线人物为了保护自己过关，维护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的镇压。

所谓反极“左”运动从对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过火的行为的无限上纲，横加指责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的歪曲和否定。

“反极左运动”控制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迅速批判这股“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

5. 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放弃原则的“联合”，是迎合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胃口的杂烩，它必将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拿原则去作交易，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为了掩护自己过关，为了使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具有更加完善、更加合法的形式，他们收买了胡勇、叶东初这样一批工贼，利用大联合作幌子，取消革命原则，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凑合代替革命的联合，吞并、瓦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工代筹”的产生只不过是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计划中的一个部署。

对于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背叛革命充当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走狗的工贼，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坚决揭露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

合，也只能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其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联合，他必定在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

在反革命凑合“工代筹”的破旗前高高地树起《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力量必将粉碎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计划。

6. 坚持文攻武卫的正确方针

在湖南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之后又出现了反革命武斗组织工联八·一九主义兵，八·一九主义兵的出世正象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出世一样，标志着工联少数决策人及其后台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的失败。

挑起武斗，是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黑线人物穷途没落的一手。对付反革命武斗组织，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镇压他们的任何挑衅。

7. 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省革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交替使用镇压和收买的两种策略，并且在收买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功。机会主义思潮已在革命队伍中蔓延，成了一种危险的病症，以湘江风雷总部一小撮叛徒的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投降只是更加大规模的叛卖革命的序幕，革命阵营的分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

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在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想……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开展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毁灭性的进攻，为了获得对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胜利，必须看清受机会主义思潮严重腐蚀的头头，[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8.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胜利发展。

这场斗争仅仅是开始，更伟大的革命决战还在前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关键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正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形式来挽救他们的灭亡。斗争的形式在变更，但斗争的阶级内容丝毫也没有改变。

任何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乘胜追击，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紧跟最高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对四十七军就中央 [67] 367 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

一、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二、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为了更好的搞好大联合，根据上述精神，当前的工作，按原布置不变，要坚定的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对于确实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经过认真调查，报军批准。

三、贯彻中央通知，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教育、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对于与高司同观点的基层组织，应区别对待，对广大群众采取教育团结的政策，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参加联合，同时下很大的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造反派，正确处理本单位受蒙蔽的群众，共同搞好大联合、三结合。

四、在做好群众组织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

五、要贯彻中央 12.2 通知，要密切注意动态，警惕敌人从中捣乱，要随时说服群众，就地闹革命，不要随便上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央文革并报周总理：

韶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来韶山参观的国内外观众越来越多，今年以来将近二百万人。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红卫兵小将强烈要求把韶山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重重阻力，倡议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建造一座宏伟的毛主席塑像和修建一条通往毛主席家乡的红色铁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洪流的推动下，广大革命群众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热情，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现在这两项工程即将胜利竣工。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因此，广大的革命群众一致要求在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隆重庆祝活动。特向总理、中央文革请示以下三个问题：

（一）毛主席塑像在韶山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具有伟大的意义，广大革命群众敬请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

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祝活动。

（二）关于大会名称问题，广大革命群众有两种意见：

（1）为了表达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拟把毛主席塑像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定

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隆重举行。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

(2) 为毛主席七十四寿辰祝寿。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

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

(三) 为了通过这一庆祝活动，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更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我们除组织省报和有关宣传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希望新影能派人来摄制新闻纪录片。

以上意见当否，请总理、中央文革速示。

湖南省革筹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 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 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 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 我们不要题字。

(六) 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1967. 12. 21； 中发 [67] 394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并各地方报社：

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执行。

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领导小组及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班返省汇报团。

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下午二时半至五时十分。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总理、康生、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邱会作等首长，在全场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进入会场。

总理向大家招手。（众：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总理：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吴法宪同志：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志很久就盼望总理、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接见，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九六八年的第二天。总理、康生同志和中央文革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大家，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请总理作指示。

周总理：

关于学习班是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杨成武同志、吴法宪同志、邱会作同志他们管。我没有过问。伯达同志在河北视察，今天没有来。江青同志这几天感冒，

那天就没接见大家，所以今天也没有来，我代表她问候大家。现在请康生同志先讲。

康生同志：

同志们！我是有官僚主义的。开始的时候，了解了一下，以后事情多了，就不大了解了。对河南班了解一点，河南班已毕业。今天来和大家见面，同志们在这里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大家，大家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你们看是不是？（众答：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向同志们致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我们，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的领袖对同志们的学习十分关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这个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我们参加了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了解了很多东西，但更重要的，因为大家通过学习可以了解到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红旗。它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任何困难，任何分歧，任何冲突，只要我们把毛主席的声音，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方针与群众见面，广大群众就会热烈拥护，坚决执行。通过同志们的学习也可以证明。训练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吴法宪同志回答：九月四号，差两天四个月）差两天四个月，我今天没有办法总结。但是可以回顾一下。

第一期河南训练班，那时到训练班来都不愿意来，认为到训练班来真倒霉，就回不去，就没有脸见朋友，没有脸见老婆、孩子，谁也不想来。有的人准备被看起来，到训练班来准备坐牢，有的人准备学习以后原来的地方回不去，当老百姓去。特别人武部的同志认为，军不军，民不民，不好办，要到野战军去。另外一想，到野战军，但年纪又老了，回原单位不行了，到野战军也不行了，回家又丢人，三条路都没有办法，再还有一条路，就是到公安局去。有的人有怨言，人家犯错误我们是跟着倒霉，跟何运洪、李善亭倒霉。也有的认为，我们又没有犯错误，叫我们来干什么。那个时候思想是混乱的，经过短时间的学习、了解，与他们想的完全是两回事。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很光荣的。原来想人家不要他回来，现在人家敲锣打鼓欢迎回去。这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只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广大群众见面，群众的思想就会转变过来，派性

就会少一点，党性就多了。我想同志们会有这个认识。同志们学习好久了，我建议在座的同志，把你们学习的过程总结总结。总结一下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的经验。这有很大好处。这是我同同志们交换意见的第一点。

另外，从广西学习班回去汇报，汇报的结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对制止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起了很大作用。广西的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答：是）你们立了一大功，（答：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是呀！还不够，所以还回来学习了。（众：笑）事情总是这样的，功总是立不完的。革命愈向前发展，思想要不断提高，不断前进。证明你们这方面学习的很好。通过广西的实践经验，有些省也准备回去汇报。杨成武、吴法宪同志向中央文革报告了，回去促进革命大联合，这种思想要求是好的，中央赞成。因此，我想当同志们走的时候，和同志们见见面。见面没有更多的话要讲，我只是想要讲几个问题。

同志们回去，对绝大多数地方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广大群众会欢迎你们的，这是主流。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因为你们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为什么群众不欢迎，会受到广大群众欢迎，这是主流。但是另外一方面。同志们也要想到，个别地方，个别城市，有些群众不大容易接受，过去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经验。广西的钦州、梧州就不欢迎，去梧州的还挨了打。说你们学修了，学成了陈独秀。遇到这样的情况，同志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有些群众受蒙蔽不了解，我们在这里学了，他们还没有学，思想没有准备。把我们用一段时间学习领会的东西交给他们接受不了，发生了矛盾。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用毛泽东思想办事，要采取耐心的办法，不能采取对立的办法，更不能采取压的办法。要用主席思想善意批评、帮助，达到联合、团结。当然，另外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个别坏人有意破坏我们的大联合，有意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把坏人，坏头头同广大群众分开来。不要把广大群众看成与他们一样，要团结群众，孤立走资派、少数坏头头、少数坏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很好分析，有的地方双方派性很厉害，回去以后不敢汇报，话插不进去，怕讲了以后引起误会、冲突。我看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两条，一条坚持原则，因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思想，这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中央的政策告诉他们。另外一条要采取灵活一点的办法，不要他们思想没有准备好，就强加于他们，这样就会造成对立，要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使他

们接受。总的是坚持原则，灵活的方法，耐心的教育。我想同志们回去以后，主流是受欢迎，支流是你们也要看到困难。

个别地方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注意，原来在这里学习，学习的东西没有巩固，在派性的包围下，一下变了，这虽然是很少的。但特别要注意。有了派性遇到几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或者遇到一场武斗，打死了人，就会激动起来。把学习到的东西忘掉了，原来回去是促进团结的，这样一来起了反作用，这样的事情虽然是少数，但是同志们要注意。比如广西他们回去绝大多数地方是好的，但是个别地方也有相反的情况。你们安徽、广东、湖南有你们的情况，不要以为我们回去什么都好，不是的，我们要做很多工作。

安徽比如安庆有四个同志要回去，一个是安庆农药厂的杨泗州同志。在吗？

（杨答：在）回去促进大联合有把握吗？（杨答：一定办到）决心是好的，但回去以后各种情况要想到。安庆的马兆国同志，你们是一派？还是两派？（马：两派）经过学习联合起来没有？（马：联合起来了）那好。还有一个李永赤同志，是一中的吗？怎么还是一中的，你多大了？（李答：廿四岁）你还是团员。整团的任务很重啊！我们的团还要，但不是刘邓的团，所以要把团整好，你是屁派的吗？（李：现在是一派了，毛泽东思想派）这话对。（鼓掌）你们与 6449 部队二团很好。请你捎几句话去，上次我讲了 6449 部队二团几句好话，就翘尾巴了，要谦虚，要搞大联合。不要听了几句话回去就激动起来（张林安：我在这里学习）你在这里学习很好，家里怎么样？（张：家里有进步，也学了，安庆已有七十多个单位联合了）解放军是搞联合的支柱，联合不联合要找你们。夏珏斋同志在吗？

（夏：在）你们是不是都联合起来了？（夏：两派联合了）有没有达成协议？（答：还没有达成协议，正在谈判）你们是不是联合汇报，不联合不要你们汇报，你汇报你的，他汇报他的那不行，四个人联合汇报，做到雷打不散，挨打一起挨打，受欢迎一起受欢迎。芜湖吴德华，你是“三筹处”的。“三筹处”也革命也犯错误。你们那里造谣言可厉害，天天说要打倒我，我还在这里没有倒。（答：那是反动的）芜湖、蚌埠有反革命，你们要注意。过去国民党的党部在那里。电校、建校要交枪，两方面都要交枪。（总理插话，有个反动小报你们看到没有？）（答：看到了，已经查封了）（总理：封了好嘛！回去要动员群众从你们组织中把坏头头和背后的坏人揪出来。）你了解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过去是三司的头头，现在

成了反革命叛国分子，还有政法公社的陈荣金。还有安徽省委宣传部杨杰也是芜湖人，去年七、八月来开会出谋划策。你们那个地方特别复杂，“三筹处”要多负责，对走资派、少数坏人要提高警惕。你们那里还有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与解放军合作。你们那里野战军、空军、海军统一了。人武部还有些问题。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工作。戴俊德，你是屁派，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能和“三筹处”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吗？搞大联合有信心吗？（答：有）史月亭、张家祥你们两位联合了没有？（答：联合了）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的？（答：已订了协议）你们那个地方很复杂。安庆、芜湖、蚌埠你们那里情况复杂，工作相当艰巨。越是困难，越要做好工作。你们回去以后还回来不回来，（答：要回来）你们回去搞联合，我看联合也好、不联合也好都要回来，都能够得到经验。搞不好不要紧，不要不好意思回来，不要说没有脸见北京父老。只要你们坚定就好办。

乘同志们走的时候，要你们好好学习这段语录。干部那一章，第二百三十九页，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你们都学了，学得好不好？要经常把这五条作为标准来衡量。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做资产阶级革命家、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苏联有个赫鲁晓夫，中国也有个赫鲁晓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挂着招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两面派。我们造反派同志、部队同志都要警惕这一点。阶级斗争规律就是这样，旧的两面派打倒了新的两面派还会产生。如果我们不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办事、去努力，只是口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与毛泽东思想相反，那就是两面派，它与第一条完全违背的。这是同志们必须注意到的。现在有些地方有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口头讲一套，背后做一套，就象毛主席讲的口里喊“要文斗”，下面踢你一脚。或者一边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把你的帽子往前一拉。后面给你几拳，你又看不见，不知谁打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手法，反动的手法，特务的手法，这是两面派。阶级斗争存在还会产生新的两面派。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同志们要做一个革命家，必须首先是毛泽东思想革命家，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家，我看你们各方面的头头要大大努力，现在你们是为少数人派别

服务的“革命家”。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革命家，不能是为那一派、那一个山头服务的“革命家”。我希望同志们做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做一个革命家，必须能团结绝大多数人，你们在学习中联合起来了，好。但过去你们有派性，就不能做团结大多数人的革命家，这里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这种人也要团结，只要改正错误，愿意悔改就要团结。这里有三层意思，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实践证明犯了错误的人。第四、对待人家必须有民主作风，不要一动就武斗，一动就打架。第五、要善于自我批评。你们现在要搞好这几条，而且希望你们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五条。另外还有三段语录，由于时间不多，我就不讲了，以后请吴法宪同志讲。

最后让我祝贺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习得更好，得到更大的成绩。

周总理：

对学习班没有过问，很抱歉，材料也没有来得及看，只是对各省的事情知道一些。已经结业的河南、湖北、江西、浙江形势很好，江西将在这个月初成立革命委员会。浙江也很快跟上去，河南、湖北也要赶上。这证明学习班对推动各省的大联合，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起了作用，这样就更有利于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有广东、广西、安徽、湖南四个省的汇报团要回去，广西回去的也回来了，还有几个省在学习，福建、陕西、宁夏、山西也准备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看来我们办得慢了些，全国二十九个省市，现在已办的有十五个，还有十四个省市。上海可能自己办。要订个规定，在春节前后都要办起来。当然，主席说过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按现在情况看，学习班对推动各省革命群众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来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有好处的，进行的会快一些。没有学习班就慢一些。广西半年多时间，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经过学习班汇报团回去，虽然有些地方有曲折，但是基本是成功的。黄达生同志回来了没有？（答：回来了）你辛苦了。说服了伙伴们，基本上搞大联合了。六个专区都联合了，只有梧州、钦州有问题。梧州去的同志还没有回来。钦州不能去。正如康老说什么事情都要两点论，有成

绩就有缺点，有顺利就会有困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低估我们的成绩，要勇往直前，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广西形势大好，总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困难。“联指”的同志也回来了吧。

同志们知道现在促进大联合中，又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极“左”的，搞分裂；还有一种右的，原来已经瓦解不存在的一些组织要复活，比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它的基层单位组织，我们同意他们保持，欢迎他们回厂、回校参加大联合。但上面的组织，跨行业、跟陈再道反中央、反中央文革，怎么能恢复。还有湖南高司也是这样。我们说，工联和湘江风雷应该联合起来。高司的少数头头跟当时的军区犯了方向错误，送枪对左派群众很大打击，如益阳、常德、湘潭都是。这样跨行业的组织不行，但他在学校、工厂、机关中的基层组织要欢迎他们参加大联合。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十二月二日对浙江“红暴”的批示，指出是老造反派犯了错误，应该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红暴”与高司不一样，“红暴”不是跟军区犯错误，“红暴”原来和“省联总”一起冲军区，后来从北京开会回去，更左一些，与“省联总”对立，这种对立与湖北的三新、三钢对立是一样的，因此，对这样的组织，要采取帮助、批评、联合。有的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的比较好，比如“省联总”，“红暴”差一些。不能因中央批语，把过去跟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跨行业的已经垮了的组织，重新复活。当然，下面基层组织可以参加联合。不能上面重新复活，这样复活就等于把去年党、政走资派所组织的保守组织，官办组织都可以恢复了，比如上海的“赤卫队”，北京的“捍卫团”。（康生：联合不倒旗，是指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指保守组织。）我们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不是把走资派官办的组织复活起来，不是把受省军区方向路线错误影响深的组织复活起来，如果这样做，这不是走向联合，而是走向分裂，这不是推动革命三结合，而是不可能三结合。这点要说清楚，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是极“左”，搞分裂的，口号极“左”，实际上本质反动。湖南从湘江风雷中分出来一个组织，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叫“省无联”。把叶卫东同志排除在外，把总部砸了，叶卫东同志还受伤了，你们知道吗？（答：知道。韦钦讲了一些情况。）你们湖南内部观点不一致，回去汇报还不成熟。谭辅仁同志，你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湘派反映批判极“左”面

搞宽了)在群众中批判极“左”思想是对的,但到基础群众组织去抓人是不对的,北京搞“五·一六”我们一再强调只抓少数坏头头和后面的黑手,要自己抓,不要别人抓,不要到对立面去抓人,不要扩大化,也不许右派翻天。湖南批判极“左”思潮,抓人,如果扩大了些,应该纠正。“省无联”认为,中央批准的以黎源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湖南黑三线的反革命三结合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个口号是反动的,矛头针对中央的。“省无联”还说什么“批判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这怎么说是反动的呢?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要打倒中央批准的章伯森、梁春阳、胡勇等同志。这是不对的,他们过去支持过造反派,是革命领导干部。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在北京搞清楚。

你们学习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林国兴同志来了吗?(林:来了。)一开始我就要你们把张家政吸收到学习班来,你们不同意,这是不好的,他是代表一派嘛,张家政这个人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只要他不反对中央、省革筹小组,我们应该欢迎他到学习班学习。湖南班要把张家政接到学习班来。他在北京等了三个月,你们讨论了五十多天还不解决,我说过好多次没有解决,我是有意见的。(众:张家政还在北京,湖南来了十五人要揪他),来了十五个人,你们要去说服他们,在学习班不要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先做十五个人的工作。(有人提出,“省无联”也来了几人学习。))“省无联”只要他们不在长沙搞分裂,他们可以来学习。湖南晚一点等十天再回去,学习好了再回去。——我和康老另外还有任务,关于湖南的问题我就谈这几点,关于广东问题请其他同志谈,我们就告辞。

康生同志:

回去以后不要听谣言,毛主席有什么指示啰!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啰,不是人民日报登的,你们千万不要听。安徽同志,你们那里制造谣言是全国第一,千万要注意。

(总理、康生同志退席,会场高呼口号)

戚本禹同志:

我提几点希望。

一、希望同志们很好学习今年的元旦社论。这个社论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写到里面去了，希望你们把这个文件拿到学习班来学习，来贯彻。

二、希望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一年里，走前进的道路，不要走倒退的道路。广西的形势就很好，广西原来是很难解决的一个省，总理、中央文革都很注意的，现在广西进展很快，实现了全省范围的大联合。从广西来信说那里的形势很好，人人脸上喜气洋洋，不象过去脸上满脸愁容，希望其它各省向广西学习，不要走倒退的路。运动在前进，我们搞倒退，搞分裂是不对的，不然我们会被历史抛弃。刚才总理讲得很清楚，一定要紧紧掌握毛主席指导的大方向，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只有搞好了大联合、三结合大家才能在一起搞斗批改。

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一定要维护革命的权威，不要损害这个权威，更不要推翻这个权威。谁要把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打倒，他就一定要失败，被人们所抛弃。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事物，新生的事物总是有缺点的，要爱护他，保护他，帮助他成长，决不要看到有一些缺点就轰，就打倒。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有些人就是要搞分裂，要把这个新生事物反掉，我们是反对的，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军管会要维护，要维护军管会的权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所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没有革命的权威怎么能行。一个经过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建立起来的权威，你们要打倒他，你们这是促进历史的前进，还是促进历史的倒退？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你们不去扶持它，它就不会很好成长。一个革命派，对一个新生事物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使它不断壮大，不要看到有缺点就一脚踩掉，我们到处都看到高大的榆树，可是它刚刚出现的苗苗是很小的，你踩它，它就不能成长。一定要爱护新生事物，使它很快成长。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的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上面革命委员会批准，大家协商建立起来的，有缺点、错误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推翻他。比如湘江风雷中出来一部分人，要把中央批准的湖南革筹小组打倒，要打倒某些人，这样你们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什么地步？我不是说湖南革筹小组没有缺点。你把他打倒，你来干，缺点、错误会更多、更大，因为对革筹小组你就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嘛。广东有些人说，一反到底，

要反革筹小组，这些我们都是不赞成的，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端正我们的态度，牢牢掌握大方向。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从不断实践，经过飞跃，形成概念，形成正确方针。毛主席那篇文章针对刘少奇攻击我们大跃进写的。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有的人就抓住人家一点，就不及其余，毛主席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宋玉的故事，不要象宋玉。广东经过中央批准建立革筹小组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主流是对的，要帮助他成长，对他的缺点采取善意的态度，帮助他改正。

今天我只是讲一点愿望，希望大家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走历史前进的道路，不走历史倒退的道路。

姚文元同志：

在新的一年里开始，让我们热烈欢呼，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高呼口号）。前天我们大家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他们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以他伟大的天才亲自领导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提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提出了一个光荣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每个革命派的同志，应该想一想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怎么样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怎么样为人民立新功。革命在前进，我们的思想也要跟着前进。

学习班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智慧，是一个新事物。大家知道，毛主席视察全国各地提出来要广泛地办学习班，干部要办，红卫兵也要办。林副主席在国庆节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因此，学习班在全国办起来了。毛主席视察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接见的是学习班，这是毛主席对学习班的最大关怀，我们不能忘记。

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又说，办好学习班看来是个办法，很多问题是在学习班解决的，我们一定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贯彻下去，确实确实的办好学习班。通过学习班来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深入学

习毛主席的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批判那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东西，现在看来，千条万条抓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抓好毛泽东思想教育是最根本一条，因为毛主席讲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因为毛泽东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的，都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抓住运动中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贯彻落实，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根本的保证。正如元旦社论所说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现在看来，什么地方干部与群众、干部与战士把学习班办好了，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行动，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除掉，就能够推动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以及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

现在大家要回去汇报，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有一个衷心愿望希望大家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那样，做到真正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就是要同那一些反对毛主席的刘、邓、陶、彭德怀、罗瑞卿等等一小撮已经被广大群众所揭露，被历史所抛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到底。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时时刻刻用毛泽东思想检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动。对毛主席的指示不但口头要讲，而且行动上要办到，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经常检查，及时总结。这样才能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将陆续见报，不管那一派，你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支持，不执行的，就批判斗争。现在大家的思想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只有紧跟毛主席战略思想，才能真正达到胜利。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如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干部。只有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反复指出这个基本思想，真正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摆架子，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杨成武同志：

我完全拥护总理、康老、本禹、文元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昨天的元旦社论向我们提出了伟大的号召，我们的工作要做得更好，不光是解放军的工作，群众组织的工作，政治思想战线的工作，经济战线的工作，以及其它战线的工作都要做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三个地区以后提出来的，加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许多问题用教育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在短短时间内三次接见了我们学习班同志，第一次是九月廿六日，在这个下面的礼堂，第二次是十一月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是前天晚上，十二月卅一日，大会堂，元旦的前夕，这两次的规模都很大。这说明了什么？就是要我们办好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学好毛泽东思想，学好毛主席的指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志是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标志。

同志们在这里学习好了，就能促进你们那里的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我们天天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东西。不关心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部队最近开了会批评了这个问题，有些人对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做得什么样子，他不关心，而是，关心派性，支持这一派那一派打内战，我们部队一直是强调支左不支派，有的做得很好，多数做得好，但是，少数做得不够，部队有了派性，就影响社会派性，社会上的派性，也影响了部队，这就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结果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除掉派性，元旦社论就有一个口号，就提到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派性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今天在座的，大多数是部队的同志，部队的同志在学习班中，要很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刚才本禹、文元同志都讲到，革命在前进，我们的思想也要前进，我们跟毛主席的思想，每一个同志主观上都是积极的，想跟的，如果私心多就跟不好，私心严重的就跟不上。那我们就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要斗私，批修”。对待一切问题，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符合毛主

席指示的、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地干，坚决地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主席指示，不管你那一派，我们都不支持。我们要除掉派性，按照无产阶级的党性办事。

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大事，全军的大事，事情千头万绪，千余万条，最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抓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个工作做好了，就统帅一切。要把这个工作当做战略任务来执行，这是战略的需要，不是一般任务。我们办的训练班，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办的。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在同志们努力学习下使我们的学习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对全国人民的贡献。当然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发展是不平衡的，刚才康老提出一条要大家总结经验这很重要，这是我提的第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另外，元旦社论要好好学习一下，把它当成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指示来学。元旦社论，对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形势，提出了一九六八年光荣伟大的五大任务，这都要我们深刻学习反复学习，这是毛主席的声音，要掌握这个思想，我们学习班也好、领导小组也好、全军也好，都要反反复复地学。而且，要根据当前的斗争实际，贯彻执行。学习好这篇社论，就能够更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亲自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怎么样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样我们就有了方向，使我们能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在这篇社论里还提到一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现在有一些省份搞得不好，铁路堵塞，例如：津浦路的南段，广西的柳州，东北的沈阳。再就是长江运输也要搞好，内河运输是很重要的。搞不好，影响我们促生产、促战备，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元旦社论。完成一九六八年提出的五大任务，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三，在我们学习班里是有激烈地、尖锐地斗争的，在斗争中要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有的人犯错误，是属于认识问题，有的人犯错误是属于立场问题。站错了队，站过来，改了，应该欢迎。当然也有少数人是不可能改的，但是从我们来说，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有利于通过学习，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达到教育人的目的。毛

泽东思想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总的说要注意思想教育，把思想工作做到家。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最近有个训练班出了些事，这当然由他个人来负责，是他自己犯罪，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训练班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够不够，做得好不好。办好训练班，要从各个方面想办法，把学习班办得更好。

今天，总理、康生、本禹、文元，用他们宝贵的时间，接见我们，给我们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法宪同志：

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接见了大家，我想大家是非常高兴的。总理、康老、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杨代长所作的指示非常重要。他们说的话，是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代表中央文革和军委的，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来的，非常非常重要，讲了很多重要问题，我完全拥护。特别是当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大批判，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把各个省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一九六八年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组织讨论，而且要认真贯彻执行。要坚信总理、康老、戚本禹、姚文元同志、杨代总长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结合各省的情况提出来的，希望大家坚决贯彻执行。江青同志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班，我们已把大家的问题交给了江青同志，因为江青同志最近感冒没有来（众：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陈伯达同志也很关心大家，最近因为到唐山、保定、石家庄视察去了，促进那里的大联合，带去了毛主席的声音，所以伯达同志今天没有来。另外，谢富治同志、汪东兴同志有别的会议也没有来，希望同志们不要辜负中央负责同志对大家的期望。

第二点，各省的学习班，学习一般都很好，但是也不平衡，有的省前进的快一些，有一些省前进的慢一点，这是很自然的。我想在毛主席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跟前，最近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在学习中，落后的要向先进的看齐，赶上去，取长补短，人家办得好的，取人家的长处，办得不好的，要引以为戒。有的省刚到，还搞得不大好，相信大家坐下来认真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后来居上嘛！你们的学习班，学习得好不好，会影响各省。学习班大联合搞得不好，就能促进各省大联合，学习班的自我批评搞得不好，可以促进各省的自我批评；学习班的“斗私批修”搞得不好，可以促进各省的“斗私批修”

学习班教育干部工作搞得好,可以促进各省的教育干部工作;学习班团结搞好了,也就影响各省的团结。这样做就推动了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在北京的学习班,无论是部队的,地方的同志,都要作好榜样。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一年半,有的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或是军管,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产生的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取得的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是代表我们无产阶级的,如果我们再去推翻它就成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你去推翻它破坏它,你还说得上什么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建立无产阶级秩序,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权威。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就不可能打倒走资派,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指示,康生同志的指示以及中央文革的指示,要作促进派,不要作促退派。

另外,在学习班中,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斗倒、斗臭走资派,斗倒、斗臭修正主义,大树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占领全部阵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统统清除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的脑子里不要有个空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斗倒任何私心杂念,才能不出修正主义,这两条非常重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千万不能开倒车。学几段语录,第二百五十一页最后一段,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这一段语录我们要好好地学,警惕我们不要开倒车。毛主席又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

克服。”（语录第二百五十二至二百五十三页）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

（语录二百四十六至二百四十七页）这两段话的意思，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须警惕的。只有随时随地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不会倒退下去。康老要找我念这几段语录的意思就在这里。我们要真正做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只有这样做才把在运动初期是骨干，运动中期是骨干，运动后期也是骨干。只有紧跟毛主席，才能做骨干。读毛主席的书，重要的是用。林副主席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一种是背，一种是用，不光是背，更重要的是用。总理、康老、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杨代总长讲了那么多的话，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坚决照办。

毛主席接见学习班三次，中央、中央文革首长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管的不多，向你们检讨。

我的话就讲这么多，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我们共同高呼：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办好学习班！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清江市革命职工、革命农民、红卫兵大会主办《红色造反报》1968年1月23日第89期第一版。）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杨曦光）
《中国向何处去？》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杨曦光）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

的奋斗目标是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 90% 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〇，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

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

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 1965 年 1 月 25 日（关于李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为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

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 90% 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〇”，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多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

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〇”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

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

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玷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总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

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并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分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

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

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

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1.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像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2.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3. 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 1967 年 11 月 12 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 10·24 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 11·12 讲话，10·24 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 11·12 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 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

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猪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 11·12 指示，林彪同志 10·24 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大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 90% 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

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 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转载于《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的讲话

〔当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曹轶欧、黄永胜、张秀川、谭辅仁等同志步入会场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学习！致敬！〕

总理：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湖南学习班和湖南革筹小组的同志在一起开一个会，学习班的汇报团早就要回去，一月二号那天把情况跟大家谈谈，要大家了解情况以后再走。郑波同志来使我情况了解更多一些，借这个机会，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来了，连广州的黄永胜同志也来了。跟大家见见面，谈谈。（高呼感谢中央的关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时间不打算用得太多了，请康生同志先讲。（众：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生讲话：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并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全面胜利、彻底胜利的祝贺！（全场热烈鼓掌）

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我前一个时期没有参加，没有过问，只是二号同总理一道接触一下，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是无知的。那一次接见同志们，由于同志的帮助，供给我一些材料，使我很大的启发，在这方面要感谢同志们罗！文件很多，没有工夫全部看，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只是看了一个“省无联”的纲领。总理向我介绍叫“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叫做“省无联”。这个纲领是奇文，奇文就要大家共读一番。按照“省无联”的“理论家”讲，去年一月风暴以后出现了一股二月逆流。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省无联”的“理论家”们不要后面一句话。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所以十月份必然出现一股逆流。他们讲的有一点也还是对的，十月份就有一些牛鬼蛇神出来了。因为形势大好，敌人感觉他们就要死亡了，狗急跳墙，蹦出来了。在北京出现一个××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他们写了一封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恰恰是十月一日出笼，十月三日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战马悲鸣”翻印了这个文件。我看过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不是人的语言，是畜牲的语言。这个文件不是信心十足，而是悲哀的鸣叫。所以叫做“战马悲鸣”。这个文件讲的吞吞吐吐，搞了一些伪装。看了“省无联”的纲领后，就感觉到：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那封公开信公开化了，具体化了。所以我对“省无联”的纲领，也只能说是“战马悲鸣”。

“省无联”的文件我看得不多，我刚才说了，杨第甫的儿子、一中夺军权的头头杨曦光的文章没有看，只看了他们的纲领，周国辉的讲演，及同志们的介绍，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们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象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讲的有刘、邓爪牙，彭、贺爪牙，有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帮他们的忙。同志们看看那些文章，也许同样还要证实我这个话。我看到他们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上引证了列宁的话，他们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机关则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不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我说这不是中学生、大学生写的。我可以证实一下，在坐的同志们，知道不知道列宁这篇文章在那一篇？什么时候写的？（总理：有没有人能够答复？）（众：没有。）

（总理：中学生答复不了，机关干部能不能答复？）原来这篇文章是列宁在一九二三年，“联共”党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个提议。这篇文章是中央为了改组“工农检察院”写的。列宁写这篇文章，绝不是“省无联”的理论先生们的意思，列宁讲的是当时苏联政法机关，镇压反革命不力，象我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一样，有坏分子占据了“工农检察院”——公检法机关。他们在那里企图分裂工人、农民；他们在那里企图反对党中央。因此列宁要改组检察院，要把旧的人员赶走，增加新的工人干部，所以他说没有认真改变，只是稍微粉饰了一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省无联”歪曲、诬蔑了列宁的话，拿列宁的话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恰恰要改组“工农检察院”，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话被“省无联”的反动分子所利用，反对我们，蒙蔽你们，这真是罪该万死！我们要坚决反对“省无联”歪曲、曲解列宁的话，把一切歪曲、曲解列宁的话的人彻底打倒！（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如果同志们不相信，就请看一看列宁全集 33 卷，你们可以了解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手段、何其毒也！他们利用中学生。利用青年对马列主义的无知，来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晓得列宁这篇文章，所以我说这个文件绝不是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所能写出来的。

这里证明了什么呢？证明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林副统帅这次谈话，总理、伯达、江青、文元、成武、吴法宪、黄永胜等同志也参加了。“省无联”这些“理论家”们，因为林副主席一针见血的把湖南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来了，触了他们反动的灵魂，因此他们就手忙脚乱，尽量的造谣。歪曲来挽救他们反革命的命运。林副主席当时讲，湖南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其中有刘、邓、陶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的爪牙，有彭、贺黑帮的爪牙，也有国民党特务。所以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说：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让他们乱一下，让反革命尽量的暴露一下，这样子就触动了“省无联”坏头头的反动灵魂，他知道他们的命运不会长久了，因此，他们说：“省革筹小组是反革命的三结合”，用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想把自己推开，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歪曲、诬蔑林副的话。但是，事实证明，林副主席的话完全正确，林副主席一讲，把反革命阶级敌人的盖子揭开了。“省无联”的纲领，杨曦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

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证明林副主席的话非常英明。在林副主席指示以后，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这是最大的一桩好事，这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有好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敌人自动的把自己揭开了。同时这种活动也证明了林副主席所说的：刘、邓、陶的爪牙，彭、贺的爪牙。国民党反革命三结合已经公开的活动起来，他们为了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所以这些文件，这些演讲，这些纲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该看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已经收到了伟大的成绩。

这个纲领是一个什么纲领呢？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这个纲领是精心炮制的。向×××揭露了陈老师在后面“帮了忙”，他从经济基础、从上层建筑说起，还号召人家学习他的理论，他确实起了台湾国民党以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所起不到的作用。反革命“非常委员会”还不敢公开署名散发刊物、传单，而“省无联”确公开提出反对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公开的跳出来，湖南的革命群众，革命人民，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员、解放军指战员，看到这个反革命的纲领，能不能容忍他们存在？（众：不能。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能不愤恨吗？（群众：不能！）

现在再讲一下“省无联”的行动纲领。第一条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些反动的理论家，还跟我们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这一句话就看出他们是恶毒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他们讲：毛主席的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代的思想，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象周国辉讲的，有人揭发的，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毛主席的思想比起马列主义是比较古老、陈旧，还是落后的，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充实、提高，才能上升到毛主席思想的新时代。同志们你不要看他的全部，只看这一句话就知道，他们如何恶毒的反对毛泽

东思想。他们所说的，拥护毛泽东思想完全是假的，他们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同志们，你们看过《伟大的历史文献》吗？在那上面讲了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下面还讲到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有三个阶段，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么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出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季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段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已察觉到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同志们看一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古老的、落后的，是不是仅仅从文化大革命中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完全是有意贬低毛主席思想，完全歪曲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这种“理论家”的理论，从那里搬出来的？不折不扣的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来的，苏修那里来的，苏修，美帝经常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说她是保守的、落后的、顽固的。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也是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总理：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些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民族狭隘主义。他们这种思想从那里来的？从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来的。同样的思想在“非常委员会”讲的很清楚。“非常委员会”的那封信，与“省无联”的纲领，开头的一句话，就不谋而合，只是“非常委员会”隐蔽一些，说什么由于个人野心家的篡夺，光荣的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考验。然后这些反动家伙装模作样的来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看他们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比美帝国主义，反共专家那么高明。他们还说：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话我不懂，他讲的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一些国家呀？你们湖南的听到过没有？你们可以跟我解释这个问题，在坐的有张家政、李仲昆，你们应该听说过吧？七个国家，哪七个？照他们的理论来讲，从他们的文件来看，七个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概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吧！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走资本主义的人，我们都是特权阶层，都是被你们打倒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了。请他们解释一下，七个国家包括那几个国家，当然我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推测。

他们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面对着现时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修、反的严重挑战，真是可怕已极！而毛主席告诉我们：中国是大好形势，世界也是大好形势。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却悲观失望，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垮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科学共产主义垮台了，面临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挑战，把他们的悲鸣心理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一文中表达出来，这恰恰是帝国主义污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我们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坚决同赫鲁晓夫作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五十几个马列主义新的政党和组织，世界形势一片大好，而他们却把世界的形势看成一片漆黑，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垮台，实际上他们是代表着帝、修、反的一种妄想，因此不断地、恶毒地反

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中国的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替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帮大忙。

下面一段是说，列宁同第二国际，托洛茨基、考茨基、布尔林等作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斗争，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新阶段。他们脑子里没有革命，没有伟大的十月革命，没有中国的伟大革命，列宁主义是在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左”的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毛主席的思想也是同中国人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在人民战争中同一切外国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理论家”悲观得很，胡说这个阶段那个阶段，同我们那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讲的完全相反。

下面一段很有趣，说：“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一个革命家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口头上。”我们衡量他们就是要看他们是不是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认为这是不重要的。我们要问，进行什么革命？进行反革命？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为什么不明显的讲？这些杰出的“理论家”，真是可怜得很啊！这是第一部分。

根据他们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你们看，这些话真是反动透顶，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国民党、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疯狂的无耻的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不但是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假借反对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我们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污蔑成资本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毛主席领导的党都说成是特权阶层，看成和赫鲁晓夫的党一样。他们这样攻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没有刻骨的仇恨才奇怪呢！（众：呼口号……）这里面没有反革命才怪了！这些刘、邓、彭、贺的小娄罗，国民党的小

丑，杰出的“学者”，大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非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非推翻毛主席领导不可。这些话，就是他们反革命理论的根据。从杨曦光的文章里面看出，他们大概也搜集了一部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东西。

第三部分，他们对我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估计。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现在才是刚刚开始，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良主义，自从“省无联”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他们又说：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同志们，你们不要被这话蒙蔽。毛主席的权威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吗？我们知道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共知的。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思想权威才树立，他们被自己的话冲昏了头，既然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是改良主义，怎么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思想权威就不能在他们所说的改良主义中树立，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真是语无伦次。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中，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都是改良主义，大家知道各省的问题得到解决都是毛主席解决的（众：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拐弯抹角的千方百计的蒙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改良主义，各省的问题解决也说成是改良主义，革筹小组的建立也说成是改良主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一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是改良主义？！他们就这样来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众：口号）。

第四部分讲到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对湖南问题所作的指示，江青同志十月十二号的指示。根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才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他们还胡说八道：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月十二日的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文化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说：文化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这些话是什么陈老师、李老师、张老师，刘、邓的黑手，周小舟的干部造出来的。我想在坐的中学生、大学生这套理论你们是不熟悉的，他们把江青同志的讲话歪曲成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取得胜利。

“纲领”下面接着说：“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主义的。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我

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湖南取得胜利，周国辉特别发挥了这个理论，说林副主席指出在湖南首先取得胜利，这完全是胡扯。

第五部分：“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把现在的省革筹小组打倒，他们上台，恢复国民党的政权，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所以说省革筹小组个别的打倒不行，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某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还说：“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这都是错误的。

第六部分，“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了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据说把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叫做战略退却，这是什么意思呢？红卫兵犯了错误，告诉你们赶快退却，但是到十月十二号就进攻了。他们挖空心思歪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歪曲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的讲话，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第七条，“在转折的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什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际上他们既有反革命的理论，也有反革命的行动。

我不多讲了，我也引用列宁对中央改组“工农检察院”那篇文章上的一句话：“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出自险恶的用心是很明显的，甚至用不着回答。”今天我回答多了，我看用不着再回答了。（热烈鼓掌，口号：向康老学习、致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打退反革命的猖狂进攻！要党性不要派性！）

总理：请伯达同志讲话。（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略）

陈伯达讲话：

我没有参加湖南问题的讨论，最近这两天看到了一些材料，刚才康老又向大家介绍了反革命大杂烩的语言，康老已经解释得很多了。这些反革命大杂烩的语言，对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好好想一想。这里边有个人叫周国辉，他说：“他们对我们什么都骂了，就是没有敢说我们是大杂烩。”我今天就敢说：“省无联”就是大杂烩，是反革命的大杂烩！（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坚决镇压反革命……）所谓湖南“省无联”，刚才请总理介绍了一下，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看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的

大杂烩。对这些社会渣滓，没好多话说的，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宣布“省无联”彻底破产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揪出“省无联”的坏头头，绞死周国辉！）

不要绞死了，让他反省反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省无联”的文章和刊物，可能是反革命家伙代笔的，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是写不出来这些东西的。这些大杂烩的胡言乱语，丝毫没有损害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根毫毛，相反的，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在幕前、幕后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家伙暴露出来了。这些臭文章暴露出来了，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收获。（康老插话：是肥料）毒草可以变成肥料，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大家。这样的货色，借用文化大革命之名去搞反革命复辟，所以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湖南经过反复是好事，许多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了，擦亮了大家的眼睛，我不想多来介绍那些混账的语言，他们总是想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把周恩来同志——我们的周总理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总理大笑说：我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这时江青、伯达等中央首长都笑了，台下群众也都笑了。）总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总理，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总理（众：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他们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这不是先在湖南出现的，在北京早就出现了。“五·一六”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样的玩艺，卑鄙无耻。这是将要灭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我今天宣布：包括“省无联”在内的许多大杂烩的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省无联”一点无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是反革命的，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这种大杂烩的组织，里面很多群众是受蒙蔽的，但是也有很多坏人利用大杂烩的空子钻进来了，其中也包括“湘江风雷”有很多坏人钻进来了。大杂烩就是要不得，刚才我不是说到有人说，没有人敢说：“省无联”是大杂烩？我们就敢说“省无联”是个大杂烩。凡是受周国辉、杨曦光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这些大杂烩，

不管你哪一个组织，坏人总是要钻进去的，社会渣滓也要钻进去的，因为在那里互相都不了解，他们就借着什么响当当的名牌货干各种坏事。干了不可容忍的坏事。响当当的是货郎担，钻进坏人，做了很多坏事，你们还包庇他！运动搞到现在，这样大杂烩的组织不能再存在了，请同志们考虑。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按工厂、按学校、按机关，总之要搞归口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要你拉几个人成立一个组织，他拉几个人成立一个组织，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大联合。

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了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其中有两点：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主席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须的调整（这时，伯达同志要谢富治同志念十月十七日通知）希望要革命的人，要重新好好学习中央这个通知。这个通知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写的。要不要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你们好好考虑。你们是参加大杂烩继续下去呢？还是回到本单位搞大联合。你们这样的大杂烩组织，谁也不能够对谁负责，人都不互相认识，怎么负责？他干了坏事要你这个组织负责，推也推不了。这里我们不仅宣告“省无联”彻底破产，同时也宣告大杂烩的组织要回去按系统搞大联合，当然联合要有酝酿的过程，只有按系统、按行业联合起来了，坏人才能暴露。现在没有按系统大联合，有一些坏人不能很快暴露出来，我们说凡是要革命的人民，就要从你们的组织中把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因为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把革命的三结合说成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要搞反革命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专政，搞地、富、反、坏、右的专政。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不能存在，那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专政。“省无联”企图搞的那个东西，实际就是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省无联”的文章还说：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要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断取得胜利，我们说“省无联”在文化大革命

的大风大浪中不断被揭露、不断被消灭！（众：呼口号）。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现在很多经验都证明了这一条，大杂烩的组织必须彻底垮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胜利。

所谓响当当的名牌货，以后再不要出卖了。响当当的名牌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没有他们的市场！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为止。（众：坚决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揪出“省无联”的黑后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总理：下面请江青同志讲话。（众：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总理：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众：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毛主席万万岁！）

江青讲话：

问同志们好（鼓掌）！向同志们致敬（鼓掌）！

同志们到北京学习已经一个时期了，我没跟大家见面，有的材料也没有很好看。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发现一些谬论，刚才康老、伯达同志都驳了，不值得大惊小怪，谬论总是要有的，有了就坚决驳，不能纵容。我觉得湖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坏人自动的跳出来了，刚才康老说了“非常委员会”是暗着干的，“省无联”署了名，是自己跳出来的，所以形势大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是大丑小丑，他的目光是短浅的，看不到远的、未来的、革命的、辉煌的前途，他总感觉悲哀，所以是“战马悲鸣”，同时他本身就是一个瘪三，就是瘪三，要藐视它。我因为了解情况不多，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我建议要把普通的一般的受蒙蔽的群众，同他那个组织的少数的个别的坏人或者是背后的什么老师，什么后台要有区别。（总理：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凡是参加了“省无联”都成了坏人，如果这样恐怕不妥当。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群众是无罪的。（众：热烈鼓掌：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有罪的少数坏头头，但头头不一定是坏人，我们如果不区别对待很容易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这点作为建议提出。我的话如果讲错了希望同志们当面批评。

同志们回湖南去，要精神抖擞，心明眼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众：热烈鼓掌，高呼：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规定！感谢中央对我们的支持！）

总理：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康老、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希望军队的同志们，通过这次学习以后，回去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的战略部署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军队特别要注意支左不支派。军队有了派性，就会影响群众组织，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有了派性也影响军队。湖南的形势大好，希望大家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要精神抖擞，心明眼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伟大胜利。最后祝同志们好！

总理：请姚文元同志讲话。

姚文元讲话：

刚才康老、伯达、江青、成武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指示，对于“省无联”一小撮幕前幕后的操纵者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反革命纲领作了深刻的批判，正象刚才江青同志所指的，这些人只是一小撮，他们代表了灭亡的阶级。他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号召以后蹦出来的，这说明在我们当前大好形势下，一小撮坏人跳出来，正好从反面教育了我们。“省无联”的东西很多，别的我都没看，只看了一个行动纲领，这是一个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伯达、江青同志，就是说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纲领而且还挑拨离间，我们要彻底的揭露，彻底的批判。

毛主席指出要“三依靠”“三相信”。相信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是好的，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的干部，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这个纲领恰恰是背道而驰，把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人民说得愚昧无知，甚至对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认识。在毛主席的思想空前深入人心，发挥巨大威力的时候，当前一片大好形势，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发生了精神的物质的力量，可是他们把这些都说得漆黑一团。我们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说大多数干部是走进和走过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们要支持和相信人民解放军，维护新生的红色政权——革筹小

组，他们污蔑解放军，他们要打倒革筹小组，所以他们完全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听说“省无联”还有一小撮坏人在蒙蔽青年，我们要把坏头头与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刚才江青同志讲：受蒙蔽的群众要反戈一击，把幕前幕后的坏人揭露出来。（江青：这些家伙现在已经跳出了）出现这些坏人坏头头没有什么奇怪。一个大革命中，出现这样的敌人，那样的反革命并不奇怪。毛主席说：敌人到垂死的时候要挣扎。正如上面几位领导同志说的：“战马悲鸣”。不管是“非常委员会”，不管是“五一六”，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只是百分之几，而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在大好形势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些意见不知对不对，总理要我讲几句，我就讲几句。

总理：请叶群同志讲话（热烈鼓掌，叶群同志再三推辞未讲）好吧，我们大家请叶群同志把我们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带给林副主席。好不好？（众：好！热烈鼓掌）

周总理讲话：

学习班听了很多中央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学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能够听到中央、中央文革同志的讲话，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你们一定很高兴。我不想多讲了，只是解释几个问题。

我们对“省无联”也是逐渐发现的。去年十月我在武汉，还有郑波以及省革筹小组的其他同志也在，听他们说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说，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我们还劝说“湘江风雷”按行业、按部门组织不要跨行业。当时“高司”提出要翻案，我认为“高司”不要再恢复了，基层单位认识错误好的可以联合。当时只是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省无联”还把我的这段话说成是“逆流”。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管哪一个省都要宣布：不要跨行业的组织。

今年一月二日接见学习班汇报代表团同志时指出，大家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应该联合起来，回去汇报，有军队的同志，有地方的干部，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当时设想得很好，后来知道湖南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意见分歧，是

不是在这里把问题谈清了再说。“省无联”的问题我只看了省革筹的电报。一月二日我的讲话，有的同志概括为四点，我对“省无联”的情况知道不多，直到这次郑波同志带来各种观点的人，包括“省无联”和持“省无联”观点的人收到了一些材料，听了几方面的意见，认识才清楚，发现“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象刚才上面几个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纲领。我觉得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高。这样的反动东西还公开演说，出报纸，他们的纲领贴在大街上，公布于众！江青同志说得对，既然跳出来就要批判。不要只看到公开出来活动的这些人，对他们幕前幕后的黑手要有足够的认识，既然跳出来了，就坚决批臭。使我们更愤慨的是他们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年前的《湘江评论》名字，把发刊词上的几句话也用在上面。这个《湘江评论》怎么能够承认？他已经出了四期，从去年十一月一日出版到现在已八十多天了，我们才发觉，说明我们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还是大好的。有一小撮跳梁小丑跳出来了，乱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总的形势还是大好的。他们跳出来，有纲领有组织，对于湖南和长沙来说就必须批判，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擦亮眼睛，认清是非。因为他们的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学生中，特别是对上山下乡的青年有影响，有些进了这些组织。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就指出：湖南的问题还没有乱透，有“三条黑线”。“省无联”就歪曲利用了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林副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是给大家一个武器，刚才康生、伯达同志又对“省无联”的纲领一一加以批驳，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马列主义的。他们的话几乎跟台湾蒋介石、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差不多，把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成是毛、林派，这话跟台湾说的、莫斯科说的、美帝国主义说的又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他们“省无联”是响当当的毛、林派？（姚文元：他们的纲领也是大杂烩，有苏修的、美帝的、蒋介石的、地富反坏右的，“非常委员会的”，“五·一六”的）（康老：还有托洛茨基的）

他们还大肆宣传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纲领。（江青：群众才不听他的，我们都看不懂，天晓得！笑声）你们可以从他们的刊物上看到，一个中学生（指杨曦光），能够提出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的理论吗？他们说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文化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

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你们看，他们把江青同志说的“革命发展不平衡”歪曲到什么程度！这是李立三的不平衡！他们搬用了李立三的首先夺取一个省、数个省胜利的主张，过去李立三就提出过，“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主张”，因此他就竭力攻打长沙，打下来一次。这个历史恐怕你们都不知道，怎么说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江青，革命发展不平衡，是我说的，下面的话就不是我说的，我讲的话还有三点，他们为什么不讲？）（姚文元：说革命发展总是不平衡是对的，革命总是会这样）他们把江青同志的话给歪曲了。发展不平衡毛主席也讲过，这是客观规律。（康老：立三、王明、博古都是那种主张，那时是去打长沙，现在他们也是要首先在长沙胜利）（大笑）他们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把我们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骂了，谢富治同志是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同志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骂了，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真是反动到了极点。这完全是反对江青同志“九·五”讲话。

他们又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么样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么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我们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只是受到刘、邓的干扰，那不是主流，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有今天。不仅十七年来是如此，五十年来也是如此，从“五·四”运动，毛主席的思想在地球上继承了马列主义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并超过了前人。因为时代发展了嘛，后人总是超过前人的，可是他们还要从现在开始进行串联，同那些少数懂得一点毛泽东思想的人重新建党、建军。这些家伙要建他们的党、建他们的军，建他们的反动理论（康老：大概要台湾去找），他们的文章有个题目叫做“中国向何处去？”（姚文元：中国当然是搞社会主义，怎么讲向何处去？）那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读读就行了。

他们说，要取得革命的真正彻底的胜利，就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要重新进行阶级分析，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这实际上是他们把毛主席的话加以歪曲。林副主席说，湖南和长沙还没有乱透，“三条黑线”没有全暴露出来。“省无联”借此就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筹小组，并把其他各省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多数干部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要推翻五十

年的历史，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重新组织国家机构，以此蒙蔽一些群众跟着他们走。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跟参加“省无联”的讲清楚，大多数人是会退出来的，今天在坐的也有参加“省无联”的组织，你们还会跟他们走下去吗？（参加无联组织的人答：不会！）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手组织，这需要你们回去搞清楚，不要只看到表面这几个人，还有的藏在暗地里，表面上这几个人多数是一时走错了路，说错了话，（康老：这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夺军权”，你们问他向谁夺军权，向林副主席、毛主席夺军权？向人民夺军权？）（江青：用夺军权这样的名字，就是错误的，他们来领导人民解放军，他们来掌握军权，见他的鬼去吧！）

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在六零年才真正在林副主席的领导下，从六零年以后我们的军队才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又说：三分之二的军权没有掌握在林副主席手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的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一直就没有离开部队，指挥着部队。去年是建军四十周年，他们把我们有四十年历史的解放军也否定了。我们提出三相信、三依靠，第二条就讲的是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解放军搞乱。从以上所说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话说中了，打中了要害。所以我们说，暴露出来好，你们学习班，好好讨论两天，包括“省无联”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怎么错的，把问题揭露出来，分清是非。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如“高校风雷”、“一中夺军权”、“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络站”等等，自己组织检查，找出自己组织中的坏人。我们应该乱敌人，不应该乱自己，要巩固自己。那些人就是利用青年人的无知，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背后有老师，我说老师后面还有老师。这些组织中坏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上了他们的当。

这次湖南问题的发生，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有刘、邓、陶的人，有彭、贺的人，还有国民党留下的人，他们在作怪。虽然这是坏事，我们要把坏事变为好事，这些人跳出来就是好事。广大群众受蒙蔽会觉悟的，会转过来的，我们要尽量团结那些可以团结的人，只是把他们的黑手，黑后台揪出来。这次把他们留下来也是一件好事，把湖南问题认识一致了再回去，更好工作。湖南的形势大好，你们回去后会进一步搞的更好。这个问题我就讲这几句。还有几件事情交代一下。

康生：

我总觉得后面有黑手，公开的、隐蔽的放毒，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觉得他们玩两面派、玩阴谋诡计，这是敌人的手法，有些青年人也跟着耍两面派手法，例如陈伯达同志刚才说，要反对跨行业的组织，搞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他们也说这样搞，但会后却破坏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耍两面手法，耍阴谋诡计，虽然是一小撮人，这点我们必须懂得，他们在我们面前耍，在湖南耍，在学习班耍。在阶级斗争中必然会碰到耍两面派的人，刘、邓、陶、彭、罗、贺、陆、杨不都是耍两面派的吗？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旧的两面派被打倒了，又会产生新的两面派，我就知道在北京就有人耍两面派。

周总理：

特别是在座的青年人，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希望你们将来一个个地都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绝不要去学那些坏作风，那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刘、邓的作风，彭、贺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我们千万不要学。耍阴谋诡计，耍两面派，那是骗不了人的。（康老：是见不得太阳的。）希望大家要注意，要改。（姚文元：要言行一致，说的和做的一样。）（江青：什么夺军权，见他的鬼去！吹了这样久，也没有夺过一个什么军权，军队的同志不要灰溜溜的，他们想夺军权夺不了的。）（众：毛主席万万岁！向解放军学习！）（杨成武：“省无联”要夺军权见他的鬼吧！军权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手里，谁敢夺！）什么夺军权，活见鬼！这个名字就应该取消！（江青：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他到苏联去吧！）

湖南红旗军问题，中央有个调查，上层同北京红旗军有联系，蔡爱卿插了手，红旗军上层组织不能恢复，也不应该恢复，（众：热烈鼓掌）下面的战斗组织只要认识了错误可以回本单位按系统、按部门大联合。听说长沙“高司”也想恢复，它过去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当然主要责任在军区，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承担了责任。但是不能够说“高司”本身没有错误。但军区改正了错误，他们反而不听，如到湘潭、浏阳等地去夺武器，动员农民进城等等。“高司”不要再恢复。希望湘江风雷也好，工联也好都要按系统按单位大联合。欢迎他们回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大联合。这是个大方向。“高司”现在有人想借这个问题，向中央挑拨，这是不对的，不许可的。

现在你们要回去了。我们提议，汇报团先回去，再学习两天，春节前回去，你们也表过态嘛，欢迎也欢迎在一起，批评也批评在一起，军队地方团结在一起。我们支持你们汇报团先走，其他的目前还要留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人来学习。包括“省无联”基层组织的人来学习。毛主席前天见到我们，还说起这个事情。你们这个班还可以继续办下去，中央愿意帮助你们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听说人武干部在省军区错误的影响下犯了错误，在小将们气愤之下，有百分之七十的挨了打，有的被打伤了，打残废了，这些同志并没有怨言。你们这个精神很好，因为你们学习得好。中央慰问你们！（热烈鼓掌。众：向解放军学习，致敬！向造反派学习，致敬！）你们军队的同志和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希望你们把这种军民团结的精神带回去。军区的干部回去还作支左工作，如果不便在本地区，可以换一下地方。有许多省军区过去支左支错了，经过学习回去就把工作搞得更好，受到群众的欢迎，军民团结得更好了，推动了运动的前进。军队不应该有派性，中央有一个通知给你们，军队的派性影响地方，地方的派性反过来又影响军队，希望你们不要去影响地方群众，因为中央有通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多说了。

地方干部有百多同志，在造反派的帮助下，也学习得很好。通过学习，站出来了。这是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一批力量，能够使湖南工作有所前进。如果不适合原来的地方，也可以换个地方嘛！

湖南产生了一些极“左”思潮，康老说是极反思潮。（康老：是极反思潮。江青：是极右思潮。）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你们那里复课闹革命，根本没有搞，你们要知道复课闹革命是当前学校的中心任务，大方向。只有那些极“左”思潮的人才说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现在已经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了。你们要促进省革筹小组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促进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召开。不管是学校、工厂都要回到本单位去，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件事，“湘江风雷”也是跨行业的组织，跨行业的组织观点不完全一致，最后总是要按系统联合，不要成立接管委员会，不要这一派、那一派搞接管，

不要争论了，把大方向放弃了，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打内战就不适宜了。希望“湘江风雷”领导人好好讨论一下，过渡性的组织以后还是要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最后，革筹小组是一个新生事物，是新建立的权力机关，里面包括部队的干部，还有地方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因为是新事物没有经验，四十七军过去也没有管过湖南全省的事情，现在要管湖南全省的事情，担子很重，原来省委的一些干部没有站出来，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怎样做好工作？我觉得应该多开些会，互相多开展批评。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开始总是会粗糙一些。江青同志“九·五”对安徽代表团的讲话，强调怎么爱护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有缺点错误不能采取打倒的办法。革筹小组同志在临走时，我们再单独找你们谈谈。

“省无联”这个脓包开了刀，动了一个小手术，把脓挤掉了，因为当前的时机已经成熟（江青：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好好解决。）当前重要的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勇敢的前进。从这点来说，你们那里是毛主席的故乡，更应该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韶山通车了，搞得很好嘛！湖南不仅是韶山通车的问题，还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今年元旦社论的五条，你们落实了吗？我得到一个消息，听说你们那里（指湖南）有人说元旦社论不值得一看，他也会写，真是狂妄到什么程度。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元旦社论，做出更大的成绩。下次接见你们的时候，是祝贺你们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还补充一句：各群众组织的坏人，让人家自己揪，你们不要去揪，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众呼口号，略）（记录稿）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的讲话

对湖南的问题，我是不很清楚的，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有了一种感觉，革筹小组的思想不那么一致，有些问题思想是模糊的。因此我就想你们急急忙忙的回汇报，思想也不一致，各说各的。这样回去汇报，会造成混乱。

刚才吴法宪同志讲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阶级观点、敌我界线不是那么清楚。十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明显的讲了这个问题，就是有三种反动力量，一种是走资派，走资派应从彭德怀算起吧！还有周惠，再加上个周小舟。庐山会议时，我接触过周惠，是一个很阴险的人。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几件事：一是李六如的《平江暴动》，实为彭德怀翻案，编写了平江斗争史。网罗了一批叛徒。李六如这个叛徒，写过一本《六十年变迁》，是平江斗争史编写委员会的负责人。现在看是联络了一批人，从文化大革命中一看，他们参加不是偶然的，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庐山会议后，一方面搞平江革命史；一方面为彭德怀翻案。利用这个东西，招降纳叛。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阶级敌人利用意识形态搞反革命舆论准备，这里面有很多反党分子，从文化大革命中看不是偶然的。反党分子利用文化艺术散布他的毒素，我只看了一个。拿刘少奇讲（你们湖南刘、邓、陶就占两个）有一个电影叫《燎原》，苏修夸奖这个电影，还有一个《怒潮》。这就是反党分子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准备。不久又发现了浏阳斗争史，其中有一个张启魁，又是特务，又是叛徒，这里面网罗了牛鬼蛇神。浏阳斗争史，胡耀邦也参加了。仔细一想，林付主席讲的，有走资派、有彭德怀的黑手。

国民党方面，湖南军阀是比较多的（周总理插话：四川以外，湖南第二，嫡系军阀也多）。湖南军阀还牵涉到安子文。有个张振汉，安子文把他找来，他还有个老婆叫邓觉先，两个人都是特务。以后邓觉先又把他的妈妈、弟弟、妹妹都搞来，全家搬到了北京，经常去香港，香港也经常来人。张振汉还回到长沙，安子文在中央开了会，立刻向张振汉报告。邓觉先到中央组织部象到家里一样。你们想一想，特务能钻到中央组织部来，你们组织里有没有钻进特务来？所以林付主席指示打中了要害，打中了敌人。但是我们的革命群众觉悟比较迟。群众组织观念模糊，到底有没有阶级敌人呢？到底有没有反革命三结合呢？没有明确的观念，所以阶级观点就不正确。从这里可以联想到：群众组织叫“夺军权”，毛主席的军权，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才要夺这个军权。明明是革命群众组织叫“夺军权”，还打出招牌，公开的还有那样多的反动纲领，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湘江评论》一期一期的那样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有的同志说原因，这究竟

是什么原因？这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伟大的党，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这样为什么不造成混乱呢？道理的确是总理讲的。革筹小组应该深思一下，四十七军的同志，你们也应该深思一下。我感到革筹小组也好，四十七军也好，面临那样反动的东西，除了这次××（编者注：应指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来才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电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很不平常。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由于划不清，因此，批判软弱无力。那方面那样的猖狂，如果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搞好呢？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好呢？群众为什么不混乱呢！

首先是为什么看不清敌人，然后找一找才看到派性作怪。有了派性，就看不清，打内战，放松了敌人，派性掩护了敌人。看不清，斗不狠，软弱无力。一方面“私”字作怪，另一方面，又被敌人利用。不是派性产生敌人，而是敌人利用了派性。

我听了××同志的汇报，我看了文件，觉得××同志警惕也是不够的。对那些东西怎么能不愤恨。揭露出来要愤恨，但不要走极端，不要随便捉人，要区别对待。但要理解同志们的义愤是好的。有这个义愤还是没有这个义愤好？有了这个义愤可能有点过火行动。我们是把这个义愤引导到正确方面来呢，还是泼一瓢冷水呢？一个青年没有义愤，怎么算得一个革命者呢！看到这些东西怎么能容忍呢？有的同志说了一些过火的话，应当体谅他们义愤的心情，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阶级观点模糊，敌我界线不清？这里有一个如何争取受蒙蔽群众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革筹小组也不那么清楚。同志们讲，省无联内部有老造反派。群众还是受蒙蔽的，应该区别对待，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争取他，如何团结他。一个办法是因为有老造反派，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就不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反动纲领和行动，又怕“投鼠忌器”，这样手就软了，心就软了，怕把群众赶跑了。这样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不是争取群众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指出他们的纲领、行动的极端反动，使他们猛然醒觉，反戈一击。我们照顾到受蒙蔽，但我们立场不明确，如何促进他们的觉悟？你们说某某……这就是堵塞我们的批评。思想问题不是开一次会、说一句话就能觉悟得了的。如果我们不敢斗争，如何使别

人起来斗争？我们动摇，如何使受蒙蔽的群众不动摇？这样团结的原则是模糊的，这样不能争取群众，不能使老造反派回过头来。另一种办法，立场坚定，思想上毫不留情地批判，才能使他们觉悟，才能团结一致。两种办法，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哪一个办法最好呢？我觉得后一个办法最好。

另外，我们对群众如何看，真正的革命群众不会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群众不会那么愚蠢，道理说清楚，他们会觉悟的。你看他们的纲领，那样反对毛主席，他们表面说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反对毛主席；表面拥护江青同志，实际上反对江青同志。我们把它戳穿，就会说服群众。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如我们处理内蒙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造反派对犯错误的群众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值得考虑。群众和头头要划清楚，不要故意的都去捉人，这方面我们批评了“省无联”，是因为他们犯错误了。现在轮着你们犯错误了。我们解决全省的问题，我们批评了这一派，对那一派多说一点好的，明天一翻，他们就会犯错误，这几乎无一例外。在会场，不管你怎样交代，一出门就不行了。那天我们处理福建问题，我说福建作个例外好不好？结果还不例外，还是派性作怪。

坏头头叫他们自己去捉，自己批判。某某讲的，有人说“你们反革命两面派”，如果真这样，不但受蒙蔽的群众不能争取，一块作战的又闹起来了。你们那天回去有打仗的没有？（群众答：没有。就是湘江风雷把李仲昆搞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如果是本组织搞的，那允许罗！不必那么急，何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同志耽心也就是这个问题吧！工作还是要做，家里出点问题也难免，打电话问一下，这方面要注意。不注意不仅自己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团结大多数不利，对抓坏头头不利。但是，注意这个问题有个前提，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阶级立场坚定，不能因为注意这个问题，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尖锐的斗争。

根据总理讲的，我讲的这几个问题，因为我了解的情况少，你们考虑，可能有错误。

范品汉同志一月三十日下午四点二十分钟来电记录人：省委机关
《永向东》战团柳絮杨、唐俊亮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杨曦光的一封信

小孙：

你好！向你致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很想与你保持通信联系，你是否能把最近的感想写信告诉我。工厂里的情况以及极左派工人的思想都请谈一谈。

你们很注意理论学习我是很赞同的，新思潮的出现致使敌人空前的疯狂和颠覆，就是从反面雄辩地证明了新思潮打中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敌人的大规模镇压能够得逞还因为新思潮没有变成新生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工人阶级自己的战斗学说，没有具体分析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没有具体分析新的资产阶级怎样把厂矿企业变成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的剩余价值怎样产生，工人头上的吸血鬼怎样从工人身上吸走利润等等，现在新思潮能否发展和巩固的要害就在于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从分析工厂的现有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权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新思潮从知识份子的空想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自己的学说，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帮助我，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努力。

新思潮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发展自己的阵地，没有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半途而废，单纯地炮轰根本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哈尔滨炮轰派，贵州 411 的结局就是证明，革命的理论成为当前斗争的关键，因此一·二四已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集中点。

希望你能在分析工厂的生产关系，经济情况方面给我寄材料和写些你的看法。

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斗争给予敌人致命的威胁的时候，一定要挺住！

一·二四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只老三，还有比他厉害多的中国最大的党阀，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目前还处在极低级阶段，应该肯定这场革命要二十年以上。

还请你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意见写给我。

不多写了。

沈坚（以后就这么固定称呼）一月三十日

官僚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崇高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毛泽东主义，
乃是世界的真理！
（来信请托送信人带给我）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杨曦光《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办法应该改变》

（按：这几封反动信件，是从（夺军权）成员孙小兵身上获得的，沈坚即杨曦光的化名，现印发供批判用。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运用批判十七年的刘邓路线的办法，向人民说明刘邓不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十七年的各个方面（建党。军队。工厂制度。社会制度等），各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後较自然地把新思潮灌输到群众中去。

给战友们的一封信

这几天的每一分钟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响。

让我们交流一下思想吧！

反革命的大镇压给人的教育太深了，群众在这种时候革命觉悟提高的高度和迅速达到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平时迫切希望但又达不到的程度。革命人民对这场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或从书本上来的，他们在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後，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认清了革命的对象。

几天的事变正是在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深刻地教育了革命人民，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地打击每一颗革命的幼苗。对於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估价决不能太低，应当肯定一点，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以前我们承认全国各地现在是资产阶级篡权，但是对於中央的情况想得很少，认为那当然是毛主席占优势，忘记了“中央和地方，中央为主”，以前湖南的造反派只仇恨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是一个没有一点反革命理论水平的家伙，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搞掉了一个慈禧太後，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央的政权没根本触动，

刘少奇被揪出是上层人物活动的结果，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敌人还有一整套班子，既然他们是一个阶级，揪出一批人对他们的政权不能起根本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对中央每一个人用无产阶级的冷静眼光去审查，但是我们从前只审查了周恩来等少数人，其他人的面目因不太清楚就不去仔细考虑了。而这一次，由于湖南革命势力的强大和先进，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一人出面就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於是，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几乎都在反革命大镇压时，在湖南人民面前亮相了，革命人民开了眼界，这一次大镇压，使湖南的革命势力从山脚下走到了山坡上，原来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有一整套班子。二月份全国规模镇压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重要的一部份，原来在湖南人民面前是隐蔽的，尤其是康生之流，以其反革命俩面派手法，骗取了不少的善良人们的信任。而这次，这个隐蔽部份也暴露了，先进的革命人民立刻应该从最进的事变去引导中间群众和不觉悟份子，使他们冷静地估计中央政权的情况。

敌人实行镇压的原因是因为新思潮的传播会要了他们的命。敌人镇压的高级水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主义的强有力。

这封信写到这里因我写了目前时局的声明，把我想要说的内容的大意都讲了，因此就不想写下去了，已写的一段还是请你们注意，因此通过一·二四，革命人民反对中央政权的情况在革命中起的作用，进行分析，以便估计在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央政权要实行怎样的变动，这确实比分析省革委会的临时性要重要得多。

除开声明所要说的各要点外，请同志们看一看“改造我们的学习”那里面把新思潮的缺点讲得很好，新思潮的缺点是：夸夸其谈，抓住只言半语，满足于一知半解等等，应该努力克服这些缺点，象毛主席主张的那样详细地占有资料，认真分析解放十八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上层建筑的演变情况，毛主席、马、恩、列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应把他们当作一个生动活泼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去研究，决不能看一个片段，如列宁所说，要知道国家的作用性质等等，就要分析国家是怎样起源的，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等等，我们要知道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态，就要分析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新东西产生了，哪些东西灭亡了，这就叫不要割断

历史，不要认为中国社会从来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被人称为“大脑壳”的阶层等等……不多写了。

此致

毛泽东主义的敬礼

沈坚（杨曦光）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长沙一中“夺军权”钢 812 分队 杨曦光 刘小兵《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

一、“一·二四”的伟大意义

任何一种新思潮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并不靠我们自己标榜，而靠敌人内心异常恐惧而进行大规模围剿。一·二四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际工运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潮被苏联修正主义的“共运”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次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是从来未有过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是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发进入自觉地投入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间，在当前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那革命永远不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引起全中国全世界瞩目的“一·二四”事件发生了，它标帜着革命人民是否能掌握毛泽东主义，由自发转入自觉，这成为中国当前整个革命是进一步深入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也成为国际共运发展的关键。这个转折，它将被光荣地下记载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虽然新思潮很早就产生了，但是象一·二四那样大场面，宣称一个群众组织有其纲领，并且给予一顿毫不讲理的怒骂，这是史无前例的。这证明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威胁，一·二四就是从反面说明毛泽东主义一旦掌握了群众将多麼强大，简直是天下无敌。

“省无联”的革命战士们，全国革命人民，全世界毛泽东主义者注视着我们的斗争，我们决不要辜负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啊！

二、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阵地

目前，必须坚决地抛弃关门组织“理论研究小组”的思想，谁要是想关门进行理论研究，然后幻想有了完备的一套后，再去传播新思想，顺利地掌握群众，那他不是一个十足的蠢才那他就是存心骗人。

斗争逼得新思潮不可能十分完备和彻底后再去指导革命，而在反革命围剿和实现指导革命斗争中新思潮必然自将迅速成熟。

三、炮打司令部

在对待新思潮的态度这个要害问题上，中央内一直隐蔽得很好，因此欺骗了湖南革命人民信任的反革命两面派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一·二四正是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上教育了革命人民。

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冷静地考虑中央机构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教训。毛主席在中央仍然是少数，这就是结论。

省无联广大群众也心底感觉到，仇恨新思潮的是镇压省无联的人，敌人使他们认识到新思潮是省无联广大群众的朋友和同志，敌人把新思潮和省无联联在一起也正说明了新思潮本质上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其说敌人万分害怕新思潮，不如说敌人万分害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革命纲领掌握群众。

革命人民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或论教中来的。

四、把“省无联”的红旗打下去！

如上所说，省无联的命运不能不和新思潮合在一起了。

在当前的转折关头，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就不能引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黑龙江炮轰派和贵州四一一的失败就是证明，谁要是妄想举起他们的右手打倒章、梁，举起他们的左手打倒省无联“坏头头”。他无异如在抗日战争时，又要抗日，又要反对共产主义。正如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朋友一样，新思潮是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朋友为有毛泽东主义，任何小资产阶级左翼都不可能指导任何革命到胜利。一个又一个省炮轰革命委员会的斗争都失败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条，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而湖南的斗争在这方面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因此这一步是否能巩固和发展已成为全局的关键，湖南真正的革命者决不能犹豫，要不惜牺牲坚持和巩固新思潮阵地。

而在目前要使新思潮由知识份子的空想成为革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战斗学说成为关键的关键。

新思潮有极大的缺陷，但命运逼得它不得不过早地投入战斗，革命人民要努力填补缺陷，纠正错误，但是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任何“退却”而言的。

因此省无联的大旗能否打下去成为举世触目的问题。

在这种时刻，任何逃跑和沉默都是可耻的行径。

省无联的坚强战士们为革命的全局和根本利益，不惜用热血和生命保卫省无联，而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这个文化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革命组织中没有你们的立足余地，趁早从省无联中滚蛋吧！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二四告诉我们，革命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处在一个启蒙阶段。革命是长期的，对于革命的长期性，我们应该反覆重述使革命人民有所准备，可以断定这场革命起码要三十年以上。

但这场史无前例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胜利，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积累了苏联等国几十年的教训，并且自己是在几十年的残酷战争中打出来的。革命胜利最大保证是——中国有了个毛泽东，请记住中国有个毛泽东！

任何悲观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一次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中国首先胜利。

中国人民下定决心根着毛泽东如同民主革命一样走过曲曲折折的漫长的道路夺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

目前处在全国革命与反革命焦点的湖南人民准备为夺取这场革命的最后胜利献出自己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

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主义万岁！

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退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6；中发〔68〕56号

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湖南省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和推广“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获得的经验。要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经常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的运动，民拥军，军爱民，继续巩固军民之间的团结。巩固各部队之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您家乡的三千八百万英雄儿女，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在您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地诞生了！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我们纵情欢呼您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洞庭湖滨到五岭山下，从湘东革命老根据地到湘西侗寨苗乡，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千万颗红心飞向您身旁。我们衷心地祝愿，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英雄的湖南，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

敬爱的毛主席，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年代里，是您，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亲手缔造和培育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是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冲破旧世界的千重锁链，亲自率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发出了“劳工万岁”的震天动地的声音，敲响了旧中国的丧钟！

是您，一双草鞋，一把雨伞，踏遍三湘四水，深入工农群众，写下不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

是您，高举武装斗争的革命旗帜，在蒋介石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陈独秀、中国赫鲁晓夫跪倒在敌人脚下，合伙扼杀革命的危急关头，亲自领导秋收起义，缔造第一支人民武装，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道路！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率领着我们踏遍万水千山，转战大江南北，打败日本强盗，埋葬蒋家王朝；您率领着我们缚苍龙，征腐恶；您率领着我们起宏图，换新天。

我们跟着您，掀起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我们跟着您，播响了大跃进的战鼓！

我们跟着您，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方向，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巩固了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天才地总结了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以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敬爱的毛主席！湖南历来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湖南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据点。无限忠于您的湖南工人阶级、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响应您《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令，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高举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大旗，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围剿，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猛烈攻击，粉碎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之流，打得落花流水，全线崩溃。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是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是您敢于斗争、敢于师利的伟大革命实践，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在两条路线斗争的紧要关头，您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热情宣传您的光辉思想，使我们心红骨硬，斗志旺盛。亲人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亲人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亲人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钢铁的长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敬爱的毛主席！您亲自批准的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象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破产了，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这个最最难忘的时日啊！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岳麓山的枫林一片火红。您巡视大江南北，又来到了我们中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给我们作了最新指示！”特大喜讯传开，全省一片欢腾。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您的最新指示，字字句句说在我们的心坎上，我们条条落实不迟疑，句句照办不走样。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正当我们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您的最新指示的时候，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爪牙，大野心家彭德怀军阀的死党，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和美蒋特务，他们以各种形色的反动思潮，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指示下，您家乡的英雄儿女，心明眼亮，精神抖擞，把这一小撮社会渣滓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敬爱的毛主席啊！翻开湖南的革命斗争史册，哪一章不闪耀着您伟大思想的灿烂光辉！回顾几十年的革命战斗历程，您家乡儿女深深地懂得这样一个伟大真理：忠于您，就是革命；跟着您，就是胜利！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您。我们决心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要坚持在一切领域中用您的光辉思想挂帅，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把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誓把您的家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活学活用您的伟大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们决心以“斗私，批修”为纲，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把学习您光辉思想的学习班办得好上加好。我们要狠斗资产阶级“私”字，大立无产阶级“公”字，誓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我们要随时粉碎阶级敌人来自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的进攻，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誓死保卫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们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掌好权，用好权，使革命委员会在斗争中不断完善和巩固，成为高举您的光辉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全省人民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战斗司令部，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国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这是湖南人民的大喜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我们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湖南三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湖南部队，致以崇高的战斗的敬礼！

湖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在阶级斗争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又亲临湖南视察，作了重要的指示。在庆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湖南，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湖南的代理人，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他们的末日。这一小撮混进我们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同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相勾结，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工人阶级、广大革命人民和驻湖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心明眼亮，精神抖擞，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敌人以坚决的打击，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各种阴谋，取得了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反革命力量必然越要同革命力量作拚死的斗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按照毛主席关于“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教导，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能够率领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革命司令部。

我们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地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对自己人，对犯

了错误的革命同志，不论是革命群众或者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全省军民，要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深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英雄儿女，一定能够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趁大好形势，乘浩荡东风，把湖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六、湖南的反击三右一风与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宣传贯彻“七.三”布告 情况续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广州军区：

自接到周总理电话后，四十七军又立即召开常委会议，专题学习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到：“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学习宣传“布告”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闻风而动，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积极学习，热情宣传，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一天比一天深入，效果一天比一天明显。

一，领导带头，形式多样。军刘政委亲自到连队检查指导开展宣传活动，各师团领导亲自到群众组织中去宣传，一二七师在师长，政委带动下，有二十七名师团干部到群众中宣传“布告”，从机关到连队，从干部到战士，从家属到小孩，以及在长沙东湖退休的老红军，也都在学习宣传“七.三”布告。几天之内，部队出动了宣传队一千一百三十一个，六千余人；宣传车二十七辆，深入到工厂，车站，码头，大街小巷，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列车上，轮船上，已向十二万六千余

群众做了宣传.采取：广播，宣讲，演唱，分片包干，挨家挨户访问，座谈，做调查，抓典型，同忆苦，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的把做好事和宣传“布告”结合起来，受到群众赞扬：“我们一定向解放军学习，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学习‘布告’，全面落实‘布告’”一个轰轰烈烈的深入的学习，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正深入开展起来.

二，部队带头，群众感动.部队顶着火热的太阳，热情地宣传“布告”，耐心地解答问题，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有的把宣传队请进单位去宣传，有的主动协助宣传队进行宣传，长沙汽车修配厂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在部队的带动下，他高举着毛主席像，在街上主动用快板宣传“布告”，他说：宣传毛主席的声音人人有责，长沙郊区黑石渡一位油漆老工人听了部队宣传“布告”后，他买了三元钱的油漆，在大街上大刷宣传“七.三”布告的标语.过去冲过部队抢过枪的群众听了宣传后，感到对不起毛主席，说：“不能再受蒙蔽了，今后一定听毛主席的话，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有的听了宣传后，“九.五”命令发布时没有交的枪支，手榴弹和子弹也交出来了.涟邵矿务局和金竹山的两派群众经过“七.三”布告的宣传和学习后，主动撤出了工事，停止了武斗；郴州“联络网”宣传学习“布告”后，自动宣布撤销组织铲掉了山头；衡阳“联络网”经过“七.三”布告宣传学习后，已把抢去的援越物资大部份送回，并恢复了铁路运输，其下属一些基层组织开始上交枪支，弹药和武斗凶器，有的则自己封存起来，长沙铁路分局自“七.三”布告发布以来，就查出阶级敌人和坏人三十九个，同时促进了生产.在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份发动群众.千难万难，只要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就不难.

但是发展不够平衡，还有一些群众组织和一部份群众对“布告”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距中央和军区党委提出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见诸行动的要求还甚远.今后打算：

- 1，抓好活思想，提高自觉性.进一步持续地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充份发动群众.宣传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就是我们当前工作的中心.

- 2，把“七.三”布告作为推动全省和我军各项工作的巨大动力.把宣传贯彻“布告”与反三右一风，开展三查一清紧密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省二次全会

“纪要”结合起来，与拥军爱民结合起来，团结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3，加强领导，对“七.三”布告宣传和学习，党委要全力以赴，发动群众排除干扰，不断总结交流经验，具体指导，真正落实，全面落实“布告”精神。

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

1968.07.19；中发[68]111号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现将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造成浩大的声势，是分清敌我，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彻底孤立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此种宣传，应当同拥军爱民联系起来，同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同清理本地本单位的阶级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等工作结合起来，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新华社及各分社，应及时把各地宣传“七.三”布告情况及问题发表，登内部的《文化革命动向》，不登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概要）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

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

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

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附件一 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1969. 12. 18）。

附件二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1969. 12. 3）

三、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唐忠富反革命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长检诉字(1982)28号

被告人唐忠富裕，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小文化，一九四八年一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南运输公司通讯员，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移交我院起诉。

现审查查明，被告人唐忠富犯有下列罪行：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一)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同伙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诬蔑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是“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狂叫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同年三月，唐忠富还叫嚣：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三)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讲话，回湖南后大肆传播，并说：“我这回心中有数了。”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卒子，死不回头”。随后，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借省、市总工会的名义，于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强行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了有邵阳等地、市来人参加的所谓“促转弯子”万人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诬陷省委领导干部“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六·四”大会后，并组织了二百三十辆汽车上街，

进行反动宣传。他们还策划十月十一日再在省委大院召开类似的大会。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并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在唐忠富等人的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四)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省委负责人，一九七六年三月，鲁瑛在王洪文、姚文元的指使下，派《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李千峰到湖南，收集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三月二十二日，唐忠富向李千峰积极提供情况，诬陷湖南右倾翻案风严重，“执行邓的东西”，“整班子，批派性”把“新干部”搞下去了，并要李千峰写信给鲁瑛，要求鲁瑛转递诬陷省委负责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信，寄给鲁瑛，信中诬陷省委负责人“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

六月中旬，唐忠富与胡勇策划，指派刘正良等三人去北京直接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转给了“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的迟群，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五)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阴谋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三日，唐忠富与叶卫等人在省总工会部署，确定由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当时的部分省革委委员，找省委领导干部纠缠。唐忠富煽动说：“要斗字当头，撕下脸皮”，“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要行使权力”，“你们去找省委，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只有内外配合起来了，斗争才有力量”。五月五日和十二日，叶卫东和雷志忠即带领一些人，两次冲击省委，围攻省委领导干部，扬言如果不答应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召开全会，就出省委机关。由于省委坚决反对，其阴谋未逞。

(六)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七月初，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要叶卫东等人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搜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对刘正良、焦佩伟等人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用评他讲话的形式向群众公开”，文章要“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出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已铅印散发了“一评”。这些反动文章诬陷我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张平化、张立宪、万达、于明涛等人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其实质就是复辟派专了革命派的政，右派专左派的政，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犯下了新的罪行”。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窜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揭所谓张平化的老底，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并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亲自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唐忠富多次对同去的人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让张平化主持湖南工作是不行的，对张平化就是要打倒，打不倒也要赶跑。”唐忠富在准备的所谓“汇报提纲”中，诬陷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同时，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大乱，说：“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八月中旬，胡勇派陈克昌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市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唐忠富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去年把我们的人赶出未了，现在可以把赶出来的人再组织起来开进去，把领导权夺过来。”唐忠富为此写了信给张厚和胡勇。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朱香桂在胡勇的指使下，组织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文件箱、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六颗，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夺权。

(八)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唐忠富与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于十月十四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会上策划了“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过准备“上山打游击”。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

(九)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一些群众来省上访，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策划调了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当晚，省委负责人亲自找唐忠富做工作，明确表示：人不能抓，民兵不能调，问题由省委处理。唐忠富对抗省委指示，二十日清晨，又伙同张厚增调了民兵共达一千多人。唐忠富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随后唐忠富与张厚、雷志忠亲自部署指挥，制造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流血事件。

综上所述，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镇压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使我省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钟时霞 陈贤吉 刘海涛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刑一字第 26 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钟时霞、陈贤吉、刘海涛。

被告人：唐忠富，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原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现在押。

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马友山。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唐忠富，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反动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同时，积极与胡勇、雷志忠等人策划，组织写作班子，以“唐勇忠”的笔名，编写《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铅印散发。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图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为省委常委。

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大部分局以上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的反动讲话后，回湖南大肆传播，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的卒子，死不回头”。同年四月底五月初唐忠富伙同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唐忠富煽动说：“要斗字当头”，“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确定由叶卫东带领部分省革委委员两次冲击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等人，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万人大会。组织二百三十辆汽车游行，进行反动宣传，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在唐忠富等人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唐忠富等人还准备十月十一日再去省委大院召开大会，妄图把省委搞瘫痪，乱中夺权。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向王洪文、姚文元授意派出收集诬陷领导干部材料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千锋，提供诬陷省委领导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湖南省委领导干部的信寄给鲁瑛。唐忠富惟恐阴谋不能得逞，又与胡勇策划，派人直接到北京找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诬陷材料，转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

动据点迟群处。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收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攻击诬陷张平化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在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上，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在研究汇报提纲时，唐忠富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为了上下配合，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大乱湖南，对中央施加压力，把省委搞瘫痪。

八月中旬，胡勇派人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唐忠富指使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要把领导权夺过来”。胡勇根据唐忠富的授意，指使朱香桂组织一百多人，于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发表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忠富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即与胡勇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诬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右派政变”，策划“要分别找一些头头串连通气，捆紧把子”，妄图负隅顽抗。

被告人唐忠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蔑为“反革命事件”，不听省委劝阻，伙同张厚私调民兵围攻，并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二十日，又与张厚增调民兵共达一千多人，亲自部署指挥，围攻邵阳上访群众，造成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wengewang.org

被告人唐忠富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被告人唐忠富被逮捕后，尚能交代自己的罪行，有悔改的表现。

本庭确认，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指挥镇压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杨德良

人民陪审员 盖杰

人民陪审员 朱友东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黄鸣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胡勇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检刑二诉字(1982)27 号 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四十五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一九五七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央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现审查查明，被告胡勇犯有下列罪行：

一、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 1. 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

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名单, 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 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同年六月, 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 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 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 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2. 一九七四年二月底, 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 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 叫嚷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 “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并以“唐勇忠”笔名将这篇反动传单铅印六千份进行散发, 大造反革命舆论。wengewang.org

3. 一九七六年二月, 胡勇召集同伙在陈大为家里开会, 胡勇在会上煽动说: “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 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 猢猻不散”。接着, 胡勇又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召集同伙开会, 提出反革命夺权策略, 说“现在夺权, 只能靠钻、靠挤”, “挤进去一个, 带进去一批”。

4. 一九七六年三月, 胡勇和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联名写诬告信, 诬陷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 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上”, “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 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给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 胡勇又与唐忠富策划, 并派人携带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去北京, 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在他们编造的材料中, 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 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正在窥测方向”, “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5. 煽动邵阳、株洲等地同伙制造动乱, 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一九七六年二月, 胡勇对其在邵阳的同伙谢智峰、肖茂盛等人煽动说: “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 意识形态上搞赢等于零, 我们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三月, 胡勇与唐忠富将邵阳的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召来长沙, 由唐忠富传播了江青对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谈话后, 胡勇接着大肆煽动说, 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 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 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 把运动搞起来, “来一个邵阳促长沙, 长沙、邵阳带全省”。 同年

六月二十日, 胡勇、叶卫东带领一伙窜到株洲召开会议, 胡勇在会上与叶卫东一唱一和地说: “我们今天是来煽风点火的”, “你们株洲的几个头头腰杆子不硬, 我们是送钙片打钙针的”, “你们要层层点火, 处处冒烟, 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6. 一九七六年八月, 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 要建立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于八月二十三日朱香桂等在胡勇的指使下纠集一百多人, 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 强占办公室, 撬烂桌锁, 抢走公章, 封了武器库等, 并发表《声明》, 公开夺权。

7. 借省、市总工会名义, 多次召开大会, 策划大乱全省, 妄图乱中夺权。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 胡勇和唐忠富、叶卫东等人, 强行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恶毒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 “拼凑翻案复辟势力, 组织还乡团”, “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并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六月四日大会还组织了二百三十多辆汽车上街, 进行反动宣传。

在两次大会后, 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同伙专门开会, 按照江青的腔调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 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 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 还多次密谋策划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在十月三日的策划会上, 胡勇还提出, 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 把权夺过来, 后因“四人帮”被粉碎, 阴谋才未得逞。we ngewang.org

8.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 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 先后三次召集同伙开会, 分析形势, 研究对策。胡勇在会上大肆煽动、攻击说: “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 是右派政变”, “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并叫嚣“要顶住, 不要当投降派”, 会上他们还议论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 要“捆紧把子”, “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等。

二、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1. 文化大革命初期, 胡勇为了抢班夺权, 就极力鼓吹: “拳头里面出政权”, 大肆煽动打砸抢, 并对抵制他阴谋活动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仅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十一月, 遭到胡勇残酷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和群众, 现已查证落实的有刘孝安、王明江、王德文、赵少锦、陈绍祺、刘虞、吴耐先、杨德华等八人。如一九六七年元月, 胡勇诬陷本厂著名的省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

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亲自带队把刘孝安押到长沙、湘潭、易家湾等地游斗，进行残酷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为了支持同伙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时，胡勇等人将王拳打脚踢，当即昏倒在地，右第五肋骨被打断，造成终身残疾。一九六七年六月，胡勇为了迫害本厂代理党委书记王明江，用木棒将王的右髌骨打成骨折，造成终身残废。

三、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 1. 一九六七年八月，长沙“工联直属兵团”与“东方红总部”两个群众组织为汽车发生争执，胡勇乘机挑起事端，煽动武斗。八月二十一日下午，胡勇乘“工联”在曙光电子管厂召开常委扩大会之机，大肆煽动说：“东方红总部确实欺人太甚，这样下去，会坐在我们头上拉屎，不打，我们今后站不住脚。要打，就大打，把‘东方红总部’给我端掉。”并当即决定从“工联直属兵团”和建湘瓷厂、新华印刷厂等单位调集武装人员，集中枪支弹药和汽车，指派周国强、周迪凡等人带队，对东方红总部“实行武力围攻”，胡勇坐镇“汽电”亲自指挥。在发生武斗的当天晚上，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的领导同志多次打电话给胡勇，要他停止武斗，并多次派人前去制止，但胡勇置之不理，继续增调武斗人员和武器弹药组织攻打。结果造成死亡二十四人，烧毁湘绣大楼，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重大事件。综上所述，胡勇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审判。 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肖景佳 检察员 朱洪规 检察员 孙 惠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刑一字第 23 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肖景佳、朱洪规、孙惠。 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四十五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 辩护人：律师易延礼。 被告人胡勇，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长沙市人民检

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胡勇,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二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六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六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以及各部、委、办和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六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会议。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陷中共湖南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策划,派人将他们编制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八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提出要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八月二十三日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被告人胡勇为了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自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还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煽动。二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猻不散”。二月底,胡勇对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我们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三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前来长沙听唐忠富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

全省”。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大会还调动了两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这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事件。六月二十日，胡勇与叶卫东等人带领部分人窜到株洲，胡勇在文化宫召开的大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十月，胡勇又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于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过来。”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十月十四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先后多次召集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被告人胡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被告人胡勇亲自策划和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二十四人，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严重后果。“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仅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十一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七人。一九六七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本厂著名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竟对王拳打脚踢，将王的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被告人胡勇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被告人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挥武斗，迫害干部群众，图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胡勇

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张迪平 人民陪审员 谭海军 人民陪审员 苏佑娣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立珍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82)刑二字第 87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勇，原名胡世满，男，四十五岁，初中文化，汉族，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82)刑一字第 23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勇犯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判后，胡勇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没有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被告人胡勇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二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么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六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六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和省革委的各部、委、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夺权作组织准备。一九七六年二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胡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猻不散”。二月底，胡勇对到长沙向其汇报“邵阳情况”的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在意识形态上搞赢，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三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到长沙听唐忠富

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同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告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人策划,派人将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六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的会议上,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在两次大会给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公开信和大批判发言中,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同年六月二十日,胡勇与叶卫东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集基层工会头头在株洲文化宫开所谓座谈会,胡在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八月中旬,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妄图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八月二十三日,胡勇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同年十月初,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准备于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的所谓联系实际狠批“三株大毒草”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召集同伙唐忠富、张厚、胡求生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还策划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会后，胡勇又几次秘密进行串连活动。被告人胡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胡勇亲自策划、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二十四人，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严重后果。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十一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七人。一九六七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长沙汽车电器厂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长沙汽车电器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便对王拳打脚踢，将王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武斗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被告人胡勇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证人的证言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被告人胡勇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胡勇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和“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 23 号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刑事判决。wen gewang.org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审判长 贾凤楼 代理审判员 曾飞隆 代理审判员 谢海元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东辉〔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长检刑二诉字[1982]25号 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湖南省宁远县人,汉族,大学文化,一九六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大学助教,中学教员,“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一中革委会副主任。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离职审查,同年十月十七日拘留,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省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现审查查明,被告叶卫东犯有下列罪行: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密谋策划,组织百余名群众,以抄“黑材料”为名,冲进省委机关,砸烂省委二办公楼的门窗、办公桌,抢走机密文件和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 2.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制造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煽动“全省紧急动员起来,斩断省、市委某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魔手!”并油印散发至其所属“战团”,命令他们立即“写成巨幅标语,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以前贴满街头巷尾”。同时,叶卫东还将上述内容在所属“战团”负责人会上进行宣传煽动,以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 wengewang.org 3.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上,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张平化抓走,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的地下室内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拘禁张平化以控制领导权。 4. 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叶卫东认为时机已到,于同年三至四月,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在夏四林家、长沙市一中等地秘密开会,策划夺权。叶提出了“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时,叶卫东还在一些会议上点名诬陷重新出来主持湖南工作的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的所谓“新干部座谈会”上,叶卫东煽动说:“张平化是什么人?”“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提出“要同张平化对着干!”同年七月

三日，他又在市总工会召开的所谓省、市工会负责人碰头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同意打倒张平化！” 5. 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一伙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内斗外轰”的反革命夺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他们多次策划，由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为了在社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向省委施加压力，叶卫东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的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于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四日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调动二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与唐忠富一伙还大肆煽动在全省“夺权”。一九七六年六月，叶卫东对各地、市来长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同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开大会，叶在会上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他们又密谋策划，叶提出“对张平化的斗争要升级，要打倒”，并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七年叶卫东在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犯罪，在室内墙上刻写“尸骨未寒、杀妻杀子”，“右派政变”，“极右政变实可诛”等反动口号。

二、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 1. 制造涟源“九·九”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背着省革筹和四十七军，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沿途抢夺民兵枪支，大搞打砸抢，打死干部一人，打伤群众四十一人。到达涟源后，又到处搜罗枪支、弹药，向有关单位强借钱粮和衣物，闹得人心惶惶。对此，涟源一群众组织电告省革筹和四十七军，要求把他们的队伍“立即电调回长”。黎原军长将电报交给叶卫东，要他赶快把队伍调回。叶却要柳枚青去追查打电报的事，以致造成了“九·九”流血事件，共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 2. 煽动、指使汝城、涟钢两起武斗。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汝城县彭起才、何辅志、陈斌如等人来长沙向叶卫东告状，说他们是被赶出来的，

请示怎么办。叶煽动说：“你们是什么造反派，连保守派都不如，人家一打，你们就跑”。“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现在是打得赢的是爷(爹)，打不赢的是崽”。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彭起才等人组织几百人于七月十一、十二日持棍棒、鸟枪等分批返回汝城，占领了县邮电局、粮站和招待所等处，第二天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打了六天，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接见涟源钢铁厂来省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支持他们联合起来，武装打回涟钢去。并煽动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凌晨攻打涟钢，当场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上述罪行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一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武铭魁 高石昆 吴尚文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刑一字第 20 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武铭魁、高石昆、吴尚文。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辩护人：律师钟益胜。被告人叶卫东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被告人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省委机关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告人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

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抓走,非法拘禁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一九七六年三四月,被告人叶卫东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叶提出“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要摘“桃子”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叶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煽动徐、王、郑等人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

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被告人叶卫东的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叶卫东在铁的证据面前，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审判长 刘潜海 陪审员 卞培根 陪审员 张天乐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世皖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82)刑二字第 85 号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第一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现在押。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82)刑一字第 20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卫东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叶卫东不服，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被告人没有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查明：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群众。被告人叶卫东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东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中共湖南省委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并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同年十二月二十日，

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非法拘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一九六七年，叶卫东按其“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与工派既联合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力争多摘中、小桃子”等指导思想，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还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的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煽动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 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卫东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

钢去。对徐、王、郑等人煽动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被告人叶卫东的行为，无论按照我国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我国现在的《刑法》，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叶卫东所犯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叶卫东上诉提出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没有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 20 号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判决。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审 判 长 贾凤楼 代理审判员 谢海元 代理审判员 曾飞隆 一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 谭隆保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张厚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长检诉字[1982]第 34 号

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曾任邵阳地委副书记，邵阳地委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依法逮捕，经长沙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人张厚犯有下列罪行：

1. 一九七四年二月底，张厚与唐忠富、胡勇等人背着省委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当省委常委，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2.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开会，研究对策，对抗省委，他们策划由省、市工会出面发动群众，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张厚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又与唐忠富、胡勇、许新宝、雷志忠、刘正良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策划对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所谓促张平化转弯子大会的指示，张厚在会上表态支持，致使“五·二五”还是以省、市工会的名义强行在省委大院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张厚、唐忠富、胡勇等人在省工会共同策划准备十月十一日在省委大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张厚审阅了大会给张平化公开信的样稿，后因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

3.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张厚与唐忠富等人遥相呼应，上下配合。张厚还给他们打电话予以打气，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八月十七日雷志忠来信指使张厚等人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后，又将信转交胡勇，要胡勇看完烧掉。

4. 张厚一伙为了控制长沙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在唐忠富的授意下，张厚、胡勇，指使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库，抢夺公章，发表“严正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事后，张厚还指使朱香桂起草了《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

革命委员会关于对民兵指挥部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军队和地方干部均应服从指挥部统一指挥。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十月十四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秘密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张厚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在会上还议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5. 一九六七年七月，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期间曾多次拍电报，写信，打电话指使李敢闯、龙昌富等人说：“一定要武装好造反派”。并向张意等人说：“一定要把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武器搞到手”。七月底至八月下旬，李敢闯等人按照张厚的旨意，曾多次将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抢走。仅据邵阳军分区证实抢走的各种枪有八百多支，六0炮、八二迫击炮二十多门，手榴弹一万多枚，子弹二百五十多万发。张厚还亲自批给邵阳运输公司进口钢材六吨，将一辆汽车改成装甲车。

6.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厚接到湘潭毛士凤(已捕)联合围攻湘乡的信后，与胡求生、宋颖芝等人策划，指派申玉清、刘益全带领二百多武装人员到湘乡参加武斗，造成打死十人的严重后果。

7.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伙同凌海波、周俊等人将原邵阳军分区政委尹才生骗出京西宾馆，脱掉尹的军衣、军帽进行揪斗，张厚从北京回邵阳后，煽动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使邵阳地区军队系统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被揪斗。

8.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邵阳两部分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因为误会发生武斗伤亡数人，张厚竟把这次伤亡事件的责任转嫁给当时邵阳地区的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他诬蔑说：“这次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账要算到走资派身上”。致使邵阳地、市公检法机关和一些厂矿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惨遭毒打，披麻戴孝，跪灵守尸，身心受到摧残。

9.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来省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刷写标语，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撕毁，因而发生冲突，张厚、唐忠富等人私调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内。七月二十日上午，张厚伙同唐忠富又增调民兵共一千余人进行围攻，张厚亲临现场，并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致使二十一人被打伤，其中重伤三人。

综上所述，被告人张厚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流血事件，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 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 察 员 罗宗祥

代理检察员 阎 军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82)刑一字第 37 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宗祥，代理检察员阎军。

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原任中共邵阳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现在押。

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易延礼。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判决如下：

主 文

判处被告人张厚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事 实

被告人张厚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张厚与唐忠富、胡勇(均已判刑)等人背着省委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和孙云英当省委常委。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秘密开会，策划对抗省委，由省、市工会出面发动群众，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张厚煽动同伙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共同策划对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大会的指示，致使五月二十五日还是以省、市工会的名义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唐忠富等人上京后，张厚还与他们遥相呼应，并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八月十七日，唐忠富、雷志忠来信给张厚等人，信中扬言：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信后表态同意，并将信转交胡勇，要胡看后烧掉。

一九七六年八月，在唐忠富的授意下，张厚、胡勇等人策划由他们一伙控制长沙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八月二十三日，张厚幕后支持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库，抢夺公章，发表“严正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事后，张厚不经市委同意就确定朱香桂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并指使其负责起草解决民兵指挥部问题的方案。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秘密开会，张厚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在会上并议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被告人张厚策划指挥武斗，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来省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刷写标语，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撕毁，因而发生冲突。张厚、唐忠富等人经过策划后，私调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内。七月二十日上午，张厚伙同唐忠富继续增调民兵共一千余人进行围攻。张厚亲临现场，并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因此造成二十一人被打伤，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厚接到湘潭毛士凤联合围攻湘乡的信后，与胡求生等人策划，指派 XXX 等带领二百多武装人员到湘乡参加武斗。造成打死十人的严重后果。

同年七月，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曾多次拍电报、写信、打电话指使李敢闯等人“一定要把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武器搞到手。”七月底至八月下旬，李敢闯等人按照张厚的旨意，多次抢夺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仅据邵阳军分区证实，抢走各种枪支八百一十八支、“六〇”、“八二”迫击炮二十七门，手榴弹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五枚，子弹二百五十万零四千四百八十四发。张厚还亲自批给邵阳运输公司进口钢材六吨，将一辆汽车改成装甲车。

同年七月下旬，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伙同 X XX 等人将邵阳军分区政委尹才生骗出京西宾馆进行揪斗。张厚回到邵阳后，并煽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邵阳两部分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因为误会发生武斗，伤亡数人。张厚无中生有诬蔑说：“这次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账要算到走资派身上。”并在追悼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致使邵阳地、市公检法机关和一些厂矿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惨遭毒打，披麻戴孝，跪灵守尸，无辜受到摧残。

理 由

被告人张厚身为负责干部，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机，卖身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进行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确认被告人张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考虑到被告人张厚过去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被捕以后，对其所犯罪行有所认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一百零一条、五十二条、六十四条和第五十九条二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主文。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审判长 孙晓光

人民陪审员 余祥云

人民陪审员 朱智勋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田湘利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贰、研究资料

叶长青 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 一、群众组织产生的背景 文革中曾产生了那么多的群众组织，不仅是文革的独有现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值得书一笔的大事。尽管我们可以对文革作种种批判，但，所谓“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利，的确在文革中有一段非常时期内，得到了相当大的体现。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有的几个民主党派外，人民群众是不能自发建立任何政治组织的。文革前，在机关单位、工厂企业或学校里，只要有几个兴趣相投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就有可能遭到公安和保卫部门的监视，即使不被关押，也得打成反党小集团。而在文革中，却为什么可以出现那么多的群众组织？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群众组织产生的时代背景。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发，除了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遇到阻力以外，在其他省市却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这固然与毛泽东的威望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中央高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当时均是赞成文革的，所不同的是对形势的估计与对运动的对象、性质、方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不同罢了（这正和 1959 年庐山会议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一样，中央核心层意见基本一致。）。因此，毛泽东能得心应手地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又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原来组成的文革五人小组，扫清了外围。不过，这时毛泽东仍是希望利用现存的组织系统，来开展文革。为了使运动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开，当时，处于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按照传统的方法，派出工作队主持运动。工作队主持运动，当

地党委靠边站，亦符合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派的意愿。因此，毛泽东开始时是欣然同意。然而，工作队却依旧依靠党组织，仍然是按传统方法，矛头向下，把斗争的矛盾对准了所谓“右派”的学生、工人、干部，和所谓“黑帮”分子的文艺界名流，学术界权威。如北京的作家老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四川老作家马识途、湖南老作家康濯、湖南师大历史学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等。因此，从1966年5月开始，在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处处揪反动学术、技术权威，所谓“黑七类”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遭到批斗，使所谓的“牛鬼蛇神”们都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毛泽东对此却很不满意。这次运动，他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工作队起了破坏作用，指示要“统统驱逐之”。因而，一下子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股由群众驱赶和批斗工作队的风潮。对于驱逐工作队的风潮，刘少奇、邓小平有些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同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想好、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以能全面顺利地贯彻自己的意图。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卜大华、牛宛平、张承志等一些中学生，先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便是第一批红卫兵。这些学生不仅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无疑，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他们的举动，也确是开了新中国时期，群众不经批准，便自发“结社”的先河。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类组织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于是，他在1966年8月1日亲笔写信，表示对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予以支持。随后，8月10日开始接见红卫兵，同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得知成立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与支持，刘、邓及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马上也让他们的子女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组织，如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安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但是，这些半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其斗争矛头却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整肃的对象即“党内走资派”，而是执行了继续“矛头向下”的作法，大肆围攻、打击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工人、干部，以及迫害原来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资

本家、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成员。毛泽东似乎察觉他支持自由结社、排开党委的策略，再次被“变味”，他便突然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对各地各单位党委有意见的少数派群众（即后来被称为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而正是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群众与普通干部，对这种阴暗面比较了解、比较敏感，并且也大多身受其害。因此，毛泽东这一支持造反派的主张，导致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很快就打乱了刘少奇、邓小平原来的领导文革运动的部署。为了将文革的烈火燃遍全中国，在文革造反运动初期，毛泽东还号召全国中学大学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串联。随后，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北航红旗）”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纷纷派出小分队开赴全国各大城市，在全国各省会城市成立联络站，发动并参与当地的造反运动，支持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普通干部的造反派组织建立。但是，即便如此，当时，毛泽东对允许“结社”的自由度有多大，实际还是规定有一些范围的。除了政治上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与林彪等极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这些明示的规定外，同时，也绝不允许建立产生全国性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组织），都不能跨省成立，而只允许在本省范围内建立与存在。所以，当1966年底，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如以合同工、临时工为主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等时，中央便立马于1967年初专此事下文，宣布取缔解散了所有具有全国性建制的群众组织。文革群众组织的活动高峰期，实际不到三年。即自1966年九、十月间起，至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止。自那以后，造反派虽然还以联合统一了的“红代会”（红卫兵）、“工代会”（工人组织）、“农代会”（农民组织）活动过一些时期，但，整体上已经基本没有自由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了。

二、湖南长沙各主要群众组织之概况

文革的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的群众运动走向，实际也就引领着全省的群众运动。一般来说，在省会城市成立了什么样的群众组织，那么，在该省的地区与县城，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建立。本文所述的湖南群众组织活动，实际也就是以其省会长沙市

的群众组织活动为代表。长沙的文革中某一段时期，群众组织之多，确可以用“多如牛毛”这个词来描述，十来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自称为“司令部”，三、五个人的组织，也敢自吹为“XX兵团”，反正是没有谁来核查他们，谁愿意“竖杆子”立山头，你只管竖只管立就是，绝不会有谁来抓你的“反革命小集团”。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慢慢就形成了实力与影响都较大的二十来个主要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按其在派性斗争的观点与存在的时期，可先后大致分为六个大派别。它们是“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极左派”（“省无联”）、“炮打三红派”。

（一）“保守派”

文革中的“保守派”，在开始时，是被造反派们称之为“保皇派”。因为，最初《人民日报》上曾有权威文章，将拥护党内走资派的人冠之以“资产阶级保皇派”予以批判。不过，《人民日报》文章中所说的“保皇派”并不是指群众组织，而是指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意指他们是在保刘少奇。自1966年11月左右起，造反派组织大规模崛起后，这项“保皇派”的帽子，便被造反派甩到了支持省市县委及各单位党委的那些群众组织头上。最初，这些被斥为“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头头与成员，对甩过来的这项帽子不仅不反感，相反还曾扬扬自得地说：“老子就是保皇派！要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级党委！”但是，后来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各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大道与小道消息，都在指责“保皇派”是错误后，才没有人公开自称是“保皇派”了，而都换成了造反的旗号。不过，两派群众组织虽都变成造反旗号（弄得后来的人，根本无法从组织名称上分辨其性质，分不清谁是造党委的反的组织，谁又是保党委的组织了），但在当地，谁“造”谁“保”，不仅两派双方都自明，就是中间逍遥的人，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保皇派”的名称在群众组织中大约存在了不到三个月，到1967年初前后，中央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指出：不要将思想上一时跟不上形势、因而有些保守的群众组织称为“保皇派”了。这样，造反派便将对立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改称为“保守派”。因此，群众组织中的“保皇派”的帽子，便换成了“保守派”，并贯穿于以后的文革派性斗争之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自1966年8月产生后，到1967年元月垮台瓦解止，大约存在了四个月时间。之所以称之为“第一轮”的保守派，是因为，这保守派的势力，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始终没消失，并以

各种形式仍顽强地出现过,直至四人帮垮台、造反派们覆灭。湖南长沙市“第一轮”的保守派组织,是以“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成立为标志,开始形成的。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又成立了其“高校总指挥部”、“工人总部”,其组织势力强大,开始时人数达十多万人,它的成员几乎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的所有普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们。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被造反派简称为“长保军”,之中自然有贬意。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员对此却不怒,反而欣然也自称此名,因为,他们的心中,就是以“保”为荣。除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为主体外,第一轮保守派中有名且实力不小的组织,主要还有“八一兵团”与“红色怒火”。

1、“长保军”——“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它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早在8月13日,就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负责人为李正(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等高干子弟(以中学生为主)。此后不久,到9月14日,“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也相继组成(以工人为主)。这两个组织人数远不如“红色政权保卫军”,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入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人总部。

以刘爱华(湖南农学院大学生、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大学生)为总指挥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以大学生为主),则于9月28日也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都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至10月中,什么批“三家村”、揪“小邓拓”“新右派”、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或其前党团积极分子身份所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组织。现在很多回忆、批判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说的“红卫兵”,就基本上是各地的如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一类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

“红色政权保卫军”仿效军队建制,在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

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据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值岗卫兵（当然也是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总部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各学校一级“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定的名称也体现了军队味，各学校叫“军分部”，不是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是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导致“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的因素有三：（1）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发展得很快，在人数与气势上，逐渐压倒了保守派。1966年12月29日至31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实力大搏斗，因为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结果，三天的争斗，以“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组织打败而逃出收场。故其组织气势顿挫，军心刹时涣散，甚至，其成员都不敢到大街上再公开亮出“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身份，以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攻击。

（2）1967年元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中，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此文一出，彻底埋葬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湖南最初也最大的保守组织，使其顷刻瓦解，烟消云散，从此，没有人再敢打“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旗号了。

（3）1967年元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怒斥并宣布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造反派方面立马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面对在实力与舆论上都已完全处败局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只好全部停止活动。李正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一号头头，时年不到20岁，是长沙市五中的高三学生。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由于其父为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加上他有一定组织能力，因而，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成立后，便被推举为“司令”。对于“红色政权保卫军”只存在四个多月，便完结了的现实，李正当然心理是不服气的。可他

老子是省军区副司令，知道被中央点了名这一事的性质严重，因此，李正就从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虽然“红色政权保卫军”不少铁杆分子，以后总想让“李司令”再登山重起，但终究没有成功。李正被老子送进了真正的军队，从一名战士做起，直至在 1979 年 2 月，以一个团职指挥员的身份参加对越反击战并荣立战功。

“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校总指挥部的两位负责人刘爱华、唐德元，在“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后，也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20 多年后，她（他）们却分别成为了湖南省的某厅级领导干部。

2、“八·一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于 1966 年 11 月 14 日成立，系省委、省军区支持的组织，由已经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张本科、省市委负责人徐启文、丁维克参加成立大会，省直属党委武装部，则直接负责“八·一兵团”。该组织成员中，党、团员占多数，战斗力很强，曾一度成为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劲敌。

但后因中央不允许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织，担心出现第二武装，即下文命令这类组织，不论是造反观点还是保守观点，一律解散。加之，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很强，又针锋相对建立了同样是由荣复转退军人组成的“红旗军”，与其相斗，因此，“八一兵团”存在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便烟消云散了。

3、“红色怒火” 它于 1966 年 12 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说它象北京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

其组织负责人曾有根（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彭湘华（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等。它以原“长保军”和“八·一兵团”的骨干为基础，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下设了“红色怒火工人总部”“红色怒火贫下中农总部”和“红色怒火红卫兵总部”。但，它的成员并没有多少，仅仅几百人而已。它的所谓工人总部贫下中农总部红卫兵总部等，基本属于只有虚张声势意义的几块空头招牌。

“红色怒火”组织在长沙的第一轮保守组织中，还根本没有一点名声。它的鹊起，是在长沙市的第二轮派性大战中，才一跃而上的。因为，第二轮派战中，武斗已成为了文革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不讳言武斗的“红色怒火”，便由此得以大出其名，成为造反派组织的一个铁杆死对头。

虽然，后因文革中枪杀了人，其主要负责人曾有根亦被拘押数年，并于 1979 年初病死于市公安局看守所。但，文革后

居然在长沙市中心广场与市公安局大院内，其成员却能够自发为曾有根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一连数日，全市很多单位的党政工团组织，都纷纷送花圈派人参加追悼会。而对这一切，当局也居然没有人来阻止与处罚。可见，它这个准暴力保守组织，的确是能得到省委和省军区的同情与支持。（二）

“新保守派” 所谓“新保守派”，这只是造反派方面的定义说法，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组织，自己是绝不认这个帐的。他们称自己是“老造反派”。的确，第二轮派性大战中的“新保守派”，之中确有相当多的组织与成员，是第一轮派战中的老造反派。但由于这些组织在第二轮派战中，第一，大都得到出来支左的地方军区的支持；第二，原来的旧保守派成员，在改头换面重建组织而出山后，都对“新保守派”组织表示了支持。因而，这批“老造反派”，便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保守派”的印记。在文革的派性大战中，造反派与“新保守派”的斗争之激烈之长久，远远超过原来与第一轮旧保守派的较量。这个特点，不仅是湖南如此，在全国各地，亦大多如此。湖南长沙的“新保守派”力量，便是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首为代表，以“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旗帜。4、“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 “高司”是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组织成立二个月后，于1966年10月15日成立的。最初，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被聘为“高司”顾问，但不久即被“高司”宣布开除。成立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到会祝贺，并高呼“向英雄的红卫兵战士致敬”。“高司”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先礼（中南矿冶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党员），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都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整个“高司”组织，都是由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所组成。其中包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医八·一五红卫兵”、“八·一三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属下组织。“高司”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他们在1966年的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的“八·一九”事件中，成为受到省市镇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把；《人民日报》于1966年8月23

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而对这些大学生们给予了声援。又是他们将高校中的多数大学生组织起来，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也是他们积极帮助湖南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工人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这些工人干部得以平反；同样，也还是他们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织。但是，不幸或有幸，自进入大夺权的1967年后，“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问题的实质是：究竟由老资格的造反组织“高司”领导人为湖南省夺权后的中心，还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为“核心”。矛盾终于导致了分道扬镳的大分裂大内讧。以赞同或反对召开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并夺权的“1·15大会”（即元月十五日大会）为分水岭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新一轮派性大战。在新一轮派战中，有些“高司”成员从中退了出来，加入到反“高司”的行列，如后来与它对立的“高校风雷”、“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矿冶井冈山兵团”、“矿冶井冈山公社”等，均是它原成员中杀出来的学生所组成。但，自始至终，在湖南高校中，“高司”却始终是多数派，即便后来被打败了，他们的势力却仍能对各高校发挥影响。这之中，固然有其得到省委部分领导与省军区的支持有关，但其以詹先礼为首的负责人的领导才能，确也有着重要作用。在全国范围内，首都红卫兵二司、湖北的“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重庆“八·一五”、成都的“红成”、浙江的“红暴”、哈军工红造团、西安交大“文革筹”等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都与“高司”有着联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驻长沙联络站，是反对“高司”而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但，首都三司下属有些组织，却公开支持了“高司”。毕竟，“高司”是一个老造反派组织，所以，后来支持与反对他们的势力，也显得很复杂曲折，并非象第一轮派战中那样，“造反”与“保守”，阵线分明。在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八·十”决定下达后，本已拥有数十万工人群众的“工联”与“湘江风雷”等造反派强大势力，因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气势更是再上了一层楼。同时，“新保守派”阵营则顷刻瓦解。拥有二万多名大学生红卫兵的“高司”，在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自然已属孤掌难鸣，在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后，便自行解散了。在这轮派战中，“高司”其实本还有

过能保不败的机会。当时，新崛起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工联”造反派头头，还是认为“高司”与“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属性质不同的组织，也认“高司”是老造反派。因而，曾向“高司”方面传话联络，抛来橄榄枝，要求“高司”放弃对“湘江风雷”之外的造反派组织的攻击，而一道携手，再创联合，共同夺权。

但是，可能是大学生因年轻而特有的傲气，只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不能够全面审视问题权衡利弊，没有任何“中庸”之道的理念，而追求全面彻底的胜利；加之，又得到省军区方面的支持，所以拒绝了“工联”方面提出的合作方案。从而，使“工联”只好成为它那“你死我活”的强硬对手。是不是学生就具定只能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能起“先锋”与“桥梁”作用，而不能长期担当政治领导人呢？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几大领袖如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毛泽东曾想培养他们做国家级的接班人，可是，观察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了，得出的结论就是：“虽然你们今天能打倒别人上台，但，明天你们又会很快被别人打倒。”最后，弄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去接管被蒯大富们一时掌管

的学校。显然，学生或纯粹的知识分子确有一个通病，就是行事总想索取“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最可能的”局面，缺乏对“度”的准确把握能力。文革中如此，1989年学潮中也是如此。学潮发展到五月十二日时，学生运动的作为虽已很激进，所创民主氛围也很大了，但尚能为各方接受，可惜，“高自联”的头头们没能把握好分寸，一味仍只进不停。最后，事情由极端走向了反面，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已创民主的丢失。

詹先礼，虽然作为湖南高校老资格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高司”的主要领导，在湖南文革史上是一位名人，但他本人的故事却并不很多。他原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做学生时就已是中共党员了。作为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强大对立面，詹先礼则担任了属造反派阵营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的第一号头头。

詹先礼能被推举到由两万多能说会道的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集聚的组织中，担任一号指挥员，除了他的组织才能与当时颇为激进的造反观点之外，他所具有的中共党员身份，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造反派们虽然要造党委的反，但偏偏他们又很希望自己的组织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尤希望是中共党员为妥，以免被对方保守派抓“辫子”。这也是文革造反运动中的一种奇特现象。

在与工人造反派组织一道摧垮“红色政权

保卫军”等保守组织后，詹先礼及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与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发生了严重政见分歧，结果在经过几个月复杂曲折的较量后，也步“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后尘，被工人造反派组织打垮，而基本退出湖南文革的舞台。詹先礼在文革后进入了工厂，并一步步做到了湖南的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四人帮垮台后，很多人都以为詹先礼会当上湖南省级的领导人，因为，文革中期，他作为造反派的对立面组织的“新保守派”一号头头，与其所支持的省委某些书记的关系很不错，造反派垮台了，他应能出头了。他所在的那一派中有个盟友组织的头头刘某，在四人帮垮台时，确曾得意洋洋地宣称过：“现在该轮到‘高司’的詹先礼当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而我也能弄个省革委常委当当的时候了！”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大概，詹先礼虽说在文革中期保过一些省委领导，但他们的“保”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保”还是有区别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要保的是整个党委及其领导，而詹先礼与“高司”所保的却只是那些支持自己组织的党委领导，若不支持自己组织，詹先礼与“高司”却是不会保的，相反还要打倒。例如，对当时支持工人造反派的章伯森（省委侯补书记）、华国锋（时为省委书记）等，詹先礼与“高司”则是定为要打倒的对象。毕竟，詹先礼与“高司”在文革初期，是湖南造反派红卫兵的旗帜，而不是保守派的代表。后来，詹先礼能做到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厅级老总，则相当原因是他的才能所致，其中，也因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冶金。

5、“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

1967年2月8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这些组织除“高司”和“钢长造”、“公检法”以外，均人数很少，影响很小，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有些组织如“毛主席的真理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则均系原“长保军”下级组织的变种。“省红联”的任务就是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下打击、排斥其他造反组织，筹备和实行夺取湖南省的大权。“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

单，草拟了《夺权公告》。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省军区方面为：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 7 人；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为：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 5 人；工人代表为：刘秀英、刘正良、唐兴国 3 人；农民代表为：毛泽容、罗迭开、欧国轩 3 人；红卫兵学生代表：詹先礼、黄绍贤、谌善山 3 人；另还有民兵、政法、新闻、省委机关干部代表等 5 人。但是，省军区指导支持下的“省红联”，却遭到了大部分老造反组织、特别是各大工厂的造反派集团的一致反对，经过大半年的特别是 1967 年 6、8、三个月殊死的斗争，终于在同年 7 月 27 日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后，“省红联”被迫解散。不过，在“新保守派”的“省红联”阵营中，除了有“高司”这样一个的确确实的老造反派组织外，之中，也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强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员：湘潭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革造联）。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不到 50 公里。湘潭市“革造联”是在第一轮派战中，由大学生红卫兵们即后来的“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湘潭“革造联”的主要负责人叫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然而，在文革初的 1966 年 9 月时，兰云飞被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 10 月下达的紧急通知精神（即不允许在文革运动中将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的中央文件），卖力为兰云飞平了反。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便在湖南的第一轮与第二轮的派战中，都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因而，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便也成为了“新保守派”的“省红联”一个支柱。所以，对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性质区分，确是件很复杂的事，之中，不仅不能只按其所宣扬的表面口号来识别，而且也不能不按其不同运动阶段的作为来划分认知。

（三）“湘派” 湖南省与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有二个集团代表。前期是以“湘江风雷”集团为主，后期则是以“工联”集团为主。以后“湘江风雷”与“工联”之所以又成了派别的简称，是因为在第三轮派战中，“湘江风雷”与“工联”又各自代表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被称为“湘派”与“工派”，虽然，他们全都是造反派工人组织。

6、“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湘江风

雷”是 1966 年 10 月 14 日，由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美工张家政等人发起，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和李党育的直接帮助下，于北京成立。其领导成员为：政治部主任叶卫东，（团员、教师）组织部长李敬林，（党员、原航运政治指导员）宣传部长李仲昆，（干部）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党员、工人）后勤部长赵南西，（工人）办公室主任柳梅青，（党员、工人）接待室主任黄长春（团员、工人）等。时年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师与能言善辩的叶卫东，是“湘江风雷”的代表人物与主要首脑。该组织建制为四级机构。总司令部——战团——支队——队。“战团”级的主要组织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山鹰”与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湘江风雷”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如叶卫东、罗新发（省航运局副局长）、李铁凡、李敬林、长沙纺织厂“缚苍龙战团”的王天保、“金猴战团”的陈本望等，都是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的“9·24”抓右派动员报告后，被打成的“大黑鬼”或“现行反革命”。“湘江风雷”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该组织庞大，高峰时成员竟达百万之众，且人员构成复杂，思想和行为也都较为激进，其左翼，则与以后成立的激进组织“省无联”一脉相承。“湘江风雷”当时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广东的“旗派”、重庆的“反到底”、江西的“大联筹”、广西的“四·二二”等造反组织，均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是该组织初期的指挥和参谋，甚至“首都三司”的洪飏（郭翠琴）还参加了“湘江风雷”。1966 年 10 月“湘江风雷”成立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曾被聘为该组织的顾问。1967 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该组织曾一度被取缔，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当时，是原保守派人员带路，省军区战士则荷枪实弹动手抓捕。抓人之多，使监狱、看守所容纳不下，甚至省军区礼堂、长沙的几家已无电影可放的电影院，也被用来作临时拘留所。后来，到 1967

年 5 月 30 日, 其总部正式恢复, 其组织也公开活动。中央撤消“二·四”批示后, 8 月 4 日召开了庆祝翻身大会。再后, 其组织左翼, 组成“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加入激进的“省无联”, 致总部负责人中的张家政、李仲昆、陈本望等, 再次被抓, 并被判刑。 “湘江风雷”组织的活动, 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其于 1966 年 10 月在京成立起, 至 1967 年 2 月 4 日夜被省军区奉中央文革指示而摧垮时止, 约三个半月。 在这期间, 该组织人数发展极快, 竟达到百万之多; 其影响, 在湖南全省也是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 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都要与“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商谈处理全省运动的事。 第二阶段, 则是自 1967 年 8 月 10 日, 中央发文为“湘江风雷”组织平反、称其“为革命群众组织”后。至 1968 年 1 月 24 日, 中央领导人批判湖南“省无联”组织时止。 在这期间, “湘江风雷”内部分裂成为两派: 以总部主要负责人叶卫东为首的主流稳健派, 站到了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方; 而以总部第二号负责人张家政为首的少数激进派, 则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名义, 参加到反对革筹小组的“省无联”一方。 结果, 后来, 叶卫东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而张家政则被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抓捕、并判刑 20 年。 在“湘江风雷”问题上, 中央文革曾就湖南省军区的一份报告, 发出过一个批示(因是在 1967 年 2 月 4 日下达的, 故被称为“二·四批示”)。在这个批示中, 中央文革命令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 应采取专政措施”。从而, 引发了省军区竟能在文革运动当中, 大规模地镇压抓捕造反群众组织成员的事件。 当时的中央文革, 为何竟然下令镇压自己天天在喊着要支持的造反派组织? 为何下达这样一个显然与毛泽东进行的文革战略相违的“二·四批示”? 对此, 不仅当时的造反派们深感迷惑, 就是在今天, 也还难使人明白。只是, 后来毛泽东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文件中, 批示过的一段话里, 责备了中央文革“何必匆匆忙忙根据一面之词, 发出二·四批示呢?”似乎是批评中央文革没有对事情调查清楚, 就胡乱行事的意思。 “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 其实是一个性格比较谨慎的人, 如果不是他所在学校党总支与工作组, 将他打成为一个什么“右派”, 他本来是可以做好一个教师的。文革造反的风浪, 将他推到了一个他不能胜任的高位, 结果, 虽然使他进入了湖南省的历史, 但他本人却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人帮”垮台后, 他第二度入狱, 并被判刑。刑满后, 有关部

门则仍使他继续了一段教书生涯，使他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晚年。 7、“井冈山红卫兵”——“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其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主要负责人谢若冰（女，预备党员、一中学生，时年19岁）、谢东子（12中学生）。 时年仅十九岁的谢若冰，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则，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谢的笔记本上签下“毛泽东”题名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起了湖南造反运动高潮的序幕。 谢若冰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党员的谢若冰，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不知是谢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遭“南下”干部为主的省委的排挤，间接所致？反正，1966年的8月，谢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状了。 而，这一状不仅告灵了，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谢若冰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薰陶。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湖南省便有着很大的影响的。作为一个女中学生的红卫兵司令，敢作敢为且飒爽英姿的谢若冰，更是在工人造反派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1967年8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际，周恩来总理点名命令让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派人护送时年仅20岁的谢若冰上京，参加向中央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的代表团。之后，谢若冰成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华国锋与解放军47军军长黎原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1968年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后，谢若冰却只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很多人都以为她至少应当省革委的常委，甚至当副主任也有资格。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工人造反派代表已成了当时

的左右时局的力量，作为中学生的谢若冰，其份量已不太为主湘的 47 军军部重视；二则，是由于谢与当时受整的极左派红卫兵头头们（均为大、中学生）有一些私人友谊性往来，受到了牵连。1970 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1974 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 1976 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岁的谢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终于忍住了，安心当她的工人，并读书求学。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从而具备了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她现在是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

8、“青年近卫军”——“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的出名，与保守派的“红色怒火”类似，因为它也是一个准暴力的组织。只是，它属于造反派阵营，倾向于“湘派”，并且在发生两派武斗事件之前，就已颇有势力，人员远比“红色怒火”多。“青年近卫军”于 1966 年 11 月 24 日成立。其前期负责人因“湘江风雷”被镇压之事，后不再出山。中、后期的主要负责人，便改为谭海清（人称海司令）。其总部其他负责人为易国其、熊玉林、王赐璋、王文辉、罗春辉、朱国良等青年工人，其成员则全部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工和中学生。在文革“全面内战”的“文攻武卫”阶段中，该组织几千人，全都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而且大部份成员，都身着只没有红星领章的正式军装（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所赠送），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就等于是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海司令”在文革中的湖南与长沙，也是一个赫赫大名的人物。“青年近卫军”的名声，也是在他领导时，才大了起来的。谭海清（海司令）是一个建筑工人，时年 24 岁，为人豪爽，文革前在单位时，还当过“先进生产者”。由于他领导的“青年近卫军”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享有盛名，竟然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他的情况。1967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居然打电话给进入湖南支左的 47 军军部，指名让他们立即通知并护送“海司令”谭海清，乘机前往北京，参加湖南省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的谈判。1967 年 9 月初某日，奉周恩来总理电令，赴武汉

参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负责人与省军区负责人的和好会议，会中，周总理曾对谭开玩笑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你这个‘司令’能不能胜任？”会前喝了不少酒的谭海清，竟醉薰薰地胸脯一拍：“没有问题！”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三天就会倒台。”

1968年1月24日，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批判湖南“省无联”时，江青说：“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1968年1月24日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宣布解散。当时，在其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之中，有不满，也有无奈。“青年近卫军”在湖南长沙造反派组织中，虽然名气很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中，该组织却只有其中一名负责人熊玉林，进入了市革委会，做一名委员。

“海司令”谭海清，不仅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反还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关押10年，却又只能判7年，对这多关押的3年时间，怎么说？“海司令”确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过此问题，但别人只能对他笑笑，无言可说，也无交待处理。这也算是有关文革中的怪事一件）。

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但因其太讲江湖义气，结果，各路朋友常来吃饭，却不付现钱，欠着，最多打个白条，所以最终，只能亏本关门了事。之后，他又开办过公司经商，才有了些成就。后因病，于1997年去世。

9、“孙大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孙大圣挺进军”

它是由省水电系统的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员所组成，于1967年2月14日成立，即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的第10天。负责人邹定国、叶财宝。其组织不大，但它成立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在“二月镇反”的阴风惨惨中诞生的，它表明了造反派工人对“二月镇反”的不满和反抗。

邹定国是一个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水电勘察队员，后来，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当然，四人帮垮台后，他没能逃脱被撤职清查整肃的厄运。

10、“长沙工人”——“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

“长沙工人”于1967年4月1日成立。它由区属工交系统的“红岩”兵团、二轻系统的“飞虎”兵团、粮食系统的“红总站”、外贸系统的“革联”及“狂飚”战团等造反派小组织联

合组成。其主要负责人：周喜庆（铁路工人、党员）、李建军（工人、党员）、张楚梗（工人）、吴超人（工人）、范令龙（工人）、熊长庚（工人）、杨炳文（教师）。后张楚梗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并做过省革筹小组的成员、省革委委员。该组织属于“湘派”的正统派，实力不大，因为，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后来不是属于“湘江风雷”，就是投奔“工联”等组织了。但是，由于该组织在“湘江风雷”被镇压期间，敢于出头与新旧保守派组织作斗争，并敢于抵制省军区的压力，因而，虽然组织不大，但前期影响却有了一段很风光的时候。所以，后来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也都留有他们几个席位。（四）“工派”

所谓“工派”，即“工联派”。前面已经说明，“工联”是湖南文革运动的后期主要造反派组织。由于，在第三轮派战中，造反派内部又分裂出激进极左的“省无联”，而“湘派”中许多组织又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因此，在反“省无联”的过程中，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便又单独形成了“工派”阵营。“工派”阵营的核心，就是“工联”。

11、“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

“工联”的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自下而上联合而成。“工联”这种以各工厂造反派组织为单位组成的社会团体，是吸取了前段组织机构完全社会化、因而人员构成复杂的“湘江风雷”，容易遭致省军区攻击为“组织不纯”的情况，而自发构建的新型群众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方式的改进，以后却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单位、本系统为主体，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战略意图。因而，后来中央在对待“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时，便明显偏重于重视“工联”。在中央的“八·十”决定中，“工联”被称为“革命左派组织”，而对“湘江风雷”，则是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湖南与长沙市的第一

号强大造反组织。“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 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 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 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 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工联”总部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后勤部。各大厂矿的主要头头都是“工联总部”的常委或委员。在 1967 年夏季的“全面内战”中，“工联”还组建了一个专业武装团体——“工联直属兵团”，周国强（市总工会干部、中共党员）为该“兵团”政委，团长则由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朱香桂担任。“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从 1967 年长沙汽车电器厂“5·9”夺权开始，“工联”各下属组织便曾一度掌握着本单位的权力，直到 1968 年 2 月 28 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工联”是文革中带有正统观念的造反派组织，它组织严密、内部单纯、注意斗争策略、紧跟中央部署，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后来其主要头头几乎都进入了省市及本单位的各级革委会领导机构。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在省革筹小组成立后，长沙“工联”发起，联合省内各地区“工联”组织与其他工人造反组织，又组建了“省工联”。不过，因为，随着局势的稳定，按中央指示，跨地区的群众组织一律撤消，其成员都回本地区本单位，故，“省工联”成立不久，并未发挥什么作用，就解散，而并入了代替原工会、而成立的“省工代会”机构了。“工联”一号头头胡勇，时年 31 岁，复员军人，文革前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电器维修工人，后于 1968 年 4 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是中共“九大”代表与“十大”代表。胡勇是一个因文革而必然会进入历史的人物。1968 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因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聊了数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后因同

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但是，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胡勇于五十年代在部队当兵时，是在时驻海南的 47 军属下某师。文革派性武斗高潮中，解放军第 47 军奉命进湘支左，而 47 军军部首长们经常要与其打交道的，正是已为湖南第一大工人造反组织主要头头的胡勇。某天，47 军副军长请胡勇，去给他们 47 军下属团级以上干部做路线斗争教育的报告。胡勇在会场上，便遇到了他当年在 47 军当兵时的连首长营首长与团首长们，当年的小兵现在竟然给自己过去首长上课，而且被他们尊称为“地方首长”，这倒也是文革给胡勇带来的一段开心巧遇。凭胡勇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经历，他自然会进入湖南的史志。但让他能进入中国历史画页的契机，则是他与华国锋有过的一段关系。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的过程，胡勇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是一个促成者。华国锋从地方进入中央的第一步起飞，就是于 1967 年 6 月 21 日的乘飞机进京。而在此前一天，就是胡勇与华国锋谈了话，让华国锋遵照中央指示“站过来”、并写出支持“工联”造反派的“亮相声明”，第二天他又陪送华国锋登机赴京。胡勇是在文革高潮中的 1968 年 10 月，由省革筹小组中的华国锋与 47 军一位副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已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1969 年 4 月，中共党的“九大”召开。本来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已决定、并报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中，胡勇是作为中央委员内定人选的。但是，“九大”期间，毛泽东在问到其家乡情况时，得知胡勇已内定为中央委员，便说了一段话：“我这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毛泽东说的“老乡”，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乡湘潭县人。而胡勇就是湘潭县人。不知是考虑胡勇的党龄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员，还是毛泽东确不想别人因为讨好他，而在他的家乡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胡勇便从此无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了。对此，与会的“九大”代表、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芳，当时即奉命给胡勇做工作，宽其心，以消除胡的不快与失落感。由此，“工联”的第二号头头、文革前已是中共党员的唐忠富，便有幸被换了上来，代

替胡勇而连续做了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四人帮垮台后，胡勇自然被拘押清查，并被判刑。出狱后，已过 55 岁的他，曾也办过一段工厂实业，后也经商办过公司，小有收获后，便收山安度其晚年。 “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比胡勇大两岁，原是国营曙光电子管厂的工人，但文革前，他便已是中共党员。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唐忠富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尚居胡勇之下。 但“九大”中，他被当选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共“十大”中连任中央委员，并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所以，后来，他便成了湖南造反派名义上的第一号头头。 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被拘押受审，并被判刑。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因身体不好，于 1997 年病故。

12、“市农联”——“毛泽东思想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于 1967 年 5 月 26 日成立，其负责人为刘友贵（韶山路人民公社社员）、甘德桂（市郊综合农场社员）、周福贵（长沙县坪塘人民公社社员），它是贫下中农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时间不长，活动不多，影响不大，但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农民代表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领导机构。

13、“大专院校”——“长沙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大专院校”是人们对这个组织的、令外人会莫名其妙的简称。它于 1967 年 6 月 25 日成立，其负责人为朱顺祥，一个湖南大学的大学生。在湖南各大学出现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的“高司”之际，独立不羁的朱顺祥就创立了这个人数很少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它的成员还有一些就是原“高司”中反戈一击出来的。当时造反派方面与“高司”的斗争时，其阵营中，尚没有正统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朱司令便率领他的小组织填补了这个空白。 由此，朱顺祥后来进入了权力很大的“省革筹小组”，后又担任省革委委员。 总体上讲，该组织能量不大，影响亦很小。

14、“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它于 1966 年 8 月 29 日成立，系长沙最早的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相对立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由胡宜民、陈振国、张春利、范钧兰、陈国斌（均为市十二中学生）等 5 人为领导核心。 1966 年 8 月胡宜民等人，最早在长沙市委大门墙上，贴出了震动全市的“坚决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即反对“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运动初期，因“血统论”的影响，“造反有理军”尚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后才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参加。 中

央文革“二·四”批示后，“造反有理军”开始是支持“高司”，而反对“湘江风雷”的。但不久，内部发生分裂，1967年4月28日，胡宜民带领大部分成员出走，另组成“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为正统的“工联”派。胡宜民后来也进入了省革命委员会，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少部分支持“高司”的“造反有理军”成员，便在其组织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即“钢长沙造反有理军”（简称“钢长造”），表示做钢杆“高司”派。自然，“钢长造”后来随着“高司”的垮台，也烟消云散了。（五）“极左派”或激进派 湖南文革中被称为“极左派”的组织，其实，其“极左”，并非后来人们对“极左”性质定义的概念。这些“极左派”组织是属于当时造反派队伍之左翼，有一种“不停止地造反”、“要对所有其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与制度造反”之激进味。因而，现在也许应该视其为“激进派”，还确切些。湖南的极左派或激进派的活动，实质性的实践活动，其实并不大，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宣传舆论或意识形态上。因为，当极左派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大肆鼓吹他们的“不断革命”论之际，整个社会的人心都已倾向思治，颇有些厌倦动乱了。而在现实中，自省革筹小组这一权力机构建立，各群众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基本已从社会性形态，先后转变为回归本单位本系统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这四大新的半官方组织了。因此，极左派们的主张，不能得到大多数的造反派成员的认可与支持。更重要的是，由于极左派们的鼓吹的观点，不仅与中央对文革运动步骤的部署相违，而且，他们不少激进的社会革命观点，更被中央视为异端邪说。同时，也不为当时大多数造反派们接受。所以，以“省无联”为组织实践的极左派，正式独立活动的时间仅三个月左右。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省无联”就被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宣布为“反革命大杂烩”组织。随后，湖南所有的极左派组织，均被“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领导的稳健造反派们，予以摧垮了。可以说，这段时期极左派们活动，留给历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召开的那些大大小小而零乱自由、并大多只有慷慨言论却再无实际行动的会议，也不是他们的各种攻击省革筹小组与稳健造反派们的大字报与标语，而是他们之中，有些大、中学生写下了若干不全是派别政治、而确有着一定社会思考意义的大字报文章。例如，《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

等。自然，这些在文革中，就憧憬“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渴望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社会制度的年轻学生们，为他们的这些思想与言论，不久即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最终被以 10 年、15 年等长长的刑期，陪伴了他们的青春。

15、“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它由“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发起，于 1967 年 10 月 7 日（“公告”成立日期是 10 月 11 日）成立。该组织成员，都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当时也确被人们称之为“极左派”。早在 8 月至 9 月，“湘派”中许多组织及“极左派”组织，就签署了对时局看法的

“8·30 声明”和“9·30 声明”。不久“湘派”中的稳健派分离出去，后来，就以上述组织，联合组成“省无联”。但是，所谓“省无联”，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仅只是一个松散的极左派组织头头的联席会议，或年轻学生们发表激进观点的一个讲坛，而并非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纪律与行动号令的机构，它的成员人数也不多，且又常常是各自为政。从组织实力上讲，它是远远不能与“工联”相比的。1968 年 1 月 24 日后，“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16、“湖南红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旗军” 于 1966 年 12 月 6 日在省第二招待所成立，其发起人为贺孟宣、陈忠华、聂其权、彭文彬、黄厚泉、杨福臣、彭寿南。它与保守组织“八·一兵团”针锋相对，也是以原军人为主体的，组织纯洁、成员素质高、造反精神强。它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看好，曾一度成为湖南文革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对于训练有素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中央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1967 年 1 月 20 日中央军委来了个批示，明确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责令省军区抓捕了其头头贺孟宣等，解散了其组织。1967 年 7 月以后，通过“变通”（即大量吸收其他非复员转业军人的社会人员），成为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后期负责人为毕健，他因加入了“省无联”，在 1969 年即被判刑 10 年。

17、“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 于 1967 年 3 月 19 日在长沙文华剧院成立，其负责人为黄杏英（女、市一中学生、党员）、汤建平（市三中学生）、刘建成（市八中学生）、李昆明（女、市九中学生）等。长沙市各中学、中专、技校均有它的二级组织机构：市一中钢“三·一九”（包括“夺军权”、“齐卫东”、“新共工”、“小老虎”等战斗队）兵团、市二中“旭日东

升”兵团、市三中“农奴戟”、市四中“红旗”、市五中“造反到底”、市六中“反到底”、市七中“五·一六”兵团、市八中“横空出世”、市九中“重上井冈山”、市十中“战犹酣”、市十一中“风雷师”、湘江中学“井冈山人”等组织。

“红中会”为长沙市中学生的红卫兵激进派，当时，他们与全国的红卫兵激进派组织，有着一些的联系。文革中著名的激进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即出自于“红中会”下属的“市一中‘夺军权’战斗队”红卫兵杨曦光之手（后改名杨小凯）。

18、“东方红总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

“东方红总部”是比“湘江风雷”成立还要早、并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它于1966年9月7日就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30日在长沙东风广场，又召开了规模达数万人的公开成立大会。

主要负责人：刘定安（曲艺演员，时年19岁）、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党员）、唐正明（工人）。

“东方红总部”虽系长沙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之一，造反初期，组织也曾极其庞大，高峰期，它也发展达百万之众，几乎长沙市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它的下属组织。

但是，年轻的刘定安等人，显然缺乏组织经验与领导才能，自“湘江风雷”被镇压后，该组织便随同垮下来，其成员逐步转入其他造反组织。到它作为“省无联”的成员组织时，“东方红总部”已仅只剩下极少数区街工厂的下属组织了。

19、“高校风雷”——“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 于1967年4月上旬成立。主要负责人为周国辉（湖南大学学生）、刘荣华（中南矿冶学院学生）、金胜利（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红斗（湖南医学院学生）等，该组织人员不多，全是大学生，但能量、影响很大，它一成立，就公开声明以为“湘江风雷”翻案为己任，故在长沙市造反派群众中，名声很大也很嘉。其成员思想激进，主张推翻特权阶层、改革社会，并试图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理论根据。后成为“省无联”的发起组织与思想库，因而，最终遭到中央文革与康生、江青的镇压。

（六）“炮打三红派”，或“湘瓷派” 所谓“炮打三红”，这项政治帽子完全是属于“莫须有”的产物。

因为，在文革高潮之际，有什么人能有胆子、或会愚蠢到去公开反对“三红”（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而湖南的“炮打三红”罪名，却竟是由某些造反派组织，以推行所谓反“三右一风”（即“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与为‘二月逆流’的翻案风”）的中央指示精神为口号，发动的新一

轮派战，结果，反而演变为遭致此惩罚的。从实质上讲，这新一轮的派战，是湖南的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因对他们在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中，被分配到的权力职位太少太低而不满，由此发动的。发动方以反“三右一风”为旗帜，应对方则以“炮打三红”的政治炸弹甩了过来。最终，由于应对方（以原“工联”大部分组织为主）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又有“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为盾牌，再加上人心已普遍厌乱的形势，所以，只经过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的较量，最终，以发动方一派的失败告终。在这轮新派战中，虽然，发动方也有很多原“工联”组织的工人集团（湖南建湘瓷厂、省新华印刷厂、原市总工会机关等），但，其意识中心与核心组织，却是原省委、市委机关的主流造反组织“永向东”战团。这些发动者，当时又被称为“湘瓷”派，那是因为湖南建湘瓷厂的“工联”组织负责人刘炎生（该厂中层干部、中共党员、劳动模范），是这个新集团的主要的工人阶级领导人。之所以后来，却被称之为“炮打三红派”，那则是获胜的一方给其定的政治罪名。

20、“永向东”——“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省委

“永向东”于1967年4月25日成立，其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付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湖南省最早最著名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后台与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付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部，及湖南长沙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也如法炮制“永向东”组织，各县区机关也照此葫芦画瓢，都成立了“永向东”组织。它上下保持联系，成为一个系统，故被其反对者称为“永向东政府”。省、市、县各级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其实掌握着政权的各部门机关，因而有着很大的实权。终于，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与介入地方的军方和工人造反派闹翻。最终，在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后，1968年7月底，“永向东”被省革委会、军队方面与原“工联”组织人员构成的“工代会”联合摧垮。以上

20 个组织，是湖南长沙文革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活动较多的群众组织。另外湖南各地有些较著名的组织，在此亦列举出来，因篇幅有限，恕不细介绍

“湘派”红铁军负责人：付 “工派”邵阳工联负责人：胡求生 “工派”湘潭红造联负责人：沈桂华、金世钧。 “湘派”衡阳湘江风雷负责人：郑开诚。 “无联派”株洲湘江风雷负责人：张传信。 “无联派”邵阳无联负责人：梁固中、陈果亿。

三、各派群众组织的历史命运 湖南长沙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大体经过了四轮回合；

1、第一轮回合：“高司”、“湘江风雷”——“红色政权保卫军” （1966 年 10 月——1967 年 1 月）

1966 年 8 月中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8 月 5 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的公布，少数学生、教师及较敏感的青年工人，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此次运动不是 1957 年的“反右”，而是矛头对准在朝的当权派 但是，1966 年 8 月 19 日，发生了中共长沙市委调动工人镇压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的事件，接着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九·二四”报告，均指出：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各级党委闻风而动，一时间全省范围内，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万计，有的被关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围攻，有的遭批斗，有的被迫自杀。如省水电勘探设计院因写了批评市委领导人的《奔命记》一文的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的邓守宇，分别于 9 月 27 日和 26 日自杀。后来成为“湘江风雷”的头头的叶卫东、罗新华、李敬林，“东方红总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红旗厂工人）、吴国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联”的兰云飞等，都是当时的大“右派”、“黑鬼”。而正是这批人，构成了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运动初期遭到地方党委政治迫害和打击的干部、工人，发动了要平反、要人权、要销毁黑材料、废除政治歧视为中心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而历次运动走红以及这次抓“右派、黑鬼”的骨干，在省市委领导的授意下，首先成立了文革中的组织，以阻挡这些“右派”、“黑鬼”平反、翻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司”、“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便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八一兵团”、“赤卫队”保守派组织等，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斗争。

正当两派组织势均力敌、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1967 年 1 月 16 日《红旗》发表了评论文章，《无产阶级革命

派联合起来》，文章明确指出“红色政权保卫军”是“走资派的御用组织”。6天之后的1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又宣布：“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从此，湖南的第一批保守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以失败告终而退出了政治舞台。其头头和成员，虽然基本上未受到任何政治惩处，但该组织分化、瓦解后，却没有能像湖北武汉的“职工联合会”，与广西的“盾牌兵”、“无联”那样，成建制的发生演变。前者演变成了著名的“百万雄师”，继续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对立；后者则组成了“联指”，始终压制了“四·二二”造反派。湖南群众组织之间的混战，第一轮回合，是以保守派组织的失败而告终的。

2、第二轮回合：“工联”“湘江风雷”——“高司”（1967年1月——1967年9月）

在要平反、争人权、销毁、封存“黑材料”，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斗争中，以“高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湘江风雷”为首的工人市民造反派，在对待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书记的看法上，在为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员平反的方法上，在与当权派斗争的方式上，和以谁为核心的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分歧。1967年初的“望江楼协议”（“高司”单独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签订的有关全省文革运动的协议）一事，和要不要召开的“1·15”批判省委领导与夺权动员大会，则导致了双方矛盾的公开与激化。

“高司”人数，相对“湘江风雷”等工人市民造反派组织，虽然不算多，但它是高等院校的多数派，组织严密，具有很强凝聚力。大学生思想总体单纯，有文化、有能力，其头头又都是家庭出身很好的活动分子，因此，“高司”组织的能量非常大。

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抓右派的“九·二四”报告后，“高司”总部即按照中共的传统方法，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宣传队，不辞劳苦分赴各地、市、各大厂矿，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大量的调查报告、整理出了大批材料。这些报告、材料，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告了“九·二四”抓右派报告所产生的恶果，控诉了资反路线的罪恶，为大批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干部、群众平了反。

但是，当时享有很高威望的“高司”负责人，却从此以救世主自居，轻视其它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造反组织及其作用。而“湘江风雷”号称百万之众，其头头则自认为是湖南造反派的当然代表。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击败保守派组织后，

终于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内讧。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宣判了“湘江风雷”的死刑。使“湘江风雷”和武汉的“钢工总”、河南的“二·七公社”一样，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几乎全部被抓，据统计，这次二月镇压被抓的造反派群众人数，全省有数万。这第二轮派战的前期回合，是“高司”胜利了。它在省军区的支持下，又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奔赴各地和各大厂矿，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这次，与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在各地市，各大厂矿，他们却普遍支持了反“湘江风雷”的保守派。在曙光电子管厂，他们支持保守的“工总”，伤害了造反的“联总”（多数派）；在汽车电器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汽电真理军”，打击了“造反有理总队”（多数派）；在长沙机床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怒火铁骑”，而排斥造反的工人“3·31造反团”；在红旗内燃机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无联”，打击“红总”（多数派）等。而在长沙纺织厂、省航运局、建筑工程公司、湖南制药厂等单位，原本就是“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的天下，他们却为了反“湘江风雷”，而不惜去支持他们也曾反对过的保守派。在肃清所谓“湘江风雷”流毒的过程中，又伤害、打击了“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这样“高司”就失去了长沙大部分造反的工人、市民的支持，丧失了控制运动的主动权，而成为了“新保守派”。特别是以十多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自下而上联合的“工联”造反组织，及能量极大的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团”，与敢闯敢冲的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红中会”等组织的出现，使造反派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沙市强大的工人造反派势力，后来，甚至迫使中央文革都不得不承认，它下达的“二·四批示”，是其“匆匆忙忙，沉不住气，听取一面之辞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967年7月27日，中央明确表态支持“工联”、“湘江风雷”，撤消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同年的“八·十决定”，则宣告了“高司”与“工联”和“湘江风雷”两大派，长达9个月派性斗争的结束。这第二轮派战的结局，是“高司”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

3、第三轮回合：“工派”——“省无联”（1967年10月——1968年2月）早在反击“二月镇压”中，“工联”与“湘江风雷”两派之间，就逐渐地产生了斗争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后来“省无联”得以产生的政治与组织基础。

“工联”、“省委永向东”、“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立后，因为其组织严密，

经验丰富，人员构成有工人、干部与红卫兵。他们对于紧跟中央的文革战略部署这一点，做到非常好。虽说是造反派，但自从中央表态支持他们后，他们便基本不再越出中央规定的造反活动范围。并按中央要求，撤消组织山头，按行业、系统、单位实现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委会，等等。而“高校风雷”、“红中会”、“红旗军”与“湘江风雷（左翼）接管委员会”等组织的头头，思想激进，特别是其左翼认为：第一次“文革”任务远未完成，目前走向安定的形势，是出现了“十月逆流”，是“二月逆流”的继续。还认为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培养一批新官僚，等等。这些极左派便一连发表了“8·30、9·30、10·30”三个关于对时局看法的声明，将已获胜利的造反派们的内部矛盾，予以公开化和白热化。“极左派”知识分子（“高校风雷”、“红中会”、“矿冶井冈山公社”等），还公开宣传着一种“新思潮”，这股“新思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现实的严重挑战。解放 17 年来，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造成了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它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即官僚特殊阶层）、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让普选出来的干部成为真正的公仆。确实，重立造反山头的“省无联”组织，虽有些令中央与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筹小组不快，但却还没有到令他们不能容忍的程度，毕竟，当时还是“造反有理”时期。但是，年轻的极左派们的这些“新思潮”言论与宣传，则极大地惹恼了中央文革。1968 年 1 月 24 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几乎全部出面，一致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的大杂烩”，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陈伯达、康生这两个“党内理论权威”，甚至在会上搬来马列著作文章，逐条逐条地针对这些十几、二十来岁的极左派学生的文章，进行指斥咒骂。最后，在湖南文革史上的两派斗争中，得势的一方，再次动用了国家机器，抓捕“省无联”头目与极左派学生、以及所谓“黑手”（主要是有支持“省无联”倾向的老干部，与原来有较高身份的“右派分子”），并施之以刑罚。“省无联”方面的“湘江风雷金猴战团”负责人陈本望，在此轮派战中，成了失败者，加之他家庭出身又是“黑七类”，便以其对文革武斗中的一件糊涂人命案有责任为由，将他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1957 年著名的《湖南日报》“右派”案成员的刘

风祥，此次也作为“省无联”的“黑手”的被判刑 15 年，后于 1970 年被枪毙：“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张家政，被判刑 20 年；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中学生杨曦光（时年 19 岁）被判刑 10 年：“红旗军”司令毕健被判刑 10 年：“高校风雷”的头头、湖南大学学生周国辉被判刑 7 年：“矿冶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中南矿冶学院大学生张玉纲，被判刑 3 年。这一轮派战的特点有二点：（1）两派之间除了一些大字报、标语的舆论战外，互相的有组织性冲突不多，规模也很小。（2）“省无联”被摧垮，完全是当时中央的指示，而主要并非对立的“工联”等组织的进攻压力。所以，后来中央领导人康生等，还批评“工联”方面对“省无联”的活动，是“熟视无睹的右倾”，是“缺乏无产阶级义愤”。

4、第四轮回合：“（工联）汽电派”——“（工联）湘瓷派”、（1968 年 5 月——1968 年 8 月）

在摧毁“省无联”的斗争中，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部署，各群众组织取消山头，实行大联合，分别加入四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职代会、红代会）。长沙市工代会于 68 年元月 17 日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市革委会和省革委会则于 2 月 28 日和 4 月 8 日先后成立，形成了军队负责人（47 军、省军区）、领导干部代表（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和群众组织代表（主要是“工联”与“湘江风雷”稳健派领导人）联合掌权局面。但是在权力的分配上，省委机关“永向东”，与军队和工人方面发生矛盾。前者借助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 指示”，联合“工联”内部的“湘瓷派”，拉拢原“湘江风雷”组织中的稳健派，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由于“工联”主要头头胡勇，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因此，当时便对这部分被攻击的“工联”势力，称之为“汽电派”。但是，军方、省、市革委会与“汽电派”工人，则利用“7·3 布告”和毛泽东的“7·18 批示”、“7·19 通知”及“7·24 布告”等一系列为消除动乱、实现稳定局面的中央文件精神，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梁春阳、尚春仁控制的“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随即，梁、尚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

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至此，到1968年9月左右，湖南省除统一并按系统性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机关干部性质的统一组织）外，基本上不再有其他社会型的群众造反组织了。这第四轮派战的活动，除了有一些大字报、标语交锋外，重要的派战战场，则主要是各种会议。

“湘瓷派”的确就是被一系列会议打败了。因为，“湘瓷派”与“永向东”当时都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成有形山头，而只能在已有的“工代会”、“职代会”中搞“议会斗争”。因此，当省革委会与军方决定对其反击时，真的只开几个会（包括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湘瓷派”与“永向东”便被会议的大多数给否定了，并给其定了罪。

实际上，经过近二年的激烈派战动乱，湖南全省各级革委会又都已建立，整体上人心都已不想再乱而想安静，能控制局面的原“工联”、后为“工代会”的各级头目，也因都成为了“掌权者”，更不想再出新变故。因此，“湘瓷派”与“永向东”的所有说法，都不仅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还招致反感。由此，“湘瓷派”与“永向东”的失败，确有其逆形势而动的注定原因。

“湘瓷派”与“永向东”的失败，也标志着湖南文革中有“自发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活动，从此以告结束。此后数年中，虽然造反派们也还曾活动过若干回合，但，那时却都只能在已有的“工代会”或“工会”框架范围中跳舞，而不能随意建立组织、自树“山头”了。

5、幸存造反派的历史命运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的召开，可视为文革中的第一个阶段的结束。这时原有的旧体制秩序，也开始逐步的恢复。省、市、县三级革命委员会，均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非党群众组织代表，逐步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1970年春开始进行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运动，四项内容中，“一打”则是重点。而这“打击反革命”的“现行”清查对象重点，则又是原来参与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

军方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与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达成共识，将原保守派骨

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这次“一打三反”，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一打三反”）办公室，中央也发出了1970年的3、5、6、号三个文文件，提出对被清查对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当然，凡意识形态上与当时的文革当局不相容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更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惩。北京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枪杀）、辽宁的张志新（1969年9月24日被逮捕）、银川的田涛（1970年2月10日被判死缓）等，就是在这次文革中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遇难的。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省与长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从已是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无一幸免，也无一漏网。之中，有少数被枪决者，有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长沙市在两个月中，一连杀了两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不知何故，在这次宣判大会欲召开的前一天夜晚，突然下令制止了大会的召开。准备参加大会的人，也连夜被通知会议改期。紧接着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才慢慢冷了下来。然而，“一打三反”运动刚结束不久，1971年夏天，全国性“清查5·16分子运动”又接踵而来，原造反派成员再次遭到审查、清算、批斗，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才获人身自由。但是，随后的几年，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视和压迫。到1974年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为保持文革的“正确性”地位不至受到挑战与动摇，于是又一次对原造反派所受到的压制情况表示了关注，上海造反派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更是作了一系列讲话，以恢复造反派的权力地位。这次“批林批孔”运动而提供的政治机会，使湖南长沙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再次聚

集起来，以省、市总工会与各单位工会的名义（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由造反派的“工代会”转为的“工会”组织中，一般都担任有职务），又展开了一次以平反、销毁被整被批斗的材料、恢复原有革委会职务、直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为主要目的的斗争。这个情况，更促使了原造反派成员的再度试图公开结社（各级、各种“运动办”机构），并以此作为与当时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谈判、以求解决上述目的问题的组织。由于中央王洪文的讲话压力，湖南长沙市的原造反派们，基本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局。对文革造反风暴尚心有余悸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的领导们，担心“批林批孔”就是又一次文革造反运动的前奏，因此，他们面对原造反派成员的压力，都只能应诺照办。对原挨了整的原造反派成员，或予以平反，或予以恢复革委会职务，或接纳其入党（但在1976年后，都被称为“突击入党”，一概不予承认）。1976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中央新一轮“批邓反右”运动的指示动员下，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击，企图实现权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过的强势地位。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粉碎，湖南的造反派势力终于彻底遭到了覆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全军覆没”，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少则半年一年，多则数年的审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则被关到同样没有自由的单位“学习班”，接受清查。1982年5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分别将省市级别的原造反派主要头头，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5年、叶卫东（教师、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年、唐忠富10年（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张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老干部）8年。经数年各种形式的关押审查后，湖南所有各级其他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有政治错误”，并明令，对这些人一律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梯队人选……。湖南最早起来支持“工联”造反派的副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也于1984年3月，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四、结束语 文革中貌似强大的造反派势力，实际上，最初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借助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特殊运动，以被迫始而后才

主动得以集合到一起，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演出了昙花一现的短短一幕。批斗当权者，夺权掌权，原本不是造反派们所能想到过的目的。大多数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群众，最初“造反”的动机，的确只是为了使自己能从新“右派”、新“反革命”的恶梦中解脱出来。文革长达 10 年，湖南长沙的造反派真正掌权，大约只有 2 年左右时间（包括动乱不定的 1967 年）。而挨整的时间，则大大超过掌权的时间。其中，在文革中二次、三次坐牢的头目，也为数不少。造反派得势时，便被中央舆论称为“群众运动”时期，使他们对曾将自己整为“右派”、“黑鬼”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头目，充其量只能用批斗、反省（少数泄私愤者也打人报复）的手段，可是，最终仍还得按中央要求，对其实行“团结”，请其归位。但是，当权派与保守派每每对付造反派，却能动用、也经常动用国家机器手段：拘留、逮捕、法办判刑，直至枪毙（特定历史条件还无须经过司法程序），更可以将造反派定为“右派”、“反革命”，贻害终身，殃及子女。

2003·6·19·修定

| 【附表 1】 湖南长沙主要群众组织一览派系 | | 名称 | 负责人 |
|-----------------------|-----------------|-------------|----------------|
| | 成立日期 | 工派 长沙工联 | 胡勇、唐忠富、雷志忠 |
| 1967.4.15 | 工派 长沙农联 | 刘友贵、甘德桂、周福贵 | |
| 1967.5.26 | 工派 大专院校 | 朱顺祥 | 1 |
| 1967.6.25 | 工派 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 胡宜民、陈振国 | 1967.4.28 |
| 1967.4.28 | 工派 省直红勤站 | 陈则良、王家根 | 工派 《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 |
| | 黄振东湘派 湘江风雷 | 叶卫东、李敬林、李铁凡 | 1966.10.14 |
| 1966.10.14 | 湘派 井冈山红卫兵 | 谢若冰 | 1966.10.28 |
| 1966.10.28 | 湘派 青年近卫军 | 谭海清、熊玉林 | 1966.11.24 |
| 1966.11.24 | 湘派 孙大圣挺进军 | 邹定国、叶财宝 | 1967.2.14 |
| 1967.2.14 | 湘派 长沙工人 | 张楚梗、李建军、周喜庆 | 1967.4.1 |
| 1967.4.1 | 保守派 红色政权保卫军（中学） | 李正、王虹霞 | 1966.8.17 |
| 1966.8.17 | 保守派 红色政权保卫军（高校） | 刘爱华、唐德元 | 1966.9.28 |
| 1966.9.28 | 保守派 八一兵团 | | 1966.11.4 |
| 1966.11.4 | 保守派 红色怒火 | 曾有根、彭湘华 | 1966.12月上旬 |
| 1966.12月上旬 | 新保守派 高司 | 詹先礼、余定成、王吉贤 | 1966.10.15 |

（注：余定成后来退出“高司”）

新保守派 钢长造 张春利 1966.8.29 极左派 湖南红旗军 贺孟宣、毕健、陈忠华 1966.12.6 极左派 红中会 黄杏英、汤建平、李昆明 1967.3.19 极左派 东方红总部 刘定安、唐正明、熊正吾 1966.9.7 极左派 高校风雷 周国辉、金胜利 1967.4月上旬“炮打三红派”——省委机关永向东造反团 尚春仁、毛华初、阎继布 1967.4.25

【附表

2】 新保守派 “省红联（筹）”所属组织一览组织名称
 负责人革命工人造反军 黎正海、刘正良
 贫下中农造反军 毛泽容、罗迭开、鲁庆祥 “红流‘贫下中农造反总司令部 易浩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 詹先礼、余定成、王吉贤（注：余定成后来退出“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 王泽焱、刘国辉钢长造 张春利毛主席故乡红卫兵 火车头总部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 易炳坤、黎迪祥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 李志仁长沙红讯兵 刘秀英湘潭“革造联” 兰云飞。

【附表 3】

极左派 “省无联”所属组织一览组织名称 负责人
 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张家政、李仲昆、柳梅青湖南红旗军 毕健东方红总部 刘定安红中会 黄杏英青年近卫军“军管会” 戈枝紫 高校风雷 周国辉、刘荣华矿冶井冈山公社 张玉钢省直联 孙君森、李淑琼、宋国亮。省教联 向志兰、袁广修、李荣光长沙北区工联 郭先开长沙南区九·二四黑鬼战团 刘长元、凌楚湘、叶金云东风近卫军 何长顺长沙虎山行 陈焕勤湘江战团 王锐聪、刘乐杨、谢巧瑜省文艺界红造团 韩军、姜有石、宋绍文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字 3 · 1 4 部队红色硬骨头造反团

李长元、袁乃珂。

2 0 0 3 · 6 · 1 9 · 修订

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红中会”是文革高潮中湖南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虽然它只是一个省会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影响仅及于湖南，但由于与海内外文革研究者历来瞩目的湖南“省无联”、与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大名鼎鼎的杨曦光（即后来在学界同样大名鼎鼎的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都有着密切关系，其当年活动中隐藏的历史信息很值得史家挖掘。由长沙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长沙文史》1 8 辑所载“红中会始末”一文，便是近四十年前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李昆明贡献的一份珍贵史料。惜乎因篇幅所限及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叙事简略、粗陈梗概、难窥全豹。笔者也曾是“红中会”成员，拟就个人记忆所及和友人提供的情况联缀勾勒，冀能补李文之憾于万一。◇ 文革初期长沙的中学红卫兵组织 文革中湖南大规模造反风潮的第一波起自高干子弟云集、信息渠道畅通、历来对政治敏感的长沙市一中。 1 9 6 6 年 6 月初以中共湖南省监委（现今称纪委）鞠处长、市委统战部王化中部长为首的省市联合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运动，不久即与学生党员谢若冰、黄杏英等人产生分歧。谢、黄认为，工作组有为保校党总支书记张林（张在工作组进校后不久即因不堪重压而自杀）而将斗争矛头引向几位知识分子校长之嫌。连续贴出多张言辞激烈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指责，但却遭到省市支持的工作组压制。当时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投闲置散的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蔡艾卿少将之女也在一中读书，蔡从女儿口中得知情况后，当着某位与其女儿关系密切、对政治亦有一定兴趣的一中同学（高干子弟）大发议论，意思是：湖南的运动不正常，第一书记长期蹲在农村，大小事却都由赵冰岩（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说了算，应该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等等。可湖南是农业省，时值“双抢”大忙，第一书记下乡再正常不过。蔡将军这番话是因洞晓天机还是信口开河或别有用心不得而知（从日后的表现看，此公确实热心于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也因此没少遭罪）；谢若冰、黄杏英是否据此决定了下一步行动，当事人也未曾与外人道，反正他们于 8 月初即潜赴上海转北京向中央告状，湖南造反行动的大幕就此拉开。 8 月 1 4 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 5 人，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

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8月18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次日，在省市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8月21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随即，自中宣部副部长任上回湘复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下车伊始便赴湖南大学发表讲话，称“一来请罪，二来造反”、恭维“湖大空气与众不同”。造反学生扬眉吐气、士气大振。8月29日，以带头造反的谢若冰、黄杏英、胡宜民等人为核心的“毛泽东主义（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成立，标志着与保守派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对立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正式登台。谢若冰等人在北京的举动令省委恼怒不安，因当时赴京出席中央全会的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曾亲邀这几位“小将”游颐和园、吃西瓜，以示亲热，并授以吃瓜秘诀：要想甜、先吃咸——嘴里含块盐吃西瓜，吃得又多又甜——意在招安，却遭冷遇。而谢若冰等人回长后的动作，则更令省委心慌胆寒。眼见招安未果，只得改“抚”为“剿”，矛头直指谢若冰。谢出身干部家庭，父谢介眉为省政协副主席、母谢巧瑜为省妇联副主席，均符合充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说“这次运动的重点”的条件。在当时环境下，欲搞臭谢若冰，进而打击“造反有理军”、平息造反风潮，对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办法，因此

祸水被有意识地引进了谢家。二谢解放前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问题”自然不会少；而解放后湖南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关系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现实问题”也不难找。于是大把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而且“问题”迅速升级、升温，档案材料也不胫而走，流入社会。加之“长保军”火上加油、多次揪斗，两位冷衙门的副厅级闲官，遂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黑帮”。当时正值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走红全国之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于9月24日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9·24”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在此形势下，背负“黑帮子弟”的帽子和“保爹、保妈”、“拒绝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罪名的谢若冰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均面临巨大压力。于是，谢遂退出“造反有理军”，并于10月28日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躁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有传言说，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潜规则，便是须不能承认谢的父母是“黑帮”）。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另有以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曹阳高为首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亦属造反派，但旗帜不鲜明，高层缺决断，人数不少、影响不大，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内部分歧严重、终致解体，不复存在。

◇ “二·四批示”与“红中会”的成立 1966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内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拥有百万成员的湖南当时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及“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在湖南影响甚大的“首都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高飞、高继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洪飙

等）、“北航红旗”（张清泉等）驻长沙联络站，及南下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暴建云、代述国、陈玉兰等）均迅速站到了“井冈山”一边。而由胡宜民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却持有与谢若冰及“井冈山红卫兵”相反的态度，坚决地站到了“高司”一方。湖南造反派在保守派的“长保军”、“赤卫队”、“八一兵团”土崩瓦解的1967年初，产生了第一次分裂。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提上议事日程，湖南围绕“夺权”展开的新一轮两派斗争日益升级。由于湖南省军区在造成“高司”与“湘江风雷”彻底翻脸的“1·15”大会上明确支持“高司”，派性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造反浪潮，局势渐呈白热化。1月20日，省军区执行中央“1·20”来电指示，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但这不但没有能平息风潮，反引起更大反弹。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夺军权”二个战斗队，立即针锋相对地报以“夺权必夺军权”这一在极左派中亦属尖端的口号。至此，矛盾已无法调和。枪刺，在“高司”派飘扬的旗帜后隐隐闪现。有必要指出的是，“1·20”电报乃文革中一大奇案、悬案。电报公布时便版本不一，有说此电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也有说是中央军委发出，还有说是军委文革发出，又有说是叶剑英办公室所发，甚至有叶办交首都三司转发之说。但不管怎样，电报是被执行了，“红旗军”的贺孟宣等人进了监狱。可奇怪的是，半年后解决湖南问题时，周恩来却当众表示：中央从未发出过“1·20”电报；更奇怪的是，湖南势力颇大的反周派竟也未对此事穷追猛打，任此真假莫辩、却被认真执行且对造反派杀伤极大的电报事件消于无形。难道他们真不明白，无论是周恩来公然否认，还是湖南军区矫诏捕人，都是做揪后台一类大文章的好题目。进入1967年2月，随着军队“支左”介入文革，全国形势出现变局：河南“二·七公社”、武汉“工总”、四川“反到底”、“8·26”等造反组织，先后遭到军方镇压。“湘江风雷”也未逃脱厄运。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杨曦光（“夺军权”成员）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也同时被捕入狱。“高司”的战果是巨大的，但却是脆弱的。就在大抓捕的高潮中，一中红卫兵“齐卫东”、

“夺军权”发表了坚持与省军区对抗立场的声明；后来组成“文攻部”的另一批一中学生，则开始了积极的地下活动，不加掩饰地为“湘江风雷”鸣冤叫屈。湘江中学学生顾新绪等人，更于闹市中心，贴出挑战“高司”与军区的大字报，扬言“等着抓”。就在“高司”的亲密战友“造反有理军”内，也有人拒绝胜利者的荣耀。早在“1·15”大会后，以“造反有理军”三中军分部汤建平为首的一批骨干，就另组“红色造反团”与“高司”分道扬镳，“二·四”批示后，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军区。2月7日，在批判“湘江风雷”头目的大会上，一批与其观点相同或相似甚至立场模糊但与“高司”有一定距离的组织，被得到省军区支持的“高司”强迫倒旗，引起轩然大波。会后，遭羞辱的“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旗工人”等组织发出强烈的抗议声浪。2月25日，又有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新成立的“孙大圣挺进军”，加入反对“高司”与省军区的阵营；局势进一步紧张，“高司”夺权的计划受到抵制。为了整合各自为战的中学造反组织为一支能与省军区、“高司”抗衡的力量，进而达到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长沙的中学造反红卫兵酝酿成立统一组织。3月9日，部分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在省展览馆聚会，“红中会”（全称为“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参与成立会议的发起组织和主要出席人员为：“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李昆明、刘建成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吴正元等；“红旗统战联盟”的谢麓山；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共产主义红卫兵”申学崧、黄杏英、李筑银等；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会上讨论组织简称时原拟称“红革会”，但时值上海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遭镇压，一中学生李筑银提出反对意见，遂定为“红中会”。3月12日，前次会议部分主要与会人员，在长沙市干部文化学校再次聚会，议决由五家发起单位各派一人组成“红中会”领导机构——总勤务站。他们是“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因谢长期未到岗遂改为李昆明、而同样由此一度空缺的一把手则由申学崧担任），“红旗统战联盟”谢麓山，“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一中申学崧，五中吴春林。谢麓山后因故退出“红中会”，在7月举行的“红中会”代表大会上，增补刘建成为总勤务站成员。3月12日的会议决定将3月9日定为“红中会”成立日，并通过了袖章、旗帜的设计方案，还决定出版机

关报《长沙红卫兵报》（该报先后由周永航、祖勇、易浪负责，共出五期），同时通过了对时局的宣言。此宣言的发表，是“红中会”正式登上湖南政治舞台的标志。在宣言中，它毫不隐晦其敌视省军区和“高司”的政治态度，但出于策略考虑。却并未亮出意在推翻“二·四”批示的底牌，而是强词夺理地将其解读为“中央批示只讲了湘江风雷有反动头目、而并未将整个组织都定为反动组织”，因此，一开始就公开了否定“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观点。 3月18日，“红中会”在文华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此，其活动开始产生较大影响。◇ “红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概况 “红中会”成立初期，人员以原“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成员居多，三中、七中、十中、十一中、十六中、十八中、邮电学校、电力学校均为其建制单位。其他学校则为原“井冈山红卫兵”等下属组织，也有一些为反“高司”的独立战斗队。其主力战斗队、总勤务站活动骨干及各校负责人为： 一中“齐卫东”等（这几个组织几经重组，最后定型为“齐卫东”、“夺军权”、“新共工”、“擎旗”、“小老虎”五个战斗队，即日后的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组织的申学菘、黄杏英、李筑银、熊爱珍； 二中“旭日东升”兵团李峰、伍明、史中信； 三中“农奴戟”汤建平、潘建国、汪卫东、王琪、周一知、马里佩； 四中“红旗”刘某、陈某； 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李枝荣、黎敏中； 六中“反到底”周某； 七中“5·16”吴正元、王福林； 八中“韶山人”、“锸未残”刘建成、肖坚、肖高立； 九中“飞鸣镝”、“重上井冈山”李昆明、肖志达、李祝双、李泉生； 十中“战犹酣”刘闯； 十一中“风雷师”杨卫华； 十二中谢麓山、周永航； 十四中“红旗”贺美如； 十五中戴某； 湘江中学“东彪”、“井冈山人”陈东海、杨大庆、黄公亮； 湖南师范学院附中易浪； 十六中胡乐多、周美芝； 十八中罗志强； 邮电学校刘彪； 电力学校祖勇。 “红中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行动，是大规模的下厂串联。在长沙汽车电器厂、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新华印刷厂、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等大小工厂乃至岳阳、衡阳、株洲、湘潭的工矿企业里，都有“红中会”成员活动的身影。4月7日反“高司”的湘潭“红造联”成立时，汤建平、谢若冰还前往祝贺，并由汤宣布了“红中会”、“井冈山”等组织发起的再封《湖南日报》的“特大喜讯”。 汤建平如此欣喜若狂是有道理的，因为1967年4月7日的再封《湖

南日报》，是“红中会”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当时形势的一个重大转折，是“高司”由顶峰向谷底滑落的拐点。在此之前，《湖南日报》是省军区的喉舌，实力本处下风的“红中会”、“井冈山”等，以小击大、以弱敌强、几经拉锯，在日益增多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报社内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

（黄振东为首）的策应下，竟将其拿下，自然很长志气。更重要的是，此刻工人造反组织“工联”的成立尚在酝酿之中，各大厂矿的造反派工人与“高司”的斗争原本处于各自为战、分散抵抗的阶段，而以此事件为契机，纷纷亮出旗号，很快形成了统一阵营。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就是在此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高司”的政治立场，并以此为旗帜，得以集合了全市各大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此后不久，在“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的大力协助下，长沙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联”宣告成立，长沙两派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对工人进行活动的同时，“红中会”等也积极争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与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4·7”再封《湖南日报》后，梁春阳于煤炭厅办公楼内，约见“红中会”负责人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时，就明确地面授机宜：要搞大动作，造成大影响。4月22日，章伯森、梁春阳领衔，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带动了从省委到基层一大批领导干部，投向造反营垒，湖南文革形势大变。随着形势好转，“红中会”亦不再隐瞒其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一夜之间，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标语刷满全城，尔后的五一大游行中，翻案口号喊得最响的也是“红中会”。5月9日，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19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等人进食，遭汤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后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首肯。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次日谈判，汤建平等人气焰更盛，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

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却大不以为然地回击：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则口气更硬：走着瞧！

由于双方均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局面僵持。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恶果后，采纳了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的建议，围魏救赵，以砸“省红联”（即“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恰逢此时中央文革又发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的电报，绝食斗争借机遂告结束。

五一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市区，“高司”只留下个别据点，大部队退回河西。“红中会”孤军深入，派出一支文艺宣传队至河西荣湾镇进行反“高司”演出，结果引起冲突，未果而返。

6月6日，部分无组织群众进攻孤悬河东的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数人死亡，长沙城内气氛极其紧张。当晚十时，市公安局掌权的“高司”派组织“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原市委警卫处干部梁俊杰为首），面临流血冲突态势，竟全部避难躲进省军区，使市公安局几成空城。次日，不明真相的群众蜂涌而入，使公安局大院如同任人出入的集市，很多市民深感不安。“红中会”获讯即迅速组织队伍进入公安局，把守住各进出口，初步控制了局面。入夜，成立不久的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派员接管市公安局，“红中会”办完移交事宜后即退出，文件档案、钱粮财物无一损毁遗失。

进入6月，因“工联”对“湘江风雷”平反持消极态度，“红中会”与其关系开始冷淡。而赴京谈判代表名单中，有大局将定方临阵倒戈来投的原“高司”派成员“8·19造反有理军”，却无“红中会”、“高校风雷”，更是引起纷纷议论（李昆明当时的解释是：“红中会”将名额让给了省水电厅副厅长贾镛）。不过，“红中会”仍然继续参加了由“工联”牵头的大多数活动，如“6·6”惨案后在《湖南日报》召开的一次各组织联席会议上（黄振东主持，唐忠富、汤建平均出席）决定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办公地点为省体育馆），“红中会”即派人参加。

中央“八·十决定”为“湘江风雷”正式平反后，长沙城内报复打人成风，不少“高司”派成员遭到迫害。“红中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抓人打人，同时重申纪律约束其下属组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这股歪风。

由于江青以中央文革负责人的名义号召“文攻武卫”，“红中会”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由汤建平负责指挥。

7月23日，湖

南医学院武斗中，一名十六中红中会成员阵亡。9月初，汤建平率百余人随“湘江风雷野战兵团”西征涟源，途中遇伏，汤腿部中弹，随征的红中会成员三死四伤。青春少年空洒热血、无辜殒命，给生者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惨痛记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正式从北京回到长沙后，局势渐趋平静。“红中会”参与了“省革筹”初期的工作，汤建平任职省革筹宣传组。随着与“工联”裂痕加深，“红中会”于10月初撤出了派驻省革筹的工作人员，并参与组建“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至此，“红中会”与主流派（“工联”）的决裂已不可避免。虽然仍是湖南文革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红中会”历史上最风光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红中会”与“极左派”

林彪在1967年10月24日于北京接见驻湖南的47军军长、“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时说过：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显然，林彪所指的“极左派”，就是“红中会”一类组织。而“红中会”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确实是“极左”。红中会的极左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炮打周恩来，二是组织“省无联”。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及北京“5·16”兵团等激进红卫兵团体的影响所致。其在理念、思想方法

从理念上说，“红中会”陷入了已成思维定势的“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的传统泥潭；而且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高烧不退、头脑发昏，以至一时失去了正常辨别、判断周围事物、事件的能力。如林彪的“10·24”讲话明明是指责“极左派”的，某些“红中会”成员却宣称“当今‘极左派’就是响当当的‘毛林派’”；又如“极左”明明是当时当局花大力制止和纠正的倾向，中央、中央文革诸人的多次讲话都是明证，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更对此有集中阐发，但“红中会”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从不讳言自己“极左”。新鲜的是，其中某些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李祝双、三中“新思潮”派马里佩）常挂嘴边、津津乐道、自我标榜，引以为荣的竟是毛泽东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思潮的一个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令常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此中深意何在？是无产阶级天然就“左”？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益革命？当然，毛泽东确实历来对“左倾”的批评都温情脉脉（王明除外）——他甚至认为犯左倾错误者是对党“忠心耿耿”——上面那段话也如此。但批评毕竟是批评，不是表扬、更不是鼓励；据此

而一味求“左”、为“左”而“左”，岂不糊涂。从思想方法上说，某些“红中会”成员十分主观，往往以揣测代替分析、以传闻代替事实。如高层斗争、毛周关系，时过四十年之今日，也仍无人敢断言已弄清楚。但当时有人却凭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学生、以反周恩来为宗旨“5·16”兵团主要负责人）、印东兵等人的小道消息，认定有“‘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周恩来是文革的下一个打倒目标”。再如“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发出；“八·十”决定也经毛泽东首肯，可就有人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妄自断定镇压“湘江风雷”、扶植“工派”压制“湘派”，均系周恩来所为。附带说一句，湖南的反周势力还有省话剧团“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宋绍文一脉，其源头据“长沙工人”头目张楚鞭称为北京的军艺“星火燎原”。宋在北京谈判期间，多次向张灌输反周思想，而宋因故提前离京时给“高校风雷”刘荣华留有一封长信，谈的也是这类问题。至于宋绍文与某些“红中会”成员的活动是否重合甚或交叉互动，笔者未曾与闻。

在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上，“红中会”也表现得极其主观。如经过七、八、九三个月的急风暴雨，刘少奇事实上已被打倒后，毛泽东“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急切心情已溢于言表。他发出“现在论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指出“没有必要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整肃王、关、戚，等等，都是明白无误的信号。而“八·十”决定只将“左派”桂冠授予“工联”，尤说明控制局面的实力与造反精神相比，更为高层所看重。但一中杨曦光却想当然将此态势比做二战后苏联与美英之间的妥协，他按“六经注我”的套路，引用毛泽东当年所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的一段话：“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意在证明毛、周在上层的“妥协”，并不要求“省无联”在下层放弃其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至于把“省革筹”与“省无联”比做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把“省无联”的存在视为文化革命有可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保证等等，其越过真理，就不是一步两步了。

认识上的主观武断导致了心态上的盲目自信，而一连串的成功经历，更使这自信发展到了自我膨胀的地步。“红中会”的发起组织一中“齐卫东”的领袖，曾只手擎天，揭开湖南文革造反的第一页；也曾挽狂澜于既倒，完成了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这一为不少人看来是不可完成的任务；1967年元旦

前后“齐卫东”以炮轰陶铸之举，登上湖南文革舞台，也处于全国领先之列。他们中有人曾很认真地宣称：我们是通过搞刘少奇发现了陶铸的问题，通过搞陶铸又发现了周恩来的问题。也许正是炮打陶铸一炮命中，使其自认为已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自信周恩来早晚将成自己炮轰之下的亡灵。可事实上，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又能掌握了多少足以致周于死地的过硬的材料？他们又有多少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材料？但是，穿上红舞鞋的舞者，是欲罢不能的，何况他们并不欲罢。萦绕其心头的，只有“何时缚住苍龙”（据说黄杏英将此名句题写在其《毛选》扉页上，想必既是明志、亦是励志）的宏图远志。“八·十”决定发表两天后，“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的声明就出了笼。也许当局暂时对此未加追究，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北京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代表的会场上，黄杏英等公然当着周恩来的面，要求只向戚本禹单独汇报，尽显年少轻狂之态。周撂下一句“小将们不信任我，散会”，拂袖而去。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来自“5·16”兵团、“齐卫东”等的影响，“红中会”的决策层决不是被动接受的，既不是受欺骗，也没有被裹胁。至少在“红中会”的中上层，有着与“齐卫东”等相同的思想基础（这反映了文革中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笔者在《思想史视野中的省无联与“新思潮”》中已略有涉及，有条件时将专文论述）和组织资源，这样他们才会踩着同一鼓点跳舞。如某些人以“红中会”的名义来炮轰周恩来的动议虽被总部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否决，但整个“红中会”负责人和骨干中，却只有周永航等个别人非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而“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事件后，“红中会”那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表明的只是“此地无银”。与北京激进团体的联系，“红中会”也自有相当稳定的渠道，如北京印东兵从1966年秋来长沙活动时起，就长住“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后又被“红中会”倚为客卿，羽扇轻摇，也是重要消息来源。“5·16”兵团成员来湖南，李昆明、汤建平均出面送往迎来，热情接待。1967年8月24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砸“延安公社”抓“5·16”分子，与长沙一中“齐卫东”成员唐亦安同被困现场的，就有汤建平。当然，“红中会”与“齐卫东”等，某种程度上毕竟还是同中有异，如绝大多数“红中会”骨干对杨曦光的理论研究，虽然关注、同情，但并不完全认同，三中的汪卫东一度还有与杨“商榷”的打算。只有马里佩、陈某（四中）等一小批“新思潮”派，追随杨曦光左

右，并贴大字报炮轰“红中会”总勤务站的“走机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嫌“红中会”左得不够。同时，杨曦光曾与于1967年秋来长沙的山东师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以“批判小组”、“十月革命”红卫兵的名义，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无视中央绝对禁止任何全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共同在长沙主持过一次有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据此形成“调查报告”这一大事，“红中会”就未曾参与组织，而纯为杨的个人行为。◇ “红中会”与“省无联” 参与组织“省无联”并随其垮台，是作为极左派的“红中会”的宿命。“湘江风雷”平反后，其与工联的矛盾陡然升级，湖南造反派出现第二次分裂。“省无联”本是“湘江风雷”派用于对抗“工联”派的联合组织，但因周恩来在武汉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多数组织宣告退出。因此，它基上仅是某些极左小团体和“湘派”中陈本望（五金工具总厂工人、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头头之一）一类失意者、游离分子的集合。首先，它的成员结构非常杂乱，既有高校风雷、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这类纯由大学生组成的精英型组织，又有长沙二机械厂“虎山行”、长沙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一类小单位的势单力薄的工人造反个体户。甚至，还混杂有如晶湘玻璃厂某些流氓分子在内的“东风近卫军”。二是不定型，不少“湘派”组织虽然声明退出，可从上到下都有人与“省无联”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社会上某些专事“反迫害”或要求落实某些具体政策的小团体，也被视为或自封为“省无联”、却又无人出面澄清。由于组织边界模糊，以至后来为了将“省无联”凑成中央定性的“反革命大杂烩”，竟将参事室张伯伦（75岁）、席楚离（85岁）等一帮因对某些与当时政局无关的具体问题有意见而扯旗造反的民国遗老，也贴上了“省无联”的标签。三是松散，省无联虽有周国辉（“高校风雷”）、张玉纲（矿冶“井冈山公社”）、孙君森（水电部长沙勘探设计院“毛泽东主义小组”）一干活动分子，却无稳定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明确分工。只见知名度最高的周国辉到处做报告，嘴巴十分快活。因此，除了时起时伏的舆论攻势和宣传战，“省无联”没有也无力挑起大的事端或制造大的事件，即便是两名中学“红造会”成员在省委大院因误越警戒线被军人枪杀的“10·21”血案，也没有被扩大为震动全局的风波。由于“省无联”形象不甚整齐且组织涣散无力，“红中会”对其

活动不算热心，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很少出席其会议，多是派周一知等为代表接洽联系，周则曾为“省无联”起草过“9·30”声明。但是，为“省无联”招来灭顶之灾的，却有“红中会”成员杨曦光，他的一纸《中国向何处去》，导致了“省无联”的丧钟响起。因此，作为“省无联”中一支成建制、具规模、有实力的队伍，“红中会”是逃不脱失败厄运的。顺便一提的是，那些先是参与组织“省无联”而后又退出的“湘派”组织头头，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湘江风雷”的高层头头张家政、李仲昆又再一次进了监狱，身为省革筹小组成员“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长沙工人”张楚鞭，也在后来成立省革委会时，失去了本可能得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席位。◇ “红中会”与“工联”

前面说过，“工联”的成立与初期的发展与“红中会”有着密切关系，二者也维持过不算短的蜜月。特别是在宣传舆论方面，“工联”一度基本仰仗“红中会”。如“工联”刚成立，“高司”就抛出一篇曲解列宁有关著述而文不对题的文章：《打倒工联主义》，“齐卫东”当即反唇相讥，报以《揪出列宁主义的叛徒》。而至少在北京谈判开始前，“红中会”内部的大小会议上，都还可以见到唐忠富等“工联”领导人的身影。

“红中会”与“工联”的分歧，起于“湘江风雷”问题。如前所述，“红中会”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湘江风雷”翻案。“工联”对此，起初也并未表示异议。但“工联”是经过大半年运动反复洗牌后形成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根基牢固、阵容整齐、领导层相对得力，又内有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一帮谋臣策士打理日常事务，外有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省委机关“永向东”战团指点迷津（“永向东”头目尚春仁的夫人柳敬台乃长沙汽车电器厂监委书记，想必很方便对身为“工联”主要头头的该厂工人胡勇就近指导），更兼章伯森、梁春阳等省级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甚至华国锋都在赴京谈判登上飞机的一刹那，发表声明，亮相支持“工联”），因而，其组织发展势头很猛，迅速据有了长沙地区几乎所有重要厂矿企业，“高司”势力逐次退回校园。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央正提倡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工联”的组织形式正符合这一方针，于是市值飙升，行情看好。胡勇、唐忠富很快便明白形势有利，权力宝座唾手可得，但想必也有了睡榻之旁岂可任他人酣眠，坐大的“工联”不容他人分羹之考虑，总之，对为“湘江风雷”翻案一事，日显冷淡，借口则是“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所发，推翻

“二·四”批示会令中央文革下不了台（唐忠富到“红中会”发表看法时，持此说最力）。这一来，自然令“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极为不满。1966年6月3日晚，在市总工会为次日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一事的各组织联席碰头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由于“工联”坚决反对第二天的行动，不同意见的双方不欢而散。“工”“湘”矛盾自此肇端，“红中会”与“工联”的关系开始降温。但在中央正式表态之前，也未发展到分裂地步，7月初南郊武斗之际，“红中会”吴春林还曾会同“工联”核心头目雷志忠，冒着弹雨亲历现场，也算是尚能同生死吧！中央关于处理湖南文革问题的“八·十”决定以后，“工联”霸主地位已定，身边又新有了“8·19造反有理军”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中会”不再重要。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工联”确也并未放弃对这个昔日小战友的争取。1967年秋，“工联”与“红中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并发表纪要，共同重温战斗岁月，表示重新修好之意。可在释放完最后一丝温情后，彼此便陌如路人，关系降至冰点。◇ “红中会”与“井冈山” 作为“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谢若冰，是成立“红中会”最积极的发起者，曾多次出面串联。但“红中会”正式树旗之时，“谢司令”不知为何却又推翻日前曾达成的共识，不愿削平“井冈山”的山头，而是要与“红中会”并存。还声称留有“井冈山”可以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声势。基于谢若冰在文革历史中形成的地位，“红中会”曾给她预留了一把手的席位，但她却从未到职视事。虽行动上她十分活跃，组织上却处于游离状态，为此，引起一些人的猜疑。其间，她又写信给“井冈山”成员李亚雄（九中），指示其稳住张振洪（二十三中）等一批初中生，守住“井冈山”不放。但当时“井冈山”主力却已流失严重——中学生多去了“红中会”，余大川、冯美琳、冯美瑛等中坚分子亦回一中另立山头，周国辉等大学生则组织了新的组织“高校风雷”。谢若冰便指示李亚雄陆续发展二中“红铁拳”、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以及后来的长桥中学“战恶风”等不少组织作为“井冈山”的新成员。可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井冈山”的新部属在工、湘矛盾中，却基本站到“工联”一边，令谢十分尴尬。形势稍见明朗，即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斗争曙光初显之时，谢若冰便回到“井冈山”，并代表“井冈山”参加了北京谈判，直到最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完结而安然退场。虽有这

一段故事，“红中会”与谢及“井冈山”的友好关系却始终未受太大影响，直至文革结束，二者基本上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井冈山”虽然退出了“省无联”，但其炮打章伯森之举，未始不是对“红中会”的间接支持。但是，若当时谢若冰入主“红中会”，结局又会如何？谁的命运会改变、？是谢，还是“红中会”？

◇ “红中会”与“红造会” 1966年3月19日，刚发起成立了“红中会”的“齐卫东”又集合校内反“高司”组织成立“一中红造会”（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随即引起连锁反应。各校反“高司”的纷纷组织揭竿而起，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盛况空前的是二中，大小山头过百，单“井冈山”就有三支互不统属的战斗队。僧多粥少，教室不够用，连猪圈都被打扫干净用于“战斗队”办公——而且不少组织有成建制加入“红中会”的愿望。这本是“红中会”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可其决策层却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竟想推广一中模式，即以“红中会”为核心筹组与领导各校“红造会”，其他组织虽可参加“红造会”并接受“红中会”领导，但不能加入“红中会”。此议一出，立即引起普遍不满。因为在一中行得通的事，在别的学校却根本行不通。因为一中的谢若冰、黄杏英、申学崧文革前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中又首先造反，颇有威信（黄杏英一度甚至被同学们戏称为“老佛爷”），自然有资格当核心。而其他各校，却绝对没有形成这样核心的基础。于是结果是各校“红造会”虽成立了，“红中会”却被挤了出来。而且“红造会”迅速成了一个与“红中会”一字并肩、平起平坐的新组织。而在一中，这种大一统的局面的维持也不到半年，“红造会”一分为三，还冒出一个搅局的“斗批改革联”。有趣的是，将各校“红造会”串联成全市性组织（一中除外）的，却是“红中会”的弃将谢麓山（十二中学生）。4月7日再封《湖南日报》后，在“红中会”于十六中召开的一场内部会议上，熊爱珍（一中学生）不知为何（笔者那天迟到，不明此前发生过什么事）当众厉声指责谢麓山，声称“不是‘红中会’的就请出去！”同作为“红中会”总部负责人的申学崧、李昆明、吴春林，却在一旁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于是，谢麓山拂袖而去，只有汤建平追出会场劝慰了几句。此后，“红中会”再不见谢麓山这位元老的身影。究竟是谢麓山早就心怀异志暗中组织“红造会”而被逐于“红中会”；还是他因受辱一怒之下遂起分庭抗礼之心、另起炉灶？对笔者而言是个小小的谜。奇怪的是，后来谢麓山在“红造

会”中，又如同在“井冈山”、“红中会”一样被边缘化，掌权的成了二中的李德等人。日后的工、湘矛盾中，“红造会”旗下，只有二中、七中等学校的组织倒向“工联”，多数则与工、湘二大派均保持距离，与“红中会”关系也不坏。◇ “红中会”与“红专会” 在长沙的中专、中技学校中，另有一个“红专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专业学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其负责人和活动分子为刘志明（省劳动技校）、宋子羽（省交通技校）、刘彪（省邮电学校）。该组织的部分基层单位与“红中会”重合，具有双重组织身份。“红专会”的观点、行动甚至结局也与“红中会”完全一致，可谓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倒霉在一起。◇ “红中会”与“10·24”联络站 林彪“10·24”讲话之后，一中“红造会”文攻部（何克建、王亚平、彭维轼）、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张武本、杨石钟）、七中“韶山兵团”（黎海蛟）等，组成以“反极左”为宗旨的“10·24”联络站。该派覆盖面不算广，但笔杆子多、战斗力强，很得“工联”欣赏，他们也始终站在“工联”派及胡勇、唐忠富一边。“10·24”派（包括某些与其虽无组织联系但观点相同的组织）的核心层在“二·四”批示后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红中会”。一中“红造会”文攻部的表现，前文已有介绍，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则通过醴陵“新一中”，自始至终影响着当地造反派与“高司”派及军方对抗的活动。其与“红中会”重大的不同，乃是不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少了许多乌托邦观念，思考比较现实，所以对中央高层斗争、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相对接近实际，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许，因为同是为老造反派的缘故，“红中会”与“10·24”派虽观点不同，彼此却都比较客气，无正面重大冲突，对“8·19造反有理军”的不欣赏态度也较一致——只有七中例外，该派的“韶山兵团”与“红中会”冲突不断，两家甚至打得头破血流，“红中会”的吴正元还险些由此丧命。◇ “红中会”与“8·19造反有理军” 原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骨干的汤建平拉出队伍参加“红中会”一事，令“造反有理军”十分恼怒，他们当即组织“揭老底”战斗队，“揭发”汤及其他“红中会”骨干均是“长保军”旧部。事实也确实如此，“长保军”成立之初，尚无“造反”、“保守”之分，连“造反有理军”本身，都是从“长保军”中造反而出来的。因此，此时“造反有理军”方面，以此来攻击队伍中新产生的分立

者，并无多大威力。相反，“造反有理军”内部的动荡越来越激烈。“二·四”批示后，幼儿师范学校学校邢银英又带走一批人，另组成“红革会”，宣布与“高司”派决裂。但从日后的情况看，这像是“造反有理军”一号负责人胡宜民针对当时微妙形势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因此后不久，胡即率陈振国、陈国斌与同出十二中的范春兰、张春利分家，另行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8·19’长沙造反有理军”，“火线起义”倒向工联。后者则仍以“长沙造反有理军”（为表示立场坚定遂自称“钢长造”）名义留守“高司”营垒。而邢银英的“红革会”很快就回归了“8·19”，邢银英也始终受到胡的信任，以至在决定“8·19”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人选时，胡还有将已毕业分配工作的邢，予以召回推荐的打算。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有影响的老牌组织的头号负责人，竟然带着大批主力另立一个与原组织对抗的新山头，这样的事，在文革的群众组织派战中并不多见。其中奥妙，“8·19”三中军分部的负责人曾对笔者透漏过，即双方分家时，胡宜民与范春兰、张春利等实有默契：不论将来哪一方获胜，均无条件收编对方余部，以能始终保全“造反有理军”组织为重。这种说法，似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高司”派垮台后，不但“钢长造”的溃兵大都归到了“胡军长”的麾下，就是原来独立的铁杆“高司”派组织二中“红旗”，也戴上了“8·19造反有理军”的袖章。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生叹，象这种类似现代期货交易中“对冲”保值操作的手段，竟可用于政治斗争；而当年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居然能无师自通地予以熟练运用，实为文革中的奇事。不知是韬略深藏，还是担心遭“后至之诛”，“‘8·19’造反有理军”“起义”后一段时间内十分低调，不事张扬，直至北京谈判前后方开始活跃。此时正值“红中会”开始与“工联”方面生怨，见昔日冤家摇身一变且日渐得宠，便认定其是“投机”、“下山摘桃子”，情绪极大、怒不可遏，双方冲突时有发生。“红中会”仗人多势众，占有上风，象围攻“‘8·19’造反有理军”成员，覆盖人家刚贴出的大字报、标语之事时有发生。而在二中、十一中、湘江中学、十六中等被“红中会”控制的学校，喊得山响的“革命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也变成摆设，新从“高司”改换门庭来的“‘8·19’造反有理军”下属组织，根本无法回校落脚。但是，由于有“工联”的支持，“‘8·19’造反有理军”的忍气吞声并不长久。当年秋，他们便开始了反击。双方各以一名“整

脚的马克思主义者”（“红中会”刘建成、“8·19”陈振国）为主将，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论战，都操一口“九评”（中苏论战时中方的九篇评论文章）腔，煞有介事地争论“分歧的由来与发展”，把点点芝麻绿豆说成比天还大。但是，由于紧跟“工联”及胡勇、唐忠富，“‘8·19’造反有理军”笑到了最后：胡宜民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黄韧（四中）出任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学红代会一把手。而“红中会”却仅有李昆明一人，做了市革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

◇ “红中会”与红“3·30” 1968年3月上旬，中央文革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被打倒。这两件看似全无关联的事件，被陈伯达合称为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回合”。3月30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江青一句“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给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定了调子，“红中会”也等来了最后一次出场机会。

“3·30”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与此同时，一中红卫兵余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余大川以一中红造会“3·30”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3·30”联络站（简称红“3·30”），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余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但是，此时湖南造反派发生了第三次分裂，政坛再生变局。掌权的“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挑战胡勇、唐忠富及其身后华国锋和47军的权威，宣称华、胡、唐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形势一时十分怪异。如站在梁、尚一边的红“3·30”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8·19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奇怪的是，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

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子还在一年前“高司”与“工联”、“湘江风雷”的派战。由于省军区全力支持“高司”，导致省内各级军分区、人武部也深陷派性泥潭。中央“八·十”决定虽然调整了省军区的领导班子，但地、县两级人员变动不大——倒是个别支持“工联”“湘江风雷”的干部（如长沙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弘强），被以种种理由清洗——而且都进入了各地“革筹”并握有重权（特别是县一级），在全省 15 个地市级革委会主任中，原军分区负责人就占了 9 个。由于这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1·24”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其中最突出的有景林（常德军分区政委）、巫海清（湘潭军分区司令）、“孙眼镜”（凤凰县人武部长）——孙曾被树为“支左模范”，事迹上了湖南日报。景林初到常德时，不显山不露水，批“省无联”时搞派性却十分积极，他一只手把造反派往死里整，一只手扶植已与“高司”派合流的保守派。1983 年因负有命案而遭处决的段远来（时已任常德卷烟厂党委书记），即是当时起家的原“高司”派头目。巫海清则身为湘潭地区革筹主要负责人，长达半年大小会议安坐如山、一言不发，而“1·24”后则峥嵘毕露，派性报复下手极狠。众所周知，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1·24”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因此江青所说的“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确非空穴来风。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 47 军军长黎源，也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十分严肃地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楚，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但客观地讲，这种情况，显然也并非“工联”头头胡勇、唐忠富所乐于看到的，胡、唐也无力对此负责。而省会长沙的情况与外县相比，则大不相同。“高司”残部虽组织过一次要求平反的游行，但却除招致《湖南日报》的严词指责外，无人理睬，翻案无果。至于在批“省无联”时打击面过宽、连带批了一些造反派是肯定的，但这是几十年政治

运动形成的惯性使然；借机泄愤、挟嫌报复、栽赃陷害者也不乏其人，但在文革的大环境中，这是些反复上演、司空见惯的常规剧目，尚不至于动摇长沙主流造反派的根基。退一步讲，就算长沙真到了右倾翻案、“老保”复辟的地步，“1·24”后同胡、唐一样弹冠相庆的梁、尚又何能辞其咎？在批“省无联”时发生的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中，他们哪样落过后？如到三中、四中抓马里佩、陈某等“红中会”“新思潮”分子的，就是日后梁、尚派干将余信谦手下的新华印刷厂“工联”组织。在如此犬牙交错的形势下，红“3·30”处境尴尬，虽受到外地遭压造反派的普遍追捧，被视为久旱之云霓，以至徐庭栋（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德一中学生）在东风广场一次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不支持红‘3·30’，还反什么右倾翻案！”但搅在胡、唐与梁、尚缠斗中，却又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当年，笔者就听见过汤建平十分恼怒地发牢骚：“同样一件事，他们（胡勇、唐忠富，‘8·19’成员）去搞，就是反右倾翻案，就是革命；我们去搞就是闹分裂，就是反革命。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

由于找不出激动人心的炒作题材，二派难分高下，局面长期胶着。可是令梁、尚派沮丧的是，中央由于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而针对广西、陕西乱局发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却搁置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分“路线是非”地严斥反对或阻挠建立新政权组织，全力支持势力大、能控制局面的派别。而毛泽东在“7·27”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北地王大宾）时，又宣布两个布告全国通用。胡、唐实力占优，又有华国锋及47军作后盾，梁、尚对号入座，自然只能坐被告席。随着梁春阳、尚春仁与叶卫东的垮台，红“3·30”迅即解体，胡勇、唐忠富完美收官。胡勇更是如日中天，他在党组织尚全面瘫痪的形势下，由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特批入党（介绍人之一则是华国锋），并出席了中共“九大”。长沙汽车电器厂里一帮追随他造反的小兄弟也各据要津，一时之盛，竟有“汽电政府”之称。可在胡、唐欢庆礼花的映衬下，基层各县造反派的命运却十分暗淡凄惨。批“省无联”时遇难的背时鬼，固然是“未敢翻身已碰头”，老帐新帐一起算；而上一轮打击中的漏网之鱼，也由于当权者和军分区及武装部方面故技重施，被扣上“梁、尚之流”的帽子，陷入苦海。经此一变，“老保翻天”、“右倾翻案”的话题再无人

提及，湖南县级政权基本复旧。这种状况自然冲淡了胡、唐胜利的喜悦。次年，已升任省军区副政委的景林调长沙主政，到任时胡、唐与其有过一次谈话，希望景“不要把常德那一套弄到长沙来”。说话的认为是警告，听话的却觉得是乞求。因为时隔不久，唐、胡就下放回到原岗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了。不过，这已是后话，与“红中会”并无关涉——因为毛泽东的“7·27”接见后不久，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即发表，工宣队全面进驻学校，文革转入“斗、批、改”阶段；随着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黯然退场和“老三届”离校上山下乡，长达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正式谢幕，“红中会”、“井冈山”、“8·19”、“红造会”、红“3·30”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陈益南、汤建平诸君曾给予支持、鼓励和帮助，陈君出力尤多，谨致谢意。） 2006年9月11日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第二章 首先进行造反的是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编年史上，是很重要的。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决定》（即十六条）；八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向朝他吹呼的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100万红卫兵；八月廿一日，毛泽东再次在北京接见上百万外赴京红卫兵。满街都是操着不同口音的红卫兵。各式各样的传单，随着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涌进了我们长沙市。墙壁上到处贴着“造反宣言”“××红卫兵司令部通告”“一个革命的倡议”等等五花八门的传单。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不用上课，不用读书，允许到全国任何地方去，坐火车、汽车、轮船一律免费，到处有政府指定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需要零花钱，凭一个学生证或红卫兵证件，即可随时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个谈起来都会令人憧憬让人骄傲的地方，而现在，成千成万的红卫兵都轻而易举地去了……我有几个过去的同学，他们在没有带一角钱的情况下，只揣着自己的学生证与红卫兵证，借这史无前例的大串联机会，

花三个月时间，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各省，虽然路途上他们也累得够呛。对此，我羡慕得要死，真后悔不该放弃已考上的中专学校而参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专学校报到，那现在不也可以穿上绿军装，佩上红袖章，全国到处去看看吗？真可惜，一步失误千古恨！不过，懊丧的心情并没有多长时间，红卫兵冲向社会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动了长沙市。八月中旬，威严的中共长沙市委大门围墙上，贴出了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坚决打倒三相信！”旁边写了注释：“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还有一幅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署名的五个人都是以“长沙市十二中学共青团员”的名义。其中，有一位后来还成为了长沙市中学红卫兵的一个名声赫赫的造反司令。居然反对相信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还要“造反”，真是骇人听闻！一下子市委大院门口围满了人，先是观看，然后就是悄悄的议论，再后就是互相之间的辩论。有人说：“这是反动标语！”“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党！”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红卫兵写的，总会有什么理由吧！”一批红卫兵则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说，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我一下班，就挤到那儿去看，去听人们之间的辩论，听这一方，我觉得有道理，但听那一方一讲，也觉得没有错，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么我就分辨不出谁对谁错呢？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演说的一句话，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个红卫兵操着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哪一级党委，我们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就能决定是该相信你还是该打倒你！”这个北京红卫兵的讲话，可以说代表了从那时的红卫后运动到以后的造反运动中的一切激进分子的政治观点。我似乎也发现了分辨是非的钥匙所在。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是非标准，在后来的文革实际中竟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对立的各派、观点不同的每一个人，在为自己辩护或指责对方时，谁都能搬出一些毛泽东主席在不同时期说的话或语录来作自己的武器，并用它去攻击对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报战、大辩论、传单战等等“文攻”范畴内，没有谁不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因为谁都认为自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都认为真理是在自己手里。故，“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个检验是否革命派的理论尺子，在复杂曲折文革中并没有多大效用。不过，在文革之初，

在以前那种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说的话都被认为是“党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众有任何疑问、更不能有丝毫反对的观念普遍存在之时，（顺便说一下，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重要的一条，往往就是因他有过冒犯党的干部的言论）现在，红卫兵突然提出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判断是否革命的标准！”的这个理念，实际对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文革之前，每一个党支部书记及担任这个职务以上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绝对威严而不容冒犯。那么，红卫兵提出的这个新口号新标准，就在观念上帮助老百姓们，将原来视所有的党的领导干部们是“神”的那种地位，给予了彻底的摧毁，使人民群众从那以后，心中只装着毛泽东这个“真神”。而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连毛泽东这位“真神”也被请下了神坛，恢复了“也会犯错误”的人的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卫兵运动在客观上也起过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这几幅标语轰动了整个长沙市以至全省，搅得每一个市民都来议论甚至互相辩论。紧接着，八月十九日，省里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二百多个大学生红卫兵排着队踊进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组问题找一个市委书记，要求接见和辩论。因为那个市委书记曾与派驻大学的工作组有关。同时，大学生们还将很多写有毛泽东语录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运动的一个文件“十六条”中的章节，用大字报形式，贴在了市委大院内外的墙上，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市委领导人慌了手脚，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汇报后，除了动用公安人员暗中准备外，随即又在一些工厂企业调集了几千名工人，迅速组成了“工人赤卫队”，来到市委大院内，意图保卫市委。可想而知，佩着“工人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和佩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双方一接触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工人和大学学生的互相辩论，态度很快恶化，升温，最终发生了工人殴打学生的事件，一批学生或轻或重挨了揍，并被轰出了市委大院。对于大学生红卫兵到市委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与请市委书记接见，很多人都似乎觉得没什么错误，因为中央各种传媒关于“红卫兵是革命先锋”的舆论，早已被人们接受了。我更认为用这么多工人去对付仅只喊喊口号贴贴大字报的学生，实在是没有道理。接着，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发布指示，指责发生在市委大院

门口的事件是“右派学生企图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作坚决的斗争。于是，原来支持学生的工人、干部，赶快紧闭了自己的嘴，刹时出现了声讨右派学生的一边倒气势。在街头，解释宣传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学生遭到了不停的围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殴打。为了加大反击“右派”学生的舆论力度，省委与市委又在我市的集会场地东风广场召开了数万人的辩论声讨大会，还安排三名颇有声望的劳动模范到会上控诉“右派学生”的反革命行为。其实，这几名劳动模范并没有看见大学生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在市委大院内。他们只不过是奉命在大会上，对大学生们的行动进行一番官样文章般的批判与指责而已。正当人们在议论如何斗争“右派学生”，正当持不同意见的工人、干部愤闷不平但又担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检举之时，突然，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如春雷巨响，一下子扭转了风向，尤其这份党中央的权威机关报在社论中，还特地点了包括长沙市在内的几个城市的名，还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很快，成千成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了长沙市的街头欢呼，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就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也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们。对此，市委不敢再有什么镇压之举了，听任人们又重新涌到市委大院，甚至听任人们高呼“改组长沙市市委！”“罢×××（省委某书记）的官！”的口号了，原来反对学生的工人与基层干部，看到党中央是支持学生的，也成批成批转到了同情学生的行列。在中央的精神与下面成千成万红卫兵和市民的压力之下，省委真的作出了一个没有前例的决定：基本接受群众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书记的职务，重新任命了一个市委书记，同时真的改组了长沙市委的班子。本在几个月前已上调中央宣传部的省委第一书记又被中央派了回来主持工作，而且，他在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即亲自前往湖南大学看望那儿的大学生与红卫兵，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此次回来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向前段受委屈的大学生们“请罪”，第二，则是同红卫兵们“一起造反”。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甚至欣然佩上了造反的大学红卫兵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省委第一书记的态度，不仅使听到或看到这个讲话内容的广大红卫兵学生与市民们感动万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书记对下面群众表示出如此诚恳的态度，何况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呢！）

同时也深深使人们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可真是了不得:连省委书记都说要“造反”了!这个被称之为“八·一九事件”的前后仅一个星期,但长沙市的人民第一次感受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街头发生的有反有复的而反差极大的政治气氛。

第三章 学徒工成了造反派的头头

《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与长沙市大学生红卫兵的示威,终于导致了省委作出的改组长沙市委,撤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的决定,从而使红卫兵以及支持同情他们的人民群众越加高兴,连续几天不断的游行庆祝,象过节一样。游行的队伍很多都游到湖南大学驻地,向湖南大学的红卫兵表示祝贺,锣鼓声,鞭炮声响个不绝。批判原市委的大字报也如春笋一般涌了出来,贴满了市委大院外围墙。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原市政府的一个警卫人员所写的题为“奔命记”的大字报,揭露了“八一九”大学生红卫兵涌进市委后,害怕发生长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们,在那几天中,是如何苍惶出逃,离开市委大院躲到乡下去的事情。这份大字报很快被印成铅字传单,广为张贴,以此表示对原市委领导人的鄙视和批判。我们厂是一个小厂,只有一百五十多名职工,但也由一个叫杨XX的年轻复员军人带头,很快,几乎全由青年人组成的一支三十多人的游行队伍,也上了街头,呼喊口号,举着自制的标语,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汇入了游行的潮流。我们一直行进到了湖南大学,向那儿的大学生红卫兵递交了一张用红纸写成大字报形式的“声援书”,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接待我们的红卫兵们一边激动地不停地握我们的手,一边不停地振臂高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 ”气氛非常热烈。我扛着一面红旗,又走在队伍的前排,自然很是兴奋、激动,看到自己支持的学生们一下子就从被压制的状态中翻了过来,非常的高兴,好似自己憋在心膛里的气也全吐了出来一样。湖南大学的红卫兵成了不少长沙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整个大学的红卫兵也成了相当多长沙市人崇敬的对象。然而,前段建立的、以批斗老师打所谓“黑五类”为主要任务的、并由高干子弟为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却持相反立场,他们认为湖南大学红卫兵的行为是“右派翻天”,改组长沙市委,撤免市委领导人的决定是不公平的。这样,红卫兵队伍开始分化了。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以外,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红卫兵组织,以支持湖南大学红卫兵的“革命运

动”。从这个时候，即出现了具体的派别观点后，所有新成立的红卫兵，除了对担任其主要领导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对立派别抓辫子外，对一般参加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的人，家庭出身好与否，已不再是先决条件了。于是，一大批对佩红卫兵袖章羡慕得要死，却始终只能畏畏缩缩站立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学生，很快都成为了红卫兵的积极分子。连对家庭出身要求最严（不是红五类子弟不要）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此后也不得不敞开大门，让那些出身不属“红五类”子弟的学生，以所谓“红战友”的名义进入自己的队伍。所谓“红五类”子弟，即其父亲是革命干部，解放军军官、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四九年前的城市贫民这五类“无产阶级阵营”的某一类成员。在不少长沙市市民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或新奇的气氛之时，在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对时局莫名其妙，手足无措之际，省委第一书记却突然于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报告的主题用词是从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对百万受检阅的红卫兵时讲话中借来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至今也弄不懂当时林彪为何讲了一段这样与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战略相违的话，也许他是为了体现同时注意两个方面的辩证法，或是就北京发生某些炮打中共中央的大字报而言。但这个方面的精神很符合党的各级领导人揣摸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概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的想法，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在下层群众中抓“右派”抓“黑鬼”的政治运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是由一连串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曲折复杂的“小”政治运动组成，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大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从省会长沙市开始，全省在省委第一书记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之后，工厂、机关、公社、学校等等各单位便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抓“右派”抓“黑鬼”的行动。省委第一书记用洋洋自得的口吻说：“前段是引蛇出洞，现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时候了！”“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和名词，而且还准备套用一九五七年的作法。至于对自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向大学生红卫兵所说的“请罪”“造反”那态度，则轻描淡写的解释为一种策略了。省委第二书记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细的布署：一、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二、开展大辩论，从政治思想上把敌人压倒；三、分清主次，分清前台后台，先抓主要的，先抓后台的；四、

这个运动搞三个月；五、大中学校主要是把矛头对准本单位。还说：“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顿时，风向又变过去了，湖南大学红卫兵到市委大院去声讨的“八·一九事件”又变成了“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在那场风波中有过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以至农民，都是应抓的“右派”或“黑鬼”。在这里，“黑鬼”一词并不是官方文件语言，而是人们从前段批“三家村”时的所谓“黑帮分子”一词延引过来的，它只具有民间性质。但“黑帮”一词却又是所有媒体的正式用语，而对“右派”的称呼，更是这次省委书记们的报告或指示的明确定义。成千上万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单位揪出来了，或被批判，或责令写检讨，以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或被企业机关等单位非法禁闭“停职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监狱。拥有近万名工人的一家国营大型电机厂，它的党委宣传部长被宣布为全省的“第一号右派”，然后被关进禁闭室。一个月以前曾写了揭露市委领导人出逃内容《奔命记》大字报的市政府警卫员被关进了监狱，另一位执笔者则在被批斗中自杀身亡。每一个单位都有人表示过对湖南大学红卫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个单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时所“抓”定的“小邓拓”“小三家村”一类的名单中的部分人，“右派”数目迅速膨胀。各个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终于庆幸自己没有前段“造反”的热潮弄昏头，一句“引蛇出洞”使他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为什么会出现那局面，于是，胸有成竹驾轻就熟地执行省委指示，在本单位大抓起“右派”来。然而，抓“右派”却不会抓到红卫兵头上。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农民成了“右派”，湖南大学红卫兵却安然无恙。因为中央早有指示，在《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亦有明确规定：即使是真正右派学生，也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才能酌情处理。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红卫兵学生拥有被赦免权。所以，即使兴高采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贴出“拥护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和“强烈要求惩罚”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大字报，省委、市委仍然没去动一动湖南大学红卫兵及其红卫兵盟友。我们厂在一、二天之内，由党支部部署，党、团员们带头上阵，很快贴满了大字报，发起领着人上街游行的 24 岁的青工杨 XX，自然是第一个靶子。另外还有三、四个人也是被攻击对象，其中包括年已五十岁的副厂长，因为他曾公开表示过同

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八·一九”行动。还有一个姓潘的老工人，也上街游了行，游行中的老工人不多，在单位领导人的心目中，年轻人犯错误情有可原，但年纪大的人参加游行，则肯定动机是“不可告人”。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支持了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再就是数落你自出生以来的每一句可以抓到毛病的话、每一件可以演绎解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事。杨 XX 除了被扣上一大堆“反革命”罪名外，还有一条是这样批判他的：杨有次对旁人指着大街行驶的一辆“红旗”轿车说，若能坐一坐这种车子，那一定很舒服。于是，这句话这件事，被说成是杨早有“妄图篡党夺权想当中央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因为“红旗”小轿车只有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才可以坐，杨羡慕想坐这种车子，那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么呢？等等。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大字报，不论是哪一派写的，一开始，就是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演绎批判模式，直到文革结束。这种模式肯定不是文革特有的，至于起源何时，不清楚。但现在可以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那些成为一个右派分子“定案材料”，亦就是出自这样一个辙式。我对这突来的风暴，很有些紧张。幸好，因我是刚调来此不久，人们并不很熟悉我，况且只不过游行时扛了扛红旗，还不是领头人，只有三十分之一的份，没有大字报会涉及到我。但，我却很为杨 XX 等人担忧，因为我平时对参加过解放军的人很崇敬，杨是一个从部队复员不久的青年人，为人随和热心，字写得漂亮，还有不错的口才。他长我几岁，况且是属于“师傅”之列，却对我这个学徒工从无轻视之举，所以我不希望看到他倒霉，因而只希望，他能碰上前段企业中抓“小三家村”时那样的好运，虽然大字报批判了一阵，但最后却能安然无恙。然而，当时，一个年轻人在本来满腔热血之际，却突然遭遇能使他“下地狱”的命运打击，并且他还得有口莫辨，一下子也被孤立起来，没有人再敢同他象平日一样热热闹闹的或开玩笑或互相说什么了，加上还有几位原一起商量去湖南大学搞声援的同事，被迫也写了揭发他的“反动言行”的大字报，声称“坚决与他划清界线”，等等。这一切，顿时使杨 XX 对人生失去了信心，一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将会要戴着“右派”帽子、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蔑视自己欺侮自己的“人下人”时，杨 XX 就深觉不寒而栗。在厂里抓“右派”运动进行高潮之际，一天，他独自一人去了城外风景秀丽的岳麓山。“我本想最后一次看看岳麓山的名胜，然后，跳湘江河自杀。每当我想到自己今后将会象‘五

类分子’一样生活，我就没有了再活下去的勇气。”杨 XX 后来几次对我讲了那一段令他深感恐怖的日子。为何他却又终于没有走至绝路呢？“是‘爱晚亭’救了我，或者说是‘爱晚亭’的历史唤醒了我！我想，毛主席他们当年在这里学习时，也就是象我这般年龄，区区几个青年人却敢有一种‘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勇气。我的人生也才开始，我为何要去自己死呢？”杨 XX 这样反省了自己，因而也由此挽救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年地处我们这座城市郊外的岳麓山及屹立于山腰的“爱晚亭”，不仅风景秀丽迷人，不仅因有唐代诗人所遗下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可以吸引历代文人骚客来欣赏，更由于毛泽东等人曾在年轻时常聚于此处读书、讨论、交流思想，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革命浪漫故事，使这儿长时期成为了年轻人与红卫兵们极其崇拜的“圣地”。

公元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那一天，这“圣地”也就解救了杨 XX 这样一个正直、无辜的青年，因而使他还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演出很多有歌有泣的悲壮故事。

大学的红卫兵虽然没被划入即刻斗争批判的“右派”行列，但他们却并不只自顾自保，而是组织了向中央反映报告湖南省的抓右派抓黑鬼运动情况，甚至弄到了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的录音，送往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抨击了这个报告及这个报告带来的整人运动。一些工厂、机关的被划入“右派”黑名单的工人、干部，在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也冒着被捕被抓的危险，一批批溜到了北京，配合大学生红卫兵，将一叠叠申诉材料送给了中央文化革命接待站。

无疑，这样大规模的整基层群众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构想，显然，各省的领导人是再一次误会了毛泽东所构想的文化革命的意义，因而又再一次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做法。于是，很快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这些被斗被批的“右派”分子平反的紧急指示。

十月十二日，省委第一书记发表了一份检讨，宣布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报告内容作废，并决定停止抓“右派”的斗争，而且要求给被斗的人恢复名誉，销毁一切这次整人的材料。

这份检讨不仅作为文件传达到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企业单位，而且还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在长沙市全城广为张贴。

对于这个突然而至的好消息，在长沙市产生了震动。

但在表面看，远远不及前段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那样，令人欢欣鼓舞。除了造反的红卫兵在街头刷了无数大字报和标语，以示庆贺中央“紧急指

示”的到来和声讨省委第一书记的九月报告外，再没有如潮般的游行队伍，没有红旗，没有锣鼓。而实际上，企业机关的工人、干部，对省委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仍心有余悸，“引蛇出洞”这句名言阴魄远未消散，因而，人们除了庆幸之外，不敢有什么动作。而企业、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对于销毁前段整理的整人专案材料和宣布给被斗被批的人平反这些工作，一般都很勉强，有的干脆就不予销毁材料，甚至不予宣布给人平反，仅仅只是停止了整人的斗争而已。因为，在这些党组织负责人心目中，实际也仍认为目前恐怕又还是“引蛇出洞”，前段斗争大概又是时间搞早了一点而已，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厂党支部书记 A，由二名党支部委员陪同，在他的办公室，分别召见了杨 XX 等人，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和省委指示，然后说：“你的问题不再搞了”。至于被整的材料，告诉他们：“党支部会清理后销毁的”。整个平反过程就是在党支部办公室，并没有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来予以公开宣布，虽然批斗他们时动员了全厂职工上阵写大字报。杨 XX 等人一方面很高兴党支部为他们平反，但心里却始终有一个阴影，因为从党支部书记那没有热情的平反中，他们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害怕在某一天，又将自己投入到九月下旬那段恐怖的日子里。要知道，一旦成为了“右派分子”，那自己这一辈子就算完了，一辈子将永远象那些五类分子（从前的地主和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一样低着头过日子。厂里原有二个五类分子，本来也是出身很苦的老工人成份，但后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人检举曾有过同性的性行为，便均被定为了“坏分子”成份，将其扫进了“阶级敌人”的行列，还大幅削减了他们的工资，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就是战战兢兢的工作和生活。文革以来，更是不但被勒令必须佩一个用墨写上“五类分子”的白袖章，而且每天一清早，厂里的几个厕所他们都必须在工人上班前打扫干净，他们每次外出或回家，都必须报告厂里的保卫人员，而保卫人员凭他个人的情绪好恶，则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批准或不同意。这二个五类分子，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厂里哪怕是一个小学徒工，若不高兴，就可以无缘无故臭骂他们一顿，甚至扇他几耳光，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根本不敢争辩。这二个人，真是可怜得很，但谁也不敢公开对他们表示同情。杨 XX 多次对我说，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也跌入那两个五类分子行列，心里就充满了恐怖。所以尽管已平了反，但杨 XX 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我多次安慰他，劝他乐观些，他却再也没有了往日雄辩的口

才，那支能写出漂亮文章的笔也不敢再拿，唯恐惹出新麻烦。他对我说：你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你就知道为什么乐观不起来。我在当时确实还体会不到那政治压迫的滋味，因我家庭出身好，自己从未被从政治上攻击过。长沙市的人工人造反运动，却在这股阴云下，悄悄地滋生和发展起来。点燃这个火的，是北京来的造反派红卫兵，即著名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的红卫兵。他们在长沙市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煽风点火”的机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沙市联络站。他们配合湖南大学等湖南各高等院校红卫兵一道，深入工厂机关进行宣传，将北京文化革命的最新动态向工人们传播，由于他们的组织与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因而很多所谓“小道消息”即报刊上不刊载的情况，都通过他们传了下来。这些北京红卫兵拥有特殊的背景（获得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中又有很多能说会道，气宇轩轅的干才，因而，在湖南省长沙市，各单位尤其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对他们都有几分畏怯，唯恐他们来自己单位造反。现在人们谈及到“红卫兵”时，总将红卫兵归入造反者的行列，甚至还以为红卫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红卫兵。其实，红卫兵只有在“破四旧”时、在学校斗校长、斗老师时，才是一致的，而一旦杀向社会卷入具体的政治观点时，红卫兵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了，而且也不是同一批人了。北京的红卫兵是如此，所以，才会有所谓红卫兵的“第一司令部”与“第二司令部”以及“第三司令部”这样一些并非仅仅数字序列区别、而是表示政治主张不同甚至相反的不同组织。在湖南省长沙市，最开始成立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保军）红卫兵，由于是站在保卫省、市委的立场上，因而，以湖南大学为代表的红卫兵，则另起炉灶，在十月份成立了“长沙市高等院校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以示造反，并马上投入到批判省、市委的斗争中。随即中学里面的红卫兵也竖起了与“红保军”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市中学造反有理军”组织的旗帜，加入到“高司”的阵营。在北京红卫兵和“高司”红卫兵的鼓舞与帮助下，长沙市工人中那些前段被打成“右派”的人，聚集在一起，也成立了跨行业，跨单位的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大都是为了使他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工人、干部能拧成一股绳，互相支持，迫使自己单位的领导人（当时被称为“当权派”，“当权派”是一种中性名词，并无倾向性）真正销毁原来所整的所谓“右派分子”材料、并公开的宣布给被错

整的人平反。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被动地被推上政治舞台的造反派工人及其造反组织逐渐壮大，并逐渐成为了左右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形势的重要力量。

长沙市先后出现了“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国际红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他们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工厂企业的青年人，早就盼望也象红卫兵那样，佩带一个红袖章到社会上去“抖一抖”，现在机会出现了。

我在街上看到一份“国际红卫军工人总部”的成立宣言，于是就跑到那儿，要求参加。

“你当不当造反派？”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接待我，问。

“造……什么反？”我有些迟疑。

“造反，就是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事情的反！不管是谁，资格有多老，权力有多大，只要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造他的反！”大学生慷慨激昂地向我作宣传。

“那我也造反！”我肯定的答复他。

“现在首要的造反任务，就是帮助那些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工人兄弟，向他们单位的当权派造反，帮助他们将那些整人的黑材料弄出来，烧毁，真正销毁，不让当权派留着秋后算帐。”大学生继续说，“你敢不敢去？”

一想起我们厂里冤枉被整的杨 XX 那几个人，我顿时激奋起来，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情感占据了胸膛：我愿第一个去！

我马上被接受为一名“国际红卫军”战士。

这个名为“国际红卫军”的造反组织并非真是什么国际组织，而只是几个北京与湖南的红卫兵试图让红卫兵运动冲向世界的异想天开，谁知这个天方夜谭般的主意居然得到不少青年人的响应，一下子在各地都有人竖起了“国际红卫军”的旗帜，尤其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竟很快发展为一个拥有数万人的主要的大造反组织。开初，甚至还真有俩名在一家大国营工厂实习的新西兰女青年也参加了这“国际红卫军”，也让她俩跟着去造了几天反，只到后来不久中央来了文件明确指示：不能让外国人参加造反组织。“国际红卫军”负责人才将那俩新西兰女青年劝退。

我佩着“国际红卫军”红袖章大摇大摆走到了厂里，同事们都用好奇新鲜的眼光看着我，并且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则趁机将从“国际红卫兵”那个大学生那儿听来的道理，一一又贩给同事们听。

“过几天，我们组织会派人来，要 A 书记交出整了杨 XX 他们的黑材料呢！”我还气宇轩昂自作主张的宣布。

将党支部整的材料称为“黑材料”？还会来人要找 A 书记！

同事们都很吃惊，也有的眼中露出很佩服的神色。

我一个人还不敢去找 A 书记，我只首先找了杨 XX 和一个也被打成过“黑鬼”的姓潘的老工

人，劝说他们造反。有造反组织为他们撑腰，解救他们，杨、潘两人非常高兴，叫我带他们去那“国际红卫军”总部，经我介绍，他们马上也被批准加入，并马上领来了红袖章。这一来，十来个青年工人也纷纷找到我，要求介绍他们亦参加，能够佩上“红袖章”，实在是当时我们年轻人追求的时髦。我自然都高高兴兴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并在厂里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国际红卫军”的一个头头委任我为我们单位小分队的负责人。实际上不用委任，厂里这些同事都已公推了我当头了，虽然我只有十七岁，还是学徒工，但因我家庭出身硬梆梆的好，又有文化，（那时厂里青年人大都只是小学文化，而我是长沙市一个重点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尤其，他们认为我敢说敢干，所以，连杨 XX 都心悦诚服而恳切地推举我这个比他小六、七岁的小青年当队长。正当我们得意扬扬，商量着如何请“国际红卫军”总部支持，拟在某天去找党支部 A 书记，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出厂党支部所整杨 XX 等人的“黑材料”之时，厂里原负责批判杨 XX 等人的“专案办公室”的两个人，居然也佩着红袖章在厂里出现了。他们参加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工人赤卫队”，一个由市委支持指示成立的工人社会组织。面对这个情况，我们感到，如果不尽快借助社会上的造反力量，那我们将无法帮杨 XX 等人讨回所整他们的“黑材料”。但我去“国际红卫军”总部求援时，发现总部要实施的帮助“抢黑材料”行动的计划太多，因为每个单位挨整的“右派”都希望赶快帮助自己。看来，我们这个小厂一时还排不上号。这时，一个青年人到厂里找了我，他建议我参加他所在的另一个工人造反组织“湘江风雷”。这个青年叫曾 XX，时年也只有 24 岁，其貌不扬，但当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大哥。他是一家国营洗染店的漂洗工人，与我同属一个公司系统。他告诉我，他也是省委第一书记“九月报告”的受害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现在中央有指示要给这些人平反，但他那个洗染店党支部的负责人，丝毫没有替他平反的意思，还威胁他“不要乱说乱动”。他便揭竿而起，在湖南大学一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湘江风雷”组织，并成功地在几个洗染店内建立了 5 个人组成的小支队。而且，他接受那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忠告，决定将全公司的“右派”“黑鬼”和造反观点的人都统一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那大学生告诉他说。然后再集中力量向本单位当权派们索讨“黑材料”。我当即接受了曾的建议，决定改而参加他领导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并表示

接受他的领导。曾则建议“红色支队”应由我来当队长，因为我的父亲是众所周知的中共老党员，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小商人，说由我当队长，对外更容易吸收人员参加，“红色支队”也不怕别人抓辫子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的组织”。但我说服了他，因为，他的魄力、见识，办事能力显而易见地比我强多了。我同意担任支队的唯一的副队长，并组成了一个有五名成员的支队委员会，一个理发店的小伙子担任对外联络委员，一个旅社的青年人担任宣传委员。另外一家冷饮店的一个姓易的老工人，则被曾 XX 任命为支队的组织委员，因为老易不仅热情高干劲大，而且对全公司的人员情况，略知一二，有利于我们组织发展。我与曾一块努力，很快在全公司每个基层单位都建立了“湘江风雷”的小分队，统一由“红色支队”领导，已拥有一百多名成员，并在一个洗染店的楼上设立了支队办公室。我们厂的“国际红卫军”小分队便改组为“湘江风雷”的小分队，我则请杨 XX 与另一个青工分任正副队长。一个仅仅十七岁的小青年，还是一个小徒工，偏偏就有人相信你，拥护你当他们的领导人，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实在是当时文革的特殊形势所造就。当时那些领导上万人的红卫兵司令们，大都也就十八、九岁，或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大学生。此时，社会上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向各单位领导用强硬手段索取“黑材料”的事，时有发生。经过我们一番秘密策划，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夜里，曾 XX 和我带领公司“湘江风雷”各小分队共一百多人分别冲进公司下属一些单位党支部办公室，一下子将所有办公室内的桌、柜、屉统统用盖有“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大印的封条贴死，并宣布：如果这些党支部不派专人与我们“红色支队”协商，共同清理，销毁和退还各类“黑材料”，那么谁也不准打开抽屉，柜子，否则，我们将采取现在不透露内容的“革命行动”！当时，“造反”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批判“走资派”如何镇压革命群众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报刊上，电台中和中央文件里，虽然始终只批判“一小撮走资派”，但它所列的那些“走资派”特征，在基层群众看来，在造反派看来，却几乎是全部“当权派”的特征，因而由中性的“当权派”变为贬义的“走资派”，并不隔着万重大山，相反是轻而易举。故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从组织上依然大权在握，但在精神、舆论上却已开始垮了。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到底将会如何

发展下去。我们薄薄的一张纸封条，因此可以封住了据有无上权威权力的中共党支部办公室的桌、柜、屉，真的谁也不敢动。我参加工作时头几个月曾呆过的 K 摄影社，其党支部的办公室当晚也被我们封了。当我带了“红色支队”的人去时，睡在办公室的 B 书记非常吃惊，尤其看到我是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时，更觉得困惑。我想，他一定想不通，一个他本着意信任培养的“革命接班人”，为何几个月之后，竟然造起他的“反”来了。我见了 B 书记，也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他曾是我的领导，而且还打算培养我作“革命接班人”，虽然，我对他前段打“小三家村”时的整人是颇不平的。开始，我想回避他，让支队其他人去与他周旋。但一般成员却唬不住有着多年政工经验的 B 书记，大概也是 B 书记见我这个当头头的，原本只不过是手下的小青年，因而对我们要封办公室的行动拒不买帐，相反，还略带威胁地说：“你们好好的冷静想一想，你们要封的办公室是什么办公室，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办公室！这样的行动将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后果！！”几名造反队员来到站在办公室外等候的我跟前，向我诉说了里面的窘境。我一听，火了。冲到办公室，冲到 B 书记面前，说：“B 书记，销毁黑材料，这可是中央的指示呀！你莫阻挡我们的革命行动为好！”

“中央没有指示直接到我这里来，我只能遵循组织原则，公司党委和局党委没来指示前，我不能销毁任何材料！”B 书记并不示弱地回答。“党中央的指示，走资派不执行，那是当然咯！所以我们才造反，我们来执行！”我说话的声音故意大起来，以图气势上占便宜。但 B 书记仍不买帐，坚持我们无权封他的办公室。我见此，便拿出杀手锏，指着 B 书记第一次直呼其名大声吼道：“BXX，你莫嚣张！你在‘K 摄影社’整黄 XX、朱 XX 的老帐，整了那么多人的欠帐，我还冒同你算，你今天是这样搞，明天我就把我们红色支队的人，还有一批大学红卫兵都带来，彻底跟你算一算，看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有几时！”B 书记本来白皙的脸，刹时更为惨白。数百的人涌到他治下的单位来，他能受得了吗？何况还会来大学生红卫兵。终于，他退让了，“红色支队”大印盖下的封条，终于牢牢地封住了他办公室的每一个抽屉、柜子。公司属下各个党支部都将情况报告给了公司党委，祈望公司党委给予指示。但党委除了向上级局党委请示外，并无任何办法。曾 XX 与我商量，认为不向公司党委“开炮”，下面各单位党支部便不会有主动为“右派”们平反的动作。于是，我们几个人找到公司

党委会，扬言如果公司不下令让各单位党支部给被整为“右派”的人平反，我们就要封掉公司的各个办公室。公司党委书记 Z，一个南下老干部，却平静地说：“你们封就封吧！如何开展平反工作，我们作不了主，上面还没有具体指示。”Z 书记的话，激怒了我们。第二天，我们带了“红色支队”所有能来的的人，涌进公司机关，除了业务科室外，将所有的办公室的桌柜一股脑全封了，迫使全公司机关党政工作停摆。对此，公司机关干部们不论他们心存何想法，在行动上却一律听任我们“封”。而且在几十名机关干部还趁机成立了一个“东方战斗队”，刷出大字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中，有三名也是“九月报告”后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同时，我们在公司机关内外都刷满了大字报标语，其中有第一次写上的“打倒我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ZXX！”的横幅大标语。打倒党委书记！公司上上下下都震动了。不仅公司机关干部，而且下面单位的干部、群众都跑来观看这些大字报、标语，看一看我们这些被视为“吃了豹子胆”的青年人。终于，一迭迭将普通群众、干部打成“小邓拓”和“右派”的所谓“黑材料”，在我们的猛烈压力与整个社会造反形势高涨的敦促下，公司政治处和各单位党支部被迫将其交了出来，分别召集大会，公开当众予以烧毁。对此，不仅那些因莫名其妙一些言论、文字便被打成了“小邓拓”“小吴晗”的人，那些因支持过湖南大学红卫兵八·一九行动而被打成“右派”的人都非常高兴，而且，使整个公司大部分群众都非常兴奋。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意外：一贯是神圣不可侵犯、威严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居然被我们这些年轻人“镇住了”，从来就不敢说也不敢想，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还会“出现冤枉人的事”，居然也由我们说出来并敢这样轰轰烈烈地逼迫党委予以纠正了。这一切，使人们都一下子对我们肃然起敬或起惧了。大批的老工人公开的找到我们“红色支队”或下面“小分队”办公室，诉说他们曾经有过的或感觉上心理上存在的冤屈，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主持公道讨回公道。一个老工人声泪俱下告诉我，由于他为了一件小事曾与单位经理吵了架，结果，那位经理兼党支部副书记竟然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要将他打成“坏分子”，幸好那次运动历时短暂，没有斗坏分子的任务，他才幸免，但在一九六二年动员一部分职工离开城市下乡去当农民时，他的妻子则在他们夫妻自己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被强辞工作，列入到“退职下乡”的名单上，至使他妻子至今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困难至

极，全家五口人没有一件衣不打补丁。还有几个老工人向我控诉，他们因为平时打牌、喝茶等娱乐较为密切，他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看不顺眼，则在职工大会上严厉指责为“组织小集团”，扬言要叫公安局的人来侦查，结果，吓得他们数月战战兢兢。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多很多，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十七年中，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无疑在工作方法或工作动机上，会有不少的失误和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那些由此而遭受某种不同程度伤害的普通群众，或只是自我感觉到由此而心理受到伤害的群众，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申诉与发泄不满的环境和渠道，而只能长期压抑在心里，现在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造反有理”这个大气候好机会，终于，十七年中积聚下来的怨气，一下子喷了出来。只要是批判“当权派”，是造“当权派”的反，相当多的群众此时便天然地站到了造反派的一边，即便自己不敢出面参加，从心底却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我顿时成了一个受崇敬的人，许多是属于我的父辈的老工人，都对我表示出种种亲切感，也非常的尊敬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商店去参加那儿由十几个老工人组织的会议，我一进会议室，他们竟“刷”的一下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鼓掌欢迎我，使我大大地受宠若惊。当他们就如何发动全体职工群众以图举行一个批判他们单位党支部书记的大会的问题，在做法策略上有分歧时，便请我为他们“作出指导”，在我谈了自己支持他们中某一方案的意见后，原持有其他方案的人，马上声明放弃原有方案，而全力服从我表示赞成的方案。看到这种局面，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份量。我始终并不以为自己是个有才能的人，只是愿意认真干点事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实为“时势造英雄”那句千古名言所揭示的道理。烧毁那些“黑材料”的行动，一九六六年底是第一次，我以为从此再不会无缘无故整人为“右派”“反革命”而置人于死地的作法了。岂不知我大错特错了！在这以后的十年当中，整人的所谓“黑材料”顽强得很，烧一次，又整一次，又再烧一次，却又再整一次……弄了好多次，直到如今，文革至今有三十多年了，仍还塞在了很多人的档案袋，厚达尺余。可见，尽管是令人早熟的年代，十七岁的人，毕竟还是很幼稚的。不过，第一次烧毁“黑材料”的“壮举”，一下子提高了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威望，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初，我们支队已拥有千多名成员了，公司三分之一的员工都成了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队员。我们“红色支队”办公室配备了扩音器，高音喇叭，油印机等宣

传设备，还弄了几辆当时还非常贵重的自行车，作支队委的交通工具。当然，这一切全是逼迫公司党委书记签字批钱买来的。我刚参加支队时，还是利用业余时间来活动，而现在，我们五个“支队委员”则全部是“职业造反派”了。由红色支队写一个“借调令”，盖上大印，交到我们厂里党支部书记手中，我便不用再去厂里上班（工资却可照领），而一心一意来造反了。而由一个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开具的这种“调令”，居然也有了一种行政效力，各单位管理部门也予以了默默认可。这事，真应了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句名言：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与此同时，公司系统先后还成立了几个造反组织。在当时社会上有多少造反组织，各厂矿、公司、机关甚至学校里，就会有多少他们的分部。一个单位的群众，全部参加一个统一的组织的事，是没有的，多多少少总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名称的组织同时共存。在一九六六年底时，我们公司的造反派不仅在影响上已控制了公司，而且在人员上也已占了大多数。我们公司除了“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外，第二大的组织就是“东方红总部”的分部，其亦拥有几百名成员。我们公司机关及各单位办公室的一些干部，则是竖起“市级机关干部造反司令部”分部的旗号。我们这几个不同旗号的造反组织，经过一番协商后，又在公司系统内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联合协议中注明：几个组织在本公司内部都隶属于这“联合指挥部”，服从统一指挥。但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则不受“联合指挥部”的约束，而各自听从各自组织的调遣。曾 XX 被推举为公司“联合指挥部”的主任，因为我们“红色支队”不仅势力最大，而且是最先揭竿造反的组织，颇受其他组织的尊重。我则亦成了“联合指挥部”一名“副主任”。一九六七年一月，得到中央支持的上海“一月风暴”即造反派夺权风暴开始了。我们公司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也象全国的造反派那样，从此由起初的求平反、索“黑材料”而造反的行动，也开始步入了文革中的夺权风暴阶段。

第七章，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记事

二月四日晚十点，我与我们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小李，在支队办公室誊抄完一批大字报后，感到有点儿饿了，便决定上街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到街上遛达遛达。虽然已近午夜，长沙市的五一大街等处仍热闹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涌腾，或围观趁夜刷出的新标语、大字报，或挤围在“湘

江风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传车旁，对慷慨激昂的宣传车广播，或以鼓掌欢呼表示赞同，或以嘘声甚至掷石块砸宣传车表示反对。

由于驻长沙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北京红卫兵是支持“湘江风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属于“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因而，在大街上的实力较量，“高司”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劣势。他们新贴上的标语大字报，很快被人撕掉或复盖，声音宏亮的宣传车喇叭，不时遭到石块的掷击，有时周围群众起哄的嘘叫声还会压过宣传车的广播声。

此时的大学生红卫兵的状况，竟似乎又跌回到五个月前的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时那种景象。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围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围攻他们的工人，是市委调来的“赤卫队”，而此刻围攻他们的却是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了他们的工人，也是他们曾千方百计呼吁为其平反，唤醒他们帮助他们举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每每目睹和回想这种情景，便令人有一种历史的悲哀感。

在围观中，在欢呼中或唏嘘声中，不知不觉，临近午夜十二点。我与小李觉得疲倦了，便从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们“红色支队”队部办公室去睡觉，那儿有三张床，供我们休息之用。突然，一辆从湘江西岸驶过来、在车头上挂着“高司宣传车”牌牌的宣传车，沿着五一大街，在缓行中以异常宏亮的声音广播着一条令人惊骇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来电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众。全军文革办转，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大街上的人们，全被这条消息镇住了。一时，没有了鼓掌欢呼、也没有了唏嘘喊叫，大家全静静地在听这辆宣传车不停在重复广播这“最新消息。”我站在马路上，象被钉住了，惊愕得好半天还回不过神来。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满脸困惑，神色紧张在问。

“不可能吧？”我也不知该怎么判断这事。

大街上“高司”的宣传车随即用洋洋得意的标准普通话，大声地反复播送这条消息。几分钟后，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发出喊叫声：“‘高司’在造谣！”“‘高司’胡说八道！”随即这些喊叫声迅速扩展为如雷鸣般的呼喊：

“‘高司’造谣！”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谣，罪该万死！”

“打倒‘高司’一小撮坏蛋！”

“打！打！！打！！……”

那辆最先广播“最新消息”的宣传车，一下子被愤怒的“湘江风雷”派群众围住，咒骂声，石块声直冲宣传车，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车，扯断了喇叭电线，使宣传车广播顿刻哑了。我很高兴，心想，说不定真是“高司”造谣，不然，早上七点就来了批示，怎么一整天还没有见什么意外变化。

“过去看看！”我朝小李说。

在我们正准备跑过去看那被愤怒的人们猛砸的宣传车时，一辆辆解放牌绿色军用卡车却突然驶来，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处停下。随即，从车上跳下一批批红领章红五星的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五六式步枪的刺刀一律打开，寒光闪闪。象一股强大的寒潮，顿时将五一大街的热闹气氛冻住。大街上的人，都惊骇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停止了一切行动，停止了一切声音。我又一次惊骇得立住了僵硬了的腿。

大街上仿佛只剩下士兵们列队荷枪跑步“蹬蹬蹬”的声音，打开刺刀和枪栓的“哗哗”响声，以及军官们下命令的威严叫唤声。

“真的抓人了！”好一会人群中终于才有人敢低声说话了。

这低低的话音，亦如一股寒流，刹时将周围人们的心灵迅速冰冻。荷枪实弹的士兵并不理大街上的人群，只是显然有计划地朝各自的目标奔去。五一大街两侧凡驻有“湘江风雷”组织分部、战团、支队等基层组织的招待所、机关、饭店，统统被士兵包围，然后，冲了进去。大街侧有几条通往“湘江风雷”总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士兵们封锁，不准任何人再进。五一大街临街有一座旧教堂，现已是由“湘江风雷”派的一个青年组织驻住，威风凛凛的士兵们很快将旧教堂包围，在大街对面，甚至布有几挺轻机枪，对准教堂的大门。一会儿，冲入教堂的士兵，将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来，在枪刺如林的教堂大门前，把这些青年人推上了一辆早已等候的囚车。

一个年龄比我大佩着“湘江风雷”袖章的工人，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一幕的我，从麻木中唤醒。“快到那里去！”他轻声

对我说，同时嘴角朝大街边一座公共厕所翘了一下，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与小李随他一道迅速跑进了厕所。厕所里，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并不讲话，有的人则只自个低声地咒骂着，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将自己臂上佩的“湘江风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风雷”布符号迅速取下，塞进自己口袋里，有的则干脆将袖章、符号统统扔进了厕坑里。

“丢不丢？”小李拿着已取下的袖章问我。

我有些舍不得，同时也觉得将袖章丢入厕坑太损我们的形象。

“藏好！”我对小李说。

我们将袖章塞进里衣的口袋，然后装着若无其事似的走出厕所。

突然涌来的数辆“高司”的宣传车，欢快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那辆被围观群众扯断电线的宣传车，喇叭也恢复了宏亮的声音。此刻，回荡在大街夜空下的声音，只剩下了一种音符：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批示！”

“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

“绞死叶冬初！”（湘江风雷一号头头）

“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

“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

几辆“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被解放军士兵扣押，临时改作了囚车。属于“湘江风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则都停车熄火，一声不吭地停在马路边，车上的宣传人员围站在车头前，闷声不响地看着“高司”宣传车劲头十足在大街上抖尽威风。

一个个“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被捣毁，一批批“湘江风雷”的人员被拘押，推上不断增加数量的临时囚车。看着这一切，我异常的痛苦，也非常紧张，更有一些害怕。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面对的都是象自己一样的普通群众，或学生，或工人，或干部，却从来还没有面对过解放军，而且是这样杀气腾腾荷枪实弹的士兵。此刻，这一切都如从天降，不仅出现了军队，而且枪口、刀尖都是对准了我们“湘江风雷”，甚至是由我们无比崇敬的中央文革小组下的命令！我的脑子

显然一下子容纳不下这一连串突然出现的问题，于是乎，我只感到晕沉沉，昏乎乎的。

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中，也出现了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重复着“高司”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并向“高司”的宣传车和跑步而过的解放军士兵，均报以热烈的如雷震天的掌声。这些群众，除了少数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数则是原已瓦解不复存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湘江风雷”一下子变成了反动组织，他们顿时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二十多天前，当“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借着《红旗》杂志那篇评论之势，踏平他们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之时，他们只有愤恨，却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们竟突然间找到了这样一个发泄愤恨的机会，如何能不兴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号中，他们自发地加二条：“坚决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决定丢弃暗藏的“湘江风雷”袖章。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大街上已有士兵在开始盘查普通的群众。但是，我现在还不是躲的时候，我试图通过一条只能并肩走两个人的狭窄巷子，插到我们支队部办公室看一下，因我们支队部是在一个商店楼上，外面没有明显标志，而唯一一面悬挂在窗口的显示“湘江风雷”组织的红旗，在傍晚已被收了进屋。因而，我想，现在大概军队还不会发现它，趁天亮前，我们可以将那儿的扩音广播设备和一些物资转走。我和小李悄悄乘人们不注意时，将袖章塞进了大街边的一个邮筒里，然后，如释负重地走开。

小李建议先去大街附近的“胜利”摄影社打个电话，探一探支队部的情况，以防万一。我觉得考虑有道理，于是俩人就先到了“胜利”摄影社。熟门熟人，瞿凯旋开门，亲热地迎接了我们。虽然瞿凯旋他们没有参加“湘江风雷”，而是属于“东方红总部”组织辖下的摄影专业造反兵团，但由于我是公司系统最早参加造反的负责人之一，又是红色支队的头头，特别，我还曾是“胜利”摄影社的职工，因此，我每次去“胜利”都会受到他们热情友好地欢迎。

象瞿凯旋这样睡在店里的人不多，大家都没有睡，正坐在宿舍里议论今夜的事变。我的到来，使他们更没有了睡意。我到办公室拿起了电话筒，一听，奇怪，没有一点声音，我对瞿凯旋说，是不是这电话坏了？

“那不可能吧”。瞿凯旋说着拿过话筒听了听，也一脸困惑。

我们又到营业厅那个电话机旁，拿起话筒，一听，又是寂然无声，我使劲用手拍打话机，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怎么这么巧，电话都坏了？架着一副黑宽边眼镜的庞达明走过来，拿起话筒听了听，便断然地说：“不是电话机坏了，而是电话被切断了！”庞达明是“胜利”摄影社的一名摄影师，比我大七、八岁，现在他是“东方红总部”摄影造反兵团的一个头头。他的话一下子使我顿悟。既然今夜军区要采取这样大的一个行动，他们还会让“湘江风雷”的人使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以通风报信而逃跑吗？显然，电信局接到了军区的命令，截断了市内全部电话。我无可奈何，丢下了黑色的电话筒。当我决定仍冒险去支队部察看一下时，庞达明、瞿凯旋他们坚决劝阻了我。认为这个险没有必要去冒，不如在这里休息，待天亮后再见机行事。

这样，我就于“胜利”摄影社摄影大厅内舒适的沙发上，躺着度过了二月四日夜里（实际是二月五日凌晨）的最后几个小时。从而躲过了个人的一次灾难。因为，凡是当天夜里在“湘江风雷”组织所在地方被军队捕捉的“湘江风雷”人员，一律被投入了监牢或临时拘留所。

第二天，恐怖依然笼罩在“湘江风雷”组织人员的头上。大街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地穿来穿去，进一步地查抄“湘江风雷”组织。高大一点的建筑物顶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如临大敌般的武装士兵。街、巷中的封锁虽已解除，但捕人的汽车停在马路边，仍到处可见，不时还可见到一队士兵押着一、二个已被五花大绑的显然是“湘江风雷”头目的人，走向那囚车。

大街小巷的标语，几乎已全部更换成“高司”派的了。在“坚决拥护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的标语上，“湘江风雷”字上已被划了几个大红“×”，以示判其死刑。“高司”一派的宣传车继续兴高采烈地欢叫着，庆祝他们的胜利。“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自然已不复存在，就连“湘江风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亦不见影子。

除了公开的“湘江风雷”总部及几大分部、战团的地点外，对于各单位的“湘江风雷”组织，军队似乎并不太清楚，连“高司”的大学生也不清楚。但，各单位却曾有过“红色政权保卫军”或“工人赤卫队”组织，这些垮了台的保守组织人员，眼见向包括“湘江风雷”在内的造反派报仇雪恨时机来临，于是，不用号召，不用鼓动，他们都自动积极地去为军队的士兵充当耳目，反映情况，甚

至带领士兵们到本单位一一指点“湘江风雷”人员。这一来，很多“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负责人都这样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组织的人，也被原保守组织人员领士兵抓了来，因为他们被说成是“湘江风雷的外围”。幸亏，负责收容的军队指挥官严格执行只抓湘江风雷头目的命令，才当即被甄别释放。军队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过了昨夜突然行动的数量，以至长沙市各类监狱都再关不下人，只好将两座电影院征用，临时改作监牢。后来的资料表明，那一天，省军区已在湖南省全省同时行动，共抓了上万人。

我与小李一早便离开了“胜利”摄影社。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多少是个支队负责人，应该到支队部去看看，与钟队长他们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办。虽然一路上还见军队在抓人，但我仍抱着侥幸心理。一则，中央文革批示说是对“湘江风雷反动头目”采取专政措施，我们几个虽也算小头目，但自信不属“反动”之列；第二，马上逃跑一法，似是不能采用的，否则，当了个逃兵，今后你还有什么可以号召人的形象资格呢！

一进支队办公室，时年 24 岁的支队长钟有新，及其他几个支队委员都已在了。一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互相问安，并告诉各自昨夜的惊心动魄经历。支队办公室依然如旧，并没有人动过的痕迹，显然军队士兵还没有光顾过这里，大家不由很有些庆幸。对于中央文革的批示，我们很是愤愤不平，认为一定是省军区汇报了假情况，才导致这个结果。同时也抱怨“湘江风雷”总部的头头们，为何没有积极向中央文革反映，使中央对我们有客观了解。

钟有新说：“事已如此，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赶快想办法，看我们怎么办？”

组织委员老易建议，我们赶快发声明，退出“湘江风雷”。

钟有新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同意老易的建议，同时提议，声明退出“湘江风雷”后，再成建制地将我们红色支队去参加“东方红总部”。“东方红总部”是我们一派的，中央文革批示没有牵涉到她。这样，我们公司这支造反力量就不致被摧垮。

支队委员们都赞同我的提议。但钟队长摇头。他说：“今后难保‘东方红总部’不受牵连，这些社会上的大组织，对总部的头头的情况，我们都不太清楚，万一他们出了问题，又会牵连到我们，我看，我们一个也不参加，马上声明退出

‘湘江风雷’，我们这千把人的造反队伍，就在本单位独自搞一个组织，反正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精神造反就是，这样，谁出问题都牵连不上我们”。钟有新队长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至少，目前是可行的，大家都赞同他的方案。老易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我去把办公室外那块‘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取下来再说”。说罢，他就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一队红帽徽红领章草绿军装的士兵，突然威武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象从天而降似的，挡住了老易。我们都惊住了，火烫了屁股似的从座位上忽地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士兵们冲了进来，刺刀尖和枪口对准了我们，并连声高喊：“一个也不准动！”“谁敢动，就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当然不敢动。一个军装有上下四个口袋的青年军人走了进来。他腰间别的是手枪，显然，他是一个指挥官。他威严地怒目横扫了我们几个一眼，大声问：“你们是不是‘湘江风雷’的？！”

“是‘湘江风雷’下面的一个支队。”钟有新队长答。

“‘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你们知道吗？！”那个军官又厉声问。

“已经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钟有新说。

“知道了就好！”青年军官满意地手一挥，并朝周围的士兵命令：“先押到外面去！”

我们一共五个人，被押到办公室外面站着，三个表情严肃的士兵仍用他们手中的枪口和刺刀尖，对着我们。

在被押出办公室的一瞬，走在最先的老易和我，看到了二个熟悉的人，他们是我们公司原‘赤卫队’的负责人。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这儿，不料我们很快被押出办公室，看到了他们，一见我们出来了，他们稍有些面显尴尬，连忙“蹬蹬蹬”急促下楼走了。显然，士兵是这二个人领来的。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搜查的士兵，在青年军官的带领下都从办公室出来了，“湘江风雷”的旗帜，袖章，印章，名册宣传资料以及那块还未来得及取下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都是他们的战果。二个士兵还将扩音机、喇叭都抬了出来，我对他们低声说了一句：“扩音机、喇叭是借了我们公司的，不是‘湘江风雷’发的。”青年军官扫了我一眼，便扭头对那二个士兵说：“不是属于‘湘江风雷’的东西，就不要拿！”二个士兵又顺从地将扩音机喇叭抬回办公室。

青年军官命令我们五个人站成一排，逐一审问我们。

“你是什么职务？”他问老易。

“支队委。”老易答。

“你呢？”青年军官又问我。

“副支队长。”我连忙答道，心脏则“扑扑扑”猛跳起来。

他上下细细打量了我几下，没有吭声，又走过去问钟有新：“你！？！”

“支队长。”钟有新沉着地说。

钟有新的话刚落音，青年军官扭头手一挥，同时厉声命令：“把他捆起来！”二个士兵闪电般冲过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一下子就将钟有新紧紧地捆住了，推到另一边。钟有新并不反抗，因为深知反抗也无益。青年军官在问过了小李和支队联络委员小罗后，又转脸朝我们四个人扫了一眼，并问：“你们中谁姓易？”

“我姓易。”老易连忙答。

“是不是负责组织工作的？”

“是。”

“把他也捆起来！”青年军官又指示身旁的士兵。

“请你们告诉我堂客一下，要她莫急……”老易连忙对我们喊。

“叫什么！不准讲话！”一个士兵用枪托朝老易腰上就是一下，并吼道。在士兵们捆绑老易之时，我更觉紧张，同时也有些羞耻的感觉，因而竟然向那青年军官说：“我是副支队长，请问，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们去？”

青年军官望着我，好半天没有吭声，只管上下打量我。

“你多大了？”他终于问，但口气明显温和。

“十七岁。”我诚惶诚恐地答。

“算了！你可以不去！”青年军官微微抿嘴一笑，用手朝我一掸说。

在将钟有新和老易押走时，那青年军官对我们剩下的三个人说“你们的支队要马上解散，再不能参加‘湘江风雷’的活动了！否则，你们会倒霉的，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们连忙答道。

看到钟队长和老易被士兵们押走，小李长长的嘘了一口气，我则既觉一身轻松，但又时而心情沉重“老易只不过队委，我却是副队长，结果，没抓我倒抓了他，人家会怎么看我呀？议到老易被抓的事，我们都认为肯定是公司里有人告了密。“不然，为什么那个解放军单单问我们谁姓易？”小罗分析说，“肯定是那

二个带路的家伙点的‘水’！”我想，大概老易因为是老工人，在我们“红色支队”负责人中年龄最大，无疑，公司里对立的保守派人员会认为老易是真正左右我们支队的的主要人物，因而把矛头刺向了他，而实际上，老易在支队委中，却基本都是听从钟有新和我的。将老易抓去，实在是冤屈了他。

我们的“红色支队”顷刻垮了。支队部被公司机关造反派“东方红战队”接管，“夺权委员会”也张贴了拥护中央文革打倒‘湘江风雷’的标语，同时，宣布将钟有新和我“开除”出“夺权委员会”。我的同事阳金河、侯川江也被他们机修厂“夺权委员会”开除。他们俩也险些被抓。告密者带来一队解放军士兵，面指阳、侯是“湘江风雷反动头目”，士兵们绳索都准备好了，幸亏为首的军官问清了阳金河，他们机修厂的“湘江风雷”组织不过是支队下面的一个小分队，而军官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支队长及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头头。”因此便使阳、侯幸免。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运动让我们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原是一个军人，他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即为广州军区副政委。而就是这个大军区副政委的身份，让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在线的人，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牵连。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为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跌入了灾难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

卜占亚出了问题，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连、上联下串的运动形式惯例，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而当一九七四年初，全国性的“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的大规模运动后，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转为公开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亚”活动了。

在湖南省会的长沙市做了较长时间的市革委会主任的景林，也是军人，他是省军区的副政委。当时，省、地市、县革委会的一把手，大多是军队干部，所以，人们对卜占亚、景林这二位省与市革委会的头头，平日不论是开大会作报告，或是私下谈及他们二位，都是不称“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称之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为，卜占亚不可避免是景林的亲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舆论，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号，扩展为“批

林批孔、批卜揭景”，将求翻身而再次造反斗争的锋芒，重点放在了卜占亚与景林这两位“副政委”身上。

当时，已没有什么造反派群众组织了，原来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成立革委会前后，早已被解散了。那么，造反派们是如何集合而来再次进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将各单位的原造反派积极分子骨干分子汇集起来，重新聚集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活动力量。第二，则是再次让大字报发挥舆论作用，以呼唤与联络造反派成员、影响“批林批卜”的形势、并藉以公开向中央传递造反派的信息。

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便是利用了一个名为市“工代会”的组织，并在实际中，使市“工代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造反司令部。所谓“工代会”，全称叫“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组织时，按中央指示，将工人造反派都统一纳入到新成立的“工代会”，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总工会”，使“工代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会组织。所以，尽管解散了所有的群众组织，也经过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而整肃了所有的造反派，但这个“工代会”机构却仍保留下来了。weng ewang.org 不过，由于因应如何将“工代会”代替工会的操作办法与政策，中央一直没能够下达，因而，这市“工代会”无事可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而仅仅在市革委会大楼的后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留有二间临街而不大的办公室，挂着一块小小的“市工代会”简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员守在那儿。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这二间小小的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造反派头头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这“工代会”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员什么的。因而，他们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顺地集合到了这个小小的“工代会”办公室，将这里变成了进行再次造反活动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大字报也上街了。当然，大多是造反派们所为，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内容则将他们整肃造反派

时发布的指示与讲话，抨之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由于有“批判林彪路线”这个旗号，加上当时对于卜占亚的问题，是由上面“端出”而并不是由群众揭发出来的，因此，对于造反派们的这次反击，省市市委与省市革委会的当权者们便不敢随意镇压，而任凭造反派暗中串连与大字报公开上街。加之，毕竟文革初期那次由于镇压学生红卫兵而后导致了他们挨批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央没有对这类问题处理的明确指示下达前，他们显然会认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旁观而不动作。

那段时间，我也是市“工代会”那二间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时，都想到那儿去看看、听听，有时也与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们，讨论对时局的想法与应采取的行动起来。在那襄，我是一个最年轻的人。因为，各单位造反派工人的头头们，当时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龄了，而我却只有二十出头不远，所以，在“工代会”聚会的造反派，都以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红卫兵。我告诉他们，我已是一个有着八年工龄的工人，并且曾在几千人的公司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时，大家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们都看到过我在这段时期所写所贴的大字报，于是便视我为“会写文章”的知识青年，也误认为我是一名前红卫兵。毕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仅以普通成员参加“青年近卫军”那件社会活动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在本单位搞造反，与省市级的“工代会”头头们基本没有多少往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我写的并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张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在文革初，他一场“抓右派”的报告，曾让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与干部遭到了短时间的厄运。造反运动开始后，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们批斗的重点，后来，中央将他召到北京，检查几年后，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大字报贴出后, 也有朋友为我担心: 因造反, 一九七〇年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整, 现在又造反, 结局那将会如何? 太令人不安了。我当时似乎想通了并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 与其这样像一个准“四类分子”般的生存, 不如拼他一把, 以争得应有的人权。何况, 我也觉得, 这道理似在我们一方: 我们闹造反, 不是毛主席与党中央号召的么? 不是有那么多中央文件与毛主席指示为证么? 可是, 为何却又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 而整治反派者, 实际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我的活动与所写大字报的影响, 使我不知不觉成为了一批造反派活动分子的负责人。因为, 我们不仅常聚会于市“工代会”的小房子, 而且更多时间, 是在原市委大楼的第六楼大礼堂召开几百乃至数千人的大会, 宣传鼓动批判卜占亚与景林。因此, 我便被人认为是所谓“六楼派”的骨干分子。那时, 原市委大楼的六楼礼堂, 空着的时间很多, 我们到那儿召开大会, 市委办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们, 任由我们活动。而我们这批被称为了“六楼派”的人, 在当时, 实际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开反击的先锋部队。我们有时写大字报, 或者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大会通知时, 落款署名则为若干个工厂企业单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称的企业, 实际有的只来了几个人, 甚至是只有那企业的一个工人或干部, 但却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业名字。因而, 几百名“革命工人”举行的大会, 却能在大字报上列出上百个企业单位“参入”者的长长名单, 让全市有名气的工厂大企业几乎统统出了场亮了相, 气势顿时显得非凡, 让其它未入会的造反派们信心大增。自然, 这也使当权者们感到了不知所措, 也不敢轻易予以弹压。w

engewang.org

对这套无师自通的组织宣传办法, 及其产生的积极效应, 我们这些领头者都很得意。文革后, 有次我读中共党史资料时, 看到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 是原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唐宏经, 写他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那二个月中, 凭他一个人单枪匹马, 竟一下子将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万工人组织了起来, 并迅速搞成了一个受到抗日的苏联红军占领当局承认的市总工会。仔细看他那组织速成法, 原来竟就是像我们这“六楼派”的做法一样, 不, 应该说, 是我们的做法, 竟无师自通地与工人运动老前辈唐宏经的套路相同! 那时, 唐宏经也是将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 并要他们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 然后由

他集合领导，并宣布凡来参加这工人集会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厂企业的工人，哪怕那企业仅仅来了一个工人。然后，唐宏经以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名义，向苏军当局申请成立市总工会。见有那么多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参入，苏军当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组织起来，于是，立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总工会的名义，自然很快几十万工人便被正式组织起来了，成为了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在东北公开成立的强大市级工会机构，从而使来“接管”旅大市的国民党人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想不到，几十年后的我们，无意中也就学会了这种工运组织速成法。

由于我们的活动实际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锋，所以，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如连续做了第九、第十两届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勇、叶卫东，市革委会的副主任许新宝等，都关注到了我，并让我参加了数次全市造反派头头的秘密会议。由于我是当时与会的造反派头头中最年轻者，又是当时活动影响很大的“六楼派”负责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评，也让我由此而结识了湖南与长沙市几乎所有闻过名的造反派头头，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长久的朋友。

无疑，我的活动也纳入了官方关注监视的范围。不过，在当时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发生的种种“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之际，官方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为难。只是，每当在我们举行什么大会或活动而显得过激时，有时会有人悄声向我做些劝说，并且，他们也告知我，他是市委办公室的人。这是由于，当时调到长沙市的市委张书记，原本就是一个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亮相干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却也不希望出现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里的指责。所以，有时候，他仗着他曾支持过造反派、受到过省市造反派头头们尊敬的地位，竟然会带着市委干部们上街撕我们贴的大字报，别人不敢撕，他就带头第一个撕。我们开大会，他则带着一群市委办公室的干部们，像我们造反派曾对付当权派的会议那样，让人上台制止我们的会议进行。他的行为曾让我们为难了一阵，很是恼火，有的人还气愤地说：“干脆将大字报贴到张老头(指张书记)的家里去!看他还撕不撕我们的大字报。”与他斗吗?他确又是一个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省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不同意。任其带头撕我们的大字报、中断我们的大会?却又损害了我们极力想点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计划。后来，只好用派人缠住他的办法对付他，一

贴大字报，一开大会，就布置了专人，若张书记一出场，这些专人就会上去缠住他，让他无所作为。wen gewang.org

现在想来，张书记当时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们再出什么事。可是，他没想想，我们这么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次陷入了类似四类分子们一样的境况，不再次奋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吗？文革以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经验，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奋力落实，是没有人会主动为我们考虑的，当权者大多数都是曾被我们造过反的领导干部，他们岂会喜欢看到我们平反的结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实际也是有时效的，该落实时你不落实，等过一段时间，这指示就不能再办了。所以，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胡勇说了一段话总结：“落实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场篮球，是有时间规定的，在场上你不用力，到时，哨子一吹，散场了，什么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过了期，就会作废！”所以，我们对张书记既尊重他，但也绝不会都听他的。

张书记曾两次派人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既为了解情况，更是为劝说我们，不要使他为难。我们当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冲他，也不能听他。不过，据我看来，张书记的确是个厚道长者，说话很直率，说得不对，你批他，他会先同你争辩，但他若觉得自己确不妥时，他又会当面向我这些后辈道歉。就是我们直呼他“张老头”，他也不恼，还笑眯眯的。当时，张书记自然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他被夹在了中间：对我们弹压不力，省委则批他；对我们做过分了，他于心不愿，并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们，加之我们有时也会攻击他、敲打他。其实，当时，谁处于了那个省会长沙市的市委书记位置，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下有负着冤屈而怒气冲冲的造反派，夹处在中间的领导干部，两头都得罪不起。[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所以，当时很多领导干部便以休病为名，自愿放弃领导职务，躲到医院里面去见机行事。四人帮垮台后，张书记被作为“四人帮”在湖南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开除了党籍、干籍，判刑七年，此后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后于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间，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想在出医院后，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当时这种状况，这种年龄，这种身体，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行走远方。他说，他自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后，又随军南下，便再没有回过老家，现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个地方。他从山西回长

沙后, 还向我馈赠了二瓶文水出产的酒, 说是他们文水的特产, 也是那首后来曾被热唱过一阵的《交城山》歌词中所说“不浇那个交城, 浇了文水”的甜水, 而酿制的。其实, 我觉得张书记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 他就是一个地委书记, 文革中, 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额外的提升, 还是做市(地)委书记。而且, 他那支持造反派, 也完全是想不想局面失控而出头来支撑, 并非什么卖身求荣。当时, 他若狡猾一点, 或者没那么重的责任心, 即便支持造反派, 也只虚于委蛇敷衍一番, 不真来出面为上级挺着, 那么, 他的结局反而不会那么惨。当时, 那么多休病的领导干部们, 后来都个个风光洋气,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与“四人帮”作了斗争。实际上, 他们是躲避了那场本应由他们出面维持力争使局面不乱的风暴。张书记当时若也像他们一样, 或假称病而住医院去, 或向省里请求调离长沙这个省会, 到远一点的遥远地区去任职, 躲开这政治风云, 那么他的后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无恙。张书记的山西老乡中, 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张是文水人, 而华则是文水邻县的交城人。(但是后来我从一份资料上看到, 说张也是交城人, 而我确记得张书记同我讲了他是文水的, 是我听错了? 或者还是张的家乡原是交城县而后又变动为属文水县的了? 不过, 无论如何, 张书记与华国锋曾是很亲密的“老乡加战友”了。一九四九年张与华一道南下到了湖南, 张被任命为湖南醴陵县委书记, 华则担任了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华后来上台做主席时, 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来大唱了一阵, 那歌中有一句词说“交城的山, 交城的水, 不浇那个交城, 浇了文水”, 而在张书记与华国锋二人身上, 交城的水, 可没恩泽于文水的张书记。他俩原来关系并不错, 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几年, 文革中, 华也支持过造反派, 一段时间, 是与张同属一个阵营的人, 对张在文革中的状况, 无疑是很了解的。四人帮倒台后, 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其实是很容易出手来救助一下张书记的, 随便发句什么希望减轻对张的处分的话, 湖南当局就会听从。即便非要处罚张, 也似可不搞得这么惨: 又是开除党籍干籍, 还要判人家的刑。至少, 应可不判刑而保留干籍, 让他有一个身份领工资、能公费住院治病而养老送终。然而, 华国锋却没有做这样举手之劳之事。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 除了我们这些人在市里鼓捣造反外, 另外还有一支力量也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 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纪某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 也是一个老造反派,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 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所以，他的造反积极性非常之高，而且，由于他也有很强的演说鼓动能力，故他在市里的建筑工人俱乐部内，便经常能集聚着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个“山头”与我们“六楼派”不同，他是完全凭其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搞成的集会，而我们的背后，却有着是中共中央委员身份与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头衔(当然，当时并无实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的系统支持。所以，当我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我们代表多少多少工厂企业的工人时，虽然不无虚张的成份，但的确也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发言，因为我们的身后真有省市级造反派头头的指挥。然而，纪某的发言，虽确也代表了全体造反派的利益，可是从组织性质来讲，他却只能代表当时参加他那集会的几百名与会者。可惜，纪某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派人同他去联系，希望两股势力能合到一起来，共同展开造反活动时，纪某却不愿。他一则认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等头头“太右”，而我们“六楼派”又是追随唐忠富等头头的；二则，他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开始，是重新进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一次新机会，而对他凭个人单枪匹马也能集聚这么多任务人的所体现的能力，可能自我评价过高。wenge wang.org 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乐部为他的“司令部”，单独进行造反活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毕竟与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时的形势不同了，毛泽东与中央都不会同意全国局势又发生混乱，即便允许工人造反派们活动，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进行，即在以党委、革委会的领导名义下进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级总工会领导名义下开展。由于当时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级革委会的成员，还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类职务头衔，因为，虽然“一打三反”运动将他们赶出了权力舞台，但由于他们的任职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后却又没有明确下文撤消过他们的职务，所以，他们即便已无实权而在做工人了，但凭这些虚衔，却可以在革委会中发挥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这一既要搞运动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出乱的精神，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们也愿遵照执行。纪某没有看到这一点，由于他是单枪匹马，故也看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精神，而我们通过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却能获知。因而，纪某组织的活动，常常不知进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过去的主观造反故事，结果，既不为当权的官方高兴，也不为正统的造反派头头喜欢。最后，一九七三年底，终于在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场之际，孤立无援的纪某，却被官方在正统

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动用公安，被逮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被抓捕关进监牢后，他所追求的愿望，即为受整受压的工人造反派们平反的希图，却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头头们的领导下，借已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讲话精神，大规模的开展进行了。而为此愿望也作过极大努力奋斗的纪某，却被以扰乱社会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结局终竟是“春来反雕残”，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息。

不过，除了纪某被打压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为首的原“汽电”派系的造反派集团，居然将原被他们打击过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团结统一起来了，以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头头不仅向“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那些头头做工作，让他们出山，并且，还向他们作了适度的自我批评，表示过去对他们有些做法“过了火”。由此，使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遭冷冻的造反派头头都得以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甚至，一些已入狱几年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头头，如“湘江风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头头沈桂华等，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设法，一度保释出狱(包括海司令在内的这批出狱者，后来因形势急变，而其问题又尚未迅速得以结论，有些则又重回了监狱)。这样，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动，便出现了一种造反派重组力量后呈空前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将一场运动称之为“斗争”，使人们不能不再次关注政局形势的走向。然而，让湖南的造反派们真正激动与兴奋起来的，却主要还并不是这篇《人民日报》社论，而是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传达下来的王洪文的一个讲话。王洪文作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间在中央所办的工农干部读书班中，对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或省一级机构负责人中的“群众代表”(即由造反派头头与各种有名望的工人或农民劳动模范)发表的一个讲话中，大力赞扬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并提出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还具体说了要提拔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做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以树一个提拔年轻干部的榜样。后来，果然，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大功的边防部队副营长孙玉国，一个三十来岁

的青年军官，首先“坐了火箭”，连升数级，很快被提升为沈阳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听到王洪文的这篇倾向明确的讲话，湖南的官方领导与造反派头头们双方，都觉得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沟通平台。于是，以造反派为先导、并大体上顺着造反派意愿的新一轮平反与批判运动，便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由省委与造反派共同营造，而轰轰烈烈地又搞了起来。

省委领导人自然从王洪文的讲话中，感觉到了某种份量。虽然，他们在心中，对王洪文不会有好感，但，此时的王洪文却不再仅仅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头头，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话，不再是造反派头头常常发出的虚张声势的“通令”，而已经是不能违抗的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了。对此，省委领导人又岂敢不听从何况，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对于刚回湖南重新担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的张平化，则根本没有任何责任，那全是卜占亚当权时的问题。大概，吸取了前次没有坚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场而结果差点被打倒的教训，因而，这次对造反派，张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免在这场新的造反运动中，又被挨批挨斗；加上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层意见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讲话精神，传了下来，便使张平化加大强化了顺从造反派的想

一九七四年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初，就出现了几乎是官方全体向造反派方面一边倒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并迅速落实解决为造反派平反的问题。甚至，如上文所述，对某些被关在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如原“湘江风雷”的头目王某与湘潭“红造联”的头头沈桂华，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之时，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们的要求，先将他们保外释放再说，“先下车，再出票”。

同时，很多单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采取了一种不对抗而顺从造反派的立场，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被他们整过的造反派们的报复。这一来，湖南便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各派团结、一致造反”而均都欢欢

喜喜的热闹形势。造反派们不仅能较为顺利地平反、再次烧掉单位整自己的“黑材料”、恢复革委会职务，还能入党；而保守派们则为自己能获得造反派们不予报复、也仍保留他们在整造反派时得到的党籍、干籍而不受威胁，与革委会曾将他们“补台”加入之事实的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们，则更为自己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斗，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轻轻松松顺利渡过这场新的造反运动而庆幸。

虽然，在大批造反派们加入中共党组织、并且有的还被正式提为党内的领导干部后，也曾引起过一些保守派公开表示不满，原“高司”派方面有六个人，也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还贴到了大街上，对当时省委顺从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见深表不满；并且，有人还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城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但是，这种公开的反对很微弱，在长沙市能够公开出头来这样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区则多一些），根本没会成为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潮流，而其标语，却常常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公开覆盖或撕毁。甚至，当时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以“穷志诚”名义在活动的保守派。

造反派们当然能从王洪文的讲话中领会到自己应该如何做，立马看到了下一步造反的“前景”：重新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解决平反问题就完事，也不是以单纯的“造反派”名义，而是要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掌权者的行列。不过，最初，造反派的我们，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解决的问题，只是要争取为我们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讨还基本人权。至于什么入党当官，开初则的确还没有考虑到。但，王洪文的讲话，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为自己平反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自己也去当中共党员，做中共的官员，以免以后仍还在掌权的“走资派”与保守派分子手下过日子，随时又有遭挨整的危险。

对此，造反派用一个策略性口号将其具体化，提出：借此东风，不仅要实现推翻“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镇压造反派的整条路线，使造反派再次予以获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泽东与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初曾提出过的“吐故纳新”，即将造反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分子、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到中共党内的方针；提出“只有从组织路线上，同时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保证从政治路线上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永远摆脱造反派总是挨整的命运！”这个策略的具体做法，便是迅速让各级党组织吸收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同时，将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文革中修改的党章规定，新入党者已不需预备考察期，入党即为正式党员，所以，造反派骨干分子入党后，即可进入党委领导机构。

造反派在操作这件事时，作为施行方针的团体力量，当然不能再搞群众组织“司令部”之类的山头，那样做决不会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党委同意，那造反派们欲实现的要求，便又只会遥遥无期。因为，当时，没有哪一级党委会喜欢造反派卷土重来，更不会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进入各级党委机构，实行变相部分夺权。虽然王洪文的讲话，来头不小，但对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驾轻就熟阳奉阴违的办法。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出现，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纳新”，就会在地方上成为一句空话。深深明白这一点的湖南造反派，于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搞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的机构，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由于这个“运动办”虽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却是党委的工作机构，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内各级“运动办”的运作指挥下，自四月份起，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荼展开了。这样，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级党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后，却又大批地要求做一个中共党员，有的还成为了党委会机构的要员。例如，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此时，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担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则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人们对当时造反派们既要造党委的反，却又要求做一个党员的做法，这个看似矛盾、也显得滑稽的事实，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运动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况，那便会绝对无法理解。当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

四人帮垮台后，全部被指责为“突击入党”，并宣布对他们的党籍，全部不予承认。

我也成了我们公司“运动办”的一名副主任。那时，已撤消了原来合并重组的新公司，仍以原来的体制还原了公司构建。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委与商业局党委发下了文件，对我们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然，公司前所谓“走资派”江山，也仍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做第二把手。同时，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我们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因是其它人的检举，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在看烧那些材料时，我很高兴，心想总算从类如“四类分子”的泥坑里跳出来了！但是，不知为何也有一种担心油然而浮：以后会不会又被再次打入另册呢？果然，没过几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装进了我的“档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册。

我入党的事，进展非常顺利。不过，对于入党这事，在三个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读书班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造反派，是谁都没有想到过事。因此，当长沙市委在市港务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头头入党的典范试验，甚至下发了一个要求积极发展造反派入党的文件后，我们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过的“吐故纳新”之风，真的又来了。

虽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但按组织原则，我的党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机修厂党支部解决。于是，我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党，于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党员。文革期间中央有新的规定，中共新党员不需预备期，入党即正式获得党籍，所以我一入党即是有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当然，我也知道，虽然我平日在机修厂的群众关系不错，但那些党员们，无疑，并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党的，之中，特别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干，以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入党的积极分子，让我这个造反派小头头入党，他们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当时类如文革初期造反风潮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大势，使他们又不

敢反对，或者是他们害怕，或者是他们也认为这次不能站错了队，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党的事，便无任何障碍。

我虽然被恢复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但此时我的兴趣却转到了共青团。当时商业局要筹组新的共青团委员会，因我时年只 24 岁，又是公司革委会头头，还成了中共党员，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新局团委的筹建，出面组织领导了局共青团的“运动办”，以与省、市共青团委的“运动办”对接。我便从基层单位挑选了一批有造反观点并有政治抱负又能说会道的共青团员，到局团委“运动办”工作，同时想将他们逐渐培养成局属各公司的团委书记。我的挚友聂常茂，是另一个公司属下一家豆制品厂的革委会成员，后来也作为造反派的优秀分子而入了党，他也被我邀请到局团委来工作，作为我的副手，一道筹建了新一届局团委班子。这一来，领导局共青团“运动办”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没有去打理公司革委会的事务。由于我有在社会上造反的经验，因此，没多久，我们商业局的新团委（我任主要负责人）及其“运动办”，迅速在市里与省里都创出了名气，省市级的造反派头头们都知道了商业局团委这支“不做小绵羊”的新红卫兵队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领导。因而，后来我被认为是造反派的“预备队”的代表及负责人，经常被邀参加省市造反派头头的核心会议。

不过，以批林批孔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没能维持多久，仅搞了四个多月就停了下来。因为，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想法，显然与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图不一样，他并不想再来一次大造反大夺权运动。于是，到八月底时，传来了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八条”文件，之中，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强调生产，强调秩序。随后，王洪文也从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为让邓小平主持。

形势发生的微妙转变，使很多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来不及进入党组织，所谓突击入党的活动便戛然而止。已进了党组织的，自然也就进了；而没能进的，哪怕是连《入党申请书》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让入了。其实，这个紧急刹车，也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下来，但大家——不论是官方、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方面——则对此都有了共识与预感：文革中已发生的历史多次表明，不让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认为是搞错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现在，既然毛泽东不让王洪文再主持一线工作，又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那么，一切与造反派有关的事，显

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了。刹时，省、市委与各级党委便不再提优先大力发展造反派入党的事，造反派们也都知趣，也没人敢再说要入党了，而都抱一种看形势发展再说的心态。

机修厂有个造反派工人，是手艺极好的木工师傅，姓肖，还是厂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原本党支部已讨论了入党问题，但因有个支部委员小心翼翼提出：听说其家乡亲属中有个地主分子，但肖师傅没在其入党申请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实一下？当时，我已入了党，又是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因此，机修厂党支部便征询我的意见，问如何办理为好。我想，这件小事还不容易？派人去肖师傅家乡调查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实，当时党支部副书记问我的意见时，我若坚持以肖师傅的填表为据，先批准入党再说，他们也会同意。但，那阵我却觉得调查一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说闲话，大势之下，反正迟几天早几天入党，都不会对肖师傅有大障碍。私下，我将意见也同肖师傅说了。肖师傅虽有几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说“既要迟几天入，就只好迟几天入(党)了”。不料，调查人员还未回厂，上面的风向却陡然生变，各级党委都奉命暂停批准新党员入党事项。肖师傅正好被卡在当口上，入党的事便告吹。对此，有一段时间，肖师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说我入了党，就不顾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服党支部，甚至压服党支部，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却非要同意去搞什么外调——外调回来说，那地主确与肖师傅家人无关——而害得他入党被卡了壳。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数次赔礼致歉，承认自己对大势过于乐观，犯了错。后来，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我便着手出力，想帮助肖师傅能趁势入党，可是，“批邓反右”运动还没搞几天，造反派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全军覆没了。最终，不仅肖师傅的入党一事从此无望，而且，连我的党籍也被吹了。weng ewang.org

不过，虽然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后，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时那样威风；即便是邓小平出山后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顿与“批派性”，让部分造反派头头灰溜溜了一阵。但，由于对整个文革，当时谁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活动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却并没有完蛋，当权者更不敢随意就处置造反派分子。所以，一年后开展的“批邓反右”运动，造反派又出头了。

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完全结束，报纸上邓小平的新闻越来越多，而王洪文却难得露一下面，正统的官方意识又慢慢重新回归。呆在局团委也好，留

在公司革委会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压抑，让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后的复旧情形。于是，我决定仍回自己的“老窝”——机修厂，回到车间里，重操钳工技术。在机修厂，由于身份上仍有局团委负责人与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而且又还是一个中共党员了，因此，我反而觉得精神上特有优势，自由自在，谁也不会管我。虽然又重回到机修厂，但，批林批孔运动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改变人生地位，得以摆脱那“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带给我的阴影与黑暗。

（摘自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断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

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 22 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 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啊！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扇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1967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嚷的农贸市场、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啊！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1982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陆续抽调了1389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 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发生过，的确确实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以期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1967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

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武力冲突。

8月3日—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参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

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8月8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但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12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很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8月11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佳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佳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名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佳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20年后，参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口，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口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 80 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佳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8月15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的自然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

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 1967 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 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 16 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 47%。

◇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的创造发明

清塘这地方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著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1967 年 8 月 17 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口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8 月 17 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场门口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地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

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 8·17 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鸣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指使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佳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掀起，拉倒外面

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佳、新塘两个公社的 5 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4 天内杀了 13 人。

◇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1967 年 8 月 22 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 9 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

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8月24日上午。

镗镗——镗镗——！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就把刀磨快点啥。”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也——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啊！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 2 人；东方、东风各 1 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 6 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 5 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 8 月 30 日止，上关公社 12 个大队共杀了 112 人。

◇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 天时间共杀人 1054 人，全区 50 人中就杀了 1 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仿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仿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5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到了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于是，

杨、廖二人在 8 月 30 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仿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 12 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 12 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 12 个人在导火索滋滋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 20 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杈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一个公社就杀了 524 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 8 月 24 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

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8月25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陆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21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21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口有点干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口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啊！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蜈蚣区委书记，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蜈蚣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再次挂电话向蜈蚣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哆哆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

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口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口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死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淨，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还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哪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 31 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 74 岁，最小的才 56 天。

顺便说说这个 56 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 58 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 72 岁的祖母、37 岁的父亲、12 岁的大哥和 3 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 6 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 4 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 37 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 56 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 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数以百计，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公元1967年8月23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

中午时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儿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敬反修部长和梁“院长”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6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法院”附属监狱关押。

次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由梁域主持，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这里也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啊，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8月27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敬反修因嫌下面动作太慢，还气冲冲地给艳旗大队党支部书记摇电话，催足杀人。

当晚，该大队杀了7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6人。

……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

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 15 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 4 人。~}

那天夜里月光极好，敬反修、梁域亲自带领民兵去了。当时，朱用进等 4 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

“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

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梁域的仇敌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 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8 月 27 日清晨。跃进大队部。一只苍白的手摇动电话机手柄，声音颤抖而激动：“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大队的何方前，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这位跃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要注意安全哟！”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装部李部长的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方前一向身体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领导一指责，吓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争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会儿见领导满意，且关心爱护自己，十分感动，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干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并一再嘱咐郑主任，要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告诉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得结结实实。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昨夜交代的任务记得牢靠，一大早就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现场，用三根棍子叉着立在三口窖的边上，并手忙脚乱地扯横幅、刷标语布置会场。

上午 9 点多钟，何方前带队押着 64 名四类分子及子女，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还跟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群众队伍。天气热，又捆着拴着，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这一招立竿见影，队伍前进的速度立刻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 62 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何方前果然做得干净利索，这个孱弱的支书当时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地放了一颗卫星，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结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方前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里，边吸旱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支部决定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响的声音，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跳。其中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如今那三口窖和 62 条人命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 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

一、寡婆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

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里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师范老~}

~{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被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

~{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里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1958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栋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着学生从60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58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竟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59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汇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脑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二、无名外乡女

在潇水河畔的东门乡政府，该乡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讲了这段往事：

1967年9月2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事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一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着愤懑、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1967年8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纪检组长冯和光还告诉我们，那时的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三、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栋，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得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8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

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 8 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我们从 1985 年 6 月 30 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 0789）中才知道，他 1949 年考入解放军 137 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1957 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 采访手记之二：幸存者的见证

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证人：周军阳，女，51 岁（1986 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1967 年 8 月 26 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

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 14 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绞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 100 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 100 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 6 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8 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60 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

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 6 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白，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 8 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啊，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 3 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嗷嗷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 8 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9 月 1 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9月3日，仿佛听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8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

“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口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5口、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7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1985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我。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54岁（1986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1967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8月26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

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口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 1 2 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 3 6 个人，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 3 6 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 3 6 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 3 6 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 6 9 5 0 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 腥风血雨后，杀人者如是说

道县大屠杀 10 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像。他说：

我 50 年当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58 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65 年 67 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67 年 8 月 1 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份，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 8 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继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查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7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礼甫双目紧皱，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

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 1 2 0 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三天后，这 1 2 0 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 5 6 9 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他说：

“……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参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三、举手表决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涪江公社赤坝塘大队贫协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实的，瘦小的个子，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怯地瞅着我们，不知找他的是什么人。你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会杀人，也曾威风凛凛掌管着生杀大权。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势：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林铺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的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举起了手，唐家的却没有一个人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 1 2 个全部杀光……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个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常和别人搞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面去了。安排好，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于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起来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我的手发起抖来，鸟铳上的鹅弓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戳、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乱跳。刚躺一会，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

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块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抗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 1986 年还存方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中。——笔者注）。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到山上没人管，那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 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

一、“开大锅饭”

她本是贫农的女儿，1966 年 10 月，经人介绍与下蒋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姑娘开始不愿意，后来听说陈高肖的父亲虽说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功已抵过；再说一看小伙子，人厚道，模样不错，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很让人羡慕。嫉妒的人则骂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

8 月 26 日晚，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叫走了。陈高肖一进大队部，马上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在他腿上捅了一枪，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哟，你们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个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女人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绊绊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獐头鼠目的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女人死死护着自己的

下身，拼命反抗。四十多岁的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到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闭上了眼睛，说，“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了，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嬉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他发泄完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 20 元钱和 4 丈布票。接着是陈登义，也是杀害女人丈夫的凶手。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美丽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愿以偿。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了三遍。太阳出来了，人们觉得应该表现出大公无私的风格，便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粗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细查却不对了。让我们按照轮奸顺序，看看他们是一些什么货色吧：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 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二、离预产期仅仅一周

再过一周，19 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她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感受着孩子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的摇篮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送来了一担鸭子。

然而，8 月下旬骤来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

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都偏西了。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二十多岁，一身蛮牛劲。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漓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三、要么嫁人要么去死

这地方叫竹山园子，一片绿油油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

那天下午 5 点，一阵凄惨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人扭着回乡度暑假的小学老师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竹林中的一口地窖边。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厉声吆喝。这一家三口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凶手们又将柴草点燃，丢进窖中，浓浓的烟火吞噬了绝望的惨叫。但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向雨生还有一个漂亮的 18 岁的女儿在家里。他们留下她，是因为他们中的某某想娶她。这人太穷，年过 30 还是一条光棍。他们回到向雨生家时，向的女儿向丽丽正伏在地上哭泣。他们揪住她的头发问：“你父母已判处死刑死了；你想想活，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丽丽听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声大哭：“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凶手们见她不识抬举，马上押着她往竹山园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到了地窖边，残烟仍在往外冒。凶手们用棕绳捆住她往洞里丢时，给她最后一次选择：“只要你答应嫁给何某某，我们就马上放了你。”

向丽丽停止了哭泣。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在当时的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口下屈从嫁人，而换回一条性命的。可是，这时对向丽丽来说，时间也是奢侈的了；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

那伙人中的一个早已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的女儿这样不识好歹，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一把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 18 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那时，天还没有黑定，竹篁衬映着晚霞，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但向丽丽和她的家人再也看不到这般美丽的景色了。

比起向丽丽，这三姐妹的命运似乎要幸运一些。她们都是同一个大队的，都只有 17 岁，父母也都在滥杀风中被杀害了。她们都姓涂，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美珍、涂秋蕾。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三人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了公社的农贸市场，关在一起的大大小小有七十多个人，多数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致，人们的神经麻木了，就连小孩也不会哭了。他们就那么蹲在地上，眼光无神地一片沉默，等待着某个时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送上屠场。这时，一个区里的领导路过这里，见人堆里有那么多小孩，顺便说了一句，“小孩就不要杀了嘛。”

就这么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四十多个少男少女。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

她们又被送回大队关着。晚上，当她们一面庆幸自己幸免于死，一面为失去亲人悲痛时，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男子，其中一个还是个傻子。在凶手们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网开一面了。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竟没一个愿意嫁人。大队“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口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于是，她们被捆起来，受尽种种折磨。后来，她们中的两人在夜里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另一个因被指定要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来信反对，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罢。

三姐妹在死亡与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无论如何也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亮光，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 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

一、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宫之中。

她当时正值豆蔻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待她如亲生女儿。婶娘生怕让她感到自己是个孤儿，她要对得起死去的兄嫂。尽管家境艰难，婶娘还是送她念了书，让她能识文断字，能写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就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在这青山绿水中姑娘渐渐长大了，当她私下为自己的容貌娇好迷人而骄傲的时候，也痛苦地发现扶养自己长大的婶娘原来是个地主婆，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是实打实的贫下中农。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提到那位婶娘时，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吧。”于是，就决定不杀了。

可是，待到杀人那天，却见这位女民兵亲手将她那四十多岁的婶娘捆着押到杀场。“带回去，把你婶娘带回去！不是讲好了，特殊处理的吗？”大队贫协主席兼“最高法院”负责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样，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押到地窖边就要动手。婶娘到这时还心存一线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寒冰的侄女问：“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蓄满泪水的眼中闪动着难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许她并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这样死，未免太寒心了。姑娘断喝一声：“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人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迸溅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当然，姑娘以后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附近几十里知道这事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虽然她还是很漂亮。再后来，外县一位因出身不好，年过三十还没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往日的事瞒得铁紧。笔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是可怜她。当然，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想当年，许多出身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的。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怜又可憎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了。

二、抛妻杀子的丈夫

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又读过中学，能歌善舞。两人结婚不到两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的。

1967年8月26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时逢女人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九家山过路，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子上，你还不快去救她！”男的闻讯急忙赶去，到边时却越走越慢，最后竟然远远站着，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许他认为女的不该这时跑到娘家来，给他丢人献丑了。或许他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居然娶了个地主的女儿！审讯的人问他：“你看怎么处理？”他竟回道：“由你们处理，杀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们牵走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又醒了过来。九家山的干部们一商量，她已嫁给贫农了，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这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三、“求求你们，莫让我光着身子见阎王”

这个石洞就隐藏在这乱石杂草中。很深，里面很宽，斜斜地伸下去，下面还有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在这躲避过日本兵。那天，听说日本人过来了，有上千人躲在里面。果然洞外来了日军，不过只是三个日本兵。日本人隐约听见洞里有人声，便以为是游击队，叽里哇啦地朝洞里吼了一阵，见没人出来，就很从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口，又从村里搬来一架风车，点着了柴草就往里鼓风。还是没人出来。三个日本兵不知里面深浅，不敢下去，于是很生气地往洞里丢了几个手榴弹，就走了。

这陈年旧事听起来好像不大光彩，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这个洞真正出名是公元 1968 年 8 月 26 日。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也不用埋，一脚踹下洞里去了事。血光与哭喊声相混杂，那场面活像是人间地狱。下午，远处又响起了吆喝声。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威风凛凛地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口走来。

老妇人叫唐长凤，几十年一直守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又养育下了两儿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的心愿了。然而，唐长凤老人没有这个福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杀掉了，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无牵无挂。是啊，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的做什么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淨！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一步步走向那个天然的坟墓。快到洞口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来。她本能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几乎是用乞求的声调，对那些年轻人说：“让我提起裤子吧，求求你们！”她是人啊，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知道羞耻、懂得维护起码的尊严的，何况她是个女人呢！她的双手是被反绑着的。

民兵们笑了起来，“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起来！”

唐长凤哭了。整个上午，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后她是没有流过一滴泪的。她那苍老的哭声原来是那么的悲凉。她最后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年轻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话、用阶级斗争的观念驳斥了老人的糊涂观念。随后，便骂着，笑着，推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 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

一、靠杀人创收的无赖

他叫胡茂昌。

这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淨，很让周围人看不起。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没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杀人呢？一是当时他心里直发冲，直想杀杀杀；二是杀人是有补助的，穷得叮当响的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 21 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来，自告奋勇地，“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当大家有点畏缩时，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杀完人，他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 13 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可弄了几下都没挑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还没等他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故决定不杀）蹣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掼，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 55 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 10 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一点，每人 5 元。

二、贪婪的公安和两条弱小的人命

有关材料上，只简单地记录着这样几句话——

八月十四日，杨逊卿（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亲自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该大队第二天杀了二人。

杀了二人，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75岁；何国新，男，5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杀了一老一少这么两个“阶级敌人”

？杨特派员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身上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觉得机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一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的手里。说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于是，决定先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

谁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个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5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的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有什么用啊！”可是，秦秀容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遂一起被杀。

三、临死前，一个地主分子的坦白交代

有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地主分子，被打死时约 60 来岁。他解放前还做过国民党的县粮食局长，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后尽管劳动改造得可以，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亮相的。这次跑不掉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

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

“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口号声骤起。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根木棍，从头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还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打死为止。

◇ 杀完地富之后……

那个大队的“最高法院院长”和贫下中农们不相信老地主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他们大约从未想过人是不能杀得兴起、杀红眼睛的，杀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杀尽，说不定就轮到自己的头上了。

一、 旧恨私仇

1967年9月2日，四十七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已有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贯彻到了全县各大队，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当然也不例外。傍晚时分，东风

大队的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和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聊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面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这事到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耳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回来搞串连。何营长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然后，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也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杀何定信的意见。

9月5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在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还进过区、乡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赢了，致使何子良耿耿于怀。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审讯”为借口，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他喝道，一边就叫着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就叫民兵开枪；但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开枪亲自将何若英打死。然后，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死者的头割下来示众。

二、借刀杀人

比起性情鲁莽的何子良营长来，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杀人的手法就要高明多了。解放后，何代余一直担任吊高楼的党支部书记，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占点什么的。1964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何支书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受社教工作队“左”的影响，还居然打了何支书一记耳光，而且致使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老支书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着就来了，何支书在会上思

想深刻地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不过，老支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支部研究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这杀人的活。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实行“革命纪律”。并坐下来，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终于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于是，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青春，义气风发地提着把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地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在四乡出尽了风头。等到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乾淨了，上面也传话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联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因怕他性子暴烈、会拼命，何支书又想出了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唤去大队部份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地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即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了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可不，留下这个何疯子还不知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于是，那打断了手脚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样，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去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可怜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烂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其实是有点多余了！

◇ 湘南大地，腥风蔓延

道县大屠杀，无异于引爆了“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连省会长沙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跟着贴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当然，影响最大、照样画瓢或有所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且举几个实例如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1967年8月29日起到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人898人。其中，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任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

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身首异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不堪凌辱被迫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晚，动手时四十七军已进驻道县，收刀时已到是年深秋。似乎有顶风杀人之嫌。数量上虽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上行使着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干部，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滥杀期间，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曾下发过如此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们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该意见在部份单位下达后，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其对全县以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如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念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

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4人。

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时，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示意斩草除根。干部们欣然从命。于是，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山窝里的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可以说是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大屠杀期间，杨书记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开会时吹了吹风。第二天一早，改名叫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

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 6 人。整个陵零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亦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 3 2 5 人。

双牌县：该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 3 4 5 人（含被迫自杀的 4 8 人）。

新田县：以开万人大会著称。1 9 6 7 年 9 月 8 日才开始杀人，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 2 1 个公社就有 1 8 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

永州市、冷水滩市：这两个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属零陵县管辖。永州市 9 月间的几天内杀 1 5 8 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冷水滩市，一起打架斗殴死了人事件，诱发了全市性杀人事件。

南山县：共杀 1 4 5 人。该县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地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祁阳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杀人期间曾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扩大“战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 3 3 个公社，其间共杀 2 1 8 人。

东安县：中国有名的武术之乡，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线上，杀人事件中仅杀 1 1 人。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腥风停息了的 8 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个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引起全县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 2 2 5 8 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 1 4 1 人；被迫自杀 2 7 8 人；致伤致残 1 1 3 2 人。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的人数。当然，这里只是顺便提提而已。

艰难的制止

1 9 6 7 年 8 月 2 9 日。

上午 1 0 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 6 9 5 0 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千创百孔的建筑、血迹

斑斑的街头和满街白花花的大字报——显示着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这里摘录两张不同观念的大字报，或可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贴出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我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集结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的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口，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这样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圩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

的，由于在坏份子的操纵下，一部份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解放军的到来，并没有马上给道县人民带来平安，就在军队进城的第二天，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2人，打伤7人，俘虏360余人，被缴枪支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的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8月30日，“红联”召开400多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部份区社仍在抓紧杀人。长沙市一位姓刘的老知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部队进驻道县后的情景：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县城。太阳高挂，道江镇却已是阴沉的黄昏，清静得反常，看不到一个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一队队佩着红袖章、挂着冲锋枪的解放军巡逻队从街头走过。除了大横幅、大标语之外，一些墙壁上还残留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布告。这种布告言简意赅，名单比罪状的文字要多；下面那一片片的名字上尽是红勾。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

9月1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9月2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6950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乡下的滥杀风渐渐减弱。但县城里的派性斗争并未结束，有时甚至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升温。9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6950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

“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原6950部队一营副营长刘富安回忆：

“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口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口，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9·23”事件发生的同时，道县杀人之风迅速向外蔓延，邻近的几个县市也抓紧动手杀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较之道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7年9月27日，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摘抄如下：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这张通告明显地带有当时部队“支左”的痕迹，深受“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各类运动中，“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将受到军代表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清洗。但这张通告无可置疑地为最终平息历时两个多月的惨绝人寰的湘南农村大屠杀发出最后的通牒。

◇ 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

1968年和1974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象征性处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之风猖獗的日子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鸣冤上告。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刘代修就是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手上有几十条人命，判了10年，因为他不该在得到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顶风作案。事情得从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说起。李念德原本有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14口。这家人1967年8月24日被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4口；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负责人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9口。刚满20岁的李念德因连夜翻山越岭逃走，才得以幸免。这里，摘抄1986年2月3日道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86】刑字第10号）如下：

被告人：刘代修，男，49岁，不识字，汉族，系道县杨家乡金狮庵人，1967年任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捕前系杨家乡金狮庵村农民，现在押。

道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刘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6年2月3日在本院会议室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1967年8月29日中午，被告人刘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与何议论杀人时，出谋召开支委会研究杀人。何同意后，便分别通知支委黄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当天晚上，被告人刘代修为首在大队正堂屋召开社员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开会

时，本大队蒋昌进，接到公社秘书蒋某某制止杀人的电话，当即告诉被告人刘代修，被告人刘代修唆使蒋向公社谎报被杀者已被民兵牵出去了，并说“杀错了我负责”，随后立即组织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绑押走。当行至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时，本大队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杀人的电话后，立即追上公路，将电话内容传达给被告人，被告人刘代修仍不听制止，说什么：“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即指挥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黄旗子河边杀害。

经审理，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

本庭确认，被告刘代修，在 1967 年杀人期间，曾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追诉期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实施的，且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刘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力一年。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栋一家大小 5 口无辜被杀后，家中一切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 0789）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 379 元，房屋修理费 300 元，共计人民币 679 元。因周文栋全家皆被杀，此补发款只能发给周文栋的弟弟。指挥杀害周文栋一家人的生产队长周某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 原载于香港《开放》2001 年第 7，8，9，12 期~}

2011 年 11 月 16 日修改

2008 年 2 月 15 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四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关于银川新华社事件的指示

宁夏自治区军区：

五月卅日在银川发生的捣毁宁夏新华分社、抢劫新华分社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物资，并殴打新华社记者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点政治事件。宁夏自治区军区有责任保护新华分社的正常工作和记者的人身安全。为此，责成宁夏军区负责处理这一事件：

1. 把这次闹事的头头抓起来，审查处理。
2. 把抢走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
3. 由军区负责把这一事件调查清楚，依法论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康生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代表时的谈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晚 11 时 25 分至十七日晨 2 时 45 分。会议开始时，康老按名单点了每个同志的名。之后，会议正式开始。出席者有朱声达（宁夏省军区司令员），李天焕（第二炮兵司令员），康健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康老对着朱声达说：你装糊涂，你们天天喊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你可以把副司令软禁起来。

李天焕：毛主席叫部队支左，你们把造反派打成这个样子，是怎样支左的？

康老：你们那一套是不是支左？不是支左，是发武器镇压造反派。朱声达你讲一讲你的想法。你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的话？你怎么搞的，总有个想

法嘛！有个方针政策嘛！有教训，内蒙就是教训嘛！你也得讲一讲你是怎样想的。在中央开会有什么都可以讲。对的错的都可以讲。毛主席历来的方针就是这样，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听。这次处理问题，就是这样，地方的、军队的不同意见都听。

李天焕：有错就改，改的越快越好。这次来到中央，就把自己的观点讲讲嘛。你们行动总是受思想支配的嘛！

朱声达：我们是来请罪来了……。

康老：你这是空话，有什么罪？不讲具体事实，具体错误，是空的。

李天焕：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有什么错误就检讨。到中央来了，有什么都可以讲。就是康老讲的，为什么搞成这个局面。

朱声达：开始我们支持是对的，二月十一日又退出来了……（大家都给他算时间）

张怀礼：实际上是二月六日退出联委的。我六日回军区汇报工作，从那天起就不叫我去（指联委会），就断绝了关系。二月十一日是正式发声明退出的。

朱声达：当时我只看到联委会的支流，没有看到主流。又甘春雷讲话后，大家对他贴了不少大字报，提了不少意见，要打倒他……。

康老：你听的那些群众的意见？你下决心，总有个道理，这不是儿戏，夺权是大事，总不能一点考虑都没有。和打仗一样，有了情况才下决心。这是个方向上的转变啊！为什么不请示就转？你们闹清楚错了，那些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好改嘛。

康健民：原来支持是对的，以后退出是错的，你们是知道的。兰州军区早就给你们讲了，你们就是坚持不改。五月份我到宁夏，朱、江对我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赵永夫是直接带部队打，你们是借手群众，让群众打造反派。

康老：不要学赵永夫。你总有个指导思想嘛，从一开始你就是这样。赵永夫是下命令叫部队打，你是给群众发枪，让群众打革命造反派。

李天焕：你们独立师闹事，怎么处理？

涂宗德（独立师长）：我还不知道。军区瘫痪了，有好多工作推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直接请示……。

李天焕：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你们那样做，对不对？

康老：军级干部会议军区有人参加没有？

康健民：他们没有参加，文件他们看了，精神传达了。

康老：你们怎么想的，农民舍不得丢下家，耽误工分，为什么进城呀！

江波：我是农民出身，我是有体会的……。

康老：你是农民出身，有体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这时，外边传来新华社记者访问刘德夫对朱走前成立领导小组的看法和领导小组的紧急命令）……

张怀礼：这些人都是他的干将。

乔克广：我们的权早就被他夺走了。

朱声达：（支支吾吾）我和他们几个商量。（指成立领导小组）。

康老：你来之之前，同谁商量过，他们同意不同意，这个领导小组怎么成立，怎么决定的，还是你独断决定的。你同那几个党委委员商量的，是谁。

张怀礼：这些人都是忠实于他的人，如司令部刘恒业……。

康老：你和那几个同志商量的

（朱：和江、陈、向、赵）

（马克：没召开会议讨论，只是他个别说了一下）

江波：我们来以前，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李世祥同志打电话，说中央要你们去北京开会，家里可叫赵、向负责，以后叫向开会，我们商量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康老：你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叫执行你的反动路线的人，接你的班，你把你那里看成一个独立王国，不是中央不告诉你们，而是你们拒绝，反抗中央的指示，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独立师的同志也要检查，难道中央的指示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们的电报转来了，那是朱声达想通过你们压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

涂宗德：军区瘫痪了……。

康老：没有瘫痪，现在还没有瘫痪，你说这些都是假话。

江波：机要处电报发不出去，通信站符合他们观点的，才给打电话，否则打不出去……。

康老：说瘫痪那是借口，中央的贯不下去，反对中央的你们贯的很彻底。

张怀礼：我给中央的信，要求用电报发出去，就是不给发……。

康老：朱声达同志你为什么不上回答我的问题？（朱：我错了，检讨）你们来中央干什么？你们采取什么方针，你讲嘛，为什么不讲，江波你也讲讲，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你们来了这里，家里出了乱子你们不负责任？（朱：那还能那样，是要中央给我们撑撑腰，我们好改……）要中央撑什么腰，撑你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腰？！（乔克广：你从兰州回来第二天，就给机关干部发枪，打了靶，国防师来了，你就大发脾气，说对你不信任，气的把桌子都推倒了。）

康老：（问朱）是不是事实，为什么发枪，是不是为了镇压革命群众。朱声达你为什么发枪？（朱：大家说安全没保证，我错了）这是空话，错了为什么错了，错在那里，（朱：方向路线错误）这也是空话，要讲具体事实。我现在第三次问你，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错了，讲具体事实。

康老：那个通知（指朱声达中央 218 号文件后转发的一个通知）是怎样说的，什么时间，什么内容，（朱：沉闷答不上来）

江波：转是转了，就是党委没有讨论，没有具体措施。

康老：你这话还象个话？

康健民：就是这样，不符合他们思想的，就不讨论，不执行，抵制。

康老：这话说对了，江波说的对，只表了个态，没有具体措施。

向辉宇：我们党委自文化革命以来，没有开过一次象样子的会，对中央文件、指示没有认真讨论过，张、冼的指示，没有很好地讨论，冼政委的话很肯切，你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最后一次党委会，从七月十六日开始到十九日，马克同志把冼政委的指示传达了，就是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是朱声达没有从思想上转过来。

乔克广、向辉宇、文亭：机关干部围斗我们，说我们是叛徒。朱给群众讲：我和大家坚决站到一起，风雨同舟，他对筹备处的群众也这样讲，群众热烈鼓掌，说朱是好司令。

康老：我了解一下，机关干部反对你们，说你们是叛徒，是些什么人？

向辉宇、文亭：我们机关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朱声达为首的少数处长。

康老：是呀，到处都是几个小头头，没有那几个小头头起不来，朱声达就是你那几个小头头。

向辉宇：我早就没有权了。

江波：新华分社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就是因为观点不同。

江波：当时我们没有很好的处理，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一·二七也有盲目性，以后为什么退出，主要是甘春雷讲话后，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是假夺权，甘和杨、马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

张怀礼：朱和杨、马的关系必须闹清楚，杨的权被夺以后，还给军区写了几次报告，信……，说他不想要权。

涂宗德：我们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时看到没有三结合，静坐绝食，冲击军区机关……。

康老：独立师的副政委，你们是支左还是支了右，你的政治工作做的怎么样？

王兴云：我们部队是正面教育，军区让干啥就干啥，现在从实际行动看，我们是支了右……。

康老：你是支左还是支右，看来你是支了右。

张怀礼：朱声达支持联委会是假的，逼迫的，联委会二月五日游行，要部队支持他们，我提意见出兵支持联委会，朱坚决反对，以后几次批评我，要我检讨。

康老：你们说人家是假夺权，实际上你们是假支持。

朱声达：我承认错误，我改……。

康老：宁夏军区的同志和独立师的同志，你们首先要认识，宁夏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军人嘛，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了就行了，有些干部，由于文化革命没有认识，支左支错了，支了右也是有的，但绝大多数同志犯了错误，当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以后，很多干部就改过来了，这表明了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德，山东军区，济南部队作出了好的样子，他们总结了三条经验：早改比晚改好，公开比不公开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毛主席早就讲过，人要工作，还能不犯错误，但要争取不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解放军支左将近八个月，可以犯错误，犯了就要改，绝大部分是这样。宁夏的问题不是性质的问题，宁夏问题的严重性是：一、对中央的指示不贯彻，不执行，违背、抗拒、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内蒙的问题，中央就指出，上抗中央的指示，就必然下压革命群众，宁夏的问题就是这样。上抗中央的指示，下压革命群众，这与我们解放军的本质是不相一致的，

这不是所有同志的责任，主要是朱声达，你和毛主席的思想，是另一种思想，你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另一种路线，你和群众是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二、中央、兰州军区不是没有指示，早就指出来了，而朱声达坚决抵制，坚持错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说：如果犯了错误，改正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坚持下去，那就变了。从宁夏的问题可以看出，坚持错误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我希望军区的同志，独立师的同志要注意，我们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教育共产党员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要无限忠心。你们反对毛主席、党中央耍两面派，千方百计掩盖错误，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我们解放军是是非明确的，对党忠实的，即便一个时期不认识错误，也是允许等待的，但不允许耍手腕，搞小动作。从今晚上看，朱、江你们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不诚实的，不要凡是人家不知道的，就企图蒙混过关，还想欺骗中央，今天没有人公开说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两面派手法；三、直到今天，你们没有认真检查错误。林副主席说：中央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希望他们不垮台。但是，如果对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坚持下去，欺骗中央，就非垮台不可。朱声达你不要用空话搪塞，不要蒙混过关，要老老实实的。如果坚持下去，欺骗中央，就会自己搞垮自己，这就非垮台不可。今天晚上会快结束了，要交心，这次来中央，要触动灵魂，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要想蒙混过关。江波你是做政治工作的，实际上就是政委，过去第一政委是杨静仁。你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我们解放军过去打仗不怕牺牲，现在犯错误还不能丢掉，要打倒私字，脱裤子改。其他同志犯点错误不要紧，要改。

我要求你们三条：一、犯了错误就承认，就改；二、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跟着犯下去；三、犯错误，要立新功。所谓立新功，就是同志们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要吃老本，这个别人忘不了。过去我们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搬掉三座大山，现在搞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犯了错误，改正错误，还要立新功。对不对，希望同志们考虑，如果对，就去做。但是要把问题弄清楚，你们拿中央的文件，兰州军区的指示，比一比朱声达干了些什么，就清楚了，你们看宁夏的局势，把造反派闹的那样大的损失，

现在正是农忙，搞农民进城，发枪，借民兵之手镇压革命造反派，为你朱声达服务，打死人，人家是要找你算帐的。

党的政策你们学了没有，陈再道毛主席还批了五条，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得到群众谅解。还可以回到革命行列来。承认不承认，改正不改正，群众谅解不谅解，就看你走不走这条路。

给你们打个招呼，象宁夏这样的错误，发展下去，很危险。不能一方面操纵群众，开进军队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方面操纵保守组织，包括军队的人在内，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过去内蒙两千多人，甘肃詹大南来了二百多人，都叫他们自己动员回去的，今后来人，你们自己动员回去。

李天焕：关键是你们按康老的指示办事，希望你们悬崖勒马。

康老：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挑起民族问题，就是罪上加罪，你们里面有无回民？（别人说，马克是回民）要注意，记者反映，固原地区“五二”、“四八”叛乱的头头，有的现在起来活动，发现杨启昌有三本反动日记，海原县县长马志宽煽动群众说：发扬过去的老办法，上山打游击。这个问题，要注意。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公告

坚决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一、我们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定地响应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风暴”的推动下，于一月二十七日夺取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窃踞的宁夏自治区党、政、财、交大权，这个行动好得很，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遵照最高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坚决支持“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

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朱声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对上抗拒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委、中央文革的指示，对下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早就指出了他的错误。兰州军区曾多次要求他改正错误。但朱声达坚决抵制，并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大批上京告状，对中央施加压力；把枪弹发给他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围剿和武装镇压，制造了一系列的严重流血事件，企图把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置于死地；在军内也实行白色恐怖，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从而，对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三、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希望宁夏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再也不要听他那一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总指挥部”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赋予我军的“三支”、“两军”的光荣艰巨的任务，为人民立新功。

四、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希望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过来，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宁夏的代理人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城离厂的农民、工人，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提“走资派”的这一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参加武斗。迅速回到农村和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

打倒刘澜涛！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

坚决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及一切真正的革命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公告

坚决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一、我军区广大指点员，坚决拥护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宁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各项英明措施，坚决拥护中央首长对我们支左工作的批评和指示，坚决拥护八月十八日兰州军区公告，并保证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二、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原名《宁夏联委会》），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坚强革命左派。他们英勇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揪出了宁夏党内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被杨、马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大方向完全正确，为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一一”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紧紧地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使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深感无比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不起宁夏二百万人民。在我们错误路线影响下，军区广大指战员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领导上对所犯的 error，决心深刻检查，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以努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的实际行动，将功补过。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结成死党，狼狈为奸，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公然反对和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拒不执行兰州军区的指示，挑动大批群众上京告状，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处心积虑地围剿和残酷地镇压革命造反派；百般打击迫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他作斗争的指战员。朱声达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坚决同朱声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清算他的罪行，坚决把他打倒。广大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奋起毛泽东思想

的千钧棒，向朱声达展开坚决斗争，把他斗垮、斗倒、斗臭，彻底肃清他在军内外的恶劣影响。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在朱声达的欺骗蒙蔽下，《大联合筹备处》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罪在朱声达。受朱声达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醒悟过来，反戈一击，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我们衷心劝告农民群众，不要上朱声达的当，不要参与武斗，迅速回到社队抓革命、促生产。

六、我们坚决支持驻宁夏地区执行支左任务的兄弟部队的一切革命行动，虚心向他们学习，积极主动地协同他们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七、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端正支左工作方向，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为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打倒刘、邓、陶！

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打倒朱声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谈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时半至五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一四八号会议室。参加人员：宁夏军区、固原分区、有关县市武装部以及六十二师前指、三工区负责同志，兰州军区康健民副司令员、群工部副部长张振太等也参加了会议。〕

（二时三十分，总理、李天焕同志先到会）

总理：我没管这个事，康老叫我来见见大家。（接着总理念名单认识大家。先问了朱声达入伍后历史，当朱说他给段德昌同志当过警卫员时）

总理问朱：你对段德昌同志怎么看？

朱答：我认为不是改组派，七大时已平反了。

总理说：（大意）傅传作同志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贺龙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二是段德昌同志被杀时，贺龙问他有什么要求，段说：一我不是改组派，是共产党；二洪湖老百姓很好；三给我一颗子弹。贺龙说他一贯正确，实际上立三路线时期，他执行的最坚决，只剩下他和关向应、夏曦三个人，谁都不相信了，段德昌同志就是他杀的，洪湖根据地是段德昌同志搞的，那时贺龙在山上，他篡了段的功劳。这一段历史贺没有给组织讲，也没有人揭发。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但到延安时我去找他，也没有讲。贺龙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这件事你（指朱）是知道的，也不揭发，你怎么没把段德昌同志的作风学到，而是学了贺老总的作风，所以这次宁夏搞的很不好，要好好反省反省。

（然后，总理逐个念名单，并问了一些同志入伍后的历史情况。会议开始十多分钟，康老进来。三时，总理离开会场）

康老：中央召宁夏同志来开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部队和群众组织都来，中央开会就是这样，不管那一方面都听，对造反派、保守派都是一样。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兼听则明。因此，与康健民同志研究，听听各方面的。群众代表来了没有？（张怀礼：没有来）筹备处来了没有？（张：没来，他们还提了几个条件，要求保证安全！解决经费）希望他们来，不来就不勉强，到中央来，还保证什么安全！告诉他们愿来就积极来，不能向中央提条件，看来他们来中央积极性不大，本来他们杀了人，是没有资格来的，中央是照顾的，还是希望他们来，接受教育，他们过去受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影响，是没责任的，可能他们不是向中央提条件。

去吴忠谈判的是那个团？告诉他们谈判的态度不对，他们（指筹备处）是犯错误的，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与解放军平起平坐，告诉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八六团谈判态度太软弱，我们解放军与他搞重庆谈判是不行的。告诉他们，是犯了错误，不是革命行动。见到他们就说他们是受了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害，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不要抵抗中央的指示。（张怀礼：看

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好！让他们搞！（此时康老很气愤）如果这样搞性质就变了，就镇压！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使，什么本事都使出来。看人武部、朱声达有多大的罪恶。当然还是要做思想工作，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八六团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进行政治攻势，揭露朱声达的问题，大量散发传单，（张怀礼：他们把传单都撕了）不会完全撕的，（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让他打！让他打！不怕打。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教育的，还可以派宣传车去。

现在是吴忠武装部还在里边？王光福你表示什么态度？（王：已起草了七条）吴忠县的问题你要负责全部解决，你和朱声达研究如何解决，主要是你们搞的，我看武装部的活动现在并没有离开朱声达，没有离开你王光福！同志们，我们是爱护、信赖解放军的，但个别人他反对毛主席，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不能代表解放军，就没资格代表解放军。

领导小组那个同志来了？（答：王仅同志来了，他是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同志你什么时候到的？（王：前天）你讲讲银川情况（王仅同志汇报了部队的开进、部署、态度、敌情等情况。当王仅汇报说部队进去后，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旗帜鲜明，坚决支持总指挥部等左派，群众热烈欢迎时，康老连连点头。当王汇报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时，康老问：真农民还是化装的？）

王仅：当时发现有军人化装指挥。

康老：农民不会用军队作战的一套办法，何其仁恐怕就是你们搞的！

王仅：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

康老：嚣张得很哪！还叫我们解放军与他谈判，算什么东西！

王仅：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

康老：何其仁、刘恒业，你们两位是朱声达的核心人物，是你们派的吗？（刘：不知道，我们没有派）怎么不知道，有人指挥，很清楚。

王仅：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

康老：好！让他们打好了！

王仅：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

康老：这都是朱声达、王光福的教育。

王仪：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

康老：（很生气）反革命！这就是你们（指朱）依靠的力量。……独立师二团回去的人怎么样？一、三团态度怎么样？

王仪：二团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没去成。一、三团比较好，比较稳定。吴忠巴塘农场一个连参与了，一个战士还上车检查我们。

康老：是那个连的？（王有生：一团四连）要派人去做工作，（李天焕：要贯彻最高指示）二团现在情况怎样？（二团长：现在通了）所以不通就是干部不通，关键是干部，政委、副政委、参谋长那个比较好一点？（二团长：现在都通了）那么快？不那么简单。你们要经常打电话告诉他们。告诉二团要与六十二师炮团合作。你们指挥部确定一下，那个地方指挥关系，二团听炮团指挥，当然不仅是指挥，还要帮助做工作。（李天焕：涂宗德要打电话，就是要很好与炮团联系起来）

平罗情况怎样？（平罗同志作了简要汇报，当说到他们去做工作筹备处还打他们时）二团、炮团没有去做工作，联合起来，人武部他们可能不相信。还要做耐心的群众工作，他们没责任，告诉指挥部要争取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迫害的。

蔡春志你谈一下永宁情况（蔡简要的汇报了永宁情况）人武部站在那一面？（蔡：现在站在指挥部那一边）以前站在那一边？（蔡：和军区一起站在筹备处一边）现在要和筹备处站在一边，那不是站在空中了。（当蔡汇报说筹备处准备攻打银川时）这是叫叛乱。（当蔡汇报说他们要来京告状，想给中央施加压力时）对中央倒没有什么压力，压的是他们自己。

张建武同志，你们那里怎样（贺兰）？（张简要汇报了情况）杨、马现在在那里？（张怀礼：在银川，现在正研究如何让他们来）你们要关照一下，在北京不要一下飞机就被群众抓去武斗，朱、何都武斗了，我们不赞成，要告诉总指挥部，这是中央决定叫来的，揪人不符合中央精神，有道理会上讲，摆事实，讲道理，在毛主席居住地方不许有这种现象，这样搞耽误时间，把问题解决了回去好搞革命，要反复讲，他们有一股气，这是难免的，要反复做工作。（张建武：筹备处提出先攻平罗、后打银川）人武部态度要鲜明、坚定，要挺身而出（张建武：他

们动员农民去参加武斗，我们对他们说农民去了会有伤亡，不好交待）这个道理对，农民去了会有伤亡，不好交待，最后火要烧掉自己。

青铜峡情况怎么样？（曾铭同志作了简要汇报）枪是拿走的，还是发的？（曾：我有怀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这样看，全国人武部大多数站在保守派一边，省军区比较好的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人武部还是站在保守派一边，这是个严重问题，很值得注意。（曾铭讲到军区五条命令、刘恒业讲制定经过时）徐洪学同志是好的，他的建议是好的，他们不纠正朱声达的错误，下命令他们怎么会交枪。（曾铭：部长有倾向，但军区强调不能把不同观点暴露在社会上。乔克广：军区要求政出一门）

康老：那是政出朱声达的门，应出于毛主席这一门，这是个什么问题？就是刘少奇讲的做驯服工具，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谈驯服工具，这就是刘少奇黑修养的毒，不能离开政治路线来讲驯服工具。有些同志还想不通这个问题，认为做驯服工具还有啥错的呢？他就没想到作什么路线的驯服工具。

田有胜同志，固原情况怎样？（田：固原情况复杂，我们原来准备给造反派发枪，兰州军区说暂时不发，我们的想法是尽量不让造反派拿走，如果说服不了，拿就拿去了。我们认为要给指挥部发枪，不然筹备处一旦窜据山区搞不好要发生暴乱）你的想法是对的，这就对了。

看来宁夏形势是一个好的形势，一方面，人民解放军野战军进去了，具体说就是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我们知道二十一军支左是有成绩的，是好的。我听说反对六十二师去宁夏，他们说二十一军在山西犯过错误，因为二十一军去山西与张日清合作过，张日清犯了错误，好象二十一军也犯了错误，这是谣言。张日清同志在夺权前支持左派，那时他是有功劳的，张日清错误是在夺权以后。夺权时候二十一军支持他们是对的。他们在山西支左是有很大成绩的，胡炜同志是执行了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到陕西后受兰州军区管，支左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反对六十二师去宁夏是别有用心的，是败坏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朱声达犯了错误，但我们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现在宁夏形势好，六十二师进去，坚决支持左派，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决定关键。

另一方面，朱声达的错误揭开了，过去长期蒙蔽干部、战士、蒙蔽独立师的同志，同志们不要睡在鼓里了。北京小将都知道朱声达是什么样的人，执行什么

路线。很久以前，就把朱声达所崇拜的贺龙当镇守使时，戴军阀大帽子挎指挥刀的照片寄给我们了。中央几次指示，兰州军区几次指示，都被朱声达等人拒绝了，这次也揭开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会很快觉悟起来，不会再受蒙蔽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是繁重的，重要的是还要深入地、耐心地、反复地做政治工作，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要动员一切力量，把受蒙蔽的农民教育过来。参加筹备处的绝大多数也是受蒙蔽的，也要向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银川总指挥部要有政策，不能压，不是很简单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部队里边也要进行教育，特别是独立师、军区司政后，从这次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工作很差。更重要的是要大量的农民、一部分工人中做宣传工作。广播电台在那一派手里？广播、宣传车要宣传，飞机还可以再撒传单，不管怎样，也还是个政治攻势。我看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把朱声达的盖子揭开，同时做艰苦的群众工作，问题就不难解决、不复杂。很可能筹备处的人不大愿意来，有点害怕，这一点要说服他来，来的好处是可以争取教育他们。那天我接见了总指挥部的几个同志，他们思想也有点不通，我提议让筹备处也来点人，他们说打死了我们那么多人，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我说要争取群众，他们还是同意叫来。你们要做工作，当然要注意不能打、不能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北京？所谓第三势力是怎么回事？（张怀礼：他们要坚决打倒甘春雷……）这是怎么回事，有了甘春雷就成了社会主义，没有甘春雷就成了资本主义！把矛头指向群众，那要犯错误的，不能有私心杂念，为什么不把矛头指向朱声达的反动路线（张怀礼：他们对指挥部、筹备处都打）不从阶级观点、革命路线看问题，只从这个人那个人上看问题，这就没有是非了。给他们谈一下，还是做艰苦工作。独立师二团不管怎样，还是有进步嘛！叛变朱声达是好事，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还是好同志。林副主席九号指示你们看了没有？有错误改了就好。

朱声达，你怎么样？（朱：改）还是一个字，那有什么用，要有一个方针嘛！我觉得你有个方针，我希望我的话没说对，就是多听少说。这是陈再道、钟汉华指示河南的“多听少说”。你还不愿意对我们说真心话，只拿一、两个字搪塞我们，希望你不要下这个决心，走这个绝路。你总是对我表示改，你改的是什么！？你改，没有行动，改什么，什么错误，怎么犯的，你来北京冼政委怎么讲的，回去又怎么做的，你连这个都不想讲，想往垮台路上走，我们总是想帮你改错，按

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的路走，但你要给条件的，如果你下决心往垮台方面走，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你有自己的章程，用你的办法来对付我们，这样不是对付我们，是对付你自己。这样子干什么，把错误包起来干什么！来的这些同志，三十七个，分分小组，大家自己研究一下，经验教训，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同时也要帮帮朱声达同志，（康健民：研究了，也帮了，前天晚上我给他谈，他，他说的一是记不清，想不起，二是说不清）你不要以不变应不变，把你不敢见人的东西拿出来，你是个军人怎么那么不勇敢没勇气。今晚我们再帮一次，再说一次，我们是按中央、主席指示，我们是有耐心的，但还要靠你自己。群众工作我们也要耐心作，但要遇到反革命分子叛乱的时候，就要实行专政。因为，向指挥部讲一讲条件成熟时，要武装一部分左派，当然条件不成熟不能随便搞。固原分区同志讲的是对的，条件不成熟不能随便搞。我们不能眼看到左派大量的被镇压，条件成熟时就要发枪武装他们。当然这样做不是就不做政治工作了，即使发了武器，还要政治挂帅，不是武器挂帅。对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要帮助改正，但革命靠自己，你（指朱）看怎么样？（朱：听康老的话，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改正错误）那就好好的把你的话兑现，我们解放军干部不能说空话，不要走很顽固的路，你再考虑一下。你们有没有简报，不然我们不了解，搞个简报给我们看。

现在五点半了，代表们来了，见见面，不是正式会议，正式会议也是这种形式，大、中、小。

有个经验，部队同志犯错误，红卫兵小将批评，对我们认识错误有很大作用，有时过火了，是次要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主要的，有些地方还要他们帮助，部队同志不要轻视革命小将，我们开始也是向他们学习，希望同志们虚心向他们学习。我举个例子，解决山西问题时，省军区犯过错误，检讨不深。太原五中一个十七岁的学生郭红，应当说他的政治水平比军区同志高，他被错关了一个月零三天，神经受了损伤。他来这里后，不管关在牢里，不管怎么样，他对文化大革命、对解放军是坚决相信的，他认为关他的不是真正的解放军，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好处是把军队缺点暴露在社会上，对部队支左对军队本身有很大好处。这么一个小女孩子，她讲的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她对文化大革命理解，对主席思想的体会比我们老干部看来高，看得深，所以即使十七岁，我们也要向她学习。

指挥部来了没有？（答：在路上）宁三司怎样？（张怀礼：三十名代表两家还不好分）到中央来开会，不是做买卖，愿开就开，不愿开就算了！它要不改变方向，我们还不依靠它呢！世界上没有第三条道路。

好吧！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康生李天焕对宁夏军区及宁夏总指挥部代表的谈话
〔时间：晚十时至七日凌晨三时半。〕

康老：今晚来了多少人？（军区 38 人，总指挥部 28 人）筹备处来了没有？宁三司、宁总司来了没有？（没有）筹备处是没找来，还是没通知他们来呢？（张怀礼：名单报来了，人也听说来了一部分，但未联系上）是什么情况呢？是害怕不敢来，还是什么原因？总指挥部同志你们看是什么原因？（牟元礼：在银川已经联系过了……）还是积极同他们联系一下。宁三司呢？（张怀礼：联系上了）怎么没来呢？（联络组：他们对代表名额有意见，没有来）告诉他们，不是两个国家，不是重庆谈判，怎么那么计较呢！他们的主要力量在那里？（张怀礼：银川、石嘴山、吴忠较多些，其他地方很少。牟元礼：以主要在银川，他们和宁三司共约五千余人）。

好，我们谈今天的会议。开会，还是各派代表都来，观点不同可以到中央来讲嘛。今天主要是谈军区的问题，让总指挥部的同志也参加。因为部队支持你们，对朱声达的问题，你们与部队是一致的，所以要你们也参加这个会议。在谈军区问题前，我想先对总指挥部同志交待几句。总指挥部同志要注意你们的思想、方向和工作作风。你们在北京搞这样大的东西（展开为刘格平平反大会的串连海报）！我们反对！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大的海报，一千多个单位。你们到这里到底干什么？！宁夏问题到底是中央解决，还是你们解决！怎么刚刚支持一下，就成了这个样子，是你们解决就不必来中央，外地来中央的，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你们张贴出来自己去看看。同志们，你们这是宗派主义的根子的，你们不仅要夺杨马的权，还要夺头脑里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的权，你们到中央开会，给中央下命令，揪这个，要那个，到底是你们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你们，这种作风是不好的，你们还没有当权呢，你们这样还能掌好权！我们要告诉北京的单位不能支持你们的这个作法，北京什么机关帮助你们搞这个东西？（指海报）

还有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你们向中央下命令要揪安子文，揪李维汉，这样搞是不行的，你们对的我们支持，错的我们不支持，你们开这样的会，事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你们在中央嘛！有代表嘛，也不请示我们一下，也不打个招呼，独断专行怎么行！刚刚支持一下你们，家里又在闹分裂，这怎么行，跟人家达成了协议又撕毁，这怎么行！你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大批判，向大联合、三结合方向走，你们自己先搞分裂，我希望总指挥部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

当然，朱声达过去对你们镇压，激起你们义愤是自然的，你们的革命精神是对的，在革命中有些义愤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朱声达下飞机你们拉去斗了，可以不采取这种形式。当然群众揪去斗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朱声达以此为借口，思想不通，你（指朱）镇压群众就能想得通？死伤了多少人！你是皇帝，你是贵族，难道不能斗一下！当然，不是说总指挥部不对，还是要向群众解说一下，义愤压抑一下，你们在中央开会，要听中央的安排，要请示中央，不要搞那个形式主义的东西，要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第一次接见你们的代表时，已经把中央的方针给你们讲过，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各派群众组织都可以来参加会议，无论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都来在会上摆事实，讲道理，把是非弄清楚，对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嘛！毛主席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总指挥部你们要主动给筹备处，宁三司做工作，不要造成人家来中央开会就抓人家的影响，你们应该懂得中央的政策，人家来了，你们就揪斗，结果给中央，给北京卫戍区增加麻烦，你们不能唯我独尊，唯我革命。今天不多谈这些了，兰州军区、自治区军区、还有驻军还是要向保守组织群众做工作，我想，我们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的。

我们还是先解决军区的问题，总指挥部同志也可以发言。群众组织的问题待各派到齐再说。

总的看来，宁夏的形势是大好的。特别是六十二师进驻宁夏后，形势大大变了。说明不管哪个地方发生什么问题，只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了，只要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依靠人民解放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广大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时是气势

汹汹的，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面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很快土崩瓦解。林副主席说，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了人民解放军，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

中央有个方针，不管任何同志犯了错误，都要给一个改正的机会，朱声达你到中央采取不讲话、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不讲话，我还少见到解放军干部抱这个态度的。我现在第四次要求你朱声达，不！是第四次请求你朱声达讲一讲，你这个态度不是解放军的态度！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你不是有四个想不通吗？想不通不要紧，你可以讲一讲嘛！讲出来，大家可以帮助你解决通嘛！今晚主要讲军区的问题，也可以联系讲一讲宁夏的形势问题，谁有意见就讲。（朱声达表示了态）你几次都是这个调子，你犯下的什么罪嘛！要具体讲一讲嘛！你犯的什么错误我们还不知道呢，这又不是讲什么理论问题，以后再写嘛！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那些不对，也许你也还是有功劳呢！你具体讲出来，你来了二十几天了，还是那么几句空话，戴空帽子，说那个空话有什么用嘛！有那些想通的想不通的都讲出来嘛！，你这叫我们怎么帮呢？主席说对犯错误的要一看二帮，你不说出来我们怎么帮呢？二十多天了，还是叫我们看吗？你具体讲一讲嘛！

（朱作了粗糙的、挂一漏万的、不痛不痒的检查，大家不满意，批判他态度不老实，强烈要求他老老实实地向中央交待具体罪行。）

同志们，我看会议这样开，今晚我主要想听一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和军队方面对朱声达有什么意见，看造反派同志哪个讲一讲。（牟元礼作了扼要汇报）马思义同志怎样被打死的？那个同志知道讲讲。（牟元礼：略）朱声达！你讲一讲马思义同志是怎样被打下去的。（朱声达：略）打死马思义同志的凶手是谁？这样的凶手要惩办！总指挥部的同志去了吴忠，对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团结教育，当然对杀人的坏头头应该处罚、逮捕法办。当然，捕人不要太多，但是是非要弄清楚。解放军现在吴忠进去了没有？（进去了）进去后要对死伤了多少人调查清楚，要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他们知道情况，让他们自己起来揭发。你们造反派也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不要搞图形式的那些东西。你们看到死伤了多少人有些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要看到，受蒙蔽的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间接受害者，要做工作，让他们起来反戈一击，建新功，把他们的反革命头头揭发出来，造反派决不要搞报复。你们要学习中央对武汉

“百万雄师”的处理方针和办法。现在，吴忠这里还有多少人？（牟元礼：已回去了五百多，还有二百多人）这二百多人造反派同志要做工作，张怀礼同志也可以告诉他们回去如何做工作，不要因看到死了很多人，就想报复，要分化保守组织。吴忠人武部的同志你们知道不知道马思义同志是怎样被打死的？（王光福：我七月二十七日来京，不知道）我希望你承认错误，检查和改正错误，帮助党和解放军解决那里的问题，稳定那里的秩序。同时，你应当知道那里犯罪的是什么人，揭发了出来就是对人民将功赎过，希望你作作这个工作，用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朱声达，死了多少人！你无动于衷，下飞机后斗了你一下，你就不行了！还有指挥部的哪个同志讲（范泰昌同志：略）你们宁大有几派？（三派）你们这一派有多少人？（范：全校一千五百人，我们有一千一百人）哈忠国你是代表吗？（哈：我是今天临时来凑数的）你在北京搞的那个一千多个单位的串连海报，都是些什么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北京什么人都有，有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还有反革命组织“五·一六”，“星星之火”，北京的情况很复杂，你们串连光以派别来分，支持你们的你就要，难道美蒋特务支持你们也要吗？你们还到北京来给刘格平同志平反，中央早给刘格平同志平反了，现在他是北京军区的政委，是山西革命委员会主任，这能说没有给刘格平同志平反吗？你们来这里开会究竟是给他平反，还是糟蹋他呢？这些问题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要动动脑筋嘛！接受个教训，以后注意吧。（范继续控诉朱声达）我再讲一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铺张浪费问题。你们开会来了三十名代表，工作人员就带来了三十九个，你们又不是来作官当老爷的，你们的派头真不小啊，准备材料你们自己动手嘛，应该让工作人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带工作人员的作风，恰恰是我们文化大革命要反掉的东西，听说你们代表团在北京搞了四十张月票还开来两部华沙小轿车、两辆小吉普，一辆卡车，你们领导成员外出坐小轿车，光汽油就花了一千六百多元，我要下令没收你们的汽车，告诉加油站不卖给你们的汽油，联系你们出的那个串连海报，你们的大手大脚不是偶然的，这样给你们指出来，是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要把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好好整整风，兰州军区和张怀礼同志应该帮助你们整整风，你们来北京是革命来的，不是当老爷来的，你们那里斗争还很艰苦，你们要节约闹革命，不要摆阔气。你们来北京的人有带枪的没有？有的话要立即交卫戍区保管，在毛主席身边带枪是犯法的，有这样的人是要逮捕的，希望你们彻底清

查一下，这不是儿戏的。（“总指挥部”揭发朱声达拒不执行中央文革办事处六·五三点指示的罪行）这些事朱声达应该是记得的，也不是要你作文章，写出来再检查，这是中央的指示，你不执行。把中央派出通讯社抢了，还叫革命行动？这是革谁的命！这些事你自己讲了多主动，人家讲了多被动。中央派出的机关，任何人没有打砸抢的权利，即使他有缺点错误，也应反映到组织上来解决吗！这么重要的政治事件，你不交待，叫人怎么帮助。（当指挥部同志揭露朱打倒杨马甘李吴实际是保杨马的阴谋后）甘春雷来了没有？（甘：来了，他们把我囚禁了五个月）这样的政治问题你（指朱）讲了就算了，你怎么能忘了呢，恐怕不是忘了，你是忘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总指挥部”揭发朱不贯彻中央 222 号文件的罪行后）这件事要查清，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这样污辱，朱声达你是知道的，你是怎样处理的？为什么在印制毛主席著作中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什么人搞的？（朱答：不知道）对我们伟大领袖这样污辱你为啥不管（黄立：在军内有人说 222 文件是黑线上下来的，是大毒草）在你管辖的部下出现这样现象，是不可理解的，你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你把你那灵魂拿出来，你算不算共产党，这样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件，你认为不严重，那你认为什么是严重的！你恶毒的反对毛泽东思想，（李天焕：很明显你就是仇视毛泽东思想，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三岁小孩也知道，你为什么对贺龙的象片那样感兴趣，为什么对毛主席的著作不感兴趣，你就交待这个问题）（朱：这实际是个立场问题）（李：为什么在中央指出这是很严重政治错误之后，你仍不处理？）（朱：我抗拒中央。）

康老：这件事，政治委员江波知道不知道？你看到中央这个指示，你是怎样处理的？（江：我当时派工作组，派人都不去。）你为什么不去！你这个政委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代表党的，你代表的那个党，你为什么不处理？军区党委的委员你们为什么不处理？你们也是有责任的。按理，这件事你们应主动的处理，用不着中央作指示打招呼，但是中央发了报你们还不处理，中央责成兰州军区处理，你们还认为把你们的权夺了，这样的权为什么还给你们，看看你们反动到什么地步了！你们反毛泽东思想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你们那里简直成了个独立王国，谁的话也不听，你们这样干，究竟谁在支持你们？你们背后的人是谁？这样严重的问题，在北京就会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在你们那里却无人处理，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我看你们是另外一个党了，你们那个党委要检查，这件事不能马虎过去，

你们要交待，如果我们马虎的放过了，我们就要犯罪，我们帮助你们是爱护你们，你们难道还想勾结走资派来搞吗？朱声达你还想靠贺龙搞复辟吗？你是在想搞复辟，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失败。你们不是依靠毛主席，是依靠刘少奇。告诉你们，那是作梦！痴心妄想！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朱声达，我今天是第三次见你啦，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但是思想，而且是行动，你还不向中央交待你的问题，难道你要我们给你磕头吗？！你把我们帮你的好心都不当回事情，一点也听不进去。告诉你，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以后的会上不让你讲话，永远不让你讲话。（张怀礼同志揭发朱声达攻打吴忠、永宁计划后）这个问题是军区谁搞的？要查清楚，告诉那里知道情况的同志，让他们反戈一击。指挥部的同志也可以帮助做些思想工作，这些同志是受蒙蔽的。何其仁，你们有没有对付中央的计划？你说一说。（何其仁作了很不老实的检查和揭发）我想你还是采取高姿态，学习山东的解放军，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彻底检查比不彻底检查好，这些问题在会上你要检查，同志们也要揭发。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问题。当前是大好形势呢，还是形势不好呢？北京有的学校认为武汉事件后，形势好象不好，北京也落后啦。这种看法不对。同样，你们宁夏的代表总指挥部的同志，你们对宁夏的形势怎样看的呢？是好形势还是不好形势，你们有的代表怕这里开会受围攻，因此到处搞串连，寻求支持，大造舆论。所以对形势要有个明确的看法。中央、中央文革认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的形势，这个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从你们宁夏来看，都是会看到的。一年前，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反动路线是何等猖狂，现在全国搞大批判，全国人民对刘、邓的路线共同声讨，刘、邓反动路线失败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还可以看到隐藏在党内的被刘邓包庇的一批叛徒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等，都被挖出来了，潜藏在党内很深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也都被揪出来啦。全国各省市的问题一个一个得到解决，象宁夏把杨马揪出来了，朱声达的反动路线也被揭露啦，当然还没有揭深透，可以说基本上揭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出朱声达反革命的面目，反党反毛主席的丑恶面目，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觉醒，军区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已经开始觉醒，朱声达的

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暴露之后，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这就是看出反动路线是怎样见不得太阳。六十二师部队进驻宁夏后，解决了青铜峡的问题。吴忠虽然部队到的晚了，造反派受了些损失，但以后还是进去了，做了很多工作。永宁的问题，只要坚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也会很快解决的。因此，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形势会很快更加大好起来。朱声达把形势估计错了，他还以为贺龙还会上台，资本主义还可以复辟，你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三番五次不交待，包括江波，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还有后台，痴心妄想，负隅顽抗，以为还有什么力量还在支持你们，等待时机，那就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碰得头破血流！你们还有黑手，还想复辟，告诉你们，清醒一点，你们的阴谋破产啦！你们的反动路线土崩瓦解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反动路线了不起，你们是小丑，是见不得太阳的，青铜峡，就是一个例子。你们应该认真检查了，不然就要倒台了。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但这个问题不光靠我们，还要靠你们自己。你们把形势估计错啦，你们那一套彻底破产啦，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造反派也要对宁夏形势很清醒，宁夏问题只要认真坐下来，冷静考虑，不图形式，问题是好解决的，比起全国来，宁夏问题是好解决的。造反派要看到这个大好形势，从这点出发，你们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相信中央能解决好宁夏问题，用不着你们出那样的大海报，你们要认清形势，好好掌握斗争大方向，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上一小撮走资派的当，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派、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分子造谣，妄图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你们头脑要清醒，你们应当有敌情观念。宁夏那里接近苏修和蒙修，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妄想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北京有一小撮象“五·一六兵团”，他们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妄图动摇党中央，北京的群众组织也是复杂的，你们应当相信宁夏的问题你们能够解决，有兰州军区的支持，有中央的领导，你们应该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相信你们那里的解放军，相信区党委内的大多数干部，北京的群众组织对你们的事情并不清楚。朱声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非常非常突出，甚至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个别的、少数的反革命对毛主席著作恶毒污辱，他们都不关心，他们是极少数的人，但相当顽固。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坚决紧跟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批深批透，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你们造反派的复仇情绪要克服。你们在北京不请示中央，做这个做那个，要加以警惕，不要搞宗派，中央正在解决宁夏问题，你们还在那里另搞一套，串连了一千多个单位。你们知道那些单位都是些什么人吗？不要搞那个宗派支持，中央不赞成你们，你们还拥护不拥护中央？你们到中央来解决问题，而又用另一个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你们弄不好会上当的。在大好形势下，你们要掌握好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听从中央对解决宁夏问题的部署，你们不要发急，宁夏问题不难解决，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几个小丑在那里搞的。

另外，造反派、军区、独立师的同志，要注意一个问题，武汉事件后，我们报纸上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就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不对，毛主席在六五年中央讨论二十三条时，就指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毛主席英明战略口号，英明的指示，现在提出揪党内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军内的一小撮那个不是党内的，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嘛，这个提法没好处，反到对刘、邓反动路线有利，对敌人有利。我们有些青年人也对这个感兴趣，有些大学一下子就出动几千人到各地去抓陈再道、王再道、李再道，这是不对的，我们军队的个别人犯了错误，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打不还手，枪被夺了都不还击，那里有这样好的军区。军区的同志要注意，把朱声达等人犯的错误，和下边干部、战士要区分开，造反派的同志要特别搞好拥军工作，这在你们那里更要突出出来，一定要搞好，军区的干部、战士要加强教育，不要受少数坏人的挑拨，去跟六十二师闹对立。最近中央作出决定，独立师不归军区管了，划归野战军管，河南的独立师已经归野战军管啦。要教育独立师好好向六十二师学习，千万不要受人挑拨，对六十二师怀疑，二十一军在山西、陕西支左都是搞的好的，独立师与六十二师要亲密合作，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朱声达的少数亲信的挑拨。同志们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相信，这点你们宁夏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朱声达犯错误，就动摇了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的信念，你们那里拥军爱民工作，比任何地方都重要。当然，有些人还是会挑拨的，会说在中央开会，康某人路线错了，矛头对准了解放军。象今晚我批判了朱声达、江波等人，不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正是爱护解放军，为了把“三

支两军”工作搞的更好，我几次苦口帮助朱声达，是为了挽救朱声达，希望他不要垮台，这个信念我到今天还没有消失，我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赶快觉醒，我们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巩固解放军，是使解放军更加巩固。这点宁夏的同志要了解，不然就容易接受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或者认为我们是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解放军是保护人民的，我们能去镇压枪杀群众吗？！那种路线那种思想，不能代表解放军，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看到主席对武汉问题的批示第二条讲到，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陈再道在内，只要认真检讨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走到革命的行列中，朱声达、江波你们应该体会到中央政策，应该把你们的灵魂拿出来，好使我们帮助你改正错误，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使解放军更加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使解放军威信更加提高。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长期蒙蔽了群众。宁夏的情况比较复杂，同志们应该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办事，这样吴忠的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宁夏前一段乱了一点，乱可以变成治。乱了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了，有了解放军的支持，有了群众的觉悟，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就好解决了。这里边有几方面的政策，指挥部和军区的同志都要注意。宁总司、宁三司既然来北京了，你们指挥部和军区要给做工作去，他们争位子闹派性，要打掉这个小派性，要他们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关心大事，不要争宗派小事。给他们做工作，最好要他们派出代表参加会议。

对筹备处要把头头和群众分开，对那种杀人头头要惩办，对群众要教育要争取，对吴忠反革命头头要逮捕法办，对受蒙蔽的群众要做工作。对永宁人武部要指出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主要由朱声达来负，人武部也有责任，希望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在政治上不能让步，要他们和朱声达划清界限，要他们出来向群众做宣传制止武斗，让受蒙蔽的群众把武器放下，第一步自己封存起来，第二步再交出来。警告他们，对抗解放军，他们的矛盾性质就变了。

（康健民：筹备处说青铜峡的反击是赵永夫的人物搞的。）

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告诉他们，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照样办理。这点要给新生的支左指挥部告诉一下，指出他们（筹备处）是赵永夫式的人物，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那些反革命头头镇压的好，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不要搞武斗了，必须指出他们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对六十二师的态度是错误的，

同志们看到了中央的九·五命令了吧？不管那一派都要照这个命令办，解放军要执行，造反派要执行，保守派也要执行，这是命令，不是一纸空文，对这个命令要好好学习，坚决贯彻。解放军的通讯员外出，他们见了就射击，有的打死了，或打伤了，这怎么行！要坚决回击，我知道你是那一派。你们指挥部的同志，有大量群众工作要做，还要改正你们组织中的缺点错误，纠正你们头脑中不纯的东西，我们相信你们，支持你们，但不支持你们的缺点，批评你们正是为了爱护你们。对筹备处，中央决定了，还是让代表来开会，希望你们劝说，来了不要抓他们，来了就让他们讲话，真理在你们一边嘛！杨、马他们参加会议好，还是不参加会议好，没有征求你们意见，今天没让来，中央解决其他省的问题，让走资派参加了，象河南的赵文甫就参加了，看来参加有好处，你们考虑一下，提出意见，至于筹备处的杀人犯是不能参加会议的，那些人要法办。你们造反派对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政策了解不够多，我希望你们少搞形式，多学习主席著作和党的政策。最后，我看宁夏问题不难解决，我们有这个信心，那些小丑欺骗蒙蔽了群众，只要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贯彻到群众里去，群众就会觉醒，只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就能把事情办好，你们好好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多研究一下中央的政策，少到外面搞串连，把屁股坐下来，多读毛主席的书，不要坐上汽车摆那些阔气。完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康生接见宁夏三派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深夜 24：10 至次日凌晨 3：05，地点：人民大会堂。康生、李天焕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宁夏各派代表团负责人（代表团负责人员名单略）。六十二师徐副师长也参加了会议。〕

康生同志问了每个人的名字，了解了本人和家庭的一些情况。当问到了毅民时，康老问了他的年龄，丁即介绍了他如何受迫害，如何开除党籍等情况。康老问如何解决的。当问到张浩时，张浩自吹在中央组织部就和黑帮进行斗争，在宁夏又和杨马斗争。康老说：“那你一贯正确喽！”又问：“你算不算当权派？你是筹备处的头头喽！”

康生同志说：我今天来晚了些，审查国庆节演出的节目去了，我从节目里带来了一句话：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有错误就改正。我告诉大家，犯了错误不要紧，

改正了就好了。康生同志问各方来了多少人，问到筹备处有多少人时（筹答：三十人）是否太多了？（筹：不多，看来还少呢？）三十人还嫌少？那就在宁夏开会好了！代表是代表一种立场，一种思想，一种情况，（筹插言：我们那里还很紧张，把我们打散了，人抓去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筹插言：我们很紧张）紧张一点好，紧张方能促进你想问题，促进矛盾尖锐化了方能解决。否则不痛不痒不能解决问题（筹又插言：解决好了就好了，解决不好，就更不好了）。康老重复一遍说：解决好了，就好了，解决不好，就更不好了，这时筹又插言打断康老讲话，康老说：你们老讲人家，你们要先把自已检查检查嘛！（筹又插言：赶得我们无家可归了）。你们无家可归了？你们先把自已的缺点检查一遍！

康老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和大家见见面，认认人……（筹又插言：被敌人反对是好事……）康老生气地说：不谈了！

康老开始讲话：

今天大家来，认识认识，对各派代表交代一下。宁夏问题，中央解决的步骤是先解决军区问题，军区问题是关键问题，朱声达长期顽固地对抗中央指示，中央绝不允许这样做的。朱声达对中央的手段很恶劣，我们军区的同志也好，群众组织的同志也好，都要揭发。宁夏的问题主要在杨、马。杨、马敢那样，也是有朱支持。朱声达在长时期里，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因此这次开会首先解决军区问题。

这次各派代表都来了。毛主席的方针是各派都来，听取各方意见，那怕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都可让他来。反动组织并非群众反动，是头头反动。保守派，造反派都来，来的不是一个观点，正确的观点来，不正确的观点也来。

中央决定这次各方代表来京解决问题的背景是，宁夏武斗正厉害，特别是吴忠指挥部被围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受到摧残，在这个时候，叫筹备处来开会，是向总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的。总指挥部和筹备处进行武斗，给中央解决宁夏问题造成许多困难。以后，徐师长做报告就能说明问题，野战部队执行命令遭到抵抗是很不正常的。

你们来这里开会，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材料都可给中央送。

关于会议名额的确定，有几个因素，原来是要解决两派武斗问题。宁三司参加了没有？（三司答：没有参加，我们反对武斗，也挨打了。）挨打的各派都有，检查一下，各有各的道理。你们少来一些，不是不平等。原来考虑两派多，你们少，有利于解决问题，不要理解错了。

到北京来开会，中央反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只要毛泽东思想派。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从人民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中央最近发表社论，要党性高于一切，不要派性高于一切。

各派代表来的不少，在北京给中央添麻烦，不能为会议设置障碍。对此无论那一派都有责任。我们规定各条，要求大家都遵守。

一、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吵架，骂娘，那样解决不了问题，不要没讲完就插上，说人家“造谣”，要看真理在谁手里。你们要达成协议。你们算几派呀？

（宁总司说：四派）我看三派吧！三派也好，五派也好，无论几派，不从阶级基础看，就看不出来。

二、北京开会，各派都不能互相捉人，不要打架，搞打、砸、抢、抄、抓，要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你们能不能执行？（众答：能）（丁毅民插言：我坚决拥护，希望家里也这样做），你这个丁毅民怎么这样，我说是在这里，家里问题慢慢解决，不能一口吃一个馒头，不要急嘛！我说的是北京。不执行“六·六通令”就不够代表资格。

三、不要在大街上贴乱七八糟的传单和图片，这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有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搜集这些东西，一百美金一张，特别是死人的照片。张贴这些东西只能往我们脸上抹黑。我们的问题靠中央解决，不是大街解决。

四、不要到北京各单位去串连，北京有派别，你们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你们，要依靠中央，不要陷入派别斗争。

五、检查一下，有没有带武器的？筹备处有没有？（筹答：没有）要好好检查一下，我们有经验，开始说没有，后来又有了！

一定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以上几条希共同遵守，要告诉全体代表。康老说：希首先检查自己，作自我批评，无论那一派，特别是筹备处的同志。筹备处的同志有的被关起来了，现在来开会了，这些代表要想一想，筹备处在宁夏都干

了些什么。筹备处向解放军开枪你们还可能不知道。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受到很大阻碍。筹备处的同志要想一想，向中央交待些什么，不要光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同样，“宁三司”，“宁总司”也要想一想，你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总的立场是怎样的？要从路线上看问题，看站在那条路线上。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真正中立的，不倾向于这一方，就倾向那一方。要从路线上、方向上看问题。看问题要看主要方面，不要看次要方面，要看本质，不要看形式，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康老问了问宁夏情况。徐副师长汇报，六十二师进驻银川、吴忠等地受到的阻碍，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被砸，宣传队受围斗等情况。康老并询问了吴忠、永宁是何时进驻的，是怎样进驻的。康老严肃的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打了，同志们想一想，我们的长城被打了……（筹备处打断康老发言：我建议进行调查，围斗宣传车的情况不符合事实）我看首先自己调查自己，不是我们调查。在中央面前要实事求是。

徐副师长汇报了参加第一次打宣传车的农民经过宣传教育，觉悟了。第二次遇到宣传车就不打了，而且还阻止别人打。康老指出：农民是好的，群众是好，头头坏，就是头头坏。欺骗农民会受到农民惩罚的，将来农民会找他们算帐的。（对筹备处代表）不要听自己人讲的就信，就觉得是对的，好多是造谣。徐副师长说：宁夏的问题，搞反动路线，盖子已经揭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群众见面了，群众就觉悟了。

康老接着讲到朱声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问题，举出一些实例。康老说，在毛主席著作的扉页上印了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对毛主席著作的侮辱。（筹备处插言：这事我们有错误，但事实有出入，扉页上印的东西，装订时可裁掉）。怎么能这样看问题？你们想了没有？这是世界人民的宝书，你们侮辱了它。不能那样解释！我看了非常愤怒，你们侮辱世界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还说是别人捞稻草，你们说拥护毛主席，到底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我在北京看到了你们印的书？有极大的阶级愤怒，没有愤怒就不是毛主席的学生，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朱声达是军区司令员，难道他不懂吗？中央责成兰州军区进行处理，但朱声达拒不执行，兰州军区处理不下去。是那样的顽固，反动。我解决其他地方的问

题都没发脾气，但是处理宁夏的问题我发了脾气，这是阶级的愤怒，我所以提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大问题，是关系大方向的问题。

补充：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中立的，中间状态的，不是倾向左的方面，就是倾向右的方面，从路线方面看问题，从方向上看问题，不是从个别的部分的，小的事情看问题，当然也可以看，但是主要的是从大方向上看问题，就是抓主要问题，不要把次要的问题当做主要的，当然次要问题也还要过问，另一个是从本质看问题，而不是从形式看问题，不要把形式当做本质，最后一点，各派都要注意这个问题，眼睛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但是原则问题要搞清楚，眼睛要看到今后怎么办，眼睛不但要看现在还要看将来，向前看，抓住本质，抓住主要问题，不要纠缠次要问题，要使文化大革命坚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走资派，把矛头对准朱声达等人，在这个斗争中，革命的大批判中间要促进宁夏的革命的大联合，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不是向宗派分裂方向走，而是向着联合的方向走。

他们就是欺骗农民，欺骗农民的人要受到的农民的惩罚。农民死了，将来要同他们头头算账的，你们代表自己也是不清楚的，你们也听了你们自己人讲的不要就信，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对的，自己人报的情况许多是假的夸大的，制造谣言都信，有些情况你们不那么清楚，拿阶级观点去分析，从路线上去看，你们筹备处到底认为声达怎么样？这是个首要问题，你们代表要研究这个问题。朱声达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你们，蒙蔽你们，利用了你们，青年受蒙蔽，群众受蒙蔽，农民受蒙蔽。工厂、学校为什么有两派？并不是有阶级基础两面派。后面有人支持，或者是走资派，或者是坏人，或者是一种社会思想。宁夏的问题并不难解决，而且六十二师进驻银川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盖子揭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群众见面了，群众是好的，宁夏的问题容易解决。

农民挖路砍树背后有坏蛋！在座的有贫下中农出身的，谁愿意把自己的树随便砍掉？那根本不是群众想的，很清楚了。

朱声达就是利用这一点，宁夏就有一个军分区，其他都是人武部，人武部也受朱声达的欺骗，上了个大当，他不是不晓得不认识的问题，他是有他的一条路线，有他的一条纲领的。你们代表晓得不晓得。在宁夏印毛选在封面上都印上筹备处的标语，这是全国没有的事情。

你们不要把这种问题凭空起来看，你们错误就没有认识到，我还不是说你们，你们怎么能那样说，我是亲眼看见的，那是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污辱。

（筹备处：当然，我们工人在印刷上不严肃，就让指挥部捞了一把。）同志呀！你怎么这样看？！我看到了，你们想了没有？对世界人民的宝书，这是极大的侮辱，不好那样解释，什么不严肃，什么捞了一把，我，今天不责备你们。你们的态度是错误的；我说的是朱声达，我看了后发脾气，这是最大的阶级愤怒。我们伟大的领袖，世界人民的导师，世界人民极端热爱，怎么是人家捞一把的问题？你们到底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怎么能够这样做？！我们在北京看到这个事情是极大的阶级愤怒，发电报给朱声达，要他检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受教育，这厂是军管了的，朱声达不传达，不执行。我不是给同志们发脾气，这是阶级愤怒，没有这种愤怒就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我不是责备工人，我是讲一个军区司令员、政委，接到电报还不处理。难道他们不懂。难道这是认识问题，以前错了，指出了错就检查，不仅如此，大军区派了工作组去检查，还解决不了，那样顽固，那样反动，派工作组还说不相信他们，他肆无忌惮地反对毛主席，侮辱毛主席，自己做错了还不执行，你看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至于小将犯了错误，工人犯了错误，可以检查，军区司令员、政委对中央采取那样态度，中央怎能容忍？我解决其他各省的问题，我都是平心静气地讲，唯独宁夏问题上发脾气，这是革命的阶级愤怒。我所以提这个问题，提醒同志们注意大问题，方向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不要把最主要的问题当做技术问题。那样就不对。事较多，就举这一个例，启发同志们想一想，犯了错误改嘛！不要去掩盖那个错误，辩解错误，这样自己就提不高了。因此我们提醒大家抓大方向，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主要问题，不要把方向问题看成次要问题，看成个别的，技术上的问题。不要把个别问题当做主要问题。第二，要看本质，不要看形式，看本质的问题，不要被形式所迷惑，第三，要向前看，不是向后看。

总的是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在会议上吵架，让大家讲话；第二不准在会议期间打、砸、抢、抄、抓；第三、不张贴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传单、图画、照片；第四、检查一下，绝不允许携带武器，如果有，立即交出来；第五、

主要讲自己的问题，不要搞这样那样的联合，不要搞到北京的派别斗争中去，那样的派别是很复杂的，就是不做有害于宁夏的问题，有害于会议的事。要做什么，要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掌握大方向，要掌握中央的政策，在批判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拥军爱民，具体的在宁夏就是拥护…师，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

整个宁夏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是大好的，宁夏的问题不难解决，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开好的，这个很自然，从你们自己的发言中，你们的思想中不同，能一下同意，有个认识过程，这个并不奇怪。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晚十一点三十分至二十一日二点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时在坐的有：李天焕同志（第二炮兵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同志。（康老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进入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下面是康老的讲话。〕

请坐下。同志们，很对不住你们，我已经把开会时间改了三次了。原来说八点半开会的，因为有事，不能来，改到九点，以后又改到十点，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实际上，我那个会还没有开完，就来了。让你们等了很久，请同志们原谅。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在中央开会，今后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常常遇到一些临时会议，所以时间不好定。今天到晚了，对不起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议是个很大的会议。宁夏自治区人口比各省都少，但是代表团却比各省都大。这也有个好处，人多，军队方面、群众组织各个方面的代表都有，可以多听取各方面意见。

今天开会，先认识一下。部队的同志已经开过几次会议了。今天各个方面的代表在一起开全体会议，这还是第一次。各方面群众团体代表，我相信，要提的问题一定很多，要谈的意见一定很多，需要向中央反映的情况一定还会很多。你们家里边发生的一些紧急情况，一定会有。例如，总指挥部和三司在银川还有冲突，还有武斗，还有打、砸、抢。这不好，这些都不应当再有。总指挥部要严格注意，你们应该打电话回去。各方面都要打电话回去。要严格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能打、砸、抢、抄、抓。

今天晚上要向大家谈什么？先谈这次会议解决什么问题。要抓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方向问题。大方向管小问题，大方向解决了，小问题也就解决了；大方向抓不住，就容易在小问题上纠缠不休。其次，你们到中央开会，你们是代表，今晚要谈一谈怎样做一个代表，代表应当做什么。开会如果不把大方向搞对，代表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任务，代表着什么立场，抱有什么态度，不解决，会议就不容易开好。所以，今天晚上先谈谈这两个问题。

首先，同志们要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去年六月一日算起的话，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一年零三个月了。经过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们更加体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意义。

今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公开发表了去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接着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社论，说明“五·一六通知”的伟大意义。社论叫《伟大的历史文件》。就是说，这是个伟大的历史文献。在这个文献中，提出了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我想问问总指挥部、筹备处、三司的同志们，你们读了这个文件没有？（答：读了！）是不是全体都读了？（答：都读了！）我看回答的不怎么响亮，有点问题。也许你们有的读了，有的没读，有的读了没有懂得。你们来北京，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语录，中央的指示、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很好地读一读。所以，在谈问题之前，我有个建议，征求你们的意见，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赞成？你们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军区的同志在内，每天至少要用两小时，至多四小时去读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中央的指示、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要安下心来，好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看同志们，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很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五·一六通知”和这个社论。它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虽然不是全部的意义，但是主要的意义，它说明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就算结束，而是要在整个历史时期内，都要进行

两条道路的斗争。从那个文件能看到，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重大成绩，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

现在面临着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了，差不多再有十天，我们的国庆节就到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全国出现了比过去更好的大好形势。同志们，你们脑子里如果不认清这个问题，你们就容易在遇到问题时，就模糊，就动摇，甚至被欺骗、利用，自己走到邪路上去。

同志们想想看，在去年这个时候，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虽然那个时候在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在党内发出了这个号召。但是，如果从今天比较起来看，这种大批判，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路线的大批判，已使他们的路线垮台、崩溃，斗臭！这是我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胜利。这不能不是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一个主要标志。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广大劳动群众，千百万群众学习、使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使用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人同毛泽东思想逐渐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是最最不可战胜的力量。亿万劳动群众与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变颜色的最最重要的保证。

不可否认，在群众当中，在各群众组织中，还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人们的头脑中“私”字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影响着一部分人，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还存在，还没有彻底肃清，还有发展，一个阶段甚至还发展到武斗，象你们宁夏那样甚至还发展到开枪杀人！但是，不管怎样，经过了“乱”，整个运动向大好的方向发展，群众会走到更高更好地团结。运动是在按毛主席的原则发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全国都是这样。现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七个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北京、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青海，市里还有个青岛。

另外，有些省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比如说象河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内蒙、四川、甘肃这八个地方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现在，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问题，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决问题。各个省的情况不同，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能够解决的。

形势的大好还表现在我们人民解放军这方面。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在介入文化大革命中，在“三支”“两军”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使我们人民解放军思想更提高，组织上更加纯洁，意志更加坚定。他们在支左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从支左中看到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伟大。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军队。他们在支左中常常挨打，仍坚持“四不”，甚至有人缴他们的枪，他们都是高举毛主席语录，永不还手，甚至有的牺牲了。同志们，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

（答：没有！接着总指挥部代表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同志们，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就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可靠的支柱。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你们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吗？（答：不能！）你们宁夏旁边有蒙修，有苏修，你们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吗？（答：不能！）解放军，这是我们伟大的长城。所以，毛主席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江青同志也讲过“拥军爱民”，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不是偶然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军队内就没有错误，军队内就没有坏人。军队中也有缺点，也不是军队中没有个别不好分子，事情很明显，有混进我们军队的阶级敌人，象青海的赵永夫；有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象内蒙的黄厚、王良太，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也还有一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执行中央指示，抗拒中央的指示。上面抗拒中央，下面就必然镇压群众，因为中央就是毛主席的中央，同群众心连心。镇压群众，就必然抗拒中央；抗拒中央，就必然镇压群众。宁夏就出了这种少数人，就是朱声达，他就是一贯地对抗中央，镇压群众。来开会，直到今天还不觉悟。这里面也有政治委员江波，也有何其仁等等的坏分子。但是，同志们，这在解放军中是少数，绝不能动摇毛主席讲的“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不是讲过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吗？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象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不能代表解放军。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

了解放军的优良品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取得了优良成绩，自己又提高了自己。这也是大好形势重要特征之一。

特别值得向同志们讲的是，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解决安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作用。江青同志的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的指示来发挥、来阐述的。正因为把毛主席的思想和广大群众见面，群众的眼睛就亮了。当天晚上，安徽代表把江青同志的讲话传到合肥，人们敲锣打鼓，本来两派斗争很厉害，很快就结合起来了，两派立即停止了武斗。各派各自抓了操纵他们的坏头头。当天晚上就把坏头头送到军管会。

你们宁夏形势大好。但是你们各派都要警惕，看看你们背后有没有黑手，有没有人欺骗，利用你们，有没有操纵你们的坏头头。杨、马是很清楚的了，朱声达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的人虽然口头上也说朱声达的罪恶和你们没有关系，但是直到今天有的代表还不觉悟，还在跟他走。你们很多代表是中学生，你们很多情况不了解，你们是受骗的。将来军区的同志是会揭开的，你们会清楚的。

从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中央发布了“九·五”命令以后，全国各地是走向大团结的形势。在安徽，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影响下，在江青同志讲话影响下，就出现了（这时，康老找材料），在这月十二日，合肥的两大派就有二十万人举行了“拥军爱民”的大会，今天淮南又有几十万人，召开了两派联合的大会。刚刚，今天下午，我们又和北京市的人开了一万五千人的大会。这几天北京出现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的很好的形势。从这些问题上，同志们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不是那些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快要垮台了。他们的希望永远不能得逞。也不象那些悲观主义者所想的，形势不好了。事实违反了他们的意志。形势不是不好了，这里，从宁夏问题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同志们想想，去年这个时候，杨、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目还没有彻底揭露，还没有斗深、斗透、斗臭。但是，今年就比去年大大发展了。因此，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斗争，中央就可以做出决定，杨马可以在你们的报纸上点名公开批判，斗倒、斗臭、斗垮。这次中央叫他们来，他们好象有个错觉，觉得究竟是不是让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将来把他们叫来开会，你们可以教育教育他们。你想，这是个好形势还是个不好形势。另外，杨马的同伙、长期对抗中央的朱声达的错误也已经揭开，大多数的人

包括他朱声达自己在内，也不得不承认，他过去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志们，这是当前解决宁夏问题最重要的，最大最大的问题。哪个组织不关心这个问题，矛头不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宁夏不对准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等人，你们就要犯错误。因此，揭开杨、马，揭开朱声达的错误，对宁夏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形势。揭开他们，才能使同志们脑子清醒，接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真正接受了，是真接受，不是口头上的假的接受，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进行的更好，就会使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从宁夏的问题也证明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阻挡不了的。他对广大群众可以蒙蔽一时，但它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群众一旦觉悟，他们会反戈一击的！这是宁夏最好的形势。把这种反动路线打垮，群众就会提高觉悟，扫除障碍，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揭开了朱声达的错误，就把他在宁夏的一套阴谋诡计，镇压群众的所谓作战计划，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彻底摧毁了。虽然朱声达、江波、何其仁今天还不承认，不揭发，但是你们的阴谋诡计，我们都知道，你们不揭，将来有人揭。直到现在你们还不觉悟。

我们是不愿意他们垮台的。犯了错误，要按毛主席说的“一看二帮”。但是，单靠我们不行。我今天已经是第五次向朱声达他们讲话了。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彻底交待。但是过去他总是摇头！（总指挥部代表群情激愤，高呼“打倒朱声达”等口号）每次总是这样，就是两句话，我犯了错误，我要改。这怎么能是共产党的态度呢！一个人的顽固，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管你怎么顽固，宁夏的形势会一天一天发展，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将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道路，取得更新的胜利。尽管你们家里还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还是大好形势，全国是大好形势，宁夏同样是大好形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倒台。这是历史的规律，不能改变的。

同志们到中央来开会，一定要掌握好大方向。那么，怎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得更好，胜利取得的更大呢？怎么能达到呢？

第一条：你们应该坚决相信，我们这个党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更好，取得彻底胜利，把社会主义建设搞的很好，以至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不能在我国复辟，使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变颜色。一句话，你们应该相信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同志们不是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吗？语录的第一条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语录上不是说吗？“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也许同志们会想：既然如此，为什么党内还出现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宁夏还出现了杨马，宁夏军区还反抗中央路线呢？这个容易理解，同志们可以读一读《毛主席语录》二二四页的一段：“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思想斗争是经常的。没有这种矛盾，不进行这种斗争，党的生命就会停止。文化大革命把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出来，这就使我们的党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要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不行。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人思想上不是没有问题，有的是敌人。它们希望我们这个共产党象它们妄想的那样会垮台。敌人嘛，反对我们，阶级斗争，这很自然。这证明我们对了。在各个组织内，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看见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他们对共产党发生了怀疑，甚至不自觉的，有人有意、有人无意相信反革命分子陶铸的话，要“怀疑一切”。他们不但怀疑我们党，还怀疑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司令部。他们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己觉得很聪明。他们把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看成象他们自己那样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集团，他们天天制造谣言，用各种谣言企图动摇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司令部。这种情况是一小部分人，而且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在各

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有。应当同你们直爽地说，在你们宁夏就有，在你们群众组织中就有，我相信在你们代表团中极少数甚至个别人，他是代表，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也是有的（康老拿出一份材料）。

正当在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一片大好形势，正当中央召集各方面代表来解决宁夏问题的时候，一小撮人还企图把历史拉到后头去。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路线、阴谋没有希望了，于是就不择手段，制造各种谣言，有时实在可耻！他们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我现在不说谁，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有的少数反革命头头，他们失败了还不甘心，他们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我不是还在这里吗？这里是中国还是外国？！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有很多流言蜚语，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这类谣言，我相信在北京的反革命分子也会有的，但我们并不怕这种东西。我们要加以分析，这种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敌人、特务。我不相信宁夏就没有美蒋特务，我不相信没有苏修、蒙修特务，我不相信没有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同志们，尤其是小将们，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啊！你们搞起内战来，派性蒙住了你们的眼睛，你们就看不清敌人了。他们破坏宁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人。这种人不仅宁夏有，北京也有嘛！反革命的“五·一六”就是这样。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在北京就有活动。对这些敌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第二种人，制造这种谣言的，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同志们，你们的斗争必须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批深、批透、批臭、。反对杨、马的斗争你们还没有进一步地深入，反对朱声达的反革命路线的斗争，你们还没有深入进行，甚至有的人还不认识。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你们各派都考虑，你们背后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你们背后有没有明的、暗的黑手在操纵你们，蒙蔽你们，欺骗你们，

煽动你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我的看法，我认为，指挥部的后面有，筹备处的后面更有！我希望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你们的代表工厂的有，但宁夏工人阶级力量弱，很多是学生，甚至是中学小同志，你们就那么聪明，锻炼的就那么好？你们自己就把自己看得那么大！不要觉得比什么人都好。当然，你们青年人在阶级斗争中注意不要摔倒。为什么安徽现在能成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就是因为两派都把操纵他们的头头揪出来了。因为我看到了，在宁夏、在北京散布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谣言，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引起警惕。

第三种，是一种社会思潮，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人，他们头脑里“私”字作怪，搞宗派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派性高于一切，没有党性了，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不自觉地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不清界线，对他们看不清了，甚至被他们利用。虽然天天也在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他们本身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理解，而是反革命分子陶铸的“怀疑一切”在他们头脑里作怪。今天怀疑周总理，明天怀疑康生，后天怀疑陈伯达，又怀疑江青，其目的就是要把毛主席的司令部拆散、打倒。你们听了江青同志讲话的录音，第一条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用到解决宁夏问题上去？这个问题，不只是宁夏的问题，在全国的大好形势下，有那么一小撮人妄图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甚至不惜制造谣言，甚至用放大镜找裂缝，说这个人鼓掌少一点，那个人这句话有问题，姚文元文章中那句话可以利用。他们天天不是在想革命，而是在想着拆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银川有些情况应该注意，要坚决同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挑拨离间、反革命的企图坚决进行斗争，应该坚决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相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毛主席语录所说的，如果对这个问题有怀疑，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所谓掌握大方向，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的司令部，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切指示，不要受任何谣言的欺骗和动摇。所以，我说在宁夏把朱声达的阴谋揭开，这就是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掌握斗争大方向，就会使我们眼睛亮，坚决想念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是头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重要条件，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同那些企图动摇、干扰、瓦解人民解放军的，和他们坚决斗争。在全国

如此，在宁夏就更加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宁夏情况比较复杂。复杂的原因，就是过去自治区军区少数的领导人，实行了一套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所以我们不能不进行坚决斗争。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解决宁夏问题时，首先不是找群众来开会，而是找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你们更进一步应该了解，为什么毛主席、林副主席下命令让六十二师部队开到宁夏，开到银川，开到吴忠，开到青铜峡，开到永宁去。有些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个人能行动吗？个人能下命令吗？如果军队里是那样，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吗？同你们讲，不管怎么紧急，人民解放军调一个营的兵力，都要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的批准。怎么一个人可以调动一个师、一个团？你们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国民党的军队、军阀的军队，是私人的军队，这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极大的污辱！毛主席关怀宁夏的文化大革命，长期考查，毛主席、林副主席知道宁夏军区在朱声达等领导人实行的反动路线下，不能完成支左工作，不是战士不好，是领导不好。他们实行了一条反动路线，为使宁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得到帮助，得到支持，得到胜利，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才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指挥部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等口号）同志们，你们应该这样理解，不要听信敌人的谣言，敌人的挑拨。在宁夏，出现了“打倒洗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你们想一想，这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反动路线？为了使你们不犯错误，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罪的。我不能不说，筹备处的头头们，朱声达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跟着他走，六十二师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却反对，这不是完全错了吗？也许革命小将你们认为朱声达的错误与你们无关，但那是你们自己骗自己。如果何其仁还算个共产党，叫何其仁讲讲他们的阴谋。你不讲，有人会讲！你们的罪恶是很大的。有些代表直到现在还不觉悟！这不是群众的责任，是军区少数人和有些县人武部的坏头头，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派去的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六十二师到了银川，才把那些反革命的阴谋破坏了，才制止了他们。现在有一个借口，就是青铜峡事件。我今天负责地告诉同志们：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

想一想，那么大的事情，能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你们还在那里讲，我们是陈再道式的人物，赵永夫式的人物。你们受骗了！筹备处的头头们，你们在吴忠怎么开的会？在渡口干了什么？你们不交待，你们那个团是十九岁的青年，不知道。青年人不知道，你张号不知道？你就是个当权派，你能逃脱你的责任！？你张号还假装反对安子文。你是县委书记，是当权派，你在安子文领导下的组织部做了七年，你就是他的一个组长，你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领导党校时的一个头头，你要交待，你到中央组织部活动什么，你同谁握的手，同谁谈的话？你以为我们就是瞎子，就是聋子？！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掌握大方向，就必须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毛主席必须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毛主席的话，人民解放军是保障文化大革命彻底进行的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批判朱声达的错误，不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是违背毛主席、林副主席路线的人。宁夏问题的复杂就在这个地方。不要因为批判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就动摇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要打掉小资产阶级的“怀疑一切”。有些青年人不懂得，共产党内，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性、纪律性，但有些人是共产党员，是糊涂了还是假装糊涂？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在会前，我接到了给我的一封信，用筹备处的名义（康老翻出信），我现在所指出的，是宁夏大联合筹备处赴京代表团在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我现在不就这封信作全面评论，我也不是说这封信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但是我必须提起你们代表团的注意，实际上你们的思想不是对准朱声达，而是对准六十二师，你们把青铜峡事件称做你们的“革命事件”。错了！也许你们的代表不很清楚，你们的团长是中学生，十九岁，还有那个张号，你们自己并没有在青铜峡，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宗派的利益想象的，你们听了不正确的报告。你们提了几条意见，五条，其中第四条是对准六十二师的，因此，第五条拥军爱民就成了空话，如果不是骗人的话，起码也是一句空话。我还接到永宁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团九月十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也不全面评论。这封信同样矛头对准六十二师，有些话是恶毒的攻击。甚至那天晚上开会，徐洪学还没有作报告，只讲了一句话，你们立即矛头对准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我现在不详细评论宁夏问题，我讲这些，是告诉你们，中央的大方向，从人民日报可以看出，是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在宁夏要全面实行，不能口头上拥军，

实际上反对。这样的手法，不是革命者应采取的态度。这是掌握大方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要做具体分析，企图动摇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首先是敌人，首先是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宁夏宁总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敌人用心狠毒。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特别回族同志。在八·八、八·一三吴忠事件以后，固原一带，少数隐蔽的回民中的反动派，暗藏的特务在跃跃欲动，直到六十二师进驻了银川、吴忠、青铜峡、永宁以后，才把那里的局面稳定了。但是今天筹备处的一些坏头头，还向那里集中，向那里去挑拨。这一点，要特别引起警惕。宁夏过去有个反刘格平的民族主义那么一件事，有的同志受过冤枉，受过处分，判过刑，开除过党籍，所以对杨马，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主持人，抱极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分清是非，予以平反。这一点，总指挥部的同志们要体贴宁总司、宁三司同志们的心情。当然，我不是说宁总司、宁三司就完全对了，矛头就对准了朱声达，对准杨马了，我看也值得深思。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要实事求是。

第三个问题，从江青同志的讲话中，你们就听到，必须巩固、扩大，发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绝不能干扰、动摇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在宁夏当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全国，一面要看到我们的胜利，一面要看到有少数人企图动摇和破坏它。这就需要更加提高警惕。为什么这几天人民日报要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正是为了巩固、扩大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但是少数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是不愿意的，苏修天天希望新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垮台，因此，我们要从大批判的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这个方针在宁夏同样适应，这就是说，运动不是越搞越分裂，而是走向更大的联合，革命的联合，在毛主席路线上的联合。在大好形势下，要更加掌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争取更大胜利。坚决相信毛主席的司令部，坚决相信人民解放军，坚决相信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次解决宁夏问题，各代表考虑问题要首先掌握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这是我今天向同志们交待的，在第一次会议上交待的第一个问题，把方向必须同同志们交待清楚，使同志们少走弯路。

下面我再讲一下，各个代表，各个代表团，到中央来开会，怎么才能够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任务，站稳自己应当站稳的立场。

同志们：你们代表中间，有年纪大一点的，有年纪轻一点的，但是，我想这样的会议，你们到中央来开，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想把解决各省的经验介绍介绍，作为你们参考。首先，代表同志们要知道，这是到中央来开会，这是到中央，这不是在你们家里随便开会，不是你们开个小团体会议，不是这样。我们把你们当作很严肃的代表你们那个组织的正式代表。你们必须了解，到中央开个会是很严肃的，同时又是很民主的，是要正确地解决宁夏问题的。这里就有很多活思想。按毛主席的方针，解决各省的问题，是要找各方面代表参加，不管代表的组织是造反的，革命的，进步的，左派的，还是保守的，右倾的，都可以来。也不管他们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或是基本错误的，都可以来。因此不是说一到这里开会，就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我们把杨马都找来了嘛！我们还准备找杨一木、马信、李茅召等人，甘春雷已经来了，也准备找李景林等人来，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你们要了解中央的政策。在这里，我向宁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解释一下，原来会议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问题，第二个是解决指挥部与筹备处的武斗问题。据我们所知，宁总司、宁三司基本上没有参加武斗。因此开始宁总司、宁三司的代表少一些，你们不要从形式上来看。以后照顾了，你们还有意见！你们没有参加武斗，这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组织同当时直接武斗关系不大，所以开始代表少一些，这里希望同志们了解中央的作法，不要误解，很多省都是这样，要消除这个误解。

那么代表同志来了，来干什么呢？第一条代表你们的组织向中央提出问题，反映情况，帮助中央解决宁夏问题，这是一。第二，更重要的是来学习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习中央政策，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今晚和大家长时间的谈话，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如果不交待清楚，就是我们未尽到责任。所以我开始提议每天应当有两点钟学习，至多四个钟点学习，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党报、党刊的重要文章。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代表团应当怎么工作呢？我们的会应当怎么开法呢？必须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开一个如何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不是开一个宗派主义的会议，不是开一个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同志们要掌握这样一个方针，

也是整个会议的方针，我劝同志们，你们代表团在北京，与家里联系也好，千万不能用谣言、挑拨离间的手法，用造谣污蔑的手法在这里开会，同时要关心家里，有这种表现要赶快注意，赶快制止，如果代表中有这样的人，那他就不够一个代表的资格，家里要有这种人，这种路线，就是给你们代表团脸上抹黑。这点很清楚，如果采取这样一个方针，那么你们何必来中央开会呢？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办事。

我在解决内蒙的问题时，王良太、黄厚和个别代表，就有这样极端错误的言论，他们说他们不是来开会，是来搞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就是四六年毛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有人把到中央汇报看作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我不是说，你们就有，现在少了，今年三、四月间，有的代表说，我们是来同中央谈判的。我奇怪，我问，你是那一个国？那一个党？我们这里是中央。我们向同志们介绍经验，要掌握毛主席的方向。

第二，会议既然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会，应该开一个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会，不应当开一个促进分裂的会。各派应当注意，希望同志们在北京根据中央这一种精神开会，家里有什么问题，也根据这个精神充分注意。如果指挥部对三司有冲突，打三司机，如果有，这不对。指挥部要打电话制止。当然这类事不是一方面的情况，三司、宁总司要注意，消除宗派对立，不要以为“唯我独左”，不要以为自己那样正确。没有那回事。应开一个更大联合、三结合的会，不要开一个宗派主义的大分裂会议，应开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大联合会议。

第三，我们的会议各位代表，应表现一种执行中央政策的模范，使会议成为一个模范的会议，通过这样的精神，来影响宁夏当地各群众组织。不要在开会中间，违反中央政策。这里有些作法应该经常注意，我已经劝告指挥部的代表了。他们的缺点不知纠正了没有？（答已经纠正了！）纠正了就好了，要纠正。铺张浪费，到处串联，不能到这里胡串。另外，筹备处有几个同志打了杨、马，这不好，要批评，可以不要打嘛！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小将对他们义愤，打了他们几下，可以理解。我的看法，筹备处的同志，是不是一定要开除他，非开除不可呢？批评一下行不行呢？不要开除，有人还是副团长，批评一下，开除干什么？事情不要做的那么绝对。你们内部的事务我不干涉，你们开除的人今天就没有叫他来开会。你们实在开除，我就请他来列席。青年嘛，谁不犯错误？

列宁讲，上帝还允许青年犯错误，共产党比上帝好嘛！要开成一个模范执行政策的会议，不要开成一个违犯政策的会议。

第四，我们的会议要成为民主的会议，有什么话可以讲，错误的也可以讲。别的组织不要人家说错了一句话，就抓小辫子。文化大革命实行大民主，为什么这个会就不实行呢？同志们知道，毛主席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最后一条就是要民主嘛！我在解决各省问题时，有些代表还没说完就吵架骂娘，那样干什么呢？我就说，既然他是造谣，你为什么发急呢？当然了，你们在会上发言，不能象我罗哩罗索讲这样长。那这个会一年也开不完。几分钟把事情讲完，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打架。

第五，大家讲话时要向前看，不要算旧帐。当然，原则路线问题要追究，要弄清。枝节问题算起来没个完，应该向前看。今后宁夏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做？当然，揭发杨、马、朱声达等人镇压群众的错误还是很需要的，但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用辱骂的方式、鲁莽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打、砸、抢、抄、抓，不要打架。你在家打得那样还没打够，还要带到北京表演一番，那就违反中央政策了。还是留点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好。你们是代表，你们自己要再打，怎么能说服群众？

各派要确实检查一下，有没有带枪。这不是开玩笑，要保障国庆安全。如果有枪，赶快交出来，带枪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是犯法的，如果有带的，要交给卫戍区司令部。要彻底检查一下。

还有一点，如国庆节以前解决了问题，就回去过国庆节。不是代表的，上访的就劝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代表出来久了，对几个事件不了解，可以换嘛，换了解情况的人。上访的，散布在北京的，劝他们赶快回去。有的说，回去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你们应该相信中央政策，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六十二师，这个，徐师长可以作保证。但各派要注意，宁夏今天不是这个样子。还有，你们不要到街上贴不利于我们，有利于敌人的大字报传单、图片，不要搞不利于革命大团结的传单、标语。有的代表团还在北京出报，还把打死、打伤人的照片在街上贴。那是出我们的丑。结果美国人拿一百元美金买一张。要多多在屋子里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到处串联。领导文化大革命是用头，不是用脚。

最后，大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中央政策、方针。我相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宁夏的问题容易解决，而且可以解决。宁夏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得到更大的胜利，出现一个更大好的形势，宁夏人民一定会出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大联合。我有这个信心，这一点一定能实现！总理已两次来催了，我还要参加另一个会，很对不起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76年10月19日晚9时30分～20日2时45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同志、曹轶欧同志、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同志、副司令员康健民同志、21军军长胡炜同志以及陕西军区、总后等二十多位部队首长。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入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康老讲话

好久没有看见同志们了。因为国庆节期间搞外宾接待，差不多二十天了。从会谈到去外地访问，主席接见，发表新闻公报，前后是二十天。不仅宁夏、江苏、安徽、辽宁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现在又从国外转到国内了。

今天开会，兰州军区同志，二十一军同志以及陕西军区的同志也来参加了，了解一下宁夏的情况。你们欢迎不欢迎他们参加？（答：欢迎！热烈鼓掌）先介绍一下，这是洗政委，你们认识不认识？（答：不认识。）真的不认识，他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洗恒汉嘛，你们宁夏不是有人贴大字报要打倒他吗？你们看，他不是在这里吗？不是没有打倒吗？（康老笑了，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鼓掌，洗政委起立，介绍陪同接见的部队首长）。

我想问一下同志们，最近主席的最新指示都读过没有？（答：读过了）都讨论了没有？（答：讨论了！）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上一次见面以后，有几件重要的事，今天开会不能详细读，但要讲一讲。第一件就是9月26日，主席接见各地军区在北京解决问题的同志，这件事，我们

宁夏军区的同志也参加了，包括朱声达同志。这件事，大家必须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通过 9 月 26 日的主席接见各军区的同志，可以看出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教导我们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从 9 月 26 日接见也可以看到，毛主席、林付主席是如何关心，如何爱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人民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人民解放军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的。通过这件事，使同志们知道主席是如何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即使部队个别同志犯了错误，也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正错误。这里面可以看出，主席是如何关心部队同志，如何帮助部队同志，如何爱护部队同志。同时这件事对宁夏文化大革命也好，部队也好，群众组织也好，必然会起推动作用，促进他们革命化，促进他们自己下决心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会促进群众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对促进有的同志改正错误也能起很大作用。同志们也可以了解到，毛主席、党中央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如何教育的，是怎样爱护干部的。明天晚上接见时很多干部是犯有程度不同错误的。如果我们同志能深刻体会到主席的思想，这对宁夏和全国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将会起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件事，同志们不要看这件事，应该看作这是学习、掌握、运用主席思想的重大的事，应该在主席号召的“斗私，批修”中引起同志们很好地学习掌握、应用主席思想。

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期间，同志们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节纪念大会，在座的同志，群众组织来解决问题的代表，部队的同志，在座的除个别的少数人以外，大家是不是都参加了？（答：参加了！）这件事也是你们极大的一件事，你们见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解放军高级领导同志。同志们应该很重视，这对同志们是很光荣的一件事，那怕有些同志在宁夏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二次国庆。这件事同志们应该十分重视，深深体会中央的政策。革命群众，解决问题的代表，解放军、各方面的同志都要这样。这是一件事。

第三件事，在这中间，大家亲自读到而且首先在北京读到中央 10 月 7 号的通知，这是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是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和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指示。这个指示的内

容，同志们都读过了，都讨论过了，今天不多讲。但我提议同志们，要进一步再三再三学习这个指示，把这个指示，如何运用到宁夏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去，如何根据这个指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同样也可根据这个指示检查自己头脑中的“私”字问题，如何同头脑中“私”字作斗争的问题，如何同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因为只有彻底肃清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同国内、国际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我现在没有听宁夏各方面同志学习这个指示的详细情况。但我从各方面看到，包括我们自己，总是觉得体会主席重要指示还差得远，还要作进一步努力，从各方面学习。这个重要指示，这是记录稿。首先讲到大好形势。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同志们应该深深体会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过去是怎样看的，过去的思想是否符合主席的这个指示。宁夏的形势怎么样？宁夏的形势是否符合主席这个思想。这都需要我们深思。

主席讲到形势大好，指示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运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大家对这一段要仔细的想一想。我初步学习研究的还不深刻。我想谈一下我对主席这一段指示的了解，也许了解的还不够，同志们可以批评、补充。

主席指出来了，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回想一下，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这已经变成普遍的口号，要关心国家大事。经过一年来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几亿人民

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车间到工人家庭，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大家都在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家还记得吧，在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我们林副主席发表了发挥主席指示的这个讲话。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夫妻之间，姐妹之间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志们自己可以调查一下，就是这样。我所知道的，前几天有一位解放军的高级负责同志跟我讲，他的夫人和女儿就是两派，到一块经常辩论，妈妈反对女儿，女儿讲不过妈妈。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是造反派，一个儿子是保守派，一个儿子是逍遥派。所以一家人到一块不象以前讲闲话，也在大鸣大放辩论。的确是象主席教导的那样，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心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象这次发动的这样广泛，这样深入。

第二条，也是重要的标志，亿万革命群众在那里学习、掌握、运用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广泛地同群众结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百年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大家都还记得吧，去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讲过这样的问题：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学习主席著作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公报上有的、报纸上公布过的。这个公报发表到今天，已经过一年的斗争。经过这一年的斗争，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比一年以前更加广泛了，这证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也是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也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开创了世界劳动人民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这不仅是中国的大好形势，而且还有世界意义。同志们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访问中国，就可以看出国际的反映，当然，不仅是阿尔巴尼亚，还有世界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都是这样。你们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新闻公报上，称赞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马、恩、列、斯的接班人和继承者，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是兄弟党承认的，不仅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创造。同志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任何力量所反对不了的，这是保证我

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我们党不被篡夺的最最重要的保证。因此，同志们在宁夏看一切问题，要从那里出发？不是从这一派那一派出发，不是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出发，一切出发都应该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紧紧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这个标准，才是划分真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假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真革命，假革命，真相信毛主席还是假相信毛主席的分界线。我们只有一派，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派，在谈论解决宁夏问题时，要紧紧掌握这点，这才是真大方向，不是假大方向。

第三，什么叫大好形势，就是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为首有党中央领导下，亿万革命群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土崩瓦解了，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粉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权。这个夺权的一月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现在全国是这样的形势，有些省、市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省不是，这个大家已经晓得了，我就不谈了，有些省、市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前一段时期好象很乱，乱得很！宁夏在前一些时候也有些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越发乱的地方，矛盾就越暴露出来，越便于把矛盾解决。事实证明，越是乱得厉害的地方矛盾就暴露得越充分，阶级敌人的面目就越发暴露的清楚，问题越能解决的彻底。这是第三个问题，要看到大好形势。

第四、在毛主席伟大号召下，目前全国掀起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高潮。我们相信，毛主席讲的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现在已经是十月，正如毛主席说的，形势一天天向好的方面发展。各地方总的趋势是革命大联合的多，搞分裂的要少了。我初步想的，认识的，就是这样，主席讲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想到的就是这四条，当然不止这四条。如果我们把毛主席的思想运用到各个地方，更会体会得深。比如，拿毛主席这个指示来看宁夏问题，比以前是大好呢，还是坏呢？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是大好的，特别是六十二师进驻宁夏以后，形势变得一天一天地更好了。就是从你们代表团来说，从代表团

同志们的思想来说，在毛主席的关怀，启示下，在中央、中央文革的帮助下，代表团的工作、代表的思想也是比以前大大进了一步的。因为大家亲身参加了国庆节，亲身看见了毛主席，亲自听到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又学习了毛主席视察三个大区所做的重要指示，我是这样看的，同志们的思想比来的时候有所提高了。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思想的提高可以从这样一个问题来看，我看了朱声达同志 10 月 9 日的检查，这个检查已经发到各个代表团了，当然各代表团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这完全都是可以的。但是有的同志讲到，这是假检讨真反扑，没有触及灵魂，这是允许的，甚至有人讲，这个检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是站在总指挥部方面，对筹备处不利。各种看法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很自然有的。但是，我的看法，虽然朱声达同志这个检讨还不彻底，有的地方没有触及灵魂。但比起来的时候进了一步。这说明主席思想，主席的号召，在我们同志特别是犯错误的同志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是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应该这样看，他是向中央、向兰州军区检讨的，不能从派性来看，他检查了对兰州军区、对中央的态度，开始检查了他过去迷信贺龙，不是对筹备处，是向中央检查他思想中的问题，检讨虽然不够，我们大家应该帮助他，不能从派性出发，不能认为对我不利，就说他是假检讨、真反扑，难道主席的召唤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点作用也不起么？不是那样的。所以，只要从毛主席的思想出发看问题，才能问题看得清楚，从派性出发看问题，就容易看得相反了。所以我看整个的大好形势，宁夏的大好形势以及代表团的思想的变化。证明了毛主席思想，毛主席召唤的威力。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方面的，阶级斗争总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总不是百分之百的，总是一分为二的，说是大好形势，不是说就没有斗争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起伏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他们会自动放下武器，自动退出舞台，因此，全国还需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一个大批判运动，从大批判中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个学校斗批改的问题，任务还是很大的，这需要我们作出极大的努力。斗私这个斗争不是开一次会两次会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一个人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同时，同志们还必须注意到，在的大好形势下面，在敌人感到他们

土崩瓦解、全面崩溃面临这样的形势下，他们还会千方百计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们还会用各种方法，各种卑污的手段，企图动摇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动摇和瓦解人民解放军，企图动摇和瓦解新成立的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委员会。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联想到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不是指出这个问题吗？就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少数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利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正确的思想来混水摸鱼，妄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搞垮革命委员会。这一点是阶级斗争中可以理解的现象，敌人它总是要反扑的，越在全面崩溃，土崩瓦解的时候，它越要垂死挣扎。这一点，宁夏的群众、宁夏的群众组织必须看到，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种反革命的组织，也许你们宁夏也可能收到这样的文件，他们在全国散发，他们叫做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他们到处散发一种信，散发这种信目的就是要瓦解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对他们的土崩瓦解不甘心，企图恢复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极少数地方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反革命和文件，这些最坏的家伙，按他们来看，陈伯达、江青、康生简直都该枪毙。

（李天焕同志插话：从主席到林副主席，他们都要打倒。）

是啊！从主席到大副主席，他们都要打倒。这叫狗急跳墙。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宁夏的同志们要注意，这种反动的思想，反动的标语，反动的文件在你们宁夏也有。

（总指挥部代表插话：有！还有“打倒洗恒汉罗”的标语）不仅打倒洗恒汉罗，他们对毛主席还造谣诬蔑。

（总指挥部代表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

么江青靠边站了。散布那些东西，不仅你们宁夏有，到处都有，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江苏也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是妄图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我个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这么个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你们看真理报上，赫鲁晓夫他们也是这么骂我们的。这一点应注意。从材料上看，这些反革命的活动，有些群众组织是受蒙蔽的。他们不是相信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相信谣言。各组织应该警惕这个东西，有这样的情况，在九月间，你们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要注意，有一个人，有名有姓，到独立师进行反中央的宣传，挑拨、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些人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上这个当。他们企图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我们知道永宁县还有人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了，说中央有黑线。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犯了错误进行翻案，其实他们不懂得王力、关锋犯的是什么错误，王力、关锋就是反对我和陈伯达的。他们喊，要打倒洗恒汉，要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去，这个东西，是在大好形势下自然会有有的，不要受这种蒙蔽。

我讲了代表团的的思想有了大大的进步。同志们，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所在地，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毛泽东思想。另外北京也有坏人，你们不要听北京那些坏东西的话，你们不要让 5. 16、非常委员会来迷惑你们，不要根据谣言来宣传。你们代表团中就有人根据谣言写信回去给他的同学，他的那个同学已经退出了筹备处，加入了总指挥部，把信交给了六十二师。在北京到处都有阶级斗争，这一点同志们要提高警惕，你们要当心上当，当心被人利用，当了敌人。在北京不能抓住一点问题就无限上纲，去符合自己的思想。不错，党校的李广文犯错误了，李广文就是要打倒我，有些人抓住李广文、张文林的问题来动摇中央对宁夏问题的解决，制造谣言，把矛头对准六十二师，替青铜峡反动坏头头的反革命事件辩护，在中央解决问题，不是听从中央的指示，而是听从反革命谣言的指示，制造混乱，这就不好了。当然，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规律必然出现的，但是这些人是不会得逞的。他们越是暴露，问题就越容易解决。不要怕这种东西，阶级斗争必然会有有的，这不仅宁夏有，全国各省都有，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规律的。但是他们阻碍不了历史车轮，改变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他们会象黑夜里的毒菌，太阳一出来就会土崩瓦解。同志们必须有这个信心，必须认清大好形势，这些人企图动摇毛主

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有一个思想，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大好形势，李广文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能得到胜利还成问题。过二、三年，刘、邓还会复辟的，还会胜利的、所以承认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是承认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决定性的胜利，形势大好这是决定大局的关键问题。同志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定这种信心，我这只是比了个例子，请同志们研究。对主席指示不是简单的读一读就行了，讨论一两次就行了。

我再讲一下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这是主席指示中最重要的一点。指示中说，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第一个原因。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这是第二个原因。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大原因。这是第三个原因。这是讲分裂的三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这是讲的群众，不是走资派。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这都是讲的群众。朱声达同志他提出，他站错了队，现在要改正，改正错误这个好嘛，可以改正嘛！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在宁夏犯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

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这里讲，专政是需要的，不是靠少数人，不是靠公、检、法的机关专政，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嘛！靠群众专政，政府不要捉人。一个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要发动群众自己处理。你们看到，安徽的问题就是这样。

同志们，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摆在你们宁夏群众组织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你们要实现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根据新的情况，要发挥创造性。我想了一下，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要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管那一派，都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才是巩固的。大家要深入研究，真正掌握毛主席的思想，真正领会毛主席对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从革命的立场上去了解它，从“斗私，批修”中去了解它，对毛主席的著作，对中央指示要好好注意学习，好好运用。这就要学习解放军，解放军里面有很多生动的例子。也要向北京的革命群众学习，特别是工厂的工人组织学习了主席的指示，已经实现了毛主席的号召，联合了起来。你们宁夏还要学习安徽的经验，他们已经实现了主席的号召，实现了大联合。对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号召，要好好学习和应用，这样才能在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里面打下思想上大联合的基础。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

第二、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个工厂里面为什么分成两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或极少数坏人利用混水摸鱼。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就要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和斗争，揭露挑动群众、蒙蔽群众的背后的黑手，使群众不被他们挑拨、蒙蔽和利用。过去分裂甚至武斗，责任不在群众，而在少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挑拨和坏人的混水摸鱼。一个工厂的工人，他们有什么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什么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呢？就是因为有坏人在挑拨。一个学校也是这样。所以，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揭露操纵、蒙蔽群众的黑手。安徽就是这样，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这个问题以后。当天晚上合肥两派就实现了大联合，他们自己把他们组织里的坏头头揪出来了。

第三、一条，重要的一条，要实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这方面我希望宁夏的同志们要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管那一派，都应该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少讲

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别人自己讲，要多做自我批评。我希望宁夏几个方面的同志们好好执行主席的这个指示。我刚才讲，朱声达同志的检查，开始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好的。各派群众组织也要实行自我批评，不要多讲人家。这是主席指示。我上次见面时讲了，宁三司、宁总司打、砸、抢的问题、这方面与你们的关系不大。但是三司、总司，你们不要把它当成包袱，以为什么问题，什么缺点都没有了，刚才讲的在独立师散布谣言，就是你们的人干的吗？还有，有的人讲，宁三司、宁总司和总指挥部不能大联合，就是因为一个甘春雷的问题，现在是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又不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研究结合谁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影响大联合呢？甘春雷的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讲嘛！我看，基本问题是一个派性的问题，不是以我为主，唯我独革。看起来是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重要问题。难道一个人有这样大的力量吗？就能阻碍毛主席的指示吗？那就把他抬的太高了。看起来是一个人的问题，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派性问题，还是双方面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所以，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就是要贯彻斗私，批修，不断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不是甘春雷，也不是那一个人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障碍，而是私字当头，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最大的障碍。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多批评自己，少批评或者不批评对方的缺点、错误，让他们自己去批。要先作自我批评，不要等人家批了再作自我批评。要多看对方的优点和长处，不要把自己的长处变为妨碍革命大联合的包袱。要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唯我独尊，以我为核心来实现大联合。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去处理，去批判。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要对自己的群众做好思想工作，大家还记得吧，1943年毛主席就说过，要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多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这样才能实现大联合，才有利于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斗争。一定要与私字作斗争，没有这一点，你们就联合不起来。你们宁夏，在大联合方面虽不是最落后的，但也不是最先进的，你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主席的大联合的指示，我们要多在这方面做工作，首先是在代表团做工作，也要在家里做工作，不要乱七八糟地给家里写那样的信，散布谣言。安徽的代表团，在北京开会，实现了联合，家里就有人说他们右倾。修了，是陈独秀。本来群众对你们的活动就不太了解，你们再散布一些谣言就不好了。自己要批判自己的错误。总指挥部要批判总指挥部的错误，三司、总司要批判三司、总司的错误。至于筹备处，你们到现在连朱

声达的那种检查还不能接受，就差得太远了。杨一木、马信，我接触了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拿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们答应了我，要作检查，二十多天了，到现在连一个字也不交给我。那天晚上我没有把你们的罪行材料拿出来，是希望你们自己自觉地检查，但你们却把中央对你们的循循善诱当成包袱。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错误很多，很严重，今晚上你们会听到，朵恩华同志马上要讲。你们到现在还玩弄很多手段，你们叫陈养山讲那不行，要讲，要讲你杨一木讲，你马信讲，你李矛召讲。这种手段，在青海，赵永夫早就玩弄过，我们不愿意再看到。陈养山，你不要糊里糊涂！（生气）你这个人呀！我们是老同事了，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四十年的老朋友了，你总是被人家利用。要作自我批评，不要继续隐瞒自己的错误。主席说，要解放一批干部。怎么解放呢，就是要一看二帮。解放一个干部，对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干部都被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我们还希望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首先要靠自己解放自己，主要是自己。怎么解放自己呢？首先要作自我批评，主席讲一看二帮，看就是看你自己，帮是大家帮。朵恩华同志讲话也就是帮杨一木、马信。这一方面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把错误隐蔽起来，甚至利用中央的政策为自己的错误打掩护。在这方面，你们还不如朱声达同志，朱声达同志到中央来还打了个电报，问他来不来，中央说来。你们怎么样呢？到北京来，背着中央，隐藏起来，我们千方百计寻找你们，才把你们寻找到一起。在党的这个关系上，你们连朱声达还不如。你们来北京隐蔽起来，背着中央干什么？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你们过去是区党委负责人，向中央连个名都不报，自己把自己隐蔽起来干什么？这里面就是私字作怪，我希望大家能够作自我批评。实行主席的指示，事情就容易解决。这个第三条，实行自我批评，对大联合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条，解放军实行正确的方针，根据主席的指示，正确进行支左工作，这对于促进大联合有重要作用。各地过去的经验都是这样，当地驻军，实现了主席指示，实行中央政策，就会对革命的大联合起很大的作用。我这一次同外宾到山东，看到青岛的六十七军的支左工作做得很好，对促进大联合做了很多工作，有一个工厂，三、四月间就实现了大联合。当然，主要是靠内部整风，靠群众自己的觉悟，但解放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过去，自治区军区朱声达、江波同志，你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方针，拉一派，打一派，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结果造成了群众的分裂，自己反而垮台了。所以，军区的同志，要彻底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这对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有好处。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你们不能从派性看问题，要从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看问题。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有一个特点，犯了错误就改。有时没有经验，思想没有准备，犯了错误。可以改嘛！林总八月九日的讲话，大家要好好学习。那个讲话现在已经发下去了。多听群众意见有好处，筹备处的同志。你们不要帮倒忙。他们错了，你们还拥护他们那错误，结果就是帮了倒忙。为什么中央派六十二师去呢？这是对你们的最大的支持。现在个别人喊这样的口号，“六十二师从宁夏滚出去！”这完全是反动的，反中央的口号。我曾经讲过，调动解放军的一个营，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点头批准，谁也调不动。你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看成象国民党的军队，没有那回事。一个营，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准，没有哪一个人敢调动。（洗政委：我们大军区调动一个连，都要报军委备案的。）是啊，你们天天读语录，语录的第一条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有些同志不懂得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也喊相信和拥护解放军，可是也不知道解放军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没有加入过党，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政党、毛主席领导的党，他们用自己的派性把我们看成是勾心斗角的集团，可以随便发号施令的。

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必须贯彻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人民解放军也要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好地支左。事实证明，哪个地方人民解放军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个地方支左就搞的好，哪个地方没有实行毛主席路线，哪里的支左就犯错误，影响到群众组织分裂。在这方面，宁夏军区的错误就特别影响到了筹备处这个组织。大家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要好好领会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军队的指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六十二师进驻宁夏，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你们要好好和六十二师合作，要相信和拥护他们。当然，六十二师刚到宁夏。有的情况还不了解，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了，有问题可以向他们提出来。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会不考虑你们的意见的。

关于大联合，我就提出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

为了促进大联合，为了把宁夏问题弄清楚，我们今天晚上想让朵恩华同志就他知道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过去是筹备处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军区的一些人，和筹备处的一些头头都有接触。让他讲一讲，是为了帮助军区犯错误的干部和其他干部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为了帮助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很快觉悟。

我的话就讲完了。我的话也不一定全对，你们可以批评。如果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不打也得倒，如果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就是天天唤打倒也打不倒。下面请朵恩华同志讲一讲。（热烈鼓掌）

（接着，朵恩华同志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揭发了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在他发言过程中，康老有许多重要插话）。

（当朵讲到秦良时）康老问：秦良，杨一木的代号是什么？朵答：秦良是 81 号，杨一木、马信都叫老头子，老头子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康老说：老头子就是老头子嘛！

（当朵讲到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参谋团员代号的变化规律时）康老说：这种手法是怎么学的，这样“高明”？哪里学来这一套特务手法？我做秘密工作时还没有这样高明哩。

（当朵揭发到何其仁指示让筹备处把吴忠快点打下来时，康老问何其仁：怎么个快打法呀？何支支吾吾说“我有罪”）。

（当朵讲到筹备处头头杨一木等人到北京后的活动时）康老说：他们不是象他们自己说的那样老实的。现在筹备处还有活动，就是他们指使，他们继续叫一些人犯错误，他们的黑手现在还伸到银川去，他们实在坏哩！

（接着，军区稽振华同志、马林同志，独立师一团团长王友声同志揭发了朱声达及其黑干将何其仁和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会议结束时，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还有许多同志要讲，今天晚上来不及了，下次再讲吧。

从王团长讲的这个事件（指朱、何等人背着王团长把马信等人交王团长下属某连窝藏保护，马信等人煽动该连指战员围攻王团长并限制其自由的事件）就可

以看出，马信他们欺骗、煽动我们一个连队围攻自己的团长，他们是在瓦解我们的解放军。现在不知道这个连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怎样？

（王团长：干部战士都转的不好。）

朱声达、江波、何其仁，你们看看，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部队危害多大！军区的同志、区党委的同志，（区党委联络部张开义在这之前，要求发言）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看你们的错误。这种流毒至今还影响着连长、指导员、战士。你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独立师的领导干部也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深刻的教训。群众组织的人，再也不要去做造谣诬蔑、散布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仅蒙蔽自己，也蒙蔽战士，正如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的，是自毁长城嘛！没有人民解放军，怎么能搞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得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你们要深刻检查，要做工作。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对他的团长采取那样的态度，不是偶然的，是马信他们在那里散的毒。我们欢迎朱声达同志，检查自己的错误。朱声达应该知道，你检查不是对哪一派，而是对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对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有极大的帮助，这可以使他们认识更清楚。

有些同志要求要讲八·八事件、筹备处打吴忠，打青铜峡的策划情况。下次可以讲。现在有些人还在为青铜峡反革命事件辩护，把问题揭开来以后，你们自己就会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军队支左如何，是实行正确路线。还是实行错误路线，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关系，这一点，从宁夏的事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散布了许多毒素，欺骗和毒害群众。毛主席派六十二师去宁夏的时候，对筹备处的参谋团（也叫地下黑司令部）和群众就有很大的震动，觉得六十二师对他们很不利。他们自己讲，他们要完啦！这是什么思想？很明显，这是受了军区错误路线的影响。这种流毒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我相信，尽管有人受蒙蔽现在还没有转过来，但只要他们把真相了解清楚，认识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会站过来的，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一旦把毛主席的路线和他们讲清楚，他们会很快转过来的，我坚信这一点，只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他们见了面，他们看到了军队支左方面错误路线的影响，即使是上层领导，他们也会很快转过来。

你们要掌握毛主席视察三个大区时的指示，结合本地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在斗私，批修中运用这个武器，把宁夏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要用主席思想去反

对私心杂念，只要同志们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是完全能够转过来的。稽振华同志讲的话我相信，同志们是想跟毛主席走的，但有的人行动不是这样。只要一旦认识到错误，就会马上转过来的，就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

最后我再叮咛一句，一定不要因为派性出发，要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我希望杨一木、马信，你们这些同志不要再玩滑头了，你们要老实地作检查。你们要叫陈养山讲，我是不听的！要讲，你杨一木讲！要讲，你马信讲！要讲，你李矛召讲，将近一个月了，你们为什么不检查，不写材料？你们为什么那样顽固？我们好心帮助你们，你们倒去作反宣传去了！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好吧，下次再说吧。

（总指挥部代表团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等口号。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同志们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宁夏总指挥部赴京汇报代表团 1967 年 10 月 21 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康生第四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十六时至十九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佑、曹轶欧、康健民。〕

兰州军区的同志，讨论陕西问题，洗政委他去参加那个会去了，李天焕同志参加另一个会议，也不能来，叶群同志她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等一会可能来。我们先开，继续昨天晚上的会议。昨天报名发言的人很多，没有讲完，今天继续发言，有的同志要发言还可以报名。这样意见，那样意见都可以讲，大民主嘛！有不同意见是允许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要听信谣言，散布谣言，混淆是非，蒙蔽群众。在会上，任何意见都可以讲。对一个问题，赞成的，不赞成的，都可以讲。各派都可以报名，轮流发言。报名的很多罗！今晚八点钟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开会，现在是四点，我们的会可以开到六点半，讲不完还可以再找时间讲罗！现在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向辉宇同志讲，马生其同志准备。

（向辉宇同志在会上揭发了朱声达对抗中央领导同志的罪行。向发言结束时，总指挥代表带头高呼：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接着大联筹马生其同志系统地揭发了大联筹地下黑司令部的罪行。马发言时，总指挥部代表不断高呼：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坚决支持马生其同志的革命行动，热烈欢迎马生其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我们并肩战斗！最后，康老又作了重要指示：）

现在已经六点半了。马生其同志最后一句话，很值得大家深思，是保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还是保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方向问题。各个群众组织都应该从这个原则出发考虑问题，也以这个原则来自己检查自己。

现在，有一件事要澄清一下。谢光明同志在场不在场？（筹：不在）为什么没来？（筹：吃过午饭就出去了）应该晓得开会嘛！到那里去了（筹：上街了）我想同谢光明同志核实一种情况，他是不是筹备处的代表？（筹：是）他是那个单位的。（筹：吴忠中学学生）我想问一下，他在北京是否写信到吴忠去？这件事，是不是确实的？因为有人把他写的信交给了 62 师在吴忠支左的部队、这是

个青年同志，中学生，当然啦，青年人嘛，犯错误可以原谅。但是，他的信中有一条，说北京三军，陆、海、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在李天佑的率领下已前去宁夏吴忠等地重新调查宁夏的问题。我不晓得，谢光明是不是认识李天佑，是不是写过信，但在吴忠确实发现过这封信。李天佑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说他率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了吴忠等地调查，那就是说中央不相信 62 师。同志们，我不晓得你们认识不认识李天佑同志？（众：不认识。这时李天佑同志站起来，康老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李天佑同志（大家热烈鼓掌）。

（李天佑同志插话：同志们，谢光明如果在北京写了这样的信，那完全是捏造，是谣言。我根本没有到过宁夏自治区，更没有到吴忠去过。刚才康老对我讲了这种情况，我听了很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说老实话，应该忠诚于党，忠诚于毛主席，忠诚于中央文革，忠诚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捏造是非，造谣诬蔑，玩弄手法，这不是真正的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同志们，战友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忠诚坦率，不要搞手法，不要造谣）。

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为了核实一下，另外我坦率的告诉筹备处代表，会议一开始，我就向你们说过，作为一个代表的任务，一方面是忠实的坦白的向中央、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都可以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好好掌握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这是你们的两大任务，能不能作一个到中央来开会的代表，就看他能不能执行这两条。开始我曾征求过指挥部方面的意见，是否要筹备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有的同志不同意，我向他们解释，来北京开会可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叫他们来开会不能证明这个组织什么性质。各派都来，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中央文革的方针。叫筹备处来，目的叫筹备处的同志了解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方针，也就是教育他们，使他们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取得一个资格回到宁夏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到中央来开会的代表。这一点，筹备处的代表，要警惕，必须坚决执行上述两条任务。现在，我提出两条希望，征求你们的意见，总指挥部、三司、总司、筹备处，共同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到中央来，也包括朱声达等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九月二十六日接见，国庆节让他们到天安门参加观礼，其目的是要教育这些同志，争取这些同志，促使这些同志积极地去了解主席的思想，了解中央的方

针，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错误。不是叫他们上了天安门，就证明他们是对的，就已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同志们，应该懂得中央的这个方针政策。但有个别人利用中央这个政策，回去制造谣言反对中央，比如说：“朱声达、何其仁、江波犯了错误，毛主席还接见了他们，可见他们是对的！”让朱声达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就证明他那是对了？筹备处的代表也参加观礼了，到了观礼台上就证明筹备处保朱声达也是对了？这就把中央召集宁夏同志开会。解决宁夏问题的方针，理解错了。这不是同中央一起把宁夏文化大革命搞好，更好地解决宁夏问题，而是制造纠纷，不惜制造各种谣言反对中央。现在，在宁夏反对中央的各种谣言都是有的。这一点，应引起在座所有在北京的代表和到会人员都注意，绝不能利用给你们在北京的这种地位，回过头去反中央。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那他就回去反就是了，何必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开会呢！这种造谣还有很多，很多。最近筹备处代表还提出十大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到要问你们，这到底是干什么？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呢？底下的群众不晓得，可以原谅，那么代表在中央开会，应该晓得吧？！如果利用代表在北京开会的资格制造谣言，反对中央，还有什么资格作代表呢？！因此，筹备处代表以及指挥部、宁三司、宁总司的代表，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同你们商量，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第一个问题，所有在北京的代表和参加会议的人员绝对不准利用在北京开会的地位，利用代表的资格，向宁夏制造谣言，反对中央，这个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代表带头高呼：坚决执行康老指示！）

第二个问题，你们如果得到消息，在宁夏不管是银川，还是那一个县，如果有人散布谣言，筹备处或者其他方面散布谣言，你们代表团有义务有责任写回文件，写回声明反驳这种谣言。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再次高呼：坚决执行康老两点指示！）

大家都赞成，很好。一时受蒙蔽。有个别人听信了谣言，犯了错误，只要觉悟了，改正了就还可以当代表，不要撤销代表资格。比如：谢光明同志自己可以检讨，也不要撤销代表，他才十七岁，是个青年嘛！你们应当原谅他。同志们，在这方面，主要是说服教育。重要的问题是不要被谣言领导自己，而是要用毛泽

东思想武装自己，不要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自己，而是要用毛主席革命路线观察一切问题。

昨天，稽振华同志讲了，说他没有到过北京，也没有到过人民大会堂，有这个感触就很好，但不要错误的利用现在的这种环境和情况，再去混淆是非，蒙蔽群众。今天，李天佑同志正在开会，我打电话叫他来，让你们看看，澄清这个问题。怎么能造那样谣言！同志们，千万不要利用中央耐心教育的政策来对抗中央。我要向你们讲，国庆节前好多代表团发生了争论，河南同志，不是代表，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何运洪，李寿涛也去天安门观礼，武汉也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陈再道、钟汉华等 12 人去天安门观礼，说服也不行。这种心情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完全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不让他们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服了那些同志，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如果不让去，就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最后还是勉强说服了，革命群众的态度是好的，一下子容易理解主席思想。但另一方面，绝不要去了就作相反的解释，来掩盖包庇他们的错误。这一点你们的代表应该注意，在宁夏谣言是很多的，是长期存在的，用这种东西对待群众那是犯罪的，是蒙蔽和欺骗群众，不是革命的行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这个问题要很好注意。

现在已经七点了，还有很多同志要讲，我想，讲话要扼要一点。有的同志讲话反映了实际情况，当然有些事实可能有个别出入，但要看总的方面。刚才马生其同志的发言，以及朵恩华同志的发言，总的方面是好的，犯了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朱声达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这就是主席讲的斗私。只有斗私，才能更好的批修。不能私字当头，派性当头，从私字出发，从派性出发，就会蒙蔽自己。

今晚会议，暂时拟定十二点再开，也许今晚开不成了，你们在家里等通知，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许短，也许长。有的同志还要讲话，希望同志们筹备一下，讲得扼要一些，把主要问题讲了就行了。今天只讲了两个人，照这样讲一个月也讲不完。好啦！同志们吃饭吧。（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生第五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至七时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曹轶欧、康健民同志。〕

现在继续开会吧，昨天晚上我那个会开到下三点，原来约定的会不能开了。现在请商金仓同志发言，马子明准备。

（商金仓同志就朱声达如何把黑手伸进大联合筹备处的问题做了揭发。）

马子明同志发言，军区张艺同志准备。马子明同志到前面来讲好吧？

（马子明同志揭发了朱声达及其控制下的大联合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当马子明揭发到张号从贺兰山下来传达了参谋团的停止生产、布置武斗的指示时，康老插话问：“停止生产是张号传达的？所谓停止生产是指工厂还是农村？”

马子明发言结束后，康老说：军区张艺同志发言，张元树同志准备。

（张艺同志系统地揭露了朱声达与反革命修正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当张艺同志讲到朱声达迫害马思义同志及六零年两大案件时，康老说：马思义是“八·一三”被杀的，这件事筹备处的代表要做深刻的检讨，你们受了蒙蔽，犯了错误，犯了很大的错误。关于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是这次接触宁夏问题时我才晓得这样的内幕。六〇年上半年，当时我们离开北京，搞“毛选”四卷的出版工作，不晓得这一回事，只听说刘格平同志犯了错误，双反是这一次才听到的。刘格平同志是 47 年和我们在山东搞土改时才认识的，这是一个好同志。好同志不是说没有个别的缺点。但这个同志对党是忠实的，这一点很清楚。那时他对反革命分子饶漱石是不满意的。他为党几次坐牢是坚定的，对吕毅和区党委的金晓村是反对的。后来听说他这个同志在宁夏犯了错误，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这次才晓得是这样一个大惨案。这次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地、实事求是地为这个惨案平反。丁毅民那时是一个青年同志，同我们一道工作过，以后怎样，不知道。在鲁南的时候是不错的。

（曹轶欧同志插话：那时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嘛！）

即使有错误，也不能那样对待，开除党籍，至今没有恢复，也许在宁夏犯了错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开除党籍，还坐牢七、八年，不恢复党籍，这实在是

党内不平常的事。中央当时可能是彭真处理这一案件的。这样一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给他们平反。不但不平反，相反还把马思义同志杀掉了，这实在是痛心！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应该很好的认识这个问题，朱声达有错误，这次要好好的反省反省。他在他的检讨中讲了一下，还要深刻的检讨。两百万人口的地方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反常的一件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底是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还是跟着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从马思义被杀害这一事中，从它的前因后果来看，是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我今天问一下，象丁毅民这样的同志，不管他错误怎么样，你们看应该不应该恢复党籍？（答：应该！）恢复了党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澄清嘛！

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还是同走资派李维汉等人有关系，就是说同过去的统战部长李维汉有关系，他过去主持民委，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有些问题和他有关系，因为汪锋、杨静仁是李维汉的帮凶。

张艺同志发言结束后，康老说：“下面由三司的张元树同志发言。”

当张元树同志谈到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五卅事件”、对抗中央 222 号文件时，康老说：“这个地方我插一句，宁夏的代表、宁夏的同志不要受欺骗，不要以为王力、关锋犯错误就怎么样，实际上他们的错误是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揭露的。他们反对周总理。反对我们，你们并不清楚。现在各地方的老保乘机想翻案，老保想翻天，想反中央，反中央文革，认为中央的电报、指示是王力、关锋搞的。他们把中央看成是资产阶级的集团，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好象中央文件是王力、关锋两个人就能搞出来的。同志们千万不要上这个当。在宁夏，这种宣传蒙蔽群众，混淆是非，为坏人翻案，利用王力、关锋犯错误制造借口，散布谣言，同志们千万不要相信。你们要告诉宁夏的同志，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这是一个忠告。我如果不讲就是没有尽到责任，至于听不听，那在你们了。我有责任，因为我是受了中央的委托、中央文革的委托来参加你们的会议的。

诬蔑了毛主席的著作，中央反对，这怎么能叫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怎么能叫大毒草呢？那么什么才叫符合毛泽东思想呢？遇事要开动脑筋，把“私”字、派性去掉来看朱声达的错误，问题就清楚了。

（代表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等口号。）

污辱毛主席著作，不反对，就是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么反对了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同志们冷静的想一想，中央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准了 222 号文件，保卫毛主席著作的文件，这怎么能叫大毒草呢？同志们动脑筋想一想就可以清楚，只要不从派性出发一想就通。青年同志要动脑筋想，把保卫毛主席著作的文件说成是大毒草，那反面就是不要保卫毛主席。

当揭发有人造谣说谢副总理说，宁夏和新疆问题很复杂，中央不急于表态时，康老插话说：“这是造谣！谢副总理从来没有这样讲，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把谢副总理马上找到这里当面对证。谣言很多，不要听信。”

张元树同志发言结束后，康老说：“张德贵同志发言，王希年同志准备。”

当张德贵同志揭发朱声达造谣“2·11”声明是经过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的时候，康老严肃地指出：“这恐怕是朱声达做的很错误的一件事，我们也是不通的，既然支持了，为什么又突然退出，还发表了告什么书？兰州军区也不赞成，朱声达为了欺骗、蒙蔽群众，还说中央、兰州军区同意的，这实在是不对！毛主席讲过，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用蒙蔽的手段对付群众，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当谈到何其仁策划让筹备处派一个女同志扮做单玉虎的老婆时，康老笑了，插话说：“到底假扮夫妻是什么人出的主意？这样事情在杭州也出现过，假扮夫妻，在那里哭，问了半天，那个小姑娘还没有结婚呢！”

当谈到朱声达策划筹备处派十一人上高级党校去揪张文林，目的在于打击总指挥部时，康老点了点头，说：“这里我插一句，我根本不认识张文林。张文林虽然在党校，我也不认识，也没有看到什么材料。李广文要打倒我，张文林和李广文比较接近，张文林可能受他的蒙蔽。你们不是怀疑有什么黑线吗？说什么人通过张文林转给我材料，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直到这次我参加批判李广文那次会上，我才认识张文林。”

当谈到吴忠人武部、筹备处派大批农民阻挡 8048 部队到吴忠执行支左任务时，康老说：“这一点我插一句话，兰州军区向中央报告，说吴忠可能发生武斗，派六团到吴忠去劝止武斗，兰州军区请示了中央，请示了军委，是中央军委同意的。应当用解放军去劝说，但是结果这个部队被挡住了。从这个问题起，就有一部分人总是反对 62 师，直到现在，个别地方、个别人，还喊什么“打倒洗恒

汉”、“62 师从宁夏滚出去”，这种宣传完全是反动的宣传，是违反毛主席对宁夏文化大革命的关怀的。

（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口号）

开始得到消息，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农民的问题，农民是不会阻挡人民解放军执行任务的，一定是人武部搞的。阻挡野战军执行任务，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这一点宁夏军区的同志要特别注意，不要不当一回事。特别严重的是，还带着机关枪阻止解放军执行任务这是严重错误的，这不能说是革命行动。”

发言结束后，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王希年同志下次讲吧，我晚上八点还有会。有的人利用青铜峡事件来制造谣言，反对六十二师，是错误的。所以我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央解决各地方问题的方针，这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解决各地问题首先解决各军区的问题。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宁夏同志必须了解，让军区同志来是根据主席指示。同志们可以看见，那天晚上陕西军区的同志来了，但陕西的群众组织代表还没有来，先要把军区的问题解决。为什么先把军区、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谈清楚？这就是主席的指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昨天、今天的会议的反映来看，筹备处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朱声达、江波、何其仁在那里操纵以及他们参谋班子杨一木、马信他们在那里蒙蔽、操纵。这证明了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到，受蒙蔽的群众一旦接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会很快觉悟过来的，我们应当欢迎这些同志。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所谓有功，就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今天到此为止，下次什么时候再开会，再通知好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康生第六次接见宁夏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至九时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曹轶欧、洗恒汉、康健民同志。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进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现在继续开会。全国的形势大好，很多地方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咱们宁夏的文化大革命迟了一步，现在希望同志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赶快赶

上去。因此，让同志们连续开会。我看正如毛主席讲的，哪个地方乱，哪个地方矛盾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哪个地方矛盾就接近解决。哪个地方乱，哪个地方问题就会解决得更好，工作就会前进得更好。你们隔壁的内蒙古就是这样，内蒙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此，咱们的工作要赶上去才行。现在开会，按照报名，陈万福同志发言。

筹备处代表陈万福谈了朱声达蒙蔽群众以及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策划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一些情况。

当谈到筹备处，准备把铁路桥梁炸毁，让中央听到响声，知道他们是造反派时，康老笑了，问：“桥炸了吗？”

当谈到他们策划青铜峡事件时，康健民同志问：“你们先打那里，后打那里，是怎么研究的？”

当谈到用炮打总指挥部的驻地时，康老问：“是用什么炮打的？”回答是：“八二六零炮”。李天焕同志插话：“是两种炮吧！八二是一种，六零是一种。”康老还问：“炮是在那儿搞的？”

当谈到李剑白说：“你在前面指挥，我当后台”时，康老说：“是啊！工人同志是受蒙蔽的。”

当谈到朱声达派解放军到各单位宣传反对一·二七夺权，由于他出于对解放军的热爱，而跟着朱声达走上邪道，康老连连点头，康健民同志说：“朱声达就是利用这一点。”康老严肃指出：“朱声达是利用解放军的威信，对工人、农民、学生进行蒙蔽。”接着又说：“你犯了错误，自己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有些同志，认为朱声达是解放军的司令员，朱声达也就利用群众相信解放军，利用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诱导群众走到邪路上去，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当谈到群众受蒙蔽，罪在朱声达时，康老说：“对，群众是受蒙蔽的。”接着说：“群众是没有罪的，是受蒙蔽的。这一次张怀礼同志回去，我们告诉张怀礼同志，要把一些犯错误的领导和群众分开，当然，造反派一时有些过激情绪，应该做说服教育工作。”康健民同志说：“我们已给 62 师打了电话，正在做这个工作。”康老说：“王希年同志发言，王锦同志准备。”

王希年同志揭发了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吴忠八·一三事件和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罪行。

当讲到朱声达手段阴险，制造上述事件时不是开会布置，而是在下面密谋策划，康老点了点头。当讲到筹备处派到各地的高参都用代号不用真名，心中有鬼时，康老连连点头说：“是啊！”并问了胡秉坤、宋长胜的情况。接着康老让王锦同志发言，并说：“他有个青铜峡事件的示意图，给大家看一看。”

会场挂出了大幅《青铜峡反革命事件示意图》，62师后勤部付部长王锦同志借助示意图详细地揭露了青铜峡反革命叛乱的问题。

王锦同志发言后，康老说：“请兰州军区冼政委讲几句话。”

冼恒汉同志说：“康老让我讲一讲青铜峡事件的情况。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62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我就是讲这一个事，我就讲到这里。”

康老接着作指示说：

“这一点，通过陈万福同志，特别是王希年同志的讲话就更清楚了。他们到过青铜峡，或部分或整个地指挥青铜峡事件，从同志们的揭发看，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

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 8 月 28 号早晨 5 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现在有些人对 62 师、兰州军区和中央进行造谣诬蔑。有种种谣言，种种反动宣传，这一点同志们不要再受蒙蔽了。筹备处自己的人讲，他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上了杨、马、朱、杨（一木）、马（信）的反动路线的当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应该由杨、马及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负责，广大群众是无罪的，甚至筹备处一些头头也是受蒙蔽的。从王希年、陈万福的发言也可以看出，宁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和各地不同，因为筹备处的行动完全是从军区朱声达等人以及杨一木、马信等人直接操纵的，而且是在每个方面都派上人去指挥的。象陈万福同志讲的，直接操纵他，做他的后台的李剑白，李是什么人？（答：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噢，是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还有个叫宋长胜的，（王希年答：是宁夏军区转业干部）噢！宋长胜也是军区刚转业的干部。李剑白讲他是后台，可是他本身还不是筹备处的人。可见在宁夏筹备处里边，许多地方，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不仅走资派直接指挥，甚至还派他们的干部直接操纵。你们可以问一下，这种情况其他地方是少有的，当然也有，但不是象这样明目张胆地搞的。同志们要提高阶级警惕，要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当然，中央的方针是让同志们有意见就讲，不符合事实的你们可以讲，但是走资派甚至筹备处代表团副团长就是青铜峡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做群众组织的代表，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听了很惊讶，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杨一木、马信那一套。广大群众本来是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被走资派操纵引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去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有个好处，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是筹备处服务小组（即核心小组）的同志，如马生其，朵恩华，朵恩华搞的是机要通讯，有的是直接指挥青铜峡事件的，如马子明、陈万福、王希年，他们揭发了问题。我们很欢迎。犯了错误，承认错误，彻底改正错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情况好得很，中央肯定这种精神。这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们拿具体行动来执行、运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接着康老让陶泊发言。

陶泊表示要向中央低头认罪，交待问题，并谈了朱声达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某些活动。

当谈到朱声达对抗 117 号文件，（指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时，康老指出：“那个文件上规定，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或反革命组织，都要经过中央批准的。那个文件上是这样讲的啊！”

当谈到朱声达说周总理派人来宁夏秘密调查石嘴山的武斗时，康老说：完全是造谣！现在你们群众中，造谣简直成了重要的资本了。

当谈到筹备处参谋团扩大会议几条决定中，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康老说：“（你们搞参谋团），就把头一条否定了。头一条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但是你们又组织一个参谋班子，抗拒群众运动，这是宁夏很独特的东西，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搞什么参谋班子！你们说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我看活学活用的，是反毛泽东思想，应该把头一条改一下，叫活学活用刘、邓路线。

当谈到何其仁上贺兰山和筹备处各处参谋团策划阴谋时，康老说：“是不是真上山了？你看见了？不是说没上山吗？何其仁你去了吗？”（何其仁站起来吱吱唔唔地说：“去了两次。”）

当谈到何其仁传达说毛主席有个最新指示是“开快车，要翻车，要勤打招呼”时，康老说：“我第一次听到，什么时候有这个讲话？你们把这个东西拿来我看看。文化大革命中假造的东西可多了。”

当谈到毛主席对武汉问题的三条指示时，康老说：“那倒是真的啊！那个问题同志们必须从两个方面理解。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坚决承认错误，第二个条件是坚决改正错误，第三个是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如果做到了这三条，陈再道同志可以回到革命行列中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已不在革命行列里面，所以才提出做到了这三条才可以重新回到革命行列中来。一方面劝他们回到革命行列里来，另一方面说明他已不在革命行列里，应该这样理解。”

当谈到毛主席对兰州军区支左问题的指示时，康老说：“这个问题我同同志们讲一下，主席说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主席是讲过的，因为当时还有反对兰州军区，反对张达志和洗恒汉同志的，主席才讲了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你刚才讲的，是中央文革根据主席所讲的，说兰州军区对青海赵永夫的问题

的处理，对甘肃詹大南的问题的处理，对宁夏朱声达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文件。在处理甘肃问题时，文件上有过。”

当陶发言说康老专门接见杨一木等人时，康健民同志说：“康老让他们来反映情况，康老没有怎么讲。”

陶发言后，康老接着指出：“你的讲话，当然同志们有意见，这就证明了一个问题，你们参谋班子的确是控制筹备处的参谋部。什么是参谋部？参谋部就是司令部。部队上的司、政、后、司就是司令部。我可以跟同志们讲，在有些国家，有些外国文参谋部和司令部是一个词。不管你写过什么东西，开了什么会议，但是从你的讲话可以证明王有生同志讲的，的确有一个地下司令部。对杨一木他们来，我们并不知道，同朵恩华同志谈时，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下黑司令部，以杨一木、马信他们为首。我们便千方百计的去寻找。你们过去是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来到北京可以向中央反映情况，可是你们一来对我们是秘密的，有话可以讲嘛，但是这时我们大体上已经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康健民同志晓得了，那一次我找他们是听他们的意见的，是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的。可是实际上他们隐蔽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愿向中央交待，不要说交待问题，就是连反映情况也不愿意。同时我觉得当时杨一木、马信采取了一种很不好的手法，当然不是类比了，但是我们觉得他们和青海赵永夫同志的手法，陈养山也犯了错误，他们让陈养山讲。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种手法很不老实，不应该这样子。在中央面前这对他们是个考验。当时他们讲到要写材料，过了国庆，还不写，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写。大家想一想，这怎么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呢？当时使我们看到，他们不愿意做检查。”

总指挥部代表对陶泊发言态度的不老实，提出了批评，康老说：“我不是讲过嘛！在这个会上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的意见，那样的看法都可以讲。我们的会有民主，我再三的讲过赞成这一派，不赞成这一派，赞成这样的意见，不赞成这样的意见，都可以讲嘛！中央召集各派来，都是听各派意见的，在这里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是绝不允许撒谎、造谣，来蒙蔽、欺骗群众。现在宁夏有些地方有人制造谣言。刚才还讲，我接见了杨一木，还为他们澄清了许多问题。这是在中央面前撒谎！这就是要继续蒙蔽群众，维持自己的黑司令部。我看这个黑司令部还或明或暗地发号施令，你们特别要警惕这个东西。在中央面前千万要老实，

要忠诚，一个党员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定要忠诚老实，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有的还是老共产党员，还担任一定的工作，应该忠诚老实，绝不能采取撒谎的态度。至于有的人讲的不对，可以反驳，摆事实，讲道理，完全可以允许。陶泊要求发言，我们允许他们讲话，至于讲的怎么样，你们可以判断。”

康老又说：“不管怎么样，（陶泊）不是真正的检查，总的还有为你们的司令部辩护的意思。应该从高的，从灵魂方面，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方面检查，而不是讲一些琐碎事实，这是不行的。”

当总指挥部代表要求把地下黑司令部干将姚持找回来交待问题，筹备处代表要求 62 师公布向中央反映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报告时，康老说：“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是受蒙蔽的，这要由杨、马和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主要责任。青铜峡事件已不是一个群众简单的武斗问题，而是一个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有一个同志提到姚诗，同志们犯什么错误，可以向中央交待清楚，是就是，非就非，不要藏起来。刚才这个同志提的意见是合理的，应该由杨一木同马信你们负责把姚持找回来，向中央讲清楚。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问题，我们责成杨一木、马信把姚持找回来，挽救他，使他受到教育，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你们也许会讲，你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们总有办法找他回来，不要秘密的，不要采取那个办法。在中央又不会打他，不会揪他，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杨一木你看怎么样？（杨一木答：来了，已打招呼了。）有什么错误可以交待清楚，下次会可以让他来。总之，中央的方针，毛主席的方针，干部犯了错误，能帮助的，就帮助他们改正，挽救他们，从错误路线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对革命有好处。河南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挽救一个同志就对革命事业增加了一分力量。这个话是对的。

时间不早了，今天会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听取康健民汇报宁夏问题时的讲话

（汇报到大联合问题时）

康老说：要跟群众讲清楚，不是甘春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他省也有，比方广西。不要把一个干部做为联合不联合的条件，群众组织要从这个框框解放出来，不要认为结合这个人不结合那个人，就阻碍实际斗争。当前是群众组织自己联合，联合都没有实现，怎么能谈到三结合呢？！有分歧的先把他摆一下，先检查，大家讨论看一看。宁夏的特点，也是宁夏问题的复杂，干部插手各派，宗派情绪发展。杨一木可称为举止不一的参谋班子，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为什么还需要那些保姆呢？好的不好是群众改造他们，不要叫他们左右群众。

人武部要分析，要一分为二，不会所有的人武部都坏，好的、比较好的要使用。犯一般错误主要责任在军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个别不好的调动工作或者学习，主要不要使人武部全瘫痪，现在县里领导机构，有些已垮了，主要还靠人武部做工作。

联合要有个过程，不能急躁，支左部队要经常工作，总的方面××师支左工作有很大成绩，军区干部大多多数是好的，不要搞得灰溜溜的。

康老几点指示：

一、要深入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林付主席的指示。部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领导支左。部队自己，尤其是干部要很好学习。我们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在内，实行天天读，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师和军区要好好掌握，那个地方野战军真正把毛著学好，才能做好支左工作。因为解放军是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支柱。宣传毛泽东思想，支左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当前主要学习毛主席三个地区的指示，在全军中进行教育。

二、军队要好好把林付主席“八·九”指示研究一下。对待干部问题，帮助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因此，××师要团结军区、人武部、独立师广大干部和战士，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对朱声达错误要批判，但不要把整个军区、人武部、独立师都认为有错误，把军区领导与群众，主要干部与一般干部分开。因此，要好好学习“八·九”指示。

三、对群众组织政策要掌握稳。对筹备处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不能压，主席指示已经讲了，要争取教育分化他们。主要问题看到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还有第二个杨、马，主要责任在他们。

四、不断教育群众团体和群众组织，掌握政策。当前部队应去促进大联合。有的以人多以势压人，有的唯我独左，叫他们好好看看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以斗私批修为纲，天天把主席的东西看一看。……有的违背主席指示，要耐心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巩固起来，倒旗联合。你们情况不错，开始别要求那么高，一步一步来。不愿倒旗也可以。联合小组这个形式很好。有些问题摆一下也好。要作自我批评，要联合。抓毛著学习和学习班。有这个基础联合小组可以扩大一点，好像一个协商会议。不赞成的问题摆一下。干部也是一样，大家赞成的就三结合，不赞成的就摆。不要你打我保，你保我打。群众不要有这个思想，一个干部不好，这个组织就垮了。不要受人挑拨。甘春雷即使结合错了，群众组织还是革命组织。以群众为主嘛。群众从这里解放出来。需要增加信心，自己独立思考。你是主体嘛。宁夏这个问题比较深，离了干部不行。

还有工人工作比较落实一些。各地都是工人落实好，工人总是比较先进的。哪个地方工人领导学生就好，哪个地方学生领导工人就差，就出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康生对宁夏军区的指示

（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同志传达）

一、筹备处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不是搞重庆谈判，是受教育。

二、加强宣传，报纸、电台、宣传车，对中央首长关于宁夏问题的谈话、兰州军区公告，要反复宣传，把有线广播搞起来（特别是电台有线广播）。

三、不要抓头头，抓来要放。

四、适当的分发武器，要武装造反派，如果他们对银川进行反扑，坚决自卫。

五、筹备处破坏铁路，康老很生气，把朱声达叫去训一顿。这是反革命事件。

六、第三势力对自己参加谈判的代表数量少，他们很有意见，中央说可以考虑。

七、继续用飞机散发传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兰州军区党委：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密关怀和领导下，自八月十六日起，在北京召开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四个月来。我们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面聆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多次教导，与会同志和革命造反派对我们进行了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们受到最生动、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认识到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明确了革命斗争大方向。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时，我们也受到了两次接见。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促使我们下决心更快地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朱声达同志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拒中央指示，拒绝军区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残酷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使我们走上了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歧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给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朱声达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一、追随和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们在朱声达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认敌为友，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朱声达同志自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九六〇年，朱积极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的罪刑活动，充当了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马为了保自己，勾结朱声达同志，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在革命群众起来造杨、马的反的时候，朱

却在军内外大肆吹捧杨是“红司令”、“好书记”，欺骗蒙蔽群众。朱还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措施，压制革命群众造杨、马的反。今年二月，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一·二七”夺权的支持，朱声达同志还散布说：“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三月又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揭露汪、杨、马等在一九六〇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并且颠倒黑白，把群众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朱声达同志长期以来和杨、马互相勾结，同流合污，而党委常委其他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杨、马划清界限，对朱声达同志的错误没有进行抵制，以致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保护左派”。而朱声达等同志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迫于形势，表示了支持，但是，由于朱声达等同志的立场没有转变，玩弄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夸大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这次夺权定为“假夺权”、“右派篡权”、“资本主义复辟”。二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组织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朱声达等同志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

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当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后，朱声达同志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当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后，朱声达等同志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由于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军区党委个别同志的煽动和暗示，有的人武部的某些同志便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的形式发给了“筹备处”，个别县人武部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了谋划和指挥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的活动。少数坏头头利用这种情况，策动受蒙蔽的群众，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接着又有计划、有组织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中央派往宁夏支左部队，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事件。

在军内朱声达同志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有些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时，朱声达等同志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以致挑动群众，围斗、殴打一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在军区内部一度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三、顽固坚持错误，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朱声达同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宁夏新华分社被抢事件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中，都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我们既不认真检查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我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我们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同志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朱声达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专职武装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主要应由我们承担。那些受蒙蔽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站错了队，也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二）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是：

一、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立场问题。朱声达同志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在与原区党委内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长期共事中，一味追随，互相利用，以致立场、思想、感情逐渐同他们结合。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充当了杨、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杨、马垮台后，又取而代之，顽固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在生活上也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常委其他成员中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有的个人主义严重，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因此，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杨、马走资派，认识不清，恨不起来；对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进行有力的抵制；对革命造反派不看本质、主流，只看现象，支流，甚至对他们革命行动看不惯，想不通，抵触大，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这样，我们就站在无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把自己置于革命群众的对立面，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迷失了大方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二、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没有形成，革命性、战斗性不强。党委长期以来，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自身革命化抓得不紧。加之中黑《修养》的毒深，彭、罗、贺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影响未彻底肃清。朱声达同志崇拜贺龙，受贺的坏思想作风的影响，军阀主义作风重，独断专行，强调个人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搞“一言堂”，压制民主，对不同的意见打击报复，严重损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委成员中有的政治上漫不经心，原则性很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调和折中，放弃了原则斗争。我们在两条路线问题上虽有些斗争，但很不得力。这样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结果是腐朽庸俗作风发生，……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没有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我们头脑里扎下根。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是，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尤其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很差，很不理解，却自以为是，以感情代政策，甚至曲解中央指示。同时，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缺乏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成革命对象的自觉性，不敢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彻底改造世界观。因此，在我们头脑里，毛泽东思想没有扎下根，私字作怪，怕字当头，怕犯错误，怕斗争，怕丢官。这是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全区广大革命群众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不起全区人民。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同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对刘、邓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罗、贺之流，对西北、宁夏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澜涛、杨静仁、马玉槐深入开展大批判，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彻底肃清彭、高、习反党集团在宁夏地区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深刻检查我们的错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同头脑里的“私”字打进攻战，脱胎换骨地进行自我改造，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振奋革命精神，立功补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军区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鉴于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请求中央给我们严厉处分，并建议改组军区领导。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打倒刘澜涛、杨静仁、马玉槐！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员〕

我所犯错误的检查

朱声达

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兰州军区党委：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同宁夏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破坏了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期间，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重要指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特别是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接见在京的军队干部时，我也受到了两次接见，给了我极大的教育、鼓舞和鞭策，使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过极其严重，内心万分惭愧，殊觉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不起全区广大革命群众和军区广大指战员。现在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一、同杨静仁、马玉槐相互勾结，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很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出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纲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蒙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

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〇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竟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出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

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三·七”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竟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

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三、反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错误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查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 222 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查、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 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

思想衡量 222 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 62 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四、犯罪的根源

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决不是偶然的，是由我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是有思想、历史和认识根源的。

思想根源：我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逐步的走向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我的立场、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自觉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一边，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反对革命。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私”字。由于私字在我的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我的一切言行，就必然是以“私”字为转移，私字当头，怕群众，怕革命，特别是怕革自己的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不是挺身而出，主动到群众中检查错误，接受批评，而是东躲西藏，逃避斗争。以致在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进而发展到对革命群众恨之入骨“挑动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残酷屠杀。

历史根源：我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认为在捆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应救了我的。后来我在长征途中负了伤（当时在红四师十团任连长），过金沙时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当时是红四师的卫生队长）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对贺的重大问题一直进行包庇。一九三二年洪湖突围、作战、行军都是

段德昌指挥的，胜利到达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段功劳是段德昌同志的，但后来被贺龙窃取了，我一直没有揭发。

我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学了贺一套军阀主义作风，一直把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带到党内来，一掌遮天，目中无人，大搞一言堂，在党内进行家长式的统治，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在部队建设上不抓根本，不突出政治，而是搞突出军事，贯彻彭、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对党、对组织阳一套、阴一套，玩弄两面手法。总之，在思想上、作风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军阀主义一套，与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一条重要原因。

认识根源：由于自己斗志衰退，作官当老爷，不肯学习，所以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特别是对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很理解。因而在识别左派时，不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而是以保我者为左派，批我者为保守派；看待造反派，不是看本质、看主流、看大方向，而是抓住他们非主流、非本质问题不放，无限上纲；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去看问题。结果必然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总之，我所以走向犯罪道路，归根到底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实际，不活学活用，特别是没有用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果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我恳请党中央给我以严厉的惩罚。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彻底同贺龙、杨、马等一小撮走资派划清界限，坚决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变立场，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戴罪立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1967. 12. 27； 中发 [67] 407 号

毛泽东：照办。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周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 8037 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地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来源：原载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政治部等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8年1月27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八时十五分至九时四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接见了宁夏军区总指挥部、三司、总司、筹革造代表。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洗恒汉。〕

中央首长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进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周总理：同志们，现在开会。陈伯达同志在外地，不在北京，没有来看你们。今天开宁夏问题结束会。请康生同志讲话。（总指挥部代表率领全场同志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生：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同志们，我们宁夏的会议，经过几个月，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关怀、指导，经过学习最新指示，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各派代表达成了协议，取得了很大成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胜利。（呼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还有周总理出席今天的会议，庆贺你们的成果，（呼口号），现在，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向同志们宣读一下。

读完“决定”第一条后，康老说：这一条就是中央批准了你们长期努力的成果，批准了你们达成的协议，即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两个协议在中央批准了以后，还要进行工

作。一方面，你们回去以后，要很好教育群众，很好贯彻执行协议；另一方面，要估计到贯彻执行协议中间往往发生一些问题，你们思想准备一下，这就要你们进行工作。没有这一条，不能实现协议。在贯彻执行协议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本着大联合的精神去贯彻，不要以为你们回去一、两天以后可以实行，实现协议有个过程，不能一发生问题就阻碍协议的执行。这一点，各地方都有这个经验，希望宁夏不要重复这个问题。要根据大联合的精神逐步贯彻执行协议。是经过毛主席批准，林副主席批准的，是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的。同志们应该是爱护的、支持的，不够的地方应该补充它，不要随便地把它当成一张废纸。你们要尊重你们的成果，希望继续努力。

读完“决定”第二条后，康老说：这一条，我跟同志们讲一讲，你们应该学习中央、中央文革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想一想，都要具体分析。这一条中有三点区别：第一点区别，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是反对他们的错误的，如象张怀礼同志就反对这条路线。还有其他的同志，你们不知道。第二点区别，错误的重要责任在朱声达同志，江波同志也有错误，何其仁同志也有错误，决定上面没有写，这就把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和其他人的错误区别开来。第三点区别，朱声达同志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说话、不检查，我也曾批评了他。这几个月来，经过中央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他做了几次检查，现在有他的书面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这就是把朱声达同志过去犯错误和现在愿意改正错误加以区别。而军区党委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

读完“决定”第三条后，康老说：六十二师是二十一军的，二十一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得很好，主席表扬过。六十二师是从甘肃调去的，（周总理插话：由于时间紧，没有来得及用部队的代号。你们回去以后，传达时用八零三七部队这个代号）这一方面，同志们应该了解，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宁夏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八零三七部队在兰州大军区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稳定了宁夏的混乱局面，在宁夏“三支”、“两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中央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同时，还要使同志们明确一点，兰州大军区是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

席表扬的，他们在支左中是很有成绩的，中央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无论在解决青海问题，无论在解决甘肃问题，无论在解决宁夏问题，无论在解决陕西的问题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支持。冼恒汉同志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你们有些同志可能不认识，他在那边坐着（康老介绍以后，冼政委起立。）

读完“决定”第四条后，康老说：这一条同志们应该特别注意，宁夏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地区，一方面靠蒙修，一方面靠苏修，还有马家的残余和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希望同志们要提高敌情观念。全国形势大好，宁夏形势也是大好，你们达成协议，促成联合。越是大好形势，敌人越不甘心死亡，敌人要做垂死挣扎的。在其他地方，中央解决问题后，敌人紧接着反扑。在中央达成协议一公布，敌人会马上来造谣，破坏。所以，同志们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支柱，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最伟大的长城。没有这个长城，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你们要使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在不久的将来，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读“决定”第五条后，康老说：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有康健民同志，他是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张怀礼同志，他是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徐洪学同志，621师副师长，王志强同志，他是一个地方干部，是回族干部，过去做过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副主席，银川市委书记，过去在刘邓路线，在李维汉修正主义分子，在杨静仁、马玉槐等人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受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支持左派。李天冲同志，是六十二师政委，也是支持你们文化大革命，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命令到宁夏去的。许仲波同志，他是炮十五师的政委。乔克广同志，宁夏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李江烈同志，他是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缺点，后来很快地支持革命派。丁毅民同志，这位同志是回族同志，也是受了李维汉、杨静仁、马玉槐等人的迫害，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党籍几年了？（丁毅民回答：八年）还坐过牢，坐了几年？（丁毅民同志回答：三年）这个干部原来是在山东的，你在

地方民族主义还有一点吧？（丁毅民同志回答：我要检查。）应该检查一下。今后，总理、江青同志也在，中央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不要什么文件了，有这么多人，而且到了筹备小组了吗！顺便讲一下，有些同志还没有平反，将来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再审查。陈养山同志，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老同志，开始犯了一些错误，后来改正，群众很谅解，也提议结合，你不要辜负群众的希望。还有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下面讲这个问题。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该根据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待中央批准后解决。有个初步想法，按照甘肃的经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大致七个席位，这样讲，革筹小组就是十七个人，甘肃筹备小组也是十七人，群众组织代表也是七个，你们根据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然后报中央批准后参加。这些代表不是代表派性去参加，这一条可以说是我们今后的宁夏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最主要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学习、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要做到这一点，你们宁夏就要继续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一种学习班最好的形式是联合办。不是各派办。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自己检查自己，少批评或不批评别人的缺点。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着重的说一下，各派的代表同志们，要努力克服派性，加强党性，大家要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用形象的话说，它象一条毒蛇。有了派性，就不会有或者减轻了敌情观念，有了派性就减轻了革命观点，有了派性就模糊了阶级阵线，有了派性，就减轻了集体观点，有了派性，就减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观点，有了派性，就忘记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有了派性，就模糊了党性，就没有党性，有了派性，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同志们要坚决同“私”字作斗争，同派性作斗争，这是能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只有克服派性，文化大革命才能更好进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才能更快成立起来，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中央批示里强调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宁夏的革命群众组织跨行业的多，要逐步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最后庆祝你们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得到胜利，庆祝你们为大联合建立基础，在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希望你们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希望你们爱护中央对宁夏问题的决定，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宁夏又一伟大胜利！（呼口号）

周总理：给同志们讲一下，江青同志今天感冒，她先走了。还有叶群同志，她也要走，有点事情。（叶群同志向全体代表招手告别）谢富治同志也去开会去了。

康生同志：和同志们讲清楚：江青同志感冒了，现在发烧，原来想不来的，我说叫她来看一下，我先介绍，等她走了我再说话，她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我说：好吧！就不介绍了。她这样就来了。她是带着温度来看同志们的，（呼口号）可见中央对同志们是多么关怀！希望同志们珍惜这一点。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到了河北，不能来看大家了。

周总理：请姚文元同志讲一下五点（指六八年元旦社论），拿来讲一讲。

姚文元：没有什么可讲的，请你们好好学习六八年的元旦社论。

周总理：你的五点不讲，我也不能泄露你的机密了。请吴法宪、汪东兴同志讲话。请冼恒汉同志讲话。

冼恒汉：我完全拥护主席批准“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热烈地祝贺宁夏四派共同达成的协议，并且希望这次来北京学习的同志回去要执行中央这个决定，成为执行决定和协议的模范。大方向对头的也不要骄傲，特别要注意掌握政策，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好形势还会被破坏的。我们的军队要支左不支派，很重要。解放军不要降到革命群众组织的水平，不管是哪一派，对了我就支持，不对了就不支持，就批评帮助。有些说百分之百的支持，我说，百分之百我不干。只有这样，才是对左派的真正爱护。错了不批评，反而支持，这是对左派帮倒忙。我祝贺你们，向同志们学习！

周总理：刚才康生同志的讲话我完全支持，完全同意。冼恒汉同志讲几句，很好。六八年元旦社论很好，我当然不好泄露了。同志们首先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急速大办特办，工厂也办，农村也办，机关、学校也办，街道里弄也办。有问题，请教主席嘛！见了毛主席就增加力量，学了最新指示，就增加力量嘛！我们天天不要忘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关键的关键，决定

的决定。我们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主席的书要天天读，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要你们学习支左模范英雄四排李文忠，他不是说过：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要学习英雄四排那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一句，用一句，错了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地改，不论是红卫兵、解放军、领导干部都要好好学习。宁夏地方虽然不大，人口不多，把这个地方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不是很好吗！要搞好“斗私，批修”，首先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实现你们协议的第一条，按照第一条规定要联合起来学。第二就是开步走，搞革命的大联合，派就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共同的东西。学通了，学好了毛泽东思想，共同性增强了，派性就减少了，无产阶级党性就增强了，这也可以促进你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大批判、三结合，这给你们本单位斗批改……（听不清）支左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这是真正的左。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把群众工作做到家，要赶快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已有十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十个是江西，后面还有几个，你们要赶上去，更前进一步嘛！你们成立了筹备小组，这说明你们进了一步。冼政委就想在春节前把甘肃的革命委员会成立，青海已经有了，你们赶上去，你们就是西北的第三位，你们有部队支持嘛！革命委员会干部已站出来，你们回去以后，还可以解放一批领导干部。现在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最多的地方是华北。华北已经有山西、内蒙、北京、天津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还有一个河北了。伯达同志亲自在抓。你们宁夏如果成立革命委员会，就可以西将新疆的军，东将陕西的军，你们看有没有希望？（群众答：有！）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赶快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春节前还有一个半月，你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在新的条件下放出新的光芒。还有一件事是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宁夏地处边疆，不要看它小，这是个重要的地方，内蒙靠外蒙，你们隔了一个内蒙古，隔得不多，你们那儿有正规军，有备战的任务。面对蒙修，有一个大口子，归兰州军区，还由你们堵，所以要备战。煤的生产又要供应兰州，又要供应包头，现在煤的生产怎么样？（康老插话：石嘴山煤的生产上去了吗？牟元礼同志回答：产量增加了。）你们要争取达到计划的要求，年底推动一下。（姚文元同志插话，没达到要努力赶上去，明年来个开门红）铁路交通你们是枢纽地带，乌达铁路还没有断，这一点很好，这一下，西北的运输就不受影响。铁路不要跟

地方挂钩，铁路上没有同志来吗？（筹革造代表起立）你们是属于兰州局的吗？要支持兰州局搞得更好。你们铁路上有几派？（答：四派。）四派也要联合，（康老插话：告诉同志一个经验；派性去掉了，就容易联合）（筹革造方面铁路代表说：总指挥部联合提出了条件。）现在不要去批评对方，不要多说人家怎么，要多说自己，文件都有了嘛！（指条件，总理拿起文件讲了一下）整个宁夏形势是好的。铁路上的情况你们可以到铁道部谈一下，挂一下钩。同志们要把生产交通运输搞得更好，迎接一九六八年争取开门红。现在，你们达成了协议，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批示了，主席批准了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这是最大的决定。庆贺你们，回去以后，你们要很好地执行（呼口号）你们的口号代表你们的意见嘛！不要再谈了。（三司代表要求发言）你们回去后，在革筹小组的领导下，有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找联络员，他明天要跟你们见面的，好啦，就这样吧！

中央首长手挥毛主席语录向同志们告别，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高呼口号。

（根据电话记录）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陈毅对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的谈话

〔元月十八日晚，陈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三十余人。军委副主席陈毅同志代表周总理对宁夏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其中特别主要谈到了宁夏军区的问题。〕

军区有支持你们的没有？（同学答：还没有。）

你们对军区的意见怎样？（同学们简单地汇报了宁夏军区的情况。）他们改变态度，你们欢迎不欢迎？（同学答：欢迎！）

你们要争取军区同志的支持。马玉槐是黑帮、杨静仁是当权派。他们军队尊重地方，受了杨、马的蒙蔽，他们可能不理解，你们可以争取他们，让他们改正错误，当然有坏人要处理。

（同学问：不让到军区去串连怎么办？）

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他们（指宁夏军区）接见你们。你们可以到军区串连，但是不要干涉，军队混进坏人是很危险的，军队的文化革命一定要搞彻底，但是方法不同。

革命青少年要和工农兵团结起来。我是军委副主席，我坚决站在你们这边。有些特别坏的，他们不处理，你们把材料报上来，我们处理。

杨静仁、马玉槐把持了党政军权，军区几个人不了解，受了蒙蔽，检讨了就行了，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处理军队问题要吸收前一阶段的经验。整个军队是好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的，是学习的榜样。你们不要象冲区党委、人委那样去冲，要通过他们的指挥员耐心说服。你们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要警惕牛鬼蛇神。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4；中发〔68〕55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坚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加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

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至此，全国已有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我们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宁夏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宁夏全体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宁夏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给宁夏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引导他们冲破重重困难，彻底粉碎了杨、马之流在宁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宁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时传达和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密切联系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的巨大努力，大大推动了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迎来了塞上江南的无限春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场革命的胜利发展，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而取得的。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宁夏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正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宁夏地处西北要地。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广大革命人民要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敌人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军民关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特务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三十二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举世无双的工农红军，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篇。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坚信，宁夏各族革命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社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转发“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1969.01.31； 宁发 [69] 号

固原专区、各市、县革命委员会：

现将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转发你们。在执行中如发现新的问题，及时反映。

希望你们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搞好。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一月卅一日

附录：“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我区广大革命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和在支左部队的大力支持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了成绩。目前，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有部分单位转入落实定案。为了适应对敌斗争需要，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的伟大战斗任务，更加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贯教导和中共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并参照外地的经验，结合我区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有关政策界限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清理对象和界限

一、叛徒：

（一）投敌叛变：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自动投敌、登记自首、暴露党的组织、出卖革命同志。

（二）自首叛变：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被捕、被俘后，向敌人自首暴露党的组织、出卖革命同志。

（三）自首变节：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被捕、被俘后，登记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和革命同志。

（四）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在地下工作期间，不经组织批准，自行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和担任反动军、政职务。

参加革命前，属工人、农民、学生等一般群众和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在游行示威等进步活动中被捕后向敌人“悔过”者，不应按叛徒论处。

二、特务：

（一）解放前参加国民党、汪伪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间谍组织分子。

（二）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受特务机关指示潜伏、派遣的分子。

（三）被特务间谍组织收买利用，积极从事特务间谍活动分子。

（四）凡在职业特务训练机构中受过特务的业务训练和技术训练的分子。

(五) 特务外围组织中有特务身份分子，或虽无特务身份但积极从事特务间谍活动者，应以特务分子论处。

三、反革命分子：

(一) 现行反革命分子：

1. 凡属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书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2. 对于有确实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的机关、私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分子。

(二) 历史反革命分子：

1.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副职）以上及相当于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青年党、民社党、阎锡山的同志会等）骨干分子；任国民党县以上党团机关中科、股、组长等和相当于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职务的分子；积极筹建反动党团组织，进行反动党团活动的县以上筹备委员均以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论处。但是，对于只挂名义，实际上没有担任反动党团骨干职务，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可以不按反革命骨干分子论处。

2. 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是指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以后，国民党军队中，连长以上军职的军官，和有上尉以上军衔的参谋、军法、政工等人员，国民党还乡团中相当于连长以上的骨干分子；国民党政府中的乡（镇）长、区长、县长、县政府科长、法院院长、检察官、警察局的巡官、县参议长（包括副职在内）宪兵尉官以上人员，并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虽非上述人员，但有严重罪恶和民愤者，也应当作反革命分子论处。至于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前的上述人员，如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分子，也应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敌伪军中上尉以上军衔的军需、军医、兽医、军械、军邮、军工、军乐、随军文化艺术工作人员都是清理对象。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可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起义人员，不能按上述原则论处。但如果起义后隐瞒重大罪恶，坚持反动立场，仍从事反革命活动者，应该新老帐一起算。

3. 反动会道门头子：是指一贯道及其它反动会道门（如大刀会、九宫道、先天道、无极道、圣母军、理教会、同善会、瑶池道、哥老会等）中的点传师和相当于点传师以上的骨干分子。其他职业办道人员罪恶和民愤很大的分子，也应该以反革命分子论处。虽不是反动会道门头子，但在取缔反动会道门以后，继续恢复和发展反动会道门组织，或者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应当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三）恶霸：是指过去在城市和农村中，或组织依靠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或权势欺压人民群众，罪恶重大，查有实据的分子；或城市里弄、码头、行业或工厂、矿山中依靠特权势力，组织流氓打手，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封建把头。

（四）土匪：是指解放前当过土匪头子或惯匪，残害人民，民愤很大的分子；以及解放后当过土匪，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或勾结、策动、指挥土匪聚众骚乱、抢劫国家资材或群众财产，或者一贯窝藏土匪坐地分赃的分子。但在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一时被土匪欺骗，参加过土匪活动，罪恶轻的人，不应当作土匪论处。

（五）汉奸：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机关中当过区长以上的职务；在敌伪军队中担任营长和清乡队长以上职务的人员中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虽非上述人员，但曾倚仗敌人势力敲诈勒索，欺压群众，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分子，也应当作汉奸论处。

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是指戴帽子的五类分子，摘了帽子或性质确定而尚未戴帽子又有破坏的分子；漏划、漏网、外逃、隐藏身份混进革命队伍的五类分子。

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悔改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是：坚持不改而又屡教不改”的分子，具体说来，就是同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黑线组织关系，或坚持追随这个黑司令部，在其所领导的地区或单位，蓄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严重的三反罪行，在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幕后策划，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证据确凿的面前，至今仍不低头认罪者。

“走资派”划到那一级？

农村人民公社：社长、书记。县：副县长副书记以上。专市：副专员、副市长、副书记以上。自治区厅、部、局、委、办：副厅长、部、局长、副主任以上。相当于县以上的厂矿企业等单位：副厂长、经理、副书记以上。学校（中学以上）：校长、书记。有独立职能的相当于县以上单位的负责人（包括副职）。

六、其他清理对象：

（一）敌伪军政宪政人员中的反革命项内包括的下列人员：政（保长）、警（警长）、宪（宪兵）

（二）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不好的分子。

（三）经过县以上机关批准戴上帽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流氓分子等。

（四）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方代理人，资产阶级及反动学术“权威”）

（五）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

第二、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最近又指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为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在对敌斗争和落实定案工作中，必须严格注意以下几个区别：

（一）把投机叛变分子、叛党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同被俘、被捕后有轻微自首变节行为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叛徒，后者是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二）把特务间谍分子和积极进行特务活动的分子同曾在特务机关内部，但没有特务身份和没有进行特务活动的炊事、杂勤、传达、收发、庶务、医务人员；

临时聘用工程技术人员；被迫、被骗受训，结业后确实没有进行过特务活动的分子和特务外围组织的一般成员区别开来

（三）把反动党团、敌伪军政宪警和反动会道门头子骨干分子同一般成员严格区别开来。

（四）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犯过走资派错误并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五）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五类”分子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严格区别开来。把这类人员的家属子女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严格区别开来。

（六）把反革命叛乱的首恶分子和有严重罪恶、民愤的骨干分子同胁从者罪恶轻微、民愤不大以及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把反革命叛乱分子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严格区别开来。

（七）把历史反革命同现行反革命区别开来，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对交代过和隐瞒、隐藏的要加以区别，已交代的又要区别守法和不守法的分子。

（八）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但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九）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十）把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腐化堕落分子、政治骗子、流氓阿飞分子同有一般偷摸行为、思想落后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流氓习气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十一）把政治事件同一般责任事故严格区别开来。

（十二）把长期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同隐瞒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区别开来。把长期隐瞒拒不交代同已经交代清楚的人严格区别开来。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主要是指曾向敌人有轻微变节行为，或者参加过反动党派，反动组织为一般成员，或者参加敌伪军、政、警、宪组织的一般成员。

第三、关于定案处理的审批权限和其他有关问题。

一、审批权限：

审批权集中于县级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自治区、专区属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由所在专区、市、县负责）。具体分工如下：

（一）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 1.专区级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的副处级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
- 2.各专区、市、县的正副书记、正副专员、市长、县长。
- 3.原专区、市级机关和相当于专区级的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正副部长、处（局）长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
- 4.自治区直辖县的正科、部长和十七级以上的干部。
- 5.中央、自治区、专区、市直属县以上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副处级或正科级、十七级以上的干部。

（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部负责审批：

政治部：负责原党群系统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生产指挥部：负责原人委系统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保卫部：负责原公检法机关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三）专区、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1.原专区、市级机关、厂矿企业事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2.专区所属各县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的科、部级（含副级）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

3.中央、自治区、专区、市所属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和职工的定案处理工作。

（四）专区所属各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原县级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等单位和中央、自治区所属厂矿企事业、学校等单位的副科级以下干部、职工群众定案处理工作，并将干部的定案处理报专区革命委员会备案。

（五）自治区直辖各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原县级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和中央、自治区所属厂矿企事业、学校等单位的副科以下干部、职工群众定案处理工作，并将副科以下干部的定案处理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备案。

（六）审批定案中凡涉及到摘、戴五类分子“帽子”应按区保卫部（六八）十四号文件规定执行。

凡是进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管会（小组）的单位，审批定案工作，必须在宣传队、军管会（小组）的领导下进行。

二、定案材料的要求：

（一）定案材料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般简历、主要问题、调查结果、本人态度及结论和处理意见。

定案材料要重点突出，情节清楚、语言恳切、文字简明扼要。一般不要超过两千字。

（二）上送区革命委员会的定案材料，主件上送一式十五份，并附主要的旁证和本人交代材料。

（三）有关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原话，不要写在报告中，可列附件。如旁证不一致时，由承办单位附加说明。

三、几个有关问题

（一）严禁逼、供、信。必须遵照毛主席“对于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加强调查研究。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一个人做出是否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的结论，是一件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特务等，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关于群众专政的问题。必须按中共中央（六八）一七〇号文件执行，实行群众专政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那些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是重大嫌疑分子具有行凶、逃跑、自杀等危险分子才能实行群众专政。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对目前已经实行“群专”的人进行一次审查，确实不是敌我矛盾的，应该做好工作，立即解除“群专”（如扣发工资的，应该补发）。对那些介于人民内部矛盾

和敌我矛盾之间的，要留有余地，可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实行群众专政。今后凡要实行“群专”的，必须按定案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才能执行。各级革命委员会对深挖机构、专案组织和“群专”队伍也要进行一次审查。必须使这些组织真正掌握在可靠人的手中。对“群专”和斗争对象的工资，在未依法逮捕和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定案以前，仍应照发。

（三）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各级革命委员会内部，如发现极少数坏人混入，应及时上报批准成立革委会的机关进行清理。需要调整的，经上级机关批准后才能调整。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一九六九年一月卅一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扩大化等问题。

座谈会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叁、本节研究资料

《冼恒汉回忆录》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实讲清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队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议”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指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理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肯定会讲错话的。

“结论”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查并平了反，平反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 0 0 1 5 6 5》）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吧。

2008 年 7 月 22 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5）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五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支持安徽革命群众批判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时间：二十日零点，地点：北京体育馆。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李富春、谭震林。〕

同志们！朋友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我到这个地方主要接见的是安徽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学生、文艺界到北京来解决问题的。同我一起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常委李富春。中共中央委员谭震林，在场的除了安徽来的还邀请了其他几个单位，有全国妇联来京的九百位，妇女工作是李富春管的，还有其他单位，不一一列举了。

首先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问你们好！

你们来京是带着问题来的，我们只能从原则上告诉你们，注意什么问题。安徽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教员、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你们是来控诉安徽省委以李葆华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你们的压力，犯了罪恶，你们的控诉，我们支持你们！

你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北京解决，即回到安徽、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去解决，即回到安徽本地去彻底批判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那里把他们批透、批垮，所以斗争锋芒要指向省委。只有打回老家去，就地彻底闹革命，前一些时期，在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现在是既反对革命又破坏生产，并把革命

的锋芒推向上, 矛盾上交, 他要走开, 办法是经济主义, 矛盾上交。根据安徽的材料, 和全国一样, 也是关于合同工、临时工的问题。当然这里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 在运动后期必须改革, 临时工、合同工进行革命串连不能扣工资, 不能调动工作, 更不能撤销工作, 回厂不能歧视, 不能虐待家属。

去年十二月九日, 抓革命, 促生产十条(草案)已定了的, 但这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故意闹经济主义, 把临时工、合同工, 不经分析, 现在一律转正, 把合同工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一律复员, 把 61 年、62 年、63 年下放到农村的也恢复岗位, 补发了工资, 这样就使国家超过了国家计划, 这些用经济个人眼前利益来收买、欺骗工人, 这是有光荣传统的觉悟了的工人不允许的, 刚才我和一个工人谈话, 那个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增加工资, 发几十万给工人, 觉悟了的工人把钱退给了银行, 他们做得对, 做得好! 所以这种行动必须揭, 这种经济主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种经济主义侵蚀工人, 是修正主义, 是无产阶级不许可的。把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一样挖掉, 但是总有一定影响, 这事在上海、东北、广州各地都出现, 财政制度增加了, 所以中央下命令一切银行, 从中央到地方完全要军事保护, 按计划开支。超过计划, 无论那级党委, 那个厂矿企业都无权开支。现在不仅从工资、奖金多开支, 而把矛盾上交北京中央, 免费车票一开就是几十、几百上千人来北京, 很多地方连接待都发生困难。他们不象红卫兵, 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接见后就走了, 他们住在北京不走, 人越来越多, 接待拥挤的很, 接待的机关, 也要搞革命, 会影响他们, 文艺界刚从本省领了钱, 粮票, 又到文化部, 又要每天七角钱的补助, 开支大, 不利市场稳定, 出现抢购, 有些高价布和冬季物资, 现在就卖光了。公园挤得很, 他们不是来闹革命的, 来交流经验的, 是来闲逛的。红卫兵把贵重物品、游览场所封闭了, 这些小将做得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不是来抓革命促生产, 也不是来交流经验, 是来闲逛, 妨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希望各方面来京同志, 回去告诉本地的同学工友们, 我们运动正向工厂农村发展, 企业厂矿在生产岗位上的同志要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不能抽空到别的地方游逛, 应更好工作, 自己在本单位要把工作搞好, 睡觉时间缩短, 才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下锻炼自己, 不要矛盾上交, 就地闹革命, 同志们回去宣传这些道理。还有反对经济主义, 反对矛盾上交, 并按系统岗位组织起来, 譬

如学生就以学校为单位，如蚌埠商学院以商学院为单位，合肥农学院以合肥农学院为单位，再联合全市。全省的联合在发展中，多个革命组织在共同目标，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工厂也是这样，按所在工矿为单位，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服务行业如此，职员如此，农村以公社为单位……。

至今还没有批准任何全国性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组织，基础要打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打思想基础，现在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必须基础打好，同时全国组织一概没有承认，我正式宣布有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批准，因这些转业军人绝大部分是好的，从军事岗位上转到行政、党政，工厂、学校、服务行业、公社，在那工作就成了那里成员，不需要把全国军人组织成一个组织，这样搞，各单位成员抽出来，不合乎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乎复员转业军人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国家一旦有事，听从号召在各地登记，在上海的在上海登记，在合肥的在合肥登记，全国有军委，有武装部，有政府管，最多各市有个联络处，把本市统计，防止社会上一小撮利用这些组织糟蹋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应在本单位组织，我也是复员军人，工作不做？到全国串联？这是一个党员不许可的。

65年毕业生没转正也想组织全国性组织，也不合适。要按需要和志愿使他们转正，工作不需要可离开工作岗位回到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回到本校。这部分可不转正，要区别对待，不要笼统，更不赞成全国性组织。64年也要组织，那我们也是过去的毕业生，都组织起来还得了？“同年”组织起来，这是封建主义办法，资本主义办法。所以要按行业来组织，革命造反派起来要夺当权派的权，一个市可以联合，工人与工人，学生与学生，成为一个市的联合，如上海一月五日十一个革命组织发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32个革命组织十条通告，这是革命造反派开始夺权，正在全国兴起，掀起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现在北京有反动组织，最近破获两个，一个冒充为“全国工农兵红色造反夺权总部”，他要夺谁的权？是夺无产阶级的权，不知是工人、学生、农民，只是笼统的到处骗人，霸占了中央化工部，在地下室里秘密活动。抢了化工部绝密文件、国防尖端资料，被化工部革命群众发现，揪了出来，把两个头子抓了起来，

问他们回答莫名其妙，连年岁都说不对。说今年二十九岁，解放前参军了，解放十七年，他十二岁就参军？还有一个“红旗军”，在东北哈尔滨有，北京有，湖南有，最近杭州也有，说这组织是毛主席批准的，根本是造谣。这头子是反动的，逮捕了两个头子，刘沙、胡国光。群众大多数是好的，受蒙蔽的，他们到处抢房子，在中医研究院抢了一座楼发号施令。我们逮捕他们时他们说是镇压群众，把解放军缴械了，我们宣布“红旗军”是反动的不交枪就全部逮捕，群众觉悟了，把枪交了回来，他们到处破坏，这是一些对社会不满的反革命分子，我们革命工人、学生、职员、教员要分清界线，尽搞全国组织他们很容易混进。

北京有西城纠察队，其他还有纠察队，思想变坏，打人杀人。逮捕了一些头子，最近这些青年人受人欺骗，组织了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实际上乱窜，下半夜活动，骑摩托车、自行车、喊反动口号，也要把反动头子逮捕，教育群众。在陕西有个“红色恐怖队”，（西安）思想走邪道，相信反动的血统论。老子好不能保证儿子好，是“自来红”。陈伯达同志讲过，这种错误的思想产生错误的行动，形成武斗打人杀人，必须把反动头子抓起来，教育自己才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个是运动不可避免的出现的，是绝对的少数，洪流正奔向前方。

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必然把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夺权形式多种，因事制宜，实事求是，革命造反派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千篇一律，在原则方向一致下，做到实事求是。

革命造反派是多数，不能说在座的没有保守派，对保守派也要说几句，你们在运动中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蒙蔽、欺骗，旧习惯、旧框框没有打破，犯了一定错误，只要你们愿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受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双十条办事，你们还能和造反派一起，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这需要本身认识错误，你们要整风，革命造反派不要认为方向对就骄傲、关门，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道路艰巨曲折，需要反复斗争，才能进行到底，所以不能保说的话，做的事，写的文章没有错，我们的工作也不能说没有错，有时跟毛主席跟的不紧，得跟上去，群众说的对就得改正，把保守派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只有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才有力量。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有力量，工作才能做的更好。

最后说清楚：我只讲了原则问题，具体内容回到老家去，根据具体情况解决，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高呼几个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

打回老家去，就地彻底闹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医学院东方红驻京联络站）

二、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夺权代表时的讲话

一、向同志们宣布，从现在起任何地方，任何省份，任何地、县要到北京来捕人，一定要经中央公安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在北京擅自捕人，你们已经没有经过一定手续在北京捕人的过去就不咎了，以后不经过公安部、中央文革批准擅自捕人的要依法惩办。

二、取消对陈明远的通缉令，如果他有错误，有罪过可以向中央报告，但你们自己不能擅自下通缉令，过去下的通缉令应当取消。

三、在合肥的现在夺权的一派的同志要求你们通知家里，通知合肥，不准再乱捕人，允许大家辩论，不许对持不同意见的实行镇压逮捕，已逮捕的一般应当立即释放。

四、任何一方不准武斗，赞成 1.26（夺权）也好，反对 1.26 也好，不准武斗，不准挑动武打，不准用标语，报纸挑动武斗。

五、中央在调查安徽的问题，希望你们不管哪一派，不能随便去制造谣言，不然中央解决你们的问题将更慢、更迟缓。

15 日你们就打伤了几十个人，中央正在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夺了权的一方更应该允许不同的意见么（关：可以到北京来谈么）在北京能谈，在合肥就不能谈么？不能开会解决么？是帮助中央解决你们问题还是制造困难呢？因此希望同志们冷静地从大的方向解决问题，不要宗派主义，不要违抗中央精神，不要违反毛泽东思想，要解决你们的问题，团结起来，把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搞得更好。把李葆华一小撮的问题揭开，掌握中央政策。夺权正确的有两种夺权，一种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种是夺自己头脑中的权，这一点谁都要做，要修正错误。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 年 4 月。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1967.03.27；中发 [67] 112 号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执行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

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做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较早站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小

组，进行专门调查。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安徽各方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

今天开会经过几次会议，双方观点都摆出来了，现在宣布中央的决定也与安徽军区代表谈了，现在康生同志宣布党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办法解释一下。

康生：

关于安徽问题，中央和中央文革和安徽的同志进行了多次接触，对 1·26 夺权赞成和有意见的代表都找回北京来了，把安徽军区的同志也找来了，把南京军区军管委员会钱钧同志也找来了，根据多方面的意见，经中央详细研究、讨论，并报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出决定，现传达：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了安徽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和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省市机关的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因此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在未作出决定之前，中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向各方面作调查研究，中央不只听一方面而且听多方面的，赞成 1·26 夺权的，反对 1·26 夺权的，甚至被通缉的，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和学习主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方法。中央把各种意见的代表人物，都叫到北京来座谈、调查，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是单一方，希望同志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不能单听一方面的，无论什么组织，大联合也好，三结合也好，今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好，帮助他方解决夺权斗争也好，这种方法必须掌握，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中央不会仓促作出决定的。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三千万人民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份。

第一（略）

对 1·26 夺权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好得很，大方向是正确的，甚至讲反 1·26 就是反革命，谁反对 1·26 夺权就要镇压。另一种认为 1·26 夺权是假夺权。中央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没认为这种夺权是假夺权，也没有认为这种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如北京夺权夺了几次，中央未作出结论，也没有说那

一方是正确的，说反对 1·26 夺权是反革命有问题，说 1·26 夺权好得很也有问题，这二种意见中央文革都未提，只是指出了存在问题，没有实现三结合，没有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是非常仓促的，开始认为省委的权不能夺，据讲是受山西消息的影响，另外还听到了不真实的情况，说程明远篡党篡军，军区也来不及看你们的文件很匆忙。因此，必然大联合彼此商讨来不及，据反映八·二七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这种匆忙中间就将应该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联合，为什么说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我们夺权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吗？夺李葆华的权吗？夺权后矛头指向何处？对并肩作战的革命组织实行镇压，而不是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将其领导人逮捕了、通缉了，这些组织被解散了，这是大错误，在夺权后对革命组织进行镇压，这个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自己的战友，于得水同志已死了，该联合的没联合，而去镇压，没有集中力量去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权，当然是夺党委的权，但夺权的打击对象是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红卫军，省暨合肥市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在夺权前，夺权后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一点从同志们告诉我们的，你们结合的干部（省委）不是真正的三结合，不要说任质斌、张祚荫、黄岩、王光宇，就是王中也是长期养病，过去也不是真正彻底揭发李葆华的，而且有些问题上自己也有责任，什么五条、七条，弄到现在五条也没有了，这怎么叫革命的三结合呢？指挥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夺权前和夺权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主要是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把不赞成自己意见的人搞成反革命。压制了左派团体和革命干部，实际上情况是这样，中央文件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我们应当说明这一点，安徽夺权没有报告中央，未经中央批准。

我们要来汇报，中央还没有安排，因为你们的材料我们没有来得及研究，你们自己来了，我们对 1·26 夺权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李胜利同志汇报，曹在凡同志补充时当时你们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要中央承认，没有其他问题，使我们感到问题不大，但又觉得不放心。因此我们提议多来几个同志，多反映几点情况，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找来谈一下，应当说，第一次觉得有问题，思想是倾向于承认你们的。我们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又觉得不放心，开始没有说你

们的大方向是完全对的，但是觉得问题不大，后来经过继续调查，所谓没有问题，实际存在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指挥部的同志没有如实地向我们反映，后来通过记者及不赞成夺权的同志的反映和揭露，觉得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就是文件上写的，当权前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问题揭露后，总指挥部代表李文安、李胜利同志也觉得 1·26 夺权没有成功，存在着问题，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南京军区也向我们建议安徽一时大联合、三结合不易解决，也建议实行军管。在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向中央提出军管，并且提出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同志为首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安徽军区司令员严光同志、政委宗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王文模同志、钟国楚同志、蒋开元同志、李士槐同志，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军管会的名单，中央赞成实行军管，并且以钱钧同志为首。

第二（略）

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第二条要提出这一点。

第三（略）

第四（略）

我们觉得现在的军代表是不够称职的，到那里镇压了革命群众组织，这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军事管制的目的。所以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做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二个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冲击，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必须说明一点，有一个坏分子，有一个反革命，他也不同意 1·26 夺权，也对 1·26 夺权有意见，假如这些人是真正的反革命，那怎么办呢？文件上讲得很清楚“因为对 1·26 夺权持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

和革命干部。”真正反革命，那是反革命的问题，要和赞成和反对 1·26 夺权分开。不能因为反对 1·26 夺权，因而就逮捕，就打成“反革命”。

第五（略）

这是因为报纸是党报，不能成为哪一派的报纸，不能宣传 1·26 夺权是正确的，反对 1·26 夺权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不看是不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用赞成和反对 1·26 夺权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这里必须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说报纸能够出版也不出版，而是说不能正常出版的情况下，可出新华电讯稿。

第六（略）

本来八·二七是革命组织，长久是不发生问题的，工人联合委员会是革命组织，也是长久不发生问题的，他们是长期与李葆华作斗争的左派革命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防止另一派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或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因而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要重申这个问题，使不赞成 1·26 夺权的明确这个问题。这二个组织过去是，现在也是革命组织，不能因为个别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同一司、三司等组织不赞成 1·26 夺权，因而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反动组织，因此肯定从他们现在情况看来，他们也是革命组织，当然还有许多组织，比如夺权时二十多个组织，不能够一一都写上。因此，八·二七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这些都是革命组织。这些组织不是都没有缺点的，都要进行自我整风，着重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

第七（略）

第八（略）

为什么要单独写这一条？我们认为八·二七也好，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也好，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因为没有支持早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因为我们知道，要真正斗倒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安徽的有利条件是机关干部起来较早，比其他任何几个省都有利，原因是李葆华在三六事件对革命学生实行血腥镇压，使机关干部觉悟起来了。这些人受压制，这是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损失，同志们要注意，地县也好，要注意夺权中要支持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早站出来的革命干部。

第九（略）

中央决定一共九条，另外说明一个问题，刘秀山同志的问题，没有写进来，因为主要是谈夺权问题，刘秀山问题应该调查，你们供给材料，但与夺权无直接关系，不在这里布置了，这不是说不要调查这个问题了。

周总理：

刚才康生同志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九条决定，在座的各方代表还有什么意见要谈。（发言……略）

我们希望你们的态度是真诚的，问题不在于请罪，凡是你们要承认，在军管会成立之前，军区代行职责，不能再有打、砸、抄、抓，不准武斗。军分区要向军分区、基地传达，你们要向家里布置，打电话回去，首先停止武斗，通过全省、各个线的有线广播说服他们。首先要打电话回去，看谁执行的真诚，准备、军队、军区、军分区委非常谨慎，要劝说、说服，不要动武器，这样情况就会好的，要做说服工作，如果双方是真诚的，不要说得太多，看实际行动，看谁的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斗争、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认识要从行动上证明，如果不是这样，就暴露了他们，一大批人军区要说服，很可能被包围，甚至会冲军区，好人冲一下，他们会走的，坏人冲一下就暴露了，经过说服最后剩一、二个或三、四个人，人们就认识了，要改变过去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拨离间的状态，如果你们觉悟了，认识到上了当，不觉悟就要走到错误道路上去，严重的错误允许你们改正，希望你们同志回家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在中央九条的指导下，允许改正错误，真正揭露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谈到有人提出要三司同志回安徽），三司同学不回去了，你们回去见诸于行动，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在座的各方代表都有，不需要北京的同学再回去参加（关锋：你们要有信心嘛！）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挂帅，团结起来，军管会帮助一步还要过渡到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相信你们会搞好的。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

1967.04.01；中发〔67〕117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附件：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1967. 03. 27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执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

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派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二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既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较早站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小组，进行专门调查。

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对安徽造反派的电话指示

〔参加单位：军管会负责人、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一司、工二司、省及合肥机关职工造反司令部代表（反夺权派）。听电话录音者：红革会王洪兴、工一司王启腾、八·二七周道元、省及合肥机关职工造反司令部代表陈明元、军管会主任钱钧、秘书王瑞根。〕

周总理：你是钱司令吗？我是总理。人都到齐了吗？

钱钧：来齐了。

周总理：来多少人？请一个代表和我讲话。

钱钧：来了十个，每人有一个机子。

周总理：十个人，推选一个代表讲话。

周道元：周总理，我是周道元，是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的。

周总理：你们今天一点钟要开会吗？开什么会？

周道元：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周总理：你们的主题和中央的意见不相同了。你们对安徽省军区有意见，要先和中央商量嘛！你们这样做，不是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你们想一想了没有？

周道元：我们是群众自发的。

周总理：群众自发，要有领导的嘛！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你们这个主题，不同意你们这样做，这样会造成群众对立，对你们自己不利，军区和军管会不好派代表和军队参加你们的会议和出兵保护。你们是革命组织吗！这样一件事怎么连我们商量也不商量呢？同志啊！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映到中央来嘛！你们应该和军管会商量，取得协议。当前矛头要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能把矛头对准严光呢？这是不对的，严光同志虽然有缺点错误，应该把矛头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道元：我们考虑不周。群众想到许多事情，是严光和李葆华一道干的。

周总理：我们已把这个问题在北京开会时与你们讲清楚了，就解释了嘛，当时，同志们都满意了。现在你们又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负责同志，不是对准李葆华，这件事就不好办了。

周道元：我把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好吗？

周总理：电话上就不要汇报了。现在已经一点种了，你们今天的会怎么办？

周道元：总理不同意就不开了。

周总理：不开就好了。这个会不开为好，开了不好办，群众要开对你们自己也不利，对军管会的威信也不好。

周道元：对严光的大字报能不能贴？

周总理：大字报主要应该对准李葆华。对严光同志的大字报可以送到省军区和军管会，不要满街贴。你们有意见可派几个代表来北京，人要少，五到六个就可以，好不好，你们商量一下，我等你们的回答。（代表们商量后）

周道元：我们大家讲了，坚决按总理指示办事。

周总理：那就好嘛！第一步可以找严光同志谈谈，消除误会了就不一定来北京，如果不一致，可以少来一些人。重新说一遍；第一，今天的大会不要开了；第二，如果同志有意见，可以先来找军管会谈一下，彼此内部解决（周道元插话：彼此内部解决）实在不能解决的话，派五、六个代表来北京谈谈。

三、安徽两派同意联合贯彻江青九月五日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首次接见安徽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67年8月18日22：45—19日凌晨1：11，地点：人民大会堂。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李天佑、曹轶欧等同志。安徽七个地区双方代表团负责人以及省军区、军管会、军分区负责人。合肥地区：P派、G派以及芜湖地区联总、三筹处代表参加。〕

康老：同志们好！

代表们：首长好！

（下面首长与各代表一一熟悉。周总理有事，晚来一步。）

康老：听说淮南已经生产了，淮南的生产产量低。（淮南炮轰派代表插话：我们都被打出来了。）情况我知道，你们不要讲了。

（康老又一一询问军方代表，当问到六安驻军负责人刘××，听说他是60军179师时）

康老：听说 60 军在徐州支左不错。

（当问到芜湖军分区司令员胡守富时）

康老：你的大字报怎么那么多，你要注意，人家告你的很多。你要很好研究研究，中央的五点建议和九条决定，你到底贯彻如何？！

（当问到安庆军分区政委布翰襄时）

康老：军分区住在城里还是城外？（注：安庆军分区在 7 月中搬到城外与保守派及农民攻打留在城内的造反派。）

布答：军分区已经在城里了。（中央已多次指示要搬回城里。）

康老：你支持“好派”啊！

布说：我偏重“好派”。

（接着康老问安庆军分区参谋长魏清岑）

魏（站起）：原来我是“好派”，现在我是“屁派”观点，我是在内部进行斗争的，没有发表声明。我补充一句话：布翰襄说军分区搬回城里去了，这是向中央首长说假话，军分区仍然在城外住。

康老：你是党委书记还是党委委员？

魏答：我是常委，书记是布翰襄。

康老：安徽问题不是刚刚开始的问题，中央有“九条”、“五条”，谁对谁不对以这个为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亲自批准的。到底是赞成“九条”、“五条”还是反对“九条”、“五条”，我们不必隐瞒。安徽有一股力量是反对“九条”、“五条”的，有的是反对的，有的是不坚决执行的。省军区就有这样的同志。安徽的问题之所以闹成这样，与省军区个别负责同志不坚决执行“九条”是有关系的，要好好检查一下。当然，省军管会不是没有正确观点的同志。安徽在 7 月下旬出现了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反动口号（指打倒王力、康生、揪出后台等口号），值得大家注意、检查。我看如果同志们本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九条》、《五条》，平心静气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当然也有挫折，有反复。有些组织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人员还不那么纯洁，但解决问题要有个大方向，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希望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今天如果赞成，就达成四项协议，保证把会议开好，如果还有

好的意见，大家提出来，先把这四条达成协议，然后向家里去电报，我就讲这四条。这一方面，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再挑起武斗了！在你那个地方发生武斗，你军分区不能没有责任，军分区不能不承认，不要把责任推给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好的。我就这样讲了，下面请总理指示。

总理问：芜湖上访人员多少？

三筹处代表抢先答：40多。

总理问：你们是哪一派？

代表答：我们是三筹处。

（康老小声对总理说：是当权的。）

（接着芜湖联总代表汇报了被三筹处打到外地——南京、上海、合肥、武汉、北京等地联总战士人员和留芜战士人数，总数约十万人。）

三筹处代表：联总骗人，没有十万。

总理：难道你们没有骗人？你那七万人……

（这时中央文革联络员把芜湖三筹用道林纸印的、很大的污蔑联总的铅印传单，先送给总理，然后送给其他中央首长。）总理很生气地指着三筹处的传单（《告全国人民书》）说：你们用这么好的纸印传单，这个东西不成样子，你们三筹处把大家都打跑了，自己会没有伤亡的？！你们拿那么好的纸印这样的东西，现在印主席语录都没有纸。（抖了抖传单）这个伤亡照片，中央早讲了，不要向外贴，中央的话你们不听，拿到北京来贴，这是外国记者最需要的最好的材料，这个东西只能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成样子了。

康老：印传单，如果没有军分区的帮助，是印不出来的，是不可能的。

总理：跟人武部、跟走资派有关系，没有地方当权派支持是搞不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时的讲话

安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五条》、《九条》，这是很好的基础。安徽可能有个别人、个别组织反对《九条》，这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在合肥有、北京街上也有贴这样大字报的，我不说是那个组织贴的喽！也不定是代表贴的，有的是坏人贴的，甚至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破坏。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

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安徽一个月以前确实有人反对《九条》，七月份有人反对，最近也有。这是小丑跳梁，如“几个为什么”呀。当然罗，我不怕。合肥不是有打倒我的吗？如果我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不打我也倒了，如果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打也打不倒。打我，安徽不是第一个，青海赵永夫要打倒我，内蒙古也要打倒我，结果不是他们打倒我，而是他们倒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千万注意。同志们要有敌情观点，也就是阶级斗争观点。面临着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派，请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同志们也不要这样讲：我这个地方没有“百万雄师”。要调查研究。北京还有，你们那个地方就那么干净吗？北京还有“五·一六”。当然，不管怎样，这是一小撮小丑。我上次同你们讲过，你们来北京不要上当，不要听信一些谣言，不要糊里糊涂。就是武汉事件发生的七月十九日晚上，绑架王力，安徽合肥就也有“打倒王力”、“揪王力”，合肥就有这样的大字报！不能否认这个事情。武汉事件就是这样。为什么？同志们，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你们要记着主席所说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时间：1967年9月5日晚9点10分到12点35分。中央首长：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轶欧等。〕

康老讲话：

同志们，现在开会了。大会是第二次会议了。这几天同志们做了不少工作，我看大家都愿意向毛主席路线方向前进，看起来你们几天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但是问题还存在一些。武斗比过去好象少一些，抢枪这个做法还存在。

特别感觉到有益的好的地方就是合肥的“好派”，拟了个电报稿，指出好派的梁守富和曹在凤同志对解放军十二军的态度是错误的。合肥的好派代表打一个电话表示支持十二军，坚决的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拥军爱民的指示，表示对6408部队，就是十二军，绝对要相信，表示6408部队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支左部

队，表示对 6408 部队的态度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应当大事小事都向 6408 部队请示汇报。这一条很好嘛！

还有一条，曹在凤同志、梁守富同志对 6408 部队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向 6408 部队赔礼道歉，应当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向广大群众公开检讨。下面一共七条电话稿，这个电话稿我觉得很好，这是我们会议的进步，不知这个电话打了没打？（合肥“好派”代表答：打了。）已经打了。的确是拥军爱民的方向（口号：向解放军学习），要同志们了解，中央关于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形势问题，关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坚决拥护解放军的问题，这都是大的方向问题。请江青同志给我们谈一谈。

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好！（高呼：毛主席万岁！）我来的很仓促，也不知怎么回事康老把我拉来了，我讲几句话，也没有准备，讲对了供同志们参考，讲错了的，同志们批评，炮轰我也可以，火烧我也可以，都可以。

现在讲一讲形势问题。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那当然在某些地区个别地方觉得严重，其实不然，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如果从历史来看，今年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了！去年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方上他们的爪牙，那他还是想当有活动能力的，而现在呢？瘫痪了，有的被革命小将打倒了。瘫痪了不是坏事，因为“走资派”不能动了，那么有的地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么现在呢？中央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市的来解决。这个想想看，安徽省现在请同志们来解决问题。就拿你们安徽来看吧，也不同了，旧的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被揪出来了，甚至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还有程什么？是叛徒。（合肥代表答：程明远。）噢，程明远，不也暴露出来了！（好派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刘秀山是个坏人，我很早就知道了，不是现在才知道的。我有材料，他是一个坏人，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的人上当，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能把好人和坏人搞到一块。当然上了当的同志受了蒙蔽好人就得注意这个问题，刘秀山一直躲在北京，现在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合好派答：在合肥亲临指挥）现

在不管怎么样，不管吵过嘴、武斗过，打过架，现在都能坐在桌子上来谈了，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形势呢？（好派答：是）大好形势！（热烈鼓掌）

江青：（面向“屁派”）你们那里很多同志怎么不叫啊！怎么了，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屁派”答：是的。）

从历史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有这么大的变化，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现在逐渐在全国展开。在各个战线上要向他开火，要批倒、批臭、批深、批透。要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曾经在每一个场合，要家喻户晓，要把他搞臭，臭的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那样中国就可以不变颜色了。因为他执政很长的时间呀！两面派有一整套的干部路线保证他的错误路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就上阵就把这些家伙统统的搞出来了。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说的容易，我们在那斗的可厉害了。同志们，我们也斗的很厉害，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如果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要还击。（呼口号）

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响应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办呢？我是指那样的情况，而现在不需要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为什么要作败家子，我们为什么要死人呢？为什么要破坏国家财产呢？我说是这样的文攻武卫，不要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不要离开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你们回去双方搞起武斗来，戴起柳条帽来，拿起长矛来就不好了。（康老插说：不单是长矛，现在是机关枪了。）机关枪那一颗子弹就完了吗。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也锻炼了革命干部，锻炼了老年一代，象康老，（康老说：今天你们锻炼我。）所以不要以为你们安徽的问题可是不简单，安徽的问题可复杂啦！当然各有各的情况，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你们比早一个时期更好，能够坐下来谈了吗！这是了不起了，不是那么动武啦，这是好事，是良好的开端，现在各省大体上这样，经过到中央来谈，当然个别地方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此外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现象，总之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对这个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就是说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重要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

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配合全国范围的大批判。

那么目前呢？当然，从文化大革命起，我说从文化大革命好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讲，首先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外，还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等等，他总是要破坏的。他们有黑手藏在背后，是不容易识破的，他以极左的面貌或右的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他也注定要失败的，同志们想想，允许不允许？（答：不允许）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叫它是东西，就是因为它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他是年青人，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的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多数是青年，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而真正的幕后人是很坏的人，你们安徽也有，就反对中央嘛，“九条”、“五条”下去都反对嘛！拒不执行嘛！如果按“九条”好好的办下去，就不至于现在又反复，有反复了。但反复也好嘛！可以嘛！你们多来一次嘛！“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上当。

（康老插话，你们安徽有没有派人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好派答：有，刘秀山是的，他收集攻击周总理的材料。康生：我说一句话，公平话，你们好派也有人来搜集材料的，不要只说屁派，刘秀山派人搜集材料，好派梁守富也来北京搜集材料。）

但我们不怕，心里没有鬼，怕什么，你们去搜吧，吃饱饭没有事干，不干革命干这个，我是不怕，他们过去就整过我的黑材料，有一个专案在上海去搜集材料，去拿来，我也没有过问，过去一大箱。最近我们发现现在有的地方成立特档，特别档案。这也都是以小的手法，见不得人的。（姚文元插话，这是小丑。）是小丑。从右的方面，就是今年一二月间有一股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一股风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五·一六”，要提高警惕，对特务、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还有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的，他们要千方百计做垂死挣扎，那么我们就提高警惕，识别他，做宣传，向群众宣传，使群众觉悟起来，就是把他们孤立起来，

他们都是见不得人的那一小撮，就是反对从左边，从极左，从右边来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这个问题。我劝同志们提高警惕。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就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答：不能）如果我们野战军被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答：不能）不要上这个当，这个口号是个错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那个军区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即使我们军队有些同志，少数同志，个别同志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也不需要如此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答：没有。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抢他们枪、打、骂都不还手，世界上有没有？（答：没有。）所以现在不能这样上敌人的当，到处揪一小撮，乱揪。我就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这有错误，你们跑到外面去，去年点革命的火，大串联，现在又出去了，这就是帮倒忙了。他们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又上了别人的当，因为青年人非常爱动。斗批改可是难啦！要坐下来看文件看材料，然后动脑筋，写文章，这比较苦，跑跑冲冲看看，甚至武斗，青年人喜欢跑，本性爱动，你们也会到处跑的，听说武汉造反派（康老插话：钢二司）刚刚翻身，又到处跑，全国都跑去了。所以这个要注意的，你们跑到那里去，不了解当地情况，一头栽进去就犯错误。凡事要相信本地的群众，不能去包办代替，就象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你们的革命一样，我们只能给你们商量协助你们。

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经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内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军队的同志错误缺点是有，应当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不要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这也是常有的，这些老同志打起仗来可勇敢啦，可靠啦！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犯错误，说了错话，做错了一些事，只要他想改正，想自我批评，同志们应当允许他改正错误，应当遵照主席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

安徽的情况，我以前没怎么摸，我不知道，有人对 6408 很不欢迎吗？（康老插话：在合肥、在淮南都有些问题，一开始好派冲了 34 师的师部大楼，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合肥的问题你们知道了，你们采取这个态度，批评了你们曹在凤。梁守富，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淮南这方面。淮南极派代表说明了情况，康老又说，不管怎样，冲了野战军是不对的。）

把野战军冲了可不好，不能开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想广大的指战员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前不介入吗，后来介入他不摸底，介入以后犯错误是难免的，不信你们试试看，换个位置试试看，你们犯不犯错误？

我说的是犯一般的错误，不是犯路线的错误，这是原则问题。对军队不能这样，有的夺枪，他们不能开枪，有的战士哭，因为都是革命群众，枪被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下一道死命令，中央已经通过。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是夺我的枪，我一定开枪，当然开枪是不对，我要开枪，我是警卫战士，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全国范围夺民兵的枪，大部份是保守派，不是夺是缴械。（这时双方争执吵起来）

同志们，如果我的意见能够起良好作用，就是我们要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不要成为张家派，李家派，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派性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姚文元插话：我建议你们要好好学习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你们多作自我批评，不是就不吵架了吗？我建议你们双方多作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好，因为你就是反对我的，我到你那里去作自我批评，你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冷静下来谈谈，那个方面是大同，求大同存大异嘛！大同是什么呢？就是说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走资派的路线上，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大原则前提下，如果你们都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什么理由不大联合呢！

如果是按你们的派性，那就不是革命，而是为自己，不是为人民，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如果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求自己那个团体，而不是吵嘴、武斗、打架、抢武器，这样就说不清是非，是非应该搞清楚的是容易清楚的，拿你们安徽来讲，看你是不是斗争以李葆华为

首的走资派，你斗不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这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同吗！有些不一样的做法和某些看法，那是可以的。我们小组也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些问题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的，我和康老有时也争论几句，我们在大前提下是一致的（康老：一个人对错误要改，就是要自己反对自己。）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可难啦！因为自己脑子里就有个阴暗面和一个光明面，阴暗面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不改掉，难免也会掉队的，那会走到反面去的，头脑里的“私”字、个人主义，再大一点就是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发展到谁的话也不听，把我们有良好的组织，良好的装备，良好的政治工作的解放军也冲了，枪也抢掉了。有的是有一小撮人操纵，你们不要上当，要心明眼亮，要冷静，要善于识别敌、我、友，你们现在有的时候连朋友都吵起来，自己阵营也吵起来，打的一塌糊涂。同志们！是分裂好呢？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呢？（好派答：大联合好；）。江青问：你们（指“屁派”）怎么不叫？不讲话？你们愿意不愿意联合？先搞大联合、三结合才能有领导，没有领导革命不好进行。

第三、谈革命委员会问题，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出来的这股歪风除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人民解放军；抓一小撮，第三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混进去，但他毕竟是个新生的事物，他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有的人就要把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搞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挑动吗？同志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答：知道。）你们逐渐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这个事情也要警惕，当然有点反复，我们也不怕。

所以我想在这个大好形势底下要警惕这三件事情，从极左到右，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背后不仅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有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等等特务，我们有材料，我们搞了一大批，这是小将们的功勋罗，叛徒集团知道不知道？（答：知道）很大的特务案子都搞出来了，过去搞不出来的，所以这次大革命的功劳是大的，潜伏几十年的这些案件，过去都不知道的，这是红卫兵的功勋，当然对安徽来说揪出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是同志们的功勋！你们要很好的警惕这三件事情，有人要破坏党中央，我说的党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

啊，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我说的话不妥当，同志们批评我。

现在中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的命令”。（念命令时，江青插话）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彪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它和革命群众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联的。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尽一切责任，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担负着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艰巨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时刻地警惕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加强战备，保证装备完整良好，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

〔江青：同志们，听懂了吧。（众答：听懂了。）我重复一遍，“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江青：再重复一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你想，把作战系统给打乱了，一旦有情况怎么办呢？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怕得要死，修正主义也怕我们，怕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也不能说没有这个万一啊！〕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都必须严格遵守，切实执行，这是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

号召。爱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这是一切革命群众和一切爱国人们的共同任务，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尤应在这方面作出模范。

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江青：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一两句，现在世界上有没有我们这样的大民主？（众答：没有！）你们想轰那个就到外面贴大字报、大标语，世界历史上也没有，总而言之这是最大的民主，也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的。〕

正确理解人民解放军的“四不”，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随时提高阶级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利用，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严防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和地富反坏右破坏和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声誉。

〔江青：不要在我们的军队脸上抹黑，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要爱护他们的荣誉。〕

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月六日通令和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那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江青：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被抢了，炮弹啊！

姚文元：打倒帝国主义的。

江青：那是帝国主义的，接不上气了，没有了炮弹，后来我们下了一个死命令，管你是什么派，立刻交出，不交就缴械，他们吓坏了，都送回去了，这真生气嘛！还抢了外国的船。北京出现这样怪事，跑到外国使馆里去闹，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知道吧？（众答：知道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是肯定的，你们坐外头嘛，如果不是使馆内部，他们做任何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的，你们都可以有权斗他，并扭送。但是不要闯到使馆去，不要跑到外国轮船上。尽出现这些怪事，这些，好人是幼稚，坏人是有意地破坏国家的荣誉。

康老：还有人抢外国的轮船，还有人带着枪到塞浦路斯船上去，被缴了枪，还去避难，这是耻辱，是投降！

江青：这是当汉奸！】

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

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把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

【江青：有些地方，就发给了保守派，有些给了坏人，这就是可恶啦。】

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

【江青：重念这一句，“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众：热烈鼓掌。）

江青：我看大多数同志是同意的，是爱护军队的。】

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众：热烈鼓掌）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众：热烈鼓掌。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希望同志们搞大联合！）

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众：热烈鼓掌）

此命令，望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遵照执行。

（众：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江青：好！我看大家都拥护这个命令。我就讲这些，咱们都照办。）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的指示

九月五日晚，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同志接见了安徽省全体代表。会上，先由江青同志向全体代表讲了当前的大好形势和斗争方向，并宣读了“九·五”命令；接着康生、姚文元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代表团双方连夜打电话，把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的指示传到合肥，全城沸腾，群情激昂，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长江路灯火辉煌，鞭炮齐鸣，表示庆贺目前合肥一派大好形势。

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

合肥两派为贯彻康生、江青等负责同志的指示，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活动。特别是收交武器以后，两派对立情绪骤下降，联合、团结的气氛越来越浓。九月八日下午“P派”约五万人举行庆祝中央首长“九·五”讲话的大会，会后游行时，沿途观看的人空前增多，有的“G派”群众放鞭炮表示欢迎，“P派”群众纷纷反映说：“今天游行欢迎的人多了，骂我们的人少了。”安徽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两派也于九月六日达成协议，并已联合开诊。文工团、杂技团两派联合排练节目，准备到街头宣传。并说：“这是合肥分成两大派以来，第一次在一起排演节目。”合肥街头出现了“‘G’，‘P’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大字标语。目前，两派已达成协议，拟于九月十日联合召开二十万人的拥军爱民大会，还准备给毛主席发致敬电。

二、提高警惕，划清界限，揪出自己组织中的黑后台、坏头头。

“P派”红革会，“八·二七”革联站等组织闻讯后，立即开会，提出打倒操纵“P派”的xxx，xxx。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六日上午，把他们送交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看管，并解除了xxx的警卫连武装。“七·七”风暴声明，不再受他们蒙蔽，不搞武斗。在京的“P派”代表表示，要坚决斩断操纵他们组织中的黑手，揭露其罪恶活动，与其划清界限。代表李文焕说：

“我们原来把xxx视为最好的干部，受了骗，上了当。”“G派”也将背后操纵者xxx送交军管会看管；将两个头头调离领导工作岗位，让其检查交待。

三、坚决执行“九·五”命令。

两派群众纷纷将武器、弹药和武斗凶器上交给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并报喜游行。

四、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首先加强了两派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根据情况还准备采取如下措施：

1、为了防止万一，部队部署进行调整，对一些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部队适当集中，以利于对群众宣传、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2、对群众组织自己扭送的坏头头，部队不加干涉。对已交出的坏头头，准备放在博物馆看守。

3、对接收两派的枪支，实行就地交接，部队看管，以防动用、转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接见安徽支左部队有关人员讲话

中央负责同志九月五日接见安徽代表时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现已决定在全国播放，并要把合肥的动态介绍到全国去。

合肥市听到了江青的讲话，当晚两点就轰动起来了，合肥前一个时期武斗很厉害，今后亦可能为大联合作出模范，要求安徽作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

从解决安徽问题看出，各地有一点乱，这就像林付主席讲的，不要怕，有一点分裂，只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向群众宣传，群众了解后也容易大联合。安徽经验证明是可以把分裂、武斗能刹住的，是可以能向团结方面走的，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会出现巩固的大团结大联合，经过批判斗争达到更好的联合，更好的团结。

从总的情况看，是朝着团结、斗争、团结的规律前进的。安徽搞好对全国有影响，要珍惜这种形势，这种形势是经过斗争取得的。从安徽的形势看，又证明了毛主席思想的伟大。只要有毛主席思想，只要有解放军，坏事可变成好事。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安徽省七地区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

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切关怀下，遵照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指示精神，为誓死捍卫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五条》决定，肃清反对《九条》、《五条》的逆流，为进一步解决安徽问题创造良好条件，对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及其在安徽省（地、市）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二、“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应该以最坚定、最积极、最迅速的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尽快地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大力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七·一三”通知、“九·一三”通知，坚决制止武斗，更不准挑动农民进城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私设公堂。严惩挑起武斗的幕前指挥、幕后策划者和打死、打伤人的凶手。双方被抓人员，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所以抢、抄的公私财物，必须如数归还。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拆除全部武斗工事。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确保四大的正常进行。

四、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枝、弹药、军用物资。各群众组织（包括公、检、法系统的群众组织）或个人手中的枪枝、弹药、

军用物资以及其他杀人凶器，应全部交给六四〇八部队处理。不得隐瞒或转移，违者以国法论处。

五、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双方应积极动员在外人员迅速回到自己的生产和工作岗位，立即恢复生产。对返回人员要热情欢迎，不得刁难，不得因观点不同而克扣工资，并保证人身安全。双方所占用的生产车辆、船只、设备、物资，一律归还原生产单位，用于生产。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确保水、陆交通运输和邮电畅通。

六、增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坚决贯彻执行公安六条。立即清除混入和操纵本组织的坏头头、黑后台，确有破坏罪行的，必须送交六四〇八部队依法惩办，任何组织不得包庇。

七、上述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由六四〇八部队和双方对等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对于违反本协议的要严加惩处。

七个地区原签定的协议，应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安徽合肥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赴京代表团（原“P派”）代表 李文焕安徽合肥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赴京代表团（原“G派”）代表 戴纯正淮南炮轰派代表 张俊淮南支持派（淮南总司）代表 钱谋始安庆红色造反者革命到底联络委员会代表 胡小会安庆地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作战总指挥部代表 徐家道芜湖“联总”代表 汪长印芜湖“三筹处”代表 吴浩桂蚌埠市炮轰派（批派）代表 何树杭蚌埠市支持派（G派）代表 郑培敏马鞍山炮轰派（P派）代表 李重光马鞍山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代表 李长忠六安四卅革命造反派总指挥代表 李占金六安专、县、镇革命造反派联合作战部代表 徐世琪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于北京

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德生传达康生对安徽省军管领导小组的指示

（从安徽问题可以看到我们伟大领袖对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把安徽问题传到全国，从安徽问题可以看到我们伟大领袖对文化大革命的

战略方针，使我们对于批发的文件和掌握情况比起其它地区都更为亲切，受到的教育是极大的，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关怀，极大的支持。

（安徽问题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越是乱的地方，问题解决的越彻底）主席又亲自邀请刚果（布）总理到淮南去访问。主席说那里打得最乱，不但动了棍子，而且动了枪和炮，那个地方怎么分裂了，又怎么联合起来了，主席邀请刚果（布）总理去访问，使他很感动。这次邀请刚果（布）总理访问，事先并未作准备，也未打招呼。在征求意见时，淮南的同志一开始就表示欢迎，在淮南时欢迎的场面很使人感动，本来只准备千把人欢迎一下，但群众自动自觉地去了上万的人，安全上也未出问题。淮南分裂后又联合起来了，生产恢复上升了。

康老讲，从安徽的问题上也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越是乱的地方，问题解决的越彻底。康老指示说，你们对毛主席对安徽问题的亲切关怀要总结一下，通过总结去教育干部，去教育群众。这里有很大的好处。要经常地抓，经常地在连队，群众中进行教育。

要彻底深刻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斩断操纵群众的黑手，只有揭发得彻底深刻，群众才能识破。现在还出现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的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原因不外乎前天提到的三点，越是形势大好，阶级敌人越是要破坏，走资派伸到我们组织里的线未断，才会发生这个问题。这在安徽很明显，9月5日中央一点名，群众就觉悟了。操纵群众组织的黑手，还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中央点了名也还是要依靠群众的认识。

康老指示：对芜湖的问题值得重视。

李军长说：芜湖出现了反对“九条”，矛头对准中央，有的跑到北京来闹，反陶二世等等。前时候，芜湖来的三个人在中国科学院被群众扭送到海淀区公安分局。芜湖军分区的同志叫他们把这三个人放了，现在追回一个，还有两个跑了，针对芜湖出现的这股逆流，最近我们在芜湖发表了一个声明，这是要不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捍卫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的原则问题，不要压制某一派，打击某一派的问题，这个声明引起了强烈反映，大多是欢欣鼓舞，欢迎的，也有反对的，说什么想把小将打成反革命，将来要平反，是什么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责任在这样的问题上表明态度，这是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李军长说：芜湖的问题，我们不能看成是一个群众问题，这里面有无黑手，坏人操纵？我们要看到革命小将是要跟毛主席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不外乎是走资派，坏人挑动和操纵。不仅这些芜湖还发现反动组织的传单，所以芜湖代表团同志和芜湖军分区的同志很需要注意和警惕这个问题。康老曾不止一次的讲到芜湖的问题，芜湖的问题比较复杂。

干部的问题主要靠群众解决。

在我们汇报到干部问题时，我们反映说：有的是共同打倒的，但大部分到两派中间去了，有的干部希望由中央点名就好办了。康老说：对干部有两种意见，一是靠干部自己解放自己，到群众中检查交代，争取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群众中亮相，接受群众的帮助，是什么干部让群众鉴定。另一种意见是靠上面点名，认为中央只要说一句，那个是黑帮，那个不是黑帮，问题就解决了，康老说：“干部的问题主要靠群众解决，不能只靠上面点名，即是上面点名，还要靠群众工作，康老说：“安徽的干部问题比较复杂，要回去做大量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7年10月22日下午4：20—6：1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中央首长：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李天佑；安徽省军管会领导小组：钱钧、廖容标、李德生、廖成美、杨广立等同志参加接见。〕

康生同志讲话

在大好形势下当然也有些逆流。特别在安庆、芜湖、蚌埠有，这种反复是正常的，事情有时候是有规律性的反复。但无论如何怎么反复，中央的方针、中央文革的指示，群众会逐渐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号召革命大联合嘛，群众是不赞成现在再分几大派，分裂嘛。这个方针是定了，这个方针是不能变的。所以你们安徽的形势，就象主席最近指示的要防止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垂死挣扎罗，想破坏中央的方针，破坏我们的大联合，破坏安徽的大好形势。

另外一方面，也有个别的坏人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各个地区提出的突出问题，两派性质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问题，如果按着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看起来容易解决的。就是说，除掉派性，除掉宗派观点，容易解决的。因此，同志们还必须

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斗私批修。“私”字，一天不斗，一天还要生长的，所以，从斗私批修，大联合中来看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些问题。

张春桥同志讲话

整个的来看，安徽的形势刚才康老所说的确实很好，这种形势的到来是很不容易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一年多的斗争，才取得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当然现在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不可能一切问题都解决，矛盾总是存在，军队不要吹自己，不要自己评功摆好。军队的成绩让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来讲，让群众来讲，自己不要讲，军队要谦虚谨慎，多做自我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也不要去做批评指责，要让人家自己讲。

当前，许多地方都要做好两派工作，毛主席说：对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要压，对小将要肯定他们的成绩功勋。缺点错误要热情诚恳，注意方式的提出来。对于保守组织也要给他们留位置，让人家进来有好处，不同意见可以争论，有对立面。不要清一色，世界上也没有绝对清一色的东西。保守组织里的大多数群众还是好的嘛。

叶剑英付主席说：毛主席的指示是“纲”，各单位讨论研究问题时，不要脱离这个“纲”。

形势问题很重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伟大成绩要充分认识，才能加强信心，总参作战部李付部长谈随毛主席视察时的体会说，看形势一要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二要有明确的群众观点，三不要带着情绪看形势。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新指示，做了一些解释，总理说：主席的指示开始落实时，要先搞典型，搞了典型后，再开全军的会议，先学习再实践。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周总理说：刚果（布）总理要访问淮南，三日我们发了电报去，两派都欢迎，刚果（布）总理去了，还说了不少的好话。开始，我们的认识总是跟不上毛主席，总想让人家看好的，淮南出了问题还让人家看。毛主席英明，就让人家看，看了后他们还说了好话。

江青同志说把八条、“十条”合在一起就提出“拥军爱民”，当时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这次重制录音要在全国放。

总之，我们部队在执行“八条”时过头了，“十条”下来群众回击了我们一下。“六·六通令”下早了一点，时机不成熟，群众不接受。毛主席也说太早了就不灵了。“九·五命令”就适时、就灵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几段话，是对大好形势最好最象的概括。

对于乱的问题，总理说：黑手揪出来就好了，再有几个月形势就更好了。关于站错队的问题，毛主席说站错了，再站过来就行了，但是大是大非要分清。对待群众，即使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要压，要教育，真正左派社会上承认了，问题不大，主要是受蒙蔽的群众，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青海刘贤权的工作就是做的好。

专政工具主要是军队，公检法受彭罗的影响太深，群众不信任了，所以还要依靠群众。战争也是这样，毛主席在陕北，胡宗南的兵临城下，当时毛主席身边只有二个连的兵力，但有群众拥护，就无所畏惧。“五·一六”只有少数黑手，群众是受蒙蔽的。如果通缉“五·一六”就易造成对立，秦化龙也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一个组织的坏头头，也要依靠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9月26日，毛主席亲自出了场，那天的录音，各大区可以复制在全国放。

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军队出了彭罗，而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尤其林付主席提出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以来，突出政治更好了。军队干部犯了错误，是难免的，极少数是严重的，即是陈再道，毛主席还要让他参加训练班学习，让他住在京西宾馆，还允许他检查，改正。

毛主席说，对于干部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略）要办好训练班。周总理说，训练班还可以把五好战士、机关干部也找来，代表各方面的意见和你们在一块学习，听听战士和普通干部的意见。

对红卫兵小将，我们要以亲身的经历去教育他们，年轻人好说大方向是正确的，这句话，周总理说：我就和他们说，南昌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夺取大城市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错了，大方向也不能保证，只有毛主席的秋收起义才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自己都有革命斗争的亲身经历，应该好好地教育红卫兵小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廖容标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的指
〔廖容标：南京军区付司令员〕

6408 部队奉中央的命令，进驻安徽，担负支左的任务，中央指示，安徽的支左工作应以 6408 部队为主，根据中央这个指示精神，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提出一个正式的建议，原安徽省的军管会应作相应的改组，并且提出省军管会改组的人选。

中央十月廿六日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正式作了批示，这个批示原文是这样。

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同志、张文碧同志、李长林同志、宋佩璋同志、林育生同志、李保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和安徽省军区一名（暂缺）组成改组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同志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为付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着整个安徽省支左任务。

希望各省、各地、支左部队，支左人员和革命造反派组织，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在改组后的军管会的领导下，在目前大好形势下，在革命的大联合中，深入进行大批判，确实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中央这个批示可以传回家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的讲话

接见首长：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李天佑、叶群、曹轶欧。

陪同接见的还有南京军区钱钧同志，省军管会李德生同志。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至二十时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当中央首长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等口号。

总理：

同志们：

现在开会了。要不要我介绍一下到会的同志？今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同志都到了，来见见你们。（接着总理一一作了介绍）现在请康老同志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

安徽的问题，各个地区的代表在这里很久了，会议开了许多啰，今天是再一次讨论问题，结束这次会议，同志们要求见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还有其他同志，今天我们答应了同志们的要求，实现了同志们的愿望。（鼓掌）我简单讲一下。下面有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总理和其他同志讲话。

首先，我觉得安徽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今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以后，安徽地区基本上停止了武斗，一些地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安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鼓掌，呼口号）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鼓掌）省军区个别同志的错误，受到了深入地揭发和批判。因此，安徽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的形势大好。（鼓掌）这种大好形势，是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是十二军支左方向正确的结果，是各地区代表思想提高共同努力的结果。（鼓掌）运动当然是合乎规律的，还有各个地区不大平衡，而且有些地方有小的反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总的形势很好，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会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样反动，总是顶不住革命的洪流。

关于安徽的问题，我同同志们谈了许多，我回想一下，通过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同志们应去总结一下，我们就会取得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凡是坚决实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行中央、中央文革的历次指示，坚决实行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和五条批示，沿着这一个方向前进，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会不断地取得胜利，就会取得很大的成绩。相反，抵制中央指示，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抵制中央《九条》、《五条》决定，那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会犯错误。

我曾经和同志们讲过，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文化大革命是极大关怀的，及时地作出许多指示，而且是专门对安徽问题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譬如在去年，当李葆华实行白色恐怖，镇压群众，发生了三天流血事件的时候，当省军区一部分犯错误的同志，硬是死保李葆华，开动了宣传车，去镇压“八·二七”，攻击“八·二七”的时候，那时我们的林副主席就进行了批评，并且要南京军区严格地调查安徽军区的这种错误行动。问题是当时象严光、宋文同志讲的，他们没有接受林副主席的指示，相反地作了假报告来欺骗中央。特别是我们应当说：一月二十一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对安徽问题作了批示，大家还记得吗？当一月二十三日革命群众要开大会斗争走资派李葆华等人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批示了安徽军区：“应派军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这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战略的指示，不仅对安徽，而且对全国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军队支左都有重大意义。正是在毛主席这个指示下，林副主席也完全赞成主席这一方针，号召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这是毛主席对安徽广大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大关怀。

大家还记得，在四月一日中央解决安徽问题，通过了《九条》，并且有《五条》指示。这《五条》指示对全国解放军支左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九条》指示直到现在，七个月的实践证明了《九条》指示是正确的。

同志们还记得，在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号召大家大联合，号召大家停止武斗，指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敌人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动摇我们解放军，企图动摇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而且向同志们宣布了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决定。这个讲话以后，安徽掀起了一种大联合的潮流，使安徽文化大革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根据同志们的努力，你们代表团的努力，中央九月二十三日批发了你们关于安徽如何执行“九·五”决定的情况，通报全国，号召全国向你们学习。九月二十六日主席接见了军队来北京的干部（有些干部是来学习的，有些干部是来解决问题的），安徽的军队同志都参加了（这是主席对同志们最大的爱护、关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同样，代表团的同志以至于犯错误的同志，不管那一派，在国庆节十月一日在天安门都参加了国庆节

大会，见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是同志们的莫大光荣！（鼓掌）最后，由于你们坚决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淮南煤矿很快地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看到了很高兴，并且把你们的革命行动向国际友人作了介绍。同志们还记得刚果（布）总理，主席介绍他去淮南煤矿参观。这种去参观使民主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所有这些，说明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给予极大的关怀，及时地进行了指示。这方面安徽所以有这样大好形势，这与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分不开的，特别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取得这些成绩，从安徽来看，证明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教训，知道今后怎么做了。根据最近中央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现在已经发出来了，最近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以及关于按系统实现大联合，这些指示都要同志们进一步贯彻，进一步去执行。另外一方面应看到，凡是不执行、违抗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同志们听了军区严光同志、宋文同志的检讨，就可以引起很大的警惕。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指示，严光、宋文同志并没有真正地执行，毛主席要支左，他们是保右，甚至错误地做出决定，要部队不同“八·二七”革命群众一道读主席的语录，一道唱主席的语录歌。他们甚至通知了李葆华，那就是说象他们自己检讨那样，假支持，真保右。象他们检讨那样，从开始一直到这次会议，他们总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指示对抗、抵制，所以他们就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他们的这种错误影响了各军分区，这种错误影响了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使安徽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个教训，现在他们开始检讨。各派的代表也应向你们的革命组织当中讲，深刻地认识这一个教训，如果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中央指示，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走到错误道路上去，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我有这样一点看法，通过安徽文化大革命，证明了毛主席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一伟大号召，完全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意愿。在毛主席伟大号召的指引下，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安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夺以李葆华为首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方面应当说是对的，而且应当说不是一个派别，而是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共同要求。这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得到了安徽各派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夺权一定是象主席所讲的，应是各革命派大联合起来夺权，不是一个派去夺权，一派夺权，排斥另一派的革命组织夺权，结果必然会造成不是实现大联合，而是造成大分裂。因此这一方面，中央《九条》的头一条特别看到这些问题，中央《九条》中开始就讲：“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这里面很清楚，中央一方面照顾到革命群众夺权的愿望是对的，广大群众的动机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看到这种夺权的政策、夺权的方向是没有按照毛主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夺权。大概安徽问题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比较尖锐，有些人反对《九条》，不满意《九条》，主要就在这一问题上，今天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上次我讲过了，革命群众要求夺权，这个要求是对的，但是，一派夺权，排斥另一派、甚至镇压另一派夺权，这是不对的。上次张春桥同志介绍了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证明上海不是一派夺权，而是大联合夺权。安徽的同志参照山西的夺权，山西夺权是太原刘格平的夺权，也不同于安徽的“一·二六”夺权。那里有亮相，那里军区的张日清坚决支持夺权，“一·二六”省军区支持夺权是假的。现在他们自己承认，实际上保李葆华。你们看一月二十三日他们还在保李葆华，一月二十六日怎能支持你们呢？所以中央考虑到这个问题，实行军管，没有批准“一·二六”夺权。“一·二六”夺权虽然有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但政策、方向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夺权的方针。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夺权是政权问题，不是个联合会。政权不能只管这一派，排斥另一派，这样就不能真正掌权，也不能真正行使权力。这一点应当说清楚。上次春桥同志介绍了上海的经验，在安徽有的地方还流行说我们两个人搞了个四条，我们什么时候搞四条？这完全不对头。（春桥同志插话：什么时候讲了个四条？）张春桥同志那次讲的，主要是不能一派夺权，应大联合夺权，这一点应注意。

第三，安徽文化大革命中，正如毛主席所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之所以分裂成为你死我活的两派，是由于走资派挑拨，坏人、敌人钻进来利用，以及革命群众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潮，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从安徽的斗争情况看，完全证明了主席的分析是英明的、正确的。当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后，当毛主席伟大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时候，在安徽在京的代表中也好，在安徽本地也好，就出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形势。这方面应当说你们代表及安徽革命群众组织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经验的头一条就是你们两派各自实行自我批评，实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且一道开会，联合起来开会，实行自我批评。比如对夺权问题，我记得好派的李文安同志、李胜利同志，都作了自我检讨，炮轰派也作了自我检讨。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宝贵的，这是符合主席要求的。第二个，两派联合开会，进行自我批评，自己只批评自己，少批评或者不批评对方缺点，对方的缺点自己批评，这完全符合主席的要求。第三，联合开大会游行，应该说这是好的。这方面，同志们创造了好的经验。这个好的经验，不是去否定它，而是要把它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巩固，进一步深入，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中央提出的按系统的大联合。我听说有的代表在这里自我批评，回到安徽去有的人不理解，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这完全是错误的。应当说他们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是马列主义的，不是修正主义的，（鼓掌）证明了主席伟大号召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看到最近有些地方有些反复，这又说明了什么东西？说明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不是开一次会进行一次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不时刻掌握毛泽东思想，时刻掌握中央指示，这种派性它还会发作。所以毛主席号召“斗私，批修”。这是个伟大的号召，伟大的战略任务。同志们决不要麻痹，千万不要忘记了好经验，再去走回头路。不可否认，最近有些地方出现了反复，当然是坏事，但也不要紧。不要认为斗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一个时候做好了还会有反复的，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有丝毫动摇，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第四，从安徽文化大革命经验中看到：军队支左，是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指示，还是不执行，这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重大作用的，应当说我们安徽的革命斗争发生的并不很晚，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能成

立一个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还只能军管，道理是什么？道理很多，有各种各样，但与前一个时期严光、宋文几个同志他们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有关。为什么今天还在安徽存在一些反革命、走资派，甚至有的群众被蒙蔽，还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中央文革？为什么现在还反对《九条》？这个问题如严光、宋文同志他们自己所讲的，他们有很大的责任。（呼口号）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因为我们看到了从三月份在这开会时，严光同志同彭胜标同志当时对我们、对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不满意的。应当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对他们作到严格批评，《九条》上没有点他们的名，没有明显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他们不满意。严光还企图把党中央同军委隔离开，企图找总参谋部的人告状，可是他们没有实现。从北京一到南京军区就表现不满意。回到安徽他们并不是真正执行《九条》，教育好派，坚决实行。他们实际上挑动群众对抗《九条》，利用夺权派对中央没有批准他们夺权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这样，引起群众分裂，最后武斗时他们发枪。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自己讲过，是死保李葆华，而且还作了镇压革命群众的作战计划。前一个时期镇压“八·二七”，后一个时期镇压炮轰派。同志们对严光，宋文同志的检讨有意见，不满意，这是合理的。另外也要看到他们开始认识错误，应该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面，安徽为什么出现大好形势？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关怀，派十二军去安徽支左，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极大的关怀。（呼口号）同志门，在这里可以看出，所以我们说省军区也只是一小撮人反对《九条》；实际上反严光、宋文的，从二、三月间，司、政、后干部、战士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反对他们的。（鼓掌）这说明我们的解放军的确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指挥的，而军区犯错误的只是那几个领导人，广大干部，广大战士是好的，他们是反对严光、宋文死保李葆华的。（呼口号）当然罗，有些同志开始承认错误，这是好的，应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是对革命有利的，这是符合毛主席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江青同志拥军爱民的讲话。安徽有些地方有人反对十二军，污蔑十二军是“陶二世”派去的。“陶二世”，这是对我的，这是安徽反革命给我安的帽子，这完全是污蔑，是极大的反革命污蔑！十二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应坚决拥护十二军

支左。十二军工作中如果有缺点，要善意帮助，彼此商量，不要受反革命挑拨，不要中反革命的诡计。

第五，通过安徽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必须加强对敌斗争观念，要有敌情观念。毛主席指示讲，革命组织分裂成两大派，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走资派挑拨。第二个原因是少数敌人钻在革命群众组织里边，或者在外边暗中操纵，挑拨离间，也就是说有几个黑手。同志们看看安徽最近的一段情况，希望同志们应该觉悟，当然我们并不把它当着很了不起的东西，希望同志们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警惕性，要看到安徽的确有反革命活动。现在有些地方走资派也好，敌人也好，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看到安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无耻造谣污蔑，挑拨离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于威胁利诱，造许许多多谣言。有人这样说，敌人、走资派制造谣言在安徽是“集大成”的。当然其他地方也有造谣的，但安徽是突出的，他们甚至竟敢假造林副主席给陈伯达同志的信，假造陈伯达同志复林副主席的信，在阜阳、涡阳散发。这是什么现象？这是死亡阶级的垂死挣扎，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人物都不采取这种手段。很明显，这是敌人。在芜湖、蚌埠、安庆，表现很明显，特别是在芜湖。我们设想一下，革命群众组织怎么能用垂死阶级的这种造谣污蔑手段？他们知道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要死了，因此不择手段地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当然是白日作梦，是不会得逞的，但是他可以一时混淆是非，蒙蔽群众，如芜湖“三筹处”有的人底下有的组织就是受蒙蔽的。这种造谣，你们不要这派指那一派，那一派指这派，我公平地说，你们各派都有这种现象。这一点你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派别问题，应看到是敌人在垂死反扑。你们看看，安徽有人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还要炮轰、打倒周总理，还要打倒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我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谢富治，谢富治没有到过安徽，还要打倒，你们想想这是革命行动吗？（众答：是反革命！呼口号）同志们要看到这是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阶级斗争，难道敌人还能不反对我们吗？毛主席讲，敌人反对我们，说明我们做对了，敌人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倒要警惕了。所以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重要的问题是革命群众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不要受挑拨，革命群众要站稳革命立场，向走资派，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革命大联合，我们要去掉派性，派性，

敌人是会利用的。最后，应当按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开展学习运动。中央组织学习班，首先把犯错误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同志调到中央来学习，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学习班不单是犯错误的同志，就是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也应该学习。所以你们省里，军管会、省军区也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犯错误的和没有犯错误的，各级干部甚至部队战士也都要学习。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要实现革命大联合，要“斗私，批修”，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实行革命的大批判和“三结合”，就必须进一步地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开展学习运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按系统的大联合，这样才能把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进行好，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我觉得从安徽经验方面来看有这么六个问题，和同志们谈谈，这当然不是全面的，供同志参考。

此外，还有几个问题简单说一下。

一个问题，我觉得你们还是有个好经验，各派、各地区以及全省都达成了协议，中央将有个批示，赞成你们的协议。这是你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实行《九条》、《五条》的结果。所以中央批示这个协议，而且希望你们能够贯彻执行。当然实行协议不容易，在实行中还要有斗争，还要做许多工作。但是有这个协议总是好的，中央批准你们。

第二，军管会改组。改组引起一些误解，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了，甚至有人利用军管会改组反《九条》，说“《九条》中第一条是，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现在不要钱钧，这是你们自己推翻了《九条》。”这完全是胡说，（周总理问：钱钧同志到了吗？钱答：到了。总理：李德生同志到了吗？李答：到了。周总理：到这里来坐，刚才忘了。全体代表鼓掌、呼口号，欢迎钱、李上主席台。）同志们，这点如果不歪曲的话，很容易看得懂，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军管会呢？就是中央没有批准夺权，成立军管会就是不承认合肥的那个夺权，实际上就是省的夺权。为什么呢？因为条件不够，这样才成立军管会的。这是一。第二，为什么叫南京军区钱钧同志去主持军管会，这就是严光、宋文不能主持，因为他们有错误，不能主持。如果说他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用不着南京军区派人去主持了，正因为他们还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对抗着，还保李葆华，所以才叫钱钧同志主持。现在军管会为什么改组？改组，说明严光、宋文不能参加

军管会，所以新改组的军管会就没有他们。第三，现在已经有了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十二军在那里，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我们信任、依靠十二军去领导，信任、依靠李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能够领导。军管会是这样改组的，不是钱钧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更不能说这就是推翻《九条》，而是为更好地贯彻实行《九条》。（鼓掌、呼口号）

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在二、三月间，严光、宋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在省军区打击了一大批干部，二、三百名干部。甚至于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禁闭起来，有的流放，有的迫使他们退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一律平反。（鼓掌、呼口号）在中央四月一日《五条》中有一条，给被打错了的人平反。《九条》中间也讲了。严光、宋文对抗这个，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平反。开除党籍的应该恢复党籍，撤销工作的应该恢复工作，解散组织的应该恢复组织。严光、宋文应当向他们检讨、道歉。应该深刻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呼口号）

最后，希望同志们注意，同志们想想，安徽到现在为什么还实行军管，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更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道理在那里？一个就是各派大联合，还要把革命的大联合搞起来。没有革命的大联合，怎样选举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呢？第二，就是有些可以解放的干部现在还没有解放。是那些人？你们自己在斗争中检验。“三结合”总是要有革命的群众、解放军、革命的干部，现在还没有成熟的对象，所以现在还要军管，在军管中去筹备实现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这一点你们应该承认，你们落后了。今天内蒙古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青海不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在基层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开始接收新党员。许多地方前进到这样的程度，希望同志们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尽快的通过筹备小组，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把文化大革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到底，我现在就讲这样一些意见，希望同志们考虑。（鼓掌，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不要向我学习了，现在还到处要打倒我。说我是“陶铸和袁世凯的杂交”。当然，正确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是象这种反革命的造谣，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现在请陈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给我们指示。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很敬佩康老在安徽问题上经过这么长时期的耐心的工作。已经有多久了？

（中央首长插话：差三天，三个月了。康老：八十七天了）这样耐心地工作我是很敬佩的！我拥护康老同志今天的讲话。

看来，安徽的形势大好，是大好形势。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好的。你们大多数都是好的。你们对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迅速响应，迅速行动，在全国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是你们的进步，是你们执行毛主席伟大指示的很重要的表现。（鼓掌、呼口号）据说你们自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后的行动，在全国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是很光采的。（鼓掌）现在大家的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打倒走资派李葆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继续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踏踏实实地实行“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指示是不能割裂的。“斗私”和“批修”这两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志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毛主席指示。真正实行自我批评，斗倒“私”字，斗倒利己主义。实行革命的大批判，斗倒修正主义，斗倒刘、邓、陶修正主义和刘邓陶在安徽地区的代理人李葆华。可赞成呀？（众答：赞成！呼口号）刚才康老说有些人，有极少数的一些人用造谣、诽谤卑鄙的手段，企图达到他们的目的。甚至狂妄地挑拨离间，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刚才康老讲了很多例子。我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很奇怪，在安徽出现这么一些怪事，有人说林彪同志给我写信，我也很狂妄地给林彪同志回了信。知道这回事吗？（众答：知道）是真是假？（众答：是假的，是反革命造谣！）又说我不理康老，（康老：说把我充军到河南去了。）康老是我们的长辈，我要向康老学习，怎么能这样造谣、污蔑、诽谤？我想这样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呼口号）那些人肯定要失败的！是一定要彻底失败的！这些人是没落的走投无路的剥削阶级的代表。那一小撮人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他们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鼓掌）庆贺你们的协议！（鼓掌）庆贺你们会议在康老领导下取得很大的成就！（鼓掌，众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这时康老插话：这是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不是我个人领导。我个人可能有错误，你们可以批评，可以打倒嘛。）

希望你们安徽象九月五日以后听了江青同志讲话那样迅速行动，来执行现在的协议，成为全国执行协议的一个模范，不是唯一的模范。有的地方订了协议不执行，希望你们要真正执行，成为执行协议的模范，成为执行你们订的协议的一个模范省。（口号略）

江青同志讲话

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上次是康老拉我来的，今天是我们全体决定要来，因为听说同志们要回去了。我没有准备讲话，康老这一下将了我的军。

不过在安徽有人想挑拨康老和我的关系，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要警惕。你们知道不知道，说我那个九月五号讲话就是为了批评康老。你说怪不怪！九月五号是康老要我来的，怎么得出这样结论来哩！（康老：那是我们商量的嘛！）（呼口号）那是我们商量过的。这不是怪事！今天我们全体都来了，又讲话了，回去你们又可以讲这个人反对那个，那个人反对这个，那还了得！没有是非准则，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讲毛泽东思想。阶级敌人总是一小撮，他们躲在背后挑拨，你们安徽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上次因为我点了一派的名，康老点了一派，这就成了我们的岔子了。其实我们是一致的，我还少说了哩！不占同志们的时间了，讲废话。祝同志们回去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呼口号）

陈伯达：我补充一句，有一些人想把总理与中央文革，和中央一些同志分开，这是完全错误的，（呼口号）这是不会成功的，也一定要失败的，一定没有好下场的！（呼口号）大家知道，制定安徽的《九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这次会议总理非常关心，实际上他也参加了处理安徽问题。刚才我忘记说了。（康老：《九条》《五条》是总理亲自主持写的。）那些人如果这样搞一定要失败，一定没有好下场。

康老：下边请周总理讲话。

（众呼：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等口号）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这次因为各省来的多，我们有个分工，所以安徽的会议我就很少参加了。开始见了一些军队同志。

这次会议，我们应该说，在康老主持下，许多同志参加了，开的很好，总算是一个走向进一步胜利的会议。

刚才康老的讲话，我完全同意、支持。（鼓掌）伯达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我是完全同意和支持的。（鼓掌）大家都晓得，这次会议是由于《九条》至今不能贯彻，发生了阻碍，你们才到北京来的。而且，《九条》的问题又由于支左的问题引起的。支左嘛，刚才康老讲得很清楚，是主席亲自批安徽省军区要他们派队伍支持左派群众大会，而当时严光同志就是象现在揭发的向相反的方面走，现在才知道更清楚。《九条》决定也是在主席亲自批示的《五条》方针下希望大家贯彻执行而作出的。夺权问题，刚才康老讲得很清楚，张春桥同志这次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同意的，因为这样才成立军管会。当时安徽军区严光已经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和南京军区商量，请钱钧同志来担任军管会主任。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有来自军管会的，有来自各方面，这样你们到北京来，来解决安徽问题。到北京来，正好毛主席指示要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以后，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当天晚上双方传回去，各自将自己的黑手和背后操纵人揪出来。我们觉得这是很大的好事，马上把它通报全国。江青同志九月五号讲话录音，不仅在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听，而且在全国各机关、企业、单位、工厂、各学校、部队、公社都放了，就是说江青同志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毛主席司令部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是起到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而且超过中央书记处的职权。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讲的话嘛！这三条讲话，在全国都响应，安徽首先直接响应的，所以我们当时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安徽运动高潮来到了，一定会迅速地解决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根据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调十二军来主持安徽的支左工作。就在你们开会以前，没有一个野战军在安徽为主力，所以这个决定是我们最高统帅、副统帅决定的，直接跟南京大军区商量，不是调一部分，是全部队，也可以说绝大部分转到以安徽为主，住在安徽支左，来负责军管，推动安徽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所以，江青同志九月五号讲的四条完全符合当时情况、符合合肥

情况，在合肥两派并肩游行，我们非常高兴。但是事情总是有反复。当然有做得好的，淮南煤矿是个例子，工人阶级首先做得好，现在淮南煤矿工人绝大多数回去，生产上升了。虽然这次淮南又有一点小的分歧，但是极小部分，是属于淮南市学校里头搞的，工人阶级就不听了。这证明了一个真理：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学生虽然起了突击队的作用，现在拿学生的派性强加于工人阶级，那工人阶级就不能接受了。（呼口号）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希望你们其他的地方，大联合要以工人运动为主，先从工人阶级联合作起，因为安徽许多大中城市，许多工矿企业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交通运输，不仅有一个淮南，还有马鞍山，有芜湖，有合肥，有蚌埠等等。这些地方大联合都要以工人为主，这就是说学生不去干扰厂矿工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嘛。这样学生会受到教育。现在学生应当结合工农，首先是工人。

尽管现在安徽问题不是很顺利的解决，还有一些反复，我想没有什么奇怪，运动的规律总是有些曲折的。为什么，就是江青同志所说的三个方面，在后头挑拨的黑手还没有完全揭发出来。九月五号江青同志点了一下，还没有点够。

江青同志插话：总理，今天还有些我没有说，我插两句。他们现在贴总理的大字报，说总理是“陶铸式人物”，“联动”的后台。这种事情，我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半了，革命群众、革命小将是很容易识别的。现在有人想把水搅混。我们是经常和总理一块办公的。刚才伯达同志的讲话是讲了我们的真正情况。谁要是这样干，我看他没有好下场。（呼口号）另外涉及到我个人，我觉得也无所谓的，可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说我是“老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有资格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我觉得这很奇怪。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是个革命者，我为什么不可以点刘秀山，反革命刘秀山！（呼口号）在座的小将们，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哩，但是他就有这样的英雄的胆量，打倒刘邓陶，打倒李葆华，为什么就不能打倒刘秀山？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还有一个陈登科，那……（口号声打断）我什么时候也要向反革命作斗争的。我不一定要成为中央委员，我就是个普通党员，这一点我要说清楚，我不是中央委员，我们小组很多同志不是中央委员，我们就是要革命，就是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呼口号）红卫兵小将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这样一说，你们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我们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刘、邓、陶什

么都是，又是中央委员，又是常委，可就是反革命，我们就是要打倒他们！同志们，反革命要不要反？（众答：要！并呼：坚决打倒刘、邓、陶！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周总理继续讲：我正要说这个问题。江青同志上次讲的三个问题，现在安徽就有反复，这就看出运动的规律。按照毛主席的预断就是这样，运动总有波折。你看，说的是要支持和加强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主流，在安徽双方都支持江青同志的讲话，但总有逆流，在挑拨破坏下，在背后刮黑风，这是少数。少数，靠什么人去揭发呢？就是靠群众，靠你们。你们如果认为两方都是革命派，就把眼睛擦亮，耳聪目明。刚才康生、伯达、江青同志说了，为什么

“九·五”以后双方都联合起来，并肩战斗，还出现流言蜚语呢？就是因为你们队伍里头有些人糊里糊涂，受“走资派”挑拨，被坏人钻空子，同时脑子里的社会思潮反映，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所以听得进去，不然怎么能够接受流言蜚语。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如刚才伯达同志所说的信的问题。有的是不把历史发展看清楚，如刚才说我的那一段。《九条》、《五条》发表以后，我批评过群众准备开群众大会来斗争严光同志，我们说还是背靠背的揭发，可以揭发，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去，因为那个时候不到这么个条件嘛！他还是军管会副主任，因为群众大会一批，当然不可能继续工作了。现在情况不同，现在眼光来看前进了嘛！比如刘、邓、陶几个反革命，去年国庆节让他上天安门，今年不能让他上，历来的发展不仅把他们三反罪行揭发出来，而且还把他们的历史揭发出来了。运动发展总是这样，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特别江青同志最后讲的一段，那就更加重要。这个运动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党中央、中央委员也是一分为二。不仅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也是一分为二嘛！刘、邓、陶就是中央常委嘛！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保护李葆华？还保护什么等等。

伯达同志插话：刚才江青同志讲的一段话，总理同志也讲了这段话，我顺便插两句。现在有一个反动口号，就是“你算老几？”这是个反动口号，反革命的口号！（众说：这是反革命！）对！不分革命和反革命，就说“你是老几？”这是反革命的口号。

江青同志插话：陶铸就自封他是“老四”，我们不封是“老几”，我们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总理继续讲：这次运动从中央分化起，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坚持反动路线、坚持不改、顽固到底的，这是极少数的。但从全国看起来党中央一分为二，各地一分为二，领导机关也一分为二，有的数量比较不少的。所以这要看是革命的人说的还是反革命的人说的。不管是谁说的，革命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革命的嘛！“十六条”为纲领嘛！现在就是要听革命青年、劳动人民当中发出革命的呼声，主席号召都是上下呼应的，得到劳动人民的响应。毛主席的思想大普及大发展，证明这次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就是拿毛主席思想来动员的。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有时跟不上，掉队，要紧跟，怎么拿是不是中央委员，拿“算老几”来衡量呢？这就是反动的思潮，影响我们群众中个别人来讲这种反动口号，这个要区别。“走资派”，坏人挑拨，还有反动思潮的影响，要教育我们广大群众，心明眼亮，提高觉悟，就是不要受他们挑拨，要拿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来辨别，以“斗私，批修”为纲，来检查自己，检查自己的组织。所以，毛主席提倡的把自己组织里头的坏头头、黑手揭发出来。你们勇于揭发，这是共产主义风格，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所以把自己组织里头的黑手、坏头头揪出来了，对方自己也一样揪。这样才能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不是专门找对方的岔子。看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不是跟毛主席跟得很紧。拿我说，我说哪个话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当面给我提也好，你善意的讲，写信，写大字报也好，是欢迎的。恶意的攻击、破坏就不能允许，因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问题、领导问题，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领导威信，这就不能允许的了。这一次我们能出席的尽可能都到了，个别人没有到，那么你们应该拿江青同志“九·五”讲话那个声音，这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来作标准，就不会受挑拨，碰到这样的话就可以顶回去，揪出来。康老说，这种造谣挑拨要揪出来。有的人相信人家的话，年纪轻，经验少，教育他承认错误就好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解放军。安徽没有野战军，野战军不象地方军区。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地方关系久了，跟走资派结合太久了，也是一分为二，总是有些人 and 地方“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象严光、宋文两位同志不管在李葆华的时

候，过去在曾希圣的时候，和地方关系搞的久，和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他就要犯严重错误，一直坚持反动路线，一直到《九条》以后还没有改，这次要彻底批判，并且改组军管会，改组军区，这是需要的。那么，你不能要求上一次马上就这样做，要经过一个步骤，毛主席处理问题总是经过一个步骤，启发群众去觉醒。但是上一次已经改变了嘛，要钱钧同志来担任军管会主任，军区没有改变。这次不同了，十二军去了，你们又说“十二军算老几”。（江青同志插话：反动口号！）这完全没有道理！十二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不是坏人，不是反动的口号、反动的思想，怎么能解释呢？这个你们一听就挡回去。十二军，刚才说了，我们统帅、副统帅调去的，主持安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部担负起来，所以改组军管会。并且告诉你们，也要改组军区。（呼口号）这个事情，我们和南京军区许世友、钱钧同志都商量过的，钱钧同志还回南京军区担任他的职务，不存在《九条》有变。刚才康老有解释的，要看大问题，总是有坏人在后头挑动下面找岔子，你们受影响。

第三，就是个夺权问题。张春桥同志讲了。过去夺权条件不成熟，所以没有批准，因此军管。但是，最后军管会的任务还是要过渡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嘛。这个要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这样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所以，安徽经过这些反复，没有什么奇怪的，不出我们的意外。但是要看积极方面，淮南煤矿已经树立了旗帜。你们已经达成七条协议，刚才伯达同志已经庆贺你们了，中央批准你们，希望按你们自己达成的七条协议，你们亲自在上面签字的，要真地去保证执行。《九条》、《五条》都要认真执行。我看安徽文化大革命会大大地前进一步。（鼓掌）希望大家真正的同心协力去作，绝大多数同志们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样来庆贺安徽文化大革命进一步的胜利。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想我和同志们一样的心情，我感觉到在北京住的时间多了，各方面代表和群众隔离了，虽然是有电话，也有人来来往往。当前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很快地回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彻底地批判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刘、邓、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毛主席、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现在许多重要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所以这方面，单在北京解决主要是原则方面的问题，方向方面的问题，共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到群众中间进行艰苦的工作。所以这个会议今天总的就结束了。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那些问题，今后在军管会、在你们自己革命组织之间，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来解决。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这样一个提议，看同志们赞成不赞成，就是要把安徽的报纸完全恢复起来。《九条》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在《九条》的第五条讲过：“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现在还只是出新华社电讯稿嘛，我想现在应当把报纸恢复起来，你们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这里边有过争论的，就是报纸名字问题，是叫安徽日报，还是叫新安徽报？我想不要在名字上争论，新安徽报也可以*（口旁加么）。表示新的。不要说那是好派起的名字，P派就不赞成，这个何必哩！主要看它到底是派性的报纸还是党性的报纸，是党报的问题，看它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陶反动路线的问题，标准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名字。因此，我想不要在名字上争论。那么现在是新安徽报嘛。《九条》当中也讲了新安徽报，再一改，《九条》就“垮台”了（众笑）。所以这一条讲一下。这里边我应当讲，为什么要恢复新安徽报？我觉得在安徽文化大革命中间，同志们系统地批判刘、邓、陶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做的不够，很不够的。这一点无论那一派都要注意。你们看看别的省，应当向上海学习，向北京报纸学习。你们不宣传党的政策，忙于打内战，忙于搞派性，天天喊“打倒陶二世”，也不管是那一个，反正是你们不高兴那一个就给戴上，有时给我戴，有时给总理戴。但我问问你们，陶铸一世你们是怎么批判的？放松了陶铸一世，搞“陶铸二世”你是真正的反陶铸吗？（伯达同志插话：没有什么“陶铸二世”。总理：没有“陶二世”。）是嘛，没有什么“陶铸二世”。对刘、邓、陶的批判，尤其你们学生组织里边，无论那一派，都要深入地批判。所谓大批判，首先是对刘、邓、陶，以及他们的代理人李葆华。这一点也许你们做了，但很不够。因为报纸只出电讯稿，报纸的作用根本没有利用，所以希望你们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既然要搞好批判，首先是彻底地批判刘、邓、陶，看刘、邓、陶在安徽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罪恶。你们甚至把陆定一忘了。陆定一文化大革命

中跑到安徽，放了很多毒，和李葆华勾勾搭搭，你们为什么忘了？这里边有个原因，报纸半年多，七个月没有恢复起来，这样应当说不好。你要实行革命的大批判，你没有报纸怎么行呢？当然，另外一些小报倒不少，反对毛主席司令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报，在芜湖就出过这样铅印的报纸。所以这个问题你们既然赞成，就应该在军管会领导下，共同协力地把安徽的报纸恢复起来，成为批判刘、邓、陶、李葆华的最重要的工具。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派别斗争、打内战给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点大家赞成很好嘛。

还有一条应当注意到的，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总理讲过了，你们可了解什么叫中央文革小组。有各种反革命的宣传，说：“陈伯达是穷秀才，一辈子还是穷秀才”、“江青算老几”、“康生是个老特务”，到处这样讲，这是反对谁？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以为是反对我们吗？这是敌人企图动摇我们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文革小组，伯达同志是组长，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是副组长，（周总理、康老是顾问。）还顾问哩！要打倒我嘛！（总理、江青：打不倒。众：热烈鼓掌。）我也相信，如果我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怎么打也打不倒的，如果我不执行毛主席路线，不打我自己就倒了。中央文革小组现在起代替过去中央书记处的作用，而且在很多问题上代替过去中央政治局的作用。从这里边你们可以看到，文革小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有些人对文革小组是痛恨的。什么人？刘、邓、陶、反革命修正主义走资派，苏修特务、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特务、地、富、反、坏、右，反动派，他们痛恨我们。革命群众应不应该同他们划清界限，应不应该？（众答：应该。）他们千方百计挑拨，首先挑拨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关系。带着显微镜到处找“裂痕”，然后造谣说：文革小组分几派，也不知道两派三派，随你造谣！（江青：他们还敢于伪造林副主席给陈伯达同志的信件。总理：伪造信件是犯罪的。）犯罪！（叶群：林副主席没有给伯达同志写过那样信，伯达同志也没有给林副主席写过那样信，完全是无中生有，反革命造谣。）这一点，同志们应该警惕起来。特别是芜湖的同志应该警惕起来，国民党在那发传单，革命群众组织的矛头，应对准谁？是对革命群众，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对敌人？应当说有些组织敌情观念不高，警惕性不高，派性大发作，敌人钻空子。安徽各派当中都有黑手在后头，也有个别地方都有敌人钻进去的，如果你们不提高警惕，你们会

犯错误，会受敌人利用。这一点，特别是芜湖，蚌埠、安庆一些地方要特别引起警惕的。所以同志们，你们一定要注意，象江青同志今天讲的，文化大革命快一年半的时间了，尤其应当提高警惕，应当觉悟提高。现在你们看看，到底我们沿着毛主席路线胜利前进，还是后退？特别是“九·五”以后，你们的成绩中央很赞许，介绍到全国去，可是你们现在看到什么呢？看到在合肥还有一股反对六四〇八部队的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有静坐的？（众答：有。）蚌埠冲击三十一师，现在为什么在这样前进的道路上还那样向后倒退呢？为什么拥军爱民在江青同志讲话以后，在中央发出指示以后，有这种现象？革命群众应该想想这些问题。当然，这是少数，是个别坏人挑拨利用，但是广大革命群众应当觉悟起来，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彻底打垮刘、邓、陶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动派，彻底打垮李葆华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晓得不晓得，刘少奇是什么人？叛徒！陶铸是什么人？叛徒！（呼口号）邓小平什么人？逃兵！淮南个别地方还有这样反革命标语，叫“刘少奇亿岁！”不是“万岁”，是“亿岁”！（江青：那他倒成了木乃伊了！中央首长及全体同志大笑）革命群众一看就懂的嘛，这是革命群众的行动？不是的，是不是脑子里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行动？也不是的。很明显，是反革命！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敌人利用我们的派性，利用我们头脑里的“私”字。因此要珍惜你们的成绩，坚决地同刘、邓、陶、李葆华，坚决地同敌人，同刘秀山、程明远、陈登科、那一方面的彭宗珠等等作斗争。甚至你们有一派的同志在过去与严光、宋文那样的路线错误还没有划清界限。这一点你们要很好的警惕。使整个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实行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按系统的大联合，各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共同努力，把安徽的革命委员会能够在不长的时间成立起来，也是同志们再一次地来立新功。我的话讲完了。

打倒刘邓陶！打倒李葆华！

毛主席发动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

（来源：新常州报《新闻兵》编辑组主办《新闻兵》 1967 年 11 月 17 日 第十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安徽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另一版本）

〔时间：上旬。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

康老：

安徽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几个月来有很大成绩，特别在“九·五”江青同志讲话后，安徽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发展。基本上停止了武斗，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安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安徽省军区个别同志的错误，象严光、宋文的错误，受到了揭发和深刻的批判。

安徽形势大好，是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是十二军支左方向正确的结果，是各地代表思想提高共同努力的结果。安徽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很多经验教训。

1. 凡是坚决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行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历次指示，坚决实行“九条”“五条”沿着这个方向，文化大革命就会不断取得胜利。相反，抵制中央指示，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抵制“九条”“五条”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2. 通过安徽文化大革命，证明毛主席指示各单位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在主席路线指引下，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安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一方面应该说是对的，应该说不是一个派别，而是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夺权要象毛主席讲的，各派大联合夺权，一派夺权，排斥另一派，就必然造成大分裂。因此，中央头一条特别看到了这个问题，这里面很清楚，中央一方面照顾到各革命群众组织夺权愿望，广大群众动机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夺权的政策和方向，没有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进行夺权。

3. 安徽文化大革命, 证明了毛主席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安徽之所以分成两派, 是走资派挑拨坏人钻进来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 无政府主义思想。江青同志讲话后, 毛主席发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 安徽出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好形势, 你们代表以及安徽的革命群众, 创造了好的经验, 两派实行自我批评, 两派联合在一起开会, 游行, 最近有些地方出现了反复, 这说明去掉派性, 增强党性, 不是开一次会议就能解决的, 主席说要斗私批修, 这是个严重任务。同志们不要在创造了好的经验后, 再走回头路。

4. 从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中看到, 军队支左是实行毛主席、林付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指示, 还是不执行, 对文化大革命有重大作用。

为什么安徽到现在还不能成立革筹小组, 还要实行军管? 这与前一段时期严光、宋文同志犯了严重错误路线有关。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走资派, 反革命反对毛主席、林付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反对“九条”, 还有群众受蒙蔽, 这与严光、宋文同志错误有关。

安徽个别地方出现反对十二军, 甚至说十二军是陶二世派去的, 实际上是说我派去的, 陶二世是安徽反革命给我加的“帽子”, 这是反革命对毛主席、林付主席派去的 12 军的污蔑。12 军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我们应该坚决拥护, 有缺点可以帮助。

5. 必须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 必须加强对敌斗争, 要有敌情观念, 安徽的确有反革命活动, 走资派、敌人走投无路, 看到安徽大好形势, 就无耻污蔑, 挑拨离间, 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甚至威胁利诱, 有的同志这样说, 走资派敌人造谣污蔑在安徽是集大成。他们甚至敢伪造林付主席和伯达同志的信, 这是死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在芜湖、蚌埠、安庆, 特别是芜湖……“三筹处”下属群众就是受蒙蔽的……同志们不要这一派指责那一派, 各派都有这种现象, 我们要去掉派性, 派性, 敌人是会利用的。

6. 按照毛主席指示, 认真开展学习运动, 中央和省军管会, 和省军区, 和省军区都要开办训练班, 犯错误的和没犯错误的, 都要参加学习, 要“斗私、批修”,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按行业、按系统的大联合, 掌握大方向, 把各单位斗批改搞好,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

(1) 中央赞成你们达成的协议，中央有批示，希望你们贯彻执行。

(2) 军管会改组，引起一些同志误解，甚至有的利用这个改组，说你们推翻九条，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军管会改组，一不是钱钧同志犯错误；二不是推翻九条，而是更好贯彻九条。(3) 在二三月间严光打击一大批干部，现在一律平反。

最后，请同志们注意，为什么到现在安徽到现在还不能有革筹小组，更不能说有革命委员会了，道理在哪？

(一) 要把革命大联合搞好，没有革命大联合，怎么能选代表参加筹备小组呢？

(二) 有些可以解放的干部，现在还没有解放，这些是什么人，你们要在斗争中自己去识别。

陈伯达：

我很钦佩康老在解决安徽问题上这么长时间的耐心的工作，我很拥护康老的讲话。

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是不能割裂的，斗私和批修这两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志们必须好好学习，要斗倒私字，斗倒利己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斗倒修正主义，斗倒刘邓陶修正主义，斗倒刘邓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

康老是我们的长辈，我要向他学习，有人假造我和林付主席的通信，造谣的决没有好下场。

江青：

安徽有人想挑拨我和康老的关系，说我的“9.5”讲话是批评康老的，这是在挑拨安徽的情况是复杂的，上次因为我点了一派的名，康老点了另一派的名，这就找到岔子了，其实我们是一致的，我还少说了哩！

周总理：

刚才康老讲话，我完全支持，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也完全拥护、支持。

这次会议是因为九条不能贯彻，才来开的，而九条不能贯彻又是因为军区支左问题而引起的。夺权问题张春桥同志已经讲了，我们同意。江青同志“九五”

讲话是代表毛主席、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代表中央文革的，根据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调十二军去安徽，做支左工作，实行军管去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搞大联合要以工人为主，学生不要去干扰厂矿。

江青同志讲话：

有人贴总理的大字报，说总理是陶铸式人物，是联动的后台，我想经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是能识别的，有人想到水搅浑，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另外，说我不是中央委员，还有资格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点刘秀山的名？刘秀山是个国民党特务，是反革命，还有一个陈登科，我什么时候都要同反革命作斗争。

总理：

你们要把自己组织中的黑手揪出来，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各个组织自己去找自己组织的，不要去查找对方的岔子。

关于解放军，安徽没有野战军，军区在地方久了，和走资派关系密切了，严光、宋文不但跟李葆华，而且跟曾希圣，犯了严重错误，所以要彻底批判，这次不但要改组军管会，还要改组军区。

这次会议总的可以结束了，在北京主要是解决原则问题、方针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到群众中去做艰苦的工作。把安徽的报纸完全恢复起来，不要在名字上争论了。……在芜湖还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铅印小报。我觉得你们安徽系统地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是很不够的。陆定一还和李葆华勾勾搭搭，放那么多毒，怎么就忘了呢？

中央文革现在代替了过去中央书记处，很多方面起到过去政治局的作用。

……刘少奇是叛徒，陶铸是叛徒，邓小平是逃兵。

你们要珍惜大好形势，坚决同刘、邓、陶、李葆华、程明远、刘秀山、陈登科、彭采珠等作斗争，有些人与严、宋错误未划清界限，要警惕。

十分希望安徽的革命委员会在不长时间内成立起来，希望再一次立新功。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接见了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安徽班全体学员。

时间：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二十点四十分至二十一点四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

接见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春桥、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南京军区首长许世友同志也参加了接见。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中央首长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全场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我重复说一次，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批示”同志们都看过了，有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接着，江青同志宣读了批示全文。（略）

伯达：现在请康老讲话。（全场高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老：向同志们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革命群众学习！向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口号）

刚才江青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告诉了同志们，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希望安徽革命委员会以及安徽三千五百万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的这个批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口号）

中央批示讲过，“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安徽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经过了长期艰苦奋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打垮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坚决地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真！打倒罗瑞卿！打倒陆定一！打倒杨尚昆！打倒李葆华！打倒黄岩！把这些叛徒、特务、反革命、资产阶级代理人彻底打垮。

一年来，我曾经和同志们一道研究过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向革命群众、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学习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同时，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伟大成绩。我在这一方面也学习了很多东西。通过研究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了解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因此，我感谢同志们，感谢红卫兵，感谢广大革命群众，感谢解放军。（口号）

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多次接触了同志们，讲了一些话。我想可能有些话是对的，有的话可能是错的。错了，请同志们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批评我，炮轰我。（众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谁反对康老就打倒谁！）

同志们，有一句话我要解释一下，不要说谁反对我就打倒谁。在安徽的确有个时期，有的不明真相或受蒙蔽的人写过大字报要打倒我。我正式声明不要提这样的口号。对写过大字报的人不要进行攻击，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希望同志们再三转达我这个心愿。我过去的谈话中对个别同志，个别干部，个别解放军指战员作了些批评，对的，同志们就改正，不对的，请同志们谅解，我是出于对同志们的爱护。话可能讲错，讲过了头，请同志们谅解。（全场高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最后，希望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常委、副主任、主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识清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不是作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哪一派的代表，是安徽三千五百万人民的代表。大家要团结一致，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委员会，巩固革命的三结

合，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贯彻到底，把安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前进的斗争中立新功。我的讲话完了。

伯达：请许世友同志讲话。

总理：他昨天刚到北京，今天来参加你们的会。（众呼口号：向许世友同志学习！向许世友同志致敬！）

许世友：不要，不要！我有什么好学习的？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们要坚决照办！一百个照办！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口号）我们要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同志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要坚决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军委就打倒谁！我们解放军，不管任何人都不准讲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军委的话，谁讲就是犯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的一切一切都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句话，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我的话完了。

伯达：现在请总理讲话。（全场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

总理：问同志们好！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刚才江青同志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批示”，也是林副主席看过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提出来的，这是你们的一个最大光荣，是对你们的最重要的指示。（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现在安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将近两年了，你们经过了许多次英勇奋斗，许多次激烈斗争，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值得我们欢迎的，值得我们庆贺的。（口号）这个革命委员会是省的，还需要把各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现在有的已经建立了，有的还没有建立，要把各个工厂、学校、机关、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要建立革命委员会，首先要联合起来，要联合，就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现在全国各省市已经建立了二十个革命委员会了，你们是第二十一位。我想，虽然你们是名列二十一位，希望你们后来居上。后来居上是指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各派群众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

现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跨行业的，象伯达同志说的那样是个大杂烩，那样就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前几天，就是四月八日在长沙，在毛主席的故乡宣布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是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是不甘落后的。你们那里跨行业的组织，通俗地说法就是好派和屁派，用外国字就是 C、P，现在大联合了，这些派都不能要了，就是象同志们说的，要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反革命派。（口号）我们要打倒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要建立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第二件事，你们报告上写的最高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今天又听到了毛主席的最新的解释，我们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要吸收很多年青的革命造反派，就是无产阶级左派，朝气蓬勃的干将参加，就是说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还要加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我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接近朝气蓬勃的。当然还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一百五十九名，军队很谦虚，退出了一部分，只有二十四名占百分之十五，革命领导干部三十二名占百分之二十，加在一起占百分之三十五，群众代表九十名占百分之五十七，机动十三名占百分之八，如果机动数里面再有群众代表的话，群众代表就超过百分之六十了。群众组织的代表大多数是二十至三十岁的，少数超过四十岁，从整个比例来看，是青年、中年人多，是有朝气的，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在实践中证明是朝气蓬勃的。

第二个比例，是常委中看老中少的比例。二十九名常委中，五十岁以上的有八人，四十岁以上的八人，四十岁以下的十三人，老的不超过六十，绝大多数是中年、青年。从年龄来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也是有朝气的，当然也还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

还有第三个比例，就是在常委中军队也是很谦虚，只占七名，革命领导干部占十名，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名，占绝大多数。新的血液加入革命委员会，说明

这个委员会是实现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年轻的较多，我们很高兴。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本来你们的常委中女同志很少，当然现在也不多。我们中央文革对别的省也提出过增补女同志，但都比较困难。你们安徽省做了模范。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因为她是女同志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也是支持这个意见的。四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李德生，廖成美同志响应很快，立即打电话回去，马上就增补了女同志。现在已有五名女同志，在副主任中有两位女同志。二十个省市都赶不上你们，你们是后来居上。这是值得祝贺的！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只有一位女同志，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嘛！希望你们安徽在抓机动名额中也注意这个问题。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中很多都是很能干，一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掌权时就把女同志摆在一旁，这是很不公正的。我接触到很多到北京来的女同志，很能干，但是就是选不上，广州、武汉都有这种情况。你们安徽是第一个赶上来的。占人口一半的劳动妇女不论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都是很能干的，做起事来并不比男同志差。在我们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就是模范。我们的比例也少了，在座的十二同志中只有二位女同志，只占六分之一，这一点你们也可以批评嘛！

总之，要称得起朝气蓬勃，在军、干、群比例中，群众比例要大；在老中少比例中，中少比例要大；在男女的比例中，女同志不要太少，这样才能使革命委员会气象一新。革命就是要培养接班人，老的当然也要，但是中少要多一点好。要有妇女参加，这样才能区别于旧的政权机构。旧的政权机构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扰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干部政策造成的。现在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掌权，革命委员会应当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毛主席今天特别提醒这件事。你们首先响应了毛主席这一号召，是特别值得称赞的，特别值得庆贺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伯达：我们今天开了一个短会，现在会议结束。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中，又传来一个新的喜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我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安徽三千五百万革命人民，以及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胜利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经过反复的较量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隐藏在安徽的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叛徒、特务，就是这样一些早已覆灭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甘心于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或者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者散布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者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充分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关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作出了英明指示，指明了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航向，引导英雄的江淮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畏的英雄气概，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在安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年多以来，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样，经受了很大的革命锻炼。我们希望，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在胜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里我们要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定不移地学习、宣传、执行、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为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胜利前进，立下了巨大的功绩。

我们希望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诞生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彻底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肃清他们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使自己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率领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把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大节摆在首位。这就是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要进一步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带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

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抓好煤炭、钢铁、粮食生产，搞好水陆交通运输，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深信，经历了阶级斗争暴风雨考验的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军民，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紧跟伟大舵手毛主席破浪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社论）

六、处理安庆芜湖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李德生在安徽省革委会紧急会议上关于安庆问题的重要讲话

战友们，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我们召集省革委会全体委员，各地、市革委会、支左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召开一个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是进一步动员起来，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两个布告的深入动员大会，是以两个布告为武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更加全面、猛烈的、歼灭性的进攻的誓师大会；也是集中力量，向盘踞在安庆的一

小撮阶级敌人的顽固堡垒发起总攻击的战斗部署大会；也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表决心的大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更加猛烈进攻的战斗号令；是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强大武器；是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战略措施。学习、宣传、落实两个布告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不紧跟的大问题，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不忠的大问题。对两个布告，是拥护还是反对，是执行还是抵制，是真革命或假革命的试金石，是革命或反革命的分水岭。全省革命人民务必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认真学习，积极宣传，坚决照办。进一步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两个布告的群众运动。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以来，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进一步狠抓了阶级斗争，形势发展很快。在这个时期内，打了几个硬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阜阳、定远、风阳、嘉山和芜湖的问题。同时，通过对这些地区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全省形势的发展。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更新阶段，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全省累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十余万期，一千六百余人参加了学习，革命的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挖出了一批隐藏得更深的叛徒、特务、黑手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各条战线上的斗批改高潮正在兴起，革命三结合的潮流滚滚向前，现在已有十三个专(市)、四十一个县(市、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一片红的日子已为期不远。“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两个布告发布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我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驻军全体指战员，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人心振奋，普遍反映说：“布告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布告是及时雨，布告宣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死刑。”许多地区闻风而动，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执行布告的热潮，大大推动了全省的大好形势。

“七·三”布告传到芜湖后，芜湖的革命形势迅速改观。广大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对所犯错误深感痛心，纷纷反戈一击，掀起了一个揭发芜湖反革命事件黑幕，检举黑手、坏人和上交武器的高潮。阶级敌人惊恐万状，分崩离析，有的自动投案，有的被群众扭送部队。省革委会点名的七个坏人、黑手已全部归案。现在武斗停止了，工事平毁了，抢去的武器已基本交回。全市的交通、邮电和社会秩序已经恢复正常。外流人员已大部返回抓革命促生产。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只要和广大群众见面，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出无比巨大的威力，革命形势就会迅猛发展。

形势大好，但是阶级斗争不会停息。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一小撮阶级敌人感到末日的恐惧。在进入坟墓的前夕，他们要作拼死的反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斗争越是复杂、深刻。

目前，在安庆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表演得特别嚣张。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是在制造反革命舆论方面，成了全省的第一名，最突出了。他们泡制反动的公开信，策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会，利用革命的口号，抽掉革命的内容，进行反革命活动，接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革命口号，把矛头一转，就对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现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反右”这个革命口号下，大做反革命的文章。

右，肯定要反的，坚决要反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统统都要反。过去反，现在反，将来还要反，定远、凤阳地区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反了；芜湖的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黑风，我们反了；安庆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我们也是反定了。什么时间出现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就什么时间反，那里出现了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妖

风，我们就在那里把它打下去。我们要把阶级敌人的一切翻案、复辟的阴谋统统粉碎，要把反右的斗争进行到底。

但是我们决不容许阶级敌人利用“反右”，转移矛头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决不容许阶级敌人利用反右来向无产阶级夺权，让牛、鬼、蛇、神上台，决不容许阶级敌人利用反右来复辟资本主义，恢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安庆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搞的所谓“反右”恰恰是朝着这些反动的目标前进的。

我们敬爱的林彪副统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开始就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到夺取全面胜利的阶段，毛主席又极其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内容的伟大深刻的阐述，害怕得一个字都不敢提。他们煞费心机地编造了一个反动的“主要矛盾转化论”，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军内掌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恶狠狠地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诬蔑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旧秩序”“代替老的旧秩序”，疯狂叫嚷：“揪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安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滚出省革委会”。他们还恶毒的煽动，要解放军的战士“起来造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的反。”这就是他们所谓“反右”的实质和目的，说穿了，他们所谓的“反右”，就是要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要搞乱人民解放军。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他们还利用“支左不支派”在提法上的不够确切，进行大肆攻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支左不支派”突破。并且扬言，要用枪杆子来批判，用战争来批判。突的什么破？向谁突破？从安庆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几个月来所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支左不支派”本身有什么不得了的错误，也并不是纠正人民解放军支左工作中的什么缺点错误，而是要从“支左不支派”打开一个缺

口，向人民解放军突破，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突破，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突破。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革命大联合的道路，否定光辉的“九条”、“五条”。使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根本建立不起来。

反右的根本方向和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稳、准、狠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可是在安庆做得怎么样呢？他们揪出了多少混入自己组织内部的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打击了多少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挖出了几个隐藏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没有，也不可能。相反，他们却对那些贫下中农、无辜群众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专政。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已经以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搞的所谓“反右”是什么货色。说到底他们的所谓“四反”就是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反对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的所谓“一粉碎”就是要粉碎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总目的，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国民党反动派的卷土重来。

在安庆，确实存在着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两股反动思潮，前一个时期，反对安庆“十条协议”的右倾翻案妖风，和近一个阶段反对安庆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右倾分裂主义，都比较突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扑的两个战线。对于安庆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反右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我们从来都给予最坚决的支持。我们坚决支持安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向刮起右倾翻案妖风，煽动右倾分裂主义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展开最勇猛的斗争，支持他们把那些煽阴风，点鬼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但是对于那些在“反右”的旗号下，进行反革命勾当的阶级敌人，我们必须给予彻底的揭露，坚决的打击，毫不留情，决不手软。

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但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上成为全省的“尖端”，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犯下了大量的反革命罪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长期以来，隐藏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但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舆论，而且欺骗和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组成专业武斗组织，不断挑起武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 抢劫国家仓库、银行、商店，炸毁和烧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了国家大量的粮、钱和物资，炸毁价值三百万元的冷库，以及市交际处大楼、专署大楼、交通局大楼、机电大楼等十多处公共建筑物，油粉厂全部烧光。他们还在华阳垦区一次烧毁国家棉花十七万斤，在宿松抢劫国家银行现款十多万元。许多无辜群众被打死打伤，甚至老太婆、儿童也惨遭杀害。

(二) 连续不断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物资，杀伤和殴打解放军指战员。今年以来，先后冲击驻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近八十次，抢走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各种装备物资和干战个人衣物。有的连队被抢劫一空。在冲击部队时，还向部队驻地射击、投弹，用石灰渣和小便在战士头上浇，用木棍、家具往战士头上砸。在部队厨房水缸里拉大便，在干战耳旁、肩上、头顶鸣枪威胁，绑架部队首长，先后共打伤指战员好几百人，打死四人；仅振风塔反革命事件中，一次就打死解放军二人；连给群众运粮的战士也被枪杀在汽车上。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下达后，七月五日，一小撮阶级敌人还继续煽动和蒙蔽部分群众，对军营港务局的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的打、砸、抢、抄、冲，抢走全部武器装备和许多物资；他们连救死扶伤的卫生医疗单位也不放过，七月十七日又煽动二百多人，冲、砸、洗劫驻军卫生队。两次共殴打干战二百多人，十四人重伤住院。

(三) 抢劫车船，私设关卡，中断交通、邮电。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迟迟不能恢复，使军事指挥受到严重影响。

(四) 抗拒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对抗省革委会关于安庆问题的多次指示，围攻、殴打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年“九·五”命令颁发后第五天，两派上交武器的第三天，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和蒙蔽“红造会”部分群众，公然对抗“九·五”命令、“六·六”通令，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将“联委会”打出城外。今年一小撮阶级敌人又煽动和蒙蔽“联委会”部分群众，制造了“一·二〇”武斗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总理的两次指示，省军管会的通令、急电至今拒不执行，继续对抗“九·五”命令、“六·六”通令。

什么人会这样对人民解放军下毒手？什么人会这样对无辜群众下毒手？什么人会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各种反革命分子，才会欺骗和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下这样的毒手。隐藏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已经表演得够充分了！全面清算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挖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已经查明安庆两派都进了坏人，插进了黑手。这些坏人、黑手，是上述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的一部分。

原安庆专署专员陈振亚，是个腐化堕落、投敌变节分子，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伸进群众组织的黑手。他开始打着支持好派的幌子，在“三·一五夺权”后混进“地革会”当了副主任。以后又跳出来，混进“红造会”，接二连三地“写声明”、“发贺电”挑动群众斗群众，上窜下跳，往来于北京、合肥、安庆之间，做了许多坏事，并把黑手伸到各县，多次召集各县当权派开会，唆使他们支持一方，压制一方，挑动群众斗群众。

原安庆市城建局副局长胡成斌，是蜕化变质分子，曾被开除党籍。去年武斗期间，他担任“联委会”的军事顾问，赤膊上阵，策划和指挥武斗。

原安庆市文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张强，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他组织“干联站”，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直接为“红造会”武斗出谋划策。在“红造会”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说：“在军事上加强防御，主动出击，打乱对方的后方，消耗对方的人力、物力、财力”。

原安庆专署工业局副局长陈良玉，是伸进“联委会”的黑手，担任“联委会”的“政治顾问”，并参与调动岳西农民进安庆城搞武斗。

原安庆专署粮食局副局长徐一美，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是“干联站”的核心人物。他长期坐镇“红造会”总部，出了许多坏主意，竭力鼓吹“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煽动武斗，制造分裂，恶毒污诬制止武斗协议是“马歇尔计划”，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后，还公开喊叫“我就不怕当刘秀山”。

钻进“红造会”的坏头头马兆国，对抗中央关于航运系统与社会上脱勾的指示，担任武斗组织“工总司”的总头目，指挥武斗。在“工总司”私设刑堂，绑架和毒打我解放军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把一个农民吊起来活活打死。许司令指示，叫安庆两派代表来合肥协商解决安庆问题，马兆国竟威胁说：“谁去枪毙谁！”“七·三”布告下达后，还煽动和指挥“红造会”部分武斗人员，冲击、打砸、抢劫部队卫生队。

恶霸地主的儿子何守平，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总指挥。他参与策划和直接指挥“一·二〇”武斗事件，对抗周总理指示和省军管会通令，连续制造了枪杀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并插手几个县的武斗。

刑满释放分子吴洪杰，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参谋长。他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指挥“一·二〇”武斗，指挥炸毁价值数百万元的冷藏库等大型建筑物。

钻进“红造会”的坏人孙邦志，是叛徒、巫婆的儿子，是漏网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反动诗，侮辱伟大领袖，泡制《公开信》，散布大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革命委员会，攻击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言论，对抗中央关于军管公检法与社会脱勾的规定，进行反革命串连，到处作黑报告，煽风点火，干了许多坏事。

安庆长期武斗，与混进军队里的个别坏人插手指挥有关系。一个是安庆市前人武部长徐征法，是好派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一贯腐化堕落。还有一个是安庆军分区科长杜长信，是“红造会”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不是个好家伙，很坏。这两个人我们已经决定把他拘留起来，在部队内部进行批斗。

盘踞在安庆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挽救他们彻底完蛋的命运，采用种种反革命伎俩，欺骗和蒙蔽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大搞武斗，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就是对我们发出的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动员令，我们有坚强的决心，以两个布告为武器，开展一场更大的“人民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向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们希望安庆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全体指战员，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强大的攻势。要把那些隐藏得更深、更狡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从各个阴暗的角落里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务必全歼，不让一个漏网！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立即停止武斗；立即拆除工事；立即解散“捍卫四大兵团”、工总司独立一、二营，“夜老虎”、“尖刀班”、“红挺小分队”等武斗组织；立即干净、彻底、全部上交抢去的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物资；立即恢复水陆交通和邮电。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小撮阶级敌人只有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向人民低头认罪才有出路。听说，在安庆有人扬言：“若省革委会要点某某人坏头头，就要用武装保卫。”并说：“一枪一弹也不能落到解放军手里”，准备继续顽抗。这些人如果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必将碰得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跟着别人干了一些坏事的人，或者受蒙蔽的群众，必须迅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改正错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揭发其反革命罪行，与一小撮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如果跟着坏人干下去，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完全相信安庆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安庆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两个布告，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一小撮阶级敌人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安庆的革命形势必将越来越好，安庆专区和各县的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胜利诞生。

我们希望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支左领导小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学习、宣传、落实两个布告，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本地区阶段斗争的现实结合起来，更加深入地开展对敌斗争，迅速发展大好形势。至今还在搞武斗的一些地区和组织，都要按照“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立即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全部上交武器、弹药、装备和物资，巩固和发展革命

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尽快实现一片红。以实际行动来配合和支援安庆地区的对敌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后还要讲一个问题，濉溪县和霍丘县两个革命委员会是经原来的军管会批准的。我们去年十二月份根据周总理关于解决苏州革命委员会问题的精神，决定这两个县的革命委员会按“调整、扩大、充实”的六字方针处理，这里再次重申，决不动摇。

(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

来源：《江淮红卫兵》1968.8.8

贯彻“九大”精神

一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贯彻“九大”精神，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政策和各项战斗任务的热潮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省“三代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我代表省革命委员会向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全国亿万军民在“九大”团结、胜利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各级革命委员会，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围绕着手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制定措施，正在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的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正在充分调动起来。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开展得更加深入，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一些“老大难”单位正在改变面貌。全国各族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形成了空前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革命的大团结，是我们完成

“九大”战斗任务，战胜共同敌人的可靠保证。这个革命大团结是当前大好形势的显著特点。

我省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也是空前大好的形势。省党员代表会议以后，各专（区）、市、县也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目前各专、市、县党员代表会议都已基本结束了。党的“九大”精神同全省广大革命人民见面，已经化为革命的强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各条战线的斗、批、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克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总结落实毛主席政策的经验。全省的基层单位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省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大讲团结的意义，大找团结的差距，大订团结的措施，出现了一个人人讲团结，处处是团结的大好局面。

最近，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巩固胜利，发展胜利，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夺取更大胜利的高潮。

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省“三代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是很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把这个会议开好，对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于团结全省革命人民，去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省“三代会”成立三个多月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推动我省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运动。根据毛主席的教导，革命还要继续前进。我们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九大”精

神为红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总结工作，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的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号召，高度概括了“九大”的基本精神，是党的“九大”的一条光辉路线，是照耀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灯塔。这一伟大号召，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团结起来，是夺取更大的胜利的保证。林副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我们自己要团结起来，不能给敌人团结起来把我们孤立了，我们要自己团结起来，把敌人孤立起来。今天闹不团结，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我们自己。”这些问题是“九大”精神，要很好领会，很好贯彻。林副主席的这些教导，指出了当前团结的伟大意义。在阶级阵线清楚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大讲团结。这是当前搞好斗、批、改运动的需要，是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反帝反修的需要。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我们解决团结问题指明了方向。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这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革命要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管你是那个山头的，不管你是G派还是P派，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搞孤家寡人政策，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同时，我们“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还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这就是说，我们讲团结，要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党的周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而不是搞“多中心”的小集团主义，更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这里还要明白团结的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是说，我们讲团结，要有利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不是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利于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削弱革命委员会。这就需要我们认真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克服我们的错误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达到革命的团结，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开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譬如讲“反复旧”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认识清楚了呢？“复旧”问题究竟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主流问题还是支流问题？“反复旧”是不是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

大家应当讨论清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才能谈到团结。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可以讨论。再例如说领导关系问题，权的问题，都应当有个统一的认识。最近不是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等等议论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上次，我们和“三代会”的同志一道学习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我提出要“三代会”的同志认真讨论一下，不知“三代会”的同志讨论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现在在谁手里，向谁争权，什么才叫有权，这些问题，我们都都要有个统一的认识。只有统一了认识，才能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才能讲到团结。要讲团结，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觉革命的问题。没有自觉革命，自我革命的精神，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还讲什么团结。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谈就崩，那怎么团结呢？我们都要有团结的愿望，自我革命的精神，这才能搞好团结。

同志们，你们都是群众代表，你们怎么自我革命、继续革命呀？群众代表就要代表群众。代表群众就必须联系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会失去代表性。今天到会的“三代会”同志，都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是，不能搞“三脱离”。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你们当中不少是“九大”代表，这次在北京，中央首长又多次传过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所以说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可能有的人说，他们是中央委员会的，我们是革命委员会的。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问题对我们有没有指导意义呀？假如我们常期蹲在革命委员会里面，搞事务，我看那就不能保证“三不脱离”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大家认真讨论、深思。

这次在北京开“九大”，康老讲到山东有个老模范张富贵，他现在就在搞接见了嘛！一年只参加了几天劳动，这样下去就要变成机关人员，就要脱离群众了。

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主要抓思想建设呢，还是管事务性的事呢？如果我们革命委员会一百五十多个委员都管事务，那么，一天到晚不出大门都搞不了。我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研究一些重大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这次会议就要通过学习讨论，

明确这些问题，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所要达到的目的。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九大”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现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十二中全会和这次“九大”，就是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粉碎了，把刘少奇的一小撮揪了出来，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又被我们夺回来了。这是个主流，是的大好形势。但是我们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我们说，至少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吧？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不是都有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吗？当然，有的个别单位，基层单位有复旧现象。但是，这不是主流，不是大局。所以我说，我们看形势，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指示，紧跟中央的指示。

总的来讲，我们这次会议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九大”精神。要在传达的基础上，很好的领会，很好的落实。

要落实“九大”精神，首先就是要解决团结问题。要狠抓团结，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就统一。这是胜利的保证。

当前这个团结问题，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一个战略部署。正如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以后，提出的大联合，那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现在呢？讲团结问题，也是毛主席的一个战略部署。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一定要明确团结的意义，对团结问题认识的深度还要提高。

“三代会”有没有影响团结的因素呀？我看，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落实“九条”“五条”。“九条”“五条”这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文献。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执行“九条”“五条”好的地方，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就巩固，就发展，领导班子就团结；凡是执行“九条”“五条”差的地方，就会出现有反复。现在安徽的形势比较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大家对落实“九条”“五条”比较重视，落实的比较好。但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当然，“九条”“五条”的落实，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基层单位，落实还不够好，还需要继续落实，很好的落实。“九条”落实有个障碍。当时曾经撒下一个不好的“种子”，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等等，这是煽动对“九条”不满的语调。这个问题要很好的认识。“九条”是不是就没有经过深入地了解情况呢？当时各方面的代表不是都在吗？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九条”是发到全国的。对全国都有指导意义。后来一落实，安徽的形势很快就好了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指导，搞好团结。以“九条”“五条”为基础，把这次会议开好。你们“三代会”要来个比赛，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看谁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九大”精神学得好，用得好，看谁的会议开得最团结，看谁的“九条”“五条”落实得好。“三代会”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会议以后，也要看哪个群众组织在革委会的领导下作用发挥得好，助手当得好，看哪个组织的工作朝气蓬勃。

同志们，你们都是群众的代表，群众组织的头头，你们应当把这个头带好。带头斗私批修，带头搞好团结。要继续革命，“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团结全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夺取更大的胜利！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首届常委（扩大）会文件汇编》

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次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开得是及时的，必要的。我们在传达学习“九大”精神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基础上，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促进形势的发展，很需要进一步根据我们当前情况，联系实际地来很好地对形势加以分析，统一对形势的看法。在这次会上，同志们谈了形势，交流了经验，认真学习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谈了团结问题，会议开得很好。今天在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形势问题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对形势的认识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我们对形势都要有一个统一的想法。不要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有的同志有的时候就听小道消息，不按照中央对形势的结论，不按照中央对形势的指示去看形势。只从个别局部的问题，阴暗的东西看得多，这样就容易否定全局的大好形势。我们现在对形势究竟应该怎么个看法，究竟是大好？还是小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不仅我们参加“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要有个统一的想法，我们还有责任说服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都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这个看法就是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在第九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指示的：“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时刻召开的。”这就是说，“九大”是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开的。这样说，是不是没有内容呢？这是有根据的，是有丰富内容的。林副主席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这个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长期以来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这样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还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同志们都非常清楚。刘少奇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在抗战的初期就有计划地安插了一批叛徒、特务到我们党的队伍里面来，窃取了党内的一些重要职位，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把他们揭发出来，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

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来了。我们建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

这就是对当前形势的结论，对形势的看法。每个同志都要很好地来学习中央对形势看法所作的结论。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紧跟中央，紧跟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紧跟他老人家对形势的看法和指示。我们对形势的看法能不能跟中央一致，也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也是我们能不能掌握好大方向的问题。这里，关于分析形势问题，讲几个具体的意见：

第一点是形势大好，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好。安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是大好。我们看现在形势，应该与去年这个时候比较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全国是个什么形势？安徽是个什么形势？去年这个时候，全国还有广西、云南、福建、新疆、西藏等好几个省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安徽是个什么形势，我们都是最好的见证人嘛，那个时候，阜阳专区没有一个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阜阳两派正在这里办学习班，互相吵架，阜阳地区有人甚至提出口号要“打过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芜湖、安庆呢，要走徐州的道路。芜湖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甘心，要走徐州的道路。安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成立革委会。全省还有一半的县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那个时候成立一个县的革委会，很不容易，前进速度是逆水推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幌幌荡荡，摇摇摆摆，没有现在巩固。接着一个安庆事件后，就出现了芜湖的六·二六事件。芜湖事件刚刚要解决？合肥又出现了七·一六事件。安庆、芜湖、合肥发生的事情不是孤立的，计划是一致的。在安庆造舆论，在芜湖突破嘛！那时的形势是阶级敌人向大联合、三结合反扑的形势。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革命形势？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一片红，全省一片红。革命的形势比去年好得多。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更巩固，更发展了。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是愈来愈好。但是在大好形势之下，出现一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前进中的问题。从主观上说，我们自己工作做得还有缺点，毛主席的政策还不够落实，也就是说，一种倾向还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我们工作上可能出现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更主要的是，一小撮将要灭亡的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是要作垂死挣扎的，是要想反扑，想把我们搞垮，想把大好形势搞垮。因此，愈接近胜利，反映出来的矛盾往往就愈

多。例如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挑拨革命群众。制造分裂，破坏当时的大好形势，破坏一月革命风暴，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深入发展阶段，在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尖锐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矛盾往往就出现得比较多。矛盾出现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看起来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革命群众运动总是有规律性的，运动愈深入，阶级敌人总是企图把水搅浑，蒙蔽一部分群众，欺骗一部分群众，来破坏大好形势。当前我们看到，这里反复旧，那里也是反复旧，这里反映一派掌权，那里也反映一派掌权。贵池县乌沙公社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反复旧”的司令部，把牌子都挂起来了。一个外调的人，到武汉去外调，看到武汉那里反复旧，说现在中央正在支持全国反复旧，谁要是不站在反复旧的这个大方向上，谁就是否认革命，谁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牌子都挂出来了嘛！有人看到武汉有反复旧的思潮，就往那里跑！我们安庆也是在幌幌动动的，是不是呀？这就成了一种思潮，这里也是复旧，那里也是复旧，到处都是复旧。

有的临时工也在闹事，有个别的把我们基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都拉去游街了。社会上出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对形势究竟应该怎么看法？到底当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反复旧的形势呢？还是按照中央“九大”所指出的我们已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呢？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人，思想是摇摆的，他看形势往往就是忽左忽右，对大好形势往往要摇摆，把一些局部的现象看成是本质，把支流看成主流，本末倒置。这样，就容易出问题，对中央指示就不能做到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对那些小道消息就非常相信。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都有很深刻的教训。听了小道的消息多了，就没有好结果，就会把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大了。我们政策不落实，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些扩大化，毛主席在“九大”上指出：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们说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现象，但这个前进中的缺点，有些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有些不够揪的也揪了，不该斗的也斗了，在一些单位有这么些现象。但是，这些都不难纠正，很快就可以得到纠正。现在还继续在纠正。

现在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特别是党的“九大”精神和广大群众结合以后，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正在进一步调动起来，整个形势是一个团结胜利的新形势，是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新形势，这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第二点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一些“左”的或右的干扰，这种干扰是来自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来自我们的队伍内部，也就是由于我们还跟不上“九大”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左”的或右的情绪。

我们看形势，要用二分法。团结、胜利的大好形势，这是主流。如果我们看不到团结、胜利的大好形势，看阴暗面多了，就会把现象当本质，把支流当主流，就会颠倒形势，迷失政治方向，就要犯错误。

第三点就是保持清醒头脑，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这个运动的大方向，要高举起“九大”的团结的胜利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前进，不要被各种“左”的或右的思潮和阶级敌人捣乱，迷惑了我们的眼睛，来干扰这个大方向。阶级敌人正在希望我们背离这个大方向，妄图利用我们造反派的同志来干扰这个大方向，来搞一些“左”的思潮、右的思潮，使我们资产阶级派性回潮，看不清大好形势。什么“你那一派的干部解放多了，我这一派干部解放少了；在下放的时候，我这一派干部下放多了，他那一派干部下放少了；结合到办事机构时，你这一派的结合多了，我这一派结合少了”。我们说这些问题，缺点还是有的，但它毕竟是现象，是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只是在少数单位，少数的地区。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难克服的，是容易纠正的。现在还有个别人想再拉山头，这样子搞，对谁有利呀？对阶级敌人有利！阶级敌人最希望我们这样搞。这是不符合当前大方向的。所以，对当前的形势我们要用清醒头脑来看，脑子不要发热。

（二）要加强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点是：我们当前大讲团结，加强革命的团结，是“九大”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武器，是我们当前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开幕式上首先就号召：“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那我们是不是不团结的呢？

是团结的。但是从全国来看，不团结的因素还是存在的，由于过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我们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形成了内部的分裂，形成不同的观点，有一些不团结的因素。我们这次大会要以毛主席提出的团结作为大会的指导思想。“九大”开得怎么样呢？完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个指导思想去落实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大会出现了很好的形势，通过文件，协商名单，选举都是很顺利的。毛主席号召：“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要把“九大”的精神贯彻下去，要贯彻到各个战线上去。“九大”不久，我们正在进行深入传达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坚持不坚持革命的团结，是能不能完成“九大”战斗任务的关键，也是检验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重要标志。所以团结的问题，是当前的大方向，是“九大”的基本思想，也是毛主席在新形势下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都要为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为搞好团结，造成团结的气氛，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现在不要搞分裂，不要再重拉山头。再拉山头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的。如果把现在的形势看成是一个复旧的形势，要起来“反复旧”，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中央在批示山东王效禹等三同志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完全体现了革命的三结合的，至少不应该说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是旧班底，原班人马。我看今天在座的没几个是原班人马。革委会里那是什么原班人马，不是有几个方面的代表吗？有革命干部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至少可以说三结合有两班人不是原班人马吧！就是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群众的教育，世界现有了很大的改造，各方面都变了，是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的革命干部。因此，我们不能说当前是个复旧和反复旧的形势，我们不能把群众引导到邪路上去。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当前要搞好团结，搞好团结不是空话，这要实实在在地落实。有没有不团结的呀？我看有。我们大家现在有少数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利于团结，要很好地解决。要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做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不能摇摆，要跟紧。我们要来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

第二点就是要坚决落实“九条”、“五条”。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这是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基础，也是加强革命团结的基础。对中央关于安徽“九条”、“五条”批示的落实，坚决做到“一碗水端平”。有些地区有些问题，做的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继续落实。这里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在有的单位没有或基本没有按“九条”、“五条”办事，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一派掌权。在组织变化、人员下放、调整革委会办事机构等问题上，掌握不够好就出现这种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片面的反对所谓一派掌权，有片面性就不完全符合事实。要求完全对等，事物总是不能那么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多一个，少一个，这种现象总是要出现的。这也是当前值得注意的又一个倾向。

第三点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坚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当前资产阶级派性在有些地区和单位有些回潮，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要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原则来克服，要在发展团结、胜利的新形势下，做出新贡献。资产阶级派性是破坏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破坏革命团结的一条大毒蛇，必须坚决反对。要善于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

在出现不团结的地方和单位，要坚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原则，要高姿态，要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己、对事都要坚持一分为二。

（三）坚持“三不脱离”，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好群众代表。

这个问题在你们这个会议上我已经讲过了一次，对这个问题还是要经常讲、经常强调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在思想上都接受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群众代表“三不脱离”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的认识，要看到这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亡党不亡党、亡国不亡国的问题，这绝不是小事。

革命的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最大的特点，最大优点之一，它使革命委员会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我们“三代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革命委员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助手，我们一定要重视、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要做到参加生产，不要脱离生产。我们听说有个别的同志，从造反以来，就没有回到本单位工作过，没有回厂

参加生产。我们“三代会”的同志们，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好，起到桥梁助手作用，充分发挥我们“三代会”群众代表的作用。这是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重要因素。

群众代表坚持“三不脱离”的原则，是充分发挥群众代表作用的关键。我们在座的有参加“九大”的代表好几个，你们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听了毛主席的指示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听到这个指示，就赶快打电话回来，原来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值班占的群众代表很不少，值班就使群众代表回不了本单位。参加本单位的生产比在革委会值班更重要，值班无非是处理些日常事情，接待群众来访等等，这些事情，各级办事人员处理处理就可以了，办事机构人员，就是办办事嘛！我们代表要很快地下去，回到单位去。我们只有“三不脱离”，才能够代表群众，才能反映群众的事情和要求，才能带领群众掌好权，用好权，群众也才能对我们代表放心，才能信得过。时间短一些，回去比较容易，时间长了，回去就不好意思了。越不好意思回去顾虑就越多，群众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因此，我们经常回去参加生产，和群众的关系就会好了。

坚持“三不脱离”，是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是群众代表锻炼成长的必由之路。

希望同志们更好地举起“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努力地学习“九大”光辉文献，加强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命的团结，夺取新的胜利，在夺取新的胜利中，为人民立新功。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首届常委（扩大）会文件汇编》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

2011年11月20日修改

2007年10月23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6）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六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的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击，大进攻的大好形势下，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夺权了！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一场夺权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沿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关键的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依仗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政权、财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的围剿。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操纵一部分受他们蒙蔽的群众，组织什么“捍卫团”、“红色恐怖队”来保他们自己，荒谬地提出“保卫省委”、“保卫院党委”的反动口号，围剿革命派，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政权，控制了广播器材、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印刷工具，大肆攻击革命造反派，企图压垮革命派。他们步步设防，节节顽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最近他们拾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烂，采用镇压和收买的反革命两手，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财权，祭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法宝，直接和毛主席对抗，和党中央对抗，对以毛主席为代

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新反扑。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牢牢地掌握斗争大方向，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反扑。斗争考验了革命造反派，斗争提高了革命造反派。斗争使革命造反派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所以能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操纵利用一些保守组织一次又一次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小撮人手中掌握了一部分党权、政权、财权。

革命造反派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把造反的旗帜越举越高！就把夺权的旗帜越举越高！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派喊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口号：“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造反有理！夺权有理！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丧魂落魄！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保守派和无所适从的彷徨者猛醒！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革命造反派无限欢欣鼓舞！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一派大好形势。全国的革命造反派以上海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为榜样，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联合起来，并肩战斗，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掀起夺权斗争的高潮。这是伟大的创举！这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特书的光辉事件！

一切革命造反派都要更加坚定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建立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团结一切革命群众，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一场总攻击，大造其反！大夺其权！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掌权，谁掌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革命造反派夺权之后，完全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我们根本不相信没有他们就不行。一切低估夺权重要性的错误论调，必须立即收起！一切犹豫观望，害怕夺权斗争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懦夫观点，必须彻底清除！一切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有能力有智慧战胜一切困难，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想法，必须通通扫除干净！

我们热诚地希望受蒙蔽的同志起来造反！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吗？那就赶快破私立公，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杀回马枪！

我们还要向那些絮絮叨叨地埋怨革命造反派“粗暴”、“过火”的糊涂人大喝一声：你们错了！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你们如果真想革命，那就请你们赶快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集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目前，还有一些地区，一些单位，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他们这些家伙，采用改头换面的阴险的手段，继续死守阵地，负隅顽抗。我们严重警告这一小撮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造反派，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任凭你有十八般武艺，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也难逃革命的法网。你们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如果你们胆敢趁革命造反派夺权之机撂挑子，撒手不管，以新的形式负隅顽抗，那就叫你们彻底完蛋！

在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盘踞的堡垒，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一切权力统统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里！

（原载于 1967 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
周总理接见时说，王任重的病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了。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无政府主义。主席命令我亲自打电话，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样自由主义就泛滥到边缘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么回答？为什么现在要发表古田会议决议呢？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今天一样还很亲切，四十年前是我们那一代，四十年后是你们这一代。现在看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做得差一点。这就是我们犯罪。我这样说，并不是保王任重。如果传出去，有人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我这里说的是心里话，这样下去怎么行！

在谈到西安的革命造反组织时，总理说，力量很强大。内部问题多，西安的群众基础好，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们政治上不仅占优势，人数上也占优势，组织上也占优势。现在夺权斗争落后了。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各的特点，不过后来居上嘛！你们不要泄气。

当谈到驻京办事处同志与交大同志争执时，总理说：看你们争来争去，在这些小事上争，争鸡毛蒜皮的事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总理接着说：巴黎公社的原则要正确运用，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选出干部要稳定一个时期，对干部要给一个锻炼的机会。领导干部要稳定一些，不要不称心就换。你们这样气鼓鼓能夺权吗？我们对西安寄予很大希望。如果你们这样，必然推迟联合，推迟夺权。

看来你们目前力量很强大，人数占绝对优势。存在决定意识嘛，必然出现分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人多必然有不同意见，问题也多，现在要开门整风，准备夺权，你们已达 90%以上了，那就叫努力整风，准备夺权。你们的问题靠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教育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夺权也要靠自己。你们现在街上互相斗，我是不同意的。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队伍真正的而不是假的锻炼成无产阶

级革命左派才有力量，才能推动省、市委领导同志出来亮相，推动军区左派出来支持你们，不然你们你争我抢，他们不好表态。不管怎么样，三结合总能实现，问题全在于你们自己，军队是有纪律性的。军区的问题我知道，干部中总有好的，在于你们发现。军区问题好改变，好办，哈尔滨说解放军支持保皇派，后来他们作了努力，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解放军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嘛，不管怎么样，三结合必须实现。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对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

一、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二、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三、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司令员既是军区的政委，又是一省的常委）他当然要保省委了，这就不能说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四、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五、对待解放军问题。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持，如果大方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六、对待领导干部问题。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赎罪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查、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的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七、其它：

1、今后不提地区性口号，总的大方向口号只有中央提出，要强调地区性口号是错误的。

2、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评论”上提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句话是对当时形势提的。今后我们不要再提了。

3、“捍卫军”、“红卫军”（指复退、残废军人组织）都要取消。

4、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先是一个系统联合，然后再工、农、兵联合，因此在联合中不要跨行、跨业，已经跨了要纠正。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报道：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主席注）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即：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

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

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

抓好活思想；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来源：原载扬州《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11日，第48号第一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七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十一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吴斌，打电话给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来源：1967年7月26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6期；1967年7月29日北航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航红旗主办《红旗》。）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的经验》

1967.08.14； 中发 [67] 245 号

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各县武装部：

陕西米脂县武装部在支左工作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公开表态支持“一〇一”左派群众组织，但是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在关键时刻，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主流，看本质，看斗争的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支持“一〇一”革命小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这是很值得参加支左的军队同志，特别是参加支左的人民武装部的同志好好学习的。米脂县武装部帮助“一〇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革命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做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改变看法的。希望迅速改变过来。

（原件附后）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的红旗

陕西军区下属一百零四个武装部当中，米脂县武装部支左工作做得最好，被西安革命派学生称为“高高飘扬在陕北高原上的一面支左红旗”。在三次关键的时刻，县武装部坚定地支持了米脂革命派。

这个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以米脂中学为中心的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以米中筹委会为代表，一派以“一〇一”为代表。一月二十五日，榆林地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专区一些地方搞了假夺权。在米脂就操纵保守组织把矛头对准“一〇一”等革命小将，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时，武装部的同志们响应毛主席向解放军发出支持左派的伟大号召，面对米脂两派斗争，从一月二十四日至一月三十日，有时通夜不眠，调查和讨论应当支持哪一派。他们

紧紧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看主流，看斗争的大方向，越感到“一〇一”好。有的一口气给“一〇一”摆了二十条优点，感到“一〇一”一直是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月三十日，他们就挺身而出，公开表态支持正在到处受围攻的“一〇一”，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榆林专区，大长革命派的志气。但是，米脂武装部公开表态支左，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榆林军分区领导人指责他们“支持错了”，要“赶快纠正”，并电话通告其他武装部“要吸取米脂武装部的教训”。

县委书记，正副县长张恒德，贺成功，何天齐等人，多次要他们“改变态度”。公、检、法一伙人说他们支持了“反动组织”，“很危险”。保守组织也围住武装部闹个不休。街上出现了“拥军不拥崔孝堂（武装部政委）”，“打倒赵永夫式的人物崔孝堂”等大标语，公开谩骂武装部的同志是跟牛鬼蛇神坐在一条板凳上，武装部部长、政委和干事四次到榆林汇报当时的处境，要求给予支持，每次都是碰钉子。军分区司令员指着崔孝堂同志说：“党培养你几十年，你白穿人民的衣服，白吃人民的饭！”并在数次会议上公开批评米脂武装部。这使武装部的同志们一时失去依靠。一次，武装部连炊事员一起全体十二个人，坐在会议室毛主席象前，部长对着毛主席象流泪，政委崔孝堂对大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离我们远，毛主席的宝书可在我们身边啊！”他们一起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出了说“一〇一”“糟得很”，是“反动组织”的人，已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他们又和“一〇一”革命小将一起忆苦思甜。他们听革命小将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一次，崔孝堂同志说：“我六岁跟父亲从榆林逃到延安，全家贫困交加，八口人死了六口，剩下母亲和我，受尽折磨，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救了。支持不支持“一〇一”，是关系到米脂十四万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是支持定了。要是我支持错了，说明我没有学好毛主席的书，没有改造好思想，忘了本，那我就带着全家去杨桥畔（劳改场）也没有怨言。要是我支持对了，是我应该做的。”

干部们说：“我们都跟毛主席走。”三月二日，当米脂还处在二月逆流的白色恐怖下，米脂武装部又在群众大会上再次公开表态：坚决支持“一〇一”，坚决和“一〇一”站在一起。大大地鼓舞了革命派的斗志。但是，阶级敌人却对武

装部恨之入骨，抓住小将一些缺点错误硬往“一〇一”脸上抹黑，说“一〇一”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是“右派翻天”。公、检、法大整“一〇一”的黑材料，说“一〇一”是“反动组织”又一次想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以压垮武装部。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协助“一〇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他们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〇一”革命小将到街头、到农村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他们先后四次写大字报向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得到群众好评。他们还热情地、耐心地对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自己在政治上在组织上，都占优势。

现在，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转变了过去的看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铜总会和铜总司代表，根据“九·五”命令精神，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在铜川市人民武装部领导下，铜川驻军参加，邀请煤炭工业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等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双方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包括国防工厂、外地流入和自制的一切武器、弹药），自达成协议之时起，立即停止使用，并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

清点、造册、集中、封存，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和手段隐藏、私存和转移。如过时再有发现，武装部和驻军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如有抗拒者，应按“九·五”命令处理。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一三”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一三”通知办事。已抢夺的国家财产物资，要由组织者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回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人的财物，应迅速归还原主或按级上交。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查证落实后，立即按“九·一三”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对伤病员移交时要附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已死者要交还尸首；并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严惩。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保证交通无阻。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不动调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自觉地遵守革命的新秩序，坚守工作岗位，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工作，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使本协议家喻户晓，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谈判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执行。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予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谈判双方：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李振兴 秦广智 刘玉瑞
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司令部崔汉超 梁国政 张静轩
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主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的代表，根据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特急电的指示精神，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在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的领导下，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的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双方拥有的一切枪支、弹药（包括土枪、土炮等），自协议生效时起，立即停止使用；并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清点、造册、集中、封存，听候处理；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一切自制的刀、矛、棍棒，应集中封存，听候处理；任何组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或手段隐藏、私存，转移枪支弹药和自制的刀、矛、棍棒。如过时再有发现，部队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一三”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

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如数退回，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一三”通知办事。已抢夺的国家财物要由组织者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还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了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了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个人财物，应迅速还原主。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根据检举揭发的材料，进行落实后，按“九·一三”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伤病员要移交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并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惩处。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今后不参加外单位武斗，也不调动外单位人员或农民来本单位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不准殴打和绑架解放军。已经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其首恶者应建议有关部门予以严惩。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坚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时间不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要自觉遵守革命新秩序，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签字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以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渭煤系统红造总谈判代表（签字）刘育忠 云鸿儒 刘庆治 戴锦生
崔晓春联委谈判代表（签字）吴清海 成洪昌 王成新 温天兴 许智敏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主 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陕西军区首长接见西安交大革委会代表的讲话
〔时间：上午。军区首长：司令员黄经耀、付司令员黄传龙、胡德立、付政委吕明浩，交大革委会代表：李世英、戴慕蓉。〕

黄传龙付司令员：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次交大跑到前面去了，又占了上风。李世英同志亲自来谈心。本来应该是我们去交大的。（交大：首长忙）我们要紧跟主席思想，紧跟形势，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交大革命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仅在西安、陕西有很大威望，而且在全国有很大声望，起重要作用。上次我们在北京学习了几天，11月2日总理、康老接见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李世英就向全市革命群众传达了。这个我很受教育，经过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学习总理、康老接见时的指示，交大的同志、李世英同志紧跟主席思想，把中央指示的精神迅速在人民中传达，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深远影响的。我个人的落后就在这里，落后于革命小将。这样传达以后对西安、陕西文化大革命，对紧跟当

前新形势，对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是更有利的，是更有利于这个大好形势的，这说明了毛主席的指示的巨大威力。

形势什么时候都是好的，陕西、全国、全世界形势都是好的，现在更好。另一方面，李世英刚才讲了，敌情观念，要抓紧。出现一些问题是支流，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少数坏人在捣鬼，他们是一定要捣蛋的，就我个人来说坚定不移地站在主席路线方面还差得很远。毛主席他老人家水平最高最高，预见力最大最大，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照办，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因为我们水平最低，不可能主席指示一下来都马上理解，例如 1962 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打了大胜仗。主席指示要把缴获来的飞机、大炮等原封不动地，完整无损地还给印度政府。当时，我想不通，化了那么大的代价，在那样的气候条件下缴来的，还要完整无损地，坏了要修好还回去。当时我在 54 军，有两个师参加作战，我就是不理解，后来想，把坏了的送回去，把好的汽车留下来，就是讨价还价，中央一再指示要交回去，我们还是不肯，说是否少留几辆汽车，作为科研用。你看，就是对主席指示讨价还价，看不到这样做对印度军队内部的影响，对印度人民的影响。现在印度左派共产党起来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了，从国际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深远了，但当时不理解。再举个例子，1936 年我们捉住了蒋介石，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把蒋介石杀掉，当时我在三原，你（向黄司令员）在云阳。但主席指示不能杀。当时何应钦，日本帝国主义想要把蒋介石杀掉，制造混乱。如果把蒋介石杀了，今天胜利的时间可能不见得这么快。当然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所以对主席指示理解不理解一定要执行。根本问题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根本路线、方针，政策都在毛著中。我学得很不好，在 8134 部队中时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地方解散了群众组织。在耀县我们把耀县统指解散了，首先是交大同学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因此，三月二十号解散了统指，四月四日，在十条没下来前彻底平反了。要相信群众么！

黄经耀司令员：

一月份以后，主席赋予我们三支二军的任务，但由于军区对主席革命路线远远没有跟上，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在贯彻中央方针时必然出偏差。因此介入以后对西安形势发展的分析是有错误的。尤其是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正确，如对当时西安出现的打砸抢和“反右倾”的认

识是看得过重的。按照主席思想群众通过运动自己教育自己，这本身包含着允许群众在运动中犯错误，不然他怎么提高？怎么自己教育自己？由于看得过重，在处理上就有错误，如对 2.10 事件，1.28 事件，军区的 5.1 剧团，新华书店，抓了些人，对错误的定性都过高了，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错了。不能用旧制度的旧办法来处理新事物。十条下来后，贯彻行动不快，没有迅速处理，总是象主席说的那样扭扭捏捏，遮遮掩掩，不敢把错误公布群众。

庆华事件，开始把一方打成反革命，支持一方去抓人、游街。以后反过来，说错了，又把另一派抓了一帮子。把两派都得罪了。这不是得罪不得罪的问题，是贯彻主席路线过程中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允许群众犯错误，由于对主席路线理解不深，把问题看得过重，上纲过分，工联这方面对事件的处理到军区来搞了好几个月，这都是支左中错误。

在支左中应紧紧掌握阶级。阶级斗争，敌我矛盾。正如同志们讲的敌情，总理、康老一再批评我们敌情不强。回来检查确是如此，不仅批评你们，而更是批评我们，因为我们向你们讲得不够，支持不够，军队是搞专政的，不讲群众就概念淡薄。主要责任在我们，西安地方确实是敌人隐藏特务的据点之一，因为原来西安是旧西北军杨虎城、赵寿山、高贵之的基地，此后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基地大本营，解放后在西安、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镇反也不彻底。比如别的地区镇压了三个的话，陕西、西安只镇压一个，相对少了三分之二。西安地区敌人旧势力没有彻底摧垮，解放后加上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如赵伯平、赵守一，李启明都是敌人，都与香港、台湾挂了钩的。陕西各级公安部门都混入少部分敌人，很复杂，老的敌人基础没摧毁，新敌人又发展，加上西安是建设基地之一，敌人当然是活动中心。拿这些敌人去教育、告诉群众，做得很差。作为支左委员会和军区更应负责任，这次批评我们，我们更应接受教训，提高警惕。

总的来说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个初步检查，军区这次去集训也是通过学习主席著作很好检查这些问题，你们这次来谈心，对我们批评不够，希你们今后不断派人来提批评，有意见就应该提，不提军队也不知道。拥军，从什么地方拥？军队有缺点帮助指出，是最大的拥军。爱民也是这样，群众中有些缺点我们也要提，有问题尖锐提出批评，现在对你们提两点希望。

(1) 希望交大同学继续学习主席最新指示，继续学习主席著作。

(2) ……

主席的思想是最高最高的，我们的思想是最低最低的。只有通过学习，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主席思想，时时跟上主席思想，跟上中央。主席看得远，站得高，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我们坚信拥护毛主席，过去有一条只要毛主席说了我们就照办，杨代总长这次讲，一定告诉部队，主席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照主席说的不会错，否则要犯错误。（黄付司令：林付主席说，这是最聪明的办法。）这次搞联合，许多老造反派想不通，搞了一年，两条路线到那儿去了，不讲保守、造反了？主席讲了，保守是认识问题，即使立场问题也可变么，不是保一次就是保了，革一次就永远革了。文化革命一年多现在他们的方向对了，就行了么！有些群众跟不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跟不上，但有一点，中央一转我们就转，转的快慢问题。我们要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落后就挨打。老造反派象交大这样，应主席思想更多一些，把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有了主席思想，派性就少，私字就少，党性就多，要克服派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主席思想。

交大是全国起来最早的学校之一，全国有名的几个学校之一，我们要保持这个荣誉，发扬这个荣誉，保持一年多的传统继续前进。在这里同志们不要背包袱，过去交大的同学是不是背了小包袱，我是最早最老的造反派，在运动中没犯错误，在全国有名，在运动中成绩很大，各种问题处理不错，是否有些包袱？没有更好，有应该去掉，象你们这样的学校，应把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更高。

二、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七月十一日二十二时至十二日二时，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春桥、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接见了李瑞山、黄经耀，

胡炜三同志，在听取汇报中作了极重要的指示。现将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指示精神，综合如下：

一，在谈到省革委会成立以后，狠抓阶级斗争的情况时，中央首长指出：陕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全国镇反最少的地区是陕西，西安是胡宗南的根据地，坏人多，你们要继续狠抓下去。当谈到从清理阶级队伍看，大学教工队伍、机关、文艺单位，工厂中都隐藏着一些坏人时，中央首长指出：你们一个个把它解决好。大学教授很复杂，交大过去是南洋大学，有的教授就拿定息，你们是否可以要大学教授写写自传？当谈到采取了一些措施西安社会秩序有进步时，中央首长指出：现行反革命活动，刑事犯罪活动要按正常的情况处理。你们要把这些点出来，发动群众讨论，造成声势把坏人孤立起来。当谈到群众组织中有部分人员受右的或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对敌斗争大方向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帮敌人的忙，要很好地批判这方面的错误思想和行动。当谈到西安国防工厂、铁路系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展缓慢时，中央首长指示：西安的问题主要是要作好工人工作。二十一军在支左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没有把工厂这个重点抓好。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军队几家要把工人工作集中力量狠抓一下。你们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重申学生不准插手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左右工人，其它组织不准介入铁路和国防工厂。要交枪，要点幕后操纵的走资派和坏头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上海、北京、兰州所以稳定，就是做好了工人工作。

二、当谈到省、西安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原来的西安两大派都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革委会讨论问题时一般都能够站在党性立场时。中央首长说：这很好。当谈到两派部分人员中还有在未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和单位争核心、争优势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教导说：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当谈到有些人想一派掌权、把另一派群众赶出来，或采取高压手段、抓人、打人、“四大”不能正常开展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行的，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是一派人数很少，也必须联合，绝不能压，压是压不垮的。至于名额多少，可以从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协商解决，采取高压手段更是不能允许的，“七·一”社论讲了，不能对群众专政，要教育大家正确对待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跑

出去的要请回来，特别是多数派要正确对待少数，要采取主动，要高姿态。当谈到有些单位、有些地区、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做了一些坏事，在本单位呆不住，带领少数人长期跑在外面，有的甚至到外面参加武斗时，中央首长指出：不少地方有这个问题，要指出长期脱离本单位、本地区是错误的，要搞清楚把坏人点出来，把群众动员回去。

三、谈到在阶级敌人挑动下，从四月初以来，安康、汉中、渭南、延安专区以及成阳、商雒专区的部分地区，连续发生武斗，双方都组成了专搞武斗的队伍，武斗的方式是专区甚至到邻专区去机动作战，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时，中央首长指出：这还是搞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阶级敌人挑动的，这种武斗组织必须解散，武器必须收缴，被挑动进城武斗的农民要立即回社、队，离开本地区、本单位的要立即回本地区、本单位，中央首长还进一步指出：有的武斗组织被坏人操纵，已不是一般群众组织了，他们利用这些来反对我们。要把坏头头点出来，把他们做的坏事揭出来。当谈到有些群众组织混进不少坏人，在坏人挑动下，做了不少坏事，如抢银行、仓库粮仓物资；拦截汽车、火车、抢劫物资、任意打死、枪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武斗中炸毁大量民房，烧毁仓库，造成大量损失；中断邮电交通，几个专区、几十个县长期看不到报纸、文件，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公开抵制和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规定；围攻、谩骂、殴打解放军宣传人员。中央首长指示：你们要公开宣布这些都是反革命行动，要发动群众搞臭这些东西。各个群众组织都要开会发表声明，对这些问题表示态度，要在陕西日报上公布。“七·三”布告适用于全国，在布告发出以后还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谈到不少的群众组织把自己说成是共产党把对方说成是国民党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极大歪曲，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个群众组织里面都有国民党，要抓混进自己组织内的国民党。当谈到有些专区的群众组织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搞大规模武斗，想用武力打垮，消灭另一派时，中央首长指示：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完全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武装夺权，绝对不能承认。一定要停止武斗，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都应该按照“九·五”命令上交。要按毛主席的教导：革命

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武力打垮另一派,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谈到有原当权派插手专、县武斗,群众组织里有坏人,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搞清楚把这些人点出来。中央首长问西安两大派是否插手专、县武斗?我们说发现有人打着两派的旗号在下面活动,但问两派负责人时,他们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组织派的。中央首长指示:要他们公开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当我们谈到最近一个时期专、县问题比较突出,我们感到支左力量薄弱,好几个专区没有支左部队,请求中央能否增派一些支左部队时,中央首长说,你们的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

四、在听取汇报中,中央首长指示:要狠抓阶级斗争,当前专县和西安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你们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集中进行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为主要内容,针对陕西和西安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新宣传中央、中央文革有关的指示和规定。省革委会要开会讨论,根据“七·三”布告精神,列举出陕西省和西安地区的反革命行为事项,做出决议,要在西安和各地召开群众大会,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向群众作报告,各级革委会、军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对“七·三”布告和省革委会的决议都要表态。你是拥护不拥护中央的东西,拥护就要表态,就要坚决支持,贯彻执行。要点出一些坏人坏事,这样群众就不再受蒙蔽了。如兴平的孟照亮是罗瑞卿、王昭的忠实干将,有的人还说他是“革命领导干部”,要公开点出来。针对存在的问题,大量印发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指示、规定,如“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通知,“九·一三”通知,以及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等等。交通不通的派飞机散发,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怕向群众宣传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们就是要控制和蒙蔽群众,有些人打着贫下中农招牌,威胁利诱农民搞武斗,其实他们是反对贫下中农的。总之要展开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把坏人坏事搞臭,把武斗搞臭,批判错误的论点、这样处理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了,否则,你处理这些问题,他就和你唱反调。

五、中央首长问到北京办学习班情况时,我们说,只是省军区部队干部在北京学了一期。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没有在北京学习班吃了亏。中央批准你们在北京办。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解决各地存在的问

题。你们下决心在北京办。办它六七千人。地方干部，分区，武装部干部，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西安两大派的大头头都来。有些人不愿意来，你们省革委会点名要他来，不来就是对抗中央，要在群众中公开宣布他。你们一方面展开宣传工作，一方面筹备学习班。宣传工作搞一段落，即可到北京举办学习班。在分区，人武装部干部大量抽出来学习后，你们考虑是否从二十一军、兰空、西办临时插调一批干部加强各分区工作。

三、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党中央：

关于“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根据有关同志的来信要求和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接触到的材料，最近作了专门清理。现将查证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这一提法，在西北地区最早出现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西北局转发的一期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简报中。原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西北局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上，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传达报告》中，按照西北局的提法，同样说过“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个话。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所谓审查习仲勋同志问题的专案，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所谓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一九六五年原西北局把经过康生审定的陕西省委《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高、习的罪恶影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了一批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九六六年六、七月，在原西北局召开的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和在这一会议精神指导下召开的陕西省委四届五次

扩大会议上，又搞所谓挖“彭、高、习反党集团”在西北和陕西的黑线人物，打击迫害了一批同志，影响很恶劣。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康生先后多次接见××等人，说什么“陕西敌情严重”、“西安是国民党的特务基地”、“西安机关比任何地方都复杂”、“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把陕西西安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并且指名道姓，点这个，指那个，要求一个一个揪出来，“扫除祸患”。这就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定了基调。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老干部，编造出陕西有胡宗南、彭高习、地下党三条所谓黑线。他们借“清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解放以来，省委历任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他们把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五十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进行法西斯迫害。他们不断地反“右倾”、反“复辟”，大整所谓“彭、高、习的右倾复辟势力”。本来陕西的土改、镇反是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的，镇反的控制比例数字也是中央批准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但是他们却不顾事实地胡说什么“由于彭、高、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造成“陕西土改、镇反极不彻底”，在“清队”中补划地、富成份，包括“四清”时补划的在内，把×万多户劳动人民错定为地主、富农，被他们乱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数也很多，严重地搞乱了阶级阵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给一大批小说、诗歌、戏剧、革命历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加上“为彭、高、习歌功颂德”的罪名，打成“反党文艺”、“反党党史”，许多参与编写和提供材料的同志横遭迫害。

以上情况说明，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训是很沉痛的。鉴于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都分别作了纠正，错补划的地主、富农也已改正；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过去在

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必要郑重宣布予以平反昭雪。为此，我们建议：

(一)对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一概推倒。

(二)“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上报下发的报告、讲话、决定、通知、传达提纲等材料，涉及所谓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反党的内容，按照中央《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所确定的原则，“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三)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被打成“反党文艺”尚未处理的，由宣传部门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平反。

(四)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尚未平反的要很快平反。错误的结论和处分应予撤销。有关检查和揭发材料，按照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清查处理。

以上妥否，请批示。

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1980.01.11；中组发[1980]2号

中央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请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组织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 1981.02.13；中组发[1981]4号

中央组织部批语：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对蒙定军等同志来信的批示，我们对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前身为十七路军）我党地下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康生在接见陕西军区、驻军和西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西安地方是特务躲藏的窝子，还有杨虎城和赵寿山等等这批人也安插很多，应该把这些研究一下。以后在“清队”阶段，有些单位就大搞深挖所谓“杨虎城、赵寿山这些留下的基础”，把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诬陷为“黑党”、“假党”，把地下党组织中许多为党工作的革命老同志诬陷为“真国民党，假共产党”，是“叛徒”、“特务”，进行残酷迫害。据初步调查，在陕西工作的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包括去世的）有六十三人被整。其中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死后还被声讨、批判。许多长期与我党合作的进步人士，也被诬蔑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遭到迫害，家属受到株连。

（二）

调查的事实证明，把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诬为“黑党”、“假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一、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工委建立以来，一直是受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的。据汪锋、周仲英等同志证明，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加强我党对三十八军的工作，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又增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十八军成立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党中央对工委工作十分关怀，毛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曾在延安多次听取工委的汇报，对工委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工作方法，都作过明确指示。

二、工委在原三十八军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工作的。工委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着重抓了对旧部队思想作风的政治改造。在连队建立了学习小组，开展了新作风活动，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积蓄了革命力量；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国民党军校，毕业后回部队担任排、连、营职务，逐步掌握部队。同时，在中上层军官中，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三、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及时组织部队起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大造三十八军“赤化”、赵寿山包庇“异党”的舆论，并指调三十八军中几十名所谓“异党嫌疑”分子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洛阳干训团和西安劳动营受训。工委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正确对策，通过做上层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保护了革命力量。一九四四年三月，蒋介石使用阴谋手段，调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派蒋的亲信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即着手以其嫡系替换了该军所属十七师连以上军官，凡被他们怀疑为共产党员的营、团干部陆续撤职、关押。在这种形势下，工委及时将暴露了身份的我党地下党员转移出该部队，并报告党中央，请求批准组织三十八军所属部队起义。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同年六月，一七七师一部在河南辉县起义。三十八军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壮大了革命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先后给予嘉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党中央命令三十八军起义部队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对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给予肯定。一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我党派往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孔从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给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强加的“黑党”、“假党”的罪名，纯属诬陷，应予彻底平反。

(三)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中，对因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党员，进行了平反、昭雪工作，绝大部分人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对所谓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是“黑党”、“假党”这起冤案尚未平反，恢复名誉。为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意见：

一、为“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黑党”、“假党”等莫须有罪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对因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地下党员彻底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对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做好善后工作。对致伤、致残的，要妥善安置。对形成的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要按有关规定进行清理。为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消除影响。对参加原三十八军起义的党外进步人士，因这起冤案受株连的，应按中发[1979]6号文件，即中央批转《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妥善予以解决。

三、共产党员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工作期间的党龄、军龄、工龄问题，应按中央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四、鉴于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现在有不少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为解决他们因这起冤案受株连的问题，请考虑将此报告批发有关省、市、自治区。妥否，请批示。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1981.09.09；中办发[1981]34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决定：为所谓“红旗党”一案正式平反。现通知如下：

在一九四三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曾把原甘肃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打成所谓“红旗党”，诬陷这个同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还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所谓“红旗党”一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一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给受到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但对整个所谓“红旗党”的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作出全面的结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多次审干的审查，证明上述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英勇地领导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和从事各种对敌斗争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一部分同志诬陷为“红旗党”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康生制造这一假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央决定给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它地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要彻底平反，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不开追悼会）；有的同志因此失掉了党籍，要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人事、干部档案中如有这类不实之词的材料，要取出销毁。希望曾在这些地下党组织中工作过的同志坚持为党为人民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登党刊）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2008 年 7 月 29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0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7）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戚本禹对沈阳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代表的谈话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派和沈阳总部的代表出席〕

戚本禹：夺权要三结合，军队、群众、机关造反派。同时要团结老干部，对老干部不能都打倒，每个人都有毛病，老干部经过长期斗争考验，有斗争经验，要看大节，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邓路线。对老干部要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针。特别是路线错误，很多人都犯了。他是领导，不执行行吗？当然，他不检查就要批判，但仍要挽救，我们对黑帮分子还要改造嘛！

对于军队问题。军队问题军队自己解决。要按中央指示办事。不要冲军队。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去冲击。

（这时沈阳总部代表谈到沈阳军区以及辽宁军区的问题。）

对于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所以不谈具体意见。

（问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什么时候写的？

李劫夫：是六二年末、六三年初。

戚本禹：《女民兵》什么时候写的？

李劫夫：具体哪年不太清了。是三八节出来的。

戚本禹：你们对劫夫同志有意见？

（答：是，还不是一般意见。）

戚本禹：可以同劫夫同志当面谈吗？

（答：可以，当面还要批判呢）

对劫夫同志我不太了解，你们最了解，但是我想保他一下，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我请示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倾向这个意见，我不认识他，今天也是第

一次见面，以前只是在报上看了他的歌。我不懂音乐，也不会唱歌，小学音乐才六十分。但是好的歌曲我愿意听，好的革命歌曲能激奋自己。

这几年，音乐界阶级斗争很尖锐，从这几年来看，劫夫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是执行主席文艺方针的。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体会很真实。

特别印象深的是在困难时期，修正主义分子攻击我们，国内外敌人攻击我们时，我听了一个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反映了我们中国人民不怕困难。迎着困难前进的英雄气概，我打听是谁写的，说是劫夫。那时候文艺界乌烟瘴气，他的这首歌起了很好的作用。

六三年我去沈阳，过去我对历史很有兴趣，那次我去东陵，回来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些女同志唱《女民兵》，我第一次听这个歌曲，问了一下谁写的，又是李劫夫，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其他的不说，就突出说这两件事。

去年，东北一个音协的张文彬，在医院里，他是搞音乐的，向他请教音乐界的问题，他讲到东北音乐界，认为劫夫同志是好的。

根据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不错的，他是老干部，参加革命很多年了。比我还早呢？！对过去是有贡献的，从他来看，他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

我们的意见供你们参考，你们的材料，我们回去也看一看，我们这些意见彼此交流一下。

你们是否从整个历史上看一下，看他的创作历史，看实践，重新审查一下，考虑考虑他是不是三反分子，是不是四类，我看不是，而且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他有错误，可以检查，改正，和我们共同战斗。他最近还在写毛主席语录歌曲（100条）。过去一定说过些错误话，这是肯定的。你们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

文革小组也倾向这个意见，让他回去，一起和你们参加斗争，能过关就过关。假如你们认为他还是三反分子，也可以写材料。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音乐界的人你们可以排排队，张权、李凌……。张权和他，谁是自己的人呢？劫夫同志还不是那样的。过去的不说，社会主义时期也创作了不少好的东西。劫夫不是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主要看音乐实践，你们可以整个研究一下。他的曲子是豪放的、健康的、革命的、乐观的、鼓舞人们斗志的。

你们可以考虑他是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要帮助他，让他和你们一起战斗，给他革命的机会，给他战斗的机会。

你们都唱过劫夫的歌曲吧？

（答：唱过。）

好，才唱，坏的，就不唱了。

（对劫夫）劫夫同志，不要强调这些，要严格要求自己，老干部，许多地方不如小将，要向小将们学习。本应该你率领小将前进，不但没这样，反而落在小将的后面，你的错误要检查。就压制群众这一条就该深刻检查。

（红色造反团的战士说：我们一定负责把首长的讲话转告我们总部，并且按照执行，我们一定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

（我们澄清两个问题：劫夫不是我们带来的。我们对劫夫没有定性，我们有很多人在搞调查，我们是先揭发，后批判，再定性。现在没有定性他是三反分子，有些人过激些是可以理解的。）

戚本禹：我非常赞同这一点。

（红色造反团战士：在《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同时，他又批准一批毒草出笼。对张权十分宠爱，赠诗送画，作曲。我们认为是两面派。）

戚本禹：这是立场不坚定。因为我要保他，所以好的方面讲得多些，你们可以理解。

批评他不要戴高帽，不要“喷气式”，还要给他创作的机会。回沈阳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要拘留，不要抄家，要让他自由，你们能办到吗？

（红色造反团战士：一定按首长指示办事。）

戚本禹：不是三反分子这一点你们双方一致，都没定性，那就好。我要去开会，你们谈吧。

（戚本禹同志走后，红色造反团的战士和沈阳总部的代表同戚本禹的秘书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陈毅接见辽宁朝鲜归侨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陈毅副总理二月十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辽宁朝鲜归侨代表。在会上陈毅副总理代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向大家致以亲切的慰问。

陈毅副总理对代表们讲话中说，你们的爱国革命精神很好。你们要求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记下来了，我一定给你们办。你们不愿给国家造成负担，很对。能工作的工作，能劳动的劳动，不能劳动的也应得到国家的安置，我一定答复你们的要求。

陈毅副总理还说，希望你们一部分人参加侨委工作，中侨委已经瘫痪了。按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提出的领导机构必须“三结合”的指示，重新组织新的“三结合”机构，将瘫痪的旧中侨委砸个稀巴烂！

最后代表们要求通过陈毅副总理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同志问好。

陈毅副总理点头说：“好！好！一定带到！”

（全场掌声雷动，人们高呼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七年二月，21·1联合调查组：《一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丑恶嘴脸》

沙均兆、杜忠智、李乃华、张要武、孙红武、邵玉凤（女）六同志，均系贫下中农出身，青年工人（有的是代干），在四清运动中发展的中共预备党员，他们最大年龄二十四岁，最小的才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阳市委把他们抽调到沈阳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工作，被派到各中学去镇压学生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十六条发表以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哺育下，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实际斗争也教育了他们，工作团所执行的路线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背道而驰的。工作团所到之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逍遥法外，而敢于造反的革命闯将受尽种种抨击和迫害。他们逐渐认清了工作团犯了方向性错误。于是，他们起来造反了。去年八月十八日，沙均兆等六同志写了《辞职书》，递交给市委和工作团，声明不再充当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消防队员，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接着，他们陆续写了《文化大革命的绊

脚石——中学工作团》等革命的大字报，炮轰市委、砸烂工作团。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李青等一小撮人明白，沙均兆等革命的工作队员，是省市委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的见证人。李青等看到革命烈火烧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市委匆匆忙忙地做出决定，解散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团解散以后，沙均兆六同志被留在苏家屯社教分团，集中在市委党校整训，准备派到农村参加四清。在党校整训期间，沙均兆等六同志继续揭发了省市委的许多问题，并且组织了革命队伍，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烈火大有燎原之势。九月十二日，在《揭发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上，沙均兆等同志联名揭发了省市委及工作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李青参加了这个大会。市委对沙均兆等革命小将怕得要死，惊魂未定，就急急忙忙地做出决定，宣布社教分团马上进点搞四清，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李青等人的这一阴谋，立即被分团的革命群众所识破，沙均兆等革命同志立即召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誓师大会，强烈要求留下社教分团，继续揭发市委的问题，肃清文化革命工作团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会上宣读了《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会后，他们把《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散发到沈阳市各处。沙均兆六同学的革命行动，使李青等一小撮人闻风丧胆，又恨又怕，把这六名同志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十四日，王焕然、冯玉麟、朱德广、李凤祥随同王健向市委书记处作了汇报，李青接见了他们。杨春甫、李青、陈鹤轩、刘宝田、朱维仁等立即召开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对策。李青传达市委的决定说：“书记处同意大家留下，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李青还居心叵测地指示：“分团不要出面领导，不要出点子，有事直接向市委汇报。”主子下令，奴才卖命。九月十四日，在王焕然、王健等的精心策划下，纠集分团的保皇小丑，成立了分团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抗。暗中，王焕然、王健之流，拼命给他们的心腹打气，多次非法开介绍信调查沙均兆等六同志的问题，为抓右派作准备，可是表面上还不露丝毫痕迹。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分团红卫兵协商，双方都认为，“目前，问题已经揭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揭的了。”九月二十一日早晨，沙均兆、郑福山两同志代表大家要求分团尽快安排大家下乡帮助秋收，参加四清。朱德广阴险地说：“不要着急，国庆节以前不下去了，农村的四清已经停止了，不要着急下去。现在大家意见不一致，反映还不一样。有的人揭完了，但还有些

问题不清楚，大家要怎样解决就怎样解决，我们支持你们。” 王焕然、冯玉麟忙于奔波，一切准备就绪。二十日，王焕然、冯玉麟向市委作了汇报，请示斗争办法。市委指示抓住《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中的枝节问题，把沙均兆六同志打成反革命。王焕然供认：“二十日汇报，我们汇报了《强烈抗议》和《呼吁书》的内容，要市委明确地给个底，群众相互之间要批判，要辩论，符不符合十六条。”开始找到陈鹤轩，陈说：“这事得找李青。”找到李青，李说：“两书可以辩论，大家可以澄清澄清。”当汇报到两书（《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中有“与世隔绝”、“世外桃源”时，李青大发雷霆，气愤地说：“什么‘与世隔绝’、‘世外桃源’，这是看旧小说太多了吧！”从而给他的打手做出了抓辫子，把革命群众一棍子打死的示范。 九月二十一日，王焕然等召开各队支部书记会议，把李青旨意渗透下去。当天下午，这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事件就开始了。 在大会围攻期间，市委唯恐围攻不力，拼命给部下打气。肖佐汉在回答围攻六同志是不是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时说：“你们到农村去搞四清，那里是第一线，斗牛鬼蛇神，在这里也是第一线。可以斗吆！”一句话泄漏天机，这帮混蛋早已把沙均兆六同志打成牛鬼蛇神。分团的大事记中也写道：“九月二十一日，绝大多数群众把矛头指向了右派。”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罪行留下的铁证。在围攻期间，分团的一小撮保皇小丑，还把沙均兆六同志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找来，由副团长冯玉麟等亲自出马，介绍他们的反党罪行。冯玉麟说：“他们对准市委，想整垮市委，决不是小事情，这是方向问题。”李青等一小撮人，给沙均兆六同志归纳了莫须有的四大罪状： 一、扭转了沈阳市斗争的大方向； 二、挑动学生斗工作队员； 三、拖住四清工作队，不能按时进点，打乱了市委的四清布署，包庇了农村的地富反坏右； 四、四十多个学校的学生到市委要材料，给市委增加压力，降低了市委威信，把矛头指向省市委，炮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李青等一小撮人，利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六同志进行斗争。只许六同志逐条承认反党罪行，不许他们反驳。当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语录时，会场高喊：“严防扒手”“不许打着红旗反红旗”“不准争取群众”，当六同志理正严词地指责他们违反十六条时，一小撮保皇小丑恶毒地攻击：“十六条适用于学校，对我们这儿不适用。”他们采取车轮战术，不让六同志休息，强行拉出去“辩论”，逼迫六同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当有人说：“这

六名同志的世界观还没有成熟，都很年轻。”保皇小丑就暴跳如雷，大声叫喊：“别看他们年轻，北京枪决的杨国庆年轻不？”在他们的逼迫之下，六同志有的五十多个小时吃不进饭，有的同志因为被打成反革命给朋友写了绝笔信。李青等一小撮人，对敢于造反的革命闯将的残酷镇压，真是触目惊心。九月二十七日，在斗争大会上，沙均兆六同志据理相争，坚信自己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向省市市委提出一系列质问，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阴谋诡计，李青的打手当场丢丑，被追得理屈词穷，目瞪口呆，群众也逐渐明白了事实真相，李青、王健一小撮人的画皮面临揭开。这下，可吓坏了王焕然、朱德广等保皇小丑。当晚急急忙忙召集分团负责人会议，经过精心策划，停止第二天的“辩论”。王焕然、朱德广急忙请示市委，陈鹤轩接见了他们，以后李青也知道此事。陈说：“你们暂时可以缓一缓吧，要澄清澄清，弄个东西出来纠正二书（《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挽回影响。”从此，大规模的围攻告以段落，相继而来的是小会“帮助”，强迫六同志检查，修改二书。老实告诉李青等一小撮混蛋，大型斗争会上得不到的东西，小型围攻会上更是得不到。沙均兆六同志被逼得吃不进饭、睡不着觉，星期天都得检查。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剥夺了沙均兆等六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和权力。从九月二十一日到十月十日，长达二十一天的逼供期间，李青等一小撮人耍尽各种流氓手段。李青指使他的奴才和打手，造谣中伤，暗中在六同志一人的面前说：“他的家庭历史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过去就对社会不满，他对党劲这么大是有原因的，你不能跟着他瞎起哄。”妄图使六同志离心离德，从而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赵景才曾对邵玉凤同志说：“你的问题轻，承认就算了，不要象他们那样，应该知错必改，悬崖勒马！”暗中，派遣“特务”，跟踪盯梢尽极镇压迫害之能事。李青等一小撮人，因时因地不断改变斗争策略。十月十一日，市委把分团的队员放跑以后，沙均兆等六同志留下来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省市市委，他们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李青等一小撮人更是慌张。他知道，对这六个坚强的革命闯将，威逼是不行的，就在生活上多方面“照顾”、尽力“关怀”，妄图收买他们。王焕然说：“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一定照办。”并说：“住在市委党校很不方便，可以住到沈阳宾馆，也可以住到辽宁大厦。”李青点头称是。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李青等一小撮人为了达到对沙均兆六同志政治迫害的目的，竟然要年轻的

女同志充当特务，有意亲近他们，打进六同志的内部，作李青等一小撮人的耳目。李青、王健、王焕然等一小撮人的灵魂是何等肮脏，居心是何等狠毒，手段是何等卑劣！《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敲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李青等一小撮老爷们，不仅不认识错误，相反地继续以新的形势来欺骗群众，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十月四日，陈鹤轩就派王健来市委党校煽风，说农村要人。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市委吓得魂不附体，陈鹤轩派王健传达市委书记处决定，十月三日下点搞四清，（李青已承认：象这样的事情由书记处决定）逃脱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责，妄图蒙混过关。当即遭到杜忠智等同志的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必须批判市委及社教分团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交还黑材料。串联的革命学生也强烈抗议。但市委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不但没按原计划退出党校，反而于十一日上午把人全部放走，动作之神速，出乎意料！提前两天，鬼在哪里？

下列事实可以说明：

- 1、十月十日，王健来党校根本没提在十月十一日上午工作队全部撤离党校。

- 2、十一日早七点三十分左右，清华大学孙仁佳哈工大李延二同学到分团找冯玉林，冯告诉孙、李：“工作队马上要进点四清”。孙李二同学十分气愤，当即去找李青。冯当时已经查觉孙李二同学不满，有闹事的可能，但是冯在八点三十分召集的队长会上仍然按头一天晚上的决定布置。
- 3、孙仁佳、李延二同学找到李青后，把党校集中的三百四十多名工作队员十一日要下去参加四清的问题以及杜忠智等六名同志要求全部留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见告诉了李青，并要求李青采取紧急措施，把人留下，李青当时频频点头、答应把人留下，杜忠智同志也找到李青。李青讲：“我已经知道了，孙仁佳和李延同学已经跟我讲过了。”并说：“我已经打电话联系了，人不走了。”其实，他早已把人放跑了。
- 4、王健供认，十月十一日以至以后李青根本没跟他谈过要把340名队员留下。当我们找李青调查此事时，他吓得面色发黄，哑口无言。事实俱在，是抵赖不了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我们找李青调查这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的过程中，李青利用各种机会，大肆放毒，狂妄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十月二十一日李青说：“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就是犯方向、路线错误，而搞四清派工作组就不是犯方向、路线错误呢？到现在我也没搞通。”请看，李青

哪里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思，他还在疯狂地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就在同一次会上，李青还说：“噢，你们还不相信我，我要是这样，那不就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了吗？！市委就不是共产党的市委，而是国民党的市委。这样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李青真是混蛋透顶，把自己比作党的化身、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充分地暴露了李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野心家！

李青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经陷于革命群众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要群起而攻之，全党共讨之，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1 • 1 联合调查组 联合调查组组成单位：沈阳市原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野火》《漫天雪》《真理》战斗组清华、北大、北京广播学院、沈医部分革命同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工沈农驻市人委联络站、沈阳市人委红色造反团部分成员（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红旗报》1967年2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鞍钢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

〔时间：七月二十五日晚，地点：中南海小礼堂。李富春李先念参加接见。〕

我们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愿意生产，毁了一个焦炉，要一两年恢复。我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先进。我就不相信鞍钢十几万工人不愿生产，一天只炼×××吨铁，但代表在这里开会几个月，而对生产搞得这个样子不痛心，看看这么大一个企业搞成这个样子不痛心。鞍钢都停产，我们是不怕的。问题是你们这样搞完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你们派别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超过了国家的利益吗？个人争面子，不为国家，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

你们在原则的基础上为什么不能联合？双方见面完全像个敌人。一年来，你们更往敌我矛盾发展了，这怎么解释？见面就动刀，开了枪，就烧房子，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劳动人民建设起来的。现在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你们学习，但先要学习林彪同志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中央文件很多，你们学了，没有用。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希望你们鞍钢生产这面红旗不要倒下去，当然也倒不了，倒了也有人扶起来。焦炉停了，还会有人恢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生产停了，没有人说话，不痛心，听不见工人的声音。

彼此都是阶级兄弟，有的思想激进一些，有的保守一些，但是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不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鞍山的王、赵、罗、钟来批判？把相互之间的小不和要放在次要地位！

周总理责成鞍钢付经理林云侠保证执行《鞍钢赴京代表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同时警告保字号“大联合”，不得以任何借口，撕毁协议，挑起武斗，破坏生产，并且要派李富春、李先念付总理去检查。

周总理在这第二次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又痛斥了王鹤寿，

他说：“军队支左，支持反王（鹤寿）、钟（剑平）观点，有倾向性是可以的。我也有倾向性。我就不相信王鹤寿，不赞成王鹤寿，他在冶金部呆了很久，搞成一言堂，一塌糊涂，不可以相信，没办法，下放鞍钢。开始生产搞得还好，文化大革命，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王、赵、罗、钟肯定是不能回去的，停职反省是最轻的了！王鹤寿还有历史问题。难道鞍钢离了王鹤寿就不能活了吗？”

周总理临走时，最后强调说：“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国对准刘、邓、陶、薄、鞍山对准王、赵、罗、钟，在大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

附：中央首长批判王鹤寿

李富春副总理在六月十三日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说：“王鹤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月十日又说：“王鹤寿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八月一日凌晨，谢富治付总理亲临北京钢铁学院，关切地问：“你们钢铁学院是不是直属冶金部的？”革命造反公社战士答：“是”。在谈到大批判时，谢付总理说：“你们钢铁学院搞钢铁都是一样的”，“对刘、邓、陶、彭、罗、陆、杨的斗争批判都是一样的吧！”，“还有个王鹤寿也不好斗！”，“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斗嘛！”，“毛主席说要搞好钢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谢富治副总理八月十六日又说：“王鹤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周总理八月二日凌晨接见湖南代表时，在谈到鞍钢支左问题时说：“王鹤寿不仅是反动路线问题，而且是反党分子，蒙蔽了大量群众，很多人中毒很深。”

陈伯达同志八月八日接见赴东北代表团学生代表，谈到鞍山问题时说：“王鹤寿是老大叛徒，大坏蛋！”

（来源：1967年8月26日北京钢铁学院《东方红》第2版，以及其他材料。）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李富春接见鞍山鞍钢两派代表讲话摘要

必须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谁都是一个考验，看谁没有诚意。我们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解放军，这是首先要讲的。如果不把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总理不接见你们。

（一）大方向问题，你们来两个多月了，谈这个协议也谈五六天了，两个多月以来，你们看得东西不少了，你们的大方向掌握了没有？天天打、砸、抢、杀人，弄得停产，大批工人离厂，这不是大方向。你们应该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进行本部门的斗批改，进行三结合，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才是斗争的大方向。

（二）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解放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但你们现在作的，把工人阶级领导到敌对情绪，对解放军采取敌对的态度。这是毛泽东思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最后一点我想谈谈各革命组织谁也不能压谁，谁也不能打垮谁。最后都要实行斗批改的，实行大联合的。是革命组织不要压人，是革命组织也压不垮。

群众之间绝不能用停发工资这些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斗争呢，不是经济斗争。用经济斗争处理政治斗争是错误的。

（来源：1967年7月25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5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为了坚决贯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坚决贯彻中央《六·六通令》，立即煞住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迅速恢复正常生产，保障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对沈阳市人民粮、油、煤、菜、水的供应，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停止打、砸、抢、抄、抓、杀。各方面已抓的人员，要立即清查，提出名单，然后将抓去的人员全部无条件的送交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由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组织各方分别接回。

二、立即就地彻底清查武器和各种武斗工具。各方面都不得隐藏和转移，然后加以清点上交，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要如数的退还给原单位。今后不准抢夺各种武器和爆炸品。国家生产的武器装备，任何群众组织不得动用。各种武斗工事要立即拆除。今后如再发现那一方动用武器、刀、弓、箭和其它化学、爆炸物品，由本协议监督小组和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共同调查处理。对于首先挑起武斗和动用武器和其它工具打死人的凶手及其幕后操纵者，要予以严惩。

三、迅速恢复正常生产。首先要恢复交通，各方占用的公共汽车要立即放回，各路公共汽车，有、无轨电车要立即通车。占用的生产车辆要立即退回原单位，群众组织不得动用生产车辆。今后都不得拦路劫车，保证驾驶人员的安全。然后组织动员群众返回原工作、生产、学习岗位。有不同观点的对方，不得歧视、驱逐，要确保返回人员的人身安全。并照发工资与助学金，过去抢夺的个人财物要立即退还。从外地、外单位调来参加武斗的人员，要立即返回原地和原单位，各派不得互相袭击，违者按《六六通令》予以严惩。

四、各方要立即查清混入组织内部的不符合公安六条规定的和其他坏人，协助沈阳卫戍司令部和专政机关维护社会秩序。

五、由各方派出三名代表（其中至少有一名常委），与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由张海棠同志任组长，由薛殿卿、孟繁志、徐广林、贺铁民等四名同志任副组长，在广大革命群众监督下，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实施。各方要给予监督小组和卫戍工作人员的方便，不要阻挠，干涉。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

六、本协议从签字时起，立即生效。各方要广泛宣传《六六通令和本协议》，充分反动教育群众，做执行“通令”和协议的模范，造成一个群众性的制止武斗的热潮。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贺铁民 王久明 王桂琴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徐广林 王金庸 段友仁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于连英，申屠四金，鲍克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薛殿卿 郭易新 何振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十五时三十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接见辽宁各地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 6：20 至 9：02，地点：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摘录。〕

康老：告诉你们个经验，武器赶快交，安徽两派都争着交，怕落后，这种精神才好哩！

总理：联络员要跟中央联系一下，把中央批转安徽、江西的文件要发给在京的所有代表。大连铁道学院两派对立的还很厉害吧？你们铁道学院把抢过来的枪支弹药、炮等通通封存起来，由警备司令部派人去收行不行？（工总司：可以。接着讲价钱。）讲价钱是不行的，我熟悉你们学院，不要以为中央没办法，非你们学生搞革命？你们再武打，我就解散你们学校，你们对抗的话，我们中央就采取专政措施！（双方吵架）你们为什么这样吵，你们各保一个，后面都有牛鬼蛇神。有两个办法，你们不执行，就用专政的办法缴上来；再不行，解散你们的学校。你们不要以为铁道部没有铁道学院不行，你们背后都有牛鬼蛇神。

康老：有些人脑子里没有国家，没有敌情，就是有宗派。

总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那么敌对，文斗也不要那么紧张嘛！旅大的问题很大，武斗都到码头上去了，损失国家的声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起来。

要号召辽（宁）大（学）“八三一”、东（北）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等都回来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八条、十条命令是拥军爱民，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的讲话要好好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十六条、工业十条学习，加强纪律性，要把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学学，把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学一学，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掌握大方向的旗帜，党性要战胜派性，整体利益要高于小团体利益，知识分子结合工农，不要学生指手划脚。去年初期学生是先锋，经过一年了，现在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报纸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你们要好好学习，把沈阳做为中心来解决，辽宁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康生：我想提两个问题，要求你们想一想。第一，想想你们怎样做个代表，这是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第二，要你们想想怎样按毛泽东思想开好这个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共同努力，搞好、搞彻底，这要代表们努力，你们代表在北京能掌握政策方向，就对本地有积极的作用。反过来不按中央指示办，代表也可以在本地区起坏的作用，所以你们怎么作个代表要想一想，代表什么？你们来干什么？都要想一想。中央叫你们来开会，怎么才能开好，怎么开得不好。你们思想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是搞不好的，你们的责任很大，对中央、对本身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很大。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鞍山市军管会两个报告的通知

1967.11.28； 中发 [67] 359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鞍山市军管会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群众就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报告和《鞍山居义小学革命师生自己动手修复校舍国家没花一文钱》的报告很好，鞍山市中小学广大师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力更生、节约闹革命”的教导，自己动手，修复校舍，这不仅为国家节约了物资和人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广大革命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作风。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不只是为国家节省了钱，砌好几道防风墙，更重要的是在头脑里筑起了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防修

墙。”现在将这个报告和这篇报导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大学、中学、小学各校的广大师生学习、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

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沈阳“八三一”、“辽革站”、“辽联”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以及沈阳地区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万分关切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去年八月，中央决定沈阳地区三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到毛主席的身边——北京来开会，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亲切地多次接见三派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特别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地方干部，我们也幸福地受到了接见。这是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从而促使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东北地区尤其是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在运动中，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今年五月中旬，我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在此期间，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

月九日讲话和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又多次面聆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教导和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使我认识和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前进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对中央领导同志和沈阳军队同志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帮助，表示诚恳接受和感谢。

下面，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很好领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中“修养”的毒较深，所以在十一中全会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采取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传播刘、邓的“黑三条”、“黑八条”，发表东言文章，划框子，定调子打击刚刚起来的革命造反派，保护一小撮，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由于我对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自己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挖的不深，没有很好触及灵魂，以致在贯彻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在对待“炮打司令部”、支持革命派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是“敢”字当头，仍表现为“怕”字当头。怕群众分裂成两派，怕公开坚决支持革命派，受到围攻，怕省委瘫痪，怕东北局瘫痪，无人负责。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怕革自己的命。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使一些单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再一次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我才逐步端正态度，开始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新阶段，由于认识落后于形势，对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路线错误。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我说服动员军队共同支持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当时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派、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派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

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不是群众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让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进去并当常委，是不对的。事前，我虽然曾向筹备“辽联”发起单位的代表建议推迟召开成立“辽联”的誓师大会，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联合的工作。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即：先开“辽联”成立誓师大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个基础；然后经过工作，把暂时尚未参加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地吸收进来，巩固和发展这个大联合。我所以同意这个办法，除了我认为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大联合符合大方向，应当予以支持外，还由于自己也有急于搞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思想，并认为辽大、东工、沈农这三所大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一时也不易消除，先成立起“辽联”，也许会促进他们很快地联合起来，消除“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对辽大八三一，我虽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看过了头（如有一次讲过辽大八三一搞分裂不对的话，并错误地引用了张国涛搞分裂的例子），便误认为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也许有利于促进辽大八三一及早地参加到革命大联合的行列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压力迫使辽大八三一改正错误后再参加大联合的错误做法，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伤害了以辽大八三一为骨干的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大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加深了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是极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沈阳八三一派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同时，把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除在“辽联”之外，没有积极说服沈农革命造反团参加大联合，也是极其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由于我支持“辽联”而没有支持沈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使军队跟我犯了错误，其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同时，军队由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短，情况不了解，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其他错误，也同我向军队介绍情况不够、不准，或者积极建议不够有很大关系。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完全责任。如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的出兵，就是我提出的；我还同意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位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辽联”成立以后，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省市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则急于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彻底揭开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东北局书记处。

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我对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还公布了东北局书记处一个极其错误的《三点意见》。后来，中央明确指出，这个《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中央指出这个错误，我才逐步认识到，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这就直接打击了革命群众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积极性，直接起到了保东北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明芳等人和保书记处的作用。效果确实很坏，加深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在一些单位中形成了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使东北局和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总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严重影响了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这个《三点意见》是我们在北京制定的，不经请示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匆匆忙忙擅自发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极其错误的。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并且以自己有过犯错误的教训自居，自以为是，对军队同志的一些意见，则听不进去。相反，却偏听偏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这样就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站错了队，不是坚定不移地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同心协力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而是同马、顾、喻站在一起，搞了一个极端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不是一般错误，而是立场错误。我在搞《三点意见》中起了马、顾、喻所起不到的作用，使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比较相信我而支持了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个责任完全应当由我来承担，特别是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点意见》发布后，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积极推行《三点意见》，更是错误的。如对于《三点意见》的形成过程，经过接待工作讲了一些不应该向外讲的话和讲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无非是要人家相信《三点意见》是正确的，让人家来支持《三点意见》。这种作法是恶劣的，后果是很坏的。特别是压

制了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我在这里向“辽革站”的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

当中央指出《三点意见》的错误后，我还想以东北局书记处的名义收回，经过徵求顾、喻的意见，遇到他们抵制收回后，我对执行中央指示，表现了不坚决，拖了较长时间。这是很错误的。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帮助下，才以我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在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立场错误，路线错误，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怀和解决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并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使我内心极为不安，心情万分沉重，深深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罪，向沈阳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一切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

总之，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次大暴露。

我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外，近几年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也犯有不少错误。如在一九六二年东北局书记处曾向中央表示同意刘邓以中央名义批转的一个叫着“非常时期”文件的精神，并要求中央给东北地区调拨物资，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结果犯了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和不顾大局的错误。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在我亲自参加制定的阜新市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草案）中，没有很好抓住人的思想革命化，却偏重于强调物质刺激，强调改革规章制度先立后破。这是很错误的。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在农村四清运动中，执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制定《二十三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错误才得到纠正。但《二十三条》公布后，我还提出过一进村就可以实行三结合，这就直接违背了《二十三条》中所规定的逐步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极其错误的。一九六五年我在东北地区京剧现代戏会演的讲话中，对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估计过高，直接违背了毛主席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在客观上起了保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自己在较长时间内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理解很差，对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很差。再就是东北局几年来对学习主席著作这件头等重大的大事，抓得很不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从以上的错误中可以看出，我虽然是要跟主席的，但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刘邓是有共同点的。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而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去了，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缺乏革命警惕性，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认识到我们和刘邓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没有识破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种种罪恶阴谋，加之中《修养》的毒较深，因而对他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仅没有坚决抵制，反而过去在一些问题上，却盲目地从组织上服从他们，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就是我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也是我犯错误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政治上最好的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照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的原形，把他们拉下了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坚决肃清他们所散播的种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

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衷心地欢迎同志对我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我决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在斗私中批修，在批修中斗私，不断地同私字作斗争，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真正做到：干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

同时，我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马明芳、顾卓新和喻屏的揭发和批判。我对马、顾、喻的问题另行揭发，彻底同他们划清界限。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不能动摇。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我们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一支伟大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教导，尤其是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积极地热烈地开展拥军活动。“拥军爱民”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战略口号，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推向前进。因此，广大革命群众要诚心诚意地永远热爱人民解放军，永远拥护人民解放军，永远学习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前进。

最后，我向大家表示，一定要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和大家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迅速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任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首先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东北地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地方干部和军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开会，解决东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在京期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几次接见了我们，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在几次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对我们教育很深，鼓舞很大。我们坚信，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和关怀下，东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全面胜利。

我们沈阳军区、辽宁军区机关和驻沈部队，自从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的支持下，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广大革命群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也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很好理解、甚至理解错了，因而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曾几次错误地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〇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曾说过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这是很错误的。

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时搞革命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辽联”常务，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当时东北局、省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不够分明，同时，在沈阳市影响较大的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工厂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参加进来，实际上并未形成沈阳地区革命大联合，把

“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应该给以帮助，而不应该参加所谓筹备三结合的机构。

二、三月份，由于我们对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和在运动中的贡献看得不够，对他们的某缺点错误看得过重，所以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当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三月份整风时，我们不仅对他们帮助不够，反而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我们也看得过重。在三月份整风时，错误地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在这个期间，我们还错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流。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本来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可是我们却对他们采取了上述错误的作法，使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受到了压制，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四月份以后，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出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领会，因而跟得不好，结合沈阳地区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不好，在促进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方面，很少关心。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迟，检讨晚，改得慢，给沈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以犯了上述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用的不好，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得不深，贯彻得不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运动发展很快，而我们的思想认识却往往落后于形势，既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也跟不上群众运动发展的要求。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也作得不够。我们还存在着骄傲自满

情绪，不能虚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归根到底是头脑中的私字作怪。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基本原因，也是对错误认识迟、改正慢的基本原因。

上述错误的责任主要在我们领导，参加支左的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过去有些干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也同我们教育帮助不够是分不开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也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们诚恳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认错，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认错。对于过去曾经受过我们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我们错抓过的人员，我们向他们检查错误，赔礼道歉，宣布平反。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地改正我们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并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们提出批评。

目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辽宁、沈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是大好的。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正确对待干部，积极地促进沈阳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热情地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永远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林副主席发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战斗号召，认清

责任的重大，鼓足干劲，增强信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更好地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伟大任务，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沈阳三派达成“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十条规定”的报告

总理并报伯达、康生、富春、中央文革：

总理最近几次对辽宁问题作了指示以后，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各派中一部份极左分子的干扰，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重申“九·九”协议、彻底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迎接革命大联合的高潮。为此，我们组织各派代表通过充份协商，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各派代表一致恳切请求在报请中央审查后生效，以利克服阻力，使之顺利地贯彻执行。现将“十条规定”报告如下，请指示。

中央赴辽宁省调查组辽宁省军区（附“十条规定”和“联合报告”）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

沈阳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沈阳地区三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九·九”协议签定后，在中央首长亲切关怀和中央调查组的协助下，经过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努力，迅速地煞住了大型

武斗；收缴了大批武器、弹药；稳定了社会秩序；出现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之后，沈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及帝、修、反的特务等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活动，并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挑起武斗，干扰斗争大方向。为进一步贯彻“九·五”命令和“九·九”协议，坚决打击暗害、凶杀、抢劫、偷袭等罪恶活动和立即煞住武斗歪风，为确保“四大”的正常开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中央解决辽宁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经三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共同协商，重申“九·九”协议必须无条件贯彻执行，并再作如下规定：

一、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由各群众组织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要做斗私批修的模范，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全面开展形势教育，宣传一年多来文化的革命的辉煌成就，正确认识大好形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和各单位代理人，并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和“九·九”协议。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必须把现有的武器、弹药和其它武斗工具（包括私造的地雷、手榴弹、土坦克、土枪、土炮和长矛、匕首、大刀、化学毒物以及各种半成品等）立即封存，十天内一律上交到警备区武器装备接收站。对逾期不交者，应发动群众揭发，并由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监督小组和警备区司令部共同动员上交，对于拒不上交者，可强行收交。尔后如再发现非法携带武器、弹药和武斗工具者应强行收缴。对转移、隐藏、私造武器弹药和非法鸣枪、爆炸者，应由警备区司令部、市公安局军管会根据情节轻重予以严肃处理。今后任何组织都不准抢夺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不准动用军事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违者按“九·五”命令处理。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的指示。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六·六”通令，立即煞住打、砸、抢、抄、抓和武斗歪风，坚决打击凶杀、暗害、偷袭等罪恶活动

1、对于凶杀、放火、暗害和抢夺金库、银行者，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对过去发生的凶杀、偷袭和重大武斗案件，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要进行调查核实、严肃处理。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要予以协助，并积极揭发、检举上述案件的幕后策划者及杀人凶手，不得纵恿、包庇。违者，该组织头头要负政治责任。

2、任何群众组织、个人都不准挑动武斗，一旦发生武斗，本单位和外单位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参与和介入。违者，均应承担政治责任。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接到三派代表任何一方报告的武斗、凶杀案情后，应立即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3、各方现扣留的人员（包括当权派）必须一律立即无条件释放。今后绝对禁止抓人、抄家。违者，以扰乱社会治安论处。

4、各种武卫组织、变相武卫组织以及进驻外单位的武卫队，必须立即解散，各回原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

5、对于抢夺国家财物者，应按中央“九·一三”通知处理。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所控制的一切制高点（包括本单位控制的和进驻到外单位的）和武斗工事（包括明堡、暗堡、战壕、各种射击掩体、因武斗修建的铁门、各种障碍物等），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五天内一律撤离和拆除；各革命群众组织无权设置禁区、地界，无权宣布戒严和巡逻。违者，经说服教育无效者，由该组织头头协助监督小组、警备区司令部严肃处理。

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宣传车和在外单位设立的广播站应一律取消。各单位的广播站要高举起毛泽东伟大红旗，不搞互相攻击性的宣传，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把广播站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红色宣传阵地。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七天内把抢来的所有机动车辆（包括能行驶的和不能行驶的上交到警备区武器装备接收站。为了恢复正常交通秩序，加强车辆和交通管理，由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在各主要交通路口上设置车辆检查站（每站由三派各派一名代表协助工作），检查所有的过

往车辆，凡无驾驶执照和车牌照以及驾驶执照和车牌照不符者，属于抢劫的车辆，退还原所属单位，对于拒绝检查与违反交通规则者，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根据“公安六条”的规定，整顿组织，清理坏人，纯洁内部。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积极支持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严厉警告一切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应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制裁。

七、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任何革命群众组织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农村文化大革命，不得到农村去抢劫、抢枪、抓人、挑动武斗，不准挑唆农民进城，已进城的农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和有关部门要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

八、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铁路运输的各项决定和指示。不准介入铁路部门的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和活动上与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切断联系。不准以任何借口拦截火车和抢劫运输物资，更不准对旅客进行搜查。

九、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各革命群众组织与公安机关（包括公、检、法。下同）脱钩，不得干预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一切公安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内外串连，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全体公安人员应全面贯彻执行“公安六条”规定，有效地行使专政职能。

加强监督小组的工作，维护监督小组的威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证监督小组的工作顺利进行，不准冲击他们的驻地，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借故围攻、殴打、扣留监督小组的成员并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违者，应承担政治责任。监督小组的成员，应积极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在监督执行协议过程中，应密切配合、充份合作，不得推托责任和拒出现场。

十、本规定签字上报中央审查后立即生效，有中央调查组协助监督小组监督执行。各革命群众组织立即传达到所属基层组织和每个成员，认真学习，坚决执行，并向全市人民广泛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监督。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任宝成、郭学龄、江琦、杨春田、武戈、李锦章（军工代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赵福林、李培源，吴山禄、崔承远、朱贵林、陈德君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孟繁志、黄学江、李义江、李贵臣、徐英林、刘忠礼（军工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警备区司令部丙辅治、郭景新、薛殿卿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十八时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沈阳三派“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的联合报告

中央、中央文革各位首长：

首先让我们以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祝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在全国一派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周总理的殷切期望下，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促进和实现沈阳市革命大联合，我们三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共同协商，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达成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现报请中央审查，并请指示。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胜利的道路上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狠斗“私”字，坚决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我们有勇气有度量有决心迅速实现沈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掀起革命的大批判和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任宝成、郭学龄、江琦、杨春田、武戈、李锦章（军工代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赵福林、李培源，吴山禄、崔承远、朱贵林、陈德君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孟繁志、黄学江、李义江、李贵臣、徐英林、刘忠礼（军工代表）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零点四十分

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捷报频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春风吹遍东北三省，北国风光无限好。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辽宁省二千八百万人民和驻辽宁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报喜：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就绪。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落实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和最新指示的重大成果。我们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辽宁省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长期以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高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的代理人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周恒等大叛徒，大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疯狂地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工业，农业，文教及各个领域，极力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把东北地区，辽宁省作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独立王国。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人，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革他们的命，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垂死的命运，用尽种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地扭转革命斗争大方向，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攻击人民解放军，妄图把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人，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冲破了重重的阻力，经过激烈搏斗和反复较量，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再的反扑。他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夺权斗争；击退了去年二月由马，顾，喻，周之流在辽宁掀起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砸开了东北局，辽宁省委阶级斗争盖子，把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特务和一小

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个一个地揪了出来，斗倒斗臭；打击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右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性胜利。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为关怀。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推动辽宁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毛主席的每一条最新指示，都给全省军民以无穷无尽的力量。辽宁地区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去年八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集辽宁省，沈阳市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两级军区和原三级地方党委的负责人来到毛主席身边开会。去年十一月，又将辽宁省，沈阳市部份原主要领导干部调来北京，解决辽宁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几次接见了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对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许多极为重要。极其亲切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对三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都做了重要批示。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辽宁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驻军全体指战员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对夺取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辽宁省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组织了大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农村基层单位，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在一起，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以后，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改正支左工作中

的错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进一步推动革命大批判，大力促进辽宁各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当前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毛主席最新指示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到四月底为止，全省共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十六万五千九百多期，参加学习的达一千一百六十五万多人次。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怀着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在全省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对刘，邓，陶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的代理人马，顾，喻，周之流，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咀脸和滔天罪行，粉碎了他们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大叛徒，大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无比的憎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的热爱；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大为提高，在分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的基础上，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现在，全省十个市，四个专区和盘锦垦区的各派革命群众组织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鞍山市，阜新市，锦州专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十二个县中有四十个县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有二十三个县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百分之九十点五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沈阳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占百分之七十九，人数已达百分之八十七，有二百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去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粮，棉征购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工业生产也在逐步上升。

现在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广大革命群众迫切希望省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经过我们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酝酿协商，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省革命委员会拟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除留十四名作机动外，按一百六十一名份配如下：

（一）革命群众代表一百零一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其中：工人代表五十二名，占百分之三十二；贫下中农代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二；红卫兵代表二十一名，占百分之十三；其他革命群众代表八名，占百分之五。

（二）革命干部代表三十四名，占百分之二十二。

（三）军队代表二十六名，占百分之十六。

在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沈阳市九十四名，占百分之五十八，外市，专六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二。有些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市，地，县，委员暂缺。

2，省革命委员会拟设常委四十五名，除留四名作机动外，暂按四十一名份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名（内工人代表十二名，贫下中农代表三名，红卫兵代表四名，机关干部三名）；革命干部代表十名；军队代表九名。经过协商，建议由陈锡联等三十八名同志担任常委（名单附后），暂缺常委三人（工人一人，革干二人）。

3，建议省革命委员会由陈锡联同志任主任委员，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国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4，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各组均由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组成。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总名额暂定一百五十人左右。原省委，省人委所属机构，除组成精干的业务班子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和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外，其余全力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行使任何权力。

以上报告，当否，请审查批示。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三十八名，暂缺三名，留机动四名）

| 姓名 | 单位 | 职务 | 性别 | 年龄 | 民族 | 家庭出身 | 本人成份 | 政治面貌 | 籍贯 | 备考 |
|----|----|----|----|----|----|------|------|------|----|----|
|----|----|----|----|----|----|------|------|------|----|----|

| | | | | | | | | | | |
|-----|------|-----|---|----|---|----|----|----|------|----|
| 陈锡联 | 沈阳军区 | 司令员 | 男 | 54 | 汉 | 贫农 | 雇农 | 党员 | 湖北红安 | 军人 |
|-----|------|-----|---|----|---|----|----|----|------|----|

李伯秋 沈阳军区政治部 主任 男 51 汉 旧职员 学生 党员 辽宁辽阳 军人

杨春甫 辽宁省委书记 男 55 汉 中农 学生 党员 河北任丘 革干

王良 辽宁省委书记 男 52 汉 富农 学生 党员 山东郓城 革干

杨迪 沈阳军区司令部 副参谋长 男 45 汉 地主 学生 党员 湖南湘潭 军人

杨弃 辽宁省军区 政委 男 50 汉 小地主 学生 党员 陕西汉阴 军人

毛远新 男 汉 革干 学生 党员 湖南湘潭 革干

尉凤英 沈阳七二四厂 工人工程师 女 34 汉 工人 工人 党员 辽宁抚顺 辽革

任宝成 沈阳气压机厂 工人 男 30 汉 贫农 工人 党员 山东宁津 8.31

王凤恩 沈阳变压器厂 副总工程师男 45 汉 市贫 工人 党员 辽宁本溪 辽革

刘忠礼 沈阳四一〇厂 工人 男 34 汉 贫农 工人 团员 辽宁宽甸 辽联

于桂兰 沈阳毛织厂 工人 女 33 汉 贫农 工人 党员 山东 8.31

张治国 辽宁大学 学生 男 23 汉 贫农 学生 团员 山东寿光 8.31

魏礼玲 沈阳农学院 学生 男 22 汉 贫农 学生 团员 安徽和县 辽革

郝义田 东北工学院 学生 男 26 汉 贫农 学生 团员 辽宁昌图 辽联

刘盛田 营口水源公社 革委会主任男 41 汉 贫农 农民 党员 辽宁营口 农民

白潜 辽宁省委书记 男 50 汉 破落地主 教员 党员 河南南乐 革干

药子明 辽宁省人委 副秘书长 男 50 汉 中农 工人 党员 山西榆次 革干

毕文廷 辽宁省团委书记 男 43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山东文登 革干

杜湛 辽宁省银行 行长 男 50 汉 中农 店员 党员 山西河津 革干

阎存林 辽宁省气象局 副局长 男 49 汉 贫农 贫民 党员 河北平泉 革干

李锦章 沈阳一一二厂 工人 男 34 汉 工人 工人 团员 山东诸城 8.31

徐广林 沈阳市电话局 机务员 男 31 汉 雇农 学生 团员 辽宁沈阳 辽革

李培元 沈阳四一〇厂 工人 男 26 汉 中农 学生 团员 辽宁抚顺 辽革

林柏松 东北电力技改局 工人 男 29 汉 贫农 学生 团员 山东栖霞 辽联

吴国清 沈阳有色金属加 工人 男 32 蒙 贫农 学生 辽宁阜新 辽联
工厂

王秋凤 沈阳红星区银行 储蓄员 女 31 汉 小商贩 学生 党员 辽宁沈阳

于文忠 沈阳市建三公司 保卫干事 男 33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辽宁丹东

8.31

贺铁民 沈阳医学院 图书馆员 男 37 汉 职员 学生 党员 河北扬宁 8.31

郑希久 辽宁省人委民政 副科长 男 38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吉林辉南 辽
革

厅

于海涛 辽宁省林业厅 技术员 男 34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内蒙 辽联

喀佐后旗

刘玉儒 锦县晓光大队 党支部书记 男 50 汉 贫农 农民 党员 辽宁锡县
农民

张祥 辽宁昌图宝力 民兵连长 男 31 汉 贫农 农民 党员 辽宁昌图 农民
公社红樱大队

王从周 沈阳军区工程兵 政委 男 50 汉 中农 学生 党员 河北唐县 军人

张海棠 辽宁省军区 司令员 男 56 汉 贫农 徒工 党员 江西清江 军人

常仲连 沈阳军区空军 高炮司令员 男 54 汉 贫农 工人 党员 河南孟县
军人

麻继斌 沈阳军区后勤 部长 男 49 汉 地主 学生 党员 河南鄆城 军人
营房部

刘采芹 辽宁省军区 副政委 男 57 汉 贫农 学生 党员 山东莱芜 军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 中央首长接见沈阳军区及辽宁省各方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晚十点五十五分至十二点十五分, 地点: 人民
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到会接见的中央首长有: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受接见者:
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负责同志、辽宁省、沈阳市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江青: 现在我们开会, 请康生同志读中央批示。

康生：

同志们，现在我们读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辽宁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的中央文件。同志们都有文件没有？（有！）文件上用红字写着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同志们经常讲毛主席指示我照办，现在毛主席告诉我们照办，我们照办！你们也照办！忠于不忠于毛主席就看你们照不照办。（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读中共中央 [68] 70 号文件，略）

再重复一句：刚才念的文件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希望同志们贯彻执行。（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

我讲几句，刚才康生同志读了中央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特别强调提出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康生同志讲的意见大家要特别注意。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要言行一致，理论和行动一致，表里一致。

中央批示指出了辽宁省的重要的特点，“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的比例。”刚才送来一个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辽宁二千八百万人口，工业人口占一千万，这个比例很大。我国工业化的省份辽宁是最大的，并且是重工业基地，全国主要的工业基地。鞍钢、抚顺是很出名的，现在怎样呀？要起模范作用，鞍钢要在全国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作用。过去在鞍山的走资派王鹤寿被打倒了，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大家要同心协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抓革命，促生产，把鞍钢生产很快促上去，这样会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抚顺是全国最大的煤矿，现在还没成立革命委员会，要赶快协商成立革命委员会，把抚顺煤矿抓革命，促生产搞上去，这样对全国的工业生产也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央批示说：“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包括抚顺、旅大、本溪吧？“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还有铁路交通问题，辽宁处于重要的地位，希望把抓革命，促生产搞好。辽宁是全国铁路最多的地方，旅大是重要港口也在辽宁，港口也要搞好。在座的同志们要极大的注意这一点，把这方面的工作搞好。

中央批示有这么一段：“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省革委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协同东北的兄弟省份，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整个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铁路交通运输计划。”中央对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提出的这个要求，要很快付诸实施。

辽宁与东北地区和好几个国家交界，有苏修、蒙修和其它修正主义。还有过去日本占领东北相当久呀！你们要注意这一点，所有这些修正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都不会看着辽宁的兴旺不来干扰的。我们要打破他们的干扰，回击他们的干扰。批语也讲了：“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必须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辽宁处在反帝反修的第一线，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需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警惕，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苏修、美帝、日本、蒋匪的特务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为了一致对敌，必须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极‘左’思潮，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利用。”这一段大家要提高警惕。中央批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和驻辽宁部队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断加强军民之间在革命原则下的团结。沈阳军区和人民解放军要巩固国防，严防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在边防上的军事挑衅。”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有很重大的责任放在同志们的肩上。只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团结一致，有分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一致。我们说中央对辽宁的要求一定能实现。

（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请总理讲话。

周恩来：

同志们，战友们，首先问你们好！庆贺你们！刚才康老读中央批示时讲的话，伯达同志讲的话我都同意。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早在去年八月毛主席就提醒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推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早一点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我们想早一点、快一点。但革命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像天津、河北就快一些，辽宁是耽误一些时间，今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家很高兴，但回想一下是不是可以快一点，我过问过辽宁的一些工作，我想如果做的好是可以快一些的。毛主席指定的四个地区，是重要的战略部署，无论是从革命和生产来看，都是这样。为什么辽宁在后头呢？就是斗争的复杂性。你们辛苦了！革委会成立的过程确实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要跟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在东北的代理人斗争，逐步把问题挖深挖透，把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出来，擦亮眼睛，跟他们划清界限，同时又要同藏在暗处的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反党集团作斗争。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进行破坏，如像杜者衡这些人呀，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受到一些干扰。不仅如此，辽宁的特务呀，内奸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呀，在机关、工厂、学校，他们也在活动。暗藏在机关、工厂、学校、码头广大群众里头，使运动受阻，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揪出来，不然他就干扰。例如早就知道的叛徒宋黎、特务侯志，他也要干扰一阵。还有坏头头在干扰，例如这次揭发出来的张祥久等人，他们也干扰了我们，如果等群众觉悟，没有认清就过早处理，容易伤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等事情成熟了，就容易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但应该说，在中央工作的也好，在大区工作的也好，也还有些耽搁，拿鞍山来说吧，早就揭发王鹤寿是大叛徒，应该早解决，我们耽误了。比如对宋任穷，中央一再想挽救他，但他不按中央的愿望办。直到现在还在文件上点名，给他留下一点生机，一线希望，希望他从死不悔改到改悔，这是毛主席的一贯干部政策。但不是说他的错误就不严重了。本来去年八月份就把地方三级党委、两级军区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请到北京开会，想早一点解决问题，现在九个多月了，中间经过些曲折，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代表们、广大群众取得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解决一个省的问题，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学习，成功来得不易呀！所以，现在你们的报告和中央

的批示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很高兴，庆贺你们明天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经过这样长的时间，辽宁省、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在明天同时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学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步一步按毛主席指示前进的胜利！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既然成立的晚，就应该吸取许多省市的经验。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人数比别的省都多，工人比例数大。现在报告上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五名，留十四名做机动，先按一百六十一名分配，将来各大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一百七十五名可能还不够，也可能突破框子。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那时不够了，你们再报告中央，这个暂且不说，就拿现在来说，把革命群众代表比例增大了，工人占五十二名，过了半数，这是好的，这体现了有广大群众代表的新生力量参加革命委员会。当然，也需要军队帮助推动。一年多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沈阳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不错，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做了检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后还需要把工作做的更好。所以决定他们有二十二名委员、常委九名。还有革命干部十名，并且有一名从黑龙江借来的毛远新同志。当然他要谦虚。你们光借不行，还需要自己省的干部，所以回去要通过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解放一批干部。辽宁是个大省，大的工矿企业这么多，需要很多干部，有经验的干部，即使犯了错误，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就应该解放出来。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仅仅有军队和群众代表不行。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毛主席指示的很清楚，人民日报社论也讲了，我不再多说了。

在常委比例上也照顾了这一点，常委原四十五名，留出四名机动，给鞍钢、旅大、抚顺和铁路，这四个单位至少有一个常委，如有的能当副主任就当副主任。其他四十一名，二十二名革命群众代表，也占多数。军队和革命干部十九名。辽宁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辽宁省一个很急迫的组织任务和政治任务，希望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再从年龄来说，青壮年居多，五十岁以上少数，只有十三个嘛！其他都是五十岁以下，二、三十岁的很多，这是一个好的气象。但有一个缺点，不如陕西、

安徽，就是女同志少。沈阳工矿区女工占很大的比例，农村、学校女同志也很多。这一点是旧习惯，破四旧，就要破这个旧习惯，就是有大男子主义，今天在座的男同志代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提出工代会协议上提出成立工代会要有女代表。毛主席说：“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嘛！希望你们回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沈阳三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组织尽管有些错误，有的错误严重些，也是上面少数领导人的问题。如有的组织受东北局、省市委走资派的蒙蔽，群众没有责任；有的组织有少数坏头头，由他们自己解决。像八三一这次自己解决坏头头的问题，自己抓出来，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这是一个胜利，现在说你们“八三么”不会反感了吧？（康生同志：就是怕说“妖”，妖在你们身边你们也不揭发，唐铎是个苏修的大特务，李光灿是反革命分子，他到北京找杨献珍和杨成武的亲信，还说自己是八三一的参谋。你们要特别注意美帝、苏修特务、蒙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你们那里前前后后什么都有，真是五毒俱全哟。还有辽联的柳运光，我认识他，是个坏家伙。）每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各个组织里都可能有坏人，不要只说别的组织里有坏人，自己组织里没有，不要被敌人利用。不要总强调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左，没有那么回事。年青同志犯些错误是不可免的。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按毛主席指示自己揪出来，像八三一这次把张祥久等四人揪出来是好办法。别的组织不要去讽刺、指责人家，要好好整顿自己的队伍，辽联、辽革站都要贯彻这个精神。不要只看人家短处，要看人家的长处，把人家的长处学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要轻装上阵。你们在这里八、九个月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央的声音听了很多了，要把这些精神带回去，有极“左”思潮的说你们“右”了，“修”了，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怎么能修了呢？！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怕别人说。八三一来开会的同志在北京解决了内部问题，揭发了张祥久的问题，取得了很大胜利，你们要求一架飞机送回去，所以我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应该把毛主席的声音尽快带回去，不要还认为除了张祥久就选不出头头来了，不要迷信他。

你们三个革命群众组织把沈阳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外市县的事让人家自己搞，不要去干涉人家，不要包办代替。

第三个问题，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毛主席有两个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工人阶级要带头，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联合起来，这一点我们很高兴的是你们提出回沈阳首先成立工代会、军工代会，也提出了要很快成立大专院校红代会，我希望你们的提议经过省革委会讨论能很快实现，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回本单位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就要受到干扰。例如张祥久的问题解决了，沈阳、苏家屯铁路局的问题也解决了。辽宁工人比重这样大，工人阶级更应该起模范作用。不仅沈阳，要拿沈阳的经验去推动旅大、抚顺、本溪、铁路以及其它很快成立革委会的城市。十个工业城市，只有三个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有七个没解决，要很快跟着成立。关于组织问题，就要把跨行业组织逐步取消，当然成立很久了，一下子取消有些留恋，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第四个问题，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要加强敌情观念，过去群众组织之间打内战就是敌情观念不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直到日本投降，辽宁就是帝俄、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以后国民党来了，还是半殖民地。旅大苏军一九五五年撤出。前后六十年，隐藏下很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分子，这在东北来说比在别的地方会多些，当然，同整个人民中来比较，只有大海中的几滴水。我们一定要有敌情观念，要把特务呀、内奸呀、反革命分子呀，都揪出来，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没有敌情观念，就会被敌人钻空子。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来解决，要共同对敌。军队不仅担任“三支”“两军”任务，而且要保卫国防，有战备任务。我们要非常爱护解放军，即使他们在运动初期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认识、改正错误，对他们就要更加拥护。这一点我们说，东北的军队他们是听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的。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东北地区是全国的关键部分。首先要求铁路局和大连海港要搞好，枢纽不通就直接影响生产。再就是抚顺煤矿搞不起来，鞍钢的生产就上不去。鞍钢上不去，全国的钢也就上不去，不仅是数量，

特别是品种的问题。煤、钢上不去，就直接影响机械、化工等上不去，对全国影响就很大。所以说，东北是全国一盘棋的一部分。刚才，康生同志、伯达同志讲了，东北问题毛主席去年七、八月份就有指示，我们抓的晚了一些。现在促成了革命委员会，原来形势就很好，欣欣向荣，现在应该更加面貌一新，你们说北国风光无限好，辽河两岸尽朝晖，我说不只辽河两岸，还是松辽平原。辽宁省成立革委会是大喜事。今天参加会的还有吉林的同志，有八三一来京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些同志，你们回去要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对中央批示要坚决照办，坚决执行。

最后我们呼几个口号：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有一个事情康老叫我提一下，延边军管会有个报告中央批了，朱德海有很严重的错误，不能回去参加革命三结合，现在也不揪回去批斗，等延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再考虑。

康生：给你交个底，他的错误很严重，弄回去斗，还不是时候，但你们不要再保他了。

江青：祝贺同志们！明天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散会！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军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隆重成立了！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关怀辽宁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许多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给予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辽宁省广大军民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十分高兴地向辽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省两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向驻辽宁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现在，继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东北地区各省也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发展是很快的。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抓紧。希望辽宁省的同志们，以及别的地区的同志们，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发现和支持革命的新事物，朝气蓬勃地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

长期以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及辽宁地区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军民团结，竭力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妄图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忠于毛主席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斩断了他们的黑手，把他们的丑恶面目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终于取得了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忠于毛主席的驻辽宁省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坚持不懈地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密切结合阶级斗争实践，热情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了新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

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特务和隐藏的或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我们要继续努力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要把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和这个组织中的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要注意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继续做好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壮大革命队伍，团结和争取同盟军，使一切革命力量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共同对敌。

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我们要以满腔的热情爱护它，支持它，巩固它，发展它，防止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要继续加强军民团结。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要继续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希望辽宁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国防、工农业、交通运输等战线上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方面。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眼看自己各种阴谋诡计统统遭到失败，就妄图用更卑鄙的手法，来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全国广大军民必须眼明心亮，揭露阶级敌人的卑鄙手法，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使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破坏生产的阴谋完全彻底破产。

辽宁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辽宁大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辽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我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

一、要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一个个地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进一步揭开工矿企业的阶级斗争盖子。

二、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在对敌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作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和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三、要高举鞍钢宪法的伟大红旗，深揭深批工业战线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把黑十二条批倒批臭，通过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反修、防修能力，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物资刺激、技术挂帅的毒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基础上，搞好工矿企业的斗批改，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工人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彻底改革重叠臃肿的管理机构，建立革命和生产的新秩序。

五、要通过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发展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大联合争取尽快地成立各级工代会，实现基层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六、要用鞍钢宪法统帅生产、指导生产、推动生产，我省工业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生产许多极其重要的产品，不仅对全国工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每个工人同志都要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东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以及欧、马、顾、喻、周之流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虽然已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进行更狡猾、更隐蔽的破坏活动。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革命大批判，要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深刻地揭露和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东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工业战线上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不同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来源：《学习资料》（第七期）〔内部参考，注意保存〕河南省工代会政宣组编 1968 年 7 月 15 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为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准备，军区各部队在九月下旬的军级干部会议之后，派出二十一个先行连队到农村进行试点，组织一千一百二十九个调查组，五千三百七十余名干部、战士，分别到三个省一百一十二个县、十三个市郊区和一个垦区的一千一百零四个公社进行调查，现将社、队两极领导班子的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从已调查完的三十四个县三千五百九十八个社、队的领导班子情况看，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新的红色政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并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但是，夺权和反夺权，复旧和反复旧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少数班子被坏人操纵或把持，领导权不在贫下中农手里。社、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分三类。

一类是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类班子的成员比较纯，新的血液多，思想先进，核心团结，步伐一致，敢想敢干；作风深入，联系群众，有权威，有号召力；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自觉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带头参加革命大批判，积极清理阶级队伍，革命、生产都取得显著成绩。

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绝大部份成员的出身成份好，历史清楚，他们热爱毛主席，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班子里的新鲜血液少，多半是原班人马，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较深，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不强，思想比较守旧，缺乏创新精神。群众说：“他们基本上是老一套。”

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百分之十三至十五。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打击迫害贫下中农，排斥新生力量，大搞右倾翻案，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因此支农部队力量使用上，应当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照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

对第一类好的领导班子，要帮助他们继续抓好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使之不断地提高和发展，用示范和个别指导的方法，充份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推动农村斗、批、改。

对第二类中间状态的领导班子，在上级革委会统一安排下，由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本社、队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所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好社、队干部学习班（参加“三结合”的和没有参加“三结合”的都参加），其次，

广泛发动群众，搞好社、队的斗、批、改，主要是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更新领导班子，适时转入整党、建党工作。

对第三类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领导班子，由上级革委会派出的解放军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动当地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同阶级作斗争。团结原班子中的革命分子，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打击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分化瓦解反动势力，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稳、准、狠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斗争中牢固树立贫下中农优势，彻底改组这类领导班子。我们认为，这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重点中的重点，一定要抓住、抓紧、抓到底，作出成效。同时在斗争中发现和培育贫下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他们入党，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按照革命“三结合”的原则，更新、健全各级领导班子，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在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发展、健全新生的红色政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一月十五日关于对军区《今冬明春三支两军工作安排情况报告》的批示，给全区部队广大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一致感到方向更明了，信心更强了。决心以“三忠于”、“四无限”的深厚感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搞好农村的斗、批、改。

关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的调查，将另行报告。

不当之处，请指示。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三]》，武汉：1969年3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转发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1968.12.07；中发[68]163号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现将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今冬明春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调查和部署。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

（此件各地视情况可发到已经成立好革命委员会的县级权力机关）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划归沈阳军区的决定

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人民解放军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了加强战备，发展农业生产和解决大批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从 1969 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在此之前，只有 1954 年组建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69 年 3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出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建制划归沈阳军区，由沈阳军区委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领导。东北农垦总局所属的农场、黑龙江某地省属农场、黑河农建师、合江农建第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兵团共有职工 20 余万人，耕地 1000 余万亩。建设兵团领导干部由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干部兼任。

3 月 20 日，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6000 人改为现役部队，但不列入部队定额。

此后直到 1970 年，相继成立了江苏、安徽、兰州、内蒙古、广州、云南、福建、江西、山东、浙江、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

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群众建设边防，保卫国家安全；培养和造就亦兵亦农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开发和建设边疆；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农业。适应边防斗争的需要，生产建设兵团还组建了一定数量的战备值班分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平时配合

部队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作战或机动执行任务。生产建设兵团对当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新疆建设兵团 1975 年发展到 220 万人口，拥有工业、农业、牧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各种综合性企业，其工农业总产值占新疆全区工农业总产值 1/3。但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系统垂直领导的组织形式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地区性经济建设规划的需要，

从 1972 年开始，各军区所属生产建设兵团陆续撤消或是改变领导体制。建设兵团的党、政工作和生产建设交地方党和政府领导，军事工作和现役部队则归所在地军区领导。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5.10；中发[1971]36 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今天开了二十五天；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十六天。参加这两个会的同志共四千一百多人。

这两个会，都是批陈整风的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和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会议着重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罪行，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当陈伯达这个反党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时候，立即拨正了全会的航向，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阴谋，把这个反党分子揭露出来，消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会议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一致表示坚决紧跟、坚决照办。

到会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姿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对陈伯达三十多年来一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通过揭发、批判，剥掉了他的画皮，戳穿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陈伯达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一个隐藏在党内三十多年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无耻叛徒、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老反革命；根本不是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而是个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凶恶的阶级敌人；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是帝、修、反的忠实代言人；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而是反党乱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他自称的“小小的老百姓”、“小小的小学生”，而是个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同志们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同他划清了界限。

在批陈过程中，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的教导，对陈伯达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了专题批判。大家反复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光辉论述，更加看穿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第一”这个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动本质和政治阴谋，进一步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批判中，重点批判了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陈伯达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竭力贩卖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彻底暴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大家说，陈伯达那么起劲地“称天才”，就是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妄图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他用谣言和诡辩制造混乱，破坏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妄图分裂我们党，达到他阴谋篡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批判中，大家还狠批了陈伯达“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大家说，陈伯达把自己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他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暴露，其罪恶目的是为他反党夺权服务。通过批判，大家认清了

陈伯达的所谓“理论”，始终贯穿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识破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决“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两个会，在批陈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风。到会同志对军区党委常委和辽宁省党委常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批评和意见。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党委常委在一起开了交心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军区党委常委还要在军区的会议上进行检查。会后，军区和省委都要继续深入进行批陈整风。下面，我根据军区党委常委、辽宁省党委常委研究的意见，着重讲两个问题：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会上，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党内出现一次大的斗争，象这次出现陈伯达反党事件，在开始时，有些同志感到突然？有的同志甚至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希望党内不出这类事。经过学习、批判，大家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不清，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没有在自己头脑中深深扎根。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四年，当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的时候，毛主席又指出：“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反复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我们就可以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就会出现象王明、刘少奇、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理解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进行反党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就是这种惯用反革命两面手法的最阴险、最狡猾的阶级敌人。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疯狂反对毛主席；他标榜自己懂得马克思，用谣言和诡辩阉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大讲特讲什么社会主义“规律”，为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干尽了反对中央文革、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尖锐、复杂，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不仅要“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还必须“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防止象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权重要，还是路线重要？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路线对了，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有了政权还会丢权。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反党篡权上台以后，搞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我们有的基层单位，比如象鞍山眼前山矿政权得而复失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

我们党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才能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集团，粉碎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夺得了一个个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前进，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这个历史经验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同志们从陈伯达的反党罪恶活动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一切反党分子向党进攻，总是要从右的或从“左”的两个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甚至理解错了，就不能抵制和排除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而且在执行中还会“左”右摇摆，甚至迷失方向。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彭德怀搞“正规化”，照搬苏联那一套，我们做没做？做了的！刘少奇的黑“修养”出来，我们学没学？把它当“教材”了嘛！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我们也是搞了的。杨成武抛出“大树特树”，我们也是跟着喊了的。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的不好，理解得不深，执行得不自觉。

要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不断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决不能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的要求，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努力提高辨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能力。“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支持；违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批评、帮助；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斗争。要不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认真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要搞好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教育。对路线问题，一定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天也不能忘记。正象有的同志说的，决不能“来以前不知道，听到后吓一跳，学习后有提高，过一段又忘掉。”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有一个好的思想作风。作风不正，总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成为他们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缺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他们的思想作风严重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是军阀主义，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不走正道走邪道，和陈伯达臭味相投，陈伯达找地盘，李、郑找靠山。这样，他们就必然搞到一起。思想作风一定要正。思想作风不正的人，党性不纯的人，搞歪门邪道的人，就容易被陈伯达这样的坏人所挑动所利用。这里，我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果陈伯达到东北来乱跑乱说，我们能不能识破，会不会上当，会不会受骗，会不会也要抬他当“太上皇”？我想，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不克服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等歪风邪气，不提高革命警惕，也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反对骄傲自满的问题上，我们军区近几年来，联系三支两军、部队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先后抓过几次；省革委会成立以来，通过路线分析、思想“爬坡”，也抓过几次。但由于我们认识不高，抓的不狠，没有把反对骄傲自满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中央三号文件所指出的问题，在我们军区和辽宁省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

从军区来看，主要是有两个包袱，满足现状，自以为工作做得还不错，似乎还能“过得去”。有些同志自以为打仗有功，支左有功，盲目骄傲自满，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只想当革命动力，不想当革命对象，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固步自封，上级指示装不进，先进经验学不进，群众意见听不进，靠“老本”过日子，认为“老本”不多可以吃一阵子，水平不高可以用一阵子，理论不高可以凑合一阵子。有的在在工作中看成绩多，看问题少，讲成绩总觉得没说够，讲缺点总觉得过了头。有的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把个人置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个人说了算。有的搞军阀主义，训人整人，骂人打人，耍威风，逞霸道，甚至利用职权，欺人压人。有的滋长了资产阶级庸俗作风，拉拉扯扯，吹吹捧捧，原则不坚持，错误不斗争。有的当官做老爷，贪图享受，铺张浪费，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有的讲假话，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存在着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外事活动中不谦虚，不礼貌，在宣传上有强加于人

的现象，对内以大压小，总要高人一头。这些问题，有的发生在我们领导身上，有的虽然发生在下面，但责任还在我们领导，首先是我自己要负责任。

从辽宁省来说，对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也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对待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有个“三高、一早、一好”的说法（即去年粮食总产量、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财政总收入达到了较高水平，省委成立得较早，革命生产形势比较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求同志们正确对待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当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更要头脑清醒，正视存在的问题，克服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继续革命的障碍。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一点，千万不能头脑发胀，忘乎所以。

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十年来为我党培育的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抵制和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什么有的人在政治上犯了那样严重的错误，正象同志们说的，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阶级斗争，就会分不清敌我；带着私心和资产阶级派性掌权，就会使革命政权改变性质；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会搞歪门邪道，闹宗派，拉山头，破坏党的团结，甚至走上反党道路。

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要紧跟毛主席革命一辈子，不犯或少犯错误，就必须“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我们讲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作到“五个统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就要在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就要反对独断专行，压制批评，搞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不能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就要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加强请示报告；特别重要的是重视调查研究，遇事不能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不了解情况就乱讲乱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辽宁在建立省委之前，搞思想、路线“爬坡”的时候，总结了一条经验：凡是经过调查研究，由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错误就比较少；凡是仓仓促促，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由个人决定的问题，就容易出错。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毛主席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辽宁省搞了一个“一把火烧两头”，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形式来搞。一头，烧清领导班子思想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一头，烧牛鬼蛇神。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把领导班子烧垮嘛！而是使各级领导班子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更好地发挥了对敌斗争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就要认真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干革命就要讲阶级，讲路线，不能搞人性论，不能搞折衷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要拿到桌子面上来，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更不要怕引起争论。原则性的争论，不仅不会妨碍党的团结，反而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当然，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无限上纲。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在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上，毛主席又要求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毛主席的这些指

示，正如林副主席所指出的：“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经过这次批陈斗争，使我们进一步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许多同志说得好，单纯的工作经验代替不了毛泽东思想，埋头苦干代替不了革命的理论，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不了路线觉悟。工作忙忙碌碌，学习马马虎虎，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时刻就会迷迷糊糊。假马克思主义者最爱吓唬那些不爱学习的人。不爱学习的人，也最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一旦上当受骗，轻者给人家当“叭喇筒子”，重者会给人家当“打手”。这是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

我们一定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挤时间“认真看书学习”，而不能强调工作忙，没时间，不去认真学习。强调工作忙，没时间，实际上是不想学习的借口。要长期坚持。而不能学一阵子；要真正弄通，而不能一知半解；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而不能理论和实践脱节。要刻苦地学习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尽快地改变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的状况，这样才能更好地、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总之，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不要忘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要忘记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批陈整风，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纲，是今年的中心任务。搞好批陈整风运动，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政治建军和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同刘少奇斗争的继续，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批陈为重点，首先把“批陈”搞好。要按照中央的部署，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为武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剥掉他的画皮，肃清他的流毒，同他彻底划清界限。并要从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打一次“防疫针”。

批陈整风运动，重点是把批陈搞好，在搞好批陈的同时，也要把整风搞好。下面，就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如何深入搞好整风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我们军队非常关心、非常爱护。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对军队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军队要谨慎”。

毛主席在看了贵州省军区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报告后，又批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对北京卫戍区野营训练总结报告的批示上，强调要“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又对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召开了华北会议。林副主席并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希望全军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周总理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毛主席又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今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指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最近，毛主席又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

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对军队这样关心，为什么特别强调军队要谨慎？我们领会：

一是我们军队，现在一方面担负着保卫祖国，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还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要同地方同志一道，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我们必须认识到，军队地位变了，任务重了，责任大了，工作的面更宽了，遇到的事情更多了，接触的人更广了。因此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地方同志，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主动搞好团结。如果我们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瞎指挥，骄傲自满，脱离群众，那就很危险。

二是我们军队确实有两个包袱，有各种不正之风。毛主席指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爱护历史荣誉是对的，但决不能把它当成包袱，骄傲起来。在胜利的形势下，更需要谦虚谨慎，正象同志们所说，“胜利的军队最容易骄傲，胜利的形势最需要整风”。我们必须通过整风，放下包袱，去掉不良作风，保持谦虚谨慎。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抓的不好，就会落后于形势，就会犯错误，就会对建军不利，对建政不利，对继续革命不利，对个人思想革命化不利。

三是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要反党篡权，总是首先要抓军权。高岗、彭德怀是这样，刘少奇、罗瑞卿是这样，陈伯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军队的同志必须十分谨慎。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我们的军队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指挥下，成为一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永远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辽宁省前一段搞思想“爬坡”、路线分析，搞了一年多，这是对的，是有成绩的。它为这次整风创造了条件，但它决不能代替这次整风。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根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有了新的丰富内容和更高的要求。而我们搞的思想路线“爬坡”，虽然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按照这次整风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于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有些“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领导班子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团结不好，还有不正之风。因此，我们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思想“爬坡”和路线分析，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要求，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搞好。

我们要防止和克服对整风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上半年烧，下半年爬，年终来个大检查。”有的同志认为，“反骄到顶”，“无骄可反”。有的同志说，“就是有点骄傲，也是光荣的缺点、红色的包袱”，甚至认为，“有骄无害”、“骄傲有理”。这些都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障碍，必须加以克服。

在批陈整风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和军队代表同志，要自我革命，自觉革命，带头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跟上，靠下，化自己”。通过整风，把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一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批陈整风运动为纲，带动各项工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让毛主席放心，让林副主席放心，让党中央放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发出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翻印

共翻印三，二〇〇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记者《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

去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改造农村旧的集市贸易，创办了一种新型集市——社会主义大集，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

哈尔套公社靠近辽宁和吉林两省交界。这里土地瘠薄，气候干旱，过去粮食产量很低。一九七四年冬季，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广大干部、群众打破“猫冬”习惯，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出勤人数逐渐减少。接近过年时，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更少了。人都到哪里去了呢？经公社党委了解，原来是集市贸易的一股习惯势力在吸引着他们。

哈尔套的集市贸易已有多年的历史。每到“逢五排十”的集日，四邻八乡，甚至几十里外的人都来赶集，多时四、五千人，少时也有两、三千人。少数投机倒把分子利用集市倒买倒卖，弄虚作假，搞资本主义活动。这种集市对一部分没有摆脱私有心理的富裕农民，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由于这种集市的影响，这个公社的集体经济受到削弱，学大寨运动开展不起来，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哈尔套公社党委对农村集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与集市贸易的联系，感到对这样的一个集市，如不加以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就会通过这个缺口自由泛滥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怎么改造农村集市？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象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简单关闭，或者进行一般管理，结果，关，关不住，管，又管不好。另一种办法是，根据农村现阶段还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把过去投入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同时，组织供销部门打破常规，扩大购销范围，积极组织群众间的交换活动，有计划地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公社党委研究，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改造现有的集市贸易。

新型集市出现了

哈尔套公社在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过程中,首先组织干部、群众大办政治夜校,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对农村集市贸易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展开深刻的批判。同时,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批判和思想工作,很多社员主动提出,把准备赶集的个人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公社党委决定,因势利导,组织社会主义大集。

一九七五年元旦,这种新型的集市在哈尔套公社出现了。这一天,各大队的社员群众由干部带领,挑着自家的农副产品,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从四面八方赶到哈尔套街里,参加社会主义大集。他们把自用有余的农副产品交给供销社,然后,再到供销社的门市摊床选购自己需要的各种农具和其它日用品。市场上购销两旺,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过去那种呼买叫卖、讨价还价的资本主义习气一扫而光。在这个集市上,公社和各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还演出了各种文艺节目,宣传新人新事新风尚。群众既来赶集,又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在这种集市上,还有城市工厂组织的各种支援农业的活动。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工农联盟、城乡交流的生动景象,听到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和学习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他们高兴地说,赶社会主义大集,越赶对资本主义越恨,心和社会主义贴得越紧,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好。

这种集市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一出现就把资本主义势力给压下去了。在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下,这种社会主义大集越办越好。现在,除了定期举办的综合性大集之外,还根据农时季节和群众需要举办单一商品的交流大集。这种集是综合性大集的补充,它在指定时间、地点和范围之内,严格遵守预先议定的价格,把供销社目前还不便于经营的仔猪、鸡鸭雏、秧苗等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组织群众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调剂余缺,互通有无。这样,就把过去自由交易的猪禽、编织、柴草等九类一百二十八种农副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在农村集市阵地上树立了社会主义优势。在一般的农副产品购销之外,公社还利用赶大集的机会,组织各队向国家交售粮食、生猪等统购统销、计划收购的产品。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大集已经成了农村经济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

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社会主义大集创办不久,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哈尔套公社的干部和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分析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实践，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他们认识到，办好社会主义大集，不仅是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一种措施，也是教育农民，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实际步骤。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象集市贸易、商品交换、自留地、家庭副业、按劳分配等等，在政策上是允许存在的。但是决不能给它供氧输血，使它无限制地扩大，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步加以限制。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为堵住小生产通向资本主义的渠道，有效地限制农村商品交换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提供了新鲜经验。

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哈尔套公社党委在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过程中，始终把引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们通过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自觉地与私有观念决裂，与旧的传统习惯决裂。在这个公社，各大队的政治夜校经常开展“路线教育”、“一事一议”等活动。每举办一次大集之前，他们都要组织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时还请老贫农讲家史、村史、社史，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比的教育。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炕头上、人心里，不断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样，社会主义大集就有了更广泛的思想基础。

领导站在运动的前头

“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同样也适用于办社会主义大集这场斗争。

((1)(4))

哈尔套公社党委认为，要让群众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公社党委要带头同旧传统观念决裂，同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公社党委书记那顺（蒙古族）是个老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把办社会主义大集看成是继续革命的一场斗争。他带头回忆自己文化大革命前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沉痛教训，主动批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影响，带头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顺坚持继续革命的行动，带动了公社、大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青年干部施亚文，主动说服自己的母亲把自留地上产的黄烟，头一个按国营牌价卖给国家，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也带动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革命化，全公社出现了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景象。

把供销社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哈尔套供销社过去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在柜台里讲买讲卖，不管柜台外的阶级斗争。在收购农副产品中搞了许多清规戒律，这个不经营，那个不收购，适应不了社会主义农村的需要。创办大集一开始，公社党委就把端正供销社的经营路线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公社党委提出，农村商业部门要坚持政治挂帅，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成为打击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军，让社会主义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当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这个供销社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营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们积极扩大经营范围，把多经营一个品种看成是多占领一块阵地，多铲除一块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一年多来，这个供销社经营的商品增加三百五十多种，农副产品收购比办社会主义大集前增加四十一项，同时还增设了商业网点，方便了群众，支援了生产。除此之外，他们还增加小红炉，方便社员修旧利废；小车下乡送货上门，收购到队。在各门市部，还增设了布匹剪裁、图书租借、义务割玻璃等服务项目。这样一来，即使不逢集日，群众也能和国营商业网点发生联系，不给资本主义留下可乘之隙。

社会主义大集出现以后，为了保证市场物资的稳定供应，哈尔套公社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安排生产时把市场需要考虑进去。各生产队落实国家种植计划时，在不影响粮食作物、不减少国家计划种植面积的情况下，统筹安排一些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逐步用集体经济的产品取代过去靠社员自留地上生产的产品。同时，在继续鼓励社员个人养猪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发展集体副业生产，把发展多种经营和组织市场货源结合起来。这样，不但在商品流通领域里，而且在商品生产环节上也掌握了向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主动权，有效地保证了市场上物资的稳定供应，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学大寨出现了新局面

社会主义大集的出现，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哈尔套农村商业的面貌，而且教育了人，改造了人，使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在这个公社的一些队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资本主义泛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社会主义大集创办以后，这种局面很快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正气压住了资本主义的邪气，形成了“干社会主义光荣，搞资本主义可耻”的革命风气，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取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可喜成果。

这个公社富有大队北疙瘩苏生产队老贫农、共产党员杨福祥，群众称赞他走社会主义道路棒打不回头，是干社会主义铁了心的人。他对旧集市早就有反感，社会主义大集一出现，他积极支持，认为这个办法能“卡住资本主义脖子”。他说，贫下中农的眼睛不能总盯着自己的小家庭，共产党员的心不能只想自己的事，干革命就得让社会主义在头脑里扎下深根。一次，他到外地开会，生产队有人用大车拉着社员的七百多张炕席到外地卖高价。他回队以后，一个副队长向他夸耀自己为生产队收入一百多元拉脚钱，还说什么：“队有收入，社员满意，弄了个两全其美。”他一听不是味，就马上批评这位副队长说，你向资本主义让步是“最大的不美”。并且说，你是领路人，只想多抓钱，不想学大寨，不带领群众赶社会主义大集，方向就偏了，路线就错了。一席话说得这位副队长无言可答，承认了错误，同时，主动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查。这件事，使社员们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路线教育。这个公社的敖汉大队腰敖生产队有一个六十八岁的林大娘，过去“搞副业为自己，赶小集入了迷”。自从举办社会主义大集以后，她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天天为集体拾粪。林大娘转变思想，一心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受到社员们的称赞。老放牧员周德金，过去一边给集体放牛，一边为自己拣烧柴，准备到集市上去卖。现在，他扔下拾柴篓，背起拣粪筐，一边放牛，一边为集体拣粪。全大队的十几个放牧员共为集体拣了二十多万斤粪肥。

自从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以来，哈尔套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社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经过一年的努力，使这个“山多土薄风沙大，十年九旱条件差”的后进公社迅速改变了面貌。去年一年，全公社兴修水平梯田二万多亩，等于过去十年所修梯田的十倍，同时还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这就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去年，全公社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四年增长

百分之四十七，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五，交售商品粮数增加了一点八倍。社员们说：“十年学大寨，唯有今年快！”

社会主义大集的创办和发展，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时，社会上也出现一些奇谈怪论，攻击社会主义大集这个新生事物。哈尔套公社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以实际行动回击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公社党委正带领广大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办好社会主义大集，推动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

哈尔套公社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受到中共辽宁省委的重视和支持，去年全省先后三次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进一步发展了农村的大好形势。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

辽宁省在清理打砸抢案件临近结尾时，抓紧复查验收，不让那些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打人致死、致残的首恶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继续占据领导岗位。

十年祸乱中，辽宁省有两万五千多人被打被逼致死。在揭批运动进入第三战役以后，辽宁省委一直把从各级领导班子里清除打砸抢分子当作重点，紧紧抓住不放。到去年年末，已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两千四百人，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一万五千人。但在对几个地区的复查验收过程中，发现还存在种种遗漏。主要表现在：一、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不纯，抵制清查。十年祸乱中，抚顺石油三厂有十三人被打致死，七人致残。但在清理打砸抢时厂领导班子不认真清查致死致残原因和责任者，而是用多给抚恤金、多安排子女就业的办法来软化死者家属，不让提出问题。他们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当年搞武斗和清队的人仍在清查班子中，一清查就暴露了他们自己。二、派性掩护，查不下去。营口市五金公司有个副经理叫张东阁，靠造反上台，是黑山县四大武斗事件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营口市工商管理局为查清他的问题，四次派人去黑山调查。黑山县委组织部有的人在派性

干扰下，封锁情况，一直打保票说他没问题。最近，他的儿子张奇用他窝藏下来的手枪（一共三支）打死了女朋友的父亲和姐姐，打伤了女朋友的母亲和妹妹时，他的真面目才开始暴露。三、隶属关系改变以后，不了了之。辽宁省师范学院原在朝阳地区时，朝阳地委曾派工作组进校，责令四个有打砸抢问题的人停职检查交代。后来学校迁回沈阳，对这四个人不仅没有再查，而且恢复职务，加以重用。四、对调入人员考核不够，使用不当，留下漏洞。辽阳市工商管理局副局长赵振金，原在广东省海丰县当武装部长。三年前转业来辽阳时，考核不周，没有发现问题。直到去年部队转来材料，才发现他在清队中打人最厉害，是积极参与迫害彭湃烈士儿子彭洪的人（以后彭洪同志含冤死去）。除此之外，有些单位虽然查了，但不认真、走了过场、留下后患。就是一些查得比较认真的单位，也有定性偏宽，造成遗漏的状况。

为把清理打砸抢的工作善始善终搞到底，辽宁省委在五月末召开的一次纪委书记和揭批办主任会议上，介绍推广了本溪市复查验收的经验。本溪市委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结束大规模群众性的清理打砸抢工作以后，就及时抓了复查验收工作，并把重点放在纯洁各级领导班子上。几名市委书记认真过问自己分管战线的清理工作，对一些问题多、难度大的单位，或派工作组，或调整领导班子，把尚未查清的打人致死致残事件普遍立案清查，从中找出主要责任者。对全市性、集团性案件，由市委揭批办牵头，统一组织力量，联合办案，消灭“三不管”状况。复查验收以来，全市从各级领导班子里，又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九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七名；清理出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十七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十五名。通过复查验收，全市二十五个县以上后进单位已有二十二个改变了面貌。复查验收还发现了原来被遗漏或平反不彻底的冤假错案平反对象一百一十五人，对他们进行了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本溪市复查验收的经验，对全体与会者有很大促进。大家认为：要纯洁领导班子，肃清“四人帮”余孽，必须象本溪市这样善始善终地结束清理打砸抢案件这一历史任务。现在，省直单位和各市地已开始打消“战机过、证难取、案难落，领导无人过问，运动干部急于散伙”的畏难情绪，普遍都在抓紧复查验收。

对当前全省清理打砸抢复查验收这项工作，辽宁省委的估量和提法是：有遗漏，各地都有一些。不是再搞一次运动，不另提口号，但决不能让这些人遗留在

班子里，占据领导岗位。不管对这些人如何处理，给不给处分，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查清。在处理上要严格按中央四十八号文件和省委五十八号文件办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可处分可不处分的就不处分，可法办可不法办的就不法办。但对首恶分子不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都应清除出党，撤销职务；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应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一般不给处分。（前一段对首恶分子的捕判面是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给予纪律处分的达百分之二十九。）辽宁省委为清理打砸抢工作规定的验收标准是：一、被打致死致残的案件是否查清了，主要责任者是否做了处理。二、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人，是否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该处分的是否处分了。三、结案材料是否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手续完备。省委要求各市地和直属单位结合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在今年七月底以前结束清理打砸抢的问题。（记者李彦）

（原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0年6月24日第1690期）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编《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1978.12-1980）》，北京：1981年

4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的通报

现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 1 6 9 0 期）《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转发给你们。

辽宁省委的清查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通过对几个地区的复查验收，仍然发现有种种严重问题。辽宁省委正在推广复查验收的经验，把重点放在纯洁各级领导班子上。不管对这些人如何处理，给不给处分，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查清；同时，还注意发现和解决原来被遗漏或平反不彻底的冤假错案问题。这条经验，很值得重视。

粉碎“四人帮”已三年零九个月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对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势力不能低估。低估了是要吃亏的。在各级领导班子中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绝对不允许打砸抢分子、所谓“造反派”头头和那些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满怀怨恨，甚至是咬牙切齿的人混进领导班子。对这个问题，务请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以及纪检机关的领导同志充分予以注意。

（此件可印发至省、军级）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中央组织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大力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补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的工资。在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我省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下发了辽委办发[1982]3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对县(区)属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停发、减发的工资也应予以补发(按规定扣除固定收入和困难补助费)。

为了进一步妥善做好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因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停发、减发工资的补发工作，针对当前遇到的几个问题，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解决意见：

一、对县(区)属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停发、减发的工资，应予以补发。经济情况较好的县(区)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要尽快加以解决；经济效益差，经费比较困难的亏损、微利的县(区)属集体所有制单位，可采取立据分期补发的办法，把偿还计划逐个落实到人，力争在近二、三年内补发完毕。

二、对于乡镇和街道所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停发、减发的工资，由于这些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产供销、人财物都未列入当地国民经济计划和劳动计划，不能和县(区)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等同起来，可根据各单位财力状况和本人所受到的经济损失，给予适当解决或一次性补助。

三、补发工资经费来源，可采取多条渠道解决。首先，要立足于企业内部挖掘潜力，增产增值；其次，上级主管部门要统筹安排，集中一部分资金，解决本系统一些单位经费不足的困难；第三，对经济困难的单位，由地方财政予以适当补助。

解决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补发工资问题，必须严格审批手续。要由原单位经过调查，提出解决意见，上报上级(即县团级)主管部门审批。原单位撤销的，由现所在单位负责处理。

以上意见，不当之处请指正。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 年)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1986.09.27；组通字[1986]38 号

现将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参照处理。

叁、本节研究资料

张志新冤案怎样平反的？(陈禹山)

来源： 中国妇女报

30 年前，“文革”的血雨腥风中，倒下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张志新。

1979 年 7 月，《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就张志新的平反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并写下了采访手记。

今天，这篇手记在这里第一次发表。文中所述展示了中共辽宁省委在粉碎“四人帮”后如何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拨乱反正的过程。

申诉

1978 年 7 月开始，张志新的亲属、家人，分别向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局、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同时发出申诉信件。

这些申诉信，写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最先得到回复，表示已转有关部门复查。张志新的母亲喜出望外，手捧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热泪盈眶。

最高人民法院立了张志新案的申诉案卷(摘要)：

郝玉芝等为张志新申诉。张志新历史清白，一贯追求进步，但是于 1969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无期徒刑。后来又在 1975 年判死刑，4 月间执行。

“我女儿犯什么罪，又捕又判？家属一点不知，令人奇怪。辽宁省公安局、法院几次来人调查，查了几次。我们家属产生极大怀疑。又问她从小得过什么病？

是否得过抽风病？但调查人来了几次，从不告诉家属她犯何罪。口头答应让探监，亲属去沈阳监狱，又不让探视。

还有 1975 年 4 月 3 日(4 日)将她处决，到 1976 年 5、6 月间才由辽宁省公安、法院来人找家属处理遗物，是何道理？据我女婿曾真(已离婚)来信说，张志新曾讲过反对林彪、江青的言论。特别讲过江青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在郝玉芝提出申诉之前，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中央关于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提示，复查该地区案件。刑庭副庭长宋延龄在审查中发现张志新案是反林彪、“四人帮”的，向副院长闫景春汇报。闫景春决定亲自复查张志新案。

笔者于 1979 年 7 月专程赴营口访问了闫景春。他说，他当时要来张志新的全部案卷，看了三天，边看边摇头，有时甚至掉泪。他是老司法，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出司法队伍，下放农村劳动，1978 年春复职。他说：

“张志新所说的每个问题，令我震惊，她马列主义水平高，和林彪、‘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毫不含糊地捍卫真理，坚持原则，不怕牺牲，也令我惭愧。但我感到奇怪，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对林彪、‘四人帮’，又如此坚强的人，为什么不站出来提出申诉？她的家属为什么不提出申诉？我了解到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我马上派人到沈阳监狱去提审张志新。回来的同志说，张志新已于 1975 年被处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张志新案的通知后，指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复审。

复查

1979 年 7 月 20 日。笔者来到辽宁省委宣传部，了解张志新案的平反经过。

赵川(辽宁省委宣传部处长)：营口法院给张志新案平反，曾来部里开座谈会，介绍张志新的观点。座谈会后，把会上记录整理出来，给部长。张志新受迫害时，部长也在牛棚里关着。他看了记录后，说：“真不简单。”他批转各副部长传阅。

我们到沈阳市法院了解处刑情况。当时他们对此案复查按兵不动，我们要求看看案卷。他们说：“不能给你们看。”回来跟部长汇报，部长要我们起草报告，向省委反映。当时听说张志新是被秘密处死的。

1979 年 1 月中旬，省里成立公检法联合复查组。复查组由当时分管公检法的省委领导张铁军挂帅。经过复查，公检法方面同意平反，认为是一般冤案，不算烈士。

部长不同意是一般冤案，认为张志新应定为烈士。

最后，经省委常委会决定，定张志新为烈士。发文件宣布平反和开追悼会。

7 月 22 日上午。笔者采访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文兰。

赵文兰：领导上要我接办张志新案复查工作之前，我知道此案。

在这之前，案件是由原办案人×××复查，×××对我说：“张志新这案，还有什么可改的。她把党的‘九大’、‘十大’也否了。”“我们加处死刑，是实事求是的。”

1 月 15 日下班前，领导把我叫到院长办公室，把×××也叫去。领导说：省法院来电话，省里提出张志新案复查要换人，原办案人不要参与复查。这样，×××就不能复查了。要他把卷宗移交给我。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把卷宗带回家里看。许多材料是张志新写在手纸上的，字很小，6 万多字，我用放大镜看。

省里不断来电话，询问工作进展情况。为争取时间，省里把我看了的卷宗拿走，省里的同志就接着看，流水作业。

头三天，我内心很沉重，很矛盾。但三天后，心情就翻过来了。我觉得，这不是一般案件，是宗大冤案。张志新是自觉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她代表了全国人民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出了心里话。把个人的安危抛开，也不顾自己的家庭、孩子了。她面对的是当时党内的大人物啊！她 10 年前所说的那些话，是我们现在批判林彪、“四人帮”说的话。在批斗会上，她所说的话，体现了她对党的忠诚。她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但被打成了反革命。

审讯她，她不服，说自己无罪。她说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要么我投降，要么你们镇压。”“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我常常边看卷宗边掉泪。内心控制不住。我想，如果当年大多数的共产党员都像她那样就好了。我们国家就有可能避过这场灾难了。

7 月 22 日下午。笔者采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徐凤林：张志新案复查，市中院开始时，由原办案人×××来办，他说这案没错。

我回来向领导汇报了。省里决定市中院原办案人×××回避。

省高院复核时，没有阻力，原办案人，主动写材料，看不到有抵触情绪。

李德生指示，此案从头查。省、市分开查，宣传部、市中院、营口中院、监狱各查各的。张铁军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

任书记(任仲夷——笔者注)对复查组工作抓得很紧。3月9日，复查组向省委汇报，任书记亲自主持汇报会。

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16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

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根据复查结果，我们认为，张志新同志是敢于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好干部。张志新被错杀，是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一桩严重罪行，是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司法工作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应立即撤销原判，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对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汇报。这次会议确定，省委要作决定、发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她的英雄事迹，并且要很好地安排照顾好她的亲属和子女。在会上任仲夷最后说：

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

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省委领导人参加了大会。除了张志新母亲郝玉芝因年迈没能前来参加大会外，张志新的丈夫、子女、张志新烈士的哥哥、妹妹都来参加了大会。

在平反大会开始之前，复审张志新案，并坚持为张志新平反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文兰，在看望张志新的家人和亲属时，把她找到的 10 多件张志新的遗物交给他们。

赵文兰说：张志新被杀害，留在狱中的东西共 125 件，后来法院判定：全部没收。省委决定给张志新平反后，我找到经手处理遗物的卢钢成同志，老卢打开账簿一查，东西早在两年前就处理了。我对老卢说，烈士的遗物，是无价之宝，哪怕找回一针一线，对亲人也是个安慰。

我和老卢一起到处寻找，老卢一件件认，最后认出了十几件，有茶缸、眼镜、手帕等。

二 00 五年八月，《不该忘却的纪念——追忆张志新》（陈禹山）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摘自悼念张志新烈士诗集

解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解说人

时间：2005年8月

地点：深圳

解说：1979年中国新版《辞海》当中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这源于1979

年6月至9月间在中国各地掀起的对张志新事件的系列报道活动。二十多年之后，

也许还会有很多人追问，谁是张志新？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辞海》中的注解：

张

志新（1930—1975）天津人。女。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之中，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遭受残酷迫害，在 1969 年 9 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75 年 4 月 4 日被杀害。表现了共产党员为真理而献身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1979 年 3 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本期《口述历史》的讲述者陈禹山先生 30 年前是《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正是他在 1979 年 6 月 5 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揭开了全国报道和学习张志新烈士的热潮。而今天他要讲述的则是《辞海》中未能涉及到的张志新案件背后的故事。

陈禹山：那是 79 年，报社就收到一份来稿，是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给报社寄来的。我记得题目是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稿子收到以后，记者部的主任，就拿给我看看，我看完以后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重磅炸弹，这个题材非常重要，但主要道理讲多了，实际情况讲少了。当作一个宣传报道来讲，应该给读者更多一些真实的细节情况。他说那好，你能不能去辽宁跑一趟，我说可以。

解说：第二天，陈禹山做火车前往沈阳。那封如重磅炸弹的来信说的正是张志新的事情。信中说辽宁省委宣传部一名女干部因为思考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被整得很惨。陈禹山例行公事地接受了采访任务，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五天五夜的辽宁之行竟然从此影响了他的生活。

陈禹山：稿子 5 天 5 夜，连睡觉都没有，没有睡过觉。流了很多眼泪，我这个文章

绝对感动大部分读者的，令我更难受的就是好多东西不能说，没有把完整一个张志

新的案件，张志新完整的人格写出来。

解说：或许正是为了弥补那份遗憾，寄托一份对真相的追求，对历史的尊重，陈禹

山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将他所了解的张志新案件的始末和盘托出。

陈禹山：大概就是 6 8 年的春天，有一个星期天，她是到一个姓闫的女同事家里，想向她借江青文化大革命时候讲话资料。这个姓闫的女同事说张志新你站过来吧，

不要站在那一派。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她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

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理解，比

如说江青叶群她们过去是干什么我对她们都不了解。这个姓闫的这个同事，就马上

向当时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去汇报这个事情，写成文字了，都写进在档案里头。

解说：1 9 6 8 年 5 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9 月，沈阳市首批二十万知识青年

被动员上山下乡。1 0 月，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机关干部，被送进在盘锦的

辽宁省“一 0 · 五”干校。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也在其中。张志新本来在私底下的言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

陈禹山：揪出来首先一开始是弄来就开批斗会了，揪出来就说她反革命，反文化大

革命，反对江青同志什么之类都来了，来了以后她当时只知道这些，白天劳动，晚

上审查批判，逼她必须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挖她黑思想，就不断地逼，而且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就 4 1 3 专案组。

解说：按照陈禹山的解读，张志新以言定罪的这些言论最初其实都只是在与同事朋友之间的闲聊之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思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待中，她被迫说出了自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地越来越深，直到 1 9 6 9 年 9 月 1 8 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解说：被判无期徒刑的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最一开始，她被编入第三大队女监犯人的一个班里，实行集体关押，不过很快，张志新由于坚持自己的言论，被单独关押，并且遭到了虐待。陈禹山在报道张志新事件的过程中亲自前往沈阳监狱。在监狱管理人员的带领下，了解了张志新曾经住过的牢房，蹲过的小号，被割喉管的现场，他还亲眼看到了张志新曾经带过的脚镣。有关张志新在狱中遭虐待被逼疯的传闻，陈禹山说，可以得到证实。传闻张志新在狱中还遭到强奸的厄运，对此，陈禹山说，从他所接触的材料和受访人群中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陈禹山：张志新最初是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无数次的坦白交待过程中，她始终坚

持自己的观点，从头至尾没有承认错误。具档案记载，1970年5月，盘锦地区
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
判张志新死刑。案件经一层层同意，最后报辽宁省委审批。审批会上，与会者对
盘锦地区法院、锦州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同意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示没
有
异议。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他说，留个活口，
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只这一句话，救了张志新一条命。然而，厄运并没有因
此
远离张志新，她又第二次被判处死刑。

第二次判死刑是这样的，张志新那个时候已经确实是疯了。林彪事件出来了，
监狱里面学习，批林批孔，在外头请人来给犯人做报道，批判林彪，在那个大会
上
犯人听了。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候有一个犯人就喊，林彪不是
地
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张志新起来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
东
，就喊了。当时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那么就是按照法律来讲的话，一个无期
徒
刑的人重新犯罪就死刑。

解说：这一次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陈禹山在档
案
中看见了有关那次常委会议的纪录。

陈禹山：一共是 5 个议题，第五个议题就是审议死刑犯，就是审张志新。后来毛
远
新讲了，判了无期徒刑，还是那么疯狂，还是犯罪，让他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改
革
，杀了算了。整个常委会，时间我没有算，整个记录大概 6 0 个字，不到 1 0 0
字
就终审了，就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决定。张志新死刑的判决公布
之
后，沈阳监狱中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
月
1 9 日，上级批示指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1 9 7 5 年 4
月
4 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时年 4 5 岁。

解说：陈禹山回忆说，张志新档案中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
部
一枪击毙。在执行枪决之前，张志新的家属曾被询问，是否要遗体 and 遗物，当时
张
志新的爱人曾真和两个孩子已经离开沈阳，在农村插队，他们表示什么也不要。
数
年之后，张志新平反的追悼大会上，女儿林林捧著的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张
志新的遗体到底在哪，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陈禹山：到曾真（张志新丈夫）的家，曾真不在家，她林林告诉我，爸爸到什么
旅
社，人大的一个老师过来看，他去看他们了，那么就和林林谈，那个时候林林 1
8
岁左右，她的小弟弟大概十岁左右。

我去采访那个时候的心里是明白的，就抓细节。她就讲她妈妈在干校被捕押回沈阳以后，抄家，搜查，把张志新押回家里。张志新的女儿上学去了，上学回来的话，那么邻居叫她不要回家了，给他讲了，最后那个邻居看到张志新已经戴着手铐从家里出来，以后再讲林林出来，叫她出来见妈妈，那时候车开车，林林就追这个车喊妈妈，就是最后一次见妈妈是这样见的。她妈妈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她就被认为是狗仔子，黑帮，在街上那些人用石头打她，欺负她的弟弟，她想入团都入不了，都是讲她受的那种，一个孩子受的株连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伤害，这样的东西对我印象是很深，我为这个事情很难过。

解说：自《一份血写的报告》发表之后，陈禹山又采写了《走向永生的足迹》，和《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两篇报道。为此，他再次前往辽宁进行深入调研。通过集体座谈和个别访谈的方式，陈禹山采访了包括法院，宣传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另外还有张志新的邻居，同事，家人，一共上百人。陈禹山说，希望能够挖掘更多的材料，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张志新。

陈禹山：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想起来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这个人可以说很完美

。她的完美最重要是内心，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很有爱心，而且对国家对民族对
我们党的事业真是充满了激情的，不是反对不是冷漠，是一个蓬勃向上的女共产党
员。她的领导叫做周恒，那是辽宁省的负责人，主要是抓文艺的，他回忆张志新的
话，学习非常刻苦，就是勇于思考，明辨是否，而且敢于仗义直言。

解说：张志新身上散发的气质与她的家庭不无联系。她的父亲张玉藻，早年参加过
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母亲郝玉芝曾就读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张志新有
3 个哥哥，3 个妹妹，张家姐妹们从小就学会了弹奏乐器，曾被誉为天津音乐界的
才女。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曲子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抗美援朝期
间，张志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人大学习俄语。也就
是在那里，她与曾真结为夫妻。有关张志新婚外情的说法早有传闻。时隔近 30 年
，陈禹山回忆说，这种说法，其实有所依据。

陈禹山：就是档案里有的，而且那个都写了，她承认，张志新的家人也开始申诉。
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回复，要求地方人民法院对张志新案件进行复查。陈禹山回忆说
，当时负责案件复查的赵文兰法官分析，要想翻案必须突破两个禁区，其一是那些
针对毛泽东的言论，其二是张志新的精神问题。在为张志新平反的过程中，人们利

用这两点为突破口，为张志新洗刷了不白之冤。

解说：从 1969 年因言治罪，到 1979 年平反昭雪，十年一梦，终归盼来了梦醒之时，只是张志新此时已经无法体验重拾清白的那份解脱。这也许就是整个事件的悲情所在。不过，我们今天的讲述者陈禹山却一再强调，今天说出这一切不是要开诉苦会，身为记者，翻阅档案，采访证人，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真相记入历史。

陈禹山：对典型人物的报道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近三个月，之后在中央的统治下，停止了宣传，不过人们对这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她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她原来和两个人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个事情是她不讲，对方也不会讲的，但是她这个东西她自己讲了。当时穆青在新华社发表一篇通讯，叫做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基本上全党全民都学习这个焦裕禄的精神，张志新学以后很感动，她是找组织坦白。

解说：作为一名老记者，陈禹山坦言，当年在采写张志新报道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注意去挖掘人物身上的缺点。不过，即使是在今天，他依然坚持认为张志新是个完

美的人，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缺点错误的话，她的婚外情可能是唯一的错误。除此之外，张志新在坦白交待的过程中，从未承认过其他错误。

张志新因言治罪，惨遭割喉枪决的命运，不过，这惹祸上身的“言”，其实并不仅仅是二十多年前宣传报道中，甚至《辞海》中所描述的“反对林彪，四人帮集团”，而是因为她坦率地评说了毛泽东的功与过。

张志新在 1969 写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与 10 年之后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有着惊人的吻合。只不过，张志新用生命作代价，提前十年道出了一个思想者的内心独白。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央在 1977 年底，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各地开始贯彻这一精神，与此同时一事件的思索和探讨还在继续。

□ 摘自《凤凰网》凤凰卫视节目“口述历史”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朱建国）

◇ 张志新冤案当初是逐步披露的

自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一周年的 1979 年 6 月 5 日，《光明日报》全力推出张志新系列报导以来，一直有一个民间传说：关于张志新冤案，还有一些重要的

秘闻不便披露。《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在回忆录（载《光明日报 40 年》，191 页）中说：

从 1979 年 6 月 5 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 9 月 12 日登载《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结束，3 个多月中，共刊登有关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长篇通讯、怀念文字、理论文章、编者按语、新旧诗词、照片、绘画、歌曲、题词以及各种报道 86 篇（幅），约 15 块整版，14 万字。

……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 年 4 月 4 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

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

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刚从深圳特区南山区委宣传部长退下来不久

的陈禹山可以回答。

◇ 陈禹山终于同意说出隐情

当年《一份血写的报告》，署名是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三个人，但真正的执

笔者、采访者是陈禹山。孙钧、苗家生其时是《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

禹山是《光明日报》记者部中写大稿的机动记者。

1979年5月中旬，陈禹山得知张志新冤案平反，立即向记者部主任卢云汇

报，经批准后，连夜乘火车前往沈阳采访。陈在初阅了张志新的基本材料后，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立即采访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儿曾林林，然后又到张蹲过的监

狱，现场勘察张住过的“小号”（只能一个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和被割断

喉管的监狱刑讯室。在四天夜以继日的采访后，当晚陈流着热泪执笔写下了万字长

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稿子写好，请孙钧拿去省委送审（当时任仲夷任省委

书记，全力支持张志新冤案平反），通过后，第五天即坐火车赶回北京。考虑到今

后辽宁站同志工作方便，陈禹山最后在稿件上把孙、苗二人名字署在了自己前面。文章发表后，孙、苗二人见署了自己名字在前，非常感动。

1998年7月21日，我在深圳南山找到了陈禹山。

年近 60 岁的陈禹山，黑瘦而精悍，虽两鬓斑白，但眼镜后面眼神深沉。凝神
沉默许久，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近 20 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恳求他披露秘密，
但他都一一坚决拒绝了。而今，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 20 周年”之日，在改革
开
放已进入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时刻，他觉
得，
到了全部披露张志新冤案秘密的时候了。

几个小时的回忆，录音机记下了陈禹山保守了近 20 年的张志新冤案秘密。
◇ 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
是
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
前
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
岁
”，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
远
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
事
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
厚，
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
不
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 20 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
中
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
“

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 张志新行刑前已被逼疯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

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 张志新确有“第三者”

1979年秋，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在北京曾追问陈禹山：为什么辽宁有些人说我姐姐有“作风问题”？陈对此避而未答。

当时关于张志新的报道中，已经披露了张写给丈夫和女儿的遗言：我对不起你们……这句话是双关的，既有自己遭罪牵连家庭的意思，也有一种夫妻感情上的内疚。但那时陈觉得对英雄的私人生活不应过多暴露。

时隔20年，陈回忆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是有所依据的。陈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本人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整个案卷中，所有指控张“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认，她说：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

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卑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

自己。但她惟独坦率承认了自己有“婚外恋”，并说是在重看焦裕禄故事之后，同

焦裕禄相比，她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对这一道德过失，她愿坦荡

认错。

陈说，当时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的丈夫曾真了，了解到曾真当年体

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

状态，加上张天性喜爱文艺，与情趣相投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

与

张深刻的思想、卓绝的勇气相比，此点人性局限，仍是瑕不掩瑜，应该说无损于张

志新作为一个真理斗士的高风亮节，在当时报道中回避这一点，毕竟还有点受

“四

人帮”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的影响。其实，任何伟人，任何英雄，总会有一些弱点

与不足，今天把这个隐密公之于世，只会使张志新更可亲可信可敬，说明她是一个

真正的人，而不是神。

◇ 胡耀邦批准宣传张志新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

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

，又有“好象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

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
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
。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
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
塞，
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
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
杀
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
杀
，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
会
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
汉，
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
管
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
民
“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
宣
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

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张

案报道讨论在 3 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 转载自《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

《张志新的凄然清泪》（茉莉）

~{ 当年为张志新哭泣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刚从农村回城不久的少女。那时满世界

~{麻木混浊的庸碌俗人中，突然迸出那么一个侠骨柔肠、光彩夺目的女英雄，不由得

~{让人为她的命运肝肠寸断。~}

~{ 二十年过去，在患了严重的健忘症——只顾捞钱不管洪水滔天的大陆国人中，

~{居然还有人记起了张志新。虽然一些“打开记忆”的报导使用的是当今流行的形式

~{，如“首次公开透露”、“重要秘闻”和“说出隐情”云云，但这些报导触到了我

~{们心中永远的痛：一个行刑之前已经被逼得发疯的张志新，因为勇敢地呼喊“打倒

~{毛泽东”的口号被割断喉管后枪毙。在个人爱情生活上，美丽而坚毅的她流着绵绵

~{无尽的凄然清泪。~}

~{◇ “打倒毛泽东”振聋发聩~}

~{ 原《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张志新冤案系列报导者陈禹山在沉默多年

~{之后，于今年七月在深圳接受了记者朱建国的采访。随后《南方周末报》试验特刊

~{登载了朱建国的采访记《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一文（见本刊 z k 9 8 0 9 a ——~}

~{编者注}，公布了一些过去属于“为尊者讳”的内容，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张志~}

~{新在行刑前已经被逼疯，之二是张志新的确曾有过婚外第三者。~}

~{ 陈禹山回忆说，由于张志新不仅认为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

~{左的错误”，所以被当时主持辽宁省革委会的毛远新视为“嚣张”，将原判的无期

~{徒刑改为死刑。经过多次小号折磨，张志新终于被逼疯。后来她用窝窝头沾着月经

~{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事，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 当年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批

~{准的“新生事物”，其目的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张志新在被割气管时剧疼难忍

~{，呼喊声惨不忍睹，旁边的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

~{ 实际上陈禹山至今仍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据曾经于1979、1980年两

~{次采访张志新事件的原《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回忆，张志新在监狱里喊出过

~{“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因而犯了被“太上皇”割断喉管赐死的死罪。笔者认为，

~{这个重要的情况陈禹山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由于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在大陆仍然是

~{个忌讳，所以陈禹山在接受采访时含糊其词，只说张志新批评毛泽东犯了“左的错

~{误”。

~{ 这么多年过去，张志新事件仍然蒙着需要一层层揭去的面纱，这只能证明当今

~{中国有多么大的“新闻自由”。~}

~{ 然而先知先觉的张志新那振聋发聩的“打倒毛泽东”的呼声终将载入史册，使

~{所有被中共惩罚却感激“母亲打儿子”的委琐奴性得以现形。至于她的疯狂，一位

~{美国诗人这样吟诵：~}

~{ 疯狂是什么？无非是那灵魂的高贵~}

~{ 与时势格格不相入。……~}

~{◇ 婚外恋为“性”还是为“情”？~}

~{ 关于张志新有第三者的问题，据说辽宁早有传言说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陈

~{禹山说他在看张志新的案卷时见到了张志新的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

~{有婚外恋。整个案件中，所有指控她“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认，但是

~{她唯独坦率地承认自己有婚外恋，并说自己在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像。

~{ 陈禹山说，他在“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了解到张

~{志新的丈夫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志新可能处

~{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状态，加上张志新天性热爱文艺，与情投意合的艺术家产生婚

~{外恋是可以理解的。……”~}

~{ 但陈禹山先生这样的“可以想见”，对张志新来说却是不负责任的。张志新曾

~{经有第三者，这是个事实。现在瑞典做学术研究的王若水先生认为，张志新的婚外

~{恋无损她的英雄形像，将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曝光也无可指责。但是笔者对于该报

~{导使用的想当然的夹叙夹议却大有疑问：你们凭什么认为张志新的婚外恋是因为“~

~{性”，而不是因为“情”呢？~}

~{ 现居美国的刘宾雁先生认为陈禹山所述几处失实。刘宾雁先生在接受
笔者采访

~{时，谈到当年他调查到的情况。他介绍张志新婚姻说：“张志新与其夫是
两种不同

~{类型的人，后者是一小官僚，一个庸人，结合时已很勉强（那人利用“培
养”张入

~{党的身份，政治因素可见也起了作用）。二人长期不合，不能从‘性’上
来解释。~}

~{张在婚前其父母、妹妹、哥哥一致反对，可见那人不适合于她，她也不会
毫无感觉

~{，后终于勉为其难。我的分析是：一、张善良，不愿有负于他；二、依当
时流行的

~{观念，认为个人的婚姻幸与不幸是小事一桩，无碍于革命。”~}

~{◇ 感谢命运让她享有过真情~}

~{ 这个勉为其难的婚姻本来就缺乏坚实的爱情基础，加上当时中国席卷
一切的疯

~{狂的政治运动，正直坦率的张志新不可避免地和苟且庸碌的小官僚产生裂
痕。刘宾

~{雁先生回忆说：“文革时，张志新怀疑江青，在家常表异议，其夫严厉制
止，这才

~{逼得张志新去找外人（一个女干部）说，被告密。张志新对于党校一位教
员（不是

~{文艺界人）感情很深，文革前已遭批评，关系中断，但张志新还把那人的
照片偷偷

~{地缝到军大衣的领子中，被捕后，自责对不起丈夫，这才告知其夫取出烧
掉。张志

~{新入狱后其夫一直未去探监，直到她提出离婚时才去见了一面，给张志新刺激很大

~{。文革初期大字报揭发此事，对张冲击极大，精神已经有失常迹象（恐应从不幸婚

~{姻算起）。”

~{ 刘宾雁先生最后总结说：“总之此事乃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二代人之悲剧

~{。文革前夫妇本已达成离婚协议，只因争要女儿才未能办成。一、倘若中共在两性

~{问题上不持清教徒主义，以致造成对个人的强大压力和人的自我压抑，以致张志新

~{在离婚的问题上拖延甚久；二，倘若此事不被用作政治攻击的武器；三，倘若张志

~{新仅受到政治迫害而无这一精神痛苦，则张的政治悲剧不致发生。”~}

~{ 在关于张志新婚外情的对象上，陈禹山所述和刘宾雁先生的回忆指的不是一个

~{人。为什么两位参与调查的老记者的说法不一致？刘宾雁先生回答说，当时辽宁确

~{有传言说张志新与一个主管文艺的干部相好。那个主管文艺的干部叫周桓，因为张

~{志新经常陪那位干部看文艺演出，因而酿成流言蜚语。这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流言极

~{大地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张志新，给她的精神留下创伤。~}

~{ 幸亏还有一位党校教员，一位值得我们女英雄把他的照片缝到军大衣领子里

~{的男性。漂亮聪慧、多才多艺的张志新被专制政权凌辱至死，我们只能为她在生命

~{的凄风苦雨中曾经拥有过那么一段温暖真情而稍感安慰。~}

~{◇ “不要又出一个张志新”~}

~{ 据说一九七九年辽宁省决定命名张志新为烈士时，在对张志新之死负有责任的

~{辽宁军政系统、以及反改革的保守势力那里引起一片强烈的反弹之声。很有意思的

~{是，反对将张志新命名烈士的理由，竟然是说她的“作风不好”。对于中国男性来

~{说只是区区“个人生活小节”的婚外情，对中国女性张志新却是至死不赦的大罪状

~{，这充份反映了中共这个政权的男权本质。~}

~{ 张志新对于中国历史的今天和未来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她的事迹甚至深刻

~{地影响了一代监狱女干警，她们也是当年和我一样为张志新哭泣的少女。~}

~{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入狱后，经过收审所、看守所封闭式的一段监禁时期，在判

~{刑后被押送到比较开放的长沙女子监狱。令我惊异的是，长沙监狱的几个女干警一

~{开始找我谈话时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她们愿意尊重我的人格，希望我也尊重她们的

~{管教工作。我当然知道我被冤枉判刑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罢

~{了。这之后我和长沙监狱教育科的一些女干警友好合作，在不谈政治、不谈案子的

~{前提下，我们办起了女监第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到我出狱时，我任教的班上

~{有几十个女犯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合格证书。那段监狱生活因而成了我生命中

~{的一段很值得怀念的时光。~}

据说当时我作为“六四”后长沙监狱唯一的一个女政治犯，给那里监管我的女

干警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她们担心和倔犟的我发生激烈冲突，以后在历史上不好

交代。“不要再出一个张志新！”她们商量怎样合理谨慎地对待我。至今我仍然深

深地感谢所有在我的案子中表现了善良人性的监狱干警。她们作为我和李鹏政权尖

锐冲突的中介，尽可能地在她们可能的范围内，使有着强烈个性的我不致因为拒不

认罪而遭受更大的惩罚。张志新用她鲜红的热血，给后来的女政治犯争取到了较为

人道的待遇。张志新对真理的追求、对专制的反叛，其思想的深广和命运的悲惨沉

重，使得中华大地不致在轻薄油滑的精神荒原中完全沉沦。~}

{□ 寄自瑞典（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二〇〇五年 陈禹山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

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

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 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 38 岁;此后,受了 7 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 45 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 30 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外界一直盛传的张志新的婚外恋确实存在,我在 20 多年前写那篇报道时,不可能提及这一点。但过了这么多年,我丝毫不觉得这有损于张志新在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形象。张志新在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团支书的曾真相恋、结婚,后来调到辽宁。性格外向、浪漫的张志新与丈夫后来关系不是很亲密,“文革”刚开始时候,张志新和曾真是分成两派的。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后来告诉我,张志新有一次从沈阳回天津探亲路过北京,说起曾真,张志新还哭了一场。 “文革”之前,张志新看到穆青写的焦裕禄的报道后,很感动,主动找组织坦白。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攻击她这一点,说她如何如何。但张志新很特别的一点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指责毫不放在眼里,但对她的“思想罪”,她明知最后的代价可能是死,却仍然不愿为此放弃她所认为的“真理”。我看过案卷,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因为至死不认错,张志新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我去监狱,看过她住的那个“小号”和她戴过的脚镣。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说,有一次张志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监狱方面找了几个女的进去给她穿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现在看来,张志新那时候已经完全疯了。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现在都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从来来往。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不和。张志新平反后,不少报纸登她的家庭合影,都把曾真的头像从一家 4 口中拿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时隔 20 多年,再回顾“张志新事件”,我想可以这样说:如果辽宁没有任仲夷,张志新还平反不了。“文革”结束后,“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在这种气氛下,

辽宁省委仍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可谓勇气可嘉。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 8 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的报道登出来之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三大麻袋的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一点便是“要严惩凶手”。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已经离去 30 年了。如今，她的名字已渐渐被淡忘。但我想，她代表了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张志新冤案的新隐情

1 张志新为何被杀

今年4月4日，是张志新烈士牺牲25周年。25年前这一天，张志新在沈阳被割断喉管后枪杀。1979年春，此案平反，揭露案情，震惊全国。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关系，张志新冤案的真相，并没有全部公开。当年采写报道张志新案件的陈禹山最近又一次披露其案情，揭示其中新的秘密。

陈禹山说，当年的报刊报道：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真相的全部。其主要原因，陈禹山在他发表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究竟张志新对自己的领袖的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哪些“意见和看法”？陈禹山详细引述了张志新的原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

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这些“意见和看法”，是1969年8月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风行的时候，在组织召开的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说的，档案里均有案可查。10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她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对党的事业，她有功，而不是有罪。她的不幸是不应该的，是时代的悲剧。

张志新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到处跳“忠字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2 张志新曾企图自杀

1969年1月9日。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批斗会上，张志新被质问：“你昨天写的所谓遗书，是什么意思？”

张志新：“那是不对头的。”

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张志新：“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证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张志新：“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

张志新：“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罪还是示威？”

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

问：“怎么严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

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当追问曾真对她的影响时，她意识到，她的不幸必会株连家人。她向审问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1969年8月张志新被捕，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与世隔绝了。同年11月，已被监视、审查的曾真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沈阳。1970年8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一年多后，曾真无奈被迫提出离婚。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至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10年漫漫风雨岁月里，也是九死一生，但他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春，他和两个孩子回到阔别8年多的沈阳。

3 张志新笔伐监狱长

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捕投入监狱后，遭受虐待，甚至毒打。

12月25日，张志新在狱中迎来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5周年的日子。她要庆祝这一天的到来，特谱写一首题为《迎新》的歌，因而遭狱警殴打、凌辱，并把她的笔和纸没收了。张志新无比义愤，用小木棒代笔，在手纸上写下控诉书：质问、控诉、声讨！身为专政机关之长，你听着：

1、你为什么不敢把钢笔退还我，不是要我写写对宣判大会的感触吗？难道由于事情繁忙忘记了吗？如果是这样，在此提醒一下！如果是怕给了我这枝笔后，写出不合乎要求的感想而改变方针，这也真是少找点麻烦，也愿听便。看来，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掉！

2、自称为代表无产阶级、共产党执行专政者，你们的作为那一点像无产阶级！一首未写完的革命诗歌，做为导线借口，行凶殴打凌辱女政治犯！你们

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可以这样随便凌辱的吗！行凶者、帮凶助威侮辱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吗？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要声讨你们。你们若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严惩！这笔账是要算的！

3、你们管理的哨兵可以无缘无故辱骂女共产党员！

4、你们管理领导下的伙房，可以用带有煤渣沙子的黄馍虐待政治犯！你这个一所之长，却推脱责任，回避问题，逃之夭夭！

5、一所之长竟用拖压办法，不发给女政治犯特需手纸，进行生活上的刁难！

你们若是无产阶级，你们为什么那么怕真理！没听说无产阶级、共产党的专政机关殴打犯人、辱骂犯人，生活上虐待犯人、刁难犯人！你们所作所为是那个“无产阶级”？

你们以为利用上述恶劣手段、可耻勾当，就可以软化革命者的意志，可以向错误路线投降吗？这除了说明你们手中没有真理，在真理面前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告诉你们：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失败和牺牲的保票才去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共产党人，一个被错误路线迫害者，脱党状态的女共产党员，孤家寡人一个，在这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缺点错误失策在所难免，是前进中的问题，自身有克服的基础和可能，在斗争中只会提高觉悟，越战越强！因为她日益掌握真理！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还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她只能作七十年代的哥白尼……。克服意大利青年“亚瑟”式天真幼稚幻想，克服法国布朗基式革命冒险主义，要自觉锻炼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对此，是无产阶级不难理解！不是无产阶级本来就没有共同语言！

坚持真理永不放弃！有什么办法尽量来使……

4 张志新被判过两次死刑

陈禹山说，张志新曾两次被判死刑。第一次是1970年5月14日。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办案人员回忆介绍：张志新 1969 年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根据策反方针，判几年刑就行了。可是她不认罪。当时同意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 1979 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罪名是“右倾”，保护了敌人。老公、检、法人员许多受难。高振忠是幸存者。对张志新案，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当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 15 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 6 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给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 年 11 月 16 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彪）批孔（子）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魏××、苏×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魏××说：“真是反动透顶。”

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

魏××说：“干脆吧。”

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苏×、魏××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被杀害。

5 张志新给丈夫的诀别信

张志新是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曾真的。

这年朝鲜战争爆发，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她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从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1955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12岁，儿子曾彤彤3岁。

1969年1月5日，张志新给曾真写了一封诀别信。

曾真：

结婚 14 年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的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结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让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两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 15 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

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沈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把孩子放（天）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

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

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志新

1969 年 1 月 5 日晚

然而，这封信，曾真当时并未收到，它被装入曾真和张志新的档案里。待曾真看到这封信时，时光已过去了 10 年。读信的曾真和他的两个孩子都声泪俱下，悲痛欲绝。

6 死囚家属学习班

据陈禹山忆述，1979年初夏，他访问张志新女儿林林，林林谈了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林林说：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沈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一段是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是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沈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在学习班上，沈阳法院的人要林林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摘抄于此：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 10 岁，而林林也未满 18 岁。

（摘自 2000 年 6 月 19 日《南方周末》，作者：陈少京）

二 000 年六月十九日，《张志新究竟因何而死》（陈少京）（1975 年一个初春的日子，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枪决而死。25 年来，张志新最终究竟因何而死，我们不知道；她的遗体如何处理，我们也不知道；她两次被判死刑的详细过程，我们更不知道；她的亲属近况如何，我们还是不知道；至于她的儿女被办“死囚学 习班”一事，我们更是闻所未闻。在这里，陈少京先生以翔实的材

料，把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披露出来。这真是一段沉痛的往事，生活在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悲剧中的一员。） 今年4月4日，是张志新烈士牺牲25周年。当年采访张志新案的陈禹山回忆张志新案情，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陈禹山说，当年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时，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冤案真相尚未全公开。让张志新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对创造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至关重要。 25年前，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为了不让她说话，割断她的喉管，然后押赴沈阳郊区大口刑场执行枪决。1979年春，这起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当时全国的报刊报道说，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事实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 当时，陈禹山发表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曾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其实这才是张志新被杀害的主因。 究竟张志新对自己的领袖的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哪些“意见和看法”？陈禹山详细引述了张志新的原话：“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

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这些“意见和看法”，是1969年8月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在组织召开的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说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她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 但至今，绝大多数的人们仍未知道这个真相。 张志新遗体到哪里去了 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在追悼大会上，张志新的女儿林林捧着的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张志新的遗体到哪里去了？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当时火化”，也有说是“因为她的身材标准，其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等等。这一直是个谜。 陈禹山说，当年宣传报道张志新的事迹时，他所在的报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两封来自沈阳的读者来信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这两封信，他一直保存着。 一封是沈阳二十一中齐利的来信，信中说： 我读了几篇关于张志新烈士的报道，张志新烈士的遗骨没有了，真是这样吗？我把我在群众中听到关于张志新的遗体的问题反映给您。望编辑同志，能否认真调查一下，这事在群众中议论很大，有必要澄清为好。 我的同事和邻居们都这样讲，张志新牺牲那天，身着褪了色的军装，但几篇报道中却是酱红色的囚服，她死后，她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作病理解剖实用。 因张志新烈士牺牲后，留下的遗体，按着医学上来说是一具较完整、无病的女尸，这在医院来讲是难找到的，就是有病的女尸，又有哪家家属愿把病尸献给医院呢，所以张志新的遗体运到沈阳，这就给医院解剖实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那么张志新较健康的遗体某一部分，就会被放在某个玻璃瓶里，供医学院的学生们教学实验。 如果真像同志们和邻居们所议论的那样，我认为烈士的遗骨就能找到，因1975年4月4日，作为沈阳市每个医院来讲，得到一具完整、无病被枪杀的女尸是极不容易的。沈阳得到张志新烈士的遗体后，定会将张志新烈士的遗体肢解，放在大玻璃瓶里保存。 烈士的遗体找不到的另一种原因是，沈阳是受“四人帮”及其死党迫害的重灾区。那个“四人帮”的死党（指毛远新——笔者注）已倒台了，但“四人帮”的须子仍然存在，这就给找烈士的

遗体带来了种种阻碍，充分发动溆阳医学院的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回忆烈士的遗体就能找回来。如能找回来一部分，不也是对烈士的一种安慰吗？对得起死难的烈士吗？

张志新同志是党的好女儿、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值得我们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来学习，永远值得我们来怀念。烈士的遗骨，就不应放在溆阳医学院解剖室的大玻璃瓶里供人展览，而应放在革命公墓让人们永远怀念、敬仰。

另一封信是辽宁中医院基础部韦同运的来信。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其尸体被拉回溆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

遗憾的是，张志新烈士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她那骨灰盒一直空着。

张志新的平反绕过“禁区” 既然不把张志新冤案的真相说清楚，怎样平反？平反会彻底吗？

陈禹山认为，这不能算彻底。他谈了张志新案件的平反经过。他说，张志新案最初由原办案人、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 XX 复审。王 XX 认为，张志新案，是“没有什么可改的”。她“反对毛主席，事实确凿”。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

辽宁省委要原办案人王 XX 回避，改由赵文兰复审张志新案件。赵文兰说，她边看案卷边掉泪。张志新说的那些话，说明了她对党的忠诚。张志新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把个人的安危抛开，也不顾自己的家庭、孩子了。作为法官，赵文兰认为要翻这个案，须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看能否冲破“禁区”，即指所谓反对毛主席；另是张志新在狱中被逼

疯。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对张志新案复审的汇报。省委书记任仲夷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给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任仲夷在会上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省委要搞出一个很好的文件，给张志新同志以表扬。这个文件不仅下发，还要向中央上报。”“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从我来说，听

了觉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别人的事我没有干过，但像她那样坚持真理，我还做得不够，值得向她学习。” 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疯狂践踏党的民主生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草菅人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的一起大冤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张志新同志惨遭杀害，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搞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张志新的家人、亲属感激辽宁省委平反张志新冤案，但对平反案情的表述是不够满意的，认为还不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当然，他们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表示谅解，只是希望有一天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张志新一个人被判过两次死刑 陈禹山说，张志新曾两次被判死刑。第一次是1970年5月14日。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曾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办案人员回忆介绍：张志新1969年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根据策反方针，处几年就行了。可是她不认罪。当时同意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1979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第一个是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罪名是“右倾”，保护敌人。老公、检、法人员许多受难。高振忠是幸存者。对张志新案，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XX。当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周XX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徵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15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再呈报辽宁省革

命委员会审批。 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 年 11 月 16 日，张志新在犯人参加的批林(彪)批孔(子)大会上，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这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因而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 年 2 月 26 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上，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等 17 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干脆吧。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干脆。 1975 年 2 月 27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 1975 年 2 月 26 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 月 6 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 月 19 日，上级批示：“洪 XX 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4 月 4 日，张志新在沈阳被杀害。 张志新给丈夫曾真的诀别信 张志新是 1950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曾真的。这年朝鲜战争爆发，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她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 年张志新被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为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1955 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1957 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 12 岁；儿子曾彤彤 3 岁。 1969 年 1 月 5 日。张志新给曾真写了一封诀别信。 曾真： 结婚 14 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的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

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结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使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两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 15 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 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渾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把孩子放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 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 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 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志新 1969 年 1 月 5 日晚

然而，这封信，曾真当时并未收到，它被装入曾真和张志新的档案里。待曾真看到这封信时，时光已过去了十年。读信的曾真与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声泪俱下，悲痛欲绝。曾真曾经含泪泣血地给张志新写了一封回信，可是九泉之下的张志新又怎能读到这封信 上的一个字呢？ “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

1 月 9 日。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批斗会上，质问张志新：“你昨天写的所谓遗书，是什么意思？” 张志新：“那是不对头的。” 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张志新：“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证实是不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张志新：“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 张志新：

“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罪还是示威？” 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 问：“怎么严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 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当追问曾真对她的影响时，她意识到，她的不幸必会株连家人。她向审问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1969年8月张志新被捕，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与世隔绝了。同年11月，已被监视、审查的曾真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沈阳。1970年8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一年多后，曾真无奈被迫提出离婚。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10年漫漫风雨岁月里，也是九死一生，但他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春，他和两个孩子回到阔别8年多的沈阳。 一场无法结束的悲剧 张志新的家人和亲属现在如何呢？这是许多读者关心的事。 最近陈禹山探访了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他们都在北京。 陈禹山说：曾真已年愈古稀，消瘦，背也有点驼了，与当年所见相比，判若两人。他独身一人住在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住在一栋多层楼房的七层，房子没有电梯，他每天沿着楼梯爬上爬下，上街买粮，买菜，自己做饭。他请了钟点工，每周上家里来搞一次卫生。他就是这样孤苦伶仃地打发自己的晚年的日子。曾真说：两个孩子，林林、彤彤现在在美国。他们都已成家。彤彤只在填写个人资料时，才写上“幼年丧母”，但从从不向人提起自己的母亲是谁。林林也不愿意再提及当年的苦难。 张志新在给曾真的诀别信中，要他“彻底”把她“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曾真说：“彻底忘却过去，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30多年来，曾真一直没有结婚，没有“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不可能走出这个悲剧的阴影。 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虽然有一个完整的家，但她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与许多六旬的同龄人相比，她显得衰老多了，走起路来也不那么

灵便，上楼梯更显得吃力。她已退休。她原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国家一级演员。她出身音乐世家。小时候，她就和大姐志新，二姐志惠一起组成小乐队参加演出。她们成为闻名津沽的“张氏三姐妹”。张志勤说，大姐是弹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波隆贝思库的《叙事曲》是大姐生前最爱拉也最爱听的曲子。

当年张志勤谈起大姐，常常声泪俱下，现在却常常沉默寡言。她给了陈禹山一份关于张志新案件评论的资料，这是从一本书上影印下来的。资料上说：张志新与秋瑾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瑾，而对殉难不过二十几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细一琢磨，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讲到辛亥革命，秋瑾是多少都要提到的，而许多年轻人不知张志新为何许人，实在是她未被载入“正史”的缘故。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诱惑，众多职业的“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

显然，张志勤想要说的，或许正是资料上所说到的。

“慷慨就义易，从容就义难”。其实，慷慨就义也不易，这是生死攸关之事。只是免除了活受罪之苦罢了。张志新烈士是从容就义的。她经受了近7年铁牢生活，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7年之久的种种摧残迫害后才就义的，她始终不“投降”。她的意志是何等刚强，死的是何等悲壮惨烈，真不容易呀！张志勤深深感到“正史”对她姐姐的不公。但她能说些什么呢？

最令人伤痛的是张志新亲人们之间的反目。张志新的娘家人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因了张志新的缘故，一直有着深深的矛盾。在张志新平反昭雪后，就很突出。当时，有的报刊宣传刊登照片，把曾真抹去。中国青年报内参《青运情况》登过《张志新同志的女儿对张志新宣传报道的意见》。文中说：这里我只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对我父亲的不公正态度……

去年新华社转发我母亲大量照片时，保留了所有的家属和亲属，还有一些其他同志，惟独抹去了我的父亲。影响所及，全国照办。助长了对我父亲的误解。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

我难以理解的是：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照片上

抹去？明明是全家四人的照片，为什么偏偏要改成三人？另一张在平反大会后怀念我母亲的的三人像也不能发？我父亲是个党员干部，涉及对他的态度，新华社为什么不去徵求辽宁省委、我父亲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也不听取在“四人帮”的时期真正直接受到迫害和株连的我们的家属(家庭成员)的意见，而只是单单去问家属？……

在我妈妈的冤案平反之后，省委从未否认我父母的夫妻关系，法院撤消了过去的离婚手续。妈妈虽已不能复生，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从心里感到，我们四口人从政治上、法律上和感情上重新成为一家人了。这是粉碎“四人帮”的必然结果，也是压在我们心底 10 年的愿望。而有的人却从他自己的狭隘观点出发，想要人为地再把我们全家人分开，不允许我们彻底消除遭受迫害的痕迹，阻挠党的政策的彻底落实。负责落实党的政策重任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却没有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关于我父亲同我母亲离婚，这是事实，用不着回避。但这决非个人所造成！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是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社会造成的！

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认为这份《意见》是曾真所写，而以林林的名义发表的。她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一份数千字的意见。她写道：

现就我和亲属们了解的与《意见》有关的一些情况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一)《意见》称新华社转发志新照片时“惟独抹去了我父亲”、“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像片上抹去。”我要说明，不登他的照片是我的意见(儿女们都同意)，原因是他“已经徵得志新和组织上的同意离了婚”，登他的照片在法律上是不合适的，况且没有宣传他的必要。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据说他在事后办理了撤消离婚的手续，事先我既不知道，事后我也从来承认过。因为我女儿已经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能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死者。至于法院批准的单方面撤消离婚是否合法，暂不在此述之。

(二)《意见》指责“负有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没有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志新事迹的意义绝不是表现在家庭中，她的光荣是属于党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当然也是属于她个人的。众所周知，党的宣传机构的领导和同志们做了大量调查，冲破阻力，以忘我的精神和对烈士深切敬仰的心情，大规模地宣传了志新的事迹。仅仅由于在一个时期没有登他的照片，《意见》就给党的宣传机构扣上一顶帽子，这究竟是为

什么？ 郝玉芝写道： 我的外孙林林失去母亲时只有十二岁，以后的十年，活人给她灌输了什么东西呢？《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孩子之手，能怪孩子吗？！我不想伤害孩子对父亲的感情，但面对《意见》我若不将真相说明，难料孩子之手还会做出何等事来…… 鉴于《意见》已经广为传播，有些不明真相的刊物冠以《父亲无端受指责，女儿修书鸣不平》之类的标题转发，我要求我的这篇东西也在同样渠道予以披露，以正视听。 这场笔墨“官司”没有连续打下去，但问题与情绪一直困扰着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已经去世，曾真、张志勤均已进入暮年。至今，他们仍受着张志新冤案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心还在流血。 这是谁的过错？谁的罪过呢？ 张志新女儿林林诉说：死囚家属学习班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渑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渑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渑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渑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

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那

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边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浑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林林所谈在学习班上,浑阳法院的人要她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林林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南方周末》)

《任仲夷大胆处理两个凡是;和张志新案》(作者:徐庆全)

2006-03-01 《炎黄春秋》 杜导正：说志同道合是对的，但是，当时我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任仲夷的高度。这是后来从对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这件事上认识到的。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 and 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处死。绑赴刑场前，她被割断了喉管。 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对于任仲夷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同志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同志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便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徐：“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 杜：当时，我们新华社总社国内部接到了新华社辽宁分社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稿，还附了七八张照片。我看到后，感到非常震惊。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很犹豫的。报道肯定要报道，但是怎么报？照片中有张志新被处死时的场面，血淋淋的，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制造的处死自己同志的大惨案啊！我当时想，报一下可以，但不要大张旗鼓，更

不许披露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对我们党的形象太不好了。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当时办有供党内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国内部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参考”编辑组。“内部参考”编辑组同志建议说，新华社不能公开报道，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有关文字和照片可以罢。这样的意见，也被我否决了。那时，我是新华社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三件工程中，我是大刀阔斧敢冲敢打的，同志善意地送了我一个诨号，叫“杜大胆”。但我心中竟还是这么顾虑多端。这说明，我的境界比任仲夷差了一截。 徐：其实，看到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会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文革”的悲愤和反思。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杜：是啊，要不说，我这个号称“杜大胆”的人，思想解放的程度赶不上任仲夷呢。 徐：《炎黄春秋》2005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纪念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的文章，从编者按中知道，是任仲夷向您推荐的，可见他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杜：这篇稿子是原在辽宁省宣传部任职的干部写的。任仲夷读到后，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该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徐：应该说，当年冲破阻力为张志新这样大的冤案平反，任仲夷确也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啊。

二〇〇五年五月，《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苏育英 邬谟侠）

编者按：张志新，女，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着国家的混乱局面，她独立思考，对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对毛泽东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有深入的剖析。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之后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张志新尽管受到非人的折磨，但仍不肯认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她被反绑着双手拉出牢房，一把手术刀野蛮地切断了她的喉管，使她发不出正义的声音。

两小时后，张志新在大洼刑场被枪决。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对张志新冤案的复查汇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坚决主张尽快平反。他在会上说：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我主张和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其后，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此案平反，震惊全国。 今年是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两位作者写出了《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一文，当年力主为张志新平反、现年92岁的任仲夷老读到此文非常赞赏，将这篇文章推荐给本刊。他在给杜导正同志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现特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坚持真理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每年的4月4日对辽宁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沉甸甸的值得永久纪念的时日。因为这是党的好女儿、好干部张志新烈士殉难的纪念日。到今年，张志新烈士已经离开我们30周年了。张志新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她平反昭雪后已广为传播。在她殉难十周年之际，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等中央和原省委七位老一辈革命家都题词，予以纪念。她的英名已载入《辞海》史册，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中。她的独特斗争的事迹，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40多年前，张志新同志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她1930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教师之家，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大学教育。从军队复员到地方后，从事理论、宣传和文艺工作。她性格开朗，热情好学，多才多艺，勤奋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同众多的党员干部一样热情参与。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造成党和国家的混乱，社会上打、砸、抢风行而起，张志新则由疑虑、清醒转为愤怒，痛斥林彪、“四人帮”种种罪行，自觉地、坚定地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于1969年9月在盘锦市省五七干校被捕，于1970年8月被判无期徒刑，直至1975年4

月 4 日为坚持真理而殉难。粉碎“四人帮”后，1979 年 3 月 26 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并于 3 月 31 日召开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平反昭雪。 张志新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事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所面对敌人，不是刘胡兰时代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窃踞党和国家高位的反革命。同这类伪装的阴谋家进行斗争，必须具有马列主义水平和高度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真理，捍卫党的正确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时代英雄，她是先进共产党员的表率 and 楷模。张志新同志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一种浩然正气？在她的斗争事迹中有哪些思想、品质、精神值得我们永久学习？这就是：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张志新同志于 1954 年入党，她在入党志愿书中曾写“我在任何环境下，都将坚持革命斗争……永不中途动摇，永不叛党，永远跟着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目的，将献出我的青春和生命。”1969 年 12 月，在被拘留的监狱里，她曾写：“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地宣读了誓言：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为人类解放而献身，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张志新同志这种伟大的理想和信念，绝不是建立在表面和口头上，她勤奋好学，始终掌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深入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林彪“四人帮”的种种阴谋言行。在当时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她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管在干校、拘留所和监狱里，她都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她从这些著作中学到的理论，深刻思考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研究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写出了十几万字质疑材料。她运用这些理论武器，联系实际，对历史和现实，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得出正确结论。她看清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从而对文化大革命由参加、疑虑到清醒。张志新同志的可贵之处，就是从社会上发生的大量事实中，上升到共产党人理论上的认知，并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这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从而坚定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坚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坚定了政治观点、坚定了政治立场。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的通知中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首先要坚持理想信念。在各个历史阶段，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应该是终生不变的。

再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党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清醒和坚定。她对党坚信不疑，在艰难严酷的时刻，把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看成是改造自己、纯洁党性的磨练。她在狱中六年，针对审讯人员的提问，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万言书。她明确宣示，“一个党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作为共产主义者，应该要求自己在斗争中提高政治修养，对敌绝不稚气，对自己也不放松。”在斗争中，她不断探索真理，孜孜以求改造自己，纯洁自己的党性。她说：“对错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解决矛盾，才能合乎党性的判断。”她庄严宣告，“对关系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看法，是忠于党的表现。”她在监狱中每次审讯总是高昂着头，她说：“共产党没有低头的习惯，要想革命吗，你就应当是个强者。”她的万言书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1970年6月29日的夜晚，在狱中她借着微弱的灯光，把手纸裁成一块块，把地板上紫红色的油漆一点点刮下来，用水润湿涂在纸上，把染红的纸贴在胸口上，用体温烘干，最后扎成一朵精致小红花，表达她对党的深深的怀念。在以后几年党的生日时，她又做了十几个精美的圆形、长方形、三角形的小书签，把自己忠于党的誓言写在书签上，时刻表达她对党的情怀和热爱。在她入党十五周年之际，她自己谱写了《迎新》歌，歌词中说：“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宣读了誓言……十五年后的这一天，我严肃接受了党的审判，不是我违背了誓言，为什么没有‘落案’，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追求真理，坚持战斗……铲私根，战恶浪……向前，勇敢接受考验，迎接胜利的春天。”她多么渴望这个春天的早日到来。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先进性，不惜舍小我而为大我。她抛弃了温暖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及年迈的双亲等21位亲人，身在监狱的她给爱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把我彻底忘却。”她表示，“一个人不管生与死，只要为了革命就有意义。”当张志新年迈的父母知道女儿被冤屈之事后，其父在梦中见她和妹妹在舞台上曾经

演出过的《魔鬼舞曲》、《悲歌》、《终了曲》后与世长辞。而其母则在病中坐起，没有眼泪，怒目而视，并激愤地说：“不看到志新昭雪的那一天，我死不瞑目。”谁无高堂、谁无爱人、子女、兄妹，张志新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纯洁的党性而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反哺之情、神圣的爱情和子女骨肉之情而被迫离开了她所有的亲人。 三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张志新坚持真理，凭她的坚定信念和纯洁的党性，在共产党的政权下，敢于同林彪、“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当时的政治观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触犯政治禁区的。她捍卫党的正确路线，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她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三忠于”，反对“顶峰论”，批判林彪大树特树搞个人迷信而行篡党夺权的阴谋；她维护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抵制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违反历史规律的倒行逆施；她忧国忧民，反对社会上的打、砸、抢，为国家的安危忧心忡忡；她对林彪不信赖，怀疑江青历史有问题，反对党章上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当她的这些观点被定罪，并被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她仍威武不屈，志坚如钢。在监狱中每一次审讯，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中写道：“我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我不是反革命，我们从来主张讲老实话讲真话，我越来越感到我没有错。”她认为自己的意见“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她坚定地说：“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他被定了罪，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我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时间和实践将会做出公正的裁判。”这就是张志新同志。 1975年2月，“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下令，决定诛杀张志新。1975年4月4日清晨，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判决书，并问张志新有什么要说的？她坚持要看判决书，遭到无理拒绝，她愤怒地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行刑前，行刑的刽子手怕张志新喊口号，竟惨无人道地将其喉管割断，而张志新仍圆睁双眼，挺立在囚车上，直至走向刑场。她只是微微地颤动着双唇，似乎对“四人帮”有万丈怒火，要把自己心中的冤屈向党倾诉。最后，她不得不倒在罪恶的枪口下。 今天我们在回忆这段惨烈的历史，回忆张志新同志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真诚地希望在发扬党内民主，健全社会法制，构建和谐社会中，张志新式悲壮的事件不再发生，

让它永远成为历史！ 张志新同志，没有离开我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她将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上。（责任编辑 萧 徐）（来源：2005 年第 5 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08 年 8 月 27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8）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八节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

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1．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3．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向。

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简报摘要登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三月十四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

（2）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3）总理，指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康生 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说：他们人用枪押着我们的同志。

江青同志说：他们带的枪没收！

有的同志说：他们抓了我们好多人。

康生同志说：谁抓人把谁抓起来！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会议结束后，总理与康生同志讲话。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北京的一些同学要打回去，当然需要你们去战斗，中央正在考虑，当然是我们陪着你们去！下面有几件事说一下（从略）明天不要都来了，我们分头去解决，一个个地解决，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就要追到底。

康生同志说：有这么几点请同志们注意。

1.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人来抓，你们要坚决拒绝。我们说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即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3.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王力同志插话：以后开这样的会也叫他们来，受教育。总理问：是那个接待站，是不是国务院那个接待站？）

4.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三司联络站的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支人民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缺点是支流，不是主流。军队里头有坏人，但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

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同志们不要到外面去谈这个问题，到外面去谈四川军队的问题。（总理插话：更不要写大字报）不能在红卫兵报、井冈山报上登载这样的消息报导，昨天清华井冈山报打电话请示我们，他们问有关军队的问题能不能登？我们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对我们解决四川问题是有阻碍的，今天谈的，也不要打电话、写信回去，打电话、写信也谈不清楚，也不要乱出去传。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到会首长：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肖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参加会者：四川廿个市、县中央点名请的被打成“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告状代表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及首都大专院校的部分人员。〕

康生：现在开会了，中央事情很多，时间紧张，各地来的人也很多。前几天解决了内蒙问题……四川的问题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解决，我们中央工作也要用一些时间。由于工作忙，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今天会议只能开到六点半，下面我们还有会议要去参加。发言的不要重复，以前讲的现在不用讲了，下面准备发言，谁发言？

自贡市的一个同志举手“我发言”！……（略）

成都代表发言（1）……（略）发言（2）……（略）

江青：廖井舟同志来了没有？（成都市委副书记）

答：来了！

康生插话，你今天能发言吧？不能发言休息两天再发言！

江青接着说：你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看样子身体遭到严重摧残）

答：“我……住在西苑大旅社（他用左手指头按住大脑壳）今天不讲也行……”

江青：你今天不能讲下次讲吗！你可以中途退场。肖华同志：请你安排医院，赶快让他住院去，找个好点的医院……。

成都军区造反派×××发言和成都军区××歌舞团发言……（略）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14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全场二百余人一瞬间都集目观注着这位革命小将的发言，当他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全场无不气愤，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个小将说：“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全场都喊，王杰站起来！王杰脸色苍白惊慌地站了起来，双眼直望着中央首长，全场高喊：“打倒王杰！打倒甘渭汉！”等口号，把王杰吓得发抖。）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我来控诉万县地、市委和军分区内的一些坏家伙对我们《主力军》的血腥镇压……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要求他立即交给中央首长！（这时，全场高喊：交出来！交出来！王贵章的脸色像黄瓜一样，双手发抖，在拉皮包拉锁时，一连拉了几下都未拉开，全场又喊，把皮包一起交上去！这时王贵章双手

抱着皮包，交给了警卫员。)

熊道生同志继续发言……。

康生：说你二月十七将 116 人装在船上准备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中……。

熊道生：他们简直是放屁！当时我听到他们对我这样的栽赃，顿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子来嫁祸于我啊……我有一个要求，请求中央首长；因万县问题很复杂，抽个时间详细汇报。

康生（直点头）：好！好！

江青：下面让成都刚来到的×××发言（川大 8·26 的一个女学生）……（略）

康生：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面说三件事：

一、这次发言没有讲完的，下次再继续发言。

二、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三分钟之久）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这时全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达到最高峰，有的举起双手跳起一米多高。最后全场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散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2）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3）阅后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3）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首长：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也参加了接见〕
陈伯达：周总理、康生有点事，等一会来，请大家发言。

代表控诉：（川大 8·26）

王力：同志们，四川的材料，各个县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交给中央首长去看了，是不是大家发言，各专区推选一个代表。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 8·15 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 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王力：刚才有同志提出，请韦杰副司令员答复，是不是中央军委有取缔后字 242 的命令？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问：为什么盗用中央军委命令？

韦杰：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军里没有听清（群众纷纷揭露他们盗用中央军委的名誉）

王力：天保放出来没有？（重庆代表揭露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放出来，关在中美合作所监狱。）

江青：韦副司令，你听到没有？马上释放。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重庆地区揭发）

王力：请大家简单点，四川的情况中央已经清楚了，重庆也很清楚。

江青：请乐山代表发言。（乐山代表发言略）

十时十分总理、康生同志到会，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大家要求发言）

康生：大家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不清，讲的慢一点，声音不要太大。

乐山代表：有一军分区支持的反动组织一面旗子还有江青同志的私章。

江青：我没有私章。

总理：有个张家口军事学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见中央军委，就这里谈吧！

王行虎：有人说，江青同志说：甘渭汉是好人，办了坏事，我决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说这样的话。（江青笑了）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鼓掌）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南充代表谈到还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来北京。

总理：他们住在哪儿？

南充：住西直门，具体住哪儿，他们不告诉我们。

总理：把名单开来。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新北大万县调查组：韦杰在西苑旅社开黑会，四点指示：（一）原则坚持；（二）错误检查；（三）支左工作他们说错了，我们说对了；（四）总的由军区负责。

万县公安局打电话回去说：我们一到站就被包围了。因此，许多保字号组织

打死人不下五十人，军分区第一次就打死五人，伤九人。

万县的发了言。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 7012 部队一个营。

总理：今天开会到这儿，明天请梁新初司令员开个小会，大家谈谈。

林跃东：控诉新华社四川分社，受成都军区迫害的情况。

林：韦等质问我，为什么要报导成都兵团？要我们报导发行主席著作，说我们配合反革命，小心你们的狗头。

伯达：今天开到这里，后天再开。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上午 10：25～1：30·京西宾馆；参加代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五人，川大“8·26”三人，川医 101 战斗团一人，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铁二七，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各一名。梁、张司令员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当张司令员和江海云握手时，亲切地拍着江海云的肩膀说，“小鬼，你好？”〕

梁司令员：

成都地区的情况可能也知道，现在武斗的现象在成都相当严重，我们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喽，解放军要解决支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造反派的问题。（这时，江海云同志把四月十八日所谓署名为“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给产业军的信”拿给梁司令员看。）这些人代表解放军吗？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几个极少数的人，他们能代表什么广大指战员？我就是支持兵团和“8·26”的，不支持产业军。他们（指张司令员和新调往成都军区去的一个部长）也坚决反对产业军，坚决不支持他们。现在有少数人受了老产观点的影响（大家笑起来了），在脑子里还一时拐不过弯来，这中间还需要一个教育过程，转变过程。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共同工作促使这些同志转变过来。总之我们的态度就是支持你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甘渭汉的秘书他一方面支持造反派，另一方面却又同情产业军。原来因为他老婆是产业军，被抓活该。（大家拍手）

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主要从政治上支持你们，另外还可以从军事上支持你们。如你们开会他们要捣乱，我们可以派军队来保护你们，对产业军上层的几个反动头头我们要打击，对产业军下层的分化瓦解工作主要靠你们来做。对产业军中受蒙蔽的群众，你们要团结和争取。他们最近在成都地区的武斗严重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欺骗和挑动大批不明真象的贫下中农进城，这些贫下中农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你们商量一下，由军区、红代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联合组织一个庞大的几千人、几万人的宣传队伍，动员被欺骗到成都的贫下中农回农村回本地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说好不好？（大家拍手欢呼好！好！好得很！）对，那就打电话回去吧！我打电话给邓少车同志（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叫他和你们在成都联系。

张国华司令员讲话：

支持产业军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军区有，地方有，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反映，成都地区的武斗那么严重，规模那么大，没有后台是不行的。这些后台就是要我们大家去揪。军队里的坏家伙我们去捉，地方上的由你们去搞，去揪去追。产业军大部分群众都是受蒙蔽的，你们要作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的工作。这次我们和他们合作，大力做好动员受蒙蔽的贫下中农回乡生产的宣传工作，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和我们很好的合作，这次希望你们打电话给你们家里的同志，叫他们去找邓少车付司令员联系。邓少车同志是个老同志，对党很忠诚，虽然由于脑子拐不过弯会犯错误（如这次支左工作中一度支持了产业军，但是一经组织指出改正错误也非常快，邓少车同志是听中央的话的，听毛主席的话的。他过去受黄新庭的排斥和压制。邓是认识问题（指错误），他今后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的向大家认错，这样行不行？（大家说：行。）（兵团李声金拿了一份产业军造谣传单给梁司令看。梁司令看了说，这是谣言，你们要辟谣嘛！前天成重红旗和产业军两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来告状，告你们革命派的状。要求见我，我根本不理他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打内仗，再吵架，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应当联合嘛！（又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薛文彬说）你们要整风，犯了错误就要承认就改正嘛！

（梁司令员又问起曾希圣同志的情况。）他说：昨天总理打电话，说曾希圣同志亮相后，被斗，现在下落不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薛文彬说：“曾希圣同志在我们那里，昨天接到中央的电话后，已经交出了，我们是支持曾希圣同志的。”

梁司令员最后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是个团结的会，团结对敌的会”。

兵团代表李声全说：“兵团的同志想和梁、张司令员见见面。”

张司令员说：好吧！这两天我抽时间到北地（兵团到北京的人都住那儿）去看看大家，有人说我不支持他们，让他们看行动吧。好，现在一点过了，大家就谈到这里吧！

（会后张国华同志和兵团代表签名留念。）

（根据“外贸部井冈山公社资料组翻印件·1967年5月7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中发 [67] 147 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

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

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人民的，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指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四川地区成都军区的最大关怀。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主席在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川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因此，要彻底贯彻中央决定，必须作很多艰苦工作。军区犯错误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应检讨错误，端正立场，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大干部、战士要原原本本传达中央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大抓活思想、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领导人态度鲜明，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广大群众监视，是会很快的扭转局势，自觉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要进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一切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不作。

这里，我还要提到，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武斗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地方武斗就是敌人煽动的，敌人利用武斗把斗争大方向捣乱，我们决不能上当。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我们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开枪杀死革命群众的凶手，特别是策划者，一定要依法处理。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拥护革命小将，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搞绝食斗争的办法，我们也从来是不赞成的，把身体搞坏是不利于革命的，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好好闹革命。

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是非常光荣繁重的，我们只能作好，不能作坏，不辜负伟大领袖对我们的信任。今天是毛主席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纪念。这

指示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科学共产主义的新高峰。这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永远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侵略, 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永恒指针, 在当前贯彻, 就是要很好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全面贯彻“五·七”指示, 把全军全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的重大措施。

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必须贯彻主席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指示, 要响应主席号召, 大力进行拥军爱民, 严防坏人挑拨。革命小将对成都军区批评, 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护, 今后你们还要用适当方式, 对我军支左进行批评。我们是人民军队, 为人民工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

四川是祖国大后方, 又是国防建设重要基地, 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 有中央指示, 现在又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又快建立起来, 中央又快派张国华、梁兴初加强成都军区领导。他们都是跟随毛主席久经考验的好同志, 是可以信任的。这使我们对搞好四川文化大革命更加有充分信心, 希望四川广大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把四川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江青的讲话

同志们, 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 我只讲一点。(非常亲切地) 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 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 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 就一切都错了。要记住, 要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他们犯了错误会很快地改正, 要原谅他们, 欢迎他们改正错误, 要与人为善,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革命派内部, 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关切地笑了)。在组织内部分不清敌我, 采取了甚至比对敌人还厉害, 这就不好了。今后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 很难说。但是大敌当前, 四川就是李井泉, 我们不能松懈, 要时刻记得批判斗争, 斗倒斗臭, 如果一松懈, 内部就会吵起来。今天, 总理、伯达、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得很好嘛, 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内战, 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忘记了这个大方向就要犯错误。我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 把精力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大方向。

第三、对保守组织, 一个组织几十人, 甬说几千几万, 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 这里有个群众问题。革命派要善于做群众工作, 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这一点, 对你们可能有点恼火, 他们对我们打、砸, 我们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要作。除了个别的头头外, 一般的应做群众工作、思想工作, 才能

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才能孤立头头，打胜仗。西南保守组织势力是不小的，对保守组织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讲话

战友们、同志们：

刚才伯达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成都军区部队，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共同闹革命，搞好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成都军区部队一定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对于前一段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根据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回去立即处理，一律平反。

刚才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对成都军区部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回去坚决执行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在我部队中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一次爱民运动，搞好军民关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特别是在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和帮助。

同志们、战友们：我和梁司令员是刚到四川的，对四川的情况不够了解，希望同志们多加帮助，把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四川的军民关系搞好。今天就讲到此，今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很多，今后再共同研究。

周总理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结束会。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的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意义。

第二个问题。成都的同志有的来了几个月了，有的来了一个多月，也有几天的，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月的流血事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形势。大家想：去年十二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了嘛。四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象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刚才有人递条子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解决。这是胜利。要使胜利继续发展。过去你们受压抑，受压制，把你们监禁起来，不能活动，现在你们平了反，翻了身，要负责任，做主人。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的代表，对今后大西南、四川要负责。

解放大西南，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矛头对准谁？要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西南头头是李井泉及一小撮人。对刘、邓、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在一起批判，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拉下马。要在批判中来考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彻底批判全国的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考验大家，考验犯错误的干部。他们知道的情况多，站出来批判，就可以看揭得深还是不深，支持还是不支持，不是说说能解决的。应当同他们决裂，彻底批判，划清界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在批判中可以看出革命群众组织，那些表现更坚决坚定，解放军也好在批判中来看应当支持那个。这是最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方向摆正，对准头头及其一伙，解决问题抓住要害，不会犯方向错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团结了。各个革命造反派过去有些差异，有的犯错误多点，有的犯错误少点，现在站在一条战线上嘛。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准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组织一律平反，回去要解决。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第三、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楚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十七个军分区、一百七十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要有数的积累，现在开始，要给以时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要加以分析，不能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片黑暗。一时的现象，中央已经抓起来，一定能改，要有时间。党政方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政府方面，特别是公安系统、公安厅、公安局，总有些坏人，一分为二嘛。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个别坏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已有命令下去，新领导去了，犯错误的同志作检讨，经过群众揭发，给机会改正错误，给军分区开个会，讲讲道理。回去以后好好把一月二十八日的军委八条、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加上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好好读一读。请把三个文件印成册子，每人送一本，包括没有到会的。一定要把拥军爱民结合在一起，相信解放军这一伟大的军队，部分错误一定能改正。包括军队内部的造反派，领导改了嘛，保护你们了。

但总会有一小撮人起破坏作用,要给时间才能发现,要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希望大家站在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同解放军抓好工作。

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查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一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作出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三线问题,那里有文化革命问题,有建设问题,过去是西南局抓,现在李井泉撤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西南局实际瓦解了,中央直接抓三线,找了曾希圣同志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同意派三十个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调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费、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一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军委

五月二十七日

二

林彪、恩来(2)同志阅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给成都军

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张国华、梁兴初、刘洁挺，请转告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已经成立，他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四川问题，请同学们相信四川的广大群众，一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参加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希望同学们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二、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

总理：现在开会，今天就根据前几天主席的指示，我们找你们来关于宜宾问题，叫党政负责人，群众代表都来，四川军区，成都的都来在这里，刘结挺同志控诉，来检查四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联的同学，回来反映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告状的反映许多问题，宜宾、万县、古灵、成都、重庆，看来不单是宜宾了，原来也不认为单是宜宾，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先要解决一下宜宾的问题，先请刘结挺同志讲一下。（刘结挺开始控诉……接待我们时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

康生：谁讲的？

总理：几号讲的？（刘结挺：中央办公厅的人讲的，九月十二日，说什么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要我们赶快离开北京，不然事会闹大……）

康生：电话讲的吗？（刘结挺：是直接接见讲的，二十七个人被接见的人揭发了这件事，就被军分区抓了……）

康生：二十七个人中间一个揭露了这件事，被军分区抓到监狱，叫什么名字？

（刘结挺：叫高玉文。）

总理：办公厅接见的人叫什么名字，你们不晓得？（刘结挺：我们没参加。）你们没参加，接见了他们。（刘结挺：对，接见了他们。）高玉文是谁抓的？（众：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王富德同志，高玉文还抓着呢？（王富德：高玉文是地方革命组织抓的，我还不知道呢。）你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来。（……郭林川没有来）郭林川在那里？（众：在宜宾。）

康生：怎么没找到？让王富德同志找他来，把他送来，保证他的安全。（众：王富德要抓他……）

总理：（问王学明）你说在什么公社？（答：郭林川在 xx 公社）（王富德：接到电话，我们找了，没找到。）甘渭汉同志，今天晚上你要保证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保证送到北京来。（……）

（谈到用飞机散传单，抓人一事）

王力：（对陈伯达同志）飞机一来，下面就抓。

伯达：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用飞机散发传单是谁同意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飞机散发也是吗？（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

（会议争论很激烈）

总理：同志们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他们原来那样对你们，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甘渭汉同志，电报讲，在监狱的请负责放出来，在外地的请负责找来，以上人员，请甘渭汉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 3 月 30 日派飞机来接，可你们，把底下这些人还看管着，当犯人，到了北京还这样。

杨成武：打电话给他们，昨天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犯人，不发出入证，他们是中央请来的客人。打电报时也打了电话，你们根本问题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

（众：还有四个没有来……）

总理：哪四个？是哪儿的？李良在哪里？（众：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甘渭汉同志，给你四个名字，加上高玉文，（众：刘结挺的女儿也被抓了。）几个？

（众：三个）有人照顾吗？（众：刘结挺的家被抄了二十多次。）甘渭汉同志，要把这五个同志找回来，三个孩子，告诉他们送回家。（汪宗清：三个孩子没有抓。）你军管了嘛！你去查，限你二天。

（王茂聚控诉）

康生：牟海秀在这里吗？你晓得宜宾抓了多少人？（牟海秀：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你在中央面前声明你一点不晓得？记下来。沈学理你对抓人的情况晓得不晓得？（沈学理：我 3 月 5 日才放出来……）你到处作报告，你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抓了人没有？（沈学理：我在中央面前声明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是抓反革命。）好，记下来。

总理：讲你放出来以后嘛，出来四十多天嘛，（沈学理：宣布了几个反革命组织，方面军，反修战斗团，前哨，觉醒，现在地委没有工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记下来！（……）（有人说：四川有人讲，李井泉还是李政委，牟海秀还是政委。）

康生：现在还是“他们的政委”嘛！（……）

（谈到军分区到京抓张西挺一事）

王力：军分区派的公安部的三个干部，来抓张西挺，他们以为刘结挺不在这里，我和关锋同志通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后来我们了解这三个干部原来是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的，是带功立罪的，就放了他们，让肖华同志办公室通知宜宾专区。（1）刘、张、王、郭不是反革命。（2）抓人怎么样，后来回去就找到了。（温国良：到公安局，就不让我们出来。）总政下了通知嘛！军阀十足军阀！

（……）

（王富德：我没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负责，没派人，我抓工农业生产去了。）（争论激烈）

（王富德：我们都可以说话嘛，元月 25 日方面军跑到我们那里要我们派军队，军队根据文件只能军管。1 月 28 日把一万多人包围军分区，把我拉出来打了一顿，打坏了，养了一个多月，有医生证明，后来省里让我管生产，我就抓生产去了。）

王力：你讲话要讲事实。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讲假话，抓人我不晓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这样的，开始我不知道，在军区开会时，甘渭汉同我有三个人去北京抓人才知道。）

总理：谁派去的？

（汪宗清：军管小组，参谋李勤然，他是市武装部、政治部，主任，他是组长。）他自己决定的？没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没有。）（……）

（谈到 2 月 17 日和荣复军）

总理：这个问题和军分区和荣复军没关系？

（王富德：我们不同意成立荣复军。）

总理：有没有关系？

（王富德：我们对他们做正面教育……我们没关系。）

总理：又没关系了？！（……）

总理：今天结束这个会，这个会还要继续开，军分区，地委的要申明他们的意见，控诉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个一个的问题弄清，你们激动心情我们理解，你们回去，今晚，明天上午开个小组会，哪个同志谈哪个问题，不要谈细节，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 月 28 日，2 月 10 日到京抓人，刘、王、张、郭问题都清楚了，以前他们也有材料，毫无疑问要平反，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四川全面开展斗争，三个省份的问题，刘结挺、张西挺、王聚茂三位同志把问题集中一下，四川要镇反这个问题，集中在那里。

康生：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 19 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 18 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 20 分钟开始大逮捕。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韦杰：军区决定的。）万县开枪开死人，你们报告没有？（韦杰：当时没报告，大约五、六天后报告的。）五、六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誉发出的？（韦杰：电报式，以军区名誉。）

王力：打死多少人？（韦杰：五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报告名单。

关锋：是否是五个？就是五个？

总理：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离座谈情况差太远了，今天就停止，因为刘结挺提出，从宜宾情况到全省在我们看，拿宜宾来说，先镇压革命群众，革命组织，2 月底到三月集中揭发大的事件。万县、左灵、自贡、成都、重庆，通告包括地方很广了，要化一点时间，不是一、二天解决的。

第一件事：成都军区要负全责，赶快把这个事停止，梁新忠同志监督，马上打电话去，今后如这样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能抓，要放出来，也不要马上就放，不然会不知下落了，你们一个一个军分区打电话，军管电话给你们，一个个军分区传达到武装部，对革命群众不能再歧视了，对真正反革命组织要区别头头和群众，明后天要发通知。

第二，请在座的解决这个事，是局部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大

形势，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么力量呢？第一相信群众，第二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嘛！

解放军起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柱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个人犯严重错误是个人责任，我们要相信群众会听主席、林副统帅的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过去的情况揭发就可以解决，不要对解放军抱情绪。

未解决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单位讲，在这里可以谈，把问题谈清楚，在外面要谈，对联络员，记者可以谈，更不要在报上，井冈山报，红卫兵报上登，也不要写大字报。军区打电话，你们不要打，四川很紧张，你们打了，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复杂紧张了。全国七千万人的一个省，李井泉是我们揭发的，对党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彻底解决。

康生：请同志们注意，我有几点说明：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总理：会就到这儿。

高呼：毛主席万岁！

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

周总理：现在开大会，今天先由军分区、地委讲一下，讲完再讲。严重的可以插一两句，要尽快一点。军分区哪个同志？

（汪宗清讲……）

（王府德讲……）

（沈学理讲……）

王力：（对姚文元）沈学理，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呢？

周总理：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简短一点。

王力：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省委的材料都看了。

周总理：你好一点嘛，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讲的。

康生：你讲一下现在的情况，你总知道些嘛，你要亮相嘛。

姚文元：你是三结合对象嘛（冷笑）（对沈学理发言）

王力：三结合第一对象是他（冷笑）

杨成武：不亮相怎么结合？

姚文元：你在这里也可以亮相嘛（说着就笑起来进里面去了）

王力：你可以亮相嘛，对于李井泉这个黑帮你可以亮相嘛？

周总理：你讲些什么，你对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么意见，你说嘛，没有说的就算了。

牟海秀：……

周总理：过去的事简单一点，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

康生：你对李井泉有什么看法（牟海秀：接触的少……）

张春桥：你对他现在怎么看（牟海秀：根本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王志敏：……

王力：冲军区的问题我插一句。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康生：（对王志敏）你讲了半天，而且要认罪，而且犯了严重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你没有讲，要具体点，犯什么错误，抽象化。（王……）

王力：四川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把毛主席批示再说一下（重复读一遍）

康生：我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中央向各地发的中央解决安徽问题，中央的批语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条。第二条是不得整群众，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反正是因为冲军分区或者对军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各地区，各单位，夺权有不同意见，而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刚才王力念的（念一遍）。

（郑光华讲……）

康生：同志，你讲一讲 2 月 17 日以后，16 日以后，19 日中间到外地捉人，实行白色恐怖，你 32111 什么态度？

康生：你简单讲一讲，32111 参加捉人没有参加捉人，参加打人没有参加打人？

周总理：抓人 2 月 19 日以后参加了？打人呢？

（郑光华：抓人参加了，打人不清楚。）

周总理：参加抓人，抓了多少？

王力：2 月 19 日以后你不是在宜宾吗？军分区、公安局和 32111 抓了 5 人，你在哪儿嘛。（郑光华：我不清楚）估计一下。

周总理：你不要讲了，

（谢永福同志，高玉文同志讲话）（……）

周总理：省委的同志还有什么讲的，韦杰同志还有讲的嘛？你讲几句。

（韦杰……）（储彬同志讲）

周总理：你写给我有多少人？军队内部的，你代表他们来了，你休养一下，以后写出来，以后还要提意见。韦杰同志你快结束吧！你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在 1 月 29 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宜宾的情况清楚了，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我代表中央文革讲几句话，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送给他的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残酷斗争革命群众，这样的一分材料他指示应该加以处理，找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谈，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问题大体上是清楚了。

王府德、汪学清、牟海秀、沈学理，这些人的发言虽然是不老实的，在伟大

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的，逃脱不了的。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我们认为同志们继续斗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伙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必败无疑的。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现在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革命造反派的大干将们，你们讲了很多了，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个情况，材料反映很多，活动也很多。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从北京到成都串联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联的，过去邓小平、彭真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动，刘邓、彭真、罗瑞卿都到那里去串联活动，中央把它们盖子揭开的，刚才有的同志批评军区是很需要的，刚才说调到宜宾一个团（是二个营）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同志们，我简单讲几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同时，我们林副主席还研究了青海问题，以及其它军区的问题，也包括四川成都军区以及宜宾军分区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坚持这个看法，毛主席1月21日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的事，毛主席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第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军某些少数人犯错误，或者是青海的赵××那样混入解放军的坏分子。无理制造镇压革命群众事件，但总是极少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这些问题中间，林副主席讲究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问题，认为中间有的做得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林副主席建议，支左问题提到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不久文件要发到各地。

我们的解放军能掌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支持左派的伟大任务取得了胜利。

当然，支持左派问题犯了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正的。希望解放军、广大群众理解，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有重大作用。

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也反映四川斗争怎样复杂曲折,摆在前面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问题,可是看到一个事实,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刘少奇,反对邓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军分区、地委讲了几句,重点要我们派工作组,调查组,到宜宾调查,意见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痒的话,四、五个人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调查我们过去调查过,现在还在作调查,但有一点要承认,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要调查什么?军分区没有讲,地委也没有讲,省委一句话也不提。

我们希望军分区、地委、省委,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大方向问题,到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调查,可以做结论。

当然革命组织有没有错误,你们自己也要作检查,对解放军,骂解放军,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你们就这样,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并且要成文件,开除党籍事没有文件传达到县委,在宜宾要传达到全体党员。

这是可以看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一时可以使一些同志受迫害,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获得彻底胜利,从宜宾可以看出。

周总理:谢副总理讲一讲,解放四川才能解放大西南,讲一讲嘛。告诉同志们,全军增加他一个职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

周总理:同志们,结束关于宜宾问题三天的会,当然,不是很全面的结束,要从宜宾突破到整个四川,先把四月一日中央文件念给大家。

(念文件)

周总理:四川问题军委还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提议,宣布十条命令,从对的,错的经验中得出东西,加以总结。解放军中一部分人犯了错误,群众也有错误,比如:冲军区什么,把负责人拉出来弯腰跪着,这是不对的,对坏分子也不这样。比如说:八条命令中央2月21日附了五条,转发了。即使对三反分子也不搞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同志早就说过,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所以冲军区把领导人拉出来跪,低头认罪,甚至戴高帽,挂黑牌,讲解放军是“保皇兵”,黑司令是军区,不对!这中央文件给你们,要好好宣传,学习。你们大方向是对的,要改正错误,有错就自我批评,造反派要自我批评,保守派要认清立场错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有根据中央那五条,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新的司令员已介绍过一次梁兴初同志,请他监督办好,放出来,健康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題,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这个口头通知可以在当地同志中宣读,以后有文件……。今天会就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

知

1967.04.04；中发 [67] 154 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一、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二、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 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这一天，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派的人竟用道渣、鹅卵石朝队伍打来。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

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上，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队伍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出好几百头戴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队伍袭来。为不扩大事态，队伍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北京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武斗持续了一周左右。“八·二六”派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

三”事件。”（有关宜宾材料引自《谢富英回忆录》）

（1967年7月17日《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宜宾专刊〉》文章记录了这件事：《为有牺牲多壮志——北京红代会张玄杰、王俊英烈士宜宾遇难记》：
雨更大，风更紧。黑云翻滚压戎城。

在四川地区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直接指使下，五月十四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猖狂的反扑，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多少红旗派的战士遭到石块的攻击。多少红旗派的战士受到木棍、铁棒的毒打；多少红旗派的战士死在暴徒的砍刀下。刚刚抵戎的我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战士心血在沸腾，怒火在燃烧，为了制止事态的发展，一批批红代会战士走到x分区要求接见，却遭到门岗的无理拒绝。

制止事态的发展是x分区的起码的职责。要求x分区制止事态的发展是我们红代会每个战士的责任。经过我们充分地讨论，统一了思想，十二时左右整队到了x分区门前，再次要求接见。但是x分区某负责人百般刁难，始终没有答应我们提出的起码要求。

四点多十分左右，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等暴徒数千人从翠屏山上冲下来，直冲到x分区门前，一些无组织的群众边撤退，边阻击，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伤亡十分惨重。面对这种情景，“与宜宾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伟大誓言在每个战士的耳边回响。我东方红战士主动把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站在x分区门前，防止群众与x分区发生冲突；一组高举着“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的大旗横排在马路上，组织群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重伤躺在马路上，躺在暴徒队伍的前边，能不抢救吗？不能！不能！张玄杰同志把东方红的大旗交给了其他同志，第一个走出了队伍，毅然地向暴徒走了过去，接着其他三个同志也跟了上去。未经交涉完毕，穷凶极恶的暴徒一棍打在张玄杰的头上，接着又是几棍，张玄杰头负重伤，倒在地上。

在x分区门前的王俊英同志，领着群众流着眼泪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冲到分区门口的暴徒在群众中乱打、乱砍，人们躲闪着，后退着，王俊英同志的一只脚刚刚退到x分区门内，就被一个人猛推了出来，暴徒看见王俊英带着红代会的臂章，狠打起来，王俊英同志倒在血泊中。

暴徒们退走了，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分别被送进了第一、第二医院。医院的大夫们，为了抢救红代会的战士，千方百计优先给他们医治，但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次日光荣牺牲了。

大夫们，红旗派战士们，含着眼泪传送着张玄杰、王俊英牺牲的消息。岷江在翻滚，金沙江在咆哮，整个宜宾爆炸了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实现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伟大誓言，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八·二六”派即将全军覆没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

但部队只是将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一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

面进行。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熙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造反派占据的南方来打杀。造反派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两百名由数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造反派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他们说是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当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骗来武斗当炮灰了。

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吵得人们根本无法安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前言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西南局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前还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这是他的表面，他的实质是什么？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西南的“土皇帝”，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实力派，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井泉有极大的政治野心，阴谋把西南变成他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独立王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李井泉狡猾的狐狸尾巴越露越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貌再也隐藏不住了。我发现李井泉的问题，是在一九六二年。那一年，国内阶级斗争异常紧张，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进行疯狂的反华勾当，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窜犯大陆，阶级敌人气焰嚣张，妄图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这个时刻，李井泉配合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了。

一、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四月，毛主席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信，广大干部、社员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李井泉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出了黑指示，这个黑指示说，“对毛主席的信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消极的理解。”致使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贯彻，造了极端严重的后果。

一九六二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井泉又借机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指示信。他胡说什么：一九五九年之所以在毛主席的指示信上加批语，是想多打点粮食，与修正主义斗争争口气，怕毛主席的指示信下去起消极作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他对李井泉明目张胆

地诬蔑毛主席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副主席有一个极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对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作了批评。林副主席还从我党各个革命历史阶段论述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号召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这篇讲话,对到会的同志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可是李井泉在林副主席这个讲话后,专挑了一份大会简报叫四川各小组传读。这份简报刊登了有关向林副主席提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又属于一般性的工作意见。李井泉不让传读中央各部局对四川提的意见,借以教育四川到会同志,却专挑那么一份对四川干部毫无特殊意义的材料,而且选择在林副主席发表上述讲话以后。很明显,这是一个反党阴谋。尤其恶毒的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井泉的亲信、反革命分子张黎群配合李井泉的活动,针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写了一篇“不是八九不离十,而是离十太远”的极端反动的杂文,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李井泉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二、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再次指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在重庆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正确的指示,并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但李井泉却以各种借口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拒绝同志们的要求。他散布说:“四川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问题。”他指责、压制坚决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说:“有些人为什么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那么感兴趣!”他醉心于在四川继续推行自己搞的“三包一奖”的“经验”,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直到一九六三年,李井泉的追随者×××,还在大肆攻击、诬蔑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是“右倾”。李井泉之流就是这样顽固地对抗最高指示。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一九六一年李井泉搞了一个大划田边角谁种谁收的“指示”,把大量的集体土地变成了私有,大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李井泉对六个专区的六个重点公社干部介绍他“点”上的“经验”,鼓动“退回去”。他吹嘘说:“第一,公社和大队干部都要压下去,凡是过去老社的一律归生产队。第二,退回去,按高级社办事,现在看来退了一步,还没有退够。第三,把生产队的副业班子搭起来,凡一九五八年建立起来的副业建设一律归生产队。第四,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不是年年增产了?(众答:是年年增产了)如果是年年增产,这样退下去,没有问题,搞它几年再说。”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又积极鼓吹“退回去”。×××等在他的鼓吹下,大肆进行“退回去”的复辟资本主义阴谋活动。

在×××的“点”上,自留地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在××直接指挥的宜宾市: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下令解散全民所有制的渔场,叫工人搞单干。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又下令并限期解散宜宾市国运营销单位。他说什么:“划若干小组和调配站,由需要工人的单位挑选雇请工人。”这样没有几个月,全市就出现了二十多个把头。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叫嚷:“仔猪市场干脆全放。”助长富裕农户走资本主义道路,影响贫下中农养不起猪,给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为了鼓动单干,他规定,国家机关下农村的工作组干部,每人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规定家住农村的公社干部除本人在家划一分自留地以外,还可以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

——他大肆提倡中医“随父学艺”，说什么：“只有随父学艺才能把老医生的本事学到手。”

——他公开叫嚷“要向资本家学习”，说什么：“人家做生意能赚钱，我们不行，赚不到钱，应向人家学本事。”

李井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选了一部分大会简报让四川省小组传读，其中有一篇大意是，今后工厂可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很明显，李井泉这是配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报告，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李井泉及其追随者，一方面勾结阶级敌人大搞反攻倒算，一方面大肆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他们说什么：“在医院、文化艺术、科学团体搞政治运动是错误的。……以后不搞了，你们放心吧！只要搞好本行业务就行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初，李井泉在自贡别有用心地说，“有人说我们这几年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应该如何回答？”李井泉这是有意识地借别人之口诬蔑党“犯了路线错误”，以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煽动。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运动中，批判斗争××时，××说：“彭德怀等只不过是议论了一下，就成了反党集团了。”××说，这句话是李井泉说的。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一口一个“彭老总”。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又散布这么一个反动言论，可见他早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刮起了“翻案风”，他拼命地替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地、富、反、坏、右翻案。在翻案中，他捏造了许多谎言，制造了种种借口，私设监狱把我和张西挺关押长达两年之久。李井泉在一九六三年八月，派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到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劝我同意替××翻案。他说：××那些问题，你们不要老坚持说什么反党、反毛主席。还恶毒地说：“对毛主席是怎么看，现在有许多新情况，你们不了解，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错误。”省监委副书记××也向王茂聚同志说：“××那些问题(指××反党、反毛主席的许多罪恶言行)，我们认为不是错误，你如果认为是错误，你可以写信问毛主席。”李井泉让监委主要负责人进行这样的“劝说”，不仅是为李井泉的反党言论辩护开脱，而且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活动。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他还别有用心地强调“甄别”问题，为替牛鬼蛇神翻案制造了许多荒谬的理论。他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行的，只要没有背景，就不算错。”他还以总结工作为名，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我们现在是这样总结，总结不够的以后还可以总结，十年二十年后可以再认识，就是将来我们死了，还会有人替我们总结的。他这里不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为大“翻案”埋下伏笔吗？在他的煽动下，大刮起“翻案风”、“单干风”，一时乌云满天。

李井泉紧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发起的翻案，公开勾结阶级

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一九六二年他专程赴宜宾，策划布置后，又亲自组织了两股翻案力量。

一股由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到劳改农场、茶场、四类分子集中劳动的菜场以及两个劳改煤矿，以登记询问、个别谈话、座谈、调案审查等方式；发动劳改犯、现管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等反攻倒算。

另一股由××X统帅，在地专机关以座谈会、个别谈话动员、批示翻案、调查审查、提供反攻倒算材料、打印反攻倒算材料等方式，发动四类分子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反攻倒算。

李井泉等所执行的翻案方针是：只要本人有申诉，组织上认为有必要，或者有其它人提出，就可以进行甄别（甄别二字应用作“翻案”）。他们的口号是：“甄别”以后，应该得到组织上重用提拔。

有翻案方针口号的鼓舞，又通过他们内外发动，五类分子的反动气焰异常嚣张，有的右派分子说：蒋介石不反攻大陆，我就不写申诉，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我就要写申诉（看，李井泉与蒋介石配合得多么密切，右派分子与李井泉配合得多么密切！）。有的右派分子公然拍桌子公开大骂积极分子。翻案加倒算，大批革命同志遭受到种种的迫害和镇压。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翻案风”，强调了阶级斗争。李井泉竟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继续上下勾结串通，坚持翻案。他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私货，说什么对外斗争是地富反，对内斗争是刘结挺、张西挺。事实上，则是把对敌斗争转移在革命派头上。一九六三年还把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推行到江安县和宜宾县。

在宜宾的反革命复辟事件中，翻案涉及的案件达、几百件，直接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革命同志达百人，受牵连的人数则更多。

李井泉之所以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倒算是因为有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屏障，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依靠，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和配合。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等，一不准我到中央控告，二把我和张西挺等揭发李井泉的材料转给李井泉，三扣压宜宾革命同志给党中央和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信。他们从一九六二年起这样干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仍然把我和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材料扣在手里不予转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串通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等批准了李井泉的修正主义报告——即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里所批准的，不是刘、张二人的党籍问题，而是批准了李井泉勾结敌人所干的全部翻案加倒算。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李井泉的亲密关系是很多人很早就知道的。平时李井泉在中央开会期间，每天晚上不是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家里，就是在××家里。李井泉在中央开会回四川传达会议精神时，常常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何说，如何讲。从李井泉的话里听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会外对他还有特别指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串通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除了他们本来就有这种亲密的勾搭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案件上直接牵连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

时，××说：“跟着彭老总走不会错。”这句话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说的。李井泉起劲地替××翻案就是为了替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的反党言论翻案，从××的案件里抹掉这笔账，以便得到长期掩盖，以达到进行隐蔽反党活动的目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的秘密就在这里。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李井泉在南充搞“点”，那里的地富子女对李井泉寄予很大的希望。社教中，他们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要解决入党入团的问题。李井泉竟作为重大问题，加上批语印发全省。批示的大意是只要经过考验是可以入党的，说“重在表现”嘛！

李井泉在干部路线上也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大小会都传达讨论贯彻“重在表现”的干部路线，根本不强调和不讲阶级路线。

李井泉的“重在表现”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他是重在反党的表现。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因为写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被李井泉提拔为省委委员、西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

反革命黑帮分子张黎群，恶毒地攻击和百般地咒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李井泉把他安排到绵阳地委任副书记。

有的阶级敌对分子和右派分子最恶毒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李井泉不但替他们翻案，而且都提到重要岗位上去了。

家庭和美国有关系，反革命分子的女婿×××，因为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有功，而被提拔为省监委的兼职委员。

李井泉就是这样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把翻了案的牛鬼蛇种，地、富、反、坏、右都作为他的基本力量，把许多坚持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一个一个地打下去。据我了解，李井泉迫害这样的干部是不少的。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三月，彭真到成都与李井泉、×××进行反革命的密谈。李井泉为了抬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身份，拉着彭真与四川贫下中农代表一起照像。此像经印刷后发到各县、市、地委。宜宾地委还把他挂在地委会议室里。

李井泉为了扩散彭真的毒素，一九六六年四月，还布置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抛出的反革命《二月提纲》。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多年来，李井泉、XXX等结成巩固联盟，发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是大叛徒×××安插在西南的钉子，深受李井泉赏识。一九六五年，李井泉便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位子让给他。从此，×××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置于领袖的地位。他经常讲：“李政委如何如何，一再教导我们。”对这种肉麻的吹捧，李井泉自以为得意。李井泉自己也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说什么我也算个小国务院嘛。因此，他在中学读书的儿子也常以李井泉的话作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压制革命学生。

南充是李井泉的常到之地，那里居然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像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李井泉的画像还高出毛主席画像一个头。李井泉泰然置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李井泉排斥异己，把既无能力又无干劲的亲信和旧人一个一个地都安排在重

要岗位上,如协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启允镇压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在晋绥的旧人,虽毫无能力,但也成了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协助李井泉镇压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从晋绥带来的老部下,越级提拔当了西南局的宣传部部长,散布大量毒素的四川日报总编辑 XX 也是李井泉的亲信;在贵州大刮翻案风,镇压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贾启允,因为是李井泉的老部下,就当上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与黑帮祖师爷周扬也挂了线。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周扬称赞他,李井泉就马上重用他。任白戈是周扬的吹鼓手,李井泉提拔重用他在前,又包庇他在后。

李井泉为了勾结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黑帮分子×××,对彭真和××双方表示尊重,还常给他们送礼品。

李井泉上下串通,对党中央进行封锁。一九六三年八月,中央监委的一个同志在成都找我和张西挺谈话,李井泉害怕暴露了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竟派公安厅一处的干部公开监视。这个同志对案件表示有某些疑义,认为不应该关押,被李井泉和×××告到黑司令部那里。××为此无理地批评了这个同志。李井泉的追随者,在宜宾大张旗鼓地宣扬,对我和张西挺的案子,中央监委来的同志都受了批评,都作了检讨,以此炫耀他们的反党势力的雄厚。

李井泉与黑帮联系之密切,勾结之紧,从下面这份材料里也可以看出。

宜宾地委招待所长写的材料说(摘录):

1、一九六五年十月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等人悄悄地来到泸州(宜宾专区所管的泸州市)。当时有×××陪同。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些人来干什么?

2、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突然来宜宾,当时×××接待,住地专机关第一招待所,×××与之密谈,这其中有什么鬼?

3、一九六六年大约六、七月份,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井泉等人突然到自贡,在自贡开了会。这些人来干什么?

4、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到了自贡。

5、一九六六年九月份省公安厅厅长突然来宜宾,住地专第二招待所。是专门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是带有任务来的。他还去泸州了解情况。

6、一九六六年十月份,×××(副省长)突然来宜宾,×××等人接谈。

7、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也突然来宜,突然而去。

8、一九六六年十月份至十二月份前一段时间里,李井泉的女儿常来宜宾,×××亲自与她密谈。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宜宾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如此多的“大头头”先后“光临”此地?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九六六年九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指一九六二年搞翻案倒算)是李井泉的导火线。对了!宜宾问题如被揭发出来,李井泉的问题就包不住了,李井泉的问题包不住,当然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也就会暴露出来。李井泉这道防线如被摧毁,那么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个大西南的后方就存不住了。宜宾怪不得有这么多黑线上的人物往来,怪不得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关心李井泉派来捉我们(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四人)的人的安全问题,害怕他们被北京的革命同志扣留下来,因而给他们通情报,叫他们走,说如不走,安全有问题,问题就会闹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李井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大黑帮分子，是镇压西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把李井泉批透、批臭，斗垮、斗倒！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首先，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

一九六二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合伙，猖狂地进行反华；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于 1962 年初抛出了他的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思想的报告，为“翻案风”“单干风”制造了理论依据。“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而猖獗一时的。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四川省宜宾地区发生了一个阶级敌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在这个反革命事件中，翻案范围涉及地富反坏右及右倾机会主义等，翻案的案件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到 1955 年的肃反、1957 年的反右斗争和 1959 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镇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左派则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那时起，五年来宜宾地区笼罩着白色恐怖，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

在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 年 10 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无数次地给党中央写材料，揭发李井泉等人的罪行。我们无数次地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去谈李井泉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给中央打过电报。但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我们写给中央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李井泉。我们写给中央的信，他根本不理睬，给中央打的电报呢，他就回电说：刘结挺呀，不必来中央，有问题可向中央监委写材料。在这个回电之后，我和刘结挺就被秘密逮捕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和刘结挺正在按这个回电，写揭发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刘结挺突然省委要找他去谈话的通知，说是两天就回来。刘结挺没有带任何东西，当天就离开了宜宾。到成都一下火车，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送进了等候在车站的汽车，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关起来。他们把这种非法关押，美其名曰“对党负责，防止意外”。防止什么意外呢？刘结挺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的话，那就是你们没有想到目前我仍然坚持要到中央去揭发

你们的问题。”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就讲：“我们不是怕你这个意外。”刘结挺就说：“你不怕我这个意外就好哇！那就请你给我自由，让我到北京去，或者你们押送我到北京去！”他们对刘结挺要到中央去的正当要求，狼狈地答不出话来，只好拿中央不许去来堵他的嘴。

在非法关押刘结挺的第五天，我也被骗到成都关押起来了。和刘结挺一样，照例受到侮辱性的全身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许多材料底稿。

（二）

我和刘结挺被骗到成都关押后，宜宾地区谣言随之四起。李井泉等也乘机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刘结挺、张西挺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每天光吃好的，不干好事。”

我们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坐的普通监狱，而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私设的一个秘密监狱我们进监狱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晓得我们被关押了，以便通过他们在外面的斗争把我们营救出来，或者由他们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我们解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办到。因为我们给外面写信，要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要经过看押我们的组长检查，要经过省监委检查，最后还要通过李井泉检查。信中话说得明白了，他们不给发；用隐语，自己人又看不懂。例如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在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几尺布票，本想给你买件衣服，现在我不好买了，由你自己买吧！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孩子，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想孩子一定会把信交给宜宾的战友，可是他们没有看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李井泉会把我们秘密关押。第二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清楚我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弄清这一点，我们心里很不落实。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听看管人员谈话，看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来。很明显，看押我们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或严格训练过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写信，了解回信的地点。我对看押我们的人讲：“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事先对孩子未作任何安排，想给孩子写信，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回信，不知回信该寄到哪里？”看押我们的组长回答说：“回信就寄到省委或省监委。”我说寄到省监委要转，很麻烦，是不是直接寄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不行，你嫌麻烦就不要寄！”第三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寄钱，我心想从邮局的回条上可以知道关押的地方。但是他们把钱拿到城里寄去了。邮局收条邮戳盖的是：“成都”两个字。李井泉所设的这个秘密监狱，不但对我们两个人保密，而且对群众也是保密的。

（三）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整整两年。后来了解，这就是成都西南郊红牌楼镇的那个派出所。但是那里的群众，不管是居民，或是机关干部、工人，没有一个晓得红牌楼的原派出所里曾经关过两个人，而且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因为这里对外的名称是个“机关”，具体名称叫“成都市委工作组”。可是看押我们的人都是省公安厅的人，没有一个是成都市委的人。这和解放前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有什么区别呢。

李井泉关押我们，为什么对内对外都这样保密？很明显，他这种秘密关押是想搞秘密杀害。为什么他又没有搞呢？这里面有个很偶然的情况，打破了他秘密杀害的计划。当时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杀害我们。例如说什么张西挺畏罪自杀了，刘结挺又如何如何。他们正在制造舆论的时候，中央监委有个常委到成都来了解四清运动的情况。因为刘结挺给中央打过电报，要求到中央谈问题，因此这位常

委顺便问起了这件事。李井泉就叫西南局监察处、省监委和审查刘结挺、张西挺专案组，向这位常委汇报所谓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这位常委到成都没有这个任务，但他想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几次要和我们谈。都被李井泉拒绝了。最后他要求和我们见一面，李井泉才被迫同意。但是见面的时间却安排在他的飞机票已买好，准备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一天，十几个人把我们两人押送到这位常委的住处。这里不仅门口有几个秘密岗哨，而且还公开派了一个干部作记录。我们进去以后，他很奇怪地说：“我找的是两个人，怎么来了三个人呢？”他还不晓得派了一个记录。当时我们向他提出来，要求单独谈情况，这个“记录”就被撵走了。“记录”被撵走后，我们首先向他谈的就是李井泉对我们的秘密关押，揭露秘密关押的目的就是想搞秘密杀害的阴谋。我们要求在没有开除我们党籍以前，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还提出如果需要关押的话，就请他把我们带到中央去，关在北京。他听后同意把我们放出来，他说他向西南局、省委谈一谈。他跟西南局和省委谈后，西南局、省委不同意放人。他又要求放一个，问是否可以把刘结挺放出去呢？他们说：把刘结挺放出去他要杀人！他又问，是不是可以把张西挺放出去呢？女同志嘛，回去照顾照顾孩子，他们说也不行，把张西挺放出去，她要翻案。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放我们出去，相反在监狱里对我们的监视更严了，对我们的咒骂声更是不断。而这位常委也因此被李井泉等人告到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去，受到了批评。就是这件意外的发生，打破了李井泉秘密杀人的计划。

关押我们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批准的，是李井泉亲自掌握情况决定的。李井泉把我和刘结挺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关押我们的地方戒备森严，围墙很高，四面有警卫把守。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黑夜比白天还亮。十几个民警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例如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去厕所的路上的片刻停留，他们都有记录。李井泉原来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安窃听器，据说研究了几次，最后说不安了。窃听器虽然不安了，却派了一个公安厅侦察处的技术科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搞什么技术鉴定。

（四）

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四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革命派，把四川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不仅私设监狱，而且还在监狱里施行一整套法西斯政策。我们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过的是不折不扣的李井泉独立王国里的犯人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刘结挺患有严重的风湿性脊椎关节炎，却偏偏把他安排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我住的房子有五个窗户却钉死了四个，只剩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齷齪，夏天也不许打开另外的窗户。

关押期间，我们两人不许接近。我病了或者刘结挺病了，也不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看望。李井泉还采取断绝水源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不管是冬天、夏天，每天除了给小半盆脸水外，其它任何水也不给。所以，我们在狱中两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被子，连女同志卫生用水都不给。平时，我们只能接点雨水洗洗衣服。看守我们的人中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当他值班的时候，我找他要点水，他还是给的。他假装自己用水，提了半桶水放在我的门口，我趁别人不注意就把半桶水拿到屋里去用了。就这样两次，被他们发觉了，借故把这个同志斗争了两个月。他们还常常逼着我们吃已经烂了的臭肉来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吃，他们骂：你们连肉都不吃，还要吃什么？有一天，刘结挺被逼吃了一盘烂肉，结

果病了十几天。即使关在监狱里边，他们还不放心，经常进行突然检查和搜身，哪怕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材料被他们扣下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在监狱里我们的材料被他们没收了几次。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过的几岁孩子写的信也“不许毁坏”，他们要随时检查。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母爱和父子之情来折磨我们，妄图使我们念及儿女情长放弃阶级斗争。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突然看见我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四岁多，一个五岁多）站在院子里。我很奇怪，就问“组长”：孩子怎么进来了？“组长”说：是上级叫来的，你叫他到屋里去嘛！我就把孩子牵到房子里来。孩子见了我不哭也不闹，连声“妈妈”也不喊。我问他们：“孩子，你们怎么来的？是哪一个送你们来的？”孩子们不说话。我说：“不认得妈妈啦？你们怎么不说话啊？”孩子张着两个大眼睛到处看，我说：“你们到处看什么呢？”孩子说：“我怕叔叔。”我说：“不要怕，妈妈在这儿。”大一点的孩子这是就哭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折磨孩子，在孩子进监狱的当天晚上就发高烧。孩子只在监狱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孩子都已经睡了，突然接到通知：刘结挺、张西挺的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我要求孩子病好了以后再走，他们说：“不行！”我说：“孩子病了，是不是明天再走？”他们说：“不行，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没有办法，我就把孩子喊醒，给他们穿好衣服。大点的孩子听了不愿意走，最小的孩子叫爸爸妈妈跟他一块回家。这时候，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说什么呢？我只好说：“不要哭。你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吗？毛主席的好孩子在坏人面前是不哭的。你们看妈妈都不在坏人面前哭。”孩子讲：“我害怕，怕叔叔。”我说：“不要怕，没关系，他们不会整你们，你们都是孩子，如果他们整你们，毛主席知道了不会答应。”这时，孩子就不哭了。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当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坚贞不屈进行斗争的时候，敌人会突然把你的亲人推到你面前，妄图软化你的斗志，分散你的斗争精力。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堕落到这种程度。

他们还常常用死来威胁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一些无法捉摸的话，预示我们马上就有被杀害的可能，妄图使用这些手法来搅乱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安静的写揭发材料，分散我们向他们斗争的精力。李井泉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我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写材料，把我们要向当说的话，要向毛主席说的话，在没有被杀害以前全部写出来。李井泉为了骗口供，什么可耻的手段都使用了。1964年5月，他们用药物使我中毒，我头昏眼花，浑身痉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头发大部分脱落了，连续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靠点开水维持生命。正在这样的时刻，李井泉派省监委副书记带领十几个人乘机闯进牢房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整整斗争了我三天。他们斗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不断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勾结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罪行。他们说：“你们不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说我们替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翻案吗？”我说：“是写过。”他们说：“你现在怎么认识？”我说：“我现在还这样认识。”他们就说：“那么就请你谈谈，替哪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了？”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仅在宜宾地区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及涉及的案件就有三百余件，他们好象不知道似的。当时我举了两个案例之后说：“你们不仅替他们翻了案，而且还升了他们的官，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中的骨干分子进行倒算。替右派分子翻案，就是右派行为！”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药物中毒以后，我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刘结挺就给他们写报告，要求把我送到医院里，他们就这样讲：“你不是要求住院吗？我们同意你住院，不过

我们得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统一认识以后，才能住医院，不然的话就不行。”他们妄图用住院来换取口供，想在我临死之前，趁我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捞点稻草。可是，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可耻地失败了。

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李井泉还常常使用资产阶级的政客手法，对我们打、拉、逼，软硬兼施。1963年9月份，李井泉派省监委书记找刘结挺谈判。那个监委书记对刘结挺说：“老刘啊，你不要老是扭着那个问题不放好不好？翻了就翻了，你不要管他，承认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就行了。”刘结挺讲：“不是我扭住问题不放，是你们非翻案不可嘛。”他又说“你老刘是个聪明人嘛，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过去的都不算，重新来好不好？只要你和省委合作，保证不给处分，这话李政委早就说过了嘛！”当李井泉这个阴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又派西南局监察组组长找我们谈。那个监察组长说：“你们不要再扯这些案子了，越扯越复杂。你们说真理在你们手里，这个问题就算真理在你们手里也难办得很啊！你们的档案有几十箱子，以后哪个去看呢？”刘结挺讲：“你们编造的材料再多，问题再复杂，但是用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来考察，再复杂的案件也能搞清楚的。”李井泉看软的不行，又派省监委副书记对刘结挺进行威胁：“你一定得按省委的决定检讨，不然的话，你想捞根稻草也办不到。”话里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杀害我们。

在革命同志之间挑拨离间，也是李井泉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叫王茂聚、郭林川和我们划清界限，揭露我们的所谓问题，一方面又找刘结挺谈话：“老刘啊，我看你相当孤立呀！你以为宜宾还有人支持你，其实，我看除了张西挺外再也没有人支持你了。”又说什么：“那十几个案子，根据我们了解并不都是你搞的，有些是王茂聚、**搞的.....。别人搞的你不要都担起来。我也当过第一书记嘛，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嘛！特别是处理案子有专案人员，第一书记哪能管那么多。”刘结挺说：“即使不是我搞的，甚至也不是宜宾的案子，只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要你们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我就不能不管，我都要进行揭发。

（五）

在监狱中，李井泉对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他既骗不了我们，也没有压倒我们，相反，我们对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造他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在监狱里，我们怀着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我们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摧残。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写了许多检举和揭发的材料，揭发李井泉从一九六二年起，顽固地推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李井泉所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露和控诉他们勾结阶级敌人大规模地替阶级敌人翻案，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滔天罪行。这场翻案反翻案，倒算反倒算，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面进行了两年。对敌人的阴谋和罪恶必须进行充分的揭露才能够在政治上压倒他。李井泉私设监狱关押我们已经是他的一条大罪状。他在监狱里对我们进行折磨和摧残，这是他的又一条大罪状。对李井泉这些罪状必须进行揭露，必须把它一桩桩、一件件记载下来，以便在我们被杀害之后，革命同志和他清算。“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存李井泉这些罪状呢？用日记的形式可以记载下来，但不容易保存，因为他们可以毁掉它。那么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想，通过给他写信这样一个合法的形式才能记载下他的罪状。于是我们就不断地给他写信。例如，为了揭露他让我们吃烂肉，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刘结挺因为吃了烂肉已经病了几天了，请“李政委”批准不要给我们吃这样的烂肉，给我们吃青菜

白饭。我住的房子五个窗户不是给他们钉死了四个吗？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李政委”，我住的房子五个窗子被他们钉死四个，只留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窗子。女同志在里面活动不方便，这个窗子我不愿意打开。现在天气热了，请允许我多开一个窗户。或者拿这个窗户换另一个窗户。是否有当？请“李政委”批示。我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两瓶药，一瓶是眼药，一瓶是治疗肾脏炎的药。但都被他们搜走了。为了要这两瓶药，我给李井泉写了好几封信。本来一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几封呢？我有个想法，给他找点麻烦！我要眼药给他写封信，要治疗肾脏炎的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要药要了半年都不给我，结果药都坏了，他们就告诉我药已经坏了，你不要再要了。以后，我又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说：就是坏药也请“李政委”批准发给我，因为我现在连坏药也没有吃的。他们不准我们两个接近，说是一个案子的不能接近。我们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就是因为两人是一个案子，究竟有没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在一起谈谈才行，不然的话，我们不好写检查。刘结挺离开宜宾时，只带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我离开宜宾时，连毛巾也没有带一条。我没有毛巾洗脸，就给李井泉写信，要求“李政委”批准我每天向刘结挺借洗脸毛巾。

总之，我们和李井泉保持“密切联系”，随时“请示报告”。一事一报，进行充分的揭露。写不写“综合报告”呢？写！在一九六五年放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给他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报告”上讲：我们被放出来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过去在红牌楼，不管写信、吃饭等等，一切都有人具体管理。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应该和谁联系’由谁管理，我们不清楚。这些事情请“李政委”给明确一下。另外，我们给孩子写了一封信，过去这种信都是交给“工作组长”，检查了以后送到上面代发。现在这封信该交给谁检查呢？是不是送给“李政委”检查了以后请“李政委”代发呢？刘结挺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年没洗澡了，准备进城洗洗澡，是否恰当，请“李政委”批示。我们还抓住他非法对我们逮捕、拘留这一点向他展开进攻。因为，他对我们关押没有拘留证，又没有逮捕证，这不能不是他的包袱。抓住这一点，我们又要求他准许我们到外面来活动。我们知道他不会答应，但这是斗争，也是揭露。布票发下来以后，我们就给他写信说：我们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发给了我们多少布票。既然发了布票，我们要求“李政委”批准我们出去买布。夏天来了，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出去做一件夏衣穿。“七一”来了，我们要求出去参加党的生日的庆祝，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国庆节来了，我们要求参加国庆活动，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公民。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三天，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他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放我们三天假……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后来给李井泉发觉了，就把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力下放给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叫人来骂我们：“你们怎么经常给首长写信？你们写信还写什么[李政委亲启]，亲字下面还划个圈，好象很重要似的，其实就那些小事。比如打开窗户这种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不就行了？”我说：“怕你们为难，给李政委批了，你们照办不就行了？”他说：“你们写封信，我们拿去给收发，收发要登记，登记了交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又交秘书室，秘书室再转交李政委秘书，李政委看了要批，李政委一批就成文件了。”我说：“用不着麻烦李政委，他可以不批嘛。”他说：“就是李政委不批，只要写上[李政委已阅]几个字，这就成了省委文件了，就要作档案保存。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你们不懂啊？”我当时心想，就是懂得这个才这样干的啊。

李井泉把权力下放，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你这个李井泉领导，只看得

起你李井泉。所以，我们不下放，我们有什么事还是直接向李井泉打报告，向李井泉请示，就是要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就是要扭着你不放，揭露到底。

（六）

五年来的迫害并没有把我们压垮，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我们也过来了。每当我们回忆这段斗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斗争的紧张，也感到斗争的幸福和愉快。

我们出来以后，特别是到北京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来看，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顶十天八天还可以，顶一个月两个月问题也不大，时间再长一点我们就怀疑所坚持的是不是正确，对斗争能否胜利就发生了怀疑。你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整整五年，你们动摇过没有？你们对斗争的胜利发生过怀疑没有？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坚持了长达五年的斗争呢？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的，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十天八天和二个月两个月是可以顶住的。坚持不懈地顶上几年，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李井泉的来头很大，他不仅控制着从宜宾市委到宜宾地委、四川省委、西南局这样一个四级组织，代表着“党”，而且他又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进行斗争，顶住这样一股长达五年之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在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坚持的不是什么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动摇过，我们从来没有按照他的决定写过一个字的检查。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进行长达五年之久的斗争呢？是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宜宾的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着我们，宜宾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和我们心连心，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从一九六二年起，宜宾的革命同志就常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揭露李井泉等人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从宜宾我们又想到全国，全国的革命同志也会支持我们斗争的。

在五年的斗争中，我们总是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时时回忆着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反对翻案风。毛主席的教导，不仅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而且给了我们斗争的智慧。李井泉等可以搜走我们的“毛选”，但是，太阳的光辉他是挡不住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就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心。

对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我们作了充分估计。一个估计是，他可能杀害我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他们的确写了杀害我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他们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从当时关押我们的情况来看，要么就是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投降，和他们一起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一起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这样，不但可以保命，而且可以保官，说不定还可以升官。要么，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保卫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向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这样就有杀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后，刘结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以后，就把抽屉打开，反贴在板子上，以便在我们被害之后，一旦有同志发现，就会交给我们的亲人毛主席。第二个估计，他可能判我们徒刑。当时我们估计可能判二十年徒刑。我们计算了一下，二十年出来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有毛主席在，我们的斗争就一定得

到胜利。我在监狱里写的日记是反映了我当时思想状况的。这些日记早就被他们抄走了。抄走以后，他们从日记上摘抄了一些片断，安上了一个题目叫做：“反革命分子张西挺的罪恶记实”。红卫兵小将抄黑材料时抄到了这份材料，看了以后非常奇怪。他们说，这明明是一心向着党，向着毛主席的日记嘛，怎么叫“反革命罪恶记实”呢？然而，在李井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谁就是他的“好党员”、“好干部”。这就是李井泉对“反革命”和“好党员”的定义。下面是几段日记摘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十多年来，党把我培养成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过党的任何处分，历次政治运动，党把我作为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使用。母亲养育我十三年，而党把我养育成人，党比母亲亲，党对我的恩情，我无法计算。亲爱的党啊！我永远不忘您的教导：记住阶级和阶级斗争，挺身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我们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她不能允许牛鬼蛇神翻案，绝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即使宜宾专区这么一个小地方，发现以后也会立即粉碎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永远不会得逞，革命同志有一天会揪出他们来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九六二年配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需要大搞翻案，终究要遭到可耻的下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苏联《真理报》捏造谣言攻击我们党的材料以后，写了一段日记。)

《真理报》为什么使用希特勒和戈培尔使用的伎俩呢？……出于一个原则，就是造谣重复三次，别人就会相信。怪不得这两年几十个“演唱家”到处演唱。(这里讲的“演唱家”是指李井泉专门组织搞我们的所谓专案组，他们编造材料，到处作报告，制造舆论。)他们是深深懂得这种伎俩的效果的。不过我相信谎言终究是要暴露的。在毛泽东时代，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必将被揭露。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热爱进行斗争的。虽然我们与世隔绝，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但是我们的斗争既不孤立也不盲目。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领导的国际原修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读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等消息时，我们激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当时我们想，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究会被人民赶下台来，扔到垃圾堆里去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我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很紧张，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几百万字的揭发控诉材料，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秘密监狱里写出来的。因此，两年的监狱生活，我们从来不感到寂寞，我们所感到的是斗争的幸福和愉快。当时我们想，李井泉既然把我们“调”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就要在这里和他斗争，就要在这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身体健康是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要有能坚持斗争的身体，就必须加强体质的锻炼。一九六四年八月份，我们发现由于活动范围小，活动少，我们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走路不大方便，如果不采取措施锻炼身体，就无法坚持斗争。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属于党的，我们有责任把它锻炼好，和李井泉斗争是长期的，尤其需要一个能够坚持斗争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每天做二十分钟的腿部活动，做四十分钟的腿部体操，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列入到和李井泉斗争的议程。

(七)

一九六四年六月份，李井泉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的报告，就是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在李井泉亲自主持改写的这个修正主义报告中，他不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我和刘结挺横加罪名，而且大肆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竟然被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批准了。这就是批准了李井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全部活动！这个报告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省监委向我们宣布。宣布以后就把我和刘结挺送到省委罗家碾招待所去了。在罗家碾招待所里面虽然有人监视、盯梢，但活动总算有点自由了。这个时候李井泉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刘结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甚至还捏造说，毛主席都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是全国的典型。和我们一起斗争的个别同志听了这些消息后，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还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们，不要再斗争了，胳膊总是扭不过大腿，刘结挺你这个小小的地委书记能斗过有权有势的李井泉吗？李井泉上面有上面的人，下面有下面的人，你不要再找麻烦了。还有的同志讲，你过去是个地委书记，属于中央管理的、现在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干部，进一步给你一个什么处分，要杀要关那就不用报中央，他就处理了。还有的同志提醒我们：既然中央都批示下来了，那就不是李井泉的问题了，你再告那就是告中央了。叫我们考虑考虑后果。甚至还有人劝我们，受点委屈算了，想不通吗，看看《修养》，就会想通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争个什么嘛！有碗饭吃就行。你看你们的孩子四、五年没有跟你们在一块，你们要对孩子负责，不要丢下孩子什么都不管了。等等。我们把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斗争中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加以考虑，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斗争，决不能不相信党，决不能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是批了，但我们对这种批有怀疑。当时想可能是一个什么书记批的，这个书记可能和彭德怀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案子里突出反映了××的问题，而××是拥护彭德怀的。我们想，决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毛主席批的！几年来，我们坚持的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斗争一定会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因此我们回答这些同志：“要告！一定要告！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为了使毛主席了解四川问题，为了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想办法离开四川。而李井泉紧紧地控制了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四川。于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开始了。这个斗争是1962年斗争的继续，也是1962年斗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刚放出来不久，李井泉就分配我们工作，把我们分到万县专区一个县里。我们算了一下，从那个地方到北京要十天的时间，一动身，李井泉马上就晓得了，马上就可以抓回去。这样就可以给你加罪名，说你畏罪潜逃，甚至说你潜逃外国，判你的刑。所以我们就是不去，劝说去不去，打也不去，就是不听你的

摆布，不服从你的分配，不让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牵着鼻子走。我们提出要求回北方工作。他们不准。我们就给中央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没犯任何错误。我们是因为热爱毛主席、坚持毛主席的路线而被开除党籍的。我们要求把我们调到北方工作。这封信结果被转到李井泉那里去了。省委组织部就找我们谈话，说中央组织部长看过信了，要我们服从四川省委安排，在哪里犯错误就在那里改正嘛，我们不听从。这时，刘结挺接到他侄子一封信，说他哥哥病得很厉害，叫他回去看一看。刘结挺就去请。假，请假也不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提出回乡搞农业生产去，回到农村作一个普通的社员去。我们分别写了报告，又、合写了一个报告。李井泉就派省委书记处书记×××找刘结挺谈话，他说：你的报告我看到了，你要劳动，你不革命啦？刘结挺听了发笑，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老红军，不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第一线参加劳动吗？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业第一线，这怎么叫不革命呢？你们想叫我们不革命是办不到的。二十三条上讲得很清楚，不能当干部的可以当员。”×××讲，“二十三条不适合你刘结挺。”刘结挺就开了他一个玩笑，说：“×书记，我看到中央只有二十三条，是不是还有二十四条说，以上二十三条不适合刘结挺？”这位书记说不出话来。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让步，没有接受他们的工作分配，而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妥协，也没有让我们离开四川。在这一年多中间，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给中央寄发了不少材料。

下面我谈一谈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在北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关怀。

一九六六年六月，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下定决心，冲破这个黑框框到北京去。我们商量后决定刘结挺先去，我留下来掩护。刘结挺走，就怕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了封信，刘结挺自己带着。信的大意是：我到北京揭露李井泉的问题，不料在半路上被抓回去了。张西挺还在成都，宜宾还有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晓得李井泉的问题，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些同志调到北京。刘结挺带着这封信，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夜晚，翻墙、越河离开了成都，在六月底第一次到了北京。刘结挺离开成都以后，忙坏了李井泉，他一方面派人对我进行了几次审讯。问我：“刘结挺到哪里去啦？”我说：“到中央去了。”问：“到中央干什么？”我说：“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呀，”“到中央哪里去呀，”我说：“到中央嘛！”他说：“中央单位多咧！到中央监委，还是中央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还是到中央文革？”我说：“那他没有说，他说他找毛主席去了！”他一方面用省委和公安厅的名义，打电报给党中央和公安部，要把刘结挺抓回去。省公安厅还用传真把刘结挺的像片传到公安部，要公安部寻找刘结挺。刘结挺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写了两万多字的材料，交给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这个接待室里有个组长，他看了材料后说：“这几年来，我们经常接到宜宾来的很多信，和你谈的差不多。我们准备把这些材料和你写的材料汇总一下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你是不是到中央监委谈一谈。”经过他的介绍，刘结挺到中央监委谈后，他们劝刘结挺回四川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也要刘结挺回四川，说材料已经转报给中央了，回去听后处理就行了。刘结挺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一谈，都遭到拒绝。正在这个时候，刘结挺听说江青同志经常到北大去，就到北大去找江青同志。但是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公安部门查出了刘结挺的住址，勒令他在七月底以前立即离开北京。刘结挺在八月一日回到了成都。

(九)

刘结挺回成都后，我们一方面给李井泉等人写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特别要求回宜宾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我们写小字报给他，揭露他的问题，并且要求他转给毛主席。当然我们晓得他不会转，不转就是他扣押给毛主席的信，这又是一条罪状。大概因为我们要求到宜宾麻痹了他，或者因为北京红卫兵小将南下串连，对他们有威胁，他们对我们的监视不是那么很严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城里去对付学生。这时，我们便决定一起走。八月二十五日一个大雨的夜晚，我们翻墙跑出来了。二十七日到了北京。在北京和宜宾的革命战友王茂聚、李良同志会合了。因为我们到北京揭发李井泉等人的问题，加上王茂聚、李良他们来北京以前写了揭发李井泉等的大字报，我和刘结挺写了揭发李井泉的小字报，李井泉等便把我们打成了“反革命”，打成了“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李井泉还故弄玄虚，把我和刘结挺的照片用传真传到北京和国防边境上，捉拿“越境逃犯”。我们四人住在一起，和那个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取得了联系。他对我们很热情，叫我们打破顾虑，把李井泉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并对我们说，据我们了解，李井泉的问题不少，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李井泉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就不好办了。我们四个人很受鼓舞，就连夜赶写材料，边写边送，边送边写。到九月中旬，我们就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材料。那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了解到我们所写的材料基本告一段落后，态度马上变了。他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看了我们写的材料，叫我们要相信四川省委是革命的，李井泉是革命的。他还要我们把掌握的李井泉的原始材料都交给他，以便中央办公厅转交四川省委保存，说这些材料个人保存不安全等等。这个人的面貌完全暴露了。我们要求把我们所写的材料交给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看，并请求这些同志接见我们一次。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接见不可能，他们忙得很。材料嘛，既已交给我了，给谁看，由我来安排。”他并下令限期要我们离开北京。

(十)

在我们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那个组长联系的这段时间里，李井泉布置他的忠实打手宜宾地委书记×××在宜宾、成都大造“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的舆论，把他们捏造了五年多的谣言一古脑儿倒了出来。他还下令动员各级组织给中央书记处打加急电报，要求把我们送回四川。他们给中央书记处打电报的同时，还给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以及中央文革打了电报。几天的电报费就用去将近一万元的样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我们还在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联系时，李井泉就派了二十八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捉我们。这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极右分子和一个劳改犯。这一天中午，同志们都休息了，我想出去买点东西，刚到门口就发现被包围了。我赶快退回来，叫刘结挺他们快点起来，想办法把材料转移出去。我和李良同志就往外冲，门上有十几个人把守着，冲不出去。我们就找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说，他们不但不理，反而把招待所工作人员监视起来了。幸好有一个湖南的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是来上访的，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一定要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把信和材料交给毛主席。这个同志是革命的同志，革命同志心连心，他接受了我们的委托，还建议我们向北京的革命同志呼吁，要他们来支持，他主动表示要替我们去贴呼吁书。我们就赶快写了一个十二万分紧急呼吁书，呼吁书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搞独立王国，搞资本主义复辟，

正当我们向党中央揭露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捉拿我们，这是破坏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呼吁革命派声援我们，制止这一现行反革命活动。这个紧急呼吁在北京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贴出不久，就有几十个红卫兵小将和上访的革命同志赶到我们的住地，把那二十八个人赶跑了。但是这二十八个人并没有离开北京，他们在商业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即九月九日，他们把带来的打印好的小字报和他们连夜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大字报、小字报中说什么“刘张王郭一贯反党”。反什么党呢？那上面没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事实，说的全是反李井泉的事。他们甚至把刘结挺不和李井泉握手。都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写上去了。说什么刘结挺傲慢，“李政委”伸手去和刘结挺握手，刘结挺把帽子一拿就走了，等等。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对我们横加阻拦，说什么“你们都是作过领导工作的，应该懂得解决你们的问题要靠组织，而不是靠群众，不应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面前”。我们不答应。他就威胁我们说：“现在每天有几十万学生到北京，象李井泉这样的大字报一贴出去，不到两个钟头就传遍全城，就会引起大辩论，如果引起大辩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在九月十日我们贴出了十二张大字报，揭露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大字报贴出后很受革命同志的欢迎，尤其是四川学生，很快就把大字报抄回四川张贴。而李井泉派来的人写的大字报则受到革命群众的指责。革命群众质问他们：“反对李井泉怎么叫做反党？李井泉就代表党吗？”革命小将质问他们：十六条公布后，来北京抓人，对吗？他们非常狼狈。同时，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上访的革命群众酝酿斗争他们，计划斗争后把“代表团”团长和那个右派、劳改犯扣下来，其余的撵出北京。斗争会安排在九月十二日。不料在九月十一日夜晩，有人叫他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第二天到中南海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有两个人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安全表示非常关怀，劝他们离开北京。并透露说：“你们的安全已经有问题，再过两天就不行了。这个事情某某某(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晓得了，希望你们赶快走。再不赶快走，问题就要在北京闹大了！”这样就在当天把他们掩护走了。由于这样掩护了一下，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如果把他们扣下来，那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鼓舞就大了，他们很快就会行动起来。

这以后我们就中断了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那个组长的联系。我们觉得原住处也不能呆了，因为有危险。到哪里去呢？当时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及清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还处于困难时期，新北大的形势还比较好，我们就决定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没有找到，只找到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说不好安排住宿，因为我们不是学生。叫我们到北京市委开个介绍信，才好安排住处。但是到北京市委，他们不给办。后来，经过一位上访同志介绍，到联合接待站去登记，联合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还分配一个接待员和我们接谈。这个接待员第一次跟我们接谈就向我们发脾气，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我们明明是来揭发李井泉的，怎么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呢？双方谈不下去了，他便要材料，说看了以后再确定时间谈。我们给了他一份材料，请他转送给江青同志。于是，他走了。后来了解，这个人原来和李井泉派到北京去做情报工作的一个联络员有密切联系。

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正以各种途径寻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商业部进驻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一个人经常来找我们“聊天”，说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去？该回去了吧？在北京住着不是个法子，等等。有一次他干

脆对我们进行威胁：“你们住在这里群众有反映，你们都有工作岗位，住在这里不工作，不搞文化大革命还行啊！”又对王茂聚同志说：“你是个地委副书记吧。还是个当权派，你应回四川受群众监督，接受考验嘛！”又对我们说：“刘结挺、张西挺，你们都是开除党籍的，是不是？开除了党籍应该找中央监委嘛！找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从来不谈个人党籍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李井泉的问题。”我们把李井泉的问题大体给他谈了一下，他听后说：“不会吧，李井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了解他嘛！”原来这个人过去是李井泉的老部下。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晓得李井泉的黑手已经从四川伸到北京来了。他派他的警卫员在北京建立了反革命组织“红旗军”，而且还通过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控制我们。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经常受到检查，也无法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后来，成都地质学院有五百多人到北京告状，告他们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便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只有先打倒西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学院党委书记的问题才好解决。他们材料不多，我们就供给材料。不久，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他们，我们便请他们带几份材料给周总理。不料到接见那天，周总理没去，材料交到××的手里去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写给毛主席的材料，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材料，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最后都落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没有一件送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

（十一）

十月三日，三司开了个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且讲了话。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有个第三司令部。在这个大会上，北航《红旗》谈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学习了这个发言，认为这个发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我们认定了北航《红旗》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并想法和他们联系。我们找到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同志，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我们谈的问题很重视，也很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样，在十月十一日，我们便把材料交给他们。十月十七日，王力同志就接见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欣喜若狂。十月二十日，王力和关锋同志一起接见我们。十月三十日，周总理又接见了我们。十二月三十日，王力同志告诉我们有关四川的情况，并叫我们回四川和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于是在今年一月份，刘结挺、王茂聚和李良便回四川了，我留在北京整理和印刷李井泉的材料。

（十二）

今年二月份，四川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又重新被打成了“反革命”。刘结挺被打成“反革命头头”。说刘结挺不仅控制了宜宾，而且控制了大西南。凡和刘结挺、王茂聚联系过的造反组织和个人都受到追查和斗争。他们还抄我们的家，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小孩换洗的衣服、被子、鞋袜都抄走了。在这次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造反派的头头，无论大小全都被抓，造反派的战士一个一个被斗争受迫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斗争过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他们大叫解放了，有的在背后出谋划策，镇压造反派，有的赤膊上阵，指挥抓人。他们还控制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以及首都来的记者，封锁消息。有的到北京去，在车上就被抓回送进监狱。这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特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保守派组织，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大镇压、大逮捕。

这时，刘结挺、王茂聚等在成都不能呆了，便在二月底离开成都，到了北京。他们刚离开成都，便有人去抓他们，晚走一点就不能脱身。我一直住在北京，但他们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并派了三个人带着手铐到北京抓我，但未得逞。（十三）

刘结挺等来北京后，就把成都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肯定了宜宾革命同志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和李井泉等人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国两条路线斗争在宜宾的一个典型反映。决定召开会议，以解决宜宾问题。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并给我们平了反。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宜宾问题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可以实一些同志受到迫害，斗争中虽有某些困难和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一定取得彻底的胜利，宜宾问题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今后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这个教导千真万确，宜宾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造反派的同志在毛主席和中央关怀下，从监里放出来了，但是回到本单位又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去斗争，被限制自由，单位上不发给工资，使这些同志的家庭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他们还威胁革命造反派“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平反，他们扬言不承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轻易放弃他们这个西南大后方的。而宜宾这个地方，李井泉是这样说的：“西南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而宜宾则是关键的关键。”关键他们是要抓的，关键的关键他们更要抓。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仍很艰巨。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团结在一起，继续斗争，彻底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大西南！我们一定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黑《修养》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斗垮，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川西平原红旗招展，长江两岸凯歌高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走访了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同志和筹备小组成员张西挺同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是原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一九六二年以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南地区“土皇帝”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分别写

的《李井泉是西南的赫鲁晓夫》和《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新贵州报》上发表和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祖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纷纷来稿来信,说看了这两篇革命文章,是上了“一次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课”,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表示“一定要好好向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学习,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

同时,广大读者也很希望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宜宾问题的斗争,是全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李井泉之流为什么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什么能够坚持这样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等。我们根据读者的这些要求,从贵阳到成都,从成都到宜宾,访问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以及红卫兵革命小将。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忆往昔峥嵘岁月调”

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风云突变,一时乌云翻滚,掀起阵阵黑风——

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劳改场所跑到城里,住进招待所,出没于地市委机关,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地叫嚣:“现在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翻案写材料了。”

在我们的专政机关里,一小撮混蛋竟公然和四类分子开座谈会,胡说什么“你们的案件是谁处理的?谁批准的?有意见都可以提!”

看!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何等的嚣张!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是何等的猖獗!这是一幅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画图啊!反革命复辟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谈到这里时,愤慨地说:“那个时候呀,硬是右派翻天,资产阶级专政,宜宾已经改变颜色了。”

水有源,树有根。宜宾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绝不是孤立的,它是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反映。

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神圣同盟”,更加疯狂地掀起了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余部的那班家伙们,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便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刮“翻案风”,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大西南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和他的黑后台一唱一和,大刮特刮“翻案风”,策动了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郭一案件就是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集中、露骨的表现。

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党的庐山会议以后,宜宾地专机关革命的党员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出混进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可是,时隔二年半后,当资产阶级司命部的总头目公然替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时,李井泉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密锣紧鼓,亲自登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涂脂抹粉,赞美他是什么“好党员、好干部”。

被李井泉吹捧为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的郭一是什么货色呢?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中,公然包庇反革命分子,并恶毒地攻击、诬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九年底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

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党内传达后，他公开跳出来与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唱对台戏，同意并赞扬彭德怀的《意见书》，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喊冤叫屈，并且明目张胆地散布什么“跟着彭老总走没有错”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造谣言，放暗箭，胡说“共产党就是厉害，说你这个人好就是好得很，说你这个人有问题，把材料一整就够了。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借机攻击总路线“要多快就不能好省。”

李井泉那样狂热地吹捧郭一，郭一又那样卖劲地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说明他们是一根黑藤上的瓜，是一路货色！郭一正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就是否定庐山会议的伟大功绩，反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的成果，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要坚决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

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下定决心要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他们一方面赶写控告材料，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罪行；另一方面，再次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写报告，提出了对郭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李井泉施展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伎俩。他将宜宾地委的“报告”原封不动地退回，并强令“重新讨论”，更恶劣的是李井泉竟然利用他窃踞的职权就在这时给郭一提级、升官。

李井泉耍出的这一系列反革命伎俩，大大激怒了宜宾地区的广大革命干部。大家认识到，这已不只是什么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了，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不出所料，一场怵目惊心的事件爆发了。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九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案，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歇斯底里大发作，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下毒手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坚贞不屈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在炽热的阶级斗争中愈战愈强了。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他们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下定决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谁替阶级敌人翻案，就和他决一死战！

狼，终究还是狼。狼子野心的李井泉，紧密配合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刮起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以百倍的疯狂和卑鄙手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但把反右倾斗争的伟大成果一风吹，而且还进一步把翻案范围扩展到反右派斗争，扩展到肃反运动。

无限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彻底戳穿了李井泉之流妄图全盘否定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阴谋诡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制订下的政策、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成绩伟大，好得很！好得很！李井泉之流替

阶级敌人翻案,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 就是把矛头指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 坚决回击, 彻底粉碎!”

于是, 这场阶级斗争, 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 提出了一个反动透顶的理论: “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

“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 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逻辑又是什么?! 这不是中外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理论又是什么?! 这句话彻底暴露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但是, 阴险毒辣的李井泉, 竟然把“罪名”强加于人, 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看! 李井泉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到何等程度!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地专机关许多革命干部, 人人义愤填膺, 肺都气炸了。

怎么办? 刘结挺、张西挺和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同志一起, 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他们根据毛主席指出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的教导, 反复研究了李鹏案件, 坚定地认为过去处理李鹏, 没错, 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 李井泉要为, 右派翻案, 坚决顶住!

就是这样, 从反右倾运动到反右派斗争, 从郭一案件到李鹏案件, 李井泉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 拼命地替阶级敌人翻呀! 翻呀! 前后翻了上百个案件。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激动地对我们说: “通过郭一、李鹏等案件与李井泉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认清了他的本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霹雳一声震天响,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英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陈济民、李良、田禾等同志听到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后, 兴奋得雀跃狂跳, 奔走相告, 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他们还立即通知在成都治病的刘结挺同志赶回宜宾。战友们久别重逢, 集聚在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家里, 兴高彩烈地畅:

“毛主席的指示, 句句是真理! 毛主席的号召, 字字说在我们心坎上!”

“毛主席啊, 毛主席! 您的伟大战斗号召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您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坚决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斗争到底!”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 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大家齐声朗读毛主席的教导: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在举国上下欢呼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时候, 李井泉之流对公报的发表怕得要死, 恨得要命。他凭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 预感到“李氏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了。他绝望, 他挣扎, 变本加厉地、不择手段地对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进行打击、陷害、斗争。公报九月底发表, 十月二十三日就宣布对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停职审查”; 非法剥夺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 在各种大小会议上, 对他们开展大规模的“揭发、批判、清理”; 甚至违反党纪国法, 限制人身自由, 无理进

行抄家；到十二月，竟公开派人监视、盯梢……。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压迫越厉害，那里反抗越强烈。在那乌云笼罩着天空的艰苦斗争中，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抱病夜以继日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写了一份关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宜宾大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材料，一针见血地指出李井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五年以前，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就能认识到李井泉这个“庞然大物”的反动本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他们不愧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不愧是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

（二）

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对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种种打击、陷害还不满足，竟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以“省委找去谈话”为借口，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骗到成都关进秘密监狱。

“李井泉把我们抓起来，想达到几个目的”，张西挺同志指出：“第一，割断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联系，第二，割断我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特别是把我们和王茂聚、郭林川等战友分开，妄图各个击破；第三，通过关押我们，把宜宾革命派压下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第四，一旦时机到来就进行杀害。因此，关押我们的地方非常秘密，在狱中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被关在什么地方，附近群众也不知道这里关着人。因为比较秘密，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为了逃避革命群众斗争，还把这座监狱改作他的‘避风港’，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张西挺同志接着说：“关我们的时候，戒备森严，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夜间比白天还亮。十几个人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连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在去厕所路上的片刻停留，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关我的房子有五个窗户，被钉死了四个，只剩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齷齪。刘结挺患有严重的风湿脊椎性关节炎，他们是知道的，却偏偏把他关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

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被李井泉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相反，敌人的疯狂镇压使他们更加坚定。他们把阴森的监狱当作战斗岗位。

李井泉妄图割断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联系，这是痴心妄想！毛主席的好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揭发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每天写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深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狱中写作条件极端困难。缺少纸，刘结挺同志就把香烟盒翻过来写。有一次，看管他们的“组长”的孩子在院坝拉屎，用几大张纸擦屁股，张西挺同志就把他擦第二次的纸拾起来写材料。晚上，关押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还是装在天花板上的，又昏又暗，和室外照得通明的警戒灯形成鲜明对比。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灯光暗算得了什么，照样写！

凭着忠于毛主席的赤诚之心，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写的揭发、控诉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有两百万字左右。两百万字啊！请同志们算一算，如果广

播,整整要八天八夜才能播完。如果登报,整张报纸都登它,要连续登五十天才能登完。

这些材料,深刻地、系统地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控诉了李井泉为地富反坏右翻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射向李井泉的子弹,每一句话都是一把投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手榴弹。

对这些揭发、控诉材料,李井泉之流害怕得要死,根本不许他们往外寄,更不许直接寄给毛主席、党中央,每个字都要经过看押他们的小组、省委监委,甚至李井泉检查,层层检查,材料也层层被扣下来了。但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停止斗争,你今天扣,我明天写,你扣下来不往上转就增加你一条“扣压给毛主席的信”的罪状,总有一天要新账、老账一齐算。

当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所写的材料,也根据斗争需要作了多种准备。刘结挺同志说:“李井泉这样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他几手。”当时,他们曾经估计,李井泉可能杀害他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李井泉之流确实写了杀害他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但是,他们仍然作了牺牲的准备。刘结挺同志曾经专门写了两封给毛主席的信,一封带在身上,准备在被杀害时,把它丢在刑场上,他说:“我相信执行的人不是铁板一块,忠于毛主席的同志看到这封信,一定会交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和李井泉的斗争仍然可以取得胜利!”另一封信,反贴在抽屉的板子上,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交给毛主席,李井泉的罪恶终久会得到清算。

狱中斗争是多方面的。李井泉为了软化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分散他们的斗争精力,曾经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最小的两个孩子送到狱中住了两天。但在阴谋未得逞时,就在半夜下令把已经睡熟、正在发高烧的两个孩子抢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在孩子身上还有一场斗争。五岁多的女孩岷沙,一到张西挺身边,就急急忙忙地把裤带解下来递给她,她仔细一摸,从带子中摸出一张纸条。这是十二岁的大女儿写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完条子,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李井泉之流发觉这张条子没有?孩子只穿了一个背心,一条短裤,这种条子是很容易被惯作特务工作的李井泉的爪牙发觉的。如果发觉了,为什么又留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据当事人揭发,他们很早就从孩子身上搜出了条子,估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会用同样的办法和狱外战友联系,让它带进狱中,是为了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反党新罪证”。但是,李井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同时,他们也没有失掉这个和狱外战友联系的机会。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女儿,作为回信,叫看管小组转。这封信被扣下来了,但也起了麻痹敌人的作用。张西挺同志把另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小条子)精细地缝在岷沙的鞋帮里。这封信是给宜宾战友王茂聚、郭林川等同志的,只有一句话:“只要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希望注意身体。”岷沙到了宜宾,急忙找到郭林川同志,把鞋子脱下来给他。这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里送出去的唯一没有受到检查的信,也是直接写给战友的、对方亲自收到的唯一的信。这封信把狱中狱外战友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造反更知北京近,斗争倍觉毛主席亲”。这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体会。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被李井泉关进秘密监狱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更是时时刻刻想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可以搜走我们的毛主席著作,但是,太阳的光辉是挡不住的,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心情是隔不

断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我们就增加了斗争的必胜信心。”所以，尽管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种种折磨和摧残，仍然那样乐观，那样信心百倍。当他们从看管人员的收音机里听到电台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派人来》这些革命歌曲时，也忘记了自己是四十岁左右的、平时又很少唱歌的人，兴奋得象小学生一样，跟着收音机一句一句的学，千遍万遍地放声歌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一唱这首歌，心里感到无限幸福，好象就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乘风破浪前进！”

有一次，凌晨四点多钟，刘结挺同志突然从床上摔下地来。原来，他又在梦中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入狱以后，他们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在梦中见到毛主席了。这一次，刘结挺同志又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伸出巨大而温暖的手要和他握手，他赶忙迎上前去……。他从地上起来，还久久地回想着这幸福的时刻，激动得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带着这种深厚的感情，他动笔写了想念毛主席的长诗《向往北京》。可恶的是，李井泉却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句当作反党材料。李井泉罪该万死！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唯一的学习材料，是一份经过多次斗争才准订阅的《人民日报》。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每天给他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舌，鼓舞着他们前进再前进。《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他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特别是报上刊登的每一幅毛主席的照片，每一则报道毛主席的活动的消息，每一次毛主席的讲话，他们都反复学反复看，越学越看越亲切。

一九六四年元旦的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十首诗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欣喜若狂，读啊，背啊，联系狱内狱外、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推敲啊，领会啊，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在那阴暗的监狱里，不时传来洪亮、有力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朗读毛主席诗词，听：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这不正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流的写照吗？！

“蚍蜉撼树谈何易。”

李井泉及其后台和爪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正是蚍蜉撼树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决心在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湖震荡风雷激”的时代，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扫除一切害人虫”，“敢教日月换新天”，攀登无限风光的险峰！

（三）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从斗争一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他们并肩战斗，和他们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从来

没有感到孤立过。就是在两年关押期中!也有许许多多战友在狱外坚持战斗。他们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大规模地给地富反坏右翻案时, 宜宾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就被李井泉的爪牙篡夺了, 整个宜宾一片白色恐怖。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揭发、控诉材料是寄不出去的。有一次, 张西挺同志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询问那一段时期先后寄给中央的十几份揭发李井泉的材料收到没有。不久, 在斗争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时候, 李井泉之流竟把这封信拿出来, 作为他们的又一“反党”罪证。

宜宾寄不出信件, 许多革命同志就冒着危险, 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带到自贡、内江、泸州等地去寄。有一份揭发材料, 是由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的一个亲戚坐火车带到内江, 然后步行了十几里路, 在一个小场上寄交的。另一份揭发材料, 是张西挺同志的母亲在被抄家时急中生智, 把材料缠在腰上带出来, 交给一个同志带出宜宾寄出的。

象这样的事, 不是一件两件, 不是一人两人。还有许多同志, 不仅帮助他们寄信, 还直接向中央控告李井泉。据张西挺同志回忆, 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的白色恐怖时间里, 先后给他们带信到外地去寄的达二三十人。这些人中, 有干部、工人、公社社员、学生、街道居民, 有相识的, 也有不相识的, 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同决心和坚决打倒李井泉的共同意志, 使革命同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四年夏天, 李井泉之流用药物使狱中的张西挺同志中毒, 头昏眼花, 周身痉挛, 在短时期内头发大部分脱落, 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李井泉乘人之危, 派了省委监委副书记带了十几个人闯进牢房, 把张西挺同志拉下来斗争了三天, 企图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骗取他们需要的口供。经过刘结挺同志的多次抗议, 李井泉才不得不把张西挺同志送入医院, 而她在医院里的一切行动都有人监视

从宜宾到成都学习的一个护士长, 在医院里偶然发现了张西挺同志, 她十分关心张西挺同志的病情, 但很快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觉了, 不许她再进张西挺的病房。一天, 护士长训练班的学员集体查病房, 她借给张西挺同志掖被子的机会, 摆脱监视, 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送到张西挺同志手中。上面写道: “我们相信你和刘结挺不是坏人, 我们心里明白。宜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你需要什么东西, 我想办法给你送来。”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 在李井泉欲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时刻, 在层层监视下的医院里, 出现这样的信, 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 多么难忘的战斗友谊啊! 张西挺同志现在谈到这件事还很激动, 她说: “只有在艰苦斗争中才能体会这种阶级感情的重量。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条, 它代表千千万万革命人民和李井泉斗争到底的决心。”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及和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许多同志, 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较长期的斗争, 要作好各种准备。特别是在李井泉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秘密关押起来以后, 大家认为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狱外的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商量, 决定作斗争十年到二十年的准备, 这一代斗不完, 下一代接着干! 直到彻底取得胜利为止。

为了适应长期斗争的需要, 大家决定要很好地整理揭发材料, 妥善地保存原始材料, 并在生活上节衣缩食, 把钱积聚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王茂聚同志和

爱人每月的收入不少，从这时起，他们就把大部分工资存入银行，一家六口每月生活费控制在四十元左右。连王茂聚同志抽了许多年的香烟也戒了。他说：“这是斗争的需要！”

王学明同志一家老小十口，每月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本来开支就比较紧，但他们把生活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到文化革命开展时，在银行已存了三百多元，他说：“为了国家不变颜色，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生活苦一点算什么！”

象这样的同志，在宜宾有一大批。去年八月，当王茂聚同志把历年节衣缩食的存款两千元从银行取出来，到北京告状时，把宜宾地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吓得要死，马上通知银行，冻结了和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人有联系的七十多人的存款，不许这些同志提取，并诬蔑说这是“反革命活动经费”。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经费”，是真真实实的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

李井泉之流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卑劣的伎俩都能够使出来，他们的面孔千变万化，手段阴险毒辣，但在革命者面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刚入狱，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就找生病住院的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谈话，动员他们“起义”，揭发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同志大怒，指着这个家伙的鼻子大骂。“你叫我出卖同志，办不到！”不久，省委监委一个副书记也找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谈话，更露骨地对他们说：“把问题推到刘结挺身上，也不是个人主义。”多么无耻。当然，他遭到的是严厉驳斥。刘、张、王、郭这个战斗的集体不仅没有被分化瓦解，反而在斗争的风暴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准了李井泉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党籍的报告。李井泉抓住这个机会大造舆论，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定这个案子是中央书记处中和彭德怀有关系的人批的，绝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以毛主席亲自批的，因此，他们的态度很鲜明：要告！一要告！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宜宾的战友对这一问题又是什么态度呢？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反复作了研究，也得出结论：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坚决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共同斗争到底！

那时候，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的战友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为了共商下一步斗争大计，住在医院里的王茂聚同志以到成都检查病情为名，设法找到了刘结挺同志。当时，李井泉不仅开除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党籍，还分别降了七级、八级，调刘结挺同志到一个边远县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两个老战友认为必须坚决抵制，决不领工资、不去报到，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李井泉的处理。再说，到了边远地区后，李井泉更容易控制，到北京找毛主席更加不方便。两人商定：一定要冲破重重阻力，不惜一切牺牲，到北京控告，向毛主席报告，誓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斗争到底！

（四）

一声霹雳惊天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了。

当时，还被李井泉软禁在成都罗家碾招待所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着报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日盼夜盼的这场反修斗

争,在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比我们设想的大大提前来到了。毛主席呵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知道我们这些年来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就一定会大大支持我们的。

“到北京去!到毛主席那里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回忆当时的心情说:那时,我们什么都不顾了,只有一个念头:离开成都,到北京去,越快越好。

“到北京去!”这是李井泉最怕的。为了阻止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到北京,他们不是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关进了私设的监狱吗?不是要把他们分远离北京更远的县里去工作吗?现在,不是又把他们软禁在这个招待所里吗?

面对眼前的处境,刘结挺和张西挺同志经过一番商量,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北京去。为了防止万一,张西挺同志留在成都作掩护,由刘结挺同志一人先去。走前,他们写好一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揣在刘结挺同志怀里,如果在半路遭到不幸,他们相信其他革命同志一定会把这封信转上去的。六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刘结挺同志想法摆脱了监视,翻墙、过河,坐上火车只身往北京去了。

在宜宾,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道战斗多年的王茂聚、郭林川等许多革命同志,也是一样的激动,他们从心底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茂聚,这个木工出身、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倾诉呵!自己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身体又多病,但他和郭林川同志一道,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地写呵!写呵!一直写了两个月,修改了八次,最后向中央写了将近四万字的报告。当他知道刘结挺同志已经到了北京,立即派他的女儿亲自把材料送给刘结挺同志,再转交给党中央。事后查明,这些材料都落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

不久,张西挺同志回到了宜宾,他们一起商量,决定王茂聚和李良同志再到北京去,其他同志则留在宜宾坚持斗争。王茂聚把他和郭林川同志写的揭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罪行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出来后,便于八月中旬,和李良同志先后离开了宜宾,到达西安再会合。他们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则由李良的弟弟秘密带往成都,在火车上转交给他们。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一开始,我们这些同志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李井泉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也十分敏感。他们深知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这样说过:“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是李井泉的导火线。”李井泉也说:“西南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宜宾是关键的关键。”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上也写着:“西南的问题,宜宾是突破口。”

是的,宜宾是突破口,是导火线,是关键的关键。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突破了,这个导火线一旦被点燃了,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抓住了,那么,上至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至他们的黑爪牙,一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统统都要完蛋了。他们在西南多年苦心经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就要宣告彻底破产了。宜宾问题的斗争为什么这样尖锐、激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这就是宜宾问题的实质所在。

就是四川问题的实质所在。”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

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批黑线上的“大人物”，什么彭真啦，彭德怀啦，李井泉啦，等等，不断来到成都、宜宾，互相勾结，密谋策划。千方百计要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置之死地，想方设法要把刚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妄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

还在去年三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他们炮制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刚刚出笼后到了成都，李井泉就指定他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向彭真汇报了刘结挺、张西挺的案件。人们不禁要问：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案件”一年以前已经处理，他们的党籍早已被开除，他们早已不掌权了，为什么此时此地还要拿他们的“案件”向他们的主子汇报呢？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更加慌了手脚，更加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运用还窃踞在他们手里的党、政、财、文大权，疯狂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镇压、大围剿。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串通一气，四处游说，大造特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刘结挺过去处理轻了，要重新揭发，要重新处理。”“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的问题很多，过去只处理了一个问题，而且他们不服，还在那里闹翻案，有必要组织人再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开。”“他们曾经作了‘小乱、中乱、大乱’的准备。所谓‘大乱’，就是‘刘结挺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当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后，他们吓得脸发黄，心发慌。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把他们（指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打成反革命，他们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他们白天黑夜，紧张地召开各种会议，阴谋策划进行疯狂反扑。为了先下手为强，他们通过自己的御用工具——原宜宾地委旧文革办公室，把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一封信和三十张大字报，加上按语，发给地、专、县、市级机关全体干部。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这三十张革命大字报说成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宣布“刘、张、王、郭”是“反党反革命集团”，是“宜宾地区最大的黑帮，最深的黑线，最危险的敌人。”要“彻底揭发、坚决打倒。”一时乌云滚滚，黑云压城，宜宾地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对于他们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所谓“反革命头头”刘结挺同志，更加恨之入骨。一方面，他们组织了大批的“专案”人员，拾出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刘结挺、张西挺“打击陷害”的十三个“冤案”，一再叮嘱要把其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郭一、右派分子李鹏等主要案件搞“扎实”，还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大量的所谓“其他问题”。单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所谓“作风部分”，就搞了三十多期大字报，并且印发给各个单位“学习”。这些所谓的“其他问题”，极尽造谣侮蔑、丑化之能事。比如他们造谣说：张西挺同志家里存有麻油，吃不完，生霉倒掉了。麻油会生霉？这确实是天下奇闻。可见这般资产阶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另一方面，由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亲自出面，组织庞大的所谓“缉拿团”，分别到成都、北京“追捕”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同志。“缉拿团”到了成都、北京，都得到了李井泉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分“关心”这件事，他通过他在中央接待站的爪牙，极力“安慰”“缉拿团”的人，说什么“待刘结挺把申诉材料写完后即要他回宜宾”，因此，他们十分“热情”接待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再催促他们赶快写材料。所以，李井泉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缉拿团”绝对服

从“中央”。所谓“中央”，就是指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成都，李井泉的一小撮同伙，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把刘结挺同志的照片传真到北京，送到边防；一会儿又打电话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老家，询问他们的下落，等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留在宜宾的同志，无一幸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家和在成都的住所，被他们一抄再抄，甚至连小孩的尿布都抄走了。更加命人气愤的是他们抄家时，把毛主席著作到处乱丢，任意践踏。他们恨不能把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斩尽杀绝。给张西挺同志看过病、打过针的医生、护士，教过他们小孩的老师，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警卫员的爱人，爱人的亲戚，等等，凡是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多少有过来往的人，都要遭到他们的怀疑、监视、直至抄家、斗争，甚至送进监狱。仅在宜宾一个地区，就有三百多名职工，被他们打成“张、王、郭反党集团”的成员、“爪牙”、“爪牙的爪牙”。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孩，因为学着大人，在街上说了一句“刘结挺是受迫害的好干部”，也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取消了上幼儿园的权利！心黑手毒，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事实正是这样。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革命同志的迫害越残酷，越使更多的革命群众看清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凶恶面目。在许许多多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斗争信念。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同志冒着坐牢、被斗、被抄家的危险，响亮地提出：敢不敢为刘、张、王、郭翻案，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很多同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走在斗争最前列冲锋陷阵的，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直捣李家王朝。打得它落花流水，打得它人仰马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正是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处在斗争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是红卫兵小将帮助他们找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没有住的，他们找，没有吃的，他们安排。刻印传单，搜集材料，许多红卫兵小将熬红了眼，跑酸了腿。不少红卫兵因此被无情斗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关进了监狱。

我们在宜宾，就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革命组织名字前面都要加上“红旗”两个字，或者干脆叫做“红旗”派。这是什么原因？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说：原来一中有个红旗红卫兵战斗组织，他们成立以来，就遵循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集中火力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混入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在李井泉之流掀起的“二月黑风”中，竟丧心病狂地宣布这个红卫兵组织为“反动”组织，把一些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什么“罪名”呢？仅仅一条，就是他们坚决要为所谓的“刘、张、王、郭反党集团”翻案。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革命的红卫兵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敌人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办公室被砸了，算什么？到街上搭起个棚子照样干。你不准贴大字报，偏要贴。早上撕了，晚上贴；黑夜撕了，白天贴。你不准用“红旗”的名字吗？休想！什么“红旗漫卷”、“红旗如画”，越用越多。

你要抓吗?好吧!四五十人一起,要抓就一齐抓。他们问:“谁是头头?”小将们齐声回答:“我们全都是。”弄得那些家伙瞠目结舌,难以对付。

革命小将们这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教育和鼓舞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他们以红旗战士为榜样,以当一名红旗战士为荣。大家自豪地说:“红旗战士抓不完,吓不倒,一杆红旗倒下了,千万杆红旗立起来。”就这样,宜宾城内红旗林立,红旗招展!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李井泉之流这批蠢人。这些年来,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李井泉之流的“庞然大物”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全国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的大力支持下,由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刘结挺冤案,党中央亲自平反了,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接见了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对他们的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们“是坚贞不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事实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尽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猖獗一时,尽管斗争有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在访问结束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十分谦虚地说:我们只不过起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应该起的作用。成绩和功劳完全归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归于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宜宾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我们四川的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李井泉之流,他们还不是“死老虎”,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四川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坚强阵地!

(原载 1967 年 9 月 2 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三、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一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烂廉罗站”,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假夺权”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所谓的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一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

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责任吗？后来一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将我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我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悲愤的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军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抗议生活不好，他们表示立即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54军的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是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学，105那个组织也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听曾辉平介绍以后，我愤怒无比，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抓我。他还说“你不要直接回家，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曾辉平走后，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接我的华沙车，直接开到54军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前，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上”。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先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这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你去，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个军用三轮摩托车进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重庆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她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没有讲完耿志刚就追着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

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也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是不是走资派，错误要不要改，段大明连连点头说“重罪在身，当然要改。”（有关重庆的材料引自《黄廉访谈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
〔时间：1967年5月13日晚10：30到14日凌晨；地点：人大大会堂西厅。
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萧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梁兴初、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

会议开始，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康生同志：（风趣地说）听起来都是一致的嘛！

总理：没有准备，听听两方面的意见，先听反革联会方面同志的意见。

代表们首先控诉革联会镇压山城造反派血腥罪行，当谈到革联会搞“三凑合”、“拉郎配”时，总理笑弯了腰。在汇报过程中，康生同志也边听边阅我们上报材料，突然指着一处对总理、伯达同志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伯达同志点了点头。

以后，对方开始发言。

总理问：“你说叫周家喻吗？听说你来了很久了吧？”

周答：四月廿五日来的。

总理：你们不要再来人罗。

答：我们已经回去人了。

总理：回去是好事嘛。听说你们（革联会）给八·一兵团发枪，发了的要收回来。

周家喻（重庆大学“8·15”负责人）比较轻浮，由于周家喻的空话连篇，空洞无物，大声叫嚷。总理说（很不在意地）：你声音大把麦克风搁下讲嘛，甚至在伯达面前讲起“社论”来了。总理再三催促，“不要讲得太多！真罗嗦！快点！快点！”后来干脆停止了发言，另外指定了一位。

总理：我对李井泉很感兴趣，你们把李井泉关在重大为什么不拉出来斗？说说抓到你们那里去的情况。

8·15成员辩解说，他们将李井泉送到贵州去斗过。当场被我代表以铁的事实，驳得哑口无言坐了下去。当接着王某某发言时，首长各看各的材料。新华社一个记者起立准备为其辩护。

总理：你参加革联会了吗？

记者答：我是支持他们的。

接着总理挥挥手，制止他发言。

此时总理秘书问砸派某某某同志要发言提纲，说：“总理要看看”。因没有准备，便将五月七日的重庆来电手抄底稿送上。手稿虽然较乱总理仍看得很细致，并在上面划线。

我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8·15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总理要他当众辟谣。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会议进行中，代表高呼口号“打倒辛易亏”。辛两

次站起来低着头。

总理：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05.16；中发〔67〕159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在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附：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如下：

一，以任白戈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受到李井泉的支持，庇护，他们互相勾结，在重庆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追随李井泉坚持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证明，任白戈早已堕落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意见，应当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重庆警备区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在二，三月份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决定，还是出了一些差错。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慎重处理争端，而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三，我们认为，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驻渝部队的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革命派内部之间的团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部，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促使各革命组织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四，我们建议成立重庆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当吸收革命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至于哪些单位搞军管，哪些单位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应当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批准。军管单位的军管代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做好革命派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大方向一致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五，要帮助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六，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学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有关社论。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搞好“拥军，爱民”作；正确的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在革命左派内部，正确的对待不同意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七，“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立即建立重庆市的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成员，应当征求各革命组织的意见。在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成立的同时，迅速作出进行工作的计划，把工，农业生产抓起来。坚持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工农业生产的思想灵魂，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使精神变物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八，解放军，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对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大多数群众觉悟过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者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革命派

应当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界限打击报复。一切群众组织，都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张国华，梁兴初
刘结挺，张西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

四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记录

〔时间：1967年5月16日凌晨1：30—3：33；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有：总理、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五十四军首长谢家祥、白斌副军长，蓝亦农副政委也在场。〕

总理：

对不住，你们来了好久了，今天五月十六日，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通知发出一周年，大家都在庆祝。

四川的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都先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先听听八·一五观点的意见。请八一兵团张益同志谈谈。

（八一兵团张益发言后，江陵厂军工造反团一代表发言说：革联会成立以来，对抓革命促生产不是起了积极作用，而是起了消极作用。）

总理：

你们反革联会的写来了十六条意见，我们看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来了。……我来读一下《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稍加解释。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有五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第一、重庆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和群众中，都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在军队内和群众中进行充分揭露、批判。这就解决了矛头指向谁的问题。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总还是革命组织，既然都是革命组织，斗争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都学了《红旗》的文章了。从全国来讲，斗争矛头应指向刘、邓；从四川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从重庆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这是大方向。斗争中要考验锻炼你们，要明确大方向。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

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驻川野战军(五十四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六二年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是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队。今年,党和毛主席,下给了部队很大的光荣任务,任务非常重,“三支两军”的任务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五十四军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但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因此,他们错误性质是不同的。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农、支工很努力,还担当了部分军管任务,还有军训试点也取得一定经验。我在这里替五十四军讲一句,五十四军被李井泉割裂得非常分散,从中印边境回来就分了四十多个地方,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我报告了主席,主席也没想到。这是不许可的。李井泉把他们分散住在四十多处,李井泉有意识把正规军住分散了,地方好影响他。另外,地方独立团扩大,这是李的坏注意。五十四军处在这种很不利的环境下,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复辟,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反运动,重庆受了成都的影响。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开片会,布置镇反,五十四军没有完全顶住。捕人就捕多了。当然这不是多少问题,问题是不应捕不应该捕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搞四大,发动群众,对有过度行为的人,应帮助提高他,为什么要当成反革命?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成都军区犯的,重庆受了影响。重庆与成都要区分,重庆与成都不同。此外,在处理不同意见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是参加了革联会的,交院九·一五、西师八·三一不赞成夺权,有不同意见,对革联会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在当时军队应考虑,却支持了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把部分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错误。

这种错误五十四军领导已开始认真的改正,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重庆情况和成都不同。五月四日,五十四军电报提出:只要主席说我们支左支持错了,我们就立即改正。原来没有想到这点,没有想到支持了一方,而没有支持另一方。中央指出后,恍然大悟,正在认真地改。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成绩还是显著的,错误已指出了,应让解放军有改正的机会,错捕了就放。五十四军在重庆人数不多,任务又重,解放军多少年又没作群众工作了,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只要坚决改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解放军是具有伟大光荣传统的,最受群众信赖的,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你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在文件中避开革联会,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联会,争论就没有结果的,一月革命以来,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重庆大联合没有联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对。开始没有意识到“三结合”,“三结合”是后来才发展的。革联会吸收几个人(过去负责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所以有争论。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摇身一变。尤其体现

革联会是野战军领导的。解放军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了权对另一派压制，形成对立，形成二、三月的紧张。说革联会对了，但条件不成熟；说不对，那时又做什么？革联会是军队领导的、支持的。解决安徽、江苏问题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重庆不必这样作。江苏改为军管，安徽最后也军管，文件上没写。如果争论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这样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们应向前看，在四川作出表率，就是由军队领导人出面组织临时筹备小组，向前进，促进其联合，把争论停止下来，再要争论就会不能前进，影响生产任务，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同意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筹备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争论就停止下来，这点很重要。如果同意中央决定，回去就不要吵这个了，甚至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五十四军政委）？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筹备小组由蓝亦农同志作主任（组长），白斌作副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不只一方。同时有其他适当干部。干部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再定。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市委书记，是“革联”夺权后的“三结合”对象）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找适当的负责人参加。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重庆筹备小组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把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起来。如象上海建立后就发紧急十条。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当然，一个革命组织宣布另一个革命组织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也要取消。错捕的要放，但现行反革命不在此例。

凡被错打的要恢复名誉。对立现象要解除。受压制的一方，前次让他们先发言，先出出气。现在你们（指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要反过来压他们，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会犯错误。

夺权的一方要多负一些责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错误要大些，你们是当权派嘛！过去“八·一五”压了“八·三一”，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另外的一方也要自我批评，错误只是小一些，只有通过大批判运动才会大联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通过整风，自我批评，就可以眼睛向前，而不是向后，希望你们在大联合方面作个典型。

“产业军”是保守的，头头还有坏的。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一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五月六日事件中，他们都在一三二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

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八·一五”，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如李井泉关在你们学校，总给人有口实。这是过去的事，不深究了。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八·一五”先做自我批评，另一方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重庆组织作出模范来。你们送给我的关于武斗情况的照片、材料都是指责对方的，我们

看后心里不好过。十四、十五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后五十四军军队才隔开了。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

即使过去有一些事实没弄清楚，组织小组调查，把坏人抓出后也不要武斗。即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要抓去放在学校。你们重大八·一五能把李井泉管起来还很不容易，是因为当了权。在北京还不行。北京开始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哪一个红卫兵也不好看管，像个刺猬，交给了卫戍区。

不要搞打、砸、抢，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批臭，不仅要把威风打下，还要触及灵魂。当然，对煽动武斗的坏人要处理。

这个问题，我说多一点，多寄托希望在你们身上。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我们委托军队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川问题决定在重庆原则适用，但是具体意见要按照五项规定办。我们相信干部总会出来“亮相”的，集中力量斗争任白戈一小撮及各单位，也有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条告诉了我们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以刘、邓为代表实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同伙，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同伙，所以无论在军内，群众中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罪恶都要充分的批判揭露，这点要充分注意。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联会的，会后谈文化革命中的问题，都要看在反对刘、邓路线作了些什么。

两个编辑部的文章，要害是打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你们研究得如何，掌握得如何？在北京，我问了一下，有的学校，特别是打内战的学校，来不及去学习。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彻底揭露。李井泉、任白戈作了很多罪恶，在报纸上要彻底揭露。

同志们知道五月十六日是什么日子吗？一年前，党内发了《通知》这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历史意义的通知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指十六日）马路上结队游行，庆祝文革小组成立。一年的工作，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我想同志们要了解第一段，就要大大加强学习，解放军同志也不例外。

第二个问题更是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

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领导干部。这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语录上也有：没有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能进行到今天这样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哪怕哪个人，哪件事出了错误，但总的原则不能动摇。

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话，五十四军三支两军工作，看到他们的成绩，实事求是地看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工作是有成绩的，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不是支持了右派、保守派。错误缺点，首先在于没有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这种方向路线错误，主要不在军内，而在刘、邓、李，在四川以李井泉为首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八·一五同志谈大方向，没有谈到这个大方向，刘、邓路线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前段也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红卫兵部队、重庆八·一五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犯过没犯过错误。有些人有些怨言，他们是革命的受到镇压，受了害，八·一五同志也间接受了害，被蒙蔽了，要有自我批评，现在一些组织受镇压，而另一些没有，甚至盲目支持镇反，但不能因此说八·一五不是革命组织，这样说也是错误的。受镇压的不满意，不要因为平了反，反过来打击报复，骄傲，又去压八·一五，这样你们更要更要犯错误，两方面同志都应该吸取教训，军队同志支持的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缺点是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杨刚，但他刚认识了错误就改。开始我就感到五十四军总比成都军区认识错误早些快一些。不能动摇对人民解放军的信任。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都很有成绩的，这样的军队该不该拥护？（众：应该）

第三、第四，总理解释很清楚了。革命组织之间如何团结的问题，大家都要进行整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记得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吗？这是根据主席语言写的通知，主席讲，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训，比不训大不一样，军训，可以跟解放军学许多好的经验，所以提出五种学习。你们是大学生，我考考你们，五种学习是学什么？“八·一五”不是最拥护解放军吗？周家喻讲讲。（周：弄不大清楚）考住了吧！（笑）忙于打内战，对这些就不注意了。（反对派笑）你们不要笑，考你，你也一样。五种学习，一学政治，二学军事，三学四个第一，四学三八作风，五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有那么多优良传统，到底要不要学？要学。

你们那里还没军训吧（有四个学校开始了）要学十五个文件，你们学得怎样？

（总理：建院不是军训了吗？沈志清，你学得怎样？沈答：开始还好，以后忙于打内战，学不下去了。）

说的实话，好。同学这话很深刻：忙于打内战、没有学，所以要整风，加强自我批评。

不用考你们了，十五个文件题目可能都不知道。（总理：“老三篇”还学一些吧？）忙于打内战，没有武器不是混战一场吗？要自我批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有一条要自我批评。看看五条，很有好处。打内战，你们看第三条怎么说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不是和稀泥，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打倒。第四条讲民主集中，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现在年青人批评人马列主义不少，批评自己马列主义不多，这是通病。要整风、整思想、整组织，以理服人，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四川打得厉害，是惨

痛的经验。

第五、要把中央军委八条和十条结合起来，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大联合，“三结合”，把斗批改任务完成。今天晚上广播了明天就登五月十六日通知，希望同志们好好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希望大家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总理、康生同志讲完话以后，五十四军的代表、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同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黄廉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意见。周家喻同志还说，要很快返回重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进行工作，对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前一段出现些缺点错误，愿意听取其他革命组织的意见，诚恳接受批评。）

（周家喻表态后）

康生：我有个问题问周家喻同志，你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话很好。“产业军”你敢去做工作吗？（周答：敢）要靠说服，教育，分化。对保守派要有策略，艰苦耐心的工作。主席这段话在去年八月三十一日提出，今年三月七日又提出，到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懂得，说解放军和稀泥。你讲得很好，要实践。你去做“产业军”工作，开始还有可能挨打，还会有人说你右倾呢！好多话都讲了。这种革命劲好但却没有很好的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今后要看你们的实践。（周家喻：今后一定做到。）不要怕人说右倾。

总理：我问周家喻同志第二个问题，你说愿意接受其他革命组织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容易。你面对着“八·三一”、“九·一五”给你提意见，你有没有勇气听？（周答：有。）希望你带头做模范。不要一听就说“扯谎”，“造谣”。以后要有这样精神。今后，你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重庆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康生：总理讲的不光是对重大八·一五，对你们（指反革联派）也适合。

总理：我对重庆是很有感情的，在那里同反动派斗争了七、八年。过去重庆是雾重庆，现在重庆是光明的重庆，一字不改地传回去，希望你们快快回去，杀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吴庆举：总理，今天发生了一件严重违背十六条的事件，今天下午首都红代会在火车站抢去了我们八箱揭发批判李井泉的材料，每集四册，共一万五千册，还有罗文斌的材料。这些材料被他们污蔑为“黑材料”。请看这是他们抢走材料的声明。（随手递给总理）

总理：红代会抢去的材料，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副总理解决。（把红代会的抢材料的混蛋声明转给杨成武同志）

杨成武同志问吴庆举：材料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什么要求？

吴庆举：坚决要求追回，红代会抢我们的材料已不止一次了。

（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学习五十四军做群众组织工作的通知

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

54 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严重的，则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2007 年 10 月 31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2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七章（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下午三点三十三分至六点十五分，地点：北师大井冈山图书馆。参加者：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各大队干部等一百余人。〕

首先谭厚兰同志把《教育革命》杂志递给伯达同志看。

陈伯达：这可见你们不严肃，你们办一个刊物，必须很严肃，每一个地方都不准错，每一个标点都不准错。教育人的要首先受教育，毛主席说，先做群众的学生，就是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这不是宣言的吧！总结群众的经验，这不是宣言的吧！（是实践），看来你们的水平不够高呀……你们研究过教育革命这个问题吗？研究过吗？

戚本禹：可不是研究吗？写了这么多文章。

陈伯达：哪里有很多文章，不算多嘛！

同学：才开始搞，前些日子光在外头大哄大嗡。

陈伯达：你们应当严肃一点。冷静一点研究，这个东西是百年大计。总之，各个社会有各个社会的经济制度，产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是与社会制度和那个时候的经济制度相呼应的，与那个社会的阶级相呼应的，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就算上层建筑吧，算上层建筑，是不是它为那个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现在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嘛！我们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很有些改革的，有些改革后的经验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学校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对不对？（谭：五八年教育革命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对，那个时候，还搞过革命，后来又没搞下去，停了。我这几天看了北京

大学编的一本《哲学文学史》，那本文学史用多少时间搞出来的，没有多少时间吧？我现在建议你们搞两本书，可以不可以，编它两本书，写它两本书？（可以。）几个月的功夫就可以编成一本书。一本是《世界教育发展史》，各个阶级、各个时期、各个社会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包括后来苏联的。苏联开始的时候，对教育制度是有些改革的，是比较主动，活泼的，过了一个时期，又停顿下来了，实际上基本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沙皇时代的教育制度，五分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还有一本是《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可以不可以，书不要太长、太厚，否则看的人就不多了。写的生动活泼一点，要人家看得懂。经过文化大革命，大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多了一点吧？不要象这个记录稿。（指伯达同志在北大关于教改的座谈记录稿）糊里糊涂地就登出来了，不管它是不是对的……。

还有你们这个师范学校本身应该怎么样？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过去没有这种师范学校，封建统治时代没有什么师范学校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的，中国学校制度基本上是搬外国的，搬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以后又掺杂了一些苏联的，苏联基本上也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下一代嘛！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教育制度不能再让资产阶级那一套来统治我们学校了，要产生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制度。

陈伯达：马列主义当然批不垮罗，马列主义要发展嘛，如果停止了马列主义是不行的。这个教育制度，马列主义还没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全解决了你们师范大学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嘛，是不是？教育制度，世界的各个社会制度的教育史，中国的教育史，各个时候的，可以不可以搞这两本书。不然你们闲着没事做，这也是斗批改的一部分嘛！

戚本禹：你一说，他们会马上组织人搞的，没问题。

陈伯达：我的建议也不一定对，你们考虑考虑，一定要经过独立思考。

戚本禹：他这个书有用处，他编了以后教学还用。

陈伯达：师范大学应当研究这个东西嘛！

谭：有专门搞的，我们有个教育系。

陈伯达：教育系。应当不只教育系的工作，教育系比较窄（谭：过去都是苏修的那一套东西）应当是宽一点，各个系都吸收，这里面包括小学、中学、大学

都要研究，小学和中学有些差别，中学和大学也有些差别，是不是？你们这里研究过没有？

（伯达同志看阅《教育革命》并作了指示）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是根本上的问题。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席说不但学文，这个文包括很宽，学做工、学做农、学军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学要改革，资产阶级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让戚本禹同志念主席五·七指示中有关学生的一段），这就是最高指示嘛！这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意见。

还有就是教学方法怎么搞，究竟是一个先生讲，学生听，这个方法，还是怎么样搞？过去不是有一句话，“教学相长”嘛，又当学生，又当先生，又当先生，又当学生，是不是可以这样。但是小学就有点不同，中学是不是还要有人管，也不一定采取过去人管的方法（戚本禹：启发式的）是要启发式的，入学年龄，比如说现在七岁才开始读书：（谭：五岁就可以开始）七岁实际上有的就是八岁了，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读书，那是硬灌，填鸭式的。提早到什么时候合适，你们先研究一下吧！

过去中国读书可能有的五岁、六岁、七岁，五岁读书，读私塾，有的可活到七、八十岁。

谭：发蒙越小越好，发蒙大了不好，六岁就可以念书。

陈伯达：五岁，有的五岁就可以的，你得看什么时候生的，有上半年，下半年生的就不一样。

谭：过去限制的太死了，差一个月也不行。

陈伯达：那我看这是（谭：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他这个不仅是教条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过去中国一般读书的人五岁上学，五岁时读《论语》，读孔子的东西。孔子有三千弟子，三千弟子，他一个人怎么能教这么多啊！我看他不是上课的方法，无事跟大家聊聊天，启发启发，可能很有启发性的。一个问题跟一个学生说一样的话，跟另外一个学生说另一样的话，看对象教学。

根据十七年的经验，我们教育制度应当怎样革命，你们可以讨论。这个杂志（指《教育革命》）这一期不算了吧！另外再搞一个创刊号吧！……这个东西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讨论，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提到，不要只一个人说话就算了，只谭厚兰说话就算了，她是你们的权威是不是？

谭谦虚地说：不是。

戚本禹：勤务员。

陈伯达：无产阶级的权威？（谭：勤务员）勤务员也可以当权威，有权威的勤务员，有非权威的勤务员是不是，完全没有权威也不行啊！你们读过《论权威》这篇文章吧！（读过！）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权威，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学术权威也是这样：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有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是不是？需要说的我都说完了（对戚本禹）你看怎么样？（戚：大家说）。

还有一本书，等文章都发表了，搞一个讨论集，教学制度的讨论集，一个集的讨论不完可以分成几期，分成几集，第一集、第二集就这样吧，给你们出了这么多题，你们就有工作可做了嘛！是不是就不一定要武斗了吧！……

戚本禹：我没有学问。大家讲吧，伯达同志来嘛，想听听教育改革方面的意见，有什么想法。你们这里专管教育，师范大学，都是老师。刚才讲好为人师。（笑）都是想做老师，一出来就是老师。刚才有人说是培养“工作组”的，过去老师就是工作组，过去老师在学校里专门整学生，培养工作组的大学，主席讲了嘛实行突然袭击。

（同学提出今后不要师范了。）

陈伯达：也是师范学校的，还当过大学教员……解放前中国的大学教授都是骗人的，学生一般都不上课，上谭也不管你教什么，也不听你的，做样子的，先生瞎说一通，就下课了，无非是拿几个钱。现在可以改变一个方法，不采用教师制度，可以不可以。

戚本禹：不要教师，大家讨论讨论吧！

陈伯达：小学还是要，辅导员就可以嘛。这个你们讨论，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不要搞成一派，要有两派。……

陈伯达：有很多毒草，你们烧掉了就没有批判对象了，是不是？毒草要批判啊！

戚本禹：现在毒草都不准借，你们图书馆准借吗？（借）

陈伯达：这个没必要，要提倡积极，要提倡无产阶级的积极性。现在要搞教育制度发展史，没有参考书不行吧！要从毒草中来看出问题啊！

谭：我们把刘少奇以前发表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可以借。

陈伯达：你们要编书，没有这些不行啊，我看可以编两部，一种编两部，三部也可以嘛，不同观点的，各写各的，百花齐放。有的可以写短文在报纸上发表，一二百字，二三千字也可以，不要都搞大文章五千字就长得不得了了。不一定写得很长。

（天文系同学发言，提天文系要不要，和天文系要不要在师范学校办的问题。）

陈伯达：天文学的发展跟农业的发展也相联系的，将来工业的发展跟天文学也还有很大的联系。发展到现在，工业的发展与天文学很有关系的，过去的农业的发展，就是跟天文学的发展是有关系的。科学的革命，自然科学的革命，首先是从天文学革命开始的。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太阳转的，这样就起了一个大革命。过去的人们，都认为太阳是绕地球转的。天文学不能说与国际旅行没有关系，看怎么搞的问题，将来是很重要的，将来要打通宇宙的航行道路。

（同学：师范大学要不要办一个天文系？问题是在哪儿办？）

陈伯达：可以研究嘛，师范大学它要搞一个天文系也可以嘛。首先是要不要师范大学？

同学：实际上其他重点大学也培养教师。

陈伯达：那也是嘛，农村教师教了那么多年，不一定是师范大学的……。

谭：师范大学没有什么必要，师范大学毕业后有的当干部，有的干别的去，不一定完全当教师。

戚本禹：你们学校毕业有多少人当教员，多少改行？（众：好多都改行。）

戚本禹：占多少比例？调查一下。

（同学：生化专业三分之二改行，地理、历史大部分都改行。）

陈伯达：过去师范学校的学生，革命的相当多。过去北京流传着“北大老，师大穷；清华……”（戚插说：清华洋。）北京师范大学穷光蛋多，比较穷的人多，当然现在是统一分配的罗。过去的革命性是比较……。

（谭：革命性强一点。）

陈伯达：可也不一定。过去师范大学在几次革命运动中并不是很突出的。（念条子：将来地理系不要了，要斗、批、散。）哎呀！斗批散很容易呀！地理系怎么说不能够参加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呢？

戚本禹：这里说是指教学内容，教学改革问题，而不是要取消。

陈伯达：学地理很重要，不管学哪一行，都要懂一点地理知识。

戚本禹：主席的地理很熟悉。

陈伯达：是啊，你不管学哪一行，学教书也罢，学工也罢，学农也罢，打仗也罢，总之地理得学，所以要看用处。怎么教是个问题。

戚本禹：时间不一定那么长，学好几年。

陈伯达：学很短很短就够了。

戚本禹：中学学生以后还要学地理，还得有教员吧，地理系恐怕还得要。

谭：地理也可以自己看得懂。

戚本禹：小学你总还得教吧！

陈伯达：我看这样吧，各个教室、图书室，都放有大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天文图。究竟有多少大的星星，现在已经发现了的，小的星星已经知道了的，都可以注出来，有哪些星座……。

体育系代表发言说：他们委托我问中央首长体育系怎么改？

陈伯达：我们问你们，提出问题就讨论，研究一下，你们讨论教员怎么办？要不要，包括要不要功课，怎么教学，怎么学法，学生和先生的相互关系，这些都要讨论。怎么学，怎么教，教员的作用是什么作用？要真正来一个革命。

戚本禹：办新式的无产阶级学校不是简单的事。

（周跃文同志代表理科几个系发言向首长反映情况，李少明同志代表文科几个系向首长反映情况。）

陈伯达：你教中文的，你今年多大岁数？

李：四十岁了。

陈伯达：你什么时候毕业的？

李：我是五零年毕业的。

陈伯达：教什么，教中国文学吗？

李：现代文学。

陈伯达：现代文学，课本给我看看，好不好？

李：师范大学到底要不要？

陈伯达：你们讨论一下嘛！

（李少明提了文科教改有关的问题请陈伯达和戚本禹同志解答。）

陈伯达：这个师范学校要不要，要是保存哪些系。这个文科不单是师范学校，还包括其他学校，其他的大学罗！文科要不要，要……（这一句不清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人，应当是能手，要有天文知识，要有地理知识，要有教学知识。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应该是这样的。要能够当教员，能够当工人，能够当农民，我这是瞎说的罗！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师范大学究竟要不要，可以经过你们自己讨论。文科要不要，要，要哪些系？如果要，教学应当怎样改革？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人哪，要有文化的，还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懂得天文的，他一定有普通的天文知识，过去这个船夫，帆船，不是汽船，船上的水手，他懂得天文，懂得地理，……没有天文知识，这个船万一碰到什么自然灾害，还不行呀！在大风的时候，懂得天文知识，就晓得往哪里走呀！社会主义社会的比较完全的工人，他能说能算，同时他又有各种的知识，各方面必须的知识，有普通的知识，天文、地理的普通知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农民、工人、共产主义社会的农民、工人都要这样。

现在我们的这些学生都有点儿可怜的知识罗，……在学校里面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所以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必须打破，文科必须要大革命。文科是学文的嘛，一般大都要学的。理科、工科究竟怎么搞法，都要经过研究，经过讨论。师范大学的确是一个教学革命阵地，你们首先出版了这个刊物，可是没出版好。……教育革命，你们学生来回答，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不是全部的能回答，要能够回答一些问题。

（历史系一同学发言说：历史系比较难搞。）

陈伯达：历史系最好搞罗！……（历史系同学发言后）过去这个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剥削阶级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学历史，应当是颠倒过来了，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没有劳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家都去劳动，停止劳动，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养活的，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没有劳动，没有人做工，没有人种庄稼，人怎么能活下来呀。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国过去的历史，一百多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农民的，有两千多年，农民战争的历史，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陈胜、吴广这大概都是劳动人民，揭竿而起嘛，把当时秦朝打垮了嘛，只几个月功夫嘛。农民战争，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劳动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完全被统治阶级垄断的，应该知道统治阶级的历史，

对统治阶级剥削群众的历史也应该知道, 首先要懂得这些阶级斗争史。……教学的问题也要研究, ……要不要这个系, 这个系是个什么样的系, 历史系要不要, 需要不需要……

历史的真象被歪曲了, 被剥削阶级歪曲了, 被剥削阶级的御用学者歪曲了(以翦伯赞为首的学者)。现在要恢复历史的真面貌, 过去中国的历史实事, 被颠倒了历史要重新翻过来, 这是戚本禹同志作的工作嘛, 他现在还想作, 我就没有这个勇气了, 我现在已经不行了。(众笑)不是说没有这个勇气, 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修正一下, 随时修正错误, 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了。勇气还是有的, 只靠勇气也不行……我应该拜戚本禹同志为师, 他能够收我这个徒弟, 我很欢迎。(戚: 你把我放在完全被动的地位。)被颠倒的历史应当颠倒过来嘛, 年纪大的人应该拜年纪轻的做先生, 这话对不对?(戚: 那你是先生啦, 大家都是大人物, 你把历史颠倒了嘛。)我应该拜同学做先生, 我这样才能前进, 才能越来越进步。

今天不一定再谈了。提一个意见。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七千多)七千多人, 几千个头脑, 集合在一起, 集中起来, 就有无穷大的智慧, 可以先开一些座谈会, 交换交换意见, 作长的比较系统的发言, 允许几种不同的意见发言, 也允许错误的意见发表嘛! 这样搞, 就慢慢搞一个头绪来了。今天我们是来请教的, 不是解决问题的。……我们说了就算了, 不行的, 你们现在应到各中小学去, 到各大学去, 互相交换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
我国青年满怀着革命的豪情,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 欢庆自己战斗的节日——五四青年节。

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 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始终坚持同工农相结合的大方向。一九三九年, 毛主席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发表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两篇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作, 就是对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高度的概括。毛主席指出: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 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以

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青年运动中的逆流，为我国革命的青年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然而，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毛主席的两篇光辉著作刚刚发表后两个月，就抛出他的大毒草《修养》，要青年离开当时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又一再强调了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然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伙同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我们的文化和教育阵地，千方百计地推行美帝和苏修的一套教育“理论”和制度，妄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十七年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显得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年青的革命闯将，是在党和毛主席长期培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崭新的一代。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革命青年的光荣传统，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冲决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罗网，朝着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前进。大批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下厂下乡，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干革命。他们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中，不仅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夺权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在自己思想的改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

我们必须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在青年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对于一个革命的青年来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要一辈子坚持奋斗的革命方向，而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知识青年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锻炼改造自己，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坚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目前某些革命群众组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原因正在于这些同志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他们还需要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经受艰苦的磨炼，使自己真正同工农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都必须时刻记住劳动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地向劳动人民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要学习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习他们“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伟大气魄，热情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和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勤劳朴实的作风；学习他们对敌狠、对己和的革命品质；学习他们高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学习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革命风格。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来自工农群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在人民解放军身上，体现了工农群众的优秀品质。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青少年同工农群众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就要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永远和人民解放军肩并肩，心连心。

在当前，对于广大革命师生来说，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青年运动的革命方向，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逐步完成各个学校的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把这些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领域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校从根本上得到改造；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千百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我们的学校成为“抗大”那样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奋勇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毛主席对军训最关心，他把这事当作最重大的事，去年 12·31 的通知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全国，这是一个大事情，先从大学开始，然后到中学（念关于军训的通知）这样可以向解放军学习。五学习：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了以后可以加强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三·七”指示，“十二、三十一”通知看可能是看了，但也可能都忘了，特别这 15 个文件要用很大的脑筋，尤其是后面《共产党宣言》等。譬如，我出这么个题目：你们说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在这三个组成部队中，哪一部分创造了发展了？我把这个题目告诉你们，以后总要考你们这个题目。为什么说毛主席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十一中全会公报第三部分就讲这个问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有个教授汤姆嘛，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四个来源，你看这个问题怎么样？我们立刻又不敢作结论，他认为毛主席继承发扬了中国古典哲学，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看看毛主席在哲学方面发展没有发展，如果发展了，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发展没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这三个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不能。有人说：军事、寻常、文化革命，这么一搞就是五个组成部分了，到底几个组成部分，总之是发展了。这个问题很大，弄清这个问题对当前批判刘邓路线，国际修正主义是大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时间：1967 年 5 月 11 日晚 19：00—20：40；地点：人大附中〕

我在人大开了一次会，会上附中红卫兵要求我来。现在我来了，想听听你们各派的看法。

（革命师生发言略）

情况不清楚，我不想多讲，不要录音，一个学校的情况，不一定适合普遍情况。目前形势很好吧？是吧？形势很好，也有缺点。大批判在全国已进入高潮，这是大决战，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大决战，现在大批判中，全国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思想水平提到从来没有的高度，咱们的国家从解放以来，已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从来没有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我们红卫兵在学校里学政治，上了六年五年，读了很多书吧？群众什么时候贴大字报？（答：六月）现在还不到六月吧？现在是五月十一吧？究竟是这一年学的东西多，还是前几年学的多，这一年学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当然这里面有的学的不好，但是学到了许多毛泽东思想。修养这个东西，这个黑修养。以前在政治课上读不读呀？清华大学两个同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一个叫两个红卫兵，他不是学什么马克思阶级斗争以后。两个红卫兵写的文章，水平是很高的，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全国各地都转载了。象他这样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写不出来的。我经常接到你们的来信，你们办了个小报，那些文章写的很好，第六期小报。写的还是不错的，这些文章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写不出来的。你们有很多同志的发言、讲话、讲的很好，那么这些讲话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讲不出来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记得有些中学生有不少打电话都不会打，打电话都不会。现在讲话到处争论得面红耳赤，拿主席思想来驳斥对方，应用地极端慢，用于阶级斗争。但是他学了，他读了，但会慢慢地在运用的过程中，就会用好的。

批判黑修养，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批判过程里面，革命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就是说在我们国家里恐怕是没有的高度，我们的工农兵的思想水平，他对待科学和社会科学掌握的水平，拿整个世界来说，比较起来说那是最高的。美国的大学里的学生，社会科学家，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我看比不上你们，红卫兵。你们不信，来辩论辩论。恐怕这些家们，我看他们辩论不过你们，这是很大的力量，我们靠什么战胜修正主义，就靠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思想觉悟，靠他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如果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了，那么对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就有可能不变颜色。将来谁搞修正主义，当官做老爷，要压迫群众，要搞新的剥削阶级，要搞这个东西，那么，红卫兵战士，我们就要起来批判，造他们的反。他们修正主义将来吃不开了，我们大家的眼睛就会擦亮了。觉悟就都提高

了。这是最大的收获，很好！形势很好。主要是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这是一点。

另外还有一点，你们看到我们搞什么夺权，有些过去对刘邓路线，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忠实执行者的斗争，有夺权斗争，我们取得很大的胜利，而这胜利不断扩大。是有我们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同学，我们人大附中红卫兵在青海斗争中流了自己的鲜血。在北京来说，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人人大附中的红卫兵，他在青海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用年青的生命保卫了毛主席的路线。（向张大海学习）这个红卫兵是那一派的？是井冈山的？还是红旗的？（是红卫兵的。）这个同学过去好不好？表现的怎样？（答：好。）挺好的，我们人大红卫兵，应该纪念这个红卫兵。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整个生产，工农生产，自从解放军支工支农以后，加强了生产制度，很多地方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气象。所以是我们困难还有，阻力还有。但是这个困难这个阻力，终究要被我们克服的，要被毛主席领导的广大革命群众所克服的。对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来说，对广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来说，是有的。我们声势越来越大。总的一句话就是很好的，一天比一天好。形势很好。在前进的过程中还会有阻力的，但是阻力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是会战胜的。

在整个声势中，我们要考虑调查我们人大附中的情况。我们人大附中能否在这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人大附中推向新的高度、新的高度。把我们的人大附中变成人民的主力，变成克服困难、克服阻力的一个动力。我们夺取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不要使我们学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变成阻力。那么，就要大家努力，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复课是可以把学校变成天津的延安中学那样，希望你们人大附中能够在大批判大联合转入到本单位斗批改的当中，做好的榜样，做好的典型。就象延安中学那样。天津的延安中学，你们知道不知道？出现延安中学，出现第二个革命中学，可能不可能？也许可能，也许没可能，树立一个好的典型，用到全国的中学文化大革命里起很大作用，不光能在北京市里起很大作用，天津市有的，人大附中红卫兵把学校革命搞好，才会有的，人大附中红卫兵是最近起来造反的一个战斗单位，后来有的老红卫兵犯了错误，我们是不赞成老红卫兵的

称呼，后来又有一些井冈山红卫兵又起来，继续起来前进，是吧！井冈山、红旗、红旗红卫兵开始有些错误，后来又造反嘛！（这一段不清楚。）

这么多解放军在你们学校来支持你们，来帮助你们搞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们的感情是和你们一致的，有这样好的解放军，都是很爱你们，非常喜欢你们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你们，同你们一起战斗，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有什么阻力不能克服呢？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这是一个好的条件，还有你们这里的干部，你们所说的干部，过去什么干部靠边站，那么现在干部问题很多，刚来两个干部，一个叫陈帮友，一个叫刘庆振，刚才他们都发了言，还有一个叫韵志水，这就不错了，有的学校一个干部也不行了，你们这里无论如何还有三个干部发言。还可以。是不是这样？怎么样呀！这三个干部，这两个干部怎么样？（众齐说不一。）有的人是老好人吗？不是坏人嘛！什么都是老好就不行，以后态度要鲜明一些（有人有点修养）有点修养不要紧，改了就行了。批判，他自己也批判，你也不能说一点修养也没有，有一点吧！红旗有没有“修养”？（众：齐说不一，有，没有）（红旗一战士，红旗也要做分析）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谁没有，谁一点也没有的举手，我看对自己还得一分为二，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缺点。

无政府主义总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吧！无政府主义是我们不主张的，毛主席是从来反对的。刘少奇是无政府主义的。当然不要扣帽子，不要同如有一点无政府主义就是刘邓路线。无政府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就是黑修养这本书，他是黑修养产生的，黑修养主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机会主义搞到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因为报纸上说了，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大家都看看这篇文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那有一点错误，（众：有。）李百替，你也有点错误吧！（李：有。）李百替有点缺点有点错误，但是你们说李百替是什么叛徒哲学，我不太赞成，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同志。还是一个好同志，不要否定他，不要一下否定他。他有缺点，过去你们打他，他说了假话可以检查一下，（红旗一战士说：李百替说干部子弟本能地反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干部子弟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是空虚的，飘渺不存在的。）

你们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好不好，如果他是叛徒哲学，我接受你们帮助，你们可以帮助。你们可以相信这点，他是一个中学的青年学生。你们整他说什么也不对，他说了假话，这个他有缺点，他可以检查的。你是否允许他革命，他还是革

命的，造反了。（有人说：他就是不能掌权。）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讲话，我认为还是好的，（有人说：他讲话是假的。）那么我也可以说你今天讲话是假的，你们可以看一看吗？要相信历史的考验，谁是假革命，谁是真革命，在历史的考验中可以考验出来的，那么对李百替考验，对你也要考验的，我们将来还要看吗？将来中国还会有困难的，还会有斗争的。在将来的斗争中我们还会看到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要一下子给他做结论。象李百替这样的红卫兵要赞成他，还要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他说中央文革有垮台的危险。）那么李百替和联动究竟哪个好，联动好吗？联动在公安部喊反动口号，那么联动和李百替哪个好？（答：“一样”，“比联动好”。）

我讲话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中央文革，我来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看望大家的。（鼓掌）我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看看大家的，可是我讲话不代表中央文革，讲话代表我自己，好不好？我也是红卫兵一战士嘛！那么李百替如果是通过群众，相当多群众，赞成他，愿意让他革命，因此，赞成他担任领导干部，我看你们这派同志也应该让他看一看，允许他工作，看他好不好，应该一看二帮，来帮助他，为什么我们要放联动呢？不是说这个联动做的对，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不是这样认为的吧！（答：不。）不是联动做的对，而是我们要给他一个革命的机会，而是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革命的机会，这是青年人犯错误吗？总要允许人家改正，他们是青年吗？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讲话和你们讲话不一样。你们年青人讲话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错误话有很多讲的错了，那么我讲话也有很多错误，但是我讲错了的话，别人一批评我，我马上就要检讨的，但是红卫兵讲话，讲错了就可以不检讨的，你们信不信？（笑）比如你们自己讲话讲错了，你们是不是检讨了。算了，讲错了就算了。

所以青年人讲话嘛！青年人有错误，就允许他改正吗！不要看的很严重，因为他是青年嘛！一般不是那么能定形的，上午他讲了后可以支持，赞成、这个人下午可以反对他，晚上还可以赞成他的，青年人是这个特点的。但是李百替呢？毛主席还是他心中的红太阳，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你们认为他反对毛主席，我不这样看，不要随便给一个青年人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他真正反对毛主席，才说他反对毛主席，他不是真正反对毛主席，就不要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不要随便给一个人定案，说这个人反对毛主席，那个联动

就有很多人反对毛主席，那么现在都放出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很慎重，不要随便胡说：你这个人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于这个东西要慎重，在我们国家里，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因为我们说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一反对毛主席那你还不是反革命？那就要抓住他那我毫不犹豫就要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当然毛主席说的要放，我就要放，我究竟是抓他赞成不赞成呢？抓他我还是赞成的，但毛主席说要放我也赞成，毛主席是最高指示我也赞成，但是放出来，你还是反对毛主席，我还是要抓。（鼓掌），如果抓了以后毛主席要放，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说的，但是你反对毛主席我就认为你是反革命，决不能说反对毛主席还有什么光彩？没什么光彩！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全民共诛之，是不是这样？（众：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对嘛！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他准确反对毛主席那我们就要砸烂他什么我就不管了。他不是，那就不要随便给他扣什么帽子，你们赞成不赞成呀？你们是不是赞成不要随便扣帽子，赞成吧！（完全赞成）完全赞成好嘛！我相信你们是会赞成的，那么是假的是真的那得历史考验来看，你让他表现吗？你给他个表现机会看嘛！你们说不让他参加领导工作。我看可以让他参加领导工作。因为你看嘛！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不给他看的机会。他就是真的反对毛主席你也看不出来，抓也抓不住，我看他不是反对毛主席的。按我的观察，到现在为止，也许他将来反对毛主席，那现在我还认为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在这运动考验，在工作中考验，在斗争中考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附大，我们希望按江青同志说的，要扩大批判，在大批判里搞大联合，大联合里面逐步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把人大附中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鼓掌）办成延安抗大式的学校（鼓掌！）

我是相信广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都不是好的，那有这样的事情呢？大多数是好的，多数是好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毛主席从来是相信大多数的。所以同志们也要相信大多数。大多数教员也还是好的。你们教员也不要计较。压制过，整过你，整错了的，整对了的就整对了，整错了不要计较，不要揪住一句话，所以这些都是青年人嘛！他们也是出于维护毛主席路线的嘛！横扫牛鬼蛇神嘛！他一时找不到，于是就找到了也可能找错了，找错对象就完了。不打不相识就完了，如果你们打红卫兵，你们打错有些人是好，你们打错就赔礼道歉嘛！去给人家鞠个躬嘛！不行再鞠一个，再不行再鞠一个嘛！

三鞠躬嘛！我给你赔礼道歉。你还扭着不放，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你们应该有这个气魄的，打错了，的确打错了，要赔礼道歉，叫声老师吗！说是某某老师，张老师、李老师我们打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道歉，行不行？（行！）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气魄，（众：有。）恐怕不大有吧！说得挺厉害……90度鞠躬，封建了吧！封建一点也不要紧，敬个礼嘛！像解放军那样敬个礼，可以吧！（可以）不全是封建的，封建的就不要了，敬礼嘛！向他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嘛！这总是可以吧！这不封建吧！走进去道歉时给他敬个礼吧！那么有好多有好多红卫兵，有解放军同志的支援，有干部教员的大多数，一起参加战斗，我相信人大附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可以搞好的，在这是可以搞好的，现在我觉得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你们要建立一个领导，领导你们人大附中进行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的那么一个临时机构，领导机构（鼓掌）你看解放军同志还要多呆两天，恐怕这个问题啊，还有阻力呀！要建立这么一个临时领导机构，临时领导机构，那么一些事情都办得成，你们斗批改也办得成，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赞成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它是赞成要有领导机构的，要有领导，不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的死敌，它从来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下面我们说首先要搞好本单位，搞好你们这个单位的斗、批、改的。首先要搞临时领导机构，那怕这个临时领导机构很大，而且这个领导机构里要照顾到井冈山，要照顾到红旗，照顾到红卫兵，三个组织都要有人参加。这回又该怎样，你们又说戚本禹又在和稀泥，不是，同志们这样的组织，建立这样的领导机构，不叫和稀泥。不信有这三派，而且要有教员参加，要有干部参加，干部，教员，教职员工，包括工人，有教职员工，有干部，而且这里面要有老头，有中年人，有红卫兵，那个干部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

你们在军训期间暂时联合，恐怕你们马上建立起来这个机构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往后的工作你们几派可能争几天几晚上不休息的。如果暂时的过程实在找不着挂帅人物呢，那么让军训的同志也派一个同志来挂帅，在军训期间同样挂帅（鼓掌）。慢慢的，军训同志就要转入第二线，让你们自己来搞。你们自己搞得好了呢，他就可以退出你们的学校。要有这样一个临时机构，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啊，军训同志参加几个同志。因为军训他是临时的，他在军训期间领导这个班子。你们学校现在还搞不出挂帅人物，你们是可以搞出来的，有军训同志的帮助，把挂

帅人物树立起来，树立他的权威。你们有这个领导班子，虽然是临时的，同志们，你们听从这个领导班子的指挥。因为他就是一个权力机构，有权，他有权，有权领导学校的一切，领导学校的革命，领导学校的教学，领导生活，领导我们学毛选吧，都要多方面领导。我们红卫兵战士们、学生们、教员们必须受到这个领导机构的约束，受到这个机构的约束。比如，有的同学说我要到四川去。如果这个领导人不同意，你就不能去，否则就叫独立行动，所以要重视这个领导机构所制出的纪律，所规定的制度。这个恐怕你们就不会很赞成吧？我约束你们来了，你们就不赞成了，对吗？你们愿意自由行动，随随便便，骑车就跑了，愿意来就来，愿意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要约束你们，你们就不赞成，所以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要有纪律，要遵守，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建立，我希望你们每个红卫兵组织自己检讨一下，提出人选。然后协商，共同协商。

各个群众组织协商，这是有左派队伍参加，因为刚才有条子说：是不是联合政府，不是联合政府，同志们，你们学习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没有？他们的联合政府就是联合政府，那是搞统一战线。因为那时我们要配合中央作斗争嘛！团结起一股力量嘛！是不是？就要搞联合政府。你们这个不是，你们红卫兵是民主党派？是民主党派吗？井冈山是民主党派吗？红旗是民主党派？你们那派是资产阶级的党？你们是资产阶级的党啊？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党，那怎么叫联合政府？那不是搞联合政府吗？不能叫联合政府啊，不能叫联合政府，你们都是无产阶级嘛，都是向毛主席的嘛，怎么叫联合政府呢？你们一听联合政府就怕了，一听联合政府就不敢要了，那不是联合政府。如果说你们井冈山，红旗和红卫兵，你们是民主党派，那可以说是联合政府，你们是不是民主党派？不是吧？（同学：不是！）是革命组织嘛！革命组织大联合嘛！怎能叫联合政府呢？大联合的临时指挥机构嘛！不能叫联合政府，也不能叫折衷主义，什么叫折衷主义呢？折衷主义呀，就是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政党的观点把它调和在一起，那才叫折衷主义。两个阶级是对立，你死我活的，一个修正主义，一个马列主义，两个主义把他搞在一起，这就叫折衷主义。那你们这三个组织那个是修正主义的？可能是不是红旗是修正主义的呀？井冈山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也是修正主义的？我看不象。有些人到底什么时候变成修正主义，但是，从总的来说，现在还不象修正主义的。

拿红卫兵来看，刚组织起来的吗？（众：刚组织。）刚组织起来……打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就是骑自行车打人的，也不一定是坏人。

那天我下车看到一个骑车子的打人，我说你们打人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打流氓……。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是不对的，是不太好的。但是他们拥护陈伯达同志，拥护毛主席，看到我们中央文革很高兴。你看，你们也不都是坏人嘛！小孩是小孩，弄不清怎么回事，跟着瞎起哄。有些人跟着瞎起哄，真正是联动的执行刘邓路线的，有些是黑帮子弟。黑帮子弟也不一定是坏人，很多黑帮子弟是很好的，是起来革命的。可是有些人是主张对联的，就是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就愿意作这个混蛋，老子反动你应该起来造你老子反，但是他还要和老子走到底。他老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搞什么反动路线的，他就愿意和他老子反动到底嘛，因为他也有他的反动哲学的。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于是他就犯错误。这种人是少数，极少数，有很多黑帮子弟还是愿意革命的，就算老子是黑帮，他还愿意起来造反，愿意革命，我看是不少。例如：某某所有个李某某，他这个人黑帮。他的孩子在没批判以前就反对他老子，这个人现在怎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敢于造反的嘛！

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联合的，是可以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底下的。不要排斥人家，不要抓住人家的小辫子不放，每个人都会有些错误的，在民众的大风大浪里你们游泳；学习游泳嘛，总是会喝水的，风浪来了，你没看清楚喝了一点水，那么喝了一点水，别人喝了水，他也喝了一口水嘛！有的喝水人家看见了，有的没有看见。那个喝水的同志，要拉他一把嘛！要让他起来革命嘛。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看到别人喝了一口水了，还要按人家脑袋往水里按，这就不是同志的度量。

如果说要把同志当作敌人打了，这个人迟迟不改的话，那就没有好下场的。我告诉你（鼓掌），你们别鼓掌，你们双方都有错误。你井冈山过去也抓住人家辫子，说红旗呀，或老红卫兵都是联动呀，那抓住不放，斗得可厉害呢。最近井冈山什么 4·3 派，出现 4·4 派，挨了批评有的灰溜溜的，你们也抓住人家不放。这个我知道的。因为你们经常来，给我来信。我晚上回来都看信。我知道一点，你们恐怕说秘密，你们信里写的难道没有？条子里面都有的，将来都是有证明。要把某某打倒，最后打倒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就好了，这是不对的，你们应该马

上改正，原来把自己的同志，自己的阶级弟兄当成敌人打没有好下场（鼓掌）那样的话，当不了接班人。

毛主席接班人中有一条，要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一段你们都读了没有？这五条有一条（戚本禹念内容），第三条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一条你们能不能做到呀？（答：能）能呀！我看现在情况你们还不能做到，如果做到就不错了，如果做不到还不行呀！而且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就要团结，这是接班人的条件呀！同志们！如果人家反对过你，你就要往死里打，那就不能做接班人。但是以前有点错，后来改正了，那也可以做接班人。以前有的把自己的同志打错了，打得很厉害，但是后来改正了，还是可以做接班人，也不要绝对化了呀！利用我的话，揪住不放，那也是不应该的。

你看有这么多好的嘛，有这么多好的红卫兵战士，有解放军战士，在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你们应该搞好的。现在中心问题是条件，大家要通过协商，成立一个临时班子，临时领导机构，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是不行的。你们（支持）协商提出一个名单来，最后由军训团同志根据各种不同意见来考虑，提初步名单，开大会，大家通过，行不行呢？（众：行）那么这里就要确定一个方案，由那些个团体确定，哪几个人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可以看嘛！将来在临时领导班子也可以观察吗！这里包括干部、教员、教职员工，还有学生。你们现在担任领导的，在军训时候由解放军担任，因为你们一时搞不出来。那军训完了以后呢？让你们的学校自己人来搞，现在主要你们学校大联合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也许会有坏人的挑动，但是现在看起来，主要的阻力是来自自己的，在相当同志反映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鼓掌），这个问题是你们学校需要下相当大功夫的问题，是要好好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几个月都没有纪律了。同志们，和军训同志谈了话，军训同志回答我们，喜欢你们，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说你们大方向是好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他们也反映了一点，你们的纪律性比较差，他们还是客气的，说你们语录学的较差。但是我看你们几乎没有什么纪律了。不是所有人没有纪律，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纪律的。

你们都听毛主席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解放军的话，说了就好。但是有些话你们并没有听，你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

就听，不合乎你们口味的，就不听。就象你们检查自己一样，解放军的话，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愿意听，不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也不愿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你们愿意听就听，不愿听也就不听，这就是没有纪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可能你们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央有个关于中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们还记得这个文件吗？同志们，（记得）恐怕是不记得了，是忘了……有的学校，不是你们学校，有的学校赶人家，好象老在这呆着，要赶人家。赶人家，人家不走，为什么不走呢？他们有任务，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走，而是愿意走呢，因为人家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他来的，他就不走。你们这，还没有这种情况，你们还好呀！你们还不错，怎样执行命令去，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你们这部分就不大听命令，相当一部分人不听命令，你们听你们自己的命令，不大听毛主席的命令的。毛主席说的嘛！就是一边复课，一边闹革命嘛！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而且要分期分批搞军政训练，你们有的人不参加，人家规定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然后训练，你们就不听，有的人可以睡觉到十二点起床，有没有呀？

（众：有，没有）他打青蛙去了，他逮蛤蟆去了，那象话吗？那老乡再不干，你们是小孩吗？你们不是小孩，是红卫兵战士嘛！把红卫兵当成小孩不是光荣，是耻辱嘛！你们首先要好好军政训练嘛！你们下去首先要打击无政府主义，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没有纪律性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话，不是我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是不是按毛主席的话去做的？因为毛主席的话不符合你们的口味，所以你们不想完全做的。你们喊拥护毛主席，我们看这一条，你们是不是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考虑这一条。还有的人要去串联，到外地去，到四川去，到那去你串联，你就不给解放军打个招呼，没同意你去，你就跑了，这叫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组织性纪律性。那叫什么哪，那不叫无政府主义又叫什么呢？过去跑了，那是主席号召大串联。我是赞成你们的。现在毛主席不让跑了，让回来，你还跑，还象过去那样，那怎么行呢？对吧！到四川去，到青海去，那时经中央批准的去了几个人嘛。但是你们没有批准的也去了，也去了几个。好象听他们说，到四川去派了九十多个呢？不多吧，有些人认识不对，所以你们去了，以后回来还要作检讨。那怕你革命的很好，回来也要作检讨，你们要按照

组织性纪律性来作，你打仗也要听指挥嘛！毛主席让你去你就去，毛主席不让你串联，你就别串联嘛！

你们要搞本单位的斗、批、改。要转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要搞这件事情嘛！这件事要善于掌握嘛！而且这些事情要比出去串联艰苦的多，你们有的同志怕艰苦，坐不下来。你们自己估计估计吧！这是我给你们估计的，你们自己估计估计吧，是不是这样？怕艰苦就出去跑，图省事。这个革命革的很长，我们革的又不好，又不好革，又不知道怎么革法。你们要杀出一条路线，你们要自己去闯，很艰苦的任务，究竟应该怎样搞，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革命新中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毛主席的新中国，究竟怎么办，究竟怎么搞，这是斗争中没有解决，要你们去解决，但是你们要不怕艰苦，不愿意解决这个任务，不愿意挑这个重担子就跑出去，有的同学就是这样的，你们自己给自己估计估计，是不是这样？我看是这样的，相当多的同学是这样的，还有个别同学不好的，个别的少数的破坏国家财产，偷人家东西，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当强盗式的。有的个别同学，而且偷解放军的东西，这太不像话了。人家一说，解放军说，我们东西偷了没关系的，这可是极个别的啊。我愿意是相当个别的极少数，是一两个，但是也是无政府主义吧，也要反一反哪。随便打碎国家的玻璃，我们过去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不能破坏国家财产。你们这个应该进行教育，应该进行批评的。你们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进行教育的。要搞臭无政府主义，搞臭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要爱护国家财产，不要打玻璃，不要破坏桌椅板凳，那东西是劳动人民的东西，不容易。那木头是从山上运来的，做个桌子，做个凳子不是容易的，我们的国家是很穷的国家，要爱护我们的国家，要保护国家财产，不要破坏，不要打砸抢。有的同志传出来是我说的，什么这个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打砸抢，有反革命的打砸抢，要做阶级分析”啦。

我看打砸抢就是打砸抢，打砸抢就不是革命群众所做的，但是革命群众做了，有的革命群众犯了错误就是打砸抢，那么就应该改正错误。这是我说的，要看到主流，如果做过的。但是不能拿我的话去辩护，打砸抢就不是革命行为。

你们的大字报，你们打内战，有的大字报还贴的很大字，越大越好，贴一张大字报就要用很多浆糊，一天就用 45 斤面糊，用 45 斤面粉，是不是这样？这里有没有伙房同志？45 斤面粉能给多少人吃饭，能做多少个馒头？那么一大堆馒

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面粉来的不容易，秋天种，夏天收，一斤面要流多少汗珠子，要耙地要锄草，麦子长起来很不容易，长出来，磨成粉，做的香喷喷的给大家吃，贴大字报要用一点浆糊，但是要节约，不要浪费，你们打内战的大字报，我看最好不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不符合大联合，不是大是大非的大字报最好不贴，贴小字报就行。不要浪费，那个浪费，那个无穷无尽的浪费，也是无政府主义，我为了研究无政府主义，把我国大革命的、各国的无政府主义的著作都看了一下，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如：有的打人，杀人，抢人哪，当强盗呀。反正不要工农的利益，或者人民的利益。这些都有，无政府主义是阻碍现在的大联合的一个主要因素，怎么才能搞臭无政府主义、怎样反对无政府主义，实行大联合呢？就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听说，这里学得还不是很好，你们学得好不好？（众答：不好。）

有的在学习主席著作当中看小说，看《红楼梦》，看《说唐》。大家不是说，主席说过嘛，可以看这些东西，按主席说的，看《红楼梦》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一点儿都不可以，但是，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不是站在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恨的立场上。《红楼梦》不看是可以。主席著作不看，你就会迷失方向。那么，你看《红楼梦》，还要看你怎么看？你是批判地看呢，还是欣赏着看，弄不好你中毒，你也会变成林黛玉、贾宝玉，变成哭哭啼啼的。我看还是不如不看。但是我也不反对。但是位置要摆得适当，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要批判地看，而且现在来说嘛，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就拿斗批改来说，有很多问题要研究的。

你现在用看红楼梦来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不对。这是错误的，这里面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派抄了一些黄色小说，自己看，个别人不是所有人，个别人有的话要赶快改正，你们抄家的东西，你们自己拿着用这就不对，你们这样的话发展下去，抄了人家的东西，你们自己用，归自己。你这样抄家真叫抄。你抄了家把东西变成自己的，不交公，变成独立大队。那人家还不抄你呀！要学习主席著作，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有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才拿起语录，自己对自己的时候语录就放到口袋里去了，这就是毛主席批评自由主义第几条？十一条啊，我希望你们把主席讲的自由主义（读十一条）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那不对。

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要活学活用，要针对你们人大附中目前产生的问题，各派自己学习主席著作，要各派作出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请解放军给你们当指导员，大学特学他几天。哪一派要是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话，他就要垮台，过不上几天就要垮台。你们《井冈山》自己学也行，《红旗》自己学也可以。按班级学也可以。在军训期间是按班学。可学的东西很多嘛。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好好学。我建议你们就这样开大会来学。大家坐好，不要站着。一人拿一本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一句一句讲，一句一句说。由解放军同志来给你们念，给你们讲。你们也可以讲，那样学才能学好，班级学也可以。你们总要学习主席著作，你们不学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清楚的，对自己采取什么态度，对解放军采取什么态度，对朋友采取什么态度，对敌人采取什么态度。

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要搞大批判。最近《红旗》杂志社论这一文章，你们学习了没有？我看你们就没有好好学。我就没看到一张大字报。也可能我没有看见，没有好好学，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文章，是打中要害的，反正你们要学，在学主席著作中，来搞大批判、大联合，来搞本单位的斗批改，解放军和你们一齐学。

解放军同志跟你们一起学。大家一起来学，学习主席著作，还要学习别的单位。别的兄弟单位。人家学习主席著作的榜样，要向人家学习，要找差距，要向人家看齐，延安中学，大家就是学习好的，学习主席著作好的，你们向人家看齐嘛，要向人家学习嘛！

你们要学好样子，别学坏样子。大学里有什么好的东西，你们要学习。哪些是坏的东西，你们要抵制。特别是你们这个人民大学，老大哥是不是？你们是附中，他们是老大哥。那个人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来了人大同学没有？新人大来了没有？来了，噢，就来一个。噢，都来了。我说你们不好你们不高兴。（人大同学：今晚您还去不去人大？）

去不了啦。我今晚还有事。人大来了几个？两派是不是都来了？都有，都来了。新人大呢？也有。我当你们面说，我不背后说。就是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他有坏的也有好的。有人大三红，还有新人大。它写了许多好文章，很不错的。我经常看的。在大批判里面它有功勋的，它还抓出一些叛徒。最近，大三红我还表扬了，他还做得不错。它们（指新人大、三红）还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抓本单

位的斗批改，本单位的还有变节的它都抓出来了。它最近搞孙决也搞得有成绩。搞胡锡奎有成绩。搞郭影秋它有成绩。这值得学习的。人家搞本单位斗批改比你们搞得好啊！

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你们这里边有谁啊（邸文域）邸文域是不是黑帮？够不够？（不知道。）你看，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不够就不够，不要硬拉。够了就够，不够就不够，但是他的错误要批判。比方过去你们学校里有的，它在学校里执行彭真一套错误教育路线。这是有的，不管他是不是黑帮，他执行了要批判。这没有什么好批判的，这就不够嘛。

这一点人大他们大学做的比你们好一点。它也有不好的，你们不要学。它两派尽打内战，你们别学它。你们已学了的，它打内战你们也打内战，都打到中学来了。你看人家对你们不大感兴趣。据说你们红旗和井冈山也是各有一派支持的。打内战你不要学，别学打内战。它说它有新的问题。有新的问题。但新问题怎么解决呢？按毛泽东思想解决。打得脑袋流血，那是毛主席的方法吗？那是毛主席的教导吗？我就不赞成。那还批评不得，最近我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反对我。最近来了很多条子，说我那天批评他“打内”了。反对我不要紧，我这个人就喜欢人家反对的，越反对我越高兴。可以反对的。但是反对对的，我是不赞成的！他说我和稀泥，他说应该以人大三红为中心来进行斗批改。我倒很希望以人大三红为中心进行斗批改，我也很喜欢人大三红，以他为中心，那么他很有造反精神。从头开始，他的造反精神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你自己不争气，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争气，他最近搞了个批判彭真，另外跟我还有点关系。说我和人大三红要我照顾他一下吧，因为他好象是这个校没有照顾我就照顾他一下，结果他自己搞批判。

我说要联合他不搞联合，他不跟新人大搞联合，你要反映怎么样？你不让人家参加主席团。这个事情，我就很恼火，很不高兴，很不满意。这个你们不要学它。我告诉你们，你们也搞了两派。搞了井冈山一派，红旗一派。这两派打内战。然后，红卫兵也参加进去。红卫兵又卷进去，我看你们现在也是支持一派打一派我已经看到了，有这个苗头。有没有？你们注意一下，你们要做促进他们联合的工作。而不要促进人家分裂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那没有好下场。这两派（三

红、新人大)再不搞联合的话,我就要采取断然措施。不管你自己的话,我就派军代表去。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还不好好搞联合,还不争气的话,那我们就派军代表去。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跟文化革命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商量这个问题。好了,八点多钟,你们都没吃饭吧,不讲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聂荣臻肖华谢富治在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聂荣臻副主席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你们好!今天是北航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我热烈祝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北航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北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北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年以前,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过去这一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划时代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在七亿人口的大国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亿万革命群众,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的猖狂进攻进行总反击,这场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目前正处于决战阶段。

北航红旗战斗队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坚强的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在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航红旗始终掌握着革命的大方向,始终高举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斗争中团结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了权,逐步地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了优势,建立了革命委

员会。在一年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北航的青年红闯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和搏斗，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光荣的战斗历程，受到了大风大雨的锻炼。你们不但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和国防科委的革命群众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了国防科委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以很大的支援和帮助。你们在参加全国许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起了积极作用。通过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大批年青的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战士成长起来了！我这个老兵，看到这个战斗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心情是很激动、很高兴的。我自己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成长和斗争，是最大的幸福。希望你们永远珍惜这个幸福，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永远做一个革命闯将。

现在，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大家面前。在全国解放前夕，在一九四八年底，毛主席曾经向全国军民尖锐地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的问题。全国军民坚决响应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取得了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处于决战阶段。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给我们下的进军令！

同学们，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很大的胜利，但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盘据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一个地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深入地开展。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长期以来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问题，是有关世界革命的全局问题，是斗争的大方向，是百年大计！

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一定会有力地带动我们学院的斗批改。同时，我们学院的斗批改，又可以更充分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教育战线上散布的毒素。我们一定要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改革我们的教育。

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我们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这就是我们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根本措施。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刻地反复地学习这一最高指示，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这一最高指示。

同志们都知道，斗批改的任务是很繁重的。要搞好教育革命，我们必须按林副统帅的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学出新的水平，不断地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性是最根本的。毛主席说：“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不彻底批判旧教育，就不可能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崭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告诫我们：“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这一点，教师和干部要特别警惕，一定要十分重视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十分关心、爱护新生事物。要加强科学性就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动脑筋，进行周密、深入的调查，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而且要到兄弟院校、科研和生产单位作必要的典型的调查研究，不断地摸索和总结经验把教育革命搞好。

要使斗批改能顺利进行，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就是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做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要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穷的武器。毛主席说：“我们要领导人们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怎样使队伍整齐，脚步一致呢？这就要求我们统一于毛泽东思想，严格遵守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各项

方针政策。要不断地防止和克服妨碍我们团结战斗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比如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最近在某些单位出现的打内战、武斗风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以革命左派为骨干，实现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伟大战略方针，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不停止地前进！

北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重大成绩。我们要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我相信，北航的广大师生员工，一定能够珍视已取得的胜利，戒骄戒躁，继续发扬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我衷心希望，北航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在学校的斗批改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来严格要求自己，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北京航空学院一定能够建设成为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愿北航同志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飘扬在北航！

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肖华主任的讲话

敬爱的同学们，战友们！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向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今天，在这个广场上红旗
飘飘，锣鼓喧天，在一片欢呼声中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胜利成立了！向你们
表示热烈祝贺！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北航革命委员会
的成立，标志着北航的新生，标志着以红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英勇战
斗已经取得重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党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北航的时代却一去不复返
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把大权夺过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保证你
们北航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不变色所做出的战斗，是我们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因此这是值得我们热烈庆祝的！同志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新的战斗开始，
在你们的面前还摆着更艰巨更光荣更重大的任务，这就是同全国人民一道向党
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深入的大批判，把他们彻底批深、批透、
批臭，把彭真、陆定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推行的旧教育制度彻底砸烂。按着
毛主席的教导，特别是“五·七”指示所教导的这样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把北
航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学校担负着为祖国培养航空事业人才的光荣任
务，在发展人民的航空事业、在我国国防方面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祖国的
天空无限广阔的优秀空军正在等待着你们的贡献！我相信，在思想革命化的基
础上，你们在航空事业方面一定能象毛主席所教导的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
创造、有所前进，我们航空事业经过你们的努力一定能攀登世界航空事业的最高峰。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重要的是学好毛主席伟大著作，活学活
用，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活着的马克思，
是活着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著作是全世界
人们闹革命的宝书。林彪副主席说：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
的需要，这是形势的需要，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
底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所
以希望同志们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住这件大事，抓住不放。

同志们，战友们！夺权是不容易的，掌好权，用好权更是不容易的。要在当
前的大批判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希望同志们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巩固已得的胜利，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志们！北航红旗，所有全国造反派，全国人民都把你们称作左派，老左派，人民解放军也是左派，也是最大的造反派，人民解放军过去造了蒋介石的反，造了美国的反，造了日本的反！现在他们要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去造刘少奇、邓小平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同志们！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牢牢地记住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勇地前进吧！人民解放军永远支持造反派！人民解放军永远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谢富治副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是北航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体同学、教职员工最热烈的祝贺！

向同志们，战友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北航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我们伟大领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北航在过去近一年的文化革命斗争中，北航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整个斗争中，你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完全是站在我们伟大领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完全跟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的，跟得很紧，你们是有战功的。你们不仅仅在你们学校闹革命，而且对全北京市革命派的支持甚至对全国革命派的支持，你们作了很多工作。这一点，我个人必须向你们学习。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

斗争，已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系列贡献，但是，当前我们任务还是很重，你们应该继承过去斗争的传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戒骄戒躁。应该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完全站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完全紧跟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当前一小撮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斗争！再就是对彭真、刘仁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批判、彻底斗争！把他们批倒、批臭！结合学校的斗、批、改，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为这个大方向的斗争贡献你们的力量。在北京来讲，全国来讲，当前革命派大联合，革命派内部团结是很重要的。应该为这个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派的团结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革命派要联合，革命派要内部的团结。我们一致去对付主要的敌人。不要去深入那些干扰我们的大方向的活动，不要去搞那些没有原则的分裂。左派的分裂我们不赞成。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节约闹革命。”响应我们伟大领袖号召，“只许文斗，不要武斗”。同志们你们过去有光荣历史，如果我们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紧紧依靠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地跟着中央文革小组，按照我们党的政策，按照我国将近一年的经验，我们要提高我们斗争的艺术，保持我们的警惕性。我们在斗争中间，不要放松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他们挑拨离间，制造左派之间分裂，我们要注意。

希望北航同学们、战友们，记住你们过去光荣的斗争，我们希望你们为今后的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你们在斗争中成功、胜利，希望你们身体健康。

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对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讲话

（一）目前北京市形势大好，但也出现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问题。大批判、大斗争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大方向，大联合搞不好，大批判、大斗争就办不好，你们应该在大批判、大斗争中作出贡献，为大批判准备材料。

(二)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原则就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中央文革的领导。坚持团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团结，反对无原则的分裂，左派组织应该大联合，左派组织的矛盾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首先是自我批评，不要火箭上纲，现在北京市什么事都干不成，斗争会开不成，演剧也演不成，三结合也搞不成，什么都分两派，开拥军爱民的会也开不成，你们不要参加派别斗争，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高举大批判大斗争的大旗，高举大联合大团结的大旗。

(三)那天伯达同志给我讲，要总结经验，整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中央文革过去三令五申的，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否定了的作法现在还有人去作。

(四)首先是坚持原则，团结才行，大问题抓住了，小的好解决，这个问题上政治公社应要作出贡献，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一个组织走在前头，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什么时候也不能把矛盾指向群众，你们要站得高，在制止武斗中作出贡献，提高斗争艺术，不要简单化。

(五)昨天我在北京革命委员会开会，中央有个决定，将来要印发，凡在外地外机关的同学，通通撤回，现在联络站多如牛毛，联络站成立就办一个小报，这是你们大学生的特点。以后联络站统统撤消。需要建立须经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批准。政法界真正有价值的调查，触及灵魂的批判可以搞，还写些批判东西，不要把人拉出去示众。呼口号，现在这样做不行了，要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材料，搞触及灵魂的批判。

二、北京市高校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陈伯达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师生的讲话

同志们：

你们好！今天我是来当你们的小学生的，来向你们请教的。今天你们先生太多了，我根本没法来上课，六千先生来教一个学生的，这是世界上没有过的吧？

我想你们今天上课很困难。你们可以相信，除了科学技术的一些东西外，其他政治上思想上的一定可以学到的，我一定要努力地学，请你们努力地讲。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教导和希望。就这样吧！（要求陈伯达同志题字）

（陈伯达同志题：“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给红旗兵团题字：“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类历史空前的奇迹。”）

我又学了一点，“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一句中国古话。说要走一百里路，走九十里才只走了一半。

为什么走了九十里路只差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路呢？这就是说后面的十里路是比较难走的。（鼓掌）大家在文化革命中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文化革命才走了一里，还不到九十里。（鼓掌）你们也可能走得更多一些，二百里路，三百里路。所以不能自己满足呀！走了九十里路才算走了一半，对你们可能走了一百里（大家不要），我们才开步走，你看我今天才来当你们的小学生，才开步走嘛！

（陈伯达同志又题字：“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写得很不好。大家强迫我写的，坚持了很久的时间我一定不写，他们一定要我写，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听大家的意见，不过我出丑了，大家不要再出我的丑，希望大家不要再贴出去。（众呼：我们一定不辜负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希望。）

刚才我给大家说了，我不会唱歌，不然我就领大家唱歌结束了。我说过，我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甲、乙、丙、丁、是丁等，你们现在的程度比我高，（众：我们都是陈伯达同志的小学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小学生，以后你们再给我上课吧！今天没有机会上课了。

我今天是来谈教学改革，我们怎么来谈教学改革？就出这个题目，慢慢来，大家讨论讨论，三个臭皮匠（众：抵一个诸葛亮）抵住一个诸葛亮。

过去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中国封建社会继承来的，教育制度还有从苏联抄来的教育制度，到现在还不多。一百多年，这种教育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关于教育制度问题，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他很早就探索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制度，是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你们要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

我们现在来就向你们学习，教育制度能不能搞好，要靠大家，要靠毛泽东思想。今天就出这个题目。

你们可以办一个刊物，大家可以发表意见，现在就是大家提个方案具体化。就这样吧！再见吧！

（有同学问河南的问题怎样）

河南分成两大派，分成两派是必然的。两派中总有一派是比较正确的，有一派是有错误的。你们支持的一派是比较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四中 赤潮：《“四·三”，“四·四”派斗争的意义》

编者按：这是中学里策略派即四·三派的文章，我们选用了其中对矛盾分析的两段。经调查，其中内幕事例基本是事实，可供同志们参考。题目为编者所加。

分歧的由来和现况

四三、四四斗争关系到军训，军训中的四三讲话是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线，但它的实质不在军训，四三派认为这是要不要革命到底的分歧，四四派认为是对犯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的分歧，（当然有些趁火打劫的论调是不应包括其中的）。双方的想法可以从下面对矛盾的全面考察而看其规律：

四三与四四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可以从其成员看出：四三派大部分是老造反派，即八月份反对对联，反对血统论，十月份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猛烈地与“联动”战斗，一月份群起夺权，可以说，是革命造反精神很强的小将（以下简称造反小将）。四四派有两部分主要成员，（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造反小将一起战斗的，也曾经有一二次站在先头，但总的来说，不很得力，比较含糊，在当时就不是主力而是同路人，但也不愧为造反派（以下简称造反同志）。

（二）受蒙蔽、犯过错误但基本上有所认识的人，如一部分老红卫兵。（以下简称曾保的人）。

在谈到现状之前，必须插叙一下文化革命转折前后的特点。

当造反派刚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前后，他们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性的，它关系到中央以至政治局的斗争。造反小将在中央文革的带领下

为了矛刺后台而向保守派所作的猛烈进攻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冲不垮十七年来刘少奇的桎梏。同时，他们对造反同志的右倾倾向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行动，文化革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由于私字作怪，造反同志当权之后不肯过多地容纳造反小将，因为后者更有当权的可能，在造反派中声望更高，这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伏笔。值得提一句的是：造反同志曾出面办报、召开大会，造反小将在几个关键时刻供稿（12·16大会，那时他们的配合是好的），受到了中央的重视。而当时一心向前冲的造反小将就把“通天”的机会让给了造反同志。后者以首都兵团为基础逐渐在红代会里掌权。

当刘少奇被揪出，并在全中国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曾保的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后边的坏人，不愿再上当，也想杀回马枪，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时，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就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历史遗留的较盲目的斗争。固然，曾保的人由于原先的地位，已经被造反派甩了很远，而且会有很多问题转不过来，但这已属于“允许保留”的不同意见了。

应该指出，大部分青年同志都没有很自觉地认识这个转变。然而由于原先的地位，造反同志在客观上对曾保的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态度并逐步从理性上认识它。但他们在思想批判从严这一点上依然做的不够，造反小将这时对他们的批评依然是正确的。

造反小将（当然不是全部）程度不同地对曾保的人采取不太正确的态度，没有充分认识这时团结大多数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对对方的能量估计过大，不敢放心地容纳他们，强调斗争中求团结而缺少团结的愿望。总认为只有对方跟自己完全一个心眼了才算改错，而这在大多数曾保的人中是不可能的，思想差距不但有而且很大。于是造反小将有些同志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孤家寡人的政策，个别的还起到了压制别人革命的作用。当然，曾保的人有些只在认识后台方面有了进步，对血统论及对造反派都没有很好的认识，不愿认错服输，所以看不到造反派的大方向，抓住枝子加以攻击。但由于他们处于较被动的地位，所以在双方关系紧张的责任上要承担得少一些。

于是，当条件成熟的时候，矛盾就爆发了。造反同志扩大它的原因是如前所述要大权独揽，曾保的人受了某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如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的影响加上原先的隔阂，就投靠在造反小将的对方，有人甚至企图通过批判

所谓反动的四三思潮来否定造反派。这时，造反同志的错误是排斥大部分革命造反派，曾保的人的错误是不承认十个月考验出来的革命左派，造反小将一些人的错误是对犯错误人的态度不正确，对团结大多数领会不深。

以上就是当前矛盾的由来及现状。

对症下药

解决以上矛盾的途径有二：（1）我们一致支持四三派，由于有十个月斗争的舆论准备，就能使革命造反派占压倒优势，很快以其为核心统一全局。同时帮助其领会团结大多数的思想，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2）四四派中的实权人物破私立公，大灭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小团体主义，与造反派的战友共享无产阶级大权；同时要加强对联动思潮的批判，使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这样，四三派的同志就应该不咎既往，以革命大局为重，团结更多的同志一起干革命。

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四三、四四的矛盾，那么就能够促成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反动思潮，打击顽固势力。这样也就能促进三结合。建立革命的权威和纪律，克服无政府主义，掌握大方向。否则，如果任四三、四四的矛盾继续下去而抓其他矛盾，则决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6年6月11号）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四三战报》编辑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许多人为了驱逐“反动的四·三思潮”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人为了攻击对立面而甩给后者以“四·三”的帽子。

然而，四·三派却在一片嚣闹声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势力并比任何一种势力都富有生气，富有革命精神，富有组织纪律性地成长起来。

关于四·三的神话可休矣！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

一． 特权人物和人民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资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须加以分析：

（1）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2）逐渐蜕化的当权派。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何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要稍微脱离

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资产阶级初期有过很强的革命作用，而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动作用，因而他是腐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今天利益的集中代表，他竭力阻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必须指出，刘邓路线在某些群众中得以推行，除了某些人的地位之外，重要的是运用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能量及群众中应用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不够。

二. 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内的黑帮分子，大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被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前，要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提高军训的水准，提到更加适合于再分配的高度，而不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这与红旗第五期社论及4·15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同时辩证法也惩罚了那些自认为“红透了”（其实家庭影响并不好，因此毫无准备与抵抗力）的特权人物子弟。他们一向以挂着“老革命”招牌的特权人物而自命不凡，一旦“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即将失去特权“天堂”的时候，他们就出自没落阶级临灭亡的愤恨而对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所以，四·三派批判这种特权思潮仍然是如前所述的新思潮的反映。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可以不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的因素！在这次文化革命中，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也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三. 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毫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刻”可以遮颜的虚伪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

现了那么几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北京，在全国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开始时都是弱的、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的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想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与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思想上的改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如阶级感情深）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再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向反面，以至象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的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个”规律进行的，这一个基本上（包括革命动力、对象）是完整的。如果依了什么“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每个转折点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个可能：（1）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步。（2）本来前进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多。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所以说掌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泽东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同样无情的。

四. 四·三派的几点政策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吃掉反动的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些单位还有待努力。另一种组织上，指革命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已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愿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甚至武斗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不少单位需要尽快联合。

但是思想斗争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绝对权威，让保守派从思想上投降。一些人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却干着压迫革命小将而纵容联动的勾当。革命小将要彻底批判联动思潮，要让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而不是从形式上新生，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而决不象那些连革命同志都容纳不了的最大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关门主义”。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前犯过错误的“老”红卫兵和联动老百姓，正大批地站出来投入运动，这是好现象。但必须指出，要站出来革命只有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这些人，以前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脱离群众，现在唯一补救方法就只有到群众中去，到革命造反派中去，大杀回马枪，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老”红卫兵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

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上大作文章，说革命小将“反解放军”“反军训”。同学们大概还记得，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进校时，是谁最欢迎！谁最支持军训？谁最积极参加军训？是革命造反派！当军训一段时期后，由于一些解放军经验不足，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小将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对军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有些方式不对！）这更充分表明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支持军训的。可是一些联

动分子，在军训开始时，抵触军训，在军训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又跳出来，打着“保卫军训成果”的幌子，极力把军训往后拉。

中国反对再分配的最大人物是刘少奇，所以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是占这次文化革命很大比重的，同时通过对他的批判，可以从根本上粉碎反动的特权思想，解放大批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重要的一环。

革命造反派是中学红代会的当然主人和中坚。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核心人物利用革命造反派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打击革命小将，压制民主，制造分裂，这种“复古”现象决不能允许长期存在。必须指出，其中某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破落户的飘零弟子，是再分配中的被动角色。

矛盾永远存在，新思潮在这个问题上战胜了、统一了，还会在更新的问题面前与保守势力形成不同看法。可以预计，今后在干部问题、教育革命问题上必定会有斗争；为了使文化革命不半途而废，代表新思潮的革命派就更不能轻放了“权”！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清华井冈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陈伯达接见清华大学师生讲话纪要

陈伯达：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天来主要的是简单谈几句话。现在已经六月了，快开学了，你们是不是九月份开学？

团派答：九月一日开学。

陈伯达：下学期又要开学了，现在又快放假了。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们请教一下。你们当先生。今天这儿有老师吗？

414 派答：有！

陈伯达：我是来当你们学生的。现行的教育制度毛主席多次批评，要来个革命，来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讲：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要不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它）实际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社会，都有不同的教育制度。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都不一样，我读过私塾，读了两年半的师范，都是封建主义的！我向你们学习！你们比我高明！

戚本禹：你人老了，老为人师！

陈伯达：后来，我就当了小学教师，大家不欢迎我，高年级学生长得比我高，年龄比我大，我吃不开。

每个阶级社会（奴、封、资）根据它的需要都有一套教育制度！现在我们学校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教学制度（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国在满清末年开始有高小、中学、大学。辛亥革命以后继续发展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国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又掺杂了一些帝国主义、买办教育的东西，燕京、天津、辅仁等大学都是美国人办的，他们的目的是为美国资本主义服务的，他的制度，基本教材都是从欧洲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教学内容有些改变，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但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动，又抄了苏联的一套，而苏联的一套也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教学制度，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有可以用的，可以吸收的东西，但全按资本主义一套来办学是不适当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应该有一套新的教学制度，在性质上和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有区别，苏联在开始时，莫斯科大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克鲁普斯卡亚有些改革的，后来又抄了资本主义的，莫斯科大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应该提出一个教育革命、教学改革方案，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毛主席已指出了，已经解决了，可是要具体化，要从群众中来吸收大家的意见，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怎样教，学怎样学，时间要多少？都要逐一加以解决，毛主席不断批评这个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大学毕业二十五岁了，青春时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都在学校了，脱离社会，脱离实践，

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演变，不知不觉可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仅文科要彻底革命，理工科也要彻底革命。

中国古时候教跟学是一个字，不能分开的，旧书上买卖也是一个字，后来商业发展了才分开。我讲这些不是要复古，是讲怎样正确处理教和学这个关系。学生可以当先生，先生也可以当学生，教学相长，你做我的先生，我做你的学生，你们研究一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这对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是一个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上是没有的，苏联是没有的。

教学的革命应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根据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你们这里出版教育革命的刊物没有？北大、师大出了一个教改刊物，还有框框，我还不大满意。你们可以召开座谈会，研究工科、理科怎样改革，研究教育制度的过去和将来。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百花齐放，不要不准人家讲话，不要一发表不同意见，就戴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的是从错误的改到正确的，有的是从正确的改到错误的，然后再改过来，也是允许的。请你们研究一下教改的问题，创造一个新的教学制度，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把它具体化，提出一套大体的方案，不然下半年你们怎么开学呀！确定以后可以使教学大踏步的前进，可以使思想大踏步前进，以便能够更快地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傅崇碧同志命令我来讲，不晓得灵不灵。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啊，我只是一个普通普通的小小的蹩脚的老百姓。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我就有点害怕了，心就跳了，因为乡下人看到人多总是有点害怕。听听就好了，不要作笔记，不要贴大字报，也不要广播，我是见了刀子就害怕，因为有许多学校的学生正在磨刀，准备大武斗。（陈伯达同志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堆刀子、鞭子等武器说。）你们都看看前面摆着的这些武器，都是要打死对方的。你们这样干有什么意思？人多、刀子多、力气大，那当然会打赢了。（吴德同志将“打赢”翻译成

“打人”，陈伯达同志说：“你看中国人不懂中国话。”后来又换一个同志当翻译，还是不行，最后仍由吴德同志翻译。）

我们中国人太多了，地方太大了，口音太多了，我们一个县就有几百种，县南边的人就瞧不起县北边的人，瞧不起东北边的人。倒过来也一样，也是互相瞧不起，不过，我们在北京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你们是按派来分，不是按口音来分别。你们在座的一千多人有多少派啊？（有几个回答：一派。）一派？一派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刀子。希望都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讲话不知道灵不灵，我的讲话对不对，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就是合不合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可以不听，如果合乎毛泽东思想，如果对人民有利，希望你们考虑。大学生的情况现在看来比较好，你们不是要向大学生看齐吗？傅崇碧同志跟我讲，最近大学生好一点，中学生准备你死我活地斗一下，我听了以后，因为没有调查研究，不晓得究竟是不是这样，没有把握，刚才进来看到一大堆武器，这当然只是收集的一小部分，还有“埋伏”的，我相信可能在准备干。

你们都是两大派吧？“四·三”派、“四·四”派。我是不三不四派，合成一派就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鼓掌）好像这个问题大家鼓掌不那么起劲。（又一次鼓掌）一鼓掌就算数了，可能你们在考虑，是不是搞“四·三”派、“四·四派”，所以开始的时候鼓掌鼓不起来，这个可以原谅的。我刚才有点强加于你们的意思，希望你们鼓掌，有点强加于人。大家好好思考思考，究竟是不是分这么两大派？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这么两大派，更不要两大派进行武斗。

我刚才说了，谁哪一派人多，刀子多，力气大，就可以把那一派打倒了，听说你们两派势均力敌，差不多，谁也打不赢谁。可能你们是不是有的制造刀子、鞭子比较厉害一些。有的学校有这些条件，有的学校没有这种条件，第六中学我就看了他们制造刀子的那个车间，那是很蹩脚的车间，制造的刀子没有现在这样高明，水平没有这样高了，好像你们制造鞭子的水平不断提高，（陈伯达同志拿起在台上展览的一把刀子）我今年在第六中学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刀子，现在看来，可见制造武器的水平比较高了，好像我们的原子弹一样步步升高，可是，不要拿这个东西杀自己的人，你们忍心把自己人这么一下子戳到肚子上吧？（作了个手势）恐怕这么一戳就死，是不是？有一个工厂杀了一个学生，只是这么戳了一

刀，就死掉了，再也救不过来了，你们忍心这样干吗？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革命，是革思想的命，是革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命，不要去革脑子，你要把脑子劈开来，把里面分成哪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哪一部分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分不清。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解决不了。

你们人多、刀子多、力气大打赢了，但是真理不一定在你手里，开始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方面，可能在一个人、两个人方面，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开始只有两个人嘛！他就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到现在，我们都承认我们是马克思的学生嘛，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所以真理不是在这个当中解决的（指刀子），是在头脑里面解决的。它懂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毛泽东思想，就有勇气，就有魄力，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现在你们不依靠毛泽东思想，不依靠马克思主义，只依靠刀子，这样死了很不值得。你们读了毛主席纪念张思德同志的《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吧？那里面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的同志跟我说：“现在武斗死了连鸿毛都不如！”我看连麻雀毛还不如，那为什么要这样武斗呢？我看不是在座的人都要搞，有的人唆动人去搞，不要上当了！

你们现在搞武斗这些队伍都要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不晓得还有什么样“队”。这些队都要不得，想一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跟我们说的，这样斗死了，是不值得的。我们为什么不留着我们的生命来为祖国服务，为祖国而死！有的究竟打死谁还闹不清楚，因为是群斗，还有，死的人为什么死，也闹不清楚。

你们准备大搞一场，这么一说，你们是不是高兴啊？可能大部分是高兴的，个别人不高兴或者只有一个人不高兴，或者在座的一个人都没有。你们自己想一想，用刚才那种刀子扎人家，你们自己扎自己一下试试看嘛，你自己不想扎自己，无缘无故地把人家扎一下有什么意思？而且扎的都是同志，将来可能是很有用的人。你们已经长大到十几岁、一二十岁了，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供应粮食给这些小孩吃，希望他能够工作嘛，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好好作了一个百姓嘛。不管是做工、做农，或者搞什么技术，或者还有一些什么旁的工作，像国家工作、军队，不然老百姓为什么要培养他？为什么一定要给他粮食吃啊？想一想，我们吃的粮食，一粒米来都不易。我们自己不要随便死掉了，也不要随便

把人家杀掉了。是老百姓供应我们粮食，要培养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是这样糊里糊涂就死去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毛泽东思想，我们随时可以牺牲生命，这样死就有意义，就重于泰山。但是，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就死掉了，死也要有个目的嘛！像这样武斗死了，实际上比麻雀毛还不如。

不晓得不是是说服了你们，你们赞成武斗就武斗吧。一定非斗不行，那我有什么办法？但我想说服你们可以吧？（众答：可以！）这个意见也是广大群众的意见，广大群众的要求，是从群众中来的意见。斗争是需要的，但是要用头脑，用思想，不要靠刀子。“四·三”派打胜了，这个“四·四”派又反过来把他们压下去，然后“四·三”派又起来，把“四·四”派又压下去，可能这样循环来做，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

你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吧：一个就是想出去逛，逛逛就要打人，好像不打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你们都是英雄嘛，力气总要使用一个地方嘛，这样想来想去，还是打人好，因此就准备打人了。现在我们在座的有联动的同学没有？联动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那一天我是见到福建的一些联动，他们叫“东海兵”，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人不认识。那天在政协礼堂这里开会，一百多人。我怕坐在后面的人听不见，我说后面的人都坐到前面来，结果，有的群众说他们是“东海兵”的，我就懂得了。我说，让他们到前面来，并不等于我同意他们的政治意见。他们的头都是剃得光光的，他们的确不大行，说道理也说不过人家，只会吵架。那天我给他们提供了两点意见。第一点，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把头都剃光了？他说，当时是破四旧。我说，破四旧怎么破到头发上来了，我们讲破“四旧”是破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这跟头发关系不大吧？女同志留头发他们赞成。女同志没有剃光头，这一点，他们比较聪明。他们没有剃头发一样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剃光头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小孩子的脾气，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将来他们留也可以，不留也可以，我没有固定的成见。我并没有说剃光头不好。你们在座的也有剃光头的。我在延安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剃光头。所以剃光头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愿意剃就剃，不愿意剃就留。第二点，我看“东海兵”那些同学的确比较娇嫩，又讲不出道理。我就跟他们说，要学做老百姓。不晓得他们听得进听不进就是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好汉，把自己跟群众区别开来。我劝他们学当老百姓。

学当老百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为什么经常说，我是一个小小的蹩脚老百姓呢，就是我对自已作了分析。我小时候做过一些农业劳动，现在我种地也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挑重担子我就不行了嘛。农业的技术劳动，比如插秧，我就不敢插，怕插坏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欢迎我们插秧，插秧有一定的技术。这个东西没有学过一个时候，不能随便乱来。种子放下去，有的长出来了，而且长的很好，有的就长不起来。我想退休到农村去，当一个老百姓，不像你们想当一个大人物。当一个什么样的老百姓呢！我只能做一些最简单的，不需要一般的劳动力去做的劳动，这些轻的劳动，我现在还是可以做的。这样我到农村只能当一个蹩脚的老百姓嘛。这不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吗？到工厂去，所有你们磨刀的这一套，我都不会。在这方面，我是你们的小学生，小小的学生，小小的学生。我如果到工厂去，只能做一些很轻便的简单的劳动，技术性的复杂的劳动，我就搞不了。这不是蹩脚的老百姓吗？所以我的这个称号是有根据的。

做工不行，做农也不行，那你教书嘛，我说，这倒是一条出路。我小时候当过两三年小学教员。可是，那时候我当了小学教员并不高明，个子很矮，很多高小的学生，有的年纪比我大，有的个子比我高，我说话他们不听，我讲课的时候，他们就哇里哇啦，所以，校长只请我教了一个学期。以后再到一个学校教，又教半年，学期终结的时候，又不要了。因为个子太小，不管教得好不好都不行，没有威信。我教学生的时候，还准备打学生。不是这种鞭子（指台上展览的鞭子），是竹子做的，有的学生吵吵闹闹，我就说，不要吵。我的话他们不听，我就把竹板拍一下，我自己好笑了，学生也笑。所以，根本不能当小学教员，现在当然可以了，老资格了，当小学教员该没有问题了吧，但还有一个最大的难关通不过，就是我的普

通话通不过，小学生听不懂。我小时候在家里教书，说的都是土话，所以语言不发生问题。现在如果是北方的一个小学，教书就发生问题了。你看，你们这些跑遍全国的人都听不不懂我的话，还要翻译嘛，那小学教员还要请翻译？所以我在北方教小学不行了。那么，我回到家乡教小学吧，又发生问题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校都是用普通话来教书了，我回去在小学生面前不敢说普通话，因为他们学习普通话，比我说得好，那我怎么上课呢，我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本事，教写字。教写字我也只能写楷书，草书也不会，篆字也不会，隶书也不会。总之

短处太多了。所以，从这方面可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整脚的老百姓。我这都是有根据的，你们不要说我是故意谦虚。

你们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刚才傅崇碧同志给我看了几张图片，小学、中学校破坏得很厉害，桌椅、板凳、窗户等破坏了（将照片亮给大家看）。当然，不一定是在座的同志破坏了的。我看现在复课闹革命，首先用自己的双手把学校修理起来，不晓得可以不可以？（鼓掌）由学生破坏的，由学生来修，不要再请工人了。这样你们也学一点本事嘛，又会修房子，又会修桌椅板凳，你们就变成多面手了。准备一个复课做条件，下半年上课了。一边上课，一边搞斗批改。你们大概都很想上课了吧，现在，首先把学生集中到学校去，一部分时间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时劳动，当泥水匠，当木匠，当修理工人，这不是有点职业了吗？我看你们当老百姓，可以当一个好的老百姓，不会像我这样一个整脚的老百姓。因为你们现在年龄还轻，精力充沛，手也灵活，脑子也灵活嘛。

搞大联合的问题。你们“四·三”派、“四·四”派坐在一起，大家交换意见，有不同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可以想一想，或者回来想一想，想多少天都可以，各方面都想得周到了，再回答也可以。有理还是无理，无理还是无理嘛。我说话不合你们口味吧？你们希望跳跳闹闹，我希望你们坐下来，你们希望散到各个地方去，我又希望你们集中到学校里头去。看看你们对还是我对，我不强加给你们。但你们也不要强加给我。比如贴大字报，就是强加给我了。

教育问题。这个教育行政是需要有人管理，现在教育部两大派的斗争相持不下，我昨天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建议，还是要搞大联合，不同派别开联席会议。你们也可以这样搞嘛。讨论我们这个学校应该怎么搞，将来教学应该怎么搞。教育行政没人管，现在分配问题、招生问题、升学问题都上来了，我现在请教育部两大派开联席会议，大家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因为对方已经作了自我批评，那就不要批评他了。阿 Q 头上有疮疤不行，这样就联合不起来了嘛。招生问题、毕业、升学问题，希望将来由教育部担任教育行政班子搞起来。

教育部有两大派，一派联系新北大，一派联系北师大。我说我既是新北大的好朋友，又是北师大的好朋友。你不能说我不是新北大的好朋友。（聂元梓同志插话：你是新北大的好朋友，是北大的好老师。）如果联合不起来，把我劈成两半算了。

可以开联席会议，先作自我批评，然后搞大联合。三个步骤：第一先整风，自我批评。总有缺点，不会完美无缺，不管缺点有多少，提一提，谈一谈嘛，根据毛泽东思想进行整风，这样就可以开联席会议了，就可以开联席会议了，就有开联席会议的可能了，不然一碰就拍桌子，说话说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开联席会议以后就可以搞大联合了。有时你们适合不适合，由你们考虑好了。

（讲到这里，陈伯同志因有事要走，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伯达同志又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赞成“联动”这些组织应该解散，插到各派组织中间。他们一定不散，一定要闹地位，那也没有办法，要等待他们觉悟。“联动”这些人都是小孩子，一二十岁，有很多就是没有见过老百姓。所以他们就弄不准什么是流氓。帽子戴的不端正，钮扣没扣好，衣服破了，鞋子没有穿好，袜子没有穿好，鞋带没有结好，就当成流氓了。我说按照你们这个标准，我们中国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要当成流氓了。他们出去没有接触社会，没有接触工作，没有接触工人，没有接触农民，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流氓，这对他们是很危险的，要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回来以后，不要歧视他们，赞成吗？过去他们有些人可能跟你们结过仇，但我们要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事业，要想一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过去那些旧账不算，那些仇都不要去记了，通了吧？（众答：通。鼓掌）看来这方面你们还要作一点自我批评，因为我说到这个地方你们鼓掌不热烈，所以说的要欢迎他们，是欢迎他们改过，是欢迎他们改过，并不是欢迎他们坚持错误嘛！（鼓掌）这样他们才有出路，不然，他们就天天在一起，想法糊涂。他们要跟你们接触，交换意见。他们的错误承认了就算了，他们是一二十岁的孩子，你还得要他们活下去，要他工作下去。好话还在后头，我先走了。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一九五五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知识青年发出战斗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国广大革命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的豪情壮志，带着毛主席著作，打起背包，冲破重重阻力，坚定地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奔赴内地，奔赴边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知识青年，不仅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促进思想革命化方面，也取得了成效。他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支重要突击力量。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他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成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战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认真改造世界观的伟大指示。他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散布了大量的毒素，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生意经，妄图把知识青年引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公然大唱反调，极力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他到处“封官许愿”，胡说什么“……认真地种三、五年地，到那时一切农活都学会了，农民能做的事，你们都能做，比任何农民都不差，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上一条跟群众关系搞得好的，具备三条，就能当乡、县、省干部，也可以到中央，那就看你各人的本事了。”这是向青年放毒，这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最害怕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对起来造他们的反的革命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迫害。特别恶毒的是，他们挑拨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关系，采取欺骗利诱、甚至克扣口粮等毒辣手段，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妄图以此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罪恶目的。所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属，必须擦亮眼睛，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一破坏阴谋。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揭露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的阴谋活动，彻底批判他们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干革命，应该协助他们把安置工作做得更好。对于一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要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否则，就会转移斗争大方向，就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凡是现在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

革命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返回生产岗位，应当和广大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农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且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女。

有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去，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怎样对待这些困难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在困难面前，革命的知识青年应该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从全局出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革命知识青年返回农村，是革命的行动。城市中的革命群众组织，知识青年的家属，应当坚决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迅速返回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革命干部应当热烈地欢迎，妥善地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

具体困难，凡属那些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各地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地帮助解决。绝对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任何借口，对重返农村的革命知识青年进行打击报复。

毛主席说：“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

一切要革命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你们的战斗岗位在农村，那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你们，那里的生产需要你们。你们要立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返回农村去，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生产搞得又好上加好。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战友们：

今天我参加你们的大会，很高兴。

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的人民群众，革命的中国青年，用自己的英雄主义，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这个新历史，产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文化、新的风俗、新的习惯，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智慧的灯塔。

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有钱人服务的，这种教育制度已经腐朽了。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将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人类历史上的崭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为穷苦人翻身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

你们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造这个新教育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一开头，不可能是很完善的，但它是无敌的，不可抗拒的新教育制度，将会在切切实实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起来。

希望你们遵循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用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力争上游，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搞出新样板。

祝你们的探索成功！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同志座谈纪要》

……为此，该文只供河造总内部传阅。

一、刘建勋问题

我们问：同志，你认识唐伟吗？

414 同志答：认识！认识！唐伟是我们的战友，他对我校文化大革命贡献很大。他是一个好同志。

（按：唐伟对河南文化大革命“贡献”更大）……

问：蒯大富在河南问题上的作法对吗？

答：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目的是实用主义的，他在刘建勋问题上押了一个宝，为的是把唐伟打下去。同时把他的一批战友也打下去，以实现蒯大富个人和其小集团的集权。因此对蒯大富来说，河南问题无所谓正确不。搞赌博嘛！胜利了是一个“赌”字，输了也是一个“赌”字。没有甚麽无产阶级原则可言。但是在客观上来说，唐、蒯在河南的作法折衷一下可能对河南文化大革命更有利。

（按：两条路线斗争怎麽能折衷？）

（按：恶毒攻击蒯大富，不知道唐伟在河南又押的甚麽宝？）

问：你说唐伟和我们河造总搞刘建勋对吗？

答：……後来我们理解了，因此我们不喊“打倒蒯大富”的口号……要有主要矛盾的概念，一个时期主要矛盾只有一个，搞多重心，主要敌人是会跑掉的，革命就要失败。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你们和刘的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不祇是一次。

（按：无非说，目前不能打倒，以后再……）

二、河南革命大联合问题

问：听说中央肯定了河造总是做为联合核心的造反派，同时也肯定了二七是犯严重错误的、组织很不纯的造反派。此外传说战斗师铁军等也被肯定了，而对八大总部未有绝对否定。你认为此消息可靠吗？

答：从“文汇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近来社论及中央处理各省、各市、各院校问题的方法分析，我认为这个消息完全可能是可靠的。

问：为什麼不绝对地否定八大总部呢？

答：八大总部大部份不是甚麽保守派……二七公社用敌对的办法对待八大总部其後果是不堪设想的。

第一（略）。第二造反派和他们的矛盾，特别是二七和八大总部的矛盾还会向敌我矛盾转化。武斗风会更猛。第三，……相反，河造总这个较好的造反派有可能被二七极左思潮冲垮。文化大革命就会走弯路。……

问：那为甚麽不让二七当核心呢？

答：……再说二七公社，它们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时，它能起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第一，极左的特点，排斥一切，搞集权，也就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团派思潮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掌了权，用坏人去镇压逆流“托派”，排斥一切。结果统一的清华井冈山祇好分成两半，当然最後清华是要联合的。但再联合起来，“核心”就要转移了。党内历史证明极左思潮可以改造利用，而不能掌权，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得到证实了。第二，在河南二七极左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严格地说由于二七组成很杂，思潮极左，它和其他组织的矛盾特别是和八大总部的矛盾有一定成分是地富反坏和工农兵的矛盾。目前以二七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是很困难的，在河南人们心中也是很难通过的。於是核心的作用就历史地落到造总头上了。……

三、对河造总策略的建议

问：你是否谈谈河造总下一段应采用甚麽策略

答：具体的说，争当核心的主要是二七和河造总，这决不是一般的山头、风头问题，

而是两种思潮的争权。也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和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团结大多数思潮的争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造反派内部的反映。

问：你的意思是否先团结八大总部後 再联合二七呢？

答：形势确实如此，实质上是河造总和二七展开路线斗争来解决争夺“核心”问题。河造总的成分和思潮是能代表八大总部工农兵群众利益的。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是路线斗争问题。庸俗地理解为山头之争是不对的。

问：再具体谈谈如何对待八大总部好不好？

答：……同时要向他们说明二七思潮的危害性。

问：我们和铁军战斗师摩擦相当大，再加上他们组织中也有保守的，联合不起来怎麽办？

答：……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而不是为了追求队伍的纯粹而战。有一些组织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路线觉悟低，可以帮助嘛！我觉得战斗师铁军好像是造反派组织，人家去八大总部，是你们关门的结果。……

问：联合时权分散了甚麽办？

答：……铁军很多是革命小将。要注意引导，联动起先也是革命小将。……战斗师、铁军等愿意搞拢我们就要共同掌权，对过去问题要多做自我检查。要相信他们的觉悟。……

问：你的思想方法很有意思，我们理解了，你再谈谈对二七怎麽办？

答：从二七的历史来看二七要改正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河造总要帮助二七改正错误，清洗组织，否则以后大联合就困难了。但是我们河造总同二七联合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河造总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或基本解决八大总部问题，真正使核心巩固，（原文不清……）这一点河造总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当然根据二七的特点和它的地位与八大总部的差别，策略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四、军区问题

问：你认为军区如何？

答：河南军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但有错误，原因是军区党委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理解不深之故，此外阶级斗争的策略性差……

五、内部问题

问：请你对河造总提提意见吧！

答：河南问题很复杂，河造总能处於这样的地位表明河造总是一个先进的造反派，他的政治敏感力很强，他的政策观念也很强。很多地方很值得北京造反派学习的。……

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帮助工农兵掌握大方向，没有理论班子，没有笔杆子队伍是不行的。……

目前河南谣言很多，对中央不忠诚，转达中央指示为我所用，作风不正，坏象百出，二七特别严重，其他组织也有。我们要学习二七的阶级斗争观念，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要注意斗争艺术，但不要学习他们的资产阶级手腕……

由于时间关系这份座谈纪要就介绍到这里。（下略）

转载于 河南二七公社、郑大革联 1967.7.17 出的《革命造反座谈纪报》增刊第二号

（来源：转载于 河南二七公社、郑大革联 1967.7.17 出的《革命造反座谈纪报》增刊第二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狂飙骤起，怒涛澎湃。一个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风暴，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

这一派大好形势，对于一向奋战不息的红卫兵小将，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

一年来，千百万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紧紧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横空出世，英姿英发，“杀”上历史舞台，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叱咤风云的勇敢闯将。

红卫兵小将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挥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上扫九天残云，下斗四海恶浪，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

红卫兵小将们，赤胆忠心，不怕牺牲，以革命的大无畏的精神，横扫群魔，力挽狂澜，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卫兵小将们，同广大工农兵一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直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巢，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红卫兵小将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惊天动地的不朽功勋，将永远彪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史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

被打落水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是一群吃人的鬼蜮、喝血的豺狼，是卖国求荣、杀人眨眼的殃国大盗，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的本性是至死不会改变的，总是妄图在将来的某一天把革命人民淹没在血泊中。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难道能忘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忘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忘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变吗？不能，绝对不能！在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忘记这些就意味着背叛！

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次大决战。

革命的大批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扫荡，是为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的崇高事业。

广大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在革命大批判的硝烟烈火中大显身手，再展英姿，“杀”出新的威风。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敢字当头，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集中智慧，集中力量，集中目标，痛打“落水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使他们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善于思索”，要“多思”。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多思出智慧，多思长才干，多思有希

望。革命小将，既能冲得上去，横刀策马，纵横驰骋，砸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阎王殿；也能坐得下来，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红卫兵小将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广大工农兵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他们是这场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红卫兵小将只有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谱写出革命大批判的壮丽篇章。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归根结底，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彻底批判旧世界，把革命大批判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

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说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比欧洲文艺复兴伟大千百倍的革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无法比拟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样伟大的革命，这样伟大的时代，更是需要和产生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巨人”。革命的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在对旧世界的大批判、大斗争中，一定能够成为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巨人”，成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时代的峥嵘岁月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虎狼当道的旧世界进行了最无情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多么广阔的胸怀，何等伟大的气魄！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榜样，在革命大批判中做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

一、打倒反革命刽子手陈再道！

二、打倒反动组织“百万雄师”！

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四、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五、把 8201 部队中的一小撮反党叛乱分子揪出来示众！

六、以血还血，还我战友！以命抵命，血债要用血来还！

七、坚决打倒刘邓的猖狂反扑！

（引自 1967. 7. 24 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信

北航红旗四五一班战士并转王芬同志：

我在六月十七日的北航《红旗》上看到了四五一班红旗战士《热情帮助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投入战斗》的报道，也看到了六月二十七日北航《红旗》刊登王芬同志写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的文章，最近，又收到了王芬同志的来信。我同四五一班的红旗战士一样，看到了一个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同志们耐心的热情帮助下，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决心起来革命，心里感到很高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王芬同志虽然在运动中犯了一些错误，但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克服了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迅速地认真地改正错误，提高认识，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来，同革命的同志们并肩战斗。我相信，象王芬这样的同志，改正了错误以后，一定能同北航红旗的战士一起沿着革命道路胜利前进。

祝北航四五一班红旗战士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迅速地成长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希望通过王芬同志转告去年下半年因不同意北航红旗的观点而同我进行过辩论的北航红卫兵同志们，能够抛弃过去的错误观点，纠正自己的不正确认识，努力投入当前的大批判运动，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

戚本禹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刚刚由武汉胜利归来的谢副总理，在我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到钢院来了，这是对我院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和支持，这是对我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最沉重打击。八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谢副总理乘坐的汽车直达我革命造反公社所在地革命造反楼前的广场。下了车，谢副总理首先在楼前看了看，然后，在我公社战士簇拥下，步入革命造反楼一楼大厅，和我公社战士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要我们进一步狠抓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打倒。我公社战士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谢副总理表示，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谢副总理在我革命造反公社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广大战士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向谢富治同志学习，向谢富治同志致敬！”“感谢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革命造反公社的战士和 5.16 战士群情激动，他们说：“谢副总理来临我公社，并做重要指示，这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大长了我革命造反派的志气！”两点左右，我公社战士建议谢副总理去《延安公社》刚刚占据的理化楼和主楼察看一下，谢副总理同意了，由我公社负责同志李洪刚、田怀中陪同前往。因理化楼积灰满地、石块、木板、铁管子等障碍较多无法进入。谢副总理在主楼前停了一会，就召集延安公社的代表到教室楼商谈，并主持双方签定了协议。〕

谢副总理说：“对钢院不了解，来是主要解决武斗问题的，今天（指七月三十一日）你们两个同学讲钢院都打死人了，你们还不去看看……（这两个同学是《革造》去市革委会反映情况的）我今天开完会就来了。”

谢副总理问到两派各有多少人时，

《延安公社》代表说：“我们四千三百人。”

革命造反公社的代表揭露说：“不对，我们按班级单位进行了全面的统计，他们是 3100 人，我们是 2800 多人，还有一些自由战士等。”

（延安公社代表吵）

谢副总理说：“不见得人多就正确。你们分歧的焦点是什么了？”

我公社代表回答：“是高芸生及以高芸生为首的前院党委的问题，我们要打倒高芸生，他们要保高芸生，说高芸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教育革命左派……”

当我公社代表介绍郭强同志被害情况时，

谢副总理说：“打死人就是不对嘛……”

我公社代表向谢副总理汇报说：“《延安公社》的凶手罗思玲已逮捕，押在第二监狱，这件事是市革委会向前同志（市革委会副秘书长）亲自主持处理的。”

后来又谈到了冶金部问题。

谢副总理要我们狠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狠斗王鹏寿。说：“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同志组成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当谈到协议时，谢副总理说：“毛主席的伟大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你们要好好学习，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的观察，正确的处理，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都不要把形势分析错了。”

我公社代表热烈鼓掌，表示坚决按谢副总理指示去做。我公社战士提到吃饭问题时，

谢副总理说：“这也可算协商的一条嘛，把它写上……”又说：“我对你们两派没调查、我相信你们的话。我相信革命造反公社，相信延安公社的同志。我不知道你们两派怎么样。到北航、地质找他们两个来（指北航田东同志和地质王大宾同志）。他们两个都有点倾向性，但是差不多。出外去，叫带红卫兵，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所以到你们学校来带了两个红卫兵。你们两派都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要互相打……”

我公社代表说：“我们要联合搞大批判，连一天都不希望‘打’……”

谢副总理说：“你们要打倒刘、邓、陶、彭、罗、陆、杨，把他们批判透。第二、你们要联合大批判，这一点很重要。第三、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还有林副主席，还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走了许多地方，中央文革小组是相当有权威的。所以那些保皇派，保守势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不敢公开，所以他们就反对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把他打倒！谁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打倒谁！”

谢副总理说出了我公社战士的心里话，我们就是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血战到底！

在谈到“三结合”问题时

谢副总理说：“哪个干部该结合，哪个干部不该结合要商量，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打‘内战’……”

在谈到大批判时，我公社代表说：“为了搞好大批判，促进革命大联合，我们提议与延安公社联合斗彭真，时间是为八月八日。”

谢副总理高兴地说：“写在协议上，我可以批给你们，不过不能互相攻击……。”

田东同志念协议时（协议由田东同志起草），延安公社的代表又说：“人不要具体，因为我们还想斗林枫。”我公社代表说：“斗林枫也可以联合会斗！”

当念到有关食堂用餐问题时，延安公社代表说：“食堂需要检查，怕有毒。”

谢副总理说：“什么检查？！我去吃！我不怕毒，不要听你的……到食堂吃饭不准打架，我们今天完了以后就到你们食堂去吃饭。”后来谢副总理又说：“建议写上一条，学习一星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谈到建毛主席塑象时，

谢副总理说：“联合起来不行吗！……建主席塑象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五六千人都来建？”（我公社代表鼓掌）

在谢副总理的主持下，座谈一直进行到早晨六点多钟，达成了十一点协议。这是对我革命造反派极大的支持和巨大的鼓舞。我们坚决按谢副总理的指示去做，坚决执行和维护这个协议，把革命大批判推向新的高潮！

六点十五分我公社和五·一六战士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列队在教室楼前，热烈的欢送谢副总理。“毛主席万岁！”“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向谢副总理学习！”“向谢副总理致敬！”口号声、掌声和歌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谢副总理乘坐的汽车穿过我公社和五·一六战士的队伍，缓缓离去。

陪同谢副总理来我院的有航院红旗田东同志和地质东方红王大宾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一战士《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注：据了解，信的作者是四一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负责人，四一四核心战斗组《云水怒》的负责人周泉纓。）

XX 同学：

你的来信收到了，请你代我向全体河南造总的战友问好！并向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下流血牺牲的战友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挫折和困难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他将严整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的意志，打光我们的媚骨，“公正”和软弱。形势将逼迫我们更加独立自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析河南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主张，我们能够修正自己在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消沉、决不颓丧。我们更要千百倍地振奋，更加猛烈，更加巧妙地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大联合的核心人物来。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在这痛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因为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到曾母暗沙，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主力军！也只有依靠我们，依靠这一支唯一能够真正代表工农兵和广大劳动人民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是历史的结论。

而上述问题都将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们作一些探讨，对在艰苦奋斗中浴血奋战的战友也许会有用处。

一．阶级关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伟大，空前深刻的大革命。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而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问题，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领袖所在的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领导中国的工农兵解决这一最伟大的问题。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为任一场大革命都是变更阶级关系并解决一个相应的政权问题。这点文化大革命和一切革命是一样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阶级斗争没有熄灭！阶级斗争依然在急剧地进行着。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将通过更新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指出的，通过党内“走资派”，夺取政权实行和平演变。而无产阶级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决地进行反复辟反演变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它不断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

在这场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首先发明和扶植了一批无产阶级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先进力量，他们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最迅速地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用毛泽东思想去领导广大劳动人民与自己队伍中演变的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将进行一次一次的大革命，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没有这新生力量来替换先锋队中的腐朽力量，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支力量也在新陈代谢。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相应政权问题的解决。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与民主革命以及苏联本来的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和基本事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

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否定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的现实或片面强调文化大革命前阶级关系的稳定方面都是错误的，都可能会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坑，成为右倾保守思潮。

但另一方面，抹杀文化大革命和其它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的大翻个儿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大革命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估计，也是极其反动的，是极“左”的，其结果必然从“左”的方面来复辟资本主义。

当然，目前来说：第一方面是最主要的，但是也必须注意第二方面，否则革命以后也会出现另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分路扬镳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两种造反派（即团派和四一四）一系列深刻的原则分歧的争论点。

二. 派别的规律性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那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那些派别。”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也是如此，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最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 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

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的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支造反派统一的称呼：四一四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

四一四派和团派在解决和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同一战场是战友，在“走资派”的白色恐怖下尤其如此。当然两派在战斗中都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例如有的团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四一四派一定程度上保了军区反动路线，但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点明，一般他都改正错误，在大敌面前重新统一起来，今天河南造总改正错误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个别地转向反面是有的。

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至于发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时，四一四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上升。

由此可见，四一四和团派的分歧是有规律性，而且是非常原则的，不可调和的。

从历史上看，四一四派几乎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最早杀出来的造反派，她的历史最久，在和刘邓血战中功勋最大。当团派的很大一批骨干力量外流、躺倒，以至于向保守组织交悔过书的时候，往往都是四一四这批造反派在白色恐怖下，争取胜利。不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由于认识问题也犯有这样那样的右倾错误，但是比起溜走、躺倒，以至于倒戈来总要好上千万倍！退它一万步也为造反派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从政治观点上，四一四思潮是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关于防修反修的伟大理论，不仅牢牢地记住当前的主要敌人，坚决地打倒他们，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战，而且能够看到大革命以后的全面的阶级关系以及长远的防修反修的目标。对将受蒙蔽群众，努力团结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和要革命的干部，四一四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所有这些都是防修反修必须的。

而团派, 由于他们的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 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散布的打倒一切, 怀疑一切, 排斥一切的无政府思潮的影响, 他们要“大翻个儿”, 妄图根本变更十七年来的基本的阶级关系, 而重新划分什么“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由“造反阶级”来压迫“老保阶级”, 实现什么“财产权力再分配”即是说要把“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据说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又是谁呢? 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吗? 不是。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是有权的。对他们来说是如何掌好权, 用好权的问题, 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而绝不是什么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 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 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 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 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 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这种“大翻个儿”重新划分“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实行再分配”等等, 团派思潮的实质是十分反动的, 这也是团派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 如何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 如何正确对待战友和同盟者, 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屡犯错误”并且“屡教不改”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 造反派中的两个派别, 两种思潮向往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前途, 因此尽管在当前对待党、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上是暂时统一的, 但是一旦这个主要矛盾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两种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地提到日程上来,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可以肯定, 团派作为一种思想是一定要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的, 其顽固的代表人物滋长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历史所淘汰。当然团派的多数优秀分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 将会抛弃这种极“左”的思潮而布尔什维克化, 或劳动人民化。

三. 斗争的复杂性

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 局部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是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 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

命，各个阶级的代表势力都纷纷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以便让历史对我们进行选择，胜利的胜利得更彻底，垮台的垮台得更痛快。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这是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需要从外部向工农群众灌输。这个灌输的过程是少数教育多数的过程，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重新学习如何在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的过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会受蒙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内部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

毛主席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中正确指出，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一方面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于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这样的复杂情况：一方面我们的主要敌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运动中的次要矛盾，比如人民群众中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工农兵和他们的次要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来掩盖运动的主要矛盾，转移群众斗争大方向，以图保护自己。有时他们利用“造反派”队伍特别是团派的队伍不纯挑动受蒙蔽群众去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有时他们则通过无原则的吹捧利用团派中的“极左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所谓“右倾势力”的四一四派，特别是参加过保守势力的曾受蒙蔽的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等等，等等。归根到底，激化次要矛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手中的大权，并且有朝一日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次要敌人，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他们表现得“极左”，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要求最迫切，他们咬牙切齿妄想一棍子把受蒙蔽的工农群众打成“保守阶级”，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压迫“保守阶级”的“造反阶级”他们仿佛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桨，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把船撞到暗礁上，以便来个阶级关系“大翻个儿”复辟资本主义。当然，他

们也很清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他们自己在台前表演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拼命地在造反派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在实际中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往往利用“团派”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家的狂热性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去打击四一四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篡夺政权，为全面复辟作好准备。

应该注意这里决不是“几条小鱼儿”在翻浪的问题，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隐患，其形式完全和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类似的，只不过是反动阶级新的代理人的手腕，可能更高一些，形“左”实右的迷惑力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在夺权的时候不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在各个局部的地区，正如毛主席说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于这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切不可丧失警惕，被敌人利用。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有革命的魄力和铁的手腕，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把走资派手中的权统统夺回来，我们要结集最最可能的同盟军，甚至大魄力地利用一切次要敌人的力量划几桨，然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彻底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刻毫不犹豫地将其打落水中。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相反，对待防修反修的主力军，对待受蒙蔽的工农兵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力求使之不向敌我矛盾转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按照毛主席教导，坚决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这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列宁对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艺术作过科学的总结，他说：“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那怕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那怕是极小的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宁强调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这就是说，这种斗争艺术也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法则。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

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不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超阶级的“公平”“合理”思想，都将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坚决肃清他们。

四. 军区问题

全国各军区进入运动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局势起了极大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支左工作，他们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愧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子弟兵。许多军区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坚决支持造反派，特别是支持成份比较好的，代表广大工农兵最高利益的四一四派。

但是就在这时，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团派的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联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时扶植保守势力，并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和团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首先打击团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

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时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三，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

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于是二、三月份之后，各地造反派出现分裂，保守派重新抬头，大规模武斗发生，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政变，局部的武装暴乱事件，文化大革命遇到新的障碍。

在新的障碍面前，必须出现新的高潮，四一四派和团派都开始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当前最关键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军权问题和支左问题。因此两支造反派的主攻方向开始统一起来，这里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然而四一四派和团派由于组成成份，发展历史和思潮特点有质的差别，因此在对形势前途。敌我友力量的分析以及战斗的部署和策略等等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团派认为各个军区犯错误的原因完全是黑手操纵的，完全是自觉地和林付统帅的对抗。因此团派的同志嘴里不说心里想的是自下而上地象去年炮打司令部那样去冲军区，“彻底砸烂”“彻底平反”。对待压制过自己的保守派，基本上是“文攻武卫”，象对待蒋介石的士兵一样，对待四一四派特别是对那些在对待军区和对待团派有错误的四一四派则是“二白匪”“二老保”坚决镇压，完全吞掉！而且应该比老保首先吞掉！

在团派看来，全国都是如此，才是枪杆子已经完全被“敌人”掌握了。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枪杆子的领导权，局部地改善军权，变成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武装夺权，象以前那样，团派对军权问题，对枪杆子问题是很敏感的，很重视的，很坚决的，他们很快就把主攻目标转移到军区问题上，然而私字夺权观，将使他们犯错误。他们想夺权的是基本上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军权，想来一个“造反阶级”压迫“保守阶级”的军权“再分配”这肯定是要碰钉子的。

总之，团派的种种分析和种种作法将更加激化那些次要矛盾，将在实际上模糊主要矛盾和分化、削弱造反派。

我们四一四派则认为，首先必须紧紧跟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部署，对军区的问题，军权的问题，对枪杆子问题必须给以极大的重视和充分的估计，克服过去对枪杆子对权不够敏锐，不够重视，不够坚决的弱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枪杆子是无产阶级的，任何私字夺权观，把阶级的军权割据为小山头的，某个小团体的武装的企图和作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军权只能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权，而决不是“造反阶级”镇压“保守阶级”吞并自己战友的权。

对于军区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划清界限，对于伸向枪杆子的黑手必须揪出来，坚决斩断。但是，我们四一四派认为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有最高的权威，我们的军权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亲自领导

的，是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无产阶级将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拉出去，打进来”的阶级敌人以后，我们社会主义阶级状况是不可能有什么原则的变化。政权，特别是军权将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此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必须坚持四一四派的特点，坚持四一四派在对待受蒙蔽群众和犯错误干部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有革有保，该打倒的坚决打倒，该保的坚决保。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象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在军区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再想借手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状况下，党内军内走资派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群众，并使用他们充当全国规模的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即没有能使受蒙蔽的群众及战士所接受的公开的政治号令，又没有足够的舆论。因此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军区，各个解决他们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已经这样做了。

重要的是，主要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听从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号令，进行着一切必要的军事布局和政治准备，以应付一切突然的事变。所以只要处理得当，全面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应当看到，由于本身的弱点，相当大部分的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对待团派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现在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四一四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正如你信中说的：河造总当前就在打倒何远洪，改正错误，完成这个转变。

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完全不等于不准备战争的一手，特别是有人要用武力吞掉我们，打垮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采用相应的自卫手段，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局部地正在进行着初步形式的自卫现代战争了。但是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或者继续发生局部暴乱和大规模的武斗，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的。那些只知道空喊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对武装斗争的阶级斗争，阶级目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做调查研究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的人和忽视武装斗争的

人一样，同样是可悲的。由毛主席把握轮舵的革命航船将绕过一切或明或暗的礁石，奔向共产主义！

我们四一四派应为实现我们的政治观点，实践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努力奋斗！

五. 四一四思潮必胜

当前各地团派一片呼喊：“河南造总要垮台了！哈尔滨山上派掌不了权！武汉三新靠边站！……清华四一四派必败！全国四一四都完蛋！”有些团派同志企图把四一四派打下去，扫除夺权斗争中的“隐患”。

可是他们不知道，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即使是日趋破落的政治势力，在未完成历史使命时都不可能人为地将它推出历史舞台，何况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四一四派是压不垮、吞不掉的。暴力有时后看起来是万能的，但暴力一旦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最高利益就会被新生的暴力所消灭，个别的四一四派也许会被走资派所操纵而走向反面或被压垮，但从整体看，四一四必胜！

为什么四一四必胜！首先，在当前的各派别，各思潮当中，四一四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说：“革命准备年代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七年间以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二零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他们最初的提法。”……各阶级成份一贯表现，特别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考查，四一四派是最接近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的。如果说四一四派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么克服这些缺点错误就将四一四派无产阶级化，布尔什维克化，将四一四派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完善起来。四一四是在克服着种种困难，在各种批评指责，甚至总在打击下“锻炼自己所必须的政治思想武器”。这时为了迎接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必须经历的痛苦的过程，困难和曲折的局面，胜利在等待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派。

而团派虽然也有许多真正勇敢的造反派，他们完全能够布尔什维克化。但团派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接近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当中不可改造的真正的代表人物的政治目标并非是为了防修反修，因此作为思潮而言，当他发现已经完成历史交给它的冲锋陷阵的任务了，到那时候这个思潮的顽固代表人物也被无产阶级的手腕捏得粉碎。

更主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从一小撮走资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并且稳固住这个权，就必须有四一四这样一支真正的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为核心，现在全国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夺权的，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我们和团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固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

只有四一四派能够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和 95% 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一四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四一四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看不到这一点，在这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总觉得自己比暂时优势或暂时被团结在“统一战线”内的其他派别矮一截，因而软弱退缩，迟疑不前，这是四一四派内部目前最主要的右倾危险。

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列宁说过：“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的经济破坏比对国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大的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况，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确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种人在大转变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

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又说过：“在革命已经暴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可以说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革命化的四一四必胜！

你的战友× ×

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在四一四内部印发《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按语按语：

这封信是我们一位同志给他的一位战友的。

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信中的坚持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观点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四一四思潮”。

我们坚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思潮会取得最后胜利。

予此我们发表该信全文，以供革命同志参考。

清华大学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来源：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三、北京高校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错误估计形势提出第三次大串连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昨天，大家讲了些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跟大家商量一下，谈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个大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新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地主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个革命的出发点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革命的性质，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一种正确的估计。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胜利的道路上，形势大好，全国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而现在，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锻炼，但是，还没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大吵大闹兴趣高，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是不能进步。闯劲大，闯的思想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对不对？

你们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里去，车间里工人倒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还有一个毛病，你们

下去是不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去了，这对不对？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而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带下去派别观点、结果影响人家生产，那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到底是个别人的估计对，还是中央估计对？请你们作一个判断。

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们的估计就想反了，中央说你们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的个别派别估计就与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学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行动就徬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联，包办代替，以为没有北京学生，其它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出去串联，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下去，呆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不知对不对？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不是原则的争论，而是无原

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看，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学习得不够，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比如武汉市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引的轨道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级。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谈过，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相结合。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得不错，你们的小报有的搞得不错，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成绩。你们现在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破坏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好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

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这个武斗很残酷罗。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比如江西连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村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之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会帮助他们。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还是搞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

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风头主义？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象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国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要在全国内每一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代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

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康生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多讲了。

讲到分析形势，都具体的作了解释。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我想讲一点。江青同志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了形势。我有个补充的事例，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两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那篇文章是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讲了国际的大好形势。那篇文章讲了三个里程碑，讲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文章中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不可能解决，毛主席解决了。

比如列宁，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里提出这个问题，但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 28 年以前还承认了阶级斗争。到了 36 年就否认了阶级斗争。直到他逝世前两年才讲到有阶级斗争。是谁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呢？是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巨大意义。

文章的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不要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三次就能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文献上有记载。难道我们当前还不是大好形势？！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仅不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根本问题就是没掌握好毛泽东思想。《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创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诬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一个英国共产党做工会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参观。他看了以后回来就说：我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这么高。我回答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诬蔑是他们不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那些诬蔑我们的人是缺乏起码知识的。

我们对毛主席要好好学。我们学得实在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想一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多少，领会了多少，应用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这是我人经常应该想的。少打点“内战”，不要光想站着两条腿这里跑跑，那里逛逛，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没有那回事。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

自己，就会少打“内战”了，我们用“五·一六通知”和 5·17 社论来检查，就发现我们学习得很不够了。

另一点，我想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敌情观念，还有帝国主义，还有修正主义，还有蒋介石匪帮，难道他们不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干反革命活动吗？来破坏吗？昨天我们收到香港寄来的一本书，书名叫“刘少奇语录”，上面有刘少奇的象，刘少奇题的字，也有 33 条，写这个书的人叫司马义（晋）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反动编辑。这就告诉我们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这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只能说明他们穷相无聊的，是接近死亡的。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讲话，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江青同志说要有比较。首先敌人是什么样，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

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腐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一枪。他开始采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出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几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五·一六通知》证明主席的预见，最后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念最后一段），刘邓陶是后来被揪出来了，《五·一六》是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献，所以苏修感到挖了他们修正主义的墙根，就把赫鲁晓夫从垃圾堆里拉出来，污蔑我们

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刚才康老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象，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认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还在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象出进。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大的小的都证明这一点，英帝、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中作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

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 5000 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事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查。去调查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我们搞了个决议。66 年毕业生，生活问题我们解决，9 月份发工资，国家供给，因为已经一年多了。67 年毕业也差不多。困难由国家来负担。至于分配地方，如果那儿需要，你也原意去，就离开学校。实在不行的一般地暂时还留在学校搞大批判。详细情况，条文上有。细节研究一下，马上发下去。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

谢富治副总理的讲话（记录不全，大意不变）

同学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是重要的会议，几位同志都讲了话。三军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有四位首长讲了话。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想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我们来听听。

今天的大会，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来了。杨成武同志有事没有来，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

我有个建议，希望把四位首长的讲话，整一份纪录，发给大家学习，学习一个星期，然后，结合社论、中央指示，配合当前形势，当前的《红旗》《人民日报》等社论，讨论一下。整理稿，最好几个学校一起整理，不要每人一样，对我有利，我就要，没有利，就不要。武汉三钢三新最近就联合整理了一份讲话，很好。

文革小组同志批评我，说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的不好。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我听不到大中小批判，听不到大联合。只听到吵吵嚷嚷，武斗。我光和稀泥，在大联合上我有缺点，要承认。在制止武斗方面，我也有缺点。但我好几次强调了哇！我还和工人讲，你们上街游行反对武斗。我一定要参加！

同志们要把大批判搞好不要搞武斗。我们还沿着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方向去干，我们应当注意。是按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的路线去做，还是按某一个学校什么动态报的形势分析去做？应当注意。

首都红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但也有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发声明，还挂着什么红代会的牌子，这就不好了。

关于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月份，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一个重要口号。

还有一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我去过京西煤矿，那里搞不好，北京的煤就有问题。你搞武斗，不要把一万吨煤给搞掉了。我们还要关心铁路工作，

我们要强调。最后还强调一下，不准冲中南海，不准冲人民大会堂，也不准冲钓鱼台。不要光贴大标语，什么谁的讲话好得很，问题在于好好地学习，

对四位同志讲话要忠实记录传达、整理，不要贴一张大字报，什么好得很。大家也不知什么内容，就各取所需，

康老插话：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

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一下。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一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总理插话：我很关心铁路。

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外作战部《井冈山通讯》（号外），1967. 8. 12
图博文物口革筹小组翻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

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并告北京市大中学校红代会各同志：

昨天，北京街头出现建工新八一贴出的大字报“斗刘实况”和建工八一贴出的“师大附中革命派八月十九日与刘平平谈话纪要”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同上次出现的斗彭大会上的大字报一样，毫无批判，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毒的话公开出来，客观上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做了义务宣传员，这是非常错误的。

新、老八一的红卫兵的某些同志，特别是新八一红卫兵的一些同志，在大批判中作出了一些成绩，便骄傲起来，发展了风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不顾影响地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毒的话，加以扩散，以至犯了上述错误，是应该引为教训的。希望你们讨论一下这件事，改正这个错误，不要再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希望作的事，上他们的当。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冲外交部一事的电话指示

〔26 日晚，北外红旗大队经总理批准在人大会堂斗批陈毅，此时北外造反团地院等冲击了外交部。陈伯达同志 26 日晚对北外造反团冲击外交部一事作了三点指示。〕

- 一、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冲击今天的批陈是错误的。
- 二、今天揪陈毅是错误的。
- 三、立即撤出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会，批判谭厚兰，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各个高校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指示不准搞谭厚兰。谁要批判谭厚兰就要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使，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的指示

总理联络员王文正同志 11 日晚 11 点对二外红卫兵电话传达总理指示：

一、有人去印度使馆问题总理已经知道了，并与外交部取得联系，没有中央命令不要随便自己行动，游行示威。

二、有关 11 日下午外交部“九·九”展览一事，你们造了反，和留学生封了展览。封了就封了，以后不要再去了。总理曾派我们几个联络员去外交部了解过这个展览，打了报告交给了总理，总理正在审查。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开放与不开放之前，不要去展览会采取什么行动了。

三、不要打人，不要抓人。他们封了校，不要去管他，有什么情况及时反映。对“五·一六”可疑分子整理材料上交，由中央处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 支队《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最高指示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伟大的转折完成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小集团暴露了他们全部诡计和阴谋相继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从他们手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文化……革命的权，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避开了一大暗礁，将革命的航船向最后胜利的方向急驶！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反革命两面派的顶峰，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向先进的革命势力作最后的拼死挣扎的产物。袁世凯以他反革命两面派特别的“机智”和特别的“手腕”夺取了清朝皇朝的政权，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革命志士的血泊中又竖起了一个封建王朝——袁世凯王朝。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袁世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两面派手腕搞垮的不是革命人民，而是他自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袁世凯和他封建的政权被革命的浪潮淘尽了，而袁世凯以险恶的两面派手腕而遗臭万年。

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势必要以百倍的疯狂，万倍的阴谋来作最后的挣

扎，因此袁世凯式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他们看到他们原来的主子已经被革命人民打倒在地了，并且踏上了千万只脚，要重新翻身一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就利用在党内的地位，搬出了他们老祖宗袁世凯的一套，大耍两面派手腕。在关键时刻，总是以“左”的和“右”的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企图使已经取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翻个个儿，重新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陶铸就是“袁世凯”式人物中的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都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家。

他们第一个特征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贬低林付主席，相应抬高自己的地位，大肆吹捧自己，这正如姚文元同志所说的：“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的自我吹嘘，他们利用他们的职权和地位，在大革命中拼命地耍阴谋，打击和贬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自己，以至于连群众的小字报也不放过，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是具体的真切的，而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抽象的、空虚的。他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利用手中大权千方百计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背道而驰，故意贬低代表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些文件和口号，甚至干脆无视这些重要文件和口号；另一方面，又装得十分谦逊，以便炫耀自己，腐蚀迷惑和欺骗那种不坚定的群众以及幼稚的青年人，陶铸在中央的几个月中就是这样干的！

要篡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篡夺党政军大权就必然削弱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至于搞倒无产阶级司令部。

袁世凯式的人物第二特征是：“他们用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文化大革命来长期存在着一股炮打总理的妖风，这股妖风非常顽强，无论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警告也压不下去，这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耍的由他们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但就是不怀疑自己，打倒自己只打倒别人。此外二月以来，群众中广传着一种中央文革分派的流言，什么总理、康老、王力、关

锋、林杰是一派，江青、伯达、戚本禹是另一派。袁世凯式的人物自作聪明，以为放出这种风来既能利用极“左”思潮造谣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能巧妙地掩盖自己；既能促使左派犯错误，并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错误，又能最好地保存自己。可是天公不作美，武汉事件和全国性的 516 兵团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伎俩，这般自作聪明的家伙，真象其老祖宗袁世凯一样，逃不过历史的无情惩罚！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反对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

袁世凯式人物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大搞垄断，积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姚文元同志说得好：“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很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的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

袁世凯式的人物不但企图垄断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垄断了一些主要的报纸的权，而且还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的常委大权。不仅如此，他的手伸向了军权，他们运用天空中的一点乌云，神经质地夸大，促进左派犯错误，散布“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企图打烂伟大长城，分裂伟大长城的人民解放军，全盘地搞垮毛主席和林付统帅的军权。一手篡权，一手搞“大翻个儿”，其心何其毒也！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四个特征是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装出一付热情歌颂群众运动的样子，放纵小资产阶级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从而把群众运动引向歧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以马列主义的最高热忱歌颂了贫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这儿毛主席所歌颂的群众运动具有最最鲜明的强烈的阶级性，乃就是坚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毛主席在文章中着重指出了贫农是革命先锋。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似乎比任何人都热情地歌颂群众运动，但是在极“左”的看来热情洋溢的歌颂下面，把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无政府主义排斥一切、怀疑一切等等资产阶级的东西硬塞到今天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以此实现其“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上台”的阴谋，从根本上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林付统帅说得何等好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毛主席在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违抗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以极“左”的面貌去纵容革命队伍中有的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和派性，并利用这些东西加剧和另一支革命派的矛盾，分裂革命队伍。更恶毒的是将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引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阶级阵线的轨道。陶铸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之后大力散布“怀疑一切”的思潮，提出极“左”口号顽强地把运动引向歧途。林杰一方面支持 414，而另一方面又和团派大谈支持 414 的辩证法，和其集团上下配合加剧团派和 414 派的对立，并且煽动团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事件发生以后，袁世凯式人物大力宣扬极“左”口号“抓军内一小撮”，妄图一举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把运动拉向最右方。但是袁世凯式的人物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这一切的一切连同他们自己都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个粉碎！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历史的火车头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飞奔疾驶的必然趋势，也决非袁世凯式的人物所能扭转！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五个特征就是极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以极“左”的口号来实现其极右的目的。他们不仅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提出极左口号来把干部、群众、军队推向敌人方面，以达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搅乱阶级阵线，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目的，而且不断地煽动我们队伍中的极左思潮，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去冲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官，他们特别重视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似乎比别处更为重视一些，大概是因为东北三省对中国太重要了吧！

袁世凯式的人物第六个特点就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手腕和反革命的“机智”。武汉事件和武汉事件后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继陶铸的换头术后创造了又一次政客手腕的奇迹。

武汉事件是袁世凯式人物的极右企图暴露以后“机智”地退却的一个大阴谋，一方面保护实力，一方面制造混乱，促进左派犯错误，进一步把水搅混，与武汉事件配合，立刻提出“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些左派一时没有识破此口号

的反动性，上了当，于是左派犯的错误被右派利用了，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危险。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袁世凯式人物的阴谋。9.1 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发表大转折的讲话点破了他们的鬼计，把准轮舵，敌人的布局打乱了，面目暴露了。然而袁世凯式的人物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顽强地耍弄他们“机智”手腕来搅乱阵线，保护自己。于是林杰问题突然泄露了。炮打林的风一下子象老天预先准备好似的乱将起来，运动似乎纳入了袁世凯式人物的轨道，谭厚兰被斗了，师大似乎翻了个儿，全市两大派的内战一触即发。

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戳穿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两面派阴谋，再一次对革命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引导，袁世凯式的人物为了掩盖已经暴露的黑手的貌似特别“过火”的高级手腕又破产了！结果水并未搅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自己。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乌云敌不过太阳，小小袁世凯的两下子虽然能够篡夺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但也怎能敌得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怎么敌得过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统帅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继刘少奇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现代“袁世凯”永远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航道向彻底胜利的方向，突飞猛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看！在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江青讲话发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准了革命航船的轮舵，绕过又一大暗礁！

看！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阴谋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部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大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空前巩固。

看！上海市革委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成长壮大。所有已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大树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坚决斗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把我们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看！军委扩大会议胜利了！人民解放军牢牢掌握印把子，以保证文化革命后的大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手里，以保证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把文化大革命牢牢地纳入毛主席指引的轨道 1

看！伟大的长城巍巍屹立，军民团结如一人，军支左，军爱民，民拥军。毛主席、林付统帅亲自统帅的人民枪杆子队伍牢牢地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看！全国一个上下结合的大批判高潮迅速来到，刘邓彻底灭亡之时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时候来到了！

伟大的转折带来了伟大的胜利！

打倒刘邓陶！打倒大小袁世凯！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字报上有许多批语，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1. “本文作者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同志，真是混蛋透顶！”

（北师大井造一兵）

2. “本文是一篇反革命复辟宣言书。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立场错了。”（延河）

3. “他们分析得有道理。”（02 一兵）

4. 此文作者都为《必胜》的东方红 00 支队。]

原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7 年 9 月 15 日

（来源：原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7 年 9 月 15 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 8：50 至次日晨 0：45，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的负责人。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叶群、戚本禹、傅崇碧等。〕

江青同志：我们现在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先读语录，带了没有？（念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二段，第 224 页第二段，第 229 页第二段）好，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总理：这次找首都红代会各学校组织来商量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倒是喜欢坐飞机，但是飞机要从地上飞起，以后又要回到

地上。“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农大东方红查出了秦化龙是叛徒。他们听我的话，在批谭时没让他上主席台，他们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我通知接受。我今晨接见了他们。虽然他们东方红查出几个“五·一六”分子，但是他们找出了人证物证，自己揪出秦化龙扭送卫戍区，这很好。安徽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中央解决问题以后两派都打电话揪黑手，他们从没有讲过团结，P派和好派也一道揪黑手了，这是从没有的好事。（康生插话：两派争先恐后的交武器，自己把自己的坏头头抓起来，送交军管会了。）

秦化龙是个叛徒，不是一家调查出来的，农大的问题两派都参加了，你们应该欢迎他们。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为什么要分裂呢？对“五·一六”要有这个精神。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

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你们何必来干预党中央领导的内部生活呢？我们是一致的，你们胡说乱猜是胡闹，是干扰我们的领导，是不能得逞的，如果你们是被人操纵就要揭发，若是自己认识问题就改正。地、富、反、坏、右坏人都想拆党中央的台。你们青年人思想常常摇摆，别的地方一听你们的讲话，就以为你们从党中央、中央文革得到什么法宝了，这很不好，当年五四运动青年受封建和军阀思想影响有派别是可以的，当时北大就有胡适之派，陈独秀派，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都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现在虽然有走资派、特务，但是主要还是毛主席的伟大领导，回想五四运动时，你们比我们高明多了，但是你们不能飘飘然，要好好的从天上回到地下来。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有些领导靠边站了，应该考虑大联合，北京武斗有的比较严重，西单商场，光学仪器厂破坏机器。工农带眼泪进去，带眼泪出来，总归是有坏人伸黑手。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对

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北京还发现有违背中央精神的事，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我们不赞成弯腰驼背。这是桃园四清的经验，“燕飞”是王光美、王任重搞的（江青同志插话：北京爬墙抓人是从叶向真那开始的。刘诗昆、叶向真打解放军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你们要批判。年青小将犯了点错误不能就摔在地上，对军队夺权是错误的，保卫国家的武器你们夺过来干什么？你们夺了枪就乱放，这事不允许。特别是有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做特务行动。去年我对红卫兵讲过，叶向真爬墙搞彭真，杨尚昆搞窃听器，身上带录音机，开秘密会，偷记录，偷日记本，这都是资产阶级特务方式。

北航红旗去年搞什么“斗争策略”小册子，绝密的，这是一套特务手段，是国民党特务手段，这种办法早就被毛主席痛斥的。我要不告诉你们就是犯罪，你们必须去掉。

还有就是抓住人家一句话，就推理，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学彭罗陆杨那一套，我们不指出就是犯罪（江青同志插话：宣布，一切秘密会议非法，我们中央文革都没有秘密会议，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北航红旗有人给蒋经国写信（念中央社新闻……，你们听了吃惊不吃惊呀！）。要警惕呀，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江青同志插话：队伍不纯是正常现象，但要相对的纯，这一点你们组织内部处理。）这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派别斗争后边搞的鬼，暴露出来是好的，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不完全、粗糙。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江青同志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元梓：我没有去。）

总理对江青同志讲：这个情况没证实。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不听主席的。我们说这些心里很难过。我们学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党的历史，我犯过不少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不需要五·一六来整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犯过错误要认识错误，我快七十岁了，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统帅。你们来日方长，不要自满，固步自封。只要一天离开毛主席教导就要犯错误。我

们的影响较大，你们的影响也不小。我们有错误有缺点，在北京对工人文化革命注意的差，因为北京工人文化革命开展的比学生晚，我们注意知识分子多了。（江青同志插话：你们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从小受家庭影响。不要忘记你们还没有进行斗批改呢！）我们有些偏爱你们，溺爱你们，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稳定，他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江青同志插话：是劳动人民家庭吗？）但这不要紧，要与工人、农民结合去受锻炼，我和韩爱晶同志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因为在一次会上我看见他很瘦，就派我的医生给他检查检查，结果这也成了包袱。（江青同志插话：韩爱晶，我们宠坏了你，我难过，你写的自我批评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你们不应该随便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全国都应该如此，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所以，北京两派不是学好毛著，而是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影响，近一年来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连坐下来学习都不行，有时连《人民日报》、《红旗》社论都来不及学。所以一些坏东西如：“怀疑一切”、“包打天下”思想很厉害。好象北京的学生如何如何好，不错，北京学生先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是对的，你们有成绩有功劳。但是今年八、九月份不同了，各地都起来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北京大学生再包打天下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的就是支持少数反对领导。不管对不对，外地反感，电话全是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是帮倒忙。（康生同志插话：这是主席说的，你们为什么总是不听呢？！）大家联合开会不能解决人家本身的问题，还有“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目前这个论调在某些组织或学校中很盛行。（江青同志插话：北京地派要吃掉天派，或是天派要吃掉地派，老实讲吃不掉，你们老老实实从天上下来，否则跌得粉碎，地派也必须从地下钻出来。）我们必须用毛主席思想为准则，如果私字当头，压一派是压不倒的，这是派性高于党性。（江青同志插话：打内战就是打私战。）

我们希望你们还是按十六条方针，紧跟毛主席的航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单位斗批改，不然，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何时才能完成？有些学生外出不回来，给他一个月的有效期，不回来开除学籍。（江青同志插话：不分配工作，参加斗批改这就是毕业分数，不参加不准毕业，这样可

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众：可以！应该！）你们还要放一辈子假吗？现在到时候了。现在考验你们两件事：

一、红代会两大派，各学校的多少派，为了迎接文化大革命后第二个国庆，联合起来好不好？（众：好！）派军训团去军训，接好军训站好队伍，否则你们没有资格参加。

二、三秋到了，又是考验你们的时候，（江青同志插话：昌平有的地、富、反、坏、右抢秋，要坚决镇压，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我们要保护搞好秋收，国庆之后到农村参加三秋，考验你们好不好？（陈伯达同志插话：可不要把两大派的观点带下去）这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锻炼自己，其它分配、选种、秋种都是考验你们。（傅崇碧同志插话：有的学生从外地回来带来了枪，说是胜利品，问题很严重）国家的财产，你们从哪来的胜利品，手榴弹、枪、子弹完全交出来。（江青同志插话：你们都不会瞄准。哎……）

江青同志：下面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说我是天派的后台。（康生同志插话：街上画了系统图，有书为证，不是造谣）说我是天派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和他谈过话，但是都可以公开，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江青同志：造谣的事太多了，各取所需，以后总得设法弄清，总不能造谣有功。）

韩爱晶你讲一讲我和你谈过袁世凯吗？（韩：没有）我知道韩爱晶名字不久，我认为韩爱晶要做象样的自我批评。我问你韩爱晶、蒯大富，你们对二月逆流有鲜明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吗？对五·一六兵团表示过什么气愤吗？（韩：有）在这里我批评韩爱晶、蒯大富，我不是天派，我是不三不四派，我批评的不对请你们批评。（江青：爱护你们才批评你们，不要灰溜溜的。）

我有一次找韩、蒯讲了一次话，蒯大富讲了一些悲观的话，我才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后台了。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的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北航有人写信给蒋经国，难道不能引起警惕吗？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革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阶级敌人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你们当了大官了。听说韩爱晶要去西安买飞机票（韩：没有，火车票），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拿钱挥金如土，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你们的言行又是怎样呢？各行其政。认为天要塌下来了，那天师大问题，你们搞了什么活动？（戚本禹同志：你们清华、北航、人大三红、体院等几个院校开了一个秘密会。）（江青同志：你们自己就说话不算数，人大三红就言而无信，你们三红里就有很多特务，回去把它搞出来。我怀疑你（指回答问题的三红战士）不是学生。你们保大特务孙泐。）

我建议你们到外边去都坐公共汽车，财经公开。我不晓得你们化了多少钱。不要采取特务手段、警察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派为什么不能谈问题呢？为什么要吃掉他呢？大鱼吃小鱼。聂元梓去了没有？你们总是幸灾乐祸。（江青同志：你们以前在教育部还俘虏过谭厚兰）你们要公开到桌面上，不要采取手段。（江青同志：你们就只能片字只语，完全是糊涂）你韩爱晶不在学校搞你的复课闹革命，而是到师大亲临前线，你们还是东支持西支持。（江青同志：看来你真是后台了。）

今天就是摊牌了。你们抱了一大块石头，却以为自己得了个宝贝，死抱住不放，走路有包袱。你韩爱晶有没有后台？（韩：没有，保证没有！保证二十年也能证明我校大方向是正确的）你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被人拉着走，你蒯大富有没有后台？（蒯：不敢保证）聂元梓有没有？（聂：没有）（江青同志：有人说新北大又立第三功了，聂元梓你不害臊，老实讲，我们去年与陶铸作斗争时，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与王任重打得火热，他是一个 CC 特务。孙泐也是一个特务，可能是一个日本特务，还与苏修有关。）（戚本禹同志：孙泐的秘书就是你们三红战士。）

你们大事不去搞，而去搞师大革命委员会，大鱼吃小鱼，实用主义很严重。不搞自己的斗批改，要提高警惕呀！不能包办代替，手要收回来，你们有没有后台，调查研究一下再说话，不必匆忙声明。我们不会冤枉好人。是什么线把你们拉在一起，乘人之危，这样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老保翻天。（江青同志：北大已经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江青同志：今天给同志们、小将开这个会。今天由沉痛变成气愤，几次都不能与你们冷静地谈，我觉得我应该做自我批评，听你们意见时较少，不能及时地对你们从思想上到政治上帮助你们提高。另外一方面，我接受外地的批评：说我对北京的学生太宠了，这是事实，批评你们很少，都说好啊！好啊！当然，老保翻天，颠覆小将成果你们不答应。在许多时候，宠、溺爱你们。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说韩爱晶如何如何……我对他说：你不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就走开。韩爱晶栽了个大跟斗，对接受我的批评不理解。对你溺爱了，见了你就笑咪咪的，圣人呵，小圣人啊！现在我感到你是绝对主义者。我敢保证，我敢保证……。北航你敢保证吗？说得太早了。

有人想从右的，极“左”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对你们太宠了，要求不严格，接班人要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接别的。而在你们脑子里毛泽东思想占得很少，因为主席从来不绝对，不武断。不久前，毛主席告诉我，让我转告给小将：“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我对你们帮助、教育不够，谈了以后，以为你们能听我们的谈话，但你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这是我们的主观主义。

上次批评了蒯大富，自从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你们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后发现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到目前某部分人，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你们自大狂妄、个人主义膨胀没地方放，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

你们是救世主，包打天下的英雄。就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作怪。去年朝气蓬勃，现在变成另外一种人，背离大方向。当然说的是部分人，但他们在起作用，我应告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没有你们就完了。中国共产党 1,800 万，就是揪出一万也是少数。你们悲观失望，韩爱晶写什么检查，连我名字都不写，变成大老爷，宠坏了你，在座的我是最宠爱你，训了要训你，训无产阶级的子女，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蒯大富我都不愿再训了。

总的说，天派、地派也好，我们做的工作少，你们有缺点有错误，我们应该承担，我并不轻松，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共患难。现在你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有的人在小报上骂我：“江青算老几！”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别认为离了你自己不行。你们回去要开门整风，把不纯分子清

除出去，提醒你们，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我们依靠军队、劳动人民。只要主席一声令下，军队就坚决跟主席走，我跟主席几十年了，不象你们摇来晃去。你们不学毛主席著作，靠歪门邪道，靠特务手段……连我的信都有人邮检，对我专政。你们那一套，是刘少奇的。主席关心你们，因此谆谆告诫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表现就是如此，什么都是好的，有三千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特务在温州捣乱，这就是敌情。我们军队去夺了权。你们人大有相当多的特务，为什么日修、苏修对你们学校的动态报导那样迅速呢？两派都有，那派（指新人大）是肖前。

另外，有奴隶思想，非常喜欢外国人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们自己的事，革自己的命，请他们干什么？当然有的是朋友，但混着不少特务。国民党也留下相当大的一批人没走，难道他们不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北京两大派，我感觉有苏修、美蒋、日本特务在作怪，你们有的自己不知道，利用你们个人主义膨胀，爱为个人吹捧，说你如何如何，听不得不同批评。我们批评你们，就对我们疏远，那边就会拉你们，要提高警惕。

另外讲一个立新功的问题。

你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立了不少功。要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小学生，每天都要想想自己为人民立了新的功劳没有？犯了错误要自我批评，立了功那是本分。

说了几次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老大，大到连毛主席的话，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多数是听的，我说的是少数，少数回去想了，也还是听的。

回去搞大联合，三结合，进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不去改谁改，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灿烂青春你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没有（原文如此，似应为：“所有”——编者）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改掉，这样光荣的任务落到你们肩膀上，这样光荣的任务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设想，发一个命令，一个月不回来不分配，不毕业。这下子揪军内一小撮的人回来了，逍遥的也不逍遥了，你们也可以分配给他们些任务，有人反映不工作就不给工资，教师也如此。教师是操纵你们的。不搞斗批改就不毕业。

从今晚会议，如果还听我们一点的话，脑袋还有一点缝的话，斗批改就摆在你们面前。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求过急，各校按具体情况，但今年年底一定要进入斗批改。学校里头斗批改，文学艺术斗批改，学校斗批改还容易一些，你们受资产阶级影响，但读了一点毛主席的书，你们是大学生的，不单是语录本，你们有毛选吗？不要教条地背，要理解主席的精神。话说多了，结束了。

康生同志讲话：我接触同学不多，但却得到了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至，有点受之有愧。开始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又支持了谭厚兰反对薄一波、孙友渔。我想问问蒯大富，你们有一个时期也反对我，和党校红战团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帮子女。如苏振华的儿子就在这里，我曾经告诉蒯大富，不要和红战团联系，你们要批刘少奇、刘邓路线，清华要与党校红旗战斗队联系。但是我好心没有用，以为我是害怕了，怕你们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没有用，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刘少奇以为我是清华后台，在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斗了我三个钟头。我说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刘少奇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三个钟头。我说不清楚，刘少奇说：“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护蒯大富的。因为个人关系我不愿意讲，我对同志们教育帮助不够。

我们今天谈话的目的是爱护的，帮助同志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语录上讲过：“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就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去读一读正确的意义，这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照我们这样作。要我们以身作则的用自己犯错误的事实帮助同志们。

毛主席讲：“一个工厂内两派那样斗争，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看不到。”当然，少数地富反坏右除外。都是阶级弟兄嘛！为什么这样，开机枪，六〇炮，放高射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释。坏分子是有的。我同聂元梓讲过，反聂的杨旭（飘派）和他的弟弟杨旭章（）是坏分子，可能是特务。这是少数。但在学校里学生这一派那一派斗的这么厉害，到底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江青：缺乏自我批评，只有批评人。地派如果不钻出来就闷死。）

不！是被埋葬！有些同志言行不一致，会上一套，下去就不一样了，言不如此，言行不一致。这就是一个两面派作风。错了不要紧，不要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还要搞秘密活动，怕我们知道。

（江青：我们的记者已经哭了，因为你们拒绝他们，你们就是无视中央，这就是两面派，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有些组织或某个人采取特务手段。我与特务、敌人斗争了多少年，我特别敏感。“天派”“地派”有些作法就是特务作法，我想不出你们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哪个学校都有动态组。有些人对一篇文章象研究密码似的，不是研究思想，而是研究这一段，那一段。这里有一小撮走资派在后台操纵。另外还有苏修、美帝、日修和蒋匪特务在后边伸黑手。他们不直接出面，如人大的孙泐。

周总理：农大东方红揪秦化龙，秦化龙就是以极“左”面貌出来，你们学校就没有？有大的有小的，不要把话讲绝对了，你们年轻不怪你们，农大东方红是地派的，我们应该欢迎。我请同志们注意，要注意敌情，外事口有美国间谍直接插手。（江青：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九月十二日在地质学院有一个气象局红旗战斗队的“谁是最大的黑手”要分析一下。）与特务斗争的经验你们太缺乏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有右的，也有极“左”的。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九·七苏修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一次会上做了一次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我们准备回击。勃列日涅夫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的。然而我们有些人说苏修骂我们是极“左”。首先是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江青：你们井冈山小报搞我们，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必要时一个个点名搞你们。）

如果按标题和内容来看，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极右了，而没有极“左”了。列宁为什么写《“左派”幼稚病》一书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社论和第一句话就是错误的。勃列日涅夫正在骂我们反革命，你们说他们骂我们是极“左”思想。当然作者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企图，因为可能是对4·14等等，但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而

用社论大反这些东西，你们清华井冈山就是极力反对江青九·五讲话，而称这些人是什么先生。（江青：你们知道这个文章（指井冈山报社论）是谁写的吗？）（蒯大富解释了一些）（江青：一定要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流毒。）（戚本禹点头）（语言学院汇报：我院两派都有外国人参加，怎么办？）你们怎么处理？！你们去斗一斗蒋南翔去，这是蒋南翔搞的特务学校。

还有人说，“极‘左’思想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我问一句，什么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东西，北京市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就是傅崇碧吗？要打砸北京卫戍司令员吗？你们怎么能把我们这些错误缺点和少数坏人的某一机构及美帝苏修混为一谈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被敌人利用了。（江青：我们还称你们是同志，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是先生了，我还得保你（批蒯），有人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个小保皇派。我生怕你们犯了错误。）

你们对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头，你们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政客式的、国民党式的、赫鲁晓夫和台湾式的看法，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看法。与香港反动报纸一对照，完全一样，是反动的。

我们揪党内走资派，丝毫不妨碍以毛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怀疑这一点就要犯绝大错误。你们还有人要整我的材料，如果不够，我可以供给。蒯大富我提醒你注意，党校的红战团开始向清华井冈山 28 团活动。（江青：当心老保翻天，韩爱晶还那么绝对保证吗？韩爱晶、蒯大富要作自我批评，向谭厚兰作自我批评，这次你们不对，你们颠覆别人，你们自己也可能被别人颠覆。）

要认真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

（江青：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散会）

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就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扭送秦化龙给北京卫戍区的信

〔秦化龙：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傅崇碧、黄作珍同志：

现有农大“东方红”刘玺、解金瑞、高亮、肖××四同志扭送秦化龙来卫戍区，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五时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地点：人民大会堂。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叶群、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

江青同志：开会了。同学们，带语录了没有，我们学几段语录好不好！

现在请总理讲话。

总理：同志们，战友们，今天还要重复昨天讲的，昨天讲了一次，今天再讲一次，可能讲不好了，因为提纲没有带来。

我想，最近一个时期，七八两个月，整个形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更向前进了。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听了吧！形势大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一致的看法。大好形势不是随便讲的，是确确实实大好，是大大进步了。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夺党内走资派的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党的领导。所以我们在夺权斗争中，我们要向深度，广度发展。特别是七八两个月形势更好，解决问题快起来了。从一月份夺权斗争到七、八月，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七个（指省的），大家知道的，山东、山西、青海……，除了这七个以外，我们还争取了过渡的办法。一种是成立军管会，由军管会过渡到三结合，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另外还有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由这个过渡到革委会。长江以南正向这个方向前进。

到七八月份我们已经解决了河南、湖北、浙江、江西……的问题，现在正在解决安徽、广东、广西、辽宁、江苏等省问题，估计在今年年底全国二十九个省可以解决二十个至二十四省。今年，第二个年头，速度会加快一些，有了一年的深入的发动，经验多起来了。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点燃发动的，是自下而上发动的，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在这么大规模群众运动中，我们伟大的领袖，让我们加紧工作，我们在这里召开了好多次会，但是出现另一方面的干扰，这个干扰来自北京，特别是来自大专院校红代会两方面的干扰。

本来红代会是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促进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但是，北京红代会，大专院校提出了一些跟我们相反的看法，说什么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的时期，在八·五大会上，我碰到大专院校一些认识的同学，有蒯大富、韩爱晶等。他们有这么一个认识，说什么“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时期”。我和谢富治一致讲：“肯定没有这回事，不是大串联，而是要回来，现在形势有利斗批改，应该在本单位，本学校搞斗批改，不是出去。接着八月十一日我们又讲了话，结果你们还是走了很多，清华走了五千人，北航也有，师大想派一个联络组到西藏去，我说了之后他们没去。总之，各校都有这种现象。

后来和武汉造反派接触，才知道，他们和我们对形势估计不同，他们对形势估计是悲观的，他们认为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好象比二月逆流更凶，因此得出结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我们一听，这怎么象话。夺谁的权，全国军事大权在毛主席手里，毛泽东思想挂帅，怎么能武装夺取政权。

有些人受了蒙蔽，保守派夺了解放军的武装，但是毛主席一声令下，派解放军去，问题就解决了。武汉问题怎么样？陈再道暴露了。

象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解放军官兵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武汉问题还不是解放军解决的？！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武汉的几小时乱子很快解决了。

怎么能说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把这些权都夺过来，就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战争解决问题，这就是内战，这完全是悲观的。

甚至有人说：毛主席在中央也是少数，我们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好象是很好，永远跟着毛主席，但是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一转，转为悲观。这种估计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想法背后有黑手的，有坏人的。有人故意散布这种论调。正象姚文元同志文章所说的，有人从极“左”，或右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不仅是走资派的问题，更有坏人、敌特在破

坏，他们暗藏在群众中散布，有些群众一时受了影响。9月1日我们曾经召集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9月5日在接见安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会上，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等又讲了。这一次再讲一下，这种对形势的估计不是坚定性，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胜的决心。

大家唱“下定决心……”但是你们的想法和做法不对头，这有走资派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动摇我们，这里有黑手，你们要警惕。走资派从右的方面动摇，也是不允许的。

9月1日江青同志给你们提出三个任务：第一，巩固和加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们不能动摇这个司令部。姚文元的文章中讲了，有一种形式，是以极“左”的形式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这个兵团是秘密的阴谋的反革命的组织。它就是要挑拨离间，整这个，整那个，矛头首先是对准我了。这不是对个人，而是通过对毛主席司令部一个领导成员，一个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从而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对我的批评是可以的，我有缺点错误，在座的可以批评，但他们是把我做一个毛主席林副统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中一员来整，他们搞阴谋，他们把我和中央文革分开，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阴谋分裂中央。（江青：起到了敌人所起不了的作用。）

我们是靠中央书记处起作用，我们整天在一起办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要受坏人挑拨利用。五·一六兵团搞出来了，我们很高兴。但搞五·一六兵团有几个原则：第一，不要把五·一六兵团扩大化。没什么了不起，就那么几个头头（江青：这是很少的几个。）说有八个方面军，什么地方方面军，后来查清了，只是一个长沙一中的一个人（另一稿为“几个”）。它没有群众，只能搞秘密活动，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一公开就完蛋了。有些群众受蒙蔽，这种人是利用青年的思想不稳定性，讲什么“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犯了嘛，也不能拿一句话一件事来决定一个人。不要扩大化，就那么几个头头。

第二，自己受蒙蔽，不知是坏人。我们主张你们自己把坏头头揪出来。秦化龙是个叛徒。七八月份我就提醒了，斗谭震林让秦上主席台，我说，他上主席台我就不参加了，他们就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农大调查出秦是一个叛徒，他们没有背包袱。外面大字报说是卫戍区逮捕的，不符合事实嘛！

第三，不能因为批了极“左”的思想，就让老保翻天，说什么反击二月逆流也错了。你们批谭、批陈还是对的，我们支持。

第四，揭发五·一六兵团是为了推动大家共同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矛头对准刘邓陶，进行大批判，这是我们的方向。

这四点是我们的方针，这是孤立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如揪出了张建旗，这是一个小头目。不是责备你们，而是教育你们。

这说明不管以右的或极“左”的动摇这个领导核心，都是妄想，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都被揭发出来了。这样做有利于我们的大联合。

如果你们还在领导核心里观察这个人的声色，那个人的表情，一言一行，把讲话掐头去尾，来分析这个那个，就完全陷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泥坑里去了。我们不能搞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么搞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无产阶级不是争名夺利。

过去的确有那么几个人，我们搞清楚了，将来要宣布。你们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

现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很幸福。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跟你们比。（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你们现在应好好学习，不要受坏的影响。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你们又靠近主席，你们在北京，应好好学习。另外还要向群众学习，上海批评我们，北京学生多了，太受宠了。另外发动工农不够。

你们表现好的很多，我们不称赞了，现在有的不好，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受机会主义领导的影响。你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恶性发作了，这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机会主义现在垮了，但是，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教育你们。你们要上求教于毛主席，下求教于工农兵。在革命的实践和劳动实践中提高觉悟。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思想呢？是受了影响，坏人的黑手是到处伸的。受了影响，承认了，接受了这个教训，则会增强免疫力。直接受影响的免疫力可能更大些，但是今天在座的不一定都比昨天的免疫力强，因为这是不平衡的。

第二个任务：要爱护解放军。江青同志讲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长城，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经常讲的。在夺权斗争后，我们提出了八条，主要是讲拥军问题，后来四月又提出十条，主要讲爱民，我们的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错了就改。这样就全面了，两个方面都有了，不能用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

这时我们没有好好宣传，后来出了六、六通令，7·20 事件宣传上出了错误，提出抓军内一小撮。并不是说军内没坏人，象赵永夫、陈再道……，但是以此乱套，到处抓一小撮，抓赵永夫，抓谭氏人物，抓陈再道，从广州揪到福州。我们的文件纠正了，但是你们还是按错误的估计，以错误的做法，到处设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整个八月，情况是严重的。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9·5 发布了正式命令，不准冲军区，9·1 讲话中江青就讲了，在北京（什么地方……）不能冲。

（江青：昨天拂晓有 30 多人象强盗一样冲进红旗杂志社，我们要破获，要逮捕。）

昨天我们接见那一派，甘肃的十几个人冲进了中南海，冲到毛主席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心区怀仁堂附近，你们说应不应逮捕（答：应该）我们抓起来了。

江青同志提出这样做是自毁长城，是对的，但是有的小报不同意。解放军支左是有错误的，但这个错误是不同于去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主席一声令下，解放军干部都会响应，我们这些老红军都会奔赴战场打敌人。象西藏两派在斗争，但对入侵的印军马上还击，这就证明了。不管敌人从东海、南海来也是一样，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总之，不能光看宣言就行了，两面派是不能持久的。你们在座的我就不能保证没有两面派，当然大多数是好的。上次讲的，定的纪律不要把我们的话捅出来，结果还是捅出去了。你们有小报，我们用大报一个一个通报你们。你们欺负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头上。昨天说了话，今天在清华礼堂门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挑拨群众运动的野心家，叫周泉纓（清华 414 总部委员），叫这么一个鬼名字，是小丑，欺负老实人。中央的事你们不要管，我们是遵守党的纪律的。你们不应知道的，我们不能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你们还在那里胡闹。今天抓了一个人，不能告诉你们名字，狡兔有三窟，他不晓得几个窟，我们抓到了。

我和你们的大多数是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究竟怎么做，就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第二条就是要向工农学，因为你们从小学到大学学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从制度内容，现在是恶性发作，显出恶果

来了，我们心里感到很沉痛，所以要坚决搞斗批改。现在号召你们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搞斗批改。

封建社会有几千年了，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了，而社会主义从巴黎公社算起才一百多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生命力是蓬蓬勃勃的，历史车轮是不会倒转的，走曲折的路走弯路是可能的。如果你们把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内容改革好，那你们的贡献有多大啊！想想那在全世界影响有多大啊！你们想了吗？想的不多，你们跑一跑，遛一遛，坐不住。现在要坐下来，这是一件大事，很艰巨。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搞了几百年不过是这么个东西嘛！

我们搞了一百年，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很多，但读的很少，我也少，临时抱佛脚。要多学，路是人走出来的，要敢于披荆斩棘，要有英雄气概，我说的是要有无产阶级英雄气概。要敢于这样做，我们要督促你们这样做，你们的心跑野了，不要象猴子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在你们当中泛滥着一个二月逆流，陶铸的“怀疑一切”，怀疑总理、伯达甚至康老，也许有我，你们如果想整我的黑材料，你们吃饱了没事干，爱整我的材料就整吧！

昨天刚讲了，今天就贴伯达大字报，其实工人农民士兵根本不理睬你们那一套（康老：还自以为不得了）为什么主席在这时让我们提醒你们“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呢？好好想一想。

这个怀疑一切，怀疑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怀疑军队，怀疑革命委员会，想干什么好事，很容易走到对立面。去年的革命者可能走到对立面，希望你们不要滑过去，我们和你们共过患难，是战友。如果硬要滑过去，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

对小将，我们是十个指头个个连心，咬那个都疼，如果一个要坏一定要分裂出去，那活该。不要把个人小集团估计得过高。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从大局考虑，我希望你们豪迈的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不是右倾！

陈伯达同志：拥护刚才总理的话。

昨天讲了一些，在所谓“天派”会上讲了话，没想到一天之内，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欢迎大家批判，经过了半夜，从天上掉到地下这也有可能，为什么分天

地派，这要作阶级分析。为什么有天地派，这值得深思，好好想想，要作阶级分析。

把我们从天上掉到地下，没有恶意，这引起我深思。天地没有绝对界线，毛主席说，我们就是在天上，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球。

从天上到地上没有什么坏处，免得粉身碎骨，从地里爬出来免得闷死。所谓北京两大派已经闹了很长时间了，所谓两大派没有理由不搞大联合，都是在一个天上，都是在一个地上，有什么理由不搞大联合，除非是敌人不能搞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为什么不能搞大联合呢？除了刻骨的阶级仇恨，除了敌我矛盾，为什么不能搞大联合呢？为什么一定要分成两大派呢？没有道理的嘛！并且把两大派强加到工人中去，我同意总理讲话。要在大联合大批判中，高高兴兴迎接伟大国庆十八周年！（口号略）

江青同志：刚才总理、伯达同志讲话，我同意，我没有更多的东西讲了。这些时讲话讲多了些，讲多了没有人听。

我真诚的希望同志们多做自我批评。天地两派现在已经半年了，时间长了，有各种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应该自我批评，这些问题这些错误我是有责任的。好长时间好几个月，很少听你们的意见，八月初接见你们时，听你们的发言，我大吃一惊，发现你们的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相反是落后了，近两三个月没有见，当然客观原因同志们会谅解，确实比较忙。主观上我们重视不够，多倾听你们的意见及时帮助你们这一点做得不够。不过犯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认识了改正了重新上阵比那些不犯错误还好一些。

此外，我还接受外地同志的批评，对北京学生太宠了，太溺爱了，不批评，批评少了，最近才批评了。过去总说你们的好，什么功大呀，好啊！固然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小将、红卫兵小将，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你们也不要背上这个包袱，压得透不过气来。功劳要别人讲，不要自己讲，不要自己记。有人讲要立第三大功了，碰鬼，我们在和陶铸作斗争时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哩！

总之，你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太少，截取字句教条式的学习，不联系实际，不联系思想活学活用，正因为这样你们不能科学地分析形势，不能根据毛

主席的教导，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形势，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我还是建议你们认真地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学的太少了，领会不深。

另外，我建议你们，如果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思想派毛主席的好学生，那就要自我批评。作自我批评没有坏处，还会增加你们的威信。要有勇气作自我批评，勇敢地向对立面作自我批评，勇敢地向天派作自我批评，能不能？

（答：能！）我也要求天派向你们作自我批评，都作自我批评，是否会好一些，如果都做到了那就了不起了。难的很啊！

我们在延安整风三年都是做自我批评，我永世难忘，哪批评别人？我们否定自己，又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还不定有多少次呢？

你们个人主义了不得了，膨胀太厉害了，还有没有一点缝，要有个缝就扩大一点，装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们还有个缺点，在北京工农工作做得不够，运动落在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手里了。你们受资产阶级教育对不对？（答：对！）你们受资产阶级教育，到处打听，风吹草动摇摆不定，搞什么动态、作战、窃听器，都要取消。互相勾心斗角，这是主席向来反对的。这哪里是毛泽东思想！

你们说江青同志批评，原来是批评我们的。就是这样。这是爱护你们。总理讲了，我要重复一下，要立新功。你们的错误就是二派，都背离了大方向，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那个问题上。

你们立新功就是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配合社会上的大批判，你们就是怕斗批改，尤其是怕批改，要动脑筋，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这是动脑筋的事，不出头露面，搞了本单位的斗批改不就是每个人都有事了吗？要不然就是少数人忙，多数人逍遥着。限一个月回来，不管什么事，包括回家在内，不回来不分配，不参加斗批改不毕业。斗批改我们不能代替你们，要你们自己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在你们肩上，不在我们肩上。必须你们完成，今年还剩三个月了，开个头也是好的。搞好大联合、三结合，搞本单位斗批改，配合大批判。不要到处乱窜乱冲，去年点革命之火，今年闯了很多乱子。（姚文元同志：主席讲是帮倒忙）

主席说“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不要以为你们大学就主宰一切，不要以为把你们贬低了。就是要贬低，不然要上天了，

天派上天了，你们也入地了。（笑）我们依靠军队，主席一声令下军队是跟毛主席走的。我说的是真话，正确的。

此外，我建议你们提高革命警惕，注意坏人，你们有些错误，是坏人引诱你们犯的。

有些坏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搞两面派，我们也有个认识过程，何况你们，所以不能责怪你们。但你们要提高警惕，善于识别。

第 251 页“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与广大工农结合了吗？这是标准！好好想想。

第 252 页“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检查你们的思想是空虚，还是踏实？“……他们的行动是动摇的”，你们是动摇的还是坚定的？你们起先锋作用，但同志们想想你们能不能革命到底？读语录，可以看到主席伟大的预见。朱成昭就是一例，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来成为革命的敌人。你们对这本语录理解不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解了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第四章）

同志们应该觉悟了，自己就那么革命？比中央都高明？唯我独革。

斗批改深入不下去，坐不下来，就是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例如北师大，陆定一、刘少奇放了不少毒，你们批判了多少。他说实现他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就实现了共产主义，胡说八道。苏修的，你们批判了多少，改了多少。例如地质学院×××，×××都在你们学校，何长工，薄一波，陶鲁笏文化大革命中都插了手，这个工作很大。斗批改要用头脑，而现在有人用手用脚，用口骂人。要提高警惕，要有敌情，你们学校没有少许坏人，我不相信。外语学院，外事口苏修、日本、美蒋特务，东北有人伸手。甚至敌人一起坐到主席台上。

（江青：奴隶主义，洋人什么都好）洋人什么都好，放屁也是香的，月亮也是圆的。外交系统不能这样下去！今天不经过总理向巴基斯坦提抗议这是向中央夺权，这是错误的，要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地院 9·7 小报犯了错误（昨天清华小报也犯了错误），你们刊了杨尚昆儿子的文章“揭发杨尚昆”，他是揭发杨尚昆吗？他把杨错误归到国家推行了高薪制。时刻注意老保翻天。

康生同志：我完全同意总理、伯达、江青同志讲话。

特别是江青同志讲，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重要。在今天江青同志领大家读语录，为什么选这几段主席语录，要深思一下。头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了解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你们现在如何理解，怎么认识中国共产党？不管天派、地派，什么派，现在都应想想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想，但有的人错误地认识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否损害我们的光荣？不损害。江青同志提议你们读一读第 224 页第二段，“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我们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变节分子、走资派，这不更使我们党更加纯洁了嘛！如果动摇了对我们党的正确认识，那是错误的，这就是读的第 3 页第二段“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队伍中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怀疑，有没有？有勇气应该说有，你们当中有些人怀疑毛主席领导的中央。认为我们的领导，中央文革、军队是一群资产阶级政客，勾心斗角，有人说我们是谁的后台，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地派），这是对我的侮辱！（生气）（江青：忘了一点：应该怀疑美蒋特务，苏修、日本特务），但你们颠倒过来了。怀疑我们。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做长期的斗争。在第 17 页“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这一点应引起深思。讲到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光读这两句就不够。

你们要冲击解放军，中央三令五申都无效，要撤回联络站，你们口头答应，但就不撤。还冒充红代会的，甚至说中央文革批准的，代替人家包办一切。所以我们向你们提议：撤回联络站，搞本单位斗批改。你们认为是大毒草，这样讲法是错误的，基本上是错误的。搞本单位要靠自己啊！限期一月，回家的，到别处去的统统回来，不回来就开除学籍；毕业生不让毕业，（江青同志插话说：不分配工作）不给工资，有政治挂帅，也有物质基础嘛（江青同志插话：他们认为党和国家是可以欺侮的）。

有些半工半读，月初领补助费到处串联，到处搞乱子，大庆就有些人去搞了乱子。回本单位搞斗批改，在外面到处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军队和地方都是回本单位，发扬四大，搞好本单位斗批改，（江青同志插话：军队只能支左不能搞派系斗争）军管军训也好，都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支左不支派，要党性高于一切。你们到各地设联络站，外地也到北京来。不是根据中央指示，而是根据小道消息。我们规定 外地的除中央找来的代表以外，不准用普通电话，越用乱子越多，拿些谣言打电话回去。外地有人抢了枪还带到北京来。（江青同志插话：带枪到北京来了）有些北京学生回来也带了枪，说是胜利品。你们从那里得来的，从美国鬼子手里吗？从印度反动军队手里吗？不是，是抢来的。（江青同志插话：从解放军那里抢的）统统交到卫戍区，行不行？（众：行。江青：我看你们回答的劲不大，是有意包庇这些人。凡是枪支、匕首都要交到卫戍区，这样才是一个革命左派。）不仅如此，还把北京的派性带到外地去，影响外地。必须改正对解放军的错误态度，去年红卫兵诞生时，就说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今天也带红卫兵臂章来的，要向解放军学习。对于解放军的缺点，要同志式的提出批评，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改的，这是一年来证明了的嘛，那有这样好的解放军，抢枪时还在读主席语录，多么动人的场面！

第三，我们要巩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学校、工厂、地方的都要这样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象初生婴儿，虽然有缺点，不会说，不会走，毛手毛脚，但是不象我们衰老的人，他有无限的生命力。我们要扶植他，不要有点缺点就挑三挑四的。这次对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就是持这个态度。这并不是说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没错误，谭厚兰同志来了，你自己知道。我们严厉的批评了韩爱晶、蒯大富，据说他两人亲临指挥开会，据说后面还有谁。天派掉下来、地派钻出来，成一派，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指关于北师大的），毛主席亲自批准，支持一个新生事物，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对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支持，不要分裂革命委员会。

从这三个问题看，北京的各学校或多或少犯错误，要对你们进行教育。主席要我们在你们犯错误时帮助你们，爱护你们。你们一些错误看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些是过去旧教育的毒化作用，在你们身上发作了。大方向掌不准忽左忽

右，稍有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我们青年时，没有这样的领导，我有错误，你们告诉我，这欢迎。第一是要干到老，第二是要学到老，第三是要错了就改，坚决改，改到老，第四就是跟到老，跟毛主席，跟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同志。

有人说你有这错那错，对，有错，可有的人养几年病了，一搞文化革命出来了，伸手了。有这样的啊！你们才有多少经历。共才一年，包袱不多，我们包袱多也不能骄傲，你们就更要努力，吃老本不行。有些老同志吃老本。犯了错误也要挨批判。批陈、批谭，我们是支持的。聂元梓立了两功，第一张大字报别人帮了他，把名签在第一个，立了一功；揭露了反党集团，可不能吃老本，不进则退。小资产阶级狂热——消极，从极左到打扑克逍遥，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这里呼吁外交院校不要到外交部去，那里国家外交大权，一不小心就犯错误，那里有机密，是啊，有高度机密的东西，因为和帝修反斗争啊！八月份办了三件错事，很被动。

国庆节前把没军训过的搞搞训练，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联合的学校不给他派解放军训练，不参加国庆。

你们在城里，与工农结合机会少，过了十·一，让你们去支援郊区县搞三秋，是个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好机会。

谢富治：同志们，刚才总理、江青同志、康老都讲了话，他们做了重要的讲话，要好好学习，开门整风。我们要搞革命的大联合，要搞斗批改，要搞革命的三结合。斗批改要配合全国的大批判，尤其是要搞好斗批改。江青同志的讲话，这是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的，不能当成耳旁风，要好好学习。如果同志们搞了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那就是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尤其是大联合，只有大联合，才能斗批改三结合。从此以后取消两派，天派、地派都不要，只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容动摇的，这不仅是我国革命司令部，也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对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表示极大的愤慨！

（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稿）

6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 支队 周泉纓、杨忌非《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 1967 年 6 月重版的一篇文章》

最高指示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一、陶铸之流的文章在 1967 年 6 月重版的时代背景

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夺取成果的决战阶段了，这是无产阶级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战役中彻底战胜资

产阶级的阶段。它标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刻来临，它吹响了把一切剥削阶级送进坟墓的大喜号！

但是敌人，正因为他们是敌人，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对派决不甘心於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後的挣扎。”因此在这个决战阶段，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比任何时刻都要尖锐万分，都要复杂万分！

把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纳入哪个阶级，哪个司令部的轨道，建立哪一个阶级的政权，乃是文化大革命决战阶段中，两大阶级，两大司令部，两种革命家的分水岭！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代表，在这一决战时刻，他老人家向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了战斗号召：“必须善於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布署，这是决定文化大革命最後胜利的一个号令。将文化大革命坚决地毫不偏离的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就能落实到改善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上。不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这个轨道，那么必然会纳入资产阶级轨道。文化大革命成果就会像辛亥革命成果那样被袁世凯篡夺。第三个轨道，第三种前途是不存在的。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陶铸之流——“袁世凯”在这里充分登台表现了。它和伟大统帅毛主席完全针锋相对。他在毛主席发出战略号令的时候，亲自命令群众组织小报抛出了他 1944 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大转折到来之前发表，在毛主席发出号令的同时发表，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预先策划的。

这篇文章打着读毛主席著作，歌颂群众运动的红旗，抹煞群众的阶级性，抹煞群众运动的阶级性，极端化地强调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性，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引导，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灌输和领导的必要性。这篇文章表面上也讲甚麽新民主主义的政权，骨子里鼓吹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这篇文章在此时（1967.6）此地发表的要害是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在关键时刻引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妄图利用人民的动力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权！从而一举扼杀文化大革命！篡夺其成果！

这篇文章是袁世凯式的反革命两面派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宣言书。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行“左”实右到顶峰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作。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篡党、篡军、篡政的反毛主席，反毛主席战略布署，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战略布署，必须对这篇大毒草痛加驳斥！在此我们对此文加以初步批判。

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参加群众运动的群众也是划分为阶级的。这是马列主义对群众运动的基本观点之一。这是一方面，如果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抹煞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观点，抹煞马列主义的根本方法——阶级分析法，那即便他们比任何人都高叫政权，他们所叫的政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

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观点，运用还是抹煞阶级分析方法，从来就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页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儿毛主席首先给了我们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这一革命分析最基本武器，一切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个武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也是如此。毛选的第二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就是最典范的使用了这个武器，以马列主义的最高热情歌颂了群众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颂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所谓笼统的歌颂，是格格不入的。毛主席在该文中特别强调歌颂了“革命先锋”，歌颂广大受剥削受压迫最深刻对地主阶级仇恨最深的半无产阶级贫农。把他们看成群众的主体，群众运动的主体。毛主席在该文中写到：“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的大业，革命的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可见主席全文热烈歌颂决不是全面性的群众，而是靠近无产阶级的贫农群众。主席在该文中所论的功劳绝非全民群众的功劳，而是只有贫农这个阶级部份所能创造得了的功劳！主席在文章中对农民之富农是批判的，而对中农则是鼓励和团结他们。伟大统帅对群众运动的阶级分析是何等英明呀！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观点是何等地强烈呀！！

可是这个野心家“袁世凯”，在他 1944 年写的，又在 1967 年 6 月在群众的小报上发表的用来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文章里，拚命地在掩盖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以最少的句子歌颂了贫农，然而对中农富农的问题只字不提。这完全等於抹煞了群众的阶级性。他把一个超阶级的群众观点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头上，说甚麽……乃是把群众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把群众的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充分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正确，信任群众的将来。”他还说甚麽：“毛泽东同志完全是群众方面辩护，群众、群众、群众的主体是甚麽？农民、农民、农民的主体是甚麽？毛主席是甚麽群众的辩护？！这儿群众的阶级性没有了。馀下的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全民社会主义”观点！抽掉了群众的阶级性就等於抽掉了群众运动的灵魂——鲜明的阶级路线和强烈的阶级目的！於是“歌颂”就脱离了马列主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全民式地歌颂了群众的一切。“过火”都是好的，可赞美的，群众中的每个部份都值得歌颂，而伟大群众运动的成果也就成了人人有份了。於是群众中各阶级的目的在这儿调和了，合二而一了！

当然现在并不如此。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他们的政治目的，过火行动的目的地是有明显的阶级区别的，有的是为防修，反修，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是开始不理解犯错误，後来理解了跟毛主席了，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只是个人自身解放。有的则为再分配阶级权力大翻个儿！“袁世凯”在此地违背现实的目的正是纵恣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迎合否定十七年，要求致力再分配的落後的反动的腐朽的阶级欲望，搞“大翻个儿”，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成为合法的！

这种极“左”的“歌颂”，全民式的“歌颂”，是“袁世凯”式的人物把群众运动纳入资产阶级轨道，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准备。

三、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的必要性

中国历史上有上千万的可歌可泣的群众运动，其中大多数是伟大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的皇朝，农民战争促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断前进。农民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民推动了人类历史，这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性。

然而为什麼从秦到清各个朝代里没有一个农民运动真正把受地主阶级压迫下的贫苦农民解放出来呢？为什麼没有一只农民军能够真正稳固建立一个真正

代表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的利益的政权呢？为什麼？为什麼？就是缺一条没有毛泽东思想统帅的工人阶级的引导，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引导，没有这一条，就没法克服他们小生产者的劣根性，就不能取得最後的胜利。

一切群众运动尽管它是天然合理的，但是他们都不可能自发地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对工农群众进行灌输！由此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引导，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他们决不可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他们的自发要求决不能上升到自觉的毛泽东思想的水准！他们的自发要求决不能上升到他们的最高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他们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後解放自己。到了运动後期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成果就被久居统治阶级地位的剥削阶级窃取了！他们种下了桃树，而剥削阶级摘去了桃子！一句话，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作领导，一切被剥削阶级都不可能代表自己阶级的最高利益，去夺取运动的成果，建立相应 的政权。

这个问题在小资产阶级特别广泛的中国尤为突出！历史上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林彪同志说得好：“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切群众运动，一切革命，脱离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可能永久，最後不可能取得最後胜利，而被纳入剥削阶级轨道！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修防修彻底根除剥削阶级根子的革命尤其如此！可是“袁世凯”在文化大革命夺取最後胜利的严重关头公然抛出他的大毒草来抗拒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引导！

他在重新发表的长达二万字的文章中，大反所谓的改良派，鼓吹群众运动的自由化。看他说的：“在物理活动的现象中我们碰到这样的规律，即事物的某些运动（这里是说运动的一种形式不是说运动的一切形式）在达到它的目的和定下它的重心之前，时常要或多或少越过它的目的或重心。在群众革命活动的现象中也有这样的规律”这儿引导不见了，毛泽东思想的灌输在哪儿，先锋队率领作用何在呢？

当然为了迷人，作者也不得不抽象地说几句：“无产阶级集中群众斗争的经验、群众的意见……”“纠正他们他们可能犯的错误”等等。然而由于作者抹煞

了群众的阶级性, 极端地“超阶级地”“笼统化”群众运动的天然性, 由此必然要抹煞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群众运动引导的必要性。他在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甚麽: “调停”——这是陈独秀的根本观念, 他这个根本观念, 就是漠视群众、限制群众和否定群众的观念, 就是孟什维克的方法论。

此地他只字不提陈独秀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尖锐性, 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性, 从而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拱手相让, 让资产阶级篡夺了“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结果使群众运动半途而废, 其成果完全被蒋介石篡夺。这一点你“袁世凯”今天否定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耍两面派手腕, 把群众运动引向资产阶级轨道, 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是多麽维妙维肖啊! 尽管你装着给陈独秀扣上了托洛茨基的帽子。但是你的目的还是要保住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实质——反对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反对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於是他们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归宿上合流了。

更重要的是, 正因为你抹煞了群众运动的阶级性, 抹煞了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引导的必要性, 你就根本不想提无产阶级如何引导群众运动了。

在任何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到来之前, 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区分在哪儿呢? 区分在於是否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去作调查研究, 去作阶级分析, 从而对阶级关系, 阶级力量, 作一个严格的客观估计, 以便最准确地最勇敢地站在未来群众运动的前面去领导群众。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谈到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要点的第一点就是: “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 顽固的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 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伟大统帅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总代表, 他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篇首先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後再来谈一切群众运动包括革命战争, 因为没有前者, 後者是空虚的, 不现时的。

“袁世凯”这个修正主义者就和毛主席对立。他尽管也空动地谈一句、两句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但是他在根本上不让年青的革命者知道怎样“引导”运动, 根本上抹煞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具体性。於是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到依靠谁? 团结谁? 打击谁? 谁容易领导? 谁不容易领导? 引导他们的甚麽? 哪些东西要提高? 哪些东西要预防? 哪些东西要克服? 等等问题。更谈不上

分析形成这些问题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内容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政党用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就成了空中楼阁了，而余下的是你“超阶级”的“歌颂”。“歌颂”实质上是保留和扶植运动中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影响方面，使之放任自流。在关键深刻一下子翻转过来吞没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部份！这就是你们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引导”，这就是把运动纳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

在你文章抛出的同个时期（1967年6月左右）毛主席有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里主席就明确地分析了大革命中各种政治势力和阶级力量。强调要依靠工农兵。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知识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的血液中。所以，革命知识份子必须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对群众运动的引导是多麽具体啊！阶级性是何等分明啊！而你明明知道主席的用意，而偏偏要发表你的狗屁洋文来对抗伟大统帅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真是罪该万死！

应该特别指出，整个群众运动过程实际上是代表两大阶级的政治势力，用自己的“理论”顽强地争夺“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的过程！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当权派，都在毛主席指出伟大战略命令的同时，顽强地引导运动，千方百计地迎合我们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思想，力求使它泛滥，扼杀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部份，从而达到篡夺运动成果的目的，复辟资本主义！而你“袁世凯”在1967年6月这个关键时刻重版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给一切敌人向我们争夺引导群众领导权提供的武器！全国性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在六月後非但没有失败，反而不断滋长的重要原因就在於你——“袁世凯”。

四、用“民众政权”口号来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任何一个革命的群众运动都相应地要解决一个政权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的步骤不外乎是两步：一是引导群众去打碎资产阶级的一切而不是打碎无产阶级的一切；二是引导革命群众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或其他必然向资产阶级专政演变的过渡政权。这儿第二条是衡量革命群众运动被引导到甚麽轨道上来的最终标志。当然资产阶级革命家“袁世凯”站到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也必定要最顽强地在政权问题上来“引导”群众运动，与毛主席相对抗。

“一切权力归农会”和列宁的“革命民众政权”一样是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接合，在民主革命时期用来引导革命农民运动建立向无产阶级过渡的政权口号。这个口号具有强烈的革命阶级性，它只适合于民主革命时期，用以对当时农民运动的领导，使之更好地纳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轨道，而决不能生硬地搬到改善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大革命中来！

用个这口号引导农民运动是历史性的，有条件的，暂时的。今天我们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决不是搬用这个口号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应当充分理解主席如何用马列主义引导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理解这儿的策略性。

更重要的是在提出该口号时，紧紧联系的，必然要强调农民运动的阶级性。毛主席在《报告》中说的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依靠贫农的农村革命政权。强调阶级性的目的就是强调这个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主席就告诉我们这个口号的策略性和阶级性。

可是狡猾的“袁世凯”，就利用这个口号，运用到 1967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中来，特别是登上赫赫有名的小报，以引导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他在该文中谈到政权时，避而不谈掌握该政权的阶级，避而不谈毛泽东思想如何引导该政权，避而不谈我党对该政权的具体领导，避而不谈在该政权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而“超阶级”地泛泛地强调此政权的“合理性”“完全正当的”“是真正的革命道德”，等等等等。泛泛地谈甚麽依靠甚麽“实力”建立政权。更为露骨的是作者赤裸裸地脱离阶级分析人为夸大这种专政的能力，甚麽“农民革命取得权力，就改变了生产关系，同时改变了农民自身。”甚麽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是统治天下的第一号能手……“老实说纯粹的“农民政权”“民众政权”“农会政权”之类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上出现的政权中剥削阶级的只有三种“奴隶主政权”“地主政权”“资产阶级政权”而被剥削阶级政权只有唯一的一种那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无产阶级政权”脱离了毛泽东思想，脱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脱离了无产阶级作核心任何一个（除了无产阶级）被剥削阶级都不可能建立代表自己最高利益的政权，所谓“农民政权”“民众政权”统统势必被剥削阶级“引导”成为“剥削阶级政权”！它根本不可能真正改变生

产关系的实质，根本不可能解放农民自身！这是历史，这是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由上分析，可见“袁世凯”的政权口号只能“引导”群众运动去实现资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在现时的中国，抽去阶级本质提出所谓“民众政权”“农民政权”等口号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政口号！只不过换个面目，耍个手腕罢了！

应该点明，在“袁世凯”重版他的文章之前，伟大统帅毛主席早以提出了用毛泽东思想引导运动的政权口号了。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两个政权口号，一个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另一个是“革命的三结合政权”。现在强调的是过渡性的临时权力“三结合”，在提到这个口号时，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详细地论述了甚麽叫“三结合”，也就是它们强烈的无产阶级性。指出它是防

修反修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新形式。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相结合提出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中唯一能引导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唯一口号。是保证改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口号！这一口号比历史上的运动提出的和革命家实践了的关于政权的口号要高多少倍！任何革命家所提的口号都不能代替它！

这样“袁世凯”的“要害”，就很明显地揭露出来了。他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口号这完全用来对抗毛主席的“三结合”政权口号的，其目的为了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争夺引导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从而实现一个必然向资产阶级演变的政权！

这个口号以极左的面貌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无政府主义，从儿使之泛滥起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诋毁伟大长城——人民解放军，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此外也直接代表了地富反坏右，美蒋特务“权力再分配”“大翻个儿”的要求。帮助他们去摧毁文化大革命，摧毁十七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袁世凯”的心是多麽狠毒呀！

回忆陶铸所谓“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口号，对比你提倡的“抓军内一小撮，夺军权”的口号不是一脉相通吗？造反派要阶级分析，并非都是无产阶级的！夺军权，谁去夺谁的军权呢？是夺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军权！所有此类口号带来的都

是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都是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口号，统统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到此地，我们就明显地见到了资产阶级理论家“袁世凯”在 1967 年 6 月这个文化大革命大转折快到来之时，重版他 1944 年这篇文章当中对群众运动的三个问题的论述的有机联系了！

第一步：模糊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从而来抹煞群众运动的阶级性！在“歌颂”群众运动的幌子下。扶植和保留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

第二步：制造片面强调运动的合理性，由此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必须灌输的必要性，否定对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从而由“袁世凯”用资产阶级理论来引导！泛滥资产阶级的东西，使之成为运动的主导反面，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

第三步：制造极左形式下的资产阶级专政口号（抽掉革命低级阶段政权口号的阶级实质，换上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来代替毛主席提倡的新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从而与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顽强地争夺取得大革命成果的权力。

三条牢牢地紧扣起来，最终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以及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复辟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建立必然向资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政权。

五、打着红旗反红旗

现代中国修正主义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行“左”实右。也就是以极‘左’的面貌来实现极右的目的。

“袁世凯”这个特别“机智”的反革命两面派，在这方面有他独到之处，在该文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片面地抽去本质地强调马列主义对某个问题论述的一个方面以攻击否定马列对该问题另一方面的论述，从而阉割马列主义在该问题上的灵魂。

马列主义对待群众运动有两个方面，一是“歌颂”，二是“引导”。两个方面都有强烈的阶级性。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歌颂是歌颂其天然合理的部份，引导是使其天然合理的部份发展、壮大、完善，去缩小、克服运动中的缺点，从而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歌颂是为了更好的引导。引导又是更好的歌颂，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但是，狡猾的“袁

世凯”以极左面目抽去群众运动的阶级性，笼统地去歌颂群众运动，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保留和发展运动中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部份，以便到关键时刻扼杀运动的天然合理部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这样“袁世凯”势必拿它的歌颂去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对运动的引导。而实质上还是让资产阶级引导运动。

这种手法很容易迎合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在“袁世凯”的“彻底革命派”、“左派”、“一反到底的革命小将”的一片歌颂声中，我们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忘记了时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必要性，於是他们头脑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淹灭了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就不自觉的演变成“袁世凯”的工具，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跟随“袁世凯”用超阶级的歌颂去猛烈的抵制毛主席对他们的领导。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516 兵团的很多年青人不就如此吗？还有我们当中……（脱落）同志不也是如此吗？

第二，抽掉马列主义革命家在革命低级阶段提出来引导运动的策略性口号的阶级本质，使之完全资产阶级，并以此来代替马列主义在革命高级阶段中提出来“引导”运动的口号，以便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将革命拉向倒转！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其他必然向资产阶级过渡的政权，这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第三，在运动的特定阶段强调各阶段不应当强调的东西来对抗毛主席在该阶段中特别强调的东西。

在运动初期，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的部份初萌芽，必然遭到反动的旧势力的拚命的压制，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是千方百计的保护这枝嫩芽，以马列主义伟大的热情来歌颂它，使它迅速地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当运动进入了中期或後期，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的部份壮大了、发展了，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引导越来越完善了。这时反动势力在强大的新生事物面前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它由压制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部份，转入扶植群众中不符合历史规律的部份即它对其影响的部份。企图以该部份来扼杀运动的合理部份，最後达到扼杀群众运动，篡夺群众运动的成果的目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是缩小、克服群众运动中不合理的部份，肃清反动势力的影响，完善运动中合理的部份，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轨道，从而夺取群众运动的成果！

每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侧重面是不同的。前一阶段侧重了歌颂，引导是辅助的。後一阶段侧重於引导，歌颂是辅助的。这是阶级斗争所必须的，无可非议的！“袁世凯”作为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典型是完全懂得上述规律的，於是他们就与无产阶级革命家背道而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必须善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後，故意抛出这篇文章，以极左的面目，超阶级的歌颂群众运动，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统观“袁世凯”的全文，乃是革命导师语录琳琅满目。而“袁世凯”在这些语录下面要反的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就是“袁世凯”与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点！不同点是他的手法可能更高明一些而已！

六，“袁世凯”的反革命实践

在伟大转折到来的关键时刻“袁世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以毛主席的关键指示针锋相对的反革命理论来引导群众运动。

有“理论”必有实践，袁世凯和其走卒在一起，在伟大转折到来之前干出了一系列破坏伟大战略布署的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反革命实践。其手腕之高明，其行动之机智乃是登峰造极的。在此我们不重复在《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人物——陶铸……》一文中论述过的东西，只提一些为什麼？

为什麼伟大转折以后党的全盘政策与姚文元同志在上海革命委员会贯彻的政策如此类同和鲜明呢？

为什麼过去北京的政策那么难於捉摸？为什麼它和上海革命委员会贯彻的政策差别那么大？

为什麼北京中央文革的阵地很多事件还要由姚文元、张春桥同志调回来处理？

为什麼在毛主席早就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以后，你从来不提这个伟大战略口号？

为什麼你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 25 周年纪念会上发言和姚文元同志发言内容相差那么大？对该文件的评价差别那么大？为什麼在 516 通知发表以后，你的一个讲话和该通知合不起来呢？为什麼你的讲话那么脱离阶级斗争形式呢？

为什麼你在刘邓陶未批深批透以前要大力搞教改？

为什麼你对代表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姚文元文章估计那么低？

为什麼蒯大富等同志的错误老是改不掉？老是打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而且硬得很呢？

为什麼北京的大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而且锋芒一直向上指？

为什麼你和林杰对团派和四一四的态度如此两面三刀呢？

为什麼你对北京两大派的 6.5、6.6、6.11 与（……）谈话调子如此看法矛盾？

为什麼你的亲信统统出了问题？为什麼你控制的报上同时在同个关键问题上——“军内一小撮”问题上出现了大毛病呢？

为什麼北京市广传你和江青同派，而总理、康老、××、××是一派呢？你把××、××放在总理、康老的後面其义又何在呢？

为什麼江青 9.1 讲话之後，林杰问题突然泄露到群众中来呢？而北京的天派如此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林杰问题来呢？为什麼师大问题搞得如此激烈呢？同时又为什麼广传谣言林杰整你的黑材料呢？这和 516 兵团的特点又为什麼如此矛盾呢？姚文元的文章中“过火”“公正”又指的是甚麽呢？

为什麼 516 兵团的规模如此之大，人物如此之厉害呢？

为什麼一月来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总是非常硬呢？而这种“怀疑一切”的风偏偏刮不到你头上来呢？姚文元同志文章中讽刺“怀疑一切”就是不怀疑自己，对光揭陶铸吗？

为什麼你的亲信在武汉忽而右得出奇，忽而“左”的要命，××在武汉是救出来的还是故意放出来的？换头术指的是甚麽？

为什麼武汉问题之後政策波动如此之大呢？“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指的是甚麽呢？9.1 以后政策为什麼又回潮呢？

为什麼在武汉问题上姚文元借用红楼梦的话“机关算尽太总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句话的意思是甚麽？

为什麼武汉问题以后，你控制的报（）抓“军内一小撮”？而同时全国都夺军权？此外你的亲信到处去夺军权。而这与你一贯对待军队的态度又有何关系呢？

为什麼前段群众中广传谣言林彪同志的军委和中央文革的矛盾不调和呢？

为什麼“武汉运动”论这种极端反动的理论竟流传那么广？影响那么大呢？

为什麼武汉问题前後，大量学生就已纷纷外出，谁放出“第三次大串联”的风？为什麼当时在底下广传“中央文革半只眼睁，半只眼闭”，默许这类流言。而後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反动的，严重地打乱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这与你有关甚麽关系？

为什麼全国中央已肯定了的革委会都受极“左”思潮的很大冲击？

为什麼你亲信的手全伸到总理的各部口呢？××为什麼对外交大权如此感兴趣呢？在这里不禁要问，奇怪的洋人李敦白与你有关甚麽关系？他为什麼能在中国掌那么大的权？呆那么长久？

为什麼总理的各部口总是一团乱，没有一点治呢？而你和你的人在总理的各种常委中权力又很大呢？……

够啦，够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全局性的问题，都是最大权力的问题，都是涉及文化大革命胜败的问题，小小的××、××是绝对办不到的，只有他们的主子你，才能办到这一点！

对於你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看一看你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你的历史，便可从你的登峰造极的两面派手腕中发现你伸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手，黑手终究是黑手，只要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一照，就完全能识别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流血不怕、砍头不怕、刘邓陶不怕、何以怕你小小的“袁世凯”呢？

为了捍卫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决心杀出一条炮打“袁世凯”的血路来！“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於牺牲，包括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把我们头颅系在我们的腰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倚天剑斩断“袁世凯”这只伸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手！

（口号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周泉纓《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

最高指示

“老实人敢讲真话，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

我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现在我沉痛地向江青同志、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向一切革命同志检查交待我犯错误的全部思想过程和有关行动。并进一步检察错误的思想根源。

（一）思想过程

我怀疑陈伯达同志是九月一日开始的，但是思想来源是长久的。为了把问题交待清楚，我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列成下列几段来讲。

1. 一些主观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听说早就要收了。我的愿望是希望迅速建立新型的红色政权，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平时状况。我以为大革命到今年二三月的状况应该说已经达到预期目的了。馀下的问题是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夺取最後胜利的成果。我认为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越快越能够保证成果，越快越容易发挥大革命的威力！推动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

但是运动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民祇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因此我在 414 成立时的想法是以“分裂战胜分裂”以“乱”求“治”，以便更快地建立防修反修，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414 成立後，陈伯达同志较多地过问了清华大学两大派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陈伯达同志的“收”是不迫切的。而今年三四月份看，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越来越严重地泛滥起来，不断地冲击、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此时必须克服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破坏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坚决地引入

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才可保证大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比较偏于倾向极左思潮，对于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的革命小将帮助不大。并且在引导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关键时刻，在某些不该“收”的单位反而硬要“收”，其结果反而使得“收”不好，“收”不快。

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来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走得比较稳，其政策比较符合毛主席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指示。与上海相比，我觉得北京的政策变化较多，不太好捉摸。在此期间伯达同志一些讲话、行动我觉得摆度较大，比如对聂元梓问题，似如有别的甚麽用意似的。更重要的是对待总理的问题，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很少保总理，大有搞掉总理之意。而我尽管在八九月份（1965年）对总理也有意见，觉得他折衷，但随着运动往后进展和大革命实践的考验，我愈来愈觉得总理后来的讲话比较和毛主席各个最新指示对得上口，和我们的想法也一致，迫切希望大革命最快地收好。总理给我们的印象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在处理问题时对中央文革特别是伯达同志很尊重。在权的问题上对毛主席很忠诚。总之我认为总理是个大“忠臣”，常务大权在总理手中就等於在毛主席手中，老百姓很放心。

所有这些印象是片面局部的，非常主观，像《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观点。但就是它们成了我错误的思想认识起源。

2. 七二零突然事件

“七二零”事件之前，我到河南去了一趟，看了一眼，一个任务是调查一下唐伟同志二月份在河南搞了些甚麽名堂，是否有根本原则问题，以决定是否吸收唐伟同志为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另一任务是从河南局势分析一下全国大革命的形势。调查完毕觉得按照康老、戚本禹同志原先对河南问题的调子是不难解决河南问题的。

“七二零”突然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我振动很大，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惊慌，我似乎闻到了政策有突变的火药味。政策一变，一切都变啦！这儿第一个问题是军权问题。如果对待军队也和过去炮打地方党委那样，那么军队必乱，军队一乱，军权就分散了。这样等於摧垮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手中的大权，毁掉了“收”好大革命的最后依靠。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内战有可能从新再现。到那时文化大革命就是“收”了起来，成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第

二个问题是民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问题，是否造反派一犯错误就有打成保守派？这样势必加剧武斗，加深对立，未来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损失也是惨重的！

面对这两个问题，当时我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焦虑和惊慌使我有些发狂，时怒时哀，当时很多同志都关心我得了“疯人症”！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七二零事件也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敌人为何这么凶？为什么抓了王力又让他跑了？

总之，七二零事件使我完全到了“激发”状态，终于我再次像头次炮打刘少奇那样豁出去，发表了《414 思潮必胜》大字报。我迫切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我这张大字报，使他老人家立刻转舵，以便使全国都像上海那样稳步地收好文化大革命，夺取文化大革命地成果！

当时很多同志都劝我不要谈河南问题，派别问题。要谈团结问题和引导问题。我顽固地拒绝了！我的回答是：关键就在这儿！大字报要害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为了策略起见，我没有和它们说明真意。

大字报发表后，团派和三七的同志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并且把大字报散发了出去，这样我就借助于它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在我预料之中的。现在看来，的确这张大字报有很多缺点和错误，阴暗面谈得多，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强。此外，的确表达了我对当时政策的担忧。大字报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团派和三七的同志们批评得正确。说实在的，大字报脱离了当时的时间、条件是不行的！

“七二零”事件和此事件后的情况使我怀疑中央还有大坏人，但是没有材料其对象是不明确的。

九月一日，江青同志发表了代表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伟大转折，而陈伯达的位置从要害地位降了下来，王力等则不见了。于是，我断言 414 观点是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意志的，而团派有的同志是错误的。同时我主观地政客似的怀疑陈伯达同志。确定了目标，把过去一切疑问完全加在伯达同志头上。

林杰问题的突然出现，种种谣言四张，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似乎又刮了起来。对此我觉得比较惊奇，觉得和自己的思路对不上了！后来师大问题起来，

中央表态了，这一下似乎我的心里豁开朗了。我把天派的过火行动再一此按照自己的思路全部地安到陈伯达的头上。

但是此时，我祇有怀疑陈伯达之意，而并无炮打陈伯达之决心。一是怕打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二是觉得材料不充分，三是中央一再说不要搞林杰问题，要相信毛主席。九月八日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文章，特别是最後一段，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姚文元讲：“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人民是勇敢的。”平时很少用“勇敢”的，然而唯独这次用了“勇敢”二字。这正是姚文元同志在鼓励我们炮轰陶铸似的人物，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於牺牲。於是我的文章就得出了两个实用主义的结论：一是陈伯达可以炮打，二是中央命令我们炮打陈伯达但不想我们搞林杰。因为一不解决问题，二容易引起大规模派别斗争，转移视线。

当时我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把文章一切要写的句子都加到了陈伯达同志身上，包括武汉问题等。

九月八日以后，我开始研究陈伯达的一些书，如十年内战窃国大盗袁世凯等。自然是去找毛病的，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的。九月十日左右，我把怀疑陈伯达的想法再次告诉杨忌非。而我自己则去开始写第一篇大字报：“重炮猛轰……”。到九月十三日中午杨把对 516 通知发表以来陈伯达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报告，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考查报告》的看法讲了讲。那天下午到晚上第一篇大字报基本上定了稿，并连夜抄写了出来。

第二天（十四号）中午贴出。十五号早晨我仔细看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当然是带着框框看的了。於是我认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决心迈出这危险的第一步了！当时，我还没“保险”的把握，但我认定这次怀疑陈伯达要比当时怀疑刘少奇时材料充分得多！特别是理论根据足得多。这时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又被激发出来，我认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勇敢的。姚文元文章点得那么明（当然是我带了有色眼镜的），中央已发出号召了，现在全北京市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轰陈伯达的，我应当站出来，把脑袋系在腰间，於是，“毒草”就出笼了。

（二）尝试式的行动

我觉得当时炮打陈伯达是危险的，当时思想上原因主要不是材料和理论根据的不足，而是对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摸不准，同时对“炮打”後造成的影响不好估计。因此当我要炮打陈伯达同志时比我“8.22”炮打刘少奇更没底。比起给蒯翻案，成立 414 总部也更无把握。心中总觉得像走钢丝似的。为了预防万一，不连累战友，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关于缩小影响面的措施

a. 把全部思路讨论祇限於我和杨忌非同志。

b. 在任何会议中作引导式的讲话，而绝不点明。

c. 在东方红战团内部宣布退出东方红，成立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在成立伟大转折纵队以后，力求不参加 414 总部会议。

d. 任何人问我有关问题决不作结论性的回答。大字报自抄自贴，并在必要时签上自己的名字，搞公开的不搞阴谋活动。

2. 力求让团派先炮打。

我从对情况的分析知道团派也在搞陈伯达的材料，我想让团派先打，因为它们有蒯大富这块硬牌子，打错了也没关系。而我们打错了危险更大一些。这里我的派性和私心是起作用的。在这里我采用了所谓“引鱼上钩”的办法。

a. 9月12日我第一次用伟大转折纵队名义发表了一个形势声明，以便试探群众的情绪，做为一个“民意小测验”。後来，我觉得群众的思路很迟钝，又叫杨忌非去做一个小动作，贴个纸条“伟大转折纵队的英雄们，你们的矛头指向谁？”但是效果还是不佳。

b. 9.14（左右）我发表了“重炮猛轰……”的大字报。同时贴上条子“特大毒草，注意保存。”以引人注目。

我认为该大字报是比较稳的，但又是很露骨的，而且还留着一条诡谲的退路。

我想如果团派继此大字报炮打陈伯达则暂时不发表文章，看中央表态。如果团派批判该大字报，那么，我可以采取不理睬的方针，看中央表态。如果中央向我们发出警告，我可以死不认账把自己的怀疑点推倒王力身上而且还可以向团派倒打一耙。当然这里也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和耍小聪明！

（三）踏上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当团派不发一炮的情况下，我再次分析了全校的形势，改变了战术措施，终于完全登上了炮打陈伯达同志，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我当时认为陈伯达是×××的后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团派是不可能炮打陈伯达同志的。我虽然也知道×××也在整陈伯达的材料，但我估计他在没有后台的情况下是没有魄力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炮打陈伯达的。因此，这最危险的一步，只好我自己来迈了。

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我对中央不够相信。认为该问题在没有群众的炮轰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不彻底解决则全国、北京的派别斗争就不容易解决。政策不可能完全在群众心目中转过来，大革命不可能迅速地按照毛主席那样的收起来。为了加速解决问题，有必要轰一炮，反正你老是煽动小将轰总理、康老（我把轰总理、康老归到陈伯达同志头上。）这回我也豁出去了。抱个不平轰你一炮，扫扫你的威风。

第二、我的狂热性到达了顶峰、认为做为一个有魄力的革命小将决不能有点地位，有了“军队”而不干为事业当敢死队了，革命总得有人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完蛋就完蛋，轰一炮！

第三、我觉得由于做了缩小打击面的措施，再加上我从来就和任何大人物、任何组织无连系，打错了对我是一个被动的考验，但决动摇不了我，于是我终于告别了我的战友，踏上了炮打伯达同志的台阶。

我决心下定后，我就请杨忌非同志来修改论文。

我告诉杨忌非同志写好一篇批判根本理论的文章就行，不必再整任何材料了。（在关键时刻，在关键的题上，人们的灵魂是要大暴露的。）我又说：“炮打”主要是靠中央表态。中央许可打了，只要透露对方的理论要点，群众立刻就会大规模发动起来，到那时，材料自然就有了。死整人事性的材料是纯军事观点，不懂得群众运动，万一失败了，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我和杨忌非只写了“炮打……”的文章，没有整其他任何材料。

3、我决定自己签名抛大字报，以便出事以后，中央容易调查。同时也表示自己忠诚的。

4、叫杨毁了自己的日记等物，我的日记等东西早已在去年八月准备炮轰刘少奇时烧光了，留下的其他材料，也在我总部成立时化为灰烬了。目的是怕出事以后多麻烦。

5、发完大字报，暂时躲避，以免群众在火头上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四）背景问题

团派同志认为我们的大字标有背景，其理由是不可能如此大胆。

的确我这次错误是严重地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破坏了战略布署，这是我的罪过。然而后台是没有的。当我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豁出去的时候，我是抛弃一切的。甚麽官、名、前途之类都可以不视，我想反正老子活了二十四岁，甚麽也见过了，完蛋就完蛋，没什么了不起！

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很顽固的，一个豁不出去，是没出息的！是不可能忠于毛主席的。

我一贯反对把自己和战友的命运莫名其妙地装在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的荷包里。战团里谁如果提出来去找找谁，我总是破口大骂：“他妈的，没出息的东西！”我认为，政治斗争是可知的。对于一个群众组织，它的成长、发展、壮大，它的生活，主要是看它的政治纲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靠这种符合毛泽东思想纲领的实现。去找后台莫非为了自己得到一种保护，一张不挫败的保票。这样就不叫干革命，而是叫干名利了！我对任何组织要以我们 414 的理论和实践去带动他们，他们好的东西可以学习，但不能依靠。我在 414 工作期间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按主席指示办事，认为革命小将应该直接按毛主席最高指示去衡量一切，这是防修反修的最根本的一条原理。只要光明正大，誓死保卫毛主席，就是错了，也容易回头。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自从 414 串联会以来，做为一个决策人之一，从来也没有去找过后台，也没有去依赖一个名牌群众组织，谁如果不信，可以调查。

（五）思想检查

我做为一个革命小将终于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在思想上不是偶然的。我思考起来有下列几点：

1. 严重的狂妄自大，不相信群众：

过份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群众，尽管也可以开会提一些意见，但我总是用我一整套所谓理由去顽强地说服战友，驳倒他们能够动摇我决策的全部理由，逼迫他们去执行我所决定了的战局。在某些关键时机以至於使用集权，先斩後奏，当然事後是可以做个策略性的检查的，但决不触及灵魂。在 414 的全部工作我的民主气氛极少，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同志们对我意见很大，由于严重的狂妄自大，使为慢慢脱离群众的意志。脱离客观实际，以自己主观去理解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和姚文元的文章。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这次事件一般是缩小圈子的，但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劝告的，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後，有个“三七”的同志看了我的大字报後，警告我当心坐牢！有东方红的同志警告我：你别太狂妄了！有的同志在会上大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意思是叫我止步。但我拿定主意後是不听意见的，认为自己动脑理解的毛主席布署前进哪有那么多害怕之理？

现在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会脱离群众的，而结果必定有可能长期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越来越远！

2. 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自我表现。封建时代绿林好汉式的对待革命：

我在下决心时，有一个因素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我企图以自己所谓英雄气概来开辟道路。一旦狂热性上升时，似乎具有很大的动力。此外，还有一种所谓“打抱不平”来对待革命。长期以来，总理、康老被炮打（当时我把炮打的原因归於伯达同志）。我想：总理如此忠诚，你还欺侮，他妈的！忠良不可欺！你煽动下面炮打总理、康老这批忠臣，我偏要打你一下，要扫扫你的威风。使用主义的判断加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顾大局，结果，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3. 无政府主义，对党不够信任：

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的思想在我头脑中滋长起来，喜欢无根据地、实用主义地、按自己的意志去怀疑人。评论首长没有专政秩序的概念。在重大问题上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这次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是无政府主义在自己头脑里滋长的必然结果。其实中央首长在王力问题上已经再

三说明了。可是我还瞎怀疑，狂妄地以群众的行动来支援中央解决问题，对党不够信任。

以上三条，是我这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原因。从思想上来说，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甚麽也做不成了。“回忆我犯错误的过程，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我在这两个根本原理上出了不少的毛病，我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相信党，而过份地相信了自己。这样下去是多麽危险啊！

今後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剷去思想上的毒瘤，使自己更好地前进。错误是压不垮革命小将的，被错误压垮的决不是革命小将！要前进就可能跌倒，要胜利就必然有失败。一切真正的革命小将都将像英雄的“海鸥”一样，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锻炼自己的翅膀。克服自己的弱点，沿着毛泽东思想红太阳照耀的道路前进！前进！决不後退！

如果有人问我：“你以后还敢不敢闯？”我的回答将和一切犯过错误而又坚决改正的真正的革命小将一样坚定不移：“敢！敢！敢！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小将永远不怕牺牲。敢字当头！

高唱林副主席语录战歌勇敢猛烈地前进！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於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摘要

10月7日，陈伯达、戚本禹同志接见人民日报社论组，接见中途，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些学生走进来，伯达同志问了他们是哪个学校，回答是清华、北大、

北航的。在他们回答时，伯达说：“向清华致敬！”“向北大致敬！”“向北航致敬！”

清华：我们两派联合起来了。

伯达：我不相信，要真联合，不要假联合。周家纓贴我的大字报，我是保护他的。

戚：你刚才还不是说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

伯达：我是有原则的，他能贴我的大字报，上纲那么高，这就说明他不简单哪！

北大蒋××：我们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

伯达：北大的两派联合是困难的，我那次讲话要北大取消动态组，保卫组，航空版，这是新北大的心头肉。但是北大井冈山，也干得太厉害了，我话还没讲完，就去抄保卫组，要抄也要先给人家打个招呼，让人家做个准备嘛！人家说我是保聂派。

戚：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组织。革命性是很强的。他们保聂元梓不是保聂元梓的错误，保的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伯达：我们都保嘛！……我现在也不同意周培源当校长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十月九日晚，陈伯达同志，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参加会议的有 23 中、35 中，清华附中三校的代表，接见时丁国钰同志也在座。

陈伯达：今天见到这么多中学教师很光彩，向你们学习。

谢富治：你们这样年轻都当教师啦！

戚本禹：还有十几岁的小学教师哪！

陈伯达：见到你们这么多教师，我很害怕。

谢富治：中学教师不简单，可你是大学教授，这还在话下。（随后陈伯达同志一一询问到会同志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学什么的。）

陈伯达问：中学停课多次啦！（答：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一年多啦！）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时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各校的情况）

谢富治：我今天找了三个类型的学校：一个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二十三中，一个是联合刚搞起来的三十五中。再一个是联合都没有搞起来的清华附中。

陈伯达：还是你有学问，你们考虑中学目前这个样子能不能改变？

二十三中同志讲：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复课方案。现在搞三个点进行试验。

陈伯达问：什么叫试点？你们不是都在学校吗？

二十三中答：都在学校是搞大批判。三个点是搞教改，摸索教学改革和教育革命的经验。

陈伯达问：你们的方案带来没有？

丁国钰答：在我这儿，（在丁国钰翻找的同时，二十三中把一份方案递给谢富治同志，丁国钰找出后，连同二十三中的斗批修计划一同交给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把两份方案交给陈伯达、戚本禹）

陈伯达：你们的计划这么厚。

戚本禹：可以写简单些。

二十三中答：这是四个材料，一个是教改的初步方案，三个是试点计划（戚本禹一直看方案）

陈伯达：学校的教师和干部解放得怎么样？

二十三中答：我校只有六个党员干部，两个非党员干部，解放了六个，教师除五人历史或其它问题没联合外，其余全部解放。

谢富治：（很惊奇地）那中学干部都解放得很不错嘛！（随后问其他两校干部解放情况）

陈伯达：现在中学上课行不行？（答：可以。要上课最好是大家都一起上，这样互相有好的影响。）

谢富治：老师、学生愿不愿意上课？（答：非常愿意。可是教师不知道怎么上，学生也说，上课是复旧。）

陈伯达：要边教边改嘛。应该边上课边改革。全北京一起上课，（有人说，要上课，有些学校还没有军训呢！）

谢富治：中学目前搞成这样。要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谢富治起来向在座的解放军刘峰等同志作揖表示感谢）

陈伯达问：现在还有多少学校没有军训？（刘答：还有六十所。）

谢富治：把六十所没有军训的学校都派去解放军。（有人说，有的学校解放军多）

陈伯达：我学过排、连、营教练。一个学校留二、三人就行。

陈伯达、谢富治：搞军训有政治意义。

陈伯达：在上课中搞改革，同学和教师都希望复课，可以考虑全面复课。

谢富治：教师也愿意复课吗？（答：愿意。）

戚本禹：多数教师是愿意复课的。

陈伯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提出方案，才能实现改革。

三十五中插话：现在应该很快解决毕业生问题。（各校介绍毕业生目前状况。）

戚本禹：两年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升学能够安排多少人？

文教口答：两年高中毕业生共三万五千人，根据过去情况，大学能够招收一万四千人。

戚本禹：还剩下两万一千人，要搞斗私、批修，要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陈伯达、谢富治问丁国钰上山下乡情况。）

丁国钰答：北京上山下乡的都造反回来啦！

陈伯达：应该造声势。（戚插话：要开大会。）要让学生知道上山下乡这是最好的锻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最大关怀。

丁国钰讲：昨天有几个学生志愿去内蒙当牧民，我们开了欢送会。

戚本禹：这很重要，怎么不宣传，应该登报嘛！（谢富治指示丁国钰要登报。）

陈伯达：上山下乡的青年应给予大力支持。

二十三中讲：六五年我校有二十八人去山西曲沃集体插队，只回来几个人，旧市委把人骗去就不管啦！插队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没人管，生活也有很多困难，由于学校经常写信鼓励，多数人还是坚持下来了。

谢富治：还是集体插队好，北京单个插队，结果全造反了！

陈伯达：你们认为上山下乡什么组织形式好？

二十三中答：我们认为搞军垦或者农场比较好，插队学生思想教育没人管。

陈伯达：先考虑六六年毕业生，再考虑六七年毕业生，大学收一部分，下余的可去劳动。办农场要朴素、艰苦，不要办双桥那样的农场。那是贵族化的农场。

陈伯达问丁国钰：北京有没有空地？

丁国钰答：北京没有。现在正去新疆、内蒙找。最好扩大现有农场，不然投资太多。

戚本禹：每年初中升高中占多大百分比？

市文教口答：根据过去情况，有百分之二十升高中，两届初高三有二十四万五千人，需要安排，我们去新疆调查，可以容纳一部分，不知能否让去，北大荒能容纳一万多人，今年还不要。

戚本禹：你们打报告，要掀起上山下乡高潮。适龄儿童有多少人？（答：五十三万）小学两年毕业多少人？（答：三十五万）

谢富治：有五十三万？！一个国家了！

戚本禹：这是个大问题。北京要向伯达写报告。要给我一份，学制要缩短，二十三中他们提出要搞十年，课程也要精简，二十三中方案也提出了，可以搞试点。

陈伯达：一般要全复课，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你们也可以提。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嘛！（戚本禹插话：他们是上连大学，下接小学，是中心环节。）大、中、小学要走上正轨。要重新组织起来，象这样散漫是不行的。军训要照常军训，课程适当精简，要学毛主席著作，语文也要加毛主席著作，要作适当安排，你们考虑怎么安排好。今天来的是少数人，回去你们可以师生商量。学制、教材你们都可以提出改革方案。你们的方案拿出来，受到学生的批判也不要紧，学生批判好嘛！学生批得不对也可以讲。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成为一家人。学生可以当你们的先生，学生可以给先生提有益的意见。（戚本禹插话：现在有的高中生写的文章比老师还好，不一定先生比学生高明）学生有时提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此时谢富治看二十三中斗私批修计划）

陈伯达：学生现在有许多防空洞，应该全面开学。你们要研究，谢副总理要研究，明天要开小学教师会。（谢插话：没有时间）我要研究，你不要泼冷水，我要全力抓。（谢富治插话：你是组长，管七亿的，怕你没时间，我是主任，只管七百万，你要抓，我奉陪，七百万要服从七亿。）

陈伯达、戚本禹：北京要做出模范，成为样板。

陈伯达：今天我们是学习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你们回去也要开调查会，开学生、教师、家长座谈会。把材料整理一下。

戚本禹：调查后写个报告，要简明一些，给陈伯达同志参考。学制几年好？清华附中有研究没有？美国几年？英国几年？德国几年？（无人回答）我记得丹麦好象中学是三年。

陈伯达：小学可以是四年，中学可以四年。

谢富治：学制的长短，从国家的力量考虑。我们的学制可以短一点，让更多的人能念书。要学好数、理化。要学好毛泽东思想。政治是很重要的，但最终要发展科学。我的话没有错吧！可考虑扩大研究生方面。搞数理化研究。文科可以不搞大学。

戚本禹：文科还要有，不能取消。

陈伯达：我们就谈到这儿。我今天做你们老师的学生，明天要作学生的学生。再见。（陈、戚退场）

谢富治：复课复什么课？

二十三中答：我们的方案提出要复八门课：政治、语文、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军体、外语（选读）。

谢富治：学外语？中国的广东话就是外语，欧洲都是一个个小国，他不学外语不行，我们中国出了几位大人物，把中国统一起来了。

上课与大批判怎么安排？半天上课半天批判行不行？升学怎么办？（有人说，不是要砸烂高考制度吗？不考试了，由学校推荐。）我还有点迷信，不考试，我认为不合适。不用分数挂帅，也可以作依据。派性那么重，保送不打破脑袋？方案是不是有两个，一个完全不够，一个简单考虑加推荐，我认为后者有说服力。你们要研究，保送根据什么条件，谁来保送。（有人说，运动初期，中央公布过废除升学考试制度，）

谢富治表示惊讶：有那么回事吗？要是，也是陶铸搞的，陶铸就是坏。考原子能专业的，入学不考试怎么行？收我这样的就没有用。（有人说，这届恐怕不能考了，一考准造反）不怕，正确的不怕造反，初中升高中考三科还好办，如果要考语文，政治就可以不考。20 万人要安排，这是天大的事，他们都是国家的

精华，我们要对他们负责，要开几个座谈会，（把去各地的上山下乡的人找来谈谈）别都找那些不愿回去的，还要找愿意回去的，有鼓舞作用，我起码来一次。我总结经验，成立一个一二十人的机构。

（对丁国钰讲）你们可以提两个方案，一个彻底革命，甚至改过头都可以，一个保守一点，提供中央考虑。

（未经本人审阅，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不得外传。）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十月十日晚，陈伯达同志、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参加会议的有 23 中、35 中、清华附中三校的代表，接见时丁国钰同志也在座。〕

丁国钰：你们是二十三中的吧？（答：是。）二十三中是走在前面的，你们没有骄傲，没有翘尾巴呀？（答：我们不会的，我们翘不起来。）做的不错。（答：我们离毛主席的要求差得远呢！）这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谢富治：中学联合的不错吧？（看到清华附中的刘刚说）清华附中很丢人呀！别人都联合了，你们干什么呢？不象话，你们太丢人了。清华附中有没有解放军？

（答：有。）你们不听人家的话，解放军也是和稀泥吧？（清华附中同学说：联合了。另一个说：没联合，是解放军做了努力。）中学都应该联合，中学生都是娃娃，清华附中要做模范，不要象现在这样。（三十五中同学讲：头头是大联合的障碍。清华附中谈到老红卫兵问题时。）

陈伯达：老红卫兵，噢！联动。

谢富治：你怎么这么说，老红卫兵不一定是联动。

陈伯达：对，不一定！不一定！老嘛，老就有些毛病。

谢富治：什么这派那派的，都是山头。

陈伯达：别说这个了，说正题吧。聊聊你们学校怎么办？国庆节已经过了，你们干什么？怎么搞？你们不要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大学生并没有什么高明，你们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谢富治：别说大学生，中学生我都怕。

陈伯达：不要跟着走，就说陈伯达说的，轰我陈伯达也不怕。戚本禹不敢说话吗？

戚本禹：我是小学生，你是老百姓。

陈伯达：你们现在去劳动，劳动回来怎么办？开学好，还是不开学好？（一致回答：开学好。）

陈伯达：要边教学，边改革，在教学中研究改革。改革不能脱离实践，教学就是实践，在实践中进行改革，不能脱离实践空谈改革。你们要在学习中提出改革方案，空谈改革是不行的。

戚本禹：小山头都不要了，什么井冈山，延安公社呀！六百多个学校，大概得有一千二百多个组织。

谢富治：不，得几千个。戚本禹你是那个山头的？

戚本禹：我没有山头，我是共产党员，搞那么多组织干吗？有些人就是想当头头，当司令，有领袖欲。那时有反动路线可以，现在跟刘邓走的是个别极少数，现在基本具备了大联合的条件。要按班系实行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指示。（问：组织还要不要？）要实现班级大联合，还要那些组织干什么？那么多司令部，你一个，我一个，怎么联合。

陈伯达：离开大联合不行，各有各的心思，三人成派，五人成党，都要称王称霸，有小野心家，有大野心家。你们边上课，边研究改革方案，一门功课一门功课地研究，怎么个改法。怎么教？怎么学？要不要硬灌？先生讲，学生听，还是学生自学，先生辅导，你们研究。

谢富治：昨天和教师谈，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考不考试？去年八月是陶铸提出不要考试了。不要考试，那怎么看谁上大学，上那个大学，学生不高兴考试，推荐会把脑袋打破了，要考试和推荐相结合。

戚本禹：毛主席并没有说一定不考试，而是反对袭击的办法，反对分数挂帅。

陈伯达：要有两种考试，一种升学考试，一种平时考试。平时先生可以出一些题目去研究，象主席说的，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分数挂帅。我念书时，平时考的是“丁”分，甲乙丙丁的“丁”呀，就是 50 分以下。后来我代数、物理都考第一，人家不服。因为我找着窍门，就是死背书、抄书。以后就应该先生出题，学生自己做文章。平时你们自己深思先生出的一些题目，自己研究。不要在课堂

上硬敲硬打。不要搞突然袭击。大家交换意见，搞互助组，互相帮助。你们去研究，一种是平时考，一种是年考、毕业考、升学考。（清华附中有人说：我们平时没事干，要上课。）

陈伯达：你们涣散了，没人管，要按班级联合。不搞四三、四四，分派分的无组织，无纪律。先上课，要开学。一开学，按班级联合的问题就解决了，本来不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闹得那么复杂。

谢富治：二十三中联合后分两派吗？（答：没有。）

谢富治高兴地鼓掌，连说：好，好。

陈伯达同志问：开始就没分两派吗？（答：对，没有。我们开始就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听后，陈伯达也高兴地说好，好。三位首长同时鼓掌。伯达同志继续讲：我请你们当先生，你们说，开不开课？怎么开？有什么障碍？

丁国钰：二十三中同学讲吧。

（二十三中同学汇报。）

陈伯达：你们不但要搞三个试验班，也可以在全校开课，然后补充、修改、提高，各班经验不同，互相比。不复课不行。我们肯定你们的基本经验是对的，要在全市推广，也可以在全国推广。要进一步补充、提高。在实践中变革教学。象主席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三十五中同学插话：二十三中是特殊的，四月份没有受冲击。）

谢富治：怎么？你要到那里去冲，去捣乱？（答：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学校同学现在没事干。毕业生要分配，同学们普遍反映不愿插队，有人借文化大革命造上山下乡的反，文化大革命就要革这些人的命。）

谢富治：有些上山下乡的都回来了。

陈伯达：这还要研究一下，找上山下乡的同学研究一下有的地方适合插队，有的地方不适合插队。集体插队比较好，个人插队比较不好。（这时谈到最近有一批青年到内蒙插队的事。）

谢富治：你们再选一个主任，我带一批娃娃去插队。

陈伯达：我也不当这个组长，也去插队。现在学生来了没事干，是个问题。大、中、小学要普遍开学，普遍上课，你不尝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要在

实践中研究，订方案。将来会基本相同，但有差别，不一定完全一样。城里、乡下的中学可能就不一样。

（清华附中插话，我们学校没人领导。）

陈伯达：没人领导，可以选一个校长。解放军可以担任，学生不行。选校长定出几个条件，解放军、教师都可以，不是走资派，校长、副校长都可以继续当。选出校长，就要为大家，不是为四三、四四派。暂时可以，长期的也可以。半年、一年都行。开学必须有头，选举学校管理委员会，三至五人，有主任委员，有校长。不要定死，讨论一下。选举校长有问题，要打架。不要派别，不要四三，四四。要按班级联合。不要打架，要有领导班子。你们毕业打算干什么？要当兵、当工人，也要当农民，没工农，就没有兵，农民还是大量的。升学问题要解决，我向你们要解决的办法。

（二十三中代表发言，目前要复课闹革命。边实践，边改革。现在毕业分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不然影响我们全盘计划。这个问题是否在我校可以搞试点。）

陈伯达：可以试试。失败了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

丁国钰：你们想当老师吗？（答：革命工作需要就可以当。）

陈伯达：中学红代会脱离群众。中学红代会对中学问题没有发言权。搞特殊化，你们有秘书吗？出门坐汽车吗？

谢富治：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陈伯达：我是根据大学的，我不拆台，我拥护你们，但你们怎么搞？

丁国钰：把优秀分子吸收进红代会。红代会要考虑升学、毕业问题。红代会代表半年换一次。

陈伯达：红卫兵很多嘛，就你能管理同学，我们就不行啦？！

戚本禹：他们尽参加国宴不行。

（这时首长又问我们将来想干什么，大部分想当兵。）

陈伯达：当兵是很好的理想。但是要有个比例，根据需要。你们现在一定要搞班级大联合，搞全校性的。二十三中可以在全市大力推广。按“三·七”批示办，按主席思想办。条件成熟了，大联合了，老牌不要。你们不要当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要走在前头嘛。（问清华附中一个同学。）你们组织有多少人？（答：现在不清楚。）你们有多少兵都不清楚，还没什么？对联动，让他们回来，帮助

他们，不要打击他们。福建东海兵组织犯了错误后，一次开会坐在最后面，我叫他们上前边来，叫他们改正错误，拜老百姓作老师。对联动问题。要一看二帮，小孩子们，一定要以老百姓为师。东城纠察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他们有反动的，要争取，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主动与他们接近，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犯了错误，感到不好意思。老红卫兵改掉错误就好，不要单独联合。干部子弟要放下包袱，联动分子要放下包袱。

谢富治：年轻人，小孩子，要团结多数。

陈伯达：对，慢慢来，人家不理解可以等待，不要着急，不要光要检查。

戚本禹：老红卫兵要向新红卫兵正确的学习，新红卫兵要团结老红卫兵，新老红卫兵要搞大联合。

陈伯达：可以和他们在—块谈心，交换意见。老红卫兵要纠正错误。我们对东西纠察队采取帮助态度，不是打倒。头头带错了，他们还是年轻人，要给出路。犯了错误要—看二帮，以后改了就好。摔了跤爬起来，比不摔还好。没犯错误的不要高兴，将来可能犯，我不是鼓励你们犯错误，你们对过去犯错误的要有个正确态度。本着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们回校，你们要鼓掌欢迎，不要喊打倒。不是欢迎错误，对错误要严肃对待，但要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改不改要看帮助嘛！我们讲多了，我是来当学生的，我们来请教，你们考虑。（又问我们教改方案。二十三中谈了简单计划，因详细材料已经上交，按我们计划，小学、中学各搞四年，毕业后劳动两年。）

陈伯达：你们考虑可以不要专门劳动，可以—边学习，—边劳动，穿插进行。

谢富治：小学、中学、大学都可以短，然后再搞尖端。（停了一会又说）二十三中是否搞了试点，你们全校要搞试点。

陈伯达：你可以让全北京市都开学嘛！

谢富治：不行。二十三中要搞起来，要全校大复课，我们可以推广。

戚本禹：可以办抗大式的。

（二十三中同学发言：我们就是要办抗大式的学校，但我们需要解决师资问题。根据我们的安排，我校现在教师就不能满足需要。）

陈伯达：开课教师问题。你们可以当教师嘛！在你校的师大同学也可以留下当教师。清理教师队伍慢慢来，随着运动发展逐步解决，教师都可以让他们上课。

谢富治：你们可以让老师上课，有错误然后批判。

陈伯达：批评教师要采取适当方式，有错误看他们是故意搞鬼，还是不是故意讲错的。

戚本禹：不要无限上纲，动不动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弄得教师不敢讲话，要实事求是。

陈伯达：也可以让同学讲。上课时先出题目，学生可以先准备，推一个人来讲，先生先听，然后帮助学生提意见，挑毛病，大家辩论，之后先生讲，再讨论。先生也是学生，学生也是先生。你们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毛著，一边开学，一边复课，搞班级联合。

戚本禹：复课，数理化也要学。没数理化怎么打飞机，不学不行。首先要学毛泽东思想，其次学数理化，这是基本功。有可能的可以自修，可以不用先生，少数人可以当先行权。先生可以给补充，纠正。有些人在数学上很敏感，有些人聪明，做题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上课方法可以研究。刚才都是出题目，供讨论。我们是学生，提的是供讨论的意见，不要当最新讲话。我们向你们请教。学生不动手动脑是搞不好的，不依靠实践是搞不好的。你们要讨论，要实践。学生老在社会上游荡不好，对你们对社会都不好。要组织起来，进行教学。

戚本禹：学校的特点，不搞教学，学生组织不起来，比如工厂，要搞生产。

陈伯达：学校不搞教学，学校就散了，就不务正业了。你们回去跟老师、同学、朋友商量，多种多样，但基本上要启发式，不要填鸭式，要诱导。

陈伯达：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不要我们去当保姆，自己干，按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研究方案，听不同意见。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我还要到那边去开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10月11日，谢富治副总理单独接见了聂元梓同志。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吴德同志。谢副总理说：

- 一、北大与谭震林没有联系；
- 二、周培源不能当校长；

三、 要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十月十四日下午三时许，谢副总理在东郊机场欢送谢胡同志之后，来到了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见了学习班全体学员，作了重要指示，同谢副总理一起前往的有聂元梓同志、韩爱晶同志、蒯大富同志、谭厚兰同志、李冬民同志。在学员宿舍里，谢副总理对新北大校文革问题作了指示。

谢副总理说：北大校文革是权力机构，同十五个学校革委会一样嘛！

（学习班核心组同志说有人把北大井冈山也拉入学习班。）

谢副总理：参加学习班那不是实质问题吧！北大井冈山也来了，他是想搞点什么名堂吧？

（核心组同志说他们不承认北大校文革，没有通过北大校文革。）

谢副总理说：北大校文革是要承认的，承认不是那是不合适的。是不对的。（指着旁边）聂元梓同志还是我们革委会的付主任嘛！要承认他们校文革。

核心组同志说：井冈山的人已经来了，怎么办呢？

谢副总理说：要他承认校文革，叫他们回去到校文革办一个手续吧！承认校文革。

（随后谢副总理就到会议室去，在下楼梯时，核心组同志说为了北大校文革问题，我们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就是不承认校文革。）

谢副总理：那有什么意思？北大文革是全校师生选的么！要承认北大校文革。

谢副总理在向全体学员作重要指示之后，当着全体学员又谈了北大校文革的问题：“北大校文革那还是要承认的嘛！”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

中学生最近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复课闹革命有很大成绩。前几天，主席有最新指示，要我们开办训练班。这样会有很大好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早就提倡的，主席一向是这样做的。我们什么事都得有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

我们的纲领。有了这个纲领，我们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只有通过实践，这样事情才好办。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一年了，我们按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伟大纲领，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搞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发动，第二年是决战，第三年是收尾。现在文化大革命一年半多了，现在基本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垮了。虽然没有把他们从政治、思想、理论上彻底搞臭，但他们垮了。现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大多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是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我们有优越性，我们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比较多，我们有好条件，我们应该更加紧跟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搞好。我们应该首先进行革命的大联合，才能进行革命的三结合，才能把斗批改推向更高阶段，这样才有利于复课闹革命。同志们，中央最近几天要发布命令。准备大学、中学、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只有这样，斗批改才能进一步进行。要复课，复课不难，复课就有一个东西吸引着同学，就是大批判。有了复课，可以把大多数同学集中起来。原来，有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少逍遥的分子。如果复课，可以把逍遥分子集中起来，积极分子更可以发挥作用。这样三结合、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才能更好地进行。

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都要联合起来，你们为什么联合不起来。当然这种联合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但是，小是小非，我们就不要管它了，我刚才在大学那也讲了。集训班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搞集训，主要是发扬成绩，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小将有很多的丰功伟绩，揭露了许多坏东西，打破了四旧。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大批判家。要好好地总结一下。在刚开始时，你们没有经验，犯了一些错误，应吸取教训，避免重犯。你们这些人不要老碰钉子。你们凡是不对的都不要做。你们应该总结经验，提高勇气，克服困难，不能一集训都把你们整得灰溜溜的。你们应该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问题。批臭走资派、捣毁四旧。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做得不够，防止修正主义，各个组织和每个人都要注意。首先要注意“斗私批修”。“斗私”，不要把勇气整没了，斗垮了，不能把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勇气斗垮了。要总结、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大是大非。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样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象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以及那些小商贩（投机倒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处理两类矛盾

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那些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常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来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两种。有我们革命派内部与革命派内部的矛盾；革命派组织与保守派组织的矛盾；革命派与犯错误干部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属于内部矛盾。但是革命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彭罗陆杨、刘邓陶以及赫鲁晓夫野心家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我们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往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说明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伟大。我们处理方法一贯是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要允许别人对错误有一段认识过程。象武汉的陈再道等五人，主席叫他们到群众中去，也叫他们参加集训班。这五个人感动的都哭鼻子了。你们革命小将也是这样，在运动刚刚开始时，没有经验，犯了不少错误。现在我们应该把那些错误扔掉。你们当时，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勇气是好的，但是打人、抄家、喷气式、弯腰、剃光头，这些是我们伟大领袖从来就反对的。你们对那些走资派这么干了以后，伟大领袖也没说什么，但这并不是纵容你们这样去做。你们把当权派搞得灰溜溜的，那谁叫他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但话又说回来了，不能因为这个，你们那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又对了。

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总结一次经验。毛著学习班就是叫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们不要泼冷水，不要搞得灰溜溜的，打击了革命小将，叫老保翻天，这绝对不允许。我们在搞革命大联合时，也要搞班级大联合。主席的

“三·七”批示我们一定要坚持。主席的“三·七”批示我们准备再从新公布。你们中学生在这方面要带个头。你们解放军不要老迷信巴黎公社的那套选举。你们要搞协商，搞推荐，我看协商比那个选举还民主，你们别笑，主席一直是这么干的，协商是一个好办法。我看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从来都是搞协商，那资产阶级的一套就是考试，考个五分也没用。当然协商不见得都同意。我看这是个好办法。毛主席一向这样干。各方代表经过多次协商，反复协商推荐，然后才进行选举。最近听说六中红旗要被别人吃掉（群众：六中红旗负责人来了。）你们组织有多少人？（××：四百多人）对立面呢？（××：对立面新兵，一百多人。）人家一百多，你们四百多，人家怎么能吃掉你们呢？如果协商，也要照顾别人。你们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娃娃，你们做的就百分之百符合毛泽东思想？

我看不见得，别人也有做得对的。好多日子没提老红卫兵了。现在我也提一提。人家老红卫兵，你们也要帮助人家，干部子弟都不好，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然，也正象江青同志所说的：“我们的干部子弟很叫人耽心。”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修正主义容易在这里出现。有一部分也好，但是他们毛病不少。但不是都不好，大多数都好。有少数人不好，有少数黑帮子弟不好办。他们是有阶级仇恨的。

你们一定要把班的联合搞好，四·三派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退出班级大联合，各派应联合起来，应补台，现在不能四·三派、四·四派了。

我看，你们核心组应当轮流当，这个人当几天，那个人当几天，怕什么，你们那个头头应当轮换。伯达同志讲过好几次，中学生可以轮流当。但这并不是说你犯错误。

不要搞四·三、四·四。但是大学生在这里分裂。谭厚兰，你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小朋友对班级联合的态度，对毛主席三·七批示的态度就是革命和不革命的问题。有人就是坐不下来，不好好学。我们这些人也要交班，交给你们，你们要学好马列主义。你们小资产阶级容易动摇，你们不能动摇。中国七亿人民看着你们。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正象林总说的：受到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你们中间不能出修正主义，你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这话讲二十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看你们坚持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坐下来半个月好好学习。我们与国民党打仗时，打一仗就坐下来学十天、十几天，半个月，总结经验，再打再战斗。我们打仗打了一年，坐下来修整，准备打下一仗，打斗批改这一仗。你们就是懒，光说等中央下命令，中央不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吗？你们自己要总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怎样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们才能按框框干，要克服缺点，发扬成绩。集训半个月要写一份总结，每个学校都应开学习班。江青同志九月十七日、九月十八日发脾气，说我们有些学生就是不听话，主要是有一些人捣乱。当然，这主要怨我，我没有好好帮助你们，但帮助你们也不听，现在才听了。得了，李冬民，就叫我讲到这里吧，我还要到别处去。

（群众要求评价解放军在中学运动中的作用）解放军在中学生中间的功劳最大最大，应大大树立解放军的威信。要留二、三个人一直在学校，解放军在学校，你们应该感到荣幸。（群众：二、三个太少了），那不少了。

（群众：现在有许多组织怎么办？）要削去山头，按天津延安中学经验办。回班，复课闹革命。

（群众：现在高、初三年级有的到内蒙去）报纸都支持嘛！电台都广播了，下去欢迎。

（群众：东城很早就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人有意见，退出怎么办？）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都承认，不承认也不合适。退出去的应回来，补台。退出去不对嘛！要联合，补进去。应坚持承认革委会。

（群众：对老红卫兵怎么办？）老红卫兵不要单搞，要加入别的组织。有个别解放军对四·三派态度不对，当然，有些四·三派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更不对！好！别问了，我该回去了。

四、北京市革委举办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讲话

〔时间：下午，地点：北京林学院。〕

训练班的方法，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用总结经验的办法，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在干部轮流做了一段实际工作，然后把干部集中起来，带着问题来学。这种方法不仅仅是战争时期，革命时期客观的条件只使我们是这样做。这个学习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所提倡的。……

我们伟大领袖特别讲调查。如果讲理论马、恩、列、斯啊，毛主席是创造性地，最高的马列主义。要谈理论，是所有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解决的，或不可能解决的理论问题，都是我们伟大领袖解决了。但是，毛主席解决这个理论问题很实际，从实践中间提升到上层。因为实践，也需我们把毛主席的全

部著作学一学，一直包括最近的最新指示还有那么一句：最聪明的人，最有才干的人是那些在实践，在实际斗争中的战士。是不是有这么一句呀？……

这个训练班的办法是一个好办法，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最好的办法，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所提倡的罗！有时间几个人在一起想一点问题，每天想点问题，就可以把我们这一段，半年一年的实际，哪些东西是成功的，哪些东西是不成功的，哪些东西是错误的，他就比较冷静。我们现在学习，一个最大的好处，首先有共同的纲领，这个共同的纲领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著作，毛选，又有些毛主席最新的指示做纲，做为你们学习的纲。根据这个纲，根据这个精神，来总结我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主要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有走资派，还能够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还能出现修正主义，还要经过阶级斗争。以这个问题为纲，来把毛主席的各种著作和现最新的指示列一下。由这么几个问题来看一看。

在革命的初期有一些小将轰他一家伙，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贴一些大字报，把你打倒啊，目的不过是打，得到就打，打不倒就算了。搞你个喷气式，斗争你一家伙，我们说不提倡这个东西，那时候打你一家伙，固然在整一个气焰外表……那个习惯势力很重，走资派这个习惯势力的力量相当大，不然的话，没有这一搞和天不怕地不怕，这么冲他一家伙，冲不垮，冲不开的，所以过去那些今天看起来他们都是缺点，甚至是错误。对待革命小将不能计较那些。我们要看大方向，如果谁要拿出东西来反攻，来整我们的革命小将，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反对。

一个是从路线方面，一个是从斗争方法两方面总结，主要是发扬成绩，其次是克服缺点，就提高了。纲领就是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和最近的最新指示。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什么态度是考验一个人是革命派还是不是革命派这一点不能马虎。我们有个别学校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不大认真，当然绝大多数是认真的，个别学校个别同志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学习不大认真，甚至不大严肃，那个东西是不能容许的。毛主席在斗争很紧张的时候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去了六省一市。到了那个斗争热闹的地方去，特别是湖南、江西，最厉害的地方去跑了一趟，就是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呀。……

在这一点你们小将是够毛主席的思想，天不怕，地不怕。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什么这个乱子，那个乱子，他都不怕。去年接见 1000 多万红卫兵时，那次在长安街围得水泄不通，我们这些人有一点胆子小，怕得跟什么一样，人家根本没那回事一样，还批评我：“你们就那么紧张。”主席那真是主席呀！在延安打仗，打胡宗南，带的一个排呀，一个排的兵力，胡宗南十万八万军队呀，打到那个地方，那个军队只离几里路，他还没有事，也还那么走，伟大的气魄！伟大的胆量！相信群众呵，这点也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学习应该把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要解决下去。这个革命的大联合还是要在学校按班级大联合，这点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转过“三·七”指示。……不仅是搞革命的大联合，而且搞以班系，工厂搞以车间科室、工厂的一起搞联合。要复课闹革命。大学、中学、小学统统都要复课。你不复课你知道那个地方改，那个地方不改呀！只有在实践中间才能改，你不实践你不知道怎么改，边复课边改，现在要把这个同学的纪律约束到学校来。

最近以来，有些不怀好意的、甚至恶意的、甚至坏人、甚至走资派挑动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经常有一点哪。这一点我看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个是坏人利用这个无政府思潮，你清华已经贴了伯达同志的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么？我看不行。据说你们清华有一个人去告诉戚本禹，怎么讲了，你们上百人的材料我都整……那一天就抛出那个人的材料，你这是开玩笑吗？这是什么话呢？最近党校出了一件什么事，你们听说了没有？你们消息大概比我灵通。（没听说）都听说了的么，李广文我也不认识这个人，没见过这个人。康生同志经常都是很保护这个人。他翻脸不认人，就贴康生大字报，贴得很恶毒。我听了这件事很生气，肯定是个坏人。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啊，听说我们政法学院也贴了康生大字报，还是那个人的大字报。政法的来了没有？有没有这件事？（……）没有贴靠不住！（××说：我没有看见）我听到说了，好多人都听到说了，你那样得了，你在小站搞伯达材料，这个账没清算。现在就这样做呵，这种办法千万不能这样子啊！千万不能上坏人的当啊！

现在你们再这样，可是要坐班房了，我要跟你们说了，因为有些家伙故意造成事情。……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967.10.14；中发〔67〕31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并转各群众组织：

（一）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二）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五）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此件在各学校内张贴）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李钟奇：北京卫戍区付司令员〕

奉周总理的指示来制止武斗。武斗停止下来了，如何想法把武斗在这里制止，永远不再发生，解决消除武斗一切后果。指名派丁国钰和我来，……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武斗暂时停止下来了，你们还很听话，双方还很紧张，要脱离接触，究竟怎样脱离接触，大家考虑，以后双方达成协议。二、脱离接触，广播停下来，不要跟对方攻击，不要相互攻击。三、人民解放军考虑怎样把双方责任搞清楚，成立一个专门调查组，调查武斗的原因。

附件：

北外“红旗”与“造反团”在李付司令主持下关于制止武斗所达成协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双方立即撤离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绝对不允许调动各单位人员参加武斗。

二、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不许互相抓人，双方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已提的双方人员。

三、双方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交出一切武斗工具。（由卫戍区解放军封存）解散一切武斗专业队。

四、双方不得用任何形式攻击对方（如用广播、传单、大字报）。

五、双方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十月十八日关于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行开门整风，进行自我批评，尽快按现班级系的革命大联合。

六、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协议，谁破坏协议，由卫戍区和革委会作严肃处理。此协议从十月十九日零点开始生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摘要

战士：吴德同志，周景芳的态度极不老实，很嚣张，说没有接到你的新指示前，他什么也不说。我们希望你把刚才讲的，让秘书转达给周景芳。

吴德：不用转达，就几条嘛：1，你们根据戚本禹、谢富治指示去执行；2. 你们可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质问；3. 谢富治同志、戚本禹同志还讲了一条，他回去还有自由，你们不要限制他的自由。要注意六·六通令。就这么几条嘛，最近“大庆公社”抓了人，那不好，抄林杰的家，中央也要通报。

战士：我校运动很复杂，斗争也很激烈，孙泱之死，你知道吗？

吴德：我接到了你们一个报告，说是死在暖气管上，我也很奇怪，1.3米暖气管怎么能吊死？

战士：这里有很大的阴谋，我们正在追查孙泱之死的内幕，但“新人大公社”一小撮人却不断挑起武斗，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转移视线，还把他们的战士赶到乡下或城内，现在“新人大公社”中有不少造反的。

吴德：要加强思想工作。听说你们学校闹得很凶。主席、中央最近的指示你们看到没有，要联合，要复课，人大的问题很复杂，你们要警惕。要掌握政策，不要上当，防止敌人钻空子，坏人一钻空子，你们就很被动，（谈到肖前）那次江青同志讲了，我才知道肖前。你们要看管肖前，防止杀人灭口。

战士：我们加强了看管，人大问题复杂，希望首长多去指示，吴德同志还有一件事，最近听说我们的小报，市革委会不准我们出了，有没有这个决定？

吴德：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指示，我们要整顿我们全市的小报。小报有的严重泄露国家机密，有的乱登最高指示，首长讲话，有的低级庸俗，有的是反动的。中央文革让我们整顿一下，我们还抽不出人，没有什么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 至 3：55，地点：人大会议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

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多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医大红旗高××：我们坚决同意谢副总理指示，现在他们“狂人日记”全国卖的很广，小学他们作教材学，连内蒙古、拉萨也有，在科技东方红翻印的“狂人日记”第一页上写着：江青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好。

戚本禹同志：你们把谢副总理的话讲出去，就行了，说江青同志给毛主席看了没有这回事。这是谣言，谁给造出去的。

孙××：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在大会上公布的还有传单。

戚本禹同志：没有这回事，谁造出去的。

孙××：是科大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我问了江青同志没这回事。科大东方红是什么组织？

孙××：科大东方红就是科学技术大学的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现在作正式声明，你们两派不要争论了，好不好。你们把谢副总理讲话公布出去，就行了。

医大：双方立即停止对这问题的争论，可以停战，坚决照办。

谢副总理：可以不可以停止争论了？

众答：可以。

戚本禹同志：因为有派性就坚持，你们不要为难他们，主要是你们，他们也不一定是坏心，这个问题你们胜利不等于你们别的都正确，开始陈里宁批判刘少奇是对的。因为十三局光整理了批判刘少奇的材料，这个谢副总理严厉批评过，听说有人当面不说有病，背后说有精神病。

谢副总理：金大夫你们，有什么意见？

金××：坚决照办。

王××：我坚决拥护谢副总理的指示，我们当时有许多工作作的不够仔细，有缺点，但大方向正确，目前形势大好。

戚本禹同志：他这样检讨，态度是好的。

王××：（读一段井冈山小报上刊登的最高指示，汇报了清华大联合情况）

谢副总理：要大联合。

戚本禹同志：“四一四思潮必胜”应彻底批判，你们团派也有缺点，要认清是非，要大联合。

王××：目前阶级斗争很复杂。

谢副总理：昨天还打架。

（王××汇报了清华××问题）

戚本禹同志：李××要搞清楚，你们要建立一个专案组，协助公安机关搞。

王××：两派冲击利害，容易被坏人利用。

医大：××还作报告。

戚本禹同志：以前大串联可以嘛！既往不咎，分清是非。

谢副总理：以前大串联是对的（医大：是对的）现在最高指示你们登的很多，有真的也有假的。

众：笑。

戚本禹同志：（把小报接过去）意思对，但我没有听过。

曹××：我们坚决执行谢副总理指示，回去传达！中央作出的正确结论我们坚决拥护！有关材料应上报，全市斗争形势复杂，应提高警惕。十六号全北京市贴出很多大字报……。

戚本禹同志：听说有的大字报陈里宁名字打×刘少奇却没打……。

金××：学部的大字报有。

戚本禹同志：问付××来了没有？有没有？

付××：我不了解。

谢副总理：千万不要再为这件事搞分歧，争论了。

医大：“狂人日记”各地都翻印，印的很多，要求让他们都收回来。

戚本禹同志：让他们自己发表声明，给他们主动权。

甄××：我们坚决按首长指示办事，发表声明。

戚本禹同志：我们不是首长，谢副总理是首长。

孙××：戚本禹同志您在为陈里宁平反的时候，提到王福显，这人有病，现在住院……。

戚本禹：这事我们不了解。

医大：提到××专案组问题。

戚本禹同志：不要搞了，以后单独找你们谈。今天的会就这样结束吧！

（全体起立，以热烈掌声欢送首长）

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记录整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一日凌晨

（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 请张贴，请转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地点：北京林学院阶梯教室〕

谢副总理讲话：

今天不是你们请来的，是我自己找得来的。找得来的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陈伯达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复课闹革命哪，好象怎么都响应得不那么热闹了，没有动起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昨天陈伯达同志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问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复课闹革命闹了半天也没有搞。所以伯达同志就特别给我打电话，说你明天就去，去跟大学谈一谈。所以我今天就来同同志们谈一谈。

这个复课闹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出来的，而且是我们毛主席关心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非常关心，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司令部，林彪副主席、还有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就是从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部份的篡夺了党和政府的领导权，我们把这个权夺回来了，夺回到了毛主席司令部。因为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特别是领导机关领导这个政权问题，这样就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修正主义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进行各方面的斗批改。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但是政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夺回了政权，他们也只是部分的篡夺了政权，并不是全部，这样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所以这样子我们大学就要搞复课，大学、中学、小学在复课中间继续闹革命，工人就要抓生产，在生产中间来进行革命的其余的工作，这就是说，这个革命进行到了一年半的阶段，就应该到了这么一个样子。怎么在夺取这一个，在从走资派中间、从篡夺部分政权中间夺取政权，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毛主席领导，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但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也是建立了丰功伟绩。你们做了相当大的工作，从学校冲向社会，从北京冲向全国，这个功劳永远也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年半的阶段，那就不是再冲向社会，就不是冲向全国，而是回到学校里面，一面上课一面改革学校本身的斗批改，这是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毕竟是穷困的，文化还比较落后，所以我们还是要上学。当然是要上毛主席思想的学，革命的学，这一点也是我们广大的学生的要求，也是广大的家长的要求，也是革命的要求。毛主席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就提出了。他要号召也是革命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学生的要求。

我们北京的学生在点革命之火时我们起了一个带头作用，现在复课闹革命也应该起一个带头作用，刚才我跟中学讲了城区有三百六七十多个中学，我说你们在这个月还有一个礼拜统统的都要复课，那一个学校也毫不例外，甚于你们学校遗留的问题，等到了复课以后边上课边解决，那么开始可以只上一点嘛！然后逐渐的增加嘛！先把有把握的就上起来，然后逐渐的改，经过边研究、边教学、边批判，然后再都上嘛！我看我们大学也应该这样讲，但是大学现在只有一个。什么

邮电学院啊，什么农大啊、还有什么林院、矿院、地院、还有北航呢！上课了没有？北航，昨天陈伯达给我打电话也讲，他说我那个时候叫他们搞复课闹革命，在报纸上就公开登载了，闹半天以后，不知那里吹来了一股什么风，就吹倒了，吹了！是那里吹来的？什么人吹来的？（众答：陈再道吹来的）陈再道，陈再道也没有叫你们不要上课（众笑）！可见你北航这一个问题没有完成任务，铁道医学院还上了二门课？（众：上了二个来月）噢！这个不错的，要表扬这个复课闹革命的，这一个月统统都复课，先复课了再说，不复课啊什么问题都难解决，复了课的问题好解决一点。

有十来个学校，可以不复课，让他去打架，什么钢铁学院啊，什么民族学院啊，什么人大啊，什么第一外语啊，第二外语学院还有工业学院哪，还有什么清华，还有什么北大，总有十来个学校，让他什么时候打够了（众笑）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再开学，其余的 62 个学校 52 个学校开课，十个学校让他们去打架（众笑），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这只不过是将军而已，我现在有个建议，大概传到你们这儿来，所以下一期开训练班学习班专门开这十个学校，每一个学校来个一二十个人，也有两派的还有干部，××上干部起骨干作用、桥梁作用，站出来的干部要来，然后要卫戍区调厉害的人，调 2 个，那么我们革命委员会，我也可以经常来，搞个把礼拜，专门整风，不知道你们赞成不赞成，把他们打架的十来个学校叫得来，多找一些人，到这地方来搞，（众鼓掌）如果真的还不行，那就不管了，说说谁也不管，让他十来个大学打到明年或者打上两三年都可以。什么时候打够了，什么时候来。

刚才我给林学院的同志做了一点工作，你吃了他的饭，你就不做点工作？你们也应该做点工作嘛！我刚才有这几个原则，谁知道你们赞成不赞成，他们就是为了一个什么单洪，单洪，我问他一个是说打倒单洪，一个要保单洪，单洪现在是革命委员会付主任，已经搞了两个多月了，突然这么要打倒？我问他有没有投敌叛变？这没有。第二是不是黑帮的死党？这没有，唉！这二点没有就有点低。这二条最牢固了，这二条。第三条是不是一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也不象，只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好好检讨，另外听说还有点什么小流氓啊！什么事情，（众笑）那个东西大概总是有点什么年轻人，那个什么男女关系啊，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但是呢，总算是小节，改正就行了。听说那个保单洪的不

要人家讨论，这个就错误的嘛，你为什么不让人家检讨呢？让人家多检讨一下好嘛。我这个人啦，随便找了一点人，他们同意我两条，第一条，那个保单洪的，要支持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但不要超过三次，至多四次吧，总是要支持检讨，支持批评，那么经过一次、二次，至多四次检讨，觉得可以，你那个打倒单洪的那派，也就不要打倒罗，（众笑，鼓掌）结果，当时他们在座的有一、二十个娃娃，都赞成，说可以。不过没有头头，没有领导人。

（众：领导人都在）在这里啊，头头赞成不赞成？（有答赞成的）（朱一恕说：有些问题没有查清楚，陈和妹：查清楚了，查了半年，没有查不清的事）谢副总理对陈和妹说：你是保单洪的我一看我就知道，（众：笑）你这个人哪，你这个人帮倒忙，人家那个地方有一股气，现在那个两派呀，什么原则问题哟，就是四川人哪，这里有没有四川人哪？四川人叫做呕气，懂不懂？就是呕了一口气。你这个人就风度有点嘛，你这个人就不会作工作，他那个要打倒单洪的，呕了一肚子气，什么这个原则呀，那个原则呀，就是呕气呀，那个小资产阶级面子呀……

（众：鼓掌）你风格一点嘛，就是你那个打倒单洪的，你们许多意见是对的，他检讨得不够，我支持你们这个要求，要他检讨，他确有这个错误。他就不再呕气了。（众：笑，鼓掌）你年青人都不会做工作，（陈和妹：让他检讨）嗯，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要打倒单洪的那一派要他检讨。嗯，听说他们两派都在你们这个地方争取群众，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参与没参与？（答：没有）

听说，我们到内蒙古的有十个娃娃，一去那个地方啊，两派都拉他，这十个娃娃做得很对，他那一派也不参加。你到那个地方去，到新村去落户，两派要参加，你又摸不清楚，不知道那一派正确，那一派不正确，你一参加进去了，将来就站不住，非把你赶出来不可，要吃苦头的。所以这小家伙厉害的，大概在北京吃了一点苦头哇，他才懂得一点。所以，这个话说得哪去了，就是讲这个复课，我看北京的 62 个大学，统统都复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应该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毛主席司令部的话，毛主席司令部，还有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坚决地复课，那个学校也不例外，所谓那个学校也不应该例外，边复课边打架，上午复课，下午打架（众：笑）。

现在有些地方复课了，各复各的，你这一派上你一派的课，我这一派上我这一派的课，这个课怎么复？那来得那么多教员啊？那个不行的，上课时都要上，

我们在北京不要创这个先例，只能在一个课堂里复课，不能你上你那一派的课，我上我这派的课，我那一派复我那一派的课，那个不行的，要复课就是统一的复课，不能够复那分裂的课，不能创建这个先例，复课的时候大家回到班里去，复课完了以后，你还吵架，你就去吵你的架。

统统复课，今天我就是专门由伯达同志授了命令的。因为毛主席关心这件事情，所以特地到了中学、大学讲这件事情，希望你们传达下去，统统要复课。你是那个学校的？“劳（动）大（学）”复了没有？就是那个社来社去的不要反对，就是要来，社来社去，还有什么呢？他回去挣工分啦！他就不干了，他现在不用他，将来还是要用的啊，（“劳大”同学讲：略）我说你那种情况，如果是那个本地方还需要，他甚至也不毕业，他回去，我说也可以。（劳大：略）社来社去几年制？（劳大××：四年制）长啦！长啦！长啦！社来社去最多三年，（劳大：略）

这件事情我可以找北京我们管农业的人到你们那个学校去调查，可以提前毕业，反之，社来社去的他又不领工资的，他还是挣工分。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就毕业了，有一部分人把那个课程加以改，改，这个急需的课程上一上，把这个课程改短，最长三年，这一个社来社去的，反正是社来社去的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来解决，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

（当北医有一个同学谈到他们还没有联合班子怎么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谢副总理讲，你这样的问题多呢？每一个学校都有反正我就是不管具体问题，我只管复课闹革命（众：笑，鼓掌）你要复课啊，那些事情就逼着去解决，你懂不懂？

（当化纤红旗同志谈到，认为化纤目前没有复课闹革命的条件，化纤东方红的同学认为有条件复课，应响应毛主席号召，马上复课闹革命时。）谢副总理问：你们是那个学校的？（众：化纤学院）你这个学校也是打架之一的学校，真厉害！真厉害！（众：鼓掌）把你留下，也作为十个大学之列，再打十年（化纤东方红，不打啦！）

响应毛主席号召，马上复课闹革命，（众：鼓掌）我看你们这个训练班没有什么成绩，（众：鼓掌，笑）当问到群众组织头头怎么办时，谢副总理讲，当然要复课啦，统统都要复课，你又是学生又是领导，你还以为当了官以后就不当学生哪？（众笑）不行的，我说了的，所有人的官再大，你革命委员会委员统统还

要当学生，为什么下不来？（鼓掌）唉，以为当了官以后就不再当学生啦！那个不行的，统统要当学生。

不过，他又学习，又工作。红代会的、学校革命委员会的，你革命组织的，甚至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学生，统统都要当学生，一面当学生，一面当干部，这样，对于干部很有好处。脱离群众，当官作老爷，再走我们的道路，要回来，还要革命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又是学生，你譬如那个邮电学院的孔祥珊，他就是革委会主任，才一年级的学生，他一天课也没有上，而且这个孩子还不错的，但是又当革命委员会主任，又回到那个班里去上课，还要受班里那个领导小组的领导、班主任的领导。要建立这么个制度，你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就领导别人，你下到班级去以后，就要受班主任的领导这个政策对不对？（众，对！）不要只当官，只管别人，这不然他又要革命的，所有的都这样子，如果长期脱离群众，这些年轻人那就又要走到我们这个道路，又是走资派，又要别人来革命，这个问题，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统统复课，复课的时候还是要尊重教员，还是要守纪律，不要高兴上课就上课，不高兴上就不上，这不行的。在课堂里面服从教员，课堂下来以后可以给教员提意见，但是也是比较善意的，这个跟你们谈谈。

你们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课复成，联合起来的要复课，不联合起来也要复课，统统都要复课北京要作个示范，搞革命的时候，我们学生搞了个示范嘛！我们复课闹革命也要给全国做个示范，全国就按照我们北京学的，这个，中学走在前头去了，究竟是大学生领导中学，还是中学生领导大学？！我看现在是中学生领导大学，中学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都有解放军在里面工作，大学凡是有解放军的地方就占了便宜，都派，那时你们都赶，（众：我们没有赶）什么没有赶？清华就赶了的，财经学院赶了的，农机学院也赶了的，铁道学院也赶了的，赶了解放军的永远也不派解放军去，没有赶？清华没有赶上？你没有赶的，也没有强烈要求的，所以就没有派，（众：我们要求派）你那个强烈要求我也知道，一派强烈要求，一派反对，（众：我们不反对，我们两派都保证。）那好，只要是两派都强烈要求的，要写申请。

（当戏专革委会谈到因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解散，有人就因为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是文艺组派的，就要把军代表赶走时）谢副总理讲：他那个军代表也不是属

于文艺组管的，属于卫戍区管的。你们不是说没有人赶，现在还有人赶嘛！（戏专东方红：我们是保的，我们没赶）谢副总理说：你一派保，一派赶，还不是等于有人赶。

（当戏专革委会同志谈到军代表是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是市革委会当然成员时）那不要赶，不应该赶，肯定的，我说了的，所有的军代表都有卫戍区管，那里由文艺组管。（当戏专革委会同志谈到想要了解中央文革文艺组为什么要撤时）你们这些小家伙，文艺组一撤，那么原来文艺组支持的都不对了，这那里有这么一种逻辑？你们大学生学过逻辑学，我这个人老粗，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学过逻辑学，那里有这么一种逻辑？那个文艺小组撤、成立，你学校要管闲事啊，文艺组的成立或撤消，都与你们学校毫无关系，你根本不要去管。

（当有人谈到文艺系统军代表由总政管时），本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道理，怎么文化界的军代表归总政管呢？统统归军管会管。

（当有人再次强烈要求再次派解放军时）可以考虑，但是你们以后再赶，谁负责任呢？为什么你们现在突然想起来要解放军干什么呢？（众：解放军威信很高）我看你们都是不相信群众，相信解放军是对的，但是你不相信群众也是不对的。有的学校要派解放军去，我就看准了，我跟你交个底，我说赶快不要派，他那个地方闹革命，就找不到一个目标，矛盾都集中在那些头头身上，你解放军一派，好啦！好容易找到一个当权派，（众笑）我说可不要上他那个当。

（当民院东方红提到周总理九月份在人大大会堂接见时说过要给民院派解放军，而现在还没有派时）要有正式公文，要有批示。（李钟奇付司令员说：你们民院已经挂上号了。）你们两派都同意吗？（答：两派都同意）你们一个东方红，一个抗大，两派打得厉害得很。这个事情不要说，你们开课的事情，不要等解放军，你们革命的大联合，不要等解放军，不要一切都依靠解放军，但是你们有强烈要求解放军去，这是个好现象，我们得全盘考虑。现在中学里面，一个中学有 50 个解放军，有两、三个就够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还有一个，他作为一个媒人也不好。媒人懂不懂？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解放军身上，主要是依靠自己。你们读语录老读第三页第二条，每一次都要读，我都背得，但是就是不执行。讲了复课闹革命，管你联合没联合，统统复课闹革命，这一点行不行？（答：行！）

（当二外首都红卫兵团谈到两派斗争很厉害，下楼吃饭都有困难，助学金、饭票被扣）谢副总理发现二外两派不坐在一起，谢副总理说，你这派坐在这里，他那一派就坐在那里，我看你们这个学习班没有成绩。还有一外，有个红旗大队，还有个造反团，打得乌烟瘴气。一外两派来了没有？（众：没有来）

（当北医的同志谈到有人抢医院）医院由你们呢？还是由上级分配的？这个医院还要抢吗？（主持会场者：大家让谢副总理把指示继续讲完）这个复课闹革命我是传达伯达同志的指示，而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能怪我没有讲，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学习班的问题。学习班，北京市已经知道有数的有六百几十个学习班，有 4 万多人，实际上可能超过这个数目，最近几天我连听了两天关于学习班的经验，就是没有找你们去听，最后昨天末尾找了两个人去了，听了一听，就是你们这个地方最好，靠不靠住啊，说你们学习最好，（众：不好）还是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还有缺点，我听了两天，有几个经验。这个学习班第一就是要三结合，就是有革命群众的领导人，有解放军，还要有已经站出来的和准备站出来的干部，起骨干作用，核心作用，你没有干部，你差了这一条。你们这些年轻人有很多长处，我们有 70~80% 要向你们学习，但是你也有 20~30%，要向干部学习，人家犯错误起码比你们犯得多，还是要有干部，起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核心作用，你们大学生这里有没有解放军！这不算少哪，差一项没有干部，下一次搞学习，要把干部弄来才行呢，所以我说那十个学校，一定要干部占三分之一，起核心作用，这是一条经验。第二条，学习要集中解决问题，学习文件不要摊得太多了，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是老三篇或者是老五篇，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几位同志的最近的几次讲话，还有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参考，关键的将时攻（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有那个老三篇、老五篇，这一点，你们大学生很难做得到。大学生闭着眼睛一个钟头就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有什么，老五篇统统都背熟了。就在“派”那件事情上，大学生眼高手低，那个老五篇也好，那个最新指示也好，解决了你那两派的实际问题，不仅是把最新指示和那个老三篇读熟了而且是真正的能够把你的思想问题解决了，那才算你真正理解了。大学生只管后面那半节，不管前半节。

要集中少数文件，而且通过这个文件把复课问题解决，而且集中解决问题，上次开学的时候，我讲了一大篇，我没有来学习，就来讲，看起来讲得不对的，讲的问题太多，应该每次，你们算是了 8 个月，只能解决一个主要问题，附带解决其它问题，当前解决一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联合，已经联合的就是巩固大联合，没有联合的就是解决联合，这个问题抓多了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点。

第三、最主要的是解决大联合的是自我批评，各派自我批评，所以干部在里边好得很。那么红卫兵的自我批评，就感动了干部的自我批评，干部的批评又推动了红卫兵的自我批评，所以办得好，都是这样。这个自我批评，大学生最困难，工人、中学生也比较好办，大学生是最困难。这一点我对你大学生不客气，大学生旧的书读的越多，这个人最难办，我这个人最怕大学生。第三就是自我批评，如果说你们有成绩，你们有很大成绩，这一点要肯定，这成绩是大家学习的结果，还有解放军的努力，如果没有成绩是错误的，如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领导上的缺点，不会怪你们。我那一次开会讲话的时候，我就没有讲到点子上，什么东西都讲了，没有讲到要害，应该要害是解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大联合，大联合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主要内容是要去掉私字，要同私字作斗争，这个私字也是修正主义的一部分。我们天天反修正主义，可不可说私字是修正主义的一小部分、这个话有没有错误，你们大学生懂，我也搞不清楚。

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剥削，我们这个私字，私心杂念是修正主义的土壤。为什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讲了这两个字，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他走了六省一市，然后快回到北京，有三个造反派跟他谈了两个小时，中间两个是革命的，一个是铁杆保皇（众笑）。毛主席作了两个小时的工作，然后又找了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同志去作了一天的工作，他们三派大联合，三派大联合又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向毛主席报喜，问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毛主席给了他四个字，就是“斗私批修”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这样来的，这个造反派最近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报告，毛主席都批了的，说“你这个报告很好，谢谢你们。”我就看到这么个报告。毛主席亲自作造反派的工作，然后才得出要革命大联合，他就跟三派谈了二个小时，然后别的人去做了工作，结果大联合，联合起来了就斗私批修。他这个“斗私批修”经过了两个月的考查，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我看这个大学里面这个斗私

这个问题，如果不斗私就不能很好的批修，拿这个个人主义的东西，拿这个私字怎么能够把这个修正主义批评好呢？一方面批评修正主义，一方面发展个人主义，那不是很矛盾的吗？

批评你这个修正主义，发展我这个个人主义，你那叫批修？现在所有联合不好的地方，除了毛主席讲的三条，除了有走资派在里面捣鬼，除了地、富、反、坏、右在那里捣鬼，我看最主要的还是个私字，私字又不在那个广大群众、在领导，领导人不挖私，一开始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最后要垮台的，你不相信？已经垮了多少，现在还有人正在要垮，有些人，我们中央死保，这些我不说，你们是知道的，不批修不挖私还不是一样垮台，我们很不希望我们这批杀出来的造反派垮台的，特别是不希望领导人垮台的，我昨天听汇报，我就跟那个邮电学院的小孔，他头一天来，第二天没有来。我就派人带过口信，我说这个人叫他好好的，听说他在学校里很有威信，希望他当这个革命委员会的要当下去，又要当学生，要保持。

年轻人，听说现在学校里面毕业的学生 60~70%都在那里结婚、找对象，我说你千万不要搞这一套，你刚 20 岁，要真正有革命的事业心、精神。以革命为重，不要去搞私人的东西。我们这些人，但是我不是在这里又夸奖我们自己，我不是这样子，我们 30 几岁才结婚，完全闹革命，不搞那一些，当然那个时候条件不如现在，我们也不希望你们 30 几岁，特别是女同志我们不能这样要求，这个要求不合理，但是起码我们总是要现在还是不为个人大私小私。你真正是革命的领导人，你就是要真正认真的、关心的、为了革命的、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

我这次要讲关于这个党的问题，我们这个党还是要改造，总是今年底到明年，这么党还是要搞起来，搞起来采取什么办法？就是要原来的大多数党员要保持的，他们也进步了，他们也去掉那些奴隶主义东西了，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方面，大多数党员，因为大多数党员有一条还十分注意嘛！成份嘛！这些事情都是对的嘛！但少数也有不注意的，少数的党员最后表现不好的了，都要退党，多数的党员也还是承认党的领导。这是一方面。第二就希望在这一年多中间的这些革命造反派头头，他们是团员的，现在他们连团员都不是的。例如邮电学院革委会主任他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可是他表现是不错的，但是表现不错，短时间不行，

要长时间考虑，我们就希望这个同志把这一批造反派吸收一批入党，吸收一批。但还是经过个别吸收，要经过一年多两年的计算，估计这个吸收要到今年年底，明年开始，可以先搞试点，那么就要吸收一批入党，吸收一批入党嘛，那一种人今天又炮轰这一个，明天又炮轰那一个，那就存在问题。你譬如政法学院的陈荣金，他也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你那个小站虽然不是他本人搞的，那个帐还没有还清，你现在又炮打康生同志，贴大字报，那个能入党？恐怕就有点问题，那个行不行？你们说行不行，恐怕有问题，还有些人没有经过反复考试，要吸取一些领导人入党，吸收一些年青人入党，到明年还要开九大。（众：鼓掌）九大可能还要红卫兵参加，但是红卫兵参加，要党员参加嘛，你开九大找个非党员参加是不行的，我们重要的任务是革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修正主义，他们资本主义，这是他们是主要的，那是最危险的，我们把任务完成了，或者是将要完成，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我们也有私字，原来存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副作用，这一部分私字必须坚决地克服，你不克服，你就这样地混过去了，你下一步还是走不过，这一点我的经验多的得很，我们搞了几十年，这次混过去了，下次等着你的，你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话，也有的人他会混，他混过去，每一次都混过去这一种人比较少，可能混到六十次的时候，你还是混不过去。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老家伙都挖出来了，还是没有混过去的。

所以要想把这个学习班办好，要集中解决问题，要解决大联合就是解决这个私字，要集中解决这个私字，主要是自我批评，如果我们这一期有很大的成绩，大家都能坐下来学习，这还是好的，如果我们这一期还有少的缺点，就是集中一个问题不够，主要是搞私字不够，搞私字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批评，这一个问题还不够，好些学习班他一学习就把联合解决了，不联合别的出路没有的，希望大学这个问题还是起个带头作用，联合起来以后要巩固这个联合，必须要搞革命的三结合，搞革命三结合，关键问题是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也要去掉私字，也要你一派虽然在呕气，你一派要保，我就坚决打倒，其实没有多少理由的。当然哪，应该打倒的还是打倒，就是我和你讲的最重要的几个条件，就是自首叛变，有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个不行，我们党也要纯洁，不能容许这种。第二对那些黑帮死党连着的一些重要干将，又划不清界限的，这个不行的。普通有一点点什么工作关系那是另一回事，人都有关系嘛，那个没有关系啊！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你

说那个跟他没有关系，邓小平是总书记，那个一般的关系，那个一般的工作关系与死党是两回事，相类似彭真是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北京市的很多干部跟他有关系，跟他是一般的关系和死党是两回事。第三种，蜕化变质死不不改的，除了这三种，其实毛主席那个上面有的，有这三种的，除了这三种以外，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错了话，犯了一些错误，只要改正了，我们就应该允许人家革命的，要拿出这么几个标准。你们那个林学院的你们不要去打了，（鼓掌）那么什么单洪啊！（郭长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外围组织……）有一个…西叫个什么玩意儿，这个人呀，那个历史相当严重，可是够得上相当严重的人，不是一般的严重。但是有一派，而且是相当多的一派拥护这个人，这个怎么办？…西成立筹备小组就不要这个人，我们伟大领袖说，既然有群众拥护他嘛，就让他搞两年再说嘛，我这可不是造谣呀！但是这一件事情不要普遍的推广，有这么种特殊人，讲是讲确实有意思，这个人相当严重，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伟大领袖说是这个人嘛！人家有广大群众拥护他嘛！你叫他搞两年再说嘛！

还有那个黎元洪也是我们伟大领袖讲的，你们听说过没有？黎元洪是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当皇帝的，当大总统的。黎元洪是我们湖北人，我们湖北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也是值得荣幸的。（众笑）刚从桌子底下拉出来的，来当大总统。过渡性的人物搞两年嘛！你们为什么要……你让一步行不行呢？（对郭长录），我不包庇这个人，你搞两年，如果不行再选嘛！（郭长录：是不是进革委会的人不能动？）你还是我说的，你呕了一口气，四川人，就是啊，就是啊，看你占上风，还是老子占上风。（众：笑，鼓掌）

（王德祥：我们学校反单的那一派，其中有少数坏家伙，受我们学校黑帮分子，爪牙许诤挑动的保许诤，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薪萍，企图反过来，整我们的革命干部单洪）（鼓掌）你这个人就不会做工作，不应该针锋相对嘛！

（当有人说到这是阶级斗争时）什么阶级斗争哟，你们双方多搞点私字好不好？不要那么针锋相对，不要那么争一口气，这个东西（指着脸皮）最爱面子的，知识分子最爱面子的，什么？什么问题？哪个问题呀？我一听那完全是个面子问题，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哪，根本没有两条路线斗争，好多事情，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两条路线斗争，有许多事情就是个面子问题，这件事也不是随便加帽子，就说是这个后面操纵的，这个话最难听，最不好听这个话了。你这个人就不会做工作，

你这个人一句话把人家……，稍微或许好一点，你就把人惹起来了。（一同学继续讲）啊呀，以后不要轻易给人家下这个结论啊——“你们后面有人操纵”，这个话呀，最厉害，对不对啊？这个不好，不要随便讲这个话，这个刺激人最深，要善于做工作么，要善于做团结工作么，我们希望你们林学院是团结么！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开一个训练学习班，给你们做点工作么，我来就是做这么个愿望。（鼓掌）咳，你不要乱拍巴掌，其实你也不欢迎，你为什么欢迎，你为什么不喜欢嘛，你欢迎，你就应该平心静气么，所以你不欢迎么，不过你们广大群众是欢迎的，你那个头头不大那么欢迎，你看这可有点道理呵，希望你们联合啊，希望你们联合。（某同学插话）咳，不要看得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某同学插话）他们搞干部论训，这个要……今年哪，不要把少数问题，不能提成多了，就是这样子呵，你刚才批这个“私”字，斗争“私”字呀，你们要永远保持你们造反派，革命派，不至于中间掉下来，希望你们多批点“私”字。你们现在在座的都是头头嘛，都是不是一号就是二号，就是三、四号头头嘛。

我们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干下去，希望你们绝大多数将来成共产党员，这一点我们都应该有这么个希望，不管你是这一派的，也不管你是那一派的，但是这个光主观愿望不行哪，主要还靠你们自己，靠你们自己呢，就希望你们永远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来办事呵，特别是要，不仅是要成为这个批判修正主义的闯将呵，也成为斗“私”的这么一个勇敢的青年，革自己的命。正如林副主席讲的么，既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又要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革自己的命比较不容易呀，这一点提醒同志们，不要把那个批评的人，批判自己的人，觉得对他的意见很大，应该感谢那个提意见的人，这样使自己才进步，是不是这个训练班要……带那几个训练班哪，统统要搞一点军事学习，半个小时，最多一小时，要下操，要过纪律生活。有文化大革命，把纪律就不要了，这完全是歪曲，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厂现在上班下班都没有纪律，我到那个京西煤矿去过了一晚。一天，高兴上班就上班，高兴下班就下班。如果那个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简直要失败了。

我们这六、七亿人自从我们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成为很有组织，很有纪律，很有战斗的部队，所以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大

国，人家佩服我们，不敢欺负我们，过去我们国家还不是那么多人口嘛，因为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人家叫我们是散沙，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应该是更加有组织，更加有纪律。个散漫哪，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那一些破坏纪律，这也是难除的，在今后的一年多要恢复，要恢复纪律，而且要更好。

好象没什么别的事情可讲，你们这么多东西，谁知道是什么东西要讲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老讲话，我给你们讲话最多了，大学生讲话最多了，我这个人又没读过书，讲话每次都有缺点。

（某校同学谈该校在外人员问题）统统要撤。（某同学问联动展览是否继续展出时）联动展览不要再展览了么。（演出队）什么演出队？（……）哪里去演出？（去外地）赶快回来，赶快回来。（教改）红代会本身没有，没什么教改组不行的，还是依靠每个学校，红代会以后不要把那个任务交的太大罗，红代会就是做一般的事情，不要把红代会的任务堆集太重。红代会的人哪，所有的工作人员统统要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留少数人，但是这少数人呢？一面上课，一面工作，为什么不可以呀。（有人说太远）你骑了自行车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这个原则可是要肯定的呀，这个原则。

我建议，统统地红代会也好，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也好，参加本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的学生也好，凡是没有毕业的学生，红代会可以搞两个已经毕业的学生，不过不要多了，三、五个就够了，在那里坚持，其他的人，就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笑）来来往往的。主要是斗私，其次是也到红代会……，开会就说，行不行呢？轮流值班，搞两个，最少三个毕业班的，行不行呢？有两个就差不多了，多了不要了。

（某同学说一具体问题），小汤山不是我们搞的吧，恐怕是你们自己搞的。（某同学继续谈话）那不是农大的吗？（劳大）农大怎么要变成劳大，（80人条件高），那个当然好点，那个东西也是在那里如果是有领导在那里搞东西，也等于是上课一样，那好一点，（好多毕业生）你这个是中等学校呵，上面也有领导机关，将来呀，你听我讲，这个各部正在搞……三个月两个月可能都成立了部的领导，那么这个大学呀，主要的行政都归到部里去，北京市我们少管，在他们还没有搞完以前，你们重要的事情要交革命委员会，有个市革命委员会。

现在我在市革命委员会讲过，你们学校现在也有个组织，我革命有三条原则少犯错误，你们学生也可以用这个三条原则。第一条原则，不论做任何事情，首先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思想，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光有了这一条不行的，你说我要打倒单洪，这是合乎毛主席的思想，那一派，我要保单洪，我也合乎毛主席的思想，这个不行的。

第二条，要民主讨论，不能够自己决定。比如那个政法学院，那个陈荣金，他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他贴康生的大字报，你政法学院来了没有？他在革命委员会讨论了没有？在革命委员会讨论了没有？（答：没有）你看吧，你们革命委员会有多少人？（25 个）25 个委员如果拿出来讨论，是不是 100%的都赞成？（那根本不会）我问你会不会赞成？（不会）都不会赞成的，你看吧，他就不懂得这一条么，你为什么……可见你们反人家这个，反人家那个，你这一点民主都没有。你贴康生的大字报，这是天大的事呵，你那个革命委员会不讨论哪。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我那革命委员会比他那革命委员会大，但是我不要我们贴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字报，我们就是反对你陈荣金，

陈荣金这个人不能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要贴他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我谢富治不能决定，我必须拿到革命委员会上讨论去决定，你看你们小家伙多么大的胆。（有人插话）我跟你讲，我要说是陈荣金不能当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谢富治没有这个权利下一个命令，说是你们派人去贴大字报，陈荣金不能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我这个革委会主任总是比陈荣金的革委会主任大么，而且那个康老是中央常委，那比陈荣金就大得更多了，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么，你看我讲的有没有点道理？这个为什么就不会到革命委员会上讨论呢？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哪？那你不是独裁吗？你什么革命派呀！还有，这是第二条。所以要有第一条，第一条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第二条就是民主讨论，大事情除了革命委员会讨论以后，还要同群众商量。

还有第三件事情，这些许多事情小将不懂的，第三件事情，还要请示，懂不懂请示呀？你们这各个学校班子，办任何事情都不请示的，总是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笑）这个哪有不犯错误的？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哪！（笑）（某同学谈他们批判思潮）那个我不管你们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反正总是不对。（……）第三要请示，大事情都请示，怎么能够自己做决定了呢？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

们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大小事情都请示中央文革么，要请示周总理么，还要上报毛主席么，我们怎么能够自己决定呢？不能够自己决定啊，要请示么，谁知道你们哩，所以我呢，不大讲这个问题。我怕把那些事情都弄到这个革命委员会来，我也糟糕的呀。（笑）所以我不大讲，但是我不讲呢，你们许多人都是好同志犯错误，不懂得民主，不懂得请示，就自己决定。（同学插话）你经过我给你写报告……，他总要去（同学插话）那不见得，那你讲讲陈荣金……，象我把炮打康老，我写一个报告到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样的事情他……，我看就不会的，是不是啊？以后反正你这几个大学，你都请到我们革命委员会，管这个事情的文教组，送去了，他有什么重要问题，我们那有常委值班么。我们革命委员会有廿七个常委，我这个人民民主的，廿七个常委分三班值班，所有的事情，凡是革命委员会能有权力办的事情都归常委值班，你集体讨论，我不能决定问题，我有什么意见我交给你常委去讨论，你给通过了就行，我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从来不单独决定一个问题。要采取民主办法，你不民主怎么行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单独决定问题，要给中央讨论的。这件事情你们犯了错误，我们也有原谅，所以我们跟你们讲讲三条：做任何事情先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第二走群众路线，要民主讨论，第三件事情，大事情要请示。你清华一下子就走了五千学生，你跟谁请示了的，那个不请示的，去了五千，没那个请示的，你要是请示也就不让你出去了。实际现在你们一不请示，第二请示以后，你批准他也照那样干，不批准他还是照那样干，这东西呀，你造反的时候你可以呀，你成了当权派，你这样干不得呀！你一个学校你一个革命委员会，你是一个当权派呀，你又是造反派，你又是当权派，你那样干啦那就不能的呀！

唉哟，我又讲太多了，讲了以后又不知你们抓什么东西。忘了，忘了，还有一件事情，听说抓什么问题，听说这个大学，我上次也讲了的，随便揪这个司令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随便怀疑。这件事情我请你们要小心，我们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了这个“五一六”，它的坏处，他的危害大，就是它第一个矛头对着毛主席的司令部，第二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第三个矛头对着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然这三个东西不能平列，主要是第一个，其次是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可以批评，但是打倒不好么。但是这个话讲了以后，我在每次会议都讲这个问题，毛主席的

司令部，除毛主席、林副主席，还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司令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志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在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立了丰功伟绩，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更重要，书记处加政治局，懂不懂啊，比书记处还重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主要工作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做了，这是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在人民中的威信最高的，但是反动派，那些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就仇恨我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到处写反动标语，反动传单，匿名信。

有一个，北京有一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油印的标语，好几个学校都接到了，我们有学校接到了没有？（××：接到了。）你是那个学校的？（国际关系学院）那是反动的语言，你们怎么不反对呀？（答：我们学生反对……）你们为什么不抵制呀？让他这个反动语言流传啊！（答：有高干子弟……）什么人都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秘密的、有半公开的、有公开的，反对伯达同志，反对康生同志，反对江青同志，反对戚本禹同志，这种，文革小组过去或是现在，清除了一些不好的人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把他清出来的嘛，正因为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嘛，他就不容许有一点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这证明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更加严格嘛，不讲你们那些派性，只要他在你那一派什么人都行，什么人都包庇下来，我们中央文革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做的事情违背了毛主席的思想，你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也要受批评的，但是就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领导成员，我们是绝对相信的，绝对拥护的，谁要危害、谁要损害他们的威信，我们坚决和他们做斗争。（鼓掌）

这个东西现在有一部分大学派传，我跟你们讲一讲，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同那些损害我们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损害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那些流言蜚语，甚至公开、秘密地、半公开地来侮辱、来造谣、来挑拨离间，要跟他坚决做斗争！（鼓掌）

同志们哪！这个不是简单的呀！我们可是要严的呀！你看清华炮打伯达同志叫做周什么？（周泉纓）去坐班房去了，坐班房是他们群众把他扭送去的，早就该扭，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什么响当当的造反派呀！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照样坐班房，不能够完全目无纪律，损害我们毛主席的司令部啊！对不对？我顺便要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问题，这有时在那里开会呀！有一个地方开会，有那么七、八

个学校在开会呀，研究什么伯达啦，康生哪，什么戚本禹啊，听说我也很荣幸，我也榜上留名，我也升了级了，这一点事情我也很高兴，你炮打谢富治还可以的，那个不算什么，我也不反对，炮打一下有什么关系，这个人哪，到处去整材料，把他什么历史翻一下也好，这是讲我们这些人，那中央文革就是不准的，不能容许的，我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哪，我也是个普通的干部，那是可以的，你去反对一下，也有好处，不过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底的，我可不怕反对，我心中有数，我这一点，你反对也可能打得倒，也可能打不倒，我心中有数。刚才那几条啊，我就不容易找得到，是不是啊！那是毛病，可多了，我这个人找错话了，讲错了话啦，做错了事，这种事情多得很多的，可以搜集这么一大堆，印小报可以印两大版，再加以夸大啊！那个不要紧的。你那个刘福元不是一直我把他保，我跟戚本禹支持了他，少数派。这在北京是去年八九月份的事情。那个人他老先生后来分裂，分裂出来，是不是啊？分裂以后我还支持他，他老先生抢“三司”，他把“三司”大印也抢得了。他后来又炮打周总理，后来一直我就不理他。不理他，我还要诚心团结他，他又炮打谢富治，炮打谢富治，他在我后面那个房子，后面按个喇叭，前面按个喇叭，就是什么话都讲出来，不知那里搜来那么多些材料，搞了这么十来天么。

后来人家让他到全北京去广播，又到清华，清华不知那一派把他广播车砸掉了，他后来也搞不成。搞不成，我一直还保护他哩，一直批评那个陈荣金不团结他们，到现在我还没改变我的观点，人家说我这个人宽大无边，这个人宽大无边。现在呀！现在的政法学院难办，现在刘福元抓住陈荣金不放。过去的时候，你陈荣金反对人家刘福元，坐喷气式，我就坚决反对，是不是坐了喷气式了？现在人家也搞你陈荣金的喷气式你怎么办哩，反你这家伙。这么搞，这个人你对我谢富治搞一家伙我是不在乎的。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嘛。

你对我们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这样搞，我们是坚决反对，我是一千个反对，一万个反对，反正我是反对的，这一点，你那个也不行的，咳，平常我们是个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跟你划清界限（鼓掌）。这个不行的，还是那个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么搞还是开了一个会呀，在搜材料啊，不是反对开秘密会呀，不是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讲了的嘛，那是八月十六号，是不是？不准开秘密会，怎么现在还开秘密会，搜这个炮打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如果

有这样情况，可是好严重啊！可是人家有报告的，我这个人没有派什么人，派人去了解情况，没有动态组，但是还是有群众揭发你开秘密会议，你以为你保密呀，保不住，还是有人报告的，我今天不讲，开群众会，有群众揭露，这个不要干的，这个错误的。咳，我又讲了好多（对李钟奇同志）你今天还要讲吧，那你讲吧。（鼓掌）下面请李副司令员讲话。

李钟奇讲话

刚才谢副总理已经做了指示，我是跟着谢副总理来听他指示的，顺便我到这里来向同志们学习。也向同学们道歉，学习的地方很多，道歉，我们组织这个大专院校红代会在搞，我们解放军派来了，我也没到这来，客观原因嘛。我跟丁国钰我们两个分了一下工，我抓中学红代会跟其它有关的，这边丁国钰同志来做工作。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责任心不强。那么谢副总理已经指示，我们应该照这个认真办，这里由于我没来直接参加你们的学习，只能向你们学习，我情况了解不多，只是听两次汇报，现在我只能把中学红代会那边的情况，主要的我的看法，向同志们介绍一下。一个就是现在中学包括中学红代会，现在将近有 360 多所中学集训干部，干部包括各校战斗组织的头头，包括了干部，包括了教师，现在已经集训了九千多人，预订在 10 月底时可达一万五千人，那么，这样就给中学小学复课闹革命集训干部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达到一万五千人差不多，主要的头头、主要的干部与教师都能够训练了，看起来训练效果很好，不是一般好，有些地方大好。吵架的不一致的现在的时候坐到一个板凳上了，开始时有的不愿意来的不愿坐在一块的，现在绝大多数都很融洽，详细情况就不讲了。其所以这样做，我们感觉有以下这么几个问题，形成这样一个情况。

第一点就是掌握武器不对现实。所谓掌握武器就是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一武器及其它有关文件学深学透，在学的过程中，边学边漫谈，边发现问题、边对照。不是单纯学文件，但是以学文件为主来发现问题，来提出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实首先认清形势，形势要求我们是什么。群众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伟大战略布署，伟大的战略号召，让我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要在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面对这种现实掌握了这么个武器，检查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么这样子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理论、政策、方针、基本掌握了，那么面对现实这

样大好形势，再结合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已经解决的问题有什么经验，存在的问题究竟有什么教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那么有针对性的把这个武器有的放矢的来对照本单位的问题。主要的这么对照以后，就明确目标了。我们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的第一条就是掌握对现实。

第二条是什么呢？对准要害、刺刀见红。所谓对准要害，就是在一条这个基础上，我们单位存在问题是什么，主要要害是什么。两派之间也好，我们主要矛盾是什么，所以先把主要矛盾掌握住，面对现实已经打下的基础，找到了目标。找到目标还抓住主要的要害目标来刺刀见红。这所谓刺刀见红呢？就是真正把我们存在问题不仅是表面的进行检查，而且真正深入到心灵深处的时候，把资产阶级的东西，破私立公，我们有什么私，上面分析了原因，什么原因形成的？那么不外一个私，一个公的问题，这个才是刺刀见红，才真正能把主要东西拉出来，这是第二条是这样做的。就是对准要害刺刀见红。针对这种情况，究竟你们学习的怎么样子呢？根据中学红代会，根据革命师生头头的训练，根据干部训练，根据教师的训练，确实大多数做的这样子，因此在学的时候痛哭流涕，大多数解决了问题，按中学红代会来说，我们八个“联指”都到了，八个联指就是那个区分会有两套有三套的，中学红代会也有两套，除了中学红代会这两套还没很好解决以外，我们八个“联指”下边那几套基本上认识到一致，这里有特别，有四区做得好，我们朝阳区、宣武区、崇文区，还有丰台区做得比较好，基本上从求大同存小异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是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第二条。由于对准要害、刺刀见红，究竟你们对准要害了没有，刺刀见红了没有，这个你们大家考虑，你们自己做结论。

第三条紧跟大方向，多做自我批评，这一点开始不习惯，开始有顾虑，我做自我批评怕抓我的辫子，我们经过反复动员，学习有关文件，掌握了这么一个思想武器，由于上述三条的准备，逐渐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将近十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都是讲自己要害，我心灵深处有什么东西，我对于这个大联合，革命大联合对照，我们自己有什么私，对于大联合有什么样的障碍，对三结合有什么样的障碍，我们这一点战斗组里有什么障碍，这个头头本身有什么障碍，都是做自我批评，我们这两派都是坐到一块的，不晓得你们是怎样做的。对方有时一讲以后，人家都做了自我批评了他在不吭气，我们又做工作，人家

做自我批评，那点是人家错罗，是山头主义罗，是派性观点哪，你们看看这个问题吗？应该客观一点吗，开始吞吞吐吐，以后逐渐把自己东西端出来了，先揭露矛盾，看准矛盾，然后就解决矛盾，那么到最后就大家分析这个矛盾，解放军在一块帮助分析这个矛盾，因此红代会主要核心成员免除了市一级的这层，没彻底解决以外，有几个解决的比较好，这里综合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破私立公问题，就是斗私批修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切存在着隔阂，不能大联合是最根本的思想障碍，大家得出共同的这一结论，这一问题必须要解决，不解决不行，不脚踏实地解决不行，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说到这一点。

最后就是对同学几点希望，也是在中学有这么几点反映，一个对我们大专院校学生反映帮助很大，我代替中学军训团、及有关同学感谢我们大专院校对中学帮助；另外一条反映，有关于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合乎斗私批修、有利于革命大联合的、三结合的、复课闹革命的、大批评的，这个是热诚欢迎的、万分的欢迎、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反映出来，过去的时候虽然帮助了、很多地方干得太急了、现在小将们在这方面反映了不少的意见、我们过去没跟本校同学坐在一块，老听上面一条线、认为大专院校听的多，见识广、高明、我们听他们的多、因此派性就给我们加强了，这个大专院校搞这一派、那个大专院校搞那一派、本来我们是原来没有派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派了，因此希望大专院校全体同学们、同志们、凡属于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欢迎你们帮助，如果有派性，对整个党性不利、对派性任其发展的话、他们现在觉悟了，不希望我们这样帮助（鼓掌）

第二点就是希望坚决响应谢副总理的号召、坚决消除武斗、这里我们殷切希望我们全体同志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参加制止武斗，并不是直接参加武斗，在院校中，中学有，大学也有，外地的红成打得一塌糊涂，我参加进去了，连血都流到我身上来了，就是在少年宫那个地方。也参加地方制止武斗，可不是好事情啊！可是最坏最坏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武斗一定要接受惨痛的教训，不要再发展了，那天我到医院，为了制止武斗，还很听话，很好。昨天工业学院有武斗我让医生去了，因为很远，那个地方有事情，我没去，也很听话，但是不巩固，还有爆发的可能，这点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一定要把他制止下去，最好不发展下去了，这与我们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是背道而驰啊！水火不能

相容，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一定要这样。这是第二点希望。第三一点我看到会场气氛跟中学红代会解决问题那个气氛有点不大一样，中学红代会解决问题，当然有一部分还是气冲冲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和平静气的，很少指责对方，都是批评自己，都是和平气静的，我提出那个问题你们做参考，我有什么缺点都是这样的口吻，大多数都是这个口吻，希望你们全体同志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恐怕比同志们好吧？但在这个会上不如中学那么协调，希望你们努力要改正这个缺点，（鼓掌）最后还有点希望还要集训，从效果出发，一定解决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那个地方准备延长一个礼拜，把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怎么样跟上主席的思想，怎么样跟上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来消除我们的派性，来增强党性，更确切地说、坚决的、努力的在群众帮助下，在领导帮助下，把斗私批修要搞彻底。这点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解决这个问题呀，大联合是巩固不了的，没有办法复课闹革命，这就是我以上这几点意见，对不对作为同志们参考。我的意见完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泉纓《和周泉纓谈话纪要》

按语：在周泉纓同志被一些声称“群众”的人扭送到市公安局去以前，我们和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座谈，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已于十月十九日下午将详细记录如实整理成座谈纪要。因为文章很长（近一百张大字报），从今日起我们将分批陆续发表。

鉴于清华某些人不能对事物一分为二，不分析研究，只凭看文章作者的姓名，就对文章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不讲道理，武断撕去大字报，鉴于某些同志对“毒草”只采取“封锁”的手法，不让人家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毒草”，以肃清其毒性，而是简单地对大字报采取“一撕了之”的不恰当手法。我们特此郑重声明，不允许任何人武断地把大字报撕掉。

如果有人撕大字报，只要他不怕真理，只要他讲道理，那么必须在“撕”之前，与我们充分辩论，只要他说的话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自己也会采取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

任何人，如果他胆敢无理撕大字报，那么由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策划者全部承担，包括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惩罚他的一切合理要求。

有材料揭发你收集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你到底对大革命怎么看呢？

答：同志们对我说过的一些错话，做过的一些错事加以揭发批评，这是好事，是对我的爱护，革命小将尽革人家的命，也要允许人家革自己的命。过去，我在四一四里尽当“秦始皇”，不当老百姓，逼着同志们按我的想法办事很不民主。这回大家反过来，批评我一下。这很好嘛！特别是三七战团的同志对我的弱点批评的最淋漓尽致，我应当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脸色还比较诚恳）至于收集阴暗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每个紧要关头慌了手脚，失去信心的人是不不少的。有人动不动就要上山打游击去，我可没有嚷嚷要上山打游击吧？每当东方红战团中有的同志谈阴暗面多一点的时候，我总是说：“眼睛不要光看到鼻子尖儿，世界上的大事不要急嘛。有毛主席在，有林彪同志的一支军队在，你慌什么？”按我看，在每个关键时刻我估计形势在清华还算得上是个“乐天派”！当然战略上估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战术上我和其他同志一样是谨慎的，按习惯语说法是：“决不让老保翻天，也不让极‘左’翻船。”战略的信念是落实在战术运用上的，两者是对立着的统一，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问题，是很大，很深，很长的问题，我按我的理解谈一点看法。有的是在东方红战团常聊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严格地说是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用自己的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历史上一切旧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变都必须有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毛主席的理论把过程总结出来了，分为二步。

第一步：是先进阶级用暴力从没落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第二步：是先进阶级手中的权发挥伟大的神威，反对旧的阶级利用馀留下来的旧的上层建筑演变和颠覆新政权。复辟旧经济基础。坚决地变革经济制度；坚决地打烂旧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上层建筑来适应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完成了上述两步，新的制度就完全代替了旧制度了。第二步比第一步艰苦得多，长期得多。因为上层建筑的东西，人的精神的东西，不象制度那么好变革，它很顽强，能量很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旧的上层建筑完全可能反作用过

来，把新的政权颠覆掉，复辟旧制度，这是历史车轮的倒转。不要太幼稚，暂时的倒转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整个转变时期内紧紧围绕政权问题，复辟与反复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所谓新政权神威首先是用来反对反动阶级复辟的神威。

历史上，每个制度的大转变过程中，都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欧洲，法国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复辟过。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我国的历史很怪，奴隶社会只有六、七百年，而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则花了近千年的时间。这是什么道理，很值得研究。周朝依靠奴隶革命推倒了殷朝，建立了周朝，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皇朝。以后这个皇朝发挥新政权的巨大威力，变革奴隶制度，使之向封建制度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奴隶主是顽强地搞复辟的，舆论在前，暴力紧跟。（翻小本子）小的不说，最大的所谓“管蔡口武庚叛”的武装暴乱就是一个典型。奴隶主进行复辟的形式是利用自己在周朝政权中的地位来进行复辟。这似乎和现代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点类似之处，当然新政权要反复辟。首先是军事镇压，然后在打击一小撮的同时，用软的一手，即用金钱，物质刺激，名利等拉拢大部分，强迫奴隶制的瓦解。强迫相应的上层建筑转变。

由此可见，我们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主席天才地全面地总结了社会制度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先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继续在政权问题上与没落阶级展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历史规律。从而破天荒地建立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进行反复辟革命的伟大理论，为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进行着伟大的实践。关于这个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报纸上，文件上讲的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仅仅从历史规律性这一点出发是难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的。现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复辟的危险要比历史上任何复辟的危险要大千万倍，原因有下面三点：

1. 转变的国际性：

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以后，航海事业迅速发展，这把一个往来很不密切的世界连了起来，很快就开始了殖民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争夺殖民地

的战争也不断地国际化，这样也促进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革命事业上联合起来，于是革命也越来越国际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个薄弱环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接踵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国际性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比如：苏联修了，对中国内部就有影响，外界压力就加大，全世界的战略重心就转变东移。比如说，亚非拉革命运动起来了，我们要支持，对帝国主义压力就加大。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我认为，在资本主义联合对付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下，一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是现实的，但是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独立完成伟大转折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基本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才可能在全世界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应该和不可以不断向共产主义转移。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现在看的比较清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存在，修正主义存在，他们对抗社会主义的影响，入侵就存在。这样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消灭的，国内的职能也完成不了。第二方面，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有反复辟的战争，有世界性的战争。有战争就要花很大的力量搞战备、搞原子弹。为此，各国革命要互相支持。中国要支持兄弟人民。所以，生产力不可能主要丰富人民物质生活。

这样分析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是国际化，它和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是很不同的，必须是全世界一块来，这也可能同发达的生产力有关，国际资本主义力量相当强大，国际上各个被压迫阶级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要联合起来战胜国际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进攻，完成向共产主义的国际转变任务就非常艰巨了。伟大毛泽东思想统帅下中国人民，将要为全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来。

2. 转变的深刻性：

这个问题大家都清楚，封建制度是从奴隶制度上长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身上长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则不同了，就是在一切制度废墟上建设起来的。要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的转变，不仅是个政权问题，制度问题，还有一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留在人们脑子里的余毒的问题，这样转变就空前深刻了。在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接了班，斯大林同志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

的贡献,但是斯大林同志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放弃了辩证法。在掌握历史规律方面,人的能动性、政权的能动性都发挥的很不够。二十年中阶级斗争规律复辟问题都不认识。这种情况尽管是历史原因,但也有斯大林同志的过错,其结果使敌人暂时得了一点势。社会主义由一片缩小为“一面大旗一盏明灯”,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困难就更大些了!

全面地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现时代防复辟反复辟任务的艰巨性以后,我们再来看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好象就可能比前面看得深刻一点,更远一点,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何在呢?在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反复辟的大革命的意义何在呢?一句话,是在世界上树起一面社会主义永远不倒的伟大红旗,这面伟大红旗标志着社会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这面伟大红旗标志着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告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深刻地证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是具体的现实的。这面伟大红旗将以无可非议的权威指挥着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阶级去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激动地挥手)。

是否可以这样评价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给世界无产者指出了共产主义前景,如果说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向着这个前景迈开了一大步,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那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为全世界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辟了具体的道路。

问:你讲的境界似乎远了点,我们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你刚才说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能的结论哪儿来!第二,你说文化大革命实现大转变的具体道路问题,那全世界到底怎样转变呢?

周答:先说第一个问题,“共产主义不可能首先在一国实现”的论断的理论根据我知道只是上面两条。其实马恩列斯毛都提过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一句格言:“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如果实现共产主义应该说彻底解放了吧!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国无产阶级首先解放,这是不可能的。

问:噢!你这样看的。

二. 国际战争完成国际的转变

周:我再谈谈你们问的第三个问题。

谈这个问题我先谈谈自己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

林彪同志好象说过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意思是：毛泽东思想一旦武装了人民，那将发出很大很大的物质力量来，马列主义不但而且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自然的巨大反作用力，这可以举个例子：大学里学哲学，老师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关系问题，讲得很死，人的能动性表现不出来。我就提了一个问题，西藏从奴隶社会急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解释呢？老师不知道是不敢回答，还是回答不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因为书本上没写这个问题吧！现在我们已能用毛泽东思想解决这个问题了。原因很简单，是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军队的伟大的能动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理论掌握西藏人民以后，产生的伟大能动性。同志们想一想这个能动性多么大呀！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这是什么速度？火箭我看也没有那么快吧！对吧！（扬眉、开朗）

世界怎么完成伟大的转变呢？这一点，首先也得从伟大理论掌握人民就能发出翻天覆地的物质力量这一点出发。

上面说到完成伟大转变分两部，一是夺权，二是用权，反复辟，夺权的理论实际都解决了，有了样板。而用权反复辟彻底完成转变的理论基本保证，有毛泽东思想保证，一定能胜利，既然这样，全世界人民都向中国这面大旗看齐，全世界人民都来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前途不是很清晰了吗？我很看重革命理论，我坚信，一旦理论问题解决了，实践是很快的，只要理论是先进的，你不会去实现别人也会去实现，人民是一定要将它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的。马克思发表资本论到今天大概一百年吧！100年在历史上是很短很短的一瞬间，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至少世界 1/4 人口进入社会主义了吧！多快呀！要知道中国完成封建转变花了近千年的时间呀！比较比较就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威力了。

问：具体怎么转变法？

周：还是两步出发，先是政权问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中国这面社会主义大旗牢牢的竖起来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就有了现实化的理论，有了世界具体的前途，有了具体的道路，这就给全世界人民增加了信念，增加了勇气。可以肯定各国人民都将去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都将向中国这面大

旗看齐，革命之火就迅速从中国向世界蔓延，首先是从压迫最深，帝国主义的统治最弱的地方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始。

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文明和富饶的源泉。革命卡断了帝国主义一个又一个的源泉，那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之间对抢源泉的矛盾也会加深，其结果使帝国主义的大后方本土燃烧起革命之火来，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但如果估计帝国主义会让这种“连锁反应”进行下去，把他们活活地绞死的乃是机会主义的。敌人终究是敌人，他们要反扑，要最后反扑，要作死亡前的联合，要联合起来使用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暴力的矛头肯定是指向要对准世界革命的大旗中国的。第二次大战开始是狗咬狗，后来狗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联合了起来，向苏联社会主义进攻了，这就是先例。当然在敌人联合面前各国人民武装也必须联合起来反对敌人的武装联合。

伟大的转变必定要由伟大的人民战争来完成的，这是历史的结论，历史的规律，国际化的突变也定要相应的国际上人民战争来实现，这也是容易预料的，二次大战转变了一大片，三次能否把帝国主义送进坟墓呢？我看有可能的。革命的暴力是新世界的产婆，你不想联合使用暴力，人家要逼你用，除非你眼看着弟兄一个个被扼杀！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大联合的铁拳必将接受国际无产阶级的请求，犁掉全世界的资本主义。

余下的第二步就是防复辟，反复辟，完成转变。那时候比中国现在的防复辟就省力一些了。第一，原则，理论已经建立了，而且在中国实践了。第二，红色政权全球开花，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如果一国变了，我看可以用联合使用暴力的办法解决。当然人类还是有创造的，各国在转变过程中还有把毛泽东思想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的。这里国际转变的不平衡性还是很大的，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可能完成第一步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假设一下，比如通过第四次大战，完成上述一切的一切，人民定要付出代价的。

问：你这些都是推断的。

周：是的，的确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味道，但我觉得比较现实的。我看我们这一代免不了要打一场大战，这种味道现在越来越能嗅到了。

三. 成绩的衡量法

问：意义谈了，成绩如何估计呢？逍遥派为什么这么多呢？

周：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意义，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意义往往是很难估计的。用物质、用钱、用死人、用眼前利益是没法估计计算的。时间上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范围不是几千里江河的问题，有时候是上百年或千年的发生作用。这给历史家带来难题，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境界低，眼光短浅而挨后人的臭骂。

问：有实例吗？

周：有的，而且很多，例如，秦始皇这个人物是人人皆知的。但是我看很多关于秦的评论中，似乎很少有比较合理的。秦皇朝兴有十年时间，十年很短吧！历史一刹那时间。可是这个封建皇帝，在这个十年中，为最后向封建制度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统一的封建政权机构。建立了一整套统一的制度。中国在秦以后的近两千年的封建朝代中的帝王将相，基本上是在秦基础上运动。光说筑万里长城一事死了很多人，但是长城以后各代中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救的人，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大得多呀！长城是人民造的，但秦始皇的组织是不可抹杀的，尽管这位封建皇帝最后因为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了，但是他比起镇压农民战争起家的刘邦、李渊、李世民来说是有贡献的。秦始皇十年中巡视全国多次，要知道当时只有马车！亲阅各种重要文件，我看这位天子，在封建皇帝里是够雄才大胆的了。

可是很多历史学家，不会评论农民运动，连秦始皇也评论不了，他们往往把秦始皇骂的比其他皇帝都坏，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对农民的软刀子和硬刀子没有太大差别，都应该批判，而且软的更该批判，因为他迷惑人，问题是对历史的贡献和政治事件的长远意义，有客观的评价罢了。

封建时代的政治事件的成绩，意义是如此深远广大，何况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伟大人民革命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了伟大的革命，搞掉了政权机构中如此大的叛徒集团，发动倾国人民来搞理论批判，触动着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根基，这种魄力是有史以来没有的，人民直接掌握伟大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革命象核聚变一样在七亿人民灵魂中产生巨大精神力量。它不仅现在震动了世界，而且将对世界的未来起巨大的作用。精神的力量化为物质力量，要有时间，有空间，有人们的实践。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已经在中国、在世界表现出一

些来了，将来精神核能放出来的时候，就不得了了。这种能量也可能是要放很多年，很多年，可以预料，用我这点境界去评论世界上第一次广度、深度最大的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不付出代价的成绩，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革命事业，问题是什么阶级什么革命家用什么立场来衡量这些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则是最有气魄，最有远见，只有他们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看待革命成绩的伟大意义，主席就是典范。当然有魄力、有远见、敢于付出眼前的一切代价，去换取伟大的成果，并不等于战术上对敌人的麻痹，要知道，每当革命大风暴快要取得成果的时候，敌人总是企图夺取成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翻船的问题，要记着历史上无数次伟大的农民运动成果丧失的教训。这种气魄、远见，是辩证统一的，这是对革命人民高度负责，主席就是这样做的。对于我们，世界革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一旦颠覆，世界历史车轮将会迅速倒转，这可不是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必须学习毛主席，现在毛主席提出一系列最新指示，全国局势已定，决定了成果的取得，至于一些具体问题是慢慢解决的。

比如你们说的逍遥派是容易解决的。

第一，要看好的一面。

我进清华七年了，没有象现在这样浓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气。现在许多人都在看毛选，看马、恩、列、斯著作。人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当然这些学习当中有些是“失败者”“战胜者的军队最善于学习”，这个我深有体会。一年多来，在大风大浪中游泳，许多人都喝了不少水，吃了败仗。现在，战胜者在更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极好的现象，这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具体表现。

第二，要具体分析。

逍遥派中一些人是一直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件书籍的，他们在这里下的功夫很大，他们不仅这样深入细致的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是“小人物”，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对小人物不要蔑视，对大人物不要迷信，这是我一贯法则。须知在很多问题上，“小人物”往往比大人物更容易理解和应用

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何等深刻呀！毛主席有句话：“事情是小人物作起来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后面记不起来了，这句话很英明，充满了辩证法。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文化革命中的先进分子，有的是“战败者”，当然，也难免有一些“悲观论”者，研究角度不一致，态度不一致，但是我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光辉下，在大革命威力逐步发挥的状况下，这些人中，必定会有不少人将来很有创造，他们是很有希望的，当然也必定有一些人走向反面，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

还有一些吃喝玩乐的逍遥派，这是少数。只要组织。引导可以不逍遥吗！

第三，要允许不平衡，不要慌，十个指头不一样长，七亿人相貌也不一样，不平衡是绝对的，大家认识不一致，很多人在某个问题上一时跟不上来，水平不同，不断的用毛泽东思想去统一嘛！在一定时间，一定的问题上，多数人总是可以统一的嘛！统一之后又会不统一，在不统一面前不要慌，逍遥派在斗私批修这个伟大方针指导下，总有一天会组织起来的。联合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历史上每一个大突变后，都需要一个相当的稳定期来搞平衡，这是规律。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反右，不是一个个过来了吗？再大吗？世界大战不是也过来了吗？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要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嘛！刚才念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到这儿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儿的“和平”都首先是以不和平的暴力和政权来保证的。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把“妥协”搞成目的，搞成主要的、唯一的手段，放弃武装斗争，搞投降，把权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印尼就是这样的，遭到了巨大的挫折，法共对资产阶级妥协、妥协、一再妥协，卖掉了灵魂，完蛋了。

中国人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对世界的伟大转变作出伟大的贡献，人多应该贡献大，这是应该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要有苦干一辈子，紧张一辈子的精神，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改造自己，习惯于紧张、艰苦的斗争。必要的修整为更猛烈的斗争，不是逍遥，要永远使人民的锐气尖尖的，活力雄雄的，斗志高高的。平静安逸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没有好处。

四. 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

问：大革命具体怎么收法？

周：为什么要收吧。

问：这不很清楚嘛，也很简单。

周：你说说吧。（等片刻）怎么不说了呢？我替你说，你给我补充。事情的过程必须是波浪形的，有高潮、有低潮，有峰有谷。一浪接一浪向前推进。高潮、顶峰指的是平衡的突破，是前进的标志。但不能老向前进啊，人跑累了要休息一会再跑，机器运动长了要冷一冷，机修一下，于是出现了低潮、谷底。这是旧的平衡突破以后，为了达到新的平衡的必要阶段，是迎接新高潮的到来，不是浪费，这是规律，不以你的主观愿望变化的。人跑长了要昏倒的，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到这种局面时被动了，再来修整补充，就已经违背规律了，修整的时间反而长，反而费劲，结果想快反而慢，想直反而曲，“以迂为真”是孙子兵法一术语，这术语大概也有这种意思。

一场大革命往往是被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打开了局面，从根基上动摇了旧社会制度，但完全把旧制度变成新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叫几声“彻底砸烂”就万事大吉了，完全彻底地完成转变，要很长时间，要在革命大风暴后的很长时间里完成这种转变是一个很长期、很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转变，有条件、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其中包括了群众觉悟、革命力量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轻重缓急主次的问题，它可能还不是最重要最紧急最主要，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这种时期有时需要相当长，我相信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能够加速完成这种转变，使历史更快地前进。但是人决不能改变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这一客观规律。特别是“国际性地转变到共产主义”这样一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更不是人们所能改变的。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同时争取尽可能的加快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

“修整、巩固、妥协”这种词似乎是没有光彩的，其实不然，这是在大革命大变动后的巩固阶段的很必要的手段，其效果是巩固大变动中获得的成果，修整大变动的损耗，总结经验，结聚力量，以便第二个高潮更快到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对敌人来说，上述措施能够更好地分化他们、孤立他们，使我们矛头更集中，歼灭战打得更彻底，很多矛盾解决得更符合发展要求、更辩证。此外，及时必要的修整、巩固在某些场合可以防止外来的突然的冲击，或有准备应付这种冲击，比如战争长，某些时候能防止敌人翻我们的船，使他们失机，等等，等等。

关于这些，实例很多。封建皇朝统治者有的很狡猾，很善于妥协，结果往往一个朝代要垮台，又搞得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周朝、汉朝都有过中兴时期。各朝代前几个皇帝都很懂得用一些妥协来修整民力，补充战争的损耗，以便瓦解农民武装力量，维护封建统治。唐太宗、刘邦可算是他们当中这一手最高明的了。相反，秦始皇处在封建制度刚刚完善时期，他残暴过急而不懂的修整、妥协，十年就垮了，这是封建时代。现代也同样，当然事业的本质是不同的。列宁时代有过很多妥协的措施，有的很成功，是很必要的。例如，在 1928 年和德国定了一个条约，妥协了，退一步为的是进两步，因为年轻的苏联实在需要修整啊！否则很容易死亡，当时布哈林这混蛋反对，好”左“呀！但是”左“的结果是要翻船的。我们毛主席的伟大政策也有”退一步进两步“的妥协。比如给定息，可以作为孤立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补充手段！政治上孤立敌人瓦解敌人，改造他们，而我们的代价可以少些，这里钱是次要的，很合乎我国国情，合作化后要整社，合作化后要修整，自留地保留一段有好处，大跃进后要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不能一直前进，破坏必要的比例关系，困难年间要注意人民团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修整、巩固、妥协”的政策也是采用的，目的当然为了巩固成果，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军队问题首先是一个防止翻船，巩固成果，保证胜利的问题，军队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是有的。军队是在社会中的军队，社会的阶级斗争势必要反映到军队内来，关键问题是如何估计这些问题。要不要搞，肯定要搞。关键是如何搞法，何时搞？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如何？“揪军内一小撮”、冲军区，似乎很革命、很彻底，但是须知用这种方法搞军队，估计错误且不说，主要的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搞是要自毁长城，军权要丧失。

军队是政权之灵，军权一丧失，不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手里。我看外国人不打进来，也被敌人翻了船。当然军权一失掉，帝国主义必然要打进来，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暂时的失败和巨大的挫折是完全可能。不要太幼稚。伟大统帅毛主席坚决反对“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号召“拥军爱民”，这是英明的决策。这个英明的决策粉碎了国内外敌人想翻我们船的阴谋，牢牢地保障最后的胜利。

干部问题，上天安门都是左派吗？我不大信。毛主席说“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嘛！要使用一批犯错误的干部，甚至有一些有过反毛主席错误的大干

部，这样做对敌人不利，孤立了敌人，对我们有利，光靠罢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下，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嘛！肯定的，干部队伍不可能百分之百纯的。真空抽到了小数点后面几个九，还有百分之零点一或更多的空气呢！宽大一些是一种妥协，一是反面人物还有暴露过程，而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了改正过程。二是党内外群众还有个认识过程。斗争是长期的，上述两个过程也必然是长期的，违反了长期性的规律，操之过急，扩大打击面，反而对敌人有利，对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好处。

群众认识问题，过急不行，要实践，要有个认识过程，用过急的办法达不到快速的效果，突变和冲击很必要，但不能老突变、老冲击，让人民群众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原文如此——刻印者注）的方法，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这是一种修正提高。

文化大革命以后要修整，要巩固成绩，要完成很多具体变革，要发展生产，准备战争，要使精神上的成果落实到人民革命实践中去，要总结经验教训，要聚集力量准备世界的转变或者本国更大的革命高潮。主席好象说过要修整十年，不知是否真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妥协”必须以具体条件而定，必须有大前提，即必须用政权和革命暴力来保证，“妥协”是革命的辅助，如要使之过火，使之过长，那就要走向反面。比如全国解放时，攻占北京城，团团围住傅作义交待政策，迫使他缴枪投降。

五. 思想分派问题

周：再谈具体收法中的一些问题。（看一下笔记）

问：谈哪些呢？

周：有关权的三个问题吧！一是思想分派问题，二是出身成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问题，三是干部问题。

问：好，这几个问题都很有意思。

周：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加强巩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有的可能要多次大革命来解决，会有反复。我只谈这些眼前的问题，可能很错误，大家讨论。

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思想体系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没落思想体系。两军对阵，你死我活，思想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是人人皆有的，因此两种思想的斗争，常说的“公”与“私”的斗争，在人人头脑中都存在的。“公”相对“私”而言，“私”相对“公”而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才会没有。问题是谁为主导，所以思想本来就不是统一的东西，而是对立统一的，分成两个体系，两大派别的二种思想没有联合的问题，一个压倒一个，一个拼命的扼杀一个。

思想体系的斗争最集中地反映在知识分子界。这个问题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尤其突出，因为剥削阶级搞劳资对立，企图独霸知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两个对立的阶级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到知识界，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斗争是永恒的，这种斗争是以政治派别斗争来表现。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种现象在社会突变时尤其明显，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代表封建主义的孔子思想和代表复古主义的老子思想对垒，比如，近代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垒等等，不但在哲学界，还如在文艺界等方面还有同类现象。

由此分析，上层建筑中思想斗争分派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既然是规律那就不以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了！

文化大革命是有史以来魄力最大，深度最大，广度最大的革命。最厉害的一点是把理论、哲学斗争全面推到工农兵中去了，让人民自觉地搞思想体系的斗争，让人民自觉地来搞上层建筑，让人民在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使劳资之间的差别空前缩小，使得很多知识更群众化，这个大力作为效果是什么呢？上面谈了，是制造巨大的精神核聚变，这种能一旦转化为物质的话，那就不得了，影响大得很，深得很，既然群众搞思想斗争，那思想斗争分派的规律性也必然要反映出来。群众中的思想派别出现了，这是坏事吗？我认为是大好事，为什么呢？（思索）这样讲吧！原先，人们脑子里的东西，无产阶级的东西不一定占统治地位，小生产者尤其如此。无产阶级思想即毛泽东思想要在群众中灌输的，因为毛泽东思想先前在人们脑子中很少，以至没有，血统工人也只是接受这种思想能力强的问题。十七年后的今天，资产阶级思想在人们脑子中，特别是在小生产者脑子中还有市场，资产阶级思想还很强，在很多地方还是占统治地位，在这个状况下若是很平静的，统一的，那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人们统一、平静，

这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个问题没有狠抓。人民思想似乎不象我们大革命中那样起伏的厉害，相对来说，平静一些，统一一些，其实这种统一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统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人民最高利益有何好处呢！十月革命到现在五十年，五十年的今天，斯大林时代这种所谓“稳定”“平静”的恶果就显示出来了。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反作用起来，起了复辟的转变现象，结果挡也挡不住。一个伟大的事业走了痛苦的回头路。

现在，我们在大革命中出现了急剧的思想派别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在人们灵魂中向资产阶级夺领导权，这是痛苦的转变，所以运动起始时，对于直接关系到政权问题，对保守思想体系采取了冲击手段、强制的手段，这有好处，能促进运动，促进在人们灵魂中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击。当政者“拉一派，打一派”，对思想体系来说，从来如此，这个道理我们这些初学革命的小将也懂得，我们是主张在思想上拉一派，打一派，你们这里有“八·九”的同学吗？（没有！）我对“八·九”在思想上是毫不留情地压迫。去年在哈尔滨我写了一个五、六千字的传单，印了十几万份，是典型的拉一派打一派，拉革命干部潘复生，打走资派李范五，当时我提向潘复生致敬，有的同学说不能向当权派致敬，我看不见得，拉红色造反团，打“八·八”团，说“思想派别斗争一定要有谁战胜谁的问题”。有的人很不同意，说这是“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我想这种大的思想冲击还会有，来几个反复交锋，我们就能控制灵魂阵地了，这样，对政权制度起反作用之后，我们的政权就巩固起来，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造反和他斗！文斗不行，串联起来搞武装的，一点也不让复辟！这就不会象斯大林那样吃亏了！这有何等好呢，我看好的很！好的很！问题是在组织上如何正确处理，思想领域中的派别斗争，思想斗争有敌我的，有人民内部的，人民内部有非对抗性的，也有对抗性的，性质各有不同，所谓性质不同，指的是矛盾的双方直接相关的阶级关系不同。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是非对抗性的，长期存在的，处处存在的，不能说斗争的双方是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因此解决的基本方法也和敌我矛盾不同，和人民内部的对抗性的矛盾比如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同。解决方法中在大革命时期采用冲击是必要的，但作为长期的方式是极“左”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伟大真理意思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派别斗争应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性质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法。

当前，每个革命派都必须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伟大号召。组织上大联合是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思想派别问题的保证，他将有利于我们打掉小资产阶级派性，真正从无产阶级党性高度来进行思想派别斗争。比如某个问题上你的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就要坚决向毛泽东思想革命派靠拢，不要象以前那样考虑组织上的小山头了，这就会大大促进我们正常的思想斗争，使我们内部更容易一步步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样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说用阶级暴力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派别斗争。而我们的力量就更容易集中对敌，这对于对敌斗争是必要的。反之如果用背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势必于人为地划分为“造反阶级”“保守阶级”，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小资产阶级派性泛滥，无产阶级党性被抹杀，资产阶级党性就抬头，内部斗争很难逐步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与此同时组织上对无产阶级毫无意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斗争就纠缠不休，这样敌人可以利用它来搅乱我们的阵线，颠覆我们的政权，所谓从“左”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是有这个内容的。

运动初期和中期在群众中出现了派的问题，应该看到这些派尽管是走资派挑出来的，但是在相当程度上还真实地反映了思想派别斗争的规律，这一点不应该否定，也否定不了，这种派别矛盾又不完全反映正常的思想斗争，小资产阶级派性斗争在组织之间泛滥起来，以至于掩盖了敌我矛盾的内容，敌人、走资派很容易利用它来搞我们，很多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反而急剧地向敌我方向转化，结果常常出现了敌人在一旁看，自己阶级兄弟猛开战的惨象。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等工作根本没法进行，革命似乎有停滞的趋向，伟大统帅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搞大联合，组织上先联合，思想跟上，相互促进（又补充一句：当然这是符合规律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精神变革总是比组织制度变革要落后一步）这样，小资产阶级派性问题就容易逐步克服，至少使它不占统治地位，然而“斗私批修”，这样，真正有效的思想斗争就可以推进了。种种资产阶

级流派的思想就可能大大地削弱了，毛泽东思想可以逐步在各个领域占领导地位，所以说，所谓思想派别斗争指的是资产阶级各种流派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人民内部，组织上不一定有固定的形式，也许这个问题你我同一观点，到那个问题上就不一定了，但思想上肯定分派的，客观上看是如此。因此思想派别并非指运动中的“八九”“八八”“四一四”“团派”了。

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并非“思想派别斗争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里仍然有哪一派掌权的根本问题。（稍停，想了一下）我记得毛主席好象说过，人民内部有各种派别，有党派，权掌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人民关系极大。思想上是分派的，哪种思想派别掌权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掌权或最终要掌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政权问题上就是要寸步不让！在全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权，在各省各地，必须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掌权！单位也是如此！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究竟谁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呢？用小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来回答这个问题是截然错误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派不是自封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革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考验、识别选择而成的！在各个关键时刻、在平时，谁能把握好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谁就应该是掌权者！苦难的中国人民选中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花了很大代价和时间！各级专政机构和领导人物要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当然也有不断的新陈代谢，这是无可非议的。

八. 干部问题

问：干部问题如何看？

周：干部问题和看待十七年问题紧紧相关的，先得说清楚如何看十七年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很多，也很大。我再谈谈看这个问题方法，具体的研究的很少。

结合教育制度这个具体问题来谈吧。

教育制度是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中国的教育制度成份复杂，有封建主义的，有殖民地的，有资本主义的，有修正主义的，但总的来看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然首先是搞土改、搞镇反、搞经济恢复，使年青的红色政权站住脚，才能进一步搞变革经济制度，最后才能逐步地花力量来变革上层建筑，使它适应经济制度的变革，进一步巩固政权，这样旧社

会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变革问题才提到日程上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后，具体如何改？如何变就有一个逐步的认识，逐步的实践，十七年来在教育变革中，广大干部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就是在努力完成这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

有不断实践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毫不例外，问题是在于对旧教育制度是采取什么态度，是彻底革命，彻底砸烂旧教育制度呢？还是进行改变，保留旧教育制度呢？这是两种革命家根本不同的态度，两种态度、两种目的，前者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制度，后者是为了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和制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前者的总代表，而刘少奇则是后者的代表，蒋南翔是他们的爪牙，于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

一个要变革教育制度，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个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一个要培养劳动者，一个要培养所谓的“工程师，专家”，一个要彻底变革，搞半日制、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亦工亦农亦兵，一个则要搞全日制，保留旧制度。

在实践上一个大力提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个则拼命吹捧清华教育质量高，大搞研究院等等、等等。

在斗争中刘少奇的斗争艺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对主席路线是阳奉阴违，随着毛主席路线的深入贯彻，教育变革也越来越触及本质，与此同时，刘少奇对主席路线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最近几年完全公开对抗主席的地步，教育革命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只有经过在政权中把刘少奇打下去，夺取他们的教育大权，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历史的分析，教育制度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东西。第一. 有过程，第二. 充满着革和保的斗争，第三. 斗争形式是在同一面红旗下进行的。斗争是逐步激化的，并非一下子全面开展的，敌人、刘少奇、蒋南翔有一个充分暴露的过程。第四. 尽管近几年来刘少奇的路线，在教育界许多环节上似乎特别猖獗，但是，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在这些初步的结论性的东西的基础上再来看干部问题就容易了。

第一、十七年来毛主席统帅着大部分干部对旧教育制度进行变革，变革是逐步向前的，这就意味着是取得一定成绩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靠主席思想的伟大

作用，但是具体实践主席思想的是千百万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所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贡献的。

第二、两条路线斗争有逐步深入的过程，阶级敌人是处在掌权的地位，他们的斗争艺术是极迷人的，他们嘴脸的暴露也需要有个过程，因此好干部在主观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客观上恰恰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执行的是刘邓路线，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主观与客观分离的观点，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有个贯彻过程。干部对主席思想的理解、认识也要有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干部头脑中的旧东西，必然也要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主席的东西，这样就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执行了刘少奇路线，这是他们的主观原因。

由此可见，毛主席关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客观现实的！作为一个犯错误的好干部身上就有两个方面了，一是忠于毛主席，努力执行主席路线的一面，二是受走资派利用和毒害、执行错误路线的一面。前者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才称得上好的嘛！这是对于一般好干部的两重性。

而刘少奇则诋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大部分好的比较好的打了下去，直到今天解放干部的问题还未解决。而这个问题在运动后期非解决不可了，否则政权巩固不下来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干群关系问题。

干群关系（分析中干部都不包括走资派）严格地说决定于干部的两重性。它分为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相应于干部的错误的一面。一切阶级敌人通过走资派扩大和保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制和法权，腐蚀我们的干部，而我们干部头脑中的旧意识又适应了这种腐蚀，于是乎就被推上了执行错误路线的第一线，压制群众，压制先进事物，逐渐和群众对立起来。这严格地说，这是产生新的走资派的原因。由此而产生的干群对立由干部自己负责。

第二方面内容：和干部执行正确路线相对应：我们的干部是毛主席培养的干部，主观上都不同程度地忠于毛主席的，努力改造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去执行毛主席路线。所谓执行毛主席路线，就是直接应用政权力量去改造群众，改造客观，当然群众中的旧东西要反抗这种改造，这样也产生了干群对立，这对立的原因主要在于群众中的旧东西。

上述两个方面在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矛盾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特别注意的当然是第一个方面，这是文化革命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执行有政权，对革命事业来说，政权是主要的，政权一变色，一切都变了，保证政权的红色，干群对立总是可以逐步在斗争中解决，到了共产主义，干群对立就完全消灭了。

分析干群的两重性，那如何解决干部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主席总结了要以斗私批修为纲。

干部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以后，有了进步，但是还要斗私改造自己同时批修，这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一方面。群众也斗私批修，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二方面。

在斗私批修中，干群进一步结合起来，干群关系大大改善，结果有利于打击一小撮顽固的敌人。群众、干部的斗私批修虽然能解决很多干群关系问题，从而大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干部问题的解决，推动和促进“斗、批、改”的完成，然而任何一个政权问题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的，原因是旧的势力很顽强，这里走资派是主要的，干部群众头脑里的旧意识也在起作用，这些旧意识要自觉不自觉地反抗或阻碍新政权的建立，这是阶级斗争长期残酷性所决定的，所以要建立一个新政权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力是必要的，它和干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相互结合的，缺一不可，所谓“强制力”当然包括武力镇压敌人、走资派和任命新的领导干部在内。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来源：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复课闹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阶段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所作的纲领性指示,为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群众性的批判,这就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扫清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完全可能和需要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完成教学改革,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挥广大革命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红旗,大家来动脑筋,想办法。

改革教学,必须同教学实践相结合,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离开了教学实践,就不知道怎么改。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只有在教学的实践中,经过群众性的讨论、批判、革命和创造,我们才能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革命的规律,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复课闹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各学校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教育每一个革命师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切革命同志务必保持警惕。

抓住斗私,批修这个根本问题,就要抓紧对革命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深入批判,这样,复课闹革命就能够搞好,教育革命就会落实。

在复课闹革命的过程中,各个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各个学校革命的红卫兵,要遵照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学习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在革命的原则下,

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帮助革命的干部和教师站出来，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在复课闹革命中，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事，应该有勇气有决心对旧的教育制度彻底批判，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决裂。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学生有很多比自己高明的地方。要到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复课闹革命，也要贯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提倡因陋就简，大家动手，解决教材和设备问题。要教育学生爱护国家财产。家长也要配合学校，加强对子女的政治思想教育。

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任务，是一个豪迈伟大的事业。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武器，做教育革命勇敢的闯将，披荆斩棘，无所畏惧，有勇有谋，坚韧不拔，敢于破除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资产阶级的旧框框，敢于提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反复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建立起一个红彤彤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一、矿院东方红的批斗陶铸专案组的红卫兵小将们对陶铸专案工作做得很好！掌握的材料很过硬。矿院革命委员会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工作。搞陶铸专案不要局限于陶铸，要涉及到南方的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都是受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指导的，要批判刘氏叛徒哲学。

二、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改造、恢复工作。

三、“到底兵团”回到班上，很好！要欢迎他们！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蒯大富同志给谢副总理的信

谢副总理：

我们要求提审反革命小丑周泉纓、杨忌非（均已被捕）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对伯达同志，中央文革。他们背后有坏干部支持他们。我们准备把这个案彻底搞清楚，但市公安局军管会不同意提审，请求您的意见。

蒯大富 1967. 10. 27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蒯大富一封信的批示

可以拉回来批判斗争，但只能文斗，不能打人。

谢富治十月廿七日

（来源：196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27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红日照环宇，四海涌波涛，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造就着无数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首都又一批中学红兵战士踏上了您指出的革命大道！他们已在按照您的伟大指示，高举“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自觉地投身到工农中去，投身到火热的三大斗争实践中去，决心走一辈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毛主席“斗私，批修”伟大方针的又一曲雄壮铿锵的凯歌！他们这一步迈得很好！迈得过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广大战士们衷心向他们致敬，坚决向他们学习！

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给我们中国青年指出了一条最最光明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主席最深刻，最概括地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措施。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就是要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就是要接毛泽东思想的班，就是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列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将来我们党的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继续前进的问题，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不是消失了，而是更激烈，更复杂、更迫切地摆在我们每个红卫兵，每个革命青年的面前。

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前进！这就是保证！这就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存谁亡问题的根本措施！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历史性的、方针性的伟大战略部署！

广大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首都中学红代会向你们发出呼吁：要高举“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向去农村、草原插队的战友们学习，坚定和工农结合的革命大方向，热情宣传、忠实执行毛主席关于和工农结合的最高批示，继续掀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高潮！

红卫兵战友们，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祖国的农村需要我们，需要毛主席忠实的革命战士，需要我们去战斗！去建设！去保卫！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革命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

亿万革命的红卫兵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生意经，什么“吃小亏，占大便宜”、什么“公私溶合”论，统统横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扫清了我们前进的障碍。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种种缺点，更加强了我们和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的愿望，使我们步伐更坚定、行动更自觉。今天，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的行动，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继续！

首都中学红代会，向广大坚守岗位，忠实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最高指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致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选择并坚持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你们是千万红卫兵战士的好榜样！

首都中学红代会向广大支持并鼓励自己子女走上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支持并鼓励他们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家长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战友们、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世界革命的前途属于我们的，历史和世界革命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就是沿着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和工农结合的胜利航向，前进！

（原载《兵团战报》1967年11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十四日晚，在毛主席、林付主席以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接见解放军代表时，周总理对崇碧同志的指示。11月15日上午李钟奇同志在外院传达。〕

一、外语学院昨天发生的这场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股武斗风总是煞不住？要检查形成这次武斗的原因，追究责任。

二、外语学院二派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三、这些问题的解决靠武斗是不行的，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时间：下午3时，地点：中央民族学院三楼会议室。〕

李付司令员：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因为你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你们的协议我看了两次很好，双方长时间不和睦，现在有时间商量了，这很好。前几天我去“一外”（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一方让你们去支持，你们没有去，这很好，这合乎毛泽东思想，我去了两次一外，前几天又闹起来了，总理让我赶快去。

总理对“一外”有个指示，十一月十四日由傅崇碧司令员传达总理指示，指示主要内容是：

“一外”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种武斗歪风老是刹不住，要调查原因，要追查责任。（李付司令员解释说：我参加了制止武斗，给订了六条，没有很好的执行，究竟谁没执行？）他们双方（指造反团和红旗大队）都犯过错误，不要不择手段地压制对方，一外武斗是极错误的，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你要告诉他们（“一外”）如果不改正错误，坚持武斗，这样下去

就会走向反面，这与主席指示离的太远了，听说“一外”破坏的很厉害，这是犯罪行为，要追查责任，进行教育，派调查组调查后交上报。

李钟奇接着讲：我一、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了以后，又给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同意你们对一、二外处理意见，不要指名道姓攻击对方，可以讲事实讲道理，你们一互相攻击，就是不择手段。除了狠抓一、二外，也要抓兄弟的民族学院、工业学院。周总理很关心，早就安排了，五月份就安排了，你们在打架，我是先来探听消息，没派人来，怕卷进去，现在准备，明天就派人（军训团）来，和民族学院革命师生共同搞斗批改，大批判，复课闹革命。先消除武斗的气氛，为大联合作好准备，不要掉队太远，应后来者居上。

根据总理指示，双方的协议订的很好，不要辜负总理对你们的希望，总理指示给你们启发，要进一步巩固提高。

（李付司令员讲“二外”达成协议）

据总理指示，有关两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协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这个问题双方意见不一致，行动不一致还有意见分歧，有实际问题，有派性，不是一、二天的问题，而是用毛泽东思想判断。

毛泽东思想要我们破私立公，去掉派性，向真理低头，按毛主席的话去做，这是最光荣的，要是离开毛泽东思想，问题就愈搞愈糊涂。这个问题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是复杂的，要求大同存小异。你们比我清楚，要总结经验，补救我们走了的弯路，后来居上。

有几个学校，打架打得很凶，武斗是最坏的事，打架不是好事，在座的都会这样认为吧？你们达成协议很好，要贯彻执行已达成的协议，这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谁也不能压谁，陈伯达讲，克服派性，克服占山为王的思想，也正如周总理说一外造反团、红旗都有错误，你们这两个组织历史我不了解，谁一点错误没有，我们应该突出政治，总结经验。

我们解放军都是工农干部出身，希望你们帮助他们，有小将们的帮助，解放军也不要害怕犯错误，至于解放军有缺点错误，从正面提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我们解放军是支左，不支派，由于水平不高，有缺点，你们可以指出来，经验证明，支左八个月，你们给我们大力支援。向革命师生学习，只要你们做得好。军

训作用很大，但协作不好也是很麻烦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彼此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复课闹革命搞好。

李付司令员最后讲：革命小将我很熟悉，火气很足，希望你们多作自我批评，不要动手、动脚、动拳头，争吵两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坚决不要动拳头，要多作自我批评，重大原则问题要讲清楚，争吵骂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好不吵架。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钢铁学院武斗问题的指示
总理办公室联络员王同志传达总理指示：

各群众组织随便抓人是不对的。用抢、骗、打的办法抓人更是不对的。以后不准这样干。再这样干要犯大错误。那就是要考虑你这个组织的性质。你们现在抓的人都要放回原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工代会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时间：晚。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等。

（当煤矿工人谈到，有些人只拿工资不工作时）

江青同志讲：不下矿还拿工资？不劳而食的还拿工资？还是工人阶级？

康生：煤矿的问题，关键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是思想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关键问题是革命。（伯达：要“斗私、批修”）你们那里有国民党反动派怎么办？也着着他们？

伯达：不劳而食是剥削阶级。

（当首长问起厂矿脱产干部的情况时，一个工人回答：只有段长和支书脱产。）

江青：段长支书都脱产了吗？啊呀！段长和支书都脱产了！还没有恢复你们原来的产量吗？

工人答：没有恢复，……

江青：噢！

（当一厂矿工人分析了厂矿工人的工资情况，并讲到了一月份工人目前生产积极性不高时）

江青：解放前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对煤矿工人惨无人道。现在煤矿最低每人每天两元多，一月就 60 多元，生病受伤国家还有补助，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好好想想，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想这一点就忘本了。你们工人应该很好地忆苦思甜，旧社会的矿工惨极了，而你们现在有人养了不劳动。（伯达：不劳动不得食。）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把本单位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否则还出那么多钱，养那么多坏人。

（当工人汇报到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时）

姚文元：这些东西是不是苏修的？

工人答：完全是照搬苏修的。

谢副总理：应该很好地斗私批修。

（长沟峪煤矿汇报情况）

伯达：工厂都是配套的，都是按比例发展的，煤矿是很重要的，没有煤发电、冬天取暖都成问题，煤炭工业部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斗私批修，斗批改搞那些反革命，搞那些破坏大联合的家伙。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以后再谈，请江青同志讲一讲。

江青：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好讲的，要继续再听几次，今天请了大、中学的小将参加，你们提了好多问题，我想你们还是好好听听工人同志发言，有一个条子说“据说要放寒假了，引起很大混乱。”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制造混乱，不要上当，还有什么要下厂往外跑，总之，是不想坐下来搞斗批改，要提醒你们现在煤很少，有些学生自己搞煤，用电在屋里做饭吃，这应当吗？一点也不顾全大局，希望你们给这些人说不要这样干，学校问题最近要专门找个时间听听汇报。

康生：下次谈时请同志们准备一下，恢复党组织生活问题要座谈一下。

内燃机工厂一工人发言说：现在学生还到工厂去串联，去贴大字报，再去可以不可以赶他们？

伯达：可以，是什么学校去的？

工人：农机学院，还有“新人大公社”。

伯达：有礼貌的请他们回学校去，告诉他们，工厂的事，我们自己管，

京棉一厂工人又说：“人大三红”也到我们那里贴大字报去了。

总理：各单位都回本单位搞斗批改。

康生：“人大”牛鬼蛇神够抓的了，叛徒、特务一大堆还到外边去？

江青：我们建议学校红卫兵小将不要包办代替工厂的事情，这样搞不好，

伯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吧！

（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时谈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十一月二十三日零时 15 分至 2 时 30 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广西两派代表团部分代表。当谈到《政法公社》时，周总理指出：

“政法学院有个陈荣金，起初大家都支持他。你知道他到处煽动，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太猖狂了。”

《联指》代表插话：“这家伙到处去夺权，他们还到广西同另一个组织结合夺公安厅的权。”

戚本禹同志说：“政法公社就是到处去夺权。”

周总理接着说：“我们现在已把他（指反革命分子陈荣金——编者）拘留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是毛主席的方针，党中央的方针。全国各学校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积极复课闹革命，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初步的经验。

坚定不移地贯彻复课闹革命的方针，是当前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党中央指出，复课闹革命，就是要“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途径。按照这个指示去做，决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复旧”，什么“改良主义”。

复课闹革命，是在批判中教，批判中学；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就是说，要在教学实践中，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战线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这种教学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教育战线上一次伟大的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显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都一定要发动群众，反复调查研究，反复实践，反复试验，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我们要欢呼这种一边教学、一边改革的做法，欢呼这种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在逐步完善的新生事物。

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不是常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吗？复课闹革命，这就是当前学校中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学校中，一切抵制这个大方向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须澄清。

进行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业，需要做艰苦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也正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想，消极地等待一切都改得彻底了再复课，而不愿意做深入的批判，做认真的实践和研究，付出艰巨的劳动，那将是一事无成的。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指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此，复课闹革命，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让愿意革命的教师和干部站出来，一定要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党中央指出：“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

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广大革命的教师和干部，同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投身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中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气象，不能把它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混同起来。我们应当热情地欢迎他们，相信他们，支持他们。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旧的习惯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破坏。我们队伍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也会干扰复课闹革命的正确方向。对这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陈：同学们，我们今天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请问你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了没有？

众：看到了。

谢：看到了！

陈：第二请问你们对复课闹革命有什么意见？

众：坚决复课闹革命，听毛主席的话，复课闹革命。

陈：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众：笑）

陈：还有一件事情，我和谢富治同志有个伟大的任务，什么叫伟大的任务呢，就是要见见清华附中老红卫兵。

谢：现在他们不赞成复课闹革命！（众：对！）

陈：所以我们就要来向他们请教。（众：向中央首长学习，听毛主席话！）是红卫兵又是老红卫兵，当然他们的意见是伟大的罗！（笑）所以我们呢，我们要做他们的学生，听懂吗？我们要做他们的学生，向他们请教，听说他们到很多学校去串联，说复课闹革命是复旧，是改良主义。（众：笑）中央的通知，要“复课闹革命”要搞革命的大批判，在革命的大批判的基础上，搞复课。现在有些学校复课了，他们就去冲，说“你们是改良主义”，“你们是复旧”。有的学校很不平安，所以我们就来向他们请教，当他们的学生。（众：笑）在座有哪些是老

红卫兵的？请他们站起来我们看看。噢，你也是老红卫兵，我们就拜你们做先生啦。你们老红卫兵啊，是红卫兵，又是老兵，老红卫兵就是老的红卫兵。我是很幼稚的，我的程度跟小孩子差不多，我要向老红卫兵请教。众：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中央首长致敬！

陈：谢富治同志和我的意见，认为你们的学校，还是应该执行中共中央的通知，复课闹革命。（众：欢呼）还是要按照去年十一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执行十六条，执行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学校要不要复课，是你们学校自己的事情。（众：要复课闹革命）你们要复课闹革命，对了！你们就不要去串联，去冲人家，人家自己也教育自己嘛！自己管理自己嘛，自己解放自己嘛！

谢：你们自己解放自己，人家也是自己解放自己，那就不要去干涉别的学校复课闹革命。（众：对！）

陈：我听说我这些老生们，老红卫兵们（笑）到处去冲，去冲人家欢喜复课闹革命的学校，并且联络了一些学校，我觉得这个做法，值得考虑。如果没有这样做就很好。如果做了改了就行了。（众：对！）如果没有也就行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各单位都搞斗、批、改，各单位都搞革命的大批判，自己搞教育自己，不要包办代替（鼓掌）我的老师，老师们，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请问你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指示，有什么话告诉我们，指点指点我们很欢迎。有的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一定要包办代替，也可以说几句自己的意见嘛，我是要当学生的，要请教的。有意见吗？我的老师们，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请你们帮助帮助我们一下吧！教育教育我们一下吧！指点指点我们一下吧！（鼓掌）

谢：那我们就散会了！散会了！

陈：今天不讲啊！可以写信，今天讲不完，讲不完可以写信送给谢富治同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时间：二月五日下午两点半，地点：西苑旅社。〕

我们伟大的领袖在去年九月份讲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目前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伟大预见，过了几个月后的时间的形势好多了。不管是国内和国际，形势都是大好啊！国内，全国已经有十四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今天湖北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广东、吉林、浙江很快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去年，特别是新疆搞得厉害，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在目前是推动形势的关键问题，全国的形势都是这样。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全国有十四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五、六个也快了，有吉林、辽宁、新疆、广东、湖南、浙江。新疆那么乱，过去武斗那么厉害，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吉林形势也发展得很快，长江两岸原来武斗也很厉害，现在不错嘛。春风已到玉门关，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的。现在春风已经吹到了新疆，新疆目前是一派大联合的高潮。不论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春风吹遍全国。

（注）上面讲话材料摘录自新疆红二司政宣部办公室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关于拼死拼活狠抓大联合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编者按：为了配合整顿红卫兵组织工作的胜利开展，现将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发给大家，望各单位革委会、红卫兵兵团负责人，组织讨论学习，及时将广大红卫兵战士的意见反映到中学红代会，以期及时纠正。

一、总纲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的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伟大革命。它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了！这是我国青年的伟大首创。红卫兵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在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支持下，红卫兵的队伍迅速壮大。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红卫兵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朝气蓬勃的生力军。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它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最后灭亡的象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欣欣向荣的象征。红卫兵运动在全世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全世界革命青少年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坚强组织，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红卫兵要做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红卫兵的最高指导思想，每一个红卫兵战士必须遵照林彪同志的教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

重于一切的地位。把学习、执行、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做为每个红卫兵战士的最高职责。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的得到解放。”

红卫兵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把支持世界革命人民的解放斗争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红卫兵要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一道为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而努力奋斗。红卫兵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军。必须以解放军为榜样，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每一个红卫兵战士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以斗私批修为纲，改造世界观。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红卫兵要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永远艰苦奋斗，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跟着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二、红卫兵组织条例

第一章 红卫兵

第一条：红卫兵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承认红卫兵章程，执行红卫兵代表大会决议，遵守红卫兵纪律，才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红卫兵战士。

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其它革命分子）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上表现好的，方可成为红卫兵战士。

第二条：对红卫兵的要求：

（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最最忠实的战士。

（二）发扬敢说、敢想、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以“斗私，批修”为纲，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兴三八作风，坚持四个第一。

（五）保持革命警惕性，随时准备参军参战，彻底埋葬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

第三条：红卫兵权利：

（一）有权在红卫兵报，红卫兵会议上参加有关红卫兵工作的讨论，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二）红卫兵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对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坚决抵制。

（四）在红卫兵组织对自己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定时，可以亲自参加，进行申辩。

第四条：加入红卫兵的手续：

本人申请，红卫兵基层组织讨论，上报上一级通过，才能被批准为红卫兵。

第五条：红卫兵由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组织时，必须办理转移组织关系的手续。

第六条：红卫兵战士有退出的自由，退出者应向本校红卫兵团声明。退出后就再没有加入红卫兵的权利。

第二章 红卫兵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

第七条：红卫兵的组织原则

红卫兵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红卫兵的各级领导机关，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必要时可以由上级机关指定。红卫兵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红卫兵下级服从上级，一切服从毛泽东思想。在红卫兵内部广泛实行民主。

第八条：红卫兵的各级组织机构：

（一）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受毛主席、党中央，共青团中央领导。

（二）红卫兵的编制一律按解放军编制。

（三）红卫兵在工矿企业、机关、部队、农村组织是共青团。受各级团领导机关领导。

第九条：红卫兵的各级领导机构：

（一）红卫兵在全国设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

红卫兵代表大会四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红卫兵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提前或延期召开。出席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决定。

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听取和审查批准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讨论和决定全国红卫兵的工作方针和当前的工作任务。

（2）决定红卫兵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修改红卫兵章程。

（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均设红代会。

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红卫兵代表大会两年召开一次。县、自治县红卫兵代表大会一年或二年召开一次。出席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各级红卫兵团（红卫兵代表大会）决定。

地方各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职权：

（1）审查和批准各级红卫兵团的工作报告。

（2）讨论和决定本地区的任务。

（3）选举出席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经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批准。

（三）在大、中学校设红卫兵团：

红卫兵的基层组织是红卫兵密切联系群众，领导群众实现红卫兵任务的战斗堡垒。

第十条：红卫兵的基层组织和主要任务：

（一）把领导红卫兵组织革命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四个第一，促进青年思想革命化。

（二）对红卫兵和革命青年经常的进行阶级教育，同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三）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四）发扬红卫兵团（红卫兵委员会）的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红卫兵的团结，提高红卫兵的战斗力的。

（五）红卫兵的各级组织要密合同级党组织的各项工作。

第三章 红卫兵的纪律

红卫兵有严格的纪律，以加强团结，巩固红卫兵的统一，提高红卫兵的战斗力的。红卫兵纪律的最高原则，是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加强对红卫兵战士的纪律教育，对于犯错误的红卫兵战士，应以“惩前毖后”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犯错误严重的应酌情给以处分，直至开除红卫兵资格。

对于红卫兵的处分，必须经红卫兵团（红卫兵委员会）决定，并且经上一级红卫兵组织的批准。

三、誓词

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像前，我们宣誓：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是您最忠实的红小兵，我们永远忠于您，忠于您的光辉思想，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把您的指示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谁敢反对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坚决打倒他！头可断，血可流，您的光辉思想我们绝不能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我们决心遵照您的伟大教导，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终身！

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原载《红卫兵报》1968 年 2 月 29 日）

五、北京高校两派武斗加剧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汪东兴、叶群、吴法宪等同志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的同志〕

陈伯达：继续上次的汇报，上次没讲过的讲，每人不得超过十分钟。要谈新闻，不要谈老闻，谈新意见，要学会说话，不要罗嗦。

秦殿丁：（站起来要求发言）广播学院要讲。

陈伯达：广播学院讲。

秦殿丁：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周总理：你叫什么名字？那个组织的？

秦殿丁：我叫秦殿丁。“红三军”的。

周总理：（翻阅三月六日接见的名单）怎么没有你的名字？

秦殿丁：我们这次换人了。我换贺亚生，曹惠茹换吕反修同志。

周总理：曹惠茹？

陈伯达：曹惠茹来了？

秦殿丁：曹惠茹来了。让她先讲吧，然后我再补充。

周总理：你们是一派的？

秦殿丁：是一派的。

陈伯达：好吧。

曹惠茹：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现在汇报一下广播学院的运动情况。我们广播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去年一月

份分裂的。一月夺权后，就处于分裂状态，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王力、李敦白、张根成插手的结果。从前我们和广播局的革命派，都是一起干革命的同志。但是其中一部分人搞了一个北京市（广播电）台的“1·14夺权”，是从造反派手中搞的第二次夺权。对于这个夺权我们是反对的。还有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二千多名造反派也是反对的。而王力却支持这个“夺权”。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王力耍了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支持我们辩论，背地里告诉他们不要去参加辩论，这样我们就搞了一个“强迫辩论”。王力揪住了我们这条辫子，就以中央文革名义搞出了两封信，把我们打成了“炮打中央文革分子”。我们写给中央许多材料，都被王力扣压了。在这种情况下“1·14夺权”的一些同志，搞出了一个公告，把我们打成“反动分子”，这个公告至今未撤销。前几天当我们问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时，他们说：“中央文革的两封信不撤销，我们也不撤销公告”。我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的司令部是什么阶级感情问题。自己哪些地方被王力利用了，自己干了那些事，自己都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至今对王力的问题不表态、不揭发、不交待呢？“2·18”以后，临时文革就来了一个改组，改组的思想基础是“1·14”和“2·18”。原临革中 21 个委员就有 16 个被踢了出去。去年三月八日王力接见了他们的代表。王力说：“你们要全面彻底的夺权，把权夺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还说：“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等等。在这种极“左”思想影响下，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同志，和受蒙蔽已经改正错误的保守派同志及广大革命干部。当时北京公社内部有人起来反对抵制，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同志就组织起一个北京公社五·一六战斗团，后来同一些其他革命派同志们一块成立了红三军，抵制王力的极“左”思想。红三军就是这样成立的。

我感到问题严重的是去年五月份时，有人就在临时文革里公开提出“向王力同志学习”的口号。北京公社的会上一一直在传达“王力同志说什么”，“王力同志怎么样”。8月9号张根成到我校去了，他根本没找我们了解情况就对他们说：“临时文革（现）踢得开吗！？”当时本来北京公社一些同志已经做了些检查，可是张根成的“光临”，使得他们更硬了起来，不检查错误，同时死保临革。

李敦白也曾经对他们说过：“既然曹惠茹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同意你们和她分裂”。

现在广播局王力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批判，从中央 12.7 文件下达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局和北京市台形势大好。广播局很快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广播学院就截然相反。王力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至今未得到批判。在去年 11 月有人借口抄“五·一六”，还抄了我们的家。自然喽，他们什么也没抄去。所以我们认为解决广播学院联合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肃清王力流毒，不肃清，就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好”就不能在广播学院实现。

另外我给学习班提一个意见，军训团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强调斩断黑手不够。

伯达：是学校的学习班吗？

曹惠茹：不是，是大专院校学习班。

（曹惠茹同志汇报完后，其他院校代表就纷纷举手，要求发言。杨逸鹏也要求发言。）

伯达：你讲吧！

江青：（向着伯达同志）他不是杨逸鹏吗？！

杨逸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周总理：你叫什么名字？

杨逸鹏：我叫杨逸鹏。我不同意曹惠茹的意见……

江青：你不是做了北京广播电台的台长了吗！

杨逸鹏：把曹惠茹开除临时文革，不是改组后的临革，而是前临革十二号公告，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们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分裂，不象曹惠茹讲的是六七年一月份分裂的，而是六六年七月份反工作组时，造反派就分裂了。现在看来王力的“三八”讲话是错误的。对形势的估计是很悲观的，说“毛主席革命路线有失败的可能，有胜利的可能”。另外王力“三八”讲话时，不只我一个人去，他们红三军的一个负责人吕反修也去了。因此说“三八”讲话的流毒双方都有。不能只说我们。我们学院临时文革八委员会宣布临革的瘫痪，造反派当了保守组织的头，今天在坐的秦殿丁就是一个。

曹惠茹：（站起来）秦殿丁是造反派犯错误。

杨逸鹏：我们学院两派也参加了天地派斗争。不能把天派全说成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也不能把地派全说成保反动路线的。而我院“红三军”就是地

派的，保王、关、林的。我们广播学院很小很小，在高校中没有影响。其实王力没有必要插手我们广播学院。

曹惠茹：王力在三月八日接见你的时候说：“广播学院对广播局是有影响的”。

杨逸鹏：我和王力只见过两次，一次是一月三十号，一次是三月八号，张根成也是两面派，他曾跟曹惠茹说我是两面派，我想曹惠茹也不会否认吧！反革命两面派就是这样在这边说好，在那边说好。

江青：过去我们解放了你！可是，你后来呢，却做了别的事情，当了台长了。这你总不能蒙我们。

杨逸鹏：……

伯达：（对杨逸鹏）可以了，不要讲了。

杨逸鹏：我还有一句，就是学习班的情况……

伯达：差不多了，化工学院讲。

……

（二外红卫兵汇报：一、军训团问题，军训团说我院一月夺权是派性斗争，否定兵团炮打总理罪行。军训团有人说，炮打总理是出于热爱毛主席。）

江青：炮打总理还说热爱毛主席？

（当二外红卫兵汇报到：解放军说：兵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炮打另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时）

伯达：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有另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外红卫兵：批陈毅问题上我们外事系统分成两派。）

总理：批陈毅是对的嘛！

（石油大庆公社谈北京公社利用反余秋里和其他几个副总理，实际是炮打毛主席的司令部时。）

江青同志打断他的话，气愤、激动地说：去年二月逆流嘛你们学校起作用了没有？（答：有一些）只有一些吗？二月逆流你们怎么表态的？（答：我们认为有二月逆流。）

总理：你们反击了没有？

姚文元：我没听清楚，你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一遍。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

江青：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是不对吗？打倒谭震林不能打吗？我还保了他，你们打嘛！你们打得对嘛！有两个展览根本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毛主席，没有突出林副主席。反击二月逆流你们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二月逆流时，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

总理：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应该讲你们自己的错误嘛！

江青：你们一点都不批余秋里，主席对余秋里是一批二保，你们是一再地保，你们倒是一贯正确了？！

总理：应该谈你们自己的错误，从二月份以后。

（大庆公社代表谈“五·一六”问题）

江青：你们已经捞不到什么了，你们还讲什么“五·一六”。我们反“五·一六”的时候，你们倒不知道在哪儿睡觉呢？

总理：别人反击二月逆流时，你们是不赞成的，你们就是错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了，你们很缺乏自我批评，特别是你，你们一直保，倒成了一贯正确的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你们是反对我的，你们口头上讲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实际上炮轰我们的，你们轰吧！胆小鬼才怕轰呢。你们从头到尾保，现在倒一贯正确了？！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是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喊：打倒谭震林！）

姚文元：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谢富治：二月逆流是想推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我很气愤，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答：要！）一贯保的倒成了一贯正确，你们一点不做自我批评，不听！不听！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康老：余秋里搞大庆展览时，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像搞掉，而去买刘少奇的黑照片。

江青：一个石油展览，一个农业展览，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没去看。

康老：两个展览我都去看了，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叶群：这些问题都是实际问题，二月逆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中央文革小组！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姚文元：我刚才叫他重复一遍，他不敢重复，有胆量再重复一遍。

江青：你有胆量重复一遍，没有胆量吧！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我希望你们多做自我批评，你是个头头，要把这个意见带回去，让群众帮你检查。

各位首长：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

总理：你们去年九月份抄了别人的东西，早就让你送回去！你对自己人凶得要死，也许就不是自己人，我怀疑他不是自己人，应该把东西还给别人。

（北医讲：有人认为，高校两派斗争，就是毛主席司令部与关王戚反党集团的斗争。）

江青：那么你们把刘、邓、陶、彭、罗、陆、杨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建工新八一发言，谈到揪刘火线问题）

江青：刘少奇那个检查到底应该给谁？是应该给新八一而给了老八一了，还是应该给老八一而给新八一了？

（建工八一：应该给老八一的）

江青：你们说清楚，因为这是导火线，我们想听一听。

汪东兴：其实是刘少奇耍的鬼，我当时是要同时交给两派的，而刘少奇只写了一个新八一，给了新八一。

江青：两派都有勒令，应该都给的，是汪东兴经手的。

（建工八一汇报到揪刘火线绝食时）

江青：绝食也是极“左”呀！印度的那个总理甘地等搞绝食，就是不搞武装斗争。（笑）你们不要上了刘少奇的当，刘少奇故意挑拨，刘少奇就是要这样的花招，另搞这一套，你们新老八一一定要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热烈鼓掌）

陈伯达：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为止，以后再说吧，还有机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时间：1968年3月29日凌晨七时半

地点：新北大广播台

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你们要立即停止武斗。

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各派五名代表，一、二、三、四、五把手参加，由校文革和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时间：今天上午八点；地点：哲学大楼 206 号

此外，全体职工们，同志们：

我今天和聂元梓到现场制止武斗时候，有的人拿匕首直接刺伤了聂元梓同志。这个凶手，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动员起来，把凶手抓起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时间：1968年3月29日上午十一点半

地点：新北大广播台

新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武斗是错误的，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大家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

由于井冈山的同志们拒绝按时参加会议，至使今天会议不能进行，这样作法是错误的。

为了制止武斗，我们现在组织、派出了调查组，有宣传队马继荣、王永钢、李乃坚，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梅谦，市公安局军管会吴保果，校文革王海忱、唐春景等人组成制止武斗调查组，马继荣同志为组长，王海忱、吴保果等同志为副组长。

希望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群众组织提供方便条件以利制止武斗和武斗的调查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三月二十九日晚十点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副司令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会场，说：“好了，同志们都来了，谢副总理和温司令员很忙，他们回去还要开会。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有带武器来的没有？”（公社同志响亮地回答：没有！卢平同志说：“我向首长保证，没有！”井冈山一人掏出一把带有血迹的锉刀。）李副司令员问：“还有没有？”（井冈山代表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没有了。”）李钟奇同志接着说：“有问题可以坐下来解决，不要骂，不要动拳头，你们搞武斗是错误的。”（卢平同志领着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维护六六通令！”“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晚 10：36，谢副总理、温司令员、李副司令员和聂元梓、孙蓬一同志一起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谢副总理向大家介绍温玉成同志。

温司令员：“今天我和谢富治同志到这儿来看看大家。听说发生了武斗，这是不好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现在我们还闹不团结，这是不好的。现在谢富治同志宣布市革委会、卫戍区研究的一个决定。”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
（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以林副统帅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林副统帅、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新北大公社战士高呼口号）

传达完文件后，

谢副总理说：“希望你们两派都要执行，希望解放军在这里帮助执行。”

（当井冈山兵团代表强词夺理说什么“谢副总理四点指示还有说明的需要”时）

谢副总理说：“这个情况，我们没有时间听，这个命令要立即执行！”

李副司令员：“谢副总理这个指示应该立即执行！具体怎么做，我们再商量。”

（当井冈山兵团代表当面造谣攻击聂元梓同志，企图逃脱挑起武斗罪责，拒不执行谢副总理指示时）

谢副总理对井冈山兵团说：“我刚才说的一句话，不在我记录内，这句话（按：指谢副总理传达第三条时补充的话）要请你们注意！这句话要请你们注意！要请你们注意！注意！”

（当井冈山兵团代表想赖帐时）

谢副总理：“刀子就是刺了聂元梓了么，聂元梓是市革委会副主任，新北大校文革主任么。”

（井冈山兵团要求调查执行，新北大公社表示相信、信任监督小组的工作，谢副总理讲话我们坚决执行，立即执行！）

温司令员：“首先把刺伤聂元梓同志的凶手交出来！”

（井冈山代表狡辩、抵赖；群众呼口号：不准对抗温司令员指示！）

谢副总理：“井冈山兵团立即交出刺伤聂元梓同志、打伤李钟奇同志的凶手！”

（群众：不许对抗谢副总理指示！）

谢副总理：“如果不按照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不按照十万人大会来办，而依自己来办……小将年青，不要上当……”

温司令员：“要警惕！”（新北大公社战士高呼口号）

谢副总理：“聂元梓同志，你有什么话说吗？”

聂元梓同志对谢副总理和温司令员的慰问表示感谢：“我坚决拥护、坚决执行谢副总理、温司令员的指示，也希望同志们这么做，我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特别是井冈山兵团的同志，我希望北大能够迅速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井冈山又疯狂攻击聂元梓同志，谢副总理一再打断，并为聂元梓同志讲话鼓掌）

谢副总理：“我们要走了。”

李副司令员：“时间不早了。”温司令员：“大家共同监督执行谢副总理指示。”

晚 11：00 首长离去。陪同谢副总理、温司令员、李副司令员的有解放军驻新北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孟队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北大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同志，新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同志。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各区、县革命委员会：

全市每年中学毕业生约有十余万人，这些毕业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浪中锻炼成长的。”

我们提倡知识份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动员他们下乡上山到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去，发挥他们的巨大作用。

去冬已组织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边疆和工厂，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建设，他们已在那里开始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把他们分配到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使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此，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做好毕业生的思想动员工作，深入宣传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所推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用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腐蚀青年，破坏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广大知识青年在大批判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划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明确政治方向，永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二）加强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老三篇”为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大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克服一部份人头脑中留恋城市，不愿到农村不愿到边疆，不服从国家分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大立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

块。”各区县必须狠抓毕业生的世界观改造，使他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份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自觉报名下乡上山，服从祖国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三）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做好毕业生分配的组织工作。

北京市的中学毕业生数量很大，必须采取分期分批的分配办法。

先分配一九六六年的毕业生，再分配一九六七年的毕业生。对于农业户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于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业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

目前已与各方面联系落实，计划从一九六六年毕业生中分配一批到农村、边疆、工矿中去，各区要切实做好这批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分配方案由计划组下达）。

（四）毕业生的分配，必须贯彻群众路线。要重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把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分配计划交给毕业生讨论，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进行报名，根据工农业分配比例、群众意见和接受单位的情况进行分配。

（五）加强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领导，及时解决分配工作中的问题。市革命委员会由政治组、计划组、文教组、军政训练指挥部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各区县革命委员会也相应地建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组织力量抓紧抓好这项工作。

毕业生分配是一项社会问题，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以及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一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年轻人！

（毛同黄作珍握手）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江青：好久不见了。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他们骂我们是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

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

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窠」。还有你这

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纁，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就没有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没有。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

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們，以后我們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很会出主意啊，是个谋士啊，是不是韩信的后代？

康生：听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康：不是你说得那样吧！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

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卿来（北大井冈山山头之一）。

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卿，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间给多长时间，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还不是……

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

江：她是老佛爷。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去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

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

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青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

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黄：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

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

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

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

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不要打内战。

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不是你说得那种情况！

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

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叶群：是伊林、涤西吧。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候汉卿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

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

毛：小孩子搞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说清华告急，黑手操纵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毛：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江西×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马克思搞哲学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造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普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一个拉萨尔，布朗基的所谓报告，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

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

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算我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

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作了检讨。

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失了街亭，打了败仗。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剩了个马。

叶群：那是失街亭。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蒯报告，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

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纓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

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

江：不要把我搞得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林彪同志刚才不是讲了嘛！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军校学来的？黄永胜同志学了一年半，温玉成学了三年还是幸运的。温玉成，你是长岗人，也就认得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槽里怎么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人大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聂元梓，以她的哥哥、妹妹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聂元素我不清楚，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妹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是悲观主义。

韩：一次总不能胜利，肯定有曲折，按辩证法。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聂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传达要点〕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 聂元梓清华大学 蒯大富北师大 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

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耐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给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 10 分 20 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治后面走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儿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

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不出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姚文元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

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读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 XX。”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 x x 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x x x 在南京军事学院，x x 学科，x x 学科，x x 学科都能考 5 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

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贵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 1966 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来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

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 63 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 40 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呜呜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

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 63 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 38 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 63 军，你就该做 38 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 38 军工作，你们欢迎 38 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 38 军，去一半 63 军，38 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 16 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 200 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 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今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么？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 88 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

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

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顿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驶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的检讨

首都革命工人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毛主席身边的首都工人阶级数万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清华宣传七·三布告和最新指示，帮助清华革命师生员工落实七·三布告和最新指示。首都工人阶级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对革命小将的无比关怀，来清华制止武斗，这完全是一种大好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

但是，我们清华井冈山的负责同志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极其错误的态度。并进行武斗，造成严重的伤亡。这完全是犯罪行为！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是对毛主席的最不忠！

在这里，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特别向首都工人阶级中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牺牲的几位工人同志的家属低头认罪，致以沉痛的哀悼和慰问。

清华大学发生长期武斗，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文化大革命正常秩序，损害了大量国家财产，引起首都工人阶级极大的愤慨。

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肩负着首都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落实主席思想，执行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封存武器，（保护我校革命师生员工）这是对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兵团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造成极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感到无比的痛心懊悔，实在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首都工人阶级，再一次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

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向首都工人阶级保证，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一定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一定不辜负首都工人阶级的期望和爱护，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无条件拆除一切工事，上交一切武器，将挑起武斗的少数坏人揪出来，条条落实七三布告，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永远做首都工人阶级的小学生，做劳动人民的一头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先作一个简单的，不深刻的检查，请工人同志严厉批评和帮助。

（原载《二七工人报》 1968 年 8 月 12 日 第二版）

八、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同学的讲话就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题谢副总理对清华井冈山同学的讲话

时间：1968 年 7 月 31 日

地点：北京航空学院

（口号）不要喊了，不要喊了！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我这个人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学得不算好，用也用得更不好，工作也就没做好。虽然我是北京市革委会的主任，北京市的许多事情，许多工作，我都没做好。就象大学工作我就没做好，有武斗，也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好。首先就是我要负责，首先就是我一个人的错误，没有好好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按照毛泽东思想，没有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把工作做好，没有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的指示，把工作做好，我应该向同志们检讨。（向谢副总理学习！向谢副总理致敬！）“向谢副总理学习”这个口号是完全错误的！清华的事情，我虽然来过好几次，我没有把工作做好，我也有错误，我向你们检讨，我做自我批评，工作没有做好。同志们，清华井冈山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

大革命初期，你们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坚决让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同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还有他们那些小爬虫王、关、戚作斗争，你们作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你们在同刘少奇这个叛徒作斗争过程中（口号）和他们这群人，和他的特务老婆王光美作斗争。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是有贡献的，你们是干的对的，（口号），你们这些，我们都赞成，都支持，一贯如此，但是你们最近也犯了一些错误，这个犯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怪我，（口号）错误、缺点啊，小将犯错误、缺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这一句话怎么讲的，昨天还讲了的，我一下子脑筋……昨天没有睡好觉，就忘了）讲了什么，……上帝是允许的（口号）我们这些人都经常犯错误嘛！你们犯错误算什么呢？但是不能天天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改正，现在你们犯了，你们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事情你们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啊，这个行动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它是完全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是完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来办事的，就讲这种行动，至于中间有个别人犯这样错误，那样错误，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代表它整个行动，它有三万人，那个不能代表，它的整个行动是符合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这个事情你们应该清楚的！蒯大富都知道，韩爱晶都知道！（口号）这个错误是不小啊！这个错误要是我犯啊！那要立即撤职，你们犯了不要紧，但是要改，不改不成的，不能够屡教不改，屡教不改不行哟！要赶快改，改了就给了你们主动权，要在宣传上行动上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支持他啊！向他们赔礼道歉，蒯大富就检讨了嘛！已经印了那个东西了嘛！我还跟他减弱了一点。检讨了嘛！但检讨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行动，行动是不是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不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是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是不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教导办事，是不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办事，按照江青同志指示办事，希望你们改正，赶快改正，虽然首都工人宣传队事先没跟你们商量，人多来了一点，现在他们制止武斗的任务已经基本完

成了，（又来照象了）那个缴武器的事情，也大部分都完成了，但是，他们可以减少一些，他们自己主动提出减少三分之二，这个事情跟你们领导小组谈了，主要看你们的行动，你们要赶快把清华的学生统统都叫到清华来，搞正常的四大，不要搞武斗嘛！你们这个好的行动，也可以影响全北京，也可以影响全国，你们如果继续犯错误啊！外面的影响你们可要考虑哟！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脱离学生的大多数，你们学校的二万多人，你们搞了半天打架，414 两百多，你们团派大概有几百？就那么多，什么一千多，你吹（笑），你吹，你吹，好就算一千吧，那你还算多少啊？你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了。也脱离你团派的大多数了。你团派有多少人啊？（一万）那你只有一千嘛，你其他大多数人都脱离了*（口旁加么）！你有没有考虑一个啊，你搞武斗，再脱离啊，人家会起来造你们的反的！会不会啊？……希望你们发扬你们光荣的成绩，发扬你们光荣的历史，克服缺点、错误，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犯了错误就改嘛！你们看，毛主席关于自我批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就是有个自我批评的作风。有没有啊？（有！）要有自我批评*（口旁加么）！你看列宁的“左派幼稚病”，那个语言翻得不对，那个“左派幼稚病”，那里面关于建党的指导的论点，那里面讲到自我批评，讲到纪律性，讲到一个政党的标志，你那个团派也算一个党噢，当然我是开玩笑罗！总算是一个组织，你们看一个政治派别，一个政党犯了错误，是什么标志，你们那个背得出来，那个背，我背不出来。一个政党，你们也不能算一个党罗！我是开玩笑！算一个团体，算不算？可不可以呢？一个群众团体，一个群众团体犯了错误的标志，你们去看一看。去念一念，错误你改了就行了嘛，你们千万不能跟工人对立，北京市有一百万工人，产业工人包括建筑工人七十万，你们千万不能脱离工人，你们要支持工人，不支持工人，你们这些大学生就吃不开。不能因为别的方面的斗争就脱离工人，这是不对的，不要把工人推向你们对立面。懂不懂这句话？（懂！）不要去欣赏那些帮倒忙的人。我去外边，我就看见大标语，在工人门口贴着：“坚决同清华井冈山风雨同舟！”那你和工人就不风雨同舟了嘛！这说不清楚嘛，懂不懂？（懂！）还有什么“坚决支持清华井冈山！”好就反对工人了。那边可能是好同志，好同学，但是帮倒忙。如果真正支持你们，就要帮助你们支持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工人宣传队。你们赶快要刷大标语，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大学来宣传毛泽东思

想，宣传最高指示，这才是爱护你们的。你们在校内刷，在全北京到处都刷大标语，然后还要有行动。这样，不管其它有千条道理万条道理，这是最重要的一条道理。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学校来，也算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我们不能违背。对我们伟大的领袖的教导，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对不对？（对！）完了！

（来源：1968年8月10日 湖北大学《新湖大》）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谢富治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晚九点十分至十点十分

地点：市革委会三楼会议室

参加接见的还有吴德、黄作珍、丁国钰、刘绍文、吴忠等同志。

谢副总理：刚才跟宣传队、蒯大富同志都谈了，很好，清华这两天有很大进步。大家都清楚，工人到有武斗的大专院校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一，这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教导、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指示，合乎广大人民愿望，也合乎大多数学生的愿望，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是对清华广大革命师生的最大关怀、爱护和帮助。这个行动可以很快促进清华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一直到教育革命。但有阻力，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有阶级敌人的阻力，也有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的阻力。阶级敌人利用这些阻止主席战略部署。但阻力总是阻不住的，主席指示的方向所向无敌。阻不住，来自社会上，清华的各种阻力也是阻不住的。林副主席讲：北大、清华落后了。但别怕，如果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很可能后来居上，宣传队要引导他们后来居上。不要怕那些阻力，主流总是主流，不要把阻力当成主流，排除障碍，沿着毛主席指出的航向前进，那就战无不胜。

现在有几件事，当着两方面说一说：

第一条：清华井冈山和 414 在言论上，行动上要支持宣传队，不得有任何障碍，妨害宣传毛泽东思想（包括广播台使用）。

第二条：清华两派立即停止互相攻击，要把矛头对准刘邓陶、蒋南翔，这一条要立即执行。

第三条：全面落实 7 月 30 日的“六条协议”，（念六条）很好嘛！

第四条：清华两派要主动接触，为革命大联合创造条件。两派首先无条件放回所有被抓的人，除 4 个外全放，今后不准任何人借口抓人，不管 414 的也好，什么人也不能抓，你还抓宣传队，抓就抓我好了。

第五条：清华两派确定联络地点，确定联络人员。这一条很好，是好事情嘛！

第六条：在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积极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第七条：是我加的两派都如此，接受宣传队的帮助和指导！你不要看不起人家老粗，工人、解放军。你们是大学生，毛主席就支持老粗。毛主席讲大学生要渗点沙子。我不懂，毛主席给我讲的：你大学生是一堆粘土，要加点沙子，渗点老粗，改善你那个团粒结构，就是要渗工人和解放军，我谢富治也是老粗，你又说我那七条，你压工人，你压我就反对。他们发誓不敢赶！你宣传队要体会他的困难，要帮他的正忙，什么七条、六条，就是一条，支持、欢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是有人反对宣传队就是犯法！

蒯大富：请宣传队帮助我们召回回家的同学和教职工。

谢副总理：后来者居上，一定要把清华办成针织总厂和新华印刷厂，但你们不要靠我们，靠宣传队，我今天讲了，以后就再也不见你们了，有什么事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人发个通知也行，你们（宣传队）不接近 414 也不行的！要两面作工作。414 群众是好的，头头大多数也是好的。要给 414 一个食堂，回去协商，枪要快交，原宣传队（指海军）回来后，还归你们管，他们是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们是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有些反对回来，他们回去商量一下。刚才我是给你们漏了底嘛！回到老路上来，那个协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一样，人数配备上差不多。对 414 还是要联合，要团结，要做工作嘛！他们那个 414 思潮必胜是错误的，但不要说 414 是老保组织，不要那么说嘛！你们（指宣传队）找到四项协议。反正你们听他们的帮助，指挥，他们让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宣传队：我们很希望能实现）这很有文章的，（对宣传队）你们要帮助他们。我们支持团派正确的一面，不支持他们的错误，支持他们的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听毛主席的话，不支持违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人和行动，你们（指宣传队）说人家蒯大富是两面派，人家不是两面派，下面有人反他。哪个赶记者，我是说过的，要抓，卫戍区要执行，记者是国家派的，这是什么国家，又不是刘少奇的国家，我前两天下了命令，赶记者就抓。

以后清华的事我不管了，我吃了饭就管清华？！

赶快搞成一派，后来居上，你们不要那么笨嘛！要借这个东风，不要受外面人干扰，敌人的挑拨，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干扰，蒯大富你这个人很容易动摇！你再把队伍拉走，我就再也不找你回来，越远越好，不回来我们在清华办工厂！

（来源：1968年8月10日 湖北大学《新湖大》）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定地走上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首次检阅了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从此，一个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磅礴于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放手发动亿万革命群众的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风起云涌般展开的红卫兵运动，是适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产生的革命青年运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烈地支持了红卫兵运动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粉碎了当时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毛主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在揭露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伟大斗争中，在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中，广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全国传播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使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闻风

丧胆。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红卫兵运动起了某种先导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革命的青年运动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早就作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结论。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

毛主席又着重指出：“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在这里，毛主席为青年运动指出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最仇恨剥削阶级，最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最懂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具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能够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最有力的批判，对那些反映剥削阶级利益、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最彻底的改革。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充分证明了，广大红卫兵只有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一支工农兵主力军相结合，才能有正确的前途，才能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因此，红卫兵和一切知识青年都必须拜工人阶级为师，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当前，学生同志们应当热烈欢迎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努力同工农兵打成一片。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工农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应受到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空前宽广的道路。广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要坚决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决心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工农兵一起，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的知识青年，要继续前进，要虚心向工人、农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要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种种轻视工农兵的资产阶级反动谬论。要象工农兵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青年，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们坚信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青年们，必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同广大的工农兵结合在一起，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的考验中逐步成熟起来，压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把埋葬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1968.08.25；中发〔68〕13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军分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

“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接到通知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并将你们的部署或计划电告中央。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先创造条件。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典型经验的报告，将另发供参考。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七集）》，北京：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引

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隐藏在幕

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小撮坏人，只有在工人、解放军的参预下，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发出来。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工人阶级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

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他们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长期工作下去，要永远占领学校和领导学校。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在文化教育单位，资产阶级有它的传统势力。在工人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时，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工人队伍包括其领导干部中的薄弱部分。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必须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或其它形式的手段对工人队伍的袭击。还要认真地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1)(2)）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1968.09.05；中发〔68〕138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发给你们，望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试行。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1968.09.01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总结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的经验，作了如下的规定：

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

二，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

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不要选调。

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般应以二十五岁至六十岁左右的有一定工龄的较老工人和少部份青年工人为宜。

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

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如需要配备少量革命干部，也不要出头，负责做些内部工作。

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七，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锻炼，不致长期脱离生产，宣传队员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轮换，但每次轮换的人数，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以免影响工作。

八，抽调工人的人数，应根据本厂的情况，很好地安排。整个说来，大体上占全市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体到一个厂可以伸缩，以不妨碍生产为准。

九，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必须采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典型试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笼统铺开。

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随时和定期总结工作的经验，发扬成绩和优点，克服缺点，以利团结大多数，揭露坏人。市革命委员会更要随时和定期召集各宣传队交流经验的会议，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关于政策的教育。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七集）》，北京：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1968.09.06；中发[68]140号

毛主席指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九月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遵照毛主席指示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文革：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包括十所艺术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日我们召集驻北大，清华，北航，地大，北工大，体育学院，人大宣传队的同志座谈了当前情况，恩来，江青同志也到会听了汇报。根据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经领导小组研究后，于八月三十一日召集五十九所大专院

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几个问题。

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深刻领会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精神实质，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要防止包办代替。学校日常工作仍由院校革委会去做，要求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警惕阶级敌人和别有用心的人，用烦琐的事务工作缠住宣传队。工人和解放军两个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充份发挥每个队员的作用。对重要问题的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防止坏人钻空子。加强请示报告，每个宣传队的指挥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掌握情况，及时向上反映。

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充份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中期的功绩，教育他们不要吃老本。对于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要急，不要压，不要无限上纲。宣传队要和同学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要善于抓活思想，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学习班要在班系，科室普遍举办。对头头和教职员，干部，可以分别集中学习，这样有利于做群众的工作。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绝不要一进校，情况还不了解，就找两派来谈大联合，这样做缺乏思想基础。对于群众组织，不提“倒旗”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确切，而且容易被坏人利用。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铲平山头实行革命大联合。在已成立革委会的院校，主要是帮助他们调整，充实，提高。要帮助他们用整风的方法总结经验，开展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克服宗派主义，改变作风，清除坏人，使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今后成立革委会要慎重，要防止搞小宗派，防止

坏人钻入革委会。对结合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要认真进行政治审查，选择那些真正的积极分子参加三结合。

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宣传队要组织专门的班子调查研究学校的情况，为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做好准备。

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绝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对于接管的档案，首先要清查人事档案，搞清各方面人员的政治情况。在清查档案和资料的时候，发现有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及时报告，绝不允许扩散。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卫戍区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普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已经并正在有领导、有步骤地到学校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不仅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必将加速我国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知识分子队伍的进程。

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正确掌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极其重要的编者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这个编者按，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意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编者按中提出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并且进一步指明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按照自

己的面貌来改造知识分子，建立起一支为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建立完全的统治地位所必需的。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到斗、批、改的阶段，解决这个课题的重大意义就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在人们面前。

编者按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不仅涉及学校，而且涉及我们文教战线及干部队伍中广大的知识分子。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进行再教育，要充分发扬积极因素。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什么路线培养什么样的人。应当把仇恨集中在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身上，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了青年。在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就可以推动人们更进一步地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多数或大多数从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能够逐步同工农兵结合的，其中必有动摇和反复，但只要他们能跟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批判并不断改变自己从家庭中、学校中带来的资产阶级旧思想，就能在为工农兵服务中作出贡献。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反革命分子、顽固派是有的，那是极少数。广大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改造、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广阔的前途。编者按指出：“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就是要从正面鼓励和促使广大知识分子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结合的

道路。结合得好并又有创造发明的，各地都有，应当用他们的榜样来教育已经或正要走上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途径。广大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巨大的锻炼和考验，痛切地感到了自己身上的革命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弱点，迫切地要求和工农兵结合，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进驻有关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这种积极性，支持他们和工农兵相结合，引导他们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斗、批、改。今后，在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但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应该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政策，要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指明出路，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采取这种政策，可以更有利于促进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交代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极少数民愤极大，需要打倒的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充分批判之后，也要给出路。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必须提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规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处理，对于思想问题，要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解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在广大的革命群众前头现出一片壮丽的图景。我们相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我国广大革命的和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上，一定会更快地前进。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1970.06.05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附件一：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1970.05.00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决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

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一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须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旧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三、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查阅有关国内外的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内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查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是是非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来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

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旧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加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

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

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

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

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

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切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锐敏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

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06.02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 * *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部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

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我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

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

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

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拚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半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

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〇”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〇”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〇”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〇”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

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〇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

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来源：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二、研究资料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戴维堤）

1967年4月14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414”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414”同时抛出了一份后来被陈伯达称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宣言书——“4

14思潮必胜”，其作者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414的理论家”的周泉纓。

当时有人向我报告说清华大学出了一张很厉害的大字报，我立即去清华园详细地看了周泉纓的大作。他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醒，只可惜我当时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纓的才华和文笔的同时，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一定要倒霉的人物，是一个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将来很可能成为曾国藩式的人物，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们一些人的手里。

所谓“414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414”思潮认为，像蒯大富之类的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派”，是一帮“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只能让他们帮着造反打江山，不能让他们坐江山。为了防止他们将来犯上作乱，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杀掉。这些观点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泉纓后来又因反陈伯达被关押了一年多，毛泽东知道后，下令把他释放了。

多年之后据周泉纓自己说，他当年拿蒯大富和陈伯达开刀，就是要将毛泽东的军，逼迫毛泽东“改弦更张”。

文革中的“4 1 4”思潮或观点，是一个非常深奥和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4。1 4”思潮和理论绝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从历史的实践看来，“4 1 4”思潮却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开始几乎都是“痞子”搞起来的。这些先天不足的“痞子”们打江山时绝对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胜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来，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甚至为了个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败告终。李自成、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看来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毛泽东刚开始革命造反时，不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骂为“土匪”、“痞子”吗？

笔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头头（包括本人在内）都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气。但是，什么人身上没有“痞子”气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们和忠厚老实、明哲保身、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和逍遥派吧？但是，若说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栋梁，笔者至死不敢苟同。（注：真正有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的所谓逍遥派除外。）

古今中外，历代皇帝和统治者都是“痞子”变化来的。当了皇帝的“痞子”对帮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割地封侯，委以重任，二是当替罪羊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痞子”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统统当替罪羊杀掉。可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最后还是上了“4.14”的当，重蹈了某些历代皇帝的覆辙。

历史无情地把周泉纓的预言变成了现实，“4.14”胜利了，“4.14”的遗老遗少们得到的是“顶戴花翎”，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之流一个个变成了阶下囚。这是后话。

当时，蒯大富等人对“4.14思潮”恨之入骨，同“4.14”造反兵团势不两立，两派整天互相攻击、对骂，不共戴天，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园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蒯大富的“井冈山”和“4.14”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清华大学的大联合一直无望，成立“革委会”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时间，联合似乎有望。周总理表示，只要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他一定出席祝贺。蒯大富十分高兴，请“林副主席”为清华革委会成立题词。林彪很聪明，他对清华大学革委会只字未题，他题的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

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林彪题字的“四个伟大”的由来。

蒯大富的命运本来应该不错，只要他同“4 1 4”联合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周总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华大学将是蒯大富的一统天下，象北航一样。可惜沈如槐、周泉缨等人早已看准了这步棋，故意搅乱了蒯大富的黄粱美梦。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清华大学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就不会发生武斗。没有武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解放军去“占领”。这样，蒯大富等人就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和历史起码要延长，甚至文革的历史要重写。这是鄙人一孔之见。可惜，这个本来可以出现的局面被“4 1 4”的好汉们击得粉碎。用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周泉缨的“4。1 4思潮必胜”大字报改写了中国文革的历史。

历史的悲剧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4 1 4”的当，把“4 1 4”和“地派”当成了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而大加讨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武斗。历史证明，头脑聪明但利令智昏的蒯大富等人不是“4 1 4”的对手。他们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在为“4。1 4”思潮验证真理：造反派就是只能造反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也！不能坐江山也无所谓，关键是差点丢了吃饭的家伙——脑袋，并且“连累”了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

1967年4月底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清华“414”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

清华“414”当时对北航红旗应该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知道我们和蒯大富关系不错，请我们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414”几个“议员”名额。

“414”的头头说得怪可怜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414”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414”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如出一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1968年的夏季，清华、北大的武斗达到了高潮。两派的头头们谁的话也不听，不进去，令所有的人非常头痛。谢富治曾带领我们北航的头头们去清华一次，想制止武斗，结果进不了封锁区，扫兴而归。中央文革、周总理也没有办法，直至后来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

打倒“四人帮”之后，蒯大富、聂元梓等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表演”和

“赫赫战功”，换来了 17 年的重刑。而作为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的对手“4

14”的头头沈如槐等人和支持者，有关方面认为他们仅仅是一般缺点错误，后来

大部分受到了重用。

笔者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也好，全国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是一个巴掌拍

不响。为了争权夺利也好，为了某种观点和信仰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不可能一个

是人见人爱的“林妹妹”，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

2004 年 4 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笔者拜读

了该书。之前笔者曾道听途说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尽释。令笔者吃

惊的是，事过 36 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沈如槐在书中仍

然对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

镜。

在书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414”的一把手，派人参与

过“揪刘火线”，围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

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

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园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

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些问题，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说，都是与蒯

大富差不多的“功劳”。如果历史地、宽宏大量地看待，应当都是“小将”犯错误

，都是一般缺点错误。但是，蒯大富可能因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

1

7年（注：陈伯达才18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414”这三个字的光，属

于“一般缺点错误”。清华大学党委和上级领导果真是清如水明如镜，令人感激之

至，鼻涕飘零。

笔者痛骂自己上大学走错了门，上错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发了“红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劳”比沈如槐老弟差远了，真正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

文革中本人不但没有炸毁高压线，而且夜间亲自站岗保卫过北航西边的高压电线杆

——那是为天安门和中南海送电的。但是，茫茫苍穹下，有阳光普照之处，必有淫

雨纷飞之地。后来北航党委“指挥”我厂党委给本人来了个属于“三种人”的“严

重政治错误”，由此毁了本人的一生，此为后话。

“死有余辜”的“蒯匪”没有被“414”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而是被“历史

老人们”送到监狱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报曾介绍过蒯大富的传奇故事，写他刑满

释放之后被山东蓬莱地区私企老板请去当了总工程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书将

以“独家新闻”继续介绍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点消息，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东风，蒯大富如今在深圳当个体户

，办公司，当老板，据说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史实与断语》（沈如槐·

十年来，唐少杰先生发表了许多关于清华文革的著作和文章，如《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二十一世纪》95年8月号）、《1968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前后》、《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二十一世纪》95年10月号）、《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2001年3月21日《南方周末》）等。唐少杰先生为研究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的问题。我作为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一派群众组织四一四的负责人，特作此文，与唐少杰先生商榷。

一、史实失真

1、1966年7月底至11月，清华大学处于相对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主席团”先后出掌学校局势，但这些被称为“三临”的清华红卫兵机构并没有得到广大学生的一致承认和拥护。（《一叶知秋》第6页）

清华大学的“三临”是指：

“临筹”即“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7月底工作组撤出清华之前，根据中央指示，工作组组长叶林提议，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

“临总”即“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8月1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其领导机构称为“临时总部”。

“临主”即“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9月16日，“临筹”主持召开校文革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由各系选举代表组成的“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校文革”临时主席团，不是“红卫兵”临时主席团。

严格说来，“临总”是“清华红卫兵机构”，而“临筹”与“临主”不能称为

“清华红卫兵机构”。“临筹”产生于7月底，早于“自控系红卫兵”（8月4日），更早于“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19日），它是根据《十六条》产生的文化革命领导机构，具有“官方”色彩。“临主”是“临筹”的继续，同样具有“官方”色彩。虽然“三临”的领导人都是以刘涛为首的一批人，但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

2、10月9日，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八红卫兵三个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一叶知秋》第36页）

12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红卫兵”等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叶知秋》第118页）

1966年10月9日，是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

1966年12月19日上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在清华大学有“八八红卫兵”的说法，那是对“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简称。66年8月份，清华大学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八八派”成立的红卫兵，人们把它称为“八八红卫兵”；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这是“八九派”成立的红卫兵，人们把它称为“八九红卫兵”。“八八红卫兵”后来分裂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12月19日的联合，就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两个总部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的联合。

3、随着兵团成立后各纵队势力的发展，由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纵队）与另外三大纵队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对文革的理解、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的清华评价方面，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干部政策。

……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

大多数干部自然纷纷转入在兵团内与井冈山纵队形成问鼎之势的相对温和的纵队之中。（《一叶知秋》第 7、8、9 页）

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唐伟为代表的纵队派。团派和纵队派都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蒯大富所依赖的嫡系部队是“28 团”和“31 团”，所以称为“团派”。唐伟在策划成立自己的组织时，他的同伴说“我们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是‘团’，我们是‘纵’”，遂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纵队”。后来形成了纵队派。此时已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井冈山红卫兵”，也没有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和“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的区别。

在团派和纵队派论战期间，即 1967 年 1 月至 3 月，两派的分歧“最重要、最直接”的并不是干部政策，而是“五个正确对待”，即以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能不能正确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战友、能不能正确对待运动初期受蒙蔽的群众、能不能正确对待广大的干部和教师。问题的实质是：象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和他的红卫兵政权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不是符合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根本目标。只是到了 3 月 31 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

调查)》之后，两派论战的焦点才集中到干部问题上。

4、5月12日和21日，谢富治来清华促使两派达成联合的四项协定，确定

了扩大为22人的革委会筹备小组名单。（《一叶知秋》第9页）

谢富治两次亲临清华，主持两派的调解，并达成了两派联合的协定。（《一

叶知秋》第123页）

1967年5月12日，谢富治和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了两派负

责人。

1967年5月21日下午，谢富治并没有亲临清华大学，而是在人民大会堂

主持两派协商并签署了四项协议。

5、四一四总部尽管在规模上小于团派总部，但它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在基层

单位共有12个部队（称01至12支队）和较完整的分部机构。四派的群众组织

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战团和以教工为主的三七战团，还有一个以干部为主的

干部辩论团。（《一叶知秋》第156页）

四一四的基层组织，无论是前期的四一四串联会，还是后来的四一四总部，从
来就没有以“部队”或“支队”命名过。四一四的基层组织大多数没有名称，只
有
个别单位自称为四一四某某支部或某某支队。

支撑四一四总部的柱石是四一四分部，“分部”是以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为基
础建立的。十一个系就有十一个四一四分部，这十一个系的四一四分部，是四一
四
的主体，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在这十一个系里。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二级行政单位都
有相应的四一四分部，如 2 0 0 号分部、基础课分部、行政处分部、研究生分部
等
等。

战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是跨越行政单位的具有相同观点的若干战斗组的集
合。四一四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分别代表四一四中的鹰派和鸽派。三七战
团
不是以教工为主，而是以学生为主。

四一四串联会成立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干部辩论团，但它并不是一个常设性组
织，而是为和团派就 1 5 0 名干部的《公开信》进行辩论而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
1 9 6 7 年 5 月 5 日两派进行过一次辩论之后，干部辩论团就不复存在了。

6、1 9 6 8 年初春，当时文革已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团派某一战
斗

小组贴出了“清华一切党权归团派”的大标语。团派还下令清华党员到团派总部登记。（《一叶知秋》第 172 页）

1968年初春，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而是处于“大联合、三结合”的阶段。就全国来说，截止1968年2月底，只有15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就北京高校来说，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大多数学校还没有实现大联合。所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才将北京主要高校的两派头头集中起来学习，要求我们“斗私批修”，早日实现大联合。当时我没听说过团派下令清华党员到兵团总部登记之事。

“整党建党”是1969年的事情。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一片红。”这就为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创造了基本条件。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才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

至于所谓“党员登记”，那又是1967年初春的事。当时确有战斗小组贴出过《论清华党权必须归井冈山》的大字报，广播台也广播过总部委员刘泉的《党员

登记倡议书》和《党员登记条例》。那个时候井冈山兵团还没有彻底分裂，没有什么“团派总部”之说。

7、（4月23日）清晨，四派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土建馆、汽车楼。（《一叶知秋》第14页）

（5月1日）团派攻占材力馆，次日又攻占土建馆。（《一叶知秋》第16页）

1968年4月23日，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的第一天，414只占领了旧电机馆，没有占领土建馆、汽车楼。

动农馆和科学馆一样，早就被414“占用”。因为动农馆是原414总部机关所在地，团派的人从来就不到那里去。

汽车楼是5月14日晚上7时左右占领的，同时占领的还有焊接馆。

整个百日武斗期间414从未占领过土建馆，团派攻占土建馆从何说起？

8、5月17日，四派占领了清华西主楼。团派占领了9003大楼，旨在控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四派攻打该大楼，未成功。（《一叶知秋》第18页）

414绝没有攻打过9003大楼。

9 0 0 3 大楼是精密仪器系的系馆，位于中央主楼的西南，离主楼较远，离东
东
门也不近。在使用长矛、砖头的所谓“冷兵器”阶段，9 0 0 3 大楼并不能控制
四
派通往东门的道路。即使到了使用枪炮的“热兵器”阶段，9 0 0 3 大楼也不能
控
制四派通往校外的道路，因为我们不经东门而从东主楼跨过围墙的缺口到校外。

5 月份，我们在研究建立 4 1 4 武斗根据地的方案时，曾有人提出占领 9 0
0
3 大楼。但精密仪器系的 4 1 4 负责人说，9 0 0 3 大楼里有大批的精密仪器，
还
有全国高校唯一的恒温实验室，如果因为我们占领而遭到损坏，我们负不起责任。
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占领 9 0 0 3 大楼，任由团派占领。由此可见，4 1 4 断无攻
打
9 0 0 3 大楼的理由。

9、5 月 3 0 日。3 时，团派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的 2 0 0 多人队伍轮番
进
攻，东区浴室内的四派守军拼命抵抗。

4 时 3 0 分许，主楼区的四派 1 0 0 多人前去增援，与团派阻击队伍在东大
操
场西边路上相遇。

5 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 6 0 余人冲锋增援。

9 时许，团派队伍从北、西两边攀梯进攻，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
双

方展开拼杀。

在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之际，四派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纠集大批人员，攻打团派占据的第一教室楼。……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

1 3 时许，团派燃起的大火以及经过喊话劝降，最终使浴室守军打着白旗下楼

。（《一叶知秋》第 1 9——2 0 页）

1 9 6 8 年 5 月 3 0 日，既然团派 3 点多钟就开始轮番进攻，为什么直到 9 点钟才从北、西两边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进攻？这中间 5 个多小时他们在干什么？团派又是如何“轮番进攻”的？

事实是，团派发动进攻不久就占领了东区浴室的一楼，但是，他们无法攻上二楼。因为 4 1 4 在二楼楼梯焊了一道坚固的铁门，决心固守二楼（东区浴室只有两层）。要占领整个东区浴室必须首先占领屋顶，这是常识。因此团派很早就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了进攻，企图占领屋顶。

四派守军大部在二楼休息待命，只派几人通宵在浴室屋顶戒备，发现团派进攻，主力自然到屋顶迎敌。所谓“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不符合事实。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我们确信他们攻不下东区浴室，因此并没有马

上采取救援行动，而是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支队伍包围第一教室楼，
实
施佯攻。四一四除了投掷砖头、瓦片、燃烧瓶之外，并没有攻入“一教”的行动。
所谓“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也不符合事实。

“围魏救赵”不成之后，我们就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我们担心在主
楼
通往东区浴室的路上遭到团派伏击，因而绕了一个大弯子，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
北
角的高压实验室，在那里建立了基地，然后才开始行动。这个时候大概是 8 时左
右
。

开始与团派交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出动土坦克。后来因为伤亡太大，连总
指
挥都受重伤离开战场了，我们才出动土坦克。土坦克的指挥员告诉我，出动土坦
克
时间最早也在 10 时以后。

所谓“4 时 30 分许，主楼区的四派 100 多人去东区浴室增援”，“5 时
后
，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 60 余人冲锋增援”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最后东区浴室的守军投降了，但不是因为大火，也不是因为劝降，而是因为
一
名 414 战士被团派长矛刺中，出现气胸，有生命危险，东区浴室指挥官与团派
代
表谈判，团派同意派车将 414 伤员送医院救治，414 守军才放弃东区浴室。

10、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27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讲“条件”，不愿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让工宣队离开，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员“陪行”，于13时40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为借口，迟迟于16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但看到工宣队冒险把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9003大楼的团派据点。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突的问题。（《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414真诚地欢迎工宣队，积极地配合工宣队。而唐少杰先生偏偏忽略了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我所亲历的事实是：

第一，7月27日上午9时左右，工宣队刚刚抵达西主楼的过街楼，我就主动指挥414人员迅速搬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及其他据点，并在西主楼与工宣队进行谈判；

第二，在工宣队进入主楼的同时，我们已经命令414的武斗人员交出武器，当时确实布置藏匿了部分武器，但在下午2、3点左右被围困在科学馆的414人员获救之后，就全部上缴了；

第三，我和工宣队的领导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就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10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队对此深感满意；

第四，工宣队进入414的所有据点，受到414方面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拆除工事和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

第五，在工宣队和团派冲突期间，414组织人员给工宣队送饭送水，协助工宣队救治被团派打伤的伤员，工宣队将414视为可靠的盟友。

414欢迎工宣队、配合工宣队，是真心的、自觉的。因为我们几个月来一直都在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现在工宣队来了，我们岂有不欢迎之理？

请听毛主席 7 月 28 日是怎么说的吧：

“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做？你们很被动

，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

“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

“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再请听谢富治 8 月 2 日是怎么说的吧：

“现在工人都说 4 1 4 好，团派不好。因为他们 4 1 4 没打工人，缴枪快，没抓工农宣传队的黑手。”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是为了向人们说明：团派和 4 1 4 在 1968 年 7 月 27 日那一天截然不同的表现实在是“出人意料”，出乎工宣队的组织者指挥者之所料，出乎中央文革之所料，特别是大大出乎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料。正是这个“出人意料”才使得工宣队对清华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有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并在毛主席认为 4 1 4 是“右倾保守组织”的情况下，改变了毛主席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并最终促使毛主席抛弃蒯大富、抛弃五大领袖。这是解

读清华文化革命 7.27 之后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也是解读红卫兵运动终结的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

二、断语无据

1、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进行了十个月，由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为中坚的群众组织——“四派”的成立和运行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并没有“瓦解”。（《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回首文革》第 794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进行了十个月，由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为骨干的群众组织——四派的诞生，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并没有真正“瓦解”。（《一叶知秋》第 149 页）

在《新华词典》中，“中坚”一词的解释是：古代军队中主帅所在、力量最强的部分，后泛指最坚强、并起主要作用的力量。“骨干”一词的解释是：比喻起支柱作用的人或事物。

毋庸置疑，人们应该高度评价清华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以及在 414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把干部称为 414 的中坚或骨干力量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在 414 诞生之际，从秘密策划，到公开串联，从大造舆论，到建立组织，

全部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所为，干部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在 4 1 4 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清华 5 0 0 多名干部中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参加了 4 1 4，但这只占 4 1 4 全部 7 0 0 0 人的百分之五。他们只有极少数代表进入了 4 1 4 的各级领导机构，但都不是主要负责人。学生，只有学生才是 4 1 4 的中坚或骨干力量。事实上，清华中、基层干部的大多数分布在各系、各单位，他们从来没有作为 4 1 4 中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或政治力量单独存在。

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大学的党政干部是依靠从党委到支部、从校部到教研组的各级党政机构发挥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政机构都已瘫痪，党政干部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都已不复存在。清华的干部队伍，上无统一的领导，下无可领导之人，作为一支队伍，应该说没有任何战斗力了。况且，在 4 1 4 成立的时候，这支队伍也分裂为两派。这样的干部队伍难道还不算“瓦解”了？

2、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不但自觉、主动地甚至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与团派对立的四派亦即保守的、温和的造反派一边，而且还逐渐地制约甚至支配了这类造反派。（《一叶知秋》第 1 4 4 页）

作为“文革”初期正宗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当然不会认可昔日干部权威的再现，大多数干部转入与之对立的相对温和或保守的群众派别之中，并逐渐主导了“四派”的决策和运行。（《1968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前后》）

文化革命中清华大学原中、基层干部是怎样“逐渐地制约甚至支配了”四派的呢？唐少杰先生“仅举清华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的事例为证”。他说：

罗征启对于文革打击、迫害干部的一些做法深为不满。他站到了四派一边，很快成为四派干部队伍及干部参谋小组的一个关键人物。

罗征启为四派所保护和利用包括清华原校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许多干部，积极出谋划策，并对四派总部的若干工作制度提出过很多有效的建议。

尤为显著的是，1967年4月23日，罗征启贴出了《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的大字报，讲出了许多原清华干部的心里话。（《一叶知秋》第144页）

多么苍白无力的例证！我们认为，“制约”、“支配”、“主导”这样的词汇应该与414的重大事件或行为联系在一起。

那么什么是414的重大事件或行为呢？

我们认为，从 1967 年 4 月 14 日成立，到 1968 年 8 月 15 日解散，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清华 4 1 4 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做了如下六件大事：

(1)与蒯大富决裂：坚持不懈地批判蒯大富的错误，与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决裂，建立了一个政治纲领明确、组织机构严密的群众组织，打破了蒯大富的一统天下，冒着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阻止蒯大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使其红卫兵专政始终没有披上合法政权的外衣，从而减轻了极“左”派的危害；

(2)大力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促进三结合，这是 4 1 4 的政治纲领。4 1 4 为领导干部取代红卫兵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而大造舆论，在清华为保护和解放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把谭浩强（团委副书记）、罗征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应中（党委常委）、刘冰（党委副书记）四位干部作为典型对象，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解放干部的运动；但是也错误地批斗了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教师；

(3)坚持反对极“左”：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这是 4 1 4 的理论旗帜。4 1 4 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反对打倒一切干部，反对冲击军队；但也犯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和个别人在个别地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

(4) 创立四派思潮：与团派就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清华即党和政权的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刻而又广泛的论战，形成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并在清华坚持实践“四一四思潮”；

(5) 反对中央文革：坚决而又讲究策略地反对和抵制中央文革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与谢富治、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6) 开展武装自卫：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与团派极端分子进行了“百日大武斗”，阻止了蒯大富消灭反对派的图谋，最终与团派同归于尽，并导致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在武斗中犯了炸高压电线杆的错误。

请问，清华的中、基层干部是怎样“制约”、“支配”4 1 4，并“主导”了

4 1 4 上述六件大事的“决策和运行”的呢？

文化大革命时代是群众运动的时代，是政治运作极其公开和透明的时代。清华大学的几个干部身居幕后，怎么能“制约”、“支配”并“主导”拥有 7 0 0 0 人的一派群众组织，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进行长期的斗争？而作为这个

组织的领导者，一群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的热血青年，又怎

么会任人摆布、甘当阿斗？

3、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

观点，并且在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时，给该文提供了许多来自马

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罗征启所整理出的四派观点以及四

一四思潮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这些观点主要内容如

下：

一、“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二、“清华干部黑一点红一大片论”

；三、“文化大革命翻船论”；四、“干部层层检查、人人过关就是犯罪论”；

五

、“文革对象为两小撮论”；六、“全国造反派分化为两大派论”；七、“两派斗

争带来不同的思潮论”。（《一叶知秋》第 1 4 5 页）

罗征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

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唐少杰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根据，我作为 4 1 4 的领导人

也从不知晓。

我在拙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中将 4 1 4 的主要观点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

1、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2、文化革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论”、“收尾论”、“转舵论”、“两小撮论”；3、

针

对干部的“平黑论”；4、针对群众的“平保论”；5、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

论”；6、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7、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8、反对冲击军队；9、反对极“左”思潮；10、“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我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

也许罗征启在文革中的确提出过许多观点，可惜我们知之甚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唐少杰先生“整理出的”七大观点。我认为，这“七大观点”并不等同于四一四思潮。这“七大观点”与四一四思潮比起来，既不系统、也不深刻，它与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相距甚远，说它“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恐怕有些离谱了。

在文革中，对414影响至深至大的只有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四一四思潮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红线主导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67年2月22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社论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67年4月6日，周总理接见经委计委建委各派代表，在谈到清华问题时讲：

“十几年来，主流还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一串红线。毛主席路线是主导的。”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清华的“红线主导论”。

四一四思潮不是某个人的发明创造，更不是某个人总结和归纳出来的。

四一四思潮是 4 1 4 群众在与团派长期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与极“左”思潮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学生、干部和教职员工在内的广大 4 1 4 群众在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创造。

4、在这次召见中（指 1 9 6 8 年 7 月 2 8 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毛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1 9 6 7 年 4 月至 1 9 6 8 年 7 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同归，自行消解。（《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且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这次没有找你们的对立面来，你们回去讲一讲，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和清华 4 1 4 就会对我有意见。”

“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清华 4 1 4 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

“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跨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

毛主席的这些“印象和评价”难道还不算“明确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中的任何一派”？

而根据 7. 2 8 讲话，我们又有理由推断：毛主席早就明确支持蒯大富，反对 4 1 4。至少在张春桥 1 9 6 7 年 1 2 月 1 0 日公开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后，毛主席的态度就很明确了。只是缘于 7. 2 7 团派和四一四截然不同的表现，毛主席对蒯大富大失所望，这才忍痛割爱，走马换将，用工宣队代替五大领袖，亲自掌控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5、正是由于百日大武斗等全国著名的武斗事件所带来的文革形势在 1 9 6 8 年最后五个月的变化，使毛泽东及其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着手部署在全国范围或者是在清华大学里批判“四一四思潮”。这说明了，毛泽东在口头上、在思想上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批评甚至否定文革的倾向，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斥责和批判作为文革初期正统主力军的造反派，但是在行动中或实践中，毛泽东开始

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甚至颇为令人惊异地实行的或应用的

正是“四一四思潮”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一叶知秋》第 2 4 3 页）

对于毛主席没有部署批判四一四思潮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种种推测。

也许，毛主席认为他已经严厉批判了四一四思潮，并将四一四思潮定性为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何须旁人多说。

也许，毛主席认为四一四思潮不过是清华园内小小反对派的思潮，对全国形势

没有什么影响，不必为此大动干戈，留着做个反面教材算了。

也许，毛主席认为他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把文化大革

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消弭造反派和工宣队之间血腥对峙的问题，此时此刻，大张

旗鼓地动员群众去批判四一四思潮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毛主席没有部署批判四一四思潮的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他在行动中或实

践中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四一四思潮。

从逻辑推理上看，既然毛主席认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

老人家就不可能“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否定文化大革

命的思潮。

我们再看看事实。

工宣队执掌清华大权以后，清华成为毛主席亲自抓的典型，他老人家用迟群代

替蒯大富继续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迟群所总结的清华经验，经他老人家批

示后流毒全国，不仅给清华也给全国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尤为严重的是，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否定了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两个估计”，一是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彻头彻尾的“黑线主导论”，与四一四思潮的“红线主导论”针锋相对，格格不入！

毛主席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重大贡献，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毛主席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让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不愿意违心地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毛主席下决心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再次将邓小平打倒。

由此可见，毛主席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也绝对不会“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唐少杰先生的著作中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的例子恕不一一列举。

平心而论，一个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人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

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只要他不存心歪曲史实，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我们当事人坐

在一起回忆历史事件时，也时而出现互相矛盾、张冠李戴的情况，我自己写的书也

有不少错误，何况局外之人？

可是，唐少杰先生没有注意到自己著作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疏漏，却批评别人关

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记述不是“通篇错误，不堪卒读”，就是“谬误多处，令

人好笑”；不是“有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数字等方面的错误”，就是“没有什

么学术价值”。勉强有他看得上的，又与他的记述“在文字上如出一辙”。（《一叶知秋》第 14——15 页脚注）

唐少杰先生在清华工作，阅读了清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大量文革资料，采访过

许多文革当事人，为研究清华的文革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自以为

已经“啃”下了清华文革这块“硬核”，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以权威的口吻评论他人

，这就有失学者风度了。唐少杰先生毕竟没有亲身参加过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并不复杂的历史，即使要捋清它的“皮毛”，也需要付出

极大的心血，遑论“硬核”？而面对各执一词的两派小报，面对众说纷纭的采访笔

录，乃至面对白纸黑字的档案资料，也还有许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要

做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沈如槐·陈楚三）

时光荏苒，清华大学四一四和四一四思潮诞生整整四十周年了。作为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四一四的领导人，我们借此机会对四一四思潮进行简单的回忆与思考。

四一四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清华大学两派的三次大论战密切相关。

◇ 纵队派与团派的大论战孕育了四一四思潮

1966年底的北京，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呐喊中，中央文革呼风唤雨，造反派四面出击，老干部纷纷落马，保守派溃不成军。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中央文革是否执行了“左”的路线？

1967年初，上海“一月革命”后，中央认为在红卫兵队伍中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提出了红卫兵的整风运动。又有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造反派究竟是不是代表文化革命的大方向？能不能实现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

这些反思其实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反思，而这些反思在清华进行得尤其深刻，因为清华文革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干预，清华发生的许多事件也对整个运动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正是这些对文化革命的反思才产生了四一四思潮，而四一四思潮的发展又促进了对文化革命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

清华的反思主要体现在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三个多月的论战中。

1967年元月至3月，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五个正确对

待”问题上，即红卫兵小将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具有不同意见的战友、如何正确对待保守派群众、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教师。论战的核心问题是红卫兵小将自己是否需要改造或提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抑或昙花一现？

可以说“五个正确对待”是四一四思潮的胚胎。

◇ 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一次大论战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随着夺权斗争的深入，毛主席否定了“上海公社”，提出了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的方针，干部问题开始成为文化革命的焦点之一。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提出了所谓“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另一方面，呼唤更多的干部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

《红旗》杂志的文章遭到了团派的激烈反对。纵队派以此为契机，接过了“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旗帜，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并引发了四一四与团派长达半年的第一次大论战。正是这次大论战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这次大论战是围绕干部问题而展开的，四一四的主要观点如“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转舵论”、“收尾论”、“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让贤论”、“勇敢分子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人们把四一四的这些观点统称为四一四思潮。不过，在这个时期，四一四广大群众对四一四思潮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对其中某些观点还颇有争议。

◇ 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二次大论战发展了四一四思潮

江青 67 年 11 月 12 日关于“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讲话、团派的“大翻个儿论”和“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引发了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二次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文化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如何认识建国十七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文化革命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彻底砸烂”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过去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这次论战主题更为集中，四一四广大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一致、更加深刻。此时，可以说四一四思潮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 四一四思潮的内涵与核心

四一四与团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尽管观点层出不穷，花样不断更新，但归根到底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十七年”，即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一个是

“文化大革命”，即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四一四的大多数政

治观点就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的。

◇ 关于十七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

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红线主导论”）。

十七年来中国还没有形成特权阶层，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国的阶

级关系没有发生像苏联那样的变化（“阶级关系不变论”）。

◇ 关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无产

阶级专政，不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大翻个儿”，不是“彻底砸烂”，而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部分改善论”）。

文化大革命已经揪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应该无休止地揪下去，而是应

该转舵了、收尾了（“转舵论”、“收尾论”）。

文化大革命应该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一小撮（“两小撮论

”）。

针对干部的“平黑论”；

针对群众的“平保论”；

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

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

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取代造反派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反对冲击军队；

反对极“左”思潮；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

四一四思潮的矛头所向就是极“左”思潮，坚决反对极“左”思潮是四一四思潮最鲜明、最独特的理论旗帜。

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是“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四一四思潮中所有其他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两个观点之上的，都是从这两个观点派生出来的。“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红线主导论”是前提，“部分改善论”是结论。四一四思潮核心观点的完整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只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最初并不是四一四提出的观点。我们当时的看法是，团派中的极端分子是一些勇敢分子，在文革初期，他们冲锋陷阵，夺权以后，他们头脑膨胀，极“左”思潮泛滥，成为各地乱局的根源，必须用铁的手腕将他们捏得粉碎，稳固政权只能依靠我们四一四。我们把这个观点称之为“勇敢分子论”。张春桥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时，将它定性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7。28讲话中毛主席又随意发挥，把“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

坐天下”改成“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对于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主席经常进行这样的“随意发挥”。

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哪一个“天下”是造反派“打”下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派便不能夺取任何一个单位的权力。造反派的“天下”都是毛主席“恩赐”的。毛主席本想让这些造反派坐天下，可惜他们的表现差强人意。毛主席说他们没有能力单独地管理国家，单独地管理城市，连学校也不能单独地管理。毛主席还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毛主席的这些话，其实这就是说造反派不能坐“天下”。

◇ 四一四思潮的实质

团派的同志早在文革中就尖锐地指出：四一四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做了结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于这个结论，文革中我们是极力否认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结论。

“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部分改善论”，否定了全国各地、各部委的全面夺权。

“转舵论”、“收尾论”，干脆就是叫停文化大革命。

而从“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到关于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让贤论”，从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无一不是对文革中一系列做法的实际否定。

我们过去极力否认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因为：

在思想认识上，我们认为文革是非常必要的，是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文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揪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二是广大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干群关系将会得到很大改善，三是，全民进行了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

在内心深处，我们真心崇拜毛主席，真心拥护文革，因此，我们积极参加文革，想经风雨、见世面，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实际行动上，我们拥护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不遗余力地批判“封、资、修”。

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造反派，而是反对那些变了质的造反派。对于那些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造反派，我们钦佩有加。

我们也曾一度被假象所迷惑，极力推崇“上海模式”：革命左派与老干部相结合，执行了温和的政策，使上海的形势特别稳定。

我们只是认为，打倒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群众觉悟得到了空前提高，文革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文革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大乱之后应该转向大治。我们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有不满，有怀疑，我们看出了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但还远远谈不上反对。

◇ 四一四思潮的特点

四一四思潮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开放性、群众性和实践性。

1、开放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思潮。从内容上说，
四

一四思潮是四一四各种政治观点的集成。从时间上说，四一四思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逐渐形成的，是在对文化革命的反思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2、群众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出自某个理论家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出自某个教师爷的归纳总结。四一四思潮是一种群众性的思潮，四一四大部分观点都出自四一四中不同的战斗组和不同的个人。

四一四思潮是四一四群众在与团派长期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与极“左”思潮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学生、干部和教职员工在内的广大四一四群众在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创造。

3、实践性

四一四思潮不仅仅是一种思潮，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实践，是在清华文革中有几千人参加的、历时一年之久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实践。四一四坚持不懈地将自己的每个观点都付诸实践。这种政治实践是血淋淋的实践，不少四一四群众在这种政治实践中付出了自己的鲜血，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 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础

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是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础。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错
误理论。这个理论一方面强调我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另
一方面又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曾
经
指出，清华之所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形成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主要
是
对这一悖论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四一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
提
下进行的革命，必须实现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
你
破坏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极“左”。团派认为：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
论
的精髓就是继续革命，而且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必
须
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如果你反对这一原则，你就是反对
文
化大革命，你就是极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团派与四一四斗争的实质是极“左”思潮与反对极
“左”
思潮的斗争。

既然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么团派与四一四斗争的实质为
什么不是坚持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呢？

这是因为：对于四一四的主流而言，当年，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没有
那么高的理论水平，更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勇气去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
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四一四并没有创造出什么高明的理论，四一四思潮所表达的观点绝大多数是当
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以及《文汇报》所公开提倡和宣传的观点，很多精
神都出自中央甚至毛泽东主席本人。四一四的创造性就在于：我们从铺天盖地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宣传中“挑出”了这些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和政
治主张，并在清华大学坚持和实践这些政治主张。我们认为这些观点真正体现了我
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就是因
为四一四凝聚了一批善良的平民百姓，坚持自己的信念，敢于用毛泽东思想去自觉
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四一四思潮的理论旗帜是反对极“左”思潮，四一四观点的主要形态是反对极
“左”思潮。从四一四成立之初，到武斗前夕，四一四一直高举反“左”的旗帜。

初期反对形“左”实右，后来反对极“左”，四一四反“左”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四一四思潮代表了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反映了人民群众结束政治动荡、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愿望。这就是四一四思潮的根基。

◇ 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以“左”反“左”是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四一四反对极“左”，是以“左”反“左”，或者说是以小“左”反对大“左”。这是因为四一四所坚持或主张的许多东西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产物，四一四的不少实践活动也是受“左”倾错误影响的。

从实际行动上看，在校内，四一四批斗“走资派”，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右派分子，甚至批斗持不同观点的普通教师；在社会上，四一四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喊“打倒刘邓”；还有少数四一四群众参与了几大极“左”事件。

从政治观点上看，四一四思潮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左”的东西。从“红线主导

论”到“阶级关系不变论”，从“两小撮论”，到“十七年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等等，都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的反映。

在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红线主导论”中，我们全盘肯定建国十七年后毛主席领导的所有运动，如反右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四清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大论战等。实际上，解放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客观规律没有充分的研究和正确的认识。这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过是毛主席左倾思想指导下的盲动。这些运动伤害了党，伤害了干部，伤害了知识分子，伤害了人民群众，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通过这些运动，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不断发展，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文化大革命正是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我们全盘肯定这些运动，就是接受了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

文革前我们受到了正规的传统教育，但是在传统教育中也包含了很多“左”的东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修防修”已经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牢牢扎根。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政治语言都已打上了深深的“左”的烙印。

因此，四一四思潮虽然对文革有所反思，但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无法上升到共产党必须纠正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共和国必须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党和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

我们之所以纪念四一四思潮，是因为我们“有幸”参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我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我们也给历史留下了经验和教训。我们——文革时期的年青一代——包括团派和四派，既非神仙圣贤，亦非妖魔鬼怪。我们思考过，我们奋斗过，我们无怨无悔。

二零零七年四月

《政治高压之下的“四一四”——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沈如槐）

（本文作者为文革中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来与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主要负责人——编者）

~{1967年5月12日，谢富治、丁国钰、周景芳到清华大学接见两派负责人~}

~{，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我们，四一四核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接~}

~{见。在单独接见四一四时，我们向他们汇报四一四的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谢~}

~{富治根本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批评四一四说：“四一四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

~{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

~{“不对。”谢富治指责四一四把矛头指向蒯大富，指向群众。我们自然要争辩，可谢~}

~{富治不愿意听。我这个人人生性刚强，宁折不弯，看到谢富治这样对待四一四，很不~}

~{服气，大声地与他进行争辩。谢富治对我极为不满，他指着我说：“你只能当闯将~}

~{，不能当统帅。”~}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四一四要支持总部，首先要大联~}

~{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

~{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

~{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谢富治离开清华后，有人散布消息说：谢富治单独接见团派时要蒯大富高姿态~}

~{，不要讲四一四是保守势力，什么地方都有左中右，，革命委员会也有左中右，让~}

~{四一四一些人进革筹小组。团派造出的舆论是：谢富治要让四一四作为保守势力和~}

~{右派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而蒯大富还对此不满，认为谢富治对四一四太软，让步太~}

~{大，不应该同意四一四代表参加革筹小组。~}

~{从三纵队与蒯大富论战以来到四一四成立近一个月，第一次有中央领导专门来~}

~{清华处理两派问题。而这第一次就否定了四一四的大方向，这对四一四来说无异于~}

~{当头一棒！在四一四的核心组会上，我们仔细研究了谢富治的讲话和态度，认为他~}

~{是蒯大富搬来的救兵，偏听偏信，有意打击四一四，为蒯大富撑腰；他不听四一四~}

~{的申辩，轻易否定一个群众组织的大方向，是不妥的。在下午召开的四一四战斗组~}

~{组长会议上我们如实传达了谢富治接见时的讲话。当时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

~{不了解清华的情况，曾想组织部分四一四战士去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由于群众对中~}

~{央文革心存畏惧，未果。很自然，四一四中充满了对谢富治的不满情绪。~}

~{5月13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清华四一四头头~}

~{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四一四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锐：~}

~{“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

~{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蒯大富把谢富治的讲话公开传达后，团派兴高采烈，在各种场合利用谢富治的~}

~{讲话压四一四，特别是5月15晚团派召开的“促进革命派大联合”大会，对四一~}

~{四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攻击，甚至扬言要对四一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连当时颇~}

~{有影响的中间派“五七串联会”都看不过去，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央文革和谢富治对四一四采取的是不屑一顾、简单否定的态~}

~{度、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形势；四一四想坚持真理，就要进行长期、艰苦、曲折的~}

~{斗争。我们认为谢富治来清华并没有耐心听取四一四的意见，他的“处理意见”是~}

~{不符合清华的实际情况的，也是不利于清华大联合、三结合的。他到清华劳而无功~}

~{，现在又想用总理和中央文革来压服四一四。我们没有屈服，继续坚持“四一四~}

~{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硬顶谢富治的批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硬顶会造成什么后果~}

~{，为了表示四一四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在纪念四一四成立一周月的大会决议中我~}

~{们引用了这样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段语录后~}

~{来被四一四战士谱了曲，变成了《四一四战歌》，成为鼓舞四一四与团派斗争的有~}

~{力武器，并导致陈楚三的牢狱之灾和四一四的“倒谢运动”。~}

~{谢富治来清华的目的是压四一四承认和服从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领导，无论谢~}

~{富治和蒯大富怎样软硬兼施，我们就是不买这个帐，坚持反对革筹小组。我们确信~}

~{，我们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

~{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

~{现，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

~{◇ 四项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5月21日谢富治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两派负责人，四一四方~}

~{面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我、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等六人。~}

~{这次接见，谢富治总的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批评四一四大方向的原则下~}

~{，和稀泥，搞三结合。”他还说：“我跟中央文革、周总理讲了，他们同意我的处~}

~{虚理意见。”~}

~{谢富治不仅继续否定四一四的大方向，而且全面否定四一四的所谓“小道理”~}

~{。~}

~{谈到四一四批评蒯大富的错误时，谢富治对我们说：“听说四一四要把总部打~}

~{倒，你们是不是想让蒋南翔回来？”“不存在推翻蒯大富的问题，可现在你们就这~}

~{样做了。”~}

~{谈到“蒯氏阶级路线”时，谢富治说：“是不是让蒋南翔回来，就什么事情都~}

~{没有了？‘蒯氏阶级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有那么严重？这么说罗征启比蒯大~}

~{富还好了！”“罗征启是什么人？你们是要彭真出来，蒋南翔出来，刘、胡、何、~}

~{艾出来吗？”~}

~{谈到干部问题时，谢富治说：“我们现在强调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等~}

~{于过去批判错了。批判错了只是一个半个。这里有条，一条是毛主席对干部的大~}

~{政策、第二条是干部自己原来站错了。就是有过火，责任也在一小撮。否则就是翻~}

~{案，大方向完全错了。讲平保平黑，那是完全错了。”谈到“两小撮”时，谢富治~}

~{说：“只有一小撮，没有两小撮。”他警告参加接见的干部：“你们干部站出来要~}

~{为大联合做贡献，不要只为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就是继续~}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疾言厉色地对四一四代表说：“你们表面听中央文革的话，实际上不是的，~}

~{将来要走向反面的。”他还说：“你们要不听话，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管了，~}

~{让蒋南翔来管。”“你们再搞个总部，再搞个四一四学校？一条是一个总部、一个~}

~{学校，第二条是让蒯大富下台。这第二条路走不通。”总而言之，谢富治采取高压~}

~{政策，想一举制服四一四。谢富治之所以这样起劲地支持蒯大富，反对蒋南翔是因~}

~{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打倒了彭真，谢富治取~}

~{而代之，清华打倒了蒋南翔，蒯大富取而代之。~}

~{在对四一四一顿棒杀之后，谢富治主持两派协商谈判。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协~}

~{商谈判，我们只不过将谢富治讲的几条原则变成文字而已。谢富治的几条原则是：~}

~{一，停止互相攻击；二，统一领导，不准扶植山头的权威；三，大联合就不允许对~}

~{立面存在；四，革筹小组成立后四一四就解散，革筹小组实际上是有权力的。~}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 “四项协议”，全文如下：~}

~{一、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

~{。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 “内战”打~}

~{社会上去。~}

~{二、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

~{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三、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四、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这无疑意味着把四一四的生杀大权交给~}

~{团派。谈判时我方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它来压四一四，谢富治说：“~}

~{协议还没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王良生说：“现在~}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 2 8 团，2 8 团不改变态度四一四不放心。”谢富治说：“那不~}

~{见得，你们要整风。”~}

~{这时我想起 1 9 6 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

~{发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在八届十~}

~{一中全会后《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新发表文章时改为“……我们无条件接受的~}

~{，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话：“对于一切危害革命~}

~{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于是，我坚决要求取消第四~}

~{条，我说：“正确的决议才能执行，错误的决议必须坚决抵制，否则就是奴隶主义~}

~{” 。~}

~{谢富治说：“奴隶主义是有阶级性的，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要统统执行，现在~}

~{无政府主义可厉害了。”我仍不服，要求对第四条进行修改，提出在“决议”前加~}

~{“正确”二字，即把协议的第四条改为“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正确决~}

~{议必须执行。”~}

~{谢富治强硬地说：“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决不退让。”当他们煽动造反派向~}

~{我们党夺权时，他们鼓吹抵制错误领导，而当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政权时，却又耍人~}

~{们无条件地服从。这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又是什么？~}

~{在谢富治的强大压力下，我们被迫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当时还确定了革筹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学生 13，干部 5 人，教职员工 3 人，共计 21 人。在学生中~}

~{，团派为 9 人，四一四为 4 人，这就是九比四的来历。四一四推荐孙怒涛、汲鹏、~}

~{王良生和我为学生代表、龙连坤为干部代表、李振民为教职员工代表参加革筹小组~}

~{。蒯大富任革筹小组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为副组长。~}

~{在讨论革筹小组名单时，团派只接受孙怒涛、汲鹏、王良生三人，坚决不同意~}

~{我参加革筹小组。他们说过去在反对蒯大富和 28 团中最积极，没有资格参加革~}

~{筹小组。四一四方面不得不向团派说明我是四一四的一把手，经谢富治表态同意后~}

~{，团派代表才勉强接受我参加革筹小组。~}

~{回到清华，消息传出，四一四炸开了锅。六位谈判代表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

~{接受他们愤怒的声讨。群众指责我们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让四一四任~}

~{人宰割的协议。我们赶紧召开核心组会议，向大家汇报谈判的详细情况，听取意见~}

~{，研究对策。会上大家都能体谅谈判代表当时的处境，对谢富治表示强烈不满。大~}

~{家议来议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摆脱困境，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所以会~}

~{议决定，由 20 名未参加谈判的勤务站成员发表声明，接受“四项协议”的前三条~}

~{，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声明引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

~{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毛主席语录，指出第四条协议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

~{既承认了“四项协议”，又保留了抵制总部某些决议 的权利，以一种进退自如的~}

~{姿态，来应付未来。~}

~{◇ 事态的发展。~}

~{然而，四一四群众反对”四项协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首先是东方红战团~}

~{连夜发表著名的“5·21声明”，明确指出“四项协议”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东~}

~{方红战团坚决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不接受革筹小组的一切领导~}

~{。随后，反对“四项协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5月22日，四一四三七战团~}

~{和其他近二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或完全反对“四项协议”，或反对“四项协议”~}

~{的第四条，并指责四一四头头出卖四一四战士，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四一四群众如~}

~{此强硬的态度使我们很受鼓舞。~}

~{可是，谢富治马上又打来一闷棍。5月22日深夜，谢富治的秘书打电话给清~}

~{华两派，传达他的指示：“你们总部和四一四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已经报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对你们有好处。”~}

~{他的潜台词就是：谁反对“四项协议”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谁就没~}

~{有好下场。在文革中，这样的大帽子谁也戴不起。我们四一四核心组感到事态严重~}

~{，决定对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做出反应。5月23日2时30分，孙怒涛通过四一四~}

~{广播台传达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在上午由总部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孙怒涛又代表~}

~{四一四核心组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我们的目的是~}

~{暗示四一四战士不要轻举妄动，要静观其变，以静制动。我们担心四一四还会有人~}

~{贴大字报反对“四项协议”，怕他们遭到打击。~}

~{当天上午，清华园内，两派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团派欢欣鼓舞，四一四万马~}

~{齐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23日中午，东方红战团发表“紧急声明”，重~}

~{申5·21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声明引用林彪语录“在~}

~{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

~{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表明为坚持真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

~{心。紧接着，四一四主要负责人陈楚三、张雪梅等四人挺身而出，发表“郑重声明~}

~{”，支持东方红战团声明，表示“任何人违反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两份声明的强硬立场给四一四战~}

~{士极大的心理支撑。广大的四一四战士也没有在高压下屈服，纷纷在大字报上签名~}

~{表示支持。两派形成僵持局面。~}

~{不料，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5月24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

~{治23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

~{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

~{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四一四~}

~{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

~{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庆~}

~{祝似乎已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

~{“最高指示：四一四上台，不行！”等口号响彻清华园。~}

~{随后，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议，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向四一四发动强~}

~{大的政治攻势，争取瓦解和摧毁四一四，二是立即成立革委会，从根本上巩固胜利~}

~{成果。24日中午《611》战斗组的“最最紧急声明”和28团的“严正声明”~}

~{就是明证。他们确定的口号是“充分发动群众，以大跃进的步伐，争分夺秒，日夜~}

~{奋战，全力以赴，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28团在声明中说“四一四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四一四必须解散”、“~}

~{东方红战团和陈楚三、张雪梅等人的声明是反革命大字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攻击谢副总理，反对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罪责难逃”、“罗征启是挑动群众斗~}

~{群众的罪魁祸首”。~}

~{24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5月30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并提出50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当晚，鲍长康~}

~{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毫无疑问，蒯大富和谢富治把四一四逼到了墙角。“四一四上台，不行！”的~}

~{“最高指示”给我们造成极其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在讨论时认为对于这段“最高~}

~{指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不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

~{话，心中很不服。起初我们还以为毛主席听信了谢富治的片面之词，但后来分析，~}

~{毛主席对清华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他老人家确信清华四一四的主张实质上就是“~}

~{蒯大富下台—四一四上台—蒋南翔回来”。可我们自己当时丝毫没有这种意识。我~}

~{们虽然反对蒯大富，主张解放干部，让干部成为三结合的领导核心，但并没有让蒋~}

~{南翔复辟的思想，所以感到很冤屈，当然也不觉得很害怕。那么如何应对当前的局~}

~{面呢？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极其神圣的，现在从蒯大富的口中随意说出来，其真实~}

~{性就大打折扣了。~}

~{鉴于蒯大富有“贪污”和歪曲传达首长讲话的“前科”，我们暂且认定蒯大富~}

~{伪造“最高指示”，不予理会。~}

~{在团派的强大攻势面前，四一四的队伍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稳定。三七战~}

~{团发表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 5·21 声明，表示要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到最后~}

~{胜利。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四一四核心力量的两大组织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一致。陈~}

~{楚三、张雪梅等人更以大无畏的精神再次发表“严正声明”，继续坚持强硬立场，~}

~{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准备为坚持真理而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与学生队伍一样~}

~{，四一四的教职员工和干部队伍也是一支压不跨的队伍，四一四的干部代表龙连坤~}

~{、魏宏波、谭浩强、胡大忻、王学芳联合发表声明，动农系 25 名干部和数力系 1~}

~{3 名干部分别发表声明，坚持认为四一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呼吁两派群众求同存~}

~{异，共同对敌。四一四的一个战斗组写了一份题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的大字报，这个标题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处于政治高压之下四一四的状况。~}

~{□ 摘自沈如槐：《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宋养毅）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造反派又在全国较为普遍地分裂成两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在河南，有“河南造总”和“二七公社”之分；在黑龙江，有“山上派”

和“山下派”之分；在湖北，有“三新”和“三钢”之分……即便在中学红卫兵里

，北京地区有“四四派”与“四三派”之分；上海地区也有“红代会”与“中串会

”之分。如同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主要理论家在他那篇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

—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东方红战团一战士）指出：“尽管不同地区两支

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的性质程度各

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又如他在同一文章中假定：“社会里

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

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以至他认为

这种全国性分裂的两支造反派，可以方便地称呼为：“四一四派和团派”，代表这

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1〕

当周泉纓在写作这一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纲领性的思潮文献时，他或许并没有想

到一年后他会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评判。1968年7月28日凌晨，当毛泽东

~{下决心把红卫兵赶下历史舞台，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所~}

~{谓“五大领袖”时指出：“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

~{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毛泽东又说：“蒯大富~}

~{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鉴于当时周泉纓已在狱中，毛泽东下令~}

~{放人：“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

~{写篇文章抓他干什么？”〔2〕至此，可以认为四·一四思潮已在全国范围内被毛~}

~{泽东直接点名为一种“右”的异端思潮。但奇怪的是，此后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

~{全国范围内，四·一四思潮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异端思潮象湖南“省无联”，武汉~}

~{“北、决、扬”，甚至上海中学生的极左思潮“中串会”那样受到过正式的批判。~}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正面审视一下什么是清华四·一四的主要政治观点，以~}

~{及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流行的社会思潮了。根据清华大学文革史的研究者所述：~}

~{“1969年4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

~{总部（团派）和414总部（4派）。两派在一系列文革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

~{和”。〔3〕什么是他们的分裂导火线呢，据此研究者的分析，这“主要表现在文~}

~{革中的策略、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清华的评价等~}

~{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的就是干部政策。这些伴随着兵团成立，发展而来的分歧~}

~{和矛盾最终使兵团于 1967 年 4 月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和 414 总部……团派~}

~{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 5~}

~{0 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

~{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4 派把团派~}

~{这套理论称之为‘大翻个理论’，即从根本上否定 1949 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

~{倒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 [4] 干部问题的评价，讲到底是一个制度的臧否。当~}

~{清华四·一四认定“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

~{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时，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推~}

~{导出了四·一四思潮的三大理论支柱。~}

~{ 其一是“阶级关系不变论”。与所有极“左”派的异端思潮认定文化大革命已~}

~{造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不同，四·一四的主要理论是“十七年阶级关系~}

~{不变论”。四·一四思潮认为：“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稳定的，经济~}

~{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

“{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具体到被认为是“{

“{黑线专政”的教育部门，他们仍认为：“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

“{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
[5 {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四·一四派中不少人甚至认为：“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

“{二。” [6] {

“{ 其二是“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从“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出发，造十七{

“{年反的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自然成了反动阶级的代言人。按周泉缨们的{

“{理解，“造反”派并不等于“革命”。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开展以来，始终有这样一个现象为人们所不理解：为什么反蒋（指原清华大学校{

“{长，“黑帮分子”蒋南翔）反工作组的时期，造反派里有不少人出身不好？每个人{

“{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种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经过长时间的{

“{热烈讨论后，人们发现没有一种站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能说明这一点。而所{

“{谓那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论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于是人们不{

“{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不革命的标准？”

四·一四{

“{们的结论是，他们（即造反派）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

~{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

~{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7〕这里，我们既~}

~{可以看到十七年阶级路线的“血统论”分析法，又可以看到十七年中中共官僚阶层~}

~{惯用的反右斗争式的政治形势估计。~}

~{ 从此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清华四·一四派在文革中要死死捍卫的是周恩来~}

~{——旧官僚体制的代表。而在私下议论中，对刘邓为代表的十七年体制更是十分留~}

~{恋的。~}

~{ 其三是“文化大革命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论”。周泉缨在他那篇以〈和周泉~}

~{缨谈话纪要〉命名的自白中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应当“收”了。周~}

~{泉缨拐弯抹角地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人跑长了要昏倒，发动~}

~{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的局面，因而必须“修整、巩固、妥协，”以防止“一个~}

~{朝代垮台”，而使“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8〕一句话，在他夫子自道的字里~}

~{行间，不难看出要求对十七年的干部政策，阶级路线以及整个政治秩序的留恋和要~}

~{求重新恢复的渴望。~}

~{ 出于这样的一些理论基础，周泉缨们必然对1967年后群众运动的继续推进~}

~{大为不满。清华团派所办的《井冈山报》在1967年6月22日重刊了当时的中~}

~{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周泉纓便借题发~}

~{挥，于 1 9 6 7 年 9 月 1 4 日贴出一张题名为：“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

~{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的大字报。此时，作为“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

~{早已于一年前被打倒，周泉纓的矛头显然是另有所指的。9 月 1 7 日，周泉纓又嫌~}

~{矛头所指过于朦胧，又贴出一张题名为〈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

~{陶铸之流 1 9 6 7 年 6 月重版的一篇文章〉的大字报。这里，“之流”明白无误地~}

~{暗示他矛头所指的是陶铸以外的人，而“1 9 6 7 年 6 月重版的一篇文章”则明确~}

~{地点出了陈伯达是当代“袁世凯”。这两文的中心观点，都认为陈伯达把文化大革~}

~{命中的群众运动引向了歧途。他们以“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

~{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主要表现是“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

~{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周恩来——引者注）的常委大权。”此外，陈伯达~}

~{还要“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对十七年的政治秩序“搞‘大翻个儿’”，~}

~{“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搅乱阶级阵线。”去“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

~{分配’的强烈欲望。”〔9〕~}

~{ 既然周泉纓为代表的四·一四思潮认为陈伯达已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引~}

~{向了歧途，那么说他们内心深处对文革其实取否定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那篇〈~}

~{谈话纪要〉里，周泉纓公然把文革的成绩比作“秦始皇修长城”，并指责他“残暴~}

~{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自然有影射毛泽东之嫌。〔10〕在私下的议论~}

~{中，周泉纓和他的伙伴们更是直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干~}

~{部大换班”；是“打倒‘刘家军’，换上了‘林家铺子’”的“排斥异己”的权力~}

~{斗争。由此他们更直截了当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引起的原~}

~{因，一则是‘个人需要’，二则是‘排除异己’”。〔11〕~}

~{清华四·一四思潮自然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求~}

~{恢复十七年政治旧秩序的异端社会思潮，而问题在于，这一思潮的代表者既不是类~}

~{似“联动”式的中共高干子女的组织，又不是保守派的红卫兵。而是当时响当当的~}

~{造反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的一支，却一再批判造反派，似乎有点令人费解。其~}

~{实，这正说明了文革中的所谓“造反派”，并不全部具有反体制的思想意识(不~}

~{是自觉或非自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意识在他们许多人的脑中仍是占统~}

~{治地位的，旧的政治秩序在他们不少人心中也仍是神圣的。只有造反派中一部分激~}

~{进派思想家，才具有稍微自觉的反体制意识。~}

~{ 除此之外，四·一四思潮的产生恐怕还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1967~}

~{年“一月夺权”以后造反派的迅速为权力的侵蚀与腐化，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

~{此相当失望；第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在中央残酷的权力斗争越来越使青年人看~}

~{清楚政治斗争的黑暗；第三，文革所引起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无序性与无规则~}

~{性使人们甚至觉得还是文革前的旧秩序更为安定。无疑，四·一四代表了一种旧秩~}

~{序的复辟思潮，而这一思潮的产生，却是以反复辟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

~{直接后果。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毛泽东公开说他反对四·一四思潮，而四·~}

~{一四思潮却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任何批判。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的态度，其实~}

~{是矛盾与暧昧不清的。他当然反对四·一四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矛头指向他及~}

~{其追随者的那部分观点。然而，在文革确实进入“收”的阶段，毛泽东为了巩固自~}

~{己的政权开始把红卫兵全部赶下历史舞台，与旧官僚阶层及其代表周恩来开始联盟~}

~{的1968年下半年，他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从组织上，他~}

~{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旧官僚阶层和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出身好的党团~}

~{积极分子。从思想上，他开始反对“阶级关系变动论”，“特权阶层论”和“彻底~}

~{“砸烂旧国家机器论”等激进的造反派思潮，概而言之，他所实践的，正是四·一四~}

~{思潮所主张的，因而怎么可能再认真地批判四·一四思潮呢。从这一观点来看，四~}

~{·一四思潮真是一种强大的代表中共本质的旧秩序的思潮，当邓小平终于复辟成功~}

~{时，可以说四·一四思潮是确实实地一时胜利了。~}

~{注 释~}

~{〔1〕 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2〕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的谈话。~}

~{〔3〕 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二十一世~}

~{纪》，1995年10月。~}

~{〔4〕 唐少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

~{8月。（见本刊z k 9 6 0 7 b——编者）~}

~{〔5〕 〈四一四思潮必胜〉，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6〕 〈历史的判决〉，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7〕 〈论造反派〉，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8〕 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9〕 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8年9月。~}

~{〔10〕 同注〔8〕。~}

~{〔11〕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 一九六七年四月，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取得主导地位的北京中~}

~{学造反派骤然分化与组合为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浮面看去，这~}

~{源起于文革中的“中央首长讲话”及其对它们的臧否。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

~{所编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所载，这一分裂的过程如下：~}

~{ “四月三日至四日，二、三月间，北京中实行军训。各造反派组织都解散了，~}

~{打算按班级实行大联合。~}

~{ 但是，两种思潮在造反派队伍中的斗争依然存在很剧烈。~}

~{ 四月三日，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中学革命师生代表，指示：~}

~{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学生认为江青同志讲话好的很，马上组织起来~}

~{。众称其为‘四·三’派。~}

~{ 四月四日，另一部分中学生也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四·四’派。~}

~{ 两派分歧是：‘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认为‘~}

~{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

~{ ‘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但在军~}

~{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

~{ ‘四·三’派认为当时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的不高；‘四·四’派则~}

~{认为中学军训好的很。”〔1〕~}

~{ 尽管这一“大事记”只是粗略地对两派的思想分歧作了记录，但从中仍可以看~}

~{到大致的焦点所在：1) 军训；2) 联动思潮。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

~{下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共有八条内容。一、彻底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二、停止外出串连，进行短期军训。三、整顿红卫兵，使之以劳~}

~{动人民家庭出身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一贯表现好的也可以参加。同时解散~}

~{“联动”。四、建立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五、上文化课与“文革”结合。六~}

~{、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师生，必须平反，反对武斗。七、整顿清理教师队伍。~}

~{八、爱护学校设备与国家财产。〔2〕这一文件表现出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中学~}

~{运动的两方面期许。第一，抛弃“联动”及其老红卫兵，重新组织新的红卫兵为其~}

~{政治工具；第二，以军训~}—~{最可靠的军队去限制新的红卫兵的作用，用一位研~}

~{究者的话来说：“总的讲，军训的目的无非是要把红卫兵这匹乱踢乱咬的野马套上~}

~{笼头，用缰绳把它牵上毛主席既定的‘文革’的发展道路。”〔3〕~}

~{ 在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主要的就是批判“血统论”，即批判工~}

~{作组，老红卫兵（及联动）对普通师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师生的迫害。军训团，~}

~{即解放军本身是一个在中共“血统论”的阶级路线上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他们在~}

~{军训中自然表现出了对批判“血统论”的天然冷漠及其抵制。这引起了“四·三派~}

~{”学生的不满。此外，在“血统”上并不占优势的“四·三”派刚刚取得了革命权~}

~{利，立刻受到了“复课闹革命”及军训团的不少限制。加上许多出身干部子女的老~}

~{红卫兵都转入“四·四”派成为干部与骨干。又使他们对“联合”不抱幻想。从“~}

~{四·四”派来讲，也正因为他们队伍的“血统”构成和他们多多少少把执行过“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愿深入批判“血统论”。加上他们早在一九六六年底便~}

~{已成立了全市性的组织——“红卫兵首都兵团”，这又使他们在大联合力量对比上~}

~{绝对不会吃亏，因而他们拥护“军训”，拥护“大联合”——这便是出自两派利益~}

~{所在的不同而造成分歧的原因。~}

~{ 自然，从两派“比赛革命”，即争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新的政治工具的角度~}

~{去看，这两派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大的现代民主与人权意义上的积极意义。然而，如~}

~{果我们注意到两派分歧更深层的社会思想原因——血统，那么，“四·四”思潮更~}

~{多地表现出对中共十七年的阶级路线及政治秩序的一种维持，而“四·三”思潮则~}

~{不时表现出对它的挑战、颠覆，甚至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式的否定。如同红卫兵运动~}

~{的研究者的分析：“说到底，‘四三派’、‘四四派’之争还是个家庭出身问题之~}

~{争、政治待遇之争。在这方面，‘四三派’的理论实际是遇罗克的〈出身论〉”
[[~}

~{4 } 如果说毛泽东及中共期许通过军训使红卫兵运动失去它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通~}

~{过“大联合”及“红代会”的成立结束所有中学生对中国政治的独立思考，那么“~}

~{对于曾对造反抱以极高期待的红卫兵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红卫兵~}

~{运动，可说是这代人要把以往学到的东西，放到他们感到神秘且无法左右的社会现~}

~{状中去实践的初次尝试。这种尝试的动机，包含着许多崇高的理想和愿望。有人想~}

~{籍此创建出一个没有任何杂念的单一社会，使生活其中的人完全平等；有人期冀以~}

~{巴黎公社为蓝本改造社会的政治结构，使之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有人试图建~}

~{立最能发挥学生积极性和能力的教育制度，来培养出一代真正的新人，当然还有其~}

~{他许多。而期望本身不在于它是否合理，而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实现的手段，倘若~}

~{没有，那么期望越高，痛苦越深。到了这个时候，红卫兵们发现，他们已经再也~
也没~}

~{有力量和手段去实现造反的理想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与他们的初衷已~
越来~}

~{越远。” [5]这一对他们狂热投身于的“革命”的失望，无论对于老红卫兵，
“~}

~{“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都是一样的。而在此失望的过程中，“四·三~
派~}

~{”思潮仍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就是~
这样~}

~{一篇文章。~}

~{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是遇罗克〈出身论〉等一系列文章中表述的“反特权”~
思~}

~{想的延续，但是它也表达了如下几个创新的观点：~}

~{ 第一，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革”与“保”的矛盾，其斗争~
焦点~}

~{又在于“权力再分配”。〈论新思潮〉认为：社会主义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
大的~}

~{社会变革都伴随着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
义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
并不~}

~{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样，~
这些~}

~{“特权人物”蜕化后“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
主义社~}

~{会的主要矛盾。”“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保’的实质”；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

~{的爆发”。〔6〕~}

~{ 第二，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力对中共各级当权派无可幸免的腐蚀作用。〈~}

~{论新思潮〉指出：“‘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

~{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

~{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7〕~}

~{ 第三，指出了这种“再分配”斗争的持续性与永久性。一方面〈论新思潮〉认~}

~{为“四·三”思潮“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的~}

~{实质是“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另一~}

~{方面，〈论新思潮〉又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

~{然又有分化。”因而，在第二次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

~{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

~{了”。〔8〕~}

~{ 从这三个创新的理论观点与中共长期以来信奉的正统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

~{观点相比，即使是与毛泽东创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比，仍有~}

~{很大的不同。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从来没有推翻过他一贯倡导的正统阶级路线，~}

~{对造反派的倚重只是暂时的、功利的。而〈论新思潮〉想把它固定为“革”与“保~}

~{”式的阶级分析，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其二，〈论新思潮〉过分地强调了权力——~}

~{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专制权力——对其干部的腐蚀作用，甚至对新上台的造反派~}

~{的迅速蚀化作用，这等于是在否定这一制度本身，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于是，这一~}

~{文章很快在北京以及全国部分地区遭到了批判。但因为它影响并不大，批判的规模~}

~{也很小。~}

~{ 但有趣的是，〈论新思潮〉的作者自称为“异端邪说”，并认为：“一些不可~}

~{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 。〔9〕而且这篇当时影响不大的文章影响了后来在全国影响极大的湖南省无联~}

~{思潮的思想家杨曦光，使他接受与发展了中国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的思想。从此，~}

~{”新思潮“成为激进的造反派思想的代号和一种反体制的符号。此外，它在理论上~}

~{公开表明的反特权与对“权力再分配”的渴望也从一个层面揭开了“四·三派”——~}

~{——这一骚动不安的中学激进派思潮深层的原因。~}

~{应当指出，〈论新思潮〉只是一种并不成熟的中学生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

~{如同今天的研究者指出的：“反观红卫兵派性斗争的发展，同‘新生代’共同接受~}

~{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思想灌输有很大关系……‘四·三派’对反动‘血统论’的批~}

~{判和老红卫兵的痛打落水狗之役，都没有脱出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时代巢臼……~}

~{这不过是以恶易恶，想以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阶级路线（‘四·三派’划定的阶级~}

~{路线），取代原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囿于亲身的感情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

~{封闭式的思维方式不过是低层面的历史循环”。〔10〕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历史的~}

~{局限。然而，〈论新思潮〉中表现出的对中国社会体制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与~}

~{探索，却正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对这一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试图超越。从这一意义上，~}

~{“异端邪说”自有它的思想史意义。另外，正是这种可贵的独立性与探索性，使北~}

~{京中学“四·三”派中后来无论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文化复兴，抑或是民主运~}

~{动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佼佼者。~}

~{注 解~}

- ~{【1】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北京：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
- ~{，1967，第111页。~}
-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编》（第二集），天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研究组，1968。~}
- ~{【3】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第228页。~}
- ~{【4】 同上，第230页。~}
- ~{【5】 同上，第238页。~}
- ~{【6】 载《四三战报》，北京：东方红抗大电校，第1期，1967年6月11~}
- ~{日。~}
- ~{【7】 同上。~}
- ~{【8】 同上。~}
- ~{【9】 同上。~}
- ~{【10】 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1968年秋—1971年秋）”，北京：《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第27页。~}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
- ~{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 许多人为了驱逐“反动的四·三思潮”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 有人为了攻击对立面而甩给后者以“四·三”的帽子。~}

~{ 然而，四·三派却在一片器闹声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势力并比任何一种势力都富~}

~{有生气，富有革命精神，富有组织纪律性地成长起来。~}

~{ 关于四·三的神话可休矣！~}

~{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的时候了！~}

~{一. 特权人物和人民~}

~{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

~{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

~{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

~{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

~{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

~{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

~{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

~{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

~{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

~{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

~{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

~{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

~{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资~}

~{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

~{须加以分析：~}

~{ （1）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

~{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

~{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

~{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

~{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

~{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2）逐渐蜕化的当权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何~}

~{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

~{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

~{所以只要稍微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

~{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

~{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

~{。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

~{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 资产阶级初期有过很强的革命作用，而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

~{动作用，因而他是腐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今天利益的集中代表，他竭力阻~}

~{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

~{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 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

~{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 必须指出，刘邓路线在某些群众中得以推行，除了某些人的地位之外，重要的~}

~{是运用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能量及群众中应用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不够。~}

~{二. 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

~{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

~{！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

~{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

~{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

~{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

~{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

~{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内的黑帮分子，大~}

~{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

~{被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

~{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

~{前，要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提高军训~}

~{的水准，提到更加适合于再分配的高度，而不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这与红旗~}

~{第五期社论及 4·15 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

~{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

~{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

~{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

~{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

~{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

~{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同时辩证法~}

~{也惩罚了那些自认为“红透了”（其实家庭影响并不好，因此毫无准备与抵抗力）~}

~{的特权人物子弟。他们一向以挂着“老革命”招牌的特权人物而自命不凡，一旦“~}

~{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即将失去特权“天堂”的时候，他们就出自没落阶级面~}

~{临灭亡的愤恨而对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所以，四·三派批判这种特权思潮仍然是如~}

~{前所述的新思潮的反映。~}

~{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

~{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

~{可以不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因素！在这次文化革命中~}

~{，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

~{，也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三．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

~{大革命当然毫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刻”可以遮颜的虚伪~}

~{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那~}

~{么几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

~{端邪说”居然正确。~}

~{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北京，在全国~}

~{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开始时都是弱的、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

~{社会的发展方向。~}

~{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的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想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他们只看到~}

~{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

~{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与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

~{态度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思想上的改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

~{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如阶级感情深）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

~{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再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

~{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

~{向反面，以至象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的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

~{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个”规律进行的，~}

~{这一个基本上（包括革命动力、对象）是完整的。如果依了什么“左派分化论”、~}

~{“新阶段论”、“每个转折点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

~{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个可能：（1）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

~{步。（2）本来前进了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多。~}

~{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
所~}

~{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
必是~}

~{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
一定~}

~{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
一次~}

~{文化革命。所以说掌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
泽东~}

~{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同样无情的。}

~{四. 四·三派的几点政策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
吃掉~}

~{反动的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
些~}

~{单位还有待努力。另一种组织上,指革命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
以指~}

~{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已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
不愿~}

~{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甚至武斗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

~{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不少
单~}

~{位需要尽快联合。~}

~{ 但是思想斗争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绝对权威，让保守派从思想~}

~{上投降。一些人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却干着压迫革命小将而纵容联动的勾~}

~{当。革命小将要彻底批判联动思潮，要让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而不是从形式上新~}

~{生，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而决不象那些连革命同志都容纳不了的~}

~{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关门主义”。~}

~{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前犯过错误的“老”红卫兵和联动老百姓，正大~}

~{批地站出来投入运动，这是好现象。但必须指出，要站出来革命只有从跌倒的地方~}

~{站起来。这些人，以前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脱离群众，现在唯一补救~}

~{方法就只有到群众中去，到革命造反派中去，大杀回马枪，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坚定~}

~{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老”红卫兵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

~{看到，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

~{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

~{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

~{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

~{的大倒退。~}

~{ 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上大作文章，说革命小将“反解放军”“反军训”。
同学~}

~{们大概还记得，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进校时，是谁最欢迎！谁最支持军训？谁
最积~}

~{极参加军训？是革命造反派！当军训一段时期后，由于一些解放军经验不足，
出了~}

~{一些问题，革命小将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对军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
有些~}

~{方式不对！）这更充分表明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支持军训的。可是一些联动分
子，~}

~{在军训开始时，抵触军训，在军训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又跳出来，打着“保卫
军训~}

~{成果”的幌子，极力把军训往后拉。~}

~{ 中国反对再分配的最大人物是刘少奇，所以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是
占这~}

~{次文化革命很大比重的，同时通过对他的批判，可以从根本上粉碎反动的特权
思想~}

~{，解放大批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重要的一环。~}

~{ 革命造反派是中学红代会的当然主人和中坚。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核心人
物利~}

~{用革命造反派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打击革命小将，压制民主，制造分裂，这种“复
古~}

~{”现象决不能允许长期存在。必须指出，其中某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
而是~}

~{破落户的飘零弟子，是再分配中的被动角色。~}

~{ 矛盾永远存在，新思潮在这个问题上战胜了、统一了，还会在更新的问题面前~}

~{与保守势力形成不同看法。可以预计，今后在干部问题、教育革命问题上必定会有~}

~{斗争；为了使文化革命不半途而废，代表新思潮的革命派就更不能轻放了“权”！~}

~{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

~{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

~{？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

~{大任务。~}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 清华井冈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 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逝者如斯》（戴维堤著 2005 年元月 17 日）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1967 年 4 月 14 日清华大学“4.14”兵团成立后，为了“把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为了迫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改弦更张”（4.14 头头周泉纓语），“4.14”的头头们在“4.14 思潮必胜”理论的鼓舞下，在“炮打陈伯达”的同时，同“井冈山兵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到了 1968 年 4 月，两派展开了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 7 月底，号称清华园“百日大武斗”。在连续几个月的武斗中，双方死伤惨重，好端端的清华园变成了战场，满目疮痍。百日大武斗的结果导致两派十一人死亡，30 多人致残，三百多人受伤。

1968 年 7 月，“团派”（井冈山兵团）头头们连续开会，决定对“四派”（4.14 兵团）发动全面攻势，并一举攻占了“四派”占领的科学馆。面对“四派”的顽强抵抗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团派”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请求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拆除“四派”的据点科学馆；正式逮捕“四派”的核心人物；由中央、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直接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而从人数和力量上处于劣势的“四派”也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实行军管，以打破“团派”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

1968 年 7 月 26 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密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 603 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 7 月 27 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7 月 27 日，由 601 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7.三”布告等文件精神。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迟群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长，谢静宜是该部队的机要秘书。（注：

迟群、谢静宜从此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人帮”倒台后，迟群被判刑十八年，谢静宜被隔离审查并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未判刑。）

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蠢材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的头头们。于是，蒯大富下令，坚决保卫清华园，不准外面的工人们进来。“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于是，“4.14”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据多年后笔者问蒯大富，当时为什么同工宣队对着干？那么多工人来，肯定是有背景的，你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傻？蒯大富说，当时利令智昏，认为是北京市某些人搞的鬼，没有想到是伟大领袖下的命令。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 50 比一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当日十一点 30 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才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奇怪的是，直到这时，市革委会仍然不明确宣布，工宣队

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笔者至今不明白，即使为了保密不提伟大领袖，但把工人宣传队要进驻清华大学的事提前一天通知蒯大富有什么不可？可能因为那样工人死伤要少得多甚至没有伤亡，蒯大富的罪过要小得多，将来杀“替罪羊”时“羊”会喊冤叫屈吧？没有别得解释。

7月27日中午十二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 and 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伟大领袖的“佛掌”轻轻一挥而已。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电发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三时多，40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

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 7 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 60 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成 130 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十、十一、十二号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五四一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一直到 7 月 30 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历史的事实是，在 7 月 27 日下午导致多名工宣队员死伤的大武斗中，蒯大富一直在市委告状、开会，对学校里发生的情况并不了解。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疲惫不堪的他见大势已去，灰溜溜地逃出清华园，跑到北航，一头扎进我的办公室驻地“红旗院”里蒙头大睡起来。

毛泽东“七·二八”大召见

1968 年 7 月 27 日深夜，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突然决定召见“五大学生领袖”。韩爱晶不知道蒯大富在北航，自己叫车去了人民大会堂。聂元梓、谭厚

兰、王大宾皆准时到达，只有蒯大富没有到场。半夜已过，毛泽东没有等他，开始了伟大的召见。谈话一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直到 28 日凌晨。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7.28”大召见。

蒯大富是主角，清华找不到蒯大富，这可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当时还没有呼机、手机之类的先进通信工具，于是，发生了文革中罕见的奇闻，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我当时正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他们。

蒯揉着双眼，问：“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我急忙告诉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我马上叫了一辆车，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他一进接见大厅，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对着伟大领袖便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握着“伟大领袖的巨手”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要抓“黑手”。

关于“7.28”大召见的谈话内容，中央办公厅录了音，有一个正式版本。韩爱晶的速记本是我整理的，同谭厚兰的版本校对后送交了中央一份。这次大召见没有公开传达全部内容，许多细节鲜为人知。这次会见内容对研究中国文革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吸取历史的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是笔者当年整理的“7.28”大召见的有关内容。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稿

（限于篇幅，删去了部分次要内容）

时间：1968年7月28日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参加接见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 青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 群 汪东兴 温玉成 吴 德 黄作珍（笔者注：参加接见的主要是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张春桥在上海，未参加。）

被召见人：聂元梓 蒯大富 谭厚兰 韩爱晶 王大宾（蒯大富迟到）

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大厅，主席站了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

主 席：都是年轻人！

江 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报。

主席：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说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来？

谢富治：恐怕不愿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主席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主席：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又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结果去了三万人，你们看怎么办？大学武斗怎么解决？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元梓）听说工人游行路过你们学校，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摆了开水。

主 席：那不知道。北大抓黑手，说黑手是卫戍区，是谢富治。“黑手”是我！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主 席：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市）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深得工人、农民的欢迎。大专院校 509 个，打得凶的，大概也就五、六个。试试你们的

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提提意见。社会现象，我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大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里，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个叫新北大（井），一个叫新北大（公社），就象联共（布）。（众笑）第三个办法，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文化革命搞了两年多了，斗、批、改。（你们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你们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人民不高兴，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多数学生也不高兴。你们学校本派讲你们坏话的也有，就是拥护你的人也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我就不相信，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要说坏话的。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不搞“黑帮”。新北大搞了十几个，我想还不止那么点“黑帮”。因为搞了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在武斗上了。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是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打起来，有时三百人，有时一百 50 人。哪有黄永胜多。蒯大富那里，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撤掉。什么热武器，核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你叫“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扎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说在学校十多年了。你走了，谁代替你？我怕你走不开。你们五个大将，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你们要是回去一讲，北大“井冈山”，清华“4.14”，（师大）“造反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不怕人打倒。

“4.14”思潮必胜。这个文章我不同意，说什么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纁。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应该放了。人家有意见，就让他再写，不然，不是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我说你老佛爷，你北大要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吗？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如果不行，按辩证法，就一分为二，就各住一个城市，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南一北，根本不见面，那就打不起来了。各人清理内部，然后统一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

“老佛爷”老巢一捅，使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你们都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有个凶手戳了你一下。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

你以后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人家讲你姐姐不好，哥哥不好，（说）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姐姐不好是姐姐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不一定妹妹都不好。为什么一定要连累妹妹呢？

（有人进来说找不到蒯大富。）

江 青：是蒯大富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找他，请蒯大富开会，他不理，广播了几次他就是不来。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要紧。

主 席：蒯大富这个人好的，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很多出来活动的都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六六年 9 月 203 日与保皇派“斗批改”干了一下。后来伯达派人来救援我们，以后就没有打过。

主 席：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有打过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吧？你很会出主意，是个谋士。

康 生：听说这次武斗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这件事（清华武斗）与我没有关系。我批评蒯大富，他回去以后，别人就左右他了。我们学校是一派，很团结。

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不见得吧？（众人批评韩。）

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太坏，人家挺难受。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多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对立派），也没解决得了，把你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不要走。你这个“女皇”。今天四个人就有两个女的。你要给人家粮食，让人家自由，出入无限。“兵团”（北师大）是“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是搞反夺权的，别的学校也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江 青：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韩爱晶：我参加了。我错了。

主 席：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轻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

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 3 月 24 日、3 月 27 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象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双方都用土炮，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四川那才算打。高射炮对天放。

江青：败家子，炮弹对准自己人。

主席：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不过一二百人，你的兵跑到哪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是不可行的。林彪同志兵多，借给你几万兵，可把“井冈山”统统消灭嘛！这个问题不要在这里答复，回去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主席：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那就分开。搬家可是个问题，还得争地盘。我看中南海，人大会堂都很大，以前也接见过四、五万红卫兵，可以办个学校嘛。或者聂元梓来，或者侯汉青来。你们不是要“杀牛宰猴炖羊肉”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我只记得杨克明。他是个年青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也参加了。第一张大字报他出了不少力。你们这张大字报也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文化革命原来打算停课半年，还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如果不行，要多少时间给多少时间。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它 7 年，八年。斗、批、走也是个办法。不就是象谭厚兰那样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

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不招行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我讲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的高中比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却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你讲哲学？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她是“老佛爷”。

主席：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主席：学文学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到工厂去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搞文学的写不了小说。上海的胡万春（注：工人作家）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总理：进了大学就僵化了。

主席：马克思受过高等教育。列宁读了一年哲学。恩格斯只读了一年书，中学还没有读完。他当过会计，管理工厂，接触了工人。自然科学他是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林彪：有一点学问都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战场上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主席：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我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我只是写战争问题时才马马虎虎看了一些《孙子兵法》，只看了一遍，等于没看。

韩爱晶：主席，文革结束后让我当兵去吧！

主席：当一年半够了，半年兵，一年农民，当二年工人，那是大学校，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工厂、农村都是真正的大学校。林彪同志是“打仗中学”的，只上过中学，算个知识分子吧！黄永胜你上了几年学？（黄答：一年半）你是什么成份？（答：下中农）温玉成你上了几年学？（温答：三年）你是什么成份？（答：贫农）你们都是土包子。上这么点学，但这不妨碍你们当参谋长。

主席：世界上的事没人反对也不好，反对就让他反对吧。那作《孙子兵法》的

人也有缺点错误。世界上没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主席：斗批走，斗批散也是个办法，谭厚兰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学文学的要写文章，写小说，写诗歌。学哲

学的要写论文，要论述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法律还是不学的好。我说砸烂公检法，但是天派反对谢富治，又不反了，不了了之。说砸烂公检法，就先砸烂谢富治。其实是谢富治首先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北京市公安局二万人，弄出九百个地富反坏。公安部有三千人，只留下 80 人，剩下的都办学习班。要砸烂公检法这很好，但是你们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是中央负责同志。

鞍钢没有公检法，靠群众审讯，就是没有大印，由群众专政。他们消息灵通，多年没有破的案，他们都破了。审讯由群众来审讯，又不打人，根据的头一条就是侦察，落实材料，这样是对的。但是，越打越烦，就搞逼供信，于是就抓人。我说一不要杀，二判刑不要太长，二至三年就行了。（问黄永胜）军队现在有无禁闭？（黄答：无禁闭。）逃兵还抓吗？（温玉成答：不抓了）

主席：斗批走，为什么要走？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人家想走，抓他干啥？他受不了，要走就算了。军队太苦，他受不了。逃兵也不抓，也不禁闭，逃兵反而少了。你看解放军犯错误不搞禁闭，你们是学校，不是还到处抓人，打死打伤，抓俘虏，搞逼、供、信，还坐喷气式飞机。我看知识分子最不文明，还是老粗黄永胜、温玉成文明，他们不抓俘虏，不搞禁闭。坐喷气式飞机也不是我发明的。我只不过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戴高帽子游街，但也没有写坐喷气式飞机啊！我又没让戴高帽子，我不是罪魁祸首。

蒯大富的作风很不好。工人进去宣传“7. 三”布告，你们开枪打死了四、五个人。针织总厂就伤了四、50 个。不过我看损失还是很小的。

总 理：林副主席早就讲文化大革命损失很小很小，收获最大最大。

主席：人家去要欢迎，不能专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进学校是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你们也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大富。现在还搞什么串连会，在和平里，在清华，在北航开会，有广西“四. 二二”，大同造反派，广东“旗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八三一”，在串连，听说在北航还开了国防系统的什么会，不要搞这一套。

韩爱晶：我不知道。

文 元：你们侯玉山不是作了报告吗？

林 彪：我们还没开“九大”，你们就说我们开了。我们没开会，你们说我们开了；你们开了还说没开。

总 理：北航开什么国防单位会议，开了没有？’

韩爱晶：一吓没敢开。

总 理：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主 席：不要搞这一套。

总 理：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

主席：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还说中央斗争很激烈，学校、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找你们来是解决问题的。聂元梓，我们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就是要使你们有准备。我从来不搞什么录音，这次搞了录音，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们就放录音，这样一搞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先是黄作珍讲话，后是谢富治讲话都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管一下。后来事情多，北京就由谢富治管。过去你们开会，我和林彪都没去，我们官僚嘛！这次怕你们开除党籍，又抓黑手，又是镇压红卫兵。

林 彪：今天我开车来的时候，街上没有北大、清华大字报，他们武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主 席：这一条我认为你们脱离群众，他们不愿意打内战，你们脱离工农兵。

林 彪：你们脱离工农兵！

主席：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北京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国民党，就是土匪，就要打围剿。如果是学生也要讲清楚，再不听就要抓起来，这还是轻的，重的就要包围、歼灭。

（笔者注：文革中，毛泽东说了许多正面、反面甚至自相矛盾的话。断章取义地用毛泽东的话整人，中国许多人都学会了，造反派如此，整造反派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讲的武斗问题，而当时韩爱晶的北航和王大宾的地院是根本没有武斗的，谭厚兰的北师大也基本没有武斗，最后却都成了蒯大富、聂元梓的殉葬者。这就是历史。）

林 彪：现在有些是真正的造反派，有些是国民党、土匪，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主 席：国民党还不是这样？他烧了就走了。

林彪：长征时我们路过广西，与白崇禧打仗，白崇禧就是那样干的，他先冒充共产党放火。现在旧计重用，是不是白崇禧留下的人干的。

主席：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多多帮助他，劝劝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蒯大富现在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吧！

主席：要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就把老虎打死。你们把广西“四·二二”的人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总理：广西“老多”也住在北航。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你怎么能召开？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的运动。

韩爱晶：那个会不是我们召开的，可以调查嘛！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在体院，学校来电话，要我接待两个省革委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人家说我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我说北京是是非之地，一开会就是黑会。

北京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只谈情况，不谈办法。后来我就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听见不妙，地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我们二把手井冈山也吓跑了，大家纷纷向我反映情况，还未来得及写报告，中央的批评就下来了。

（康生、姚文元等人继续批评韩爱晶。）

主席：你们批评韩爱晶太多了，他才 23 岁嘛！

江青：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质、北大都作了些工作，立了些功劳，那时候你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对的。我们那时也有委托，而现在藏他们是不对的，他们中间许多是反解放军、反革委会的。谭厚兰，你那个革委会是谁给你稳住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是中央文革。

韩爱晶：我们错了。

谢富治：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她立刻就去给你们稳住了。

江青：谭厚兰你三伏天怎能那么样？他们几十个人那也是群众啊！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个月不见太阳，亏你作得出来，我们听了都难过。就是反革命，也是青年人，要教育嘛！开始是蒯大富，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主席：那是无政府主义，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

林彪：没政府的极端就是有政府。主席说，世界上无政府和有政府是相对的，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消灭，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就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你那个兵团（指谭厚兰的对立派师大造反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对他们是没有好感的，你们把兵团的人放了！无产阶级要讲人道主义。你“老佛爷”也是这样。

聂元梓汇报北大“井冈山”有个反革命集团要“油炸”江青。

主席：油炸，这是在小房里说说，他哪里要油炸？

江青：牛辉林是有问题，也可以教育。聂元梓我还有没有一点发言权？我一直躲着你们，我难过。你们现在是群众斗群众，坏人就藏起来，那方面有人。“4.14”也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总理、伯达、康老的，但他们还是群众组织，蒯大富要打掉他。

主席：“4.14”几千人打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打不掉，有坏人要自己去揪。

江青：我住的地方，你们也知道，要绞死就绞死。你们开始一同共患难，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能治国治天下？主席向来就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你们不很好向主席学习。

主席：民院有个伊林，攻击林总；北外有个“六.一六”刘令凯就是反对总理的，总理说把他放了。有人说总理宽大无边，我说总理这样做我是同意的。“联动”开始就不应该捉，但当时我点了头的。

谢富治：这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没关系，这是我捉的。

主席：你不要掩盖我的错误，我是点了头的。

谢富治：我把人捉多了，这是我的错误。

主席：放也是我叫放的嘛！放出来以后，有的在天安门，有的还要上八宝山去，骑自行车闹一两个月也就没有意思。这里面有人搞流氓活动，抢钱，搞女人。

聂元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井冈山”有一千多人下山。

主席：不要搞牛辉林他们。你那个下山的我看靠不住，人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还是要他们回去，不要勉强，不要侮辱人格，要出入自由，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都犯过错误，你们初犯错误，也不怪你们。

今天你们两个天派，两个地派我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现在 509 个学校，打得厉害的有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为什么炮灰那么少？你们应该想一想。

谢富治：主席非常爱护你们红卫兵小将，中央文革江青同志非常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我要负责任，我对你们帮助不够。

主席：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北京市办大专院校头头学习班，不让串连，也没向中央汇报。不让串连不对，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江青：串联起来统一观点，抓出坏人。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门就嚎啕大哭，主席站起来上前握手，蒯大富拉住主席双手继续大哭。江青同志先笑，后流泪。蒯边哭边告状说清华告急，说“黑手”操纵工人镇压学生，是大阴谋。众人让蒯大富坐下。）

主席：黄作珍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不知道中央这次开会算不算数？我只好伸出“黑手”。把我送到卫戍区去吧，我是“黑手”。

（蒯大富目瞪口呆。）

谢富治：伸出来的是红手。

文 元：伸出来的是红手，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主席：一要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四是打就是大打。工人都撤出来，要打就大打，上交的武器还给你们，跟四川一样，几万人，大炮对天放，架无线电。我才不怕打呢，我一听打仗就高兴。那个布告要广泛宣传，广西的要宣传，陕西的也要广泛宣传，再不听，就包围歼灭，是反革命嘛！

总理：你五个人要好好想一想，广西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出一个月了还要打，交通都不通了。你们五个人不是关心国家大事吗？为什么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配合中央？

主 席：他们忙呀！

总 理：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江 青：你们别再分什么天派、地派。

主 席：不要再分派了，希望你们不要再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分什么两派？不过困难还是有的。

总 理：要跟主席走。

姚文元：要跟主席走。

王大宾：主席，教改搞不起来，搞不上去。

主席：我们也搞不上去，不怪你们，我们都搞不出来，何况你们呢？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有的人很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想走，走就走，也就算了。

总 理：这是旧制度的影响。

主席：历史上看到一些人，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是学法律的，搞政治经济学，哲学搞不下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同版？因为他身体不好。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有三派，以马克思为一派，第二有普鲁东，另外还有布良基、鲁尔，还有个巴枯宁。第一国际为什么搞不下去？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

江 青：我真心疼你们，你们有怨气，说我们不要大学生了。有的听话，有的不

听，有的当面讲一套，背后又不听，你们后面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主席：不听无产阶级的就干涉，就镇压。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几十人也行。）

主席：你聂元梓是有选择性的，你是合你的口味才要，你是专要 603 军，给你 308 军行不行？以后从 603 军中调些人到“公社”，从 308 军中调些人到（北大）“井冈山”，你要欢迎 308 军，308 军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次会，郑维山做了检讨。谭厚兰你这个女将放了一把火，把那些将军吓坏了，到处找司令，郑维山去保定解决问题了嘛！没有出来接见。谭厚兰，郑维山也来找你的麻烦吗？

谭厚兰：没有。

陈伯达：韩爱晶你的头脑膨胀得厉害，韩爱晶、蒯大富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主席：20 几岁嘛！不能轻视年轻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不认真学习、讨论，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意见第一，会走向危险道路的。

主席：我官僚么！一次也没见你们。要不是抓“黑手”，我还不接见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毛主席，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总理，那是危险的。

主席：是相当危险。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总理：主席早就讲过，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蒯大富，中央对你们的态度，都是经过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卫戍区转达的，你们不相信中央。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最重要、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再置苦罔闻，要犯极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学校实现了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现大联合的方针，你们这些学校没有看到全国需要，没有看到全国运动的每个时期需要作什么。你们斗走资派，斗文艺界

的牛鬼蛇神，那是好事情。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

主席：全国工农兵，百分之六十五都是好人，北京 509 个大学，武斗厉害的也只有五、六个。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只不过五百人。蒯大富，你应该欢迎工人。

康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北航给了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政委。这事要严肃处理。（笔者注：康生老贼的信口雌黄，差点要了笔者的命。）

韩爱晶：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的枪都在，卫戍区检查了。

主席：蒯大富上了老虎背，不好下，蒯大富你下来嘛，照样当官做老百姓。

陈伯达、康生：韩爱晶你无自我批评，长久如此。蒯大富当了司令，你是政委。

谢富治：韩爱晶就是没有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们的枪收回来？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多次，你就一直没有很好表示个态度。

主席：不要说他了，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主席：年轻人听不进批评，他们有些象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时也主观、武断得厉害。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请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支持蒯大富的，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要受他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给我派了解放军，什么事情就清楚了，免得我有口说不清。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把他宠坏了，谢富治比我还宠他。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主席：不要光批评。杨成武搞了个中心，国防科委搞了个中心，全国几千几万个中心，就是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蒯大富，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打下去又无群众，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这边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思想，我不能接受。他文章的主要口号是无产阶级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但也要争取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的一些人。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你们仍然要打，你们要打到那一年？工人进去要欢迎，你们反而对工人开枪。工人是徒手，你们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在师大我倾向谭厚兰，在北大倾向聂元梓，在清华不是倾向你吗？在五个学校中还是倾向你们五个。蒯大富，难道你还不知道，几万工人没有中央命令，他们敢进你们清华？你们被动。“4.14”欢迎，他们交了枪，但“4.14”思潮必胜不对。在北大“井冈山”坏人多，聂元梓你那派好人多些。

聂元梓：他们说反王、关、戚是反中央，在学习班开串连会是打倒谢富治。

主席：反王、关、戚是对的，学习班串连一下也可意，我也禁止不了，但搞谢富治不对。八点多钟了，五个钟头了，我回去睡觉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人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江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主席：现在“4.14”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台了，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不要搞的我们爱莫能助。

主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就到韩爱晶那里睡。韩爱晶好好招待，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开个会。

总理：韩爱晶，你能帮他（蒯大富）想点办法。

主席：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都不听，市

陈伯达：你们不欢迎就是对抗工革委会也不算数，中央只有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你们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战士，脱离群众，脱离学生大多数，以及你们领导的一部分人。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你们领导下的人也有不少讲你们坏话的嘛。人。

主席：后给你们打招呼，是我们的错误，黄作珍，谢富治去作了工作。“四·一四”抬尸游行，还有搞武斗的。“4.14”没有与工人冲突，但你们很蠢，被动。

江青：你们还不了解“4.14”，他们中有的人还说蒯大富“左”了，沈如槐“右”了。清华联合没有蒯大富不行。

主席：蒯大富，你们“井冈山”两个，“4.14”一个，二比一搞大联合，你能不能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当不了。

江青：现在还在武斗，制止了武斗再说。

主席：第一实行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文化革命两年多了，热衷于打内战。第四，要打就大打。文科还是要办的，过去办得不对。文科、理科也要办。师范学院不办，谁来教高中？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抗战时，一战就几年，打得鸡飞狗跳墙，不但大学没办，中学、小学也没办，但是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时间太长，大学方法不对头，不要考试，考试干甚么？马恩列斯谁来考？谁来考林彪？谁来考我？谁来考哲学，政治经济学？开展辩论，好的就留下，坏的就丢掉。杜林活了 808 岁。

韩爱晶：主席我有个问题，如果您老人家百年之后，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将来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怎么办？

（笔者注：这就是文革中韩爱晶有名的“天问”。）

主席：出现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年来，北洋军阀段琪瑞搞了十几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有军队、政权，有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 彪：有毛泽东思想。

主席：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一些，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掉，全国人民灭不掉，总不能把中国人民全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

总 理：我的弟弟周永爱和王、关、戚搞在一起，我把他送到卫戍区去了。

主 席：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 彪：鲁迅的弟弟是一个大汉奸嘛！

伯 达：韩爱晶，你思想上还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文 元：韩爱晶过去就提出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主 席：什么不出？靠不住。还要搞几次文化大革命，还是会有波折的，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总 理：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把马列主义掌握好。他把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了，这就是件大功勋。过去马列主义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变化不会有。

主 席：不过这个问题韩爱晶问得好，问我我就答复。要不说你们幼稚嘛！不要认为没有我们，天就会塌下来，这也是一种迷信。

江 青：韩爱晶给我写过几次信讲这个问题。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主 席：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我们这些人有几种死法：一种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三是坐火车、坐飞机摔死，我爱游泳也可能淹死，无非如此，寿终正寝。

文 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的悲观主义。

韩爱晶：我担心一次前进不能最后胜利，前途是曲折的，按辩证法斗争会有反复的。

主席：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回去赶快把有关领导找来，集中起来（开个会）。你们今天睡个觉，明天再开会，今天散会算了，以后再再来。

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这时，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聂元梓等五人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韩爱晶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这时，一个女工作人员过来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去。一会儿，毛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你们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大家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毛主席被工作人员扶着走了。

（笔者注：请研究文革史的读者注意，起码在“7.28”大召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还是关心爱护和支持的，尤其是对蒯大富还是“死保”的。）

以上就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事过30多年之后，它已经成为历史的文物。当今的年轻人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那个动乱的年代是什么样子，也没法理解这次大召见的“伟大意义”，但“7.28”大召见对于研究文革历史、研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和文革中“左”的错误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在召见时针对“五大学生领袖”特别是蒯大富和韩爱晶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可是过了不久，他就把“五大学生领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注：据“4.14”头头沈如槐认为，是后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

头头（当然是迟群、谢静宜之流）最后说服毛泽东抛弃了“五大领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7.28”大召见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预示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客观上也为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可能是伟大英明领袖始料未及的。当然，它也是红卫兵当“替罪羊”的开始。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是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728”大召见之后，以“五大学生领袖”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便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了学校，学生头头们开始受审查、批判。不久，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运动。正是经他和中央批准，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人被隔离审查、关押，被打成“5.16”分子和坏头头，成了“替罪羊”。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邓小平还没有“解放”，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抓“5.16”运动与邓小平毫无关系。直到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五大学生领袖”才被正式定罪判刑，由“替罪羊”正式变成了阶下囚。而大部分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们又从“516”分子变成了“三种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看来这话也很难成为真理了。实事求是地说，在等待红卫兵学生运动这一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而已。

笔者不想为“五大学生领袖”开脱什么，更不敢为他们喊冤叫屈。他们自己种的苦果应当自己尝。但是，他们决不是天生的坏蛋，他们本来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后代，贫下中农的儿女，正宗的“根正苗红”。文革中，他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本来想当旧世界的掘墓人，最后却成了阶下囚，成了“四人帮”的殉葬者——“五人帮”。文革中，他们的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膨胀、大暴露，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不懂政治，却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和悬崖峭壁，最后粉身碎骨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用北航被打死的吴仙虎同学的话说，他们当了几天“齐天大圣”，把天下搅得大乱，却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但是，笔者坦言，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犯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路线错误。正象两军交战一样，他们是听命于指挥官的“炮灰”，是战士，最后

是战俘，而不是战犯。所谓“反革命煽动罪”、“反革命诬陷罪”、“反革命伤人罪”，似乎于理不通。后来对他们的定罪判决，正象文革中对刘少奇等人的打击迫害一样，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中国特色”的发明，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与现代法律毫不沾边。文革中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和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人的人太多了，难道都算“反革命煽动、诬陷、伤害罪”？当年的许多“老红卫兵”打死、打伤了那么多“黑帮”和“黑五类”，后来没有一个人获罪，有的人现在仍然高高在上，这难道就是“中国特色”？（注：据说某副司令员和当兵的曾经把彭德怀真正地“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乖乖！比韩爱晶厉害！）

笔者认为，虽然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产物，早晚要完蛋，但红卫兵过早地以“替罪羊”身份退出历史舞台，导火线就是清华、北大的武斗和由此引起的毛泽东“7.28”大召见。清华、北大的大武斗，蒯大富、聂元梓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文革初期“走资派”的镇压群众和毛泽东的支持造反派，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不可能这样严重。没有中央文革之流的背后支持和挑动，就没有天、地派的斗争；没有天、地派的斗争，就不会有大武斗。那样，毛泽东要找“替罪羊”必须另找理由。历史上，杀“替罪羊”历来是当权者缓解政治危机的惯用手段，但象毛泽东这样“眉头不皱”者和邓小平那样“斩尽杀绝”者，古今中外罕见也！

在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中，他首先用年轻幼稚的第一兵团——学生红卫兵（包括中学老红卫兵和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作为敢死队把天下搞得大乱，打垮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把“走资派”和“黑五类”打得遍地皆是，屁滚尿流。然后，毛泽东又启动了他的第二兵团——利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学校和一切大小“臭老九”占据的地盘，把开始不听话也没用了的第一兵团“就地歼灭”；最后，毛泽东使出了真正的“王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军管，并发动了文革第二大战役——“批清运动”，利用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把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学生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一般干部甚至解放军内部的造反派全部打垮，凭空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反革命分子”，演义出了不仅文革史上、也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惨烈、最滑稽的战争画面。

由于清华、北大的武斗和蒯大富借枪事件，在陈伯达、康生的建议下，中央决定收缴北航的枪。不久，卫戍区通知我把枪支清理好，擦干净，要来人收缴。卫戍区来人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难过地流了泪。我们把擦得亮亮的枪支、子弹如数上交，与卫戍区的帐目完全相符，一支不少，不但不少，还多出一些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中收上来的，一并上交了卫戍区。

卫戍区的干部十分满意，一位王参谋一个劲地夸奖说：“北航真不简单！这么多枪支子弹，一支不少，一支不坏，一点没出事，真不容易！了不起，了不起！要是换个学校，就很难说了。”

中央收缴北航的枪，是一个信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缴了枪”的北航红旗和红卫兵们的末日不远了。

聂元梓口述自传

第十五章 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上)? 校内群众何以分裂

“除隐患”战斗队主要是隐秘地搞王关戚等人的情况，是在小范围里与他们斗争，在大范围中，我们与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王、关、戚及其同伙谢富治等的斗争，则是在校内校外同时地展开的。他们呢，也在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着，就是在北大校内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扶植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势力。

中央文革在北京市搞分裂，造成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首先是从高教部夺权开始，王、关、戚支持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支持“地派”，反对北大。北大法律系的学生牛辉林在地质学院王大宾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小组织，专门搞分裂，自称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组织。这样，在中央文革和“地派”的支持下，牛辉林等的势力越搞越大，后来从地质学院回到北大。1967年6月5日，牛辉林与陈伯达在北大单独谈话以后，立即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这时候，逐渐有一些人，一些老师、教授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为什么参加呢？因为这正顺应了他们的心理。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不同意见，在北大就更是如此，北大历来就是非常活跃，见解纷纭的地方。现在呢，是那些对我不满，对校文革不满的师生员工，见到有人出头反对我，先后投到“井冈山”的旗帜下了。

那些先后参加“井冈山”的，有许多是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和批斗的学生、老师和干部。因为是我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导致北大在“文革”初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的批判浪潮。这些人有老教授，有教师、干部子弟、个人历史复杂的人，等等。这是主要的分歧。其次，则是社教运动的后遗症，那些因为陆平倒台而受到牵连的人们，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将他们挨整的缘由归罪于我，到后来，他们也获得了“革命”、“造反”的权利，自然而然地，他们都把怨气归到我这里，认为是我的大字报引出来这一连串的结果，使他们吃了苦头。其实，我写大字报的时候，哪里就能想到那么多？那时候随便揪斗，随便地戴高帽子、挂大纸牌子，坐“喷气式”，这些侮辱人格的方式，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发生这些情况，我难以负责。我们开过斗争陆平的大会，事先就是针对当时群众批斗中出现的上述情况，规定了“五不”，不允许罚站，不允许被批判者不得声辩，不允许挂牌子，不允许坐“喷气式”，不允许戴高帽子。这是我和校文革搞的，就是想树一个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做。可是，中央文革不满意，江青批北大太“温”了，挑动群众乱批乱斗。这样一来，局面大乱，乱批乱斗的事情，我哪里能管得了？

还有一些人，本来是和校文革站在一起的，后来也“上山”，参加了“井冈山”。

周培源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他本来也是参加了校文革的工作的，1967年3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后，他们都参加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可是，周培源后来又“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的推断是，在校文革工作中，他觉得我重用他不够，没有多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我太霸道了，不民主，至于具体的原因，我说不出来。我那时候，思想也不对头。我觉得，凡是跟着牛辉林跑的人，我认为他们就是要跟着王关戚跑，就是要和我作对，和校文革作对。当时我认为，中

央文革王、关、戚等人是野心家，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我反对他们，而你们受他们的挑拨，站在我的对立面反对我，就是削弱了反王、关、戚的力量。反正你们站错了队，谁愿意走你就走，我不去做你的工作。其实，我应该把他们找来，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一下看法，把矛盾解决了就好了。可是，那时候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对于学校里的人员参加那一派，我是谁愿意过去谁过去，我对他们根本不加理睬。你们就是都过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理睬你们。我心里明白，地派是受王关戚支持的，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改，但是，你站在王关戚一边，反对校文革，反对我，这就是错误的，我决不能拉你们过来。那时候我们是“老保”，是保守派啊！他们给我起外号“老佛爷”，他们在大饭厅门口吊一只鞋子，诬蔑我是“大破鞋”，这样一群人，你周培源就跟着他们走？我是跟中央走的，我错也是错在跟中央的路线了，你周培源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是那些搞人身攻击、搞左道旁门的人，你和他们在一起，你自己成了什么人了？你们愿意站队站到哪儿就站到哪儿，让历史来证明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还有孔繁，原来跟我关系都挺好的，他是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本来也是因为给陆平提意见受到陆平排挤的，他还跟我说过，像有些这样搞宗派搞官僚主义的人，苏修要是打进来，一准会跟着苏修跑。他最初也是校文革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也分裂出去反对我，我觉得，他是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还有，运动中，他被学生批斗过，他也许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其实，学生批斗他，我是制止过的，不过不是公开出面，不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在下面做过工作，但是工作做晚了，没有制止住对他的批斗。还有，学生批斗他，还把批斗会的照片贴在哲学楼前面的布告栏里。这我都是反对的，都是做过工作后撕下来了。但是，我没有跟孔繁直接谈一谈，没有直接让他知道我的态度，因此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我要是直接地和他谈一谈，为学生批斗他向他表示道歉，解释一番就好了。

张恩慈也成了我的反对派。他跟王关戚跟得太紧了。其实，张恩慈的离开学校，杨克明的离开学校，我都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给他们开了绿灯。当时学校是不允许他们走的，我这个总支书记明确同意他们走，他们才能调动，我要是阻拦，他们也走不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太复杂了，人们因为各种原因重新

组合，而且是分分合合，动荡不已，很多情况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毛主席说过，在任何地方都有两派，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主席自己主持了中央工作那么久，又有那么高的威望，他都不能不承认他无法把党中央都统一起来，仍然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何况，我从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到担任校文革的主任，资历、经验和声望都差得很远，进一步而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能有多大的权力，我一个校文革的主任，能有多大的权力，在北大，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能够把全校师生都指挥得动，从来没有过什么“一统天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讲了那么多话，党中央发布了那么多指示，都是三令五申，还未必能够全面贯彻下去，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又有多大能耐？

陈伯达助产“井冈山”

当然，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这天陈伯达到北大来，他到得很早，在大饭厅先见了牛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饭厅附近遇见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指责，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于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一些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下支持不下去，宣布退出“新北大公社”，而反对校文革的对立派则兴高采烈，以为他们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陈伯达讲话的第二天，几个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群众组织就联合起来，在牛辉林领导下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他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许多，拥护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则在这种冲击之下产生了分化。

（陈伯达的“6.5讲话”对于北大的局势影响甚大。据《北京大学大事记》所载，此后数天，情况如下

“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帮助式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6月9日，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决没有好下场。’

“6月14日，《新北大》校刊发表哲学系战斗团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须批判》的长文。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对立’；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以上诸条，表明了陈伯达讲话后北大群众迅速分化的过程，反对派组织纷纷成立，新北大公社内部有人分裂出来“造反”，也有的出面批判校文革。聂元梓“坚持大方向”的大字报，是表示她对于陈伯达批评的不加理睬，“六六串连会”则是新北大公社的坚定分子面对不利形势下的紧急举措。笔者)

“整风要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如果说，陈伯达的“6.5讲话”，是北大“井冈山”的催产剂，那么，谢富治1968年3月的所作所为，就点燃了北大大规模武斗的导火索。

中央文革也好，谢富治也好，他们都是野心勃勃地想在混乱中夺取最大的权力的。我聂元梓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可是他们又拔不掉。我又不犯错误，不搞别的事情，他们抓不住。越是这样，他们越是着急。李讷从北戴河休养回来，她告诉我，谢富治说，“要拔掉北大这颗钉子。”这句话是李讷亲自对我讲的。是67年夏天李讷对我讲的。

1967年秋天，虽然说王关戚倒台了，可是，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变，谢富治由幕后走到前台来，成为对付北大的重要角色。分歧越来越清楚，冲突越来越尖锐，我就反击了。

1968年3月下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我就在会上讲了，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是，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我就把我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听到这话，谢富治气得手都直哆嗦。他没有想到，我会把火烧到他的头上。

我对谢富治，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谢富治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从资历从职务上来说，都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投靠在江青脚下，投靠在中央文革脚下，别人不用说，在王关戚倒台以前，连对于戚本禹这样的“小字辈”他都是毕恭毕敬。在市革委会讲话，言必称“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一定要紧跟江青同志”，还要一一历数中央文革的成员，不厌其烦地重复道，“康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伯达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王力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关锋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戚本禹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等等。他还宣布，谁要反对哪一个都不行，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中央文革哪一个也不能反，反江青是反革命，反陈伯达是反革命，反王力是反革命，反关锋是反革命，反戚本禹也是反革命...真是令人感到不堪入耳。当时我们正在同王关戚进行斗争，“除隐患”战斗队的活动，动静很大，听了谢富治这样的讲话，我气得手都直发抖！还有，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搞名堂，我私下里对谢富治讲过好几次周景

芳在市革委会中，设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各单位都有耳目，背着市革委会秘密调查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动态，上报中央文革。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参加市革委会工作的工人，他不愿意跟着周景芳搞特务活动，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觉得在是革委会里这样搞是不合法的，就对谢富治讲周景芳搞特务活动。谢富治呢，还为周景芳开脱，说周景芳在北京市革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你不要反他，等等。我明明是揭发周景芳，让谢富治这么一说，我是反周景芳了。可是，谢富治这话说过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西单商场大武斗。一追查原因，是周景芳指挥西单商场武斗，周景芳暴露出来，所以垮台了，这也不是谢富治把他拿掉的。相反地，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谢富治也没有把周景芳活动的罪行公布给市革委会的委员们，他自己更是一句检讨的话也没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谢富治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认定他就是中央文革江青那一伙的。

对于王、关、戚，谢富治的态度同样是全力维护和吹捧他们，以致把北京市革委会变成了王、关、戚及其后台中央文革的一个搞阴谋活动的据点。经我多次向谢富治讲王、关、戚等利用北京市革委会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后，谢富治仍然一再地为他们做解释和开脱。

后来，谢富治不仅将北京市革委会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还想在要求市属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过整风实现革命化和制定各级革委会革命化条例的幌子下，变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如北京市革委会一样，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因此我在市革委会会议上讲，制定革命化的条例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革命化。所以，要整风就要首先整谢副总理的风。这样就打乱了他们以革命化的口号下，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这样就引发了会议上的冲突，导致市革委会会议矛头一转，出现集中火力批判我的上述情形。

关于反谢富治的一份旁证

笔者偶然地见到了一件关于北大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的材料(手写稿)，谈到了校文革和聂、孙反对谢富治的问题。录在这里，以备参照。

这是孙蓬一于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写的《我的初步检查》。该文从三个方面作了自我批判。一、在对待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态度上的错误。二、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方面的严重错误。三、对待群众问题上的错误。

第二部分“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方面的严重错误”中，谈到反对谢富治的问题对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原文如下：

(二)对待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

我竟在去年 4 月 13 日公开炮打谢副总理。这是一起不可宽恕的严重政治错误。

这一错误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它严重地损害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并为北京市以后出现过的几次炮打谢副总理的逆流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客观上给阶级敌人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可乘之隙。

在很长时间里，我对自己的这一严重错误，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去年 4 月 13 日炮打谢副总理的大会上，聂元梓同志曾两次写条子阻止我。但是，我根本听不进去，牢骚一发而不可收拾。事件发生后，聂元梓、校文革和公社总部的一些同志采取紧急措施，忙了一夜去消除影响，而我却若无其事地回去睡觉去了。甚至在聂元梓同志向中央作了检讨后，我还一度拒不检讨。以后勉强作了检讨，但并未认真触及灵魂，从中吸取教训，致使检讨以后，错误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对谢副总理的怀疑随着听到的流言蜚语的增加而加深。到了今年 3 月份，在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举办的高校学习班期间，在与校内外的一些同志接触中，又错误地议论过谢副总理，影响是很恶劣的。当时我校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攻击谢副总理，但在我的错误的影响下，校内写的一些大字报，印的一些传单，矛头也是指向谢副总理的。社会上出现了公开反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后，我一方面认为他们不应该贴，觉得没有中央的明确态度作根据，容易犯错误；同时，从内心里讲，觉得他们贴上也好，看看中央怎么表态。同时，说心里话，我当时是希望谢副总理能够被打倒。后来，从 3 月 19 日以后几次市革委会的会议情况，我虽已看出反谢副总理中央是反对的，但当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应公开表态支持谢副总理，回击一下反谢副总理的大字报，但我仍然不同意，因为一则对谢副总理的错误怀疑并未消除；另外，在我思想上还迷醉于一些流言蜚语，幻想这可能是中央的安排，暂时还不到打倒的时候；加之我觉得如何发表声明，我们自己也不可能作公开检讨，过去曾和有的贴大字报的单位一起议论过谢副总理，我们自己不检讨，还去批评人家，这说不过去。如果人家也起来揭发我们，我们岂不成了两面派？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连中央的精神也置之度外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一方面

检查我们自己的错误，一方面帮助有的单位的同志公开检查，对一小撮敌人则给予狠狠回击，用行动纠正错误，紧跟中央，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我却由于私心杂念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竟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说老实话，如果不是中央开了 3 月 24 日会议(1968 年 3 月 24 日夜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召开驻京部队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向与会者宣布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毛泽东出面接见了与会者，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先后讲话，在讲话中有“揭露”杨成武、傅崇碧在北京市反对谢富治、想夺市革委会的权等“罪行”的内容笔者)，以后只要一有气候，再次炮打谢副总理，再次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也是随时都有可能的。

去年 4 月 13 日，我第一次炮打谢副总理，事件的本身尽管不是预谋的，但是也并不是像我当时所检查的那样，只是由于“误会”，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事实上在这之前，由于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对自己的影响，已对谢副总理产生了怀疑。这一点，当时许多同志在批评中都早已指出，可是我讳疾忌医，拒绝了这些正确的批评，并且还对一些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同志，心怀不满，不去深刻检查自己，反而认为人家是受了朱成昭势力的挑唆，因而就采取了压制手段。结果，一方面使自己的病根未除，养痍遗患，又使自己和群众越来越对立，使很多抱着批评我的错误的好心同志大失所望，实际上把一批革命的同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另外，当时所以那样顽强地表现自己，还因为错误地觉得谢副总理偏袒地院(即“地派”的领军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笔者)，压了北大，心里想：北大不是好欺负的，非叫你知道知道北大的厉害不可。就是在这样极端狂妄、不可一世的错误思想促使下，才迫不及待地犯下炮打谢副总理的罪行。

过去对井冈山兵团中的革命同志，因我炮打谢副总理而喊出打倒我的口号，是以敌对情绪对待的。今天想来，这是罪有应得。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我既然犯了怀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群众为什么对自己就批判不得，打倒不得？应该说，同志们这样做，恰恰表现了同志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和

热爱，是一种革命行动。自己接受不了，只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大有问题。假如当时就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早就可以从这种打倒的口号中接受帮助，吸取教训，使这方面的错误及早得到纠正！

在谢副总理的问题上，我之所以长期坚持错误，除了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直在支配自己以外，还有一个更加肮脏的念头在不断地起作用，那就是如果谢副总理倒了，自己和公社这一派被别人长期以来抓住的一个最大的辫子也就不存在了，自己和公社这一派就可以彻底“翻身”，更加证明自己是“一贯正确”了...

第十六章 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下)?

不祥的警报

在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我讲要整谢富治的风，打乱了他们的安排，会议开不下去，当时会议就中止了。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会议，谢富治他们开小会作准备作安排，然后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我，就在市革委会会议上全都批我。批我“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厂的工人)都跟着发言批判我，表扬谢富治自市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功绩”。

这次批我的会，后来还在学校传达过。批我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就是说我在学校怎么压制另一派。我怎么压制呀？另一派要怎样写大字报就怎样写，要批谁打倒谁，我都没有卡他们。你要写我的大字报，也让你糊，你要骂我，也让你骂；说我是“破鞋”，弄一只鞋子吊在大饭厅里。有本事拿出事实来，只要能拿出一件事来证明就行。但是，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有生活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凭空捏造啊！没有办法，你骂我就骂吧。我也管不了。政治是非是政治是非，侮辱人是小人干的事！就这样也弄不倒我，我没有大的问题啊。中央有什么大的号召，我也全都响应过啊，我都是参加了的，不是对抗，只不过有的问题我的做法与他们不一样(当时我怎么能公开反对呢?)反正也抓不住我什么问题。

市革委会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是宣扬谢富治的功德，一方面批判我。开会我也不检讨，你批我就批吧，是我的错误，我改正，不是我的错误，我坚决不承认。反正也没有让我发言，我就听着，看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我自己心里有底，你还能批我到什么程度！

就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批判我的同时，我挨批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市革委会会议通过，背着我这个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们擅自决定，就向群众传达了，一直传达到街道居委会，连那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市革委会在批判聂元梓。

这次批判我的会，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但是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中，传达到街道上。我认为这事情不简单，这是要动员全市群众来反我呵！但是，在市革委会参加会议的我，又没有在会议上接到关于向学校师生传达有关情况的任何指示。我呢，开始是传达给校文革委员，没有在全校群众中传达。认为这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并没有要求把会议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到三、四天以后，知道谢富治已经在全市都传达了，这样，我和校文革委员们决定也向北大全校群众（包括“井冈山”的群众）传达会议对我的批判。

然后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刘新民的父亲是北京市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刘福。一天夜晚，刘福在市里开会，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从会上溜出来，对他女儿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谢富治刚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学校，决不许你回学校了。刘福是怕第二天学校出事情，怕他的女儿赶上出事，发生什么危险。这正是3月下旬的头几天。刘新民睡得迷迷糊糊，对她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刘新民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

在这以前，把我的事情传达到街道，我就感觉不对头，要出问题。这是动员群众反对我呀。他们反对我，又没有抓住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就要找出什么罪状来。这次刘新民传达的信息，要搞你们北大，也是要找罪状。我认为形势不妙，要发生什么大事件了，我更加坚定不移地，要把市革委会会议对我的批判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得群众在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况时，头脑是清醒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出人意料。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诉诸群众。我实在是着急，批我的后边总有大事发生。我和校文革的同志讲了我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开一个全校大会。

本来在北大已经是向全校传达过市革委会开会批我的事，但是，那一次只是讲聂元梓受批判，没有讲前因后果。我回到北大以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

不管你是哪一派，是北大的都来，愿意听的都来，开全校大会，把市革委会开会的情况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谁怎么发言，说的什么，谁怎么发言，批我什么，都告诉大家，一个发言一个发言地传达，将每个发言人批判我的内容都传达给全校的群众。实际上我就是动员，起动员作用，让全校群众的头脑都清醒起来。我是北大的人，我干了些什么，北大的人都清楚，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让大家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要不，外边的人都反进来了，北大人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呢？我是连锅端，不是光讲好事，批我的事，说我的坏话，我一样地说！把底交给了大家。

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3.25”大武斗事件。7个学校的学生同时到北大来进行武斗。

3月25日下午一点钟，我还在市革委会开会挨批判，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要我赶紧回学校。可是，这时我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在受批判，怎么能走得开？我就回电话说，别着急，不准还手。等我回去后再说。接到第一次电话，我还没有回去，我还在开会，过了一会儿，北大的电话又打过来，说是外校的学生要抢占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的门都挤坏了，形势非常危急，你赶快回来吧。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对峙的情况下，广播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只能通过大喇叭来指挥北大学生，控制局面，一旦失掉了广播台，不能及时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北大学生只能是各自行动，谁也掌握不住现场，大规模的混战就不可避免。我还是说，千万别还手，谁还手谁负责，我马上赶回来。可是，我还是得等到批判我的会议结束，才能离开。会议开完了，我从市革委会出来，红代会陈良赶来，同我乘车赶回北大。从白颐路赶到中关村，就见南校门一带，都是外校来打武斗的学生，有从南边的白颐路方向过来的，有从北边的成府路方向过来的，都汇集在中关村向南校门拐弯的路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徒手的，也有手中拿着棍棒和长矛的，显然地是作

了充分准备的。我坐的汽车根本没法通行，我们就顺着中关村向北，想从东校门进北大。在蓝旗营附近汽车还能走，到了东校门拐弯处那里，我看到人多得很，人山人海，来打武斗的学生像潮水般地涌进北大东校门。这还仅仅是我看到的情况，在我赶回来之前，已经有多少人进到学校里边，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人太多了，汽车走不了，陈良在这里下车回红代会了，我就下了车，让车调头。这时候我听到来北大打武斗的学生说，今天市里批聂元梓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我已经下了车，看到数不清的人群，前浪推后浪地往北大校园里涌，一想情况不对，外边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北大的学生也有上万人，局面如此混乱，靠我自己是无法解决今天的武斗问题的。要是真打起来，外校的学生很多，至少有几万人，北大的学生本身就上了万，你到北大来搞武斗，还能不还击？要是打起来，这得死伤多少人？不论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哪一派的学生，这些都是无辜的青年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顾不上别的，我必须马上去找武斗的后台谢富治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今天只有找到谢富治，才能制止这场大武斗。我就让车掉头，因为人多拥挤，汽车掉头用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在车下，听到外边来的学生那样讲，我就知道今天即将发生的大武斗，不是一般的人搞的。王茂湘转告我的刘新民所说的话表明，这就是林彪、谢富治的黑手。为了千百个学生的生命，我必须立即去找谢富治，公开撕破面纱，拉这个挑动武斗的后台来制止这场大武斗。

谢富治：“你真厉害！”

我乘车子当即赶回市革委会，看到吴德、丁国钰在办公室，我就问他们，谢副总理哪里去了？他们说谢富治回去吃饭了。吃完饭他还回不回来？他们说他们马上就回来。我就坐下来等着谢富治。我一边等，一边就赶到愤怒的心都要跳出来，憋不住了，我质问吴德、丁国钰，北大今天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每个校门口都是拥挤的人群，进都进不去。我说，“去年春天的北大武斗，是周景芳支持地质学院王大宾搞的。现在，王、关、戚抓起来了，周景芳也被关起来，这一次的武斗，是谁指使的？”我的意思就是对吴德和丁国钰讲，这武斗就是你们搞的。除了你们没有别的人。在我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吴德有气无力地拉着长腔说，“不知道。”丁国钰没有吭声。

等了一会儿，谢富治还没有回来。我就说，“谢副总理不回来，那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吧。”他们也不作声，不表态。三个人都憋在那里。这时候，我的心里非常气愤，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北大的场面又展现在我眼前。一分一秒，对我来说都是极为重要，千钧一发！

我后来才明白，当时这局面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他们想对付我，又找不到地方下手，今天策划武斗，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闹事，就是要给我栽赃。今天要是两边的学生打起来，损失肯定小不了，几万人的大武斗，这在北京就是创记录的最大规模武斗，那得死伤多少人？双方的学生都是要流血的，不管死伤多少人，都会栽赃到我头上，我就是后台，我哪怕不在现场，我是在家里，是在天边，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这武斗也是我指挥的，我聂元梓制造武斗的帽子就戴定了，我就被他们彻底地打倒了。我是没有什么证明我无罪的证据了。那他们就把我抓到监狱里，就除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顾不上思考的，我最着急的，还不是我个人的得失，我只想到，这场武斗，几万人打起来，那还了得？那该死伤多少人啊！不论哪个学校的学生，也不能看着他们死呵。我必须挺身而出，立即揪住挑动武斗的后台谢富治，把他一定揪到现场，与我一起制止武斗。要制止武斗，就得抓住黑手，就得盯住谢富治、吴德和丁国钰。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判断并非虚妄的臆测。北大武斗的帽子没有扣在我头上，因为我把谢富治“将”住了，“逼”住了。可是，后来要想逮捕我，抓不住我的把柄，无法给我捏造罪名的时候，却指责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北大校园里的武斗，我费尽心机去制止，我还能遥控指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汉中的武斗？可是，正如我上面所说，只要是北大打起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逃脱不了策动武斗的罪名。北大的两次大规模武斗，我都是亲自到现场，想方设法地制止了，汉中那么远，我哪里控制得住，鞭长莫及啊。）

我心里正在翻腾，谢富治回来了。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谢副总理，你对我有意见，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你为什么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去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我就是这么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的。（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受审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吴德还活着，他也没有出面否认过这件事。）

谢富治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那你说，今天的武斗谁搞的？这么多学生，同一个时间到北大，都提着棍棒刀枪，现在都快打起来了。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去。”谢富治说他不。他不去也不行。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是叫你们去制止武斗，就是北大打起来，也不能把制造武斗的帽子安在我头上。“我是要求市革委会去制止武斗啊！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叫他们两个人跟我去制止武斗，他们不去，你来了，我叫你跟我去，你又不去，那学生打起来，你们都得负责任！”谢富治急了，悻悻地说：“好吧，我跟你去，我不怕死！我和你制止武斗！”这样，我就逼着他们一起上北大了。我上了谢富治的车，要和他一个车走，我得盯住他，别让他半路上再溜了，别让他再出什么名堂。我坐的北大的车放空回学校。走在路上，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谢富治坐在后边，我不和他坐一块儿！我和他没有话说！丁国钰和吴德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车子跟着来了。

一路上，我都不理谢富治。我坐在司机旁边，就是要离他远一点儿。在车上，我们两人都没有吭声。走了一阵子，谢富治找话题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给毛主席提议的呢。”我一点儿都不领他的情，很冷淡地说，“不知道。谢谢。我当不了。”停顿了片刻，我说：“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助我制止武斗的。没有别的意思。”在这种时候，谢富治还想笼络人心，这办不到！

车子走到白石桥，离北大不远了，谢富治无可奈何地说，“你真厉害！你倒不了台。”我说，“我不怕倒台，我今天是请你帮助我来制止武斗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找他别的意思，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就是给我比你谢富治更大的官，我也看不上，我也当不了。我就是请你到北大制止武斗，我不是要投靠你，你也别拉拢我。你别说这些话。过了半天，他又重复地说了一句，“你真厉害！”

为什么不追查“3.25”？

当时，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我和他们三个人就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要求北大的学生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北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7个学校的学生，大约两三万人，准时准点地到北大校园里搞武斗，上面竟然没有人吭一声，就把这件事搁下了。这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利用北京市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指使学生搞武斗，然后又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中央文革也是装聋作哑，佯作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多恨我呀。否则，在北京，在中央文革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样大规模武斗，这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会，批判谭厚兰，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各个高校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指示不准搞谭厚兰。谁要批判谭厚兰就要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使，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北大有个学生叫陈颖，他参加了那天的会议。那个会召集到会的人数比较多。听了江青的讲话，陈颖马上就对江青失望了，他觉得江青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么大型的会议上居然靠造谣，靠胡说八道来维持自己，维护自己的嫡系，实在是太卑鄙了。因为批判谭厚兰那一天，我和陈颖都在北大，正好是空军的一些人员到北大来座谈，就在校党委的那个院子里，我们都在参加座谈会，我怎么能躲在角落里指挥批判谭厚兰啊？这是蒯大富他们搞的，批判谭厚兰。）

谭厚兰是批都批不得，7个学校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这比批判谭厚兰一个人，事情要大多少？武斗要打起来，该死伤多少人？可是谁问了？谁理了？谁管了？要抓出策划挑动武斗的黑手并不难，只要把到北大搞武斗的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和牛辉林找来，询问一下情况，为什么不同学校的学生会同一个时间到北大，是谁的指使，问题不就清楚了？可是就是没有人管！查清这次武斗的根源，是很简单的，结果是没有人管，没有进行追查，不了了之。

林彪的讲话一箭双雕

1968年3月，真是风波险恶，一浪接一浪。先是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批判我，并且把情况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然后是“3.25”大武斗，到3月29日，我在北大校园里制止武斗时负伤。其间，还有林彪在“3.24”、“3.27”两次大会上点我的名，暗示我与“杨余傅反党集团”有牵连，江青跟着林彪推波助澜，对我雪上加霜。

1968 年的 3 月 24 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干部紧急会议，林彪、江青他们在会上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反革命集团”并对 3 人进行组织处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在这个会上，林彪就点了我的名，给我栽赃。只是因为当时听到这个讲话的都是军人，没有扩散到社会上，我没有及时地得知此事，反对我的人也没有及时得知此事，因此，才没有在社会上迅速激起反响。

3 月 25 日，七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搞武斗。

3 月 27 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 10 万人的群众大会，批判“杨余傅反革命集团”，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我特别地注意林彪讲些什么，因为刚刚发生了“3.25”北大武斗事件。林彪的讲话是一箭双雕，他说杨成武是两面派，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林彪暗示我和杨成武是有黑关系的，林彪说杨成武不愿意要这个代总参谋长的“代”字，想当总参谋长，有野心。林彪说，杨成武讲了一件事，是当着聂元梓的面讲的，后来呢，杨又出尔反尔，否定这件事。当着聂元梓面，他就不承认。林彪没有具体说这是一件什么事。在大会上，马上就有学生趴在我的耳朵上说，“你这次又立了大功。林副主席讲的是什么事啊？”我当即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林彪是当面造谣，可是这句话我不敢说出口。我和林彪、杨成武从来没有三个人在场讲什么事情的场合。再说，他根本没有讲他当时对杨成武讲的是什么事，这就更加无从谈起。

（笔者没有找到林彪的“3.27 讲话”材料，据查，林彪在“3.24 讲话”中，曾这样讲道“再一个就是杨成武的政治品质很坏，是一贯两面三刀的人...他为一件事情，跟了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他说呀，事后他赖账，他说他没讲。”这段语焉不详的话，把聂元梓扯了进来，但事实真相何在，就令人寻味了。笔者）

林彪的“3.27 讲话”，加上他指使谢富治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的事情，我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他这个人当面说瞎话，当面造谣言！当着 10 万人的面，当着我和杨成武的面，他就说假话，把我作为一个证人，把我置于非常尴尬的地步。同时，他又似乎在暗示什么，暗示把我说成与杨成武是一伙的。他是副统帅，全党全国除了毛主席就数他了，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还有江青，在这个会上也点我的名，说叫我反右我反左，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与林彪互相唱和，对我下毒手。江青谢富治怀疑我有后台，否则我怎么会同他们那样地顶着对着干。因此，他们就怀疑到杨余傅头上，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结果，“3.27”大会以后，北京城到处都刷上了“打倒杨余傅反革命集团！”和“聂元梓是杨余傅的小爬虫！”的大标语。还针对我反对谢富治的态度贴出“拥护谢富治！”“谢富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所以，“3.27”10万人大会，不仅是向群众公开宣布杨余傅的“罪行”，而且是进一步地为北京大学受7校围攻打武斗提供理由，进一步地扩大北大武斗的动员令。“3.25”武斗如果说是“师出无名”，“3.27”则由“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正式地宣布，聂元梓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是杨余傅的小爬虫，当然应当除之而后快！

校内武斗谁之罪？

3月25日，谢富治到北大讲了几句话以后，当时的大规模武斗是解决了，7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离开了北大。还有一些来武斗的人员就留在北大，住进了“井冈山”的地盘。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受到追查，更谈不上认真处理。如果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有意保护学生，制止武斗的话，他们应该当时就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会议，批判这种到北大搞武斗的行动，并且把7校的头头抓起来，追查后台，严肃处理。可是，正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就是要对付北大，是这次武斗的幕后支持者，他们当然不会贼喊捉贼了。

“3.25”大武斗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武斗之风并没有刹住。林彪和江青的“3.27”讲话又给到北大打武斗的人们打了气鼓了劲。7校到北大搞武斗的一部分学生留下来，住在北大“井冈山”，帮助“井冈山”在校内搞武斗。当时“井冈山”就在校园里抢占楼房，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往楼外面乱扔，建立武斗据点，摆开在校内进行武斗的架势。北大的形势就发展成由校外来人搞武斗，演变为在校内两派学生自己打了。一些外校的学生，也冒充是北大“井冈山”的人，以本校学生的身份参与武斗。外校人员就住在“井冈山”那一派的宿舍里。那一段时间，在饭厅里吃饭的人突然增多了，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

在这样的局势下面，应该怎么对付？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现在仍然很困惑。至今我都无法判断是否有更好的做法。由于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插手，校外校内两派斗争了这么长的时间，双方都发展起规模很大的组织，现在，“井冈山”在外校学生的支持下，准备武斗，蠢蠢欲动，我们是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防备和反击他们，以武力对武力，把武斗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争取损失最小，伤亡最小，还是拱手相让，无所作为，听任“井冈山”在学校内放手地武斗，听任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自发地与他们对抗和还手？那不就打成一片，失控的学生，在盲目的冲动之下，会流多少血，死多少人？从道理上讲，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应当避免的，但是，在无法避免的武斗面前，你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还适用不适用？你的上级，有能力制止武斗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不吭一声，都放任武斗，你怎么办？要不要做好应付武斗局面的准备？

比较起来，北京大学的武斗，在各高校中，是最有节制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北大公社”占了主流，另一派只是在校外活动。而且，校文革的成员都比较稳重，不像蒯大富那样幼稚、冲动。我自己呢，一直是反对武斗的，我相信，靠武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经过的政治斗争，毕竟比那些年轻的学生们要多得多，思考问题也要深刻一些。因此，无论在校外校内，我们都没有主动地挑起武斗，没有主动地去打别人，都是人家打过来，逼迫我们还手即使这样，不管是1967年的“4.11”，还是1968年的“3.25”，外校学生到北大闹事挑衅，我都是亲自出面，以致把谢富治“将军”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3.25”大武斗之后，形势恶化了。校内的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由校外来人武斗转变成校内武斗，“井冈山”在校内强占宿舍楼，建立武斗据点，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从楼里扔下来。“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当然不能忍受，因此就经常发生磨擦，引起冲突和流血事件。形势非常严峻。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们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组织学生不要自发还击，把因牛辉林指挥强占宿舍楼、乱扔学生的行李衣物引起的小打小斗压制下去，不要由小打扩展成大打，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方面又叫王茂湘做“井冈山”方面的工作，对对方的群众进行说服劝告，不要站错了队，不要被挑动打武斗，动员“井冈山”的群众“下山”，退出“井冈山”，瓦解“井冈山”，釜底抽薪。王茂湘的“挖山”工作很有成绩，被称为“王铁嘴”，因为他

讲话占理，别人都说不过他。他的做群众工作的才能是很出色的。（可是，后来对王茂湘的处理却是非常荒谬非常错误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言行，就压制他，又开除他的党籍，不给他评定教授职称等等。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作对付校内武斗的准备。新北大公社采取的是有组织地对付“井冈山”武斗的办法。总得有人具体负责呀，不得不让什么人出面处理校内武斗的情况，所以他们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处理武斗事件。为什么找高云鹏？因为高云鹏做事稳重，有思想水平。在高云鹏的领导下，他不会主动地去打武斗，不会乱来。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同意动手流血。假如不是高云鹏这个人当时负责“文攻武卫”，那北大的两派武斗会打到什么程度，是无法预料的，只会比现实更严重。高云鹏不仅不会主动地搞武斗，而且很有主见，从来不听任何人的盲目冲动的意见。我亲眼见到，好多学生围着高云鹏，非常冲动地要求打武斗，高云鹏都不受他们的情绪影响，不许他们动手。

因此，在北大的武斗中，是没有打死人的。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

而且，我自己还在制止武斗中受了伤，流了血。1968年3月29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扎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个大坏蛋，而来扎我，是受了蒙骗。他的后台就是谢富治。这次，谢富治是在公安部，我到公安部去，在东门传达室给他打电话，要他一起到北大去制止武斗，他根本不出来。

北大的校内搞武斗，我也管不了。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两派学生是一视同仁。在我心里，对学生之间，坦率地说，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井冈山”那

一边的学生，都是跟着王关戚，跟着中央文革搞起来的，跟着他们跑。“天派”这一边呢，一直就是受到江青呀，中央文革呀，谢富治呀，受他们的压迫。江青就说，北大运动搞得太“温”了，聂元梓你搞得太“温”了。开大会批斗陆平的时候，陈伯达说北大是“一潭死水”。因此，我的倾向性，不是因为说这一派的学生拥护我，那一派的学生不拥护我而产生的，我是从本质上看问题，这一派是反对王关戚、反对江青谢富治的。那一派是跟着江青，跟着王关戚，王关戚倒台了，我们还是大讲反对王关戚，反对没有王关戚的王关戚势力，继续打王关戚，实际上就是指中央文革，我们不能公开讲对抗中央文革啊。

为高云鹏声辩

后来，高云鹏被指责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策划、指挥者，被判处 10 年徒刑。这是非常不公平，完全没有道理的。

如前所述，北大武斗的起因，是由于别的高校学生到北大来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新北大公社从来没有到社会上、到别的学校去挑起武斗事件。人家打到你门上了，你怎么办？置身于局外，可以说，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犯罪。可是，处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全国各地，哪里不在进行武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派，能够在对立的一派的武力攻击之际，自动地放弃抵抗和自卫。能够像高云鹏那样，把武斗局势控制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再说，武斗从来就是双方的事情。北大武斗，是有背景有后台的，在学校里，采取主动进攻的是“井冈山”牛辉林。7 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打武斗，是有牛辉林和“井冈山”做内应的。后来，7 校的武斗人员有一部分留在北大没有走，他们也是和“井冈山”“共同战斗”的。论武斗的责任，他们要大得多，为什么牛辉林就没有判刑，只有高云鹏代人受过呢？

北大武斗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就是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还有林彪。我说这话的根据，不仅是刘新民提供的信息足以证明，更重要的是，“3.25”这么重大的武斗事件，就发生在北京市，发生在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的眼皮子底下，是我把谢富治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流血，奇怪的是，居然事后就没有人过问，不了了之。几万人参加的事情，要追查是很容易的，只要把 7 个学校的学生头头找到一起，一一查问，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就可以找出这次武

斗的指挥者。可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却不去做。中央文革不理睬，北京市革委会也不理睬，就听任别的学校和北大校内继续对新北大公社动手打武斗。没有人保护你，你还能不进行自我保护？

至于汉中武斗，高云鹏也不是武斗的策划者，他曾经去参加汉中一派群众组织召集的会议，不过，当他赶到会场时迟到了，当时策划炸毁“汉运司”大楼的会议已经结束，根本不存在他参与其事的可能。他怎么能够成为这次炸楼血案的主要“罪犯”？

因此，对于高云鹏的处理，是非常错误的。当抓捕高云鹏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我还到他家里去给高云鹏的妻子送过钱，在生活上帮助她一点儿。高云鹏被关进陕西的监狱以后，我还冒用他家人的名义给他写过信，表示关心，不料，这封信被监狱管教人员识破了，为此，我还受到查处。但是，今天我仍然要为高云鹏申辩，他不过是北大武斗的替罪羊，就像我做了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一样。

现在我们回头看历史，北大武斗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我逼着谢富治到北大讲话，“3.25”大武斗制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对于武斗后台居然毫不追查，有意纵容，因此，武斗从校外转到了校内。北大“井冈山”已经开始强占大楼，动手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行李从楼上扔出去，小规模冲突，相互动手动脚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北大公社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由学生自发打群架，还是有组织地缩小武斗，把武斗控制在一定规模？当然，完全避免武斗，是最理想的了，可是，这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若是你在这种处境下，你会怎么办？

“你可干了一件傻事”

我叫谢富治制止武斗以后，别的人找我，说“你可干了一件傻事。你为什么要找谢富治来制止武斗？你不要管，不要出这个头嘛。只要武斗打起来，事情闹大了，你们北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下可好，你是给谢富治送了一顶制止武斗的桂冠，给谢富治脸上贴金了！现在北大的武斗也没有解决，由校外来打变成在校内打。这么一来，你们就不好办了。”我的一肚子话，没有敢跟他说，北大武斗的事情，事关重大，关于谢富治，关于林彪，这都是压在心里不敢讲的事啊。我去制止武斗，学生们嘲笑我说，我主张左脸蛋挨了打，再把右脸蛋也凑上去。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跟这个差不多。我说的是，即使挨了打，也不要还手，赶快离开吧。我自己呢，人家上门来挑衅，来打武斗，我不但不组织反击，还要去向人家道歉，平息事端。其实，那时候，我只能这样做，只能把来武斗的学生劝走了，哄走了完事。要不，武斗打起来，不管有理没理，反正都会栽赃在我身上，都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的罪行。江青、谢富治一直都想要搞垮我，就是找不到理由，没有机会下手。

我和谢富治斗争的情况，我谁也没有讲过，我一直闷在自己的心里头。这个事情涉及到林彪，所以我一直没有暴露过。要是仅仅涉及到谢富治，我当时就讲出来了。那时候林彪是副统帅，我当时不能讲。我要讲了能行吗？我就是当个冤死鬼，也不能讲。我对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周总理也不知道北大武斗的真相。谢富治又是受林彪指示的，林彪能个人指示吗？他知道学校里的情况吗？准是江青陈伯达他们捣咕出来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希望拔掉北大这颗钉子，因为在文革初期，北大一张大字报被利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据点，现在，北大早已不跟着他们了，成了反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要把我除掉，然后派别的人来北大，这样就能领着学生跟他们走，照他们的指示办了。后来林彪垮台了，迟群谢静宜整我的时候，我也不能讲，那时候谢富治还没有倒，江青还在台上，他是紧跟江青的啊。

这前前后后不证明正是你谢富治搞的阴谋，挑动武斗嘛！怎么后来往监狱抓我的时候，在北大开全校大会，宣布说是我搞武斗，宣布说我是武斗的后台？我搞武斗，还能是把外校的上万学生召到北大来打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不叫北大学生到别的学校去砸他们的广播台？不到他们的学校搞武斗？

我被抓到监狱以后，第一个审问的事情就是武斗。不但是说北大武斗是我搞的，我还是陕西武斗的后台！审了半截，我讲完制止武斗的全部情况，和林彪指使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的经过，审问我的人都惊呆了。原来他们都以为，这下可抓住我这个大武斗的后台了，哪里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大武斗的后台是林彪和谢富治！他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什么的都用不上了，预审员张口结舌地无法继续审问，就宣布暂时停止审问。以后也没有再追问下去。那个预审员（姓陈）后来对我说，“你在制止武斗的事情上，还是立了一功的。你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吧。”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党中央，交给陈预审员转交。

(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表功,是尊重历史。我不是要为自己争名利,是要讲出历史的真实。这些事情,我不讲,没有别人会讲。安子文的问题,换了别人,可能就是装作没有看见,安子文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对我自己又没有什么切身的损失。他愿意跟什么女人睡觉都行。我要想当官,我只要找安子文就行。现在跟谢富治斗,也是因为我对形势的认识,我要想当官想提拔,我为什么不能顺着他,顺着江青陈伯达?我现在讲这些,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为了很多跟着我受到牵连的人。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要让人们知道,我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着林彪江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人?不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

当时,有一次,我曾经跟赵建文、肖灼基等商量过,以我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向他揭露王关戚呀,谢富治呀的情况,让他明白谢富治是什么人,不要再上他的当了。肖灼基说,这样的信不能写。我就说,现在不能写的话,那咱们先整理一下材料,要不,时间长了,事情就忘记了,或者人走散了,这些情况也就汇总不起来了。肖灼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落个什么下场。再说,现在是谢富治正红的时候,你告谢富治的状,能有什么结果?这样,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就失去自由了。

1967年的9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已经暴露出来中央文革这帮人的庐山真面目了。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王力、关锋被抛了出来。这时,北大的所作所为,也已经明显地证明,我们反王关戚的矛头所向是正确的。中央文革怕把王力、关锋抛出来以后,被事实所说服的群众会拥护北大。此时,北大已经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起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或据点)变成了反对王关戚(也就是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怕公开抛出王力、关锋二人后,北大反对他们的力量会增大,怕北大“翘尾巴”,所以,在当时召开的一次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座谈会“文革”头两年,中央文革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就狠压北大,特别突出地批我。江青在会上公开讲,聂元梓反对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江青着重讲了她和我的关系。江青说,“我和聂元梓过去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来往。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也没有来往。她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就把我抛出来了。当时中央文革每一次开会,都是有录音的。我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

为后来判我刑的时候，指控我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和江青确实如此，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没有来往。我列席参加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期间，江青请我吃饭的时候，她对我表示热情，她让我有事直接找她，让我也通过李讷找她，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67年春天的时候，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拉过我几次。他们找我谈话，要求我和他们一致行动。他们说，你是市革委会的，是大学红代会的，又是北大校文革的，身负重任，身兼数职。你有功绩，有影响，我们愿意和你合作，希望我们能一起搞。这话对我说过几次，可是我“听不懂”，没有反应。最后一次，他们的话刚刚说完，我没有吭气，站起来就走。陈伯达追出来，直向我道歉。从这以后，他们就到处讲，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都不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这时确实也不是完全听了，我已经有些跟不上，也不想跟了，详情见下文）。连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其实就是不听他们的话。

不但是江青指责我反谢富治，毛主席也认为我反谢富治。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召见北京市高校的红卫兵“5大领袖”（详情见后），在讲话中，毛主席曾经当面对我说，“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

这时候，社会上，反军，冲军队的思潮很厉害，凡是我能管得了的，我都制止了。新北大公社的个别人带着学生冲过一次军队，我没有办法把北大全都捂住，但是我的基本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坚决拥护解放军。所以毛主席说我拥军是正确的，反谢富治是错误的。

第十七章 欲罢不能

几个问题，真想问问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越是向前发展，我的不理解就越多。

在那时，我头脑中已经有一些想法。一个是怎样区分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专门讲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总是说现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文革中实际定性处理的大量的敌我矛盾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是必学文件，现在成了“黑修养”，这怎么解释？第三个问号是，跟

毛主席当年一块儿搞革命的人，现在都成了坏人了，毛主席怎么过去就没有发现他们一点儿问题？第四，还有，在 1966 年年底，67 年初，我就在想，这么大量地整干部，是不是应当？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整干部整得人人自危，毛主席说“抢救运动”是错的，现在这样整干部，比那时候还要严重，数量这么大，面铺得这么宽，这能说是正确的吗？如果搞得不对，这事怎么收拾？“抢救运动”搞错了，说是康生搞的，账算到了康生头上，毛主席出来扭转局面；这一次搞文化大革命，“5.16 通知”写得很清楚，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报纸上和中央文件也一直是这么宣传的，若是做对了，那没有问题，若是搞错了，这是谁弄的？谁能收拾这大局？这几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越想越不明白，可是，我谁都不敢讲啊！

我曾经想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我自己悄悄地问问他，看他有什么指示，可是后来也一直没有问。毛主席上天安门啊，几次接见红卫兵啊，国庆节庆祝活动啊，几次上天安门都有我参加。我多想乘机向毛主席请示啊！当时，开群众大会也好，接见红卫兵也好，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人员，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时间长了，站累了，人们就到大厅里休息休息。天安门城楼中间有个大厅，大厅两边都有小房间，放着几个小沙发。毛主席一般都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他的周围都没有人，没有人走到毛主席身边去，更没有人跟他说话。人们在大厅里出出进进，但是谁也不到主席身边来。总理要是出来进去，就有很多人围着他问话，请示工作。我问总理北大要不要成立校革委会，就是在大厅里问的。可是，毛主席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不管时间长短，都没有人过去跟他说话。每一次都这样。我鼓足了劲想去问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问题，关于对待大批老干部的问题，可是一旦到了毛主席身边，就又打退堂鼓了：算了，别问了，毛主席能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时候，把毛主席说成了神，我自己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敬畏，无法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了。

到夺权的时候，我正在顶着这股夺权风，我是光联合，不夺权，就是那段时间，我再次起了念头，非常想找个机会问问他。有一次，毛主席找我，不是在大厅里，是在城楼上，他问我，情况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毛主席和我谈话，报纸上还登出这张新闻照片，毛主席因为个子高，在照片上，他正在弯着腰向我问事情。这照片还贴在北大校园里。我那时要是鼓起勇气问问他，把话说出来就好了。

鼓了几次勇气都没敢问。也许，我们对他太敬畏了，他身上的灵光圈，把群众和领袖隔开了。

这几个问号，我没有去问他，可是，我的行动上是非常注意的。我是顺着大流走，坚决不出头，不领潮流。人家到处夺权抢权，我就没有去夺。我就是搞大联合。社会上批斗会上又戴高帽子又挂牌子，坐“喷气式”，搞体罚和人身侮辱，我斗陆平，文明讲理，树了个样板，北大就是这么斗。其他的人，我也管不了，北大一万多学生，我哪里能管得住？还有，对北大的教授，我都是尊重他们的，我没有指使任何一个学生去斗哪一个老师，去斗哪一个学生。像季羨林、周一良，在他们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都说是因为反对我而受到迫害，其实，我对于他们挨整的事，毫无所知。校文革也好，新北大公社也好，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请示我的，我也不能把北大的每一件事情都抓过来，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处理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这有多少头绪，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然我也做的很不够。我那时候应该是工作做得更主动一点儿，主动地找几个老师，找几个教授，跟他们谈一谈，定定他们的心，那就尽到我的心意了。

不许辞职

说实在的，“文革”初期，我曾经兴奋过，以为有了真正发表自己的意见，沟通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但是，此后的运动发展却使我越来越困惑。到了夺权阶段，尤其是对于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关、戚等人产生怀疑，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我觉得，把那么多老干部统统打倒，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武斗越打越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作为北大校文革的主任，自己对许多事情都想不明白，还怎么领导全校师生把运动进行下去？

还有，从这时候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对毛主席所信任和重用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产生了怀疑，我就逐渐不愿意紧跟毛主席了，不愿意把运动搞下去了。

1967年夏天的7、8月间，我去看杨惠文，和杨惠文说了这些想法，想从运动中退出来，不干了。杨惠文说，你别看现在搞得这么乱，毛主席到时候有办法收拾。你要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

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再出面了。讲到她自己，杨惠文说，她现在是当作“走资派”接受批斗，反正现在打成“走资派”被批斗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她也不着急。这真是怪事，文化大革命搞了刚刚一年，别人以为我这样正在得势的人物忧心忡忡，杨惠文这样被“打翻在地”的“走资派”反而一身轻松，非个中人不足道也。这正是“文革”的荒谬之处。杨惠文劝我退身避祸，这些话说得都对，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想抽身退出也做不到了。

按照我自己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到 1967 年夏天，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该夺的权也都夺了，该回到正常的秩序上来了。1967 年 7、8 月间，我做了学校里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工作。虽然我个人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终于没有成功，派性越来越厉害，武斗越打越凶。鉴于全校的局势恶化，全国各地都是群众组织分裂，严重武斗，文化大革命形势十分混乱的情况（1967 年 7、8 月间，全国都是处于最混乱的状态；如果说“文革”是十年内乱，那么，这两个月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湖北的“武汉事件”，北京的“揪刘火线”，上海的“上柴联司武斗”，“揪军内一小撮”，等等，都在这两个月，全国武斗的高潮，也由此开其端。笔者）我认为这样继续下去，文化大革命发展下去，必然无法预料其前景。根据我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以及根据我对于校文革成员的了解，我们都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因此，在此期间的一次校文革常委会议上，我就讲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我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我们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当时，我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就有人马上提出反对，有人说我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常委们都拥护这种意见，我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但是，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接着过了没几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在周总理出席的情况下，我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当时，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当时江青很严厉地训斥我，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我怎么办？我想退下来都不行啊。毛主席肯定过我们的大字报，给我那么大的荣誉，八届一中全会上，是毛主席提出让我负责成立校文革的，我不胜任、不想干了，也不能一甩手就下台，不能随便撂挑子，必须经过请示中央批准。我的党内组织观念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既然江青明确表示了态度，周恩来等人也都默认了要我继续当校文革主任的意见，我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是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沉浮，不可能不犯错误。

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中，我讲到当时我的这种思想状况，我说，1967年秋季以前，北大校文革所犯的的错误，我全部承认，认真检讨，但是，从这次接见会上，江青不准许我辞职，形势所迫，我不想干都不被允许，那么，对这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不能负责，不能承担责任。因为我明明知道形势越来越复杂越困难，我没有能力应付，所以我请求辞职不干，江青等人还必须要我干，周总理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我是被逼无奈，勉为其难，完全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对北大校外校内发生的种种不测负责呢？

蒯大富：骑虎难下啊！

文化大革命就像一个旋涡，把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而且是一旦卷进去，就变得身不由己了。运动发展的某一阶段，作为个人，可能从中会感到得到了一些利益，因此而积极地参与它，可是，到下一个阶段，当你发现其中充满了险风恶浪，想要退出这旋涡，以躲避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却发现，你无路可退。所谓形势逼人，不到这个时候，就没有真正的体验。

这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不但是我有，蒯大富也对我说过，是“骑虎难下”。那是1968年3月，北大的武斗，从外面调人来搞武斗的阴谋失败了，他们就改变了策略，在北大学生内部制造武斗。挑动校内的两派打。可是，这样子，武斗的帽子也跟我没有关系。我看的明白。我在北大为了不让学生参加武斗，还受到了很多指责，受了很大冤枉。

这时候，蒯大富在清华搞武斗搞出了大动作，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百日大武斗”的时期。我怕北大的武斗影响了他，怕他误以为北大是我在搞武斗，所以他也在清华大学打武斗。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上，我们和蒯大富谈话，劝他不要打武斗。蒯大富真是风尘仆仆地来了，像是刚刚从武斗战场下来的样子。我对他说，清华的造反派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你蒯大富不要在清华搞武斗了。你不要看见北大在搞武斗，你就搞武斗。我告诉你，北大的武斗不是我聂元梓搞起来的，将来我是不会为武斗负责的。可是，你清华的武斗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蒯大富是要负责的。武斗的罪名你是抹不掉的。”这也能看出我对于搞武斗的基本态度。蒯大富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没有明白我所说的话，他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

第十八章 长达 10 年的隔离审查

毛主席凌晨召见

1968 年 8 月初，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北京各所大学。

此事是从清华大学发端的。1968 年 7 月下旬，“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制止武斗的名义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受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武力抵制，死伤数人。这件事情，产生很大影响，也让我更加困惑。

为此，毛泽东连夜紧急召见了北京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我也在被召见之列。这次谈话，从凌晨 3 时半到 8 时半，足足 5 个小时，可以说这是毛主席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自表态赞扬红卫兵运动以来，对红卫兵的一次最直接、最时间长的谈话，此前，都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开会，发表指示。这次毛主席召见，周恩来、江青、谢富治等都在场。只可惜，这不是在运动初期指示红卫兵应该怎么行动，也不是在红卫兵运动中期研究新的情况和对策，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宣告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在召见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高校中两派对立、打武斗的现象，并且明确表示他是支持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领导学校的。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当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正在指挥“井冈山”的人马对抗工宣队的进驻，毛主席召见的时候，找他找不到，直到召见快结束的时候，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

堂。有文章写道：蒯大富一见到毛主席就放声大哭，说“毛主席不要我们了”。据我的记忆，蒯大富的确是含着眼泪，而“毛主席不要我们了”的感觉，恐怕在现场的几位红卫兵领袖，都会有同感。我呢，因为先前已经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怀疑，对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产生了怀疑，在现场就表现得比较镇静。

（毛主席的指示，根据有关资料，节录如下：

毛主席说：“今天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4个办法：1、实行军管；2、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作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3、斗批走；4、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10年8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说，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还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转引自《北京大学纪事》。笔者)

毛主席召见我们的时候，专门对我讲，“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毛主席接见完了，我们出会场的时候，谢富治说我、蒯大富、韩爱晶，主席批评你们，

你们一句也不检讨。我想，我拥军是对的，反对你谢富治也没有错。我没有理睬谢富治。

工、军宣队进校接管一切

接下来，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全国所有的大学和中学。

工宣队军宣队一进校，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尽管说，我这个校文革主任的名义和后来所挂名的北大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工宣队进校起，我就交权了。到 1968 年 9 月，又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我和北大原来的两派头头一起，隔离或者说是半隔离起来。

工、军宣队进校，领导一切。工、军宣队就是支持“地派”的。毛主席说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到大学里来，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要教育学生，但是，工、军宣队实际上是谁指挥的？就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指挥的。林彪、江青他们支持“地派”，工、军宣队也支持“地派”。迟群、谢静宜同样支持“地派”。迟群、谢静宜在北大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其实，我如果不反对王关戚，不反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不反对中央文革，我要是一直跟着他们走，可以说，我进中央是没有问题的。运动初期，江青就曾经向我发出信号，要我有事情就同她联系。我只要顺竿爬，哪里轮得到迟群、谢静宜掌权之后作威作福，对我狠下毒手。江青他们讲，我反对谢富治就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其实，我要是想当官，我可以一点儿力气也不用费，只要跟着他们走，连溜须拍马都不用，就上来了。但是我不是为了当官，哪有一个想当官的人会反对有权力提拔自己的人？那时候毛主席也是这样，你只要跟着他，跟着江青，就提拔上来了。江青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我说得很明白，让我有事情就找她，“你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请示我，给我打电话，或者找李讷，让李讷转告我。你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就是一次都没有找过她！

工、军宣队进入学校，不只是在北大，在全北京市都是支持“地派”的。而且在全国也是支持他们挑动群众分裂、拉出来的那一派的，只是各地组织的名称不一样就是了。跟他们走的，受到他们支持的，都是“造反派”，反对他们的，都是“保守派”。在北京，凡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中央文革就赶紧叫他们成立革委会，想把学校里很快稳定下来。“天派”这一边，就鼓动另一派学生打

内战，让你不得安生，你成立不成立革委会，他们根本不管。学校内部闹得凶的，都是“天派”的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都是很快就成立了校革委会的，都没有闹；天派占优势的学校，北航韩爱晶因为年纪轻，可以被利用，把彭德怀关在那里，也没有闹，就是清华和北大闹得厉害，内战不已。蒯大富因为反对过江青，所以也受中央文革的排斥。

工、军宣队进学校，支持的是“地派”，所以后来各个系统，工厂、学校和机关，掌权的都是“地派”。什么“天派”“地派”，这是中央文革拉出来的派，并不是群众自己分裂出来的，被划为“天派”、“地派”的两派学生，各自从来没有在一起集会，没有组织起来互相联系，更没有什么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天派”、“地派”的帽子是江青扣上的，是中央文革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群众组织里划分亲疏，只有群众分裂了，他们才能控制局面，拉一派打一派。

工、军宣队进校以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工宣队批我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康生，反42年延安整风。事情的起因是，68年国庆节过后，我处在半隔离状态，我和王茂湘、孙蓬一等人都在姊妹楼那里隔离着，白天办学习班，吃饭和晚上睡觉可以回家，但是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离校。有一天在楼外面的草地上，我对他们讲了下面这些话，我说康生当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一贯整人，是个坏蛋，现在又这么整人。我是害怕如果我被抓起来，他们还不知根底，继续找康生和中央文革，所以，我要他们认清康生的真面目。结果不知道谁向工、军宣队报告了。所以工、军宣队就批我反康生。

（前引孙蓬一的《我的初步检查》中，也讲到工宣队军宣队进北大后排斥校文革的情况：“我原来想，新北大校文革是中央一再承认和支持的，宣传队进校以后，一定是很明确地支持校文革的。对宣传队领导北大的一切我是丝毫也不动摇的，但又想，既然校文革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就不能把校文革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立起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打破了过去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校文革。当我知道别的学校是宣传队和革委会联合出通知，共同搞活动，而北大却不是这样，我开始有点想不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有有点担心，担心这样下去，会把校文革给否定掉。当时就想，如果否定了校文革，那么北大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怎么来写呢？”

“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毕业生纷纷离校。好多毕业生在临走之前向我诉说了他们当时在校文革问题上的不舒畅的心情，这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在庆祝祖国山河一片红进城游行时，我们校文革的大旗没有打出去，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后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又偏偏和某大学的游行队伍面对面相遇。看到他们打着革委会的大旗，而且还晃来晃去，故意向我们显神气，这时我就过于敏感，总觉得他们是故意奚落我们。当时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中央承认的权力机构，他们可以打革委会的大旗，而我们就不能打？越想心里越觉得憋气。这种情绪，后来就在学习班的一次会上表露出来了。...”录在这里，供参阅笔者)

余汝信：《1968.7.28 毛的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窃以为，无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将文革史加以分期，炎热的 1968 年 7 月末都不失为一道重要的分界。由此回溯至 1966 年 8 月的整整两年，应可冠名为“红卫兵时期”；此后，或可称之为“后红卫兵时期”。而这一分界最重要的标记，则是 7 月 27 日由中央警卫团（代号 8341 部队）指挥的三万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突然进占受两派学生武斗蹂躏已久的清华园，以及次日凌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对聂元梓等“五大领袖”的集体召见。

史载：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三时半至上午八时半，毛泽东、林彪召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破天荒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之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陪同召见及参与谈话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

到底是清华园内团派的负隅顽抗刺激了毛的神经，从而导致了这一常人都进入了酣梦时分的凌晨紧急召见，还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毛有计划的、蓄意的安排？直至今日，我们尚缺乏资料，难以准确判定。而据韩爱晶君告之笔者[2]，他认为，曾经狂飚般横扫整个中国的红色风暴，早已在一年前的 1967 年夏季失却方向，步入迷途，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群体，多次失却了历史曾经给予过他们的机会，以致到 7 月 27 日这一天，最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蒯

大富本人对韩的这一说法未置可否），而毛泽东一旦将由军队指挥的“工人阶级”推上了前台，红卫兵们的退场已是历史的必然。

有关这次召见的经过，目前尚未见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开。公开出版物中，原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陈永康所著《红色季风》（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有相对来说较为详细的转述。去年底出版的官方所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述及了这次谈话的梗概（见该书页1521-1525）。该书的基调是为毛开脱，同一件事，于毛是犯错，于林彪、江青则是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关键处皆大而化之，多未说清楚或者可以说是故意不去说清楚，对这次召见谈话的描述亦然。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花一点时间探究一下事情的本来面目。

一、“五大领袖”封号的来历

《毛泽东传》：“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他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页1521-1522）

《毛泽东传》的作者可能忘记了，毛泽东本人说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首先放火的是毛本人，而不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毛还说过：“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3]

按毛泽东以上所说，始作俑者，是毛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毛在文革初期鼓吹的“造反有理”，才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

至于“五大领袖”，据蒯大富告诉笔者，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封号”，还是肖劲光告诉他，是毛泽东本人的原话。韩爱晶补充告之笔者，1967年上海“一

月革命”后，毛提出北京要走不同于“上海人民公社”的路子，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毛为此设定了“北京模式”的具体步骤：先成立大专院校、中学两个红代会及工代会、农代会，形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后，再与军队干部、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三结合”，组成革委会。毛还指示，大专院校红代会主要负责人由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五大领袖”担任，地院的朱成昭不行了，换上王大宾。

韩爱晶说，王大宾原提出，大专院校红代会要以首都三司为核心，谢富治不同意。大专院校红代会于1967年2月20日成立，核心组成员是谢富治请示中央（包括毛）后指定的，核心组五人，谭厚兰代表的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是一司的，韩爱晶代表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是二司的，蒯大富代表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和王大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三司的，而聂元梓所代表的北大“新北大公社”则什么司也不是。同年4月，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聂是副主任之一，其他四人均是常委，以至蒯、韩后来自嘲道，他们也曾经是“副省级干部”。

二、“五大领袖”均根正苗红

在那个十分讲究“家庭出身”、“阶级成份”的年代，既然当得了钦定的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在“出身”、“成份”方面须经严格审查，必须是根正苗红，无可挑剔，以免给对立面抓到任何把柄。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滑县，其父乡中行医，同情中共革命。聂家兄弟姐妹七人，除二哥聂元赏外，其余六人全为中央党员。当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滑县县委三任书记，包括第三任的赵紫阳（198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亦为滑县人氏），都曾在聂家办公。聂元梓本人于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革命运动，时年仅14岁。1938年正式加入中共，以后历任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区委第一副书记、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教育处处长等职务，1952年定为行政12级（后来再未提级），1960年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文革前夕，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4] 因为聂在文革初期已四十五、六岁，是大学中层领导而不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所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这五人只能称为“五大领袖”而非“五大学生领袖”。

蒯大富，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其父为农村基层干部，父母均为中共党员。蒯1963年夏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该系与工程物理系其实都是保密程度甚高的核专业学系。蒯在读的工化系902班，代号含义是102专业、1969年

毕业，所谓 102 专业，实际上是六年制的绝密等级的放射化工专业，该专业学生录取前均须经过严格的政审筛选。

韩爱晶，1946 年生，江苏涟水人。其父为新四军战士，中共建国前已去世。继父为江苏淮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韩 1964 年被北京航空学院三系录取，三系即飞机设计系，整个三系包括韩所读的座舱设计专业均属于机密专业。

蒯、韩两人所读专业，在文革前非“红五类”出身者不能问津。另谭、王两人亦为出身贫寒家庭，谭为北师大调干生，中共党员，1966 年 29 岁，王大宾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年龄与蒯、韩相若。

三、聂、蒯首先受到毛、周支持

《毛泽东传》称：“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页 1523），这与历史事实也有距离。

聂元梓领头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首先就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在《毛泽东传》一书中就有记载，1966 年 6 月 1 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 六月一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页 1414）

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了态后，中央文革诸人才敢于有所行动。而蒯大富反工作组，首先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当然，周也不过是遵旨行事。

据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 年 7 月 30 日，周“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据蒯大富告诉笔者，周恩来是于 7 月 31 日凌晨 2 时至 5 时在清华静斋与之单独谈话，谈毕，请蒯再找三个同观点的同学，到城内人民大会堂继续谈。31 日晚 7 时至 10 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再次与蒯等学生谈话，了解清华运动的实情，在座者还有华东两位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渭清。据蒯分析，周一日内两次约谈，目的是为次日

即 8 月 1 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有所行动寻找突破口。8 月 1 日，周“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5]

《周恩来年谱》1966 年 8 月 4 日条目记载：“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辩论会。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又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据蒯大富回忆，辩论会于 8 月 4 日晚 10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举行，周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周在辩论会上主张对蒯大富平反解放。《年谱》8 月 22 日条目再称，周“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6]

同样，文革的历史责任，不能全推在“五大领袖”一类的造反派头上。“五大领袖”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在文革前并非是共产党政权的当然反对者，相反，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文革初期（聂元梓的例外是在北大社教的后期）的受压制，使他们本能地加以反抗。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才意识到中央其实有两个“司令部”，他们极力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只不过他们后知后觉，不明白他们的利用价值其实在 1967 年夏天已经完结。“如果”——韩爱晶曾假设——如果 1967 年 7 月就回到课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一代的历史结局是否就大大不同了？不过，正如蒯大富反驳韩爱晶所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四、一个小插曲——蒯大富为什么迟到

《毛泽东传》称：“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页 1523），据蒯大富对笔者说，事情真相并非如此。

7.28 召见谈话开头，毛泽东见蒯未到，曾问：“蒯大富没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来？”谢富治答：“恐怕是不肯来”。韩爱晶极力为蒯辩护：“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要哭的，肯定是出不来”。韩的话说对了一半，蒯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怎会不来？何况是毛泽东本人接见！蒯不是出不来，是不知道有接见这码事。

蒯大富对三万工人围攻清华园毫无思想准备，7月27日白天，吴德是对他打过招呼，但蒯根本没有想到，吴德也没有说明，派工宣队是毛本人的决定。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27日整整一天，吴德、迟群明知派工宣队是毛所定，为什么不向蒯说清楚？直至今日，蒯还表示大惑不解。

谈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分到了北航。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发完电报后，蒯再乘车到了北航，见到北航红旗的保卫组长，方知中央首长召见，匆匆赶至人民大会堂西门，已近清晨七时。经通报后，蒯见到出来接他的谢富治，嚎啕大哭，谢劝其不要激动，又亲自搜查了蒯，知其未带任何凶器之类，然后将其带进湖南厅会场，蒯赫然见到一大群身穿白衬衣的中央要人，毛泽东也在其中，蒯上前又再抱头大哭。

五、毛：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以笔者管见，毛7.28召见谈话的基调，是既有批评，也有呵护。据韩爱晶记录，毛说过：“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此中亦可体会到毛对“五大领袖”感情之复杂——他本人既然就是始作俑者，何以能过多地责备

其忠实的追随者？《毛泽东传》论及此事，只说批评，未有引用毛多处的呵护之辞，乃是“别有用心”。

自 1950 年代末谈话从来不准录音的毛泽东，7.28 召见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召见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在谈话中特地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官方的录音后来有没有整理成文，不知道。可能笔者孤陋寡闻，惟从未见有这次谈话的官方记录文本公布过。

7.28 召见后的当天上午，“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督促下，整理了一份简要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在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广为印发、传达。

及后，“五大领袖”中的三、四位曾聚合过一次（缺了谁，事隔多年，蒯、韩都记不起来了），根据各人笔记，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谈话记录，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作过传达（笔者也存有这种传达记录稿）。蒯、韩说，他们自己所做的记录早已因多次受审查而被收缴。近年，韩爱晶根据当年同学的笔记，结合自己的回忆，整理了一份相当完整的记录。应笔者请求，韩特意将这份记录的最后一部分，即他本人提出毛百年之后怎么办的这一段复印送给了笔者。笔者认为，这一段谈话记录充分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特征，所以除改正了几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作为本文的附录，公诸于同好，同时，以此纪念一个我们都曾是那样热血沸腾过的、已远逝去的青春年代。

据笔者所知，“五大领袖”中，谭厚兰已于 1982 年患癌症离世；聂元梓现年 83 岁，居北京；蒯大富、韩爱晶已年近六旬，现居深圳；王大宾，现居成都。

（2004 年 5 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三）

注释

[1]1968 年 8 月中旬前，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等 61 个工矿企业，并无农民参与。工宣队军代表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及海军委派，总指挥为中央警卫团派至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主任张荣温。8 月中旬后宣传队改称“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次年 1 月，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张荣温兼主任。

[2] 笔者曾于 2003 年 9 月和 12 月两次与蒯大富、韩爱晶长谈，得益良多。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 144、147。

[4]据聂元梓《我的家庭情况和简历》（未刊稿）。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 44-45。该书所载周与蒯谈话时间与蒯本人的回忆有出入，此处以蒯本人回忆为准。

[6]同[5]书，页 46、51。

文革学生领袖的漫漫人生路

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69 年 11 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

1971 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1973 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

1975 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1978 年 4 月 19 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 年，38 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 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 200 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

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几度风雨王大宾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赞扬，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领袖”。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

1973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1987

年夏季,有人给他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 8 岁,是共产党员。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

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天派领袖韩爱晶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 28 个昼夜中,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

1967 年 7 月 9 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主持小型“审斗会”审斗彭德怀。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

1979 年,公安机关逮捕韩爱晶。

1983 年 6 月,判处他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 年 6 月 21 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工作组领掀起多次反蒯狂潮,迫害蒯大富,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 月 18 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领袖,人称蒯司令。

1967 年 1 月 6 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挟持到清华大学。4 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

从 1968 年 5 月 29 日到 7 月 27 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 月 27 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 名工人被打死,731 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7 月 28 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

12 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 年，清查“5·16 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 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

1973 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

1978 年 4 月 19 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1983 年 3 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1987 年 10 月 31 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1992 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 叶志江 ·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 4 1 4 总部”，俗称“4 1 4 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为“老团”和“老四”。

清华大学几万名师生员工中绝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观点的不同，或因个人的经历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学间关系的亲疏和其它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属两派。在两派发展的鼎盛期，团派号称拥有一万多人，而 4 1 4 派号称拥有七、八千人。

1968 年 4 月 23 日，两派学生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武斗夺去了十多个年轻的生命，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

文革前，我是清华大学树立的“又红又专”标兵。我的“事迹”曾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文革伊始，我即遭批判。

1966年6月13日，我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我“不老实”，故意弄坏三顶戴在我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头上。我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

我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低年级学生陈育延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966年8月8日，陈育延和唐伟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成为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红卫兵领袖”。我和陈育延从无交往，但那个“同情的眼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年后，我们因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而戏剧般地相恋。

这“红”与“黑”相恋的花边新闻让清华园里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我和陈育延没有投身于“正面战场”，而是客串了一个被人称之为“英雄救美”的武斗插曲。这次“客串”，虽说很冒了一点生命危险，但在日后却成为一段佳话，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已经或打算写入他们的书中。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对这件事的解读也就相异。红卫兵领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华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注一）；大学教授曾昭奋看到的是文革对科学的亵渎（注二）；而女性的感触又使得黄肖路和杜欣欣两位女士更关注事件的爱情层面（注三）。

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倘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1968年5月中旬，我从内蒙回到已成为武斗战场的清华园。当我找到陈育延时，她立即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这一派（团派）的人活活打死了414派一个叫孙华栋的学生。我们两人本来就反对武斗，这件刚发生的事更使我们感到武斗的残忍。陈育延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她决定宁可不要这项“乌纱帽”，也不参与武斗了。

5月19日，我们准备离开清华回家。临走前，陈育延将一个装有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当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走到大礼堂时，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414派占领的科学馆，而左手一条路则是经过团派的据点。

我和陈育延开玩笑：“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

不料我的这句玩笑话竟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当时，诺大清华园里几无行人。我们在右边的路上走了没有几步路，就被科学馆屋顶上放哨的人发现。好在武斗初期，双方都还没有真枪真炮，使用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武器。屋顶上的人用大弹弓将拳头大的石头向我们射来，以示警告。

陈育延性格刚烈，几块石头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后退的建议。

当我们走到科学馆大门时，十多个手持长矛的武斗人员从大楼南侧的小路上冲了出来，对我们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因为双方相距只有几步之遥，陈育延自知已无法脱身，便要我骑车快跑，说书包里的日记绝不能落在老四的手里。

我自然清楚她的日记的重要性。这十几本日记里不仅有团派总部历次会议的记录，也有她搜集的反康生材料和孙华栋被打死的有关情况。当然，日记里还有大量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这些日记要是落到老四的手里，势必会在清华园成为十分轰动的新闻，并给团派和陈育延造成很大伤害。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容不得我去考虑其它可能的选择。为了保护这些日记，我只能眼看着女友落入“敌手”。我迅速对陈育延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便骑车跑了。

我十分看重情义和个人名节，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接受独自逃脱的结局。三天后去科学馆救陈育延是我既保护日记又不失情义和个人名节的两全之计。

我并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但我的“自投罗网”，至少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然而，孙华栋尸骨未寒，4 1 4 派全体将士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候我去自投罗网，无异于去自杀。

5 月 2 2 日，时近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清华园里一片肃杀之气。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遗书”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大门口放哨的卫兵认出我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我有什么事。我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卫兵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我回答他：“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他要请示领导。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这陈楚三在清华园里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父亲陈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个代表之一。1943 年，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在乌鲁木齐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当时，陈楚三才出生二个月。

秦始皇暴政，老百姓揭竿起义。楚霸王项羽生逢乱世，以八千子弟兵起家，灭了秦国。据《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曾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楚三的名字起得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意义。

落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陈楚三问清我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我是被准许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在进门前，大概是怕我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我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将近七十天。当我重见阳光时，眼前的树木人物都苍白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

在黑暗中，我凭感觉知道我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赐坐，倒也待之如宾。陈楚三要我将装有衣物的书包交给他，我紧紧捂住书包说：“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仿佛这个书包是我见到陈育延的通行证，万万丢不得。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只听到陈楚三身旁的人一声断喝：“他妈的，进来了还不老实！给他一个下马威。”说时迟那时快，我被人从椅子上拉起，胸口感受到猛烈的打击。

刹那间，我只觉得所有的气管支气管，甚至于毛细气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点气也喘不过来。

当我的一部分大脑在和现实发生互动时，总有另外一个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在活动。前者（现实的我）只是后者的一个观察对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阅读的书或者是一部正在观赏的电影。和现实互动的思维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痛苦或快乐，而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则理智得多，而且富于想象力。

“哇，”我的第二思维立即幸灾乐祸地评论：“原来胸部挨打是这种滋味。”

（在当天晚上的另一次拷问中，我又体会到了头部被打的感觉。审问我的人用棍子猛敲我的头顶。每敲一次，我被黑布蒙住的眼睛前便会一片金光灿烂，有如无数颗金星在闪烁，壮观而又美丽。）

容不得我去细细品味这第一次打击的味道，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便遭到六，七个人地毯式的轮番轰炸。浑身的痛楚让我害怕起来：莫非我真的会像孙华栋一样被活活打死？

我猜想殴打孙华栋的人的本意并非要置他于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处，导致孙的死亡。我也相信这些殴打我的学生并不愿意我死在他们的手上。为了便于他们掌握分寸，适可而止，我有意将我的呻吟声由高而低，以至于无声。

这一招果然奏效，我听见在旁边观战的几个女学生在劝说：“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伟大的女性！

她们可以引发战争，如外国的海伦和中国的陈圆圆；她们也可以解救苦难，如天上的观世音和人间的清华女学生们。

我被活着抬走了。

在另一个房间，我躺在地上“会见”了科学馆里第一个难友杨立人。他似乎也刚被殴打过，正在呻吟中。

这杨立人在清华文革中也小有名气。说起来，他还是杨开慧的亲戚，父亲和青年毛泽东有过交往。他在大字报上署名“金戈铁马”，观点也比较极端，曾经炮打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的调查员文章。我原以为他是一个豪爽型的汉子。岂料我眼前的杨立人不仅举手投足，而且讲话的声调都非常“娘娘腔”。想起他自称“金戈铁马”，不禁好笑起来。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京口（今镇江）北固亭怀古》一词慷慨悲壮，豪情无比。如今，这如虎的“金戈铁马”忽然娘娘腔起来，岂不滑稽。

娘娘腔的杨立人倒是颇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一边大声哼哼，一边小声和我交换“情报”。原来，他也不是战场上的俘虏，但因炮打《红旗》杂志一事，4 1 4 视他为反动学生。他从外地回学校时，没料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埋有伏兵，被逮个正着。

沈如槐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中提到：孙华栋被团派的人打死后，“4 1 4 的人对‘狗熊’无端绑架杀害非武斗人员的行为异常愤慨，决定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科学馆。”

于是，一批和平居民被伺机“请”进了科学馆，先后成为我的难友。这些人虽然是被“随机抽样”绑架来的，但倘若将各人的命运和在文革时的遭遇叠加起来，却也构成清华文革的一个缩影。除了杨立人，列举这些难友的经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昭奋，土建系教师，文革期间参加了以清华教师为主的“红教联”组织。因为“红教联”遭到 4 1 4 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请”进科学馆“说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奋是否在棍棒之下，将他和“红教联”的问题“说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难。直到今天，关于“红教联”的是是非非，当事人和研究者或出书著文，或在互联网上争论得不亦乐乎。

1997年，“红教联”的主要负责人陶德坚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写下《风雨人生》，给世人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当年，4 1 4 派对“红教联”不遗余力的批判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像唐少杰那样没有参加过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权威”会在他的专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中沿用 4 1 4 派对“红教联”的批判，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

曾昭奋出身于广东潮汕农村的一个世代华侨家庭。因为“红教联”一案，他被定为“敌我矛盾”。“四人帮”倒台后，他虽然被恩赐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错误”，后又修改为“属一般错误”。

这种对个人的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诬陷他的“材料”可以继续存活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吞噬他的余生。

然而，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曾昭奋和陶德坚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学者。

在我看来，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观点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只有个人的命运才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深思。

1998年，已成为建筑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筑》主编的曾昭奋，在《读书》上首次披露了我们在科学馆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问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左羽，清华职工，和清华行政处的一个姓蔡的工人，在去领工资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关了起来。好在科学馆里住宿和吃饭都不收钱，工资没领到也不碍事。

1949年前，左羽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57年，因给清华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虽然他倒是姓“左”。文革伊始，清华园出现反党委的大字报，有人贴了一张保党委的大字报《右派笑了》，警告反党委的群众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的覆辙。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后，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女儿，左羽离了婚。他别无所求，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可是才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右派就是反动派”，不肯见他，还将他买给她的玩具扔了出来，说她不要反动派的东西。在科学馆的黑暗中，当他讲述这段人生经历时，不禁潸然泪下。

虽然我对1957年反右中发生的事和人物有浓厚的兴趣，但那时我对“右派分子”的认识大体上和左羽的十岁女儿处于同一水平。左羽使我开始了解到“右派分子”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并拥有理想的人。他们苦难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发人深思。

贾振陆，数力系学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级。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华，忧心忡忡，慌不择路，被414派的人“伺机绑架”。在科学馆的黑牢里，他无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场争吵，也十分焦虑他和女友争吵后的“突然失踪”会有什么后果。

多年后，他出任华夏银行技术总监，在上海开会时特意来看我。旧事重提，当年的痛苦都成了开怀的笑料。

陈家宝，无线电系学生。比其它俘虏幸运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414派。陈被抓后，女友来“探监”。陈家宝受到特殊优待。或许，他便是沈如槐心目中一个没有受到虐待的俘虏。

6月中的一天，科学馆屋顶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陈家宝退出团派加入414派的声明。陈听到广播后通过我秘密挖好的小洞传给我一张小纸条，说那个声明是伪造的，他没有当叛徒。为了讨回他的清白，他准备越狱。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陈家宝为了证明自己对自己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忠诚”而冒险越狱的行为。但在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学生就是这样盲目地为所谓的真理而献身。陈家宝如此，那些拿着长矛参加武斗的大多数学生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之前，我曾经逃跑过一次。逃出科学馆后因路线不对，被在外面放哨的卫兵截住，扑倒在地。在科学馆外面的草坪上，十几根长矛直逼我的眼睛，成为我在科学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

我虽然逃跑失败，全身又被用钢丝捆住达二十多个小时，但我因此知道选择另一条路线从科学馆逃走是可能的。6月中旬已属夏令，守卫科学馆的学生每天都要午睡，门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学馆的厕所就在大门口，只要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乘其不备冲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将我的逃跑“经验”告诉了陈家宝。在以后的几天中，陈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为越狱做准备。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俘虏一起被带到门口上厕所。当我们都已出来后，迟迟不见陈家宝的动静。我明白他想跑。我对领我们上厕所的看守说：“你先将我们送回牢房吧，否则我们一起逃跑，你抓哪一个？”看守不疑有诈，便在告诉门口放哨的学生厕所里还有一个俘虏后，带我们走了。

结果，陈家宝果然乘虚逃跑了。陈逃跑的当天，便通过团派的高音喇叭广播了他的声明，指责前几天4 1 4派广播的他的“叛变”声明是伪造的。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让4 1 4派的人十分恼火。他们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我知道并配合了陈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当然地痛打了一顿。

在陈家宝逃跑前，每个俘虏都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所谓“单间”，实际上是学生做光学实验时用的一个狭长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间用木板相隔。

参加武斗的学生算是投笔从戎，虽然拿起了刀枪，但也不可一日无书。4 1 4派的武斗人员在从各食堂“抢夺”粮食，为日后坚守作准备时，居然没有忘记从图书馆抢了一批书。一日，我趁看守不备，从中“偷”了一本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这本书如同一道阳光照亮了这黑暗的斗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在昏暗的蜡烛光下，当我追随邹韬奋周游列国时，我全然不知身处何方。

书有数百页之厚，书中绝大部份内容都已不记得了。然而，邹韬奋在克里米亚海边天体浴场，被一群一丝不挂的苏联女孩子将他遮盖的小裤叉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难堪到变得自然，甚至自觉那条小裤叉是多余的心理活动，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有几个裸体 Waitress 的酒吧“探秘”。当这些裸体女郎围着他周旋时，在餐厅四周数百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折射下，邹韬奋自觉成了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唐明皇。

我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些和 Sex 相关的情节会如此鲜明地留在记忆中。1982年，我在美国读了李敖的《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写他在黑牢里的性心理活动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环境的极度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人有三急”，这一点人道主义是不能不讲的。但为了防止逃跑，我们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在三分钟内“完成任务”。这条规定让我“便秘”了近一个月，到后来，即使给我三个小时，我也无法完成任务了。

好在我们还有限制饮食的规定，每天两个馒头被如狼似虎的肠胃消灭得一干二净。一个月便秘居然没有造成肠道拥堵，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记录。

陶森，电机系总支书记。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1956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

414派虽然为解放干部做过许多值得称许的事，但也不敢偏离批判“走资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们作为“走资派”重点斗争的对象之一。那时候，两派学生互相揪斗加入对方组织的干部，使清华许多干部无所适从。

4月23日，414派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陶森的大会。不料团派在凌晨抢占了大礼堂，批斗陶森成了百日大武斗的导火索。陶森也就成了第一个关押在科学馆的俘虏。

陈育延被释放后，她是科学馆中唯一的女性难友，被单独关押。在我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交谈。整个关押期间，我只记得她说过两次话，都是和我有关。

一次是在我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时，突然听到她在隔壁发表了一句评论：“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她教我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我照她的办法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

听说文革后她又回到领导岗位，担任过清华大学总会计师，清华大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离开科学馆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我从未忘记她对我的赞许和帮助。

在我进科学馆后的最初几天中，还有一个“难友”，那就是陈育延。她是414派抓获的最重要的俘虏，但我在科学馆中始终未能见到她。

和我在科学馆中“游戏人生”不同，陈育延一进科学馆便立即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无疑问，陈育延掌握着414派想知道的许多重要情况。他们也知道陈育延在团派总部受到排挤，因而十分想撬开陈育延的嘴。沈如槐在他的书中简洁而真实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41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实，并绝食抗议。”

陈育延绝食了七天。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陈育延，414派的头头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释放她。毕竟，414总部有许多人加入过陈育延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是所谓的“老八八派”，彼此有过共同战斗的友情。在陈育延签署了“离开科学馆后，生死自负”的字据后，她被抬出了科学馆。

文革时，陈育延思想激进，被人称为“陈常左”，那是时代给她的烙印。举一小例，毕业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我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脸色一沉：“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我鄂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一个迂腐落后的北大学生。我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我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

但她正直，善良，高贵和理想主义的品质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仅在科学馆里主动绝食，以死抗争，不肯出卖同志，在蒯大富、沈如槐等清华大学文革风云人物日后受到审查时，她也从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毕业后，她被发配到贵州省正定县安常镇一个中学教书。

人的归宿有时和地名会有一种宿命般的联系。三国时，“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便战死在“落凤坡”。

外号“陈常左”的陈育延落难“安常镇”，也算是命中注定。

1972年，她回北京探亲，工宣队知道后将她叫到清华。

“蒯大富已被隔离审查，希望你能揭发他的问题。”工宣队告诉陈育延。

“我在毕业前已写过有关材料，我没有新的补充。”陈回答说。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了，你应当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问题的性质已经变化了，你要站稳立场。好好回忆一下。”工宣队软中带硬。

“我现在的记忆肯定没有几年前清晰完整，我当时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我不会推翻。你们要作新的解释，那是你们的事。”陈育延本色不改，软硬不吃。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到吃中饭的时候。午饭后，工宣队退而求其次：“我们取来了你过去写的材料，你在上面签个名确认一下。”

“那可以。”陈也是爽快人。

她翻了一下工宣队交给她的几页纸，突然发问：“那不是我的笔迹。”

“这是我们从你写的材料上摘录下来的，都是你的原话。”工宣队显然还不了解陈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陈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的摘录有没有错误，没有原件核对，我不能签名！”

不知道是工宣队找不到原件，还是这些摘录里有“猫腻”。他们终于恼羞成怒了：“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以后会有办法对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请你付两角饭钱。”

陈连这点小事也不肯示弱：“吃饭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清华，来回车钱三角，应当由你们付。扣去两角饭钱，请你们给我一角钱。”

工宣队只得摆摆手，让陈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过后不久，安常镇中学便收到了清华大学调查陈育延的公函。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动。她并无太多音乐细胞，但在我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却常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也和我们当时的情况和心境太贴切了。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我的老母也焦虑万分。她冒着风险，多次到科学馆向 4 1 4 派的武斗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们，被准许进来探望我。我因为挨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伤痕。我怕母亲看到后伤心，见面时我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破的裤腿。

在我出狱后的头一个晚上，陈育延十分动情地为我弹奏了这支古曲。我听后亦大感动，泪如泉涌。

但这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将我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1975年，我们在武汉又戏剧般地分手。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林道静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

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和陈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和陈育延以死抗争不同，我虽然也算得上“坚贞不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在“斗智”。

七月初的一天，团派武斗人员向科学馆的屋顶发射了燃烧弹，引燃了屋顶上的油毛毡，一时大火熊熊，整个屋顶被烧毁。而团派的高音喇叭却颠倒黑白，指控 4 1 4 派制造“国会纵火案”，企图烧死被关押的团派俘虏。科学馆里的 4 1 4 人员群情激愤，将我们驱赶到烧毁的屋顶，向我们展示团派的暴行。当然，在愤怒中也免不了对我们施以拳脚。

当我们被带回牢房后，看守拿来纸和笔，对我说：“团派广播说是我们放火烧死俘虏，你文章写得好，你将真实情况写出来，我们马上要广播。”

团派这种行为，显然是不管我们这些俘虏的死活，给我们制造难题。我不写，免不了一顿毒打；写真实情况，让团派难堪事小，我自己“失节”事大。略作思索，我写了如下一段话交给了看守：“火起时，我们全体俘虏都在一楼，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火扑灭后，我们又被带回一楼。我们现在都安全。叶志江”

4 1 4 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条后，对我的“机智”倒是很欣赏。因为我写了一段既符合事实，却又无法广播的文字。虽然我确认了俘虏们的安全，但“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这段话却可能被团派拿来作文章。

看守对我说：“算你脑袋瓜灵，不广播了。”

我免去了一顿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学馆中最难忍受的还有饥饿。

我们每天发给两个馒头，大约下午二点发一个，晚上六点发一个。没有任何蔬菜肉食之类，只有一碗盐放在牢房中供食用。从晚上六点至第二天下午二点，整整二十个小时饥肠辘辘。

在清华念书的学生中喜欢吃米饭的南方人居多。而当时北京人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对南方学生而言，吃米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武斗开始后，两派武斗人员都从各食堂中抢夺大米和面粉。科学馆里的武斗人员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饭。但在科学馆被围困的后期，由于蔬菜鱼肉的供应中断，4 1 4 派的武斗人员每天也只能吃面片汤和花卷。上好的大米只能用来代替沙袋，修筑工事了。

俘虏们吃的是馒头，但大师傅不可能为俘虏每顿去做馒头，而是一次做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冰箱之类的东西只有在书中见到过。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个小时去盼望它。

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我们采用“精神会餐”来安慰我们的肠胃。每个人都将自己吃过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们中间最“有钱”的，也就成了“精神会餐”的主讲。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讲香酥鸭的滋味，直到出狱后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尝了香酥鸭为止。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来两碗面片汤，让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鼻而来，碗里还似乎漂着几片诱人的肥肉。当时我们五个俘虏合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个人都被这两碗面汤刺激得直咽口水。我迟疑了一下，问看守：

“那其他三个人呢？”

“只有两碗，快喝。”看守说。

“那我们分着喝。”我马上说，不料看守厉声回答：

“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们三个成份不好，没有资格喝。”

那真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即使当了俘虏，也得按阶级成份加以区别！

尽管那两碗面汤如此诱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更珍贵。我对看守说：“你拿回去吧，我们都不喝！”

我和陈育延，以及我在科学馆中的全体难友，大多是 4 1 4 派在孙华栋被打死后“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而抓进来的，其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斗。我们这批人除了帮助消耗抢来的粮食（陈育延除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供他们练练拳脚而已。我们不能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没有宣传价值（唯一的一次宣传机会又因为陈家宝的逃跑而弄巧成拙），甚至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团派对我们的生死存亡丝毫不关心。然而，我们这批人的存在毕竟是

“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一个侧面，它或多或少地会折射出武斗期间人们的心态、行为和命运。

当我们在黑牢中苦苦挣扎时，科学馆墙外的武斗已从“原始战争”演变为“现代化战争”。两派都拥有了“热武器”，除了一般的枪支弹药外，还拥有土炮和土坦克之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真枪真炮大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从外地的解放军部队或造反派手中搞来的。据说，有一个学生为了搞到武器，不惜使用“美男计”，和某地军分区司令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他利用出入军区的便利和司令女儿的配合，搞到了十几支步枪。

清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拥有设备十分完善的校办工厂。武斗期间，这些校办工厂变成了两派的“兵工厂”。清华学生入学后要接受一个月的金工劳动和训练，车、钳、刨、铣、磨和焊，样样都会，动手能力很强。于是，大批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装甲车被两派学生制造出来，并被投入战场。

武器的升级必然导致伤亡人数的上升。

一天晚上，我听到墙外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喊叫声。从喊声中我听出是一个放哨的 4 1 4 派学生被老团开枪打死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这些俘虏便胆战心惊，生怕老四将仇恨转嫁到我们头上。那天晚上我便作为死者的“祭品”而饱尝拳脚。

在战场上，一颗穿甲弹让两个曾经相遇相识的学生有了不同的命运。

这两个学生中，一个是冶金系的学生周家琮，另一个是电机系的学生赵德胜。我和他们曾到重庆“大串联”，一起住在重庆江北大横街小学。

当清华学生分裂成两派时，周家琮加入了 4 1 4 派，而赵德胜加入了团派。两个人都参加了“百日大武斗”。周家琮能文能武，一手持长矛，一手用笔写杂文《有感一读〈“友邦惊诧”论〉》，指责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对团派的偏袒。沈如槐将它誉之为“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篇杂文”。（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4 0 1 页）

7 月 6 日，当周家琮乘坐“装甲车”驶向科学馆时，埋伏在第一教学楼旁的赵德胜向装甲车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土制的装甲车难以抵挡货真价实的穿甲弹，司机杨述立当场毙命，而周家琮侥幸逃过一命。

我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当我和姚永宁在逃离重庆时，他决定“甩”掉赵德胜。事后他对我说：“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或许赵德胜并不知道周家琮就在装甲车上，但我却因此事的发生而相信了姚永宁两年前的判断：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中红军女战士冯留特卡爱上了一个有蓝眼睛的白匪俘虏，年轻英俊的中尉奥特洛克。当“蓝眼睛”在押解途中试图逃跑时，冯留特卡扣动了扳机，“蓝眼睛”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鲜血映着蓝蓝的海水，浪花拍击着海岸，冯留特卡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向昔日的同窗好友扣动扳机的学生是出于何种动机。是像赵德胜那样因为心中怀有仇恨？还是像冯留特卡那样出于对革命的信念？

我被关押在科学馆时，周家琮曾试图来探望我，但被看守劝阻。毕业离校后，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及各人的遭遇，并提到了他遇险这件事。他说：“既然赵德胜念及我们在重庆时的友情而让我侥幸活下来，我也只得辛辛苦苦地活下去……。”当时，他已为了追寻他的“梦中情人”而到了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钢铁公司位于川滇交界处的大山沟中，四十年前正是攀钢草创初期，那里的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的。毛泽东说：“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死里逃生的周家琮不怕吃苦，不怕没有好觉睡，在那里奋斗了数十年。几年前，当我在上海再次见到周家琮时，他已是攀钢集团这个特大企业的付总裁了。

而赵德胜则因武斗时杀人一事进了大牢。

1968年7月12日，在全国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7月12日的前后几天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科学馆上空有“永不消失的电波”，那是被围的414派学生通过高音喇叭播出的联络密码，而科学馆的地下，解救被围人员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令老四们扼腕的是，团派的学生居然用埋在壕沟里的水缸准确地测出地道的方位，并用炸药将它摧毁。

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如此“能文能武”，显然让人印象深刻，所以，“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毫无疑问，作为全国最大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一定在毛泽东的视线内。

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不在这些能文能武的理工科大学学生头上套上金箍咒，他们也会无法无天，走火入魔。所以，在讲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半个月后，他便作出了制止清华学生武斗的重大决定。

我们的苦难日子也终于熬到了头。

1968年7月27日，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园制止武斗。蒯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打死了数名工人。而414派则明智地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当晚，毛泽东召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宣告红卫兵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我们当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拆除工事所发出的巨大声响使我们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很快，我们便听到牢房外有很多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问：

“这房间里有人吗？”

“没有人。”看守回答。

听到正在离去的脚步声，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万一一切照旧，谁发了声音谁就可能挨打。但机会难得，我不能让那些杂乱的脚步离去而无所作为。急中生智，我用脚将一个搪瓷杯踢到了房间中的硫酸罐上，只听到咣啷一声后，离去的脚步停住了：

“房间里有人，将门打开！”

门开了。一个工人向我们宣布：

“我们是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来清华制止武斗。”

就像那个时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一样，我和其他俘虏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见到了阳光，人群和树木，我们也不再挨饿了。当天晚上，贾振陆一口气吃了两斤米饭，我也吃了一斤二两米饭。我们根本不需要下饭的菜，饭团一进入口中便会自动吞下去，仿佛喉咙处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但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两派迟迟不能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我们被转移到主楼三楼的大教室，依旧是原来的看守看管我们。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是多么渴望自由。我决定组织越狱。一天中午，当我确定大多数人已经午睡后，我拉开了已在几天前被我悄悄弄坏门扣的房门。几个俘虏跟着我从主楼楼梯旁离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我们顺利地逃脱。曾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一辆路过的粪车将受伤的曾昭奋送了回来。

在 4 1 4 派向工宣队报告俘虏逃跑一事后，两派举行紧急会议。团派坚称没有见到任何俘虏，指控 4 1 4 派阴谋杀害俘虏。但陈育延在会上忍俊不禁的笑容露出了破绽。

4 1 4 派已无俘虏可交换，两派迅速达成了协议。

在逃跑前，我曾想带走那本陪我度过了这段苦难日子的《萍踪寄语》。离开科学馆时，我已将它悄悄带在身边。但转念一想，这本书原是清华图书馆的，万一逃跑时被抓住，我岂不多了一条“偷书”的罪名。我只得恋恋不舍地将它放下。

几十年中，每当我去书店时，我都会在书架上寻觅这本书的踪迹。然而，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于书市的今天，它却踪影全无，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了。

而我好想重读这本书。

注一：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几天后，陈育延和叶志江推着自行车从科学馆前路过，他们是团派中反对武斗的“鸽派”，自以为 4 1 4 不会为难他们。哪知道 4 1 4 发现他们后，立即派人拦截。叶志江骑车跑了，陈育延被抓到科学馆。4 1 4 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口，并绝食抗议。一周后，叶志江来到科学馆，对 4 1 4 守卫人员说，陈育延有病，他愿意作为人质留在科学馆，换取陈育延的自由。结果陈育延走了，叶志江被我们扣押在科学馆，直到 7. 2 7 工宣队进校。叶志江是 2 8 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他的许多观点都曾遭到我们的口诛笔伐。但是，他讲义气、重情感，危难时刻舍己救人的行为，却不失英雄气概、男人本色，着实令人敬佩。

2 0 0 7 年底，我在收到曾留守科学馆的 4 1 4 派学生邱心伟寄来沈如槐的书后便复信给她，指出书中几个不确之处：

心伟：

发来的邮件和寄来的书都看了。时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读来却恍若昨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岁月磨去。想要搞点研究探讨之类，也非风烛残年所能胜任的。一旦钻了牛角尖（或曰“顿悟”注），说不定就会追随周泉樱去信佛了。你所说的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要真做起来也难。

沈如槐据说花了六年时间写了一部清华文革记事。其记载之翔实，在我看来几乎是同类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了。但倘要追究起来，恐怕也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以我个人为例，书中 366 页提到了我当年“英雄救美”的往事。这件事本与革命的主题毫不相干，不过是给血腥的武斗添加了一点小资情调而已。但既蒙厚爱写入“文革记事”，我当主角的对这段文字不妨考证一番，留一点“真相”给读者。

书中说陈育延被抓后一周，我去科学馆要求留下当人质换取陈育延的自由。其实我三天后就去了科学馆。因为陈被抓，我骑车跑掉是不得已的。当时我的自行车上有一书包陈育延的日记。日记里有团派历次（包括武斗期间）总部会议的记录，孙华栋事件和炮打康生的材料，当然还有不少充满小资情调的个人隐私。所以陈育延要我快跑。我对陈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就骑车跑了。倘若当年老四得到了这些日记，“百日武斗”恐怕会有更多的精彩情节了。

三天后，我在皮带后面藏了一把小刀去科学馆“救美”，脑中绝无“交换人质”的幻想。我想陈育延被放也不是我去科学馆的结果，而是因为她绝食七天，老四念其是“老八八”，不忍心让她饿死在科学馆。

我之被扣，当然是自投罗网。但书中称我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则令我大惑不解。我当年从未加入“28团”，至今都不知道28团有哪些英雄好汉，如何能充当其笔杆子？文革中我写过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报，但都是以个人署名的。我自忖也并未为老团提出过什么可以“必胜”或必败的理论，是当不了什么“家”的。

当然，我很感谢沈如槐在他的书中重提当年这个插曲和称我“舍己救人”的溢美之词。我想说明的是，要想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真相并非易事。

注：周泉缨在他最近出版的《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一书的作者自序中说“1997年，我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突然顿悟”。文革期间，周泉缨在清华园贴出《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成为清华大学“414”派的理论家。

叶志江

注二：曾昭奋《科学春秋》：就在科学馆大火之前，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叶志江同学等就被关在科学馆一间暗室中的几个小暗室里。

……

叶志江同学却非常乐观，时不时朗诵“大江东去”。他还说，“我们没有受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罪，现在正好来补补课。”事实上，我们这些被逮进来的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刚被逮来时，先是一个“下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围大概站着四、五个身壮力气大的学生，轮番拳腿交加。我的经验是，只痛皮肉，不伤根本。年纪大者在被毆、摔倒、爬起、再被毆、再摔倒的过程中，折了骨头，伤了内脏，可视为“意外”。

且说这叶志江（正好与叶企孙先生同姓），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一九六四年，他在《数学通报》上半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则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注三：黄肖路，旅美华人，目前正在美国著述关于父亲黄万里和清华园的回忆。杜欣欣，旅美华人，著有《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在时间中沉醉——关于自然、历史和文化名人的散记》等书。

2008年8月16日初稿

2011年11月22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七章（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谈话纪要

时间：六七年元月十二日十九点——十三日两点三十八分

地点：中南海东会议室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如何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回去跟云南日报打个电话，一切阶级要夺取政权都要先造成舆论准备么，这就是舆论准备么？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就是从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来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就规定的了，但是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还有新的反复，1949年进北京城随着革命的深入，进行了三大改造，反右斗争，五八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六二年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新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六三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前十条，六五年提出了二十三条，同时进行了戏剧文艺改革。前年，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是革命的，那一段时间文汇报由于毛主席过问了，江青同志主持，先是革命的。文汇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骄傲了，它就不革命了，革人家的命可以，革自己的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成了绊脚石，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发展变化，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后，骄傲了，不革命了，现在又被夺权了，它又革命了，这就叫做不断革命。

1957年有一个向右派进攻的社论是主席写的。姚文元的文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讯号，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党内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五月十六日批判彭真反党集团，六月一日公开号召就是聂元梓的大字报，纲领性的文件是十六条、双十条，全面公开，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反扑，我们必须全面进攻，现在是进入第二阶段，总进攻，全面铺开，讯号就是上海“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就是进攻的讯号，因为工农群众和学生运动不同，怎么表现政治统帅一切，工农是主要力量，既要革命，又要生产，光搞不行，要有舆论准备，因此上海先发表了这些文章，中央发出了号召，“告上海市人民书”是舆论准备，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是舆论准备，贺电都是舆论准备，你们那个地方也要做舆论准备，中央已经号召了嘛（念贺电最后一段），你们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倡议和中央的号召。上次说明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云南日报的工人同志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云南日报要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你们力量不够，可以争取外援嘛！革命学生可以协助编辑，但主要是靠自己，保守派可以争取一部份，当然不可能全部争取。还是用原来的云南日报，内容面目焕然一新，我打电话给刘殷农同志，叫他们写一个告昆明市，云南省人民书，局面会很快得到扭转，就可以改变面貌，不要怕。保守派的“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怕，过去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蔽，强调生产，实际压制革命，刚才听郭超说：“冶炼厂还有压制左派。”你们不要光看到别人落后工人反对你们。你们已取得了第一步胜利，工人会支持你们的，他们（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生产，破坏革命，这正是运动

初期的状态，但慢慢会转的。他们有两步，一步是空喊革命，搞经济主义，实际上是强调眼前利益，要个人增加工资，算旧帐，把国家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利益抛开不管，落到空喊革命，破坏革命。云南还只是初期苗头，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一定时期是会强调经济要求的，用物质利益来毒害工人，你们要坚决反对，反对谁呢？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他们会把矛盾上交，保守派要比你们还“左”，提出极“左”的口号，使领导无法答复，然后到北京来，你们赶快回去，戳穿他们的阴谋，揭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反扑，劝阻他们不要上北京来，上北京来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对个人国家不利，所以要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这个你们先作舆论准备，识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你们要站得比他们高，看得比他们远，工人停工支持你们，责任在省委，但不宜长，取得了第一步胜利，回去后要说服

他们上班了，如果有一部份提出经济要求，就会被利用，就容易上当，就会闹矛盾，当权派就容易各个击破，分化你们的组织。矛盾上交，他就躲开矛盾，这个不行，人家都走了，当权派就没有人斗了，所以你们上京来的五百多学生，工人，我们要见他们，把这个说清楚，你们既抓革命，又抓生产，既反对抓生产压革命，又反对搞经济主义，作好舆论准备就可以了，工作做好，群众就会站到你们这边来，所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农村，学生与工农相结合，你们准备迎接新高潮到来。

二、怎样正确理解抓革命，促生产：

就是刚才我说的，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并立的，首先革命是主导方面，有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就会发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生产就发展，革命造反派有了革命的干劲，生产一定上去，其它已经解决了。

三、革命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学生同工人结合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学生在工厂点火，但一定要通过工人，因为工人是主人，强扭的瓜不甜，一定要工人有造反的种子，他们把火点起来。有文化的关系，你们是支援的力量，不是主导的力量，他们是主力。代替的办法，包办的办法是不允许的，串连不要到车间，去车间只允许参观，大字报要布置在车间外面，开会可大、中、小结合，开经验交流会，小的座谈会，中的讨论会，大的动员会。第二，工学院的可以实习，到厂内去，实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推动革命，不是单纯的为实习而实习，向老工人学习，老工人要教你们，思想感情就通了，说话就顺了。但要与厂里的领导、老工人商量，安排得当。第三，不是学工的，如文理科，中学生，下厂劳动。形式很多，但有一条就是革命靠自己，不能包办代替，只是学生，靠工厂的造反派自己闹革命，决不能以学生代替工人闹革命，否则对知识分子和工人都不利。对工厂的串连是如此，对农村公社的串连也是这样，不能包办代替。

同军队联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军训啰！你们的军训大概要推到三月份，二月份可找一个大学和中学试点，三月份实行，以后你们还要上连队当兵呢！

同机关串连，不要使业务停顿，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业务，革命造反派起来，以他们为主，你们帮助，比如云南日报，以云南日报的造反派为主，尽一切力量帮助，其它机关也是一样，你们帮他们去造反，把业务搞得更好。北

京有个新情况：群众起来，领导不通，一怕躲起来，就象云南省委一样，这样就促使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群众，阎红彦回去后，就是不解决问题，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领导躲起来，这样就使造反派把矛头转向群众，找保守派，保守派有三种类型，一种表现好了，就可以参加造反派。二种是中间的，可以不去动他，争取他。第三种就会表现得比你们还“左”，形“左”实右，自己树起一个造反派旗帜，也造反了，比你们更“左”，把领导抓去斗，胡斗了，搞得没有人搞工作，使业务停下来，有各种各样的造反派，这种革命不是真正能闹得好的，这样一来，真正革命的就站站出来，做事，即使过去犯过错误的，只要肯干，改过自新，戴罪立功，就要让他革命。工厂、农村、企业，机关有特点，你们要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自己研究。

四、学工串连问题。

学徒工一般不能出外串连，因为还有工作任务，国民经济已把学徒工计划在内。按“抓革命，促生产”办，业余时间可以到本厂或外厂进行串连，但不要离开本地，不合理的转正应放在运动后期解决。

半工半读的学生，如劳动的工作量在生产计划内，那么劳动时间坚持工作，学习时间可以搞革命，在本地串连。如不在生产计划内，劳动是学技术，可以放假串连。可以放一、二个月，回来再补学，这得由本单位群众商量决定。

五、支边人员是否可以回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

支边人员厂子在当地，领导也在那里的，应该在那里闹革命，难道只有在上海能闹革命，而云南就不能闹革命了吗？现在在建厂的，要是不把工厂建好，这样来就不好了，对三线建设不利，如果当权派挑动地方与外地工人的纠纷，你们要进去，做工作，要戳穿这个阴谋。

六、关于六三年以来下放退职人员要求复职怎么办？

六三年下放的，已恢复在农村安家或在其他工厂工作的，就不能再回来了，再回来经济秩序就破坏了，若确是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的，可以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解决。

合同工，临时工有许多不合理的办法，利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停职辞退的，这是不行的，要回来。但在以前早就停了的，现在提出要补发工资，这是经济主义，是不行的。

七、六一年以来因经济，学业而被勒令退学的工农子弟要求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以否？

已放到农村，工厂的，就可以在农村，工厂闹革命，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回学校。已经有工作再回学校，就不符合抓革命促生产了。

八、关于拘留问题：

革命群众被打击应释放，被打击压制围斗的应恢复名誉平反。

九、如何划分当权派？

当权派就是本单位的高级领导，先搞上一级，后搞下一级。譬如：学校先搞院委，后搞系总支，厂里先搞厂党委，后搞厂支部，机关先搞机关党委，再搞市级领导、科级，处级中坏的，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是当权派。

以上系总理谈话纪要，未经总理审阅，仅供革命同志参考。

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整理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厉，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

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云南各界造反派的讲话

时间：1967年1月14日凌晨2点5分——4点35分。

地点：北京中南海小礼堂。

周总理讲话：

同学们：

昨天接见了云南十二位代表同志，其中包括同学、职工，南工下串联的革命师生，并且李成芳、郭超也在，他们反映了昆明一系列事情。今天又接见了云南的革命造反派同志，问题已基本解决，大家回去闹革命，现在需要你们回去，云南形势正在发展。

我们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高潮，是毛主席亲自倡导，亲自领导发动起来的，毛主席下令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先是在文化教育团体，把全国大中学校和小学的一部份都动员起来了，大中城市的领导机关也发动起来了，群众搞斗、批、改。在学校兴起了革命组织，在群众中产生的新事物是青少年组织，如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毛主席从地平线上看到这一新生事物，立即得到了推广。“八·一八”主席接见了红卫兵战士、革命学生、教职工。这是第一个高潮。但接见了之后，它的形势就不限于学校，冲向了社会各方面，冲向机关，也冲向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机关。从城市向农村发展，从北京发展到全国。它象一股革命洪流冲向前，尽管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暗藏的敌人，资产阶级分子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甘心被赶出历史舞台，怕革命，怕革命的洪流冲击他们。但这股洪流不管是对敌人，对敌对的思想都是不可阻挡的，思想革命的洪流触及人们的灵魂，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挡得住，它不断向各方面冲击，甚至领导机关。

尽管主席预见革命会向前，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讲，“这是个思想革命的洪流，在一个人的灵魂都要受影响。”在我们的领导设想成分期分批地搞，但被革命的洪流冲垮了，思想革命的洪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按它的客观规律发展，这是无敌的力量。要迎接这一洪流。不能阻挡。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想压制，但失败了。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归被冲垮了。他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压制群众，不但阻挡不住，结果失败了。十一中全会推动了前进，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没有认识，总结分期分批慢了一点，结果红卫兵一到被冲垮了。为什么不可以炮轰呢？毛主席提的嘛！“炮打司令部”，一轰各级领导就手忙脚乱了，这个地区的领导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一定都轰准，也有打空炮的，看你经得住经不住考验。有的地方落后于北京。特别是云南，很落后，路又远，红卫兵去得晚一点。但是红卫兵终于还是到了，震动了。很多地方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云南就是一个。十一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又主持了十月工作会议 各级领导还没有想通，会上揭发了很多问题才逐步想通，其他省的领导都谈了些问题，多数地方有效，而云南有的有认识，有的没有认识，有的根本没有认识。不理解，怕群众，怕革命，怕革到自己头上。林彪同志讲：“破私立公”这对领导很不容易。在坐的工人是革命的战友，想想，你们是不是破私立公了，总想个人的得失是不行的，所以云南在第一个高潮，第三个阶段没有很好的动起来，就在一月四日发生了这个事件，是在关键问题的表现，是省委仍然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

我们制定了两个十条，农村十条，厂矿十条，是为展开文化大革命，它是向全国铺开，形势大好。学生可以放假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那儿去进行革命，机关干部也要同工农结合在一起闹革命，就要靠第一阶段组织发动起来的人，红卫兵革命师生，甚至机关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帮助推动，但是你们还在受压迫。这些都要解决。

1月4日工人学生开联合造反大会，阎红彦拒绝了，不但省委不支持，阎红彦也不出来，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出来检讨，这是合理的。既然保守派喊你出来，你出来了，造反派喊你出来，不出来，这是起了支持保字号的作用。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如果省委是革命的那么就出来嘛！也没有什么。毛主席让我们去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但这些人怕了，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怕炮轰，怕革命，怕当小学生。

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让在群众烈火中锻炼自己嘛！由于昆明工人、学生进驻昆明军区大院激于义愤唤起阎红彦的震动，可是这一行动使阎红彦更加害怕，看到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还不挺身出来，相反却离开了昆明，躲在西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和群众闹对立，让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周兴去，没约阎红彦一道去，群众更生气了，所以对峙起来，第一书记不去，仍然是对立，而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他不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在群众面前搞义气。在游街中受了点伤算得了什么？这么大一股洪流，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受了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这样的人一成群，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我们的党就要变质。资本主义就要复辟，这怎么行！我们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是伟大的国家，我们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前途影响到世界的前途。如果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出了问题，对世界革命的前途就将受影响。要重视我们伟大国家的前途，世界人民的前途。而赵健民不这样想，云南省委也不这样想，相反还跟群众闹对立，呕气，这样的情绪不对头。这样的事不说明真象，一说出来群众激动了，很多人饭也吃不下，这对群众是欺骗。我们的党是说老实话的党，在党的会议上不说老实话，这算什么党？我希望在坐的后一代不要象我们老一代这样。就因为六号出了这样事，七号紧急，八号阎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去的法医证明的。是自杀的，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公开和你们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的工友、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和毛主席汇报过了，有人想用阎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造谣污蔑，要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友、学生头上那是妄想，同时与昆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他的死是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有同学要调查，调查以后，如实向中央汇报。至于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他的

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中国有句古话：“不进则退”。阎红彦不合乎林彪同志讲的，吃透两头，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上不请示毛主席和毛主席著作，甚至说，那是书上写的。毛主席的话是从实际中来，他不看什么是指针，什么是方向，这不是毛主席的学生，这是根本反对毛主席；他下不依靠群众，自己高高在上，不向群众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接近，他到不到你们工厂去呀？（在场群众回答：不去！）周总理继续说：他怎能当小学生呢？怎么能受锻炼呢？阎红彦把自己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同样是不民主，专断。这样的人不能更好的工作，使自己孤陋寡闻，他批评李井泉不民主，自己相反也是这样，落后，蜕化，最后走上绝路，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谁不与群众相结合，就没有好下场，你们很年轻，不能再走这条路，让你们造反，学到新作风，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作风，要长期奋斗，这是一个教训，不管过去有多大功劳，但你现在不革命也是不行，我们解剖云南的麻雀，可以教育全党，使我们全党得到教训，提高，但有的领导也可能不接受这个教训，就得闹革命，现在，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意云南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派代表到北京来，他们和我畅谈了两次，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他们在北京任务基本完成，明天他们就要回去了。在北京只能解决大方向，具体问题要到本地解决。自己解放自己，问题在本地。我们有一句话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昨天我给省委打电话，提了五点意见，告诉云南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1. 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再有任何动摇。
2. 你们必须坚决彻底批判过去云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3. 你们只有采取这一立场，才能肃清阎红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
4. 你们现在必须支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5. 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云南省厂矿、农村、机关、团体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保守派和受蒙蔽的同志，教育他们能觉醒过来，特别把十六条，二

十个反对经济主义，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文件给他们双方讲清楚，促进他们联合起来，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信任群众，依据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6. 我建议上述五点坚决执行，我相信这样做，云南局势会扭转过来，走向健康的发展。

今天下午我们给昆明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去了一个支持电（全文省略）。

这个电报同时用电话和民用电报同时打过去了，得到了昆明市人民的拥护，今晚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群众已经开始撤离了，这件事，这样做就很好了。

当然斗争还只是开始，我们为了要使你们进一步的批判云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你们继续闹革命，必须告诉你们，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云南，地处边防。西边是印度，南边有缅甸、越南，美帝国主义经常进入我国领空，随时都处于战备状态。南越还在打仗。这样的地带不能当做普通地区看待。从全国来说我们也必须尊重人民解放军，反过来说人民解放军也必须遵守中央军委的指示，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们本身也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与地方不同，只有军事院校，军队系统的文化团体，即使这样，他们也有他们的特点，还有一些规定。

由于省委压制群众，所以昆明群众激于义愤进入了军区大院。你们都要回去。解放军要遵守中央军委的指示，你们也同样要尊敬解放军，凡属解放军负责保护的地方，你们都不要去，有事要好好商量，我们对解放军战士有五点指示：（1）不动气，（2）不动手，（3）骂不还口，（4）打不还手，（5）打伤了也不开枪，如果红卫兵同学们打伤了解放军，我就说“你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如果他是一个革命者，他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们一般都是遵守的，红卫兵向解放军学习，尊重解放军战士。

希望把我的这段话转达给前线的战士，请×××同志转达我们对前线战士的问候，他们保卫国防有功，我们希望台上台下的同志们今后不要再冲入军区大院，我们确实查证了周兴、阎红彦、郭超、赵健民确实没有住军区大楼。关于档案问题，军委有指示，重要机密文件要保管在军区，我们已责成军区检查有无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文件，如有立即交出来。我们信任广大的群众，你们回去要坚决的闹革命，你们也要考验市委、地、县委，看他们是否做了。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

员，不走阎红彦的路就要走革命的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你们青年人，有年青的工友，你们有朝气，但免不了犯错误，这是容许的，经验少嘛！正因为这样，中央和军委决定要进行军训，学政治、学军事，革命不但要有干劲而且要有科学知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语录，而且要学习成文的东西，还要学习十六条，学习社论，这些我们同学要在斗争中学习，还要学习老三篇，学习党的政策，要向群众请教。有了这两点还不够，还要有个组织纪律性，不管团体多大多小都要有组织纪律性，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要把这套学好，才能战斗好。

你们从云南来了，很远，不容易，这次给了你们武器，希望你们好好的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你们都要很快回去了，我们的联络员来给你们联系回去的交通问题。

（根据整理者自己的记录整理，未经总理审阅）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云南省大学生代表的电话记录

时间：元月十四日凌晨

张政委：你总理啊！请南下三司同学高志伟同志来讲话好吗？

高志伟：你总理吗？

总理：嗯！你哪位？你是北京哪个学校？

高志伟：我是农机学院的，你不是要我说话吗？

总理：今天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有个电报给你们吗？希望你们按照中央的希望。完全支持了你们，责任完全在于省委。这个电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都亲自看过的。我们希望你们跟昆明的同学、工人，说服他们按照这个希望，按照你们大会的决定，今天夜里还是退出离开军区大院，具体事情我跟你们这里的代表谈。你们北京的同学单位这里不是有一位吗？他们都已经谈好了嘛！明天就坐飞机回昆明去了，我希望你们帮助中央对还没有离开军区的同学和工人好好做点工作。

高志伟：总理！当地的工人同志听到总理的电话和中央的电报以后，感到很高兴。因为中央支持了他们的革命行动，长了革命派的志气，所以感到很高兴。问题是什么呢？工人同志也坚决响应中央呼吁，准备撤，问题分歧在于怎么撤法。

总理：这个问题你们是北京的同学你们很清楚。完全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工人用罢工来支持革命行动，我们也很懂得的。如果怕回工厂，如果保守派和工厂负责人还要对他们敌视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省委、省人委，要他们按照中央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其中不是有一条，不许不许……吗？明天就贴出布告去，明天就是今天白天贴到各个厂矿去，替他们声明，保证他们的工作不许歧视，尅扣工资，不许任何的打击报复，家属也不许虐待等等都可以保证的。对军区大院你们应该主动撤出，比较主动，给他们说清楚！

高志伟：总理啊！工人同志和我们的态度也是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呼吁的，已经撤了，现在分歧啊！和大会主席团并不在这个问题。

总理：多少问题，进行民主商量吧！

高志伟：问题是沒有民主商量！大会主席团刘殷农提出了三个决定都没有很好的征求大家的意见，做出决定又反啦，现在工人同志特别有意见。如果说工人同志不好，那么不会撤的，正因为大会主席团不是走群众路线。

总理：你们可以批评他们。

高志伟：问题是大会主席刘殷农都跑了。

总理：这是工作嘛，你们不是第三司令部的吗？就是要在造反派中做工作嘛！领导同志要经过训练锻炼嘛！学习领导嘛，不然的话中央国务院出面了，毛主席自己批的文件都没有效了，我也不好交待了嘛！

高志伟：总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坚决响应中央的电报，我们还准备明天上午开完大会以后，我们考虑一下要撤的，不是不撤。现在的主要分歧是和大会主席团的分歧。

总理：我懂你的意思。现在在里面的人已不是太多了吗？你还是去讲一讲，你辛苦一点嘛！我为昆明市连日连夜都在搞，你辛苦一下嘛！

高志伟：总理的意思是要我们去做一做解释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

总理：以后回去还可以召开主席团会批评他们嘛！

高志伟：今天已经造了大会主席团的反了。

总理：以后你们可以改换一些人嘛！他们有这个权利嘛，我们也不好干预呀！

高志伟：现在已经 170 多个单位成立临时联络站，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啦！

总理：临时联络站嘛！中央的这个电报还是对他们有效。

高志伟：是有效嘛！

总理：中央的电报总还有效嘛！

高志伟：有效有效，明天上午准备十点钟开大会，准备由一百二十多个单位发起开一个大会，在军区开一个大会，开完会就准备撤。

总理：现在场里还有多少人？这样搞不是要搞出分裂了吗？你这样搞不是造分裂了吗？

高志伟：现在问题是主席团的刘殷农同志不知跑到那儿去了。

总理：我告诉你，我给你讲一件事，我们今天中央通过了一个通知：不管有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要进入军事机关，尊重人民解放军（这个）专政工具。我告诉你，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把这个支持云南革命斗争的电报加快的发了，因为你们不是前天下午开了这个会吗？我十二点以后就给你们发出去了。中央通知的这个文件我报告了毛主席，我压了一天多，明天才发出。如果你们再不走，明天中央的这个通知一到，你们就变成了被中央的通知命令请你们走，这就不好了嘛！我请你作工作嘛，你懂得不懂得。他们主席团不讲民主，明天上午开会可以提嘛，可以讨论，应改换就改换嘛！今天晚上离开问题……

高志伟：你的意思是什么？

总理：我的意思是希望今天晚上离开比较好。

高志伟：现在马上就离开？

总理：嗯！

高志伟：现在就离开？

总理：嗯！

高志伟：你的意思是现在就离开？

总理：嗯！这个通知，我压了一天，明天发出。我们提今后不要，你们就不包含在这里边，你懂得不懂得！那就没有一点责任。不然，中央通知发表了以后，你们还后走，保守派就拿来指责你们违反中央的规定了，那就不好了嘛！

高志伟：我现在请一个工人同志和你谈好不好？！

总理：好！

刘先礼：总理，我刘先礼啊！我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总理：你哪个工厂的？

刘先礼：我是云南大学政治系的。刚才刘殷农找代表去了，听说你要和代表们谈话，他去找代表去了，他一会就来。

总理：你不可以谈一谈吗？

刘先礼：可以。

总理：你是云南大学的，刘先礼。刚才我不是和北京农机学院的同学讲了吗！

刘先礼：我们几个战斗团的给你讲啦，当然我们工作中有一些缺点，没有走群众路线，工作没有做好。现在在十二点钟以前大部分的工人同志已经撤出去了，剩下一部分同志组成一个联络站……

总理：你讲吧，联络站呀！

刘先礼：刘殷农一会就来了，让工人同志给你讲吧！

陆林：我是陆林，工人代表。

总理：你哪个厂的，叫什么名字呀？同志！

陆林：陆林。

总理：陆林同志，中央不是给了你们一封电报吗？支持你们嘛！我们希望你们还是今天离开的好。

陆林：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我们今天和主席团有一些分歧。

总理：你们主席团不民主，会开得不好，明天开会可以批评嘛！

陆林：你的意思就是叫我们现在撤出去？

总理：因为现在你们不走，你们明天就被动。我刚才告诉你们那两位同学：一位北京的同学，一位云南大学的同学。因为中央最近发了一个通知，今天通过的，就是所有的解放军驻军的机关一般的学校同学和工人不要进去。如果规定了，我们希望这个规定发表以前，你们先离开，我们后发表，今后不要……，也就不包含你们了。我们不要给保守派一个机会，你懂不懂啊！

陆林：好！懂。

总理：我还有一句话，你们要在军区大院设联络站，这个事情不要（搞）。因为军区不介入这个运动，不能在那儿设联络站。你们和军事院校去联系，军区大院是不能设联络站的。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因为这个电报毛主席自己批准的。给你们的贺电你知道了吗？听话嘛！

陆林：知道了，知道了！总理：我们对大会主席团有很大的意见，他们没有走群众路线。

总理：这个事情我晓得，这是你们内部的事，这个你们有自由，要批评他们嘛！

陆林：我们走的时候太乱，说撤就撤，撤了什么也没有，撤得灰溜溜的，那些保守派真是要讥笑我们了！

总理：什么？

陆林：要讥笑我们。

总理：怎么会讥笑？中央给支持你们的电报，你们可以印出来到处发嘛！

陆林：我们可以这样发，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做，象这样全部就撤，说撤就撤，而这样反反复复的……。

总理：我问你：中央给你们电报你们印了传单没有？

陆林：印了，我们自己印的。

总理：那很好嘛！那你们应该觉得光荣嘛；怎么……。

陆林：我们印是印了，我们也坚决响应这个号召。问题是我们走得太仓促了，没有组织，大会主席团没有组织好，乱七八糟的，有的人把旗子也拖着，就是那个红旗拿来扛着走，有的是拖着走，现在秩序很乱。

总理：这就是主席团工作没有作好了。

陆林：主席团工作得不好，这样一来，灰溜溜的就撤出去了。

总理：我不这么看，你们有什么灰溜溜的，中央……。

陆林：保守派正是这样看我们，讥笑我们。保守派啊！

总理：保守派，你拿中央的电报就可以和他辩论了嘛！

陆林：好好！我懂你的意思了。现在……

总理：明天你们把中央的指示大宣传而特宣传，进行大肆的宣传嘛！

陆林：好！好！

总理：中央支持你们嘛！批评云南省委执行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要分别考虑其性质嘛！

陆林：我们还有一个要求，我们要求云南省委公开作检讨。

总理：我告诉你，我已经给你们代表团讲清楚这件事了，如果云南省委给你们作检讨，你们才撤出，如果云南省委作的检讨不满意，就不撤……

陆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明天也撤出。我们发出了一个紧急呼吁，因为在今天不能撤出去，我们发表了一个紧急呼吁，今天上午十点撤出去，就是这个条件。

总理：你们不要提条件，提条件反而被动。

陆林：不是他们（不清），我们也要撤出去，我们提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给我们答复。

总理：我跟你们代表（给秘书讲：你去给我把代表找来，他是昆钢的，刚才的一个是农机的，一个是云大的）你们的代表都在等着听电话，我跟你们代表讲得很清楚，他们明天下午就飞回去了。

陆林：明天下午就飞回来了，好！

总理：我告诉你，这个形势很有利，你们应该要采取主动，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在这里纠缠，这样对你们很不利的。我完全了解你们的全部情况，我们完全支持你们，你们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和我争，同志！

陆林：知道了，听懂你的意思了。

总理：我们说，责任完全在于省委，是不是呀！那么检讨，省委回去检讨，你们将还可以批评他们。你们要省委检查，如果不检查就不撤，你们不是很被动了吗？

陆林：懂得你的意思了。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工人同志，昆明机厂的，他要和你谈谈。

王旭辉：总理，我是昆明机床厂的工人代表王旭辉。

总理：你听到我刚才讲的吗？

王旭辉：我没有听到。

总理：你讲好了，我们希望你们现在就撤出去，比较主动。我给你们来北京的几位代表都谈得很清楚了，谈了三次了，我一直在等着你们的电话才离开办公室。

王旭辉：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立即撤出。但是在撤出时，大会主席团一共作了三个决定，上午他通知撤，结果到了中午他又通知说不撤。上午他通知

撤，但是怎么撤又不讲。昨天主席团在广播车上通知撤出军区大院，但撤出军区的条件也不讲，为什么撤也不说……。

总理：中央和国务院给你们的电报你看到了没有？

王旭辉：看到了。

总理：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电报，你们不是听主席的话吗？主席希望你们撤，为什么你们还要问，还要说别的问题呢？你们撤出去就好嘛，你们主动嘛！这个电报是支持你们斗争的，批评省委的嘛！保守派抓不住东西嘛！你好好的读一读嘛，怎么主席批准的电报你们都不重视！主席团说错了话，你们内部批评他们嘛。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你说一说。

王旭辉：主席团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是郊区的，离这个地方几十公里，今天就没有办法撤走。我们是郊区厂矿，根本没有准备，天黑了突然通知撤离，那不是前几天下着雨，我们搭了一些帐篷，现在怎么撤法也不讲，就限昨天 24 小时以前撤出，这是办不到的。工作中一点准备也没有，大会主席团就是他们说了算，工人的意见他们根本就不听。从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来讲，从我们进来以后，从来没有听说过宣布什么大会主席团的名单。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工人有多少，红卫兵小将有多少，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撤了，咋个搞的，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上午说通知撤，结果工人的意见怎么撤，他又不讲，下午又作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撤，但是到了天要黑的时候，又说要在昨天 24 点以前全部撤出。外边又下着雨，这个情况大会主席团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人的死活问题，叫我们郊区的撤了睡在露天坝坝上去？像这样下着雨，有老的，有小的，有的还是家庭妇女，这些在露天坝里怎么睡呢？他们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大会主席团说了算数，工人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本就不接受。

总理：同志，你说的是你们主席团跟你没把事情搞好，这个你们有权利批评他们了。但是我问你，中央国务院给你们的电报你看到吗？看到了中央完全支持你们嘛！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嘛，是不是？！所以你们不要再提什么办法了，如果 12 点以前撤不了，现在已经过了 12 点都快天亮了嘛，同志，应该要他们想办法把你们送回去，多少人呀！

王旭辉：我们三百多人。

总理：现在不是还有车子在大院里吗？

王旭辉：没有，还有几部宣传车。

总理：只有宣传车，别的都没有啦！有车子嘛，同志，你们还可以用嘛！你们刚才的条件是内部的事情，你提条件跟军区一讲，就不好啦！他不能负责任嘛。你们的代表在北京就谈清楚了，他们回去会告诉你们，你们有意见，你们看大的问题。如果你们回到工厂受到什么压迫，我们可以告诉省委、省人委出一个通告贴到各个厂各个矿，不许压迫你们，不许歧视你们，不许克扣你们的工资，不许改换你们的工作岗位，应该好好的对待你们。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发通告。把十二月九日十条中的一条公布来保护你们，这个事情我可以叫省委、省人委搞的。关于你们在郊外怎么回去，你们可以找他们，有车子可以分一部份把你们送回去嘛！

王旭辉：总理，我们今天十点钟开会，开了会以后我们就撤了。

总理：不是呀！你们到了十点钟开会，又发生新的问题，中央电报就一点效也没有了。

王旭辉：我们说今天十点钟开完会就撤了。

总理：如果开完会又不走又怎么办呢？

王旭辉：我们一定走。

总理：那你何必等着开会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开了会以后再走呢？开了会以后又变卦了吗？不好嘛，同志！

王旭辉：总理，我们如果象这样半夜三更的走，我们不愿意走的，现在天黑了，我们走不回去，有车子也送不回去，现在才五点多，走向郊区去不好走。

（断话）

陆林：我们是坚决拥护你的决定。我们就是要开个会庆祝，我们在军区这段时间斗争的胜利，关系重大，通过开个大会庆祝庆祝；另一方面，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回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们想开个会，想拖延到十点钟再走，是这样的。

总理：你哪一位呀？

陆林：我陆林呀！

总理：我问你，陆林同志，开一个会再走，热烈拥护中央这当然好啦！我问你：如果那时有人不走怎么办呢？

陆林：会走的。

总理：这个事情就是夜长梦多呀！你那儿有人提出条件来、军区如果不答复怎么办呢？

陆林：我们不肯定要军区答复。

总理：不要军区答复，你们只是自己开个大会？

（争吵）

陆林：我们还可以不让军区答复，如果军区负责人要答复，我们也不让他答复。云南省委的问题就不同了、我们认为责任完全在于云南省委，在于阎红彦。周总理，我们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这样说的：……

总理：这三个条件不行嘛！不好回答嘛，这三个条件。

陆林：不行啊！这三个条件是这样说的：还要求在今天上午十点钟答复，鉴于目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为了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戳穿云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社会生产的新的阴谋，在上述三个条件暂时不能达到时，可以大部份革命群众撤离军区大院，但是要在军区大院内设立革命工人代表、革命红卫兵及一切革命组织的联络站。

总理：你是哪一位？

陆林：我是陆林。

总理：我告诉你：现在中央前天通过了一个通知，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能到解放军机关里面去。你这个在解放军大院里设联络站不合中央的规定嘛，同志！

陆林：我们完全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啊！

总理：按中央的指示办事……

陆林：到十点钟，我们完全撤。

总理：你第三个条件等到十点钟变了卦，我怎么办呢？

陆林：我们完全撤走，只是提出三个条件。

总理：提出条件不一定能实现，你们怎么好撤走呢？那不是反而被动了吗？

陆林：我完全按照总理的精神动员了。

总理：我告诉你，你不要提那个条件，你听一听我的话嘛！

陆林：我坚决听你的话，总理。

总理：你提三个条件，那明天开会……。

陆林：总理，你是不是去休息，我们坚决听你的话。

（争吵）

陆林：刘殷农同志来了，总理！

刘殷农：周总理！

总理：你是刘殷农同志？

刘殷农：我是刘殷农，他们说我不跑了，我没有跑，我回来了，我在院子里面的。

总理：我告诉你，你们今天群众大会开完后没有布置好，你们没有把中央的那个电报读……。

刘殷农：声音小，我听不清。

总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不是赶了一个电报给你们吗？完全是支持你们的。

刘殷农：是啊！我们领会这个精神了。

总理：那问题是你们在主席团里没有讨论成熟，就宣布撤退了，他们就不了解。他们现在不是要提三个条件吗？这三个条件不好实行啊！我们已经给你们代表谈了，你们代表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等一下他们再给你讲一讲。因为三个条件为什么不好，我给你讲一讲，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你们才好撤。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责任完全在于省委，就责备了省委了，将来出去了你们可以叫省委检讨。检讨不满意，还可又再检讨嘛！如果你们要现在检讨，如果不满意，你就不好撤了嘛，就被动了嘛！你这个条件不要提得被动，懂不懂啊？！

刘殷农：我们原来各战斗团、队的负责同志讨论了两次，都是无条件的撤出，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总理：对的嘛！

刘殷农：事实上，绝大多数同志也支持主席团的这个决定，已经离开军区了。

总理：但是不是还有少数同志？

刘殷农：是啊！我们工作没有作好。

总理：对、对！你们慢慢的作，我们不会怪你们的。

刘殷农：是啊！我们工作没有作好，要……

总理：现在这样子，你们还是跟他们好好的商量，不要等到今天白天开大会再撤出去了。第二个条件，要军区给你们平反，这不需要了。

刘殷农：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

总理：中央支持你们的斗争嘛！难道军区比中央还大，中央的声音你们都不听，还要军区平反，怎么……

刘殷农：我们同志认为中央已经这样关怀支持我们，没有必要再叫省委给我们平反。

总理：中央电报这是毛主席批准的，你看了嘛，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你们要在军区设立一个联络站，这是不合适的，中央今天通过了一个通知，说明了地方上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够到军事机关里面去。

刘殷农：我们会坚决执行的。

总理：因为照顾你们的情况，我们加了个今后，也就是以前的不提了，保守派就没有借口了，懂不懂啊！所以你要在那儿设一个联络站，你不是被动了吗？将来军区不答应你们条件，不是很被动吗？我把我们内部的事情都告诉你们了嘛！

刘殷农：是啊！是啊！我们很感谢中央对我们造反派的支持。

总理：你们的代表今天下午就回去了，你跟几位同志谈一谈。你们，我看还是决定离开，大会还是可以开，开个更好的大会，把中央的电报铅印出来。

刘殷农：我们已经布置了，印了。

总理：我告诉你们，你们通过一个向毛主席致敬电，表示坚决支持中央的电报号召。你们要继续的彻底批判云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你们把气势拿出来，保守派就没有话可说了，你听懂了吗？你看可以不可以不讲条件，明天上午开会以前，就撤出去开会去嘛！不回来了嘛，这不就是一个办法吗？你看做得到做不到啊！

刘殷农：我尽量做吧！

总理：如果尽量做，做不到怎么办呢？

刘殷农：总理，因为有些情况也不大好说，其它几个同志还想跟你讲不讲？

总理：我已经讲了三、四回了，我累得……同志，我请你们的代表给讲几句好不好？

红：总理，我是红色人民军团的，对于刚才的几个问题想跟你谈一谈，就是关于大会主席团决定撤的问题。

黄兆琪：你是哪位同志？

红：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

黄兆琪：你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我是黄兆琪。我想给你谈一个问题，刚才周总理亲自给你们打了电话了，我们一直坐在周总理旁边，有几个问题跟你们谈一下。

红：黄兆琪同志，我谈是有些真相，刚才机床厂那个代表谈的有些不真实，情况不真实。我想谈一谈，重申一下，关于这个决定，决定撤的问题。昨天早上主席团决定撤，但是遭到一部份人阻挠。说什么这是因为前天中央有一个指示我们就坚决照着办，但是有人说这是什么投降主义呀！折中主义呀！

黄兆琪：是哪一部份人讲的？

红：逃跑主义呀！

黄兆琪：这是哪一部份人讲的？

红：（向旁边同志，哪一部份人讲的）……有一部份有分歧，所以在中午的时候，主席团就决定暂时不撤，到了下午叫大家讨论，主席团决定还是撤，无条件的撤。就出现了这些意见，象机床那位工人讲的，现在天气晚了不能撤，这是没有道理的。现在五点多钟，为什么几点以前不能撤呢？他为什么不能开车呢？认为委屈了，我们不同意！现在给别的同志讲。

‘八·八’：总理，我给你讲一件事。

黄兆琪：你是谁呀？

‘八·八’：我是首都三司的，清华大学‘八·八’战斗队的。

黄兆琪：清华‘八·八’战斗队的，你是哪一位呀？

‘八·八’：我——，我给你讲一件事，今天南下造反兵团的串联了一些暂时不愿意撤离军区的一些工人，组成了一个临时联络站，已经宣传接管大会主席团的全部工作。明天上午，大会主席团（就是原来的那个主席团，不是临时联络站）要在检阅台召开一个大会，他们联络站要夺权，可能会发生冲突，甚至可能会发生武斗，请周总理给我们指示。

黄兆琪：你看南下的同学另外还有没有同志在？

‘八·八’：还有。

黄兆琪：那请他来接电话好不好？请陈汉来谈一谈好不好？

‘八·八’：要我们队的吗？

黄兆琪：不是你们队的，是南下造反兵团的。

‘八·八’：南下造反兵团的刚才在宣传车上，好，来啦！

高志清：总理啊！

黄兆琪：不是。

高志清：黄兆琪啊！总理在不在？

黄兆琪：你是不是老桂啊？是不是高仰义啊？

高志清：我是高志清，我姓高，高志清。成立联络站的问题，是不是你回来再谈好不好？谁串联的，谁组织的，为什么要组织，为什么要串联？这个问题，你回来我们讲。

黄兆琪：你是不是南下同学？

高志清：我是三司南下串联队的。

黄兆琪：请陈汉同志给你讲几句好不好？

高志清：好！

陈汉：高志清吗？

高志清：嗯，你陈汉吗？

陈汉：南下造反兵团接管大会联合指挥部是怎么回事呀？！

高志清：我们没接管，谁接管啦？我们没有接管。

陈汉：没有啊？！

高志清：没有啊！刚才是清华“八·八”打的电话呀！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红旗在场嘛！这个问题怎么说，什么接管这个问题，你清楚嘛！这里的有些问题，在这方面没必要再作过多的解释，你回来可以讲清楚这个问题。关于紧急呼吁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已有一百七十多个单位成立联络站，为什么撤离啊，对撤军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工人一时的认识问题。

陈汉：喂！高志清啊，给你说一下，你转告南下革命造反兵团，坚决按照中央的电报办事情。

高志清：对对对！

陈汉：坚决按照这个办，不折不扣地。

高志清：好！

陈汉：立即撤消驻军区这个联络站。

高志清：这个联络站要撤消？

陈汉：哎！

高志清：哎？

陈汉：对！

高志清：这、这个不行。

陈汉：不是在军区要搞一个什么联络站吗？

高志清：这个联络站不驻在军区的。这是一个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准备开会什么的。这样的形式完全不是驻在军区的联络站。是这样的情况，是象大会联合指挥部那样性质，这不象驻军区的什么联络站那个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问题扯到哪儿去了，这就不好办了。（争吵）

陈汉：军区的人都撤走了？

高志清：全撤走了。

陈汉：全走了？

高志清：还有一些啊！

陈汉：还有谁啊？

高志清：还有，还有那些工人。坚决撤就是了。要撤，究竟怎么撤？问题是和大会指挥部有些分歧，所以其他单位就串联起来，准备开个大会，开完大会以后就撤，就这个问题嘛！

陈汉：是这样啊！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电报，还有电话指示，就是照这个办事情，不开什么大会了，撤走！

高志清：今天撤走，我和其他……

陈汉：马上就撤。

高志清：今天撤，还得和其他同志商量。

陈汉：你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高志清：可以啊！可以，可以。

陈汉，就这样吧！

高志清：行，喂！刚才，我们提出的意见是不现实的。有份紧急呼吁书，总理说提出的三个条件……，提出的三个条件暂时不能达到时，也可以撤离军区大院。但是要离开大院的话，设立由革命的工人代表、革命的红卫兵一切革命组织代表组成的联络站，刚才……（争吵）

陈汉：喂喂喂！

高志清：意见有分歧啊！意见有些分歧啊！

陈汉：现在不论分歧，回去可以进行辩论，回去辩论也好，现在的人那还必须撤出军区，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

高志清：可以可以，我们没有意见。

陈汉：好不好？

高志清：好。

黄兆琪：喂！请你找一找刘殷农啊！

高志清：好，你等一会儿，黄兆琪同志。

黄兆琪：哎哎。

唐天锡：总理在不在旁边啊？他们刚才在这儿谈的话，完全是欺骗！我念念他们这个呼吁上边，这段话我念一下啊！我念一念，就是他们提出了四项要求是不是？三项条件这三项条件我念一念，后边的几句话我念一念：“如上述三项条件暂时不能达到时，大部份革命群众可以撤离军区大院，但是要在军区大院内设立由革命工人代表、革命的红卫兵及一切革命组织代表组成的联络站。联络站一直要斗争到三项条件满足，再行撤离军区大院。”刚才他说这个联络站只是明天大会主席团的这个形式，这完全是撒谎，与他们自己写的，他们负责写的这个呼吁书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他们这个呼吁书上写的三个条件都要满足，但是他们的这个代表又讲那三个条件不一定要满足，又是没有什么条件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总理面前不能撒谎，是不是？什么事实就是什么事实，……

黄兆琪：你哪位啊？

唐天锡：我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唐天锡。噢，还有一点，这些单位连他们串联的单位，就是他们传单上写的，我念一下啊！就是上面写了十几个，最后就是四十一个革命群众战斗组织。只有四十一个，现在他讲是一百六十几个，将近一百七十几个，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黄兆琪：喂喂！

唐天锡：喂！现在请刘殷农同志讲。喂！

黄兆琪：党中央的电报翻印了么？

唐天锡：喂！

黄兆琪：喂！你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吗？我跟你讲，这个争论问题不要再啰嗦了，有些问题……

（争吵）

黄兆琪：喂！现在有些问题，有关争论问题，有关辩论问题，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你现在先跟同志们讲清楚，照中央的那个电报办事，不折不扣地马上就撤出去。

唐天锡：就是！我们无条件的撤。但是现在他们不让撤，有的不撤。

黄兆琪：有的不撤？

唐天锡：他们就是不撤，就是刚才讲的，他们要满足三个条件才撤。

黄兆琪：哪一些不撤啊？

唐天锡：就是刚才讲电话的那些嘛！

黄兆琪：那些不撤？不撤的把名字说上来，我给他打电话嘛！

唐天锡：噢！

黄兆琪：哪些不愿撤的？

唐天锡：先在电话里讲话的这些代表。

黄兆琪：噢！就是这些代表！

唐天锡：哎！

黄兆琪：喂！你给他讲清楚，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

唐天锡：对对，就是。

黄兆琪：总理已经讲得很清楚。

唐天锡：总理早就讲清了。

黄兆琪：那三个条件嘛！这三个条件总理作过解释，特别是这个电报啊，这个电报是林彪同志亲自修改的，书记处同意，主席亲自批的啊！你说我们平时讲“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

唐天锡：就是！就是！对！对！

黄兆琪：平时讲的是，现在要对现的时候了，做得怎样了？另外还有个问题呀！有些东西，我们怎样执行主席的指示，怎么样执行党中央亲自批的指示啊！特别是党中央亲自下的命令还在那里，这是一个问题，给同志们讲清楚。

这次进驻，我们的确是胜利了，党中央毛主席撑了我们的腰。进驻军区后，总理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亲自指示我们怎么干，而且现在已四点钟了，总理还在旁边，给我们这次上京的代表指示怎么干，而且给刘殷农同志打电话，都亲自指导我们这次运动的。今天下午，今天晚上啰，全体云南地区到北京来的代表——有工人、文艺界的，还有教育界的，周总理亲自接见他们啦……

唐天锡：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讲的……

黄兆琪：接见了他们以后，又亲自作了指示。有些问题党中央对我云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确实关心哪！有的路怎么走，总是……

唐天锡：对对对，我很理解的。

黄兆琪：……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跟同志们讲清楚，无论如何，现在一个也不能留，只能够全部马上撤出去。

唐天锡：是。

黄兆琪：还有个问题，联络站怎么也不准留，如果那一个留，你们就找他……拖出去。

唐天锡：对对对。

黄兆琪：好不好？

唐天锡：好的，好的。

黄兆琪：你给同志们讲清楚，工人同志啊！还有今天总理讲，这样，工人同志恐怕工资问题，回去受迫害啊，他还亲自作了指示，要求各工厂不能这样做。总理刚刚还讲过这个话，回去不准扣工资还有不准施加任何政治迫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知，每个工厂都去张贴，好不好？在这里是跟同志们讲清楚，无论如何，一个也不能留。还有一个问题，工人同志，旁边的工人同志都要作出模范的行动，还有红卫兵同志，一定要作毛主席的红小兵，好不好？

唐天锡：好！

黄兆琪：你问问他们，看哪些思想不通，给他来接电话，我们给他讲讲，好吗？

唐天锡：好！现在还找不找刘殷农同志呢？

黄兆琪：刘殷农同志在不在？

唐天锡：在！

黄兆琪：在，我跟他讲几句。

唐天锡：好！

刘殷农：喂！你总理吗？

黄兆琪：我黄兆琪呀！

刘殷农：你黄兆琪呀！好。

黄兆琪：你是老刘啊！刚才总理讲了话嘛，我们都在总理的旁边。今天下午、晚上总理又接见我们啦！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后，总理又请示，党中央国务院发了电报嘛，这个电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啊！

刘殷农：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啊！

黄兆琪：是主席亲自批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央有些问题考虑到我们的方便起见，中央准备发个通知。这个通知以后是任何人不准到军区去，考虑到我们已经去了嘛！以后又加了个“今后”，今后任何人都不准去。这个问题是考虑到我们工作方便嘛！中央考虑到我们工作的方便，运动的开展，都是站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边。还有一个总理给你打了多少次电话！这次斗争，从一开始到现在，总理一直给我们打电话，还有是亲自指示怎么办。都一直在给我们讲。如果这一次斗争没有党中央的（支持的）话，我们能不能胜利，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些问题是我们走了以后，如果再这样搞下去，要被动的。

刘殷农：是呀，是呀！我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越快越好嘛！

黄兆琪：哎？

刘殷农：我原来的意思就是撤出军区越快越好。

黄兆琪：越快越好！如果哪一个要阻挡的话，我们先把工人同志动员起来，给他们讲清道理，讲清道理后，全部，一个不留的全部都撤出去。还有叫我们的红卫兵带头讲清楚，好不好？

刘殷农：你看，这件事情啊，原来我们马上回去动员。你知道，我们那个队伍也大，是不是？问题比较多时，所以有些队就没到，精神就没有领会，所以昨天出的通知就有点乱，后来我们根据情况就改变了一下，就说思想没有统一起来

嘛，暂时不走，思想弄通后再走。所以这些情况，本来我们的思想，我的思想是能够越快越好，但实际上，我们进来就是组织工作跟不上，因为队伍那么大，是不是？问题也比较多，所以考虑不到啊，所以同志们有些接受不了啊！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黄兆琪：我们明天回来了。

刘殷农：明天回来？

黄兆琪：明天回来了！

刘殷农：明天上午吗？

黄兆琪：明天还没有定下来。我们很快就回来啊！怎么样啊？

刘殷农：请你转告总理一句，你就说：我们驻在军区大院里边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坚决的不折不扣的实行中央指示，拥护中央的呼吁，我们是说到做到，不是口头上说，实际上是另外一样，我们是无条件的撤！

黄兆琪：好好好！

（此系记录稿，如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的讲话

谢副总理：左派内部有缺点、有分歧，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共同对准大方向。不要把自己内部的问题拿到外面去公开。不要公开在外面贴大标语，更不能撒传单，更不能写大字报在外，像这样做都是不对的。现在你们两派内部要停止争吵，可以由你们哪一边先停止，如果那一边不停止，也不要计较这些。

谢副总理又讲道：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一般不能叫托派，托派是很坏的敌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敌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提倡这样搞。“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中央哪里提过这个口号，报纸上也没有提过。全国也没有这个口号，哪里也没有提过这个口号，听说昆明街上都是标语，这不好，这是你们造反派内部自己的事情，不要公开出去嘛，主要是造反派内部自己要评比与自我批评。

对干部的问题：当前大联合大夺权是主要的方向。要搞三结合。你们要赶快打电话回去叫家里面停止论战。

黑龙江的那个报告与社论都是很好的，非常重要。

对于干部，你们要发动机关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来分析，召开中小型座谈会，来分析对比嘛。只要不是“三反”份子就要照红旗第三期社论办。关于干部那一段是主席亲自修改的，修改最多的就是那一段。对犯错误的干部大家要认真分析。

代表问道：云南有一个不好的情况，所有的上层干部都靠边站。与上层干部接触就说是“走上层路线”。

谢副总理说：这不好，不能这样看，这些老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经验较丰富，都要争取团结，犯错误的要允许别人改正。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起矛盾。把造反派打成保守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们被抓出来以后，恨不得把所有的干部都打倒。一定要认真分析，不能采取一律打倒的态度，一定要找出一个比较好的来，否则三结合就搞不成了。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

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和四〇三厂同志们：

昨天军区军医学校少数人和今天外语学校少数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竟敢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违抗军委命令的错误行为。昆明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如果你们对军区有何要求，可以派少数代表到军区商谈，广大群众应该劝说他们退出后勤大院。好让后勤部门进行备战工作。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零点十三分——三点五十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一 接见记实

当伯达、康生、谢副总理等同志走进会议室时，全场暴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央首长向同志们问好，同志们祝首长好。谢副总理给大家一一介绍首长名字之后，便坐下。

伯达：跟大家交换意见。随便谈谈，关于云南的问题；关于大联合的问题，夺权的问题，请大家随便谈……。

康生：哪位是高仰义呀？（高回答）你是哪个学校？参加了哪个组织？（高一回答）你们云南的工作怎么大联合，随便谈谈吧！

伯达：你们现在有两个大联合，可以再搞一个大联合嘛！

（大家思考问题，会场上暂时没人发言）

伯达：请大家随便谈谈吧，不要拘束。我们是来当小學生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你们不说话，我们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们也不好讲嘛，不要拘束。

（大联合指挥部杨树先同志发言，代表云南省全体革命造反派和全体革命人民向中央首长问好，并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检查了我们在过去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汇报了来京学习的情况。紧接着王云仙、施志汝以及“新云造”的夏明富同志、还有陈志荣同志都相继发了言，分别谈到过去工作中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出现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以及来京后的学习情况。当施志汝同志谈到：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是来请罪的时）

康生：你们“造反有理”，怎么会有罪呢？“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你们要是都来请罪了，那还不成了“革命有罪”了吗？（众：笑！）

（当陈志荣同志谈到：大联合、三结合是大方向，一定要大联合、三结合时，康生同志几次插话）

康生：这里我要插一句话，你们搞“三结合”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三结合呀？是“合二而一”的“三结合”呢？还是要革命的“三结合”呢？（陈答：要革命的“三结合”，大联合！）对！要革命的，不能是大杂烩的，你们不要说请罪，你们这样说，我们听了很不舒服，你们没有罪，你们有理！你们来北京一趟，不要把革命干劲磨掉了*（口旁加么），你们不要没有锐气了（特有风味地），我就担心这个！来北京了，而应当是（革命）干劲更大，搞得更好！

（当陈谈到：我们之间的分歧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的，因为首长们很忙，我们就不打算讲了，准备回去整风时再解决……）

康生：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不容易解决的啊，夺权以后，分歧可大哩！特别是掌权以后，有的地方分歧就更多了。北京清华、北航等内部的分歧也很大嘛！内部吵得很凶，简直要打架、抄家哩。听说你很难过（指着大联合指挥部陈志荣同志），有什么难过的呢？分歧是联合的前奏嘛！（众：笑！）

康生：（伯达同志也同时插话）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团结——批评——团结”，这样才能是真正的团结、联合。

（大联合指挥部陈志荣又检讨了一番，并说：“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现在正准备写一个联合声明……”）

康生：光讲联合，不讲原则还是假的，思想没交锋，写个“声明”也是空的。该争论的还是要争论。

伯达：要在斗争中联合，要在复杂的斗争中联合，光在旅馆中搞联合是不行的。

康生：对的，不要谩骂，不要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在北京打起架来啊！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你们交锋的，你们若不交锋，我们就要走了！

伯达：我们主张你们思想交锋。看看你们究竟有哪些分歧？

康生：你们的分歧是否在冲击军区的问题上？

（大联合指挥部的同志谈到，在进驻军区前就有了，明显的是从进军区后，他们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个口号开始的……。）

杨树先同志讲：他们说我们大联合指挥部犯右倾，要反我们的右倾机会主义……。

涂晓雷同志把我们之间接着他们所说的几个所谓重大原则问题，提出来并逐一驳斥，进行澄清。当谈到撤出军区的问题时

康生：他们（指“南造”）不对，你们对！不撤出军区这是个原则错误。革命不革命，首先看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左的还是右的，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看对待解放军的态度。这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一点含糊。

（涂晓雷同志说：“新云南”的同志一再搞攻击的材料，到北京还在整“大联合”的很多材料。）

康生问：你们搞了他们的材料没有呢？

（涂答：有。施志汝补充：我们压起来没有发，没有大量的搞！）

康生：（笑了笑）你们两方面都搞了嘛！

“新云南”杨文科同志发言：今天，来到北京，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在中央首长面前，不能撒谎！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做老实事！刚才讲那些都不符合事实！康生同志刚才讲了：对待人民解放军的态度是考验真左派还是假左派。我们一贯反对进驻军区的，我们认为行驻军区就是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进驻军区……。

康生：你们进没有进驻军区呵？

（杨答：我们没有进驻军区，只是到里面去作慰问演出、宣传……）

康生：你们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呢？

（杨答：我们是在外边，只是演节目的时候进去了！）

伯达：你们宣传动员他们出来呢？还是演节目鼓励他们在里面坚持战斗呀？

（杨结结巴巴答：嗯……我们演的节目都是由他们安排的，我……我们没有权力呵……）（众首长相视而笑）

（此时南下造反兵团高仰义马上接着发言：我来说。自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团成立以来，我们是支持《八·二三》的，是支持黄兆琪的。但黄兆琪处理问题老是犯“右倾”，黄兆琪的右倾是由来已久了，是老右倾了。接着便列举了八桩事例证明黄是犯右倾了。）

康生：阎红彦大抓“南下一小撮”与同学提出抓“南下一小撮”性质不同哪！不要混淆了啰！（杨还想继续发言，被首长打断）

（接着黄锦华同志发言谈到了“新云造”与“大联合”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大方向方面，“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反右倾的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26 夺权问题，所谓走“上层路线”的问题，对南下造反兵团的看法问题。）

（当黄锦华说到我们也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时）

伯达：你们没有犯罪呵！你们很有成绩，你们造反有功！犯什么罪？

（云大《共产党宣言公社》周维文发言：刚才黄锦华提到我们《共产党宣言公社》，我就不得不发言了，我们为什么要退出大联合指挥部，大联合指挥部不民主，搞一言堂，排斥不同意见，当然我们反右倾不对，但是大联合，我们来北京后，《八·二三》大反托派……）

康生：抓什么托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对，抓托派也不对。

（当周又继续发言的时候）

康生：你叫什么名字呀？啊，周继文，云大的吧！请你讲短一点嘛，你是学文的搞理论工作的，1、2、3、4 几点就讲完了嘛！

（伯达同志叫刘志宏同志发言，刘志宏同志谈到他们工厂工人怎样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反对制造分裂，反对经济主义，反对“打倒×××”，反对所谓“反上层路线”，反对“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个口号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中渔利，感到很高兴……时）

康生：你们做得对！

二 首长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北京南下的学生，应采取当小学生的态度下去。因为是下去学习，不是去包办代替那个地方的革命，这一点，在你们南下的时候，也没有给你们南下同学谈过。对！对！可能在座的人还没有听到过，没有个个都谈过，当然也不可能嘛！但总的精神，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也讲过了。人民日报社论也讲过了。下去的学生不管到什么地方去，到工人那里，到农民那里去，到机关那里去，到其它学校那里去，首先是当小学生，这是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永远不能忘记。如果是以一个指挥官的态度下去，那是不行的。

对南下学生的作用应当作具体分析，有它积极的因素，有它消极的因素。积极的因素就是他们在运动初期到各地去带些革命气氛，但是，当那里的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们还呆在那里就成了包办代替，那就不对啰！就会犯错误，积极的因素就会变成消极的因素。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建议，请北京的同学都从各地撤回来。中央已经下过命令了，要南下的学生都回来。如果不撤回来，呆下去，还在那里做指挥官，一定会继续犯错误，现在撤还来得及。你们反映的一月份冲军区问题，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所谓反右倾的问题，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在根据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反你们要搞“大乱”。你们这样提，完全是错误的。冲军区也有你们一份，撤出军区你们又要讲条件，这些责任你们怎么能推掉呢？但是你们南下同学也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你们，群众批评了你们，就觉得翻不了身啦，抬不起头来啦，不要这样。你们做了许多工作。重要的是接受教训，你们应当把错误当作肥料，吸取营养，作为经验教训，转化为力量，可以帮助你们将来走上正确的道路。犯错误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继续坚持错误，人家给指出了，还是继续持不很好改正，那就危险了。现在赶快回头，作为一种经验。你们现在也有了正确的经验，也有了错误的经验，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这样就好了。如果一个人一生只有正确的经验、没有错误的经验，是不会成材，是不会有出息的。你们要从积极方面去想问题，新问题复杂得很，你们受了一次锻炼。犯了错误不要难过，从积极方面去想问题，接受了教训，就会更好地战斗，正确地战斗。我的意见你们考虑对不对，犯了错误不要难过，如果不坚强的战斗，那就不对了。希望你们赶快回来，不回来就会继续犯错误，还留在那里继续作指挥，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我们在北京到过一些大学、中学，凡是到过过的地方，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去当小学生，在座的同学有的会知道。我们知道，老是讲当小学生，你们对甘当小学生这一点，可能有些不大听得进去，现在就有了体会了吧！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感到不那么容易当小学生啊！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当小学生，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先生。包括正确的经验，犯错误的经验，不那么正确的经验，我们在这里学了一些东西，我们感谢你们。意见对不对，请你们考虑。

讲到联合的问题，不是原则的联合，不是离开革命大方向的联合。要在革命的原则上，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在群众的斗争中，搞革命的大联合。不是合稀泥，是革命的大联合。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我们希望你们早日回去。你们在北京是否能够搞大联合。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见，不知对不对，你们在北京是否能促成大联合？北京同志的讲话有的可能对你们有启发，可以促使你们大联合，但主要还是要你们回到当地去，实际解决问题。实际上要真正解决，还必须就地解决。希望你们赶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就地搞大联合、“三结合”、就地闹革命，这样好不好？你们云南是边疆，是边远的地方，要害的地方。很乱可以实行军管，军管的目的还是为了发动群众，还是要搞三结合。

刚才和云南的一些同志谈过这样一些问题，边疆地区，很乱的一些地方，要害的部门，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的目的，还是要发动群众，搞革命的三结合。

最后一点小建议，今天要在全国广播上海《体育战报》两篇好文章，明天全国各报都要刊登，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

我这些话对不对，你们可以考虑。刚才我已经跟你们省里的几个同志讲了。我的话完了。

康生同志讲话：

伯达同志讲的，代表我们文革小组共同的意见，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建议，供你们参考；事情主要靠你们去做。也许我们对情况不很了解，建议不符合实际情况，你们可以讨论研究一下，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伯达：这一点，希望北京南下同学要特别注意！）那些对的就做，不对的就纠正。十六条的精神主要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因此，希望北京南下的同学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

刚才我批评南下同学的缺点，是在你们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讲的。南下同学到云南煽风点火，成绩很大。这一点要肯定。据军区的领导同志反映，黄兆琪同志也是在高仰义等同志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刚才讲了你们一些缺点，也不要紧，不过是为了冲击你们一下。不能因为个别缺点而否定这个成绩。我们还记得阎红彦等一小撮对北京南下同学是有反感的，要揪他们的一小撮。这个情况云南省有，别的地方也有。应当看到他们的巨大成绩。我们看问题要有分析，要有阶级分析、

革命分析。对事情要一分为二。他们有自我批评精神，要欢迎。另一方面，希望同志们在大联合过程中，同样地对自己的缺点、毛病也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两方面要互相学习，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这样大联合的工作才能做好，三结合的工作才能做好。这一点大家是共同的一致要求。

你们来北京半个多月，是有成绩的。几次互相交换了意见，有进步、有成绩。你们说思想未交锋，今天也补起来了。今天我们是有意让你们交交锋，有的同志说有一肚子气，带一肚子气回云南去干什么呢？出了就完了嘛！目的是希望你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分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希望你们很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三结合，促成革命大团结。现在看来，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特别在军区×××、×××以及其他同志的帮助下，相信你们是会搞好的，相信你们是能够团结起来、实行三结合，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同志们来北京，学习了红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提高了思想水平，这次来还是有很大成绩的，促进了同志们的思想进一步提高，这是大团结、大联合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次来北京受到很大的冲击，冲击一下也好，现在有了大联合的基础。

你们不是讲大联合、三结合吗？在当前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问题要注意，一个所谓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各学校各地方都存在。这是很反动的、很不对的，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有人提出“反上层路线”，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正确的阶级路线。不作具体分析是不对的，是达不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目的。这种思想不排除，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立革命的“三结合”，没有“三结合”也就不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团结。当前障碍大联合、大团结、三结合的就是打倒一切、排除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思想。希望同志们从自己的头脑中，回去也在同学中，排除这种思想。刘志宏同志，你们那个从解放军派去的党委书记，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站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上的，你们就要保，不要怕保，因为他是革命的，对革命的就是要保。当然、一定要作阶级分析，如果是刘邓司令部的就要反。但不要一听到保字就害怕，一定要有阶级分析，要看保什么，是保毛主席司令部的、是无产阶级的、就一定要保，不要一概反对。你

们来北京给我们商量事情，难道也是走上层路线吗？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当时运动的主要障碍和阻力，同志们要特别注意。

再一个问题是，夺权中怎样“三结合”。怎样进行三结合。一种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建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有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所领导的解放军的代表，也有革命的干部代表。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主张的三结合，是正确的三结合。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其中工厂三结合的工人不仅包括新工人，也包括老工人，干部也要分技术干部、一般干部、领导干部。对老工人、特别是老技术工人，不要看他们造反晚就歧视。革命不分时间，造反不分先后。参加过农民运动的同志都知道，常常是坚定的贫雇农，不是立刻就起来了，首先起来的往往是些勇敢分子，但贫雇农起来后，就坚定得很。工人运动也是一样，解放军当然就不用讲了。具体说工厂三结合，干部必须包括一般干部、领导干部、技术干部，还加上民兵代表、工人民兵组成。按这种三结合搞出来的就是革命的三结合。这种三结合，不是折衷，不是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大杂烩的三结合，更不是合稀泥的三结合。第二种三结合，是折衷主义的三结合，杨献珍“合二而一”的三结合，也是合稀泥的三结合、大杂烩的三结合。这不是毛主席提倡的，是不能抓革命、也不能促生产的。我们要在革命的原则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搞三结合。另外要防止一种“三结合”，这就是第三种“三结合”。这种三结合是假的三结合，利用团结的名目，三结合的名义、混进一些人实际是复辟。搞了半天，结果统统都回去了。这种就更加复杂。这是破坏革命的三结合，实际是分裂，是复辟，而不是什么三结合。

因此，在夺权问题上要具体分析。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合二而一的三结合，更不能是复辟的三结合。

此外，关于三结合夺权问题，大家要好好读一读去年《红旗》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篇文章讲，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党，不是法西斯国民党。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跟毛主席走的，并不是所有干部、十七级以上干部“长”字号、“正”字号、“总”字号都是坏的。只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

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还有我们的党团员，是否都是不好的？不是的，大多数也是好的。这些基本的思想，在夺权斗争中必须认识清楚。这个前提认识清楚了，才不会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史上没有过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仅仅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夺权，而不是像在国民党社会中那样夺权，不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夺权。因此，夺权只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不是对所有的当权派都要夺权。绝不可能见当权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打倒。不分清红皂白，不分地方，见当权派的权就去夺，那非犯错误不可！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理解这一点，不记住这一点，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就连毛泽东思想也没有了。所以，刘志宏同志，你们那个厂，听你的说法，到底是夺权，还是不需夺权？（刘志宏同志说：党委书记刚来，我个人认为是好的，但他屈服于其他党委委员的压力，红旗举得不高，造反派有气愤。）那恐怕还是要夺权。（伯达：党委书记是好的可以帮助夺权。）对！不是统统不分青红皂白都夺权，不然，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了，一定更用阶级观点看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伯达：过去提的普遍夺权，全面夺权，这些口号是错误的！）如果全面夺权，普遍夺权，那么，他们（指李成芳、张子明等军队领导同志）的权你们夺不夺？解放军的权你们夺不夺？如不夺，就不全面，就不普遍了嘛！（伯达：厂矿也是有好的比较好的，总是大多数是好的。）不是所有车间都夺权。再一点，夺权以后，省的名字，中央已有通知，不要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临时权力机构还是用“革命委员会”比较好。有的地方用过“人民公社”这个名字，现在也要改了。上海原来用过，现在也要改了。

还有一点，要和同志们交待一下，即斗争的办法问题。十六条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的文件历来强调这个问题，但现在各地有些斗争方法不符合十六条，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等等，不知云南情况怎么样？要大量宣传、不要光学，还要用。有些报纸上登什么“喷气式”挂牌子，这些做法只能脱离群众。（伯达：“砸烂狗头”这些话以后也不要用了。）还有人下跪，是封建主义的做法，毛主席坚决反对的！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有理就讲理嘛！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搞那些？搞那套，说明你没有理，简直是形左实右！过去用过那些做法的不要再

算账了，今后不要再用。（伯达：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的话，是毛主席的主张。你们要把中央的精神传下去。回去要大力宣传，已经搞了的，不要再搞就行了，不要再追究了！）毛主席说了，造反有理，就是有理嘛！有理为什么要做那些呢？就是没有理才去这样做！这只会脱离群众！

还有一件事要向同志们交待一下，就是关于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说，大字报有革命的大字报，有反革的大字报。反革命就利用大民主，利用大字报，反对我们，例如“联动”就是。这是一个一分为二。还有一个一分为二。就是有质量好的大字报，有质量不好的大字报。有的是低级趣味，如现在流行的“砸烂你的狗头”，只是骂人！（伯达：是没话说了，才这么说！）是人头，不是狗头！如果是狗头那就好啰！问题就不大了，是狗头就不会执行刘邓资产阶反动路线了。这一点，你们跟《红旗》《人民日报》学一学，他们没有说过这个话。（伯达：什么混蛋啰！油炸啰！绞死啰！枪毙啰！火烧啰！这些话没有意思！有的还做一个纸人，用火烧掉，多无聊呀！这都说明没有道理，道理不充分，如果是好好调查研究，掌握了材料，掌握了道理，就不会这样干啰！）你们要学习《红旗》上的文章嘛！《红旗》上的文章就没有说过这些话，就没有这样做过嘛！干革命，写文章都要实事求是，不要骂人。各团体、各学校红卫兵的报纸上有的文章写得很好！如三司的夺私字的权那篇文章，上海体育战报的那篇文章等。生动活泼，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人民日报都转载了。但是，另一方面要注意，也有不少是不实事求是的，马路新闻，谣言可多啦！成了传播谣言的工具。危险的是有些青年不喜欢看人民日报，偏偏喜欢看马路新闻，听那些谣言。红卫兵的报纸的确有些好文章，但不能传播谣言。有的还惹了乱子，如说朝鲜政变，越南政变。朝鲜就来信向我们抗议。有的还向我提出抗议，搞到我的头上了。有些恐怕是坏了故意造的谣言，我们上了当，登了这些谣言。这些谣言登在报纸了，写成标语贴在马路上，减低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降低了文化大革命的威信，使国际朋友看了感到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个样子！（伯达：这是低级趣味，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有些报纸喜欢把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等等，印成照片，画成漫画登在报纸上，直到现在还有人搞。如有一个叫“百丑图”的，印的那么漂亮。这种东西无论省报（《湖北日报》登了）、红卫兵报都不要登。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各地千万不要传播这些东西。你们来北京不要带这些东

西回去。北京有好的经验，但也有坏的东西，对北京的东西也要一分为二。好的就学，不好的就要反对，就要抵制。

怎么样，今天就谈到这里了。总之，你们这次来北京，不要难过，不是有罪，不要灰溜溜的。革命过程中犯错误的事是常常有的，不要受批评就难过。你们不是带罪来的，而是带功的。革命有功，不是有罪。你们来北京是革命的，有功的。你们好好的来，好好的回去，是不是我批评多了一点？当然你们要特别注意，不能躺在过去的的成绩上，有功的时候不要吃老本，不要躺在功上睡大觉。高仰义同志特别要注意，听说你在云南有些本钱，但不要靠吃那点本钱。文化大革命飞跃向前发展，稍微自满一下，就会落后。过去是人家的先生，群众起来以后常常又变成学生。我相信，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定能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大联合、“三结合”夺权斗争搞好！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非常重视云南的事情，很关心大家，除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没有来以外，全部都来了。都在这里了。刚才伯达、康生做了重要指示。（伯达：不是指示，是交换意见。）还有中央文革的其他同志也讲了些话。你们来北京收获不小，回去把这些话讨论一下。（康生：订个君子协定，我们的讲话不要明天又印出去上大字报。我们的讲话不都是对的，记录也不一定准确，有时各派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各取所需！）（伯达：君子协定也不容易定，我有一次讲话，说好不要录音，不要印，还是印了。）（康生：容易订，但不容易执行。有时讲话可以冲口而出，如“君子协定”，科学院的说法是“革命协定”，如果捉小辫子，可以说是有四旧哩！这里有什么君子！今天是交换意见，云南的运动还是靠你们自己研究一下。）（伯达：今天的意见，对的，你们就吸收，不对的就丢掉。）认真学习，认真贯彻，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康生说：你们要抓生产，这是国计民生问题。

（有人问，民主党派的权夺不夺？）

康生笑了笑说：民主党派的权夺他干什么！还想当资产阶级？当国民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谢富治接见云南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二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时，周总理、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了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和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赴京代表，对云南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今天没有说的来看看你们。上次给你们云南的代表打过交道，这次谁来？

（众答：没有来）

上一批没有再来，云南的同志还是很讲纪律。

（总理翻阅名单，一边叫名字，一边问情况并作了指示）

杨树先同志，你是那年从华东去云南的，现在有没有回华东上海的？（答：走了一些）你们要做些工作，中央的通告贴出去了吗？要告诉他们回去，动员他们回去，你们要准备欢迎。你们建筑公司造反派有多少人（答：八千多人）你们单位有多少人？

（答：一万八千多人）

哦！这么多，在昆明是个力量，你们是自己为主，还是外边学生帮助？

（答：自己为主。开始时由三司帮助后来就有分歧了）

（总理笑了说）哦！分歧了。这次三司来人了吗？

（答：来了）

是哪一个同学？

（高仰义答：是我）

上次不是你来的？

（答：是陈汉来的）

现在回来没有？

（答：可能已经买票了）

他回来告诉他，我们还打过交道。要一分为二，南下的同学还是有功劳的，运动初期在昆明起了作用，是有成绩的。现在他们（指三司）没有带你们了？

（答：没有了）

当然要自力更生，但不要忘了人家饮水不忘挖井人。

还有一个机关干部，省级机关造反司令部的，你们机关夺权了没有？

（水利厅陈志荣回答：夺了

搞“三结合”没有？是不是长字号都靠边站？

（答：原来是厅长靠边站了，处科长没有全部靠边站，学了中央精神，已经给家里打电话了）

红旗第三、四期社论都讲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的文章要组织三结合，你们看了吗？怎么搞法已经很具体了，领导干部嘛，要监督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批评，叫他们检讨，要区别对待。

云南日报谁来了？

（答：两方面都来了）

你们两派观点不同，云南日报怎么办？

（答：现在合起来办，办报纸还是一致的）

你们对冲军区是怎样宣传的？登报没有？

（答：没有在报上公开宣传）

这就好，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登了就承认错误，浙江冲了军区先是那样认识，现在他们觉悟了，承认了错误，都写了检查，你们时间长了回去再检查，检查报纸实事求是，有错误就承认，没有就算了。

云南日报两派能合作，说明有团结的基础，报纸可以造舆论，你们要宣传大联合、三结合的大方向，看来大联合还是有基础的。

（有人说分歧还是有的）

分歧回去解决，云南省委、省人委的事情，不能长期瘫痪，云南是边疆，生产的问题，军队的边防、备战、援越抗美的问题，中央委托军区×××负责，云南大军区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推动帮助你们三结合。不光是两个军区领导，省委、省人委的负责同志也要站出来参加工作，云南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但对外不公布，报上也不登。目的是推动你们工厂、机关、学校大联合、三结合。

然后提出三结合的名单报中央，当然要征求你们的意见，中央同意了就登报、广播。红旗三、四期社论给了你们原则帮助，上海的文件更作了明确的规定，你们回去认真学习。大家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求大同，存小异，既然是革命造反派就要求大同，存小异。我有重要事情，你们不是要照像吗？走，照像去。

（照像后，总理走了，谢副总理讲话）

谢副总理：同志们这次到北京，总理也接见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都接见了，伯达、康生同志讲了很多话，今天总理有很重要的事，也讲了一段话。希望同志们回去。根据毛主席的路线、毛泽东同志、总理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去革命、去办事、去搞“三结合”。

我和你们接触了几次，是向你们学习的，康生同志讲了，要你们有什么分歧，原则的分歧，拿到桌子上谈清楚，分清是非，团结起来。是坚持原则的团结，不是合稀泥。原则就是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就是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你们要根据毛泽东思想去夺权，去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你们两家还是要合作，要团结，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共同搞好工作，当然，要弄清是非，不是合稀泥，你们两家的同志，“大联合”、“新云南”，还有南下的同学，那天作了些批评，主要是有一些全国性的思潮，你们不要误会了。每一个方面都有些长处和优点，各有各的缺点，“新云南”有“新云南的优点，所以要虚心、团结”，“大联合”要向“新云南”学习，“新云南”在某些问题上也要向“大联合”学习，不要以为那一位同志讲了话，就感觉怎么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我这个人毛病很多，你们革命性好，你们有很多优点。

坚持原则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同时在造反派内部要与“私”字作斗争，不要小团体，更不要个人，造反派要革命，既要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也要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既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也要夺头脑中“私”字的权。造反派在斗争中要经受得住考验，不要把我们原来要革命的东西也沾染上了。造反派是不是真要革命，不要在关键时刻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上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当，搞小团体主义，有

“私”字，有“我”字，有了这些，那革命就不行了，如不革掉“私”字的命，总有一天要垮台。

云南是边疆，是前线，又是国防重地，要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更高，要使我们祖国、云南是红的，毛主席的太阳永远照在那里。云南是重地，对外如越南，影响是重要的，这块地方把革命搞彻底是重要的，对东南亚的影响，对国外的影响就不同了。要让这块永远是红的。

你们造反派的头头回去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多学习主席著作，多学习中央指示、社论，我这两个月天天给你们造反派打交道，今天上午我还在做工人的工作，他们一直闹。现在北京有一百多万工人革命组织中混进了许多“保”字派的，混进了坏人，天天打架，今天我砸你，明天你砸我，这回可暴露了。是革命造反派就得有个标志，你是真革命派起码不能反对解放军，成天反对解放军算什么，你是真革命派就不能打人抢东西，破坏国家财产，中央三令五申还这样就不行了，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革命，同时要促生产，天天讲抓革命就是不促生产，你这个革命派就得打个问号。以前的事没有经验就不追究了，过去了的事情不算了，算老账是不行的，但经中央三令五申还要搞，军委八条命令公布后，还不能按中央的指示去做，你这个造反派就有问题了，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不能这样做，今天上午我接见一百个人，会上就吵，有的还捉人，“九·一六”打架是有名的。“九·一六”、“九·一五”不象话，北京的事可以给你们讲三天也讲不完。

北京好的东西多，缺点毛病是小指头的事。学习毛著跟毛主席、跟中央文革小组造反精神，也很好，支援了全国，把革命的火点向全国，这是主要的，这些都是主流，但那些反动思潮是有的，那些思潮是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自刘、邓路线，不是来自群众。

没有说的了，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按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路线，按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去搞，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去总结经验，去办事。你们组织方法要很快改变。一揽子不行，一个组织中有重工、轻工，有农民、有居民、有店员不行，你昆钢的人怎么知道百货公司的人？联不上的组织不跨行业，上海、山西都推广按行业组织，贵阳更好一些，现在贵阳不仅不跨行业发展到一个战斗组织以车间为单位，一个轧钢车间分三、四个组织不行，你要开会，我要生产，

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咋个行，哪里配合得上？！你们当工人，我也当过工人。

要按业来，要有利于学习，有利于干革命，有利于三结合，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平时了解。你是什么人？他那个工厂清清楚楚的。就是以车间为单位，恐怕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脑子里要想想这个事。贵阳有个纺织厂这样搞效果很好，生产也好，革命也好。他们有个口号，叫归口联合，一归口，革命也好革，生产也好生产。纱厂有个细纱车间，粗纱车间，要归口联合。上边到一个市，是可以的，工、农、商、学、兵大联合，下边要归口，工人是工人，农民是农民，学生是学生，财贸是财贸，下边工厂、大学中学、财贸等各单位，以本单位为基础，这样做就比较好一点，搞得稳。在北京，我正在做这个事情，现在开了个红代会，把学生都联合起来，还要准备个工人代表会的筹备会。一个工厂里多少总部，那得了！你要上班，我要开会，这就打架，不打架才有问题。你们开始闹革命，没有尝过这个味道，要使革命发展，学生也要把学生联合起来，到工厂、农村劳动也可以，要统一一下，不能各搞各的，减少互相矛盾。现在上海、山西、贵阳走这个道路。北京还没有解决，但都要向这个方向前进。所有大城市走得快的，都走这个道路。上海走这个道路，贵阳走这个道路，北京也要走这个道路。昆明要吸取外地经验。你们的组织一直向下发展赶快停停，好好把组织整顿一下，巩固一下，然后看怎么办？你们看，我又说得太具体了，你们怎么搞就怎么搞，我说的也许是错的。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李再含给昆明军区党委的一封信

李政委并军区党委：

我完全拥护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五月三十日对昆明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据说有怀疑是假的。经我了解，这是确实的，没有半点虚假；又有人说军区党委谎报情况、欺骗中央，是中央不了解情况下所作的指示，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用的惯伎，他们常用这一套来欺骗群众，破坏中央的指示，万万不可上当。

如何贯彻四点指示，我有以下意见：

一、建议昆明军区的全体同志应以革命利益为重，大局为重，坚决拥护和支持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毛主席、党中央信任的，我们就要支持和拥护。如有不同意见应按原则办事，内部解决，这样做才不至于被阶级敌人钻空子，他们就无隙可乘。

二、“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双方都可能犯有错误，但性质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犯错误。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建议军区党委召集双方代表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斗争水平。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机构，共同对敌。至于他们本身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整风解决。而不用外部解决的办法。

三、通过前一段实践，建议军区党委认真总结“三支”“两军”的经验，特别是军管的经验。

四、动手发动群众，投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通过大批判运动把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这里我顺便报告军区党委一个情况，中央批准西南地区要在报纸上点名批判李井泉，贵州点名批判贾启允，我们是这样做了。

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六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康生王力接见云南两派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

康生：

我情况不了解，没有什么话可讲，谢富治、王力同志对双方的意见听过，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同志们的讲话中有一个问题比较重要，两方面组织，炮兵团到底是不是保守组织，恐怕这个看法是不恰当的。中央历来都认为新云南、大联合或炮兵团、八·二三都是革命组织。的确，周律型(云大炮团)提出的这个问题(能解决)其它有些就容易解决了。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说是两个革命组织在观点口号上的分歧，王力同志提出大家好好学学毛主席的《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看恰恰对云南两个革命组织有很大意义。中央的意见希望你们在中央的方针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实现大联合。有不同意见可以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交换意见。黄兆琪同志，你们有一个“评战犯求和”，我看了这篇文章，你们把炮团说成“战犯”，这是不对的，你们要有自我批评(黄站起来插话：这是一个战斗队写的)。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人写的，但总是代表你们组织，我们应当勇于自我批评，炮团的几评，有些提法也不妥当，炮兵团也应该检查。两方有些口号都不要，你揪你的赵永夫，我揪我的赵永夫，哪有这么多赵永夫？不符实际，妨碍革命大联合。我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大联合(指示)。毛主席再三说过：“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双方要好好研究，好好学习。这是个重要问题。去年八月一日毛主席再次提出的问题，当时有些红卫兵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犯了错误，走向了反面。

今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批示天津延安中学的军训问题上又提出了这个问题。给军训一个任务，要劝说革命小将象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两方面都可能看到了。不仅红卫兵参加，还讲到要允许犯错误的干部，除年老多病都可以参加，这又重新指示了。但大家贯彻执行不那么好。炮兵团也好，八·二三也好，对一些中间派或保守性质的，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政治政策，这就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不可能实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回去要做保守派的，中间派的工作，这种做叫和稀泥、折中主义吗？不是，这是毛主席要求这样去做。

炮兵团作这样的工作，应该说不是一个错误。相反，八·二三你们这方面做得少了。应该去做，应该向炮兵团学习。炮兵团去做是对的，至于工作有缺点错误，这是会有的，但不要因此不去做。更不要因此就说炮兵团是保守组织。所以两方面都要研究，如何争取广大群众。

我再三地跟北京小将讲过，希同志们学习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其中第三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又被

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象赫鲁晓夫，当然要反对，不能和稀泥。要争取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在这方面都要正确处理。

八·二三的同志应注意，我读了你们的“评战犯求和”，这是完全错误的，你们把另外一个组织称为战犯，这怎么联合呢？另外你们提了一个标准，三个条件，你们提出用中央五月三十日的四点指示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这怎么行呢？三个条件那些全是叫人家投降，那还联合什么呀！那个不对的，另外炮兵团也的确要检查一下，对待解放军的态度，应实事求是处理。揪赵永夫，我也参加了，赵永夫原是蒋介石的特务反革命式人物，你们一揪赵永夫，就说谁是蒋介石反革命了，对解放军，不管犯有多大错误，要慎重，历史问题要慎重处理。你们要好好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听了谢富治、王力同志讲话后，我很有信心，我希望你们向好的方面走，珍惜我们的每个进步，不要进一步退两步。我相信，云南问题可以由云南的同志在中央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谢富治、王力同志的帮助下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刚才有一个罗志刚同志讲了不同意见，这是这个会上的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好事。特别是对八·二三有好处，也说明同志们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思想上有觉悟，八·二三同志们决不要因为过去你同意我，现在反对我，变了就恼火了，就讽刺、漫骂，就随便上纲，就把人说成是叛徒，那就不对了，把好事变成了坏事。炮兵团也不要说八·二三不行了，有人起来造反了，不要幸灾乐祸，不要嘲笑，讽刺（方绍红：我们保证不会这样）。那一个同志刚才有点不安，想到要受围攻，黄兆琪，有没有这种危险？（黄：保证不会。）

我不相信八·二三是铁板一块，不会有不同意见。我看你们炮兵团也会有，这个要说公道话嘛！

王力：目前有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压不同意见。

康生：：要提倡这种事，八·二三、炮兵团都要提倡这种事，这是第二个方面。有事多同群众商量，罗志刚同志讲时也不要害怕，你也要有风格，即使围攻也不怕。

第三，八·二三有好的意见，炮兵团要听取，要尊重解放军，不要因为解放军犯了错误，就动摇了。主席讲的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

依靠绝大部分革命干部。你们要学习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对军队的一个通知。解放军是担负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不管那个同志犯多大错误，也不要动摇，要相信依靠，使我们解放军更巩固。尤其大家知道云南是边境，那边是敌人，据我知道，最近，瑞丽有蒋介石特务活动，云南的敌情观点，两方都要注意，美帝、蒋介石、修正主义都会进行破坏，特别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我觉得你们两方面贴两个军区的大字报，揪赵永夫，在街上大贴特贴的。我们建议不要整，对中央文革不利。希望双方有意见，送材料传单。我希望，你们双方达成几点协议，原则问题不能马虎。

当然，大字报(指对解放军)不要上街，不上街也可以进行批判，不贴那些抓赵永夫的大字报。你们双方都应该清理一下，不正确的口号、标语(王力：两个口号，抓赵永夫，带枪的刘邓路线不要提。康生：“战犯求和”“反革命逆流”也不要提。)

谢富治：封《云南日报》，去军区静坐，评论员文章也不能定为逆流。如果这样下去，要犯大错误。说收买八·二三也不符合事实，都不要这样讲，河南一提就是御用工具。

王力：有问题可以揭发，要审查那个人都可以，包括军区可以批评。

康生：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可以调查，我很赞成，我支持你们调查，可把材料交给中央，但不要随便下结论，相信中央可以判断的，中央会处理的。你们两方都可以调查，历史问题也可调查，但不要到街上贴，轻易公布。

王力：大字报上街，如果是好人就伤害了好人，如果是坏人给敌人通风报信。

康生：这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问题，是关于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你们想一个人，一个干部，没弄清，说成是叛徒，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取消，你们云南有没有南开大学调查的？(答：有)有卫东，“八·一八”，我们赞成你们调查，但告诉他们，要经过研究，核实。

2. 双方面都不赞成打、砸、抢，你说我打、砸、抢，我说你打、砸、抢。实际上，我当然没有去调查，也没有去看，但我看双方面都有一点，问题轻重大小不同，既然双方都不同意搞，是不是达成个协议，不要打、砸、抢、冲、抄、抓、坐。(谢：天那么热，坐干什么，在家里学毛著多好。)

3. 双方都要保证，尤其在云南边境，铁路、公路，有没有轮船(谢：只有滇池没有轮船)无论如何要保持不能断，这是国家生产、支越问题，是生命经，象血管，更不能对桥梁、涵洞有所损害。同时重要工厂要保证生产。要抓革命促生产，大概你们知道，具体地说，云南有些特殊工厂、原料，绝不要因为自己内部矛盾而影响，我很担心(谢：特别是做弹药的工厂、光学仪器厂)。同志们不是常常用“誓死”、“鲜血”坚决保卫等，这是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千万不能影响，不能把援越抗美给忘了。今天来的有没有工厂的?)有没有工人?(炮派答：有，没有进来。)汽车运输是个大问题，几千辆汽车不能停下来，支边工人是属那里管?(炮派答：是属交通厅管的。)支边工人几千人，是属交通厅管，你们的任务很大，千万不能争吵。支边、交通、公路、铁路、桥梁、无论如何要正常，不仅不能阻碍，而且要爱护，这才能表现出边疆文化革命的特点。

4. 双方达成协议，不要抓人，你揪我的人，我揪你的人，这样一抓就会武斗，已有那么一个经验了。你们看一看，你们双方要坚决保证，双方或轻或重都有这个关系，不要抓人。保证不出现五·二八、五·二九的武斗。你们双方要监督，要实事求是，要教育战友，不要抓人，不要武斗。

5. 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无论是昆明军区、云南军区以及两方革命群众组织，要严格保证这个问题。两个军区要保证各个军分区不要组织农民，这点同志们骗不了我们，大批农民没有组织是不会进城来，不管两级军区有什么矛盾，无论如何，保证农民不能进城。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必然要犯大错。

6. 最后，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抢夺枪支，特别是解放军、民兵、公安的枪，或者工厂里面的，千万不要动这个东西，动这些东西要犯很大错误。教育我们的革命小将、战友不要那样做。同时，昆明军区，云南军区要说服战士们，坚守岗位，不要离开枪、连队组织，边疆更不能这样做。告诉同志们一个经验，××军区的战士因两个组织的矛盾影响到军区内部，有的战士把枪丢了，纷纷跑到北京来。这实际上是受蒙蔽的，这就完全不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领导的解放军了，这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在北京可能听到我们很严重地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一个省，省军区这方面的人，或大军区直属的人，也有到北京来的，你们也可以注意，要教育说服，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

总的，我提六条，这六条看大家赞成不赞成。既然大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它是是非非以后可以谈。先把这六条做到，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你们不同意也可以（炮兵团、八·二三代表异口同声：“赞成”并鼓掌），那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还有一条，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嘴说容易，实际行动是困难的，希望你们做到。今天大家在这个房子里鼓掌，以后还要看大家在实践中去做。

（来源：《九·一四战报》第二十三期，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主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另一个版本：

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地区“八·二三”和“炮兵团”部分在京人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康生、谢富治等同志接见了昆明“八·二三”和炮兵团部分在京人员，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同志，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同志，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同志。】

康生同志讲话：

……

八·二三的同志有一些好的意见，炮兵团也要听，要尊重解放军和军管会，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但不要因为有人犯了错误就动摇了三个依靠，要学习去年12月30日关于军区的通知，中央对解放军是怎样讲的，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支柱，不管什么人犯错误，也不能动摇相信群众的信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前进，特别云南是边疆更应该注意，据我知道，蒋介石特务活动很厉害，云南的敌情观念都请大家注意，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因此我接着讲两方面在对两级军区的大字报最好写信、送传单。在街上大贴特贴，这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利，所以我建议双方能达成协议，当然原则的问题也不能不讲清楚。

1. 大字报不上街，那些抓赵永夫的大字报、两个口号都不要上街，抓赵永夫和带枪的刘、邓路线都不要提，也不要提战犯求和（谢：反革命逆流）另外说军区收买了八·二三也不对，也不符合事实，这些话不要讲，那些不正确的标语口号不要上街，但也不要放弃原则，特别对军区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中央反映，

你们不是讲张子明、李成芳、胡荣贵有历史问题，可以调查，但不要随便下结论，应该把材料交给中央，黄兆琪方面不是在调查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批评，历史问题也可以调查，但不应上街去贴，这不是一般问题，他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一个干部确实没有搞清，就下叛徒的结论，就等于把他的政治生命取消，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不是有在云南的吗？做一些调查，经过核实再做结论。

2. 双方都不赞成打、砸、抢，你说我，我说你，我们也没有详细调查，我的看法是否双方都有，只是轻重而已，双方都不赞成，是否达成一个协议不要打、砸、抢、抄、抓还加一个坐，就是静坐，天气多热在家里坐着看毛主席的书不是多好，这一条我看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3. 双方都要保证铁路、公路安全通车，这是一个生命线，无论如何不能断了，更不能把桥梁、涵洞损坏，双方要达成协议，同时重要的工厂要保证“抓革命，促生产”，大概你们知道，云南有一些特殊的工厂、有一些援越的工厂，不要因为内部的这个问题，影响了这个问题，我很担心这个问题，你们平常讲，誓死保证，用鲜血保证，我看这也应该保证，不要忘了，要千万记住，看了名单今天没有工人来，汽车运输无论如何不能停，几千辆运输在边疆有一些支边的，你们的任务还比较大，无论是干什么都要维护正常，不但不能破坏而且要保护，表现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要抓住边疆文化大革命的特点。

4. 双方都不要抓人，你抓我的，我抓你的，看起来就会武斗，双方保证一下不要抓人，保证边疆不要再出五·二八、五·二九的武斗，有这样的经验，双方是不是保证。双方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实事求是的教育战干不要抓人，不要武斗。

5. 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无论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双方都有个保证，两级军区要保证各军分区武装部不要这样干，采取这个办法就要犯严重错误。

6. 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去动枪支，无论是解放军和民兵，公安局的、工厂民兵的枪要好好地放好，不要动用，如果动用了，就犯很大的错误，要教育革命小将，革命战友。同时，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要反复教育战士坚守岗位，离开枪，离开连队，离开边境，就更不对了。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教训，由于两方的矛盾，有许多战士，丢了枪支，跑到北京来，战士是受蒙蔽的，而有些干部也是这样，这完全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领导的解放军，不要这样做，在北京你

们也可能听到一个省，有个省军区和大军区的人也有到北京来的，这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应该说，有这种现象，就应该教育、批评。

总的说来，就是第一，大字报不要上街，第二，双方不要打、砸、抢，第三，双方要保证铁路、公路、桥梁、涵洞不受损害，第四，双方不要抓人，第五，双方不要组织农民进城，第六，无论如何不要动用枪支。

我讲了六条，看大家赞成不赞成，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样，我也相信你们能解决，我先问一问能不能？（大家说：能，热烈鼓掌）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不过要听其言，观其行，讲容易，做就难了。

谢副总理讲话：

我们完全赞成康老的讲话，是不是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学好，不但要学，而且要用。把最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最近转载的《文汇报》的社论都要学习好，这些文章现在全国造反派都在学。康老讲的这六条，多研究一下，学习一下，把这些事都给家里打个招呼，发动家里的造反派都来学。云南的问题，还是通过云南的造反派解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当然，中央文革小组也可以提些意见，不过最后还得自己解决，最后还得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文革也很清楚了，那天我们回家去就上班了，今天就不要继续讲了，你们谈来谈去，就是这么多话，要多做自我批评。中央也要解决，军队的事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都要解决的，会帮一些忙。你们两方都不要讲了，以后再讲，你们自觉都拥护康老的六条，先把要做的事达成协议。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不要再讲了，双方可以商量一下，如何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方案，中央解决云南的问题，都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决的方针、政策要同家里打个招呼，和家里通个气。你们也不完全能代表大家嘛！不再说啦，我们说的已经很多啦，希望你们还可以在大的方面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也可以由家里提大家讨论，可不可以这样，主要的观点现在都摆出来了，关键是如何解决。刚才看了讲的六条，是不是还加一条，“共同斗争刘、邓、陶。”共同对敌，斗争刘、邓、陶、阎，在斗争这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谢富治：

当前要把这个革命推向前进，革命到了一定的时候，革命群众组织占了优势时，要把文化大革命指向更深入的阶段和更高峰，只有把革命的队伍联合起来。在革命初期，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现在要使革命前进，必须解决联合的问题。对两派处理不适当，会有很大危害。

王力：

自我批评的，主席就信任了，死不作自我批评的，主席就不能信任。

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重要口号都是毛主席提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有没有，毛主席也讲过，从上到下都有这样一种反革命复辟逆流，那时是二、三月。四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拥军是使革命小将懂得如何处理好对待军队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对待军队，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只要我们领导上加以引导，是能够做到的。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坏家伙暴露出来了，根据苏联的教训，必须发动群众打倒他们，另一方面革命派过去受排挤、受打击，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受压制打击的革命小将、中将、老将解放出来。如果不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被这些人打倒，被关进监狱里去，被整黑材料打成反革命，被杀头。同志们我们要有鲜明的爱和憎，因此，凡是反对刘、邓、陶、李、阎的，就要保护他们，谁伤害他们都不允许，一定要有鲜明的爱和憎。这次我们工作团，毛主席说一定要组织小将参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体现这个方针，凡是反对刘、邓、陶、李、阎的，揭发他们的人，要重用。不要有框框，不要受年龄、资格、级别的限制。我们的年龄大了，总要有人接班，对革命小将，要大胆使用，要教育，培养他们，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红卫兵现在当省委书记不

行，当大学校长也不行，要有个成长的过程，要好好培养他们，对他们的缺点要批评，但不能伤害他们。

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相信和依靠开展的大多数在二十三条里边也就提了，是与刘少奇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同刘少奇一直作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八·二三”派代表时的讲话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富治副总理，总参作战部部长成学俞同志，贵州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同志等首长，于 1967 年 6 月 30 日下午 3 时 10 分，在昆明接见了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 26 名代表，作了重要指示。〕

谢副总理说：“同志们！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战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成学俞同志，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同志。还有中央文革的同志以及井冈山、北航红旗小将，也都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也来了。来向你们学习。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统帅、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向在座的同志，八·二三派、炮兵团派以及云南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们几个人也是‘三结合’，也是老中少。这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倡议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临走时，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很健康，林副主席也很健康，你们所关心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身体也很好。”

这时，黄兆琪心情激动地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

谢副总理接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受了八·二三、炮兵团同志的问候。”“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当然，我们也了解一点情况。在北京时，我们接见了八·二三与炮兵团的同志，接见了几次，最后康老讲了话。我们到了昆明，在军区开了几天座谈会，昨晚上很高兴看到了你们八·二三很好的一个决议。已

经全文发到了北京，毛主席已经看到了。你们八·二三的同志要跟炮兵团搞联合，搞团结，要进行整风，我们很高兴，这几条意见是很好的。”

谢副总理说：“两级军区现在也是抱这个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解决大联合问题，团结的问题。今天来向同志们学习，听同志们的意见。”

谢副总理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你们创造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先例。这几天看来是有条件的。我们到云南来，你们是主人，我们也是主人，首先你们是主人，不要拘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讲。”

接着，杨树先同志开始汇报。他首先代表昆明地区八·二三派全体战士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余立金同志、成学俞同志、李再含同志以及井冈山、北航红旗小将。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无限关怀。我们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康生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六点指示。接着，汇报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谢副总理说：“可不可军队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你们不要去参预，军队在‘三支’上是肯定要参预的。但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去参预。军队院校也不要参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你们11·8、11·7，两派都联合起来嘛，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当汇报时检查了我们对待保守派组织工作做得不够，压的时候多些。

谢副总理接着说：“你们要多作自我批评。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也作了自我批评，批评很严格。老将作自我批评，你们小将也要作自我批评。”

“你们在北京时，我看有点骄傲，所以，我们对你们批评多一点。我们给炮兵团说：你们也不要翘尾巴，不要以胜利者自居，否则犯错误，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毛主席在延安就说过：要多作自我批评。我们请北海红旗的小将给炮兵团做工作去了。”

谢副总理说：“我们只是给你们煽了点凉风，只是一点凉风，不是泼冷水。”

谢副总理接着说：“机床厂压保守派的教训好。即使是联合了，若是压又会压出一个组织来。”

谢副总理说：“去年毛主席写了信给清华附中，写的信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但他们就是不听，搞什么红五类、黑七类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而，变成联动。”

当汇报到有关干部问题方面的情况时，谢副总理说：“毛主席对干部一向很爱护，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站出来的干部，只要敢站出来揭刘、邓、陶、李、阎的人，不管他们过去有多大的错误，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要支持。”

谢副总理还说：“我们临走时，毛主席指示，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的，有个过程，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汇报到现在，街上照样出现“打倒张××，李××！”等的大字报，他们仍不执行康老的六点指示。这时，谢副总理说：“别人揪了，他被动，你们不要针锋相对的去反对。你们不揪，在政治上就主动了。”

当汇报到联合问题时，谢副总理说：“我有一个想法，下边每个单位，如工厂两派联合起来后，上面给谁挂勾呢？黄兆琪同志答：“上边也联合，上下一齐一起联合。”李再含同志说：“先联合，有个过渡，后再成立革委会。”

谢副总理说：“先由八·二三、炮团兵联合，过渡一下。”

谢副总理说：“一搞‘三结合’，力量就强了。有老中少，不一定要中央批准，关键是你们自己批准，即是造反派，革命群众，军管会三方面批准就行了。”

谢副总理说：“现在联合了。但到成立筹备小组时，还会出现问题，争席位，争名额。”

谢副总理说：“不要到处请客。北京成立革委会时，请了很多客，我都作了检讨了。”

谢副总理最后说：“改变昆明的风气，掌握大方向。不仅不武斗、不打架，就是宣传车、大字报、大标语的仗也不要打。”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九时——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凌晨一时十五分。

地点：昆明某地、××招待所。

九点零五分，谢副总理等进入会场，与代表们一一握手，然后一一点名认识。（代表们热烈鼓掌）。

谢：我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派来的，井冈山、北航红旗的四人也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来云南了解情况。首先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向炮兵团的同志、向全省的革命人民问好！代表我们九位同志向你们致敬！（热烈鼓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派我们来，这次是按领袖指示的“三结合”……来这里是向你们学习的。临走时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身体很健康。（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临走时也见到了林副统帅，他身体也很健康！（热烈鼓掌、呼口号：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临走时也见到了恩来，江青等文革小组的同志。

主席告诉我们：云南的事情依靠云南的广大革命群众解决，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今天我们跟你们商量，怎么解决？是否这样？

（李毅汇报情况、讲到二月份上京谈判问题。）

谢：你们前次上北京的有没有？（李毅：有周继文……）。

谢：（这次）北京的还没有来？（李毅：没有来、今天来。）打电话叫他们来，炮兵团的统统来。

（李毅继续汇报，讲了归口服务站的问题。4. 11，4. 13、4. 23、方向东就4. 23大会社会的问题情况作了补充。）

方：我们再次促进两方面的联合。我们也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为9. 14的争论我们很不服气。我们也提过一段时间复辟逆流……。我们不发了。（“指六月提纲”）

谢：我们今天在南屏街还看到下面是“五月兵变”。上面是“六月提纲”。

马庆波：运动的阻力是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子明搞支左要负主要责任，很多东西要他承认错误的。……

谢：下关的情况怎样？

李毅：已一个多星期了，我们提出、军管会不管。

（我们有办展览的，还有分团在那里，我们去的的一个常委到下关就不能活动了。）

方：我们有无政府主义。这次去下关，兵团没有派，是下边自己去的。

冯：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是很多的，组织纪律很差。

谢：上次到北京不是说新云南的组织较好吗？

（我们老老实实归口，新云南解散了。）

方：对军管的态度问题，由于李、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有的军代表下来，我们的态度不好。“六月提纲”我们同意帮助宣传的。归口服务站，张子明及其朋友未能很好引导，而是别有用心地拉一派打一派，……开始分裂很痛心，上次矛盾上交了。今天，又是毛主席操心我们没有搞好云南的文化革命，我们是犯罪的……。

（李毅：有的提得不适当，但有很多事实）（5月9日——指第一篇评论员文章）

李湘：再谈师院5人小报的问题。

李毅：要解决云南问题，干部亮相问题很重要。刘林元死了。谢副总理曾说过刘是好同志、但叫他担任云南工作胜任不下，（谢副总理点点头）。赵健民贴了三张表态的大字报，就被严密监视集中火力打，三部电话机只剩下一部，还要拆，不能跟中央汇报。省委“红光”是十足的保守派。周力原来是山西决死队的，李成芳的部下，李要他负责省委总部工作。现在是干部站出来一个打一个，即使是该打倒的，也允许他揭问题，给出路，但一个个被打成三反分子。

谢：是否有这种情况？另一派支持站出来的，你们要搞。

李毅等：没有！我们只打倒周兴，他们8·23也喊要打倒了。

李再含：所有参加干部联络站的都斗吗？

孙亮：基本上是这样。

（李毅等：除了李清祥较高以外，其它都是厅局长干部。）

（孙：正式十二人，常联络九人，他们要求首长接见，汇报工作。）

方：省委、省人委有两派。

孙：但有些是否造反组织，还值得考虑。

李毅：到现在还在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最近又提出张力雄、朱家壁……

孙：文化革命中的很多反革命案件，是跟军区有关的。有一案件李成芳批了，还要黄兆琪批，5·26 反革命传单先说不出去，但还是让八·二三搞出来了，还说公安厅要配合云南军区搞兵变。

李毅：还说三天内要改变总医院(43 医院)的观点，与附属医院一样。11·30 被逮捕的杀人凶手，捕后交军管会，又放了。出来还戴大红花上街呢！市公安局的枪要收掉，是否中央有指示？

谢：你们今天工厂来的很少，大都是学生。

(答：来了，7321 厂的)

谢：(对坐军区大门口一事)派两个代表行不行？

(答：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谢：工厂在什么地方？(答：西郊)

杨凯：(八·八战斗队)罗世光揭了问题，现在八·二三的陆续回来了，不给他钱，还斗了他五小时。

谢：现在他在什么地方？(谢副总理很重视)

杨：我们已把他接过来，一两天就会从北京启程了。

谢：同志们！我看武斗的问题，按康老的、实际是中央的六条。要两大派协商解决，看谁站得高，谁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希望你们两家宣传中央六条通令，把武斗停下来。两派不武斗就无所谓制止武斗了。

杨：准备明天传达中央指示。

方：(与八·二三)没有达成协议，北航的同志来说了一下，我们提出是否双方联合整风，未同意。

谢：(问沈)你们原来只有一派吗？

沈：我们 1 月 23 日夺权后要搞“三结合”。

谢：你们不要军管更好嘛。

沈：现保守组织复活了，原来有 500 多人，后自己瓦解留下六、七十人。由于李成芳作报告后，军代表来了 180° 转弯……。

谢：那好办。

李再含：你们占优势，好办！（对物资局的问题）

（答：不行，他们已参加了八·二三）

谢：（问杨凯）你到北京反映了些情况回来，应该有个方案了嘛！你谈这些。

（共宣一人提到要顾全大局、要容忍，多检查自己，不要多责怪别人。要讨论能否联合、如何联合的问题。当谈到应开展全市性大整风，狠搞“私”字时，谢副总理点头赞成。）

谢：今天上午跟八·二三讲了点意见，军队的事情，支工、支农、支左、军队内部的问题，他们自己去搞。不要参与你们，你们也不要参与别人。这个意见在北京，江青同志就提出过。军队回军队、学校回学校。

（答：可以，首先学生联合）

沈：根据情况，工人还会比学生先联合。

众：我们赞成，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地归口。

（杨凯谈到我们轰的，他们要保，这是原则问题时。）

李再含：先联合，联合起来就好办了。

李毅：我们希望尽快跟八·二三达成协议，希望李政委大力协助，改变立场。

谢：风格要高一点嘛！首先是大家联合起来，批判、彻底批判，彻底肃清，把他们肃清。革命派内部要实行大联合，特别是你们革命派占优势，更有联合的条件。所有的同志都要为革命大联合贡献力量。这是伟大领袖提出的，要我们联合，这是大联合，有了联合要搞“三结合”。干部站出来，我们是欢迎的，不要站出一个来就打。我们支持干部起来揭露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正确的。你们两方达成协议嘛。不仅是昆明，全省影响的地方，都要把武斗停下来。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要整风，最近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这是解决我们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要解决，首先要批评自我批评，特别要自我批评。昨天是开了会，开到3、4点钟，李成芳他们两级军区作了自我批评。他们（北航的）很受感动，说这个问题，我们要向老将学习。解决内部矛盾，象康生、江青所说，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今天找你们商量，相信云南两千万人民。三相信嘛！相信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是在北京解决。四川解决一个成都，还是解决一个重庆，希望把这个问题下面解决。按毛主席的意见，要由云南几十万人民解决。主席认为：云南存在着解决这个问

题很好的条件。希望你们在全国作出一个很好的范例。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帮不了多少忙。

李毅：我们坚决按首长的指示去做。

周继文：（念一份紧急呼吁）

谢：这个意思是很好的。（指周继念的呼吁）

谢：（问前哨代表）你们去工学院打？

李毅：这是污蔑，他们(8. 23)抓人划押。

谢：只要双方都高举毛泽东思想，都有批评、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就好办了。

方：这是最高指示。还要相信八·二三的广大战士。

谢：对！

李毅：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张子明就不相信他，要把他踢出军管会。所谓军管会的公开信，不相信就是军管会全体搞的。

红代会一人八·二三、炮兵团战士相信是可以联合的。但有人在幕后捣鬼，只要把昆明军区李成芳、张子明的问题搞清楚，要联合是容易的。李成芳以前是拉八·二三打炮兵团。结果愈压愈强，后又在炮团内拉一派、打一派，近来吹捧方向东便是。

谢：今天的会是否继续开下去？

李湘：关键在于如何监督贯彻执行。（谢点头）

谢：今天是否散会啦？

（散会）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富治接见驻昆明部队时的讲话

我们这次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几位同志来的，包括红卫兵小将同志。我们是来向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群众学习的，来当小学生，也来了解一下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根据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对云南文化大革命作一点了解。

我们来了好几天了，了解了一些情况，熟悉了一些东西，但很不够。

首先让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呼）我代表所有来的同志，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敬礼！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非常之好！（鼓掌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云南情况了解很多，对云南的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非常关心，非常爱护，所以这次让我们来看看同志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只是代表伟大领袖对云南的广大革命同志问候、致意和关心，把看到的问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三相信，三依靠来解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云南文化大革命当前形势很好。要把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把他们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南来讲是李井泉，在云南来讲是阎红彦，必须彻底把他们打倒！彻底肃清影响。我们要高举批判的旗帜，把他们搞臭，打倒，肃清他们的流毒。

当前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革命派内部分歧。我们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对准刘、邓、陶。我们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教导办事，推向革命大联合，推向革命“三结合”。

云南的问题要自己解决。我们已与两级军区党委开过会，也与八·二三、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交换过意见，他们都表示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他们愿意自己来解决问题，本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同志们：我们军队的指战员同志们，我们都要为批判刘、邓、陶、李、阎作出贡献。为革命派的大联合作出贡献。（呼口号）

军队担负着伟大光荣的任务：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云南是边疆，我们要警惕着美帝国主义。越南人民给予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没有承认最后的失败。随时要挑起扩大这个战争。另一方面，今天昆明示威游行，缅甸的反动

派搞的反华、排华，也是一个斗争重点，云南的军队面临着对美帝和反动派，还有修正主义斗争的严重任务。军队一方面要支左，一方面要警惕外来的敌人。

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的指示，按照军委，还有我们付统帅的教导，我们军队要稳定才好。内部的事情内部来解决。

这几天。我们与“八，二三”炮兵团的同志商议。

我们军队支工、支农、支左，这是要涉及到广大的群众运动，这样对军队经过锻炼，经过考验是必要的，很好的。

军队内部的文化大革命，靠军队内部解决，我们可以向地方学习，但是地方可不可以考虑，因为江青同志在北京也讲过了，地方不要干预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军队正面教育的同志呢，也不要直接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是和同志们商量，首先是同两大革命左派商量，也是和在座的军队同志商量，因为在北京江青同志提过这么一个建议，今天也可以和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是来看看大家，把我们伟大领袖向你们问好的意思传达一下，没有什么要讲的。我的话完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副总理接见昆明地区部分军事代表时的讲话

下午六时至十时半

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我想讲三四句，都是老话，但老话要经常讲，反复讲。

一，搞军管的同志们在目前错综复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时时刻刻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线前进，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所左右这个大方向。无论怎么干扰，也不能离开这个航线。

二，军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没有经验。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不能不管，有些地方可以不管，不可不管，不可多管，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应该管的单位是关系国计民生，而左派又不占优势的，影响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如果不是属于国计民生，或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我们就可以不管，实行军管就是多余的，像省委办公厅实行军管干什么。

三，军管是没有经验的，进入工厂、机关、企业，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支左问题，刚才×××同志讲的好，谁是左派要有一个识别考验的过程，还有自己

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左派的问题。一个单位，情况可能很复杂，有的一个单位一个左派，有的两个造反派，那里的表态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要有调查研究的态度，不能随便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支持，因为我们要求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到那里去。有些搞不准不一定表态，因为左派不一定要哪个批准，北航红旗哪个批准了，他就是很好的造反派嘛，听说有一个军工厂先去一个宣传队，后又去军事代表，以后又去一个宣传队，又有驻厂的军事代表，他们各支持一方，随便支持，没有经过任何人讨论。我记得北京卫戍区也到了很多工厂，他们很谨慎，在厂内外他们作了很多调查，支持的都经过北京市革委会、工代会、红代会大家讨论大家公认，有争论的放下来再调查，第一批有十八个厂，有争论的一个，第二批二十个，有争论的两个，他们又去调查。你们去几天，就支持一派，采取不慎重态度，这个问题要由各方面讨论，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决定一件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去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们到云南了解情况，来云南学习，在可能情况下尽一小点力量帮助同志们，这是很有限的，主要是靠云南同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路线去解决，要创造一个有利的气氛和条件，造反派要创造这个条件，军队也要创造这个条件。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思想去做，不要听信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小道新闻，流言蜚语，甚至用个别造谣来制定政策，那是非常危险的。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要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处理问题。现在两级军区党委有了解决问题的愿望，两大造反派有了解决问题的愿望，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个愿望作出贡献。现在气氛有时好一些，有时坏一些，今天中午接见时的气氛就不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谢富治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编者注：文中“我们”为谢富治与王力。〕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今天这个军队的会议不算，已经开了七次会议了。就是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开了七次座谈会。短的三点钟，多的六小时，一共开了七次了，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两大派开了三次，每次大概也是少的五、六小时，多的八、九小时，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已经开十二个半小时了，除了一小时吃饭外，整整开了十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我们这次听了很多意见，了解了很多情况，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这次我们来，确实是来当小学生的，主要是听，多听，主要是来学，多学。这几天也讲了一些话，每次会议都讲一点，我们几个人都讲了。在各种不同的会议上，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讲的，没有在一起讲，但是要讲的话，大体上都讲了，今天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讲了。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今天因为有这么多的干部到会还要再说一下，就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们临走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谈了一下。过去关于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也有过指示。但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性质的任务，那还是最近主席把它彻底讲清楚了，完全把他原来的打算说出来了。就是军队通过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使干部战士得到教育、提高和锻炼，以至于考验，改造。使军队的干部在这一场考验中间亮相，看看谁正确，谁错误，谁比较正确，谁的错误多一点，谁的错误少一点，以至于发现个别少数的坏人。因此，所有的军队都要担负这个任务，我们毛主席最近还决定中南海的警卫团要抽人出去支左、支工、支农。我们的军队和每个人都要在这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教育、锻炼、提高、改造，以至于考验。这对我们军队来说，是一件大好事，每个人都应经受一次考验。这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所以困难很多，矛盾很多，我们大家都要积极参与这一场战斗。既要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做出新的贡献，又要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得到锻炼、考验、改造、提高，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席在我们来云南的时候，一个礼拜中谈过两次讲到这个问题，把他原来的意图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就是最近才讲的，讲的透透的。就是要军队，连中南海的警卫营警卫团都要去。使部队得到考验，看看谁正确，谁错误，谁比较正确，主要是干部。另外个别坏人，比如赵永夫就暴露出来了。

第二、要说的也是老话，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搞什么，永远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我们就是要把那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把他们那些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彻底打倒，彻底的肃清。这是个大任务。在整个斗争中都要贯穿着对这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斗争，这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主要矛盾，办哪一件事情，处理哪一个问题，都不要忘记了这个根本任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离开了这个东西就离开了航道。毛主席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我们每时每刻做每件事情都不要忘记了。在这样一个大任务下包括本单位的斗批改，在西南，在云南，在边疆省分，要彻底批判刘、邓、陶、李、阎、肃清他们的影响，这个意义特别重大。可是你在昆明一看，从形式上看，从这几天的汇报来看，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够，都去搞内战，这样就很不好了。我看我们不管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要紧紧抓住这个纲。这是重复说了。

再就是抓住这个纲搞革命大联合。革命已经搞了一年了，现在云南的群众，特别是昆明地区，左派占了优势，联合起来力量就大。

为什么讲这次在两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呢？因为这一个错误是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这就不利于左派队伍的联合，这就违背了当前主要的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总之是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多数的。

革命的大联合是我们毛主席提的，团结多数是我们毛主席一再教导。要由大联合逐渐地推进到革命的“三结合”。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了。要逐渐地把军管会的权交给群众，造反派，站出来的革命干部，要搞革命委员会。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企业，一时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可以成立筹备小组。要逐渐地把军管会的权收缩。军管会就是为了不要军管会，军管就是为了不要军管。昨天我说了，凡是不重要的，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一概不要军管。凡是左派占了优势的，不要军管。只有那个地方是几派对立，又是关系国计民生，天天打架，生产根本不能维持，要去管它几天，除了这些地方，你都不要管。那个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天天在打架，你让他去

打嘛！他反正又不生产大炮，又不生产机关枪，又不生产大米，又不生产什么，他高兴去乱你就让他乱嘛！那有什么坏处？何必要去军管呢！

然后就是到本单位去斗批改，完成斗批改，这都是大方向。

我们要坚持大方向，每天千千万万的现实的事情多得很，我们要坚定地掌握大方向，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事物，那些现象来干扰。从“左”的、从极“左”的方面干扰，从右的方面干扰或被打架等什么事来干扰，甚至被那些假情报来干扰。刚才我们看了你们报告电线厂多少人打架，打死人呐！我们就马上派了几个人去看，去一看，根本没有那回事，不是那么严重，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讲得不得了啊！讲得不得了呀！不得了呀！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根本没有那回事！你这个支左办公室，老先生呐！我看也是这样！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干扰！天天来干扰，搞来的是不准确的消息。不坚持大方向，不争取主动，就是被那些错综复杂的现象来干扰。坚持大方向这一点要坚定。不要上当。

第三、我们讲一下云南问题的解决。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大概很短时间我们就可能离开昆明。（解决云南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地解决，一种是解决不了。当然，我们是争取解决。昨天给“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讲了，我们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云南的革命同志们的关怀带着来了，也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也带来了主席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希望。我们对他们两派讲了，我们要马上返回北京。你们对主席的关怀、问候，对主席的交待，云南问题就地解决，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如果我们回到北京，我们要是空手而回，这也好像是不好汇报的，是不是要有点成果？所以这两派，每派来了十五、六人都是他们的头头。昨天会议开得比较好，大家都敞开心思想作自我批评，都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计划，一些方案，也还比较诚恳。当然，这些头头们，要想把各自的十万八万人或二十几万人都代表了，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愿意联合，不愿意打内战；吵吵闹闹，总是少数。所以从我们给他们开的三次会议来看，每次会议都有进步。看起来，他们都还有希望，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广大的革命群众。

但是，关键目前是在军队。我们是三相信三依靠，群众是基础，但是目前解决问题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所以我们这次的力量主要是做军队的工作，了解情况比造反派那方面花得时间长。刚才讲

已经谈了七次了，今天算是第八次了。昨天那个大会不算，要算是第九次了。那个大会是我们讲话，是我们向群众汇报。冲击会场就是了，学了一点东西，看了一点表演。军队方面我们听取你们的意见多，有了个好的开端。那次两级军区的党委会，很多同志，×××同志，陈康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那个会议开得很好，主要是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一出来就糟了。又出得不好，当然也没有什么。今天李成芳又作了检讨，我同意刚才再含同志的估价，欢迎这个批评，欢迎这个自我批评。

既然关键是在两级军区，又特别是大军区要负领导责任，要多负些责任。所以，军区今天在座的同志责任是比较重大的。这是主席交给我们、交给你们的任务。你们有意见，今天充分的提，以后下去还可以提。这个是好事，应该允许这样做，过去这样做的不够是不对的。但是，所有同志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只有批评，不是简单的只有埋怨，而是采取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不仅只有批评，而且还要有自我批评。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但有主要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团结的愿望，解决问题的愿望。这一条是非常要紧的。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主席的教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甚至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批评可以很尖锐，可以经常搞，比如今天，如果大家对李成芳的检讨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还可以检讨嘛！还可以批评嘛！

但是有一条，我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不仅是在我们军队本身，对小将们也讲了。昨天的谈话，好几次谈话，我也讲了，就是我们对于形势的分析，搞批评，不要随便上纲上得太高。上纲，不应上那么高的纲，你给他上那么高，结果就不利于解决问题。应该上的纲你没有上，也不对。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小将他一个问题就会给你上纲，上得很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原谅他们，我们要诱导。我们老将，我们中年人，就不能那样。

批评还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在一定范围内批评，不是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拿到群众里面去，特别是拿到各派中间去。这是不是保守思想呢？是不是内外有别？当然有些检讨是可以公开的，比如我建议将来李成芳你们写一个东西公

开出去，那是准许的。有些东西可以公开出去检讨；但往底下传达的时候，没有个成文字的东西，就不能随便传达，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真正形成了文字的东西完全可以拿到群众中去，因为这些缺点错误都是人民内部问题嘛！完全可以公布嘛！但是要统一，要有个文字的东西出去，不要你又讲一点，我又讲一点，各取所需，那就把问题搞乱了。

我希望今天在坐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三十七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为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作出努力。不管过去有多少错误，多少缺点，多少问题，都要为当前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全国将近三十个单位，如果再加上某些大城市，就将近四十个单位，都要拿到北京去解决，那得要多少力量？而且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现在全国只有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也要拿到北京来呀！最近山西就到了北京嘛！恐怕黑龙江还是要到北京来的。至于我们北京的革命委员会那是经常在中央开会、讨论的。云南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特别在昆明来讲，左派占优势。就犯的错误的来讲，也就是支持了这个左派，没有支持那个左派，或支持那个左派不够。现在有别的地方，军队犯的错误的比这个严重，他就是完全支持了正正当正的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压制了造反派，取消了造反派。野战军也在帮忙，好几个省，好多个省都是这样子的，不是一个省。他就是完全扶持保守派，把造反派取消，把人抓起来。而且发生大规模武斗。反夺权，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云南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你们昆明也不是，无非就是这个造反派多支持了，那个造反派少支持了，或不支持。但是，我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不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不严重的，发展下去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再过一个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就变化了。也要起变化的。所以，现在云南的条件比较好，军队也比较多，犯的错误的也很严重，而且后来这种苗头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些错误总是在这种范围里面，还走得很近，就回来了，这个路才开步走，就回来了，所以就要趁早解决。我们开了会以后，大家不要去专门批评了，不要加深。

我现在看到军队机关还有点问题，我还有点关心，不大那么稳定。昨天开会那个会，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啊呀，我看冲会简直有点生气，这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地方是西南国防重地，军队不能没有纪律，军队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提建议开个会是可以的，有意见可以提，但你不能这样搞，不能这

样搞，大家要重视，把军队稳定下来。国防这件事情中央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关键是干部，关键的关键又是在座的干部！要带头！军队不听招呼，可麻烦呐！一个内蒙古两千多人到北京，后来没有别的办法就动用武力。军队要进行教育。进行革命的教育，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进行仇恨刘邓陶李阎的教育，进行阶级教育。同时要进行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律性的教育，部队要听指挥。各级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提意见可以提，但是要听指挥。我们外交部的造反派是很厉害的，那些翻译都是造反派，天天要打倒陈毅，但是接见外宾时，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给陈毅当翻译。要守纪律，部队不能这样没有纪律，完全没有纪律不行。机关也是一样，机关不能去影响部队。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内蒙古，一个是四川，山东也有一个时期，别的地方也有苗头。内地还不要紧，云南就不能这样子。特别是云南的两个军，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军队要支持闹革命，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造反派，这要明确坚定，但是军队要守纪律，不能随便没纪律。

前天我给造反派讲了，他们很赞成这个意见。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完全是遵照毛主席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这对军队有很大的好处，这是应该介入的。但是军队本身的文化大革命，地方不要参与，地方学校我们也不要参与，我给他们两派协商，他们两派赞成。听说第一次接见“炮兵团”就有三个解放军，五个，第二次接见就没有来了，解放军主动没有来了，要给他们分开，这就很听话嘛！不介入，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我们学校、机关、搞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这是在北京江青同志提出来的。地方不要介入军队，军队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军队也不要到外面去，去找支持。可不可以这样商量？军队也不要参加到地方里面去，这是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不一样的是两回事，那个不参加还得了呀！那不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吗？这是讲军队搞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讲的是这一部分，文工团呀，体工队呀，什么学校呀，你们不要去参加人家。人家也不要参加你们，自己搞就是了。当然接受人家一点经验也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去参加，两边都不要去参加。协商嘛，这样对军队有好处。我给八·二三、炮兵团协商他们赞成这个办法，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军队的同志也可以和他们协商，但是也不要下命令，下个命令不顶事，我讲的也不是命令，只是和你们商量，商量通就做，商量不通就拉倒，最好是商量通，这对军队有好处。

今天就没有别的事了，都讲完了。我觉得今天我和刚才几位同志讲的都不成熟，不要到外面去到处宣传。你去一传达，明天又不知出几张什么大字报，又是说某人讲的几点，各取所需，简直是毫无根据的，你没有那回事，他都可以给你贴几条。如果你讲十多二十分钟，他就可以给你贴十来八条，简直多得很多的，恐怕越搞越搞成习惯了。

军队里不要被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问题来动摇我们掌握大方向，不要被那些流言蜚语，甚至是造谣，小道新闻，甚至挑拨离间，来左右了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关系。许多消息非常不可靠，我们就信，昨天有人讲了什么“信”？造、传、信，过去有逼供讯，它不叫逼供讯，叫造谣、传说、相信。就是流言蜚语，造谣，小道新闻，可就信了。如果把这些当作自己政策的出发点，那就非常危险。

没有什么别的话讲了，完了。

（热烈鼓掌）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谢富治王力在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上的讲话

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盛大集会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成学俞等同志与革命派代表亲切会见

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李再含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晚，昆明东风体育馆）

说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李再含同志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谢富治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还有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同志，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志，包括北航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要我们几位同志到云南来，向云南的所有的革命同志们包括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到这里来向你们学习的，向你们当小学生。当然，我们这个学生也是一个很不好的学生。

首先，请同志们让我们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向在座的全体同志们，战友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好！同时也代表我们几位同志向在座的全体同志们和战友们致以热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到云南以前，到了我们伟大领袖那里去请示了，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我们伟大领袖的身体非常好，非常健康！我想到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好的消息。我们又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们还同时见到了党中央的许多同志，你们大家很熟悉的周恩来总理，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同志，身体都很好。

我们伟大领袖对云南的革命同志们，尤其是革命小将同志们是非常的关怀。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对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非常关怀的，也是非常了解情况的。

同志们，我们到云南昆明已经一个礼拜了。这一个礼拜开了十几个座谈会，短的三、四个小时，长的是十二小时。我们在这十几次座谈会中间，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知道了很多情况，了解了很多的问题，给予我们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这次来时间是比较紧的，大概我们很快要离开昆明了。在这中间，我们知道，我们开始了解了一些情况，带来了我们伟大领袖给予昆明的革命同志们的问候，带来了伟大领袖的关怀。但是毛主席也给了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和愿望，就是云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要相信云南的两千多万革命的广大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就是我们伟大领袖告诫我们的三依靠：依靠人民，相信人民；依靠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就是说云南的问题完全交给云南的广大的革命同志们和云南的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自己来解决，自己来解决自己云南的问题。

同志们，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很好的形势。今天晚上这个大会就是非常好的会，是一个革命的大联合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会！

毛主席要我们广大云南的同志们，云南的问题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经过这几天的实践，云南的革命派，特别是两大革命左派，八·二

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的努力和云南军区的，两级军区，还有其它的部队，大家的努力。云南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问题。已经开始在解决了，今天进行的会议就是解决的结果。听说明天要出云南日报了，这个云南日报是经过炮兵团、八·二三还有我们刚介绍了的一位上海《文汇报》的，那是很好的报纸，他在那已做了一些“合稀泥”的工作。所以我说云南的问题，毛主席完全信任我们云南的造反派，云南的解放军。这是对云南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最高的信任，最大的鼓舞，要你们自己解决。

同志们，我们很快要离开昆明了，我可以把几天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可以带回北京去汇报。第一件事情，就是云南的广大的革命派同志们、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是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和无限崇拜的心情。云南的广大的革命战士和云南的两千多万广大人民都一向和我们伟大领袖是心连心啊！

第二件事情，我要可以带回北京的，就是云南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紧的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一切力量，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甚至组织上彻底打败、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把他们在云南的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彻底肃清，彻底打倒。这是云南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最大的决心，而且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转告到北京报告毛主席。

第三、就是经过这几天的活动，看到了今天的会议，云南的广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首先是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在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原则下，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同志们，首先是这两大派和昆明市和全省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愿意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这个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就有利于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力量就大了。我们大家只要都响应了中央的六条也就是康生同志对云南代表同志们所讲的六条，这样子更有好处，这个大的联合已经开始了，今天就是大联合了。同志们，联合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现在，不仅仅是两大组织要联合起来，其它的革命组织也联合起来，但是在坚持原则、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原则的前提下。有利于团结的事情多做，有利于团结的话就多讲，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就不要做了，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要讲了，我们大家要为革命的大联合贡献自己的力量！同志们，如果我

们要联合，而且要巩固这个革命的联合，这就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首先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认真的坐下来读毛主席的书，特别是要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的著作，要充分地开展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我这个人哪，办事就不行，讲话又没有个单子，这个就不服别人，这个应该自我批评的，也没有个演讲稿，当然时间也有关系啰，还是一个认真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有了缺点就要自我批评，这件事情哪，你们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他们领导同志们，昨天在一次会议中讲的很好，大家就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带回北京去。还有最后就是我们要带回北京去的“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要促战备。经过了大联合以后要促战备，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都准备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发展我们的胜利，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是一个会见会议，也是向你们学习的会议，要我讲什么问题我没有讲，就想把你们的好事，你们正在做或准备要做这么几件大方向的问题我们带回到北京向我们伟大领袖汇报。

我的话完了。再见！

王力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首先，向今天到会的同志们和今天在外面听这次会议的实况转播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刚才，谢富治同志已代表我们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完全拥护这一个讲话。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同志们同意不同意？就是在我讲话的时候，不要呼口号，好不好？（好！）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这几个同志，我们到云南的这几个同志，我们本身也是一个“三结合”，有干部，有军队同志，有红卫兵小将，这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组成的一个“三结合”班子，到你们云南来当小学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对云南的问题很关心。毛主席提出来，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这就是说，由云南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云南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云南的革命干部同志们，你们自己动手来解决云南问题。毛主席坚定地相信，云南的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同志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革命干部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动手把云南的问题解决好。

我们到这里来，今天是第七天了，我们当了七天的学生了，我们学到了好多东西了，这个七天的学习，我们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就是，云南的问题是能解决的，是一定能很好地解决的！

云南形势同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样，是很好的，是大好形势。全国的形势也是一样，也是大好的。

我们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揪出来了，已经遭到了群众性的批判，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正在不断的一个一个的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大批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锻炼的革命的小将站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从过去受压抑，从过去少数的地位，从过去不当权的地位变化了。变化的程度不同，但是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了。从少数变成了多数，从受压制变成了当权或者很快就要当权，就拿云南地区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从今年一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夺权的阶段，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斗争，有了很大的成绩。从今年一月开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个伟大的战略的决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今年一月以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举世无双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在参加地方上的支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这一系列的工作当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这一支军队本身，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枪杆子在我们的手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枪杆子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军的介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样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对于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本身也是一个严重的锻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是一个深刻的教育，是一个考验，是一个锻炼，是一个教育、提高同改造。

同志们！这是运动的主流，这是运动的本质。我们必须看到主流，我们必须看到本质，我们必须看到大好形势，我们不能为一些支流，为一些枝节，为一些次要的问题就扰乱了我们的视线。好象不得了啰，这里又打架啰，那里又吵架啰，那里又武斗啰，那里又是标语战啰。这一点，我们到昆明来的七天，我们当小学生的是有点感觉到不是那么满意。我们想很好地学习，学习你们这里怎么样搞的。揭露刘、邓、陶、李、阎，这一课我们到街上看不到，很少。到学校里去看，也很少，看不到。打内战的东西多，很热心。但是，这样一些东西，这样一些问题，决不能够影响我们，妨碍我们对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主流，它的本质的分析，认识。我们不应当受来自这一方面或者来自那一方面的干扰，我们要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示我们的大方向，我们要紧紧地掌握住大方向，我们要紧紧地把握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包括在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中间，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不能不重视现在一些对于斗争大方向的干扰的情况。我们这些小生也不知道讲的对不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们感觉到，从今年四月中旬以后，我们昆明的同志们，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些同志们嘛，没有能够正确地分析当时一直到现在的情况。今年四月中旬我们的伟大领袖向全国的人民发出了伟大的号召，什么号召啊？同志们记得不记得？（回答：拥军爱民）是啊，同志们都记得，都知道。今年四月中旬，毛主席发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的口号，这是一个根据当前的形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一个口号。

在今年一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在今年一、二月间，同志们记得记不得，一、二月间是有一股冲击军队的潮流。一月二十八号，发布了八条命令。同志们记得记不得？（回答：记得）这八条命令对于稳定我们的部队，因为稳定部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利益。毛主席下命令要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就发了这八条稳定我们的部队，也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所以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号的报告里头说，这八条就是一个“拥军”的八条，拥军，不是一般的拥军，不是平常的拥军，

而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拥军，是在人民解放军参加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问题，发布了这一个八条。

前一段，也确有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情况。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又没有经验，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崭新的事物是没有经验的，又加上有这么一个八条，有的同志，特别是有一些个别地方有一些领导人，军队的一些领导人，毛泽东思想武装得比较差的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出现了一个在二、三月间把一些革命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把一些革命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是出现了这样一些严重的错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直接抓了这一方面的工作，把这个问题已经抓住重点，已经解决了。抓住那个最严重的地方，已经解决。总结了两段的经验：冲击军队这一方面的经验以及军队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的个别同志，总结了这个经验后，同志们，就发布了四月六号的十条，知道不知道？（答：知道）十条命令。江青同志讲了，这十条也可以说是“爱民”的十条。这一个“爱民”，它不同于平常的、平时的、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那样子的“爱民”。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爱民”问题，它是军内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处理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处理同革命群众关系问题的“爱民”。因此，从四月六号以后，全国的形势很快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势变了，新的问题冒出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了。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他赶不上这一个形势，他还把当前的形势，他以为是二、三月那样的一个形势。其实形势改变了，他还当成是二、三月间那一个形势。形势就看错了，口号也提得不对了，因为到了四月下旬，他死抓住一个“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一个口号，这就落后于形势了。已经不是这样一个形势，这一个期间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占主要地位的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把他们的错误看重了，甚至于把性质看错了。因此在这个时候一些地方，包括你们昆明，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就把形势看错了看重了，把军队犯的错误看重了，他死抱着要抓“反革命复辟逆流”啰，一定要抓什么赵永夫啰，又是什么永夫什么永夫啰，有的又说是一个又粗又黑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啰。这一些革命的小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他们在这个形势已经起了变化以后，跟不上这一个形势，还继续提出这样一些不大对的口号，错误的口号。矛

盾性质看错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对，或者是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看待这些问题呢？我们有的一部份军队的同志就把革命小将的这样一些毛病看得太重了，这样子的结果，就怎么样呢？结果，我看你们两大派都没有抓住“拥军爱民”的这个口号。对不对啊？（答：对！（热烈鼓掌））我们的军队的同志，军队的领导同志也没理解，也没有狠抓毛主席提出来的伟大的“拥军爱民”的口号，是不是啊！（热烈鼓掌）把这一方面的错误就看得太重了，这样子把形势也分析得不对，也提出“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口号了。也把个别不同意这样意见的同志就当敌我矛盾了。就没有采取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个矛盾了。不适当的上纲了。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志，主要是军队的某一些负责的同志在这一个期间（不长）在几个问题上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同志们，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对不对？（热烈鼓掌）怎么样子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回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拥军爱民”。（长时间热烈鼓掌）根据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这一个伟大的号召，你们两大派的同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冷静地分析一下云南的形势。根据“拥军爱民”的这样一个口号来分析研究一下，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各种不适当的口号就不要提了好不好？（好！）根据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口号来认清我们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人民解放军，同昆明的军区，同云南的军区的领导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啊？（回答：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号召来判断现在存在的问题，矛盾的性质，也根据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号召来确定我们处理这个矛盾的方法，什么方法？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把八条同十条结合起来。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也要把十条、八条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当“拥军”。我们有责任，负担着稳定部队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对军队同志的意见，我们有责任向他们提。所有的原则性的问题都应该提，必须提。这也是对我们军队最重要的爱护（热烈鼓掌）但是，这种提意见一定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好不好？（好！长时间地鼓掌）我们军队的同志们要“爱民”，认真地贯彻这个十条，主要的是十条，还有八条。而“爱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爱民”，这个问题，一个最重大的政治原则是什么？就是要保护革命派！（长

时间地鼓掌)我们要充满阶级感情地保护革命的小将!(长时间鼓掌),保护革命的群众组织,(鼓掌)保护革命的领导干部!(长时间地鼓掌)。

同志们!我们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他搞修正主义一套,他腐蚀我们,他散布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他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专政,所以我们要打倒他。如果让他们掌握中国的命运,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就都要被打成反革命,所以我们才起来造反,所以我们才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鼓掌)

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作为毛主席的,忠实于毛主席的队伍,我们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响应毛主席的“爱民”的号召,就要忠忠实地保护革命的小将,不能伤害他们,不能给他们戴帽子,不能把他们整得灰溜溜的。(长时间热烈地鼓掌)爱护他们,保护他们,决不是无原则地捧场!(热烈鼓掌)无原则的捧场就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就是糖衣炮弹!(鼓掌)就会把我们的革命小将毁掉!(热烈鼓掌)我们一定要满腔热忱地、充满着阶级感情地不怕一切阻力,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革命的同志。同时,必须注意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中所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潮,要把这样一些思潮善于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各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我们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要对这样一些思潮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就是对革命同志的最大的爱护。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来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把那样一些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同夺权斗争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地位的变化最容易滋长的,最容易发作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争权夺利,铺张浪费,腐化堕落这样一些苗头就要把它抓住,来进行教育,引起大家的注意。让小团体主义、让个人主义争权夺利,这样一种思潮泛滥是不对的。(鼓掌)这是关系到我们现在正进行的夺权斗争,我们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把权夺过来,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权向何处去,是关系到我们当权以后政权的性质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来支左,这是“爱民”的重要内容。

要“爱民”，正确地处理“爱民”这个问题，还必须采取各种适当的形式，经常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作自我批评，座谈会也好，谈心会也好，开个大会也好。

我们工作当中有了错误了，有了缺点了，怎么办呢？就公开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向革命群众承认我们的错误。最近一个时期，毛主席反复地教育我们军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只要讲三句话就行了。一句话，错了；第二句话，是什么错，就是什么错。在这个问题上或者那个问题上方向错了，就承认这个问题上方向错了。第三，就改正，这样就好了。公开检查比不公开检查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检查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有了错就检查是毛主席教育我们的，反复地教育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痛痛快快，不要吞吞吐吐，否则，就会被鬼缠住，就会被动，痛痛快快地检查了，就主动了。（热烈鼓掌）

同志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有的同志，军队的同志这一个时期在这一个问题上或者那一个问题上，在一个时候犯了错误，甚至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这是不同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够说他们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一个问题我们用“拥军爱民”的方法来解决好不好？（好！）用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根据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把它扩展到部队的内部，部队内部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问题，两级军区的问题，两派不同意见的问题，也应当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同样地，“拥军爱民”的口号扩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内部，扩展到你们的两大派之间，也应当用“拥军爱民”这一个方法来解决，好不好？（好！）

所谓云南的问题，主要的就是这么三个问题：军队同地方的关系、军队内部的关系、昆明的以及云南的两大派的关系问题。这样为什么毛主席说相信昆明的的问题，云南的问题能够同志们自己解决呢？就是说同志们这几个之间的关系的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在“拥军爱民”这个伟大口号下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为什么要开展拥军爱民呢？为什么要提这个口号呢？为什么要处理军队同志们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要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要处理两大派的关系问题？就

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正确的轨道，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紧地沿着斗争的大方向前进。

现在据我们知道的，我们这一次来学习的，同志们给我们上了一些课，军队内部的问题，已作了比较好的解决。昆明军区的同志，云南军区的同志都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八·二三，炮兵团同志们，一些领导的同志，谈了好多次，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处理云南问题的方针。大家在一些问题上是不是开始达成协议了？还没有具体达成协议，但是大家都有达成协议的愿望。云南日报内部两派的同志，同昆明的八·二三同炮兵团的同志，已经达成了协议，达成了很好的协议，明天就要出报了。毛主席希望云南创造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范例，自己解决云南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希望，云南日报能够在云南首先实现两派大联合的一个范例，使得这个云南日报能够成为推动、促进云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战斗工具。刚才谢富治同志讲了，文汇报的同志，还有人民日报的同志做了一些工作，主要的他们也是来学习的，是同志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经验，谢富治同志说做了一点“抹稀泥”的工作。有的同志批评这次中央解决云南问题是“抹稀泥”的方针。我不赞成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热烈鼓掌）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不是“抹稀泥”呢？不是折中主义呢？不是调合主义呢？因为它是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它是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分析判断一切言行的是非，同志们，参加同我们一起谈话的同志都会知道这一点，我们在每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只要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都是不能够同意的。（鼓掌）

根据毛主席云南的问题由云南自己解决的这样一个方针，谢富治同志，还有我们几个同志提议北京来的同学一律回去，一律回北京。你们在处理云南问题有什么需要反映的情况，需要提的意见，你们可以向云南的同志们提，也可以回到北京向我们提，向中央、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反映。

两大派的同志，八·二三的同志，炮兵团的同志，都作了决议了，拥护中央处理云南问题的方针了，我记得好象双方都提出来要开门整风。我们欢迎这个整风，一边战斗，一边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都要作自我批评，着重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权。我们这两大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一定要好好地理解毛主席反复提出来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的解放自己”这一个口号。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同志们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鼓掌）

去年八月，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刚刚萌芽的时候，清华大学附中的很少几位红卫兵还处在非法同遭受打击的时候，他们写的一论，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还被认为是反动文章、大毒草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到了他们的文章，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就立即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胆略同远见，抓住了红卫兵这一个新鲜的事物，他立即向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就是著名的八月一号的一封信，在这一封信里面，毛主席满腔热情地热烈地坚决地支持红卫兵，由于毛主席的支持，这一个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鲜事物很快地就在全国发展成为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成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冲锋陷阵的闯将。同志们，正是在这一封信里边，毛主席一面坚决支持他们，一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口号，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要使得他们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问题。同志们！这一批红卫兵小将有一部分人是注意，是欢迎，是接受伟大领袖的前半段对他们的支持，而对伟大领袖后半段对他们的教育，他们把它丢到脑后。同志们，这样，他就走上了邪路了。所以我们伟大领袖以后又反复地讲这个道理，在今年的三月七号对天津延安中学的一个批语里面，又反复地讲了这个道理，要拿这个道理来劝说这些同志，劝说小将们。我想两大派的同志都要很好地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通过整风来结合你们的实际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提出来的，反复教导我们的这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要性。

从今年五月十七号报纸上发表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件”的文章，最近又重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划时代的光辉的著作。我们提议同志们应当好好地认真地学习这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因为它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搞了一年了，一年多一个月了，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一个月了。我们应当坐下来，想一想，用毛主席这些文章，文件作为武器对照一下我们的实际，想一想，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回事啊！首先究竟是革谁的命哪？革命的对象是谁呀？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谁

呀？如果搞了一年多，把这一条都忘记了，忘记了我们一定要革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在你们云南来说。我们要把他们这一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从各个战线上肃清，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以致组织上把他那一套打倒，所以我们才要干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斗争任务。我们过去有着共同斗争的遭遇。有的同志还是在风浪中的战友，那么，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能够联合起来呢？究竟是什么理由不能够团结起来呢？（热烈鼓掌）

这是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团结的大会，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的大会，这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的部队同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的大会。这是一个拥军爱民的大会，这是一个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誓师大会。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万岁！

李再含讲话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首先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这一次我们随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等来到云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是第二次了，这一次来到云南，我们没有带什么其他礼物，唯一的礼物，就是刚才谢副总理讲的，就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声音。就是毛主席对于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关怀，就是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就是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就是要我们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随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他们来到云南给同志们带来的唯一的礼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联合起来，没有理由不联合起来，因为，我们斗争的大

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有联合的共同基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有共同的革命对象，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能够联合起来，一定能够联合起来。我们曾经有过联合的经验，云南的两大革命左派曾经联合在一起，遗憾的是后来又分开了。现在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又重新联合起来了，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要记取革命大联合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在云南两大革命左派大联合的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痛苦的道路，有过痛苦的经验。同志们想一想，当着你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形势是多么好啊，当着你们暂时分开的时候，情况又是多么的不好啊！同志们不要笑，我这是讲的“多么不好”就是大家都忙于打“内战”去了。影响了我们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了。这就不好。因此，我们有过联合的经验，也有分开的痛苦的教训，我们应该发扬联合的经验，记取分开的教训，在重新联合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还会遇到重重的障碍，还会有许多阻力。同志们，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的。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彻底完蛋了。我们要排除这些障碍、排除可能出现的障碍，我们首先要防止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极少数的坏人对我们的挑拨离间。我们在联合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只要不是大方向的分歧，大方向我们也不应该分歧。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某一些具体问题、枝节问题、非本质问题、非主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协商可以解决的。就是一时解决不了，我们双方也要求大同存小异，也可以放一放，也要互相让一步，这个不叫和稀泥。因为这是一个枝节问题、非本质的问题、非主流的问题。我们在大联合当中，还要排除可能出现的某些同志“私”字作怪，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是妨碍我们大联合的，我们不能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否则就会破坏革命的大联合。

最后让我们高呼：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革命的大联合万岁！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打倒李井泉！

打倒阎红彦！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九·一四战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会见昆明机床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七月四日凌晨四点一刻，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在驻昆部队负责同志李成芳、陈康，刘懋功等陪同下到了昆明机床厂，受到了《11·8》战士的热烈欢迎。李成芳向谢副总理介绍了《11·8》兵团负责人唐国礼同志，谢副总理与唐亲切握手。

谢副总理说：“我们看看大字报。”于是在唐国礼等同志陪同下观看了《11·8》战士控诉、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和《5·1》兵团的大标语，谢副总理问唐国礼：“你们还有一个组织叫什么？”唐答：“叫5·1兵团。”谢副总理又问：“可不可以去看看？”唐答：“好”。随即陪同谢副总理到了《5·1》兵团部。《5·1》兵团的战士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迎接谢副总理。谢副总理问：“你们还武不武斗？”唐答：“我们没有有武斗。”《5·1》兵团的同志答：“我们也没有武斗。”

谢副总理说：“你们应当联合起来才好！”群众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这时《5·1》兵团战士把一封用大红信封装着的信递交给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把唐国礼和《5·1》兵团负责人胡希平拉在一起，紧握他们的手说：“你们要联合起来！”谢付总理离开《5·1》兵团，在“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的口号声中来到《11·8》兵团团部。

谢副总理对工厂生产非常关心，一坐下便问道：“你们的生产搞得怎么样？”众答：“搞得不好。”谢：“你们这个厂是个很好的厂，我来过好几次。”接着又说：“你们厂发生过一次武斗吧？是五·二……”众答：“是五·二六。”这时《11·3》负责人姜福志说：“那次我们有十几人被打伤了，有好些还住在医院里。（指在座的刘福海）这是我们兵团的负责人刘福海，被打伤了，还住在

医院里。”谢副总理问：“《5. 1》兵团有没有被打出的？”胡希平等未答，姜接着说：“我们了解了，没有。”谢：“你们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听毛主席的话。《11·8》和《5·1》兵团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

谢副总理又问：“你们生产哪种镗床？”众答：“座标镗床。”谢：“生产计划是多少台机床？”这时担任生产座标镗床李积德同志答：“全年计划××台，现在只完成了×多台。”谢：“怎么过了半年多才完成×多台？这不行啊！”唐国礼插话说：“我们厂到六月十六全厂银行存款只有××元。”谢：“全厂只有××元钱，你们还要搞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我到你们厂来过几次，座标镗床的问题很重要啊！国内外都很重要，应该把生产抓起来，有什么问题在业余时间来辩论。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11. 8》兵团和《5. 1》兵团要联合起来。”

谢副总理非常关怀地最后指示说：“你们两派要联合起来，不要再打架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看看哪个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要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武斗，哪个地方武斗都不要去。你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要把刘、邓、陶、李、阎斗垮、斗倒、斗臭，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臭。一个厂××几台的任务（指座标镗床），只完成几台不行。座标镗床你们是全国第一家开始做的，现在全国都很需要。”

谢副总理讲完站起来说：“我们要走了。”随即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群众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对《云南日报》报社代表的讲话

七月四日上午十时许，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等，在离昆登机前，接见了到机场欢送的《云南日报》社无产阶级革命派《全无敌》战斗兵团代表，以及《新闻兵》造反团的代表和驻报社军代表，对《云南日报》十分关切。

谢副总理问：报纸出了没有？军代表送上试版后的当天报纸大样（正式付印前最后稿样），说：报纸要套红，还没有印出来。

谢副总理接过大样，非常高兴地与代表一一亲切握手。谢副总理对代表说：报纸要检查一下，快，但不要出错。昨晚看到街上的大字报和标语，有关《云南日报》方面的很多，有的写“启封”了的，有的写“复刊”了的，有的写“新生”，有的写“诞生”，众说不一。也有写“出版”了的，这个好像是中间派的说法。报纸不要站在哪一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谢副总理最后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报纸办好。并再一次和军管会的负责同志一起与报社代表和军代表亲切握手，热烈祝贺《云南日报》出版。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驻云南省的部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是支持了左派的。但是，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 error，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是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时地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提出了依靠云南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英明方针，并派谢富治、王力同志来帮助，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对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要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刻也不离开斗争的大方向。对来自右或极

“左”方面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各种思潮、口号和做法，都要耐心地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引导到大方向上来。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对刘、邓、陶、李、阎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最近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已在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进一步肃清和检查我们的错误，认真地吸取教训，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以大局为重，增强两级军区和部队内部的团结，保证部队的稳定，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和援越抗美，保卫边防等任务。

三、八二三和炮兵团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压制革命群众、激化两派矛盾的言论和做法，要认真检查，坚决改正。对两大派之间的问题，应本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由军管会与两大派共同协商，订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今后，我们要切实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出现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潮，要遵照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满腔热情地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加强对受蒙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促进和巩固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尽快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军管是过渡，过渡得越快越好。凡左派占了优势，干部已站出来的单位和地区，即可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条件不够成熟的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云南省与昆明市尽快建立“三结合”的筹备小组。已实行军管的单位和地区，要改变管得过死，限制过多的缺点，放手发动群众，积极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权力机构创造条件。

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既要敢于打击一小撮，也要勇于解放一大片。只要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刘、邓、陶、李、阎的罪行，都应该热烈欢迎，大力支持，坚决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他们过去的缺点错误为借口，进行抵制，反对，排斥和打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省军管会即将组织省、市机关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积极帮助各级革命干部尽快地站出来。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也要组织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为干部亮相创造条件。站出来的干部，对两大派不能只偏一方，要积极做两大派的团结工作，促进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

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党委凡召开解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会议，要吸收有关方面的年轻干部参加，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的会议和某些工作，要吸收革命小将参加，各级领导在一定时期要召开一次老、中、小各方面参加的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教导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认真吸取教训，作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今后，一定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针和政策，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彻底肃清我们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决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和群众在一起，把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上当否？请予指示。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新云大八·二三《倚天剑》分团 《文卫战报》 《阎孙黑帮在云南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云南大学是云南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直接掌握、严密控制的一个顽固堡垒。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阎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便把云大选作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结反革命经验的试点单位; 并把这里作为他们在昆明地区、云南地区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堡垒。用阎红彦、马文东的话说, 叫做“稳住云大, 才能稳住其它学校”; “这次风浪, 顶不顶得住, 就看云大了”, 他们在云大, 一有动作, 就加以总结, 纠集外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执行反动路线的负责人前来参观、取经, 把他们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经验向全市、全省传播。流毒深远, 罪行累累。

<http://www.wengewang.org>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运动开始至六月五日。阎孙黑帮根据彭真的“二月提纲”, 并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治国在云大的所谓“经验”为主, 炮制了云南的“四月提纲”。云大党委立即在组织上拼凑了一个以胡泮生、袁光为首, 尤××、杨××等参加的领导核心, 形成一个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黑司令部, 忠实执行上述两个反革命“提纲”。他们把运动的斗争锋芒指向一股教师、干部, 竭力混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 组织批判会和大字报进行围攻。同时, 竭力为党委、各总支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脱, 让他们篡夺运动领导权, 逃避群众斗争。 第二阶段——去年六月上旬至八月五日。以省委秘书长马文东为首的王作组进驻云大, 与胡泮生、袁光的校党委黑司令部紧密勾结, 狼狈为奸, 更露骨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短短的六十多天里, 把约 32% 的教职工打成“重点人物”、“反革命”、“牛鬼蛇神”、整了大批同学的黑材料。同时, 更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 压制革命师生职工起来揭发他们的罪行。<http://www.wengewang.org> 第三阶段——八月初至十一月初。工作组撤出云大后, 马文东按阎孙黑帮的布置, 继续在幕后操纵, 成立了由铁杆保皇分子王××、李××、石××等出面, 胡泮生、袁光幕后指挥的文革筹委会, 继续窃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段时期, 除了继续大整“重点人物”的黑材料外, 大力组织保皇“红卫兵”, 甚至动用专政工具, 大肆围攻炮轰派同学。同时对未列入“重点”的广大教师、干部施加压力, 继续检查“下楼”。 打击一大片在云大, 与云南各大中小学情况一样, 阎孙黑帮及其爪牙除了打击大批党政专职干部外, 还突出地表现在打击了大批教师。具体做法是: 一、转移斗争大方向, 对干部、教师一概怀疑, 一概打倒。 运动一开始, 校党委黑司令部袁光等人就对师生作动员报告, 提出这次运动主要是“搞教师问题”; “修正主义教

育路线,云大教师,干部哪个没有贯彻!就是他们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马文东布置:“大字报想写谁就写谁。”然后通过总支层层布置,围攻大片教师、干部。胡泮生说:“揭发面要达百分之九十以上。”马文东说:“物理系教师、干部中,90%以上被贴了大字报,群众发动起来了”。要各单位效法。结果全校教师、干部90%以上被大字报围攻,有的系则是火烧100%”。

二、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大片革命教师、干部。对全校干部、教师进行秘密的政治排队,把大量的一般干部、教师作敌我矛盾处理。其计划是:老教师中抓40%得牛鬼蛇神;青年教师中抓9%;学生中抓1%。凡被排为“四类”的,马上组织人“揭发”,按人立户头整黑材料。如果揭发不出,就采取抛档案、内查外调,搜办公室、搜家等办法找罪证。对教师、干部的讲义、文章、平日言行,甚至主动交心的材料、学习会上的思想检查、入党申请书等材料,砍头去尾,任意歪曲,强行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列为“反党”罪行。结果,打击计划超额完成。

初步统计,老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占其总数的68.8%;青年教师占25%;十七级以上党政干部中,被列为“反党分子”、“党内右派”、“叛徒”、“挂起来”、“靠边站”的,占54%。其中行政系统竟高达87%;而作为“左派”使用的骨干,只有三人。学生中打了二十多起“反革命”事件和“反革命”大写报。初步统计,两千多学生中,三百人被直接或间接打成“反革命”,占15%(暗中排为“四类”、“右派”的,未计算在内)。

<http://www.wengewang.org> 三、挑动学生、教师、干部互斗。五月初至八月上旬,组织学生集中围攻教师、干部。同时又挑动教师、干部互相写大字报围攻;最后还搞什么“小字报揭发”、“背靠背揭发”。对未列为“重点”的教师、干部,要他们“站稳立场”,通过“揭发”,与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同志划清界限;对列为“重点”的教师、干部,则要他们“立功赎罪”,揭发其它同志的问题。一般教师、干部受大字报围攻的时间长达三个月(五月初至八月初)。另一方面,他们又挑动教师、干部对学生进行围攻。八月六日以后组织全校把曹、保两同学的革命大字报打为“反革命大字报”,八月廿三日以后,又挑动师生围攻工学院、农林学院、南下同学及本校的炮轰派。在他们的挑动下,云大干部、教师、学生的“混战”,持续了整整半年,相互关系严重对立,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坐收渔利。

保护一小撮 在打击一大片教师、干部、学生

的同时,工作组、党委黑司令部、筹委会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保护。

一、制造舆论,保护运动主要对象。去年五月下旬、袁光在各系文革小组成员、政治辅导员、党团支书会议上说:“现在是右派、左派都在争夺群众。你们引导写大字报,枪口要准,枪法不要乱,不要打带兵的人(按: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要引向党委、党总支,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导运动了。”

二、定调子,打包票,公开包庇。工作组一进校,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正确的,不允许怀疑。云大党委也是正确的、胡泮生、袁光是好同志,是不容怀疑的”。三反分子、付总务长杨××被群众揭发,工作组李××出来保镖:“他是左派,一向是高治国、李广田的对立面。”中文系总支委员、副系主任张××,群众一致公认为中文系头号牛鬼蛇神,可是工作组和党委黑司令部竟让他窃夺该系文化革命领导权,并宣扬他是“听话的好干部”,不顾全系革命师生反对,借“放包袱”之名,强行“解放”了他,并拉入臭名远扬的保守组织“红缨”,积极参与镇压炮轰派师生的罪恶活动。其它一些系一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都采用封为文革付小组长或调到校文革办公室任主要工作的办法保护下来。

三、抛假替真,舍卒保车。化学系抛出一个不大管事的总支委员作替死鬼,却把系总支的重要决策人物书记、付书记、副系主任等保了下来。

四、杀鸡惊猴,压制揭发。中文系教师团支部书记杨××五月底要组织支部同志揭发系总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被组织围攻,强加“不信任系总支”,“转移斗争大方向”等罪名,打为“野心家”、“牛鬼蛇神”。教师蒙××六月份写了一张大字报《为什么?》质问中文系旧文革为什么把矛头指向群众,包庇三反分子张××,马上被围攻,斗争,打为“现行反革命。”

五、培养保皇骨干,组织保守队伍。为实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目的,袁光、杨××等人出马,在师生干部中选拔了一批所谓“左派积极分子”(约二三百人),进行专门训练,名曰“训综骨干”,说要做到“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阎红彦对此深表赞扬,对袁光说:“云大抓了队伍问题,在这方面有基础,就按你们的安排办。”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不少成了后来的三级文革小组成员。

八、二三以后,又以这些人为骨干组织了云大有名的保字号组织《红缨》、《刘英俊纵队》、《星火》、《无产者联合司令部》等。为使这些人忠实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他们封

官许愿，进行收买。让王××、石××在运动后期任党委付书记和副校长，聂××任教育厅副厅长等等。<http://www.wengewang.org>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种种暴行 对于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的广大教师、干部，他们实行了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主要有：

- 一、规定黑纪律。如不准读毛主席著作，不准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不准看报纸、不准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辩论、不准与南下串联同学接触等等，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 二、私设劳改队，从九月中旬起，正式把“重点人物”送进劳改队，由受蒙蔽的红卫兵押解劳动。多数劳改队到今年一月才被受害者冲破。
- 三、武斗。如拳打脚踢，拧耳罚跪，扭手按头等，有的系还创造了“问一句话，打一个耳光”的特殊武斗方式。
- 四、各种人身侮辱。如训话、警告、恶骂、低头、示众、发工资时强迫写大字报自报“养猪费”、挂黑牌劳动、敲小锣游校、编号排队，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写劳改鉴定等等。
- 五、私设公堂和变相拘留所。每天集中于固定地点，进行逼、供、信。出门上街，甚至大小便都要请假。国庆节不放假，照样劳改或集中关押、写“蠢猪保证书”，“不准乱说乱动”。
- 六、非法抄家。抄去的东西及征用的自行车等至今未还。
- 七、封建连坐。教师干部受迫害，子女被骂为“小牛鬼蛇神”、“黑崽子”，挑动邻居路人对其家属进行侮辱、恶骂。有的亲属甚至连坐而为“牛鬼蛇神”。

目前反动路线仍负隅顽抗 现在，工作组虽已经撤走，校党委、旧文革、筹委会虽已靠边站，但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仍不甘心失败，他们利用反动路线对一些人的影响和蒙蔽，继续千方百计地推行反动路线，迫害革命教师、干部。 他们散布各种谬论，例如受迫害者起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推行的反动路线就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呀 “根据揭发材料(印黑材料)你们也有缺点错误”呀，等等，千方百计抵制对反动路线的深入批判。 他们拒不为受打击的一大片教师、干部认真平反，把罪责推给群众，却叫嚷要立即解放那些坚持反动路线，至今没有悔改表现的黑打手。他们操纵少数人对已平反的少数教师、干部继续进行歧视和迫害。对起来组织革命造反组织的同志进行一次又一次疯狂的镇压。今年二月一日，五月廿九日两次镇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倚天剑》战斗团。六·六《通令》下达半月后，还毒打、拘留《倚天剑》战士，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结束语 欠债一定要偿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

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他们最害怕革命教师和革命学生结合起来，最害怕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只有彻底地批判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实行毛主席的“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革命路线，才能形成革命的大联合，最后打倒他们，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历史是无情的，那些主张并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人，最后必将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大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所打倒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发出的以“要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伟大号召，正在我省各专（州）县贯彻落实。

一个多月来，各地部队党委、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对此进行了反复研究，把这一工作列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加强了领导。有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建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办公机关，负责抓这项工作。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都闻风而动，说干就干。据丽江、临沧、大理、开远、思茅、蒙自、文山、曲靖、东川等专（州）县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十月底止，已办和在办的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共三百五十六个，参加学习的一万三千多人（部分学习班的统计数）。

开办得较早的学习班，目前已经办完了第三期。

这批学习班的主要收获有：

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参加下关“大联合”学习班的各团队负责人都认真地对本派的派性作了自我批评。他们把自己的派性列了八大罪状：一是以势压人；二是唯我独左；三是对干部你打我保，你保我打；四是不作自我批评；五是从本派利益出发，谁支持我就团结谁；六是报复主义；七是学“毛著”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八是对人家光看缺点，对自己只讲长处。下关总站两派在组织上本来已经联合了，但思想隔阂并未消除。这次在办学习班时，头头们为了照顾

这一现实情况，仍然按原来两派分开编组。但在学习过程中，群众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重新按部门进行两派混合编组，以利团结。结果，通过学习，两派的联合获得了巩固和发展。

工人们说：“过去是刘少奇把我们工人阶级分成两派，今天是毛主席指示我们联合起来。”目前，下关地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正朝着革命大联合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二、进一步认识了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不同程度地检查和克服了在干部问题上的“私”字。在临沧专区军管会和革命派联合举办的学习班上，革命派的负责人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教导，进行检查对照。他们突出地检查了三点：（1）对干部队伍没有作阶级分析。毛主席说，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而我们却没有牢固树立这个观念；（2）怕字当头，明知打不倒，又不敢大胆解放；（3）干部站不出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干部本人主观努力不够，另一方面是造反派帮得不够。许多同志认识到，对待干部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私”和“公”字的问题。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坚决的措施，把干部工作抓上去。

三、进一步认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和革命群众组织，对第一批学习班正在总结经验。滇南地区的一些学习班总结的初步体会是：

一、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学习班一定要以“要斗私，批修”为纲，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从而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二、必须始终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主要学习内容，带着大联合、干部问题和三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反复地认真地学习，不断加深领会、对照检查，亮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活思想，斗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私”字，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高度去论危害，挖“私”根，从灵魂深处找原因，从行动上看效果。把“私”字斗倒、斗臭。加强思想革命化。要抓大节，抓大方向，防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

三、要掌握重点。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斗争实际，突出重点，有的放矢，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两个关键问题。

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始终要应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启发政治觉悟，多作自我批评，不指责别人，不强加于人。在学习班里，群众教、群众学，人人都是教员，人人都是学员。会内学习和会外运动结合起来，互相促进，边学边用。

五、加强领导。军管、支左机构，要加强领导，就要和学员一道学习，做到“五同”（同学最高指示，同亮思想，同斗私心杂念，同批修正主义，同开讲用会）。把群众中的先进思想、先进经验集中起来，加以发扬光大。把群众中先进萌芽的东西加以扶植培育，总结推广。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云南省军管会《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1967. 11. 16； 中发 [67] 348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云南省军管会《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写得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现转发给你们参考。建议你们印发给各学习班，当作学习参考材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炮三司》李清祥《我对赵健民的看法》 我对赵健民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今年一月份他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 43 医院，当时许多南下同学和医学院等校的同学要冲医院抓他，我曾经阻止过。二月份在北京，同学们提支持赵健民，我也同意。但是当时我是不了解他的。后来接触中，我发现他同阎红彦划不清界线，对革命造反派没有正确的态度，写信控告革命小将桂尤喜和黄兆琪，给我的印象不好，认为他风格太低。后来我上北京去了几个月，八月初回来。在八月二十一日以后，才逐渐认清了他的本质。 经过长期观察，我认为赵健民和他的同伙林亮等是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毛主席

“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方针，操纵炮兵团武装一派、消灭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下面我着重揭露他这一段时间的主要罪行。

八月二十一日占领新华山后，周超等人立即就把赵健民接出来住在翠湖宾馆，亲自策划和指挥。当时他就在会上说：“我们与炮兵团是同生死、共命运。炮兵团如果被消灭了，我们也就完蛋了”。

占领新华山的计划，据我了解是事先策划的。这个计划，来自于军内。在占新华山之前，我从北京回来，发现武斗升级很快，曾经问过方向东有什么打算；方向东告诉我，有个计划，部队准备占圆通山，新华山炮兵团去占领，和云大、师院连成一片，放弃医学院。我当时主张占新华山，是当时谣传说有许多人被八·二三打散，把新华山当收容所，不能出击，如果有人打来，也不马虎。赵健民先讲占新华山不大好，说是怕把生产指挥系统打乱了，政治上被动。但是，他又说：“既然占了，就不要撤了！但是要把生产指挥系统恢复起来”。实际上只要占着新华山，生产指挥系统就不能恢复。占新华山后，赵健民亲自主持研究了“武装保卫昆明的动员令”这个声明，基本上是他口授由李国栋写的。实际上他是主张占领新华山的。

占新华山后，赵健民就反对我把新华山当成收容所的主张，他制定了一套套战略计划。他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组织骨干队伍，训练一些骨干队伍”，“把新华山变为一个屯兵场，但不能按兵不动，要主动出击，不能见死不救”。“海口必须占领，因为 200 号信箱可以补充枪支弹药”，“打通西线，控制马街”。因为西线有粮食，又有煤炭，可以解决供给问题，同时，《援越抗美》的几千人又在武定、禄劝一带，可以调来。在西线没有打通时，赵健民主张放弃东线，因为东郊八·二三势力强。集中力量打通西线。马街占领后，他又计划打通东郊。赵健民、沉昌雄同我商量决定派冯庆波带领两百多人回大石坝去组织那里的炮兵团。“九·五命令”下达后，我曾经几次叫人打电话给冯庆波不要去抢枪。他不听，去嵩明抢武装部的枪，打死了五个人，实际上叫冯庆波去东郊也是赵健民、沉昌雄等排斥异己的一个阴谋。冯去东郊后，方向东去军区找陈康，说冯是上山当土匪，叫部队把冯抓起来。沉昌雄也派人送信给炮师叫抓冯庆波，陈康没有答应，叫炮兵团自己去抓。这件事叫我和焦云俞等知道了，十分生气，当时感到赵健民这些家伙品质太坏，准备把他抓起来，吓得他住到翠湖宾馆不敢出来。

赵健民这套战略

计划是逐步实现了的，在实行这个罪恶计划时，死伤了几千名无辜群众，这笔账一定要算在赵健民身上。

赵健民不仅制定了炮兵团消灭八·二三的战略计划，而且还亲自主持研究了一些重要战役的作战计划。九月四日上午，赵健民同侯良辅、李士行等和延安兵团的政委等在原昆一钢铸造车间旁边亲自研究过打电机厂的方案。他主张海口巩固了，从海口、安宁和西山打马街，新华山来个主动出击，就把西线打通了。这天开会，我是下午到的，他们上午研究的。研究的情况是由延安兵团哪个政委告诉我的。他还多次提议打一下医学院附一医院，目的是打一下附一院，再进攻篆塘的 12·6 第四团，打通 43 医院的信道。打附一院时，打死了一个炮派的组织部长魏××，把西郊兵团的杨××眼睛打瞎了。参加这一次的现场指挥有省建公司的姓杨的一个和姓范的一个等。赵健民还多次向我介绍沈阳两派打仗时使用炮的情况，当时有人造谣说八·二三从步校拿了几十门炮，赵健民就叫我把师范学院的四门炮组织到新华山去用。一来因为这些炮被部队卸去了瞄准器和底火，不配套；二来因为师院自己想用，不让拉走。这件事情幸好没有办通，如果办通了，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许多作战部队的调动，都是赵健民和沉昌雄亲自研究的，具体情况会有知情的同志出来揭发的。攻打博物馆后，赵健民还去物资局亲自慰问过死者的家属和到医院慰问过伤病员。赵健民还亲自开条子发枪，他在翠湖宾馆时写条子给新华山总指挥部林非（红交兵头头）发出的枪就有三四十只，管得十分具体。赵健民这些做法绝不是认识不清，而是出自于阶级本能。占新华山不久，他就多次给同他住在一起的侯良浦、李士行说过：“老侯呀！事情已经到这步了，要错就错到底了。”李士行同志曾经多次给我提出过这句话，我曾经劝过李，叫他不要再积极了。在云大设广播电台，先搞起来一个，赵健民是支持的。后来又搞了一个，互相干扰，大家有意见，主张撤一个，云大炮团和共宣都不同意撤，只有分开时间，一家广播一段，架设广播电台是很严肃的事情，这个道理赵健民是完全知道的，我当时问过能播送多远，说是只有六十公里的半径，就没有再管。现在听说能播送到国外，这是一件大事，必须查清。占领新华山后，赵健民实际上是炮派的总指挥，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由他主持或有他参加。李毅、沉昌雄等什么事情都要找赵健民。他在炮兵团内部也拉一伙人，排挤、打击另一伙人，凡是能顺从、迎合自己的，不管是什么

人，都拉在自己身边。在干部中，他主要依靠林亮、周超、健政民等人，群众组织负责人中，主要依靠沈昌雄、李毅、王守库等人，而把炮兵团的核心常委中多数工人同志排挤到一边。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笼络坏人，依靠坏人，不讲一点原则。

林亮是赵健民的主要参谋。赵健民把他搞成炮派的核心常委。赵健民去北京以后，炮派的大权就操纵在林亮手中。林亮在八月初炮派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拉一派，打一派，激化了两派的矛盾，起了很坏的作用，对八.二三刻骨仇恨，到处宣传不能同八.二三联合，说“同八.二三联合是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现在不能联合，没有条件。”宣传炮兵团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八.八”批示肯定赵健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八.二三保李成芳、周兴、郭超，这些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宣传八.二三要消灭炮兵团，计划未变；宣传八.二三有多少枪没有交。他宣传、支持这些谣言，继续准备武斗。他反对交枪，说：“交枪先交不能用的，枪和弹不配套的。”“要做两手准备”，问题不是不交枪，是遇到八.二三这样一个对手，他们的枪比我们多，现在没有交完”。因此，现在炮兵团手中还可能有几千支枪。新华山、云南饭店、海口、物资局、翠湖宾馆等处都有枪。林亮布置“这些枪不能轻易拿出来，非到八.二三来围攻时才拿出来用。”他还交代，要防止火力侦察，不要暴露，不要上当。他策划把工役制部队一万七千多人完全调来昆明，把这些人安排到二十几个厂子去，实际上是作为武斗的力量。中央有电报要这批人回到山东、河南，这些人有许多不愿回去。赵健民、陈康利用了这些人的情绪，在西站召开的一次工役制代表会议上，答应愿意留下的可以安排工作。林亮等策划用一部份人到军区去闹事，要军管会分配工作，军管会不管，就自己安排。我反对他们冲军区，后来还是去了，在九号院住了几十天。现在《援越抗美》的人正在集中，来到昆明计划占住政治学校，把胜利堂作为《援越抗美》的总部。最近许多坏事，都是林亮策划的。

周超这个人也是赵健民赏识的，是情报组长，许多谣言都来自他那里。亲自布置抓人、打人，品性极为恶劣。另外，象郭青、杨秀荣、健政民这些人也做了不少坏事。赵健民在生活上也是非常特殊的，他家住在宾馆四楼，吃大鱼大肉，带了两个秘书，公安厅的保卫员。怕见群众，有一段住在宾馆，不敢到一楼吃饭，要人送上四楼。发了二十五个特别通行证，只准这二十五个人见他，根本不象个革命的样子。

赵健民之所以敢于做这样多坏事，能做这样多坏事，是同两级军区内少

数负责人的支持分不开的。上新华山后，他曾一度住在陈康家里，后来又去住过。陈康讲“军区有人知道了不方便”，才搬出来。有不少重大的事情，他们同军区的一些人都是有联系的。赵健民之所以敢做那样多的坏事，还同现在已经被揪出来的王力、李广文等反革命集团有关系。王力、李广文是支持赵健民的。

赵健民在历史上确实是个叛徒，被捕以后，供出来入党介绍人和其它党员，供出来党组织的情况，肯定是叛变自首。至于他被捕叛变后是不是有人被害和组织遭到破坏没有，只是情节轻重，并不能否定叛变的实质。这个问题，八·二三掌握的材料是确实可靠的。经过初步调查，我可以肯定的说，赵健民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八批示，中央叫他站出来揭发旧省委的问题，做两派联合的工作，他却把矛头指向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昆明军区党委，操纵炮兵团，消灭八·二三，自封“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辜负了中央对他的希望，践踏了八·八批示。他已经把炮兵团引到邪路上去了，是害了炮兵团。

真正要革命的同志们，特别是炮兵团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把操纵炮兵团的坏人揪出来，把混到炮兵团的坏人揪出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再含接见昆明八·二三战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李再含同志在贵州军区司令部大楼小会议室，接见了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几家战报的记者。八·二三记者就李政委在十一月二十三号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话以及二十二号对昆明军区几个记者同志讲话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提问，李政委一一作了回答。现将李政委谈话(记录稿)中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摘要转载于下：

李政委说：你们这几个月，两派长期没有很好地联合起来，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们的同伙搞那一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势必受到影响。因为广大群众的精神力都不能集中到大方向上来，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搞得不深不透，少数人还没有很好地搞清楚，没有批倒批臭。

比如给你们举个例子，原省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阎红彦带了×××、×××。贵州的贾启允也带了两个人，那次会我也去了。这个人表现很不好，和中央唱反调。其中特别突出的一次，在李井泉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讨论伯达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很重要，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李井泉在那里鼓动大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当时云南来说，对伯达同志的报告到处挑毛病，大唱反调。×××过去我也不认识他，这次开会才认识的，这个人就大唱反调，起码看，是严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很好批判他的这些东西，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是不是还有？希望云南广大革命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负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战，不把这些走资派、叛徒、特务、坏分子挖出来批倒批臭怎么行？！这是一个大方向问题。

八·二三记者在问到赵健民时，李政委说：我们上次去云南是谢副总理挂帅，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说，不一定到北京，可以就地解决。当时主席对各省主要成员那个站出来很关心。四川要李大章站出来，赵健民不是主席直接讲的，是中央文革的意图，叫赵健民站出来。这样，谢副总理到云南直接找赵健民谈话，到四川找李大章谈话。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况，这又是几个月了。这几个月到底是什么情况，要由云南广大群众来解决。我不了解情况，你们自己正确地处理。

李政委在谈到云南还要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时说：“云南有相当一批干部来自薄一波的太岳。薄一波是刘少奇的左右手。叛徒集团里面的也有。从多数同志来讲是属于认识问题，因为盖子没有揭开。现在盖子揭开了，应该批判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东西，应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跟薄一波严格划清界限。云南原来在太岳区与他更接近的、更熟悉的、更高的干部，有的到地方，要清理出来；属于军内的，按中央指示，办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不能拿到社会上去，不能上大街。地方革命群众、造反派不要插手，不要干预军内的事情，相信军队本身的问题，军内可以解决，要按中央指示办事。地方革命群众、革命造反派对军内有意见，允许送大字报，开座谈会，提意见，允许向上级反映，但不要搞到大街上去，这样容易被坏人利用。

云南究竟有没有薄一波的死党，要调查、研究、揭发，云南是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个斗争大方向问题。这里面还要划清一条界限：原来参加决死队的广大群众还是好的，即使是跟薄一波走的，也是个别的，也是极少数，不要扩大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些不是这种情况的，也有个肃清流毒的问题。工业战线也有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路线问题一定要反映。

在谈到昆明军区党委请示中央点名批判李成芳等人的报告时，李政委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属于军队的问题，你们不要管。军内问题，地方造反派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

八·二三记者在会报到昆明地区出现了破坏部队稳定情况时，李再含同志说：“昨天我听说昆明军区三大机关声明在贵阳街头出现，我立即下令复盖了。在贵阳我们不允许，我们一定要照中央指示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谈，可以向中央反映，军内问题是有原则的。你们两大派要正确处理军内问题。”

对于昆明地区出现的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情况，李再含同志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一些，这段时期，鲁副司令员常跟我联系。对黎锡福、李兆昇同志，我建议送到北京医院治治病，保护起来，他们不是属于三反分子、叛徒，不属于这些问题嘛！”

八·二三战报记者在问到中央对李成芳同志有没有新的指示时，李再含政委说：据我知道中央没有什么新的指示。你们按照谢副总理指示的精神，现在仍然有效。谢副总理指示的精神与五月三十日指示不矛盾，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七月份是毛主席亲自派谢副总理来的嘛！

记者在问到李成芳是不是薄一波的死党时，李政委说：可以根据你们的认识，别的方面公布的材料，提出问题，可以参考，再按中央十一月十四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的很清楚，很详细，军内问题最好不要管。

李再含政委在谈到云南文化大革命下一步如何办时说：两大派要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主动积极创造这个条件，听毛主席，听党中央的，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群众组织的问题自己解决。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谁是走资派，谁是犯错误的，谁是好的，那些该解放，那些该三结合，这个两大派可商量、讨论，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嘛，不要先定调子。有错误先揭发、批判，调查研究，最后再作结论。两大派本身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斗私、批修，

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来解决。有坏头头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本来我们和谢副总理去了以后，创造了一点好的气氛，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是不是有人捣乱破坏。捣乱破坏起不了决定作用。只要两大派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也捣乱不了，破坏不了，关键在于两大派的群众。

（来源：《政法战报》 1967. 12. 29）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

昆明军区党委速转军区机关和军区各级党委：

近来昆明地区有些机关和部队极不稳定，特别是三大机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和“三支”“两军”工作的进行，地方两大派武斗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中央首长对此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

稳定部队是最高利益，也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迫切的需要，因此，军区所属机关和部队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大局为重，应坚决执行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一月十四日通知。当前驻昆部分机关和部队，以各种借口开展的“四大”，是违背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六条通知规定的，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坚决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视察三个地区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八·九讲话，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要陷入地方两大派的斗争，已经陷入要猛省过来，迅速拔出来。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

昆明军区党委速转两大派群众组织：

当前昆明地区武斗严重，中央首长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你们：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为此必须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火、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四大，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二日通令，拆除各群众组织在交通要道所设的一切障碍和哨卡、恢复交通秩序、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抢枪，已抢的枪支弹药和一切军用物资应迅速归还，不准抓人，已被抓的人应迅速释放，进驻国际旅行社的群众组织应迅速撤出，对广播电台、发电厂、邮电系统、国家仓库等单位，军队和各群众组织都要严加保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破坏和侵犯。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1967年12月27日23时43分至28日凌晨2时

地点：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

当总理、康老、谢副总理进入会议室时，全体同志起立，鼓掌欢迎。总理严肃地坐下后，翻阅名单。

总理：刘懋功同志来了没有？（刘起立：来了）黎锡福同志来了没有？（黎起立：来了）坐下。那个是李明？（李起立）张子明、胡荣贵来了没有？（陈康：明天来）今天都到了？（众答：都来了）都是军队的同志吗？（有人说：郭青不是。）

总理问郭青：你是炮兵团的？（郭：我不是炮兵团的，那一派也没参加，是炮兵团的观点）嘿！观点就是派性，我那天就说了，你是陈康的夫人，有派性就要影响陈康同志，我们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全党、全国、全军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云南两大派都是中央确定了的，都是造反派，但都犯有缺点错误，要帮助。今年一月来了一次，那时还没有分，以后分了整整一年了，解放军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负担很重，伟大统帅毛主席信任，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听最

高统帅的话，像李文忠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每个解放军的指战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都不能离开这个标准，那天(指 21 日)说了，会议情况不准对外传，但第二天就传遍了，昆明都知道了，第三天电报就来了，你们都有派性，今天请你们来摆一摆，听一听你们的。空军的同志先讲，刘懋功同志后来，谈谈昆明形势怎样？部队稳定不稳定(刘：我也说不清)不要紧，不要怕……军队没有派性？是不是群众的派性影响到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影响到群众？(康老：不要怕，大胆讲。)(刘：云南军区情况我不了解，派性在三大机关我们空指都有，就不利于三支两军，我们要党性，不要派性，解放军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然怎么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支左不力，抽出来，不插手，作专案处理，像秦基伟一样让他休息，但不能和他们接近的都是一派，一定要把李的问题搞进去，把整个部队搞进去，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哪有他一个人有问题，跟他的人都有问题，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谢副总理：注意，不怀好意，自毁长城。)(当刘汇报到五、六月份李成芳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时。))现在不能转过来支持另一派压制一派，你是不是支持炮兵团？(刘：我两派都支持，)(康老：你们两派都支持，支持什么？)(刘：(1)一视同仁。(2)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3)不在两派之间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作小动作。)云南是援越抗美前线，是边疆，现在两派打起来，武斗应不应劝阻？劝阻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压制群众？十一个同志的电话算不算数？陈康你说！(陈：算数)有人说你是被迫签字，算不算签字。(陈：那是群众说的)郭青你是怎么看的？你有没有打电话传出去？(郭：我没有参加会，怎么知道。我是知道这回事，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压制群众。)怎么算压制群众？(郭：很多东西不符合事实，我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要你们去制止武斗，应不应该？(刘，应该)电都停了，广播电台发射不出去，毛主席的声音在全世界受到干扰，是我们自己干扰。这样对不对？我们劝他们不要打，停下来，这算不算压制群众？(刘：当然不算)有人说是压制群众，矛头指向群众。(康老：省军区来电报，说很稳定，李明同志你说稳不稳定？)(李：省军区稳定……)(康老：说整个昆明。国防电台都停了，算不算稳定，你们管云南省、东川市了。谢：东川武斗死了两百多人。康老：人家电报

还说很稳定哩！)这是睁着眼睛欺骗中央！电报是那些人签发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张力雄：是熊副司令员……）你说名字！（谢副总理：就是熊奎一个人发的电报？）你们管的地方，包括东川在内好吗？（谢副总理：还有以礼河。）（李明：东川问题复杂，我们管不了。）你们管什么？（康老：电台停了，可是你们还报告非常稳定！）这是反毛主席路线斗争！这是正确的？陈康、郭青是不是正确的？用这个办法搞路线斗争？！（康老：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被武斗破坏了。（谢：铁路也不通了，康老：我们在越南是帮助谁？谢：外援武器，连机枪都抢走了。）送的，什么抢的。有意送的（康老：李成芳有错误，现在我真怀疑，到底是李成芳的错误大！还是现在的错误大！这是有意给国家丢丑。）（接着总理叫起陈康的秘书问话。）那里武斗搞的那么利害，应不应该劝阻？十一个人的劝阻算不算大毒草？应不应该收回？（李永福：制止武斗我是同意的……。）电话算不算大毒草？（李永福：不是。）应不应该收回？（李：不应该收回。）好，这是你说的，记下来。（又叫起张力雄的秘书问话）十一个人的电话，劝说部队稳定下来，制止武斗对不对？是不是大毒草？要不要收回？停电了，发射台停了，打电话劝阻应不应该？（总理问话时，郭青插话。）（总理非常严肃地）我还不知道，要你来教训我！陈康叫你牵着鼻子走，我不能让你牵着鼻子走。（康老：这是在中央开会，党、政、军队都在一起，谦虚一点，老实一点，这是中央，总理讲了，我讲了，你记下来。）司、政、后闹得乱轰轰的两次叫张子明、胡荣贵来，群众不放。黎锡福同志受伤，李兆昇同志被打，这样谁能出来劝阻？部队不稳定，谁造成的？（邓敏：是李成芳的影响造成的。）有没有另一方面拉一派打一派？！在中央开会，党、政、军队都在一起，要说老实话。（邓敏：省军区也是有倾向性。）倾向性有多大？另一方面的司令员挨打、受罚！陈康同志，这是一点不乱？（接着询问了军区机关最近情况，鲁的秘书秦××汇报了一些情况。）

总理，三大机关的作法是不是成了四大？（秦××：比四大还厉害！……连地方小报都到军区大院去卖了。）那不成了市场。与内蒙二月差不多了。中央十一月十四日通知，规定军区不搞四大，军以下就更不用说了。劝司、政、后按十一月十四日通知办事，不要搞四大，稳定部队这对不对？有人说不对；（秦××：完全对）有谁不同意，可以起来吗？是解放军的发言，不是解放军的不要发言。

云南的两个组织都是跨行业的组织，成份不能很纯，很多人跑出来，很难巩固。我们一直想搞按系统、按行业、归口大联合。写文章、发通知，想推动一下。云南通过推动，谢副总理去就是想推动一下。（谢副总理：好了十多天）（大家说好了个把月）有人说李成芳一直压炮兵团，假定一切责任都是李成芳，是他错了。李成芳是什么时候离开昆明的？他只有一个多月，经过批准就离开昆明的。如果你们好好作工作，就应劝炮兵团，他们得势了，很好劝了，这本来应好好作工作，劝两派归口大联合，但有人说按李成芳的步子走的，首先要劝军区不要闹派性。刘懋功说有派性，不要怕，不要怕攻击，人家早来电报攻击你了。（谢副总理：有人说你是大阴谋家，我看不象）两大派对立这样严重，现在这样对立，应把扣子解开，军队不应卷入派性斗争。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斗私批修才能联合，现在只有军队才能出来作工作。地方还有谁能站出来工作？（陈：赵健民）（康老：站得出来站不出来？）（陈：中央表了态的，支持他站出来）康老：什么中央表态？（陈：八·八批示）康老：站出来了没有？（陈：现在是一派支持，一派打倒）这样大军区就不能开展四大。军区领导机关闹派性怎么行？打了电话叫军区不要搞四大，这是好意。有人说是大毒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罗元发：还批判了三天）要派代表来北京来请愿，让他们来，我们不怕。只要他们担保，能劝阻两派停止武斗，他们可以来讲理。陈康同志，你我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做到？（陈：很难说）张力雄同志你看怎么样？（张：我也没有信心，我们尽量作工作）李明你看怎么样？（李：我们打电话回去，说他们的电报完全是错误的）他们能不能叫两派停止武斗？（李：我看不可能）郭青说我们把矛头指向了群众。好，我们把司、政、后的代表人物都请来。不要来二把手、三把手，头头躲在后面，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群众的派性影响部队，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群众，他们自己说是造反派，好，请他们来北京。黎锡同志，你看怎么样？（黎：我认为要解决两大派问题，首先要解决军队问题）刘懋功同志你看怎么样？（刘：我看困难）你们在坐的有没有参加造反派的？（梁：有，站起来我嘛！在中央嘛。）今天请你们来，为什么都不说话？（接着总理问了参加会议的两级军区工作人员对军区目前形势四大的看法，大家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

总理：决定的关键是你们十几个领导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难道广大群众愿意武斗吗？郭青同志，你是机关干部，应该做好工作。中央有规定，

军队不准与地方串联。中央劝他们不要与地方串联，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康老：要谦虚一点。你大概是教训人惯了，教训起我们来了？有意见可以提嘛，要谦虚嘛。）（总理又问了十三、十四军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当十三军的同志谈到有一股反十三军的风时，）陈康同志，你不也是十三军的吗？怪了，也要反……大家听听‘把矛头指向野战军，把野战军搞成这个样子。大军区、省军区你们心安吗？（当十四军的同志谈到由于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也刮起了一股反十四军风时，）薄一波的影响有多大？应该科学分析一下，十三、十四军过去都是一个兵团吗？司令员是谁？（大家说是陈庚）陈庚是薄一波的人吗？（谢副总理：他一直是反薄一波的。）政委是谁？（大家说就是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是薄一波的人吗？我们过去都是独立的兵团，有光荣的历史，（罗元发：是建立了巨大战功的。）转战南北，是独立作战的队伍，不研究部队的历史，陈谢兵团谁不晓得？！陈庚是薄一波的吗？决死队的干部都是薄一波的？！多危险！对决死队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是青年干部，陈康同志，你是决死队的？（陈：不是。）你应不应作工作？听听人家说说话，想一想，客观一点，不能说是决死队的都要肃清影响，是决死队的人都要肃清影响，那还了得，那不跟在延安时批判张国焘一样，扩大化。那是罗瑞卿搞的，后来主席亲自抓了，亲自到抗大道谦，三十多年来主席一直说这个问题。不能因为跟过张国焘的都要反。决死队出来的人都是薄一波的人，那还了得，那就会被“五·一六”利用。（康老：不能扩大化的，肃清薄一波的流毒要说一说，北京到是要好好肃清一下，他们要肃清叫他们到北京来。）

康老：说两点，第一点提这样口号，形式上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把薄一波扩大化，扩大影响。薄一波哪有那么大影响？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们反薄一波的做法，起码可以说是形左实右。名义上是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扩大薄一波的影响。这是对我们解放军的诬蔑。薄一波哪有那么神通广大？！另一点，这种提法起瓦解我们解放军的作用，动摇、瓦解我们解放军，是自毁长城，这恰恰是美帝、苏修、蒋匪帮、党内走资派所需要的。怎能用这样的口号反十三、十四军！要作分析，要教育群众，揭露这种别有用心的人的手段，挑拨、污蔑的手段：（总理：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毛主席信任十三、十四军，叫他们守边疆，有人说他们是薄一波的队伍，

这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假如薄一波的影响这么大，毛主席信任他们守边疆？事情要分析，要有阶级分析，革命立场，毛主席思想。

总理：就是决死队出来的也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个有问题，个别处理。不能变成社会口号，搞到社会上去。不能借着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来自毁长城。江青同志“九·五”讲话，你们听了没有？第二条就讲要支持解放军，不要自毁长城嘛！（谢副总理：你们哪里搞得“热火朝天”，大多数人是好的，个别人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要提高警惕，提高警惕！）领导不能跟着犯错误。提李成芳死党就是扩大化，我提的是打倒党内一小撮，不能在决死队做过工作的都算死党，都算流毒，都去肃清，那是错误的，军队要有威信，现在急需稳定军队的威信。（谢副总理：首先是野战军。）对野战军不信任了，这样子就要动摇军队，互相猜疑。地方造反派的热情是可佳的，但插手军队是错误的，林副主席讲过：一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二是拥护军队；三是支持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讲：解放军是支柱，所以军队无论如何要团结一致。电话的第一条完全是对的。第二条没有提领导的派性是个缺点，目的是稳定部队。但有人说是大毒草。你们三大机关有没有带头支持炮派的？部队的头头知道不知道？三大机关群众中有没有负责人？有多少？有没有十多个？文体院校有没有支持炮派的？我们请这些人来，要求第一把手。你们商量一下，他们要来，就叫他们来。到北京来辩论，三大机关有没有组织？叫什么名字？（有人说：有组织，叫无产阶级革命派。）省军区有没有？（李明：我们那里没有组织。）三大机关搞四大的来，来的必须是第一把手，不能以二把手、三把手来应付我们，他们在幕后，这是对中央的态度，你们准备怎么回去？你们有没有把握？今天二十七号了，元旦前不回去是不允许的。原来说是两三天，我们已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作了报告。党、政、军都在一起。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都在一起开会研究，毛主席、林副主席有指示，我们不能离开他们的指示。你们开了几天的会议，打了个电话回去，就有人说是大毒草。不要怕来闹。你们是不是准备收回？（罗：有人提过意见。）张力雄同志怎么样？（张：我提过意见，一是收回重发，二是修改。）是不是多数人赞成你的意见？要稳定部队。（鲁：今天又打死 109 团一个人，打伤三人。）是啊！这样局面延续多久了？云南是边疆，他们是气势汹汹，要来北京，就叫他们来，你们负责人开个会，商量一下，就说中央同意他们到北京来辩论。但不能应付，

不同意电话精神的，真正的负责人，请他们来辩论。现在我们第一步先解决军队的问题。（谢副总理：关键是军队，军队稳定了，武斗就可以马上制止。）什么都是黑会，大毒草，说是大毒草就来辩论嘛！叫收回？不能！接受辩论。电话有缺点，领导先作自我批评，没有把李成芳的问题交待一下，来了再补上嘛，（谢副总理：原来陈康同志提过，想叫地方两派也来，我想那不行，军队的问题解决不了，地方更不行。）郭青，今天叫你到场，下次不参加。你是陈康的夫人，今天提醒你，要做一点有利于军队的事情。（谢：今天叫你来，还有另一件事，会议精神不能往外传。告诉你们秘书同志，不能走漏一点消息，不要搞小动作，否则是违犯纪律的。）要执行，首先是你陈康同志执行，要执行，首先对你妻子执行起。我是非常严格地说这句话的。你要注意八条命令，要自爱，怎样有利于党的事业，不能有派别观点。你们十三位同志以两天时间搞个东西就回去。陈康、张力雄同志，你们先给家里打个电话，看能不能起作用。把武斗停下来，十三、十四军也要打电话回去，两军不要泄气。我就不相信真正赤胆忠心的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会不听毛主席的话，会不好好劝两派不要打架。江西的经验，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深入现场，解决问题。深入现场总会劝住的。工作作不好，是由于派性太强。康生同志前次讲，派性就象毒蛇，有派性就要垮台。（康老：凡不符他的东西都说是大毒草。还说站在毛主席立场上，这是假话。）我们要学习李文忠同志，听毛主席的话，几十岁的人年纪大了就忘了？！（谢副总理：十三、十四军要挺起胸来，康生：十三、十四军要挺起胸来，稳定下来。谢：中央信任你们。）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你们，中央信任你们，这几句话要传到部队。（当有人提军区文体单位赞同炮团观点的在京十四人二十六日晚上到民族饭店围攻鲁副司令员一整夜时，）陈康同志，你去作工作没有？（陈：我打了电话。）你自己去了没有？（陈：没有去。）要是我，我亲自去作工作，别人受围攻，你舒服吗？你应该亲自去。江西革命小组的程世清、白××同志，就是遇事亲临现场。一星期在家学习一次毛主席著作，开一次碰头会，其余时间都到现场解决问题。（谢：你们不但不亲临现场，遇事都向后跑，把责任推给别人。康老：陈康同志有个问题，你去考虑，你依靠谁？如果不紧紧依靠和团结十三、十四军，你们怎么工作，依靠少数人，依靠你们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和谁站在一起？和炮兵团吧？派性发作，你怎么工作？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一致，是党性。象

他们那样观点一致，是派性，受派性影响，还有坏人，走资派捣鬼，解放军领导机关不能受影响，你们二人回去，要依靠两军，不依靠怎么行？）

康老：有人想把十三、十四军说成是李成芳的死党，保李势力，要坚决反对。他们是毛主席的军队（总理：罗瑞卿还动摇不了军队，李成芳还能吗？团结信任部队很重要。）

康老：不管那一派，没有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么进行？部队坚持四不，有的挨了打，还坚持做工作。（总理：真正的革命同志，说到这里总是要感动的。打伤了，流了血还读语录。更不要说李文忠同志。李文忠同志不行了，他还把门板给小将……如果欧阳海、蔡永祥是一次，他是几次，我们听了很受感动，要像他学习，难道你们不要学？现在说两条，一条，给两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一条打电话回去，看能不能劝阻，把武斗停下来，陈康，张力雄负责说服炮派。谢：两派都在打，炮兵团犯错误是取攻势的。总理：告诉他们现在他们走到犯大错误的边沿了。）康老：性质是会起变化的，是到变性质的边沿了。（总理：新疆搞到那样，说了还停了。我就不相信云南不能说服。十三、十四军也要做工作。另外不同意电话精神的，请他们来，二十多人不要超过三十人。要辩论到这里辩论。包括副参谋长在内。）

康老：主席一说了，解决每省的问题，首先解决部队的问题，怎么制止武斗关键在你们。你们有派性，武斗就不会停，就是暂时停了，以后还会有反复。应该猛省，上次我就说过了，派性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是反无产阶级的。有了派性真理就看不见，就可以把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看成是大毒草。有了派性就没有敌情观念，你们都是军队的同志嘛！应睁眼看一看！面前有美帝、有反动的奈温政府，苏修用武器帮助他反对我们。还有泰国反动政府、老挝富马反动政府、南越傀儡都和美帝、苏修、蒋匪帮勾结在一起。云南还有国民党特务组织在那里。他们有破坏云南的计划，你们也知道。看看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反对国民党特务呢？还是使他们高兴？有了派性统统忘了，没有阶级观点，把伙伴当敌人。有了派性就没有敌情观念，就没有革命立场。云南不仅国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支援缅甸、老挝、泰国的人民战争。革命任务不仅国内，而且国际也很艰巨。云南现在这样子，是对兄弟党有帮助还是有损害？有了派性，这些观点都没有了，口头了革命，实际上忘掉了，有了派

性，就不会有坚定的无产阶级观点，就会把敌我界限、阶级界限模糊了。凡赞成你那一派的就好。稍微不赞成的就说是大毒草，镇压他们。我们支左支什么？支左不支派，支左是支毛泽东思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支持。那一派都有左中右，都有坏人混进去的。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无所谓支左。有了派性，就不会真正有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甚至生产、外交关系，广播电台都不在话下，那叫革命吗？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看看他们现在作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糟蹋无产阶级专政！有了派性就没有党性。全国是大好形势，已发展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准备整顿党的组织，召开九大的时候了。要教育群众，去掉派性。大家都是老党员，知道这个情况，就不会想一想！有派性就不会真正接受毛主席思想，这种派性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革命的，是反动的。我上次讲过：派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我们要向这最凶恶的敌人作斗争。斗私批修要向派性作斗争，私字就是派性。（谢：对派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自封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老实告诉你们，应该猛省。有了派性，就像毒蛇缠着，咬着一样，派性是阶级斗争在部队中的反映。领导干部、秘书办公室、参谋这一点不清楚，怎么能支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云南的问题，首先是领导机关、大军区、省军区，到了你们觉悟的时候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这样下去，要犯更大的错误。中央不希望有一个同志垮台，总是再三教育，犯了错误，首先要自己教育自己。你们认为两派武斗不好解决。我看也容易解决，首先领导和部队要统一起来，凡是难解决的问题，都是部队不统一，容易解决的都是部队统一。过去江西打得很厉害，昨天要提出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叫他们稍晚一点，我们腾不出手来，湖南、湖北过去打得也很利害，现在也提出要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解决，发展快，道路有一条，部队统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云南问题长期不能解决，首先是部队不统一，存在着派性。关键在部队，不是司、政、后下面的同志，不是战士，关键是领导，这点你们应该慎重考虑。

谢副总理：总理、康老，事情特别多，今天来向大家讲了，给我们很多教育。康老看了很多材料，原来说是三天，林副主席知道也报告过主席，搞了这么多天，打回去个电话，这是大毒草（康老：那里说是毒草，你们就动摇）。总理、康老

急了，今天不是我叫他们来的，是总理、康老对云南的关心。他们发急，我们都发急，你们开会的，有的都不急。总理、康老抽时间讲了很重要的话，语重心长的话，很严肃的话，批评非常严格的话。不是对那个人过不去，是关心云南这个重要的边疆，关心二千多万人民，关心军队，关心援越抗美。不能再乱，不能再让破坏。担子要在坐的人挑，（康老：你们看过材料美帝很困难，越失败越要狗急跳墙，越要垂死挣扎）要提高警惕。这不仅对云南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革命有重要意义。我那天就讲了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康老：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要拿出坚决措施。两位首长的讲话要好好讨论。云南为什么使人耽心呢？你们讨论两天，打了电话回去，有人说是大毒草，（康老：不是说李成芳没有错误。）他停了职嘛！（康老：要相信中央解决，不能把李成芳的问题当作派性斗争的题目借题发挥。）严肃的话要认真思考，猛省。不然你们要犯更大错误。严肃批判是爱护，不要从另一方面理解。继续滑下去危险！危险！不仅毁坏自己，而且使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损失。但是也没有多大事，一个云南闹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们要好好讨论一下，要作自我批评，制订坚决有力的措施，即使有点错误也不能动摇，不能互相拆台，不能取消军队的发言权。怎么提高军队的发言权，是天大的事。不能因为派性作怪，把军队搞垮。这是无政府主义。（康老：要犯罪）今天总理、康老讲话很重要，很严肃，很关心，不要不觉悟，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要制订措施，不解决军队的威信不行。要采取迅速的坚决的措施。学习要早一点；把那些思想不通的都弄来学习。两级军区要打一个电话回去，两军也要打一个统一的电话回去把刚才讲的传回去。但不要拿这个东西去压别人。（康老：文化大革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他说几句好的他就要错误了。）像五月三十日的四条，李成芳拿到部队，搞两个月。是错误的。不准拿这些东西去压别人。稳定部队这几句话是要说的，但不要压对方。

康老：刚才陈康说：让赵健民站出来，那是军区报告中提出的，不是中央提的。主席看了报告，批了，那是批的报告，不单是为赵健民，赵健民以后翘尾巴，支持一派，打一派，完全是错误的。我接触赵健民，对这个人印象不好，他思想是有问题的。有些事情现在还不告诉你们。

女同志有个教训，影响丈夫，不只是你们这里，不只是你们这个。不要满足，心是好的。实际帮倒忙。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是动机效果统一论者，只讲动机不讲效果，是唯心主义；只讲效果是机械唯物主义，今天交代，千万不要乱讲。我再给你们说一件事，内蒙有些干部到中央来开会，说是重庆谈判。我就问，就是重庆谈判，我们是国民党？你们是国民党？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煽动部队来了一千八百多人，给中央施加压力（谢副总理：现在昆明街上大打，就是因为知道这里在谈判。）你们千万要注意，阶级斗争很复杂。（谢副总理：秘书守纪律是我们的传统。）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总理、康老、谢副总理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分接见了昆明部队在京开会的全体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中央首长在讲话中严肃地指出：部队和地方上两大派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对中央的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特别是必须把武斗立即停下来，再不停止，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走向反面。

昆明部队在京开会的全体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五时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在京开会的同志，听到两大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教导，根据周总理指示，要求谈判。我们很高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 一、欢迎两大派立即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 二、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

三、我们指定王砚泉、崔文斌、熊奎、雷起云、朱刚五同志组成谈判小组，主持谈判，以王砚泉为组长，崔文斌、熊奎为副组长。

希望你们在谈判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各派应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纲为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预祝你们谈判成功。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昆明云南两级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梁中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部队的指示

梁中玉同志（十四军军长）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部队十三军、十四军的指示。下面为电话记录：

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三分至二十八日凌晨三十分，接见昆明部队在京开会的全体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总的精神是：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

在讲到稳定部队，提到十三、十四军时，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指示，要把这些话立即打电话告诉给两军。

中央首长的讲话，主要内容是：关于肃清薄一波影响问题时，

康老说：要分析一下。有的人要在十三、十四军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他们形式上是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扩大薄一波的影响，起码可以说是形左实右，薄一波哪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们不是真反薄一波，这是对转战南北有功部队的诬蔑，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这种口号是动摇瓦解人民解放军，是自毁长城，恰恰是美帝、苏修、蒋匪帮、走资派所希望的，怎么能用这个口号反对十三军、十四军呢？要教育群众，揭露这个，这是别有用心，挑拨诬蔑的手段。

总理说：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是薄一波的部队呢？你们想一想，这个合乎不合乎毛主席思想，要阶级分析嘛！要合乎毛泽东思想。周总理说：这是不是社会口号呢？这是很不利的，是自毁长城。

谢副总理说：个别人不怀好意，别有用心，要提高警惕，十三、十四军要挺起胸来。

康老说：十三、十四军要挺起胸来，不要怕，要稳定下来，毛主席信任，林副主席信任，中央信任十三、十四军，有人提出把十三、十四军说成李成芳的死党，是保李势力，要坚决反对。十三、十四军是毛主席的部队，要把这些话打电话告诉两军，但不能用这些话去压别人，压对方。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对云南郭顺兴事件的批示

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电话转达总理批示：平浪的问题我们报告了总理，总理同意陈康同志的意见，立即追查限期交出凶手。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附：

陈康意见（李云福元月六日上午三十分电话转达）：

一一平浪打死副总军事代表问题，陈副司令员的处理意见：

一、查实情况；二、如情况属实，责令一平浪炮团交出杀人凶手，如果不交，即强行逮捕凶手。妥否，请总理指示。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我们在京开会的同志，欢迎和支持云南两大派进行谈判。根据报来的情况，我们提出两个问题请你们很好考虑：

一、谈判的双方都是一个阶级兄弟，是在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如果有人一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准备武斗，即所谓两手准备，是完全错误的，是拿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

二、所有在武斗中被打死打伤的人，绝大多数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是真正的走资派，也不是地、富、反、坏、右，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砚泉、起云、建功同志和军区三大机关党委：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正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社论，传达了我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各项光荣的战斗任务。我区部队全体指战员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寸步不离，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最快的行动，保证使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在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工作中为人民立新功。为了完成这个最大的战略任务，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军区三大机关和省军管会要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为此特提出如下要求：

一、目前住在军区大院的军队开展四大单位的所有人员，应动员他们一律撤出、返回本单位，以“斗私批修”为纲，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对军区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送材料。

二、军区三大机关和省军管会应坚决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革命的正常秩序，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保证完成任务。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按照中央 11·14 通知执行：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整风的方法，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目前各级党委应按照中央文革小组一月二日

关于学习“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通知，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元旦社论中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对当前的工作做出规划和安排，并认真组织力量，大抓、狠抓落实。

三、军区三大机关和省军管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出来做工作，下边的同志要给他们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正常地进行工作，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服从领导听指挥，不能有无政府主义，对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意见，应按照中央十一月十四日的通知办。

四、军区机要、通信等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机要保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职责，遵守制度，遵守纪律，保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

五、军区警卫部队应严格执行职责，提高阶级警惕性，不准外部人员随便出入军区大院和办公大楼。对警卫部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要严格执行职责，又要正确对待群众，真正成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好战士。

上述各点，望各级党委和支部，逐级的、分别地向群众做思想工作，既要敢于坚持原则，又要耐心进行说服教育，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力求尽快的把军区机关和省军管会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以保证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所交给我们的一切工作任务。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一、东川、一平浪、文山、大理、曲靖及其他地方的武斗必须制止。任何一方的进攻者和支持进攻的人（如果在武斗中伤亡大，损失严重），都将受到历史惩罚，总有一天要揭露出来的。

二、云南省和昆明市不准有攻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大字报。

三、禄丰杀害团副政委郭顺兴的凶手和指挥杀人的头头必须限期交出。

四、外省的人（不论四川、贵州、湖北等），一律不准参预云南省两大派的问题，如有，应一律回原地去，参加本地区文化革命。云南各专、州、县的人员不要到昆明去串联，昆明地区的人员也不要下去串联。已经到外地去串联的人员要立即返回。一律就地闹革命。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一九六八年元月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昆明两大派谈判，如果能够迅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最新指示，达成好的停止武斗的协议，我们愿意派飞机将双方谈判的代表接来北京签字。

来京人员名额如下：

一、参加谈判的十四人全部来。

二、文山、曲靖、东川、保山、昭通、红河、楚雄、一平浪、以礼河等地各来二人（一、二把手），下关两派各来三人（一、二、三把手），玉溪两派各来一人（一把手）。共四十四人。

三、两派的总头（核心常委一、二、三、四把手必须来）各来十人共二十人。

总共来七十八人。

除谈判代表外，请朱刚同志带队。

（一月十四日五时三十分刘鸿第传达）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一、中央首长很关心，谢副总理指示：要正式通知两派，要他们给专、县做工作，把武斗停下来，两派在下面的人，要把他们叫回来。

二、听到两派达成停火协议，昆明已于一月十四日十八时停火，并已传达到专县，我们认为很好。

三、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已达成的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这是对你们的一次严峻考验。

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同志的电话

（封秘书电话传达）

中央首长最近几天看了云南的电报，对我们有批评和重要指示，现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我们研究，打回如下电话：

从近日情况来看，武斗并未停止，某些地区继续发生严重武斗，如一平浪、楚雄、下关，曲靖，昆明东郊金马村还发生了严重破坏 202 次客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现提出如下几点：

一、必须坚决按照协议贯彻落实执行。

二、不论哪一派，哪个组织，如果继续搞武斗，破坏协议就要走向反面。

三、立即停止武斗，谁要继续挑起武斗，造成严重损失，必须交出指挥武斗的头头。

四、两派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个别坏人和走资派从中挑动。

五、必须深入宣传协议，大量印发，认真学习《文汇报》“论派性的反动性”社论。

六、由昆明两大派和军管会立即派出三个监督小组，分别赴滇东北（曲靖、东川、昭通）、滇西（下关、楚雄、一平浪）、滇南（文山、广南、邱北、个旧、开远）协助当地两派和驻军监督协议的贯彻执行。

在大理，楚雄或别的地方，那些正在带头向另一派用武装进攻的一方的头头（讲了又不听者），不准来北京开会。那些处于守势、不用武力进攻别人的一派，即使被攻者打散，也要派同等数量的代表来北京签字。

昆明到贵阳 202 次列车要立即连夜排除障碍，以便迅速通车，并将两次破坏列车的头头，要本组织立即交出来。

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这个电话记录要发到所有专州。特别是武斗的点都要发到，指定来北京谈判地方一定要发到，部队要相应的发到。点名的地方发到县。要发给两大派，连夜上街宣传。）军队（不论是两级军区、野战军、铁道兵、军分区、人武部等，以及所有“三支两军”人员）和地方干部，从现在起，如果不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促进两派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是继续片面地支持一方搞武斗，明的或者暗的指挥一方进攻一方，造成严重损失者，将来查出来，一定要受到严厉处分。立即传达到所有人员，坚决贯彻执行。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一月十八日凌晨零时五十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谢富治接见了昆明部队在京负责干部和云南部份革命群众代表

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地点：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

（群众代表到会时，谢副总理正在讲话）

谢副总理：形势发展很好，但有些紧张，谈判费这么大劲，为什么武斗这么厉害？二、三号起一直从昆明打到下关，是破坏行为，是犯罪！把军代表、一个团的副政委杀了，到现在不交凶手，又破坏了一平浪煤矿，又砸了盐矿，到下关杀了一百多人，这哪是文化大革命？

康老：这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谢副总理：这样的反有人支持。文山就是在边疆，我们同美国作战，援越抗美。武斗一个组织最厉害的就是《援越抗美》，这个组织不要脸，他这是破坏！什么《援越抗美》？不管什么派也不行！上次总理、康老讲过要悬崖勒马，如果这样下去，比李成芳的错误更大。王非，何德庆你们机关就是不听话，云南就是不执行十一月十四号决议，王非你派人到部队去串连。

康老：你们到底执行的是谁的计划？打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革命活动。

谢副总理：今天叫赵健民来参加会。过去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揭问题，贴几张大字报也好嘛！但你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你出来干了许多坏事，你片面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我们完全是为了革命利益，我们只能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谁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走，我们就支持。否则，就不支持。我们就是一派，不管你是炮派也好。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错误，中央调离他们。如果你们乱搞，不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搞个人的，那是不行的。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幕后有人指挥。

康老：赵健民，你是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

赵健民：十月二日。

康老：你脑子里还有中央吗？谁叫你来的？是中央叫你来的吗？

赵健民：我是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

康老：你可以请示一下嘛！不请示你自己来，还是化名的。（问陈康）听说有几个都是化名来的，有没有这个事？（陈康答：有）谁叫你们来反映情况的？我听说赵健民来了很吃惊。你是省委书记，不是个小孩子！刚才谢副总理讲，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诡辩）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老：你的话不要说死，你不要骗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你说你没有片面支持炮派干坏事，你给我写个条子。（赵健民写条子）你说你没有支持炮派，你考虑考虑。你是省委书记，在京西宾馆还打电话指挥炮派，还说没有支持。对你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大考验。考虑一下再写吧！（赵健民把条子递给康老）写好了？怎么写的呢？（康老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甬同我们搞外交。如果你要是支持了怎么办？

赵健民：我支持了受党纪国法处分。

康老：要澄清一个问题。上次有人讲支持赵健民是毛主席批准的。完全没有这回事。那是昆明军区有个报告，对解决云南问题提了些意见，中央批那个报告。有人到处招摇撞骗。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那一年被捕的？

赵健民：一九三六年。

康老：几月被捕的？

赵健民：九月。

康老：那时你做什么工作？

赵健民：当组织部长。

康老：那时你和黎玉接上了头没有？

赵健民：接上了。

康老：你被捕后押在什么地方？

赵健民：押在××（未听清）。

康老：供出你的那个叛徒叫什么名字？

赵健民：叫×××（未听清）。

康老：他怎么认识你的？

赵健民：我去视察工作的时候，他认识我的。

康老：被捕后审问过几次？

赵健民：韩复榘审问一次，还有××（未听清）审问了两次，还有……。

康老：是叛徒供出了你，怎么一年多就出来了？

赵健民：那时，日本人来了，很混乱，国民党逃跑就放了我。

康老：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健民：我没有自首。

康老：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还欺骗大家。你是个叛徒！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健民：我保留意见。

康老：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变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特务云南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指美蒋）的计划。你上次来北京，几次写信找我谈话，我觉得一个省委书记来了，不管怎么样忙也得谈谈。你那一次谈话，我向中央反映了，你那次谈话，是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的话。

谢副总理：刘少奇也这样讲的。

康老：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罗，陆、杨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你赵健民就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那些混账王八蛋再选进我们党内来。你赵健民就是为这个目的。

赵健民：我那次谈话是有记录的，可以公布记录。

康老：很好！你是费了心思的。你那个谈话，半天一个字半天一个字说出来的。你要公布记录，我们要把你的东西全揭出来，不仅在云南，而且要在全党公布。大家听到了没有？这是他要求的。答应你这个要求。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讲过没有？

赵健民：讲过。

康老：那就对了，我没有造你的谣。你对刘少奇讲过没有？

赵健民：讲过。

康老：哪一年？

赵健民：一九六三年。

康老：什么地方？

赵健民：在昆明，刘少奇从越南回来时讲的。

康老：嗨！六三年就讲啦！你还同别人讲过没有？

赵健民：没有。

康老：不见得。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张王牌，如果六七年开这个会，刘少奇会怎么样？彭、罗、陆、杨会怎么样？叛徒、特务一大堆还留在党内！用合法的手续，来隐藏他们叛徒的面目。他们总是要改变面目混进党里，篡夺我们党的领导权。毛主席英明，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光把一堆叛徒、特务揪出来，就有很大的意义。赵健民！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来骗我们，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红太阳照得红彤彤，牛鬼蛇神都照出来了。把那些叛徒、特务照得原形毕露。

谢副总理：谁捣鬼都逃不过，谁不跟毛主席、不跟毛主席司令部，搞自己那一套，不管你怎么巧妙，都要暴露出来。

康老：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我们要严肃处理。

谢副总理：会都不让他们参加嘛！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

康老：在现在的形势下，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那个样子，没有黑手才怪呢！我相信河南、山东支边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那些黑手、特务、叛徒、走资派在那里挑动。你赵健民来北京干什么？你就是为了在北京安安静静地指挥。你就是这个目的来的，在昆明不方便。我问你，你来反映情况，你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了什么报告？提过什么建议？

赵健民：十一月初，我写了一个报告，有情况，有建议。

康老：你反映的什么？

赵健民：我反映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李成芳错误搞乱的。他不揭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他整我的黑材料，他拉一派打一派。

谢副总理：我问你，我们到云南去，叫你做两大派的联合工作，到现在你做了些什么工作？

赵健民：八·二三、炮兵团的我都做了……。

谢副总理：你说假话。

康老：你的建议是什么？

赵健民：我建议李成芳停职反省。

谢副总理：那中央早就决定了，八月份就调离了李成芳。

赵健民：我建议两大派到北京来谈判，把形势缓和一下。

康老：还有什么？

（赵健民没有回答）

康老：怎么样？你的建议里军队这一条就没有提。

谢副总理：“抓军内一小撮”就是你在哪里支持。

康老：我找你谈过两次话。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军队的问题，那么重要，你没有提。你想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垮那是痴心妄想！我相信工人、学生、农民没有人跟着你走的，就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揭开了谁跟你走？

我希望军队的同志，昆明军区也好，云南军区也好，空军的也好，我们把中央的“底”告诉你们，你们有什么意见请讲讲。

（康老念赵健民的条子：“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如果支持了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愿意受党纪国法处分。”）

×××等：这是假的，这是靠不住的。

（×××揭发赵健民调支边工人到昆明搞武斗，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对抗中央等罪行。）

（当揭发赵健民调支边工人到昆明组织《援越抗美》搞武斗时）

谢副总理：抗美援朝是打美国人的，怎么打群众？什么《援越抗美》，把这几个字污辱了！

（当×××揭发赵健民答应给支边工人每月每人四十块钱，不回原籍，就地分配工作时）

谢副总理。这是搞反革命经济主义！

康老：（把赵健民的条子拎起来）你们看，这几个字值多少钱？

赵健民：那是造谣！

（×××念了赵健民发的一个电报，再次证明赵健民支持《援越抗美》的错误行动时）

谢副总理：要偷偷摸摸的办了，是不行的。

赵健民：对支边工人问题，错的是你×××，对的是我。

（当×××又一次证明支边工人是愿意回原籍的，赵健民蒙蔽支边工人到昆明搞武斗时）

赵健民：（疯狂地）造谣！造谣！

康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我遇到两个人最顽固，你一揭他的问题，他就说，造谣！造谣！一个是内蒙的王逸伦，一个是你赵健民。本质问题就是留下来搞武斗。

赵健民：中央可以审查。

康生：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

×××：（问赵健民）你为什么八月二十四日上新华山？

谢副总理：（对赵健民）你就是支持一派打一派。

赵健民：（又想诡辩）……。

谢副总理：你不要多说了。

康老：（对赵）你不是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健民：我要求。

康老：你写一写。

谢副总理：（拿到赵健民的条子后）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两个解放军把赵健民押离会场）

谢副总理：军队同志不要上坏人的当，你们要好好学习，要提高警惕。就是有坏人、有黑手要破坏解放军的团结，破坏造反派的团结。不要上他们的当。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不要上当。

还有赵健民的秘书也要监护起来审查。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形势一片大好，就是云南不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克服派性，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停止武斗，停止机关“四大”。简直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打个电话回去，就说是大毒草。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

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也有人总想把部队搞乱，什么也不听指挥！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不管哪个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有错误改了就行，不要再顽固坚持，都要注意。你张力雄同志，过去我们支持你，但你风格不高，团结工作作的不够；让你当军管会副主任，陈康也是副主任，但要批评你两个。

康老：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不管是谁有了错误都不要坚持，不要搞到派性里去，一搞到派性里就没有真理了，不是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而是为派性服务。你们的会要好好开，你们有进步，但进步不大。陈康同志是不是比刚来时有进步？

（陈康答：有点。）

赵健民在京西宾馆，还在活动，（军委办事组的同志：在这儿做尽了坏事。）在这儿表演，你们看像不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把我们当阶级敌人看待。王逸伦也是说：造谣！造谣！和赵健民一样，结果一审查是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

谢：刚才总理给我打了电话，你们（指云南军区）要告诉工八团迅速地停止武斗。周总理说了，他们（指工八团）这是完全违背了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如果立即放下武器，我们还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好的，是革命的，不然就用军队包围起来，强迫交枪。

罗元发：我们相信工八团大多数同志是好的。

康：这次我们讲了派性的问题，司、政、后机关的同志刚来，我们今天劝一劝你们，主要的要你们参加这个会议，今天接见你们一些代表。我们之所以没有很快接见你们，是要你们在这里在毛主席身边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提高觉悟。

谢：要改变立场！

康：要把部队稳定下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解放军在各次革命运动中都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她和中国人民一起，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是保卫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支柱。我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军队有的单位在一个时期是犯了错误，改了就

行了。林副主席八·九讲话提出要勇于改正错误，总是希望军队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希望他们好，不希望他们垮台的，在陈再道、钟汉华问题上真正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现在他们都在这里学习，还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还是可以做工作。解放军有个优良品质，不但有丰功伟绩，而且有了错误能很快改正。能够消灭敌人，这是丰功伟绩，有错误很快能改正。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那本书里说：不犯错误的人不是有能干的人，有能干的人在于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能很快改正。我们解放军就是这样。

今天晚上的会很有意义，是毛主席指示支左一周年。一年多来，支左、“三支两军”工作，解放军作出了很大成绩，支持了地方文化大革命，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提高了自己的觉悟锻炼了自己，暴露了缺点，改正了错误，信心更提高了。不管那个机关犯了错误，我们解放军支左是有伟大成绩的。伟大成绩是主流。但是不认识支流还是要犯错误。上次说了，有人要在十三军、十四军肃清薄一波余毒，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十三军、十四军是党的军队，是毛主席的军队，难道是薄一波的军队？所以提出要在十三军十四军肃清薄一波余毒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指挥的嘛！支左有伟大成绩嘛！这是主流。不管那个干部犯错误，是一个共同的，是暂时的，是支流，是能改正的。个别干部犯错误决不能动摇我们这个信心，但要看到，由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或多或少的反映到军队中来了。某个时期，某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虽然是支流，但必须严肃地注意。广州军区总结了一条经验，军队干部沾染上派性，比地方红卫兵还难克服。广州军区支左成绩很大，他们总结了七、八条经验，中央有个批语，你们回去可以看看。为什么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没有总结几条经验？难道我们的派性比别人少一点吗？不！因为自己有派性，看不到自己的派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革命性，大家要好好学，克服自己头脑中的派性。军队同志要猛省啊！此外，希望同志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从阶级斗争规律看，敌人要破坏革命，要破坏我们党最重要的手段是从内部来搞破坏，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来攻破的。同志们，看，刘少奇这个叛徒为什么能在党内隐藏这么多年，还当了党的副主席，做了国家的主席，为什么彭、罗、陆、杨这些叛徒，特务能在党内隐藏这么多年，还篡夺了党和国家、政府的重要

职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主席讲的：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用两面派耍两面手段。什么叫两面派、两面手段？刚才赵健民的表演就是一个例子，他还理直气壮哩！他说我们党内部没有民主，长期不开代表大会。完全是修正主义的理论。你同他谈，他还说他的讲话有记录，可以公布记录，要是不了解他的情况，还叫他给吓住呢。他自传上写着是自首出来的，他今天说不是，还要保留意见，这就叫两面派、两面手段。你们大家知道了吗？罗瑞卿就没有入党。他给主席的请罪书上说，他根本就没有加入共产党，罗瑞卿讲起话来咬牙切齿，好象他非常无产阶级革命化哩，这就是阶级斗争。

不要睡大觉了。但也不要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是陶铸的叛徒的东西，怀疑一切是错的。

谢：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信不移，要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要相信群众，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

康：这是一个很大的常识，老的两面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会不会产生新的两面派？有阶级斗争就会产生新的两面派的。要对解放军，对群众组织天天进行教育，千万不要搞两面派手段。这是敌人、叛徒、特务搞的，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东西。派性还能表现出来，这种东西不容易暴露。赵健民就是个两面派，不要相信他，一月九日他还在京西宾馆打电话指挥炮派哩。

谢：那是搞特务工作。

康：同志们不管有多大错误，千万不要搞阴一套，阳一套，千万不要耍什么两面派敌人总是要耍两面派的。

刘少奇是敌人，玩弄两面手段。今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云南的工作近一个月来有点发展，昆明的武斗基本上停下来了。可是几次都是昆明好一点了，下边就严重起来。这好象是一个规律了。这个问题要注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的。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四日到禄丰，还带有 1400 件武器去支持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管局的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

谢：到现在没有交出凶手。

康：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最近苏修还运武器给缅甸。他们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工八团九日占了一平浪，把煤矿破坏了。15号占了楚雄，14日在某地抢了3500件武器，16、17号攻占了下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值得严重注意。同时在永平已发现了电台。

谢：发现敌人的电台。他们由昆明到达下关，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抢那么多枪？

康：我们要相信，他们（指工八团）多数是好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但是有坏人。因此，我们的确想到，赵健民是利用了这个问题了，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这只黑手就是他。赵健民说云南的问题在李成芳，李成芳有错误，我们知道。云南就是一个李成芳吗？还有赵健民哩！两派中间都有少数的坏人，但一个突出的是炮派，要警惕。我们不是支持一派的。

谢：最近这个炮派的行动特别值得注意。

康：我们有个经验，坏人有时他两派都支持，他要把水搅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南搞得那么混乱，要引起我们注意。云南是边疆，担负着那么多重大任务，支援越南，支援其它兄弟党，任务越来越重，你们知道了，我们要支持越南，支持老挝、缅甸、泰国，还有印度。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革命都很重要。因此要搞得更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大家都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毛主席讲了，为什么为一个小派别服务，不为一个七亿人口服务呢？云南乱得差不多了，问题越暴露得差不多了，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你们大家要赶快团结起来。统一思想，行动一致。军队一致了，地方就好解决了。同志们看看全国，能一点也不动心吗？广州黄司令员来了，向中央报告广东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别的省都来报告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云南还在搞武斗，还坐上汽车打五百里。不过一讲清楚了，我们相信你们会跟上去，赶上去的。

谢：要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军队里有什么八派观点，炮派观点，都是错误的。

康：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同志们都想一想，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十四军的同志去做。经验是首长亲临现场。

谢：政治工作要耐心，要观点明确，指出错误。

康：河南空十三军解决开封化肥厂的问题就解决得好。

谢：要耐心，要注意不要輕易开枪打死人。主席讲，军队要准备几千人伤，几十人牺牲。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总会死些人，还是象林副主席说的：胜利最大最大最大，牺牲最小最小最小。那个团的副政委牺牲了，我们是同情的，但不要在这上头作文章，不要开追悼会那一套。希望两个军加紧政治思想工作。

康：领导要深入，要有一个信心，毛泽东思想一定胜利，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政策和群众见了面就会生效。第二条，要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条，收枪。第四条，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

谢：强迫交枪。

康：最后我相信，是毛主席讲的，哪个地方乱透了，哪个地方的问题就解决的好，云南乱得差不多了。不乱，赵健民是看不清的，以前对赵健民认识不清嘛，对他还抱有希望呢！

谢：康老讲了很重要的话，这对大家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爱护。总理很关心，刚才还打电话，劝同志们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不要继续发展下去，当然天塌不了，但不要造成更大的损失。要用最大的热情对待毛主席，对待党中央，对待中央文革，要热爱，要紧跟。大家要下最大的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党中央的话。每个人都要自我批评，不要有私心，要公，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事，要迅速地、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要再糊涂了。要把昆明出现的好形势坚持下去，要坚决反对派性，要坚决制止武斗。武斗两派都有，但主要是炮派。为什么对赵健民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他片面地支持炮团。这是犯罪。希望支持炮派的同志要觉悟，要猛醒。你是炮派观点，他把你拖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什么八派观点、炮派观点，都是派性作怪。少数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这是犯法行为。我希望张力雄、李明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炮派的武装进攻行为。八派也一样。我看丁荣昌去东川制止武斗不力。他发来电报都是片面性的。电报多是假的。是派性作怪要注意，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会上当。司令部两个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长，你们为什么要搞“四大”？你们就是要陷害军队支左嘛！你们搞得军队什么发言权都没有。

康：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嘛！

谢：要坚决把东川、下关、文山等地的武斗停下来。

康：王非，刚才讲的很重要，这件事是犯法行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谢：希望你们把会开好，学习好。在毛主席身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把军队搞好，哪一派也不能搞派性，都要自我批评，刚才会上讲的，只在内部讨论，不准打电话回去，统统保密。

康：关于赵健民的问题，不要打电话。

罗：不要打电话，据说北京还有昆明的百把人。

谢：一律反对假报告，反对只告别人，不讲自己。什么电报每天一大箩，我说电报就是派报，每天电报多得很，象快报一样。司令部机要局就象个公共汽车，谁都可以使用，谁都可以发电报，就有人批。今后军队问题一律不能上街，不准通到社会。鲁瑞林、田维扬、两军的同志，都要作检查。

康：今天对炮派讲得比较多，对炮派观点的批评比较多。我们有个经验，对一派批评多了，另一派再过两天就要犯错误。八派观点的同志要注意。还有一条经验，要保密，能不能做到？（众答：能！）会上答应容易，就是做了保证但做不到。对司、政、后机关来的同志是一个考验。你们可以不赞成，但赞成了要保证做到

谢：原来说，两派有协议中央支持，武斗基本停下来，两派就到北京来签字，可是武斗就是停下来。八派也好，炮派也好，都是跨行业的，全省连起来的，最容易被敌人利用，这是最头疼、最难办的，所以要采取坚决措施。领事馆、国际旅行社，给越南的影响不好。旅行社是八派干的，还有一个越南领事馆，搞得影响不好，这两个地方都是八派干的。你们要高度警惕，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不要有个人主义，不要有私心，首先要把部队稳定下来，统一认识，克服派性。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不要让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东西再发展下去了。

（接见到此结束）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中央首长对云南目前武斗非常关心，全国都停了，就是云南不停。云南、昆明停了，就是滇南、滇西不停。

现在要立即谈判，立即把武斗制止下来，不论是否达成停火协议，双方都不要主动进攻、主动出击、主动开火。不谈判，继续胡闹，中央将采取坚决措施，不论过去是什么组织，现在不听招呼，要走向反面。

立即谈判停火，主要是靠军队，部队未直接支持的，有影响的组织，要立即行动，立即进行工作，很快把武斗停下来，军队谁要再支持、助长武斗，也要采取坚决措施，不论任何人作任何小动作，都要查出来。现在发现现在处理，将来发现将来处理，一定要认真教育部队，现在先不谈，先把武斗制止下来，先把交通恢复起来再谈。春节前，一定要做出成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五时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

两军、云南省军区、空指、总字一二二部队、各师、民族一、二支队、各分区，军区直属各大单位：

（一）

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沿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事代表郭顺兴同志（当地炮派个别坏人干的），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谍”。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

“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死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

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受走资派和某些坏头头的挑动和指挥，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多次警告，不听沿途驻军的多次耐心劝阻，继续进行武斗，严重地干挠了斗争的大方向，破坏了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生命安全。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恶劣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为。

(二)

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了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特宣布：“滇西挺进纵队”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立即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释放被抓人员，交出坏头头，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全区部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派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必须明确干了这些坏事是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和指挥的，要把走资派、少数坏头头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把参加武斗和不参加武斗的区别开来，把“挺进纵队”和整个炮派区别开。决不能利用这件事作文章，压制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要把这笔账记在走资派和少数坏头头身上。

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和“三支、两军”人员，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教育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立即进行谈判，停止武斗，恢复交通，立即停止挑动民兵、农民进城武斗，立即停止破坏国家财产和危害人民生命的行为，立即停止违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系列指示的行为。全体同志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各单位应把这一精神，向全体干、战、职工、家属和当地群众组织负责人，立即进行传达教育，并将教育情况即时上报。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

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传达了中央首长指示的基本精神：

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听了中央首长的几次报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最近的极为重要指示。我们听了后，感到特别亲切，受教育很深，震动很大，字字句句打中要害，是一次最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现在把中央首长指示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基本精神，先告诉你们，望立即认真组织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一、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认真贯彻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目前，军管、支左工作中的中心问题，是支左不支派，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能支持，并要坚决抵制，耐心加以教育。派性是毒蛇，派性是恶毒的敌人。有了派性，就没有敌情观念，阶级观念、国家观念。有了派性，就看不见真理，就不可能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样就会犯错误。军队不要陷入两派里头去。如果有些领导干部，支左人员已经陷入派性斗争中，必须猛省，立即从派性泥坑中拔出来，再闹派性就是有意对抗最高指示。地方上的派性反映到军队中，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地方。军队的派性是阶级斗争在军队内部的反映。军队的派性不克服，就做不好“三支两军”工作。因此，我们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把派性彻底批臭，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决不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的错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听最高统帅的话，要真正象李文忠同志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每个干部战士都不能离开这个标准。

二、军队必须保持稳定。当前最重要的是军队要稳定，稳定是部队的最高利益。军队内部不能有无政府主义。现在发现有的部队当面听背后不听，原因是军

队内部有派性。军队任务很重，因地方上党、政机关瘫痪了，要靠军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传播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特别是云南的部队更加重要，面对帝、修、反，战备任务很重，又担负着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要反复教育全体同志，树立敌情观念，阶级观念，国家观念，以国家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保持部队稳定。昆明部队战备任务很重，要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是个很重要的任务。

军队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坚决地按照十一月十四日通知的六条办。解放军不去地方上串联，人家来串联我们也要说明不准串联，整个解放军都是如此。军队文化大革命内部搞，开展“四大”的单位也是内部搞。

关于肃清薄一波的影响问题，应该科学地分析一下，你们兵团过去有光荣的历史，陈、谢兵团谁不晓得，这个问题要注意两点：一、提肃清薄一波流毒的口号，形式上是反薄一波，实际上是给薄一波扩大影响。薄一波哪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们队伍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们这样提法，起码可以说是形左实右。二，这种提法起动摇、瓦解解放军的作用，是自毁长城。就是决死队出来的也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有问题个别处理，不能变社会口号，搞到社会上去，不能拿着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来自毁长城。江青同志在“九·五”讲话中就讲了，要支持解放军，不要自毁长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军队无论如何要团结一致，军队支左要一致起来，如果不一致要内部解决，不要公布于社会。军队内部不一致没有道理，工人阶级内部如此，军队更应如此。要提高阶级警惕性，不要受敌人的利用。现在我们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要全面胜利的时候，帝、修、反、美特、苏特、日特、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他们不甘心失败，我们要防止敌人挑拨离间，造谣污蔑，以被“左”面貌出现进行破坏。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协议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分人组成，“滇西挺进队”，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来自各方面的多次劝告，于元月一、二日，全付武装，从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向滇西挺进，煽动当地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配合他们的行动，仅仅十八天时间，先后攻打了一平浪、楚雄、下关等重要城镇，抢夺国防仓库，破坏滇西工业生产，打死打伤许多革命群众，危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们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滇西挺进队”的行动，是受了走资派的操纵的，是混进他们组织里的极少数坏人从中挑动的，这个组织里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

为了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副统帅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立即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地、积极地、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坚决规劝和制止“滇西挺进队”的错误行动。

我们希望他们：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交出指挥武斗的坏头头，坚决与走资派和坏头头划清界线，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是能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我们一定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把坏头头、混进群众组织的极少数坏人和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

要把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和没有参加武斗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

要把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参加武斗的“滇西挺进队”和其他没有参加武斗的工役制工程团区别开来；

要把“炮兵团”派“滇西挺进队”和“炮兵团”派其他组织及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斗私批修，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一个接着一个成立，出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高潮。云南同全国一样，也是一片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努力学习和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但是，就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出现了所谓“滇西挺进队”。

“滇西挺进队”自一月一、二日以来，在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少数坏人的挑动、操纵下，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是把枪口对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对准革命群众。“滇西挺进队”在滇西大搞武斗，破坏生产、抢夺国防仓库，危害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这是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保证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根据中央指示，特发布如下通令：

一、“滇西挺进队”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你们必须立即猛醒，赶快觉悟，同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少数坏头头，划清界线，反戈一击，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了。

二、“滇西挺进队”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用物资。

三、立即撤出矿区，迅速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和斗批改。

四、所有人员不能以任何借口破坏煤矿；矿区的一切设施和国家财产，必须予以保护。

五、矿区炮派革命群众，要积极协助军管会贯彻上述各条。

以上各条，希望你们立即执行。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关于云南鸡街、铅厂、雨过铺事件的指示

一、关于鸡街、铅厂、雨过铺发生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严重政治事件。

二、必须交出鸡街、铅厂、雨过铺三个地方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坏头头，而且要主要的头头。

三、必须指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必须立即改正，如果不改，将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四、必须释放被抓的人员，交还车辆、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质。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凌晨零点十五分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谢富治吴法宪关于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空军罗元发司令员传达，二月六日晚，空军后勤部礼堂)

今天利用这个时间传达一下谢副总理、吴副总长的指示。

今天下午，谢副总理、吴副总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些指示：

一、全国的形势是大好的。全国上下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年要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现在全国已经成立了十四个革命委员会，报纸上大家都看到了吧！革命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了，如河北、湖北、前几天还有甘肃，最近浙江、湖南、广东以及其它地区很快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形势发展的非常快，是个大好形势。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紧跟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紧跟的话，就会落后于全国的形势。那么就是说，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跟上全国大好形势。这个大好形势、革命的形势发展非常快。最近东北的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的代表还在谈停止武斗的问题，家里已经在搞大联合了。形势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同志们要看到这个大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云南的两派在这个地方，要很快地签订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的协议，还要搞大联合。八·二三、炮派要在这方面很快地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武斗在云南地区并没有完全停止下来。现在云南的广大人民群众也要求大联合，人民的心情大家是知道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过去两派都做了不少的贡献，但不管哪一派，或多或少也犯有这样的缺点或者那

样的错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犯了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也是难免的。我们来北京不是来搞辩论的，是要来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经过斗私、批修，搞好大联合。两派一定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哪一派在这个大好形势下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中央的话，不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话，必然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就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志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领会这一点。在这里应该很好地把协议搞好，两派都要很好的联合起来。

二、关于报纸问题：

云南地区的报纸没有很好地向广大人民传播毛主席的声音，或是传播得不够。由于武斗影响了报纸的出版，云南广大人民听不到中央、主席的声音。报纸一定要很快复刊，要办好。《云南日报》和军队的《国防战士报》要很快地恢复起来。这个报纸，最主要的应该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重要文章、社论，把中央、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指示、党中央、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及时地传达到广大的革命群众中去。

三、在谈判中，各个专州县，下关、文山、个旧、曲靖、东川、昭通、都来了，（玉溪还没有来），除昆明地区两大派签定制止武斗的协议（全省性的协议）以外，各地区要制定一个协议，在总理办公室联络员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每一个地区要搞一个本地区停止武斗的协议。有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来，有的在云南。不要来的可以报告，商量一下，再参加谈判。签字以前，军队、军分区也要来两个人（有的地区是武装部），当地两大派加军分区（武装部），三个方面嘛！今天晚上研究了，争取后天来。

四、再一个是：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七百人，听说今天多数派、少数派敲锣打鼓地联合起来了，昆明部队三大机关来的三十九人，经进过谢副总理、吴副总长批准，同意你们去军事学院学习班去学习，你们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嘛，时间还没有定，中央首长很忙，接见两派代表时，通知你们来。你们研究一下，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你们先进去，到接见时间通知你们来；一个是暂时不要进去，但是现在你们极端民主化很严重，除掉你们三十九个人，还有他们七百人呢？（三十九个人插话：接见后再进去。）好嘛，我把这个情况向谢副总理汇报一下，延长一

点时间再进去，但是，要学好。你们前半个月坐不下来，派性很大。根据军委办事处反映，春节后开了两天座谈会以后好了一些，你们承认了三条：一、来时你们说没有派性，现在承认有派性而且还很严重。二、感到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跟得不紧。三、要自我革命，斗私批修！以前老是革人家的命，现在要革自己的命了，自己又要作革命的对象又要当革命的动力，自己革自己的命。总的是有收获的。但是你们家里三大机关还是没有很好地坐下来学习，三大机关还很乱，一定要按照中央十一月十四日通知办事，把你们学习的情况给家里打个电话。北京的政治空气和那里不一样，空军幼儿园的孩子（编者注：接见是在观看了空军幼儿园孩子表演以后进行的）要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后代，永远不出修正主义。在坐的同志大多数年轻，要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使铁打的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

关于一平浪的问题，谢副总理讲，两派不要在那里作文章，一定要坚信中央。革命造反派你造什么人的反呢？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要造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我们有的造反派没有按照毛主席最新指示办事，有的超出了这个范围。浙江红暴会，毛主席批了，他们犯了错误。一平浪的问题两派要正确对待，特别是炮派要按中央指示办事，要相信中央。炮派在下关搞了三个通令，他们在那里要单独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要看你造谁的反。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就错了。（刘懋功：炮派发表了声明，态度还是好的。）炮派发表了声明，有自我批评，态度还是好的。不管八·二三还是炮派，都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他批评你，你批评他，不要算老账，现在要大联合，要多作自我批评。造反，造谁的反？一个是造走资派的反，一个是违背无产阶级路线。我们造反不能乱造一顿，造无产阶级的反就是不对了嘛。

两派要紧跟中央，相信中央。你们的组织很庞大，都有跨行业的组织，以后要归口大联合，归口闹革命。大联合后要搞工代会、农代会、职代会，都要按照毛主席肯定的贵州棉纺厂的经验，归口闹革命，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

另外，军队无论如何不能参加哪一派，不管八派也好，炮派也好，你们都不要参加，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军队与地方的线要割断。对八·二三或者炮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支持。军队要按照毛主席“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办事，不要搞派性。你们可以到北京部队机关参观，去看一看住在华北地区的解放军他们怎样紧跟毛主席的，是怎样学习毛著，怎样斗私批修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本身不应分成两派，要团结起来，无论如何不能参加地方两大派，有不同意见坐下来谈。今天谢副总理讲，军队对两大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不支持，你们自己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要按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办事。最近中央军委在这个方面还要有个指示，你们回去讨论一下，按中央指示精神打电话回去，你们两派要搞大联合，这是大方向，这条路非走不可，你们要搞武斗，非犯错误不可。再不要搞武斗了，工矿停工，农民进城，交通停滞，影响援越抗美物资的运输。搞武斗是违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绝大多数群众，革命造反派，是愿意搞联合的，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们打电话总是有些歪曲，随便发挥，这是没有党性的表现。随便发挥就变成造谣，要有严肃的态度，不能随便发挥。对自己有利的就随便发挥，那就不好了。今天总理办公室同志，朱刚同志在这里，你们打电话的稿子给他们看一看，看是否合乎这个精神，如果有随便发挥，要由你们自己负责。我做一个口头声明。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二十一点零六分至二十二点三十五分，总理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我省驻军和两派赴京代表。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云南两千一百万人民的无限关怀，对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全文如下：

总理：同志们：云南两大派达成了两个协议。谢副总理要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一道来见见你们。你们一部分同志还要回去动员保证执行这个协议。

现在请谢富治同志讲一讲。（鼓掌）

谢副总理：你们定了“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两个协议，现在总理、康老、江青，吴法宪同志今天都来了，最后你们还有三个人要签

字，签了没有？（答：没有。）你们现在就签，在中央首长面前签字，就要执行嘛！我们做证明人。（签字）好！（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云南昆明地区的代表，一平浪的代表、楚雄的代表、昭通的代、曲靖的代表、东川的代表、以礼河的代表、文山的代表、红河的代表、保山的代表、下关的代表、玉溪的代表和军队上的代表，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地北京，来到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在地北京。同志们经过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的指示，学习了中央、周总理的指示、学习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大家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无产阶级党性，克服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北京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达成了刚才签字的两个协议。这两个协议是很好的。中央文革小组准备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这两个协议，支持这两个协议。

同志们来啦，要把这两个协议在昆明，在云南所有地区，在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中间坚决贯彻，加以落实。这个落实，还有待于我们军队的同志和两派的同志作很大努力。

昆明是我们祖国重要的国防前线，有着重大的援越抗美的任务。同志们知道，越南人民在春节期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越南人民打的，它体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同时，我们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特别是云南的同志对越南的援助，这是直接的，越南人民把我们这个国家做为他们的大后方，最直接的后方就是广西、云南。这个后方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非常革命化的国家。所以，才能成为一个最可靠的后方。这个后方的巩固是很重要的。云南不仅只是越南人民打美国帝国主义的重要后方，同时是缅甸、泰国、老挝革命人民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重要战略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把革命搞好有重要意义，把整个云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是对越南，缅甸、泰国人民的重要的支持。所以云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云南的人民解放军负有重大的责任，把那里的事情做好。首先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迅速地停止内战，收交武器，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春风，已经吹遍了长城内外，长江两岸，吹遍了全中国。这个春风是不是吹到你们那里去啦？这是革命大联合的春风。云南形势总的是大好的，但比较全国来讲是落后的，这是你们自己讲的，其实是后来者居上。大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可以赶上去。现在武斗要赶快停下，武器要交，要按着协议办事。现在还有一些打仗的事情。这个协议适用云南所有各派、各地，所有的人都要执行。不能一面签订协议，一面还在那里打仗，不遵守协议。

云南的派性是很严重的，军队有，地方有。十三军、十四军写了检查，十三军的较好。军队、地方都应该检查。

昆明两大派都是跨行业的，应该停止武斗，应该归口大联合，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

云南现在的秩序还不那样好。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坏人，对那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特务、叛徒，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反动派，在云南要提高警惕性。两派内部的坏人，都应该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总理也讲过，都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双方自己抓坏人。上面就有坏人，有李成芳嘛，有赵健民嘛！这就是坏人嘛！都应该抓。两派群众里头，也是有的。

这个协议还有军队参加。所有军队都不应参加地方两派的活动。军队内部的事情，军队自己办，地方也不要参加军队的事情。至于“三支”“两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军队内部应搞“四大”的应按军委指示搞。不搞“四大”的坚决不搞。也不能变相地搞“四大”。军队要听指挥听命令，不能发展无政府主义。云南的军队随时有同美帝国主义作战的任务，随时有同反动派作战的任务，要遵守纪律，按照林副统帅指示的，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特别是军队应该遵守纪律。一声令下，就同美国作战，同各国反动派作战。

现在同志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达成了很好的两个协议。要坚决地执行，落实。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有一个很好的学风，不能一面签订协议，一面在家里打仗。这是不允许的。那样搞自己要垮台的。

在这里还要讲讲工八团的一部分人，在滇西成立了什么“滇西挺进纵队”，在那里做了很不好的事情，特别是在下关。后来云南的军队根据中央的指示，要

他们交枪，交出坏头头，进行训练，他们没有很好听从，他们后来抵抗，先行开枪，后来双方伤亡很多人，军队也伤亡了一些人，这是走资派挑动的结果，不能怪工八团，要怪走资派，也不能怪炮兵团。对这件事情双方都不要作文章。现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紧跟形势，不能搞小动作。希望今天到会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协议。你们在中央首长、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面前签了字的，签了字要实现。

还要说件事情，除了谈判以外，已有 800 人在学习班学习，还要增加 800 人，总理又加了 100 人，就是 900，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云南的关怀，（口号）这事不能马虎，要好好办，中央文革小组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到底。按着毛泽东思想、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好。（口号、鼓掌）

总理：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老：同志们，我完全同意谢富治的讲话，并祝贺你们两派达成“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的协议。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很重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口号）

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中间，第一条，双方保证从几月几日起？，时间签上了没有？（答：签了。）从哪天起？（答：二月十六日十八时起）好。第二条，限期几月几日？（答：二月二十三日以前，全省封存完毕，三月四日以前按指定地点全部上交军管会。）好。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武器大家抢来抢去，现在又要交出来，同志们想了没有，武器呀！啊！枪啊！炮啊！手榴弹啊！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造武器是打谁的，打我们的敌人，打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打社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也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苏修、蒋介石、反动派。我们的武器是打这个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武器是为了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的，是为了援助缅甸、泰国革命人民的。这个武器一方面反对敌人的，另一方面是支援革命人民的。我们的武器，现在这样抢来抢去，夺来夺去，前一段在云南是干什么？不是打敌人，是打自己的阶级兄弟。这合乎不合乎毛泽东思想，合乎不合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合乎不合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大家想一想。过去这样搞武斗，实际上是帮助了

走资派，也帮助了敌人。受走资派、敌人所利用。毛主席不是讲过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没有说要用武器杀自己的阶级兄弟。革命派要有阶级性嘛！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嘛！大家称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应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嘛，很明显，过去是受了走资派的挑拨利用，搞错了。那么是谁挑拨利用呢？谢富治同志讲了，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健民。（口号）受他们利用，现在觉悟了，达成了协议。所以中央接见了同志们，庆贺同志们。这不仅是纸上的协议，是同志们觉悟提高了。同志们要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因此交枪，制止武斗要彻底，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云南地区枪大部分交了，是不是交完了，不见得。所以希望同志们回去执行协议要彻底，搞到底，武斗大部分停止了，但小的还有，同志们回去后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同志们信任我们，要在中央首长接见时签字。我们接见，签了字，大家要共同负责任，你们向我们负责，我们也要向你们负责，向云南人民负责。不要口头上字面上达成协议，实际上又推翻了，这就不好啦。当同志们回去的时候；也许有的群众不理解，特别是坏头头不理解，认为你们出卖了他们，有的说，你们到北京修了。这是反革命的话。到毛主席身边出修正主义，那中央是什么？！（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云南有这个说法，其它地方也有，这是反革命的。同时，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青年，应该言行一致，千万不要搞两面派，口是心非。反革命、一切走资派、叛徒、特务、刘、邓、陶等，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口里说的跟他们做的完全是两样。老的两面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露出来了，按着阶级斗争的规律，今后是否会产生两面派，出现新的两面派，可能的。因此，同志们要千万警惕。我们错了就改，错了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耍两面派。例如，赵健民就是耍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同志们打倒赵健民，不仅要打倒赵健民这个人，要把他的两面派的思想，叛徒的思想，彻底肃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光明磊落，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共产党，忠于革命。应该是这么一个态度。因此，达成协议回去以后，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今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要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去落实，这是我们希望同志们注意的一点。

第二，我经常讲，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同志们，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在边疆，云南面临着美帝国主义，面临着苏修，面临着缅甸、奈温反动派、泰国、老挝反动派，面临国民党残匪特务，你们有战备任务。刚才谢富治同志讲过了，敌人正在云南千方百计活动。前一个时候由于派性，受蒙蔽了，敌情观念模糊了，没有啦，这很危险。这怎么算一个革命派呢？因此，希望同志们要加强革命警惕，加强敌情观念，有些敌人会打着红旗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刚才谢富治同志讲的，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同志们被他们表面的现象蒙蔽了，认为他们好像是革命的，实际上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提高革命警惕。现在揭露出来一些。两派都有一小撮坏人，不能睡大觉，不能麻痹大意，不能说那派有，我这派没有，两派都有。两派都要自己揪自己的坏人，这样才能保障我们文化大革命争取全面彻底的胜利。这是第二点。

第三，如果我们要识破敌人，就要坚决彻底地消灭派性。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央的文件，报纸杂志讲得很多。希望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彻底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派性的确是毒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也是腐蚀同志们的思想，引导人们走错误道路的敌人。所以要彻底克服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毛主席领导的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口号）同志们讲的不错，打倒派性，增强党性，才能实现革命大联合，才能实现革命三结合。

同志们在学习班讲了，说云南落后了，应当这样说，在时间上稍微落后。从时间上讲有的省是上游，现在已经成立十四个革命委员会，广东很快就成为第十五个，吉林第十六个，他们叫中游，你们是中游还是下游，很难说了。或者是中游，或者是下游。时间上说，你们是落后了，但是上中下游，不仅从时间上算，主要是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好不好，一切按毛主席指示、按着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标准，就成了上游；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不是成下游了。刚才谢副总理讲了，你们还可以后来居上，居毛泽东思想的上。同志们要去掉派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不仅是昆明，还有各地都要很快实现革命大联合，解放干部，搞三结合，很快成立革命会。这样才能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指示。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在云南面临一个很重要，很大的问题要同志们解决，这就是三结合，部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云南解放干部，在派性影响下，没有实行。所以成立革命委员会联系到解放干部的问题。你们到底解放谁，要好好想想。不解放干部，你们自己也解放不了，革命委员会就不能成立。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希望各派要考虑这个问题。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很关心你们那个地方。我们昨天向主席报告，你们已经有 800 人在那里学习。主席说，不行，还要增加一倍，所以总理决定，增加 900 人，这是关键的关键，同志们有的在学习班，有的就要进学习班，在家里也要办，不是一派办，要象你们达成协议那样联合起来办，下面办不好，可以送到中央来办。参加学习的同志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学好林副主席的指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最后讲一讲关于部队的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三支”“两军”中在云南做了一些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但是云南的部队，不必隐晦沾染了一些派性，容易理解，社会上的派性影响了部队，军队的派性又影响到社会上去。所以，部队的派性要彻底克服，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广东军区总结克服派性的经验，希望你们要注意这件事。因为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谢副总理：十四军有个关于派性的检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说很好。昨天我看了十三军的检查，比十四军在某些方面还深刻一些，这也不错，不过主席还没有说话）我们解放军有这样一个特点，犯了错误，听到主席的声音，他可以立刻改正，可以进行自我批评。（谢副总理：检讨是一个方面，还要看行动。）应当说云南的部队前一个时期，派性相当严重，影响了地方，很严重。部队内部也是不统一的，不一致的，也是派性，这样就不合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同时，部队有些干部陷到派性里面去，昆明军区有李成芳、张子明，省军区有没有？也有。张力雄你有没有？（张答：有）我看你的派性也不少。还有一个副司令员朱家璧，来了没有？（朱答：来了）你有没有派性？（朱答：有）怎么办？（朱答：改正）有了就改嘛！按毛主席讲的改了就好了。所以靠自己改正，另一方面请其它兄弟部队帮助。

最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江西省军区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有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今天已经发给同志们了。这个批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的。他讲，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有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了错误帮助他们改正。但是，另一方面支左工作中有成绩又应当宣扬他们的成绩。主席讲了嘛：我们地方部队也是一分为二，支左还是有很大的成绩，有个别地方，个别部队犯了错误。犯了错误就帮助他们改正。大军区、野战军要把他们看作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没有理由歧视，没有理由搞派别。当然，首先要使自己正确，大军区、省军区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就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使“三支、两军”工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搞得更好。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从全国讲。我觉得主席的这个批示，对云南的部队很重要，希望同志们很好的研究、贯彻、执行。特别是刚才谢富治同志讲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和革命群众一道，和革命干部一道，争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这个任务彻底完成，全面完成。这是我们的希望。我的话完了。

总理：请江青同志讲话。（口号）

江青：首先问同志们好！（口号）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口号）我对云南的事，可以说很不清楚啰！知道一点不多。临来看了这么一大堆，看不赢呀！（笑）多少有点强加于我。不过，我觉得同志们到北京来了，听说来了快两个月了。我今天才来和同志们见面，首先是欢迎！（鼓掌）你们要回去就欢送。（鼓掌）

我想讲一讲，坏事是可以变为好事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主席是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但是在你们那儿，我是知道一点，有武斗，有的地方斗的还不轻。是不是这样？（众：是）武斗能不能算好事？不能算好事，因为伤害了人，损坏了国家财产，不能算好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

第一，如果你们搞了革命大联合，就是不打不相识，是不是？（鼓掌、口号）

第二，青年人，我年青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枪，这一点我谅解的。拿了枪，放两下，也是个锻炼。你们来自祖国的边疆，要是将来有什么战争，你们也锻炼了一下。对不对？（众：对！）

第三，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假如你走过了头，就是说走到对立面去了，懂不懂我的意思？（众：懂。）如果不是在人民内部矛盾里头超出人民内部矛盾，那就要剿匪！你们想想看，你们是乌合之众，我们的军队是：“四不”。（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口号）向小将学习！向小将致敬！（口号）

假使你走到对立面去了，你们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我们一声令下，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听毛主席命令的。你们想想看，你们的枪就成了火柴棍了嘛。（笑）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子弹，哗哗哗就打完了，吓唬人（笑）。没有枪想枪，有了枪怕人家抢，第三步送回去吧！（笑）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武斗是很坏的事情，不应该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嘛。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可以用道理把对方批倒、批臭，完全可以嘛！为什么一定要拿枪，有的拿机关枪，有的地方拿高射炮，一万五千多发炮弹，是什么地方？不是你们吧？（总理：是重庆。）这是个败家子，对着天空咚咚咚的打了一万五千多发，我心里一直不舒服。你们拿步枪打一打，只要不伤人，练习练习不要紧。我年青时也拿过枪，也打过枪。

现在既然达成了协议，就要遵守双方的诺言，不要再搞武斗了，你们再搞武斗，就会成为过街耗子，人人喊打。因为人民群众不能很好的安心生产，同志们想了这个问题没有？（众：想了。）武斗是损坏广大人民利益的，对不对？（众：对！）是一小撮坏人操纵你们武斗，他们逃之夭夭。现在就是要搞革命大联合，坏人他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曾经建议过各个组织自己揪内部的坏人，在今天，还有一个建议，是否可以联合起来揪，也可以*（口旁加么），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他自己不肯揪，把材料送给他。

你老想打，哪有那么多子弹，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因为搞得人民不安生，我想小将和革命群众，目的都不是如此，都是为了革命，我刚才听说背后有两个坏人，挑拨你们，你们上了当。甚至还有的说到中央来就修了，说这话是反革命。到毛主席这里来，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反而说你们修了，这是挑拨，是造谣，是对中央不尊重，是污蔑。我的意见供同志们参考，不知对不对。（鼓掌！）

康老：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平浪。这件事情出现在云南，希望你们警惕这件事情。（江青同志：要悬崖勒马。）要悬崖勒马！解放军“四不”是对革命群众的，对反革命是坚决消灭的，同志们这点不要糊涂，不要认为人民解放军就那么软弱可欺。解放军什么反动派没有消灭过，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难道我们还怕赵健民之流。云南已经有了一个现实的教训，希望注意这个问题。

江青：祝贺同志们达成协议。还要来九百人学习，一千也可以，欢迎。

回去的同志要好好宣传主席的指示，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的决定。我相信云南不会太落后，那儿春风吹得早。你们都穿了棉衣（笑），春风大吹一阵，你们就吹好了。

祝贺你们！（鼓掌）

总理：

各位同志，我们今天这个会开的好，富治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给我们讲了很好的意见。你们把春风带回去、传给昆明、云南所有地区的群众，说明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都很关心云南的革命群众。你们想一想，去年一月份也在这里谈判，开过会。那时在场的几个同志今天也来了，现在名单上分成两派了。去年我们给你们谈的时候，你们战斗在一起，黄兆琪、方向东（二人站起来）现在两边了，你们俩是这样（手势指分坐在两边），我们还是这样（指总理自己），你们想一想，你们一年前战斗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云南的走资派阎红彦等人开火。当时军区开始支左的前后，是支持了当时的省委，你们就冲了军区。我们向你们解释，不要去冲，叫军区不要责备你们，支持了你们。当时我们把毛主席的声音告诉给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告诉给省委一部份干部，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好，过了一年，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武斗。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可以充分吸取教训，江青同志讲的很深刻，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不再重复了。你们两派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们八十二个代表，其中有一部分要回去，传达毛主席的声音，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造成这样的对立，两派势不两立，现在又达成停火交枪和恢复交通的协议，群众不好理解，你们头头也不好交待，坏人会在里边挑拨，群众会责备你们。这就需要把毛主席的声音伟大领袖的讲话传给两派群众。不应该闹派性，军队也不应闹

派性。（江青：军队更不应该闹派性。）我们应该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红旗嘛！（康老：云南有这样的说法，十三军、十四军是薄一波的军队，这是错误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十三军，十四军是毛主席的军队，是林副主席的军队，怎么是薄一波的军队，那是替薄一波扩大宣传。）要把刚才同志们讲的话传达回去。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是做错了，为什么做错，这是有原因了。是有挑拨有人在后头。两边都流了血，死了人，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责备你们。你们应该传达主席的声音，要把仇恨集中在走资派身上，集中到挑拨我们的走资派身上，集中到坏人、黑手身上，不要革命的两派互相埋怨。刚才说了，云南地处边疆，刚才江青同志说，有美帝，有蒋匪帮残余，有反动派，有敌人，内部还有暗藏敌人，还有地、富、反、坏、右、特务、汉奸、叛徒。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这些方面去，不要双方群众不满，双方彼此要重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斗私批修，重新实现大联合。

回去都要很好的执行协议，还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把仇恨集中到他们身上去，把革命群众、革命战士联合在一起。你们两家头头，黄兆琪、方向东，我都很熟，你们是不是今天就握手言欢，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奋斗，有没有这个决心，你们当面给大家表示。（鼓掌，黄、方握手）（江青：不打不相识嘛！）对！江青同志讲了嘛，比一年前进步了，有丰富的经验了，有很多经验教训嘛！你们到北京学习了很多东西，这样你们回去对群众好交待。必须讲清楚，动员他们联合起来，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凡是挑拨离间的坏人，群众眼明心亮，只要讲清楚了，自己抓自己的，也可以联合起来抓，互相送材料。但有一条，不要指责对方，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多做自我批评。这样有利于革命大联合。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动员更多的人到北京来学习。确实云南处在边疆，离北京很远，打个电话都不容易，例如一平浪、东川出事，我打电话，就是打不通，据说电话线断了。（康老：报纸也没有了。）现在已经来了八百人了，不算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听了，觉得不够，再加一倍，再来八九百一千都可以。要你们回去宣传，到北京学习一次不容易，万里迢迢。要好好坐下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录音报告和其他同志的讲话，中央的指示等等，好好地学，坐下来学。我晓得，打红了眼，

报纸都不看的。你们说是不是这样？（众：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嘛，不把头脑武装起来还行呀：现在要冷静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一个月了，不认真更不行。各省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要赶上去。回去宣传、动员来学习，要把毛主席的声音传回去，这样一号召，也可能大家争先恐后的来，不要紧嘛！以后再办第二期，你们学了也可以办。学了以后也可以回去传达，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样，云南的广大群众都学会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林副主席讲了，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到北京学习，回去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到实际中去考验你们。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别关心的事。

第三，我们人民解放军处在边防，现在，十三军、十四军都有了自我批评，我们相信昆明军区、云南军区也会有很好的书面自我批评。部队搞“四大”的，要按正确的原则。三相信，三依靠，解放军是最主要的，群众是主要的，解放军是人民群众的支柱，我们又是边疆，越南同志说，我们是越南可靠后方，坚强的后盾。你们云南那么打法，把越南侨民都打死了，这使我们很大的不安。这是坏人在挑拨，所以边疆的人民解放军要很好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副统帅林彪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团结成一个人一样，军队不应该存在派性，要完全去掉，增加党性，做出模范。凡是错了的，要痛痛快快地改。

主席最近还有一个指示，这儿说一下。刚才说的军队不应该有派性，野战军也好，省军区也好，军分区也好，人武部也好，都应该是错了就改嘛！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作标准，因为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有成绩的，应该发扬成绩，做出样子，团结成一个人，保卫边疆，一旦有事情，发动群众，奔赴前方。因为在第一线嘛！现在军队担负“支左”工作。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要经过群众的大联合才能解放领导干部，解放一大片，批判一小撮。否则革命三结合就无从谈起。有军队，有群众代表，没有领导干部就结合不起来。同时，解放军要作出模范，因为现在是军管，军代表也好，将来成立革筹小组也好，军队是核心。军队对群众组织，不要介入。军队搞“四大”的单位也不要与地方群众组织挂钩，不要串连，在报纸上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当然，作个报告也是可以的，但不要干涉内部的事务。这样，军队才有稳定性。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要避免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发生派性关系，听一面的话多了，听另一面的话少了，就助长群众组织带派性。所以，不但只是他自

己，而且连他的儿女、爱人也不要参加地方组织，受这么一点约束。受这么一点约束有什么好处呢？这样有利于军队的领导干部做支左工作。这也是巩固我们军队所必要的。这是从积极方面来讲的。我们的军队，特别是边防军，特别重要，今天在座的不管那一级都应该好好反省。特别是十三军、十四军检讨了，只要有错误，就痛痛快快地改。我们最高统帅都是允许的。我就想补充这几点。

现在一部分同志要回去，预祝同志们取得胜利。你们要把刚才几位负责同志，富治同志、康老、江青同志的声音传回去，希望你们一路顺风，把春风吹到云南全省。（鼓掌）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云南的广大革命群众。（鼓掌）

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口号）

谢副总理：军队的同志，学习的同志，要把刚才的讲话好好学习。你们订的协议，不仅是对你们两大派有效，听说还有个“炮三司”和“工总司”，对这两家也应该有些约束力，也应当有效。

周总理：还有一件事，八派说他们还有一些人被扣在对方，你们签订了协议，按协议，通通应该放，送给对方。刚才他们握手言欢，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好不好？（众：好！）

（八派王希伦反映报纸问题时）

周总理：你们想一想，这么大一个云南，还要贵州帮助出报。

康老：希望你们赶快出报，不要出派报，要出党报；不要在贵州出，要在昆明出。（鼓掌）

总理：云南有个广播发射台，因为武斗，分成两派，停止了广播，使毛主席的声音在海外、东南亚、西亚、北非都听不到了。这那里是革命行动，是破坏行动。从今天达成协议起，再不准有这种行动，这是土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那就不许可。你们看到“2·6”命令了吗？（即指1968年2月6日发的“中发(68)26号文件”）只要破坏国家设备和财产，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用“二·六”命令采取行动。

（全体起立，高呼口号，欢送中央首长离开会场）

（注：此稿系经省军管会及两派记录员核对的，但未经中央首长审核。）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关于贯彻落实“协议”中的几个问题

一、协议在全省各地区必须迅速坚决贯彻不折不扣地执行，从协议生效起，如再发现有人打枪时，应立即由监督小组和本组织进行追查。如果是好人打枪，应严厉批评，教育，纠正，保证不得再犯。如果是坏人打枪有意破坏协议时，由本组织把他揪出来，严加处理，并向上报告，以此教育全体人员。

二、各军管会、军队，各派群众组织，应造成声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好形势，宣传协议落实。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互相征求意见，有缺点错误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三、收枪交枪必须同时进行，有的立即收枪上交这是好的；有的先收后交，但是封存后必须明确几天内一律上交，所有上交枪支、弹药，必须由军管会，支左委员会和当地驻军，监督小组共同清点接收。收交后再发现有抢枪，发枪者，必须受到纪律制裁。

四、对“工总司”和“炮三司”以及全省所有群众组织，必须一律照协议执行，不得例外。

五、各县民兵，农民必须按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切实执行，再不准挑动民兵，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经进城的立即返回本地区抓革命，促生产。

云南各地和昆明市逃往各地（包括逃到昆明市）的人员，一律迅速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

六、由北京返回云南各地的谈判代表和军管，支左人员，参加签字的人员，要切实抓紧真正使两个协议落实，回去时间十天左右。必须把停火交枪任务完成后才能返回，不得过早回来，返回北京时间听候通知。代表返京前必须安排好家里的工作，指定专人负责，继续抓好协议落实等工作。

七、在执行协议中要有阶级斗争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走资派、叛徒、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乘机捣乱破坏。如发现确有现行反革命分子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立即报告，并协助当地军管会，支左委员会和驻军，采取专政措施。

昆明、云南两级军区、两军在京领导同志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云南省军管会转文山，东川、下关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其他地区的革命群众组织：

欣闻文山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已于二月十日下午达成停火、交枪协议，并举行签字仪式，签字后两派一起游行，互相祝贺，互相赠送毛主席像章，气氛很好，现正为全面实现协议积极努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表示坚决的支持和热烈祝贺！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最近，东川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业已达成了停火、交枪协议。下关等地的革命群众组织，也正在积极准备谈判和交枪，放人。这是非常可喜的大好事。

希望文山，东川认真落实协议，进一步作出新的贡献。并希望各地区和革命群众组织，都仿效文山、东川，迅速达成停火，交枪协议，并付诸实施，立即无条件把武斗制止下来，尽快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和社会秩序。

目前，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全国务省的革命委员会一个接着一个的成立，形势大好，发展很快。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党性，打倒派性，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挑拨破坏，在争取早日实现和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中立新功！保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昆明、云南军区，两军、空指在京开会领导干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罗元发与昆明两大派在京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空军罗元发副司令员与昆明两大派在京代表座谈时指出：

今天给你们讲的，主要是主席很关心云南的问题，接见时专门问了云南的问题。你们执行协议的情况是很好的，有阻力，要做好工作，防止坏人。云南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要有阶级斗争观念，贯彻落实协议中，个别坏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要防止他们挑动、破坏，要坚决把协议贯彻到底，你们两个协议得到中央批准，中央首长签了字，云南广大群众是十分拥护的，因为协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合乎毛泽东思想，但有少数人有顾虑，云南反复了两次嘛！双方有些戒备。一方面是坏人，一方面是顾虑，下面一些同志错误地接受了过去的教训，眼光老是向后看，怕枪交了会不会吃亏，这不是向前看，是老眼光，是保守的看法。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两个协议，要做好思想工作，有坏人就要坚决斗争到底。这次再不能有反复，要下这个决心。哪个单位交了枪，受到攻击，我们就要支持他，他执行协议符合毛泽东思想嘛！不交枪，我们就要反对，要做好思想工作，现在，有的要先交旧的，留新的；先交长的，留短的。多数交了还留个尾巴，有的偷偷摸摸转移，这些都不好嘛。……，要加强整顿昆明的社会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罗元发副司令员电话指示：

交枪问题要向两派讲一讲，昨天谢副总理有指示，协议必须坚决执行，不能马虎，现在有些阻力，不想交，互相戒备思想是不对的，要向前看，要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只有坚决贯彻执行协议，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协议不要采取两面派态度，这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体表现，是对一个组织的考验，把枪隐藏、转移都是不允许的，枪是一定要彻底收交，

不能动摇，如果有一方交了枪，另一方进攻他们时，人民解放军就要坚决支持他们，对于不交枪的，顽抗的和少数坏人，两派要团结起来把他们孤立起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云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二个协议的批示

1968.02.22；中发[68]35号

中央同意云南两派达成的协议，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地处国防前线，担负繁重的援越抗美的斗争任务，中央希望，云南省各地各革命群众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挑拨操纵。你们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迅速解放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并在这个基础上，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以便更好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三、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陈康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的指示
四月十一日，两级军区、两军在京首长对两派代表团传达四月八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精神。

时间：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四点至六点三十分。

地点：北东西苑旅社会议楼。

参加首长：陈康、田维扬、吴效闵、梁中玉、段思英、张力雄、李明。

田维扬：今天把中央首长一些讲话精神跟同志们传达一下。另外，就是云南的大联合、三结合，我们作了一个初步的提案，给同志们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可能不完整、不全面，可以充实，走群众路线嘛。

根据总理的指示，“五·一”以前要全国一片红，只有二十天时间，紧迫得很，我们提了个粗线条，大家讨论。

四月八日参加接见的有九个人，今天一个有事，一个有病，其他都来了，下面请陈康同志传达。只是精神，不是原话，还有我们自己的领会。

陈康：首先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我们的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先学一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今天来向同志们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传达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同我们的领会；一个是介绍力争五·一以前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设想。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四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参加军以上会议的同志，对我们教育很大，鼓舞很大，我们对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现在将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同我们的领会向同志们讲一讲。

(一)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五·一”前全国一片红，各省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不能落后，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阻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力争在“五·一”以前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如果跟得很不紧，不照顾大局，就要犯大错误。

(二)矛头对谁呢？不要把矛盾性质搞错，要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和本地区的代理人，在西南要特别注意对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进行彻底的批判。李成芳、赵健民是两派共同的敌人，把他们揭发出来，是两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不要抛开他们不批判，打内战。在对待李成芳、赵健民的问题上，要划清揪出来以前和以后的界线，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未揭发以前，对他们有个认识过程，不能笼统的说包庇他们，以前认识错了，改了就行，不能揪住不放。不能利用这两

个人的问题作文章，说什么“三家村”“李成芳司令部”都是错误的。李成芳、赵健民主要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不能都联系上，属于我们个人的问题，可以揭发，可以上送材料，不要一提就是打倒。要把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不要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抓住不放，纠缠不休。

(三)要搞好团结，要搞好大联合，没有团结，没有大联合，三结合就不能解决问题，地方上群众的大联合关键在军内，军内关键在于领导，团结是大局，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大敌当前，团结对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不团结，要反对右倾分裂主义，我们的同志在关键的时刻要识大体，顾大局，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打内战，搞磨擦，互相抵消，如果再那样搞下去，就要犯大错误。一定要团结一致，一定要同心协力，造成浓厚的团结的大联合的气氛，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一切妨碍团结的言行都要抵制，不管有多少意见、分歧都不能离开大方向。背离了大方向，就没有标准，什么也说不清楚，认识不一致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搁起来，一定要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做到三个“忠于”，四个“无限”。中央文革是毛主席、林付主席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要忠于她，热爱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已经发表半年多了，要检查我们跟得怎么样，执行怎么样，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第二个问题：关于加速筹备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周总理指示，“五·一”节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伟大战斗号召，我们一定要在“五·一”以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作为当前的奋斗目标，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这是大局，是大方向，我们的思想要集中到这里，我们的力量要集中到这里，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障碍，要全力以赴。当前云南是一片大好形势，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付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指导下，经过云南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形势越来越好，落实三个协议取得了伟大成绩，武斗基本停止，枪支大部收回，交通邮电基本恢复，并开始出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新高潮，现在联合

起来的单位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在日益增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逐渐接近成熟，在这大好形势下，关键是我们领导的思想要跟上形势，跟上群众，只要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五·一”以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是可能的。我们应当有信心有决心来达到这个奋斗目标。

第一我们的指导思想，力争“五·一”前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们的中心和奋斗目标。不能犹豫，不能动摇，必须从积极方面着眼，看到一切有利条件，克服一切困难，鼓足干劲和时间赛跑。现在离“五·一”只有二十天时间，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要放在四月二十日以前大体做好，要突出中心，当前的中心就是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其他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其他一切工作，一切问题都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只有突出中心抓住重点，才能集中思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否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完不成，就有落空的危险。

要加强团结，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在我们领导同志之间、军队内部之间，军队与群众之间各个方面都必须识大体、顾大局，增强团结，做到互相支持、互利谅解、互相帮助。有了团结，完成当前中心任务就有了保证。否则互相磨擦，力量抵消，当前的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为了增强团结，其他问题可以暂时放下来。

二、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机构的设想，根据其他省的经验 and 云南本地情况作了一些设想，云南省比其他省不同的是：少数民族多，要照顾到这个特点，我们初步设想，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十一左右，红卫兵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左右，其他单位的代表占百分之七左右）军队的代表占百分之十九左右，革命干部代表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还要在总名额中留一定数量的机动数，占百分之一左右，如华侨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代表。革委会的常委由三十名左右组成，革委会机构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外事组。工作人员暂定一百五十名左右，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粗线条，作为同志们讨论问题时参考，可以部分采用，也可以全部推翻。

三、当前几项主要的准备工作：

①继续解放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对待干部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干部路线来识别干部、解放干部，不管哪一个革命干部，有没有条件站出来，首先要看他符合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五条标准和林付主席指示的三条标准，符合的就是好干部，不符合的就不是好干部，不能有其他的标准。要把好的干部选进革命委员会，使红色政权真正掌握在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手里，绝不能混进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走资派。革命干部的条件具备了，就要大胆解放他，让他站出来，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支持他们，就要支持他改正错误。改正错误要有个过程，不能抓住不放。影响干部站出来的主要是派性，带着派性对待干部。就不能正确的识别干部，也不能迅速的解放干部，我们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不能服从哪一派的观点，对干部的看法意见不一致、分歧，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间非常紧迫，任务繁重，由于过去云南解放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好，在短期内要解放大批干部，困难是很多的，因此要采取逐步解放的办法。干部的解放的名额不够也可以暂时把它空下来。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确定由段思英同志去解放干部，由陈泽民、李明同志参加他们的领导。希望两大派拿出足够的力量来抓好这个工作。军内参加哪些干部将来与两派的群众协商，现在还提不出来。群众组织的代表要迅速着手协商，要力争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把名单提出来。在代表中间要有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红卫兵代表、妇女代表、机关干部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等，还要有昆明市的代表，也要有专县的代表，要注意有广泛的代表性。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由朱刚同志具体负责与两派代表协商来解决问题，由两个军长吴效闵、梁中玉及张力雄同志参加，帮助大家协商解决群众代表问题。

②迅速签定两大派的大联合协议，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大联合的协议要很快签定，协议已经送中央，因为中央首长很忙，大家有要求今晚就到，能够请中央首长参加签字，尽可能作指示？这是我们和大家一致的心情，我们迫切要求中央首长这样做。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不知能不能实现。中央首长讲中央首长太忙，是不是需要中央首长来参加签字，作指示，两派达成协议，报中央批示的可能性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协议上点李成芳、赵健民两个人的名的问题，意

见不一致，要提都提，不提都不提，只要你们两派协商好，就行了。大联合协议达成后，两种方式：一种报中央批示，一种是中央首长参加签字、作指示，两种可能性，还是报中央作批示的可能性大。我们争取中央首长参加签字作指示，但我们两方面都准备同时进行，不管哪种方式，时间要快，云南的情况非常需要中央首长来参加签字作指示，这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巨大的促进。

签字后与两派同志协商报中央批示，留下少数人在京协商筹备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各项工作，多数人回去落实大联合协议，成立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根据其他省的经验，革命委员会是从基层建立起来的，这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意见。

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其他各项工作已着手准备，现在比较困难一点的是解放干部的问题、写贺电、誊写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讲话及制造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象章已分头进行。

这就是我要传达的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和我们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设想。再向同志们说明一点，这究竟是个设想，提出来作为同志们考虑问题的线索，不是框框，可以推翻。

我讲的有什么错误，请田付司令员、张力雄政委及两军的同志们补充。

田维杨：我同意陈康同志根据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精神的传达，这个讲话主要是对军队内部讲的，为了做工作，大家团结一致，紧跟当前的大好形势，也向大家讲一讲，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的军队同志和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军内主要是团结问题，中心是昆明军区，中央对我们的教育给我们严厉批评，叫我们耐心等等，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批评，应当从严肃的态度接受中央的教育，应当很好地搞好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的一句话就是斗私批修，搞好团结，把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好完成，特别是时间不等人，“五·一”节要一片红。中央首长说“你们是不是愿意当个副班长”形容落后（梁中玉插话：副班长站在最后一个）。军内要团结，齐心协力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五·一”一片红，但不要放在“五·一”，要放四月底完成，要千方百计争取，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解放军能够团结了，我们不打内战了，特别是军区领导同志能自我批评了，齐心努力了，就好办了。以军区领导同志为主，省军区、昆明军区，我们大家努力，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设想，有了毛主席的路线，有了方针、政策，有了解放军做实际工作，我们内部搞了团

结，我们的工作就能更好的完成。人民解放军不仅要在口头上团结，而且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严格检查我们自己的缺点错误。

中央说了，要陈康同志出来，不要群龙无首，要听中央的招呼，我田维扬也要听中央的招呼，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学李文忠同志。过去我们内部有问题，有问题可以，要顾全大局，以后来解决，中央讲了革命不是革一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我们要顾全大局，服从大局。大局就是“五·一”以前全国一片红。中央一再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央面前表了表，我们服从谁，服从毛泽东思想，服从毛主席，我就表这个态。

要高姿态的检查，触及灵魂的检查，承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缺点、错误，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群众，有派性，应该做高姿态的检查，检查了就好，毛主席说，早检查比晚检查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我愿意在群众的监督下改造自己，决不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只有这样才能执行毛主席的教导，我要求在群众的帮助下，揭发、批判我的缺点错误，不依靠群众要犯错误。只有机会主义分子才不依靠群众，陈独秀、李立三才不依靠群众，还有王明、博古、张闻天，要以我为核心的机会主义，以后又来了个高、饶事件。

中央负责同志说，田维扬要出来说话，我就表这个态。中央说要我出来说话，无非是中央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召集人嘛，总要有个人嘛，就表明这个意思。我服从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也提出了要我们听中央的招呼，就是指我、鲁瑞林、查玉昇，这一次又让我们听招呼，我们完全支持中央，接受中央的教导，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我们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除了陈康传达以外，我就补充这一点，我就表示这个态度，以大局为首，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

吴效闵：

完全同意陈康同志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和我们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提出的初步意见和设想。陈康同志讲的是和八日中央首长讲的精神符合的，设想是根据这个精神考虑的，会议重点是对军内的。中央首长讲，只准按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话传达，不准原文传达。

我体会最深的是，要坚决执行，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

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身上，西南地区要特别注意，彻底批判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号召我们把主要矛头、主要仇恨集中到这些人身上。当前最主要是争取在五·一前实现全国一片红，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这是大局，是当前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号召我们，大敌当前，要以大局为重，同心协力，团结对敌，号召我们不要搞磨擦，打内战，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不要颠倒了矛盾的性情，内部矛盾要服从对敌斗争，服从敌我矛盾，要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主要精力要集中到争取五·一前实现省里的三结合，不掉队，不当副班长，有利于五·一前实现三结合的事尽最大努力完成，不利于五·一前实现三结合的事不做，有些问题目前条件不成熟，以实现革命三结合关系不大的，先放下来，刚才田副司令讲了，革命不是革一天，时间还很长，不要因为一般性的问题、次要的问题，干扰了主要的问题，离开了斗争大方向，离开了大局就没有标准，许多问题就扯不清楚，背离了斗争大方向，影响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要犯大错误，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我们一定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集中精力，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起来。

第二点，中央提出，要陈康同志主持工作，不能群龙无首，要有个召集人，要围绕陈康同志来工作。不仅我们自己要这样做，而且军内军外都要做工作，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团结一致的，解放军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共同努力，为当前的战略任务而奋斗。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支持、坚决照办。

第三，我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很多的缺点错误，其中一点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派性，在很多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欢迎同志们提意见、批评，写材料、往昆明军区、往中央送，不能因为目前强调团结、强调服从大局、识大体、顾大局，而掩盖自己的缺点错误，我愿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努力，为人民立新功。

梁中玉：

我同意陈副司令员关于八日中央首长接见的传达。总的精神就是要我们九个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条条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身上，西南要特别批判邓小平、贺

龙、李井泉、阎红彦，这就意味着我们前一段斗争大方向掌握得不好，我体会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们都是军内的同志，军队内部不要磨擦，不要把主要敌人丢到一边，要照顾大局，服从大局就是服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抓这方面东西不够，要团结对敌，不要在枝节上争论不休。另外，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人民内部的事一定要团结，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问题，五·一以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要实现一片红，尽快地把云南的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临时权力机构成立起来，还有廿天，中央首长很注意这个事情。

第二点中央首长指出，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我坚决听中央首长的话，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我体会中央首长传达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不能群龙无首，总要有一个头头。毛主席不断地讲，一个班总要有一个班长。

第三点，我自己从去年春季到今年春季，参与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地犯这样错误和那样错误的过程。有严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很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起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做得不够，一年来工作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总的是世界观改造得不彻底，以后要与同志们接触，希望同志们批评，也可以向中央上送揭发材料，犯了错误离不开群众的帮助，一靠毛泽东思想，二靠群众的帮助，三靠自己，这几个方面离开哪一个方面都不行。

段思英：

我同意陈康同志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四月八日中央首长把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找去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根据我们的学习和体会，我认为是对我们的问题作指示的，这个指示打中了要害，抓住了问题，对我个人来讲，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中央首长指示很严肃、很中肯，同时又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会议上讲的精神陈康同志都谈了，云南的问题当前主要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刘少奇、邓小平身上，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进一步深入地批判，揭发刘、邓、陶、李、阎。西南的重点是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

他们在西南是很有影响的，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是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第二点，军内的团结问题，军队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内部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下，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搞好云南的大联合、三结合，力争在四月底以前把云南省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任务非常艰巨，非常繁重，中央首长问专案调查组搞得怎么样啦！时间很紧，只有十九天了。

再一个精神就是要我们支持陈康同志站出来工作，中央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云南工作，不能群龙无首，开会也才有个人召集嘛，我们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听中央的，按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办事，支持陈康同志出来工作，搞好云南的大联合、三结合，做好两派大联合工作，坚决按毛泽东思想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最后一点，作为我个人来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很不好，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在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支左任务中是犯有错误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我个人是有的。尽管在京西宾馆开会作了批评，自我批评，作了检查，但现在看来还很不深刻，也还没有和群众见面，希望两派的同志对我个人的缺点、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帮助，以便我认识改正错误，也希望给军区领导，给中央反映，帮助我，我也决心改造自己，将革命革到底。

张力雄：

我完全同意陈康同志传达的中央首长四月八日接见在京西宾馆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所作的重要指示。在接见中，中央首长非常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这些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非常中肯，语重心长，打中了要害，对我们教育、鞭策很大。我和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要坚决贯彻中央首长的重要要指示，除了陈康同志作了系统的传达和介绍了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外，除了两军的同志讲的以外，我补充三点：

①作为我个人在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有的错误是严重的，应当向两大派的同志，特别是八·二三的同志作检查。今天不可能作详细的检查，首先向到会的同志们表个态，希望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上送材料，帮助我改造世界观，继续革命，和同志们一道搞好工作；

②根据中央首长八号指示精神，为了更好地搞好云南的文化大革命，需要特别是当前更加需要支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云南工作。这一点，刚才几个同志已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我个人完全拥护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支持陈康同志出来工作；

③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抓好有关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建议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早日成立云南省的革命委员会。

李明：

我完全同意陈康同志对中央首长指示的传达和以上同志的意见。八号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我个人教育很大，感动很大，中央首长对云南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这个指示，非常及时，针对性很强，而且很严肃，也非常中肯，给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对我们云南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关怀和爱护，我们在讨论中感受很深，教育很大，这个指示就是要我们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五·一前实现一片红，中央首长讲十八个省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能否争取第二十五、二十六个，不要当付班长，提出了严肃的认识，如何对待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这是对待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是对待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我们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团结，首先是军内团结，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西南的李、阎上，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摩擦，不要对消力量，要集中力量，做好两派的大联合工作，按时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按照中央首长指示，支持陈康同志出来主持云南工作。

作为我个人来说，同志们很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很多错误，不管是支左还是对待两派，也不管是处理军队内部问题，有许多缺点错误。

今天不可能向同志们详细作检查，尤其是对待八·二三的同志，有许多缺点错误，八·二三的同志有意见是完全应该的，我上半年搞生产，过问文化大革命不多，下半年支左中也有许多缺点错误，对炮派也是同样，欢迎两派的同志，提出批评，可以揭发，可以上送材料，我也决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欢迎同志们批评，揭发，今天向同志们表个态，我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刻和大家团结起来，同心

协力作好“五·一”以前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切准备工作，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中央交给的任务落实、实现。

（来源：《九·一四战报》毛泽东主席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九·一四战报》编辑部（第四十七期）1968.4.15）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滇挺”原头头李国祯第一次在×××揭发、控诉、批判“滇西挺进纵队”大会上的检查交待

我今天向大家交待“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同时对我个人所犯的罪行作初步的检查。第一个问题，关于“滇西挺进纵队”的情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在云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长期盘踞在云南省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眼看资产阶级司令部将土崩瓦解，就常常改变自己的策略，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以各种面目出现，极力的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武斗，借群众之手屠杀群众自己。严重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维护他们自己的生存。“滇西挺进纵队”就是叛徒赵健民、侯良辅、林亮这一小撮反革命集团和炮派部份坏头头，为了屠杀革命群众，把云南地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而一手策划组织起来的。“滇西挺进纵队”组织起来以后，在他们一手操纵下犯下了滔天罪行，破坏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屠杀了多少个革命群众。我们工八团是“滇西挺进纵队”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执行了他们的黑指示，我既是走资派的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我今天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教育帮助下，使我认识到这是阶级敌人在搞鬼，我要猛醒过来，我要彻底揭发走资派是怎样组织指挥“滇西挺进纵队”的滔天罪行。

“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大叛徒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的一手操纵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起来的。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打“11·30”以前就有了。去年十二月份贾玉玺写信告诉我：“最近林亮下去作了调查，然后作了形势报告。根据几个老头的意见看来，当前形势对我们炮派很有利，昆明炮派力量很大，占的地方较多，但下面有些地方不如老八势力强，怕把老八赶出昆明给下边炮派增加压力，使下边炮派支持不住。还怕老八在昆明站不住脚往滇西撤

退,卡住了我们炮派的上下联系。决定打完‘11·30’紧接着解决滇西问题,成立一个‘滇西挺进纵队’,由沈参雄、林亮、贾玉玺、杨凯、王守库等负责总指挥。”他说:“本想叫我去参加总指挥部去,考虑到我要带人到前面去打,所以决定我不参加总指挥了。”他还说:“在外边是叫‘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对内就是‘滇西挺进纵队’。任务是把昆明到保山这一条路的老八全部打掉,扫除障碍,充实巩固炮派。这次要下定决心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把老八全部消灭掉。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对楚雄安宁片的炮团提出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叫我赶快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并叫我趁此机会把下关的人拉上来分配工作,不然将来话都不好说了。他们就是这样以分配工作来引诱我们八团参加武斗,为他们卖命的。在那封信里边,他还叫我们市里面住的几个连队要配合打“11·30”,挽回以前的影响。不久沈参雄、王守库又在翠湖开了五团指挥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统一支边人员的思想,要支边人员坚决服从派里的决定,配合打“11·30”和成立“滇西挺进纵队”。沈参雄在会上说:“派里决定要解决滇西问题,五团指挥部也在计划之内,已经下了厂的就不动了,没有下厂的要配合派里的决定。”还威胁说:“陈康、张力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赵健民是革命干部,等赵健民回来了红色政权还是赵健民掌握。”“只要是真正的红炮手就要听这些人的话,就要听派里的安排,不然就靠边站。”侯良辅说:“你们这支队伍才是响当当的左派,就是有点错误也是前进当中的错误,不要怕武斗,不要怕死人。”并要我们八团发动工人把十四军派去的宣传队赶走。说:“他们是李成芳的保皇兵,要换成云南军区的人。”最后沈参雄要各团表态。我也表示了态,我说:“我没有意见,保证执行派里的指示,以后派里叫俺出多少人就出多少人,叫俺干什么就干什么。”并检查了我们以前没有执行派里的指示是错误的。散会后,贾玉玺又写了一个声明,实际上是保证书,经我同意后以我们八团的名义在新华山广播了。声明主要是保证派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坚决服从派里的决定,听派里的指挥。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滇西挺进纵队”,实际是为组织“滇西挺进纵队”和打“11·30”作思想上的准备。到了今年元月份,林亮又亲自告诉我:“派里准备解决滇西问题,叫你们八团去200~300人配合行动”。他说:“滇西问题解决了就把你们全部分到厂子里去,健民非常关心你们,给你们去的都是好厂子,他还要求你们团的干部也跟着下厂,

你回去跟你们团长、政委说，叫他们作好思想工作。过了不几天，在新华山贾玉玺住处，沈参雄又告诉我，“派里决定解决滇西问题，全派出两千多人，你们八团要去 200~300 人配合西区行动。你们八团和西区为一个分部，其它还有几个分部，你们是属于‘滇西挺进纵队’第四分部，由你和老邓以及老胡等人负责”。开始他要我们这部分去配合打一平浪，打下一平浪后就守住一平浪。我不同意，我讲了“八团在下关的工人被‘四·二零’吃掉了，要先打下关”。他说：“打下关已在计划里面了。不先打一平浪楚雄解决不了，楚雄解决不了一平浪也守不住。”沈参雄还说：“打了下关后再把八团的人员留些在下关，带些人配合去打楚雄，然后到一平浪守住。”他当时答应回去同王守库研究一下再说。接着贾玉玺又告诉我：“炮派准备在解决滇西问题后，集中力量进攻昆明，把‘八·二三’全部干掉”的一个计划。他说：“那时整个昆明市区都是炮派的，等健民回来日子就好过了，天下就是炮派的了，今后健民可能是革命委员会付主任，林亮将来当个省长不成问题，李毅最低是个付省长，侯良辅是个书记处的什么干部我没有听清楚，王守库当个交通厅的付厅长。国祯你尽管干吧！今后你起码还不是个科级干部。俗话说，‘炭热是火，酱咸是盐’，咱们好了大家都好，咱们不好大家也好不了。”又叫我趁此机会把八团的人从下关拉上来好分配工作。根据派的指示，元月十号在西山党校开会决定了去下关的人，十号王守库叫李仁铸找我去谈话，因为我去晚了王守库不在了，就由下关“大联合”李仁铸、邓国栋转告我说：“派里同意你的意见，先打下关。”接着我去找到了焦云力，他又给我交待了任务，叫我“同李炎带的人一起出发，配合李炎先拿下元谋、武定，再去下关。”还叫我“这次带回一万支枪更好。”十一号我们就同李炎带的人一起出发了，抢了元谋武装部的武器以后就直接到了下关跟“大联合”一起组织了“滇西指挥部”，和“大联合”一起打了下关。按照派里的计划，原来决定我们打了下关再去打保山，然后回头打掉永平。后来打完了下关孔敬文就接到上面打来电话叫赶快停火。因为在昆明时沈参雄规定过，一听到“停火”就是个暗号，就是叫你们赶快往回撤。所以我们听到“停火”的通知后就决定赶快离开下关回昆明，后来到了下关沈参雄、贾玉玺来了，他们对中央发觉“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怕得要死，对我说：“你死也不要承认有‘滇西挺进纵队’。”并叫我不交枪，根据陈康的命令，停止待命。他还对我说：“中央指示要抓你，不要出

面了，叫其它人出面活动。”“现在我们的情况汇报不上去，你赶快组织人写出材料向中央汇报八团的情况。”贾玉玺还来信说：“要是不行你就跑掉，以后再到北京告状。”

第二个问题：我是怎样蒙蔽群众的？为什么要蒙蔽群众？在当时人家蒙蔽了我，我又蒙蔽了大家。我没有认识到是坏事情，贾玉玺在信中不叫我外传，叫我看完就烧掉，我也就照办了。当时我认为是打老八不能说，怕暴露了炮派的计划。

沈参雄给我讲完后也说：“不用向工人传达，别叫老八知道了。”说完后我到了党校就没有传达，临到下关也没有讲，光说下关打的厉害，住苍山饭店的四百多人都被赶出来了。要我们去给下关解围。用这个办法把大家蒙蔽出来了，当时也没有认清这是反动的。所以到了下关我也没有讲这个问题，到了吉山坡冲击解放军是我叫冲的。在当时不听解放军的话，还认为个人是对的。没有认识到是错误的，更不承认也不相信中央的指示。因中毒太深了，老是认为是李成芳的保皇兵，三十七师是支持老八的。因此对中央、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也不相信，所以走到了党和人民的反面。

到了一平浪以后，在派里头头的策划和指使下，说什么：“‘滇西挺进纵队’你死也不要承认，承认了就成了反革命组织。枪无论如何不能交，一切听从派里的”。他们说：“这些都是三十七师的，都是老八观点的，并不只是拦你们八团，而且是要消灭整个炮派，无论如何要顶住。这些军队要搞政变，文件是假的，陈康没有点头。”贾玉玺甚至说：“割头也不要承认有这些事情，看他能怎么办？”听了这些人的指示，思想中毒更深，我也就用这些话来蒙蔽大家。沈参雄还叫俺拿张力雄的指示当作整材料的提纲。当时我就想办法把工人稳定下来，一切听从派的指示。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成了对立面，不管怎么讲，就是不听，并且说：“要收枪叫云南军区来收，你们收是交头不交枪。”

这是我对抗中央的具体表现，也是对抗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具体表现，这是自毁长城。因此我犯了罪。我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来对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对抗中央指示。

第三个问题：我为什么执行黑指示那样积极卖力？

第一，由于个人长期不学习，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阶级斗争中，看不到敌人的阴险狡猾，也没有认识到赵健民、侯良辅、林亮这些大叛徒、走资派。只看到他们是炮派几十万人的核心常委，又是所谓的革命干

部，中央都挂着号的人，又是山东老乡。所以对他们非常相信，对他们的黑指示，如同圣旨一样，忠实、积极的卖力执行。

第二，个人思想落后，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私字在头脑里作怪，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处处为了讨好上司，就蒙蔽工人流血卖命。我心想，将来运动后期，这些人掌了权，当了官，也忘不了我姓李的，说不定，现在出点力，讨点好，得到这些人的好评，将来给一个一官半职的官做一做，或者弄个出力不多，拿钱不少的角色干干。讨好了这些人，起码将来回山东时能写个好鉴定带回山东去。特别是贾玉玺说“赵健民回来后，你李国祯起码也是个科级干部”以后，我对执行他们的黑指示就更加积极卖力了，光想升官发财。我为什么要保王洪奎，也是为了个人私利，因为他是俺一个专区的主要负责人，将来回山东能在他的手下找个好工作干。总之，个人成了尖尖头，只要有利于我就钻，不利我就不沾边。第三，再加上小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为了个人将来的私利和一派的私利，什么人民的利益，什么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统统抛在一边。不是党性高于一切，而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事，而是一切按照派里的指示办。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而是忠于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等走资派和一些坏炮头。因此才对抗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对抗中央指示，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才混淆了敌我界限，将革命群众当作敌人，将大叛徒、走资派、坏炮头当作恩人。认敌为友，执行他们的黑指示，包庇他们；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敌人走一条路，唱一个调，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多少受我蒙蔽的八团工人掉了脑袋，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犯下了滔天大罪，走到了党和人民的反面。我有罪，今天我低头向党向人民认罪。

我经过各位首长的教育和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使我深刻的认识到，“滇西挺进纵队”的一举一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滇西挺进纵队”的所作所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大叛徒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和炮派坏头头利用我借刀杀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为，是这些大坏蛋耍阴谋，放暗箭，叫我们自己杀害自己的阶级兄弟，是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妄想消灭共产党，消灭贫下中农，消灭革命造反派，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我要向党，向人民积极坦白交

待我个人的罪行，向人民低头认罪，交待“滇西挺进纵队”的所作所为；彻底揭发大叛徒赵健民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坚决和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和炮派坏头头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接受党和人民的处理。 李国祯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李国祯第二次在×××揭发、控诉、批判“滇西挺进纵队”大会上的检查交待 我有罪，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各位首长请罪，向大家请罪。工八团参加“滇西挺进纵队”的人员，犯下的错误和犯罪的行为，我要承担一切责任。我要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交待，争取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处理。 我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我已认识到是谁把我们推上犯罪的道路，是赵健民、林亮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我们陷进了反革命的泥坑以后，又是谁挽救了我们，是恩人毛主席，是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内心不由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在毛主席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教育帮助下，我要回头是岸，重新做人。我要揭发出云南地区，以大叛徒赵健民、陈康、张力雄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对我们的陷害，肃清他们的流毒，坚决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消灭在汪洋大海之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要彻底和陈康、张力雄、赵健民清算这笔血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过去我在大叛徒赵健民和炮派某些坏头头的操纵下，欺骗蒙蔽大家，在滇西、在下关干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把大家推到了武斗第一线，跟我一道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上。今天我再一次向大家交待：我是怎样执行大叛徒赵健民、侯良辅、林亮和炮派沈参雄、贾玉玺、王守库等人的黑指示，蒙蔽大家，成立“滇西挺进纵队”和“滇西挺进纵队”的策划、组织过程，以及“滇西挺进纵队”的行动计划，和在下关犯下的罪行。同时对我个人的罪行作检查、交待。 第一个问题：关于“滇西挺进纵队”的情况。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份人，攻击一部份人；或者借题发挥，

“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正当云南省文化大革命不断的取得胜利的一片大好形势下，窃踞在省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眼看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将土崩瓦解，就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策略，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以各种面目出现，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一次又一次的大武斗，让群众互相屠杀，转移斗争大方向，疯狂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妄想破坏文化大革命，为维持他们窃取的大权。“滇西挺进纵队”就是大叛徒赵健民、侯良辅、林亮等和炮派某些坏头头，为了屠杀群众把云南地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而组织、策划起来的。也是赵健民、侯良辅、林亮混入炮派后，亲自组织、策划、亲自操纵、指挥炮派的大武斗中，一个重要的计划，“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也是赵健民一伙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攻打“11·30”以前，贾玉玺就写信告诉我。最近林亮向下面各专、县来的人作了翻查，作了个形势报告。根据几个老头的意见，当前形势对我们炮派很有利。中央准备在明年春节后解决云南问题。炮派要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打出一个好局面，对老八要由武卫转入进攻，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各个解决。现在昆明炮派力量很大，占的地盘多，完全有力量把“八·二三”赶出昆明。但下边有些地区还是八派占优势，昆明的老八还不断的往下去，扩大他们的势力。如果把老八赶出昆明，怕他们往滇西撤退，卡断了我们炮派上下联系，怕下边炮派支持不住。再说，下边有些地方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连陈康司令员都不知道，都是以老八为主成立的。所以派里决定，在打完“11·30”以后，就解决滇西问题，成立“滇西挺进纵队”。“滇西挺进纵队”，只在内部讲，不往外传，不要叫老八知道了。成立一个“滇西总指挥部”，公开对外。总指挥部的人有林亮、沈参雄、王守库、杨凯和我，总指挥是沈参雄。沉说本来叫你去参加指挥部，后来考虑到你要到前边去打仗，就不参加了。“滇西挺进纵队”总的任务是，要把安宁到保山这一路上的老八全部干掉，扫除障碍，充实巩固炮派。在舆论上，对禄丰、一平浪和楚雄的炮团提出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同时向各专州派出调查组，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解决。（后来我知道向开远派出了五、六十人，是林非带去的。）信上还说：派里这次下决心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把滇

西路上的老八消灭掉，争取炮派都上政府里边来。五团指挥部要紧跟派里决定，坚决执行这一计划，你要赶快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并趁此机会，将八团在下关的人拉上昆明，分配工作。要不然将来见了面话都不好说。贾玉玺还要我们八团住市区的几个连队和西山党校的人参加攻打“11·30”，挽回以前的影响。十二月二十三日，五团指挥部在翠湖宾馆 420 号侯良辅的家中召开了会议。参加开会的有侯良辅、沈参雄、贾玉玺、王守库、李仕行、十团的汤其加、十一团吕敬德等。八团是我参加，还有九团姓王的，七团的不认识。会议表面上是研究工役制工人的工作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为压我们八团参加打“11·30”，解决滇西问题和统一思想的动员会。沈参雄在会上说：“这次我受派里的委托来把派里的意见向大家传达一下，关于工人下厂的问题已向赵健民同志请示了，我们是按照赵健民同志的指示进行分配。对首长的话执行不执行是态度问题，是听不听毛主席司令部的话的问题。”王守库插话说：“陈康、张力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赵健民是革命干部，那个人能不听？只要是一个红炮手，只要是跟毛主席走的人就得听这些人的话，不客气的讲，只要是炮派的人都得听从派里的决定，不然是靠边站，投降老八也行。”沈参雄接着说：“这个问题老王说的对，大家要注意，不能为一个人、一个团，要为一个大派着想，要想到是几万人的问题。”“这次派里准备解决滇西问题，你们几个团都是主要力量，下了厂子的就一动不动了，没有下厂的要配合派里的行动。这次派里的决定，全体红炮手对你们希望很大，都把炮派的胜利寄托在支边工人身上，特别是五个团出身又好，都是棒打不倒的小伙子。”这时候侯良辅插话说：“你们才真正是响当当的左派，没有什么含糊的，就是有点错误，也是前进当中的错误，打架不用怕，不要躲避武斗，不要怕死人。毛主席说：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好人算账，好人打坏人白打。你们这支部队这样纯洁，还有什么可怕的？”王守库说：“打死老八白打，打死你们要算烈士。我王守库敢负责。你们不想一想健民回来了是听老八的还是听老炮的？红色政权是老八掌握还是老炮掌握？”沈参雄说：“根据各团情况，今天讨论一下怎么办？表一下决心。”当九团代表表态后我就表示：“俺没有意见，今后叫俺八团怎样干就怎样干，叫出多少人就出多少人，以前没有按派里指示行动是错误的，俺代表八团作检查。”侯良辅说：“你们八团住在西山，还带来下关十四军的人，他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宣传队。”他说：“他

们能宣传什么?都是李成芳的保皇兵，是梁中玉搞的鬼，不行，得赶快发动工人把他们赶走，换上云南军区的。我给你们八团几门炮，支在西山，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李仕行接着说：“你们八团不下厂不对，听军管会的话，住在西山有吃有花，这是中了糖衣炮弹，受了蒙蔽。赵健民给你们留的都是很好很重要的厂子，要搁在以前，你们是进不去的。”十团汤其加马上挖苦说：“我看八团是孬种闹革命，屈服了斗争。”俺听了很生气，跟汤其加吵了起来，会就这样散了。散会后，贾玉玺还写了个保证书，叫以我们八团的名义在新华山广播了。过了两天就打“11·30”，我们八团住在市里面的三个连队都参加了，打得很凶。住在西山党校的也去了十几个人，由我领着守马利山头。

今年元月三日，林亮在他家里亲自对我说：“派里准备解决滇西问题，要去2000人，你们八团去200~300人。解决了滇西后就把你们全部分到工厂里去。如果不把滇西这条路保住，老八失守昆明后肯定要往滇西撤退，所以派里决定我们要早下手。我们完全有理由，因为老八要破坏滇西这条路，我们是去保护，中央肯定是会支持我们的。”要我回去作好准备，等待派里通知。元月七号在新华山贾玉玺的住处，沈参雄就向我交待了任务。他说：“派里决定解决滇西问题，准备出动二千多人，你们八团要去200~300人配合行动。这次编成几个挺进纵队往外出，不要一起出，就是你带一部份，他带一部份，这个走了那个再走，分散出去，不然目标太大，车子要的也多。”我问哪些单位去?他说：“安宁昆钢一个分部，一平浪、禄丰一个分部，楚雄一个分部，基本上跟打11·30一样，你们八团和西区一起还是第四分部。出去时经过安宁，要在安宁集合，经过编制后再走。”我问派里谁去?他说：“我不去就是杨凯去。你们第四分部由你和老邓(步校的)、胡参谋(步校的)负责，由张炳林给你们调车。”他要我们先去配合打一平浪，打下一平浪后守住一平浪。我不同意我们先打一平浪，我说：“八团在下关苍山饭店住的四百人全部被四·二零吃掉了，有几个连队很着急，我想先去打下关。”他说：“打下关已经在计划里边了。你要打下关也可以，我再和王守库研究一下，看看先解决哪边有利，反正一平浪守不住楚雄就打不下来，楚雄打不下来，一平浪也守不住。”我说：“要拉人守一平浪也得从下关往上拉。”他问：“下关有多少人?”我说：“有一千人。”他说：“可以嘛!打完下关拉五百人到一平浪，留五百人在下关。下关武器不多，到了那里很好的和“大联合”商量，

抓紧时间打完了回头配合打楚雄也好，这样完全可以。等我回去和王守库商量一下，看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贾玉玺还对我说：“‘滇西挺进纵队’这只是内部知道，不能传出去。解决了滇西问题就集中力量消灭昆明的老八，到昆明大会师。那时整个昆明都是炮派的，等赵健民回来日子就好过了，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赵健民可能是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搞不好还是主任，林亮将来当个省长不成问题，李毅最低是个副省长，侯良辅是书记处的什么官我没听清，王守库还不是个交通厅副厅长。国祯你好好干吧，将来起码还不是一个科级干部。俗话说：‘炭热是火，酱咸是盐。’趁此机会，把八团的人从下关拉上来分配工作，咱们好了大家也好，咱们不好大家也不会好。”

根据派里的黑指示，元月九日我就先在西山召开了干部和服务员会议，研究了去下关的人。在会上我欺骗大家说：“下关打的厉害，‘四·二零’把我们住苍山饭店的四百多人赶出来了，打死了我们八团很多人，抢走了全部东西，我们要到下关解危去。”蒙蔽了大家。最后确定跟我去七十六个人。十号，王守库派李云柱找我去谈话，因为我去晚了，王守库走了，就由下关“大联合”李云柱、邓国栋转告我说：“派里同意你先去打下关，并决定十一号出发。”后来我又找到焦云力，他叫我同李炎带的人一起出发，配合李炎先拿下元谋、武定再去下关，回来时带回一万支枪。他还叫李炎到电线厂给我找了两门 120 迫击炮带上。从焦云力那里回来以后，我到云南军区三六七医院找到医院政治处主任王炎峰，向他说：“跟沈参雄说一声，我上下关去了。”王说：“派里的这个计划我早知道了，你们去打下关我没有意见。打完下关再配合打楚雄也不晚，下关最多一天一夜就能解决问题。下关是个要地，不好打，要多带炮，要采取近战夜战的办法，打就要狠打，要打赢。”王问我去多少人，我说去七十七人，王说：“还有哪里要去？”我说：“王守库说十二个总站全动？”他说：“哪里用得着那么多的人？你们和下关炮团配合好就行了，你们走后我和沈参雄联系一下。”我说：“下关没有武器。”他说：“武器到元谋武装部找部长赵光灿，叫他支持一些。（他当即写给我一张纸条，上写：赵光灿、王炎峰）到了下关还可以去找军分区魏司令员，或者找姓支（还是姓付的我没听清）司令员，想办法解决。清华洞的仓库战备武器仓库不能动，民兵武器的仓库可以动。打完你如果不回来就写封信给我。”打完下关后，我向工人说：“首长叫拿二号库。”我们拿了一号库，一号二号库是我自己加的。当晚熊奎老婆打电话给我，

她说：“你去打下关很好，一定要把下关给我打下来，把滇西这条路打通。”她以前曾说过：“住几百人在市里，我给你安排。”根据王炎峰的指示，第二天上午我们还到海口找刘家帮要五号炮，因五号炮已被拉到一平浪去了，刘家帮不在，未拿上。通过各种准备后，我于元月十一日下午带领八团七十七人编成九个班，配合李炎带的“红交兵”两百人从昆明出发，乘坐汽车，携带武器及两门一二零迫击炮，绕路到元谋，抢了元谋武装部的枪支交给元谋炮派。李炎带的“红交兵”和十团的人留在元谋。十三日我们七十七人和下关“大联合”的五十余人又经南华、祥云，于十四日早上到达下关。下关“大联合”早已知道我们要去，都在等待迎接，并安排了吃住。元月十四号中午，在下关总站武装部见到了一个军人，曹跃伦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参谋长。”这个参谋长小个圆脸，山东口音。问我是不是派里叫来打下关的？还问了我昆明的情况怎样？我回答后他对我说：“‘四·二零’惨无人道，把苍山饭店打的很惨，你们八团有个工人还被‘四·二零’抓住后用炸药崩掉了。”后来我说，我要去找孔敬文。他说：“你去吧，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解决下关的问题。”当天晚上我就在“大联合”开会，研究打下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主要的有我、曹跃伦、孔敬文、冯殿英和支左委员会的殷丰年，云南省军区的干部吴运学，还有大理军分区的一个干部。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以“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总指挥部和三个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部的成员由五个人组成，孔敬文是总指挥，我是工八团这个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然后由三个军人按着地图分配了攻打下关的任务，规定了攻打下关的路线、时间和信号，以及如何传达动员等问题。十五号孔敬文向我传达了沈参雄的三点指示：1 紧早不紧晚，抓紧时间打下关；2 打完下关市后繁荣市场、恢复交通；3 整顿组织。一切准备完成后，于十六号早上各路就按照总指挥部的规定向“四·二零”派发起了武装进攻，一直打到十七号下午，把“四·二零”全部打出了下关为止。在打下关这几天，我看到参谋长一直住在总站武装部楼上，经常和孔敬文研究进行指挥。十六号下午我回到总站武装部跟孔敬文和他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他向我了解打到什么地方了？我说：“打到市委会去了，都还没有吃饭。”他马上对孔敬文说：“一定要叫后勤跟上，把饭送上去，要安排好。”十七号我打完黑龙桥回到总站武装部，看见有七、八十个战士正在换衣服（便衣换军衣），参谋长在那里叫那些战士赶快换好

衣服就走开。走的时候冯殿英还说：“走什么，这不很明显吗？将来有了问题还能跑得了。”我听说这些战士大多数是军分区的，都参加炮派那一路打了。殷丰年当时是住在面粉加工厂楼上，打下关那几天，不断到总站武装部楼上和参谋长联系。我还听魏参谋长在“大联合”抢枪方面还出了一把力，不然“大联合”到清华洞抢枪不会那么顺利。

第二个问题：“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带领“滇西挺进纵队”第四分部所属八团人员和下关“大联合”一起武装攻打下关“四·二零”派以后，又在下关实行了大抓、大杀、大抢，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危害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在下关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流血惨案，犯下了滔天大罪。

在下关一是大打：从十六号早上起我亲自指挥工八团的部份人员从打马车社开始，打了东风旅社、向阳饭店、百货公司、新华书店、黑龙桥，一直打到穿心古楼。配合下关“大联合”和炮团把“四·二零”全部打出了下关市。在攻打中双方都打死了一些人，并且随便打炮，打坏了许多房屋，炸死了不少群众。打炮是殷丰年和大理军分区的一个军队干部指挥的，我派了八团人员打的。

二是大抓：十九号打完下关后，“大联合”派出大量的人员到处搜查抓人，我也在穿心古楼下边把八团人员集中起来，然后分成小组，命令他们在黑龙桥至滇西大学一带挨家挨户的进行清乡搜查，并叫他们要搜查严格一些，凡是“四·二零”的人统统送给“大联合”处理。结果他们不管老的小的一齐都抓，把成批成批的群众送到金沙林勘和新建市医院等地分别关押起来。

三是大杀：在抓人的同时，“滇西挺进纵队”中我们工八团和“大联合”的某些人还惨无人道的大肆屠杀革命群众。据我知道真正在武斗中双方打死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打完后被抓住枪毙的。仅在十七号下午打完后，我从穿心古楼回到总站的一路上就看见枪毙了三十多个，真是遍街横尸。有的是由坏人操纵指使杀人，有的是图财害命杀人，还有的趁机报私仇杀人。例如我派去搜查的十连服务员蒋建荣带领工人在古楼上边一个院子里指挥工人并亲自动手把几个“四·二零”的伤员全部枪毙了。十七号在古楼附近我还亲眼看到我们工八团六连的张延会抓到“四·二零”的三个群众，在大街上就用冲锋枪打死了两个，第三个在他开枪时往我身边躲被我挡了一下才没有被打死，打伤了胳膊。看见“大联合”的马永士在古楼那边枪毙了一个群众。“大联合”在武斗期间还发动民兵和派人在新桥前边打伏击，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不少“四·二零”逃出去

的群众，他们还派人去点名枪杀，被抓的群众除此以外，还把“四·二零”的一些群众逼上苍山冻死饿死，跳洱海淹死。杀得下关市一片白色恐怖，甚至鸡鸭猫狗都不能生存。

四是大抢：打完了下关以后，有的人趁搜查之机，大量抢劫私人的财物，有的还明目张胆的抢劫国家财产。例如：我就派杨安胜等人开着汽车去抢了六头猪，下关“大联合”的就抢得更厉害，我看见他们将国家的东西抢来，成车成车的拉进总站。我们八团的很多人都抢得衣服、单车、手表等，据我亲眼看到的抢来的单车估计就有十来辆，从下关逃跑时都送了亲戚朋友。有的还把抢来的水果糖给我吃，把抢来的手表和现金交了一些给“大联合”。由于几天的大打、大抓、大杀、大抢，严重破坏了国家财产，使工厂停工，市场停业，交通中断。打的数万群众得不到安身，失去自由，杀的到处是孤儿寡妇，数百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弄得下关地区到处是枪声、到处是哭声，一片凄惨景象，就象当年俺们山东来了还乡团和遇到日本鬼子大扫荡一样。这些都是大叛徒赵健民、林亮之流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组织“滇西挺进纵队”，挑动群众屠杀群众，借我们贫下中农之手杀我们贫下中农和工人群众自己的结果。也是我在他们的操纵和指挥下蒙蔽大家犯下的滔天罪行。

第三个问题：我蒙蔽群众，对抗中央指示，对抗解放军。

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完下关后还要打保山，回来打掉永平。后来刚打完下关，就接到派里的电话，说陈康司令员叫赶快停火。因为在昆明出发前沈参雄给我规定过，他说：“一听到叫‘停火’就是叫你们赶快往回撤，这是个暗号。”所以我听到“停火”的通知后就赶快离开下关返回昆明，这跟在昆明炮派打东风商店，打“11·30”，打“东方红兵团”和打“1·26”兵团时一样，也是打了几天几夜不见陈康有什么指示，每次刚一打完他就来电叫立即停火，炮派更大肆广播“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我们坚决拥护。”我看我们的行动是陈康司令员亲自掌握的。元月二十二日，当我们准备撤回昆明时，四十二师张副师长找到我，向我传达说：“昆明空军崔政委传来电话，中央指示‘要八团就地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接到通知后我就同孔敬文研究怎么办？孔敬文说：“枪我们不交，要交也要到昆明才交，如果硬是要交，四十二师必须派人护送我们到昆明。”用这个借口拒绝交枪。后来十四军又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叫交枪，孔敬文又和我商量，他说“你把吊槽抢来的枪交给我，我打个条子给你，将来就说枪

已经交给‘大联合’了。”为了蒙蔽群众，对抗中央指示，我说：“行！”我就欺骗大家说：“‘大联合’枪少，怕‘四·二零’以后反扑，我们要支持‘大联合’一些武器。”叫各连交出了三、四十支旧枪，同时对十四军说：“让我们研究研究中央的指示再说。”欺骗大家急忙逃往昆明。到了吉山坡石门坎地带遇到执勤部队后，执勤部队又再次传达和宣传中央的指示，要我们八团交枪和交出坏头头。我仍然继续欺骗大家说：“解放军是李成芳的保皇兵，中央指示是假的。”并指挥大家抢了执勤部队的枪支，指挥人和汽车冲开执勤部队的阻拦逃到了一平浪。元月二十三日我们刚到了一平浪，沈参雄、贾玉玺就先后来到了一平浪，在干海子沈参雄传达了陈康、张力雄的电报指示，陈康的电报内容是：“听说你们在下关做的情况很不像话，现在：(1)原地待命，不要动，动要经过批准；(2)赶快弄清情况等待调查落实；(3)听候中央命令。”沈参雄说：“就按陈康的指示办，队伍住在干海子原地不动，枪不能交。”他还叫我们向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炮师”群众同他们辩论。接着他又念了张力雄的电报。听了后我觉得不符合事实。沈参雄说：“那你们就把张力雄来电作为提纲写材料报中央，说十四军谎报军情。”由于他们对中央发现“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怕得要死，当天晚上沈参雄两次对我说：“你死也不要承认，就说‘滇西挺进纵队’这事没有。”二十四日早上沈参雄刚走，贾玉玺就来向我传达了派里的三条指示：(1)听陈康的，住在一平浪煤矿，原地待命；(2)沈参雄连夜回昆明向陈康、张力雄汇报；(3)武器不能交。在吃早饭时他也说：“‘滇西挺进纵队’这事割头也不能承认，你承认了我们就成了反革命组织了。”晚上派里还打来电话说：“文件(指省军管会通告)是假的，陈康没有点头，枪不交。”二十五号贾玉玺写来一封信，再次叫我割了头也不要承认有“滇西挺进纵队”这些事，说：“你要是承认了那就成了反革命组织。要是不行你就跑掉，到昆明来我想法把你送到北京去找陈康解决，就说是三十七师谎报军情。”他们还派代表张闯对我说：“要坚持住，不要怕，就是全派打成反革命也要支持你们八团。”还在演出的大会上也向工人说过。根据陈康和派里的指示，我就对大家说：“‘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谁也不要承认，枪也不能交，交枪就等于交命，交枪就等于承认了‘滇西挺进纵队’。”并且我也认为省军管会的通告、解放军传达的中央指示是假的，心想如果中央有指示陈康为啥还叫我们听候中央命令，派里也说陈康没有点头。所以我

叫大家不要听解放军的，说：“这些兵都是三十七师的，是老八观点，他们见我们的枪好，要收我们的枪给老八，这些兵都是李成芳的保皇兵，要搞政变”等等。继续蒙蔽大家抗拒中央指示，不交枪，并且调整充实了指挥部，重新组织了武卫组、材料组、谈判组和后勤部，把大家分配到山上占领了工事，我对大家说：“要是解放军文的来就把他们推回去，要是解放军开了枪就和他们干。”要大家对解放军说：“要收枪就叫云南军区来收，你们来收是交头也不交枪。”我由于听了炮派沈参雄、贾玉玺等人传达的陈康指示和炮派的指示，我受了他们的蒙蔽又来蒙蔽大家，一直抗拒执行中央的指示，对抗解放军，不交枪。二十七号曹跃伦带的人在干海子学校里面先向解放军开枪，打起来后我在后边山上又下命令给机枪射手王洪坤，叫他朝解放军打。我自己受坏人操纵走上了对抗中央，对抗解放军的反革命道路，也把大家推上了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把枪口对准解放军的道路上。这是我在下关犯下了大罪以后死不觉悟再次犯下了滔天大罪。

李国祯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假象的炮制者、真相的澄清者：原“滇西挺进纵队”（工八团）宣传部长马自明《关于所谓“滇西问题的真象”的真象——用《滇西挺进纵队》的犯罪事实驳“一平浪事件”的无耻谎言》 “滇西挺进纵队”于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违抗中央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的指示，由下关回窜到一平浪煤矿之后，坏头头李国祯根据某些人的“指示”和策划，重新组织了武卫、材料、后勤、谈判四个组，准备负隅顽抗。 为了给“滇西挺进纵队”对抗中央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制造舆论，李国祯亲自向材料组布置，写出了“公路八团6·29战斗兵团声明”、“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37师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感谢信”、“告全省人民书”、“公路工程八团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汇报提纲”等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我起草的。这几个材料中的主要一篇即“汇报提纲”被收在一本取名叫“一平浪事件”的册子中。这本册子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毒草集。我的这篇材料是一株大毒草。现在用的题目是：“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内部汇报材料”。 “汇报提纲”这株大毒草，当时是根据李国祯的授意泡制出来的。经过大量的揭发和李国祯的坦白交待，现在才知道实际上李国祯是依照张力雄北京来电精神和沈参雄的暗示作为提纲的。在这两篇大毒草中，用尽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手法，

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为“滇西挺进纵队”开脱罪责。我的这篇大毒草抛出以后，被“滇西挺进纵队”的策划者、组织者、操纵者们视为至宝，在我的谎言之上再行造谣，使它结构更严谨，词藻更狡猾，内容更离奇，作用更迷人，更富有欺骗性，以此上欺中央，下瞒群众，一些派性严重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也把此当作救生稻草，捞来攻击别人或为右倾翻案提供炮弹，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也迷惑不解跟着上当。总之，它在社会上流毒甚广，造成恶劣影响，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为当了辩护士。三个多月来，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下，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滇西挺进纵队”人员对“滇西挺进纵队”所犯罪行的揭发、控诉、批判，又通过坏头头李国祯的几次交待，使自己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有所提高，对“滇西挺进纵队”的内幕有所了解，对“滇西挺进纵队”的所作所为和反革命性质有所认识。我十分悔恨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改造不好，对毛主席不忠，使自己受走资派和坏人的蒙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现在，我要翻然悔过，重新做人，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因此，我有责任对“滇西挺进纵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加以揭露，有责任把由我起草又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加工而颠倒了的事实颠倒过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澄清是非，消毒除害，以正视听。以此作为自己立功赎罪的表现。

“汇报提纲”是在元月二十六日晚上出笼的。当天晚上派里来人，急急忙忙地对李国祯讲：“派里要你们八团今晚马上写材料，连夜送昆明，坐明天早上八点的飞机同派里的代表一同去京。”按照他们的要求，李国祯提出五个方面作为提纲。他对我讲：“你就根据我说的这几个方面马上动手写，四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出来。”开始李国祯准备叫朱时雨去昆，第二天他没有去，由王永坤带到了昆明。就这样，这样一个从头到尾，颠倒是非，说谎造谣，欺上瞒下的“汇报提纲”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去了。其是罪该万死！

下面，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事实真象，对我起草别人加工的“提纲”中的若干主要错误加以批驳。（一）究竟有无“滇西挺进纵队”存在？首先必须说明，在我所写的“提纲”原稿中本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可是，那些“高明”的修改者们竟然在“提纲”的一开始，就矢口否认“滇西挺进纵队”的存在。“提纲”中说：“他们以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等罪名强加在我们的头

上。”“我们根本不知道‘滇西挺进纵队’。”“……。”“滇西挺进纵队”是强加的吗？虚构的吗？不！“滇西挺进纵队”就是“滇西挺进纵队”，人证事证俱在，赖是赖不掉的。“滇西挺进纵队”不仅有，而且成立的很早，很完整，很秘密。据亲自和“滇西挺进纵队”的策划者多次接触，深知内幕的李国祯交待，“滇西挺进纵队”就是大叛徒、大特务、走资派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和炮派某些坏头头，为了屠杀革命群众，把云南地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而组织、策划起来的，也是赵健民、林亮、侯良辅混入炮派后亲自组织、策划、操纵的。

“滇西挺进纵队”的出现，是赵健民之流蓄谋已久的大阴谋。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攻打“11·30”以前，炮派就要对八·二三派由武卫转入进攻，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各个解决，准备把八·二三派赶出昆明。但是他们怕八·二三派退出昆明后撤往滇西，卡断了自己的上下联系，于是就决定在打完“11·30”以后，就着手解决滇西问题，成立“滇西挺进纵队”。李国祯还交待：“滇西挺进纵队”只在内部讲，不往外传，不要叫老八知道了，成立一个“滇西指挥部”公开对外。指挥部的人有林亮、王守库、杨凯，总指挥是沈参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滇西挺进纵队”李国祯和“大联合”、孔敬文不是在下关也用“滇西指挥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三个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臭名昭著的通告吗？

中央发现并着手处理“滇西挺进纵队”问题时，我们回甯到一平浪的当天晚上，由昆明专程前来的沈参雄就两次对坏头头李国祯说：“你死也不要承认，就说‘滇西挺进纵队’这事没有。”专程由昆来的又一个头目贾玉玺在传达炮派里的指示时，也再三叮嘱：“‘滇西挺进纵队’这事割头也不能承认，你承认了‘滇西挺进纵队’，就是承认我们是反革命组织。”再妙不过了，一语道破了全部问题的实质。有无“滇西挺进纵队”，“滇西挺进纵队”的策划者、组织者们了解的最清楚不过了。为什么他们要否认，而且在有关的宣传材料中一有机会就首先否认？这是他们进行的反革命勾当中最要害、最要命的关键问题。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慌的要死，怕的要命。为了逃脱历史的审判，赖掉罪恶勾当，他们在不承认“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名称的同时，玩弄权术，施展花招：“我们元月十号派出七十七名工人前往下关，路经元谋、武定、永仁、南华一线”，企图与省军管会通告中指出的“于元月二日出发，经禄丰、一平浪、楚雄……”进行诡辩。须知，你们所干的事是密封不住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这次“滇

西挺进纵队”出动解决滇西问题，有数千之众，分成了若干个分部，采取分期、分批、分路，分散出去的办法，以减小目标。我们工八团仅只是第四分部的一部分。应当指出：八团七十七人和“红交兵”、工十团两百余人是于十一日下午从昆明出发，途经元谋、武定、永仁、南华到下关的。但不等于“滇西挺进纵队”的其它部分没有到禄丰、一平浪、楚雄。他们不仅到了，而且在舆论上以“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在那里干了许多坏事。而省军管会通告上指出的元月二日出发，经禄丰、一平浪、楚雄，正是指的“滇西挺进纵队”这个整体。（二）是谁在下关挑动武斗，政治目的何在？“汇报提纲”歪曲和捏造事实，力图把“滇西挺进纵队”对下关的武装进攻，说成是被迫的自卫、力图把挑起武斗和出现反革命武装进攻的罪责强加到与自己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身上。甚至强加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身上。“提纲”中说：“我们遭受了种种迫害”，“面临威胁中”，“面临被消灭的危险”。“对方每日每时、每时每刻都计算着攻击我们”，“十四军开给四·二零一万支枪的条子”等。因此，“我们不能赤手空拳，等着被消灭，我们和下关‘大联合’联合在一起_拾了解放军枪近 400 支”。特别突出的是，在“四·二零”攻打苍山饭店问题上大做文章，大造舆论，把对方说成是“灭绝人性”，“大肆屠杀”的刽子手。事实是怎样的呢？

“四·二零”打了苍山饭店这是事实。但绝对不能割断历史事实的始末攻其一点。“四·二零”打苍山饭店是元月六日晚上×点左右，而在这以前的×时八团的部分人员就和下关“大联合”配合首先攻打了农具厂。我们同“大联合”打农具厂就是为拔掉车站附近的这颗钉子，消除隐患，为以后完全解决下关问题做准备的。而“四·二零”攻打苍山饭店，则是为了解农具厂之围，目的显然不同，怎能推卸到人家身上?!“汇报提纲”把“滇西挺进纵队”所属工八团部分人员到下关说成是为了“解救被杀害、抢劫、负伤的阶级兄弟”和“进行慰问”。企图为“滇西挺进纵队”忠实执行赵林反革命集团武装攻打下关，屠杀革命群众的反革命计划开脱罪责。然而事实是：李国祯从林亮、沈参雄等人那里接受了组织“滇西挺进纵队”武装攻打下关等地的任务后，在昆明西山党校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并决定了去下关的人员。为了蒙蔽群众，他说：“下关住苍山饭店的工人，被‘四·二零’赶出来了，他们要去下关为他们解围、报仇，各连选好代表。”这次李国祯交待说：“因八团当时已有一千人在下关，派里叫他们武装

起来，和下关‘大联合’一起攻打‘四·二零’。所以我原来准备只带五、六十人去下关作骨干，后来报名的人较多了，最后上车的为七十七人。”很显然，这七十七人是根据赵、林集团的意旨，为了实现“滇西挺进纵队”如的计划，在李国祯的蒙蔽下，作为攻打下关的“骨干”送下去的，而绝不是去进行什么“慰问”和“解围”的。李国祯带去的七十七人全副武装，并拉着两门大炮，从昆明出发，到达元谋之后，嫌枪少，又抢劫了元谋武装部的全部枪支弹药，然后来到下关。试问，世界上有如此全副武装并带着大炮的慰问团吗？他们这样来到下关绝不是来慰问八团住下关的阶级兄弟的，而是来“慰问”（屠杀）下关人民的。因此，这个新型的“慰问团”到了下关之后，既没有开慰问大会，又没有了解八团人员的情况，而是干了些什么呢？据我所知和根据坏头头李国祯的交待，1 元月十四日中午在汽车总站接受了一个参谋长的接见，并接受解决（攻打）下关的指示；2 李国祯与曹耀伦等人在大联合跟孔敬文等人开会，研究成立了“滇西指挥部”及攻打下关的三个前线指挥部，决定了进攻计划。这次会议，事前谁也没有告诉我，我跟着他们进去，听到了这些内容；3 当晚指示八团住下关人员与‘大联合’一起抢了清华洞 396 库的武器；4 十五日命令十连、十三连抢了吊槽通讯枢纽部的全部武器，亲自勘察确定了炮位；5 亲自抽调并组织十二个攻打的武装骨干班和第二梯队的人员，并作了动员，规定了纪律；6 从十五号晚上起，率领八团人员开始攻打下关，一直打到十七号下午，将“四·二零”派全部赶出下关市区为止。然后又组织八团人员配合“大联合”进行搜家清乡到处抓人，抢东西，甚至公开杀人。这都是众所周知的铁一样的事实。当时所以竭力宣传去下关是为了“了解情况”，“进行慰问”，根本目的是为了掩盖“滇西挺进纵队”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为了把“滇西挺进纵队”武装攻打下关的罪恶转嫁于人。

“汇报提纲”还说什么李国祯带的“滇西挺进纵队”人员到下关后，遭到了四·二零派的武装挑衅，并“勒命我住下关人员一日内撤出下关，否则全部消灭”等等，而事实是，李国祯所指挥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大联合”在下关用了我们国家罕见的，对敌人的手段，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下关部队和革命人民于元月十四日发出了“通牒”，“限令在二十四小时内撤离下关，否则出了问题，概不负责”。正是在这些“通牒”之下，有多少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离开了自己的家门，流落在外，有多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含泪东奔西跑无处存身。

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事实。为了同一个目的，“提纲”还把“滇西挺进纵队”按照赵、林集团的反革命目的，武装攻打下关说成是“四·二零”派“继续围攻，并于十六日主动向我开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和当地受‘四·二零’围攻的‘大联合’派实行自卫还击”，这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事实是：李国祯带领的“滇西挺进纵队”部分骨干人员到达下关之后，立即与八团原在下关的人员汇合并与下关“大联合”一起于十四日组成了“滇西指挥部”，在“滇西指挥部”下面设立了三个前线指挥部，规定第一前线指挥部从马车社、邮电站、东风旅社，沿中心大街、邮电局、向阳饭店、百货公司、黑龙桥往里进攻；一个前线指挥部从下关的南面、东南面往北打；一个前线指挥部跨越 7604 部队营房经新桥由东往西攻。八团在党校和棉毯厂住的人员各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来参加攻打下关。元月十四日开始做了思想动员和组织等工作后，于十五日各自进入战场，当日夜晚开始向市内炮击，十六日拂晓开始向下关发动全面总攻击。

“提纲”却把“滇西挺进纵队”的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动进攻说成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自卫还击’。”实在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三) “滇西挺进纵队”究竟在下关干了些什么？“汇报提纲”说什么“这次武斗双方都有伤亡”，“我们没有开枪打死解放军，根本没有‘毁尸灭迹’”“没有冲击通讯枢纽部”等等。它在把事件的引起嫁于对方组织之后，又企图把这次严重事件说成是双方的一般“武斗”，掩盖“滇西挺进纵队”的罪责。究竟是两派“武斗”还是反革命屠杀？“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用它的行动作了回答，他们的作为完全表明，不同于任何一次“武斗”，而是根据大叛徒赵，林之流的意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血腥大屠杀下关市革命人民的反革命事件，因此手段十分野蛮，惨无人道。“滇西挺进纵队”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一种国民党法西斯式的反革命行动。“滇西挺进纵队”横行于下关，打、杀、砸、抢、抓，无恶不作，使用了大量的炮弹、炸药，炸毁了不少国家工厂和民房，有些房屋被燃烧弹烧为灰堆，有的市民被炸死炸伤。在攻打完之后，又大肆杀害革命群众。通过揭发，有的是图财害命杀人，如九连的白炳发等人见财如命，从两名被俘的群众身上拿去手表和钱财之后，拉到山沟里枪杀了。有的是见机报私仇，由下关“大联合”的点名，工八团的人开枪。有的把群众公开在街上杀害。如六连张庭会，据初步揭发，他一个人即杀害革命群众达四、五人。有的集体屠

杀手无寸铁的伤病员。住在半工半读学校的几名“四·二零”伤员，就被十连蒋建荣和下关“大联合”张××等集体枪毙了。还有的是把群众关进集中营后又拉出来枪毙的。在被杀死的群众中有的被蒙着双眼，有的还举着双手，有的捆着胳膊，真是惨不忍睹。除了大杀，就是大抓。打完后，就开始了所谓“搜抄和清乡”，到处抢劫。每到一地，不问有人无人，先向屋里扫射或者向院里投手榴弹，有的群众就死伤于乱弹之下。数以千计的革命群众在无情的屠刀下高举双手被押送到金沙林勘，新建市医院的集中营，无论大人小孩，手举的不高，就会遭到枪托和铁条的毒打。在那里，他们私设公堂，任意非法审讯和毒打革命群众，有的人被打成残废，有的人被打之后又从楼上摔下来，最毒辣的是，要被抓革命群众向他们“投降”。在大抓大杀的同时就是大抢：“滇西挺进纵队”人员，借搜抄为名，到处翻箱倒柜，大量搜刮公私财物，许多地方被洗劫一空。据胡守义亲自交待检查，他同另外两人在邮电局抢了人民币三千五百元和新手表一个。李国祯还命令杨安胜、宋保田等人开上汽车抢物资局的面粉、猪肉、粉丝、糖、油等。有的人到了医药公司，见营养品就抢，有的见了葡萄糖竟来不及装就双手捧着吃起来了；有的人到屠宰场竟开枪打猪，打死后再用汽车拉回；有的人尚未结婚也无对象，到了老百姓家里把人家女人裤子、小孩衣服抢来；有的抓住老百姓的鸡，把头给剪掉；有的把人家的收音机等给砸烂。总之，他们是能拿的就拿，不能拿的就砸，见狗打狗，见鸡抓鸡，其是鸡犬不留啊！“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所进行的这场大屠杀，大洗劫，使无数革命群众走投无路，入地无门，有的被迫逃往苍山，有的跳入洱海，有的死在被机枪封锁的路上……。风城啊！从苍山之顶到洱海之滨，从大街到小巷，到处是尸体，遍地是鲜血。不少的孩子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不少的父母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儿女，有的失去了妻子，有的失去了丈夫。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有家不能归，有儿女不能团圆。下关的工厂停工了，交通中断了，使解放十八年来的繁荣昌盛的下关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变得一片凄凉，正如某居民委员会大门上写的一付对联：“风城冷寂寂，夜间鬼啾啾”，横批“躲也无用”。这就是下关市革命人民对“滇西挺进纵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控诉和写照。

“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如此大量屠杀革命人民，抢劫民财和国家财产，其罪恶昭著，绝不是“武斗”二字可以掩盖过去的。企图用武斗来抹掉“滇西挺进

纵队”的反革命性质,是徒劳的!要赖掉更是办不到的!“提纲”中说什么“我们没有开枪打死解放军,没有毁尸灭迹”。事实是,元月十七日,解放军战士上街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滇西挺进纵队”的杀人行为,抢救负伤群众。“滇西挺进纵队”组成一帮打手,有我八团和下关的人在一起,朝解放军迎面而来,第一步就恶狠狠的对解放军说:“你们给我回去!”接着朝天开了枪,解放军照例做解释讲道理,豺狼最后下了毒手,重新举起手枪朝解放军打了过去,一位解放军战士应声倒下……,这是铁的事实。“滇西挺进纵队”大量残杀革命人民之后,为掩盖其罪恶,丧尽天良毁尸灭迹,把杀掉的革命群众尸体于夜深人静之时,用汽车一车一车的拉往郊外,倒入一个一个大坑内劈土掩盖,集中的埋在往巍山去的山坡上。这不叫毁尸灭迹叫什么?你们要怎样干才叫毁尸灭迹?总之,“滇西挺进纵队”在下关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

(四) “滇西挺进纵队”如何顽固到底,对抗中央指示? “滇西挺进纵队”顽固对抗中央指示,罪上加罪。但“提纲”则竭力为“滇西挺进纵队”开脱罪责。继续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提纲”说什么“我驻关七零零余人被‘四·二零’中一小撮坏人惨杀打伤,抢劫一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退役前的学习整顿不能进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广大工人一致要求离开下关赴昆明和我团驻昆明人员一起等待退役”。这完全是我们撒的弥天大谎。真像是怎样的呢?“滇西挺进纵队”来到下关后,屠杀革命人民,大量搜刮民财,犯下了滔天罪行之后,在中央着手对“滇西挺进纵队”进行惩罚的时候,而慌忙逃跑的。中央对“滇西挺进纵队”的组织、策划等问题早已发觉,因此,“滇西挺进纵队”在攻打了下关犯下滔天罪行之后,有的人就急忙给李国祯来电话,要他马上“停火”(按:“停火”是沈参雄给李规定的暗号,听到“停火”两个字以后,就是出现问题了,要马上回昆),当时李国祯接到“停火”以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设法马上离开下关去昆明,继续在下关怕摊子不好收拾。元月二十二日中央来电指示要八团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而李国祯接通知后顽固对抗中央指示,召开会议蒙蔽群众说:“大联合武器不够,我们一个连抽出三支枪,从吊槽抢的旧枪单打的给他们,清华洞的不要给,因为枪交不上来走不了,清华洞的去昆明后再交。”以此来对抗中央指示。后来我团工人宋保田又把中央指示转交给曹耀伦时,曹耀伦又当场撕掉,坚决反对。各连交上来三支枪之后应付了一下。

当天下午四点钟就慌忙离开了下关。根本不是“提纲”中所说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赴昆明等候退役”。而是大发横财之后，犯罪逃跑对抗中央。

“提纲”还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说什么：“驻昆 37 师在公路两边山头上架起机枪大炮，分兵把口，持枪拦截，恶狠狠地骂我们是土匪，是反革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边呼打倒陈康、张力雄、赵健民！边用拳头、手榴弹、子弹带、枪托毒打我工人，绑架我三人。”“打伤我十一连工人×××，左腿粉碎骨折，打成重伤十六人，轻伤二十四人，抓走七十余人。”“在拦路时 37 师还抢走我生活车一部，砸烂箱子三十一个，拿走现金一部分，购粮本一户，其它用具一部分。”这一切都是我们凭空捏造。而事实是：“滇西挺进纵队”离关逃跑的路上到达吉山坡石门坎地段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命令来到吉山坡石门坎地段宣传中央指示，要八团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解放军并派出代表与李国祯谈判，李国祯不但不听，反而指挥工人向解放军开枪，拾了解放军的枪支数十支，李国祯还向工人诬蔑说：“这些是三十七师李成芳的保皇兵，中央指示是假的，得坚决冲过去，不冲过去不能走。”在他的指挥下，不顾解放军的重重阻拦，前面用人闯，殴打解放军，后面开车冲轧过去，当即解放军被汽车轧成重伤三人，打伤和闯伤五十余人。“滇西挺进纵队”不执行中央指示，不顾解放军的再三说服，汽车在前跟，人在后拼命的往一平浪方向逃跑，在逃跑时还抓去解放军战士一名。到达一平浪后，李国祯马上召开大会亲自下令说：“如果三十七师再追就下他们的枪，如果打我们就跟他们干到底，有问题我负责。”事实证明，我们在吉山坡所采取的抵抗措施是完全错误的。解放军反复宣传中央指示，我们不听，硬说中央指示是假的，拒不交枪，不交坏头头，一直顽固对抗。是我们打伤和轧伤了许多解放军战士。“提纲”捏造事实，反说解放军骂我们，抢劫我们车辆、物资等等。就是为了否认、掩盖“滇西挺进纵队”，对抗中央，对抗解放军。

“滇西挺进纵队”刚逃跑到一平浪，沈参雄就及时赶到一平浪煤矿与李国祯秘密策划，继续对抗中央指示，命令八团“住在干海子煤矿，原地待命，枪不交。”我们钻进煤矿之后，李国祯遵照沈参雄的指示，便急忙组织了四个组。由武卫组指挥，立即封锁山头，禁止解放军来煤矿宣传中央指示；谈判组轮流与解放军强词夺理，消磨时间，对抗中央；材料组大造舆论，不承认“滇西挺进纵队”，蒙蔽群众，煽动当地煤炮和解放军对抗，保护“滇西挺进纵队”

来反对解放军执行中央指示对“滇西挺进纵队”所采取的措施。以便在煤矿等待所谓“中央指示”来进行绝望的挣扎。

“提纲”说什么“在前阻后赶的情况下，我们进驻一平浪煤矿等待中央命令，而 37 师仍跟踪追击，对我们用武装层层包围，限制我们活动自由，并不断向我们驻地煤矿开枪射击。”“二十七日晚九点多钟 37 师开枪打死炮团两个负责人”，“下午三点 37 师吹起了冲锋号，从学校附近的墙用密集的炮火直射我们的前沿岗哨。”等等。企图抵赖武力抗拒解放军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责。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事实是“滇西挺进纵队”钻进煤矿后，解放军去谈判达数十次都无结果，八团人员在李国祯的指挥下，不但不交枪，不交出坏头头，反而提出“交头也不交枪”，直到进行武力抵抗，走到人民的反面。二十七日的九点多钟当地煤炮数十人到解放军阵地前沿，从解放军手中抢夺武器。解放军给解释：“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是来缴八团的武器，没有你们的事。”而煤炮中的几个服务员不但不听，还继续带领人员从解放军的手中夺枪，并首先向解放军开了枪，当时打死打伤解放军各一名。解放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才采取了有限的自卫还击，这是完全正当的。而“提纲”却造谣说是解放军首先开枪打死了煤炮两个服务员，并否认他们开枪打死打伤了解放军，这是没有根据的，无理的！另据李国祯交待说：“下午三点，曹耀伦带领一部分人员守在校的楼上，解放军走上来继续向我们做宣传工作，要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交枪，而曹耀伦带人一跃而出，首先向解放军开枪扫射，当即解放军应声倒下十余人，接着我自己在对面的山头上亲自指挥王洪奎用机枪向解放军扫射。”解放军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中央指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才坚决实行了自卫还击。而“提纲”却硬说什么“在我八团交枪时他们（指部队）又开枪打死我工役八团三百多人”。这是根本不符合现场情况的。“提纲”的修改者们厚着脸皮造谣。

“滇西挺进纵队”既然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命令实行自卫还击，对其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

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提纲”不管怎样颠倒和捏造，但最终挽救不了“滇西挺进纵队”所犯滔天罪行后，而落于人民法网之命运！（五）

“提纲”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四点所谓“恳切要求”，其中第一点是要求“中央迅速派人前往云南调查情况”。这一部分完全是“提纲”和“声明”的修改者加上去的。在历数了所谓“滇西问题的真像”的真像后，已经不难看出“滇西挺进纵队”是由大叛徒赵健民和林亮等人直接操纵组成，并按其武装消灭滇西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旨行事的。他们在下关等地干尽了坏事，丧尽了天良，犯下了滔天罪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顽固对抗中央的指示，拒不放下武器。所以正像康老说的，它已经走向了反面，它已经成了反革命匪帮。如果需要提出什么要求的话，那只能是这样的一点要求，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要剿匪”。也就是对“滇西挺进纵队”所犯之罪行，严惩不怠，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在一平浪的执勤部队正是坚决按照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做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才是光明磊落的，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提纲”的修改者仍然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提出了四点所谓“恳切要求”，并居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来云南调查情况”。须知中央在做出处理“滇西挺进纵队”的决定和指示之前，就已经对“滇西挺进纵队”的种种问题做了详细调查了解，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这也是人们常识范围的问题。既如此，还要求“中央来云南调查情况”。如果不是“汇报提纲”的修改者们故意虚张声势，给自己壮壮胆子，迷惑群众，就是恶意中伤中央。他们无非是诬蔑中央没有经过调查就“盲目”下达了处理“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指示和命令而已。可见他们为了不顾事实地千方百计的要赖掉“滇西挺进纵队”这笔账，不仅到处造谣一再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还不惜把矛头指向中央，用心何其毒也！现在真像已经大白，历史已经给“滇西挺进纵队”做出了结论。我希望一切革命群众不要再受由我起草，别人加工的“提纲”这篇大毒草的影响，更不要使它再成为为一小撮走资派和坏人的右倾翻案服务的工具。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的时候，处于祖国西南边疆、国防前哨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巨大鼓舞下胜利诞生了！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企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给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乘胜前进的全国广大革命人民。

我们满怀亲切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经受了深刻锻炼的云南省两千三百万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战斗敬礼！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关怀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云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多次作了极其英明的指示，给云南革命人民指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个伟大胜利！

在云南，也和其他地区一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长期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云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从右的和极“左”方面的破坏，终于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保卫国防和

“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立下了新的功勋。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

我们希望，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依靠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为了加强对敌斗争，云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实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的革命团结，军民的革命团结，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团结和各民族的革命团结。要遵照毛主席“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的指示，同危害革命利益的右倾分裂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只要我们加强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和分裂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有重大的意义。希望云南省和全国各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加强工人群众的工作，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阶级，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的大联合，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和首创精神，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的作用。要大力促使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发扬毛主席历来倡导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作风，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知识分子中那种言行不一的坏作风，反对一切两面派的行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革命形势越是大好，一小撮阶级敌人越是要进行垂死的绝望的挣扎。云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加强边防，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要广泛深入地、耐心地、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坚决保护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揭发清查

坏人。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对敌，粉碎幕后的反革命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要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保证革命生产双丰收。

金沙水拍云崖暖。毛主席当年率领红军长征时伟大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进。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云南高原的前程无比灿烂辉煌。我们坚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云南各族英雄儿女，一定会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率领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保卫国防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新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接见时叶群同志在座。（云、贵同志尚未到）

（对刘结庭、张西挺同志）你们夫妻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时我就想见见你们，你们造李井泉的反，你们对，他们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们。他造你们的反，你们也造了他们的反，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是起作用，也可能整死你们。该打的倒不给你打，不该打的猛打。

李井泉这个人不好。我认识他几十年了，他一贯不好，不是一天不好，不是好人，是坏人。前年我在一次会议上狠狠地讲了他。他是不爱讲话的，但讲坏话是很积极的。背后讲坏话是很多的，捣鬼是积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了。大快人心，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党内没有好处，现在还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但是至少把他搞臭了。你们解放出来，这是件好事。

四川七千万人，等于德国人口，比意大利大，比法国大，比西班牙大，在欧洲仅次于苏联。在国内当几个小省。贵州多少人？（答：近两千万）当三个贵州。你们就等于几个省的头头。从战争的观点看，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四川。云贵川主要在四川，无论从东面打来，还是从西面打来，四川都是后方，都是以四川为根据地，对美帝也好，苏修也好，我们的根据地都在四川，工业、粮食都靠四川，

军事需要的东西尽量放在四川。你们要把四川的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

（云、贵同志到）

会开完了，有些同志要见，要见一起见。

（对×××同志）你们去云南，可以起晚吧！最好不要反复，要反复小一点。（答……）调查研究么，人都不认识。

主席讲要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就是团结，这是列宁的话。马克思第一个宣言也是号召团结。这次“九大”，毛主席号召团结，无产阶级赤手空拳，打倒资产阶级靠什么，靠的就是团结。

今天你们在座的同志，我知道不很团结，有的是对立面，有的是半对立面。对立面没有关系么，可以团结起来。过去抗日时期在一起，打土豪在一起，民主革命反封建也在一起，反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在一起。反帝反封建这不是共产党的特点，资产阶级也反封建么！我们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打下基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的职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员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不是个人行动能行的。有种人主张只要打掉一个人就可胜利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列宁反对，列宁的哥哥刺杀沙皇被抓后杀了，列宁认为那条路是行不通的。要团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代替的办法，要解决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要团结起来，唯一的办法是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我们都不是产业工人出身，我们加入共产党，我们的思想就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了，完全从成分上讲就行不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工人，斯大林也不是，他们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但他们思想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为无产阶级服务，决心以共产党纲领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这是社会现象。

你们各省的，今天是云、贵、川，你们实际上是又团结、又不团结，大前提是团结的，但我们又不能自然主义，听取自流，有句话：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科学的，马列主义的，要发扬团结的一面，把不团结的一面克服下去。

革命靠两个方面，一个是革掉打倒的一面，有的用暴力打倒，有的用非暴力的打倒，有的还要把人革掉，靠革，打倒，不革不行，整个人类历史，几十万年

都是革掉旧的，都是靠革，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才进到现在的这种情况，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单靠革这一方面不行，另一方面要靠团结，团结是武器，是力量，一个人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就是靠无产阶级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某些人觉悟不高，他就用不着动武力，他们出兵反而促进我们团结。如果我们不团结，自己打自己，到一定时候帝国主义就会出兵。不团结，对国家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都不利，所以革的第二个方面是团结。这两方面是相反的，人的两腿也是相反的，一个朝这边，一个朝那边，人的手也是相反的，这个大姆指朝这边，那个大拇指朝这边（比手势），这就是矛盾。有矛盾是必然的，要想没有矛盾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让矛盾发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永远有，但是我们要克服矛盾，不能让他发展。不团结就不能斗争，没有团结就没有革命，取消团结就等于取消了革命，就等于帮了敌人的忙。反对敌人，反对走资派，大家都是团结的吧！你们抗日不是很团结的么！打美帝你们不是很好么！打蒋介石不是很好么！革刘少奇走资派的命，革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包下来的，思想上，现在还反动的革命（原文如此，“革命”二字似应删去）这些人的命，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作法，不这样就不好了，革这些人的命是必须的。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头脑搞糊涂了，把对敌斗争用来搞自己，不要自己搞起来，这样就使敌人高兴。小事情不要上大纲，小事情不能以自己的利益来解决。

要马虎的，我们又马虎又不马虎，大问题上不马虎，小问题上就要马虎，马克思说过这个话：就是两个人组成社会，如果没有让步，就不能共为社会，就失去社会性，没有社会性，就是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二个：一个是使用工具，一个是联合。没有联合就不能进行生产，就不能生活，就回复到几十万年以前的那种状况。有阶级社会就有革命，革命就要联合，就要求得本阶级内部的联合。因此，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响应落实毛主席的号召，为着胜利你们一定要团结，无论如何要团结。思想上的差别天天有，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是不一样的，总是不一致的，但我们又需要一致。差别总会有的，但不能因此而大闹特闹。文化革命初期要闹，不闹就革不掉走资派，就不能把他们打倒，就要回到资本主义去。现在是否就干净了呢？革命不能停止，有些基层单位还是有问题，还要延续下去，要把基层搞好，革命还没有完，要夺取全国胜利，要继续搞革命就要团结，特别是上层，你们头头的团结，不团结就是空谈革命，口头革命，不利于革命，破坏

革命，是团结好还是不团结好？我们国家兴旺好还是不兴旺好？是联合起来好还是不联合起来好，还是团结好，兴旺好，联合好。

党性。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表现在内部的团结，不注意内部团结的人是不符合党性原则，是缺乏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的。暂时可以混下去，但迟早要揭露出来。所以要坚持原则，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要和睦相处，不要互相呕气，不要互相挑剔，不要互相牵扯，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给以安慰，成为很好的朋友。同心协力地办事情，革命就能革得好，生产也能搞得好，打仗也能打好。团结不好就搞不好，这样敌人就高兴。我们国家越弱，敌人越高兴。越强敌人就越不高兴。当我们反对走资派的时候，我们挖掉了他们的根子，去掉了他们在中国的内因（原文如此，“内因”似应为“内应”），敌人就害怕，敌人不高兴的事，害怕的事，对我们就是好事情，我们应该高兴，现在我们不能做敌人高兴的事，敌人现在就是希望我们造反的内部分裂，分裂就会使敌人高兴，如果那样，我们国家就不能兴旺起来，战争一来就会出问题，不是要建设一个强胜的国家吗？那么就强胜不了。

现在我们团结起来，敌人就害怕，第一看我们造反，打走资派，敌人就害怕；第二看我们搞联合，团结起来，他们就不高兴。所以我们要团结，要使他们不高兴。

我的意见很清楚，我就是和稀泥，调和，为什么不能调和呢？不和不行，就是要和稀泥，不团结不行，又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而是革命内部。

现在你们管的事业很大，几千万人口的大省，都是几千万人么，贵州几千万？（有人答：两千万）就是贵州小一点，但是也不等于六个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都不小，任务很大，任务很重，伟大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通过种种生产关系，通过漫长的时间，……但人从动物中解放出来，脱离动物状态，（原文如此，此处似遗漏了一段文字。）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靠人的觉悟提高，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上的改变一下子就变过来了，但人的思想的改变就需要很长时间，俄国革命搞了半个世纪，现在还很落后，我们才搞了二十年，破除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旧东西，有个共同特点是私有制。阶级社会五千年很长，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是很短的，资本主义才三百年，更短，可是

要破除私有观念，需要百年，几百年，需要很长时间。大家应该有共产主义精神，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我过去讲过公产主义，再简单说成是“公”字，有的人讲其公，内心大藏其私，最后落得个假公真私。

（××、×××同志到）你们要走了，见一见面。

任何东西都是对立的，统一的。任何对立中都包含统一，一般可以同时存在，只有发展到最厉害，才破裂，现在需要同时存在，我们要消除那种对立。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个试金石。要同心协力，不同心也要协力，我讲过这个话。要风雨同舟，同舟共济么。今天来的同志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不要在小问题上兜圈子，斤斤计较小事，不是共产主义者伟大气魄。要胸怀宽大，为共产主义奋斗，为解放全人类奋斗，这是伟大、光荣的事业，我希望同志们下定这个决心，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自己都对，别人什么都不对，抓住一个小辫子猛上纲，这不对。一就是一，不能把一说成万。二就是二么，蚂蚁就是蚂蚁，象就是象，不能把蚂蚁说成象，见到一说成万就不对。没有反映客观。要正确反映客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夸大，把微小的量夸大为巨大的量都不对。希望同志们不要这样做。小事情不计较，夸大，闹到社会上去（原文如此，似应为：“不要夸大，闹到社会上去”），不要呕气。和睦相处，心情舒畅好，同心协力好，不要呕气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好。革命工作做好，不要去各抓一派。

今天见见面，有些是老熟人，张国华、梁兴初、谭甫仁、陈康、田维扬等同志，有些同志不熟，我不太了解你们的具体事，我也不注意了解你们的具体事，笼统讲一讲。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197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1979年2月27日，国务院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1970年在牧区划定的阶级成份应予推倒，不予承认。)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们省委和军区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学习了十天，今天就要结束了。参加学习的，军队系统有八百四十一人，地方系统有一千零一十人，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一人。这次学习班，认真传达讨论了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四号文件，对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开展了大批判。学习开始时，周兴同志代表省委和军区党委宣读了中央四号文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给我们这次学习带了头引了路，学习期间，大家反复认真地讨论了中央四号文件，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林彪的反革命纲领进行了逐条逐段的批判和大会声讨。参加学习的同志，态度严肃，精力集中，认真钻研文件，积极投入大批判的战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学习、批判，使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并研究了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具体部署，摸索了开展大批判的一些经验，为在全区部队和全省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培训了骨干，打下了良好基础。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一) 对这次学习班的基本估价

大家反映，这次学习班办的好，时间不长，收获很大，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1. 进一步激发了对林彪一伙的阶级仇恨，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更加看清了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大家说：“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一个杀气腾腾、血淋淋的法西斯纲领，是一本地富反坏在的大变天账，是他们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铁证。”林彪一伙恶毒地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使用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特务手段，图谋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真是罪

恶滔天，死有余辜。大家通过对我党五十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的回顾，通过解放前后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大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是我们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林彪一伙疯狂诽谤、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一定要更加热爱毛主席，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到底。

2. 进一步认识到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和重大意义，更加坚定了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大家通过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和他们实施这个纲领的十大罪证，认识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正如同志们说的，林彪一伙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他们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结果只能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大家表示，一定要把中央四号文件传达贯彻好，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决心打好这一战役，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批深批透。

3. 进一步增强了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同志们在批判中，把林彪过去公开的言行和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相对照，更加看清了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最忠”的家伙，原来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笑里藏刀的野心家，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警惕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识别反革命两面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坚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4. 进一步增强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认识到，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总是妄图用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正确路线。林彪一伙更是这样。我们通过批判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批判他们在形势、路线、政策等三个方面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大家体会到，革命的大好形势是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党的政策是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党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大家表示，要通过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自己的“三个觉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这次学习班，虽然有了这些收获，但由于时间短，对中央四号文件的学习，对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批判，还仅仅是开始。学习班结束后，我们要同广大群众一道继续学习，继续批判，一定要把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工作搞好，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深刻认识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重大意义，坚决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四号文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以大量的事实，充分揭露了林彪一伙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滔天罪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批判了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何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认真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的继续和深入，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又一重大战役。认真搞好这次传达讨论，对于彻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全区部队指战员和全省各族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从我们这次学习班的情况看来，要搞好中央四号文件的传达讨论，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必须继续狠抓认识问题。要充分认识到毛主席发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

了毛主席对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信任和关怀，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马、恩、列、斯在同马列主义的敌人作斗争中，总是运用对反面教材的公开批判，来教育党，教育无产阶级，教育广大劳动群众，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马列主义觉悟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拉萨尔、杜林、巴枯宁等假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是这样；列宁、斯大林在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老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叛徒作斗争中，也是这样。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听到有人说在柏林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写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就说过：“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钱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以便声讨这个早已成了“臭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同国内外的阶级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一九五五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发表了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亲自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主要按语，为这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伟大群众运动指引了前进的航向，是我们辨别揭露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武器。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也是将反面材料先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把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发动群众进行反击，使群众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伟大斗争中，也是多次公开发表反面材料，然后进行彻底批判，有力地教育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我们还专门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集，毛主席亲自写了出版说明，深刻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说，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赫鲁晓夫，以及党内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这一次，毛主席又抓住林彪这个大反面教员，不仅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在群众中公布，而且把他们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革命、诽谤领袖的反革命材料全文印发，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以外，全国人民都来批判。这充

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必将进一步从反面教育广大群众，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林陈反党集团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以更加高昂的战斗意志，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有少数同志对广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的觉悟和智慧估计不足，对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流露出某些畏难情绪。一是担心“水平低”，有些问题“讲不清”、“批不了”；二是担心群众“觉悟低”，有些问题“划不清界限”，甚至会“起副作用”。这些担心和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林陈反党集团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帝、修、反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林彪这个反革命纲领如此反动而虚弱，通篇都是造谣和污蔑，有什么批不了的呢？！我们还要特别充分认识到：林彪这个反革命的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剥掉了林彪的一切画皮，把他的叛徒、卖国贼的凶恶面目赤裸裸地露了出来。他们的这个反革命纲领，一经交给群众必将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愤怒声讨和彻底批判。前一段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和这次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先行试点单位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广大工农兵群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智慧，他们批判的很好，很有水平。只要我们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一定能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就一定能够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鉴别能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也有少数同志对把林彪这个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的艰苦性认识不足，流露出某些简单化的情绪。在批判中，下功夫用气力不够，认为这也不值一驳，那也不值一驳，满足于就事论事，批判一般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要把这次大批判的战斗打好，必须满怀胜利信心，集中全力作战，防止简单从事。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他们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才能化毒草为肥料，才能真正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同志们在讨论中说得好：“对林贼的反革命纲领，既要

看到它的虚弱性，也要看到它的煽动性，如果不认真严肃地进行批判，那在客观上就等于扩散毒素。”我看这个话说得是深刻的。我们一定要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积极勇敢地投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战斗。应当认识到，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批判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是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大批判抓紧抓好，绝不能批得不疼不痒。

还有少数同志，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林贼父子已经粉身碎骨，林贼死党纷纷落网，就觉得这场斗争似乎可以结束了，大批判没有多大搞头了。我们前段传达讨论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时，有些单位就有这个经验教训。在传达六十八号文件时，普遍抓得很紧，效果也好。但传达七十七号文件时，少数单位产生松劲情绪。学习效果就差一些。应该看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要彻底批判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各个领域里清除它们的流毒，还是长期的战斗任务，对于这场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松劲情绪。在当前，就是要通过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在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中掀起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新高潮。

总之，要把这次传达讨论和大批判搞好，必须进一步认识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要充分看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他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继续。通过这次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实质，是改变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林陈反党集团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一句话，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代

表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我国就要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深刻理解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重大意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捍卫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一定要把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抓紧，抓细，抓好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部署，省委和军区党委已分别作了具体安排，我就不详细讲了。这里主要对如何组织领导好这次传达讨论和大批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各级党委要把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路线这个纲，当前就是要抓好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要把这个纲抓好。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好。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钻研中央四号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要认真学习马列的有关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把传达讨论工作搞好，才能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好、批判好。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团以上党委的领导同志，在批判林彪反革命纲领的战斗中，要带头揭发批判，成为冲锋陷阵的战斗员；同时要亲临前线，具体组织群众战斗，当好指挥员。

2. 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一定要抓住中心，突出重点。中心是路线问题。重点是要批判林彪一伙在形势、路线、政策问题上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

关于形势问题：要狠批林彪一伙污蔑国内大好形势的所谓“政局不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反动谬论；通过批判，认清林

彪一伙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就是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妄图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妄图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大家认清当前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认清这个大好形势的出现，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进一步鼓舞胜利信心，增强革命斗志，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胜利。至于有的同志反映，我们在前进过程中，还有一些缺点，有的地方少数群众生活上还有些实际困难。这当然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切实加以解决。但是，这同林彪一伙的恶毒攻击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所以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困难，是不足为怪的，决不能以此来否定大好形势。我们应当引导群众分清主流和支流，充分认识大好形势，彻底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

关于路线问题：

(1) 要狠批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污蔑攻击。这是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核心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伟大旗手，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改变党的正确路线，总是集中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彻底批判林彪一伙对毛主席的污蔑和攻击。

(2) 要狠批林彪一伙颠倒、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妄图为一小撮牛鬼蛇神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罪行。他们胡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封建主义”，这岂不是完全颠倒了我国五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吗？这岂不是说我们不仅没有搞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民主革命也没有搞吗？这岂不是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其实，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建立林家父子封建王朝的，正是林彪及其一伙。他们还胡说党内斗争是“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是“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叫嚣要对所谓受“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等等。这完全是对我们党内路线斗争历史的污蔑，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极端仇恨，说明他们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一丘之貉。

(3) 要狠批林彪一伙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污蔑和攻击。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 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彪一伙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 暴露了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林彪一伙污蔑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林彪一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攻击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 目的还是妄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

(4) 要狠批林彪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 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罪行。林彪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他一贯的拉山头, 搞宗派, 搞惩办主义, 实行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他有时也用“团结”这类话骗人, 但根本不讲原则, 不讲斗争, 目的还是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我们部队的同志, 特别要彻底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军队受压”、“笔杆子压枪杆子”等无耻滥言。他们所说的“军队受压”, 就是指他们那几员大将和一小撮死党, 受到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所说的“笔杆子”, 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揭穿他们妄图蛊惑军心, 挑拨军队和党的关系的罪恶阴谋, 使我们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加强军内外团结, 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5) 要狠批林彪一伙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唯心论, 是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要继续批判林彪一伙的唯心论的天才论, 认清他们到处大讲“天才”, 极力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 其目的就是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反革命舆论准备。我们要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 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总之, 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批判, 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什么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认清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实质, 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毛主席的领导, 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

关于政策问题: 要狠批林彪一伙所谓的“民富国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口号, 批判他们散布的“国富民穷”、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变相受剥削”

等反革命谬论。要充分运用“回忆对比”的办法，联系实际，大谈毛主席领导下的幸福，大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认清林彪一伙进行煽动挑拨的罪恶目的，要狠批他们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污蔑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妄图挑拨干部同党的关系的罪行。要狠批他们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的罪行。使广大青年进一步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更加认识到党和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而林彪一伙的恶毒挑拨，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把青年引向邪路。要狠批他们所谓“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后期被压制成了替罪羔羊”的反动谬论。使大家认清林彪才是破坏红卫兵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们倒打一耙，妄图挑拨红卫兵同党的关系，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通过批判，认清林彪一伙恶毒攻击党的各项政策，就是妄图改变党的政策，改变党的路线；认清他们的所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是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就是要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3. 要注意运用传达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经验，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加强对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要抓好培养骨干（干部、宣讲员、翻译人员等），搞好先行试点，做好传达讨论的准备工作。在传达讨论中，要把搞好干部的学习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干部在大批判中的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传达讨论时，要加强具体指导，每一步学习和批判，都要明确的要求，突出重点。要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反复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保证大批判既有战斗气氛，又搞得扎扎实实。

4. 切实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林陈反党集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开展大批判中，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言论，同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混同起来，防止伤害群众和干部。对于少数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认识上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应当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启发他们的觉悟，通过座谈心得体会，联系实际，接受经验教训，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重点单位和问题多的单位，要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把本单位与林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坏事，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楚。

5. 认真掌握阶级斗争动向。要充分预计到，林彪反革命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各级党组织，要密切注视敌情动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保卫工作，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监督改造。对边疆地区，山区和内地工作薄弱的地区，要派得力干部去帮助他们做好传达讨论工作。对于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利用林陈叛党叛国事件进行反革命活动分子，要坚决打击。

全区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在春节期间和尼克松访华前后，各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严密注视境内外敌情，严防敌人破坏和袭击。

不论部队或地方，都要继续认真做好保密工作。最近，美蒋匪特把搜集我们关于林陈反党集团的文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限令特务匪徒想方设法窃取这些文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次文件发的面很大，发到了农村生产队和厂矿的班组。各单位一定要切实执行文件保管规定，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防止被窃和丢失。

6. 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各级党委一定要搞好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结合起来，要使大批判成为强大的动力，进一步激发斗志，增强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促进工农业的大跃进，促进部队的建设，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我省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省革委会成立以来，我省的国民经济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和兄弟省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大鼓革命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我省的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努力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云南是边疆省，一定要落实毛主席对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批判林彪一伙对我省边疆工作的捣乱和破坏。他们大讲什么“政治边防”，实际上是贩卖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边疆经济建设，妄图把边疆搞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继续揭发批判，肃清他们的流

毒。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从边疆的实际出发，结合边疆的特点，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把我们的边疆工作搞得更好。

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要搞好经济工作，首先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对加强党委一元化领导问题作了指示，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主席说，这个报告提出了问题，但解决不彻底，所以主席批了“认真研究”，以引起各地注意。主席讲，如果地方党委决定了的事，还要拿到军队党委去讨论，那不是搞颠倒了么？中央领导同志说，三支两军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地方党委成立了，应该实行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应团结起来，要发挥军队干部的作用，也要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把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各项工作搞上去。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农轻重的光辉思想，认真研究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问题，要保证农业、轻工业有更快的发展，进而推动重工业的更快发展。从我们省来说，特别是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上去了，就主动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好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染十二个字的布局 and 农、林、牧、副、渔的关系。只有拼命把农业搞上去，轻工业才有原料；只有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市场才能活跃，才能发展重工业累积更多的资金和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所以我们要狠搞农业，力争今年要比去年有一个更大幅度的增产。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搞好经济作物。国家要求我省在烟、糖上要多作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当前，要抓紧农田的水利基本建设，加强小春的加工管理，适时完成早稻栽插任务，切实做好大春备耕工作，为夺取今年的农业全面丰收打好基础。要把农业抓上去，关键问题，一个是抓路线、一个是抓农业学大寨，主要是把农村的基层领导班子搞好。同时还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使工业部门的工作真正转到以农业基础的轨道上来。

工业上，要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加强综合平衡、抓好薄弱环节，改善企业管理，厉行增产节约，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第一季度“开门红”，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也要有新的发展。

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老工人政策和农村分配政策。前一段贯彻中央八十二号文件（关于农村分配问题），凡是把中央政策和群众见了面的，反映都很好，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许多贫下中农说，就像毛主席亲自到了我们这里作了调查研究一样，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政策问题，当前主要还是提高认识，狠抓落实的问题。要通过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进一步提高对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政策观念。对于落实政策的情况，要进行检查，对违反政策的现象，要坚决纠正。

同志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项政治任务。林彪一伙和苏修叛徒集团对我们进行恶毒污蔑和攻击，妄图否定我们的大好形势，完全是徒劳的，这只能更加激起我们的无比义愤。我们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用搞好革命和生产的实际行动，用加强战备工作和加强部队建设的实际行动，给林陈反党集团和帝修反以有力的回击。我们全省各族人民和全区部队指战员，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1977.02.04；中发〔1977〕3号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报告，望认真贯彻执行，稳妥地把云南问题解决好。云南是祖国的西南边疆，又是多民族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华主席、党中央对云南非常关心。这次召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开会，在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认识，调整加强了省委领导班子，为解决好云南问题创造了条件。中央希望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各级党委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迅速掀起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坚决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四项战斗任务。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各级党委一定要立场

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前哨，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带领广大群众，排除一切干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云南当前面临着较多的困难，但是，中央相信，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云南省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只要在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夺回“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实现安定团结、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胜利，云南大有希望。

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报告全文
华主席、党中央：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于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三日参加了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在锡联、登奎、永贵同志主持下，我们回顾一年多来云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情况，检查了前一阶段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情况问题，讨论了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意见。会议开得很好。报告如下：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九七五年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贯彻执行了四届人大精神，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一九七五）廿六号文件，得到全省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在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总的形势是好的，调动了我省群众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的关系。加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呈现出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但是，由于“四人帮”直接插手，并唆使其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等几个人捣乱破坏，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贾启允同志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严重影响，违背中央（一九七六）四号、五号文件和中央（一九七五）廿一号文件的精神，另搞一套，造成云南一次大反复，后来又搞了个省委（一九七六）四号文件，冲击了工业、冲击了农业、冲击了商业、冲击了交通运输，也冲击了部队，使全省更多……

军队和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昆明军区党委及其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委、全省广大指战员，是按照中央（一九七六）三号、四号、五号文件的，基本上顶住了“四人帮”那一套，军区党委绝大多数同志，对省委四号文件也是不赞成的，抵

制的，这样就保持了党委的团结，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但是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下，军内也有个别同志违背了中央（一九七六）三、四、五号文件，层层抓代理人，揪走资派，向“四人帮”告黑状，扩散“四人帮”炮制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抗拒军委的整编，不服从调动。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尽管军队工作中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从全区部队来说，总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绩是主要的。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奋起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贾启允同志既不按照中央（一九七六）十六号文件办，也不向省委传达华主席对云南省问题的指示和他本人的批评，又另搞一套，捂盖子、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贯落空，所有这些都遭到全省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去年十二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同志批评和斗争，才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始好转。当前云南总的形势是好的，去年一年省委领导所犯的错误，应由贾启允同志负主要责任，贾启允同志应当向华主席、党中央作出深刻的检讨，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检查。我们欢迎他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为了把云南问题解决好，我们的意见是：

1.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这是今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任务。“四人帮”对云南干扰破坏严重，前段运动未搞好，各级党委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打一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人民战争，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要的讲话和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进一步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进一步明确进行这场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彻底揭深批透“四人帮”插手云南的罪恶活动，查清同他们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统筹安排以运动的胜利来发展推动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2.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我们对“四人帮”的死党和

对不自觉中跟着“四人帮”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无论是深是浅,只要把参与阴谋活动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对犯错误的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因受“四人帮”影响而说错话、做错事的绝大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对他们主要应加强教育,做细部的思想工作,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多多挖掘错误,多作自我批评,必要时可以采取学习班的方式,集中学习,提高觉悟,分清是非,加强团结,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要三不要的方针,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在省委(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错误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统筹考虑,逐步解决。

3.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省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粉碎了“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蓬勃发展起来,各级党委要因势利导,带领群众,坚决批判“四人帮”在革命和生产关系问题上所散步的一系列谬论,一切贯彻执行毛主席备荒、备战,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认真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及中央(一九七七)一号、二号文件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首先要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工业战线上也要把“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要把轻工业促上去,要关心群众生活,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

4. 加强敌对斗争,巩固边防。云南地处边疆,国境线较长,苏修及美蒋特务、蒋缅残匪内部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采取派进来,混出去的反革命手法相呼应配合,千方百计的破坏捣乱,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全省党政军同志和各族人民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革命认识,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对敌斗争,严防敌人挑拨离间、破坏捣乱,对于专门同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党中央作对的反革命

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对打砸抢必须坚决镇压。“沙甸平叛”是正确的，绝不许翻案。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巩固边防、保卫祖国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昆明军区地处西南前线，贵州是军区的后方，两省都是多民族地区，斗争情形非常复杂，全军各级党委和全体指战员必须百倍警惕，加强备战，加强部队建设，加强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坚决粉碎任何胆敢骚扰和侵犯我国边境的敌人。同时，必须进一步密切地方军队的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军队要积极支持和尊重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大力帮助地方工作，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要关心干部建设、关心部队建设，要掀起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的新高潮，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发扬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的优良传统，加强民兵建设，搞好军民联防、巩固边防。

5.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来京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安平生同志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陈丕显同志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决定。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免去贾启允同志在云南的一切职务的决定。中央的这两项决定是对云南各族人民的极大关怀，是加强省委领导的极有力措施，我们热烈欢迎并积极支持安平生、陈丕显同志到云南工作，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都建设成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团结、战斗的坚强核心，坚持要老、中、青三结合，新老干部都要解决好，三个正确的对待问题。目前，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这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级党委对下属组织，要加强领导，积极帮助，应给予表扬和鼓励，对少数问题较多的，应采取具体帮助措施，促其迅速转变，党的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加强党的观念，遵守民主集中制的。

6. 全党服从中央，共产党绝不允许结帮营私，绝不允许在党内组织派别和秘密小集团。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严守党和国家机密，同一切违背党的原则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针对。各级党委要认真传达和学习华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联系本地区的实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订出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各项工作尽快促上去的行动计划，务必做到工作又细又稳的地步，要特别强调整个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必须遵

照华主席、党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对于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必须在群众中点名批判，或采取组织措施的干部，经中央批准的必须报中央，其余一律报省委批准，不要层层检查，不要层层揪，不要纠缠历史的旧帐。坚决不许再拉山头、搞串联，不准搞战斗队，不准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不准冲击机关、部队，切记不要重犯过去另搞一套的错误。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中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们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遇到有关工资待遇上的一些问题，应当如何处理，不够明确，现请示报告如下：

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平反时，恢复原工资待遇，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因降级而减发的工资补不补发？

二、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按照处分党员的规定，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而做了处理的冤假错案，平反时，恢复原工资待遇，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补不补发？

三、文化大革命前（1966年5月16日前）审理的案件，批准执行的时间在5月16日以后，此次复查，应给予纠正的，其工资待遇问题，应如何办理？

以上三个问题，根据中发〔1978〕55号文件，和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批转中监委文件的精神。我们的意见：上述经批准平反的人，恢复原工资待遇的时间，从上级党组织批准平反之日算起。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不再补发。生活确有困难的，可酌情给予适当的补助。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按照处分党员规定，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而做了处理的冤假错案，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是否补发的问题。按照中央一九六三年一月批转中监委文件的规定，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的处分无效，但是，我们考虑，由于过去一段时期，不少冤假错案没有及时纠正，其中，包括被错划的右派在内，有一些是没有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或者审批的手续

不完备，这次在恢复其工资待遇时，如补发十余年或廿余年的工资，就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对本人来看，都不妥当。因此，我们的意见，对这类情况的冤假错案，也应当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不再补发工资。生活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以前审理，文化大革命以后批准执行的案件，实际上属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范围，其中的冤假错案，应当按照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办理。

此外，对恢复原工资待遇的时间，我们还考虑，除上述从上级党组织批准纠正之日算起的意见外，最好有一个统一规定的时间，或者按照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规定，一律从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算起。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望批复。

中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给云南省委纪委的批复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函悉。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的案件，主要是澄清事实，分清是非，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经过复查需要改变原结论和处分，恢复原工资待遇的，除已有规定者外应从批准之日开始执行；因处分而减发的工资或少得的劳动报酬，不予补发。个别生活确有困难的，可酌情给予适当补助。过去有些处分决定手续不够完备，但实际上已执行了，复查后如需改变结论和处分的，亦按此精神掌握。

“四清”运动后期结论处理的，应视为文化大革命前处理的案件。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编《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1978.12-1980）》，北京：1981年）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云南地下党、“边纵”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报告》

省委：

“文化大革命”中，云南地下党被诬蔑为“国共合作”的党，“边纵”被诬蔑为“地霸”、“土匪”武装，作为“隐患”消除。省、地、县各级革委会，对地下党、“边纵”均列专案审查，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歪曲、否定了云南地下党领导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当时，某些领导人歪曲历史的讲话，诬蔑地下党、“边纵”的审查材料、册子、传单，广为流传。使地下党、“边纵”的广大党员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些同志被迫害致死，许多人致伤致残，并株连家属子女，株连有关的统战人士和少数民族代表人物。还以此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和当年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建国初期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和主持云南工作的宋任穷同志。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极为恶劣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领导工作上的失误，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也有过不恰当的评价，一些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认真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九七九年一月，安平生同志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代表省委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对云南地下党立案审查是错误的，因这个问题受到政治迫害的同志，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会后，各级党委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反右扩大化中的错案，县以上干部的问题已平反改正了。但是，诬蔑、否定地下党、“边纵”的流毒和影响还未彻底消除，有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为了进一步拨乱反正，恢复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进一步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根据省委指示，组成复查工作小组，进行了复查。现将复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

“文化大革命”中，省革委“二办”把地下党地委、“边纵”支队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均列入《云南地下党叛徒、特务登记表》，在“二办”综合的《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概况》(以下简称《组织概况》)中，对地下党、“边纵”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复查情况是：

一、《组织概况》中说：“一九二八年正式成立的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的委员”，“均先后遭逮捕而叛变”。经查：云南地下党，是党中央派人来建立的。一九二六年成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一九二八年，成立了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

传播马列主义, 开展革命活动, 在滇南几个县发动过武装起义。一九三〇年, 王德三、李鑫等主要领导同志和许多党员被捕, 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省工委成员, 除个别自首叛变外, 其余都是英勇就义。《组织概况》所说, 是歪曲历史事实的。

二、《组织概况》中说: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夏, 地下党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省工委委员“都有严重问题”, “有的是老牌特务、内奸和阶级异己分子”。经查: 一九三五年, 云南地下党在困难的条件下, 恢复重建组织, 出版刊物, 宣传党的主张, 在易门边界地区发动过武装暴动, 一九三八年五月建立了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在党中央、长江局、南方局领导下, 建立了云南抗日先锋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城市、工矿、学校和一些农村地区, 建立了工作据点, 在上层人士中进行争取工作,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 为后来各方面发展打下了基础。省工委委员中, 没有特务、内奸和阶级异己分子, 现都在各级担任领导工作。《组织概况》中的诬蔑不实之词, 应予推倒。

三、《组织概况》中对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底的斗争历史和组织状况的歪曲和诬陷。主要有:

1、《组织概况》说地下党组织“回避斗争”, 省委一九七二年批转《关于“七·一五”事件的审查报告》中说: “七·一五”事件中, “省、市工委进行了一系列右倾投降活动”。经查: 皖南事变后, 南方局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 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指示, 对省工委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 继续深入群众, 积蓄力量, 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五年春, 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新民主主义联盟”。抗战胜利后, 领导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一二·一”惨案发生后, 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一二·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 “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一九四六年夏, 领导了声讨国民党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举行了声援北平“反美抗暴”游行示威, 开展了反内战、反卖国、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一九四八年开展“反美扶日”运动, 在“七·一五”事件中, 地下党组织领导是坚决的, 群众斗争是英勇的。一九四九年在群众中开展求生存、争解放、保厂护厂、反对资金外逃、反对设备搬迁台湾、反对蒋介石残余力量溃退入滇负隅顽抗的斗争。在斗争中锻炼培养了大批骨干, 输送到农村和游击队。各地党组织, 经过长期艰苦奋斗, 在各族群众中扎下了根子, 形

成了星罗棋布的地下工作据点。说地下党“回避斗争”，在“七·一五”事件中“省市工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右倾投降活动”和“反美扶日运动遭到失败”的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应予推倒。

2、《组织概况》说“省工委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立即将工作转移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这一英明指示”，“只搞学生运动，武装斗争迟迟不去开展”。经查：一九四六年底，党中央指示南方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组织起几支中坚游击队，建立几个成块的根据地，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省工委于一九四七年在滇东和滇南地区，组织了小规模武装活动。在发动农民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和反蒋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上，于一九四八年春，在滇东南地区发动了游击战争，成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七月，第一纵队主力一部，南进千里，与粤桂边区主力一部会师。十月，两支游击队主力在前委领导下，团结战斗，打回滇东南，和在盘江南北坚持斗争的部队汇合，建立、巩固、扩大了滇东南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同时，在省工委领导下，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滇南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纵队，以后又在滇东北、滇中、滇西、滇西北和滇康边界、滇北发动了武装斗争，建立了根据地。一九四九年七月，云南省工委与桂滇边区工委合并为滇桂黔边区党委，统一领导全区工作。全区游击队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野战军进军云南之前，“边纵”部队在敌军围剿中发展壮大，组建了十二个支队，两个独立团，(有两个支队在桂西，罗盘支队主力一部和部分游击团在黔西)共三万多人；还组建了二十二个护乡团，三个游击团，共一万多人，游击队、民兵九万多人。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消灭了数万敌人，解放县城六十一座。游击队的活动遍及云南九十多个县和昆明四周，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钳制了敌人五个军，对野战军的正面战场，起了配合作用。在野战军压境的形势和党中央政策感召下，促成了卢汉起义。《组织概况》所说，是歪曲历史事实的。

3、《组织概况》说“边纵”部队是“以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主”，是“地霸土匪武装”。经查：“边纵”部队是按人民军队建军的宗旨、原则建立的，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部队大部分是在兄弟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发展起

来的。成分主要是各族贫雇中农。解放前。云南许多地方都有一些民变武装、反蒋的地主武装和少数民族头人的武装，各踞一方，根据党的统战政策，收编改造，集中力量反蒋，是正确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成功的。临近解放时新收编的武装，改造工作没有完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据此把“边纵”部队说成是“以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主”，说成是“地霸土匪武装”，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

4、《组织概况》说云南地下党省工委、边区党委委员“都属叛徒、特务嫌疑”，“边纵”地委、支队领导干部“问题极为严重，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属叛徒、特务、武装土匪头目、地霸分子”，“后期的云南地下党，客观上起了特务、叛徒、国民党、三青团骨干防空洞的作用”。经查：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前，云南地下党发展党员是比较慎重的，七月以后，控制不严，个别县区接收了一批不够条件的人入党，有的坏人趁机混入党内，造成有些组织不纯。此外，有的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未经严格考察就接收入党，安排了不适当的领导职务，这是工作中的问题。长期以来，敌人力图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图谋都未得逞。这一时期的省工委、滇桂黔边区党委委员和地委、支队领导干部五十多人，除被迫害致死和病故的外，现都在省内外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组织概况》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二)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领导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认识和对有些同志的处理上，也发生过一些错误。

1. 一九五一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整党的决定，我省以地下党干部为重点进行了整党，提高了干部的觉悟和政策水平，增强了党性，纯洁了组织，对完成土改等各项任务，起了积极的作用。必须充分肯定，这次整党的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正如省委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关于云南初步整党工作报告》中所说的：“部分地区进行组织处理不够慎重，有的缺乏具体分析和分别对待的精神或处理面过宽”。当时结论和处分的依据，主要靠本人交代和小组批评帮助，材料一般未经调查核实，使一些同志受到错处，有的长期挂起来，有的在后来的运动中被引伸上纲受到错处，有的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和纠正。

2. 一九五四年，省委对云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郑伯克同志进行了批判。在省委《关于郑伯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初步总结发言》中说：郑伯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恶劣的地方主义”；“滇桂黔边区党委成立前后”，“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隔绝了大部分地方组织与区党委的联系”，“抗拒解放大军进入云南”；“郑所领导的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脱离中央的独立王国”，“资产阶级的路线，贯穿在他建党、建军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各个方面”；“五〇年初……他违背中央指示，乘大局已定而宋、陈未到的重要时机，到处搭架子，搞接收，同中央抢地盘；擅自组织大规模的游击队入城仪式，企图先中央而接管昆明；在四野、二野急进滇南堵歼南逃残敌，急切需要游击队配合并与他建立联系的紧急时机，他竟按兵不动，……造成残敌逃窜国外”等。经复查，郑伯克同志一九四一年来云南担任省工委书记后，云南地下党组织在南方局领导下，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的；滇桂黔边区党委成立后，分工由郑伯克同志领导的地区，是贯彻了区党委的决定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十二月九日，卢汉起义。中旬，敌第八军、二十六军进攻昆明。中央军委命令第五兵团一部迅速由黔入滇驰援，命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昆明市委发动群众，组织义勇自卫总队，逮捕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秩序，支援前线。“边纵”西进支队和九支队一个团，接到通知，赶来支援。部队进驻昆明市郊，在东郊开军民大会，是为了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后，随即南下参加滇南战役，完成配合野战军追歼逃敌的任务。这是符合中央军委命令保卫昆明的部署的，不能视为“抢先入城”。各地建政，是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建立的。有的是在卢汉起义后，形成空白，为了建立革命秩序和做好阻匪迎军工作而建立的。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不能视为“同中央抢地盘”。邓小平同志一九五一年就说过：“以宋任穷、郑伯克、李明为首的会师，是做得好的。”边区党、政、军、民从一九四九年秋，就在激烈的反扫荡中，开展迎接野战军的准备工作，在各游击根据地，筹集了大量粮秣给养和慰问品，修桥筑路，设立接待站。十二月，“边纵”司令员庄田、政委林李明，政治部主任张子斋率领一支队，到广西百色。一九五〇年一月，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到沾益和贵州，迎接野战军。野战军进军云南，沿途受到边区军民最热烈的欢迎。不能说“抗拒解放大军进入云南”。在滇南战役中，纵队司令员庄田率领的一支队，与四野的两个师，沿滇越边境，疾

进千里，堵截敌人南逃国外的去路。“边纵”领导机关，率领四支队配合四兵团十三军，进军蒙自地区。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率领的西进支队和起义部队一部，从滇中直插元江，抢占元江桥头阵地，配合十三军，歼灭未过江的敌陆军总部和第八军。其它各个支队，所属武装和广大民兵，亦积极参加阻击敌人的战斗。对此，邓小平同志一九五〇年在《关于西南工作情况报告》中，曾作过历史的概括，说：“我云南人民武装及二野一部曾协同卢汉将军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旋以四野、二野各一部由广西赶赴滇南，因为云南有广大的解放区，有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有有组织有觉悟的解放区人民，在他们的有力地协同和支援下，才能迅速地扑灭了李、余两匪的叛乱”。因此，一九五四年省委《总结发言》的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3. 一九五八年批判所谓“郑、王反党集团”（已改正），省委在省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云南地下党在建党建军方面有过严重的路线错误”，存在着“系统的地方主义”，“他们在国家机关和党内窃踞了重要职务，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竭力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图谋篡党，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报告强调深挖“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和右派分子，对地下党的同志还采取了“改造团结教育”的政策。这些评价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三）

综上所述，云南地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边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党中央、毛主席、南方局、华南分局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在党的建设、秘密工作、民主运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民族工作、敌军工作各个方面，成绩都是显著的。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错误，主要的是在解放前后，形势发展快，斗争任务重，干部思想跟不上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有的干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政策不很清楚，有的人组织纪律性不强。在云南解放前后的几个月中对发展党员控制不严，发生了一些偏差。但总的看，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一九五一年，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云南小组，对云南地下党的看法发生争论，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云南党光荣伟大是第一，这是应该肯定的”。“应该承认他们作过好事，打了游击，建立了武装，培养了干部，他们作的正确，作的伟大，

作的英勇，是有功劳，要承认，要肯定。但是，还有第二第三，那就是有毛病缺点错误。第一第二都要承认，只看缺点而抹杀优点成绩不对，只看成绩而忽略了毛病缺点也不对”。这个评价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正确的。

(四)

解决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进一步发展云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边防，调动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四化建设的大事。要按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不错的不改。要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根据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云南当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分析问题，积极、慎重、稳妥地落实政策，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对符合政策规定的要求，应妥善地加以解决。要引导干部团结一致向前看，识大体，顾大局，不纠缠个人是非和历史旧账。为此，对处理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历史遗留的有关问题，提以下意见：

1、“文化大革命”中，诬陷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冤案，应予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应妥善解决。

“‘文化大革命’前对云南地下党、‘边纵’所作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受到错处还未改正的，应按中央组织部〔1981〕5号文件精神，予以复查改正。

2、对于被捕、被俘的问题，应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对于在地下斗争、游击战争和“七·一五”事件中被捕被俘人员，在敌人审讯时供出公开的组织，而没有损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过去被定为政治、思想动摇、自首叛变等问题，这是不恰当的，应予改正。

3、在地下斗争中，经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派入国民党的各种机关团体和乡保组织，同党组织保持联系，以社会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是正常的、正确的。因此受错处的，应予复查改正。

被迫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在事前或事后向组织作了报告，没有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而受错处的，亦应复查改正。

4、解放初期，被停止活动或解散了的基层组织的党员，表现好，在土改、合作化中已重新入党的，应承认其原来的党籍；至今未重新入党的，不再恢复党籍；现在申请入党，具备党员条件的，可以重新入党。

5、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以前，个人或集体自动脱离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加入我党领导的“边纵”或其它革命组织，或与我方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仍在敌人内部为我党工作，确实做过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工作的人，受到错处的，应按云统发[1980]09号、42号文件规定办理。

在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中，和我党有统战关系，支援过我们，解放后一直靠拢我党，受到错处的人士，仍应按党的统战政策对待。

6、对错被开除党籍，后来一直表现好，现在具备党员条件的，可以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错处理后丧失党员条件的，不再恢复党籍；按党的原则不应接收入党的，不恢复党籍。

对于错被开除公职，错被遣回乡的，复查改正后的工作和工资问题，原来是地方错处理的人员，按中央组织部中组发〔1979〕33号、〔1980〕7号文件规定办理。原来是部队错处理的人员、按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0〕194号文件规定办理。自动脱离革命队伍的，正常复员转业的，不属落实政策的范围。

7、复查中档案材料遗失，确实找不到的，可按当时处理的主要依据进行调查，作出结论。复查后，档案材料要进行清理。中央有规定的，按规定办；没有规定的，参照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央组织部《关于处理整风反右派斗争中干部档案材料的若干规定》的原则处理。

8、原地下党、“边纵”人员的申诉，原则上由原处理单位负责处理，现在所在单位配合。原单位撤销的，地方由本人现在所在单位或所在地的县以上党委，部队由军分区或接收其业务的单位负责处理。原部队换防的，由其所在地军分区、武装部受理，与原部队联系解决。部队转材料到地方，由地方处理的，由处理单位复查。集体案件，由原审查单位复查。复查结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

各级党委要重视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省和这类案件多的地、州、市，要建立专门班子(有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同志参加)，做好复查落实政策的工作。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中央组织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云南省军管会和省革委对云南地下党立案审查是错误的，在审查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因这个问题受到政治迫害的同志，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会后，各级党委对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一九八〇年七月，省委决定从省委有关部委和昆明军区政治部抽调干部组成复查工作小组，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复查。经过查阅历史档案，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分别征求过云南地下党原地委以上、“边纵”支队以上的领导干部的意见，统一了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功过是非的认识，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提出了进一步解决好遗留问题的意见，并向中央组织部作了初步汇报。在此基础上，由省委组织部作出《关于云南地下党、“边纵”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报告》。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省委组织部的复查报告，现一并报送中央。

省委认为：

一、云南地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边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在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从大革命到全国解放，从地下斗争直到发展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都是有显著成绩的；发展了党的组织，培养了干部，许多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许多党员成为今天的领导骨干；创建了游击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了“边纵”所属的部队，配合野战军解放了云南。当然，工作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但从总的来看，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二、“文化大革命”中，省军管会和省革委对云南地下党的立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给云南地下党、“边纵”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应彻底平反；所形成的审查材料，全部撤销。

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由于领导工作上的失误和“左”的思想影响，对云南地下党、“边纵”所作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所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给予复查改正。

四、解决好云南地下党、“边纵”的历史遗留问题，应着重从政治上澄清是非，消除错误影响，以达到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目的。要引导同志们识大体，顾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振奋精神，积极努力，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当否，请审查批示。

中共云南省委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对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批示

中共云南省委：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做了贡献。通过这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希望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而努力，卓有成效地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的通知(节录)

1982.03.02；组发[1982]6号

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准。现将中央批示以及云南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据了解，有些省、市、自治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正在解决，有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领导同志曾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请你们根据这一批示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考云南的做法，对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地予以解决。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黄兆其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 昆检诉字第 16 号

被告人黄兆其，男、三十九岁，汉族，浙江省上虞县人。逮捕前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云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他在云南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案犯，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策划篡夺云南省各级党、政领导权。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黄兆其的犯罪活动，使我省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灾难。wengewang.org

被告人黄兆其的犯罪事实如下。

一、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一)一九六七年六月，黄兆其授意涂晓雷、刘浩等人以“三镜观察员”名义，写出《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和《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特务的三点(计划)”“在五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一九六七年八月，黄兆其等人又密谋策划“揪

军内一小撮，作为第三次的行动计划。”提出“搞军内的问题，要从张力雄开刀。”“揪张力雄应该有专人来抓，成立专门的联络站。”

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主持编造了一份“报告”，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反动联盟”，“指挥手下一些亲信，诸如李明(省军区副政委)、丁荣昌、朱家璧、熊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帮，结党营私。”把这些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地下党托派”、“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要“立即清除”。并提出要“改组云南军区党委”。阴谋搞乱军队。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致使上述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还株连了一大批军队的其他干部，严重破坏部队稳定。

wengewang.org

(二)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一月，黄兆其、刘殷农、金华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诬陷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在黄兆其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打赵作战部”，搜集拼凑诬陷材料，捏造“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有“叛徒二十八人，走资派二十三人，国民党伪军官、特务七人”等，制定了对“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狠打、痛打、打死”的方针和部署。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黄兆其还策划在昆明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他在会上，诬陷赵健民是“三十年代的大叛徒，四十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六十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八年一至六月，黄兆其指使李树林等搜集诬陷材料，并主持编写所谓“干部情况汇报”，将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大批厅、局级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提出“必须打倒”和“进一步审查”的就有一百四十七人，使这些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同年六月二十一日，黄兆其还指使安炬祥、胡文龙等写了一份《紧急报告》，诬陷省委书记高治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商业厅厅长侯良辅、省轻工厅厅长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并提出要“立即逮捕”。在此期间，

黄兆其等人还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公、检、法”，诬陷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致使一大批公、检、法机关干部遭到残酷迫害。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张培智、刘浩编写了“彻底清算赵健民之流罪行”的文章，并联名在《云南日报》发表，诬陷赵健民等干部、群众，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还把当时的群众组织“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诬陷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进一步诬陷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他还诬陷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wengewang.org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上述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和“赵健民之流”中，制造了冤、假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六万一千多人。对此严重后果，黄兆其负有直接或间接的罪责。

(三)一九七六年四月上旬，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人策划，将昆明地区部份群众准备于四月八日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是幕后指挥。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清华大学交吴炜煜转报江青等人。

同年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进行陷害周总理的反革命案的主犯被公安机关逮捕后，黄兆其为掩盖他们指派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这一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当天即与胡延观密谋为徐、胡二犯开脱罪责。次日，黄兆其又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策划，确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采用嫁祸于人的手段，诬陷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二、阴谋颠覆人民民主政权

(四)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其篡党的阴谋活动，黄兆其等人积极配合，先后组成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和“六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沈炳章）的秘密指挥机构，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伙秘密联络，互相勾结，上下配合，阴谋篡夺我省各级党政领导权。

(五)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七日、十四日、十六日，黄兆其先后五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提出要“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六月，黄兆其又两次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六人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地的活动据点联系，领取旨意，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同年九月十六日，黄兆其又指使涂晓雷、林敬荣写了一份“改组省委”的计划和名单交给姚文元等人派到云南来的“记者”，转报江青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六)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捏造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煽动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

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宣称：“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七)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伙同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掀“复辟势力”，制造混乱，蛊惑人心，阴谋乱中夺权。wengewang.org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秘密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所谓的“提、补、纳、调”方针，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权。他们还提出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对于在他们所谓未控制领导权的单位，则“采取继续乱的方针”，“乱够乱透”，“胁迫党委就范”。在此期间，黄兆其还利用其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的权力，采取“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将其同伙突击提进所在单位的党委班子。

(八)一九七六年三月初，在省委决定召开地书会议的前夕，黄兆其与刘殷农、朱克家等加紧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提出：“靠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策划以“扩大会议规模”为名，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免、停、调和下放”的所谓地、局一级“新干部”拉来参加地书会议，并要挟尽快恢复他们的职务。同时，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由沈炳章在会上带头起哄，金奕旦等人在台下发难，由张奎林、徐宝兴组织建委系统五百余人到会上揪斗省委副书记黎韦和高治国等领导干部，黄兆其还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杨建祥等人组织了二、三百人的“告状团”、“上访团”，来冲击会议，进驻省委领导机关，揪斗省、地、州党委领导干部。会议期间，黄兆其、刘殷农还主持拟制向中央发出诬陷省委的电报，公开提出要“改组省委”，另组成所谓“党的临时领导小组”。

同年三至九月，黄兆其与刘殷农、胡延观等人多次密谋、搜集诬陷省委领导干部的材料，多次对省委常委进行“分析排队”，策划分裂、搞垮省委，制定靠谁、打谁、拉谁、烧谁的所谓“靠、打、拉、烧”方针和部署，妄图篡夺省委的领导权。

在此期间，黄兆其还直接插手和指挥曲靖、玉溪、大理、红河、文山、昭通，思茅、保山、东川等十三个地、州、市和部份省级机关、厂矿的同伙进行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八月，他还指使昆明铁路局郭弟元、徐洪文等非法绑架和关押、审讯省委副书记郭超达半月之久。

(九)一九七六年二至八月，黄兆其、刘殷农等密谋策划，煽动将在押的现行反革命、流氓犯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强行释放(未逞)。同时，黄兆其还支持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轰闹、强迫释放陈克发、杨运昌等十三名在押人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和支持下，我省十三个地、州、市先后发生了围攻党委，冲击公安机关，强行释放在押犯的严重事件，共放出一百二十四人，严重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十)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同月十三日、十六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策划武装叛乱。黄兆其攻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妄图策动军内 X X X 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的同伙“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 and 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在此期间，黄兆其按照计划积极活动，指派涂晓雷通过雷 X X 与军内 X X X 约好了同黄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未见成)；并由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动向，又由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即探听叛乱动向)，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

装叛乱。文山和楚雄州的何立宽、刘光兴等接到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立即开会策划，积极准备响应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策动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密谋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妄图负隅顽抗。还由涂晓雷等制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继续制造混乱，妄图破坏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

综上所述，被告黄兆其长期以来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在云南伙同刘殷农等案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阴谋篡夺云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动武装叛乱，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黄兆其所犯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证据。

被告人黄兆其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百零二条、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此 致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检察长 杨学强

检察员 张甸侯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 18 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学强，检察员张甸侯。

被告人黄兆其，男，现年三十九岁，浙江省上虞县人。原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辩护人：刘章达、黄晨曦，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

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核对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兆其在云南为首,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weng ewang.org 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黄兆其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在云南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黄兆其等人的犯罪活动,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黄兆其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黄兆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一九六七年七月,黄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反动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五月二十九日晚举行军事政变。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主持编造诬陷“报告”,捏造事实说: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结党营私,搞资产阶级反动同盟。在“报告”中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壁等领导干部是“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下党托派”,致使这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残酷迫害。

一九六七年,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在云南成立了“打赵作战部”,诬陷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同年十二月四日,黄兆其主持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会上他诬陷赵健民是“三十年代的大叛徒,四十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

六十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打倒赵健民。

一九六八年，黄兆其主持写了“干部情况汇报”，将一些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批厅、局领导干部诬陷为“叛徒”、“特务”“敌特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提出必须打倒。同年六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使安炬祥、胡文龙写了《紧急报告》、诬陷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和厅局的领导干部张曙光、侯良辅、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等，要求“立即逮捕”，使侯良辅、林亮冤狱多年。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组织政治土匪，东窜西挺，执行美蒋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此期间，黄兆其还诬陷“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等群众组织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六万一千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一九七六年四月上旬，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诬陷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转报王洪文。同年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安机关将其主犯依法拘捕后，黄兆其不仅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活动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还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被告人黄兆其为首组成“八人核心”和“六人核心”的班子，领导、指挥同伙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黄兆其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五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一些领导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weng 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四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等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

等处的活动据点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同年九月十六日,黄兆其修改了涂晓雷、林敬荣写的“改组省委”的夺权方案,支持他们交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此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反动文章,大量印发、张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等领导是省委内的“复辟势力”。煽动揪“复辟势力”和“还乡团”,提出“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黄兆其、刘殷农还与军队的某些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打所谓“三个战役”在全省和军内掀起打王必成和陈康,层层揪“复辟势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徐宝兴等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阴谋分裂和搞垮省委。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朱克家策划,通过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会议期间,黄兆其通过同伙组织五百余人揪斗省委领导干部,亲自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等人组织“告状团”、“上访团”冲击地书会议。黄兆其还主持拟了发给中央的电报,要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诬陷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领导运动,提出改组省委,企图篡夺省委领导权。

一九七六年黄兆其为首,伙同刘殷农等煽动强行释放在押的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案犯,黄兆其还主持,煽动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强行释放了十三名在押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支持下,全省共放出在押犯一百二十三人,破坏了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weng ewang.org

被告人黄兆其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十月十三日、十六日,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策动武装叛乱,学习蔡锷武装起义。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驻昆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的基地,由刘殷农、徐宝兴分头给省市和各地州的同伙“打招呼”,作好准备,还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同时由刘殷农要

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消息，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煤管局、海口三五六厂的张贤忠、金奕旦、刘志宏等人“打招呼”，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的同伙派人到昆明听取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回去积极准备响应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后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六次庭审调查和辩论，三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人黄兆其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黄兆其亦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张开文

人民陪审员 张顺安

人民陪审员 陈绍康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 杨建萍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刘殷农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昆检州诉字第 17 号

被告人刘殷农，男，四十二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昆明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刘伙同黄兆其、涂晓雷、胡延观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阴谋颠覆政府，策动武装叛乱，犯下了严重罪行。致使我省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一九六七年，刘殷农伙同黄兆其等人，捏造事实，策划诬陷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刽子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联名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文章，诬陷赵健民“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东游西挺”，“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wengewang.org

一九六八年三月，刘殷农等又诬陷赵健民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结成“反革命联盟”、“屠杀革命群众”，“网罗一批特务、叛徒、走资派黑爪牙”，是“国民党代理人”，对这批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同期，刘殷农又把省委书记、常委刘明辉、孙雨亭、高治国以及赵增益等和一批厅局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要统统打倒。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刘殷农又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进一步煽动追查所谓“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煽动大揪“赵健民之流”，致使大批干部群

众惨遭诬陷迫害。造成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和“赵健民之流”中，制造了冤假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有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有六万一千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伙同黄兆其又编造《这是为什么》一文，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委、省委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煽动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同时又伙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诬告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刘殷农亲自编造了向省、市委发出“宣战”的公开信。煽动同伙“要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战”。提出要把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撤、停、免、调、抓”的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恢复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殷农指派陈天寿等人把省外外贸局临时工袁保华抓到工人文化宫，对袁进行非法审讯，袁保华在拘禁中被刑讯逼供残害致死。

二、阴谋颠覆政府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黄兆其一方面联名写信给江青、王洪文，诬告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同时，刘殷农、黄兆其、李树林、杜晨光、张奎林、徐宝兴、邹思浩、许少先八人多次密谋，制定“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刘殷农与黄兆其又在昆明、开远、贵阳等地同军内的许梅康、叶秀锦等人串连，商定“军队以打王为主，地方以打陈为主”。并授意其“文班子”编造，印发和张贴《把云贵总督王必成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等文章，诬陷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伙同黄兆其等在全省范围内煽动打倒王必成和陈康。与此同时，刘殷农等人又提出“提、补、纳、调”，要“为新干部上台扫清道路”的方针，阴谋夺取云南省党政领导权。

一九七六年四月，刘殷农等人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动诬陷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是“这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使曹光祥、马首良等人写报告，派涂晓雷、沈炳章送到“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交吴炜煜转江青。

刘殷农、黄兆其等人五月十二日听取了涂晓雷传达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做够”；“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造反派为什么就不能当一把手？当省委书记？”在“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会上，经过讨论，他们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总理了，现在先看看再说，可先作些准备。当他们得知王永昆反革命集团要打周总理的阴谋，即让胡恒铿、徐宝兴参与王永昆一伙的阴谋活动。“五·一八”反革命事件发案后，刘殷农、黄兆其等人为掩盖罪行，又于五月十九日上午紧急策划，决定采用“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嫁祸于人的阴谋。刘殷农指使王海全、王云仙等编造了九份假“旁证”，叫安朗起草《关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与省委副书记黎韦的关系》的报告。刘殷农定稿后，又亲自写了《补充报告》，分送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迟群、谢静宜。诬告陷害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王必成和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在省市也加紧了夺权活动。在省里与徐宝兴、涂晓雷、张奎林、沈炳章，在市里与曹光祥、马首良、王云仙、王海全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对省市领导人进行排队分析，拟定了分别采取“靠、打、拉、烧”的反革命方针。

在云南省委地书会议召开前夕，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策划，“要给会议施加压力，会内会外要配合”，提出“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一定要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停、免、调”和下放的人召回来参与夺权活动。

与此同时，刘殷农在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宋江”、“公子虔”、“梯也尔式的人物”。并伙同黄兆其、涂晓雷编造了改组云南省委的电报稿，提出要“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并煽动一百五十一人签名，带领一伙人冲到常委会上，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

一九七六年六月昆明市党干会议前，刘召集曹光祥等密谋打倒一批领导干部，起码要“按翻一、两个”，“换掉一批人”，要“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以市促省”的篡权目的。会上，不少老干部被扣上“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刽子手”等帽子，有的

当场就被抓打围斗。会后，刘殷农又将他在昆明市的夺权经验，向楚雄、西双版纳和文山的邱立峰、马正全、何立宽等人传授。在此期间，刘殷农还亲自编造了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的反动文章，诬陷邓小平和党、政领导干部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是剥削压迫工人、贫下中农的吸血鬼”，要用“暴力”来对付这些“党内资产阶级”。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刘殷农与黄兆其共谋要以释放在押犯为突破口，打开夺权局面。刘殷农在同伙中煽动说：“我在市委斗，你们要在外面斗”，“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不是三个人的问题”，“是镇压造反派”。刘还在常委会上多次提出抓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连时间也是错的”。并亲自指派羊鸿德去煽动财贸系统群众向省市委施加压力。刘还向江青一伙派来的“记者”诬告市委，“是制造白色恐怖”。在黄兆其、刘殷农的煽动下，全省十三个地、州、市都出现了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强迫释放在押罪犯的严重破坏法律实施的严重后果。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刘殷农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二日就派吴福全去上海了解江青反革命集团余党的“动向”。先后于十三日，十六日与黄兆其、涂晓雷、徐宝兴、张奎林共同策划，并确定“学习蔡锷大干一场”，占领电台，绑架党政军领导干部。“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全国响应”。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由黄兆其策动原昆明军区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刘殷农负责向昆明市一些单位及部份地、州的同伙“打招呼”；涂晓雷与军内的许梅康、叶秀锦等人联系。刘殷农于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三天内，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同伙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同伙，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他们感到形势不利，又共同策划“改变策略”，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掩盖罪行，破坏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查，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

綜上所述，被告人刘殷农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在云南制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打倒国家和地方党、政领导人，颠覆政府，策动武装叛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百零二条、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犯有颠覆政府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wengewang.org

此致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熊世华 付远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 19 号

公诉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熊世华、付远兴。

被告人刘殷农，男，四十二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辩护人 杨维新、郜金波，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刘殷农伙同黄兆其、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及广大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拘禁后，又积极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被告人刘殷农及其同伙在云南的犯罪活动，前后达十年之久，使我省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

和人民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刘殷农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刘殷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与其同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赵健民是“大叛徒”、“老反革命”,执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的策划煽动下,先后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还有省委书记刘明辉、省委副书记孙雨亭、高洽国、省委常委赵增益等领导干部。特别在康生公开点名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的冤案后,刘殷农及其同伙,更是紧密配合,大掀所谓“赵健民之流”,罗织各种罪名,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一千四百七十三人,被打伤致残的有九千六百六十一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殷农就曾指使陈天寿等人非法拘禁无辜群众袁宝华,致使袁被刑讯逼供而死。

一九七六年四月,刘殷农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未遂的反革命事件”,布置王海全等人搜集材料,并由马首良等人写成“报告”,经刘交涂晓雷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是此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年五月,当王永昆一伙公开诬陷已故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拘捕时,刘殷农为了包庇其同伙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诬陷周总理的罪行,指使王云仙等人制造伪证,叫安朗起草《报告》,诬陷王必成等是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的“后台”,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反革命目的。we ngewang.org

被告人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阴谋颠覆政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殷农即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权的方针,在昆明提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为了夺权,一九七四年,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组成“八人领导核心”,共谋制定了“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策应林

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省委常委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同时，还向江青、王洪文直接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搞“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煽动打倒王必成、陈康等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加快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又组成“六人领导核心”，积极配合行动。二月，刘殷农发出“战书”，公开向省委“宣战”。三月，又与黄兆其共同策划破坏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提出“省委班子是不行的”，“一定要调整、改组”。在会上，刘殷农发言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梯也尔式的人物”，煽动一百多人，发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和“改组省委”；并亲自带领其同伙冲击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立即发出此一电报。六月，刘殷农及其同伙操纵、控制昆明市党干会，要求“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市促省”，加紧“夺权”。刘殷农在总结其夺权“经验”时，诽谤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要用“暴力”来对付。仅在昆明市的党干会会议期间，就有一大批老干部分别被诬陷为“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不少人当场就被抓打围斗，遭到残酷迫害。

与此同时，刘殷农还与黄兆其等人煽动群众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逼迫释放在押罪犯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等人，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刘殷农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刘殷农的这一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使人民民主专政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刘殷农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仍不甘心。十月十二日，急忙要吴福全去上海窥测动向，十三日及十六日与黄兆其等人频繁开会，策动武装叛乱。共谋“上海不干，我们在云南干”，“学习蔡锷大干一场”，“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在此期间，刘殷农部署了其同伙在昆明一些单位和厂矿，“控制民兵”，准备“搞武装斗争”，并向文山、楚雄等地的任怀灿、马昭等“打招呼”，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并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

施及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罪恶计划未能实现，刘殷农又与黄兆其变换手法，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准备“第二套班子”，妄图作最后挣扎。

本庭经过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五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一百一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刘殷农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应按现在实施的《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刘殷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云南犯下了大量的罪行。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刘殷农已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李绍华

人民陪审员王鹏程

人民陪审员刘 洁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周素蓉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胡延观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昆检刑诉字第 18 号

被告人胡延观，男，汉族，四十八岁，初中文化，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wengewang.org

被告人胡延观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凭借其地位和权力，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图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 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延观化名胡立群与刘殷农、林敬荣(化名林叶)联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三十年代就摇尾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分子，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云南“经过苦心经营，确实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黑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内奸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将一九七五年中央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情况，省委向中央报告省级机关和地委常委以上干部排队情况，以及省委关于对阎红彦、赵健民“问题”的研究意见等重要机密，蓄意编写在会议第四十七期简报上，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同伙，同时，在“简报”中诬蔑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确实已经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还攻击刘明辉等几位常委“搞阴谋诡计”、搞“核心中的核心”，是“超级省委”。把省委贯彻(75)26号文件，说成是“整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镇压造反派”。四月底，胡延观在省级机关批判大会上发表演讲，继续扩散省委的重要机密，煽动夺权。诬蔑省委“以整顿为纲，把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把有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三要翻案的所谓‘老家伙’重新扶上台，实行领导班子大调整、大改组、大换班，。他的演讲稿被徐宝兴等人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把各级领导班子搞瘫痪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

二、参与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延观将王洪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诬蔑云南省委一九七五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的很厉害”，“省委反派性，搞带职下放，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是迫害新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的一根棍子”的讲话提供给黄兆其。同年三月，胡延观又向黄兆其提供了一九七五年省委贯彻二十六号文件的情况，同时诬蔑邓小平接见了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四人后，“刘明辉就大刮右倾翻案风，搞大调整，把年轻干部大批的搞下去”，“郭超伙同万里在铁路局刮右倾翻案风’。胡延观还对黄兆其说：“省委一九七五年为阎红彦，赵健民翻案”。胡又私自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不属于黄看的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简报，并作了摘抄。胡延观还将省委领导人对中央打招呼会议的讨论情况提供给黄兆其。胡的上述行为，为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篡夺省委领导权制定“靠、打、拉、烧”的方针提供了反革命依据。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四月底，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之前，胡延观给林敬荣出谋献策：理论讨论会“要在群众性揭批的基础上，弄清右倾翻案风的表现”，“真批邓假批邓，标志是联系不联系云南实际”。林敬荣即于五月三日在其家中，与黄兆其、杨玉荣、刘浩等人开会，策划制定了五条反动方针：①要揭发省委假批邓的阴谋；②要戳穿搞纯学术讨论的骗局；③要发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从里面作斗争；④会内会外配合；⑤争取把这个会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林敬荣将上述内容写成大字报，在理论讨论会上，进行反革命煽动。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胡延观为篡夺省委领导权，把他们捣乱造成云南省一些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瘫痪和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口授给去北京的林敬荣，转报给了姚文元和迟群，嫁祸于省委。当迟群收到“报告”后，对吴炜煜说：“象这样的情况很重要，你遇到了及时转给我。”林敬荣领受了吴炜煜关于“云南问题，象一个要穿透了的脓包一样，是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的旨意。回昆后分别向胡延观、黄兆其等人作了汇报。

一九七六年六月下旬，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向胡延观传达了中央关于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并向他宣布了“不准告诉任何人，要以党籍保证”的纪律。胡延观当时表示“一定按省委决定办”，但第二天就把这一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并要黄兆其“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等人得到这一情报后，于七月中旬和八月初两次在杨慰农家开会，策划了“要抓紧解决恢复职务的问题，争取多一个算一个，然后回本单位斗”。“要抓紧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些组织问题”。对省委领导“不能拿掉几个，也要争取分是非时棒棒打重一点”。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一九七六年八月下旬，胡延观与黄兆其进行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策划。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两晚上，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徐宝兴等人在杨慰农家开会，按照黄兆其与胡延观事先的策划，提出了对“五大书记坚决打(倒)”，“但重点应该转向王必成、黎(韦)”的方针。并提出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方案。会后，黄兆其把他们策划的方案告诉了胡延观，胡表示赞同。九月二十八日由涂晓雷、林敬荣执笔写成“报告”，胡延观看后表示同意。经黄兆其审阅，于次日下午由林、涂送给记者谢荣镇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三、诬陷省委和昆明军区负责人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等公开贴出打倒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和大标语，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后，却在当天与黄兆其策划，以徐、胡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作借口，为该二犯开脱罪责。十九日下午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一起到胡延观家，共谋策划追查“后台”，胡延观捏造事实，诬陷王必成、黎韦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二十四日晚，胡延观和黄兆其一起将诬告王必成、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的情况报告公安机关，要求追查。

被告人胡延观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八条，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陷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员：张 藻、李保全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 20 号

公诉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张藻、李保全。

被告人 胡延观，男，汉族，四十八岁，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逮捕前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辩护人 杜大林、杨树林，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胡延观，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胡延观凭借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与黄兆其等共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政军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被告胡延观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胡延观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wengew ang.org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延观与刘殷农等人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变分子”，“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组织了一套“叛徒、特务、内奸”的“黑班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一九七六年三月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行动，利用他主持编写《简报》的机会，诬陷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诽谤省委刘明辉等领导人“搞阴谋诡计”，组织“超级省委”；同时又将省委讨论赵健民“问题”及向中央所作有关干部情况等机密材料，蓄意泄露扩散，诽谤省委一九七五年研究赵健民等冤案是“翻案”。同年四月，胡延观在一次省级机关大会上发言，诬陷省委大批领导干部是“复辟”、“翻案”、“算账”的“老家伙”。胡的这一反革命发言稿，由其同伙徐宝兴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起了反革命宣传煽动作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在昆明街头公开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此一反革命活动后，与黄兆其共谋开脱徐、胡二人罪责；五月十九

日, 又在其家中积极与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密谋策划, 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 示意是“五. 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之后, 又将其诬陷内容告诉林敬荣, 由林报告给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五月二十四日, 胡延观同黄兆其一起将黄梅仙编造的伪证告诉给公安机关。

被告人胡延观为了篡党夺权, 颠覆政府, 利用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 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提供给黄兆其等人。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 胡延观将省委领导干部对待所谓“打招呼”会议的不同态度密告黄兆其, 阴谋分裂、搞垮省委。一九七六年四月底, 在“理论讨论会”前, 向林敬荣出谋献策, 利用“理论讨论会”煽动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同年六月, 胡延观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 造成云南党政机关瘫痪及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有关材料, 提供给林敬荣, 嫁祸省委, 由林通过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据点, 转报姚文元及迟群, 妄图改组云南省委。尤其严重的是, 一九七六年六月下旬, 胡延观竟把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 示意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刘殷农得知此一重要机密后, 于七月至八月多次开会策划, 抓紧时机, 要“解决一些组织问题”, 进一步加快他们的夺权行动。wengewang.org

本庭经过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 有五名证人出庭作证, 对各种证据五十八件进行了审查, 充分证明胡延观所犯上述罪行,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 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的规定, 应按现行《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胡延观, 利用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权, 将其所掌管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积极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 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情节十分恶劣, 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 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 阴谋颠覆政府罪,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 第九十二条, 第九十八条, 第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三十八条, 第五十二条,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wengewang.org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蔡国栋

人民陪审员：曾有琥

人民陪审员：徐抗美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梁美玲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涂晓雷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昆检刑诉字 19 号

被告人涂晓雷，男，汉族，现年三十五岁，贵州省开阳县人。捕前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被告人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参加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一九六七年六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造了题为《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在昆明市和全省各地大量印发张贴、广播，捏造“蓄谋已久的

五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五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壁等领导干部“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号密室里，开始了他们五月兵变的罪恶活动”。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这篇文章对搞乱、分裂部队，使云南省军区的大批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朱家壁等人身体被摧残致残，起了煽动作用。wengewang.org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授意，由涂晓雷等人写了题为《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诬陷赵健民等人“为了达到翻案复辟的目的，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就是他们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造成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这篇文章起了极坏的欺骗、煽动作用，对此严重后果，涂晓雷负有罪责。

一九七四年六月至十一月，涂晓雷与黄兆其等人策划，写了题为《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省“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提出要“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炸！”要把省委“沉没”、“埋葬”。

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执笔并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编造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把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一批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王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扑”。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二十五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有的还被诬陷为“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同时明确提

出：“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存的省委必须改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二、进行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贾启允诬陷邓小平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后，即将此话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指使授意《红旗》杂志社的“池恒”等编写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并制定了利用三月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方针。由涂晓雷在会外写大字报，配合会内的斗争，涂参与策划执笔编写了《谁是刽子手》和《敦促刘明辉转弯书》的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还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等等。涂晓雷还参与修改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写的改组省委的电报稿，涂亲笔加上“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把邓小平打倒。

一九七六年四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共同策划决定，由涂晓雷、沈炳章等人到北京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汇报情况，领受旨意。四月十八日，涂晓雷化名王正名、沈炳章化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委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将昆明市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为“昆明未遂四·八反革命事件。等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涂当即受到接待人吴炜煜的表扬说：“你们云南揭邓是比较早的，象那句典型话(指贾启允诬陷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是从你们寄给的材料中发现的，我们就用了，你的那封信写得很好”，“我们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全国运动”，“我们会替你们保密，你们也要替我们保密”，接着吴炜煜对涂晓雷授意说：“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飞跃”，“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作够”等等。wengewang.org

涂晓雷领受了上述旨意，于五月十日回到昆明，五月十二日，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讨论，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总理了，运动发展下去是可能公开的，新的体系要站住，必须把老的体系搞掉，要做到这一点总理是个关键人物，现在先看看再说，可先作些准备。决定了王永昆反革命集团公开打周总理，先让他们打。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发生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包庇徐宝兴、胡恒铿，和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案的“后台”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写信给文化部于会咏、刘庆棠提出要求改组云南省委。九月中旬，涂晓雷又和林敬荣到连云巷向《人民日报》“记者”谢荣镇面谈了改组云南省委的阴谋，接着涂晓雷又与林敬荣编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送交谢荣镇，郭剑峰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这份改组省委的方案中，要求江青反革命集团派一个在云南军内外有影响和熟悉云南情况的中央委员（指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当省委第一书记；要黄兆其、朱克家等人进省委领导班子。

三，积极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涂晓雷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积极活动，于十月十三日参加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等等。会上决定搞蔡锷式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策动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充当蔡锷式人物”。并制定了绑架党、政、军领导干部，占领电台，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的同伙“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确定以昆明、楚雄等地为发动武装叛乱基地的行动计划。涂晓雷分工负责与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联络。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叛乱的阴谋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员面谈的时间地点。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十月十四日涂晓雷还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暗语电报，要沈到

南京找人探听上海等地的动向速回昆明。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他们感到形势不利，又转变手法，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订立了攻守同盟，转移、销毁了罪证材料，写了《联系云南实际，揭批“四人帮”》的三十条提纲和《周兴是怎样死的》等三篇文章，制造混乱，破坏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查，确定了“迎接反复”的“第二套班子”，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w engewang.org

被告人涂晓雷的上述犯罪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王 鑫 王瑞启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 21 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鑫、王瑞启。

被告人涂晓雷，男，现年三十四岁，贵州省开阳县人。原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辩护人：杨富春、马军，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对涂晓雷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涂晓雷在云南参与黄兆其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案犯。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

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划武装叛乱。被告涂晓雷等人的犯罪活动，长达十年之久，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wengewang.org

被告人涂晓雷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一九六七年六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写了《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反动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反动文章在昆明等地广为散发、张贴，对于搞乱部队，使大批军队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黄兆其的授意下涂晓雷参与编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领导干部和群众，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这篇文章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对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起了极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一九七四年六至十一月，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反动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并诬陷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煽动打倒省委领导干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撰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反动文章广为散发，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一批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要把省委“坚决打倒”。wengewang.org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诬陷邓小平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利用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涂晓雷在会外写了《谁是刽子手》等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积极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在会内夺省委的权。同时参与修改黄兆其等人诬陷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走资派的精神支柱，不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不能平民愤的电报稿时，涂晓雷亲笔加上“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打倒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四月，按照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策划，涂晓雷与沈炳章化名王正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及昆明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的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并领受了“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作够”的旨意。涂晓雷回到昆明，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传达，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周总理了，共谋策划：王永昆他们要公开打倒总理，先让他们打，看看他们打的情况再决定行动。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被公安机关拘捕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案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进而又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与邓跃泽联名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改组云南省委。九月中旬，涂晓雷又与林敬荣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夺权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涂晓雷得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三日晚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提出：要“搞武装斗争”；密谋策动驻军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进行叛乱，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武装弹药，以昆明、

楚雄等地作为武装叛乱的基地；给同伙“打招呼”，作好武装叛乱的准备。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参与驻昆部队的许梅康等人的密谋会议，分析了军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并安排了黄兆其与驻军某副司令员会面的时间、地点；同时，涂晓雷还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速返昆明。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上述情况汇报给黄兆其、刘殷农，再次研究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实现。事后，被告涂晓雷又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转变手法，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材料，确定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五次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六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都证明被告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涂晓雷基本供认了自己的罪行。wenge wang.org 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于判决书送达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尤凤瑞

人民陪审员 浦士厚

人民陪审员 何兆兴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 蔡斌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刘光兴反革命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州检(82)刑诉字第 9 号

被告刘光兴，男，四十二岁，回族，云南省下关市人。逮捕前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现在押。

被告刘光兴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案，经楚雄州公安处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

被告刘光兴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相勾结，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陷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进行篡夺省、州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楚雄地区策应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 一九七四年，被告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勾结，上下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反动传单、材料、煽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秘密串连会，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光兴的策划指挥下，揪斗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在全州煽动层层揪“三派人物”、斗“复辟势力”，致使全州六百三十三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赵××秘密地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利用窃取的权力，把其中十八人安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妄图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

2. 一九七六年一月, 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等人策划向王洪文写诬告信和向“四人帮”派来云南的所谓“记者”捏造事实, 诬陷楚雄州、县领导干部“私设王洪文专案”、“带头怂恿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让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 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等, 信中被诬陷的干部有余活力、高仕良等二十四人, 其中县以上领导干部十六人。

3. 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 危害人民民主专政。一九七六年一、二月, 在刘光兴主持下形成的向王洪文告状的信中, 以及陷害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的传单中, 污蔑政法机关逮捕罪犯是“搞资产阶级专政, 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是“镇压造反派”, 为释放罪犯造反革命舆论。二月十九日刘光兴支持禄丰的张乃贤等人围攻州委书记余活力, 要挟释放罪犯李国荣、李清明。二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在州委大会议室对张乃贤等人说: “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我支持”、“对走资派就是要敢斗, 不能手软。”在刘的煽动下, 张乃贤等人于二月二十七日将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挟持到昆明要挟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 为在全州强迫释放在押罪犯打开了缺口。一九七六年六、七月间。刘光兴多次说“抓人是右倾翻案风中抓的, 路线错了, 先放出来再说”。在刘光兴煽动支持下, 一九七六年全州被强迫释放罪犯 18 名。在释放罪犯时, 出现敲锣打鼓, 鸣放鞭炮迎送, 甚至罪犯报复殴打政法干部和群众的严重情况, 对此, 刘光兴负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责任。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九月, 省委决定拘留禄丰“八·二五”打砸抢事件的现场指挥李成滇、普文荣。刘光兴在执行拘留普文荣时, 亲自参加为普文荣举行的“告别酒会”并流着眼泪说: “用我的手抓自己的战友真是痛心”, “我希望你们在家的要团结战斗”。在拘留李成滇前夕, 刘光兴向禄丰的唐联学等人说: “你们这次欢送造反派头头可以多来点人, 搞得热闹一些, 来了可以批斗余活力”。在刘的煽动下, 唐联学等人于十月十二日给李成滇戴上大红花, 出动一百多人, 坐汽车, 呼喊“热烈欢送战友李成滇奔赴新的战场”、“为革命坐牢光荣”等口号送到楚雄。当天下午揪斗了生病卧床的州委书记余活力。

4.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 刘光兴得知参加会议的名单没有他, 刘即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 并通过黄兆其、刘殷农活动参

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冲击地书会，围攻省委领导。刘光兴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制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未逞)，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5. 一九七六年，刘光兴指挥柯平、吴向忠、邱立峰、赵文鼎、李国樑等人多次策划篡夺楚雄州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为实现其阴谋计划，决定了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在党内斗，邱立峰、李国樑、赵文鼎等在社会上斗的策略，秘密组织了夺权的“文班子”，和“武班子”。wengewang.org

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樑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玩弄阴谋手段，指挥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施加压力，强迫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回楚雄后，刘光兴又召集同伙策划控制州委扩大会议，组织打倒州委书记余活力的材料，煽动州、县同伙在楚雄搞“会外配合”。八月八日召开的州委扩大会议被刘光兴直接控制。他指挥同伙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州委夺权。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反革命舆论，受刘光兴指挥的同伙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八月九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对州委书记余活力架“喷气式”罚站板凳。刘光兴支持王朝明等人的非法行为并胁迫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八月二十刚胁迫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八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带领二十多人到昆明，要挟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当“决议”遭到省委拒绝后，刘光兴坚持反动立场。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和省委指示，应由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省委并多次明确指示楚雄州委应由州委书记余活力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可是，刘光兴公开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说：“余活力犯走资派错误，不能主持追悼会或致悼

词”，“我主持追悼会，普贵忠致悼词，以后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刘光兴主持了毛主席追悼会，公然取而代之。

二、按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在楚雄地区策应反革命武装叛乱

6.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五日下午，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攻击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十六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刘在十七、十八日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wengewang.org

7.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州委常委传达了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后，当晚刘光兴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三千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二千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光兴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特提起公诉。wengewang.org

此致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长 赵家栋

检察员 倪安全 黄延德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82)刑一字第 007 号

公诉人：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家栋，检察员倪安全、黄延德。

被告人：刘光兴，男，四十二岁，回族，云南省下关市人。原任中共楚雄州
委副书记。现在押。

辩护人：楚雄州法律顾问处律师 马一麟、刘章达。

被告人刘光兴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
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
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
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对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光兴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
刘殷农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
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
被告人刘光兴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告人
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
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
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陷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阴谋推翻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拘禁后，被告刘光兴又接受黄兆
其、刘殷农等人的旨意，在楚雄地区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其上述犯罪
行为，使我省特别是我州的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各族人民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wengewang.org

被告人刘光兴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刘光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诬陷、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一九七四年, 被告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 上下配合, 指使他人 在楚雄地区翻印、散发《陈康是云南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陈康与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王必成、陈康反动言论选编》等反动传单及材料, 诬陷、煽动打倒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同年三月, 刘又与张×X、王×X 联名写出《司令舞剑, 何其毒也》的大字报, 对王必成和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进行诬陷。

一九七四年, 刘光兴多次召开秘密会议, 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所谓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 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 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的煽动指挥下, 揪斗了楚雄州委党校党委书记(原楚雄地委副书记)任永, 州委宣传部部长马荣春。刘还积极配合军内某些人, 揪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由于刘的煽动, 出现了层层揪“三派人物”, 斗“复辟势力”的局面, 致使全州六百三十三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 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等人秘密提出了一个二十余人的“提干”名单, 把其中十八人安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一九七六年一月, 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策划向王洪文写诬告信和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派来云南的记者捏造事实, 陷害州、县领导干部“带头纵容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 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 用谣言发动群众”等。被诬陷的干部有州委书记余活力、楚雄县委书记高仕良等二十余人。

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初, 在刘光兴主持下形成的给王洪文的诬告信和陷害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的传单中, 被告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 诬蔑政法机关逮捕人犯是“搞资产阶级专政, 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楚雄一片白色恐怖”等。支持张乃贤等人围攻州委主要负责人, 要挟州委释放在押人犯李国荣、李清明。事后, 刘光兴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张乃贤等人的所谓“革命行动”; 并说, 对走资派不斗争是没有出路的。在刘的煽动下, 张乃贤等人于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将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挟持到昆明, 要挟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 为在全州强迫释放在押人犯打开了缺口。

一九七六年,刘光兴多次煽动说:“抓人是在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的煽动、支持和影响下,全州被强迫释放在押人犯 18 名。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执行省委决定拘留李承滇的前夕,刘光兴对唐联学等人说:“送人时,你们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些,来了把人交给余活力。”在刘的煽动下,唐联学等人给李承滇戴上大红花,涂写“欢送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李承滇同志奔赴新的战场”等大标语,出动百余人将李送到楚雄,揪斗了生病卧床的州委书记余活力。

一九七六年三月,刘光兴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通过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活动,刘光兴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会议期间,刘参与黄兆其、刘殷农冲击地书会,围攻省委领导,并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定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领导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参与黄兆琪、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直接参与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刘光兴指挥柯平、吴向忠、邱立峰、李国梁、赵文鼎等人多次进行阴谋活动,决心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等州委领导干部,由他们的一批“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为实现其阴谋计划,刘光兴决定了党内斗和社会上斗相结合的策略,秘密组织了阴谋颠覆政府的文武班子,控制党的会议,布置李国梁、赵文鼎等人搜集材料,罗织罪名,妄图打倒州委主要负责人。同时,煽动州、县同伙涂写“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等标语进行会外配合。会内则支持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对州委主要负责人驾“喷气式”罚站板凳。胁迫州委常委到楚雄军分区

“请”付××参加会议。刘光兴胁迫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调付××、白×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项决议后,又带领二十余人上昆,要挟省委批准两个“决议”。当“决议”遭到省委拒绝后,刘光兴仍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执行中央公告和省委指示,不让余活力主持毛主席追悼会或致悼词,自己取而代之。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刘光兴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仍不甘心。十月十五日,派河平、安且康等人上昆明与黄兆其、刘殷农进行联系。十六日,柯平等人返楚,在其家中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楚雄地区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果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

权”的旨意后，刘光兴便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安且康、邱立峰等人诬蔑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密谋策动武装叛乱。十月十八日，州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关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打招呼会议精神后，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梁办公室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包括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同时还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刘光兴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wengewang.org

本庭经过六次庭审调查和辩论，三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刘光兴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光兴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其行为构成了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审理中，被告人刘光兴尚能认罪悔罪。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刘光兴有期徒刑拾贰年，剥夺政治权利叁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审判长 李洪志

人民陪审员 何家华

人民陪审员 黄养心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李家仁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何立宽反革命案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82)文州检刑诉字第 33 号

被告人何立宽，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革委副主任、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被告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文山州公安处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现查明：被告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旨意，在文山地区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诬陷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密谋策动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一，诬陷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

(一)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诬告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诬陷“岳永喜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二)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何立宽指派陆元明等人到昆明，将由其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并由陈伟将这份材料寄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诬陷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棐：“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诬陷原州委副书记李铤“有叛徒嫌疑”等等。报告中诬陷文山州、县十三名党委常委“大刮右倾翻案风，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二、阴谋颠覆政府(三)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接受了黄兆其“在云南批林批孔、联系实际，主要是批王(必成)打陈(陈康)”的

部署后，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在此期间，伙同胡玉珍策划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四)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何立宽与黄培根、陆元明、丁正中、陈伟、马昭、任怀灿、童永昌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多次策划，形成了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确定了打倒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民、文山县委书记杨铎、副书记项朝光；批判原州委副书记王棐、罗运通的计划。致使文山地区从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多次出现绑架、围攻、揪斗王民、王棐、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州、县领导干部的严重事件。

(五)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领取了黄兆其要他组织人上昆搞会内会外配合的旨意后，指使丁正中、陆元明、陈伟等人“尽快组织人上昆告状”。丁正中等人根据其旨意，于三月二十二日抢了州委大小汽车五部，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组织了一百余人赴昆告状。围斗省委领导干部，向省委施加压力，破坏了省委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后又指使丁正中等人于四月八日组织了二十余人的告状团第二次上昆，冲击州委在昆明召开的常委会未逞，围斗了州委副书记王民。wengewang.org

(六)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积极参与了黄兆其等人改组省委的阴谋活动。并在要求中共中央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和改组省委的电报上签了名。

(七)一九七六年五月至八月，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成员多次进行策划，责成陈伟编写了《文山地区触目惊心的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分别送给《人民日报》驻云南的记者以及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安炬祥等人。并指派陆元明向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炬祥诬告文山州、县主要领导干部，图谋将州委副书记王民、王棐赶走，把支持帮派的李凤萼、苏复调回文山，恢复郭明进文山县委书记职务。八月，何立宽再次指派陆元明等人上昆明，将其和黄培根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还指派陈伟将报告寄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要求将八名省委常委，五名县委正、副书记“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批斗”。

(八)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月，何立宽向同伙传播外地在押犯家属强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所谓“经验”，并把州委研究在押犯的案情泄露给同伙。指使陆元明、童永昌等人煽动在押犯家属两次进驻州委机关，围斗州委领导干部长达十七昼夜。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破坏了州委正常的工作秩序。

(九)一九七六年八月下旬，州委召开扩大会议前夕，何立宽与帮派核心成员在童永昌家，策划了将同伙塞进材料组和各小组召集人，控制州委扩大会议。并由参加会议的同伙在会上发难，向州委施加压力。还由丁正中和马昭搞会内会外配合，写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妄图改组州委，篡夺领导权。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十)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希望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受行动计划。同月十六日，又派童永昌赶赴上海，探听“四人帮”余党的动向，并规定了联络的方法和暗语。

同年十月十三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十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旨意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叛乱，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十一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粉碎“四人帮”前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十月十三日和十九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三发、军用手榴弹四枚。同月十七日、十九日，何立宽又指使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

委要武器弹药，积极准备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何立宽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立宽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活动，诬陷迫害文山州党政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何立宽的犯罪活动，使我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何立宽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此致

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长 依臣勇

检察员 昌坤林 朱荣辉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82)刑判字第 14 号

公诉人：文山州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依臣勇、

检察员 昌坤林、朱荣辉。

被告人。何立宽，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文山州革委副主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辩护人：程兴、陈常富、杨星耀，文山州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文山州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现查明：

被告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何立宽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他当时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勾结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动武装叛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告人何立宽的犯罪活动，使我省、我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全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何立宽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捏造事实，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与杨志明、张协丰等人去找黄兆其密谈。何向黄诬告原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接着黄兆其讲了“运动主要是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联系云南和昆明军区的实际就是要解决王必成和蔡，马、雷、董的问题，要打倒陈康”。对此“何立宽是同意的”。同年四月，何布置上昆找他的刘玉净、童永昌回文山“发动群众，联系省、州实际，深揭猛批与蔡、马、雷、董有牵连的人和事”、“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要打，打不倒(要)逃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刘殷农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人的传单、材料交刘玉净带回文山传抄散发，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五月，何立宽与陈伟、马昭、丁正中、陆元明等人在丁正中家密谋策划，何说：“运动到现在光靠大字报不行了，大字报再多，上面能知道吗？要整材料上报”。指使陆元明、马昭、陈伟等人收集材料，编写了由何立宽署名的《就文山州委主要领导大刮右倾翻案风至今拒不转弯，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汇报材料》和由何立宽、黄培根共同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的恶果的报告》，于同年八月，分别寄送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派人面交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在这两份《材料》和《报告》中，捏造事实，诬陷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榘“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诬陷原州委副书记李铤“有叛徒嫌疑”等等。《材料》、《报告》中还诬陷诽谤文山州、县十三

名领导干部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扶植起来的还乡团，翻案派”，“要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揭发批判”。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何立宽纠集黄培根、丁正中、马昭、任怀灿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密会策划，何对他们说：“王民是刮右倾翻案风的主要角色”、“文山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就指向王民，王栾和罗运通也很坏”，提出要“打倒王民，点名批判王栾、罗运通”，同时支持黄培根在文山县要“收拾杨铎、项朝光”的主张。致使王民、王栾、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州、县领导人多次遭受围攻揪斗和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的摧残凌辱。

参加篡夺省级党政领导权的活动，阴谋颠覆政府。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篡夺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于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冲击了省委常委会议。接着，何立宽又在黄、刘一伙拟写的，其目的在于改组省委，夺取省委领导权和“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了名。为实现夺取省委领导权的同一目的，何立宽还领受了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给省委施加压力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了二批共一百余人的“告状团”，抢了州委的五辆汽车，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击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再次破坏了省委和省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阴谋搞垮省委。

煽动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罪犯，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

一九七六年五、六月间，何立宽召集丁正中、童永昌、陆元明等人策划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何立宽传播了外地在押犯家属逼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所谓“经验”后说：“现在的关键是需要他们(指在押犯)的家属出面才行。我们这里的这些家属‘造反精神不强’”“要做一下他们家属的工作，如果光靠我一个在常委会上斗，他们家属没有“革命”行动，不对他们(指州委领导)施加压力，他们是不会放的”。“现在就是要叫他们家属去进住州委会议室、整天围着康守忠、王民、王栗等几个书记，副书记、也叫他们吃饭、睡觉都守着，其他的工作不能给他们干”。何立宽还说：“要组织一下各单位在街上多出些大标语、大字报，强烈要求州委立即释放”在押犯等等。在何立宽的煽动和唆使下，在押罪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的家属再次进住州委机关，围攻州委领导干部先后达十七昼

夜，逼迫州委领导释放在押犯，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策动武装叛乱。wengewang.org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何立宽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十月十三日与任怀灿等人策划上山打游击。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取如何行动的旨意。十月十六日，何立宽又指派童永昌赶赴上海窥测“四人帮”余党的动向，并规定了联络的方法和暗语。

十月十七日，任怀灿、马昭向何立宽汇报了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和刘殷农要何立宽“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把民兵抓紧，抓住民兵指挥权不放，要注意和部队取得联系”、“万一不行就上山打游击”的旨意后，何立宽又多次与任怀灿、马昭、余相德及军内个别同伙密谋策划，积极响应黄、刘一伙的武装叛乱。选定文山老君山一带为叛乱打游击的活动基地，布置同伙准备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车辆汽油、医药器械、地图、通讯器材等等。后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全州人民的斗争，何立宽的罪恶计划才未能得逞。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立宽在云南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其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和黄兆其、刘殷农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本庭经过七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一百四十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何立宽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本庭确认：被告人何立宽犯了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何立宽拒不认罪，态度顽抗。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被告人何立宽犯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何立宽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审判长 马 忠

人民陪审员 陶恩灿

人民陪审员 杨宗昌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班崇兵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1982]刑上字第 87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立宽，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文山州革委副主任，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上诉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经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判字第 14 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上诉人以无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查明：

一九七四年四月，上诉人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诬告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同月，布置刘玉净等人回文山“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等人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的材料交刘带回文山扩散，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干部。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上诉人与黄培根、丁正中等人策划揪斗干部，致使文山州委和文山县委领导人王民、王菜、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多次遭受围攻和挂黑牌子游街凌辱人身。一九七六年五月，上诉人指使陆元明、马昭、陈伟等人编写由上诉人署名的《就文山州委主要领导大刮右倾翻案风至今拒不转弯的汇报材料》和由上诉人与黄培根共同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的恶果的报告》，于同年八月分别寄送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派人面交黄兆其等人。《材

料)和《报告》中,捏造事实,诬陷诽谤文山州、县十三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翻案派”,“要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揭发批判”。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上诉人参与冲击省委常委会议。并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在“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名。同时还领受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两批“告状团”,抢了州委汽车五辆,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击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图谋夺权。

一九七六年五、六月间,上诉人召集丁正中等人策划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授意在押犯家属“进驻州委会议室,整天围着康守忠、王民、王棐等几个书记、副书记,叫他们吃饭、睡觉都守着,其他的工作不能给他们干”。在上诉人的煽动和唆使下,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的家属进驻州委机关,围攻州委领导干部达十七昼夜。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上诉人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派任怀灿、马昭到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取旨意,派童永昌赴上海窥测“四人帮”余党动向。十月十七日,任怀灿、马昭星夜赶回文山向上诉人密报了刘殷农关于“万一不行就上山打游击”等行动旨意后,上诉人又多次与同伙密谋策划上山打游击,并选定老君山为叛乱基地,布置同伙准备叛乱的武器弹药、车辆汽油、医药器械、地图、通信器材等等,伺机配合黄兆其、刘殷农策动武装叛乱,其阴谋未能得逞。

本庭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上述罪恶有大量物证,书证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完备,应予认定。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和拒不认罪的表现,应予严惩。原审考虑到上诉人犯罪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予以从轻判处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其全部犯罪事实面前声称无罪,表示对原判永远不服,甚至反诬原审违反法律程序,对其诬陷等等,纯属坚持“四人帮”反动立场,掩盖其反革命野心,应予驳回。据此,特依法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wengewang.org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审 判 长 汪福佑

审 判 员 程体儒

代理审判员 石贤才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旭强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二 00 五年五月二十日，思茅市林进良等十六人的公开信：《云南“揭批查”运动中的特大冤案》

一九七六年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云南省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玉必成、省委书记安平生，下了一个毒招，借手中的权力，再次挑起派性的狂潮，他们违背中央清查中的一系列指示和清查标准，无端罗织罪名，把一派群众打下去，把数万人搞去劳改、劳教，因而形成了陈年累月的一大批上访群体，老老上访户。

大自然从春到冬已经走完了 28 个寒暑，岁月和苦难的煎熬这些受害者头上已飞满了白雪，多数人重病缠身，无钱医治，熬不过苦难的已先后含恨离开了人世，在弥留之际还喋喋不休告诉儿孙和难友，一定要为清白和无辜申诉，再申诉。

为此，28 年来我们也不知道向各级司法、党、政部门写过多少申诉书，每个人都有存稿一摞又一摞。

为此，我们的脚板也不知北京、昆明跑了多少遍，苦苦的述求呀，彷徨中的等待，迎来的都是互相间的推诿与白眼。

为此，公安机关为了“守土有责”也不知花了多少警力与纳税人的钱财，来防止“刁民”在苦难中的申求——上访。他们要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管小民的苦和难。

令人关注的十六大召开了，中央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几年来的亲民政策，迎来了人民的尊敬，再次唤起了我们这些尚未灭泯的心灵。特别是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我们奔走相告，认为这是一部解决目前

各类社会矛盾的好经，但愿云南的歪嘴和尚，这次不要再念错，和中央一起同唱一首和谐的歌声。

一、唱好这首和谐的歌，首先就要还“清查”的帐。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随之而来的揭、批、查运动，中央就有明确指示，清查“四人帮”的对象只能是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人；清查范围仅限于省军级；打击面只能是“四人帮”的心腹干将，不能任意扩大。然而云南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安平生，对中央这些指示予不顾。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云南的另一派群众组织。1976 年 12 月 8 日在全省揭批查动员大会上宣布：“查清、粉碎了以省委那几个把持军政大权的人为后台，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帮派体系的清查对象”为标准。从此，上挂下连，凡参加这个群众组织的人，都成了说清问题的对象，成了“四人帮”的须须根，号召另一派的人要象打日本鬼子、斗地主老财一样去报复另一派，哪怕是普通工人、农民、老红军、老干部。边陲的天空一时间杀气腾腾，阴风熠熠，一片白色恐怖。他们支持的那派，则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充当安平生等人的“派卫军”，把已经冷确了下来的派性斗争，又疯狂地燃烧了起来，以百倍的疯狂，向他们的对手扑去，誓报“划线站队”时已纠正了错误的仇恨。栽赃陷害，捕风捉影之风骤起，创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数万件冤、假、错案。只要这些“派卫军”有人说×××划线时打过人，就马上成为打砸抢分子；出身不好的成了“阶级报复”分子。正如云南省高院原副院长李文进在二监派性狂言中讲的“路线正确，一切都对，路线错了一切都是错误的”。“老子连盖章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审你们，单位报上来的材料，党委做个决定，就可以判你们刑了。”他们那一派哪怕是杀人犯、放火犯都一律平反昭雪，如思茅地区墨江农民进城杀了 500 多人的 6.28 事件，普洱农民进城杀了 80 多人的 8.1 火案，澜沧农民进城杀了 38 人的 7.26 事件都一律平反，有的杀人犯还委以重任。权利加派性的疯狂，形成了一派专另一派政的历史悲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批判斗争的就有 150 万人（约为文革中参加这个群众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15 万人，抓捕判刑和劳教的约五万余人。县团以上干部为 7549 人。

例一，思茅地区景东县为例，全县被批斗人数为 3100 多人，被打伤致残的 1000 多人。从县到生产队撤换干部 1000 多人，抓捕 125 人，由公安、警察、专

案组将受审人员五花大绑押到 14 个公社巡回游斗 108 人，正式判刑 53 人，在批斗大会上活活打死 4 人，残酷折磨致死 9 人。

例二，思茅是行署所在地，文革中只不过是普洱县辖区的一个镇，人口不足二万。当时一口气就抓了 103 人，判刑 52 人，逼死 8 人。

例三，普洱县小学教师罗廷祖，被普洱县常委会用 55 个字，以反革命罪判了 6 年刑，出狱后，不给落户，成了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白恩培书记，你在《云南现代简历》的序言中声称，“云南不存在冤、假、错案”，“全省只判了 24 个人”，在事实面前不觉得脸红和面愧吗？是你受蒙蔽，还是有人借你的地位来掩护他们的罪行，我们不得而知。

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云南清查“四人帮”迄今为止，派了数万干部，折腾了 28 年，在你们认为这个“体系”中一个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也没查出来。鲁瑞林将军是你们认定的黑后台，还捏造了一个一·二四假案陷害他，可中央认为是假案，为他平了反。朱克家你们认定的是这个“体系”的首席代表，目前重新入了党，在恩洪煤矿任部门经理。“体系”中两个主要人都成了好人，那么“体系”主体都不存在了，为什么现在还在那里“体系”长“体系”短的嚷嚷。不外乎一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二是为了继续利用权力欺骗不明真象的群众。

众所周知文革中“天下大乱”每个省、每个单位、每个县，甚至有的家庭都分成两派。如果全国所有省、地、县都像你们的搞法，岂不是全国有一半人口变成了“体系”，天下不乱才怪呢。28 年来我们一次次上访，你们一次次封杀。今年 3 月 29 日，部份受害者找省委、在接见代表们时，还首先来了个杀威棒，“你们案子不要讲，两案不能翻，翻案是不行的。”

4 月 25 日，信访局长为首，有组织部、政法委、省纪委参加的接见我们的五个代表的会议上，我们要求“案子不能翻”我们有知情权，法律是公开的，几个在场的领导没有人能出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来。没有任何人敢于正面回答我等提出的问题。

两案者，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也。这两个案件，早在 20 多年前，中央特别法庭已经审理终结，他们的判决书想来你们已经读过。庭审期间没有任何涉及云南的人和事、判决书也没有任何地方涉及云南有人与他们有关联。那么，我们这些受害者，任何人与他们都挂不起钩来，毫无干系。你们现在

为什么还在讲“两案不能翻”，我们有谁是在为他们翻案？你们硬要把我等打成两案，其用心不外乎为了政治需要混淆视听，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用大帽子压制受害者。准确的说我们是云南省王必成、安平生等人趁粉碎“四人帮”之机，制造出来的大冤案、大血案，是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大错案。对于这个大错案，中央早就下了改正令，只不过你们仗着云南山高皇帝远，加上欺下瞒上，又有权力指令公安保驾护航，不准上访，才拖到今天。

早在 1982 年，中央两案工作会议期间，胡耀帮总书记就讲：“清查工作必须按中央标准来进行清查，不能另立标准，另搞一套，把不该清查的人列入清查对象，把一派群众组织，作为‘四人帮’帮派体系，把一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当作‘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来对待，就是扩大化，搞错了就要平反，就要纠正。”

1984 年邓小平在接见安平生、李启明时也说：文革中两派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这个必须纠正，早纠正比晚纠正好，自己纠正，比别人纠正好。

1997 年 12 月 12 日，罗干在全国信访局长会议上讲：“莱阳市清查运动扩大化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中央多次申明，地、县两级不存在‘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要尽快落实解决。”

1998 年国务院办公厅接待处领导同志在接见西双版纳上访的人时，诙谐的讲：“都说西双版纳美丽，可是，那里有这么多‘四人帮’谁还敢去？中央从未发过文件叫下面抓‘四人帮’是你们西双版纳州委自己搞的……”

我们不明白，云南的高官们，为什么至今还在与中央唱反调。2001 年 11 号文件还要把我们打成“没有改造好的帮派分子”中央叫纠正、平反，最近还在顶着“翻案是不行的”这一切都说明你们还在对抗中央，扩大矛盾，压制受害者，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吗？公平与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法律和政策在受害人这一边。可以断言，坚持错误，不但受损失是受害人，而是党心、民心。我们这些人是死了心的，清白人生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

二、“我们也想纠正，但是上面没有政策”。

讲这些话的人，大多是一些有良知的法官。

其实关于纠正“揭、批、查”中的错误，不是什么没有政策的问题，说到底云南当政者愿不愿意作的问题，愿不愿意克服派性增强党性的问题，难道中央为解决这个问题发的文件还少吗？从文件汇编中我们查出的有中发（77）4号文件（78）48号文件，中纪二办秘字（80）25号文件，中发（82）9号文件（这是解决两案的纲领性文件）中办法，（83）9号文件，中办法（86）6号文件，这些文件，当权者不是闻过饰非，就是走走过场。（82）9号文件当受害者从外省贯彻传到云南省后，他们为了压制中央政策在云南贯彻执行，还以泄密罪抓了近千人，关押了两年多，其用心是何等歹毒。

思茅地区中院，根据这些政策，据我们所知，就曾进行过认真清理，并着手解决，在判刑的52人中，先后纠正了14人，某负责人告知某受害者，他看过500多份案件，一个够判刑案件的都没有。98年他们说准备解决几个有影响的人，县上的问题就好办了。

这14个人解决，难道中院不是依法改判的吗？是由于没有政策才改判的吗？

目前所谓没有政策，就是某大人物以言代法，在99年左右下了冻结令，用“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来反对党的有错必纠的原则，事过四、五年了，还在讲“案子不要谈”“翻案是不行的。”省高院××讲我们已向省委写了报告，人家不答复怎么办呢？思茅中院×负责人讲：“如果上面有指示，我们不睡觉也会给你们办的。”“我们每次到省里开会，都提过这个问题，都说省委没有文件”。玉溪市委、景洪州委都曾写过专题报告，可见各级党委和政法部门都承认这个错案的既成事实，只是省委闭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冤、假案”。近日更加蛮横武断“案子不要谈，不纠正了。”“这是你们在诚心构建和谐社会吗？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到底是什么人的口谕，能具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法律是公开的，是公共行为的准则，我们有知情权，我们强烈要求光明正大告诉老百姓；二，法律的实施与废止、解释，是人大的权力，这位“三不指示”的人有什么权力剥夺人大的权力。三，有错必纠，依法行政，清查中老一辈革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他有什么权力篡改。是全党服从中央、还是全党服从个人。

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为了自身的清白，为了生存，为了建立依法治国的和谐社会，我们誓将抗争到底。纵观历史，大凡贤明的君主，其伟大之处，必然是知错必改。共产党就是从不断改正错误中走过来而前进的。要知道正视错误并解决错误才是有信心、有力量、有良知的表现啊！

三、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28 年的苦难，我们这些老上访，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广大的工人、农民、法官、老红军、老干部，他们早就对此事有过公平的定论，对省委某些人枉法弄权倒行逆施行为早已深恶痛绝，本《信》将其要者录后。

50 年代原云南省委副书记马继孔写了一本《紫苑随笔》有这样一段话：“组织了几万干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一个真帮派体系也查不到，查了 15 年却伤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执行的是‘党内分裂向后看’。”他们对上不听招呼，听了传达拒不执行，对下，对伤害的同志，又封锁消息，也不平反，直至今天。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将军在《西南三十年》中写道：“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根深蒂固，热衷于搞派性的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有派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就必然在揭批查中发挥其破坏性和影响作用……”

景洪县小勐养农场×××党委书记，在解决揭、批、查蒙冤坐牢释放回来安置就业的人员会上讲：过去我有派性，抓你们时巴不得枪毙，才解心头之恨，现在看来错了，司法上的事，我无权解决，现在回来了，同等工龄，别人拿多少，给你们拿多少。

思茅地区主管政法的×××副书记，1998 年当听完受害人×××陈述当时揭、批、查时阴风熠熠、杀气腾腾的状况后，感叹道，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啊。”“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不几天他就为这个受害者签发了改判文书。

×××民警，她负责监控×××受害者，2004 年 8 月 15 日为这个受害者送去了水果、月饼，见面后讲道：×大爹，我也知道你是受冤枉的，人家上面叫我来看着你，请你理解，出了什么事，我们的饭碗也会丢的啊！

思茅地区原组织部副部长，当时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一天与受害人×××不期而遇，他深切地握着手说：这些年你受苦啦，那时人家李德云（组织

部长)想抓谁,就抓谁,哪个还敢说个“不”字,就连张文英(地委书记)也讲,老史啊全区凡公社以上一派观点的已经抓了 2000 多人了,这样搞下去,以后怎么交待!

这样的深切同情太多太多了,本《信》无法全写下来。

近来,科学发达,从《毛泽东旗帜网站》我们也获知许多老红军、老八路,也通过网上为我等鸣不平,如 33 年参加红军 91 岁高龄的郑加平老人,33 年参加红军 90 岁高龄的黄泥太老人;33 年参加红军 89 岁的王忠远老人;37 年参加八路军 83 岁的王奇老人,35 年参加革命,原昆明市委副书记李书成老人……

由于 28 年来,我们有冤无处申,有状无处告,委省一些领导又固执己见,不愿改正错误,上访北京他们又监控又打压不能成行。怎么办?我们相信共产党还是好人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无门喊冤,才写了个贴子,希望网友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我们讲讲公道话,催催省委,改正错误,为构建和谐的云南做点好事,我等将永远难忘。

思茅市部分受害人叩拜

林进良 郭继忠 李文兴 郭喜群 杨春正 高岩 吴培信 李红兵 杨中湘 白荣华 金家柱 罗廷祖 刘仕昌 李红武 邱燮荣 王保昌

2005 年 5 月 20 日

二 00 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李树林等三 0 四人关于请求撤销违法违宪的《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办发[2001]11 号文件》的报告

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和全体代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全体委员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即将召开,云南揭批查受冤弱势群体第九次给“两会”写报告了。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在云南被云办发[2001]11 号文件剥夺了。公民依法申诉被云南省政法部门“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超越宪法特权而拒之于法门之外已三十一年了,何以“依法治国”?年复一年给全国人大的维权报告,也没有音讯,故再报告如下:

一、150 多万人受冤的云南揭批查运动

从 1976 年底到 1983 年云南省委领导的揭批查运动，违背了党中央“文化大革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少数阴谋野心家另行处理外，对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必须采取“冷处理”和“从宽从缓”的方针。但云南省委，派性和权力相结合，将云南“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云南帮派体系”全省上下层层清查，抓捕判刑。同时制造了以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为首的“武装叛乱”“武装夺权”“上山打游击”的假案，从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到战士，地方老干部到民兵组织都被“涉案”。云南揭批查受清理审查进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批斗的 150 多万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理的 15 万多人；被判刑入狱的 5 万多人，判处死刑 2 人，审查期间捆绑吊打、刑讯逼供，被打死，逼死的千余人。

昆明市寻甸县 13 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全部以“四人帮”帮派骨干篡党夺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两个农民生产队长也以篡党夺权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全县判了一百多人。

云南揭批查抓“四人帮帮派骨干”，工厂抓到班组的“工人四人帮”农村抓到生产队的“农民四人帮”。昆钢车间抓“四人帮”，还要“三男一女”，连一名军嫂也抓上凑数。

处在高黎贡山里的腾冲县桥头生产大队，揪出了“农民四人帮”，分别是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生产队长和大队信用社会会计。回民马天祥以“阴谋篡夺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 14 年，妻子被逼疯，女儿被拐卖，家破人亡。

玉溪市江川县的民政局干部杨秀杰，是参加解放战争，多次立功的老干部，罗庆明是江川一中的体育老师，是西藏平叛立功的转业干部，两人被定为“帮派后台”，发动全县签名，“要求枪毙杨秀杰，罗庆明”，采取不签名不记工分，不分口粮的手段，造成“民愤极大”假象，被玉溪市中院判处死刑，不给上诉，于 1978 年 9 月枪杀，还不给家属判决书，不准家属收尸至今尸骨无存。

昆明市禄劝县屏山镇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被审查批斗，一名被判刑。生产队长 23 人被关押，数百名干部社员被捆绑吊打。更为荒唐的是，凡被批斗者，人人罚款 100 元，由县委副书记罗应祥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收罚款。

云南揭批查枉法滥判无辜，五万多份判决书，五万多人的政治生命和血泪，是铁的事实，云南省委向党中央和公众宣布和云南党史记载，云南揭批查判刑只有 24 人，欺上瞒下。三十一年来不准申诉，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农民出狱后，不给落户，不分土地……云南的揭批查运动制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错案。

二、最高检践行“依法治国”方略，成立刑事申诉检察厅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 1999 年 3 月 5 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载入宪法第五条第一款的，最高检于 2000 年 9 月 10 日，召开全国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会议宣布最高检，成立刑事申诉检察厅，旨在让老百姓有冤有处伸，有状有处告。韩杼滨检察长强调“对申诉积案不查，有错不纠，就是违法失职，明知错案而拒不纠错，一错再错，就是枉法读职。（引自 2000 年 9 月 10 日《检察时报》头版）

胡克惠副检察长说：“对依法应该予以维持原判决定的，要态度明确，坚决维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做好息诉工作；对确有错误的原处理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和阻力，都要按法律规定，坚决纠正，还当事人一个清白，给当事人一个说法；该赔偿的坚决赔偿……。”（引自 2000 年 9 月 13 日《云南信息报》头版）

有冤要伸，有状要告的云南揭批查受冤者，依法向属地法院检察院和原单位提出申诉。不到四个月时间，申诉形成规模，这是枉法滥判的必然后果。是“依法治国“依法维权的政治文明的进步的可喜现象。

三、违反宪法，剥夺公民申诉权的云办发[2001]11 号文件出台

2001 年 2 月 26 日，当时的由省委书记令狐安（现任中纪委常委）副省长李汉柏（现任云南省纪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黄维彬（现已腐败下台）三人决定召开全省紧急专题工作会议，三人会上的讲话，将依法申诉的公民，非法定罪为“没有改造好的帮派分子”“帮派残余分子”；将依法申诉的行为，定为“为‘四人帮’翻案”“否定云南揭批查伟大成果”；对依法申诉者采取“四打一挖”措施（即孤立、打击挑头扛旗的骨干分子；彻底打掉他们妄图翻案的幻想；及时打掉他们的组织，打断他们的联系。对那些骨干分子和幕后策划者、指挥者采取有效措施，严密监控，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摘自中共云办发[2001]11 号文件第 12 页）三位领导的讲话内容，于 2001 年 3 月 2 日形成了“紧急专题会议《纪要》”

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办发〔2001〕11号红头文件发至全省各基层连夜传达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依法申诉是公民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

依法受理公民申诉是法律监督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能，从1979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施行，到1997年《刑法》修订，这是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健全。到了2001年3月2日中共云南省委居然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出台云办发〔2001〕11号红头文件，以“云南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的“绝对正确的结论”，干预司法，不准公民依法申诉，不准政法部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是典型的“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红头文件是“依法治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云南高级人民法院明确答复上访者：“揭批查的申诉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法外律条，使宪法和法律在云南成了一纸空文。

四、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统治下人权被肆意践踏，在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笼罩下的云南大地，依法申诉的公民却成了公安机关的专政、监控对象。

①按申诉上访名单“照单请客”被公安局传唤到各地派出所威胁、恐吓进行审问、笔录，强行在笔录上按手印，更不能容忍的是要被传唤者站到派出所的墙边，象小偷、刑事犯罪嫌疑人一样，强迫照相……人格受侮辱，人权尊严被肆意践踏。遇重大节日、活动、警察、保安人员监视居所，最长者达8天8夜之久。

②在云南申诉无门的状况下，派代表到北京上访，公安警察围追堵截，把上访者从飞机上、火车上拦截下来，关押（称置留）非法搜查行李和随身物品，非法审讯，并强迫照相，使70多岁的李树林同志身心和经济受到摧残和损失。

③要求省委撤销云办发〔2001〕11号文件，在省委信访室门前，遭警察施暴，将80多名70岁左右的法定老人，强行推、拖、扭、抬、丢上警车，拉到昆明市体育馆关押。郭继忠当场被扭伤腰，不能动弹，送往医院。膀胱癌患者王伟被强行扭、拖丢上警车受伤，当晚大量尿血，病情恶化，现已去世。十多人老人被扭伤手臂，撕烂衣、裤，扭烂手表。警察对风烛残年老人施暴的2006年“3.21事件”激起了昆明市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慨。

④为避免老年人再受类似 " 3.21 事件 " 的伤害，便采用书面请求省委、省政府、省信访局长预约接访，由 5 名代表参加、时间地点由领导决定。几十次 " 预约接访报告 " 石沉大海，有序上访遭无理拒访。2007 年 1 月 11 日，派信访代表到省委信访局讨个回应。70 岁左右的老人们有序地坐在信访接待大厅等候领导来接待代表。省委又下令出动防爆警察 100 多人，多辆警车，到信访接待大厅抓人。老人们手挽手含泪高唱《国际歌》，喊着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毛主席万岁 " 的口号，抗议和阻止警察抓人，警察两次冲散人墙，冲进接待大厅，将冲击倒地的 9 名老人（其中三名老妇）拖、扭抬丢上警车，拉到市西山区公安局关押，一天不给吃饭……。

从 2006 年的 " 3.21 事件 "，到 2007 年的 " 1.11 事件 "，中心议题是要求省委听取撤销云办发[2001]11 号红头文件的报告和诉求而遭到残酷镇压的。

2006 年 3 月中组部、中纪委派巡视组到云南，云南省揭批查受冤者 3000 多份申诉报告寄到巡视组，组长祁培文向申诉人承诺：" 把情况带到北京汇报，研究解决的办法 "。2006 年 4 月就 " 要求撤销违宪违法的云办发 [2001] 11 号红头文件，向中纪委写了《投书状》有 107 人签名，也给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寄了《投书状》，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2006 年 5 月，胡锦涛总书记到云南考察，巡视组长祁培文和省委书记纪白恩培向胡总书记也汇报了上述情况。

2007 年 7 月，老人们进京上访，五位同志被抓回（一人在京 2 人在途中，2 人在昆明）被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 15 天。

在云南，违宪违法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 " 红头文件 "，公民投书控告，胡总书记不管，党中央不管，全国人大不管。老百姓维护宪法和法律统一、尊严、权威，维护自身人权，在中国到底由谁来管？？？问苍天，天不应，问大地，地不答。" 以人为本 " "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 " 依法治国 " 在哪里？？？到何处去寻找？？？

五、希望之光

2007 年 11 月 27 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并强调《切实抓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各项工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法制保障》。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2007 年 11 月下旬，到各

部分政法机关和最高检调研时两次强调：“……要着力，着眼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司法不公的问题……”我们希望把“着眼”和“着力”落实到“着手”，变成“着手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公、司法不公的问题”。真正让老百姓有冤有处伸，有状有处告，促进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2007年12月25日在全国政法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同政法会议代表和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提出做好政法工作的五点要求，其中“要维护人民权益”一题中强调：“维护人民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目的。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要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问题”。胡总书记对大法官，大检察官提出了“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给人民以希望。但是政令出了中南海，并不是都能遵照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到云南27年，至今都没有传达贯彻落实，是最典型的实例了。

六、我们的请求和建议

根据《宪法》总纲第五条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规定，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请求和建议。

1、按照《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的第八条”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我们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或责令中共云南省委自行撤销违宪违法的云办发[2001]11号文件。因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共云南省委也不例外。

2、云南省委领导的揭批查运动，将“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云南帮派体系，践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派划线，以派定罪，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重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云南揭批查所判案件，违反1980年1月1日施行的《刑法》第九条，运用溯及力判处案件是无效的。

云南揭批查运动制造了冤假错案，同时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揭批查既得利益集团，为巩固发展其利益，出台了违宪违法云办发[2001]11号文件，不准公民依法申诉，不准政法部门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一次又一次地镇压公民申诉维权。他们受既得利益所趋动，从本质上和实际行为上，不能自觉依法纠正冤假错案。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宪法》第七十一条，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到云南实地调查，作出相应决定，拯救冤民，昭雪冤魂，解除受株连的子孙后代背负的冤谱，切实解决司法不公，执法不公的问题，将“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依法治国”方略真正落到实处，构建和谐社会。

恳请“两会”关注云南。报告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报告人：

李树林 吴万宝 钟 丽 安炬祥、田 俊 宋国强 李长友 杨思祥
尹华才 息嘉良 杨吉丰 马首良、耿明贵 金家柱 赵 凯 施云生
刘仲权 方 棉 张正清 包亚芳、李正启 桂保龙 朱昆泉 杨崇信
刘志忠 丁 雁 刘志宏 雷廷富、汪多闻 周炳发 王 发 杨仁民
黄传华 李忠厚 杨荣辉 杨凤全、叶宝平 胡海泉 唐之建 高培芳
俞晓文 梁凤鸣 骆尚彬 孔德苍、王福生 罗绍祥 刘 荣 张奎林
罗中明 杨红礼 田忠义 孙朝银、王大林 王占国 李炳臣 张 金
师本龙 孙根芝 伽正喜 李 聪、贺 聪 丁忠福 陈发贵 熊国宝
黄梅先 王 玲 古安生 李金陵、艾文彬 李积德 林家才 王兴武
贺加烈 杨 谦 刘金祥 马应生、于祖培 廖光碧 许少先 于 宽
唐万鹏 王汝清 吴培信 施德邦、沈 焯 董华春 高清云 丁建华
丁执恭 龚庆生 周金昌 王成佑、李其明 薛继才 孙 良 李久华
蒋银构 叶家先 宋 猛 石济仲、李光彩 邱秉苍 高湘南 龙巧英
高家贵 李 祥 宋自华 张祖荣、李 龙 何 清 赵加义 杨声誉
梅永源 王兴华 马光第 杨本茂、毛振成 陆洪星 赵忠才 那天佑
毛来仲 张自强 王 发 黄成龙、张延贵 马学功 施从善 郭继忠
张文学 梁建萍 颜尧贵 林进良、周载祥 杨吉平 张进昌 罗庭祖

金和益 郭平 肖明忠 杨宝贵、王瑞明 李红兵 魏石清 段希陶
李文兴 李桃兴 李向明 梁剑平、林凌鹏 丁金寿 黄建文 刘启汉
唐之建 王家福 董时汉 曾琼仙、华陵 窦根相 雷荣生 张世显
李春楷 洪家祥 赵自荣 张秀英、杨丹 魏德升 陈兆翔 马光华
杨恩佑 彭传芝 唐天材 马敬新、虞老玉 陈建昆 方绵 宋天喜
徐明 赵光斗 付觉吾 张保明、张顺 杨永祥 李忠厚 徐典模
王兴华 张占云 张文清 李国汉、秦长生 吴刚 杨福云 张华强
刘建友 方文林 曹文宝 杨文顺、赵道富 普华荣 杨子明 周培信
郭平 黄勇为 李寿海 杨万先、冯鹏书 王华生 官体富 周大勇
何荣荣 郝文荣 冯宝清 李贵香、滕少清 王幼志 严家荣 帅素芳
李朝友 孟庆岚 华峻 王幼功、马美云 左应 王云仙 杨再兴
王霖 刘志兴 张竹兰 马学功、阮金祥 聂文烂 马超群 柯平
吴选凤 苏应达 王开云 诸泽高、杨德洪 陈昌武 赵正斌 林家才
谢廷升 李显宗 赵正宾 李应昌、杜崇德 李连培 李云开 陈谦贵
方文林 罗寿昌 余刘礼 张大学、孔承平 尹加盈 葛海生 陈启先
钱德珍 李向明 金合益 张宝明、苏履华 杨增堂 赵季林 赵忠武
邓自逵 马太稳 吕伯伊 程德剑、苏红昌 陈兴启 张振雄 李襄蒙
周济云 邓仙兰 王正发 高辉、马金文 李其富 李振华 王沛
孟国富 杨国富 李焕星 周云生、吴万宝 皋振邦 周淑华 自培义
郭龙昌 时耀龙 杨尚谷 杨体仁、秦长荣 刘光国 陈元龙 徐继华
常永新 樊代源 杨荣芳 王炳仲、施丕振 刘其祥 杨位 舒定然

日期：2008 年 2 月 25 日

二〇〇八年三月七日，李树林等关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 26 年来拒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 号文件——为解决我们的生存权，致全国“两会”的公开信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

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全体委员：

我们是云南揭批查受冤弱势群体，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之际，连续第 10 次给“两会”写报告了，虽然都石沉大海，但是我们还是要写，因为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历史，为未来，为后人我们也要写！

今天的信是向“两会”代表、委员诉说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 26 年来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 号文件始末的事实，以及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以安平生、王必成成为书记的云南省委，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把一大批衷心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的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农民，打成“‘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作为敌我矛盾，动用专政工具判刑处罚，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法律后果。

云南揭批查运动自 1976 年末到 1983 年，计：被不准上诉名为处死实为谋杀 2 人；被判处刑罚入狱 5 万多人；受党纪、政纪、行政开除公职处理 15 万余人，受审查、批斗的 150 多万人，审查期间被打死、逼死千余人。其面之广，其数之巨，堪称全国之最！

中共中央中发[1982]9 号文件是“文革”后指导揭批查的纲领性文件。中发[1982]9 号文件下达，云南 5 万多受害者都早已被判刑锒铛入狱了。虽然政策明显滞后，但它毕竟是一把……尺子。然而，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视此文如洪水猛兽。

一、封锁、抵制、对抗中发[1982]9 号文件是云南省委的必然选择

云南以安平生、王必成主政的省委，站在资产阶级的派性立场，利用掌握的权力，违背 1975 年、1978 年《宪法》，所搞的揭批查运动，以决计问罪在先，锻炼周纳罪状在后的法西斯手法，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冤假错案，云南冤狱遍地、一片白色的恐怖。派性既得到利益集团弹冠相庆，加官晋爵。到 1982 年已是他们收获权力和利益的黄金时期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传达贯彻中发[1982]9 号文件，对云南执政当局，显然是不利的。他们搞的以派划线，大搞派性报复的违纪违法的揭批查，就会大白于天下；他们私设监狱、刑讯逼供、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上千人的罪责，就必将

受到追究；其以党代派、以权代法，锻炼人罪，枉法判处数以万计无辜者刑罚的狰狞面目，必将暴露……；他们费尽心机篡夺的权力，也会受到质疑和动摇。……

为巩固派性利益集团一统云南的天下，对中发[1982]9号文件，执政当局对该文封锁、抵制、对抗是其必然的选择；对传播中发[1982]9号文件者则以大狱伺候！

二、传播中央文件精神者被抓捕，向中共中央举报者被判刑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国家，执政党有关其党员及人民权益的文件，让人民知道，是尊重和维护党员与人民的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举。可是，在其他各省传达贯彻中发[1982]9号文件的消息，使云南的蒙冤者们，窃窃私语、偷偷议论，传播该文件的精神，希望能纠正云南揭批查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但事与愿违，这一可怜的梦想似的应然权益，在云南是不准私语和议论的，因为触犯了云南的派法！当国保部门侦得上述私语行为，云南省委再次下令，再用刑罚镇压的手段，对付私议传播该文件的无足轻重的客体似的人们！这似乎是不准说话的王国的童话？不，人民代表们！这是千真万确的血泪事实啊！请看：

原云南省交通厅的张显忠、傅觉悟，原昆明市委宣传部的王海泉、昆钢的董时汉，×××的家属陈建英等，都因偷偷传播中发[1982]9号文件精神，被以“现行反革命”、“泄密”等罪名抓捕入狱。全省在同一时期，因同一问题被抓捕的都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竟达千余人。这些人被关押的时间，最短的三个月，最长的达三年多。云天化的钱厚源因传播了该文件精神，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其高大的身躯被压弯投入囹圄，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保山地区干部滕少清，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的精神，结合保山地区在揭批查中违法、违纪的实际，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按理说，这是共产党员的权力，是《宪法》保障、党章允许的合法行为。但云南省委受不了了，怎么能容忍自己辖下的问题，被捅到中央去呢？于是，他们派公安厅的张××和省纪委的贾××，冒充是“中央调查组”找滕少清调查落实所反映的问题，滕欣喜若狂，将时任保山领导搞揭批查违法、违纪的问题一一汇报。滕少清哪里知道，这次谈话成了他“攻击”领导的“交待”证据。因此，1982年11月2日，滕少清被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云南日报》为此还在头版发了专讯：“坚持邦派立场，攻击清

查工作，诬告陷害领导，保山地区邦派残余分子滕少清被依法逮捕”，并配发短评——《保持应有的警惕》。

这种以监狱与舆论双管齐下的残暴手段说明，当时的云南省委“执政”为谁不是很清楚吗！无须注释。

滕少清在狱中受尽折磨，当局采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逼供、诱供、指供。保山地区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对其起诉，由于没有任何“反革命”证据。只要有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滕少清最终还是于 1983 年 4 月 28 日，以“诬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判决书为“（1983）保地法判字第 04 号”。

宣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下级党组织的本职工作和职责所在，也是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言论和行动应该是一致的。而云南省委之所以不仅不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反而在全省范围内动用专政工具、舆论工具，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手段，肆无忌惮地对付传播该文的这群被压在社会底层的没有法律，没有人权尊严的过着苦难生活的人民——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革命者——是为了维护揭批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法纪何在，天理何在？以上事实说明，云南的揭批查，是见不得阳光的！把持省委大权的宗派利益集团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欺上压下，有恃无恐的独立王国。

三、云南省委既出台云办发[1982]26 号文件，又不执行，是作“秀”

1982 年 5 月 31 日，中共昆明市委根据中发[1982]9 号文件精神，给中共云南省委作了《关于对劳改劳教释回的邦派人物安置处理的报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批转了昆明市委的《报告》，出台了云办发[1982]26 号文件。中心内容是“由原单位安置就业，安排其生活出路”（附上，中共昆明市委的《报告》和云办发[1982]26 号文件）。可惜是画中之饼。

中发[1982]9 号和云办发[1982]26 号文件关于“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确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的规定，若执行可缓解政策相对人的处境。当时我们的年龄都在 35-45 岁之间，具备就业条件，有的具有专业知识，一技之长，安置就业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云南既得利益集团，对坚强地活着出狱的人，是最大的“心病”，必须置于死地而后快，怎么能给“安排生活出路”呢？所以出台云办发[1982]26 号文件是作秀，完全是应付中央。云南省委自己出台的文件，自己也不执行，省

委、省政府机关被判刑的几十人，一个也没有“安排生活出路”，连昆明市委也不执行云办发[1982]26号文件，全省各地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宪法》给我们就业的权利以及……，统统被剥夺殆尽，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单位当然拒绝安置了，其他单位又不敢收“帮派人物”！这是云南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云组通[2003]3号文件，是否定、篡改中央政策的，中央揭批查文件的公开，中发[1982]9号文件终以《文件汇编》的形式让老百姓看到了。蒙冤受害者不但被判刑，出狱后又不安置就业，不给生活出路，那么用中共中央的政策来维护自身微弱的生存权利，就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衣、食、住、行、医，是人们不可缺失的生存条件，是最起码的人权。劳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宪法》第42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给出路”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

据说在法治国家，是权利苏醒的时代，公民的维权意识提高。由于被政治和生活所逼，我们不断在属地各部门申诉上访无果的情况下，被逼进京上访，为此又被监控、被行政拘留，哪有人权！云南公权力侵权是公开化“合法化”，维权者受打击镇压，云南当局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和法律，……。我们曾多次到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上访，送报告，云南省委、政府、人大领导们20多年来，对我们从来是不屑一顾，视同无足轻重的客体，可以任意处置的。在中发[1982]9号文件下达21年后，作为其下属部门的云南省委组织部，煞有介事地出台一个云组通（2003）3号文件。这个文件把中央文件中的“……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的明确规定，篡改为“生活确有困难，参照低保，酌情处理”。这个既无中央规定的精神，也无实施的可操作性。云组通（2003）3号文件错误在于：

1) 违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云南省委组织部颠倒了组织阶位，它不仅用云组通（2003）3号文件，否定省委云办发的（1982）26号文件，更否定了中发（1982）9号文件。这种下级越权否定上级政策的做法，请代表们评定吧！何为“组织部”？组织部目无组织，岂不怪哉！

2) 从经济上看，揭批查中被判刑出狱的人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当时的年龄是35-45之间，如果认真按“给出路”政策去办，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就业，不仅能够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谋取生活，还必将为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不但能

自食其力，还能养育子女，敬孝父母，家庭卸累，社会形象也会好些的罢。然而，云南省委却冷酷无情地剥夺了我们从事劳动生存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当年为糊口，无法尽家庭责任，而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无经济来源，成了家庭的沉重包袱，被逼无奈，才不得不成群结队到省委上访，谁之过？！

“确有困难，参照低保，酌情处理”的云组通[2003]3号文件，是对被剥夺者的再剥夺。而把剥夺者打扮成“慈善家”，对被剥夺者“恩赐低保”，甚至附加“不得申诉上访，否则立即取消低保”的政治条件。即使这样，全省绝大部分的受害者至今连低保也没有。逼得原永善县农业局长投了金沙江，临沧邮电工人上吊自尽，昆纺工人饿死昆明街头，原铁路局转业干部刘绍祖病饿死于家中，老鼠啃吃了他的眼、耳和手趾、脚趾……2008年元旦去世的刘荣光同志，都是贫病交加、无钱治病、惨死在家中无人过问。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却是21世纪云南大地上“和谐”的现实！

云组通（2003）3号文件的政策依据是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退休享受退休工资、医保社保，与“参照低保、酌情处理”在经济待遇上是有较大差别的。省委组织部的（2003）3号文件严重损害了蒙冤受害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地地道道的漠视人权的文件！

云南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是：“中央文件封起来，省委文件做招牌，组织部文件最权威，跟毛主席革命的群众最可怜！”

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遭云南省委蔑视、封锁、抵制，其以云办发（1982）26号文件作秀欺骗，忽悠了党中央；省委组织部的云组通（2003）3号文件，视无辜受冤者——法定老年人群体，是任其施捨的封建制度下的奴隶！而中共云南省委代表着一派揭批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曾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流过血、汗的我们历来是不屑一顾，颐指气使的。不仅如此，还残暴地非法剥夺我们的合法权利，三十年来对我们的呼声置若罔闻，哪有“三个代表”的踪影？

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云南当局，以鸣鞭为得意，竟将依法维权申诉的老年人定为“没有改造好的帮派分子”“两案人员”，是“不稳定因素”，继续在政治上

镇压，生活上虐待；以剥夺公民合法权利者“有功”，维权者“有罪”的“理念”，这是“以人为本”的“云南特色”。

共建者共享，这是十七大政治报告肯定的，而我们这些老年人中，有参加抗日战争，打击日寇的老八路，有参加解放战争，为新中国建立打过仗，负过伤的老干部；有抗美援朝，保卫祖国援越抗美，保卫边疆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改天换地的工人、农民。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依靠亿万人民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那时，我们为了国家的发展，在国家高积累，个人低收入的创业环境中参与共建几十年，理应共享。“参照低保，酌情处理”的“施舍型文件”，是对共建公民合法权利的再剥夺，是侵权！公正、公平何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们向“两会”写报告，是根据《宪法》总纲第五条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地方政府最根本的职能，是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在所管辖区域有效实施。云南省委、省政府 26 年来漠视法律、拒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 号文件，因而省高级法院对公民依法申诉，明目张胆答复“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法外野蛮律条，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难道不要过问和追究责任吗？，用牺牲《宪法》的尊严、中央的公信力、公民切身权利作代价维护的“稳定”，能“和谐”吗！？

五、我们的要求：

1、《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连弗兰西斯·培根都说：“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对依法申诉的代表答复说：对申诉“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严重的司法违法行为，请全国人大予以追究，维护公民的诉讼权利。对全省 5 万多人的冤假错案又被压了 30 年不准申诉，请求全国人大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督促最高人民法院履行法定职责，由其依法责令相关人民

法院依法受理申诉，依法再审，纠正冤假错案。这是“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的社会本质要求，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诺言。

2、非法剥夺了公民依《宪法》，按政策肘应就业的权利，造成了庞大的特殊弱势群体，不能用“低保”而一推了之，而应该落实中发[1982]9号文件，云办发[1982]26号文件，以云南国营二九八厂为榜样，由原单位或政府有关部门负责，按退休职工待遇，解决生活问题。

恳请“两会”关注云南，切实追究 26 年拒不贯彻落实中发[1982]9号文件政治责任，切实解决五万多人的生存问题，我们期盼回音。

写信人：李树林 吴万宝 钟 丽 安炬祥 田 俊 宋国张、李长友 杨思祥 尹华才 息嘉良 杨吉丰 马首良、耿明贵 金家柱 赵 凯 施云生 刘仲权 方 棉、张正清 包亚芳 李正启 桂保龙 朱昆泉 杨崇信、刘志忠 丁 雁 刘志宏 雷廷富 汪多闻 周炳发、王 发 杨仁民 黄传华 李忠厚 杨荣辉 杨凤全、叶宝平 胡海泉 唐之建 高培芳 俞晓文 梁凤鸣、骆尚彬 孔德苍 王福生 罗绍祥 刘 荣 张奎林、罗中明 杨红礼 田忠义 孙朝银 王大林 王占国、李炳臣 张 金 师本龙 孙根芝 伽正喜 李 聪、贺 聪 丁忠福 陈发贵 熊国宝 黄梅先 王 玲、古安生 李金陵 艾文彬 李积德 林家才 王兴武、郝加烈 杨 谦 刘金祥 马应生 于祖培 廖光碧、许少先 于 宽 唐万鹏 王汝清 吴培信 施德邦、沈 焯 董华春 高庆云 丁建华 丁执恭 龚庆生、周金昌 王成佑 李其明 薛继才 孙 良 李久华、蒋银构 叶家先 宋 猛 石济仲 李光彩 邱秉苍、高湘南 龙巧英 高家贵 李 祥 宋自华 张祖荣、李 龙 何 清 赵加义 杨声誉 梅永源 王学华、马光第 杨本茂 毛振成 陆洪星 赵忠才 那天佑、毛来仲 张自强 徐仕成 黄成龙 张延贵 马学功、师从善 郭继忠 张文学 梁建萍 颜尧贵 林进良、周载祥 杨吉平 张进昌 罗庭祖 金和益 郭平、肖明忠 杨宝贵 王瑞明 李红兵 魏石清 段希陶、李文兴 李桃兴 李向明 梁剑平 林凌鹏 丁金寿、黄建文 刘启汉 唐之建 王家福 董时汉 曾琼仙、华 陵 窦根湘 雷荣生 张世显 李春楷 洪家祥、赵自荣 张秀英、杨 丹 魏德升 陈兆翔 马光华、杨恩佑 彭传芝 唐天才 马敬新 虞老玉 陈建昆、方 绵 宋天喜 徐 明 赵光斗 傅觉悟 张保明、张 顺 杨永祥 李忠厚 徐典模 王学华 张占云、张文清 李国汉 秦长生 吴 刚 杨福云 张华强、刘建友 方文林 曹文宝 杨文顺 赵道富 普华荣、杨子明 周增信 杨 位 黄勇为 李寿海 杨万先、冯鹏书 王华生 官体富 周

大勇 何荣荣 郝文荣、冯宝清 李贵香 滕少清 王幼志 严家荣 帅素芳、李朝友 孟庆岚 华 峻 王幼功 马美云 左 应、王云仙 杨再兴 王 霖 刘志兴 张竹兰 马学功、阮金祥 聂文烂 马超群 柯 平 吴选风 苏应达、王开云 诸泽高 杨德洪 陈昌武 赵正斌 林家才、谢廷升 李显宗 赵正宾 李应昌 杜崇德 李连培、李云开 陈谦贵 刘其祥 罗寿昌 余刘礼 张大学、孔承平 尹加盈 葛海生 陈启先 钱德珍 李向明、施丕振 张宝明 苏履华 杨增堂 赵季林 赵忠武、邓自逵 马太稳 吕伯伊 程德剑 苏红昌 陈兴启、张振雄 李襄蒙 周济云 邓仙兰 王正发 高 辉、马金文 李其富 李振华 王 沛 孟国富 杨国富、李焕星 周云生 吴万宝 皋振邦 周淑华 自培义、郭龙昌 时耀龙 杨尚谷 杨体仁 秦长荣 刘光国、陈元龙 徐继华 常永新 樊代源 杨荣芳 王炳仲、舒定然等等。2008 年 3 月 7 日

云南 107 名蒙冤者的《投诉状》！投 诉 状投 诉 人：陈发贵、李树林、吴培信、黄传华、包亚芳、罗廷祖、曾琼仙等 107 人，名单（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身份证号）附后。被 诉 人：中共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地 址：昆明市西昌路 号；电 话：投诉人不服被诉人恣意执政，制订和发布违宪违法的云办发（2001）11 号《省委专题会议纪要》（简称《纪要》），非法剥夺投诉人的合法申诉权，越权设定“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罪名，并将此罪名强加于投诉人，严重侵害了投诉人的合法权益，也践踏了《宪法》、《刑事诉讼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以下简称《党章》）的尊严！依据《党章》第十五条，《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之规定，特向中共中央纪委投诉。投 诉 请 求一、请求确认云办发（2001）11 号《纪要》是违反《党章》第十五条、《宪法》第五条禁止性规定，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条、第十二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属违宪违法的无效文件，予以撤销。二、请求确认被诉人将投诉人认定为“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文革邦派分子”并施行“监控”、“传讯”、强迫照相等非法侦察措施，是违宪违法的侵权行为，令其为投诉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三、请求责令被诉人及时解除对云南省各级法院、检察院（以下简称司法机关）的羁束，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依法受理投诉人的申诉。四、为维护执政党中央及《党章》的权威和公信力，及《宪法》、法律的尊严，追究被诉人及其责任人的党纪责任。

事实 和 理 由 投 诉 人 都 是 年 逾 60 的 法 定 老 年 人 ， 依 法 具 有 公 民 申 诉 权 。 投 诉 人 符 合 法 定 申 诉 条 件 ， 因 不 服 28 年 前 的 冤 假 错 案 ， 分 别 强 加 给 投 诉 人 的 “ 四 人 帮 黑 爪 牙 、 日 伪 汉 奸 ” （ 即 ： 杨 秀 杰 的 罪 名 ） ， “ 现 行 反 革 命 ” 、 “ 打 砸 抢 ” 、 “ 推 行 林 彪 划 线 站 队 反 动 路 线 ” 、 “ 严 重 违 法 乱 纪 ” 、 “ 仇 视 社 会 ” 、 “ 行 凶 打 人 ” （ 详 ： 证 据 2 ） 等 等 罪 名 ， 而 被 处 以 刑 罚 （ 其 中 杨 秀 杰 、 罗 庆 明 被 云 南 省 玉 溪 地 区 中 级 法 院 认 定 为 “ 四 人 帮 黑 爪 牙 、 日 伪 汉 奸 ” “ 反 革 命 、 伪 军 官 ” “ 划 线 站 队 残 害 群 众 ” 罪 ， 枉 法 判 处 死 刑 并 剥 夺 上 诉 权 而 在 上 诉 期 内 残 遭 枪 杀 ； 详 ： 证 据 1 ） ， 故 分 别 向 有 管 辖 权 的 司 法 机 关 多 次 个 案 提 出 申 诉 。 由 于 被 诉 人 制 约 司 法 机 关 ， 因 而 投 诉 人 的 申 诉 被 司 法 机 关 以 “ 省 委 决 定 凡 ‘ 两 案 ’ （ 即 ： 林 彪 、 ‘ 四 人 帮 ’ 两 个 反 革 命 集 团 案 ） 不 受 理 ” 为 由 加 以 拒 绝 ！ 二 十 多 年 来 ， 投 诉 人 从 中 年 申 诉 到 老 年 ， 所 得 的 答 复 或 答 以 “ 四 不 ” （ 即 ： 不 接 申 诉 卷 、 不 受 理 、 不 复 查 ， 错 了 也 不 纠 正 ； 详 ： 证 据 3-1 ） 或 置 若 罔 闻 或 悖 法 驳 回 （ 详 ： 证 据 3-2 ） 。 6 年 前 ， 投 诉 人 老 了 ， 无 人 雇 用 打 工 ， 生 活 无 着 ， 无 奈 ， 多 次 向 被 诉 人 提 出 申 诉 ， 其 以 “ 四 不 ” 或 冷 遇 对 待 。 可 是 ， 时 间 将 投 诉 人 之 间 或 原 不 认 识 或 虽 知 名 并 无 来 往 之 关 系 ， 使 之 熟 识 了 。 既 然 被 诉 人 认 定 投 诉 人 的 申 诉 案 都 属 “ 两 案 ” ， 那 么 投 诉 人 的 申 诉 即 属 同 案 ， 投 诉 人 只 得 被 迫 聚 集 ， 依 法 推 选 申 诉 代 表 上 访 了 。 对 此 ， 被 诉 人 不 仅 不 扪 心 自 省 ， “ 善 体 法 意 ， 顺 遂 人 情 ” ， 维 护 投 诉 人 的 合 法 申 诉 权 ， 及 时 解 除 其 对 司 法 机 关 的 羁 束 ， 保 证 司 法 机 关 独 立 行 使 职 权 ， 依 法 受 理 投 诉 人 的 申 诉 ， 反 而 颐 指 气 使 、 恣 意 执 政 ； 藐 视 法 律 地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 制 订 和 发 布 云 办 发 （ 2001 ） 11 号 《 纪 要 》 （ 详 ： 证 据 3 ） 将 投 诉 人 诬 为 “ 没 有 改 造 好 的 邦 派 份 子 ” ， 诬 指 申 诉 人 “ 实 质 上 妄 图 否 定 ‘ 揭 批 查 ’ 斗 争 和 ‘ 两 案 ’ 审 理 工 作 的 成 果 ， 企 图 翻 案 ” 。 投 诉 人 不 敢 恭 维 被 诉 人 的 法 律 水 准 ！ 只 有 封 建 主 义 的 独 裁 司 法 才 不 准 翻 案 ， 社 会 主 义 的 民 主 司 法 不 仅 允 许 ， 而 且 维 护 翻 案 ！ 依 据 96 年 《 刑 事 诉 讼 法 》 （ 简 称 《 刑 诉 法 》 ） 第 203 条 规 定 ： “ 当 事 人 及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 近 亲 属 ， 对 已 经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的 判 决 、 裁 定 ，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或 人 民 检 察 院 提 出 申 诉 …… ”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司 法 解 释 法 发 （ 1997 ） 7 号 第 二 十 二 条 ： “ 对 当 事 人 提 出 的 申 诉 或 者 再 审 申 请 ， 认 为 符 合 受 理 条 件 的 ， 应 当 登 记 后 立 卷 审 查 ” 、 法 发 （ 2002 ） 13 号 司 法 解 释 第 六 条 二 款 规 定 ： “ 对 经 终 审 人 民 法 院 审 查 处 理 后 仍 坚 持 申 请 再 审 或 申 诉 的 ， 应 当 受 理 ” 。 所 以 “ 翻 案 ” —— 申 诉 是 受 法 律 保 护 的 ， 是 防 止 刑 事 审 判 的

冤假错案的司法救济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首要条件！于是，被告人责令相关公安机关，对投诉人施行非法“监控”、强迫拍照，监视居住，甚至为堵截投诉人之申诉代表（2人）上访，不顾违法扣留、“传讯”申诉代表达 20 多小时（详：证据 4），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传唤拘传不得超过 12 小时”之禁止性规定。这是违法拘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几年来，投诉人数十次地向被告人和有关司法机关申诉，然而一切努力都成枉然。被告人如此我行我素，藐视国法，视投诉人之人权和合法申诉权如草芥，投诉人万难承受，誓死不服！

一、投诉人符合法定申诉条件

投诉人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前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其余的也是积极向上的青年。历史进入那急风骤雨般的时代，“文革”在全国大地上展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毛泽东主席又带头贴出《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次接见千余万红卫兵，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10 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以批判“资产反动路线”为中心的工作会议，《红旗》杂志 1966 年 13 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引自《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第 13 页，以下简称《康与赵》；详：证据 5），社论指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为什么反对不得批判不得？为什么群众一批判一反对，就是反党反党中央？劝同志们不要听这些老爷们的胡说！投诉人就是在这历史的环境下参加“文革”的，也是不能抗拒不能予见的原因。云南“文革”在 1967 年初分为“八二三派”（简称“八派”）和“砲兵团派”（简称“砲派”），投诉人参加了“八派”。

1、依法，投诉人无罪

投诉人被冤假错案强加罪名而被处刑罚：在 1978 年 12 月前判决的，占投诉人数的 80%，是在被告人坚决贯彻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期间，是在被告人的领导下，法院为了“保卫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等而判刑的；在 1979 年 12 月前判决的占投诉人数的 15%，只有 5% 左右的人是在 1980 年元月《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判决的（以上详：证据 2）。以上事实证明《纪要》所称的对投诉人的处理是“坚持‘从宽从缓’的方针和‘冷处理’的原则”是无证据证明的虚伪表述，是上骗国家，下欺百姓的谎

言。恳请中纪委追究这有负人民的违纪行为！现将投诉人被处刑的《判决书》（证据 2）的一审下判时间分为三段陈述：（1）1979 年 11 月 29 日前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由于被告人“以人划线”、“依靠一派镇压一派”，即：将“八派”划为“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体系。因而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不仅省级、地（州、市）级、县级揪“帮派头目”、“帮派骨干”“帮派分子”，而且连公社、大队、中、小学和如小小昆明木器厂也要揪……。堂堂只服从法律的法院居然也采信了。如：证据 2-60《判决书》确认昆明市呈贡县吴家营区吴家营村的杨崇信“积极参与公社帮派头目马汝能篡党夺权活动”；证 2-70《判决书》确认昆明木器厂王福生“参与该厂帮派头目周庆余、林子良……”；证 2-41《判决书》认定玉溪县师范学校彭国毅“积极追随师校行帮派头目……”等。法院认定这些“罪行”是依据哪部哪条法律规定？证据 2 证明，多数判决书不引依据的法律、法条，少数判决只引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甚至杜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惩治刑事犯罪条例》”（详证据 2-100）。若按前者，则“八派”、“砲派”“摧资兵团”都触犯了，因为“两大派组织重复夺省委的权……”“夺权！夺权！！夺权！！”，在夺权声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瘫痪，云南各级党政机构瘫痪了。……解放十八年之后的云南大地，‘旧’的政权在不情愿中塌台了”（摘自《康与赵》第 28 页；详：证据 5-1）。两派包括“摧资兵团”都要“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在 1974 年“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砲派组成“反潮流”要“肃薄（一波）、肃李（成芳）”、“打倒谭甫仁”（原省革委主任）、“打到鲁屠夫”（原昆明军区付司令员、省革委付主任）、“打倒大叛徒周兴”（省委第一书记），这些大标语、大字报贴在昆明闹市区，是当时昆明人众所周知的事实。“6 月 23 日至 30 日在省委召开地书会议上‘反潮流’又包围会场，影响会议进行。10 月 10 日至 23 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学习……，会议期间，‘反潮流’人员冲击会场，将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和省委书记陈康围困了三天。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从北京发来‘指示’要王必成转告李毅、方向东等同志将周兴放出来，并要省委做好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回到工作岗位上。”（摘自《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9.12，第 173 页，以下简称《五十年》；详：证据 6）。以上行为被告人却不予追究，偏袒“砲派”。依据法理，在国家立法机关未宣布此法有

效前，依据此法科刑处罪是无效的。至于判决书没有引适用之法律，只是笼统地“依法判决”是无法律依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 1956 年 10 月 17 日发布的《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以下简称《程序总结》）“四、裁判”之关于判决书“应当说明认定事实的证据和适用政策、法律、法令的根据”的规定，所以这些判决属无法律依据的判决，无效的。而证据 2 中有几份判决依据 1975 年《宪法》科刑，更是错误的，如：证据 2-83，景东县法院依 1975 年《宪法》第二十八条对吴学康“煽动”停工停产科刑，而该法条规定是：“公民有……罢工的自由，”试问法官，“煽动公民主张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的行为是犯罪吗？合法行为遭到刑罚，在民主与法制的国度里发生，令人汗颜。所以如此适用法律是荒谬的。1979 年 11 月 29 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除同五届人大制定、批准的宪法和法律，及其常委会“制定、批准的法令相抵触的以外，继续有效”。据此，在 1979 年 11 月 29 日前对投诉人科刑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属无效判决，因此投诉人依法有权申诉平反。（2）1979 年 11 月 29 日后的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这一时期的一审判决，二审已进入 1980 年了。1980 年元月 1 日起，《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关于刑法溯及力的问题”“（二）”之“2、刑法生效前的犯罪虽已追诉，而法院判决尚未确定（即：生效）的，在审判实践中，按刑法生效以前的犯罪对待，根据刑法第九条的规定处理。”《刑法》第九条规定：“本法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据此，法院分别认定投诉人犯“诬告陷害”、“诽谤”、“煽动打砸抢”、“故意伤害”、“扰乱社会秩序”、“违法乱纪”等罪名是无法律依据的。因为建国以来至此时就没有一部法律、法令、政策有这些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罪名和刑罚！因而投诉人中被强加这些罪名的人是无罪的。至于投诉人中按文革《十六》条规定和中共中央在“文革”各时期的决定、指示、文件，和按为宣传、贯彻这些决定、指示及文件由人民日报发表相应的社

论精神，对某级党委中的领导乃至省委中的领导人有意见，写了大字报或写了材料按合法渠道交上级党委或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或人民日报驻昆明记者的向上反映的行为，是宪法保护的合法行为！证据 2 中的判决将此合法行为认定为“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篡党夺权”，是违宪违法的！因为个人不等于组织，地方组织不等于全党和中共中央！因为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六条》、中共“九大”、“十大”乃至“十一大”《政治报告》关于对“文革”的决议，在当时是合法并应贯彻，因为宪法确立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判决违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中对否定“文革”对发动“文革”、“文革”后果的责任承担和“文革”中的两派都是错误的规定！因为投诉人的行为是为维护 75 年《宪法》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符合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以利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规定。因此，不顾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历史政治环境，和国家根本大法的规定，硬要将“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罪名强加投诉人的多数（占 80%），是违法悖情悖理的。“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至今被诉人在《纪要》中坚持“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详：证据 3），是不顾事实，违宪违法的。被诉人指控投诉人是“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即：“两案”案犯。法院为何不以“两案”案犯来审理？被诉人认定“文革”中“八派”，从省至农村公社构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派邦体系”，参加各级“八派”组织的人，就是参加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邦派体系”，这，涉及全省几百万参加“八派”的干部和群众，是全省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依 79 年《刑法》第十六条规定，第一审应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但被诉人规避法律不指令省“两案”审理办公室将材料移交省检察院提起公诉，由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若依法定程序，投诉人一定会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那么投诉人的沉冤早就得以平反，将人生最宝贵的中年献给国家与民族，不致身陷囹圄浪费生命了！这道理很简单，我们无罪！因为我们不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所以不存在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是由于不能抗拒不能预见的原因，正如原省委书记普朝柱、付书记刘树生、尹俊参加“摧资兵团”、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维彬任“砲派”大派专案组长一样；并且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会受被诉人制约，没

有“砲派”派性，是会刚正不阿，公正执法的。以上只就案件实体，依照法律应判投诉人无罪！2、办案和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前已陈述，被告人从 1976 年底开始领导“揭、批、查”运动，就是“以人划线”（即：以王必成、赵健民，和以各单位参加过“砲派”的在各单位党委任职的领导划线，凡“保”的是正确派，凡有意见或反对的即是“邦派体系”、“篡党夺权”；这与 1957 年反右派时，凡向所在单位领导提意见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啊！）“依靠一派，镇压一派”，于是投诉人就先后被所在单位或“隔离审查”或名为参加学习班实为“隔离审查”而被非法拘禁了。于是投诉人被架喷气式或五花大绑在大、小会上任人批斗、毒打、侮辱、咒骂；有的被挂黑牌游街、游乡、游村，警车广播开道；有的被带上手铐、脚镣拉到大会上批斗……。经过如此的“发动群众”，由各单位对立情绪很大的“砲派”或倾向“砲派”（少数）的人组成“专案组”。“专案组”用指供、诱供、逼供甚至刑讯逼供之非法手段，逼投诉人“交待”、“揭发”问题，证据 2——这些判决书中采信“同伙交待”就是用这种法西斯审查方式取得的。这是私设公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否则，被告人必须解释云南各单位“隔离审查”的行为是否违反 75 年《宪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之规定？！“隔离审查”投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少则半年、多的 3、4 年，后来法院将隔离期折抵刑期（详：证据 2），是合法或是以权压法？！哪部法律规定各单位（非司法机关）拘禁公民，私设公堂是合法的？用反宪法、反法律的手段审查投诉人并科罪处刑，是对人权和法制的践踏！总之，案件从审查到起诉、审理程序都是严重违法的！最高人民法院早于 1956 年 11 月在《程序总结》“三、审理”规定：1、必须公开开庭审理；2、公诉人应当出庭支持公诉；3、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4、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质证，“证人的证言应当当庭陈述”，“物证须当庭审查，辨别真伪，并让被告辨认”……；5、被告有权辩护等。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两法施行前有效）规定，必须公开开庭，被告有权获得辩护。投诉人被追诉的案件，其实际程序是：

（1）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投诉人可能犯罪的情况下，就被限制其人身自由，这是封建独裁的决计问罪在先，锻炼周纳罪状在后的手段！因为，专案人员是“砲派”或倾向砲派的人，与投诉人对立情绪大，不可能客观收集证据。所以，专案人员

用指供、诱供、逼供，甚至刑讯逼供的手段，收集“证据”。他们将传闻当作事实，用推理当作证据；将咒骂的大字报底稿当作“受害人”的揭发了。由于专案人员不懂什么叫“篡党夺权”、“帮派体系”、“诬告陷害”、“帮派骨干”、“反革命”“划线站队”等等罪名的法律构成要件，也不懂任何刑事案件必须以“七何”（即：何事、何时、何地、何情、何故、何物、何人）要素证明案件事实，才能达到法律上的真实，所以专案人员就按上级指示或媒体批判文章的名词，罗织罪名报公安局了。（2）公安局不经审查，即盖章抓人。如：证 2-97 判决认定景洪县的工人曾庆官在 1968 年“文革”时仅 20 来岁，因故打了领导一耳光也被抓起来了。（3）法院审理程序更是严重违法：I 证据 2 中凡 1980 年前判刑的，都是未经公开开庭审理即下判决（非法剥夺了被告人的诉权），是以未经质证的无效证据支持下判的，如：证 2-2、3 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上山打游击”、“阴谋策划反革命应变活动，妄图上山打游击”等的事实，后被否定就是证明；II 公诉人都未出庭；III 单位“专案”人员参与案件审理；IV 案件经办法官都是“砲派”或倾向“砲派”观点的，显然影响公正判决，如：证 2-3《判决书》（83）复刑复字 111 号，法院确认：A“在‘文革’期间，组织带领职工冲击市委机关”认定为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B“在市党干会上诽谤重机厂领导同志是‘还乡团’团长”等，构成诽谤罪。先不说“还乡团”一词来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同年 2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五十年》第 183 页；详：证据 7 及 7-1），只论昆明市中级法院搞派性，锻炼人罪，故意适用无效法律！理由是：中级法院的领导和法官不会不懂法律没有朔及力，其明知前罪是《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后罪是第一百四十五条一款规定的。构成后罪要件是“告诉才处理”，重机厂领导人未向法院起诉，法院是无权追究刑事责任的（难道重机厂的领导是中共中央或国家领导人，可以提起公诉？否！）。因为本案行为人的行为是在“1976 年 2、3 月”间实施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九条的规定：“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据此，法院追究前、后罪的刑事责任是违法无效的，因为《刑法》实施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令和政策有此二罪名的规定。证据 2 中几乎 40%的判决认定“冲击”“县书会议”、“党员干部会议”是“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性质。向领导——人民的公仆反映意见和要求，公仆不作为，

只好到其召集的会外主张要求，在当时《宪法》和法律不禁止的前提下，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出于执行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客观方面是 1975 年《宪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三款、第二十八条一款保护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是合法行为！所以把不搭界的罪名“反革命”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强加给投诉人，是派性，依法应宣告无罪！以上证据证明的事实，足以说明证据 2 中百余份判决书的案件从审查、起诉、到审理，整个程序和实体判决都是严重违法的。对此，依《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投诉人符合法定申诉条件。由此，可以证明被诉人在《纪要》中称：“对犯罪者的起诉、审判，都是严格遵循法律程序，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的”话，是骗上欺民的谎言。

3、锻炼人罪被诉人在《纪要》中硬说：“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那么让事实来证明吧！（1）恣意判刑依据 75 年、78 年《宪法》规定，国家审判机关是人民法院。主体不合法的中共普洱县委，施行不须犯罪事实，不须法律依据，对参加，“八派”的该县小学教师罗庭祖，按捺不住派性的愤怒，就亲自出马下判决，“判决书”全文如下（详：证据 2-1）：对反革命犯罗庭祖的处理决定经县委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会议决定：对现行反革命犯罗庭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陆年。中共普洱县委员会（印）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此“判决”不仅使罗庭祖失去六年的自由，出狱后还遭到吊销户口，失去在中国大地上合法的生存权，用罗本人的话说“被开除了国籍”，至今罗身罹绝境，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判决”中还恬称“依法判处”，如此横行恣肆，真是无法无天，令人发指！在查遍封建时代的明、清历史，像这样的司法行为是绝无仅有的。透过罗庭祖案，可窥被诉人领导的“揭、批、查”运动的一斑，也反映出投诉人所受的苦难。请中纪委追究这蹂躏宪法和法律的罪恶行为！（2）草菅人命受害者杨秀杰，山西屯留县人，1946 年参军，49 年入党，在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从战士提升至连长，1963 年以 13 军 123 团营教员的军职转业到云南江川县工作，64 年任县民政科长。“文革”开始他就被当地“砲派”打为“走资派”，被戴尖尖高帽与县委书记一道被批斗。68 年又被江川“砲派”关押在江川县江城镇，后又转移至县人委办公室达半年之久。县革委成立，他被“结合”进县革委任常委。可是，在“揭、批、查”运动中他却被“砲派”诬为“四人邦黑爪牙”、“日伪汉奸”、“历史反革命”而被捕，他在受尽折磨后，玉溪地区中级法院法院胆大妄为地枉法判处死刑。

在中共江川县委领导下，为使杨秀杰被枪杀，公然强令县干部、群众签名、盖章、盖手印：“要求枪毙杨秀杰”：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的干部，若不签名盖章就视为与反革命划不清界限，遭大会点名小会批判；家在农村的，凡不签名盖章就不分口粮和现金，……。这样，在虚假的“民愤极大”、“万民签名要求”下，杨秀杰被判“死刑”。受害者罗庆明，江川县第一中学教师，云南昆明人，解放前任过国民党军校教官（文职），1949年跟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随军进驻西藏，在平叛中荣立三等功。然而，在“揭、批、查”运动中被“砲派”污为“历史反革命，伪军官”同杨秀杰一样，被捕后受尽肉刑，被游街批斗，被打得体无完肤，无法站立，惨不忍睹。同样，在中共江川县委领导下，为了枪杀罗庆明也是逼农民签字，制作轰动全县的“万民册”，造成“民愤极大”的假象。于是罗庆明也被玉溪中级法院枉法“判处死刑”。该法院向杨、罗二人宣布“死刑”的第二天，1978年9月19日杨、罗二人就惨遭杀害，非法剥夺了杨、罗二人及其家属上诉权。这哪里是执法，是谋杀！杨、罗二人被杀后，法院不准家属收尸，不公布判决书，还逼迫家属离婚“否则就要斩草除根”；至今法院仍不将判决书给受害者家属！（详：证据1-1、1-2）。这血淋淋的事实，竟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云南大地上，是在被告人领导“揭、批、查”运动，于1978年“6月下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又提出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增加批判林彪的份量，对那些搞‘划线站队’起家，以后又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的帮派骨干份子新老账一齐算，揭深批透，特别是杀人犯，证据确凿（注：可以捏造）的要公开审判，处以极刑”（引自《五十年》第195页；证据7）后发生的，也是原省委书记普朝柱任中共玉溪地委书记（江川县属玉溪专区管辖）时发生的。哲人培根说：“没有执行的制度，比没有制度更可怕”。投诉人写至此，望天无言。不知何日将草菅人命，谋杀杨秀杰、罗庆明的污官酷吏绳之以法？以上事实和法律证明，强加给投诉人罪名的判决书是：I、审理程序严重违法；II、实体审判没有法律依据或适用法律错误；III、没有经质证、查实的合法证据支持判决认定的事实，就穿凿附会，锻炼人罪，以权代法将投诉人科以刑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二）主

要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证明力的；……（五）引用法律条文错误或者违反刑法第十二条（即 79 年《刑法》第九条）的规定适用失效法律的；（六）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七）量刑明显不当的；（八）审判程序不合法，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 投诉人符合上述法定申诉条件。二、被诉人不执行中共中央决议、指示和文件，对抗法律规定被诉人不执行中共中央《对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受审查人员定性处理的意见》的“二”关于“划定问题性质的界限：对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应根据其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中的罪行大小、错误轻重确定其问题的性质”，该条“（一）”之“7、”规定：“组织邦派势力，阴谋策划篡夺中央国家机关一个部、委，或一个省、市、自治区领导权活动，蓄意制造冤、假、错案和武斗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首要分子”的规定，将整个“八派”打为“四人帮”邦派体系，从省直到公社层层揪“邦派头目”、“邦派骨干”、“邦派份子”、致使参加“八派”的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敌人，因而被冤、假、错案枪杀 2 人、判刑入狱的多达 5 万多人（证据 8）。这是被诉人违反《决议》关于“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应当否定的规定；否认参加两派（“八派”、“砲派”）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比较好的，两派中的坏人是极少数而导致的恶果。也是被诉人违反《党章》规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的后果。投诉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政治、组织上的关联，更不是“首要份子”！被诉人却将投诉人打为“没有改造好的邦派份子”、“文革邦派份子”，这是将整个“八派”认定为“反革命集团”违法行为的承续，这涉及全省参加“八派”的几百万人的大案，应按《刑事诉讼法》（79 年）第十六条之规定，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可是，被诉人规避法律，未经依法审判，仍将（2001 年以后）“八派”当作“反革命集团”，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之禁止性规定。据此，被诉人将投诉人打为“没有改好的邦派分子”、“文革邦派分子”，是越权设定罪名，严重侵害投诉人的人身权！这是其一。其二，判刑五万多人，冤假错案遍布全省。而被诉人对抗中共中央“对冤假错案一经发觉坚决纠正的”指示：1、被诉人于 1978 年 11 月 23 日召开全省 43 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愤怒揭批云南军内外”“那个资产阶级邦派的后台（即：鲁瑞

林，原昆明军区付司令员、省委付书记）”“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云南日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即：“一、二四”案；详：证据9），这是轰动全国的政治大假案。该案经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作出“查无实据，应予否定”的结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79年10月批准了联合调查组《关于“一、二四”案调查终结的报告》，要求“过去在‘一、二四’案问题上对鲁瑞林同志的批判及报刊文章中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详：证据10）。此案株连数以千计的人，投诉人中现还有不少人被株连，至今未予平反。可是，被诉人不传达、不公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示，不为被株连的投诉人平反。

2、不执行中发[1982]9号文关于：“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的规定，被诉人不仅不执行这一规定，将原决定按人民内矛盾处理（详：证据11）的参加过“八派”的老干部、原省国防工办付主任李树林（1946年参军，1948年入党）逮捕，未经开庭审理即下判决，判处伍年徒刑；更有甚者，1983年投诉人中有人听说有中发（1982）9号文便议论文中规定“给生活出路”，被诉人领导的昆明市政府和其他有关地州县政府竟下令公安局以“传播谣言”、“泄密”为由，再次抓捕近千人入狱（详：证据12）。所以9号文下达后，被诉人既不给投诉人出狱后的生活出路，更不按中共中央要求复查案件，纠错平反。

3、被诉人不执行中发（1983）9号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进一步复查平反政法系统经手办理的冤、假、错案的意见报告》关于“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公、检、法机关以及有关部门，对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要主动的抓……务必把一切冤、假、错案坚决平反纠正过来”，由于被诉人制约司法机关，因而投诉人出狱后的申诉大多数不被受理，即使投诉人中的少数人得以复查，因被诉人思想路线不端正，法院总是从派性出发，总留大尾巴，将无罪之人让其负罪坐牢，只是改罪名或减点刑。

4、投诉人不执行中办发（1986）6号文关于：中共中央要求“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基本完成落实政策的任务。”的规定，由于被诉人制约各级司法机关，所以投诉人的申诉司法机关仍不受理，直至1998年（详：证据13）。其三，被诉人不执行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彻底否定“砲派”，对“砲派”中的头头瞻徇回护，对参加“八派”的干部，哪怕是老干部也“决不心慈手软”的。如，大型企业昆明重机厂的“砲派”

头褚英豪，其在 1967 年 12 月“文革”中多次私设公堂，主持审打干部和群众十多人，其中厂党委付书记尚开基被毒打致重伤，该厂“八派”张自荣被铁棒打断手、脚后，被拉到重机厂后山遭枪杀，全身被打成蜂窝状，暴尸荒山，惨不忍睹（详：证据 14）。在“揭、批、查”运动中，由于他“揭、批、查”“有功”，从一般干部提为办公室主任，他利用职权大肆迫害大批参加过“八派”的干部和群众，连 68 年后进厂未参与重机厂“文革”两派的复转军人以及从东北富拉尔基重机厂调到该厂的干部，也被他打成“四人邦”“邦派骨干”、“邦派分子”，并用刑讯逼供、迫害家属的恶毒手段，蓄意制造昆明重机厂“邦派体系密谋武装叛乱，图谋上山打游击”的大冤案（详：证 2-3），使该厂一百多名干部、职工惨遭迫害，其中 22 人被以现行反革命逮捕，高级工程师张大吉被逼自杀身亡。在褚等一伙“砲派”头头的密谋下，重机厂党委 60%的常委、70%委员、80%团干部被打为“邦派骨干”、“邦派分子”，惨遭迫害。以上事实证明，褚英豪就是一个负命案的恶人！然而，被告人“以派清派”，使褚英豪得以飞黄腾达，从文革前的一般干部被提升为中共昆明市委付书记、昆明市常务付市长。这一倒行逆施，激起重机厂广大职工的强烈不满，纷纷举报。褚却加以压制。被告人鉴于群众的压力，于 1984 年 9 月 4 日“免去”褚中共昆明市委付书记的职务，9 月 10 日昆明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免去褚的副市长职务（详：证据 14）。此事《云南日报》、《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可是，1985 年 7 月，“文革”参加“摧资兵团”的普朝柱被提升为省委书记，对褚英豪这么个恶人，不仅不依法立案审查，依法公正处理，给全省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反而将褚英豪又提升为云南省化工厅厅长、省人大常委至退休（详：证据 14）。又如，大型企业昆明机床厂“砲派”头头 x x x，1968 年将女工 XXX 双脚打断致残，指挥武斗等等恶迹，却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而入党，被提升为付厅级付厂长至退休。再如：“砲派”大派“专案组长”黄维彬，从一般干部提升至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纪要》制定者之一；原省委常委常务付省长、现省人大常务付主任刘绍尧，是云南大学“砲派”“文攻武卫”负责人，也是从一般干部提升起来的。而对省革委付主任 1959 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过的英雄徐学惠，因是“八派”推荐以英模代表结合进省革委，即被罗织罪状定为“四人邦”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安排一般工作”（《五十年》第 195 页；详：证

据 15)；对民兵英雄藏族干部中共云南省委付书记七林旺丹、全国劳模省委常委赵学全，因参加过“八派”或倾向“八派”，统统被免职。以上事实说明，被诉人派性多么严重。其四，被诉人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对若干野心家、阴谋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即党内斗争)办法来处理”的决定，将云南全省“八派”当作“帮派体系”从省至公社层层揪“帮派头目”、……(详：证据 2)，因“帮派”及“追随林彪‘划线沾队’反动路线”被判刑的高达五万多人。对此，被诉人却缩小数字，谎报为“经过反复审查定案，最后全省 7569 名清查对象(人数达几百万的“八派”，被从公社、小厂至县、地州市至省层层“隔离”、“学习班”审查，才这么多?)的处理情况是：判刑 24 人……”(《五十年》第 228 页；详：证据 16)。这是上骗中共中央，下欺人民的大谎言！墨写的数字遮不住投诉人多年牢狱的苦难事实！被诉人明知错了，但在普朝柱派性的领导下，却不依法纠正。所以，在云南，历史像面团，任随人们揉来揉去，“林彪反革命集团”与“八派”、投诉人根本不搭界，却被硬联系上；到 21 世纪，历史的面团通过《纪要》又将“法轮功”与投诉人塑连上了。于是，高高在上的省委书记令狐安先生，不管投诉人的申诉，也不理老红军原昆明军区付政委胡荣贵将军的意见，不顾原昆明军区一批老干部证明关于对证 2-20 判决书认定的转业干部骆文心“趁‘划线站队’之机”，在昆明军区殴打他人“伤残”纯属子虚乌有(详：证据 17)，偏听“文革”时是“砲派”专案组长、从一般干部很快提升起来的黄维彬，和李汉柏的派性谎言，同意制定发布《纪要》，严重损害投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中纪委审查，维护投诉人的人权。三、《纪要》是违宪、违法，违反党章的文件《纪要》于 2001 年 3 月发布后，被诉人不仅指令有关公安机关“监控”投诉人，而且现任省委书记白恩培先生 2002 年 12 月 23 日在“省委七届三次全会上的报告”之(三)中竟然说：“严厉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和文革帮派分子串联翻案活动的力度加大，有效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云南日报》2002 年 12 月 26 日头版；详：证据 18)。将投诉人认定为“文革帮派分子”是越权设定罪名，违反《刑法》第十二条、《宪法》第五条第四款禁止性规定；将投诉人合法的申诉行为置于“严厉打击”之列，是对《宪法》第五条五款、第四十一条二款和《刑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藐视，严重侵害了投

诉人政治和人身权利。《纪要》不顾证据 2 和本状“一”证明的事实,其“三、云南‘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工作是稳妥的”之中,在该文第 7 页以权压法地作出:“对犯罪者的起诉、审判、都是严格遵循法律程序,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不存在冤错案和‘落实政策’问题”的“结论”,于是,该文以偷换概念的手法,将投诉人不服刑事冤错案的申诉,偷换为由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管辖的案件,在其第 9 页称:“最近,中组部对这类申诉案件(注意:《纪要》是针对投诉人的,申诉的是刑事案,不属组织部门管辖)有明确指示:……③对文革问题(什么问题?)的申诉案件,一般不搞复查,只进行复议。”由此,在该文第 12 页竟然打着中共中央政策的旗号,“规定”:“对‘文革’问题的申诉案件,按照中央对处理这类问题的一贯政策(按:有如此法外律条吗?若真有,就不必要《刑诉法》了!?),一般不搞复查。”这是《纪要》针对投诉人制定的土政策,用以对抗法律,掩盖“以派清派”,冤假错案遍布全省的问题;以此羁束行政和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履行法定义务。2005 年 5、6 月,投诉人中部份人向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信访局申诉,该局以昆信(访)复字[2005]1 号、8 号分别复函,称:“按照中央对处理‘这类问题的一贯政策,对文革问题的申诉案件,一般不搞复查’”,“总体上不存在冤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经与“市政法委……等部门商定,……不予受理。”(详:证据 19)。这是《纪要》的“结论”与“规定”对下级政法委等机关羁束的证明。2005 年 7 月至今,投诉人分别多次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该院立案庭长、审判员田 X 不同意受理申诉,他说,省委 11 号文(指《纪要》)规定,对文革问题申诉案一般不复查,因为不存在冤假错案……知道这个文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法院在省委领导下,不能不执行,所以不受理;他连申诉状都不接了。该“结论”和“规定”违反《党章》总纲关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的工作”的规定,违反第十五条:“有关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只有党中央才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表示主张”的规定。因为“纪要”的“结论”和“规定”,违反《刑诉法》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及第二百零

四条的规定，也是违反《宪法》第五条四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宪法和刑诉法的上述规定，拒不执行，属全国性的重大问题！被告人置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检察职权于不顾，竟然以《纪要》对外表示其主张：“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问题，”“对‘文革’问题的申诉案件，一般不搞复查，”实质上是取消刑事诉讼的审判监督程序，剥夺司法机关进行再审立案的审查权及监督权。《纪要》以揭露“二、认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帮派体系犯下的罪行”为名，将无有效证据证明、未经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有效判决认定、与《康与赵》第 339 页的数字相同的“罪行”：“他们利用夺取的部分权力，……在全省制造冤假错案 15175 件，审查 1387367 人，划为‘九种人’的达 257828 人，他们施用 100 多种酷刑，打死逼死 17269 人。”对此，投诉人提出异议！在中共中央号召构建和谐社会，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纪要》的作者向全省党员和干部发布这些捏造事实和“罪行”数字，是煽动阶级斗争，或是煽动派性、煽动仇恨？抑或是让境外敌对势力用以攻击中国人权的“依据”？

“100 多种酷刑”，刑“种”的定义、刑“种”名称、施刑和受害人名及其情节能用证据证明吗？“打死逼死 17269 人”？为什么被枉法处刑的五万多份判决中设有一份判决作出被其“打死逼死×××”人的“犯罪事实”认定呢？投诉人厌恶派性！这些数字是否“砲派”专案组提供？！黄维彬先生应当向中共中央纪委说清楚。综上所述，《纪要》违反《党章》总纲及第十五条的规定，违反《宪法》第五条、四十一条和《刑诉法》第五条、第十二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属以权压法的违法文件，依法应予撤销。《纪要》用文革一派之言，煽动派性和仇恨，破坏构建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的氛围，且文过饰非[早在 1979 年 2 月 22 日以安平生为第一书记、王必成为书记的被告人，由《云南日报》发表题为《善始善终地结束好揭批查运动》的社论，要求“就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来说，当前主要是搞好定性处理工作”（详：证据 20），这，符合证据 2 大多数判决书的下判时间]，不顾投诉人被冤假错案强加罪名而被处罚的大量事实，硬说是“严格执行”了中发（1982）9 号文精神，作出：“不存在冤错案和‘落实政策’问题”的结论，以捏造“中共中央对这类问题的一贯政策”为根据，作出：“对‘文革’问题的申诉案……一般不搞复查”的非

法“规定”，以此制约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使投诉人的合法申诉遭到压制至今。据上，《纪要》是反法、悖德、悖理、悖情的派性而又野蛮的文件，应予撤销。令投诉人誓死不服的是，被诉人发布《纪要》后，指令有关公安机关对投诉人实施非法“监控”、监视居住（至今），甚至以“传讯”为名，实为拘禁投诉人申诉代表（二人）上访；并将投诉人打为“没有改造好的帮派分子”、“文革帮派分子”，与“法轮功”同列，要“严厉打击”，严重侵害了投诉人的人权！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维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维护和尊重人权及投诉人的合法权益，呈请中共中央纪委支持投诉人的投诉请求，让投诉人晚年给子孙后代有个说法，以慰天年。此 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附：

1、本状附本 1 份，17 页 投诉人：陈发贵、李树林、2、《证据目录》1 份，页 罗庭祖、包亚芳等 107 人 3、与《证据目录》名称、数量相符的证据 2006 年 3 月 20 日 4、投诉人名单 1 份， 页。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赵健民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赵健民，又名吴培强，山东省冠县人。1932 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现任山东省委书记兼省长。

一、1933 年春夏之际，在赵健民同志担任济南市省立乡村师范支委、支书期间，山东省委连遭两次破坏，因此，济南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在此困难条件下，赵健民同志恢复和发展了济南等地党的组织，并组成我党济南市委和山东省工委。到 1935 年赵健民同志找到直南特委，经直南特委把这一情况转报北方局，1936 年四五月间北方局派黎玉同志到济南找到赵健民同志，济南党组织才正式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二、1936 年 9 月赵健民同志在担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期间，到济南检查工作时因遇到叛徒而被捕。先后押于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在被捕后经过七次审讯，虽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但赵健民同志始终没有供出任何关系。最后韩复榘亲自审讯，决定送反省院“感化”，并且由伪山东高等法院以“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的罪名，判

了徒刑五年。赵健民为了不去反省院，以不服判决为理由提起上诉，故一直羁押在法院看守所而未去反省院。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往宁阳，才经法院通知，才于 1937 年 10 月找保出狱。出狱后当即找到黎玉、林浩同志。

上述问题经调查证实与赵健民同志本人交代的情况是一致的。据此，我们认为：赵健民同志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坚持独立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二、研究资料

我所知道的谭甫仁被刺事件（周孜仁）

谭甫仁，广东仁化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委总政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八路军二纵新编三旅政委，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五五年授中将军衔。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想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也想说明谭甫仁当属林彪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这样，一九六八年八月，待到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均已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也已就绪待建，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行事大刀阔斧，敢说敢干，颇富魄力。上任伊始，旋即以“划线站队”、“围海（滇池）造田”、修“万岁纪念馆”三板斧，在全省很快树立起毋庸置疑的巨大威望。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计划每年一届。一九六九年开了第一届。第二届代表数号称上万，故又称“万人大会”），其时，笔者作为“谭办”秘书参会调研，

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深情无限地对笔者表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此健壮，实乃云南人民的最大幸福，激动得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接下来——他说他真想再喊第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没喊出声来——我当然知道他想喊什么，只能对这位山民的朴素憨实报以一笑而已。仅此一端，足见其时谭在云南边疆的威望是足够高的。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个万人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毙。身上共中三弹：颈部、肩颊部和胸部各一。其中一弹从胸部心脏旁边穿透，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暗杀发生在凌晨四时五十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十二时许。谭一九一〇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他的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七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017案件”。

几十年后的现在，中国人对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算是见得多了，且不谈贪赃枉法者如成克杰、胡长清者流，即使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的被劫杀也并无大的轰动。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类事情却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九三六年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则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的版本就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断然击落，谭事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然从舷梯款款而出，吓得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干掉了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不是没有理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定然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的时候，笔者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身秘书，一曰王克学，任昆明军区党办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另

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照看地方工作，为此，甫专门组建了一个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在外间看来是非常神秘的。军区调研组就被外间叫做：“谭办”。

“谭办”成立于1969年10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就自然解散。只是谭甫仁被杀前后，笔者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

凶案的几个蹊跷之点

“017 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十一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式是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谭很喜欢去专州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在外巡游，十三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当然由秘书事前拟好，十五日他去会上讲过，计划十八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十七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个，仅仅剩下了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说到此，必须对谭的住宅多花些笔墨介绍。谭甫仁住解放新村32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是富人们的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实际上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32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使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端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院中窄路，就是军区机关的中灶食堂（即干部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两天失踪了，等等，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的王自正。王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他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的枪械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所有这些条件他都具备。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暗杀全过程追记

为了说清暗杀的全过程，必须对谭甫仁住宅的环境再做一些补充描述。

和 3 2 号后墙平行布置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垦成了菜地，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东西，并从 3 2 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于是就留下隐患——凶手王自正就正好由此墙爬了进去。他从食堂取来凳子，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绕大院而过的环城公路现在叫西昌路）一入夜便阒无人迹，记得当时我们偶有急事晚归，骑单车经由密树森耸的环城公路，还常有厉鬼追魂的恐怖之感。王自正是凌晨四点左右潜入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由小院又非常方便地蹿上小楼，接近了谭甫仁的卧室。

这儿又得对别墅院的结构继续作些补充。别墅前门有警卫室一。原来住二人，现在只一人。然后是一片花园。接着就是小楼了。紧靠后墙是一排附属平房，有厨房、贮藏室，还有房间供警卫、保姆及其他人等居住。平房和小楼之间是斜长形的天井。凶手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谭甫仁卧室在二楼，他非常清楚，竟直去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推断，王自正这

样问道：“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回答的是：“不知道。”凶手急眼遍扫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王夫人射杀。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于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死顶紧夫人额头抠的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多绝对非常安静。这枪声绝对是惊天动地的。既已抠动了手枪，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谭甫仁死于枪下。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我的印象里她是单身一人。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也跟着跑起来。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当时谭甫仁如果坚守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一间屋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凶手只有六颗子弹，已经用了一颗，六姨如果能够参与搏斗，将凶手的子弹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可惜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戴口罩，脸略胖圆，大眼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时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都睡了！前面说了，野营拉练拉走三个，现在只剩前门一个，后面一个。前门距离稍远些，他就蹩进小天井，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奇怪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磕睡太大？昆明有句俗语：“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可现在的问题是：明明枪声已经响了，明明命在旦夕的首长把门敲得山响，磕睡再大也不会如此不省人事呀！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

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那么，事情是不是如此呢？五年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一九七五年，公安部派副部长赵苍璧来滇重新审理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实招供，说那一晚他正和裸姆睡觉呢。他以为有人捉奸——那年月作奸犯科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警卫员正当年华，那裸姆呢，说是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跑了台湾，一个人就留在昆明老家替人烧饭浆洗度日，她的年龄应该不小，至少五十上下了。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其准确称谓应是“伪军官太太”，即使不加惩治，也需要从严格控制，可她偏偏却留在了“云南王”的身边，此事曾使我们十分不解。据笔者记忆，裸姆很爱整洁，成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白皮肤，五官十分端正，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她毕竟已隔日黄花，怎么会在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身边演绎出这等鸟事？这也让人啼笑皆非。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现在轮到谭甫仁来陨命了。窄窄的小天井里，谭已经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这位猎物在二千三百万云南人心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政治斗争总是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闹剧。

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五十年代写过一本书，叫《我们播种爱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还轮不到谭甫仁，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要被浓缩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的三十二号院的小天井来，以一对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这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对局。行猎者一共射出三颗子弹，一颗射中谭的颈部，一颗射中肩颊骨，最后一颗尤其准，正中谭甫仁胸膛，而且显然就从心脏处射入，谭立扑于地——王自正有充份理由认为谭已经死了，于是由原路扬长而去。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五十分。但是等到秘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经是六点过了。凶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次得手之后，他已经又非常从容地去军区政治部大院进行了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平静入睡。

王自正的住地位于离解放新村不远的西坝，隶属于昆明军区的另一个院落。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两年前的八月，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等等，这些阶下罪囚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他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原单位负责人保卫部一个叫陈汉宗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暗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五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宗住房的具体位置，于是胡乱找到一间房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瞪瞪起床

来，他把王自正引去了陈的家门口。小孩认识陈，对王也很面熟，引路回来自个儿又囫囵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宗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去了。他夫人也不在昆明。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西坝了。一位正在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帮家伙已经被关押快两年，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就放任不管了。反正王自正把他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回到西坝，他非常满意地平静睡去。而大搜捕，开始在全昆明开始了。

我的印象

本段插入的是笔者个人当时的经历。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八号“谭办”安睡。离三十二号有相当距离的八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笔者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八号院的值班室高卧。需要补充的是，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不来上班，等我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已关门闭户。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看见食堂对面有许多军人，一个个默默低头慢徊，在三十二号周围的草地上做地毯式的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满地白霜，草地上踏得乱糟糟全是脚印。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我是读过的。象这样搜寻案犯，不但找不到线索，原来有一点线索倒被这帮笨蛋破坏殆尽。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出街觅食，这才发现，一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大事了。回到八号，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感到惊讶：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三天。八号寂聊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一座很精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半夜都会有军人惊吒吒冲进来，全副戎装，荷枪实弹，手臂上还扎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地要我将办公室的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像凶犯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里。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们的顶头上司甫汉

独个儿躲在他的办公室里伤伤心心哭，我们就更无事好干了。按照布置，就让我们每人写交代，按小时为单位，说明那些天的所作所为，包括每一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一个人在办公室学毛著学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散步；几点，在阳台上拉二胡；几点洗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六点，军区大院被封锁，接着，整个昆明市也被封锁了。空中交通完全关闭，陆路交通也实施了严格管制，车站道口过往人等均需进行严格盘查。昆明全城更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作犯罪嫌疑人。几天之内抓人无数，笔者不知具体数据，不能在此妄言。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半月案件侦破却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光火了，狠批了昆明军区这帮无能之辈，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笔者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但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如此判断当是十分准确、一针见血的。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难脱干系，在谭被害后第八十二天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时分，用尼龙网兜悬在床头栏杆上自吊身亡。参与侦破工作的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也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接受调查。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一九六八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份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某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都是二野班底，林彪自是很不放心。派谭甫仁来滇主政，又调五十四军入滇，将南京军区的王必成调昆明军区作司令员，对昆明军区掺沙子进行成份改造……林可谓是煞费苦心了。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把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当时大会小会都要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景的自杀，应该说是深得其中的斗争奥妙和自己政治处境的的尴尬了，除了自杀，他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据说，还让目击者一一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一一去军区各办公室指认。数日指认无果，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引路的那位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带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询问。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什么什么而不知其父亲为谁。七十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共用澡堂。马苏红和王自正的小孩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打闹。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一一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一一很快查到了那位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奇怪：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吗？身被羁押，他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一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西坝。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去打扫清洁。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于是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派队，让马苏红从队首向队尾走一遍，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一一马又一次准确无误地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处长，他对笔者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恐慌，惊讶，可怕，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笔者就亲自看见许多兵士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篦似的摸索寻找。保卫部有“五六式”手枪遗失，而“0 1 7 案件”现场发现的就是该型手枪的子弹。后来听说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

“五六式”手枪一支——王行凶后返回时把枪扔进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堆在那里——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深夜进行的。派了许多兵士在屋外实施包围，然后由两个保卫干事进门将王唤醒。内部传闻对抓捕过程叙述如下：

王问：“干什么？”

答：“请你跟我们出去一下。”

王问：“我可以穿皮鞋吗？”

答：“自便。”

王反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掏出另一只五六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丢失的手枪是两支，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支了，不知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七粒子弹，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用去四粒，还剩三粒。这时，他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便往门外直奔而去。但他已无路可逃了，门外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关于凶案的余音

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17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一直存在，甚至谭甫仁将军的骨灰，几年之内都没有能够进入本来顺理成章应该送去的地方：北京八宝山公墓。

谭甫仁遇刺不到一年，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写进九大新党章的法定继承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一代雄杰过于夸张的政治表演从此落幕，炙手可热的“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困境。再让赵泽莽担任破案组长显然不合适了。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老昆明军区的人来担任了，赵的专案组的某些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象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当然必须用够。不言而喻，谁抓住了破案权，谁就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而案件破与不破，反倒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专案组“翻翻烧饼”当然不足为怪——事情一直就拖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才由公安部副部长赵苍璧前来云南重新审理此案，算是对“01

7 案件”做了最后了结，而谭的骨灰问题还是不了了之。谭的被刺，是那个特殊年代不可避免的悲剧；案件侦破过程本身，也折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矛盾和悲剧。

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划个线，那么谭甫仁确应是林彪线上的人物了。据当时所知，一九七〇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也是一个跳得很高的角色。如果他不是被刺身亡，那么等到“9 1 3”林彪东窗事发，谭的日子肯定是非常难过的，被挂上贼船也未可知。因此，他的被害，对他本人来说，也许还算上天眷顾，得一善终。

再看凶手这边，王自正好像系河南内黄县人氏，当时的传闻是，王家庭出身富农。乃父在河南解放时即被当局镇压，王故而身怀杀父之仇，用菜刀手刃当地村乡干部，而后投军（解放军）南下，来到了云南。直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才发现了这些问题，遂决定审查结束便将其调离昆明，派赴边疆文山军分区保卫科工作。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王血债在身，足见他的案情是非同一般的，那么何以不绳之以法，反而还要继续将他留在军内？而且对他的监管如此放任，以至于他乘夜实施了暗杀大家尚且蒙在鼓里？仅此一端，看来当时为王罗致的罪名就很值得推敲。

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清理阶级队伍清得“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可恰恰就在政府大员自己身边，却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联想到当今社会，很多领导者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如成克杰之在《东方之子》节目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表白：广西三千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不解决，我睡不着觉呀，而私底下却和情妇李平几百万几千万地贪。谭甫仁那个年代倒是没听说谁贪污谁腐败的，但领导者把所谓革命理论仅仅当做一种工具，对人对己，两种玩法，这荒唐、却非常危险的种子，却早已经播下了。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丁嘉龙、听雨著 人民出版社 1998 出版，全书共 448 页

（尽管这本书是站在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还是应该感谢它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

二〇〇八年三月五日，陈朝富：《周总理“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的电话指示——纪念周总理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发言》

东川是中国的铜都，与会泽，以礼河相连。1967年7月，王力到云南改组省军管会，支持赵健民站出来的“八·八”批示后，“肃薄肃李”揪军内一小撮的喧嚣声甚嚣尘上。担任东川、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的军管会领导，都是十三军、十四军派来的。为此受到炮派的围攻、冲击。67年8月。他们把东川军管会主任十四军42师师长田大邦，干部刘友义揪到云南省军区礼堂批斗，刘友义同志当场被打，田大邦被连续批斗，因高血压、心脏病而病倒。东川市武装部部长军管会副主任王若海被炮派推下高楼摔死，东川市军管会瘫痪了。武装部打开武器库，向农民发枪，挑动农民进城制造大规模武斗。在新村包围矿务局机修下，停水、停电、断绝一切交通、通讯达一月多。在城区、农村、工厂杀害八派的工人、农民、干部达200多人。炮派不准八派收尸，用打冷枪的手段，使收尸群众又被打死、打伤，造成几十俱尸体曝晒一周之久，真是凶残之极。

由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建功，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朱家璧组成两级军区制止武斗工作组到东川后，停火交枪，由解放军战士保护八派群众，才把尸体收回掩埋。可见炮派杀人之多、之凶残、解放军战士在收尸现场无不悲痛动容。

1967年12月。滇东北炮派联合进攻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赶走了军管会的军代表，打死打伤干部、群众，又把八派大批群众关押起来，占领了毛家村电站、会泽、以礼河成了“炮管区”。随后直逼东川新村，新村八派干部群众于12月17日分两路撤出一路往昆明，一路往汤丹矿山。

东川炮头李国治制定了进攻东川矿区的计划：“以农村为依托，以民兵为骨干，围攻矿山。围而不攻，将军管会崔保平等和八派骨干逼下金沙江，一举歼灭”。

周总理于12月21日作出指示：“东川情况非常危急，两派发生严重武斗，危及工矿安全。东川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必须保护矿区安全。如果破坏矿区，就要问罪。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

炮兵团李国治等人，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大举进攻东川汤丹矿区，占领东川矿务局机关和军管会驻地。打死支左部队战士2人，坚守矿山的职工2人，打伤多人。十四军42师副师长崔保平及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被逼徒步下金沙江边，冒着漫天鹅毛大雪的掩护，在江边群众的帮助下，连夜渡过金沙江，爬雪山到达四川会东。从此，东川的军管会及所有的支左干部、战士，和八派观点的干部、群众，都被打出东川了。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将军管会副总军代表崔保平在传达贯彻周总理保卫矿山指示的宣传动员会，侮辱为“带领支左部队参加武斗的动员会”。（见《纪实》103页）如此歪曲事实，抵毁周总理指示，他们的立场、观点是多么的鲜明啊！

在炮兵团进攻矿山时，农民杨国文被打伤手和腿，至今身带残疾。到了揭批查运动时。带领炮兵团进攻矿山，对抗周总理指示的李国治，升官了，杨国文保卫矿山被打伤，却以“邦派骨干，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投省一监劳改。炮兵团进攻矿山被打死的两名解放军战士的墓也被挖掉了。“文革”中杀人的凶手们，披红挂花，敲锣打鼓的平反大会，和两次被打出东川的干部群众，被揪斗、批判、逮捕、游行示众的公审大会、宣判大会形成了是非颠倒鲜明的对比。

周总理在天有灵，也会气愤，也会为深受揭批查冤案迫害的东川干部群众鸣冤的。周总理关心东川的建设，关怀东川人民，周总理永远活在东川人民的心中！

二〇〇八年三月五，包亚芳：《周总理是云南“文革”大是大非的见证人——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云南各族革命人民，无不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周总理和毛主席共同革命、共同建国，共事一生。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作出科学的战略决策，周总理是最积极的拥护者、坚决的执行者、勇敢的捍卫者。由此两人结成相扶相成、相得益彰的特殊的、牢不可破的关系，周总理是毛主席的最案密的战友。

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向共产主义前进中，必须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保持共产党不变质，国家不变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的。

周总理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率先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站在这场革命运动的最前列，推动和领导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周总理 20 多次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亲自为数百名被资反路线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平反。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总理所到院校总是详细地讲解“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反复提醒师生：“要警惕黑手从背后杀一刀”。引导干部群众排除干扰，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

在文化大革命中，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了，毛主席热情支持这一革命壮举，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周总理等，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为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云集北京，周到地安排了衣、食、住、行、医。毛主席请红卫兵住进中南海，周总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去看望，热情的鼓励，亲切的谈话，至今语音绕梁。

1967 年 7、8、9 三个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洞察文化大革命群众分裂，闹资产阶级派性，指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还指出：“群众分成两派，主要是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要求：“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周总理按毛主席的指示，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关心，具体指示下进行的。回顾周总理处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所作的一系列指示，批件和讲话，是对周总理的最好的纪念。

一、云南两派是怎样形成的

1967 年 1 月 4 日，昆明地区 100 多个造反派组织组成大会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闫红彦到会接受批判。云南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闫红彦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赵健民表态说：“我坚决反对，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因此，几万人的批判会开到晚上十点多钟，不但闫红彦不到会，省委领导也没有一人到会，群众被激怒了，冲进昆明军区找闫红彦。

第二天，闫红彦得知红卫兵造反派冲击军区大院的消息，立即表示“出去向造反派讲清道理”，但是云南省委的领导人都不同意。特别是赵健民在书记处办公楼得知造反派来此寻找闫红彦，赵健民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非把闫红彦逼出来不可”，云南省委将闫红彦藏到云南军区警卫团“小麦峪”了。

如果按闫红彦的意见：“要我去，我就去”，冲进军区大院的事就不会发生。第二天如果按闫红彦的意见：“让我出去向造反派讲清道理”，事态也就平息了。由于赵健民一而再地不准闫红彦与群众见面，由于闫红彦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定，对抗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指示和批评，怀着极其阴暗的心理于1月8日服药自杀了。

赵健民不让闫红彦出来见群众，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向群众挑衅“我知道闫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你们”，激怒了十几万革命群众，激于义愤将其拉去游街了。

周总理得知情况以后，立即电话指示大会联合指挥部“立即撤出昆明军区大院，不得干扰军事机关”。当时在是否撤离军区大院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少数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黄兆其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听了周总理电话指示后，立即对造反派进行动员：“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黄兆其等带领大部分学生、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的，名称仍为“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会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八派）；继续坚持进驻军区大院的即云大炮兵团等少数组织重新命名为：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即后来的炮派），黄兆其等革命造反组织坚决按周总理指示，无条件撤出军区是正确的。

而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5年5月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却颠倒是非，把闫红彦之死、赵健民被游街、栽赃到黄兆其和广大八派革命群众头上，请看周总理于1967年1月14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云南代表时的讲话，周总理说：“1月4日，工人、学生造反派开大会，闫红彦拒绝了，看到学生冲进军区大院，不但不挺身而出，相反离开昆明躲在西山。1月8日，闫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派去的法医鉴定的，是自杀。闫红彦是可耻的

叛徒，我在这里和你们公开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没有关系，有人想利用闫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办不到的”。

周总理在讲到赵健民游街一事时说：“第一书记不出来，另一个书记向群众挑衅‘我知道闫红彦在哪里，也不告诉你们’激起群众义愤把他拉上车游街了，还骂群众是‘反革命行为’。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领导？……革命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这样的人一成群，我们的国家就要变色，党就要变质，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游一游街算得了什么？……”

周总理在 1 月 14 日，对坚持进驻军区大院的南下三司学生高志伟通电话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通过了一个通知：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要进入军事机关，尊重人民解放军这个专政工具……如果你们再不走，明天中央这个通知一到，你们就变成被中央通知、命令‘请走的’，就被动了”。周总理一再催促“马上就撤”。联络站（炮派）在 1 月 14 日迫于中央通知的无奈，才撤出大院的。

周总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处理云南文革初期这桩全国罕见的重大事件，是非分得明，责任分得清，周总理是处理云南“文革”大是大非的见证人。

二、就维护部队稳定，周总理的多次讲话

67 年 1 月 4 日，赵健民力排众议，坚决保护闫红彦，不让闫与群众见面，挺身而出，为保闫红彦而被拉上汽车游街……但闫死不到二个月，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段斗争的盖子》，提出“以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反党集团内”有军队两人（直指秦基伟、李成芳）。他是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他完全以造反派的姿态参加了炮派的核心常委。

67 年 3 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云南省军管会，以李成芳为主任。赵健民的大字报，早就把矛头对准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政委李成芳了，军管会成立四十多天，赵健民为核心常委的炮派就把矛头对准李成芳，发表了十四篇评论员文章，公开信等，如《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十四篇文章，要害是向军管会夺权。

1967年6月27日，王力到云南，改组了省军管会：撤掉李成芳，张子明、黎锡福省军管会主任、副主任的职务，换上了陈康，张力雄。

王力走了，以陈康、赵健民及其操纵的“左派”，就“合法”地控制了云南和昆明的局面，在王力的支持下他们肆无忌惮地开展了“肃薄肃李”反军乱军，一系列活动冲击军管会，于8月24日，武装占领五华山（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并发表了占领五华山的声明。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私设电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云南大乱，是王力七月之行造成的。

赵健民在云南大搞“肃薄肃李”，把矛头对准十三军、十四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破坏部队“稳定”周总理有多次讲话，1967年12月27日周总理说“有人要在十三军、十四军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他们形式上是反薄一波的，实际上是扩大薄一波的影响，起码是形左实右，这是把矛头对准转战南北有功部队，是自毁长城。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毛主席信任十三年、十四军，派他们驻守边疆的，怎么能说是薄一波的部队呢？有人提出十三军、十四年是薄一波、李成芳的死党，我们要坚决反对。十三军、十四军是毛主席信任的部队，要把这些话，打电话告诉两军……”。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把如此重大的事件，怎么不写入党史呢？可能也是别有用心吧？

三、中央对取缔私设电台的命令

赵健民为核心常委的炮派，占领五华山后，私设电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是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67）303号文件，命令指出：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是违反党纪国法，绝对不允许的……它不但造成无线电波的传播混乱，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正常广播，严重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给党和国家造成政治的严重损失……

周总理说：“云南有广播发射台，因为武斗，停止了广播，使毛主席的声音在海外、东南亚、西亚，北非都听不到了。这哪里是革命行动。是破坏行动……是土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那就不许可。你们看到“2.6”命令了吗？只要破坏国家设备和财产，危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要用“2·6”命令采取行动。”如此重要的大事，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怎么不作史实记载呢？

四、国务院对工役制工人退役问题的批示

国务院于 67 年 9 月 29 日，《关于工役制工人退役问题的请示报告（摘要）和国务院批示指出》：“工人服役期满后，不得强求继续留用，应返回原调出地区单位……”云南从河南、山东协调由农民编制为义务工役制工人，为援越抗美修筑境内公路。到 67 年业已服役期满，工程也全部竣工，本应退役回原调出的农村，参加社队生产”。省军管会的请示报告是按合同规定，“由哪里来回哪里去，”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役制工人也卷入进去，并且大部分是炮派观点。赵健民是非常清楚的。1967 年 8 月 29 日部份工役制工人找到赵健民提出“要留在云南”。赵健民和军管会主任陈康合谋，就改变了国务院批示，变成“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擅自继续留用，并从滇南调到昆明，组成了“援越抗美”兵团，每月发 40 元工资，成了赵健民昆明武斗的急先锋、别动队。这些都是周总理接见昆明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代表时，揭示出来的赵健民的批条和电报。被周总理怒斥为“搞反革命经济主义”。赵健民留用工役制工人，为实现其“控制马街、占领海口、打通西线”彻底消灭八、二三派计划的机动武斗骨干，昆明人民是亲眼目睹，深受其害的见证人。

走资派利用派性，当他们有难时，就钻进群众组织，把群众组织当成他的护身符；当他们要进攻时，就把群众组织当成他们的敢死队。赵健民搞经济主义强留工役制工人，成为他进攻的工具，消灭八、二三的敢死队。工八团从滇南到昆明，全副武装后，组成“滇西挺进纵队”，从昆明向西“挺进”数百公里，到一平浪枪杀了煤管局军总代表郭顺兴同志，在下关，洱源等地，杀害八派干部群众 250 多人，是革命行为吗？

省军管会主任陈康就郭顺兴被打死，作出的处理意见向周总理的报告：“一、查实情况；二、如情况属实，责令一平浪炮兵团交出杀人凶手，如果不交，即强行逮捕凶手。妥否，请总理批示”。周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电话转达周总理批示：总理同意陈康同志的意见，立即追查、限期交出凶手。由于“滇西挺进纵队”，从昆明一路打、杀、抢沿途人民和军队，武装攻占下关，肆无忌惮地公开枪杀群众、打死打伤值勤的解放军干部和战士，犯下了滔天罪行，成了货真价实的土匪

武装！对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决定取缔、围剿了这一危害人民的土匪武装！

然而，在云南揭批查运动刚开始，云南省委违背中央政策，将云南“文革”八·二三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云南帮派体”，大肆抓捕，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际，云南省委完全站在派性立场上，不顾历史事实真相，向中央报告作出“‘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这个组织名称，纯属假案，予以平反昭雪。死伤人员按因公死伤的待遇进行抚恤，并做好善后工作。”

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到了何等荒唐的程度啊，从千里之遥的滇南到下关杀了 250 多人，抢了那么多军用仓库战备武器、物资，死伤人员按因公死伤待遇进行抚恤，是“因公”吗？这是什么“公”？赵健民“控制马街，占领海口、打通西线、消灭八、二三派”之“公”。被杀的军队干部战士、下关、洱源的 250 多群众，都是“秉公”去枪杀的吗？周总理、谢富治、江青说“是政治土匪”没有错。对人民，对人民军队如此杀戮，与政治土匪何异？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缅怀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文化大革命而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作出的丰功伟绩，发言者含泪哽咽与会者心情沉重。

在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后，为了政治的需要，在中国较长的一段时期，媒体用资产阶级特有的立场、观点，手段，通过“抬周贬毛”“拥周反毛”文章，制造“周总理反对文革是违心领导文革”的谎言，把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敬爱的周总理珠联璧合的整体，硬生地撬出一道深深的鸿沟。用兽性和吃人理念，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高尚与卑鄙倒挂，篡改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真实。

这些阴谋、卑劣手段，深知深爱周总理的邓颖超同志在弥留之际，一直念念不忘地说“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这量重千钧的两句话，是代表周总理向世人、向后代的重大嘱托，也是对一切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谎言者的迎头痛击。“拥周反毛”“抬周贬毛”，这是为达目的采用的卑劣手段而已，否定毛主席、否定周总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果，是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目的的。周总理按毛主席的部署，亲自领导、主持解决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是大非问题讲话、批示，被彻底否定，将云南 5

万多按党中央，周总理指示办事的干部群众，工人农民，打成了“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骨干”而判刑入狱，他们将毛主席周总理又置于何地呢？！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是难得的一部派史，是制造云南思想动乱，是不稳定因素的源头。用事实真相揭露批判，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昆明八·二三《风展红旗》）
（暂至 67 年 1 月昆明地区两大派分立为止）

前言

1966 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违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八月廿三日，革命小将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十六条的鼓舞下，杀向社会，“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直捣阎、孙黑帮老巢！

阎红彦叛党自杀后，但是他的阴魂不散。大叛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赵健民之流跳出来了。他们煽阴风，点鬼火，挑拨离间，分裂造反派，导演了“1. 26 夺权”丑剧，挑拨支边工人，兄弟民族、华侨和造反派的关系，使造反派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然后取而代之。他们又秉承反革命两面派王力的意旨，策划“大揪军内一小撮”“武装一派，屠杀一派”的新阴谋……。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闯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他们正在经受着战斗的洗礼，不断在斗争中成长，壮大，意气风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五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件——1966年5月16日《通知》。通知指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丧钟。

五月廿四日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露了彭真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把矛头直指《三家村》后台——旧北京市委。阎、孙黑邦见大势不妙，孙雨亭私下召集其得力干将张曙光及其爪牙，密谋“舍车马，保将帅”，收集整理了群众早已揭发出来的三反分子高治国的材料，密送阎红彦，准备抛出三反分子高治国。

五月下旬 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阎、孙黑邦制定了一个大逮捕、大收监、大劳教的黑计划。省公安厅专门设立了一个“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六月一日 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六月四日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旧北京市委。

六月五日 旧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阎红彦不传达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只传达西南局重庆黑会上李井泉的黑指示，强调说：“现在关键问题是加强领导，运动重点是放手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并布置“有啥揭啥”，有意将矛头引向群众。会上，阎、孙黑邦打着批判《四月提纲》的幌子，开始把高治国抛在一边，孙雨亭掌握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实权。

六月六日 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

但是，阎、孙黑邦秉承刘、邓黑主子的意旨，极力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加强领导为名，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向几个主要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并由孙雨亭亲自抓大学片。

六月七日 在地委书记会上，阎红彦为旧云南省委定调子说：“1963年单干风、翻案风，文艺上的自由化，机关读古书风，全国有，我省也有”“我省有单干问题，过去被于一川、梁浩隐瞒了，所以认为问题不大”“我们的问题是阶级觉悟不高，水平低，当时没有发现”。

云南日报发表署名陈岩(王甸执笔)的文章和“《滇云漫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材料抛出了李孟北。接着，各地群众来信，要追《滇云漫谈》的根子。孙雨亭在大专院校叫嚷：“把李孟北揪出来了，说明省委是正确的”。

六月十日 阎红彦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在地委书记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阎红彦在会上以“组织革命化”为名，阴谋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他说“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20%可以清洗，省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五千人顶替”。根据这个黑指示，各专州组织大批工作组，集中整训中、小学教师，把大批教师打成“反革命”。

六月中旬 阎红彦最害怕机关干部起来造反，后院起火，本来他们的方针：对机关是“压制”。先收拾学生，回过头来收拾干部，但迫于形式，不得不研究开展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由“压制”变为“控制”。为了控制党政机关，旧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成立省级机关文化革命小组，由刘明辉出面任组长，并直接安插一批阎、孙黑邦的亲信，如阎南君、李文、王腾波、张克、荆克洲、刘华等控制掌握各级党群、农水、政法、工交、财贸等六个大口，孙雨亭并亲自指挥省级机关的运动。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一次研究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的省人委党组会议上，阎、孙黑邦再三强调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突出重点”，“干部要按左、中、右排队”。孙雨亭还说：“重点搞学校，如果机关也开展四大就会干扰中心”，会议确定全省的重点是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勘察设计院等单位及文教系统。决定立即派出工作组。

六月十八日 阎红彦、孙雨亭布置各大专院校运动时，除了抛出几个臭名昭著的老右派如李广田掩人耳目以外，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大叫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普遍揭发”“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论是谁都可以揭”，“有什么揭什么”，对广大教职工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围攻。据统

计，云大、师院、工学院、农林学院、医学院五所高等院校的 3470 名干部及教职工中，被大字报点名围攻的达 1867 人占 53.7%。

六月廿二日 阎、孙黑邦妄图扑灭已经燃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孙雨亭立即派出得力干将率领大量的“工作人员”到各校镇压。并亲自在师院“蹲点”，总结“控制运动的经验”。

六月廿六日 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带回文化大革命的步骤草案和孙雨亭密谋制订了全省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阎从西南局带回的一个绝密文件上说：“全国要抓 40 万右派”。在一次常委会上阎问：“57 年我们搞了多少右派”？孙雨亭、岳肖峡回答：“1.1 至 1.2 万”。阎说：“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还行！这次恐怕不止此数，搞的面会大大超过。”

六月廿八日 阎、孙黑邦闻讯全国已经揪出了一小撮盘踞在宣传、文教部门的三反分子后，旧省委慌忙召开常委会议，对高治国进行所谓“批评帮助”。当晚，密电西南局决定免除高治国省文革小组长、西南文革小组成员职务，由孙雨亭任组长。

六月三十日 旧省委组织部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阎、孙黑邦的旨意，制定了全省文教系统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庞大计划，并拟成两个黑文件，一是：“省委对各地区中、小学文化革命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个是：“省委批转组织部关于抽调五千人加强教师队伍的报告”，批发全省各地执行。

六月下旬 中央公安部明文通知在运动中不准多抓人和过早抓人，这个通知与旧省委要多抓人的通知针锋相对。公安厅荆××却按照阎红彦旨意，大肆宣扬：“两个通知精神是一致的”“省委通知适应于社会上，公安部的通知适用于内部”。为大逮捕计划作舆论准备。

六月×日 赵健民又把王任重大抓“右派”的反革命方案、私自给工交系统的某几个负责人传看，暗示给他们要在革命群众中大抓“反革命”。在赵健民的指使下，工交系统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仅就省级工交厅局机关等十八个单位的统计，就有八百人之多。

七月一日 《红旗》第十期发表了“信任群众，相信群众”的社论。

七月二日——五日 旧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高治国进行了假批判、真包庇，会上根本未触动省委任何问题。五日，阎红彦在会上对高下了个结论是：牛鬼蛇神。

七月九日 旧省委写报告上报中央，吹嘘省委揪出高治国的“英明”，闭口不谈省委的问题，背地里与李井泉、邓小平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包庇高治国。此后西南局关于处理高治国问题报告的批示中就说：“关于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经我们与省委商议，改为在内部进行批判。撤销高治国职务问题，可待进行批判到一定阶段再宣布。”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也竭力掩护，提出三条黑指示：1 高治国过去是一个好的地委书记；2 不要开除他的党籍；3 不要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旧省委秉承黑主子意旨，一直包庇三反分子高治国，从未在群众中进行批判斗争。

接着，阎、孙黑邦散布“省委宣传部是烂了的单位，立即组织庞大工作组进驻省委宣传部，扑灭刚刚兴起的从高治国问题烧向黑省委的革命烈火，并以宣传部作为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试验田”。对省委机关干部给领导贴大字报的就加以扣压、围攻和打击。

七月上旬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雨亭到各大学工作组开会，总结“经验”，出笼了“关于高等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一些初步意见”，是疯狂镇压各高等学院群众运动的黑文件。孙雨亭还提出，要“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右派”“要在学生中抓右派，让他们在运动中暴露”“有反动言论的学生，一般都要记一笔账”。孙雨亭还推行昆明师院成立“文革”的经验，布置搞“教职员代表大会”形成“领导核心”，加强“组织控制”。阎红彦十分赞赏，叫立即在各校推行。

七月十五日 孙雨亭到云大检查工作，反动透顶地说：“只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实际上连毛主席也不相信了”。

七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就毛主席畅游长江发表“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wengewang.org

七月廿五日 旧省委又发表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小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大清洗、大换班、大斗争作了具体布署。各专县普遍派出工作组，在中、小学大搞“集中营”、“拘留所”、“逼供信”进行武斗，把不少

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加以清洗开除。许多县达到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七月下旬 阎红彦说：“这次摸摸，机关里家庭被杀、关、管、斗的，表现不好的，拿钱不干工作的多少”。阎红彦参加十一中全会以前，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机关运动，提出“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要排排队，要搞彻底”“一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另一种不是分子，但问题较多，也比较严重”“排队的名字直接送王甸亲收”。

还规定一系列清规戒律，框框套套缚住广大革命干部的手脚，借口“保密”“内外有别”，“不准机关之间相互看大字报”，否则“要经过省委文革办公室同意”“本单位的大字报不得到外单位议论”“不准机关干部上街看大字报，不准干部和学生串连”“不准机关职工成立战斗组织，这是为了“防止内外勾结”。控制不住了，就搞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阎、孙黑邦专门在新华山上成立了黑情报站——省委机关文革办公室，收集各种黑情报。

七月下旬 阎红彦到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下令撤销工作组，但阎红彦拒不执行，借口说：“云南的工作组没有打过一个反革命，问题的性质和北京工作组不同”。严密封锁中央的指示。

七月廿七日 阎红彦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透露毛主席已提出大学不要工作组的问题。从 27 日至 31 日，阎红彦接连就工作组问题打来电话。只是叫省里各大学“酝酿”是否撤出工作组。

八月二日 孙雨亭对各大学工作组讲“撤了不要怕，右派领导一下也好。右派打倒左派，左派再起来打倒右派，左派就坚强了”，“工作组在，右派暴露不够，左派锻炼不够”，“工作组撤了，右派反攻也好，要引蛇出洞，混战一场有好处”。

八月四日下午 阎红彦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透露说：“昨天清华大学开两万人大会，总理说，中央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暗示孙雨亭赶快作好对抗中央的准备。

八月五日 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撤销工作组，阎红彦感到实在混不过去，不得不撤出工作组，又继续玩弄花招，散布说：“派工作组是对的，现在撤工作组，

也是正确的”。孙雨亭还露骨地主张：“不按北京的解释”（不承认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八月六日 孙雨亭走窜各大、专院校。他在云大胡说“撤工作组是受到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启示”。“云南工作组少而精，没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当时派也对，现在撤也对”。

八月八日 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接着发布了十一中全会公报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告了他一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旧云南省委书记处却召集会议，讨论工作组再派回学校的问题。阎孙黑邦继续对抗中央，欺骗群众，又巧立名目，以派“调研组”、“联络员”为名，继续派出大批人员到学校控制学生运动，扑灭革命烈火。

八月十日 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五日 孙雨亭仍继续召集各大学工作组会议，他说：“一、今后不要工作组，怎么领导运动，大家要想个办法；二、各校成立文革，工作组都要表态（支持），各校成立文革时，工作组一定去，一祝贺，二做点鼓励性的检讨今后就更好了解情况”“选举文革筹委会，实质是争夺领导权”。会后各工作组都以联络员等身份，幕后操纵控制各校群众运动，煽阴风。点鬼火。

八月十六日 省委宣传部的革命同志提出要斗争高治国，追省委根子，孙雨亭即密令工作组切断高治国与黑省委的关系，宣扬“不要追无底洞”。省委机关干部一给领导贴大字报，就遭到打击迫害。省委卫生所同志给阎南君贴了大字报，不仅大字报被扣压，阎南君还诬蔑这是“阶级报复”，并散布“大字报是揭露牛鬼蛇神，也是暴露牛鬼蛇神”的论调。孙雨亭立即把矛头引向下，大肆挑动群众斗群众，扬言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揭”“一锅煮”，掀起一场群众之间的大混战。

同时，阎、孙黑邦通过刘明辉宣布：“其它单位转入理问题，梳辫子”“搞思想革命化”，布置在十月份即草率结束运动。

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大军。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八月十九日 云大二同学贴出大字报揭露揪斗高志国是旧省委“舍车马，保将帅”的丑剧。孙雨亭慌了手脚，立即组织上千人的大字报围攻，孙雨亭还亲自到云大讲：“曹、保(二同学的姓)大字报，说它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也不过分”。
wengewang.org

八月廿日 毛主席 8 月 5 日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文件发到云南，中央要求立即传达。而阎、孙黑邦公然扣压和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孙雨亭在一次省委会议上说：“现在学校闹得很厉害，机关再乱起来，可不得了。已经传达了的，就算了，没有传达的就暂时停一停。”阎红彦立即赞成他的意见，结果把毛主席大字报扣压了一百多天。

阎红彦开十一中全会回来，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不作认真传达，对刘、邓的问题闭口不谈，歪曲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不能随便套，没有党的历史知识的人也看不懂”。并狗胆包天地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首先要炮打工交口司令部！我说的话也算对工交口的一张大字报！”

从七月上旬到八月中旬一个月里，阎、孙黑邦在省级机关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省级机关参加运动的 8900 人中，被列为重点就有 1900 多人，占 20%。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的干部就有 4400 多人占 45%，而阎红彦等却没有一张大字报。给孙雨亭贴了一张大字报的干部，就遭到围攻，受到迫害。

八月廿一日 《红旗》十一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

八月廿二日 深夜，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冶金工校的革命师生，在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接见首都革命师生的鼓舞下，连夜串连，传送北京学生给农学院学生周鸿的一封信“清华来信”，传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传送北京及其它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出校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情况，互相鼓舞，组织炮轰省、市委。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八时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中医学院、冶金工校等院、校的革命造反派，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到省委礼堂集会。“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点燃了全省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限的生命力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吹起了向阎、孙黑邦等一小撮走资派的进军号，吓得阎、孙黑邦胆战心惊。阎红彦玩弄

两面手法，表面“欢迎”，另一方面又制造反革命舆论，把“八·二三”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说什么这是“匈牙利事件”“小政变”等等。

下午和深夜，省委秘密派马文东、王甸等人蒙蔽、煽动大、中学校的部分学生到省委机关“保卫省委”，围攻主张“炮轰”的革命学生。同日，昆明工学院成立“金棍子”战斗小组。

他们认为：“红卫兵没多少‘炮弹’，真正有‘炮弹’的还是机关干部”。当晚，阎红彦说：“机关干部不要急于上街，不要急于搞反击，让他们再暴露一下。”刘明辉对机关干部谈话“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站队的时候，不管你是谁人，你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是每个人表明态度的时候了。”黑省委立即下令停止省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致对付红卫兵”，强迫干部“保卫省委”。既阻止了干部起来揭发黑省委的问题，又制造机关干部和红卫兵的对立，把干部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真是恶毒之极。

旧省委深夜组织机关干部围攻写大字报炮轰省委的宣传部等部门的 45 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叛徒”，强迫写“检讨”。阎红彦还亲自下令秘密拍摄了五张大字报的“黑照片”准备秋后算账。

阎红彦、×××，利用军权，调动一批部队及公安人员进驻省委。廿三日深夜，刘明辉到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动用专政工具，派出警车监视镇压革命群众，省公安厅副厅长×××坐镇指挥。还公布收到北京来信的昆明农林学院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以进行政治迫害。

八月廿四日 旧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名为贯彻十一中全会精神，实则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放了“八·二三”大会录音，作为“反面教材”。晚上，旧省委指使马文东、王甸调动一批受蒙蔽的学生来围攻革命造反派时，还通知地市委书记参观，美其名曰：“接触实际”。孙雨亭亲临现场指挥。

阎红彦还亲自交待杨西文、史烽等人布置拍照，特别要选择“炮轰得厉害”“有刻骨仇恨的照下来”，“以后是有用处的”等等。又叫王甸布置人把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也拍摄成黑照片保存下来，准备秋后算账。

八月廿五日 旧省委在云南艺术剧场召开各大中学校的筹委会负责人大会，地市委书记出席旁听。阎红彦大耍两面手法，叫嚣说：“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还说：“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

不倒”，赵健民也为旧省委涂脂抹粉，说什么：“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紧跟中央、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时间长达二月之久，革命派学生受到激烈围攻。

八月廿六日 地市委书记举行小组会，大肆攻击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的炮轰派，说这两个学校是“右派控制领导权。”

下午，孙雨亭在地委书记会上大讲对待“八·二三”事件的四种人，把干部分为四类，即“一、左派肺气炸了；二、中间派无动于衷；三、右派暗中窃喜；四、有的里应外合。”

孙雨亭发现“八·二三”事件中，昆明工学院学生十分积极，立即密召工学院院长赵凤歧，威胁他必须立即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否则就“开除党籍，直至逮捕法办。”

八月廿七日 周兴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把话说透一点，地委书记要心中有数。革我们的命，我们欢迎，但革什么命？炮打司令部打什么？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打，但执行的你还能打，本来是造帝、修、资的反，不是造有缺点的人的反嘛！不清红皂白地反，就搞乱了”。“通过这样一来，暴露了敌人，有问题的人，糊涂的人，也发现很多‘左派’，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反革命”等等。此后，全省各地根据省委镇压“八·二三”的反革命经验，纷纷把炮轰派打成反革命。

刘明辉到公安厅布置组织近百人的工作组，由两个副厅长率领，到昆明市东风、新华两个公安分局坐镇指挥，抄大字报，抢传单，跟踪盯梢，刺探情报，大搞黑名单，黑材料。

旧省委成立省委文革接待站，调张曙光为站长。确定方针是：“应付、吸引红卫兵，突出接待站掩护文革办公室，确保书记处”，各地市委接待站也相继成立。

八月廿八日 第一批南下学生共 23 人来到昆明，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wengewang.org

赵健民为阎红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好，说什么：“阎红彦同志在八月廿五日、廿八日两次讲话都讲得很好！水平很高，很有辩证法，既没有伤害‘左派’的积极性，就是有右派也抓不住什么把柄，红彦同志讲话我们要好好学习。”赵健民在工交厅局长会议和厂矿负责人干部会议上公开说：“对炮轰应该有阶级内容，阶级分析，说炮轰是给省委提意见，我赞成，说炮轰是打倒，我反对！”

八月廿九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对付南下串连革命学生。周兴在会上拍着桌子说：“问题很明了的他们的方针已定了，就是来打倒我们的。”×××还露骨叫嚷：“这些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孙雨亭还叫喊：“这些人一来就钻昆明工学院。”大造“大抓南下一小撮”的舆论，春城开始出现围攻南下学生的大字报。

黑省委文革办公室开始建立“情报小组联络办公室”，各大专院校及有关机关，设立小组，收集“情报”。如“××厅，何时成立了什么战斗组织？有多少人？负责人是那个？”“××厅×××，今日上街参加辩论”。凡集会游行，要及时汇报队伍的行动、目的，喊什么口号，向何处去，谁领头等等。

八月下旬 黑省委密秘派遣公安人员便衣侦查监视盯梢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医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并制定了大逮捕计划，并已准备好劳改农场。

八月底 阎孙黑邦采取真包庇假批判的两面派手法处理了“汽车技工学校镇压学生事件”，“昆阳的九·九组织农民、干部围攻昆明化工学校红卫兵的事件”、“呈贡的七·七把大批给县委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事件”、“云省勘测设计院八月中旬镇压革命大字报的事件”。并四处散布：“省委正确”“是十六条中的第一种类型”妄图上骗中央，下欺群众。

八月三十日 云大陈立新、师院李木昆等革命小将秘密成立“反修战斗队”，是组成炮兵团的第一个战斗队。

八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九月初 在一次工交大口会议上，旧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和×××都说“大敌当前”“九月十五日是个大关，这些学生可能来大闹一场回去过国庆”。赵健民私下还攻击说：“毛主席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组织反击，还在稳坐钓鱼船。”

九月二日 阎红彦、孙雨亭搬进昆明军区招待所，把黑省委指挥中心移到军区。设立了大三线(阎红彦、孙雨亭退居三线，为最高决策，周兴等居二线，

岳肖峡、张曙光等人居一线)、小三线(接待站,大门口接待站居一线,黑省委是二线,书记处属三线)对付群众。

九月三日 中央文革小组与西南局来电了解省委中有那些人不能担任文化革命的领导,省委书记中有严重问题的有谁?书记处当晚开了一个“绝密”会议。只报了高治国一人是牛鬼蛇神。

阎红彦与×××密谋,挑选了四个军区部长级的干部冒充《解放军报》记者,分赴大、中学校刺探情报,每天向黑省委汇报。他们汇报了南下学生中带头的是李忠、麦克元,阎红彦就立即下令文山地委书记火速调查李忠的家庭情况,把李忠家庭原属上中农硬说成是恶霸地主,准备陷害,还在学生中物色培养“保”字派。

九月四日 北京南下学生和昆明师院红卫兵小将,在省委机关门口冒雨静坐 20 多小时,要求阎红彦接见,阎躲在军区拒不接见,孙雨亭还在军区大骂“今天是什么‘世道’”、“哼!革命几十年,现在成了革命对象了”。

九月五日 云大政治副主任尤正发和省公安厅抛出了一张反动大字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周鸿》

九月六日 黑省委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段,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省委书记处开会,阎红彦提出要搞“平衡”政策,要依靠“二司,平衡三司,打击杂牌”,秦××在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磨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辫子’,整一下”。孙雨亭、马文东立即对各大学文革发出四点指示:“一、不纠缠“炮轰”与“保卫”的口号,不主动挑起辩论;二、实在非辩论不可,要抓住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宣传十六条,不讲阶级路线等根本问题;三、南下学生中的黑崽子,由他们自己审查,我们不去抓,对很坏的要材料收集起来;四、各大中学的坏人,要向群众揭底”。以上这些黑指示,成为当时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纲领。

九月七日 阎、孙黑邦继续对抗毛主席指示,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昆明医学院学生×××歪曲八.二三大会真相,污蔑造反派是“右派”。岳肖峡得知得马上密令其秘书帮助编写修改,写成“八月二十三日在省委礼堂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大量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张贴,阎、孙黑邦大为赞赏,

密令多印，散发全国全省。还专门指令要送给贺龙五份，后因阎红彦怕太露骨而未送。

九月九日 黑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孙雨亭在会上讲话，要各地委“认真研究”“掌握控制”“地县委所在地城镇，着重搞一搞四旧”“正面宣传教育”等等，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我省文化大革命引向扫四旧，压制群众运动。

九月十日 李井泉秘密来昆。下午，李井泉找阎红彦、周兴、秦××、孙雨亭等人密谈。晚上，在军区招待所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李井泉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组织“红五类”子女斗争“黑五类”子女。布置放由他带来的宣扬反动“血统论”的录音。二、核心是组织“左派”力量，组织红卫兵。李井泉说：“只要真正有几千个有战斗力的红卫兵就解决问题。三、提出要控制邮电大楼、电台、报社、公安等要害部门。他说：“机关大楼冲就冲，占了也不要紧，占了城市还可以到农村，无非打游击”。孙雨亭拍手叫好，说：“井泉同志一讲，我们思想开朗了，有办法了”。会上，阎红彦当即和贺龙通了电话。wengewang.org

九月十一日 下午，李井泉召开保守派学生座谈会。会上，把“八.二三”说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政变演习”。李并给云南省委定调子是“正确的”。他还鼓动“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血战到底”，要“几红夹一黑”。

傍晚，省委书记处匆忙开会策划成立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与革命造反派对抗。指定赵增益出面组织。大搞反革命“平衡”政策。

晚上，阎红彦指使秘书给陶铸打电话，要中央答复云南省委是不是黑帮。陶铸说：“中央不好表态，李井泉在昆明，由李答复。”李井泉知道后对阎说：“云南省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打了两个司令部，我看省委不是黑帮。”李还叫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电话转告陶铸。

九月十二日 红卫兵总部成立，阎红彦率领省、市委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指定秦××等人为辅导员，拨给房子、汽车、大量活动经费，大肆推行反动的“血统论”，贩卖谭氏黑货，组织三万多人听李青源大讲所谓的“阶级路线”，并在云南日报头版刊登，还将录音送到各学校放毒，挑起大规模学生斗学生。

九月十三日 旧省委秘密开会，确定在北京私设情报站(即北京食宿接待站)，派省科委副主任李书成任组长，省民政厅付厅长刘鑫任副组长，到北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北京南下学生和云南上京学生的活动情况。

昆明地区到处大抓“南下一小撮”。

九月十四日 上午，云大、师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正式成立。

下午，南下串连学生和昆明地区革命学生，由于揭发了九月十日、十一日《云南日报》社论的严重错误，几千人整队到报社抗议，遭到围攻及扣留。随后到省委机关，再三要求阎红彦等人接见。阎孙都躲在军区拒不接见。同时，又用窃听器窃听礼堂会议情况，并指使岳肖峡贴出大字报污蔑革命师生。

九月十五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部分云南学生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讲了炮打司令部问题。刘明辉明目张胆地歪曲林彪同志的讲话，说：“阎政委的讲话与林总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黑省委以为时机已到，积极准备大反扑，孙雨亭密令王甸主持编写“反击材料”，针对炮轰省委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歪曲事实的答辩。还声称：“这些材料打出去，形势就会大变。”

九月十九日 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秦××献谋说：“最近贵州把一些内部情况，甚至省委常委会记录都弄丢了，我们这些人随便讲几句话都记下来，万一拿出去，说不清楚，我看清理一下。”阎红彦作贼心虚，立即赞成，会后即由王甸、林建中负责清理，烧毁了一大批书记处和常委会会议记录，毁灭罪证。

九月中旬 阎红彦、孙雨亭组织人秘密收缴高志国、梁浩、李孟北、张更生的全部工作笔记、日记等，在机关内部，实行“坚壁清野”，把全部文件和材料，包括干部的私人笔记，一律密封转移，以此对付红卫兵小将查抄，怕泄露省委的内幕材料。

省委办公厅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孙雨亭指使下，大批烧毁全国各地寄来的传单，不让昆明群众看到，封锁消息。

对省委机关干部加紧控制，规定几不准；不准同红卫兵接触，不准暴露身份、说出姓名，不准记笔记和随身带笔记本，上街要三人以上同行，看大字报要编组前往。违犯规定以叛徒论处。

九月下旬 周兴到各大专院校，到处接见革命师生，大肆为黑省委涂脂抹粉，他说：“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基本上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可以信赖的，先后打掉了于、高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凭良心说，云南省委没有做过亏心事。”阎红彦立即加以夸奖，说：“周兴主动出去接见效

果很好, 希望继续这样办。”孙雨亭也拍手叫好, 说: “这些话只有你去说才行, 别人是办不了的。”

九月三十日 北京已经批判谭立夫反动血统论的黑货, 但周兴在书记处会议上, 却公开赞扬谭立夫的第一篇大毒草很好, 说: “谭立夫很有才干, 通过运动才能出这种人才。”阎红彦还说: “北京谭立夫讲话出名了, 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的水平。”

九月下旬 阎孙黑邦通过文革、组织部、公安部门三个系统大肆收集黑名单, 查档案, 查家庭情况, 准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调查了四十多个南下学生的情况, 准备拘留逮捕。

九月下旬 昆明地区各中学, 大搞所谓“红色恐怖”, 斗争“黑七类”的黑风, 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wengewang.org

黑省委为了逃避斗争, 不顾中央的计划安排, 大量怂恿炮轰派师生上京, 对徒步串连的更是“有求必应”。孙雨亭还恶毒地说: “让他们(指中央)也尝尝学生的滋味。”同时, 黑省委又借口“支援秋收”, 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策划, 把大批学生远远调离昆明, 妄图使炮轰省委的烈火熄灭下来。

九月底 吴作民召集财贸大口主管运动的厅局长开会, 酝酿准备成立打游击的后勤部的工作。吴说: “局势紧张, 省委可能和你们失去联系, 要转入地下, 你们要有独立工作能力, 如果文化大革命搞不成, 就准备上山打游击。”并布置各单位调查了解, 到时候能带出多少人。

十月一日 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十月二日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提出,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必须彻底批判。

十月×日 阎红彦提出“大乱几个单位”(共七个: 交通、邮电、粮食、物资、供销等), 企图破坏生产压中央。当时, 有人提出交通、邮电还能停? 阎恶毒的回答: “机器坏了就坏了, 我到军队打电话, 全国不怕就你怕? 全国大得多的(生产单位)也不是停了? 不是不要怕乱吗? 怕什么? 影响就影响嘛! 汽车停就停嘛!”当时同全国比, 昆明运动“冷清清”, 阎又怕乱, 又怕说他没有发动群众, 因此, 也是做样子给中央看, 同时借此再抓一批“牛鬼蛇神”。

十月五日 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提出整群众的材料，经群众和被整同志同意，可以当众烧毁。黑省委拒不执行。并早在九月底就转移了一批黑材料，档案文件也大量转移，阻止干部揭发黑省委问题。

十月十二日 谭立夫到昆后，周兴指使专人把谭立夫等九人隐蔽在二十二中。谭立夫的二篇大毒草《告全校革命师生》书交给周兴，由云南日报秘密印刷。周兴还派老婆、秘书看望过谭立夫。最后因谭被南下同学发现，要抓他，周兴又派专车将谭立夫、刘京等九人专程送往川泸州转赴成都。

十月十四日 南下同学反复要求看揭发省委的大字报未成。黑省委后来又撰拟了“十月十四日，南下一小撮在省委机关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歪曲了事实真像的传单。并在群众中大量散布谣言，说：“三司专门学了一套打人经验，是从西安打到成都，呆不住才跑到昆明”“看来他们不带着几件血衣回去，是不甘心的”。

十月十五日 旧省委听说中央要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规定，由王甸指挥，秦××同意，连夜把第二批黑材料转移到军区。”

十月十八日 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黑省委为瞒骗中央，被迫成立清理黑材料小组，由周兴、岳肖峡等负责。中央十六日规定，“责成原工委组、党委或其它组织负责人”。但黑省委十月八日的通知却说：“要各大口、各学校、各单位成立“专门小组”“清理小组”，一直未发动各单位检查处理平反、黑材料问题，许多基层单位迟迟不动。

十月中旬 中央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来电关于参加人员问题，曾经提出要有省委中持有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参加会议，但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云南省委意见一致，没有不同意见”，并决定由阎红彦、赵增益、马文东三人出席会议。

十月二十日 昆明工学院成立：“井岗山八、二三战斗团”。

十月二十二日 阎红彦与秦××密谋，将省委书记处大楼自行划为军管区，冒充军事机关，并指定云南军区付司令员王银山负责，周密布置，会同公安

厅付厅长毛崇横组成三人小组，“保卫机关”，与红卫兵对抗。省委书记及办公厅部份工作人员都换上军装，伪装成军区工作人员。

十月二十七日 市邮电局第一个造反组织“工人战斗总队”成立了。

十月下旬 市公安局刘殷农同志作为机关干部第一个杀出来在街头贴出大字报，揭露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刘殷农同志杀出来后，阎孙黑邦非常恐慌，布置要“防止内奸”，加紧控制。刘明辉要省级机关文革办公室摸摸各级文革办公室人员的底，“看看有什么问题”。王甸说：“凡是发现叛变、动摇的，要及时处理。”“你要揭发我，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我就先枪毙你。”张曙光说：要把揭发他们的人“装进麻袋里，扔到河里去”。

十一月三日 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wengewang.org

昆明八·二三“井岗山”战斗团、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派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积极起来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阎红彦被迫在检阅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参加三千会的地、市、县委书记也出席了这次大会。阎在“检查”中顽抗抵赖，给旧省委定下了对文化大革命“只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调子。

十一月五日 黑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为贯彻中央十月工作会议精神，实则继续顽抗，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下午，孙雨亭在预备会上布置：会议准备开二十天，以十五天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五天期间要安排“四清”、财贸、生产，根本不提清算和批判黑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三千会期间，阎红彦被迫出来在宾馆接见群众，当群众高呼“炮轰云南省委”的革命口号时，赵健民仍拒不举手。当群众质问时，他公然对抗说：“共产党员旗帜要鲜明，我反对笼统地炮轰。”

这一天，工交大口继续烧毁黑材料，被昆明“八·二三井岗山”革命小将发现，取走了两箱，当晚赵健民亲自到新华山处理，竭力进行辩护。革命师生问他：“是不是黑材料？”他一口否定，撒谎说：“烧的不是黑料材，是多余的，重复

的简报材料。”当革命小将问他：“中央军委十月五日的指示适不适合党政机关？”他狡辩说：“指示说适用于县以上的大专院校。”公开抵制中央军委的指示。

在检阅台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他仍然矢口否认，抵赖工交烧毁黑材料，革命小将当面斥责他“不要脸”，这位堂堂的“本届中央候补委员”竟然破口大骂“你才不要脸。”

十一月七日 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组织进驻省委，串连机关干部起来造黑省委的反。

十一月八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今天昆明机床厂广大工人同志冲破了走资派设下的重重障碍，杀了出来徒步从北郊来到昆明参加了检阅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省人委、省委机关出现一批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十一月十日 晚上，阎红彦召开地、市委书记、厅局长座谈会，有人反映机关干部对拍炮轰大字报的黑照片有意见，阎红彦说：“有权利拍大字报的照片，拍照有什么错误。”有人谈到学校文革选举和党委领导问题，阎红彦插话说：“党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领导，犯错误就在于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选举上反革命都可以。”阎还说：“你对群众过激行动咬牙切齿有什么用？群众起来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他还露骨地威胁说：“这次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你们厅长，副厅长”，妄图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压制革命干部起来揭发黑省委的问题，保护以他为首的黑省委一小撮走资派过关。

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并对一些领导干部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十一月十六日 《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指出：必须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今天中央又发了补充规定。但是阎红彦、赵健民仍拒不执行，坚持不给革命群众平反。

十一月二十日 中央发来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规定。黑省委清理材料小组由一个部长乘专车去军区取回材料。阎、孙密令王甸，借口“现在条件不成熟”，怕“搞乱”，任何人不得启动这些材料。

十一月廿三日 冶金机械厂十多个工人战斗组织在一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杀向黑省委，揪斗了阎红彦、赵健民。就在这一天十多个工人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11. 23 战斗团”。

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昆明八. 二三战斗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组织又联合组成“炮打司令部作战部”，并召开第一次“炮打司令部”大会。会上革命群众喊出了“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的革命口号。阎孙黑帮派爪牙四处宣扬说：“这是反动口号”。

十一月廿九日 早在十月初，云南砖瓦厂“八. 八”“曙光”“红旗”等工人战斗组织联合成立了“重炮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怀恨在心，于 11 月 29 日这天勾结保守组织，趁重炮团召开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大会时，采用武力公开镇压“重炮团”。“重炮团”重伤十二人，轻伤十人。

十一月下旬 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阎孙黑帮及其爪牙大肆反对中央文革。张曙光等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我想这些人写文章倒可以，作领导工作不行，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能力。”阎的老婆、农水大口组长王腾波攻击陈伯达同志说：“这些大理论家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你唯一的理论家讲话，也要叫下面能够理解嘛！”“陈说几种怕字派，他只在上面讲，把下面工作的干部都要整死了！他们在上面的都是正确的。”她叫嚷：“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秀才们，昆明已经乱成这个样子，最好来这里看一看”。她还直接攻击林彪同志说：“林彪同志讲的乱子观，没有向下面交底，到底要乱到什么程度？”原省文革小组成员、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竟狗胆包天攻击中央文革是“陈伯达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在领导”，“这次尽搞的是北方局、西北局，就是搞宗派斗争，这样搞下去，我们党就要出现大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

十一月下旬 昆明地区开始大规模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wengewang.org

王甸、林建中秉承阎孙“平衡力量”的反革命方针，一手泡制的保皇组织“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总部”“无产阶级革命者联合司令部”出笼，专门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这些组织直接向林汇报，林随时布置工作。

十一月下旬 省人委机关革命造反组织“打倒刘明辉大会筹备处”，在东风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刘明辉三反罪行。

十一月底 阎孙黑帮收到陈毅同志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对部队院校的讲话，认为捞到稻草，省委文革小组密令各大口迅速组织阅读，准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第二次大反扑。于是，黑省委组织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一)准备大逮捕、大清洗。在保山，昭通大盖“集中营”及监狱。

(二)挑动群众组织互相打、砸、抄家等，并广泛传播蒯大富失踪等谣言，大肆抄贴盗用姚文元同志名义写的“论造反者”的反动文章，威胁革命造反派。

(三)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煽动保守组织代表上京“告状”，黑省委一次就批准了二十多批。

十一月三十日 今天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工人同志，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 11.30 战斗兵团”。

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冲破白色恐怖，召开了批判党群大口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次大会。孙雨亭见到“后院起火”，惊恐万状，千方百计进行压制破坏。

十二月二日 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是黑省委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经的大黑会，是统一口径研究对策，交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经验，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会。会议结束的晚上，阎红彦讲话，一再强调：“路线错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界限要划清。”并对地市委书记说：“只有靠你们自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十二月六日 省建公司全公司工人造反派今天联合起来成立了“12.6 战斗兵团”。

阎孙黑帮为了稳住阵脚，维持其反动统治，大搞加官晋级，收罗党羽，明目张胆抗拒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任免、不调动干部的决定，一次就在八十多个县提拔了县委常委以上干部三百九十四人。(其中有一些是党内走资派)

十二月上旬 省委各部委一些负责人刚开始贴大字报揭发省委问题，阎孙黑帮就以加强接待工作为名，把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负责人几乎全部抽调

搞接待工作，企图把他们推向和革命造反派对立的地位，阻止他们揭发黑省委内幕。

十二月十二日 《红旗》杂志发表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社论的发表。社论对旧省委以沉重的打击。

十二月中旬 阎红彦策划建立“地下省委”，代号叫做“红湖”，妄图同党中央、红卫兵小将对抗到底，并选定了西山党校高干读书班。还选择了一个“地下联络站”，以便和黑省委取得联系。阎孙还同意拨出三万元钱筹建，安装了保密电话，准备了汽车及锅、碗筷、大米等生活物品。

十二月中旬 阎孙黑帮镇压群众运动的阴谋不成！又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进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阎红彦公开煽动说：“七亿人口的大国吃不垮”，“打开仓库，要什么拿什么”。孙雨亭也宣扬：“谁要谁给。谁不给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还私下对文革接待站的人说：“多给钱，给东西，减轻对省委的压力，不然过不了关。把造反派放出去，快叫他们定。”赵健民在一次工交厅局长会议上布置说：“合同工、临时工的工资，低了应该解决”，还提出“工资福利要解决”，并在黑林铺作了试点。

由于黑省委发出了四个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黑文件，导致昆明大批工厂停工，市场紧张，造成极大混乱。阎孙黑帮的死党张曙光还唯恐天下不乱，咬牙切齿地说：“什么叫乱？就是要电源断了，汽车停了，自来水满街流就好了。”在制造大混乱后，他又反过来煽动接待站的一部分干部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他说：“你们可以给中央文革写信，这样写：最最敬爱的江青同志，目前昆明地区形势大好：粮票告急，油漆告急，扩大器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 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封闭旧“云南日报”。黑省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煽动保守派在社会上开展了“是否该封闭云南日报”的大辩论。

十二月十九日 旧“云南日报”地方版暂停，报社造反派改出“新闻电讯”。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井冈山”、“红军战斗团”等十一个战斗团队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十二月下旬 黑省委又开了两次会议，密谋策划上山打游击。他们选择了曲靖、红河、玉溪、楚雄等几个地方作为打游击的据点。会上还对高干子女及家

属的转移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黑文件及一些贵重财物也先后进行了转移。we
ngewang.org

十二月×日 赵健民在书记处会议上，无耻地边哭边说：“检阅台召开的会，提出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打倒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我想不通。”

十二月底 云南有色局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传达黑省委指示，反复说：“现在情况在变化，要作最坏的准备，把大多数党团员组织好，必要时把队伍带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粉碎了旧云南省委“秋后算帐”的阴谋。

一月二日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月三日 张曙光在召开的接待工作会议上煽动说：“花钱可以买接班人”“花钱可以保权”“要钱财政厅拿，要粮粮食厅拿，要布商业厅拿，要物物资局拿……七亿人口吃不垮。”

下午，阎红彦召开黑省委书记处碰头会，说：“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晚上，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潜来昆明，由阎红彦亲自秘密安排，住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李和阎单独密谈，曾说到刘澜涛历史上曾叛变自首，阎红彦如何检讨，军区内部斗争激烈，×××下不了台，处境困难等等。深夜，阎亲自送李井泉飞往上海。

一月四日 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旧省委书记处经过讨论，决定拒绝出席，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当夜，少数南下串连学生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口号，并提出“要大反黄兆琪、刘殷农的右倾”。

一月五日 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黑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月六日 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黑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态度非常恶劣地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威胁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糊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晚上，王甸在西山地下黑参谋部对工作人员说：“打游击这件事早一天下决心就好了，就可以多带一些人出来了”，又说：“如果联系中断，我们组织一个战斗队去串连，每人戴袖套，作旗子，这样好活动一些，到地县委去。”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黑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威胁，“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月七日 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妄图欺骗中央，给中央施加压力。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竭力宣扬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污蔑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妄图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竭力夸大赵健民半身麻木，骨折。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阎红彦并对下发出黑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wengewang.org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保皇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故意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阎孙黑帮妄图借此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一月八日 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陈伯达同志在电话中反复指示要阎“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中央”，“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等等，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畏罪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清晨，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即派人前往小麦雨捉拿活阎王，清晨六时到达小麦雨时，见到的只是一个死阎王。

当日，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社会上造谣说：“阎红彦被红卫兵打死了”，“阎政委光荣牺牲”。。

深夜，张曙光、×××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

一月九日 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给中央汇报。

下午，黑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派他老婆到书记处说：“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并秘密召集一些人到四十三医院泡制一封“控告信”，“控告”桂尤喜、黄兆琪对他的“迫害”。旧昆明市委、公安厅等单位还

分别由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追悼阎红彦的大会。公安厅的“追悼会”上，一些人抱头大哭，为阎红彦招魂。

原“红卫兵总部”的黑三字兵公开宣称：“悼念阎红彦”。

中央对云南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切，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情况，支持革命造反派。并同意革命造反派、军区、旧省委三方面派代表赴京汇报。

一月十日 革命造反派代表十三人及旧省委书记郭超、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乘专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一月十二日 周总理对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六点指示，叫军区、旧省委彻底转变立场，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旧省委于晚十时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向毛主席致敬电”、“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等重要文件。

全国出现了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开展夺权斗争的高潮。

凌晨两点三十八分，周总理在中南海东会议室接见了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

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来了支持电：“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厉，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

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革命群众根据中央指示，经过反复讨论，迅速撤出昆明军区。we ngewang.org

一月十四日 周总理接见各大区书记时，对阎红彦叛党自杀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阎供给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他上不请教毛主席，不读毛主席的书……下不请教群众，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

周总理谈到赵健民的问题时说：“群众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告诉。群众恼了才把他押在车上游街三、四个钟头，住在医院，当防空洞了。……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周总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对群众的态度时，又指名批评了赵健民。

一月十五日 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周兴在省委机关召集省委机关干部及省级机关各厅局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六点指示，并介绍了阎红彦叛党自杀经过。

一月十六日 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会同红卫兵小将组成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孙雨亭及其死党十分惊慌，密令其爪牙四处活动，进行破坏。

一月十七日 打倒孙雨亭首次大会于晚八时在检阅台召开，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各阶层群众约十万人参加了大会。孙雨亭等被揪出来示众。

一月二十二日 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小撮走资派蒙蔽一些群众组织，假借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说，“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来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集）》，出版单位：
昆明八·二·三《风展红旗》，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2008 年 4 月 21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5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七章（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三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廖海光：对 1·26 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 1·26 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1·26 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当时还消毒……

伯达：消什么毒哪？

廖海光：这样问题就大了，就发生了批判斗争。

总理：有勒令解散的吗？那几个？

廖海光：我们勒令解散 12 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伯达：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在下两面……

伯达：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

廖海光：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

伯达：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王力：福建从 1·26 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17·8”抓了 300 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 74 人，福建中医学院 400 多人抓了 11 个，扣留了 14 个，3 月 26 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参加 2·7 大会也被解散。当时 2·11 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们 2·11 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仙游：“南下同学说军区扣留了 12 个同学，2.13—2.22 开三次全县大会，到 3 月 5 日已捆起来游街武斗、挂牌子。“你们三司是右派组织”，“三司红旗永远不倒！”在福州是反动口号，还揪到农村去斗，在庙里每天关有一百多人，六点左右，抓了 12 人出去打，他们要我们受“阶级教育”，部队发通令，部队执行任务抓右派时，任何人不得阻碍，要让群众来收拾右派。”

总理：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 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福州七个代表谈到：东海兵战要武战斗队，回家坐车过年，平常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睡懒觉，打扑克，划船等）。

周总理笑问：那是东海兵吧！

答：全是！而这些人现在是左派，因为他们没有喊 1·26 好得很！

总理：“哦”！

谈到有的干部不愿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东海兵那儿时，

总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此时三司同学递上了 1·26 福建日报上刊登福建军区政治部写的八篇文章。

周总理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说：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 1·26 做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总理念了一段报）讲：你们 28 日来的，26 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柯纠耿：1·26 以来两个月心里很痛苦。一方面坚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被打下去了。我们一再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军区，军区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军区处理 1·26 问题粗暴，简单化。

军区屁股没有坐在造反派一边。对事态没有制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 8·29 有什么用？发现的问题跟军区提都没有得到支持，晋江专区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引起注意。我们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群众基础很单薄，造反派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例如师院联合应以“追穷寇”为核心力量，却以《红联师》为依靠来组织联合。当时我把责任全归罪三司，认为他们害的。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是当前一个大问题，现在对老臣态度是不对头的，老臣被搞进城犯了缺点错误，但应看到他们支持了革命的红卫兵暴露了这次运动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可是军区做的是简单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做法不妥当。军区对老臣问题有原则性的错误的。

三司：念语录（接班人五条最后一条）

科大：柯的发言文过饰非，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军区身上，新北大干到底也是怎样，屁股坐在东海兵一边。柯苏，张莉莉，都是这样热衷于组织革委会，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柯处理不对的。

总理：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 1·26 事件及 2·7 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一，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二，福建处在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三，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大联合，实

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陈伯达与福建省双方谈判代表的谈话

八月十日晚十一点到八月十一日上午九点，陈伯达同志接见双方谈判代表，我们十二位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南面会议室，陈伯达同志已经在那边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询问各个同志的姓名和组织，陈伯达同志说：叶飞在报上点名了没有？我们说：没有！要经过中央批准。陈伯达同志又说：中央已经批准了吧！叶飞可以在报上批判。叶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作风。

下面是八·二九控诉说：他们围攻我们，他们有四千人围攻我们，我们在楼上只有四百人，刚才通电话时，他们还在进攻，占领了三楼，还放毒气，还准备放火，用抢来的棉被、棉衣放火，冲击时他们用小口径步枪配合，我们大部分被小口径步枪打伤，伤势很重，有的穿过肺部、心脏，他们还挖了三个洞，准备用炸药爆炸，我们重轻伤有二百多人。现在已断水、断粮，但是，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我们代表汇报说：八·二九那边说他们现在想复课闹革命，但厦大、华大、林学院、二师院又来了不少人。

陈伯达同志说：呀！糟糕！人马上就要放，首先要检查对方抓的人放了没有。八·二九先抓人，两边抓人全部都放。

八·二九汇报说：我们战友二天二夜没有吃了，天天被挂牌游街和强奸。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谈那一些了，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不能做判官，这些话我都听不进去。好，好！我知道这些意见。

我们说：我们已经放了人，他们不放。

陈伯达同志说：抓人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说：放人后，大家撤离华侨大厦，保护现场，进行现场调查。

陈伯达同志说：我完全同意。

八·二九说：伯达同志你不知道，他们是包围我们的，他们要先撤退，我们才能放人。

这时陈伯达同志站起来，用铅笔敲桌子说：你们不要多说了，不要讲条件，放人和撤退同时进行，我赞成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要占漂亮房子。八·二九搞一个地方交际处也太漂亮了，我住过。八·二九立刻撤出华侨大厦，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吗？革造会要保证八·二九撤出安全。

我们说：一定保证。

庄志鹏：福州正在搞白色恐怖，尤其大搞了好多制高点，上面堆满了石头、硫酸。

伯达同志说：不要上纲上得那么高，不要戴高帽子。

八·二九讲：伯达同志，你的军事理论水平很高，有作战经验，造成武斗是两军对垒。

伯达同志讲：武斗的经验我没有你们多。（这时大家都笑了）

八·二九讲：他们要先撤，我们才能放人。

伯达同志讲：你又附带条件了。你们抓了人可能被关在华侨大厦，如果从华侨大厦放出来，他们这边欢迎，可能又要大举进攻，这是你们的顾虑，说穿了这是你们的困难。革造会你们有真理、有毛泽东思想，退避三舍也可以打胜仗。你们看过了吗？左传退避三舍也不等于打败仗。

我们说：他们人一放，我们就全部退。

伯达说：好！全部退好！

八·二九说：我们住华侨大厦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伯达同志说：你们住那样好的房子，是腐蚀你们的，没有事情干就攻击对方，我这样说是爱护你们的，不管是长期住或短期住我都不赞成。

八·二九讲：革造会在福州占好多高楼大厦，如台江百货大楼，东街口百货商店，外贸局。

我们说：那些都是各单位造反派的。

伯达同志说：你们一下子就扣什么欺骗中央的帽子，我以前接见革造会太多了，给革造会讲话讲多了，你们就一下子涌来一千多人，要我平等对待，算了，

见见老乡也可以，以前接见一次接到许多喜报，现在我看喜报不能，我们不接接了，只接一个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

八·二九讲：七月十三日，陈伯达接见，革造会有六种传单，很多，我们都带来了（拿出来看）。

伯达同志说：革造会传单很多，那没有问题，我是主张放姜观的，我是向你们学习的。那一次我才知道人武部的作用。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搞什么“过得硬”，打、抢、抄、砸。第二回接见是一千多人，我和韩先楚一起去，我在里面替韩先楚讲话，讲韩先楚是同意放姜观的，我是替他讲的，大家就轰，叫他自己讲，七讲、八讲，他才同意放。

八·二九讲：姜观放了，他们全省庆祝三天，就差没有骑大红马，还把我们拿去挂牌。

伯达同志讲：戴大红花也很好。不要这样讲，关了那么久放出来很高兴，开庆祝会你们青年喜欢这样搞，好，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和韩先楚同志说过，他们还会开庆祝会，你们要有准备。

我们讲：放姜观我们很高兴。

省机总司：我们也很高兴，姜观是造反派（大家听了大笑）。

我们讲：你们现在也会讲姜观是造反派啊！

伯达同志讲：允许人家改正错误（陈伯达同志带头鼓掌，我们也热烈鼓掌）。

八·二九讲：他们抓我们挂牌游街强奸。

伯达同志：这样话我不爱听，听不进去。

八·二九：中央十条下来后，军管会贯彻不力，八·二九也有错误，希望造反派批评我们，但事态发展不是这样，把我们看成保守组织，八·二九和军区是有斗争的，光大字报就放了五百多张，口头批评就更多了。

伯达同志讲：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是错误的，是反动的，“过得硬”（泉州）是反动组织，要他们解散，没有人武部，“过得硬”是搞不起来的，军分区、人武部搞“过得硬”是过不硬的，是反动的，给工分、给饭吃把农民糊里糊涂调进来还不知道干什么。毛主席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对全世界革命是有贡献的，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再搞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农民不要受骗上当，现在有种动向值得注意，要注意，我们农村，什么农村包围城市，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再

提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在解放战争史上，毛主席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给我们指出了道路方向，现在再提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的，什么过得硬是乱弹琴，不要为了几块铜板，去做坏事，希望和你们见面后，这个道理到处讲，过得硬是过不硬的。

伯达同志讲：阿 Q 最怕别人讲他有疮疤，果然你们八·二九疮疤很多，可能他们也有，我们知道华侨大厦都是水泥的，有利防守，搞武斗有好处。

这时伯达同志很气，伯达同志走到门口，门外有八·二九的一、二百人要求接见，伯达同志就去看看他们，伯达同志讲：你们来几天了？

八·二九讲：来二十几天了。

伯达同志讲：坐车不要钱呀！我们给你们搞协定。

这个时候八·二九里有人哭哭啼啼大诉苦，受围攻、挨了打。

陈伯达同志说：别算老账了，你们也不会服服贴贴的。我见你们一下就行了，不要住那么久，还要工作，回去吧！

八·二九：回去有人要抓我们。

伯达同志讲：你们有什么出名，都回去吧！

（陈伯达同志和他们谈有二十分钟就回来）

回来后伯达同志讲：我给八·二九讲今天见见老乡，因为老乡来了，我去见见老乡，我也很勉强。不要回去讲陈伯达同志接见八·二九，这样我很不舒服，不要因我接见而捞什么稻草。我有个脾气，不要强加于我。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代表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新福大》（福建省革造会、革委会·新福大公社主办）星期一 1967年8月14日 第三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凌晨一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一个协议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达成第一个协议：双方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放全部抓的人员。必须在八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以前释放完毕。望我们立即执行。其他问题在继续协商中。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凌晨一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九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二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二个协议：放人后，“革造会”在三小时以内撤出华侨大厦及其周围的全部人员，回到原地。原驻华侨大厦的“八·二九”等八个总部在半个月以内全部撤离华侨大厦，另迁较为朴素的新址。“八·二九”等组织原驻的其他楼厦应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革造会”原驻的楼厦，也应该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九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三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三个协议：

坚决执行中央七月十三日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双方坚决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经进城的应立即动员返回原村。必须绝对禁止任何人、任何机关，利用任何借口，或者利用所谓“老区”的名义动员农民进城。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应担负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不得借口进城，已经进城的，都必须尽快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福州、诏安、厦门、泉州、崇安、晋江、福清、仙游、建阳、建瓯、南平、宁德和全省各县市已经进城的农民，省军管会、军分区、人武部负责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原村。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七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四个协议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四个协议，双方保证在全省各地做到：

1、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抓、打、搜、拘留不同观点的群众，砸、抢、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

2、在协议达成三天后停止使用广播车，撤销在街头上的广播站。

3、不得撕毁、涂改、复盖不同观点的大字报、标语。不准搞一言堂，保证“四大”。

4、互不围攻，各方自动拆除武斗工事（包括街头的制高点）。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国务院给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五年毕业生定级问题的复电

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八月六日来电收悉。现答复如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五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暂缓定级问题的通知是指一九六五年暑期毕业生，不包括一九六五年暑期以前的毕业生。

一九六五年暑期毕业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目前是否定级的问题，国务院正责成有关方面进行研究，将另行通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时间：十三日晚及十四日晚，陈伯达两次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破坏协议，就是犯罪。人民解放军的枪不能夺。凡事要三思，任何一派都不能轻举妄动，千万不能做这两件事：一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二不能夺解放军的枪。

遵守了协议是考验，不动员农民进城是考验，不夺解放军的枪是个考验。解放军好，不能夺枪，因为解放军不开枪，如开枪谁敢夺。这种夺枪是错误的，韩先楚同志承认了错误，写了检讨，让你们两派讨论，欢迎大家提意见。不要提揪福建陈再道，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绝对不许“八二九”对“革造会”报复，军区不能给“八二九”发枪，谁发枪谁要负完全责任。没经过协商，不能发枪给保守派组织。不能发枪给保守派残杀造反派，诏安就是一例。

现在不要说空话，马上打电话回去：1. 不能动员农民进城；2. 不能夺枪。这两条马上执行。三方面都给家里打电话，军区打电话，革造打电话，“八二九”打电话，如不执行，我不见你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晚，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现在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你们回去做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农民已进城的要他们回去。

不管是谁，现在有一个重要事情。就要动员农民回老家去。回乡下去，对他们说，城里是工人、学生做的事情，他们来干嘛，农民应做自己的事情。你们应认识到，农民受蒙蔽了，上当了，你们应当学会给农民谈话，劝他们回去，说你们进城是错误的，上当了。

农民进城大方向是错误的（热烈鼓掌）

我们是经过农村包围城市这条路的，那是 1927 年后，那时农村包围城市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经过了这条路，那时的城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在的城市是无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城市，在这个条件下，再说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的，要给他们讲道理，劝他们回去，你们要做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

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双方应该严格遵守协议，付之实施。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陈伯达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凌晨四时四十分至八时三十分(第一次)

四时半许，当我们厦门革命造反派走入会场时，陈伯达同志已在会场了。伯达同志走过来亲切地同我们代表一一握手。陈伯达同志问控告团负责人是不是促联派的，我负责人回答：“是，是新厦大公社的。”伯达同志让我控告团负责人坐在自己身边，用闽南话同代表们亲切交谈。陈伯达同志说：我是代表福建人民讲话的，我这个人回去讲土话，老百姓说我没有忘本，这点比叶飞好，叶飞同他母亲讲话还要翻译，我这个人讲普通话很“路渣”(闽南话)，懂吗？是“糟糕”的意思，比小学生讲得还差，回去不敢和小学生讲普通话，我爱讲家乡话，就是没人讲，我家乡话是受母亲影响的，是海边人的口音。

现在讲几个问题，有几个问题先讲一下：

禁止继续挑动农民进城武斗，这是很重要的。你们看是不是？现在到处都有人动员农民进城，很有可能是军区、人武部或保守派搞的。

(代表汇报厦门保守派“革联”和公安局老保下乡发动农民进城情况)

没有人发动农民跑进城才怪，发动农民进城一定有人组织，是公安局、人武部、军分区搞的。厦门就是公安局搞的，公安局要悬崖勒马。叫农民进城武斗，不做工，拿工分(代表：封锁海堤的农民还给钱，给三餐干饭，让他们抢劫集美侨校的侨生仓库。)这是对革命犯罪，对党犯罪，是反动的活动。

(代表汇报“革联”到部队“抢”枪，有的驻军还喊“坚决支持真正革命左派”、“向真正革命左派学习”的口号)

他们发枪给保守派是一种罪恶的活动，是什么左派？是保守派，是真正的假“左”派！有人是在玩弄权术，不能玩玩这些权术，这是玩火，玩火必自焚，这

是破坏国防，破坏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发枪给这些保守派是培养一批带枪的流氓，后患无穷。

什么是“抢”！名义是夺枪实际是“送”。从福建情况看，从福州、厦门、泉州看是这样，这对部队很不利，发枪给农民，实际不是真正的农民，老实的农民不会进城武斗。我建议韩先楚自己下命令，不要用我陈伯达的名义，要把保守派的枪枝一律收回。枪杀革命群众是谁干的？

(代表汇报厦门驻军刘春山、李平、田军屠杀革命造反派情况)

韩先楚要下决心收回枪枝，要军区悬崖勒马。发枪给保守派，这是对党、对人民、对解放军、对祖国罪犯，结果是屠杀造反派，是瓦解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我们的长城，有的军区和保守派是要破坏这个长城。有人以为这样可以保住自己了，实际上是保不住的，这样可以保得住，我们就不用革命了，革命就不会胜利了。建议你们搞一个拥军爱民运动，他们不爱民是错误的，旗帜要拿在人民手里，要重视这个事实。(我代表说：好！我们照办！)

发枪给老保还欢送，发给什么真正的左派，其实是真正的假“左派”，不能玩火了，玩火必自焚，毛主席常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干，破坏解放军，破坏国防，告诉韩先楚要军区悬崖勒马，不要用陈伯达的名义，我是福建一个老百姓，现在为福建人办点事。韩先楚打个电报给军区，由他来处理，并报告中央。现在还来得及，下决心把保守派的枪一律收回，残杀青年的事情这是什么行为？怎么能用枪来残杀青年？

(代表汇报 8 月 19 日凌晨三时到现在刘、李、田赤膊上阵，在瓷厂，“革联”和驻军对我“促联”开枪扫射。其中革联瓷厂“新红军”在 8·2 事件中也充当打手，扔出手榴弹，炸伤我八·二九公社负责人邓志国同志等)

谁？说清楚什么人？

(代表介绍了八·二九公社，伯达同志频频点头)

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韩先楚下定决心把枪全部收回，还是可以的。

福建这个协议(有关制止农民进城，反对武装老保)原来我还以为是比较好的，但厦门就这样干起来。这是违反群众的希望，群众希望他们不要武斗，他们违反了中央、毛主席的希望、毛主席的政策。有些人，坏人或犯错误的人、走错路的人，就是怕这个协议达成，赶快发枪，破坏协议。玩火者必自焚，以为发了

枪可以保住自己。(有人插话：帮了倒忙。)把武器发给农民，自己站不住脚。如果他们站得住脚，我们也不用革命，革命也不会胜利。(代表指出××军军长刘春山的部队所驻地区，不论是厦门、东山、诏安，都同时发生造反派受血腥镇压的事件，伯达同志听了非常的气愤。)叫刘春山来，李平也要来，把问题谈清楚，谈通了就好了，走错了路要猛回头，走错了路一直滑下去就是自取灭亡。(代表讲刘春山是×××军，李平、田军已点名了叫他们来)叫他们来，告诉他们要商量问题，顾全福建问题；稳定前线问题。不要发枪，发给农民的枪一律收回，一定要韩先楚讲。叫他们来，要休息就与韩先楚一起休息，住到医院去，但叫韩先楚同志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代表插话后)“八·二九”对军区是好的，他们也不同意，告诉韩先楚，“八·二九”也不同意发枪，也是反对农民进城的。

我对这些青年也没有成见，我认为这两派都谈得较顺。(代表提出：这次八·二九总部同革造会谈判，要有厦门代表参加)你们可以来嘛，你们见过两派代表吗？(代表插话，讲部队开枪及二十日的情况)这是破坏解放军的荣誉，应坚决制止农民进城，制止海员、渔民上岸。鼓浪屿不能破坏呀！集美不能破坏呀！集美、鼓浪屿、厦门都不能破坏呀！现在要马上开放自来水。(这时革委会和八·二九总部代表进来，本团代表插话)

厦门可来三人。保守派也要来人。来了我们可以影响他们。(代表讲：老保“革联”已来了一百多人了)哦！(笑)就是那次来吵架的。(代表讲：“革联”打电报回厦门说陈伯达同志接见“革联”两次，并亲切地交谈。)说我亲切接见，亲切是亲切，就是吵架，那天晚上他们吵得不成样子，影响开会。临走时(指门口)我跟他们讲了几句话，我说是厦门人吗？干什么？回去吧！他们说要揪汪大铭，我说揪汪大铭同志干什么？他们说，他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回去会死的。我在这里开了这么多会，从来没见过像这样一个群众组织，这样吵闹，闹得不成样子。(代表讲：“革联”造谣说伯达同志对林金铭的死表示沉痛)是说有个林金铭死了，那天我没有沉痛啊！(哄堂大笑)。我说要他们(指“革联”)猛回头，不要走错路，走得太远了。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犯罪。我叫他们不要争吵，吵吵闹闹我有点害怕。(当代表提出不让老保“革联”也派代表来京时)让他们来受教育嘛，他们是受蒙蔽的，这些人很可怜，你们要做点工作，帮助教育他们。(贾文

贵控诉了党内军内走资派对他的迫害，并汇报厦门公安局问题，陈伯达同志问他是不是福建人，他说是安徽人，伯达同志说：“我代表福建人谢谢你！”）

现在首先停止武装进攻，收枪、放人。现在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解决福建问题，是海防前线嘛！

（代表要求把韩先楚叫来，当面谈清。伯达同志答应了，并多次叫秘书去打电话，但韩先楚久未前来，伯达同志利用这段时间，同代表们亲切地谈家乡风土。）

在接见过程中，当陈伯达同志听见厦门革命造反派“促联”正遭屠杀时，很气愤，当场指示韩先楚马上发出命令给福州军区，立即制止屠杀厦门革命造反派“促联”。伯达同志多次把命令草稿征求我“促联”代表的意见。

（新厦门公社、协会、独总文攻武卫临时作战指挥部《新厦大公社战报》《云水怒》《惊雷》《革命造反报》《新挺进》《百万雄师》联合主编第六期 本期四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陈伯达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晚十一时三刻至次日一时四十分（第二次）

十一时二十三分伯达同志亲自到会场门口当面叮嘱全体代表：“等下韩先楚要来，你们不要乱喊。”

（福州革委会代表，八·二九总部代表同时被接见）

十一时三十五分，陈伯达同志身穿军装步入会场，全场热烈鼓掌。

（韩先楚到场）

伯达同志：今天早上找不到韩先楚同志，对不起大家，他想同大家谈谈话，有意见还可以提的。

韩先楚：我身体不好，正在治疗，对家里的事情不了解，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没有彻底走群众路线，没有和地方领导干部很好商量，所以很多工作做不好，平反工作，制止农民进城，制止夺枪，要下最大决心，用最快的速度去办。我们前一个阶段在支左工作中犯严重缺点错误，准备向大家作检查，先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了，中央文革福建组提了意见，修改稿子，过一两天可送给在京的

福建同志征求群众意见。我们敢于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修正错误，错了就改。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深刻的革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慢，改正也较慢，给福建运动带来损失，对不起中央和广大群众，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愿意改进错误，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武斗，制止农民进城，制止保守派杀害革命派，把散发的枪枝收回，挑动农民进城的，送枪给保守派的，一定要严加惩处，我们一定能把福建文化大革命搞好。

伯达同志：韩先楚同志的表示是好的，我们欢迎。福建军区的检讨可以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满意了就可发表，韩先楚听了昨天情况，他表示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违背中央，荒谬的调动农民进城的反动行为。

(此时厦门促联派拍来请求中央支援急救医药的电报)

促联代表：伯达同志，厦门来电报，我们“促联”一百多位被枪杀的伤员感染破伤风，缺乏急救药品，请求中央文革用飞机送到厦门抢救一百多名促联战士。

(伯达同志接过电报十分认真严肃地看，并立即告诉韩先楚，然后交给伯达同志的秘书，要他立即处理，秘书即刻离开会场。

接着有人告诉伯达同志，外面有福建各地赴京代表要求接见)

伯达同志：不是那回厦门革联的吧？那些要揪汪大铭的吧？

(有人答：不是)可以派几名代表，找个地方，韩先楚也见见他们。厦门有没有消息？有机帆船追赶舰艇要抢武器这是不对的，要拥护解放军，我昨天说了，要把“拥军爱民”抓起来，懂了吗？(厦门促联代表：一定照办)

“促联”代表：我们没有船，“革联”才有机帆船，是因为航管局是军管单位，没有军内走资派配合，他们是不能上舰艇抢枪的。

韩先楚：夺枪，实际上是明抢实送。

伯达同志：军队不能发枪给保守派，发枪给农民，发给的一定要收回，保守派拿了枪，是明抢暗送。军区开门让他们(指保守派)拿，还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们搞拥军爱民是对保守派施加压力，“革联”既不拥军也不爱民。“革联派”就是那次要揪汪大铭的，汪大铭一到北京，他们就追来了，这不是有人在幕后指使吗？“革联”根本不讲道理，要批评，他们丢福建人的脸，谁要揪汪大铭！

他们的拥军大成问题，不拥军，又不爱民，解放军支左，保守派就不拥军了。军队要支持你们，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保守派很快就要垮台了，福建哪几个地方拥军爱民较好？（代表们说：惠安部队、宁德海军等较好）。

韩先楚：我们要先爱民，民才会拥军。军管不是从名词上去理解，我回去要开各级干部会议。

“促联”代表：革联得到厦门驻军支持，部队的“八·五团”是同“9445”（厦大革联的）配合，所谓“9445”即“绞死苏吴”的谐音。

伯达同志：绞死什么？

“促联”代表：绞死苏、吴！我们造反派负责人苏辉明、吴国耀同学。

伯达同志：“9445”这完全是“联动”的口语，是联动式的组织。“革联”是谁叫他们来的？

“促联”代表：他们有钱，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人。

伯达同志：革联都住在那里？要叫他们回去。告诉他们受蒙蔽了，你们要去做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北京没有带枪吧？

“促联”代表：他们和北京的反动组织5·16兵团有关系。伯达同志说：他们和“5·16”搞在一起那就更糟糕了。他们要揪汪大铭同志，我叫他们回去，他们说汪大铭会杀死他们。我说那么厉害？我那天用闽南话和他们谈，是亲切了吧，他们根本不听。

汪大铭：革联在西苑贴大字报说，“促联”从东山动员了农民进城，其实他们是东山造反派突围出来的一千多人，有牺牲的，有受伤的。

（伯达同志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韩先楚介绍）

“保联”代表：我们要韩先楚就厦门两派表态。

韩先楚：起初我原以为都是反对叶飞的老造反派，两派都是造反派，我偏听偏信，不了解下面情况。现在听陈伯达同志意见，“革联”动员农民进城，搞打、砸、抢，不能算造反派。

“保联”代表：韩先楚，“革联”什么时候成立的？成员情况如何？政治纲领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二月成立的，是三月黑风的黑打手！

韩先楚：我不了解情况。

“促联”代表：你们连谁是造反派都不知道？怎么能支左？

伯达同志：最近情况发展已经很清楚，现在界限分明了。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阵营很清楚，动员农民进城，抢枪，这是反党、反党中央的行为，这是很清楚的。让韩先楚以后谈吧。“促联”是革命派！“促联”是革命派！

伯达同志：“革联”有多少人？

“促联”代表：在市区大概有三、四万！

伯达同志：不少嘛，你们要争取帮助他们，帮助那些群众过来。

你们八二九、革造会彼此就不会做工作。他们有四万多人，要争取过来。厦门是国防前线，死了人很严重，是有人在破坏，革联是在搞破坏的，杀害了很多人，他们，他们的活动对我们革命派，对人民解放军都有害。你们对厦门“革联”要做工作，争取他们过来，革命派不要去抓人，对保守组织要对他们做工作，让“革联”内部分化，让他们把坏人揭发出来，自己抓坏人，革命派如果抓人，他们就会煽动，就不容易瓦解。厦门“促联”派要会做工作，瓦解“革联”派。他们多数是劳动人民，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才能孤立坏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为什么会破坏国防呢？

我说促联是革命派，你们要有敌情观念，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美蒋，你们忘掉蒋介石了没有？

众答：没有。

伯达同志：革命派要同人民解放军很好合作，解放军中个别坏人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

伯达同志：好了，去看看他们吧！（指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福建各地代表）你们也一起过去看看他们。（凌晨一时半伯达同志到南大门另一会议厅去接见福建省各地赴京代表几百人，其中也有几十名革联参加，历时半个多小时）。

伯达同志：都是闽南人（指坐在前面的代表）我也是闽南人。你们是不是没有来过北京，想来玩的？

众答：不是，是来反映情况的。

伯达同志：“革联”来了没有？厦门人那天来吵，吵得一塌糊涂，他们要来北京揪汪大铭。汪大铭同志来了没有？我们不许在北京揪人。

泉州“过得硬”是反动组织，我建议“过得硬”必须解散，就是人武部、军分区搞起来的嘛。陈文德(华侨大学革命造反派负责人)一定要放。军分区、人武部调动农民进城，组织象泉州“过得硬”是反动组织必须解散，动员农民进城是反动行动，是不允许的。

今后不准打人，抓人，在福建也是这样，我们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办事。“革联”有人来没有？(没有人回答)。“革联”要揪汪大铭同志，这个行动是错误的，他刚刚到就来揪，这是有人幕后策划的，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本文根据记录整理，未经伯达同志审阅)

厦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控告团材料组整理初稿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

(新厦门公社、协会、独总文攻武卫临时作战指挥部《新厦大公社战报》《云水怒》《惊雷》《革命造反报》《新挺进》《百万雄师》联合主编第六期 本期四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陈伯达第六次接见福建双方代表时的指示

八月二十二日凌晨，陈伯达同志第六次接见了福建双方代表，作指示如下：

福建的枪大量在保守那里，是送的。造反派也有，但很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造反派，夺枪主要是保守组织送枪给保守组织，送枪给农民。造反派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保守派就垮了。

寿安支左就搞得很好，对保守组织，你们要会懂得做工作、分化瓦解，对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抓，让其组织自己抓。你如果一抓；坏人就在煽动，一煽动他们就团结了，团结起来对付你们。

要争取多数群众，最大限度孤立坏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为什么要破坏国防，夺舰艇的武器，没有坏人操纵不会这样干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前面有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你们要有敌情观念。内部也有敌情问题，但不要互相猜疑，到处疑神疑鬼就不好了。杀人、放火的就很可疑，开机船追舰艇是很可疑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和福建双方代表告别讲话

〔地点：西苑旅社。摘要〕

你们要走了，我今天来看看你们向你们告别，你们要按照协议商量合作。关于拥军爱民，中央有个号召，你们按照这个号召去宣传办事，建议你们好好学习。

福建是前线，拥军爱民要坚决执行，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按照国家利益办事，不能按照派别办事。

（三名代表反映军分区开枪枪杀造反派）我很难过，军队不能开枪，不应该开枪，要按照拥军爱民的号召办事，要爱护造反派，要爱护红卫兵，都要做自我批评，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应该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路线，不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们希望不希望祖国强大，喜欢不喜欢社会主义？（众答：喜欢）希望你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陈伯达杨成武接见福建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廿三时三十分

地点：人大会堂

代表：八·二九总司，八·二九晋司，厦门促联派，革联派，省革造会等

伯达同志说：天气冷了，老朋友好久不见。你们福建还是很乱，你们双方都要负责任，特别是革造会要负主要责任。革造会组织大，很杂，人员不纯，很难保证没有坏人操纵你们。

杨成武同志说：冲军区是错误的。对敌斗争问题，要向你们讲清楚。因此，总理要我在一日六时挂电话给福州军区。要找皮定钧，找不到，找到廖海光。因为昨天有二百个人冲到军区去抢枪。（革造会说没有这回事，他们是要求皮定钧接见。但旁边有个中央联络员证明有这回事。）还把韩先楚同志家的东西也抢走了，还拿走二个秘密的军事文件。中央打电话，主要是要追回两个文件，不准拍照，不准抄写。你们要求皮定钧接见，总理有三点指示：

（一）可以接见。现在皮定钧是最后一个指挥员，因为韩先楚病了，在北京。如果你们要揪，就要犯严重错误。

(二)你们现在喊出“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我们不能接受。韩先楚同志有错误，要帮助，不能打倒。你们要揪军队一小撮，这是错误的。

(三)告诉皮定钧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要中央调查组跟革造会说清楚：他们可能上美蒋的当，也可能上地富反坏右的当。现在所有抢的枪要封存。

伯达同志说：革造会要注意，不要走到反面。我要向革造会再次发出警告。我们的话，你们有时要听，有时不听。如果不听是要自食其果。要互相约束，不受约束，不守信用，开始是造反派，以后就会很危险。杨成武同志的讲话是向你们发出严重警告。不要去向部队夺枪，不要抢军队的设备，不要拿部队的文件，不要揪一小撮。你们之间不要互相揪，军队更不能揪。世界上那有那么好的军队，他们有枪不能开。

杨成武同志插话：这一点是一个考验，看是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开枪已经不简单了，人民解放军的枪给夺了，有个团长看了大哭。我们告诉他，好人夺了枪，还没有多大问题。坏人夺枪，问题就大了。不过也不怕，以后再说。

伯达同志说：你们要好好地听，要提高警惕性。

杨成武同志插话：阶级警惕性是很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司令员，有个地方发生武斗，这个司令员带人到这个地方调解一下。司令员被杀害了，造反派混进坏人。我们现在讲的，希望你们提高警惕。当然，造反派中，大多数是好同志。

伯达同志接着说：革造会砍掉一半，还有二十万人，就那么干净吗？难道敌人不会利用你们吗？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杨成武同志说：北京昨天开了一个工代会的扩大会。工厂都是工人，都是无产阶级，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矛盾。为什么工厂变成两派，有的工厂分成三派，打得很厉害，把财产破坏了。这都是人为的。一点是走资派挑动的，一点是地富反坏右挑动的。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工厂要搞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你们都是小头头(伯达同志插话：你们不要以小头头的领袖自居，什么司令官啦，什么秘书啦，组织中混进了坏人，这是很危险的。)

八·二九代表讲：我们完全赞成伯达同志、杨成武同志的意见。我们抱着诚心诚意对革造会提出意见。这是对革造会负责的。革造会里面混进了坏人，省委书记叶飞的秘书杨国怀是死保叶飞的。他纠集了省委走资派的秘书，组织了《追

穷寇》战斗组。八月九日，参加围攻华侨大厦。这个性质很严重。你们要注意，省委里面有一个张传栋是省委党校校长，叶飞的死党，公开叫嚷：要和革造会战斗在一起。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你们革造会可能不明真相，被那一些走资派利用了。我们也很痛心的。我们在伯达同志面前给革造会提点意见，我们完全是抱着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心情。

伯达同志说：这个意见提得很好、很对。不管你们革造会有没有这回事，这些话对你们都是适用的。要好好地接受，也要好好地听取人家的意见。你们革造会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沿，你们现在头脑发胀，你们组织庞大，一控制不住，组织庞大了，什么人都有，要注意地、富、反、坏、右，还有蒋介石利用你们，他们到处插手，纠集……(听不清)有的黑手已经钻进你们里面了，最后有了靠山，你们就乱来。这样会走向反面，这对你们都没有好处。

杨成武同志说：现在全国都有冲军区，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考虑。这里头有文章，怕有坏人在里头搞鬼。今天我们两个都是福建人，希望你们好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其他问题犯一点错误没关系，解放军也有犯错误。韩先楚同志你们要打倒，中央是不同意的。有错误是难免的，要帮助他。

伯达同志说：你们一定要拥护解放军，要拥军爱民。

杨成武同志说：你们不要认为韩先楚同志不检讨，革命就革不下去了。要韩先楚同志检查早慢一点都可以，差不多就行了。主席讲，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改了就好。对你们小将，我也没有多大批评。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就要走向反面。

伯达同志说：要刹车。

杨成武同志说：你们要按报纸社论、中央文革的指示去做。过去的事情，不要再争吵了，就拉倒了。(厦门公社派和革联派在会上签定了八条协议。协议签定以后，杨成武同志对厦门两派说：祝愿你们两派都要执行。以毛泽东思想来执行协议，这是政治上对我们的考验。)

伯达同志说：看你们有没有诚意。

杨成武同志说：林副主席在语录上写“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要认真地领会，你们要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去办。你们知道古田会议吗？那是在 1929 年，龙岩上杭开了古田会议，在一个庙里开会。

那时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按照你们大学生水平，看一下就很容易，但做起来就不简单，要经过多少斗争。你们要反无政府主义，古田会议主要是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这的确不简单。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们很多事情要注意。你们两派斗争为什么要打死人呢？为什么要把人家打成残废？这是不行的。红军还有优待俘虏。我们都是阶级兄弟，绝不是美帝国主义者……（听不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上刀山下火海都敢闯。对主席的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才能大联合、大批判。我们今天很荣幸参加了你们两派签定的协议。我们要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希望你们都能做到。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不是初期，我们要高举大批判的革命旗帜，要大联合，搞三结合。要批判刘、邓、陶一小撮走资派，结合本省、本地区、本单位，解放军斗彭、罗。你们要有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自我批评，要批评人家，人家是不服的。拥军爱民的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不要光讲不做。

（新厦大公社 陈志杰 六七·九·四凌晨由泉州转发的北京来电）

（来源：《厦门前线》新厦门公社、协会、独总文攻武卫临时作战指挥部《新厦大公社战报》《云水怒》《惊雷》《革命造反报》《新挺进》《百万雄师》联合主编第七期 本期四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

补充另一版本：

陈伯达杨成武第八次接见福建代表谈话要点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组织：八·二九、革造会、厦门促联、革联等组织

陈伯达同志讲话要点：

（1）现在福建很乱，两派（八·二九、革造会）都有责任，革造会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八·二九也有一点责任；

（2）我和革造会打过交道多次，革造会说有四十万人，我说砍一半；八·二九说有四万人，我也砍一半，两万人就了不起。你们说我受蒙蔽，事实上真理不会因我受蒙蔽而失去真理；

（3）我给你们谈话、发电报，一定要通过我看后才承认，没有经过我看的，我都不承认；

(4) 福州八·二九要对厦门作些调查了解；

(5) 革造会不要整天忙于抢武器，到处抢东西、接管什么地方；

(6) 厦门要立即停止武斗，停止向军队夺枪，已夺的枪要封存。不停止武斗，只有美、蒋高兴，双方的事等以后调查，调查团包括八·二九、革造会等参加。所有被动员的农民立即回去；

(7) 不能喊“打倒韩先楚”的口号；

(8) 对革造会还要发警告，你们有时听，有时不听，这几天又不听，要自食其果的。不受约束，不受控制，不守信用，这样是很危险的。给你们发出严重警告：不许夺枪，不许破坏军事设备，不许拿部队的文件，不准揪，军队更不能揪。哪有这样好的军队，手中有枪不叫开？

(9) 革造会已经堕落到危险的边缘。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要刹车呀！刹车呀！革造会你们现在是走到危险的边缘，你们脑子膨胀了，发热了。全省跨行业的组织，什么人都有，要注意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利用你们，到处插手，有些黑手混到你们里面去，放手地干。别以为后边有靠山就乱来，就走向反面。现在你们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10) 外地去福建串连的，你们都要欢送他们回去，开个欢送会。现在福建的群众会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这些“野心家”，不要东跑西走，去江西、湖北、武汉，你们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清楚就跑到全国去了，你们在短期内，都要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杨成武同志讲话要点：

(1) 福州军区是不能冲的，冲福州军区是错误的，对敌斗争讲清楚，冲性质就要起变化；

(2) 中央打电话要追回革造会在九月一日抢走的两个军事秘密文件；

(3) 许多北京的学生要求见×××，中央、总理指示可以接见，接见时不要揪×××、×××现在是福建前线最高指挥。因为韩先楚有病，中央同意他在北京养病，如果要揪×××要犯严重错误，保证不揪他，可以接见。揪他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4) 韩先楚同志是不能打倒的，韩先楚同志与陈再道有本质区别，不能无限上纲，“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我是不能接受的。韩先楚同志有错误缺点要一看二帮，韩先楚你们要打倒，中央是不同意的；

(5) 九月一日下午我叫调查组去跟革造会说清楚，可能会上美、蒋的当，也可能会上地、富、反、坏、右的当，已夺去的枪要封存上交；

(6) (关于解放军枪支被夺的问题) 这点是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生气，不开枪。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的解放军营长、团长、战士的枪被抢，都哭了。好人坏人夺枪以后都要追究；

(7) (关于韩先楚的检查) 检查要满意是不可能的，思想转变不是一日之功，不要认为韩先楚同志不检查，你们就革命不下去了，早晚一点都可以，差不多就行了。主席讲过：犯错误是允许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对你们小将我们也没有批评，如果再搞下去，就要走向反面；

(8) 不能有这一派要吃掉那一派，革造会就是要把八·二九吃掉，八·二九是吃不掉的；

(9) 现在全国都冲解放军，值得深思，这里大有文章，怕有坏人在里面搞鬼。

(来源：江苏《全无敌》全国通讯组主办《全无敌》1967年9月21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总理陈伯达对福建问题的指示

1967.09.04； 中发 [67] 287 号

福州市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并北京红代会在福州的同学、以及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并抄送福州军区、省军管会、中央调查组、八·二九总司令部：（以上均请福州军区转）

福州军区是福建前线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担负着很重要的战备任务。你们随意进驻其指挥机关，这种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希望：

一、你们进驻福州军区各领导机关的所有人员一律即行自动退出其营区。你们进驻军管会的人员，也应当一律自动退出其驻在范围。

二、你们在福州军区各领导机关和个人住宅所拿到的一切文件、档案、图书、资料等，应立即全部清点交还原单位，不准拿走，不准打开，不准照相，不准破坏。

三、福州军区领导机关的所有坑道设施，任何组织，任何人均不得冲击和破坏。已接近到坑道的人员一律退出其警戒范围之内。如有人破坏坑道，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制裁。

四、你们把参加中央赴福建调查组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唐副主任揪去游街，是很错误的。应当马上放他出来，让他恢复正常工作。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协助中央调查组顺利进行工作，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任何为难和威胁。任何组织都不得逼调查组表态。调查组只执行中央给予的调查任务，他们也无权表态。

五、各群众组织之间，绝对不得互相抓人扣人，不得抓走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各群众组织所抓的一切人员，都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人员所提供的任何口头材料，一律无效。

六、北京红代会的学生、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都应当在短期内返回原单位闹革命，不要干预福建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在福州的言论和行动，无权代表他们的整个组织。

七、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积极响应和坚决执行中央所发出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别是福建地处海防前线，面对敌人。革命群众组织更应以国防安全为重，以大局为重，一切行动，都要慎重，都要三思，不可轻举妄动而做出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事。

八、福建省军管会是中央决定成立的，军管会主要领导人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付统帅林副主席委派的。省军管会工作中有错误缺点，已经向中央作了检查报告，并将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支持和协助军管会工作，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缺点。但是，决不可冲击和占领他们的办公地点。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凌晨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接见福建革造会联络站负责人讲话
周恩来：

同志啊！同志啊！你们眼光太短了，什么矛盾很大，哪里有与蒋介石矛盾大？蒋介石打过来你们连自己家乡也保不住，还能够安心这样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革造会！不在军区，知道吗？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就到处揪陈再道，这是对我们伟大军队的污蔑！革造会要听中央的话，要拥护那个八条。

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动摇军队不要自毁长城，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了，今天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说今后再夺枪就是反革命行动了。

总理指示说：你们有两个任务：一要有敌情观念，共同对敌；第二要团结大多数，搞好革命三结合，进行大批判。

会后总理、伯达接见绍安代表。

临走时，对绍安代表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分裂，要坚持大联合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周恩来对福州军区请示电报的批文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际法、影响祖国声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接见福建革造会负责人时的讲话摘要

〔地点：人大大会堂。被接见的福建革造会负责人是：姜观、周振祥、郑克诚等。〕

革造会负责人一进接见会议厅，总理、伯达同志和他们亲切地握手。

总理问了姜观的情况说：你什么大学毕业？

姜观说：我文化水平不高。

总理说：文化水平不高为什么能写出那些文章？

姜观说：我也没写什么。

总理：台湾蒋介石很喜欢，现在《福建日报》怎样？有的说是姜观的报纸。你出来（从狱中出来）是你自己办的吗？

姜：我们自己办。

总理：自己办，没军管？

姜：我们没有攻击“八·二九”，没办成派报。

伯达：台湾广播了什么？

姜观：四篇文章。我们有错误，要检查为什么被利用。

伯达：刚才总理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凡是敌人高兴的，我们就要反对。

总理：福建离台湾很近，你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总理：

“八·二九”是老造反派，可能他们在对军区问题上偏你，你们偏激，如何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毛主席战略部署上联合起来，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当前是这个问题，找你们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批评你们右倾，讲你们修，是一部分，也不是大部分群众，你们面对台湾，大敌当前你们也不想一想，最大的矛盾，究竟是美蒋还是内部，当然是蒋介石。

主席提出“斗私批修”，林付主席在国庆节讲话讲得很清楚，这是大方向。对外是美蒋国内是斗私批修。批修，是革命的一份力量，“斗私”，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林付主席去年就提出来，今年主席提出四个字。我们有错误是宣传上，今年红旗十二期社论强调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只是这个错误不能说中央错误，你们没有。九月一日讲了，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你们说紧跟，口号紧跟了，中央对福建问题的决议就不紧跟，中央说不要办派报，你们就办派报，中央说只能有党性，不能有派性，你们以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要紧跟毛主席司令部，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跟错了。对的你们不跟，这如何解释？符合的跟，不符合的就不跟，这就叫做派性。

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要有个认识过程。对“八·二九”错误要谅解。福州今天你们是主要力量，政治上、组织上都占优势，对你们希望就不能不大。主席

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大方向不能保证一切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方针、部署错了，都可以犯错误。四十年前南昌起义，八一军旗树起来，这是全国性的，向国民党打了第一枪，所以八一旗帜不能倒。因为贺龙问题把××砸了，不对。方向对，政策不对也会犯错误。现在小将最喜欢讲大方向，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保险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听中央的。第三次出去串联，帮倒忙，好多是这样，福州也是这样。

主席说，要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你们。（接着总理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了）大方向对了，政策如果掌握得不对，也错。现在你们容易极“左”，“八·二九”偏右，也是造反。“八·二九”的那种口号（指“八·二九”要革造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是不对的。如果他们讲他们的错误，你们讲你们的错误，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联合，求大同存小异，通过大批判来搞大联合。

当然军区也有责任（指这次国庆活动联合不起来），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两方面都做工作，那就好了。

伯达同志：

对一个人一看二帮，要看行动中的变化。对韩先楚同志，对军区的看法，老实说，我们的看法是有变化的，这是从他的行动变化。我们并不熟悉，是谈话交换意见。刘培善到福州还是有变化，与在江西就不同，如果把一个人看死就难办。对军区、韩先楚同志的看法，是否这样，你们考虑。对韩先楚同志要象我们说的，一看二帮，中央在帮，他很希望帮助。他现在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刚才总理说，大敌当前，蒋介石知道这一点，打倒韩先楚是对他有利，要改变这个观点，不要把一个人看死了。过去一些观点也不一定对犯了错误不允许人家改，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说要一看二帮。我看他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你们可以帮助，他有表现，你们也应该表现，不能单看一面，要有二方面，才联得起来。不知道对不对，你们考虑一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州军区和福建省革造会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伯达、杨成武、吴法宪中央首长等接见了福州军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代表，摘要如下。〕

总理：

今天找你们来开会，解决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愿意，像你们所说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那么，不管是哪一派，中央提出的要求，你们就要兑现。

现在福州闹得够呛了，当然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暴露了敌人，也快要暴露了自己，你们来的有没有“四·二〇革造会”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众：一个也没有。）“军造会”与“四·二〇”有没有关系？你们没有和他们通电话啊？我今天亲自给王泉金打了电话，请他来谈谈。石祥松到了没有？（众：到了）你被他们说成是叛徒了是不是？（众：是）

观点是可以研究的，不能出来一个，造反派就说他是老保，又出来一个，就说他是老专。你看，极左到那里去了？你们“军造会”和“四·二〇”有没有联系？（军造会：没有。我们和四·二〇在打倒韩先楚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某些做法上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

你们不要忘记对面有蒋介石，大敌当前嘛！你们跟四·二〇没串连？实际上有串连，福建再不能乱下去啦！你们在这里有多少人？（答：四十二人）

你们要平反，中央当然是支持的，叫你们来开会，就是平反了嘛！（军造会代表：韩先楚没给我们平反）什么？什么韩先楚？他……中央给你们平反就平反了嘛！在中央面前开会和你们讲话，叫你们来就是平反了嘛。

首先要求你们军人，不管是开展四大的，不开展四大的，要守纪律，要对解放军负责，不能当中央面一套，背后一套。既然来了，就承认你们接待你们。

伯达：道理对，来一个人也行，道理不对，来再多也没用。

总理：蒯大富一张大字报就行了，一张对一万张。今天我找王泉金同志本人，叫他们来北京商谈。中央调查组全回来，把事情搞清楚，有错误就撤回，没错就回去，不能一派赶他走就走，四·二〇不来调查组也不能来，矛头针对中央调查组是不是大方向？（众：不是）

军造会代表：我认为福建乱的根子是韩先楚。

总理：好了，好了，现在不来谈这个问题，今天不是叫你来控诉的，是商量解决问题。照你的意见，把韩先楚撤掉，问题就解决了？最高司令部没有同意，我本来不准备说这个话。福州乱得够厉害了，乱成这个样子。你们内部分裂也怪韩先楚吗？今天不是解决问题是先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气以后再出。革造会的也好，军造会也好，你们在这里的人还不能解决问题，还要请家里的人来。事态发展下去不是乱了敌人，连自己的阵线也会乱了，就会走向反面了。

（十二月份要解决十二个省）

总理：就是嘛，广东好，福建差；浙江好，江苏差；山东好，河北差，辽宁也差。辽宁早就来了，我们还没见他们，非要把他们解决好不行。等了一年半了，现在是应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所以请你们来，趁热打铁。不过不要把我讲的，弄成大字报贴出去，你们记，我不反对，但是不能各取所需，要以大局为重，为什么现在不能联合呢？

杨代总长：毛主席最新指示里不是讲过了吗？12月要解决12个省，现在光打内战有什么好处，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总理：前十名是不行了，江西已经挂上了，你们福建总不要落后于20名之后么！打敌人是第一线，不要忘记敌情，打内战这么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关于勒令福州《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

1967. 12. 23； 中发 [67] 404号

福建军管会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福州发行的名为《北京》的刊物上，擅自大量刊登没有公开发表的，未经核实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此刊物应立即停刊，并把过去已出版的二十九期送十套交中央文革审查。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4； 中发 [68] 132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热烈地庆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福建省是处在祖国国防的最前线，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些凶恶的敌人，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之流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在福建的代理人，长期以来，招降纳叛，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在福建复辟资本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经过激烈的斗争，充份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叶飞这些福建走资派的丑恶面貌，把叶飞之流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中央批准福州军区党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名单，同意韩先楚同志担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皮定钧等十一个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央希望：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应该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使整个福建的面貌为之一新。

要抓好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一个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认真清理阶级队伍。

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斗私，批修”，让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更普及，更深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进一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叶飞之流的“独立王国”和反动的“多中心论”，批倒批臭。

要进一步地引导群众组织，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要认真地做好“精兵简政”，“拥军爱民”的工作。

要进一步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福建全体革命群众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继续高度地警惕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继续高度地警惕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的各种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解放台湾。对于那些敢于来侵犯我国前线的美蒋匪帮，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歼灭之。

总之，中央相信：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必将大大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福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因而必将在各个战线上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紧接着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祖国海防的最前线——福建省的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们向一千七百万福建省人民和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福建省面临台湾海峡，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东南大门，是我们解放祖国领土台、澎、金、马的前进阵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早已森严壁垒的我国东南海防前线，现在，更加众志成城。这对于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匪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巩固我国国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福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就亲自率领工农红军，把在井冈山燃起的革命武装斗争烈火扩展到福建。毛主席在这里亲手写下了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我党我军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引导着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始终鼓舞着一千七百万福建人民的革命斗争。

解放以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同社会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相勾结，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竭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想阻挡革命车轮的前进。

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福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帅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经过反复的激烈的搏斗，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 and 一切反革命分子负隅顽抗的种种阴谋诡计，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广大指战员，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一起，坚决打击了美蒋匪帮对福建沿海的窜扰活动，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热情宣传、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定地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三支”“两军”和保卫国防的斗争中建立了巨大功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战斗在国防第一线的福建军民，肩负着严重的对敌斗争任务，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对敌，决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美蒋匪帮，以及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然要进行垂死挣扎。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深入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紧紧地依靠人民群

众，巩固祖国海疆这个钢铁长城。对于那些敢于来侵犯我国前线的美蒋匪帮，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福建省军民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团结，加强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团结。革命群众要爱护和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爱护和支持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按行业，按班级，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坚决粉碎阶级敌人挑拨离间、造谣破坏的阴谋活动。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彻底粉碎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坏作风。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教育革命中，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都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必须把这件事抓好，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希望：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千百万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号令，都必须认真学习，坚决照办，彻底执行，及时总结经验。只要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一定能不断前进，更快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社论）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周世忠(福州军区参谋长) 朱耀华(福建省军区司令员)

康 林(二十八军军长) 郑 国(三十一军政委) 尹明亮(闽北指挥部政委)
 杨思禄(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康烈功(海军福建基地司令员) 兰荣玉(原
 省委监委书记) 叶 松(原福建省人委副省长) 伍洪祥(原省委书记处书
 记) 黄亚光(原省政协副主席) 魏金水(原省人委省长) 刘永生(原省
 人委副省长) 陈洪波(原省林学院副院长) 庄志鹏(省工总司) 田毓民
 (工联总) 洪秀朴(小嶝岛民兵政教) 郑火排(红卫兵福建革委会) 王
 云集(省八. 二九总司) 张益飞(省八. 二九工总司) 黄祖德(福州市工人
 联络站) 石祥松(工联总) 宋建云(南泥联总) 江城防(龙溪工人主力
 军) 陈烈忠(三明一. 二八) 周婵娟(省工总司) 苏千永(省八. 二九总
 司) 黄茂玉(闽侯劳模) 洪阿锦(霞浦县渔民代表) 彭国华(省机总
 司)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 韩先楚在福建县以上革命委员会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 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略)

福建总的形势同全国一样, 也是大好, 而且越来越好, 在十二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 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项任务和一系列的政策指示, 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去年十一月实现全省(除金门外)一片红, 到现在, 基层单位也绝大部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 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不断加强, 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有了很大缓和, 军民团结进一步加强, 共同对敌。群众发动得更加广泛, 运动正在向深入发展, 斗、批、改各项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也开始摸到了一些经验。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也是很好的。所有这一切, 都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 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英勇奋斗的结果。各级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部队的同志, 特别是担负“三支”“两军”的同志也做出了贡献。例如: 进入龙岩地区执行任务的部队, 广泛宣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政策, 举办了八百多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军事行动的配合下，兰汉华、赖祖雄、张震东等坏人操纵的武装集团已被摧毁。部队英勇顽强，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很好，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当前形势，从全省来说是在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把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政策，直接交给了广大革命群众。军区党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贯彻，抓得比较紧，反复检查执行情况。同时对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思想动态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抓紧了团结广大群众的工作，共同对敌，因而在工作中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广大革命群众对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是信任和支持的。有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反复，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是正常的，应该有个正确的看法。第一，有错误及时纠正，有问题及时解决；第二，出现了某些小反复也不要怕。

在大好形势，越要谦虚谨慎，头脑要清醒，及时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否则，有可能犯新的错误。这一点要有高度的警惕。

军区党委一月初开了支左工作紧急会议后，问题比较多的地方，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但有的地区转得还不快。

我们部队广大干部、战士是好的，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要认识到了就能迅速改正。有些同志在支左工作中，是有错误缺点的，但绝大部分都是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有错误改了就好。主要是领导问题，各级领导要抓紧做工作。

我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了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主要是我。（略）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需要，是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是加强思想革命化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十二中全会以后，又重新发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并且还专门发表了《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这就是要求我们的同志认真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使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尽量不犯或少犯错误。

林副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有少数同志不重视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不讲两条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不能回避。就以文化大革命来说，每深入发展一步，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产生对立的思想斗争。例如，当前正在进行的斗、批、改，要不要大批判、怎么搞，有路线斗争；搞什么样的“三结合”，有路线斗争；清理阶级队伍，矛头指向阶级敌人（九种人）还是指向革命群众，有路线斗争；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上山下乡等等，都有路线斗争。在每一项工作进程中，不弄清两条路线问题，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甚至会分不清是非，分不清敌我，就会迷失方向。

有的同志不愿提路线斗争，自己不讲，也不让人家讲。一讲就是“派性发作”。原因是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有的是怕触及灵魂，怕暴露自己的错误。有的同志，虽然口头上讲路线斗争，但不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路线斗争实际，不把自己摆进去，甚至错误地认为：“我们这里情况跟别的地方不同”，“两条路线斗争是上面的事，我们这个小单位不存在”，“要摆两条路线斗争，你同刘少奇去摆……”。还有的同志，在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对社会上的各派群众组织搞折中、调和、平衡，不讲原则，在军内也有类似情况。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基本的就是群众路线。即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两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围绕着如何对待群众问题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相信、依靠、保护革命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刘、邓的打击、镇压革命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待群众问题上，在对待各派群众组织问题上，不是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衡量，而是用个人感情、主观愿望为标准。有的同志不用路线斗争去

看待群众组织，不从斗争的全局看问题，自己有错误，又不改正，群众对他们提了意见，反而说群众是错误的，随意扣上“反军倒×”的帽子，犯了支一派、压一派和打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错误。我们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福建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英明指示，来看待一个群众组织。凡是正确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支持；不正确的就进行教育，帮助改正。这样，我们才能紧跟毛主席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把工作做得更好。

对待群众组织，要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在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的掌握大方向比较好一些，有的掌握大方向差一些；有的一个时期好一些，另一个时期不那么好。不论对那一派，都要一分为二，优点和成绩都要肯定，缺点、错误都要教育帮助，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这个时期缺点错误多一点，有的另一个时期缺点错误多一点；有的轻一点，有的重一点。坏人总是极少数，比较好的组织也不是没有坏人，各个单位都有不同情况，在这个单位可能这派坏人多一点，在另一个单位可能那派坏人多一点。不能只认“牌子”，同某一个组织挂钩，都看成好。或者同另一个组织有联系，都看成不好。总之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都要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又要作比较，有比较才能看出好和差。

比如，怎样看待主流和支流问题，有的同志口头上讲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实际上把支流看得很严重。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偏保，文化大革命初期，对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炮打叶飞，看不惯，甚至有抵触。只看所谓“老实”、“听话”、出身、成分好、党团员多（我们是要“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不看执行了什么路线，受什么人操纵。因此，有的一开始就带着右的保守思想介入文化大革命，不支持革命造反派，有的后来又支持极左派，这样就犯了错误。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群众运动中出现了缺点错误总是难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何况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年青人，在运动中喝了几口水，更应该谅解。毛主席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我们有的同志就很不理解，对犯过错误的革命造反派，总是揪住不放，甚至当作

阶级敌人对待。而对亲自己的一派，就是里面有坏人，也视而不见。更严重的是个别单位，对群众不是保护，甚至开枪打死打伤贫下中农；个别部队人员把好人打死后，还不让其家属看。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替受害人民伸冤，是我们的本分。对于少数犯了严重错误而又坚持不改的人，要执行纪律，个别坏人办坏事，要严加追究，严重的要判刑。××等地问题比较严重，抓关了××多人，刑罚就有××种，打伤了不少。我们要××××部队的同志派了宣传队、医疗队去，把错抓的，没有确凿证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的好人放了，受伤的给予治疗。群众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高呼“毛主席万岁！”很多群众感动得流了眼泪，有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对解放军一再感谢。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我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根本途径。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就会一事无成。我们有的同志，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不走群众路线，搞包办代替，说服教育少，靠行政命令办事。这样搞下去是危险的。

还有向群众“出气”的问题。我们是毛主席培养教育多年的干部。在运动中，有的同志可能受过围攻，甚至挨打，无论如何不能从个人思想出发，反过来对群众出气、搞报复、借机整人，那就会犯绝大的错误。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要解放全人类，要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不能意气用事，否则，就会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林副主席说：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表现：一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经过锻炼和考验，有了缺点错误及时改正。一种是对自己不能一分为二，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错误一面。两年多来，这种人没有很好触及自己的灵魂。一种是袒护自己的错误，自己不作检查，群众批评、上级指出还不满意，甚至用群众的某些错误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否定自己的错误。有错误是掩盖不住的，工作中会暴露出来，群众会揭发，这种人要把立脚点移过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站到广大革命群众一边。有的单位，有的人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对上检查还可以，但对部队的同志和群众不大敢讲。或者口头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并无改变。毛主

席说：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不是要你只向上级作检查，主要是要向群众检查，检查了群众就谅解了。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就要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毛主席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现在有的同志，还是怕群众讲话。群众提了意见，比较尖锐一些，就沉不住气。有的同志非常怕告状，明里说“我不怕，你去告嘛！”暗里却指责为“上窜下跳”、派人跟踪或者追查。有的同志只喜欢听恭维的话，不喜欢听批评的话。对讲自己的好话坏话，都要具体对待。好话讲过了头，就要出来说清楚；向他们诚恳地表示：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对我们的支持，帮助。光讲好话的，不一定个个都是好人；讲坏话的也不一定每一个都不好。有的是恶意攻击，但可以从反面警惕自己，考虑在工作中还有什么缺点错误被利用的。还有的同志抵制上级正确指示，对群众实行封锁，害怕党的政策与群众见面。毛主席说：“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怕群众怕得出奇。

要让群众讲话。群众工作，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四个第一，抓活思想。让群众把话讲出来，才能抓好活思想，工作才能有针对性。看看讲了什么话，贴了什么大字报，正确的就采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照他的意见办；认识上有问题，错误的意见，就用毛主席思想对他们帮助教育；是坏人也可以让他暴露。可以分析一下，提的意见是不是有道理。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都会辨别清楚。有的同志怕群众讲话，手里拿了很多帽子，什么“派性发作”、“阶级敌人作怪”、“矛头指向三红”等等。有的地方贴了几张大字报，有人就作统一布置，针锋相对反击、复盖，甚至人家贴了毛主席的批示，也采取这种态度，就更加不能容忍的了。毛主席教导说：“一切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要让群众对你不感到害怕，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同志要做到走到那里，不论那一派的群众都敢向我们反映问题，讲心里话。在运动中，要发动群众敢于揭发坏人坏事，勇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要允许人家申诉、说明，要让人敢于替受冤屈的好人说话。假如我们处理问题不公正，或者抓错了，揪斗了好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随便加上“不服从领导”、“包庇坏人”等帽子。

两年多来，我们部队担负“三支”“两军”任务，一方面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的单位，路线斗争觉悟就高，“三支”“两军”工作成绩就大，走到那里，就得到那里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要了解我们“三支”“两军”工作的部队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不好，路线斗争觉悟高不高，到各派群众组织中去一了解便知道。所以我说，群众是检验我们部队工作的“温度表”。

毛主席说：“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造舆论，造革命的舆论，造毛泽东思想的舆论。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报纸、广播、小册子，还有小报、传单、大字报等，组织强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泛宣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号令，传达到广大群众中间去，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部队各级领导同志，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要到群众中去，宣传一个路线，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一种观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达到五个“统一”。

第二，革命委员会班子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林副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领导班子的问题，政权问题就是班子问题。

什么样的班子，就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执行什么路线，就选什么样的班子。班子选不好，就不可能保证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贯彻落实，斗、批、改各项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我们要从爱护、支持的立场出发，帮助纠正，使它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不能一有缺点错误，就要“砸烂”、“推倒重来”。

根据一些单位摸底的情况，县、社、队的班子状况，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差的占百分之十几。公社、大队和一些基层单位问题比较多一些，上级革命委员会要下去了解清楚，认真解决。

这些班子的问题，主要是：

搞资产阶级派性，一派的人掌权。这样的班子缺乏代表性，革命性也很差，没有权威，革命搞不好，生产上不去，还利用职权打击另一派的革命群众。因此，得不到群众的拥护，遭到群众抵制或公开反对。

“和事佬”、“逍遥派”当家。这样的班子，不讲路线斗争，没有是非标准，搞折中、调和，搞平衡，也缺乏革命性和代表性，干劲不大，死气沉沉。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革命、生产都起色不大，两派群众都反对。

原班人马上台，照旧的一套办事。有的旧机构还在暗中起作用。有的原来的领导干部没有参加三结合，但处理问题还要他点头。

还有的班子是坏人掌权，镇压革命造反派。群众说，这样的班子是“坏人当道，好人遭殃”。

当前，要把搞好领导班子（包括办事机构）当作重要工作来抓。

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选拔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

选拔班子要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地、充分地同群众进行民主协商，绝不能从个人的好恶、亲疏出发。

搞好领导班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毛主席的五条和林副主席的三条，要使广大群众能掌握。让群众监督领导班子的工作，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揭发班子里头的坏人、坏事。

还有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专政队、纠察队的人选，要经过充分民主协商，张榜公布，让群众审查，经革命委员会批准，归革命委员会领导，要按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切实搞好。纠察队要少搞，只负责在本单位保护工矿企业安全，维持治安，监督管理揪出来的坏人，但是不准随便抓人、打人、关人。要多搞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工宣队和军宣队要团结协同，密切配合。

今年春季，要抓好班子的调整充实工作，着重先解决三类班子。如有的革命委员会被坏人篡夺了权力的，要发动群众重新夺回来。

农村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只要权力真正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水平低一些的要积极帮助提高，不能要求太高、太急。

要抓紧革命委员会思想革命化建设。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仍然会有矛盾、斗争，要把民主集中制搞好。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军队的同志、地方干部，任何人都都不准搞小动作，搞背后活动，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要抓好活思想。当前，三结合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都有一些活思想。

有的军队干部，抱临时观念，工作不安心。把支左叫做“临时工”，参加三结合叫做“合同工”。有的怕困难，怕犯错误。有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包办代替，不尊重群众，不尊重地方干部。我们一定要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地方干部学习，勇于负责，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军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去。

有的地方干部，工作不大胆，缩手缩脚。这一方面是自己有“怕”字，有依赖思想，另一方面是军队同志支持不够。军队同志应当积极支持站出来的干部，让他们在第一线，大胆工作，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同志、地方干部、群众代表，都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

有的群众代表，比较长离开了群众，没有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有的还搞资产阶级派性，背后做小动作。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按毛主席思想办事，让他们到群众中去，联系群众，受群众监督。

解放干部要抓紧。毛主席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只要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反动路线，或者过去工作中有些错误，也愿意改，就要支持他到群众中去检查，取得群众的谅解，及时解放他们。只有到群众中检查，群众谅解了，群众才信任，他才有威信。只向少数人，几个头头作检查是不行的。解放的干部，好的结合进去，站到第一线去。已经结合的干部，死气沉沉的，对事业不起作用的，经教育改不过来的少数人，要逐步调整下来。

第三，统一领导问题

现在，支左单位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还有问题。比如：

一个地区有若干单位，各个单位分工包干一些系统，都有自己的支左办，派出支左人员各成系统，工作上各有一套部署，口径也不一致。部队支左系统向下

布置的工作，革命委员会不知道，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工作贯彻不下去，形成各抓一条线，各有一套做法，多套马车，很多中心，搞分散主义，实际上革命委员会架了空。

有的是一个连队负责好多单位，或者负责一个公社，分得很散，加上包办代替，容易出问题。不少地区和单位的支左人员，是好几个部队机关凑起来的，互不了解，观点不一，领导多头，这些情况如不改变，尽管投入支左力量很多，工作也难以搞好，又影响部队的建设和战备。

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即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行五个“统一”，思想上的统一，也要有组织上的保证。

（一）专、市、县革命委员会要切实做到一元化的领导。专、市、县设一个支左办公室，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负责支左工作。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队提出要求，派出支左人员。按建制单位，由负责支左的领导同志加强领导，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情况，原单位管部队工作的同志，不要乱插手乱指挥，发现他们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向革命委员会和负责支左的领导同志提出来，由他们负责教育纠正。支左人员的工作对革命委员会负责、工作布置、使用、调配，传达上级指示，组织学习由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和支左领导干部负责，支左人员需要调换时，要征求革命委员会的同意，原单位不得直接调换。支左人员对革命委员会工作上有什么意见应及时向革命委员会提出来，也可以同时向本部队的领导上反映。革命委员会发现有的人表现不好 向原单位提出调好的去换。

（二）驻军领导机关，要帮助、支持革命委员会。军队的机关，不论比革命委员会高一级，或者同一级，对革命委员会只有帮助、支持、爱护的责任，没有指挥、领导的关系，各级革命委员会对上级革命委员会负责，直接受上级革命委员会领导。

（三）驻军单位多的地区，支左任务要以一个单位为主，其他单位配合。军分区、人武部把主要力量投入专、市、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有的支左人员，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要集中学习，提高认识以后再搞支左。有的转不过来，就要作组织调整。担任战备值班的部队和单位，应该减少或退出支左任务。

（四）部队抽出参加支左的，要按建制，按系统组织，不要把部队的建制都打乱了。我们是前线，部队还要随时准备打仗。一个连队抽一两个干部，两三个

班长或好的老战士，三五个人搞一个组，按建制关系，营编小队，团编中队，师编大队。师、团各抽一两个领导干部，带几个人，管好本师、团的支左分队，到一个地区或一个系统、一个单位或几个单位去支左。师、团领导干部蹲在比较重要的、比较大的单位，抓典型，解剖麻雀，指导全面，各支左分队也适当集中几个点，照顾周围一些单位。军以上机关也按这个精神组织和调控支左力量。支左人员和宣传队要认真组织学习、训练，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不断提高。

第四，工作要抓住中心

斗、批、改的各项任务都要抓紧，从全省来说，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其他兄弟省、市工作部署比我们快一些，不能因为我们慢一些，就超越阶段去赶。我们各个专、市、县，情况不一样，都要按照实际情况，部署自己的工作。

大批判，要贯彻到整个运动的始终，同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每一个阶段，不搞好大批判，这个阶段的斗争就搞不好。大批判，就是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武器，去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人民群众。就是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

现在，有的地区革命大批判搞得不好，有人还问叶飞能不能打倒？有人还替叶飞讲话。有的社队、工厂、企业，资本主义的东西还很多，有的地方四旧又开始抬头。我们一定要把大批判抓好，提高群众的觉悟，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

毛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前一阶段，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有的同志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克服等原因，发生了形“左”实右的现象，一派打击另一派群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逼供信的情况比较严重。

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就受到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有的同志，没有很好的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忽左忽右。有的同志怕被人家说“右倾”，不敢出来讲话。见到违背毛主席思想，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事，不敢批评、教育，不敢抵制、斗争，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把

党的政策、原则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才真正叫右倾。有的同志嘴里也喊“反右倾”，实际上他自己本身就有右倾思想。

毛主席历来强调稳、准、狠，特别强调准字。准，就要调查研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不是不搞；狠，也不是不讲政策。搞准了，也就稳了，搞准了才能打得狠。最近接到毛主席批示的清华大学宣传队的一个文件，各单位都要向支左人员传达贯彻，认真执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论军队的、地方的，要做好工作，要相信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好的。我们不抓，阶级敌人就同我们争夺这些子女。

我们纠正前一段的错误缺点，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政策，提出把搞错了的好人放了，就是为了团结更多的群众，孤立真正的敌人。把清理阶级队伍搞得更准，更好。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群众，把党的政策直接交给群众，团结起来，特别是把犯过错误的群众团结起来，清理阶级队伍，不是放松了，而是抓得更紧，不是停下来，而是会搞得更快，成绩也会更大。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要注意极少数坏人钻空子，挑拨离间，造谣惑众，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发动群众揭露追根。

有的地方，工作中心掌握不好，清理阶级队伍还没有搞好，有的刚开始，有的还没有开始，就马上动员上山下乡，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这是好的。但是，由于领导掌握不好，影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群众意见不少，广大革命群众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把群众中的极大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斗、批、改抓紧搞好。有的也可以留下部分了解情况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好以后再下去。机关清理阶级队伍，主要靠本机关的群众，一定要清理以后才下去。学校搞好了的可以先走。

群众充分发动了，掌握了毛主席的政策，就一定能够搞好。对清理对象要宣传政策，用政策攻心。

上山下乡工作，一是教育要成熟，二是准备工作要细致。

现在，有的教育讲得不活，不全面，道理讲得不充分，既要讲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安家落户；又要讲清楚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工农兵相结合，有所发明、创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把他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一方面接受工农的再

教育；一方面又可以为人民服务，把文化带到农村去，帮助贫下中农读报，帮助学习毛主席著作，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对上山下乡的人，要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克服各种困难。从组织上说就要做好安排，作好组织准备，作出计划，分期分批，到什么地方，怎么插队，有人带领，落实到人头。能全家大小都下去的，尽量使他们在一起，有的家里只有老人，需要照顾生活的，象征兵的独子一样，也要考虑给予适当照顾；有的身体病、残，等等，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去到以后，要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都安排好。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为他们负责到底，把各方面的工作搞成熟一点，争取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前先走一批；准备不成熟的，可以缓一缓，夏收夏种季节下去也可以。总之，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工作搞好。

精减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也同样要把工作搞细一点。处理临时工，也要具体分析，要在斗、批、改中解决。有关人员处理，可以放到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坏人清出来了，有的老弱病残，要另外安排，有一部分临时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表现又好，身体也好，就可以补上去。

在斗、批、改中，对那些不合理的，不符合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东西，都要同群众商量、讨论，加以改革。比如，经济作物区的安排不合理，有的地方征购任务太高，产粮区反而吃粮少等问题。还有，对农民基本群众捉了几条鱼，挑了一点菜上街卖，以及沿海人多地少，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用自己生产的東西，搞点小买卖的问题等，都要具体分析，体谅实际情况，不能当作“扰乱市场”、“投机倒把”来打击。还有，福建出木材，过去走资派情愿把木头烂在山上，也不让群众用一点盖房子、修房子、做农具，这些问题，各地都要注意调查研究适当安排，切实解决好。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第五，部队本身的工作问题

前面讲的几个问题，是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也是部队“三支”“两军”要做的工作。除此，部队本身还有自己的工作。

部队工作很多，军区党委已作了安排，各部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安排好。部队工作，主要是抓好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四个第一，抓好活思想，抓一好带三好，全面落实四好。

（一）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认真贯彻林副主席提出的原则：“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上狠下功夫。”一定的形式是要的，但不能专搞花样、形式。我们要突出地强调实际效果，认真地、扎扎实实地抓好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通过学习，真正地从思想上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体会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比正确，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是世界革命人民的行动指南。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真正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了就用，用毛主席的思想统帅我们的思想，落实到每一个行动上去。这样，我们的部队就能够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人民事业。

（二）要坚持四个第一。抓好活思想。思想工作要做深做细，做到人家心坎上，不能消极防御，有问题不让暴露。要让人家讲话。只有让人家把话讲出来，才能知道有什么活思想，话讲出来了，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就支持鼓励，有错误是认识问题，就用毛主席思想去教育帮助。现在，一方面有的单位不敢管理，纪律不严；另一方面，有的单位民主空气不够。有的同志喜欢奉承，害怕批评，听不得下面的不同意见。下面干部、战士讲了一些心里话，有的就扣帽子，把人家堵回去了。有的领导，对敢提意见的，总是不顺眼，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弄走，甚至搞严重的打击报复。军内也有不平之事，我们应当根据党的原则认真处理，毛主席历来提倡让群众讲话。我们要使干部、战士敢讲话，把思想搞得很活泼，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大家都关心部队的建设。最近，××××部队副指导员吕书妹同志给军区写了一封信，很关心部队的建设，××××部队战士余俊明同志关于支左工作的来信，是带有代表性的。这种精神就很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表现，领导同志要提倡这种精神。我们把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发动干部、战士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

现在都在搞斗、批、改，部队有些东西也要改革，例如机构要精简、合并、减少层次，有的领导关系要调整，一些规章制度要改革，等等，希望大家积极提出建议。

（三）一定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以一好带三好。一好带头，就是用毛主席思想带头，其他三好，也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组成部分，不能放松。现在，有的连队七、八年一直是四好，有的连队七、八年一直没有评上。事物总是发展的，总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七、八年来，战士换了几批，干部变动很大，不可能一点都不变化。有的连队过去没有评上四好，现在比过去有明显进步，就应评上。有发展，有变化，四好连队的质量才能提高。我们的四好连队，大部分是真好，但也有的是用包住问题的办法保四好，这样搞是错误的，凡是掩盖坏事的就不能评四好。相反地，出了点事，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及时解决，仍然可以评四好。

（四）干部问题。军队是拿枪杆子的，要稳稳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永远忠于毛主席。军队的班子更重要，现在我们在干部工作上还没有摆脱老框框，还是论资排辈，把一些好的干部压在下面，提不上来。还有的只看是不是听自己的话，喜欢“老好人”。“老好人”放在岗位上，也算一个干部，实际上对事业不起什么作用。今后要改变这种情况，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五条、林副主席的三条选拔干部。要注意大节，不要光看那一年入伍，什么时候当干部。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政治历史没有问题，有干劲，就可以提起来。不然的话，干部平均年龄很大，政治上又暮气沉沉，就会把部队带得没有朝气。选拔干部时，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上级党委、同级、下级，有关的部门各方面都征求意见。考察清楚了，就要坚决地大胆地破格提，步子要大一些，这样新生力量才能很快上来。

（五）部队训练问题。两年多来，部队担任“三支”“两军”任务，大量地分散在外面做群众工作，还有担任战备值班、施工、生产等任务，军事训练搞得很少。今年老兵复员，新兵补充数量很大。当前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正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去年西欧、北美的人民革命运动，有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美帝、苏修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在革命力量面前，他们狼狈为奸，不但在政治上互相勾结，军事上也准备冒险。我们是前线，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当然，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战备。但训练一点不搞不行，

各单位要认真抓一下，最基本的技术战术要学好，队列训练也要搞一点。有的同志怕戴“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的帽子，不敢抓部队的训练。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讲得很透彻，我们深刻领会，落实到工作上去。

以上所讲的，总起来说，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坚决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十二中全会上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元旦社论发出的各项战斗号令，主要靠我们的干部去贯彻落实。

各级领导同志要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下去调查研究有两条很要紧：一是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观察。如果观点不对，就会把坏的看作好的，把对的看作错的。二是要接触群众。一方面要听支左人员、领导同志和地方革命领导干部的汇报，一方面要听群众的呼声。要听几个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反映，耐心地听，让他们把话说完。听了以后加以对照、核实，用毛主席的思想加以分析。这样，我们才能掌握群众的活思想，摸到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把群众中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意见和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才能及时发现我们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指导比较符合实际。我们要坚决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把群众在斗、批、改中创造的经验总结起来，加以推广，进行指导。

今年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中光辉的一年，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迅速贯彻落实下去，把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得高高的，把革命的领导班子搞好，把一元化的领导搞好，“认真搞好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把各项工作搞好，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搞好，向毛主席献忠心，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建国二十周年大庆献礼，为人民再立新功。

（来源：永春县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主编《造反报》第九、十期（本期六版） 1969年2月24日）

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晚，韩先楚皮定均在福州军区、福建省革委会支左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韩先楚讲话：

我这里再讲几个问题。

1、第一天会议的简报我看了，好话太多。讲好话，讲坏话都要分析。一个共产党员，要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有的人什么好话都讲，到时候反你最厉害。我第一次讲话，个别同志是不是真正想通了？我的讲话跟党中央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有缺点，能够把问题摆出来，这样，我们能够更好地做好党的事业，我们有的事情下面没有讲下去，有的不敢传达，有的各取所需。第一次讲话，简报上讲没有一个不对的地方，我自己心里很不安，不要人家说好话，不要冲昏头脑，要找差距，工作做好是应该的，工作做不好是不应该的。好话坏话都要分析，绝大部分是好同志，是不是个别同志还想不通，实际上是想不通，说是通了，那样不好。

2、纠察队要少搞，纠察队要精干，看管敌人，保护工厂的机器，可以多组织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把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军队宣传队搞好。报纸各级抓得不紧，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来搞。报社的人员要到下面去，到学校、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社论要看上面的，看中央、中央文革，要有针对性。报社的改革、建设，都要注意搞，《福建日报》的发行要扩大，生产队都要订。纠察队不要搞逼、供、信，我们军区枪毙一个人要经过中央批准的。最近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一个文件，毛主席批示“照发”，支左部队要很好地看，很好地学习，要教育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要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要用党的政策来教育他们。黑帮的子弟谁也不理他，也没有人管，他感到孤立嘛，青年人嘛，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过去有的人把自己的父亲都杀了，自己家里的土地都分了。主席讲了，反动的文人还要给他们出路，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绝大部分还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的同志穿了一件白衣服，怕接近他们沾黑了，不去教育改造人家，张孤梅死了，他有孩子也要照顾嘛。

3、人民群众来信，干部、战士来信要提倡，要引导他们关心军队的建设。有的人告状了，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小的事情要在本单位解决，要看民主空气好不好。

4、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决不允许搞小动作，搞背后的活动，每一个大单位可以查出几个的。总部取消了要用“三代会”来代替，有的总部明取消，暗的

没有取消。是公开活动好，还是暗地活动好，我们老是感到人家派性作怪，你又不去分析一下。他们出小报，有好处，可传达中央的声音，他们不是正式的，不是代替官方的。“三代会”要搞起来，要有专门人管这个事。

5、个别单位有的人有了错误向上级检查很好。对自己部队，向群众就不敢讲，要做好部队的工作，向群众检查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路线斗争，团结与斗争是对立的统一，不能光讲团结，不讲斗争，从斗争当中去求团结。听了皮副司令讲话，我们主观上也是想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但是对部队领导教育，对同志的帮助不大，教育抓得不紧。不仅在支左中有缺点错误，而且在各项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有错就改，改了就好嘛！就怕有的人阳奉阴违。有话要摆到桌面上，这就好办了。不要搞文件了，讲得有缺点大家提出，讲好了还可以，但是讲错了问题就大。支左中有错误与领导有关系，除个别少数坏人以外，大多数的干部、战士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要多商量，多提意见，我喜欢当面提出来，工作要认真去做。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一个办法，要到有薄弱环节的地方，到先进的地方，要先派一些同志去摸一摸，然后再去开各种座谈会。你们要多反映情况，不要自作主张，这样才会少犯错误。

大家一定要按着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记录稿，可能有错有漏，仅供参考）

皮定均讲话：

同志们：

军区召开支左工作会议，从二月一日开始，到今天已经开了五天了、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加强军队的责任感，更好地完成斗、批、改任务。大家以毛主席思想为指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联系思想实际，联系本地区工作情况，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韩司令讲了话，大家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认识，肯定了大好形势，肯定了成绩，揭发了一些存在问题。有的班子不纯，有的专政队伍违反政策，扩大了打击面，以及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同志们认识清楚了，看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挖到了问题的基本根源。经过这次讨论、学习，也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同志

们说：这次会议，是一次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会议，是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会议，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会议，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是突出一个“忠”字的会议，是对自己突出一个“严”字的会议。会议要解决的问题，韩司令已经讲了。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我完全同意韩司令的讲话。

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必须在群众中反复讲，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广大群众牢牢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地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教导很多，林副主席讲的很多，我们过去讲少了，尤其没有结合福建的情况来讲。讲也讲一些，但是还不够。韩司令讲，他有责任，韩司令六七年、六八年没有在家，主要责任是在家的，主要是我。我们没有把路线斗争问题提到重大问题上教育部队。要讲讲福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建国以来政治、思想、经济、组织、军事上各方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因为这样，也就揭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福建问题，就要讲到刘少奇在福建代理人叶飞也必然要讲到军区韩司令与叶飞斗争的经过。路线斗争的问题，去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韩司令专门讲了一段。他讲了叶飞的罪行，没有讲他与叶飞的斗争。叶飞的每个错误，韩司令都作斗争，也就是讲了福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有利于肃清叶飞的流毒。有一些根本的情况，大家不知道，现在从反映的情况来讲，部队、地方，关于叶飞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讲得少，讲不多，这是错误的，叶飞在福建，有他一定的影响。韩司令讲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听懂。从这段工作看，好像没有听懂，没有很好传达也没有很好学习。那一次，同志们认真学习，很好传达，可能这一次犯错误少一些。主席的指示要经常讲，反复讲。我着重讲四点。

一、韩司令到军区，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坚决同叶飞作斗争。

我过去在战争年代里，没有同叶飞工作过，不认识这个人。到了山东，四七年以后，才认识他。当时他说他有什么高血压，我也不懂得什么血压高。是他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军阀主义作风时，我才认识他。对他不了解。我调福

建来，在华东知道这个人的一些情况，一九五三年，我不愿意来。后来说福建面临金门、台湾，要解放金门、台湾，不来，就是怕死鬼，就这样，我就来福建。到了福建，叶飞讲话腔调有时高，有时低，我就听不惯这种腔调。我们这样大老粗，讲话像打篮球一样，讲完就算了。当时，好多副司令和叶飞合不来，都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我想各种办法离开福建。五五年我去学习班学习文化，五七年至六〇年学习了三年，又没有排脱，我是不想到福建来，与这些人在一起，没有多大好处。最后叶飞还给我加了一个罪名，说是饶嫩石路线的人。饶嫩石这个人从来不认识、从来没有与他讲过话。什么是饶嫩石路线的人？很奇怪。叶飞这个人，不好相处，脾气摸不着，好起来什么都行，不好，什么都不行。自己感到很复杂。叶飞这个带兵不懂得带兵，又不懂得建设军队，到群众工作，他不懂得种庄稼，到群众家里去，没有他屁股坐的地方。对这个人的大节，我没有像韩司令看的深，更没有与他作斗争。叶、范、候是刘少奇在福建省的代理人，叶飞是道道地地的走资派，范式人是叛徒，候振亚是叛徒。这一小撮，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是按刘少奇的指示办事。叶飞把福建看成独立王国。一九五五年，彭德怀来福建，说要搞七十二个营。我就对叶飞说，在旧社会，你就是闽侯王了，他说，就是闽侯王。他是福建省的大恶霸。这里我讲几件事。

1、韩司令五八年来福建。这一年，叶飞在大跃进中，是弄虚作假的一年，是大暴露的一年。韩司令是坚决反对他的。这一年，叶飞报粮食产量一百八十亿斤，实际上八十亿斤还没有超过。叶飞有没有根据？他就吹一百八十亿斤。征购粮他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这个政策，对群众是什么态度。他说：“我死不如他死”，他是站在什么立场、观点讲话的？叶飞大搞拔白旗，插红旗，打击人。对党的政策，他就是左右摇摆。纠正“五风”，他又从极“左”到极右，他说：“大跃进是大跃退，不是中国老百姓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否定大跃进，实际上，福建是他搞的“五风”。五八年，他大吹一年。我专门回来看看，到底怎么样？看一看，很糟糕。有的地区，说一亩地一万斤，我去一看，摇头，不相信。有的说一亩地多少万斤，风都吹不进去啊？我去一看，讲了一些道理风吹不进去，水怎么能进去啊？后来叶飞又全盘否定。韩司令反对叶飞的作法。韩司令这种做法，是维护总路线，捍卫三面红旗的；叶飞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三面红旗的，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韩司令在干部会议上，讲了怎样正确对待总路线

问题，他说地方上犯了缺点、错误，军队有意见，要按组织反映，要支持地方克服困难。叶飞推行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十无”，美化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知名人士。这时，韩司令批评他这样做不对。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要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韩司令到福安等许多地方作了调查。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韩司令与叶飞作过斗争。叶飞不但不接受，反过来，说韩司令是右倾，是反对三面红旗。到底是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面这些问题很清楚，真正反对三面红旗的是叶飞。

2、五八年金门炮战，叶飞不顾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要从一线调九个团到三明、龙岩大炼钢铁。韩司令不同意他这个做法，那时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挑衅，蒋介石匪帮要反攻大陆。调那么多部队要请示中央，才能调动。作为军队这是正常的。叶飞就胡搞。韩司令提出说，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要维护党的军权。叶飞要“先斩后奏”，他要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就是为了这件事，军区报告了中央军委，得罪了他，他有意见，不满意，在地方、军队干部会议上说：我这个政委，连部队都调不动，算什么政委，我这个上将不要了，政委也不要了。九个团，我们福建能有多少个九个团。本来韩司令到福建，中央就交代叶飞管地方，军队工作由韩司令主持。这就很明确，叶飞就不能包揽军区大权。

六〇年时，他不是以上将的身份，以政委的身份，而是由省委出面，把省委驾于军区党委之上，不要军区党委，不经过军区党委怎么行呢？叶飞胡搞。

毛主席在北戴河就批评叶飞。叶飞说要搞一百万顿钢，主席讲，你福建搞一百万顿钢做什么？叶飞也不知道搞一百万顿钢要搞多少东西。他尽吹福建顶好几个国家。毛主席对叶飞批评，证明韩司令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是维护党的原则。在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叶飞，刘少奇却表扬了叶飞。叶飞对毛主席的批评是无动于衷的，对刘少奇的表扬，却沾沾自喜。

3、叶飞主管地方工作之后，为了控制军队，企图把军队拉到自己手里、他说，地方党委要敢于领导军队，问莆田县委敢不敢领导二十八军？厦门袁改敢不敢领导三十一军？韩司令说，军队与地方要互相支持，军队对地方同级党委要尊重。韩司令讲，中央军委住在北京街道，街道支部能不能领导军委？这是个原则问题，这是维护军队威信的问题，维护党的军权问题。叶飞实际上要夺中央军委的权。六四年、六五年的时候，他出了新花样，他公开讲，我们军队准备应付一

部分干部到地方当骨干。叶飞讲，我要组织第二野战军。你这个第三野战军，是属谁领导的？我听了很生气。

4、叶飞是逃跑主义者。在战略部署上，叶飞是按彭德怀一套搞的。林副主席说，彭德怀是打烂仗的办法。叶飞五四年有个作战计划是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搞的计划。韩司令来福建以后，看了叶飞搞的作战方案，不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符合林副主席指示的精神，也不符合实际情况。韩司令就与大家研究，搞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给了叶飞看，叶飞讲，这个计划还可以，他没有意见。可是六〇年肃清彭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流毒时，叶飞自己搞的作战计划，是错误的。韩司令搞了一个计划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叶飞在一次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搞突然袭击，说他没有看过作战计划。他这一来，就是说，作战计划，政委都没有看过，你不是单纯军事观点吗？后来从作战部拿出作战计划，一查，叶飞是看过的。一拿出作战计划，他没有话讲了，他扯谎，他就是搞这个名堂。

六〇年底，叶飞给韩司令加上了种种罪名，什么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彭黄分子沾边的，等等。韩司令一来福建，原来我们两个也不认识。在朝鲜，听说西线有个韩司令，也没有见过，只听说这个人很厉害。自己想，两个人能不能合在一起工作？彭德怀当副总司令时，搞了百团大战（我当时当团长），搞得稀里糊涂。我来福建时，彭德怀跟我说，你最主要的到闽江口去看一看。我一来，就赶快到闽江口看，一看，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呀！韩司令来到福建，一见面，就讲起来了，韩司令一直是和彭黄作斗争的，叶飞是搞罪名加上去的，请同志们注意一下。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利用极“左”思潮，军里一些坏家伙搞了一些什么“三百个为什么”“韩先楚的罪行录”，这一些东西无非还是叶飞六〇年加的罪名。当时叶飞拿省委帮助军区，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叶飞这个人哪，要先和他比一比本事，是在他的手下他才行的。这个人不是讲阶级路线，不是讲对人民负责。过去人家说：“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实际上他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后来军委说要纠正，对韩司令斗争是不对的，他马马虎虎做了检讨，他那个检讨是别人写的，拿给他看，他连看也不看，就送到中央去了。

5、在干部路线上，韩司令与叶飞作过斗争的，这一点很明显。叶飞只要亲他就行，他重才轻德，他不讲阶级出身，只要会讲会写就可以，听我的话就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听他的话就要受打击，他排斥工农干部。在几次会

议上，他说我单纯军事观点，我说“单纯什么东西呀！”他就是重用他过去的老部下，那帮人。郑重、张传生，他就是重用这些人。张传生是个地主羔子，当时他的地主父亲为了留种，把羔子搞出去了。韩司令批评过叶飞，说：“你弄这两个人，对党不负责任的”。叶飞还把王于耕要搞上教育厅当个厅长。叶飞搞名堂，对工农干部打击排斥，他对刘永生同志打击迫害，讲刘永生只能当个营长，说他是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刘永生是闽西的老同志，韩司令给叶飞指出，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对待老干部。对本地干部。叶飞不重视，他就是找一些拍马屁的人。韩司令刚来福建，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地方干部当县长。韩司令六五年在武汉时，韩司令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主席送出来，讲：“感谢韩先楚同志的帮助。”叶飞就是靠几个南下干部，南下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总是要用地方干部，在闽西开会要讲三次话，普通话讲一次，本地的官话讲一次，本地的土话还要讲一次。

6、他歪曲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毛主席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叶飞在厦门会议上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主席讲的就是要我们在打仗时灵活机动。叶飞要讲之前，我首先就跟他说：“你要讲就不能讲‘走’，在海岛上有×××军，×××军的一线部队，你这样一讲，打起仗来就走了。林副主席讲‘海上一寸土，好比陆上一座山’，这已经讲到底了嘛。”以后把叶飞的讲话报到中央去了，他这个讲话就是不对的嘛。在民兵工作上，他按照彭德怀的方针，不搞人民战争，对福建省的武装部他很歧视，福建的武装部长搞个县党委委员都不容易呀！他与刘培善到北京开会回来，说：“我们国家没有彭德怀这个国防部长就不得了”，福建民兵工作没有搞好。主要是靠人民战争，我们就大抓一顿抵制他们一顿。一九六四，叶飞在晋江县出了个大花样，美国在越南南方搞战略村，他在晋江也搞了个战略村，他破坏民兵工作。当时韩司令坚持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以后搞了武装基干民兵，以后又发展了军民联防，这是全国搞得最早的。济南、广州都来学习这个东西。

7、叶飞在福建搞“独立王国”。他说：“反对第一书记就是反党”。他把党与群众的关系搞成猫与老鼠的关系。毛主席说，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嘛！那一年开会，韩司令讲话说：“如果第一书记是跟毛主席的你反头头就是反党嘛。如果第一书记不是跟毛主席的，你又是错误的，怎么能够说是反党呢？”叶飞对韩司

令这个讲话记得很牢，说韩司令支持省委态度不明确。六〇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老虎屁股摸不得”，就是批评叶飞，还有讲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些问题也是批评叶飞的。六〇年以来，韩司令就对叶飞进行专门的帮助。韩司令经常对我这样讲，不能人家初一，我们初二，我们要从党的事业出发，他老讲这个话。

从此以后，主席批评叶飞两次，叶飞像没有听到一样。六六年叶飞写了个报告向中央作检讨，毛主席有个批语，说他是“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是没有改造，而是根本没有改造”。叶飞从北京回来对主席的批示根本没有传达。总之，两条路线斗争反映 在各个方面。

二、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

叶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红卫兵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炮打司令部》，他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先炮打司令部（指厅局长）。他对抗毛主席，韩司令是和他作过斗争的。我这里讲几点：

厦门八中到福州来造叶飞的反，要揪王于耕到厦八中去斗，王于耕在厦八中搞过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学生提高了觉悟。认识到王于耕是资产阶级在教育界的代表人物，首先从王于耕开刀。叶飞知道这个事，就赶快叫范式人、侯振亚亲自到厦门去阻挠，也叫军队去阻挠，我们军队不是去阻挠，而是去做宣传工作。叶飞还布置各地怎么办，阻挠红卫兵到福州。他怎么搞的呢？我这里讲几个方面。

1、厦门八中学生到福州来揪王于耕时，韩司令和军区党委就动员叶飞叫王于耕到厦门去，他就是不听，他想尽一切办法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那一天，红卫兵要求叶飞接见，韩司令动员他要去接见，对他说：“这是群众”这个时候，叶飞请示了陶铸、谭震林，韩司令叫叶飞去接见群众，有好处，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叶飞为了八中的问题，说有人要把电台砸烂，要我们军队去保护。韩司令一查，根本没有这个事。叶飞对学生运动怕得要死。

“八·二九”是怎么来的呢？八月廿九日，把叶飞弄得没有办法，他就到第三会议室，叫刘永生到前面去，刘永生头上没有头发，到外面晒太阳。这个时候韩司令派我去动员叶飞，我就对叶飞说：“你要出去，你不出去怎么行？”他一面打电话问能不能出去，弄得很紧张的样子。八点钟在省委里面去接见了，东海兵也组织好了。东海兵呀，主要是一中的学生，一中是王于耕培养的典型，这些人不

知道。这一天郑重把学生叫去保叶飞，与“八·二九”作对，老保就这样保出来了。八·二九小将见了叶飞，叶飞很紧张，对范式人说：“我走了，一切工作由你负责”，象生死离别一样。以后出去了。就回来了。“八·二九”就是这样来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所以叫作“八·二九”。

2、六六年八月至九月份，毛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叶飞提出炮打分司令部，转移斗争大方向，蒙混过关，他讲“教育厅是宣传部领导下的”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系统要搞文化大革命”，要首先从宣传部开刀，先炮打分司令部，说是“文化教育界执行了反动路线”，他就是往别人身上推。

3、挑动群众斗群众。闽中、闽南红卫兵斗叶飞，叶飞与郑重搞了个“工人赤卫队”（我开始还认为这不错，“赤卫队”嘛，）红军也搞过嘛，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是“工赤兵”，保叶飞的。“八·二九”造反派是有功劳的，当时都是赤卫队把他们包围着，围攻学生，东海兵也是一样的保叶飞。认识要有个过程。以后，红卫兵要到北京去告状，叶飞不让坐火车，想办法控制他们，红卫兵又到白沙去坐火车。以后又被他们扣回来了。这时韩司令在军区里也批评叶飞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4、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卫兵封闭省委办公厅大楼，叶飞要调军队镇压，韩司令坚决反对，韩司令说：“我们不能去，群众运动是符合大方向的”以后省委要搬到屏山招待所。韩司令说“不能给”，要到后勤招待所，韩司令说“不能给”，以后他们搞到公安厅，过了二天，叶飞给我打了电话，我一去是在公安厅，他说要架电话，以后我们统统不给。最后没有办法，公安厅造反派起来了，贴了两张大字报，天不亮叶飞就跑了。跑到了马鞍山，伙房也没有。我打了电话说“这是指挥要地，你把省委搞到这里来，我们怎么办哪？”以后我们考虑，这里又是省委的地方，不让他来也不好，就让他来了。以后红卫兵又来了，韩司令经常叫我去打外差，去做工作。

5、六六年“11·23”事件，是叶飞策划的流血事件。当时是“工人赤卫队”总部设在文化宫，造反派砸了工人文化宫抢黑材料，叶飞就叫许多人去看，有的看了还流泪，范式人也去了。“11·24”就组织开大会，反对“11·23”。这一天打了架，流了血。韩司令对这个问题表了态，支持了红卫兵，叫叶飞负全部责任，这个问题震动很大。

6、六六年底，中央看叶飞不起作用了，福建又是前线，就叫韩司令兼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时省委开会，韩司令就批评叶飞，不符合毛主席指示，叶飞死不悔改。六六年中央工作会议，韩司令就针锋相对地与叶飞作斗争，把叶飞的问题在会上讲了出来，叶飞欺骗中央。军区韩司令一直支持造反派，“革委会”（造反派组织）六七年“1·26”以前军区是支持的，韩司令经常接见他们。“1·26”以后才起了变化。“1·26”以前，有人把干部弄到马尾×××山，开了会，交代了问题。以后回来，就把矛盾指向了军队，这个秘密还没有搞清楚。“革委会”也起了变化，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突出表现出来，在党内军内就更加复杂了。

为什么叶飞刚刚揪出来，就立刻刮了反军风，刮起了反对韩先楚同志的妖风。“一月革命”风暴，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这时，全国大夺权，走资派看军队一介入，权一夺，大势所趋，他们就认为根本问题不在造反派，起主导作用的是军队，就来了个“1·26”，那时，浙江、上海、新疆、西藏不少地方都有“1·26”。我就讲“1·26”是个反动行动，不是革命行动，他把矛头指向军队，人家不好喊“打倒解放军”，不好喊打倒那个排，打倒那个营，打倒那个战士，他就找军队的代表，福州军区就找韩先楚同志，广州军区就找黄永胜同志，南京军区就找许世友同志，沈阳军区就找陈锡联同志。一看全国的情况，我就着急，他妈的！搞军队，军队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福建把矛头就对准韩司令，从广大群众来讲，要打倒韩先楚，群众是受蒙蔽的，他并不懂得嘛！韩司令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敌人是有目的，是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他要破坏文化大革命，首先就要破坏伟大的长城，只有把军队压下去，才能把权夺过去。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资产阶级也懂得，所以他搞解放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叶飞在军内流毒极深，替他说话的有郑克诚、周振祥、李俊海、王锋，还有蒋俊基、孙继争，他们颠倒是非。我们大别山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家里养了瞎眼狗”，这帮人就是瞎眼狗，专门咬家里人。他们是野猪，他们会造谣，搞“三百个为什么”、“韩先楚的罪行录”，他们把韩司令与叶飞作斗争说成是个人意气，说韩司令的错误比

叶飞重一百倍，韩司令是五八年来福建的，军队原来是叶飞带来的，韩司令原来在第四野战军，对这里的干部也不熟悉，这不是颠倒是非吗？就是借口把军队搞倒。路线斗争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有的甚至说：“韩先楚窝藏叶飞、王于耕”。那时叶飞要写检讨，他说没有地方写，周总理打来个电话，说他住在医院里写材料。这样，这帮狗，瞎眼狗就来咬。叶飞在医院里不写检讨，他在那里打老K。我和廖海光去叫他写，他说“写，写”，走了他就不写了。军队是有人真保叶飞的，还是相当负责的同志，还有人派汽车去把王于耕今天接到这里，明天接到那里，但是，倒没有人要打倒。韩司令是真正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却说是“保叶飞的”。这帮人要打韩司令，中央表了态，提出不能打倒。这些人顽固不化，王、关、戚在后面操纵，与这帮人勾搭，这帮人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福建有个“五·一六”分部，×××军闽指，×××军有没有呀？现在我们知道后勤部有（闽北尹政委插话：我们那里还有大家伙），他们煽动军内外反对韩司令，反对韩司令不是反对个人的问题，就是反对军队，反对解放军，这是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揪叶飞，他们没有动静，打韩司令他们赤膊上阵。思想上站在叶飞一边。有的是特务分子，有的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现行反革命，有的是双手沾满贫下中农血鲜的阶级异己分子。李俊海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反共演讲第一名，国民党时他也是反共演讲第一名。还有一个人，想当军区司令，他不打韩司令怎么行呢？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要讲一讲中央对韩司令是什么态度的，重温一下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中央首长一系列的指示。据不完全统计对韩司令的表态有十三次。

(1)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同志给韩先楚同志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以后查清，两张传单是造谣的，总是有反革命的造谣。他们冲军区，这个不是革命行动，要韩司令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司令两天两夜。以后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韩先楚同志这样很好，坐着汽车去接见。”

(2)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总理接见福建赴京代表团讲话时说：“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同志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总理还打电话来讲，新疆、福建出了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影响，福建的形势要特别注意，有什么要报告。

(3)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会议上，陈伯达同志说：“有人说，中央文革委托到福州抓军内一小撮，打倒‘韩再道’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周总理说：“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很紧张，对野战军司令员动不动要打倒，在福建搞什么‘韩再道’，还要揪‘闽老谭’”，总理说“一定有坏人插手，不然，很难使人相信。”显然有反革命分子在挑动的。

(4)六七年九月三日，伯达同志接见福建两派时说：“打倒韩先楚，中央不接受。韩先楚同志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解放军，这里就有鬼嘛！”

(5)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八·二九”总司，“革造会”，厦门“革联”、“促联”，伯达同志讲：韩先楚是前线指挥官，你们以后会晓得，打倒他是不对的，回去要做好工作，要与韩先楚同志合作。‘打倒韩先楚’是政治上犯错误”。

(6)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总理说“现在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广州揪黄永胜，福州要揪韩先楚，南京要揪许世友，沈阳要揪陈锡联，他们是老将军……’，这是对伟大的军队的诬蔑。”

(7)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革造会”、“军造会”时，（“军造会”是非法组织）总理说：“福建要把矛头对准叶飞，全国对准刘、邓、陶。你们不对准叶飞，打倒韩先楚，台湾在广播了，你们要警惕，敌人欢迎的事总不是好的事。”

(8)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接见时，问了韩先楚同志身体怎么样……，你是打不倒的。

(9)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部分军队代表时，伯达同志说：“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指挥官，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官，担负着很重大的任务，保卫着祖国。”“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根本要不得，根本错误，中央是反对的。听懂了没有？”周总理讲：“‘九·三’指示不是说明了吗？

搞两面派这是刘少奇的作风，彭、罗、陆、杨的作风，在福建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韩先楚，放着叶飞不管，福建的走资派是叶飞，中央的决议里都点了名嘛！你们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韩先楚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早就讲了吗？不管怎么，韩先楚中央是保定了。”康生同志说：“中央就是要保韩先楚，保定了！”

(10)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全体同志时，陈伯达同志说：“我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毛主席支持韩先楚同志，党中央支持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官，你们不保，不支持，是什么意思？只有台湾高兴。蒋介石高兴。”吴法宪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陈伯达同志是保韩先楚的，你们要打倒，你们不是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这样做，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11)在中央学习班时，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说：韩先楚同志，你不是会打仗吗？你同他们打一仗。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接见六大区的军队代表，主席又讲：韩先楚同志，拥护你的那一派没有问题了吧？你们要做好反对你们的那一派群众工作。对造反派和对军队不同。最近，韩司令按照毛主席指示，几次到下面都讲了，韩司令给我们作了榜样。现在有些反复，就是你压了人家才有反复。今天讲了，要象韩司令那样去做好群众工作。不要死不悔改。

(12)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说：韩先楚同志来了没有？福建不是很复杂吗？后来不是韩先楚同志做了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吗？你们的报告很好（指成立革委会的报告）。

重温这几个问题，毛主席、林副主席，对韩先楚同志作了明确的表态。搞极“左”的是极端有害的，极端错误的，不是值得深思的吗？个别的人转不过来要犯错误，自己要讲清楚，向党内讲清楚。有的还讲“韩司令在漳州的讲话不符合东山的情况”，这是错误的。军队有一些人替敌人帮忙，还有没有发现的，现在还做坏事，在阶级斗争中很复杂，要从现象看本质，许多问题看不清楚，中央对这些问题非常明确，这些人为什么胡搞呀，要从两条路线斗争去认识，这些人所作所为，福州地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为什么我要列举了这么多事实，为什么这帮人把矛头指向黄永胜、韩先楚、许世友、陈锡联呢？就是要把军队搞垮，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要讲一下，处理“一·二六”、“二·七”的错误问题，这个错误不是韩司令个人问题，是经过军区党委常委统

一研究的，当时，我们也有责任，特别是我在政策、策略上考虑不够，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为几件事我出的点子比较多，我们做错了不对，三月中旬较短的时间就发现了，搞到群众头上了，这是不对的。敌人利用旧的公检法，搞群众，我们感到不对头，就开会了，纠正了。当时陈景三出了许多主意，那时，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是他搞来的情况。泉州、厦门、福州的表态问题，特别是泉州的表态问题，他说，那个是造反派，现在看来，是造反派恰恰是保守派，他去检查情况，我们也听他的话，我们警惕性不够“七·二三”事件才感到他有问题。三月十八日。军区党委开会，搞了《纪要》给康老看了，康老说“这个好吧。你们纠正了错误”，我们想纠正错误，但是有的地方，有的阻力就很大。现在韩司令讲了，就改了嘛！有的人他错了他就不认错，这就不对嘛！军内外利用我们的错误，我们是要注意的。

我们不是要算账，“反军倒韩”问题，福建军队是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叶飞的流毒没有肃清，韩司令不提“反军倒韩”是为了团结群众，但是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在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地方都有一些问题，也有夺权的，也有搞班子的，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要把反军倒韩的头头搞清楚，什么“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这完全是混账逻辑。韩先楚是中央信任的嘛！有人讲×××军，×××军，××军，有问题，就是不持我们的，在他那一边，去年八九个师的干部到四·二Q那里去，还有将军，策划搞“五·一六”，要当“五·一六”的后台。还有的想找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当他的后台，这是大有人在，就有人支持，公开搞一套，背后搞一套，现在还有人不死心，扩大了韩司令的事实，在群众中乱说。就是有师团干部把枪支、子弹送给人家的嘛！这不是家鬼和外鬼牵连起来吗？有许多分区这样搞，挑拨各个部队之间的关系，××师有人要向××师开枪，就有军队丑化解放军的，××师在群众中说××师“这样的面条都不吃，那象军队呀？”有这些问题、那一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你放枪，毛主席支持韩先楚，你打倒韩先楚，毛主席指示清理阶级队伍要对准“九种人”，你去对准群众，不要认为这是一般的认识问题。有些人，人家喊打倒韩先楚，你也举手，你站在那里去了！人家演反韩节目你上去谢幕，人家开会，你上去登台表态，好多人还代表陆海空军讲话，将来这个账不算吗？这样的解放军是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吗？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中央的表态层层下达，

韩司令确实是保护造反派的，韩司令讲话造反派听了流了眼泪。今天在座的要回去了，你们表态是真正的爱护群众，是真正的转过来，还是假转？

四、怎样把这一次会议贯彻好？

这一次一定要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贯彻下去。你们不要要文件了，真正改了就行了，要用各种的方法传达下去，要传达到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去，要传达到所有的支左人员，在部队工作的要传到排以上干部，传达要越快越好。最根本的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指针，结合会议的精神进行传达。

1、要把这次会议传达作为路线斗争学习的动员。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是提高两化建设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也是提高“三支”“两军”工作的需要。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要结合实际，使干部、战士真正懂得站在那一边。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分不清是非，不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就会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2、支左有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向群众作检查，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就想偷偷溜走了，人家群众是不会放的，只有改了才能改得好。领导干部不要担心纠正缺点错误会被敌人利用，只要我们站在革命群众一边，敌人就利用不了。这里面有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敌人总是要破坏的，有错误不纠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搞破坏，这是不奇怪的，但是要主动向阶级敌人斗争好呢？还是让敌人煽动群众好呢？工作要抓中心问题，就是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是我们的中心。清理阶级队伍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敢于强调，要使运动深入发展，就要靠政策，要坚持这么几条：一是充分发动群众；二是亲自搞调查研究；三是一定要掌握政策。一定把隐蔽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挖出来，一定要把大批判搞起来。

3、春季工作要强调一下，领导班子要搞好，要调整要充实，要更新，要逐步完善，要认真地去摸，各级结合起来，调查研究。搞调查研究要注意向老人调查，要找他们座谈。要把“三代会”搞起来。“三代会”有他们的小报纸，要发挥作用。要解放干部，要让干部在群众中检查好，只有解放干部才能加速把清理阶级队伍搞好。

4、生产一定要搞好。生产搞不好，搞得没有饭吃怎么行呀，已经到了春天了，要抓紧工作。

5、要总结经验，各方面都要抓一个样板，清队要抓一个样板，大批判要抓一个样板，农业生产要抓一个样板，要有样板才能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请同志们抓紧落实，把福建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以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

今天讲的韩司令与叶飞的斗争，是要大讲的。要学习韩司令紧跟中央，敢于斗争，联系群众。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搞“独立王国”，不要“唯我独尊”，请大家要注意。

（记录稿，可能有错误，仅供参考）

（来源：永春县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主编《造反报》第九、十期（本期六版） 1969年2月24日）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一九八一年一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出版的《人民司法》第一期刊登文章：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冤假错案也不少》

文章指出：福建省各级人民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共判处各类刑事案件 6,595 件，其中反革命案件 750 件，普通刑事案件 5,845 件。判处死刑的 276 人，其中反革命犯 93 人，普通刑事犯 183 人。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势，保证揭批查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冤假错案时，各地发现在这两年判处的刑事案件中冤假错案也不少，需要进行全面复查。为此，我们在检查验收“文革”期间所判案件时，重点检查了福州、厦门两市中级法院和建瓯、沙县、三明、龙海、莆田、平潭等七个县(市)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 98 件。发现确有问题的 93 件，

占 94.3%。其中属于无罪的 67 件，占检查案件总数 68.36%。应免于刑事处分的 2 件，占 2.05%。定性不准或量刑畸重，应予减轻刑罚的 21 件，占 21.4%。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3 件，占 3.06%。如福州市中级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反革命案件 22 件，经复查应宣告无罪的 17 件，占 77%，应改性减刑的 4 件，占 18%；能维持原判的只有 1 件，占 5%。厦门市中级法院判处反革命案件 9 件，经复查全部有问题，其中应宣告无罪的 7 件。龙海县法院判处反革命案件 12 件，有 10 件是错案，2 件事实不清，需要重新调查。在错判的案件中，有如下几种情况：有的仅因一时一事不满或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不了解情况，说了或做了一些有损于党和领袖的错话、错事，被以反革命罪判了刑；有的因在敌台煽动下，受骗上当，向敌特机关写信要钱要物，也说了一些攻击性言论，并未进行反革命活动，被以通敌(挂钩)罪判了刑；有的因生活困难，为找生活出路，出境投亲靠友而偷越边境，被以“投敌”罪判了刑；有的出身成份不好，或历史上有污点，有一般错误或违法行为，但构不成犯罪，也以反革命罪判了刑；有的是普通刑事犯罪，而作为反革命罪判处。经我们初步研究认为，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了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应参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由原审法院实事求是地把一切冤假错案纠正过来，并做好善后工作。

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 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 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 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 年在《红旗》杂志第 11 期上发表《谈反潮流》。

1976 年 11 月被隔离审查，1977 年 11 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 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崇安县监狱里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连续两次减刑，1988 年减为 10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1994 年 8 月提前出狱后赋闲在莆田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的家中。毛泽东汇给的 300 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 210 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连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的采访，自云“一生坦荡，功过任由评说”。

由于当年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 1700 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 10 多里去探望。2004 年 2 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消息中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2008 年 9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6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七章（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四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日报》事件的电报广西军区并请转抄印给驻《广西日报》和在报社前静坐的“八·三一广西红卫兵”总部、北京驻邕的革命同志们：

（1）进驻报社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利。

（2）要维护军管小组、革命组织，要支持军队对报社军管工作，军管小组成员要做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搞好报纸。

（3）有意见可以和军管小组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持军管小组正常工作。

（4）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判，也可以在报上讨论。

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该谈话纪要的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以及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不尽相同，按序收录於下。〕

一、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六月一日二十二时至二日凌晨二时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出席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汪东兴

被接见的有：广西赴京代表团双方代表，韦国清、陈发洪、李士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

总理首先说：“你们到北京很久了，因为我们工作很忙，没有及时的接见你们。今天在座的有的有区党委负责同志、广州军区负责同志、广西军区的负责同志以及你们两派代表。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以后还听军区的意见。首先从学生方面谈起吧。

龙智铭（四·二二代表）：我要向总理控诉……

总理：今天不是控诉会，而是听听你们的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嘛！毛主席说：右派的话，我们也要听嘛！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们还让他参加会，四川就是这样，犯了很严重错误的，我们也让他们参加了。

康老：今天开这个会，要摆事实，讲道理，大家都来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这是一。第二，到中央来与在下面打“内战”不一样，那一派的意见都要听，光听单方面的还不好，要平心静气的讲。第三，一方讲话时，另一方不要喊口号，不要吵起来，不要打断讲话，以免拖延时间，按总理刚才讲的办，大家同意不同意？（众：同意。）

李日明（桂林“老多”代表）：我们外面还有“红代会”的人，他们要求进来，请首长一起接见。

总理：我们已经回答他们了，他们不需要进来。你们广西文化革命已搞了一年了，你们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进来了嘛！

李日明接着说：南宁五·二五事件是韦国清、徐其海之流一手操纵，利用保守组织挑起的……。

总理：五·二五韦国清同志还在北京嘛！

龙智铭：他可以遥控。韦国清、徐其海以高工分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挑动群众围攻广西大学，围攻造反的领导干部伍晋南，希望首长密切注意南宁问题，最好派人去了解。

（当他汇报到广西日报降国旗一事时，说：）“老保”污蔑我们降国旗，现在有照片，请首长看（送上大幅照片给康老）。

康老：是谁照的？

龙智铭：是我们照的。

康老：是怎样照的？

龙智铭：我们进去照的。

康老：你们那里来那么多钱？

龙智铭：我们有好几部照相机……

（在“四·二二”、“联指”的几名代表发言后，柳州职工总部代表在胜发言说：五十五军×副军长到外游说，说毛主席曾讲过韦国清是好同志，好党员，而且还说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讲过，要求首长澄清……）

康老：（很严肃地）我插一句，这句话我是讲了的，我是讲了的。

这时，总理翻阅代表名单，问：八八总部有个雷激是吗？来了没有？

雷激（“八·八”红卫兵）站起来回答：来了。

总理：“兵营”、“兵训”是不是你们搞的？有没有这回事？

雷激：没有，没有。

总理：是谁搞的？

何作然（“四·二二”代表）：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红卫兵自己管自己，自己训练自己……

廖伟雄（“联指”代表）：他们撒谎。他们先在西大“兵训”，而后到外单位去实行“兵管”，区党委宣传部调查研究室、市委都去“兵管”了。《广西日报》是军管单位，他们也去实行“兵管”了。在调查研究室那里还贴上“兵营单位，不许串连，不许冲击”的标语。他们派了二百多人扛着行李进驻南宁市委，并要夺权……

雷激：我们没拿公章。

陈伯达同志：拿公章有什么用？

冯东晓（“联指”代表）：他们除住办公室外，还住“走资派”袁家柯家里，并说：谁反对“兵管”就是反革命。我们反对他们“兵管”，把他们的行李甩出去，把人也推出去。（总理笑着问：发生武斗啦？）我们把他们推出去，后来他们又来了，我们跟他们说理，他们硬赖着不走，现在还有几十人。

总理问四·二二代表：有这回事吧？（“四·二二”代表未予否认）。

“联指”代表送给总理一份桂剧团《四·二七独立师》“兵管第一号通令”。总理边看边问：（向“四·二二”代表）是你们这一派的吗？

何作然：我们没有这个组织。

总理又转向“联指”代表：是你们的吧？

“联指”代表：我们根本不搞这个。

总理笑着说：不管是那一派的，反正有这回事吧！

明在胜：柳州分区、驻军支右不支左，因此我们也搞了个支左办公室。（康老用拳头对一下，给总理做手势，表示是与军队对立的。）

两点零五分。总理说：你们双方的观点基本都讲了，送来的材料我们也看过了。今天先谈到这里，我们还要找军区的同志谈，散会。

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晚十点零五分至二日凌晨二点零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八点五十五分，韦国清同志身穿军装和广州军区陈副政委以及广西军区李仕才、徐其海、王希永等负责同志一起到会。

十时正，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汪东兴等同志进入会场。

总理说：“你们来到北京很久了，因为我们工作很忙，没有及时接见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广西区党委、广州军区、广西军区的负责同志以及你们两派代表。我们今天主要听听两派代表的意见，以后还听军区的意见。首先从学生方面谈起吧。”

水电厅设计院“火种”代表龙××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抢着说：“我要向总理控诉！……”

总理打断了他的话，说“今天不是控诉会，而是听听你们的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嘛！”

康生同志接着说：“今天这个会，要摆事实，讲道理，大家都来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是一。第二，到中央来与在下面打内战不一样，哪一派的意见都要听，光听单方面的还不好，要平心静气的讲。第三，一方

讲话时，另一方不要喊口号，不要吵起来，打断讲话，以免拖延时间。按总理刚才讲的办，大家同意不同意？”（众：同意！）

总理说：学生方面先讲吧。

“火种”代表的讲话被停止。桂林老多李××说：“我们外面还有红代会的人，他们要求进来，请首长一起接见。”

总理说：“我们已经回答他们了，他们不需要进来，你们广西文化大革命已搞一年了，你们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进来了嘛！”

李××无奈，只好转话题说：“南宁五·二五事件是韦国清、徐其海之流一手操纵，利用保守组织挑起……。”

总理插话：“五·二五韦国清同志还在北京嘛！”

“火种”代表说：“老保污蔑我们降国旗，现在有照片，请首长看。”（送上大幅照片给康生，企图逃脱冲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时把国旗降下来的罪责。）

康老看过照片问：“是哪里照的？”

答：“是我们照的。”

问：“是怎么样照的？”

答：“我们进去照的。”

问：“你们哪里来那么多钱？”（1）

“火种”代表自以为得意的答：“我们有好几部照相机！”

接着“红卫兵总部”李××、“一司”李××、“工总”盛×相继发言，都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大造谣言。被总理压住了，让我方代表汇报。

我方代表首先驳斥了老保的谣言，严正地指出：三月黑风的后台就是伍、贺、霍，并揭露伍晋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贺希明的罪恶历史、霍泛的假党员和叛徒等问题，把他们标榜的“革命领导干部”的谰言，驳得体无完肤。当汇报到伍晋南是个漏网大右派时，送上伍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康老看，康老聚精会神地用红铅笔在上面画杠杠，而后递给总理意有所指地笑一笑，总理又画了几条杠，又转给伯达、××等同志看。伍晋南低着头，惊恐万状。当汇报贺的罪恶历史时，贺希明斜坐靠椅，搭拉着光了半边的脑瓜。恨不得钻进台底。他使劲地用手捏捏鼻梁和两边太阳穴，丑态百出。当汇报到霍泛是假党员，大叛徒时，霍泛呆若木鸡，脸色苍白。

接着，柳州老保代表表明××发言，他把柳州军分区、五五军说得一无是处，说他们支右不支左，当他说到五五军××副军长到处游说，说毛主席曾讲过韦国清是好同志、好党员，而且还说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讲过，要求首长澄清时，康生同志打断他的话，严肃地说：“我插一句，韦国清是好同志，这句话我是讲了的，我是讲了的。”该代表哑然无声，狼狈不堪。

这时，总理翻阅代表名单，问：“八·八总部有个雷激是吗？来了没有？”

“八·八”雷激站起来回答：“来了。”

总理问：“兵管兵训是不是你们搞的？有没有这回事？”

雷激神态慌乱，连连撒谎：“没有！没有！”

总理又问：“是谁搞的？”

“八·三一”何××站起来狡辩地说：“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红卫兵自己管自己，自己训练自己……”

我方代表马上揭露：“他们撒谎，就是他们搞的，先在西大‘兵训’，而后到外单位去实行‘兵管’，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市委都去‘兵管’了。广西日报社是军管单位，也去实行‘兵管’了。在调查研究室那里还贴上‘兵管单位，不许串连，不许冲击’的标语。”这时市委代表说：“他们派了二百多人进驻市委，并要夺权……”“八·八”雷激赶快抵赖说：“我们没拿公章！”伯达同志笑着插话：“拿公章有什么用？！”市委代表继续说：“我兵团反对他们‘兵管’，我们跟他们说理，他们硬赖着不走。……”总理问老保：“有这回事吧？”老保不敢否认。

这时我方“建司”代表送给总理一份桂剧团“四·二七独立师兵管第一号通令”。总理边看边（向老保）问：“是你们这一派吗？”老保们面面相视，不敢回答。“八·三一”何××站起来，不知所措，硬着头皮讲：“我们没有这个组织！”总理又转向我方代表：“是你们的吧？”我方代表笑着回答总理：“我们根本不搞这个。”总理说：“不管是那一派的，反正有这回事吧。”

这时“一司”李××几次企图拉转话题，避谈“兵管”问题，我方代表继续揭露他们用“兵营”“兵训”对抗军管军训……，这时康生同志用两拳对一下给总理做手势，表示“兵管”是与军管对立的。（2）

注释：

(1) 老多刚才在汇报中说他们组织穷得没有钱买纸，只好把大字报写在地上，所以康老这样问。

(2) 四·二二发表的记录略去以上三大段，最后加了一段：柳州四·二二白鉴平告军分区的状，说“柳州到处有‘支持韦国清，打倒白鉴平’的标语”。这时总理、伯达相视而笑。总理说：“暂时谈到这里吧，以后还要谈的。你们送上的材料，有的看了，有的还要看看。我们还要跟部队的同志谈一谈。”

三、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二十二时零三分——六月二日一时五十七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总理、伯达、康生、王力、肖华、汪东兴等同志进入会场时，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一进场就说）今晚有事来迟了，军区的同志还没谈过，今天先听听群众组织的意见。一派是造反派（稍停一下）桂林老多（笑）。

（李日明、龙智铭及老保赵承先抢先站起来发言）

康生：你们坐下，先听总理讲话。

总理：你们双方都谈一谈。（龙智铭：我们要向总理控诉韦国清。）今天不开控诉会，只摆事实、讲道理，不管那一派的意见都要听。右派的也要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把情况弄清楚了，就好解决了。拿四川来说，比你们广西严重得多，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你们要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你们写的材料有的已经看了。

康生：你们不习惯到中央来开会，与在下面打内战不一样。中央是要调查各方面的意见，那方面的意见都要听，然后中央再研究。总理说了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口号式的。同志们要控诉，你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这一派讲话时，另一派不要吵，讲完了可以反驳，不要吵起来，不要喊口号。吵一夜也没有结果，希望大家都守纪律，不要打断别人的活，不要吵起来。你们愿意遵守吗？

（众答：愿意！）

赵承先：（举手站起来）我要求发言。

总理：你是什么组织的？

赵承先：《红色监察》赵承先。

李日明：（举手）总理，我要求发言。桂林老多的。

总理：（对李日明）你讲吧。

李日明：总理，首都红代会的同志要求参加接见，他们在门口。

总理：我已同他们说过，不用来了，给他们写书面材料送来就可以了。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快一年了，情况你们最熟悉，还是靠你们自己吧。

李日明：（翻语录，准备念语录）

总理、伯达、康生：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学，我们大家都要遵守的，为了抓紧时间，在这里就不要读了。

李日明：我先代表我们代表团和广西革命造反派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广西的问题很严重，走资派手段很毒辣。（接着谈五月份情况，着重于对造反派的压制和打击）……

总理：（当李谈及五·二五事件是韦国清一手操纵时）五·二五韦国清还在北京呀！（李说红卫兵遭到围攻）那些组织围攻？（答：“红色公安”等）。

（龙智铭谈广西日报问题，指出静坐原因：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压制造反派的声音！专当保守派的喉舌，成了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四·二七，我们进报社，军管小组还诬蔑说我们降国旗，说完将有关广西日报降国旗一事的十二寸照片递给总理。）

康生：这是那里照的？（龙：我们自己照的。）你们那来那么多钱？（笑）

龙智铭：（将警备司令部给“工总”、“倒海翻江”的忠告、警告书和造反派出版的广西日报交给总理）要求中央注意广西武斗问题，要求命令徐其海制止武斗。

李耀增：（补充揭发广西日报罪行和围攻小将情况。）

李朝杰：（指出广西军区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先谈《工总》问题，强调军区支保不支左，把《工总》打成反革命。）……，《工总》的同志在，可以请他详细谈受迫害的情况。

（盛国福补充《工总》问题）

总理：现在你们（指老保）谈一谈。

赵承先（老保）：（回避支左问题，专揭伍、贺、霍，说这三人结成了反革命联盟，企图夺广西党政军大权……。同时把所谓五·三“冲击”国际列车的罪名强加在伍身上，说伍是漏网大右派……。）

总理：（听得不耐烦）你少说一些，让别的同志说。

赵承先：（继续揭发贺、霍）

总理：（打断赵的讲话）你讲快一点，影响别人，别那么啰嗦！

方均：（老保，说伍晋南是迫害贫下中农的罪魁祸首。后谈四月三十日去围攻广西大学一事反诬受围攻。最后说：）我们进城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

詹敬康（老保）：（给韦国清歌功颂德，表示坚决支持韦国清。）

任树人（老保）：（把我们说成“老保”，诬说南宁流血事件是伍晋南挑起的。把“兵管”、“兵训”加罪于伍，是伍挑起冲击广西日报等）。

明在胜：（谈柳州支左情况。最后谈到韦国清时说）老保到处造谣说毛主席说过韦国清是好同志，江青同志也谈过，还说康生同志也说过，……我们不清楚，想问首长。

康生：我插句话。是，我是说过。

总理：（马上接上）我回去查一查。（翻了翻名单）雷激，你是八·八红卫兵吗？（答：是。）兵管兵训是怎么回事？

雷激：好，我回答这个问题。……

何作然：这个问题我最清楚。兵管兵训是红卫兵自己训练自己，自己营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有几个人同时起来解释“兵管”“兵训”问题。）

总理：“兵训”可以理解，“兵管”呢？

廖伟雄（老保）：他们是管别人，不是管自己……。

方均（老保）：……，他们搬行李进去住，我们把他推了出去。

总理：那又发生武斗罗！你们又打了他们！

李朝杰：“兵管”是我们下面的战士提出来的，主要是红卫兵进驻，任务在于支持和发动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受压的厉害。

总理：（笑）有没有“运管委员会”？（答：没有。）

雷激：我谈一下“兵管”的来源。“兵管”是广西大学在四月二十九日被走资派挑动上万不明真相的农民和保守组织围攻时，《革联》的战士们为自卫防御而提出的，我们到别单位并不夺权，除了住，我们什么权也没有夺，怎么能说是对抗“军管”呢？

刘谓隆（老保）：（跳起来，气势汹汹）他们在中央首长面前撒谎。（我们指出“他不是代表”。老保廖伟雄说“造反有理”。首长瞥了他一眼后，灰溜溜地低下头。）

白舰平：“兵管”“兵训”柳州也有，是和军管对顶的。因为他支保不支左。（总理、康生笑了。康生用拳头相碰作示意。白舰平接着说柳州红卫兵还要成立“红卫兵支左办公室”。随后介绍了柳州军分区支保压左情况，并把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的战友为毛主席绣的锦旗交给总理，总理仔细观看后放在桌子上。最后白舰平说：柳州到处有《支持韦国清！打倒白舰平！》的标语，……。这时总理、伯达相视而笑。）

总理：暂谈到这里吧，以后还要谈的。你们送上的材料，我们有的看了，有的还要看看。我们还要跟部队的同志谈一谈。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该谈话纪要的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以及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不尽相同，按序收录於下。〕

一、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被接见的有：广西赴京代表团双方代表、韦国清、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

总理：今晚接见，主要解决紧急问题。柳州国际列车停运。我等了你们五天，你们不听，你们不觉悟，把派别斗争搞到列车上去了。军区同志来了吗？

王副政委：来了。

总理问：柳州的火车开了没有？

王副政委：不清楚。

总理：柳州铁路局是否也分两派？

王副政委：不了解。

总理又问：徐其海同志知道吗？

徐副司令员：我不了解。

明在胜（柳州职工总部代表）：刚才接到电报说，十一日六次列车开到黎塘，“老保”说车上有《广西日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农民去围攻，上车殴打司机。搜查司机仓和国际邮件，抢去《广西日报》，当时同铁路金局长和军管小组商量，提出三点要求：（一）交出凶手。（二）保证司机和列车的安全。（三）交出《广西日报》。当时他们答应到柳州解决，但到柳后，金局长等又出尔反尔。……

总理：你看怎么办？

明在胜：我认为这三点正义要求是合法的……

总理：我问你，不开车对不对？你回答！

明在胜：是合法的。

总理：铁路上都这样搞，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呀？！要惩办凶手，没有调查怎么惩办？都只顾派别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全大局，不顾国际影响！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这不仅仅是列车的问题，你们幕后有人指挥，有后台！伍晋南，你是支持这一派的，你知道不知道？

伍晋南：我不知道。

总理又问贺希明：贺希明你知道不？（贺未回答）

白鉴平（柳州职工总部代表）：仅仅是因为司机带了三百分《广西日报》。（此时“四·二二”一代表提出“老保”抢报纸是不对的）

总理说：他们抢报纸是不对的，你们是派别报纸，也确实是……

总理又对“联指”代表说：你们上火车抢报纸，把国际列车邮件也检查了，这是不对的。（并问：）《广西日报》是谁办的？

白鉴平：是我们办的。

总理：军管的报纸，你们怎么只有一派来办？

白鉴平：没有，他们没按中央指示办事……

总理：中央、铁道部给你们的电报收到没有？“老多”也好，什么多也好，广西革联也好，什么都不听，是什么影响？

李日明（桂林“老多”代表）：今天才收到，还是在桂林转来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电报要从桂林转来？（总理秘书送材料给总理看）

总理：我只问你不开车对不对？

白鉴平：司机受伤了。

总理：换一个行不行？

李日明：不开车不对。

封金丁（“联指”代表）：十一日六次国际列车从凭祥开往黎塘，他们那一派的司机，就是他们保皇派吧，带有非法《广西日报》……

总理：你还不讲这个，你保谁我还不知道。

封金丁：（详细介绍事情的经过，讲到《广西日报》问题时）

总理：在《广西日报》问题上，你们有什么分歧？

封金丁：他们夺《广西日报》的权，自己非法出报，我们坚决反对……

盛国高（“四·二二”代表）：军管小组的权我们没有夺，只夺版面小组的权。

总理：（看了《广西日报》后）这根本不是局部夺权，一看就很清楚，这是派别报纸，我一抓就抓对了，你们超过了军管的权。光登你们自己的观点，光登你们自己的消息。中央指示你们根本不执行。

刘谓隆（“联指”代表）：关于《广西日报》问题，我想讲一讲。这事，是伍晋南策划的。

总理：你不要讲了，我懂了。就是没有中央电报，都应该开车，受点伤算什么？开车这才是为人民服务，才算《老三篇》精神。

李跃增（“四·二二”代表）：《广西日报》军管前就是一派的，只登一派文章，军管后分两派。

总理：只是一派声音呀！广西是前线，抗美援朝第一线，越南一看就知道了。如果军管了，只登一派声音也是错误的。

李跃增。军管后，军区一小撮“走资派”他们变本加厉的镇压革命造反派……

总理：不是让你们参加版面小组吗？

李跃增：没有，所以我们夺了版面小组的权。

“联指”代表：你们不是夺版面小组的权，而是夺军管的权。

总理：你们夺到手了，为什么不讲公道一点，又造成你们一派的呢？

李跃增：后来他们又调几千人来围攻造反派，打伤我们三百多人……

总理：（打断李的话）铁路你们赞成不赞成军管？

曾春生（四·二二代表）：赞成。

总理：赞成就要马上打电话回去，叫开车。国际邮件抢了，首先失掉国际信用，这是另一派的错误。《广西日报》你们不同意，就抗议嘛！你们抢一次，又很凶，只登一派观点，国际消息就够你们登的了。他们抢你们的不对，报纸放在机车上，怎么会知道？两派嘛，肯定有人通消息的。伶俐在那里？（封金丁答：离南宁很近）。很近嘛，一个电话通知就行了，抢那就不对。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黎塘，列车从南宁什么时候开出？（封金丁答：十一日）抢邮件，你们总喜欢搞派系，不顾全大局嘛，不顾全局嘛。十一日开出，上来又打，打伤几个人？

（明在胜答：还不清楚打伤几个人，主要是司机被打伤了。）本来是想用中央、中央军委名义解决的。后来，我们不想施加什么压力。车到柳州，要交凶手，你们的条件根本实现不了，我到那里去也实现不了。打人是在黎塘打的，怎么到柳州来抓凶手呢？谁打的还不知道，上那找去？北京搞武斗，人打死还不知谁打的。

龙智铭（四·二二代表）：金局长答应处理的，要求开车到柳州再处理。但到柳州后，他与军管小组商量，就不处理了。

总理：凶手没带上，怎么处理？因凶手打了人就走了。如果受轻伤就涂点药，如果是重伤可以住军队医院，军队内这一点小事就管不了！？你们（指“四·二二”）根本就不理。你们广西是援越抗美的前线，飞机经常到那里去，是一等战备区，为什么敌情观念这么弱，而“内战”情绪这么强，区党委一些负责同志，根本不管，不考虑国家，不考虑大局，个人利益第一。你们满脑子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就是考验你们学毛著怎么样。你们就不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不顾整体利益，脑子已热到一百多度了，十二日凌晨到柳州，你们头

一个要求，就是要交出凶手。如果我受伤，我就不这样，我还要劝同车的人开车，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抢报都不对了，为什么还抢国际邮包，完全不顾国际影响，这叫两条路线斗争吗？那一条符合呢？为了解决问题，柳州铁路军管会的、铁道部军管会的都到了现场。（这时铁道部军管会副主任等进入会场）他们亲自打电话了，说要先开车，如有不同意见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谈，就是不听，到十二日晚上，还不答应，这不叫为难呀！

白鉴平：保字号组织知道，我们这边不知道。

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长：怎么不知道，我亲自打的电话。

总理：你们只听同伙的话，不听站在全局观点的同志的话。（总理非常生气）你们满脑子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指“四·二二”）提的三条完全坚持，第一条就是交出凶手，根本不可能把凶手提交上来。抢了报纸不对，打了人也不对（指“联指”）

白鉴平：列车员与司机观点不同，他是从水箱爬上去抢的。

总理：是一派吗？

白鉴平：不是一派。

总理：不是一派就应该打吗？

白鉴平：不应该。

总理：一、三两条要求，根本没办法实现。报纸给他们抢了，就不知道弄到那里去了。你们这个问题是难题嘛！目的就是不开车，就是你们两派斗争的战术。

明在胜：他们否认我们的一切要求，根本不管。

总理：军管会要求你们到北京来谈嘛！怎么不管？

明在胜：没有接到电话。

铁道部军管同志：怎么没接到，我亲自给工人司炉、值班打的电话，打了三次。

总理：你听听，他是军管副主任，相当于部长。

明在胜：打伤了人。……

铁道部军管同志：我看了，没有打伤！

总理：（做手势）就算打伤了吧！还开车到道叉上，阻拦别的车通行，新的司机不受伤吧？为什么不开车？你们完全为了“内战”。车上有越南人，他们看

得很清楚吧，如果有苏修挑拨就更危险了。今晚我把你们找来，开始有点生气，应不应该？（“四·二二”有三、四人回答：应该。）把车开到道叉上，别的车都不能开，这是破坏行为呀！完全只顾派别斗争，只顾一派，没有顾整体利益，没有顾全世界利益，你们提的要求，明知做不到，偏要坚持。我也懂得你们对军区不满，对驻军也不满，他们是为谁呀，是为公的嘛！没有为私的。

龙智铭：本来在黎塘就应查出来，……

总理：怎么查？你这个人好象没打过架似的，（“联指”代表有人插话：他打得最凶啦！）我叫卫戍司令部带你去看一看，你能够抓出凶手吗？有些人口里喊拥护解放军（一面做手势，一面从底下打），就打了；有些人一面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脚就从底下踢过去（做手势）。这是路线斗争呀！伍晋南，这叫路线斗争吗？（伍晋南站起来回答说：我同意总理的分析。）柳铁副局长王永安说不交凶手不能开车。那位同志说得更妙了（指“火种”龙智铭），怎么一下交得出凶手，打群架怎么找得到？他一打，就跑了嘛，如果群众觉悟高了，就交得出来。这司机又不大伤，怎么查得出，如果是一颗子弹还可以查得出，象内蒙发生的事，查出了凶手。你们要求交出凶手，叫追查还可以，我在这里只能说追查，要交出凶手。我随便交一个给你们要吗？交不出来怎么办，我是凶手你们要不要？如果交一批人给你们，你们要吗？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们都是凶手，凶手那有那么多？

对柳州的问题，我们在钓鱼台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便拟了一个电报，由广州军区转广西军区处理。按公安六条、军委八条、“六·一”命令、“六·六”通令，已经够抓了，估计到这样做可能开枪。这电报，中央负责同志签字了，但我还是把它压下来，想等一等，所以没有发。但是你们提那三条，还是要坚持，这个办法，是国民党作风。青年小将，保错了还可以改正，主席说相信群众，我对你们推心置腹的，不相信你们还相信谁？我们教育你们不够，车已开出了吧？

铁道部军管同志：还有十几个旅客，坚持坐那个车到京作证。

李朝杰（“四·二二”代表，红卫兵联络站）：我代表我们这个组织，哦，我代表我们这个代表团……

总理：（态度严肃地）你还没有和他们商量，怎么能代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武断。

（柳州代表递了个纸条给李××）

李朝杰：可以代表，因为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错了，没有顾全大局，但报纸……

总理：报纸以后再谈。

白鉴平：我们错了。

总理：石祯祥是换班司机应开吧？要想国家的大道理嘛！打乘务员从一月就开始了，那也是你们这条路，从衡阳到岳阳，还有人鼓动呀！就是吕正操，弄得一班一班的人罢工，我们那时还动员红卫兵保护。广西是前线，一等战备区，为什么不想国际影响问题，报纸不报道国际的，只登派系的文章。你们打电话回去叫开车吧！同意不同意？（“四·二二”：同意；“联指”封金丁：同意。）我希望你们考虑国家影响、整体利益问题。另外，军区要负责，并告诉野战军，不能让农民进城和到车站搞武斗，不要打群架，最主要是农民不要到城市去冲击车站。（铁道部军管会同志插话：凭祥也有农民到车站打架）首先保证列车通行，你们达成个协议，我想这条是可以达成的。

李朝杰：我们没有动员农民进城。

邓文光（“联指”代表）：你们没有？你们到处去动员，到郊区，到各县去，今晚还去抢粮仓。

铁道部军管同志：香港市场脱销，我们还要安排运输。这是复杂的斗争。

总理：这是复杂的斗争，国家的大事。要反美、反修、反英许多这样的事情，都要想，你们都是学主，关心国家大事嘛，完全为个人利益，我们是觉察得出来的，你们今晚两派各派出三个代表达成协议。第二，就是报纸问题，登北京消息完全可以嘛！（这时总理秘书送《广西日报》一份，是军管小组最后出的和“四·二二”夺权后出的报纸，及有关材料给总理看，并说伍晋南等还打贺电，随后并递上贺电。）

总理：伍晋南打过吗？（总理秘书插话：是伍、贺、霍三人联名的）

伍晋南：（有气无力地站起来回答）发表过一个声明，支持过。

（总理秘书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前天在东大桥和“工总”开过会）。

总理即说：革命的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辨别是非，不要上当。你们说韦国清同志在北京遥控，我看其真正遥控的是伍晋南。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中人家的计。

李跃增：人头要落地的呀！他们挑动农民搞武斗，宾阳事件，荔浦事件……

雷激（“四·二二”代表）：他们把我们红卫兵小将放进防空洞去，烧六六粉，还用鼓风机吹……

白鉴平：他们净是造谣。（并送传单给总理看，内容是：毛主席在接见越南代表时，越南同志问到韦国清同志的问题时，主席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

雷激：他们（指“联指”）就靠造谣的。

总理：你们硬要逼我讲，我就讲了，主席是说过的，但怎么传出去的，我不知道，我没有传。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要看全部历史嘛！这点应该考虑，不考虑是不行的。你们上次逼着康老讲，康老讲了。现在你们又逼着我讲，我就讲。对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中央是要支持。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你们把他斗来斗去，上了人家的当！他有错误是要检查的，韦国清同志也准备回去检查，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嘛！这次到北京来就是要创造条件嘛！

报纸问题。冲军管是不对的，今后再冲军管就要扣留，现在有“七条”了嘛。当前怎么办？你们已经夺了，我倒有个提议，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要办成派别报纸，不登本地消息，只登中央电讯，《人民日报》六版嘛，够你们登的了！

赵顺先（“联指”代表）：我们意见，还是给军管小组办，按中央指示办事。

总理：你们这么急干什么？先走一步再试试看嘛！

廖伟雄（“联指”代表）：我们意见应交给军管。

盛国富：军管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邓文光：（“联指”代表）你们想否认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办不到……

总理：广州报纸，我已去了几天，但到现在两个月还不行。而你们已经冲了，先不谈你们怎么样，你们先登北京电讯、上海新闻等，不要登一派的，不要变成派报。

任树人：我们按总理的意见办，但办报应由报社内部工人来办，不应依靠外部的人来办。你们（对“四·二二”）要石勇滚蛋，办不到！（这时双方争论激烈）

总理：不要争了。你们（指“四·二二”）冲军管是不对的，广州还没有冲呀！慢慢商量嘛。为了及时传播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先登北京消息，是个临时措施，这样他们就不会抢你们的报纸了，能制止一些武斗。

盛国富：我们完全按总理意见办，但要军区保证发行！

总理：军区怎么保证？

刘谓隆：我的意见是发可以，但只能用他们那派的名义发，不能盗用军管名义发。（双方又争论起来）

龙智铭：我们坚决维护中央文革指示。

总理：（更生气）你们现在又逼我，你逼我就讲了，你们冲击军管就是不对，冲就是包括抢嘛，七条通令已经发下去了，谁发冲军管单位就要抓人的。（这时“联指”一代表又提出，夺军管报社的权是非法的，要交回来。总理接着说：）要一步一步来嘛，中央最后要作结论的。

总理最后对“四·二二”说：你们对军区有意见，我们也知道，军区支持韦国清同志过急了，个别同志工作方法有缺点毛病，你们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

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晚十一时四十五分至次日凌晨一点三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来到之前，韦国清同志身穿军装和徐其海、王希永等同志走进会场。

十一时四十五分周总理进入会场。

总理：今晚有个紧急问题，军区同志来了吗？

王希永：（站起来）来了！

总理：柳州的火车开了没有？

王希永：不清楚！

总理：柳州铁路局是否也分两派？

王希永：不了解。

总理：徐其海同志知道吗？

徐其海：我不了解。

老保们七嘴八舌的嚷：他是军区支左的，怎么不知道？

明××：刚才接到电报，十一日六次列车开到黎塘，支韦派说车上有《广西日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农民去围攻，上车殴打司机，搜查司机仓，抢去《广西日报》，当时金局长和军管小组商量，提出三点要求：（一）交出凶手。（二）保证司机和列车的安全。（三）交出《广西日报》。当时他们答应到柳州解决，但到柳后，金局长又出尔反尔……

总理：看怎么办，

明××：我们认为这三点正义要求是合法的……

总理：（生气地问）我问你，不开车对不对？你回答！

明××：（支支唔唔）是合法的……

总理：（更加生气）铁路上都这样搞，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呀！要惩办凶手，没有调查怎么惩办，都只顾派别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全大局，不顾国际影响！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们后台有人，有后台！伍晋南，你是支持这一派的，你知道不知道？

伍晋南：（站起来很慌乱，很尴尬）不知道。

总理：贺希明你知道不知道？

贺希明：（站起来，慌乱地）我不知道。

柳州白××：仅仅是因为司机带了三百份《广西日报》……

总理：《广西日报》是谁办的？

白××：是我们办的。

总理：军管的报纸，你们怎么只有一派来办？

白××：没有，他们没按中央指示办事。……

总理：中央铁道部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没有？“老多”也好，什么多也好，广西“革联”也好，什么都不听！是受什么影响？

“老多”李××：今天才收到，还是在桂林转来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电报要从桂林转来……

总理：我只问你不开车对不对？

白××：司机受伤了。

总理：换一个人行不行？

“老多”李××：不开车不对。

我方封代表详细地介绍事情发生的经过，讲到《广西日报》问题时……

总理：不单是这个问题，关于《广西日报》，你们有什么分歧？

封：他们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自己非法出报，我们坚决反对……

“工总”曾××：（态度傲慢）关于《广西日报》问题，如果有时间，我想谈一谈。

李××：（与曾同时讲）军管小组的权我们没有夺，只夺版面小组的权。

总理：（看了《广西日报》后）你们的报纸就是派别的报纸，我一抓就抓对了，你们超过了军管的权！

李××：《广西日报》军管前就是一派的，只登一派文章，军管后分两派。

总理：只是一派声音呀！广西是援越抗美第一线，越南一看就知道了。

我方代表驳斥：你们不是夺版面小组的权，而是夺军管的权。

总理：你们夺到手了，为什么不讲公道一点，又造成你们一派的呢？

李××：后来他们又调几千人去围攻造反派，打伤我们三百多人……

总理：（打断李的话）铁路，你们赞成不赞成军管？

曾××：赞成，但他们只登保字号文章（答非所问）。

总理：（很生气）我问的是铁路问题！

曾××：（很生硬地）也赞成。

总理：赞成就马上打电话回去，叫开车。他们抢你们的不对，报纸放在机车上，怎么会知道？两派嘛！肯定有人通消息。伶俐在那里？

封答：离南宁很近。

总理：很近嘛，一个电话通知就行了，抢那就不对。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黎塘，列车从南宁什么时候开出？

封答：十一日。

总理：抢邮件，你们总喜欢搞派系，不顾全大局嘛，不顾全大局嘛。十一日开出，上来又打，打伤几个人？

明××：还不清楚打伤几人，主要是司机被打伤了。

总理：本来是想用中央、中央军委名义解决的，后来，我们不想施加什么压力，车到柳州，要交凶手，在黎塘打人，怎么到柳州来抓凶手呢？

“火种”龙××：金局长答应处理的，要求开车到柳州再作处理，但到柳后，他与军管小组商量，就不处理了。

总理：凶手没带上，怎么处理，凶手打了人就走了，如果受轻伤就涂点药，如果是重伤可以住军队医院。你们（保伍派）根本就不理，广西是援越抗美的前线，为什么敌情这么弱，而内战就这么强？实际就是考验你们学毛著怎么样。你们就不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不顾整体利益，脑子已热到一百多度了。十二日凌晨到柳州，你们头一个要求，就是要交出凶手。如果我受伤，我就不这样，我还要劝同车的人开车，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为了解决问题，柳州铁路军管会的、铁道部军管会的都到了现场。（这对铁道部军管会副主任等进入会场）他们亲自打电话了，说要先开车，如有不同意见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谈，就是不听，到十二日晚上，还不答应，这不叫为难呀？

白××：（企图狡赖）保字号组织知道，我们这边不知道。

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长：怎么不知道，我亲自打的电话。

总理：你们只听同伙的活，不听站在全局观点同志的话，你们满脑子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提的三条完全坚持，第一条就是交出凶手，根本不可能把凶手提交上来。

白××：列车员与司机观点不同，他是从水箱爬上去抢的。

总理：是一派吗？

白××：不是一派。

总理：不是一派就应该打吗？

白××：（目瞪口呆）不应该。

总理：一、三两条要求，根本没办法实现。你们提这个问题是难题嘛！目的就是不开车。（3）

明××：他们否认我们的一切要求，根本不管。

总理（非常生气）军管会要求你们到北京来谈嘛，怎么不管。

明××：（抵赖）没有接到电话。

铁道军管同志：怎么没接到，我亲自给工人、司炉、值班打的电话，打了三次。

总理：你听听，他是军管的副主任，相当于副部长。

明××：打伤了人……

铁道军管同志：我看了，没有打伤！

总理：（做手势）就算打伤了吧！还开车到道叉上，阻拦别的车通行，新的司机不受伤吧？为什么不开车？你们完全为了内战，车上有国际友人，他们看得很清楚吧。

今晚我把你们找来，开始有点生气，应不应该？（老保零零落落有三、四人回答：应该。）把车开到道叉上，别的车都不能开，这是破坏行为呀！完全只顾派别斗争，只顾一派，没有顾整体利益，没有顾全世界利益，你们提的要求，明知做不到，偏要坚持，我懂得你们对军区不满，对驻军也不满，他们是为谁的呀，是为公的嘛！没有为私的。

“火种”龙××：（自以为高明地打断总理讲话）本来在黎塘就应查出来……

总理：（生气地）怎么查？你这个人好象没打架似的，（我方代表插话：他打得最凶啦！）我叫卫戍司令部带你去看一看你能抓出凶手吗？有些人一面口里喊拥护解放军（做手势）一面就打了，有些人一面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脚就从底下踢过去（做姿势）。这是路线斗争呀！伍晋南，这叫路线斗争吗？

伍晋南：（站起来，有气无力地）我同意总理的分析。

总理：柳铁副局长黄永安说不交凶手不能开车，那位同志（指“火种”龙××）说得更妙了，怎么一下交得出凶手？如果群众觉悟高了，就交得出来。这司机又不大伤，怎么查得出，如果是一颗子弹还可以查得出。你们要交出凶手，叫追查还可以，我在这里也只能说追查，要交出凶手，我随便交一个人给你们要吗？交不出来怎么办？我是凶手你们要不要？如果交一批人给你们，你们要吗？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们都是凶手，凶手那有那么多？对柳州的问题，我们在钓鱼台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便拟了一个电报，由广州军区转广西军区处理，按公安六条、军委八条、“六·一”命令、“六·六”通令，已经够抓了。估计到

这样做可能开枪。这电报中央负责同志签字了，但我还是把它压下来，想等一等，所以没有发。但是你们提那三条，还是坚持，这个办法，是国民党作风。青年小将，保错了还可以改正，主席说相信群众，我对你们推心置腹的，不相信你们还相信谁？我们教育你们不够。车已开出了吗？

铁道军管同志：还有十几个旅客，坚持坐那个车到京作证。

李××：我代表我们这个组织，哦，我代表这个代表团……

总理：（态度严肃地）你还没有和他们商量，怎么能代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武断。

李××：可以代表，因为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错了，没有顾全大局，但报纸……（4）

总理：报纸以后再谈。

白××：我们错了。

总理：要想国家的大道理嘛！广西是前线，为什么不想国际影响，报纸不报道国际的，只登派系的文章？你们打电话回去叫开车吧！同意不同意？我希望你们考虑国际影响问题，整体利益。首先保证列车的通行，你们达成个协议，我想这条是可以达成的。这是复杂的斗争，国家的大事，要反美、反修、反英，许多这样的事情，都要想。你们都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嘛，完全为个人利益，我们是察觉得出来的。你们今晚两派出三个代表达成协议。

第二，就是报纸问题，登北京消息完全可以嘛！

（总理秘书送上军管小组最后出的和老保事权后出的《广西日报》及有关材料给总理看，并说伍晋南等还打贺电，随后并递上贺电。）

总理：伍晋南打过吗？

总理秘书：是伍、贺、霍三人联名打的。

伍晋南：（站起来神志慌乱）发表过一个声明，支持过。

总理：你们说韦国清遥控广西，到底是谁遥控？我们是清楚的。

总理秘书：他们最近来了一百多人，他们三个人还到东大桥去开会，小将是受蒙蔽的。

白××：他们（指我方）净是造谣。（送传单给总理看，内容是：毛主席在接见越南同志时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

“八·八”雷激：他们就靠造谣的。

总理：你们硬要逼我讲，我就讲了，主席是说过的。但怎么传出去的，我不知道，我没有传。越南同志对韦国清是很尊重的。要看全部历史嘛！这点应该考虑，不考虑是不行的，你们上次逼着康老讲，康老讲了，现在你们又逼着我讲，我就讲了，我们是支持韦国清同志的，你们把他斗来斗去，上了人家的当了！他有错误是要检查的，韦国清同志也准备回去检查，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嘛！这次到北京来就是要创造条件嘛！（当总理谈到报纸问题时，双方争论激烈）（5）

总理：不要争了，你们（指老保）冲军管是不对的，广州还没有冲呀！慢慢商量吧，为了及时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先登北京消息，是个临时措施，这样他们就不会抢你们的报纸了，能制止一些武斗。

盛××：我们完全按总理意见办，但要军区保证发行！

总理：军区怎么保证？

“火种”代表：我们坚决维护中央文革指示。

总理：（更生气）你们现在又逼我，你逼我就讲了，你们冲军管就是不对，冲就是包括抢嘛，七条通令已经发下去了，谁要冲击军管单位就要抓人的。

注释：

（3）四·二二记录此处还有一句：“这就是派系利益超过了国家利益，这是国民党的作风。北航红旗还搞了一本武斗战术，简直是太不象话了，荒唐！”

（4）四·二二记录中，上面的话很简单，此处是“同意总理意见，我们不开车错了。”

（5）总理上面这段话，在四·二二发表的记录中，被删略得前言不接后句，零乱不堪，完全歪曲了原意。这里照录下来：“总理：（很生气）你们逼我说，我不得不说一下，本来还不想说的。主席是说过，但不是这样说，是谁传出去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传。（生气激动）上次康生同志已说过了。当然罗，支持韦国清，是要他回去做检讨。韦国清在越南是有功劳的，越南同志很尊重他。你们是学生，不要上人家的当，要独立思考。”

三、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至六月十五日一时二十七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总理独自一人接见。总理进入会场时，众：毛主席万岁！

总理：（很生气）跟你们研究一个问题。今晚本来不安排和你们谈话的。柳州的车开不出去，军区知道不知道？徐其海。（徐答：不知道。）韦国清呢。（韦答：刚刚才从总理办公室那里知道。）你们柳州铁路是不是也分两派？（王希永：不知道。）哪个是搞支左的？（我们说：就是徐其海！徐说：是五十五军。）柳州的代表来了吗？

白舰平：来了。（递上关于停车的电报给总理）

总理：你念。（明在胜来念电报）（念完后）你说怎么办？（白不作声）不开车对不对？（李日明：不对！）全国都不开车怎么办？文化革命怎么搞？你们就只顾派别斗争，不顾国际信用。停车五天了，我们一直耐心等待，等待你们觉悟。我们的话就是听不进去。这件事情是有后台的。伍晋南知道吗？（伍：我不知道。）贺希明知道吗？（贺：不知道。）

白舰平：……，六次特快的司机带了三百多份广西日报，被保守派拦截，殴打，司机安全得不到保证。

总理：司机还没有重伤，假如重伤还可以换一个嘛！

白舰平：我们昨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了。

总理：广西日报是一派办的还是两派办的？

老保：一派！

总理：我们下了几次指示（指停车之事），你们都不执行。你们应该想一想受些什么影响。

白舰平：我们刚收到电报，几次向中央文革……也没有给指示，电报还是去桂林发来的，……。

杨福庭：我们今天吃晚饭时才收到电报，电报上说“一直在等中央指示”。

李日明：总理说有几次指示，我们都不知道。

总理：我打给军管小组的。

老保：他们带了非法的三百份广西日报，是司炉检举的。

总理：派别斗争弄到车上去了。

老保：他们（指我们）保皇派……。

总理：什么保皇派！他们保哪一个我还不知道哩！

老保：机务段的都是他们的人。

总理：到柳州应该换乘务员。

老保：没有换。

总理：应该让别的人上去（开）嘛，是铁路局本身不对嘛！

曾春生：我谈谈广西日报问题。

总理：有广西日报吗？我看看。（龙智铭送上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八日的广西日报给总理。）

曾春生：这个（指刚才发言的老保）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封左庭，大右派的儿子，……。

老保：（指曾）混蛋司令官！

总理：你（指老保）为什么骂人？！广西日报到底是什么观点，你们不能同意呢？（看广西日报，转向我们）你们这样登消息，总是一派的，成了派系的报纸，超过了中央给的权力。当然，他们说“非法”也不恰当，抢报纸也不对，因为报纸，停了五天，你们好好想一想，不要生气，这些都是问题。在这条战线上出了一个丑，就是重伤了也不能让列车停啊！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阶级兄弟嘛。

李日明：过去他们也是一派的！

总理：军管的报纸支持一派，他们是错的。中央对广州日报的处理已经很明显，两派有争论的文章就不登，中央为此就让你们参加版面小组。

李日明：他们不给我们参加版面小组。

总理：后来又是怎样参加的？

杨福庭：我们于五月二十七日夺了版面小组的权。

总理：夺到手，又登你们这一派的东西了。

李日明：我们出版报纸，他们去围攻，打伤我们三百多人。

总理：《广西日报》的事放到后面再说。我问你们。赞成不赞成铁路军管？

（众：赞成）。你们赶快打电话回去，那一派打人，惩办。你们（对老保说）抢报、检查国际列车邮件，抢了国际邮件是很错误的！你抢什么广西日报，他们还不是收到了。即使是派系报纸，抢也是无理的。乘务组也有两派，有人通消息，抢报纸这件事就很不对，动员农民去抢就更不对头！

白舰平：他们打了人，又抢了邮件箱。

总理：（很气愤）他们来了两百多人。又打人又抢邮件！

白舰平：抢了两件邮包，有越南友人作证。

总理：你们总是考虑派系利益，不考虑国际影响。要首先顾大局。十一号开出，南宁车站就通了消息（给老保），打电话去作了准备，打伤了几个人，又抢东西。昨晚我同黄永胜通了话，黄永胜说要劝一劝，大军区不愿施加任何压力。……

龙智名：在黎塘打人时，司机就打电话给金局长，要他处理，他答应到柳州处理，到了柳州，他又不处理了。

总理：……，轻伤不下火线嘛，国际列车不能误点，这是国际信用问题。你们那里是前线，是一等备战地区，为什么敌情观念这么弱？就是没有把毛著学到手。

到处打人，根本不顾整体利益，脑子发热到了一百度。

十二号凌晨到了柳州，如果是我受伤，我就不下火线，我一定开车，这才是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是为了派系利益，抢报纸，打人，你们什么也不顾。这点你们（指老保）就不说。你们车站也是派系斗争，这也是两条路线斗争吗？……，解决不了，先开车，然后两派派代表上京谈判。但你们的人还是坚持三条，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全局，只听自己同样的话，就是听不进我们顾全大局的话呢？你们满脑子反毛泽东思想，我两派都批评。他们抢报纸不对，打人更不对。你们这一派如果顾全大局，就应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换一个，照开车。你们的三个条件，头条我就无法实现，当时不可能交出凶手，凶手在黎塘（按：实际上凶手就在列车上，是位列车员。因我们当时不了解情况，没法回答总理提的问题。）到柳州能抓到吗？

这就是派系利益，超过了国家利益！这是你们两派的战术。这是国民党作风。北航红旗还搞了本武斗战术，简直是太不象话，荒唐。

白舰平：他们根本不答应这三条，也没有把指示传达下去。

铁道部军管小组副组长：我亲自给工人打了电话。

总理：他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派，来了可以处理，结果列车现在还没开出，即使是司机被打了，到了柳州也应该换司机，新司机他也不开，无伤不上火线。国际列车不开了，你们就不考虑国际信用，还有什么感情！

如果有挑拨我们和越南的关系怎么办？援越他怎么还相信！我一来就生气，应该不应该？（众：应该。）我是为国家生气。我一直等待觉悟，四天了，七十二小时停在柳，你们还把车头开到岔道口，这就更错了，就严重一点，这是破坏行为啊！你们就是义气用事，就是三个条件，不实现不行，明知作不到嘛。我知道你们对军区不满意，所以对柳州军分区也不满意。这是公事啊！凶手只能查，那里一下就变得出？（龙智铭：在黎塘就应捉凶手！）那里抓得出，打群架，一下就交得出凶手？要等到群众觉悟了，才能找出凶手，打群架难查，除非打死人。交出凶手不能随便答应，答应交不出怎么办了交不出我来顶要不要，（大家沉默不语）当然罗，我们做领导工作的没把你们教育好，我们有责任嘛。作为省委工作的负责同志也应该想想，你们也有责任（很生气）。伍晋南同志，这是路线斗争吗？（伍：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我们北京的打群架的很多，凶手一下子抓不出来，等群众觉悟才能交出，不然他们就都是凶手，你怎么办？不能随便打人，但我只能说追查凶手。七条通令你们看到了，法律完全有根据的，黄永胜打了电报给广州。第二个司机把车开到岔道上，本来中央拟好了命令，最后就等我批了，但我一直把它压下来，不愿批发。你们知道吗，命令一下，就要抓人。我知道你们与军区很对立，命令下去，还不知道子弹会不会飞出来（做了个手势）。

一个派系对一个派系，勾心斗角，两派都不对，保的保错了，允许的嘛，军区支左还有支错的，何况小将！

李日明：我代表我们代表团，同意总理意见。我们不开车错了。

总理：你怎么能代表，你们又没有商量。（我方全体代表：我们用条子商量了。）

李日明：我们要求追查打人凶手，要揪出幕后策划者。拿广西日报就挨打，人身没有保障。

总理：广西日报等下再说，要叫那个车子开上来。被打的陈振民让他来，司机能来也让他来。来了之后，你们先跟他们谈，不要肚子气，还是把车子开来，乘务员也来。在铁路打司机打乘务员，从今年一月就开始了，也是京广线，从衡阳一直打到岳阳，他们到北京来，我一夜就说服了他们。我没有料到在广西出这个乱子。你们打个电话，两派都要说，你们（指老保）同意不同意？（老保：同意。）我们希望你们广西不再发生打人的事。特别是铁路。国际列车那一组所有的人都来，有好处，对他们教育教育。

广西军区要负责，通知各军分区、野战军，无论如何不能叫农民到城市闹事，打群架，农民进城就会冲突。（老保：他们挑动农民进城抢了粮食局。）你们又在那挑起事（指责老保）！你们两派达成个协调！

铁道部：刚才凭祥还有农民在打架。

总理：叫军分区和野战军负责处理。

白舰平：再打伤我们也保证开车。

铁道部：香港市场脱销，很多物资又运不出去，希望同志们了解和考虑。

总理：香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祖国同胞，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反帝反修。码头装卸要快，有的四十多天不装货。你们都是学生，区党委的同志不会不知道，就是不关心这些事，只考虑影响自己那一方。

你们两派各派三个人达成协议，试一试。

报纸问题，全部登北京消息，新华社电讯很多，足够你们登四版。（总理秘书把伍、贺、霍三人支持新生广西日报的传单给总理）伍晋南，你打过电话吗？（伍：是的，）说韦国清遥控，究竟是谁遥控？在这里开会的包括军区都不要打电话回去。

白舰平：老保到处造谣说毛主席说韦国清是好同志。

总理：（很生气）你们逼我说，我不得不说一下，本来还不想说的。主席是说过，但不是这样说，是谁传出去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传。

白舰平：他们还造谣说总理代表中央公开表示支持韦国清。

总理：（生气，激动）上次康生同志已说过了。当然罗，支持韦国清，是要他回去做检讨。韦国清在越南是有功劳的，越南同志很尊重他，你们是学生，不要上人家的当，要独立思考。军区没有把工作做好，引起你们很大的反感。

报纸不要办成派系报纸。你们先占住，最好不登广西本地消息，全部登北京、新华社电讯、人民日报社论，这样你们就主动了。（答：我们同意）。

杨福庭：总理，《广西日报》我们要求发行。现在，广西比较好的只有《新桂林报》，但他们给卡住。我们强烈要求发行广西日报。广西各个角落的人民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总理：你们出电讯，他们不发行问题就在他们了。《广西日报》问题，一步步解决。

（缓和地）说支持韦国清，并不是不要他检查，他一定要检讨，他一定要检讨，他也表示要检讨，你们两派吵得这样凶，他怎么回去检查？所以才叫你们双方来嘛。

……

曾春生：广西日报问题是军区搞的，总理有时间的话，我谈一下……

总理：你们回去达成协议，达成协议才是革命派，不然就不是革命派。

（我们答：我们保证按总理的指示办事。）

老保：（气势汹汹）根本的问题是恢复军管……

总理：什么根本问题，你们这样急干什么？根本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嘛（老保还要闹，总理很生气）你们再这样争，那就收回我的话，由你们打去！（老保见总理生气，便软了下来）今天不是全部解决，广西日报问题暂时这样办，其他以后再谈。

（老保又继续吵吵嚷嚷，总理生气的离开了会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周恩来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该谈话纪要的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以及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不尽相同，按序收录於下。〕

一、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二十一时二十分至十六日零时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出席接见首长：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戚本禹

被接见的有：广西赴京代表团双方代表，韦国清、陈发洪、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

总理：今天车开出了吗？

联指代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于今天上午九点三十八分开车了。

总理：达成协议没有？

李××（桂林“老多”代表）：没有商量。

总理：今天接见三个钟头，因还有别的事。

廖伟雄（“联指”代表）：上次接见后，有些人说：你们说霍泛是叛徒，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我今天再来落实他的材料，看你们（指“四·二二”）还保不保！（接着详细的谈从敌伪档案查来的材料，当谈到霍泛在上诉书中说他参加了陈立夫、陶希圣组织的读书会，廖质问霍泛是否参加 CC，要老实交待时，霍泛颓丧地说：“根本没有”）

总理：（对廖）你不要问他，你说你的。

廖伟雄：由伍、贺、霍组成反革命联盟后，“走资派”、牛鬼蛇神纷纷投靠，举几例……（当说到谢王岗时）

康老：我提供一点材料，他 39 年在合浦县委，组织被破坏，是个特务破坏的，谢与特务杨福有关系。

廖伟雄：还有民主党派的二十二二人参加了“四·二二火线指挥部”，成了“革命领导干部”。

四·二二代表：造谣。

雷激（“四·二二”代表）：刚才区党委组织部廖科长把我们红卫兵自己搞的“四·二二火线指挥部”说的一塌糊涂，我们不能容忍。他们说支持我们的都是“走资派”，请首长调查。另外我要声明一点，我们的行动不受伍晋南支配。一中军训团团长孔竹指挥一中受蒙蔽的红卫兵围攻《指点江山》，西大“革联”去支援，一中红卫兵以赶“革联”同学为名，挑起武斗，使用农药六六六粉、石

灰，把我们受伤的红卫兵塞进防空洞，烧六六六粉，用鼓风机吹，不知死了多少人……

总理：有这样的事吗？军区同志，这里有军用电话，赶快打电话查有无此事，如有，马上放人出来，对受伤的要治疗。（王希永同志听了总理指示后，马上出去打电话。）

雷激：十四日他们从冻肉厂运来四十多把杀猪刀，三卡车石头，有铁钉木头，见人就打，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将被挖了眼睛。

康老：（怀疑地）你们是从电话听来的？

雷激：是的，还打死八个人……

总理：不管哪一派，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这妨碍生产，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

雷激：他们打伤了我们三百五十七人。

总理：（怀疑地）你们要核对事实，将来要查的。

龙智铭（四·二二代表）：从六个医院查来的数字，（念住医院人数）。

总理：你们调查很快呀！

雷激：还有从罗文农场调来六百劳改犯搞武斗，打我们。（联指代表当即说：罗文农场根本没有劳改犯。）

总理：一中《指点江山》有多少人？

雷激：两百多人。

总理：伤的就不仅这个数字呀！

雷激：我们有人去支援的，也被打伤。

总理：我们有个调查团，去调查，如果没有这些事怎么办？

雷激：我们有些红卫兵的行李被淋上汽油烧了。市公安局还用望远镜指挥武斗，他们说这是群众运动，我们管不了。有的群众跪在解放军面前，他们见死不救。我们到军区，他们不让进，我们手挽手冲进去，他们说我们打伤解放军战士，也不出来解决。“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部队”的负责人都被打伤了，这是军区一小撮“走资派”一手策划的。

胡立辉（“联指”代表）：我是一中红卫兵，我来揭发他们刚才在总理面前的造谣。一中来电，我念一下，（接着念来电）军训团几十名战士已被打伤了。

康老：是不是你们也在动员外面的人来支援？

胡立辉：我们没有动员。

康老：是不是他们在家动员了你不知道？

廖伟雄：（插话）据了解双方都有，因为他们打上门来，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康老：（点头）这还差不多。

李日明（桂林“老多”代表）：我是桂林“老多”的，宾阳事件……

总理：你们“老多”打遍全广西罗！还到宾阳、南宁，你昨天承认不开车是不对的，我很欣赏这点。今天你应反对武斗。

李日明：（又说一中如何如何）他们造谣说粮食局被抢，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钦州以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为名，调农民进城，砸红卫兵一、二、三司令部。

总理：你又讲到钦州去啦！（做手势，表示“老多”到处去）

李日明：他们还调动排洪民兵到农校，到农民家里搜捕“老多”。

总理：你们去了几个人？

李日明：去了三十七人，他们毒打后扔到大塘里。

总理：后拉上来啦？

李日明：我们造反派拉上来了。

总理：现在回来了没有？

李日明：已经回来，钦州红卫兵静坐斗争，已有二十多天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办法不好，但……容县学生上课，写作文，都写“老多”滚回老窝，唱歌也唱桂林“老多”滚蛋！放幻灯也放“老多”滚……

总理：（看送来的文件）火车于九点多钟开出，但中途又被截，昨天已呼吁了……

戚本禹同志：（非常生气）这是破坏，简直无法无天了，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是这样。

康老：（非常生气）你们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管你们那一派，在广西出现这种情况是奇耻大辱，你们双方代表不感到羞耻吗？你们这样搞实在不象样子，再这样搞，《人民日报》公布你们的材料，看你们垮台不垮台。

戚本禹同志：我看按照康老的办法，公开批评，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李日明：（急忙地）我们没照顾国家大局，我们错了，已打电话回去，要顾全大局，不再这样干了。

廖伟雄：今天开车是我们的人开的，他们进一步反对总理的指示，拦车。

李日明：荔浦……

陈伯达同志：不管那一派，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是个政治错误。国际列车不开，对你们那一派有利呀，这是破坏祖国荣誉。

康老：（很生气）只有一条，对反革命有利。

陈伯达同志：我同意康老意见，不管那一派，要通报全国，你的英雄就破产，全部垮台了。不管那一派，要保证国际列车通行无阻。

李日明：在荔浦我们运了两千多张《广西日报》，他们煽动农民来抢，把我们的人也打伤了……

总理：你们多少人在那里？

李日明：二百多。

总理：你们回本地闹革命不好吗？你们开始革命造反精神好，现在各地起来了，还包打天下呀？！

陈伯达同志：（严肃地）不能包办代替，搞过头了，会走向反面的。

总理：太平天国起来以后，发展很少，光是广西佬，外面的不发展，后来就失败了，但那还是农民罗！……

李日明：桂林市公安局，六九五五部队派人到荔浦去调查，荔浦方面也说是假的，我们有的人被捉去游街、劳改，脚起泡了，有的人被灌大粪……

总理：你们还是回本单位去，到处包打天下，会走向反面的。

陈伯达同志：搞过头就会走向反面。

总理：桂林“老多”开始创业时不错嘛！现在你们回去搞好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不好吗？你不到处去，谁还会打你们。你们桂林“老多”进《广西日报》报社后，搬走机器是否有这回事？

李日明：没有！没有！

总理：（又问）一点都没有动吗？

联指代表：运到荔浦有发电机。

×××：（另一桂林“老多”代表）运有扩音机、发电机，是我们宣传车上的。

总理：你们看社论了吗？不要再搞宣传车了。

李日明：我们没有，都赤脚走天下，是有名的，写标语用泥来糊。

任树人（“联指”代表）：“老多”的宣传车还在南宁出现。

总理：你们广西老百姓，生活是艰苦的，要保持这一光荣传统，红七军赤脚走天下，是有名的，写标语用泥巴来糊一般还可以保持五天。

李日明：广西各地以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会为名，调动农民进城，层层布置抬韦国清，抬得快的，会就结束快……（王希永同志电话调查回来，将材料交总理。）

总理：（边看边念）军区调查，自十三日起有武斗，西大“革联”、“工总”、二中“赤卫军”三、四千人围攻一中，支持一中的也来了三、四千人，军训团的解放军被打伤了几人，孔竹被斗争，军区宣传车被砸坏一辆，（总理说：“我建议你们回去不要用宣传车，反正出去是被砸的，砸了汽车，是个损失，广西是前线、需要用车”。）双方伤三百多人、没有六六粉熏防空洞的事，现武斗已基本停止。《解放军报》记者王荔报告：十三日打起来，发生武斗，汽油烧被子的事，记者进不了现场，无法了解，挖眼睛的事没发现，确实被打四百多人，伤一百多。《红旗》杂志记者报告：武斗确是十三日发生，情况与上差不多。（念完后）总理又说：不要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你们在这里商量解决广西问题，不要在家搞武斗。

冯东晓（“联指”代表）：我是市委兵团的，要求发言。

总理：还是谈打、砸、抢呀？

冯东晓：不谈这个，谈别的。（总理点头答应。冯揭发了伍晋南是广西文艺界右派的总后台的很多材料，揭发伍晋南收罗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作为“四·二二指挥部”的干将。）

明在胜（柳州职工总部代表）：柳州军分区支保。天天搞武斗、抄家。

李日明：广州军区政治部派了几百名记者到广西，不同观点的就收集材料……

总理：有几百名，那么多？！

李日明：发现记者证发到几百号！

任树人：（发言把伍晋南怎样两面三刀，怎样刮三月黑风，如何策划把矛头指向广西军区的罪行加以揭露）。

石怀宇（“四·二二”代表）：我们刚才接到电话，武斗并没有制止，军区谎报……在军区策划下公安厅放出六百多劳改犯参加武斗，我们已经抓到两名，他们承认了。军区支持的没有一个是左派组织，也不敢讲那个是左派组织。（还气势汹汹的问徐其海同志）

总理：（制止）你讲你的嘛！

石怀宇：军区调动农民围攻西大红卫兵……

总理：时间已经到了，有几件事弄清一下：第一，这边（指联指）你们劝说开了列车是对的，但一定要说是伍晋南策划还没有调查清楚，若调查清了，要处理的，但是，他们冲击报社，还打了贺电，这完全不对嘛！

康老：（对伍、贺、霍）你们在北京遥控，还搞这一套，是不可理解的。

总理：你们说韦国清遥控，事实上，我问他很多广西的事情，他都不知道。而伍晋南你们和他们住在一起，很了解，消息很灵通，是不是住在一起？（“老多”代表插话说：“他们住在旁边”。）（联指代表揭露：住在中间，还经常一起开会。）

总理接着说：再这样搞，我就隔离你们。第二，武斗问题，我们打电话给军区，要立即制止，广西是前线。你们（指联指）说得对，为什么到报社静坐，旁边就是越南领事馆，敌机又在空中侦察……，对军区有意见可以提，也可以批评，但不能采取那样的办法。你们（指“四·二二”）要独立思考问题，革命靠自己。我建议你们双方对开车问题，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问题，达成个协议。（这时桂林“老多”递了个条子给总理，总理又转给康老，条子的内容大意是桂林“三结合”条件成熟了，要求中央承认）

康老：（看了条子，很生气）你们“三结合”条件成熟不成熟我不知道，从你们口中说的都是对解放军很大的攻击，就靠这条还能“三结合”？！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席讲“三结合”“三依靠”，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没有解放军，就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区，野战军可能有些缺点错误，但是你

们（指“四·二二”）这一派从来未讲过解放军一句好话，今天我不是考你们，中央关于军训头一句的五个学习是什么？（“老多”代表李日明答不上，支支吾吾说：“康老，我想到一个问题”。）

总理：你们不知道就讲不知道嘛，不要不懂装懂。

康老：你们不是说拥护解放军吗？你们连中央通知中第一句话的五个学习都答不出来。我们还没考你们呢，要学习的十五个文件是什么？（李日明又说：“康老，康老”企图打断康老的讲话）你不要讲，听我的嘛！（很严肃地）几次会，你们都攻击解放军，难道解放军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不好，不可依靠、不可相信、不可学习吗？你们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好好端正态度。伍晋南你这个老红军，我希望你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总理：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

康老：再插手，我们就隔离你们。（接着又问伍晋南）你发电报支持冲击《广西日报》？（总理插话说：“这个他昨夜就承认了。”）伍晋南，我要警告你这个老红军，再这样活动要注意。到北京还活动，真是不可理解。

总理对“四·二二”学生代表说：要独立思考，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晚九点十八分至十二点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一厅

九点十八分，总理、伯达、康生、戚本禹等同志进入会场。

总理：今天车开出了吗？

我方代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于今天上午九点三十八分开车了。

总理：达成协议没有？

“老多”李××：没有商量。

总理：今天接见三个钟头，因为还有别的事。

我方代表：上次接见后，有些人说：“你们说霍泛是叛徒，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我今天再来落实他的材料，看你们还保不保！

“八·八”雷×造谣说：一中军训团团长孔竹指挥受蒙蔽的一中红卫兵围攻“指点江山”，“西大革联”去支援，一中红卫兵以赶“革联”同志为名，挑起武斗，把我们受伤的红卫兵塞进防空洞，烧六六六粉，用鼓风机吹，不知死了多少人。

总理：有这样的事吗？军区同志赶快打电话查有无此事，如有，马上放人出来，对受伤的要治疗。（王希永同志听了总理指示后，马上出去打电话）

“八·八”雷×：十四日，他们从冻肉厂运来四十多把杀猪刀，三卡车石头，有铁钉木头，见人就打，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将被挖了眼睛。

康生：你们是从电话听来的？

“八·八”雷×：是的，还打死八个人……

总理：不管那一派，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这妨碍生产，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

“八·八”雷×：他们打伤了我们三百七十七人。

总理：（怀疑地）你们要核对事实，将来要查的。

“火种”龙××：从六个医院查来的数字（念医院人数）。

总理：你们调查很快呀！

“八·八”雷×：（又造谣）还有从罗文农场调来六百劳改犯搞武斗。

（我方代表老苏马上揭露：罗文农场根本没有劳改犯）

总理：一中“指点江山”有多少人？

“八·八”雷×：两百多人。

总理：伤的就不仅这个数字呀！

“八·八”雷×：我们有人去支援的，也被打伤。

总理：我们有个调查团。去调查，如果没有这些事怎么办？（6）

“八·八”雷×：（继续造谣）我们有些红卫兵的行李被淋上汽油烧了。市公安局还用望远镜指挥武斗，……这是军区一小撮“走资派”一手策划的。

陆××：我是一中红卫兵，我来揭发雷×他们刚才在总理面前造谣，一中来电，我念一下（接着念来电）。军训团几十名战士已被打伤了。

康生：是不是你们也在动员外面的人来支援？

陆××：我们没有动员。

康生：是不是他们在家动员了你不知道？

我方代表插话：据了解双方都有，因为他们打上门来，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康生：（点头）这还差不多。

李××：我是桂林“老多”，宾阳事件……

总理：你们“老多”打遍全广西啰！还到宾阳、南宁，你昨天承认不开车是不对的，我很欣赏这点，今天你应反对武斗。

李××：（又造谣一中如何如何）他们造谣说粮食局被抢，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钦州以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为名，调农民进城，砸红卫兵一、二、三司令部。

总理：你又讲到钦州去啦！（做手势，表示“老多”到处去）

李××：他们还调动排洪民兵到农校，到农民家搜捕“老多”。

总理：你们去了几个人？

李××：去了七人，他们毒打后扔到水塘里。

总理：后拉上来啦？

李××：我们造反派拉上来了。

总理：现在回来了没有？

李××：已经回来，钦州红卫兵静坐斗争，已有二十多天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办法不好，但……容县上课、写作文，都写“老多”滚回老窝，唱歌也唱“老多”滚蛋！放幻灯也放“老多”滚……

总理：（看送来的文件）火车于九点多钟开出，但中途又被截，昨天已呼吁了。

戚本禹：（非常生气）这是破坏，简直无法无天了，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

康生：（非常生气地）你们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管你们那一派，在广西出现这种情况是奇耻大辱，你们双方代表不感到羞耻吗？你们这样搞实在不象样子，再这样搞，《人民日报》公布你们的材料，看你们垮台不垮台。

李××：（急忙地）我们已打电话回去，坚决执行。

廖××：今天开车是我们的人开的，他们进一步反对总理的指示，拦车。

李××：荔浦……

伯达：不管那一派，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是个政治错误，国际列车不开，对你们那一派有利呀，这是破坏祖国荣誉。

康生：（很生气）只有一条，对反革命有利。

伯达：我同意康老意见，不管那一派，要通报全国，你们的英雄就破产，全部垮台了。不管那一派，要保证国际列车通行无阻。

李××：在荔浦，我们运了两千多张《广西日报》，他们煽动农民来抢，把我们的人也打伤了，……

总理：你们多少人在那里？

李××：二百多。

总理：你们回本地闹革命不好吗？你们开始革命造反精神很好，现在各地起来了，还包打天下呀？

伯达：（严肃地）不能包办代替，搞过头了，会走向反面的。

李××：桂林市公安局，六九五五部队派人到荔浦去调查，……

总理：你们还是回本单位去，到处包打天下，会走向反面的。

伯达：搞过头就会走向反面。

总理：桂林“老多”开始创业时不错嘛，现在你们回去搞好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不好吗？你不到处去，谁还会打你们？你们桂林“老多”进广西日报社后，搬走机器是否有这回事？（李急忙否认：没有！没有！）

总理：一点都没有动吗？

我方代表：运到荔浦有发电机！

另一桂林“老多”：运有扩音机、发电机是我们宣传车上的。

总理：你们看了社论了吗？不要再搞宣传车了。

李××：我们没有。

“小8”：“老多”宣传车还在南宁出现。

总理：你们广西老百姓，生活是艰苦的，要保持这一光荣传统，红七军赤脚走天下，是有名的，写标语用泥巴来糊，一般还可以保持五天。（7）

（王希永电话调查回来，将材料交总理。）

总理：（边看边念）军区调查，自十三日起有武斗，西大“革联”、“工总”、“二中赤卫军”三、四千人围攻一中，支持一中的也来了三、四千人，军训团的

解放军被打伤了几个，孔竹被斗争，军区宣传车被砸烂一辆，（总理说：“我建议你们回去不要用宣传车，反正出去是被砸的，砸了汽车，是个损失，广西是前线，需要用车。”）双方伤三百多人，没有六六六粉熏防空洞的事，现武斗已基本停止。

《解放军报》记者王荔：十三日打起来，发生武斗，汽油烧被子的事，记者进不了现场，无法了解，挖眼睛的事没发现，确实被打四百多人，伤一百多。

《红旗》杂志记者：武斗确是十三日发生，情况与上差不多。

总理：时间已经到了，有几件事弄清一下：

第一，这边（指我们）你们劝说开了列车是对，是不是伍晋南策划还没有调查清楚，若调查清楚了，要处理的，但是，他们冲击报社，还打了贺电，这完全不对嘛！

康生：（对伍、贺、霍）你们在北京遥控，还搞这一套，是不可理解的。

总理：你们说韦国清遥控，事实上，我问他很多广西的事情，他都不知道，而伍晋南你们和他们住在一起，很了解，消息很灵通，是不是住在一起？（“老多”代表替主子辩解：“他们住在旁边”。）

我方代表狠狠揭露：住在中间，还经常一起开会。

总理接着说：再这样搞，我就隔离你们。

第二，武斗问题，我们打电话给军区，要立即制止，广西是前线，你们（指我们）说得对，为什么到报社静坐，敌机又在空中侦察……对军区有意见可以提，也可以批评，但不能采取那样的办法，你们（指保伍派）要独立思考问题，革命靠自己。我建议你们双方对开车问题，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问题，达成个协议。（8）（这时桂林“老多”递了个条子给总理，总理又转给康生同志，条子内容大意是：桂林“三结合”条件成熟了，要求中央承认。）

康生：（看了条子，很生气）你们“三结合”条件成熟不成熟我不知道，从你们口中说的都是对解放军很大的攻击，就凭这条还能“三结合”？！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席讲“三相信”“三依靠”，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没有解放军，就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区、野战军可能有些缺点错误，但是你们（指保伍派）这一派从来没有讲过解放军一句好话。今天我不是考你们，中央

关于军训通知中头一句的五个学习是什么？（“老多”李××答不上，支支唔唔地底着脸皮说：“康老，我想一个问题。”）

总理：你们不知道就讲不知道嘛！不要不懂装懂。

康生：你们不是说拥护解放军吗？你们连中央通知中第一句话的五个学习都答不出来，我们还没有考你们呢，要学习的十五个文件是什么？（“老多”李××还厚着脸皮说：“康老，康老”，企图打断康生同志的讲话）（康生同志很严肃地）你不要讲，听我的嘛！几次会你们都攻击解放军，难道解放军就象你们所说的那样不好，不可靠，不可相信，不可学习吗？你们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好好端正态度。伍晋南你这个老红军，我希望你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总理：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

康生：再插手，我们就隔离你们。（9）

注释：

（6）四·二二发表的记录中，总理以上十二段话全被删略，在这一段话里则加上一句：“如果真是这样，就是很不对啦！现在整个南宁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中，你们大会战呵！”

（7）以上七段对话，四·二二发表记录都删掉了。

（8）总理这一大段话，从“第一”起到此处止，四·二二发表的记录中，篡改成为这样：“你们不要作结论，你们也不要挑动农民的事都说成是军区搞的，你们自己要解放自己，不要依靠别人。领导干部能不能站出来，要看群众的意见。广西军区是大军区，我们要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介入武斗。广西是前线，是一等战备区，一有情况就要出兵，敌机经常来拍照，你们在下面乱轰轰的。军区做错了可以批评，可以协商，我们负责督促他们，广西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你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造反派，现在分成了两派，保守派就钻进来了。无论如何，双方都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影响生产。你们要靠自己，独立思考。铁路、制止武斗、挑动农民进城，你们自己达成协议，达成了，说明你们是造反派。”

（9）四、二二发表的记录，删去康老这句话，并把总理的话改为：“我再一次警告，伍晋南，你们三人再搞什么支持之类的东西，我就要把你隔离。”

三、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六月十五日二十时四十三分至六月十六日零时十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总理、伯达、康生、戚本禹等同志进入会场时，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笑）车子开了吗？

白舰平：今天九点四十五分开出了。

老保：报告总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出的。

总理：我看了你们打回去的电文，很好，这就解决了嘛。达成协议了吗？（答：没有）未达成协议不急，明天再协商。今晚谈三个钟头。一对一。（注：一对一的意思是发言时一个对一个。）

老保：首先把叛徒霍泛的材料落实一下（读霍口供及伪法院判决书，……。伍从四·一九后和贺、霍一起跑到西大，组织反革命司令部，牛鬼蛇神纷纷投靠。还说支持伍的领导干部都是坏蛋，走资派……。）

康生：（当老保谈到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时）是不是在党校学习的那个？（答：是）据我知道，合浦地下特委被破坏，与杨虎有关系，杨虎通敌，谢王岗跟他有什么关系么？（老保：没调查。）

老保：……，你们（指我们）保错了，尽管我们过去分歧很大，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反戈一击。

雷激：刚才×××攻击四·二二指挥部，这完全是造谣，四·二二指挥部全是学生，红卫兵的行动，全是自己干的，我们靠自己独立思考，不受任何人的支配，诬蔑支持伍晋南的都是走资派，请中央调查。（接着谈一中惨案，揭露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保守派及放出劳改犯屠杀红卫兵小将的残忍手段。如把伤员丢进防空洞，然后烧六六六粉等。

总理：有这样的事？广州军区的同志，你们听到了吗？马上打个电话回去查一查。（王希永出去打电话）如果有，马上放出来，恢复健康。不管那一方，都不能调动农民进城。（雷激还讲了调动农民进城和用劳改队屠杀造反派，小孩也被挖眼睛，重伤 357 人等情况。）真有这回事么？（惊呀）可组织一个调查团去调查。材料要落实，如果真是这样，就很不对啦！现在整个南宁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中，你们大会战啊。

老保：（反咬我们一口，说“指点江山”一小撮勾结西大“革联”对一中进行阶级报复。诬蔑我们企图对他断水断电。还说我们动员了三万人来包围他们。）

总理：断水断电，真的？（老保：除水厂、电厂外，一律罢工。）你们有多少人？（老保：有一千五百多人，一中红卫兵团九百多，“指点江山”有二百多）你们一千多人都给包围，你们不动员人来围么？

老保：没有！没有！

康生：动员了你不知道吧？（笑）（老保：没有。据我知道的没有！）

老保：（为伙伴解围）两边都有。

康生：这还差不多（笑）。

总理：这样讲还老实点。

李日明：我讲宾阳事件。我最清楚宾阳事件。

总理：呵，桂林老多，我很欣赏你的态度，第一个冲口讲不开车不对。你们在桂林很好，出去外面也要反对武斗。

李日明：我坚决反对武斗，现在广西各地武斗成风（接着谈了广西各地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军区以“学毛著讲用会”开“三级干部会”等办法大抬韦国清，大树韦国清个人威信及打击造反派的情况……，）（有人把电报递给总理）

总理：（有点生气）列车到现在还开不出广西。

康生：（很生气）这那是革命，这是无法无天。

戚本禹：（生气）这是破坏！

康生：（很生气）广西出现这种事情，这是广西的奇耻大辱，你们的两派代表到中央来，你们感到羞耻不羞耻？！

总理：（较缓和地）你们赶快达成协议，达成后，要在广西日报上刊登这个消息。

康生：（很生气）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你们，让全国人民来批判你们。

李日明：我们已打了三个电话回去叫开车，今天来电话说已开到桂林，（接着谈荔浦事件，指出农民被挑动进城围攻造反派。）

伯达：不管那一派，动员农民参加武斗、拦车都是政治上的错误，要保证国际列车通行。……现在还没出广西，破坏了祖国的荣誉，对你们有没有好处？在政治上犯了大错误！

康生：（很生气）这是国际列车！

伯达：不要考虑派别利益。

戚本禹：我同意康老的说法，要在人民日报通报批评，不管是那一派！

伯达：要通报，按级通报，该通到那一级，就通到那一级。一通报你们的名誉就扫地，不管你是什么英雄，都要垮台！

李日明：（继续谈荔浦事件）。

总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我知道，桂林一开始就搞得不错嘛！你们原来是师院罗，文化大革命改成“革大”。老多为全区文化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嘛！我们认为桂林搞得很好嘛！

伯达：走过头了，就成反面。

总理：（向伯达讲）桂林是搞得不错。我和你们商量一下，现在大家都起来了，你们可回来了嘛。象红代会一样。不然，到处的老多都被围，各处都打电话来给你这个头头，向你告急求援，你这个头头连接电话都接不行。

伯达：不要包打天下了，回来把斗、批、改搞好。

杨福庭：我们原计划是派一百多、两百人左右出去搞调查，不是串联，这对我们家里没影响，对全区文化大革命也有利。后来因被走资派煽动农民来围捕。有的去增援，现在可能增多了一些。

李日明：钦州只去了七个“老多”，却调动一万多人来搜捕。

杨福庭：容县去进行调查的只两个“老多”，也调动两三千人来围。

总理：于是，你们“老多”就越去越多了！你们“老多”是革大还是桂林市学生？

李日明：开始时是“革大”多数派，后来中学生也叫“老多”。是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

杨福庭：在桂林市还是指“革大”，出去就把这个含义延伸了。

总理：现在和你们商量商量，把“老多”调回来，搞好本单位斗批改，也就是支援嘛！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相信那里的人能搞好。不然后人家反感，到处围你们。

总理：（说了一段历史）：一百多年前，广西太平天国（？听不清）到处打天下，没有根据地，本地巩固不了，结果都失败了。

杨福庭：荔浦事件中，我们经过荔浦的四五批人都被拦劫，连调查组也被抓了。（叙述几批人经过）。

李日明：（继续荔浦事件）“老多”被抓，白天劳改，晚上游斗，灌大粪，……。

伯达：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国民党对待老百姓的手段。

总理：（关怀地）如果真有这回事，我们马上叫放出来，出来后可要回去。

康生：要回桂林去，把桂林搞好，做个榜样，你们桂林确实搞得不坏嘛！

李日明：凡路过荔浦的都要检查，他们扬言：陈伯达过也要检查。（总理和伯达相视而笑）

李日明：（谈宾阳事件）

总理：我问一件事，进了广西日报后，“老多”是不是运走了广西日报的机器回桂林？

杨福庭：没有，是运广西日报和我们自己从桂林拿到南宁去的广播器材，一个发动机和一些喇叭。我们今天来了人，核清了事实。（秘书送来电报给总理）

总理：有几个电话材料，念给大家听听。

（一）王希永：从十三日起，西大革联、工总、二中井岗山有三千人围一中红大会，一中红大会也有三、四千去支援，军训团有三、四人被打。军训团长也被打伤，军用宣传车也被砸。（总理：被砸也好，你们可以不用了，但砸了战备物资受损失）伤员没有放入防空洞，今天下午停打了。人还未散开。

（二）王荔：确有武斗，伤四百多人属实，重伤一百五十多人，因进不去现场，所以死人没看到，……。

（三）记者：十三日至十四日确有武斗，记者进不去。

总理：进不去，要调查，煽动农民进城不好，影响生产，……有两件事，一件保证铁路畅通，一件不要大打。

冯冻考（老保）说伍是大右派，是文艺界右派的黑后台，文化大院如今是白色恐怖的中心，也是伍搞的，……。

明在胜：（谈柳州军分区支保不支左）

（李日明给总理递交挑动农民进城的通告和被没收的伪造新华社记者证。）

任树人（老保）：（说伍是两面三刀，污蔑伍给 4·22 静坐捐钱，说在广西日报静坐时，有美国飞机来，也与伍有关系，……。

总理：这个上次不是说了嘛，简单一点！

石怀宇：（刚接到电话）广西军区刚才又谎报军情，武斗并没有结束，造反派死了二十多人，公安局放出六百多劳改犯，要他们立功赎罪，（接着揭露军区对“红总”和八·三一又打又拉的阴谋）

总理：今晚就谈到这里。你们都已打电话回去了，车开了，这是好的，你们（指老保）不要什么都扯到一块，不开车也扯到伍晋南，广西日报伍是支持了，这不对。

康生：有吗？伍晋南？

总理：他承认了的。

伍：有。

康生：到北京还这样活动。

总理：你们（指老保）不要作结论，你们（指我们）也不要挑动农民的事都说成是军区搞的，你们自己要解放自己，不要依靠别人。领导干部能不能站出来，要看群众的意见。广西军区是大军区，我们要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介入武斗。广西是前线，是一等战备区，一有情况就要出兵，敌机经常来拍照。你们在下面乱轰轰的，……

军区做错事可以批评，可以协商，我们负责督促他们，广西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你们中大多数都是造反派，现在分成了两派，保守派就钻进来了。无论如何，两方都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影响生产。

你们要靠自己，独立思考。

铁路、制止武斗、挑动农民进城，你们自己达成协议，达成了，说明你们是造反派。（笑）康生同志，还有话么？

康生：（看李日明和杨福庭递的条子）李日明说桂林的“三结合”的条件很成熟，从你们对解放军来看，很难说“三结合”成熟。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三依靠，没有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广西军区、军分区，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你们从来不讲一句解放军的好话，你们两方都想想，学解放军有五个学习，你们学什么？中央通知第一句话如何说？我要考一考你们。（问李日明，李答不出）

总理：（笑）你说啦！记得就记得，记不得就记不得。

李日明：记不得。

康生：你们不记得，怎么能说解放军不好呢？还有十五个文件是什么？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好好总结一下，学习一下。

我提醒一句，伍晋南，你这个老红军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总理：我再一次警告，伍晋南，你们三人再搞什么支持之类的东西，我就要把你隔离。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该谈话纪要的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以及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不尽相同，按序收录於下。〕

一、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一时至三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

出席接见首长：周总理、康生、戚本禹

被接见者：广西赴京代表团双方代表

这次接见，主要是听取“四·二二”代表意见。

一中“指点江山”史妙甫等人讲南宁武斗情况，说是军区和韦国清挑起的。林业厅的宣传点是李殷丹、段远钟等人操纵的，后台是军区。六月七日军区在三〇三医院召开厅局长干部会议布置武斗。欧致富在会上讲了话。在文化宫也开党团员会，公安厅开处以上干部会，专门布置武斗。

又说：现在南宁发粮票分两种，他们买不到粮，没饭吃，不让他们回家，回去就打，有三千多人已跑到外地去了。

说：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每人给一条毛巾，上面印有“保卫祖国”四字，是军用的。

又说：韦国清和军区到十万大山看地形，准备打游击，准备到越南去。

这时总理插话：韦国清同志现在还在北京嘛，韦国清跟毛主席这样久，怎么能干这个事呢？

康生同志：贺希明是一九二九年被捕的，后来到国民党当高级军官，是桂系的，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霍泛是不是党员搞不清楚，是个叛徒。你们要和他们划清界线，这是对抗性的矛盾。当然，他们坏不等于你们坏。你们是受蒙蔽的。

总理：桂林“老多”过去是出名的嘛，“四·二二”是造反派嘛。你们造反的早，觉悟的晚。又指“联指”说：你们造反的晚，觉悟的早。

中央首长还对“四·二二”代表说：你们要帮助伍晋南同贺希明他们划清界线。

总理最后问“联指”代表：你们承不承认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

“联指”代表答：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理又问：“四·二二”代表：你们承不承认是人民内部矛盾？“四·二二”代表答：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理指示：你们回去好好学习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希望你们双方达成协议。并成立一个联络组，由王荔（解放军报记者）当组长，负责对你们的联络工作。

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至三十日三时三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一厅

接见的首长：总理、康生、戚本禹

总理：今天找你们双方代表来，铁路来的同志你们看到了吗？

我方：见了。

总理：双方好好商量，一个铁路上的事情，为什么这样闹？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争光，都要放在第一位，不是为了派别的利益，就不会发生停车这样的事了，你们这两派我以为可以放一下，因为已达成协议了嘛！本来想解决其他省的问题，但以后听说你们又闹得很凶李日明（老多代表）来了没有？

对方：李日明也回去了。

总理：为什么他要回去，不打个招呼呢，联络员知道吗？（联络员答：不知道。）

我方：李××也回去了，他们是回去指挥武斗的。

对方：朝杰差不多给你们打死。

总理：现在你们说说协议达成了，为什么不能执行呢？

对方区直革联、服务工读教师周××站起来干哭：（对方的其他代表也配合上几声干哭）。南宁现在造反派活不下去了。

总理：（笑一下）怎么会活不下去呢！两派都有死人，这是常有的事情。你不要这样激动，你不说就换个人说。

对方：（曾××站起来怒气冲冲的对着总理拍桌子）。

总理：（严厉的），你为什么要拍桌子，对我拍桌子是什么意思，你们这是对中央不满嘛！（这时，在场的解放军都站了起来。）（10）

康生：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拍桌子呢？

曾××：（脸色发白）我不是对总理，我是对韦国清的……

康生：韦国清不在这里，我们两个又不是韦国清，你们是怎么搞的？

总理：你们把事情说清楚嘛！我问你，青海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难道广西的问题解决不了吗？用激动的方式是不能解决问题。

曾××：（狼狈地）我错了。

对方：（大肆造谣，把“六·一三”一中事件完全歪曲，加罪于我方）。

总理：我问你们是不是占领了一些据点？占领据点便造成对立。

对方：我们造反派到处挨围，他们对我们实行大屠杀。我们只占领了展览馆、百货大楼、广西日报社。

总理：大家在演习作战，互占制高点。

对方：（继续造谣，一中指点江山的史××插话，总理打断他的话）。

总理：这个被挖眼睛的同学叫什么名字？现在在什么地方？送医院没有？看到了没有？

对方：我没有看见。有个十六岁的女孩，他们问她“四·二二”指挥部在那里，她不说，就被挖掉一个眼睛。

总理：“四·二二”不是公开的吗？为什么还要问？

对方：（不敢正面回答）有一个女的被砍成三截，一个被砍掉了脑袋，用麻布袋装好放在装西瓜的车上运走。

总理：那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你们怎么知道呢？

对方：天还未亮，我未看见。……他们要把我们杀绝。

总理：怎么杀得绝呢？（11）

对方一中“指点江山”史××讲军训情况，完全颠倒黑白，接着谈“六·一三”事件，造谣说：军训团长亲自动手打人……我们的行李全部被烧掉，我们死伤很多。

总理：到底是伤还是死啊！

对方：死伤难以知道。

总理：从十三日到十五日那不是打了一天两夜了吗？群众都不散，在那里看？

对方：后来发现了劳改犯，是从粮食厅旁边冲出来的。

总理：劳改犯是从粮食厅门冲进来的？

对方：后来劳改犯跑到永宁分局躲起来，又发生了永宁分局事件。还有孔竹……

康生：孔竹为什么跑到“四·二二”指挥部去呢？

对方：因为孔竹对武斗不负责任，是他自己去“四·二二”指挥部的。我们只有两个据点：造反楼、百货大楼。

总理：他们用武器，你们用武器没有？

对方：我们也用了。他们用军用卡车冲航运局的铁门，航运“工总”一千多人都退到船上。他们派炮艇来，我们要谈判，他们不同意……

总理：你叫他们反革命，他们怎么会同你们谈判？

对方：（造谣说郊区派出所调动人马去围攻文艺干校）攻航运局，有两个解放军指挥，还说：中共中央宣布，新“工总”是反动组织，……这是韦国清策划的。

总理：韦国清在这里，怎样去做这么多工作？

对方：（又造谣说军区如何策划武斗，欧致富做动员，还通过有线广播站宣传先镇反，后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等等。）

总理：刚才打电话查了，确确实实没有这个事，（对我方）你们进入广播站广播了没有？

我方：广播站是军管单位，我们没有进去。（12）

总理：你们承认不承认群众组织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

我方：承认。

对方：承认。他们是有后台指挥的。

总理：你说有人指挥，是什么人？

对方：李殷丹、刘毅生、江平秋、阎光彩、史清盛、管世新，组成高级参谋部。

总理：你们认为他们都是不好的？

对方：我们也没有这样认为。

总理：你们“四·二二”指挥部，对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你们认为怎样啦？

对方：我们的行动是不受他们干扰的，我们认为伍晋南是革命领导干部。

总理：他们三人在西大很久嘛？

对方：我们没有受他们任何影响。

总理：前几天我们证实了他们打电报回去，这就起了挑拨作用嘛。以后你们不跟他们联系行不行？

康生：希望你们对贺希明、霍泛研究一下，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历史调查调查，这是很容易的嘛。

对方：我们对霍泛已经组成调查组调查了。我们在广州发现贺希明一些线索。

康生：贺希明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你们知道吗？贺希明起初参加学生运动，在上海劳大被捕后，投靠桂系，十多年同党没有联系。他是国民党军一级的政治部主任，是反共老手。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兵力都消灭光了，他回去怕见李宗仁难

以交差，就又投靠了我们。他混进来后，是得到刘少奇的重用，马上当了解放区的一个县的县长。有人说是张云逸同志搞的，根本不是那回事。

总理：他们（指我方）揭发了很多材料，都是事实嘛，你们（指对方）应该看看。

康生：他是李宗仁的亲信，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你们（指对方）要清醒清醒，不要因为他们不好，你们也有什么不好，革命群众要同坏分子分开。你们要把这个包袱放下。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他是桂系高级军官，是反共老手，他是混进我们党的。

对方：我们是区别对待的。

康生：有这么一个人，混在我们队伍里，怎么行呢！在文化大革命里揪出这个人，是很大的胜利。霍泛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证明他是。如果你们要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他们的档案给你们看看，你们青年人，要好好的想一想，中央对你们还是爱护的，你们也不要背包袱，造反派不能同敌人——军官、叛徒混在一起。

总理：你们要和贺希明、霍泛划清界线，他们混进西大，把事情搞混了。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应当相信党中央，如果你们要和他们结合，那就危险啦。你们（指我方）也不要因为他们接近了坏人就攻击他们。你们（指对方）没有政治经验，那边（指我方）揭发，贺希明都不敢抬头。他是陶铸所赏识的，把他带到广东。你们要划清界线，这是对抗性的。你们过去保错了，要划清界线，你们“四·二二”，还是造反派组织嘛。你们（指我方）不要责备他们。现在你们喊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也喊你们老保，你们分成支韦派，保伍派，没有意思嘛，你们变成了什么革命组织，以后你们不要叫支韦，保伍了，你们革命组织有独立性嘛，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

戚本禹：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嘛，那有那么多派别？

总理：以后这种说法通通取消，你们“四·二二”，你们（指我方）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叫作“联指”。

康生：我具体的告诉你们，贺希明是在劳大被捕后自首的。你们（指对方）是受蒙蔽的。

总理：他们投靠你们（指对方）你们不要上当

戚本禹：他们投靠了你们（指对方）嘛。

对方：（柳州白××）我们上当了，我们错了。

总理：他们（指我方）揭发了很多材料，都是事实，你们（指对方）也应该把贺希明的历史调查清楚，你们可以合作吗？（对双方）。

我方：我们建议、关于贺、霍问题，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同他们联合起来调查。

戚本禹：这才是革命造反派的态度。

总理：这个就很好。他们（指我方）揭发的都是事实，都是有根据的嘛，你们要相信他们。没有他们（指伍、贺、霍）在你们就好解决了。

康生：个别地方有个苗头，江西发生夺枪，两方都要注意，不要夺枪，一动这个（枪）就危险啦，医学院物理室的东西，有毒害的，也不要动用，你们现在有点苗头了，一定要赶快制止。

总理：你们晓得吗？南宁有许多战备物资，如炸药。我们说做越南的坚强后盾，是越南的大后方，但你们天天搞武斗，越南同志看见了不难过吗？（13）

对方：（叫嚷他们的代表李××被我方抓住了）说：他快被打死了，总理命令他们放出来。

总理：（对我方）如果李××在你们那边，就把他放出来，错了就承认错误嘛。

我方：我们可以查一查，照总理指示办。

对方：说他们很多人跑了，南宁的居民都跑光了。

总理：居民跑光了，是不可能的事。

对方：（造谣说他们买不了米）

总理：都是挑拨。有人说韦国清跑到越南打游击，韦国清跟毛主席闹革命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韦国清不可能做这个事，你们不要相信，就是伍晋南也不敢做这个事。

康生：你们在北京写的传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知道了，他们高兴，他们如获至宝，他们抹杀我们的社会主义，他们最注意广西情况，以后你们不要在街上乱贴！（14）

总理：纽约、伦敦、东京、缅甸都在反华。现在世界革命在发展，反华逆流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广东组织一个抗暴委员会都不成，我到广州跟他们谈了四天，他们认为大敌当前，应该团结起来，即答应开大会，他们还鼓掌通过呢？可是后来还是分开来开。你们是越南的后方，是援越抗美的前线，闹到这个地步，那怎么成呢？

康生：缅甸一千多暴徒搞我们大使馆，把我们援助他们的专家都打死了。我这样想，在南宁能不能组织一个联合声讨缅甸的大会？但是我现在不提倡这样做，这会打起架来的。你们一讲就是别人不好，为什么不多做自我批评呢？

总理：问题不来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有人在挑拨。

对方：（东方红医院的医生，歪曲一中事件的情况）。

总理：你们公安造反要慎重。

我方：我们是很慎重的。

对方：（继续讲一中事件）

总理：别说煽动性的话，说事实嘛！（15）

戚本禹：一中的问题，谁是谁非，谁负责任，我们都清楚啦，你讲简单些，总理两天没休息了。

总理：你们说的，劳改犯是农场出来的，还是监狱的，在企业留用的，还是劳改期满释放的？

对方：农民搞武斗，发背心、水壶、球鞋、毛巾……有个“老多”记者在一中被打打得半死……

总理：你们应该回去查一查。

我方：可以查一查。

总理：你们叫这边老保，他们又喊这边是牛鬼蛇神，都不要喊，双方都是阶级兄弟犯点错误嘛，比敌人的骂法还厉害，你们军区也承认，双方谈判时，互相谩骂。现在来北京谈判，双方要好好想想。首先要冷静，听了情况，把要害问题讲一讲。今天我耐心听了你们的发言，这边（指我方）态度很好嘛。

康生：你们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戚本禹：由联络员组织你们学习。

总理：他们（指我方）态度很好，很冷静，下一次再适当给你们讲。你们（指对方）也要好好听，不要闹，你们过去上了当，不要紧，不要互相责备。你们有共同的基础嘛，你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都是群众组织，革命嘛，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旁边还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伟大的任务还在后边，现在广西所发生的事情是受坏人挑拨的。你们（指我方）抓了他们的人，认真的调查一下，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嘛！可能你们（指对方）死伤的人多些。双方要好好的学习、冷静下来，达成执行六条的协议。

（散会）

注释：

（10）四·二二把这句话改为：“你这是怎么搞的？”

（11）总理以上几段话；四·二二都删掉了。

（12）以上十六段对话，四·二二发表的记录，基本上都删略了，只有四·二二告状的一大段保留。

（13）联指以上记录的对话三十段，共一千七百多字，四·二二发表的仅十九段，共一千多字。从四·二二发表的记录中，关于伍贺霍问题，根本看不出死保伍贺霍是什么错误。特别是他们把总理的话改为：“总理。没有什么保韦派，保伍派之分，以后不要这样叫了。他们两个人嘛！谁站出来得好，就支持谁！”

（14）四·二二把这段话改成这样一句：“你们的传单可以告诉中央，不要满街贴，要有敌情观念。”

（15）以上总理讲的三段话，两段都是批评四·二二的，但在四·二二整理的记录中全被删去，只剩下对公安厅兵团讲的一段。此外，康生同志听四·二二代表汇报时的插话：“为什么不多做自我批评呢？”被四·二二改为批评联相代表，并把原话歪曲为：“你们不用讲了，他们也会讲你们，要多作自我批评。”

三、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六月二十九日二十三点五十六分——六月三十日三点二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总理、康生、戚本禹进场。（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全部会见时间都是听我方发言，中央很明显的支持我们。）

总理：今天专找你们两方来了。铁道的来了，你们双方见了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笑）。可见事情要好好商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争光摆在第一位，两派的观点摆在第二位。最近你们达成了协议（指六·一六协议），我们就处理别省问题了，现在你们又闹得很厉害。（念谈判协议）李日明呢？（答：回去了）为什么不招呼一声（杨：红代会叫他回去的）（老保：回桂林指挥武斗去了，李朝杰也去抢百货大楼去了。）啊，还是头头呢？周飞（答：回去了）龙智铭（答：有！）白鉴平（答：有！）现在听听你们的看法。

周志成：我要求发言（哭）。广西革命造反派日夜想念毛主席，红卫兵小将活不下去了！（很悲痛。稍停）（同志们插话：讲，老周，在中央首长面前什么都可以讲。）

总理：没那么厉害吧，活得下去的！别激动，好好的说。

曾春生：（拍桌）不！是这样。

总理：你这是怎么搞的？

曾春生：我是对韦国清！

（戚本禹向曾摇手，要曾不要解释，示意曾坐下。）

总理、康生：韦国清又不在，你这样不是对中央不满吗？

曾春生：这是我不对？

总理：（对曾春生说）行了，行了！（摇手叫曾坐下）（对周志成说）你这样激动就先不讲吧。

周志成：总理，南宁革命造反派确实活不下去了。现在我把事实向首长摆一摆。

总理：这就对了。我们是同情你们，支持你们的。好好的讲。

周志成：……。 （总理很注意，很耐心听，不时又插问，不时点头，仔细纪录。）在南宁一中，一开始我们就被打伤三十九人，其中百分之五十是造反派，百分之五十是群众。红代会的同学也被打伤，有名单（康生：你给一份名单给我们。）……。更残忍的是叫一句“打倒韦国清！”就被挖掉眼睛。十一岁的邓强中亲眼看见，我们已经把他带来北京，要求总理能亲自听听他的控诉。（总理：联络员，你记下来）……。 （略）

总理：农民也没有抢粮食，你们也没有抢粮食嘛！上次你们说没有抢，现在仍然是说没有抢嘛！一中“指点江山”还有多少人？（石妙甫：还有 210 人！）你清楚你把一中事件讲完。

石妙甫：军训团压我们很厉害，我写了“论联合”！的大字报，就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传单，以后批判我们的《要武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变成批判群众的大会。军训团团长孔竹说打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为此，我们搞兵训，我们很困难，没有地方活动，我们请求要房子，军训团不给，叫我们去向红卫兵要，企图挑起群众斗群众。六月十三日军训团宣布撤走一部分，我们就有希望找到一间房子，我们一上去，就被 200 多“红卫兵团”的人包围。孔竹也赶来说，解放军不走了。党委书记又来说，房子问题可以商量。晚上十点多钟，广西大学“革联”十三人来传经，介绍兵训经验，他们一样也没有带。他们一上楼，就被围。200 多名一中红卫兵冲上来，武斗开始了，……。孔竹亲自打人，又照电筒（总理记下孔竹的名字），下半夜 4 点多钟，我们上楼休息，又遭围，我们从围墙缺口冲出，40 多人只有 20 多人冲出来，伤的人去红卫医院（总理又记下红卫医院）第二天广西大学“革联”200 多人和我们六十多人重新回到一中内，挨打后又冲出来，在外面一直打到十五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才接四·二二指挥部命令撤退（总理就记下 4·22 的名字。）（老保：4·22 是冲击广西日报的。）十六日早晨五点三十分，4·22 调我到《航运工总》，同样，《航运工总》打的很厉害，……。也有劳改犯参加。（龙智铭递上劳改犯材料。总理接后递给康生看。）

总理：你们继续谈，还有一个什么惨案？

周志成：我先谈谈劳改犯的材料。（总理：是先谈惨案吧！）好。文艺干校惨案是这样，……。四点在地委方向发一绿色信号弹（总理记下并问：地委在文艺干校附近吗？）（答：是的。）……。他们用 29（注：应为 25）车队调运人马。（总理记下二九车队，并问：是干什么的？（盛国福答：战备车！总理又记下）我带来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孩来，他可作证。……。这次大屠杀到底是谁挑起的呢？六月十三日以前做了很多舆论工作，到处演讲：韦国清的光荣历史，伍晋南的丑恶历史，4·22 是牛鬼蛇神窝。又作了组织准备，成立五·二五指挥部，然后调兵到区党委、区人委，搞得我们造反派的人回不了单位，不发工资。

总理：是那些单位？你再说。（记下单位）是强占吗？（答：是进驻。）（总理记下进驻）

周志成：党校等地方还住了农民。

总理：农民是常住吗？

周志成：不是！住几天干完了又换一批。

总理：他们住的地方有没有军队？

周志成：不清楚。他们搞好战备后，为了抬韦国清，开始了对造反派的大屠杀。

总理：韦国清在北京呀！

周志成：军区还有韦国清的死党，如李士才……。

总理：李士才在北京，前两天才走吧？

戚本禹：走了一个星期了。

周志成：在家还有司令员欧致富（总理：“欧致富是在家。）欧致富六·七讲了话，是大屠杀动员令（念欧的讲话）。六·九军区开会，内容我们不讲了（递材料）。6·14—19 军区又开会（念会议内容，递材料），又连续发了 1—5 通令，宣布先镇反。我们有一、二号通令（总理：给我看看。）（递材料，念二号通令）

总理：你们宣布镇反了吗？（老保答：没有。）

周志成：（念二号通令其中几句）同时南宁有线广播站二十六日广播了先镇反后搞文化大革命。

总理：广播站是什么的？

周志成：是军管的。不仅这样，而且用军车来运石头。攻《航运工总》有两个军官亲自指挥。（总理记下。并问：在队伍的里面？）在队伍后面。喊口号：中央通知，《工总》是反革命组织。而且在一中也广播了。

总理：你们谁听见中央发过这个通知？（答：没有！）

周志成：这是伪造中央文件。六·二四通知发表后，《五·二五》广播站广播六·二四通知不适用于 4·22 指挥部。

总理：我问你们，你们双方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众：是）答得很好！

周志成《五·二五》指挥部是有人幕后指挥的。（点了李殷丹、江平秋、史清盛等人的名）由他们组成高级参谋部。（总理记下，并在名字旁划了一括弧，写了“高级参谋部”。问老保有否？）（老保：没有！）

总理：你们 4·22，伍晋南参与了吗？

周志成：没有。

总理：不是给广西日报的电报吗？（答：这是他们自己发的，代表都没有全部知道。）你们对他们三个结合吗？

曾春生：伍晋南是革命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我们还要调查。

康生：贺希明、霍泛的材料你们可以调查调查，中央今天正式告诉你们，贺是混入党内的高级特务，是李宗仁的红人，你们要和他们严格分开，中央是爱护你们的，你们也不要背这个包袱。我们也给他们蒙过了，让他们当上了省委书记，何况你们小将。你们（把老保）也不能因此攻击他们。（戚本禹插话：不能攻击一点，不及其余。）革命者要和敌人的县长、叛徒严格划分开来！

总理：你们 4·22 指挥部，我们一向认为是革命造反派，特别是“桂林老多”是闻名的造反派，几次讲话都提过嘛！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你们要和他们（指贺、霍）划清界线。上次会议揭发贺时，他不敢抬头，（康生：他是军级政治部主任。）他还是陶铸支持的，把他带到广东，我很熟他，但不知他这么坏；你们不要因此互相攻击；不要叫保韦派、保伍派，支韦派、支伍派，取消好不好！（众：好！）

康生：我给你们交底。贺是在“劳动大学”参加戏剧社被捕，是共青团员，叛变了。十年未和党发生关系，跑回广西，当了高级军官。（杨福庭：我们对三个人是从来就区别对待的，并且我们还调查了贺希明的叛徒线索。）

戚本禹：上次会议他们从来没有替他们辩护。

康生：后来我们把他们的队伍打散了，他不敢回广西才投靠过去。（戚本禹：现在他又投靠你们小将。）霍泛是否是党员，现在还没有人能作证。你们可以逐年追问贺，他到底干了什么？

总理：没有什么保韦派、保伍派之分，以后不要这样叫了。他们两个人嘛！谁站出来得好，就支持谁！

戚本禹：我们大家都保卫毛主席，只有一派。

康生：你们要学学政治经验，你们观察那天晚上贺一直抱头不敢吭声。（石怀宇：看见了。）为什么贺、霍两人总是推伍晋南在前头，他们明知自己站不出来，所以推伍晋南打头阵，伍晋南是老革命，你们要动员伍晋南和贺、霍划清界线，继续闹革命。

白舰平：我们回去要和他们划清界线。

戚本禹：这个表态很好！

老保：他们转变了，我们欢迎他们过我们这边来！

总理：你别讲什么转变啦，他们也欢迎你们过来！我不能接受你这句话！

老保：我们建议双方合作调查贺、霍。

戚本禹：这个态度也好。

曾春生：我们同意共同调查。

总理：这就好了，当权派不来，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试了几次，江西也成功了，我们准备庆祝他们，他们那里还抢了枪，你们只是打死人，我不否认军区有错误。

我今天全部听你们的了，很耐心的听下去了，你快点结束，让医生讲讲。

周志成：他们抓了我们的代表李朝杰！

总理：你们（指老保）打电话回去，我另告诉军区，抓人一定要放，告诉军区让他们回来。

众：他们（指老保）还抓了我们很多人。有一千多人。

总理：这个数字可调查。

老保：4·22 也抓有我们很多人。

总理：韦国清是有错误的。但他不可能反毛主席。上十万大山，跑到越南，越南也不会留反毛主席的人。伍晋南也不可能嘛！这是有人挑动，我都不信。

康生：你们的传单可以告诉中央，不要满街贴，要有敌情观念。

总理：传得很快，东京、香港、纽约、莫斯科，现在又加了伦敦，又起了缅甸，都搞反华，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最严重的是，广州两派成立一个统一的支持港澳同胞的组织都不行。你们说对不对？（答：不对！）说得好！如果是你们到广州，也不会参加联合。

康生：我看了材料，缅甸奈温调了一千多暴徒打死了我们派去的专家，你们想想，如果在南宁能举行联合的会议，抗议奈温多好。

史妙甫：现在居民都逃光了，哪还能开会？！

总理：不可能嘛！

戚不离：几条主要的街道是走得差不多了。

康生：当然，现在一起开不行了。一开会一定会武斗。

杨福庭：由于南宁的大屠杀，桂林已有三千人来避难（主要是南宁的，其他各县也有一些），他们有的无吃无穿，流落街头。我们革命造反派已尽力安排。但由于南宁形势继续恶化，逃来桂林的人猛增，请问首长怎么办？

总理：来桂林就好办嘛！到桂林就好了。

老保：他们强占了军用物资。

康生：你不用讲了！他们也会讲你们，要多作自我批评。

总理：我很欣赏李日明（桂林老多）的态度。停车问题他一口就承认不对，结果车开来了。你（对周志成说）谈快点。

周志成：我就谈到这里，让医生谈谈。

总理：好。

刘显奇：我谈几句。红色公安也参加一中武斗。

总理：我提醒一句，你们公安部们享有特权，参加文化大革命时，你们公安人员也是很复杂的，要特别注意。

刘显奇：他们不给我进去救伤员。（此时总理站靠椅旁，继续作记录。）

总理：你们这里有一中的吗？（老保：有！）我不要吃你讲！你好好听。

戚本禹：一中问题我们已经清楚了，谁该负责任我也清楚了。刚才两位同志也已讲得很清楚了，你可以简单点，总理两天没休息，要休息了。

刘显奇：我再谈谈劳改犯的事。

总理：这些劳改犯是监狱里放出来，还是劳改场的，还是工厂、企业单位里的？

刘显奇：南建队的、罗文劳改场的。我被工人抢上船，……。被打的工人惨得很！不能想象。

老保：总理，我要求发言。（总理根本不理睬）

戚本禹：现在确有人打着保韦（国清）的旗帜来干坏事！

刘显奇：桂林红卫兵记者周伟智被毒打，现在还关在一中粮食仓库里。（杨福庭插话，讲周伟智被打之事。）

总理：罗立辉（老保）你打电话回去，放出来，军区负责送来北京。（罗：如果没有怎么办？）你怎么这样说呢！（总理有点气）你问我要吗？！要我交出来吗？你要有勇气答应，人不在就查吗！群众是知道的，如果家里连你也蒙住了，就是毁尸灭迹，我们还是查得出来的！有群众嘛。

你们（指我们）把他们叫老保，你们（指老保）叫他们是牛鬼蛇神，这一定有坏人操纵，你们两派要注意。军区来电说二十四日谈判你们双方对骂，谈不下。今天的情况不错，他们（指老保）听下去，没有吵。

康生：你们学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

戚本禹：明天由联络员组织你们学学，河南学得较好。

总理：你们先自己学，以后可能时就合起来学。

刘显奇：在武斗中，军区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龙智铭：总理，我们提提要求行吗？

戚本禹：不提了，由联络员处理吧。

总理：今天不错，他们（指老保）不吵，听下去了，就贺、霍的问题统一了，我们过去还看不透彭真嘛，信任了他这么多年！

下面我还谈几点：第一，你们总会统一的。第二，不要互相攻击。第三，不要叫什么老保。这次你们（指我四·二二指挥部）牺牲多了些，领导有错，还有坏人挑拨，问题要解决，你们（指我四·二二指挥部）没有谈完的可以下次再谈。我再谈一次，要打电话回去把李朝杰、周伟智放出来送回北京。

你们回去先冷静两天，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后由联络员、记者，推动你们就“六·二四”通知的六点达成协议。

龙智铭：我们要求派医疗队到广西去。

总理：可以。

龙智铭：还有粮食问题！

总理：这些问题我都记下来了，一定要解决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广西两派达成十条协议

五月以来，特别是六月以后，广西各地所发生的一系列流血事件，是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所造成的。它使亲者痛，仇者快！六月一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九日在北京，中央四次接见了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总理、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对目前广西出现的流血事件极为关切，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双方代表表示坚决拥护，坚决照办。经过协商，我们双方就如何保证“六·二四”通知中的六条在广西各地实现，达成如下十点协议：

一、坚决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二、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已抓了的人应立即放出，不准扣留。医疗部门对双方的伤员应一视同仁给予治疗，不得因观点的不同而拒绝治疗。

三、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已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保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正常供应（如粮食、水、电、交能工具等）。工资问题按照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工业十条”的第八条处理。

四、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对于一小撮挑唆和煽动农民离开生产岗位，进城参加武斗的首恶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五、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保证铁路、公路、轮船运输畅通无阻。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单位不得破坏。

六、所有在外单位的人员在一星期内撤回原处（各群众组织原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除外）。

七、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打架，不冲击，撤销武斗工事和囤集的木棍、瓦片、砖头、长矛、大刀等，取消高音喇叭和宣传车，消除武斗因素，保证“四大”和人身安全。

八、不准夺枪，不准开枪，各单位现有枪支由军区派员监督收回或封存起来，不准重新发枪。

九，由当地驻军派员召集双方派出对等的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上述各条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论，由双方平等协商解决。

十、本协议自七月 x 日起生效，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如有违犯者，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

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曾春生（广西红卫兵总部负责人）龙智铭“火种”兵团常委）黄杰华（桂林“老多”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颜景堂（南宁“八·三一”兵团负责人）黄明发（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廖伟雄（广西接待站革命造反团负责人）广西军区：王希永（副政委）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北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谈话纪要

〔该谈话纪要的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以及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不尽相同，按序收录於下。〕

一、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一时至五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陪同接见首长：戚本禹、黄永胜同志

被接见者：广西两派代表，广州军区陈副政委，广西军区徐副司令员、王副政委，区党委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霍泛。

“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四·二二”拦军车截了援越军火。还有多少没有退？当时晓不晓得是援越物资？“四·二二”很不对。交回来了，还是听命令的。你们要自卫，要军区支持嘛！你们（指“联指”）把他们的据点都拿下来了，只剩下了三个了，你们还想把他们消灭呀，是消灭不了的。再要这样，我就要军区把他们武装起来。广西地处前线，是越南的近后方，我呼吁你们想一想，人家打美帝，你们打内战，双方面都没有敌情观念，无动于衷。你们这样干，是不是要美帝进来，让美帝飞机在南宁上空转一转。我们号召

你们上前线，你们才能团结起来。你们双方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内战怎么停止，你们有没有诚意停止武斗？你们能不能把占领的据点退出来？（“联指”答：我们早就有诚意。）你们报战况，我不感兴趣，打内战有什么好报的。“联指”抢了三千八百条枪，“四·二二”抢了四千八百多条，“四·二二”的枪比“联指”多，但“联指”的弹药比“四·二二”多。这样，内战势必越打越大。双方要停止打内战，武器封存，回原单位，占的地方退出。你们干不干？要为大局着想，共同对敌。个人受点害算得了什么！阶级兄弟吵一吵算什么！我劝你们消消气，往前看，把阶级仇恨对准敌人，怎么想不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要把广西局面稳定下来，第一步停止武斗；第二步把武器封存起来；第三步被赶出的同志欢迎他们回去。他们的组织还可以存在，不同的观点可以辩论，首先西大“革联”欢迎“能闯万重关”的同学回去，搞个试点。同时橡胶厂“一摸三揪”也要欢迎“工总”的人回去。“联指”也这样，欢迎他们回去。不扣工资，不歧视，不吵架，双方都做模范。代表同志们要做说服工作。贫下中农要保证不进城搞武斗。“四·二二”没有农民，就不要再说了。以后就不要再挑了。

“工总”恢复。熊一军、丁友仪马上释放。

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准动员人去攻占铁路。柳州工交兵团要和铁路组织分开。现在铁路好多地方不通，这种现象不能容忍。还有的夺解放军的枪，不象搞文化大革命。铁路两派组织不同观点，可以保留，但不能打仗。铁路不通，给越南人民什么印象！你们应该主动去做工作，保证铁路畅通。五县联防有材料没有！将来发给军分区、武装部来集训的人学习，总结教训。（戚本禹同志插话：“四·二二”不要去轰人家，打自己人，可耻）

一派占优势的地方，对另一派不要压。桂林“老多”在桂林对“联指”是压还是帮助？军队过去没有支对，压制了“四·二二”，现在看清楚了。两个月来，他们还是有觉悟的。（戚本禹同志插话：军区认识很好。）现在改变了，表示支持你们（指“四·二二”）。“联指”过去压你们不对；你们抢援越物资不对，你们到京西宾馆去，韦国清同志接见你们，把他打伤了，这就不对了。韦国清同志有错误，在桂林调动军队压你们，他已经向你们作了检讨嘛！你们又去冲就不对了。（戚本禹同志插话：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的。你们打他，太过分了，要

作检讨。)过去你们受压制,现在不能再反过来压别人。(戚本禹同志插话:你们要这样,很快就会走向反面。)

七月份双方达成十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很高兴,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可是被破坏了。南宁打的最凶,(联指)要多负点责任。搞成那个样子,不像个可靠的后方。

“四·二二”占的展览馆、造反楼、医学院、广西大学没有粮,军区给送去,但你们不要抢。

“联指”扣医疗队的人,要立即送交军区,保证他们的活动自由,人身安全。(戚本禹同志插话:医疗队是北京去的,没有带什么观点,为什么不同意你们,这说明什么问题?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还把广西新华分社的小汽车、摩托车抢去了,叫人家没法工作。失去人心,要走向反面。你们的行为把军区都教育了,感到支错了。(戚本禹同志插话:北京的学生不要去了,停止串连,劝他们回来。武汉“三钢”、“三新”也要回去。)

中心问题是要搞好与解放军合作,军区过去是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指“四·二二”)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军区认识有很大提高,愿意检查错误,很好。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的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伍晋南同志你说对不对?(伍晋南答:对!)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军区支持你们,但不能助长你们的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决不能因为军区支左,知道你们造反精神旺的地方,又反过来压“联指”。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韦国清同志并不认为你们打了他,而改变对你们的态度,但你们不要以为打了他,他才支持你们。不能乱打。

你们(联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你们对的都会给予肯定,错的要指出。

广西军区要教育各个分区改正错误。

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这些机关长期受彭、罗的影响,即使今天造了反,有些方法和作风还不对头,甚至挑拨是非,搞小动作,有的甚至搞特务活动。所

以，这次运动中，政法部门必须深入地进行斗批改，要真造反，要认识到这些作风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很久没有见，先把这几件事说一下：

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欢迎出去的人回原单位；不强占地方；不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把这些做了，才能解决广西问题。

你们（指“能闯万重关”）衣服被烧了，将来折价给助学金。凡是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来由学校帮助一下。

最后，“联指”代表张小秀问：我们是什么组织？

总理：是群众组织。继续革命，还是革命组织。

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接见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零时二十分——五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陪同接见人：戚本禹同志、黄永胜同志

被接见者：广西两派代表，广州军区陈副政委，区党委乔、伍、贺、安、霍

总理：二个月没有接见你们了，今天接见你们。你们（联指）怎么搞的，越搞越不象话，老是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又转向四·二二）你们搞军车，截了援越军火，中央文革通知你们知道不知道？炮弹还有部分没退回来是吗！

4. 22 代表：有二十箱炸药已取下来，分到各个点去了，所以没交回。

总理：是不是你们用啦？

4. 22 代表：拆下炸药。一百号炮弹已送回。

总理：没有错了吧？三七炮弹你们拆了二十箱。

4. 22 代表：对！

总理：你们当时不知道是援越抗美物资吗？

4. 22 代表：戚本禹同志说啦，才知道。

总理：是在金鸡车站抢的吗？

4. 22 代表：我们当时不知道。

总理：那是向越南方向去的嘛！你们自卫也不能这样，这样做很不对。

4. 22 代表：我们错啦！

总理：交回来了，还是听命令的。现在军区支持你们嘛！

联指代表：四·二二说的情况不对，我们了解他们还有四百发炮弹没有交回，他们抢夺的炮艇能用这种炮弹……

总理：怎么不对，你们攻人家三个据点，方向错啦！开枪想把人家消灭，这是消灭不了的，你们继续这样干，我们就要武装他们。人家不服气的嘛！

我方代表：我刚从南宁来，我想如实向总理反映情况……

总理：想一想，进攻人家对不对？

我方代表：我们进攻他们不对，但事实是他们先打我们，昨天还在造谣楼开枪打伤我们小 8 红卫兵……

总理：你那天来的？

4.22 代表：他是八月八日来的。当面欺骗总理，滚出大会堂。

总理：（很生气）你别这样搞，想压人家怎么行？让人家讲话。

我方代表：我是八月十三日来的。

总理：那天到的？

我方代表：十三日到。我们同 4.22 的矛盾是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理：你们想消灭人家。你们两派达成协议最早，我不断地注意你们，但你们老是没有停止内战的愿望。

4.22 代表：他是教师。

我方代表：我是六五年毕业的，一直参加文化大革命。

总理：你指挥武斗吗？

我方代表：我没有，我也从来没有打过人，我们一贯反对武斗。

总理：你们在这里还搞武斗，怎么在家不搞？

我方代表：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武斗。

总理：你们不是攻了邕江大桥吗？

我方代表：他们十号就占领了，用砖头、电网封起来了。

总理：交给解放军不好吗？

我方代表：解放军经过那里也被抓走。

总理：你们占了几个地方？

我方代表：我们占了区党委、市委、市人委、桂剧院等，四·二二占领展览馆、广西日报社、百货大楼、工农兵饭店、反修医院、东方红医院、西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等。他们还要打开工农兵饭店放火烧。

总理：你们有多少汽车？

我方代表：具体数字我不了解。

总理：你能代表联指吗？

我方代表：各单位的汽车是用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有个汽车司令部，他们动汽车也是用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有过几个例子，过去扶绥的汽车运生产资料经过朝阳广场时被 4.22 抢去，连司机也拉到造反楼去，司机的钱包、凉鞋都被抢光。

总理：不要讲具体例子。你为什么不回答数字？

我方代表：我是外单位的。

总理：你避开不答。

我方代表：我不是避开不回答，我不了解具体数字，我想如实向总理汇报情况。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我方代表：十六万多。

总理：有多少工人？

我方代表：大部分工人在我们这边，具体数字不清楚。

总理：有多少学生？

我方代表：有二万多。

总理：你们有多少武器？

我方代表：具体数字不清楚。

总理：那你们用什么来搞武斗，进行自卫？

我方代表：用木棍、钢叉等武器，也有一些民兵武器，军区都收回去了，但 4.22 不交。

总理：有个四四九仓库，是你们这派抢的吗？

我方代表：有这个事实，但没有拿到东西，接到中央文革指示以后马上就退出来了。

总理：你们抢到的枪三千八百支，4.22 抢得四千八百支。但是你们抢的子弹比 4.22 多，子弹多可以多打，还是你们占优势。这样内战势必越打越大。（16）

我方代表：我们愿意全部交还，停止内战，不搞武斗。我们正打报告给总理。

总理：你们一边打人家，一边打报告。

我方代表：一向都是他们先打我们。（17）

总理：武器全部封存，不搞武斗。以后交还给军区行吗？

我方代表：要双方都交才行！

总理：那当然。

我方代表：我们是受害者……

总理：可能你是受害的，我看你的气很大。

我方代表：都是他们先打我们的。

总理：象你这样讲，你们有你们的说法，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就没有诚意会谈了。

我方代表：我们是真心诚意的。

总理：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打仗，你们有气，应该打美帝，你愿意去吗？

我方代表：我愿去。

总理：那你报名去吧！到越南去打美国鬼子，但你们首先要停止内战。

总理：对 4.22，你们占了多少地方？

4.22 代表：展览馆、广西日报社、百货大楼、西大、工农兵饭店等。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4.22 代表：有三、四万人，工人二万，学生一万、干部五千。

总理：你们（4.22）在南宁人少。但占地方倒不少。工人从多少个单位被赶出来？

4.22 代表：从一百六十五个单位被赶出来。在外地有一千多人，在本地有一至二千人。

总理：你们赶他们多少人？

4.22 代表：就是在西大实行兵管。

总理：我知道。你们有多少武器？

4.22 代表：具体数字不知道。

总理：你们先停止内战，封存武器，现在解放军支持你们嘛！都回本单位去，先在西大试点，要欢迎人家回来，不同观点可以辩论，人家的组织允许存在嘛！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搞大批判。批判中南地区结合本地区。工人方面是联指占优势吧！铁路的作个模范，欢迎他们回来。（18）

我方代表：我们没赶他们，我们欢迎他们回来。

总理：工厂的，橡胶厂的是不是赶他们？

我方代表：是他们自己跑的，没有赶。

总理：你们做个模范，他们回采，应该发工资，成吗？

我方代表：可以，我们早就欢迎他们了。

总理：（对 4.22）你们西大就欢迎他们回来嘛！

我方代表：他们把我们所有的衣报、蚊帐、被子都烧了，他们还叫我们联匪，回不去。

总理：以后不要这样叫了。你们衣服被烧了，家庭困难的可以给助学金。

4.22 代表：八月二日他们跑到西大杀我们一个人。……

我方代表：他造谣。

总理：过去的账不要算了吧！机关谁可以代表说服他们回来？（点名我方代表冯同志）你是市委的吧！

冯：（站出来讲），我可以代表说服。（总理点我农民代表）你是农民的，可以说服农民不进城搞武斗吗？

我方代表：我们郊区农民从来不进城搞武斗，但 4.22 这次还是煽动六百个四清下台干部进城搞武斗。现在我们郊区的蔬菜都运不进城，都烂了。

4.22 代表：我说二点，一，工总被打成反革命，……

总理：这点我后面还要说的。

4.22 代表：我们要求释放熊一军，他是工总的宣传委员，被关了四个多月，还有铁路的丁有义也被关了四个月。

总理：这两个人可以释放。

柳州 4.22 代表：我们柳州抓了十六个……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柳州 4.22 代表：有八万人。

总理：有这么多哟！

柳州四·二二代表：现在没这么多了。

总理：铁路是你们占优势吧！

柳州代表：是的！

总理：你们不能调外单位的去冲铁路，要保证铁路通行，你们同意不同意？

双方代表：同意。

总理：你们（指 4.22）还在野战军的枪，这简直不象话。

柳州四·二二代表：他们把外单位的人调来，占领了南站北站，把我们的人都赶出来了。

总理：不是都军管了吗？

柳州四·二二代表：但他们支持联指。

总理：支持错了所以没有保障，如果支持对了就不会犯这个错误。南宁铁路怎么样？

我方代表：我们没有停过车，主要的是柳州。我们是管南宁到凭祥的。

总理：要保证南宁这段。

我方代表：完全可以保证。

总理：桂林呢？（向老多）你们占优势吧！

老多：桂林这段可以，但全州那段被他们卡住了。

我方代表：我们没有卡。

总理：还是这一条，不许调外单位的去干扰，观点不同可以保留，不许搞武斗，特别是不准调合同工来，这点可以做到吗？

双方：可以！

老多：全州那段他们调外面的人，架机枪打，还扔手榴弹。

总理：你们内部的内战比军阀时期还厉害。

老多：主要是军分区、武装部的问题，他们还搞什么五县联防。

总理：中央决定，铁路由野战军管，铁路的不能到外单位串连，外单位也不能向铁路串连，军管后不能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首先把铁路恢复。你们都在讲授越抗美，但铁路不通怎么行？越南朋友乘车还要停下来，这样做不好。你们要

把仇恨集中到美帝、苏修，不要打内战。你们老多在桂林表现不错嘛，你们应作两边的说服工作，你们是造反较早的一个。

老多：我们没有打。

戚本禹：4.22 在北京围攻他们，几十个人哄，我亲眼看见过的，打不打我不知道。

我方代表：他们在京围攻我们，达十一次之多，有的同志被打重伤。

戚本禹：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是可耻的。

总理：你们想一想，他们在家里被赶出来的情况。不要光看到北京的。

总理：联指在南宁柳州占优势。南宁也有 4.22 占优势的，也有联指占优势的。你们双方都要欢迎对方回来。你们桂林有没有压人家的？

老多：没有。

我方代表：怎么没有？人都被他们赶出来了。

总理：你们不是也抢东西吗？广西日报的东西不是也抢到桂林了吗？你们桂林老多可以建立革委会，做个模范成不成？成立革委会，三结合问题可以和部队结合。

老多：好！（很高兴）

总理：还有在北海等地也是联指占优势。军队支左，支错了改变过来就好了。军区解散工总是错误的，要改变过来，我们可以说服联指，但你们在京把韦国清打伤了，这一点是你们搞的吧？不能说是联指搞的吧！韦国清有错误，他要检讨，在桂林压制你们，曾想调动部队，后来就改了，他也检讨过了三次。

老多：我们在桂林批判他，还游街。

总理：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那样搞。

戚本禹：这样搞是错误的。（19）

总理：（问伍晋南）伍晋南同志，打韦对不对？

伍晋南：打是不适当的，（后来才讲）打是错误的。

总理：七月份达成了协议，我们伟大领袖看了之后很高兴，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但很快就被破坏了，南宁搞得最凶，其次是柳州，联指人多一点，这方面要多负一点责任。（20）

老多：最根本的问题是军区支左问题。

总理：我同意你的说法，以后军区要改变态度。

4.22 代表：我们南宁有一千多人在展览馆、造反楼等没有饭吃，没有水喝。

总理：军区给你们解决。（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总理看后说）这里有新华社来电，你们联指抢走新华社小汽车、摩托车，叫人家没法工作。失掉人心，要走向反面的。

4.22 代表：他们还绑架医疗队十二人，重伤四人，在 303 医院。

总理：还没有放呢！

我方代表：接到总理指示后，我们就放了，后来叫他们去看东方红医院埋人坡。

总理：挖出尸体没有？

我方代表：前天挖出八个，还有三个在太平房，昨天挖出五个。

总理：医疗队放回来了没有？

我方代表：我们送回军区了。

总理：军区收到了没有？

徐其海：没有收到，还扣了魏副政委和孙主任。

总理：你看看，你说送军区了，可军区说没收到。（21）

4.22 代表：北京去的红代会，武汉三新的同志是搞调查的，也被他们抓。

戚本禹：早就说过了，叫他们不要去，要叫他们回来嘛！

总理：三新不是响当当的吗？武汉的问题还没有搞好，怎么到广西去搞。过去军区支左有错误，支一派，压一派。过去你们上了贺的当（戚本禹插话：也上了霍泛的当）军区支持你们，也要帮助他们停止内战，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向大联合，不是再斗了，矛头向上，要停止武斗。韦国清并不因你们打了他就改变态度，但你们如果还打，就要走向反面。上海红革会开始是好的，以后炮轰张春桥，就走向反面。

戚本禹：你们不吸取教训，你们会很快走向反面的。

总理：要对准党内走资派，但军内不能这样提，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否则就会犯错误，包括伍晋南在内，对不对？

伍晋南：对，不准对准解放军。

我方代表：我们大方向是否错了，我们是在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最早的。

总理：你们的成绩是不能抹杀的。

我方代表：我们开始也斗争批判韦乔，只是红旗杂志社论出来了，我们根据社论的精神支持韦国清的。根据社论的精神，我们又打倒伍、贺、霍。

总理：支持韦国清是对的，打倒贺、霍是对的。贺、霍的问题“四·二二”是有错误的。

戚本禹：但你压“四·二二”就不对啦！就错啦。

总理：对“四·二二”压制就不对啦！你们对的都会给予肯定，错的要指出。

柳州四·二二代表表明在胜（边哭边讲）：柳江旅社、柳江饭店打死四百多人，把我们的头头也抓了，造反的头头只剩下我一个了，他们扬言抓我。

柳州联指代表：是他们先围攻我们的战士，并且卫东兵团也去围了，我们没有打死人，但在我们去的半路上，他们就伏击抓了我们二十多人，打死一人，柳江旅社是我们财贸兵团在那里的，他们去围攻我们的同志，后来我们去增援。整个柳州市从六月份起死了十余人，这个是事实的，我们请求中央派人去调查，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多。

总理：（问军分区）到底死了多少人？

柳州军区司令员：从六月到现在我们统计死十人，联指五人，柳造四人，老医生一人，一中没有死人，柳州旅社死了一红卫兵。（22）

4.22 代表：公检法有问题，他们有一个“五一五”战斗队专搞武斗，还有“红色公安”专整群众黑材料。

总理：有这事吗？

我方代表：我们有这个组织。五月份搞武斗以来，我们都没有出去。“红色公安”是市公安局的。

总理：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我也见到好的公检法出来造反，首先要把阴暗面揭发出来，公检法过去受彭、罗影响不少，首先要欢迎少数的回本单位去搞斗、批、改，你们广西问题不能拖下去了。铁道部由四十七军军管，柳州铁路局由五十五军军管。联指有几件事做对了，但反过来压人家就不对了。工总给平反，熊一军、丁有义二人要放出来。

我方代表：但他们把我们打成联匪也要平反。

总理：我不是说了吗？平反，平反！

我方代表：那我们是什么组织？

总理：是群众组织。你们要继续革命，还是革命组织嘛！

注释：

(16) 总理这段话，联指和军区记录都是如此，而四·二二整理的记录却是这样：“你们的枪比四·二二少，地区不平衡，桂林四·二二多，老多的枪多，在南宁、柳州，你们枪多，比四·二二多，弹药占绝对优势，大大超过人家，当然压人家。”

(17) 四·二二的记录，这里还有几句插话，“联指：这是刚才来的电话，八点零五分，南宁开来的 9025 次列车在柳州 538 工地被他们大约三十人抢了。总理：什么武器？联指：是军用的，军用物资。……总理：（不耐烦地）不要说那些了！把武器封起来上交，允许人家回去。”

(18) 四·二二整理的记录在总理这段话中，塞上这样一句，说是总理说的：“你们四·二二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查遍联指和军区的记录中，都不见有此句。

(19) 四·二二竟然在总理的话中插进这样一句：“你们联指有些保守，偏保。”纵使在当时偏袒四·二二的军区记录中，也遍查不出此句！接着下去，总理对打韦国清的问题，按四·二二整理的记录看，简直不是批评，而是表扬、鼓励、辩护。请读者们辨别一下四·二二的记录原文吧：“总理：……你们在京西宾馆把韦国清同志打了一顿，这不好吧？韦国清有错误，支左支错……你们青年人火气大一些，气愤起来。一下子打了两下了。（笑）”“戚本禹：……过火了点。”请读者对照这些四·二二的记录，考虑：打韦国清是对的？韦国清什么时候搞过支左工作？总理因打了韦国清而笑？这是合符情理的吗？

(20) 四·二二竟敢借总理之口，插进这样一句：“四·二二不得不抵抗，四·二二不得不抢枪！”

(21) 四·二二在此处还有这样一段对话：“联指：你听我讲。总理：我听你讲什么？联指：首都医疗队支持四·二二；拉一派，打一派，不上我们那里去。总理：……我不听你的！……”请想想，总理会这样讲话吗？

(22) 以上四段有关柳州问题的，四·二二完全没有，而只是写了戚本禹再三质问“柳联包围一中”事件，和总理批评柳州军分区司令员说：“（一中）一个也没有死？你敢保证？你说没有一个死，如果死了一个，由你负责。”

三、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一时——四时四十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出席者：广西四·二二、广西联指、广西军区、柳州军分区、六九五五部队和五十五军代表、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五人（韦国清因病缺席）、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场。

（总理进场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很久不见你们了，两个月了，最近很忙。（很生气地）你们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四·二二），看你们怎么办？！四·二二的同志，文革给你们的电话知道了吗？（要上交援越抗美军事物资问题）。

四·二二：知道了。

总理：你们比较听话，办得比较快。还有一部分没有回收是不是？

四·二二：是。（汇报执行中央文革电报指示情况，并递上一份报告）

总理：你们这样做不对。自卫嘛！跟军区去要。

四·二二：我们是不对。

联指：不对！

总理：怎么不对？

联指：他们放在炮艇上，打我们。……

总理：你们方向错了，你们根本不是支什么韦！你们进攻人家（四·二二）现在只剩下三个点了。你们想消灭他们，这怎么能消灭得了？这怎么行！人家不服，桂林老多当然要支援他们啰！你们这样下去，怎么能成为越南最可靠的后方？达成协议无效嘛。你们这样做，让越南人看看，影响多坏呀！你们广西要成为越南可靠的后方，别人不放心。

联指（广西大学教师）：（打断总理讲话）总理，我是监督小组的，刚从南宁来，我们如实反映情况。

总理：（很生气）好，我只听你一刻钟，怎么个“如实”法。

联指：……，他们百货大楼先开枪，……

总理：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联指：我十三号来的。

四·二二：不对，八号我们就看到他了，他当面欺骗总理，把他轰出去！

总理：（向四·二二摇摇手又问联指）你什么时候到的？

联指：我是十三号到的。

总理：什么？十三号来，十三号到？

联指：我是坐飞机来的。

总理：哦！

联指：（接着又讲四·二二进攻他们）

总理：你们总是这句话。我诚恳要求你，讲以前，先想一想，这样搞武斗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要说服下面，不要搞武斗，……。

联指：我们和四·二二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理：你们把他们当为敌我矛盾来打！

联指：不是这么回事！

总理：怎么不是！你们都没有敌情观念。对你们的办法就是要把美帝引进来，打敌人了，你们就不打了。

联指：内战是他们挑起的。……，他们不抓革命促生产，全面罢工，都跑出来了。

总理：你们把人家赶出来嘛，怎么上工？

联指：他们……。

总理：你们还有没有希望（不打内战）？

联指：我们主动要求。

总理：你们在那一地方提出？现在伍晋南不在，你还说谁操纵，你是那里的？

联指：我是西大的。

总理：哦，是大学生。

四·二二：他不是学生，是西大教师。

联指：我是六五年毕业的，才当两年教师，和学生差不多。

总理：你为什么受人利用，呵！还是个教师，专门领导打内战。……

联指：没有，我是被赶出来的。

总理：你是被赶出来的，那在你那个单位，一定是少数派。我问你，你们联指在南宁占多少地方？

联指：（汇报西大情况）

总理：你老是讲西大，你代表联指还是西大？

联指：我是西大的，我代表联指。

总理：我问你！联指占了多少地方？

联指：他们四·二二占领展览馆、广西日报、百货大楼、邕江大桥……

总理：（邕江大桥）你们不是夺了吗？

四·二二：他们想从邕江大桥运农民来。

总理：你们（对联指）承认不承认夺了？

联指：……

总理：现在不是在你们手里吗？你们不可以把邕江大桥交给解放军吗？

联指：（汇报战况）

总理：你们总是汇报战况，这我不感兴趣。

（联指被迫汇报占领的地方（总理边记边问）

总理：就这吗？所有的机关都被你们占领了！

联指：我们占领的地方的得到群众拥护的。

总理：你们占了人家的地方，人家还拥护你们？！

联指：（汇报四·二二在工农兵饭店“抢单车”）

总理：我问你，你们有多少大卡车？

联指：不知道。

总理：你们自己掌握多少汽车？

联指：我们有“汽司”，是有汽车的。

总理：你们能调动多少汽车？

联指：我们的汽车是用来“抓革命，促生产”的。

总理：你避开回答问题！

联指：我们都是如实汇报情况的。

总理：我希望你说点真的。你们有多少人？

联指：十六万多。

总理：工人多少？

联指：绝大部分。

总理：具体多少？（联指答不上）

总理：学生多少？

联指：二万多。

总理：机关干部多少？

联指：有绝大多数。

总理：到底有多少？

联指：一万多。

总理：总数说有十六万，分开又说不出。（稍停）郊区农民有多少？

联指：有九万多。

总理：那么多，一半城市的，一半农村的罗！

联指：农民不算在十六万里面。

总理：农民到底有多少在你们这边？

联指：百分之九十五参加联指。

总理：到底有多少？

联指：七万多。

总理：不对。九九八十一，九五四十五，八万六嘛！

联指：……。 （全场哄笑）

总理：加起来二十五万，全在你们这边。怪不得你们压人家。（稍停）你们有多少汽车不肯说，那你们有多少枪枝弹药？

联指：具体数目不知道。

总理：又是不知道。

联指：我们全部上交了。我们听军区的话。武装部发了个通知，所以我们全部缴了。

总理：全部上缴了？

联指：绝大多数。

总理：那你们武斗是用冷武器，不是热武器啰！

联指：是用木棍、钢叉……（又改口说）我们不否认有点枪。他们有雷管、炸药。……。我们坚决反对武斗。

总理：你们又说反对武斗，又把人家赶走，你们把武器封存起来，武器上缴，撤离据点，你们干不干？

联指：干。（谈监督小组，攻击桂林老多）

总理：你们在南宁把四·二二压下去，桂林老多当然要来支援啰！

联指：是他们压我们。我们联指从来都是高姿态、高风格的。

总理：怎么？人少压人多？

联指：是呀！是他们人少压我们人多。

另外一个联指（女）：在北京我们是受害的。

总理：也许你们是受害的。但是，你真正的代表不出面！……（看材料）八月十九日十四时你们调动六十部汽车攻打×××仓库，有没有这件事？

联指：……

总理：为什么不讲？（总理念材料数字）你们枪比四·二二少。喔！地区不平衡，在桂林四·二二多，老多的枪多，在南宁、柳州你们（联指）枪多，比四·二二多，弹药有××发，占绝对优势，大大超过人家。当然压人家。

联指：我们夺的枪，已经写了报告。

总理：你们一边抢枪，一边打报告。是不是还要打一仗？（念联指抢迫击炮、手榴弹数字）你们愿意不愿意交出来？

联指：是他们先打我们，在北京他们还打我们！

总理：你们在北京可能被打，你们在南宁、柳州打人家嘛！你要消消气，要顾全集体，要大公无私，你们能先公后私就了不起了！

联指：听总理的话。

总理：我的话你都讲拥护。但你们事事都说人家挑起的，你们真愿意这样做，还是对付我的？

联指：我们在北京是受害者，我们主动……我们没有人身安全……。

总理：我不是说了吗，可能在北京你们被他们打，在南宁、柳州你们打他们
啰！

联指：总理说的话我们坚决拥护……，这是刚来的电话，八点零五分南宁开
来的九零二五次列车在柳州五三八工地，被他们大约三十人抢了。

总理：什么武器？

联指：是军用的，军用物资……

总理：（不耐烦的）不要说那些事了，把武器封存起来上缴，允许人家回
去。……

联指：同意！

总理：同意就别说话了。

联指：他们在北京挑起武斗！

总理：你每一件事都说人家挑起，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达成协议！

联指：他们在北京打人，来了很多人……

总理：他们人来得多，因为他们受压制嘛！

联指：（又攻击四·二二）

总理：你怎么知道？怎么都是人家挑起的！你们既然同意广西是越南后方，
个人受点委曲，又算得什么？多少战士、空军、后勤部队，就是红卫兵，也有牺
牲在越南的嘛。想到他们，个人算什么！我这样开导，你们还不听吗？！我问你，
你愿意打美帝吗？

联指：愿意！

总理：好。你到越南去，马上报名。你打下一架飞机，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同
了，应该恨敌人嘛，何必打自己人呢，应该往前看。

联指：（对总理要她去越南，犹豫不答，其他联指焦急地为她打气。这个女
联指才回答）愿意！

总理：你是真的，还是对付我的？

联指：……但是，他们总是……

总理：总是双方的，不是单方挑起的，两个巴掌打才响，（比手势）行了，
我听听四·二二的同志说了。你们四·二二在南宁占领的地方是那些？

四·二二：展览馆、广西日报、造反楼、……

总理：你们人数比较少罗，不过你们还占这么多单位……

四·二二：我们的人都挨他们赶出来，回不了工厂。

总理：（生气地）你们（联指）把人家从工厂里赶出来……。 （又问四·二二）工厂被赶出去的有多少？

四·二二：一百六十五个单位被赶出去。被赶出去在外地有一千多人……在本地有些跑到指挥部，有些在其它地方，无法统计。

总理：学校你们是占优势吗？

四·二二：西大、医学院我们占优势，红卫兵总数加起来，我们也占优势。

总理：你们要把广西局势稳定下来……

联指：西大他们实行兵管，把我们赶出去。

总理：你们被赶出来，他们现在欢迎你们回去。他们被赶出去的，你们联指欢迎他们回来吗！过去军区支左支持错了，他们要承认。现在军区决定支持你们（四·二二）。第一步停止武斗。做到了，第二步就封存武器，维持革命秩序。你们把广西大学做个试点，欢迎他们（联指）回校。观点不同，可以辩论嘛，你们（四·二二）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要欢迎他们回来，慢慢地走向大联合。在这方面，你们要做个模范。（总理转过头来对南宁机务段的联指说）你们要欢迎四·二二的人回去，不要吵架，不要扣工资，保证他们生活、工作。

联指：愿意。

总理：不是愿意，而要欢迎。（接着，总理就要橡胶厂、市委联指保证工人、机关干部能够回去，欢迎四·二二的同志回去。又叫郊区农民联指保证不再调农民进城搞武斗。）

联指：我们没有调。

戚本禹：这个你不要说了！

（四·二二递上农民进城吃去粮油数字、发票等材料）

总理：农民以后不要进城了，要好好搞生产。

联指：我们现在农民没法搞生产，因为四·二二挑起武斗，很多农民都跑出来了。

总理：以后谁都不准调农民进城。

（联指的那个教师又乘机站起来要发言）

总理：你这个教师就是有点别扭，就是准备吵架的，就是不想达成协议。

联指（女）：（生气地站起来）……

总理：你这样还能上前线？现在讲讲柳州，柳州也是个大战场。

四·二二：总理，我们工总被军区砸了，打成反革命！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被关在牢里，已经有四个月零三天了，还有个丁有义，我们要求平反。

总理：这个事军区承认了的，下面我们还要讲。工总要恢复，熊一军、丁有义马上释放。（然后问柳州造反大军）你们柳州有多少人？

四·二二：有七万多人。

总理：你们受压制是少数，那有七万多？

四·二二：以前有七万多，现在只剩下六、七千人了。

总理：这差不多。铁路是你们占优势吗？

四·二二：（向总理汇报铁路造反派受迫害情况）

总理：你们工交兵团为什么到铁路去呢？

戚本禹：（对总理说）是他们（联指）围他们（四·二二），围得很紧。（总理叫人把柳州那两个人（联指）叫来）。

总理：（柳铁四·二二）人占多数，能畅通由于他们（联指）叫外单位来，搞乱来。

四·二二：（汇报各个工厂的造反派被赶出来与火车司机被抓的情况）

总理：铁路军管支持错了，你们那个地方（柳州）过去军队支左错了，破坏了正常秩序。军区要改变支左态度。

四·二二：支左对了，就能维持正常秩序。

总理：对，我同意你的分析。

四·二二：（汇报全州联指架机枪破坏铁路运输）

总理：铁路两派观点可以保留，但不许打。你们打内战打成什么样子，比军阀还厉害。以后不能动员人力干扰铁路，破坏铁路，这是命令！

四·二二：我们知道他们（联指）破坏铁路，车不通，一夜睡不好觉。

联指：（不承认破坏铁路）没有。

总理：怎么没有？！你都晓得有，你不在南宁，怎么晓得？你这种态度是吵架的。人家说话你就说是造谣，是阴谋。

四·二二：破坏铁路关系到军分区、武装部。他们还搞了五县联盟（递上五县联盟材料）。

总理：野战军军管的铁路，谁都不许干扰，不要搞串连。刚才老多同志说听了铁路不通车一夜睡不好觉，这种精神是很好的。

联指（女）：（听了总理表扬老多，很生气地站起来）……

总理：你不要生气！你要把气愤对付美帝国主义。

联指（女）：我考虑考虑。

总理：考虑，考虑！就是对付我：你也学会了外交词令，一二十岁就学会了外交词令，越南人民对你们很有感情，有的话音还相近。

戚本禹：打敌人光荣，打自己人可耻。

总理：联指要好好想一想，你们在南宁、在柳州占优势，你们不要压四·二二，你们联指有些保守，偏保，矛头向下就是错的嘛！（把头转过来对四·二二说）军区压制了你们，把工总解散是错的，要说服联指，联指过去压制你们是不对！你们在京西宾馆把韦国清同志打了一顿，这不好吧？韦国清有错误，支左支错了，过去说过错话，压制了你们，特别是在桂林派军队镇压桂林老多。韦国清有错误，批判嘛，不要打嘛！

戚本禹：打韦国清是不对的，过火了一点。

总理：韦国清也不因为你们这样打而改变态度，伍晋南同志，你说他们这样打对不对？

伍晋南：打人是不妥当的，不对的。

总理：你们看，你们支持伍晋南同志的，伍晋南也说不对。领导同志是比较注意的嘛，你们青年人火气大一些，气愤起来，一下子打了两下了。（笑声）

联指：（诉苦）

总理：（念十条协议）十条协议我首先送给伟大领袖看，他看了很高兴，说这很好嘛！……现在南宁搞得最凶，其次是柳州，联指责任要大一些。在南宁、柳州，对四·二二你们压得多，他们不得不抵抗。四·二二不得不抢枪。现在，先由解放军隔开，把武器封存起来，然后拆工事。否则，铁路不通，你们一个也回不去。

戚本禹：铁路要成为独立系统。（此时，被叫进来的柳州联指旁听代表进场）

总理：（对柳州工交兵团）你们为什么到铁路去？

柳铁联指：柳州铁路有个车辆厂参加我们兵团。

戚本禹：铁路的要归还铁路管，你们不要去管了，铁路的要成为独立系统。

总理：你们要把车辆厂的少数工人（四·二二）赶出去，这不行。……他们（四·二二）机务段人多，他们是小包围，你们联指是大包围（比手势）。

四·二二：这个问题出在军区。

总理：我同意你的分析，军区态度要改。

四·二二：（汇报南宁几个被围据点没有粮食吃）

总理：由军区送去，明天给你们送去，你们不要去抢了。

四·二二：（汇报首都医疗队被抓情况）。

总理：医疗队是我派去的，怎么也抓了？！

联指：我们放了，送去军区招待所，军区可以作证。

徐其海：没有！没有！联指把军区的人和医疗队都送到东方红医院了，现在还困着。

总理：你看，军区也说了吗？你们（联指）就是不老实。你们犯了错误，失去人心，你们的行为把军区的两位同志（王希永、徐其海）教育清醒了。

联指：你听我讲。

总理：我听你讲什么？

联指：首都医疗队支持四·二二，拉一派，打一派，不上我们那里去。

总理：你的态度不对嘛，我不听你的，你们的伤员有由军区医院帮你们医，他们伤的人很多，没有办法，只靠我们派去的医疗队，你们要把医疗队抓了。军区支持你们（联指）就错了嘛！

戚本禹：医疗队在北京是一张白纸，不带观点下去，到那里去同情他们（四·二二），为什么不同情你们（联指）这说明什么问题？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太不得人心了。

联指：（污蔑四·二二活埋他们的人，要医疗队去看）。

总理：人家提问题，你说医疗队已送回去了，要说在军区，军区说没有，你们就要医疗队看你们展览，看展览管他们什么事。

戚本禹：王希永态度比较好（稍停），你们（联指）打电话回去，马上把医疗队放出来，送回军区去，军区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工作便利。

四·二二：（汇报联指还抓了首都红代会和武汉三钢、三新战士）

戚本禹：谁叫他们去的？武汉自己的问题还没有搞好，他们去不对，抓也不对，劝他们回来。

总理：（看条子）你们（联指）要把新华分社的车辆抢走了，不和新华社合作，太霸道了，这样太不得人心。（停顿）总之，医疗队、新华社、外地学生，（联指）不要抓，四·二二的粮食由军区给你们送，中心问题是要好好和解放军合作，军区过去拉一派打一派是不对的。你们四·二二造反派是不错的，很有劲，矛头向上，精神不错，但你们把韦国清从京西宾馆拉出来打，过火了一点，现在军区转过来支持你们了，你们不要反过来压人家。你们要帮助他们（联指）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共同合作，前途还是走在一起。对霍、贺你们也有错误。

戚本禹：上当……现在军区已有认识，还要再提高。

总理：军区检查了错误，还要作军分区、人民武装部工作，梧州、百色、桂平等地问题也很严重。矛头要对准党内走资派，不要提军内一小撮，矛头不要引偏了，不要把矛头指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认识错误就改，这就好。

戚本禹：如果你们反过来压他们（联指），就会走向反面。

联指：总理，那我们的方向不是错了吗？我是独立兵团的，我们过去也是批判反动路线的，我们也批判韦国清，我们支持韦国情是在红旗第×期社论以后。

总理：在某些点上，你们是对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你们压人家就不对了！你们不要以为保韦国清就对了，没有什么保不保的，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戚本禹：支持韦国清是可以的，但不要这个口号来压对方。（作手势）

联指：我们没有压。

戚本禹：事实就是压了嘛！

四二二：（汇报柳江旅社、贮木场、柳州一中武装事件及调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情况，要求柳州联指运回尸体，请中央严肃处理。）

柳联：（一口否定，说一中没有打死人）

戚本禹：你们一个都没有打死？

柳联：没有。

戚本禹：你说什么？一中是谁包围的？

柳联：我不知道。

戚本禹：（连续问）你们去了没有？！你们去了没有？！

柳联：去了。

戚本禹：你是一中的么？

柳联：不是。

戚本禹：你们不是一中的去干什么？（连续问）

柳联：（答不上）

总理：柳州军分区谁来了？知道吗？

王建（柳州军分区司令员）：一中是发生武斗，一个没有死。

总理：一个也没有死？你敢保证？！你说没有一个死，如果死了一个，你负责。

王建：（吞吞吐吐）文化大革命以来，柳州总共死了十个。

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王建，伤的人明天送到军分区治疗。

四·二二：（递上二十号 8·18 攻击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的大字报和联指对我代表的恐吓信）

戚本禹：（对联指）反对谢富治、王力同志的大字报是你们的吧？

柳联：（抵赖）不是我们的。

戚本禹：8·18 是你们的吗？

柳联：8·18 是我们的。

戚本禹：（手持联指恐吓信）信是你写的吧？

柳联（工交兵团）：是我写的。

（四·二二送上柳联打回柳州要屠杀造反派的电报底稿）

戚本禹：（接电报稿）这个是你打的吗？

柳联：（十分惊慌）不，不，不是我打的。

戚本禹：查出来要严肃处理。

（四·二二揭露铁路联指盗用总理名义给他们所谓命名为联指并递上他们的造谣小报）

总理：我什么时候给他们命名？！

（四·二二揭露公、检、法干坏事，成立五一五武斗队）

联指：没有。

总理：你是公安的吗？

联指：我是西大的。

总理：为什么替公安辩护？

（联指不敢回答）

总理：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公检法过去受彭真、罗瑞卿控制，有很多思想和作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搞跟踪、搞盯梢，偷听电话，搞特务活动，甚至挑动是非。公检法一定要搞大的斗批改才能彻底肃清罗瑞卿的流毒。……两个月没有接见你们了，一定有很多话要讲，现在你们双方停止武斗，然后把枪封存，地方和铁路分开，不要破坏交通，要保证铁路畅通，任何一派都不准冲击铁路，任何人不得调动农民进城，欢迎对方回本单位。西大作个模范。

联指（女）：（受了批评，哭了）总理，那我们是什么组织？

总理：什么组织？群众组织嘛！你们革命的话，可以成为革命组织。

联指：他们要宰了我。

总理：不会，那里会！

联指：（暴跳如雷）……

总理：你这个人叫什么？哦！任树人，小 8 代表，最爱吵架。

联指：他们叫我们联匪。我们也要求平反。

总理：你们（四·二二）以后不要叫他们联匪了。

四·二二（众）：好，今后我们一定不叫了。

总理：好，好，好。他们答应不叫了嘛！

四·二二：要求广西军区把“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撤消、平反。

总理：已讲了，军区要承认错误，平反嘛！（这时女联指还在哭）

总理：你们广西人很坚强，韦国清打仗很勇猛，是个猛将嘛。这个月一定解决你们广西问题。桂林搞得不错嘛，可着手商量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你们桂林老多做得不坏。在广西是造反派带头的一批，要做两边的工作。（老多表示一定做

联指工作、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总理、戚本禹挥动语录本向代表告别）

（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广西两派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八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一再强调指出：广西处于援越抗美的前线，要做越南人民最可靠的后方，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武斗，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根据总理上述指示精神，双方在京代表重申，必须坚决贯彻七月五日总理批示的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并且，根据目前广西情况，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广西联络组的协助下，就立即停止武斗达成如下协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停止开枪，双方各自撤回原据点。互不围攻。不抓人，不打人。已抓的人必须立即释放。

二、武斗停止后，枪支弹药应由军区在双方监督小组协助下卦存起来。今后不准再夺枪和抢劫援越抗美物资。未经中央批准，军区不得擅自发枪。

三、不得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目前还停留在城内的农民，应由军区和武装部门动员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保证农民正常生产。

四、不得在街道路口设立岗哨、关卡、修筑工事、拦截行人和车辆，保证市内交通畅通和人身安全。

五、必须坚决拥护野战军军管铁路。外单位任何一方不得干扰、冲击和破坏铁路运输部门，确保铁路运输畅通。

六、集结于外单位的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对回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应热诚欢迎，不得歧视和迫害。

七、以上各条由军区和监督小组立即监督双方执行。对违犯上述协议的首恶分子和幕后策划者，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双方应将协议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

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任树人（南宁八一八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封金丁（广西铁路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潘立英（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

反团)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石怀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 骆伟洋(广西工总) 刘德胜(区党委机关《倒海翻江》) 广西军区王希永(副政委)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撤消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

五月廿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表了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以下简称忠告警告书)，这个忠告警告书是十分错误的。我们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抓住造反派的某些缺点错误，随便上纲，压制打击了革命造反派，加深了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我们郑重宣布：决定将忠告警告书撤销，并向新工总，倒海翻江公开道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来源：广西“4.22”战报编辑部、红代会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红旗报编辑部《“4.22”战报 红旗》联合版 1967年9月24日第4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恢复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名誉的声明

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下称工总)是南宁地区造反较早的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不深，贯彻不力，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对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把“工总”夺权后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对她是不是革命造反派有所怀疑。因此，于三月一日我们错误的砸了“工总”总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为此，我们特郑重声明，军区砸了“工总”总部的行动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极其错误的。现公开承认错误，为“工总”恢复名誉，并向“工总”广大革命群众公开道歉。今后我们坚决遵循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教导，坚决支持“工总”的一切革命行动。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盖章)1967. 9. 10

(来源：广西“4.22”战报编辑部、红代会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红旗报编辑部《“4.22”战报 红旗》联合版 1967年9月24日第4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该谈话纪要的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以及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不尽相同，按序收录於下。〕

一、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至四时半

陪同接见者：戚本禹 黄永胜

周总理：上次接见时，说了几句话，你们（联指）就走了。你们回去做了些工作，做得不错（联指代表向总理表示要作检讨），不要检讨了，回来就不要检讨了。

（联指代表汇报了总理五次接见后联指执行总理指示的情况。）

总理接着说，不要算旧账，主要是以现实的斗争来考验两派，从六·六通令到九·五命令，还有你们自己的十条协议，以这两个多月来考验你们，看那方面执行得好，这是一个标尺嘛！这是最好的考验，看你们是不是革命派。现在摆在你们面前重要的是铁路运输的问题，现在铁路运输是否正常，有没有农民进城，南宁工厂生产恢复得怎么样，现在还夺不夺枪，你们在外面的人是不是回来了。

你们两派达成的协议，已经两个多月了，上次我再三说过，不要提支谁保谁，打倒的对象不要笼统的提，要加以区别，贺、霍你们已经批判了，不要再纠什么集团了，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两个多月了，不要老纠缠这个问题，你们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我希望你们对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十条协议全面实行，在这方面来考验你们够不够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纠缠在领导干部上面，就会增加对立，不能求同，广西走资派是有的，但不要以此来互相攻击，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影响的话，就不要领导干部和你们住在一起，你们两派可以辩论，但不要搞武斗。

你们（联指）称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团，对广西各地联指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号召他们，你们不要只管南宁，可以呼吁他们，如果他们不听，你们就要加以区别，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批评他们。

现在铁路达成的协议没有效，军管会无法行使职权，难道中央的命令在广西不能实行，铁路要首先解决，我们去人解决不了，广西、湖南等地铁路不通，广西紧靠越南，那边在打美帝，东西供应不上，你们眼看铁路瘫痪，你们难道不痛心，现在有野战军护路，铁路两派都要信任军队，不管那一派，都要受军管会的领导，业余时间可以闹革命，两派都支持军队，军队才能发挥作用，外部不能去，不要搞打、砸、抢，更不要到铁路搞打、砸，抢。

当联指代表汇报他们上访人员在桂林和北京有的人被抓时，总理说，你们老多是最早的造反派嘛，要保持荣誉，失去信用就不好啦（老多承认了错误），如果象桂林老多那样，承认错误就好办，如果都把责任总是推给对方，问题就不好解决，有了协议就是不执行，希望你们把信用放在解放军身上，由他们召集双方达成协议，执行协议好不好，你们桂林老多站出来嘛，我说的是你们师院老多按中央政策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办事，协助解放军维护铁路运输，你们不要欺负小8了，否则人家就不服，我要是小8也不服，也要造你们的反，你们抓人，搜证件这不好，你们不要认为观点同的，拥护你们的就好，观点不同，反对你们的就不好，要根据他们是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是不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要服从真理，即使与他们观点不同，反对你们，如果真理在他们手里，就应该支持，老多要成为团结大多数的老多，你们抓了人要通报全区，向被抓的同学赔礼道歉。“四·二二”你们到了犯错误的时候了，骄傲起来，不按九·五命令、六·六通令办事，很快就会走向反面，造反派不是封的，是靠斗争实践来证明的，不要以为过去造反早，造了一些反，就永远是造反派，不要吃老本，不能摆老资格，要立新功，不管那个人都要这样。现在讲三条：一、相信解放军，铁路马上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沿途武装巡逻；二、希望桂林老多站出来，参加护路工作，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按九·五命令办事，一字一句的执行，不要按派别观点，袒护一方，不能认为与四·二二观点相同就好，观点不同的就是坏的，这不是党性，是派性，铁路沿线要播送江青九月五日讲话录音；三、领导干部（伍晋南、安平生）换个地方住，小将们不要受他们影响，要独立思考。

四·二二的工事要拆除，两派都要封存武器，凡是夺的和自己造的都要封存。

不少的战士与联指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你们四·二二骂他们是跟“老保”站在一起，这不对，结果造成军队与你们对立，难怪解放军战士和联指广大群众关系好。

（当四·二二说到站在他们一边的干部无法审查时）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征求联指的意见，可以请军区帮助审查，又说，为什么工人要分两派，工人中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是没有根本对立矛盾的，难道还有一派拥护刘少奇？我相信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拥护刘少奇，北京的工人都不愿分两派，主要是一些头头在煽动，我们希望你们两派检查一下，你们今天没有那一派强调大联合，革命大联合是毛主席的方针，工人带个头不要搞两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不要管学生，他们分几派也不要管。

周总理说：先从铁路开始，首先把铁路搞通，求大同，存小异，工人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完全可以站在一起，大批判完全可以搞在一起，铁路工人看见铁路不能畅通，机车连在一起，能不难过吗，越南炮火连天，我们铁路中断，世界无产阶级一条心，工人是会难过的，老多派人到铁路去就会知道，也会从中受到教育，要听野战军的指挥，谁要破坏铁路交通，谁要用枪打司机，就把他抓起来，这样搞几回就好办了。

两派都研究一下，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看谁站得高，执行得好。

戚本禹同志插话，今天联指自我批评精神差一些，上次总理批评你们几句，就不辞而别，可见你们有些娇气。当然四·二二也要警惕，你们到了犯错误的时候了，如果吃老本，不站在正确方面，就会犯错误。

周总理强调指出，广西地处海边防，与越南交界，一定有坏人钻进来，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在你们那里，美蒋苏修特务容易钻进来，破坏铁路基地，甚至有秘密电台，专门收集沿海情报，今后凡是破坏铁路的，就抓起来，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你们脑子里一定要有敌情观念，双方不要互相指责，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出革命的样子，立新功，首先保证铁路畅通，支援越南打敌人，今天就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四·二二提出广西日报的印报机器有些零件被联指拿走（联指代表说，是被民族印刷厂工总拿走的）和首都医疗队缺乏药品，无法开展工作时，总理说，这两个问题由军区负责调查，研究解决。

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地点：人民大会堂接待厅

时间：十三日凌晨二时至四时五十分

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同志、军区、军分区、野战军、欧致富等首长出席了会议。

接见开始时，总理笑着说：“你们‘联指’走了，我们又把你们请回来了。”

这时我联指代表团负责人站起来说：“我们向总理检讨，我们不辞而别是不对的，……”

总理打断了话，笑着说：“不要检讨了，你们回来了嘛。广西两派还没有下结论，听说你们回去做了很多动员工作，执行“九·五”命令也不错嘛！这是考验你们，向前看嘛！你们谈谈回去后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好不好？”（23）

接着，我联指代表团负责人就详细谈了总理五次接见后，我们联指贯彻执行总理指示和执行“九·五”命令的情况，并且向总理检讨了过去我们“联指”的缺点和错误，并揭发四·二二打一中的事，同时表示坚决把伍贺霍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揪出来。

联指：“我想谈谈‘联指’的斗争历史和组织情况……”

总理：“不要讲历史了，讲新的，要用新的来衡量，“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十条协议”，“九·五”命令执行的怎么样，这是衡量革命派的标准之一。（24）铁路的情况怎么样？”

联指：南宁到凭祥，南宁到湛江是正常通行的，就是柳州、桂林不通。

总理：你们还有夺枪的吗？

联指：没有。

总理：你们的协议签订很久了，要很好去执行，现在不要老纠缠在打谁、保谁的问题上，你们不是斗争了贺霍了嘛！不要纠缠在什么集团上，你们说他们伍贺霍集团，他们就说你们韦国清集团。这怎么行？要实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

路线，要实行“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九·五”命令，“十条协议”，这些都是考验是不是革命派的标准。（25）对于干部问题，也揪出了一些，但确定谁，还要看看，你们可以辩论辩论，但不得搞武斗，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把领导干部隔离起来分开住。

柳州四·二二：九月七日有一汽车运化肥，到才湾站时被“联指”打死了。

总理：你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团对各地“联指”起作用吗？

联指：我们广西联指，只是南宁的，我们代表也多数是南宁的，我们是代表广西两千多万人民的利益、来京反映广西问题，但我们和各地的“联指”没有组织上的关系。

总理：你们号召一下可以吗？

联指：我们可以发呼吁，呼吁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柳州联指：他们说他们被打，我们的机车也开不出去，因为六十四台机车都被“工机联”扣了，他们把机车都连挂起来，做武斗工事。

总理：你们（四·二二）违背九·五命令，车不通行，你们看到物资运不出去，你们好过吗？你们心安吗？（26）你们（联指）发个呼吁行不行，推动他们一下。

联指代表站起来回答：可以！

柳州联指：我们九月四日，一百多旅客也被（老多）扣留了。

联指：我们南宁上访的学生，在八月二十八日，响应总理号召，打回老家去，归口闹革命，但到桂林也被老多非法绑架，非法审讯。

总理：你们老多我以为是比较好的，我比较赞扬你们，你们怎么搞的？

老多代表：有些极“左”面目出现的人，打着老多的旗号干的，是红代会干的。

戚本禹同志生气地质问说：极“左”面目出现的人，就是你们（四·二二）。

（27）

老多代表：打火车的有打着“湘江风雷”、“红铁军”旗号的，打死司机就是他们，打电话问湘江风雷，他们说：“对这种人要依法制裁。”后来我们就围了他们，要他们交出凶手，否则留下头头，他们说：“头头跑到北京了！”

总理：那你们和卫戍区司令部联系一下，把凶手抓起来好吗？

老多：好。

柳州联指：我们柳州机车车辆工厂有三人来北京搞图纸，已来二个多月，住在铁路第二招待所，昨晚被柳州“工机联”的人抓去了。

柳州四·二二：我已调查了，029号服务员告诉我，三个人是办好手续走的，还有一个象朋友一样，和他们一齐走的。

柳州联指：我也调查了，服务员告诉我：“是昨晚十二点被二、三十人绑架去的，其中有“工机联”二人，有名有姓。”

总理：北京现在还有抓人的现象，太不象样了！不能在北京发生违犯“六·六”通令行为，“九·五”命令也出来了嘛！不管那一派，都是不光采的，都不是以大局为重，还是派别利益，你们在京很久了，中央文件很多，要学习嘛！总应靠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怎么一件事两个人调查就不同？

柳州联指：我建议明天，我们一齐去调查。

总理：联络员和你们一齐去。（28）

柳州联指汇报五次接见后，回柳州的工作情况：交了一百多支枪，同时指出柳州造反大军跑到各县去抢枪。当他又谈到六十四台机车被扣和柳江大桥一百多人跑回上海时……

总理问：有没有这回事？你们应该老实一点。

戚本禹问：工人是那一派的？

柳州联指：是造反大军的。

柳州四·二二：他们走是有原因的，是被赶走的。

柳州联指：他们是工人，我们是学生，他们的联络站原比我们多，我们怎么能赶走他用？！九月四日的国际列车被他们（柳州四·二二）控制，中央联络员都进不去，里面有十八个苏修人员，一百多越南人，影响极坏。（29）

柳州四·二二：我们“工机联”人少，他们人多。我们被包围得不能上街买粮食买菜，还是6984部队给送。

总理：你们两派都是互相指责的，没有一点积极的建议。老多还说点老实话，你们都不承认错误，你们在毛主席身边，应学习的多一点吧！我们要求你们把信任放在解放军身上，由他们组织两派达成协议好不好？

双方：好。

联指：我们回去的人，小 8 的、西大的、三中的，被老多抓到师院去了，也是“老多”审问的。不是什么打着“四·二二”旗号的人。

总理：你们老多应公正一点，刚才就不好，抓人家小 8、西大的人，连小 8 也不服嘛！你们净欺负小 8 干什么！要是我是小 8，我也不服，你们“老多”应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看人家说的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要不是你这派的意见，就听不进去。（戚本禹插话：这件事，他们老多应发个通报，通报全区，这样可以提高威信嘛！）

总理：你们通报一下，你们应该向那六个同学赔礼道歉，你们才能取得人家的信用。主席最近对我们说：“造反派不能靠谁去封，要靠自己奋斗，封了造反派，没有群众基础还是不顶用。”（30）不要以为你们过去有点造反精神，如果你们不执行“九·五”命令，很快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老多”是老造反派，也不算老罗！才一年嘛！不能摆老资格，要立新功，我们干了几十年，还要立新功。

（31）（戚本禹插话：老多不要吃老本。）不管那一派，都不能吃老本，现在有两条，第一条要相信解放军，把凭祥到北京的列车由野战军管起来，沿途武装巡逻。第二条，希望老多站出来，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不折不扣的执行

“九·五”命令，和解放军一起，把铁路管起来吧！保证铁路运输通行。（戚本禹同志插话：你们老多在中间，两头都管不好，好象军阀割据。）不要因为你们和“四·二二”观点相同，通通都揽过来，把这边（四·二二）看成都是好的，把联指看成不好的，人家也有很多好的嘛！领导干部换个地方住，你们不要受影响，要小将独立思考，这派的，那派的，不要把你们的脑子搞乱了。枪支联指交了一部分，确实做出了成绩，（32）那么“四·二二”也应交还，起码也要封存嘛，要拆除工事。

老多：我们全部封啦，昨晚我们还开了一个庆祝大会。

四·二二代表在发言时，污蔑“联指”在谈判封存武器时，只同意封存部分并污蔑九月七日一中事件是“联指”先开枪的；还假惺惺的说：和联指主动团结不够，喊他们联匪。（戚本禹同志插话：不是不够，而是错误的。）

四·二二：过去对支持我们的当权派的问题，缺乏阶级分析，上了贺、霍的当了，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审查排队。

戚本禹：对当权派的问题，你们要征求联指的意见，也可以与军区和你们一起审查。

“四·二二”又造谣说，我们围攻他们的据点，还说欢迎“能闯”回西大；发表了声明。另外对民族电影院美国国旗等，说公安厅王农写了一个说明，说我联指栽赃“四·二二”，最后又假惺惺建议和我联指进行调查，并说，如果是“四·二二”的坏人，一定法办。

联指：如果你们有这个诚意就行。（联指接着揭露了“四·二二”在桂林抓我们的人，是“老多”和“四·二二”在桂林的联络站，由西大傅××点名抓的，并揭露西大革联根本没有诚意欢迎“能闯”回去。此外还揭出他们搞炸弹试验，使西大旁边的一百多名农民不能种菜收菜。）

柳州四·二二汇报，他说和柳州联指签定了五条协议，但下面认为我们领导右倾，而司机怕死，不愿开车，同时还胡说“联指”抓人，使工人无法回工厂。对于武器封存问题，他说：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但下面不放心。（总理插话：可以让军分区去检查嘛！）接着柳州四·二二又造谣说，柳州联指，据军分区提供材料，他们尚有一万支枪（柳州“联指”马上驳斥，并要求中央派调查组去调查），他们还自己制造武器，这部分还封存不封存？

总理：不管是自己制造的，还是什么的，凡是武器都要封存。

戚本禹：你们有多少人？

柳州四·二二：有六万多，八月大屠杀，都跑光了，还有六、七千人。

戚本禹：联指有多少人？

柳州联指：九万多，工人四万多。

戚本禹：你们工人为什么要分两派，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呢？你们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根本的矛盾，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嘛。文化大革命已一年多了，为什么要分两派？柳州情况我不大清楚，据我们调查，北京的工人就不愿分两派，就是头头去煽动的。

四·二二：我们在五次接见后，想先在北京搞联合，先搞学生。

戚本禹：先搞工人，不谈学生，学生爱搞几派就几派，搞四派五派都可以。

总理：先搞铁路的，完全可以站在一起搞大批判，工人阶级本身利益是一致的，要在毛主席路线上搞大批判，观点有点不同，可以求同存异嘛！越南那边炮

火连天，为什么火车中断，为什么把机车连起来，你们不感到难过吗？我希望你们“老多”先站出来，为人民立新功。保证铁路通行，要依靠野战军，谁破坏就把头头抓起来，如沿途有人开枪，就停下车来，把头头抓起来，搞几次就好了，实在不行就派两个连跟车，搞几次就行了！

四·二二：广西日报出不了报纸，机器零件被他们拆啦！

联指：机器零件是被“四·二二”的“工总”拆去的，八月八日在广西日报发生武斗时，“四·二二”工总拆下拿到报社三楼去啦，现零件仍在“工总”手里。

总理：这件事由军区负责调查处理，把拆下的零件交还军管小组，如果不行，就搞一个临时的机器解决，欧司令员，你看行不行？（欧：可以），铁路问题，我们下命令马上实现全面军管，广西是那个师管的？（黄永胜答：是×××师和×××师）

柳州四·二二：我们要求总理给我们通几次电话。

总理：你们广西靠近越南，部分地区靠海，你们内部一定有坏人钻进来，你们内部不一定没有坏人，有美蒋特务，苏修特务，甚至使用秘密电台进行破坏，破坏铁路的不知是好人还是坏人，因此凡是破坏铁路的就抓，你们赞成不赞成？

（双方：赞成！）这很好，脑子里要有敌情观点，从这个地方入手，你们研究研究，好贯彻，如何贯彻，希望大家都有大联合的气氛。

戚本禹：你们联指自我批评就差点，上次总理批评两句就不辞而别，这么娇气。别的省还没见过，我看就得压一压，今天你们批评精神就不够，当然“老多”你们快要走向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次犯错误，二次犯错误，犯到爬不起来啦！

“四·二二”中有一小撮坏头头。

四·二二：联指中有一小撮坏头头，五次接见后他们炮打周总理。

联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说的是军区周副政委。

戚本禹：炮打周总理就会变“五·一六”。

四·二二：五次接见后，联指向军区提出了十几个为什么，把军区负责人斗得很厉害。

戚本禹：你们“四·二二”反军区错误是严重的，斗的比他们还厉害。

四·二二：这点我们有错误，过去我们没把广大战士和某些领导分开，和战士的关系搞的不好。

总理：广大指战员和联指的感情很好，所以广大指战员都支持他们。现在你们要接受新的考验，要立新功，首先要保证铁路畅通，打美帝国主义嘛！先开个头，以后按“十条”，一条一条地兑现，你们“老多”（只是指师院的，不能冒充）抽一千二百人，要有证明，协助解放军搞铁路运输。

今天主要是解决铁路运输问题，我还要办两件事，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注释：

(23) 四·二二把“广西两派还没有下结论”删掉了。

(24) 四·二二把“这是衡量革命派的标准之一。”删掉了。

(25) 四·二二又把“是不是革命派的标准”删掉了。

(26) 总理以上讲的整段话，都被四·二二删掉。

(27) 四·二二把戚本禹同志这段话都删掉。

(28) 以上六段对话，四·二二删去只剩这样一句：“在北京现在还有抓人的事，实在不光荣，不管是那一派，影响你们广西的荣誉，不是顾全大局，而是派性高于一切。”

(29) 以上从总理问四·二二“有没有这回事，你们应该老实一点”起到处为止，这五段对话，都被四·二二删去了。

(30)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段指示，居然也被四·二二砍掉了一半。在四·二二发表的记录中，只有前半句。而删掉了“封了造反派，没有群众基础，还是不顶用。”

(31) 以上从“你们老多起”到此处止，被四·二二删掉，另补进戚本禹同志插话：“联动原来也是造反派……后来就不响当当了，就走向反面了。……”

(32) 这句话被四·二二删掉了。

三、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一时五十八分至四时三十五分

地点：人大会堂小礼堂

陪同接见：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

出席者：广西四·二二、广西联指代表、6955 部队首长、广西军区首长、各军分区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五人。

总理：你们联指都气走了，现在总算请来了。

联指：我们承认错误要向总理检讨。

总理：不用检讨了，回来就是认错嘛，听说你们回去做了些动员工作，你们执行九·五命令做了些什么？谈一谈，谈新的，给我们新的感觉。执行九·五命令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嘛，考验考验，考验你们，也考验我们。

联指：让我们汇报一下在第五次接见以后，在思想上是怎样执行总理指示的。接到中央指示后，当天我们联指召开了一个常委会，讨论联指今后向何处去，今后怎样战斗，同志们的心情是较沉痛的。……总理第五次接见说我们是群众组织，这是对我们的考验。但我们分析形势，清楚地看到伍、贺、霍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拉一派打一派，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分化瓦解我们的组织，……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四·二二一小撮操纵武斗，我们自卫还击，规模大了些，过火了一点点。首都医疗队不听总理的话，他们公开表态，甚至参加了四·二二的游行，我们扣了医疗队的人，在东方红医院群众打了他们几下是有错误的，我们夺了解放军的枪，也是不对的，我们总结了前一段的错误，指挥部发表了七条决议。

总理：七条是什么时候写的？

联指：（递上七条）封存武器问题，我们发表了严正声明，撤除了所有的关卡，我们联指的范围内一片繁荣，行人畅通无阻，四·二二那边冷冷清清，百货大楼这里，街上都是砖瓦，没有人走。四·二二不执行总理指示，八月二十五日还打死我们一人，打伤三人，尸体暴晒了四个多小时。八月二十六日在京两派代表谈判时，王荔说南宁形势大好，没有开一枪。我们怀疑王荔的消息是从那里来的，……下面由张×同志把广西两派组织的发展史谈一谈。

总理：（张×站起来，正要讲）哦！？你也会讲历史？！历史长得很，我不听了，不要讲了。讲六·六通令、九五命令执行得怎么样，……这是一个标尺嘛！看那个执行得好，我就用六·六通令、九·五命令考验你们两方面，你们还有十条协议嘛！这是最好的考验嘛！听说你们交了两千多枝枪，是吗？

联指：是的。武器我们送了两千多枝。

总理：弹药呢？

联指：交了八箱另五千多发。

总理：你们还有一千多枝枪呢？

联指：集中了。

总理：都集中了吗？

联指：（吞吞吐吐）有一部分集中了。

总理：集中在那里？分几个点？

联指：集中在指挥部。

总理：指挥部在那里？

联指：在区人委礼堂。

总理：你们抓对方的人是不是都放了？

联指：都放了。

总理：全部放了？

联指：……

总理：你是指南宁吗？

联指：我是南宁的。

总理：柳州的也放了？

联指：柳州的我不知道。

总理：你不代表柳州联指？

联指：我们联指代表团只是南宁的，外边的，下面的看到我们叫联指，他们也叫联指，我们与他们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总理：铁路是否通？

联指：总理，我谈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急急忙忙的念讲稿，攻击四·二二）。

总理：先说你们自己嘛！铁路怎么样？能正常运行吗？有无扣车情况？

联指：我们保证南宁到凭祥。

总理：柳州不归你们管？

联指：是四·二二管的。

总理：工厂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农民进城的事？

联指：四·二二有一帮跑到外面搞打、砸、抢，没有回来（汇报一至七月工业总产值情况）。

总理：不要说了。

联指：你不是要我说吗？！

总理：你们现在有没有夺枪的事？

联指：没有。

总理：你们出来的人都回去了？

联指：都回去了，听了你八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后，都回去了。

总理：你们两派达成了十条协议，你们应该首先保证十条协议的执行，不要提出什么支谁保谁。你们（联指）打倒的对象不要笼统统统的，两个多月了还这样。我们不断地谈，不能笼统，指出来的贺、霍人家（四·二二）不是已经批判了吗？还笼统提，你们不要叫人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了，反过来，人家叫你们韦国清集团也不好嘛！你们（联指）不能总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跟你们讲了，你们老是这样。你们两方面组织要保证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全面执行，拿这个来考验，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广西总有走资派，当然啦，也不要笼统，你们不要拿这个攻击、对立。现在大批判，大联合，斗干部要找，可以辩论嘛！如果有影响的话，再这样下去，我就不让领导干部同你们住在一起。你们桂林老多在这里还有多少人？

四·二二：还有三、四个。

总理：四·二二呢？

四·二二：还有一百多人，我们动员了几次，二号走了一批，四号走了一批，讲八号走的，到今天还没有车。

总理：回不去吗？哦！五次车不通了，柳州的铁路怎么样？

四·二二：柳州联指又调动外单位的人到南站、鹿寨、鹧鸪江，用机关枪卡住，车开不了。我们的人被围困在机务段里。

联指：我讲柳州情况（攻击四·二二）

总理：不要说了，上次不是叫你们双方派人回去吗？

四·二二：我们定了五条协议。

总理：执行协议有什么困难？

四·二二：协议定了以后，下午四点，又开车去贵阳，他们开了一趟去湛江，到六号为止，我们开了六趟车。

总理：太少了。

四·二二：七号开车，计划送化肥去全州，回来时，正司机陈光林被联指开枪打死，副司机被打伤。副司机负伤坚持开车到桂林。

总理：打死了？

四·二二：打死了。子弹从右胸穿过去。

总理：那个车站？

四·二二：百里村站。

总理：联指是本地的还是车站的？

四·二二：本地的有，车站的也有，是车站指挥的，他们沿线架起机枪。

总理：小站有地方的（联指）？

四·二二：是，地方联指到车站去了。

总理：（看了五条协议）有地方的！你们这个称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的对地方不起作用？

联指：我们只能代表南宁，和地方没有联系，不属我们领导。

总理：你们不能号召？

联指：我们只能呼吁，没有组织联系。

总理：现在铁路还不能听军管指挥？

四·二二：铁路军管小组改组后，八月二十六日铁路的“钢联指”从沿线调了一千多人，占领了柳州局一些点。

联指：不能开车是由于……

总理：你是那位？（翻名单）你是《柳州日报》的，你怎么知道铁路的情况。铁路全部军管，你怎么知道铁路的事情？

联指：他们扣留了六十四台机车，不给开！

总理：因为开枪，打枪不能开吗？

四·二二：机车是有六十多台的，但是不开是有原因的。

联指：他们拿来做工事，焊接起来了。

总理：铁路达成的协议没有效，你们两派都熟视无睹，中央的命令还要不要？难道中央的指示在广西就不能执行吗？你们双方还考虑不考虑越南的影响？你们（联指）只管南宁的联指，下面的就不管了，总是和你们有联系嘛！

联指：（赌气地）我们又没有什么章程叫他们（指县以下的联指）加入。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可以说话？

联指：我们回去呼吁。

总理：回去，回去就晚了。

四·二二：我们正在研究，有些人以极左面目出现，破坏铁路交通运输。

总理：你们老多可以使桂林好，在桂林以北、以南的情况就不好了。你们心安吗？

四·二二：我们心里是不安的。

总理：两广、湖南车一直开不通，国际铁路运输失灵，你说心安吗？

联指：我要讲讲柳铁情况。

总理：（生气地）你又要说话。

（联指不顾总理讲话，还在讲）你知道什么，你怎么不说你们路上打枪、开枪打死司机呢？

联指：桂林老多在桂林扣留我们六个人。

总理：你们老多是比较好的，我是比较赞赏你们的，怎么会搞这一套了。

联指：他们把我们的证件都拿走了。

总理：有这么回事吗？

四·二二：是有这么回事。但不是老多搞的，是以极左面目出现专搞打、砸、抢的流氓无产者搞的，他们在车站抓人、抢东西。

总理：是你们这一派的吗？

四·二二：他们把着造反派的旗号，打着桂林老多的旗号干的，其实不是桂林老多，还有一些冒牌《湘江风雷》、《红铁军》支持他们。

总理：他们有多少人？

四·二二：有三百多人。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四·二二：我们老多这边有二十万人。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清算他们呢？你们力量大，你们占优势嘛。你们可以把他们围起来嘛！

四·二二：十号前就解决了。我们围了他们，缴了他们的械，《红铁军》还架起了大炮、机枪对着我们，我们马上包围了……

总理：很好。

四·二二：《湘江风雷》总部打来电报，说他们根本没有派人到桂林，要我们造反大军对他们（冒牌的）进行军法制裁。我们马上解决了。

总理：很好。

戚本禹：应该采取军法制裁。

四·二二：现在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桂林市“革联”已经没有市场了。大批判已经搞了起来了。“革联”的头头已经上了北京。

总理：你们可以和警备司令部卫戍区联系，把他们（“革联”头头）抓起来嘛。你们老多是比较早的造反派，要保持你们的荣誉。我向外国朋友称赞了你们，桂林是比较好的，外办同志对外国同志到桂林参观不放心，我还说不要紧，你们能够维持秩序，我不是找你们谈过了吗？

四·二二：是，在人大大会堂。

总理：所以，我才让外国代表团到桂林参观，铁路局的内部，不管那一派，都要服从军管会的指挥，不能和外部联系，军队护路，不管那一派，不能乱打枪。

四·二二：现在有一批人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干坏事，我们要抓出来，《红铁军》的一部分人在桂林枪毙了一个联指，我们要抓凶手，他们说凶手走了，我们要抓头头，要交出头头。打着我们这一派的坏人我们敢揪，你们联指中的坏人，你们敢不敢抓？关键是敢不敢用毛泽东思想办事。

总理：对！支持军队就会显出威力来，你们桂林老多同解放军的关系是好的。

四·二二：现在桂林以北（铁路）没问题。

总理：桂北没问题，桂南就是柳州的问题罗。柳州应该负责。（联指提到铁道部第一招待所有三人被抓。双方调查结果不同）在北京现在还有抓人的事，实在不光荣，不管是那一派，影响你们广西的荣誉。不是顾全大局，而是派性高于一切。

联指：上次接见后，我们（柳州）回去交了一百七十多支枪。

总理：没有了？

联指：有，不多了。

四·二二：我们人少，没有办法出来买东西，连油盐菜都是六九八四部队帮我们运，工厂除了水泥厂以外，我们的人都被赶出来了。跑到上海、广州、重庆等地。我们代表团发了通知，动员他们回柳州，但回去的被抓，有的工人不敢回去。

总理：你们两方面总是互相斥责，没有一点积极的办法和新的建议。如果你们都采取老多的精神，有错误就承认，我们还有办法，事情就可以办好。你们总把责任推给对方。两个多月了，又有十条协议。只是说愿意做，但又无行动。我只好叫军队出面。我要求你们，是不是把信任放在解放军身上，由他们召集你们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好吗？（众：好！）如果你们老多能站出来，师院有多少人？

（四·二二：一共两千多）两千多人，站在广西铁路沿线，站在解放军立场，做两派工作，说公道话，都要保证铁路畅通，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协助解放军，维护铁路交通，那派不对，你们就批评，怎么样？

四·二二：我们（桂林老多）愿意这样做，保证坚定执行总理指示。

联指：我们被抓的六人就是送到广西师院的。

总理：是吗？

四·二二：是的，后来我们打电话回去把他们放了。

联指：老多审问我们……

总理：别说了，别说了，人家（老多）承认有这回事就行了，抓了他们六人就不对嘛！虽然不是你们老多捉的，但送到你们师院，人家就会说是你们捉的，造反派抓人，人家就会不服，我是小 8 的，我也不服嘛。不要攻小 8，抄证件不好，不要观点相同的就是好的，错了就要批评。如果他不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要帮助他改正。

戚本禹：对抓联指六人一事，你们（老多）可以通报批评嘛！

总理：我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你们（老多）把这件事通报全省，你们的威信不是降低，而是更高了。总得要树个标兵嘛！你们老多比较好嘛！四·二二不要以为过去造反精神好，如果不执行九·五命令，也要走向反面。造反派不要靠谁封的。主席最近还讲：造反派不是靠谁封的，主要靠自己奋斗得来的。

戚本禹：联动原来也是造反派。

总理：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破四旧，立四新……清华附中还发表了“三论”，造反精神很不错，但后来走向反面了。

戚本禹：后来就不响当当了，就走向反面了，所以说，老多不要吃老本。

总理：要立新功。

戚本禹：老多要警惕些，要写一些《老多不要吃老本》的社论。

总理：我们每个野战军把铁路全管起来，全线武装巡逻，那一派违犯则捉头头，希望老多站起来啊！根据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按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广西十条协议办事，不要有派性，还有江青同志的演说要沿线进行宣传、学习。你们要相信两条：一是相信解放军把铁路维护起来；二是老多站出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同观点就放过去，不同观点就不行。那不行的。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九·五命令办事，协助解放军维护铁路。

另外，领导干部不要和你们住在一起，今天我只讲（铁路）这件事。枪不交可以暂时封存，恢复交通拆除障碍物，互相来往，在南宁搞“东、西柏林”怎么行？你们是阶级兄弟嘛！

四·二二：桂林的枪全封了，还开了个誓师大会。（送上一份桂林来电）

总理：很好。

四·二二：我们向总理汇报第五次接见后我们四·二二在南宁执行总理指示的情况。第五次接见后，四·二二指挥部定了两条：一是联指不向我们打枪，我们不开枪；二是联指不向我们的驻地进攻，我们不开枪。我们是这样做了。八月三十日下午，我们监督小组（代表）又提出全面贯彻八·二六协议的建议，双方要全面封存武器。我们封存了武器弹药，军区代表五人，九月十日去查看了十七个点封存武器的情况，检查起来，我们没有很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执行中央指示不够快。但有一个问题，我们枪很少，联指虽然交了一部分坏枪，但还有很多没有交，又向我们打枪，我们在家的同志不放心。

总理：我说了，不是要你们四·二二马上把枪上交，光封存起，看看嘛。

四·二二：我们四·二二正进一步搞好拥军。广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欢迎军区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过去对军区有些行动是偏激和过火的。对军区也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很好地把军区支左的错误的

某些负责人和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对军区广大指战员存在着对立情绪，关系搞得不够好。

总理：（不断地点头）嗯，嗯，……如果你们和军区对立起来，你们要具体分析。（秘书叫总理，总理站起来说：我先去打电话，你继续讲）

四·二二：我们有些同志见到军区一些支左人员穿便衣参加围攻我们，所以见到一般战士也围住辩论，这样做不对，我们要检讨。

戚本禹：你们对解放军的态度是有错误的，这一点联指战士和解放军是有感情的。

四·二二：我们现在正进一步通过和解放军接触，进行座谈，我们正向他们介绍广西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重新向解放军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虚心倾听解放军对我们的批评，进一步搞好军民团结，我们和联指两派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和联指中广大群众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欢迎联指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相信，两派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大联合。我们西大革联已发表声明欢迎西大“能闯”回去。

戚本禹：（频频点头）对！

四·二二：过去我们做联指的工作不够，我们对联指也有些过激的行动，如我们叫联匪不对，有时一见就叫保皇派，保皇狗不对。

戚本禹：叫联匪是错误的，不是做得不够的问题。

四·二二：对那些支持我们四·二二的领导干部，我们有一段时间曾缺乏阶级分析，因此上了贺、霍的当。我们是有错误的。第四次接见在中央首长的帮助下，以后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对领导干部、对当权派，我们要进行排队，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支持，犯有错误的要揭发批判，使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坏人及削尖脑袋的家伙，就要揪出来，批倒批臭！我们正对区党委中的当权派以及站出来的干部进行审查，进行分析。但对他们全部历史进行调查有困难，我们四·二二现在离开南宁到全区各地去不了，到外省没有经费，也没有介绍信和证明。

戚本禹：你们要三结合那些干部，可以征求联指的意见，可以叫军区帮助你们审查。

四·二二：我们四·二二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这是我们在工作中犯错误的根源，四·二二队伍中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是比较严重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潮容易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干搅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发现有人打有四·二二的旗号，也有四·二二中的一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进行违法活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整顿组织，纯洁队伍，把四·二二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现在四·二二的处境很困难，被困在几个据点里，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到现在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没有粮票。我们对联指的同志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围困我们，不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使我们造反派的工人、干部能够回到本厂、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有原则分歧，可以通过四大进行辩论来解决。

下面讲两个事件：一个是联指说我四·二二在东方红医院活埋联指战士。活埋解放军的事实真相。

戚本禹：我们已知道了，不用说了。

四·二二：还有民族电影院发现有美国国旗、国民党旗的问题，联指说我们里通外国而美蒋勾结，现在我念一份区公安厅××同志对这个事件真相的说明，（念说明全文）是谁干这个坏事，我们想和联指中的同志一起把坏人揪出来，如果是四·二二的坚决法办。

联指：刚才四·二二说要欢迎我们回西大，实际不是这样，是假欢迎。（另一个人插念西大革联发表的声明最后一段）是抓我们的坏头头。西大××在饭堂还公开说，三个月后还要枪毙我。

总理：你们不是还有个女同学吗？没有来吗？

联指：是，没有来。

戚本禹：批评她几句，她就哭了。

总理：她火气很大。为什么不来？是不是西大的？

联指：不是西大，是艺术学院的，她在家中搞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

戚本禹：她这样能搞宣传？！

总理：我不信，我看她是带头逃跑的。

四·二二：拥军爱民问题。六九八四部队坚决支持我们（柳州造反大军），我们共同开了几次拥军爱民大会，他们出面制止武斗，维护铁路运输。有二十多

位同志被联指打伤，军分区的态度正在转变。通车问题我们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定了五条协议，我们内部有少数同志说我们右倾，出卖他们，对我们不满。车头有一部分停在机务段，是停车场，司机大部分是造反派，其他单位都是联指控制的，造反派司机开车出来被抓、被打，无法出车。生产问题，柳州基本上瘫痪了。一百多个工厂只有两个在造反派手里。我们这边跑出几千人，上海有，广州有，武汉有，北京有，贵阳也有。在上海的同志，我们打了电话动员他们回柳州。

封存武器问题，我们做得慢，不是闻风而动，十号我们封了一部分，十一号已全部封存。柳州联指手上还有一万多支枪。有一个问题，联指他们自己制造很多武器，如在柳州建筑工程机械厂，联指制造了不少枪枝、手榴弹等。九·五命令中没有说要封存自己制造的武器。

总理：所有武器都要封存，不管是自己制造的还是夺的，全部封存，然后限期上缴。今晚我们先解决铁路问题，火车托野战军把铁路搞好。

戚本禹：你们柳州四·二二工人有多少人？

四·二二：原来有五、六万，八月大屠杀后打散了，现在在家里坚持的有六、七千人。

戚本禹：联指呢？

联指：我们有四万多人。

戚本禹：柳州一共有多少工人？

联指：有五万多。

戚本禹：工人为什么要分两派呢？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调和”这个词用得不科学，我们指的是要联合，工人阶级只能有一派。上次总理讲了，要联合，为什么要分开？柳州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从北京、广州、青海的调查来看，工人不愿分两派，都是头头搞的。工人不管是那一派，都不会拥护刘少奇，先把工人联合。工人阶级利益和他们本身的利益是一致的。你们今晚的发言，听了这么久，都没有强调革命的大联合。

四·二二：我们正在做大联合的工作。我们想，先从学生做起，找他们联指中西大的同学座谈。

戚本禹：联合问题，你们先放开学生，先把工人联合起来，工人还要搞生产，工人只能有一派。

四·二二：我们先把铁路畅通问题搞好。

总理：先从铁路开始，使铁路畅通。你们老多先到铁路服务一下，瞧瞧工人怎么样，他们看到火车不通，是会难过的。你们广西是前线，过去那边（指越南）就是炮火连天，要做越南的可靠后方，为什么把铁路弄断了，铁路不通，怎么行呢？我告诉你们，年青的同志有些事情不太懂得。你们老多首先站出来，维护铁路，立新功，为文化大革命效劳，湘桂线，还有到湛江，到贵阳，要连通，你们要服从野战军，如果有人破坏，先把头头抓起来。你们两派不要起哄，发现有枪声（打火车）就停车追查，把坏人抓起来法办，搞几次就可以通起来。你们两派研究研究，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比高低嘛！看谁执行得好。

四·二二：希望双方都有个大联合的气氛。

总理：你们联指要号召一下嘛！你们要从大城市推广出去，不能说外地的联指你们不管，他们不会同你们没有联系。

戚本禹：你们联指自我批评是很差的，前几次接见，都很少见过你们做自我批评，上次总理批评了你们几句，你们就跑了。批评你们是为你们好嘛！可见你们很娇气！说明了你们在那里是压人家，没有见过一个代表团象你们一样，难道你们就批评不得？！今天你们自我批评很少，相反四·二二他们自我批评多。另外，现在到你们（四·二二）这一派开始犯错误的时候了，中央肯定你们了，你们不要骄傲，要立新功。如果掌握大方向，就不会犯错误，不然，如果犯错误，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就爬不起来了。

四·二二：（汇报第五次接见后广西联指炮打周总理的情况，念了一条联指炮打周总理的反动标语）。

联指：（不承认，慌忙辩解）我们不是对总理。

四·二二：还有呢！（又念了另一条联指炮打总理的反动标语，并递上有关材料）

联指：（张口结舌）

戚本禹：（面对联指）你们个别人这是会有的，你们审查一下。

总理：你们联指三个人发了一个传单，名义上是认罪，但通篇都是说自己是正确的，不对就自我批评嘛！

戚本禹：难道你们一点也批评不得吗？（边翻看四·二二刚递上的联指炮打周总理的材料边说）你们炮打周总理就象（北京）“五·一六”了！

四·二二：（汇报广西联指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情况）联指的一小撮坏头头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军区表态支持四·二二后，他们就抓军区，抓军区的负责人来斗，他们到广西军区去静坐，质问军区十五个为什么。（递上一份联指质问军区十五个为什么的传单）。

戚本禹：你们（四·二二）对解放军也是有错误，过去犯得不少呢！

四·二二：是的，是有错误。

《广西日报》的机器零件被联指抢要了，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地传播伟大领导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出版了油印的《广西日报》。

总理：你们联指为什么把机器拿走呢？

联指：（拒不承认，反诬广西民印厂“工总”队员拿走了）。

总理：（总理要油印的《广西日报》）油印的《广西日报》是不可想象的，从来没有见过一张油印的省报，这样再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委托省军区把机器搞起来，也可以把军队的机器拿来印嘛！欧致富来了没有？（欧致富站起来），你负责把机器搞起来，我就不信在南宁找不到机器！（欧：噢！）

今天就解决保证铁路畅通这一件事，我下令××××××师把全线（指柳州铁路所管的线路）接管，你们双方都打电话回去，老多要完成这项任务。

四·二二（汇报首都医疗队缺药品，行动也不自由等情况，并递上首都医疗队的一封信）。

总理：刚才说医疗队问题。你们（联指）给他们一些自由嘛！

联指：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是群众组织，不管药品，这是军区管的。

四·二二：他们（首都医疗队）进出很困难。

戚本禹：（把首都医疗队的信递给总理）这是首都医疗队自己写来的信，从来信看，联指做了很多错事。

联指：（无话可说）

总理：我要两三个医疗队的同志回来当面汇报。欧致富同志你打电话回去，药不够，你们接济他们。（欧：噢！）

四·二二（老多）：总理，我们是负责冷水滩到桂林这条线还是全线？

总理：全线。到凭祥，还要到湛江，到贵阳，每站都要去，沿线做工作。你们去看看，就知道向工人学习些什么？这对你们老多是个新的考验。

四·二二（老多）：好！我们一定照办。

总理：下死命令，凡是破坏铁路交通的就抓，你们（指双方代表）赞成不赞成？（众：赞成！）你们广西两派的敌情观念比广州还差，你们脑子里要充满敌情观念，要警惕美蒋、苏修特务的破坏，做越南的可靠后方，不然，就不能联合起来。你们互相之间不要指责，不管过去有多少功，都要立新功，都要保证铁路畅通。今天就要求做这件事，先做好，再把十条协议一条一条对照、兑现。

（四时三十五分，总理、戚本禹同志健步走出会议厅，全体起立，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接见结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广西两派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根据总理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的指示，为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九·五”命令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迅速有力地制止武斗，我们两派代表在广西军区和中央文革办事组广西联络组的组织下，就全面上交枪支弹药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于九月二十五日零点以前将武器全部上交给“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联合收枪小组”。

在武器上交前，双方必须全力做好宣传说服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全面上交武器是认真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具体行动。

二、上交武器的范围：

- 1、已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
- 2、城市民兵用的枪支弹药；
- 3、地方机关、厂矿企业的原自卫武器；（军管的公检法单位武器由军管会负责封存。）
- 4、体育运动用的枪支弹药、炮艇；
- 5、自制的武器（包括土枪、土炮、零件、附件、半成品）、各种爆炸物及装备（如土坦克等）。

三、任何组织及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藏、转移和拒交武器，如有违犯者由本组织协同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一律强行没收，若有违抗者，以违犯国法论处。

四、在武器上交过程中和武器上交后（九月二十五日零点后），如发现仍有使用武器行凶杀人者，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本组织协助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对其坏头头及肇事者坚决镇压。

五、除广西两大派以外的各组织和个人，外省来广西人员，枪支弹药上交办法按本协议处理。

六、上述协议自签定之日起效，并呼吁全区广大革命群众共同遵照执行，如有违犯者视其情节轻重，由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严肃处理。

七、本协议由原监督小组协助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监督执行。未成立监督小组的地区，由军队召集双方，各派五名代表参加监督执行。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赴京代表团：任树人（签字）黎度光（签字）潘玉臣（签字）（柳州联指）郑国仰（签字）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农烈（签字）陆军（签字）雷激（签字）（柳州革命造反大军）明在胜（签字）广西军区：欧致富（签字）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二十时于北京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该谈话纪要的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以及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不尽相同，按序收录於下。〕

一、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半至四点

地点：人民大会堂西藏厅

陪同接见者：戚本禹 黄永胜

被接见者：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军队代表、区党委：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安平生、贺希明、霍泛（接见前两派代表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唱《团结就是力量》）

总理：你们开始联合啊（双方代表说，刚才我们一起学了语录，唱歌，有联合的愿望）你们有联合的愿望就很好嘛，要行动起来，你们看见北京两派联合的气氛了吗？过去北京的机关、工厂、学校分两派，从九月五日中央负责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以来，九月份的气氛一天天在变，特别是从昨天下午开始，中央直属各部一下子联合了二十二个部，工厂联合得更多，学校中学带头，原来联合一百六十多个，现在联合二百多个了。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学校、机关、工厂都可以联合，走资派总是少数几个人，为什么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呢？（联指工人代表表示保证和四·二二联合）好嘛，你们工人带个头，联指在南宁、柳州交的枪很多，他们拥军，做自我批评，你们（指四·二二）有落后的危险，要赶上去。

铁路最难打通的，就是柳州这一关，柳州这一关过了没有？机车是不是还焊在一起，（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答：已开开了，现在每天开出十二台机车）十二台可太少啦，柳州是交通枢纽四通八达，要多做一些工作，你们铁路两派，能不能联合起来？你们要派人回去做说服他们，（柳州造反大军代表说：机车开不出去是因为工厂停工。）不是工厂停工，而是两派对立太大。

桂林的情况怎么样？外地有多少学生在桂林啊？（老多回答：有三千多人，街上很热闹，看我们大批判）很热闹，离开生产岗位去看大批判也不行，国庆节到了要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一年多了，不在本单位，跑到桂林来也不行（桂林老多汇报桂林大联合、三结合的情况）桂林要做个样板，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去铁路的情况怎么样？（老多代表做了汇报）国庆节还有十天，可以做点工作，首先通车。南宁的联指要给铁路沿线各县的联指发个号召（南宁联指说已经发了）。

（老多开始汇报白沙事件）总理说，这个我知道啦，不要讲啦，在桂林，你们老多是多数，还有人往外跑，这说明你们工作没做好。广西就是谁占多数，就想把人压倒，如果是这样，我要保留意见，不能太夸奖你们了，否则你们就骄傲起来。你们要欢迎他们回来。为什么他们不回来呢？这是你们歧视人家，不能骂人家“老保”，更不能骂人家“联匪”，要请安徽代表团给你们介绍经验，他们两派自我批评好，互相赞扬。江青同志讲话后，不到两个礼拜，双方不断地自我

批评，不断搞联合行动。你们危险，就是老多在桂林占多数，歧视少数，你们要讲道理。我称赞你们，不知道你们回去干了些什么？一骄傲一骂，人家就不受你的，不听你压，他们就走出去，夺枪自卫嘛。他们从阳朔到雁山抢东西，这是不简单的，都是你们压人家。你们老多在广西包打天下，你们要先把桂林这个基地搞起来，希望你们桂林这面红旗树立起来，不然你们到铁路上去，也会有问题。在铁路上，我不相信你们批评联指过少，一定是批评过多。你们自认为是响当当的左派，你们师院一千多人发展到十万多人，就能保证思想一致吗？结果老多呢，就欺负人家。你们要注意，你们出去的目的，就是把铁路两派工人联合起来，不能加深两派对立，不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铁路工人不能分成两派，分成两派一定是少数坏人和头头在捣乱，那一派搞好铁路，搞好大联合就是好的，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不就是个人主义。派别利益不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整体利益。你们到铁路上，既不是四·二二，也不是联指，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们要推动两大派团结，不能支持一派压一派。明天你们回去两个人要把铁路搞通，铁路不管那一派，不能认为是四·二二，不对也支持，联指对的也不支持，中央给你们这个机会，（指铁路护路搞宣传）是考验你们，不能去压人家，我宣布老多要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立场上，不能拉一派压一派。铁路交通只能有一派，不能有两派。桂林联指跑出去的人，你们硬是要到他们那里去做工作，欢迎他们回来，你们老多十万多人，对五百多人好争取嘛，只要是革命群众，一个人也要做好工作。“一人向宇，举室不欢”。你们老多把人家五百多人挤出去，说明你们没有本事，工作没有做好，你们自称是响当当的革命派，这次就考验你们，看你们是响当当，还是不是响当当，铁路我们整了几个月罗，越搞越坏。

在南宁你们（指四·二二）交枪交得不够，工事拆除得不多，你们要回去几个人，很快地把这个工作做好。

联指在第五次接见时，我就说了一句话，还没有定性嘛，这个女同志就生气啦，她来了没有啊？（联指回答：来了，在西苑旅社）应该叫她来嘛，（指参加接见）多来几个人没有关系（联指答：下次参加）下次来就过国庆节罗。

（总理看了铁道部军管会关于柳州通车情况报告后）柳州开出十八台机车，桂林开出十二台，相当于平时的三分之一，太少啦，为了迎接国庆，最少要达到

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可是铁道部还比较乐观。我就是不满意。今天二十二时桂林老多乘车去南宁，从桂林开出九九九号机车，到柳州后按规定换机车，老多不干，就把机车开在道岔上，使车不通啦。（柳州造反大军代表辩解，说九九九机车是联指的）你是那里的？你又不是铁路上的，管那么宽，连铁道部的报告都不相信？你们自信心就那么强，和你们讨论问题可不容易啊，你还辩护，蛮不讲理。我给你们这任务（指协助护路搞宣传）你们就拿鸡毛当令箭，大概要换的机车是联指的，你们不干，这就是派性嘛。换车头可能没跟你们商量，按规定没有必要和你们商量。你们两派非联合不可，你们不联合我就叫你们等着，采取其他途径解决你们的问题，要你们去（指老多）是为了疏通运输，你们呢，却阻碍运输，再搞几次呀，我就叫你们回桂林去，我的“鸡毛”是可以收回的，我的决定是可以收回的。希望先把铁路搞好，至少把铁路沿线搞好，我说话严一点，就是希望你们改正错误。铁路大家都要维护，沿铁路的南宁、柳州、桂林、玉林、河池五个分区，都要做工作，军区要通知他们。

南宁问题：平毁工事做得怎么样？交枪、恢复市场做得怎么样？（四·二二汇报）你们两派订的十条协议能不能切实执行？领导干部对那一派的问题也不要管，你们两派先搞大联合，响影领导干部，北京就是这样，群众一出面就把问题解决了，你们广西地处前后，联合应该比那个地方更感到联合的迫切性。你们（指四·二二）抢的援越抗美的炮弹，还有一部分未交。

伍晋南、安平生你们啊，不要管他们革命组织代表，让他们自己搞，可能还快一些。

（四·二二表示愿意和联指联合。希望联指批评帮助，总理带头鼓掌）双方要互相欢迎对方人回去，不能歧视，不要打击，不要扣工资。你们（指四·二二）把工事平了，联指如果来攻你你，他就会犯新的错误，双方开会都要多做自我批评，你们都是革命群众嘛，有的造反精神旺一些，革命有先有后，可以赶上来嘛。不能“以我为核心”，这是蠢人做傻事，以为自己造反早，或人数多，就要“以我为核心”是不对的，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好，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最紧，群众就欢迎谁。

你们南宁两派觉悟都比较高一些，交枪都比较好。你们双方都派些人回去，在军区领导下，双方派代表组成庆祝国庆筹备委员会，登报纸，搞宣传，影响全

区。桂林要首先响应，将外出的人员请回来，并借他们参加筹备小组，你们十万人派十个代表，他们五百人呢，派两个代表，你们要有无产阶级的胆量嘛，不要派性要有党性，在这个问题上，先搞联合行动，南宁先做出一个榜样来。

我们要在二十八号以前，把北京去各地的学生接回来，外地在北京的上访人员也要送回去。

军区也回去一个人，把交通、电讯搞畅通。

你们双方搞几条协定，主要是怎么支持对方的。

（四·二二汇报首都医疗队回京情况）北京医疗队到南宁救死扶伤，你们（指联指）为什么不满？回京两次都上不了车，你们派性高于一切，这是与中央对抗。二十二号一定要保证医疗队回北京，再伤医疗队一根毫毛，唯你是问。

（四·二二汇报联指中有人写炮打周总理的标语。联指表示，我们是热爱周总理的，此事我们进一步调查，如有一定严肃处理）这是个别人的事情，不能和联指联在一起，我才不愿听这些话呢，我也不相信你们（指联指）是五一六，五一六不能乱扣。第五次接见有个女同志问我，联指是什么组织？我说是群众组织，还没有定性嘛，可能传出去以后，有些人不满。你们四·二二也不要以为得一点势，就压人家，你们这样也会摔跤的。

今天接见时开始气氛很好，你们口头上都讲联合，做自我批评，遇到具体问题就争吵不休，派性高于一切，怎么能叫我相信你们会按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走呢？

（四·二二代表表示欢迎《能闯万重关》的同学回校搞大联合）你们占多数，人家回去不能取消组织，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只要他们搞大批判，批判刘邓陶，就是革命组织。

（四·二二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三条建议：第一、军区检讨在广西日报上的错误；二、改组军管小组、撤换石勇；三、军区负责把机器零件找回来，争取十月一日出新华电讯。联指代表提出外部住报社人员应当撤出，四·二二代表即说。以上三条做到了我们撤出）是啊，报社内部要联合起来，军管小组长不称心，可以换一个嘛，缺少铅字可以互助或调剂嘛。

（四·二二代表汇报北海武斗问题）钦州军分区调查清楚，武斗是谁挑起的。南宁联指要发出呼吁，制止武斗。

你们不要满脑子联指、四·二二，要满脑子为人民服务。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要按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走。

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二时至四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同志、黄永胜同志、军区、军分区、五五军、六九五五部队首长，以及区党委书记六人，也参加接见。

总理：听说你们联起来了，是吗？

四·二二：我们在一起唱歌。

联指：我们有这个愿望。

总理：有联合的愿望就好嘛！我向你们祝贺。北京就是这样搞的，九月份许多单位都联合起来了，中央各部昨天开了一个动员大会，原来不联合的，一下子就联合了几十个。中学联合了一百六十多个，工厂也联合了几十个，学生、工人都可以联合，两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

联指：我们工人保证和四·二二的工人联合起来。

总理：好嘛！你们工人带头，学生跟上去，你们老多出去多少人？

老多：一千多人。

总理：你们搞的七条协定很好嘛！签字了没有？（戚本禹说：签了。）

柳州联指汇报上交武器的情况，说：我们按总理指示，柳铁钢联指已在二十日凌晨将全部枪枝弹药上交完毕，柳州联指在六时全部交完并召开了庆祝大会给总理发了加急电（将两份加急电交给总理）。

总理：交枪的事联指比四·二二交得多！很好（33）。铁路怎么样？（联指答：通了，五次今天发车），最难搞的是柳州，柳州现在怎么样？（柳州联指汇报了恢复生产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你们提的都很好，我就想了解柳州铁路这一关过了没有？机车怎么样？

柳州四·二二：打开了。

总理：（对秘书说：打个电话问铁道部现在困难在那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你们铁路两派能不能联合？

柳州四·二二：现在阻力很大，我们要求回去做工作。

总理：那你们就先回去一些人嘛！

柳州四·二二：现在每天开十二台机车。

总理：太少了，柳州是重点嘛！四通八达，联指在南宁、柳州交抢多，又开展“拥军爱民”（面对老多）你们有落后的危险，要赶上去，你们想回去做工作可以回去嘛！我上次不是说了吗？主要是用这段来考验你们，你们桂林怎么样？外地的去还有多少人？

老多：有三千多人，晚上很热闹，每天到街上看大字报。

总理：还有三千多呀！离开生产岗位出去看大字报，也不行，把学校的地方都占了，也不利于学校的斗、批、改，是外地的吧？

老多：各地都有。

总理：北京的还有没有？

老多：基本上没有了。

总理：那就说还有几个人吧！

老多：有一到二个。

总理：是那派的？

老多：是地派的。

总理。地派也好，天派也好，应出现在北京的地面上嘛！不应出现在桂林的地面上。（34）你们铁路困难在那里？

老多。我们的人由柳州回黄冕时，十六个人被联指抓了八个，以后柳州军管去接，中途有三个逃跑，被联指开枪射击，现在下落不明。

总理：现在离国庆还有十天，时间很紧，首先要把铁路交通恢复起来，你们联指发出呼吁了没有？

联指：已经发出了。（把三个呼吁书递给总理）

老多：桂林各地有不少造反派被走资派压制和迫害，……

总理：还有抢枪的吗？

老多：资源县联指九月九日还抢枪，……

总理：你们桂林军分区不是较好的吗？

老多：是较好的，下了几次命令，武装部不听，以后下了死命令才解决，联指在雁山打死了我们的人，尸体不给收。

总理：你们在阳朔又打了一仗是吗？你们到那里干什么？

老多：他们全副武装想来包围桂林，又抢粮食，6955 才去的，（联指代表递给总理一份电报）

总理：是民兵嘛！是那里的人？

老多：是桂林、柳州、南宁联指的人。（35）

总理：在桂林你们老多是多数嘛！应该教育他们回来，你们占多数还有人跑，这说明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担心你们是不是过头了，不能说每个县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派，我听伍晋南说要把全省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打倒，怎么会有这么多？不会都是这样的，有的是执行了反对路线的。你们就是这样，谁占多数就想把另一派压倒，如果你们桂林的少数派还往外跑，就证明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对你们就要保留意见了，不能把你们夸奖太多，不然你们就骄傲起来了，你们要欢迎人家回来，不要骂人家老保、联匪。我刚才在中央文革开会，安徽两派联合得很好，双方都作自我批评，你们桂林（老多）不能歧视人家，你们占绝对多数，压人家少数，这是危险的，你们在这里讲道理，我在这里称赞你们，谁晓得你们回去怎么样，瞧不起人家，人家就跑，我看人家能动员人到桂林抢东西很简单，我看一定是你们压了人家，你们就要考虑考虑。（36）如果你们在铁路上不改变态度就危险，你们老多跑遍整个广西，我看你们要以桂林为基地，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工作搞好，你们称自己为响当当的左派，年青人不能自封。自己封自己总会摔跟斗，师院你们才一千多人，你们发展了多少？

老多：十万人。

总理：一旦到十万，你们就很难保证思想上的一致，就以多数来压人，你们在铁路方面要说服两派联合起来，如果不联合，反而加深矛盾就不好了。你们出去不能压人家，你们要宣传，你们不能再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如果你们在铁路上不改变态度，就不能加速团结，只能加深对立，都是阶级兄弟嘛！那一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去做，就是无产阶级的，如果不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去做，就是派别利益，小团体利益，就是小资产阶级，这件事委托给你们，看军管会反应怎样，你们在铁路上应变成宣传队，不能是四·二二派、老多派，也不是联指派，这样才能推动团结，你们只支持四·二二，压联指，联指就不干，互相斥责，就不能解决问题。（37）刚才，会前韦国清同志要

求中央派调查团，我看不采用这个办法，你们自己去解决，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行，我责成你们再回去一个人，沿途检查，把我刚才的一段话传达下去，从冷水滩到凭祥到湛江，非打通不可，在铁路只能是一派，不能是两派，不要派性，要无产阶级党性。铁路问题，我就考验你们“老多”，你们要把那些跑出去的人争取回来，有多少人跑出去？

老多：五百多人。

总理：五百人，你们都动员不回来，说明你们工作有缺点，工作未做好。

老多：我们已出了布告欢迎他们回来。

总理：光出布告不行，你们还要亲自去找他们回来，革命群众嘛！只要不是坏人，就应团结起来。主席说：“你们把人家挤出去了！”十万人还不能团结五百人。

老多：我们保证做到。

总理：我在铁路问题上，就是看你们是响当当的，还是不响当当的。要宣布老多不是那一派的，而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在铁路上不能分成两派，不合作铁路交通就会受影响。“四·二二”要回去做工作，我同意你们回去几个人。你们交枪比联指少。联指，上次你们那位女同志问我，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了一句群众组织，没有定性嘛！就跑回去了。那位女同志呢，来了没有？

联指：来了，在西苑旅社。

总理：怎么不叫她进来。

联指：我们的代表只有十四名。

总理：嗨！多来几个也没有关系嘛！

联指：好，下次我们叫她来。

总理：那就要到国庆节以后罗！（38）（秘书打电话回，总理看送来的材料。）你看，马上找到你们的岔子了，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军用、联运车通行无阻，客运通行到冷水滩。问题就在柳州机务段，才开出十八台机车；桂林十三台，相当于以前正常运行时的三分之一。铁路军管说很好，就满意了！我们要求达到百分之九十，铁路军管要求太低了，我就不满意。三分之一是多少，你们大学生算，师院的。（总理让师院讲）

老多：百分之六十几。

总理：（笑），师院的什么百分之六十，三分之一嘛。柳州铁路“工机联”逐渐上班了，但今天发生了一个问题，从桂林开出的九九九号机车到柳州后，按规定应换机车，但因为这是老多开的。

柳州四·二二：九九九机车是柳州联指抢去搞武斗的。

总理：现在是老多开的嘛，你又不是铁路上的，你们不相信铁道部军管的报告吗，你什么都包办。你们自信心这么强，所以跟你们讨论，是不容易的。换机车，算不算规定。（39）

柳州四·二二：算！

总理：对！可是结果，因为是老多的，就一定要开到南宁，铁路上就不同意。在机车上水时，就换上柳州的机车，老多不满，就把机车停在道叉上，把交通阻塞。（总理秘书说：现在断了。）老多的理由说是执行总理的指示，不准换，要直达南宁，执行指示和换机车是两码事，规章明明写的换机车，有什么不好，你们不讲理多么危险呀，我坐火车也要换嘛，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准换，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我给你们任务，你们就把鸡毛当令箭。大概因换的是联指的，你们就不放心。你们就有那么强的派性，还没有开会前我就担心这件事，现在证明了。柳州局不先和你们商量，按道理可以不和你们商量。不应当派性高于一切，所以你们两派非联合不可，如果搞不好，我就让你们等着看，用另外办法解决，你们老多发挥了派性，换车不商量不好，但我叫你们去，为的是疏通运输，结果阻碍了运输，再搞几次，我就把你们调回桂林，你们就是派性高于一切。（40）你看这位代表（指柳州四·二二），我一说九九九，他就想到什么事，你看这不是派性高于党性吗，你们拿鸡毛当令箭，我这鸡毛是可以收回来。你们知道吗？

老多：我们调查一下，如果有这事，要严肃处理。

总理：等一下。军管来了再说，我本来叫你们去，是为了搞好铁路运输的，你们可以和各军分区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广西有多少个军分区（黄永胜：八个，有五个在铁路上），那就解决很大问题了嘛！当然也允许你们青年人犯错误，但要改，要把铁路搞好，你们说要中央派人，我看还是由你们来搞好嘛！搞好了还可以推广这个经验。（41）南宁四·二二怎么样？

四·二二：（汇报交枪情况，听说指挥部能控制的基本交完，其它要回去作工作，我们已打电话回去了，武斗工事的消除工作，医疗队说较好。）

总理：把十条协议逐条实施，可以不可以？

四·二二：可以。

总理：你们两派先联合，群众可以推动领导，北京就是这样做的，那就是头头开会，群众等不及了，敲锣打鼓去推动他们，结果是头头不得不接受群众意见，在北京部长、司局长已靠边站很久了，批判也批判了，站不出来，除坏人外，有什么理由不搞大联合，为什么两派这样对立呢？群众一出面就解决了嘛！

四·二二：（表示要向宁夏学习。）

总理：你们不要落后了，你们的联合比谁都急迫，你们的炮弹未交完，只要一做错怎么弥补也补不回的。

四·二二：（表示要联合，并说，欢迎联指批评他们。）

总理：（带头鼓掌），安平生、伍晋南，你们不要管他们的问题。

四·二二：（当汇报他们死人多时）

总理：死了人、伤了人这是损失，但也锻炼了人。

四·二二：我们听总理的话。

总理：听毛主席的活，听林副主席的话。联指人多的地方要欢迎四·二二的回去，四·二二人多的地方也要欢迎联指的同志回去，不要歧视他们，不要扣工资，你们都是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有先有后，后来的赶上来就行了嘛！《文汇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的问题”，提以我为核心是蠢人，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要看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好坏（四·二二当说欢度国庆问题时），南宁搞得比较好，你们两派可以马上派人回去，在军区领导下组成一个国庆筹备会，联合欢度国庆，可以登报，这样各市县可以向你们学习，桂林也要把那些少数人请回去，人少也可以派代表，如果十万人搞筹备小组，选出委员十人；他们五百人也可以派两个人，这不好吗？你们还是占少数，他们两个，但也有代表性呀，这就是党性，就不是派性嘛！桂林搞好了，柳州也得学习了，这样各县都可以搞起来了。

柳州四·二二：（造谣说柳州联指进驻一中，架机枪不让他们的人回去。）

柳州联指：我们没有人在一中，我们的枪全部交完啦。

总理：军分区有人吗？

柳州军分区：二十号上午，联指的枪已交完，四·二二只交了一部分。

总理：你们到四·二二中去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军分区，你们在支左工作中有些错误向他们检讨了没有？

柳州军分区：检讨了。

总理：南宁（指联指和四·二二双方）你们回去搞筹备，搞联合行动好不好（双方：好），桂林也会做好的、这要看柳州的联合了，其它玉林、河池也会响应。不然，你们广西问题，确实是“马拉松”了，铁道部的同志来了没有？999 机车是谁开的？

铁道部：“四·二二”开的。

总理：他们（指四·二二），就是有个心理状态，就怕联指开机车，一旦路上停下来会有人来围，架机枪，就会死人，一定是这个心理，有部队保护嘛！

铁道部：这只是专列有部队。

总理：这点你们军管做得不力的，要把各地在京上访人员和学生运回去，要把在各地的北京学生运回来，派野战军沿途保护，有部队保护你们就放心了。

四·二二：我们愿意和联指搞拥军爱民，把十月作为拥军爱民月，搞大联合，共同批判刘邓陶，揪出广西走资派，揪挑起武斗的策划者，审查当权派，揪打着支韦旗号干坏事的人，我们想全部回去。

总理：全部回去了，我们有事找谁？军区你们也回去一人，家里人太少了。

四·二二：（汇报医药、粮食、工资有困难，要求联指协助解决。）

总理：这些问题都要解决。你们在这里搞个协定，专门讲支持对方的。

四·二二：（汇报北海联指抓人打人的问题）

总理：军分区知道吗？是谁挑起武斗的？

钦州军分区：还未调查清楚。

总理：需要打电话或亲自回去调查清楚（答：好）

四·二二：北海造反派死得最惨，百分之八十都死了。

总理：戚本禹（笑）；哪有这么多？！

四·二二：北海联指自己公布就打过六·八总部五五七人。

总理：你们南宁联指就发个呼吁书，虽然他们不是你们的组织，但名字一样，沾污了你们的名称，你们一定要发呼吁书。

联指：我们保证发。

四·二二：他们（指南宁联指）曾为北海联指报捷，还说打得好。北海联指还说要杀到南宁，踏平四·二二。

总理：胡扯（戚本禹笑）

四·二二：他们说，他们没有联系，实际他们派人去，每段工作都有布置。（四·二二汇报首都医疗队回京被围攻，有两个被打后，送郊区二十公里外的问题）

总理：是那个学校的？

四·二二：是北医八·一八的。

总理：他们是天派的呀，应和四·二二的观点不一样嘛！医疗队，打他干什么？

联指：昨天四·二二一千多人护送他们上车，但列车晚点，他们就回去了，后备军写了两条标语……当然这条标语是错误的，今天部队派两个班护送，但他们十七人就要包一个车箱（十二号车箱）旅客没有位坐，要求进这个车箱，但他们把车箱都堵死了，后来旅客把他们拉下来。

总理：怪事，北京派的医疗队，是救死扶伤的，你们为什么要干涉，两次上车上不了，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搞得很不好，军区派人护送，你们不干，两个班保护十七个人，总共才四十个人，我看一定是联指鼓励旅客搞的（联指：我们回去一定查明，严肃处理）你们写了两条标语代表了一种情绪，这是很错误的。

四·二二：我想给联指提几点意见。

总理：时间不多了，不要讲啦。你们对立情绪这么严重，你是铁路的，你说不带派性，我就不相信，你刚才说的话，我看就不那么确实，医疗队给四·二二看病多点，你们就有意见，我们派医疗队看病，本来是好事，但是增加了你们的磨擦。

四·二二：广西日报问题我们提个新方案，军区就广西日报问题做个检讨，改组军管小组，撤石勇的职。

联指：我们 58112 的同志回去了，但四·二二不撤出报社大楼，我们要求他们撤出。

总理：工人回去就好啦，军管小组负责人不称职可以换一个。

联指：机器零件在四·二二工总手上，如果实在找不到，我们 58112 的工人可以仿制，我们希望四·二二的同志撤走，工人好回去。

四·二二：机器零件是联指拆的……。

总理：你们派性这么严重；刚才大的问题谈得不错，遇到具体问题派性又来了。

柳州联指：我们希望造反大军也欢迎我们的人回去。我们回去的人，他们说要听他们的指挥，带他们的袖章，铁路问题两派都有工人在这里，建议在联络组的主持下达成个协议，回去双方做工作。

总理：国庆节前，铁路双方人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这些问题由联络组、铁道部军管会主持会议具体解决，到本单位观点不同，允许保留嘛！何必要人家加入你们的组织，改变观点呢。

四·二二：我们请求解决桂林九二工程问题。（具体汇报。）

联指：九二工程是我们建工局管的，老多到那里干涉，工人不敢回去，现在桂林联指很多人被赶出来也回不去，有不少的人流落在柳州、南宁等地。

总理：为什么你们老多也要到那里去？叫人家变成老多，你们广西的派性闹得这么厉害。（42）

四·二二：现 5.16 在广西闹得很严重，可能是联指一小撮坏头头搞的。

总理：5.16 不能乱扣，批评我几句也不能算 5.16，我才不听这句话，那天对你们两派也不是定性，是你们那位女同学问了，我才说的。（43）

联指：（汇报我们交枪情况……）

总理：我们知道了，不要讲啦。

联指：（汇报我们恢复商业网点……）。

戚本禹：不要讲啦，你们回去讨论总理指示，有些问题协商解决。

总理：国庆节问题，你们派些人回去研究，刚才你们一面说向宁夏学习。但一到具体问题，派性又来啦，你们把小事夸大成大事情，一个医疗队几次回不来，你们说铁路没有联指观点，我就不信，这就是对抗中央嘛！你们这边（四·二二）也是一开始说得很好，一到具体问题就指责对方，我们是越南的后方，那边打美国鬼，但铁路不通，机车才开三分之一，很多炮弹运不过去，你们就满足了？我就不满意。现在苏修等都去引诱越南和谈，我们就是真正支援越南的，铁路不通

怎么办？你们能不能联合？（指联指）刚才说的一段话，我才不相信是旅客搞的，一定是联指的人搞的，有些人去冒充旅客，现在我给你们一个任务，一定要保送医疗队回京，如果敢动医疗队一根毫毛，我就唯你们是问（联指：我们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到北京，并查清这一事件，严肃处理）。你们南宁联指要号召各地联指制止武斗，你们协议定了这么久还未完全兑现，所以你们坐在这里四个月。

四·二二：我们西大已做出决定，欢迎“能闯”的回去……

总理：只要一条，你们人多，对方回去，你们不能取消人家的组织，人家批判刘邓陶，方向是对的，都是革命组织。虽然过去有些缺点错误，但改了就好，西大不要外单位去串连。

联指：我们很想回西大，但有些具体问题……。

总理：你们这样我就不“仲裁”了，具体的问题你们回去自己解决。

铁道部：关于铁路问题，关键问题是两派武斗问题，如果能制止武斗就好办，两派观点不要带到生产上去，建议两派按中央关于铁路运输问题的指示执行，尽快上班，任何情况不要影响运输。

柳州联指：我们一定回去动员，坚决执行。

总理：不要把观点带到生产上去，生产就是生产嘛！观点不同也可以在一起工作嘛！这点你们联指要多负些责任，因为你们和农民联系较多嘛！你是南宁联指，他是柳州四·二二（指铁路）能不能联合？（两派：可以）。

铁道部：我们铁道部已经实现大联合，请总理参加我们的会议。

总理：我不去了，你们开会可以请他们铁路的同志参加，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联合起来！（散会）

注释：

（33）从总理问“你们老多出多少人？”到此处说联指枪交得多，很好，都被四·二二删掉。

（34）以上八段对话，都被四·二二略掉了。

（35）以上五段对话，又被四·二二略掉。

（36）四·二二发表的记录，删掉以上从“你们在这里讲道理”起到此处为上的一整段。

(37) 总理以上的讲话，意思很明显，是针对着老多在桂林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明确指出老多到铁路的任务是宣传，而不是搞其他不恰当的事。总理这段带批评性的谈话，在四·二二发表的记录中，原意基本上都阉割了。反而塞进一句：“我再次宣布、老多是中央派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使人看了，以为不但没有批评老多，反给老多加冕，赠给新的封号！

(38) 以上十二段对话，全被四·二二删掉，只用两句话一笔带过了事。

(39) 总理这句话，又被四·二二删去。

(40) 以上几大段话，总理毫不含糊地批评了老乡，但四·二二只写上寥寥几句，删略得如此厉害，以至把总理的话弄得前言不接后语。请看四·二二发表的总理讲话：“……叫你们通，你们反倒阻碍青年做事，这就是派性高于一切。”

(41) 总理这段话，按照四·二二发表的记录，词句含糊得使人以为不是指老多，而是指军分区。请看四·二二玩弄的文字技巧吧：“……五个军分区解决了，铁路就好了，当然，他们犯了错误，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改正就好了嘛！”

(42) 四·二二把总理这段话全部删去了。

(43) 下面四个短句，四·二二发表的记录也都全删掉了。

三、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二十八分——四点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陪同接见者：黄永胜

被接见者：广西四·二二、广西联指代表团、广西军区、军分区、六九五五部队、五五军部队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六人。

总理：听说你们两个代表团联合起来了，创造了联合气氛，我庆贺你们。

(四·二二：今晚我们在一起学习语录、唱歌)北京的情况你们看到了吧，国务院各部过去一个也不联合，昨天有二十二个联合了，工厂就更多了。工厂、学校、机关都可以联合，因为走资派总是少数的几个人，你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特别是工人阶级，有什么理由分成两派，让坏人操纵！

联指：我们工人保证同四·二二工人联合起来。

总理：好！工人阶级要带头，学生跟上，“老多”任务重，现在最难打的一关是柳州。（问“老多”你们知道柳州情况吗？）

四·二二：（汇报“老多”参加维护铁路及“老多”在黄冕站被抓等情况）

联指：（柳州）昨天把武器上交了，我们都想回到工厂，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同四·二二联合。上次总理批评我们自我批评不够，我们开会检讨了。

总理：机车还焊在那里（柳州）吗？（对秘书）打个电话给铁道部问一问柳州铁路困难在哪里？你们四·二二不是要求回去吗？我同意你们回去几个，要做下边工作。柳州联合有阻力吗？

四·二二：我们死伤人多，受压厉害，下面可能有些阻力，我们尽量做好工作。（汇报柳州开车情况，说到今天开出十二趟车时）

总理：太少了，柳州是交通重点，四通八达，你们双方对立情绪还没解决，联指在南宁、柳州交枪比较多，你们有落后的危险，你们造反派，我不是说了吗，要经受新的考验。我不反对四·二二（代表）回去。上面搞通了，下面还要好好做工作。

四·二二：总理，柳铁工总代表已到北京，要求参加今晚接见，向总理汇报铁路情况。

总理：住在什么地方？（四·二二：住在西苑。）联络员同志去叫来，桂林怎么样？

四·二二：（汇报谈到桂林正掀起学毛著，大批判高潮，形势大好。）

总理：光搞大批判，还有本单位斗、批、改呢？桂林有多少外地学生？

四·二二：有三千多，包括工人、干部，连中学也住满了。

总理：连中学也占了，怎么搞斗、批、改？

四·二二：我们（桂林）正在准备开工代会，筹备搞革命委员会。

总理：有干部吗？

四·二二：有干部。我们认为王同连、冯邦瑞经过考验是可以的。

总理：驻军呢？

四·二二：六九五五部队张政委，还有军分区×××。

总理：是军部还是师部？

四·二二：是师部。

总理：是嘛，你们桂林做个榜样嘛！搞“三结合”，搞革命委员会。你们搞铁路有什么困难？去了多少人？

四·二二：我们的人全部出发了，去了一千多人。

总理：都是师院的吗？

四·二二：全都是师院的。

总理：国庆还有十天，要搞好铁路，你们南宁联指要沿线发号召，你们发到小站了没有？

联指：我们呼吁已发下去了。

四·二二：桂林专区各县情况严重，造反派纷纷被迫逃到桂林来，桂林压力大，资源武装部支持联指打造反派，造反派写了绝命书……

总理：桂林军分区不是比较好吗？为什么不派部队？

四·二二：桂林军分区是好的，但下面武装部不听，后来张政委下了死命令，要武装部派人去保护造反派，情况才好转。另外，桂林联指勾结阳朔联指，几百人开车到桂林郊区抢粮食，开枪打死六九五五部队战士一人，老多一人。

总理：桂林你们占绝对优势，还有人（指联指）跑出来。证明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我对“老多”有一点保留意见，就不能夸奖太多了。不要歧视他们，骂他们“老保”、“联匪”。我看要请安徽代表团给你们演讲，介绍经验，他们两派自我批评好，互相赞扬。江青同志讲话后，不到两个礼拜，双方不断作自我批评，不断搞联合行动。你们“老多”在桂林占绝对优势，瞧不起少数，骄傲起来，人家跑掉了。伍晋南同志说要把大大小小走资派打倒，就把广西说得一团漆黑，有一些是执行反动路线的。

你们“老多”踏遍广西，要在桂林搞好，以桂林做基地。桂林是一面红旗，我是希望你们搞好这面红旗的！所以把“老多”推荐到铁路上去。但是，要注意，青年人封自己是左派就要摔筋斗的。

“老多”在铁路就要是说服两派联合，不能参加两派对立，不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工人没有两派。那个头头把铁路搞好了，就是好的。

在铁路上，“老多”不是四·二二派，也不是联指派，联指做对的，也应该支持，不然，联指就不服你。你们要变成宣传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广西铁路还是靠你们解决，你们是造反派嘛！我再次宣布：“老多”是中央派去的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明天你们回去几个人做工作，铁路只有一派，没有两派，铁路工人只有党性。没有派性，现在给“老多”管铁路，是考验你们。

四·二二：（汇报桂林联指跑出五百多人的情况）

总理：你们“老多”有多少人？

四·二二：桂林大大小小二十万人。“老多”已发展到十万人。

总理：你们有十万人，联指跑一出五百人，要做工作，把五百人挤出去，十万人就不算本事。要说服回来，主席最近讲过：对革命群众“一人背则举座而不欢”。这句话意思是，大家坐在一起有一个背着坐，大家都会感到不舒畅。这次（维持铁路）要考验“老多”，看你们是不是响当当。

南宁（四·二二）枪交的不够，军区支持你们。你们踌躇不前，（念铁道部送来柳铁运输情况）铁道部很乐观，这几天开车相当于平日三分之一，我就不满意。最少要达到百分之八、九十。运送“老多”去南宁的专用九九九号机车，“老多”在柳州不准换车头，蛮不讲理。

四·二二：九九九号机车是联指抢桂林机务段的，专门搞武斗用，现在仍然是联指控制。

总理：铁道部报的为什么不相信，听我念完嘛！铁道部同志，九九九号机车是联指开还是四·二二开？（铁道部：据我们了解是四·二二开的），我给你们老多一个协助维护铁路军管的任務，你们把鸡毛当令箭，这样搞，派性高于一切。你们现在就是派性高于一切，你们两派就是非要联合起来不可，不然，就把你们留下来，我用另外途径解决问题，叫你们通，你们反倒阻碍青年做事，就是派性高于一切，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还可以撤你们回来，“鸡毛”是可以收回来的，广西有多少军分区，在铁路沿线有多少个？

军区：八个军分区，铁路沿线五个。（念：南宁、桂林、柳州、玉林、河池）

总理：五个在铁路沿线，责任大得很，五个军分区解决了，铁路就好了，当然，他们犯了错误，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改正就好了嘛！南宁，你们四·二二交武器。毁工事，做得怎样了？

四·二二：（汇报交枪情况，交了两批，指挥部控制的都交完了，还有一些散在个人手中，正在动员交，接着谈到实现大联合的愿望和做法）。

总理：大联合你们领导自己思想要通，北京群众监督领导，群众比头头快，领导不通，群众出面把问题解决了。

四·二二：我们有千条万条理由要联合，广西两派不联合就不能成为越南的可靠后方。

总理：好嘛！你们最有体会，更有理由联合。

四·二二：（继续谈大联合问题）……我们也希望联指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

总理：（很高兴，带头鼓掌，四·二二跟着鼓掌）呀！你们（联指）为什么不鼓掌？你们后面一定有人，他们在这里。安平生、伍晋南，你们暂时不要管他们（对四·二二）前几天他们来谈还是谈不来，对立情绪还很大！由他用搞去。

四·二二：我们死、伤了很多，但是这笔账要算在走资派身上。

总理：对！你们死、伤了很多当然是个大损失，但得到了革命的锻炼。

四·二二：（表示要拆除所有的工事，上交所有的武器）

总理：你们拆除了工事，上交了武器，那就立了新功！你交了武器，军区要来保护嘛！如果军区不保护，那就要犯新的错误。

四·二二：（表示自己占多数的单位欢迎联指回去）

总理：联指人多的工厂、学校、机关要欢迎你们，你们（四·二二）也要欢迎他们，都不要打击、报复、克扣工资，有什么困难还要帮助，都是阶级兄弟嘛，要作自我批评，不走毛主席的道路还走什么道路？不过，革命有先有后，都要联合。提“以我为核心”不对，是个蠢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四·二二：（继续谈大联合问题）我们建议国庆节和联指一起开庆祝大会。

总理：是呀！南宁在这方面觉悟比较高，是中心嘛，封枪，交枪也较好，你们现在就有事情要办理，两边都派人回去，军区参加，在军区的领导下，联合组成一个筹备国庆小组，联合庆祝国庆，然后登报，号召广西全区学习，首先桂林响应把“少数请回来”。筹备，五百人请二个参加（筹备小组），这就表现出你们政治的度量，他们回来就会高兴了嘛，要有无产阶级的度量，你们十万人十个代表，给他们两个代表，那就不是派性了，而是党性了。柳州可能难一些，柳州的谈谈。你是柳州的吗？（问柳州代表）

四·二二：是，我们是柳州的（谈交枪问题）。

总理：（转过来问联指）你们有柳州的吗？

联指：有。

总理：柳州军分区有人来吗？

柳州军分区蔡××：（站起）有！

总理：交枪的情况你们知道吗？

柳州军分区：知道。（说联指全部上交了）。

总理：四·二二的呢？

柳州军分区：柳州造反大军交了一部份（谈了两个组织交枪情况）

总理：你们过去是偏于联指的，要改过来。

柳州军分区：是的，我们已经检查了。

总理：今后每天都要到四·二二（造反大军）那边去，要对四·二二好，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问题。要帮助他们解决。五十五军有人来吗？

五十五军刘××：（站起）有！

黄永胜：五十五军过去支左支错了。

总理：对！支错了。

五十五军：我们已经检讨了，承认了错误。

总理：承认了错误，转过来就好嘛。你们明天要到他们四·二二驻地看他们。

五十五军：我们现在都住在一起。

四·二二：六九八四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五十五军开始转过来了（接着谈联指冲击支左办公室和警备司令部，斗孙副军长问题）。

联指：我们是去拥军，去慰问的。

四·二二：不对！这里有部队的声明。（送上“声明”）

总理：（看“声明”，摇头，笑起来）这是柳州联合支左办公室，柳州警备司令部和六九八四部队发表的声明，你们冲击就不对了，应该承认嘛。旧的不提了。南宁在军区领导下筹备庆祝国庆，一起开会，逐步扩大。桂林占优势，柳州、玉林、河池也跟上，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行动。南宁作出个榜样，好不好？不然就马拉松了。铁道部同志来了吗？

铁道部：来了。（谈铁路的情况）

总理：你们就是这样，互不相信，就怕另一边突然刹车，怕联指打电话给农民，半路拦截，突然来那么一下子（用手作包围手势），你们的心情我们都理解，都打过仗嘛。（转过来问铁道部的）你们车上派了部队没有？

铁道部：没有。

总理：这就不对了，应该派部队嘛，半路发生了问题也好观察嘛，凡是专列都要有军队，这件事军管会做得不对，马上派去。五十五军沿途保护，二十八日以前要把北京外出的学生接回来，这些学生在外大约有二万，这些人都要用专车送回，要武装保护。（对老多）这样你们就放心了。你们是有根据的（指老多不同意换九九九机车）因为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四·二二：（谈拥军问题，）……军区犯错误改了就好了。

总理：军区将来一定要检讨。

四·二二：我们订了拥军公约（递拥军公约给总理）

总理：（点头）对！对；

四·二二：我们定十月份为拥军爱民月。

总理：好！你们“老多”学校改名为为什么？（思索一下）啊，革大，你们本身还要斗、批、改。

四·二二：我们建议联指和我们一起协助军区搞好“工总”平反，联合揪出挑起武斗的后台，黑手（总理点头），我们代表团要求全部回去贯彻中央的指示，希望联络组也去。

总理：你们都回去了，有事我去找谁？你们留几个人嘛？

四·二二：（向总理汇报目前困难的处境）。

总理：军区也要回去一个人，电讯要与北京畅通，粮食、工资，医药问题要解决，柳州、南宁要搞好。“十·一”以前就搞好这些，欧致富：怎么样？

欧致富（军区司令员）：唔！

四·二二：（继续谈目前困难处境）

总理：明天回去，最好你们推出代表，在这里先就铁路问题订几条协议，派人回去专门讲，帮助对方的，不讲自己的，影响桂林、梧州。

四·二二：（谈全区各地造反派受压的情况，特别讲了北海的）

总理：北海是属于那个军分区管的？

四·二二：属钦州军分区。

总理：钦州军分区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吗？是人武部搞的还是怎么样的？不然武斗搞得这么起？

钦州军分区：（含含糊糊）不清楚。

总理：武斗是谁挑起来的？军分区为什么不调查，你们来了几个人？

钦州军分区：只来了一个。

总理：你打个电话回去，叫军分区马上派人去北海调查，要不，你自己回去，亲自去处理。（钦州军分区：我打电话回去。）

四·二二：根据北海联指的自己说：北海造反派死了五七一人。

总理：军分区要负责任，他们跑出了多少人？

四·二二：跑的跑，抓的抓，杀的杀，他们“六·八”指挥部被打散了，又没有办法汇报，真是“冤沉海底”。

总理：叫什么？

四·二二：叫“六·八”指挥部，百分之八十是工人。

总理：他们人这么多，谁压迫他们？一定有武器！

四·二二：是的，北海联指步枪、机关枪、炮都用上了。

总理：南宁联指要发个呼吁书，不管在组织上是不是你们联指的，呼吁他们，号召他们改正错误。

联指：我们派人去调查。

四·二二：他们踏平了北海造反派，南宁联指还要给他们报喜！向他们学习。

总理：杀了人，还报喜，这就不对！

四·二二：他们还说要杀到南宁来，要消灭四·二二！

总理：扯淡！？

四·二二：总理，我刚才接到南宁来的长途电话，有个紧急情况向你报告，首都医疗队上车被联指打……

总理：北医八·一八的，天派的嘛！地派支持他们（四·二二），你们为什么还要打？把医疗队打伤就不对了。

四·二二：我们跟天派，地派都有联系，都支持我们。

总理：你们这样好，你们没有卷入两派。

联指：（谈打医疗队之事）我们的后备军贴出两条标语，一条是“医疗队是武斗的挑起者！”一条是“医疗队是披着白衣的豺狼！”这是不对的。

总理：谁把医疗队拉下车？

联指：是旅客。

总理：是不是旅客？！

联指：（继续谈医疗队之事）

总理：你为什么这样清楚？

联指：刚打电话联系的。

总理：你就信那个电话，医疗队为你们治伤嘛！他们（四·二二）提出要求，我派去的，你们为什么要把人家拉下车，你们一定有一种情绪，不单是两条标语的问题，而是你们对医疗队不满，是一种思潮，医疗队两次上不了车，打电报给我，你们搞的真不好，派性高于一切，军队派人去护送都不行，我看就是你们联指人干的，要不，就是你们联指派入混到旅客当中，鼓动乘客干，我打了几十年仗，还想瞒过我，你说对不对？

联指：（被迫地）对！

总理：铁道部同志，你是内行，你说是不是这样？

铁道部：是的。

总理：你们要客观反映问题，照你的口气就不客观，相信电话，我看电话就不准，铁路不要站在派性上，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关于医疗队我不是讲过了吗？本来是好事，而你们把它搞坏了。

联指：我们马上打电话回去调查，立刻处理。

总理：照你讲话的口气，我看你就不客观。

四·二二：我想向联指提一个意见。

总理：我已经批评他们了，你又来加一把火，我不再当裁判了，你们回西苑谈吧！

四·二二：总理，我们跟军区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念关于广西日报问题的新协议，争取“十·一”出版）。

总理：广西日报军管小组过去有问题，就换一个负责人嘛！

联指：我们的人已经回去了。

总理：回去就好了。

联指：但机器零件没有了。

总理：广西连一个印刷厂都没有？

联指：……，零件在四·二二“工总”手里。

总理：你们动员大家合作嘛！

四·二二：零件不在我们这里。是他们自己欺骗自己！

联指：好了，好了！我们保证回去自己想办法制造，但是铅字搞武斗时作弹弓打完了。

总理：你们广西有没有制造铅字工厂？

联指：没有。

总理：其他厂调整嘛！赶快铸嘛！派性膨胀太大了，造成损失，你们白天把这几件事办一办，双方派人回去，就铁路问题和国庆问题达成协议，但不要走光了。

四·二二：（汇报“九·二”工程问题）

总理：你们广西派系搞的真够呛！

四·二二：（继续汇报“九·二”工程问题）我们希望总理责令军区处理这个问题。

总理：你先说别的吧！由广西军区搞，但这事不晓得军区有没有威信来搞好。

四·二二：总理，联指一小撮坏头头炮打周总理，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离间林副主席和周总理，这是五·一六思潮。

总理：上次你们（联指）那个女同学的态度不好，我批评几句，她回去放了一些空气。这些话我才不听呢。

四·二二：我谈谈广西大学关于大联合问题。

联指：（抢着说）我谈谈交枪的问题。

总理：（不耐烦）我都不听了。

戚本禹：你们回去讨论总理的话。

总理：首先搞协议，共同筹备国庆，双方派人回去，搞个良好的开端。你们前面说得好好的，但是到了具体问题就吵吵闹闹，这叫我怎么相信你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小问题变为大问题，医疗队是我派去的，你们搞得他们无法

开展工作，他们要回来也回不来，我要批评你们联指，你们联指就不自我批评，使医疗队两次上不了火车（回北京），这不是简单的问题，这就是对抗中央。你们联指混在旅客中，搞一些人做旅客，把医疗队拉下来，这骗不了我。你们四·二二也是这样，开始讲得很好，但到了具体问题就吵了。你们都不顾大局，这怎能做越南巩固的后方？他们在前方流血，我们都不好过。开了三分之一的机车，我是不高兴的，现在要趁雨季赶送资物过去，……。我们要真正支援越南嘛！我给你们（联指）一个任务，在二十二日保证医疗队回来，要是再动了我们医疗队一根毫毛，（气愤地）就唯你是问！你们联指要号召全区联指不要搞武斗。你们（四·二二）造反派，（戚本禹：现在是你们得势）不要因为得势了一点、就骄傲起来。“老多”不是在前面犯了一个错误吗？

四·二二：我要求谈一谈广西大学大联合问题，……

总理：这些话倒可以考虑。

四·二二：（继续谈西大大联合问题）

总理：有一条，你们（在西大）占多数，他们回去，不能解散他们的组织。他们过去有错误，现在矛头对准刘、邓、陶，大方向就对了。改正了错误，就是革命组织。革命有先后嘛！你们（西大四·二二）欢迎他们回去，不要外单位去串连。

联指：（西大联指站起来想申诉）

总理：你看，又来一个了，你们回去旅社谈吧，我不听了。

铁道部：（汇报柳铁情况）

总理：刚才念的文件已经讲了，你看柳铁运输关键问题是什么？

铁道部：关键是武斗，把观点带到生产上去了。

总理：你们不要把观点带到生产上去，不要分两派，一道生产，一道工作。不要煽动别人去干扰，不要在沿途搞武斗。这个联指要负责的。武斗是地方到铁路上搞的。你们是铁路的，你是联指，你是四·二二，能不能联合？

四·二二：（柳铁工总）能！

联指：能！

铁道部：报告总理，我们下午开庆祝大联合大会，请总理参加。

总理：（笑，摆手）我不去了，你们还是请他们去吧！铁路的都去。

铁道部：好，我们邀请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联合大会。

四·二二：总理，这面锦旗是我们广西四·二二战士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人一针一针绣起来的，我受同志们的委托带来北京，请总理转送给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把锦旗送给总理）

总理：你们就是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下联合起来。这比锦旗更有意义。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你们联合起来了，一定很高兴！

（总理、戚本禹同志离开会场，众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柳州铁路局两派《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要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关于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我们热烈拥护，坚决照办。在中央文革广西问题联络组，铁道部军管会和柳铁军管会的领导下，经两派代表协商，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革命大联合筹委会的组成

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迅速实现柳铁地区的革命大联合，促进全局的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在柳铁军管会的领导下，按对等原则，双方各派出七至十一名代表成立柳铁地区革命大联合筹委会。

二、革命大联合筹委会的权力和任务

（一）在筹委会统一领导下，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薄吕武是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敌人，必须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肃清他们在柳铁的流毒，为斗私批修，完成本单位斗批改做出新的伟大贡献。

（二）为了消除双方对立情绪，自筹委会成立之日起，各派的广播、报纸、大字报，标语等立即停止相互谩骂和攻击，违者由筹委会通报批评。

（三）筹委会协助军管会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柳铁两大派总部常委和分局及主要厂、段、站、队、院、校的两派组织负责人共同学习，两派组织对所属群众也应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期分批进行学习，学习班应以斗私批修为纲，主要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老五篇等著作，通过学习总结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高阶级觉悟及路线觉悟，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搞好思想革命化，以利于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争取尽早实现我局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组的革命大联合。

（四）正确对待干部，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要团结教育干部大多数，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在外的干部，应迅速回到工作岗位，坚持工作，将功补过，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教育。对犯有错误的局级当权派，由大联筹共同协商批斗，其他犯有错误的当权派，由业务处及基层单位两派协商进行批斗，如发生争执单方批斗时，另一方不准以任何借口阻拦和干扰，一定要坚持文斗，不能武斗。为了解放干部，可在军管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两派进行审查，为了使干部接受教育，由军管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局分局及主要站段的负责干部分期分批进行轮训。

（五）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服从柳铁军管会的正确领导，积极支持柳州驻军做好三支两军和护路工作。

（六）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要节约闹革命，坚持业余时间闹革命。双方必须遵守九·二四达成的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尽快成立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建立运输生产新秩序，保证完成国家交给的运输生产任务。凡离开工作岗位的干部和职工，双方应各自动员说服，热烈欢迎限十一月五日前返回，逾期不回者，按擅离职守或旷工论处。

（七）两大派组织中的教师和学生，应遵照中共中央十月十四日通知，立即回校复课闹革命，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所有学生今后不准干扰铁路运输和生产工作。具体复课事宜，由军管会召集双方师生代表研究决定。

（八）坚决贯彻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保证四大正常进行，严禁武斗。双方应积极支持军管会和当地驻军对隐藏枪支武器弹

药进行一次清查，彻底上交，发现有持枪者，群众有权收缴，并扭送军管会进行严肃处理。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应遵循毛主席教导，对于一个组织里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三、上述协议经两派全权代表签字，自签订之日起实行。

柳铁工机联 王反修 黄雄民 肖福祥 杜叔林柳铁钢联指 王永红 曾庆云 晏 伟 温甲友柳铁军管会 王国瑞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韦国清《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各位领导同志，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同志们：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十分关切广西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五月初，邀请广西双方代表团，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亲切地八次接见双方代表，以及其它一些小型接见，都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教育、极大鼓舞和极大鞭策。广西的文化大革命正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并正在大力促进和开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衷心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广西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地向毛主席认错，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认错！在运动中，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三月底我到北京后，又多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谆谆教诲和极其重要、极其恳切的批评，使我认识和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前

进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对中央领导同志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帮助，我表示诚恳接受和衷心感谢！

去年底和今年初，我代表区党委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过三次，但很不深刻，特别是没有深挖犯错误的根源，觉悟迟，改正错误的行动不快。我决心老老实实检讨错误，迅速改正错误，到群众里面去，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

下面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我对这场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理解很差，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思想跟不上形势，在一些问题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很不理解，保守思想严重，对群众起来造反看不惯，怕打破旧秩序，怕影响生产，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因而，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站错了立场，站到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对革命群众采取防范、躲避、限制、压制等办法，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运动开始，由于我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工作组派不出那么多，就把一部分已经搞起来的单位暂停下来，大大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搞三个“横扫”（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中，我没有明确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结果是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屈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并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挑动工农群众围攻革命小将的两个市委书记，在请示中央、中南局后，撤了他们的职。但我只限于组织处理，没有真正提高到方向路线错误来认识，更没有检查区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担责任，吸取教训。对待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

革命小将，我在思想感情上，不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肯定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他们起来革命造反，而是把他们的某些缺点看得严重了一些，加之我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阶级分析，看他们是否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而是片面听取汇报，就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街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使革命小将又一次遭到围攻。特别严重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除了提出把师院民兵枪枝的机针拆掉外，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我这种对革命小将如临大敌，请派军队防范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派宣传车及调动部队的错误完全由我负责，解放军是没有责任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滥了解放军的威信，损害了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在这里，谨向解放军同志们赔礼道歉。

在处理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的问题上，我是十分错误的。九月八日下午，桂林，南宁，北京一些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要求迅速解决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但是由于我对绝食思想上有反感，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派了当时后补书记霍泛等人去。次日上午，我前往接见时，革命小将比较激动，社会上却谣传我被打重伤住院了，并出现了很多捉拿凶手和赶走南下串连队的标语和大字报。对这件事，有些小将要我发表书面声明，澄清事实真相，我只是在九、十日两天，分别开干部会和工厂、学校、机关职工群众代表会，口头说明情况，没有及时发表书面声明；同时我在讲话中只限于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积极赞扬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消除当时出现的指责革命小将的一些舆论和错误做法。因而，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连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在这里，我再次向南下串连队及“桂林老多”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在处理三江问题上，由于我不是站在到三江参加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民族学院革命小将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对压制文化大革命，犯方向路

线错误的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当作违法乱纪来处理，因而我在九月廿三日提出了解决三江问题的六条意见，态度很暧昧，和稀泥，实际上是迁就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压制打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十一月底，民院小将再次来广西，区党委和我承认了错误，重新作了处理，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在党政机关运动的部署上，“十六条”规定大中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由于我不相信群众，害怕机关与学校同时开展运动，干部学生内外结合，把机关搞乱，而没有认识到“不破不立”，不把旧秩序打破，新的革命秩序就建立不起来。加之当时党政机关大部分干部下乡搞四清，我没有下决心把他们及时抽回来，而是把三分之二的单位的运动，推迟到十一月底才搞，使广西区市党政领导机关的运动落后了一步。

中央工作会议后，在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及区直机关动员会上，我没有发动大家集中揭发、批判区党委和我的路线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只是在常委扩大会上作了一次简单的自我批评，便笼统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结果，区党委和我的路线错误，没有得到集中的批判，实际上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层领导干部。使三级干部会议没有开好，区直机关的运动走了弯路。尤其严重的是，当时我对伯达同志的报告，虽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时表示完全拥护，但由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仍很不理解，因而对报告中某些问题也还不理解，在思想还没有完全弄通，当把报告印发下去时，认为原则性很高，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是接受不了的。对本禹同志的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更是思想不通，害怕红卫兵去“冲”，怕影响农业生产。伯达同志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总结了两个月来运动的经验，最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本禹同志的建议也是正确的。而我脑子里旧条条框框太多，对新鲜事物、正确的指示和意见接受很差。我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

我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方向路线错误外，近几年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也有不少错误，如在一九六二年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推销的“大段包工”联系产量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的试点，并一度大砍社办企业，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损害集体经济的作法实际上是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执行了

中国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所谓“桃园经验”，排挤和打击许多基层干部，静止孤立地发动群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是极其错误的。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制定“二十三”条后，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错误才得扭转和逐步克服。

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持资本主义政治方向，他们以种种阴险手段散布了大量毒素，干了很多坏事，妄图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由于我政治觉悟不高，缺乏革命警惕性，没有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加之受《修养》一书的影响，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因而，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盲目地从组织上服从他们，在思想上也受到一些影响。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最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照出了他们的原形，把他们拉下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坚决肃清他们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和影响。

（二）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在思想上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在行动上没有作到紧跟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因则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邪路上去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十六条”，一致通过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理应深刻领会，认真贯彻执行。但是，由于我保守思想严重，求安怕乱，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看支流多，看主流少，看现象多，看本质少，看小节多，看大节少，看缺点多，看成绩少，概括起来，就是看支节问题多，看大方向少。致使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没有得到坚决贯彻执行，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小将，使广

西的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大损失，十一中全会后，不到两个月，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但是，由于我对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以及总理、伯达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仍然不能正确的理解，对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旗帜鲜明给予坚决支持，对自己的严重错误也仍然没有及时的认真彻底批判和清算，因而路线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我犯错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对高级干部更要重视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对高级干部来说同样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跟毛主席闹革命几十年，对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是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但由于没有认真的用毛主席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革掉头脑里的私字，因而在革命转变的关键时刻，站错了立场，站到了反动路线的立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怕群众、怕革命，怕打乱旧框框，怕冲击自己的特殊化，养尊处优和当官做老爷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正是“私”字在作怪。我的“私”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满足于自己过去没有犯过大错误，居功自傲，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墨守成规，凭老经验，靠吃老本，听不进逆耳之言，民主作风差，违背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由于我存在严重的官气、骄气、以致脱离群众，不仅对群众的阶级感情不如战争年代那样深厚，甚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对群众运动横加指责，压制。从这次犯错误中，使我深刻认识到，不下狠功夫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狠斗私字，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破，就不能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不可避免的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要犯严重错误，过不去社会主义关，以致不能保持晚节，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这是毛主席对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的总结，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学习毛主席这个最新指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只有彻底破除头脑里的“私”字，才能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才能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是官架子大，不平等待人，严重脱离群众。”

检查起来，主席指出的两条我都犯了。特别是近几年，在担任区党委第一书记工作中，确实是官架子大，不能平等待人，民主作风很差，因而严重脱离群众，引起群众很大的不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这是完全应该的，是对我最好的帮助，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审查和批判，决定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加强群众观点，搞好同群众的关系，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多和群众商量，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三）

毛主席亲切地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到群众中去，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以实际行动彻底改正错误。

一、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一辈子革命。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最高指导方针。对毛主席思想必须无限信仰，绝对忠诚，拼命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努力紧跟。但由于我政治思想水平低，还会常常跟不上毛主席思想。要作到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是理解的，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通过坚决执行作到逐步理解，并经常向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及时请示报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证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彻底贯彻执行。坚决做到：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决心放下架子彻底打掉官气，满腔热情地到群众里面去，勤勤恳恳地当群众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坚决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工农群众、红卫兵革命小将、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坚定不移地和他们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根据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作好

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大力促进和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既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份力量，又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在“破私立公”上狠下功夫，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经常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在群众运动的熔炉中，进一步烧掉自己的错误。以实际行动，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同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一道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力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更大规模地开展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把广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人民立新功，将功补过。

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检讨很不深刻，衷心欢迎同志们对我的错误继续揭发、批判，坚决支持同志们对我进行严格审查和考验。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打倒刘、邓、陶！

打倒王任重！

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韦国清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广州军区党委：

六月份以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多次接见军区在京同志，对广西军区支左工作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和批评，给我们政治上很大教育、很大关怀和有力鞭策。但由于我们认识迟、觉悟慢，没有很好领会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对错误的认识极不深刻，改正不力，辜负了中央首长的教导，深感有愧。现将我们所犯的错误检查报告如下：

一、今年一月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全力以赴，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近一年来，所有参加“三支”“两军”的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努力，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不理解，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在南宁市的支左工作中，支持了一派，压制了另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影响了各军分区和各市、县人武部，给南宁以及整个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回顾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南宁“四·二二”造反派的想法有错误，压制了“四·二二”，特别是在砸“工总”总部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时，正值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展开夺权斗争。当时我们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支持了他们。但对造反大军成员“工总”中成分不纯的现象看得过重，是不是造反派有所怀疑，特别是当他们在夺权以后，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遭到社会的指责时，更加动摇。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于三月一日错误地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其结果，直接影响了广大群众对“工总”的正确看法，使工总在政治上遭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处境困难，工作不好开展。我们对“工总”的这种错误行为，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极端错误的。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迟迟没有认识，没有改正。直到八月下旬总理指示时，才先后释放熊一军，召开大会为“工总”总部恢复了名誉。对此，我们深感痛悔莫及！并再一次向工总广大革命群众赔礼道歉。

对造反大军中的“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我

们早在二月就承表态支持过，但没有给予坚决支持。没有很好的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巩固内部，团结大多数，发展壮大组织。三月间，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我们没有从分析形势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执行中央指示，而是操之过急，简单生硬，没有很好走群众路线，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在军训试点中，也没有依靠这几个左派学生组织，而是强调班级联合，把原来的组织解散了。这些错误做法，引起了革命小将的强烈不满，一再提出意见，而我们自以为是，坚持不改，使我们与小将的关系疏远。

三月下旬，我们开始做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工作。当时，由于我们工作做急了，对情况判断不准，以为机关干部阻力大，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因而，有些造反派即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我们对这种说法很反感。以为我们支持韦国清同志是对的，而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四月中旬，伍晋南同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我们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我们对两大派的态度，凡符合大方向的革命行动都支持。我们的错误是，对反对韦国清同志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与支持。严重的是，一段时间未给予承认这个组织。因此，对他们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的表现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六月二日发出的《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错误地指责了他们，给他们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压力，起了压制造反派的恶劣作用。我们这种错误做法，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现在，我们已正式声明，《忠告、警告书》、《通告书》是错误的，予以作废。我们向“四·二二”广大革命群众认错，并赔礼道歉。

自五月起两派发生了武斗，特别是六月到八月份，武斗越演越烈。虽然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做了许多工作，但制止不力，武斗一直没有停下来。致使一些革命群众受到伤害，国家财产受到损失，生产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在执行军管任务中，我们对群众态度也有错误，没有很好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办事，民主作风不好，走群众路线不够，引起了一些造反派的不满。例如军管的《广西日报》：有的文章有缺点错误，小将们对此向军管的《广西日报》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抗议。我们没有对他们的革命热情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耐心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更加严重的是，我们没有虚心听取他们善意的批评，认真地及时地检查错误，承认错误，相反，对小将们却采取了一些指责、谴责等错误做法，同小将们对立。这就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群众批评的教导。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致使《广西日报》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我们负有严重责任。我们所犯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错误做法，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南宁市和广西各地的斗、批、改受到了影响。我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参与支左的干部、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

二、我们在支左中所以犯方向路线错误，根本原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路线觉悟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而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在犯了错误之后，不能迅速改正。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水平，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善于识别左派，积极支持左派很不理解。我们头脑中的旧框框多，保守思想严重，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看支流多，看主流少，看现象多，看本质少，看小节多，看大节少。概括起来，就是看枝节问题多，看大方向少，至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正确贯彻。这是犯错误的一条重要教训。我们对毛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领会很差，对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很不理解。革命小将对我们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行为造反，正是小将们可贵之处。即使他们暂时有些缺点错误，我们也应从爱护的观点出发，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而我们却以为他们造反造错了，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特别在冲击军区和军管单位的问题上，只强调他们不对的一面，指责他们，而很少考虑到我们存在什么缺点错误。这是我们与革命小将产生隔阂，形成对立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支左工作中，只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没有同时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对象。

革命小将们确实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我们在与他们接触时，往往不是虚心体察他们的优点，深入他们之中，甘当小学生；而是以领导者自居，凭老经验，吃老本，自以为是，缺乏无产阶级革命气魄，胸怀狭窄，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实际。这样，就不可能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思想感情和革命精神，就不可能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总之，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影响是很坏的。我们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在这里我们诚恳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认错；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认错。

三、毛主席亲切地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公开进行检查，迅速彻底改正。

①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帮助教育两大派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等各项规定，以及广西两派十一月八日达成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和以前达成的几个协议。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通过革命的大批判，逐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我们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做到：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②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坚决支持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并坚定不移地同他们团结在

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遇事多和群众商量，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地当群众的小学生，勤勤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支持韦国清同志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站出来到群众中去，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

③坚决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以“斗私，批修”为纲，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狠斗私字，破私立公，就是要从灵魂深处暴发革命，要打进攻战。学了就用，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加强思想革命化。在自己头脑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做到：处处、时时、事事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鉴别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

④在部队和全体支左人员中，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大学大用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深入开展爱民活动，誓做爱民的模范。坚决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紧密结合“三支”“两军”的伟大实践，更好地把军区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胜利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以上检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示。

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

（来源：《广西文革列传》作者晓明提供。）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广西两派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为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尽

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努力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加强敌情观念，严防帝、修、反的破坏活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广西两派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在广西军区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办事组广西联络组的协助下，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十条协议：

一、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以及本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

在军区（或军分区、人武部），驻军主持下，双方派代表共同协商，组织全区、各市、地、县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二、共同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军区（或军分区、人武部），驻军主持，双方派对等代表，成立各市、地、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临时领导小组”，分期分批吸收双方战斗队以上骨干和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参加学习。各基层单位也必须共同开办学习班。学习班要以“斗私，批修”为纲，主要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老五篇等著作，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促进思想革命化。

第一期学习班应在十一月中旬开学。以后各期学习班开学时间由临时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三、高举“拥军爱民”旗帜，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坚决维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大力协助部队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和备战工作，粉碎阶级敌人分裂和瓦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罪恶阴谋。

广西地区处于援越抗美最前线，阶级斗争十分复杂，两派必须加强敌情观念，共同对敌，严防帝、修、反的破坏活动，使广西成为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四、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应当一“看”二“帮”。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双方不要因

对干部的看法不一致而影响革命大联合，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决两派之间意见分歧。

双方在军区（或军分区，人武部）驻军领导下，共同调查和审查本地区，本单位认为有问题的领导干部。

五、在军区（或军分区、人武部）、和驻军领导下，充实和加强自治区、地、市，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在需要调整的地方，可以进行调整；自治区、地、市、县领导班子应吸收两派对等人员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各部门、各基层生产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以利于更好地执行中央的有关命令、通知、指示，保证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双方保证不干预铁路运输部门的生产和文化大革命。

郊区农民要按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开展运动，城市和农村的运动互不干预。

六、一切在外的工人、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以及上山下乡青年等其他人员应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双方应妥善安排返回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不得加以歧视；一切在外串联的大，中，小学生，应坚决执行中央“十·一四”通知，立即回校复课闹革命，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单位擅自开除、解雇的职工、干部以及临时工、合同工，应按中央“工业十条”和今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处理。

七、维护无产阶级革命新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双方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及“九·一三”通知，遵守广西两派在京达成的“十条”、“七条”协议。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确保“四大”开展，尚未上交的枪支和未拆除的工事，要立即上交和拆除。广西军区（或军分区，人武部）和驻军必须行使自己的职权，对违抗“九·五”命令和“七条”协议的组织和个人，要采取坚决措施。任何个人不准动用民兵武器进行武斗。民兵武器的管理，应严格按照今年六月二日中央军委的规定处理。

双方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协助专政机关采取专政措施。

双方要维护“十条协议监督小组”的威信，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工作方便。

八、坚决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双方应尽力减少各自组织的脱产人员，共同合理使用文化大革命经费，力求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和侵犯国家资财的犯罪行为。反对经济主义，坚决执行中央“九·一三”通知及其他有关政策。

九、坚决执行中央“十·一七”通知，“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翼”，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迅速实现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促进建立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以上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广西两派代表签字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农烈 雷 激 王世乾 李耀增 李晓阳 龙智铭 白玉秀 李超林 潘广华 李日明 李朝杰 杨福庭 石怀宇 明在胜 宾天锡 白鉴平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屈宽运 罗义钧 黎度光 陆立辉 曾永敢 宾祖媛 陈忠寿 邓国明 任树人 廖伟雄 张锋 潘玉臣 勒红 纪刚（列席） 刘同华 王克铭（列席） 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签字 广西军区 欧致富 广西军区 魏佑铸 六九七五部队 孙凤章 七三三二部队 焦红光 六九五五部队 郝忠云 南宁军分区 许长庚 梧州军分区 张跃先 玉林军分区 甘照寰 百色军分区 苏毅坚 钦州军分区 王晓峰 河池军分区 张智理 桂林军分区 毕可周 柳州军分区 才世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于北京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对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的谈话

〔摘要。铁道部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同志参加了接见。〕

你们达成了协议，但还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看你们思想是半通半不通。所以你们想见我，看来也要一定见一次。你们联合了，还提什么以谁为核心？我多次讲过了，“以我为核心”这种提法是愚蠢的，可笑得很。毛主席最新指示，文汇报社论你们学了没有？（众答：学了）学了就应该解决问题么。谁要成为核心要实践证明，左派不是自封的。提出以谁为核心是愚蠢的。现在有些人总是要我们给他们定性，好象我们一定性，就挂上了金字招牌。那是靠不住的，左派不是自封的，要自己奋斗么！

广西“4.22”就算激进一些，但达成协议不执行，就是本来左也不左了。你们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是你们的行动纲领。怎样才能看出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呢？就要看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三句话。就要落实在你们柳州的协议上。谁实现谁就是左派，签了字回去不按协议办，这还是什么左派？我们说话要算数，要有革命的气概。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说把美帝赶出三八线，就把他赶出去了；说援助越南就支援。对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签了字就要算数。我就拿这个考验你们，看你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看你们的行动为何，用这个来考验。过去组织都叫群众组织，工人阶级的组织还会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加不加革命二字都一样。这是群众组织，有的激进一些，有的缓进一些，事物在发展，人也是在发展的，群众组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上了当，被走资派蒙蔽，发觉后改了也很好，如果不改群众可以把他换掉，有的群众组织保守些，赶上来就行了，革命不分先后。

今天我已经回答了“以我为核心”是不对的，但又提出什么应该以“左派为核心”说自己是左派，所以就要以我为核心，你一定要说自己是左派。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划出这个公式是可笑的。有的说自己的大方向就是响当当，大方向对不能说一切都对。我上次给你们讲过南昌起义的事，毛泽东思想伟大就是通过看变化来考验，毛主席总是看变化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世界上的事情变化是经常的，矛盾是经常的，统一是暂时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

工人阶级更不能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尤其是铁路工人，尽管“4.22”比较激进一点，“联指”好像缓进一点。“联指”支持军区，这不能说错，支持韦国清是军区提出来的么！支持解放军是应该的么！在铁路上不管谁激进一些，谁缓进一些，这就看看你们今后的行动了，武斗双方都打死了人，不能把账算在哪一派身上，挑起武斗。第一是走资派，铁路上有吕正操、武竞天，各地总有他们一些人。账要算在走资派身上。第二是有坏人挑动，第三我们思想上受到社会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双方死了人，当然应该由国家抚恤，最近主席批了个文件，对牛鬼蛇神的定义加了几个字，牛鬼蛇神是指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击面过宽，18年总不能说一个也没有改造好。另外还有敌特，这称第二类。不要把仇恨记在群

众头上，为文化大革命流了血死了人是值得的，解放战争三年夺取全国胜利，抗美援朝三年多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这次是过社会主义关，三年才过了一年半，免不了流点血，这是为文化大革命出了力，国家应该抚恤。这样就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了。

我说在联合我不是要求你们马上取消组织，还可以带自己的旗帜么，人有个性，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特性，但不能要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不能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派性是排他的，不能排斥人家。即要保持个性、又要发挥共性，你们联合起来，两个组织是否取消，现在不要急，将来水到渠成。

现在关键是干部的解放，不然怎么做工作呢？干部就要支持协议，检查自己的错误，否则就解放不了，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反对，这怎么解放呢？现在就要用这个尺度来考验干部是否以斗私批修为纲，不能以派性对待干部。

有一些走资派和坏人躲在这一派里，搞挑拨离间，混水摸鱼，他们一旦被揭发出来，也不要以此打击对方，如“4.22”支持贺希明、霍泛，贺是反革命，霍是叛徒，我们宣布了揭发出来就不支持了，不来往了就行了，坏人、敌特更是混水摸鱼，欺骗你们，这样的人一旦被揭出来，决不要把这些事怪群众组织，不能因为贺霍就怪“4.22”，如北京“五·一六”问题，我们第一是揪他们的坏头头，不要扩大到群众中去。第二是靠他们本组织揭发，如秦化龙等都是动员他们本派揪出来的。他的组织还存在，不要因为人家那一派中揪出了坏人，就弄得那个组织都灰溜溜的。如在处理武汉百万雄师问题时，主席告诉曾思玉，不要让三钢、三新去揪百万雄师的坏头头，让他们自己组织揪就行了，不然打击面就会宽，结果还是少数人没有照办，打击面宽了些。

第三，不要因为打击“五·一六”的极左思潮，就变成右的老保翻天，

第四，以批判极左思潮来推动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零点十五分至二点十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厅。

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同志。

总理一进接见厅满脸笑容的说，又叫你们来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上一次那位女同学来了没有（张××向总理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

总理：来了就好，不用检讨了。加“革命”两个字你们就高兴了。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是一样的，有时中央文件写群众组织，有时也写革命群众组织，都是一样的。这次文件也这样写了（指中央批示广西的十条协议上面写“广西两派群众组织”。）

你们那次是不是砸“工总”了？

代表：砸“工总”主要是“四·二二”里面的一些主要组织砸的，开始是工总的三个分部起来造反，我们有几个组织支持了他们这一行动。现在看来，不管谁，砸群众组织都是不对的。

总理：对呀！（代表说，我们也有不少组织被四·二二砸了。）不管那个组织要想吃掉别个组织是不行的。广西走资派有没有呀？过去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同志、乔晓光同志应多负一些责任。当时参加赤卫队的你们有没有呀？（众答：两派都有。）以后区党委瘫痪了，部队支左。他们的领导地位变了。后来又发生夺权斗争。（众答：我们大多数组织都是参加夺权斗争的。）你们夺了权没有掌权，军队你们也没有结合嘛！三月以后军队掌权，当时中央想叫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后来考虑还是叫他来北京好。军队没有经验，在支持韦国清同志问题上急了一些，（黄永胜同志说：当时我们的确急了一些。）你们爱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就变成支持韦国清同志了。

代表：二月开始我们和四·二二红卫兵中的几个组织斗批韦、乔，搞了一个多月，《红旗》杂志三、四期社论发表后，我们研究了韦、乔的材料，认为乔的问题比韦的重，韦不是三反分子，所以提出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深刻检查错误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我们提出来以后，军区没有表态。（黄永胜同志说，是的，他们提出来比我们早。）

总理：那时伍晋南到西大没有？

代表：没有，伍是四月十七日去的，四·一九发表声明，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时两派才明显的分开。

总理：啊！四·一九声明后你们才分开的。

代表：伍晋南说韦国清在北京遥控的！

总理：这是不对的，不仅伍晋南说，四·二二也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留韦国清同志在北京，他也准备作检查，这个同志很遵守纪律，他确实没有打电话回去，我们可以证明。当然，他以前的检查没有这一次这样深刻。你们两派达成十条协议，第二天共同开会庆祝，这是一次联合行动，反映很好，我们就批准了，本来想趁热打铁，但因为领导干部问题没有解决。关于革筹小组，你们支持韦国清同志参加，四·二二写了一封信也是同意的，今天又来了一封信，说韦国清三月以后的问题没有检查。三月以后韦国清已到北京，出现的一些问题，从领导上来说，军区应负责任，军区的检查不错嘛！

代表汇报了三至六月我们受压的情况，检查在六月以后的自卫还击中搞过了头，目前我们正在通过“斗私，批修”提高认识。

总理：广西发生的武斗，主要是走资派和坏人在挑拨，你们两派都死了一些人。从你们来说，这些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你们现在高姿态，在政治上就主动了嘛！你们的十条协议比我设想的好一些，他们（指四·二二）说是大大毒草，这是一部分群众的激烈情绪，总想打个你死我活，以我为核心，以我为主，这是错误的。你们要冷静一些，都是工人、学生干部嘛！面临敌人，敌机还在你们那里打下来，广东可以联合，广西为什么不行？广西是不会落后的，十条协议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执行十条协议就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不执行就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别的问题都好谈，主要是干部问题。他们（指四·二二）只剩下一个了。

代表们继续揭发伍晋南的三反罪行和生活腐化的事例。总理生气的说，这个人是个很不严肃的人。广东形势大好，毛主席接见，你们去了没有？（众答：去了。）总理和蔼的笑着说，广州代表今天坐飞机回去，晚上两派有几千人去机场欢迎他们，你们要赶上来。（代表说，昨晚我们接到主席批示后，南宁、柳州、桂林等市，都连夜开大会庆祝。黄永胜同志补充说，他们通宵达旦的游行。）广西的协议和广东的协议主席是同一天批的，你们广西在京时间最长，有半年多了。伍晋南如果出来，对你们也没有什么不利之处。有些事情你们可以等一等嘛！如果以后有更好的还可以换嘛！他历史有问题，必须要交代，这个你们要继续调查，假定你们有五个人参加革筹小组，当然十个可以罗！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干

部，两派各一个，还有农民，地方干部是韦国清，当然罗！韦国清同志要负责小组的领导工作，还有安平生，加个伍晋南。安平生是支持你们的吗？

代表：我们是支持的，但安平生同志要揭发陶铸并划清界线。

戚本禹同志笑着说，他们怕安平生出问题所以有些保留（大家都笑了起来。）

总理：这个同志我们是同意他站出来的，他头脑很清醒，能做工作，他的检讨写得比乔晓光好一些。对伍晋南问题，你们要高姿态，如果四·二二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他们就要走向偏激，不利于大联合。（戚本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代表：四·二二有部分群众要打倒伍晋南。

戚本禹：如果他们要打倒就扶他（边讲边做手势）又更高姿态。

总理：他们支持五个伍、贺、霍、谢、袁，你们都要打倒，保留一个不行吗？贺希明历史反革命分子，霍泛叛徒，谢王岗，还有什么南宁市委书记是不行了，（众答：袁家柯）他们只剩下一个了，给他们保留一个也好嘛！这个问题你们不要急嘛！你们的意见可以保留，总得有他们的一个人。乔晓光你们两派都是要打倒的，有人说，乔晓光是刘少奇的模范干部，看来不太象，这话不知从里传出来的，当然他犯有错误回去好好检查，经过考验还可以工作。这个人先不说，回去检查后再说。

代表揭发伍晋南是个假党员伪造历史的情况。

总理：他到独立三师以前，这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调查。（代表进一步揭发伍晋南的三反罪行。总理见代表打倒伍晋南的态度很坚决）你们看四·二二支的领导干部还有那个好的？

代表：我们再三考虑，伍晋南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下面还有一批黑线人物，如秦兆阳、郑天健等等。

戚本禹同志惊讶的说：秦兆阳是个大右派呀！

总理：文艺界的造反派你们有多少？（代表汇报了数字。）你们有这么多人，有干劲，怕什么？可以斗争批判嘛！

关于革筹小组，军区方面，军区两个，欧致富、还有个新来的那位，魏什么（黄永胜：魏右铸。）空七军一位……，地方干部有韦国清、安平生，再加个伍晋南，由韦国清同志负责。先把革筹小组搞起来，伍晋南一个人，你们怕什么，要经过一段过渡嘛！

代表：我们认为对伍晋南不是扩大教育面的问题。接着详细的揭发了伍晋南的三反罪行。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不要说了，中央知道的比你们多，有些你们看不到的，你们给我们送来一大迭材料（用手比划约有半尺）我们都看了，有些问题我们不好讲，我们一讲，你们又传出去。对方受不了。

代表：伍晋南有一段历史，我们要进一步调查，我们工人、学生、干部、贫下中农再三的讨论了伍晋南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坚决要打倒。

另一代表：他在文教方面也忠实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另一代表：他多次吹捧刘少奇（详细地汇报了伍吹捧刘少奇的罪行。）如果他出来，后患无穷。

总理：他那有这么大的本事！（代表们不约而同的说，这条战线上的斗批改，挖根都要他到伍晋南的头上，他出来，有损于革筹小组的威信。）干部问题，你们再考虑考虑，如果他们换另一个人也可以，那是他们的事，但总要保留他们有一个领导干部在革筹小组嘛！（戚本禹同志插话：广西文化大革命取得很大胜利，形势大好，你们要考虑考虑顾全大局。）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可能一次都结合好，例如北京、山西都有这种情况。新生事物出现，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从旧的方面带来一些遗传的烙印，当然并不妨碍新生事物的发展。革委会的人不可能各方面都满意，有一些是经过考验，各方面都满意的，但是也有一些是过渡性的。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吧，前五代的领导都有问题，这并不影响我们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例如第一代陈独秀是托派是反革命。第二代是瞿秋白，是个叛徒，我还要写篇文章。第三代向仲发，投敌叛变，以后还是被敌人打死。象本禹同志在批判李秀成的文章中说的，死有两种有光荣的死，（戚本禹同志插话：有可耻的死。）因他出卖我们差不多被捕了。李立三还保留他，这次文化大革命过不了关。第四代王明、博古，王明跑到莫斯科，反党反毛主席，变成中国修正主义头子之一。第五代是遵义会议以后，虽然是毛主席领导，但张闻天管了不少事，从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五年管了十年，一九五九年被揪了出来！彭、黄、张、周集团，周就是周小舟嘛！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党的前进发展嘛！我们党一大时，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健在的有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还有四个牺牲了，也有的变成叛徒，当了反革命，张国焘是个野心家当了特务，现在还在香港。难道你们成立革筹小组就那

么百分之百的完善吗？你们为一个伍晋南，花了那么大的劲，写了几本书。当然，你们很仔细认真，搞了不少材料，花了不少力量，你们调查的材料，我们很重视，有些确实很珍贵，以后还可以继续调查嘛！

代表：汇报了伍晋南之流蒙蔽一部分群众到农村搞“农管”，挑起武斗，甚至提出“打倒韦国清，口粮六百斤”“支持伍晋南，口粮吃不完。”“打倒韦国清，分田到户，有生意做”等等。还汇报了一些生产队有分田到户的情况。

总理：这么多的贫下中农干什么的？！

代表：我们要求总理指示，责成广西军区协助我们把下乡策划农管，挑起武斗的谢王岗、李丹等走资派揪回来。

总理：仔细的询问了走资派李丹的情况。

代表：目前我们在四个专区发现有反动传单。（递上反动传单给总理）总理看后交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说，这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捣乱。

代表：我们还发现有秘密电台，有一个“解放军之声”（黄永胜同志证实说，军区是发现有秘密电台。）

总理详细地询问和记录了电台的情况，严肃的说：电台问题要认真追究。

代表：金城江四·二二分部转播台湾的反动广播两次，每次半小时，均被我联指战士严加谴责，才被迫停止。都安也发现四·二二有电台。

总理：四·二二确实有坏人，不过要由他们内部来揪，你们革命组织有没有？他们说你们有高参，这是夸大的。你们回去整风嘛！现在四·二二的据点还没有撤吗？

代表：没有撤？医学院、展览馆、新华街、解放路、新华饭店楼、反修楼、手工业医院等还没有撤，他们还继续搞“民管”、“兵管”，还汇报他们搞“农管”问题和集体杀害贫下中农问题（递上金城江、容县黎村等地的电报材料。）

总理：你们同各地联指有没有联系啊！

代表：根据总理指示，要我们影响和推动各地联指搞好大联合，我们发出了呼吁，加强和各地联指联系。

总理：各地的联合的情况怎样？

柳州联指汇报了柳州大联合的情况。

总理：北海怎么样？

代表汇报了北海等地的大联合情况。总理点头微笑，表示满意。

总理：四·二二还派人到各地联系吗？

代表：有。他们不仅派不少人下去，还在南宁搞了一个所谓“反迫害联络站”，把那些不安心农村劳动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来历不明的人，有几千人集结于南宁。

总理：这个情况和广州一样。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道路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中央也有通知，这个问题要解决，参考广州的办法。

代表：《刘三姐》在全区流毒极广，我们要求能重放这个电映，供全区革命群众批判。

总理：这是要批判的，要缓一步嘛！但不是当务之急，现在广西是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目前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关键是成立革筹小组，革筹小组主要就是干部问题。希望你们好好考虑，如果你们一定要等，我们还是有耐心筹下去的，你们来的时间最长，来了半年多了，总是要解决问题的嘛！今天下午黄永胜同志和你们谈了四个多小时，现在又谈了两个小时，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今晚睡好觉，明天早上头脑清醒清醒好好讨论。

接见结束，总理和代表团全体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总理健步走出大厅，全体同志热烈鼓掌欢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黄永胜、韦国清、刘兴元、吴法宪等同志。摘要〕

一、关于建立文革筹小组问题

中央决定建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风璋、焦洪元、郝忠云、王斌、安平生、伍晋南等九人、由韦国清同志负责，群众组织中央文件就没有写进去，工人如果多一点，可以各派两人，大学生一人，中学生一人，机关干部一人，贫下中农一人，共各派六人。如果多一点，可以七人。除了革筹小组以外，在未召开各种代表会议之前，可以组织象协商会议那样形式的会议。使领导同志知道大家意见，互相之间意见，容易统一，打破过去死气沉

沉的局面。在桂林“老多”是占多数的，但还有少数，少数也要有政治地位，你们要承认他们（桂林“联指”）你们至少吸收十名以上“联指”的成员，才算在北京学到一点毛泽东思想。

二、关于广西“联指”和“4.22”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联指”）和广西“4.22”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本来都是造反出来的，后来分成了两派。“4.22”受军区压了，走上了激进，结合了一些走资派和坏人，比如历史反革命分子贺希明，大叛徒霍原。敌情观念不强，联指的发展很快，其中也吸收了过去一些有保守思想的群众，联指支持解放军是对的，支持三支两军工作，是好的，在八月武斗大打以后，联指发现错误就尽量努力在许多事情上，促进了大联合。

三、关于军区的问题

广西军区在三支二军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进行了检查，军区支持了一派，压制了另一派，加深了两派的对立情绪。

三月以后韦国清已来北京，他没有责任，主要由军区负责。有人说，他是遥控南宁的，实际上这个同志是很遵守纪律的，他确实没有遥控。

四、关于广西两派在前阶段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联指）在八月两派对打之中，你们是错了的，如在东方红医院，你们做得过了头，在小报方面双方都有不象样的东西，我看了很生气，你们在八月以后是有很大转变，但是还有问题，“4.22”说“联指”有什么“高参”。这个我和戚本禹同志研究了一些材料，要说高参，你们双方都有。革命要靠自己，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如果你们发现有坏人，由自己组织揪出来就好，不要指责对方，“高参”是国民党的称呼，高级参谋吧！以后不要再喊“高参”了。

广西“4.22”你们敌情观念不强，在你们内部暗藏有坏人，如贺希明、霍泛，还有罗。你们开始使用报话机，发展到用无线电台，的的打打的，从明码发展到密码，这是犯法的，你们的密码也太不高明。你们搞秘密电台，敌人也会用秘密电台，或者利用你们的据点，搞秘密电台，这些电台可以发到美国第七舰队，港澳、越南等，那就无法辨别了。你们吵架的事，也会让敌人知道，这是违法的，

过去做了有的是无知，如果你们不检查，这种实际上就是反革命活动，那么做这件事的头子可能就是反革命。

“4.22”你们把援越的炮弹都抢了，你们和坏干部结合。这三点应当好好检查，（杨成武同志插话：前几天还发现广西有电台活动，当然不一定是你们的，是否敌人的还要查。）还有切断电线、拦截火车是犯法的。

五、关于今后广西问题的指示

中央希望广西军区或韦、安、伍三位同志，将来还有其他同志，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不要背包袱，不能吃老本。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核心小组时的讲话

〔该谈话纪要的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与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不尽相同，按序收录於下。〕

一、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时三十分至二时三十分。

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余立金同志。

十一月二十三日零时总理先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核心小组，一时三十分革筹小组成员八位同志也同时参加接见。现将革筹小组的同志参加接见后的谈话纪要如下：

一、关于两派问题：

当“四·二二”代表说“联指”有不少是保守的时，戚本禹同志说：中央定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说谁是老保。造反派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是造反派，明天你不执行中央指示，就要变成老保。左派不是世袭的，要看行动。

当“联指”代表提出，“四·二二”在八次接见后要“联指”紧跟“四·二二”时，总理说：提出要紧跟“四·二二”这个口号是不对的，甚至要“联指”承认是老保才能联合也是不对的。

当“四·二二”代表说“联指”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应该撤销时，总理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二、关于贯彻《十条协议》，搞大联合问题：

总理说：你们知识分子不少，有的可能要参加革筹会，你们要自觉。最关键的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贯彻《十条》。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回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照你们这里说的做了，每件事都与革筹小组商量，开大会也等对方通了，准备好了再动；也可能不是这样，你们不商量好单方就开大会，这不符合主席思想。主席是主张办事不要急，商量好了再办。

革筹小组首先要到群众中去。但你们要给条件，中间要由你们做桥梁。许多单位没有联合，怎么办？采取协商办法，以对等人数组成革筹小组，组成革筹小组之前，可以搞协商会议形式。

（“联指”代表说，现在气氛有些不大好，我们主张不喊派性口号。“四·二二”代表即说，他们还喊打倒伍晋南的口号！）总理接着说：我还有个建议，韦国清同志先回去，伍晋南同志、安平生同志晚回几天，让代表回去做工作，这是个实际问题。工作不做好，回去一下很多人都上来了，你们要想一想对方的困难。现在“老多”十万人上街就很随便，这是有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那时候在白区工作就不是这样子……

《十条协议》达成很不容易，任何一方前进一步都要欢迎，后退一步就骂就不好。你们提口号要注意，现在双方都提出要打倒坏头头，一提双方就要对骂，这样搞不好。坏人总是少数的，你们双方都有坏人在里面，但不要乱提口号。今天以前的事不要算了，这个月还有几天，要把工作做好，做个示范。你们都是广西佬嘛，打仗要有坚韧性。韦国清同志看样子象个书生，但打仗很有坚韧性。当然，主要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加强学习。回去要抓好《十条协议》落实工作，而且首先要把南宁、柳州、桂林的工作做好，你们想一下子把八个分区都搞好，哪来得那么快。

中央决定、军区检讨、《十条协议》由军区印发全区，你们讲话以这些做根据，不要带派性。（戚本禹同志插话：特别是有的伪造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压对方，这是犯法的）。主席说讲话要算数，特别要忠诚老实，有人说不要武斗，可是下边就又用手打人（作手势），这样怎么能搞好工作？（戚本禹同志插话：要言行一致。）无产阶级革命派嘛！说话要算数嘛。我国成立后说话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广东回去很好，不能说一点乱子不出，但开始是好的。

回去多从正面做促进工作，把仇恨集中在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身上，群众武斗受那种思潮影响。要培养无产阶级作风，这是毛主席提倡的思想作风，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不可战胜的。

主要是劝说，年青人好波动，刚才说了两种可能，回去有小波动不要见怪，要做好工作，创造气氛。大联合不成，就是先从小的入手，大联合开始就是小联合。要贯彻《十条协议》，要“斗私，批修”。你们开协商会议，可以先学习社论，从你们革筹小组开始，带头一学下边就好办了。现在学习语录不少，但有的学习语录是用来对付对方的。读语录时要结合自己，才有说服作用，所以《十条协议》第九条又增加了主席“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和求大同，存小异的内容。

北京针织总厂大联合的材料主席批了，发给你们，优先看一下。这个点等于主席亲自抓的，对你们也很重要。基本经验就是重视调查研究，要谦虚，做群众的小学生，不要轻易表态。你们今天回去在飞机上可以学习，作为我送别你们的礼物。（到会同志鼓掌，感谢总理的关怀）。

三、关于《广西日报》问题：

总理说：首先外部人员撤出，内部两派联合出报更好，不行先出电讯，要慢慢来，先从这步开始。

当军区提出有的人要军区承认报社军管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总理说：方向路线是就整个来说的，不能一个一个的搞，搞那么繁琐干什么。（戚本禹同志插话：你们不能用框框去套）。报社问题就是按军区检查的去办。

四、关于军区的检查报告问题：

当军区提出有的人对军区检查有意见时，戚本禹同志说：这不对。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维护军队的威信嘛！

总理说：解放军就是这样好，有错就检讨，不要军队一检讨，马上就揪住。

“联指”代表说：军区的检查报告他们（四·二二）登出来，每段都加按语，拿军区的检查来压我们。总理说：这不对。（戚本禹同志插话：不要这样搞。谁不搞大联合，三结合，慢慢就变成不革命的组织了）。

“联指”代表说：我们对检查的意见主要是想和军区交换一下。

总理说：军区检查自己可以高姿态。主席也讲过。当然要高些，中央已经批了嘛！

“联指”代表说，主要感到有些事实有出入，回去还可以同军区商量。

戚本禹同志说：如果还搞派性的话，你们这些人就要走向另一面。军区检查之后，你们两派要多做自我检查。

总理说：军区说了各革命组织和指战员没有责任，就不要老抓军区了。军区是高姿态，把问题都揽下来了，你们这样搞不是给军区出难题嘛！（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插话说：军区是从正面检查的，你们从反面提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意见，这样对军区是不公允的，叫军区怎么好检查）

戚本禹同志说：双方都给军队施加压力，这是不好的。你们回去要先发表自我检讨书。

总理说：这怎么行？不要从这方面给军区出难题。

（接见不久，约三时许，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给军区同志传达总理指示：军区的检查不登报，由军区印发两派，两派不负责印发）。

五、关于干部问题：

总理说：你们批判干部不要抓那一个人，还是要以本单位为主。不管那一派占多数，都要协商，平等待人。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要通过本单位的群众去批判，解放一批干部，站出来工作。

对伍晋南不要提打倒，不要画漫画。伍晋南同志站出来是毛主席批准的，当然他不能翘尾巴，要虚心、谨慎。你们也不要为难他。（戚本禹同志插话：“联指”回去马上反可不行，有什么问题与革筹小组商量），要维护大局，要维护革筹小组的威信，这是集体，不是个人。

当“联指”提出对伍晋南同志的假党员问题要继续调查时，戚本禹同志说：调查也只能在革筹小组内研究。

六、关于桂林市武装部九九分队开枪问题：

总理说：委托郝忠云同志调查处理，你们双方都不要动，由郝忠云到现场处理，两派派人参加。

七、关于柳州造反大军抢夺修筑国防公路的炸药问题：

总理说：五十五军应去解决问题。孙副军长和分区合起来处理。国家的东西，这样搞不好，要物归原主。

八、关于外地人员来南宁问题：

“联指”代表提出，现在各市、县有不少人到南宁来怎么办时，总理说：劝说回去，还要慢慢做工作，群众路线嘛！

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赴京代表团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零点十五分至二点三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厅

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余立金、韦国清等同志。

周总理笑容满面的走进接见厅，跟我们一一亲切的握手。

总理：今天不谈那么多问题了。要谈大问题。

四·二二：总理，谈联指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还有些活思想。

总理：你们两派评价对等，中央文件已经定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还争什么么？要争那只好回去争，谁不执行协议，我们就要通报。四·二二我什么都讲了，还有什么没讲呢？四·二二也是革命群众组织嘛！桂林老多造反精神旺些。军区错了，现在改了就行了嘛！

你们为什么开会来的人很少呢？（指在南宁召开庆祝十条协议和中央的决定）

四·二二：我们通知下达慢了些什么……。

总理：协议签字了，我事先都讲了，一定要很好执行十条，当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都实行，应该是逐步的实施。

广西日报过去商量不好，现在外单位人员统统退出，统统退出，由报社内部两派组织，组织编辑部在革筹小组领导下，军管办报，统一的东西就登，不统一的东西就不登，万一有困难就先出电讯。

版面小组不大成功，广州不成功，北京也不成功，所以不搞版面小组。你们一定要说军区在广西日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什么问题都拉上去，烦琐哲学。大的都讲了嘛；如果你们再揪这还是派性发展，你们（指四·二二）一揪，他们（指联指）就会把伍晋南的材料摆出很多来。我想四·二二不应该再有什么争的了。

贺希明、霍泛是走资派，现在还不叫他们回去。

四·二二：我们对联指要区别对待。如“红色监察”在联指起很大作用。

（总理问联指，联指代表说明情况）

总理：红色监察这三十八个人，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四·二二：因为他们是专政机关。（全场大笑）

总理：（笑着说）监委是党委机关嘛！你们（指四·二二发言的代表）也是党委机关嘛！怎么是专政机关呢？

四·二二：这个组织在群众之中是很可怕的！

总理：怎么可怕呢？

四·二二：因为他是管运动后期划右派的！

（联指代表听后，不禁哑然失笑）

总理：红色监察能那么大？监委是党委机关，又不是专政机关，早就瘫痪了嘛！他们是红色监察，你们有倒海翻江，两派可以协商嘛！这样一个问题，完全可以按十条协议解决嘛，还叫我来判断？！两派回去搞大联合，问题就解决了嘛！

公检法最好不参加群众组织，他们是专政机关，广州已解决了，表面分两派，实际分四派。他们是专政机关，不能参加机关红代会。不能打乱他们内部业务工作。例如到这个派出所串联，到那个派出所串联，现在南京搞得也很凶，军队和群众搞到一块了。总的是按系统联合，公检法不参加群众组织。

联指：现在外地来了很多人进驻了很多厅局，如：交通厅，文化大院，特别是公安厅。

总理：外单位人员要统统退出。

联指：他们准备夺权。

总理：那不行，宣布公安机关军管、独立。任何组织不能夺权，也不要串联。

（四·二二再次提出东方红医院之事，企图攻击联指。）

总理：你看，上回不是把那个事情讲了嘛！他们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北医有个八一八，医疗队到你们那儿去是支持你们的嘛！我本来不清楚，现在才知道八一八也分两派，到你们那里去的是总部，到成都去的是联总，两派我都支持，但是，他们都被打了，这些说明了复杂性，群众是好的，可是最近就从他们的动态组的主任，夫妻俩都被捕了，两个都是特务，是街道揭发的，搜集很多材料，我们没有主张群众扭送，我们就把他们逮捕了，总部闹，我们就批评了他们，我们并不因为支持你们的八一八组织内部有特务，他在你们之中伸了黑手，挑拨你们

的关系，就对这个组织怎么样，群众是好的，坏头头由群众自己揪，自己扭送嘛！联指也不要揪。那个联总也到成都受压，两派出去都打了，可是回来两派又打。

四·二二要求解散区党委群众接待站。

联指：接待站是行政机构，中央又没下令解散，你什么都想管。

总理：你们要吵，回去吵，你们在坐的都吵，回去还能联合？！

（四·二二在总理面前假惺惺地表示，讲了四点意见以后，就转移话题，继续攻击《红色公安》《红色监察》）。

总理：你们四·二二说的四条都对，可是现在一条就推翻了，你桂林老多保证一个坏人没有？

老多：有。

总理：因此你们要区别对待，过去初期有些组织被坏人利用，后来就垮了嘛！你们现在变成支这支那，现在受社会思潮影响，出现武斗是坏人暗中搞鬼，到了今年军队支左，形势就变化了嘛！有的右派又想反攻，有的极“左”思潮也起来了。专政机关不要参加两派，它还要行使它的权力。你们两派都有铁路、农民、专政机关。毛主席最新指示后，你们要按系统联合，如果你们不听，那就不是思潮问题，那就有坏人了。为什么两个造反派还不能联合呢？你们（四·二二）讲对方津津有味，就是不讲自己。

你们要加强敌情观念，面对敌情，你们尚且如此，广西不要落后于广东嘛！你们都要往前看嘛！联指也不要因为他们结合坏人，就怎么样。贺、霍我们留在这里还不回去，一回去就斗了，对你们不利。联指说伍晋南的检讨还不够，当然不够了。他们三人联名检讨，你们要支持！我劝你们再也不要象以前那么对立了。他们都要到群众中去嘛！联指对孙凤章也有意见：包括伍晋南在内。你们回去各揪一片，那都不要回去了，都在这儿学习。我把你们在第八次的发言稿打印散发，你们讲话要算数。联指在许多地方占多数，更要努力，要采取高姿态，努力带头贯彻十条协议。你们达成的几个协议都很好。不要因为军区偏向于你们（联指）就骄傲起来。外县联指人数是多的，你们要做工作，带动和影响他们。武斗啊，就是派性作怪。中央有一个部把另一派的头头捉了去，我们要他们放，中央文革要他们放。结果把人弄死了。后来我们就要他们交出凶手，拘留，然后再通报。现在拿十条来衡量你们，如果违犯，革筹小组要通报，中央文革也要通报，那影

响就大了。武斗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要以为人数多，中央还是有办法的；你们少数的，也不要哇啦哇啦叫。所以你们要认真将十条协议逐步实施。老多不做群众工作，群众可能会脱离你们而参加他们联指。联指也不能因为这样讲，就骄傲起来，就打起来。

四·二二：报告总理，桂林联指开枪打死了我们四个人，伤了十二个，并强占了市委大楼，把生产指挥部的人赶出去。

总理联络员：据说是桂林工总去人武部夺枪和开声讨会而引起的。

总理秘书：有这么回事。

总理：你们何必去示威嘛！你们多数，不高姿态，你们这样做，周围也就这样做。你们声讨联指大会就不对，我还是说你们不对，我还是说你们不对。

桂林老多：他们把生产指挥部人都赶出来了。

总理非常生气的说：你叫我讲，我还说你们不对，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结果还搞什么示威、声讨啊，这不符合十条规定嘛！如果桂林联指确实占领了，也不对，老多更不对，为什么你们大多数，你们开大会声讨就不对嘛！由部队说服，你们应采取谈判的办法去解决，但你们开声讨大会，你刚才说的，连支持你们的政委都说了，是开声讨会嘛！你们总是拿力量压人，就是不拿道理说服人，今天就说明了，十条协议签了字，你们这样搞中央的批示根本无效。你们开声讨会就不对，这事交给一四一师处理，叫他们调查清楚，但你们不要替他们辩护。现在还有敌对情绪，回去怎么做工作？你们就是没有高姿态，高姿态不容易呀！称赞你们一下就不行了，全国四大学校开头造反，现在看来北京大学还分两派，南京大学，八·二六单方面夺权，现在闹对立，还有郑州大学，西安交大。

桂林老多：人多也有个难处，他们尽向我们头上拉屎，怎么个高姿态？

总理：你们怎么能这样说呢？头上拉屎？两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全区各县、市联指占多数，在桂林你们老多占多数，四·二二要高姿态，联指更要高姿态。八年抗战国民党向后退，消极抗日，我们留在敌后，国民党保存实力向我们挑衅。可是表面上还谈判，他们装模做样派联络员见毛主席，毛主席说：我们什么都不怕，要你们所作所为叫全国人民知道，你们要打的话，我们就退避三舍，我一定退九十里，退九十一里就不干。那我就要回击。我这个道理，就是要让一下。暴露暴露嘛！有人犯错误，如果是偶然的，那是认识问题嘛！可

以改，当然也有坏人在挑动，双方都是干柴烈火，非打不可，那就是派性在作怪。主席为什么得出有理有利有节，你们几万，他们是少数，一四一师又支持你们，说服他们会退出来的。我看你们不学习民主作风，现在有人光靠电话办事，根本不同群众商量，如西单商场那场武斗，群众莫明其妙，你们看过没有（众答：到现场看过了），后来他们检讨时十分痛心，国家财产受损失，这完全是派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正义感情，武斗就是不好。这里可能有两种思想问题，一种是坏人在挑拨，这些事不可能由我解决，你们有革筹小组，共同商量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牺牲都没有？一点血都不流呀？敢叫日月换新天，社会主义的关不好过啊！你们青年人要懂得联合谁，反对谁，矛头指向谁，党的政策如何掌握，这些都要注意才对。广西工人有困难，工人力量还不那么强！你们有多少学生呀？（总理翻阅代表名单，逐个点名，来分析工人不强）。哦！不少大学生啊！我还是中学生，没有读过大学呢！

戚本禹面对总理风趣地说：你还是大学生，留法学生。

总理笑着说：我只学了革命，法语都丢了。学生就有股知识分子气，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思想上有不稳定状态，你们总是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青年人有朝气、有干劲，缺点，就是没有经验。经验只有通过本身实践才能积累，这样的干部才了不起。我同你们谈了很多，说一点有好处，还须你们闯出经验，我们话说的太多，没有什么用，过一下就忘了，只能靠你们闯，才能取得经验。

四·二二代表妄图挑拨联指所属组织的关系，我们严加驳斥。

戚本禹同志就：造反派和保守派不能世袭的，就是你（指四·二二）本身都不能保证不变化，中央讲两派都是群众组织嘛！

联指：他们要我们紧跟四·二二，说是中央首长说的。

戚本禹生气地说：不对！怎么能跟四·二二呢？应该紧跟毛主席！

四·二二不肯承认错误，双方在总理面前就辩论起来，尤其老多吵得最凶。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的领导集团都是这样，回去怎么联合？

总理：他的事叫人家想办法，反过来人家说你们桂林老多到处晃来晃去，我看有道理，都回去嘛！（又面对桂林老多李日明说）你今天两次态度都不好，总

是错怪人家，通过几次接触原来你不是第一把手啊！政法学院有个陈荣金，起初大家都支持他，你知道他到处煽动，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太猖狂了。

联指：这家伙到处去夺权，他们还到广西同另一个群众组织结合夺公安厅的权。

戚本禹同志说：政法公社就是到处去夺权。

总理：我们现在已把他拘留了，你们知识分子不少呀！你们都要先责备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以“斗私批修”为纲，使十条兑现。不要指责对方，要严格要求自己，回去发表一个“自我批评声明”。要有过程，广西那么大，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照你们说的，在革筹小组领导下工作，什么事都要商量好才办；先开会研究，什么事都不要急，等两天。主席办事从来都主张有准备，文化大革命才一年半嘛！才走五十里，你们眼睛要看远点。

我今天再重复一下，革筹小组成员，他们首先应到群众中去，我完全支持，但你们要给条件，不然一下子又斗起来怎么办？他们就不敢下去了，要有桥梁，在革筹小组领导下，按以前的对等人员组成协商会议，不协商好不办，未成熟那就再商量，你们回去做工作，要做个准备阶段。

这时革筹小组人员也进入接见厅。

总理问郝忠云桂林那件事。

郝忠云说：是工总到人武部夺枪，并开大会后游行，呼口号打倒联指坏头头而引起的。

总理：你们要想一想对方的困难，现在派人到桂林，由革筹小组委托郝忠云，双方派人到现场调查这一工作，你们要前进，前进一步要欢迎，不要后退一步马上就骂人，你们（四·二二）骂打倒对方坏头头，变成口号就不对了。

联指重申我们对伍晋南的态度。

总理：联指打倒伍晋南决心很大，伍晋南站出来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还可以考虑一个问题。你们可以先分两步走，伍、安第二批走。你们一定要考虑别人的困难和群众情绪，你们先回去几个人，先做工作。

联指代表揭发四·二二到融安去抢地质队的炸药，军分区做工作无效，四·二二坚决不交回。

孙凤章说：我们叫他们交，他们不听没有交。

总理：我委托你（孙凤章）公正的、认真的调查清楚，中央当然要他们物归原主了。你们最好双方到南宁后，双方都不要行动，到现场调查清楚。许多事先要做准备工作。达成协议不容易，执行也不容易，总归要前进吧！前进半步也是好事，前进是好事，后退也不要紧。我们这样分析，事物总是发展的，今天二十二号还有九天到月底，九天把准备工作做好。

联指代表又向总理汇报四·二二在南宁大肆攻击联指，扬言要抓联指什么坏头头。

总理严肃地说：提打倒坏头头，面就广了嘛！变成一个口号那就不行。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嘛！广西人最有坚韧性。红军中的广西佬最勇敢。你们不要看韦国清象个书生，文雅得很，其实打仗是很坚韧的，毛泽东思想挂了帅。你们回去专门做自己的工作，首先把南宁、柳州、桂林做好，一下子要把全区各地、市、县工作都做好，那有那么快，逐步地做好各军分区的工作。你们说话要算数，忠诚老实。我们共产党人就讲忠诚老实。不要搞武斗。（总理做手势，左手高举，喊“不要武斗”，右手就从下面打过去。）这是特务作风。言行要一致，无产阶级嘛！不是资产阶级嘛！解放后我们说话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啊！

戚本禹同志：现在有人假造主席和林总指示，这是犯法的。言行要一致嘛！

总理：你们说话要算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说话是算数的。某大使馆不听中央指示，就出乱子了嘛！你们那儿实际上只隔一条线。美国在那里进行战争升级，物资要从那儿运过去。回去以后你们要做正面工作。把仇恨应集中在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身上，记在特务身上，打倒他们，战胜他们，肃清他们嘛！群众不要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作风和思想，精神变为物资。你们（指领导干部）要回去接近群众，群众要给干部创造条件，机会，不要回去各抓一个，应由本单位搞。斗、批、改只有通过本单位才能搞好。政治上平等待人，形成风气。我就谈这么多了。还是你谈谈吧！

韦国清笑着说：总理给我们的指示很重要。

总理说：什么指示啊，今天我同你们谈了，希望你们记住，不要一上飞机就忘了。年青人就是这样。小波动不要见怪，多做工作嘛！回去要把大联合的风气带回去。大联合前，先来小联合。从十条协议入手。在协商会议上除了学习最高

指示外，还应学习中央的社论。革筹小组，你要带头学习，带头做。把中央指示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北京针织厂的文件，这个点等于主席亲自抓的。对你们很有针对性。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要作好调查研究，要谦虚谨慎，找两派共同促进大联合。这个文件我就当着礼物赠送给你们了。

联指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魏佑铸：总理再把广西日报问题讲一下。

总理：我刚才讲过了，首先外单位人员统统撤出，内部搞联合。如果暂时联合不起来，先出新华电讯。两派共同协商后就可以登，还是交给军管。版面小组很难组织，广州、北京都试过了，不容易成功，还得依靠报社内部。

联指向总理汇报了四·二二利用军区的检查，大做其文章，对我联指进行攻击和否定。还要各军分区照此办理。同时，非要军区承认在广西日报问题上单独作检查，才肯交回时，总理就：一件一件事都去作检查，什么都联系上就烦琐哲学。军区大的问题都作了检查了嘛！

戚本禹同志说：军区的检查是高姿态，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军区检查对联指无关，有人乱来，那是不对的。

联指代表向总理汇报我们对军区的检查很有意见，为了顾全大局，不给坏人钻空子，我们暂时保留。

总理秘书邹××：军区的检查是从正面高姿态地检查的，与联指无关。你们的意见我们研究过了，你们从反面去理解嘛！这样军区就不好检查了。你们反映伍晋南的情况。总理说：联指打倒伍晋南，决心很大嘛！你们应该内部解决，支持革筹小组的威信。不要再提打倒，不要再画漫画了。你们任何一个行动，我们都知道。你们应通过实际行动，说明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但是伍晋南不能翘尾巴！

戚本禹同志说：有错误还得认真作检查。

四·二二代表要求总理放第八次录音。总理说：你们独立思考。我这是随便说的，难免有几句话是错的。

联指代表再次提出有些县的四·二二大批集结南宁，进驻机关。

总理说：你们要做工作，说服他们回去。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总理和戚本禹、余立金同志和代表一一握手。余立金同志紧紧握住联指学生代表的手说：向革命小将学习！代表说：向解放军学习！向首长学习！联指代表们和余立金同志谈在广西的空军打下敌机时，余立金同志激动地说：空军不错，联指有贡献。最后我们还邀请余立金同志到广西去。他说：我已去过，以后还要去的。你们回去要做大联合的模范，带起头作用。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1968.07.03；中发 [68] 103 号

毛泽东批示：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朝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七集）》，北京：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1968.07.24；中发〔68〕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的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陕西省同全国一样，正显示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启发他们自觉地起来揭发检举坏人。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

戈一击有功。在处理这类事件时，要注意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在发生反革命事件时，要充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革命秩序。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干部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来源：根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三]》，武汉：1969年3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

〔时间：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一时五分至六时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接见的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文元。富治、永胜、法宪等同志和温玉成副总长。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中央首长进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起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康生：现在开会了。今天开广西的会议。广西的问题，情况你们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中央“七·三”布告不但发到广西，而且发到了全国。同志们来时看到街上长长的游行队伍没有？都是拥护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的。你们广西问题闹了很久，全国出名了，全世界也出了名。现在请同志们到中央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同志来了，但还有少数同志不愿到中央来，不愿到毛主席身边来，不愿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还有的来了不到学习班学习，跑到阴沟里去活动。我要问同志们：你们如何执行“七·三”布告？！刚才同志们不是喊永远忠于毛主席

吗？但是同志们不来，或者来到北京不到学习班住，是不是忠于毛主席？！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尽量讲，中央是讲民主的。但是，要告诉大家，你们来不是打官司的，不能讲条件，更不能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讲条件。你们是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讲条件是不行的！中央召集的会，你们讲条件，是中央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中央？！广西问题，铁路不通车，拖了两个月之久，我现在要问问你们：你们反美不反美？（众答：反！）你们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众答：支持！）现在援越抗美物资被抢去了，火车不通了，谁高兴？美帝高兴！苏修高兴！叛徒、特务高兴！你们口里喊革命，实际上是反对革命！希望你们有的人不要玩两面派了！有的人已走到边缘，再走下去就变修了！

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这时区党校“红浪”的朱仁站起来。）我希望你忠实地讲，你来北京到底干什么？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永胜：你在毛主席像前要讲老实话。）

康生：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

总理：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

康生：你要老实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些什么黑会？搞了些什么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伯达：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康生：你如果还有点革命气味的話，就要在中央面前和毛主席面前讲出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朱答：广西柳城县）家里是什么成份？（答：中农）地主也是农民，富农也是农民。你在党校做什么？（答：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哪里学的？（答：东北师大）什么时候毕业的？（答：六零年）毕业后呢？（答：到广西党校）那你到广西很久了，谢王岗是你的上司吗？（答：没见过）在北京见过吗？（答：没有）你说没有见过是撒谎！

文元：你还没有回答康生同志的问题！

康生：你什么时候来的？（答：四月二十一日来的）

总理：你是“控诉团”的？（答：我们是汇报团）你们出来时叫汇报团，现在叫“控诉团”了，你跟熊一军在一起吗？（答：没有见过）怪事！你们四月份来的，熊一军也来了嘛！

永胜：要交待来北京的活动情况！

康生：你要交待你搞了些什么黑活动！

伯达：你在北京住在什么地方，向谁汇报，跟谁联络？

康生：你是党员吗？是什么党员？是党员还撒谎！

接着，总理、伯达、康生问：你们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朱仁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才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

文元：你们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组织？（朱答：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叫什么组织？（朱答：全国“造反派”总部。）

伯达：一个是造资产阶级的反，一个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你们造谁的反？你们是假借名义要造无产阶级的反！

康生：你造了些什么谣？

法宪：你有什么资格召集全国十几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利？谁给你的任务？

总理：你方才不是在门口闹着要来吗？不是要“控诉”吗？现在请你们来了，你们“控诉”吧！在北京什么时候开的会？（朱答：这个月的前几天。）

康生：前几天，是哪几天？你老实点好不好？（当朱仁讲到在会上有人谈到当前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问题时）

康生：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两个司令部？是不是你们那个司令部和我们这个司令部的斗争？

文元：请你解释清楚，什么叫两个司令部？

康生：曹东峰（西大“革联”）参加了没有？（曹起立作了回答。）

总理：桂林“造反大军”参加北京的会了没有？（桂林“造反大军”刘振林答：我们有个同志参加了半天。）

康生：你们住在那里，近水楼台嘛！到现在还不愿意回来，在那里气味相投嘛！

总理：请你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比跟国民党谈判都困难，请都请不回来。

（刘振林说，有两个代表不是我们“造反大军”的……）

康生：代表是中央定的。就这个理由就不愿来，和中央讲条件，你们还愿不愿到学习班来？什么时候回来？（刘答：明天全部搬去。）你们如果再不去，北京所有的工人、农民就要把你们赶出去！

总理：（生气地站起来对刘振林）我问你们，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对不对？（永胜：还成立了“接管监狱领导小组”。）你们组织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老多”要改个样子，不是去年那样了，今年变了，性质要变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你们不听中央的召唤，不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召唤，你们这么大架子，拒绝中央的接待，住在北航不回来，是个严重的错误。你们在北航的都站起来！承不承认住在北航是错误的？（答：承认。）现在有三件事：第一，你们要承认错误，要向中央文革写出检讨；第二，今天就搬回去！第三，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那里有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有×千犯人，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去年，前年你们造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定混进了坏人！你们要在学习班里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人民日报》刊登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文章。今天是二十五日，一定要让部队接管监狱！

（当桂林“造反大军”刘天偿谈到桂林市被农民包围和在机场挨打的问题时。）

总理：打人是错误的，“联指”已经写了检讨，态度是诚恳的。（永胜：这个态度是好的。）农民进城问题，军队劝他们回去，“联指”也劝他们回去。

总理继续对“造反大军”说：我们拿这几件事考验你们，要改正错误，在学习班里接受毛泽东思想，不要认为过去造反是响当当的，就永远响当当的了？

文元：你们在北京开会的详细情况，要给中央写出书面汇报。

总理：你们汇报团、“控诉团”到底是两个组织，还是一个组织，到底是什么团？是不是到中央面前就叫汇报团，在北航就叫“控诉团”？

（当朱仁说他们住在和平里不了解情况，消息很闭塞时）

永胜：你们就是要搞小道消息，造谣！

文元：“消息很闭塞”，此话不通。毛主席的声音，广泛宣传，家喻户晓，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公开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个消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是正大光明的。无产阶级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至于那些小道消息知道越少越好，知道了，那是要上当的。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在阴暗角落里制造出来的，我们要提高警惕，追查到底。

玉成：你们的所谓汇报团，在北京做了很多坏事。冲京西宾馆，再三劝说不听，打烂玻璃，打伤战士，派战士把你们送到和平里，你们把战士也打伤了，现在这个战士还在医院。你们说在和平里开了一次会，实际开了几次会造了很多谣。桂林“造反大军”的去了，你们开欢迎大会。到处串联，散布谣言。要你们组织起来学习，你们不愿学；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你们不听。你们做了很多坏事，我们都有账。希望你们在中央面前老老实实讲出来。

法宪：你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在北京四个月到底干了些什么？

（当“四·二二”赴京“控诉团”苏振国说到梧州烧房子问题时）

总理：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苏答：三月）你三月份出来的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还有到广州做坏事的，你知道不？（苏答：不知道）凡是坏事你都不知道，你都不代表！你们把坏人揪出来没有？梧州放火时，你在哪里？（苏答：在南宁）在南宁你怎么知道梧州的情况？你们在京西宾馆呆了十天，到处贴大字报，打了玻璃，打伤了人，还打电话回去，造了很多谣。

永胜：你们讲：“别人来宾馆顶多两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呆了四十八个小时”；还说“坚持就是胜利！”

总理：事实说出来了，你们不得不承认；不说出来，你们就把错误推给对方。梧州问题今天不再谈了。梧州的火，“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

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康生：（对苏振国）我问你，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的是不是反革命，镇压这些人叫不叫迫害？对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你到底怎么样对待？怎么样处理？（苏答：回去调查……）不能等回去，就要在这里处理。（苏：我们没抢援越物资）

总理、康生同时说：你们都是“造反大军”。接着，康生又说：梧州搞成那个样子，你们怎么能看得下去，怎么能对得起群众？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会怎么愤恨！

文元：中央“七·一九”通知说，“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对苏振国）是怎么理解的？

康生：不仅是对广西人民的最大关怀，是对反革命的迎头痛击！

（苏振国：广西反革命两面派蒙蔽群众，……）

富治：这就是你们在北京贴大字报的口气，你们这就是反对“七·三”布告。

总理：“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立即停止武斗，交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抢夺的援越抗美物资。

（当西大“革联”曹东峰说“四·二二”常委龙智铭等人是被开除的，不能代表“四·二二”时）

总理：你能代表“四·二二”吗？你是什么“四·二二”？我们请的“四·二二”的三十个代表为什么都不来？

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当曹东峰讲到“四·二二”的群众在他们一边，不在龙智铭等人一边时）

永胜：你这个话就不对，你们杀人、放火、抢东西就叫有群众，他们就没有群众？！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群众！

总理：你离开南宁四、五个月，你能代表那个“四·二二”？

法宪：你叫曹东峰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拥护革筹，拥护广西军区？

康生：曹东峰，我提醒你，今晚不是讨论哪个代表哪个的问题，是讨论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是讨论执行不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的问题。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杀人放火、抢劫援越物资、枪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对反革命你采取什么态度？

总理：你支持广西革筹小组不？你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你支持广西军区不？你支持“七·三”布告不？

玉成：你们在北京贴大标语，写“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对不对？你给我回答。

总理：这个口号是对还是不对，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怎么能说是宣判了韦国清同志的死刑？！

康生：不要兜圈子，要直接回答问题。

法宪：这个口号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总理：这个口号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法宪、玉成同志说：要回答这个问题。

康生：你（对曹东峰）像什么东西？是什么态度？你是什么派？你是不是就不回答，你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性质。总理问你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们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你很会表现手法，在哪儿学来的？

总理：“七·三”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你们说是“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当然韦国清同志不是没有错误，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检讨了嘛，你们都看到了嘛，有文字为证嘛！你贴出这样的标语不感到问题严重吗？

文元：“七·三”布告是毛主席批示的，你们歪曲毛主席批示的布告。还把它贴到大街上，这是什么性质？！

总理：你（对曹东峰）能代表新“四·二二”，那么，我们叫新“四·二二”来人，你可以叫来吧？他们到现在还不愿上飞机。南宁的火不能再放了，铁路不能再中断了。你能不能劝三十个代表都来，和石怀宇联系上，电话不通你可以写信，我们有办法交给他。你贴了那样的反动标语，你能叫他们来，就算是你改正了一点错误。

康生：电话不通，可以写信，可以在北京向大家表示一下嘛！你（对曹东峰）这个青年人，不知在哪里学了那一套两面手法。这种手法是会毁灭自己的。在中央面前，要老老实实讲问题，你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你想骗人，能骗谁呀！一个大学生，在中央、毛主席面前玩那一套花腔！我看你口头上讲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批示的“七·三”布告，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执行阴沟里黑司令部的路线，你不敢讲，你没有勇气。

总理：你（对曹东峰）给石怀宇写封信，叫他把“四·二二”三十个人劝好，两天之内叫他们到北京来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了。我给你们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玉成：你们（对朱仁、曹东峰）这些头头阻碍解放军战士到和平里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从明天起你们就要停止这种活动，不能阻止！

总理：你们听到没有？朱仁要负主要责任。你不是学生，你是个教员，是出谋划策的人，又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现在桂林、柳州的都来了，就是南宁“四·二二”的三十个人不来，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给你们三十个代表不少了，不执行“七·三”布告就不能代表。

富治：哪个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哪个就能代表。

康生：（对朱仁）你先不要说话，你回去把在北京的活动原原本本、老实地写出来，怎么造的谣，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考验考验你是革命的，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朱仁说他们在和平里的人思想很混乱）

康生：不是他们思想混乱，主要是你们头头的思想混乱。你们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你们是站在阴沟里的黑司令部的路线上的。

总理：你们回去要好好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按温玉成同志宣布的，他是卫戍区司令员，不能对抗。要遵守北京革命秩序，不能对抗解放军的宣传。如果对抗，就是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

（朱仁：谢谢中央首长的关怀）

康生：你在哪学的那么多外交辞令！

总理：现在讲柳州问题。

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柳铁“工机联”王反修：马上通车）。你叫王反修？（总理站起来）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这个反修，要真正反修。你是学生出身，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们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键过不去！你们是不是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王反修：“工机联”抢四千多箱，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你们全在柳江南岸，占的据点很多。（王反修：我们请罪。）

玉成：中央的“六·一三”通知下去以后，你们到处说是假的。（王反修：我们坚决贯彻中央通知。）

永胜：你们口头上讲坚决贯彻，但你们的行动呢？完全是骗人的。你们说假话，言行很不一致嘛！

总理：你们同“钢联指”能不能合作？“钢联指”来了吗？（“钢联指”张坚答：可以解决。但我们安全没有保证。）你们（对王反修说）的黑老板还在不在后面指挥？你不是张炎的“秘书”吗？你要说实话。你们能不能保证双方不阻挡通车？（王说从来没有阻挡过。）怎能说从来没有阻挡呢！（张坚：他们放脱轨器。）对！只差五十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抢救，火车就要出事啦！（王辩解：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什么不懂事！这是反革命事件！

康生：反革命！什么不了解情况！

总理：（对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我向你，你们参加抢援越弹药，不能交出来吗？你们抢了一万一千八百箱，这不是小事！还有廖伟然，你们能在很短的时间交回吧！今天是二十五号了，你们要在一、两天通通交回来，你们明明知

道是援越物资的列车嘛！一万一千多箱弹药，你们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怎么分的，难道不知道？！

富治：正因为知道是援越弹药，所以他才抢！

玉成：这次抢，是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几十分钟就抢得干干净净。

富治：这是什么行为？

总理：你们怎么还骗我们，想混过去。在中央面前，怎么能讲假话，能骗过去吗？你们面临两件事：第一、把抢去的援越弹药统统交回；第二、要和“钢联指”合起来恢复通车。保证通车，不是一方，但“造反大军”负主要一方的责任。“钢联指”你们在路外还有断轨的事情吗？（答：没有）我们在铁路会议上宣布张炎是坏人，他是幕后指挥，不能回去了，你们知道嘛。你（指王反修）现在还在为他辩护！

康生：中央宣布的你们都不听，还为他辩护什么！还包庇他。

总理：现在铁路要恢复通车，首先要停止武斗，哪派也不要侵占地方。对“工机联”、“造反大军”的考验就是要把抢去的援越物资，全部交回，把抢去的枪全部交回。“联指”也要把抢去的枪交回。不然，恢复铁路交通就无法保证。双方在这里开会，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听从解放军指挥，由解放军全线护路。

“联指”张林、张麦生你们能负责吗？（答：能！）你们也不要跑到南岸去。（答：没有）柳州铁路大桥，由解放军接管，两派撤出。

今天是二十五日，你们两派（柳铁）二十六日要达成协议。你们带个头。你们达成过五次协议了，都不能兑现。能说你们后面没有坏人，没有黑后台、没有反动家伙吗？你们还为张炎辩护，这不老实嘛！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南宁、桂林铁路来的人与柳州合在一起，由铁道部军管会、总参军交部的同志，同你们一起协商讨论，立即达成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解放军来的人，也参加签字。

玉成：柳州主要是白鉴平、廖伟然。

总理：现在谈桂林问题。

玉成：桂林主要是刘振林、刘天偿。

（刘振林报告说：我们进占监狱的人，保证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撤出。）

玉成：你们进占的监狱周围山上的制高点也要撤。

总理：桂林“联指”曹铁军、李年生，你们也要保证，打电话回去。“造反大军”保证从监狱撤出，“联指”保证在“造反大军”撤出时不要打他们，双方保证。

（当“造反大军”提出“联指”抢了六千多条枪支问题时）有没有这件事？

（“联指”李年生答：有这件事）你们承认有这件事，就把枪送回去。有错误要像刚才检讨打人那样，检讨了就很好嘛！（刘振林提出“联指”不在协议上签字。）你们一派起草的他们当然不干。一四一师韩更同志、分区景伯承同志，你们两人与他们双方一起，搞一个协议。

你们（指景伯承）支一派压一派，检查没有？（景：已检讨。）

康生：（对景）我听说你检讨得不大好哩！上次开会是点了名的。你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我看你是“联指”的后台。

永胜：是后台，两边都有，一四一师也是后台。

总理：景伯承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你们（指一四一师、桂林军分区）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两位（指韩、景）一个是一四一师的，一个是军分区的，要把桂林的问题好好解决。不只是解决桂林市的问题，还要解决好铁路沿线、全专区的问题，铁路的从冷水滩到永福。大概桂林市的问题，“老多”要多负一些责任；城外的问题，“联指”多负一些责任。

康生：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要听人家的意见，不要一讲就说人家是“造谣”。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有一万多条枪时）

总理：（问一四一师韩更同志）“老多”手里有多少支枪？（韩答：不知道。）

永胜：你们一四一师送给“老多”枪，还说不知道？

总理：今天是二十五日，要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包括韩更，景伯承两位，都要保证。进城的农民要回去。（“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收留了很多外省人员）刘天偿你们“造反大军”也有农民进城吗？有没有外省人员流入桂林市？（刘答：一个也没有。）（韩更：有）你说没有，一四一师都承认了嘛。农民由部队劝他们回乡生产。外省人员由你们“造反大军”负责劝他们同去。你同意不同

意？（刘答：同意）你们回去达成全面协议，要有效的保证铁路畅通，不要农民进城。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反对革命委员会时）你们“老多”过去不是一向要支持桂林市革委会的吗？怎么也反对啦！这些问题，都要在协议上解决。

康生：协议要双方面提出来，一方面写出来，让另一方签字，人家不签字，就说人家不联合，这不是诚意。说要搞联合，是给对方施加政治压力，这就是假的。不要玩弄那一套，要商量好，不要用这种压对方的手段，这不是真正要联合。协议条文要两方面订，要求大同、存小异，把大同的写上。各地都不要用单方面提出协议硬要人家签字的办法，这是压对方的政治手段。刚才，你们（指“老多”）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一方面的，还振振有词地说对方不联合，这个我懂得，年青人不要学这一套，耍手腕是不行的，要坐下来，双方商量解决。

总理：革命委员会是要支持的，已经双方协商，上报批准，是合法机构，这是原则问题。但不能说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做错事，有错改了就好，可以批评帮助嘛！但是，有人提出要打倒革委会，推翻革委会，是不行的！农民要人（指流窜到城市的坏人）是合理的，但是应该通过军队，不能抢，不能破坏城市的革命秩序。至于“造反大军”吸收了一些成份复杂的人，由他们自己清理。这些问题，要双方坐下来，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诚恳的商量，先将铁路通车、制止武斗等问题达成协议。“联指”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对他们冷淡，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当然，不能把过去反对过革委会作为前提。应该肯定地说“七·三”布告中，“四·二二”、“造反大军”包括“老多”方面的错误大。特别是中断铁路运输，放火烧那么多房子，严重得很！“七·三”布告发布后，还在北京说很多黑话，贴不少黑标语。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联指”也不能压他们。曹东峰在北京干了那么多错事，我们还叫他写信回去，准许他改，将功折罪。刚才王反修不是认罪了嘛！也要看他们能不能认罪！

（当刘振林说到他们正在清理阶级队伍，还揪出了杨德华时）

总理说：对呀！杨德华是你们保的嘛！杨德华是要揪的！

康生：我有个要求，要求你们思想上首先懂得你们来北京干什么。我知道你们各派都带来了材料和你们认为的证据。你们来的目的，是想打官司的，作为打官司的依据。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不是来打官司的，若打官司，广西搞成

这个样子，全国人民同你们的官司是打不完的。你们不是有“控诉团”吗？全国人民的控诉比你们大得多！

富治：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对广西被你们搞成这个样子，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

康生：你们不要只看到南宁、桂林、柳州。你们要看到全国。“七·三”布告到了上海，工人看了大吃一惊！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广西有这样一些事情。你们脑子里就没有一点敌情观念！刚才问你们反美不反美，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你们口里讲反对美帝，实际上不反。你们口里讲支援越南人民，实际上阻碍援越。你们口里讲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口里讲揭露“反共救国团”，实际上帮助他们。口里讲反修，还有的人名字叫王反修，实际做的是修正主义高兴的，不管主观如何，客观上帮了修正主义的忙。你们口头上拥护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实际上是反对。不仅在你们那里有人反对，你们在北京居然贴大字报、标语，向我们示威，向北京七百万人民示威！你们没有敌情观念，有不顾大局！两派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某些军队同志支一派、压一派，也有这个问题。

你们不要只想到你打死我一个人，我打死你一个人，要想想大局，想想敌人，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想想这个呢？

总理：你们（指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

康生：敌人把手伸到你们那里来了，但是现在有的人思想右倾，对敌人恨不起来。

去年参加你们的会，我点过谢王岗的名，今天到会的，有没有还保谢王岗的，他是国民党特务，还有没有保贺希明、霍泛、袁家柯的！有的人在中央点名以后还划不清界限。伍晋南同志，你跟他们划清界限没有？（伍答：划清了）靠不住吧！那是敌人，要警惕呀！上次我们点了张炎的名，今天居然还有人替张炎辩护，

总理：是王反修！

康生：这是大问题，大方向。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今天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把你们找来北京学习，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政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好好学一学，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好好检查自己，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做自我批评，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但是有人不来，公开对抗，还有的来了，不到学习班，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去开会，这是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是相信或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你们来不是打官司，而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检讨自己的错误，恢复铁路交通，交回援越物资，促进革命大联合，很快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现在美帝、苏修、蒋匪帮天天说：中国边境成立不了革委会，你们同意不同意成立革命委员会呀？你们执行谁的指示呀？你们这样搞，是适应美帝、苏修、蒋匪帮的要求，你们不解决这些问题，天天讲什么大方向，哪里是掌握大方向，是假的！是骗人的！这是同志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你们来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学习，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但是有的不来，有的来了不进学习班，你们想一想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当然，敌人是少数，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同敌人划清界限呢？借口电话不通，这不通，那不通，这是政治态度问题。到北京来，不到学习班学习，是有另外一条路线的！

你们口头上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实际上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把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对准革命委员会。他们口头上喊反右，实际上他们就是右派，就是右倾分裂主义者。所以不要只看口头，要下决心啦！要把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克服掉，把敌情观念提高起来。你们晓不晓得，谢王岗在北京没有？

永胜：谢王岗、袁家柯都在北京。

总理：朱仁见过谢王岗没有？（朱答：没有）袁家柯呢？（朱答：见过他的老婆）啊！见到他老婆，这不是偶然的吧！说明你们有联系。

永胜：你究竟同他们划没划清界限？如果划清界限，就把他交出来！

玉成：谢王岗在师院住过多久？

总理：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老多”是很不光彩的！

康生：这个你们要做自我检讨，为什么他们能够到你们那里。

总理：他们在南宁也住过“四·二二”的地方。（桂林“造反大军”说，我们正组织人对谢王岗的问题进行调查。）

康生：什么调查！你们根本不愿划清界限。

永胜：中央点了名的，还敢于到你们那里去住；你们还和他坐在一块，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去了。

总理：“四·二二”原来保了贺、霍，犯了严重错误，承认了是好的。但是在点了谢王岗、袁家柯之后，他们都跑到桂林，你们还要调查，中央已经告诉你们了嘛！

康生：所谓调查，就是不相信中央！

总理：所以杨德华又跑到你们那里去了。这些坏人都往你们那里跑，你们“四·二二”要好好想一想。

康生：我有个要求，就是你们把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好好学一学，认真作出自我批评。

文元：你们要好好学习《人民日报》刊载的毛主席对上海机床厂调查报告的批语。

康生：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做自我批评，问题就扯不清楚。同志们讨论问题时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算账算不清楚。若算也要算大账，就是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掌握没有掌握。

广西有些头头不是那么纯洁。学生开始起带头作用是好的，但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主席对上海机床厂调查报告的批语，请你们好好学一学。特别是主席讲，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要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健步伐，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有些知识分子开始有觉悟，以后变了，我看朱仁就是这样。广西大学的曹东峰，是不是革命的，我有怀疑。不论是师范学院也好，广西大学也好，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看广西两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进“反共救国团”，都可能混进王公度、贺希明那样的托派，都有叛徒、特务、走资派混

进去，两派都有学校的黑教师。广西大学、广西党校有没有黑教师？你们自己说还没有发现，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讲过吗？《今日的“哥达纲领”》说是学生搞的，我看不可能。那不是学生写的！

总理：王反修，是学生搞的吗？（王答：是。）

康生：说是学生，骗人！我看你王反修也搞不出来。是黑教师搞的。在座的谁读过《哥达纲领》？朱仁你读过没有？（朱说：看过）你看的是《哥达纲领》还是《哥达纲领批判》？（朱答：《哥达纲领批判》）你不要混过去，你看过没有？（朱答：没有。）

那个“纲领”，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说没有黑教师，见鬼，骗人！是掩护黑教师，遗憾的是过去没有发现。所以要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办学习班。

你们达成协议跟家里联系无条件的实现“七·三”布告。你们现在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应当是无条件地把铁路搞通，在七月份搞通；无条件的交枪，无条件的停止武斗，无条件的停止杀人放火。杀人、放火的人被镇压是受迫害吗？朱仁、曹东峰你们整天喊受迫害，杀人、放火的人要保护吗？那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

要按照总理刚才讲的，立即达成协议，不是口头上讲，要用实际行动。桂林的同志，你们是靠北航呢，还是靠中央？

总理：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还是跟北航走？当然，不是说北航什么都不对，但他们招待你们不对。

康生：他们错误地招待你们，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抗！你们还参加了黑会。

法宪：有没有参加过去年年底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答：有）不是办的很好吗？为什么回去不促进大联合？

你们好好想一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布告”，这是全国没有的，广西二千四百万人民，要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是你们不执行，铁路中断两个月不能通车，这是全国没有的，严重影响援越抗美，影响物资运输、部队供应，影响外贸，影响人民的生活。还有到处杀人，放火烧房子的，这也是全国没有的。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一传达，各地都闻风而动；但你们广西，接你们来学习，

有些人不来。中央、中央文革派最大最好的飞机去接你们，可是有一架飞机却摆在桂林停了十天。我们空军闻风而动派飞机，晚上也飞，气候不好也飞，可是等了你们这么久，你们不来，这对得起毛主席吗？是忠于毛主席？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头脑要清醒一点，到时候了，再不能拖延了！你们究竟要把广西引到什么地方去？

你们还无动于衷。争争吵吵。没有什么可争吵的，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唯一正确方向，就是要搞好革命大联合，尽快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康生：我们今天批评“四·二二”，“联指”也要作自我批评，不能压他们。如果你们再压他们，下步犯错误就是你们了，这是有经验的。

伯达：广西两派，还有跨行业的，所以坏人混进来了。

总理：梧州“造反大军”有些人跑到广州去了。

伯达：还有跑到北京来的。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要按部门、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如果不这样搞归口大联合，坏人就容易混进来。国民党、特务、托派、叛徒，走资派就会混进来。所以最后解决广西问题，还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事，逐步做到按部门、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样，互相了解，坏人就不容易钻空子，坏人就不容易钻进来。

北京的一些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有些大学生是表现不错的，现在有少数几个人很可惜走向反面，如果不赶快觉悟是不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老造反派。过去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对的。但胜利冲昏头脑，头脑膨胀了，现在手伸得很长，开秘密会议是很危险的。在和平里、清华、北航开的一些秘密会议是危险的。

文元：奉劝你们把秘密摆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观点、材料摆出来。

伯达：北航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清华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韩爱晶、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他们懂得多少？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你们在北京听到一些大学的消息是不可靠的，听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才是最可靠的。如果你们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走到危险的道路上去，滑到泥坑里去。不要以为当个头头就不得了，就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些知识分子，不放下架子，没有什么本事，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空空洞洞的、

蒯大富能领导多少人？（文元：二百多人。）是不是一致的？可能不一致。脱离了工农群众，要回头是岸，回过头来，还欢迎他。你们同他们串连起来了，你们要提高警惕。

你们来搞什么串联？曹东峰、朱仁搞什么“控诉团”，住在和平里，你们离开广西好几个月了，既不了解情况（康生：也不愿意了解情况），也完全脱离了广西的群众。你们不听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专门去听小道消息。

总理：你们不要去听小道消息。

永胜：那是阴沟里的消息。

总理：有些省自称来汇报的，我们都不承认他的。

伯达：你们识别不了坏人，就要上当。这样搞下去，可能要跟坏人走的。你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执行“七·三”布告，坚决按照部门、按照行业、按照班级搞革命大联合，不要搞跨行业的，这样才有出路，才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康生：关于小道消息问题，请同志们注意，北京专门有一伙小集团，挑拨离间，经常造谣诬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矛头对准解放军，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们为实现其反革命目的，不惜以各种方法造谣，

文元：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荒谬绝伦的造谣，反革命的造谣！

康生：这是反革命分子造谣。他们挑拨离间，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司令部。这是反革命手段，他们除了供给美帝、苏修外，还有什么作用！

永胜：这是搞挑拨离间。

康生：还有一伙人，专门造假文章，说我有一篇《五个回合的重新站队》讲话。目的就是搞分裂，搞乱革委会，大联合也可能搞乱。目的就是要实现他们的右倾分裂主义。还有一篇说是伯达同志的《“斗私批修”的辅导报告》，也是假的。

总理：简直的造谣公司！

伯达：现在已经流传到天津。保定、华东等地去了。

富治：他们想以此适应他们的分裂主义。

康生：在北京听小道消息，挑拨离间，那可危险啊！

伯达：“七·三”布告要落实。

永胜：柳州有人撕“七·三”布告，这是什么行为！你们口口声声讲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把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撕掉，是忠于毛主席吗？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这是反革命行动！

我不作为中央的工作人员，作为广州军区的成员说几句，我要提出批评，你们拖住了广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州地区只有一个广西不能成立革委会。你们这叫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广大群众是要求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就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在挑动破坏。这只有美帝、苏修、反动派高兴，广大人民是不高兴的。你们撕布告，“四·二二”、“造反大军”七百人跑来北京几个月，还跑去广州，什么地方都去了，你们把手伸得那么长，你们这是黑手，要斩断你们的黑手！难道人家不能革命。你们到北京来造谣，是造谣公司的合股成员，至少少数人是合股成员。你们贴标语说：

“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政治死刑，这不是反革命？！

你们在南宁打，越南领事馆搬家，搬到对河去，你们还要打，还有没有国际主义精神？

在桂林，你们打越南的学校，使人家退走，还有点国际主义吗？还把桥炸了，把粮食也抢走了，你们对得起越南人民吗？

抢援越物资，放火，也是你们干的，这是搞文化大革命吗？

你们冲监狱，不想想里面关的是些什么人，你们究竟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和谁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康生：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了，你们还摇摇晃晃地跑来北京，贴出那样的大字报，不害臊！搞不起来联合还有什么脸皮这个那个的！

永胜：广东的武传斌也来了。

总理：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我再讲几句，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我也不怕你传出去。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

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他们说什么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辩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

（“广西联指”廖炜雄：伍晋南说不结合袁家柯不等于打倒袁家柯。）

（广西“四·二二”曾春生：这句话是伍晋南跟我谈的，我是故意摸底的。）

总理：是靠不住的。要公开谈，不要背后谈，你这个摸底，不是摸上当了吗？！

（曾答：我没有上当，但是有人上当了。）

康生：伍晋南同志的问题，他检讨。今天不谈伍晋南的问题，集中谈反美、反修、反蒋、反对叛徒、特务的问题，对准这些敌人。

广西是最前线，是越南最接近的后方。但是你们抢援越的物资，打越校、越侨和越南领事馆，这不是反革命！完全没有国际主义，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要认真作自我批评。

富治：揪坏人。

永胜：白鉴平，你挂牌要过饭没有？你丑化社会主义，想跑去香港，被抓回来。还有，廖伟然，过去当兵，是被开除的，你是四十二军的，我知道，我在广州军区呆了十几年。我怀疑你们两个人，究竟造谁的反？站在什么路线上了？你们反对革委会，反对解放军！

玉成：你们两个人，是中央指名要来的人。

永胜：你们两个好好想想，造谁的反？你们都要好好想一想，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群众，就是江青同志所讲的“三指向”。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说北京市革委会他参加了。

玉成：他（指武传斌）还说我接见了，公开造谣！

康生：朱仁，你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造谣的，就是黑会的执行主席。白鉴平，你也参加了吧？

永胜：你（指白鉴平）就是黑会的成员。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样子？你们究竟是什么感情？

总理：你（指白鉴平）是山东人，怎么到柳州去的？

（这时有人起来揭发，白鉴平的父亲是右派）

（有人揭发“工机联”“联战”头头钱文俊这次来京时带四瓶炸药上飞机。）

富治：这是反革命！

永胜：你们“四·二二”、“造反大军”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中央点名的，你们保护，完全把自己摆在对立面上。你们“四·二二”把坏人当好人，中央“七·三”布告发布二十多天了，你们不执行！湖南、广东比广西好些。

总理：这次找你们来，就是考验你们。现在你们已滑到了边缘，有些已经犯罪。现在是给你们改正的机会，将功赎罪！

康生：白鉴平，我问你个问题，你参加几天黑会？北京有些什么人到会？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黑会？谁通知的？（白答：参加一天半，十八日一天，十九日半天）

玉成：刘振林、刘天偿，炸桥、抢粮是你们干的，你们是头头。

康生：白鉴平，你讲话不老实，你隐瞒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懂得。

（南铁“红色铁路”吴锋杰揭发：白鉴平不参加学习班举行的落实“七·三”布告表忠大会，却跑去参加黑会，诬蔑表忠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会等）

富治：你（指白）对我们伟大领袖是什么阶级感情？

总理：你是什么立场？什么思想？什么感情？赖金石（柳铁“工机联”的）为什么跑出学习班？？又是去哪里搞黑串连了！

（有人揭发柳州“造反大军”地总高寿仪也参加了黑会）

（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并说会议要向中央写个报告）

康生：不对！你们是这样讲的：中央知道了，写个报告，争取主动。犯了错误的人，要说实话，不要耍两面手法。青年人耍两面手法，必然要毁灭自己！我是为了爱护同志们，向同志们讲清楚，改正错误要说实话，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不能搞外交手法。

总理问桂铁“工总”施向东：你们把“四五号”列车的车头搞走了，有没有这回事？（施答：有一次）啊！“有一次！”一次就够严重的了！司机是齐齐哈尔来支援的，就是因为你们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你们拿机枪对准司机，把车头拉走的，还打开车门、车箱，把工具箱打开，拿走斧头，我直接给韩更打电话，一

宿没睡觉才搞回来，这么大的错误，你为什么不检讨？还讲别人。你这是什么行动？（施答：这不是革命行动。）这是反革命行动！我看你比王反修还调皮，他还承认犯了罪，你连犯罪也不承认。

康生：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指出，这是反革命罪行。你却只说“不是革命行动”。

总理：你（指施向东）也是中专毕业生，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干部，你们领导铁路，工人就会上大当！

康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国民党、抗美援朝都没参加过。现在是个知识分子就觉得不得了啦！

总理：你（指施向东）今年多大？（答：二十七岁）不管你是什么家庭出身还不是个知识分子！

康生：白鉴平，你是冰室代理会计？

总理：你（指白鉴平）是商店里的怎么能领导群众？乱领导一阵，要把群众领导到哪里去呀！

富治：白鉴平你是不是要走你父亲的道路？！

总理：（问“工机联”李振林）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李答：从部队转业下来的）

永胜：你们给解放军抹了灰！你们还有点解放军光荣传统没有？！

总理：今天在座的工人很少，还是学生成份多，原来受的资产阶级教育都暴露出来了。坏人就混进来了。

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会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还行呀！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要赶快通车。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对齐齐哈尔的司机那样对待就是反革命罪行。

不管哪一方抢解放军的武器弹药，都要迅速交回。再放火不行，双方抓的人都要放，劝进城的农民回去，铁路要达成协议。广西七月底要实现毛主席的批示，如果你们诚心跟坏人走，那是另外问题。现在还有六天，先把铁路通了，张炎什么时候都可以斗，今天下午铁道部军管会和总参军交部，你们铁路上两派在一起

研究通车协议，如果到月底还不通车，怎么能说忠于毛主席呀！两派都要清理坏人。今天回去两派都要自己检查自己，并付诸于行动。打电话的打电话，写信的写信，不要互相写大字报，能不能保证？（众答：能保证）在广西制止武斗，首先要在学习班前止武斗，在学习班搞武斗就不像话了，有决心没有？（众答：有！）

康生：你们在学习班有没有带枪的？有枪的要交。在和平里住的有多少人，有没有枪？

总理：回去要传达，有武器要交出来，匕首也要交出来。

（曹东峰说：西大“革联”被围几个月了，没粮食吃）什么没粮食吃，你们抢啦！

康生：百货大楼为什么烧？就是先把东西抢光了，再放一把火灭口。

总理：（对曹东峰）赶快动员没有来的人来北京学习，才能改正错误。

法宪：今晚开这么长的会，同志们要听进去。犯错误不要紧，要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两派回去都不要搞资产阶级派性，如果你们再不改，广西的广大革命群众，要把你们踢开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了不起，广西人民是要革命的，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是跟中央、中央文革的。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照办，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

（梧州“造反大军控诉团”一个教员报告要求发言）

康生：不谈了，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听够了。宣布散会。

全体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印制厂 105 红印兵团翻印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20； 中发 [68] 134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是援越抗美的前哨。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曾经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特务，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广西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面目，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韦国清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三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大造革命声势，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要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要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内团结和军政团结。认真落实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指示。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作好援越抗美工作。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歼灭敢于来犯的美蒋匪帮，巩固边防，保卫祖国。

中央相信：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化，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强大革命威力下，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紧接着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和海防前线的福建两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反革命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给了那些叫嚷“中国靠近边疆的省、区成立不了革命委员会”的帝、修、反的蠢虫们以迎头痛击。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广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伟大的战略部署和英明的决策。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满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广西二千四百万各族革命人民，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既是胜利的伟大进军，又是曲折的艰巨里程。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个胜利，都要同阶级敌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激烈的搏斗。

广西是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前哨，过去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老巢，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敌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极端仇视，极端害怕。一小撮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跳了出来，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阻挠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在革命群众团结对敌的巨大威力下，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可耻地失败了。广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广西的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同阶级敌人进行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持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使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完成“三支”“两军”任务的同时，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力以赴，

务歼入侵之敌”的教导，多次击落入侵的美帝飞机，给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胜利。我们希望：广西各族革命人民在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继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力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极其伟大的战略意义，为我们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指出了根本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各级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根据毛主席指出的各个步骤，积极地投入伟大的斗、批、改高潮。对毛主席提出的各项任务，即建立各级革委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以及教育革命等等，要逐条讨论，逐条落实，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广西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具体情况，订出自己的规划，切实执行。

广西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稳、准、狠地打击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英国特务和其他特务分子、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

右分子。地处祖国边疆、援越抗美斗争前哨的广西军民，一定要大力加强战备，严守边防、海防和空防，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广西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都要巩固和发展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我们坚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西各族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一定能够继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二、研究资料

《文革中广西武斗二三事》（韩 辛）

（一）概况

一九六七年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成为两大派：造反派（南宁 4 2 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和桂林老多）和保皇派（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和桂林联指）。造反派要打韦国清保伍晋南，保皇派要保韦国清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两派打的不可开交，四次闹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要周总理公断谁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一第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相安无事。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总理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纪要”迅速传达到广西基层，造反派欢欣鼓舞，保皇派垂头丧气。第二天天刚亮，在保皇派占优势的工厂单位支左的驻军代表纷纷打起背包回军待命。保皇派的大群众因此忧心忡忡，许多人退出联指，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此后两派武斗迅速升级。

一九六八年夏，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随后周总理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广西两派武斗的“七三布告。”命令广西两派在 2 4 小时内向当地驻军部队交枪，超过 2 4

小时由解放军强行缴械。驻军派出直升飞机在广西各地空投散发七三布告。此后几天是广西武斗以来死人最多的最残酷的。南宁 4 2 2 和柳州造反大军被定为反革命组织，联指大报其仇。造反派大小头目包括扛 5 c 多群众被杀被关。剩下的群众是连踢带打没好日子过，只能夹著尾巴做人。桂林“老多”因没挑起武斗，勉强给算了个群众组织。保皇派广西联指大获全胜一统天下。

要想理解广西武斗的结局，就得说一说造反派要打倒的广西区党委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韦国清还是毛头小子的时候就跟著韦拔群在广西东兰县闹革命。后来邓小平到广西百色策动武装起义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七军，韦国清就在红七军当个排长什么的。红军长征经过黔桂边区，韦国清就跟著红七军加入了长征的队伍。建国后五八年广西撤省建僮族自治区（后来改僮族为壮族），韦国清接替李井泉出任区党委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虽然主政几年政绩平平，但韦国清可是广西驻军的老首长了，再加上那时候的老百姓都听共产党的话。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有这一段你就知道为什么解放军支左就是支联指，两派交枪就只是造反派交枪，顽抗者格杀勿论。

（二）南宁

如今南宁许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六八年“七三布告”公布后解放军攻打自治区展览馆，清剿 4 2 2 反革命组织，和后来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了南宁城的事。

可这大洪水从何处来？却是极少人知道的秘密。南宁两派武斗打的很凶，把朝阳路从市百货大楼到邕江桥头的半条街烧了个精光，好几千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了保护自治区党政领导，区党委大院的围墙上拉上铁丝网架起机关枪。把冲著大门口的喷水池都改建成了碉堡。造反派 4 2 2 占了区展览馆，把它建成了武装根据地。

可要守住若大的展览馆，少说也得一二百人才行。七三布告一公布，南宁警备区司令部迅速派出部队，在联指的配合下把展览馆团团围住。解放军架上高音喇叭向里面宣读七三布告，勒令 4 2 2 反革命份子立即交枪投降，不要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自取灭亡。里面的人一听都傻了眼了，几个月前周总理还说咱是革命造反派，怎么一转眼就变成反革命份子了。往外面一瞧，除了解放军外还有持

枪荷弹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好。24小时一到，解放军开始进攻了。里面绝大多数的人只想暂时躲起来，找个机会溜出去。但也有少数不怕死的，跟解放军干上了，打死打伤六名（？）解放军战士。可打死了解放军战士这反革命的帽子就算戴牢了。几小时以后，解放军攻占了展览馆，在联指的大力协助下击毙了不少反革命份子。可大多数的422群众都躲到展览馆地下的人防工事里去了。

那年头美帝国主义正在轰炸越南，南宁是革命大后方的最前线，因此市里修建了不少人防工事，尤其是区展览馆这样的大建筑底下。422在地道里准备了大量的乾粮和水，据说够几百人坚持一个月没问题。人防工事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正当广西军区领导头痛的时候，南宁下起大雨来。据说上游雨下的更大，邕江水位看涨。但住在江边，邕江水哪年不涨几回？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可六八年的大水却邪门，一夜之间竟把南宁城除了公园里的古炮台外都给淹了。可以想象那百来号躲在地道里的人的下场。几天后大水退了，解放军从展览馆地下的人防工事里清理出许许多多发臭的尸体。南宁市武斗到此宣告结束，随后成立了以联指和解放军为主的“革命委员会”。

关于南宁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许多人都认为是422作恶多端，天怒人怨的结果。时间一长，人们也就淡忘了。可联指一统天下大获全胜的结局给广西文革后期带来了许多后遗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重新出山，拨乱反正清理文革遗留问题。全国各省市纷纷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却难产迟迟开不了，原因是区市两级中联指出身的干部从中作梗，极力反对为文革中参加造反派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的群众平反。七九年（？）区第四届人大好不容易召开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怎样评价周总理在广西文革中应负的责任。

由于周总理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此事只能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大会其间特地从某地农村赶来了的一位不速之客给大会提供的一份爆炸性的材料，揭示了六八年南宁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源头。来人是复了员的前解放军某部工兵排排长，七三布告后的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他奉命率领工兵排在邕江上游炸毁了一座大水库的拦水大坝。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炸坝。（值得一提的是邕江下游还有一座低水头的西津水电站。）大会文件发到代表手中，一个个看的目

瞪口呆，大会要求严格保密。与此事有牵连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刘重桂因此下了台。

（三）柳州

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武斗阶段，柳州各群众组织开始打造长矛大刀。各单位大门口都有手持红樱枪人站岗放哨。与此同时各群众组织为了占一个能用来开会作指挥中心的据点开始较量实力。柳州市武斗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柳州建筑公司青年工人邓顺成。事件的起因是造反大军的柳建，木材厂和酒厂的战斗队看中了木材厂的大礼堂，想占为自己的据点。突然发兵占了大礼堂，并立刻封了门窗严加防范，静待联指反击。大礼堂分上下两层各有人员把守，人人佩戴识别袖标，每日更换口令。

联指闻讯立调兵员把大礼堂团团围住。因为用的是长矛大刀，联指一时拿不出什么进攻的好主意。到了半夜，把守楼上的邓顺成和一个同伴溜到下面想看个究竟。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口令，一下没反应过来，冷冰冰的长矛就捅进了喉咙。外面情况不明，没人敢开门送他到医院。一夜流血过多，天没亮邓顺成小命就没了。第二天一大早，解放军赶来调解劝说两派各自收兵。

第二年春天，柳州两派武斗逐部升级越演越烈，所用武器不断更新换代。从原来的木棍狼牙棒到长矛大刀，到了最后干脆到各地驻军军营把步枪机枪高射炮都“搬”了出来。说是“搬”而不是“抢”自然是有道理的。造反派第一次到当地驻军的一个军械库抢枪，就因不听鸣枪警告，当场被驻军开枪打死了三个。解放军把“革命群众”打死了可不是一件小事。事情闹大了，广西军区下令不准随便开枪。胆大的再来抢枪的时候，解放军就站在一边看。绿灯一开，几天之内当地的驻军都被缴了械。X月，造反大军由柳铁工机联作内线，在柳州南站一次抢了八个车皮的援越军列，全是清一色的全自动步枪和大批弹药。自此柳州市武斗进入白炽化的阶段。两派武斗大战之前有一特殊事件值得一提。飞鹅路中段有个3—4层楼的延安旅社，不营业了给红卫兵占了当据点。能时为准备武斗，红卫不知从能里弄来好几箱炸药，都堆在一楼。一天夜里炸药突然爆炸，把大楼给炸塌了一半，死了不少红卫兵。死者中有个小名叫小六子的初中生，那年才十五岁。炸药爆炸原因不明，有人说是抽烟不小心引爆炸药，也有人说是联指暗算。

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剑平是柳州工程机械厂工人（六八年底被逮捕）是个有心计的人，为扩大造反大军的势力范围，一手策划了柳州市武斗的“三大战役”：攻打柳铁文化宫，市水厂，和市印染厂。这三个地方原来都是联指的地盘。造反大军为从联指手上夺过这些地盘，从各单位的战斗队调来几百人来攻打。联指也从各单位的战斗队调来几百人打保卫战打反攻。这样大规模的武斗一打就是好几天，双方都有重大伤亡。联指在“水厂保卫战”中死的人最多，因为水厂位于柳江河北岸，是保卫柳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

造反大军武器上占优势，联指吃了不少亏。联指也抢部队的枪，可地方部队的装备太次，连半自动步枪都没有，尽是些七点二六和七点九口径的步枪，子弹互不通用，打起仗来很受限制。联指枪枝弹药的主要来源是地方人武部和民兵的装备，其中有好多还是日本人的三八大盖。联指为了弥补武器上的劣势，自己动手制造了一大批的手榴弹。但搞兵工毕竟不是本行，手榴弹的质量不过关，使用中提前引爆炸死了不少自己人。此外，联指还试制了一种象迫击炮的武器。用无缝钢管焊成迫击炮状，添上炸药外带一个装有钉子的炸药包。炮管里的炸药爆炸时将炸药包送到敌方阵地上爆炸，钉子乱飞有相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两派武斗死了大概好几百人，具体的数字不详，反正各单位三天两头开追悼会。武斗的两派都认为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自然都把自己一派在武斗中战死的人封为“革命烈士”。追悼会是越开越气派，“烈士”的坟墓也建的越来越豪华。相比之下，位于柳州市大龙潭真正的烈士陵园只是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土堆。柳钢附近有个叫欧阳岭的荒山被联指建成新“烈士陵园”，山上建满了豪华气派的烈士墓。

经过“三大战役”，柳州两派打出了个分江而治的局面：造反大军占江南，柳州联指占江北。导致大批难民向两岸流动，各自逃到本派控制的地区，一片红色恐怖。柳州铁路局宿舍在江南（壶西），钢联指在那里呆不下去，职工家属纷纷逃难到柳北，一下子把各单位的大礼堂都住满了。

柳州市区风景秀丽，市内有数孤峰突起，九曲柳江蜿蜒从市区穿流而过，古有“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赞语。柳江蛟龙腾跃把市区北面画成葫芦状，成“三江四合，抱城如壶”之势，把柳州市分为柳南，柳北，壶东，壶西四大区。六八年的时候市里没几座五层的楼，几座山就成了天然的制高点。四十多层楼高的鱼峰

山正对著葫芦底刚建成通车的柳州市当时唯一的公路大桥柳江大桥。这立鱼峰脚下是碧绿的小龙潭，传说是歌仙刘三姐骑鱼升天的地方。鱼峰山上有翠松亭、冠山亭、现美阁等古建筑遗址。山间有清凉国、盘古洞等 7 个岩洞，洞中有元、明、清以来的摩崖石刻。除了鱼峰山，柳南还有驾鹤，箭盘，马鞍三山。壶西有大小鹅山，壶东马鹿二山，柳北雀儿山。数山之中，以鱼峰山最为小巧却置为关键，是“兵家必争”之。首先鱼峰山座落在柳扛 7 b 市的中轴点上，山顶有个五米见方的平台。架一挺机关枪就可控制前面的柳江大桥及左右的飞鹅路和屏山大道，山后不出百米就是工人医院，山腰的洞里又能藏兵。造反大军占了鱼峰山可把联指和山下百姓给害苦了。山上的人每天都往山下打冷枪，谁都不敢出门。

联指为了报复，在江北架起高射炮，每天朝鱼峰山上打。有一天，山上的造反大军惹了祸，竟然把过路的解放军给打了。说是解放军却穿一身蓝绿色的军装，对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原来这是在越南打仗调防回国的 6 8 8 6 部队，穿戴的都是越南人的军装。战士们在越南吃尽了美国佬 B—5 2 轰炸机的苦头，真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好不容易调防回国，本想著能轻松一下。谁知道一路上，军列让咱中国老百姓抢了好几回，临到休整地了还挨枪子，憋了一肚子的火。尽管上级有指示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可这一肚子的火总得找个地方发吧？休整了几天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各军营里除了放哨的突然空无一人，当夜柳州城里枪声大作。第二天中午部队才回到驻地，战士们一个个眉开眼笑，浑身上下都是泥。有的战士口袋里装了许多空弹壳，送给驻地附近的孩子们。孩子们好奇，问战士们昨晚那去了？有战士悄悄的回答：“你可要保密哟，我们打鱼峰山去了。”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两个文件》（刘振武）

（原编者按：刘振武（1926年～1968年），男，广西博白县人。高中文化。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县民政科副科长、博白县凤山中学总务主任、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8年，他起草文件，指出当时的“派”性党中央，已经篡夺了党，军队和国家。为此遭到政治迫害，含冤病逝。）

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

由中国人民的优良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在党的重要领导同志主持之下，最近在两广边境地区的秘密地点，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已经通过“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等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由于我们的条件特别困难，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寄给你们。请求你们协助立即刊印和散发到全国各地去，送到一切有战争，有争论的地方的两派群众手里去，以便于正确地解决两派争端，找到共同的语言。

由于这两个文件，对解决两派争端，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你们在刊印的时候，务请由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检查校对，不要有任何只字标点符号的差错，以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会议还在继续举行，将要通过的有“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团结”等三个极为重要的文件，以及会议的新闻公报等。这些文件，都需你们协助刊印散发，通过以后，将陆续寄给你们，请做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

在新闻公报上，我们将公开我们的组织，及其主要的组织成员，以便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

此致

革命敬礼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1968.7.21.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一号文件

宣 言

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的严重的关键时刻，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面临的严重困难，为挽救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被彻底破坏，为挽救祖国人民免除分裂、内战的疾苦，而开展伟大的保

党反“派”的正义斗争。并争取这个斗争，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以实现祖国的重新统一与团结和平。

(一)

我们需要保的党，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反动的蒋介石王朝，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接着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需要保的党，就是 1956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这届中央委员会，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儿子，他们是我们党的，七亿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共同财富，他们是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能联系群众的，最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富于领导才能和指挥才能的，最有经验的天才的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一个领导集团，才能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完全正确的领导。

但是，使我们万分沉痛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领导集团，近两三年来，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以这个集团为主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因而，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完全正确的领导。使我们的党完全瘫痪，完全瓦解，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和领导能力。使我们的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全国性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的刚刚从经济困难中恢复起来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又一次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使我国又一次面临从来未有的严重困难。所以，保证恢复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全部权力，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这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了一切。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问题，那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而变成历史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二)

我们需要坚决反对的“派”，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挟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去的，彻底地破坏了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由极少数的几个人组成的“派”，及其自封的“派”性中央。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篡夺了党，篡夺了军队，篡夺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全部地篡夺了她的职权；并且利用八届中央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骑在八届中央的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线，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体规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蹋了作为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设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成了一条软骨蛇。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整个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根据自己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需要，破费国家的无可计数的巨大财富，巧立各种名堂，从社会上搜罗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蒙蔽和欺骗他们去支持他们自己。凡是上了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派别路线和派别政策的人，就一律被封赏为所谓“造反”派，凡是不支持他们的错误政策的人，都一律被贬为什么“保守”派，甚至是“反革命”。系统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政策！公开策动政变性的遭及全国各地的大内战和大分裂。

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枪枝、弹药以及“打倒”、“推翻”、“消灭”、“砸烂公检法”等等完全是对敌才能使用的武器，散发给上了他们的大当，受了他们蒙蔽的人。这样，就导致了全国性的，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大屠杀、大流血、大混战。所谓挑起武斗的黑手、黑后台、黑指挥等等，恰恰正是这个“派”性中央。这个“派”性中央，已经完全毒化了我们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分裂内战、经济萧条、人民苦难的死胡同。

(三)

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的敬爱的领袖身边。我们万分沉痛地看到，直至现在，我们的领袖，都还没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直至现在都还没有知道，这个“派”性中央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建国以来，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和从来未有的大损失。

这个“派”性中央，挟持领袖，使用“愚君害主”的种种阴谋手段，贩运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货，明目张胆地公开发售。几年以来，这个“派”性中央，所说的，所做的，无不充满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条要人们尽忠的所谓“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呢？这就是“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条“革命路线”，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提出，到1966年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才完善化系统化的。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张国焘式的“任人唯亲”的派别路线。提出这条路线的人，从根本上推翻了无产阶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以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的灵魂，偷换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这条反马列主义的所谓“革命路线”，传给上了他们的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并且要这个“派”身体力行。而被贬为“保守”派的人，则为了保卫自己的需要，也从“派”性中央手里，夺过这条所谓“革命路线”，从而就形成了全国性的两派的对立。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形势十分尖锐。由此，即产生了遍及整个祖国国土的流血内战，“派”性中央，号召人们忠于这样的“革命路线”，实质上就是号召人们忠于流血、忠于死亡，忠于内战，同忠于祖国和无产阶级的最后分裂，“其用心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的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1958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

重大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象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人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呢？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呢？怎么会去推翻民主集中制，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呢？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的“党委领导一切”、“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呢？可见，实行一系列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愚民愚兵政策、奴化政策、窃国政策的“派”性中央，其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四）

这个“派”性中央，以宏篇大论，咒骂“修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就是这个“派”性中央，公开号召砸烂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政法部门。并且公开说：“公检法一垮台，我就高兴。”同志们应该想一想，这些话，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究竟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个特别的性格，这就是昨天还称这个同志是“亲密的战友”，后天则突然宣布这个同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昨天亲手提拔起来

的干部，今天则突然下令撤职，一脚踢开。对这种神昏颠倒的行为，我们一言以蔽之，曰：反复无常，法无定见。

这个“派”性中央，还有一个性格，就是发动大串连的是他，下令禁止串连的也是他；叫喊“两个阶级大搏斗”的是他，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也是他；大喊“支持左派”的是他，下令“不支派”的也是他。对这种特殊性格，我们又一言以蔽之，曰：朝令夕改，早话晚忘。

这个“派”性中央，大喊立新功的是他，天天卖旧货的也是他；带头在党的八届中央搞分裂的是他，大喊两派实现大联合的也是他；从根本上拒绝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是他，大教别人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也是他。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行，我们称之曰：言行不一，文过饰非。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 1957 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一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实行着派别路线，贯彻着派性政策，本来就专门靠撒播仇恨种子为职业，那么，怎么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正确地解决遍及全国各地的两派争端，从而实现真正的两派革命的大联合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目无党纪国法的，破坏党纲党章，破坏国家宪法的，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派”，那么，怎么能够有效地克服遍及全国各地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呢？怎么会能够领导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民主、有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法无定见的人；本来就是朝令夕改，早话晚忘的人；本来就是言行不一，文过饰非的人；本来就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把一切成功归于自己，把一切失败归于别人。”的，实行私党、私国政策的最自私、最自利的人，那么，依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在七亿人民的思想中，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呢？怎么能统一七亿人民的意志，并且给他们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已经打击了许许多多的领导干部，已经把我们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糟踏得不成样子，并且把许许多多的人，打成“保守”派，那么，依靠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能团结干部的绝大多数，并且通过他们去团结全国人民，以建设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卖旧货、论前功过日子，并且早已被“伟大前功”的沉重包袱，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那么，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会有半点力量，领导七亿中国人民，去开辟新的前途，创造新的业绩，建立新的功勋呢？

请问：在一个“派”性中央面前，在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里，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黑帮、黑线；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土匪绿林；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怎么会出现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完整无缺的圣人呢？

（五）

受了“派”性中央的圣人论的蒙蔽和欺骗的青年人，出于对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无知，出于对党中央的爱戴和拥护的善良愿望，听说要保卫党中央就一哄而起，一拥而上。这种精神，本来是可嘉的。但是，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保了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并且错误地保了这个“派”篡党、篡国、篡军的“贼脏”。同志们，应该想一想，难道八届中央的绝对多数的成员，会起来反对党中央，从而自己反对自己么？头脑简单，缺乏政治生活经验的青年人，显然你们已经上了大当啦！

这个“派”性中央，自吹开辟了什么“革命航道”，号召青年人要跟着游上去。这到底是那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一条所谓“革命航道”，早已被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一层又一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黑帮、黑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叛徒、土匪……等等，严严实实地、密密麻麻地、结结当地把这条所谓“革命航道”堵死了。你们永远永远都不可能游得过去，爬得过去，跟得上去了。人家在这条“革命航道”上游了几十年，跟了一辈子，到头来还落得是一个“反革命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难道你们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才迟迟跟上，会运气好一些，而能够捞到半点油水么？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鲁迅先生反说，“路本来是没有的，人行多了便成了路”。上了大当的青年人，还是回过头来吧！自己走自己的路，可能会稳当些，安心地多读些书，可能会得益多些。

我们诚恳地劝告那些盲目地跟在“派”性中央身边的，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那些人，在一系列严酷的事实面前，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保证自己不是“黑帮、黑线、黑后台”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保证自己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不提防“背后一刀”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不怕同那些以前功饰后过的，完全脱离了群众的人一起，终归被人民群众所唾弃，而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呢？

近十年来，我们从这个“派”性中央手里，除了得到破坏、贫困、仇恨、分裂、内战之外，别的东西，则一样也没有得到。从党的利益出发，从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出发，从七亿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地清算这个“派”性中央的严重错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严重时刻了。否则，我们大家都将成为对党、对无产阶级、对祖国不忠的历史罪人。

当前，帮助党的八届中央，克服“派”性中央的分裂破坏活动，促进八届中央的全体成员，在党的、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七亿人民的共同利益面前，重新实现大团结，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把被人们“打倒”了，“推翻”了，“砸烂”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扶起来，并坚决地支持她

实现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前途。

(六)

我们郑重地向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严正宣告：

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和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部队；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产阶级和七亿中国人民的共同的事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如果有人把我们的国家和军队当成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成某一个人复辟封建主义的御用工具；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成某一个人的私人事业，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绝对通不过的，是完全枉费心机的，是绝对徒劳的。

二、我们不承认任何个人，有权篡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打倒”和“推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我们不承认任何个人，有权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打倒”和“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党纲党章的制约之下活动。如果，有人破坏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这就叫做反党。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立即对这种反党案件，进行检查。并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由大会作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希望中共中央监委，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如果，有人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领导人，这就叫做篡国政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必须立即对这种篡国政变案件进行检察，并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由大会作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四、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被破坏的部队；是保卫祖国国防不被侵犯的部队。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拿人民的钱的人民子弟兵，被骗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

因此，我们坚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能够顺利地行使党所赋予他的神圣职权。

我们坚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把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顺利地行使全国人民所赋予他的神圣职权。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竟然置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于不顾，竟然放弃自己保卫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神圣天职，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别人篡党、篡国，实行封建主义复辟政变的御用工具，而继续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那末，其主要军事领导人，必须承担叛党、叛国的罪责，并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北京市卫戍区司令部，都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五、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以自己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于祖国人民的模范行动，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道，果敢、坚定地去纠正任何伟大人物的错误。正如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纠正领导的错误一样。现在，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那就只能证明他没有半点的政治远见。

六、我们真诚地，赤胆忠肝地衷心希望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以党的利益为重，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能够以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为重，从完全错误的道路上回过头来。我们感到你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太远了。我们感到你们在张国焘的旧路上走得太远了。

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几十年来，对缔造我们伟大的党、缔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成果，都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对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革命前辈著下的丰功伟绩，我们总是当做最珍贵的财富，来备加爱护的。我们正是从保卫这些同志的光荣的、伟大的革命历史出发，才去批评同志的错误的。我们希望通过批评错误的事，去

教育犯了错误的人，从而使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显然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们充分意识到，帮助自己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自己对党、对同志尽忠的表现。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认识，能够改正，则是我们全党的幸运，全中国人民的幸运，也是改正了错误的同志的最大的光荣。因此，我们衷心希望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放弃一切个人的恩怨成见，认真珍重一切改正错误的良好时机。

七、“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处的两件工具，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错误理论服务的。因此，参加两个派别组织的人，都是受蒙蔽的，上了大当的。所以，各地驻军、人民武装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必须切实负起自己的责任，认真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保障一切受蒙蔽、受欺骗而上了大当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学生、革命教职员工、革命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革命工农群众的人身安全。切实帮助受蒙蔽、受欺骗的同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鼓励他们反戈一击，起义归队，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人民群众和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革命大团结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又是唯一正确的政治措施。因此，绝对不能有任何对受蒙蔽、受欺骗的人，实行打击报复，伤害人身安全的错误事件发生。各地驻军、人民武装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要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能够顺利度过由于“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一而造成的暂时困难。并率领他们团结一致地、参加到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的队伍中来。

同志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吧！

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通过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二号文件

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现在全国各地的两派争端，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互相仇恨的情绪，还很严重。有的地方。流血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有的地方，正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

流血战争。对这种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坏城乡工农业生产，给人民群众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流血大内战，我们全党、全军、七亿中国人民，都感到无比的关切。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最迫切的共同要求。我们认为，站在无产阶级的即党的立场上，采取正确的方针，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争取整个祖国国土，重新实现真正的和平，是我国人民当前面临的最严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我们认为，两派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错误性质又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具体说来，“造反”派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们又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保守”派是有错误的，但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决地加以保护的。

(一)

为什么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呢？

一，两派都在错误的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帮助了“派”性中央，篡夺了党的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鸣锣开道，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一个完全正确的领导核心——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二、两派的斗争大方向都是错误的。两派都错误地把“派”性中央，根据他们分裂党的八届中央的需要所制定的，“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的派性路线，当作是什么“革命路线”来贯彻实行。结果，两派都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革命者，都要把同自己对立的一派打成“反革命”。从而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如果，我们把“派”性中央比做一块大石头的話，两派都是被压在这块石头底下的两条大黄瓜。不过一条被压在上面，一条被压在底下。在上面的一条，既感到石压瓜，又感到下面的瓜顶瓜，其所受的压力就特别重。在下面的一条瓜，没有直接感到石头的压力，仅仅感到瓜的压力，因而，反抗也就特别强烈。正是因为这样，就出现了瓜压瓜，瓜顶瓜的矛盾和争端。这就是两派争端的性质。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如果不揭开“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不把“派”性中央这块大石头搬开，那就势必两瓜都将压扁在这块大石头的底下，谁也战胜不了谁。这一简单的道理，可惜至今两派都还不知道。

三、两派都使用了民兵枪枝，都破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只不过是有多么的不同而已。两派都没有坚决地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置于一切派别的利益之上。两派都没有把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当做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来看待。

此外，当然还有别的错误，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

为什么说，“造反”派的错误是严重的呢？

受“派”性中央的直接支持，帮助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性中央，实行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并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帮助了“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领导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领导一切”的根本制度；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决定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帮助“派”性中央，推行国民党的“以我代党，一个领袖”的那一套，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运用“派”性中央散发下来的“砸烂公检法”的武器，冲击和削弱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司法部门；帮助“派”性中央，在“做个人好战士”的幌子下，以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制度，并且取代了各级党委的权力和地位。总之，帮助“派”性中央，以革命之名，行复辟封建主义之实。所有这一切，怎么能算不错呢？不仅是错，而且就其性质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政变暴乱。但是，这种暴乱，是“派”性中央挟持领袖，公开发动的。因而，直至今天，都还没有人认真研究其性质，还有更多的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造反”派的错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错误，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错误根源也只有一个。这就都是受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毒害而引起的，都是受了

“做个人好战士”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兵、役民的奴化政策的欺骗而造成的。因此，他们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

所有受蒙蔽的人，大多数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人，他们都是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们当中的年轻人还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们对待受了蒙蔽的人，绝对不能采取镇压的措施和仇恨的态度。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受了蒙蔽，上了大当的时候，他们是会痛苦的。在我们的百般热情的鼓舞和帮助之下，相信他们是会觉悟过来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反面来帮助“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认真珍重无产阶级队伍的重新团结的话，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欢迎受了蒙蔽的同志，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是完全必要的。

受了蒙蔽的同志，当他们发现自己头上的“党中央”，只不过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的时候，在大批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优秀领导干部被撤职、被推翻；大批解放军指战员倒在内战战场的血泊里；青年学生应该分配工作的，分配不出去，应该升学的，无学可升；国家破坏，内战不息，人民困难等等严重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会发现受损失的，恰恰正是他们自己。受损失的正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人民群众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铁案如山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是会把受损失的总的根源检查出来的。因而，他们就有可能很快出现一个政治思想上的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的飞跃过程。如果，我们不预见到这一点，就不是有远见的革命者。

（三）

至于被“派”性中央贬为“保守”派的，为什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决加以保护的？

因为，他们往往是我们的各级干部的大多数，是我们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重要的领导力量。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干部队伍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几十年或十几年来，国家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自己的极为宝贵的贡献。他们为克服三年的经济困难，都尽到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公安政法部门，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治安，都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们富于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过极为密切的联系。

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是我们党的、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保护他们，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难设想，目前的“造反”派，能够有力量担负得起他们的繁重的任务，能够取代得了他们的地位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难想见，我们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开了他们，是能够设想的吗？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地毁灭整个国家的话，那末，正确地对待他们，则是完全必要的。

不能否认，“保守”派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错误还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同人民解放军的错误，“造反”派的错误一样，都是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的错误领导，所一手造成的。因此，片面地责怪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不正确的。

最近两三年来，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的错误领导，为挟持领袖，举行复辟政变制造舆论的需要，无限度地破费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量的国家财富，去接待自己的客人。所有这些，所谓“保守”派的同志是看在眼里，想在心上的。他们对这种情况是早就心怀不满的，他们的这种正当的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原谅的。

当“派”性中央为了支持自己的需要，而封出了所谓“造反”派以后，上头的“派”性中央即通过“造反”派，把一大堆完全是敌对性的口号，诸如“打倒”、“消灭”、“推翻”、“砸烂公检法”等等，直至枪枝、弹药来对待他们。此外，“派”性中央还直接公开出面，把一块又一块的大石头，压在他们的头上。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尽管他们对受蒙蔽的人开枪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在敌对性的行动面前，采取敌对手段，予以还击，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所以，这些错误的罪责，应由“派”性中央直接承担。如果，片面地推在“保守”派的身上，显然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应该的。

有人说，“保守”派是群众反对的，“造反”派是受群众欢迎的。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做具体的分析。

近几年来，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一直忙于搞封建主义的复辟政变，根本就无心过问国计民生、人民疾苦。这种情况，群众是不完全了解的。由于群众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因而，错怪下面的所谓“保守”派，这是难以避免的。加上他们自己身上存在某些缺点错误，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是

可以理解的。当一旦恢复了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国计民生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逐步地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相信他们是会重新得到群众的拥护的。群众支持“造反”派，是要向他们要饭吃的。如果他们也跟“派”性中央一样，不过问国计民生，不关心人民疾苦，那末，群众也是会很快地就抛弃他们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是科学地、有分析地而是片面地看待问题，那我们就一定要犯特大的错误。

我们这样客观地、有分析地评价“保守”派，绝对不能成为“保守”派镇压或排挤“造反”派的理由，和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闹分裂、闹对立的理由，而“保守”派、“造反”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互相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地去揭发“派”性中央的一系列的严重错误，是克服我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找到共同的语言。

应该指出，“保守”派有的错误，是应该立即纠正的。比如，有的地方的“保守”派，竟杀人、放火、放毒、甚至颠倒是非，嫁罪于人等等，都有所出现。有的地方，则殴打不同观点的干部，开除不同观点的职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脱离群众的，是不得人心的。这些错误做法，既帮助了“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又帮助了“派”性中央找到了压迫自己和支持“造反”派的理由，从而加深了分裂。因此，它是害人的，又是害己的。是十分愚蠢的。所以，我们郑重地希望，犯有这类错误的同志，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坚决地彻底地改正过来。

（四）

其实，犯了错误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或那一派。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派群众，都犯了一个普遍性的共同的特大错误。这就是，以一个能够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八届中央，换得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利益的，复辟封建主义的龙袍加身的“派”性中央；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各级党委，换得了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委员会”。尽管全国人民都费尽了力气、付出了无穷无尽的“永远健康”的巨大代价，所换来的仍然是仇恨、分裂、流血、内战。工人无工做，学生无书读，知识青年分配不了工作，病人无药可医，农民没有化肥种田，干部被斗殴受伤、死亡，解放军战士流血牺牲，戏院关门，影院倒闭，商店的布匹、煤油、火柴及其他日用品相继断市。总之，城市破坏，乡村萧条。

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又一层乌云，看不到自己的半点的光明的前途出路。全国人民都犯了这样一个大错误，真是“史无前例”的啊！

所以，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以“永远健康”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行使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所赋予她的神圣职权。并全力以赴地保证其实现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伟大的党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才会有七亿人民的幸福及其光明远大的前途。

（五）

“派”性中央的那些东西，必须立即展开大批判呢？

“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是一条张国焘式的分裂党，分裂人民的叛党的派别路线。这是“派”性中央，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原理而提出来的，是根据他们分裂八届中央，实行篡党、篡国、篡军，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条派别路线，已经完全毒化了我国的政治气氛。现在全国各地两派所执行的，都是这样一条派别路线。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如果，不彻底地批判这条派别路线，就不可能彻底刷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保守”派身上的种种政治侮辱，及其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不可能有效地帮助受蒙蔽的“造反”派，提高觉悟，起义归队。总之，一句话，绝对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两派的争端问题。而军队战军队，干部战干部，群众战群众，这是七亿中国人民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啊！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它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最根本的哲学原理的。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党委领导一切”的革命原理的。如果，不开展对“政

治第一”论的批判，就不可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光焰无际的伟大红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完全变质，伟大的祖国前途，就有可能向封建社会倒退。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很多军事领导干部被撤职，很多战士流血牺牲，至今都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套愚民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心窍堵死了，至今都还没有人知道祖国分裂内战的根源。如果，不对这套封建主义的愚民哲学，开展大批判，就不可能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大解放、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就不可能把七亿中国人民的智慧挖掘出来，并把它引导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就可能得逞；伟大的祖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前途。

“做个人好战士”、“三忠于个人”，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派”性中央，实现其窃国阴谋，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敢毅然、决然地开展对所有封建主义的一切的大批判，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置于“封建皇君”的统治之下，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有彻底失掉的危险。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判，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敢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派”性中央的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派”性中央篡党、篡国、篡军的重要的阴谋手段。因此，也必须开展坚决的批判。如果我们不敢开展对复辟封建主义的愚民性的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批判，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就不可能满足七亿人民的广泛的文化生活的精神要求。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是我们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以及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放松了对“派”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的批判，而再争下去，再打下去，再战下去，那末，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要完蛋了。而这，仅仅只能使美国帝国主义者高兴。亲爱的同志们，清醒过来吧！

(六)

我们呼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在各军种、各兵种的班排里，开展对“派”性中央的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路线、理论和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最有效、最迅速、最彻底地肃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广大指战员的蒙蔽和思想毒害。切切实实地，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把保卫党中央的全部成员和全部国家领导人员顺利行使职权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坚决不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个人，有任意推翻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的特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绝对不能容许去充当窃国者的什么“个人好战士”。如果，你们是封建皇朝的皇家兵，那不管你是做谁家的好战士，我们是管不着的，也是无权过问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首先回到重新团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以自己的模范的行动，号召全国人民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迅速地回到党的八届中央的周围，回到以我党为伟大旗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红旗之下，以便于实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新大团结，顺利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绝对不能片面地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而应该以自己受蒙蔽、受欺骗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两派群众和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引导他们立即参加对“派”性中央开展大批判的伟大斗争；参加保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伟大斗争。及时地把两派完全错误的斗争矛头，扭转到正确的方面来。

(七)

我们呼吁正在互相交火、互相争吵的两派同志，应该立即停止永远没有完结、没有前途、没有胜利希望的，自相残杀的战斗。立即主动地把自己的武器封存起来。（待到两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和大团结以后，再由军事领导机关，同时把两派武器收回国防仓库）。必须认识，坚决地批判从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派”

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坚决地保卫党的八届中央重新实现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才是两派的共同利益，才是七亿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前途。

因此，我们建议两派同志，立即把被自己“打倒”了的领导同志，不问其观点和派别如何，一律送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上去。因为，他们都是“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就有责任保护他们，并支持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个别确实有错误的，也应该由上一级党委的监察机关去处理，绝对不能由个人或派性组织去处理。此外，两派必须立即把被自己一方关入监狱的对方同志，无条件地释放出来；把被自己一方斗殴成伤的对方同志，加以切实的医治，迅速恢复其健康；把被自己一方赶走了的对方同志，一律欢迎他们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双方都要撤销对对方实行经济封锁的错误措施。以畅通城乡经济和物资交流。两派都要放弃自己的派别利益和派性立场。从完全错误的组织里面，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总之，双方都要主动采取一切正确有效措施，来消除两派之间的分歧，互相尊重对方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保证两派在伟大的保党反“派”斗争中，重新团结起来。

必须认识，“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的两件宝贝。两派组织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完全错误的理论服务的。因此，两派组织都是分裂我党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极为有害的毒剂。在批判“派”性中央的错误的同时，放弃和取消这些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必须明白，我们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工会、共青团、妇代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离开无产阶级的这一系列的阶级组织，去另起炉灶，成立别的组织，都被认为是分裂无产阶级队伍的派别组织，必须开展批判。因此，我们呼吁两派同志同时放弃自己的派性组织，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希望得到两派同志的热烈赞同。

（八）

我国面临“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事实是存在的。不过，不是在下面，而恰恰正是存在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内部。这就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同挟持领袖，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派”性少数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同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

民主集中制,同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斗争,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同无产阶级的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的斗争;是复辟封建主义同反复辟的斗争。这就是当前我国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实质内容。但是,这场斗争,正确的东西被压制,而完全错误的东西,却又占了上峰。因而,也就形成了极为曲折,极为复杂的局面。

在这场极为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到底是应该支持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还是支持“派”性中央的错误少数?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谬论?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到底是应该支持“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还是支持封建主义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作出丝毫不苟的明确的答案,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遇到的空前未有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希望一切坚持原理、坚持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在保党反“派”的伟大旗帜之下,联合起来。

(九)

此外,我们必须再次提起同志们的注意。对一时受蒙蔽而误入歧途的青年,是我们的革命后代,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只能采取百般爱护的方针,热情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迅速地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而绝对不能对他们采取打击报复和镇压的错误措施。绝对不能采取“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错误手段对待他们。在分配工作、升学就业、征兵入伍等方面,应该一视同仁地,切实保障他们的政治地位和一切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国人民在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重新团结起来。

在全国完全实现了全面和平以后,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机,对牺牲在两派战争的战场上的解放军指战员、两派群众和干部、青年学生,全面进行抚恤,安慰他们的家属,以便牢固地实现全国人民的真正大团结,更有效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志们，团结起来吧！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斗争，是正义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重新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通过

《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吴若愚）

（一）大屠杀背景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后，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分裂为两大派：“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和“4·22”（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

“联指”是支韦（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

“4·22”则是支伍反韦的造反派。

“4·22”主要是由青年学生，市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联指”则与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

“联指”拥有现实当权者以及军队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随着解放军“支左”介入实行军管，支持联指“坐大”。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4·22”。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4·22”的红色恐怖。发生在广西各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野蛮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二）大屠杀概况

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就是“保皇派”的“联指”对“造反派”的“4·22”和同情“4·22”的群众以及无辜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屠杀，是以“革命”的名义的屠杀。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4·22”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

广西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皆首屈一指。

1967年年底玉林“4·22”的“福绵事件”后，1968年1月4日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1967年秋冬，钦州地区的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即4·22群众）。1968年1月18日灵山“革联”控诉团200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但广西军区对灵山“联指”“飞虎队”乱杀人命听而不闻，没有采取制止措施，甚至纵容“联指”对“4·22”的屠杀。因此，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1月20日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份群众400多人来到广西军区请愿，声援灵山“革联”控诉团，揭发各地“联指”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抗议谴责广西军区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压一派之实。

广西军区不但提供武器，在各地怂恿和鼓励“联指”对“4·22”进行武装围剿，而且还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毙。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试图武装自卫。

而广西当权派控制的《广西日报》则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4月9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12

级台风，公开叫嚣：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 1 2 级台风。

遍及全广西的大屠杀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连边远山区，穷乡僻壤都未能幸免。

广西大屠杀又分为 1 9 6 8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会，“刮 1 2 级台风”为第一波高潮，下半年则以“七·三”布告的颁发，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中共广西区政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 1 9 6 8 年那场大屠杀，有这么一段总结概述。（被屠杀者的统计数字，仅仅是有案可查的众多失踪者，至今生死不明，不在此统计数据内）那一个又一个有体温有笑容的具体生动的生命被抽象化为一组组冷漠的数字：

1 9 6 8 年 7 月至 8 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 8 4 0 0 0 多人。

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3 9 5 1 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3 1 3 8 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 2 6 3 人，教师 1 5 6 人，学生 4 7 人，居民 1 0 6 人，农民 1 3 1 1 人，其它 1 2 5 5 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2 0 5 1 人，其中国家干部 3 2 6 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 3 2 2 2 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 5 0 0 人以上，2 8 7 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 1 1 2 8 人，其中：干部、工人 5 5 6 人，全市冤、假、错案 1 1 5 2 2 起。天等县杀死、害死 1 6 5 1 人。上思县杀害了 1 7 0 1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 1 . 3 3 %。钦州地区 7 个县市失踪 1 0 3 5 9 人。玉林地区杀害 1 0 1 5 6 人。

（三）“刮 1 2 级台风”掀起第一波屠杀高潮

~{ 1 9 6 8 年的广西，到处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中。大权在握有解放军支持撑腰的“联指”对“4·22”大开杀戒。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对此有详细记录，让我们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一月至三月

2 月 6 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 2 0 0 0 多人，配备步枪 8 0 0 多支，轻重机枪 2 6 挺，冲锋枪 4 0 7 支，各种炮八门，手枪 1 6 4 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

攻打“4·22”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4·22”13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4·22”死五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72间,吃去国家粮食14000多斤,肉类8800多斤,耗费国家资金20000多元。

从2月7日至5月27日上思县被斗打1125人,被杀39人。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召开学毛着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期间,灵城打死三人陈尸示众。大会总结号召对敌人镇压,中间有人布置杀人,新圩公社回去杀五人,第二天早赶回开会。

2月16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

由于2月9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12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14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300多人,由蒙治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13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于16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圩、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5时才停火。“联指”方面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杀害,双方对打死5人……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5户九间,厨房3间,牛栏1间。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17天内,全县被杀害239人。

3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8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3月16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一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102人。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3月19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94人。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7月5日的专区革委会上,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是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局,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也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对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态度,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

3月18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1000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3月27日至5月22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12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10个月的婴儿)有13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3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22”围剿。“4·22”派被杀110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3·24”事件。

四月至六月

4 月上旬, 巴马瑶族自治县, “4·22” 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 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 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 副部长黄正业, 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 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22”, 此次共杀害 30 户(全屯 46 户) 杀死 56 人, 烧毁民房 44 户 133 间(全屯 140 间) 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4 月 13 日, 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 在革委会名单中, 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参加革委会, 引起“4·22”不满, 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 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 “4·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 撕毁大会横额, 砸烂县革委会牌子, 这就是贵县“4·13”事件。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 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22”的方案, 提出刮“12 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 二是清理街道, 抓人杀人。在 10 天时间里, 捕了数百人, 除当场打死外, 其余分别关押。从“4·13”后的一个月, 将关押的全部枪杀, 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 230 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 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 38 人, 斗死 90 多人。

4 月 15 日, 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 22 人, 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 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 得三元赏钱, 三个晚上共杀 22 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 没收家产, 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 投机倒把)。张玉使, 符冠英, 何迁兰, 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 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 894 元, 有帐可查, 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 3066.41 元, 全部被吃喝完。

4 月 14 日, 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 4 月 13 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 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 月 15 日) 杀 24 人, 4 月 16 日又杀 52 人, 从 4 月 5 日至五月 6 日杀 56 户 92 人(其中 15 户被杀绝, 1 户 17 人被杀 13 人), 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

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 2 7 0 1 . 2 7 元（内改嫁证明费 2 1 8 元，设卡哨搜人身 4 1 5 1 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 1 0 1 6 . 4 0 元），大米 7 6 9 斤。

4 月 2 1 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4 · 2 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 0 多人，将 1 2 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 1 7 7 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 4 0 %。

从 4 月 2 3 日起至 2 9 日止，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会议与 1 8 日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杀人事件。

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 1 1 个公社 1 5 5 个大队，有 1 5 4 个大队布置杀人，从 4 月 2 6 日至 2 9 日，全县共杀害 1 2 2 9 人。城乡各地，陈尸百里。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 1 0 1 5 6 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1 2 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5 月 3 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十分惨重，不得不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5 月 1 1 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惨遭杀害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军”以及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共 1 8 0 0 0 多人。

5 月 1 2 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4 · 2 2”“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竞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十个不同观点的人，身受折磨，死去活来。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 1 0 0 0 0 多人。

钦州“枯那事件”

5月17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酿成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枯那事件”,这一事件共杀害了群众和干部973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后,标榜上思“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4·22”是反动组织。是日,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22”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27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68)军营字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武装民兵200多人开赴枯那“剿匪”,一无所获。7月9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议保卫组相应于7月25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道,“我组织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

但是人武部和段振邦为了实现派性杀人的目的,于8月16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承以负责“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1000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一计,由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4·22”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

件”有关者通通与匪同罪，大抓大捕 1 6 7 1 人，惨遭杀害 9 7 3 人，其中国家干部 1 4 9 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 6 1 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5 月 2 4 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22”被围剿。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 5 6 0 0 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 8 0 0 多人的“4·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 5 0 多天时间，从 5 月 2 4 日开始到 7 月 8 日结束，平矿“4·22”惨遭杀害。

5 月底至 6 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 4 2 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联指”的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控制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6 月 1 2 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 2 5 8 人，其中被迫害致死 3 5 人，致伤致死 7 5 人。7 月 1 4 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 2 4 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 1 2 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6 月 1 9 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二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6 月 1 9 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直接策划煽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 1 1 人当场被打死，2 0 多人被打致伤残。2 0 日上午王德堂决定“积代会”延期一天，他向“积代会”布置杀人，公社回去后要狠抓积极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屠杀全面展开。王德堂在文革期间，还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 6 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

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关押、毒打、揪斗，杀害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

分子”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 7 8 6 4 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 5 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打死 1 3 0 0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 10%，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

武宣大规模吃人肉事件

柳州地区武宣县，距柳州市仅 9 0 公里，虽非通衢大邑，但其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扼南下贵县、玉林，北上柳州的交通要津，红水河流经县城，又有直下西江流域的桂平、梧州的舟楫之便。

可就是在这个并非蛮荒之地的武宣县，文革期间，却上演了一幕幕疯狂野蛮的人吃人的惨剧。

1 9 6 8 年 5 月 1 3 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原因是 5 月 4 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 1 2 0 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4·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 6 0 0 人并请贵县“联指”3 0 0 多人支援，共 9 0 0 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 9 7 人毁掉房屋 6 7 间价值 3 7 9 0 0 元；共有 3 7 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 2 6 6 0 0 多元。自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联指”大规模吃“造反大军”（4·22）人肉事件。为了以正视听，这里一字不漏引用中共广西整党办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 9 6 8 年所记载的史实：

6 月 1 5 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 4 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从是日起至 8 月底止该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 7 5 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吃人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农民、有国家干部和所谓的中共党员。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 1 8 大队长，解放后，他任苍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 7 月 1 日晚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

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着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巨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烟缭绕，腥风飘荡，焦味充荡，一派阴森状令人不寒而栗。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该县于4月5日成立革委会，相继又成立“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和“武装纠察队”，但县革委会、人武部、“联指”、“贫联”，“武装纠察队”是穿着连裆裤的“联指”派，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造反大军”当“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

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持“剿匪”。几天时间“造反大军”荡然无存，打死杀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野蛮行径。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了文革，各省、自治区都积极处理了“文革”遗留问题，唯有广西原区党委继续坚持派性，美化广西在“文革”中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的野蛮事件，后来中央几次追查过问，区党委竟有人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公然袒护了武宣“联指”中部份人吃人肉的严重事件。这样，灵山县、贵县、武鸣华侨农场“联指”吃人肉的野蛮事件的盖子就被捂住了。

广西各地剖腹挖肝事件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记载除武宣县外，南宁地区的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钦州地区的浦北县、灵山县以及玉林地区的贵县都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一一罗列为下：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时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这是一起野蛮杀人命事件，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导致该区后来乱杀人、剖腹取肝的事件不断发生。

据“处遗”调查统计，该区从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的事件11起21人，其杀人手段极野蛮残忍。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名兵抢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还剖腹取肝，陈尸野外的事件，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个阵亡。上林“联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4·22”“四类分子”（地富反坏）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杀人手段野蛮残忍、罕见。比如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杀陪祭。乔贤大队的蒙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亲生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哭边烧，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惨不忍睹这是一起严重的派性报复杀人事件。

武宣、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

（四）“七·三”布告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七·三”布告出笼的背景

其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军管，在广西，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对“4·22”的集体大屠

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如果说“七·三”布告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4·22”的屠杀，那么“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4·22”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

比如1968年7月底8月初广西军区先后调动220师660团四个连，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炮兵第642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对南宁“4·22”实现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这一仗“4·22”被打死3795人（当场打死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其中被打死2324人）。南宁地区的宾阳县“七·三”布告后，在县革委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亲自布置的大屠杀，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里，全县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

河池地区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动9个县（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三个兵工厂（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联指”武装人员会同6911部队共3000多人，围剿凤山县“4·22”一役毙杀1016人。

“七·三”布告颁发的直接原因，是缘于柳州“造反大军”抢夺援越军列。

“七·三”布告颁布的缘由

1968年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抗美援朝打得热火朝天之际。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该事件令中央震惊，称“已严重干扰破坏了毛主席的文革部署”。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7月3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使广西当权者如获至宝，变为他们堂而皇之大屠杀“4·22”的尚方宝剑。7月9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

“七·三”布告传单 9 0 0 0 0 多份。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 5 1 个宣传队，南宁市有 5 0 0 0 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 6 6 0 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7 月 1 2 日至 8 月 3 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都是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和一篇又一篇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的讲话。

7 月 1 5 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 1 5 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会后“联指”在全区掀起屠杀“4·22”的狂潮将所谓“障碍”革委会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22”派和地富反坏右），打死和枪杀，以此作为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

让我们看看广西各地大屠杀的情况：

7 月 1 5 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 8 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地“4·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者）。他们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 2 8 0 多人，杀害 3 3 人，还有的人被抓之后，至今生死不明。

在桂林地市，又按照桂林的需要制定出“八·二零”公告。为此事，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 8 月 1 8 日到桂林几次，在 3 0 1 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从 8 月 2 0 日至 1 0 月一个多月里，桂林地区（包括桂林市）被害者达数万人之多，其手段之毒辣，惨不忍睹。这是“七·三”布告这个特大事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7 月 1 7 日解放军 6 9 7 7 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 1 2 0 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 1 4 0 多支，尔后又抓捕 8 0 多人。

柳江“福塘事件”

7 月 2 4 日凌晨 4 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 3 0 0 0 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事情经过其严重后果是这样的。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市“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月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25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宜等。

7月24日凌晨4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份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份撤离福塘，留下部份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3斤。

广西各地“七·三”布告颁布后屠杀情况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广西各地“七·三”布告颁发后的屠杀情况有如下记载：

南宁地区的邕宁县 6 月份前死 5 4 人，在受到“右倾”的批评后，于 7 月 1 6 日至 1 9 日分五片召开会议（千人至万人大会），刮 1 2 级台风，结果在全县 9 个区同时调民兵攻打“4·22”派据点事件。全县乱杀人到 8 月 2 2 日止达 4 7 6 2 人，7 至 9 月打死 9 4 7 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人数 8 8 %。

凭祥市印“七·三”布告 2 6 0 0 0 份，调动 1 0 5 6 人，组成 7 9 个宣传队，办学习班 7 8 期（参加学习的 2 4 6 4 人），在全市造成乱打，乱斗，乱杀人事件。8 月 5 日至 9 月 3 日以凭中为重点的落实“七·三”布告为中心任务的全市中小学校，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 7 1 名教职工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其中凭中 3 6 名教师即有 1 1 名被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走资派”等罪名。

在南宁地区自“七·三”布告下达至 1 0 月止共揪出坏人 6 0 0 6 1 人（布告公布前揪斗 1 1 6 8 5 人），7 月打死，逼死 2 7 3 8 人，大战 8，9 月的结果。八月死 5 9 4 3 人，九月份死 1 2 5 2 人，两个月打死，逼死 7 1 9 5 人占全年死亡人数 4 0 . 6 %。

桂林地区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区死亡 1 8 5 9 人，之后死亡 9 0 8 7 人（共计 1 0 9 4 6 人），占死亡人数 9 0 % 左右。桂林地区死亡 9 0 8 7 人，南宁地区死亡 7 1 9 9 人，两个地区在“七·三”布告后共死 1 6 2 8 2 人。

在临桂县，在 7 月 8 日至 7 月 1 0 日，公社主任武装部长的会议上，县武装部长龙凤山批评行动慢的公社，并命令武装部长（是一个行动慢的公社武装部长）在桂林带去 1 1 个精干的民兵，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错误。此次会议后，各公社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和县“联指”派人分别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在杀人会上，各公社均先宣读“七·三”布告然后杀人，会议结束到 7 月 1 6 日共杀去 3 6 人。7 月 1 6 日至月 1 8 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出面开会，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就是搞“4·22”骨干分子和各公社大队的四类分子和其它危险分子，刮他 1 2 级台风。”

胥明德也说具体对象是对立面的头头，对立面的骨干分子还有为未改造好的四类的分子等。从此次会议后到 7 月 2 4 日共杀 1 0 0 人。从 7 月 2 6 日至 8 月 2 2 日共杀 9 6 人。8 月 1 7 日桂林军分区召开 1 2 县民兵团及县武装部长会议，布置攻打“4·22”据点。在“八·二零”时临桂县被关押在军管会 4 0

余人（除 1 人在杀场中死里逃生外）均被杀害，就地枪杀或经过关押杀的无法计算。8 月 23 日押在麻袋厂的其中 9 人拉出杀害。8 月 28 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英豪分别向驻桂的公社民兵团说，要抓紧清理关押人员，要搞得对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从 8 月 28 日至 9 月 18 日又杀去 89 人，这样临桂县从 68 年 6 月至 68 年 10 月共被杀 1783 人。全州县于 7 月 8 日召开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7 月份共开批斗会 1107 次，165062 人，被批斗者 2179 人，人们说“七·三”布告成为“联指”镇压“4·22”的尚方宝剑。7 月 13 日县革委主任说现在农村杀人比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州县共杀人 1111 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 57.4%）。

德保县贯彻“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的办法向下贯彻。7 月 7 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传达“七·三”布告和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精神，公社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作大会报告，宣布以大队为单位，摆开战场，把所谓四类分子和“反团”（反共救国团）187 人进行批斗，当场死伤 19 人（各占一半），燕洞公社 7 月 18 日开万人大会，被批斗者宣布罪状后个个过鬼门关，（在过关时个个被已准备好的纠察队民兵用木棍，枪托等凶器毒打），过关时 206 人均被毒打。各公社均采用此办法进行贯彻，到 7 月 20 日宣布全县已抓了坏人 1200 人。8 月 5 日王君太主持召开县常委会，决定召开大会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状会”，在讲台前跪着的“反革命”共 700 人，王君太一面号召刮 12 级台风，向敌人进行猛烈进攻，纠察队，民兵的等动手打骂，下面哭声震耳。至 68 年 8 月 7 日县贯彻“七·三”布告办公室。“七·三”布告传达后，德保县抓紧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工作。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到 8 月 5 日止，农村共揪斗干部，群众 2120 人，县直机关共揪斗干部职工 121 人，学习“七·三”布告后投案自首者 200 人，全县死人 312 人，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 98 人，之后 214 人。

上思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负责人说：“贯彻‘七·三’布告，策动全县对积极敌人实行专政，过去没有“七·三”布告，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了“七·三”布告，就能解决上思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再次掀起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十级台风’不行，就刮‘十二级’台风。对敌人专政，这次会内搞，会外也要搞，会

内外结合。”于是会议期间共杀了两批人共 2 3 人(第一批 1 1 人均为国家干部)会外杀 7 5 人，共 9 8 人(会外零星杀人不计)。在贯彻“七·三”的同时贯彻区革筹清理阶级队伍指示，全县共清出“叛徒”5 1 人，特务 4 人，走资派 5 1 人，反革命分子 4 1 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 2 2 0 人，其它坏份子 8 3 5 人，在清理斗死 1 2 1 人，逼死 1 8 人。

都安县在向专区革委报告中说：从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这一阶级斗争特点，主要是横扫积极敌人颠覆革委会的现行破坏活动，这一阶段全县共揪斗 7 3 6 7 人，但更深更艰苦的斗争还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七三七三“七·三”布告威力下，一个“三查一清”运动迅速在全县开展起来。到 8 月底 9 月上旬共揪斗 1 2 1 8 5 人，挖出 6 1 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团”和“中国青年党”。

北流县 7 月 8 日举行 7 万人参加的贯彻“七·三”布告大会。提出更猛烈地向积极敌人进攻。7 月 9 日革委武装部作出贯彻“七·三”布告决定，说靠“七·三”布告威力揪斗“黑班子”等案。接着成立四个项目组，1 0 1，2 0 2，3 0 3，6 0 6 项目组，共查清 2 5 3 个案件(全是错案，假案)。7 月 1 8 日北流“联指”和各公社为贯彻“七·三”布告成立“七·三”指挥部。此后在全县范围内乱揪乱斗，全县被诬为“黑班子”的 8 2 0 人，被斗争 7 4 8 人，打斗至伤 4 7 9 人，致残 6 2 人，致死 3 1 人，打成“反团”8 0 4 人，斗打致伤 4 1 4 人，致残 1 3 9 人，致死 2 2 5 人(其中区委书记顾德荣未得三结合，诬副书记搞反团。)该区受害 5 0 0 多人，致残 2 0 5 人，致死 1 1 2 人。后顾被判刑 1 3 年又翻案加刑 3 年共 1 6 年。

9 月陆川县集中中小学校老师集训，贯彻“七·三”布告，搞斗、批、改、清理积极队伍。一大批中学老师受到摧残，陆川中学 8 0 多名教师职工被杀 1 1 人，批斗 5 6 人。未厂中学 2 2 名教职工被杀 7 人，陆川中学校长前后被斗 1 2 0 次后逝世(采用这个方法贯彻“七·三”布告清理阶级队伍的县还有，这是比 6 6 年 7，8 月集训老师进行批斗更为严重的又一次对教师的摧残)。

桂林市“八·二零”大屠杀

6 8 年 8 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

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4·22”桂林“老多”据点。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参加了会议并讲话：“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乾淨”。8月19日在104部队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12县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了“八·二零”行动。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份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其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月29日陈秉德号召刮12级台风，30日全市大游斗。8月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9月4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着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人（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345人，超过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20日前武斗中死人267人的30%。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凤山“江洲惨案”

8月1日由凌云、乐业、巴马县人武部干部带领的三县“联指”武斗队和6911部队进入凤山县，会同该县“联指”和人武部中队共1000多人武装围剿“七·二九”兵团，“七·三”布告下达后“七·二九”被县人武部和“联

指”当作“土匪”围剿,人马逃散到“南山”—江洲一带和“北山”—六隆一带躲藏。

这天,解放军和凌云县“联指”武装队包围了江洲洞,洞里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装民兵10多人,解放军和凌云“联指”围攻三天三夜后,洞里弹尽粮绝(只有七支步枪),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于是洞里提出,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即可缴枪投降,解放军和“联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内派出代表黄显应,陆祖业,陆沦贵处理“谈判”,指挥围攻山洞的凌云县人武部科长卢元俊主持“和谈会议”,双方谈判结果达成协议:“洞内“七·二九”缴枪投降,保证全部人身安全。”经双方签字后,

“七·二九”先交枪,后出洞。解放军和“联指”收缴枪支后,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队部仓库关起来。三小时后,枪杀了7人,其中一个小孩仅12岁,而后又杀害了十多人。

这就是震惊河池,百色地区的“江洲惨案”。但在十年浩劫里,却被称之为“江洲剿匪大捷”。卢元俊等人“立功受奖”。继“江洲惨案”后,解放军和“联指”又围剿北山。

广西大地“一片红”

8月21日,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本报记者评述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从而实行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宣告成立,革委主任是韦国清,副主任是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革委委员133人。

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要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讲话传达后,全区各地又掀起了乱杀人的新高潮。

由于广西各级革委会和人武部贯彻执行韦国清的部署，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冠以种种罪名进行镇压，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区革委会，广西军区于 9 月 23 日给广西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220 师，独立一，二师，空七军，二零分部，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

宾阳县一面布置不要乱杀人，一面又说确实群众要求要杀的也可以杀。该县在 9 月以后依然继续乱杀人。

临桂县 9 月以后在军管会看守所关押的人不断被拉出来杀害或斗打，无人过问。至于群众杀人的事，更是时有发生。当时还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的通知前，采取口头通知，说要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到处出现突击杀人。

广西大地确实是“一片红”——仅仅是“七·三”布告颁布至 8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 84000 多人。1984 年“处遗”工作中，有人根据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概括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人之惨，历史罕见。”

（原载《北京之春》2003 年 8 月号）

《韦国清屠杀广西“四二二”派》（徐 勇）

~{在文化大革命中，南陲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他省的受害者大多死于文革中的种种冤错假案，广西则不同，无辜群众大都死于由军队直接指挥、参与的大屠杀中，而且时间都是在 1968 年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政权机构成立以后。据八十年代中共中央调查组来广西“落实政策”时民间所作的粗略统计，1968 年 7 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十万人！种种名义的杀戮，包括武装一派，在全省范围内武装剿杀反对派“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利用“清理阶级队伍”，挖掘“反共救国团”，“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等等。据 1992 年北京权威的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披露，广西文革中被“无辜滥杀了 8 万多人”（130 页），这显然是一个接近但缩小了的数字。

“广西王”韦国清和广西文革中的两大派

韦国清，壮族，原红七军的老干部，参加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曾任连、营、团长；抗战期间任新四军第三师和第四师旅长；在解放战争中历任华东解放军第二纵队司令，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委等职。他的最主要功绩，是在中共五十年代“输出革命”时，带领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胡志明打胜了越南奠边府战役，建立了北越的红色政权。1955 年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并任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195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一直担任自治区主席和第一书记。文革一开始，他便当上了广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1968 年又当上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大概是文革中唯一的从未下过台、也未靠边站的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后历经华国锋、胡耀邦时期，韦国清非但没有下台，还官升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大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广西王”。

韦国清之所以能稳住他“广西王”的位置，与他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竭尽忠诚、百般献媚分不开。1956 至 1966 年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年冬天要到南宁来休息冬泳，韦国清为毛专门修建了两座大花园：河东的明园和河西的西园，毛为此称韦国清为“我的广西老朋友”，在文革中一再保他。因为他又是邓小平红七军时期的老部下，华国锋时期他力主邓小平复出，更是保邓有功，为邓小平视为知交，一直官运亨通。

文革开始，由于韦国清的多年经营，广西的多数党团组织、各区县武装部、武装民兵，在广西军区军管会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死保韦国清和军区。这一派人多势众，组织严密。而以大中学校学生和另一部份工人造反派为主，成立了“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反对韦国清和军区，这一派大都是一般的和出身不太好的群众，一直被军队称为“牛鬼蛇神总司令部”。文革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开局面，支持过“四二二”，但不久他们在全国逐步掌握了权力，毛又要保他的“广西老朋友”过关，“四二二”便被中共中央的文革派抛弃。

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对反对派自然恨之入骨，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中共文革派对“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他们下手的机会，却还没有名正言顺

的屠杀借口。1968年春，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

制造“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

1968年5月17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1人，副团长3人，政治部主任3人，经济部长1人，支队长4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在向上谎报军情的同时，韦国清等人也下达了不惜代价制造假案的指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还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这个莫须有的“反团”案到1983年已彻底平反，证明是个荒谬透顶的冤假错案，但它当时给广西人民带来的灾难，令人发指。

所谓的“反团”案一公布，千百万反对派的平民百姓就成为他们要消灭的“阶级敌人”，首当其冲的是当时自治区的“走资派”谢王岗、袁家柯、霍泛、贺希明、傅雨田等，其实是省委一级不同意韦国清做法的干部，皆被定的罪行，

1968年7月19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但是没有任何证据！

1968年7月11日在欢呼“七·三”布告的大会上，当时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1968年7月18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攻打“四二二”据点的理由时，把他们指挥解放军用大炮炮击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引起民房起火，说成是“四二二”纵火焚烧居民房屋，据此要求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强制措施……。

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辑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四二二”派的，全南宁市有3,547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四二二”观点的群众）。

广西各地区、县以至农村中的效法者，其手段和办法就更加难以形容了：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5213人，厅级干部1人，县级干部23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一个县就逼出“反团”40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11天打死338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7864人；

钦州地区7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10,420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杀17人（救活13人），暗杀3人，外逃1人，重伤21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防城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据今天官方的《武鸣县志》记载：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

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农村居民二一七六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一千八百多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至32页）。

另外，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XXX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再据今天官方的《容县志》记载：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区武装部长在县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古兆乡所谓破获‘反共救国军’组织，和实行‘群众专政’的经验，全县乱杀人的恶果由此开始。此后，全县有738人无辜被打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这些数字令人不寒而栗。但这只是一些主要的抽象数字。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家庭顷刻间被灭门，多少生命瞬间被毁灭！

1968年4月30日，广西驻军8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5月1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22人，有4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下面的真实记录，很能说明当时是如何制造出“反团”来的：

一个中学几百名师生集合在一起开大会，大会标题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斗争大会”。大会开始，一位老教师被虎视眈眈的“红卫兵”押上台前，主持开会的“工宣队”负责人宣布：“今天我们开大会，斗争我们学校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他们拥护刘少奇、邓小平为领袖，要反共复国……”。接着要反革命分子X X X坦白交代他的罪行。被押上台的老教师脸色浮肿，走动困难，慢慢摊开讲稿，一字一句的交待起了“罪行”，他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在本校还有同一派的学生X X X、X X X也参加了这个“反动组织”，当他一念到这里，他所点到的十几个学生，也在学生队伍之中，一下子被“路线觉悟高”的另一些学生马上用绳子绑了起来，一起推到主席台前。大家一看原来都是“四二二”一派的。所谓的“反革命反动组织”的证据呢？没有宣布。当天，这十几个才十三、四岁的“反革命”马上被分别关押起来。深夜，各种“侦破专案组”出动，把“反革命”双手吊到教室的梁上，索要“反动组织”的“名单”、“印证”等。这些“反革命”开始并不害怕，以为他们没有证据，瞎说能定个死罪吗？“专案组”晚上“审讯”时，先问：“你是不是反动组织成员？”“不知道！”马上拉起绳子，一阵拳打脚踢，往死里打；有的用铁钳挟被打的学生，用竹子、铁钉钉学生的手指，把人吊到离地一米多高又突然松开绳子使人跌下来，直到昏死过去。不用两天工夫，这些学生就“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是反动组织成员了。但是直到逼死3人，还是没有什么物证。既然打“反革命”不需要任何证据，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十几个学生受到了“启发”，暗里通气，向“工宣队”交待时，揭发“联指”派打人、踢人很凶的几个人，“他们也是我们发展的反动组织成员，而且是骨干分子，为了杀人灭口，妄图消灭罪证，他们想把我们打死，其实他们早被我们发展成为联指组织中的‘反团’成员……”。

军队直接出面指挥的全省大屠杀

红色绞肉机在1968年的广西隆隆开动，“阶级敌人”越来越多怎么办？杀！由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明里暗里地指示、组织，由各地驻军、武装部、革委会具体施行，以“清理阶级队伍”和“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刮十二级台风”，先在农村各地杀！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七·三布告”,广西韦国清等人利用此机,指使“联指”把对立派当作阶级敌人,发动武装围剿,乱杀、乱抓之风愈演愈烈,被武斗和乱打乱抓而死的人不断增多,造成骇人听闻的大血案。

7月5日,区革筹负责人召见两派群众组织的常委,宣读传达“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保证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去的解放军装备,依法惩办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等现行反革命分子。

7月11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3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随后几天,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如《坚决执行,誓死捍卫》、《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等。驻桂空军派出飞机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贺县、融安、等市县以及铁路沿线大量散发“七·三布告”。所有的口径都是“四二二”是违反“七·三布告”的“阶级敌人”,除此以外,没有别人去抢解放军的装备,没有别人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这些现行反革命都在“四二二”那里,必须坚决“镇压”。

临桂县革委会委员胥XX,是临桂县“联指”派头头。在“七·三”布告下达后,他亲自策划指挥杀害大批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其中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19名县区干部。胥某亲手杀死3人,这个人杀人手段残忍,但为他办理人事档案的军队当权者,把他的档案写得干干净净,而且是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立了功”等等。胥某1971年9月以照顾父母为名,调回四川綦江县还担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长。1984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公安机关逮捕了胥犯,对他的档案清清白白感到惊讶。

1968年8月3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社论说:这些“阶级敌人”在农村呆不下去,纷纷跑到各大中城市。因此,全区“无

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行动起来，把“阶级敌人”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8月24日，柳州军分区调动8县两矿一郊的“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的“四二二”据点，打死146人，共用去现金10万4千多元，吃去粮食5万多斤。

在宾阳县，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在军队革委会主任王建勋（6949部队副师长）、副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副政委）的直接指挥下，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时间里，打死所谓的“阶级敌人”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人民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户全家灭绝。

下面这一部份具体数字，是今天经由民间调查而获得的：

灵山县被打死3200多人；

都安县被打死441人；

开鸣县被打死698人；

宾阳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3681人；

上林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1906人；

蒙山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私刑致死603人；

百色地区被打死1073人；

河池地区被打死7000多人，其中有五个县被打死千人以上。

据今天大大缩水了的官方县志的记载，文化革命中广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尤其是在1968年韦国清等人下令的对反对派“四二二”的“刮十二级台风”中的死者远远高于其它各省。下面是一些随手拈来的记载：

贵港市（原名贵县），1968年4月，县革委会支持成立“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对另一派群众进行镇压。调动了除木格以外的各区民兵1000人进城。4月15日，开始围攻少数派据点，并连续10天搜捕了数百名少数派群众。在此期间，被保红部指挥部打死杀死、迫害致死的共230多人。事后，各区社也仿照县城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镇压反革命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等等，使全县杀人风迅速蔓延，

席卷全县。据统计,受这一场‘十二级台风’的影响,全县5、6月份有2129人被斗、打或被杀死”(《贵港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天等县,在1968年3月14—17日开了“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大会之后,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博白县,“在贯彻‘七三’布告过程中,全县各地不断发生乱抓、乱关、乱打、乱杀人的事件,到9月底为止,全县被打死的干部群众共337名。”在整个文革中,该县非正常死亡者达千人。(《博白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页)

合浦县,“2月,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5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扶绥县,“7月下旬至8月初,落实中共中央‘七三’布告,县革命委员会……层层召开现场会,揪斗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伤残多人,后果严重”。(《扶绥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平果县,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全县被乱杀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横县,乱打乱杀中“被无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一千多人”。(《横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阳朔县,“全县文革中打死六百三十九人”。(《阳朔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罗成么佬族自治县,“6月15日,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有县、区、公社、生产队干部8998人参加,错误批斗150多人,其中死59人。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1389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被杀人数，只不过是整个文革中每县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部份而已。此外，广西文革中共有大约 73 个县市，仅此官方大大缩小了的统计，以平均每县（市）被杀 700—1000 人计算，便有至少 6 至 8 万人被无辜屠杀！

炮火夷平南宁旧闹市区

1968 年 7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宁警备司令部门卫森严。在会议室里，军区的几位要人正在酝酿如何武装消灭全省反对派的“战略”、“战术”问题。打算从广西军区调 6 个连的兵力，加上南宁“联指”的近万武装，觉得还不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调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的“联指”力量，并划定兵力部署的位置。

“四二二”的部份群众，见到解放军参加攻打，就赶快“反戈一击”，宣布改变观点。南宁警备司令部通辑几名所谓“反团”首要分子，“四二二”开始也不相信，但在舆论压力下，8 月 4 日“四二二”指挥部保卫处不得不抓了 6 个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可是，这种自相残杀并没有使军队对“四二二”群众的剿杀计划停止。7 月 5 日，“七·三布告”颁布，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 3 万人大会后，各地乱捕乱杀的现象加剧，各地被打死，杀死的人数比布告公布之前增加了几倍。有的地方对“四类分子”全家杀绝，有的对不同观点的群众搞所谓“批斗”，被吊打、逼供、活埋、枪杀的不计其数，滔滔邕江河，每天都有尸体在上面漂浮……。

接着，各地的“联指”纷纷到南宁，准备消灭广西的最后一批“坏人”。人们看到，在广西军区独立师的指挥参与下，火车站也调来大炮，炮口对准“四二二”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7 月的太阳象火一样滚烫，炮手们一遍又一遍地擦着炮弹，他们已经等不及了，纷纷请求允许开炮，人们根本份不清谁是解放军谁是联指的武装人员。

7 月 15 日，邕江北岸南岸只见人群车炮往往返返，无数白色安全帽和钢盔闪烁发光。军队和“联指”的高音喇叭已经开到最大的限度，震动整个南宁，好像邕江大桥也在摇晃。

中午 12 时，“四二二”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

侧象 { 坍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

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份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巨大的声浪已把他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火像着了魔似的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撼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18点55分至约点30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谎言也被广西军区当作“四二二”的罪状报告给了中央。

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16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19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信》。同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21日上午9日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27日，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

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7月31日15时，开始对“四二二”派占据的展览馆发动武装大围剿。据官方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X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112页）经过一阵猛烈炮击后，战斗从晚上打到8月1日8点，耗费高射炮弹690发，机关枪子弹1000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17000多发，终于消灭展览馆主要火力点。“联指”和军队冲进去共抓获“俘虏”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四二二’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军区某些负责人就在检讨的当天，命令6912、6966、6936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四二二”的解放路据点，那里的12条街道被打成一片废墟…。

8月5日地面上的围剿基本结束，打死反对派人员1470人，抓获“俘虏”6445人和居民2500人，可见当时战况的激烈和残酷。事后，“联指”用翻斗车搬运尸体，运到二塘煤矿丢下废矿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阳沟掩埋75具，从解放路俘出的人员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一批“俘虏”路经“广州照相馆”门前时，26人遭军队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到8日为止，抓获“俘虏”9845人，先后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其中关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的711人、南宁幼师的441人，都被列入“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共救国团”的“要犯”“首犯”。

被“俘虏”的人员，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有2324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246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解放军炮火轰毁的街巷有33条，各种房子2820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分社，10000多户，50000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价值6000万元以上（同上，第115—116页）。

淹没地下人防工程的邕江集体谋杀案

1968年的8月8日，在广西发生了一宗惨无人道的集体谋杀案。

面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人员的大军围剿，“四二二”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躲进了地下人防工程。因为这一地下工程的先进性，军队和联指一时无法攻入。四九年后广西在经济建设上可谓一事无成，但在战略公路和人防工程的修建上却大出风头，尤其是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有供几万人坚守数月的粮食储备，曾被中央军委表扬为全国典范。

但彻底消灭反对派是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既定方针。不久他们便拟定了用水淹的最后歼灭方案：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为此，联指的一个主要头目去请示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和军区政委韦国清时，韦国清佯作大怒：“你们混帐！我管不了你们打派仗的鸡巴臭事！左江大坝是否开闸泄洪，我更管不了那么具体！全自治区现在乱成一窝蜂，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哪一行不要我来抓？还有抗美援朝，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交下的任务，我必须全力以赴，懂不懂？国际斗争，世界革命，懂不懂？你们那些屁事，我哪有时间过问？”

但联指头目立即领会了韦国清的弦外之音：这不过是一场“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韦国清点拨他们可将人为的大坝开闸，说成是“泄洪”，即因山洪爆发，电站大坝超过警戒线，几乎年年都要开闸的，不是很自然吗？于是联指头头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据当时的《广西日报》报导，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水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58年7.4·71米的水位。从南宁火车站走朝阳路去百货大楼，都要坐船，可见水涨之高。

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走朝阳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况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员，因为河水暴涨，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但又有不少当场被杀。至于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反对派和他们的家属，自然全部被活活溺死。坚守在地下的反对派对军区和联指对他们斩尽杀绝的决心已经没有怀疑，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北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人来救他们一命。他们拍过明码电报，派人突围上京紧急告状。但曾经利用过他们的亲爱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此置之不理……。

他们更蒙在鼓里的是，以韦国清为代表的广西军区对他们的军事镇压，其实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绿灯”放行的。1968年7月25日下午1时5分至6时15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主要领导接见了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份同志和军队部份干部，并对广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接见并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这次讲话后来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成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它标志了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决定抛弃为他们打倒刘少奇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

在这次接见中，所有中央首长讲话都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少有的，大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感。康生点名要“四二二”派的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站起来，首先就来了一通“下马威”：“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接着周恩来也说：“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在随后对“四二二”派其他代表的逐一点名指责中，也大多是这种不容分辩的、大帽子乱飞的训斥口吻，如：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周恩来等人更断言“四二二”已经被所谓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所控制。

于是，曾被周恩来、中央文革捧为“响当当造反派”的“四二二”在广西全军覆没。只见随着滔滔的洪水，一具一具的尸体漂浮上来。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断木和一些家禽尸体，如今的邕江河水驮浮的是广西千千万万的人尸，从南宁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时候，港澳地区的人们却发现了一具具尸体从上游漂来，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

韦国清等人马上明令沿江各县打捞尸体，每捞到一具，可以由公家报销人民币 10 元。

更多的尸体烂在了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之中。自 1968 年起的整整几年内，尽管省市革委会派人不断向各个地道口里喷射福马克林、六六六等强力消毒剂，南宁市区总是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腐臭味。

接下来，那个向韦国清口头请示这宗集体谋杀案的主角，联指的头目，在 1970 年被韦国清下令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狱中。

尾声：谁是直接杀人凶手？

消灭了省府南宁的反对派后，韦国清立刻马不停蹄地对剩下的各地“残余分子”进行斩尽杀绝。8月10日，军区下令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反对派的问题，马上调宜山、河池、巴马等9个县的“联指”武装会同6911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3000多人“进驻”凤山，以“强行收缴”武器为名，抓捕一万多人，而当时全县人口仅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经这一次围剿，就枪杀了1016人，占整个文革中死人人数1331人的77%。（《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7页）……

8月20日，桂林的反对派也被消灭，被直接杀死的有345人。反对派参加桂林市革委会的22个委员中，有19人被关进监狱。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军队和联指共抓获反对派9845人，关押期间动用15种刑罚审讯，又有近千人死于非命（同上，第119页）。

解放军南宁警备司令部于8月12日开始举办“活人展览”，将反对派26个所谓的“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进铁笼，当

作禽兽展览，并组织了近五十万人参观。军队带头，各地纷纷仿效，一时抓反对派作“禽兽展览”风行全省，又有不少人惨死在铁笼内。~}

接着，全区的反对派只剩下一些“残匪”，例如凤山县的“残匪”居然跑入深山，军队故技重演，假称下山交枪一个不杀，并强迫“残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残匪”韦明景被父亲动员下山，第二天便成了枪口下的鬼（年仅 17 岁），从此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广西军区派兵围剿那三兄弟，居然从 1968 年围剿到 1982 年。

在如此残忍的杀戮中，直接下手的凶手都是些什么人呢？在八十年代进行的复查中发现，除了数万军队奉命杀人外，最积极杀人的竟全是共产党员！据官方的统计：在整个广西的大屠杀中，有 4 万 7 千多共产党员参加直接杀人。官方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白纸黑字：“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二万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九千多人。”（132 页）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二 00 三年八月，《北京之春》刊载闻于樵的文章：《文革“七二五讲话”：不仅仅是广西造反组织的终结》

本文所说的“七二五讲话”，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 1968 年 7 月 25 日

《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份同志和军队部份干部

时的重要指示》。时间是在那天下午 1 时 5 分至 6 时 15 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

大厅，出席接见并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

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富治（副

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次讲话当

年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作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影响极广。虽然这个讲话只是针对广西一个地区的问题而作，但却成了对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

起着非同寻常指导作用的“重要指示”。

◇ 对一个说法的两点补正

在 2001 年 12 月 10 日出版的《文革博物馆通讯》115 期（《华夏文摘

》增刊第 276 期）中有韩辛的《文革中广西武斗二三事》一文，文中说：“一九

六七年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成为两大派：造反派（南宁 422，柳州造反大军

，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和桂林老多）和保皇派（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

局钢联指，和桂林联指）。造反派要打韦国清保伍晋南，保皇派要保韦国清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两派打的不可开交，四次闹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要周总理公断谁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一第二次接

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相安无事。第三次接见两派代

表，周总理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一九六八年夏，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

西两派代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随后周总

理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广西两派武斗的‘七三布告’。”

韩文所提到的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的讲话，应该就是这个“七二五”讲话。但是，与韩文回忆有出入的是，这个讲话是在中央《七三布告》发出 22 天之后才作的，并不是在《七三布告》之前就作的，也不是在这个讲话之后才签发了《七三布告》。是否在《七三布告》之前还有另一次接见讲话呢？应该没有，这从“七二五讲话”中康生的开场白可以看出：“现在开会了。今天开广西的会议。广西的问题，情况你们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中央‘七三’布告不但发到广西，而且发到了全国。同志们来时看到街上长长的游行队伍没有？都是拥护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的。你们广西问题闹了很久，全国出名了，全世界也出了名。现在请同志们到中央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同志来了，但还有少数同志不愿到中央来，不愿到毛主席身边来，不愿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还有的来了不到学习班学习，跑到阴沟里去活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广西代表们是在《七三布告》后才被接到北京的，可见此前并无另一次接见讲话。

韩文所说的周恩来“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也不准确。在“七二五”讲话中，并无直接宣布广西“四二二”派为“反革命组织”的明确结论。不过，通篇讲话中，确实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

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代表讲话中少有的。确实给人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感。当康生在讲话中第一个点名要“四二二”派的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站起来时，首先就来了一通“下马威”：“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接着周恩来也说：“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在随后对“四二二”派其他代表的逐一点名指责中，也大多是这种不容分辩的、大帽子乱飞的训斥口吻。比如，讲话中说到南宁大火时，有这么一段训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话：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讲话中，对“四二二”派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

关于周恩来对广西“四二二”派评价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周恩来在这个讲话中谈到桂林造反大军“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一事时，有这样一番话：

“去年、前年你们造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

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

定混进了坏人！”周恩来还斥责“四二二”另一代表苏振国说：“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

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当“四二二”代表曹东峰汇报“西大

‘革联’被围几个月了，没粮食吃”时，周恩来反驳道：“什么没粮食吃，你们抢啦！”

这样一些讲话传达下去，当然就会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组织”了。

◇ 关于“反共救国团”

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在此之前，广西驻军已经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对“四二二”派展开了打击，而这次讲话，则

由中央出面肯定了对“四二二”派这一“莫须有”的指控。周恩来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

‘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

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今天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康生也说了：“我看广西两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进‘反共救国团’……”但讲话的重点打击的还是“四二二”派。

这个所谓“反共救国团”案，应算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大冤案。既然广东“旗派”与广西“四二二”的头头都被牵连进去了，下边被牵连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众自然更是难以计数。文革中与康生有关的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案和云南的赵健民冤案，都已经有了长篇专题著作（图们、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但有关两广文革中的“反共救国团”大冤案却至今未能见到写出专著。这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题材。

◇ 对广东“红旗”派的打击

在“七二五讲话”中，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所谓“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康生还说“‘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

这已等于是明确宣布广东“红旗”派是反革命组织了。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他们说什么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辩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黄永胜说：“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

武传斌，文革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文革中任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团及广州红旗司令部、广东红旗派负责人。1967年1月领导了广东省夺权。2月下旬领导了红旗派冲击广州军区行动。是广东地区激进造反派的“领头羊”。据称当时广东有这样的传言：“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中大文革看武传斌。”1968年2月22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任常委。6月初领导了对“东

风派”中山大学“革造会”的进攻，两派大规模武斗持续至中旬，因“东风派”的

“郊贫联”调动大批农民前来增援，中大红旗才撤除了对“革造会”的包围。6月

30日，武传斌率100余人冲击广州铁路分局火车站，强行乘车赴京“告状”。到京后住于北京航空学院，于7月17日主持召开了全国造反派会议。

7月24日，即“七二五讲话”的前一天，武传斌离京返广州参加省革委常委

会议。他不知道他刚离开北京就有了这个“七二五讲话”。7月30、31日，广

东省革委会按照“七二五讲话”精神，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待“反共救

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待与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林的关系问

题、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问题、“反革命屠杀团”红警司

问题等。8月4日《中大战报》、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卫二红”战斗团发表《反革命小臭虫武传斌罪行录》。8月7日至8日，省革委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

传

斌、莫竞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邱学科等“旗派”头头交待错误。8月1

2

日广州红代会作出清除武传斌、林凡（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

）的决定。

由此可见，“七二五讲话”不仅是对广西造反派的打击，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广

东的“红旗”派。这两方面的打击都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此后，广西“四二二”派

遭到严酷的清剿，广东“红旗”派也成了“过街老鼠”，由“响当当的造反派”变

成了“反革命”、“右派”，广东各地游街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押着示众的“牛

鬼蛇神”是地、富、反、坏、“旗”……

◇ “清队”的样板

“七二五讲话”在相当程度上为各地的“清理阶级队伍”作出了样板。怎样以

势压人进行逼供，怎样进行上纲上线，怎样“打态度”，怎样根据人的家庭出身和

职业来推定罪名，都可以从这个讲话中受到启示，学到方法。请看下边这些讲话片

断——

康生：你要老实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些什么黑会？搞了些什么

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伯达：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温玉成：你们在北京贴大标语，写“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对不对

？你给我回答。

总理：这个口号是对还是不对，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怎么能说是宣判了韦国清

同志的死刑？！

康生：不要兜圈子，要直接回答问题。

吴法宪：这个口号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总理：这个口号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吴法宪、温玉成：要回答这个问题。

康生：你（对曹东峰）像什么东西？是什么态度？你是什么派？你是不是就不

回答？你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性质。总理问你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们说这

个口号是反革命的！

康生：你（对曹东峰）这个青年人，不知在哪里学了那一套两面手法。这种手

法是会毁灭自己的。在中央面前，要老老实实讲问题，你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你想

骗人，能骗谁呀！一个大学生，在中央、毛主席面前玩那一套花腔！我看你口头

上讲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批示的“七三”布告，是反对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是执行阴沟里黑司令部的路线，你不敢讲，你没有勇气。

总理：你（指施向东）也是中专毕业生，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干部，你们领

导铁路，工人就会上大当！

康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国民党、抗美援朝都没参加过。现在是个知识分

子就觉得不得了啦！

总理：你（指施向东）今年多大？（答：二十七岁）不管你是什么家庭出身还

不是个知识分子！

康生：白鉴平，你是冰室代理会计？

总理：你（指白鉴平）是商店里的怎么能领导群众？乱领导一阵，要把群众领

导到哪里去呀！

富治：白鉴平你是不是要走你父亲的道路？！（会上有人揭发白的父亲是右派）

“办案专家”康生在讲话中要朱仁回去写出关于“北航黑会”的交待时说：

“

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考验考验你是革命

的，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段话堪称“经典”，后来几乎成了各地“清队”中大搞逼供、诱供时的常用和通用话语。

◇ 值得研究的“北航黑会”

“七二五”讲话中，除去有关广西武斗问题外，还着重追查了“四二二”代表

跑到北京航空学院去参加的一个“黑会”。这个“黑会”，据另外的材料介绍，是

在7月17日举行的，由广州“红旗”派负责人、中山大学八三一头头武传斌主持

，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激进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会议。

在“七二五讲话”中，中央领导人一再追问这个“黑会”的时间、出席人、内

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四二二”派代表追问：“你们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康生还要求朱仁写出交待：

“你回去把在北京的活动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在地写出来，怎么造的谣，你在会上怎

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

来。”姚文元还追问：“你们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组织？”朱仁回答：“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叫什么组织？”朱答

：“全国造反派总部。”姚文元还要求：“你们在北京开会的详细情况，要给中央

写出书面汇报。”康生还问“四二二”代表白鉴平：“我问你个问题，你参加几天

黑会？北京有些什么人到会？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黑会？谁通知的？”当“四二二”

派柳州“造反大军”的总代表高寿仪说：“黑会”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会议

要向中央写个报告时，康生反驳说：“不对！你们是这样讲的：中央知道了，写个

报告，争取主动。”康生这一说法，有可能是无中生有恶意陷害，也有可能是确实

掌握了内部情报。

从讲话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当时造反派要成立全国性组织是相

当敏感、坚决反对的。近年在文革史研究中，已有人提出当年的造反派组织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了“准政党”的性质。显然，各地造反派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正

是这种“准政党”性质的一个突出体现。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从文革初期中央领

导人还在鼓励群众成立造反组织时起，就一直明确反对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组织和全

国性的组织，并专门发过文件宣布取消全国性组织，还把好几个全国性组织定为“

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自然更不能

容忍全国性造反组织的成立了。吴法宪在讲话中就说：“你有什么资格召集全国十

几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利？谁给你的任务？”

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那些认为文革时期的所谓“大民主”给了群众极大

自由权利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的。

从“七二五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成立全国性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但是到底已经筹备到了何种程度，“黑会”的具体策划人和参加者到底有哪些人，会议到底有些什么具体内容，被中央否定后还有些什么情况……这些都未再见到更多资料。其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件。

◇ “七二七”的前奏曲

“七二五讲话”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即中央领导人对北航和清华两大著名学生组织的态度。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与新北大公社、地质学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他们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垃圾。周恩来在讲话中严厉质问：“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还是跟北航走？”这一问是很厉害的，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常向“走资派”或“保皇派”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刘少奇走？”现在轮到他们被摆在刘少奇的位置上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再看看这些讲话

陈伯达：北京的一些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有些大学生是表现不错的，现在有少数几个人很可惜走向反面，如果不赶快觉悟是不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老造反派。过去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对的。但胜利冲昏头脑，头脑膨胀了，现在

手伸得很长，开秘密会议是很危险的。在和平里、清华、北航开的一些秘密会议是危险的。

姚文元：奉劝你们把秘密摆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观点、材料摆出来。

陈伯达：北航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清华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韩爱晶、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他们懂得多少？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请注意，这是在 7 月 27 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这一历史事件的两天之前，这时陈伯达已经明确宣布了“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这就预示了，派工宣队的“战略部署”，这时显然已经作出，只是“革命小将”们还被蒙在鼓里，还在那里狂热地大打内战。广西代表们被关在中央学习班里，谁也不可能将这次讲话的内容向北航、清华的“战友”们通报。因此，蒯大富仍然在那里发号施令，仍然在盼着伟大领袖对他的再一次“解救”。

“七二五讲话”其实已经奏响了“七二七”的前奏曲。

“七二五讲话”中，还传达出了后来发表的姚文元那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一些信息，整个讲话中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的鄙视、歧视，陈伯达讲话中说：“一些知识分子，不放下架子，没有什么本事，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空洞空洞的。蒯大富能领导多少人？（姚文元：二百多人。）是不是一致的？可能不一致

。脱离了工农群众，要回头是岸，回过头来，还欢迎他。你们同他们串连起来了，你们要提高警惕。”

在“七二五讲话”的最后，“四二二”派梧州“造反大军控诉团”一个教员报

告请求发言时，康生断然说：“不谈了，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听够了。宣布散会。”

这句结语颇有象征意义，它给这次接见划上了句号，同时也给文革中盛极一时

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两天之后，工宣队强行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正式将他

曾倚重的“革命小将”打下了文革历史舞台，曾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红卫兵、“革命

师生”从此改称为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甚至“臭老九”。在“七二五讲话”过

去刚好一个月后的8月25日，姚文元那篇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工人阶级

必须领导一切》公开发表，其中提到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大小小的

‘独立王国’”，“‘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等等，在“七二五讲话”

中都已经用不同的语词表述过了。

（附注：本文所依据的“七二五讲话”是1968年7月26日中央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印发各地学习，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

印制厂105红印兵团翻印的版本）

郑 义《广西吃人狂潮》

◇ 王副书记为我们打开绿灯

还是在许多年前，一次与刘宾雁同车南下，我同他谈起广西文革的大屠杀及人

吃人惨剧。文革时，我在广西便对此略有耳闻，但恍若天方夜谭，叫人难以相信。

一九八四年，在北京改《老井》，一位广西作家曾向我痛陈大屠杀及人吃人的

种种惨境，言之凿凿，我不能不信。我问宾雁兄知否？知道。问宾雁兄打算写否？

不，不想写，太丑恶了！好，我写！从那一刻起，我便背上了这沉重无比的十字架

。——知我者，晓明矣！你知道这是我无法推却的历史使命，便和我一起扛起这十

字架，走向广西。为此，我终生感激你。广西的十万冤魂也会永远感激你。

自成都赴南宁，一路马不停蹄。南宁给我们的印象是淳朴美好的。一下车，便

请一三轮车工人拉我们去找旅馆。要价很低，态度极佳。见第一处咱们未选中，便

又殷情迎上来，要带我们去另一处。以为他想再挣我们钱，便婉言谢绝，在附近徒

步找寻。那汉子并不走远，不时过来给咱们参谋。看来，他并非看中了咱们几个小

钱，而确实是放心不下。咱俩感慨不已。这便是咱们遇见的第一个南宁人。南宁的

公共汽车上下车秩序亦使人感叹：人们彬彬如君子，一个窄窄的车门，居然可以分

成左右，一排上，一排下。我敢说，在全国各大城市，上下车如此谦让有序的，只

有南宁。雨天，各处停放的自行车，皆披着主人脱下的雨衣，花花绿绿一片。民风

醇厚古朴，使人觉得仿佛误入桃花源那一刻，我几乎怀疑起大屠杀、人食人的惨剧

。我简直希望那一切只不过是误传。

马上开始工作。通过关系，我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王某，出示介绍信并按照咱俩事先商量好的口径说明来意：收集资料，研究文革中的反常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文革对人民的毒害。王副书记态度尚好，接谈半小时，承认广西文革期间曾屠杀九余万人（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数字，与我在民间多次听说的相去不远，估计出入不过百分之五十。他在我的介绍信后签上意见：请区处遗办接洽。盖上大印。我辞谢出来，感到旗开得胜：在最高主管部门能了解到这些情况，已属不易了。更重要的是：绿灯已经打开。

◇ 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

根据各界朋友们给咱们提供的线索，次日我到自治区“处遗办”（“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办公室”。这是一个从省到县甚至到乡的办案系统。因为各级党、政及公检法部门在文革中都不乾淨，只好设立了这一临时机构以打开局面），请他们加盖公章，在介绍信上签署意见，批转南宁地区、梧州地区、柳州地区接待。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部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

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十几年来，许多当年的刽子手都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这位宾阳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在军队保护下荣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

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县处遗办主任李副书记愤怒地递给

我一份以该县名义上报的控诉书，坚决要求将该副师长绳之以法。

上林——南宁附近一山区小县，人口少，但杀人按比例全区第一。记不清是何

原因总之未能查阅案卷。幸好手中有朋友托朋友的名单，文化界的朋友们盛情款待

，杀鸡摆宴。席间谈起上林文革杀人情况，一阵“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来，人们便开始乱抓乱打乱杀。一时间杀人如麻（数字不在手边），县城电线杆上皆挂

满人头。问及吃人，满座皆称上林吃人不多，远远比不上武宣等县。人们记得的案

例是：某将人活活剖腹取肝后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见一人，问：被杀者同意你

吃他肝了吗？答曰没问。不行不行，他若不答应，你吃他的肝没用。（本地迷信，吃甚补甚。）某将肝丢弃，又去抓了一个“阶级敌人”，用种种酷刑，逼迫被害者

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采访之余老莫还向我谈了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日晨

，被专政的“牛鬼蛇神”们正在田里劳改，忽一队武装民兵来押人去开批斗会。老

莫见难友们都被押走，却无人叫他，便恭敬地问一民兵。那民兵考虑一番，说：“

只叫我来带自己村的人，你去不去我不管。”老莫遂未去会场。而那日参加批斗会

的人，全被打死，无一幸免……。

◇ 中华民族的国粹：杀孩子斩草除根

马不停蹄地紧张采访。我的采访本上记载了越来越多的血色文字。……

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X X伯伯，你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就练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一家夫妇，男人有出身问题，女人却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女人抱着即将被杀害的几个（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她的要求不高：“给我留下一个最小的也好啊！”但民兵们毫无人性地连她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也一起套走。（二访广西，在游花山崖画时，几位广西诗人也给咱们讲了类似细节：母亲忍泪给将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末日，欢天喜地而去……）——杀孩子斩草除根，这中华民族的封建国粹，在我查阅的案卷中多有记载。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一案卷中载：一凶手抱起孩子一摸，说是女的，又一凶手上前复查；组织者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小女婴方得幸免。据多人向我提供：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这个去县城仅二华里左右的村庄（其他村也杀），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某家坐坐。拍门声惊得主人喃喃自语：“该我了，该

我了……”马上悬梁自尽。民兵们听到响声，砸开门将他救活。（此人文革后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之状，可见一斑。

晚上，我通过县处遗办邀请的一位中年农民如约而至。此人声音低沉，少语寡言。但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一本秘密日记上逐日记录了该村的大屠杀。我问他日记，可惜（日记）在清查处理案件时交给了工作组，大约已作为证据而归入某级档案。他低沉地向我追述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和细节。最后我才发现：正是他后来出于深深的同情娶了那位连吃奶孩子都未能保住的女人。那女人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已上学了。……八三年后“处遗”时，凶手们要上门赔罪，女人拒不接受。后来在有关人员“说服动员”下，勉强同意。于是凶手们带上几斤点心，几斤肉，跪下赔罪。女人在有关政策的“教育”下，接受了凶手们的赔罪，将血海深仇一笔勾销，还含泪给凶手们倒茶。

◇ 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几人称几姐

钟山县某村，武斗民兵远赴贺县（？）围攻四·二二派的据点（某矿）时死一人，遂在俘虏中任意抓了三人返村祭坟。其中二人系国内外知名的工程师夫妇；只要是经该工程师签名认可的矿砂，国外一律免检。矿区被围时，夫妇二人未能及时逃脱，于是被视为俘虏。在埋葬武斗烈士的祭坟仪式上，主持者宣布罪状：某，工

工程师，帮助设计武斗工事；每月工资高达一百多元！工程师请求发言，大约他想辩
解未曾参与武斗及工事之设计建造，他不是建筑工程师；他肯定还要说他妻子直到
今天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不经全国人大，公安局都不能逮捕……。主持者禁止他发
言。一声枪响，几位姑娘率先冲上来，抡起马刀就砍。三人刹时间便倒卧血泊。
然后将受难者尸体抛入坟坑，再于他们尸体之上安置享祭者的棺木。（令人不解的是
，人们往往煽动、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过几人便尊称几姐，新修的文革史志材料
上称：三姐四姐、五姐等颇多，最多有九姐十姐！）请乡政府官员带我去杀人现场
，皆面作难色，称“忘了”。我知道这是托词，坚持请求。他们陪我驱车至该村，
连询几人皆称“忘了”。当年那么大的杀人场面，十来年就忘了？终于抓到一村干
部，只好带我去。村后二里许的一块平坦草坡上，有一处荒草掩盖的墓穴，民兵将
棺木迁葬了，几位无辜者的在八三年处遗后被亲人带走了，工程师夫妇在北京工
作的儿子洗净双亲的遗骨，用麻纸一块块包裹起背走了。头骨上深深的刀痕清晰可
辨。
。……那村依一座拔地而起的石灰岩山而建，景色如画萋萋芳草，掩盖了昔日的
罪行。牧归时分，牛群驮着横坐的孩子们缓缓行过……
上林县某村，采访一位杀人而食的支部书记。案子他早已供认不讳，案情亦不

复杂，普通得我至今已无任何印象。但这位食人者的形像却牢牢刻在我记忆中。

谈

起往事，他如同谈一件与己无关的闲事，谈笑自若。我早就将相机准备好，大光

圈

，慢速度（屋里一般较暗），开始谈话时便选择好座位，似乎漫不经心地随手摆

弄

相机，根据目测估计距离，估计取景。趁他不注意相机时轻轻掀动快门。这些未

遭

惩办（最多开除党籍）的凶手们不喜欢拍照。现在他们没有多大压力，完全会断

然

拒绝。谈及吃人，他兴致勃勃谈到在游击队时就吃过敌人，仿佛这是他历史中最

光

荣的一部份。见他谈起人肝的种种吃法，我突发一异想天开的问题：“人肝怎么

做

最好吃？”他答道：“烤着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

在该村，乡干部带我寻访另一位杀人而食的主犯，可惜他外出未归。天色已

晚

，只好登车返县。

一日，我要去寻访一著名案例中的首犯。人们说要走许多路，劝我不去。我

执

意要去，走多少路都要去。我想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增加感性认识。

在一座残破待修的木桥前，小车停下。我们步行到某村。在一座低矮阴暗的

农

舍里我终于见到了苍老的凶手。案情我早已背熟：解放时，该村一地主上山为匪，

剿匪时，将地主及其两儿枪毙；一起上山的小儿年尚幼小，释放回村，已无立锥

之

地，便到邻村认一户贫下中农为父母，老实勤勉地耕种收获。不料文革突至，村

里

要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手头竟无人可杀。忽忆起地主之幼子尚在邻村，便命民兵去抓。谁知邻村早已动手，将他关起来。从窗里，他看见旧村民兵至，自忖死期已至。为了少受点罪，立即上吊自杀。民兵们冲上楼去，将他放下救活，五花大绑押解回村。半途，他任打死也不肯再挪动一步。于是塞进竹编的猪笼，抬回村去。在村中将他绑在电线杆上打得死去活来还不解恨，便用烧红的锅铲一点点烙。死去活来，活来死去。趁他昏死过去时，拖到小河边一块倾斜着伸入水中的岩石上，几人用树枝按住他四肢，凶手易晚生动手剖腹……。

——这就是易晚生啦？瘦小而乾瘪的老头儿。我们进去时，他正和几个老头在玩纸牌消遣。也是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可你为何要动手杀人取肝？老人的开场白极为英勇无畏：“对，什么我都承认。我已经八十六岁了，不怕坐牢。反正活不了几天了！”（公安机关未捕他的理由正是年事已高（！），“抓不抓没意思，一抓起来肯定死在监狱里……”）说罢，老人挑战似地昂首望着我。但我并未应战，只是与他侃侃而谈。“——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弄得全村不安，我那阵儿是民兵，每天晚上站岗巡逻，几十天时间，枪托子把衣裳都磨烂了。……他父亲有什么罪恶？把村里准备烧砖瓦的一垛草放火烧了！害得大家没东西烧砖瓦！…

…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

：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

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来杀。……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

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

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我给老人和他的老石磨、烂家具拍了照。又是几年过去了，老人大约已不在人

世。那么，那几张照片将是他的遗照了。

◇ 上林三里公社大血案血泊没脚

在钟山县，类似杀人分食的案例不少，但如此活活折磨的却不多。如另一案中

，受害者刚被殴倒在地，人们便蜂拥而上执刀割肉。未能拥进里围的指挥者（记得

好像是支书）大呼：“不许抢！生殖器（记不清当地土语了）是我的！”受害者苦

苦哀求：“行行好，让我快点死吧！”一人大发“善心”，狠狠一棒将其击昏。

受

害者名字我尚记：甘大作。

上林县三里公社曾发生一起大屠杀，一次杀害一百六十余人。起因于一起“国

会纵火案”：在军队支持下，一派成立革委会后，加紧打击另一派。几人密谋，半

夜用一小炸药包在自己的公社革委墙上爆破了一直径不超过一米的窟窿。天未明，

广播喇叭就公布这是对立派破坏新生红色政权的罪行，号召以战斗来保卫。随即
开

始大肆逮捕，将对立派骨干及“牛鬼蛇神”一百六十余人押解到河边，一声令下，
用刺刀、枪托、大棒驱赶到河中。桥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杀未淹死的人。一水性
好

的人潜泳顺水逃遁，人们沿岸追了二里，终将其击毙。一百六十余人无一幸免。
那

天到过现场的人们都扔掉了鞋：血泊没脚，鞋全泡透了。

还是在该县，我访问了一位被害者遗属。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土房内，我见到
了

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父亲被民兵在村外暗杀，将尸体扔进山洞。他母亲因
做

稻草人误用了有伟大领袖的报纸，被批斗死。他的两个哥哥也被打死。亲戚带上
这

颗独苗子逃到三里，恰逢三里血案，吓得他们又逃往他方。那时节，他不过六、
七

岁，不懂事，天天哭喊着要回家。他哪里知道一家人早已死绝，欲斩草除根的凶
手

们正到处找他！小伙子平静地诉说着往事，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但他克制
着

，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陪同我的干部，随口讲起某村的一桩惨事，以此证明这孩子亲人之死尚非惨
绝

人寰：一中学生正在犁田（耙田？），忽来人通知带上语录和绳子立即到公社开
会

。刚到公社便被用他自带的绳索将其绑缚，毒打致死。老父老母已六十来岁，闻
讯

拉着架子车去收尸。血迹斑斑的尸首拉回来却无处掩埋：集体地是不许埋，自留
地

是不许埋，山坡上也不让埋！——如此死无葬身之地，有何弥天大罪吗？不，他
仅
仅是一个对立派（四·二二派）！老两口万般无奈，只好怎怎踉将儿子尸体背上
荒
山，回家取来煤油和几斤黄豆（有黄豆易将尸体烧尽），架起一堆火烧尸。老父
一
边烧一边哭喊：“天哪！谁听说过人世上有这种惨事啊！哪有自己动手烧自己儿
子
的啊！”

灰飞烟灭。一个年轻的生命转瞬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而那水牛，还拖着犁
耙
伫立在水田里等候小主人归来……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悲惨是不能比较，尤其是不能容许旁观者比较的。
我
只能说还有类似的惨剧。记不确是哪县了，反正是钟山、蒙山二县。案卷里凶手
们
描述了如下场面：

深夜，一行武装民兵押解一男一女到村外活埋。男的是刚成年的儿子，女的
是
母亲。她毕业于清华（北大？），因丈夫解放时去了台湾，便成为凭空捏造的“反
共救国军”的当然成员。在活埋坑里，母亲问儿子：“咱们就这么死了吗？”儿
子
答母亲：“不承认是死，承认也是死，反正不免一死了！”凶手们令他们躺下，
开
始填土。忽然儿子翻身坐起，说：“这么死太难受了！”凶手遂一梭标刺穿胸膛，
往
回一拽，梭标头上带出一块肺，血如涌泉……——我翻阅案卷时，身旁一位处遗
办

工作人员介绍道：凶手们的供述中隐瞒了一个重要情节：他们猥亵地强迫儿子趴在

母亲身上活埋的。哦，记起来了，这正是那个闻名全广西的丑恶无比的案例！

◇ 割下地主女儿的头颅当篮球掷

如此丑恶的案例尚有若干：有强迫孙子背年迈无力的老祖父赴刑场的；有强迫

儿子捧起刚被打死的父亲的血涂在“烈士墓碑”上让亡灵享血祭的；有教师想吃

“美人心”而将自己漂亮的女学生打死挖心的。（此案曾落实，但凶手后翻供，说他

举铁锹去挖心时铲不动。女学生死时背着小弟弟（妹妹？）胸前交叉的布背带很结

实。我追询最初的案卷，处遗人员称怎么也找不到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家乡博白县尚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

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了解你的事迹

……。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

，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我因时间不够，未亲赴博白县落实此案，但此类传闻，其实可

靠性十有八九。文革中，我曾听说一人肩扛一条人腿回家去吃，大白天招摇过市，那腿上还穿着裤子。此事颇不可信。但十年之后此行广西，我居然在某县又听目击

者几乎一字不差地讲述了一遍，连那脚上的裤子亦千真万确，绝非杜撰！

◇ 专吃男人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

通过民间渠道采访受害者遗属，采访老办案人员、公检法干部，我摸清了一些案件。

某案，小派（四·二二派）在大派（联指派）数县武装力量的围攻下溃败而逃。某头头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尽。后将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残骸挂在闹市示众，逼他妻子跪地请罪。一凶手执匕首在她背上划了一刀，惋惜道：瘦了点，不好吃！然后逼问：这是你男人吗？是。你男人是反革命吗？是。女人已身怀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够了，最后说：你不是爱你男人吗？你就抱着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一青年码头工人，因是小派成员，便借口他曾倒卖过什么东西（反正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记不清了），将其游斗打倒在地，然后头着地拖到江边。至少有一百级左右的石阶已将他磕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凶手执刀开膛取心肝，一刀拉下去，他竟长嘘一口气，双手将凶手抱住，吓得凶手魂飞魄散……。我到他哥哥家采访，一家人几乎是麻木地回忆了往事，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心如死灰的淡默。妻子携孩子早已远嫁他乡。我给他年近半百的哥哥照了相。这个虚肿的中年汉子早已成为一具丧失表情的木乃伊。

某案，村支书将对立派某人妻子奸污，怕日后报仇雪恨，遂煽动村人将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数捉拿，并威胁利诱村人押解这些无辜者乘船渡过黔江，在县城墟亭附近的闹市区批斗致死，割食殆尽。这便是武宣独有的一例“灭族”案。

某案，一女民兵因参予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而声名远播，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处遗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一个电话催问处理结果并严厉责问：像这样的人，为何还不赶快开除党籍？但该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一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县。处遗办人员谈此案时，称：她当年还未出嫁，还是个姑娘，估计也干不出那种事……

◇ 桐岭中学黄校长被学生分食案

可与上案轰动效应“媲美”的，是桐岭中学黄（家凭？）校长被学生分食案。这是一个极其完整的故事。我尽可能凭记忆将这悲惨的故事叙述得较为完整：

黄某出生于武宣山区一富豪（地主？）人家。青年时代接受了马列主义，向往革命后成为游击队支队长。老父亦同情革命，他家便成为最可靠的联络点。共产党的重要会议，许多都在他家秘密举行。解放后，黄某任苍梧县副县长（县长？）。大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政治运动中，查出他曾有变节行为，遭到政治打击。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国民党军队将他及村人包围在一山洞中，喊话要他出来缴枪。本

来山洞中有足够的粮食，饮水和弹药，完全可以长期坚持，但为了洞内外大批群众的安全，黄某只好出来缴枪。村民遂得以平安，黄某也并未受到处置。没过几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队伍，转战于桂东山区，并坚持到最后胜利。大约是六二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长期调查核实：他并未出卖同志、出卖机密。缴枪不仅事出有因，而且很快又拉起队伍，为革命事业立下许多功劳。但他留了个小小的尾巴：革命不坚决，在困难时期产生动摇。留尾巴就留尾巴吧。县政府的位置早已蹲满，已不可能官复原职，于是给了他个级别大致相当的重点中学校长。又五、六年过去，当初给他留下的那个“小尾巴”终于要了他的性命。

文革中，“抓叛徒”成了权力斗争的一大法宝。学生们不知怎么知道了校长的“小尾巴”，便把他打成叛徒，大小会批斗。一晚批斗会结束，几个学生押他回宿舍。为首者说，看守太麻烦，干脆打死。于是在黑暗中一棍子击在头部，他很快便停止了呼吸次日清晨，便有学生执刀割肉，以示与之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割肉很快形成风潮，整个桐岭中学校园内，到处是两块砖架上一块瓦的小灶，炊烟袅袅。收尸的“牛鬼蛇神”教师后来追述，黄校长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用两个挑土的竹簸箕一装便挑去埋了。

第一个割肉者谁？竟是校长大儿子的女友！此人原来狂热追求校长公子，此时为摆脱关系，竟恶狠狠第一个操刀割肉而食！

晓明，你一定还记得咱们二访广西时，一天晚上到咱们住的旅馆来长谈的那小伙子吧。那就是黄校长的二儿子，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当编辑，名叫黄×周。第二个字忘记了，第三个字记住了，因以姓为名极罕见。当时他逃亡在外，家里写信叫他千万不可回来；只要他在外，村人便不敢杀害母亲及年幼的弟妹。后来各级革委的保证下，他终于回村了。凶手们早已埋伏在村外，准备先将他暗杀，然后再收拾他母亲及弟妹。回村半途他到一亲戚家住了一夜。凶手们未等到，以为情报有误，收兵回村。次日他才得以安全到家。小住几日，立即感到肃杀之气逼人，便又出逃。

经过在武宣的紧张采访，我终于可以权威地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逻辑，我将其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 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那牡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

“

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

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

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

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

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

。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

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

——

——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

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

干乾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

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

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

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

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

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忏悔吧，我的骄傲的从不忏悔的民族！

忏悔吧，我的苦难深重却又罪孽深重的民族！

我愿为我们起草第一份忏悔辞。

愿上帝宽恕我们，赐福于我们！

愿鸽群永远在我们头顶飞翔！

□ 摘自《历史的一部份》第八章

2008 年 5 月 9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9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七章（5）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五节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纪要
〔被接见者：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索朗顿珠等十一名西藏学生〕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对贫农出身的小喇嘛，要进行培养。没有还俗的，也要使他们参加对喇嘛寺的管理。

班禅的错误很严重，但还要看一下。一九五九年达赖叛国，西藏在平叛后进行了经济改革，班禅当了西藏自治区的代理主任。但是作为农奴主的代表，班禅起了野心。一九六〇年和六一年，他阻止喇嘛还俗，还到内地四出活动。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习仲勋右倾，对他无原则迁就，班禅终于在一九六二年野心大暴发，写了一个“七万言书”，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一九六四年，西藏人民对班禅进行了斗争，一九六五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中毒深，交待不好，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代理主任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权，保留一个政协常委的职务，这主要是为了给他保留一个自新的机会。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班禅的问题证明了这一点。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我们想还是让他留在北京改造，再看他一下。

阿沛和班禅有所不同，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西藏的作用还未完全失掉。他与班禅有所不同，班禅反对政教分立，阿沛赞成我们主张的政教分立。政教分立这和阿沛等人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他在宗教上是没有地位

的。现在他当自治区主席，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至于他过去的问题。以及他和国外的关系问题，他能否彻底交待，这是对他的考验，我们要给他时间来交待。这次国庆让他上天安门，主要考虑是代表一方面。同时，我们安排了一个藏族同学讲了话。现在农奴主还存在，我们就要利用他，可以对那一部分人起作用，否则，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就会捣乱，对国家建设不利。当然我们也不怕，这是分化他们，表示党和政府对他们仁至义尽，这也是对跑到国外的人的一种分化。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应该从劳动人民中去培养干部，但这需要时间。阿沛的前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心诚意地跟毛主席走，就有出路；一种是走班禅的老路，就会自绝于人民。我们总是要做到仁至义尽，主要看他自己。

西藏的宗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政教一定要分开，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灭不了的，这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培养干部，使用干部都要贯彻阶级路线，但对一些农奴主的子弟，要利用他们的经验，让他们做工作。当然不是依靠他们，依靠的是劳动人民，你们那里中下级政府机关里，就可以多收一些解放了的农奴，逐步培养他们。你们要把农奴主的子弟赶回西藏去改造，并且叫他们黑五类。“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因为这样就等于不让他们改造了，这是宿命论，是新迷信。我们既要破除旧迷信，也要破除新迷信。北京工业大学有个谭力夫，他的讲话是极“左”的，把“红五类”的条件规定的比党员条件还严，实际上是脱离了广大群众，是形“左”实右。但也要注意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至于这些人（农奴主子弟）是回去改造好，还是分散改造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分散改造，可能更有利些。

对统战工作也要本着这个精神去做，既要培养劳动人民，贯彻阶级路线，又要对农奴主子弟团结、教育、改造，使用他们。

最后，总理勉励西藏同学回西藏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给拉萨革命派的电报

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给拉萨电文：

西藏台转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

我们收到你们二月二十二日从拉萨发来的电报。对你们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1）中央军委二月十二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同志作些工作。

（2）中央文革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捍卫和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陈明义在西藏自治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陈明义：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革命工人同志们，革命农牧民同志们，
革命干部、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同志们，
红卫兵战友们，部队指战员同志们：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边防部队全体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同志们、战友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范围内从胜利走向胜利。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同全国一样，进入了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发展和壮大。万里高原，一派大好形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边防部队就是这个伟大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区部队进藏十七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林副主席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与西藏人民和进藏工作人员一起，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打倒了万恶的封建农奴主阶级，粉碎了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积极参加了西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亲自为我军规定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广大指战员同西藏各族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在当前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我边防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指示，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卫文化大革命，坚定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在当前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农奴主、农奴主代理人 and 地富反坏右、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而“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内的一小撮反坏分子同他们勾结起来，并成立所谓“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欺骗、拉拢、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

群众，耍阴谋，放暗箭，造谣惑众，颠倒黑白，制造混乱，妄图变天。他们要造无产阶级的反，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妄图实行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复辟。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拼命地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实行白色恐怖；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疯狂地咒骂、污蔑我边防人民解放军，公开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一再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公开叫嚷要夺军权，甚至扬言要“血洗高原城”，“要与军区干到底”！他们极其恶毒地挑拨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甚至分化瓦解部队，煽动部队“调转枪口”“反戈一击”，妄图搞垮边防人民解放军。他们拚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顽固地抗拒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西藏军区接管地方已集中的武器、弹药的命令；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抗拒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反对军区对西藏日报社等单位实行军事接管。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原则的错误，大方向的错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破坏战备工作、影响国防巩固的错误。一句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战备，巩固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边防人民解放军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同阶级敌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坚决地打退了这一股反革命逆流。把西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一场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向广大革命群众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崇高的战斗敬礼！

通过这一场斗争，我们胜利了，阶级敌人的丑恶面目暴露了，他们的阴谋毒计破产了。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广大革命群众在阶

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敌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迅速发展壮大，满怀信心地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军。

这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我们高呼：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会再来捣乱，再来新的反扑。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玩弄的新阴谋，打退他们的新反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的政策是，对反动组织，坚决取缔。对其中首要分子，依法惩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参加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只要宣布退出，不咎既往。对于曾经受了反坏分子蒙蔽和欺骗的群众，我们欢迎他们很快觉醒过来，受蒙蔽的群众是没有责任的，罪在极少数反坏分子。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三结合”，联合夺权创造条件，朝着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大方向，再接再厉，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在贯彻执行“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时，对于当权派，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

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我们必须坚决拥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做抓革命的闯将，促生产、促工作的模范，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认真学习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和规定，以及《红旗》杂志第三、四期的社论，努力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打倒头脑里的“私”字，大立“公”字，克服自己队伍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小团体主义、非组织观点、自

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把西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阶级斗争是异常尖锐、复杂的。“无限风光在险峰”。让我们排除万难，奋勇前进，努力攀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的顶峰吧！

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1967年3月6日西藏《风雷激战报》。陈明义在西藏拉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阴法唐在西藏“大联指”大会上的讲话

阴法唐（西藏军区政治部负责人）

把西藏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本报讯 五月七日，“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的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的“五·七”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他们坚决表示：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武器，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打击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斩断他们伸向西藏的魔爪，完成斗批改的历史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既是斗批改的武器，又是斗批改的方向。连日来，拉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他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重温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伟大战略意义的指示，回顾了一年来执行这一伟大指示获得的巨大成果。七日上午，一万三千多革命工人、农民、“农奴戟”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

汇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又一次集体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与会者群情激昂，不断振臂高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西藏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负责人吕义山同志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西藏军区政治部负责人阴法唐同志在热烈掌声中讲了话（讲话摘要另发）。

“大联指”负责人郭铎之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西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激情，热烈欢呼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庆祝毛主席这一指示的发表更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热烈拥护，坚决照办，誓死捍卫。

阴法唐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首先，我们一起祝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给林副主席的信中，对人民解放军和各行各业作了把全军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极其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五·七”指示，不仅在理论上大大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为我们制定了世界革命的行动纲领，画出了共产主义宏伟的蓝图。

按照“五·七”指示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无产阶级觉悟，促使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逐步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使我国建成社会

主义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如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五·七”指示发出后，对全军、全国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全军、全国都积极贯彻执行。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按照

“五·七”指示办事，在把军队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巨大的成绩。

驻藏部队一年来认真反复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一伟大指示，军学、军农、军工、军民都兼起来。高举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到了新的水平，推向了新的阶段。狠学“老三篇”，改造世界观，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控诉反党分子的罪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阶级斗争观念，增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坚强信念。毛泽东思想掌握了广大指战员，就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一年来在农副业生产、工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开荒面积就比去年耕地面积增长一倍以上，播种面积也增长一倍以上，这是一个大跃进，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了一份力量。在群众工作方面也有很大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助民劳动、参加社教、四清运动，特别是在最近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的任务中，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一步加强了军民关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商店、党政机关也都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决心把每个单位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对“五·七”指示的态度，也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毛主席的态度。必须认真地坚决地学习它、执行它、宣传它、捍卫它。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抓革命，促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办好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有很多课程，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在当前要认真学习“老三篇”，学习《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彻底铲除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大立一个公字，大立无产阶级权威，大大加强革命性、科学性

和组织纪律性，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破私立公的过程中，消除《修养》的流毒。

要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认真领会了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才能正确理解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才能正确解决如何对待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问题，才能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实现团结大多数的过程，就是不断树立“解放全人类”世界观的过程。

要紧紧掌握斗等的大方向，按照毛主席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打击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武斗。转移目标是错误的。要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当前重新学习“五·七”指示意义十分重大。“五·七”指示是斗批改的武器，也是斗批改的方向。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事，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五·七”指示，把我区部队、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和机关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贯彻执行“五·七”指示，作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的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来源：《风雷激战报》 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 主编 第七十期 1967年5月9日 星期二）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

一、会议听取两派情况的全面汇报以后，中央认为：造总、大联指均定为群众组织，以便实现大批判、大联合。两派的性质暂不下文字的东西。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牧民进城，立即恢复交通运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江青等同志讲话和报纸的社论，这些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

三、要防止挑拨离间，调拨民族关系。

四、报纸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声音的。

五、如何做得好，这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还有一点要向造总同志传达的，“专打”不能定为群众组织、中央认为它是有错误的。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西藏军区任荣等人时的指示

〔九月十八日晚上八点二十四分到十一时三十分，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文元、法宪，接见了西藏军区任荣、陈明义、张鹤田和苗丕一、周仁山、任荣等同志向中央首长汇报了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后，中央对西藏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一、拉萨两派均定为革命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批判、大联合；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民，牧民进城。凡是已经调进城的，立即劝说他们回去；

三、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立即恢复交通运输，保证交通畅通；

四、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搞破坏，挑拨民族关系、军民关系，不要上敌人的当；

五、立即出《西藏日报》电讯版，报纸要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这是天经地义的，《西藏日报》应立即出版，谁不这样做，就是对抗中央。

以上各点，看那一个革命组织执行得好，这是对革命组织的一个考验，谁按这个执行的就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要求双方对以上问题达成协议。

（根据任荣同志传达记录整理）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周恩来对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的指示

国华同志五月四日三时传达周总理五月四日重要指示精神：

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十日前要送上。西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概不超过十五号，应准备和四川同时成立。周仁山不能结合。

西藏自治区军管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

（来源：《风雷激战报》 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 主编 第 257 期 1968 年 5 月 6 日 星期一）

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张国华接见西藏两派代表的讲话

编者按：国华同志五月五日在京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藏班学员代表的讲话，是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望各总部、战斗团、队组织全体战士认真学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范、周、王、惠死党已向其在各地的爪牙发出密电，妄图重新打起“造反有理”的旗号，扬言国华同志的讲话是“大大毒草”，要彻底进行批判。望一切革命同志提高革命警惕性，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粉碎这一新的反革命新反扑。（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晚·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好久没见了，同志们好吧！早就想看看同志们，时间实在紧迫，不是懒惰，就是时间紧迫，很想看望大家。（刘绍民插话：学习班同志都等你去）（任副政委插话：大家都盼你去）离开西藏一年多了，但我在西藏呆的时间很长，很想来看同志们。今天，今天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以后再找时间再谈。另外，成都七号就要成立革委会，还有几个专区要成立革委会。因为四川有个意义，七号是十条批准一周年。你们怎么样（巫玉淑、陶长松插话：按总理指示办）（刘绍民：争取提前）陶长松同志你们怎么样？（陶长松：按总理指示办，但是有个问题，有个彻底平反问题）这个好办。（问军区负责同志）你们准备怎么办？（任副政委回答：逐步地彻底平反）错了坚决改，要彻底平反。错了就改，改了就好，这是主席教导的嘛！同意不同意，（陶长松问答，这样就没有什么了）平反是晚了

一点（任副政委：平是平了，平的不彻底）再彻底平反嘛！（曾副司令员插话：那个地方不够，再补嘛）没有平好再平好，不彻底的再彻底，这个问题你们商量。我就是这个意见，错了就认错改错，认了错，改了就是好的，这是毛主席教导的，我们要按主席的教导办嘛！要说明一点，你们这是内部问题，我们大家应当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是主要的，这是大方向。大批判这是大方向嘛！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嘛！大联合，这是主席的战略部署，三结合这是主席的战略部署嘛！搞革命委员会这也是主席的战略部署嘛！这是革命的成果嘛！当然，也不是完了，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是一步，但是要迈嘛，这一步不迈，以后就不好走了。这和走路一样，这一步迈不开，以后就不好走了嘛！当前两派的同志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还有贺龙，还有杨、余、傅，西南还有李井泉、廖志高。西藏是西南的一个地区，一个自治区，李井泉也必须彻底批判，批倒批臭批垮。在西藏有王其梅，历史上还有范明，还有惠毅然，这是走资派嘛！还有周仁山嘛！也要批倒批臭。周仁山这个人，过去我对他没有看得清楚，虽然那时也发现他有很多错误，但没有看得很清楚。我对他看得也不清楚。但是去年以后，逐步看到他的许多材料，以后证实了调查了，看到他的所作所为，这个人不是好人！历史情况，这个人是在国民党，加入国民党是隐瞒的，参加共产党找不到介绍人，他说的几个，湖南的同志（巫玉淑插话，杨大易）杨大易同志头次来了，我问过他，他根本没有介绍周仁山入党。历史情况还有很多，你们（指军区负责同志）详细介绍一下，我只讲这一点，就这一点就行了。我再讲一点，我原来怀疑他是习仲勋、李维汉、汪锋这些人派他到西藏去的。那时只是怀疑，这个怀疑，现在证实了。就是他们派他到西藏去的！所谓叫接替范明。还有，我举个例子，这个人是两面派。对班禅的问题，他是两面派，（刘绍民插话：这个问题斗了他几十次，他都不承认）你听他讲呀！我是看了材料的，我不是凭空讲的。还有个稳定发展问题，他当着我的面讲，那时候我是不同意的，那是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搞的，挂的中央名义。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才提出来的，以前就提出的，这是错误的，稳定嘛，就是稳定个体经济，发展嘛，就是发展个体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这是极端错误的。周仁山不同意我的意见，现在调查的材料证明，他是积极分子，是不是？（巫玉淑回答：是的，他还发展了）

那就是两面派了！听说这次斗私批修时，他讲了一个意见，关于王其梅的意见。因为当时我把周仁山当成好人，我还找他商量，王其梅在文化大革命紧张的时候，病倒了，血压那么高，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王其梅基本上是个好人。这次斗私批修所说的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两在派嘛！去年的时候，他要对“造总”发表十条罪状。当时打电话给我，我就住在这里，说是要公布十条站出来。我说站出来嘛。一个是造反站出来，一个是检讨站出来。在电话上是很严肃指出的，他怎么说的，我不清楚，那有一个对群众组织宣布罪状站出来的！这个作法、观点、立场是很有问题的，后来没有公布嘛！（任副政委插话：没有。）“造总”那有十条罪状呀！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嘛！还有去年九月十七号，在清华的表态，如果是小将我可以理解，周仁山公开攻击人家，这是很错误的，而且是在江青同志“九·五”讲话以后干的。他路过成都回西藏去，我正在吃饭，他跑进去了，他找我，我说你这是极错误的，攻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不是自毁长城吗！这不是极大的错误吗！去年又跑到兰州，这个事情不能怪你们“造总”的同志，他负责任，周仁山负责。如果周仁山去兰州，要怪“造总”那就错了。当然，陶长松同志，有些同志当时这样做也有缺点就是了，总的能怪“造总”吗？要怪周仁山！我到处找他，他给我发了一个电报，不落名字，我估计就是他，我叫秘书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回去。“造总”在一段时间，对周仁山提出保的口号，这是不了解情况，这个不能怪“造总”。如果有人要怪“造总”，我看他就错了。不过“造总”要吸取教训。开始我也不了解吗！还有一条，他讲话过去在区党委开会，他是看人的，他总是观颜察色，总是别人说完了他才说，有时我说了他才说，他事前不把态度拿出来，我批评过他态度不明朗。周仁山的事情不能怪“造总”的广大群众，如果有人这样认识，就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群众嘛！广大革命群众，在不了解不清楚以前是难免的嘛！我对他这个问题发现好久，考察好久，了解好久，现在才搞清楚了嘛！“大联指”的同志要注意，同意不同意？（“大联指”同志答：同意。）“造总”是“造总”，周仁山是周仁山，不能怪“造总”这是两码事。周仁山是不能结合的，这个意见，中央，总理说过，也提出了意见，现在要狠狠批！要揭要批，要彻底揭，彻底批，要把他那些东西批臭！两派联合起来批，同意不同意呀！（陈副司令员插话：已经联合干了一段了）那好，继续干（曾副司令员：乘胜前进）对，乘胜前进。主席讲：“宜将剩勇追穷

寇”，追到底嘛！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是大敌当前，要共同对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李井泉。王其梅，陶仁山、惠毅然。还有老右派范明，过去我们批的不深不透的，我要作检查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不是主要负责人，但我也要负责的，过去没有批深批透，他的阴魂不散，要彻底批深批透。这里我又要交代几句，听说民院少数同志，个别同志也为范明翻案，有这样事情吗？那就上当了，不了解情况上当了！不要去责怪这些同志，我看了一篇文章，是他儿子写的吗？（江绍全，是的。）这篇文章是很恶毒的，里头有很多东西是攻击主席的，因为西藏很多东西是主席定的。是根据当时情况，那时是从政策和策略出发的。他作为攻击主席，不知你们看了没有，陶长松同志你看了没有！（陶：不知道。）我了解过，是范明的侄子写的，我在成都问过李新（交通大学的），他说他们不了解情况。民院有多少人了解这个情况，魏治平他了解吗？他也不了解。有人参与了，是不了解情况上当了！（廖副政委：不了解情况就是上当了。）（苏子武：魏治平根本没有这个事。）有人参与是不了解情况，没有参与就更好了嘛！（江绍全，李延敬）李延敬是哪个学校的？（江绍全，现在那篇文章在全国各地散布很广）那也不怕嘛！西藏两派联合起来了，要巩固这个联合，发展这个联合，我顺便再谈一下西藏的历史情况，西藏的历史情况复杂得很！有外国货，有本地货，有国民党、有走资派。外国货英国特务，印度特务，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我看是不少！不是讲很多人，是从政治说的。英国人搞那么多年，他没有培养爪牙吗？印度叛匪跑过去的那么多，难道没有活动吗？他们会睡觉吗？达赖会睡觉吗？班禅会睡觉吗？三大领主会睡觉吗？他们不会睡觉，他们要搞破坏，他们要搞复辟！我们革命派的同志要有敌情观念，不要没有敌情观念。我们军区的同志敌情观念也不强。你们弄清了吗？（问陶长松）（陶回答：弄清了一部分，有些还没有弄清。）（苏子武：已经搞出来四十多个。）我们要好好调查，好好研究。四川有个小组，专搞巴塘案件，（巫玉淑：平措旺杰，搞了不少材料）那天汇报了，老任来听了。四川同志搞了西藏情况也不少（巫玉淑，我们也在搞，各专区都有。）（苏子武：民院也有）（刘绍民：我们从去年五月就在搞）（米良贤：现在还在搞）你们要好好调查，好好研究，所以要加强敌情观念。主席最新指示要好好研究，主席讲了两个“继续”，一个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一个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两派自己闹磨擦，对敌人就放松了！军区研究得也不够吧！老任哪（指

任副政委）（任副政委，很差！）所以也有个方向问题，这个方向不是狠狠地对准敌人，对准走资派，不是紧紧掌握大方向。军区、军管会，我这个主任也有一份责任，我虽然不在，我这个主任总还是个主任嘛！四川前一段很长时间反“十条”，方向弄错了！特别是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打“内战”，对敌人没有抓住，大方向没有掌握住。“三·一五”指示后，刚把方向扭过来，没有个十天又把方向扭过去了，对准五十四军，要打倒谢家祥。这个问题扭过来了，又对准省革筹，对准刘、张，又对准五十四军。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好好的了解敌情，研究敌情。前一段，恐怕两派互相研究对方的力量花得很多人。是不是研究了？“大联指”研究过“造总”，“造总”也研究过“大联指”，研究得又多又细。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这样考虑不对，我收回。这样研究敌情就少了！这个问题不是怪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是军管会、军区领导同志们注意不够，责任还在于军区、军管会，在于领导。我们的革命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只要引导得好，是会对准敌人的，不能怪他们，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呀！（陈副司令，主要是我们如何领导，没有搞好。）我不是半斤八两，你们两派要很好地吸取教训吸取教训就好了，吸取教训还是需要的。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条，文化大革命是两个“继续”，在西藏也是与农奴主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同志们要注意，不要马虎啊！西藏是不那么简单的。和平解放的，和平解放就不和平！虽然改革时打了一仗，进军是和平解放，和平不和平，情况就更复杂了。还有个对外，对印度公开的斗争，两军对峙，（廖副政委：几米远）只有几公尺，随时都可以开枪开炮，我们更要有敌情观念嘛！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我们不仅能联合起来，而且能联合得很好，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们要巩固联合，发展这个联合。我再说一句，团结对敌，这是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我要讲一讲，总理指示传达过了吧？（大家，传达了）传达了我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我给中央同志谈过，西藏的问题好解决，西藏比四川要快。从现在看来同四川差不多，（任副政委：可能还要慢。）还要当副班长呀！你们两个呢！（陶长松、刘绍民：不愿意当副班长）我是不愿意当副班长的，可能七、八号辽宁要成立，只剩下六个了。成都市大概七号成立革委会。总理那天晚上，电话指示以后，我是连夜挂的电话。放下电话就把你们找来谈了，找西藏

的同志谈了，传达了，就不讲了。总的精神，西藏最迟十号要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送上去。今天几号了？五号了。报告写了没有？致敬电写了没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写了没有？《西藏日报》的社论写了没有？我看叫两派写，联合起来写，你们笔杆子多嘛！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军区写，总的要求是十五号，十五号前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是总理的要求，西藏的报告写好了没有，我不清楚，总理问我，我只能说正在写（曾、廖：初稿写好了，没有名单）要送上来，我们不能太落后了，落后是落后了一点，不能太落后了！（陶长松，总理还说什么？就讲这三句话吗？）不是三句，还讲得很多，那天周仁山问题也讲了。我前面讲了，要把报告送上去，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都写上，要解决什么问题都写上。

今天，我一方面是传达总理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把我的心情表达表达。我也是西藏人嘛，我很心切，很着急。你们怎么样？你们工作很忙呀！委员、常委、主任，我提个意见，要三结合，还有个老、中、少结合。革委会是个政权，掌握在谁手里，一定要选拥护毛主席的，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政治，还要有干劲才行。革委会一定要政治上为无产阶级掌权的，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成为领导西藏对敌斗争的坚强的司令部，真正担负起把西藏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西藏。还要有干劲、朝气蓬勃，要造反有功的人，造资产阶级的反坚决，造走资派的反坚决，有功的人。这些人起来要朝气蓬勃，一定要选一些青年，光搞些老头不行，还要有妇女，一定要有女将，你们是哪一边的？是“大联指”的吧？（指巫玉淑、马瑞华同志）（曾副令员：是“大联指”的）。“造总”没有女将吗？（陶长松：有，没有来）还一定要有藏族，藏族要占相当大比例，因为西藏是民族地区，不光弄些汉族，要有工人、农奴、贫苦农民，（任副政委：牧民）农牧民，当然也要有一定的学生。你们是不是考虑一下这几条，拟几条讨论一下。我没有写好，讲几点意见，你们考虑一下好不好？我们的革委会一定要彻底革命的，政治上一定要这样，工作上朝气蓬勃，联系群众。（陶长松：你能不能当主任委员）我不能当，人多嘛，我不能担负，我不称职！（陶长松：你是军管会主任嘛）过去我的工作没搞好，有缺点有错误。（刘绍民，主要是你工作忙）副主任你们研究，主任由中央定。同志们应当紧张起来，抓紧工作，只有五

天了。具体组织工作应很好搞一下，要组织一班人，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搞革命委员会，一个班子搞批、斗，批斗刘、邓、陶、王其梅、周仁山，范明还要搞。斗私批修搞得怎么样？（刘绍民：有一定成绩还搞得不好）就是嘛！要继续搞，我看组织一班人，要昼夜干才行我这个传达的，十号不拿上去，我是没有办法交代的，我受批评，你们也受批评我们办得到吧？（众不语）怎么没有劲？（众答，办得到）我问你（指贡布）你叫什么名字（贡布）能不能办到？（贡布：可以办到）你是藏族，西藏的大事情嘛！委员多少名额提个意见嘛！（任副政委：一百二十一名）按人口比例不算少，我们西藏是个自治区的单位嘛！委员多少？主任多。少？（常委三十一、主任十三），你们讨论了没有？（米良贤：正在酝酿）结合的对象，杨东生同志没有什么意见吧？通得过吧！苗丕一呢？（陶长松：没有很好的检查）有错误可以检查嘛！杨东生同志是个藏族，从小革命，很小就参军了，（廖副政委，是个老红军）历史上没有问题，很老实。苗丕一这个人在我们部队比较老，历史也没有问题。（蒋永年：杨东生没有触及灵魂。）杨东生同志是个藏族，从小参加红军当翻译，有错误可以检查，也需要检查。郝平南怎么样？（阴主任：历史上查了，没有什么问题，内蒙古对他的评价也还不错。）（巫玉淑：郝平南当官不革命）（廖副政委：看改了没有嘛！）（巫玉淑：他来不到一年，在内地住六个月，住院两个月，谁知道他改了没有？）我只是提出来，到底怎么样？你们去商量，还有厅、局长也可以嘛！还有地委专区嘛！结合的人西藏比四川好，据我个人的看法，西藏比四川条件好，我一方面是传达总理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是表达我的心情，也是个希望，希望赶快搞起来。一定要巩固这个联名，发展这个联合，共同对敌，才能搞好。军区有错误，还可以检查，没有彻底平反，还要彻底平反。还有两派都不能对准群众，对准群众就是错误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能对准人民解放军，对准人民解放军也是错误的。这两条要注意。人民解放军、革命群众组织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听说西藏军管会没有什么权威，军管会是毛主席给的权威，应该支持她，维护她的权威。并不是因为我是军管会主任，就是这个权威，军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象李文忠同志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的前进！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

进，把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西藏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造总”的同志，我们抽时间再专门谈一次，听说你们还有意见。（陶长松，很希望能谈一次）“大联指”的同志，你们还要不要谈了？（刘绍民，我们很希望谈谈，你很忙）我要去的！讲半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时间长了不行。我还有事，谈了就走，讲几点意见，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嘛！

（此稿系电话传来，可能有个别字句不准确，以今后在京的西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来的记录稿为准。）

（来源：《风雷激战报》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主编 第 262 期 1968 年 5 月 23 日 星期四）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张国华接见西藏“造总”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晚九时

地点：京西宾馆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了解同志们的意见，有些话和同志们讲一次，我还是西藏人嘛！把我个人的意见，观点对同志们讲讲，不是指示，是意见，供同志们考虑。

“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贡献的，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当然西藏不只你们这个组织，你们在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有贡献。过去我们是这样看的，但不仅仅是你们，这话要和你们讲清楚。当时区党委决定支持你们，因为你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一月风暴”夺权，这大方向是对的，但不成熟，事后也证明了条件不成熟。军区支持你们夺权，大方向也是对的，但就条件讲，也是不成熟的。军区与“造总”的关系，本来是好的，军区二月五日支持你们，但那个会开得不好，军区不应退出会场。在那会上群众有过头语言，过头语言不少，还有错误做法，那是不对的。军区对你们提出了是对的，你们应吸取教训。从这以后，你们和军区的关系就紧张了。你们以后又冲击军区，是两次吧！对冲击军区，军区看得过重了这也不好。（任副政委：“二·九”冲军区是看得过重了。）看重了，关系就紧张了，但象你们那样做也不对的。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造总”的同志也要总结一下，对军队那样做也是不好的。这个关系的

紧张，从我个人讲，从军区讲，我们有责任，不怪群众，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军区应吸取教训，对部队也要加强教育，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二、谈谈二月逆流。从中央讲，二月逆流的干将是谭震林，西藏是王其梅、周仁山、惠毅然，甚至还有那一小撮，不是那个群众组织搞的，如果军区讲了二月逆流是“造总”搞的，那是错误的。现在我摆开来讲，二月逆流决不是军队，也不是哪个群众组织。你们不是保守组织，如果你们是保守组织那就不同了，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提出支左后，人民解放军就积极响应。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造反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抓了你们的人那是不对的，为什么抓了人呢？是上了当，的确是上了当。周仁山在军区支持你们时是举了手的，但后来他写了你们十条罪状，要我点头，我给顶回去了。周仁山支持你们“造总”是假的，他原来同意支持你们，二月间他马上写了十条罪状，一个多月那儿来的呀！我当时认为他这个家伙是认识问题，有点投机。关于“专打”，中央表了态的。周仁山在这个问题了也投了机，将来你们好好批判，当时我没有认识这么高。对“专打”他看了中央对取缔“专打”表了态，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负责同志批了“专打”土皇帝，土皇帝指我，我并不把这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事，这问题说清了就行，以后不要再讲了，如果有人拿这个问题去攻击“造总”，我也是不同意的。你们也不要再讲什么“革命行动”、“革命组织”了，平反是可以的，整我的材料是可以的，我不看得那么严重，没有什么了不起。周仁山是个两面派，他见我五月中向北京学生表了态，他就支持你们，七月份又支持你们了。陶长松上成都来时，我也同你讲过了嘛！这个两面派表现得相当充分了。而把矛头对准军区、对准任荣同志，我看是不是把这个仇恨集中到王、周等人身上。军区对有问题的人抓起来了，还出了报、公开信，这是错误的，我是西藏党委书记，我有责任。（军区首长：当时国华同志不在家，我们有责任，出传单有错误的。）（“造总”，抓人抓得对，放得也对，平反不平罪，这如何讲？）这是对立统一嘛！（任副政委：我们原话不是这样讲的，说抓对了几个人与抓革命群众组织的人是两回事。）对坏人要抓，什么时间都要抓，抓惠毅然、李宗清是对的。李宗清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把她放了是不对的，她没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现在她还有活动，还是要把她抓起来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众：同意）（陈副司令员，李宗清是个白骨精。）现在抓坏人和“造

总”组织是两回事。四川也如此，我们已批判了，不能说抓人有成绩。是不是镇反，我看不是这么回事。四川是二月镇反，因为它是有纲领的，而西藏是在支左要作中犯了错误。三月份军区主动去和你们改善关系，（余致泉副司令员：派了一个观察员。）（“造总”代表：被我们轰出去了。）对于平反问题，军区搞得不彻底，平晚了，“四·一”指示下来就应赶快平反，而平得不彻底的可以弥补吗。公、检、法这个机构应该砸烂，特别公、检、法在运动初期镇压了本单位一些群众，那是智泽民搞的，西藏公、检、法是王其梅搞的。（黄金澄：周仁山也插手了。）公、检、法应该彻底砸烂，但决不能搞群众。公、检、法中大部分的群众是好的，有黑干将，军区和军管会可以发动群众去砸，还可以调一些人去。王其梅管了那么久，一揭发就清楚了，对周仁山也是这样。政治上没有彻底平反。组织上没有彻底平反的要彻底平反，组织上要帮助恢复发展。当然，现在实现大联合，这问题好解决。你们这个上层组织也不存在了，对下面的组织要进行分析，有好的组织也可能有不好的组织，要有分析。你们刚才讲的对“造总”六司、丁青 14 团，我无法表态，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由你们“造总”去处理。当然对群众有界限，要联合。现在不存在保守组织，过去有保的现在也转过来了，但要区分坏人，不能把群众都当成坏人，都当成坏人就搞错了。辽宁 831 有几个坏头头，不能讲那个组织的群众都坏，当然对坏人不要包庇，革命派就要这样，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林副主席和中央的话。不听话要帮助，要教育，再不听就走反面。不要错了的也说是革命行动。你们组织有多少人？（陶长松：有二十几万。）二十多万人的组织，坏组织、坏人是会有的，你们自己去揪出来就对了。极“左”思潮也不对，要帮助教育，不能把这些人当成坏人来揪，思想问题要按思想问题解决。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不要讲是“革命行动”，说错了，做错了，改了就行。总之，一个不能对准群众，一个不能对准解放军。要对准刘、邓、陶，四南区有李井泉，西藏是周仁山、王其梅。对任明道、郭锡兰也要揭发批判。惠毅然要坚决斗争。历史上还有范明，两大派联合了，要和军区合作，共向对敌，这样革命委员会就好搞了。如果“造总”，认为还有压力，那就和军区讲一下，在学习班里讲一下，不要说二月逆流是“造总”、“大联指”讲过没有，（军区首长：两派部有互相骂的情况。）

三、大家集中精力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是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等，革命派的同志要积极行动、筹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平反不彻底，能在这里做的就应该做。你们有一点我不同意，不能等问题都解决了再成立革命委员会。刚才新华社的同志来催了，我说快了，我们不能放空炮，你们愿当副班长吗？

（众：不愿意。）中央的意思，西藏革委会成立要比四川早一些。总理已催西藏几次了，还没有催四川。你们报告写得怎么样了？你们要争取时间，红五月吗？不能耽误时间了。谈我个人心情，很焦急，西藏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不听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话，要变成“独立王国”了，这个纲上高了点。你们十号前把报告送上去，西藏比四川简单。四川有七千万人，组织有几万个呀！一个大事要把站出干部历史搞清，文化大革命表现也很重要，但历史问题一点也不能含糊。西藏的大部分干部我是了解的，根本的要按林副主席的三条要求。群众代表要造反有功的，历史清楚，有群众代表性，我们就支持他，使革委会具有革命化、朝气蓬勃。

最后讲一点，任荣同志、阴法唐同志、陈明义同志等，中央都很清楚，这些都是好同志。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是工作上的问题，和周仁山、王其梅有根本区别。听说你们“造总”对任荣有意见，可以提，可以帮助，但不能当敌人，当成敌人就错了。（李毅：我们根本没有把他当敌人。那些大标语不是我们贴的，写的，是××汉商搞的。）这问题要提高警惕，四川也有这样的坏人。错误、缺点要检查，同志们要顾全大局，从大局着眼，大联合是大局，三结合是大局，革委会是大局嘛！同志们提出意见，我们来个闻风而动，你们赶快回去做“造总”的工作。格尔木问题要解决，运输要恢复。老陈呀，（指陈明义副司令员）要研究一下，以前我不了解问题这么严重，国民党上尉以上，一个不留，留一个就糟了！过去多少次清理就没有清干净，民院也要清理，国民党的少将不老实，老实才怪呢！这些人不能放在运输线上，还有慕生忠的爪牙也要揪出来。你们组织发动自己揪坏人，那些农奴主的代理人要清理，要整顿我们的队伍。康老接见四川时两次都讲了这些问题。（陈副司令员：坏人揪出来了，组织更健康。）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以后有时间再讲，欠了账总要还的。

（插话：你什么时间去西藏学习班！）

张：等你们报告送上去了，我再去学习班。（张司令员的话音刚落，李毅就提出问题。）

（李毅：张司令员的讲话，大部分是对的，可是你谈到二月逆流，完全是根据任荣给你定的调子讲的。在西藏是周、王、惠掀起，惠毅然早已被打倒了，他怎么会掀起二月逆流呢？）

张：二月逆流是走资派掀起的，惠毅然是在走资派嘛！

（“造总”代表插话：抓惠毅然是在当“造总”黑后台抓的，把惠毅然拉出来是有阴谋的。）

张：惠毅然是惠毅然，“造总”是“造总”，是两回事，怎么说提出惠毅然是个阴谋呢，我就不理解了。

（插话：二月逆流是不是从二月中至三月中，惠毅然在六四年区党委会上就罢了他的官，你张司令员最清楚的，怎么会说是他掀起的呢？）

张：不要搞形式逻辑，惠毅然二月二十五日去十一师进行策反，被扣了的。惠搞这些东西不奇怪，他搞复辟，不奇怪。

（插话：惠毅然在六四年就搞出他了，为什么和二月逆流拉在一起？）

（苏××，拉出惠毅然，就是打击“造总”。）

张：惠毅然写了“前八年后八年”，说我搞宗派，从形式上讲也讲不了。惠毅然是我们老部队的，我怀疑他，他想当西藏党委书记，他去找乔明甫。他找中央组织部写了介绍信，要当党委书记，我说凭这条我就不同意。

（李毅：二月逆流是周、王、惠掀起，为什么只抓惠呢？）

张：这问题你们把周仁山斗一下，把惠毅然斗一下，就清楚了。

（阴主任：最近发现惠为范明翻案，王、周是支持的。）

（插话：范明翻案是六二年开始的，怎么扯到二月逆流上？）

（阴主任，范明翻案过去也有……）

（两人插话：没有叫你讲。）

（雷佳陆插话：军区在二月逆流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张：不能这样讲，军区是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

（插话：你的讲话，一部分讲清了，还有一部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黄金澄：不准“造总”参加三月五日的大会，三月五日的大会是什么性质？）

张：那是错误的，抓惠毅然是对的，抓“造总”不对。

（插话：四川和西藏是一样的，为什么四川能说是镇反呢？）

张：四川我是了解的，四川是李井泉依靠保守组织镇压了革命造反派，阶级斗争是很尖锐、复杂的，李井泉搞了一、二、三线，西藏比不上四川。如果过去有人讲惠毅然你们的黑后台、黑手，现在搞清了，不是就行了。惠毅然是走资派，“造总”是造走资派反的吗？怎么说是一起的呢？

（陶长松：把惠拉到二月逆流说不通。）

（荣传华：说惠毅然是二月逆流干将，“造总”同志反感很大，周仁山、王其梅性质不一样，周、王把矛头对准群众，惠毅然和他们不同，不能混在一起。）

（插话：军区在粉碎二月逆流犯错误说是上了当，镇压革命群众，这是问题的实质。）

张：军区在抓人上是上了周、王的当，军区回去再研究一下。

（插话：二、三月究竟是根本上错误，还是基本上正确，有人说，二月、三月风光无限好，怎么认识？）

张：抓革命群众根本上错误的，应该平反。

（插话：七九〇六部队一封公开信，你看了吗？）

张：我们要加强部队教育，这不对的，不能随便上纲，不能随便对群众组织这样表态。

老任、老陈，你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插话：朱子元问题你了解吗？历史上有问题。）

张：宋子元我了解、历史上要弄清，彷彿记得他是在反扫荡时的问题。

（李毅：你谈谈刘肇功的问题。）

张：历史上刘肇功和范明勾得紧，后来在反范明时，他表现还可以，就留用一下，后来了解他不是自觉揭发的，和范明勾得还是紧，他出身原来以为是农民，后了解他是小商小贩。文化大革命中，“一·五”事件是他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对他的处理是对的，这个人有蛮干精神。

（李毅：他有蛮干精神。）

张：李宗清是他的老婆，是国民党骨干分子，她有无现行活动我怀疑，刘肇功和她不划清界限，这问题值得考虑。

惠毅然的问题好解决，我们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周仁山、王其梅是同的嘛？只差一个惠毅然嘛！怎么提法，西藏要提周、王等一小撮。我要走了，还有会，革命委员会这事赶快搞。

（来源：《风雷激战报》 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反总指挥部主编 第 263 期 1968 年 5 月 25 日 星期六）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陈明义对西藏“大联指”代表的讲话
接见时首先征求了“大联指”代表的意见。

陈明义：

1、同志们对我们提的意见帮助很大，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2、西藏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大联指”是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尤其是揪出了周仁山，立了一大功，为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过去对同志们揪周仁山积极支持不够。去年七、八、九月把“大联指”内定为偏保组织 我负主要责任。对“大联指”同志们思想上、精神上都有挫伤，我作检查，是我私字作怪，关键时刻没有顶住，今后在适当时候还要向同志作深刻的检查。

3、西藏经过揭发、批判，阶级阵线基本上清楚了，作为西藏这样复杂的地方，还有许多工作要作，把几方面的敌人要搞清楚。

（一）十几年来，对范、白反党集团批的不够，他们的阴魂不散，几次政治斗争都有翻案。余孽还在，联系这根线，范、周、王黑线都是这个线，要彻底连根都要挖掉。

（二）平措旺杰搞的东藏民青，这个窝子是国民党、帝国主义搞起来的，过去没搞清没定，现在看面很大。

（三）已被打倒的农奴主阶级达赖、班禅集团还在心不死，他们有同主子在国外的，也有在西藏的。拉鲁的老婆也公然跳出来活动。国民党同帝国主义相勾结，要彻底挖掉他们的影响。国民党、印度、美国特务，这些人的活动，你们心

中有数没有？巩固边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把他们搞出来，他们是怎样活动的？黑手是怎样活动的？都要调查搞清，都要作很大的工作。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混入群众组织里的由群众自己揪，公开的反革命由军管会搞，该抓的抓，该镇压的镇压。

4、很多工作要研究，你们姿态高，今后要很好的团结“造总”的同志，吸取二、三月教训，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才能取得很大胜利对“造总”的优点要鼓励，对他们的缺点要帮助。我们的优点要发扬，缺点要改正，发展大联合，“大联指”对军区支左工作有很大帮助，过去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来源：《风雷激战报》 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主编 第 266 期 1968 年 6 月 5 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中央首长对西藏问题的指示

六月六日晚 8:00—12:00 总理、伯达，康生、春桥、文元、永胜、富治、法宪、东兴等九位首长接见了西藏军区党委常委、地方领导干部苗丕一、杨东生同志。六月十一日晚昆明军区副政委任荣同志向在京西藏学习班全体同志进行了传达，主要精神如下：

中央首长指示：要注意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动向、动态。国外是大敌当前，边防可能出点事。中锡边界印军活动很频繁，飞机到前沿侦察，叛匪也在边境蠢蠢欲动。最近印度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还有苏修、美帝头目在边境侦察。我们要加强战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如果敌人胆敢侵入我国边境，就要坚决回击，保卫文化大革命，叫他们有来无回。

中央首长 9·18 指示已明确指出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是对的。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各大组织里都有坏人，要发动群众自己抓，清理阶级队伍。要发展巩固大联合，谁也不能吃掉谁，谁也不能压垮谁，压是错误的。压是压不垮的，相反越压越不好。人数多的要照顾人数少的。军队支左中的错误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的问题，基本上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军队检查要按主席最新指示，要按主席革命路线，要有利于革的大联合，有利于共同对敌，有利于革委会的建立。

要立即制止武斗，停止打内战，恢复交通运输。在学习班要马上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两派和军队都要签字，11师52师都要签字，送中央文革审批。西藏日报要联合出版，赶快出报纸，要传达中央指示。这是天经地义的。可以组织汇报团回西藏，军队领导也回去几个，把中央精神传达下去，制止武斗，恢复秩序，然后再来一些人把情况带来，问题在这里解决，促进革命委员会早日成立。为革命委员会作好筹备工作，水到渠成。

（来源：《文革通讯》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 第八期 共四版，河南二七公社予西分社，洛阳矿山机器厂四一六总部主办）

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西藏军区给西藏“造总”的公开信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警备区部队，为了给驻财经大院驻军运送给养，保证驻军正常的战备工作，于上午进入该院。革命群众本应协助我们搞好这一工作，但该院的“造总”下属群众在少数坏人的挑拨下，对我部队开枪打手榴弹，打伤我干战数名，并毒打抓走我警备区司令员石板樵同志，还抓走我干战数名，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应立即放回石板樵同志和被抓走的我干部战士，并要立即交出凶手。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十六时二十五分

（来源：《风雷激战报》 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主编 第七十期 1967年6月10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西藏军区给西藏“造总”的第二封公开信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

我们在今日十六时二十五分发出致你部的公开信，经西藏军区、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反复播送，并以电话反复通知，想你们早已收听到了。可是截至现在为止，仍未见你们将非法抓去的拉萨警备区司令员石板樵

同志和其他指战员送回。我们再次敦促你部立即送回石板樵同志和被抓走的干部战士，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并交出向我武装进攻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

近日来，我财经大院、大昭寺、西郊等地驻军遭到阶级敌人挑拨下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攻、辱骂、殴打，有的断粮、断水，甚至向我部队开枪射击，这是西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周仁山、王其梅、惠毅然及老右派范明死党和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残渣余孽挑拨军民关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严重罪行。今日向我拉萨驻军和值勤部队武装挑衅和进攻越演越烈，到处开枪开炮，到现在为止，已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二十多名，抓走数名，但是，我们为了爱护广大革命群众和阶级兄弟，一再严格约束部队，不准开枪，现在我们热忱的希望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牢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坚决维护“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及时识破和揭露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加强军民团结，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二十三时三十分

（根据广播整理）

（来源：《风雷激战报》 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 主编 第七十期 1967年6月10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近，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妄图在中锡边境进行军事挑衅，达赖叛国集团又在加紧组织叛匪回窜。大敌当前，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在国内外阶级敌人身上，要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要联合出版《西藏日报》。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现就立即停止武斗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一、大张旗鼓，反复深入地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英明指示，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进一步落实“三·一四”协议。

二、双方保证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停止开枪、放炮。今后不准以任何借口挑起武斗和参加武斗。谁挑起武斗，谁向别人进攻，谁就要负主要责任。对挑动武斗的策划者和残杀、毒害群众的凶手，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自己把他们揪出来或有关机关根据核实的材料予以惩处。

三、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是自毁长城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已抢夺的必须立即如数送还。

群众组织或个人拥有的一切枪支（包括土枪、土炮）、弹药，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全部上交警司统一封存。今后一律不准再制造武斗凶器。外来的武器警司有权收缴。

四、双方不得在路口、要道私设哨卡，修筑工事，拦截行人和车辆，保证人身安全，保证车辆正常行驶。

五、严禁双方以任何借口抓人、扣人。不准私设公堂，非法审讯。已抓已扣的人员应立即放回，不得殴打陷害。

六、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工人、农（牧）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保证邮电、气象、银行、粮、油、库（站）、商业等单位的正常工作。不准调动农（牧）民进城参加武斗。已进城的农（牧）民和已集结的外单位人员应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对返回人员要热忱欢迎，不准歧视、谩骂、围攻、殴打，要保证“四大”正常开展。

七、西藏地处边疆，交通运输十分重要，有关单位应切实保证公路、民航的畅通，恢复交通运输，不得阻碍和破坏。

八、《西藏日报》是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的，决不能中断。报社两大革命群众组织要在军管会领导下，保证《西藏日报》的正常出版，谁阻碍就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就是对百万翻身农奴的犯罪行为。

九、上述协议由警司和两大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立即监督执行。双方对监督小组开展工作要给予方便和支持。对违犯上述协议的首恶分子和幕后策划者，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执行情况要随时通报，并向中央报告。

十、唐北格尔木西藏所属单位应按上述条款执行。本协议自中央批示时间生效。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藏班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签字：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万德茂 扎西彭措 毛卫红 白玛昂觉 张全道 张清法 张永和 傅伟 伊斯玛
贡布李世博 刘绍民 刘长山 米良贤 江绍泉林洪楠 欧珠 侯广文 袁秀洪 秦家
甫 陶长松 徐礼持 曾代祥 冯时杰 强巴 鲍友德 雷佳陆 赵文贵 蒋永年 蒋英

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及部队代表签字：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志林 刘长永 任荣 许甫 陈明义 邹洪鸣 陈乐扬 陈子植 廖步云 樊春元
苏中杰 董志隐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于北京

（原载西藏大联总《风雷激战报》1968年10月1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立即停止武斗协议”的批示

1968.06.22；中发〔1968〕100号

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代表的帮助下，签订了《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中央文革认为，这个协议很好。希望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坚决地、完全地贯彻执行，使西藏地区的武斗迅速地停止下来，保证交通、广播电台、邮电、气象、银行和其他生产、商业部门的正常工作，保证《西藏日报》的出版。

西藏地处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方，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前线。中央文革希望，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西藏各民族革命人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地处理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提高革命警惕，团结对敌，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争取早日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28； 中发 [68] 136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西藏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它长期受反动的农奴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英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的掠夺，美帝，苏修，蒋匪帮也派遣了许多特务，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勾结达赖，班禅叛国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广泛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

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引导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要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对某些尚未完善的县革命委员会，应当通过两派革命群众的充份协商，予以调整，充实和加强。

继续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内团结，军民团结，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防止阶级敌人挑拨离间。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印度特务的破坏活动。加强战备，巩固边防，保卫祖国。如果印度反动派胆敢侵犯我国神圣领土，我们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歼灭之”。把祖国的西南边疆建设成为伟大的钢铁长城。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迅速恢复交通运输，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相信：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更快地传达，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示和战斗号令，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西藏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委：

据西藏军区最近向中央、中央文革报告的西藏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认为有以下问题必须向你们指出：

（一）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的，一切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必须坚决支持、拥护、尊重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大联指”的某些同志不尊重革委会的领导，不参加革委会召集的会议是错误的，希望“大联指”的这些同志顾全大局，立即改正，否则要犯更大的错误。

（二）西藏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阶级斗争十分复杂。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和驻藏的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重要责任。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

（三）西藏军区的“平反公告”和对大昭寺事件的处理是军区纠正自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错误，这种作法是符合毛主席关于“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的教导的。“大联指”和“造总”都要正确对待，不能片面理解，不能各取所需。“大联指”应该支持军区纠正错误。要大力加强革命大联合，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平反公告”，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委员会。

（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把斗争矛头对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五）西藏军区及驻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分区、人武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耐心做好两派革

命群众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认真做好“拥政爱民”的工作，加强团结，遵守纪律，执行命令，加强战备，搞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中央决定，将现在成都办的西藏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到北京来办。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

6月11日，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提出要在1971年实现全自治区人民公社化，同时结合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牧区补划阶级成份，在农区调整阶级政策。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指示》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出现，要求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指示》原则同意《请示报告》所提出的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并对若干具体问题作出政策规定。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
国务院：

为了适应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事业，尽快地改变历史造成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状况，对西藏要求支援八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院所需的师资，拟由国家机关选调干部帮助西藏两所中学所需的师资，其余六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院所需的师资，拟采取与卫生部门支援西藏医疗队同样的办法，由支援西藏卫生工作的六个省市，定区定校包干支援。经商得上海、江苏、湖南、河南、辽宁、四川六省市及国务院政工小组的同意，现将具体办法报告如下：

一、派出支援教师的任务：

(1) 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同西藏当地教师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

(2) 担任一定的教学任务；

(3) 负责培养提高当地师资，从根本上改变师资不足的状况。

二、派出支援教师的分工：

(1) 国家机关负责支援那曲地区和格尔木两所中学教师共九十名（每所中学所需师资四十五名，计：汉语文十四名、数学五名、物理四名、化学四名、政治四名、外语四名；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各二至三名；下同）。由国务院政工小组组织分配。

(2) 上海市负责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教师，一九七四年二十七名（其中：数学八名、汉语文六名、物理四名、化学四名、体育五名；两年后轮换，下同）。一九七五年三十八名（其中：政教四名、数学八名、外语四名、汉语文六名；物理、历史、地理、音乐各四名）。一九七六年三十六名（其中：政教八名、数学八名；外语、化学、历史、地理、美术各四名）。并负责支援八一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3) 江苏省负责支援札木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4) 四川省负责支援昌都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5) 湖南省负责支援拉萨市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6) 河南省负责支援山南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7) 辽宁省负责支援日喀则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三、派出支援教师的条件和工作年限：

(1) 派出教师必须政治思想好，政治历史清楚，具有一定的业务水平，身体健康，能适应高原地区，年龄最好在四十岁以下。

(2) 派出教师工作期限每期二年（路途往返时间除外），工作期间不探亲。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进行轮换，轮换三期，共六年。在各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帮助下，西藏即可自行解决师资问题。

四、各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应尽可能对支援学校提供教学所需的图书、仪器。

五、派出支援教师的生活待遇：

(1) 派出教师进藏不转户口，只带临时油粮关系，在藏工作期间一切生活标准，根据当地不同地区的规定，应与当地教师的待遇相同，并由西藏负责解决。

派出教师的工资除原单位发给的外，差额部分由西藏发给。低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

(2) 派出教师所需冬装，由西藏负责每人补助制装费八十元。教师进藏前添置棉衣、被褥等所需布和棉花，请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本着节约的精神，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经济困难的请原单位从福利费中酌情补助。

(3) 派出教师进藏路费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返回路费由西藏负责；在藏工作期间的公费医疗由西藏负责报销。

六、派出支援教师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月间进藏。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批转有关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具体事项由西藏派人同有关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协商解决。

国务院科教组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上海市、江苏、湖南、河南、辽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本着增强民族团结，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精神，按照报告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切实做好支援西藏师资的选调工作，努力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国务院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

6月25日至7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议目的是解决西藏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西藏自治区负责人任荣等 6 人向中央写出《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

其后，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 9 月 8 日批示及西藏自治区 6 位负责人写给中央的报告。

全区组织 6, 000 多名干部下乡，贯彻中央批示和自治区扩大会议精神。

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央同意《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现发给你们。

西藏地处我国的西南边疆，和尼泊尔、印度等国接壤，国境线近四千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生产潜力很大。藏族人民是我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大部住在西藏，藏汉人民在历史上和睦相处的历史很悠久，但因历代统治阶级的错误政策，也发生过不少隔阂。所以对西藏自治区各项问题的处理，必须十分重视和慎重。

西藏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都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民族自治区。藏族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藏族人民在历史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近三十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藏汉等各族广大党员、干部、驻藏解放军，发动和组织藏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群众，团结藏族爱国民主人士，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应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中央对于西藏各族同胞表示亲切的关怀和慰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这对于逐步实现藏汉各族人民在经济和文化

上的事实上的平等,进一步密切党和藏族人民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胜利地进行国际斗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各民族的存在,多数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在今后很长期间也将继续存在。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如果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在帮助藏族人民完成社会改革以后,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者”自居,不努力培养本地干部并帮助他们真正当家做主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祖国各民族的民主平等团结统一),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末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要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所有进藏同志都必须充分了解,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

发展西藏建设,仍然应当主要依靠西藏党政军和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共同努力。同时,中央各部门也要加强对西藏工作的正确指导,并且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组织全国各地积极给他们以支援和帮助。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总结过去的经验,今后必须注意以下八项方针:

一、中央各部门都要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根据那里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具体指导。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或等待。切忌主观、片面、一般化、一刀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要盲目地、硬性地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

二、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要积极协助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调查研究西藏工作情况,主动提出建议,协同有关部门处理好西藏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对于有关西藏工作的重大问题,要事先征求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意见,并请示报告中央决定。

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问题要事先请示，一般的问题要事后报告。西藏地广人稀，脱产人员的编制和财政支出决不能照搬内地的一套，目前必须精兵简政，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确实最必需的地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和西藏工作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会议，西藏可不派人参加。

四、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除了调派必要的领导骨干外，主要应有计划地输送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及其他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如医生、教员、科学技术人员等。

五、中央各部门，特别是计划、经济、文教、卫生部门，在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照顾西藏的特殊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在物质、技术等方面给以积极的支援。

六、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要注意关心和照顾进藏干部和职工的家属子女，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实际困难；对调回内地的进藏干部和职工，要妥善安排和解决好他们的工作、学习、疗养和生活等问题。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

七、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对于《纪要》中提到的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制定措施，抓紧解决。并将落实情况报告中央。

八、西藏自治区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四、五中全会和《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过去工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对发展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调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在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纠正各种“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农牧业、财贸、文教、民族、宗教、统战等各项政策，要认真调查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抓紧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

中央相信，西藏的广大党员、干部、驻军指战员、职工群众和各族人民，一定能够加强团结，根除派性，顾大局，向前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

会的精神，和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在发展西藏建设，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作出更大贡献，夺取更大胜利。

中央着重指出，巩固汉族同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宗教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之间又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我们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了，加以目前国际形势复杂，我们如再不抓紧时间迅速大力改善民族关系，就将犯极大的错误。全党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有统一的充分的认识。

中央认为，本通知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县。由于各民族自治地方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各项具体内容，只供参考。中央希望，各有关地方党委根据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检查一次自己的领导工作和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并且拟定今后改善党的领导、落实民族政策、做好各项工作的措施。如有重要问题和意见，望报告中央。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2008年9月9日初稿 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二周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七章（6）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六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新疆大学“九·三”事件赴京汇报代表团

〔周总理十月二十八日（一九六六年）在政协礼堂接见了我们全体代表。十一月二日，周总理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再次接见了我们全体代表。总理和我们非常亲切地谈了话，听了我们的汇报，对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说：“你们的精神很好！”

总理看了保守派同学的传单《红卫兵要做无产阶级保皇派》后，很生气地说：“胡扯！怎么这样提。”

总理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四百名赴疆大队的传单《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后说：“我拿了传单就觉得不对头了，给王恩茂念了，他也觉得这是错误的。”

总理批评四百名红卫兵说：“（对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他们犯了错误。”

我们反映了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总理说：“既然你们恢复名誉，当然他们也要这样做。本地的学生，外地的学生和工人一起平反，不更好吗？”

总理要我们注意民族政策，并要我们帮助开好三千会。

接见后，周总理戴着我们敬献给他的毛主席象章和《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纠察队》红袖章同我们照了相。

由周总理亲自批准，赠送一万枚毛主席像章，交给我们代表团带给新疆革命人民。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新疆革命人民的最珍贵礼品。

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同志十月二十一日在公安部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很关心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说：“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摘自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第六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载《赴京汇报代表团讲话摘要》

（来源：摘自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第六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载《赴京汇报代表团讲话摘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对新疆少数派“红二司”战士的讲话

〔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同志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劳动党建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北京途经乌鲁木齐，于十一月十五日夜在宾馆接见了新疆红二司二百余名革命战士。十一时五十分（乌鲁木齐时间）当康生同志进入大厅时群情激动，无限欢欣。数名维、哈、汉红卫兵给康生同志戴上了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的红卫兵袖章，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不站在毛主席一边就砸烂他的狗头！”“向自治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被接见的有新疆大学星火燎原战斗团、革命造反团、东方红战斗团和外校、外地部分革命小将。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伍修权等同志。开始时，红卫兵战士给康老和伍修权同志戴上了“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袖章，大家热烈鼓掌，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之后，大家请康老坐下讲。〕

康老说：

我谢谢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同志们今天到飞机场去欢迎我。（大家鼓掌欢迎康生同志坐下讲，康生同志不愿坐下）坐下讲，不大方便。要讲话就不坐，我坐着就讲不出话来。（鼓掌，众喊：“一定要康老坐下！”鼓掌）康老坐下又站起来说：坐下，后面的就看不见了，坐不坐由我吧！坐下就讲不了话了。两个半钟头以前，我写了封信。（读信）

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志们：

谢谢你们给我的关于“王恩茂同志的检查”。对这个文件，因为今晚招待外宾，来不及阅读，我准备带回北京仔细地看看。

你们很想见见我，我也很想同你们谈谈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我是同好几个兄弟党参加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同机来此，他们有事急于回去，我也要很快的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阿党五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因此，我无法在此停留，明天（十六日）早上就必须离此返京。这样我虽然很想找你们谈谈，但是时间来不及了，请你们原谅。将来你们到北京来时我们再谈吧！

林彪同志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希望你们紧紧掌握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彻底地批判错误路线，把这场由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旅途匆匆，恕不多写，以后再谈。

敬礼！

康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十二时

现在交给你们（康老把信往桌子上一放，鼓掌！）。

既然同志们都来了，我就从床上起来跟大家见面，（笑，众也笑）看来要谈话，不谈不象话了。谈什么呢？你们谈呢？还是我谈呢？（请康老先谈）

我先讲。你们看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没有？（同学：看过！）里面不是讲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那里不来，我怎么去？（众笑）毛主席教导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你们看，我还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好，还是先当群众的先生好？（热烈鼓掌）

我是十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的。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写给我一封信，提了三个意见：1、要到机场欢送我；2、要叫我到国际方面去串联；（众笑）3、他们说最好他们也派几个代表跟我一块去阿尔巴尼亚去串联。第一、我谢谢他们。因为有几个代表团同去，就不必欢送了，就不必客气了。第二、还是谢谢。我确实串联了，国际串联也是串联嘛！（笑）串联的情况，你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通过他们的大会，通过我们的贺词，通过在我党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宣传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到了亚得利亚海边一个叫里拉的城市，到了××（地名），赫鲁晓夫篡改（漏记）侵犯阿尔巴尼亚主权，背信弃义撕毁条约的这么一个地方，贝拉特，看到了我们帮助他们建立的纺织厂。这个纺织厂他们命名的时候，叫做“毛泽东纺织厂”（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然后我就到了菲里城，我们合作建立的氮肥厂、热电厂，以后又到了法罗那，我们帮助阿尔巴尼亚建立的化工厂、电厂。所有这些厂，我们都串联了！（笑）到了三十几个党，都串联了。

这一次到阿尔巴尼亚，全民欢迎中国的代表团，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我们这个代表团……。你们从报纸上看到了，是毛主席的贺电。这个贺电，使全体人民都沸腾起来了！（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通过这个贺电，不但对阿尔巴尼亚，对她的党、对她的人民，对党员，而且把参加大会的，凡是祝贺阿尔巴尼亚大会的兄弟党都动员起来了，他们认为毛主席的贺电有国际意义。

参加这个大会，通过这个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如实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这些你们从报纸上看到了。

我们的贺词中，我们就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的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全部地都加上了。因为我们又不强加于人，但是我们讲了，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样的看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用科学的语言说，什么叫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暴风雨般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一点我们可以敞开了讲，在大会也讲，群众会上也讲，兄弟党会议上我们也讲。

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利用毛主席的贺电的力量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利用这个大会宣传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三，也宣传了你们红卫兵！（热烈鼓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同志，恩维尔·霍查同志，在我走的头一天晚上，宴会的时候，他讲了两句话很有意思，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开

始听说文化大革命嘛，学校里不是放假吗？原来说是放半年假就差不多了，现在又说到……到什么时候啊？（同学：到明年秋天！）开始想不通，中国人这个事情，学生放下书不读，搞革命搞一年，这不太多了吗？（大笑）以后就想通了。想通了讲了两句话：“革命搞一年，胜读十年书。”（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我看这句话是对的。现在这个学校是个大大学校，还有比这学校更大的吗？谁的校长呢？毛主席的校长！（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有的外国党讲：“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热烈鼓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说：“赞成还是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总之一句话，毛主席的思想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我们这个红卫兵对世界的影响，在我们国内，虽然想到了，但是体会不了那么深，我现在就体会得比较深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但在你们的一生中，而且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在世界的革命运动中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载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册上面去！（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然，反对毛主席，赞成毛主席的人都有。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两种人。在大会上，有一种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红卫兵糟得很。是什么人呢？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牛鬼蛇神，或者表面上是“左”的，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走中间路线的人。（热烈鼓掌）

有的人在会议上提到毛主席的思想，提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站起来，他不好不站起来，别人都站起来了。（大笑）双手放在胸前（做姿势。笑）；有一种人，他站起来又坐下了（做姿势。笑）；还有一种人，听到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就溜掉了。（大笑。）

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国内有，在国际也有。如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反动派、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他们也赞成毛主席的思想那就糟了糕了！（大笑）正因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才说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毛主席不是常讲：敌人反对我们，那就好了，要是敌人也赞成我们，那就说明我们错了。（热烈鼓掌）

广大人民，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对毛主席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是赞扬的。“好得很”，“糟得很”这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通过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你们回去想一想。

我这是向你们汇报一下，看我串联的怎么样。（笑）

我曾经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讲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大概你们从《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社论里就知道了。当面测验一下，好不好？（笑）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要？为什么要进行？毛主席那么样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反复接见你们，这是为什么？（星火燎原红卫兵宋卫东激动地回答：就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为了使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不变颜色。我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同志讲得对，（有人说：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是啊，都对的，但还差一点，应当更进一步。

你们在大学，中学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是学了一些，那么，总是晓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林彪同志所讲的，提倡一个“公”字。因为把地主的土地，官僚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没收了；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定息恐怕就要扫除掉了。（同学：××地方定息已经取消了！）那是你们干的，中央虽然还没有明文规定，看来经过你们这么一扫啊……。（笑）中央没有这个规定，但有这个意思。（笑）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新的经济基础，那么一种新的经济基础就必然要求新的上层建筑为这个新的经济基础服务。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要求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为这个基础服务。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求这个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社会，这新的经济基础，是不是设想一下，如果还是旧的上层建筑，能不能为这个新的经济基础服务？（同学：不能！）那就必然要求新的上层建筑为这个新的经济基础服务。如果是新的经济基础，还是旧的上层建筑，旧的上层建筑必然反转过来影响新的基础。如果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的、是旧的，必然使

新的基础不巩固，那么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巩固。所以上层建筑是影响经济基础的。

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把旧的上层建筑——四旧罗！——去掉，那么我们新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巩固，会出现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使新的上层建筑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这样就会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修正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不变颜色。

你们讲得很对的，但需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你们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实际工作的经验，不断提高你们的认识。我们相信，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在中国会大大地发展！（热烈鼓掌）

我给外国的兄弟党讲，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政权问题。这一点是大家知道的。那我们没有取得政权时，中国人民跟随毛主席，跟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一点大家都清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人，仅仅是称赞阶级斗争，还不能是一个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在取得政权之前，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已经取得政权之后，就是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过去大家都是这样讲，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无非就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好似说，已经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看来，在取得政权之前，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没有取得政权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政权之后，是巩固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果失掉了政权就失掉了一切。如果政权被修正主义篡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彻底，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过渡过去。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这个功劳应归功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热烈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发展了。你们看了十一中全会公报没有，开始的时候，毛主席根据社会

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这个总的纲，通过总路线、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触及到人们灵魂的革命。因此我就想到，你们除了串联啊……还要在理论上，在思想上解决问题。首先是想到什么东西呢？到底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在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意见是不完全一致。我们国内干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在你们看来，你们讲实话，到底有没有阶级？十七年来，有没有阶级？（众：有）表现在哪儿？（众：到处都存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那我就反驳你这个论点了。（笑）列宁划阶级是怎么说的？（众：是按经济地位划的）那么根据这个，咱们不是就没有阶级了吗？（众：毛主席发展了）怎么发展的？（众回答不一）这个问题在你们思想中考虑一下。廿年前，我们开了一次土地会议，成立了一个土地法。在我们这个土地法里，按列宁定义划分了阶级，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什么叫中农、什么叫贫农、什么叫雇农。这个话是对的，我不是说列宁的不对，但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土地法里面，地主如果是被没收了土地，参加劳动五年，就可以改变成份。如果一个地主，他也参加了劳动了，表面上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了，那么是不是这样经过五年，就改变成份了！你相信不相信？（众：不相信！）如果你现在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讲讲，说那个地主劳动了不止五年了，已经二十年了，可以改变成份了，你看行得通行不通？（众：行不通！）行不通，大家讲得有道理的。毛主席对于这个阶级问题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说，看一个阶级，不仅是从经济范畴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品的分配这方面去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从这个方面看，虽然没有剥削了，没有地租的剥削，但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力量，还在那个社会里面存在。那么这次文化革命，红卫兵抄了地主的家，资本家的家，还有变天帐。为什么呢？所以说，看阶级不单是从经济来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上来看。这件事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那么，既然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这个国家如果没有阶级了，那么这个专政的对象不就没有了吗？那赫鲁晓夫不就对了吗？你如果是全民国家嘛，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了

嘛，没有阶级了嘛，可也有些坏分子，也有些流氓，也有些偷盗贪污分子，是阶级还是分子？（众：阶级）那全民国家不就完了！不讲道理！

既然没有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阶级的专政，既然没有阶级了。那么这个专政就没有作用了嘛。你是说对外国罗，对外国的话，那么全民国家也能对付一下嘛。

这样，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阶级？这个问题就成为毛主席的思想同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是一些好心的，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死板教条的人的分水岭。既然有阶级斗争，怎么能没有阶级呢？既然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对阶级的专政，怎么没有阶级呢？

在中国方面来讲，取得政权以后，十七年来，大概进行了以三种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

第一次是在取得政权以后，主要的是以经济范畴为主地进行了阶级斗争。这就是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等等。说是以经济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这个大概在五六年以后就基本解决了。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在三十年前就宣布在苏联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次、五七年整风反右，这一场斗争主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以政治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说是以政治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经济范畴、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这个经验，我们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曾经提出来十月革命的九条规律，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这又是一次。

第三次、就是我们这一次。以文化、思想这个范畴为主，当然联系到经济范畴，当然也联系到政治范畴。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革命叫做文化大革命，是超过了文化革命的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的革命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十七年来我们在三种范畴内进行了三次阶级斗争。所以，修正主义骂我们，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国内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是修正主义这么说法。但是我们看来，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开始的时候，谁叫吴晗写那个剧本的，他不写不行，难受嘛，睡不着觉嘛。（笑）

从国际方面看，开始有一个南斯拉夫，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脱化变质到成修正主义。如果说南斯拉夫，铁托是个别的事情，那么苏联——列宁缔造的国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够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并且向着资本主义复辟！那么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想一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不可以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

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范畴，也表现在政治范畴；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范畴，也表现在思想范畴。

我向兄弟党说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种天才的预见。

这次文化大革命，所以必要，所以必然产生，毛主席之所以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根据我们国内的实际，阶级斗争的实践，根据国际阶级斗争的经验，他就天才地预见，没有取得政权以前，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夺取了政权之后，还是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权问题，那就什么问题都谈不上了。

我向外国党的同志们讲的时候，没有象这样长篇大论地讲，把这个思想讲了讲，大讲就拿人家当学生了嘛。在咱们家中就可以讲讲。……（漏记）

就是说这个红卫兵抄资本家的家，现在几个大城市，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银元美国的数字我忘记了。据说……我没有调查，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笑）大小枪支一万多支。（众惊）一万多支，其中包括有炮，（众更惊）其中包括有机枪，特务用的电台呀，就是收发报机，几百架。材料不在我身边，一下子记不清了。

成绩是伟大的，但是你仅仅把这些成绩向外国兄弟党讲，还是不够的，还是从理论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讲，从毛泽东思想来讲。

大概是在×××（地名）要作一个报告，没有作，最后在告别宴会上我就讲了，但不完全是这个。

毛主席不是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来的嘛。你们搞红卫兵呀，搞红卫兵呀，破四旧呀都是。当然你们要想发展到毛主席那样，比较难啊，但是你们从这样一点，那样一点，

从群众中来，经过毛主席这么一总结一发挥就出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笑）毛主席不是讲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从哪里来？从你们那里来嘛，你们一点没有，我怎么来呢？（笑）

我想，最后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我刚才讲了，通过我们十七年来的经验，就看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有经济范畴的阶级斗争，有政治范畴的阶级斗争，就必然有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它是经济范畴的阶级斗争，政治范畴的阶级斗争的更深入的更高级的一个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阶级斗争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中。由此，我们就进一步地了解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我们自己就亲身体验到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这是一步步深入的。他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见，也使我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规律。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点呢？通过这一个斗争，就把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深入到亿万人民群众中去，广大劳动群众、革命知识分子更高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件事是史无前例的，这件事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力量，任何敌人是打不倒的。

我在天安门上看到红卫兵检阅，每一个人，一面走，一面举着这个（举起《毛主席语录》）。（鼓掌）我就想，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拍着语录本）结合起来了。（热烈鼓掌）这个力量帝国主义惧怕，修正主义诬蔑。千百万人把毛主席思想和他们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我们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进行到底，逐渐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保证。（热烈鼓掌）

这个运动之所以伟大，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社会不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不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我们国家复辟，改变我们无产阶级的颜色；使我们能够跟着毛主席的思想，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件事情，不单在中国方面有重要意义；就是在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间，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在国际上也有重大意义。所以修正主义惧怕我们，连我们这五十几个学生在那儿也害怕了，在苏联，只有五十几个人，他们都要赶走。对毛泽东思想他们害怕得要死嘛！你看修正主义这样子，报纸上就没有嘛。智利的革命学

生组织了红卫兵，拉丁美洲也有，墨西哥的学生也要组织红卫兵，非洲的学生在中国的留学生也搞红卫兵。回非洲去，不知走到那一个什么地方，走到……（伍修权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那些非洲人象你们一样，戴的红袖章，穿的兰褂子，打扮成你们这个样子，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非洲那个地方，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就在街上走，被美国佬看到了，就照相，当下红卫兵就和他们打架，就打了一场。（笑）这件事，在西非地区，引起国际骚动。

所以保证不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不让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不变颜色，在于人的革命化。人同毛主席的思想，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了。这件事是很大的。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罗，第三点是什么啦？（回头问随行人员）忘了，不管它顺序吧！（笑）

第三点，是使我们晓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正如五七年毛主席所讲的，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要成为这样一种情况，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这样一个局面。

这种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根本不可比拟的。同一般的，不但是修正主义讲得，就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过去所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那也是很不相同的，想不到的。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民主超过了巴黎公社的那种民主。

现在是这样子罗，那的确是，不管你是什么权威也好，不管你是什么老革命也好，不管你有什么资历也好，只要你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批评嘛！就炮轰嘛！哈哈。（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高呼口号：“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

我举一个小故事。

《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同学：十月六日）有个小孩讲，（同学：十三岁，扬州人。伍修权同志：对！十三岁，扬州人。）那个小孩相当沉着，（笑）她讲了，她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父亲不赞成。我就问她了，我说你兄弟、姊妹几个？她说四个。我问她了，你是老几？她说老二。我说是不是你母亲喜欢老大，或者喜欢老四，她不喜欢你？她

说不是。她父亲——（同学：监委的，是监委）对，是督察委员。那个扬州的地委书记对文化大革命是有抵触的，她父亲是跟着跑的，所以我就反问一句。那么她就接着讲了。“你过去是革命的，我赞成；你现在不革命了，我就反对！”（热烈鼓掌）这个十三岁的小孩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可见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心了。我就问她，是不是他不喜欢你呢？她说不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她说我们的观点不同！（笑）哈哈！她和我谈了话以后，这个小孩就把她这个毛主席纪念章给我戴上，戴到现在（指胸前的纪念章），我还戴着出国串联呢！（笑，掌声）

这样的一种大民主，你哪个国家敢实行！你说这个赫鲁晓夫……（大笑）赫鲁晓夫行不行呢？勃列日涅夫行不行呢？修正主义的爪牙现在这个日夫科夫——保加利亚的——行不行呢？捷克的参加大会的毛德里斯行不行呢？匈牙利的卡德尔行不行呢？东德的乌布里希行不行呢？你试试看，只三天就垮台了。（大笑）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因而也才懂得了毛主席所讲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集中呢？（众：有）集中在毛主席的思想上。那有没有民主呢？你看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众：大串联）大串联。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有没有统一意志呢？（有）毛主席的意志，那末有没有这个个人心情舒畅呢？我看你们就有点心情舒畅，（笑）也有个别人心情不舒畅的。（笑）他不舒畅，就给他治病嘛，治好了心情就舒畅了。（有人喊：王恩茂现在心情就不舒畅）以后就会舒畅了。（笑）

有个红卫兵讲了，那是哪个地方？文化部嘛，文化部的萧望东嘛，他说，我不是黑帮，我还是有功劳的嘛。有个红卫兵讲，我们斗你，不是要把你斗成右派，是要把你斗成左派！（热烈鼓掌）我们的同志革命的心的确是好的，谁愿意把同志斗成右派呢？右派的帽子还是少一点好嘛！毛主席思想的左派嘛！（热烈鼓掌）

当然现在开始这样的局面了，那还要进行努力了，还要发展了，去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我们从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就认识到了，看出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是一点了，还有一点呢？五七年党里面有这么个文件，这个文件没有发表，叫做……“事情正在起变化”，还是这个……我忘了是哪个文件了，就是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时候，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还是……当时是两个中央文件，一个是……，这里面毛主席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要建设，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这个问题，五七年到现在十年了。十年中间，检查我们做的怎样了，你说这十年中间一点儿也没有做，那不是这样的，但是力量还不够，这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队伍不大，这个队伍还不够坚强，还不够。为什么说也是培养了一些呢？同志们，这个东西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了，在国际方面影响之大是我们想不到的。对自然科学来说，我们看到了，咱们试验成功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北京的同志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情，美国、西德搞了二十年，我们只搞了一年多，就搞成了。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美国的一个科学会议上，有人报告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个科学家说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象过去那样看了。

最近还有上海的人工合成苯，这件事情，也是科学上三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绩。

那么最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这件事情，使帝国主义震惊的不得了。英国资产阶级有一个说法，他说，这次科学实验，它总是象楼梯似的，一级一级地才能上升。他说现在中国把这个楼梯给烧掉了，一跃进呀，就跃上去了！（笑，热烈鼓掌。）

有的工厂里面搞技术革新，我们在农村，农民呀、工人呀，创造发明。

总而言之一条，十年来——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到天津去了，我到天津的工厂里见到工人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这件事，在五七年整风反右中，在五八年曾经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工人学毛主席的哲学。我开始去上海求新造船厂，有一个车间这样做了，我就同他们开了一个座谈会。然后，我就到了天津，天津一个仁立毛织厂——就是织毛料子的——还有一个食品加工厂，他们自动地学习毛选。我在天津曾经开过两次座谈会。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的時候，讲毛主席所讲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比如我们在学校也就是说哲学从哪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从哪里来的？比如我们在学校里讲课的时候讲，矛盾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抽象地讲也可以理解，也可以懂，但是

怎样去把它说得那样生动。仁立毛织厂的工人同志，他们讲得实在生动得很。事隔快有十年了，我总是还是记得他的这次话的。他首先讲了，他说仁立毛织厂是个老厂。的确是比较老的，解放前就有这个厂。解放后生产一直上不大去。那么他们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特别是学习了《矛盾论》以后，他们就找这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到底在哪个地方？他们也开了座谈会，你讲这个是主要矛盾，他讲那个是主要矛盾，纺织车间讲它的是主要矛盾，织布车间讲它的是主要矛盾，究竟主要矛盾在哪个地方？以后就经过调查研究，也是经过从群众中来，才晓得主要矛盾在哪儿呢？在纺织车间。纺织车间上不去，织布车间织布常常受到限制。那么纺织车间是什么问题呢？机器不好，人力不强。后来调整了一下，纺织车间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过不了两个月，织布车间又跟不上去了，他们就想到了：大概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啦，矛盾是绝对的。然后在织布车间这么一搞，生产就又上去了。因为他们才知道了矛盾是不可怕的，矛盾还真正地能够发展生产。

去年十二月间，我到天津去了。在那个工厂里面正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工厂里面有黑板报，黑板报上写得很好。有一个工人，学习毛主席的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就讲了，他说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总要占用一点生产时间的，或者是正式的生产时间，或者是一些生产准备时间。你们在搞革命的时候，还耽误一年学习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个减法，从生产中间总要减减，减出时间来学习，但是学了以后怎么样呢？三种变化；人的思想变化了；人的思想变化了就技术革新了，机器技术变化了；技术变化了怎么样呢？生产就变化了。三种变化嘛！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什么呢？是个乘法。所以从表面上看呢，是个减法，就好似你们这个样子，半年多没上课了吧，你说这是不是个减法，可不就是个减法嘛。（笑）但是从你们这个文化大革命来看呢，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个乘法。很生动地把这个辩证法，这样子具体应用了；而且是有一人，他用一个事迹来解释。

所以六二年的时候，我们的党校校长杨献珍——他是我们的敌人。他一直骂我，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这是其中一条罪状，就是说我在工人中间提倡学习毛主席的哲学，“工人怎么能学习这个东西呢？那不就庸俗化了，表面化了！”他反对我，我当然高兴了。（笑）其实这并不是我创造的，是人家工人创造的，我不

过开了几次座谈会，支持一下嘛！我看这个减法、乘法，对我们来说，看得很清楚也就正如霍查同志所讲的了，“革命搞一年，胜读十年书。”

所以我们说，这几年，我们培养了一批新的革命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运动还不大。到底怎么样完成毛主席五七年提出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大量地培养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队伍。现在看起来，从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中间，人才辈出。我很佩服你们开大会的时候，理科的立刻就写出那么一篇短短的文章。尤其有些红卫兵的大字报，词句很好，我们也看了。这个人才，整个中国现在在这样一个大革命，这样子一个熔炉噢！政治火焰的熔炉中间，才能创造出来！所以看到了，毛主席的这个任务，我们找到了一个法子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大量地培养无产阶级的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队伍。这一点，已经看出这样一个作用来了。当然，我们离完成还有距离。

这是我要讲的一点。还要讲的一点呢，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有直接关系。这是直接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有两手政策，第一是战争威胁，第二手是和平演变。演变经过什么呢？经过我们党内的、我们国内的那种资产阶级当权派人物，即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么我们文化大革命这么一扫呢，就清除了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和平演变的这种社会基础。修正主义在我国干什么东西呢？搞这……叫做什么东西呢？（回头问随行人员）修正主义把和平演变叫做什么呢？（猛地想起）“颠覆活动”。修正主义要在我们这里面搞颠覆活动。过去找过嘛，找过高岗，找过饶漱石，找过彭德怀；这次文化大革命，你们看，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你们大字报上也有吗，找过彭真，找过陆定一嘛。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么一扫，把修正主义颠覆活动的基础就扫掉了。那这不是对反对修正主义有直接关系吗？

另外，帝国主义也好，修正主义也好，它们说我们好战。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是要备战的。我看这一点是说对了。你们相信不相信？我看，你们这个革命，是一个政治上的战备动员。现在提倡这个串联嘛，要徒步嘛！徒步串联嘛，看来徒步串联特别重要，不仅是锻炼自己了，到处宣传啦，也跟工人、农民学习，而

且锻炼行军嘛。哪有那么多汽车让你们打仗去坐？哪有那么多火车让你们去坐？

（笑）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的战备动员。

那么，从这一点，也就讲到了，这个问题要看你们啦。美国帝国主义天天这么设想，根据苏联的经验，天天这样设想，希望从中国第三代——第三代就是指你们。看来，第一代搞修正主义，搞和平演变比较困难了；第三代大概有希望！

（下面有人回答：妄想！）这么一搞就把第三代的希望也搞掉了。（笑）当然啦，是不是真正彻底搞掉了，这靠你们，看你们是不是迅速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这件事确实是帝国主义它自己讲了。这样一搞，美国人也讲，它们的资本主义再过二十年就垮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有根本意义的。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毛主席经常提倡的抓革命促生产。这一点从什么道理讲？从物质变精神，精神反过来变物质。我们从哲学方面来看看，很清楚，人的精神那当然离不开物质了。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说呢，人革命化了以后，就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个问题，我去年在天津的时候，问工厂的工人，问近邻的农民，他就很容易懂这个问题。因为你就讲这个嘛，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人变了，机器变了，生产变了，那是什么东西呢？那是精神变物质很具体很具体……他这个比起在学校里边看得还清楚。导弹核武器，这样快就搞出来，美国从原子爆炸到导弹发射经过十年，苏联经过五年，我们只经过两年，实际上还没有两年。为什么使帝国主义那样吃惊，因为人的精神革命化了。这种精神，毛主席的这种思想被群众所掌握了，它就会必须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抓革命、促生产，一定搞得好，是不用怀疑的。所以这一点在开始的时候，很相信这个问题，同志们也很相信。说是最近有一个社论，（同学说：《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因为的确是这个样子罗。这个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人的革命化，必然会变成物质力量，只要把这个力量组织得好，那就是一种。（漏记）

这是一条。最后一条，通过实践。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更大的发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毛主席的思想会在运动中间经过群众掌握之后，可以更大地发展。不可能设想，这样大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发展。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实践中来的，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

实验中来的。这样一个运动怎么能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我刚才讲的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大民主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如何培养知识分子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怎么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颠覆活动；怎么把精神变物质，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它就必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外国我就讲了这么一些，没有这样长篇大论地讲，只是扼要地讲了一下。当然讲的时候嘛，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就赞成了，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就不赞成了。

所以总起来说，这一次我离开北京时，红卫兵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去国际串联，到底怎么样，还要靠他们评论，但是我做还是做了一些。有时候讲一天，一天也相当劳累，一天要讲四次话的，每到一个地方，人民全城欢迎中国代表团，赞扬毛主席的贺电，所以结果怎么样呢？一到那个地方，人家先给我招待一下，喝一杯酒，就讲了，人家讲话，你不能不讲吧！讲一次，然后在群众大会上又讲，人家讲话你又讲；开完会吃午饭，又讲一次；吃晚饭又讲一次。一天四次。（笑）成绩到底怎样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回去要向毛主席报告，到底做得好不好，自己还很难说罗。那一个任务我也没有完成，上飞机也没有把他们带走，我也不知道人家赞成不赞成，也不能带去。但是不带去也一样，你们在国内搞，通过报纸呀、社论呀、广播呀、通信呀，国际的影响那还是很大的。

所以，总的看来，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赞成我们的红卫兵；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我们的红卫兵，成为一种国际的阶级斗争，已不仅是在中国的阶级斗争。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同志们做得好罗！自然罗！我在工作中间有没有缺点，那……，要不就不革命，不革命你就没有缺点，就象庙里的那个泥菩萨。（笑）你们不是常讲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嘛，怎么能没有缺点呢？没有错误呢？列宁都讲过嘛，上帝都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笑）也可能有。主要看大的方向，大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同志们所讲的，要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我们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进行到底，要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路线贯彻到底，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垮，消灭掉！（热烈鼓掌）

我冒充先生喽，讲到这里。（热烈鼓掌）我还交待一下，在飞机场，同志们给我的材料“王恩茂同志的检查”还有你们刚才给我的这些材料，一下子叫我一次吃下去，（笑）消化不了（笑），我还是带回去。

这件事要是出在你们身上，……我不是给大家常讲吗？你们不要觉得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不一直都是对的。我们自己的错误也不少罗！就是不要找保姆，既然不要找保姆，也不要找保男嘛！（大笑）红卫兵就是要敢闯嘛，敢想、敢干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对于这个文件，（指“王恩茂同志的检讨”）我现在不能细看，你们的工作到底怎么搞法，大概你们自己要问我，这个问题、那问题要问我，大概是有这个想法的。这一条我告诉你们，第一，我已经离开二十天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一天一个发展，一天一个变化；你看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我没有赶上，你看三号这一次，十号这一次，十一号这一次，我都没有参加；我走的时候，中央开会还没有完呢！中央不是开会吗？在北京开会，这个大概你们学习报纸的时候都知道的，还没完我就走了。所以有时候中央有些什么最后决定，我不好乱吹嘛。（笑）如果吹的不好，你们在整我的时候，这就是口供嘛！（笑）本来我就没有心要犯错误，你逼着我犯错误嘛！（笑）

所以离开二十六天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新疆的事情，我不那么清楚，我刚才看了看你们那个东西，看了个题目，有个“九三事件”是怎么回事呀，我也还弄不清楚。

只有一条，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把这个总纲掌握住的时候，大方向就对。

卡拉奇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人民日报》这些时候我没有看见。我在从巴基斯坦到这里来的飞机上——我们自己的飞机——从一号到十二号的《人民日报》带上了，在飞机上带着，我在飞机上才看了。我看你们新疆到北京去串联，有一件事很好嘛，新疆的同学到天山上去挖了一棵……两棵？（同学：两棵）挖了两棵松树送给毛主席，这个事情嘛，又有经济，又有文化，这个是非常好的，我还是在那个报纸上看的。从和田到乌鲁木齐，经过天山，看那个天山上确实有松树，（笑）这点也还是我的一个常识，一个知识。因为我脑子里那个天山上象那个昆仑山一样，光光的，没有东西。（笑）昆仑山也许有东西。我们在飞机

上看到这个天山上边确有森林，很怪的啦，我请教了一下，它那个松树长在这边，（一同学：向阳面）不是向阳面。（笑）为什么山的那面没有，这边就有呢？道理是这样的，那边的雪水少，这边的雪水多。所以，我看到报纸上新疆的同志也有维族的，也有其他族的，哈族的吧？还有汉族的同学们。你们这个大学的、中学校的同学们，我看这个事情你们都懂。现在不晓得你们新疆到北京去的都去完了没有呀？（同学：没有！）还有多少？（同学：还有中学生；中学生不让去了，中学都开学了……）我说一下噢，我现在不知道，我不负责任，据说现在允许去了，是不是？（同学：允许去的，中学开学了，象这儿的农二师、八一中学，现在都要开学了，这是事实。）在新疆呀？（同学：是！）那太容易了嘛，你不上嘛！（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革命造反有理万岁！”）你那样说，说你那个地方是个小学，我要上毛主席的这个大学！（大笑，热烈鼓掌）

有没有一半？到北京去的有没有一半？（同学：有！）包括中学生的有一半吧？（同学：有！）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有多少路？（众回答不一）八千里路要走嘛，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有人背着背包走了。（同学：走了好多了！）八千里路要走起来要……？（同学：一年）还要宣传啦，还要跟工人呀，农民呀，革命先辈学习啦，有的时候还要休息一下。但是，这是干革命！这个八千里路要走多少天啊？（众回答不一，伍修权同志说：六个月）大概半年不行。

康生同志讲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疆串联的一同学问：中央是否有这样的指示，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赶出城市？

康老回答：“没有这样的指示”。（这位同学拿出乌地区红卫兵总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颁布的（66）纠字第四号通令交给康生同志看。按：这是多数派组织发出的通令，发出后得到自治区党委的配合执行。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通令。新大革命造反团及其他革命“少数派”社团都发出通告，宣布这一通令无效。）这位同学作说明说：“这个通令发出后乌鲁木齐公安机关配合行动，乌鲁木齐不但是把五类分子、牛鬼蛇神的往外赶，还有的不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也往外赶。我们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同志与自治区党委联系多次却没有解决。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我们找王恩茂同志多次，十一月十三日找王恩茂等了八个小时都没有解决，我们觉得这是形‘左’实右的，特别在现在自治区有些

单位才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在前一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的还没有平反。发出这一通令是不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我们向您请示。”

康生同志答：“我知道中央没有这个规定，这是情况不了解。运动中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真右派，假左派’的人不能划成牛鬼蛇神，这些还是革命的。别那样讲，不对。我们自己（指红卫兵组织）不能这样讲，即使这里有牛鬼蛇神，这时也不好处理。”

（又有人说，王恩茂同志说：“你替我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当第一书记也是不容易的，不然你们当书记试试看。”请康老反映给毛主席，好好批评批评他。）

康生同志说：“好。这样说共产党也不好当。全人类的命运交给了我们，不仅不好当，有时命也要牺牲。革命怎么那么容易！”

〔这次亲切的交谈至十六日晨二时半（乌鲁木齐时间）。结束后，红二司八农造，一中造等赶来，康生同志又与之作了十分钟的交谈。农学院革命造反团，农学院革命火种造反团等单位的同志也陆续来了。想问问题，反映情况人很多，时间已是深夜两点半了，康生同志还须于十六日早晨乘机离乌返京，就只好结束了这次接见。〕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红二司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记者记录整理）一九六六十一月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新疆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电文

新疆自治区党委、区人委、生产兵团党委并转各级领导和参加这次批判自治区党委和生产兵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同学和工人们：

新疆这次批判自治区党委和生产兵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革命行动，中央积极支持。

革命学生和工人激于义愤而采取的静坐、绝食和停工的行为，责任完全在于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中央对于革命同学和工人接受中央关于恢复饮食和工作的建议，表示极大安慰和热烈欢迎。

对于所有参加和支持这次革命行动的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服务人员和机关干部，中央责成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必须保证：

- 1、动员全市、全疆人民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 2、欢迎参加斗争的同志进食和复工。
- 3、迅速医治身体遭受损伤同志的疾病。
- 4、不许有任何歧视和报复。
- 5、不许扣发工资和调换工作。
- 6、不许对他们家属进行迫害。各级领导如违反以上保证，将受到严厉处分。

中央急切等待参加这一革命行动的同学和工人立即推出负责代表，由王恩茂同志陪同来北京，解决一切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来源：原载新疆红二司《新疆红卫兵报》编辑部编印《红日照天山：关于新疆问题中共中央文件及中央首长的讲话》，1968年10月)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关于《新疆日报》报社事件的电报

新疆军区党委、红二司、革命职工联合总部，并抄有关各群众组织：（均请新疆军区抄转）

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参加武斗的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

二、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

三、新疆日报的问题，由新疆军区组织双方代表通过协商解决。报纸出版如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二十三时

(来源：原载新疆红二司《新疆红卫兵报》编辑部编印《红日照天山：关于新疆问题中共中央文件及中央首长的讲话》，1968年10月)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给新疆大学的指示及新疆军区的声明
〔新疆大学“红三连”要召开“五·二七”民族大会。周总理发出紧急指示〕
立即研究说服不要开这个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新疆两派全体在京代表《关于坚决执行总理五月二十六日指示的联合紧急决定》（摘要）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五月二十六日晨批示了三新赴京代表团关于坚决抵制新大星火燎原三连等组织五月二十七日决定在乌市、喀什等地区召开纯少数民族参加的“彻底粉碎王恩茂三条黑线的反动理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光辉民族政策。”的大会的报告，总理指示立即研究说服新大星火燎原三连不要召开这个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三三五部队关于红三连召开民族大会的声明（摘要）

新疆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所属红三连预定于五月二十七日召开有数万名少数民族人员参加的所谓“打倒王恩茂大汉族主义”的群众大会。我们认为，召开这样的大会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是民族分裂会议，是不利于各民族人民团结对敌的，是不符合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利益的。红二司、新工总、新农总反对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这一严正立场。

1968. 5. 26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为制止乌鲁木齐市武斗给新疆军区的指示
一、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由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个人，要拿你们是问！

二、给南梁地区送面粉。

（根据有关消息，传达报告整理）

（注）七月二十日发生了武汉反革命事件，以武汉《百万雄师》为师的新疆三促，在王恩茂之流的指挥下大肆屠杀我三新革命造反派，他们一手制造了“七·二六”新疆医学院大血案，“七·二八”畜牧厅大血案，同时已调集兵力，准备于七月二十八日夜全面包围新大、八农、新工等，妄图一举打平三新。

就在这最最关键时刻，周总理命令新疆军区制止了这次更大的屠杀。当夜，军区给红二司打来电话，声称：（1）从晚十时至凌晨六时全市戒严，（2）给新大“星火燎原”送面粉；（3）恢复两派关于制止武斗的谈判，云云。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新疆奎屯农校武斗事件的电报
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转奎屯驻军：

据报告，农七师农校发生严重武斗，红战团于今日攻占了红旗兵团三百余人所固守的大楼，人员下落、伤亡情况不明，请你立即指定专人，对此事进行妥善处理。

1、绝对保证红旗兵团三百多人的人身安全，不准以任何借口对他们进行迫害，不准逮捕同情和支持他们的群众。

2、对伤员要妥善治疗。

3、对双方要做好政治工作，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各群众组织之间，如有不同意见通过协商解决，要坚决制止武斗。

4、上述处理结果和双方伤亡的数字迅速上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给新疆“红二司”来电指示

〔时间：晨四时四十八分至五时零四分。〕

摘要（摘自电话纪录）：

你们这几个月的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好的喽！这几个月我并没有管你们，也没有给区党委打电话，主要是考验你们了。目前是大联合、大批判、不要派性压倒党性了，不要走过了头，我需要提醒你们。……

你们的战友有的受了伤，有的被打死，军队做过了火。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处理这件事，要惩办凶手。……

对边境地带不能去了，有些地方是秘密的了，不能去了，是前哨。我讲的是阿尔泰，伊犁。伊犁有个副司令员，几个月没有工作了。同志，你们去的太远了，那是苏修的边界，一定要处理好，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十月一日的国庆节，任何地方只能是由毛主席任命的军区司令员，政委主持，不能由你们红二司主持，你们也不能做新疆第一领导人嘛！……

你们与新疆军区有敌对情绪，不能把其他组织排除在外。……北航在新疆做的也不一定都对了，你们不能都听他们的。

总之，我给你们打电话是关心你们，我先给你们打电话说清楚，再给张希钦打电话，这是很照顾你们的了。……一些问题还是由军区领导了，你们不能包办，不能派性压党性。我是长期支持你们的了，一直没有说话。今天给你们打电话，我感到有些问题要重新提醒你们不要走过头。……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周恩来关于召开国庆大会等问题给新疆的指示

〔时间：上午，总理来电指示（要点）〕

- 一，都不要在人民广场开会；
- 二，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三三五部队自己开；
- 三，红二司在南门体育场开；
- 四，工农革委会等自己找地方开。

（注）：关于召开国庆大会，我三新革命造反派遵照总理指示，积极准备参加军区的大会（当然也有不少战士思想不通），但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王恩茂一小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二八”惨案。当时中央考虑到在一起开会可能发生问题，决定分开庆祝。这样又出现了会场问题，都想在人民广场开会，争持不下，所以总理就作了如上四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关于新疆喀什问题给七三三五部队的指示

总理给七三三五部队派往喀什解决问题的孟昭远同志来电指示（摘自电话记录）：

“喀什地处边疆，是反修斗争前哨，必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要坚决贯彻《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当地的公路交通不允许任何人阻碍破坏，谁要设路卡、路障、破坏交通，要对该组织负责人查处。……你（指孟昭远同志）就代表我们中央监督他们双方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给喀什问题调查团来电指示要点

〔时间：北京时间凌晨三时。来电从武汉发出。喀什问题调查团由新疆军区、七三三五部队红二司组成。〕

一、无条件开放交通，以前没有下命令，这次要给你们下命令；

二、八野、四野的武器立即收交，群众组织的武器由自己统一封存，今后喀什由七三三五部队负责监督；

三、到晨六时（北京时间）将工事全部拆除，并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志汇报。

抄自《四一八通讯》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

（注）喀什造反派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在晨六时前将自己的防卫工事全部拆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哈密问题的指示

总理秘书传达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的指示：

“铁路交通是国家的命脉，而且关系到国际影响问题，尤其目前冬季来临，粮食、煤炭的运输任务非常繁忙，铁路的断绝会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总理指示，委托七三三五部队驻哈密××航校派出部队监督哈密铁联，红联（三促观点）于十月十四日已达成的四项协议的执行，保证哈密站运输畅通。”

“总理指示：哈密车辆厂，××厂两个工厂和工务段和机务段只能在厂内闹革命，不准到铁路线上去串连，不准在工作时间辩论，不要影响铁路运输。总理指示：今后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这是违背国法的。维护交通安全这是当前国家的最大利益。”

（抄自《四一八通讯》十二期，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对参加全国铁路会议代表的谈话中关于西北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零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全国铁路运输会议的代表，听了造反派的汇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总理从东北、华北、中南又问到西北。

总理说：“哈密最近又有问题，车又不通了，这是怎么回事？乌鲁木齐的来了没有？（说着就翻看登记簿）”

问：“钱锦祥、丘国权来了没有？”（钱、丘二人站了起来，不语）

总理又问：“你们是铁路军管会的吗？是那个部队的？空军还是陆军？”

（这二位吞吞吐吐半天不语。我铁造司代表申世侦同志站起来回答：“他们是新疆军区的。”）

总理：“嗯，是新疆的。新疆军区和造反派对立的很厉害呀！空军是支持造反派的。”

申接着说：“我是第一铁路工程局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观点的代表。”

（总理立即翻看登记簿，边看边说）“嗯，你是红二司的。”关切地说：“你说下去，说下去。”

（申向总理汇报了我局自四月份以来，运输生产一直处于被动瘫痪局面的根源。）

总理说：“嗯，是乌鲁木齐的。军管主任钱锦祥，管生产的丘国权，运输处处长汪文富和彭兴根、米本立、孙如喜。”（总理一一点名，他们一个个站了起来）总理看他们一下站起六个，就问申：“你叫什么名字？”（申回答了问话）总理又问：“就来你一个人吗？”

申答：“只有我一个人。”

总理说：“二司在这里也是少数啊！”

申汇报：“这次会议，军管会没有通知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了，在七三三五部队帮助下才来到北京。我们局从五月份以来，为了抓造反派，截车、停车、罢工极为频繁。……我们在元月份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夺了我局党、政、财、文大权。三月二十日军管后宣布夺权无效，抓‘一撮反革命’，把我们压下去。后来军管会搞了第一线生产指挥部，由十五人组成，我们这一派无一人参加，从而把多一半的广大群众排除在外，剥夺了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运输。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总理激动地说：“二司在很多地方是少数，你们（指局军管会、铁联总）在很多方面压他们。压是不行的！”

申接着汇报说：“目前乌鲁木齐武斗仍在加剧，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我局二司观点的职工有一千多人被迫在外地，不能回局参加生产。从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七日，仅我们铁路职工就被打死七人，重伤残废近三十人，轻伤近百人。”

这时总理又关怀地问：“这些人现在什么地方？”

申答：“在外地，北京、西安、兰州、嘉峪关、哈密、乌鲁木齐。”

总理问：“你们组织有多少人？”

申答：“我们局在西北各省都有任务，五省都有我们组织的人，在新疆境内有四，五千人。”

总理听完后对苏静说：“乌鲁木齐局两派都不要走，留下来解决问题。”

总理接着说：“乌鲁木齐、广州、柳州开完会都不要走，留下解决问题。……”

最后总理说：“铁路是关键的企业，今年只剩下两个月了，任务很重，运输抓不上来，要影响整个建设。你们要搞大联合，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过春节以后，再把全路的同志们找来学习一次‘斗私批修’，再看看情况。”

（摘自第一铁路工程局革命造反司令部参加全国铁路会议代表记录材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在京学习代表时有关新疆问题讲话摘录

〔时间：67年11月9日晚11时至10日零时30分，地点：国务院小会议室。李富春、李先念在座。〕

总理对铁路代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略）。接见时总理问了新疆铁路的情况，并作了重要的指示。

总理问：哈密铁路一直有问题。哈密、乌鲁木齐的来了没有？（两派的代表都站起来回答：来了。）你们来的不少啊！二司和我老交道了，我很熟悉。（铁造司向总理汇报了我局铁路运输及目前问题时）

总理说：哈密的情况我知道。新疆的问题我知道。你们铁路受地方影响，地方受军队影响严重啊！部队新疆军区和空军对立，兵团介入地方，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解决部队的问题，要“釜底抽薪”，“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先告诉你们，最近要把新疆部队负责人找来解决。

新疆问题没有解决，你们铁路自己搞嘛！铁路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搞联合呢？当然，部队问题要先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左齐传达周恩来对新疆的指示

〔时间：11月17日下午，地点：京西宾馆。新疆军区付政委左齐同志对伊犁红造会宋××兵团农四师周×××、××部顾问××亲切交谈，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总理说：如果再让王恩茂上台，就等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胜利。

左齐同志：说伊犁的造反派是很坚强的，广大革命群众站在造反派一起。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什么也不怕。现在造反派都回去了吗？

高：回去了一些，还有一些在外边。马申等人现在正在伊犁和造反派谈判，他反诬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

左齐：他难道不知是让王恩茂之流打击出去的吗？他们（指新疆军区“四野”）一定是错了。总理对伊犁造反派很关心，打电话让军区派人把外边的造反派接回来，好好安置，他们对抗总理指示是不行的。

高：我们造反派有的回去了，“四野”他们扬言还要打我们造反派。

左齐：他们还打，那更好么，那不更加暴露了呀。他们不敢打你们告诉伊犁的造反派要回去就是周总理叫军区接你们回去的，看他们敢怎么说。“四野”中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一小撮坏头头后边，还有人操纵，张什科，还有那张胖子（指张学勤）等人签署的，把造反派当反革命镇压的命令，你们见到了吗？

高：听说现在在“四野”哪！

左齐：这是犯罪行为，你们可以给张什科他们写信，叫他们认罪，不要再犯罪了。中央最近就可能着手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对于胜利大家要充满信心，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们！

昨天孔付司令员说了兵团的造反派把“八野”、“四野”都看成反革命，这不好，因为“八野”、“四野”还有很多群众，是受蒙蔽的。要注意到这一点，主要抓他们的一小撮坏头头么！

（当问到总理 11 月 9 日在铁路驻京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疆问题一段讲话是不是和传单上报导的内容一样）

左齐：是的，是这么说的。

问：郭一平（总理联络员）曾经对刘汉等四个部长说：“如果再让王恩茂上台就等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胜利是吗？”

左齐：是这么说的，不过不是对刘汉说的，是对军区喀喇昆仑的同志说的，话是这么说的。

现在看来新疆问题快要解决了。你们要整理材料，现在老保在北京活动很厉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齐谈中央文革对打倒王恩茂的意见

〔时间：上午〕

新疆军区付政委左齐，阿勒泰军分区付司令员，8015 部队孙付师长，政治部田主任等首长，向兵团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对新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首长们说：当前新疆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一天比一天好。前天中央文革一个同志来和我们谈了四个多小时，谈的问题很多，其中几个核心问题是：

一、关于王恩茂，他（指中央文革同志）是用比较的方法来说的，王恩茂和上海的陈丕显比，与河南的何运洪比，与陈再道比，比的结果是王恩茂比这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恩茂两面三刀，阳奉阴违，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王恩茂必须打倒！这两天中央文革另一个同志也对我说，如果王恩茂不打倒就意味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疆的胜利。

二、打倒有几种倒法，一种是象刘邓那样，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一种是撤职，降低使用。另一种是调离，这都算是打倒嘛！后两种叫做圈外打倒，圈内处理。

三、王恩茂是新疆党的最大的走资派，是刘、邓在新疆的代理人，在自治区就是要打倒王恩茂、昌×才之流，在兵团就是要打倒王恩茂、张仲瀚，在新疆军区就是要打倒王恩茂、张希钦。王恩茂是自治区、军区、兵团党内走资派的总根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关于武光问题给新疆红二司的指示

〔时间：晚十点五十分〕

周家鼎秘书传达总理指示：

总理说：在武光问题上，总理和康老曾经提醒过你们。他说，他一直等了半年多时间，本来由你们起来揭发，但是一直没有消息，北航的同学不但没有揭发，反而把武光保护起来了。现在已经由北京的专政机关把武光逮捕了，总理要我把这个消息正式告诉你们。总理说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已经晚了，总理提醒你们，你们没有做这件事情。总理接着又讲，你们已经提高了警惕，并发现了一些坏人，黑手插手新疆问题，你们现在应当自己起来，把黑手揪出来。对于受坏人的挑唆而作出了一些不利于新疆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由于受坏人的蒙蔽，坏人的挑唆在新疆地区作出了一些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和不利于团结对敌的事情，应当

有勇气正视和检查。总理说的这段意义，你们既然已经警惕了这个问题，并发现了有坏人插手，你们就应当自己起来把坏人黑手揪出来。

总理他又接着讲：新疆的红二司作为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他是一直关心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半多了啊，大家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政策水平都应当有所提高。现在，希望你们根据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的最新指示，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对自己内部的坏人应当杀一枪，懂不懂这个意义，就是说你们内部不好的人，坏人就得杀一枪，杀一枪的意义不是当真用枪打死他罗，就是你们自己应动手把他揪出来罗，把黑手揪出来。过去作错了的，你们改了就好嘛。要象林副主席所指示的，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立新功。这是总理讲话大意，这个精神不会错的罗。这个话是我传达的，不要扣每字每句上，主要领会精神，总理昨天听了我的汇报。

（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关于逮捕依敏诺夫给新疆红二司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零点二十四分至二十七分，总理办公室来电，传达了总理指示：周总理命令我们立即把依敏诺夫逮捕，押送军区看管。责成我们将此事处理情况，另上报中央。

（摘自《星火燎原总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零点三十分决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周恩来接见铁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讲话中有关新疆问题摘录

【一九六八年元月五日下午二点四十五分至五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五个铁路局的谈判代表，新疆铁路系统的两大派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在谈到西北情况时，周总理说：

青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青海就促进了甘肃的兰州，还有什么宁夏、陕西、最后是新疆。新疆嘛是最后了。红二司和一、三司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指铁路局两派）已经是很不容易啦。我首先祝贺你们。

红二司同志来了没有？（铁路司代表站起来答：来了！）啊！久别了。一、三司的同志来了没有？（铁联总代表站起来答：来了！）听说你们协议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武器上交给谁的问题，刚才我和铁道部军管会还有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室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新疆的问题我比较了解，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新疆军区嘛，主要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新疆军区出两名代表，空九军出两名代表，红二司（指铁造司）出两名代表，一、三司（指铁联总）出两名代表，共八人组成查封、收交、保管武器小组，红二司你们同意吗？（铁造司代表答：同意。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一、三司的同志同意吗？（铁联总代表答：同意。也高呼了口号）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嘛！

在谈到制止武斗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要武斗，“六·六”通令，“九·五”命令都说了，已有多次规定，要执行，武斗要停下来。武器可以封存上交，困难是武器交给谁，军管会有些派性，群众不信任。如新疆，采用各派组成小组保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关于新疆铁路两派在京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并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贺电

新疆军区、铁路第一工程局军管会转一工程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同志们：

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一铁路工程局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北京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并于本月二十七日召开实现革命大联合庆祝大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特表示最热烈地祝贺！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到国防建设和战备、援外，关系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最迅速地把铁路运输促上去，是当前铁路系统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的战斗任务。我们希望，铁路第一工程局的全体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在军管会、当地驻军的领导和支持下，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全国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以

“斗私，批修”为纲，打倒派性，增强党性，严格遵守和贯彻执行你们自己所达成的协议，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继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坚守生产岗位，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军民团结一致，为夺取革命、生产的双胜利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邱会作对新疆军区党委及建设兵团党委的三点指示

〔这是元月二十七日邱会作部长在王恩茂和张希钦作完第二次检查后，对新疆军区党委、兵团党委、7335 部队党委所作的指示。〕

目前最重要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忠于毛主席，要使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新疆贯彻下去：

一、认真地检讨，按林副主席指示，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保是保不住的。（越保越坏，越保越垮台）

二、打倒派性，派性是毒蛇，是大联合的凶恶敌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凶恶敌人）

三、要用最敏锐的思想，在新疆要搞大联合，大联合是根本的方向，要拼死拼活地去抓。（大联合是文化大革命的利益，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注）上面讲话材料摘录自新疆红二司政宣部办公室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关于拼死拼活狠抓大联合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周恩来关于新疆红二司抄赛福鼎家等问题的指示

〔时间：下午两点三十分〕

周峰同志传达：

总理指示说：红二司这样做是不对的。

运动已搞了两年多了，不能再搞打、砸、抢、抄。红二司是新疆一个主要造反派，把他们放在新疆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位置。他们每犯错误，（总理）都及时指出，他们自己也注意改正了，但是不能总犯错误。

拿走的东西都要立即一律交还，今后不能再犯。

（抄自红二司八农兵团《九三烽火》41期68.5.8并参照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学习参考》68.5.31所载校对）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周恩来就限期收回被抢武器对新疆军区的指示

〔时间：八点十分〕

总理办公室周家鼎同志传达总理指示：

三促最近抢枪很凶，总理让我告诉军区，让郭鹏同志对三促做工作，所抢的武器要限期收回，全部交回，否则要通报全国。这种做法是违反《九·五》命令的，是不允许的。限期交回（期限 总理没有讲，请军区考虑），否则要通报全国，一通报，他们就要垮台。据说，三促几次冲击空九军。代表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为什么要这样搞？总理说：请军区出面谈。

周家鼎同志说：

这是总理指示，你就这样转告军区首长。总理要我直接告诉郭鹏同志，请你转告一下。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建设兵团在京负责同志时的指示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十七时五十分至十九时四十五分，地点：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时，新疆军区，七三三五部队在京负责同志也在座。被接见：王恩茂、赛福鼎、郭鹏、张希钦、丁盛、裴周玉、曾如清、孔瑞云、杜海林、王振东、杨贯之、杨宗胜、候全智、朱铁谷、王宝铨、刘楠、陈冠（七三三五部队）同志。〕

总理：大家等久了，兵团情况怎么样？丁盛同志还走不了，也不能老拴在这里。裴周玉同志，对你压力很大，丁盛走，行不行？你的意见怎么样？（裴答：最好不走）最好不走？不走就不走嘛！

丁盛：走是可以的。

总理：我还有些不放心，还没有报告中央，中央文革，孔瑞云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孔瑞云：没有什么意见。

总理：没有什么意见？（指四月十一日）那么多意见？（孔：没有了。）丁盛同志意见怎么样？是他的对？还是你的对？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嘛！不要搞折衷，搞妥协。

孔瑞云：我们去的时间很短，我们想把工作做好，主观愿望是好的。

总理：主观愿望是另一回事。你是从××军去的，你们过去认识，还是丁盛同志推荐你去的。你一去就钻到那边去了。

孔瑞云：我们去不了解情况，按丁盛同志介绍的情况做的，对受压制的人同情的多了一些。

总理：你们是不是感到石河子死的人多一些？

孔瑞云：石河子问题完全拥护总理指示，对石河子事件没有意见。

总理：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主席看的材料比我们多，主席从头到尾把情况告诉我们。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生产兵团成份不纯，石河子就是有陶峙岳的人在里边，有张仲瀚的人，去的劳改犯多，有盲流，情况复杂，边境还闹事，对保卫边疆不利，才决定军管，这是主席告诉的，所以才起草了二月十一日的文件（十二条）。是你们（指丁裴等）起草的，我修改的，中央文革讨论的，主席、林副主席审定的。王、关、戚想插手，我说，这地方不一样，与青海不同。他们（指王、关、戚）经过北航红旗、红二司、王兵弄了不少材料。不然，石河子还会闹起来。你们（指孔、杜、曾、朱等四同志）不清楚，张仲瀚统治了那么多年，他在干部中搞小恩小惠。你们好象觉得对另派压得很厉害。兵团和军队一样，在本单位搞，不能和地方一样，不能到处串连，××军在青岛搞得很好嘛！（孔：我和丁盛同志很熟）正是因为战友，不同意见摆到桌面上，不

能当着丁盛的面一样，丁盛走了以后又一样。认识到错误就痛痛快快改嘛！你们在青岛搞得很好！支持王效禹的嘛！

孔瑞云：我也是支持丁、裴同志的，我认为兵团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压制不同观点，介入武斗是错误的。

总理：不，你那天（指四月十一日）不是这样讲的。

孔瑞云：我那天有些紧张，发慌。

吴法宪：你们那天和丁盛同志争嘛！你们争的焦点，你们（指孔等四同志）矛头是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指丁、裴等同志）是对准走资派的，你们方向就搞错了嘛！

总理：那天你们不同意三、七开嘛！（指兵团的成绩与错误），既然承认大方向对，就不要争三、七开，二、八开了。不要争那些事。就是四、六开，大方向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孔瑞云：我们不争了，同意他们意见，过去也没有什么意见。

总理：没有什么意见？那你们（指孔等四同志）打来了电报嘛！我们才请你们来的嘛！你们的意见代表多少人？你们的意见同多少干部说过，你们总代表一些干部的，你们回去，能不能有把握说服一些干部？（杜海林：我们回去完全可以做）。

孔瑞云：我们没对谁说过，就是我们两个人。

总理：怎么两个人？你们还有谁？有意见都讲一讲。杜海林同志有什么意见？

杜海林：我们原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得过重了，对走资派抓得不狠。

总理：要对准几种敌人，不仅有走资派，还有叛徒、特务、苏修。

杜海林：总理“四·一一”指示后，我们想通了。

总理：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康生、江青同志、文革负责同志、军委办事组同志。你们去是加强兵团的，这是目的嘛！朱铁谷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朱铁谷：没有意见。主要我们对新疆复杂情况认识不足，我们只看到张仲瀚打倒了，余孽轻了，对反动路线看重了。

总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短时间的，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反动路线。“十二条”是毛主席批准的。（朱：我们坚决执行“十二条”。）是啊！“十二条”

是有具体规定的。工厂、农场不要进行串连，值班连队不搞“四大”，医院、学校是搞“四大”的。“八野”要解散，我给丁盛同志说过。“八野”回去时开了一个欢迎会，登了报（指六七年二月原“八野”代表由京返乌市时），我批评过他（丁）。“八野”他们有错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嘛！王恩茂同志参加这次会议（指兵团去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文革大会）招了麻烦。当时，我研究好了。分三个梯队回去，第一是军区，第二是兵团，最后剩下王恩茂、赛福鼎同志，叫他（指王恩茂）回去先到红二司去，他没有这样做，我批评了他。兵团参加了地方武斗不好。但王兵那派不对，长期住在外面，王兵他们回学校没有？小将不要过多责备，但错误应指出。

朱铁谷：他们已经回去了，我们做过他们的很多工作。

总理：你们把反动路线说多了，他们（指不同观点那一派）的气焰就高了。你们的不同意见在家里没对别的干部讲？（朱：没有）确实没有？（朱：没有。不能在总理面前扯谎。

总理：（问裴周玉同志）是不是这样？

裴周玉：公开没讲什么，但他们讲那一派好的多，无形中支持了他们。

总理：文化革命已经两年了，绝对的保守组织没有了，像产业军那样的组织没有了，现在的群众组织里边都有左、中、右。生产兵团的“八野”在石河子问题上是在对的方面的。王兵这一派还没有完全割开，他们支持红二司是对的，但也有错误。不管对哪个造反派，不指出错误，就会唯我独左。（举杭州例子）

总理：曾如清你是什么态度？

曾如清：拥护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到兵团对缺点方面看得多一些，认为错误改得慢一些，有一些着急，比如大联合搞不起来。

总理：只有共同对敌，才能搞大联合。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只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才能搞大联合。斗争的方向一定要对准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共同的基础，共同的敌人，是打击对象。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不然是假联合。

曾如清：大批判有些地方也搞不起来，也有些急。对兵团大方向我们是肯定的，我们调查研究很不够。

总理：兵团还有张仲瀚的余孽。在四月十一日后，我问了王震、张仲瀚怎么样？他讲：张仲瀚近几年变质了。他还讲了句公道话。我说张仲瀚是大地主，是阶级本质决定的。另外加上陶峙岳的余党，再加上盲流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劳改犯，这都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不作这个阶级分析，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兵团×××万人，要作阶级分析。陶峙岳有×万人，还有家属，有地位，有影响劳改犯人，他们也有家属，盲流××万人，有×万多人（多数是好的），有些人（因）本地生活困难一些就住外跑，真正贫下中农是爱土地的，跑去的人混进一部分地、富、反、坏、右分子。动员的上海、武汉、天津支边青年，上海尽量把工人子弟留下，把资本家的子女送去，从上海来讲，是对的，但你们那里增加了负担。当然，对支边青年要一分为二。

吴法宪：他们这些人，造什么反？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这些人的反。

总理：新疆与苏联接壤。（裴：还有五、六万少数民族职工、家属）是啊！不能说一点地方民族主义没有。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怎么能与你们××军××军、××军江苏省军区比？对象不对头。到了新的社会嘛，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都是从五湖四海来开荒的，搞好可不容易。石河子问题发生后，主席三次说：再不能给新疆送劳改犯了。要不是“十二条”，石河子还会乱的，不管犯什么错误，整张仲瀚是对的，幸亏去年在这里开了二十多天张仲瀚的会。叶剑英不管他有什么错误，说什么错话，办了什么错事，但他协助处理兵团的问题是对的，不要光看到高楼大厦，但职工去了没有地方住，住地窝子。张仲瀚把石河子搞得很大，我一去就否定了，叫他分散。他搞石河子大城市计划，你们回去查一查，图还有，要搞几十万人。兵团是很复杂的社会，你们（指孔等四人）要当新社会去研究，不管你们当军长的，副军长的，还是当师长的，都要当新社会去研究。我去也当新社会研究嘛！这个情况下，你们不把面对的敌人当作主要任务，而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主要的。丁、裴只是执行了很短一段反动路线嘛！是认识问题嘛！兵团不同自治区，也不同军区，要具体分析，要一分为二，不然红二司和王兵大闹天宫，这还了得！一听三个名字就够呛，一个叫×××，一个叫×××，还有一个叫×××（插话×××），乱是可以乱的，怎么能大乱呢？加上北航，一开始就去，这点，王恩茂同志又犯了错误，开始我给你打招呼，你对后去的就

招待，保你的就招待，你招待的那几个孩子，还在北航劳改，开除了党籍，不是党员，开除了党籍，这不算数。（王恩茂同志：我有罪）兵团极其复杂，到那里要进行分析研究，和兵团两个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我相信你（指朱）的话，没跟下面说，但裴周玉同志的话是对的。有人找你的时候，你总要表态嘛！总带倾向性嘛！

吴法宪：你们领导就是两派，下面怎么联合？

总理：因此领导统一很重要。丁盛同志去广州，裴周玉同志你怎么样？有信心没有？丁走了谁去兵团？

丁盛：建议×××同志去。

总理：×在新疆多久了？他现在是什么职务？调他去，××不削弱了吗？

王恩茂：赛福鼎，丁盛同志最好不要去。

丁盛：我不会管。

总理：你搞得不坏嘛！

杜海林：根据两派情况，丁还是不要走，他两派都能做工作。

总理：你们（指孔瑞云等四同志）回去，能不能做王兵那一派的工作？能不能说上话？和王兵这一派接近的干部中有张仲瀚的人，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残余（不是国民党起义的都是，而是现在仍有活动的，但不要搞得人心惶惶），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主要的。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朱铁谷：有信心。现在师、团干部大多数站不出来，不能做两派工作。

总理：现在边境情况怎么样？有多少武装连队？受没受到影响？

裴周玉：有影响，比较严重的是伊黎，而且与地方有联系。

总理：这样在破坏“十二条”嘛！除学生外，还有什么人？

张希钦，裴周玉：有职工、有学生。农四师有十二个走资派、叛徒、特务跑出去，还带出一部分人。

总理：就是复杂嘛！你们（指孔瑞云等四同志）回去调查研究，到下面去看看，不要急于表态。

朱铁谷：我们是这样表态的屁股是坐在革命派一边，也支持红二司及其同观点的。

总理：那个革命派？

朱铁谷：原“八野”、“联总”无产阶级革命派。

总理：我看还是站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派。不然的话，就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就是两面派。正如毛主席形容的，嘴里喊不打不打，下面又踢一脚。现在不是运动初期，公开保的全国少了。真正百万雄师这样的没有了，两派大都是革命派，有些又不完全符合革命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件事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错的。现在反右，都把双方说成右，把自己说成左，谁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支持，左派自封不行，你封他也不利，你封他左派，好象一辈子都是左派，不能吃一辈子左派饭。历史是发展的，事物是变化的。你们（指孔瑞云等四同志）要调查研究。要阶级分析，是就是，非就非。去年我去广州讲过红旗派是左派，他们现在还自认为是左派，我去电报讲，你们这是形“左”，实右。不能一辈子左派，千万不要把事物看固定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肯定。北京针织总厂第一条经验，就是调查研究，不要急于表态。到底能不能成为革命派，要看斗争的实践。革命小将才两年嘛，打了几十年仗，还出了个陈再道。生产建设兵团对新疆关系很大，有×××万人，占新疆人口的五分之一，起决定作用，集中，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张仲瀚搞独立王国，象个小国家一样。运输在他手里。

你们要和军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合作。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总要参加几个人嘛！王振东同志，你有什么看法？（当王振东同志讲到，有人说我们执行的是没有张仲瀚的张仲瀚路线时）这句话是错误的，要批判。张仲瀚有什么路线？张仲瀚不仅是走资派，还是反革命、三反分子，他野心很大，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他不只是一条线，还有贺龙支持他。对张仲瀚不能作为反对路线来批判，要作为反革命分子来批判。说没有张仲瀚的张仲瀚路线是错误的。把丁、裴执行的两小段反动路线抓住不放不对。你们（指孔瑞云等四同志）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下结论是最大的错误。

王振东：四位同志过分地支持了“造反派”。

总理：他造谁的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支持。所以支持造反派不一定都对，不是过分不过分的问题，是支持错了。你们说话要明确，确切。

总理：杨贯之同志你怎么看法？（当杨贯之同志说到我们犯了反动路线错误，应严格检查，但方向是正确的时）方向和路线不能分开，执行错误路线时，方向

也不对，不然不好解释。方向是把矛头对准走资派，你们的反动路线虽然很短，但那一段就没有力量斗张仲瀚。你们的反动路线主要是六六年“九·三”，也是在区党委影响下的（王恩茂：这个责任在我），六七年也有一点，介入了武斗，但很短时间，要说清楚，不然概念不清。（当杨贯之同志谈到我们认识上基本一致了，但要看今后行动时）

总理：你们写个决议出来，有文字为凭。这样我就可以看出，你们思想真正统一了没有。

裴周玉：我们有个“纪要”（指兵团党委在京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四月十七日纪要），请中央批一下。（总理翻阅“纪要”）

总理：杨宗胜同志有什么看法？

杨宗胜：中央对兵团问题处理得早，不然不是现在的情况。

总理：兵团那四个人怎么样？（指陶晋初、陈实、刘一村、王慎）回去了没有？

裴周玉：没有回去，请求批准弄回去斗。

总理：先把领导思想统一了，再把那四个弄回去斗。不然他们还会放毒，回去斗不起来。张仲瀚有社会基础，千万不要忽视。

总理：候全智同志有什么看法？（当候全智同志谈到兵团机关保张势力情况时）

总理：政治部、干部部、卫生部的四个人支持王兵他们，支持红二司绝食。我问他们绝食没有？他们说没有，是搞后勤的。他一句话我就看穿了。对绝食的态度，我是一反对，二和你一道绝食，三支持不住时就劝你复食。我一说，他们脸红了。有卫生部的，有文工团的，绝食时送了东西，他们先吃，张仲瀚躲在医院里，我叫他找绝食的头头，他一下就找到了王兵。现在政治部情况还没有改善吗？（候答：没有）总得想个办法。应该提下边新的成份啊！斗、批、改搞了没有？（候答：斗了，还没有改）

（当候全智同志汇报到兵团机关的阶级成份复杂时）

总理：要是这样，你们四个（指孔瑞云等四同志）真是思想通了，就回去做工作，或者下放一些人劳动。

总理：王宝铨同志，你们机要局怎么样？几个人？（王答：××人）没有出去串连？（王一派）那不错呀，你们有点突出政治。

总理：王宝铨同志有什么看法？（当王宝铨同志汇报到过去张仲瀚时期不学毛主席著作时现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主席语录是否普遍？

王宝铨：普遍。但有些保张分子不参加学习。

总理：要做工作。

（当王宝铨同志汇报到保张分子善于搞两面派时）

总理：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知识分子当面说得好，回去就变了，搞两面派。当面他说保密，但马上就上街贴大字报。反正我们有了经验，我们讲的话，就准备他贴大字报。这是刘、邓、陶的一套作风，他们继承了，最恼火。当面吵架都可以，就怕背后搞鬼。培养这样的接班人多危险啊！你们（指孔瑞云等四同志）新去，可要谨慎。

吴法宪：我们要相信诚实的人。

（当王宝铨同志谈到新来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时）

总理：搞革命要分清敌、我、友。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一致的，民主革命阶段打倒三座大山，团结的面宽一些，现在窄一些。

总理：刘楠同志有什么意见？

刘楠：和他们一样。

总理：文革的工作很复杂、很繁重。文革主任是谁？文革范围这么大，你们的工作怎么搞？你们要把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讲话和中央首长的讲话多宣传，中央这么多指示要放录音嘛（当刘楠同志谈到批判张仲瀚的材料发不下去时）要宣传毛主席的嘛！这样还敢反对吗？你们第一步先不要把批判张仲瀚的材料拿出去，要首先把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讲话印发。要突破封锁，要注意方法。先不要与他们顶牛，因张仲瀚并没有死，是活的，不是死老虎，不是死灰复燃，而是活的，鬼火还没烧完。你们搞些宣传队，到边防农场去，把毛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声音、中央的声音，宣传到部队，使广大职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吴法宪：“九·五”命令，江青同志的讲话也多宣传。

总理：象货郎担子一样，走到那儿宣传到那儿，宣传毛泽东思想。

吴法宪：兵团办学习班了没有？（答：办了）兵团坏人多，情况不同，总理进行了阶级分析，你们不要发急，要一层一层地剥，要逐步来。

总理：不要急，一步步来，你们这么多边境连队，不要搞乱。兵团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没出大乱子，没跑出几个嘛！（指外逃）这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证明毛主席的伟大，祖国的伟大。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别的国家谁敢这样干呀？

吴法宪：军区、兵团、空九军都统一了就好办。

邱会作：根据总理指示，“纪要”写得很平，针对性不够，没有角，不尖锐，主要从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分析不够，关键是兵团领导班子不团结，争论焦点，一是反张仲瀚，一是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面不统一，下面就有文章了。

吴法宪：把批判反动路线和对走资派分开是不对的。说丁、裴方向对，又有反动路线，这样说不通。顶多说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石河子问题处理是正确的。反动路线是刘、邓、陶的，是资产阶级的，是保护走资派、叛徒、特务的。不能把概念搞错，总理指示很清楚，处理石河子问题，执行的不是反动路线，是革命路线。上次（四月十一日）你们（孔瑞云等同志）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概念也搞不清。

总理：张仲瀚的阶级基础，就是刘少奇的阶级基础，张仲瀚的一套就是刘少奇的一套。张仲瀚不是五十天，十七年的问题，而是从入党以后就表现出来，就叛变了。当然，党内的阶级斗争不是一个人，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还有陈独秀、王明、瞿秋白、李立三等。但张仲瀚本人的反动基础和刘少奇是一样的。在大方向上，不批张仲瀚就等于不批刘少奇。处理石河子问题上是正确的，有两小段时间犯了错误。你们（指孔瑞云等四同志）概念就没有搞清楚，可能“纪要”也没有搞清，要重搞一下。纪要也好，决议也好（吴法宪：决议好），要尖锐一些，要戳穿说，决议要取得丁盛同志同意，取得一致，（吴法宪：写二、三千字就行，搞个好决议，统一思想，按兵团情况）兵团写个好决议，对促进军区，自治区问题的解决有好处。去年王恩茂同志没有搞好。兵团有个小反复没有想到。王、关、戚要为石河子翻案，风很大我们顶住了。石河子的案，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不能翻。

邱会作：写决议旗帜要鲜明，张仲瀚的案不能翻！石河子的案不能翻！“十二条”不能反！写个好决议，经中央批准就好了。你们的生产要抓上去。

吴法宪：要按总理指示办，总理对兵团很重视，你们要抓好，你们要真正一致，要在毛泽东思想上的一致，不同意见可以摆到桌面上来，但决不准搞资产阶级两面派，双方都要高姿态，检查自己的错误。

总理：兵团的决议搞出来，经中央文革讨论，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批准，对促进新疆大联合很有好处，贯彻好决议一致了，敌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吴法宪：四川就是敌人钻空子、搞挑拨、兵团有没有这个问题？（邱会作：敌人已钻了他们的空子）

总理：新疆绝大多数是好的，不仅军队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各族人民绝大多数也是好的，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这么大边境线没有出问题，没有主席的威望，没有林副主席的威望是不行的。丁盛同志主持搞个好决议。（丁盛：我不行）你搞得不错嘛！你再等两天，稿子定了以后再走。

吴法宪：（对裴讲）你们一定要写个好决议，不要和稀泥，是非要搞清楚。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通过）

经中央批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受到了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是对兵团全体同志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四月十一日、五月四日，中央、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首长两次接见与会同志，对兵团的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与会同志一致拥护，并进行了学习和讨论。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团结对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特作如下决议：

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兵团地处反修前线，内部的阶级成份不纯，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尖锐。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在兵团的代理人张仲瀚及其死党，长期以来，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为后台，以隐藏在兵团内部的叛徒、特务、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为基础，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培植反革命势力，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兵团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依靠忠于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广大指战员，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兵团的代理人张仲瀚和他的死党，粉碎了他们一次有一次疯狂地反扑，戳穿了他们的种种阴谋，揪出了以张仲瀚为代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特务，夺了他们的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证明了兵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兵团党委常委在运动中也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表现在：一九六六年“九·三”参加了围攻革命小将，压制了不同观点的群众；一九六七年七月间介入了地方武斗。在其它日常工作上也有缺点错误。对这些错误必须严肃处理对待，吸取教训，认真改正。

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审定的《十二条》规定，是兵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稳定兵团、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强大武器。兵团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捍卫和贯彻了《十二条》，保证了兵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

张仲瀚、武光及其党羽操纵和蒙蔽部份群众，猖狂地反对《十二条》，成立“批判《十二条》委员会”，污蔑《十二条》是“大毒草”，是“反革命纲领”，追查指定《十二条》的“幕后人”，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股反革命妖风，兵团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给予了有力回击。对那些由于认识原因而违背《十二条》的错误行为，也进行了批评

教育。今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模范地执行《十二条》，勇敢地捍卫《十二条》，继续与违犯和破坏《十二条》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三、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复辟和共产党反复辟的一场流血的政治战争，是张仲瀚、武光及其余孽血腥镇压兵团原“八野”、“联总”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夺权的反革命事件。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给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支持，及时地给这一反革命事件定了性，定了案，作了英明果断的处置。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仲瀚、武光及其黑后台的操纵下汽二团的“工造团”，污蔑这一事件是“武装镇压‘造反派’”、“‘一·二六’事件定性没定案”，“石河子的案我们翻定了”。这是明目张胆地跑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为张仲瀚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翻案，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翻案，必须予以坚决揭露、批判和粉碎。

四、兵团各级（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兵团取得伟大胜利的产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成果，是领导兵团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已发挥了很大作用。广大革命群众必须积极支持、帮助它不断发展和完善，维护它的革命权威。对那些攻击“文革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派性文革”，以及“砸烂文革”、“踢开文革”等错误言行都要进行批评教育和坚决斗争。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耐心地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张仲瀚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虽然被揪出来了，但他们不是死老虎，而是活老虎，不是死灰复燃，而是鬼火还没有烧完。张仲瀚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在不断耍阴谋、施毒计，挑动群众斗群众，策划武斗。他们操纵“xxx”死死抓住兵团党委一些错误不放，并大肆造谣，无限上纲，恶毒攻击，污蔑兵团党委“系统地、全套地、持久地、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了没有张仲瀚的张仲瀚路线”，诽谤兵团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大倒退”，等等。他们明目张胆地转移斗争大方向，否定兵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妄图为张仲

瀚翻案。对他们这种狂妄的和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必须予以坚决揭露、批判和粉碎。必须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主动地、连续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把阶级敌人挖出来斗倒、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张仲瀚的阶级基础，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张仲瀚的一套就是他们的一套。在大方向上，不批判张仲瀚就是不批判刘、邓、彭、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

当前，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坚决反对反革命两面派。对那些长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单位和部门，如公、检、法，必须坚决砸烂，彻底改组。我们要战胜阶级敌人，必须善于清理和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广大群众组织和混入其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继续做好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壮大革命队伍，团结和争取同盟军。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工作，加强军民团结，巩固民族团结。按照《十二条》规定，在斗争中进一步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使一切革命力量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共同对敌。

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必须认真贯彻、坚决执行。兵团担负着建设祖国边疆、保卫祖国边疆的繁重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到伟大红旗，用革命统率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农牧业、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及其它生产建设任务。必须加强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擅自离开生产岗位、工作岗位。坚持归口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就地闹革命。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搞好工作，加强战备。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坚决抵制和批判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坚决镇压那些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建设的阶级敌人。

七、“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务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兵团复杂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反映到兵团党委内部来。在前一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党委内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新来的四位同志，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既无认真的调查研究，又缺乏阶级分析，不加区别地抓住兵团党委两小段时间里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放，把支流当成了主流，误认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要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闹得党委内部不团结，因而就影响了对张仲瀚及其一小撮余孽的斗争。这是认识问题，但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分清了是非，促进了团结，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党委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要发扬民主，“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反对“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行为。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八、“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高统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做好一切工作的灯塔。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对毛主席一定要心怀一个“忠”字，对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狠抓一个“用”字。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坚持“天天读”的制度。要继续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使兵团同志都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战士，誓把兵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以上决议，各级党委、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全兵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3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疆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和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仍然在继续挑动武斗，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团结

对敌。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忠实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彻底粉碎阶级敌人挑动武斗的阴谋，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实现、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新疆各革命群众组织在京代表，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以实际行动向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学习，经过充份协商，就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达成如下协议：

一、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布的“六·一”命令、“六·六”通令，“六·二四”、“七·一三”、“九·一三”、“二·一八”通知、“九·五”命令，以及总理五月二日的指示，立即制止武斗，上交武器。

1. 立即停止各种形式的武斗，立即停止打枪、打炮。要识破和坚决反对阶级敌人挑动武斗的阴谋。

2. 各革命群众组织所拥有的武斗武器和凶器（包括军用和自制的枪、炮、弹药、炸药、雷管、长矛、匕首以及半成品、化学毒剂等），以及电台、报话机、自制密码，在协议签字十二日内，全部登记造册，就地集中，报告联合监督检查小组检查验收（包括本协议达成前上交的武器），上交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或当地驻军封存，由联检小组共同研究处理，并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备案。原来用于制造武器所占用的设备、机器、材料等，必须立即登记造册，经联检小组检查后全部归还原单位，投入正常生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准隐瞒转移、私藏和私自销毁武器，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再制造、抢夺、输入输出各种武器、凶器和通讯器材。如有违反上述规定者，各群众组织应主动各自扭送和报告联检小组，由联检小组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如有包庇和隐瞒者，应对该组织头头严加惩处。

3. 在协议签字十二日内，各群众组织拆除一切武斗据点，拆除武斗工事、关卡，路障，不准以任何借口保留。确保交通运输畅通，任何群众组织不得戒严。确保邮电通讯畅通，不得扣押信件，邮包、电报，不得窃听电话等。

4. 协议签字五日内，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如作战部、治安处、保卫科、制止武斗指挥部、自卫联防指挥部、专政队、武功队、联络站及单方面的护厂队等等）以及其它一切变相的武斗组织。

5. 各群众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从外单位、外地区调来本单位、本地区参加武斗，也不准到外单位、外地区参加武斗。绝对禁止调动农、牧民进城参加武斗。

二、充份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障“四大”的正常进行和人身安全，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破坏对方的集会、游行、宣传、演出及其它一切革命活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互相攻击、谩骂（包括大字报、标语、广播、传单、报刊等）。不得撕毁大字报、大批判专栏，拆除高音喇叭。严禁打、砸、抢、抄、抓、杀，严禁搜捕、殴打、侮辱、迫害、暗杀，严禁私设公堂。各群众组织现仍扣留的人员，无条件的在协议签字后五日内，全部保证安全送回原组织、原单位。其中罪证确凿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刑事犯、严重打人凶手、杀人犯、里通外国分子、现行犯革命分子，经过联检小组审查立即交专政机关查处。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迅速掀起生产新高潮，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坚决贯彻中央“九·一三”通告、“二·一八”紧急通知，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和抢夺国家和集体的厂房、设备、车辆、粮食、商业部门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以及私人财产。过去非法占用、抢夺和强占的，必须立即全部归还原单位和个人，严禁破坏铁路、公路和通讯设备，如有破坏者，按中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外出和外单位人员（包括生产兵团外出人员），在本协议签字十二日内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立即动员他们回到自己的生产、工作和学习岗位上去，立即参加生产和工作。对返回本单位、本院校的人员，要热情欢迎、不得因观点不同进行刁难、歧视、克扣工资、工分和打击报复。过去扣发的工资、工分，一律按中央有关规定予以妥善处理。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不折不扣地执行“八条”、“十条”、和“九·五”命令。进一步掀起拥军爱民的新高潮，加强军民团结、密切军民关系，积极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三

支”“两军”工作。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和部队，不得围斗、抓打、侮辱和扣押解放军指战员，不得抢夺军用装备、物资、车辆，已抢夺的按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款处理。严防阶级敌人以任何形式破坏军民团结、破坏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捍卫毛主席光辉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新疆地处反修、反帝前线，又系多民族地区，敌情复杂，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必须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增强敌情观念，严防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对制造挑动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行为，坚决抵制、彻底粉碎。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的批示，各自清理阶级队伍，充份发动群众，整顿组织，清查混入本组织中的坏人。

七、自治区公、检、法系统、铁路系统、煤炭系统、气象、电讯、财政、银行、体育、军工厂矿企业等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中央规定进行，外单位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介入和干预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准到外地串连。为确保边境安全，更不准以任何借口到边境地区活动。

农村要按照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城市和农村互不干预。

八、为保证本协议的贯彻执行：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即十二条），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互不介入，互不干预。

1. 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捍卫、忠诚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一切命令、通令、通知，以及本协议，提高政策观念，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充份发动群众，做好思想工作，搞臭武斗歪风。

2.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自觉动手，模范执行本协议，执行好的要通报表扬，对违反和破坏本协议的组织和个人依据情节轻重，给与通报批评和依法惩处，

对于挑起武斗的幕前指挥和幕后策划者、阶级敌人、坏人和打死、打伤人的凶手，各革命群众组织不得包庇，应各自主动扭送专政机关，依法惩处，如有包庇坏人者由各组织头头负责。对于对方组织的上列人员要主动向对方组织提供材料并报告联检小组和专政机关处理，不得以任何借口到对方组织中去揪人。

3. 由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 7335 部队以及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派出对等代表，红三司派出一定比例代表，共同组成乌鲁木齐地区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各专、州、市、县由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当地负有支左任务的驻军以及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对等的代表，组成当地联合监督检查小组，监督检查本协议的贯彻执行，并有权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

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在军方组织下进行工作，执行任务，行使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代表小组活动，遇有分歧时，应发扬民主，协商解决。

4. 为了监督检查各革命群众组织执行本协议的情况，维护革命秩序，建议并经军方同意，由新疆军区、7335 部队派出人员组成监督检查部队（各专、州、市、县，由当地军区、军分区、驻军派出）在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军方代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5. 联检小组全体成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坚守岗位，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支持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和监督检查部队开展工作，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确保他们顺利地有效地行使职权。如有刁难、殴打、扣留及伤害联合监督检查小组人员和监督检查部队，由该组织负责人和肇事者负全部责任，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惩处。

九、新疆各地区、各系统（包括各县、社、公检法、煤炭、气象、电讯、财政、银行、体育、军工厂矿企业）的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自觉遵守、模范贯彻执行本协议。各地区原定的协议仍然生效，如与本协议有矛盾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除执行自己签订的协议外，也要积极支持，保证对本协议的贯彻执行。

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立即生效。

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京代表签名：

乌鲁木齐地区

三促两红代表

胡良才 王子玉 杨宏勤 肉孜买买提

赵廷选 郭志英 玉素甫 张秀兰 葛希成

李东辉 华反帝 卡得尔 李济民 骆建新

三新方面代表

杨立业 尤努斯 刘景本 陈德平 马明远

于立支 艾尼 田淑珍 吴巨轮 张玉麒

刘鸿科 李清溪 杨贵尧 斯拉木

红三司代表

曹昌学 李振同

喀什地区 伊犁地区

田峰 阿不拉阿吾提 马富贵 王宗信 潘育成 阿不利提甫 周军 托尔逊木

沙

于国言 周玉蓉 张惊涛 胡立政 柯之勤 王造反

哈密地区 昌吉地区

谢凝祥 毛积森 王炜 李福炎 向文忠 王有 程鹏 姚德祥

张志武 王晋成 李党恩 马晨

博尔塔拉地区 塔城地区

杨瑞生 其割米提 刘万生 依马木 王忠庆 丁安 卜训成 李东飏

刘树清 潘志明 刘涛华 曹德谦

阿尔泰地区 巴音格楞地区

曹忠贤 冯少林 李长海 周自和 张希德 王象炎 刘子英 安文杰

曹阳 刘恒利 杨瑞华

阿克苏地区 克孜勒苏地区

周国党 买买提沙特尔 刘世清 黄润卿 康策 王明善 王吉俊 于松柏

蔡洪禄 姜世平 艾力马木提 程华庚

和田地区 克拉玛依地区

谢兆麟 艾合买提托合提 李红武 赵德铭 赵铭海 宋洪道 衣培显 马忠远

程庆彤 管雨声

第一铁路工程局 军队主持会议代表

黄庆奇 孙如喜 王增民 刘显明 新疆军区 生产兵团 七三三五部队

袁克恭 刘事江 赛福鼎 裴周玉 陈 冠

支左部队代表

刘发秀 任书田 崔 虎 向 新 黄 瑜 高明正 张鸿斌 王善良

张世平 高成玉 董香森 王新光 崔文海 王复华 孙宝慎 尉祖光

任树峰 王正臣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于北京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制止武斗、上交武器协议的批示

1968.06.22；中发 [68] 101 号

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达成《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这个协议很好。这是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北京的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的帮助下充份协商的结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新疆地区的新胜利。中央文革希望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能够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新疆地处我们伟大祖国反对美帝、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前线，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地方。中央文革希望新疆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各族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提高革命警惕性，团结对敌，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对新疆两派在京部份代表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一日凌晨二时零五分，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部分代表，军内和兵团的代表

也参加了接见。三新在京代表团根据军内、兵团、三新，三促记录稿整理，未经中央首长审阅。】

九时三十分，首长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健步来到了会场。顿时全场一片欢腾，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新位置在大厅中央，左边是兵团，右边是三促，军队干部分坐两边。

总理：请康老主持会议。

康老：（笑着说）同志们，开会了。今天的会，想开得短一些，因为还有些事情，有些同志有其他事情没有来。同志们来了以后，对我来讲还是第一次见面。总理见过你们几次了。

总理：见过！那是在去年三，四月的时候，以后都没见，这次我都没见。

康老：请同志们原谅，这次没和大家见面，忙是个原因，也有其他原因罗！你们两派没有联合起来，见了面我们就要讲几句话，但有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各取所需，你抓我一句，抓总理几句，所以我们就没有接见，没有讲话罗。

总理：我的话抓得最多了。

康老：我们请你们原谅，这次接见怎么样，我希望你们给我们创造条件。由于你们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使我们不敢接见你们，不敢讲话。还是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思想增加一些，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减少一些，联合起来，我们讲话就比较容易了。你们在这里学习还比较好，达成了协议罗！

总理：达成了制止武斗协议，不是大联合协议。

康老：达成了制止武斗协议，中央文革还加了批语，很好嘛！你们研究什么时候联合起来？什么时候成立革委会？新疆联合不起来，苏修就高兴，天天在那里广播，造谣说新疆要成立另一个政权，蒋匪帮造谣说，新疆革委会是成立不起来的。你们还在那里争谁正确谁不正确，首先要看大方向。谁是敌人？你们面临苏修、蒙修、美帝，还有印度反动派。新疆面临三个方面的敌人，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同志们商量一下，能不能很快地把革命大联合搞起来，很快成立革命委员会。什么时候能联合起来，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

总理：康老开场了，（看了一下名单）现在第一名红二司吴巨轮，你站起来。（吴站起来了）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字。原来我给中央同志和同志们介绍，都

是说你叫胡乱闯同志。你看，康老讲了，能不能大联合？你们是否认为大联合条件成熟了？你讲一讲吧！

康老：你把名字改了！你是山东人吗？我们是老乡啊！（首长笑了）

总理、伯达：改了好！改了好。（点了点头）

文元：你真名字叫吴巨轮，为什么要改名呢？

总理：打电话给我说名字叫胡乱闯。

康老：为什么叫胡乱闯？（吴答：这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时候叫的名字。）

康老：造反要造苏修、帝国主义、蒙修的反，造敌人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总要有个敌我界限，不能胡乱闯了！名字改了就好了。

伯达：造反要造苏修、蒙修的反啊！不能乱反啊！

总理：上午我找了半天，才知道你叫吴巨轮，很好嘛！

文元：吴巨轮这个名字也不错嘛，历史的巨轮嘛！

康老：（问吴）你在学校学的什么？学什么的？（吴答：学数学的。）学数学的应当头脑清醒，逻辑性比较强嘛，怎么能够胡乱闯，怎么能够叫胡乱闯呢？

文元：你是几年级的？（吴答：毕业了，六七级的。）

总理：红二司的吴巨轮发表意见吧！

文元：你讲吧！

（当吴汇报到赛福鼎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已进行了讨论，我们紧跟中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联合，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大联合。而现在两派分歧很大，仍然有阻力。）

总理：革命大联合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你们是不是在毛泽东思想上有分歧啊？在执行最高指示上有分歧啊？

（吴答：这个没有分歧，而对新疆文化大革命看法上有分歧。）

总理：你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事啊！

（当吴汇报到军分区不承认各地三新分部，其中谈到拜城问题时。）

总理：拜城军分区有没有人哪？

（答：没有）没有？是属于那个军分区啊？（答：阿克苏的）

总理：（问部队代表）驻拜城是哪个部队？是不是存在有这个问题？

（军分区答：不是我们，是七九七五部队。）

总理：是属那里管的？（答：是×师的）×师有人没有？（答：我就是。）

（站起来）

（答：我们部队是承认的，但群众组织有不承认的。）

（当吴巨轮汇报到搞革命大联合应该创造良好气氛的时候。）

总理：你们在这里跟三促谈得怎么样啦？

吴答：没有谈。

总理：你们住在一起，还没有谈吗？

康老：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吴答：在一块。

总理：你们住在一起四个月了，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生活，怎么还不联合？怎么不主动伸手去谈判呢？我讲过你们是老造反派，你们不好好注意，我们就要取消这一句话了。你们每犯错误，当走到边沿的时候，我们就提醒你们，你们闯的好，但也闯了些乱子，我已登记了十几件事情了，你们是有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们高姿态不好嘛！军队里有人有缺点错误，要帮助。你们思想也没有通嘛！

永胜：你们要做自我批评呀！

总理：康老语重心长地对你们讲了，你们面对着的敌人——苏修、美帝、蒙修，他们都希望我们联合不起。我们认识已经两年了，你（指吴巨轮）作为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康老插话，应该有志气嘛！）要主动、要带头、要高姿态、要有志气嘛！

总理：三促的头头是那一位呀！（工促会的胡良才站起来，报告总理，我叫胡良才。）你们在一起住，一起吃饭，一起谈了话没有？

胡答：没有。我们给三新发过五封信。

总理：不要发信，可以谈话，他们不主动，你们也不主动。你们都是山东人，都姓胡，你们两人握过手没有？（双方回答：没有。）就在这里当场介绍，我来给你们介绍，你们握个手好不好？

（两人握手，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总理：我不是什么指示，我们只是起促进作用，我们只是促一下，主要靠你们自己，你们要高姿态，要采取主动。

总理：胡乱闯同志，据胡良才同志说，你们叫他们是老保，他们叫你们是什么？（吴答：他们叫我们老牛。）（大家笑了）他们叫你们是老牛，这成什么样子？这样对立，怎么能搞大联合？这怎么能怪军队，怎么能说军队是后台呢？当然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可以提嘛！

总理：胡良才同志，你今年多大了？（胡答：二十九岁）你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胡良才讲到父母逃荒时就哭了）

总理：那是旧社会，现在解放了。你是作什么工作的？几级工了？（胡答：是钳工，工作十二年了。）十二年，是个熟练工人。你比他大，他是学生，你是工人，你应该姿态高嘛！我们号召同志们向工人学习。工人要与学生结合嘛！活生生的例子就在面前，你们要结合，要带头作模范。你（指吴）已经毕业了，不是到农场，就是到工厂，不要等到生产岗位再结合，现在就要在革命岗位上结合起来，要当模范。你们两派要讲一些有希望的事情，现在就是要搞大联合。你们说军队有缺点，我们记下来，告诉赛福鼎同志改一改。

吴巨轮：没有改！

总理：难道一点都没有改？整个部队都没有改？那不成了漆黑一团！乌云压顶了！你们……就没有通过？兵团也是这样吗？你不能说一点都没有改，你提一点有希望的事嘛！

吴巨轮：不能那样讲，基本上没有改，到现在还武装一派，镇压一派，不怪广大指战员，我们有希望了，但事实使我们失望了。

法宪：责任在上面。

总理：说下去吧！

（当吴巨轮汇报到每到关键时刻，总理都是十分关怀和爱护，都作了指示，回忆起来有二十多次的时候。）

总理：不是指示，而是我们讨论研究过的，给你们打个招呼，提醒一下，你们应该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我们是老战友罗？再提醒你们一次，不要再往北航那里去了，因为北航是是非之地。

吴：我没有去，只参加过一次批斗武光的大会。

总理：你们下边没有人去吗？有没有人住在北航？

吴答：那里我们有人住。

伯达：你们有人住在北航，不要住在北航，不要再住在北航罗！

总理：我再提醒你们，我再提醒你们四个字，北航是是非之场。你们自己理解去。

（当吴巨轮汇报到有人住在北航时）

总理：你是领头的，为什么要住在北航？要检查检查，你们在北京住有多少人？

吴答：有的是上访的，有的是被打出来的。

（当吴巨轮汇报到缺乏阶级斗争经验，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如一·二六事件，武光问题等等的时候。）

总理：（转过面来对三促代表说）他们上了当，你们三促就不要拿武光问题去压他们，一压就会发生武斗。武斗也可能军区有人挑动你们，也可能是你们自己搞的，有多种原因，不能从一方面去看罗！（胡良才：对。）

（当吴巨轮汇报到王恩茂、张希钦借用武光问题压三新造反派的时候。）

总理：这个问题王恩茂同志在检查中不是有了吗？（吴巨轮：没有）（胡良才：有！有！检查了。）

（当吴巨轮汇报到武光问题上，对总理指示贯彻得不力，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

总理：你们不要说我怎么指示，还是讲你们怎么促进大联合，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三促不拿这个压你们就行了。

（当吴巨轮汇报到大联合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时。）

总理：你们来以后，主席有许多最新指示。你们谈谈大联合的问题吧！

（当吴巨轮汇报到有人说我们打倒王恩茂是错误时）

总理：（严肃地）什么时候说的？有没有具体人？

（吴巨轮汇报到有些宣传队和军管人员都是这样讲的时候）

总理：你们刚才说的宣传队，如果他们真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参加你们学习班就好啦！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是不对的。军管会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如果他们是那样讲，都是不对的。

（当吴巨轮汇报到军区继续支一派压一派，发生大量抢枪事件的时候）

总理：是五月吗？

吴巨轮：四月底五月初。

（二十二点二十分，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来到会场，会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问同志们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当吴巨轮接着汇报到军区检查的时候）

总理：二月份的检查下达了没有？

张希钦：下达了。

三新代表：没有！

总理：军区的检查是二月份送中央的，给你们检查可能晚一些。

（当吴巨轮汇报到新疆有不少地方单方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

总理：有多少地方？

吴：有铁路系统。

（当吴巨轮汇报到单方面成立革委会实质问题的时候）

康老：请胡良才同志讲一讲好不好？

（胡良才站起来，当汇报到大联合问题时）

总理：搞大联合你们是不是把三新排斥在外呀！想把他们吃掉呀！

三新代表：就是！

胡良才：没有！这是颠倒黑白，我是八一钢铁厂的，是最大的厂子，绝没有排斥他们！大联委名额是对等的。

总理：不光你那个厂罗！还有外厂、外地、外县。

胡：乌鲁木齐都是这样。

总理：外地有没有？（胡：外地可能有这种情况）

（当胡良才汇报到大联合阻力来之于头头时）

富治：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多数派要搞大联合，对少数派加以排斥，第二种，人数少的，要等他们力量发展到优势再搞大联合，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对的。（胡良才：这两种倾向都有，我们不是想把他们压垮。）

（当胡良才汇报到他们抢解放军枪枝武器是自毁长城时）

康老：现在你们有多少武器没有交？（胡答：大约还有两千多支）

吴巨轮：“三·一八”协议达成后，我们交了，都是土造的，但交得不干净。

胡：你们从玉门运来武器两箱子，都是自动武器，我们现在有的都是四月二十六日抢的。

康老：（向胡良才说）你们有炮吗？

胡良才：有，有土炮，自己做的。

吴巨轮：你们攻打八农，一中使用的平射炮是那里来的？

康老：有洋的也有土的。两派检查一下，洋的，土的都要交。

胡良才：这些杀人武器，伤的都是群众，我们很痛心的。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把这件事情作好。武器不能再留在手里。但明抢暗送是不符合事实的。现在有人在挖地道。

总理：地方上，你们人数多是不是？既是这样，更应当主动把武器早一些上交，封存起来，不仅乌鲁木齐，全疆都要这样。

胡良才：现在乌鲁木齐已经交了四百多支。

总理：你们不光乌鲁木齐呵？还有全疆各地，全疆你们人多一些嘛！

杨立业站起来：乌鲁木齐工人两派对等。

胡良才：你们人数对等，为什么往外逃？

（当胡良才谈到军区在物质上优先照顾三新时）

总理：这一点，我要替三新辩护几句啊！因为军区，军分区对你们亲一些，对他们差一点。你承认不承认这一点，你要是诚实的工人，应当承认这一点。（当胡良才汇报到他们不压三新，新疆军区支持三新超过三促时。）

总理：你们抢武器，军区有送的没有？（胡良才：没有，是我们长期侦察的。）

康老：我不了解情况，事情要分析，说所有解放军都明抢暗送也不可能的，说一点没有也不符合事实。我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不去送，下面把武器埋了，他亲的一派去了，说没有武器，把脚向埋有武器的地方，边跺脚边说：“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就走了。亲的一派一听，就知道武器在那里。（首长们大笑。）

总理：你们要分析一下，你们不知道不要肯定。（总理说后笑了。）

总理：有些暗送的事实也不怪你们，说出来吧！

康老：要客观一点。

总理：我们把你们两派缺点说一说，同时都有长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组织，希望你们联合嘛！你刚才讲得好，不管人多少，压是压不垮的。如果那个地方，确实是两派，对方人数少得多，很少，都要和他们一块谈，才能实现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他们人少。怕武斗，不敢呆，有的外出，有的串连，有的被压服了，这样的情况，要把工作做到家。有军代表参加才能联合，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三个基本条件一定要具备。红二司这个系统，有的地方是发展少的，只要有人，就不能不承认它。要求你们姿态高一些。不是你一个人，另外还有下面，你们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魄，能不能做到呀？

胡良才：坚决按照总理指示办事。

总理：他们既然说了你们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你们调查一下，一定有！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劝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推动大联合，这是毛主席说了多少次，不要说我的指示，这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我们只是传达，千万不要说我的指示。

胡良才：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大联合有了基础，任何附加条件都是不对的。

总理：吴巨轮同志，你说都是单方面成立革委会的有多少个地方？你能举出几个例子吗？

吴巨轮：“铁路局就是这样，很多，都是这样。”

（这时铁造司代表王增民站起来要求发言）

总理：你是那里的？

王增民：我是第一铁路工程局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代表，我叫王增民。

总理：（看花名册）铁造司的？对方呢？（铁联总代表黄庆奇站起来回答：是铁联总。）

总理：叫什么名字？（黄答：叫黄庆奇）

总理：（看花名册）是哈密的？王增民同志，你是乌鲁木齐的吧？（王答：是）铁联总乌鲁木齐的是谁？（这时铁联总代表袁克恭站起来，“有！我叫袁克恭。”）

（当王增民汇报到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辛元林把在毛主席身边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协议比作国共谈判时）

总理：把你们在这里搞的大联合协议说成国共两党谈判是错误的。管他是那个副司令，不管辛元林怎么讲，你们两派同意不同意你们在北京达成的协议是国共协议呢？假如他（指辛）讲错了，你们可以提出批评，你们自己可以搞好嘛！

总理：袁克恭同志，你说你们达成的协议是国共谈判是不是？（袁答：是）
（大家笑了）

康老：是国共谈判吗？（袁：不是！不是！）

康老：对罗！不管什么副司令他们讲错了，你们批评嘛。

（当王增民汇报到十项协议没落实，甚至铁造司派出大联委代表孙志祥同志在铁路军管会三楼会议室被枪打伤的时候。）总理：哪个打的？（王答：是东野）

（当王增民汇报到军管会人员做铁造司战士工作说，打倒王恩茂是不对的，赶快退出铁造司时）总理：军管会是那个部队管的？（王答：新疆军区）（张希钦：军区军交部的）

（当王增民汇报到军管会人员说新疆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军管会不一定错误时）总理：他们宣布不承认你们那个组织吗？（王增民答：他们不宣布，实际上采取不承认态度。自从王恩茂四、三检查以后，停发了铁造司的经费，开会也不通知我们了。）

总理：第一铁路工程局你们这一派有多少人？（当王增民汇报到被压前后组织，人数的情况以后）总理：你们包括新疆境内哈密，乌鲁木齐吧？（王答：是新疆境内疏勒河以西的人数）

总理：你们这个组织还是存在的嘛，你们的代表也来了。（王，这是中央的关怀，是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的关怀。）

（当王增民汇报到乌鲁木齐有宁夏的专门武斗人员时）总理：宁夏的组织怎么跑到你们新疆那儿去了呢？（王答：它是我局所属单位，在宁夏是联筹观点的，宁夏问题解决后，他们就到了乌鲁木齐。）总理：他们有多少人？（王答：原来人数多，后来有人觉悟了，回去了，现在还有二十多人。）

总理：张希钦同志（这时张站起来）你在北京，军交部还是亲一派，疏一派，不承认铁造司吗？（张希钦答：我们两派都承认。铁路的会议两派代表都参加了。）

（铁造司哈密铁九·三代表刘事江站起来说：报告总理，张希钦当面欺骗总理，在全国铁路交通会议上，还不承认我铁九·三总部所属组织。）

总理：啊！中呀！现在铁路局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三个局，柳州、乌鲁木齐、还有西安、是铁造司的组织要承认他们嘛！（这时铁联总代表黄庆奇站起来说：报告总理，王增民、刘事江的发言，至今还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总理：他们说的是军管会。（王增民：报告总理，让我说完他再说。）

总理：对！对！对！（当王增民汇报到有的军管代表分化瓦解铁造司组织时）

总理：是谁呀！是对方组织，还是军管会呀？张希钦同志，你们那个军交部是有宗派性的呀！对这个问题，我是有怀疑，因为新疆铁路我是比较了解的。现在在全国铁路局有十八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三个铁路局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柳州、西安、乌鲁木齐，目前全力以赴成立柳州铁路局革命委员会，都要学习一下七、三布告，火车头嘛更要好好学习，明天中央就要发布一个文件，你们学了吗？（王，学习了。）

总理：张希钦同志，你们那个军交部有点宗派性，亲一派，疏一派，是十分危险的罗。

张希钦：这我了解，回去后是促进了大联合的。

总理：军交部没有抓主席思想，贯彻这个协议，没有把主席思想贯彻下去，亲一派，疏一派，有没有事实呀？

张希钦：军管会对铁联总亲一些，对铁造司疏一些，这是事实。

总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抓？我告诉你，有派性，不抓，就会发生问题哟！这是危险的，我对这个问题很怀疑，你要很好检查一下。

（当王增民汇报到革委会把国民党，伪警察，三青团，四不清下台干部结合为付主任时，军管代表却说，三结合干部有问题不清楚，可以把问题挂起来先结合，以后再弄清，再调查。（总理边笑边记下来，伯达同志向总理笑了。这时其他代表要求发言）

康老：既然铁路这一派讲了，应该另一派也讲一讲。

（这时铁联总代表黄庆奇站起来）

康老：你叫什么名字？（黄答：我姓黄，叫黄庆奇，铁造司代表发言把矛头指向军管会，指向解放军，还说我们抓打他们的人，不符合事实，我局大联合协议是在总理关怀下达成的。）

总理：那是中央文革集体主持下搞的，我也参加了。（黄庆奇说，有五个当权派在新大，铁造司一直保持到现在，并讲大联委主任都让铁造司头头担任时。）

总理：你是哈密的吧？（黄答：是，哈密的。）

总理：刚才他们说你们在军管会开枪打伤了他们一个人，是不是事实？

黄答：有这么一回事，但情况有出入，是他们先炸死我们一个人。

康老：王增民同志，他说你们先炸死他们一个人是不是事实？

（王增民说：不是。当王讲明事实真象时）

康老：等他讲完了你再讲。自己人炸死自己人，这不可能吧！

黄庆奇：他们不抓革命促生产，当然军管会不给开支，我们也不同意开支。

总理：我问你，如果他们被赶出去，他们回来工资也不发吗？

黄庆奇：我们没有赶，我们赶，我们要负责任。

总理：现在你们铁路缺勤多少？

黄庆奇：百分这十九点六，他们的人长期在外，不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那你们想法欢迎他们回去嘛。

王增民插话说：铁造司战士不改变观点就遭毒打，工资也不开。改变了观点就开支，有困难还给补助。

总理：我告诉你，有些地方人数很少，也要同他们一道搞大联合，三结合。你们两派有没有人在北京啊？

黄庆奇：我们没有他们有。

王增民：我们有，是被抓打出来的。

总理：是住在铁道部招待所吗？

王增民：不是，是住在亲戚朋友家里。

总理：如果铁道部保护回去，能不能回去？

王增民：如果能够保证不强迫他们改变观点，能保证人生安全，可以。

黄庆奇：报告总理，在总理面前我向毛主席宣誓，我们保证不抓打他们一个人，保证敲锣打鼓欢迎他们。

刘事江：报告总理，铁联总黄庆奇刚才的表态我们表示热情欢迎，坚决支持。

总理：好，双方都表示了，把第一铁路工程局双方的人都找到，早点回去。

（当黄庆奇说：铁造司的人在外面时）

总理：如果确实被赶出来的，工资要照发，在北京的要找到，不要他们一直呆在这个地方了，我们让铁道部努力嘛，你们也要做出个模范来。

（当黄庆奇谈到他们没有赶出铁造司的人的时候，刘事江报告六·一五协议达成以后，铁造司战士被抓打情况，双方就争论起来。）

总理：不要吵了，你们刚才一个表示欢迎，一个表示回去，我找铁道部军管会送回去。

（当黄庆奇汇报到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情况时）

总理：别说了，现在我可做见证，乌鲁木齐这条线的生产还是可以的，我知道你们人多嘛，多做点是份内的事嘛，主要你们要采取高姿态，欢迎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黄庆奇：他们不回去。

总理：刘事江同志刚才不是说了嘛！

（黄庆奇又汇报了铁造司哈密铁九·三至今还有二百多人在城里搞武斗）

总理：好了，今天就开始了，刚才那个同志表示了，我让铁道部努力嘛。

刘事江：报告总理，坚决照办。

总理：好，好。今天双方都表了态，一方愿回去，一方欢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黄庆奇汇报说铁造司从内地往新疆运武器时）

总理：有件事我要再提醒你们，你们双方都不要再运武器出来了。有些地方发现从新疆收到武器，你们铁联总人数多，更应该早一点把武器上交，封存起来。不管人数多少，压是压不垮的。一个地方即使一派人数很少，也要同他们搞大联合、三结合、三新发展得少一些，你们是多数的一派，要有这个气魄。

康老：第一铁路工程局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不要算旧帐，要向前看，最高原则是毛主席的思想，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枝节问题不要算旧帐，仇恨要集中在敌人身上。

（当王增民汇报到二·一九事件中，铁联总自己炸了自己人的时候。）

康老：你不要解释了，自己把自己人炸死，很难说服人，解释不通。

文元：建议同志们发言，要紧紧围绕今天会议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掌握斗争大方向，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新疆能够迅速得到贯彻。

永胜：不是打官司。

总理：对（大家鼓掌，呼口号）

三促代表：报告首长，三促李东辉要求发言。

（当李东辉谈到执行中央文革六·二二批示情况时）

总理：（很严肃地）你们这一派贯彻执行得怎么样？按照中央文革批示贯彻了没有？（李答，正在努力。）

（当李东辉谈到赛福鼎同志传达最新指示时）

总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只听了高兴，要看你们干得怎样。

（当李东辉谈到大联合的时候）

总理：那是过去，现在呢？（当李汇报到给对方写了五封大联合倡议信时）

康老：啊！你们这个办法行不通，你们还是要彼此商量才能联合，你们这个办法是办不到的，你们那样作，不管主观愿望如何，而使对方感到是压力。

总理：（问你）你和张玉琪同志谈过没有？你们是同学嘛！（李：没有。）

总理：你们两个都是大学生，怎么谈不到一起，怎么谈的问题都不具体。复杂得很？知识分子。

（当谈到大联合中如何高姿态时）

康老：你们这个办法说实在的，不是大联合的办法，而是一种政治手段，我们懂得这个问题。

法宪：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个不行。

总理：这问题你们两人怎么不说话？你们两人怎么办？（这时有人建议张玉琪同李东辉握手。大家鼓掌。当李东辉又谈到大联合问题时）

总理：刚才康老讲了，不要单方面起草搞方案，应当双方面坐在一起商量，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协商，先搞大联合，然后就剩下一个王恩茂同志的问题了。王恩茂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嘛！总不能说王恩茂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大联合嘛！

（当李东辉谈到三新是少数怕被吃掉时）

康老：你们是大學生，他們是少數，怕被吃掉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你們要主動去做工作，解除他們這個顧慮，拿出實際行動，使他們相信不會被吃掉的，這就好辦了。你們是同學，在北京住在一起，都在一塊吃飯，互相談過沒有？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能在一起吃飯，就是不在一起談，這個問題怎麼解釋啊！（李說：主要是武光操縱的，是武光之流挑動的。）

總理：武光早已被抓起來了嘛！

康老：武光老早離開了新疆了嘛！被關起來了嘛！時間又那麼長，他的手脚伸那麼長？這不是抽象的說法嗎？

總理：你們盡講抽象的，不着邊際的，知識分子愛繞圈子，對於你們兩人之間還有什麼武光問題呢？你們兩個同學怎麼解決？你們八農能不能先聯合做出個榜樣來？

（當李東輝又談到王恩茂打不倒他們就不聯合時）

康老：你們兩人之間也沒有王恩茂問題嘛！

總理：他們（指三新）還不放心，好像說不把王恩茂打倒，王恩茂還在新疆就會把他們壓垮，他們在新疆就翻不了身。（李東輝：就是，我們證明。）

總理：王恩茂執行主席和中央文革號召到三新方面去咯，你們還不能去？在這方面我就批評過張希欽，他就不如王恩茂，王恩茂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還是去了，這是事實嘛！

三新代表，去是去了，但是不經常在那裡住。

總理：賽福鼎同志，你們是什麼時候去的？

張希欽：七月一號。

總理：我問賽福鼎同志。

總理：經常回去嗎？

賽答：有時候有事情就回去。

康老：你們住在那裡么，那裡有秘書，有電話，在那裡接電話辦事就行了，主席指示要堅決貫徹。你們在那裡要多做工作，要住進去，要住在那裡和群眾接觸談心，一塊兒生活，別的单位都是這樣做了，不能老住在京西賓館，京西賓館越住越脫離群眾。

总理：你们一号去的，已经十九天了。如果天天住在那里，好好做工作，很多问题就是不难解决的罗！对你们来说，这一方面应主动，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前进。

康老：你们要真正从思想上，工作上多接触，促进革命大联合，不要光讲这个同志的指示呀，那个同志的指示呀，这样做是一种危险。你们就会互相指责对方，你说他违反总理指示，罪该万死，他说康老是怎么讲的。不是我们讲的，而是毛主席指示，我们只不过是传递，我们也记不得是那一天讲的罗！拿着鸡毛当令箭，去攻击对方，那就错了。

总理：我开始就讲了，不敢接见你们，就是这个原因了。我要求你们回去，谁也不要写对方大字报，谁也不要贴对方大字报，那样危险得很，要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好好学习，按这个去做。

（李东辉接着发言，再次谈到武光问题时候）

总理：武光嘛！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你还提他干什么！不要再提了，不要用武光问题压对方。

康老：（严肃地）我刚才不是提了吗！以后再也不要提罗！

总理：（拿着中央6·22批示的文件举起来了）对李东辉说，你们这一派表示你们是听中央指示的，中央文革的批示就在这里嘛，你们要把它兑现！你们这一派不带头，不推动，这怎么能表示你们执行协议呢？

（当李东辉又谈到抢枪的问题时，受了坏人操纵和挑动时）

总理：（很严肃地）坏人是谁？

康老：既然你们抢枪，是坏人挑动，你们内部不单单是交枪问题，而且要把坏人都揪出来。

李东辉：是，我们现在正在做这项工作。

总理：你们在这里，你们说话要兑现嘛！不要去应付康老的话，你们既然承认抢了两千多条枪，就应当在这一方面谈一谈，坏人是谁。我们不告诉，不过不要让三新给你们点出来。那时候，你们就不好了，自己讲出来，把坏人揪出来可以划清界限嘛！你们心中是有数的。只有这样，才可以表示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嘛？啊！（大家笑了）你们还年轻嘛！要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容易，要

锻炼几年、几十年，我们还要锻炼，我们还要保持晚节啊！要天天改造，只要你们自己知道有坏人，就把坏人揪出来嘛。

康老：不要谈抽象罗！你们承认了抢，不承认明抢暗送，承认你们夺了人民解放军的枪，这是错误的，方才胡良才也承认了错误，怎样改正错误呢？第一，坚决贯彻中央文革批示和六·一五协议，迅速全部、彻底上交武器，第二，你们夺了解放军的枪，你们再不要指责对方解放军的态度不好，你们对解放军的态度怎么样？自己还不是一样？你们也犯了错误，你们不要说对方拥军工作没有作好，你们也没有做好嘛！只有检查这个错误，承认错误不能是空洞的。第三，你们说不是解放军送武器，而是坏人干的，既然你们知道是坏人挑拨就这样算了么？应该把坏人揪出来嘛！第一交枪，第二承认对解放军有错误，第三揪出坏人，要作到这三点。不然只是抽象的谈改正错误是不行的，起码要做到这三点。

总理：不配合行动，说大话是不行的，要改正错误。

伯达：我说几句话。听了几个同志的发言，有个感觉，主要谈的枝节问题。你们还年青没有经验，要总结经验，不要乱闯啊！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有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应该总结一下。

总理：正面的反面的都有，应该很好总结一下，做对了的，要总结经验，做错了也要总结教训。对于双方都要总结。

伯达：要特别注意总结反面的经验，还要学习对方的经验。不能光说对方的缺点。

总理：经验不仅要总结做对的，而且也要总结做错的，这也是主席的思想。还要学习对方的长处嘛！

伯达：也要学习对方的长处啊！你们几个发言的同志都是知识分子，人年青，有前途，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要向毛主席学习，向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学习！要向广大群众学习！还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主要你们讲话，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缺乏自我批评的态度，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这样就不可能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做好工作。还有，大家在发言中，缺乏敌情观念。新疆是边疆地区，又是一个很大的边疆地区，特别是苏修，叛徒集团都在新疆，干了许多破坏工作，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没有人谈到这个问

题，你们没有人说到敌情这一点，该不该做自我批评？没有敌情观念，就不能对情况做正确分析。

富治：他们不是没有敌情观念，而是把对方看成了敌人，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了敌我矛盾。

总理：苏修一个很强大的功率播音就在新疆边境，大家很清楚了，不要把矛盾颠倒了。

伯达：颠倒了，将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看不到敌人，这就是有很大的危险，没有敌情观念就不能正确的对待旁人，就不能正确的对待自己，不能正确的对待自己的组织，也不能正确的对待对方的组织，总认为自己了不起，把别人说成漆黑一团，这样能正确对待对方吗？要有自我批评精神，要有敌情观念，知识分子要向工农群众请教，与工农相结合，要向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请教，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法宪：天天打内战，不顾大局。伯达：毛主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大道理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伟大战备部署，大道理要管你们的宗派主义的小道理。懂不懂？对不对？你们考虑一下。文化革命两年多了经过了反复，正确的错误的经验都有。什么是大道理，你们应该领会，毛泽东思想就是大道理。好象你们今天不讲大道理，光讲小道理，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是不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啊！大道理管小道理应该不应该呀？（众答：应该。）只有这样才能搞好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才能不断改造自己。今天在座的好多都是知识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我们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改造自己。有这样的精神就可以坐在一起协商了，诚心实现革命大联合，要作自我批评，少批评对方，今天大家的讲话，还是有点落后，不讲自己，尽讲别人的缺点错误，那个工人同志（指胡良才）说了点自己的缺点错误。

总理：胡乱闯同志今天也说了点自己的缺点错误罗！

伯达：胡乱闯闯了两年多了，应该闯出一些道理来，不能再乱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律是不能违抗的。要改掉你的名字。

总理：（指吴）你现在是吴巨轮，这个巨轮还是开始建设嘛！巨轮要向前嘛！不能是往后嘛！巨轮要有人掌好舵。

康老：轮子不能向倒开，倒开就不好了。

文元：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掌舵。

伯达：要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头脑膨胀，靠自己乱闯。你们要很好学习。今天发言的很多是知识分子，要很好向工农群众学习。要有高度的敌情观念，这才符合毛泽东思想。

总理：听了你们的发言，不象是新疆来的。

伯达：广大群众的心情是要大联合的、三结合的，是不是呀？你们没有代表新疆广大革命群众的愿望。广大群众还要你们争下去吗？还要你们互相攻击吗？要你们象老太婆那样吵架？你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风格、要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风格、文化大革命中总要学点风格。

总理：你们到北京来，在毛主席身边，不是学毛泽东思想，学毛主席的指示，而是听小道消息。

伯达：小道消息不能听呀！你们看小报，有什么“陈伯达斗私批修的辅导报告”呀，什么“四个伟大”呀，“四个无限”呀，这都是假造的。一个说是陈伯达同志写的，一个说是康生同志写的，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在制造混乱，你们应当学会分辨真假，分辨是非，掌握毛泽东思想。

总理：你们应该作个分析，前年北京学生到新疆去点火，是起了作用的，是有丰功伟绩的。现在再去，再听他们的就会给你们增加负担罗！

伯达：他们要包办代替，你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北京有些大学生，开始是很好的，不错的，后来脑子一膨胀，路子就走得不对了，你们也跟着走就不正确了。如果不警惕，不谨慎没有敌情观念，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就会走错路。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有的开始是正确的，后来就可能走到反面了。我们走路也是这样，开始路走的是对的，后来路走的不对了，要学会问路。一开始出门口，路走的对，如果以后走错路不问路，自以为正确，就不问路了，就走错了。要向叔叔伯伯、大妈、大嫂问路，不问路就会走错路、走回头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是比较曲折的，敌人搞破坏，搞挑拨离间，新疆有苏修、内奸、特务、叛徒挑拨离间。

总理：挑拨离间，还有苏修分子，这个路是曲折的。

伯达：这个路是曲折的，或者是很曲折的，要懂得问路，要向毛主席最高指示问路，向毛主席问路，向广大群众问路，这样就能够少犯错误和不走错路。毛主席说，错了，改了就好。为什么一个人，一个组织犯了错误，非把他整死不行呢？不让他改过呢？还有，根据我判断，有可能是自己错了，还说人家错了。你们年青人有些判断不一定正确，自己错了，还说别人错，以为自己对，所以要学会问路。要向毛泽东思想问路，向广大群众问路，能听懂吗？（听懂了）谢谢！我说的是地方话呀。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搞革命大联合，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成立了革委会，你们还没有大联合，太落后了，应该感到自己落后。可能有坏人挑拨，要赶快搞大联合协议，这并不难，要多做自我批评，有敌情观念，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大联合了就可以搞三结合，革委会。你们有的地方是单独一派，把另一派撇开，单方面成立革委会。这种做法并不高明，北京过去也有这种情况，把对方撇开，单方面成立革委会。北京也有些组织说他是拥军派，你是反军派，什么四三派，四四派，总之一派想压一派。现在已经联合了。联合要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准，不能以宗派看法为标准。希望新疆两派在这个问题上，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做进一步的努力，创造一些办法，快一点搞成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只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敌情观念，就能很快的达成，不要总是想一派吃掉另一派。

康老：时间不早了，请总理讲话。

总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同志，早想见见大家，因为大家来这么久了。由于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没有学好。不能听小道消息，那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不能坐在一起谈了。这个我们有经验，所以今年就没有采取接见的办法，虽然见面少，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指示，社论，文章，标题都表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你们都看到了。你们两派来了四个多月了，看得应该很清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有五分之四，二十四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剩下了最后五个。这五个都是边疆地区，都有敌人的挑动，受敌人的影响，就联合不起来，敌人在那里高兴。台湾蒋介石就说，福建搞不起来。你们那里苏修就说，新疆搞不起来，印度反动派说西藏搞不起来，缅甸反动派说云南搞不起来，美帝国主义说广西搞不起来。我们能让敌人高兴吗？能让敌人高兴吗？还是刚才那位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有自豪感，我们是伟大

的民族，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多了，正如伯达同志讲的，我们应当学到一些本事了。胡乱闯、胡大乱、张大炮你们三个同志，我们都见过了，搞了两年多了，总应当增加不少的知识。你们造反派敢于批判王恩茂的错误，革命精神是好的，但是你们也有些错误，比如说康老讲了伊敏诺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留下的特务，你们受过他的蒙蔽，他挑动抓赛福鼎同志，你们还抄赛福鼎同志的家。

康老：这是大错，是大节问题，说他袒护王恩茂，有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总理：赛福鼎同志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斯大林时期他与苏联合作，搞“三区革命”，解放后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与苏修、叛徒、特务作斗争，把伊敏诺夫、包尔汉揭发出来，你们应当支持赛福鼎同志，你们反而上了伊敏诺夫的当。已处理了。好的是我们说了以后，一批评就改了，当然我也不能处处给你们提醒，两年了，要靠自己判断，不要只看对方错误，伯达同志刚才语重心长的讲了，不要抓住对方错误。开始北京学生点了火，现在要你们自己判断真假是非，应该进步了，应该是独立自主了。

康老：现在你们还没有独立自主，有些人还要听北京学校的小道消息，就会走错路，特别是三新的同志们与北京学生接触多，要提高警惕，你们不能光听北京学生小道消息了。否则，就要上当。现在有许多谣言就是从北京搞起来的。我告诉你们有人想代替中央去管你们。

总理：有那么个小集团。

康老：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北京日报这两天的社论你们看一看。

富治：不是社论，是个通知。

康老：你们要好好学习，再不要胡乱闯了，再乱闯就糟糕了。

总理：你们到北京来了四个多月，不要相反落后了，你们在那里敌情是严重的，没有把敌情观念带来，苏修在边境上对新疆有一个强大的广播电台，我们正在作工作，想办法压倒它，这是思想仗，他们靠修正主义，我们靠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切都要靠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

的马列主义，我们最近得到一些消息，看了你们一些材料，现在你们快要回去，要把毛主席指示带回去，可是你们还没有把毛主席最高指示学好。毛主席接见了没有？（答：还没有）你们正在等待主席的接见。兵团王兵与三司是一道战斗过的，也算是你们的战友，现在察觉他做了很多坏事，今天他没有来罗！兵团党委意见我们要研究罗！王兵是前车之鉴。当时，我们知道他是保张仲瀚的，受张的影响，我们打算挽救他，想把他和张仲瀚的那些打手、部长们分开，现在看来不行罗！如果在兵团问题上犯了错误，那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罗！你们在石河子问题上犯了错误，那是受了他的影响。与自己一起战斗过的。总是会有分化，开始是革命的，以后有的人就蜕化，叛变了，倒退了。阶级斗争规律就是这样，自己要警惕，要抓大的。现在，我们要促进你们，很好地执行中央文革批示，实现革命大联合。你要在“六·二二”批示的基础上，双方要主动。特别是三促人数多，要主动，你们抢了枪应当上交，即使是对方交的少，自己也要做模范。你们交了，他们还会打你吗？

伯达：要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高姿态，就要做模范。

总理：不要把对方总是当成敌对的。本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有坏人在后面，你们不点他，我只点出一个王兵。对三促我不熟悉，只知道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亲你们的。坏人我点不出来，你们自己揪吧！总有上当的，当然这是个别的，你们要与他们割断关系。你们要先执行协议，先自己作模范，不要总指责对方，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互相商量达成一个大联合协议，现在全国廿四个省（市）都有协议，可以借鉴，你们要后来居上。这里你们有特殊的地方，你们那里有严重的敌情，你们要勇敢地、坚定地、急迫地、不动摇的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大联合协议可不是别的问题，按胡乱闯他那三条呼吁是达不成协议的。一定要拿打倒王恩茂。张希钦来做为标准，非打倒他们不能联合，那怎么行。他们两人怎么解决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强加于人，不能非叫人家同你们一道打倒王恩茂才能结合。吴巨轮同志，说实话你们里面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青一色的罗！不可能一样，我讲这话不是分化瓦解你们罗！分化瓦解你们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争取内部统一吗？不可能！

伯达：大联合要按部门，按班级，按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

总理：工厂里到一起去，学校里到一起去，都要大联合，铁路到一起去，铁路吵得那么利害，还是要到一块去的。不管怎么样，都要实现大联合。不能那样的前提罗！那样就永远达不成协议。你们都说听中央的，你们自己也没有个标准，所以一定要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解放军要负责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要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以信任的。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要听，要拥护，要执行，不要突出是那个人说的，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你们的要求，不然给我们增加负担。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支持人民解放军，你们一定要把新疆军区搞出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是跟着某某人，都是混旦王八蛋，人家听了就恼火。这是运动初期某些红卫兵提的，文化大革命到了现在已经两年啦！不能这样啦！

康老：简单的道理。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能那样地在新疆搞文化大革命吗？

总理：（接着说）不管怎么样，兵团在新疆搞生产，又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新疆，苏修就不敢轻举妄动。否则苏修早就打过来啦！这是我们的长城罗！不能因为某人犯了严重错误，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时间长一些，但还没有到死不悔改的程度。他要改正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给人改正错误的时间。陈再道犯了那样的严重错误，主席起草两份电报，还要他来学习，允许他改正错误。他已经走到人民内部矛盾的外边去了，还要把他拉回来。你们年轻人犯错误，改了就好。老同志犯错误也要给改正的机会，帮助他改正，不能每一件事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伯达：主席说要一看二帮）我们打了招呼以后，军区同志到你们那里去了，不武斗了。如果他们去了，表现不好，我们打招呼，天天去，总比以前好，天天在一起接触。现在时间不等人，所以大联合协议要搞，最重要的事是搞大联合。全疆的，地区性的都可以搞特别是铁路有了协议，要很好地贯彻执行协议，很好地兑现。现在全国铁路就剩下西安，柳州，乌鲁木齐没有成立革委会。明天就要发一个文件，全国党政军民都要学“七·三”布告。铁路上更要学，军队也要学好，要宣传。这个布告，不光是铁路上的问题，还包括国际主义，群众组织要与反革命划清界限的问题，使群众组织不致走上犯罪的道路。希望你们把大联合搞起来。大联合搞起后，紧接着要搞革命三结合。搞革命三结合反正

要有军队、干部、群众的代表，现在新疆军区能够出来说话的就只有赛福鼎同志。要允许人家三促犯错误，允许三促改正错误。我向三新同志呼吁，应该给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的机会。说某某同志参加了革委会，你们就不承认，好象自己就活不成了，这怎能设想呢？这是不对的。革委会是主席，林付主席批准的。在革委会就可以随便把人压垮吗？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不管吗？你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信任不信任？你们知道你们符合毛泽东思想，还怕三促压垮你们干嘛！你们三个带头的人，不能那样设想嘛，不能没有信心嘛！

伯达：主席经常讲，没有清一色的东西。

总理：对嘛！没有清一色的东西嘛！一个党、一个群众组织、一个革委会都不可能是青一色的。有个对立面可以比较。你们三新也不会那么一致，也不会青一色的。就是你们三个人也不见得那么一致的，我不相信完全是一致的，要允许有不同意见。将来革委会成立了，还会有不同意见的，甚至过去有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改正错误，也要有不同意见的。只要他改正错误也应当允许他改。不能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事物总是在发展的。

伯达：吃掉对方群众组织是不可能的。

总理：总之，要促进新疆革委会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有军队，干部，群众代表，现在条件成熟了。你们说条件不成熟罗，我们看条件成熟罗，你们双方回去好好想一想，群众是不可能等的，关键在于你们对立情绪很强烈的几个同志。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你们通了，群众工作好做一些，顺利一些，你们一定要自觉。

伯达：与北京各大学有关系的同志，要割断关系。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他们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你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赛福鼎同志站起来建议，我建议三到五天达成一个大联合协议，十天内掀起一个大联合高潮，大家同意不同意？（总理：伯达，首长们带头鼓掌赞成。这时胡乱闯由于没有拍手，在旁边冷笑，康老就发火了）

康老：有人对赛福鼎同志建议的态度是错误的！特别是你们三个人（指吴巨轮、刘鸿科、张玉琪）不好，不举手！我看见了。我们不赞成！

总理：我也看到了。特别是胡乱闯，你的情绪不对，王恩茂打不倒，你就要回山东。

康老：（生气地）你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回山东，山东人也不要你。

伯达：你们三个人表个态嘛！

总理：你们两个（指刘鸿科，张玉琪）还勉强，你（指吴巨轮）还在那里对赛福鼎同志的建议冷笑。最后看到康老和我看你了，你们才举手，这才引起注意，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我和康老都在注意了。

总理、伯达、康老、文元：你们三个要表态！（李东辉：现在有人说不联合，说是王恩茂打不倒不联合。）

总理：这怎么能行呢？怎么能这样呢？（刘景本：新疆革命大联合的阻力主要来自王恩茂。王恩茂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康老：你不要讲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打不倒王恩茂新疆一辈子不能大联合？不能三结合？（刘景本：我们不是讲打倒王恩茂这个人，而是打倒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康老：你的意思是什么？好好讲讲。

总理：他（指王恩茂）把江青同志批评他有二心的话都对你们讲了。这是事实吧！这是在给中央的报告上他讲了，没有对你们讲，他感到对不住你们。就拿这一点来讲，他是诚实的。这不能说没有吧！他向你们这样讲了，江青同志知道后都感到不安。

康老：总理和伯达同志讲了很多，我本来是不想讲的，吴巨轮同志的发言态度不欢迎赛福鼎同志的建议。刚才站起来发言的同志，还是向后看，不向前看。你们说现在搞革命大联合的条件不成熟。这正是敌人高兴，这不管主观上怎样，客观上符合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的需要，符合了蒙修的需要，符合了蒋介石的需要，符合了印度反动派的需要。你们总是没有敌情观念，看不到敌人，不顾全大局，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把同志们的脑子迷糊住了。你们讲你们一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简单举个例子。就讲今天吧。从今天的事实，我们亲眼看到。毛主席问赛福鼎同志：“怎么样。”赛福鼎同志对毛主席说：“已经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毛主席说：“好。”赛福鼎同志说：“下一步准备搞大联合协议。”毛主席说：“好！好！”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讲“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新疆条件已经成熟了。可以大联合了。你们却认为条件不成熟。

这是不是忠于毛主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话是我在这里听到的。不管你们怎么讲，从这看，你们说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假的忠于毛主席假的。我本来不想讲的，怕另一派抓你们的辫子整你们，这是很可能的。但你们的态度把我们逼得不得不讲了。毛主席说搞大联合好！好！你们说条件不成熟。你们说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你们把自己看得了不起，你们比毛主席还高明？！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们是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还是用另外一种思想作指导？总理、伯达、文元同志都讲了话。赛福鼎同志那样热情提议，你们不听。你们是什么阶级感情？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自封的，要看行动。我再三讲，要向前看。面对阶级敌人，你们还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办事，你们那样想不对的。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两派都有错误，青年人嘛，要改嘛！总理不是经常讲你们的好处吗？说你们犯了错误还能够改正。为什么对自己可以，对人家就不行呢？还是伯达同志讲的自我批评不多，敌情观念太少。我们希望同志冷静地想一想，不要头脑膨胀，要看到自己的错误。为什么毛主席当面说的话你们不听，你们对毛主席的思想怎么学的？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作了结论，新疆大联合不是条件不成熟，是成熟了，主席说好！好！如果不成熟，为什么毛主席这样讲？你们应当改变这种态度。退一步讲，就是条件不成熟，你们为什么不去创造条件呢？请同志想一想，两派都要想一想。你们两派都要注意。新疆有个不好的苗头，有个不健康的情绪，说我们人民解放军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军管，支左都不好。军区不好，军分区也不好，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毛主席讲三相信三依靠，重要的一条是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难道新疆就例外吗？你们两派都要检讨，特别是三新，要端正对解放军的态度。新疆解放军出错误是王恩茂的责任，不是解放军的责任，不能因为王恩茂有错误就骂人民解放军是混蛋王八蛋，我们应当骂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蒋介石、伊敏诺夫是混蛋王八蛋，怎么能骂人民解放军是混蛋王八蛋呢？我要提出抗议，难道这是正常的情绪吗？解放军有缺点错误，要帮助改正，他们要检讨就欢迎，不能采取你们这种态度。当然，我不是包庇王恩茂的错误，王恩茂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我也不是包庇张希钦的错误，张希钦的错误比起王恩茂的错误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也不包庇军区军分区，应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指挥的革命军队，你们对解放军是什么态度，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没有

解放军你们能这样搞文化大革命吗？你们对解放军一点感情也没有。军队中有些缺点。（富治插话：没有打过仗。）就是没有敌情，把一切罪过都归于人民解放军，这都是原则性的错误。我希望你们好好想一想，到底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要拥军爱民。你们是怎么拥军的？一派是夺枪。一派是骂解放军，罪责都加到人民解放军头上，这是不对的。总理，伯达讲你们落后了。在北京学习四个月，文化革命两年多了，连大联合都搞不起来，不知羞耻！还振振有词，自我膨胀，不脸红吗？希望同志们平心静气想一想。我今天主要讲“三新”的问题。我要警告另一派，比方说，不要拿我们今天的话去压“三新”。如果这样做，下次犯错误就轮到你们了。从前就有这样的例子。批评了这一派，另一派三天就犯错误。

富治：这是捞稻草！

总理：（对三促胡良才）你是一个工人，要负责说服大家，你们不要捞稻草。

康老：你们自己的错误就够你们检讨的了。你们是一派掌权。你们住在一起，却不搞联合，而提倡耍政治手腕。你们写的那些信，谁不知道那是手段，你们还振振有词！

（这时大家呼口号，坚决执行康老指示！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老：我没有什么好学习的，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对新疆问题的看法和你们有些同志不一样。我认为新疆形势和全国一样是大好的，大联合的条件是成熟的，要很快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我建议，今天是七月二十一日，我希望在十天内，到月底，在北京的代表协商达成一个大联合协议，现在散会。

总理：在十天内，北京代表达成一个大联合协议，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就可以谈三结合的问题。

（中央首长领大家呼口号）

伯达：革命的大联合万岁！

总理：革命的三结合万岁！

群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我们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敬祝我们各族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新疆各族广大革命群众，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发扬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揪出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新疆地区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六月三十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听到新疆两派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下一步准备搞革命大联合协议时，非常关怀地指示：“好！好”，这是支持、鼓舞和促进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力量。六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的批示和七月二十日中央、中央文革首长在接见新疆代表团时的讲话，又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指出当前新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条件已经成熟，号召我们立即实现革命大联合，团结对敌。我们以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实现革命大联合，为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立新功，来报答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我们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的帮助下，经过斗私批修和充份协商，就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达成如下协议：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掀起革命大联合的高潮。要认真地学习、宣传和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有关革命大联合的指示，特别是关于新疆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最新指示，认真地学习、宣传和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六月二十二日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七月二十日的讲话，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最快的行动，立即掀起一个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群众运动。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联合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促进思想革命化，把新疆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各地区、各单位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应通过协商，建立大联委。大联委的成员应根据两派对等原则协商产生。红三司也应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大联委要积极推动基层单位的大联合，并积极筹备建立本地区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

大联委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大联委的成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地把自已视为

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而不能只看作是某一派的代表。大联委必须充份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多和群众商量，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后，要大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要互相干预、互相介入，更不要干预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三、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谭、薄、安以及在西北和新疆的代理人揭深揭透，斗倒斗臭，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肃清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粉碎右倾翻案妖风。革命的大批判，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实际，结合各项任务，持久地开展下去，紧密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四、要正确地对待干部。毛主席教导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地对待干部，迅速解放大批干部。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热情帮助，给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让干部站出来工作。对两派有重大争议的干部，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统一认识，一方要批判时，大联委应给予积极支持。争论未决的问题，由大联委统一组织联合调查、核实材料，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呈报上级审查处理。

干部要正确地对待群众，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当群众的小学生”，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该本着毛主席“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的教导，彻底检讨错误，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为人民立新功。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感情，热爱人民解放军，拥护人们解放军，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学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要大力协助人们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和战备工作。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八·二五”号召，“九·五”命令和“八条”、“十条”，要作拥军的模范，密切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破坏军民团结的罪恶阴谋，保卫我们的伟大钢铁长城。

六、解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立即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两派都必须坚决动员离厂、离队、离校的职工、农民、和师生，返回本厂、本队、本校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在厂在队在校的职工、农民和师生要热情欢迎他们返回本单位、本学校，不得刁难、歧视和迫害。

七、坚决贯彻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认真地、坚决地贯彻“六·一五”协议。

八、解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七·三”布告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是分清敌我，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孤

立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极其重大的措施。我们必须积极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坚决贯彻毛主席“五·一九”批示，深入发动群众，各自整顿组织，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混入本组织中的坏人和黑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得以资产阶级派性混淆两类矛盾，双方都不得到对方组织中去抓人，真正做到保护广大群众，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九、坚决捍卫毛主席光辉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新疆地处我们伟大祖国反对美帝，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前线，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地方。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国内外阶级敌人惯于利用民族问题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疯狂地破坏，我们必须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性，增强敌情观念，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对

敌，彻底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制造、挑动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

十、铁路系统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全面落实元月五日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五·一二”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和“六·一五”协议，实现、发展、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为早日成立第一铁路工程局革命委员会，实现铁路一片红而奋斗。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

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永远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加速实现革命三结合，促进新疆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彻底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阴谋诡计。新疆八百万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正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轨道乘胜前进，必将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让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在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面前发抖吧！

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京代表签名：

乌鲁木齐地区

三新方面代表

杨立业 尤努斯 刘景本 陈德平 马明远

于立支 艾尼 田淑珍 吴巨轮 张玉麒

刘鸿科 李清溪 杨贵尧 斯拉木

三促两红代表

胡良才 王子玉 杨宏勤 肉孜买买提

赵廷选 郭志英 玉素甫 张秀兰 葛希成

李东辉 华反帝 卡得尔 李济民 骆建新

红三司代表

曹昌学 李振同

喀什地区

马富贵 王宗信 张惊涛 胡立政 田峰 阿不拉阿吾提 于国言 周玉蓉

伊犁地区

周 军 托尔逊木沙 王造反 潘育成 阿不利提甫 柯之勤

哈密地区

王 炜 李福炎 王晋成 谢凝祥 毛积森 张志武

昌吉地区

程 鹏 姚德祥 马 晨 向文忠 王 有 李党恩

博尔塔拉地区

刘万生 依马木 潘志明 杨瑞生 其割米提 刘树清

塔城地区

卜训成 李东飏 曹德谦 王忠庆 丁 安 刘涛华

阿尔泰地区

李长海 周自和 刘恒利 曹忠贤 冯少林 曹 阳

巴音格楞地区

刘子英 安文杰 杨瑞华 张希德 王象炎

阿克苏地区

刘世清 黄润卿 姜世平 周国党 买买提沙特尔 蔡洪禄

克孜勒苏地区

王吉俊 于松柏 程华庚 康 策 王明善 艾力马木提

和田地区

李红武 赵德铭 管雨声 谢兆麟 艾合买提托合提 程庆彤

克拉玛依地区

衣培显 马忠远 赵铭海 宋洪道

第一铁路工程局

王增民 刘显明 刘事江 黄庆奇 孙如喜 袁克恭

军队主持会议代表

新疆军区 生产兵团 七三三五部队

赛福鼎 裴周玉 陈 冠

支左部队代表

刘发秀 任书田 崔 虎 向 新 黄 瑜 高明正 张鸿斌 王善良

张世平 高成玉 董香森 王新光 崔文海 王复华 孙宝慎 尉祖光
任树峰 王正臣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新疆两派大联合协议的批示
1968.08.01；中发 [68] 118 号

照发

毛泽东

新疆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七月二十八日签订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以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团的指示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永胜、法宪、叶群、东兴、玉成等中央和中央文革首长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九时三十五分到三十日凌晨一时四十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新疆代表团和新疆军内代表。根据三新代表团和铁造司代表团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首长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健步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总理：同志们，今天临时请你们来，西藏、新疆的革命委员会快要成立了，成立革委会的报告已经交给你们讨论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今天还是上次来的同志，已经见过你们一次了，上次江青同志没见你们，这次高兴的见你们。你们那一位先说，不一定作了准备，（工促会胡良才同志站起）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胡良才作了回答：三促的？新大的？）哦！工人，（看名册）当胡良才谈到上次中央总理等首长接见时）

总理：是中央、中央文革、（当胡良才谈到把成立革委会的报告传回家里时）

总理：这是个大错误。是用电话打回去的还是用电报打回去的？（胡：用电话还搞了录音）

总理：还在街上贴了大字报吧？（胡：没有。）

总理：还到军区去闹，是吗？三个促都去了，工人、农民、学生。（胡：有工人、学生、农民很少）首长问胡家庭情况。胡检讨错误后坐下。新工总杨立业站起）

总理：你是哪儿的？（杨：新工总的。）（总理看名册）十月拖拉机厂，也是山东太安的。多少年工龄？（杨：十二年）也十二年，巧！（当杨立业谈到总理和中央文革把革委会成立的报告交给群众组织讨论时）

总理：是我们碰头会研究的。（当杨对谈到报告还有保留意见时）

康老：保留什么意见？（杨对王恩茂进革委会通不过）

康老：还是王恩茂。

总理：王恩茂是犯了不少错误，在新疆十几年来，总还是做了些有利于劳动人民和我们党的工作。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里通外国分子、作了有利的事，还有生产建设兵团啦！红二司的同志们，你们想了没有？这个，我们以前没有说过。（当谈到王恩茂有二心时）

总理：他不是承认了吗？不是批评了吗？摆一摆，想一想。（这时红二司吴巨轮同志站起）

总理：（对江青）他叫吴巨轮。（当吴巨轮就成立革委会问题作了补充时）

总理：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指新疆、西藏）（当吴谈到革委会名单时）

江青：你为什么不讲新疆文化大革命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法？

总理：报告中名单只占很少一部分嘛！（当吴谈到毛主席对“7·25 三新拥军谈心会的报告”作了伟大批示，而有人却借此说三新是反军乱军派时）

总理：三新是反军乱军派！（总理与其他首长笑）（当吴巨轮汇报到成立革委会的报告中对新疆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全面时）

总理：是评的低了，还是评的高了？（当吴说只点那五个人还不够，不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后）

康老：吴巨轮同志，我问一下，新疆大学在北京有几个代表？（吴：四个）有没有共同研究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管理学校的最新指示？（吴：没有）这对你们可重要了。

总理：你们一直没有谈过吗？你们不联合了吗？还是两大派啊？（这时，红二司刘鸿科同志站起来）

总理：你叫刘鸿科？胡大乱，姓都改了。鸿雁科举（笑）你们这四个人都没谈过？（刘：和李致民谈过）不打不相识，直到现在你们还不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一起谈。你们各请各的怎么返校？他找工促会的，你找新工总的，这怎么行啊？叫工人阶级帮你们大联合。

康老：你们思想通不通得过，工人管你们？（刘：通。）

总理：你们找杨立业，他们找胡良才，这样通。首先一个工厂要实现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成立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这样才能进入学校。（杨立业：现在都想抢着进去）

江青：一定要联合起来清理阶级队伍。（当胡良才不承认有抢着进校的情况时）

康老：你不要讲，他讲的是真实的。如果没有联合，就一定要抢。你们新疆工人阶级今天还没有条件进校，还没有条件执行毛主席这个伟大指示。

康老：胡良才、杨立业，现在是学生领导你们，还是你们领导学生？（杨：过去就是）

总理：现在要转啦！你们两派，一个工促会，一个新工总，你们首先联合起来，三结合，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才能进校。

康老：首先清理阶级队伍。（当胡良才谈到八钢早就联合，并说明两派人数时）

康老：那更应高姿态罗！（当胡良才汇报到联合起来时）

康老：你们军管会（比手势）还是支一派压一派？是不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什么时候联合的？（当胡良才讲元月份总理谈到二月六号成立新疆革委会时）

总理：我说的是好几个地区，也不是只说的你们嘛，二月六号，我也不是算命的嘛！

康老：联合起来，有没有把坏人揪出来？（胡答：已揪出了几个，送到公安局）

康老：现在清不清理阶级队伍？（胡：现在自己清理自己的）

总理：现在已经联合了，上面还是工促会？（胡：大联委出头）

总理：工促会找大联委，新工总找不找？（胡：找）（新工总刘金本站起来）

总理：你叫什么？（刘答）（看名册）区党委的。原来在那里？（刘答）多少年了？（刘：十二年）你说过待遇两派还不一样？（工促会肉孜站起来）

总理：你是那一位，三促这方面的，你叫什么名字（答）会说汉话？（答）现在区党委作什么工作？（答）你那年学的汉话？（当肉孜说三新坏人多时）

总理：你们三促会就没有？！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个都没有？！（当肉孜说“有是有，但不让他们参加活动”时）

总理：开“5·28大会”听说你们这边也有少部分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参加，是吗？（当肉孜大谈武光问题时）

总理：你说短一些，这些事我们都晓得了。（当新工总刘景本谈到有关干部档案人员问题时）

总理：干部档案在一派手里，如果在一派手里由军区接管，现在是不是归军区管？（当肉孜谈到档案的钥匙是被属三新的干部拿走时）

康老：同志，到底现在钥匙在谁手里？是在军区手里，还是在群众组织手里？（刘答）

康老：档案要在军区，不能在那一派手里。一派掌握档案是不允许的。

总理：现在是不是在军区手里？

永胜：不管在谁手里，交给军区就行了，为什么非要这个人去工作？

总理：你们（指三促）要非把那个人扣起来不可？把人和钥匙交给军区就行么！军区把钥匙拿过来，郭鹏，你也不清楚，龙书金同志也不在，应该把钥匙接过来，（这时，赛福鼎站起来解释。当赛谈到他曾处理的意见后）

总理：有龙书金同志回去查一查，不管那一派，档案都要交军区，反正档案由军区管理。乱了要理整，不管那一派，搞出去了要负责追回来，三促插手的，也要负责。（三促会王子玉站起来，总理询问家庭等情况后）

总理：你们印刷厂大联合了吗？（答：没有）你们有多少人？（答：一共九百多人，我们七百多人）你联合起来，才能按毛主席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在你们这边的人多，你们怎么不能联合，姿态高一些么！（当王子玉发言中谈出“军方”二字时）

总理：不是军方，是军区。这不是共产党的语言。（当红二司塔城分部李东彪谈到塔城单方革委会时）

总理：是去年几月份成立的？（李答）新疆大联合你们不是参加了？（李：参加了，可他们不承认，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说，全疆的对塔城不适用）

总理：军分区有人没有？你们说全疆大联合协议在你们那里不适用？（塔城军分区说：没有）

江青：我刚听几个同志发言，感到气氛不太好。到北京来，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身边来，而且已经达成大联合协议，可是还是坐在两边，这边指责那边，那边指责这边，那边说这边不好，这边说那边不好，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怎么行呢？我感到不太好，你们在我们面前这么互相指责，怎么能大联合呢？我提点意见供给你们参考，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我们面前互相指责这不是大联合的气氛。（当三促塔城代表站起来要讲话时）

总理：你们是塔城的吧？是不是又要答辩哪？能不能先自我批评？（当他谈到过去压了三新时）

总理：那是犯过压制的错误。那现在怎么办哪？（××：感到痛心，做检查，谈到补台时）

总理：你们怎么补台，吸不吸收他们？（××解释）你们那里没发生过武斗吗？（××答，并谈夺权中有些错误）现在怎么联合他们的？（××解释）你们有多少人？（××答）

总理：革委会主任是谁当？来了没有（××解释）

康老：你们的主任就是当地原来的旧地委书记？（××竭力的解释）

康老：那你夺的谁的权？是不是夺的代理书记的权？（××还解释）

总理：不要说了，你们没有把群众联合起来，就不完善，不联合，你们负责任多。（当红二司塔城分部代表在发言中提到“军方”二字时）

总理：什么“军方”，部队犯错误应该检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是祖国的保卫者，什么“军方”，“民方”，这是资产阶级的话。已经宣布龙书金同志为新疆军区司令员了，你们晓不晓得？

江青：站起来认识一下（热烈鼓掌）（当三促方面红革联代表谈到成立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提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恰当时）

总理：为什么不恰当？（××：我们认为大方向完全是正确的）

总理：有的还开枪，你们不晓得？开枪与你们有一点联系吧？与三促有关系吧？（××军队有错误，但大方向是对的）（这时红二司刘鸿科站起来）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刘答）（当刘就成立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汇报，其中当谈到有的军分区如塔城军分区在讲话中称：“三新”群众为“朋友”时）

总理：“朋友”？！（总理及其他首长，笑）

江青：人民解放军称自己的同志为朋友吗？！

总理：塔城军分区来了没有？是不是有？（塔城军分区负责同志答：可能有）

总理、江青：你们要回去检查。

江青：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怎么能对群众这么称呼呢？（当刘鸿科谈到有的军分区如和田军分区负责人在这里还说三新是保武的把三新打成武光之流时）

总理：今天，三促同志们要注意，你们就没有犯错误？武光问题他们上了当，你们就没有上当？！他们受了骗，经验不足嘛，你们不要那么太自满，事物是在发展的，群众一时上了当，广大群众是没有关系的。（当工促会胡良才起来辩护武光之流并非指三新时）

总理：你不要说了，他们的心情我是了解、懂得的，你们那样说实际上还不就是指人家的嘛！

康老：三促同志，武光问题并不是你们揭出来的，是中央揭出来的。你们就那么高明？如果那么高明？那你们为什么不早揭出来？那还是中央把他揭出来的。

江青：三新对武光问题，吴巨轮同志认识到受了蒙蔽，检查了，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应该摘掉这个帽子，不能加在他们头上，这是打击群众。如果三新说你们是什么之流，你们舒服吗？这个帽子应该取掉。

总理：和福建一样，福建对于“张冠之流”也是搞了一年，你们还说不是指三新，你们嘴里不说是指三新，实际上是指三新，我们知道这个。

康老：这个口号（指武光之流）是错误的。

江青：刚刚来，不了解情况，听你们说，三促是多数派，三促既然是多数派就应该气魄大，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真理往往不在多数派那里，而在少数派手里，少数派也会发展到多数，那个“之流”，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受军队的影响。

总理：这是支一派压一派。（当刘鸿科汇报到在谈大联合协议三促方面只承认新疆军区宣传队而说七三三五宣传队是不合法的时。）

总理：七三三五空军的宣传队，两个宣传队都是合法的。你们三促也怪，说七三三五宣传队不合法，这一点，三促也是不对头的。

康老：军队是统一的么！（当刘谈到我们坚持在协议中提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校宣传队的帮助下时）

总理：对！对！（当刘谈到三促坚决在协议上写上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时）

总理：人家军区在检查中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几个大军区也都承认了这个错误。这一点，新疆军区倒有自我批评精神，你们确不要人家自我批评。（当刘谈到有的军分区如克孜勒苏错误的解释毛主席批示的“照发”只是照着发下去，而并非要“照办”时。）

总理：克孜勒苏军分区来了没有？有没有这个情况？（答没有）

康老：同志们，也给大家说个笑话，原来办法的“辨”是两边一个辛苦的“辛”，中间是个“力”，双方一努力就办成了。现在简写，中间一个“力”，一边一点，可是那一边缺一点，就不是办了，办不成了。

总理：克孜勒苏军分区，还有个军分区，回去查一查，不要都说没有，你们这个情绪不对头。在学习班三新做了检查，军分区同志也很感动，你们都争先恐后发言，情绪很好。龙书金同志你知道了吧？联络组的同志汇报时也很感动，觉得三新和军队很好。当时感动，可是后来也就变了。

江青：三新做了自我批评，就抓小辫子，过去很受感动，今天又抬头了，今天就发现了不承认。

总理：今天情绪不对，我听了两个，克孜勒苏、和田的，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如果说哪个部里有什么问题，我还不敢说没有，还得检查。你在这，怎么敢说没有？就应该调查，怎么能包下来。

永胜：主席批示印发了很多，其他学习班学习的很好，受了影响。

总理：我对军分区有点意见，回去后要在龙书金司令员新的领导下好好检讨。

江青：尤其在边疆，军队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总理：王恩茂承认犯了独立王国的错误，你们军分区就是没有影响？（当刘谈到有枪枝还没有上交时）

总理：你讲的乌鲁木齐市，还是全疆？（刘：乌市，全疆也基本这样。）

总理：裴周玉来了没有？兵团所管工厂是否实现了大联合？成立文革的是多数、少数？你们应该带头啊！兵团这么大的单位也要照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成立革委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这些事都要搞。（当刘汇报到有的群众还回不到本单位时）

总理：革委会成立了，要叫他们回去，两派都要欢迎，革委会成立了还不能执行协议，要一起回去么！回去就解决了，协议上有么！要执行协议，协议是主席批示的。

康老：新疆产业工人有多少？（有××万）

江青：没有搞大联合三结合，不要进入学校，有人抢进入学校，这个不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要在那个地区有条件。

总理：搞的不好，反而弄乱了。（当刘谈到目前家里正在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时）

总理：你们要好好把毛主席的指示，文元同志的文章学习一下，认真学习，结合起来，要实现。

康老：当然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作用，但有缺点，前年冬天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在飞机上遇到了北航在那里，当时北航是起了作用的，否定这个作用是不对的，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应肯定这一方面。但是现在北航群众是好的，问题在头头。姚文元的文章北航的头头是有份的。所以好好把文元的文章学习。（当刘谈到“三促”贴出了“以工促会铁联总为代表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时。

总理、康老：（笑）你们有没有？不要光说人家，很难说哩！

康老：这个问题有连锁反应。

江青：新疆八百万人，产业工人××万，比重很大，形势大好啦，应很好发挥作用。主要清理阶级队伍，这个还没搞好。工人阶级要左右形势。

总理：应该很好首先搞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本单位的本派的要作出榜样。

江青：我们从关内调出不少人到新疆。

总理：新疆工人历史短，但有很多是内地去的，上海的、天津的、鞍山的、本地的那是一代，还有点基础的，在座的工人同志要回去主动搞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知识分子本人还是有弱点的，长期读书，脱离实际，受资产阶级教育。自己知道这个弱点就很好。

康老：你是学什么的？（刘：学政教的。）

康老：云光，你们定为什么？（刘：我们定为三反分子）

康老：噢！他可是教你们的！（当刘谈到抢着进校势必会引起两派激化时）

总理：联合起来清理阶级队伍是很重要的。要归口闹革命。我们内部通知发了，会送几份给你们，你们明天给他们念一下。（当刘谈到现在还有抢着成立单方革委会问题时）

总理：现在抢成立，当然是不应该的。

康老：那次是说已经成立的（指七·二零首长指示）。

总理：如果这样，军区批准也是不对的，龙书金同志要审查一下。

（当刘谈到补台问题只是给留两个名额时）

总理：两派组织经过充分协商，要充分协商，一次不好，两次。

康老：要充分协商，充分协商。（当刘说首长已明确作了指示，我们都要坚决照办时）

总理：解决还是你们解决，每个单位，军区、兵团、三结合实现革委会，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统帅下，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走。我们……

江青：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刘表态完，工促会胡良才站起来发言）

总理：你第二次发言，时间短一些。你们别人有没有发言的？

（铁联总黄庆奇发言。谈到盼望中央批示报告时）

江青：你们的修改稿还没有送到这里来，我们看的还是那个老稿。（当铁联总黄庆奇谈到新疆军区是支持我们打倒武吕张包伊是对的，怎么能说犯方向路线错误，所以思想上想不通时）

江青：（省略一段）王恩茂许多时候是跟刘邓的，也有时候是跟毛主席的。

（当铁联总黄庆奇说三新贴出的某条标语是分裂解放军时）

江青：你们那边也有分裂解放军的行为。

总理：说空九军的宣传队是非法的。

江青：要维护解放军。你们也有企图分裂解放军的。（当黄谈到报告中没有把叛徒，特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写进去时）

江青：刘邓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恩茂是站在这条路线上的，现在想回头。武光和刘邓有联系，是大头目、小头目的问题，都是敌人，这个问题就很明确了，你们不知道，两派要平心静气，就不要吵了。

（当黄谈到七·二零指示以后对方如何如何时）

总理：不要讲了，刚才不是讲了吗？

江青：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当黄谈到还有一部份人在外时）

总理：一部份人没回去，还要不断欢迎他们回去。

（这时铁造司代表站起来说目前仍然存在抓打现象）

总理：刚才铁路上谈了几个问题讲的还可以，可是后来就指责对方了。

（铁联总黄庆奇谈到三新贴出标语时）

江青：这个口号是什么？（黄答：是“支持赛福鼎、团结龙书金、打倒王二心、枪毙张希钦”）

总理：这个提法不对，现在都正在商谈，几个人都存在，怎么能把几个人这样分开。（这时，哈密“三新”代表解释说这个口号是“支持赛福鼎、拥护龙书

金……”）（当铁造司代表谈到中央，中央文革首长“七·二零”接见后仍发生抓打时）

总理：达成协议后还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有？（铁联总代表说“没有”，双方争执）

总理：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我们不听了。

江青：公与私是对立的两方面，没有公就没有私，没有私就没有公。问题是公与私怎样摆法，是把公摆在上面还是把私摆在上面。今天听了你们的，据我看，你们两派把私都摆在上面一点。因此今天听一听还是有好处的。你们面对苏修，蒙修，斗争是错综复杂的。这样，要多作自我批评，坐下来。你们在我们面前都这么吵，我想回到学习班会吵得更厉害。要顾全大局，不顾大局就被敌人笑掉大牙。你们两派后面都有坏人挑动，只要你们搞了无产阶级大联合，敌人就跑不了。你们不真正搞大联合，敌人就有空子钻。

康老：同志们，你们看一看会场，两边互相指责。你们在中央面前要坐到一块去，已经达成大联合协议了，在中央面前还都坐不到一块。

江青：去年九月五日，康老把我拉去接见安徽代表，叫我讲话。我很吃惊，一边鼓这个掌，一边鼓那个掌。原来是两派，你们这些头头是脱离群众的，你们回去后群众是不答应的。我们可通过报纸、广播传达、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那里有两个报纸还统一不起来。你们那两个报一个是（有人答：一个是军字号、一个是造字号）今天对我们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看你们回去还要好好商量，在我们面前都互相指责，这是很虚伪的。

总理：抓住一点，就攻，刚作几句自我批评，以后就又吵开了。

（这时工促会胡良才说，这是因为我们工人没起到作用）

总理：是首先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

江青：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文元的那篇文章就是毛主席改的，里面有不少是主席的。文元：不仅是那两段语录。

江青：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要辜负伟大领袖的期望哪！

（当胡良才谈到大联合时）

江青：联合起来，清理阶级队伍，两派都有坏人。

总理：每个队伍里都有坏人。

江青：清理了阶级队伍，然后进驻学校，进驻学校是要有条件的。××万产业工人不能左右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不可理解的。总是有坏人挑动的。

总理：一方面是有坏人，另还有听学生的。工人阶级应带头，学生要与工人结合。工人和学生不一样，学生放假闹革命，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停产都不行。

江青：现在工人阶级要左右文化大革命局势。你们新疆落后于西藏。

康老：你们大大落后于西藏。

江青：我们听听你们的，结果是这样的。

伯达：你们脱离当地群众情绪。

总理：你们脱离当地群众情绪。刚才听到刘鸿科的反应是客观一些。他回去一趟，情况熟了，他讲的就客观一些。当然还有的是不一定对，两报一刊社论应该好好学习，可是头脑还是这么热，大家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实现革命大联合，还是闹宗派，山头主义。如果军区某些领导同志有错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就不要受影响了。要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气魄，我们请你们谈谈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你们有许多事没调查清楚，到这里吵，我们怎么听（工促会胡良才又说：主要是我们工人阶级没带好。）

总理：这是毛泽东思想。（当胡良才谈到没有向家里作好工作，落后于群众时）

总理：这话很对。

江青：你们学习了文元同志那篇文章了吗？

总理：在一起学习不了。没在一块学，就各取所需。

江青：你们刚才一个同志说，今天是来准备听宣读批示的，没有宣读感到那个。你们回去要合起来一块学，坐到一条板凳上，不要坐到两条板凳上。如不这样就不配当群众的代表，群众的头头。你们谈的，出我意料之外，幸亏我听听。

（当喀什三促方面红革联周玉蓉起来要发言，胡良才却要讲话时）

江青：那个女同志发言。这是唯一的女同志（发言），你不要大男子主义，轻视女同志，不要打断她。（当周玉蓉谈到三促资产阶级派性汇报提纲，“这是真联合，还是假联合”时）

总理：对啊！问问自己。（当周建议两派共同搞个汇报提纲时，受到三新代表的热烈鼓掌欢迎。）

江青：（对周）来，现在就坐过去。（鼓掌。两派交换座位，呼口号）

康老：你讲的，提出一个问题，那提纲是一派搞的，还是两派搞的（周：一派）一派的提纲是根本不成立的。你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搞。

江青：你们都是青年小伙子，两个晚上不睡觉死不了。回去后，这两天充分协商，把这个东西搞好。

康老：你是那方面的。（周：三促二红方面的）

康老：拿那个提纲去整人家，三促要注意。

总理：这个女同志把你们的缺点提出来，这才是好同志，这才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只有自己揭自己的底，才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样就会走向团结。军区龙司令员是班长，就应该维护人民解放军，不能再喊什么保王兵啦。当然，这是个别人，个别组织啦。这样，不管那派都要批评，犯了错误有几种人，有的犯了严重错误，是要改的，只有死不悔改的就打倒。要改的就帮嘛！王恩茂还没有走到敌我矛盾，但错误是严重的。刚才说是与刘、邓、贺龙、习仲勋，叛徒是有区别的，是要改的。

江青：要变一心，要帮助。

总理：要允许给他机会嘛！军区是巩固的嘛！回去会想通的，是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对毛主席的指示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军队是听号令的，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新疆敌人主要来自苏修、蒙修、想挑拨、破坏、但挑拨不了。广大群众是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何况有××万产业工人，只要经过教育一切都不怕的。回去后，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在新疆是没有区别的。生产建设兵团也是起了作用的，基本方向是对的。（略一段）同志们，大局要看清，主要的来自修正主义、民族败类、民族分裂、里通外国分子、反动派、美帝属于一类。内部还有反动军官、暗藏特务、要作工作，要肃清，清理阶级队伍。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要挖出来嘛！加以清理。这是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要忘记这么三条黑线，双方都要抓出来。要抓住大的，不要抓住小的不放，把三条黑线忘记了。要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因此，回去——

今天三十号了，你们回去不睡觉搞他两天死不了，搞大联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搞大联合，怎么把各个工厂联合起来。地方，如塔城、伊犁、都要做工作。不然白纸黑字，达成了实现不了。不能口是心非，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也是二心。王恩茂犯了错误，江青同志批评他，他还对你们讲了，没瞒你们，因此他这个检查不打算公开发表，一发表，说不定苏修拿去。王恩茂还不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在新疆工作。

江青：他还是个路线上的错误。

总理：这个报告（指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的报告）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决定，结果你们一下打回去，这胡良才已承认错误了。

江青：你们也可以批判我们，炮打火烧。北京不是有人还要绞死我，油炸我，我有空我就去。

总理、康老：北京也有人反对我们嘛！

康老：有个问题我重复一下。上次我讲过，对解放军问题，还是要按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要相信，要依靠，三依靠重点是人民解放军，根本是对解放军的相信。这一点，不是在某个地方，而是在全国，新疆是比较突出的。上次我对一些同志作了批评。特别是三新，吴巨轮同志，看来有很大的进步。只要有敌情观念，对解放军就有了正确的看法。如果没有解放军，你们两派怎么能进行文化大革命，江青同志说，这是我不能自毁。我向三新建议：你们这种思想还不是根深蒂固的。有时还可能遇到具体问题就又动摇，一动摇就要犯错误的，原则上的错误。这种思想要巩固它。另外三促说相信依靠解放军，这是好的，但是你们去保那些方向路线错误。本来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人家承认了，你们还说没犯，不承认，拉后脚，这叫拥护？

江青：还有分裂解放军哪！

康老：这一点不是拥护解放军，所以两派都有一个问题，正确对待解放军。

总理：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要听小道消息，我说了，北航是是非之地，但不是指广大群众，你们自己要好好考虑。

康老：新疆有没有参加北航黑会的？（吴巨轮答没有）（当三促××提出为纪念毛泽民同志建议把毛远新派到新疆去时）

江青：他已结合到东北，派到辽宁去了。

康老：纪念毛泽民同志最好的办法是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毛主席指示工作。

永胜：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江青：每个人都可以继承烈士遗志前进。

接见结束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欢送，中央、中央文革首长。代表们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总理等首长步出会场时，不断转身向全体代表招手。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新疆八百万各族人民，代表全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向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报喜：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成绩，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成绩。”

新疆地处反对苏修、美帝、印度反动派的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习仲勋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等，代表了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

义、反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妄图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疆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经过反复、激烈的大搏斗，打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多次反扑，揭露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终于把这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揪了出来，粉碎了他们妄图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迷梦，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为关怀，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作了英明的指示，给了新疆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一九六七年初，毛主席及时、英明、果断地处置了石河子反革命事件，作出了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十二条），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去年七、八、九月毛主席巡视三个大区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今年，中央文革的“六·二二”批示，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对拥军谈心会和八月一日对于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批示，大大加速了新疆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多次接见了新疆地区的代表，特别是八月十一日、十五日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全体同志和新疆代表团先后光荣地受到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接见，这是对新疆全体军民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是夺取新疆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强大动力。

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在执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支左工作中，军区党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自治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曲折和损失，教训是深刻的。其主要责任是在军区党委常委身上，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热情帮助下，军区党委对所犯的严重错误作了

认真的检查，已经和正在改正。王恩茂同志对其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他严重错误也多次作了检查，并正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进行改正。目前，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胜利前进。

回顾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每一段历程都是毛主席亲自指引，每一个成就都凝结着毛主席的心血，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我们满怀无限激动的心情，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

目前，新疆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空前大发展。全疆参加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已达五百三十余万人次，通过“斗私，批修”，有力地促进了广大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地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革命大批判正在开展。各族人民和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以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革命大联合热浪滚滚，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于七月二十八日达成大联合协议后，绝大多数专区都进一步制订了本地区的具体协议。革命三结合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更加紧密，更加巩固。

各族人民和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新疆生产建设形势一片大好。

各族人民和驻新疆人民解放军正在提高警惕，团结对敌，加强战备，巩固边防，决心把新疆建设成反对苏修、反对美帝、反对印度反动派的红色前哨和铜墙铁壁。

新疆八百万各族人民目前迫切要求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成立以后，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

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誓把新疆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四)

我们经过与各方面充分协商和党委集体讨论，现将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具体意见报告如下：

一、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名额定为一百五十名，除留预备名额二十名外，暂按一百三十名分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八十三名（内工人代表三十九名，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代表二十二名，学生代表二十二名），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八；革命领导干部二十五名，占百分之十九点二；军队代表二十二名，占百分之十六点九。在目前已选出的委员中，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三十，妇女占百分之十。

二、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四十三人组成，除留预备名额六名外，暂按三十七名分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十七名（暂缺一），革命领导干部十名（暂缺三名），军队代表十名。

三、革委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十二人。建议龙书金同志为主任，王恩茂、赛福鼎、郭鹏、裴周玉、李全春、杨立业、胡良才、孜牙、吴巨轮等九名同志为副主任（暂缺三名待补）。

四、革委会的工作机构，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工作人员暂订为一百二十名左右。

另外，乌鲁木齐市委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也已就绪，拟于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查批示。

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9.01； 中发 [68] 137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名单，批准由龙书金同志任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缺副主任三人待补。

中央热烈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境外，有苏修，蒙修，美帝和印度反动派的挑衅，在境内，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阶级斗争极其复杂和尖锐。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北和新疆的代理人习仲勋，刘澜涛和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等，同这些内外敌人相勾结，妄图把新疆变为修正主义的基地，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疆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罪恶阴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下，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教导，加强敌情观念，高度警惕内外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深入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紧密团结各族人民，一致对敌。

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批倒批臭。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继续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巩固边防，保卫祖国。帝，修，反如敢于来犯，就“坚决，彻底，乾净，全部歼灭之。”

要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方针，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制止觉悟。”新疆有五十万左右的产业工人，应该充份认识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在正在到来的新的斗，批，改高潮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切实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中央相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只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依靠各族革命人民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把新疆建设成为各族人民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团的指示

〔时间：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二十一时半至二十二时四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接见的中央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东兴、玉成同志。根据实况录音整理未经中央首长审阅。〕

伯达：现在开会，请江青同志宣读中央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在宣读中央批示之前，我祝贺同志们胜利地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江青同志宣读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文件，从略）

伯达：请周总理讲话（众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

总理：

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问你们好（掌声）。首先庆贺你们经过长期斗争组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口号，掌声）许多话都讲过了，现在提一下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另一个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搞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民族团结，军民团结，这三个问题。首先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之所以会经过这样长期斗争才组成，是有它的内在原因和外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就是在你们报告中所说的：在境外，有苏修、蒙修、美帝和印度反动派的挑衅。内有民族分裂主义、里通外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这些人的破坏活动，这是外因吧，除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算在这里边以外，这是原来社会就存在的嘛，它经常地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新疆的进行，但是，更主要的是内在的因素，就是在新疆党内跟全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以及他们在西北的和新疆的代理人习仲勋、刘澜涛和武光、吕剑人、伊敏诺夫、包尔汉、张仲瀚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上窜下跳，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他们进行各种的破坏，勾结国内外阶级敌人，挑拨离间、阴谋破坏，用各种方法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长期的对立，不能够实现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这个曲折的道路，你们都亲身经过，不需要多说。同时新疆党的领导机关长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觉悟迟，改正得慢，这也成为阻碍新疆文化大革命发展，阻碍大联合的重要内因。幸好我们新疆各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革命群众还是要革命的，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嘛，是要跟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走的，要反修的，要

反帝的，要反各国反动派的。只要新疆各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听到我们伟大领袖的声音和号令，他们就可能转过来，就是说，做错了的就改正嘛，受蒙蔽的就觉醒过来嘛，一时没想通的就通了嘛，就是说广大群众跟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结合在一起，那就能够取得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事实证明也是这样。举个例子，如去年石河子事件发生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作了决定，并且及时地作了一个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就把局势就稳定了。因为对新疆来说这不是小事，它包括有职工，家属在内 160 多万人，这么个数字的生产大军，有工厂、有农场、牧场、有交通工具、南疆北疆、布满天山南北，而且有一部分武装部队。特别是在边疆，跟苏修、蒙修塔边的地方都有生产兵团的生产单位，也是战斗单位。这个力量稳住了，就没有让暗藏在里头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暗藏的反动派、特务、叛徒、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右分子、劳改犯、没有起到破坏作用，形成了稳定的力量，这是对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很重要一个决策。这点，当时许多革命小将还没有那么看得懂，逐步，逐步的你们认识了这个稳定的重要性，新疆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大联合的步骤是推迟了，可是武斗也发生了，但没有象别的地方闹得那么厉害，境内外的敌人虽然进行破坏活动，但是还没有那样猖獗，除人民解放军以外，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说，广大群众的呼声被伟大领袖知道了以后，变成了伟大的决策，又回到群众中去，群众就掌握了我们伟大领袖的思想，决策，就坚持了这个决定，这是个很重要的例子。所以，今年你们就更清楚了，经过了中央文革批示的文件，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的拥军谈心会的“七·二五”批示和八月一日关于你们大联合的批示，这都起了极大的，强大的推动力，推动了大联合，最后一次，中央、中央文革与中央军委的碰头会各位同志在八月二十九日接见了你们，江青同志在最后发动了一个大联合的运动，使你们长期对立的情绪改变了，从那天晚上改变，长期对立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已经混座在一起了，联合在一起了，今天是不是联合了？（群众答：我们变成一家人了）（群众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江青同志：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只有五天，形势就改变了嘛，可见，常常是数量变成质量，就在一个关键时刻，一发动。所以那次江青看准了形势，一发动，马上形势就改观了。（群众

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向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如果说去年石河子事件，伟大领袖下的决心，稳定了当时新疆局势，这一次八月二十九日的联合行动江青同志指导的，就起了一个进一步推动大联合的作用。可见一切事物运动的发展，它有一定规律，到必要的时候就要加以提倡，加以推动。因为现在条件已经这么成熟，不能再等待了，不仅是周围的形势给你们推动，你们内部也成熟了，因为你们已经把内外的敌人都识破了吗，把阶级敌人都识破了，经过反复的搏斗，也把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也揪出来了，当然还要继续揪罗，但其头头们已经识别清楚了吗，至于这些头头曾经蒙蔽过那一方面，一时地受蒙蔽，这没有什么，对群众来说，作为教训、作为经验。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任何一个人在革命运动中，不仅要取得正面的经验，还应该取得反面的经验，犯错误只要能改是件好事，不然就没错误的经验了吗，也不完全吗，所以在这一点上，你们不要认为那一派保了那一个，都有保错了的，现在联合起来，就应该把这些事情作为经验教训，共同的经验教训罗。联合起来以后，共同地解放应该解放的干部，不要再认为你保的我不保。我保的你不保，这不对了吗，是不是？（群众呼口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最重要的你们还是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这是一切一切的根本。因为你们就是离中央远，来的时间虽然长，究竟是远离中央，过去的党委在这方面也没有很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受到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扰，所以毛主席的声音不能时常地传到天山南北，使你们那个地方政治上是落后一些，应该这么说，但群众并不是落后的，我多次到过天山南北，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跟随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学习，宣传不够。这就是要首先大家要，学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把这次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批语上有“七·三”、“七·二四”布告，大作学习工作、大作宣传工作、使天山南北八百万人民，连老太婆到小娃娃都能学懂，北京就有吗，连十岁左右娃娃都能宣传“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嘛。这样子就能大动员起来，这样子国内外阶级敌人就不容易藏身了，就能揭发出来了。（群众高呼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所以，我们要如同我们过去所常说的，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阶级斗

争一抓就灵，在新疆，极其复杂、尖锐，就是要眼睛擦亮，靠什么擦亮呢？就是要好好靠读毛主席的书，好好地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你们在这儿半年，毛主席许多新的指示，从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和十月发表的巡视三大区的重要记录，然后，今年差不离将近一年了在报纸上发表的许多主席的指示，你们要好好的学，好好的用，很可以把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一步。（口号，掌声）许多话都讲过了，现在提一下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另一个就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搞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民族团结，军民团结，这三个问题。首先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一步。在学习上，今后革命委员会应该大大提倡，只有这样才能使几百万群众眼睛亮了，头脑明了，就是能够使毛主席的思想为群众所掌握，那国内外敌人它就无计可施。它怎么破坏可以能识破。就是林副主席说的，要吃透两头，一头就是要吃透毛泽东思想，一头就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这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贫苦牧民和一切的革命群众。依靠这两头，你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也好，干部也好，我们解放军指战员也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在这一个基础上，你们才能说我们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说真正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而不是说，你一条路线，他一条路线，那是错误的嘛，无论那一派，你总不能完完全全的正确，不管那一派，把自己自封为左派，或者自封为完全正确，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当然，年青的小将们说错了，我们告诉他，没有完全正确的，年青的时候总要犯点错误的，不犯错误倒不可理解，除非你不作事，你不活动，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学了就用，在用中犯了错误，改，就才能懂得如何能够站的牢，站得稳，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这样就能大联合起来，就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所以，必须有个共同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头毛泽东思想，另一头是广大人民群众。你们不依靠广大群众，光依靠你们少数人，现在不是有些革命群众组织起来了，但少数头头在上面悬起来，不接近群众，这就不好了。时刻不能离开群众，我们现在就比你们苦得多罗，我们希望多接近群众，但是机会就比你们少，你们到了革命委员会里来，到各级革命委员会去，总不要脱离你们自己工作岗位，生产岗位，这样才能够一边学，一边不脱离群众，吃透两头，这就能够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能够达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第二个问题，就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首先就要实现归口闹革命，迎接斗、批、改的新高潮。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你们回去就要开成立大会了，但是，新疆看一看呢，各个专区，各自治州，还有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还少，至于各学校、各厂矿、各机关更少，原因呢？就是你们各组织长期以来，两年多，近两年吧，都是跨行业的，跨行业的，上次已经谈过了，就不能归口，我们应该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告诉我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那你们回去就应该来推动，所以你们工促会、农促会或者是红革联、新工总、新农总等等，都是两个两派，工也两派，农也两派，牧大概也是两派，学生更不要说是两派，这还是不能合，应该归口，按系统，首先就应该在工厂里搞，这回主席不是在报上发表的讲清楚了吗。拿一个厂子来说，总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嘛，实行革命大联合嘛。从工厂来说，从车间一直到厂，都应该这样子嘛，实现了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嘛，成立了这个，就可以进行大批判了嘛，在大批判当中，就可以解放干部嘛，因为光有革命的三结合，它不一定各级都解放，还通过革命大批判中，又清理阶级队伍，革命大批判，大批判不仅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还联系到本地区的、本省、本自治区的，本单位的大批判，来清理阶级队伍，这样子，容易解放干部，这样子，就可以整党，也才能吸收新的血液。没有革命委员会，没有清理阶级队伍，没有大批判，就谈不到整党，整党就必须吸收新的血液。没有刚才那几点，就不可能整党，有了整党，也才可以在这上头精简机构，有了领导嘛，就按工厂来说，科室人员太多，许多规章制度不合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这种上层建筑需要改革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一个厂，那天问了，有个厂下放到生产车间里去，把生产队伍扩大，把闲杂人员减少，这样就可以抓革命促生产，生产的速度就会更高，今天《人民日报》不是宣布了吗？北京这样大热天，八月份，几个厂都登出来了，不仅是人减少了，因为去支援到学校里去了，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针织厂去人最多，可是他们那个地方虽然是温度最高的时候，但是生产不仅完成指标，而且超额完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还有其他工厂罗，都给你们证明了嘛。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说的在工厂里一般斗、批、改的程序，但现在你们回去，就是要首先实现你们刚才也都承认了主席这个讲话罗，“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

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那么，你们承认这个，当然工人阶级本身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地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但是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在归口闹革命，有了主力军了，工厂工代会搞起来，新疆那么多城市，大中城市不少，还有大的农场，农业工人，都应该这样组织起来，这就成为有了主力了，有根据由这样的已经完成斗、批、改的工厂，然后再拿这个力量组织工人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进到学校里，进到机关里，帮助那个还没有联合起来的，促进他们大联合，帮助他们进行斗、批、改，甚至留一部分人在将来跟他们进行工人、解放军，跟学校里的革命学生、教员、工人的积极分子，这样的三结合，工人、军人、积极分子的三结合，就会把大中小学校搞好，同样的把机关也可以经过这样的改革，斗、批、改。如果说机关庞大，在新疆也是个典型，新疆的党政机关，我没有去参观，生产建设兵团，我去参观过，石河子那个地方，那个机关的庞大，要照张仲瀚那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计划，那把石河子变成了比乌鲁木齐还大的城市，那个图表不是划在那里。当然，经过批判他，这个发展停下来，不需要那样子嘛，应该农业为主的一些单位，在新疆遍地都可以建立嘛，沙滩都可以变成绿洲嘛，只要把地下水能够保留起来。所以这些地方机关庞大，就是要采取我们伟大领袖的指示，在斗、批、改中一定要进行这个步骤，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下，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下放人员，把很多人下放劳动。劳动的场所在新疆那是广阔得很，农厂、牧厂、林场及加工工业，大有余地。并且新疆，刚才中央批语已经提出了八百万人口。地方有五十万左右产业工人，生产兵团占二十万，这当然包括交通工人，都是带机器化的。这样大的数目，如果很好地照刚才说把斗、批、改高潮搞好，支援各个学校、各个机关、农场、那会搞的更好，就连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就会起的更大。但这个必须经过刚才那些很严格的步骤，不能一哄而起，首先还是先搞自己工厂，先清理阶级队伍。因为新疆究竟只有一代工人，来源比较广，比较复杂，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好的，经过教育嘛，有的就是有毛病，还可以改造的嘛，不可以改造的极少。所以这个问题对新疆来说，大联合要打好基础，打好了基础以后，推动一个城市大联合，一个专区的大联合，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想提醒一下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民族团结，军民团结。这在新疆关系很重大的。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不仅有维吾尔民族，这个数目还比较大，但现在汉族也占了不小比重，还有其他的各族。语言比较距离，语言系统距离比较大，正是因为这样子，要互相学习，汉族也要学习地方兄弟民族语言，学了一种其他语言就比较容易贯通了，因为他是同一个系统语系。反过来，兄弟民族也应该学汉语，因为汉族是全国主导的民族嘛，他的语言成为全国共用的语言，就这么一件事情，我就提议，赛福鼎同志在场啊，我就提议，标号到底是汉语在上头还是兄弟民族语言在上头，我认为应该汉语在上，兄弟民族语言在下面。因为他是辅助的。这个我在青岛一九五七年，我记得，你们没有去，一九五七年我讲过这个问题，离现在已经十一年了，我还坚持提这个意见。因为我们，当然嘛，汉族有这个缺点罗。它不拼音，主席总是主张把拉丁话拼着，将来帮助其它兄弟民族学习汉语，便当。这表示个什么哩？表示个方向。我当然这是个建议啦，你们革命委员会讨论咯。这个表示民族团结，因为我们向一个共同方向，毛主席思想，毛主席著作首先是用汉文写出来的嘛，是用汉文口语讲出来的嘛，要学习主席朴素语言，精深的道理，就要懂得汉语汉文才能学好，然后译成兄弟民族文字的东西，用文字译出来，使广大劳动人民都学到。在新疆互相学习语言很重要，并不难学，我们康生同志他听了藏族语言，他有个兴趣，你说藏文并不难学嘛，我想维文也并不难学，因为都是拼音，这个对我们容易。你们在坐的，我一看都年轻人多嘛，在新疆呆了多少年了？（向胡大乱）胡大乱，你会不会？你几年了？（胡答：十五年了）真是应该学了……

该学了，不然你怎么作群众工作，我们赛福鼎同志从来都带着翻译说话，好象你是抵另外一个国家一样的，你会汉话，你跟我们不亲切，你应该说汉话，我们应该学维吾尔话。（群众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加强民族团结！）十五年了不学维吾尔话是很不应该的。

总理：胡乱闯更没有学吧？（胡答：没有）

江青：我刚到上海的时候，一句上海话也不懂，我一到群众中去就学会了嘛，（总理插话：是的，一接近群众，他就无论如何要逼着你去学。）做群众工作，逼着学地方话。

总理：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变成一家人了，我们是民族大家庭。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兴旺，走向全世界胜利，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采用的是自治区的制度，这是个过渡制度，而不采用列宁时代那个加盟共和国，这个问题在宪法上都说清楚了，颁布宪法时讲过，这里不多说了。提醒大家一下子，我们是走向共同，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嘛。共产主义还有民族习惯，风俗不同，但是总的政治目标，思想体系是一个，这是走共同的道路，所以，必须在民族团结上要大家都要努力。同样的，军民更应该团结了。因为新疆是边防嘛，刚才中央批语上讲得都很清楚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它虽然号称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是社会帝国主义，现在已发展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把整个捷克一下就吞下去了，树立了个傀儡政权，象当年法西斯对付挪威那个狰狞样子，现在就走这条路，他这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谈。

江青：象美国对付南越一样。

总理：我们必须军民团结得更好，因为在新疆必有强大的军队，在这个上头，因为新疆的首先党政工作没有做好了，王恩茂同志代表党政做了自我批评，军区工作也有错误，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因为这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也就是我们的统帅和副统帅委任龙书金同志做新疆军区的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群众热烈鼓掌，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坚决支持龙书金同志的工作！）龙书金同志当然过去没有在新疆呆过，但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整体的，四十年前从井冈山上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手培养、亲手教导出来的，四军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的决议，古田会议的决议，这是我们建军也是建党的纲领，这个军队又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是个整体统一的军队，所以，我们人民解放军干部不管呆在那里，都是要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号令的。我们坚决相信，如果那个不听！只要一旦给广大指战员指出来，说他不理毛主席、林副主席号令，我相信广大指战员就不听他的。因为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从井冈山就订下来的，从古田会议肯定的。人民解放军是整体的，所以派龙书金同志去加强新疆军区的领导，也就是对今天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去的，起着推动作用罗，今天希望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组织，你们应该了解

这个道理，你们应当坚决支持我们新疆军区这一个新的领导。（群众鼓掌，高呼口号）当然罗，我们也是同样相信王恩茂同志，他做了检讨的，他一定能够站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帮助支持龙书金同志工作，因为他已跟中央做了诺言的。

如果民族团结一家人，军民团结一家人，拿主席的话说：“试看天下谁能敌。”那就保证了新疆的边防，还加上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从去年十二条规定以后，变成军管了，在边疆，在天山南北，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一边保卫祖国。他们写了个决议，在今年经过我们决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讨论，那个决议是应该的、成立的，我们也同意的，但是手续上必须要中央四个机构的批件批了，就是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它，现在附带告诉你们。（鼓掌）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新疆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来说，对各族人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巩固边防嘛。

你们这些人要学毛主席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也要依靠广大群众，吃透两头，又要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这样子做起来，我们就可能把新疆在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把新疆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也就能够把新疆发展起来，因为新疆有无限的潜力，很大的潜力，由我们发展。在革命搞好了以后，生产一定能够大发展，所以，不论是革命、不论是生产，都可以使我们新疆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钢铁长城，来保卫我们祖国西北边疆。我们祝你们回去取得新的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伯达：我们今天这个会不准备开得很长，就准备结束。我讲几句。

热烈地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热烈鼓掌）这是全国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最后一个，这没有什么不好，可能结果会是更好的。

江青：全国革命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通通成立，今天九月一日。（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伯达：再重复一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可能结果会是更好的。现在我再请大家特别地，特别地注意中央批示中非常重要的话，要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修正主义”这个教导。毛主席这个教导的意义是很现实的，这个意义是很深远的。我们应该永远学习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这个教导，并将在革命实践中，时刻注意到这一点，这样我们的新疆革命事业就会更好前进！（群众高呼口号）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扼要的说就是要清理阶级队伍，着重清理特务、叛徒和死不悔改走资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并且防止修正主义侵袭，是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一个重要问题，一个重要任务。

庆祝同志们胜利地回到新疆！（热烈鼓掌，呼口号）在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给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赛福鼎同志前几年在工作中确有严重错误，但最近几年有改正，有进步。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同志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民族团结，防止苏联修正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拨利用。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的批示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意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指示

197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疆在反修防修斗争中前进——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同时，热烈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我们向战斗在反修前哨的新疆各族人民和驻疆人民解放军致以战斗的敬礼，向支援新疆建设的各族工人、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开发边疆的农垦职工和扎根边疆的知识青年表示亲切的慰问。

在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五年新疆各族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二十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反修防修，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先进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干部大批成长，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新疆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多年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不断向我新疆地区派遣特务，收买一小撮叛国分子，公开煽动叛乱，并多次进行武装侵略和军事挑衅，做尽了坏事。新疆各族军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粉碎了新沙皇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的钢铁长城，是坚不可摧的。

在反修防修斗争中，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各种类型的厂矿企业遍布天山南北，工业产品的自给率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比自治区成立时增长一倍多。畜牧业不断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很快。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革命文艺日益繁荣。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比自治区成立时增长近五倍。遍及全区城乡的医疗卫生网已经形成。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文字改革和新文字的推广工作成绩显著。一个历史上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和剥削，深受老沙皇欺压蹂躏的旧新疆，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社会主义的新新疆，巍然屹立在我国西北反修前线，呈现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新疆各族人民要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更快发展。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就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搞清楚和要使全国知道的主要问题是反修防修的问题。新疆自治区各级党委要把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教育摆在首位。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为什么对资产阶级专政，提高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自觉性。要看到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内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搞社会帝国主义，搞侵略、颠覆和分裂活动。我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要充分认清这个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本质，坚决打击一小撮投靠苏修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驻疆人民解放军和各族民兵必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务歼一切来犯之敌。

要继续加强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新疆的民族团结与反修斗争密切相关。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要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各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包括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要继续培养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对汉族干部和群众要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发展平等互助、互相尊重的新型民族关系，争取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

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新疆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各地要继续支援新疆建设。新疆各族人民要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自治区各级党委，要依靠各族工人和贫下中农（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我们衷心祝愿新疆各族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反修防修斗争中，为保卫祖国，建设边疆，作出更大贡献！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改革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的会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的《报告》，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兵团所属各企事业单位、农牧场，划归地方统一领导。

五、政变后的的若干改变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 1970 年在牧区划定的阶级成份应予推倒，不予承认。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

1980.06.14；中发[1980]51 号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因此案受牵连的同志，如尚未落实政策，望督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

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为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捏造罪名，颠倒是非，诬陷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谢良、杨之华、刘护平、李云扬、吉合同志等一百多人，于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后自首叛变。康生、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方面把有关这些同志在狱中对敌英勇斗争的证据材料不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大搞逼供信，制造假材料，硬说这是一个“叛徒集团”。康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一次会议的讲话中，竟诬蔑说“这些人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这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把矛头指向曾代表党中央营救这批同志出狱的周恩来同志。在审查中，他们采取法西斯手段，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迫害，致使马明方、杨之华等二十多位同志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对“新疆马明方案”（也称“四三专案”）进行了调查核实。大量材料证明，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到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我党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学习航空的人员、从苏联归国的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关进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坚贞不屈，无情揭露敌人，盛世才恼羞成怒，下令杀一儆百，三同志英勇就义。马明方、张子意等绝大多数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百子一条心”，既同敌人的毒打、监禁、饥饿等法西斯暴行作“至死不变”的斗争，驳斥了对我党的种种诬蔑；又同叛徒的拉拢、引诱作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没有自首叛变的问题。一九四六年，党中央指示周恩来同志委托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把关押在新疆监狱的马明方等一百三十一人（其中孩子二十三人），于同年六月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并派专人护送回延安。这些同志回到延安后，受到党中央和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接见慰问了由新疆回来的同志。马明方、张子意同志代表狱中同志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方志

纯同志代表狱中的同志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

毛主席、周总理对“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工作十分关心，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将中央专案三办《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遵照办理。但是，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报告中把本来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这一冤案，说成是“有人揭发”，“立案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群众公布，使一些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平反昭雪。

事实证明，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应推倒强加于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凡因“新疆马明方案”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应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按党的政策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凡因此案受到株连的同志也应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依照上述精神，为每个同志作出相应的结论（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党组织已作有符合实际的审查结论的，也可维持原结论）。建议撤销总政[77]政审字第13号《关于新疆航空队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新疆航空队案审查结论的通知》，以此文件为准。有关档案材料，按中央发出的有关规定，认真进行清理。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二日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一年二月，王震视察新疆后，提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

邓小平在建议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2008年9月15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八册（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第一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

文献资料

一、中央有关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对夺权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答复张春桥请示：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夺权机关。

周：才夺一天多。

毛：要抓典型。

周：市局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数较多）。

毛：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周：那种办法好。一边斗争，一边留用，有了对立面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面压在身上也很被动（指造反派）。留用，一边斗争一边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队伍流于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们要拿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少，夺过去很快又被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修改报刊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1）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2）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被戴高帽子，抹了黑脸的，洗洗脸继续上班工作。

（3）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是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得挽救他，使他改过自新，不然怎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

（4）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能躲躲闪闪，怕字当头。敢字当头，再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示（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

一、三结合问题

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有长的，要看内容。

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改变”，这是反动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它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是改成市委和市人委。

（上海）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前门进后门出。

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指一月三十日就炮轰张春桥问题给上海红革会的电报）我看了，写得很好，有造反的气派。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措施。”这一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帐以后还要算：

1. 市人委机关向总理的勒令；
2. 红革会问题；
3. 广革会反对电台军管；
4. 龙华机场反对军管。

五、其它：

1. 现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是一九二〇年讲的，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2.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斗争方式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4. 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5. 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对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

二、三、四月份是夺权的决战时刻。当前有四大任务：1. 夺权；2. 抓革命，促生产；3. 镇反；4. 内部整风（整思想、整作风、整组织）。

要搞三结合，对于革命的领导干部不结合要犯很大错误，要走到反面去。

《论共产党员修养》是欺人之谈，对资产阶级有利，要好好批判。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的批语

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知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对方报纸上报道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说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

1967.05.31； 中发 [67] 172 号

各军区，省军区，军，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省军管会：

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暂规定如下：

一，关于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批准。

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军区审查，报中央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备案。

二，关于已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成立地专级正式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审查，报中央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

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县级正式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及附件

1967.10.27；中发[67]328号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件：

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下问题，如过去作了组织处理的党团员，有的要求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请指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会：

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暂规定如下。

一、关于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野战军批准，均报中央备案。

成立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军区审查，由大军区批准，报中央备案；县级由省军区或野战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和中央备案。

二、关于已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批复

1967. 11. 07；中发 [67] 334 号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报告说，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未经上级审批以前，就单方面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做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中央同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现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发各省、市、自治区参考。

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作了若干修改，请按照修改后的规定执行。

附：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请示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关问题

据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电报报告说：最近，我省有些单位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未进一步发展革命大联合和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为此，于十月二十四日省革委常委会议讨论作了几条决定拟下发一通知，妥否，请批示。

（附通知原文）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斗私，批修”伟大战斗号召指引下，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最近发展很快，为建立革命委员会创造了良好条件。最近几天内，已有不少单位向省革命委员会请示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最近也发现有些单位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未进一步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未经审批以前，就单方面的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作法是违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指示精神的，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此，经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如下：

一、在进一步实现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过程中，任何组织不能用抢章、窃章等手段搞反夺权。

二、今后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单位，不要随便建立革命委员会，最近未经审批而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无效。

三、今后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须经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审批，审批权限暂作如下规定：

除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遵照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规定办法外，省级各机关、团体、各国营省营厂矿企业事业、省级财贸企业、大专院校、省级文艺团体和卫生事业单位，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其余均按各单位隶属关系，分别由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审批报上一级革命委员会备案。说明：

（一）省级机关不建立革命委员会，可成立领导小组，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要改正名称，亦需审批。

（二）省级机关中，电业局、铁路分局、邮电管理局、煤管局、地质局等属中央部管单位，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地方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问题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军，各省军，军分区，各革命群众组织：（以上均请各所在军区转）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要大办学习班，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扩大教育面。这是实现革命大批判，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重大战略措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最近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都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把各地毛泽东思想学习办得更好，搞好各级干部的学习，凡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实行军管的地方，应由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军管会负责主办并加强领导；凡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实行军管的地方，一律由各大军区，省军区和当地驻军领导机关负责主办，组织实施。开办地方干部学习班；各主办单位要同当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协商，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学习班的领导。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积极支持大力协助，从全局出发，服从统一安排，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

所有学习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

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联翩出现的革命委员会，象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现在，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在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壮丽一幕。

一年前，当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天才，高瞻远瞩地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总结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一年多来，它在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中，已经显示出朝气蓬勃的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深深地扎根于群众。毛主席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群众的代表，特别是工农劳动群众的代表，是有实践经验的革命战士。他们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利益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就使得各级革命委员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这对于保证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血肉相联，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革命的“三结合”，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军民团结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多来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受到很大的锻炼。由于解放军代表直接参加了各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更能够经受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就更能够粉碎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

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他们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帮助，深刻地触及了他们的灵魂，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在革命委员会中，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好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地组织和带领群众前进。同时，在革命委员会中，有老干部同年青的新干部一道工作，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做到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这就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组织上有了保证。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同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它有着自己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

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象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做那样，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这样，就能够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要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革命司令部，就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断地巩固起来的。

革命委员会千好万好，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战员，是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识别和选拔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他们正在把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对自己的最高要求。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员，要继续把学习毛主席指示、执行毛主席指示、宣传毛主席指示、捍卫毛主席指示，当做自己最神圣的职责。革命委员会要保证毛主席的各项指示能够最迅速最准确地传下去，使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它还在发展。一切革命的同志，应该爱护它，支持它。对于它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提出批评，帮助它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一切参加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模范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十分注意扫除脱离群众的灰尘。

星罗棋布在祖国各地的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将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树立起无产阶级权威，发挥出巨大的革命作用。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社论）

二、中央批准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及中央报刊社论

1，上海市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

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

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举行了有利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斗、私、修、反、修的斗、私、修、反、修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号角，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胜利的第一炮。

在这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这个伟大号召，好象一声春雷，振奋了全上海，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从此，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在痛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光辉胜利！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大搏斗，大厮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因此，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掌握了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意攻击。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扶植资本主义势力，妄图复辟

资本主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竟狗胆包天，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耍阴谋，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垮台时，他们又开黑会，定黑计，大刮阴风，大布妖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他们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卡住我们的咽喉，切断我们的血管。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象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都是一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人。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历经革命风浪考验的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目睹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眼看毛主席缔造的红上海开始改变颜色，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红色造反者们发扬了天不怕，地不怕，敢同恶鬼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乘革命的大好时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勇敢地挑起革命与生产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迅速扭转了局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奋起砸烂了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一月革命，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铁拳；一月革命，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战鼓；一月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地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新形式；一月革命，开辟了上海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阶段。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大

联合，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横扫自己头脑中和自己队伍中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行会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垃圾，加强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的强大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就团结，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我们上海人民公社的全体红色造反者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是我们的终身天职。伟大的“老三篇”，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光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著作，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斗“私”字，大立“公”字，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定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全上海！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的大夺权，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打倒旧市委、旧市人委，挖出一切目前还隐藏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旗帜，坚决打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镇压，同时严防类似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之流的反革命组织，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进行捣乱，袭击革命左派和革命组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旦发现，组织立于取缔，首恶分子及幕后操纵者马上依法严办，决不宽贷。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号召：

全市的革命工人们，要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更好地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进一步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工业生产，搞好交通运输，搞好市场供应，搞好内外交流，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全市的革命农民和革命的农村干部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大力抓好田间管理，保证城市供应，夺取今年夏熟丰收，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最近发出的伟大号召，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同时严守岗位，加强备战，提高革命警惕，时刻准备迎头痛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帮凶的挑衅和进攻，时刻准备无情镇压国内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新的伟大的功勋！

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们，要更认真地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作好准备！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革命干部和工作人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同时要严守岗位，尽职尽责，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全市和外地在沪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要断续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就是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寸权必夺”！在已经夺权的单位，我们要学会巩固权力，使用权力，决不容胜利果实再落入敌人之手；在被右派假夺权或我们夺权后得而复失的单位，就必须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组织阶级力量重新夺权；至于那些仍然被资产阶级代理人所盘踞控制的单位，我们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立即开展夺权斗争，决不容许那些反动家伙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总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时，在夺权斗争指中，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夺权，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那种“见干部就揪，是当权派就打”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论调，必须彻底批判。我们对于旧市委、旧市人委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精神，区别对待。对于他们当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就是要积极支持。对

于犯有一般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愿意悔改的，我们就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允许他们改过迁善，将功赎罪，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至于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则必须坚决打倒！

全市的革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坚决地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为实现上述号召而斗争！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革命左派夺权、掌权，为开展全面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夺取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一些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向我们发起新的反扑，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决不可以松懈斗志，麻痹大意。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再有几个反复，多次曲折，再打几个大战役，打几次歼灭战。但是我们的决心是下定了的，不管风浪再大，都要挺起胸膛，勇猛前进，迎接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闯过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决不后退半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必将在更猛烈的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让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吓得发抖吧！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战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荡涤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原载 1967 年 2 月 7 日《解放日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暴中，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我们庄严地宣布了上海“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领导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所颁布的宣言、通令、通告、决定、决议及其他一切文件，一律继续有效，全市人民必须切实遵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2, 山西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大小特务，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窃听器、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拼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拼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或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的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出外“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窠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

我们大声疾呼：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更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查处。

三、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令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放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当的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反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衷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附：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
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
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
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
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

山西农民造反兵团

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太机第四野战军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就反抗最烈。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上下勾结，结党营私，企图把山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阴一面，阳一面，表面上高唱“检讨检讨”、“认罪认罪”，暗地里却刮阴风，放暗箭，处心积虑围剿革命派。最近，当他们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就狗急跳墙，使出了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以此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革命派的疯狂围攻和反扑，正是掘下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造

他们的反了，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他们的夺权斗争，认真学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出席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敬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四千多人，虽然人在太原，而心却飞向北京，飞向您的身边！现在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我们战斗的喜讯：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代表，在您的光辉思想的旗帜下会师太原，于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隆重地举行了山西省革命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永远和我们革命群众心连心！我们每一个人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历程中深深地体会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们用千言万语也倾吐不尽对您的无比崇敬和无限热爱。我们纵然抒发革命的豪情，歌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千万遍，也难表达对您仰慕的一颗火热的红心！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您，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围剿革命派的严重时刻，为我们驱散了迷雾，拨正了船头，指明了航向；是您，最亲切最及时最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一·一二”夺权斗争；是您，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是您，及时地提出了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为我们指出了新的前进的方向。山西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代表会议遵照您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扬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产生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这个以革命群众为基础、以革命的领导干部为核心、以人民解放军为支柱的临时权力机构，定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

人的工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会议还总结交流了前段斗争的经验，向全省人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吹响了今后新的和更雄壮的进军号！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庄严地向您宣誓：我们决心铭记您“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伟大教导，巩固和发展以革命的“三结合”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争取在三月底将全省范围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取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为全省夺权斗争彻底胜利而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们决心遵照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的伟大教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我们坚决响应您“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团结全省广大人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迅速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誓夺一九六七年革命、生产双胜利。

我们坚决按照您“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的伟大教导，开展整风运动，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决心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跟着您干一辈子革命！我们决心把山西办成一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永远地飘扬在红彤彤的新山西的上空！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誓做保卫您、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谁要是胆敢反对您，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最后，让我们怀着万分虔敬的心情，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祝愿您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3, 贵州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风暴，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把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大权，统统夺回来！

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下，十七年来忠实地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祖师爷的旨意，在贵州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小撮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一批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变质分子，给他们挂上“马列主义”的招牌，塞进我党政机关各部门。这一伙人串通一气，连成一条线，上瞒中央、下欺群众，把贵州省搞成一个“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

这一小撮人，十七年来一直骑在人民头上，欺压迫害敢于坚持无产阶级原则的革命干部，欺压迫害敢于同他们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小撮人是压迫贵州人民的太上皇。

这一小撮人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大搞反革命的反攻倒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大力鼓吹单干风，把贵州省搞得乌烟瘴气。这一小撮人不顾人民的死活，大肆兴建其修正主义的宫殿，腐化堕落，荒淫无耻。这一小撮人是剥削贵州人民的吸血鬼。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贵州人民起来造反了！一张张大字报象一把把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捅了这个马蜂窝。这一小撮混蛋跳起来了，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对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镇压。他们一手制造“六·八”、“八·三一”、“九·五”事件，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甚至私设监

狱，动用专政机器，非法逮捕、刑讯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对人民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其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手段之毒辣，在全国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这一小撮混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死心塌地地追随其修正主义头子，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混蛋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口口声声说“认罪、认罪”，但时时刻刻却在密谋策划，至今还在转移黑材料、排列黑名单，准备反攻倒算，对革命造反派下毒手。

他们一手炮制的工人纠察队、工人敢闯团这样的保皇组织，对付革命派，挑起武斗，制造事件，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当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被革命造反派粉碎以后，又使出更加毒辣的手段——经济主义。这些混蛋粪土国家钱财，挥霍人民血汗，用金钱来腐蚀我革命造反派队伍，收买工贼叛徒，破坏国家财政经济，破坏生产，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这一小撮人已经完全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美帝国主义站在一条线上了。

这批混蛋们最近又在策划新的阴谋，他们退居幕后指挥，使全省的工作瘫痪。保皇军化整为零，把黑手伸向农村，妄想挑动农民与工人的矛盾，破坏农业生产，其用心何其毒也！

贵州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十七年来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是清算这一小撮混蛋罪行的时候了！

是砸烂这个修正主义独立王国的时候了！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我们向全省人民号召：

一、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每个人必须在当前这场大风大浪面前经受考验，决定取舍。一切革命者应该毫无保留地支持这次革命行动，拥护和服从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领导。如果谁胆敢破坏我们革命造反派夺权，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二、抓革命，促生产

所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企业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不得有误！革命造反派不但要成为革命的闯将，还要成为生产的模范。我们号召全省革命群众努力工作，积极生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光！

三、坚决反对经济主义

所有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上海革命造反派以及贵阳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出的反对经济主义的通令。立即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冻结一切流动资金，取缔投机倒把。如果有意违犯，我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完全有权处置。

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立即逮捕。凡破坏生产、挑动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者，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凡把矛头指向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

五、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宣传、执行。如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由革命群众及有关部门协助监督查处

夺权斗争的号角吹响了！不管前面有多大的狂风暴雨，我们都要迎上去。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大踏步前进。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一切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浩浩荡荡地冲决一切障碍，奔向胜利的前方。

一切革命的同志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

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

贵州省省市毛泽东思想文化科研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贵阳红色保卫战斗团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新华社贵州分社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新贵州报》毛泽东思想并肩战斗联络站

贵州省广播事业管理局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中共贵州省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贵州省工交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贵州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财贸分部

贵州省宣教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公安厅 1 1 3 革命战斗总队

贵州省人委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队

贵阳市市级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财贸战斗兵团

贵州省誓死保卫毛主席“中南海”兵团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教工战斗兵团

贵阳市毛泽东思想小学教师战斗团

东方红文工团东方红公社

贵州省气象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冶金工业部贵阳铝镁设计院毛泽东思想“驱虎豹”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科委系统战斗团

贵阳医学院工农红卫兵

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
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
捍卫毛主席红卫兵总部
贵州省体校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革命军工农战斗队总部
退休工人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阳联络总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号兵”战斗队
新北大驻贵阳战斗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驻黔联络站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驻黔联络站
首都一司驻西南联络总站
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
中国科技大学南下串连红卫兵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西南的春雷》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我们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它有威信，有能力，统一地集中地领导夺权斗争。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核心领导的权力机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

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就是这样一个纲领。它向全省人民发出的五项号召，好得很！好得很！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当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魄力和勇气，应当在群众中亮相，应当振臂高呼，应当亲临前线，和革命群众结合，并肩战斗。只有这样，才能号召广大群众，才能组成一支有集中领导的、有组织纪律的、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

贵州将彻底变革。贵州在前进。夺权，这仅仅是彻底变革的开始。我们预祝贵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沿着毛泽东思想的光明大道胜利前进！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无产阶级！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上海、山西、青岛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贵州又树立了一个榜样。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敬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今天，我们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贵阳市举行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我们万分激动地向您汇报：在您老人家的亲自号召和支持下，在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从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贵州省的党、政、财、文大权以后，乘胜前进，经过酝酿和协商，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第だ ≡ 鎗枪筠菀磺 ？百万各族人民

的天大喜事！毛主席呵，毛主席！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们对您的衷心热爱！我们欢歌，我们跳跃，千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您老人家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铭记您的教导。我们不但有胆略把大权夺过来，也完全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把权掌好、掌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扫除了害人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贵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和全体革命派向您宣誓：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更高地、永远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您教导我们：“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我们一定要彻底地、不折不扣地、全面地执行您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

“抓革命，促生产”，“要节约闹革命”，这是您发出的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听您的话，百分之百地照您的指示办事，发动全省广大各族革命群众，大抓革命，大促生产，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一定要坚决打倒经济主义，不讲阔气，不讲排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您的著作，把活学活用您的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我们一定要勇追穷寇，在全省范围内把各项大权统统夺回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知道，斗争仅仅是开始，巩固夺权的胜利，还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还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坚信，有您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支持，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一定能够充分发

挥广大群众的智慧，经过过渡，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您老人家告诫我们：“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铭记您的教诲，更加谦虚，更加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跟着您老人家，乘风破浪向前进！

让一切敌人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在我们接连不断的胜利欢声中抽泣吧！发抖吧！

瞻望未来，无限光明。贵州山上山下，必将风展红旗如画。让我们高举起双臂，迎接崭新的、红彤彤的、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的新贵州！

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于贵阳

4，黑龙江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今天是我们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驻军部队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最盛大的节日。我们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最最热烈地祝福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您的忠实的红小兵。您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您的指引下，奋起战斗，向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展开了最坚决的夺权斗争。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今天我们成立了黑龙江

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从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里，把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来！

黑龙江省是祖国反帝反修的东北方前哨，是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我们斗倒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一个崭新的红彤彤的黑龙江省诞生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威震四方，沉重地打击了苏联修正主义和美日反动派，粉碎了他们妄图从黑龙江省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阴谋，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威风！让苏修和美日反动派以及国内那些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在我们英雄人民的伟大胜利面前哭泣吧，发抖吧！

我们在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遵照您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和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必将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决心高举您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炬，努力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文章，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斗争艺术水平，建设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造反大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是我国防御现代修正主义和美日反动派进攻的前哨。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采取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有些领导干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一道战斗。

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站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

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劳。

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新的斗争实践中考察他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

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黑龙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夺权斗争中，记住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很好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经验证明，我们有了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有了夺权斗争的胆略、魄力和勇气，还必须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切实注意这一点。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让我们热烈地祝贺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社论）

5，山东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今天，我们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千钧棒，一举攻克了多年来一直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的省委、省人委这座顽固堡垒，宣告了旧省委、旧省人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亡和新的临时权力机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老人家报喜，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前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鼓吹阶级调和，大搞物质刺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又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用专政机器，镇压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培植御用组织，借以保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当他们看到自己末日来临的时候，又与一些所谓“左

派”组织的反动头目，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妄图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看透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组成了“三结合”的指挥中枢，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住战机，猛追穷寇，把他们窃踞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夺了回来。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全省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齐声欢呼：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报告：在这场夺权斗争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行动，为夺权斗争的胜利立下了辉煌的战功。他们不愧为您亲手缔造的人民子弟兵！他们真正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遵照您的教导，继续扩大“三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遵照您规定的政策，正确地对待干部。对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干部，我们要坚决依靠，并肩战斗。对犯错误的干部，我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做好工作；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也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充分揭露，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保证：我们永远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学生、好战士。我们要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誓把我们新山东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永远普照全山东，全中国，全世界！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经历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场粉碎阶级敌人搞假夺权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力,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山东省的新的伟大胜利!我们向山东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山东和其他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教训,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

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阶级斗争的紧急关头,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些反动分子,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收买某些组织的个别头头,把这些人变成他们的代理人和保护人。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同时,他们利用那些受蒙蔽的群众,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施加压力,使工作机构陷于停顿,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

怎样粉碎敌人的猖狂反扑?山东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山东省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正是他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正是他们识破了阶级敌人假夺权的阴谋。在决战的关头，更加显示了他们的伟大的作用。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山东省革命的领导干部一批一批地挺身而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并肩战斗。革命干部，特别是长期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在最尖锐复杂的斗争日子里，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同革命干部、革命左派群众一起牢牢掌握以毛主席为伟大代表的党的方针政策，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强大的支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

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

在两个阶级的大决战中，每个人，每个群众组织，每个干部，都要重新受到严峻的考验。在这里，关键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破除一切私心杂念，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夺权。谁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就必然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导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以致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这样下去，即使过去作出过多少成绩，也会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些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受了敌人的蒙蔽，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对那些个别死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必须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继续参加革命，而不要歧视

他们。这样，就能够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群众，极大地孤立一小撮无产阶级的敌人。山东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决战前夕，毛主席向全党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喜看今日之大好形势，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正在迅速被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在沿着毛主席指出的轨道，粉碎一切阻力，排山倒海，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社论）

6，北京市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人们盼望已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宣告成立。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始终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在这全北京市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让我们大家一起，衷心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出席了我们的大会。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建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参加了革命的“三结合”，从各个方面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让我们向他们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实现了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这些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远道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支持我们。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首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的结果。

北京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伟大祖国的首都。但是，被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据下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支持下，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和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一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大放修正主义的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在京剧、舞剧、交响乐的革命中，他们百般刁难和攻击江青同志。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一再抗拒毛主席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长期按兵不动。姚文远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又不准北京的报纸转载，也不准发行单行本，还攻击上海的革命同志。他们一贯实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安插亲信，重用坏人，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一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封锁，把北京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基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骑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大恶霸，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旧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抗日战争初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反对林彪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

现在查明，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大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

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一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正是在他们进行这些反党阴谋活动的时候，他们的黑手被抓住了。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一举摧毁了“三家村”黑店，直捣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巢，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发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及时作出改组北京旧市委，组织新市委的决定，得到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大推动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控制下进行的，他们把北京变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地。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护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庇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锋芒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许多单位亲自指挥，围剿革命派，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他们把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到夭折的边缘，并且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全国。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回到北京，挽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重新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当红卫兵和大串联这类的新事物，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给以坚定的支持。首都红卫兵对全国各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北京，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精神，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打退了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斗争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上海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一月革命”风暴。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下而上地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协商，分别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北京市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欢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全国的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的反抗必然要增强十倍，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政治能量还很大，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相当的优势。因此，无产阶级能否保持和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极端重要的新课

题。这个问题，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通过“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了，在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也复辟了。我国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同资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斗争。例如，一九四五年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改变所有制方面，有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斗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以及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武训传》、《红楼梦讲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决战，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进攻。发动亿万群众起来革命，从下而上地对混到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一次大扫荡，大扫除。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极其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伟大的魄力，才能够发动这样规模巨大的，惊天动地的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只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把政权掌握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就是保卫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不仅现在必需，以后也还会有。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同马克思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列宁建立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的学说同样重要，同样伟大。

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掀起一个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大决战。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国修正主义的总头头。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骨干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当前最重要

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大方向，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批判，彻底清算和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流毒。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我们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把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夺回被他们篡夺去的一切阵地。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应该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共同目标下，并肩战斗，共同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应该在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边战斗，边整风，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应该用开门整风的办法，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来解决。不应该因为不同意见而“内战”，搅乱了斗争的大方向，甚至被敌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大联合，大团结。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整风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允许保守派借口大联合，来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吞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我们一定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对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应该歧视他们，排斥他们。要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一道闹革命。当然，

对于反动组织，如“联动”之类，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同他们联合。对于这类组织和他们的头头，要实行专政，对他们的一般成员，则要分化瓦解、区别对待。

我们要结合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革命的“三结合”，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基础，必须在革命群众斗争中逐步实现。那一些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对象，只能由革命群众来批准，不能自封。每一个革命的干部，都应该积极投入这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积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同他们划清界线，认真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考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支持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样的革命的“三结合”，就可以防止坏人借口“三结合”，混水摸鱼，反攻倒算，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吴德，刘建勋等同志，已经开始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边。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能经受考验，得到锻炼，继续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更好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更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充分利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反面教员，从各个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使更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

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首都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商店，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街道，插遍首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要把人民的首都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革命城市。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新高潮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凯歌！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胜利！我们要珍惜这个胜利。让我们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和酝酿，分别召开了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实现了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帮助下，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希望和灯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主席就在这里领导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首都革命人民，坚定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红色堡垒。

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直接指挥和支持下：却千方百计地要把北京变成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基地。

如果无产阶级不坚决粉碎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那就要象毛主席所指出的：“……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乌云遮不住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十七年来，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气势磅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开始了。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倒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罢了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官，撤了他们的职。

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和发源地。这里的每一场战斗，都影响着全国运动的进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牢记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声号炮。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起了震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荡涤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北京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掀起了一个革命的大批判新高潮。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获得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定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超越任何障碍，战胜一切敌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北京在前进，中国在前进，革命在前进。

在我们面前，是一派大好形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敌人还在妄图顽抗。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还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斗争还会出现曲折，我们的道路还是长的，任务还很重。

当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摆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本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们一定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结合批判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结合批判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进入各单位的斗批改。

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边战斗，边整风，克服自己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前，特别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

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大批判，在大批判中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洗炼，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将更加巩固，更加强大。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社论）

7, 青海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在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以“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为主体，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

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西北高原的一次大捷！

凯歌高奏，红旗漫卷，在这欢庆胜利的盛大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沸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当我们回顾一年来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时，我们的眼里饱含着激动的泪水，心头充满了对您的无限热爱。昆仑山高，您光辉的形象更比昆仑山高，青海湖深，您天大的恩情更比青海湖深。以祁连森林作笔，用青海湖水当墨，也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感激，无限敬仰！我们永远永远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那掌握着中国革命航船之舵的巨手，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

是您以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是您亲手书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光辉的篇

章，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和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是您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是您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高瞻远瞩，以极大的魄力，果断的措施，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维护旧世界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是您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道路。

云涌星驰宇宙宽，风吼雷鸣气势豪。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一系列的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鼓舞着亿万文化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全面的胜利的总攻击。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一声令下，我们挥戈杀向战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您伟大的号召，给了我们必胜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们向青海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连续冲击，清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顽固堡垒。

造反有理，一反到底。您殷切的期望，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的《青海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决心紧紧跟着您老人家，誓当砸烂旧世界的闯将，永作开创新时代的先锋。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一年来，我们迎逆风，战恶浪，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围困。“一二·九”在民和，我们粉碎了旧青海省委妄图私自销毁一汽车黑材料的阴谋，“造反有理”的战旗在湟水两岸高高飘扬；“一·二八”大夺权！我们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狂涛怒澜顶风上，击退了资产阶级经济主义歪风的进袭，我们革命造反的红色铁流浩浩荡荡。是您的革命路线时时为我们胜利领航，使我们在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成长。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您老人家为人类命运操劳，语重心长，我们为祖国前途出力，志大胆壮。您光辉的思想是我们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精神武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急流险滩无所惧，刀山火海我敢闯。我们彻底粉碎了青海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您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您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毛主席啊，毛主席！在阴云迷雾的白色恐怖中，我们日日夜夜仰望着您光辉的形象；在艰难的日子里，您老人家的教导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坎上！

浩歌正气动天地，生生死死为革命。面对残酷的迫害，我们高声朗读着您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英勇守卫青海日报社的九天九夜里，我们满含热泪无限深情地一遍又一遍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我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面向着东方，心向着东方，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碧血青史写新篇，蓝天白云寄红心。

旭日东升照长空，锦绣河山展新容。毛主席啊，毛主席！又是您老人家洞察一切，及时发现了青海的问题，拨正了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引导着我们走上了新的历史航程。

天大地大不如您老人家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我们又怎能不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您光焰无际的思想照耀下，历史的长河更加汹涌澎湃，波澜壮阔，浩荡东向，气象万千。今天，青海的形势大好！您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插遍了昆仑南北，您播下的革命种子，生根开花在湟河两岸，一个万炮齐轰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正在青海高原全面兴起，蓬勃发展。

革命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了您所教导的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使我们深深懂得：政权就是我们的命根子。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誓死斗争。

我们决心遵循您老人家的教导，高举起您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批判他在青海省党内的代理人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祖国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敬爱的毛主席，您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您争气。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从阶级敌人手里夺得了大权，我们也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这个大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有您光辉思想的照耀，有您亲自主持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我们敢于为无产阶级掌权，我们也一定善于为无产阶级用权。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您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加强青海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迅速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而斗争。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深深地懂得，我们的胜利同您的战略部署要求比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一定念念不忘您的告诫，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遵照您所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牢记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教导，响应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号召，警惕阶级敌人“和平演变”的阴谋，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永远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永不变质，永远革命。

敬爱的毛主席，您总是谆谆教导我们：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一定听您的话，照您制定的政策办事，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我们不但要做国内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兄弟，随时准备支援亚非拉地区反帝反修的斗争，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全球，闪耀万代！

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要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猛促工农牧业生产，多快好省地为把青海建设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的战略后方而挥汗劳动。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战斗号召。这是您对我们

的最大关怀, 最大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的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和“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肩并肩, 心贴心, 急革命派之所急, 帮革命派之所需。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我们要永远向解放军学习, 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 战斗在一起, 胜利在一起, 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誓让莽莽昆仑变为钢铁般的长城, 绵绵祁连变成无敌的防线。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啊, 毛主席! 您是我们的英明舵手, 您是我们的伟大领袖, 我们誓死保卫您, 誓死保卫您的革命路线, 保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永远永远牢记您的教导: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 仅仅是第一次, 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 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 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要高度警惕那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千秋万代忠于您的思想。谁敢反对您, 我们就打倒谁! 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 我们就造他的反! 谁敢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根毫毛, 我们就砸它个稀巴烂。为了保卫您, 我们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江山代代赤胆在, 长河滔滔志不摧。我们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 您伟大的思想永远永远与日月同辉!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向您庄严宣誓: 我们最最坚决地执行林彪副统帅的号召, 永远读您的书, 听您的话, 照您的指示办事, 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用您光辉的思想, 来统帅一切, 推动一切, 改造一切。我们要把学习您的光辉著作, 看得高于一切, 先于一切, 大于一切, 重于一切。我们要永远以“老三篇”为座右铭, 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 彻底斗倒“私”字, 在头脑里树立您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 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誓把青海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永远照耀着青海高原。

毛主席啊, 毛主席! 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 无限忠诚, 无限崇拜, 无限热爱。有了您, 人类的命运就有希望; 有了您, 世界的前途就有指望; 有了您, 我们就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我们要永远紧跟着您, 紧跟您的光辉思想, 紧跟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紧跟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时代在前进! 祖国在前进! 请您老人家放心吧! 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待! 千年青史, 在

您的教导下，由我们来谱写——谱写成您光辉思想的颂歌；万里山河，在您的指示下，由我们来安排——安排成您光辉思想的新天下！我们永远永远是忠于您的新一代！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在亿万革命群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中，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青海省以“八·一八”左派组织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从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经历了激烈、紧张的阶级搏斗的严峻考验。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青海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曾经在一些艰苦日子里，顶着阻力行，迎着风浪上，终于从阶级敌人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胜利地夺了过来。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钢铁战士。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保卫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柱石。青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示，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青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经出现了反复。这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暴露了，革命方面也表现出来，阵线分明了。事情的规律往往是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反复，问题就看清楚了，就解决了。矛盾越是充分暴露，就解决得越彻底。青海的事情就正是这样。

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无往而不胜。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大联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夺权斗争，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三结合”。这就保证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这种大批判、大斗争，在推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时候不能放松，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放松，在掌权和用权的过程中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青海省的夺权斗争中，一批革命的领导干部站了出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他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亮了相。毛主席说：“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青海省的革命干部，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做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帮助他们转变过来，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青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群众，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打击报复。而是以对革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一个一个地帮助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在“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中提高觉悟，反戈一击，共同对敌。

青海的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上，进入了新的伟大的航程。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同时，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实现思想的革命化。这样，才能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创造出—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红彤彤”的新青海。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社论）

8. 内蒙古自治区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滕海清高锦明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1、革命委员会组织机构不宜过大，革命委员会应有彻底革命精神，首先是思想革命化，才有组织革命化。初步方案按照黑龙江抄下来的。中央首长指示，领导机构不一定原来有什么，现在要都恢复起来，先根据实践经验摸索。根据需要，建立一个组织，不适合的就撤消。这是一个摸索过程。比如各地机关摊子，哪些要，哪些要加强，哪些不要。还没有到改的时候，现仍确定哪些适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摸索中找经验。这组织机构问题，中央的整个精神是机构不宜过大。不一定要把所有摊子都补起来，在实践中，需要的建立，不需要的就不建立，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到大改的时候。最近主席给姚文元一个任务，叫他调查九大问题、精简问题。

2、革命委员会的本身成员，按原汇报方案，自治区 1300 万人按 150 人出，盟市 50 人。中央看了方案后，认为现在看革命委员会，应该质量上强调，不应该从数量强调，革委会成员不一定太多。讲到盟市 50 人太多了，减少一点。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产生应以呼市地区为中心，因为呼市是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要照顾下面和盟方的问题。

革委员是过渡性的东西，在摸索中考验干部是否称职，能否担当起来。中央指示，机构不宜过大，少一点，精悍一点。

3、原来军队里面少了一点，原方案军队 20 人，而地方领导干部多了一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站出较多这是好事，但不一定都参加革委会，可以参加工作，群众代表多一点。

4、注意培养新生力量。革委会应当做到“三结合”。三结合中有一个新老问题。有工人、学生、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优秀的，政治历史清楚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的，有干劲不是派性，而是党性很强的人，选这些人到革委会中来。这里有个新老结合，新的上来帮助老的，老当权派有个接班人问题，把年青人带起来，以老带新，以新斗老。都是老家伙不行，都是新的也不行。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涌现出了好多好多革命领导干部，好的苗子，有个互相帮的问题，一方面要非常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也要注意革命老干部，他们有很多经验，当然会有错误，互相结合，互相学习，培养新生力量。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经主席，中央文革批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影响很大，是对修正主义的严重打击。但哪一天成立还得请中央批准，凡是中央不批准的不做，苏联十月革命节修正主义是否发动攻势，值得研究。革命委员会成立，哪一天开大会请中央批准，准备十一月一日开大会。自治区两位书记，暂时不参加革委会，一个是康修民，同志们知道，石家庄造反派反映了很多情况，但中央八条是肯定康修民同志的，等情况搞明了再参加。王再天参加军队以前，参加旧军队，一般历史问题调查清楚再参加。总理、康老指示，康、王同志问题调查清楚以前暂不参加革委会。向中央讲了二人情况，不管怎么样，文化大革命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康修民在八条中肯定的。王再天一直表现好，不可能是三反分子，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中央一方面重视群众意见，另一方面中央指示经康、王讲清楚，调查清楚再参加，早一点、晚一点没问题，可以参加工作。

中央谈到内蒙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阶级斗争复杂，康老说内蒙有苏修、蒙修、日本特务，加上乌兰夫，王逸伦、黑爪牙，所以阶级斗争复杂，形势大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从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传来了特大的喜讯。在我国北部边疆、反修前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内蒙古地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彻底垮台，斩断了他们的后台老板中国赫鲁晓夫伸向内蒙古的黑手，迎头痛击了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蒙古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阴谋。对于巩固我们边疆，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向内蒙古一千三百万各族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和鼓舞下，同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的结果。内蒙古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顶黑风，战恶浪，经受住严重的考验。他们不断地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良好条件。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功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驻内蒙古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关键的时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挺身而出，坚定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地进行了反对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再一次表明：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复

杂，不管有多大的阻力和干扰，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无往而不胜。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又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路线，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论哪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正确地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力量总是要失败的。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曲折和反复，正好彻底暴露了阶级敌人的面目，大大锻炼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现在，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内蒙古革命形势空前大好，今后还会越来越好。

在欢庆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国内外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还会捣乱再捣乱。处在反修前哨的内蒙古军民，必须高度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及时揭穿和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巩固祖国的边疆。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内蒙古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把内蒙古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社论）

9, 天津市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1967.12.01；中发 [67] 361 号

很好，照办。

毛泽东十二月一日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天津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胜利的喜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了！

这是您的战无不胜的光辉思想的一曲新凯歌！

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一丰功伟绩！

阳光普照，红旗招展，渤海之滨，锣鼓喧天。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您的伟大的思想哺育我们成长，您开辟的革命航道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前方！您的恩情高过山岳，深过海洋。我们心头充满着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滔滔海河流不尽，曲曲颂歌唱不完。千声欢呼万声唱，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那掌握中国革命之舵的巨手，亲自制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在您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下，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

放了天津，使这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城市获得了新生，使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在这永生难忘的日子里，天津的革命群众第一次放声高歌《东方红》！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年代，亲临天津，视察工厂、学校、农村，对我们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您的教导，您的关怀，您的高大庄严的形象，您的慈祥的笑容，深深地铭刻在天津革命人民的心里，鼓舞着我们沿着您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飞跃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〇年，又莅临天津，和天津四百万人民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您给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光荣！激励着我们鼓足干劲，奋发图强。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海枯石烂心不变，风吹浪打志益坚。我们永远跟着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勇往直前！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三年，在天津受到罕见的洪水威胁的时候，亲自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动员令。您的伟大的战斗号召，表达了海河两岸千百万人民的心愿，百倍地增长了我们的驯服海河、根绝水患的信念，调动了千军万马，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英勇地向大自然开战！

回顾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这些无比幸福的时刻，我们心潮汹涌，热血沸腾，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您统帅亿万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猛攻。就是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在天津解放不久，便一头扎到天津，拚命地宣扬“剥削有功”，为资本家涂脂抹粉，充当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此后，他又屡屡到天津放毒。臭名远扬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就是首先在天津抛出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还培植了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做为他在天津的代理人。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妄图把天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

敬爱的毛主席，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您的战斗号令，怀着誓死保卫您，保卫您的革命路线的决心，凝集起对一小撮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向他们发起了冲锋，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妄图扑灭您所点燃的革命熊熊烈火。他们围剿革命群众，武装镇压革命小将；他们耍阴谋，放暗箭，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操纵反动组织，实行反革命夺权，制造白色恐怖；他们伸出黑手，挑动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抗拒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的雄文四惠 悄 奈按笏枷牒夕裕 颐侵该？方向，给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您，带领我们闯过一个个急流险滩，战胜一道道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中越战越强，把海河两岸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是以您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关怀着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是您的英明的决策，伟大的号召，为我们拨开了迷雾，鼓舞着我们披荆斩棘，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冲锋陷阵！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最最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我们面对着残酷的迫害，手捧您的革命宝书，日夜仰望北京城。您及时地派来了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我们并肩作战，向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起总攻，经过剧烈的搏斗，终于摧垮了他们所盘踞的顽固堡垒，把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上了您所指引的航程！敬爱的毛主席啊！没有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今天的胜利，没有我们的一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敬爱的毛主席，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出的最新指示，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工人阶级一马当先，条条战线万马奔腾，以“斗私，批修”为纲，迅速掀起了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革命大批判的高潮。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空前大好。在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日夜盼望的红色政权诞生了！

敬爱的毛主席啊！十八个月来，您领导我们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取得了最大最大最大的胜利！千胜利，万胜利，一切胜利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认识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新的战斗

的起点，展望未来，前途似锦，光明灿烂。我们任重道远，永不骄傲自满。我们决心更高举起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涤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把天津市建设成您的光辉思想的新天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温床，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红！我们一定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天津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让您的伟大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把“拥军爱民”运动持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向守卫在首都门户，为人民屡建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虚心学习，争当拥军的模范，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响应您的伟大号召，依靠群众，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新秩序，把新生的天津建设成磐石一样巩固，钢铁一样坚强！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您的光辉的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是智慧的海洋。大树特树您的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永远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把天津市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天津市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把世界引向了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一个学习您的伟大著作的运动正在国际上蓬勃展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球。我们以生活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感到荣耀，为战斗在您的旗帜下而无比自豪。我们不但要做国内的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我们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弟兄，全力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让您的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照遍全世界！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继上海、北京之后，我国的又一大城市——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渤海湾边红烂漫，海河两岸尽朝晖。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变天津为复辟资本主义基地的黄粱美梦，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天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恶统治的彻底垮台。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热烈欢呼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谨向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天津驻军和天津市四百万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天津市解放十八年来，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严厉批判了在城市斗争中主张依靠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会议刚刚开过，中国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天津，一头钻进资本家的怀抱。他抛出臭名昭著的“天津讲话”，大肆宣扬“剥削有功”论，把资产阶级捧上了天，鼓励资本家“多剥削”，“赚大钱”，极力煽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千方百计把王光英之类极端反动的资本家乔装打扮，作为他精心培植的所谓“红色资本家”的标本，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他在天津抛出了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和他在天津的代理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培植亲

信爪牙，网罗牛鬼蛇神，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天津变成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桥头堡。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天津的代理人反复较量和英勇搏斗的结果。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英勇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在这场夺权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驻天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扎扎实实地进行深入、细致、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满腔热情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群众，做了大量的、很好的工作，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新的长征的开始。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进行一系列的艰巨工作，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要斗私，批修，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从灵魂深处来一场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前，处在穷途末路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利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妄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在用糖衣炮弹来征服我们革命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妄图从思想上腐蚀瓦解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队伍。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在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同时，狠斗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不断扩大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天津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港口，是交通的重要枢纽。我们相信，天津市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必将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为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新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7. 12. 30； 中发 [68] 1 号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昕、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州、丁士来、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榜、陈全生、周开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将与江西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井冈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凯歌声中，在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的时候，从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我们谨向英雄的江西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四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在井冈山树起了革命的红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革命道路。从那时起，英雄的井冈山儿女，紧

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在百战百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赤胆忠心干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方志纯之流，长期以来，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使江西这块红色老根据地改变颜色。忠于毛主席的江西革命人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冲破重重阻力，战胜狂风恶浪，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千条万条，贯彻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见面，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掌握，变成千百万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

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模范地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们始终把学习、执行、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组织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毛主席的伟大声音，最迅速、最广泛、最深入地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受蒙蔽的群众，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样，他们就以迅速的步伐，实现了全省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西省部队广大指战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全力支持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在他们之中涌现出了象英雄四排和

李文忠同志那样的支左爱民模范，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榜样。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千条任务，万条任务，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学用结合，立竿见影，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狠抓“斗私，批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坚信，英雄的井冈山儿女一定会遵循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教导，戒骄戒躁，乘胜前进，让毛主席亲手树起的井冈山红旗高高飘扬，万代飘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社论）

11，甘肃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1.23；中发〔68〕11号

兰州军区党委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洗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阴、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胜、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洗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付主任。

中央祝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认为，甘肃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召开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推选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革命大批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兰州地区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中央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甘肃广大军民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 把甘肃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据新华社兰州二十六日电 甘肃一千三百万人民热烈欢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新的伟大胜利。全省人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示，一定要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喜讯迅速传遍全省，城乡到处锣鼓喧天，一片欢腾。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岷山、腊子口、哈达铺，在红军胜利会师的会宁，以及全省各地，广大人民纷纷集会，热烈庆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深厚感情，一次又一次地纵情高唱《东方红》，千遍万遍地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晚上，兰州市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聚集在省革命委员会门前的广场上，和省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一起狂欢，直到深夜。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在欢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刻，深深地体会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

议上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事情千头万绪，但是，最根本的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总结经验，检查工作，制订措施，特别要搞好领导机关和成员的思想革命化，带动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引导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认真学习、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高潮。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以及许多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在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都决心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最新指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把本部门、本单位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甘肃各地许多工厂、学校、机关等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欢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最大障碍，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最大障碍。他们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长期对立的兰州大学三派组织，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校有六个系和两个附属工厂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全省各条战线都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热潮，迎接和庆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兰州新华印刷厂革命职工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提前完成了一月份印制《毛主席语录》的光荣任务。临夏回族自治州广大贫下中农在热烈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表示，要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甘肃省代理人汪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在抓好革命的同时，积极作好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力争今年农业生产有更大的发展。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我国西北高原要地、反修斗争前哨之一——甘肃省的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胜利诞生了。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汪锋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斗争在甘肃地区的决定性胜利。这是西北高原上又一曲振奋人心的毛泽东思想的凯歌！

我们谨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甘肃省各族人民和驻甘肃的人民解放军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礼！

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反复较量和顽强搏斗的结果。尽管敌人是狡猾的，斗争是艰苦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靠着威力无比的毛泽东思想，在解放军的坚强支持下，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打败了阶级敌人的种种反扑，粉碎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破坏革命队伍团结的阴谋，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不断在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终于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

战斗在甘肃省“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把对毛主席深厚的阶级感情，倾注在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决贯彻上，倾注在对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反复落实上。他们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他们踏遍甘肃高原万重山，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传播毛主席的声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私、批修，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新的功勋。

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战斗号令，都紧紧跟上，坚决执行。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经常地如实地反映情况，多请示，多报告，绝不自以为是，自作主张。要以最大的热情，最

强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扎扎实实地落到基层，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春风已到玉门关，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以破竹之势胜利向前发展。我们希望新生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成为带动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坚强指挥部。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都要力争成为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要更加广泛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进一步发扬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好学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真正做到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把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妨碍毛主席最新指示执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一九六八年的各项战斗任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社论）

12. 河南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1.25；中发〔68〕17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南五千万人民表示热烈地祝贺。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九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

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南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新局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驻河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克服了省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加强了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河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玉、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四十一名担任常委。

河南省有五千万人口，有许多现代化工业，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河南省革命委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工人、贫下中农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同志们：

河南五千万人民盼望已久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今天庄严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欢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让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团结一致，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首都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我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结果。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的彻底垮台，宣告了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彻底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它标志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敏生、赵文甫之流，长期以来，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结成死党，忠实地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他们大肆吹捧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极力贬低和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扬阶级斗争熄

灭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时而从极“左”的方面，时而从右的方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们一贯耍阴谋，放暗箭，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的要命，恨得要死，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忠实地执行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年二月，正当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他们不甘灭亡，垂死挣扎，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相勾结，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说明，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河南就要走回头路，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翻在地，清除了河南党内的大隐患，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广大群众，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大规模地开展了“拥军爱民”运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经过一年多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大传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全省呈现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一切光荣归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光荣归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杰出的领袖，最天才的统帅，最英明的舵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

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革命，是一场关系到世界革命命运和前途的大革命。回顾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步步指引；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去年七月，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问题作出了英明决定，从此，河南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去年国庆前夕，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这是对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以后，立即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江河奔泻，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完全成熟了。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同志们，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的伟大斗争开始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千条万条，头等重要、最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透彻、最精辟的总结，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好形式。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要认真总结经验，继

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学了就用，立竿见影。

我们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持续地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王任重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赵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结合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走资派，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要迅速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联合起来。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帮助更多的干部站出来革命。

我们要结合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和壮大党的队伍，把河南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的伟大号召，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革命群众要更加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

我们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打击投机倒把。发动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维护革命的新秩序，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掀起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一定要保证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要坚持节约闹革命，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要坚守生产岗位，自觉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国家财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夺权斗争胜利以后，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夺权靠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也要靠毛泽东思想。省革命委员会必须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必须以身作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参加劳动，调查研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建新劳。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要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把河南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祖国中原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辽阔的中原大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凯歌。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热潮中，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丰硕成果。

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河南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五千万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南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曾经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面对着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信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一定会照彻中原大地。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迅速传播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航向，鼓舞着他们顶黑风，战恶浪，和阶级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全省范围内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光辉的体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在干部问题上，长期以来，就实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更是变本加厉地打击和迫害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的领导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深深地懂得：革命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也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批判他们，夺他们的权，革他们的命；对真正好的革命领导干部，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决支持他们站出来革命。河南省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所以能够站出来，是和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分不开的。因此，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敢不敢革命，对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敢不敢支持，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有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感情和风格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毛主席指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他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

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为推动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目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整个河南省，各条战线都呈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我们希望河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切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特别要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我们相信，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必将搞得更好、更好！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举得更高、更高！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社论）

13. 河北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

1968.01.29；中发〔68〕21号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席。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毛主席亲临河北视察时，对河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英明指示。河北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彻底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在河北的代理人林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河北省革命同志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了革

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十个专区，有九个专区和大多数县、市都成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认真地执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河北省的形势大好，革命和生产取得了双丰收。农业获得了全面丰收，工业、交通战线上也取得很大的胜利。

中央希望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驻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河北各地、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亿万军民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至此，整个华北地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对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谨向河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驻河北省全体指战员和河北省四千三百万革命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河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非常关怀，对每一个关键问题，都作了伟大的指示，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作了英明的决策。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河北省地处我们的首都北京的周围。长期以来，中国赫鲁晓夫千方百计地向这里插手，伙同其在河北省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就是在中国赫鲁晓夫导演下，炮制出来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英勇的斗争，把他们打得

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河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充分证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只要抓住这个关键，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变成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形势就会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就会越来越好。

人民解放军驻河北省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把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最大的热情，下最大的决心，用最大的力量，采取切实的措施，帮助革命群众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机关、学校、直到街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红花开遍河北全省。

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突出一个“公”字，狠抓一个“用”字。突出无产阶级的“公”字，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狠抓“用”字，就是发扬毛主席历来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这样做的结果，就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各级革命委员会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北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无限热爱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做学习、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千百万工农群众，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起来，充分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这是河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更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事情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抓什么？抓思想，抓根本。根本就是要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就是要以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中心，斗私批修，言行一致。这是最大的无产阶级

政治，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抓住这个根本，工作就有标准，战斗就有力量，前进就有方向，就能一通百通、百战百胜。

我们相信，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一定能够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一定能够成为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率领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社论）

14，湖北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极大关怀和及时指导，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对湖北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胜利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的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了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各方面的干扰，经受了严峻考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武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个胜利！这是无产阶级走向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途径中又一个喜讯！我们向湖北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湖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敬礼！

英雄的武汉和湖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一直是在毛主席亲切哺育、亲自统率下，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革命航道破浪前进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多次畅游长江，驾驭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伟大气魄，极大地鼓舞着湖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在全国亿万军民的强大支持下，迎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彻底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一伙，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得落花流水。斗争是剧烈的，以王任重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曾经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一小撮走资派的任何绝望的挣扎，都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紧要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英明的决策，果敢的措施，领导着湖北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终于夺得了湖北省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功绩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及湖北各地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满腔热情地帮助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作了深入的艰苦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革命群众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无间的生动局面。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树立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革命好学风，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搞好思想革命化。在这里，关键在于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我们希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认真实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广大革命人民服务，同种种脱离群众的旧的习惯势力彻底决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事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从思想上、政治上不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推动各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和斗批改，把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全湖北、全中国东风浩荡，红旗如画。我们深信，在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鼓舞下，长江两岸、中南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必将继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奔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0；中发〔68〕32号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悼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布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以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

促生产，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广东省地处国防前线，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南大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陶铸在广东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给了帝、修、反又一个沉重打击。这对巩固我国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对支援港澳同胞的爱国正义斗争、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谨向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省人民和驻广东省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是我国人民百余年来多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四十多年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广州举办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主席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始终鼓舞着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给予光辉的指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

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坚定地忠于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部队，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以毛主席的指示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他们狠抓了支左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轮训班，强调在工作之前，首先要学深学透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支左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他们坚信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袭，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以满腔热情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以极大耐心做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发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广东省驻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保卫祖国南方，建立了新的巨大的功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切切不可忘记敌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地处边防前沿的广东省，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会不断地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广东军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百倍加强敌情观念，警惕敌人煽动、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队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派性，斩断黑手。要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筑起钢铁般的南海长城。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目前，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东省革命人民，一定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南大门上永远飘扬！”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社论）

16, 吉林省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2. 22; 中发 [68] 33 号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二月十四日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五名委员会组成：由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徐中禺、苏俊禄、蒋克诚、王振华、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邹明友、吴钊弟、耿志才、边仲科、徐飙、李树、陈贵、赵桂兰（女）、张振标、乌孟庄、王维宾、孙凤歧、尹家英、姚美玲（女）、许肇昌、周文贵、朱淑珍（女）和四名革命领导干部，两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暂缺）共三十五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王淮湘同志担任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同志和地方革命干部两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二人（暂缺）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吉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年多来，吉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揪出了以赵林为首的吉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的大批判，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八个地、市已经有七个地、市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吉林省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工业得到了发展。

长白山麓，辽松平原，一派大好形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把刘、邓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以“斗私，批修”为纲，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各项工作，夺取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中，紧接着南海之滨欢呼革命委员会成立，从壮丽的长白山下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凯歌：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当前，长白山麓、松辽平原，一片大好形势。吉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吉林部队大力支持下，经过反复较量，粉碎了阶级敌人种种阴谋诡计，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吉林的代理人、大叛徒赵林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吉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一千七百万各族人民，谨向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解放军驻吉林部队全体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战斗在吉林省“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在狠抓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过程中，有力地抓了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最新指示的落实。他

们通过帮助革命群众组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来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使广大革命群众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区别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了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各方面肃清其流毒，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吉林的代理人批臭、批透。大批判要坚持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决不能松懈。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大力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革命委员会不是各派的联络站，而是革命三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不但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要做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参加革委会的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也不能只做一派的代表，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做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代表，做广大革命人民的代表。

吉林省地处国防前线，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吉林省的军民担负着重大的战斗任务。我们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要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阶级警惕，坚决揭露和粉碎一小撮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如果混进了坏人，要自己加以揭发和清理。要认真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一定要把工农业生产抓好，保证革命和生产的双丰收。

长白山下春风浩荡，松花江畔红旗如画。我们相信，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一定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领导全省革命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吉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社论）

17，江苏省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3.20；中发 [68] 49 号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就是象我们的统帅毛主席当时所说的那样：“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江苏省人民群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江苏省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互相配合，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对这些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英勇的斗争。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特别应当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卓越的新功。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的胜利，起了很巨大的作用。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从祖国的东南又传来了新的喜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切关怀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英雄的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千七百万江苏人民，向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卓越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广大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个伟大的胜利，使江苏省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在江苏省复辟资本主义黄粱美梦的破灭，给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又一个沉重的打击。“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江苏省的历史又揭开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必然要不断利用各种卑鄙恶劣的手段，进行破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必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高举革命批判大旗，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大力加强军民团结，保持高度警惕，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分子。

在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思想是向阶级敌人进攻最锐利的武器，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新生的江苏革命委员会，必须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须继续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继续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要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认真执行毛主席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不管来自什么山头的革命同志，都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要使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机关，发挥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在革命的风暴中又前进了！我们预祝江苏人民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更大的胜利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3.18；中发〔68〕4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

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革命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经中央批准的两派在京代表达成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应认真执行。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大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国防要地，所有革命群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严防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动活动，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在春风吹遍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祖国的东海之滨，钱塘江畔，又树起一面鲜艳的红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都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浙江，视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对浙江军民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鞭策。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浙江省三千一百万革命人民，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浙江的一小撮代理人，猖狂地对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极力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采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的全力支持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破坏，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浙江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坚决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战斗号召，执行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驻浙三军广大指战员旗帜鲜明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把人民解放军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浙江军民在伟大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坚强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如钱江春潮，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坚定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浙江地处海防前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大力加强钢铁般的革命团结，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严防一小撮叛徒、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挑拨离间，坚决粉碎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同破坏军民团结、损害人民解放军声誉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巩固伟大的红色长城。要加强战备，严守海防，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争挑衅，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保卫伟大的祖国，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战斗航程。我们相信，浙江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各级、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以“斗批，批修”为纲，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做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节约闹革命”的方针，把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浙江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19, 湖南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4. 06; 中发 [68] 56 号

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延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廷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湖南省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和推广“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获得的经验。要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经常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的运动，民拥军，军爱民，继续巩固军民之间的团结。巩固各部队之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国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这是湖南人民的大喜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我们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湖南三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湖南部队，致以崇高的战斗的敬礼！

湖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在阶级斗争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又亲临湖南视察，作了重要的指示。在庆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湖南，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湖南的代理人，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他们的末日。这一小撮混进我们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同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相勾结，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工人阶级、广大革命人民和驻湖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心明眼亮，精神抖擞，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敌人以坚决的打击，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各种阴谋，取得了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反革命力量必然越要同革命力量作拚死的斗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按照毛主席关于“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教导，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能够率领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革命司令部。

我们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

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对自己人，对犯了错误的革命同志，不论是革命群众或者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全省军民，要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深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英雄儿女，一定能够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趁大好形势，乘浩荡东风，把湖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20，宁夏回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4；中发〔68〕55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坚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加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至此，全国已有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我们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宁夏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宁夏全体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宁夏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给宁夏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引导他们冲破重重困难，彻底粉碎了杨、马之流在宁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宁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时传达和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密切联系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的巨大努力，大大推动了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迎来了塞上江南的无限春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场革命的胜利发展，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而取得的。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宁夏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正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宁夏地处西北要地。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广大革命人民要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敌人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军民关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特务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三十二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举世无双的工农红军，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篇。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坚信，宁夏各族革命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社论）

21, 安徽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14；中发〔68〕61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安徽省军管会四月十日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李德生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安徽省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开始就积极投入运动，同刘邓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展开尖锐的斗争。一九六七年廿一日毛主席对安徽驻军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英明指示，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和五条批示。九月前后，康生同志多次接见了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并作了讲话。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对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不仅引导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且指导了全国的革命斗争。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辉煌成果，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隐藏在安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和破坏。这一夥阶级敌人或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散步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此等等，充份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英勇的搏斗，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

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李葆华、黄岩等的反革命罪行，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揭穿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各项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狠抓阶级斗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支左不支派，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

安徽是我国煤炭钢铁、粮食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省分，是我国东南水陆交通运输的要道，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工农业生产，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把安徽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中，又传来一个新的喜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我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安徽三千五百万革命人民，以及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胜利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经过反复的较量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隐藏在安徽的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叛徒、特务，就是这样一些早已覆灭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甘心于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或者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者散布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者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充分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关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作出了英明指示，指明了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航向，引导英雄的江淮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畏的英雄气概，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在安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年多以来，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样，经受了很大的革命锻炼。我们希望，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在胜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里我们要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定不移地学习、宣传、执行、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为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胜利前进，立下了巨大的功绩。

我们希望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诞生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彻底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肃清他们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使自己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率领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把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大节摆在首位。这就是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要进一步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带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抓好煤炭、钢铁、粮食生产，搞好水陆交通运输，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深信，经历了阶级斗争暴风雨考验的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军民，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紧跟伟大舵手毛主席破浪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社论）

22, 陕西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4. 30; 中发 [68] 67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一年多来，陕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了西北和陕西地区以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反革命老巢，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和陕西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起了促进的作用。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陕西地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习仲勋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地区的代理人叛徒刘澜涛等批倒批臭。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揭露并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推广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经验。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继续胜利前进。在无产阶级的战斗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隆重地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兴奋地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两千一百万陕西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陕西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敬礼！

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把“延安还是西安”比作“革命还是反革命”，以此来教育我们划清敌我界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胜利斗争的革命中心；西安，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一个反革命重要基地。延安和西安的斗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关系着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

解放以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死党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怀着狼子野心，苦心经营，妄图在西北和陕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搜罗了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拼凑了一套又一套黑班子。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实质上，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大造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之流的反。斗争是剧烈的、艰苦的，但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广大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经过反复的较量，终于摧毁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陕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遵照毛主席“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教导，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广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宣传活动，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军民团结，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要防止斗志松懈、停滞不前的情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顾革命的大局。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妄想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分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活动。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决不准许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我们希望，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继续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拥军爱民。要发扬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时刻注意克服脱离群众的各种倾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所有参加省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同志，都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

我们相信，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在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焉孛魔“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23, 辽宁省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5.08；中发〔68〕70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五月七日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同意设四十五名常委；同意由陈锡联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田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光荣诞生的。两年来，辽宁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和帮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他们在东北和辽宁的代理人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周桓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联盟的残余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隐藏在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辽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央热烈祝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遵照林副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讲话中所说：“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使自己成为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比例。中央希望，辽宁的工人阶级应充份认识自己的领导责任，在完成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中起着带头的模范作用。

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辽宁省至今还存在着跨行业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希望，辽宁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应积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必然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辽宁处在反帝反修的第一线，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需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警惕，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苏修，美帝，日本，蒋匪的特务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为了一致对敌，必须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极“左”思潮，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利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和驻辽部队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断加强军民之间在革命原则下的团结。沈阳军区和人民解放军要巩固国防，严防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在边防上的军事挑衅。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协同东北的兄弟省份，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整个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铁路交通运输计划。

中央希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吸取他省先进经验，把辽宁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军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隆重成立了！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关怀辽宁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许多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给予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辽宁省广大军民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十分高兴地向辽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省两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向驻辽宁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现在，继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东北地区各省也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发展是很快的。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抓紧。希望辽宁省的同志们，以及别的地区的同志们，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发现和支持革命的新事物，朝气蓬勃地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

长期以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及辽宁地区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军民团结，竭力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妄图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忠于毛主席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斩断了他们的黑手，把他们的丑恶面目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终于取得了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忠于毛主席的驻辽宁省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坚持不懈地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密切结合阶级斗争实践，热情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了新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特务和隐藏的或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我们要继续努力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要把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和这个组织中的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要注意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继续做好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壮大革命队伍，团结和争取同盟军，使一切革命力量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共同对敌。

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我们要以满腔的热情爱护它，支持它，巩固它，发展它，防止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

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要继续加强军民团结。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要继续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希望辽宁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国防、工农业、交通运输等战线上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方面。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眼看自己各种阴谋诡计统统遭到失败，就妄图用更卑鄙的手法，来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全国广大军民必须眼明心亮，揭露阶级敌人的卑鄙手法，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使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破坏生产的阴谋完全彻底破产。

辽宁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辽宁大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辽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社论）

24, 四川省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5. 28; 中发 [68] 75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四川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后方，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解放以来，阶级斗争仍然是特别尖锐。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他们曾经千方百计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招降纳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把四川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

经过两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露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四川省的胜利，是得之不易的。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四川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的结果，这是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巨大成就。我们向四川省七千万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央同意：由张国华同志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女）、徐驰、邓兴国、江海云（女）、王恒霖、彭家治、张泗洲、冯玉德、蔡文彬、杨志诚、但坤蓉（女）同志担任副主任。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所提的常委和委员名单。

中央希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广大群众，提高阶级的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要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公开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希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继续巩固、继续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必须遵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继续努力建立革命委员会。

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揭露那些挑拨军民关系的坏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方面。四川省的工人阶级、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把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当作是自己的光荣责任，对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罪恶行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各项指示。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意见。要顾全革命大局。在斗争中，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战斗指挥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照遍了巴山蜀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胜利前进的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省七千万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四川的全体指战员，致以战斗的敬礼！

四川，是我国的战略后方。解放以来，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封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声音，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地在各条战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企图把四川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四川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一小撮又和社会上残留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进一步勾

结起来，猖狂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扑，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军民团结，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次又一次刮起右倾翻案妖风，进行垂死的挣扎。

在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中，贯串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当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还处在相当艰苦的时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四川很有希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四川革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勇往直前，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击退了一次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终于取得了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四川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死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决不能使我们麻痹起来。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搞翻案：妄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翻案，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右倾翻案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足为怪。我们要坚决粉碎右倾翻案风，开展持久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把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努力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兴风作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少数的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最近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这一指示，透彻地揭露了世界上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共同的反革命本质，透彻地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本质，向我们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自己工作中，永远要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流和支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切不可中了坏人的挑拨。要爱护和支持革命委员会，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支持和拥护人民解放军，保护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不断增强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的坚强团结，增强军民之间的坚强团结，增强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坚强团结，警惕右倾分裂主义。要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

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四川革命人民，一定能够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更好地完成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基本建设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让我们迎接这个光辉时刻的到来吧！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社论）

25，云南省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0；中发 [68] 128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一人），待以后增补。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建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是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胜利宣告了云南地区阶级敌人复辟活动和垂死挣扎的彻底破产。

中央希望，从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提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做到：

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充份认识到云南地处祖国边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缅甸、印度和泰国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屏障，是援越抗美斗争的前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巩固边防。

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毛主席的“七·一八”批示，大造声势，坚决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迅速猛醒过来，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揭

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对于犯有中央指出的那些反革命罪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依法惩办，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动员广大革命群众，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遵守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大力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彻底粉碎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科技路线，坚决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知识分子要坚决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防止阶级敌人从中破坏捣乱，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云南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的时候，处于祖国西南边疆、国防前哨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巨大鼓舞下胜利诞生了！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企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

给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乘胜前进的全国广大革命人民。

我们满怀着亲切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经受了深刻锻炼的云南省两千三百万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战斗敬礼！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关怀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云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多次作了极其英明的指示，给云南革命人民指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个伟大胜利！

在云南，也和其他地区一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长期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云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从右的和极“左”方面的破坏，终于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立下了新的功勋。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

我们希望，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依靠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为了加强对敌斗争，云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用

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实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的革命团结，军民的革命团结，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团结和各民族的革命团结。要遵照毛主席“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的指示，同危害革命利益的右倾分裂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只要我们加强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和分裂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有重大的意义。希望云南省和全国各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加强工人群众的工作，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阶级，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的大联合，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和首创精神，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的作用。要大力促使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发扬毛主席历来倡导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作风，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知识分子中那种言行不一的坏作风，反对一切两面派的行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革命形势越是大好，一小撮阶级敌人越是要进行垂死的绝望的挣扎。云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加强边防，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要广泛深入地、耐心地、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坚决保护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揭发清查坏人。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对敌，粉碎幕后的反革命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要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保证革命生产双丰收。

金沙水拍云崖暖。毛主席当年率领红军长征时伟大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进。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云南高原的前程无比灿烂辉煌。我们坚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云南各族英雄儿女，一定会坚定地团结

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率领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保卫国防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新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社论）

26. 福建省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4；中发 [68] 132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热烈地庆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福建省是处在祖国国防的最前线，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些凶恶的敌人，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之流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在福建的代理人，长期以来，招降纳叛，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在福建复辟资本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经过激烈的斗争，充份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叶飞这些福建走资派的丑恶面貌，把叶飞之流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中央批准福州军区党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名单，同意韩先楚同志担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皮定钧等十一个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央希望：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应该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使整个福建的面貌为之一新。

要抓好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一个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认真清理阶级队伍。

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斗私，批修”，让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更普及，更深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进一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叶飞之流的“独立王国”和反动的“多中心论”，批倒批臭。

要进一步地引导群众组织，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要认真地做好“精兵简政”，“拥军爱民”的工作。

要进一步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福建全体革命群众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继续高度地警惕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继续高度地警惕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的各种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解放台湾。对于那些敢于来侵犯我国前线的美蒋匪帮，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歼灭之。

总之，中央相信：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必将大大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福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因而必将在各个战线上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紧接着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祖国海防的最前线——福建省的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们向一千七百万福建省人民和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福建省面临台湾海峡，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东南大门，是我们解放祖国领土台、澎、金、马的前进阵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早已森严壁垒的我国东南海防前线，现在，更加众志成城。这对于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匪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巩固我国国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福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就亲自率领工农红军，把在井冈山燃起的革命武装斗争烈火扩展到福建。毛主席在这里亲手写下了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我党我军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引导着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始终鼓舞着一千七百万福建人民的革命斗争。

解放以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同社会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相勾结，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竭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想阻挡革命车轮的前进。

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福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帅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经过反复的激烈的搏斗，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 and 一切反革命分子负隅顽抗的种种阴谋诡计，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广大指战员，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一起，坚决打击了美蒋匪帮对福建沿海的窜扰活动，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热情宣传、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定地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三支”“两军”和保卫国防的斗争中建立了巨大功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战斗在国防第一线的福建军民，肩负着严重的对敌斗争任务，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对敌，决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必须充分认识到，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美蒋匪帮，以及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然要进行垂死挣扎。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深入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巩固祖国海疆这个钢铁长城。对于那些敢于来侵犯我国前线的美蒋匪帮，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福建省军民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团结，加强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团结。革命群众要爱护和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爱护和支持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按行业，按班级，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坚决粉碎阶级敌人挑拨离间、造谣破坏的阴谋活动。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彻底粉碎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坏作风。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教育革命中，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都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必须把这件事抓好，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希望：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千百万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伟大

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号令，都必须认真学习，坚决照办，彻底执行，及时总结经验。只要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一定能不断前进，更快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社论）

27，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20；中发 [68] 13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是援越抗美的前哨。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曾经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特务，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广西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面目，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韦国清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三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大造革命声势，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要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要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内团结和军政团结。认真落实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指示。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作好援越抗美工作。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歼灭敢于来犯的美蒋匪帮，巩固边防，保卫祖国。

中央相信：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化，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强大革命威力下，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紧接着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和海防前线的福建两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反革命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给了那些叫嚷“中国靠近边疆的省、区成立不了革命委员会”的帝、修、反的蠢虫们以迎头痛击。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广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伟大的战略部署和英明的决策。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满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广西二千四百万各族革命人民，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既是胜利的伟大进军，又是曲折的艰巨里程。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个胜利，都要同阶级敌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激烈的搏斗。

广西是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前哨，过去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老巢，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敌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极端仇视，极端害怕。一小撮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跳了出来，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阻挠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在革命群众团结对敌的巨大威力下，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可耻地失败了。广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广西的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同阶级敌人进行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持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使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完成“三支”“两军”任务的同时，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教导，多次击落入侵的美帝飞机，给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胜利。我们希望：广西各族革命人民在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继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力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极其伟大的战略意义，为我们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指出了根本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各级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根据毛主席指出的各个步骤，积极地投入伟大的斗、批、改高潮。对毛主席提出的各项任务，即建立各级革委会、

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以及教育革命等等，要逐条讨论，逐条落实，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广西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具体情况，订出自己的规划，切实执行。

广西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稳、准、狠地打击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英国特务和其他特务分子、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地处祖国边疆、援越抗美斗争前哨的广西军民，一定要大力加强战备，严守边防、海防和空防，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广西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都要巩固和发展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我们坚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西各族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一定能够继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社论）

28，西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28；中发〔68〕136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西藏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它长期受反动的农奴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英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的掠夺，美帝，苏修，蒋匪帮也派遣了许多特务，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勾结达赖，班禅叛国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引导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要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对某些尚未完善的县革命委员会，应当通过两派革命群众的充份协商，予以调整，充实和加强。

继续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内团结，军民团结，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防止阶级敌人挑拨离间。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印度特务的破坏活动。加强战备，巩固边防，保卫祖国。如果印度反动派胆敢侵犯我国神圣领土，我们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歼灭之”。把祖国的西南边疆建设成为伟大的钢铁长城。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迅速恢复交通运输，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相信：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更快地传达，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示和战斗号令，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西藏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9.01；中发〔68〕13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名单，批准由龙书金同志任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缺副主任三人待补。

中央热烈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境外，有苏修，蒙修，美帝和印度反动派的挑衅，在境内，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阶级斗争极其复杂和尖锐。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赫

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北和新疆的代理人习仲勋，刘澜涛和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等，同这些内外敌人相勾结，妄图把新疆变为修正主义的基地，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疆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罪恶阴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下，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教导，加强敌情观念，高度警惕内外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深入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紧密团结各族人民，一致对敌。

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批倒批臭。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继续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巩固边防，保卫祖国。帝，修，反如敢于来犯，就“坚决，彻底，乾净，全部歼灭之。”

要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方针，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制止觉悟。”新疆有五十万左右的产业工人，应该充份认识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在正在到来的新的斗，批，改高潮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切实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中央相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只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依靠各族革命人民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把新疆建设成为各族人民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及负责人

| 顺序 | 省份 | 成立时间 | 主要负责人 | 被点名人 |
|----|-----|-------------|-------|---------|
| 1 | 上海 | 1967. 1. 10 | 张春侨 | 曹荻秋 陈丕显 |
| 2 | 山西 | 1967. 1. 25 | 刘格平 | 陶鲁笳 卫恒 |
| 3 | 贵州 | 1967. 1. 25 | 李再含 | 贾启允 |
| 4 | 黑龙江 | 1967. 1. 31 | 潘复生 | 欧阳饮 李范五 |
| 5 | 山东 | 1967. 2. 3 | 王效禹 | 谭启龙 |
| 6 | 北京 | 1967. 4. 20 | 谢富治 | 彭真 刘仁 |
| 7 | 青海 | 1967. 8. 12 | 刘贤权 | 王昭 |
| 8 | 内蒙古 | 1967. 11. 1 | 滕海清 | 乌兰夫 王逸伦 |

| | | | | |
|----|----|-------------|-----|---------|
| 9 | 天津 | 1967. 12. 6 | 解学恭 | 万晓塘 张淮三 |
| 10 | 江西 | 1968. 1. 5 | 程世清 | 方志纯 |
| 11 | 甘肃 | 1968. 1. 24 | 冼恒汉 | 汪 锋 |
| 12 | 河南 | 1968. 1. 7 | 刘建勋 | 文敏生 赵文甫 |
| 13 | 河北 | 1968. 2. 3 | 李雪峰 | 林铁 |
| 14 | 湖北 | 1968. 2. 5 | 曾思玉 | 王任重 |
| 15 | 广东 | 1968. 2. 21 | 黄永胜 | 陶铸 赵紫阳 |
| 16 | 吉林 | 1968. 3. 6 | 王淮湘 | 赵林 |
| 17 | 江苏 | 1968. 3, 23 | 许世友 | 江渭清 陈光 |
| 18 | 浙江 | 1968. 3. 24 | 南萍 | 江华 |
| 19 | 湖南 | 1968. 4. 8 | 黎原 | 王延春 |
| 20 | 宁夏 | 1968. 4. 16 | 康建民 | 杨静仁 马玉槐 |
| 21 | 安徽 | 1968. 4. 18 | 李德生 | 李葆华 黄 岩 |
| 22 | 陕西 | 1968. 5. 1 | 李瑞山 | 习仲勋 刘澜涛 |
| 23 | 辽宁 | 1968. 5. 10 | 陈锡联 | 马明方 顾作新 |
| 24 | 四川 | 1968. 5. 31 | 张国华 | 李井泉 廖志高 |
| 25 | 云南 | 1968. 8. 13 | 谭甫仁 | 阎红彦 赵建民 |
| 26 | 福建 | 1968. 8. 19 | 韩先楚 | 叶飞 范式人 |
| 27 | 广西 | 1968. 8. 26 | 韦国清 | 贺希明 谢五岗 |
| 28 | 西藏 | 1968. 9. 5 | 曾雍雅 | 周仁山 王其梅 |
| 29 | 新疆 | 1968. 9. 5 | 龙书金 | 武光 吕剑人 |

三、庆祝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江青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是早晨才知道要开这样一个盛大的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临时告诉我，要我来说几句话。（鼓掌）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红卫兵小将们，（鼓掌）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我想不出什么好的语言来形容我心中的喜悦。（鼓掌）回忆这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惊涛骇浪，追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终于把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粉碎了。（鼓掌，群众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鼓掌，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现在有少数个别小将犯了这种或者那种错误，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正。（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就是有个别单位，有什么武斗，那也很滑稽的。当然是坏事情，脱离了广大的群众，也脱离自己本单位的群众，这不是好事，我们反对。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革命小将，（鼓掌）暴露了敌人。（鼓掌）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七月二十七号，工人阶级主力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鼓掌，群众高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人民解放军做后盾。（鼓掌）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愿意革命的教职员工应该欢迎，（鼓掌）服从领导。（鼓掌）不允许少数个别坏人刁难，要把这些坏人破坏斗、批、改的家伙揪出来。（鼓掌）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要好好地保护红卫兵小将。（鼓掌）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因此，我建议你们也要好好地学习本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这一篇按语。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斗、批、改，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很多的。我们还会遇上许多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前进！（鼓掌）

我的话完了。（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战斗的敬礼！（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在今天北京市庆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在今天首都庆贺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大会上，让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问你们好，向你们庆贺！（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也向全国各族人民庆贺！

大家都说，现在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自从去年一月上海工人阶级首创夺取走资派的权的“一月风暴”到现在，整整的二十个月了。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鼓掌）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同时，我们大家也要紧紧地记住，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外还有一个台湾省没有解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大家晓得国内外的敌人不会甘心他们在中国失败的，他们一定还要挣扎，还要反扑。所以，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我们认识，统一我们步伐，统一我们行动。各个单位都要能够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

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各单位，也就是说，譬如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机关也是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彻底地把那些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各地、各单位的代理人斗臭、斗倒，并且要在我们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下，清理各个单位的阶级队伍，把那些坏人揪出来。要继续地批判一切反动的思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一些反动的学术权威、技术权威，等等。要精简我们各单位的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精简的人员到基层去，到生产中去。

青年们也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鼓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应该号召全国的革命人民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所以，现在开始组织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以人民解放军为后盾，有配合地进入到各学校去，促进那个地方没有联合起来的革命大联合，同各学校、各单位的学生、教职员工中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个里头的斗、批、改。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把自己逐步地、不断地锻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有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掌）

在这样进行斗、批、改当中，就可以把我们教育革命进行好。不仅对学校如此，对于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各种机关，凡是没有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或者没有搞好斗、批、改的，我们都应该派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去帮助他们，去领导他们。（鼓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现在，从国际上看，敌人是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是一天天好起来。很清楚，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内外交困；以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为中心的修正主义国家也是互相猜疑，互相倾轧。所以追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日子也很难维持。旧的世界我们可以说走向崩溃是肯定了的。（鼓掌）我们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全世界胜利也是肯定了的。但是在胜利来临之前，世界的敌人一定要挣扎、反扑。（鼓掌）所以，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要按照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鼓掌，群众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打倒党内一小撮的走资派、叛徒、内奸！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中国人民公社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红卫兵万岁！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中国各族革命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人民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鼓掌）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天山南北凯歌嘹亮，青藏高原阳光灿烂。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乘胜前进的时候，地处我国西南、西北反帝反修前哨的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胜利诞生了！

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我们向西藏和新疆各族革命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和新疆部队全体指战员，以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向两年来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全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致以热烈的战斗的敬礼！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和新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支持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较量和顽强斗争，终于把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和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一小撮叛徒、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英国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挖了出来，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分裂祖国统一的迷梦，给了帝、修、反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颠覆破坏阴谋以沉重打击。

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到西藏和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把美帝、苏修的一切反革命谣言击得粉碎，使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痴心妄想化为泡影。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尽情地热烈欢呼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革命人民所取得的这个伟大胜利！

我们坚决地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坚持不懈的战斗，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项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同时，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使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

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在贯彻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每项工作中，更好地肩负起领导一切的伟大历史使命。

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抓好典型。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坚决执行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必须亲自选择一些点，从中吸取经验，指导面的工作，并向中央作报告。要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广大群众意见，十分注意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

毛主席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攻，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捣乱和破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一定要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战备，加强边防、海防和空防，随时准备解放台湾，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敌人如果胆敢碰一碰我国的神圣领土，发动武装侵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它们歼灭。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阔步前进！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面貌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社论）

2008年9月15日初稿

2011年12月2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八章（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主席：

这次回上海过国庆节，住了十二天，作了一点调查工作，开了几次调查会，到基层去看了一下，前一时期打得最凶的柴油机厂也去了。一接触群众，学习到很多生动活泼的新东西，深深感到，主席最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都是集中的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内心的要求，抓住了当前革命运动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譬如办训练班吧，干部需要，造反派头头也需要。有一个染化八厂，是生产活性染料的，七月份成立革委会，到现在自己已经办了八期学习班，每期一周到十天，学习“老三篇”和其它主席著作，造反派中队委员以上参加，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参加，着重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用主席思想为指针，作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正确对待群众，团结群众，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新干部掌权后，工人主要一条意见就是到群众中去较少了。这样学，效果很好。这种短期学习班，厂可以办，其它地方更可以办。他们一听到主席最新指示，立刻感到真像说到他们心坎里。

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一）“九大”问题

在四个座谈会（革委会、红卫兵、工厂和学校造反派党员、军队同志）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征求了人们的意见，我们本以为大家会感到突然，其实不然，造反派中已经在议论了。可见群众心中是在思考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这种核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不应主观主义的去建立，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并且在斗争中发展的，整顿党的组织。首先不是从基础而是从领导机关开始。上海各区、县、局及相当于局的单位，至十月五日，已经建立三结合班子的共三十五个，委员八百五十六人，其中，党员四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一批较好的党员实际上已被革命群众选进领导班子。有些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参考，不知是否妥当？

“一月革命”前，党员参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到今年一月以后，一批党员就陆续参加造反派，其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不等。阶级斗争实际，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的基础上，才能领导几万万群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容易曲解为恢复原状。”应为整顿和改造。刘小奇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尚需继续大力批判。重点是：第一、党的性质任务问题。第二、建党路线问题（“生产好、听话、就可以入党”）。第三、对群众关系问题（这是根本问题，一些党员谈到因受黑“修养”的毒害而当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受刘邓路线蒙蔽，而压制群众。无不痛恨，有极深感受）。第四。民主集中制问题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些都需要用毛泽东思想对刘少奇的那套修正主义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不知这样综合是否对？

一致极其热烈地盼望：“九大”前“毛选”五卷能出版，能够有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许多党员（特别是工人造反派）希望更多了解党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某些人物的历史面貌。因为过去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用了。

（二）精兵简政问题

这个问题很迫切。

这几个月中，市革委会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二十个工作部门三千二百二十九人。办公室下面就有七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人员，无论如何。这个机构太庞大了。机构越大，各种坏人就会钻进来，领导干部就会脱离群众，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就必然会滋长山头主义，其中有一些部门（不是全部）人员增加正是由于山头主义在作怪，同春桥同志商量，至少要砍掉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这个思想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已向领导干部传达了。

关于干部和群众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训练班等问题以及继续大批判问题，“人民日报”“红旗”是必须有专门的社论。主席的重要指示就在社论中分别引用。不知这样考虑对不对？

一月革命以来，十个月了，造反派的头头，大多数在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学习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市和区、在基层中，我们见到了一大批敢于革命、敢于挑担子的生气勃勃的好干部。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开始被宴会、鼓掌、捧场、小汽车所陶醉，个别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开始脱离群众，不再那样如饥似渴的去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有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批评了一些头头的“追求名利、出风头、享乐”的坏作风。希望“敲起警钟，起个革命化”。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到“三反”的那一段短短的历史。除学习班外，春桥同志准备开一些小会，进行教育和深入谈心。

怕多占用您十分宝贵的时间，这封信就写到这。

另外两个问题以后再报。选了一份党员座谈会记录，请主席参考。

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生谈准备中共“九大”新党纲

党章历来抄苏联的多。苏联的党章也分列宁时代的，斯大林时代的和赫鲁晓夫时期的。

大家研究一下党纲如何搞法？

一九零三年苏共有一个党纲，是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后来列宁改了，主要的争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成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大争论。之所以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同俄国历史上的争论有联系。俄国开始建党时的争论是建立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司徒卢威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从那时至今差不多六十五年以来，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基本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政权问题，这是个重大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俄国的党纲，叫列宁党纲。斯大林时代没有专门讨论党纲的问题，但是十八、十九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问题，例如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以后，在六一年的二十二大上搞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纲。这个党纲的基本问题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苏联党纲的历史是：孟什维克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和斯大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又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一九零三年苏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纲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的党纲也可以参考。

党纲采取什么形式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苏共一九零三年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很长，一九一九年的党纲简直成了政治经济学了（它是为了增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点）。本来党纲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形式长，内容复杂，什么都有，所以大家记不住。这可能受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繁琐得很，连房子问题也谈到了。他把当时设想的许多问题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不容易把政治问题突出出来。

我们党怎么样呢？

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纲有十条，是简单的几条政治纲领。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纲采取的形式是：序言就是总纲。那是因为主席鉴于苏联的党纲复杂，所以搞个总纲，起党纲的作用。八大党纲怎么搞的，因为我有病，没有参加，所以没有一点印象。

大家参考一下我党历史上的以及外国党的，研究一下。党纲到底采取什么形式好？“九大”涉及到党纲的问题，所以不管组织部也好，党校也好，要研究一下。组织部的同志们把思想放开一点。党纲是采取列宁搞的那种形式还是七大总纲的形式，或另外一种形式，或单独的形式？可以解放思想，考虑考虑。

另外，党的组织机构到底怎么搞？主要看同志们的意见。监察工作怎么搞？我看监察委员会要不要都可以考虑。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里讲到，党的组织是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斯大林在联共党史里也是这样提的。我们长期感到我们组织工作中的很多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看我们的党和我们党的组织

工作，而是把我们的党看成是绝对化，铁板一块。过去党的组织工作常常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脱离了毛主席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离开了每一阶段的阶级斗争。我们的许多组织文献（包括刘少奇的黑《修养》），都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形而上学的，把党弄得很死板，好象铁板一块，死水一潭，结果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长期统治着完全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什么叫组织？它是生理学上的名词。俄文可以翻成器官，依我看，医生形而上学真厉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尤其是不联系神经系统。我常想，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就象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医生一样。人没有新陈代谢就完了，党也一样，主席常讲要“吐故纳新”，不能是形而上学的。当然也不能说旧的医学都排除辩证法，但是有一点很形而上学，就是说人的脑细胞是一成不变的。共产党就象个头脑，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是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所以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把辩证法运用到党的建设中来了。毛主席说党内的斗争是正常的现象，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毛主席在党的建设上对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有许多重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没有拿这个题目去综合和研究。过去刘、邓、彭、安等人，特别是主管党的部门——组织部根本没有这样去做。主席经常批评过去的组织都是党不管党的，所谓不管党是不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建设党。他不是不管党，是管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党。过去的监查工作和组织工作中，不确立毛泽东思想，不研究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和理论，所以组织工作就搞不好。党校也好，组织部也好，要列这么一个课题，就是“毛主席的建党学说”，用这个课题在毛选和毛主席的其它言论中去加以研究。

如果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去论述党的建设。我记得在延安整风时，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说过，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当时很多同志震动很大，因为那时许多党员了解的党性是当驯服工具、要缴纳党费，服从组织决议。主席说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也引起很大震动。主席还说有些同志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也是党员过去很少考虑的问题。所谓

“承认党纲、党章”就是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在党的建设上是很突出的问题。虽然列宁讲了要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但是这样明确还是主席提出来的。主席还提出党的问题不单纯从组织上解决，而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个联系到了辩证法。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都是认为一个人不好，从组织上一开除就万事大吉。其实，错误思想是一种社会现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老早就开除出党了，但是机会主义还有。李立三垮台以后，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还有。赫鲁晓夫下台三年多了，难道修正主义就没有了吗？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死亡，修正主义并不因此就没有了。王明下台了，但是王明路线彭德怀和彭真还实行么！抗战胜利后，彭真到东北还是实行王明路线么！所以只有组织上的解决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胜利，因而主席说思想上从严，组织上从宽。王明还是中央委员，要留个反面教员。彭德怀还是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职务还未解除，那种事很容易，开个会就解决了。但是不是组织上一解决，就不需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了。不论组织上怎么解决，思想上也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的。

过去组织工作上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建党。主席关于党的建设讲了什么，没有研究过，没有把它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课题之一。怎样改造我们的组织工作？希望党校、组织部和监委组织一些人翻翻毛选，好好想想这方面的问题，作些摘录和综合。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十二条是二五年搞的。主席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党校和组织部的同志们可以研究一下。例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整风报告，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讲到防止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的问题）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了关于党的民主问题。有的文章虽不专门讲，其中也谈了党的建设问题，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研究主席的思想可以综合研究，专题研究。五九年我们讲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主席曾承认过一个问题，就是在党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点是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根据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发展的。

（康生念中组部的报告，报告中说，对刘少奇的建党路线要彻底批判，并肃清其流毒）这条很重要。要搜集材料，加以综合和研究，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彻底地批判。因为只有破除刘少奇的，才能树立马列主义的建党路线。这是大批判中

的一个重要部分。……整理材料很重要，特别是关于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对叛徒包庇重用的材料要整理。应该着重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来整理，整理材料也要政治挂帅。……

当前是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主席很及时地提出了党的问题。党的问题有二，一是关于九大问题，一是整顿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问题。准备九大和整顿党的组织是分不开的，和大批判、斗批改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九大最好的准备，最好的整党，对干部也是最好的审查。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去准备九大，整顿组织也不是孤立的。整党是文化大革命中主席提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主席发扬了最大的民主。把“九大”如何公开交给群众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过去准备大会不同，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我们的党，关心我们的大会。各地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要受过去旧的框框的约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设想这个问题。

“九大”是不是没有准备，开得过早？好象有些地方还乱着，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还没有整顿党的组织，我看事情不是这样。整个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历次大会也没有这么好的准备。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毛主席思想通过文化大革命为亿万劳动人民所学习、掌握和运用。亿万劳动人民直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是准备“九大”，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文化大革命在某个意义上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教育运动。过去历届的八次大会，哪届象这届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大好形势中这点是最主要的，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要把“九大”开成用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大会，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的大会。

就理论方面讲，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不仅是准备“九大”的问题，全国

的问题，而且是世界马列主义的发展问题。这给“九大”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世界上各党代表大会也没有这样子。

第二，关于政治上的准备。

多少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进行的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政治大革命。用政治大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打垮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党的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的斗争。阶级斗争从来也没有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土崩瓦解。

可以想想，我们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作过斗争，主要在党内进行。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作斗争，是在党内，在干部中进行。同李立三的斗争也是在党内进行。同王明的斗争，在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征和延安整风。比过去进了一步，但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地发动群众。同张国焘、高、饶、彭德怀的斗争，也主要在党内展开，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地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组织上的准备。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干部。审查代表，过去是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上层的几个人审查。第一次到第七次大会不是一层层开会选出代表，实际上是上级指定名单，下级通过。至于八次大会是先从省委定起，然后由下而上，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我算山东的八大代表，你说选我的人都知道我？实际上是一种形式，更不要说经过群众审查了。过去不是通过群众考察干部，干部也不真正都是在阶级斗争中考验过的。这次不同了。文化大革命前搞社教运动，在《二十三条》中就提出反对走资派，《十六条》中也提出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到去年六月一号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六月份到今年一月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经过一月后的夺权斗争，大大地纯洁了党的组织，当然现在不能说党内没有暗藏的坏人。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等叛变分子，自首分子，特务分子揪了出来，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不搞文化大革命有些人根本不会弄清楚。……这些人窃据了党政

军的一部分权。一九三七年关于自首叛变的“七·七决定”就是他们思想的反映。过去是几个人审查干部，现在是群众运动审查干部，这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是世界上没有的。

第四，干部上的准备。开“九大”，要提拔一批新干部。过去是上级考察干部，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一批新干部，有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把过去那套揭露了。是现在的工代会好，还是过去的市工会好？是红代会好，还是过去的团市委好？整个的红卫兵运动比过去胡耀邦搞的团好不好？

我陪同谢胡同志在青岛、济南访问了一些工厂，看到一些工人很有水平，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向他们学习。我接触的工人多数是初中毕业，个别高中毕业或技工学校毕业，到工厂做了几年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能联系到革命，联系到生产，这很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涌现了一批新干部，哪次大会也没有准备得这么好。

第五，国际上的影响。

中国党开大会，对国际总会有影响，但没有这次这么大。世界上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和马列主义者有个分水岭，就是赞成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赞成还是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切政党建党的指导方针。帝修反反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苏联修正主义天天骂我们是“大国沙文主义”，恰恰是我们援助世界革命人民，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的牺牲，朝鲜战争时是这样，对越南也是这样。……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是影响各个方面的。

我讲的还不全面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阶级斗争方面，纯洁党的队伍方面，提拔新干部方面。国际影响方面，以前的八次大会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准备，所以主席提出召开“九大”，是英明的决策，大家欢欣鼓舞。

召开“九大”和恢复党，发展新党员是分不开的。主席提出要整顿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我们大家要好好讨论。主席指示准备“九大”要联系到整顿党的组织问题。文化大革命和建党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是三年时间，还有一年多，整顿党不可能在“九大”前统统整顿好，在“九大”后也要根据新的党纲整顿，恢复，重建党。总而言之要把过去刘少奇那种只作驯服工具，而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党的状况彻底改变。不要把

党变成死板的党，不要支部书记就是皇帝。主席举例说，沙石峪大队的支书盖了好房子，而且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有些党员官作大了，也不民主了，脱离群众，有事不跟群众商量。

一方面，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另外要吐故纳新，增加新的血液，吸收一批新的党员。“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员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当“驯服工具”，难道能做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驯服工具吗？纪律应当是自觉的，有条件的，就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中说的三条：“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可是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而正确的革命理论，会加速这些条件的形成。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密切联系真正群众运动和真正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准备九大党章草稿

大家都要求把第八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改，中央着手搞这工作，中央为了把工作做得好一点，前天晚上（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中央要求上海搞一个九大党章草稿。当天接到通知后，当即就召开部分革委会成员会议，大家认为中央把这样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上海，这是对我们上海广大党员，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信任。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差，

能不能搞出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党章，还要靠我们努力，既然中央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我们要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做好。我们考虑准备这样搞：

一、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小组，十个人左右组成一个组，由这十人负责修改。这项工作由我（即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三人负责，今天就开始工作。

二、现在革命委员会抽调二百多人，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街道等单位进行调查，组成四十多个调查组，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一个修改小组，这四十个修改小组要拿出四十个九大党章修改的方案。总纲和党章从头到尾都要修改。你们认为原来的党纲要批判，就批判。那一条要保留，那一条就保留，那一条要改就改。各小组都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来改，这样把各小组集中起来，再下去讨论。也可能有反复，这是正常现象，最终汇成一个草案。

三、修改小组不派人去，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个单位，在那里发动群众，修改党章，现在七十多个单位报名了，到目前为止我收到来信很厚的一迭，这说明很多人关心党的工作。有的人虽不是党员，但是比有些党员关心，我们都要掌握这些新动向，如有广大群众参加了，就会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这样有修改小组拿出四十本修改党章方案，又加上三军、工总司、红代会等七十本，那加起来就有一百十本，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百十本进行综合写成本“九大”的党章报告，这样交给中央，由中央再进行汇总，那些可以吸收的，中央再把草案发给全国进行讨论，全国可以修改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就可以比较完善，在“九大”通过以后，就成为我们的纲领，大家坚决遵照执行。

在对待修改党章这件事，有的人认为很重要，很关心，而有的人重视也不够，因为比较忙，要抽人，第一把手要负责。如果你那个小组提出草案是反毛泽东思想如何办？你第一把手要负责的。现在上海工作有缺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是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但是最近一个月跟得不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九大”工作不重视，认为姚文元同志在上海作了调查，报告中央和毛主席了，而没有把对“九大”准备作为带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没有把“九大”召开的准备作为一个头等重要工作来抓。

为了开“九大”，就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准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已为“九大”作了准备，从政治上把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揭出来了，批判了，从组织上清理了队伍。一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混进革命队伍和中央的人揪出来了。这一年半对我们说来就是整党，一年半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文、中心是党，因为党是最高组织形式，斗争还在继续，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继续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九大”作准备。“九大”不仅仅是开一个会议，从这方面来抓工作，我们会站得高，看得远了，整天就不会被眼前的事揪住了。我们就要看看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就不会从极“左”极右方面来干扰斗争大方向。最近革命大批判就松了，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大家对刘少奇知道得多一点，陶铸也了解一点，因为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评陶铸的两本书》，而邓小平就少了，难道陈丕显，曹荻秋就批透了吗？还没有，在上月就有谣言，说陈丕显见到了毛主席，有人就很高兴。是不是有人等待陈丕显上台呀！肯定有。为什么在出现炮轰南京路时，吸引了这么多人，搞精兵简政，要整顿队伍，但现在把走资派放在一边，有人就要用此机会溜掉。同志们，陈、曹还没有死心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呀！对于这些干扰，有的人就有很大兴趣，有人总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总想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搞垮，因为垮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人就高兴了，而这个问题有反应，不在于阶级敌人在冲击我们，而在于我们没有把方向抓牢，来带动群众，对准一小撮，我要负责，有些工作，上次回上海没有着落，主席视察之后的指示没有落实。当前我们要召开“九大”，要为“九大”召开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不注意，上海就可能走向反面，原来比较先进，跟主席一步没有跟上，就可能落后，脱了一、二步就困难了。必须紧跟主席战略部署。当前要抓住“九大”筹备工作，那些派性就没有市场了，就可能把无产阶级志气鼓舞起来，好多单位有问题，前进不大，有些单位比较先进，而转化为落后了，铁联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上海反常委会与反中央一样，各个击破，而在上海也是各个击破，先反张春桥、姚文元、后反徐景贤，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徐老三，这是流氓话。在上海还有一种习气，你算老几，洋泾浜，在智取威虎山中，因为杨子荣是最后一个到山上，是第九个，所以说是算老九。这是土匪用的语言，今后谁讲这些话就是流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红卫兵是老几呀？

我们工人，农民算老几呀？我们毛主席就是依靠普通工人、农民、红卫兵、革命干部，有些共产党员听了也不反对。徐景贤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我有错误也可批评。有些人是别有用心，把徐景贤搞得灰溜溜的，又搞王成龙。

张春桥同志又谈到，离开阶级斗争形势就没有办法分析，打倒徐老三你可以贴吗？打倒王成龙你可以贴吗？打倒张春桥你可以贴吗？我们呢，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发动猛烈进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搞垮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否则上海就会落后了。中央关于九大问题下达以后上海没有声气，有些单位恢复党组织生活，就没有向革委会报告，你们不带动群众，就有人带动群众前进，搞了武斗，我就不相信群众想搞武斗，普陀区，武斗频繁，一定有反革命。

当前要抓住“九大”准备工作，无论如何不要把修改党章孤立起来，要与当前斗争结合起来，要与恢复党组织生活结合起来，这是不容易的，有斗争，有人会“左”，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有些人就不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也有些党员尾巴翘得高高的，怎么样，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还要听我的，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对刘、邓不造反？对人家造反不支持，我看这样党员有问题。

张春桥同志又谈到，犯了错误愿意改与不改有区别，翘尾巴就不对，不能中央讲恢复党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就翘尾巴，这里充满着斗争，这里包括阶级斗争。

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抓紧，中央给我们一个月时间，两个星期内你们要交出初稿，第三个星期总结才能回过头来讨论一次吧！第四个星期才能总结成一份草案。这里要好好学习，如果对刘、邓和毛主席建党路线都不知道，搞不清楚那怎么能修改呢？这需要我们对毛主席建党路线指示好好地学习一下。另外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了什么问题，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张春桥同志说：“九大”党章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党章，因为我们的党经历了马列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我们的党章就要表现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最新水平的党章。“七大”是刘少奇搞的。“八大”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春桥同志接着说：我们都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次就要看我们搞得如何，搞好了送给主席，给主席能打四十分、五十分、还是六十分刚好及格，还是不符合要求，受批评，犯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我们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那提高也快。

张春桥同志谈到：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中央认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张春桥同志解释这个最新指示时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那就是指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象以前特务，叛徒和乱七八糟都混进了党组织。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有些组织不是朝气蓬勃，而是死气沉沉，以前有些党员干部年龄不大成天看病，没有朝气，而是暮气。有些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斗反而没病了，陈、曹放了不斗，反而胖了，你们不斗他们，将来他们要斗你们啊！

张春桥同志在谈到修改党章时说，要知道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什么叫纪律？什么叫民主？无产阶级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为何不能遵守纪律。这次修改党章要向毛主席学习，要向列宁学习，列宁有些建党理论要好好学习，特别是毛主席的，边修改边学习。我们想到的，就有这么几条。你们下去以后，每天要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修改小组汇报。

这几点我们报告了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好，也只有毛主席，相信群众，让广大群众来修改党章，那工作会搞得更好。

附带讲一下，团怎么样？现在还不能有明确答复，修改党章会碰到党团关系，到下面去要征求意见，有很多人要求红卫兵代替团，如连队没有红卫兵，解放军本身是一个兵，而红卫兵又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所以解放军再戴一个红卫兵袖章就不大好了，又如工厂也没红卫兵，农村，机关和其他单位也没有红卫兵，所以红卫兵与共青团如何关系，希望广泛征求意见。不管怎样，团组织也要整顿，团内也混进了坏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就是坏蛋，当然大部分团员是好的。假如学校红卫兵要代替团，红卫兵也要整顿。

到下面调查碰到没有定性的怎么办？没有定，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没有检查好的不要参加党组织活动。有些人不愿意参加党组织，就不一定要拉他，有些人还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参加党组织。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现在冲向社会的风气有加强，学校还是要复课闹革命，不要在社会上，有些人还在外面，有的人还在武汉，人家不欢迎，学校有些人一

到工厂，有的就闹分裂，分成两派，到农村也是这样。学校斗批改没有改好吗？不管大学生，中学生都要回到学校，如果到工厂去要诚恳学习，那还有点好处。

最后张春桥同志说：让我们在毛主席的生日的前一天，把修改的党章草案交给毛主席。

徐景贤同志讲话：

春桥同志讲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而艰巨的任务，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项工作抓好。最近工作就要围绕着筹备“九大”来带动其他各项工作，促进我们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批判刘、邓的建党路线，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最后徐景贤同志指出，要求这次下去的同志，在斗争中学，在工作中学，到群众中去学，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建党理论和有关指示。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报》1967. 12. 10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谢富治、周总理、康生出席了座谈会〕

问同志们好！（热烈鼓掌）这两天座谈会，听得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离开了群众，就无所作为。好多创造性的东西都是从群众那儿来的，特别是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那里来的。

大概是去年冬天跟今年春天，我们在这儿和工人同志座谈过，总的我觉得，工人同志的精神面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形势，听大家讲的是一片大好，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突出地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一般地办了三期，有一个厂（铁路大厂）办了十一期。办了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这样整个形势很快就好转了。有许多工厂增了产，很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有一些单位由于武斗，生产受到影响，有些下降，目前也逐渐恢复了；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不好，那是很少数的。象刚才这位女同志讲的第一机床厂，他们那里经过一个反复，这是比较少的。另外，京西煤矿，大概只有门头

沟一个矿是比较差的。（康老：那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思想问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那个地方比较差，可能有许多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康老讲的，是个政治问题。因为那种老厂、老矿，有国民党、会道门，等等。不过，这是在一片大好形势里头，极个别的。还有的个别地方形势不好，主要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在那里作怪。第一机床厂和另外一个厂的同志，都讲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采用种种的方式来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其中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当前来说，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主要表现，要向它作斗争。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要勇于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象煤矿工人，在旧社会是很惨的，旧社会的煤矿惨无人道。现在煤矿工人最低的工资每天两元多，生了病，受了伤，还由国家负担着。有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不上班，不干活，还要拿工资，有一点小病就不干工作，这就是忘本了。还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掌了权后，脱离了群众。所以要斗私、批修，要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还有人不仅不干活，不上班。而且还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更是绝对不容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决地积极地和这种人作斗争。

刚才我听到有人说，三十岁以上的党员就比较保守了。我想，年龄不应该是保守的原因。我们的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所以，年龄不是保守的主要原因。保守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三十多岁还是青年人。我到现在还不服老。我不是说我人不老，而是说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还是很年轻的，我跟同志们在一块，觉得更年轻了，即政治上感到年轻了。

在这大好形势里头，我听来听去，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机床厂，发生反复是因为没有经过军管，他们现在要求军管，我们准备同意。军队“三支”“两军”，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由宣传队、军管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最近又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因此，使得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同志们在会上发言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学生、中学生都应该好好地向工人同志学习。（谢富治同志：讲得对！讲得对！周总理：对！）（群众热烈鼓掌，学生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很对！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必须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历次革命运动，初期

总是学生先起来。但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从来不是学生，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要带头，而且要左右革命的形势。我们建议，红卫兵小将不要干涉工厂的事好不好？

此外，在同志们发言里，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是值得学习的。就是同志们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水平高的。因为，如果不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清楚，那么，目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不清楚了。怎样整党建党，怎样解决党群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同志们都可以回去再讨论，讨论了可以给我们提供材料，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有个单位已拿出个大概的意见来了。）北京市运输公司修配厂的同志讲的关于整党的那份材料，讲得很好。

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铁路大厂的同志讲的那个“三开”，就是日本时代吃得开，国民党时代吃得开，共产党时代吃得开，可他还是共产党员，怪不怪？这事情是很怪的！党外的，有什么国民党，什么会道门，如一贯道。这里头的人，对一般的当然可以教育，但对它的骨干分子，特别是有现行活动的，我觉得应该坚决处理！对那些不老实的地、富、反、坏、右，也应该坚决处理！当然由群众监督改造，由群众来处理，不是专门靠政府这个专政机关。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一整党，一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搞斗、批、改，就会涉及到人的问题。

关于斗、批、改，要从工厂的基层单位搞起。人浮于事，脱产的行政管理人員太多，参加生产的人少，这个情况不允许再存在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改掉它。基层的工厂、企业一改好，一两千人的中央大部也就存在不下去了，不精简也得精简，不改也得改。同志们在改的方面也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希望同志们继续试验、创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我就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错了的，同志们批评。（热烈鼓掌）

（根据记录整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会上的讲话

修改党章需要大家好好读书，读《联共党史》特别是头几段（第二章）、列宁《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左派幼稚病》、《关于党的纪律问题》。纪律是有条件的，“驯服工具论”是不对的，党章一定要体现民主集中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党是好好的，但是并不排斥党内有坏人，当时有陈独秀。党内生活比较活跃，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遵义会议前搞得一塌糊涂。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经过整顿，党内比较活跃。进城以后，又有些变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刘少奇一套越来越糟了，有些方面把权也夺去了，搞了个后十条，一九六三年就更严重了。

总纲最难写，一定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新贡献也要写上，最好要用毛主席语录写，不在于新的说法，要每天学毛选。

“九大”开的时候，一定是很活跃的，……姚文元同志给毛主席的信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上海有的（党员）党籍要重（新）建立。这样的事曾在苏联多次发生，提出“清党”的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发展新党员有可能坏人钻进来，要防止。

对“八大”党章怎么估价，有人讲是刘少奇的党章，不能这样说，至少民主集中制讲到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同志。被接见的高校有清华、北大、地质、师大、北航、农大、林院等。首先汇报了三个多小时，然后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

祝同志们好，我……学了不少东西。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脱离群众就无所作为。许多新的创造新的经验，是从群众中来的，特别是从你们革命造反派中来的，总之你们的精神面貌与半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形势，我听了一片大好，表现在各方面都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各单位都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厂办了几期。你们的发言是很有水平的，说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

头脑，所以形势大好。许多单位生产都是增加的，有的厂由于斗争生产影响了，现在也恢复了。有的单位在前阶段生产受了一些影响，现在开始恢复。当然有的单位不好，象刚才第一机床厂汇报的是少的，因为有反复。煤矿方面就是门头沟较差，不好的原因很多，恐怕就是个政治问题。如康老讲的，老厂里复杂，有特务等等。这是一片大好形势下个别的，这个别不好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作怪，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资产阶级用各种思潮来腐蚀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大家知道，建党，刚才听到说，三十岁以上的党员保的多，年龄不是保的原因，主席七十多岁了，还是革命造反派的伟大领袖，保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个人是不服老的，不是年纪不老，是我的精神状态不老，特别是与你们在一起，我这个人更显得年青了。

军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军管，我们是同意的，“三支两军”起了很大作用，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很讲道理，大学生应该向工人学习，为什么大家不呼口号？（众呼：向工人同志学习）

此外，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不突出不搞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是不行的，这一点回去好好搞一下。新华印刷厂讲得很好，就是建党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党内要清除特务、叛徒、变节分子，党外也要清理，对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要严肃处理，刚才提的三K党（指国民党、一贯道、三青团）有现行活动的严肃处理，地富反坏右不老实的也要严肃处理，当然由群众处理，不是由政府。

康生同志：

我同意江青同志讲话，工人起来了。毛主席说在去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只有学生群众运动，现在工人运动起来了。到今年一月份，有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上海的工人阶级。过去主要是文化革命方面的内容，到工人起来后，还有一部分农民起来了，这样便成了社会主义的大运动，无产阶级的大运动。

大家讲，形势大好，运动发展到今天，毛主席提出以斗私批修为纲，要恢复整顿党组织也可以开始了。形势大好，两次座谈会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论点是正确的，恢复党组织，整顿党组织。有些同志提了很多意见，汽车修配厂给了我们

很好的材料，希望同志们整理好经验，九大恢复和整顿党组织要走群众路线的。恢复整顿党组织，甚至重建党，这样一件大事也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整顿恢复党组织，在发展中恢复党组织不是简单的恢复。从同志们座谈可看出同志们所关心的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毛主席和广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心连心的，这是第一。

第二，恢复什么党，建什么党，这要讨论，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健康的，可能有少数会翘尾巴，要作好思想工作，要办学习班，抓活思想，抓斗私批修，要结合起来搞。

三、恢复党组织也好，整顿党组织也好，什么人可以恢复，什么人不可以恢复，或者暂时不可以恢复。如主席指示所说的，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决不可恢复，如果怀疑历史有问题的，要缓一下，了解清楚了再说。

四、什么人可以入党，恢复与发展必须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是造反派头头不吸收入党常常会发生矛盾，什么人可以接收，什么人不可以接受，要讨论，什么人要清除也要讨论。清除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有不起作用的，暮气沉沉的还不如群众的怎么能当党员，应该劝他们退党，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不是这样做，党怎么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呢？

五、领导关系问题，党组到底和革委会关系是什么，有人说要突出领导，大多数人说要过渡，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领导班子不好搞，发生问题，影响文化大革命三结合等等，这也要讨论。

六、恢复了干什么？有人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恢复了也要搞斗私批修，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斗批改，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逐渐过党的生活，要讨论，总之，不能变成刘少奇黑修养的，听话的，要成为真正有革命朝气的队伍。

七、关于共青团问题：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有人认为工人农民中红卫兵少，或者根本没有，主张恢复团。这是个问题，红卫兵有的说可以存在，有的说可以不存在了，所有这些问题，请你们讨论，本着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讨论一下，搞个报告。

陈伯达同志：

听说北京有一百万工人，产业工人只有七十万，大学生十三万，大中学生一共四十多万人，比工人少得多，工人阶级应起作用大，这不是一个数值问题，在大革命中工人阶级一个人可起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作用，可是过去一些大学生到工人中搞两大派，把两大派强加给工人身上，工人应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主要作用，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左右北京文化大革命形势。

江青同志：斗批改也要左右，应从工人基层生产单位搞起，机关脱产人员多，生产人员少，不允许再存在了。改要左右。

陈伯达同志：行政机关要精兵简政。

江青同志：部、口也要改。

陈伯达同志：从现在就可改了，有些人现在不工作，不劳动的可以不给他们饭吃，告诉他们不劳者不得食。他们逛大街，工人阶级应当起监督作用，要这样：
(1)要认真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能曲解、歪曲。(2)执行主席指示，不管是那个工厂，都要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落实，有派的要两派一起商量，学习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有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好好学习，认真讨论，见之于行动。(3)向抓革命促生产先进单位学习，向他们学习长处，不管大厂小厂。

周总理：同志们开了两天座谈会，听了好多好的经验，我们有些不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与工人接触大大少于大中学生，但是第一张大字报出来时，学生起来快，需要学生点火一下。后来工人起来了，与工人接触少，你们搞的好，这主要是你们的，主要学校还未成立革委会。在初期冲一下搞得不好，但到打硬仗，搞大批判了，因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行了，大中小学的来了，要好好向工人学习。

谢副总理：打架的还没有来呢，下次把他们请来。

周总理：我讲大联合问题，要斗私批修，制止武斗，封存武器，这样就要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造反派。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联合，但都需要从学习开始，首先要斗私批修。革命所以搞得不好，是因为他们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学习班，制止武斗，封存武器，并见之于行动，有了这个基础，大联合、三结合、本单位斗批改也就好办了。北京现在工厂走在前面了，正如康老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工人应起带头作用，不仅一月革命，现在的运动也要带头。各

省这样讲的就有起色，在学生方面，我们花了好多精力，就是慢，不是说学生没进步，红卫兵我支持你们，应好好向工人学习，只有靠本单位群众，才能搞好。

谢副总理：首先好好传达，组织学习，学好毛主席著作。

陈伯达：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在工人同志汇报过程中，中央首长作了十分重要的插话：

二七车辆厂徐锴：什么叫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康老：就是看他向群众检查不检查，交待不交待。群众谅解不谅解，通过不通过。

（当汇报到有些党员平时运动不来，恢复党组织进就来了）

江青：革命的时候不革命，恢复党组织时来了，这样的党员要他干什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谈中央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两个文件

今天找你们做几件事情。

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有两个文件：一是十月二十一日中央把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发到连队支部及地方相应组织；一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和中央文革继续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这是把前些时候征求的意见综合了一下，并要求大家再提意见。你们看过了吧？讨论过了吧？党校反映了几次？

还有两个文件是十二月二号《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十二月十六日《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大家都看到了没有？座谈了没有？

这三件事都是为了准备召开“九大”所进行的工作。“九大”怎么开，什么时候开，开什么样的会，党的组织怎么整顿，什么时候恢复，什么人能参加组织生活，什么人不能参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章怎么修改，党纲怎么办，是作为总纲——象过去那种形式，还是象苏联在一九〇三年和一九一九年列宁搞的

那样单独的形式。我想这些问题要发动党校和组织部的同志们深入讨论。因为过去党校和组织部是接触这方面问题的。

上海讨论党纲、党章草案，送来十八种，是从一百几十种草案里选出来的，我还没有看。

上海送来的文件中说：上海市总的有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又分成各个方面的。连延安中学也搞了一个，有的街道居民也讨论党章，批判刘少奇的建党路线，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有些政治空气混乱的单位，一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正气就抬头了。党群关系不好的地方，通过学习关系改善了。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成为上海政治生活的中心。修改党章成为群众运动。收获很大。从修改党章看出，广大群众通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刘少奇那套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在起草党纲和党章条文时充满了对毛主席的热爱，充满了对林彪同志的尊敬。但是起草一个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党章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水平低，选了十几种草案都很粗糙。上海的工人、农民、战士、红卫兵、广大党员干部经过多次地讨论。广大居民、工人、学生能够参加讨论和修改党章很高兴，觉得很光荣，热情很高都抢着干。

从各地来看也是这样。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工代会代表座谈建党问题，也召集了大专院校包括中小学的代表座谈了一次。大家共同认为，主席把召开“九大”、修改党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样重要的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走群众路线，发扬极大的民主，群众感到非常光荣，非常高兴。由此看到毛主席有事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而且这个方法一直运用到召开党的大会，修改党纲、党章、建设党中来。这的确是很重大的问题。这个经验我们要学习，北京做得不够。

党校和组织部更有这种条件，应把这三件事（也是一件事：整党）同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本单位的斗批改很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志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还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进一步做好这件工作，使这项工作确实变成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中心。党校和组织部完全有这个条件，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回去计划一下，从思想上、组织上好好安排一下。比如组织部要统一搞一个、八个处分别搞一个修改党章的草案，一共九个。党校分教研室布置一下。叫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怕犯错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

还有一个文件，关于整顿团和红卫兵，也要发下去。团还是要的，团怎么整顿？党校团员转党的有没有？团员要求入党的有没有？党校哪些党员够条件？哪些不那么够？十二月二日的文件中有些条文好掌握，有些不好掌握，其中有一条主席很重视，就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党校有没有？有人提出不要轻易劝退，要多做思想工作。耐心教育是需要，当然还要看他，他活起来才行。

另外，党校和组织部可以发动群众写对刘、邓招降纳叛的批判文章。这方面更应该做。把刘邓彭安包庇叛徒的资料搞出来供给批判。组织部编了几本？（郭玉峰回答：编了三本，两本正在研究修改。）这方面党校做了工作，有成绩。刘少奇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曹轶欧同志说：恐怕基本上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刘少奇这个人忽然这么一转，忽然那么一转，有时形“左”实右。材料要做整理工作。党校、组织部还要搞点正面材料。毛主席论党的建设要搞。（组织部、党校同志回答：都在搞。）八仙过海嘛，你们自己搞吧。当然有的不免有重复。毛主席论教育的语录发下去了吧？

围绕这个问题一方面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一方面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反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建党路线。通过写文章，修改党章和准备“九大”来搞这件事。从党校和组织部来说，这件工作一方面同大批判联系着，一方面同斗批改联系着，所以要抓紧这件事。“斗私、批修”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要结合搞。事情很多，你们自己去计划。

另外一件事，党校做一下，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摘录一本材料。这对于当前讨论主席那个指示，即十二月十七日的批示有好处。不要搞得太繁琐，太繁琐了人家看不懂，搞得扼要一点。黑格尔的论绝对与相对也搜集一点。把相对主义的康德、马赫的主要论点也摘一点。这样使大家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接受快，太多就不行了。

费尔巴哈的两本书翻成中文没有？（指“未来的哲学原理”与“基督教的本质”。）

这里顺便问一下，主席的批示都收到了吧？主席的批示对我们教育很大，鞭策我们进一步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极大的推动力。有的同志对主席

的《矛盾论》看过，甚至看过好几遍，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看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看过，还有的看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特别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关于相对与绝对的问题讲得很深刻。我们更熟悉的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发展了的《矛盾论》。《矛盾论》中反复讲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例如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相对性；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学是学了，讲是讲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活学活用，紧跟毛泽东思想还是个问题，我们的报纸刊物没有紧紧地跟上主席思想。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句话是今年五月空军部队的吕祥壁同志牺牲了，从他的笔记上摘的语言，应当说这是代表广大群众对我们伟大领袖的真诚热爱，同时也是朴素的语言。报纸、刊物用了这种语言。对这个问题主席是讲过几次的，说过这个说法不科学。但是有的同志把领袖谦虚这件事同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另外一件事混在一起。因为主席说它不妥当，不是简单的从谦虚讲的，而是从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高度讲的。我们的报纸、刊物登了以后，主席提出来不妥，有的同志却把主席的谦虚和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混在一道，不能用毛主席著作检验为什么不科学。当然这是表达了群众朴素的情感。所以主席利用湖南的报告做了这一批语。这个问题不仅是湖南的问题，是讲马列主义哲学、也是提高了我们马列主义的水平。

主席讲有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读了许多书，但是越读越蠢。

从批语看出，主席对马列主义哲学是多么精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用极通俗的扼要的语言高度概括出来。

这一点拿我们自己检查来讲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完全不懂也不能那么说。因为读过《矛盾论》及马克思主义其它书。但是，用这么样的语言概括简直是望尘莫及的。毛主席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这样扼要的概括，使我想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有短短几百字，想起了六五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主席在杭州接见伯达同志和我的时候说：哲学家要滚一身泥巴，反对课堂哲学，反对书呆子哲学。他的范本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条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讲到以我为核心时已经讲过了。“大树特树”这种说法细细想想也不科学。因为权威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

从主席批示的第一条看，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但是不是因此怀疑和否定主席思想的权威？不能这样。主席思想不仅在中国人民而且在世界人民中有很高的权威性。过去孤立地讲绝对权威那不合辩证法，但不是否定主席思想的权威，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不但被中国党和群众，而且已经被全世界革命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承认，被实践所证明。

“大树特树”这种说法一方面是不科学，因为权威不能用人工去建立，还有个不妥当是好象毛主席的权威没有树起来，要我们人工去树立似的。实际上早在实践中建立起来了，何必我们去大树特树呢？当然群众说大树特树不是这个意思了。

主席的批示对我们启发、鞭策、教育很大。我两天没睡觉，重新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重新读了，列宁的看了一篇，不很多。《矛盾论》和《实践论》也读了，我还想继续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是四十年前学的，在上海大学念书时是我们的讲义（上海大学在国共合作时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这本书以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读。这次又重新读了一下。这本书的题目“起源”是管三个东西。准确地翻是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他讲的绝对权威是奴隶制的家长可以对妻子、子女任意处置，随便杀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权威垮下来了。康德也有类似的词句叫绝对命令。

重新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给我们很大推动，军队行动很快，他们立即传达了文件，指定了学习材料。《矛盾论》要整篇地看一下。《矛盾论》关于绝对与相对的问题讲得很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都是讲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矛盾论》讲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又包含普遍性。主席批示中的话实际上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都

有了。根据主席的批示，象林副主席讲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可以提高我们对主席思想的认识。关于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恐怕一下读有困难，要特别把第二章第五节学一下，参考一下。

问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单独的绝对真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黑格尔哲学永远结束了那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一切看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康德的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真理，世界是不可知的。列宁说“对于波格丹诺夫，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完全排斥了承认绝对真理。对于恩格斯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辩证论者。”所以没有单独的绝对真理，它都是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另一方面又有绝对真理，马赫的相对主义就不承认这一点。

在绝对相对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这两方面做斗争，一方面是承认绝对真理，否认它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另一方面是承认相对真理，否认绝对真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把这两方面都讲了，回去把第二章第五节看一下。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看一下，都看更好了。恩格斯对的方面接受，纠正他错误的方面。主席还叫我们看一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看后头，第九章、第二章也可以看看。

总而言之，不要教条式的去学。要活学活用，要带着问题学，要带着主席这个批示去学习。主席批示第三条：“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主席的批示第三条，大家去读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和领导工作方法的决定。中央早就禁止祝寿，最早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见诸文字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上：“十一，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批示下面三条是答复湖南的三个具体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讲了防止骄傲，防止糖衣炮弹。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做出一点成绩要越发谦虚。我接触一些革命组织的革命小将，开始受走资派压迫，革命性很强，现在把走资派打倒了，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地位变了，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当权者。地位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注意思想就要变化。从北京有些大学的

头头可以吸取教训。朱成昭一开始在地质学院受薄一波、何长工压迫，我们支持他，后来成了三司的头头。现在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叛国分子，要投靠苏修、香港。

我最近给几个名牌大学的头头找了两条语录，我对谢富治说，开会是你们要学。一条是二百四十六页最后一行到二百四十七页：“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无论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土改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中看，常常是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完全是一贯到底的，有的是不成的。因为一方面不断产生新的骨干，另一方面有的骨干落后了、腐化了，相形见绌了，就会被产生的新骨干所代替。

第二条是二百五十二页的下边一段：“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今天运动到了一年半的时候，青年知识分子要注意主席的这个教导，使自己更加努力和引起警惕，不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

总而言之，希望认真地、严肃地去学习和领会主席的这个批示，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主席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理论的认识更加提高一步，对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好好学习。所以遇到问题不要以为书读了以后就不需要再读了，遇到问题还要带着问题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使我想起王力、关锋的狂妄。今年五月，报纸上重新登载了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因为我们感到需要，征得主席同意，重新发表的。发表后，我根据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新的情况和我自己想的问题，又重新读了一遍，有点新的体会。我觉得

讲话不仅是文艺问题，而且是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哲学问题，例如这篇文章中讲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等五个问题，不仅文艺工作者有立场问题，态度问题，而且任何革命者都存在这个问题，对当前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加强团结很重要。特别是态度问题，对敌友我有三种态度。对敌人要坚决打倒，对朋友是有联合，有批评，有斗争。对的赞成，好的表扬，错的批评，反动的要坚决反对。对自己人，对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政党，应该赞扬，有缺点要善意地帮助。北京学生运动恰恰有时放松了敌人，而把矛头对准自己人。工作对象也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包括了哲学问题。主席讲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讲到政治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动机与效果、普及与提高、专家与群众、群众与个人、破与立、思想与组织的关系，最后讲到唯心与唯物的问题，从哲学角度讲涉及这十个大问题，我读了一下，不敢说理解的很好。应该肯定这个方法，就是读了还要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我是参加了的，亲耳听到主席的讲话，并不能因为这点就骄傲起来，又重新读了一下，想到这么多问题。

有一次我遇到关锋、王力，对他们说了大致我刚才说的内容。现在我才知道竟引起这些家伙的极大反感，他们说康生向我们大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知什么心血来潮，好象他从来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仅读过，而且是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和丁玲、肖军、草明等人进行了斗争。王力、关锋这些人这么狂妄，怎么不犯错误？

你们一定要谦虚谨慎，一定要警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当然谦虚不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曹轶欧同志插话：骄傲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就要犯错误。）这一点党校的青年同志要时刻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很不好是要两面手法。正象主席经常说的，一些人嘴上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下面却踢人家一脚。对这种态度要有阶级观点，马列主义观点。刘少奇这一帮叛徒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两面手法，两面态度，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是特务手段，是叛徒掩盖其面目的手段。这批老的叛徒、特务已经被揭露。但是阶级斗争的深入会不会产生新的两面派人物，完全可能。

……对我念的这二百四十六页和二百五十二页两条语录党校的同志体会更深，因为有李广文这个活标本。

（曹轶欧同志插话：党校同志把这两条语录贴起来，每天念。党校特别是十七级以上教研室的干部要经常敲警钟。）

也要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譬如党章党纲也可以让他们起草。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九月十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授权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这是对上海工人阶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经过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

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

现将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的规划和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审查批示。

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1. 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革命委员会具有革命权威。

2. 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得好，查清敌情，阶级阵线分明。

3. 整党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一整套反动谬论搞得比较深；清出了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少数长期死气沉沉的和犯有严重错误尚未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党员暂缓恢复；对广大党员进行了教育，站错过队的党员多数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4. 革委会中党的领导核心，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革命斗争中经过更新的，新老结合的，经过革命群众反复酝酿推选的。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初步选定国棉十七厂，上海阀门一厂（原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三个单位在十月份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其中国棉十七厂和原良工阀门厂，都是老造反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一月革命”夺权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上港七区造反派队伍

坚强，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有贡献，党的核心中有老造反的党员，也有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

在总结上述三个点的经验后，年前准备再选择十几个到几十个条件成熟的工交单位开展建党工作。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进行，今后也不搞那种由上而下规定数量的“大发展”。

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发展新党员，必须坚持毛主席这一伟大建党纲领的要求。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而不是那些中间派，“老好人”或言行不一的人。

广大革命群众一致强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然也不能脱离实际。

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必须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方针。

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

接收新党员，必须本人申请，并有正式党员两人介绍。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地广泛地听取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

全市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两年多严峻的考验，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不要预备期，以便即能行使正式党员的权力。今后发展党员还是应当有预备期。

四，关于新党员的审批。

由市革命委员会授权有关单位革委会中党的核心小组或常委中的党员，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权，审批批准新党员入党。市以下各级革委会领导成员入党，则须经上一级审批。

首批新党员入党，要举行较隆重的会议，吸收革命群众参加。其他有关单位也可派代表参加。

入党宣誓的誓词，均由本人自己写。

第一批新党员入党后，拟报请中央批准予以报导。

五，凡属下列情况的单位，不得发展新党员：

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没有搞好的；虽然搞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但支部的领导仍是旧班子原班人马的；阶级队伍没有清理好的；革命大批判和教育受蒙蔽的党员的工作做得差的；党群关系特别紧张的。这些单位，要做好其他工作，特别是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为建党准备条件。

六，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党员继续加强教育。现在，有的党员有保守思想；有的党员总觉得“你们非党造反派反正得归党员管”；有的怕被介绍的人以后出了问题找他“算帐”，不敢做入党介绍人；在发展新党员时，有的党员可能会揪住造反派同志的某些缺点不放；有的也可能怕这怕那，为了“讨好”造反派，不敢坚持原则。这些都需要针对活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利于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胜利地走过十九年了。

在庆祝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国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表示最热烈的问候！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革命文艺，欣欣向荣。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一小撮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已经彻底破产。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十九年来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锻炼得空前巩固、空前强大了。

所有这一切胜利，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亿万革命群众英勇奋斗的结果。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虽然时间还比较短，但是，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久经英勇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他的巩固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在一起，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在一起，必将创造出更加光辉的功绩！

我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不断地立新功。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一派大好。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美帝日子不好过，苏修日子不好过，各国反动派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反革命统治不会长久了。等待着他们的是：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全面崩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全世界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打倒各国反动派！

粉碎美帝、苏修勾结瓜分世界的阴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68年10月2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在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和组织整顿的彻底性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一次整党。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是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行动起来，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的两条路线的一场决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党的领导，并正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成为全党唯一的领导中心。现在，我们的党，是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正确路线。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出发，抹杀阶级斗争，镇压劳动群众，改变党的性质，使列宁缔造的党变质成为所谓“全民党”即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中国赫鲁晓夫黑《修养》的核心，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科学社会主义。他所鼓吹的一套什么“自我修养”，其目的是保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扼杀共产党员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准备“驯服工具”。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打掉了腐蚀革命意志的官气，密切了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这样，就发现了和锻炼了左派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教育了动摇的中间派，孤立了和揭露了右派即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执行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群众性的而不是关门的整党运动，才能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手里，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性，领导广大群众前进，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赋予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历史任务。

当前整党工作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这个生动的比喻，包含着极深刻的辩证法。毛主席教育我们：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在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着的组织，不要看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组织。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吸收新鲜血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广大革命群众中，首先在工农兵劳动群众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造反派战士。他们有这样特点：两条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站在斗争第一线，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挺身而出，特别反对修正主义很坚决。这是很可宝贵的革命品质。他们也有缺点，这是可以教育和克服的。

上海阀门一厂一位要求入党的工人同志说：“党组织应当吸收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战士入党。要求入党的造反派的同志，要有正确的入党动机和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为了达到任何个人目的）；夺权之后，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不是为“私”掌权）；要始终如一地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积极宣传、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斗私，批修，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不能以“老造反”居功自傲，不能革命革到一半就中途而废）；要紧密切联系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它反映了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对自己先锋队的要求。应当积极地吸收符合这样要求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朝气的新鲜血液入党。要求入党的同志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已经入党的同志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经得起今后任何大风大浪的考验。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工人队伍中党的建设，重视发扬革命朝气，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主席就提出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一九五〇年六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一九五七年七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又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畏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完全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相对抗。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注意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而是包庇无产阶级的叛徒、工贼、特务、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帮助这些人混入党内攫取领导职位。他们不是提高工人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是向他们灌输最腐朽最黑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就是受了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毒害。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

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论，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并且在包括工厂、商店、人民公社、机关、学校、街道等各个方面的群众中认真清理好阶级队伍，把混在群众中的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使吸收新党员有一个可靠思想和组织基础。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有一些犯过错误而又认真改正了错误、积极工作的同志，他们与那些坚持错误或躺倒不干的人不同。他们去掉了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灵魂中增加了来自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应当支持和团结这样的干部共同工作。应当把他们犯过的错误成为人们共同记取的教训。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有的地方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存在保守思想。有这样的情况：成份、思想都不错的好同志，等了五、六年，打了多次报告，仍然不得入党。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中，有四千名左右的委员，其中大约半数左右是革命群众的代表，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工农兵的代表。这四千左右的同志，是经过了革命风暴的考验和锤炼，再经历了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干部要经过革命群众的讨论、审查和领导的批准，而且经常进行着局部的撤换和调整。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开十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隆重的群众大会，万众欢腾，家喻户晓。请问各地历届的党、政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哪一届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呢？有哪一届这样广泛地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了解，又这样广泛地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呢？决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而不是采取什么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恩格斯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所窃取的一切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就是宣告了他们失去了党、政、财、文的一切

职位，这是不言而喻的早已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把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内奸、工贼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他早已被革命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权力和职位了。

革命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是一种随着革命不断发展经常发生的过程。一个干部是否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要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考验。现在参加工作的广大的干部也是这样。新干部参加工作，千万注意不要脱离劳动群众。但我们不要因为怕干部犯错误而不敢大胆使用。劳动群众把他们提上领导岗位，同样地会不断地教育和帮助他们，以至在必要时撤换他们。

清除反革命分子和剥削阶级分子出党，吸收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把忠实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挑选到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中去工作，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干部定期下放参加劳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并且形成经常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全面地执行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就能有力地粉碎修正主义任何形式的反扑和挣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更加生龙活虎地领导无产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逐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

（《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
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二、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1968.10.18； 中发 [68] 155 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赉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

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〇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

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968. 10. 18

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

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

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

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1)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申报》关于军阀邢士廉查封上海总工会，传讯刘少奇的报导

● 总工会被封后所闻

淞沪戒严司令部金副官长、前晚奉邢司令命令、查封总工会、当同杨副官带排长一名兵士十名至四区、经宁署长派杨巡官率长警一排、至和兴里二十七号总工会内、将一千人驱出门外、屋内器物案卷逐一检点登册毕、于门上加司令部之封条、并于该里口贴有查封之布告、昨日下午、又将封存物件、一并用汽车运往司令部、留存候核。

闻此次总工会突遭解散、其原因颇多、自日纱厂工潮解决时、工会方面种种要挟、致官厅办理异常吃力、迨工部局电气处复工问题磋商、英国当道遂主无条件复工、而总工会又提出五条、嗣经邢司令许交涉员张道尹等议决、凡电气处工人、均可自行到交署报导、一面由虞会长设法与之接洽、又经许多周折、是以政府与江苏郑省长等早有密电邢司令等、取严厉制止或竟解散、邢司令以如无煽惑工人以及越轨行动、稍存宽厚之心、暂不置议、詎此次九七案件、发生交涉、邢司令适又在宁、闻悉之后、颇为震怒、于是郑省长遂密电邢司令、立予解散封闭、并查拿首要、如有抗拒、即当场捕拿云云、闻邢司令于封闭该工会后、除通飭所属军警密为戒备防范外、昨已赴宁、面谒郑省长、报告一切、并顺道贺寿云、又闻淞沪戒严总司令部、于前日查封总工会时、詎委员长李立三被其脱逃、只将职员刘贯之拘获、昨闻司令部人云、须李立三到案、刘贯之可无大罪。

又讯、近半月来、总工会屡有被封之传说、自委员长李立三晋京、即被政府密派暗探监视甚严、旋设计出京返沪、而政府方面、因接受某方警告、决意严厉取缔、至前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本埠交涉公署、淞沪警察厅邢总司令、同时接奉执政府密电、飭即会同查封、迅速具报等因、邢总司令因当晚赴宁公干、立召

副司令常之英、金副官长、及各官署代表执行查封手续、适下午洋务工会工友数百人、赴总工会索取救济费、人数麇集甚众、至傍晚飭派军警前往弹压解散后、总工会各科重要职员、均已散去、司令部仍飭派军队一排、淞沪长警一排、于八时许前往查封、将住会人等一概逐出、门首粘有司令部及五区警署封条、此查封时之情形也、昨日淞沪戒严总司令部、特传讯该会委员长李立三·总务科刘少奇·会务科刘贯之·交际科杨剑虹等、查询五卅以来经收捐款之帐目、及会内情形、但闻截止傍晚、李等尚未赴司令部候示。（公平社）

注：奉系军阀邢士廉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查封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2)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长沙《大公报》关于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的报导

○戒严司令部 逮捕刘少奇

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癆。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注：刘少奇逃到长沙后，藏在贡院西街文化书社，军阀赵恒惕令戒严司令部于十二月十六日将刘少奇逮捕。

(3) 许文煊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藏在长沙文化书社被军阀赵恒惕逮捕的证明

关于刘少奇被捕的问题

我在 1925 年春到 1926 年冬在长沙文化书社做会计工作。1925 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回湖南，住在文化书社楼上，大约一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

找刘少奇。见到刘少奇后，就把他抓走了。没有抓其他的人。当时湖南省长是赵恒惕。

许文煊 1968. 10. 15

注：许文煊原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退休。

(4) 反革命分子黎泽泰关于军阀赵恒惕要将刘少奇“斩决”的交待

1925 年赵恒惕抓了刘少奇并要将刘“斩决”

1925 年我在伪湖南省长署秘书处当文牍，正是反动军阀反共大刽子手赵恒惕当伪湖南省长的时候。赵恒惕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后颁发了“十斩”“四杀”的布告，就包括有共产党人在内，即所谓“过激派”分子。刘少奇就是在赵恒惕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个紧急时刻被捕入狱的。当时据伪湖南省长署会计杨剑雄对我说：“亲眼看到赵恒惕在审问刘少奇案卷上批有“斩决”字样。特为揭发，证明这一确凿事实。

黎泽泰 1967. 8. 23.

注：一九二五年军阀赵恒惕在广东省罢工，广东革命政府酝酿北伐，湖南出现倒赵运动的情况下，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发布了“四斩”的反革命布告。黎泽泰的笔供证实，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要将其“斩决”。

黎泽泰一九二五年是军阀赵恒惕省长署文牍，后任国民党上校军法处长、县长等反动职务，原任我某省参事室参事。

(5) 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军阀赵恒惕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的报导

影印件原文：戒严司令布告云。昨查新河等处并无外人杀伤中国工人之事。如有造谣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云。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

(6)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同志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报导

○安源教员黄静原被枪毙矣

▲临刑时大呼口号——

▲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人——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曾见前报。当时工部所属学校教员及工人先后被捕者三十余人。工部职员兼教员黄静原亦在内。黄被刑讯多次。于昨十六正午被镇署押往安源枪毙。临刑时黄面不改色。问“何罪”。监刑军官答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乃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黄静原死不要紧”等语。闻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个。黄曾充稻田第一女师教员。被押后现任稻田女师徐校长曾去电营救。教育司亦去电请予开释。不料竟尔枪毙。究不知内幕如何。

(7) 地主分子成秉真一九五九年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节录）

主席遇险，在伪政府民十四年主席居长市清水街被伪省长赵恒惕逮捕危殆万状据云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后他来会我。（我居长县湘民盟总部）且出示叶开鑫手书一纸其云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等语并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以是知叶开鑫亦早知共产党有出头日子。

注：成秉真是刘少奇的表兄，他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中所称“主席”系指刘少奇。“简介”对刘大肆吹捧，但也透露了刘少奇被“逮捕危殆万状”，“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并馈赠洋银百元之多为盘资”。成秉真为美化刘少奇，改为“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敌人对刘少奇叛变革命，颇为赞赏。军阀叶开鑫特意为其题词说：“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

地主分子成秉真已死。

(8) 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亲笔供词。此人以后被刘少奇擅令枪毙，此事足以证明刘少奇做贼心虚，杀人灭口

杨剑雄反省

我于民十三年在军阀赵恒惕所组织的伪省长署会计股当会计员。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赵恒惕和他的各伪处长合室办公的时候。听到伪军法处赵处长报告。“昨晚省长令我拿的共产党刘少奇我比派卫队营的兵于文化书店捕获来了请示如何处理”赵恒惕答“你提问一下速送陆军监狱署收押”并对陆军监狱署李伪署长写了一个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见。我听了之后。就想到这个人不是我从前同学后在育才中学毕业去过俄国的刘卫煌吗？一俟下办公。赵恒惕先走出时。我即在伪赵处长手中借案卷一看。注明系宁乡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办公之后。我就去军法处去偷看提问。我在隔天井阶边看见一个着灰布长袍。手向后靠。拿了一顶博士帽。背对着我正在答问。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军法处将他送至陆军监狱署。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料理一切后。即喂车赶至陆军监狱署。去看慰他。但伪李署长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见之令。不让我会他。这位李署长原与我有旧官场中的酒席应酬。并李也晓得我系赵恒惕的相信人员。我和李说了许多请求通融的话。并最后提出如赵恒惕责备你（李）归我负责。李终于允许了我去会他。在进入几层关锁的深狱中。隔栅与他相见。我的样当然比在读书时不同。并挂有伪省长署的特别证章。他似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报了名字给他。他脑子里静了一下。就连声答记得了。我问他“你为甚么来到这里。”他答“我也不晓得为甚么。”他讲时注意我的证章似有顾虑的样子。我就很忠实很庄严的对他说。“我现在某处做事。晓得你的事极严重。你有甚么事。甚么话。还不对我讲还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没再有人能进这里来会你了。”他听了我这番话。澄思了一下。就对我说。“我的内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门外某号。请你去问她就知道。在这里我不便讲”（旁有看守的）我又问他“你要钱用不。还要其他东西不”他答“我不要钱我只要一床被请你要我的内人送一床被来”我就安慰了他一番连忙跑到青山

祠去会何夫人。何当时不在家。我留了一个名片写明住址要何速来我家。我回到家（住鸡公坡）没久。何即来我家。悲泣撞伤不已。我安慰了她许久。她才咽哑平静下来。我问她卫煌为甚么被捕。我今天已在陆军监狱署会见了。要我来会你。就知道的。”何答“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儿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杨先生你也是晓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这里被捕去了。”我将我和他的关系、及知道案情的严重。并愿竭力营救他的心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口。说。我已着人回乡去叫他的老兄来省。他的老兄来了看如何进行。我又告诉她。他在狱里要一床被。她即将被送去。而伪陆军监狱署人员不予收转。我又写信给李署长连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转。过两天他的老兄刘六公到省。商量营救方式。那时有芳储乡住的洪庚扬在某处做事。与他同里同学。闻讯参加营救。于是我和洪分途进行。请宁乡当日所谓首要人物叶开鑫贺耀祖谭润生次要人成苍林杨晋圭等共同具禀担保。保禀由刘六公写作好。再由刘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请叶贺等到天乐居。将保禀一一加盖私章。他们并将保禀交付给我。要我当面送交赵恒惕。我踊跃承担这任务。并与叶贺相约如赵问你们时请你们切实担保。我比回到省长署。就持保禀迳至赵恒惕办公室外。连声报告要见省长。也不顾自己的人微职小。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候赵的公文批阅完毕。再来设法要达成我的人物。赵问我你与他有甚么关系。我答“系同乡同学。”叶竞秋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马弁摇电话与叶。我不俟马弁入。我即走去将电话摇好。要叶师长说话。叶晓得是我喊他。当然明白这回事。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四字。我即将这案件送至伪军法处办理手续。空了两天。他就出险了。出险后。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谢了我。何夫人并说我们这一生不会忘记你。他最后提出问我。说。你愿意入党不。我那时浑然一物。闷懂过日。没曾认识到

这步。回答他我不入。过后我想这恐怕是他无以答谢我。以此来当作礼物罢。只怪我接受不了。别时，他告我他在长沙还有几天。耽过，就会去上海。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系大恶霸地主，一九二五年任湖南省长署会计。赵恒惕是杨的姨表姐夫，因而杨成为参预策划刘少奇叛变出狱的重要人物。杨犯一九五二年被我政府逮捕后所写的笔供，虽然是为表“功”保命，但也道出了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后，完全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民十三年应为民国十四年。刘六公系刘少奇胞兄刘云亭（已死）。叶开鑫（已死）、贺耀祖（已死），均系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洪赓扬（已死）一九二五年任长沙禁烟局局长，是刘少奇的把兄弟。何夫人即刘少奇前妻何保珍。

（9）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刘少奇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叛变出狱的亲笔供词

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刘作衡 1967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刘少奇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迅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刘作衡系刘少奇的胞兄，被刘少奇安插在我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现被本乡革命群众监管。

（10）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广州《工人之路》报关于刘少奇叛变出狱溜到广州的报导

刘少奇被释放抵粤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前因养病回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无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国各工会闻讯之下，纷纷电赵恒惕请即释放刘君，湘赵因慑于群众力量，遂元月十六释放刘君，刘君出狱后即来广州，经于昨日抵步，故友闻讯，争相访候，谈述湘赵之强暴，无人不为发指云。

注：刘少奇接受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以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叛变出狱，旋往广州。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重要职务，向报界吹嘘自己，蒙蔽群众。

(11) 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要王光美抄写刘的简历底稿中，承认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被捕”（此四字是刘少奇亲笔），但将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去广州”，以掩盖其叛徒面目。

(12)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宁乡县公安局给刘少奇的信

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店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等出名向赵匪恒惕具保始得容救主席出狱一事，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我县呈奉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我们为了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项荣救主席事是否确实以便处理迄赐批复是幸。

此致

尊高的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霍建国上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后，供出了一九二五年曾“救”过刘少奇的名。宁乡县公安局为此将判处杨犯死刑之事直接报告刘少奇，请示处理意见。

(13) 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原稿。
这是刘少奇杀人灭口的铁证

湖南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廿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一月廿九日

注：杨剑雄是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刘少奇接到宁乡县的报告后，做贼心虚，十分害怕，竟迫不及待地不经任何手续私自电复宁乡县公安局。刘在复电中，利用报告中写错了年份（将一九二五，写成一九二四），对杨剑雄所谓“救”他出狱一事，矢口否认，并要公安局将杨犯照原判死刑处理。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按照刘少奇授意会同县法院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犯处决，杀人灭口。

刘少奇在复电中诡称同杨犯“在小学同过学，以后三十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出狱之事“与杨剑雄毫无关系”，这完全是撒谎。事实是：刘在一九二七年包庇杨剑雄逃避了农民斗争；杨不但与刘有来往，而且与刘少奇前妻何宝珍也很熟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犯给刘少奇写信称兄道弟，十分亲热；一九五一年土改时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少奇这种杀人灭口的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14) 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逃避农民斗争的亲笔供词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注：这是“杨剑雄反省”的结尾部份。

(15) 右派分子杨少岩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对杨剑雄“帮过忙”的交代

1927 年刘少奇说杨剑雄曾帮过他的忙

1927 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 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1967 年 6 月 22 日杨少岩

注：杨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为我某省师范学院教员，现被革命群众监管。

(16) 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给刘少奇的信。此信证明，他们解放后还有来往，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

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汉皋一别忽忽廿有二年地角天涯无时不神驰

左右数十年艰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

吾兄之功伟矣全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而乡居从事教育又为所束后事生产小口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怠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为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为成治平县杨厚吾何逸先区诸兄间有接触妄谓弟为开明多所照顾差堪告慰耳倘得

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矣顷阅报载

朱总司令出席全国体育会讲话对全国体育将大有改进国术各门均须普遍训练兹有友人郭起凤彭玉麟两君河南光山县人为国内最有名之剑击家郭曾任天津市武术会会长广州市国术馆馆长击败日本进藤中佐北部大佐德国库司顾问名藻一时彭曾任长沙国术馆馆长及湖南商专工专教师寄居舍间有年深知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倘得

政府擢拔对人民服务必有极大贡献敬祈

吾兄为之推毂举国内之遴材罗致之公私两利不胜拜祷之至专此奉达敬（？）

钧安企候

赐示

弟杨剑雄谨启 十一月八日通信宁乡太平桥转

注：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

(17) 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杨剑雄一九五一年到北京找过刘少奇的交代

1951 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刘作衡 1967 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当年“保”过刘少奇，并自恃“保”刘有功，一九五一年来北京要刘少奇包庇逃避土改斗争。

(18) 宁乡县法院根据刘少奇授意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剑雄处决的判决书

影印件原文（节录）：

公元一九五三年度

宁县人民法院判决 法 刑 字 第 14 号

起诉人：宁乡县第三区人民政府

被 告：杨剑雄，男，现年 52 岁，宁乡人，住三区七福桥乡，地主成份，中学程度（注：实际就读过上海大厦大学），出身豪劣。

右被告因恶霸案件经第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主 文：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力终身

注：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接到刘少奇电报后，迅即按照刘少奇的授意，会同县法院将杨犯判为恶霸案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立即处决，以实现刘少奇用杀人灭口的方法隐蔽自己叛变革命罪行的目的。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庐山等地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高潮，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提供“工运情报”，大造反革命舆论，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刘少奇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之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同丁觉群一起，住在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到九江去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他向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并要汪、陈“速

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出卖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1) 国民党中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会议记录

注：会议记录的重要部份见下页放大的记录。

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还有，昨天十二点江琴同志来了一个电话，说三十五军有人到总工会去要房子。当时本就打电话到卫戍司令部去问，李军长回电说没有这回事。到了今天，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同志来报告，说全国总工会被李军长派了一机关枪连的人占了。同时，全省总工会刘少奇同志又来报告，说全省总工会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四五个兵去保护他们。大概是全国总工会同全省总工会弄混淆了。所以引出了李立三同志所报告的事。但保护并不要一机关枪连，几个人就够了，也不要门口守卫，在附近的地方就是。

注：汪精卫对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装，极为赞赏，说：“纯出于自动的诚意”。刘少奇乞求派兵去保护他，汪精卫同意派兵保护。这充份说明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事前是与汪精卫有密谋的。

(2)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报导

注：这些借口“避免制造谣言，挑拨工兵，影响工兵联合战线”的投降“布告”、“通电”、“函件”等等，据叛徒成柱周交代早在六月二十七日由他起草好，后经刘少奇亲自修改、签发的。

(3)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信原文和译文

注：刘少奇在六月二十七日作好了一系列自动交枪的准备之后，为了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密谋反革命活动，然后“释放”。

信中许白昊同志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财政部长，反对刘少奇向敌人交枪。后调任上海总工会常委。一九二八年二月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五月牺牲。

法租界巡捕房

第六十六号 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于汉口

法国总理先生

汉口

总理先生：

昨晚近二十时三十分，一支由汉口卫戍司令部一名军官率领的巡逻队来到友益街。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原先在那里的罢工纠察队员丢下武器，逃走了。巡逻队的指挥官在总工会办公处逮捕了该会的几个重要成员并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发 总工会主席

刘少奇 第一书记

许白昊 第二书记

项英 湖北罢工纠察队总队长

刘少华、关明轩 码头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近五夜时，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邓演达、鲍罗廷、汪精卫、谭延口、程潜以及冯玉祥元帅的一名代表。

会后，约凌晨二时，冯玉祥元帅的代表刘骥将军去友益街进行视察。

向忠发于今日白天返回总工会；在总工会，他可能为汉口保安局的士兵和武装便衣人员所监视，其生命作为本地区当前安宁和各工会执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担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员没有回总工会。

现附去张贴在总工会门口的中文布告的译文。

中国地界内各工会的主要办公处都已军事看管。

戴孟若

(4) 叛徒丁觉群关于刘少奇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丁觉群是刘少奇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反革命叛卖勾当的重要夥伴

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待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则用“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因此我对他的许多事是了解的。兹就我所知道刘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口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刘少奇在汉口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出卖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

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游行，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游行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泄露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刘又与陈详细研究了进行的办法，采取内外结合。陈公博在社会上扩大兵士与纠察队的冲突，制造谣言，并借此制造舆论，要求遣散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刘少奇则在工会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动宣传与活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在这信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

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刘少奇在庐山的反革命活动。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

丁觉群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注：叛徒丁觉群原系汉口公共汽车公司教员已退休。现在北京监护。

(5)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的报导

注：上面影印件是《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报导的放大部份。

(6)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镇压工人运动的报导

影印件内容摘要：

各工会联席会昨晚七时全国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特在血花世界开紧急会议，到代表六七百人，由主席向忠发宣布开会。……次则刘少奇报告各团体联席会议经过，继通过决议案三条，……（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国民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

全省总工会布告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机关枪打死了几十个同胞，大家一定愤激得了不得。现在政府已派兵前往维持秩序，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二）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及总工会办法。

(7) 叛徒董锄平关于刘少奇充当英、日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保镖”和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大约係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作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摘要列举于下：

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将工会组织的课，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拏经济主义来消灭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

是拏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时，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此拒绝，该英总领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临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直至一月五日，国民党才派军警入驻所谓“英租界”。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并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提出七项要求，大意为（一）“英租界”当局向我方赔礼道歉（二）“英租界”当局抚恤我方死伤人员（三）“英租界”当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这显然和英总领事同一腔调，不承认汉口“英租界”已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为蒋贼介石复将我已夺回的“英租界”再度出卖给英帝国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基础。

三、为日帝国主义者保镖。自汉口“英租界”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后，汉口“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当局，纷纷向我方作试探，是否要同样夺回，并表示要自愿交还。德国商人还正式要求其领事将“德租界”交还中国。四月三日，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打死我人力车夫，这一凶杀案，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所闻，马上奔赴“日租界”，给以包围，又形成一月三日夺回“英租界”局势，此时工贼刘少奇吓得屁滚尿流，赶赴现场，利用革命人民热爱党、相信总工会的感情，尽欺骗威吓，要我革命群众，退出“日租界”，还和“日租界”当局握手言欢，以表歉意，为他的日本主子压惊。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罪行

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令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

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

注：叛徒董锄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一九五九年一月任我武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拘留中。

(8) 叛徒成柱周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

六月廿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附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廿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廿七日就搞好了，六月廿九日交枪前后斗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

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廿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

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

六月廿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成柱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注：叛徒成柱周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是刘少奇的反革命“投降书”的起草人。现在拘留中。

(9) 反革命分子张登平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缴枪后向汪精卫作报告，1927年六月底七月初刘少奇在上午缴枪后下午三时左右刘少奇亲自到铭新街华商总会，向汪精卫作缴枪经过汇报。刘少奇去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夹着公文皮包去的。

张登平 1968. 5. 13

注：反革命分子张登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是刘少奇出卖革命的同夥和见证人。现在上海市在押。

(10)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解除工人武装后进行欺骗宣传的报导

省工会努力工兵联合

▲派队宣传工兵联合之意义

▲并解释自动解除武装之理由

湖北全省总工会以反动派藉工人纠察队武装为口实，造出种种谣言，淆乱听闻，近杜绝反动派之藉口及表现工兵亲密结合起见，遂于二十八日停止工人纠察武装，并请政府保护工人运动，自该会停止纠察武装后，外面仍多谣传，影响所及，误会必多。昨特通令各工会火速督促宣传队，出发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

并将最近工兵联合战线之事实，如帮助北伐胜利，欢迎北伐军，慰劳受伤将士等，详为报告，俾一般民众得以晓然云。（人民社）

注：刘少奇交枪后，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内奸罪行，于七月一日通令各基层工会派宣传队“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

（11）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国民党中央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交枪投降报告的报导

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

△决案共十项

中国国民党工人部，工人运动委员会，于昨二日开二次会议。

一，报告：（一）主席报告前次会议结果，（二）刘少奇同志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之意义及经过，（三）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保护工人团体之办法及经过，（四）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武汉店员存在经过及结果，（五）主席报告本部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结果，（六）丁觉群同志报告工商纠纷委员会，已移归工商俱乐部办理。

（12）刘少奇包庇叛徒丁觉群的两封亲笔信

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1926—1927年时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为委员。在工作中我常见他。国民党叛变时，我先到了牯岭，后来，丁也到牯岭。我们住在一所房子内，约一月余。我先到上海，后来，丁也到了上海。丁在湖北和上海工作时，表现是好的。后来被捕，也没有听说有反党行为。丁出狱的详细情形我不了解，但我听说过，丁觉群是写了自首书才出狱的。丁出狱后，直到现在，没有找过我，说也没有找过党。

刘少奇 1952年六月

退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我认识他，1928 年以前在汉口和上海工作时，一般表现是好的。他所说 1928 年被捕以前的情节是真实的。但是他在被捕以后是叛变投敌了，所以只坐牢四年多就释放出狱，出狱后，又在反动的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工作，从来没有找过党的关系。他似乎没有当过特务，没有积极进行反党的活动。

刘少奇 1958 年六月六日

(13) 刘少奇包庇叛徒董锄平的亲笔信

董锄平，1922 年同我在中国劳动组部的上海办事处共同工作过，表现不坏。1923 年工人罢工失败，劳动组部被封，北洋军阀政府对我们的压迫加紧，在这以后，董锄平即离开工作跑到菲律宾。

1926 年北伐胜利，武汉解放，董锄平从菲律宾回国，到武汉湖北全总工作，表现也不坏。

1927 年革命失败后，董锄平跑到上海，我看见过他，但我未听到他被捕过。他说：被捕一星期出狱，就找不到党的组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找党是很容易的。他到菲律宾去显然是害怕，没有得到党的允许，而是逃跑。

全国解放后，董锄平又回到北京，并来找过我，又提到他的党籍问题。当时我批评了他，并说不能恢复他的党籍，因为他几次表现在革命困难危险的时候就逃避。但他可以参加工作。

董锄平在革命顺利时作过一些工作，在反动统治猖獗时，也没有听到他作过坏事，但他不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危险的时候即自动脱离组织。作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不够条件的。

刘少奇 一九 年六月 日

(14) 刘少奇一九五零年包庇叛徒成柱周的亲笔信

徐冰同志：

成柱周同志以前和我一道工作过，后脱离党的关系，请你介绍他到你们办的政治研究所学习为荷。

刘少奇 六月五日

成柱周同志：

来信收到。你可拿我此信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找齐燕铭副秘书长分配你一点工作，你过去的经历及你有限的要求（家属生活）亦可老实地向齐燕铭同志提出。祝你

进步！

刘少奇 十二月十九日

（15）刘少奇包庇反革命分子张登平的亲笔信

你的来信我已转交中央组织部。

张善孚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请直接向党的中央组织部接洽，将你如何脱离党以及脱党以后的经过情形，全部无隐瞒地向组织部写一报告，中央组织部在问明你的情况后，将对你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明白的答复。

敬礼！

刘少奇 十一月十二日

注：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写给张善孚（即张登平）的亲笔信。

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贩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到奉天（今沈阳）任满洲（即东北三省）省委书记。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

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

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1)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译 文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奉天专电八月二十四日电) 支那(中国)时局困难以来，似有许多共产党员趁中央、奉天间的诸问题正在谈判而陷于忙乱之机，潜入奉天纺纱厂，故当局预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左右，该厂职工王绳一等几人下工后，来该厂里院与南方职工打扮的支那人(注：系指刘少奇)秘密接头，正在递交共产党传单及其他材料费用等时，被警戒者发现，当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审讯。

王系三年前招收的该厂职工，至今逢机便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是一直受当局监视的人物。

(2)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影印件原文

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注：赵即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孟即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叛徒崔某即崔凤翥，全总代表是张崑第。丁是丁君羊。

（3）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摘要：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注：少即刘少奇，孟即孟用潜，“某工人”系叛徒常宝玉。

注：满洲省委这两个报告的内容，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戳穿了刘少奇在他的简历底稿中所称“在罢工中”被捕，“敌人找不出证据”等彻头彻尾的谎言。

（4）叛徒孟用潜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投敌罪行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

出卖了我，还出卖了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

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沟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划押。

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阶级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搜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

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做为共产党案审讯，而做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

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

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搜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

一九三零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孟用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叛徒孟用潜即孟坚，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时，同刘少奇在奉天纱厂一起被捕投敌，充当内奸。原任我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押北京监狱。

(5) 叛徒丁基实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关于张麻子所谈的刘、孟罪行材料

在刘、孟出狱后约三四天，我在街上走，张麻子赶来喊我，要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以后，他就问我：“老刘老孟出来啦？”我说：“出来啦。”他说他听到一些消息，“听说都承认了共产党，并且出来以前，还写了悔过书。”“听说刘还把孟坚供出来啦，刘另外还供出一座房子，不要随便谈。”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他说从警察方面得到的。

丁基实 1967.9.10

注：叛徒丁基实即丁君羊，一九二九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为满洲临时省委负责人。

张麻子（即邵麻子，邵扶民，已死），当时是我党特科工作人员。丁基实原劳改就业人员，现押北京监狱。

（6）反革命分子关辅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现将奉天纺纱厂一九二九年间逮捕共产党情况交代如下：

我一九二九年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七、八月间在厂北门外发现共产党传单，助理王广恩要我们追查。经我用恩威互济手段，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他暗中交给我一份共产党名单，其中姓常的是我厂共产党头头，立即把他看管起来。在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由警察和卫队在厂北门外逮捕了二个共产党。当晚警察局司法主任曹凤鸣、厂里徐连奎、董文华、孔令铎和我审讯。经一一刑讯，他们都承认是共产党员。

先审的是我厂里那个姓常的。第二个是中等个面貌黑一点的。第三个审的是个高个子，稍一动刑，他承认是湖南人，今年六月来东北，是共产党员，是辽宁地区负责人，是省委级，地下组织设在沈阳工业区西下洼子。审完后，他们三人都在供词上签名划了押。第二天上午由厂办好公，将他们三人送交警察局。事后听警察厅秘书于祥林等人对我说，因他们坦白悔过的好，而被释放。

关辅金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关辅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是收买叛徒崔凤翥，并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7) 徐廉奎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我在奉天纺纱厂当庶务主任，六月厂内发现共产党传单，纺纱厂总理孙祖昌、助理王广恩要我们马上查清。副技师关辅金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崔告密了厂内共产党七、八个人，我们即将厂内共产党头头 xx 玉抓起来，经动刑引诱，他承认是共产党，承认与厂外有联系，供出明天下午外边准有人来厂开会。孙祖昌即报告警察厅派孙督察来厂作周密布置。在九月末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一个高个子白脸的和矮个子黑脸的来了，由厂内共产党头头 xx 玉暗中指点，卫队当场把他们逮住，当晚警察厅在工厂对他们审讯。我和关辅金、孔令铎、董文华等人参加。

先审黑脸的，一动刑就承认是共产党，是联络员，是来开会搞罢工的，与白脸的是同事关系，住沈阳工业区，年龄卅多岁，河北人。

后审白脸的，稍一动刑，跪倒在地，什么都说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省委宣传领导，是来搞宣传组织共产党、搞同盟罢工的，审完后，他俩人和厂内共产党头头 xx 玉签字划押，第二天将一案三人押送警察厅。

这个案子办完后，工人党员崔凤翥告密有功，厂里发给他奖金百八十元。

徐廉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注：徐廉奎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纱厂庶务主任，是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敌伪人员有十五人，其中已死九人，活着的除徐廉奎、关辅金外，还有纱厂助理王广恩、会计关恩厚、卫队正目杨明襄、卫队队员王清怀四人，他们分别提供了刘少奇被捕自首叛变的罪证。

(8) 陈元祯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代

对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案件的交代

我原名叫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处理过奉天纺纱厂一起共产党案件。捕人以前纱厂出现工人闹罢工，我们去纱厂，厂里卫队把我们领到一个屋里，李春藩、杨树忱也在，这时开始准备刑具过堂，第一个过堂的是个胖子，白脸中等个；随之又提来一个中等个，圆脸平头；第三个过的是高个子，瘦子黄脸，关里口音。经审问动刑三人均承认是共产党，并供认了地下党的组织，其中一个承认是组织部长，一个承认是省委书记，还有个说是支部书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纱厂把被捕三人送到了警察商埠三分局，根据分所的公文和笔录一个一个的进行了复审，被告三人均在笔录上划了指押。后把三名犯人送省会公安局司法科了。

此材料是我亲口提供。

陈元祯 1968 年 1 月 23 日

注：陈元祯一九二九年任奉天商埠警察三分局差遣班长，系参加审讯刘少奇的见证人。现由长春市监护。

(9) 关庆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对旧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案件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我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同年八、九月间一天，收到商埠警察三分局关于纱厂发现共产党传单的呈文，由我主稿，指令该分局注意侦捕。指令下达不久，一天中午接商埠警察三分局电话报告，纱厂发现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除派人前往监视外，请求逮捕。当即报告白铭镇，白局长说，刚才接过该分局电告，已令其追捕归案。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听说已逮捕三名共产党，在纱厂略过一堂，都承认是共产党。三名人犯在局内拘留不足一月，白局长亲自提审过。此案结束后白局长和我说：参加办案的有长官公署、军法处、全省警务处、宪兵司令部等单位，那个南方籍犯人承认是共产党，来沈阳不久，目的是扩张党的势力，恳求从轻处理，如能得到释放，甘愿具结，愿开列地下党名单、

机构、地点以作条件。经张学良同意，仅以涉及嫌疑，备函送往法院。事后张学良根据名单，直接命令宪兵司令部、稽查处、军法处先后逮捕共产党人数起。

交代人：关庆云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注：关庆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会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是参与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沈阳市监护。

(10) 刘青第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关于一九二九年我承办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我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九月间警察所送来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三人，有厂内的，有厂外的，首席检察官朱树声和主任检察官汪廉审讯，我记录。经警察所一一审讯，都承认是共产党员，为首的承认是负责沈阳地区党的书记，并供出几十个党员，十几个组织，在沈阳有麻袋厂、兵工厂、纺纱厂等。在外地有大连、营口、辽阳、抚顺、哈尔滨等。还写了自白书，承认领导工人罢工，是犯罪的，误入歧途，现在悔过自新，坚决以后不作非法活动，要求宽大。经检察处复审，事实与在警察所供认的相同。三人都在自白书上签了字。

根据他们三人自白从宽，检察处起诉，即送高法审理。起诉书大意是：被告三人系共产党员，煽动罢工，为首的是负责沈阳地区共产党书记，深知改悔，并提供了组织关系及散布情况，是悔过自新的具体表现，应从宽处理。……。不久高法开庭宣判。由高检处将他们交保释放。

这一案处理后，朱首席对我说：过去共产党说我们对共产党人抓一个杀一个。这回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头头，判的这么轻，共产党都感到意外，这是政治攻势。这样可以收买，可以瓦解，可以为我们工作，在政治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刘青第一九六八年五月

注：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是敌伪审讯刘少奇时的记录人。现由辽宁省监护。

(11) 刘多荃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起共产党案件情况

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时常跟随张学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厅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个大共产党案。关系到东北三省的事。当时警察厅长白铭镇和宪兵司令部副官长程广道，告诉我捕了三个人。经审讯，其中一个人供认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供出了满洲省委员会和沈阳、哈尔滨、本溪湖、抚顺及铁路沿线党组织和活动计划。张学良责成参谋长荣臻和白铭镇与这个党的负责人达成了政治交易条件：要他彻底交出东北活动计划、地点、参加人员名单等。今后不再在东北搞政治破坏和颠覆活动；对中东铁路有关工人运动双方事先取得联系，相机配合……。这个负责人要求签字画押后，不登报，双方联系各派妥靠人员，到指定地点会晤。

张学良亲口对我说：这个共产党负责人给他写信表示感谢，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

这个案子连捉带放共廿天左右，释放时我们和他有秘密计：对外宣布确非共产党人，找不出确实证据，由警察厅批准无罪取保释放。

刘多荃一九六 年 月十一日

注：刘多荃又名刘芳坡，一九二九年任大军阀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后任中将军长（与原我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是同乡，关系密切，互称“兄弟”），是刘少奇在东北充当内奸的重要知情人。

原任我辽宁省交通厅长。现由辽宁省监护。

(12) 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这是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刘少奇为掩盖其叛徒罪行，蓄意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投敌，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13) 中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给满洲临委的信

注：刘少奇被捕叛变“出狱”后，向我党中央做了假报告，因而又窃据了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的职位。

(14)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注：刘少奇向中央的报告，以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中央。他和孟用潜被捕投降大军阀张学良而获得所谓“释放”之后，即派孟用潜往北满任特委书记，他以假借巡视工作为名，到哈尔滨同敌人进行勾结，配合大军阀张学良镇压工人、学生运动，进行反苏反共。

影印件原文

中 央：

兹有数事逐项报告于下：

(1) 中央指定省委名单及工作分配，省委依照此间情形略有变动，因为孟坚、国珍已去哈任工作，又调回对哈市工作有妨碍，而且孟坚在奉被捕一次，纱厂附近及公安局等处认识很多，如来省兼管奉市工作，事实上要常外跑不合宜，而且抚顺目前工作，自破坏后，以前组织或捕或逃，完全解体，暂时是要从各方面建立线索，最近虽然有两三处关系派一人专驻在工人外面还是没有多大作用，君羊住省委组织部工作，因寻找山东逃来同志线索，比孟坚较合宜，指挥奉天工作同志，（山东）亦较好，因此省委决定之启兼宣传，君羊组织兼管奉天工作，宏经工运，三人组织常委，孟坚哈市书记兼组织，候补常委国珍哈市宣传候补常委 CY 书记参加常委，惟来信以七人组织省委，但只六人名字，据宏经报告省委委员有西平一个，其余委员一人是立功，还是西平呢？但西平在同志中感情不好，观念也有一些错误，省委不同意他参加省委。

.....

(6) 最近中东路斗争已经发动起来，兹将哈市报告及省委对东铁工作的决议，附录于下请查阅指示，并请求中央将此报告材料作一通信，在红旗或全总刊物上发表。此间工作人员甚忙，无人作文故也。

省委为特别加紧哈市及中东路工作，已派少奇同志前往哈市巡视。详细情形日内当再有报告寄来。

(15)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六日《盛京时报》关于东铁总工厂华工罢工问题的报导

注：这是内奸刘少奇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的十二条，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煽动反动工潮，攻击苏联的罪证。

(16) 重要知情人刘多荃关于刘少奇叛卖革命的亲笔供词

一九二九年冬，荣臻谈到中东路事件时说，咱们拿这个满洲省委书记做质，对谈判很有利。一九三零年三月鲍文樾对我说中东路问题我们吃了亏，为了找回面子，让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协助，如国民党反苏罢工搞了许多经济条件，送给他看，他还给修改增加了几条，并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了，给我们帮了大忙。张学良说过，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在哈有许多事情全能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去办。一九三零年四月，黎天才和我说，那个满洲省委书记，从哈尔滨去上海路过沈阳时说，在沈阳你们救了我的命，在哈尔滨对我也很好，东北好像我第二家乡。

刘多荃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注：刘多荃的笔供证实，内奸刘少奇在中东路事件中，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煽动工潮，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中东路事件说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军阀张学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匪帮的策动下，非法武装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苏联籍人员三十九人。蒋介石匪帮七月十日单方撕毁中俄（合办铁路）协定，挑起“中东路事件”。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匪帮发表与苏联交战宣言。九月八日发生武装冲突，经过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扎兰诺尔、同江等战斗，大军阀张学良惨遭失败。十二月二十二日中苏互派代表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原状。

大军阀张学良为了挽救失败残局，利用刘少奇在哈尔滨煽起反动工潮，反对苏联。刘少奇根据蒋匪介石和大军阀张学良提出的反苏反共罢工条件，亲手修改成十二条总要求，在《晨光报》发表，组织假请愿，威胁苏联局长，阻挠“伯力协定”的实施。当时的苏联是革命的，刘少奇伙同蒋匪介石、大军阀张学良进行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真实罪恶至极！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十二中全会，从十三号起，到今天已经开了（总理：十三天。）十三天了。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开得很成功，对党章，“九大”代表产生法和在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认识和处理，都作了很好的讨论。这是对即将召开的“九大”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工作。同时，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亲自从头到尾领导的。大量的日常工作，是由中央文革、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的。我因身体不好，做的工作很少，对整个的工作体会不全面、不深刻。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主席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个大概，但必然讲的不够准确不够全面，同志们只听听就行了，不必记录，

不要传达。由于我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够和思想提炼得不够，今天讲的话可能罗苏。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主席又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新的形式、新的做法来进行的。而这个革命呢，它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一般的说存在于阶级社会里面，按马克思所说，从有文字的历史起，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不过，老实讲，在没有文字以前也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也就是奴隶社会。马克思大概是总的说的，实际上在没有文字以前已经是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就是阶级社会，而有些地方有些国家，那个时候并没有文字。阶级社会必然有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要推动社会前进，我们必须抓阶级斗争，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斗争，仅仅认为可以用行政的方法、经济手段的办法，来推进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做法，是修正主义的做法。事实上，我们不斗争，敌对阶级他会向我们作斗争，他会向无产阶级进攻。你不斗他，他斗你。所以我们为了防御应该斗争，为了进攻也应该斗争。如果想避免

这种斗争，那么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而业已建立了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打倒。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是倒了，但是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倒。另外，还有，由于资产阶级，地、富、反、坏，这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人还都存在，他们随时还准备复辟。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小生产的存在，他随时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成份。小生产者的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走向社会主义，一条走向资本主义，他是在叉路口上的经济，这种经济，随时可以滑入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

再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来自外国的武装干涉，武装侵略，来颠覆我们的政权。和平的这种阴谋式的颠覆和武装的进攻，这也能造成颠覆。

但最主要的，除去以上三种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国家领导成份中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的产生。这个是比较其他三种力量大得多，有决定性得多。苏修以及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搞社会主义的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国家领导机构的人员他们本身蜕化变质，转化为资本主义分子，政权就变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变成一种资本主义政权，变成一种法西斯政权。所以，有决定性的还是国家的领导，尤其是这种国家的上层的领导。

所谓国家包含什么东西？军队、党、政府，这就是国家的基本的组成部分，而国家是由这许许多多的环节形成的统一体，形成的一个机构。当然还有群众组织。这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一个国家的统一的体系。

毛主席最近一再地强调，而且完全是根据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自己的思想的发展，清楚地看出所谓国家，老实讲，从本质上讲，主要是军队。所谓从本质上讲，不是说把一切都包括，就是说从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中间抽出主要的因素是军队。军队是复辟不复辟的诸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只要军队不变色，那么，其他的党、政、民都有办法对付，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嘛！枪杆子底下也就能够防止反动的政权的复辟。就能巩固政权嘛。所以，军队这个环节必须稳稳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下，必须稳稳地永久地来用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子，不搞这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话，单只是夺得政权，这个政权还是可以失掉的。

大量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这就是现在从南斯拉夫一直到苏联，都是这么样个情况，但阿尔巴尼亚在外。

用和平的手段，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不能用和平来取得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再强调，而尤其是毛主席在近半个世纪里面一再强调和亲身实践的。毛主席是我们红军最老的创造者、指挥者，他是搞武装斗争的，而不是和平的。和平这个口号，和平过渡的口号是不能够真正的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有一种可能，这个口号能够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所以这种和平过渡的口号，在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是麻痹人民不要动武，不要起来革命，不要推翻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了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客观作用，就是叫大家麻痹，丧失警惕性，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赫鲁晓夫新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就表现在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便宜的事情，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是要遭受一些牺牲的，要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假如不经过这次文化革命，刘、邓他们和他们这一伙子，这一帮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条件下面，他们会一轰而起，来把国家，把党，把社会主义都拉到改变颜色。大家看了关于刘少奇的这种惊心动魄的这些铁证如山的材料以后，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是他一个人，首先他是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还有一帮子人，他同国民党始终是勾结着的，同帝国主义是勾结着的，假如时机一成熟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他们要搞复辟的。而这次文化革命，就是预先打破了他们的阴谋，而避免了这种危险性，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武装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一定人民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种损失。而现在这种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一次这种斗争实际上是我们同国民党斗争的一种继续，是国共战争的一种继续。四九年那个时候，是打拿枪的国民党，这次是打不拿枪的国民党，两次都是打国民党，一次是武战，一次是文攻。武战和文攻老实讲是阶级斗争中，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在进行民主革命中，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中，都是两个缺一不可的斗争的形式。不是说有一个就可以代替一个，不行的，必须两个都有。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种阶级斗争，它有的时候，假如说已经发生了复辟，那当然只有用流血的战争，我们应该断然毅然的展开内战；或者是外国敌人打进来，我们断然毅然展开武装反击。可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必展开武战，而用文战。在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用武战。马克思曾经讲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来打倒，就是说必须用武装斗争。但他后面又讲了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转为物质力量。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把马克思的话倒过来说，怎么说法咧？他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打倒。我们倒过来怎么说咧，倒过来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武装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力量还得用精神打倒。就是说，除了武装的批判以外，我们还要搞这种文装的批判。这就是我们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前进，是一个发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为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复辟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讲了，欧洲这些国家已经复辟，除阿尔巴尼亚以外。另外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走向修正主义。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文如此，似应为“之前”——编者），世界上差不多大多数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组织，那个时候都主张搞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这些组织纷纷叛变，差不多全部都叛变了，只有列宁所领导的党中间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派，他们坚持下来了。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工党，这一些通通由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了欺骗无产阶级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由革命的政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变成改良主义的、变成不革命的政党。这是第二个例子。这种复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发生复辟的例子。这是我们容易看得见的。那么从资产阶级革命来看，它也曾经发生过复辟。我们举法国的例子，最典型是法国，当然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起源于英国，它开辟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革命的新的纪元。可是影响最大带领整个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可是法国本身曾经发生多次的复辟，两次王朝和两次恢复帝制。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一次、二次、三次，最后在普法战争之后，把拿破仑第三打垮了以后，德国人胜利了，法国人失败了，这个时候才把共和体制

稳定下来。而在以前两次皇帝复辟，两次帝制，它也是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并不是说革命一成功之后，资产阶级可以一直顺利地下去。不是的，它是建立了共和制度，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给农民，那是搞得很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法国的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地主、贵族的手上，而农民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法国革命之所以那样猛烈，那样子有力量，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就是地主、贵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是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和小资产阶级受着压迫，所以它爆发了很猛烈的革命，一直从十八世纪震动到十九世纪，前后反复的争夺。反正我们说明一条，就是连资产阶级革命都可以发生复辟，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是更可以发生这种复辟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取消私人所有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扫除一切私人所有制，实行共产，实行财产社会主义化，社会化，这个是很彻底的，但是所遇到的抵抗比资产阶级革命遇到的抵抗要大得多。

所以，这种复辟的可能是很大的，欧洲这么多的国家都可以复辟，那么，中国如果搞得不好，那就可以把我们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又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的国家，那就会使我国的历史发生大倒退。而我们阻止了这一点，就使我们国家的历史大大地跃进。两种不同的后果，取决于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否照毛主席的号召，能够坚决进行到底。

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经济上也只有通过这种思想革命化，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够使生产力的积极性也就是人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就能够使得生产得到大大的发展。单纯的这种经济建设是不能够代替思想革命化，是不能代替文化革命的。要有经济建设，但是不能拿这个东西来代替思想上的建设，思想上的革命，不但不能代替，而且应该用思想的建设，思想上的破，思想上的立，思想上的革命来领导经济建设，领导政权建设。这一点，我们同苏联这些国家做法不同，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搞思想上的破和立，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但搞，而且把它当作带头的东西。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同这些修正主义的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而不这样子，我们同他一样，一样的做法就会导致一样的结果，不同的做法，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样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不同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不能复辟，社会主义能够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所以，以上这些话就说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这是主席十三号提出来的问题。我这个发言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来发表的意见。

第二个要讲的是，这次文化革命的胜利，它的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地位。

主席曾经把我们的胜利说出来了，主席说：“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主席又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这种胜利我们可以说它几点。

头一点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列宁讲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毛主席讲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这个意思，具体句子我记不起了。我们如果有经济或者又有思想，但是没有政权，这一切都落空。前年我不是已经讲过这个话，就是说尽管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万万富翁，那些只是资本主义手上的财产。即便是在我们社会主义手上的财产，我们尽管一千万吨钢、一亿吨钢、两亿吨钢，尽管原子弹、尽管导弹，但是我们没有政权，这一切都是替资本主义来准备财富，而不是属于我们的。没有政权，这一切繁荣，连大会堂都不是我们的。今天在座的同志的头都不是自己的。所以政权是无产阶级的生存权、生命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是解决了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一点是已经在理论上一再地说明了的。但是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巩固，怎么不丢掉这个政权，这个问题当时的条件，当时的时间，他们是很难解决的。只有毛主席根据国内、国际上的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对国家政权的大审查、大清理、大扫除，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当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尽了，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但残余还有没有？还会不会发生新的？我们可以断定，残余还会有的，可以断定，还会可能发生新的，而不可以丧失这个警惕。但是基本上给了他们一个决定性的打击，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他们这些人，老实讲，过去我们是不大了解的，总觉得他们是革命的吧，是老共产党员嘛！这一查才知道他们是一些毒蛇、是一些牛鬼，是叛徒、是特务、是内奸、是工贼。我们专案小

组进行了很有效的工作，特别是江青同志对专案领导得、抓得很紧，把这些我们素无所闻的事情，触目惊心的事情，真凭实据，人证、物证、旁证都拿出来了，才能使我们恍然大悟。否则，没有事实，总是使人迷迷糊糊，不那么清楚。现在把这些家伙揭了出来。当然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把这些家伙挖出来，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次生命。四九年的武装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的生命。而这一次是给了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二次生命。国家机器无论用什么名义，譬如叫做巴黎公社也好，叫苏维埃也好，或者叫做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好，最主要的看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他执行什么路线。我们这个政权如果掌握在刘少奇和他这一伙子手上，他也可以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牌子，这种招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可以变质的。比如苏维埃政权，在赫鲁晓夫手上它并未取消苏维埃几个字，可是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复辟，其它的一些国家也是的，它并不改变原来的名义，用这种潜移默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它变过去了。所以挖出这些坏人，是给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以第二次新的生命。现在我们把他们这些旧家伙打倒了，走资派打倒了；叛徒、特务打倒了，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除台湾以外。而这一个政权是能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能够反映群众的需要，能够联系群众，是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政权。现在所吸收的这种政权的这种成份，不是那些旧的、叛徒、特务、坏家伙，而是吸收了经过考验的、经过事实证明的、是拥护毛主席思想的，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拥护共产党的，这样一些人来掌握政权。建立了这样一个政权，而新政权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权。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这些不属于有政治问题的老干部，学会了怎么样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继续革命，而不停顿的革命，学会了怎么样子对待群众，而不是压制群众，学会了怎么样子来执行主席的指示的必要性，坚定了对主席思想的信心。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主席说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根本的原则。离开这两条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那么这次文化革命，是教育我们老干部相信群众和相信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是对于

政权的巩固有重大的意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最重大的收获之一，最重大的胜利之一。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的七亿人口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是共产主义历史上没有前例的。苏联虽然他们有列宁主义，德国虽然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但是他们思想的普及都没有达到中国七亿人口中间来普及现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之所以变成修正主义，同这一点是有密切的关系。过去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掌握在少数的知识分子手上，并没有完全把它交给群众，为群众掌握，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上面如果要一变，底下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的能力，因此也就随着跟着变过去了。而我们把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通过文化革命普及，把这种无产阶级这种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科学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普及到人们中间去，这样就使得，谁如果走歪道道，走倒退的道路，走反动的道路，就立刻为全国群众群起而攻之。就是把基础扎到群众中间去，这可以说是这次大革命的大胜利之一。这是在人民的方面。

在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一方面军队本身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军队派出了大批的人去参加三支两军，这对军队是很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这同时对于军队的战争准备，是一个最好的准备之一。

另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表现在它必然要引起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上的大跃进。文化是打先锋的，同时必然带来了政治上的革命的变革。那么，我们相信和已经看到，并且将会更多的看到文化革命可以造成经济上的大跃进、生产上的大跃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三种阶级斗争形式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就是说，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三个东西是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的三个组成部分，三个要素，三个成份，而这三个成份，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有的时候以这个为主，在一个时期以某一种为主，而其他的几种捎带着点边；而在下一个时期转变再以另一种形式为主，又把其他两种带点边，捎带着；在再下一个时期，又以另外一种形式为主，来捎带着一点。多半是前一个形式，总是为另一个形式作准备，而前一个形式发展到高度的时候就转化到另外一个形式。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这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规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胜利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主席的思想智慧最大的普及。

虽然几十年来主席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间，在军队中间，在党里面是成为最高领导的，但是，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会有这样的普及，不能有这样大的普及。主席的思想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但是高于群众的智慧，反映了实践，但是高于实践。马列主义到现在，从马克思到现在有一百二十年，而这一百二十年中间从来也没有把马列主义这样子交给群众，交给人民，交给七亿人口。什么叫七亿人口呢？七亿人口就是说整个欧洲的人口。我们过去思想上最有权威的是欧洲。欧洲是什么呢？指那些东西呢？指英国、法国、德国，这是主要的，其次还有意大利。法国是很有权威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英国只有五千多万人口，法国接近五千万，还不到，德国也只五千万以下，意大利也是四千多万，合起这四个国家不过两亿多人口。那么，苏联两亿三千万。那末，就是四亿三千万，最有权威的国家是四亿三千万。美国是两亿人口，还不到，还差几百万。那么，这就是六亿人口。最有权威的国家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的人口都没有我们多。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的一片红。但是，他们没一片红，没有一片红！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没有象中国这一次的能够把毛主席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如此的普及起来，就是连资产阶级社会里面，或者奴隶社会里面，或者封建社会里面，没有另外一个任何其他的人的思想权威得到如此普及，如此深入，如此为人民所拥护。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把革命的思想普及到劳动人民中间去的唯一的一次普及运动、教育运动、提高运动。这可以说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大大地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思想，使无产阶级有了斗争的科学的武器。同时，是扫除了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隐藏了四十多年的这种分子，横扫了资本主义百多年、封建主义几千年的影响。可以说，集中在这两年半的文化革命，打败了几千来这种旧的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一切传统思想。

我们通过了种种社会发展阶段，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外，以后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的思想，虽然一方面有代表劳动人民的，但一方面有代表统治阶级的。可是居统治地位的，统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凡是不合统治阶级、不合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统统站不住，都要打入地下的。只有维护他们利益的思想，才能站得住。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打破了几千年这种传统的为剥削阶级利益而辩护的各种各样的思想。

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我们党的实践上，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胜利，就可以避免失败，而违反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就要吃亏，就要失败。这是我们从实际的经验中间体会到的。我们只要把主席的指示同群众见面，就能够变为群众的思想，就能改变群众的精神面貌，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今后，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经验和教训，必须进一步地稳稳地掌握主席的思想同群众见面，及时的传达和迅速的落实主席的思想。群众只有掌握了主席的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才不会为冒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欺骗。这就是主席思想的如此广泛的普及，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那么，这收获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上的收获、思想上的收获、文化方面的收获和毛主席的思想，政治上的收获、经济上的收获和毛主席思想的普及这种收获。

文化革命中间的这种成绩，我过去曾经讲过，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现在，这个损失是越来越小，是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还小，而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的成绩越来越大，将来还要更大，这是可以断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这个损失和收获，实际上是等如一换百，一换千、一换万，是一本万利的收获。这种损失，同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这点损失，也不能够取得大的成绩。无代价地取得成绩，是从来没有的，它总是要付出一定的损失。你打仗，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嘛，是不是呀？它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暂时付出这点代价，它的收获是很大很大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革命所取得胜利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

的想法，错误的想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还是可以说，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但是，今天说这个话，不是重复过去的，而是更高的看出损失更小，而更高的看出成绩更大。

同时，我要说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间的历史地位。要讲一讲，才能看出我们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大，它是最广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影响中国今后的命运的。我当然是不懂历史的。历史的权威是毛主席。在我们全党里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权威，我只是在中央开会经常听到毛主席讲点历史。就在那里，“祠堂里的老鼠”听上几句的。

在我看，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纪、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是处于繁盛的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处于这种那个时候出现了影响全世界二千多年来的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那时出现什么人物呢？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亚里斯多德、伯拉图、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这些人都是已经载入世界的历史上的名字，他们是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但是，那种文化是什么呢？它有阶级性的，它是正处在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盛行的时候的文化，是为奴隶主辩护的文化。伯拉图著了一本书，叫《理想国》，这是用对话的体裁来说明他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就是要建立奴隶主的专政，而他的思想成为以后世界国家学说的一种基础。对其他的关于艺术方面的，关于政治方面的，哲学方面的，都起着作用的。这个是奴隶制度的文化，但这个文化同我们现在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同我们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小巫见大巫吧。看到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个是小巫。而没有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脑子觉得，它那个了不得，但实际上同我们的一比，它那个没有什么了不得。不过在人类历史上，那算是一次大的文化，奴隶主的文化。

后来，世界第二次的文化运动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以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十四世纪、十五世纪，这时意大利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也就逐渐产生了新的思想意识

形态。到了十六世纪上半期，文艺复兴进入繁荣的时代。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但是他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也不敢声明他是什么阶级的，没有阶级性的，实际上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不敢申明。提倡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他也不敢说是谁的自由。但是，他是反对神权，反对宗教。这个意大利的运动，以后传到英国，传到法国，传到德国。传到德国，就产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而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立刻转化为农民战争。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二年的农民战争（应是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后来德国长期处于农民的革命的震动的中间，德国长期是不统一的。在英国，我们大家看过有名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各国都发生了受他影响的东西，有的在文艺方面，有的在政治方面，有的在经济方面，有的是各方面都有点。这一次文化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文化运动，文化的革命，或者文化的改良。当然在意大利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到法国，就是法国形成一个启蒙运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鸠、卢骚这么一些人。还有其他什么霍尔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们是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傅立业，也来自于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是什么呢？第一次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革命或者是改良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革命的或者是改良的。第三次呢，全部革命的。当然，后来有叛变的，叛变这个革命的。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西欧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发生了起义，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法国就是里昂工人起义，德国也发生了纺织工人的罢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个代表新的阶级的新的思想体系，是为新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新的阶级指明任务，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第三次就是无产阶级，而列宁的思想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恩格斯是死在一八九五年，而列宁生长于一八七〇年代，所以他同恩格斯是同时代，就是列宁长到二十五岁

的时候，恩格斯还没有死。可以说同时代相接的，那时恩格斯还继续在著作。所以，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人类第三次文化革命运动，这一次完全是一种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特别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第一国际，以后纷纷叛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除俄国的没有叛变外，其他全部叛变，但是俄国也还有少数派叛变。可是马恩列他们的思想没有象毛主席的思想这样子能传播到七亿人口当中去，他们合共起来只有那样多人口。而每个国家搞每个国家的一套，而没有象我们这样的一下子就在七亿人口的国家中传开。所以，他们的规模比我们小得多，深刻的程度比我们差得多，根子比我们扎得浅得多，浅得多。而中国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亿人口中广泛地传播。不仅如此，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广泛地传播。在不久以前，法国所发生的大的这种群众革命运动，有它们自己的内在原因，但是，有我们文化革命的影子，影响和推动，很多都是学了我们的。这次法国罢工的人数，可以说超过法国自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所没有过的规模。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六月间，曾经发生过武装起义。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又在一八七一年发生巴黎公社，也是马克思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很不彻底。马克思主义当时并不是占绝对的优势，当时是蒲鲁东的思想和布朗基的思想。布朗基是不要群众，蒲鲁东是不要政权，不要专政的。但是，客观上这次运动是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运动。所以，它的历史意义，虽然失败，但不可磨灭的。

这三次世界性的，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它们一样大，更不是比它们小，也不是比他们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

这就是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收获之一，中国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应该怎样排法，是更小，还是一样大，还是稍微大一点。我们来看，它是最大的。这是讲它的历史地位。

这是我要讲的文化革命胜利的三个方面。下面要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文化革命路线问题。

毛主席曾经有这些话：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前面讲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领导着这一个革命的路线方面的斗争。

基本上就是有下面这么几点。

第一，最主要的就是发动群众。要不要发动群众？可以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实质，焦点之所在。毛主席是主张发动群众的，而刘、邓为代表的反动路线是反对发动群众，是压制群众、镇压群众。

这场革命用什么路线来进行，决定这场革命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二月提纲”是刘、邓司令部抛出来的镇压革命群众的黑纲领。他们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是不准登载的。刘、邓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实际上是镇压群众的。江青同志的二月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与刘、邓“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反对他们那个东西的。六六年五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二月提纲”，粉碎了刘、邓司令部的第一套班子，就是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那就是六六年五月间把这第一套班子打垮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纲领性的文件。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经验证明，这两个文件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清算了刘、邓的错误。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出党内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揭开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毛主席的大字报大大地震醒了全党，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

民的革命斗志。以后轰轰烈烈的这种由亿万群众参加的炮打司令部的战斗，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但是，刘、邓司令部并不甘心，并不自动地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在他们镇压群众的做法失败以后，他们就执行一个新的手法，继续镇压群众，分裂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掀起了反革命的经济主义邪风，施展用生产来对抗革命的诡计。表面上，他们好象是很积极于生产，实际上他是别有用心的，是拿生产来压革命的。犹之乎罗瑞卿过去表面上好象是要搞军队的军事训练，但是实际上是想压低毛主席的思想在军队中的传播。但是他不公开这样说，而是实际上拿另外一个东西来对抗。这是第一套班子的人和第二套班子的人都采取过的，压制群众、压制群众的革命化的手法。

路线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公之于群众，把路线斗争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举。从来没有一个领袖象毛主席这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这种气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是例外，列宁是例外，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毛主席采取一系列的英明的措施，比如说，接见了广大的红卫兵，达一千三百万之多，次数达八次之多；采取了“四大”的作法，把大字报贴到街上来作法，由刘邓不准互相串连改为互相串连的办法，批准了军委为革命群众进行平反的五条紧急指示，发布了工农业系统文化革命的两个十条，支持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等等。

亿万群众的发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和根本的保证。

不发动群众，按资产阶级、走资派和一小撮坏人的办法去搞，就会使这个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使这个运动夭折，不能达到它应有的成果。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是很鲜明的有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一条就是毛主席的发动群众的路线，一条是压制群众的路线。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头一条作法和主要的做法，关键性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还是不发动群众。毛主席是坚持地一贯地采取

发动群众的这种马列主义的做法，这种符合于历史唯物论、符合于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做法，是有理论根据有事实证明的做法，是我们党永远要坚持的做法。

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党，应该是阶级的党，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党，劳动人民的政权，而不是与此相敌对的阶级沾染进来的政权。除非他们放下了武器，彻底投降，我们跟他们搞点统一战线，团结间接同盟军，这是一种暂时的、部分的做法。但是，这是一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并不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线。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路线是依靠群众，依靠劳动群众，只有这个才强有力，只有这个才可靠，其它是不可靠的，其它是没有力量的，其他是不能保证革命的。所以这次路线斗争，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而这个两条路线是反映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做法，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做法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做法的对立和斗争的表现。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原理，来依靠群众。否则，我们便一无所成。

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一方面也是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力量没有保证来进行这个革命。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成为非常的必要。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先决的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够成为如此广泛的可能。但是在苏联，他们也取得了政权，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个条件。他们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是完全可以依靠群众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之成为修正主义，以及他们一系列的国家转化、蜕化为修正主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我们要实行大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看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促进、互相保证、互相发展的。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我们这个政权，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是毛主席来掌舵的，而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别的什么领导，是由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来领导的。一切惊涛骇浪，任何时候出现的满天乌云，有了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都可以乘风破浪，击退逆流而胜利地前进。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个领导班子的问题。当然它的下面的实力，还是枪杆子。各级的领导班子，我们必须很好来配备。必须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相信群众的，是能够自己进行思想革命的，这样一种班子。如果这种领导班子，被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篡夺了的话，就要发动群众把他夺回来。就像一月风暴以后我们这样的做法。

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军队。所以，军队本身更要特别地来加强这种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进行思想革命化、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子，军队本身才能够履行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柱石的作用，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实力。

军队必须在“三支”“两军”中间正确地对待群众，坚决地实行“五不”的做法。无论如何不能镇压群众，特别是开枪镇压群众。我曾经常常同同志们谈，枪、子弹是没有眼睛的，那一大群人，你知道那个是好，那个是坏。你枪一开的时候，子弹把好人打着了，坏人反而没有打着。所以，开枪无论如何不是办法，即便是对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叛徒，我们也不能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只能采取“五不”的这种做法，而不能采取开枪的那种粗暴的做法。那种作法是同段琪瑞的做法没有区别，那种做法同吴佩孚的做法没有区别，那种做法同蒋介石的做法没有区别。开枪嘛，是向群众开枪。这就是一方面要发动广大群众，一方面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就是要排除各种干扰，使毛主席的这种正确的措施能够落实。发生干扰、阻力，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是证明着敌对阶级的存在，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叛徒、特务、内奸和外部的帝修反的存在。所以如果对于这些干扰不从阶级上来看他的严重性，认为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事情，那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看清楚他，他的劲儿从哪里来的，是阶级的根源来的，才有那种劲头。不然他也没有那个劲头。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社会影响，他所受到的舆论的这种推动，使他走向反党、反对革命的这种做法。

在运动的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对这条路线的“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这种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他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

替刘邓陶翻案。并且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老干部、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等的这种漂亮的口号下，来实现他们的反党、反对革命路线的这种做法。

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要刘邓的领导，而反对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他们关心老干部是假的，包庇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他们本身才是真的。而真正关心革命老干部的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他们关心高干子女是假的，而反对红卫兵和为“联动”翻案这却是真的。他们怕把军队搞乱这个话是假的，而挑动、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与中央文革对立，这却是真的。他们以抓生产为名，而实际上来镇压革命，来对抗文化革命的展开。运动初期，他们追随刘、邓镇压群众。后来又一下子摇身一变，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做后台。他们提出国家机关中对一切司局以上的干部都要火烧，就是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这种干部也要烧。他们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不少的政府机关瘫痪。抓人的这种风，揪军队高干的这种风，冲军事机关的这种风，提出在连队也要搞“四大”的这种指示，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现在的事实是昭然若揭了，不是中央文革，而是他们！

主席原定在六七年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种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一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主席在二月十八日召见，对于“二月逆流”，提出了批评。中央碰头会也多次地批判了“二月逆流”。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破产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是文化革命的胜利。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了、批判了“二月逆流”，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个文化革命会要流产的。但是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是，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今天会议中，还有几个职位较高的老同志，一贯有右倾的错误。他们也应该接受教训。同时，主席也希望能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了反对了。过去这种民主革命对他们是

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那么样的舒服。因此，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了反对革命继续前进、反对不断革命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二月逆流”是对于文化革命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右的方面的代表。但是，他们这个右，必然在走到过份的时候，就走向引起了极“左”，就会导致极“左”的这种抬头。王、关、戚就是这一种极“左”的反党、反毛主席路线抬头的代表。他们用极“左”的这种思潮，大搞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是打击一大片，打倒一切。其实，王、关、戚他们实际上是刘、邓、陶班子里面的老成员，是他们刘邓陶班子里面的余孽。他们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委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央发出“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九·五”命令和江青同志发表的讲话，特别是主席亲自视察各个地区以后发表的指示，王、关、戚是破坏主席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的。最终，他们是遭受到了粉碎。

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六个省市的革委会成立了。从四月到九月，由于“二月逆流”造成的恶果和极“左”的思潮的这种干扰，就使预定可以成立的革委会都把时间推迟下去了。这段时间出现了比较乱的现象。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暴露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九月以后，主席的指示，又把形势迅速地好转过来了。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期间成立了十八个省的革委会。

今年三月间，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勾结了余立金这一个叛徒，和傅崇碧这些，他们耍两面派，实际上是搞阴谋活动。他们是干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执行的。

中央“七·三、”“七·二四”的布告，是对付极“左”的这种思潮，和这个地、富、反、坏、右在中间搞鬼所造成的局面，煞住了他们这个歪风，而使全国除台湾以外实现了一片红。

在进入斗、批、改的这个新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论的这种思潮和做法。多中心实际上是无中心，多中心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多中心实际上是以自己为中心，多中心实际上是搞独立王国，是搞山头主义，搞分裂主义。我们要反对这种多中心，要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要继续批判“多中心”论，这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

司令部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唯一领导中心。反正，在这场革命中间，一下子出现这种干扰，一下子出现那种干扰，他们都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依靠群众的路线，打击走资派的路线。这些干扰，都经毛主席很快地识破了，中央文革很努力地事事执行了毛主席的措施，使这种“左”的、右的统统遭受失败，而且保证毛主席的这个路线的胜利。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政策问题，那就可以概括为刚才这一些，就是民主，大民主，同时要保证专政，同时，要反对这种“左”面来的或者右面来的，而根本上最主要从右面来的这种干扰，才能够保证这个路线贯彻下去。

中国革命和中国这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新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的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指导的。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是马列主义发展中间一个新的、崭新阶段，我比一比就知道它是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但是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列宁主义是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是在这一时代下产生列宁主义。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这种时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里面进行大的搏斗的时代产生的。所以，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时代的条件不同，他们各代表当时时代的特点。但是，他们共同点呢，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是都有世界性的这种意义，而不是某一国或者譬如中国的，或者是俄国的，德国的这种局限性的，而是有世界性的影响的，是反映了世界的当时的实际的。

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仅仅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而在巩固政权、防止复辟的问题上，是提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成败命运的这种思想，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整个，毛主席这几十年来来的革命的科学，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文化革命所表现的这种思想，都表明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没有死，而把他复活起来，而向前发展起来，而不是停顿，也不是守旧。

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矛盾。而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对抗，对抗将消失，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他并没有发挥起来。斯大林是马列主义者，但是后期的思想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直到他死的前一年，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而且搞得不好，还要变成对抗的矛盾。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永远的普遍的存在，必须用这一个规律来观察社会现象，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不能抛开这个规律，作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例外的东西，那就不对了。毛主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一方面是坏事，但他主要的能够推动我们社会向前发展。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斗争是万物之母。这是最古典的希腊的赫拉克里特说的话。只有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下面的矛盾，而把这种矛盾分成两类的矛盾，这是很必要的，而不要把一切矛盾都说成是内部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把一切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说成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样子说是不行，是不对的。只有毛主席正确地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一个崭新的思想，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一方面承认有矛盾，同时不把矛盾混为一谈，而区分为敌我矛盾和内部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原则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些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的阶段，消灭一切旧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旧的观念，以达到根本消灭阶级的差别。由于实践的限制，他们只指出了个模模糊糊的方向，但没有进一步地阐述，没有进一步地肯定。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指出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于比无产阶级还强大，时刻企图复辟。小生产者不断地生长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了防止复辟，必须在长时间里面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不仅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它们在思想方面的反抗，要同它们进行思想斗争。但是，列宁在一九二四年就去世了。他一共只活了五十四岁。他是一八七（年生的，到了一九二四年就死了。他没有来得及来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跟随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他在前一阶段是有功绩的。但是，他过早地宣布苏联

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毛主席就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肯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不是没有阶级，而是还有阶级的；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还有阶级斗争的；不是说可以一劳永逸，永远太平下去的，而是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认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毛主席指出，为了防止复辟，“单有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到底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是前人没有明确地规定的。列宁只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他面对资产阶级的强烈的反抗和复辟活动，强调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他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没有阶级冲突了，所以他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比列宁的思想是大大地倒退了。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在什么问题？还是一个政权问题上，就是无产阶级需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资产阶级需要推翻这个政权。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谁。马克思、列宁看到了主要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巴黎公社的时候，马克思曾经说，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里牢固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暴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之后，还要遭受这种反动派的反击。列宁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是，他主要的是以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他认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发展起来，会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主要从这一方面来看的，看到复辟的这一方面的力量。当然，他也说到国

外的帝国主义的这种干涉。但列宁他没有把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物作为这个成为资产阶级复辟的这种主要的对象。斯大林他在实际上是解决了一批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等等等。但是，他后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看成是外来的武装干涉。而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对象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苏联也就是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于是乎全国变色。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全国变色的。所以这一点毛主席同马克思、同列宁、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重点显然是不同的。苏联在一九三六年以后，他们是不抓阶级斗争，就是搞物质建设，物质刺激，这个是迷失了方向的。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这同他们的作法不同。我们一方面固然抓紧生产，但是我们必须搞思想上的革命。过去是搞了夺取政权和经济上的革命，但是今后带头来还是思想革命来带头，来领导生产和领导政权建设。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怎么继续革命有许多贡献，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个办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苏联过去他们曾经反对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但是只限于中央的内部，限于组织上来进行处理，就是罢官为止，没有发动群众从思想上、理论上来批判。因而他们这个问题仅仅是简单的处理了，没有看到非发动群众不能解决问题。他们的做法是简单化，而我们的做法同他们相反。毛主席说向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来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拿到群众中间去，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掌握群众，由群众自己起来解决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不仅仅从组织上夺权，而且从思想上、理论上来夺他的权。当然，也要从组织上来夺权。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么革命的一种创举。

此外，直接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来建立三结合的新型的政权机构，把革命的领导班子的建设放在首要地位，这也是一种新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也有一些这一方面的思想。但是，只是一种萌芽的思想，不是一种很肯定的、很发展起来

的思想。列宁是注意到发动广大群众来管理国家，不断地揭露、清除政权机关中间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斯大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是他忽略了政权机关本身的改革。他只看到外部来的干涉，没有看到内部会出大问题。果然，他死了以后，就出了赫鲁晓夫，把他的事业，把列宁所创造起来的事业推翻了。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经验，彻底地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政权。这是对于政权的一种新的做法。决定政权的本质的不是它的形式，刚才已经说过了。苏维埃也可以被少数派利用，也可以被赫鲁晓夫利用，实际上他们可以改变无产阶级的路线、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由真正可靠的这种革命分子和能够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种革命分子，能够实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种分子，组成革命领导班子，才能够保证这个政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毛主席所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是一个根本的方针，是我们可以永世传下去的一种方针。

此外，工人阶级登上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也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一个伟大的创举。马克思、列宁他们也触及到这些问题，但是没有象毛主席那样具体地在实践中，在理论认识上那样明确化和现实化。毛主席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并亲自倡导派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直接领导上层建筑的这种斗、批、改。这是解决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个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如《人民日报》上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毛主席思想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进程，不是一次能完成的。所以，不能够放松警惕。这里毛主席是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都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毛主席对马列主义这种划时代的发展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有他的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条件，就是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实践，就是在帝国主义处于一种新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一种新的阶段的反映。同时是他个人的天才，他个人的

经验所产生的。所以，能够把马列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停滞，也不是倒退，而是大大地前进了，把马克思主义登到了一个新的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下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尽管毛主席自己是谦虚的，不要提这样子这种阶段。但是实际上世界上的人们都看到，中国的人民都看到，它的确是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只有这样地认识毛泽东思想，才能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然就认为“山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城市里面，从苏联回来的人他们才有马克思主义。过去教条主义就是这样看的。其实，不但有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复活了，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提得更高了。所以，他们这些人有意地贬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进中间的地位。他们是违反客观的实际的。而实际上毛主席思想是的确的确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里面进中间一个崭新的阶段，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贡献。

第五个问题，简单地讲一讲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

毛主席这样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毛主席又说：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实际上共产主义的革命，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分不开的。我们的这种事业实际上是一种国际的事业。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足的美国这些国家，都应该成为国际革命的对象和发展的范围的。毛主席刚才那一条道理讲到，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问题。世界革命的确是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什么是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呢？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就是一六四零年起，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他们是时代的中心，他们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主要方向。所以这样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从英国革命以后发展到法国革命，也就是整个十九世纪的欧洲都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来渡过的，这是一种世界革命。

另外一种世界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那么出现了另外一种世界革命。那就是什么世界革命呢?就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就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新的纪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成为时代的中心,它决定时代主要的内容和时代发展主要的方向。我们看清楚了,世界革命的确有两种,一个是资产阶级所做过的世界革命,一个是十月革命以后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可是,由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这种对世界的影响,对于世界革命的影响是削弱了,倒退了,他们不是来援助世界革命,而是相反的,阻碍世界革命,压制世界革命,而只有中国才坚持了国际主义的义务来发展世界革命。世界和中国不可分离的,犹之于我们中国的某一个省和我们全国的其他省不可分离的有联系是一样,程度上当然有差别。中国在全世界上,世界如果是一个总的国家的时候,中国也等于是一个省,是世界国中间的一个省,但是,是最大的一个省。而最大省的革命,它必然要蔓延,必然要影响到其他国家,必然有义务帮助其他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不能闭关自守。当然,我们也不是学帝国主义那种做法,去冲击、去侵占人家。可是,中国的榜样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仿效,指出了他们前进的道路。而我们自己也不应该放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来帮助世界革命的发展,而不应该消极,应该积极地来支援世界革命。譬如我们对于非洲的很多国家的援助,对于拉丁美洲的援助,对于亚洲许多国家的援助,都表现了我们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一种做法。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很被动,那就不是国际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我们都同人家闹翻了,好象是很孤立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同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同各国的反动派没有共同的语言。当然,在某些时候,在个别的情况下,利用间接的同盟军,组成暂时的联盟,特别是战争中间的暂时的联盟。但是,总的方面我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要同他们斗争,要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他们同流合污。表面上在外交上搞得轰轰烈烈,同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当权派、各国的反动派表面上好象搞得很热闹的那种外交活动,以为那就是不孤立,但是这种做法在某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是一种灵活性的表现。可是,我们原则上总是支持造反派,支持反对旧制度的一切的这种力量。无论是民主革命性的,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无论是民族革命性的,我们都应该汇成一个总的潮流来

反对现在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我们表面上同这些帝、修、反政府的关系好象不那么多，不那么密切。但是，广大的群众还是站到我们这一边的。从他们反动的当权派这方面看来我们好象孤立。可是，当权派在他们国家里面总是少数，而最大多数是同他们当权派相反的、是正在觉悟，还要更大的觉悟，正在酝酿着革命，或者已经革命，将会全部来进行革命。我们如果是只看中了他们这种反动的当权派，而看不到群众，不同群众联系，不促进群众，帮助群众，那我们将要在现在和以后，和越来越以后成为政治上很被动的，就脱离世界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暂时表面上团结了一些帝、修、反的当权派。从远景上看，我们不但孤立，只有这样子才能够造成不孤立。从当前一时表面来看，好象我们是孤立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孤立的。而且孤立不孤立，首先在实质上，我们只要依靠群众，我们就是不孤立。而且对我们本身就是七亿人口的大国，我刚才说过了，我们这个国家等于一个欧洲，包括这些大强国都在内。我们这个国家搞好了，我们就是一个大的“联合国”嘛！我们就不孤立嘛。我们思想上永远保持革命，同时也把生产搞好，把文化搞好，把经济搞好，把政权搞好，那我们就是可以成为世界上逆流中的砥柱，成为革命向前发展的支柱。那么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它就当然地和自觉地来完成它的国际义务，它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思想。否则，我们就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对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重大的有决定性的事情，是推进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在搞了几十年以后就被修正主义出卖了。它对于世界上的影响只有一段，而且不大。而我们国家比它们大好几倍，等于三个苏联，我们力量也比它大得多，我们革命的旗帜也鲜明得多，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更新阶段的发展的思想。我相信中国革命对于世界上的影响会使人类的发展进程大大地加速。

从世界上一个国家影响世界历史命运的，可以说前后有这几次：

第一次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发现了美洲大陆，它派出了哥伦布，派出了麦哲伦，都是他派出去的。它在美洲占了很多地方，也在太平洋上占了很多地方。你不要看小小的西班牙，当时它曾经是称霸于世界的。美国的这个地方，就是它先进入的，美国的南部就是它先进入的。古巴这些地方都是它占领的。这个时候它

是搞了一段子。它对于世界的历史是在那个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大陆，就是我们地球下面的这一片土地是它发现的。

影响世界整个历史进程的第二个是谁呢？就是英国。英国十九世纪末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美国是它的，加拿大是它的，印度也是它的，其他的小地方多得很。所以，英国的国旗是太阳不落头的。不论太阳在什么时候出现，总有英国的国旗。可是，英国在不久以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华盛顿独立战争之后，它渐渐地衰退下去了。渐渐丧失了美国，丧失了印度，丧失了加拿大，它渐渐地从独霸世界的国家变为对世界没有多大影响，它的影响渐渐地减弱下来。

那么，第三个影响世界的是谁？就是现在最坏的美国。美国者，实际上是“丑国”，最不爽。一切肮脏的事情，一切反动派它都支持；一切革命派它都对抗，专门干压迫革命的勾当，不干好事。那里有反革命，它就那里去支持；那里有革命，它马上开队伍去压迫。它是影响世界的进程的，但是，它不是从进步的方面来影响，而是从倒退的方面来影响。

那么，过去影响世界的，第一个时期是西班牙，第二个时期是英国，第三个时期是美国。在英国美国之间，苏联的革命也对世界有影响，可是我刚才说了，很有局限性。

现在，我们可以高瞻远瞩地看到全世界上的远景，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影响全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推动世界向前进的，促进世界革命的，帮助世界革命的，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大、最持久的国家，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的，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方面从革命的方面说，那是最大的，超过苏联的；那么，就是从实际力量的影响上，它超过西班牙，超过英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革命的国家，最影响人类历史命运的国家。所以，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很光荣的，很伟大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革命路线，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如果我们丢了毛主席这个旗帜，丢了毛主席思想在人民思想中的传播，我们行动中间不以毛主席的思想为指导，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不听毛主席的话，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存在着另外一个前途。我们国家不能那样强盛起来，不能那样兴旺起来，不能对于人类历史作出很大的贡献来，不能使本国人民获得更大的利益、幸福。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来指导

我们一切工作，坚持文化革命的这种精神，坚持革命的这种斗争精神，坚决地不断地来批判、打击这种反动的思潮，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来普及马列主义，代表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色，一切反动派，无论是内部的颠覆和外部的武装进攻和这种和平的颠覆，都会遭受失败的。我们国家有两个前途，一个，变成对世界、对人民、对国内的人民不大起作用，或者使劳动人民受二遍苦，重新复辟 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工人农民重受压迫，政府里面、军队里面的官僚主义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生长起来，他们夺取了政权，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前途。这两个前途是存在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这次文化革命这个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方向，坚决地看清楚有阶级，要进行阶级斗争，而不松懈这些斗争，不要像斯大林那样采取宣布没有矛盾这种违反辩证法的做法。那么，我们是站得住，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下来，把社会主义坚持下来，把对世界革命的援助坚持下来。

我们不但要争取全国的一片红，而且要争取世界的一片红，而且是完全有把握的争取世界的一片红，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这种革命的胜利，总是无疑的。历史发展规律，虽然中间有起有伏有倒退，有暂时的倒退，但是这种前进的势力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前进的势力是阻挡不住的，旧的世界是一定要、无疑要、无条件地要灭亡的，只是时间上有先有后。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这种革命的精神，毛主席这种思想，把我们国内搞好，把我们国内搞好，把我们国内搞好！同时，援助别的国家，毫不吝惜地援助别的国家。这样子我们才能把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变成在政治上也是伟大的，思想上也是伟大的，精神上也是伟大的，而不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要成为一个大而强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那种强国，而是无产阶级的强国，社会主义的强国，毛泽东思想的强国。我们的前途是广阔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决不怕暂时同这些反动的当权派这种对立和孤立，不怕受他们的冷落。我们看到广大的群众，在他们压迫之下，在严寒的冰块之下，革命的潮流是在暗流着，而且有些爆发出来，而迟早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们如果违反了方向，我们将来在历史上是被动的；我们不违反方向，我们在历史上是主动的。这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

另外，我想谈一谈今后怎么办？毛主席有许多最新指示。我全部同意，完全赞成，完全拥护，同志们坚决去执行。我原来想把这些东西念一下。我想用不着

念，因为大家同志们都知道的，就是说反正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去讲这一个问题，不去阐述这一个问题。

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但是，我在主观上总是愿意跟着毛主席的。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

我的讲话，就是夹生饭，不成熟，很罗苏，不精练，越是思想不精练的时候讲话就越罗苏，越提炼，话就越少。讲话讲到这里为止，最后喊几个口号，有十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1日印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听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林彪同志是我们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彪同志昨天的讲话是又一次实际的典范，告诉我们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的讲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方面，对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高度的概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林彪同志说：“我对实际情况了解的少！”其实他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比我们更多，比我们更深刻，他的这种谦虚的态度，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我谈一谈学习林彪同志讲话的一点体会，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有些看法可能不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林彪同志的讲话自始至终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线。他从两个阶级来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从两条道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来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意义，从两条路线来讲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做法；他从三个里程碑来阐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从中国革命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决定影响，提出了一个伟大目标，就是争取全世界实现一片红。林彪同志指示，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才能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强、最革命的国家，才能促进和帮助世界革命向前发展。我体会林彪同志讲话中有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三个里程碑，一个伟大目标，而决定的条件是毛泽东思想挂帅。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我们小组的同志讲了很多好的意见。我们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从揪出大叛徒刘少奇，揭露了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揭露了“二月逆流”等方面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不搞资本主义就要复辟，这样说是对的。但林彪同志比我们看得更高，更深刻，他是从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出发来看这个问题的，是从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说过：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一九五八年在武汉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在经济战线上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着重地说，不能过早地宣布阶级消灭。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间，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五？一六通知》，亲自作了几次修改，四月中旬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上加了一段话“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我们身旁，当时我们也没有感到这指的是刘少奇。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我当时了解得很肤浅。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许多同志在一个时期内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从思想认识方面讲，根本问题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不甚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过去我们思想上是不清楚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短的过渡时期，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呢？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并且指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还带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瘢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四章中，发挥了马克思这种思想，甚至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国家。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这个问题上有缺点，但还不能说他完全不讲阶级斗争。在一九二八年以

来，在共青团的报告和中央监委会的报告中，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他的缺点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宪法报告中宣布消灭了阶级，从此不讲阶级斗争了。所以毛主席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批评斯大林，说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不能解决。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国际和我国的实践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林彪同志的讲话，不仅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方面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还从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和论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揪出了刘少奇这个叛徒特务，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刘少奇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表。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假定没有刘少奇，也会有别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现，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林彪同志正是从毛主席首创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论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样，就把问题讲得非常深刻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他的特点是什么？它同过去的阶级斗争在形式上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林彪同志在讲话中，都作了深刻的阐述。

林彪同志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什么方法呢？一种是武的方法，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文的方式，是和平过渡的方式，和平演变的方式，从社会主义和平地转化为资本主义。

毛主席早就着重地、明确地指出这种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敌人和平演变的政策和党内修正主义的腐蚀下，“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

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和平演变，内部瓦解，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一九五七年匈牙利发生公开的武装暴乱，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没有得逞。以后用赫鲁晓夫的和平演变的方法，就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苏联也是和平演变过去了，伟大列宁的党演变为法西斯党，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都是重要的历史教训。所以毛主席特别重视领导班子的问题。林副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用什么方法解决呢？林彪同志指出，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创造性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用不停顿革命的方法去解决。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什么方法来进行革命呢？毛主席又创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这是毛主席又一个伟大的创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伟大的成绩，这一点到会的同志说了许多事实。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因为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符合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因此就能克服各种阻力，迅猛前进，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同志的讲话，在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之后，接着就从两条道路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意义。这两条道路是什么呢？一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心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领导班子问题。林彪同志说：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巩固和保卫政权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夺取政权还要困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刘、邓、陶等一小撮走资派妄图从内部进行颠覆，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二月逆流”的干将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承者，同志们看到二月逆流的成员，并不是从国外派进来的敌人，而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一道战斗过的同志，就是这样一些所谓老同志，进行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危险也就在这里。

“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沿着这种逆流，社会主义的苏联就一步步地迅速地全面地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绝对办不到的。尽管在一定的時候，他们起一定的干扰和捣乱的作用，但是他们的面目很快就被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很快就被粉碎了。清算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参以“二月逆流”的人，我们都希望他们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他们赌咒发誓，说敢于改正，又假定他们能作出来较好的检讨，那也不能保证，一旦时机到了，他们又可能再反。最根本最可靠的保证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群众，使那些妄图复辟的人不能乱说乱动。

现在苏联、东欧、朝鲜一个个都修了，那里的人民遭了殃。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得到世界马列主义者和广大革命群众这样热烈地拥护，就是因为革命人民要走十月革命道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革命人民的希望。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符合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意愿，所以得到广大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不是偶然的。

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贯穿着两条路线斗争。林彪同志讲话中，讲到两条路线的时候，着重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一条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一条是瓦解群众，分裂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

林彪同志讲话中说，把党的路线斗争同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又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的路线斗争，但是从来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把党的路线斗争同广大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在向阿尔巴尼亚同志谈话的时候，曾经谈到许多年来，我们党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办到。

林彪同志讲话中回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经过，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起到现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一九六六年八月开了十一中全会，对于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他们表面赞成，实际反对。正如毛主席说的，他们举手赞成是一回事，实际行动是另一回事，这时全国各地的工人起来了。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开始了对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样就触动了“二月逆流”的成员们的灵魂和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二月十六日各路人马会合，大闹怀仁堂，他们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拥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反对一九六六年《红旗》十三期社论。他们公开反对延安整风运动，为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翻案，谭震林等公开否定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达到了极为猖狂的程度。这以后以王、关、戚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大搞形左实右的活动。以后又有杨、余、傅事件，为“二月逆流”翻案，所有这些，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从左和右的（主要是从右方面的）干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他们一个一个粉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林彪同志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三个阶段，从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等问题，非常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系统地发挥了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的思想。阐述了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说，毛主席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仅在夺取政权问题上提出了决定成败命运的思想，而且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运的最大贡献。

关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毛主席曾经向我提出过，到底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是不是一反对我们就孤立了？这些问题，林彪同志在讲话中对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他说，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总的方面，我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要同他们斗争，要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只要依靠群众，我们就不孤立。

毛主席、林彪同志着重讲了这个问题，是有缘故的。因为“三和一少”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的，刘、邓、王（稼祥）就是“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军会议，我国代表团的方针就是刘、邓、王制定的，就是搞“三和一少”投降主义。不能说现在我们外事工作人员中，没有这种思想，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方面的流毒还要很好地肃清。问题是我們是不是承认世界上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要革命的。如果承认这点，那么只要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广大的革命群众就会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便决不孤立。如果我们丢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反对各国反动派，不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脱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那么即使有许多资产阶级政客来给我们捧场，我们也一定要陷于孤立。

林彪同志说，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下来，把社会主义坚持下来，把对世界的援助坚持下来，争取世界一片红。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林彪同志讲话的精神实质。学习林彪同志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我对林彪同志的讲话，也没有很好地学习和体会，也没有很好地准备。只是自己想到的一些问题，同同志们交换意见，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第一章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全党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全国七亿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党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吐故纳新，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民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四）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应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必要时，在非党群众中公布。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脱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 党的组织机构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各人民团体，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

第七条：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一元化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事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一般设支部；党员较多或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也可以设立总支部，或者基层委员会。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大作风。它的主要任务是：

- （一）领导党员和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 （二）对党员和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 （三）宣传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 （五）发展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四、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1968. 11. 02；中发 [68] 153 号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现已闭幕，全会公报已经发表。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同志回到本地后，请即按公报内容进行传达。传达范围：地方传达到厂，社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党员，没有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单位，均暂不传达；人民解放军传达到团级党委会。传达方法：地方可以分省，市县两级开各单位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进行口头传达；军队传达方法自定。

全会文件不登报的有：一，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他的罪证附件。第一个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省军区自己印发，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协商会议中分发或宣读，第二，第三两个文件由中央印发，经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各军种一直发到各地区，各部门，各部队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手中。

传达情况和反映，望陆续简报中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中央文革：

鉴于我们这次党员代表会议由市革命委员会直接向广大干部、党员传达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效果好。拟将原来确定由县、区传达到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中、小工厂、企业、事业、商店、街道和中学等约四千多个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中的党员干部（包括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非党干部），改由市革命委员会在本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召开一万七千人的大会直接传达。再由县、区负责组织学习、讨论。

当否，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十一月二日回到上海后，作了两次传达报告，参加了一些小组讨论会，有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传达不传达？原来规定不传达。我在五百人的会上，只讲了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三个问题一传达，就成为讨论问题的纲。大家讨论和思索问题，就有了中心，对公报开头几段，也就懂了，并且有了批判“不见得”派的思想武器。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传达了主要精神，效果也很好。看来，一点不传达是不行的，传达主要的精神，十分必要，很有好处。

二、要不要非党员参加传达会议？原来中央规定是开党员会议。在上海，市一级的会吸收了一小部份非党员，效果很好。在小组会是，凡是站出来的干部和曾经站错队的党员占多数的，虽然讨论得也算热烈，但是，比起造反早的党员和非党员造反派占多数的小组来，就差一些。在向基层传达的，我们就多吸收了一些非党员，参加传达大会的，共一万五千人，其中地方一万二，部队近三千人。在地方代表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五，非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女同志占百分之十四。实际上，许多基层，掌权的是非党造反派，不向他们传达，他们领导讨论和落实公报有困难。这些人听了传达，也特别激动，“过去中央全会，顶多传达到十七级干部。这次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星期，就传达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人了，”这对培养一批新干部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陈毅同志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静安区一个党员听了传达，在本单位学习小组上通了一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因为社会上流传陈毅的好话很多，什么有战功，能文能武，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待帝、修、反四面进攻，头发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颠倒黑白，把他的错误，罪名说成功劳，什么陈毅揭发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请回来的。等等。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学课本

的，有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念颂扬他的课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干部和群众，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揭发了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将另行整理上报）。国防科委系统原来为聂荣臻的问题打内战，是上海老大难单位最多的。现在有些单位开始联合了。郊区各县和市区部份单位。对二月逆流中解放军支左的错误，议论较多，把几个老总的问题说清楚，反而有利于军民团结，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要求将陈毅弄到上海来批判，消毒；另一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为了适当保密，我们规定了不写标语、大字报、不印传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违反纪律的。

四、在传达中，我讲了“毛主席称赞上海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控制着上海的局势”，也讲了毛主席说上海也还有一些老大难单位，对工人阶级和老大难单位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动。我们决心把十二中全会的传达，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有的同志说，公报看了五遍，觉得懂了，参加了这次市里的传达会，才感觉原来的了解很差。如何把公报和全会的各个文件认真学好，如何把传达、学习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摸索一些经验。

以上几个问题，有些省的同志打电话来问，我不便答复，不知这样做，是否妥当，请指示。

张春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晨

2008年10月7日初稿

2011年12月15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八章（3）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第三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

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

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九十九页）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页）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三页）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

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

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

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

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

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

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粉碎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

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

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

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

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暴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

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

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苏修叛徒集团丑恶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兄弟党”、“兄弟国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当作可以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破坏和颠覆，而且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党，对于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都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进行镇压、破坏、颠覆，甚至出兵侵占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绑架他们的所谓“兄弟党”的成员，无所不为。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各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广阔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持支持日

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苏修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我们大会的代表，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鲜血液。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和女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老红军战士，也有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多的代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共同商量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标志着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的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形成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个兄弟民族，包括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包括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相信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雄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一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毛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接着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并且决定了主席团秘书处成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

林彪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林彪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其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有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立了功的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根据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

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团结。

它标志着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必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会自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一百七十六名）

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群 汪东兴 温玉成

董必武 刘伯承 朱德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于会泳 王体 王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王效禹 王淮湘 王景升 王辉球 王超柱 马毅 马福全 孔石泉 韦国清

天宝 毛泽仁 邓子恢 邓颖超 龙书金 田华贵 皮定均 刘丰 刘兴元

刘庆棠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格平 刘盛田 刘锡昌 华国锋 华银凤

孙秀兰 孙淑琴 买仁虎 江礼银 年四旺 冯全民 朱光亚 任荣 许世友

杜平 邱会作 杨育才 杨春甫 杨桂芳 杨得志 吴涛 吴德 吴金全 吴学珍

汪家道 肖劲光 李大章 李天佑 李四光 李玉英 李再含 李守林
李作鹏 李定山 李桂英 李雪峰 李瑞山 李德生 吕玉兰 宗希云
冼恒汉
周建人 金祖敏 周丽琴 罗锡康 郑维山 张日清 张云逸 张达志
张生堂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西挺 张体学 张连友 张国华 张泗洲 张恒云
张英才
张耀祠 张富贵 张鼎丞 陈郁 陈士榘 陈永贵 陈代富 陈爱娥 陈
敢峰
陈锡联 胡世全 胡良才 胡修道 南萍 范文澜 姚连蔚 映宗 袁升
平 浩亮
徐海东 徐道义 徐景贤 聂元梓 唐岐山 唐金枝 殷维臣 顾阿桃
钱学森
尉凤英 梁兴初 康健民 郭沫若 寇秋枝 曹轶欧 曾山 曾绍山 曾
思玉
曾雍雅 彭冲 彭贵和 黄成连 黄象和 韩先楚 程世清 舒积成 粟
裕
董明会 隆光前 解学恭 谢家塘 赛福鼎 黎原 樊孝菊 蔡畅
蔡协斌 蔡树梅 滕代远 滕海清 潘天福 潘复生 谭甫仁 魏秉奎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同志们：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党的四十八年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回顾党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

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表示决心，并且坚决相信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一定能够实现。

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象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扼要地系统地总结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战斗任务，他在报告中，恰当地给予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应有的评价。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公认，林彪同志这一报告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会议以后，在他的指导下，在 1961 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 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的反革命阴谋，并且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形成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它的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 1966 年 8 月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 年 10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 年 12 月的工业会议，1967 年 3 月军以上干部会议，1968 年 3 月 24 日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 年 10 月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主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严厉地批判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风，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林彪同志这些讲话，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特别是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战斗号令。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斗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的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重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把我军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林彪同志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国内外形势是大有利于人民的，而不利于敌人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牢牢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落实政策，奋勇前进，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伯达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开幕时候，对于我们党的历史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深刻分析。

毛主席提出：我们党这次大会要开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指示，正在圆满地实现。

我完全拥护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思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同时，出色地叙述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

我完全拥护这一次代表大会将要一致通过的新党章。这是表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划时代的新党章。

从来没有一个会议象我们这个代表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全世界一切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为我们这个代表大会而欢欣鼓舞。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蒋介石匪帮，却为之胆战心惊。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开拓了前人还没有探讨过的各个方面的思想、政治领域。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多年的大风大浪斗争中，在各个战线上，总是大无畏而又细心地工作，不断地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不断地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紧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的革命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因而他的思想锋芒所向无敌。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指导我们从一个胜利到一个胜利。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充分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在理论工作上和实践斗争中，都是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因此，正如林彪同志的报告中说的：“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

我们的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指导下同国内外的敌人、同党内右倾“左”倾机会主义战斗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摧毁了刘少奇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灿烂辉煌的胜利。毫无疑问，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必将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更大的胜利，直到世界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灭亡。

我们能够成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战士，这是最大的幸福、最大光荣。我们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正在胜利地开好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九大”后，我们必须更加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全部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政策，搞好斗、批、改。

我们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要注意学习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高度地掌握了事物运动的辩证规律，很早告诉我们，最近又再三提醒我们：一个时期总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教导，才能在工作上避免偏差和错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毛主席思想而奋斗到底！

让美帝、苏修和汉奸卖国贼去狂吠吧，让那个以卖国卖党为荣、多年来由苏修叛徒集团喂养的无耻叛徒小丑王明之类去狂吠吧，他们是永远不能得逞的，他们永远要失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全党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敬祝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康生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同志们：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这是我们党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会。

在大会开幕的时候，毛主席对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示，“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对这次大会和今后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给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我完全拥护，坚持执行。

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报告。林彪同志的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阐述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全面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林彪同志的报告中，对新党章草案作了很重要的分析。这里我就谈谈个人对新党章的一些看法。

现在提交大会讨论的新党章草案，是在毛主席建议和领导下，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集中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起草的。

1967年11月毛主席提出由党的基层组织参加修改起草党章。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在这个时期中，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30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讨论和修改，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教育运动。

1967年，毛主席把起草修改党章的光荣任务，首先交给上海党组的同志们，196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修改党章的经验，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工作的通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开展了，全国各地，凡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和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外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并且提出了修改草案，仅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综合整理上报的修改草案就有126份。

中央、中央文革认真研究了各地的建议和修改草案，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起草了新党章草案，经毛主席批准，把这个新党章草案，提交党的八届扩大的十

二中全会，经过逐章逐条的讨论和认真修改后，作出决定，将新党章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又在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仅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种，集中整理上报的讨论情况和建议就有 172 件。还有大批人民来信。中央、中央文革认真研究了这些建议，进行了修改，并根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将新党章草案提交这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各位代表对新党章草案，逐章逐条地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代表们热烈拥护新党章草案，并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大部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提出过、讨论过，有的已经采纳了，所以现在提交大会的新党章草案，没有大的修改和变动。

大家看到，新党章草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四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集中了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而制定的。正如林彪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讲的：“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

党内外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讨论新党章的过程中，大立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破刘少奇的招降纳叛的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高度发扬党的民主，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力推动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动了整党建党工作的进展。

新党章草案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首先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一伙，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种种借口，公然在他们制定的党章中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删掉。我们广大党员和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对刘少奇反革命一伙的这一滔天罪行，无比愤恨。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

底揭露和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一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在新党章草案中，以更明确的语言，重新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第二，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深、用得最好、执行最坚决。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遵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第三，新党章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新党章的总纲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

总纲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总纲还指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也是毛主席所讲的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所有权的大革命。

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1850年，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中阐述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马克思和列宁的不断革命论，是在批判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提出的，主要是强调必须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不间断地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他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否认工农联盟，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提出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

中国的托派陈独秀等人，宣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也否认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否认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变节分子瞿秋白，他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阶段混淆在一起，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了盲动主义路线。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路线，给我们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毛主席同这些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革命实践中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学说，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革命精神。并且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学说，提出了有阶段的不断革命的学说。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者的统一者，毛主席这些创造的阐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第四，新党章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新党章一开头就明确提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政治目的，规定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新党章明确提出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提出用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和毛主席关于整党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任务，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指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提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斗任务等等。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把打倒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写在我们的党章里，就是反帝必反修，把打倒苏修叛徒集团，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规定为我们党的纲领性的战斗任务。

第五，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单扼要。

毛主席指示我们，党章要简明扼要，适合工农兵群众的要求，去掉形式主义烦琐条文，突出政治思想，在起草新党章过程中，努力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新党章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世界上第一个党章《共产党法则》突出政治的长处。《共产党法则》是 1847 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新党章又吸收了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的长处，这个党章是 1905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中的工作，它的内容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新党章又吸收了我们党历史上有的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章简明扼要的长处。

新党章吸收了历史上国际国内党章的长处，避免了那些冗长烦琐条条。新党章只有十二条，篇幅短，政治思想突出，内容简明扼要，力戒烦琐，结构严密，逻辑性强，语言精炼，好记易懂，便于广大工农兵学习中掌握。听说现在就有许多工人、农民就能够背诵我们的新党章了。这是毛主席英明指示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的伟大成果。

新党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让美帝、苏修、叛徒王明、蒋介石匪帮和各国反对派去狂吠、去叫嚣吧！正象我们林副主席所讲的，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黄永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同志们：

我们最热烈地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会上所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热烈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是对我党四十八年历史经验最精辟、最深刻、最科学的总结，是开好这次大会的指导方针，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的团结战斗，夺取更大胜利的伟大号令，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回顾我党四十八年的历史，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粉碎了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阶级敌人，使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坚信，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一定能在全国取得更大胜利，一定能对世界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

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一个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报告。

新党章是毛主席建党思想、建党路线的光辉结晶，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就保证了我们党一定能够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对主席极其重要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热情宣传，坚决执行。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我党、我军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倒退，就失败，就丧失一切；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就有了一切。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在国际上

反对帝、修、反的伟大革命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永远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林副主席几十年如一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最忠诚，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坚定、最勇敢，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一直大力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号召全军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使我军革命化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为在全党全国普及毛泽东思想、在世界革命人民中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一定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加强部队革命化建设，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遵照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投入到“三支”“两军”第一线。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的柱石作用。认真总结经验，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对美帝、苏修的侵略阴谋，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特别要做好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准备敌人大打。既要准备敌人打常规战争，又要准备敌人打核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更加充满了胜利信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必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近，苏修入侵我珍宝岛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世界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王洪文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同志们：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大会，是一次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会上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我们广大的工人阶级表示最热烈地拥护，坚决地照办。

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伟大的行动纲领。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和落实。

我们决心做到以下几点：

一、狠抓根本。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各条战线上，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迅速地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坚决做到，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海枯石烂，红心不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真理：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败，这个拿鲜血换来的经验，我们广大的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忘记！

二、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工厂斗、批、改的任务，认真搞好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落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并且“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永远朝气蓬勃，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教导，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和带动生产，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促使经济战线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的跃进，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四、我们要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加强战备，武装好工人，随时准备好粉碎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关于不能轻易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教导，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永贵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各位代表同志：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大的喜事，最大的幸福。我们贫下中农颗颗红心向着毛主席，千遍万遍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次大会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将在我党历史上产生极其深远、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上所作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大会所广泛讨论过的新党章，都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文献，字字句句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斗争的航道，保证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坚决贯彻执行。

在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我们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我们贫下中农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毛主席为我们贫下中农撑腰，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党四十八年的斗争历史，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胜利。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正如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就靠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快三年了，三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千变化，万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亿万人民中大传播、大普及是最大最大的变化。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社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更高了，大家说：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也不难；怕这怕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也不怕。用毛泽东思想斗天，

天低头；斗地，地变样；斗灾，灾认输；斗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就垮台。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最怕人民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如饥似渴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命根子，誓把全国广大农村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一定要牢记林副主席的教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的一切行动。我们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要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作好一切打仗准备，用农业支援工业，支援前线。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孙玉国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即将通过的新党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我们热烈拥护，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是来自珍宝岛的边防战士。三月二日、三月十五日，苏联叛徒集团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进行了自卫还击，给了敌人以应得的惩罚，胜利地保卫了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我们全体指战员，怀着的一颗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就是粉身碎骨，也不向苏修让寸分！”

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有力地证明：苏修和美帝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是纸老虎。同时，也再一次证明，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没打过仗，但是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就无敌于天下！

在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武装侵犯珍宝岛的斗争中，广大民兵和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配合人民子弟兵，一齐投入战斗。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同仇敌忾打豺狼，出现了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们的边防是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长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的胜利也一定是打出来的！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如果帝、修、反胆敢来犯，我们就一定把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统统把他们送进坟墓。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誓死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尉凤英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大会主席团、各位代表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次大会。

我们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热烈拥护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热烈拥护新的党章。这些伟大的革命文献，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是照耀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前进的灯塔。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坚决照办！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二十九年前教导我们：“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妇女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党历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妇女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这是中国妇女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

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一切。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心明眼亮不转向。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人换精神厂换貌、人换精神地换装。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就能千秋万代不变色。

有了毛泽东思想，帝、修、反胆敢来进犯，我们就能把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光！

有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我们决心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们要以林彪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海枯石烂心不变，天崩地裂志不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纪登奎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席团、大会代表同志们：

我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会上的极为重要的讲话，衷心拥护林副主席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我完全拥护经过大会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次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我们的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我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发言，心情很激动。我感到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一个共产党员，跟着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直接受到毛主席的教育，是最大的幸福。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自己教育太深了。我这个人，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受了是刘少奇黑修养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过去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众很多批评、教育，经受了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锻炼。

开始，我对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很不理解，当革命群众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触及了灵魂。触及一点，理解一点，触及的深点，理解的就深点。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下，怕字少了，敢字多了，才逐步提高了点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间，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路过郑州，伟大领袖对我这样一个犯错误的人，给了很大的鼓励。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群众对我整一下，大有好处。我说的是心里话，是老实话。我深深体会到最关心我们老干部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收获之一，是老干部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冲掉了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批判了资产阶级错误的东西，使干部学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继续革命，学会怎样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学会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这不是大有好处吗！可是，我们党内的某些犯错误的老同志，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糟得很”，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走上了反对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道路。另外最近发现在我们那里有某些同志，虽然主观上是热爱毛主席的，但是，至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甚理解。不去看我们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是埋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些支流的东西，挑剔与伟大成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在那里闹“三气”，就是那个怨气、泄气、不服气。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应该从某些犯错误老同志那里吸取教训。我也算个老干部，今后更应当谦虚谨慎，按照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自觉地、虚心地听取群众批评，接受群众监督，“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也就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问题。由于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不论是对支持你的，还是反对你的，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教育帮助。如果按照支持自己或反对自己作为区分是非的标准，甚至对反对过自己的群众实行压制，那就一定要犯大错误。

在我们那里，还有一些工厂企业，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一派掌权压另一派的情况，对毛主席的政策落实的还不好。这不怪下边，主要是我们领导上工作没有做好。会后，我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坚决认真宣传、贯彻执行执行“九大”的路线，认真总结经验，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九大”全体代表保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月十四日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进入主席台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不绝。

毛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当这两个文件一致通过的时候，全场长时间地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四月二日起，全体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

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和学习了毛主席在开幕会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示热烈拥护，坚决照办。代表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了党的历史。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个党员；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今天，我们党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代表们说，这就是历史对我们党四十八年的英勇奋斗获得伟大胜利所作的结论，也是历史对陈独秀、王明等曾经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破产所作的结论。只有懂得党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代表们一致激动地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家充满信心地说：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我们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我们这次大会，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开得很顺利，很团结，很好，它一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个夺取全国更大胜利的誓师大会。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段、逐句地反复地讨论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个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今后的战斗

任务，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代表说，林彪同志的报告，把我们想要说的，都概括进去了，我们越读越高兴，越读越亲切。代表们还对报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章逐条地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代表们认为，这个修改草案，是全党、全国革命群众共同起草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代表们认为，这个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在四月十四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发言的同志一致表示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拥护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拥护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他们发言过程中，全场不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大会在通过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后，决定将这两个文件委托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作文字上的校正以后发表。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各族亿万革命群众，举行了盛大游行和集会，欢庆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收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兄弟组织，许多友好国家、外国进步组织、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共一千九百七十七件。他们对我们党的这次代

表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他们的祝贺和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四月十五日起，进入第三个议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代表并将继续分组讨论，结合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

第一章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经历了长期的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满怀信心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全党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全国各民族亿万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四）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党员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应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必要时，在非党群众中公布。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 党的组织原则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

地方、军队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党委员会的人选，都必须经上级组织批准。

第七条：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一元化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每三

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一般设支部；党员较多或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也可以设立总支部，或者基层委员会。

党的基层组织，每年改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它的主要任务是：

（一）领导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对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五）发展新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吐故纳新，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二、代表大会的第二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及各大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这个名单很难排。比如北京军区六个军，只有×同志（一个军长）排上了。候选名单排上的，大多数是好同志，但并不一定个个都那么好。排上名单的好的是大多数，能保证党的领导。但也有的不那么理想。还有很多好的没排上。这么大数目，怎么能都了解清楚呢？不见得选上的、排上的都合乎理想。有的同志在中央工作犯了错误，不排又不好。也不是没列入的比列入的强。历史上常常证明后来者居上。头一次要进中央委员会的占名单的大多数，“七大”没有这么多人，“八大”也没有这么多人。八届中央委员只到了 50 多人。

工农代表要做工作。但要帮助他们，不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这些同志在地方上很活跃。参加中央工作后，来访的人也多了，就要妨碍他们联系群众和参加劳动。（有的同志从中央到社队都有工作，五种职务。大队和中央的职务留下，其他去掉。）不要脱产，这就是又要工作，又要参加会议。我们安排的县地委一些同志，只是了解本单位的情况。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全国的情况。长期脱产，一到我们中央，这几个坐机关来，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选工农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过去有，这次是主要的。工农占中央委员会 70% 以上，解放军是大多数，也是出身于工农的。

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会不会变化？犯过错误的可能变好，不变就不行了。新选上的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我们需要工农积极分子。有的省就提不出来，这就说明他们脱离群众。我们这些同志要了解积极分子，要和他们交朋友，开个会，了解不清楚的要和他们谈话。谈话就清楚了。黄永胜同志，打张辉瓒时你干什么？（黄……）到北京才认识。领导同志不要忙于事务。事务工作要做，但有些不管也可以。

这个名单大体上是公道的，但也有些不公道。譬如说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为什么这么分？我就说不清楚。比较困难的是几位老同志。

一些老同志排上了还得选他们（许世友：他们反毛主席几十年还选他们呐？）反几十年难说，要你许世友选是困难，这些人资格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检讨也检讨不清楚，就不要写了。写了大家也不满意，还不如不写。让他们到群众中去。世界上有这些老同志有什么办法？也有功劳，也有错误。我看这样就差不多了。看他们今后的表现。我们看他们的行为，他们也看我们的行为。“七大”选了王明、李立三，王、李代表两条路线，不选他们还行吗？“八·七”

会议没有叫陈独秀参加，“六大”叫他参加，他就不来了。李维汉在湖南就很右，他同情把农民运动骂成痞子运动。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很“左”，形左实右。形“左”实右是掩盖右倾的实质。“左”是形式，右是本质。这些人后来都坏了。现在选进坏的也不怕，没有他们，地球还不一样转？

（许世友：毛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那不行。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么！

我看共产党就比国民党和其他党好。我们选举，起码不用花钱买选票，不要活动费，没有到会的也可以选。“六大”我就没有到莫斯科，也选上了。王明统治四年，太“左”，不适合当时情况。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由于政策适合当时的情况。资产阶级搞什么议会选举。我认识一个人，为了当税务局长，只当三个月，花了很多钱买选票。当了以后就拼命地刮皮，要不他就蚀本了。我们共产党是灭不了的。我们有政治纲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不能埋头搞选举，更重要的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要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我们有许多根据地，活着的差不多了，抗战以来，人多了。

在会议过程中，有些代表团提了意见，我是赞成的。黑龙江的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这个名单没有刘少奇一伙，王明说他是精华而我们是糟粕。刘、邓要有区别。邓小平在红七军时临阵逃跑，在北京又干了许多坏事。他打过仗。有人说他打仗也不那么行。在中央苏区他是受打击的。

还要选政治局委员。挺麻烦？你们想一想，一步一步做。我想由下而上的方法比较好，只提数目，不提名单。大家想想比较好。搞个政治局常委，想一想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周恩来：主要在于协商，由下而上。过半数当选。用票数多少比较，不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表现。）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

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

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是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

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讲话。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伯达 周恩来 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康生在中央召开的整党建党会议上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同志们,我首先说明一下,刚才纪登奎同志讲话要修改一下,我不是作什么报告,因为我没有作准备,也没有系统的想,只是想到几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不是什么正式报告,同志们可以参考一下。你说是报告,同志们回去就

要传达罗！你不传达，封锁中央同志报告，那对你们不得了嘛！所以，这一点改正一下。

另外，和同志们谈的时候，我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在座的大概是三部分同志：一部分是参加整党建党会议的各地方、各部队的同志，一部分大概是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的同志，另外还有个别搞文件的同志。这三部分同志或多或少同我都有点关系。

整党会议实际上我根本没有管，但名义上中央决定我、春桥同志、谢富治同志管，实际上是纪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郭玉峰同志、曹轶欧同志和杨德中同志他们五位同志管。但不管怎样，分配我这个任务，没有好好地抓。

三个专案组的很多同志，在我管专案中间，同我都有些关系。写文件的同志，在业务上管一下，但是政治上也没有怎么管。昨天周恩来同志所讲的国际国内的那种形势，他们闭塞得很。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努力不够，客观条件不讲，所以有点对不住参加整党会议的同志。有些问题，想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次会议开得还好，之所以好，首先就是纪登奎同志、郭玉峰同志，以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未开会前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调查工作、研究工作，所以心里有底了，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六厂二校做过典型的实践工作，这方面，对我们的会议有很大的帮助。纪登奎同志与其他同志亲自到六厂二校去调查过，接触过。此外，也有同志们的努力，各地方交换的经验，实际上工作做得好的不只是北京六厂二校，每个地方总是有上、中、下就是了，每个地方总有好的经验，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你们介绍过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虽然张春桥同志觉得还不够，但是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十七厂的情况跟其他厂还有点不同，这个厂是党员起来领导造反的，和其他厂有点不同，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所以，这方面应当说，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学习了六厂二校的经验，交换了各地方的经验，讨论了文件，思想上理论上有所提高。有些政策问题大家也交换了意见，政策问题各地方是不平衡的，就是一个单位，这部分同那部分也是平衡的。

所以，任何经验，必须结合具体的单位、具体地区、具体的环境来运用，不能套。有些问题咱们在会议上觉得可以了，但是在实践中间感觉到还存在着问题。对一个问题，总是象毛主席所讲的，实践、理论、再实践，不断地提高，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发展。

应当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具体的环境。具体的革命相结合。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的要活学活用。我们在会议上讨论一些问题，读了毛主席著作，但是到底怎样运用，当前的会要开完了，那就是在实践中间去检验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决定到底适合不适合，认识同实践有个过程，不是认识了以后，实践当中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过程。

你们的简报我没有全看，几次想来听取你们的讨论，因为事情很多，把工作有所耽误，不说客观了，主要是主观努力不够。

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地方的负责同志要抓这件事，但是负责同志抓得不够，这个批评完全对，这个批评也包括我在内。

刚才我在汽车上又回想了一下，在全国解放以后，叛徒刘少奇、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我是没有去过的，人家不大高兴我去，我也不太高兴去。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时候赫鲁晓夫还没有上台，没有解决。所谓解决，也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差不多，一般地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个党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做组织工作的人，总是常常不做思想工作，常常把思想工作同组织工作割裂开。这一点我自己是有经验的，一九二八年我作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我又在中央组织部做工作，我本身就是这样，做组织工作忙于组织事务，不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工作，这件事不只是我，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的。当然，不包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毛主席做过党的组织工作。

由于长期形成的这一种习惯，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两个问题，使我深刻地想了很久很久。

一个问题，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党。过去我就没有想过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总是觉得组织上入了党，大概思想上也就入了党。否则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呢？这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四个第一，思想工作同政治工作有关系，但是做政治工作的人有时不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你们读“毛选”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主席在整风报告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这件事对我也有相当大的启发，平常想，谁没有一点主观主义呢？怎么还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从前了解党性不纯，就是不服从纪律，不好好工作，说怪话，消极怠工，贪化腐化等等。这是大家懂得的，但是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首要表现，我就没有想过。

所以，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把建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提高到思想工作方面去了，提高到政治方面去了，一直提高到哲学、世界观方面去了。

主席的整风报告发表几十年了，但是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不能注意或者不十分注意思想工作，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没有完全实行的。当然，在毛主席领导下，通过过去的整风，毛泽东思想直接为广大群众所学习、所掌握、所运用，那比以前还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并不是说已经完全解决了。

所以，同志们说领导同志（不是所有的同志），尤其是各省市核心小组的同志，抓这个工作抓得不够，断断续续，时冷时热，这件事同认识上或多或少有点关系。

拿现在全国的整党工作来看，根据同志们的报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事实，这是同志们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整个的整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全国整党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的问题不少，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从思想上了解整党工作抓得还不够。

譬如说，从你们的文件中间来看，全党真正的学习党章，报纸上解释党章，党的刊物上介绍党章的文章，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从材料中间看，广东抓得比较紧，党章通过一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加以注意了。但是，从文章的本身来看，解释党章本身很少，主要是体会。

全国大家积极地拥护主席的整党“五十字”方针，在会议上大家都充分地讲了。但是“五十字”方针到底怎样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是很深入的。我看你们简报上讲“五十字”方针的讨论也是各式各样的意见，这很好嘛！大家交换意见嘛！但是，由此可见，思想方面，解释工作方面，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同样，我说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好。但是，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这个会议中间，还有没有不足的地方？这种不足的地方，首先是要我负责，不是同志们负责，我根本没有管。

我觉得这次会议好的地方，是政策性问题讨论得多，但思想性问题讨论不够。是不是这么估计，这个看法妥不妥当？因为我只是看看简报，而且还没有全看。

总而言之，提出一个问题，各地方整党头一条总是说要思想整党，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思想工作到底怎样做，并不是那样很具体。

譬如说，主席的“五十字”方针，各地方也好，在我们的会议上也好，大家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拥护这个问题，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知道，一九六七年十月，青海的同志提出来，他们那里是不是可以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主席在这个电报请示上，作了批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发生的问题，对整党建党作了高度的概括。全国、全党的同志注意它，学习它，研究它，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甚至强调，好象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才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只是“五十字”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所以，这一点同志们知道陈伯达同志所讲的，事先我们交换了意见，不能把整个党的历史、不能把整个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五十字”截然割裂。同志们学习、了解“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我们“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第四段，记载了这样的文字：“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无论在民主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间、无论在国际斗争中间，都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的发展是一样的。是在同阶级敌人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发扬起来的。同志们回顾一下，在民主革命中间，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开始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以后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然后同王明、博古、张闻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然后又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道路的问题是进行了斗争，将来五卷出版的时候，更可以看得清楚了。以后又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作斗争。在农业问题上，同邓子恢作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彭德怀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后，同以刘少奇为首的叛徒集团作斗争。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更加前进、更加巩固、更加团结、更加提高的过程。我们所以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取得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我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包括组织上的建党的思想在内。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割裂开，似乎除了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因为党领导一切，毛主席语录三十三部分起码大多数是关于建党的问题。那里只有“五十字”的方针呢？如果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割裂开，那就不会了解到“五十字”的建党方针。所以，如果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就不会真正的了解毛主席的建党思想。

你们不是常拿语录吗？你们打开语录看一看，第一部分是讲共产党，第二部分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第十部分是讲党委领导，第十一部分是讲群众路线，第十二部分是讲政治工作，第十六部分是讲教育和训练，第十七部分是讲为人民服

务，第十九部分是讲革命英雄主义，第二十三部分是讲调查研究，第二十四部分是讲纠正错误思想，第二十五部分是讲团结，第二十七部分是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十八部分是讲共产党员，第二十九部分是讲干部，第三十三部分是讲学习。这些部分直接讲到党的问题，其他部分也涉及到党的问题。

所以，不要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路线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指导整党建党工作的同志，必须全部去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方面。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没有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不怪同志们。

另一方面，大家很重视“五十字”整党方针，但是到底“五十字”包含那些问题，怎样认识？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这个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六厂二校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讲过一下，我说，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我也跟同志们讲过，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共青海核心小组，问中央“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不是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了这么五十个字：“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一些问题，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概括成：“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但是，这个高度的概括，我刚讲了，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我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一方面，不应当割断历史；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到底包括那些内容。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这样一个先锋队的党，它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它是先进的部队。这一点在“五十字”中间没有明确提出来，有的同志说，到底那个为重点？大概他还没有完全看懂。基本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句话，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

组织。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很清楚，我们整党首先要从思想上整党，就是这个意思。“五十字”虽然没有讲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武装，但是，毛主席用先锋队组织表达了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没有写，但是如果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没有先进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一点也反映了我们在党的工作方面，不重视思想性的问题，不着重思想第一。大家很清楚，没有毛泽东思想，很多东西都没有嘛！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长期的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战胜一切修正主义，以及“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也不可能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

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思想入党。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这是讲的什么呢？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能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这种先进分子，必须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就是你们讲的“三忠于、四无限”，这种先进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进行阶级斗争，敢于英勇地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这是我们的阶级基础。

在整党中间，有些地方不是犯有错误吗？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在座的同志你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路线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那些各式各样的所谓造反派来领导整党？在一个时候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蒯大富他们要插手给共产党准备“九大”（笑声），你们不要笑，人家组织了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要准备“九大”，扫除“九大”障碍。这件事，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工宣队的同志，你们弄不弄

得清楚？他们是怎么设想的？他们清除“九大”障碍，是要清除谁呢？大概是要清除我们。他们想夺取召开“九大”的大权，所以，我听说有这样的示威，我对谢富治同志说：“要坚决制止住。”有一个时候，他们自己准备谁当中央委员，由非共产党给共产党准备“九大”，总是不那么合适就是了。基础不大巩固，一反就反掉了，昙花一现嘛！由造反派整党，在有的地方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有的地方就发生的严重了，其中严重的就是四川，四川介绍了这种经验，我就不详细讲了。把这种思想搞在整党建党上去，群众不晓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领导同志，老共产党员，也一时糊涂，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

同志们要问，我们整党不是要实行群众路线吗？又说实行群众路线，又说不要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这如何理解呢？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路线，党的路线，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群众的尾巴；极“左”思潮的人可以走到否认党的领导。所有这些思想在整党中间都应该看清。大家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是产生了一个“二月逆流”吗？“二月逆流”是谭震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发谬论，说文化大革命只讲群众路线，不要党的领导，他说这叫作形而上学。可笑得很，他大概也不晓得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把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二月逆流”的干将们否定了党的领导。我们当时反驳谭震林：你把毛主席摆在那里去了？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我们揭露他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间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党的组织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个辩证关系，要领导群众，就要依靠群众。所以，我们的整党是开门的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所以要进一步了解，怎样叫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不是群众领导党，而是党领导群众。党要依靠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广大群众才能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没有先进的队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基础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怎么进行阶级斗争呢？即使进行了，也是要失败的，这一条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黑修养》讲的。《黑修养》只是讲修养，不

进行阶级斗争。党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一个“朝气蓬勃”，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作“驯服工具”。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先进分子加入党，有了广大革命群众，一方面领导他们，一方面又要向他们学习，依靠他们，去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党就成为一个先锋队组织，这样的党，在苏联来说就是列宁的党，在中国来说就是毛泽东的党。

所以，对“五十字”一方面不要割断联系看，另一方面不要笼统的提几个口号，要有具体的分析、具体的了解，在了解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指示是一个整体，伯达同志昨天晚上，不是念了毛主席一九三七年给陕北公学的题词吗。毛主席在题词中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里也是讲的先锋队。关于先锋队的内容，主席也不只是在一九六七年才提出来的。主席接着说：“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向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可以和它联系起来。

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也可以和接班人五条联系起来。

接班人头一条，就是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五十字”方针所说的先进分子。第二条，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五十字”方针里面所说的阶级斗争。第三条，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甚至要团结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就是讲，怎样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嘛。第四条、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这就是生动活泼嘛。

所有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指示、方针、路线，不能不求甚解。毛主席说：“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所以我说，大家重视“五十字”方

针是对的。第一，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不要割断历史；第二，不要不求甚解，当作口号，要作具体分析。另外，要下一点功夫，我们的思想才能统一起来。这是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了，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各地方也好，我们这次会议也好，对于党章的学习重视不够，譬如我刚才说了，现在报纸上，解释党章的文章，都是一些体会、感想等等，对于党章本身的解释我们没有做。《红旗》杂志也没有做，你们也没有做，在会议上也没有专门讨论。党章总纲中很多问题需要解释，譬如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什么说这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学习具体政策是对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要因为注意具体政策而放松了对于整个党章的学习。

最近苏联修正主义，在《共产党人》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地批判、诬蔑我们的党章，这说明我们的党章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

所以，在党章的问题上，我们同党内隐藏的敌人，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斗争，还是拥护党章，还是反对党章，还是对党章表示漠不关心，这都是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首先指示我们，要动员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修改党章过去都是领导机关搞。这一次毛主席说，要动员基层的党员参加修改党章。并作了一个示范，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工作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这个通知发下去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就展开了。全国上下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外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地、认真地讨论和修改，而且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改草案。中央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起草了一份，据我知道，组织部起草了一份，中央办公厅起草了一份，党校起草了一份。各省市综合了一下送到中央来的共有一百二十六份。从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发出指示到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整整经过一年的时间，从下而上来修改党章，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敢于打破迷信，敢于修改党章，敢于负

责，有的还搞得不错。应当说，现在的党章，一方面是根据了毛主席的指示原则；另一方面也集中了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集体智慧。总而言之，整个的过程，是经过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几次反复讨论。一九六八年集中到十二中全会，各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根据十二中全会意见，又重新修改了，然后再发下去讨论。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以前，又在下面充分进行了讨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到中央来，然后中央吸收一些好的意见，经过修改作为草案提到“九大”，“九大”各小组又充分地进行了讨论，四月十四日才最后通过。

这样，通过修改党章，就实现了广泛的、有领导的、党内的民主。这种民主生活，可以说在党内以及在外国党中间是没有过的。这实际上是最大的民主。

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党章，把群众、党员的积极性和对党的责任心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开动脑筋，反对刘少奇“八大”搞的那个党章，同意了新的党章，把原来的六十几条，变成十二条。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说要通俗易懂。这个党章有毛主席的指示，有广大群众的智慧。在我们修改中间也参照了马克思起草的第一个《共产党法规》，也参照了列宁一九〇三年起草的那一个党章。我们去掉了形式的、烦琐的东西，把精华吸收到我们的党章里面来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东西呢？我也没有和同志们正式交换意见，但是，我觉得“九大”通过的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七大”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革命的指针。”

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在一个时候，有一种错误说法，说“七大”的党章是叛徒刘少奇搞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时，有一个修改党章的委员会，名义上是刘少奇作头子。但是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写在党章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是反对王明的修正主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反对彭德怀投降主义、反对王明“左”右倾主义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中间反映到党章修改委员会里面，写上了毛主席的思想。刘少奇招摇撞骗，说是他起草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然同志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的时

候把它取消了。在当时延安整风那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对全党的要求，叛徒刘少奇不能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是一到进城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他同这些叛徒们，对毛泽东思想就更加抵触了。毛泽东思想是要逐渐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他们就用许多借口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也很奇怪，我在“七大”参加了起草党章，但是在“八大”时候就没有让我参加了，让我干什么呢？就让我做两件事，一件给林伯渠写发言提纲，我没有写，交给《红旗》杂志的一个同志了，还有一件给朱德写一个发言提纲，我交给秘书写去了。

“九大”的新党章首先一条，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也表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七大”写上了，“八大”取消了，“九大”再写上。不仅写上，而且通过总纲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概括。

同志们可以仔细地研究一下，总纲的第一段就是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这个党干什么呢？第二段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比“七大”的时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大大地提高了。

第五段：“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六段：“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家可以看，它的顺序是：党的性质、党的目的、党的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基础、党的领袖，最后讲我们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觉得，“九大”的党章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的概括是比较好的。第八段是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拿我本人来讲，过去并不是那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讲，叫做一个过渡阶段。大家知道，所谓过渡阶段，在一种意义上讲，它是从一个社会发展另一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两个阶级之间，都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说，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氏族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说是过渡阶段。但是，过去的人们不了解，可谓过渡阶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一个过渡。不晓得同志们是怎样想的？老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过去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总是比较短吧！列宁讲过，说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你们去翻一翻《国家与革命》，总是觉得阶段比较短，很快可以到共产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一个时候说，他们已经进到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修正主义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总觉得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范畴。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他的理论和实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所谓历史阶段，是历史范畴的阶段，就象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间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一个叫相当长，一个叫历史阶段。这里面起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纠正了一种混乱思想。共产党总是希望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但是毛主席经常讲，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几十年，而是一百年到几百年。所以，这句话值得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下面接着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完全解决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权的党，现在不是那么迫切，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你找一找过去的那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们过去的土改大纲是怎样划分阶级的，从经济上、从剥削地位上划分嘛！主要从经济范畴上划

分阶级这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那就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苏联为什么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那个时候，说现代修正主义的威胁，还不那么明显，昨天晚上你们听了总理的讲话就可以知道了，的确存在着这么个危险。换句话说，存在着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你们开了一个月的会，这句话不一定完全都弄清楚，你们提出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不是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九大”讨论过，实际上所谓不断革命就是继续革命，就是翻译名词不同。

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呢？这个问题就大了，马克思讲过不断革命论，列宁讲过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讲过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中国的瞿秋白、陈独秀也讲过不断革命论，党章上所讲的：“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这里面包含几个含义，我简单说一下，所谓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讲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大家看到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上的名词运用不同，就发生疑问，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一个名词，两种翻译方法，大家不必在这上面多费时间了。这两个词为什么不统一呢？因为在马列主义史上，经常用的是不断革命这个名词，所以主席同意这个名词。

关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一八五〇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以及马克思在《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篇文章上，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问题，所谓不断革命，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不断革命同毛主席讲的问题有所不同，但是有个共同特点，都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应该不断地继续

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讲这个问题。他们不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要继续革命，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展的。历史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讲一下在党章上怎样去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发展。这里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准确地说，应当是这些矛盾只能靠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毛主席很谦虚，勾掉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这几个字。要了解为什么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不是讲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而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个阶段。所以，这方面是个很重大的发展，这是一条。还有一条，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文字上没有表达出来，主要使同志们知道，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与马克思、列宁所讲的阶段不同；第二，毛主席讲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

这方面，同志们可以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文件中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意思就是不能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否定不断革命，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阶段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所以，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是真正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要继续革命，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党章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不但是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而且找到了革命的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们说，党章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明确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明确规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章的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党章上讲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彻底的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现在苏修特别攻击我们这一点，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部队的同志，在整党中间，特别要深刻地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党章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从刚才我讲到的那些问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很短的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的问题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过去马列主义书籍上都没有或讲得很少，只有毛主席解决了。在苏联，托洛茨基也歪曲过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呢？他的理论就是不断革农民的命、反对工农联盟，认为无产阶级对农民还要专政。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讲的不断革命是根本对立的，是反革命的。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曾经一个时期宣传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也否定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否定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节分子瞿秋白，曾经利用“左”的面目，提出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讲的一次革命论，他否定革命阶段论。毛主席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的统一者。”“左”倾冒险主义者瞿秋白，就主张一次革命，不分阶段，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混在一起，他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搞了“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从陈独秀到叛徒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你们熟悉的，叛徒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就是所谓要大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中

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停顿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批评的停顿在民主革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叛徒刘少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最后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有伟大的功绩。我们党章上规定这一点，这是我们党章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党章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党章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党章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的政治目的，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明确地规定要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明确地提出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整党建党，整顿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任务。这里特别提到了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一点，在我们觉得是应当写的，苏修觉得是大坏事，戳痛了他。把反对苏修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反修，如果不反修就违反党章。所以，他们现在很恼火，又不敢明确地讲，今年四月十三日，苏修《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与叛徒王明有关系的。这篇文章首先说，对我们的“九大”，他不能熟视无睹，他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把反对修正主义写在我们党章上，他还能熟视无睹？他攻击我们党章，中国共产党半世纪以来还没有个党纲。我们历来认为，我们的总纲，基本上代替了我们的党纲。但是，我们是没有这样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纲，没有象苏联二十二大那样的党纲。他说党纲是要规定党的性质，是要明确地、有科学根据地阐明党争取什么和为什么而斗争。现在我们才懂得，原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党纲，规定了他的全民党这样的性质。他虽然现在不敢讲，但是，从这一篇文章证明，他还是要按照他这个性质来指导他的党，他的党纲，规定是全民国家，要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然后说，我们已经有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了，现在才开“九大”。的确我们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根据我们的党章规定，五年开一次，那么五六年就要开“八大”，六一年就要开“九大”，六

六年就要开“十大”。那么，我们现在拖了两次，好象这样不适合党章规定。我们同兄弟党的同志说，假如六一年开“九大”，那个时候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发现，我们就要同叛徒一道开“九大”。六六年要开“十大”，刘少奇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进行，我们还要继续同叛徒集团一道开，而且可能选他们做中央委员。我说，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把这些叛徒清出去，以后晚点开好，还是同叛徒一道早点开好？他们说，还是晚开好。开代表大会，要看用什么思想来开代表大会，不是时间的迟早，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党章来做。

然后，他又攻击我们说，我们这个党章是残缺不全的。从篇幅上看，比我们“八大”党章起码短一半，这恰恰是我们党章的好处。毛主席讲，要使工人、农民都看得明白，要通俗易懂。

他们说，我们的党章反对苏修，可是这些叛徒也软弱得很。我们的党章，明确地提出来，反对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不敢引用我们的全文，他说，我们党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把“苏修为首”的几个字去掉了。下面他自己又解释说，按照中国的解释，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说的苏联。我们党章上说，要同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他问我们，那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是谁呢？他们诬蔑这些人都是变节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把一些“健康的力量”都吐掉了，他们所谓的健康力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些叛徒，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他们的叛徒。所以，他们再三地讲，我们把他当作了头号敌人，把反对苏修从党章上固定下来。这说明苏修是惧怕我们这个党章的，惧怕我们党章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而我们党章上写这个东西，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必须把反对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与反修搞在一起，就是说反帝必须反修。这是党章的第四个特点。明确了我们当前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斗任务。

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党章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这是根据毛主席说的，要简明扼要，适合于工农兵、劳动群众的要求，要去掉形式主义，去掉烦琐的条条，突出政治。所以新党章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世界上第一个党章，就是《共产党法规》突出政治的长处，《共产党法规》是突出政治的。这是一八四七年共

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在他的党章上头一条，即明确地提出来，要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我们的党章，也吸收了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的长处，这个党章是一九零五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中去工作，党不是一个俱乐部，党员必须是做工作的。这个党章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不是以后那样发展到一百几十条。我们的新党章，吸收了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所制定的党章的长处，同时也吸收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的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章比较简明扼要的长处，避免那些烦琐条文。同志们可以看到，包含了“五十字”方针，在总纲上，也包含了接班人五条，写在第三章上。所以党章基本上概括了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时，也把我们从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整党建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通过党章记载下来。我们现在整党，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搞坏了，而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胜利的基础上，把我们党整得更好，继续前进，使我们的党成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党。成为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党。这不仅对我们党，而且对世界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赞成陈伯达同志的提议，要好好地、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五十字”的方针和新党章，好好地来一次学习，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此外，同志们提出来，领导机关要重视整党建党工作。我同意张春桥同志的意见，他自己拿上海作例子进行自我批评。这一点，各地方应当学习。

同志们还提出了青年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章已经有了规定，青年团还是要的，但青年团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工作，个别地方开始了。军队原来是有的，而且军队青年团的工作起很大作用，青年团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军队的同志提出好的意见来。

发挥青年团的作用，还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咱们这次会议没有办法议论，经验总结得太少了，恐怕你们回到各个地方，要总结一些经验，要交流经验，去摸点典型，调查研究，弄点材料，把材料弄好，把经验搞好，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团章还未改，这个方针定了就容易了，青年人很有积极性，发动每一个青年人来修改团章嘛！

总而言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同志们提出的整党建党工作，也要实行毛主席那一条，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从斗、批、改来说，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共产党什么事情就办不成，部队也有这么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也鞭策我自己，鞭策我们中央同志。这次会议是由两个新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领导，还有两个新的中央委员郭玉峰和曹轶欧同志，另外一个管六厂二校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干部杨德中同志。

我有一个汽车司机同志，到了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工作。我还有个警卫员同志到了北大哲学系，平时看那个同志政治也不那么高，有点散漫的样子，他现在告诉我说，他还领导哲学系呢？不但领导哲学系，北京不是有个鼎鼎大名的冯友兰哲学教授，资产阶级权威嘛！他还领导冯友兰学习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的确不但把刘少奇叛徒集团清除出去；而且使新的干部得到锻炼，涌现出来。所以，这方面应当感谢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

同志们：

传达“九大”会议，我们总结了在北京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传达“九大”的经验，采取了一个较短会议的方式，另外九大文件，本身三次经主席审阅的新闻公报，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和新的名单，全部登报了。现在登在《红旗》第五期上，大家每位可一读、再读、三读，再来念它就浪费了你们的时间了，你们也不见得好好地听，因为你们晓得本本么，这一次我们就免了这四个新闻公报，就是九届一中全会的新闻公报，那是发表了。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特别是选举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副主席为九届中央

委员会副主席，林副主席在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4 月 14 日讲话，林副主席怎样谦虚，更是值得我们热爱、支持、拥护。

关于“九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次讲话，两次是 4 月 1 日开幕词，4 月 28 日一中全会讲话，刚才宣读了两次，文本已经每个单位印发了，在这听了外，又可回机关各单位分组念给你们听，原准备读两次，每读一次时间就半小时，这次也免了，也是当机立断的节约。

还有一次是谢副总理念的。4 月 14 日在孙玉国讲话后讲的一段话，就是公报中谈到的“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许多同志问，“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讲的什么？谢富治同志宣读了两次，加上他的讲解，可以说是满足你们的要求了，还有在 4 月 14 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九个同志的发言，谢富治同志提到我的发言，另外八位同志的发言，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黄永胜同志、王洪文同志、陈永贵同志、孙玉国同志、尉凤英同志，纪登奎同志，都印发给各机关了，又可以节约一部分时间。

现在我也宣读，是公报上没有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九大开会期间邀集部分同志，主席团秘书处十二位同志，就是公报前一系列的，还有各大组负责同志。九大开会是每个单位一个小组，政府机关一万人，代表二十九人，加一起是四十五个单位，今天有五位出差，抓革命，促生产，其余今天都到了。我们这是一个小组，九大共有四十五个单位，各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单位，共二十九个单位，北京市一个单位，北京市的代表协商是很充分的，政府机关也学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另外军队方面有十个单位，十一个大军区选出自己的代表。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 80 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交流彼此经验，总结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六个大组，毛主席让每个大组推出两个人，

从中央老同志中象董老找出两位，共十四位同志，加上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同志谈过两次，又谈过一次选举问题，我把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内容很多，合成一个内容，当时没有录音，没有速记，个人记个人的，对起来也困难，从北京取得经验，各单位传达不全一样，加以整理，今天传达的比较好一点，你们说政府机关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还是念，加一点解释。

就是秘书处几位同志加另外几位同志，即 4 月 11 日、13 日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召见会议，是个人笔记，未经毛主席审阅，记错了我说错的责任。

（以上为周总理讲话，下面开始传达。括号内为周总理和林彪的插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更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3 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

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26年，27年，28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1927年12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1929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底到28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1930年6月到8月。三次是王明路线，31年到35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50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AB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AB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

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 28 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28 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28 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一千多人，他们自称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28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

（总理：毛选一卷 37.5.3 和 37.5.7 两篇文章。）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1927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1938年。

（总理：可学主席 1937年 11.12 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1942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

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垮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

他们有后台，要认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林总插话：主席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六厂两校。）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抓，现在可以了，我就搞几个典型，统统抓，搞不过来，只好搞典型，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但是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去抓。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捉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 400 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尿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的，现在不仅解放军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1968年7月27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人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打死人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22万万元，

每年给 5% 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康生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的讲话

康生讲话

毛主席四月二十八日的讲话对“九大”方针和今后任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概括。中心问题，从头至尾贯串一个团结问题。团结的目的是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次讲话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各个问题。主席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再解释，只就个人粗浅体会谈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学习参考。

一

主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主席首先说苏修，叛徒、汉奸王明及苏修各种刊物攻击我们党是小资产阶级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党，说我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军事官僚专政。我看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苏修叛徒集团吓昏了，吓得惊慌失措，连忙翻出他们的老祖宗叛徒考茨基攻击列宁的话来攻击我们。叛徒考茨基在《社会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列宁“在民主的废墟上成立了政权，建立了军事官僚专政。”苏修叛徒集团说我们也是军事官僚专政，可见修正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骂成军事官僚专政，是他们的老传统。修正主义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主席过去说过，“他们攻击我们是教条主义，实际上攻击的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他们攻击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反面教员攻击我们，咒骂我

们，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当前有真社会主义，有假社会主义，有真马克思主义党，有假马克思主义党，还有半真半假的。有真无产阶级专政，有假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国际问题很好研究识别。苏修叛徒吹嘘他们自己是列宁的党，我们看它的领导阶层实行的是背叛列宁的修正主义的党。他们说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把列宁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法西斯的国家。修正主义对内实行资本主义，对外实行侵略，把列宁的国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主席说他们就是不敢骂我们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我们就敢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专政。

苏修叛徒集团攻击我们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正革命的党？对这个问题，我们党一九六三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回信》（即二十五条）的第二十四条已有论述。

第二十四条：（略）

……

我们当时提出了这些条件，因此，我们的党成为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苏修叛徒集团还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我们想是这样的：

（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林副主席报告讲到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威特兰写信中说的三条，（读三条，略）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基础？那必然导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很大贡献。明确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有了巩固的基础。

（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分不开。“二十五条”第十九条说得很清楚。

第十九条：（略）

……

真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一元化，有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军队不是对内压迫群众、对外侵略外国人民的工具，而是对内保卫革命，对外支持国际革命运动。苏修攻击我们的一元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军事官僚专政，实际上是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攻击我们一元化倒退，实际是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

二

我们有些同志本来是好人，但跟着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犯了错误，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在工厂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这里面，主席告诉了我们政治通经济的关系。苏修攻击我们党章不讲“经济建设”。从他们的攻击我们又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这问题值得考虑。苏修说的是经济建设，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利润为原则。刘少奇紧跟苏修，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结果好人跟他犯走资派错误。经济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了这个问题。说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就。运动中证明哪些工厂抓得好，哪些工厂生产就突飞猛进。刘少奇在黑《修养》中曾经说：“我们将来的建设……技术工作将占首要地位。”一九五二年，他又对留学生说：“你们学好一门技术，革命就差不多了。”他的革命就是学好一门技术。

列宁、毛主席在经济建设上，政治是第一位的，苏修叛徒集团、叛徒刘少奇都说经济第一位。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两条路线尖锐斗争。斗批改中必须彻底批判苏修、刘修，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

落实政策中间，应很好认识。主席举了“二七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的例子，说工厂里有坏人，但坏人总是极少数。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轻重，对坏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检讨得好，还要给予出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反对扩大化。主席几次讲话反复讲这个问题。

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看有主要有两个倾向：

一，扩大化。各地不同程度都有。个别地方还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正在纠正。这是一种倾向。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

二，最近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个别群众组织的头头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思想，认为他是造反派，只能清别人，不能让别人清自己。他们对造反派不加阶级分析，不以一分为二方法看问题。造反派中间也混进了坏人嘛。“七·二七”进清华（大学），有个宛长福（注：贵州“四·一一”派的）就丢了四个手榴弹。说明造反派中有坏人。……一个是抗拒在造反派中间，革命队伍中间清坏人，一个是矛头指向解放军、军管会。这情况山东正在纠正，武汉也在纠正，河南也有，四川也有。完全是干扰毛主席的大方向。实际上是干扰“九大”的传达和落实各项政策。

这两点都要注意。防止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专案干部特别要注意。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组织头头要特别进行教育。

四

主席报告中讲到整党建党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各地正在搞，但总结经验、抓住典型还不多。进行这项工作，首先一个问题是思想整党和组织整党问题。有的地方作得好些，有些地方只注意组织，不注意思想。现在新党章通过了，党章党纲中有一段讲到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应很好组织学习，思想上以毛泽东建党路线教育干部，批判刘少奇叛徒建党路线，彻底批判，然后组织上整党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主席指出，不但整党员，而且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这里的问题开门整党还是关门整党……

有的地方作得好，向群众开门，不是形式上的，不是敷衍。另一种不敢让群众参加，，关门，半开半闭。所以整党问题中，四月二十八日的教导特别值得注意。整党一定要搞，但要小心谨慎，粗枝大叶就要犯错误。整党中间要特别执行主席四·二八讲话的教导，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批判计较功劳大小和私心杂念和叛徒刘少奇的保命哲学。

主席的讲话涉及问题很多，打仗问题等，一下子学习不可能都学好。但开始讲团结问题，最後又讲团结问题，而且给“九大”作了估价，说会开得不错，“团

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说保密工作作得好，因为叛徒、特务挖得差不多了。从王、关、戚，杨、余、傅清除後，消息不再走漏出去了。无产阶级队伍的纯洁，党的团结，在主席思想的指导下，团结才能这样巩固，将会在今後取得更大的胜利。

陈伯达讲话（摘录）

苏修新沙皇还是继续帝俄沙皇的老传统，想侵略中国的东北和长春一带所有的领土，新疆所有的领土，甚至西藏、青海。这是俄国老沙皇计划的，俄国老沙皇曾派他的特务到西藏、青海、蒙古各地方和东北，当然到了北京，准备占领长春以北，新疆、西藏这些地方，甚至占领整个华北。俄国老沙皇是这样计划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书信集。上面有材料，看看俄国老沙皇怎样占领中国。现在珍宝岛实践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是俄国新沙皇尝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动一动手脚，看看会不会怎么样……

现在苏修、美帝要占领我们的地方，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市场。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只有他来了才能消灭他……

主席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氢弹都要有，要超过他们。这方面要有雄心壮志。……

我们有很多的优越条件：有无产阶级思想，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口，有这么大的国家领土，世界上任何敌人都会被我们打败，任何困难都会被我们克服。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失掉的只是一条锁链，而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世界。

这样来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就可以懂了。……

据我所知，一九四九年人民中国成立後，党内所有限制、改造资产阶级的文件，社会主义的文件，都没有刘少奇参加。刘少奇没有参加其中哪一个文件的工作。而相反，所有毛主席知道的、写的文件都是反对刘少奇抵制刘少奇反动路线的。

……农业合作化，他说先有农业机器才能合作化，和毛主席思想违背。毛主席说先有合作化，再机械化。这关系国家命运，很重要。主席常说工农联盟建筑在反封建基础上，土改後如何，继续下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有了这个联盟才能彻底孤立资产阶级。……

毛主席提出一句有名的话：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心血来潮就是忽左忽右，不能掌握正确的方向，不能按照党的政策前进。应该按毛主席的政策、方针去作。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和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伟大的发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就要避免片面性。右的或左的，各种片面性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帮倒忙。

有一天晚上，我们同一个省、一个市的一些代表谈过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学习《语录》第一八七至一九六页，就是对待问题要避免主观片面。思想片面，总容易犯错误。你有你的片面性，我有我的片面性，各执己见，不是全面地看问题，就不能搞好团结。在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道路上发生了障碍，其他事情就只好做了。

主席很早以前，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说过：“我们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海中游泳，要学会这个游泳，不要使自己沉下去，也不要呆在边上。这就要学会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避免片面性，全面地看问题，巩固大联合、“三结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解答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的第一段说：“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同志们提出应当怎样地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了解得也不深刻，想谈一点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在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林副主席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精辟地阐述了 this 学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谈到毛主席对马列

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光辉发展，谈到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要深刻地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要好好地研究林副主席的报告。

同志们学习中间，各机关的《学习简报》提出了一些问题，不少问题，要求适当机会得到解答……

有的同志问：在林副主席报告中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在新党章中讲的是不断革命的学说，这两者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是否可以从三个发展阶段来讲，就是说：列宁讲的是“不断革命”，毛主席讲的是“继续革命”，这就是发展？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基本含义一样，如果简单地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用“继续革命”来表达，那是不全面的。不能真正表达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不要扣字眼，这二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继续革命”更完整一些。在外文中这两个是一个字。

也有同志问：“不断革命”，是否是说党员从入党到死，既要做革命的动力，又要做革命的对象，不断地和自己的“私”字，和自己一切不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思想作斗争？

一个共产党员应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当然对，但如果你把毛主席不断革命的学说缩小的那么个范围，也不对。

当前还有一种论调，有的地方流行所谓“反复旧”，昨天简单地讲了一下。山东开始的。据我晓得的，北京一些学校、一些单位收到过十一月十七日青岛杨宝华同志的讲话，提出了“反复旧”问题。这个讲话，散布到各地方。福建、浙江、武汉、河南、兰州、重庆、成都，都散发了，错误地提出了“反复旧”问题。同中央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提的反复旧问题完全相反的。武汉说是“全面复旧”。甚至说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掌权”。因此，错误地讲“无产阶级要再夺权”，“二次革命”。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们把这种“再夺权”叫作“实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歪曲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实际上是反对林副主席的报告，反对“九大”的

方针。他们打着旗号，说什么他们是“继续革命”，这样来了解继续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建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危险，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即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党章总纲中有一段概括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了阐述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林付主席的报告回顾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引证了马克思一八五二年（1858年？）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所说的三条：“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从马克思这三条中，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的任务是消灭一切阶级。

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是1850年《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论述德国革命时提出的。当时德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同他们斗争中，提出要不断革命，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年，马克思在著名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又进一步分析了不断革命论的问题。同时马克思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著作中又提出这个问题。根据这个思想，马克思1852年又提出上述三条，这同不断革命有关。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和不断革命学说，在1905年反对社会民主党中又加以发挥了这一学说。当时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不断革命的学说，反对列宁对不断革命学说的阐述，提出同马克思、列宁完全相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否定工农联盟。

托洛茨基的这种错误思想传到中国，被托陈取消派，陈独秀接受，他们在中国贩卖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陈独秀从右的方面贩卖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瞿秋白从“左”的方面宣扬反动的不断革命论，就是把民主革命阶段同社会

主义革命阶段混为一谈,叫做一次革命论。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这种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他恢复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从理论上加以发展并在实践中解决。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要问:既然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阶段中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只有肯定这一点,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一八五二年所说的三条,其中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所以林副主席引用了这一段。我们从这一段中也了解,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确是当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左”倾机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恢复、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我们的新党章上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们要深刻地了解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的学说,就要研究它的丰富的具体的内容,不能仅仅从继续革命这四个字去扣问题。

马克思和列宁所讲的不不断革命论,主要是强调必须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在一八五〇年同一九〇五年那时候,还谈不到社会主义如何进行到共产主义的问题。

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学说,主要是讲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这一段,还要继续革命。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学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列宁说过,剥削阶级被推翻以后,在整个的历史时代,他们还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复辟的行动。而且从农民、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中,还会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苏维埃的职员中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个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九二八年,他在苏联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他批评当时流行的一些“自流论”,批评那种“我

们这里没有阶级，我们的敌人已经安静，我们这里一切都会如意”的理论。斯大林说，“以为我们已经没有阶级敌人了，他们已被打垮和肃清了，这是不对的。不，同志们，我们的阶级敌人还存在。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增长，企图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他在一九二八年的讲话是完全对的，那个时候他经常强调这一点。他的错误在哪里？错误在一九三六年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农村基本集体化，苏联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这种错误影响到苏联共产党，也影响世界一些共产党，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时，这问题更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为他们国家不存在阶级斗争。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根据苏联和俄国的实践经验，看到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同志们念毛主席语录，不是经常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吗？林副主席报告中，从头至尾贯串着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今后如何进行斗、批、改。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贡献，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的历史阶段中。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发展，还表现在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的学说。它表现在我们党 1958 年 12 月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这是毛主席思想的体现。决议中说：“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就是说，不能把民主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淆起来，也不能把社会主义阶段同共产主义阶段混淆起来，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进到共产主义阶段去。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伟大贡献，即指出我们要不断革命，又要有阶段地革命，我们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者。换句话说，就是有阶段的继承革命论者。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者。

毛主席的贡献不仅是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他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形式。这种革命的形式，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又在实践中创造了革命的形式，这是毛主席对不断革命论即继续革命论的又一个光辉贡献。

因此，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我想，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它的丰富的内容，而不要单纯地扣字眼。我只提这一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二个问题，关于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林副主席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一九三九年的黑《修养》，批判了他一九四九年的天津之行，指出他投到资本家的怀抱，也讲到他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叛变投敌，充当了内奸、工贼等的许多罪恶。有的同志问，在抗日战争以前，在白区工作时期，他还有哪些罪行？这个问题在十二中全会批准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已讲过了，还附有证据。这个文件，已经发给各单位，我想在座的同志们都看过。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讲了。

有的同志问：在林副主席的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同志们不大了解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刘少奇怎么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要求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四月，我和军队的同志谈过。现在再来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一下意见。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怕资本家操纵。”这就是说，刘少奇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的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生产力论，或者叫做唯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的水平，农村很分散、很落后，那么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

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

这种理论人们叫做“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让资本主义很好地发展。按这个理论，社会发展指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新社会制度就自然产生，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然到来；生产力不发展，革命阶级自觉革命没有用。这种“理论”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套“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革命作用，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水平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一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一种思想。一九零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书上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就是说，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就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了。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都一再重复这种论调。特别是一九三零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塞维主义》的书中，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污蔑说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说列宁犯了很大的错误，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按照俄国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书中，都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都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理论”，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看老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再看看刘少奇在北京、天津的言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了”。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从国际方面来说，他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一脉相承；从中国来说，他同陈独秀机会主义宣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脉相承。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与这种反动理论坚决作过斗争，彻底粉碎了这种反革命的论调。列宁强调说，强调指出，不是俄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恰恰相反，俄国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列宁反复地说：有布尔什维克党，有马克思主义领导，有广大的工农联盟，有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取得政策后一定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俄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上。大家为了批判刘少奇的生产力论，同时为了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妨看一看这篇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又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引了一句拿破仑的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关于批判刘少奇宣扬的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就提这样一些材料供同志们参考。

同刘少奇鼓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有关的，是他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和殖民政策，不但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占重要的位置，并且可以发展东方的文明。同志们可以翻翻刘少奇反动言论集，在第一本书上，有刘少奇一九二四

年六月写的一篇叫做《救护汉冶萍公司》的文章。汉冶萍公司主要是德国、日本投资办的，后来有美国的投资。刘少奇大声疾呼要“救护汉冶萍公司”。他在文章中说：“汉冶萍在东亚，它的存在比平常产业有更深几层的重要。它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按照刘少奇的说法，汉冶萍公司不但对我们中国经济重要，对东方发展物质文明也重要。他又说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担保此百余万人民之生计不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国各种游民土匪化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就是说，他认为，要通过帝国主义办工厂，把恐慌的流为土匪游民的中国人变为有职业的正当国民，这是帝国主义的责任。然后又讲：“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在他看来，中国人民的生和死，决定于帝国主义是否在中国办企业；中国是兴盛还是灭亡，也决定于帝国主义是否在中国办企业。同志们看看，这不是完全的汉奸“理论”吗？刘少奇为了挽救汉冶萍，竟大声疾呼，咒骂中国工人阶级，他诬蔑中国工人：“素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汉冶萍以前所受此中损失，实不堪言。”所以，照刘少奇看来，汉冶萍的垮台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道德心”，“没有维护帝国主义”的“道德心”。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工贼“理论”。所以我们说刘少奇是工贼。这是一九二四年。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一九二五年，他就向赵恒惕投降了。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又把武汉工人的枪交给了敌人。实际上他在安源时已经起着工贼的作用了。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刘少奇在天津教学人员座谈会上解答问题时说：“中东铁路是平等的，共同管理，利润平分。将来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开工厂，在两利之下也是可以允许的。”你们看，刘少奇主张，解放以后还要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开工厂。

所以，刘少奇当汉奸、当工贼、当叛徒不是偶然的。他在大革命初期，实际上就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解放后有一个电影，名字叫做《燎原》，是为刘少奇捧场的，是美化刘少奇在安源的活动的。实际上刘少奇在安源的那一套，从他当时的许多文章中看，那是挂着革命的招牌，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我只是举了他

的关于汉冶萍公司的一篇文章，同志们看看刘少奇反动言论集，他的许多文章，都暴露出他的汉奸、工贼真面目。

鼓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我们翻一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可以看到，1907年第二国际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伯恩斯坦等人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大肆鼓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德国斯图加特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机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说：“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任何时候都斥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发扬文化的作用。”还说：“社会主义力求使人类有可能利用全世界的生产力，力求引导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人民走向更高的文明，大会认为殖民思想按其本质来说乃是社会主义运动总的文明化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在听到这些谬论很奇怪，实际并不奇怪。现在苏修提倡“华沙条约国”经济互助，就是这种思想，苏修现在借口帮助不发达的国家，来实行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志们从报上可以看到苏修怎样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看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怎样实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他们完全是按照第二国际在殖民政策问题上的反动“理论”行事。我们可以叫它是新殖民主义。刘少奇的思想同新老修正主义者一模一样的。他就是想成为“红色买办”。

这些问题上就供给这么些材料。

第三个问题，学习林付主席报告第三部份“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有的同志不大清楚“七·二七”这一事件，要求解释一下，我认为这个要求很重要。

“七·二七”，即1968.7.27—7.28，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问题，开展斗、批、改，新阶段问题，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是有伟大意义的事。……

对他们的教育，（注：指蒯大富、聂元梓等各大学校头头。）从二十八日清晨三点半到上午八点半，整个进行了五个小时的教育。一边批评，一边爱护，一边关怀，提醒他们。那样的教育，过去我们在主席身边几十年还没见过。

主席的话他们没有完全传达，对他们不利的，他们不讲。我还记得，所谓“领袖”们刚进去，主席说：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这他们不传达。主席说：（略）……但也得到一个教训：即使主席这样教育，这些“领袖”们不是诚恳接受，相反，有些人还带抵触情绪，或辩解。或不发言，或沉闷，或抵触。对这些人千万注意，两面派，还谎报情况……蒯大富说学生“都被工人打出去，打到北航去了，”完全是假的。一面痛哭流涕，一面说假话。另一个方面也得到一个教训，知道犯错误不是可以一下子改的，主席的话不是一下子可以了解、接受，就去作的。……

第四，同志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报纸上讲过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那么，全面胜利是不是就是最后胜利？如果不是，两者有什么区别？

我不记得报上用过“全面胜利”没有，这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但它和林付主席报告说的最后胜利含义不同。所谓全面胜利，是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所谓最后胜利，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存在阶级斗争，继续革命问题。最后胜利就没有什么阶级了。这看法对不对，请同志们研究一下。

林付主席报告第五部分，标题就叫“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八个部分中这一部分最少。“九大”讨论时，许多同志提出这一部分太少了，和其它部分不大调和，是否合到“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部分去。林付主席和起草的同志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单独成立一部分好，因为这问题很重要。虽然文字比较短，但内容极为重要丰富，作为一部分好。

报告中这样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有的同志问，主席在哪次会上讲的呢？怎么没见过？的确不是会上讲的，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毛主席接见以巴卢库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讲的。当时巴卢库同志说：“现在只是一种可能性了，就是胜利，最后的胜利。”巴卢库同志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主席过去在同阿尔巴尼亚同志谈话中，曾经两次讲到文化大革命两种可能性的问题。我记得在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毛主席同谢胡同志谈话时，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走资

派胜利，我们失败；第二种可能是我们胜利，走资派失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到了一九六七年，经过了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经过了一月二十一日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经过了地方的夺权斗争，到一九六七年二月，阿尔巴尼亚卡博同志同巴卢库同志，又来访问。主席在和他们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两种可能。但是，主席这次谈话的提法同前一次不同了。主席说，第一种可能是我们胜利，走资派失败；第二种可能也还存在着，我们还可能失败。同志们看，在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主席讲第一个可能是我们失败。一九六七年二月主席讲第一个可能是我们胜利，但还存在着两种可能。

到了第三次谈话，就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巴卢库同志来参加国庆节，十月五日主席接见他，巴卢库说现在没有两种可能性了。巴卢库同志讲：“现在只是一种可能了，就是胜利，最后的胜利。”主席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是主席一九六八年十月讲的。从这里看到，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革命斗争的实践，一步一步深入分析的。主要的意思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我们不要忘掉剥削阶级的存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主席接着又说：“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列宁在 1919、1920、1921 年反复讲过这个问题。最尖锐的是 1920 年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我们有权利毫不夸大地说，我们胜利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另一个方面，不应当忘记，我们至多才获得一半的胜利。我们获得胜利，是因为我们能够抵挡住那些比我们强大并且同我国逃亡国外的剥削者地主资本家勾结的国家。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因为什么呢？“危险并没有消除，危险还存在，而且在革命

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前始终存在。”列宁继续讲，“同志们，但是我们的胜利永远不是完全的胜利，我们所获得的胜利还不到完全胜利的一半。”

一九二一年二月，列宁在全俄缝纫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他说：“资本是一种多么大的国际力量，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商店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工人阶级共同起来才有可能。”

主席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主席说，只有全世界胜利，整个人类消灭了剥削人的制度，整个人类才能解放。主席经常讲，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在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最后胜利就是消灭阶级。虽然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阶级斗争，阶级矛盾，说最后胜利，岂不否定了这个观点，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观点，使我们丧失警惕，麻痹起来了吗？

为什么从同志们提出问题中找出这么一个问题来谈谈？因为现在有曲解。这种曲解说：主席不能说最后胜利，因此“反复旧”的人完全否定三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歪曲主席的话，利用主席的马列主义的语言，破坏革命，否认成绩，把红色政权还认为是“资本主义”。当然一些工厂、学校，机关还存在些问题，工宣队，军宣队工作中有缺点，斗、批、改的任务还没完，这是一方面，但如果歪曲主席的话，全盘否定三年伟大成就，那是完全错误的，形式上“左”，实际才真是复旧的……。

二、研究资料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九大前后》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的最后口述回忆》摘录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 批判“二月逆流”

这件事首先得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一九六八年一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全会。会议对参加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他到会的陈毅等六人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联，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中共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

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简报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

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

全会在讨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己当代表不够资格。

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

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取有关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 张春桥：陈毅只会下棋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三野司令员，上海干部中有许多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毅十分爱戴；二是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亲率三野解放上海，接着出任上海首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享有崇高的威信。现在张春桥要想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简报，其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张春桥看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

张春桥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着，张春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

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 选陈毅为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春桥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后不到一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短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赶紧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准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

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份尖端材料！

“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搜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 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 1953 年至 1966 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份，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等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八十名上海“九大”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司’”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专案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心中有数。

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等人的材料。“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搜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清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绝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

1969年3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毅等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

大会开幕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份，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回答，“应该是肃清陈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 王洪文：请陈毅清算自己

1969年3月27日晚，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齐集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

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

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就让陈毅威风扫地，很是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发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咀脸”；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毅忙不迭的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身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 张春桥：让陈毅讲话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了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意犹未尽，仍然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几个争说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是听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大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批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由代表们又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一九五四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仍然兼任上海市市长，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共当了九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

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改正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四十多年来，自己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跟我咬耳朵，要我把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抛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他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交给了我，让我发言。

◇ 翻陈毅旧账

陈毅刚讲完话，我就抓过话筒，对陈毅的发言进行“消毒”。我说：“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说到这里，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啪”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难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关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简报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代表们这才晓得为自己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原来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我清了清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刚才的发言中胡说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己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后脑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情况的。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俯着额头。显然，刚才我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使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失去了领导中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增无已。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作过结论。陈毅自己也作过多次检查。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偏偏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

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呢？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作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陈毅，认为他的气焰已经完全被压倒了，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都散去了。

◇ 周恩来透过吴法宪传话

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我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次。

在吴法宪办公室等了十分钟左右，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我们逐一握手，然后座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我们频频点头：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

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和我们没能再整陈毅。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号

2008年10月15日初稿